外交风云（全5册）

见证战争世纪中
催生新秩序的大国角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外交风云（全5册）

见证战争世纪中
催生新秩序的大国角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总目录

-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第三版）
- 从蜜月走向对抗：冷战初期的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研究（1948～1953）
- 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
- 溃败之路：1904～1905年俄日战争
-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

（第三版）

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

牛 军 / 著

启微

1944年到1946年是20世纪的转折年代，
国际上冷战的疑云不断聚集，
国内国共两党关系处于从合作到破裂的紧张状态。
当此之时，美国政府先后派出的两任特使在调处国共关系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本书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的代表作，作者利用大量档案资料，深入剖析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及其走向失败的原因，从中可见国、共、美国、苏联四方的复杂互动，国际形势对国内政局的影响以及国内政治力量对国际形势的反作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牛军，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88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任教或从事研究工作。长期从事中国对外关系史、中美关系史、冷战史研究，曾应邀前往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里奥特国际关系学院、香港大学历史学系、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客座教授、高级客座研究员。专著《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和“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英文版由 Eastern Bridge 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专著《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获选 2011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英文版由 Brill 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另有专著《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2019 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中国外交决策研究》（日文版）2021 年由日本千仓书房出版。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

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

（第三版）

牛 军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序章 “伟大的美国梦想”
- 第一章 走进泥潭
  - 一 压蒋与联共
  - 二 史迪威与赫尔利
  - 三 赫尔利翻云覆雨
- 第二章 从独角戏到二重唱
  - 一 赫尔利的幻想
  - 二 不光彩的交易
  - 三 一个帝国主义者的逻辑
- 第三章 冲突的焦点
  - 一 危机四伏
  - 二 进军东北
  - 三 “外交接收”失败
- 第四章 难咽的苦果
  - 一 “最佳方案”
  - 二 马歇尔上任之后
  - 三 机会仍然存在
- 第五章 “无法在水上步行”
  - 一 和平昙花一现
  - 二 马歇尔与东北内战
  - 三 重蹈覆辙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 后记

序章 “伟大的美国梦想”

1944年至1946年是20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的年代。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年代中，发生了两个影响世界政治的重大进程。其一是世界进步力量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势力急剧没落，并最终被逐出历史舞台。其二是以美苏英中为主体的战时大同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迅速解体。那些在战争中新崛起的各种力量不断调整彼此的关系，它们之间各种形式的斗争此起彼伏，方兴未艾，并最终导致了战后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总而言之，旧的势力范围已经在二战的大炮轰鸣中土崩瓦解，新的国际格局正在动乱、纠纷与冲突中形成。

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历经四百年的殖民体系分崩离析，欧洲列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一蹶不振。曾经看上去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它苦心经营的“大东亚共荣圈”变成了埋葬大和武士的坟场。

另一方面，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衰落和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崩溃，在东亚地区有三支重要的力量迅速崛起。其一是美国。它借二战之机将其势力特别是军事力量扩展至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它凭借着独一无二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企图取代欧洲列强和日本，在东亚独占鳌头。其二是在地理上横跨欧亚的苏联。它在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迅速成为世界一流的军事大国，此时为了其地缘政治利益和其他诉求，毫不掩饰要在东亚发挥巨大影响的决心。第三种力量是亚洲的新兴民族解放运动。由于亚洲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战争结束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地兴起并汇合成为不可阻遏的浪潮。后来的历史证明，亚洲新兴民族解放运动的存在和蓬勃发展，使得任何在这一地区称霸的企图都是异想天开的。

东亚国际关系经常是以中国为中心展开的，战后东亚政治中的各种

矛盾在这个时期再次汇聚到中国。东亚各种力量的布局、演变和消长，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美国政府在这个时期两次积极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直接出面调处国共矛盾，主观上是基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的选择，以及罗斯福[1]、杜鲁门两届政府对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各种力量的分析和评价；客观上则取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赫尔利和马歇尔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相继赴华调处国共矛盾，正横跨这一关键性的历史时代。他们的言行特别深刻也特别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诸多方面。

总的看，美国调处国共矛盾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所包含的根本矛盾之一——实力与目标的差距——的产物。自从美国与西班牙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开始，美国十字军就扛着星条旗，自认为是“代表了最广泛的自由、最纯洁的基督教和最广泛的文明”，踏上了向西太平洋扩张的征途。由于对西班牙战争的胜利，美国夺取了西班牙在西太平洋和东亚的殖民地。在阿拉斯加、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等地树起的星条旗，标志着美国的势力范围从此延伸到东亚。以往在打开中国门户的过程中，美国不过是步欧洲列强之后尘，被史家戏称为别人在前边打开一道门，“美国人就跟着进去”。现在不同了，美国终于取得了进入东亚大陆，特别是进入中国的“踏脚板”和“发展对华贸易的基地”。1898年，曾任驻华公使的田贝声称：“全世界都把中国看成我们所出产的货物的大好市场。除了日本之外，我们比任何其他商业国家都接近这个市场。在我们面前有着灿烂的前景，它将使太平洋比起大西洋来对我们更显得重要。”美国一些政治家预言，“谁了解了中国，谁就能执今后五百年世界政治之牛耳”。美国一些经济家则把中国看成是销售美国剩余产品“最重要的市场”，他们声称“东亚是所有富有生气的国家抓住不放的俘获物”。

正当美国兴冲冲地准备跳上中国大陆大干一场时，却迎头碰上西方和东方的列强在中国掀起新一轮的割地狂潮。在这场弱肉强食的混战中，美国曾打算至少占领一个优良的中国港口，以便“能够从那里有力地主张我们（美国）的权利和有效地运用我们的影响”。然而，由于美西战争的纠缠，美国未能如愿以偿，它在中国取得一块势力范围的企望终成画饼，结果是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被称为“门户开放”的政策。这个政策标榜保全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实体的完整，但是实质上试图加以保护甚至扩展的，是美国在全中国的贸易和影响力。事实上，美国利用“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并几乎获得了其他列强用武力在中国勒索到的一切特权。

所以它被美国人称为“顺便搭车的帝国主义”“也有我一份的政策”。[2]

“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对华政策中诸多矛盾的产物，包括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国内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相互矛盾的主张，特别是美国在中国的目标与实力之间的巨大差距，等等。提出这项政策的目的，就是在美国无力参与瓜分狂潮的条件下，要从列强向中国勒索到的每一份贡品中，都能分一杯羹。不过就这一目标而言，美国从未如愿以偿。日俄战争结束后，美国被沙皇俄国和日本携手排斥在中国东北大门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又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朝夕之间便把美国苦心经营的所谓华盛顿体系搅得乱七八糟，支离破碎。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门眼看着就要被日本人关上了。美国当时面对日本在东亚咄咄逼人的扩张，除了不断起草和公布各种照会外，并不打算真的着手干些什么来遏制日本，或者说它还不具备真的干些什么的实力。直到十年后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挨了日本空军的炸弹，大批军舰被炸沉到海底，罗斯福政府才于手忙脚乱之中庄严地向日本宣战。

当日本飞机把炸弹投向珍珠港时，整个东亚局势便开始向着新的方向发展了。日本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改变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美日之间不战不和的沉闷局面，彻底粉碎了美国的一切动摇和幻想，促使美国罗斯福政府重新大幅度地调整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综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全部军事和外交实践，可以将其政策概括为：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取得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优越的战略安全地位，并保证美国工商业在这里有繁荣发展的前景。

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自己汇入世界反法西斯潮流，毫无疑义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美国历史上的空前义举，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为人类社会免遭法西斯主义的蹂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来说既是灾难，也是机会。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美国决策者在战争的火光硝烟之中，似乎已经看到了他们的前贤预言的“灿烂前景”。正是在重塑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欲望的驱动下，美国自决心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起，便不断左顾右盼。它在致力于粉碎“大东亚共荣圈”的同时，既要警惕所谓苏联影响力在战后“从亚洲东北部向外扩张”，又要觊觎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遗产，还要防止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的确，日本战败后，东亚地区不可能真的出现等着美国或其他大国

来填补的“权力真空”。美国要在这个地区取得支配地位，势必要与两股势力迎头相撞。首先是在战争中迅速崛起的苏联，它由于自身的利害关系，必定要在东亚地区发挥重要影响。苏联即使不向东扩展其势力范围，也不会漠视美国无限度地向西扩张。1943年春，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美国日益关注苏联对外政策的动向。罗斯福总统的重要助手舍伍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指出：“俄国在斯大林格勒取得的辉煌胜利，改变了整个战争的局面和瞩目可见的未来图景。由于这一仗，……俄国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出现了。……罗斯福已意识到，他现在必须把目光透过1943年的军事胜利而看到将来战后世界的真正事态。”[3]这反映了当时罗斯福政府内外一批政策制定者的看法。战后美苏很可能在东亚地区发生一场针锋相对的实力较量，美国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其次是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亚洲人民对殖民统治的痛恨日积月累，犹如蓄势欲发的火山。历时四个世纪之久的“白人帝国”如今已经危若累卵。

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积聚着远比欧洲战场复杂得多的矛盾。这里既有起着主导作用的进步人类与法西斯主义的矛盾，也有列强之间长期对殖民地的争夺，还存在亚洲人民反对一切外来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一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饱受殖民统治者的压迫，他们对一切不管是来自西方还是东方的殖民统治都深恶痛绝。美国高举着民主自由的大旗参加到反法西斯战争之中，面对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却忧心忡忡。战时曾任副国务卿的韦尔斯就说过：“虽然日本试图统治太平洋和亚洲的物质结果可以完全消除，但必须坦率地承认，精神的发展——远东人民中的民族主义的增长——却由于1942年的胜利而极大地加速。”如果西方列强不愿对旧时代形成的东亚国际关系做基本的调整，那么在东亚地区，“除了一个世纪的混乱和普遍的无政府外，很难预见其他的前景”。[4]

为了一举解决上述两个难题，美国于1943年初制定了一项新的对华政策。这项政策概括地说就是“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China be a great power）”。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赫尔在回忆录中坦言，美国曾经设想靠美英日之间达成协议来维持西太平洋的均势，但战争改变了那里的格局。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东方大国，将在很长时间里消失，因此唯一主要的大国将是中国。美国、英国和俄国也都是太平洋地区的大国，但每一方的重大利益都在别的地方。结果为了使远东稳定，不得不使中国参与任何达成的协议”。“如果中国也不行了，太平洋就不存在稳定的手

段了。”[5]显然，所谓“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就是要使中国成为支撑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的台柱子。罗斯福曾把美国执行这一政策可能获得的好处解释得一清二楚。1943年初，他告诉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中国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而将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6]罗斯福还向韦尔斯说明，他“感到承认中国居于四强的地位，将足以阻塞白人控制世界的攻讦的口实”，并且“一个稳定的中国，对苏联在远东的野心，将形成一道屏障，也可以当作一种最有价值的向心力，以限制亚洲革命暴乱的影响”。[7]可以这样说，“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的政策形成伊始，便着眼于战后统领东亚，限制苏联，并服从于美国长期以来争取影响和控制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企图。当然，强调罗斯福政府制定这个政策的着眼点包括对东亚战后秩序的设想，并不等于否认这个政策曾起到过加强和鼓舞中国抗战的政治和心理上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战争期间是重要的，也是巨大的。

“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是“门户开放”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也是“门户开放”政策得以产生的矛盾——目标与实力的巨大差距的产物。美国的“主要利益”不在东亚，它也没有能力同时兼顾欧亚两大洲。罗斯福政府对此有明确的判断，所以就需要一个符合美国标准的“统一强大的中国”，使之能发挥“片儿警”的作用，为美国照看好亚洲的领地。问题在于，当罗斯福等美国决策者们的头脑中形成“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的设想时，他们正面对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既不“统一”，也不“民主”，更谈不上“强大”的局面。然而，罗斯福宁愿相信他的特使居里编造的神话，即“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委员长（指蒋介石——引者注）”，肯定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人可以“完全信赖”蒋介石会按照美国的愿望，“推行一项有力的战争政策，并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和民主的强大国家”。罗斯福并非对神话和谎言缺乏洞察力的昏庸之辈，但他有时很可能需要它们来充实自己的想象，并说服别人追随他的政策，何况东亚对于美国远非生死攸关之地。因此，他宁愿睁一眼闭一眼地信口宣布：“中国在过去——约半个世纪以来，已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主国家之一。”[8]为了证明这种说法千真万确，罗斯福政府从提出“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开始，便不遗余力地着手在国际上把中国塑造成美国想象中的那种“强大国家”。

1943年1月，罗斯福政府宣布取消美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随后罗斯福通过批评史迪威，统一了美国军政首脑的意见。3月，他告诉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艾登，中国将与美英苏三大国站在一起，在国际事务中发

挥特殊作用。艾登立即表示，英国"不那么喜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跑上跑下的想法"。罗斯福郑重其事地宣布，"美国准备尽一切可能加强中国"，并且对丘吉尔未能在某次演讲中把中国排入大国行列"表示遗憾"。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为此尖酸地抱怨罗斯福政府是在用"收买无资格投票人，使他具有选民资格，来为自己投票出力的办法，瓦解不列颠的海外帝国"。[9]4月，时任美国总统特别顾问的霍普金斯告诉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宋子文，罗斯福认为"中美间此时已无须再非正式讨论原则，尽可与美方正式商谈远东各种实际问题，及中国对世界集团之意见"。[10]

1943年10月，美国军政首脑在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即将召开之时，开会讨论他们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罗斯福在会上强调，签署任何有关战后的协议，必须"包括中国"，"哪怕这个时候达不成协议也在所不惜"。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赫尔不断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施加压力，迫使苏方承认罗斯福政府给蒋介石的头衔。赫尔告诉莫洛托夫，美国打算鼓励中国继续战斗，并希望中苏两国"能以友好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他还在私下会晤中表示，美国不可能忽略中国，否则很可能"在太平洋地区发生最可怕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影响"，那样的话美国将不得不调整政策，以使"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保持适当的稳定"。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认为，赫尔的话是"明显地暗示，目前对俄国的援助，其中某些部分可能拨给蒋，除非允许中国签署四大国宣言"。[11]当莫洛托夫继续拒绝美方的建议时，赫尔竟以中断会议、空手而回相要挟，直到斯大林做出让步才罢手。为了使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能及时获准代表中国在会议拟定的宣言上签字，赫尔主动向傅秉常提供美国的电台。在美国的有力支持下，国民政府代表终于在莫斯科四国外长宣言上签字。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结束后，罗斯福政府既然已经迫使英国和苏联至少在形式上接受了它的政策，剩下的就是把蒋介石拉上战车了。11月22日至26日，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召开三国首脑会议。罗斯福一本正经地接待了蒋介石这个所谓"四强"大厦的第四块"基石"，蒋介石也煞有介事地与罗斯福谈论了东亚的未来，好像他们真的是在平起平坐地决定东亚的命运。在23日的会晤中，罗斯福告诉蒋介石："中国应该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订该机构的一切决定。"蒋介石对此"欣然地"接受。罗斯福和蒋介石一致同意，日本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领土，战后必须归还中国。他们强调："辽东半岛及其两个港口，即旅顺和大连必须包括在内。"罗斯福提

出，美中在战后应互相合作，反对“外来侵略”，美国应在太平洋地区保持足够的军队，以便有效地承担“责任”。蒋介石表示希望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使其“能履行国际义务”，并允许美国使用旅顺港。[12]此外，罗斯福和蒋介石还就美国援华、中苏边界和东亚其他国家的一系列问题等交换了意见。

通过开罗会议，罗斯福政府与国民政府确定了双方在东亚的战略合作关系。罗斯福终于在国际上实现了美国的政策目标，他相信开罗会议“不仅在今天和不久的将来取得成果，而且今后几十年也会产生效果”。蒋介石认为，开罗会议“以政治的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他通过宋美龄告诉罗斯福，他已“无法找到颇有意义的话来表达内心充满着的感激之情”。1943年圣诞节前夕，罗斯福发表致美国人民书，宣布美国和中国“在深厚的友谊和在统一的目的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密切”。美国国会同时宣布废除歧视华人的排华法律，以便进一步证明，美国“不仅视中国为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13]12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把开罗会议说成是“转移了世界人类的命运，重写了世界历史的新页”，“开罗会议的决策，乃是美国远东政策最鲜明的结晶，……代表了全人类的最大希望，也给予了全世界以无限光明”，而且“世界人类历史的新页是在开始编写了”。[14]

全面评价开罗会议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就像“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这个政策一样，它毕竟反映了中国人民英勇不屈、浴血奋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开罗会议及其发表的《开罗宣言》，无疑具有反法西斯的性质和积极意义，曾经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但当从回顾历史的角度观察罗斯福和蒋介石会谈的影响时，不能不指出它具有相当严重的性质。11月23日会谈的结果表明，罗斯福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把维护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同国民政府捆在一起，决心与国民政府建立包含某种排他性的准政治军事联盟。美蒋战略关系的确立刺激了罗斯福政府在东亚的胃口，驱使它更多地向国民政府投资，从而使美国在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方面，逐渐失去了选择余地。蒋介石则根据与美国结盟的性质确信，不论他需要什么，美国“都会照办”。许多年以后，美国战时驻华外交官戴维斯不无感慨地评论说：“美国几乎是在达到战时顶峰之际，在与国民党中国的关系方面被拴住了。”这绝不是事后诸葛亮。就在罗斯福兴致勃勃地在国际上宣扬所谓新的中国时，中国的现实已经把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部矛盾暴露

得淋漓尽致。

从1942年底至1943年初，盟军在军事上取得的辉煌胜利引起了世界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动，各种政治力量均感受到这种变动所产生的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法西斯势力惧之，反法西斯力量喜之，当然也有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国民党方面的反应是蒋介石出版了他的《中国之命运》。蒋介石在书中声称：“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中国今后的命运取决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国力之能否集中的一点之上”。他还指斥中共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是“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并宣布如果中共不放弃“武力割据的恶习”和荡涤“封建军阀的观念”，国民党一党统治“就一日不能终结”。[15]显然，《中国之命运》的主旨是奠定一种理论基础，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框定中国未来的命运。它是向中共和中国其他追求民主的力量发布的宣战书，具有为发动内战做思想和舆论准备的严重性质。《中国之命运》的问世表明，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该书所阐述的思想支配下，势必坚持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统治，并早晚要走上发动反共内战的道路。《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仅两个月，国民党便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掀起一阵攻击中共的宣传浪潮。与此同时，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频繁调动，使西北国共对峙的地区顿时出现剑拔弩张的气氛。整个1943年夏，国共关系又一次处于危机状态。

1943年夏发生的国共危机严重冲击了盟军在亚太地区的对日作战计划，并引起苏联方面的强烈反应，东亚国际政治局势为之震动。这次国共危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揭示了国共关系对东亚政治形势的复杂影响；它犹如一道催化剂，极大地加快了罗斯福政府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反应过程。

最早试图从战后的战略层次探讨美国在中国正面临的尴尬局面的，是以戴维斯和谢伟思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的美国驻华外交官，他们当时在美国国务院里被称为“中国通”。他们的战略性思考几乎与罗斯福提出的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的目标同步。当罗斯福决心让蒋介石成为大国俱乐部的名义会员时，那些“中国通”就开始观察并思考，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能否承担美国赋予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他们的探讨也开始于国共矛盾尖锐化的时刻。1943年夏的国共危机显现了国共矛盾涉及的诸多问题，这促使“中国通”们逐步把握到中国问题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他们

广阔的背景知识、丰富的实地考察经验和冷静深刻的分析力，确实使他们迅速抓住了美国在中国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中，美国驻华军政人员最关心的是中国能否在抗日战争中继续打下去。他们当时普遍认为，援助国民政府是维持中国战场的主要方式。但是，随着其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他们愈加不确定，国民政府是否有能力和能否有效地利用美国的援助来加强对日作战。他们提醒罗斯福政府，蒋介石及其政权的胃口是很难被满足的，不论美国增加多少援助，都不会被蒋介石认为是“实质性的”；在中国战场对日军发动任何攻势作战，都“必须由盟军提供外国军队承担”；美国能得到的唯一报偿，是国民党军队“占领敌人撤离的地区和巩固他人取得的进展”。他们还尖锐地指出，由于“国民党是保守的政治势力的集团，在国民党中存在着法西斯思想”，而美援会起到支持国民政府中的腐败分子的作用，因此他们建议罗斯福政府，应有意识地将美援作为制约蒋介石的手段。1942年8月，史迪威提出对蒋介石实行“讨价还价政策和压力政策”，既不是他个人好恶的产物，也不是他偶然冒出的想法，而是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对国民党政权保存实力政策的认识的间接反映，是他们对国民党消极抗战政策不满的表现。

1943年，随着亚太地区军事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内部国共矛盾的尖锐化，美国驻华外交官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开始达到新的深度。他们在给罗斯福政府的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因论据充实和论点深刻而引人注目。他们认为，美国在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1）国共矛盾不可避免地要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内战，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国民党由于其本性和弱点，很可能成为失败者；（2）国共斗争反映着东亚不同政治营垒之间的对立，必定会严重影响美苏在这一地区的关系，绝不可等闲视之；（3）面对中国现实，美国必须调整无条件的和片面的援蒋政策，否则美国在中国已经做出的“巨大努力”将有可能付之东流。当前最现实的途径，是首先与中共建立必要的联系，以便控制住中国的政治局势。总之，美国对华政策真的已经到了需要改弦易辙的关键时刻，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处理国共矛盾。

美国的“中国通”们的报告揭示了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症结，撬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石。合乎逻辑的问题是，一个既不愿意积极同日本侵略者打仗，又不统一，也不民主的国民党政权，能够成为战后东亚稳定的基础吗？罗斯福政府为什么在高举民主自由之大旗同德意日法西斯

作战之时，一定要对一个带有浓厚的封建法西斯色彩的政权如此垂青？美国在中国难道真的已经别无选择了吗？“中国通”们的报告的确比较客观和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内部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战后东亚各种政治力量的基本布局及其与中国局势，特别是与国共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此重要而又强烈的信号，势必引起美国决策者的重视。

时任副国务卿的韦尔斯后来写道，在1943年9月，罗斯福在与他谈话时，曾对国民政府的状况深表不满，认为国民政府“极端腐败”，“没有行政效率”，“对于广大中国人民的苦难漠不关心”。罗斯福表示特别担心“日本战败后，在中国又燃起内战战火。危险在于，苏联将插手支持共产党，西方世界也将被引诱或被迫为自己的利益而支持国民党”，那时就会出现“西班牙内战时所见到的形势，只是规模更大，更危险”。因此“战后中国是最可能造成麻烦的地方”。[16]赫尔也同样感到美国的援助如果没有国民政府的配合，不可能自行产生效果。可问题恰恰是国民政府贪污且无效率。如果国民政府像韦尔斯当时形容的那样，在内战和无政府状态中无限期地挣扎下去，那么美国在中国的一切努力最终只会被证明是枉费心机。

但是，既然罗斯福已经打定主意支持蒋介石，而且美国正在把军事援助大量地提供给国民政府，他当然不会轻易抛掉蒋介石政权这个想象中的能使列强在远东保持平衡的砝码。罗斯福很可能知道自己是在冒险。他曾这样告诉斯大林，他之所以坚持抬高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并非因为他不了解中国目前的软弱地位，而是他的目光更远地瞩望于未来”。[17]罗斯福为了看到他想象中的那个“未来”，决心要——作为美国走向巅峰时期的总统，他相信美国有这个能力——在对华政策上化险为夷。

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实际上是沿着两条思路同蒋介石打交道的。一条思路是确立美蒋之间的战略关系，把蒋介石同美国——也就是把美国同蒋介石——牢牢地拴在一起，以取得和巩固美国在东亚对其他大国的优势地位；另一条思路是迫使蒋介石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按照美国规定的指导方针，处理他在国际和国内面临的各种问题。

罗斯福与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就中国内部问题进行的讨论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但从罗斯福同他儿子的如下谈话中，可以大致窥见其基本想法。据小罗斯福回忆，他父亲当时说过，国民政府不是“具有现代意义

的民主政府”，国民党军队“根本没有打仗”。虽然蒋介石以军队没有训练和缺乏装备为自己辩解，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拒绝史迪威的军队改革计划，并以大批国民党军队包围“红色中国的边境”。不过，罗斯福对蒋介石尽管有诸多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因为他认为蒋介石夫妇固然“有许多缺点”，美国“却不得不依靠他们”。关于中共，罗斯福相信蒋介石指责其不抗日是撒谎，他充分了解“大部分中国海岸”控制在中共手中。基于此，为了解决国共之间的纠纷，罗斯福向蒋介石建议：“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他还提醒蒋介石，美国“不会陷入那里（中国）的任何内战的陷阱里”。[18]

继在国际上把中国抬到“四强”之一的位置上之后，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实际上也为中国的统一确定了一个模式。在他看来，蒋介石虽然有缺点，但没人能取代他；中国共产党人是愿意抗日的爱国者，而且控制着许多地方。罗斯福选择的路线是：维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通过民主的方式推动国共联合，在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统一。可以说一直到马歇尔调处失败为止，美国在解决中国内部问题方面，从未超出罗斯福设定的这个政策的逻辑。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因时局发展，时有起伏，时有曲折罢了。

罗斯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这条路线包含着不现实与现实两种成分。在1943年的最后一天，戴维斯在给罗斯福政府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蒋介石也许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中国人，他使多数美国人误认为他就是中国。”[19]这的确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不现实性所在。罗斯福政府自从提出“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后，它在中国就不仅是在支持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而且是在维持一个反对改革的政权。罗斯福政府为实现其政策目标所做的全部努力，同扶持蒋介石政权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问题恰恰在于，美国连维持“门户开放”的力量都没有，又怎么可能有能力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塑造成一个“强大国家”？而且由于美国把它在东亚的利益同国民党政权拴在一起，这就使它不能不对蒋介石产生某种程度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又反过来削弱美国控制蒋介石的能力。这确为罗斯福所始料不及。因此，罗斯福政府的政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不现实的政策。

不过也应该看到，罗斯福政府的政策中也包含着现实的成分。巩固蒋介石的地位是美蒋结盟的必然结果。美国增加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一方面是为了支持蒋介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中国内部的政治统一，

问题是罗斯福提出的政治统一的途径是组织一个国共联合政府。这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中共的力量，并愿意承认中国民主潮流的发展方向。因此，他不赞成蒋介石和国民党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主张国共两党通过政治谈判，进行民主联合。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始终强烈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这是罗斯福政府在对中国现实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共及其他一些民主的政治力量所做的妥协。特别是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罗斯福政府的这种行动对维护中国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当然，这种现实成分没有成为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主导方面。它受制约于美蒋战略联盟，即便在其对华政策陷入绝境之际，也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因此，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现出一个荒唐的特点，即罗斯福政府总是企图使中国的现实去符合、去适应其不现实的设想。

沿着罗斯福政府提出“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到开罗会议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脉络，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调处国共矛盾是罗斯福政府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从维护美蒋战略关系的稳定出发所采取的重要行动；它是实现所谓“伟大的美国梦想”的关键步骤，服从于美国战后对东亚国际秩序的战略规划。国共矛盾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1943年以后，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国共矛盾的尖锐化为起点，以直接介入国共斗争为归宿，这反映了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焦点和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解决国共问题，已成为罗斯福政府战时对华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后来的发展证明，那些战时的选择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和结局。

[1] 为方便阅读，本书所涉外文人名统一见文末“中英文人名对照表”，特殊情况除外。

[2]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刘维宁等译，北京出版社，1984，第25页。

[3] 〔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325~326页。

[4] Sumner Welles，*The Time for Decision*（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44），pp.297-299.

[5] 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Macmillan Co.，1948），pp.1586-1587.

[6]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中册，瞿同祖、赵曾玖译，商务印书馆，1976，第687页。

[7] Sumner Welles，*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New York：Harper，1950），p.186.

[8]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陈启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558页。

[9]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75，第504页。

[10]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第159～160页。

[11]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第264页。

[12] 本书编译组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447～451页。

[13]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第108页。

[14] 《中央日报五十年来社论选集》，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第31～35页。

[15]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明报社，1945，第116～121页。

[16] Sumner Welles，*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p.151.

[17] Roosevelt-Stalin Meeting，November 29，1943，2：45 p.m.，Roosevelt's Quarters，Soviet Embassy，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FRUS* hereafter），*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1943*（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1），p.532.

[18] Elliott Roosevelt，*As He Saw It*（New York：Duell，Sloan & Pearce，1946），pp.142，163-164，249，250.

[19] John Paton Davis，*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New York：Norton Press，1972），p.299.

第一章 走进泥潭

一 压蒋与联共

如果深入分析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向蒋介石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建议，可以确定其逻辑中包含两个基本前提：第一，罗斯福政府实际上认为中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美国既然将中国视为打败日本的盟国和战后亚太地区的支柱，那么无论是制定战时对华政策，还是规划美国对战后亚太秩序的战略方针，都必须了解中共的政策，掌握中共的动向，这是当时围绕中国展开的国际关系的一大新变化；第二，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判断，要解决中国的内部统一问题，特别是为了能集中力量对日作战，国民政府需要实行民主化的改革，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对中共做出必要的让步。上述两个前提是研究开罗会议后美国以调处的方式开始介入国共矛盾的两条基本线索。

上述两个前提的存在，决定了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在现实中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如果蒋介石拒绝在政治改革方面做出让步的话，美国该怎么办？罗斯福曾否定了美国将领们在军事问题上的有关建议，即将美国援助作为迫使蒋介石接受史迪威对中国军队拥有指挥权和落实缅甸战役的计划的手段。他告诉美国军事领导人，蒋介石能维持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实属不易，而美国“不能用对待摩洛哥的苏丹那样的办法，向他声色俱厉地说话或逼迫他做出承诺”。[1]后来的发展证明，他在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上也是如此，其结果将在之后的历史叙述中逐步予以展示。

1944年6月18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取道苏联塔什干到达重庆访问，掀开了美国调处国共矛盾的第一页。华莱士这次访华的目的比较复杂，甚至包括罗斯福为了选举需要，而将遭到民主党内部较多人反对的竞选搭档长时间送到国外的政治考虑。[2]不过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的角度看，华莱士此次访华的首要任务就是转达罗斯福政府的严重关切，敦促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妥善处理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这两个相互交织的

问题。在他即将访华之时，罗斯福非常明确地告诉他，如果蒋介石“愿意招请一位朋友”把国共两党代表“都请进同一个房间”坐下来解决问题，美国人将“很高兴地被请去充当敌对派系之间的仲裁人”。[3]

在华莱士出访重庆之前，蒋介石已经通过驻华盛顿的外交使节，大致掌握了罗斯福派华莱士访问重庆的主要意图。5月15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电告蒋介石，华莱士访华“似有意探讨于相当时期求一筹划中苏关系之道，以期避免远东及中共将来可能发生之纠纷”。[4]蒋介石很快复电魏道明，趁早打消华莱士的这个念头。[5]

从华莱士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的内容中可以看出，罗斯福显然更关心如何解决中国内部的国共矛盾。华莱士在与蒋介石会谈中，循循善诱地开导后者如何才能避免“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的命运”。他告诉蒋介石，罗斯福总统相信，国民政府摆脱当前政治危机的出路是实行政治改革，接受中共方面的合理建议，包括允许中共代表参加政府。在美国方面看来，中共不过是一个主张“实行土地改革的民主集团”，而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源是在“经济困难”，“统一必须通过全民福利来表现”。[6]但是，蒋介石除了表示敬佩华莱士在探讨农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方面“好学不倦”和“建设性的思考与目标”外，对美国插手国共关系并不感兴趣。蒋介石认为，罗斯福政府如果企图用要求国民党方面进行民主改革的方式插手国共矛盾，不仅会使中国抗战局势“动摇”，而且会使中共“更加嚣张”，以致“无法消弭赤化之祸害”。[7]

显然，尽管华莱士等在会谈中苦口婆心，蒋介石却根本不相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能治国民政府的心腹之患。美国人认为蒋介石缺乏现代民主意识，蒋介石则认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国情和民族心理。蒋声称中共“比俄国共产党人更加共产主义化”，它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使，企图“夺取”政权和“赤化”中国，而且中共在以往的谈判中“勒索过分，态度顽强”。除非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否则国民政府不排除“被迫予以军事制裁”的可能。如果罗斯福政府有意斡旋，最好先来调解中苏关系，或者将调解中苏关系和调处国共矛盾“同时进行，同时解决”，以便一揽子解除国民政府的“内顾”与“侧顾”之忧。否则，罗斯福政府对国共矛盾最好“暂转超然态度”，以免将来“啼笑皆非之苦”。[8]

从6月21日至24日，华莱士与蒋介石先后举行了六次会谈。除了双方同意向蒋介石身边派一位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来解决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纠纷外，华莱士在美国所关心的实质性问题上未能取得什么进

展。如果说还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蒋介石在美方一再敦促下，迫不得已才同意了驻华美军可以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员”。[9]为了敷衍华莱士，蒋介石还在6月23日向他转交了一份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代表林伯渠在西安谈判时提出的所谓“政治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包括20条内容，在之前的国共谈判中已经被中共中央否决了。[10]

继华莱士访华之后，罗斯福政府再次敦促国民政府改弦易辙的苦差事，落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的头上。在华莱士启程访华时，美国国务卿赫尔打电报给高斯，指示他必须向蒋介石说明，允许美军在中国战区与“中国人”进行军事合作，而且国民政府应该与中共领导人达成协议，撤销对中共控制地区的军事包围，以便国共双方的军队均可致力于对日作战。[11]

华莱士离华回国以后，高斯便与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向国民党方面说明，美国目前最关心的是“加强中国的统一战线”，罗斯福政府希望蒋介石能采取“有政治家风度的步骤”，进行民主改革和改善与中共的关系。8月30日，高斯进一步向蒋介石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即国民党如果不能在广泛的基础上解决国共争端，可行的办法是先成立一个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负责任的”战时内阁。[12]

在高斯费尽唇舌之后，蒋介石一如既往地拒绝任何进行民主改革的劝告。他嘲笑美国人根本“不懂中国的共产主义问题”，而且简直是在给国民政府制造麻烦。他声称正是由于美国人的某些行动，中共领导人正变得“越来越傲慢”。他还抱怨美国人总是对他喋喋不休，公平合理的办法是美国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其“服从”国民政府。[13]

美国领导人对蒋介石大为不满，认为他对美国政策的理解“令人失望的绝无进展”。罗斯福郑重其事地告诉在华盛顿访问的孔祥熙：“倘（中国）内部有纠纷发生，英、苏乘机而起，则美将无词以对。”[14]赫尔也指示高斯转告蒋介石，罗斯福总统和他本人均认为，高斯提出的组织联合内阁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等建议，“既合时宜又切实际”。只要蒋介石同意，高斯可以直接向中共领导人转达美国方面的这些建议，并且可以邀请史迪威等一同去向蒋介石说明。[15]

然而，尽管罗斯福政府一再做出努力，仍无法使蒋介石按美国指出的方向前进一步。蒋介石除了端出国民参政会来敷衍高斯，对美国直接插手国共矛盾仍然不置可否。显然，蒋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最有可能的

是他还没有从罗斯福政府中相中合适的人选。高斯绝望地报告罗斯福政府，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没有什么基本变化”，并表现出“没有任何真正……利用民主的概念”。高斯的看法是，蒋介石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样继续拖延时间只会对中共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国民政府将更加羸弱；另一方面，一旦苏军参加对日作战，他们就会与中共军队合作。此外，日军的失败也会使控制华北的中共军队获得“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地位”。[16]的确，面对如此紧迫和复杂多变的形势，罗斯福政府一筹莫展，不知道怎样才能使在日军的攻势下看上去已经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利用它剩下的“半个机会”振作起来，从而肩负起美国分配给它的责任。

罗斯福政府在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的同时，亦开始与中共建立联系。早在1942年5月下旬，周恩来在重庆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提出，希望美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和记者访问延安。他还托斯诺转信给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特使居里，表达中共愿意同美国合作抗日并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17]这期间，时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秘和史迪威司令部顾问的戴维斯曾三次与周恩来会见，询问是否可以与中共军队建立情报合作。周恩来的答复是建议美军派遣“一个军官小组”去陕西、山西等地建立“观察站”。[18]这之后，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些官员曾多次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美国政府应派遣官方代表访问延安，或者在那里设置官方机构。中共方面的邀请和美国驻华使馆官员的建议等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美国国务院的关注，不过这的确是后来罗斯福政府决定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的由来。

1944年1月25日，戴维斯再次上书美国政府，力陈尽快与中共建立联系之利害。他在报告中说：“我们需要在还能受到欢迎之际，立即派遣一个军事的和政治的观察团到中国共产党地区去搜集敌情，帮助并准备从该区发动某种有限度的作战，获取关于中共实力的精确估计，在设若俄国人攻击日本的时候，报告俄方在华北和满洲的作战情况，和估量华北和满洲发展成为一个分立的中国人的国家或甚至成为俄国卫星国的可能性。”[19]戴维斯提出上述建议的目的，显然不仅是考虑到对日作战的军事需要，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他“最关心的是中国正在到来的内战，苏联对它的利用”，以及美国“缺少对中共的第一手资料和联系”。[20]

戴维斯的报告由霍普金斯转呈罗斯福，这次终于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罗斯福立即指示美军领导人加以研究并采取行动，美国国务院也着

手与陆军部协商，如何派代表到延安去。高斯特别指出，应该派熟谙国共问题的谢伟思同往。2月9日，罗斯福通过盟军驻中缅印战区指挥官史迪威转告蒋介石，要求允许美军立刻向中国西北地区派遣代表团。至于为何突然采取这一行动，罗斯福仅向蒋介石说明了半个理由，即华北和东北是日军主要集结地区，美军非常需要那里的情报。[21]

蒋介石当然不会不理解罗斯福提出向中国西北地区派代表团的真实意图，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重大政治影响。既然罗斯福吞吞吐吐，他也不妨拐弯抹角。蒋介石在答复罗斯福的电报中说，美军可向中国西北地区派代表团，但仅限于在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地区或驻地”，国民党军队可以尽力提供所需的情报。[22]罗斯福碰了软钉子后，于3月直接提出美军需要向延安派军事代表的要求。这回他补充说，这样做还可以了解中苏在新疆发生冲突的形势。[23]蒋介石这回索性置之不理。直到华莱士访华时重提此案，蒋介石才被迫让步，同意向延安派遣一个美军观察组。

美军观察组由18人组成，分两批于7月22日和8月7日抵达延安。美军观察组是美国向华北地区打入的一个战略楔子。综观戴维斯等人建议的内容，美军观察组成员的构成，罗斯福政府为使之成行所做的不寻常的努力，以及中共中央对美军观察组表现出的高度重视和国民政府对它的高度提防，可以肯定地说，只要罗斯福政府愿意，它完全可以以美军观察组为战略支点，改变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然而结果恰如一位美国学者的评价：“迪克西使团在通常意义上是失败了，因为它处处居于落后地位。”[24]这里的所谓“落后地位”就是指它总是被放在历史进程的尾部——其原因不是形势发展得太快，就是美国决策者的理解太慢。

罗斯福决定派遣美军代表团访问延安，本来既有军事考虑，也有政治意图。但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却只能在军事方面发挥实际作用且极为有限。美军观察组在战时发挥的作用，同罗斯福政府为把它送到延安所做的努力不成正比。这是因为罗斯福努力把美军观察组推到历史的前沿后，又把它撇在历史大道的一边，他宁可相信连蒋介石姓“蒋”还是姓“石”都弄不清楚的“冒牌将军”赫尔利。结果美军观察组的一些成员尽管连篇累牍地提供着被历史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分析和建议，却难以从根本上影响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之际，驻华美军也迅速与中共军队建立起联系。驻华美军采取这种超出常规的行动，首先是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需要在华中建立情报通信网；美国战略情报小组需要获得美军准备在中国沿海登陆地区的情报资料；史迪威的中印缅战区指挥部需要了解一旦向华北的日军发动进攻，中共军队到底能提供哪些援助。这一切都需要与中共军队展开合作。从1944年夏开始，除了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外，在华北诸多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五师控制的地区和华南的东江纵队等，均有美军人员在积极活动。在收集日军情报、气象资料，勘察登陆场，了解中共军队在沿海地区分布情况，以及营救落难的美国飞行员等各方面，中共军队与美军的合作都是卓有成效的。[25]

8月18日，中共中央针对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发布指示，提出有必要建立和加强与驻华美军的军事合作，并争取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双方更多方面的合作关系。该指示指出："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了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和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可能实现，但目前不应希望过高"。[26]中共领导人当时考虑过，与美军合作有可能引起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但他们认为，这一可能的后果同所获政治和军事利益相比，与美军合作仍是利多而害少。因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军事上"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27]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与美军的合作，特别是配合美军在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军事行动，向有关部队发出了专门的指示，包括要求各有关部队改进参谋、情报和通信联络等方面的工作。如"增设战略情报机关，定为联络部"，作为同美军进行情报合作的机关；师级和小军区增设联络处或联络科，以便"与美军取得联系"。[28]

在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不断增进了解的基础上，驻华美军各单位多次提出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的计划。其中包括戴维斯提出的向连云港附近中共军队空投武器弹药的计划，美军战略情报小组提出的向中共军队提供训练和物资并建立情报网的计划，麦克罗少将提出的美军在山东沿海登陆时与中共军队合作的计划，等等。史迪威亦直接向蒋介石提出，向中共军队"提供五个师的装备和军火，并给予大炮支援"。这一建议得到罗斯福和美国陆军部的支持。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来华不久，也曾为"加强所有中国军队与美军的协调行动以对抗日军"，命令他的参谋人员拟定与中共军队合作的计划。[29]

10月下旬，中共领导人一度认为美军可能在杭州湾一带登陆，而且“时间可能很快”。中共领导人这时的基本判断是“美国可能在长江下游登陆，我们和他们合作”；美国在中国大陆上与日本作战，“那就不能不依靠中国大陆上的力量，那就不能不与我们合作，与我们合作就对我们有利”。[30]遂做相应的部署，命令有关部队向沪杭甬和华北指定地区挺进，在沿海加强游击战争，准备在美军登陆时配合作战并发动大城市的武装起义，包括夺取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等等。[31]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也认为，中共军队给予美国陆军的合作和实际协助的程度，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驻华美军与中共军队的合作持续到1945年初。后来由于赫尔利的阻挠，驻华美军与中共军队合作的努力付之东流，此后双方虽然保留着某些接触，但不过是一支序曲中断后留下的余音而已。

1944年夏，美国以压蒋联共的特殊方式介入国共斗争，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有密切关系。它既是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提出的方针在现实中合乎逻辑的延伸，也是开罗会议后围绕中国战场发生的一些严重事件猛烈冲击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结果。所以，研究开罗会议后中国战场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是解开美国以压蒋和联共开始调处之谜的钥匙。

大致是从1943年11月开始，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反攻，在西太平洋广阔的地区与日军展开了一场蔚为壮观的岛屿争夺战。美军凭借优势的海空军力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炫目的战果。随着美军在太平洋上节节推进，对日作战的战略问题逐步成为美军领导人议事日程中的首要问题。

1944年2～3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盟军领导人多次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对日战争的战略规划。在这些会议中，美军领导人一如既往地准备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登陆作战。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设想，美军最好能够攻占台湾，然后以该岛作为封锁日本和踏上中国大陆的跳板。他们当时对于利用中国军队配合对日作战，以及利用在中国耗资巨大的空军基地对日本发动大规模轰炸等，仍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罗斯福在会议期间重申了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基本国策之一，即“使中国打下去”。美军领导人也认为，西太平洋地区作战“当然与中国有关”。3月中旬，美陆军部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向负责在中国战场收集情报工作的梅乐斯发出通知，美军计划于当年12月在中国沿海实施登陆

作战，并要求梅乐斯迅速提供从上海到厦门之间各港口和登陆地区的情报，以及中国军队有可能在哪些方面采取配合行动。美军领导人认为有必要通知史迪威，命令他从与中国军队配合作战的角度，提出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最理想的地区。[32]

美军利用中国战场进攻日本的计划很快便被证明是难以付诸实施的。从4月开始，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攻势作战。这次战役的目的是在日本的海路交通由于美国海空军的进攻而日益困难的情况下，在中国开辟陆路运输通道，同时彻底扫荡在华东和华南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解除美空军借助中国大陆的基地对日本本土发动空中进攻的威胁。日军在此次号称“百年罕见的大远征”中，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战果。约30万国民党军队在面对日军的大规模攻击时，由于指挥失当以及很多部队士气不振，虽有一些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到战役后期，华东地区的美军机场几乎被一扫而空，衡阳、柳州和桂林等地的美军大型空军基地也相继被迫放弃。过去美军就对国民党军队是否有能力保卫这些空军基地心存疑虑，部分美军领导人担心从中国大陆对日本发动空袭会导致日军发动进攻，摧毁美军的机场，现在这个担心变成了事实。罗斯福政府的军政要员们均对国民党军队的表现大为失望，一向刻薄的美国媒体甚至说中国战场正变成盟军的“癌症”。

[33]中国正面战场一度出现的大溃败的确严重冲击了盟军的战略部署，并成为美国军政领导人的一块心病。特别令他们不能容忍的不仅是国民党军队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以及军队士气的萎靡不振，还有蒋介石在大难临头之际，仍然顽固地保存军事实力，让部分国民党军队继续为反共内战养精蓄锐的种种做法。蒋介石拒绝调动胡宗南所部的精锐之师向日军发动进攻，反而釜底抽薪，要求史迪威将正在缅甸同日军酣战的部分中国远征军调回国内，以拱卫昆明和重庆等。这些部队脱离史迪威的控制后，能否被用于对日作战，对美国来说是不得而知的。

中国正面战场出现大崩溃之颓势，美军长期筹划的对日军事战略受到猛烈冲击等因素，极大地加剧了美蒋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政府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根据军方的强烈建议，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尽快解决国共之间的纠纷，其目的首先就是使包括驻扎西北的胡宗南部在内的所有中国军队，都能够全力参加对日作战，从而保证美国既定的战略计划能够落实。同样，驻华美军恰在这个关头积极与中共军队建立联系，也是受到美国军事战略和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影响采取的行

动。当然，不少参与推动驻华美军与中共军队合作的“中国通”如谢伟思、戴维斯等的确希望以此为契机来推动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至少是不能再中断联系了。

正当日军在中国战场挥师疾进之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攻势也突飞猛进。美军继攻占吉尔伯特群岛之后，很快就从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对日军发动了全面反攻。特别是美军太平洋舰队依靠其强大的海空军优势力量，成功地运用“跳岛战术”，展开了大跃进式作战，从根本上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面貌。美军的猛烈攻击使日本苦心经营的太平洋防线的中心和南翼很快濒于崩溃。

6月16日，美军按预定计划在塞班岛登陆，经25天激战后占领该岛。经过塞班岛战役，美军一举打破了日军企图坚守的所谓“绝对国防圈”，从而切断了日本本土与加罗林群岛的联系。美国海空军直逼日本本土，冲绳岛已是兵临城下。塞班岛战役对中国战场在美军战略计划中的重要性也产生了潜在的影响，美国的B-29重型轰炸机已经可以凭借塞班岛的空军基地，直接空袭日本本土。换句话说，美军在中国建立的空军基地，有一部分已经可以被取代了，而且这个趋势还会随着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继续进攻而进一步发展。

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推进遥相呼应，史迪威指挥的中国远征军也开始向日军发动反攻。在中国远征军和美军的联合打击下，日军被迫放弃北缅防线，向南收缩兵力。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取得的胜利证明了史迪威长期坚持的观点，即经过改编的中国军队只要装备齐全、训练有素、指挥得当，就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当然也能够打败日军的精锐部队。不过问题在于，蒋介石绝对不允许别人插手国民党军队，纵使它比不上任何国家的军队。

盟军在缅甸的作战行动是当时亚洲大陆对日作战的焦点，其目的是开辟对华运输通道，以支持美国空军从中国发动对日本的空中攻击，以及在中国战场对日军发动反攻，配合美军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但是，血管眼看就要接通，肌体却在支离破碎。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溃退，以及华东、华南地区的美军机场被摧毁或放弃，发动缅甸战役简直成了舍本求末：一旦中国正面战场崩溃，美军的努力势必前功尽弃。美军方甚至评估“中国作战能力大致已不复成为在中国战场的一个有力因素”。[34]

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推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胜利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失败恰成鲜明对照，这不可避免地会严重影响美军领导人重新审议整个对日作战的战略。1944年9月，美英军事领导人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以协调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后的军事行动。会议期间，他们也讨论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进攻方向，以及为尽快迫使日本投降应选择的最佳军事战略。会议提出两条可供选择的进攻路线：其一是于1945年3月向台湾发动进攻，其二是于1945年2月全力攻占吕宋。会议还决定，如果苏联能早日参加对日战争，美军应避免在亚洲大陆实施代价高昂的登陆作战。[35]实际上在此次会议之前，罗斯福已经向在华盛顿访问的孔祥熙透露，美军很可能放弃攻占台湾的计划。[36]孔祥熙则向蒋介石报告说，他在美国了解到美国人的“心理”同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相比已有很大改变，他们对中国战场重要性的评估在下降。[37]

这时中国正面战场的危机已达到顶点，9月15日，史迪威几乎绝望地向马歇尔报告，“在华南，一切都完了”。他被迫决定放弃桂林的美国空军基地，而且“一旦日本兵出现在柳州，我们就得退出柳州”。[38]几乎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上将哈尔西率领的美国特混舰队在进攻莱特湾时，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两相对照，美军领导人遂于10月初做出最后决定，放弃在台湾或中国沿海登陆的方案，选择相继夺取琉球列岛和冲绳，在那里建立攻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当时正在华盛顿执行任务的麦瑞尔将军回到中国后告诉史迪威：美军扬言需要中国沿海的基地，主要是为了掩护其他计划，中国战场除了牵制日军外，发挥不了其他作用，美军已经无意在中国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39]

第二次魁北克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将会议决定通知斯大林。显然，美国对日作战计划的变化增加了与苏联合作的重要性。美国驻苏联军事代表团亦向斯大林提交了美军打算利用西伯利亚的海空军基地的计划。

10月14日，赴莫斯科访问的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向斯大林提出，美军希望了解苏军对日作战的具体打算。10月15日，斯大林在答复美方建议时承诺，苏军将在打败德国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届时将在中国东北对日军发动全面进攻，并准备进攻北平和张家口，以切断日军退向华北的通道。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向美国代表团具体解释了苏军作战计划和美苏在东亚协调军事行动等问题。[40]

苏联当时明确承诺参加对日作战，必定会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重大

影响。最显著也是争议较多的一例，是在1943年12月上旬召开的第二次开罗会议上，罗斯福自食其言，宣布取消在缅甸实施大规模海陆联合作战的计划。

在1943年11月底召开的第一次开罗会议期间，美英中三国首脑及其军事幕僚等详细讨论了三国军队配合夺取缅甸的计划。罗斯福当时很坚定地支持美国军方的意见，不顾英国的反对和拖延，决定尽快在南部缅甸地区向日军发动两栖进攻，以配合中国远征军发动的北缅战役。[41]

第一次开罗会议结束两天后，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会晤。斯大林正式表示，苏军在打败德国后将参加对日战争，并表示愿意考虑与美军在西伯利亚展开空军联合行动的计划。[42]斯大林采取这一行动显然有其战略考虑，它的意图不仅在于推动美英集中精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而且在客观上起着离间中美在东亚联盟的作用。这种作用几乎在德黑兰会议一结束便表现出来。

在第二次开罗会议上，丘吉尔和英军领导人一把抓住苏联保证参战这根稻草。他们争辩说，如果在缅甸南部实施两栖作战，就会影响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况且国民党军队能做出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美英不值得为打通滇缅公路消耗可贵的战争资源。美军方则坚持认为，盟军不在缅甸发动进攻，日军便会乘机进攻印度；如果中国军队得不到两栖作战的配合，则意味着缅甸战役不是失败，就是取消。双方在争论不休的情况下，决定由罗斯福和丘吉尔评判取舍。

罗斯福支持缅甸作战方案时，既考虑到当时作战的军事意义，也是为了长远的政治利益而为国民党政府打气。现在，他是在与几天前完全不同的气氛中重新衡量缅甸战役的得失，难免要改变初衷。12月5日，罗斯福决定接受英国的建议，放弃在南部缅甸实施两栖作战的计划。在开罗会议召开之前，罗斯福曾经告诉马歇尔，对于中国“最糟糕的是我们每次都遵守不了我们的诺言，我们连一次诺言都没有履行”，他对此表示“十分厌恶”。[43]这回罗斯福又把蒋介石晾在一边，而且没有再感到“十分厌恶”。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他对这样做可能产生的后果满不在乎。中国战场毕竟牵制着日军一半以上的师团，而且国民党政府也刚刚被美国确定为“四强”之一。

美军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美国海军部部长李海上将对罗斯福的决定表示悲观，认为美国“正进行可悲的冒险，蒋可能在战争中垮掉，

……如果中国完了，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在太平洋已经够呛的任务，将更为艰巨。日本大量的人力将转用于对付我们对日本本土的进攻”。[44]这种分析使罗斯福也紧张起来，第二天便询问史迪威，蒋介石“还能存在多久”。当听到史迪威关于“局势很严重”，再出现类似浙赣战役的局面，“蒋介石可能被推翻”的答复时，罗斯福表示美国必须找另外一批人“继续干下去”。[45]这句话听起来很有些认庙不认神的味道，它的确反映了罗斯福此时此刻极度忧虑的心境。但是，如果同罗斯福此前此后的言行相比较，任何过多的引申和附会都难以自圆其说。

应该指出，苏联将参加对日战争的保证和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突飞猛进的战果等，虽然都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但不足以抹杀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它们不过是导致美军放弃更充分利用中国战场向日军发动反攻的诸多原因中的一部分。事实表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长期奉行消极抗战、保存实力的政策，才是导致罗斯福政府中的军政要员越来越低估国民党军队和中国战场的作用的主要原因。国民党军队在1944年春之后的表现使美军领导人大失所望，亦在情理之中。

一些论著在评论1944年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时，比较多地强调美国军事战略的变化对美蒋关系的影响，认为“当美国力量未逮中太平洋之时（1943年6月以前），美国只恐维护中国战场之不力，当美国力量一及中太平洋之时，美国便唯恐回避中国战场之不速”。[46]罗斯福政府在军事上的确是急功近利的，而且也是唯利是图的。客观地看，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但罗斯福政府希望国民党政府发挥的作用不仅是拖住中国战场的100万日军。王邦宪先生所著《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一文，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统计，1945年1月至8月，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的经济援助为22650万美元，相当于1943年和1944年两年经济援助总额的3.7倍；罗斯福政府在同期给予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则相当于1943年和1944年两年军事援助总额的两倍。[47]这也许更能证明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否唯利是图。这里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战政策，的确导致了军事失败的悲惨结果并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如果说罗斯福政府的军事战略调整对当时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同美蒋关系相比，对美国与中共之间关系发展的影响更大。它实际上使美国与中共打交道时终于摆脱了对日作战的军事需要所带来的羁绊，为美国介入国共斗争提供了独特的条件。

冲击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另一起重大事件，是1944年春中苏关系

严重恶化。从16世纪80年代起，沙皇俄国开始向西伯利亚地区拓疆展界。到17世纪中叶，俄国领土伸展到中国黑龙江一带，从此开始中俄间的接触。沙皇政府对中国长期奉行扩张与侵略的政策，在中俄边界接壤地区遗留下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俄两国之间播下了不和与猜忌的种子。十月革命以后，苏俄政府曾经数次公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是，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中俄之间虽然多次谈判和交涉，却没有解决多少实际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苏两国之间仍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悬而未决，其中包括东北地区的主权与中东铁路的归属、外蒙古的地位、苏联对中国新疆地区的政策以及与盛世才政权的关系等。由于日军控制着华北并在东北建立了一个傀儡伪满洲国，中苏在东北和外蒙古的接触实际上被日军侵略势力隔断了，双方矛盾的焦点自然集中到新疆地区。

1933年，新疆发生反对金树仁统治的“四一二”政变，盛世才利用这次政变的机会，在新疆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为了维持在新疆割据称雄的局面，扯起“亲苏反帝”的旗帜，企图背靠苏联的扶持，借助外力抵抗国民政府的压力。他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为苏联向新疆渗透打开了方便之门。当时苏联通过向盛世才政权提供援助，取得了在新疆通商、采矿、派遣顾问乃至驻军等优越权益，并在新疆政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苏联在新疆的影响迅速扩大，引起国民政府的严重不安。尽管苏联领导人一再公开表示，苏联承认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苏联对新疆没有领土野心，可这听起来总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国民政府当时的担心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新疆在苏联的影响下，变成第二个外蒙古；其二是中共通过新疆地区加强同苏联的联系，获得苏联的援助。为了防止这两种危险发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直密切监视盛世才的动向，伺机重新控制新疆局势。皖南事变发生以后，胡宗南部队在巩固西部战线的同时，全力加强陕北陇东封锁线，从而形成了一条长3000里、宽500里的防线，目的是形成东援北围西堵的战略基地，既可以防止中共向南面国统区渗透，又能够严密监视盛世才的动向并向其施加压力。

苏德战争爆发后，西线的巨大压力使苏联一时无暇东顾。蒋介石利用国际形势变化提供的有利时机，加强了对盛世才的压力，试图一举解决新疆长期割据的局面。1942年8月，蒋介石视察西北地区，部署西北地区防务，推动解决新疆问题。蒋介石驻留兰州之时，派宋美龄前往迪

化“招安”，宣传以三民主义治理新疆，拉拢盛世才反苏反共。

盛世才当时看到苏联正陷于重重困难之中，遂再次投机，在蒋介石威逼利诱之下，决定投靠国民政府。双方商定，胡宗南部队进驻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一线，帮助盛世才防堵中共军队和苏军可能对新疆发动的联合进攻。军事部署完成之后，盛世才便公开宣布反苏反共。国民政府随即派遣干部和军队进入新疆，并迫使苏联撤回驻新疆的军队。从1943年5月4日起，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新疆的局势。会议决定采取措施推翻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代之以“忠于苏联的新疆原住民代表组成的政府”。[48]会议结束后，苏联陆续撤出驻新疆的军队和顾问，并撤退专家、技术人员以及援助新疆的工业设备等，并中断了与新疆的贸易。苏联在新疆的行动一时间给国民政府造成几乎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

新疆政局的动荡直接导致中国西北边境地区的不安宁。1943年秋，新疆阿山地区（今阿尔泰地区）哈萨克族酋长乌斯满率部进攻驻扎青河和乌河的中国守军。1944年春，中国政府军队向哥萨克军队发动反击。3月，中国守军在追击哥萨克军队时，多次遭到来自外蒙古的苏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49]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30日，苏联与日本签署渔业协定。国民政府立刻将此解读为苏日双方同意不参与针对对方的战争。国民政府还宣传说，苏联因与日本改善关系而撤出在西伯利亚地区的驻军，致使部分关东军得以入关参加“一号作战”。

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反苏宣传立即予以反击。4月2日，塔斯社发自乌兰巴托的电讯指责中国军队“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并用飞机扫射难民和居民。塔斯社的电讯还声称，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苏联将根据苏蒙互助条约，支持和援助外蒙古“保卫此共和国的领土与安全”。苏联驻华大使亦向国民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照会。

蒋介石当然清楚地知道他同苏联打交道有多少本钱，并一直担心在新疆反苏会招致报复。除非拉住美国做后盾，否则难操胜券。蒋介石吸引美国注意的手段便是宣传“苏联赤化中国”。

新疆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3月17日向罗斯福告急称，来自外蒙古的苏联飞机多次轰炸和扫射在新疆承化和奇台地区追击叛军的中国军

队；而且自2月以后，中共军队开始在陕北集结，准备夺取河防地区国民党军队的阵地，这显然是由于苏联与日本达成“某项之谅解”。[50]4月12日，蒋介石再次提醒罗斯福注意，中苏纠纷靠国民政府“自制”是无法解决的，美国对此必须明确表态。[51]他随后指示驻美大使魏道明向罗斯福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一贯政策”是“夺取中国政权”，并“使美、日在东方两败俱伤”，然后“其赤化远东、独霸世界之政策乃得如计实现”。[52]

4月30日，魏道明奉命会见了美国务卿赫尔。他在会见中阐述了国民政府对苏日签署渔业协定和苏联在新疆的行动的看法，认为苏联的这些行动“显示苏联远东政策实施之开端，与具体对欧扩张势力有同等意味”。[53]5月11日，魏道明拜见罗斯福时表示，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大政方针始终“协同一致，追随其后”，希望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合理要求与可能援助，甚至其能主张一切”。[54]蒋介石拉美反苏的外交行动严重恶化了东亚的国际气氛。从1944年春开始，国民政府与苏联的互相攻讦有增无减，双方的对立有日益尖锐的趋势。

如果说中国正面战场的溃败干扰了美国的军事战略，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则冲击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全部计划。能否得到苏联的合作，是罗斯福政府制订对日军事战略和处理战后亚太地区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关键之一。罗斯福始终认为，在战争时期同苏联和睦相处、发展合作关系是美国唯一的选择。同时，他也相信在二战结束后，苏联除了集中力量重建满目疮痍的家园，不大会有余力驰心旁骛。因此，他将争取合作作为美国处理对苏关系的主旨。罗斯福相信，依靠他个人的才干和美国的实力是能够协调美苏在各地区的关系的。从1943年夏开始，罗斯福政府已经感到有必要了解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意图，并积极寻求妥善处理双方在这个地区的关系的途径。

美国当时在东亚有求于苏联的两个问题，一是促使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二是争取苏联保证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推动苏联尽早参加对日战争对于美国的军事意义不言而喻，它既可以减少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牺牲，又可以早日结束战争，而其政治背景几乎凝聚了美日俄在东亚近半个世纪的纠纷。罗斯福政府当然不希望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在这—地区却出现对美国不利的局面。因此，促使苏联早日参加对日战争和协调美苏的对华政策，成为影响罗斯福政府战时对苏政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罗斯福政府曾要求苏联对日宣战，允许在西伯利亚地区建立美国空军基地，并共同向中国提供援助，但均被斯大林拒绝。直到1942年夏，苏联的态度才发生变化。1943年10月30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告诉来访的赫尔，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特别使赫尔兴奋的是，斯大林当时没有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提出任何条件。[55]在11月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苏联参战已经是罗斯福与斯大林讨论东亚问题的前提。1944年春，美国驻苏联军事代表团开始与苏联讨论在西伯利亚建立空军基地的具体问题。经过长期努力，美国好不容易获得苏联参战的保证，当然不能允许因中苏关系恶化和蒋介石推行反苏政策而遭到破坏。

争取苏联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罗斯福政府在亚太地区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苏联的地理位置和它在战争中已经显示的巨大实力，使它对亚太形势的影响力显而易见。而且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后，势必要对中国某些地区实行军事占领。到那时，苏联会因此成为决定国共斗争前景的关键力量之一。中国内部不统一的局面将肯定成为国民政府同苏联打交道时的根本弱点。因此，罗斯福政府除了促使苏联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外，还必须争取苏联在处理中国内部事务方面赞成美国的立场，承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包含在亚太地区取得优势地位和限制苏联的意图，但仅靠支持日渐衰弱的国民政府是不可能达到此项目的的。所以在中国问题上，罗斯福政府不得不争取同苏联达成妥协。罗斯福正是揣着解决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的目的，前往德黑兰会见斯大林的。他决心与斯大林做一笔交易，而且相信斯大林会同他一起“为实现民主与和平的世界而努力”。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告诉斯大林，美国“正在装备和训练30个中国师”，并准备“再搞同样的30个师”，而且中国“存在着一个展开攻势的前景”。罗斯福在解释美国对华政策时说：“毕竟中国是一个有四亿人民的国家，把他们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罗斯福显然很自信：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政府最终会实现稳定，而其军事实力将会不容忽视，因此斯大林一定会通情达理。罗斯福既然决心为美国寻求一个“朋友”，斯大林难道会为苏联找一个“潜在的麻烦”吗？斯大林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对罗斯福的意图洞若观火。他一开始便指出：“中国人仗打得很糟，……这是中国领导人的过错。”他向罗斯福表示，苏联同意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都应归还中国，不过“必须使中国人打仗”。当罗斯福谈到应当允许中国共产党人参

加政府时，斯大林表示了赞成。[56]斯大林虽然寥寥数语，但其传递的信息却相当明确。苏联支持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有条件的，国民政府只有积极抗战和实行民主改革，才能赢得声誉和苏联的承认。

斯大林有条件地承认国民政府的表态，加快了罗斯福政府介入国共矛盾的步伐。后来发生的新疆事件则使罗斯福政府进一步意识到，要改善国民政府和苏联的关系有多么棘手。特别是蒋介石把苏联在新疆的行动同中共生拉硬扯到一起，好像中国真的正在被苏联与中共里应外合地“赤化”，这更使罗斯福政府感到有必要尽快实现中国内部的统一。否则国民政府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美国就会失去与苏联讨价还价的筹码。

无独有偶，6月，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告诉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他从苏联记者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是，苏军参战后，势必要与控制华北战略要地的中共军队合作。由于担心这样做会引起同国民政府和美国的纠纷，苏联可能会拖延参战。显然，国共矛盾已成为改善中苏关系和推动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的重大障碍。如果中国内部问题不早日解决，美国战时和战后在东亚的利益难免会受到损害。

美国首先采取的措施是防止中苏纠纷扩大化。4月10日，罗斯福打电报告诉蒋介石，值此“同盟国间亟需团结以努力从事作战之时”，建议蒋介石采取现实的态度，“将此目前事件予以搁置”，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57]赫尔还通过中国驻美使馆特别提醒蒋介石注意，“直接的反苏宣传有可能损害盟国间的友好关系”，而且“只要目前国共紧张局势存在，苏联将继续表现出不愿扩大给予国民政府真正的政治和军事援助”。[58]罗斯福政府息事宁人的态度对抑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中苏纠纷的暂时平息并不等于问题已经解决。罗斯福政府决心通过解决中国内部统一问题，为改善中苏关系创造条件。

从更广阔的范围着眼，前述华莱士和高斯采取压蒋妥协的行动，可以说是罗斯福政府急于摆脱美国在中国面临的困局而迫不得已走出的一步棋，反映了罗斯福政府为协调美苏政策和改善中苏关系而创造条件的迫切心情。同样，美国向延安派遣观察组，在一些美国的“中国通”看来是为了拉住中共，防止其“投入苏联怀抱”。一旦美国达到此目的，其结果等于打掉苏联手中的王牌，堵塞住苏联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渠道。控制中共同在亚太地区取得对苏联的优势，对于罗斯福政府来说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向精明的罗斯福不会不向往这种令人满意的前

景。

既然压蒋与联共是罗斯福政府调处国共矛盾过程中最初的也是特殊的阶段，而1944年春开始日趋紧迫的中国战场的危机和中苏关系恶化又是罗斯福政府以这种方式直接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重要推力，那么随着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罗斯福政府也势必要调整其策略。这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当然是顺理成章的。

二 史迪威与赫尔利

华莱士和高斯与蒋介石的会谈表明，罗斯福政府调处国共矛盾的努力从一开始便陷入困境。恰在此时，中缅印战区的盟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的矛盾也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场冲突以史迪威大倒其霉而告终，其结果之一便是美国陆军少将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特使的身份登场，而且很快便取代了到期离任的高斯，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史迪威被调离中印缅战区导致罗斯福政府调处国共矛盾的政策出现波动，而赫尔利在其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唯有对史迪威被调离这一事件追根溯源，才能了解赫尔利参与调处国共矛盾的来龙去脉。

史迪威被调离中印缅战区的前因后果是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史中特别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台湾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把史迪威指挥中印缅战区期间采取的一些行动称为酿成中美战时合作的悲剧的“种子”，对国民政府的危害大得“不可以估计”。他们认为，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的根源是极其复杂的，包括双方对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地位权限之不同解释”“中国战区自始未受西方盟邦平等之待遇”，以及史迪威个性“恣睢乖张”“性情暴躁”，等等。[59]

蒋介石应该最明白，为什么他会同史迪威争论不休。他把引起双方争执的原因归结为谁该拥有美国援华物资的控制权和分配权，以及如何认识和利用中共军队抗日等问题。在蒋介石看来，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国民政府来控制和分配租借物资。其动机并不难理解，毕竟那是一笔巨大的军事资源，可以用来加强国民党军队的实力。问题是美国方面，特别是史迪威本人坚定地认为，蒋介石从来没有真正打算用美国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同日军作战，如果美国方面放弃了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就再也没有办法迫使国民党军队同日本人打仗了。利用美国援华物资作筹码，迫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按照美军的计划同日军作战，是美国军方一直试图运用的手段，当然，罗斯福本人对运用此法不时地表现出游移不定。[60]

同样，史迪威主张利用中共军队对日作战，甚至愿意向中共军队提供美国装备，也是为了尽快打败日本而全面开掘中国的战争资源。而蒋介石本来就对打日本人兴趣不大，况且中共军队一旦得到美国的武器装备，势必如虎添翼，严重威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史迪威与

蒋介石矛盾的症结是，史迪威在贯彻罗斯福政府的军事计划，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来推动国民党军队同日军打仗；蒋介石抱定的宗旨则是“以拖待变”，坚决保存实力，准备打他的“第三个战争”——内战，当下则是让美国人去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这既是美蒋战略利益分歧的基本点，也是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的起点。

当然问题也并不这么简单，仅仅是美蒋战略利益的分歧，尚不足以使史迪威落得被召回的结局。合乎逻辑的发展应该是，史迪威不断得到罗斯福政府不遗余力的支持，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史迪威自从到中国后，便一直受到华盛顿的掣肘，在改革国民党军队和对日作战的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一再两面碰壁。

1942年5月，盟军在保卫缅甸的战役中败北。雄心勃勃地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史迪威经此一役，痛感有必要给国民党军队动一次改革的大手术，才能使之成为真正能打击日军的力量。他认为国民党军队在缅甸失利的主要原因，包括“劣等装备”“军火不足”“运输工具不足”“无供应机构”“临时凑成的医疗服务”“愚蠢的指挥”“蒋介石的干涉”等。于是，史迪威下决心按照美军的标准，重新编练一支美式的中国“新军”。他回到重庆的第二天，在身患重病难以行走的情况下，仍如约会见了蒋介石，向他提出改革国民党军队的三项措施：第一，实行精兵政策，“少数可靠的、装备优良的、得到良好供应的师，会比把现时平均数增加一倍价值更大”；第二，清除不称职的高级指挥官，否则国民党“陆军会继续走下坡路”；第三，选择一能干之人全权指挥和控制参加缅甸战役的国民党军队，“不受任何人干涉”。[61]

史迪威的建议完全符合美军的意图，并得到了美军领导人的支持。他们认为，使国民党军队在目前的对日战争中尽可能发挥作用，固然是当务之急，不过国民党军队也只有通过同日本人打仗，才会强大起来，成为维护蒋介石统治地位的可靠力量。陆军部长史汀生后来曾不无遗憾地说：“如果蒋介石让史迪威执行他最初的计划，据此规模和方式训练中国军队，他一定会真正发现，在战争结束时他将拥有一支强大有力的军队，他的军事地位是毫无疑问的。”[62]

但是，史迪威这时提出这样的军队改革计划，只能表明他对蒋介石的本性缺乏认识。国民党政权带有浓厚的军阀色彩，保存实力可以说是这个政权的首要诉求之一。而保存实力，首先就是保存军事实力，军队则是核心。蒋介石知道，美国在对日战争中对他尚有所求，只要抓住军

队，就不怕美国鹅不在他的窝里下金蛋。蒋介石希望史迪威只是一位带着糖果和同情探望患者的友人，从来没有打算向他请教高明的诊断和药方。难怪史迪威百思不得其解地在日记中写道："为什么这个小笨蛋不了解他的希望在于实行整编三十个师的计划，建立一支单独的、有效的、装备优良而训练有素的军队呢？"[63]

史迪威终于明白，改革国民党军队不过是痴人说梦。于是1942年8月，他向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建议，罗斯福政府应该用租借物资同蒋介石讨价还价，否则美国在中国战场必定无所作为。史迪威的建议得到军方的支持。陆军部作战处在权衡利弊后亦认为："给予中国的租借物资不应看作慈善事业，而应以交换条件为基础，即在获得它们以前，中国先从事军事改革，而中国的军事成就为继续租借法案唯一可以接受的保证。"[64]

但是，罗斯福此时正瞩目他梦想中的那个有关中国和亚太地区的"更远的将来"。他已经相信他的助理居里等的判断，认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居里于7月上旬访问了重庆，同蒋介石多次长谈，向后者转达了罗斯福对华政策之要旨和美国援华计划的军事战略背景，包括史迪威关于改革中国军队和在缅甸发动第二次攻势的计划。蒋介石在会谈中抱怨美国援华物资之不力，乃至到了"一机赴华，亦感心疼"的吝啬程度。居里最后建议蒋介石制订一个采取军事行动的方案，以便与史迪威的军事设想协调起来，然后就可以将美国援助500架飞机和每月运送5000吨作战物资等要求囊括其中，蒋介石欣然接受了。[65]经居里回到华盛顿后积极游说，罗斯福终于答应向国民政府提供500架飞机，空运物资增加到每月5000吨。他告诉蒋介石，"今后必将在技术困难许可之下，尽速尽量以接济之"。[66]12月16日，罗斯福还告诉蒋介石，美国在战后"将确认中美英苏为世界上的四大警察"。[67]罗斯福的决定表明史迪威注定要倒霉了，而且事实上罗斯福当时已经动了将史迪威召回的念头，只不过被他的军事幕僚们劝阻了。[68]

果然，罗斯福不久便通过马歇尔斥责了史迪威提出的"讨价还价"政策，认为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称蒋介石是"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特别是"他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在全中国创造出我们要花两个世纪才能达到的局面，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工程"，所以美国人不应该"向他声色俱厉地说话或逼迫他做出承诺"。[69]

很难相信，罗斯福真的认为蒋介石确实完成了那样"伟大的工程"。

更为合理的解释是，他其实是在杀一儆百，借批评史迪威以统一美国军方的意见，给华盛顿那些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持批评和轻视态度的军方人士一些颜色看，不允许他们继续干扰他钦定的对华政策。

正当史迪威与蒋介石闹得不可开交时，美国驻华空军指挥官陈纳德提出一套不同凡响的空战计划。陈纳德在抗战爆发后，曾担任中国空军的顾问。1941年8月，蒋介石批准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陈担任队长，积极参与中国空军的培训和空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7月4号，罗斯福政府决定将美军志愿航空队纳入美军陆军正式编制，成为美军第十航空队的一部分，陈纳德担任该部队少将指挥官，统领美空军在华作战行动。10月，陈纳德交给正在重庆访问的罗斯福总统特使、美国共和党领导人一封信，请他转交给罗斯福。他在信中自命不凡地宣布："只要我拥有作为一个美国驻华军事指挥官的全部权力，我不仅能打垮日本，而且能使中国人变成美国持久的朋友。我相信，我能培植这种友谊，使中国世世代代成为一个大的友好的贸易市场。"他告诉罗斯福他的计划很简单，由105架新式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以及"在最后阶段（今后几个月内），再要几架重型轰炸机"组成空军，并保证得到30%的战斗机补充和20%的轰炸机补充，就可以在"六个月内，至多一年内"摧毁日本空军，然后"瓦解"日本。至于保卫机场，陈纳德认为只要有一定数量的美国空军的支援，国民党军队完全可以胜任。[70]1943年5月，他再次向罗斯福强调，这才是"征服日本之门"。蒋介石对陈纳德的空战计划赞赏备至，因为史迪威一直迫使国民党军队同日本人打仗，而陈纳德的计划却可以让美国空军为他打仗。他告诉罗斯福尽管放心，一旦日军企图从地面袭击空军基地，以阻止美军的空中攻势，现有的中国"陆军力量足资应付"。[71]

陈纳德的空战计划立即遭到美军领导人的强烈反对。马歇尔对日军不久前发动的浙赣战役记忆犹新。他提醒罗斯福注意，如果美军扩大在华的空中行动，必将招致日军从空中和地面的反击，保护美军的机场至关重要，而这个任务只能由国民党军队承担。因此，要发动大规模和持续的空中行动，就必须具备这样两个条件：第一，需要有训练有素和统一的中国军队，以便能承担保卫美军机场的重任；第二，只有打通缅甸到云南的交通线，才能保障美国空军在中国战场的供给。史迪威的态度更直截了当："如果没有什么东西需要空军去掩护，那么空军的掩护就分文不值了。"[72]1943年5月，马歇尔代表军方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空中进攻没有强有力的地面行动配合，"被刺激的日本人可能会扫荡在中国和

印度发起攻击的基地”。[73]这一预见被一年后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证明是正确的。

陈纳德计划之虚幻成分显而易见，罗斯福很可能是宁愿装作没看见。他告诉马歇尔，美国必须“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空中行动对中国的士气非常重要”。罗斯福一再强调，必须以“充分合作”的态度援助蒋介石，任何认为“支援中国盟友是不可能的态度，都是不能容忍的”。而且“蒋介石是国家和军队的领袖”，所以表达反对他的意见，“在心理上是困难的”。特别是在华盛顿游说的宋子文不断提出美国再不如何如何，“中国就拟单独同日本议和”，罗斯福“在心理上”就更困难了。[74]他决定让陈纳德去“击败日本”，何况陈纳德还夸下海口，说“可以使中国永远做我们的朋友”。罗斯福力排众议，明确指示有关部门，将每月运进中国的物资中的40%拨给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从1943年7月开始，每月运进中国的7000吨物资中，必须拨出5000吨供陈纳德调用。然后罗斯福兴冲冲地告诉蒋介石，他“充分相信，从战略观点来看，今年我们能做的首要事情之一，是从中国起飞飞机去打击敌人”。[75]罗斯福支持陈纳德的空战计划，与其说是出于战略考虑，不如说是出于政治需要而用美国的空中行动来贿赂蒋介石，促使他支持美国的亚太政策。

史迪威的确是在一条羊肠小道上艰难跋涉，对他的束缚不仅来自蒋介石，而且来自罗斯福。史迪威奉行的军事第一的原则与罗斯福的长远规划既有一致之处，又有分歧，而其分歧方面又往往干扰罗斯福钦定的大政方针，使罗斯福大为不满。当然，这并不是说史迪威对中国的政治问题所涉及的广阔领域缺乏理解。

1944年7月，史迪威曾这样写道，国共斗争继续存在的结果，将是战后中国立即发生内战，如果苏联参战，“红军自然将倾向俄国的影响和控制，这将直接影响中苏关系，同时间接地影响美苏关系”。如果美国不果断地采取行动，它“在中国的威望将经受严重的痛苦”，中国不会对目前的战争“做出任何贡献，并播下战后中国混乱的种子”。史迪威执拗地认为，国民政府只有通过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和同日本人作战，才能得到在战争结束时“保持稳定的手段”。[76]

但是，罗斯福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蒋介石尽管不愿意同日本人打仗，却表示愿意同美国“站在一道”，拥戴美国“负起领导责任”，甚至可以做到“违背我们自己的判断”来“支持美国的政策”。所以罗斯福无论如何都要“使委员长高兴”。史迪威的悲剧不仅是美蒋战略利益冲突的

产物，而且是美蒋战略联盟的结果。从罗斯福决心使“伟大的美国梦想”变成现实之日起，号称美国最优秀的陆军将领史迪威，就注定要成为美蒋政治联盟的牺牲品。

1944年夏，由于中国正面战场发生严重的危机和国民政府继续奉行保存实力的政策，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一度平静下来的冲突再次爆发，而且一发不可收拾。7月初，史迪威在答复马歇尔的一份电报中提出，挽救中国战场的唯一出路，是蒋介石给予他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调动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和中共军队，从山西向日军发动反攻。他要求美国政府必须以最强硬的语气说话，否则蒋介石肯定“说什么也不干”。[77]美军领导人立刻建议罗斯福，应就此问题向蒋介石明确表态，并批准提升史迪威为上将。[78]

在军方的强烈要求下，罗斯福终于下决心，要求蒋介石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授予史迪威，以便美国在中国战场力挽狂澜。7月7日，罗斯福打电报提醒蒋介石：“亚洲的未来以及美国在此区域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都处于危险之中。”除非授予史迪威指挥包括中共军队在内的一切中国军队的全权，否则“我们的共同事业将遭受严重挫折”；而且，除史迪威外，目前无人“有能力、力量和决心来抵消现时威胁中国的灾难”。[79]

面对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蒋介石认为应付办法不外三种：一是拒绝，二是接受，三是拖延。他的选择是“缓和处之”。“缓和”即拖延解决，但并非消极地拖住不办，而是设法找机会讨价还价，努力将事件导向对他有利的结局。首先，蒋介石在答复罗斯福的电报中提出，为解决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一步“应由罗斯福总统派一位熟悉政治以及军事问题并得到总统完全信任的”美国代表访问重庆，与他“共策进行”。用高斯的话说，蒋介石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一位“能向史迪威发号施令的总统私人代表”。[80]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限制史迪威的权力，还可以撇开史迪威，另辟更直接地向白宫施加影响的渠道。蒋介石成功了。7月15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他已经决定派一位私人代表到重庆去协助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只不过蒋介石需要“采取一切步骤，为史迪威将军能在最短期内取得统帅权一事，先做准备”。[81]

其次，蒋介石提出，解决军事问题必须满足他的政治条件，即中共必须服从国民政府的“行政和军事命令”，才能“处于史迪威的权力之下”，而他要拥有对与中共军队合作的否决权。[82]蒋介石在华莱士访华期间便在玩弄这种讨价还价的谋略，提出美国如果打算调动胡宗南部队

向日军反攻，必须以解决国共问题为先决条件。蒋介石此次故技重演，是企图利用美国急于要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机会，达到控制中共军队的目的。

最后，将国民党军队分为第一线兵团和第二线留守兵团。第一线兵团交史迪威指挥，编制和装备由美方负责，人事调动权仍由蒋介石控制，中共军队不列入史迪威统率范围。此方案为何应钦提出，获蒋介石同意，经修饰后拟成条文，由孔祥熙直接转呈罗斯福。[83]蒋介石的目的是一旦迫不得已接受美方的要求，还可以据此限制史迪威，使他能够指挥的部队除了云南的部队外，不过再加上薛岳和张发奎的几个师而已。

蒋介石的缓兵之计确实为他摆脱困境带来了转机，赫尔利使华便是这个转机的枢纽。8月10日，罗斯福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决定派遣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访问重庆。[84]蒋介石要求罗斯福派遣一位“具有政治远见和有能力的、有影响的个人代表”，目的是将“军事合作”置于“政治合作的基础上”；罗斯福则告诉蒋介石，赫尔利就是他心目中那位“有远见和政治能力的私人代表”，一定能够对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有很大的贡献”。[85]蒋介石所谓的“政治合作”，就是要美国与他合作解决军令和政令统一的问题。罗斯福对此表示“很能理解”，而且赫尔利和史迪威也充分了解蒋介石面临的政治问题。他还告诉蒋介石，准备免除史迪威在租借物资方面的“负担”。租借物资必须控制在美国人手中，史迪威可以不必过问，以免蒋介石为此不依不饶。罗斯福虽然也明确表示，“交由史迪威将军统率的军队，不应有限制。凡用以保卫中国和攻击日本的军队，均应由他指挥”，[86]但这在中国政治的现实中被证明不过是纸上谈兵，蒋介石对此并不会特别介意。罗斯福这样做未必是糊里糊涂钻进蒋介石的圈套，也有可能是顺水推舟。既然蒋介石坚持把解决“政治问题”作为“军事合作”的前提，美国又何妨以争取“军事合作”为契机，彻底解决中国内部的政治问题，关键是看赫尔利有没有这个本事了，而罗斯福和美国军方都对他颇有信心。

不管罗斯福政府打的什么主意，蒋介石反正把赫尔利使华当作他转守为攻的杠杆。一位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横插在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可以起到三种作用：或者使双方的关系“有效及和谐”，或者被利用来挟制史迪威，或者取史迪威而代之。因此，罗斯福决定派私人代表使华这个决定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史迪威的地位被削弱。更何况赫尔利虽然自

负，对中国政治和蒋介石与史迪威之争的症结等却缺乏基本的了解，而且他到重庆的时候，甚至都搞不清楚蒋介石到底姓“蒋”还是姓“石”。

蒋介石自赫尔利到重庆后，便开始在后者与史迪威之间“以夷制夷”。蒋介石此时已经确信，触犯史迪威并不一定会冒同美国决裂的风险，关键是拉住赫尔利。他在赫尔利身上显然很下了一些软功夫，以致赫尔利很快就相信，美蒋之间的全部分歧不过就是蒋介石不喜欢史迪威，而且仅此一点也不过是由两人性格差异引起的。难怪蒋介石打电报给罗斯福，把赫尔利吹得天花乱坠，说他“不仅异常谙达人情”，而且了解“问题之观点”，因而深得他本人的“完全信任”。[87]

蒋介石在拉拢赫尔利的同时，还不断为史迪威设置障碍。史迪威所要取得的军事指挥权包括调动指挥各战区国民党军队之权、对军队指挥官的任免赏罚之权、使用中共军队并为此向其提供军事装备之权等。特别是关于使用中共军队问题，史迪威坚持将其作为一项纯粹的军事性质的安排；如果将其同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结果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事实表明，史迪威亟盼获得的这些权力，无一不受到蒋介石的限制。经过旷日持久的电报往返和谈判，史迪威始终无法越雷池一步，而蒋介石却等到了摊牌的机会。

9月15日，蒋介石又一次向史迪威宣泄了一个半小时的不满情绪，然后要求他要么将尚在缅北作战的某部队南调，去进攻八莫；要么让在缅甸作战的卫立煌部队退过萨尔温江（中国称怒江），东返保卫昆明。蒋介石釜底抽薪的要挟使史迪威怒不可遏。他立即向马歇尔告急，声称美国在中国战场所做的—切努力都将因此付之东流，而且“关于指挥权问题的会谈拖沓毫无进展”，现在必须使蒋介石认识到，“再事拖延和无所行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88]

史迪威的报告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引起骚动。会议刚刚做出尽快收复全缅甸的决定，现在这个决定完全有可能因蒋介石自行其是而流产。9月16日，罗斯福签署了一份由军方起草的给蒋介石的电报，措辞激烈地教训蒋介石必须记住，只有立刻采取行动，才能保住他“多年来奋斗的成果”，以及美国为支援他所“做出的努力”。否则，“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都将因军事上的惨败而落空”，美国继续维持和增加援助也不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蒋介石必须准备接受这种“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89]同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将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制定的对日作战计划通告蒋介石。

史迪威信心满满地把罗斯福的电报看成塞进蒋介石嘴里的“辣椒粉”，以为靠这“有力的一拳”，一定会把蒋介石打垮。结果适得其反。很难设想蒋介石会不知道他向史迪威提出从缅甸撤回中国远征军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而罗斯福的电报终于成了他摊牌的借口。9月24日，蒋介石召见赫尔利，一本正经地宣布了三个“不能”：第一，三民主义是“立国主义”，“不能有所动摇”；第二，国家主权与尊严是“立国命脉”，“不能有所损伤”；第三，“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因此罗斯福政府必须将史迪威召回。不过他最后没有忘记补充一句，他本人和国民政府都保证会支持任何一位真正“富于友谊合作精神”的美国军人来担任中国战区的指挥官。[90]备忘录发出后，蒋介石尚嫌不足，随即指示孔祥熙在华盛顿加强游说，以防不测。

蒋介石的要求在华盛顿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一时间美国军政大员众说纷纭，罗斯福也举棋不定，唯有赫尔利果断地落井下石。他在与蒋介石会谈时，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史迪威身上，并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以便使罗斯福政府有台阶可下，也可能包括使他自己有台阶可上。10月10日，赫尔利向罗斯福转呈蒋介石的信和一份备忘录，并附上他的评论。他在评论中说：“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您告诉我您的目的就是阻止中国崩溃和使中国军队打下去。作为达到此目的计划的一部分，您决定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根据对此间形势的研究，我相信没有哪位中国领导人能够像蒋介石那样提供与您友好合作的基础。蒋介石与史迪威基本不能调和，现在您不得不在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做出选择。在您和蒋介石之间不存在其他争议。蒋介石同意您的每一请求，除了史迪威的任命之外。”[91]

电报发出后，赫尔利坐卧不宁，唯恐罗斯福犹豫不决，再生变故，以致威胁到他在重庆的地位。经过一夜“不成寐”之后，10月13日，赫尔利又向白宫发出一封长电。他在电报中危言耸听地提醒罗斯福：“如果在目前的争执中支持史迪威将军，您将失去蒋介石，并可能因此失去中国。”[92]赫尔利在这里大概说出了罗斯福实际上早晚都会做出的选择。诚如戴维斯所言，在罗斯福眼中，“蒋介石就是中国”，美国失去了蒋介石，就会随之“失去”中国。如果失去了史迪威，毕竟还有赫尔利。10月21日，“斧头”落到史迪威头上，他终于被撵出中国。[93]

史迪威被调离中印缅战区，标志着罗斯福政府的战时对华政策经历一次严重的失败。史迪威的积极支持者之一，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认

为，史迪威被召回表明，美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得到“可怕和悲惨的结局”。史迪威的另一位有力支持者马歇尔表示，他决心不再让任何一位美国将军去中国。因为事实表明，美国人不会得到“真诚的支持”。

但是，一位美国将军的命运毕竟不能同美国的战略利益相提并论；同罗斯福政府一厢情愿但此时仍然情有独钟的美蒋战略关系相比，史迪威去哪里指挥打仗的确是无足轻重的。何况罗斯福政府已经为支持蒋介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实际上就是一笔投资，为了得到加倍的报偿，就必须加以保护。撤换史迪威表明，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走上一条恶性循环的轨道。在这种恶性循环中，美国又开始一轮新的“巨大的努力”，这次肩负重任的是赫尔利。

三 赫尔利翻云覆雨

综观罗斯福政府解决有关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的过程，可以大致看出美方的思路是准备以解决国共政治分歧作为利用和装备中共军队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而这可以视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预设的陷阱，即起码可以阻止驻华美军直接与中共军队合作。史迪威本人曾向蒋介石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由他本人前往延安去见中共领导人，要求他们表示“正式承认蒋的政权”；二是美军会首先将更多的军事装备提供给国民党军队。史迪威的目的是解中国战场的燃眉之急。[94]赫尔利即使没有参与这个方案的制订，至少也是完全了解其内容的。

就中国政治和国共矛盾的层面分析，撤换史迪威也可以说为罗斯福政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以统一中国军队指挥权为契机，一举打破美国解决国共矛盾所面临的困境。罗斯福本人或许没有如此深入的思考，但可以确定赫尔利尽管对国共问题的了解和理解都惊人的肤浅，但对这种做法还是很有雄心的。如果同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联系起来，史迪威提出的这个当时没有被蒋介石接受，后来被赫尔利执行的方案至少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提出。首先如前所述，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这一点被赫尔利充分理解并铭刻心中。其次是增加在国共之间做交易的策略，赫尔利以军队统一促使国民政府在政治方面妥协，同时以蒋介石的政治让步钓出中共军队。不理解这种策略，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后来赫尔利在调处走入绝境时，竟频频回首，对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达成的“五点协议”留恋不已，一直认为它是“能够借以与共产党进行谈判的基础”，也是使中共同意交出军队的唯一文件。

罗斯福给赫尔利的正式命令是使史迪威更容易地取得指挥权，同时也包括与正为解决国共纠纷无出路而苦恼的高斯等保持密切的联系。美国国务院则进一步向赫尔利介绍了在解决国共问题上的进展和主要障碍，并明确要求他在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上支持和帮助高斯。[95]赫尔利在临行前曾走访欧洲司，要求得到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相关信息，并对他应采取何种政策提出建议。他在那里还透露，他将取道莫斯科赴华，并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谈。至少他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的安排均得到罗斯福的首肯。[96]

另一方面，赫尔利被选拔出来使华也因他在二战中的某些经历。赫

尔利作为一名共和党人，却在战争中一贯支持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多次受命奔走于政治纠纷丛生之地，又往往能施展出独到的手腕取得一些显著的效果，因此颇得罗斯福的赏识。1942年冬，赫尔利曾访问苏联，当时还被允许到前线走了一圈，成为第一个享此殊荣的美国将军。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召开之前，赫尔利曾受命为调解中苏关系访问重庆，与蒋介石相处融洽。罗斯福的信任、苏联方面的好感、蒋介石的垂青等因素加在一起，使赫尔利看上去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人选，在重庆可以左右逢源。

赫尔利从华盛顿启程后，一口气走完四大步骤，为参与国共谈判铺平了道路。他离美后首先访问了莫斯科。8月31日，他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两个人专门讨论了中苏关系和中国问题。根据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给国务院的报告，与赫尔利同行的纳尔逊告诉莫洛托夫，罗斯福主张积极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合作的目的，就是尽快打败日本，为此“美国政府必须支持蒋介石并使中国完全统一”。纳尔逊表示，希望就此问题了解苏联的看法。莫洛托夫在发言中抱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恩将仇报，不顾苏联曾经积极援华抗日，致使中苏关系“每况愈下”。他说苏联对中国内部事务不负任何责任，不应把苏联与中共“联系起来”；一些中国人“自称是共产党人”，不过是表达他们对经济状况不满而已，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莫洛托夫重申，苏联将欢迎美国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对罗斯福政府挑选“最优秀的人物”赫尔利去重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苏联“至感高兴”。[97]莫洛托夫的这番谈话使赫尔利断定他的使命不会受到来自苏联的干扰。

9月6日，赫尔利与纳尔逊到达重庆，他们第二天就会见了蒋介石。赫尔利在这次会见中立即告诉蒋介石：第一，罗斯福派遣他使华的宗旨是“维护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蒋介石对此则“频频点首，表示感谢”。第二，莫洛托夫声明苏联并不支持中共，并且非常希望能改善中苏关系。蒋介石当时虽然对此表示怀疑，但经赫尔利一再解释，竟然终于“相信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的代理人”。在这次会谈中，蒋介石不过是在敷衍赫尔利。赫尔利却声称他从中看到了统一中国的“前景”，蒋介石“表现出符合”罗斯福愿望的“明显趋势”。

9月12日，赫尔利起草了一份“十点建议”，供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了解他的使命和宗旨。十点建议的第一条就强调“中美合作首要目的是打

败日本和解放中国而实现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联合”。此外，除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陈词滥调如“集中在中国的所有资源”“提出目前和战后的经济计划”等之外，实质性内容反映在第二、第三、第五诸条中，包括改善中苏关系以支持国民政府，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一切军事力量”，支持蒋介石“在民主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政治统一”。建议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解决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98]国民党方面的答复一如既往。蒋介石表示，应将“十点建议”分为两个部分，前六项涉及中国政治的“可作为一个问题”，涉及史迪威指挥权的条款需要在“一个国际协议”中解决。宋子文则更直截了当，提出应将“在民主的基础上”一句从第五条中删除。[99]

赫尔利使华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使史迪威“容易实现”获得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但他在调解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的最后阶段，竟帮助蒋介石撵走了史迪威。对形势的判断固然是赫尔利决心帮助蒋介石赶走史迪威的重要因素，不过也不能排除个人的野心驱使。赫尔利来华前便觊觎驻华大使的职位，结果遭到国务院的拒绝。赫尔利到重庆后，显然没有放弃这种企图。当他感到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后，便认为如果继续支持史迪威一味蛮干下去，既不符合他所理解的罗斯福的初衷，也会使他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尤其是他自认为还肩负着全面贯彻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使命，这从“十点建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赫尔利显然不打算无功而返，于是他决定通过帮助罗斯福做出撤换史迪威的所谓“明智”的抉择，保住自己的地位。

赫尔利并没有就此为止，接下来，他一面帮助蒋介石赶走了史迪威；一面又用帮助赶走史迪威做本钱，同蒋介石做了一笔交易，换取蒋介石向他保证，将“承担责任与中共达成一项协议”。[100]在调解史蒋矛盾的同时，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安排，赫尔利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建立了联系。他数次会见了董必武和林伯渠等人，在会见中强调蒋介石的政治地位问题。他说蒋介石在中国还是一位举国公认的“抗日领袖”，而且在他看来蒋介石的态度已经有所改变。例如允许赫尔利与中共代表接触，允许他在必要的时候访问延安。赫尔利在会见中也承认“中国现政府不民主”，而中共军队“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所以，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国民政府的“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中共党员参加”，美国租借物资的分配也“绝不应偏于哪一党”。赫尔利还进一步提出了他对国共谈判程序的设想，可以首先由双方代表达成一个“初步的结果”，然后再由他到延安与毛泽东会谈，“求得合作的基础”，最后是“蒋毛见面”，共同“发表宣言，两党便合作起来了”。在军事

方面，他说美军将很快在中国沿海登陆，所以中国“不团结”将“妨碍军事行动”。[101]

赫尔利与中共代表的这些谈话在当时也不是虚伪之词，其内容既符合罗斯福政府当时对国民政府的状况和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估计，也符合罗斯福政府一个时期以来调处国共矛盾的基本方针，美国领导人的确有意通过以蒋介石为领导中心的民主方式来解决国共矛盾。赫尔利在“十点建议”第五条中明确写道，支持蒋介石“在民主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政治统一”，这反映了罗斯福政府打算在政治问题上促使蒋介石做出妥协的意向。赫尔利当时虽然接受了宋子文的意见，删掉“在民主的基础上”几个字，但不等于他同意改变罗斯福确定的原则。

经过会谈，赫尔利给中共代表的印象是“态度诚恳”。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共代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向赫尔利发出了访问延安的邀请，并向他提供了国共谈判的背景资料。中共中央这时同意赫尔利参与国共谈判，既符合中共中央的对美政策，也是基于对当时罗斯福政府调处国共矛盾政策的估计。毛泽东在董必武和林伯渠与赫尔利会谈的报告上的批语中写道，罗斯福政府由于担心蒋介石的地位不稳，“在许蒋存在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102]换言之，中共领导人当时认为，罗斯福政府调处国共矛盾是出于无奈，所以有可能用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作为条件，同中共做政治交易。

史迪威调离中国之际，赫尔利已全部完成了参与国共谈判的准备工作。他在了解双方的基本立场后，于10月28日提交一份被称为“五点建议”的草案，其内容是：“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实现国内军队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和解放中国；二、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的主席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三、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均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双方将采取各种政策，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四、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所有国内各政党，均予以平等、自由及合法的地位；五、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所有官兵不论属于中共军队还是政府军队，均将根据其等级，享受与政府军队同等待遇，其各单位军火和军需的分配，亦享受同等待遇。”[103]赫尔利曾将此方案给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看过，中共代表对其的看法用赫尔利的话说，这个方案是“相当无害的”。[104]

赫尔利的“五点建议”基本概括了他在“十点建议”有关部分提出的原

则和他在与中共代表会谈时阐述的观点。他提出这样的方案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好像一面声称维持蒋介石的统治是他使华的宗旨，一面又在实际上削弱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不过在美国人的观念中，并不存在这种矛盾，至少不是尖锐到不可调和。赫尔利至少在一开始与罗斯福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们相信只有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做出妥协，才能巩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

赫尔利的“五点建议”一定使蒋介石大吃一惊。蒋介石对军队问题从来都是最敏感的。在他的认知系统中，赫尔利这样解决军队统一，无异于承认国共双方地位平等。而泛泛地表达他为国家领袖，在中国政治现实中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并不足以维护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原则。他授意王世杰和张治中修改赫尔利的方案。经过修改的提案仍然保持着“五点建议”的形式，内容却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国民党方面修改后的“五点建议”是：“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105]

这里有必要详细指出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对赫尔利“五点建议”的一些改动。其中对赫尔利原草案第二点的改动是根本性的，即强调了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统一”原则，政治上也就无让步可言了；对第三点在“民主”之后加“程序”两字，这实际上是指坚持国民党的法统；第四点与第五点调换位置，将“平等、自由”两词删去，表明国民党方面对中国政治中长期争论的实质性问题的敏感，即在国民党一党统治下，就不可能有各党派的平等；原第五点变成第四点，增加了“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一句，其用心昭然若揭，就是要强调国民党方面取消中共军队的一贯立场。国民党方面修改后的“五点建议”与其说是一项供谈判的方案，不如说是一份阐述坚持国民党一党统治的下发文件。实际上这份文件也是经蒋介石本人亲笔修改的。[106]

这份经过修改的“五点建议”由宋子文于11月7日交到赫尔利手中，此时赫尔利即将乘飞机前往延安。[107]不论国民党方面是否蓄意选择这个时间，赫尔利此刻既不可能仔细比照提案的内容，也没有机会在重庆与中共代表磋商了。结果是他在延安第一次交给中共领导人的就是这个被改过的方案。[108]

11月7日，赫尔利乘飞机离开重庆，当天到达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事前并不知道赫尔利此行，获悉来者是美国驻华大使后，便驱车前往机场迎接。赫尔利在乘车前往窑洞的路上，突然表示对农民如何驱赶一头毛驴深感兴趣，并大呼小叫，这可能是为了营造一种更轻松的气氛，但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天，赫尔利开始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举行正式的谈判。他在发言一开始便声明，他来延安谈判是受总统罗斯福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另外他来延安也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他的任务是“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来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和“支持民主”。然后，他介绍了与蒋介石会谈的主要内容以及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主要就是承认中共有“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考虑“吸收”中共代表“参加军事委员会的问题”，以及“在公平的基础上成立统一机构，……中共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等等。他认为国共两党都是爱国的政党，蒋介石则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并且“真正希望中国统一自由与人民幸福”，而且也愿意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愿意吸收中共代表参加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随后他宣读了宋子文塞给他的那个提案，并说请中共领导人“考虑这个提纲作为谈判的基础”。毛泽东立即询问那个“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说是他起草的，不过国民政府方面“是同意的”。毛泽东则追问是“蒋或是赫的意见”。赫尔利后来终于承认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不过这“不是必须接受的，而是试验性的方案”，而他已经“尽力提出民主自由”，等等。在这次会谈中，赫尔利还声称蒋介石“表示愿与毛主席见面”。[109]

当天下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由毛泽东首先发言。他对赫尔利访问延安表示欢迎，然后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中国抗战形势、中国战场的特殊状况，以及中共中央的主张和政策。关于赫尔利带来的“五点建议”，毛泽东阐述了中共中央的原则立场，主要是政治改革和军事问题。他强调当前改变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结构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中国亟待解决的不是促进“民主程序”，而是“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的联合国民政府”，问题在于蒋介石想将政治改革拖到战后去解决，如此则只会“把危机拖长和扩大”。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共军队在敌后作战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共军队“准备配合盟军作战”。至于“五点建议”中关于整编中共军队的内容，毛泽东直接予以拒绝。他说“这一条主要的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应被整编的是那些“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中共军队。中共不能接受提案的第二条，应该在“命令”两个字前面加上“一切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民主”等限制词。赫尔利当时提出，这是限制政府权力。毛泽东反驳说，对于国民政府的命令，中共确实不能服从，一切抗日军队都应服从联合国民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命令。至于同等待遇问题，毛泽东嘲笑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每月薪金只够“支付一包美国雪茄”。中共军队不会要求与士兵收入微薄、疲弱不堪的国民党军队“享受”同等待遇，因为那样做的话，中共军队的战士会像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一样，“虚弱得不能行走”。

毛泽东发言之后，赫尔利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激烈的辩护，他把国民政府的腐败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归因于在缅甸战役的巨大消耗。他甚至指责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批判“有重复敌人所说的地方”，而这是“不公平的”。赫尔利大概已经忘记了，他的辩护词不过是在重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过的话。毛泽东的反驳也非常尖锐，他说他只是重复了“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话”。中方的记录在这里标明了毛泽东的口吻是“严肃和沉重的”，可见他对赫尔利的话反应强烈。

毛泽东在会谈中严厉批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有两个原因。其一，赫尔利提交的“五点建议”完全反映了国民党方面的立场，如不予以彻底的反驳，赫尔利将无法了解国共之间的症结所在。其二，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判断罗斯福政府介入国共之争的出发点是急于维护和巩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政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尖锐地谴责蒋介石，有可能迫使赫尔利在政治问题上做出让步。事实上，当赫尔利了解到，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批评并不意味着中共不会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后，他立刻提出毛泽东与蒋介石举行一次“伟大的会见”，声称那肯定会“解决许多困难”。毛泽东答复说“很愿意会见”蒋介石，“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至此赫尔利“突然高兴起来”，他说“现在我们有一致的意见了”。

在随后的谈判中，中共领导人就“五点建议”逐条提出了修改意见，而赫尔利几乎同意了所有主要的修改。讨论中花时间长一些的是在军队问题上，分歧点表面是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实质是国共之间长期争论的中共军队问题。双方最后达成的协议是，毛泽东提出，“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这一表述的逻辑是，首先将国民党一党政府改组为各党派的联合政府，然后中共军队可以服从联合政府的指挥。赫尔利立即表示“完全赞成”。[110]

经过严肃的谈判，中共领导人与赫尔利达成“五点协议”，并由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五点协议”的内容包括：“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111]

11月10日，毛泽东与赫尔利签署了“五点协议”草案，留下一栏供蒋介石签字。比较中共签署的“五点协议”与赫尔利带来的经国民党方面修改的“五点建议”的内容，很容易发现其中修改的内容是实质性的，反映了国共分歧仍然是针锋相对，冰炭难容。新“五点协议”的前提是国共两党地位平等，核心内容则是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这可以说是一项彻底的政治改革纲领。由于“五点协议”包含了中共中央一个时期以来所主张的立场和原则，毛泽东于签字的当天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请赫尔利代为转达。他在信中说，通过同赫尔利谈判后签订了这个“五点协议”，其精神“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之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112]

同毛泽东签署“五点协议”后，赫尔利曾向中共领导人表示，他“经过考虑”后认为，“五点协议”的条款都是公平合理的。[113]特别是中共领导人表示继续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更使他感到满意和放心，并相信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赫尔利在离开延安时向罗斯福发出一份电报，他告诉总统“五点协议”中“几乎所有的基本原则都是我们的”。[114]他到重庆后甚至告诉戴维斯，如果谈判破裂的话，那么责任将在国民党方面。[115]赫尔利的这种表示当时未必不是真心实意的。因为一方面，赫尔利作为一位从美国政治中浸淫出来的政客，他相信采取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不仅不会损害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利益，而且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加强他们的地位。美国政府曾经依靠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度过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并使国家走向了繁荣。美国领导人从来都认为，他们的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中国也不例外。另一方面，赫尔利非常可能并不了解国共矛盾的历史、复杂性和实质，实际上当时没有哪个在中国的美国人能够理解。所以，他对两个方案所包含的国共两党的根本分歧，缺乏必要的理解。

11月10日，赫尔利携“五点协议”回到重庆。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与赫尔利同行，以便与国民党进一步谈判。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重庆，当然是在表达对此次谈判的重视，不过他们更倾向认为赫尔利签署这样的协议是由于对国共问题的无知，就像他带着国民党修改过的建议来延安而对其中的陷阱懵然不觉是一样的。所以，中共中央对这次谈判能否取得成果是相当谨慎的。

果然，当赫尔利把“五点协议”交给宋子文后，蒋介石和国民党要人立刻一致强烈表示反对。宋子文声称，赫尔利拿到一张空额“账单”，而国民党永远不会接受中共的要求。蒋介石告诉赫尔利，他不愿造成类似南斯拉夫和波兰那种局面，这个“五点协议”在美国和英国或许可以作为解决同类争端的办法而被接受，但在中国，则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而他在没有承认国民政府被彻底击败之前，是决不会同意组织联合政府的。[116]显然，蒋介石深知国民党政权有多么脆弱，他根本不敢冒此风险。

至此，赫尔利在调处中终于撞上了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必然要带来的矛盾。他最初的反应是对国民党方面的态度不以为然。11月13日，赫尔利约见了周恩来。他告诉周，因为从延安回到重庆后生病一天，还没有见过蒋介石，只是向王世杰和张治中等人介绍了“五点协议”的内容。

赫尔利认为国民党方面的不满主要是针对有关中共军队的条款，而且他们建议不要公开此文件，以及最好不要上报罗斯福。赫尔利表示他非常不赞成国民党方面缺乏谈判诚意的态度，而中共“是民主的，他们是愿团结的”，并且“五点协议”已经上报罗斯福。不过他肯定意识到了国民党方面将不会接受“五点协议”，所以一再直接或间接地要求周恩来必须对协议内容保密。他甚至说：“我们要保证不向外发表，我与你与毛主席站在一起，以便斗他们。”他似乎认为只要能与蒋介石当面会谈，就会解决国民党方面的问题，因为“蒋是想好的，下边的人是坏的”。[117]

11月15日和17日，国民党方面两次向赫尔利提交了反建议案。赫尔利均表示不满意并予以拒绝，他认为国民党代表的所有指责中，唯一有价值的是关于联合政府的名称问题，只要把“联合”改为“两党”和“多党”就可以了。[118]16日，他在打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蒋介石等“不能证明他的观点是对的”，而他本人“正不断与委员长和他的助手磋商，可能会使他们认识到，与共产党达成合理协议是必要的”。[119]

罗斯福复电指示赫尔利继续施加压力，同时复信毛泽东，表示为反对双方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余期望与所有（一切）中国力量多的强有力的合作”。[120]面对美方的各种压力，蒋介石却无动于衷。他通过解决史迪威问题，已完全了解赫尔利手里有几张底牌，知道罗斯福政府其实无论如何也不会抛弃他的。赫尔利实际上已面临曾经使史迪威翻车的类似局面，不过对于他来说，上次是在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做出选择，这回却是在国共之间决定取舍。赫尔利当然不愿步史迪威之后尘，他从延安回到重庆后，在第一次会见国民党代表时就表达过类似的担心，说过“你们不要将来连我也赶出去”。[121]这表明他是清楚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尖锐对立将是何种结局，因此他没再多费踌躇，便决定背信弃义了。

11月19日和21日，赫尔利分别会见了蒋介石和国民党谈判代表。他提出了解决作为谈判最大障碍的军事问题的办法，即可以由美军指挥官来指挥国共的军队，并向中共军队提供装备；他同时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建议，将“五点建议”中的组织“联合政府”改为允许中共代表参加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赫尔利从此大倒退，彻底背叛了他曾经签字同意并认为是公平合理的“五点协议”。在这些会谈的基础上，赫尔利同意向周恩来转交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三点反建议”案。其内容是：“一、国民政府，因欲有效完成所有国内武力之统一与集中，俾能从速战胜日本，且

对中国之战后复兴，寄其厚望，故愿将中国共产党之武力，于改编后收为国军之一部分，此后该共产党武力，在薪饷、津贴、军火及其他配备方面，即取得与其他部队之同样待遇，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二、中国共产党应在抗战建国方面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经由军事委员会将其所有部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国共产党之高级军官中，遴员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愿遵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并经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并愿采取政策，以策进步而促进政府之民主程序。兹依‘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权利，予以保障。各该自由权利，仅受抗战期间军事安全需要之限制。”[122]

“三点反建议”显然仍是国民党的老调重弹，与前两次提出而被赫尔利否定的两个提案相比，唯一不同之处是添加了中共交出军队之后，可由国民政府“遴选”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参加军事委员会的内容。这显然体现了赫尔利与蒋介石会谈的意图。至于美军的指挥权问题，则由赫尔利直接向周恩来提出。

11月21日，赫尔利在结束与蒋介石等会谈之后会见了周恩来。他向周恩来转达了国民党“三点反建议”的内容，以及他提出的由美军担任国共军队的指挥官和向中共军队提供装备的建议，并介绍了会谈的内容。至关重要的是，赫尔利在会谈中蓄意曲解他已经签字的“五点协议”的精髓。他说“五点协议”中“最重要者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及参加决策机关”，而组织联合政府变成了中共向国民政府“插进一只脚趾”。当周恩来问到蒋介石对联合政府的态度时，赫尔利竟然说联合政府“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他还以“原不知实际情形”为由，不承认自己赞成“五点协议”的全部条款。周恩来当即指出无法接受国民党的反建议，因为第一，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徒有虚名，并无实权，而且从不开会，冯玉祥、李济深便是先例；第二，中共代表只参加军事委员会而不参加政府，“仍不能参加决策”。赫尔利对此的解释是蒋介石对此均有承诺，只是不愿写在纸上。赫尔利遂建议，或者周恩来请示延安后再回复，或者周恩来直接带上王世杰、张治中到延安去谈判，而他“老了”就不去了。[123]

周恩来在当天请示中共中央后再次会见了赫尔利，其间商定第二天周恩来会见国民党代表，不过只谈原则问题，阐述组织联合政府的立场，不涉及“五点协议”的全文；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将立即与包瑞德乘

飞机返回延安汇报，然后再来重庆谈判。[124]实际上，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立即对“三点反建议”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他在报告上的批语反映了他的基本判断：“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125]

第二天上午，赫尔利邀请周恩来、董必武与王世杰、宋子文在他的寓所举行了一次会谈。双方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治改革和组织联合政府，另一个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举行会谈。关于第一个问题，双方的分歧非常清楚地呈现出来。周恩来在发言中强调中共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王世杰则强调“目前无从宣布废止党治”，因为“训政是载在《建国大纲》和国民党党纲上面的”，不过国民党“并非不准备容纳党外人士”。关于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会谈问题，这是赫尔利最关心的，国民党代表也提出如果毛泽东能来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有些问题“不难得到解决”。但是，周恩来强调毛泽东赴重庆“必须能够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聊聊。现在民主政府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还不是时候。[126]这次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当天下午，周恩来和董必武会见了蒋介石。这次会谈的内容表明，赫尔利与周恩来谈话时是不够诚实的，他更在意的是将谈判维持下去。在会谈中，蒋介石一方面表示希望国共重新合作，并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声称“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而且他现在“做的就是民主”。[127]蒋介石的态度表明，国民党方面无意进行民主改革和组织联合政府，而赫尔利所说的蒋介石答应了中共的要求，只是“不愿写在建议上”等，都是子虚乌有。

上述时间紧凑的会谈都是基于周恩来定于11月23日返回延安而安排的，赫尔利则是幕后的主要推手。不过由于天气的缘故，飞机无法按计划起飞，实际上周恩来12月7日才启程。赫尔利利用这段时间，多次会见周恩来，一再劝说中共方面认真考虑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

11月27日，赫尔利与周恩来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他向周恩来喋喋不休地阐述他那个“插进一只脚趾”的理论，声称按照他的办法，中共一定会“大有作为”。他说国民党“恐怕你们插进一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所以中共现在接受“三点反建议”首先可以逐步改造国民政府，“一口咬不下，不妨做三口四口咬”；其次，中共可以取得合法地位并参加行政院；再次，可以合法地得到美国援助。他为了证明这是真的，还向周恩来透露他同魏德迈的一次谈话，说魏德迈是迫切希望与中共军队合作的，因为中共军队只需要军火，其他军队还要供应粮食；美

军准备向中共军队提供机枪、手榴弹等轻武器，以及派遣200名低阶军官去协助训练部队。他说最近将有大批美国飞机北飞运兵南下，“去的一趟是空的”，他已经向蒋介石提出给中共军队“运送一些武器”，而蒋介石未置可否，“只说让他考虑一下”。他还说新任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告诉他，如果他能指挥中共军队，就“可以拿到五十个运输机给你们运送”。此外，他还在会谈中向周恩来透露，罗斯福已经任命他为新的美国驻华大使。[128]

周恩来对赫尔利提出的军事合作的内容是重视的。他询问赫尔利：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是否同意美军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中共军队的改编是在何应钦的指挥之下，还是在美军司令魏德迈的指挥之下？魏德迈本人是否能够到延安和华北前线视察？在赫尔利介绍了魏德迈的军事计划以及他愿意去延安和华北之后，周恩来告诉他，中共军队愿意也有能力配合盟军在中国战场的军事行动。最后，周恩来提出，需要确认赫尔利是否将在延安签署的“五点协议”和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等报告了罗斯福政府。赫尔利表示已经送出，但还没有收到回复。[129]

赫尔利有关与中共军队进行军事合作和提供军事援助的谈话产生了一些影响，毕竟在这个阶段，争取实现与美军的军事合作是中共的“既定方针”。11月29日，周恩来将拟定的一份给国民党方面的“谈判复案”报告中共中央。这个复案提出组建“国防最高委员会”，然后由这个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和军委会。周恩来认为这样做可将“五点协议”的内容都包括其中，估计蒋介石“绝不会接受”，但中共可以借此“拉美国”。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分析说，目前有美军将领“做统帅，利多害少。将来美国要束缚，我们已经更壮大”，苏联一旦参战“我们更不怕了”。[130]当天，毛泽东在收到复案和备忘录前曾给周恩来去电，指示他暂留重庆，等董必武和王若飞先行回延安讨论后再做决定。[131]不过这个决定没有拖延太久。

12月1日，陈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13页的信。他在信的第一部分阐述了他对国共谈判和赫尔利调处的看法和主张，开篇即举清初多尔衮给史可法信中的名句，“本朝天下取之于闯献，非取之于明朝”。他以这句话所包含的战略指导思想为例，系统阐述了宜将谈判“拖下去”“就汤下面”，等待国际国内形势巨变，“水到渠成，把我党推上全国大舞台，实有如水就下，沛然莫御之妙用”，并提出如何“拖下去”的具体办法。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和赫尔利调处，陈毅认为美国目前的企图“不过是全部着

眼于他的军事利益，其全部政治见解仍是保持蒋的统治体系，认为我们的军事力量必须动用”；赫尔利推动国共谈判达成协议“只是动用我们军事力量的一个工具，并无诚意要改革政治”，而“这是美帝国主义弄的极其精巧的商业手法，这是他们传统，口惠而实不至，惯会牺牲别人替自己打仗而外表十分漂亮”，等等。[132]毛泽东当天接信，阅后即提笔回复：“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133]

当天，毛泽东在看过周恩来发来的“复案”草稿后即电告周，“目前不宜交出。应坚持五条协定”，周恩来立即回延安并转告赫尔利。[134]第二天，12月2日一早，周恩来会见赫尔利，通知他已得到延安指示。第一，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与“五点协议”“距离太远”，而中共中央认为只有组织联合政府才能克服危机；第二，国民党方面态度至今未见改变；第三，中共中央需要开会再讨论，所以他本人也不会再到重庆了。他在会谈中针对赫尔利对“五点协议”的曲解，很坦率地指出，中共与赫尔利对联合政府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案的关键就是否定了组织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决定中断谈判，这对赫尔利不啻兜头一瓢冷水，他详细地重复了之前关于“插进一只脚趾”“一口咬不下，不妨做三口四口咬”的理论，以及中共妥协就是“同我——美国政府合作”，那将得到诸多好处，等等。[135]

赫尔利曾与魏德迈一起同周恩来会谈。但是，既然延安已经做出决定，周恩来在会谈中当然要拒绝赫尔利的要求，告诉他改组国民政府是“救中国的问题”，赫尔利的问题是一直不明白“政府不改组，就无法挽救目前的时局”。[136]但赫尔利当时似乎还是没有领悟到这样的回答到底意味着什么。

12月7日，周恩来乘坐飞机离开重庆，赫尔利茫然若失。他立即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会谈，企图另辟蹊径。他告诉蒋介石，如果不在政治上妥协，就不能统一中国军队和“在战争中产生一个强大、自由、统一和民主的中国”。他一面说服蒋介石做出一些装潢性的人事变动和改革方案，一面同国民党方面共同制订了一个新的方案，以便继续同中共谈判。这个新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成立包括共产党和其他非国民党人士参加的战时内阁；（二）建立一个由政府代表、共产党代表和美军军官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制订出中共军队编入国民政府军队的详细计

划；（三）由一名美军军官统率共产党的部队；（四）承认共产党为合法政党。”[137]

赫尔利和国民党一起搞出的这个新方案有两个关键性内容：一是组织包括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战时内阁”，以此回避组织联合政府；二是由美军参与建立三方委员会来整编和指挥中共军队。赫尔利以此为证，向罗斯福报告说，在他看来，蒋介石“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并将继续前进”，尽管有人批评他“走的还不够远”。[138]赫尔利之所以如此满意，是因为上述两个内容反映了其愿望。他从参与调处一开始，便坚持让中共代表参加国民政府的决策机构，这是他的“民主”概念的具体化。现在提出组织各党派的“战时内阁”，是企图将让“中共参加决策机构”与联合政府两个概念中和在一起，或者说搞得混淆不清。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粉饰而已。国民政府所谓的决策机构其实就是蒋介石的“脑袋”，不根本改组国民党政府为联合政府，“战时内阁”仍然只是一块遮人耳目的“民主”牌坊。

赫尔利曾一本正经地报告罗斯福，不经总统批准，他本人无权同意美军参与指挥中共军队。因此，这一点当时没有写进供谈判的正式文件中。但事实是，这一建议由赫尔利首先提出。他曾告诉蒋介石，“共产党的军队归附政府，这是谈判的主要目的”，[139]而且完全符合罗斯福政府的意图。1945年1月4日，美国新任国务卿斯退汀纽斯向罗斯福提出，如果国共两党不能达成协议，最好由美军军官指挥所有中国军队。这样美军在中国沿海中共控制地区登陆时，“可以避免政治方面的困难”；如果苏联参战，有一位“享有全权”的美军司令，对美国“更为有益”；而且在战争结束时，一位美军司令可以作为对中国的一种“稳定的影响”。罗斯福政府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文件亦提出相同内容的建议。[140]史迪威当时提出指挥国共两党的军队时，主要是为了对日作战；这回罗斯福政府重提这一方案，着重点已经转向战后控制中国的局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赫尔利实际上已经开始将调处的重点转到如何控制中共军队的问题上。

赫尔利在与蒋介石磋商的同时，不断与中共领导人书信来往，试图说服他们回到谈判桌旁。12月8日，亦即周恩来到达延安的第二天，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便奉赫尔利之命，与中共领导人举行会谈。包瑞德在会谈中表示，如果中共不接受国民党的建议，会在美国造成对其不利的影响。毛泽东则尖锐地指责赫尔利言而无信。他表示无法理解赫尔利

的论点，如果中共双手被反捆着，一只脚伸进国民政府中去有什么意义。他告诉包瑞德，中共希望与美军合作，但赫尔利不要指望以此同中共做政治交易。罗斯福政府打算继续扶持蒋介石政权，那是他们的权力，但这无济于事。中共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条件下已经战斗了七年，他们能像一切自由的人民一样行动自如。同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说明，由于在国民党的建议中“不可能找到基本的共同点”，他已无必要再去重庆。另外，为了使各方面了解此次谈判的真实情况，中共准备公布“五点协议”。[141]

11月26日，周恩来因天气原因，在重庆等候返回延安的飞机。毛泽东曾考虑是否在适当时机将“五点协议”的内容透露给民主党派和外国记者。[142]现在他向包瑞德正式提出中共将公布“五点协议”，显然戳到赫尔利的痛处。赫尔利从延安返回重庆第一次与国民党代表会谈后，已经意识到谈判不会那么容易，所以向周恩来强调要对该协议内容保密。[143]现在如果中共中央公布“五点协议”，不仅意味着国共谈判有可能完全破裂，而且肯定会使赫尔利处境尴尬，甚至声名狼藉。难怪他为此暴跳如雷，大喊被人“捉弄了”。12月11日，赫尔利复信周恩来，表示坚决反对公布“五点协议”。他说“五点协议”和“三点反建议”都是谈判的基础，是可以修改的，而且“三点反建议”也非国民党的“最后一言”。[144]

在赫尔利复信延安的同一天，在重庆的王若飞报告中共领导人，他从包瑞德处获知，赫尔利对中共打算公布“五点协议”“非常气愤”，认为这破坏了双方之前的协议，“使他在国际上丢了脸”；另外美方也猜测，中共中央此时拒绝谈判是否受到苏联的影响；等等。[145]在得知赫尔利对公布“五点协议”反应如此强烈后，中共领导人决定不把事做绝。毛泽东指示在重庆的王若飞转告赫尔利：中共中央“毫无与美方彻底决裂之意”，“五点协议”可以暂不公布；中共拒绝任何人迫使其做“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样的廉价交易，其他一切都好商量。[146]12月16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重申中共的基本原则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中共方面从来没有关闭谈判大门，现在的主要障碍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在此条件下只做个别人事变动是毫无意义的。[147]

周恩来的信使赫尔利燃起一线希望，认为这是中共有意恢复谈判的重要信息。他立即复信中共领导人，要求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并声称“循着五点协议的原则取得成功的机会比以往更为有望”。[148]周恩来

很快就写信告诉他，中共方面不愿抽象地讨论是否接受“五点协议”，国民党应首先实行以下四点补充建议，以表示其确有诚意解决问题：（1）释放一切政治犯；（2）撤退包围边区和袭击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3）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4）停止一切特务活动。[149]

1945年1月7日，赫尔利复信周恩来。他一方面表示拒绝接受中共的四点补充建议，另一方面提出一项新的建议：他将与国民党代表一起访问延安，与中共方面会谈，如果在原则上达成一致，就请毛泽东和周恩来同赴重庆，完成签署协议的工作。[150]赫尔利的建议是他在一天前与蒋介石会谈的结果，蒋介石当时只是在故作姿态，其目的是推卸谈判破裂的责任。11日，毛泽东回信答复赫尔利，他再次访问延安只会“徒劳往返”，因为国共两党八年来的秘密谈判已经证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他建议还是在重庆为准备召开国是会议而先召开一个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民盟代表等；筹备会议的程序公开，确保参会代表行动自由。[151]毛泽东的建议使国共谈判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些建议成为此后国共谈判的中心。

1月20日，赫尔利写信告诉毛泽东，蒋介石和国民党已经决定采取新的步骤，在行政院内设置一个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战时内阁性组织。他试图以此证明国共双方的立场已经多么接近，但对关于中共军队指挥权问题的两项建议却缄口不谈。他还说，他将派遣一位美军官“带着飞机和希望去延安”，将周恩来接到重庆谈判。[152]其实，赫尔利在与中共领导人书信往来时经常闪烁其词，不断陈述蒋介石和国民党那些所谓“重要和切实的让步”，对其急于要求中共同意恢复谈判的真实意图讳莫如深。赫尔利如此作为，与其说他是代表罗斯福的调处人，不如说他已变成蒋介石的掮客。在中共领导人眼中，他的可信度越来越低。

1月22日，毛泽东通知赫尔利，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周恩来赴重庆谈判。[153]赫尔利不免自鸣得意，认为这是他施展谋略迫使中共妥协的结果。他甚至对周恩来离开延安时发表的声明充耳不闻。周恩来在声明中公开宣布，他再次前往重庆的目的不是与国民党谈判，而是要推动召开党派代表会议，公开讨论组建联合政府问题。至于军队问题，无从提及。[154]毛泽东的建议和周恩来的声明表明，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改变以往与国民党方面秘密谈判的方式，借赫尔利调处之机，将国共两党的争论诉诸更多党派，以公开讨论组织联合政府来推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

周恩来抵达重庆当天，国民党代表即在招待会上提出设置战时内阁性组织的问题。赫尔利也在一旁浑水摸鱼，与宋子文一起试图混淆一党专政与民主政治的界限，劝说周恩来让步。周恩来当即表示：只要不取消国民党一党统治，任何形式的组织机构中共均不会参加。他第二天又发表了公开声明，重申中共中央的立场，就是要求召开党派代表会议来讨论组织联合政府。[155]

1月25日，在谈判正式开始之前，赫尔利向周恩来透露了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方案：（1）坚持“三点反建议”；（2）在行政院下设一个相当于战时内阁的机构；（3）成立由美国、国民党和中共等三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军队整编委员会；（4）任命一名美军军官为中共军队总司令，并由一名中共代表和一名国民党代表分别担任副司令；（5）一旦整编委员会成立，国民政府便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赫尔利在谈话中表示，他反对“一党政治”和“极权主义”，并认为周恩来在谈判中仍可坚持废除一党政治，主张民主联合。[156]

上述方案乍看起来自相矛盾，其中的关键就在国民党谈判方案的第一点，即国民党坚持“三点反建议”上。由于国民党提出在行政院下设战时内阁性的机构，以及由美军参与整编和指挥中共军队，“三点反建议”一条已经形同虚设。再次端出这个已经被赫尔利实际上否定的方案，不过是作为一个筹码。一旦中共中央提出组织联合政府和召开党派会议，国民党就可用它和设置“临时内阁”作为双方对等让步的交换条件。综观此次谈判的全过程，双方几乎未就坚持还是否定“三点反建议”进行任何讨论。

谈判正式开始后，王世杰声明，国民党将在“三点反建议”之外，再采取以下措施：“（一）政府将于行政院之下，附设一机构。该机构之性质，与战时内阁相类似，其组成人员，为由七人至九人，该机构为行政院之决策机构。中共及其他党派，均将被邀参加。（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委派中国军官二人（其中一人由共军司令官充任）美国军官一人，就中共军队之改编、装备及给养等问题负责拟定建议，呈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之。（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委派一美国军官充任中共军队之直接司令长官。该司令长官应对军事委员长负责。政府所颁行军事法令及非军事法令，统由该司令长官就其所辖军区之范围内，负责予以遵行。”[157]

王世杰提出的这个方案完全反映了美国方面急于控制中共军队的意

图。毛泽东在得到周恩来的报告后极为愤怒，指斥这简直就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周恩来在谈判中指出：民主与党治是绝不可能并存的，而国民党的建议是试图在维持一党统治条件下的所谓让步，组成三方编制委员会和任命美军司令指挥中共军队等，实为无理之提议，应该代之以改组国民党控制的军事委员会，改编和训练全国军队，承认敌后抗日武装，组建联合统帅部指挥全国军队，而不应仅是指挥中共军队。[158]

2月2日，周恩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项“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其内容是：“（一）党派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会议由国民政府负责召集，代表由各方自己推出。（二）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解决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三）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草案，应通过于将来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是会议，方能成为国家的法案。（四）党派会议应公开进行，并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159]

周恩来的强硬立场将赫尔利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此时已是雅尔塔会议召开的前夕，这次美英苏首脑会议的主题之一是讨论尽早打败日本和安排战后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这不能不使罗斯福政府产生紧迫感，对于赫尔利则是一种危机感。他完全了解前此罗斯福多次阐明的方针，实现中国内部的统一是中国拥有四强之一的大国地位和改善中苏关系的先决条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能否保持优势地位。

赫尔利不得不再次提醒蒋介石，蒋正在失去宝贵的时间，控制中共军队才是当下“最重要的目标”；为此，国民党必须在政治上妥协。中共中央已经公开提出要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国是，这已经使国民政府陷于被动局面，现在再加上赫尔利的一再督促，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对周恩来的建议做出答复，表示同意召开包括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并规定其任务是，“（一）从事结束训政时期，以建立宪政政府之步骤；（二）将来共同遵行之政治决策及军队之一元化；（三）国民党以外各党派参加国民政府之方式”，会议决议“将提交国民政府考虑并执行”。[160]这个方案可以说全盘否定了国民党前此提出的一切建议，周恩来同意进一步研究后再做答复。赫尔利要求国民党妥协的目的是换取中共交出军队，但周恩来告诉他，统编军队“还要看国民党进一步采取什

么行动”。赫尔利在绞尽脑汁、精疲力竭之后抱怨蒋介石贻误时机，他告诉蒋，“能够与共产党一起工作的唯一文件是五点建议”，而且那也是“共产党签署的把军权交给国民政府的唯一的文件”。[161]

赫尔利完全没有料到，他四个月煞费苦心调处的结果竟然只是原地踏步而已。这样的结果除了能使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告诉斯大林，赫尔利在把国共两党“搞在一起的工作上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之外，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中国军队没有统一，政治上仍是四分五裂。赫尔利抱怨蒋介石未能抓住时机，实现控制中共军队的目标。他在给罗斯福政府的报告中承认，目前国共谈判的结果“不能马上实现中国武装力量统一”。他还指责“中共是不民主的”，它的目的“是在制定宪法或在民主基础上还政于民之前，摧毁国民党统治的政府”。[162]赫尔利这已经是在怂恿国民党方面倒退，并鼓动罗斯福政府支持这种倒退。

蒋介石显然充分理解赫尔利的意图和心情，他抓住时机以政治上的强硬立场来进一步影响美国的政策。他要求赫尔利转告罗斯福政府，不论中共赞成与否，国民党都将召开国民大会，而且希望美国给予支持。3月1日，蒋介石发表公开讲话，宣布将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并再次提出已在国共谈判中被否定的要求，即由美军参与改编和指挥中共军队，而对国民党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一案却只字不提。[163]这表明，蒋介石和国民党决心以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来对抗召开政治协商会。蒋介石之所以在此一特殊时刻再次公开表示其顽固坚持国民党一党统治的立场，赫尔利的态度起了相当恶劣的作用。

3月2日，中共中央发表评论，抨击蒋介石3月1日讲话是“想找寻一件民主的外衣，来包裹其反革命法西斯的躯壳”，“最清楚地暴露了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立场与企图”。中共中央声明，它将一如既往，坚持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组织民主联合政府。[164]

3月9日，周恩来通知已经回国述职的赫尔利，由于国民党方面对政治改革毫无诚意，中共认为已无必要答复国民党2月3日的提案。[165]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的最后一次谈判宣告破裂，赫尔利四个月的调处以失败告终。

以中共中央于1944年9月公开提出组织民主联合政府为标志，国共两党的争论已经涉及战后的建国方案。赫尔利正是在这一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开始调处国共矛盾的，其调处在客观上增强了蒋介石政府坚持一

党统治、反对政治改革的信心。这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也使罗斯福政府的战时对华政策从此走进一条死胡同。

[1] 转引自〔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第555页。

[2] 参阅〔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60页。

[3] 《华莱士副总统与蒋介石主席谈话记录摘要》，1944年2月21日至2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73页；另参阅〔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60～161页。

[4] 《驻美大使魏道明自华盛顿呈蒋主席报告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似有意探讨中苏关系及中共问题电》，1944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861页。

[5] 《蒋主席自重庆致驻美大使魏道明嘱向华莱士副总统非正式表示如其来华有调解中央与共党合作之表示则中国抗战局势将因之而动摇电》，1944年5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862页。

[6] 《华莱士副总统与蒋介石主席谈话记录摘要》，1944年6月21日至2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78～579页。

[7] 《蒋主席自重庆致驻美大使魏道明嘱向华莱士副总统非正式表示如其来华有调解中央与共党合作之表示则中国抗战局势将因之而动摇电》，1944年5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862页。

[8] 《华莱士副总统与蒋介石主席谈话记录摘要》，1944年6月21日至2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72～582页；参阅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台北：中国美术印刷厂，1964，第25～44页。

[9] 《与蒋主席的会谈》，1944年6月23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79页。

[10] 《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关于中央政府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方案》，1944年6月2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867～869页。

[1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June 15，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7），p.103.

[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August 31, 1944, The U.S.State Department, ed., *FRUS, 1944, China*, Volume VI, p.550.

[13] 《与蒋主席的会谈》，1944年6月23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78~579页。

[14]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自华盛顿呈蒋主席报告谒罗斯福总统商谈关于由史迪威指挥华军及纳尔生来华之任务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4年8月2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80~181页。

[1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September 9, 1944;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 (Penfiel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45, September 13, 1944。以上见The U.S.State Department, ed., *FRUS, 1944, China*, Volume VI, pp.567, 569。《赫尔国务卿致驻华大使（高斯）》，1944年9月9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86页。

[16] "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July 24, 1944;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6, 1944。以上见The U.S.State Department, ed., *FRUS, 1944, China*, Volume VI, pp.484-485, 573。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第532页。

[18]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533页。

[19] 《驻华外交官的备忘录（1943~1945年）》，《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87页。

[20] John Paton Davis, *Dragon by the Tail: American, British, Japanese, 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p.300.

[21] "President Roosevelt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February 9, 1944, The U.S.State Department, ed., *FRUS, 1944, China*, Volume VI, p.329.

[22]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2216, February 23, 1944, The U.S.State Department, ed., *FRUS, 1944, China*, Volume VI, p.349.

[23]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3), p.159.

[24] 参见〔美〕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万高潮、卫大匡等译，解放军

出版社，1984，“前言”。

[25] 参阅《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李先念年谱（一九〇九—一九四八）》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443～447页。

[26]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1944年8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美军观察组档案汇编》影印版1，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第138、139页。

[27]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我党与美军合作的方针问题给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等的指示》，1944年9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美军观察组档案汇编》影印版1，第188页。

[28] 《中央军委关于建立联络机构给华北、五军区、五师、东江、新四军指示》，1944年9月9日；《军委关于向苏浙豫皖发展给华中局的指示》，1944年10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386～387页；《准备力量向苏浙地区发展》，1944年11月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733页。

[29] 〔美〕魏德迈：《魏德迈报告》，台北：光复书局，1959，第275页。

[30] 《毛泽东在延安党校作的报告》，1944年10月25日；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552～553页。

[31] 《军委关于向苏浙豫皖发展给华中局的指示》，194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86～387页；毛泽东：《准备力量向苏浙地区发展》，1944年11月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33页。

[32] 参阅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p.128-129；〔美〕威廉·李海《我在现场：

[33] 罗斯福、杜鲁门顾问回忆录》，马登革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第236～237页；〔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第696页。

[34] 《罗斯福总统致蒋介石委员长的通知》，1944年7～8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34页。

[35] 参阅〔英〕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下），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618～619页；〔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64页。

[36]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自华盛顿呈蒋主席报告谒罗斯福总统晤谈关于中国军事情况及军队数量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4年7月1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75页。

[37]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自纽约呈蒋主席报告与赫尔利将军晤谈经向其表示美国为求维持世界和平必需扶助中国使之有力方可密切配合电》，1944年8月1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76～177页。

[38] 转引自〔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第705～706页。

[39]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196.

[40]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第406～407页。

[41]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p.116-117.

[42]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第297页。

[43]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118.

[44]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well's Command Problems*（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Military，Dept.of the Army，1956），pp.70-71.；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118.

[45] Theodore H.White，*The Stiwell Papers*（New York：W.Sloane Associates，1948），p.251.

[46] 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第13页。

[47] 参阅王邦宪《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复旦学报》1983年第4期。

[48] 转引自薛天衔《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战略和策略——以苏联对新疆三区革命的战略策略为中心的探讨》，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第103页。

[49] 《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告以我剿匪军队在新省东北遭到套有红五星徽飞机轰炸情形并请苏方与我合作调查此项飞机之来源谈话纪录》，1944年3月13日；《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自迪化呈蒋委员长报告五角红星飞机来我军上空轰炸情形电》，1944年3月12日。以上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58～459页。

[50] 《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告知最近发生而与远东战事发展有密切

关系之重大事件电》，1944年3月1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64页。

[51]《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其对外蒙、新疆边境事件能作一切可能之努力电》，1944年4月1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68页。

[52]《蒋委员长自重庆致驻美大使魏道明嘱向罗斯福总统特别提明共产国际对中国一贯政策及我政府对共党之政策电》，1944年4月1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69～170页。

[53]《驻美大使魏道明自华盛顿呈蒋主席报告与赫尔国务卿晤谈关于苏联之远东政策及中共在美之宣传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4年4月3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70～171页。

[54]《驻美大使魏道明自华盛顿呈蒋主席报告谒罗斯福总统晤谈关于援助中国、苏俄之远东政策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4年5月1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71～172页；“The Charge in China（Atche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1，1943，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772。

[55]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p.100-101.

[56]《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5～6、41页；Elliott Roosevelt，*As He Saw It*，p.180。

[57]《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长建议暂时搁置外蒙、新疆边境事件电》，1944年4月1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67页；“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11，1944；“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April 11，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772。

[58]“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June 15，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104.

[59]参阅郭荣赵《中美战时合作之悲剧》，台北：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1979，第291页；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6、14、23页。

[60]关于罗斯福的态度变化，参阅〔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第554～556页。

[61]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well’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 D.C.：Office of the Chief Military，Dept.of the Army，1953），

pp.153-154.

[62] Henry L.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48），p.539.

[63] 转引自〔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27页。

[64]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well's Mission to China*，p.223.

[65]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居里先生商讨史迪威将军所拟三路攻势作战计画谈话纪录》，1942年7月2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656～661页。

[66] 《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长表示将在技术困难许可之下尽速尽量以急需之物资接济中国函》，1942年9月1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21～722页。

[67] "Draft of Letter From Mr.Owen Lattimore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The Consul at Kunming（Ludden）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No.29，December 16，1942，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2*，*China*，p.186.

[68] 参阅〔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15页。

[69]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第554页。

[70] 转引自〔美〕杰克·萨姆森《陈纳德》，石继成、许忆宁译，东方出版社，1990，第204～208页。

[71]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223页。

[72]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60.

[73]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64.

[74] 〔美〕杰克·萨姆森：《陈纳德》，第209页；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67。

[75]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

第558页。

[76] Theodore H.White，*The Stiwell Papers*，pp.321-322.

[77]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169.

[78]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64页。

[79] 《罗斯福总统致蒋介石委员长的通知》，1944年7～8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34～135页。

[80]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well's Command Problems*，pp.385-386.

[81] 《罗斯福总统致蒋介石委员长的通知》，1944年7～8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35页。

[82]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well's Command Problems*，pp.385-386；〔美〕杰克·萨姆森：《陈纳德》，第280～281页。

[83]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自华盛顿呈蒋主席报告谒罗斯福总统商谈关于由史迪威指挥华军及纳尔生来华之任务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4年8月2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80～181页。

[84] 《罗斯福总统致蒋介石委员长的通知》，1944年7～8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35页。

[85] 《罗斯福总统致蒋介石委员长的通知》，1944年7～8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35页。

[86] 《罗斯福总统致蒋介石委员长的通知》，1944年7～8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35页。

[87]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to President Roosevelt，Major General Patrick J.Hurley to President Roosevelt"，October 10，1944，1 p.m.，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170.

[88]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well's Command Problems*，pp.435-436.

[89] "President Roosevelt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September 16，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p.157-158.

[90] "Major General Patrick J.Hurley to President Roosevelt"，October 10，

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167.

[91] “Major General Patrick J.Hurley to President Roosevelt”，October 10，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170.

[92]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well’s Command Problems*，pp.464-465.

[93] 《史迪威将军的报告》，《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37页；〔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第710页。

[94] 参见〔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108～109页；〔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69页。

[95] 《赫尔利将军所获得的训令》，《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39页。

[96]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p.79-180.

[97]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5，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p.254-256.

[98] “Missions of Hurley and Nelson”，September 8，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259.

[99] 《赫尔利九月十二日提出的十点建议》，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重庆出版社，1992，第372页。

[100] “Memorandum by Mr.Troy L.Perkins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November 14，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p.692-693.

[101] 《赫尔利的表示》，1944年10月17日；《董、林关于第二次和赫尔利谈话向毛泽东汇报电》，1944年10月18日；另参阅《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551～552页。

[102]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552页。

[103] “Draft by Major General Patrick J.Hurley”，October 28，1944，*FRUS*，*1944*，*China*，Vol.VI，p.659.

[104]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214.

[105] 《赫尔利带来之五条》，194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95～396页；“Revised Draft by Chinese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November 7，1944，*FRUS*，*1944*，*China*，Vol.VI，p.666。

[106] 《张治中、王世杰签呈》，1944年11月7日，《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

[107] *FRUS*，*1944*，*China*，Vol.VI，p.666.

[108] 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收录了这份“五点方案”，标明的时间是10月28日，但准确地说应是国民党方面11月7日的修订案。

[109] 《赫尔利少将与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谈话记录》“第一次谈话”，1944年11月8日上午。

[110] 《赫尔利少将与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谈话记录》“第二次会谈”，1944年11月8日。

[111] 《延安协定草案——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1944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93~394页；美方记录英译中文版，见《五点协议草案》，1944年11月10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2页。

[112] 《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1944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97~398页。

[113]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587页。

[114] “Major General Patrick J.Hurley to President Roosevelt”，November 16，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699.

[115] “Memorandum by Mr.Troy L.Perkins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November 14，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693.

[116]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216.

[117] 《周恩来与赫尔利谈话要点》，1944年11月13日。

[118] 《国民党于十一月十五日提交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的反建议》《国民党于十一月十七日提交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的反建议》，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375、376页。

[119] 《赫尔利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11月16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370~371页。

[120] 《罗斯福复毛主席电》，1944年11月6日，此电文由美军观察组转。

[121] 《周恩来与赫尔利谈话要点》，1944年11月13日。

[122] 《三点方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3页。

[123] 《周恩来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21日（上午11：30）。

[124] 《国民党提出另一协定》，1944年11月21日。

[125]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560页。

[126] 《周恩来、董必武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谈话纪要》，1944年11月22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380～384页；另参阅《王世杰同周恩来谈话记录》（《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这是王世杰于1944年11月23日根据回忆所做的会谈记录。

[127]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589页。

[128] 《周恩来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27日；另参阅《周恩来访晤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谈话纪要》，1944年11月27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385～387页。

[129] 《周恩来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27日；另参阅《周恩来访晤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谈话纪要》，1944年11月27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386～388页。

[130] 《周恩来关于向国民党提出谈判的复案和备忘录向毛泽东报告》，1944年11月29日。

[131] 《董王二人先回延安讨论复电》，1944年11月30日。

[132] 《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第309～312页；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第436页。

[133] 《给陈毅的信》，1944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229～231页。

[134] 《坚持五条协定暂不交复案》，1944年12月1日；可参阅《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590页。

[135] 《周恩来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2月2日。

[136] 参阅《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590页。

[137] 《驻华大使赫尔利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1月14日，《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138]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2月7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20页。

[139]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2月7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

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21页。

[140]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President Roosevelt”，January 4，1945，*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p.154；“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to the President”，January 14，1945，*FRUS*，*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5），p.352.

[141] 《中国共产党的答复》，《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3～144页。

[142] 《毛泽东关于向外透露五条协定问题给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电》，1944年11月26日。

[143] 《周恩来与赫尔利谈话要点》，1944年11月13日。

[144] “The Appointed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to Mr.Chou En-lai”，December 11，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p.732-733.

[145] 《王若飞关于包瑞德、赫尔利等对国共谈判的一些意见给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电》，1944年12月11日。

[146]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的指示》，194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12页。

[147] “Mr.Chou En-lai to the Appointed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December 16，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p.739-740.

[148] “The Appointed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to Messrs.Mao Tse-tung and Chou En-lai”，December 20，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p.744-745.

[149] 《中国共产党的答复》，《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5页。

[150] “The Appointed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to Messrs.Mao Tse-tung and Chou En-lai”，January 7，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163-164.

[151] “Mr.Mao Tse-tung to the American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January 11，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168-169.

[152] “The American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to Mr.Mao Tse-tung”，January 20，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180-181.

[153] 参见《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574页。

[154] 参见《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597页。

[155]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597页。

[156]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598页。

[157] 《国民政府的建议》，《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6页。

[158]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598页。

[159] 《国共谈判文献》（三）（无版本信息）。

[160] 《与委员长的会商》，《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8页。

[161]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2月18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36页。

[162]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2月18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36页。

[163] 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的演讲》，1945年3月1日，《中央日报》1945年3月2日。

[164] 《新华社记者评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的演讲》，《解放日报》1945年3月3日。

[165] 《共产党的答复》，《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51页。

第二章 从独角戏到二重唱

一 赫尔利的幻想

随着赫尔利在调处过程中的不断碰壁，罗斯福政府内部围绕对华政策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中心就是罗斯福政府从一开始介入国共争端时便面临的那个基本问题：如果未能使国共两党达成协议，美国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对策。罗斯福决定要在国共之间充当调解人时，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耗费多少精力。他根据自己“自万里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的判断，相信中共同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无甚差别”，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1]但事与愿违，赫尔利第一轮调处的失败使美国战时对华政策面临一次真正的危机，罗斯福政府内部的争论亦随之爆发。

赫尔利到达重庆不久，他与美国驻华军政人员之间的分歧便暴露出来。就在前述赫尔利告诉罗斯福，美国失去蒋介石就会失去中国之时，戴维斯和谢伟思等人却向罗斯福政府发出了不同的警报。他们在给罗斯福政府的一系列报告中，分析了中国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首先就是中共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影响绝不容忽视。他们认为：“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而是他们的命运”；“共产党已建立了既广且深的群众支持，因而使他们之被消灭成为不可能。从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占有确定和重要的地位。……除非国民党在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上和共产党有同样的成就，并证明自己能争取人民的领导地位……不然，共产党在短短的几年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

其次是对国共关系演变趋势的判断。戴维斯和谢伟思等人认为，国共谈判前途渺茫，蒋介石和国民党都知道，一旦在政治上做出让步，同意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中共“迟早会夺走他和他的国民党的权力”；由于无力在政治上展开较量，蒋介石和国民党宁愿消极地将问题拖到战争结束之后，现在则是保存实力以便最后同中共摊牌；反观中共，他们除

了组成真正的联合政府，并“没有兴趣与蒋介石成立协议”。

再次是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他们认为，在未来难以避免的国共冲突中，美国能提供的援助不足以抵消国民党“在组织上的弱点”；面对目前国共之间的僵局，美国应采取的政策是“以和平的过程调整中国新的力量关系，以阻止内战的灾祸”；如果调处失败，美国必须限制“与国民党的牵涉”，并“开始与命定将控制中国的力量——共产党进行某些合作，以影响他们使之更趋向于美国友善的独立的地位”。他们提醒罗斯福政府，美国是在“与时间竞赛”，如果苏联在美国调处成功或拉住中共之前加入对日战争，中共就会“被苏联所抓住，成为苏联的附庸”。[2]

戴维斯和谢伟思等在赫尔利刚刚开始调处之时，便提出这种如此深刻和系统的见解，他们几乎是全盘否定了赫尔利调处的前提、思路和手段。

戴维斯、谢伟思等人与赫尔利的分歧最初尚未导致他们之间的冲突。这是因为一方面，赫尔利一开始固然坚守蒋介石不可取代的意见，但美国国务院里那些中国问题专家的忠告毕竟还是给他留下了一些印象。他当时既认为“中国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国”“中国政府是个人独裁统治的政府”，也承认中共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力量”。[3]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官们也力图影响赫尔利，争取使他面对现实，采取更加有弹性的行动。10月22日，戴维斯从延安写信给赫尔利，建议他访问延安，与“这里将决定中国未来的人”面对面地谈话，以便弄清楚他应“走的路”；提出罗斯福总统对那些“中国重要人物应有充分全面的印象”，而赫尔利则是帮助罗斯福得出正确结论的人之一。[4]不过，赫尔利与他们之间的这种协调并没能维持多久，由于国共谈判的突然中断，双方的冲突终于爆发了。

周恩来于12月7日离开重庆后，赫尔利同驻华外交官们的分歧很快表面化。戴维斯于12日向美国政府报告说：“在国共之间达成协议的努力已经失败”，美国应该“毫不含糊地”告诉蒋介石，它将根据自己的判断，同“对抗日贡献最大的中国军队一起工作并提供援助”。[5]

赫尔利此时正为自己调处的失败懊恼不已，戴维斯的报告难免引起他的极度怨恨。赫尔利也在不久后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报告，为他的调处失败辩解。他声称，根据他的理解，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领导地位，以及统一所有

中国军队；他认为国共两党“公开宣布的原则如果有分歧也微不足道”，真正妨碍两党合作的“最大势力来自外国”。赫尔利在这里所说的“外国”是指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驻重庆的代表，也包括某些美国驻华军政人员，而且只有“俄国人没有支持中国共产党”。他称部分美国驻华军政人员“那伙人”，详细列举并谴责了后者的观点，诸如国民政府是靠同日本人达成协议才得以苟延残喘的，而中共不必与国民党联合以及统一军队；美国应与中共——而不是国民党——合作。赫尔利故作姿态地保证说，他本人不会受任何“反对中国统一的观点的影响”，不过美国领导人在委任“那伙人”时，应对他们有“明确的看法”。[6]12月30日，赫尔利再次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那些有关国民政府正在与日本人达成协议的报告并不是真实的。他一本正经地提出一个看上去令人啼笑皆非的证据，即蒋介石和宋子文都说，那些报道是“毫无意义的谎言”。[7]

赫尔利的报告立刻遭到美国国务院中国处负责人文森特的反驳，他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赫尔利对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的解释基本正确，不过美国在帮助国民政府避免崩溃和保住蒋介石的统治地位的同时，必须在中国政治局势中保持灵活性，准备“立刻支持”最能抵抗日本人的政治集团，从而避免在蒋介石垮掉的时候遇到麻烦。关于赫尔利在报告中说“俄国人没有支持中国共产党”，文森特认为在解释时应“有所限制”；中共的确没有得到苏联直接的物质援助，但存在苏联对中共间接的支持，而中共对国共谈判的态度“无疑受到莫斯科的影响”。文森特还嘲笑赫尔利对国共分歧的判断过于浅薄，他指出国共两党的分歧既是简单的，也是基本的；蒋介石同意中共代表参加国民政府是有条件的，即他们不会控制也不能直接影响到国民政府的政策，而中共的主要诉求则是建立各党派地位平等的联合政府，因此他对赫尔利调处能否达到目的不是很乐观。关于赫尔利蔑称为“那伙人”的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观点，文森特简洁地将其归纳为：国民政府“有可能垮掉”，美国政府应准备与中国最强大的政治集团——中共打交道；虽然赫尔利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罗斯福政府却必须认真地考虑，一旦赫尔利调处失败怎么办。[8]

上述赫尔利的报告和文森特的备忘录揭开了罗斯福政府内部有关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国共问题政策争论的帷幕。1944年12月24日，赫尔利收到毛泽东经美军观察组转发的一封信。根据美方英译文记载，毛泽东在信中说，周恩来正忙于“筹备重要会议”，故不能接受赫尔利的邀请前往重庆，而且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方面并没有足够的诚意在“五点协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因此毛泽东建议，“在延安举行一次会议，如有

可能请包瑞德出席”。[9]27日，包瑞德奉命到达延安，但第二天便被打发回重庆。他带去了周恩来当天写给赫尔利的一封信。信中说是由于翻译错误，赫尔利误解了毛泽东的意思。[10]包瑞德也告诉赫尔利，中共领导人否认提出过在延安举行会议以及邀请他本人出席的建议。不过周恩来在谈话中确实请他转告赫尔利，中共“希望改革，但没必要提倡撤换蒋委员长”。[11]

毛泽东12月24日的复信是由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人员翻译并电传的，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发生误解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而且就当时的气氛看，中共领导人提出邀请赫尔利访问延安这种可能会使自己陷于被动的建议，也是不合情理之事。问题在于赫尔利已经知道中共领导人并无此意后，仍然同国民党方面协商，并向中共领导人提出，他愿与宋子文和王世杰一起访问延安。赫尔利的建议被中共领导人拒绝了，他借此机会发难，首先向美国驻华军政人员中的“那伙人”开刀。

1945年1月14日，赫尔利在向罗斯福汇报国共谈判进展时说，周恩来曾于12月22日提出“建议在延安与政府代表举行会谈”，并邀请包瑞德也参加。但包瑞德到了延安后，周恩来不但否认曾经提出过这种建议，反而向国民政府提出新的要求。赫尔利表示“当时无法解释共产党立场急剧变化的原因”。赫尔利在这里显然歪曲了事实。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文献记载，不论是从毛泽东的信中，还是从周恩来同包瑞德的谈话中，均看不到中共领导人“建议在延安与政府代表举行会谈”的字样。赫尔利这样说是为了证明，中共的谈判立场确实曾经发生过“急剧变化”，这样便推卸了他的责任，以及为在美国驻华军政人员中排斥异己埋下伏笔。

果然，赫尔利在谴责中共变卦之后便笔锋一转，把矛头指向魏德迈司令部的“一些军官”。赫尔利声称，他已经克服了国共谈判中的一切障碍，但中共领导人突然拂袖而去，究其根本原因是驻华美军司令部中的一些人在魏德迈离开司令部期间，“制订了在共产党控制区使用美国军队的计划”，而且该计划“以在美国和共产党之间达成一项协议为基础，避开中国的国民政府，直接向中共军队提供美国给养，并把中共军队置于一名美军军官指挥之下”。赫尔利在报告中也承认，在此以前，他也听到过有关这个计划的“风声”，但他根据上述情况断言，国共谈判遇到的困难肯定是驻华美军制订的这个合作计划造成的，该计划企图“不通过中国国民政府来联合美国和共产党的部队”。[12]

赫尔利在报告中提到的那个计划是驻华美军司令部拟定的一份与中

共军队合作的计划。该计划是根据魏德迈的下令拟订的，并由包瑞德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伯德上校带到延安交给中共领导人。赫尔利含糊其词地说，计划起草于“魏德迈不在司令部期间”。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难怪魏德迈听说之后与赫尔利闹别扭，而且美军人员也完全没有像赫尔利指控的那样，企图把国民政府撇在一边。他们曾经将该计划交国民党方面研究，并表示会尽早告诉蒋介石，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了。[13]驻华美军司令部参谋长麦克罗将军在指示包瑞德将该计划提交给中共领导人之前，曾经要求包瑞德向中共领导人说明，美军人员的行动“纯属探索性的”，计划能否实施还未做出最后决定。赫尔利即使不了解包瑞德的行动过程，也没有理由指责美军人员的行动超越了罗斯福政府的政策界限。但是，赫尔利这样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竟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美军领导人立刻根据赫尔利的报告，命令魏德迈调查事件原委，并最终决定将麦克罗和包瑞德都调离中国战区。[14]

赫尔利犹嫌不足。他继续向罗斯福政府控诉“那伙人”的行动，指责他们已使中共领导人确信，竟然能“撇开”国民政府和他本人，“通过军事机构直接与华盛顿联系”。他陈述的根据首先是1945年1月9日，驻华美军司令部的德帕斯在访问延安以后，通过美军电台向魏德迈报告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中共愿意派遣代表访问华盛顿，并准备面见罗斯福。其次是朱德于1月23日写信给魏德迈，要求美军提供两千万美元贷款，用于瓦解伪军。赫尔利认为，如果罗斯福政府接受中共领导人的建议，等于承认中共是“一个武装的交战国”，是“破坏美国扶持国民政府的政策”，结果是“立刻会在中国引起混乱和内战，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不仅如此，当麦克罗等辩护说，驻华美军“有权以任何有效的手段”同日本人作战时，赫尔利指责他们违反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则之一——军人不干涉政治。他声称，某些驻华美军人员的主张是“承认美国军队而不是合众国政府有权制订政策”，而美国的政治制度规定“只有合众国政府才能决定采取行动，并能指挥军队作为政府的工具来执行有效的政策”。[15]

尽管赫尔利的论证合乎逻辑，但需要澄清的基本事实是，一些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行动是否已经超出当时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规定的范围；他们到底是在执行一种政策，还是在“制订”新的政策。赫尔利肯定完全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不向有武装的以暴力反对国民政府的中共提供租借物资或其它援助。来自美国的任何供给中共的援助，都必须经过国民政府给予那个党”，即使这种援助“最终可能证明

要比从美国运来抗日的同等价值的武器和军火更合算”，也绝不可违反这个原则，否则就会破坏罗斯福政府的既定政策——“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为政府委员长和军队统帅”。[16]显然，赫尔利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在这时已经把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推向了极端。

赫尔利通过排挤麦克罗、戴维斯和包瑞德等人，至少达到了两个目的。首先是确立了他在中国作为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解释者的地位。既然赫尔利把他同美国驻华军政人员中“那伙人”的纠纷说成是捍卫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斗争，美军方决定调离麦克罗等人便带有评判是与非的性质，即在实际上肯定了赫尔利的行动和他对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诠释。赫尔利打击麦克罗等人不仅是要杀一儆百，而且为排斥异己打开了大门。结果继麦克罗、戴维斯和包瑞德之后，被称为“中国通”的美国驻华外交官也一个接一个地被“撵出了”中国。

其次是在美国驻华军政各单位中实现了“军令政令统一”，特别是使驻华美军司令部隶属于赫尔利领导之下，魏德迈则清楚了他与赫尔利的关系。在史迪威调离之前，驻华美军司令部与美国大使馆是平行单位，前者主要听命于美军总部。两个机构虽然在推行美国对华政策时互相配合，但在具体工作中却是各自为政的，史迪威司令部的实际作用和影响甚至超过了美国大使馆。

赫尔利接任驻华大使一职以后，很有可能是受到蒋介石“军令政令统一”的启发，试图独揽美国驻华军政机构的领导权。12月6日，赫尔利在大使馆召集美国驻华各单位代表开会，决定以后每星期三召开一次汇报会议。赫尔利在这次会议上声明，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协调各驻华机构的行动。1945年1月，赫尔利在美国大使馆宣布，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是阻止国民政府崩溃，任何人都不得背离这一政策。他规定未经他的批准，不得将对蒋介石不利的报告通过外交途径送往华盛顿。[17]当时买他账的人不多，连魏德迈都感到有必要向他的上司请示，应该如何理解美国对华政策，并对赫尔利搞掉他的部下表示不满。“那伙人”也不顾赫尔利的阻挠，继续向美国政府报告他们的观感和建议。艾其森甚至在一份备忘录中警告赫尔利，他那些无事生非的指责，可能会导致大使馆的某些同僚被召回国。[18]

但是，自从麦克罗等人被处理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那些坚持己见的外交官被陆续调离中国，魏德迈则变得唯唯诺诺，他经不住赫尔利的软硬兼施，终于俯首帖耳。2月15日，魏德迈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

发表公开声明，表白他“试图置身于政治之外”，并把驻华美军的任务说成是“在国外继续进行战争……只是偶然与政治有关”。他宣布“受命”支持国民政府，他的政策是“不向任何人、任何活动或任何组织提供援助”。[19]魏德迈的声明标志着赫尔利已经实现对美国驻华军政机构的控制。

赫尔利在重庆的较量中得手毕竟只是解决了局部的问题，争论并没有到此为止。麦克罗等人的行动不仅是1944年夏季驻华美军与中共军队合作的简单延续，而且是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出现某种混乱的产物。

1945年1月，美国国务院的中国事务专家们对国共谈判拖拖拉拉普遍感到不安。蒋介石发表元旦广播演说的第二天，在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处的文森特即指出：蒋介石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声明“被认为没有重大意义”，“蒋介石没有实现与中共暂时妥协的事实表明，他对（组成）有代表性的政府的最后承诺值得怀疑”。新上任的国务卿斯退汀纽斯亦认为，蒋介石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组织联合政府会使中共扩大影响，并且“多半会控制政府”，谈判失败又“会招致国民党最后垮台的危险”。[20]1月12日，美国国务院中国处在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的备忘录中提出：美国在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合法政府的情况下，与其他集团建立联系虽属“不守信义”，但在其他试探失败以后，如果“作战迫切需要，在特定的基础上将援助扩大到据信能够并愿意同日本人打仗的任何地方组织，而不考虑其政治隶属以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将是正当的”。[21]

1月16日，美军领导人与国务院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试图澄清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议搞得混乱不堪的对华政策，以便驻华美军采取行动时能有所依循。美军方在会议中声明，魏德迈曾经一再询问其使命的性质，国务院应对此问题提供政策性指导。1月29日，文森特起草了一份备忘录，答复美军方的询问。文森特在备忘录中试图使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尽可能看上去有条理，说美国对华政策包括长期和短期两个目标：短期目标“是在动员中国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对日战争方面提供援助，在中国运用美国的影响，在较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和军事统一，以便使提供的战争物资取得更大的效果和价值”；长期目标“是通过援助，使中国成为统一、民主与合作的国家，能为远东的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至于目前驻华美军的使命，备忘录认为“应集中于短期目标”，为了打败日本，必须重新装备中国军队。鉴于中国局势复杂，希望驻华美军的这种行动服从于“使中国成为亚洲强国”的目标“是不现实的”；由于国共关系

尚“不能令人满意”，重新装备中国军队不可能包括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这自然会产生政治方面的影响；不过当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时，军事当局“应准备武装任何据信能够有效地同日本人作战的中国军队”。备忘录特意说明：不论为实现长期目标还是短期目标，美国的目的都是实现中国的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统一于蒋介石之下；目前“蒋介石表现为有希望统一中国的唯一领导人，不过为了达到直接的目的而选择支持蒋介石，前景是混乱的”；美国有必要“保持某种程度的灵活性，以便允许在中国与任何最能促进中国统一、民主和友好的领导人合作”。[22]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备忘录的关键在于试图动摇罗斯福政府长期以“蒋介石就是中国”为前提而构筑的对华政策，明确提出了美国有必要保持某种“灵活性”。

1月29日的备忘录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第一次系统地修正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尝试。他们在估计战后中国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问题，与罗斯福并无分歧，但他们不赞成通过全力扶持可能要垮掉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来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担心那样做到头来会鸡飞蛋打。这时正值美国国务院被罗斯福冷落三年之后，重新积极地加入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之中。中国问题专家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提出如此尖锐的更改，一开始便对美国军政领导人的思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上述重要文件均于2月初转到重庆美国驻华大使馆，赫尔利顿时感受到某种威胁。他认为这是国务院里的“那伙人”企图颠覆他的阴谋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篡改他所奉行的对华政策。赫尔利当然不希望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沿着国务院备忘录的路线调整。

从1月31日到2月18日，赫尔利向国务卿发出了由四个部分组成的系列报告，系统阐述了他在中国调处国共矛盾的过程和他对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的理解。他说他在国共的争论中“猛然注意到”，中共事实上“不是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一党统治和个人独裁的政府事实上不是法西斯主义；国共两党都在“争取民主原则”，他目前调处国共矛盾遇到的障碍既有国共之间的分歧，也有如前所述来自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干扰，以及还有其他一些外国势力，等等。赫尔利坚信他一直在坚定地贯彻罗斯福亲自制定的政策，而罗斯福政府“决定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是正确的”；现在虽然碰到困难，但罗斯福政府只要有“清醒的头脑，并能宽容和忍耐”，肯定“能有所作为”。最后他提出，希望回华盛顿

与国务卿本人“当面讨论形势”。[23]系统分析赫尔利的报告，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严重的矛盾，例如把中共称为“有武装的、以暴力反对国民政府”的政党等。此刻他宣布突然有了新的发现，实际上是为了堵住那些对他的调处表示悲观的人的嘴。既然国共之间的分歧并不严重，罗斯福政府只要再耐心一些，再多给些时间，他就不会无所作为。

1945年初，赫尔利在了解到驻华美军与中共有来往后，便断定他的失败是“由一个美国计划造成的”。他有些故弄玄虚地不通知中共中央就撤换了美军观察组领导人，认为这样做而不公开施加压力，就可以“使共产党相信，他们在取代国民政府的努力中不能利用美国”。如前所述，毛泽东恰于1月22日通知他，周恩来准备到重庆谈判。赫尔利据此断言，正是他的谋略使他“立刻能够同共产党领导人重新开始谈判”。[24]

赫尔利得出这种荒谬的结论，至少说明他还是不了解国共关系的历史和复杂性，也不了解中共的历史和政策的特点。12月16日，周恩来在给赫尔利的信中说得已经很清楚了，中共中央并没有关闭谈判大门。此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写给赫尔利的信中，都曾提出恢复谈判的具体方案。他们的建议表明，中共中央仍然在观察国内外形势，特别是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至于对赫尔利的调处和目前陷入僵局的国共谈判，则是采取拖延和保留回旋余地的方针。由于赫尔利一再否定或不具体答复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中共领导人当然会拒绝继续与国民党进行秘密谈判。

后来中共领导人在提出召开党派会议、公开讨论组织联合政府后，表示同意恢复谈判并派遣周恩来前往重庆，其目的是借公开谈判的形式来推动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这与赫尔利自鸣得意的谋略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中共代表在谈判中未就任何原则问题妥协，本来已经足以使赫尔利明白，外部压力是不可能迫使中共中央放弃自己一贯立场的。但他执迷不悟，竟然认为谈判破裂是由于他利用外部压力的力度还不够大。于是他决定利用亚太地区国际形势的演变，寻找进一步向中共领导人施加压力的手段。

其实，赫尔利何尝不知道他的处境已经非常尴尬。振振有词地宣布“决定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是正确的”并不困难，但用事实证明之谈何容易。为了解开这道难题，赫尔利于1月14日直接打电报给罗斯福，提出了一项建议。他说罗斯福应该在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努力与苏联和英国领导人协调对华政策。他说应该“确保丘吉尔

和斯大林同意下列计划：（1）中国所有军事力量立即统一；（2）战后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中国”。只要罗斯福政府与苏联和英国达成上述协议，他就能实现“中国军事统一”和“建设一个自由、统一和民主的中国”。[25]赫尔利的这个建议已经涉及根本改变罗斯福政府在解决国共问题上一直坚持的原则，他企图通过争取与苏英等大国协调政策，为解决国共争端创造条件。

赫尔利异想天开地相信中共中央会屈服于国际上的压力，是根据他的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外来因素可以给中共中央的政策造成决定性的影响；第二，美国有能力做到在国际上孤立中共，这主要是协调美苏对华政策和改善中苏关系。

赫尔利在1月14日向罗斯福提出的建议中，已经把争取苏联与美国合作作为解决国共争端的先决条件。这显然背离了美国政府在调处国共矛盾过程中一贯坚持的一个原则——优先解决国共争端，然后调整中苏关系。罗斯福政府虽然认为中苏关系与国共争端密切相关，交互影响，却一直不打算将调整中苏关系与调处国共矛盾搅在一起。这一方面是因为罗斯福政府相信，调整中苏关系的时机尚不成熟，在美苏未在亚太地区涉及的重大问题上取得谅解之前，放手让蒋介石同苏联直接交涉，很可能打乱美国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罗斯福政府一直认为，中国内部的国共矛盾不解决，国民政府与苏联打交道时必落下风。所以，只有首先实现内部统一，才能使国民政府在调整中苏关系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苏联无机可乘，美国才有牌可打。况且苏联领导人已经说明，他们在中国内部纠纷中是清白的，罗斯福政府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把国共问题与中苏关系拴在一起。

罗斯福政府采取首先调处国共矛盾，然后调整中苏关系的方针，与蒋介石的企图背道而驰。蒋介石的思路是按照法国的模式解决中国问题，效法戴高乐与苏联搞好关系，然后借助苏联的压力迫使中共妥协。如前所述，蒋介石和国民党一直在向罗斯福政府描述苏联正如何利用中共“赤化”中国，以及中共如何在苏联支持下策划“夺权”，等等。然而罗斯福政府却断定，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的叙述是危言耸听，尚不值得给予过多的关注。

在这里大致回顾美国副总统华莱士1944年7月访华期间以及之后的一些情况是有意义的。当时，蒋介石尽管已经充分了解了苏联这时尚无意介入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却仍然喋喋不休地向华莱士灌输的确存在

中共按照苏联的旨意“颠覆”国民政府的危险性，然后要求美国首先担任中苏两国的“仲裁者”。华莱士当即表示，罗斯福政府不可能承担在中苏之间扮演媒人的义务。他不无揶揄地告诉蒋介石，如果中共确如蒋介石描述的那样与苏联过从甚密，那就更有必要赶紧先着手解决国共问题。[26]

华莱士的谈话反映了罗斯福政府的基本思路。美国国务院曾指示时任驻华大使高斯，应该向蒋介石强调，解决国共争端是使中苏关系能够改善的先决条件。罗斯福在听取华莱士的访华报告后，也曾于7月14日打电报提醒蒋介石，他正在慎重考虑“斡旋布置中苏二国代表的会谈”；国民党如果能够与中共“预先取得协议，具体布置如何在华北有效地对日作战，那末，任何这类会议更易于召开”。[27]

蒋介石从罗斯福政府那里吃了地地道道的闭门羹，不过他毕竟从华莱士透露的消息中了解到，苏联有意改善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并不希望因支持中共而冒险与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冲撞。蒋介石决心不顾罗斯福政府的规劝，首先着手改善中苏关系。7月，蒋介石决定派遣宋子文访问莫斯科，并开始为此与苏联直接接触。国民政府还采取一系列行动，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气氛。在新疆，国民政府撤换了盛世才并改组了新疆省政府。

9月16日，蒋介石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他声称改善中苏关系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并表示确信改善中苏关系会很容易。[28]在此届国民参政会关于外交问题的十项提案中，包括改善中苏关系内容的提案有三项，这是历届国民参政会所没有的情况。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呼吁加强中苏关系和派遣友好代表团访苏的决定。重庆报刊同时登载了大量有关改善中苏关系的评论和文章。经蒋介石一阵呼风唤雨，重庆顿时弥漫中苏友好的气氛。自7月起，蒋介石为改善中苏关系所做的一厢情愿的努力，在此届国民参政会期间达到了高潮。

蒋介石单方面调整中苏关系的行动很快引起罗斯福政府的关注。美国驻华大使馆不断向罗斯福政府报告蒋介石的动向，认为他对美国的方针缺乏必要的理解，没有意识到中苏关系由于国民政府的反苏宣传而恶化所带来的基本问题，以及国共矛盾应在合理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只有解决了国共争端和中国政局稳定，才能恢复中苏关系的稳定。8月15日，美国国务院在为罗斯福与孔祥熙会谈准备的文件中说明，应通过孔祥熙转告蒋介石，美国政府认为，国共达成协议可以使任何改善中苏关

系的行动“变得更容易”。[29]11月18日，罗斯福在获悉国民党方面拒绝“五点协议”后，曾立即指示赫尔利转告蒋介石，国民党应该与中共达成协议，这不仅仅是他的主张，也是“俄国”的观点；他要求赫尔利必须强调“俄国”两个字。[30]与此同时，罗斯福告诉孔祥熙，苏联并不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共产党，国民政府对中共应“设法容用”，而不必与中苏关系扯到一起，以免后患无穷。[31]

罗斯福政府的态度如此，苏联领导人此时亦无暇为处理中苏关系而举行谈判。苏联驻华武官曾在与美国外交代表谈话时，挖苦国民政府是用“不诚恳和孩子式的方式”提出宋子文访苏；苏联领导人现在正忙于欧洲战争，无法“为那种不诚恳的请求操心”。这时在国民党内部意见也不统一。宋子文和孙科等国民党要人认为，蒋介石在国共争端解决之前便企图改善中苏关系，既不明智，也不现实。美国的压力、苏联的冷淡和国民党领导集团内部意见的分歧等结合在一起，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先在国共谈判上花费一些精力。不过他从未放弃沿着另一条线索的努力，而且终于等到了一位理解他的处境并愿意合作的美国人——赫尔利。

赫尔利自从当上总统特使后，就一直密切关注中苏关系的动向。11月7日，他在前往延安的同一天还向罗斯福报告说，蒋介石有改善中苏关系的诚意。他特意提醒罗斯福不要忘记，苏联领导人同样表示过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32]既然苏联愿意同国民政府打交道，而蒋介石又急于领受苏联的善意，赫尔利肯定认为自己的建议不仅有根有据，而且做起来易如反掌。他甚至没等到华盛顿的答复，便为蒋介石操办起来。

1945年2月初，蒋介石在一次会谈中告诉赫尔利，苏联领导人已经同意于本月底或3月初，在莫斯科接待宋子文。国民政府为此次谈判准备的方案是：“（1）建立更密切和更协调的中苏关系；（2）建议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立刻参加对日战争；（3）融洽地讨论战后朝鲜的地位和苏联使用东北港口的问题；（4）战后中苏间的经济关系；（5）讨论保证未来中苏边界的和平。”他表示希望美国方面能提出某些修正和建议。赫尔利不仅赞成蒋介石的行动，而且要求罗斯福政府给予支持。他在向罗斯福政府报告这次会谈内容时说：理解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对解决中共与国民政府的矛盾至关重要”，而莫洛托夫已经将苏联的态度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了。[33]

蒋介石这时将调整中苏关系与召集国民大会作为对抗中共有关组织联合政府的建议的两项重大措施，赫尔利此时如此热衷于介入调解中苏

关系，其结果是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再次出尔反尔，以致谈判最终破裂。蒋介石之所以忽然气壮如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赫尔利的态度使他相信，有可能通过改善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达到孤立并最终“除掉”中共的目的。他在1月底的一次国民党高级会议上声称，“俄国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在远东不会骑上一匹“劣马”，而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强大起来以后，中共就会成为那种“劣马”。[34]

赫尔利自作主张，鼓励国民政府在事关美国整个亚太政策的问题上自行其是，立刻遭到来自美国国务院内部的抨击。国务院领导人警告赫尔利：美国政府一贯奉行的原则是不在中苏之间充当调解人，并坚持在调整中苏关系之前，促使国共达成协议。2月8日，国务院中国处在给国务卿斯退汀纽斯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中苏关系如何发展与所有同盟国家有关；在蒋介石准备与苏联谈判的问题中，有许多涉及美国和英国的利益，当然不能仅由中苏两国解决；蒋介石与苏联谈判能否获得预期的结果，取决于三种因素——谈判代表宋子文能否从蒋介石那里获得实权，宋子文能否使苏联相信国民党不会继续奉行反苏政策，以及国共关系的现状；其中国共问题是最关键的因素。[35]根据这个备忘录提供的中苏关系涉及的广泛背景，不论从哪个角度怎么看，赫尔利在中国的有关言行都是不合时宜的。

实际上，美国的战后亚太政策决定了它必然会介入调整中苏关系。它既不会允许国民政府擅自行动，破坏其战略规划；也不能容忍中苏改善双方关系时，将美国排斥在外，以致中苏之间达成的协议损害美国的利益。国务院此时反对赫尔利鼓励蒋介石自行处理对苏关系，充其量是感到条件尚不成熟，而赫尔利却认为这是给他苦心炮制的锦囊妙计泼冷水。他抱怨国务院是在贬低他在国共谈判中的作用，使他“仅作建议而不将这些建议付诸实施”，他的前任高斯就是因此失败的。实际上此时赫尔利的调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再不抓住中苏关系这根稻草，他就只有等着淹死了。2月下旬，赫尔利与魏德迈一起回国述职。随着他怒气冲冲地回到华盛顿，罗斯福政府内部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也从重庆转向华盛顿。

赫尔利是在他的调处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时回国述职的。他一再大包大揽，驻华使馆的那些美国职业外交官为他的一意孤行而忧心忡忡。他们既为美国在华利益面临灭顶之灾而担心，也为赫尔利的独断专行而苦恼。由于受到来自国务院的鼓励，他们不断上书华盛顿直陈己见，提

醒罗斯福政府需要在认清中国政治现实的基础上，保持住对华政策的灵活性。

2月14日，卢登和谢伟思向魏德迈提交了一份措辞尖锐的备忘录，抨击赫尔利的做法违背了罗斯福政府公开声明的对华政策。他们在备忘录中指出，美国亚太政策的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少的美国人生命的牺牲，打败日本”；根据罗斯福政府的公开声明，美国的目的“是要中国在政治上团结起来，这是有效地动员中国军事力量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当前造成中国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原因，是蒋介石推行保存实力、消灭异己的政策，而赫尔利的行动已经使国民政府确信，美国“会继续支持它，并只支持它”，“它会源源不断地收到更多的美国援助”。他们提醒魏德迈，“以外交手段解决国共分歧的努力已告失败”；目前明智的做法是由魏德迈发表一项声明，按照丘吉尔在南斯拉夫决定支持铁托时的做法，宣布美国将以打败日本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倾向为标准，评价一切政党；这样做的结果是“会给中国人提供一个至今未有的走向坚强团结的基础”，蒋介石将“被迫在政权上做让步和允诺组织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36]

两天以后，谢伟思根据他得到的情报向罗斯福政府报告说：国民党要员们已经确信，美国与他们一样对苏联抱有“怀疑和担忧”，并且会明确地支持国民政府，而赫尔利并没有设法打消他们的这种念头；国民党政府正准备以法国为榜样如法炮制，不过这是自欺欺人；中法两国的客观条件完全不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比戴高乐更虚弱”，“中国共产党却比法国抵抗阵线强大——而且正迅速变得更强大”。谢伟思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国际政治中的“手腕和知识非常有限”，他们习惯于“在不现实和盲目的乐观中，尽可能地狡辩和制造借口”。[37]

赫尔利离开重庆之时，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们越来越为中国局势的迅速恶化感到不安。他们经过讨论后决定孤注一掷，直言不讳地向罗斯福政府发出警报。2月28日，在赫尔利到达华盛顿之前，艾其森签署并发出了由谢伟思起草的一份报告（以下称“2·28”报告）。他们在报告中严厉地批评赫尔利奉行的政策，认为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蒋介石自认为力量强大的感觉，结果导致国民党不现实的乐观和不愿做任何妥协”；另一方面则促使中共领导人确信，美国已经决定“只支持蒋介石”，以致他们迅速地扩大和加强了中共军队的军事行动。在此局面下，罗斯福政府如果继续执行只援助国民政府的政策，中国的内战“将加速到来，中国的混乱将不可避免”。为了避免深陷泥潭，

罗斯福政府需要按如下两个原则调整对华政策：一是以向中共提供援助来代替来自苏联的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和干涉，首先应私下向蒋介石说明这样做的好处，如果仍遭拒绝，就应像丘吉尔解决南斯拉夫问题那样，采取“公开声明这种更激烈的步骤”。二是“先取得具体的军事合作，而以政治合作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为此应向蒋介石建议，首先组织一个有代表性、有实权的战时内阁，然后以中国各派军队达成仅在各自区域中活动的协议为条件，由一名经魏德迈授意和蒋介石指定的美国军官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这样既可以“提高美国的声望”，又可以“将共产党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以代替他们投入苏联的怀抱”。[38]

上述建议中的第一个原则是将矛头直接指向赫尔利，他们提出如果国共谈判破裂，美国不必幻想苏联的协助，而应果断地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迫使蒋介石让步。建议中的第二个原则完全不符合由蒋介石提出，遭到史迪威反对，得到罗斯福赞成，被赫尔利忠实执行，经国共谈判证明是行不通的方针——在中国以解决政治问题为军事合作的先决条件。

“2·28报告”在华盛顿引起一阵骚动。副国务卿格鲁很快将它上呈罗斯福，并要求赫尔利到国务院澄清问题。[39]3月5日，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与赫尔利爆发了一场面对面的争论。赫尔利在国务院看到艾其森签发的报告后，立即暴跳如雷，指责这是“对他不忠诚的行为”，扬言一定要“干掉”谢伟思“这个狗娘养的”。他当时嘲笑史迪威就是因此而被召回的，高斯和艾其森“根本没见过共产党人什么样”，而且“从来没能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弄到一起”；蒋介石表现出顽固不化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的地位变得“更牢固了”；赫尔利警告他的对手，军队中反对他的人“已经被消灭了”，现在国务院竟然仍有人持不同政见，他决心到陆军部和白宫去“战斗”。赫尔利劈头盖脸的非难，使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最终变成了一场驻华的职业外交官们是否忠诚的审查，而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回答变成了无罪辩护。他们不得不表示，尽管乐于奉陪赫尔利继续争论下去，但最后仍须由最高领导人做出决定。[40]

赫尔利痛斥国务院的外交官后，继续到陆军部和白宫游说。他和魏德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向美军领导人保证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只“靠很少一点”的美国援助，就可以打败共产党。然后赫尔利又经过两次访问白宫，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了罗斯福的支持。第一是在国共没有达成协议之前，不向中共提供援助；第二是争取苏联和英国支持美国的对华

政策。[41]

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的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了一次公开讲话。他在谈话中指责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是中国统一和民主的障碍，并故意把中共与军阀混为一谈；他声称中共的力量被高估了，国民党军队才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美国决不会向中共提供援助。[42]赫尔利的这篇讲话是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将转向“扶蒋压共”的信号，是罗斯福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基本完成的一个标志，也是赫尔利代表罗斯福政府在美英苏三大国中率先表明支持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立场。罗斯福政府迈出了借助国际压力解决国共问题的关键一步。

需要指出的是，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在调整中转上“扶蒋压共”的轨道，并不仅仅是因为赫尔利特别神通广大，尽管他个人的确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也是被一股强大的内在动力推动的结果，它发生在雅尔塔协定签订前后，此时不论国共争端如何解决，罗斯福政府必须确保使纸上的规划变成现实的格局。赫尔利不过先走了一步，罗斯福则是看到和置身于这种趋势后力图加以利用。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罗斯福更多地从美苏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全局着眼，力求在这一地区保持对美国有利的稳定，因而在决心全力维持蒋介石的统治时，仍有可能对中共做出某种妥协。3月中旬，他决定接受中共的要求，促使蒋介石允许中共代表参加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就是突出的一例。[43]赫尔利则完全是从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出发，企图利用美苏之间的妥协，向中共施加压力。赫尔利能够击败国务院里的反对派，罗斯福的支持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实不论是赫尔利的建议，还是罗斯福对他的支持，都大致反映了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内在逻辑导致的难以扭转的发展趋势。

二 不光彩的交易

由赫尔利提出、经罗斯福认可的美国调处新方案的主要特点，就是借助国际压力——主要是与苏联协调对华政策，迫使中共妥协。罗斯福政府尤其是赫尔利在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苏联是否会支持——至少不干扰赫尔利的调处工作。罗斯福政府在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一份文件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美苏英三国外交政策存在潜在的不协调的地区；美国必须在解决中国问题方面承担起领导责任，采取措施来使中国“成为远东一个主要的稳定因素”；然而，如果不能同苏联达成实质性的协议，美国能否达到这个目的是“值得怀疑的”；苏联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希望有一个对它友善的中国，而美国对此应给予“明确的保证”。[44]

自从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举行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结束以后，罗斯福持续努力与苏联协调对华政策。1944年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罗斯福指示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向斯大林说明，美方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使中国团结一致的人，因此不应让他的政府垮下去”，希望斯大林“在设法解决蒋和中共之间的问题时要耐心点”。6月10日，哈里曼“奉旨”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他向这两位苏联领导人介绍了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他说美国在中国的计划有三个要点：第一是扶持国民政府；第二是调处国共争端，“使它们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第三是使蒋介石“放宽国内政策”，即进行政治改革。哈里曼说他考虑的是“美苏联合的对华政策”，换句话说，是希望苏联领导人也能赞成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

斯大林对哈里曼提出的第一点没有异议，对后两点却报以嘲笑。他说那是“说来容易做到难”。他表示“美国应该而且可以在这方面起主导作用”，甚至可以“更加完全”地影响蒋介石；他认为蒋介石是“最佳人选”，但不是没有缺点，主要是同日本人“战斗不力”，而且周围有一群“无赖和卖国贼”；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是‘人造黄油’共产党”，不过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要同日本人作战”；蒋介石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与中共交恶是“愚蠢的”。斯大林最后声明，苏联“仍然以1924年对华友好条约为基础”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45]

罗斯福政府从斯大林的这番谈话中不会感受不到，国民政府与苏联打交道的困难程度有多高。苏联尽管不打算在蒋介石的统治地位问题上

与罗斯福政府尖锐对立，但同时也要求美国方面采取措施，改变国民政府的现状。苏联的政策简单地说就是在妥协的格调中，力图加强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制约。面对现实，罗斯福政府需要敦促国民政府进行民主改革，推动国共合作，否则就无法使苏联领导人接受美国的条件。这是罗斯福当时决定加快和更深入地介入国共矛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罗斯福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以及赫尔利在中国疲于奔命，都是为了在处理与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关系之际，尽快澄清中国的局势。

1944年10月，罗斯福政府利用丘吉尔访苏的机会，敲定了苏联对日作战的日程和军事部署。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苏联参战后会在亚太，特别是在中国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后果，美国应如何应付苏联在各地区可能采取的行动。

11月10日，回到华盛顿述职的哈里曼在白宫向罗斯福介绍了苏军对日作战的计划。罗斯福当即对苏军参战后的政治意图提出了疑问。他当时询问哈里曼，“如果俄国人进入中国，他们还肯出来吗？”[46]美国的担心主要聚焦于两个问题：第一，苏联是否会在打败日本后尽快从中国撤军；第二，苏联是否在苏军占领区扶植亲苏的自治政权，甚至可能是独立的政府。罗斯福当时尽管受到赫尔利那些夸夸其谈的报告影响，但仍然对苏军参战后的中国局势深感不安。

11月17日，罗斯福再次召见哈里曼，讨论与苏联对华政策有关的各种问题。哈里曼根据他的判断告诉罗斯福，苏联领导人同样急于使国共达成协议，以便苏军在东北向日军发动进攻后，可以利用中共军队保护苏军的右翼；苏联在参加对日战争之前，有可能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它向蒋介石妥协；如果国共之间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就会面临“与铁托在南斯拉夫的形势多少有点相似的局面”；苏联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支持中共，并向蒋介石提出“严厉得多”的条件；届时美国在中国会面对一个“结局不可能圆满的局势”。罗斯福当即授权哈里曼向斯大林询问清楚，苏联在对日宣战之前，“他们希望达成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协议”。哈里曼的答复是“中国整个的政治问题，我认为无疑会在我们和俄国人的关系上带来最大的困难”。[47]

回到莫斯科后，12月14日，哈里曼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他在会谈中根据罗斯福的指示，试图“套出”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全部政治意图。斯大林直率地告诉哈里曼：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应归还苏联。他随后又在特意准备的地图上画了一圈，说明苏联为了保护符拉迪沃斯托

克（即海参崴）港口的交通，希望租借包括中国的旅顺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地区；此外，苏联还需要租借从大连到哈尔滨，再由哈尔滨折向西北至满洲里以及向东连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全部铁路线。斯大林保证，除了这些条件之外，苏联并无意侵犯中国在东北的主权。[48]

斯大林提出的这些条件让罗斯福政府如芒刺背，但在迫切需要苏联尽早参加对日作战的情况下，罗斯福感到除了做出妥协之外，也别无选择了。苏联的地理位置加上军事实力等，使它在东亚地区居于强有力的讨价还价的地位。罗斯福政府在相关的国际事务中对苏联所求尚多，特别是国共谈判迟迟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些客观条件促使罗斯福决心将同苏联的交易进行到底。这毕竟算是借花献佛，慷他人之慨；更何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们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而且在那以前不知道做过了多少次。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了峰会，讨论打败德国后的对日作战问题和战后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罗斯福和斯大林为协调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后美苏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关系，用中国在东北的利权做了一笔政治交易。他们最终就战后东亚地区涉及的各种问题达成了协议，即史称的“雅尔塔秘密协议”。苏联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重申了承诺，苏军将于欧洲战争结束两至三个月后，即开始对日作战，并与国民政府缔结一项友好同盟条约，“以期用武力帮助中国达到从日本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目的”。作为交换条件，“雅尔塔秘密协议”规定：“1.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2.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权利，即（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的海军基地，（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交给苏联。”[49]“雅尔塔秘密协议”的产生标志着由于欧洲列强的衰落和日本行将退出亚太国际政治舞台，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美苏两个大国据主导地位的局面。

“雅尔塔秘密协议”是二战后期美苏合作的产物，反映了它们之间关系的特点；协议中包含着很多基于军事考虑的算计和妥协，是美苏双方在东亚的力量对比保持暂时均衡的产物。这种状况使中国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美苏两国谁能更妥善地处理对华关系，谁就能在双方的较量中

取得优势，并限制对方的发展。按照罗斯福政府战时的设想，既然美国在战后要称雄亚太，就必须在东亚大陆中心的中国取得支配地位。中国本来是罗斯福政府设想的亚太政策的重心，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羸弱，现在却成为美国亚太战略中非常薄弱的环节。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中向斯大林妥协，承认苏联在中国局部地区享有特殊的利益，就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国民政府的严重弱点。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罗斯福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华政策，其方向是在“雅尔塔秘密协议”规划的格局中，在促使苏联按照承诺参加对日战争的同时，通过稳定地控制住中国局势，确立美国战后在这个地区的优势地位。为实现这个目标，罗斯福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通过调整中苏关系，促使苏联保证承认国民政府在战后对全中国的统治。调整中苏关系已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不论是美国领导人还是4月回到重庆的赫尔利，都把主要精力首先用于推动中苏谈判。至于如何解决国共争端，他们以为水到自会渠成。

苏联这个时期对亚太地区的政策的出发点是取得并保护它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不过其目标总的来看还是有限的。它们包括维护亚太地区（主要是东亚大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保卫苏联东部边境的安全以及获取某些特殊的权益。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消除最后一个战争策源地，将日本势力逐出它在东亚的占领地，从而根本解除日本对苏联安全的长期威胁；另一方面是利用苏军参加对日作战所必然产生的巨大影响，努力制造一块缓冲地带，防止战后新的侵略势力进入以致苏联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利益，包括安全利益和优越的经济利益等受到新的威胁。

欧洲战争结束之际，苏联断然宣布中止《苏日中立条约》，积极准备向日军发动进攻，这是完成其亚太战略的重要步骤。不过这仅仅是第一步，苏军的行动必然会引起地缘政治上的连锁反应，对亚太地区，首先是东亚大陆地区的国际力量对比产生深远的影响。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在打败日本后，苏联在这个地区将面对一个野心勃勃、决心雄踞亚太的美国以及一个像火药桶一样，随时可能出现爆炸局势的混乱的中国。妥善处理在这个地区的对美和对华关系，将是苏联战后亚太政策的中心问题。

苏联在东亚处理对美关系的基调是通过妥协，争取让美国承认它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利益。除了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的影响外，苏联采取这种

政策是因为它在战后的主要任务必定是重建家园，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苏联不愿意也不能承受因与美国发生冲突而再受战争摧残，即使是军备竞赛也不能承受，它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休养生息。但是，苏联的妥协并不是无限制地让步。苏联既不希望在东亚与美国对抗，也决不允许美国在东亚扮演日本曾经扮演的角色，以免美国势力无限制地扩张，危及苏联东部边境的安全。

苏联以妥协为基调处理对美关系，必然会影响到它处理对华关系的政策。中国是苏联设想的亚太安全缓冲地带中的关键地区，中国的政治局势如何发展，是决定美苏在亚太的关系能否稳定的重要因素。苏联基于对未来与东部边疆毗邻地区的稳定与安全的考虑，希望促使中国内部政治形势稳定，并努力使中苏关系得到改善和稳定。不论是中国发生内战，还是中苏关系恶化，都有可能招致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干涉，甚至有可能演变为苏联与美国的直接冲突。因此，苏联也需要调整中苏关系和解决国共矛盾。它基于切身利益，不能不关注甚至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

“雅尔塔秘密协议”签订后，苏联领导人采取的行动表明，它的优先目标首先就是改善中苏关系，即利用苏军参加对日战争的特殊条件，通过谈判一举解决中苏之间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地发展奠定基础。其次，在中苏关系获得改善的条件下，利用其特殊的政治影响来推动国共谈判，使中国出现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从而杜绝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干涉的借口。换句话说，国民政府也只有接受苏联与美国谈妥的条件和奉行对苏友好的政策，苏联才有可能在解决中国内部问题方面给予支持。

苏联领导人虽然一再表示相信在中国，国民党才是唯一有力量统一中国的政治集团，但他们完全清楚国民政府的性质和两国间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因此，在改善中苏关系时，苏联实际上奉行的是一种可以称为“中立国民政府”的政策，目的是影响国民政府的内政和外交，迫使它不敢积极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免使中国变成东亚的一个反苏基地。一方面，作为在亚太地区对美妥协的一部分，以及基于对中国政治力量对比的估计，苏联领导人一再声明，他们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承认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也不断强调，他们对国民政府“有许多保留意见”，抨击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各种不合时宜的内外政策，谴责国民党内存在严重的反动势力及种种倒行

逆施；苏共还借助舆论公开对中共争取民族解放和推动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斗争等表示同情与声援。事实表明，苏联承认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是有条件的，而实现这些条件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足以使中苏关系稳定、和睦地发展。

苏联与国民政府改善关系必然要影响它与中共的关系。苏共与中共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两党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成员。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苏联领导人对中共中央在抗战爆发后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很多政策，包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拒绝按照苏军统帅部的命令在华北地区与日军进行正规战等，既不能理解，也很不信任，以致苏联领导人一再公开或私下称中共是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当然他们也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的。[50]从本质上说，中苏两党分别代表着两个民族的利益。也正因为双方关系中存在这种特点，苏联必然要利用它与中共的特殊关系施加影响，以防止独立不羁的中国共产党人擅自行动，干扰苏联的对外政策。

然而，苏联和中共在处理同美蒋的关系中，毕竟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苏联在利用中共的力量牵制美蒋方面，显然是留有余地的。必须指出，由于美国和国民政府把改善中苏关系与解决国共争端拉扯在一起，并经常蛊惑人心地把中共说成是苏联在中国的政策工具，苏联领导人经常在公开场合或私下向美国方面表示，苏联在外交方面与中共没有多少联系，这是有其策略方面的考虑的。事实上，这时苏联的确已经同中共没有多少联系了。问题在于，苏联在亚太地区热衷于大国外交时，过于轻视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甚至还利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党际关系，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使之服从苏联的对外政策。苏联的这种做法在道义上是不光彩的。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美苏基于各自的利益，都开始为推动中苏谈判进行积极准备。赫尔利在4月返回重庆后，已经将推动中苏谈判当作他的首要任务。在到达重庆之前，他途经莫斯科，在那里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讨论了与雅尔塔会议有关的问题。斯大林在会谈中表示，苏方也可以给赫尔利全权，由他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何时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内容透露给蒋介石。[51]赫尔利在重庆期间，不断说服蒋介石，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应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的精神，做出必要的妥协。5月10日，他向罗斯福逝世后继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报告说，根据他与蒋介石会谈后的理解，在涉及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问题上，蒋介石除了不

同意“雅尔塔秘密协议”中“优越权益”和“租借”两个词以外，几乎同意了那个协议中的每一条。[52]赫尔利显然认为，促成中苏谈判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希望杜鲁门政府尽快授权他向蒋介石提出举行中苏谈判的建议。

4月下旬，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他在白宫第一次会见杜鲁门时，就曾询问后者作为罗斯福的继任人，是否准备履行其前任在雅尔塔会议上声称要承担的义务，促使中国接受“雅尔塔秘密协议”中的有关规定。杜鲁门当即保证，美国方面将承担在雅尔塔会议上承诺的全部义务。[53]莫洛托夫随后就在旧金山向宋子文发出邀请，表示欢迎他访问莫斯科。

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使中苏谈判直接被提上议事日程。5月下旬，杜鲁门派其前任罗斯福最信任的顾问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再次同斯大林讨论如何协调美苏在各地区的政策。28日，霍普金斯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谈，他们详细讨论了苏联参战和对华政策等问题。霍普金斯首先提出，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在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将在何时对日宣战。斯大林答复说，苏军准备于8月向日军发动进攻，目前正为此积极准备。霍普金斯随后表示，杜鲁门政府希望了解苏联对中国内部统一问题的见解。斯大林声明，苏联并没有专门的计划，他赞成中国成为“完整的、稳定的国家”；蒋介石应“成为统一中国的承担者”，因为他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不如蒋介石那样好”，而且他们“没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当霍普金斯表示美国将在中国坚持门户开放政策时，斯大林说：“美国是战后能够用自己的资源在经济上援助中国的唯一国家。”[54]

斯大林的上述谈话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苏联肯定会履行以往的承诺，按时对日本宣战；第二，苏联对日宣战后，将奉行支持由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政策；第三，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苏联的条件则是杜鲁门政府确实履行“雅尔塔秘密协议”，协助推动中苏谈判取得成功。美国方面当然对此感到满意，杜鲁门一接到苏联希望于7月1日以前开始中苏谈判的通知，便决定马上通知国民政府，宋子文应该尽快去莫斯科报到。[55]

霍普金斯与斯大林5月28日的会谈是欧洲战争结束后，美苏协调其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事件。以此为标志，美国调处国共矛盾的独角戏开始演变为美苏的二重唱。从这个角度看，中苏谈判则是这场二重唱的序

曲。

中苏谈判于6月30日开始，至8月14日结束，分两个阶段进行，前后历时一个半月。这次谈判是根据雅尔塔会议的精神调整中苏关系，使美苏两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有关中苏关系的秘密交易合法化。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已成为历史潮流的时代，在全世界人民高举着民主自由的旗帜继续同法西斯浴血奋战的时刻，美苏作为《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家宣言》的主要签署国，用中国的利益做了一场交易，但这个交易起码在形式上还要取得物主的同意。这次中苏谈判虽然不过是迫使当事国政府承认“雅尔塔秘密协议”的一个手续，其过程的复杂程度却大大超过了美苏的预计。

苏联领导人在中苏谈判中坚决贯彻他们的既定方针，依靠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有利地位和与美国协调亚太地区政策的巨大影响，充分利用国民政府对中共迅速发展以及苏联可能给予其援助的恐惧心理，迫使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和接受苏联在中国东北取得优越权益等，从而牢固地控制住苏联所谓东方安全缓冲地带的中心环节。

根据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口头协议，雅尔塔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必须对国民政府保密，直至苏军从西线调25个师部署到东方前线为止。他们的理由是防止国民政府过早知情，泄漏苏军参加对日作战的意图和军事准备。在上述5月28日的会谈中，斯大林毫不隐讳地告诉霍普金斯，苏军何时开始行动“有待于履行雅尔塔协议中与苏联愿望有关的条款”。他解释说：“为使苏联人民看起来参加太平洋战争是正当的，有必要履行这些协议。”[56]斯大林实际上是在暗示霍普金斯，杜鲁门政府必须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美苏的安排，否则苏联就有可能按兵不动。霍普金斯有足够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对苏联领导人的提醒心领神会。

尽管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不断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会谈的内容，但直到6月12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在会见蒋介石时，才具体告知苏联方面关于缔结中苏条约的条件，即“一、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二、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的权利。三、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在东三省主权完整条件下，组织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四、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应保持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五、库页岛南部及与其接壤诸岛，以及千岛群岛，应归

苏联。”彼得洛夫当时解释说：“苏联是一个太平洋沿岸的国家，苏联在太平洋需要有不冻港。”这是极其荒谬的逻辑，不过彼得洛夫说得一本正经。他也没有忘记提醒蒋介石，他提出的这些条件已获得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57]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理对苏关系的考虑也是极为复杂的，同样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不过其宗旨最终仍然是维护其一党统治。国民政府在谈判中的立场不论是软化还是强硬，最终都以能否巩固和加强它在国内斗争中的地位为底线。在中苏谈判开始之前，蒋介石分别于6月12日和26日向彼得洛夫阐述了国民政府的立场。他说关于旅顺港问题，绝对不得使用“租借”一词，否则就会使中国成为“不平等国家”，并且使中国“领土不完整”。蒋介石拒绝苏联“租借”旅顺不仅仅是一个名誉问题，更是要确保国民政府对该港口的管理权和使用权。关于外蒙古前途的问题，国民政府可以给予高度自治，包括准其自行决定外交和军事问题，但主权应属中国。外蒙古的地位是中苏之间长期存在的争端，两国在1924年5月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达成了协议，现在国民政府坚持既有立场也是必然的，否则有可能在国际上引起不良的连锁反应，甚至造成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不稳定。蒋介石最后指出，中苏两国间的事情可以由中苏双方自己解决，“美国同意与否，没有关系”。[58]蒋介石强调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是使苏联不要因为担心中美结盟而提出太苛刻的条件；第二是试图预先堵住苏联方面的嘴，以免他们总是利用美苏之间的秘密谅解，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其实蒋介石心里应该非常清楚，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严重地依赖美国，杜鲁门政府的态度变化是决定国民政府的妥协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很可能斯大林也是这样估计的，所以他在以往的谈判中才表示希望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发挥作用”。

中苏谈判正式开始后，苏方的谈判者是斯大林本人，中方则是行政院长宋子文。他于6月30日到达莫斯科，第二天即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7月2日开始谈判，斯大林向宋子文详细解释了苏联方面对“雅尔塔秘密协议”中各项条款的理解。他首先解释了苏联提出给予外蒙古独立的理由。第一是为了加强苏联对抗日本的战略地位，第二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说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正当理由。他甚至表示，如果苏联在外蒙古没有自己的“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斯大林这是在暗示宋子文，国民政府必须接受苏联的要求，否则苏联对抗日本的战略地位就没有“加强”，苏联人民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反法西斯战争打到底，

意即苏联有可能不出兵对日作战。宋子文当即表示不能接受斯大林的解释。他坦率地告诉斯大林，国民政府的困难同斯大林的困难差不多，它无法向中国人民说明为什么要“放弃一部分领土”，而且接受这一条甚至会导致国民政府垮台；苏联既然要在外蒙古拥有驻军自卫的“法律权”以“对抗日本”，那么国民政府宁愿给予外蒙古高度自治权。

关于东北的港口和铁路等问题，斯大林首先提出，大连港需要“国际化”，但应该由中苏组成联合公司来共同管理；由中方人员任理事长，苏方人员担任经理；关税收入双方各得一半。他提出苏联要求这样做的理由是，“雅尔塔秘密协议”中承认，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权益必须“获得保障”。宋子文则指出，大连港“国际化”的含义是使之成为自由港，管理权应属中国，而苏联可以享有优越的商业利益；如果苏方坚持中苏联营并分享关税，会导致中国航运转向其他港口，结果必置大连于死地。宋子文还声明，旅顺港应由中苏海军共同使用，不能再提“租借”。斯大林表示，在用什么词的问题上可以“迁就蒋委员长的愿望”。斯大林随后提出，中东路应由中苏共同经营，经理由苏方人员担任，铁路所有权归苏联，期限暂定为40～45年。与会的莫洛托夫补充说明，苏联还应控制与铁路有关的煤矿。宋子文则坚持“共同经营者”系指中东铁路的干线，支线和沿线厂矿企业等均不应包括于条约之内。

关于中国内部问题，斯大林建议国民政府能“容纳若干自由分子参加”。他特别说明，这里所谓的若干自由分子“不限于共产党”；而且“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者”，至于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则“颇有疑问”。宋子文则强调，国民政府只能在军令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允许中共代表参加政府；政府的领导权属国民党，而且决不能搞联合政府。斯大林对此表示谅解，认为宋子文表达的是“国民党的正当愿望”。[59]

在7月2日的会谈中，双方的争论首先集中在外蒙古的前途问题上，结果是谈判因此陷入僵局。7月4日，宋子文打电报向蒋介石建议：如果苏联在外蒙古前途问题上坚持其立场，就应该中止谈判。7月7日，斯大林与宋子文再次讨论外蒙古问题。宋子文坚持中国对外蒙古享有宗主权，不过可以给予其“高度自治，军事、外交均可自主”，其中包括外蒙古行政当局有权允许苏联在该地区驻军。斯大林也拒不让步，声明如果中方不承认外蒙古独立，苏联就不能签订中苏条约。双方立场如此尖锐地对立，宋子文感到已无挽回余地。他立即电告蒋介石：外蒙古问题事

关重大，如不打算继续谈判，他准备于11日外蒙古独立节之前返回重庆。[60]国民政府之所以在外蒙古前途问题上一再据理力争，主要是因为经过抗日战争，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如果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作为战胜国仍要丧失国家权利，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会被严重削弱。

但是，当苏联领导人坚定地要求以承认外蒙古独立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先决条件时，蒋介石不能不重新权衡利弊。7月6日，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经讨论决定在外蒙古前途问题上对苏妥协。蒋介石在会后打电报指示宋子文，承认外蒙古独立在形式上应由国民政府提出，经外蒙古人民用公民投票的方式解决，不得就此问题与苏联订立任何秘密协议。作为交换条件，应要求苏联保证：第一，中国对东北拥有的领土、主权及行政管理权必须完整，其中包括旅顺的管理权应归中国，军港可共同使用，不可共同管理；大连可成为自由港，行政管理权应归中国；中东路干线由中苏共同经营，由中国方面负责管理；中东路支线、附属厂矿企业不包括在内。第二，苏联不得支持中共和新疆地区的所谓匪乱。如果苏联不接受上述条件或不给予具体答复，宋子文可以中止谈判。[61]

7月9日，宋子文向斯大林转述了蒋介石的建议，并声明国民政府是为了与苏联合作才“忍痛牺牲”的，希望斯大林能投桃报李。斯大林立即表示：苏联将封锁与新疆接壤的边境地区，禁止运输军火，并协助国民政府平息新疆的“叛乱”；国民政府提出在中国军令政令统一是合理的要求，苏联只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不会向中共供应武器，并将停止对国民政府的批评宣传；苏联尊重中国在东北的领土、主权与行政权的完整。[62]由于国民政府与苏联在外蒙古前途问题上各得其所，谈判很快集中到东北问题上。

7月9日，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了苏方提出的关于东北地区港口和铁路问题的条件。苏联方面提出两方面的条件。第一，港口。旅顺辟为军港，仅供中苏舰船使用，军港及旅顺市由苏联负责管理；大连港可供各国商船使用，但应辟出部分水域专供中苏船舶使用，苏联可在港口地区驻扎并调动军队；大连市政府由中苏各派5人组成，市长由苏方代表担任，大连港由苏方主管；在大连和旅顺的规定区域之外，由中国管理，所派行政人员应经苏联军事当局认可，并遵守苏军当局颁布的治安命令。第二，铁路。国民政府应承认苏联恢复其在中东路和南满路中长春

至旅顺、大连各段的所有权益，其中包括铁路所属工矿企业、建筑物和森林土地；苏联同意国民政府参与铁路的管理，为此组织一中苏联合公司，设董事7人，苏方4人，中方3人；董事长由苏方代表担任，协议期限40年。[63]苏联方面提出的这个协议草案不仅超出雅尔塔秘密协议的规定，而且超出斯大林于7月2日提出的条件。这表明苏联实际上打算完全控制大连和旅顺两港，以及中东路和南满路的南段及其附属的工矿企业等。

同一天，宋子文将国民政府起草的协议草案交给斯大林。在9日、11日和12日的正式谈判中，中苏双方就东北港口和铁路问题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宋子文在7月9日的会谈中说明，根据1924年5月中苏达成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苏联在1935年已将中东路售予日本的事实，苏联不应再享有中东路的所有权；东北有关铁路的共同管理和经营仅限于干线，不应包括其他内容。11日，宋子文进一步提出：苏联不得利用东北铁路运兵，路警必须由中国方面派遣；如在旅顺港的苏联驻军确需调动，可通过海路进行；中东路公司的理事会应由5名中国代表和6名苏联代表组成，理事长和经理均由中方代表担任。宋子文还提出，大连和旅顺必须由中国管理，旅顺可设苏联军事指挥官一人，权力限于管理旅顺军港。斯大林除同意由中方负责东北铁路的警卫和苏联不经东北铁路运兵之外，其余一概予以拒绝。[64]

此时，美英苏领导人即将在波茨坦召开会议，而苏联领导人急于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之前达成协议。他们敦促宋子文尽快接受苏联方面的条件，斯大林甚至提出，可以设法推迟美英苏三国的首脑会议，以等待蒋介石的电报答复。宋子文则以苏联方面的要求已经超出国民政府对他授权的范围为由，声明必须返回重庆与蒋介石当面详细磋商，否则不可能对苏方的建议做出任何答复。[65]7月14日，宋子文返回重庆，中苏谈判暂时中断。

中苏谈判的第二阶段于8月7日开始，至14日结束。这一阶段的谈判是在对日战争发生根本转折的背景下进行的，国民政府的主要谈判代表改为外交部长王世杰，宋子文继续参加谈判，从旁协助并提供咨询。

7月26日，美英苏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并警告“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66]8月6日和9日，美空军先后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正式向日本宣战。9日0时，苏军同时向中国东北的东部、北部和西

部边境发起突击；12日，在外蒙古集结的苏军兵团越过大兴安岭，以每天100公里的速度长驱直入，冲向长春和沈阳。在盟军摧枯拉朽的联合进攻的打击下，日本政府于8月10日发出乞降照会，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此期间，中国战场也在发生巨变，后来的发展证明，其中对亚太国际关系冲击最大的是中共军队开始进攻日军。8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宣布“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他号召一切人民抗日武装配合苏联红军，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坚决消灭一切不愿投降的日本侵略者。[67]8月10日、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连续发布七道命令，中共军队立即开始在东北、平津、归绥、太原、平汉、陇海、济南、胶东、津浦、沪宁、运河、广九等地区前线，向日军发动全面反攻。[68]

对日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对苏联和国民政府都造成了一定压力。对苏联来说，如果日本宣布投降而中苏谈判仍无进展，势必在外交方面造成某种困难，使苏联无法利用苏军占领东北地区的有利时机，以合法形式在东北获得优势地位。这不仅会影响中苏关系，而且有可能牵涉到美苏关系。苏联领导人在与美国和国民政府交涉时，曾经一再强调如果不能保证得到某些报偿，苏联人民将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向日本宣战。但是，苏军向日本发动进攻时，显然没有以中苏谈判取得成功为条件，而苏联人民却表现出充分理解苏联政府决定参加埋葬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的高度政治觉悟。既然事实如此，苏联领导人的借口只能做这样的解释：如果没有中国的邀请，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后，便没有理由向中国索取报酬。苏联领导人的确怕有“师出无名”之嫌，不过师出无名并非对日作战无名，而是从中国攫取利权无名。

至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眼看着苏军迅速席卷东北甚至前出到华北，如果继续坚持不做出让步的话，苦心经营的在国际上孤立和包围中共的计划很可能前功尽弃。斯大林在谈判中的确利用了苏军开始在东北对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局势，向王世杰、宋子文等施加了压力。国民政府无疑从中感受到巨大的威胁。蒋介石在中苏谈判中断期间曾经向苏方声明，国民政府决不能再后退一步；此时却不得不授权宋子文“权宜决定”。[69]国民政府除了维护“面子”，已经不再顾及其他了。也难怪密切跟踪中苏谈判进展的哈里曼认为，宋子文虽然做出据理力争的姿态，但最终仍会妥协，除非美国向苏联施加影响。[70]而事实证明杜鲁门政府所能施加的有限影响也无济于事。

苏联和国民政府基于对各自利害关系的考虑，在第二阶段谈判中均做出一定让步。斯大林提出的折中办法是由中国负责大连市和大连港的行政管理，港务局局长由苏联代表担任，港口设备所有权为中苏共有；大连划入军事区，在和平时期不对大连市、大连港和与之相连的铁路实行军事管制。至于旅顺港，军事和行政管理均由苏联人负责，为照顾国民政府的“面子”，可设立一个中苏军事委员会；南满铁路延伸至旅顺军事区部分，不受旅顺军事当局管辖。关于双方共同经营东北的铁路，可在中苏联合公司中设10名董事，双方代表数量对等，董事会主席由中方代表担任；中东路与南满路只能设1名经理，由苏方代表担任，副经理可为中方代表。王世杰和宋子文表示基本接受了苏方的建议，他们提出的修改是在铁路管理方面可设置1名苏联经理，不过在遇到分歧时，董事会主席享有决定性投票权。斯大林对此未持异议。

宋子文、王世杰等报告蒋介石，认为已经不可能迫使苏联再做让步；签订中苏条约的好处是可以澄清中苏关系，保证苏联从东北撤军，并能削弱中共力量。8月12日，他们打电报给蒋介石，声称“倘再迁延，极易立即引起意外变化”。[71]他们在获得蒋介石批准后，接受苏方的全部条件。8月13日晚，中苏双方达成协议。14日，莫洛托夫和王世杰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继“雅尔塔秘密协议”之后的又一笔交易，苏联和国民政府各有所获。由于《条约》及一系列附属协议的签订，苏联基本达到了战略目的。它通过控制东北的主要铁路交通和获得在重要港口的驻军权，实际上控制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战略要地。这不仅使苏联在东北获得了优越的权益，而且可以阻止其他大国的势力在战后进入东北，苏联的东方安全防波堤从此合龙。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于国民党也不是只赔不赚。它损害的是中国的利权，国民政府却从中得到苏联支持它在中国实现军令政令统一的保证。《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换文的第一条明确规定：“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关于东北苏军与国民政府之关系，《条约》规定：由国民政府派代表在东北收复区“设立行政机构”“树立中国军队”。[72]难怪条约签订后，国民党大员们欢欣鼓舞。宋子文告诉哈里曼，他“受到相当大的鼓舞”；宋美龄也向杜鲁门赞美中苏谈判的这种结果；孙科则声称，苏联保证支持国民政府和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是对中国统一的“最

大贡献”；王世杰对条约表示“甚为满意”，并宣布“中苏两国政府间应立即办理批准条约和交换照会的工作”。蒋介石则告诉赫尔利，中苏条约表明“（一）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二）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主政府的努力；（三）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73]

正是由于有了某种虚幻的充实感，蒋介石才立即接受赫尔利和谋臣策士们的建议，在抗战一结束便向中共发动政治攻势，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很难想象，一个被决心以武力消灭异己的国民政府如此欣赏的条约，会成为远东和平的“基石”，会给中国内部问题的顺利解决带来福音。

三 一个帝国主义者的逻辑

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反应最积极且强烈者莫过于赫尔利了。中苏条约签订之前，赫尔利在中国的调处已经走到山穷水尽之地，他越来越像一个不断输掉本钱的赌徒，《条约》的签订被他看成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在赫尔利看来，他从华盛顿回到重庆后所推行的政策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关键性因素，第一是苏联在国共问题上是否真的会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保持一致，第二是中共中央是否会因追随苏联而改变政策。中国政治的现实和在第一阶段调处的失败，本来应该可以使赫尔利在观察这两个问题时，头脑变得清楚一些，而且杜鲁门政府内部也继续发出一些颇有见地的劝告。但是，他似乎宁愿对现实视而不见，对杜鲁门政府中的一些更有中国问题经验的有识之士的劝告充耳不闻。赫尔利相信，不论是罗斯福在位时还是杜鲁门接任总统之后，美国政府通过在国际舞台上努力争取，就可以圆满解决第一个问题。至于第二个问题，他自有一套荒诞的逻辑。

1945年4月2日，就在赫尔利在华盛顿新闻记者俱乐部向美国媒体阐述美国对华政策的同一天，美国国务院中国处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提醒赫尔利需要注意到，他的言行有可能造成一种困境：一方面蒋介石可能认为，赫尔利会“创造一个‘国际环境’”，使蒋介石和“他的政府不会在让步中垮掉”；另一方面，赫尔利如果想达到目的，就必须向中共施以“坚定和持续的压力”，但问题是美国方面并“没有有效地施加压力的现成手段”。[74]但赫尔利对后一点似乎胸有成竹，或者假装自信满满的样子。

4月3日，赫尔利离开华盛顿，取道伦敦和莫斯科返任。他是根据罗斯福的指示选择这条路线的，其目的是沿途争取丘吉尔和斯大林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赫尔利第一站在伦敦会见了丘吉尔和外相艾登。丘吉尔当时毫不掩饰地挖苦赫尔利的计划是“伟大的美国式的梦想”，不过英国对东亚事态的发展已经无能为力，即便明知是个“梦想”，也只能追随其后。[75]在莫斯科，赫尔利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赫尔利在会见中告诉他们，国共之间的分歧仅属细枝末节，而美国方面的打算是“第一，支持一切统一中国军队的努力；第二，赞成中国人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政府的热望”。为了尽快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决定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而他在中国的努力是为了使“中国人自己选出他们的领导人，自己做出决定，并为自己的政策负责”。赫尔利是在

表白罗斯福政府过去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希望以此换取苏联领导人也摆出对等的姿态。不过赫尔利也太大言不惭了，如果他确有诚意尊重中国人民的意志，承认中国人民有权自己做出选择，又何必跑到莫斯科来统一认识？苏联领导人倒是一如既往，斯大林痛痛快快地表示，他可以确认之前他关于中共主要是为了争取改善民生的政党的看法，而且“赞成”赫尔利在这里阐述的美国对华政策，并“愿意协助”。[76]

赫尔利自认为不虚此行。当他兴高采烈地回到重庆时，竟自以为可以以三大国的代表自居了。赫尔利告诉蒋介石，经他穿针引线，美英苏“三国意见，业已一致。政策即为促成中国之军令统一，使其为一独立、民主、统一之国家”。蒋介石则表示非常满意，读了赫尔利“4·2讲话”后，的确“引以为快”。[77]

4月28日，赫尔利在重庆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宣布，他在华盛顿会见了罗斯福和斯退汀纽斯，在伦敦会见了丘吉尔和艾登，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他与这些领导人讨论了中国问题，然后三大国已经就对华政策取得一致意见。当记者问到苏联对华政策时，赫尔利故弄玄虚地答复说，即将到任的苏联驻华大使会说明苏联对中共的态度。赫尔利的行为使他看上去更像是蒋介石的外交部长。他公开发表这种讲话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以所谓“三大国一致”的对华政策，向中共施加压力。

赫尔利自以为是地放言高论，很快引起杜鲁门政府中一些苏联问题专家的严重不安。他们担心赫尔利过分解读了苏联领导人的谈话，进而过度依赖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保证，这会将美国对华政策引入绝境。4月19日，哈里曼向美国务院远东司负责人说明：赫尔利关于与斯大林谈话的报告尽管事实是准确的，但他从中得出的结论过于乐观。哈里曼断言，苏联领导人不会“无限制地”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合作；特别是当苏军开始向日军发动进攻时，如果国共争端仍未解决，中国不能组成一个统一的、对苏联友好的政府，苏联领导人就会“充分利用支持中国共产党，甚至在东北，如果可能也在华北，组织傀儡政府”。哈里曼认为，赫尔利不仅是在自我陶醉，而且也会使蒋介石“过分乐观”；杜鲁门政府应该采取行动督促赫尔利“谨慎从事”，不要“唤起那种没有道理的希望”。[78]

三天后，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的凯南发给国务卿一份报告。

他在报告中指出：即使是同样的词句，其含义“对于俄国人与我们并不相同”。苏联领导人在与赫尔利会谈时如此痛快地使后者感到心满意足，就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中共领导人的同意，美国的计划充其量也就是纸上谈兵。凯南认为：“苏联的对华政策将如同最近一段时期一样，是一种流动而有弹性的政策，目的是在亚洲与苏联接壤的地区尽最小的责任，赢得最大的利益。”苏联领导人为此首先会设法改善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如果不能达到目的，他们就准备与地方性的军队合作。凯南提醒美国领导人，“在此紧要关头，我们本来就急于得到苏联的支持，再加以斯大林所用的言词……引导我们过分依赖苏联的援助，甚至认为苏联会默认美国实现在中国的长远目标”。[79]此时，已调到美国驻苏大使馆工作的戴维斯亦在给哈里曼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根据苏联政治制度的特性，即使苏联控制着中共，“也不是通过政府系统，而是通过党”，而事实是苏联对中共中央的影响“被高估了”。[80]

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们还注意到，苏联的舆论并没有因为苏联领导人对赫尔利做出保证，而停止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抨击，也没有停止对中共的赞扬和支持。他们认为这种状况表明苏联更积极地关注中国，以及正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更积极地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总之，在他们看来，不论是从苏联是否会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还是从中共中央是否会接受苏联的影响等角度分析，赫尔利都没有理由因为同苏联领导人谈过那些话，就对解决国共问题的前景如此乐观。

与此同时，美国务院中国处的外交官们也在借杜鲁门接任总统的机会向赫尔利反攻。他们指责赫尔利的言行背离了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精神，而且完全是在另搞一套，并且赫尔利竟然对杜鲁门政府的相关部门封锁消息，仅把那些“赞成国民政府的报告送呈国务院”。他们将赫尔利的言行冠以“赫尔利政策”，并指出这个政策正在助长“蒋介石在解决内部统一问题上的不现实”（倾向），赫尔利“不明智地将美国对华援助仅限于蒋介石的军队”，结果损害了美国在中国的地位；这不仅导致“中国内部混乱”，而且“使（中国的——引者注）外部关系严重地复杂化”。他们提醒美国领导人必须注意，中共的力量正在迅速发展，他们“显然希望得到苏联援助”；而“国民政府正寻求美英的支持”；美苏在国共争端中各支持一方的状况即将形成，而这“孕育着远东和世界未来的和平被炸毁的可能性”。[81]

面对杜鲁门政府内部的一片警告之声，美国领导人不得不提醒并要

求赫尔利注意，苏联领导人尽管保证支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实现政治和军事统一，美国仍“有必要面对这种可能性，即斯大林的保证与目前的形势直接有关，而这种形势不会长期持续不变”；苏联一旦积极介入亚太国际事务，肯定会按照对其最有利的方式，重新审订对华政策；赫尔利当前的首要责任是使蒋介石“充分觉察局势的急迫”，尽快实现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统一，为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建立一个基础”。5月7日，副国务卿格鲁打电报给赫尔利，转达了国务院的关切，并告诉他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主旨是“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促进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使它“能够担负起国际和国内责任”；美国在继续支持国民政府的同时，应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应该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理解，美国的支持并不是“应有尽有的银行支票”。[82]

赫尔利并不把来自杜鲁门政府内部的非议放在眼里。自从罗斯福逝世以后，他已自诩为罗斯福和杜鲁门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当然诠释者。赫尔利假道伦敦、莫斯科回到重庆后，4月12日，他与蒋介石举行了一次会谈。赫尔利在会谈中告诉后者，他4月2日在华盛顿对新闻界发表谈话以及返任途经伦敦、莫斯科等地分别会见英国和苏联的领导人等，这些行动都是得到美国总统和国务院授权的。[83]赫尔利自认为有权解释此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并据以推行之，对于他来说也是有理由的。所以，他接到国务院的指示后，很快就发起了反击。

5月20日，赫尔利直接打电报给总统杜鲁门，向这位新任总统讲授战时美国对华政策史，以便充分证明他在执行罗斯福总统的指示方面，肯定是循规蹈矩的。赫尔利告诉杜鲁门，早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美国政府就有力地声明承担责任，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各方面支持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美国与中国签订的租借援助协定继续了同样的政策。美国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承认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罗斯福派他使华，就是为了“阻止国民政府崩溃和协调中国政府与（美国）军事机构之间的关系”。罗斯福完全了解国民政府的缺点，但是他仍然认为“在中国，美国无法指望从其他政权、政府或任何其他领导人那里获得的支持和合作等，会比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那里得到的更多”。赫尔利声称，他和魏德迈已经“阻止了”国民政府的崩溃，国民党军队也已经“稳定并支持住了”，还在“某些地方发动了进攻”；特别是经过他两次游说莫斯科，“中苏关系正变得更密切更协调”。赫尔利力图使杜鲁门相信，“俄国赞成统一中国军队，蒋介石目前正为统一而努力。这两个事实表明，有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84]赫尔利在这里的确把杜鲁

门政府应该全力贯彻扶蒋政策的理由阐述得淋漓尽致，即罗斯福政府确定的对华政策之所以不可动摇，就是因为只有国民政府才能给予美国所需要的“支持和合作”。

赫尔利这一套引经据典又联系实际的辩护到底对杜鲁门本人产生了多大影响，固然难以准确估量。不过，随后发生的历史事件确实有力地巩固了赫尔利的地位。6月6日，华盛顿爆发轰动一时的“六人被捕案”。赫尔利在国务院内的重要对手，被称为“中国通”之一的外交官谢伟思，一下子变成了在美国的共产党间谍嫌疑犯。在美国国内反共情绪正趋高涨之时，谢伟思的被捕把赫尔利作为一名勇敢的反共斗士的形象烘托得更加醒目。而且此时正值中苏谈判即将开始的关键时期，这更能显得赫尔利在中国无法取代，因为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太密切了。结果，美国国务院的这一轮鼓噪很快便沉寂下来。

“赫尔利政策”对国共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影响都相当严重，因为赫尔利的所作所为实际上都是在鼓舞和怂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继续顽固地坚持其一党专政和反共政策，而这势必导致国共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更倾向使用武力。6月，国民党军队即开始在浙西、绥西和绥南等地区制造军事摩擦。6月6日，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陈诚发表声明，国民党军队如遇“不友好的军队”的攻击，“不可能希望他们不用拥有的一切武器自卫”。这几乎是在公开宣布，国民党军队将会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进行内战。陈诚的这个声明由国民政府方面通报美国驻华大使馆，但是，赫尔利在向杜鲁门政府转达时，不仅不做任何说明，反而在两天后写给国务卿的一份报告中指责林沃尔特和史密斯，说他们关于国共关系紧张的报告是在散布谣言。他向杜鲁门政府谎报军情说，国共之间没有发生新的武装冲突，只是在互相“口诛笔伐”，而且在他看来，国共之间“情况确实有了进步”。[85]

赫尔利这类瞒天过海、蒙蔽视听的言行，更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感到无拘无束。7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向淳化爷台山地区发动军事进攻，企图夺取中共所控制的关中分区。抗战尚未结束，内战烽烟又起。事态发展的内在逻辑是清楚的，国民政府之所以敢于在外患未泯之时又要放手打内战，“赫尔利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赫尔利政策”的另一个后果是相当彻底地破坏了中共军队同驻华美军曾经建立起来的抗日军事合作，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造成了长久的消极影响。在赫尔利回国述职期间，毛泽东曾经同美军观察组人员多次谈

话。他在谈话中表示希望罗斯福政府一定要认清，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奉行的政策十分危险，最终很可能会导致在中国爆发内战，而中共迫不得已也只有应战；目前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抗日，而罗斯福政府应着重考虑这一涉及它切身利益的问题。[86]

赫尔利4月2日在华盛顿向新闻界发表的谈话立即引起了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中共中央认为，赫尔利这个讲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极的信号，它将中共领导的军队描述为“不合法的军队”，这表明战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将更向“扶蒋”倾斜。4月5日，中共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转载了赫尔利的讲话，并发表“编者按”。“编者按”公开点名批评了赫尔利和美国的对华政策，认为其危险性就在于助长了国民党的独裁反共政策，这将引发中国的内战。[87]从历史的过程看，可以说《新华日报》的“编者按”是中共在二战后期转向同美国对抗的序曲。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共中央改变战时对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在七大的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中，中共中央公开警告杜鲁门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呼声必须给予严重的注意，不要使美国的外交政策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88]毛泽东在七大期间以英军在希腊进行军事干涉导致希腊共产党失败为例，提醒全党要警惕新的外来干涉的危险，要警惕英军武装干涉希腊的指挥官斯科比式的人物。他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有可能变成以美国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场长期的麻烦，所以高级干部要注意研究美国的情况，还要准备吃亏。[89]中共领导人的这些谈话表明，中共中央认为同美国的对抗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将是一场关系中国革命运动前途的严重斗争。

七大期间，中共中央已经决定采取措施，限制美军在敌后中共控制地区的活动。中共中央在给有关部队的指示中说，美国已经决心全力扶蒋，美军“暂时不愿贸然断绝与我方的关系，是企图借这种关系了解我方的政策”；因此，对美军可表示愿意合作，但是只限于供给情报、气象信息及地上救护，其他问题应向中央请示；如有未经许可的事件发生，我方有全权禁止。[90]随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通知各有关部队，为了防止美军利用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联系进行破坏，不再准许在各根据地活动的美军组织派人到前线去，特别不准许美军在各根据地建立通信机构，并停止向美军供给机密情报；对于擅自空降到中共根据地的美军人员，应解除其武装，不准其通信并监视其行动。[91]毛泽东通知在延安

的美军观察组人员，他们为了抗日可以到中共根据地去，但“不准偷偷摸摸到处乱跑”；原因是杜鲁门政府现在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中共对他们不放心。[92]驻华美军在此期间曾经提出在灵丘、阜平和沂水等地建立机场，在中共各军区、军分区建立通信网，在敌后增加地面救护站、气象台和侦察电台，等等。这些要求均被拒绝，中共中央在给有关部队的指示中说明，限制美军活动的目的是“警惕其反动阴谋，增加美军在敌后行动得不到我军配合的困难”。[93]

七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发动了一场宣传战。中共的报刊和广播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和评论，猛烈抨击杜鲁门政府正在推行的“扶蒋反共”政策。这场宣传战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揭露国民党军队正将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用于打内战，中共中央据此强烈要求杜鲁门政府立即停止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并呼吁中美两国的公众联合起来共同制止杜鲁门政府的错误政策。

7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评论，标题是《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将矛头直指还在重庆等待中苏谈判结果的赫尔利本人。毛泽东在评论中指出，“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如果这个“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其结果是“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94]

赫尔利对中共中央越来越尖锐的抨击和警告置若罔闻，他宁愿在自己给自己挖掘的陷阱里越陷越深。6月30日，赫尔利会见了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王若飞。他在谈话中暗示说，现在“事情进展得很迅速，事情的逻辑或许会在没有争吵和正式协议的情况下，为国共争端带来解决办法”。[95]他的所谓“事情”就是指刚刚开始的中苏谈判。7月10日，赫尔利在给国务卿的一份报告中说：国共两党目前都在拖延时间，“以等候莫斯科会谈的结果”；中共中央不相信苏联会“赞同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仍充分希望苏联支持它们抵抗国民政府”；“除非苏联公开表明态度，中共关于此问题的意见不会改变”。他声称“共产党的领导是聪明的，当文字写在墙上，他们自然会去读的”；“现在任何争辩不能改变他们的地位，而只有事物的坚定的发展将改变他们的态度。……如无苏联支持，则中国共产党终将以一个政党的地位参加国民政府”。[96]

赫尔利在报告中阐述的这些观点是“赫尔利政策”的思想基础，其中

贯穿着典型的帝国主义逻辑。赫尔利认为，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有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不过是像国民党一样听命于某个大国的工具。在这种逻辑支配下，他自信只要国民政府能同苏联达成协议，中共中央就会自动妥协，中国人民就会“自己选择”蒋介石。面对中国日甚一日的内战危机和中共日趋激烈的谴责，赫尔利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了。他把宝全部押在中苏谈判的结果上，就等着开盘中彩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尔利得知中苏条约签订后大喜过望，他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8月16日，蒋介石在重庆通知赫尔利他本人对此条约的内容“一般地满意”。赫尔利立刻建议蒋介石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举实现“军令政令统一”。他认为：由于中苏关系的改善，“蒋介石现在将有机会发扬实在而真正的领导地位。他将有机会发扬不仅在战时，且在平时为中国人民领袖的资格”。[97]

8月14日，中苏条约签订的当天，蒋介石即向延安发电报，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之后几天，蒋介石又连续两次发出邀请电报。[98]赫尔利是积极促使蒋介石采取这一行动的幕后推手。27日，赫尔利乘飞机亲自前往延安，迎接中共谈判代表团赴渝，以示隆重。赫尔利在中苏条约签订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基本上是基于他对苏联对华政策和苏联与中共并无重要关系的判断。这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苏联对中国内部问题包括国共关系等的公开表态，到底是对美国方面有诚意的妥协，还是像前述那些美国驻苏使馆的苏联问题专家所争辩的那样，只是某种权宜之计，以麻痹杜鲁门政府，哄骗赫尔利？这也是赫尔利同美国国务院中一些“中国通”争论的焦点之一。

不久之后的发展表明，苏联领导人至少在战争结束最初一段时间里，还是很忠实地履行了向美国方面承诺的义务的。就在赫尔利和蒋介石利用中苏条约的签订向中共中央发起政治攻势之时，苏联领导人也开始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斯大林在此期间曾经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去重庆谈判，以“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否则发生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99]从上述内容看，斯大林显然认为中共领导人如果不去重庆谈判，一旦发生内战，就存在美国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如此中共军队会遭受毁灭性的失败。

那么中共领导人去重庆谈判就会避免内战吗？苏联领导人显然也明白，国共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在推动中共中央“寻求维持国内和

平的协议”方面，斯大林进一步提出相当彻底的建议。他在1948年初，曾向一个访问莫斯科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谈到他当年的决定。他说苏联在战后曾经告诉中共，在中国进行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应同蒋介石达成协议，解散军队，加入国民政府，但中共领导人没有接受这一劝告。斯大林承认“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苏联的估计是错误的”。[100]斯大林在这里承认，苏联当时并不仅仅是要求中共领导人去重庆谈判，而且要求中共在国共一直争论的根本问题上妥协，要求他们解散军队，参加国民政府。苏联的这种立场给中共中央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客观上也助长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强硬立场，而赫尔利对他的调处前景仍然乐观和信心十足，亦源于苏联的政策。

重庆谈判的结果证明，不论是来自国内还是国际的压力，都未能迫使中共中央放弃已经获得的成果和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去重庆谈判前，在党内领导人会议上明确阐述了中共中央坚持的底线：“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的。”[101]事实证明赫尔利的策略不过是异想天开，他在同国务院一些职业外交官的争论中阐述的观点也多少有点文不对题。

美苏二重唱的影响在重庆谈判一开始便暴露出来。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邀请，由毛泽东亲自赴重庆进行谈判，他们当时的确准备为实现国内和平做出一些政治上的让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作为重庆谈判的发起者，却对达成国内和平、民主和团结的协议等缺乏诚意。在蒋介石看来，他邀请毛泽东赴渝更多的是向中共发动政治攻势的一个重磅炮弹。8月28日，在重庆谈判即将开始之际，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高级会议上，明确规定了这次谈判的宗旨是政治军事一揽子解决；对于中共的政治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对军事问题则“严格统一，不稍迁就”。第二天，蒋介石又决定在谈判中必须坚持国民党的“法统”，不得超越这一界限去讨论政府改组，一切问题都要以军令、政令统一为中心来解决。蒋介石之所以提出如此强硬的方针，赫尔利的支持和怂恿固然起着关键性作用，但是苏联方面也负有无可推诿的责任。蒋介石正是感到在国际上无所顾忌，才冒出借助外来压力，在谈判桌上取消中共军队和各地区中共政权的妄想。

既然国民党方面贯彻这种谈判方针，重庆谈判难免旷日持久，进展缓慢；而且这预示着重庆谈判即使能取得某种进展，也难以起到制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的实质性作用。不过在重庆谈判开始后，赫尔利一度

表现得异常超脱，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在国共代表之间穿梭往返。在他看来，既然中苏条约已经公布，“有才智的”中共领导人自己“会去读”，那么他只需要坐享其成了。

然而，重庆谈判并没有沿着赫尔利的设想发展。中共中央尽管这时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却也不打算像赫尔利想象的那样，只是简单地“以一个政党的地位参加国民政府”。9月18日，周恩来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毛泽东准备在赫尔利回华盛顿述职之前返回延安。这意味着赫尔利将空手而回。赫尔利立刻意识到他的计划即将破灭，他赶紧写信告诉毛泽东等中共代表，他本人将推迟返回华盛顿述职的行期，以等待国共谈判的结果；他还极力挽留毛泽东在重庆继续谈下去。[102]

9月22日，赫尔利会见了国共双方的谈判代表，他抱怨他们在谈判中“试图解决太多的细节”。赫尔利到这时竟然还认为国共两党在整个抗战时期一直在争论的政权和军队问题都不过是“细节”，且认为“试图在改组政府和军队整编的所有细节上达成协议，十之八九会导致无限期的争论”，如果“能就基本原则达成协议”，那些“细节”就不难解决了。[103]第二天，赫尔利向杜鲁门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喜不报忧的报告。他声称除了政府和军队问题之外，国共在其他方面都已达成协议，而且双方在政府和军队问题上，争论的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他据此断定，重庆谈判的“成就”会使国共两党继续“讨论和平时期的合作”。[104]赫尔利长期参与国共谈判，很难想象他会不知道他所说的“细节”——军队和政权问题，正是国共两党长期分歧的焦点。很有可能的是，为了回国后能对杜鲁门政府有所交代，赫尔利宁愿在如此严肃的政治博弈中投机取巧，看来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确处境不妙。

自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以后，重庆谈判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面对面谈判解决中国重大问题的机会。但是，这次谈判并没有解决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也是这次谈判本来应该解决的问题。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两党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该《纪要》规定了国共两党将共同遵循“团结建国，避免内战”的总方针，并决定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不过也仅此而已，它给予渴望和平与安定的人们的，更像是一种精神安慰。由于受降、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等实质性问题（赫尔利称之为“细节”）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纪要》难免成为一纸空文。实际上在重庆谈判尚未最后结束、“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之时，国民党军队便在驻华美军的协助下，

在华北、华中大举抢占中共控制的各地区。随着国共内战将爆发的危机自10月中旬起日益加剧，中共中央决定于11月撤回尚留重庆继续谈判的全部代表。美国方面所热衷推动的、得到苏联诚恳支持的重庆谈判，终于在内战的炮声中宣告结束了。

重庆谈判的结局同它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重庆谈判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事件，它虽然发生在二战结束之后不久，但如果追根溯源，可以说它也是美国战时对华政策和赫尔利直接介入国共矛盾的产物，是美国战时两届政府与苏联协调对华政策的产物，也是美国在亚太确立雅尔塔体系的一个重要步骤。根据美国政府和赫尔利的设想，中苏谈判和国共争端的解决本来均应在对日战争结束之前完成，而美国在战后面对的将是一个内部统一的中国。但历史的进程与美国政府和赫尔利的设想相反，中苏条约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同一天签订的，重庆谈判则发生在日本投降整整两个星期之后。可以说，是日本出人意料的迅速土崩瓦解，彻底打乱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东亚大陆地区的计划表。

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局面。其结果之一是，国共两党利用日军停止抵抗的时机，立刻展开一场以争夺受降权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斗争，甚至在一些地区爆发了局部的内战。这场斗争至少到1945年结束之前，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内容，对中国政治形势起着支配作用。相比之下，国共在重庆的谈判倒有些像一支不协调的插曲。实际上，在争取受降权（不论是名义上的还是实际的）的斗争中，只要国共双方的力量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中国就不可能出现和平局面。而且，即使双方的力量暂时达到均衡，一旦它被破坏，又会爆发新的冲突。这是抗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国共两党斗争的一个基本特点。

在争取受降权的斗争中，国共双方的目标都是扩大自己的控制地区，同时限制和削弱对方的军事行动。国民政府在这场斗争的开始阶段处于明显的劣势。它长期执行消极抗战的政策，致使几百万人的军队一直部署在大后方，远离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在华北、东北等地区尤其如此。相反，中共军队却一直活跃在敌后，包围着日军占领区的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这种战略态势对于国民党方面肯定是十分不利的。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在日本政府于8月10日发布乞降照会以后，杜鲁门政府在中国将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于帮助国民政府垄断受降权，其政策迅速转向全力援助国民政府恢复对中国统治的轨道，调处国共矛

盾实际上已经降到了不那么重要的地位。

从8月底至10月，美军帮助国民政府运兵50余万，抢占了上海、南京、北平和天津等重要城市和诸多交通要道。此外，美军还派遣了有53000人的军队，控制了北平、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其他一些交通要道。[105]驻华美军的这些行动更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有恃无恐。“双十协定”签订前后，正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华中诸多地区开始大举进占之时。战场上军事态势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国共谈判的结果。如果说蒋介石将接收重点置于华南之时，尚可同中共坐在一起谈一谈；那么，当国民党军队在美军的协助下通过大规模运兵，自认为已经打破军事上的暂时均衡之后，便毫不犹豫地撕毁“双十协定”，放手向中共军队控制地区发动进攻。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谈判既是杜鲁门政府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构建战后亚太格局的终点，也是这个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格局破碎的开端。

赫尔利调处失败的根源并不在于他对苏联对华政策判断失误，而在于他无视从而也就无从理解中共中央多次公开声明的“独立自主”原则及其确切的含义，以及中共中央多次表现出来的坚持这个原则的决心和意志。

[1]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居里先生听其报告来华之原因及传达罗斯福总统之口信后告以对共党问题应了解之基本要点及嘱其研究解决中国币制问题之办法谈话纪录》，1941年2月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42～543页。

[2] 《驻华外交官的备忘录1943～1945年》，《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87～599页。

[3] 《驻华大使赫尔利1944年12月4日致国务卿函》，《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赫尔利与董必武谈话记录》，1944年10月17日。

[4] John Paton Davis，*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p.344.

[5] “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Davies）”，December 12，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p.734-735.

[6] 《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函》，1944年12月24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03～407页。

[7] 《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函》，1944年12月30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08～409页。

[8] “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 （Vincent）”，December 26，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Ⅵ，pp.750-751.

[9] “Mr.Mao Tse-tung to the Appointed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December 24，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Ⅵ，p.745.

[10] “Mr.Chou En-lai to the Appointed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December 28，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Ⅵ，p.755.

[11] “Colonel David D.Barrett to the Appointed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December 30，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Ⅵ，p.757.

[12]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1月14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10～414页。

[13] 参阅〔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202～203页。

[14]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2月7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25页。

[15]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2月7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26页。

[16]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2月7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25～428页。

[17] “Transcript of Press and Radio News Conference by 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April 2，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Ⅶ，pp.322-323.

[18]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Vincent）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Temporarily in the United States”，April 2，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Ⅶ，pp.322-323.

[19]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Vincent）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Hurley），Temporarily in the United States”，April 2，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Ⅶ，

pp.322-323.

[20]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President Roosevelt”，January 4，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154.

[21] “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Political Appreci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China”，January 12，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172.

[22] “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Vincent）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29，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37-38.

[23]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1月31日、2月7日上午、2月7日下午、2月18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15～439页。

[24]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2月7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427页。

[25] “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to President Roosevelt”，January 14，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176-177.

[26] 《华莱士副总统与蒋介石主席谈话记录摘要》，1944年6月21日至2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77页。

[27] 《罗斯福总统致蒋介石主席》，1944年7月1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83页。

[28] 参阅《对“一年来军事外交及政治经济等情形”报告的决议（1944年9月17日通过）》，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重庆出版社，2016，第821页。

[29] “Memorandum for President Roosevel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49”，August 15，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p.142-143.

[30] “President Roosevelt to Major General Patrick J.Hurley”，November 18，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4*，*China*，Volume VI，p.703.

[31]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自华盛顿呈蒋主席报告访罗斯福总统晤谈关于军事、中国统一、垫款及驻华大使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4年11月1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02～203页。

[32] 《赫尔利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11月7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350～351页。

[33] “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ebruary 4，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851-852.

[34] Joseph W.Esherick ed.，*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Service*（New York：Random House，1975），p.342.

[35] “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Vincen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ebruary 8，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853-854.

[36] “Memorandum by Messrs.John S.Service and Raymond P.Ludden to the Commanding General，U.S.Forces，China Theater（Wedemeyer）”，February 14，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216.

[37] Joseph W.Esherick，ed.，*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Service*，pp.342-344.

[38] “The Charge in China（Atche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ebruary 28，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242-246.

[39]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372.

[40]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p.372-373；〔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214～215页。

[41] 参阅〔美〕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王益、王昭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41～142页。

[42] “Transcript of Press and Radio Conference by 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April 2，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317-318.

[43] 参阅〔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212页。

[44] “Pre-Conference Documents，CHINA”，*FRUS*，*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p.353-354.

[45] 参阅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p.140-141。

[46]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

记》，第413页。

[47]〔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第414~415页。

[48]〔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第424页。

[49]《雅尔塔协定》，1945年2月11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204~205页。

[50]《赫尔利将军与莫洛托夫的会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39~140页；〔苏〕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万成才译，新华出版社，1980，第33~37页。

[51]《赫尔利大使与斯大林大元帅的会晤》，1945年4月15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60~161页。

[52]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p.304-305.

[53]〔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李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第67页。

[5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Mr.Charles E.Bohlen”，May 28，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887-891.

[55]〔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192页。

[5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Mr.Charles E.Bohlen”，May 28，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888.

[57]《蒋主席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讨论有关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之问题谈话纪录》，1945年6月1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559~562页。

[58]《蒋主席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讨论有关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之问题谈话纪录》，1945年6月12日；《蒋主席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说明中苏之事应由两国直接商议谈话纪录》，1945年6月26日。以上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559~562、569~571页。

[59]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to President Truman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Paraphrase］”，July 3，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 ed.,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pp.911-914;《行政院长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与史达林商谈关于外蒙独立及使用旅顺军港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5年7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76～590页。

[60]《行政院长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主席请示如史达林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是否即中止交涉电》，1945年7月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92～593页。

[61]《蒋主席自重庆致行政院长宋子文指示外蒙独立须俟我国内真能确实统一时方能考虑并告以所谓国内统一巩固之要旨电》，1945年7月6日；《蒋主席自重庆致行政院长宋子文指示必须以东北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及苏联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为我国允许外蒙战后独立之交换条件电》，1945年7月7日；《蒋主席自重庆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嘱向史达林说明允许外蒙独立为我对苏之最大诚意希望苏联对我之要求能作具体之答复电》，1945年7月7日。以上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93～194、596、597页。

[62]《行政院长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与史达林会谈关于解决外蒙、新疆、东三省及中共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5年7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09～620页。

[63]《行政院长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苏方所提大连、旅顺及铁路等条件之内容电》，1945年7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07页。

[64]《行政院长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与史达林会谈关于解决外蒙、新疆、东三省及中共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5年7月9日；《行政院长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与史达林会谈关于苏联撤兵及铁路管理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5年7月11日。以上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09～620、622～631页。

[65]《行政院长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与史达林会谈关于苏联撤兵及铁路管理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5年7月1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22页。

[66]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78页。

[67] 毛泽东：《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945年8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19～1120页。

[6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664页。

[69]《蒋主席自重庆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告以大连自由港问题准予权宜决定电》，1945年8月1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

《战时外交（二）》，第646页。

[70]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第549页。

[71] 《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为速缔立中苏条约以防生变请对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授予权宜处置之权电》，1945年8月1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649页。

[72]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二分册，第264、274页。

[73] 《中国对中苏条约的反应》，《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82页。

[74]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Vincent）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Temporarily in the United States”，April 2，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324.

[75]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听其报告杜鲁门总统仍命其任驻华大使及其离华数月之经过情形谈话纪录》，1945年4月2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11页。

[76] “The Charge in the Soviet Union（Kenn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17，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339-340.

[77]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听其报告杜鲁门总统仍命其任驻华大使及其离华数月之经过情形谈话纪录》，1945年4月2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11～213页。

[7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Stanton）”，April 19，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341-342.

[79] “The Charge in the Soviet Union（Kenn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3，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343-344.

[80] “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Davies）to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July 26，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439-440.

[81]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p.292-293.

[82]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Hurley）”，April 23，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344-345；Russell D.Buhite，*Patrick J.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N.Y.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p.213.

[83]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听其报告杜鲁门总统仍命其任驻华大使及其离华数月之经过情形谈话纪录》，1945年4月2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211页。

[84]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Hurley） to President Truman”，May 20，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107-133.

[85] 《进一步的国共谈判》，《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66页。

[86] 《谢伟思与毛泽东等谈话备忘录》，1945年4月1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564～570页。

[87] 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4月5日。

[88]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31～1032、1085页。

[89]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192页。

[90] 《中央关于警惕美蒋特务合作对我进行破坏给林平电》，1945年6月2日。

[91] 《军委关于美国对华的反动政策及我之对策的指示》，1945年7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179～180页。

[92] 《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2页。

[93] 《军委关于美国对华的反动政策及我之对策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179～180页。

[94]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1945年7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14～1115页。

[95]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就与中共代表王若飞的谈话致国务卿》，1945年6月30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663页。

[96] 《赫尔利大使对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评论》，《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63～164页。

[97] 《中国对中苏关系的反应》，《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82页。

[98] 《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定大计，受降办法系盟军总部规定，未便因朱毛-电破坏信守》《蒋主席三电毛泽东促行》，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8月16、21、25日。

[99]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2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第78页。

[100]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达州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第98页。

[101] 《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1页。

[102] 《赫尔利大使离华》，《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70页。

[103] 《赫尔利大使离华》，《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70～171页。

[104] “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23，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467-468.

[105] 参阅〔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790页。

第三章 冲突的焦点

一 危机四伏

经过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苏谈判达成“雅尔塔秘密协议”，到在莫斯科的中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再到在重庆的国共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可以说战后初期在东亚大陆终于形成了一个以美苏中合作为中心、美国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地区格局。这个地区格局不久后就崩溃了，不过为了分析其何以如此脆弱及其崩溃导致的严重后果，首先需要概括指出这一格局的两个重要特点。

其一是构建这个格局的设想是由罗斯福政府于太平洋战争中期提出的，而它被逐步落实并最终变成现实的过程则开始于战争后期，一直持续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不久，即8月14日中苏签订同盟条约和10月10日国共达成“双十协定”。

战时美中苏在东亚大陆保持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础，就是反对日本在这个地区的侵略和扩张这一共同战略利益。日本在亚太地区发动的侵略战争彻底摧毁了一战以后列强在这里构建的均势，结果是促使美中苏三国通过持续的外交协调与结盟，在这个地区重新建立和协调了它们之间的战略关系。不过，随着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维系美中苏三国战时同盟关系的最重要的基础很快就塌陷了。它们之间存在的各种历史遗留的或在战争期间累积起来的分歧、矛盾等，均很快发酵并逐步表面化。各种不稳定因素在各方互动中很快暴露出来，并有逐步占据支配地位的趋势。各国内部都显著存在的对战后和平和重建国家的合理需求和期待，以及由此推动的各种妥协与合作等，均受到严峻的挑战、冲击。

其二是以美苏中为中心、美国居主导地位的东亚地区格局不论是形成，还是维持都取决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获得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以及战争结束时刻达成的解决方案被维持住。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就是从吞并中国东北地区开始的。日本因战

败而彻底退出东北之后，这里迅速成为美中苏矛盾汇聚并尖锐化的一个焦点。在美苏冷战爆发之际，这里很快成为美苏在东亚大陆地区争斗的一个热点。如何在战后，特别是在冷战爆发的新条件下处理美中苏三国在东北地区的利益纠纷，成为决定东亚国际形势演变方向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后来的发展证明，上述两个基本特点的存在基本决定了战后初期美中苏在东亚大陆地区构建的格局自形成之日起，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如果进一步分析上述两个特点之间的关联，就会更加凸显中国东北地区形势的特殊性。

自19世纪末以来，列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纵横捭阖既是决定这里形势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极大地影响着列强在亚太地区的相互关系。事实是，在结束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14年占领之后，美苏又在这里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斗。

早在20世纪初，日本、美国和沙皇俄国就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成为竞争对手。日美俄三国之间的激烈角逐构成了当时列强在东北地区关系的基本格局，其中以日俄之间的争夺为主，美国则居间纵横捭阖，企图坐收渔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苏联的影响逐步减弱，另一方面是日本的势力不断扩大。直至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了日本独占东北的进程。当时的美国政府虽然宣布了“不承认主义”，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阻止日本的武力扩张。苏联政府曾经支持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向东北的中国抗日联军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苏联对外政策的主旨以维护东部边境地区的安全与和平为主，所以不愿为东北问题与日本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1933年5月，苏联正式向日本提出，愿意谈判让售中东铁路。1935年3月23日，苏联为了缓和与日本的关系，不顾国民政府的抗议，与伪满洲国达成所谓《苏“满”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将中东路转卖给伪满洲国。[1]以这一事件为标志，苏联势力从此全部退出东北，日本则终于实现了霸占全东北的野心。

日本靠武力征服造成的独霸东北的局面，必然要随着日本在战争中的彻底失败而根本改变。在重构战后东亚国际格局之时，占据世界政治中心的美苏难免要为解决东北地区的有关问题做出安排，何况东北地区

与苏联毗邻。于是在战争后期，美苏都开始积极筹划，争相参与对东北地区的战后安排。而且，由于美苏都拥有强大的实力，它们之间的纵横捭阖，在一定时期内和某种程度上对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苏联对东北的政策是其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上说是服从于苏联的战略利益的，具体地说也取决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如何估计和评价中国在未来东亚大陆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苏联决定参加对日战争后，很快就选择东北作为主战场，歼灭在那里的日军关东军。[2]这当然主要是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不过苏联在军事战略上做出选择之后，企图利用参战以及将在战后一个时期对东北实行军事占领的有利条件，谋求在这一地区的局部优势地位和某些优越权益也是其出发点之一。苏联除了通过改善中苏关系以达到“中立”国民政府的目的外，还试图通过控制东北的主要港口和铁路以及取得在辽东半岛的驻军权等，在争取优越权益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在实际上拥有支配东北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力。这样，即使在战后不能彻底阻止其他外国势力的渗透，至少也可以形成一个可以控制的缓冲地带。

美蒋在战时已经确立的战略关系表明，国民政府在战后难免会继续追随美国的对外政策，苏联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苏联领导人当时的确也没有这个打算。毕竟，斯大林当时还是相信，通过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施加影响可以更容易地实现苏联在东北地区的计划。可以说苏联对中国东北的计划同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既有冲突，也存在可以妥协的空间；特别是对于美国尽早打败日本的军事战略而言，有着对苏联做出妥协而换取苏联在打败德国后尽早参加对日战争的紧迫需要。就罗斯福政府的抱负而言，它在中国的需求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东北当然不会被排除在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已经开始考虑战后如何解决东北问题。1943年11月，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召开之前，把蒋介石拉到开罗。他的目的就包括了以中国东北的利权换取苏联在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上，预先同蒋介石取得谅解。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一面明白无误地表示，日本用武力夺占的包括东北四省在内的中国领土在战后必须“归还中国”；[3]一面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提出，可以考虑在战后使大连港国际化，以满足苏联方面希望获得一个前往太平洋的暖水港的要求。[4]蒋介石表示，他并不反对罗斯福的这类建议，但前提是苏联必须保证在战后只与国民政府合作，并保证不得损害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以及美国应为国民

党军队提供九十个师的装备，等等。[5]

德黑兰会议期间，美英苏三国首脑就东北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11月30日，当丘吉尔询问斯大林关于苏联战后在亚洲的政治意图时，斯大林表示苏联希望在东亚获得一个不冻港。罗斯福立刻依据他同蒋介石谈话的结果，提出可以把大连开辟为“在国际保证下的一个自由港”以满足苏联的要求。斯大林当时表示，他认为罗斯福的这个主意“不错”，并暗示与大连港相连的铁路问题亦应同时解决。[6]

显然，罗斯福政府为了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是不惜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不过美国的妥协并不是没有限度的，罗斯福还是力图在有求于苏联而自己的影响力又有限的条件下，争取一个中方可以接受而又不根本损害美国利益的结果。罗斯福政府妥协的限度就是满足苏联获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的愿望，并承认苏联在东北享有某些优越的经济利益。换句话说，也就是将苏联在东北的发展限制在有机会获得优越的经济利益的范围之内，而苏联从东北走向太平洋不可妨碍美国从太平洋进入东北。罗斯福做这种妥协部分是由于他相信，凭借美国的雄厚资本和技术力量，可以通过自由竞争，在东北取得美国希望获得的利益。只要东北不为苏联独家控制，美国就不愁没有发展余地。罗斯福政府一面承认并支持中国恢复对东北的全部主权，一面又用中国东北的利权与斯大林做交易，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这是斤斤计较、老谋深算的表现。

罗斯福承诺使苏联在东北能够获得一个不冻港，就像是在慷慨地施舍美国的财产。不过斯大林肯定了解苏联在经济上与美国竞争的严重弱点，他绝对不会满足于仅仅获得在经济上发展的有利条件，而是要力争彻底控制东北，杜绝美国染指那里的机会。这是苏联提出还需要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美苏在东北问题上的妥协，一开始就包含着互相限制，甚至对抗的因素。

1944年12月15日，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向罗斯福政府报告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第一次详细阐述了苏联战后在东亚地区的全部要求，这立刻在罗斯福政府内部引起了严重的担忧。哈里曼对斯大林的这次谈话满腹狐疑，他当时向罗斯福报告说，斯大林所保证的尊重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实际意义不大。苏联控制了中东铁路，并可以通过获得驻军权来加以控制，这形成了中苏对东北地区的影响。他因此提出，罗斯福政府应特别关注苏联对东亚政策的各种动向。[7]

1945年2月，罗斯福与斯大林经过会谈，就战后东亚问题签订了“雅尔塔秘密协议”。这表明妥协仍然是这时美苏处理双方在东亚关系的主要倾向。但是，它们之间的深刻分歧不可能被一纸协议根本消除，它们仅仅是暂时被掩盖起来而已。实际上，在讨论“雅尔塔秘密协议”的过程中，美苏在东北问题上的分歧已经显现出来，只是罗斯福当时没有打算花更多的精力去解决这些分歧罢了，也可能他更希望将具体的分歧留给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自己去与苏联解决，美国只要达到确保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目的就可以了。

2月8日，罗斯福与斯大林开始讨论东亚问题。罗斯福告诉斯大林，他已经收到哈里曼关于苏联参战条件的报告。其中关于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战后转交给苏联的问题，解决起来没有什么困难，但与中国东北有关的一些问题则不那么简单。罗斯福提出，苏联无疑应该在东北南部的铁路终点有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不冻港，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使大连成为“国际共管的自由港”。至于中东铁路，罗斯福表示，他更倾向由中苏联合经营，而不是像斯大林建议的租借给苏联。罗斯福笼而统之的答复当然无法使斯大林满意，后者提醒罗斯福注意，如果他提出的那些条件不能被满足，苏联人民就难于理解，为什么苏联要同与它没有重大政治纠纷的日本打仗。这等于是说，如果罗斯福不接受斯大林的条件，苏联就不参加对日战争。最后罗斯福和斯大林同意，将苏联的参战条件用书面形式记录下来，而起草文件的任务委托给哈里曼和莫洛托夫。[8]

2月10日下午，莫洛托夫和哈里曼开会讨论了苏方起草的协议草案。哈里曼在讨论中提出了三点修正意见：第一，旅顺和大连两港应成为自由港；第二，东北地区有关的铁路应该由中苏组成联合委员会共同经营；第三，他补充说协议的内容最终应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哈里曼强调说，草案“必须体现这三条修正意见”。莫洛托夫回答说，前两点已经获得斯大林的赞成，关于第三点当还需要哈里曼进一步澄清。哈里曼在会后将苏方的草案和他的修正意见一起交给罗斯福审阅，罗斯福立即认可了哈里曼的修改意见。[9]

当天下午，罗斯福和斯大林正式讨论了美方提出的修正案。斯大林表示同意大连港成为国际共同管理的自由港，但旅顺将成为苏联的海军基地，所以需要租界。罗斯福对旅顺港由苏联租借作为军港这一点做出让步。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东北铁路的运营由苏联和委员会共同管理更合适，以及这需要征得蒋介石同意。但是，他随即声明国民政府也需要

同意维持外蒙古的所谓现状。关于外蒙古问题，苏联第一次提出是在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告诉哈里曼，他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唯一没有对罗斯福提及的是“承认外蒙古的现状——保持蒙古共和国的独立身份”。哈里曼当时在给罗斯福政府的报告中说，他“对此并没有吃惊”。[10]罗斯福询问斯大林是希望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在莫斯科讨论这一问题，还是希望由他来转告蒋介石。斯大林表示希望罗斯福转告。于是他们达成了一致。[11]

2月11日，苏联方面提出了他们的最后修正案。其中在关于大连和东北铁路的条款中，加入了“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的字样。哈里曼对此“很不高兴”，希望罗斯福予以更改。罗斯福却表示“不愿为几个字大惊小怪”。另外，哈里曼对“苏联的这些要求必须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疑义地予以实现”一句，也提出了异议；罗斯福则认为“这不过是行文而已”。哈里曼又把草案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将军们传阅，指望他们就某些细节提出问题，以使他有借口再次说服罗斯福改动草案的行文。[12]但哈里曼的印象是美国的将军们显然对政治问题兴趣不大，他们此刻最关心的就是苏联是否会履行在打败德国后两三个月内进攻日军的诺言。结果，罗斯福终于与斯大林和丘吉尔一起在雅尔塔秘密协议草案上签了字。

“雅尔塔秘密协议”虽然对维护美苏的战时同盟关系，特别是确保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但是，美苏双方在讨论中对协议涉及的中国东北港口与铁路的条款的确存在不同的理解，这在哈里曼向罗斯福提出而后者当时并不重视的那些内容上清楚地体现出来，而这些分歧被证明最终成为战后东亚大陆出现危机的根源之一，其核心就是东北地区的控制权。毕竟，哈里曼本人认真阅读并动手修改过苏联方面提出的协议文本，并在美苏首脑会谈中一再表达了比罗斯福谨慎得多的态度。[13]后来的发展表明，苏联企图利用“雅尔塔秘密协议”尤其是其中某些条款的模糊不清，将中国东北纳入它的势力范围。美国方面对“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条款显然有不同的理解。至少在罗斯福看来，“雅尔塔秘密协议”“不过是说俄国人比英国人或美国人在该地区有着更大的利益罢了”。[14]这种战略思维的根本分歧当时并没有导致美苏领导人的龃龉，因为它们尚不足以超过美苏合作打败日本的共同利益的需要。但是，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这一分歧对美苏在东亚地区的关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欧洲战争结束后，美苏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亚太地区。当“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条款需要进一步具体化时，美苏之间的矛盾便突显出来。5月10日，亦即欧洲战争正式结束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东欧处在一份为驻苏大使馆准备的备忘录中写道，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通过鼓励中共，苏联保持着影响中国未来的有效手段；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肯定会利用参加对日作战的机会，在中国东北争取支配性的地位，它将以在东欧和中欧使用过的方式来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美国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苏联的影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包括通过向国民政府提供各种援助，从而防止中国的非共产党势力因对蒋介石失望而转向中共。[15]

两天后，时任副国务卿的格鲁根据哈里曼和凯南对苏联对华政策的分析，向陆军部和海军部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苏联尽早参加对日作战对于美国是否如此重要，以致美国政府满足苏联的政治要求必须优先于苏联参战？第二，是否应该重新考虑“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安排，是部分还是全部实施该协议的条款？格鲁建议说，作为履行“雅尔塔秘密协议”的交换条件，应要求苏联保证同意按美国提出的方式实现中国统一，并保证支持《开罗宣言》中关于解决东北和朝鲜前途问题的条款。[16] 格鲁的建议显然适合杜鲁门接任总统后，美国政府中形成的处理对苏关系的气氛。

熟诸军事形势和美苏关于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的复杂性的美陆、海军首脑比美国务院要实际得多。他们在讨论格鲁的备忘录时认为，原子弹固然可以决定战争的进程，不过目前还不能把赌注押在未获得结果的试验上。于是他们给格鲁如下答复：首先，苏联是否参战及何时参战，并不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苏联提出的政治条件，军事方面的考虑并非政治上达成协议的决定性因素；其次，苏联有军事能力打败日军，先于美国占领库页岛和中国的东北甚至华北地区；美军只能在库页岛有所作为，所以必须与苏联取得谅解；否则除非使用武力，美国不可能迫使苏联在东亚让步；再次，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仍在推动国共谈判，而不取决于美国还要进一步向苏联施加多大压力。在做如是解释之后，他们提出在目前的军事条件下，不妨重新检讨“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内容，以便寻求美苏之间更充分的谅解。然后他们又一脚把皮球踢回国务院，表示希望国务院澄清杜鲁门政府在东亚地区如何处理与苏联关系的政策。[17]

格鲁并没有立刻接受军方的观点，他很快将国务院给哈里曼的一封

信转给陆、海军部，以作为给史汀生和福雷斯特的答复，而这封信实际上是国务院给驻苏大使馆的一份指导性文件。国务院在信中重申了罗斯福政府时期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包括了要求苏联在战时和战后都不仅支持中国的统一，而且应该在使中国发展成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强国方面与美国合作。为此美国政府应该得到苏联的如下保证：第一，说服中共接受国民政府的合理建议，达成统一中国的协议，将军队编入政府军中，然后接受美军的统一指挥；第二，在抗击中国东北、华北和朝鲜的日军的战争中，只与被统一起来的中国军队合作；第三，在对日战争的军事行动结束三个月后，美苏共同从东北和华北撤出全部陆海空军队，苏军占领的地区应转交国民政府充分控制。该信声称，争取与苏联达成上述协议的目的，就是要确保苏联完全接受《开罗宣言》的原则，继续和彻底地承认包括东北、新疆和西藏在内的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持国民政府目前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18]

5月28日，哈里曼在莫斯科参加了霍普金斯与斯大林的会谈。霍普金斯这次是以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的特使身份访问莫斯科的，希望能够通过与斯大林直接会谈，确认苏联的各项政策，从而使杜鲁门政府能够在罗斯福去世后将美国的对苏联政策与美苏关系衔接起来。哈里曼则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示，利用陪同霍普金斯的机会，在会谈中向斯大林提出涉及对华政策的两个问题。第一是苏联在东北恢复其历史地位后，是否承认“门户开放”政策和使中国成为工业化国家；第二是苏军进入东北后，是否打算让国民政府在那一地区组织政府机构。斯大林对此给予肯定的答复，表示苏联将保证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以及东北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由国民政府建立政权，而且苏军所到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至于具体问题，他希望这时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最迟于7月1日到莫斯科来谈判解决。[19]可以说杜鲁门政府在雅尔塔会议后第一次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协调行动的尝试到此为止，其结果对于杜鲁门政府显然是可以接受的。

上述杜鲁门政府5月间的一系列行动表明，欧洲战争结束后，美国领导人在如何对待雅尔塔秘密协议方面是存在矛盾心理的。他们一方面继续希望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的承诺换取苏联早日出兵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担心苏联会利用参战后必定会形成的优势地位，根据其意图任意解释有关东北地区的条款并采取行动，从而影响美国在东亚大陆的战略利益和影响力。杜鲁门政府在斯大林与霍普金斯的会谈中仅仅提出苏联承诺在东北保证“门户开放”和将东北行政权转交国民政府接收，并没有

就雅尔塔秘密协议本身提出修改意见，这表明妥协仍是此时美国处理东北问题的主要倾向，特别是美军在冲绳岛登陆作战中人员损失惨重，这使美军方更加重视促使苏军早日参加对日作战。

在获得斯大林关于苏军将如约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后，从5月末开始一直到中苏谈判第一阶段结束，杜鲁门政府持续表达促使国民政府接受雅尔塔秘密协议让步的态度，以免国民政府的外交行动破坏美苏之间的谅解，从而妨碍苏军参加对日作战。6月9日，杜鲁门会见了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宋子文。国民政府此时已经确定了宋子文在7月1日之前访问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就苏军参战后的有关问题谈判，而这次会谈是他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提出的。[20]杜鲁门在会谈中出示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文本，并告诉宋子文，前总统罗斯福承诺会支持协议中的规定，特别是美国人“亟需苏联参加作战”；他说这是为了减少中美军人的损失。[21]

4天后，6月13日，宋子文再次会见了杜鲁门。他在这次会谈中奉蒋介石之命询问杜鲁门，美国方面到底如何理解雅尔塔秘密协议中某些行文如“租借”等的确切含义。杜鲁门对此只是含糊其词地声明说，他“不会做任何伤害中国利益的事情”，只愿看到那些“可能引起麻烦和纠纷的问题得到解决”，而他真正关心的是“如何使苏联立即加入作战，而非枝节问题”，等等。[22]

6月15日，赫尔利按照杜鲁门政府的指示，向蒋介石通报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内容。他当天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蒋介石当时表示要等宋子文回到重庆后再予以答复，然后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美国是否愿意为了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而联合使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第二，美国是否成为中苏达成的协议的一方？第三，涉及库页岛的问题，不能仅由中苏讨论。[23]18日，格鲁在与杜鲁门进行一次谈话的两天后，打电报给在重庆的赫尔利，指示他可以转告蒋介石，杜鲁门政府将承担履行在雅尔塔达成的秘密协议的责任。赫尔利随后的确向国民政府方面转达了这一信息。[24]

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谈判正式开始后不久，哈里曼便会晤宋子文，与后者讨论了在中苏谈判中涉及的几乎所有问题。哈里曼告诉宋子文，应该尽可能对所有问题“达成充分的协议”，因为“过去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好机会。宋子文告诉他，谈判因战后外蒙古的地位问题而陷入停顿，并希望能取得杜鲁门政府的支持。哈里曼却告诉宋子文，在雅尔塔会议上并没有讨论该如何解释关于外蒙古维持现状的含义，所以只能按行文

的字样接受。[25]实际情况是，哈里曼是杜鲁门政府中最早知道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的企图的。早在1944年10月15日，他在给罗斯福政府的报告中就清楚地报告了斯大林对战后外蒙古地位的要求，即“独立的身份（identity）”。他在这个报告中说，他对斯大林的这个要求并不吃惊，因为他几个月前就想到这一点了。[26]据此可以说哈里曼在莫斯科显然是故作姿态，他的言行反映了杜鲁门政府无意在外蒙古前途问题上与苏联发生龃龉，那一地区的前途对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并没有多少影响。7月4日，美国国务院打电报告诉哈里曼：美国政府介入中苏谈判为不智之举，他可以转告宋子文，关于外蒙古的决定只能按“雅尔塔秘密协议”中的有关文字理解，美国对此不能做任何官方解释。[27]第二天，哈里曼便劝告宋子文，不必固执成见，应该在“广泛的基础上”与苏联达成协议，否则弊多利少。[28]

杜鲁门政府对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提出的要求——不论是杜鲁门政府还是哈里曼本人都对此一清二楚——还能沉得住气，当斯大林针对东北铁路和旅顺、大连及其周围地区提出一系列要求时，他们却有些坐不住了。

7月6日，赫尔利从重庆报告美国国务院，国民政府开会决定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让步，以打破中苏谈判的僵局，甚至还准备做出进一步的妥协。[29]在接到这份电报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同一天向哈里曼发出指示，美国的原则是：（1）在中苏谈判中不充当“雅尔塔秘密协议”的解释者，但是美国作为该协议的缔结者之一，希望中苏在此协议基础上取得谅解前与美国进行协商；（2）无意参与对大连的行政管理和控制，但希望保证尊重国际贸易中无差别对待的原则，在利用大连港和东北铁路设备方面，各国机会均等；（3）杜鲁门政府注意到斯大林保证尊重中国对东北的主权；（4）东北铁路所有权属于苏联这一点，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没有根据。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哈里曼立刻领会了这个信号意味着什么。[30]7月7日、8日两日，哈里曼在听取宋子文说明中苏谈判的进展情况及中方的打算后，于9日向杜鲁门政府建议：波茨坦会议召开在即，由于中苏最终肯定会达成协议，特别是中国会接受苏联对东北港口和铁路的要求，美国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准备利用美苏领导人会晤的机会，重新研究对“雅尔塔秘密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31]

当天，哈里曼再次与宋子文详细讨论东北的港口、铁路等问题。他通过讨论感觉到，宋子文在满足苏联的要求方面，很可能准备走得比蒋

介石所允许的范围更远，而且已经超出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条款；但对于国民政府方面是否打算不惜一切代价与苏联达成协议，又有些捉摸不定。由于没有得到杜鲁门政府的明确指示，哈里曼只能模棱两可地劝告宋子文，在苏军向日军发动进攻之前与苏联达成协议有巨大的好处，国民政府应该做出现实的让步，不要在东北问题上陷入绝境。同时他又向宋子文建议，如果中苏双方的分歧在短期内得不到解决，应该以“尽可能友好的方式”停止有关的讨论，回到重庆后予以“认真的考虑”。[32]哈里曼的这段建议表明，至少他有意利用美英苏首脑在波茨坦开会的机会，推动杜鲁门政府调整在中苏谈判中一味压国民政府让步的方针。至于在目前指导思想陷入混乱的情况下，宁可使中苏谈判暂停。实际上，在哈里曼的指示下，驻苏使馆的确起草了一份分析苏联参战后东亚政策的文件，其内容之详尽几乎包括了苏联有关政策和可能采取的行动的各个方面。[33]

此时不仅哈里曼犹豫不决，美国政府也同样莫衷一是。13日，格鲁根据国务卿贝尔纳斯的指示，为答复哈里曼8日的建议，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并指出：在外蒙古问题上，应该说服蒋介石，用外蒙古独立换取苏联保证中国在内蒙古和东北获得牢固的地位。至于东北问题，苏联提出的条件同恢复其在日俄战争中丧失的权利相比，对中国是有利的；可是按照苏联对港口和铁路的权利的解释，对中国又很不利。备忘录提出，美国政府应该单独或与英国联合，向苏联施加影响，以使它在东北铁路和港口方面的要求有所限制。包括大连港的“国际化”不能解释为苏联应获得行政方面的支配权，共同经营东北铁路不能解释为苏联拥有所有权和在经营中的支配地位。总之，既然苏联已经保证参加对日战争和不支持中共，国民政府也应准备做合理的让步，不过不能影响美国的利益，以及不能与美国的政策发生矛盾。[34]格鲁的备忘录明确反映了美国在东北的利益，至于什么是中国的“合理妥协”，杜鲁门政府在中苏谈判中支持宋子文的限度是什么，却没有做任何说明。

由于斯大林需要前往波茨坦参加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中苏谈判暂时中断。在波茨坦会议期间，苏联对东北的意图成为美国军政幕僚经常讨论的议题。他们在此期间提交的一系列备忘录中指出：“雅尔塔秘密协议”以某种形式表明了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华政策，即门户开放和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但是，苏联在中苏谈判中提出的在东北获得特殊地位的要求，既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也损害了美国一贯奉行的对华政策，这“同罗斯福设想的整个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建议杜鲁门政府更积极地关

注并介入中苏谈判，坚定地支持国民政府抵制苏联那些超过“雅尔塔秘密协议”的要求。具体办法或是请宋子文到波茨坦，将中苏谈判变为多边谈判，使美国成为直接参与者；或者同苏联领导人直接交涉，向苏联施加影响，取得苏联在东北支持门户开放的保证，对于中苏谈判中的细节则可以不过于拘泥。[35]

政治军事幕僚们的建议措辞激烈，使美国决策者颇费踌躇，因为即使在上述三个基本精神一致的方案中进行选择，也不那么容易。在第一阶段的谈判中，苏联已经保证不支持中共和不干预新疆事务，并声明在战争结束后，将东北行政权移交给国民政府。杜鲁门政府如果在东北港口和铁路之争中采取强硬的立场介入，甚至导致苏军参战之际中苏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冒这样的风险值得吗？

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这的确一度使美国军政要人们激动不已，但他们很快就判断这并没有更多地改变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马歇尔在回答杜鲁门关于是否还需要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问题时，相当冷静地指出：一方面，苏联已经在中苏边境接壤地区大规模地集结了军队，这本身就已经使美国达到将大批日军牵制在亚洲大陆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苏军已经在远东大规模集结，只要苏联领导人愿意，就可以不顾美国的态度，挥师进入东北，取得它想要得到的一切。马歇尔显然认识到，尽管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可能已不像过去那样是绝对必要的，美国却没有因此就可以对苏联发号施令。美国除了继续协调与苏联的关系，别无更佳选择。

美国领导人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继续执行在妥协中限制苏联的方针，避免采取过于刺激的行动，一方面继续推动中苏谈判，催促宋子文回到莫斯科的谈判桌旁，并不对国民政府做出正式和明确的保证；另一方面也要向苏联施加压力，限制苏联在东北提出过度的要求。

17日，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正式召开之前会晤了斯大林。他在会谈中询问苏联对东北的港口和铁路的要求等，是否会妨碍那里的“门户开放”。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苏联控制了大连，那里会成为自由港；苏联经营东北铁路亦不会妨碍美国未来在东北的贸易活动。他认为中苏谈判的关键障碍在于国民政府不肯承认苏联在东北的“优越权益”。参加会谈的国务卿贝尔纳斯强调，苏联提出任何超出雅尔塔秘密协议规定的要求，都会引起麻烦。斯大林反驳说，苏联提出的条件比“雅尔塔秘密协议”的规定更优厚。美国领导人显然不会满足于斯大林的这种保证。当晚杜鲁

门告诉史汀生，他主张在东北坚持执行门户开放。[36]

7月28日，哈里曼向贝尔纳斯建议，应由杜鲁门直接说明，中苏在解释“雅尔塔秘密协议”方面存在的分歧。如果宋子文没有美国的支持，中苏达成的协议会给苏联在东北超过美国的特殊利益，甚至会切断东北同外国的贸易联系，那时美国将无法推卸在东北放弃门户开放的责任。他同时起草一封信，请求授权他转交苏联领导人。信中包括三点内容：（1）承认苏联在使用东北港口和铁路方面的利益，唯一的目的就是使苏联获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以便与外部进行联系；（2）苏联应充分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3）在东北承认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的原则。[37]8月4日，赫尔利从重庆报告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已经决定接受苏联对旅顺港的要求，而苏联又提出在旅顺以南100海里的一个岛上建筑军事设施。

面对杜鲁门政府内部强硬派的呼声和苏联在东北问题上咄咄逼人的进展，杜鲁门于8月5日指示贝尔纳斯，立即授权哈里曼通知斯大林：第一，美国不准备撤回对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支持，宋子文已经接受了雅尔塔秘密协议中的条件，中苏之间不得达成进一步使中国让步的协议；第二，美国不同意将大连港划入军事区，以及将其一部分作为海军基地，罗斯福不仅曾经拒绝苏联租借大连，而且建议使之作为国际化的自由港；第三，建议在公布中苏条约时，中苏同时宣布保证东北“门户开放”；第四，美国不反对组成国际委员会，共同管理东北港口和铁路。[38]“8·5指示”是美国在中苏谈判问题上政策发生变化的重要信号，它明确提出了美国限制苏联在中国东北谋求优势的界限，这成为哈里曼后来直接插手中苏谈判的指导原则。

由于杜鲁门政府的态度明朗化，哈里曼在中苏谈判第二阶段判若两人。8月7日，哈里曼会见宋子文后，声称对国民政府让步的幅度感到吃惊，好像国民政府过去的软弱与杜鲁门政府的影响全然没有关系。第二天，宋子文告诉哈里曼，斯大林又提出一个苏军应得到东北的日本战利品的问题。哈里曼认为，这是苏联在企图长期控制和榨干东北经济。他立刻将美国政府8月5日的指示转告宋子文，为这位对谈判前景感到“沮丧”的准代表打气。[39]

8日当天，哈里曼还会见了苏联领导人。他根据杜鲁门政府的指示向斯大林声明，美国反对将大连港划入军事区，希望苏联在公布中苏条约的同时，宣布支持东北门户开放。斯大林当即表示不能接受哈里曼的

解释。他指出，“雅尔塔秘密协议”中的“优越权益”一款并非仅指贸易，苏联要求共同管理大连市区和港口这一点与“门户开放”没有关系。苏联方面已经一般地满足了中国的条件，东北相关的铁路和港口都是俄国人用俄国的钱建造的，如今苏方已经同意中方负责铁路警卫以及参与管理铁路和港口，可他们却不欢迎俄国人。斯大林最后表示，大连必须划入军事区，苏方可以保证通过大连展开的贸易活动充分自由，东北铁路原则上亦如此。[40]

尽管斯大林再次做出对“门户开放”的明确保证，哈里曼仍然满腹狐疑。他向杜鲁门政府报告说：“雅尔塔秘密协议”中没有哪一条允许美国支持苏联的要求。他无法相信，在苏联保安部门的控制和秘密警察的管理下，大连能成为真正的自由港。12日，哈里曼根据美国务院的指示写信给莫洛托夫，重申了他的口头声明：（1）大连应该成为国际自由港，苏联在运输方面的“优越权益”可获得充分保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连港及与之相连的铁路可以划入军事区；（2）尊重中国主权和“门户开放”的原则。他在信中强调，杜鲁门总统本人非常希望，斯大林不要再迫使国民政府让步，谈判中凡是与美国的利益和原则有关的问题，都应与他协商。[41]

既然啃不动苏联这块硬骨头，哈里曼唯一的办法就是阻止中国方面继续后退，支持宋子文抵制住苏联的压力。哈里曼在会谈中提醒宋子文：国民政府方面的让步如果影响到美国利益和政策，必须事先同美国协商；杜鲁门政府已经一再表明，宋子文充分履行了雅尔塔秘密协议；如果他进一步妥协，就只能被理解为苏联在其他方面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宋子文立刻表示，他本人“彻底了解并承认此态度之正确性”。[42]

美国在8月5日以后直接介入中苏谈判，其重要性并不在于是否会严重影响中苏谈判的进程和结果，而是在于美国的行动表明，它已经不愿容忍因东北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给美国未来在东亚的全面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当时苏联在东北已是大兵压境，相比之下，美国的外交手腕由于缺少相应的实力做后盾，显得非常软弱无力。苏军大批进入东北后，美国政府为了尽快结束中苏谈判，以免出现更为不利的后果，于11日指示哈里曼在中苏谈判中坚守的底线：（1）接受苏联将大连划入军事区的要求，但平时不得驻军；（2）同意外蒙古独立，其影响不得波及内蒙古；（3）在港口设备所有权的问题上，应该设法支持宋子文；（4）铁路经营事务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43]美国的让步实属迫不得

已。它既然已经决心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东北，可又无法通过中苏谈判，限制苏联对东北的控制，这就决定了不论中苏谈判的结果如何，美国最终都难免要与苏联在中国东北展开一场激烈的竞争。

在美苏的角逐中，国民政府扮演的角色是相当尴尬的。中苏两国在东北存在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势力的迅速扩张，中苏在东北的接触被日本隔断，致使双方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一旦日本势力退出东北，中苏在东北地区的各种争端必然会再度爆发。蒋介石对此当然不会掉以轻心。概而言之，维护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既然是生死攸关的首要政治目标和根本原则，它也必定成为处理对苏关系的出发点和归依点。这个基本原则也贯穿于蒋介石解决东北问题的整个过程之中，而且表现得特别突出。这既是由当时的中国政治的本质决定的，也是由中苏关系的特点决定的。

国民政府对苏外交的难题在于需要解决中苏和国共两种互相纠缠的关系。一方面，如果无法使苏联放弃控制东北地区或过度索取利权，不论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哪个方面，都会给国民政府造成严重困难，甚至可能引起一场政治危机。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中国引起的政治震荡，可谓前车之鉴。另一方面，如果不对苏联做相当让步，一旦苏军进入东北后对中共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对国民政府的威胁更严重。这两种前景都会危及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不过尚可两害相权取其轻。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外交方面并不会超出近代中国统治者的思路。苏联势力向东北的渗透不过是“肘腋之忧”，中共才是“心腹之害”。蒋介石既然确定了和苏反共的方针，在东北必定要对苏联让步，切断苏联与中共在战后很有可能在东北建立的联系，从而继续维持包围中共的战略态势。

决定国民政府在处理对苏关系时一直以妥协作为基调的另一个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因素，是它本身缺乏足够的实力，从而造成在外交上对美国的严重依赖。除非积极追随美国的东亚政策，否则国民政府在对苏外交方面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国民政府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的一切争论，不仅是在维护中国的利益，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配合这个时期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方针，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有关规定落到实处，至少在形式上如此。

但是，无论如何也应该承认，不论从上述哪个角度考虑，东北对于国民政府毕竟有着比美国远为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国民政府在追随美国妥协的基调中，仍然企图尽可能缩小或控制苏联索求的范围，在东

北地区的有关问题上采取了与外蒙古问题有重大区别的处理方式。从中苏谈判的实际情况看，国民政府在处理中苏关系时，始终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东北问题上，一面按照杜鲁门政府的要求努力协调中苏关系；一面不断利用美苏矛盾，施展“以夷制夷”的手腕。在这方面，蒋介石的确是煞费苦心的。

1942年8月3日，罗斯福派往重庆的代表居里与蒋介石会谈时第一次试探了国民政府在战后对东北的政策。当时蒋介石强硬地表示：“中国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绝无讨论之余地”，如果未来在有关战后安排的和会上不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他“将继续抗战，即招致国家之毁灭，亦所不惜”。他认为罗斯福政府应该发表公开声明，重申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否则苏联一旦插手东北，太平洋在战后“将无太平之望”。[44]显然，蒋介石做出如此强硬的声明是在影响罗斯福政府的政策；他对罗斯福政府在东北问题上有可能对苏联做出妥协的企图是足够敏感的，而且认为如果得不到美国的帮助，国民政府“所能尽力之处甚微”。[45]所以，他一直企图用在东北向美国人提供好处和便利，收买罗斯福政府支持国民政府抵制苏联可能提出的各种要求。

1942年10月7日，蒋介石向当时正在重庆访问的美国代表威尔基建议，旅顺、大连等中国沿海要塞“必须返诸中国”，同时欢迎美国在这些要塞建立海军基地，供中美“共同维护而应用之”。[46]1943年6月18日，在宋美龄访美期间，蒋介石专门指示她在见到罗斯福时，应说明东北的旅顺和大连“只可与美国共同使用，而不宜与其他各国公用”；中国必须保有旅顺港，将来大连或可作为自由港，不过这也要视苏联的对华政策而定。[47]如前所述，罗斯福当时确实满足了蒋介石的愿望。他在德黑兰第一次向斯大林提及东北问题时，除了表示可以使大连港成为国际管理的自由港外，并没有更多的许愿。

罗斯福政府在雅尔塔会议中对苏联让步的程度的确大大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料。在中苏谈判的酝酿阶段，国民政府曾经做出相当大的努力，争取杜鲁门政府站到自己一边，协助国民党政府尽可能地限制苏联在东北港口、铁路方面提出的要求。国民政府之所以对“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有关条款强烈不满，首先是担心如果同意苏联“租借”旅顺，会引起一系列外交纠纷。按照“租借”惯例，苏联在旅顺将享有驻军权、行政控制权，甚至包括实际上的治外法权。其结果不仅会导致苏联在实际上控制大连港乃至辽东半岛，中国在该地区的主权严重受损，而且会在整个渤

海湾造成不稳定的局面，直接威胁到华北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其次，蒋介石对同罗斯福政府长期交往所达成的谅解抱有幻想，他不相信美国会对东北港口这块肥肉失去兴趣。更何况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总统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对苏联政府的立场要比前任强硬很多。加之当时赫尔利的外交行动，更加重了蒋介石可以通过外交活动影响美国政策的侥幸心理。

客观地评估，蒋介石当时显然高估了国民政府在美国东亚战略天平上的分量。他曾经先后向美国提出各种建议，归纳起来有四点：第一，希望确切了解美军是否准备在辽东半岛登陆，这是决定国民政府在东北对苏方针的基本因素；第二，要求美方做出对“雅尔塔秘密协议”有关条款的确切解释，以便在同苏联谈判时有所依赖；第三，坚决反对将旅顺港租借给苏联，同时邀请美国参与使用旅顺港，从而造成对苏联的直接制约；第四，争取美方直接参加中苏谈判，甚至签订一项多边的协议。

事实证明，这套拉美抵苏、以夷制夷的手腕，在当时很难产生预期的效果。决定外交天平倾斜方向的基本因素是实力地位。如果美国当时有实力自己打败占领中国的百万日本军队，特别是在东北地区的数十万日本关东军，以及有意愿在东北直接同苏联打交道，何劳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邀请，美国很可能早就当仁不让了。杜鲁门政府一再拒绝给予国民政府明确的支持，把蒋介石那些絮絮叨叨的建议统统归为“枝节问题”。美国领导人指示赫尔利，有必要向蒋介石解释清楚，美国不愿共享旅顺港的使用权，也不可能参加中苏谈判；美国的立场是履行“雅尔塔秘密协议”，而该协议规定了旅顺租借给苏联。[48]

杜鲁门政府此时的态度如此暧昧，致使国民政府处于被动的地位；它除了按照美苏“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文本做出妥协，很难有其他的选择。国民政府当时判断，如果拒绝妥协，苏联完全可以凭借其出兵东北后的实力地位，实现它在东北的要求，而更大也是更可怕的代价可能是苏联转向在苏军占领区扶持亲苏政权，当然首选就是中共军队。进一步说，杜鲁门政府也会因为国民政府在外交上自行其是，拒绝在中苏争端中给予支持。反之，如果能够同苏联达成一个协议，杜鲁门政府对中苏纠纷便不能坐视不管，而国民政府进退便会有所依据，从而限制“雅尔塔秘密协议”的不利影响。可以说国民政府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并抱着一些幻想开始与苏联谈判的。

在中苏谈判的第一阶段，宋子文所坚持的所谓“原则”基本上没有超出美国方面对“雅尔塔秘密协议”的理解。即使是关于旅顺港的争论，用宋子文的话说也不过是争一个“面子”。苏联的让步仅仅是不使用“租借”两个字，但在实质性问题上，如旅顺驻军权和行政控制权等，苏联的要求统统得到了满足。

7月13日，宋子文在哈里曼的鼓励之下，不顾苏联的压力，毅然中断中苏谈判。他采取这一行动除了不愿为中苏谈判承担个人责任外，主要目的是想利用波茨坦的美英苏三巨头会议，争取杜鲁门政府支持他在谈判中坚持的条件。宋子文在谈判中断前已经向哈里曼说明，他已经尽可能地接受了斯大林对“雅尔塔秘密协议”中有关条款的解释，现在希望了解杜鲁门政府对解决东北港口和铁路问题的确切看法；美国方面要么促使苏联接受中国的条件，要么提出一个中苏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49]

7月19日，蒋介石与宋子文讨论了中苏谈判的情况。蒋介石在会谈后打电报给杜鲁门，要求他在波茨坦直接与斯大林讨论一下东北问题。蒋介石在电报中表示，宋子文在莫斯科的谈判中已经贯彻了“雅尔塔秘密协议”，在外蒙古问题上甚至走得更远。他不能做超出中国人民允许的限度的事情，希望杜鲁门向斯大林解释中国的合理立场，以使苏联不要再坚持不可能被满足的条件。[50]宋子文则在重庆告诉赫尔利，杜鲁门政府在中苏谈判中应该更充分地支持国民政府，而且他不愿意再到莫斯科去谈判，因为“拟议中的与苏联的协议会在政治上损害对其负责任的人”。[51]

杜鲁门政府此时虽然无意再满足苏联对东北利权的过度要求，却不打算让蒋介石把它的态度误解为国民政府可以任意同苏联讨价还价。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本来就担心中苏谈判破裂，绝对不希望由于发出错误信号而导致中苏谈判中途翻船。7月23日，杜鲁门答复蒋介石说：“我要求你执行雅尔塔协议，但没有要求你做任何超出该协议的妥协。如果你与斯大林主席在正确理解雅尔塔协议方面存在分歧，我希望你安排宋子文到莫斯科，继续努力达成完全的谅解。”[52]28日，国务卿贝尔纳斯还专门打电报给赫尔利，指示后者催促宋子文于7月30日或31日再赴莫斯科，继续与斯大林谈判并争取达成协议。[53]

美国领导人这些听上去强硬却又难以捉摸其本意的答复使蒋介石颇费踌躇。他不清楚，到底怎样才算没有“超出该协议的妥协”。在无法确

切了解杜鲁门政府的意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只能按既定方针行事。当宋子文表示不愿做中苏条约的签字人后，蒋介石选择与政学系关系密切的王世杰担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作为国民政府的首席代表，而宋子文则作为二把手，他们一同前往莫斯科进行谈判。这一人事安排表明，蒋介石仍然打算力争与苏联达成协议。

当王世杰和宋子文到达莫斯科时，中苏谈判的气氛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子文通过同哈里曼的会商确信，杜鲁门政府在东北问题上已经改变了以前一味妥协的态度，这无疑使王世杰、宋子文等人讨价还价的地位有所加强。不过杜鲁门政府的口头保证不足以抵消苏军即将大举攻入东北所造成的压力。王世杰、宋子文等坚持的条件实际上基本维持在最低水平上，即：第一，要求苏联给国民政府留些“面子”，宣布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使他们向中国人民有所交代；第二，战争结束后保证苏军按时撤出东北，该地区的行政权交国民政府接收。至于有关的港口和铁路利权问题，几乎全部接受了苏联的条件。

国民政府的让步对此后美苏和中苏在东北的争端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的利害关系，导致不同的斗争重点。美苏在东北的矛盾集中于港口和铁路的利权方面，表现为是否承认“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国民政府同苏联的矛盾主要是行政权的接收之争。哈里曼曾经回忆说：“我发现宋一点也不关心那些令我们担忧的事情。他认为，能使斯大林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满洲的主权即为一项巨大的成就。他远不像我们那样地关心是中国还是苏联军队保卫铁路或者谁是大连港务局局长一类细节问题。”[54]哈里曼这些事后评论并不完全准确，但却清楚地反映出美蒋在东北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美国方面的某种情绪。美国的这种态度也证明，它全力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并不是因为特别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是担心东北的“门户”不对它“开放”。

后来的发展表明，美国、苏联和国民政府在东北的矛盾使东亚建立在“雅尔塔秘密协议”基础上的格局从一开始就很不稳定。“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调节美苏和中苏关系方面的平衡作用是暂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美苏两国的矛盾这时在东北仍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不甘心东北被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不允许美国染指东北；一个要东北“门户开放”，一个要关上东北大门。国民政府的软弱和对美国外交支持的幻想使它无力阻止两个大国在这一地区的角逐。而且，国民政府因袭了清王朝“以夷制夷”的外交传统，企图在美苏复杂的矛盾中火

中取栗，更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不难预见，东北在战后难免会成为新的热点，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动很可能以东北地区的冲突为中心展开。

二 进军东北

通观美国、苏联与国民政府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战后东北问题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它们三方当时对中国政治力量对比的真实状况的认知，基于不同的理由和逻辑而存在程度不同的误判。中共中央在抗战结束不久即做出进军东北的决策，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关键点。这个根本性转变的核心就是近代以来列强主宰东北命运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中共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将成为最终决定战后东北命运的力量。从后来中共军队进军东北所产生的历史性后果看，中共中央决定进军东北的战略决策不仅决定了东北冲突的形式和前途，而且最终导致东亚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迅速的和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以及逐步改变了美苏主宰战后东亚命运的局面。

在将日本侵略者逐出东北后，使东北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战略基地，是中共领导人经过长期谋划、长期准备并力争实现的极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从历史的联系看，战后中共部队向东北的进军，可以说是抗战时期东北对日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曾在东北地区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军队经过艰苦奋战，相继开辟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等毗邻东北的战略要地地区，这为战后中共军队能够抢先进入东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冀东根据地的军民为开辟进军东北的通道，在长城内外长期坚持游击战争，打破了日伪军在长城沿线制造的“无人区”封锁线。他们依托那里的根据地不断向伪满统治的纵深地区渗透和发展。在战后争夺东北的斗争中，中共军队开辟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和山东抗日根据地这两大战略地区的重要价值很快就充分显示出来。

1942年7月9日，毛泽东给当时正在山东临沭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临时驻留的刘少奇发去一份长电报，特别提出了“山东的重要性问题”。他说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区，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因此希望擅长组织工作的刘少奇能多待一段时间，以“掌握山东任务”。[55]

1945年4月5日，苏联宣布中止《苏日中立条约》后不久，中共政策

立即出现了将战略发展重心从配合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逐步转向在华北和东北配合苏军作战的动向。毛泽东批转了晋察冀分局的一项重要指示。该指示认为：苏联终止《苏日中立条约》表明，苏日战争爆发已为期不远，远东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今后配合盟军作战，将主要是配合苏联。现在须加紧进行主力军、地方军的训练与扩大，以便能抽出若干主力，用于开辟东北。晋察冀部队的主要发展方向应置于热辽与雁北地区，这对于配合苏军作战意义重大。该指示还指出：过去由于苏日签订中立条约，我们的舆论工作着重宣传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胜利，致使许多干部对美国存在盲目的观点，不了解美国偏重扶蒋的政策，也在人民群众中增加了对美蒋的幻想，为了克服这种盲目性，今后应着重宣传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以及苏联的强大和它取得的胜利。[56]晋察冀分局的指示本身是针对局部地区的工作情况，但毛泽东及时批转这一文件表明，它的基本精神符合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对全局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期间，夺取东北已经成为一项相当突出的战略。中共领导人认为如能控制东北地区，就能形成背靠苏联的态势，从而根本改变中共长期被包围的态势。在1935年长征期间，中共中央就制定过“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即夺取西北地区以便能背靠苏联，这甚至得到了斯大林的呼应，当然最终还是未能成功。[57]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毫无疑问，中共中央认为控制东北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革命力量长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状况。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认为还有可能通过东北地区与苏联建立直接的联系，争取到国际援助。毛泽东当时提出：“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做外交工作，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但也要准备“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不过他坚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58]

1945年6月下旬，冀热辽军区组成三支“挺北支队”，开始向热河、辽宁的敌后地区进攻，掩护干部到指定地区开辟工作。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夺取实力地位的战略方向很快指向东北。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

发展，向南防御”，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中共中央认为：“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59]中共各有关部队立即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迅速向东北挺进，从此展开夺取东北的斗争。显然，在抗战接近尾声时，争取东北在中共中央的战后革命战略中已经具有关系全局的重要意义，决定着中共在战后的战略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对于东北势在必争。国内外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止中共部队进军东北，至多影响其规模和速度。

中共军队进军东北并不单纯是一个军事行动，还是一场极为复杂的外交折冲，而且在开始阶段主要是外交较量，甚至可以说进军东北的成败也取决于外交较量的结果。中共在东北面临的是美苏和国民政府经过长时间的外交谈判后构建的格局，其中并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保留一席地位，反之是将它彻底排斥在外的。罗斯福政府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与苏联讨论东北问题之时，已经对苏军参加对日战争后的作战方案及其可能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与中共军队进行军事合作的局面及其应对等，做了相当详细的分析。[60]国民政府为了防止苏联与中共在东北建立起特使关系，宁愿在东北地区的利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客观地看，美苏和国民政府在东北固然都有弱点，但它们的实力均强于中共。在冲破这种既定权力结构造成的障碍和阻力的过程中，与美苏和国民政府任何一方的关系处理不当，中共都会陷入完全被动，以致失去控制东北的机会。

到1945年8月下旬，苏军已经控制整个东北，在这一地区取得支配地位。“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形成和实施均与如何稳妥地处理对苏关系密切相关；如何妥善处理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与东北苏军的关系，是中共能否在东北站稳脚跟和迅速发展的关键问题。

1944年夏至1945年初，中共领导人对苏联是否参加对日作战和战后对华政策等的基本判断，显然变得越来越积极；中共七大提出争取东北的设想则与对苏军参战后的东亚形势估计有直接的关联，中共领导人对得到苏联的帮助还是持乐观态度的，尽管他们保持着谨慎。[61]中苏谈判开始以后，苏联和国民政府基于改善双方关系和外交政策的需要，均利用舆论工具渲染中苏谈判如何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代表如何“坦率”“友好”地讨论问题。中共领导人当时尚无法确切了解莫斯科谈判的具体情况，很难确定中苏谈判会产生什么结果，以及苏联参战后对

国共斗争会持什么态度，包括对东北的政策，等等。8月3日，曾经长时间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和与外国机构联络的中央委员王若飞在延安做了一次形势报告。他说中苏谈判一定签约，而且绝不会是“苏联自由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条约”；不过苏联不会允许国民政府亲美，也不会限制中共发展，尽管可能不愿意直接提供援助。[62]由此可以推断，中共领导人认为国民政府此刻与苏联的关系是很不确定的。这一时期对于包括东北问题在内的中苏关系的各个方面，中共中央对外均未发表意见。

1945年8月8日晚，苏联对日本宣战，苏军随即向东北的日军发动进攻。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实行广泛的进攻”，包括了“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63]8月11日，朱德公开发布了一系列向日军进攻的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是命令八路军吕正操部队向东北挺进。[64]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说明，二号命令只是“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率领的部队外，并非要求其他部队立刻开往东北。8月11日和12日，中共中央颁布的有关全国军事部署的决定中，也都没有提到进入东北的部署。[65]

8月13日，毛泽东向尚集中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干部做了重要的政治形势报告。他在报告中肯定了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对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运动的积极影响，认为“外国共产党的军队来援助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打击法西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所没有过的事”。不过，综观报告的全部内容，毛泽东对苏联参战的肯定还是有一定范围的。他一方面是为了鼓舞士气，通过宣传来抵消杜鲁门政府全力扶持国民政府争夺受降权对革命队伍内部造成的心理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估计到，只要有苏联力量的存在，就有可能迫使杜鲁门政府不会贸然直接帮助蒋介石和国民党下决心立即发动内战。至于苏联是否会给中共直接或间接的援助，毛泽东未做任何预言和解释，而是强调在中共七大期间提出的一项原则，即中共全党要有坚持自力更生的决心和准备，“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66]

毛泽东的这次报告实际上已经表达了中共中央在当时对中苏关系的判断，并奠定了处理对苏关系的基调，即立足于自力更生，同时争取与苏联合作。他在该报告中列举了中共军队力争控制的全部地区，其中对东北三省只字未提。实际上中共中央最初对进军东北采取了谨慎的方针。

8月13日，冀热辽军区根据既定方针，决定调动部队分三路出关进入东北，通过配合苏军的行动在热河、辽宁和吉林等三省发展。22日，中共中央提醒晋察冀分局注意：苏军已经占领热河、察哈尔两省，晋察冀分局可抽调大批干部，到苏军占领区的城乡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政权和武装。必须以友好的态度与苏军协商，在其允许的范围内工作。[67]从较早进入东北地区的中共部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看，进入东北地区的苏军在华北和东北不同地区对兴冲冲地前来联络的中共军队做出的反应是不一致的，这大致说明他们并没有得到高层的统一指示。直到9月上旬，中共曾克林率领的部队到达沈阳后，当地苏军还表示，他们需要向莫斯科请示，到底应该如何与这支中共部队相处。[68]这种情况表明，苏联至少也是不重视中共力量的存在和作用的，苏联领导人在与美国和国民政府接洽时，并没有考虑过中共这个因素。苏军统帅部制订在东北地区对日作战计划时，也没有考虑是否以及如何与控制着大片华北地区、华北与东北接壤地区的中共军队进行军事合作。实际上苏军对中共军队在相关地区的情况了解甚少。

22日至26日，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政策更加谨慎。中共中央曾经通知各解放区："苏联为中苏条约限制及为维护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69]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可以派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并获得发展。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只提出配合苏军和外蒙古军队，控制热、察两省和辽宁部分地区。该通知说明："东北三省属于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去活动，目前无法断定。因此命令所派遣的干部，继续进入东北。军队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70]可以断定，苏联领导人此时对重庆谈判的态度是这一时期影响中共中央对东北政策的主要因素。

8月26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公布。这时冀热辽军区北进各部队分别在围场、平泉、承德、绥中等地与南下苏军会师。经配合作战攻占了围场、隆化和山海关等重镇。张家口地区的八路军部队也与苏军会师。从中共中央所获的报告看，进抵长城一些地区的苏军对前往接应与配合作战的中共军队态度友善，并愿意进行合作。当时除了苏军未阻止，也不反感、不反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地区外，苏军实际上并没有，很可能也是无法完全控制广袤的东北地区。他们只是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并没有能力完全制止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当然，苏联最初持谨慎的态度，也是因为担心中共军队的行动，尤其是苏军与中共军队合作，会影响到苏联与美英的关系。[71]

中共中央根据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已经可以对苏联的态度做出基本判断，并据以确定与东北苏军关系的原则。29日，中共中央在一份给晋察冀和山东等分局的电报中阐述了对东北问题的基本判断和政策，即“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三省。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是，中苏条约中也有可利用之处，苏军报刊亦表示在中国支持民主与进步。只要中共军队在东北的行动不直接影响苏联方面在中苏条约中承担的那些外交义务，苏军“将会采取放任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所以，中共指示各地区派往东北的干部和部队应立即出发，只要苏军不坚决反对，即可非正式进入东北。进入东北的部队不要用八路军的名义，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文章，不进大城市，不勉强与苏军建立联系，不请求苏军给予帮助。一切只要苏军不坚决反对者，即可放手进行。但是，苏军坚决反对者则必须予以照顾，不使苏军在法律上为难。中共中央当时估计，由于道路不通，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尚有困难，而苏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完，中共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北和热、察两省。[72]同日，中共中央在给从山东渡海进入东北的部队的电报中指示他们，到东北后不必去找苏军指挥机关正式接洽，因为苏方受条约限制，不会表示同意中共军队的行动，而且南满各城市也不会交中共接管；进入东北的部队不要用八路军的名义，用各种各样的名称和式样，应注意在苏军不去的县镇和农村开展工作，创造力量。[73]

根据上述两份文件可以推断，中共中央对于苏军是否给予援助是有保留的，所谓“争取”苏军的协助就是使苏军不妨碍中共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中共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后，主要应在苏军尚未控制的城镇和乡村开展工作，组织力量，而大发展的时机则选择在苏军撤退而国民党军队未到之时。

9月初，胶东区党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山东渡海部队在大连与苏军做非正式接洽。对方表示，对中共军队在乡村开展活动不加干涉。6日，冀东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率部进入沈阳。7日，苏军代表与曾克林等举行会谈，讨论双方如何协调在东北的行动。苏方同意，八路军先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开展工作。11日，中共中央根据胶东区委的报告，认为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到东北的农村和小城镇开展工作，利用国民党势力尚未到达东北的时机，迅速发展力量，争取在东北确立巩固地位。[74]

9月中旬，中共部队抢先进入东北已经刻不容缓。此时国共重庆谈判尚未取得重要进展，而国民党军队已派遣四路大军，向平津张地区推进，抢占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为了推迟国民党军队深入华北和抢先进入东北，保证完全控制热、察两省，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铁路沿线组织重大战役。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催促挺进东北的各部队抓紧行动，选择的时间和道路"以愈快、愈近愈好"。此刻不论苏军采取什么态度，中共军队都必须进入东北。这时与东北苏军协调行动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已经不是要不要向东北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快更好地向东北发展。

9月14日，东北苏军指挥部代表贝鲁诺索夫在曾克林陪同下到达延安，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东北苏军指挥部的口头通知。贝鲁诺索夫声明，根据苏军统帅部的指示，在苏军撤出之前，国民党军队和中共军队都不要进入东北，已进入苏军控制大城市的中共军队请自行退出，苏军不久即撤军，苏军撤出后"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由中国自行解决"。中共领导人表示，中共军队可不进入东北和热河的大城市，苏军应将热河、辽宁原属于抗日根据地的地区移交中共军队。贝鲁诺索夫遂表示同意。通过这次会谈，中共中央大致确定，中共军队是可以不公开地进入东北的，而且进入东北后，可在乡村和苏军不管理的地区开展活动，苏军实际上同意由中共军队控制经冀热辽进入东北的通道，以及苏军撤出东北后，不会干预中共争夺东北的行动。经过谈判，双方实际上达成如下默契：苏军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但不能以八路军的名义活动；中共可以在东北乡村开展工作，但不得在大城市和苏占区公开活动；苏军同意中共控制由冀热辽进入东北的通道。[75]这时正是中共中央酝酿确定中共军队战略方向的关键时刻，这次延安会谈使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加快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步伐。

9月17日，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经过讨论后，向在重庆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发出了一份电报，提出了名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该电报提出，为了在苏联军队"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需要立即在冀东、热河一带屯兵"十万至十五万军队"；"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19日，中共中央在重庆的代表团即复电批准了这个计划。[76]中共军队随后开始大规模向冀东和热河地区做战略集中，并陆续进入东北。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一面避免同苏军发生矛盾和冲突，以免苏军阻挠；一面力争苏军不干涉和少限制自己的行动。从9月中旬到10月初，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可以说是既能发展，又无法放开手脚不受限制地发

展。

不过恰在这个时期，苏联方面开始调整在东北的政策。随着美军开始在华北登陆和美苏之间出现外交龃龉，东北苏军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不反对但也不主动、不积极的态度逐步发生变化。苏联从9月中旬开始，在东北采取有限度地支持中共的政策，同当时美苏在东亚的关系紧张和日本投降后苏军在东北面临的复杂局面有密切关系。9月11日至10月2日，美苏英中法等五国外长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缔结和约和管制日本等问题。美苏在巴尔干半岛及与东欧国家缔约等问题上争论不休。特别是在东亚，美国企图利用单独占领日本的既成事实，垄断对日本的控制权，抵制苏联参加管制日本。苏联则针锋相对，提出组织四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美国拒绝了苏联的建议，单方面宣布于10月下旬召开远东咨询委员会会议。在美苏的争论中，国民政府采取了追随美国的立场。伦敦外长会议因美苏争执不下无结果而终，双方关系顿时紧张起来。在这种气氛中，苏联在东亚地区采取强硬对抗的姿态，向美国反击。苏军在东北采取不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限制的行动，支持中共军队进入和控制东北，就是在东亚地区反击美国的重要行动之一。

另一方面，苏联在东北的地位并不稳固。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苏联必须于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全部撤出东北。当时东北伪满军队已经放下武器，但潜在的影响不可低估。这支军队长期保持对苏作战的态势，敌视苏联的程度可想而知。苏军撤退后，国民党军队有美国的帮助，势必很快会进入东北。一旦国民党军队和伪满遗留势力合流，加之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将随着苏联在这一地区实力地位的削弱，变得更为棘手。这种不稳定的状况使苏联方面对东北未来的局面感到担忧。一旦国民政府顺利接收了东北的行政权，苏联就有可能失去控制那里局面的能力。加之美军陆续在华北各大港口登陆，并协助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和东北地区大规模运兵；杜鲁门政府也在不断要求苏联公开保证，在东北地区将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77]这也导致了苏联领导人加深了对杜鲁门政府试图在东北地区排挤苏联的怀疑。

正是基于对在东亚与美国博弈以及巩固在东北的实力地位的考虑，苏联采取了两项重要的措施。其一是拖延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时间，阻止国民党军队迅速进入东北；其二是准备在苏军撤出后，在东北造成对国民政府的牵制力量，防止出现国民政府独家经营东北的局面。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苏联当时除了帮助中共在东北获得一定发展之外，没有

更多的方案可选择。正是基于对实际利益和实力对比的现实估计，苏联在10月开始给予中共军队越来越积极的援助。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才被国民政府的外交攻势打断。恰是在这个阶段，中共中央大幅调整了进军东北的战略计划。

9月下旬，中共中央已经得知，苏军将暂缓撤出东北。苏方表示中共军队可以接收毗邻东北的一些华北重镇，包括承德、平泉、赤峰等进入东北的战略要道。[78]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提出，东北部队部署应背靠苏联、朝鲜，以外蒙古、热河的城市和乡村为依托，建立持久斗争的基地，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的各大城市上。目前不能将主力部署在东北大门口。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做这种部署，当然与苏军的友好态度有关。但同时也说明，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尚不能直接在东北南部的战略要地获得迅速发展的机会。中共中央认为，东北苏军不会承认国民政府以外的其他组织，肯定会将东北统治权交给国民政府。中共中央还要求山东渡海部队，仍然不得在苏军驻扎地区靠岸登陆。[79]

10月初，中共中央接获东北局报告，说东北苏军已经“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苏军将从日军那里缴获的大量装备都移交给中共军队。东北局遂向中共中央建议，可抽调30万主力进入东北。[80]10月下旬，苏军代表进一步鼓励东北局，在东北“应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迅速派人“接收工业中心及城市工业”，苏军并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甚至建议，最好将中共“党的中心移到此间”。[81]

这时期东北苏军向中共提供了重要帮助。其中包括：将锦州以南至山海关地区转交中共军队接管，这对于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和阻止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进兵具有重要意义；将缴获的部分日军仓库移交给中共军队，这给初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带来的益处不言而喻，它是中共军队在东北一度发展较快的重要条件；苏军从营口和葫芦岛撤出时，立即通知中共军队前往接收，使中共军队得以控制营口和葫芦岛，彻底破坏了国民党军队经海路抢先进入东北的计划，为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发展提供了方便。9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命令东北部队，改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的番号，苏联远东司令部通知东北苏军，不限制佩带此种标志的部队的行动。东北苏军采取的这些行动，是中共能够先于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并获得较快发展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苏联此时在东北对中共的支持毕竟是有限度的，这种有

限度的支持，是为了在同美蒋争夺东北控制权的斗争中取得更有利的外交地位。确切地说，苏联仍然企图维持和巩固它在东亚既定格局中的地位，而不是打算抛弃这个注定要土崩瓦解的格局。因此它既允许中共在东北发展，又不准它无限制地发展。至于限制的范围，则取决于苏联同美蒋关系的紧张或缓和的变化。如果不特别指出这一点，就不能理解苏联在东北对中共的帮助何以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并在11月中旬以后发生了急剧变化。

中共中央为保证顺利实施“向北发展”的战略，在调动军队抢先进入东北的同时，在华北沿海地区同美军展开了一场外交和军事博弈，而其焦点是阻止驻华美军控制华北通向东北的各海陆要道。

9月底，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根据同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开始在华北沿海的一些重要港口登陆。美军在中共中央实施夺取东北的战略刚刚展开、国共在华北的武装冲突正达到高潮之际，抢占华北的海陆交通要道，战略意图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是帮助国民政府抢占华北重镇，为国民党军队控制华北和集结出关做准备；第二是限制中共军队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和发展；第三是为了造成军事对峙的局面，向东北苏军施加压力。这可谓是一石三鸟。为达到这些目的，美军不惜参与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共控制地区的行动，直接向中共军队施加军事压力，直至在山海关地区抢占中共军队控制地区。

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如果不坚决抵抗华北美军的军事干涉，势必会失去对华北一些交通要道的控制，以致严重阻碍中共军队向东北的进军。自9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越来越关注美军在华北沿海登陆后的动向，认为“敌伪、美、英一致助蒋与我争夺东北，甚为明显”。[82]中共中央当时即通知华北各部队，一方面对美国的外交工作极宜谨慎，基本方针是避免与美军冲突；在前线碰到美国军民，应不予扣留，不加伤害，不收缴其武器和通信器材；如果美军人员与国民党特务一起到解放区活动，仅扣留国民党特务，不牵涉美方人员。[83]另一方面应“十分警惕对方非法行为之可能”。[84]中共中央还提醒山东分局，美军可能即将在烟台、威海、秦皇岛等地登陆，延安总部已经采取政治行动阻止美军的行动；美军在那些港口地区登陆后，中共有关部队应避免冲突，以善意接待；如美军进行武装挑衅，请迅速向中央报告。[85]此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向各地区中央局发布指示，要求在遇到登陆的美军时，应以主人态度予以欢迎，避免冲突。各部队必须照常掌握驻地行政和治安管理权。

如遇美军向我方开枪开炮，拘捕我方人员和占领我方阵地，以及携带国民党军队登陆，应向中央详细汇报，以便公开揭露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但在行动上必须忍耐一些。[86]

中共中央这时对美军在华北沿海登陆采取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重庆谈判尚未结束，同美军的关系紧张不利于在重庆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此时认为还需要确切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驻华美军的意图，因此力图避免刺激对方以致加剧与美军的矛盾，给自己造成新的障碍。

10月上旬，随着国共在华北的武装冲突愈演愈烈，美军在华北港口登陆后亦对中共驻军采取敌视态度。例如，在天津登陆的美军破坏了天津市的八路军办事机构，并拘捕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随着美军敌对行动的不断升级，中共军队同驻华美军的关系急剧恶化，双方在华北很多地区都处于对峙状态，并时有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发生。当时双方最尖锐的直接冲突集中于烟台和秦皇岛地区。

烟台是从海路进入东北的最近港口。八路军于8月25日占领了烟台地区。随着夺取东北战略的实施，烟台被中共中央确定为海运部队进入东北的枢纽。9月底，美军船只开始在烟台附近海域游弋，企图伺机夺占烟台。9月27日，叶剑英要求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转告驻华美军司令部，烟台已在中共军队控制之下，那里没有需要缴械的日伪军，美军已经没有必要在那一地区登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一再催促山东根据地的有关部队，必须尽快做好渡海准备并采取行动，及时发现美海军舰艇在航道上游弋，冒冲突的风险也要向东北海运部队。中央军委通知东北局，美军已经在天津登陆，我军渡海行动不能因此停止，必须改在夜晚分散进行。9月30日，中共中央还严厉批评山东部队的渡海行动过于迟缓，“已是大错，如不立即补救，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87]

29日，美军舰抵达烟台海面。10月1日，美军派代表在烟台上岸，与中共驻军负责人谈判，要求在烟台登陆。中共代表提出，美军士兵可在指定地点休息，美方可派人到市内察看美国人的财产。除哨兵外，一律不准携带武器。美军对中共方面的合理安排仍不满足。4日，美军派驱逐舰一艘，进抵烟台港，并要求中共撤退烟台地区的驻军，撤销在烟台的防务，将烟台移交美军接收。

为阻止美军在烟台强行登陆，中共中央指示烟台守军：对于美军登

陆，“我军必须表示强硬拒绝，建筑工事，实行抵抗。只有在不能击退美军并无法阻止其登陆时，才予撤退……但仍不先开枪”。中共中央认为：“只有我军采取强硬态度，并在世界上引起舆论大风波之后，才能压制美军的无理干涉。”[88]中共中央将烟台交涉的全部经过、有关函件，以及美军在烟台地区行动的详细情况等，全部公之报端，以期造成反对美军介入中国内战的舆论。

美军原计划参与夺占烟台的军队共有5万名海军陆战队官兵。他们受命可以采取全规模的军事行动，并配以充分的海空支持。在了解到中共军队已经解除了日军武装、控制了烟台地区并确实准备实行抵抗之后，美军指挥官便以“没有美军在那里登陆的理由”为名，放弃了在烟台登陆的计划。

秦皇岛—山海关地区是中共军队同美军发生较激烈冲突的另一个地区。秦山地区既有陆路出关的重要通道，又有海路出关的重要港口，是联结华北和东北的咽喉要地。日本投降后，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等地已被中共军队控制。美军抢占这一地区，是为了帮助国民党军队控制向山海关运兵的滩头阵地和铁路线。美军得到的命令包括如遇中共军队抵抗，“可执行必要而适宜的军事行动”。[89]显然，同在烟台地区的美军不一样，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国民党军队控制这个地区。

10月1日，美军在秦皇岛强行登陆，并向前往联络的中共军队开枪射击。10月18日，美军乘卡车冲入中共军队控制的海阳镇，进行军事示威。随后美军于20日配合国民党军队攻占海阳镇，解除中共守备人员的武装。10月中旬，美军不顾中共守军的警告，强行修筑秦山铁路，并向中共军队的阵地推进，为进攻山海关做准备。31日，美军掩护国民党军队攻占北戴河。美军指挥官甚至恫吓说，如再遇中共军队射击，就轰炸中共军队据守的村庄。

10月18日，东北局报告中共中央，秦皇岛登陆的美军表面上表示中立，并试图与中共守军保持友好关系，实际上是在为国民党军队突袭山海关并进入东北做准备。[90]鉴于秦山地区中共军队与美军的对峙日益严重，中共中央严令当地驻军禁止任何美军人员进入中共控制区。

这时国共已经在华北铁路沿线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共中央当时提出的战略任务之一，就是“控制冀热辽，堵塞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的计划”。在中共军队的有力打击之下，国民党军队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平津地

区集结并进攻东北，已不可能。如果美军控制秦山地区，并完成秦山铁路的修筑，就会为国民党军队突入东北提供极大的便利，同时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防御计划。

鉴于秦山地区的局势日益严重，中共中央指示有关部队：对美军强修秦皇岛至山海关铁路应表示坚决反对；除非武装的美国人之外，应禁止美军任何武装人员进入中共军队控制区；在铁道线及其他接近美军地点建筑工事，严密部署警戒，不许美军通过；如美军武装进攻则坚决抵抗，只有在抵抗不住时才得撤退，并在有利的条件下实施反攻；有关部队应迅速将上述警戒线通知美军，并不得对美军先开枪。[91]

中共中央在延安也采取行动直接与美方交涉。朱德和叶剑英分别致函驻华美军负责人，强烈谴责秦山地区美军蓄意干涉中国内政，协助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向山海关中共驻军实行军事压迫。他们要求美军离开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战场，如果美军有正当事务必须前往中共军队控制地区，应该事先与中共方面联系。在此期间，驻重庆的中共代表访问了美驻华使馆，抗议美军帮助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他们提醒美方注意，美军介入中国内政有可能引起国际争端。秦山地区的中共军队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对美军采取了坚决抵抗的措施。

中共中央采取的措施并没有阻止美军控制秦山地区。美军已经强行登陆，给中共军队造成严重困难。中共军队只能迟滞美军的行动，却无法根本阻止美军向前推进。中共中央对美军的基本方针是坚决抵抗，避免冲突，不打第一枪，以免酿成更大冲突，给国民党方面挑拨的机会，给美国反共势力提供军事干涉的借口。在整个10月，中共军队与美军一直处于对峙的状态。到11月初，在东北登陆失败的国民党军队被美国军舰运抵秦皇岛，随即在美军支持下，向中共守军发动进攻，很快控制整个秦山地区，并由此突入东北。

中共军队在华北沿海抵抗美军的同时，也在华北铁路沿线采取抗击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抗战结束之前，国民政府在华北地区紧急组建了第十一、第十二两个战区，其目的包括在华北争抢地盘，并防止中共军队与苏军建立联系。抗日战争结束不久，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高层就认为要想接收东北，就必须控制华北，巩固平津后再出榆关，否则国民党军队孤军深入东北是难操胜券的。中苏条约签订之后，国民政府企图依靠对苏外交，和平接收东北，以弥补国民党军队兵力严重不足的弱点。重庆谈判结束以及国民党军队在华南和华中取得优势地位后，蒋介石遂

决定开始向华北用兵。国民党军队分成四路大军，沿平绥、同蒲、平汉和津浦等铁路线，向平津张地区集中。其战略意图是夺取和牢固地控制华北战略要地，一面配合在东北刚刚开始的外交接收，一面与华北沿海登陆的美军遥相呼应，为从北宁线和热河进入东北做准备。所以，国民党军队能否控制平津张地区既是能否控制华北的关键，也是关系到能否控制东北的战略行动。

为了挫败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企图，中共中央于9月便开始在华北实施大规模交通战，提出“为争取时间扩大解放区，发展东北，整编主力，必须迟滞蒋军行动”，华北各根据地军民必须分段彻底破坏一切铁路和公路。中共中央向华北各根据地部队发布指示：目前国民党军队正向平津张地区急进，企图控制华北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及争夺东北。为了保障根据地军民的既得利益和争取东北的战略计划的实施，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铁路前进的国民党军队，必须予以坚决打击和阻止；华北地区作战的重心应放在铁路线上，目的是消灭或阻止北进的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特别强调：各地各部队必须认识到，目前的交通战是决定今后国内形势和中共地位的中心环节，所以必须“全力进行，坚决作战，不要怕消耗重”；任何“决心不大，成绩不好，陷于被动，随便放走顽军通过，或怕消耗，不愿坚决作战，都是不对的，必须严格纠正”。[92]10月中旬，华北中共军队先后发起察绥、邯郸、津浦路等战役，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迟滞了国民党军队建立平津张战略基地并抢先进入东北计划的实施，为向东北大进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华北地区的态势看，国民党军队在陆路集结军队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是在华北美军的大力援助下，才通过海运和空运一部分主力部队进占了平津和秦皇岛—山海关地区。11月初，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山海关推进。1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山海关并突入东北，而这一行动实际上得到了该地区的美军的协助。至此，国共在东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序幕终于揭开了。

三 “外交接收”失败

控制东北是国民政府在战后的既定战略目标。8月24日，在国民党召开的高层会议上，蒋介石在讲话中将在战后完全控制东北列为“国民革命最大的目标和最迫近的工作”之一。[93]如前所述，在莫斯科中苏谈判的第一阶段，苏联领导人就已经明确保证，一俟战争结束，苏军会将东北的行政权完全移交给国民政府接收。基于苏联方面的承诺，国民政府在抗战结束前便确定，战后在东北地区将奉行“外交接收”的方针。中苏条约签订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更加相信，只要能够改善对苏关系，促使苏联方面履行承诺，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实现完全掌控全东北的目标。9月18日，蒋介石发表了纪念“九一八”14周年长篇讲话，其中专门谈到中苏条约会使中苏两国“唇齿相依，守望相助”。[94]实际上中苏双方的确对苏军进入东北后的权责和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达成了协议；[95]蒋介石在中苏谈判期间已经在指示宋子文，要求苏方为国民政府官员空运进入东北提供方便。[96]

9月下旬，中共军队开始大规模向东北进军的行动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这促使国民党军队加快了进入东北的步伐。另一方面，10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馆通知国民政府，东北的苏军已开始撤退，主力部队准备于11月底撤完，希望国民政府派代表于10月10日至15日到达长春，与在东北的苏军当局举行谈判。[97]9日，国民政府东北行营代表董彦平抵达长春。之后双方经商定，同意东北行营驻扎长春。12日，熊式辉、蒋经国和张嘉璈等也到达长春，中苏有关接收东北的正式谈判随后开始。

从10月13日至11月15日，国民政府东北行营与在东北的苏军当局在长春进行了一个月谈判，这阶段双方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民党军队如何向东北运兵，结果未能就有关行动方案达成协议。国民政府的谈判方针是利用中苏条约的有关规定，要求苏联允许并协助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国民党军队如能顺利进入东北，再辅之以整编伪满军队，就可以迅速确立在东北的军事优势。东北苏军的方针是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向东北运兵，即在彻底解决涉及东北地区利权的各种悬案之前，不准东北有大量国民党军队存在。

中苏长春谈判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0月13日至23日，其间

正式谈判三次，双方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国民党军队在大连港登陆的问题。国民政府在接到苏联关于谈判接收东北事宜的通知后，外交部副部长甘乃光便于10月1日下午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国民党军队的第十三军将于10日前后，从九龙乘美国运输舰前往大连登陆。[98]为了防止苏联方面借故延宕，外交部同时指示傅秉常，将照会内容直接转告苏联政府。[99]国民政府此时提出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的建议，不仅是国民党军队单方面的决定，而且是在根据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的建议行事。[100]

大连地区于8月22日被苏军空降部队250人占领。国民政府在谈判开始即提出以一军之众，乘美国军舰在大连港登陆，很可能引起东北苏军对其真实意图的怀疑和警惕。另外，东北行营建议的军事行动也不符合中苏双方在莫斯科谈判时确定的接收程序，或者说双方对这个程序的理解有很明显的不同。苏联外交部接到通知后不久即召见傅秉常询问第十三军在大连登陆后“究赴何地，其目的何在”。[101]7日，苏外交部正式通知傅秉常，第十三军在大连登陆违反中苏条约中关于大连港商业化的规定，苏联拒绝任何军队在大连港登陆。[102]苏联驻华大使馆亦向国民政府递交了内容相同的照会。9日，王世杰召见彼得洛夫做两点口头声明：第一，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行动，不能被认为违反中苏条约；第二，国民党军队到东北的目的是维持治安和镇压反动分子。他要求苏联驻华大使馆再向苏联政府转达国民政府的声明。[103]12日，东北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告诉熊式辉，他无权答复是否允许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104]

10月13日，长春第一次正式谈判开始。熊式辉继续提出国民党军队准备在大连、营口、葫芦岛和安东等港口登陆，苏军应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给予协助。担任东北苏军代表的马林诺夫斯基表示，在大连登陆涉及中苏条约，应由两国政府解决；营口和葫芦岛可供国民党军队使用，但苏军不能保证安全，亦不了解港口的设备情况。他建议国民党军队最好是经铁路进入东北，他同时提出，国民政府在东北的秘密组织应该停止活动。[105]担任东北行营特派员的蒋经国在当天会见了马林诺夫斯基，后者表示国民政府不得任用伪满人员。蒋经国随即密报蒋介石，需要重视马林诺夫斯基在会谈中对反苏秘密组织问题的警告，因为苏方认为那些人的政治立场是反苏的。[106]

17日，中苏双方代表举行第二次正式谈判，仍未能就经大连运兵问题达成协议。熊式辉在谈判中提出，国民政府计划向东北运送四个军的

部队，其中海运两个军，陆路运送两个军，并准备将伪满军队改编为保安队。苏方则坚持，海运的军队可于11月初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届时苏军将撤出那两个地区；陆路运兵可经热河省进入东北，苏军可保证交通线安全；如有非正式武装，苏军将予缴械；至于国民政府能否整编伪满军队，须经请示才能答复。[107]至此可以说东北行营在与东北苏军的谈判中几乎一无所获。

此时国民政府在重庆也是一筹莫展。10月15日，彼得洛夫会见王世杰，严词拒绝了他9日的声明，表示“无论谁的军队在大连登陆，均系破坏中苏条约，故苏联政府，坚决反对”。[108]蒋介石仍不甘心，他于16日指示东北行营：军队海运决不能因苏联方面反对而停止，在大连登陆的要求一定要坚持到底；同时国民党军队也要积极恢复北宁路交通，为陆路出关创造条件。不过蒋介石还是专门提醒了东北行营，对于保持中苏合作还是“应特别注意”，竭力避免对方误会。[109]

熊式辉等人曾于17日继续与马林诺夫斯基交涉，提出国民党军队可以分别通过海运和陆运进入东北，海运军队可在营口、葫芦岛等地登陆。马林诺夫斯基答复称，国民党军队可以在那里登陆，但苏军不负责维持当地治安；他建议国民党军队还是走陆路为好，苏军可以保证沿途地区的安全。[110]熊式辉等于18日接到蒋介石16日的指示后，第二天即与马林诺夫斯基举行了第三次正式谈判。熊式辉在谈判中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特别强调国民政府坚决修通山海关到锦州的铁路并收缴沿线非政府军队的武装，以及国民党军队一定于月底在大连登陆。马林诺夫斯基则坚决反对，声称此类事务根本无法在长春解决，只能由两国政府之间交涉。他最后表示可以向莫斯科转达东北行营的要求，但要求熊式辉也向重庆说明东北苏军的立场。[111]第二天，甘乃光会见了东北苏军副参谋长巴佛洛夫斯基，进一步提出要在大连设立航空站，并提前派接收人员前往大连地区视察。[112]苏军方面对所有这些要求都以必须请示莫斯科为理由予以拒绝，巴佛洛夫斯基第二天告诉甘乃光，绝不允许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不允许国民政府收编伪满人员，国民党军队可通过铁路运兵，但在沿线有些地方苏军不能负责安全。[113]

由于苏军方面一直称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谈判已经无法继续下去，熊式辉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返回重庆，与蒋介石商讨对策。此时正值国共军队在华北主要铁路沿线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东北苏军的强硬态度使国民党军队企图以少数精锐部队通过海运抢先进入东北的计划成为

泡影。

长春谈判的第二阶段于10月25日开始。国民政府在前一阶段交涉失败后，决定放弃在大连登陆的计划，改为坚持要求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引起这种策略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终于确定了，东北苏军不可能允许国民党军队经大连运兵，蒋介石遂决定国民党军队进军东北的主力将沿北宁线进入东北。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计划是原计划在大连登陆的部队转在营口、葫芦岛登陆，然后迅速控制住锦州和锦西等地区。[114]这样就可以通过与在平津和秦山地区的军队配合，并在该地区美军的协助之下，完全控制北宁线及沿线地区。另一方面如上述，东北苏军从长春谈判开始，就提出国民党军队可以在营口和葫芦岛等地登陆，所以他们在外交上也就没有了反对的理由。

10月25日，王世杰在重庆会见彼得洛夫，告以国民党军队将根据熊式辉和马林诺夫斯基达成的协议，在营口和葫芦岛两处登陆，并于29日派飞机前往侦察；海运的国民党军队将使用美国船舰，并请当地苏军协助。[115]26日，熊式辉回到长春。他当天便急电蒋介石称，“苏方态度，显有急激之变化”，东北行营遭遇各种限制，大连登陆已经完全没有可能。[116]国民党第十三军遂决定放弃在大连登陆，改为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董彦平随即通知苏方，要求协助国民党军队在该处登陆，并提出从27日起，使用美国侦察机在登陆场做侦察飞行。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第二天到达长春，与马林诺夫斯基协商登陆问题并达成协议。

10月28日，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了彼得洛夫，要求苏方为第十三军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提供保障。他在此期间还多次打电报给东北行营，强调“第一要务，还在使国军如何速入东北”。为此必须迅速与苏军协商在营口、葫芦岛登陆，以及经山海关运兵等问题。其中的关键是苏军负责维持两个港口的治安。否则迁延不决，国民党军队将无法进入东北。[117]29日，蒋介石再电东北行营，指示今后应以打通北宁线为“对苏军交涉的中心”。[118]

东北行营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于10月29日与马林诺夫斯基举行第四次正式谈判。马林诺夫斯基在会谈中表示，可以“掩护”国民党军队，保证其在“营口登陆之安全”；在葫芦岛则因苏军兵力甚少而“无把握”；国民党军队如果经北宁路运兵，在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已有“大股”中共军队，故苏方“不能保证安全”；如果国共发生武装冲突，苏军不予干涉。但苏军于11月11日撤退之前，国民党军队不能进入锦州。马林诺夫斯基

在会谈中再次指责了国民政府人员在东北有反苏行动，他还警告熊式辉，苏军不准美国军舰驶入大连水域。[119]与此同时，彼得洛夫在重庆亦告诉王世杰，苏联政府同意第十三军在葫芦岛和营口登陆。[120]国民政府还公开宣布，杜聿明已经与东北苏军达成协议，国民党军队可由海空两路进入东北。

为了保证控制北宁线的计划顺利完成，蒋介石要求东北行营在积极与苏军交涉运兵的同时，也要尽力维持双方在东北的合作关系。10月25日，苏军搜查设在长春的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和中央党部特派员办公室，切断了东北行营同外部的通信联系。26日，苏军通知东北行营，禁止国民政府官员到各地视察，不准国民政府在长春组织保安队，并指责国民政府的官员在东北进行反苏宣传。苏军还在长春郊区进行军事演习，以显示实力。

苏军在长春制造紧张空气，使东北行营惊慌失措。各大员纷纷向蒋介石告急，声称东北苏军的态度在急剧变化。蒋介石为了缓和与苏军的关系，立即通知熊式辉，要求国民党在东北各地的党部一律停止活动，党务人员归东北行营统一指挥。规定“如有不守纪律，违反政策，及有反苏言行之人员，应作反动分子取缔”。[121]蒋介石还坚决撤换了CC系在东北进行反苏活动的官员。10月28日，蒋经国向苏军政治顾问声明，东北行营坚持奉行对苏友好的政策，并将蒋介石的命令转告苏方。[122]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通过决议，指示“东北党务工作人员对于苏联充分采取友好态度”。11月1日，蒋介石特意通知准备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的部队，必须与苏军“密切联络，尤须忍耐戒慎，不可发生误会”。[123]

苏军对国民政府的要求继续采取敷衍的态度，一面公开表示信守以往谈判中的诺言；一面将营口和葫芦岛移交给中共军队，利用中共军队阻止或延迟国民党军队登陆。如上所述，苏军代表在谈判中曾多次表明，营口和葫芦岛只驻扎少量苏军部队，所以不能保证国民党军队登陆安全。11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通知国民政府，营口“已被来历不明之武装部队占领”。[124]当美军运输舰到达营口时，发现该港口已被中共军队占领。美军指挥官上岸与中共代表联系登陆，遭到拒绝。在葫芦岛亦遇到相同情况。美军指挥官经讨论认为，强行登陆有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这不符合他们所获得的指示，因此决定折回秦皇岛，并将此决定通知蒋介石。[125]

11月5日，熊式辉与马林诺夫斯基举行第五次正式谈判。熊式辉在

会谈中指责东北苏军故意为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设置障碍，包括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不负责北宁路运兵的安全，禁止东北行营视察交通设施，还把营口、葫芦岛转交中共军队等，所有这些行动完全违背了中苏条约的精神。马林诺夫斯基当即反驳说，苏军不可能阻止八路军进入营口，葫芦岛早被中共军队占领，而苏军不能介入中国的内部冲突。他声明从10日起，凡是苏军撤出的地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苏方均不再过问。他还谴责国民党的机构人员在东北进行反苏活动，并再次强调反对东北行营整编曾与苏军作战的伪满军队。[126]双方在互相指责中言辞激烈，立场尖锐对立，谈判终于中断。

第二天，苏军通知熊式辉，同意由美军运输机空运国民党军队至沈阳、长春等大城市机场，但只能在苏军撤退前5日降落；机场地面设备由苏方负责，每次只准降落飞机一架；空运部队的驻地由苏方指定。[127]苏军的规定实际上限制了国民党军队的空运计划。至此，国民政府经海陆空运兵的计划无一不困难重重。

在第五次正式谈判之前，熊式辉和蒋经国等曾经设想三个方案：或与苏军破裂，或维持原谈判方案，或采取强硬措施，如撤退东北行营，使谈判升级到政府之间进行。他们经讨论后决定，先以营口登陆为谈判中心，争取维持目前的关系。为此，11月5日，熊式辉还向马林诺夫斯基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专门要求苏军解除占领营口的中共军队的武装。[128]但如上所述，继续与苏军交涉的结果是谈判陷入僵局。随后东北行营的负责人分别向蒋介石陈述了他们对苏军意图的估计。

熊式辉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认为，苏军为应付国际视听，会允许国民政府空手接收，但不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而苏军可利用的筹码就是已经进入一些关键地区的中共军队；长春谈判的失败有可能使苏军或者扶植东北地方势力，或者把行政权移交给中共军队，使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有名无实；而国民政府目前可供选择的最好对策就是向苏联政府做正式抗议声明，或者直接同斯大林交涉。[129]

张嘉璈在他提交的报告中分析说，东北苏军的行动证明，苏联对东北的政策是不准在那里建立反苏的政权，不准美国染指东北，不准国民政府利用东北来搞“以夷制夷”，不准对中共造成内外夹击之势。他也认为，除非直接同斯大林交涉，从而取得苏方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彻底谅解，否则就只有退出东北了。[130]

蒋经国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指出，东北苏军的态度预示东北形势“必有变化”，而这并非只是中苏之间的问题，还受“美苏关系及国共冲突之影响”，而苏联担心的是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会支持美国在东北之利益”，甚至在美苏“未来战争中”被美国利用，故东北苏军不愿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入东北，其手段就是帮助中共军队在东北发展，使国民政府“一时不能顺利接收东北”。[131]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人的报告中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一致认为，苏联在东北的目标是阻止国民党军队大批进入东北，支持中共军队是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手段；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发生变化是美苏关系恶化的结果，苏联有可能在东北造成国共冲突的局面后，出面调解。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国民政府实际上是无法接收东北的。11月10日，熊式辉飞回重庆，直接向蒋介石请示对策。

东北行营三大员的报告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战略性问题摆在蒋介石面前，包括：根据国民政府目前的实力和全国的军事态势，国民党军队是否急于进入东北；在中苏两国政府的关系进一步澄清之前，是否继续在长春进行接收东北的谈判；以及接收东北是否应该以占领长春为重点；等等。

这时在东北登陆受阻的国民党军队第十三军和第四十二军等部已经陆续抵达秦皇岛。蒋介石本来已经准备一旦营口、葫芦岛登陆不成，便从山海关打入东北。苏军声明11月10日从锦州撤军，蒋介石遂于6日决定，向山海关发动军事进攻，沿北宁路突入东北，首先控制从热河和河北进入东北的交通枢纽锦州。为了配合军事行动，蒋介石决定停止长春谈判，撤退东北行营，将谈判移到重庆和莫斯科之间进行。[132]其用意一方面是将地方当局的谈判升级为国家谈判，以期引起国际关注，向苏联施加外交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在展开军事行动时，避免外交上节外生枝。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蒋经国准备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直接谈判。

11月15日，国民政府通知苏联驻华大使馆，由于苏方一再阻碍，国民政府决定东北行营从长春撤至山海关，后撤行动将于17日至23日之间进行。蒋介石还专为此事致电杜鲁门，称苏联在东北已经违反了条约，这已经危及了“中国主权完整”。[133]蒋介石在此之前已经通知蒋经国，令其准备前往莫斯科，直接与苏联领导人交涉东北问题。[134]就在国民政府宣布撤退东北行营的同一天，秦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山海关

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国民政府发动的外交和军事攻势使东北地区一时间弥漫起剑拔弩张的气氛。

蒋介石在11月中旬处理东北问题的方式可谓咄咄逼人。在外交方面，东北行营的熊式辉等人的建议是先同苏联最高当局协商，如无法达成谅解，行营再撤出东北。蒋介石却决定干脆先将行营撤到山海关，以此向苏联施加压力。在军事方面，白崇禧等人曾建议，首先稳定地控制平津张地区，大军再出榆关。但国民党军队四路进军完全控制平津张地区的计划未能顺利实现，蒋介石就断然决定先以少量精锐部队从山海关突入东北，甚至不惜冒兵力不足的危险，不顾第十三军孤军深入，有遭受已经在东北和冀热辽解放区集结的中共军队夹击的后果。他敢于这样孤注一掷，几乎全盘改变接收东北的计划，杜鲁门政府给予的支持显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苏关于接收东北的交涉过程中，杜鲁门政府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民政府计划的制订和变动，都与杜鲁门政府的有关政策有密切关系。杜鲁门政府对中苏条约的态度可以说是满意但不满足。满意的是中苏条约至少在形式上暂时排除了苏联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插手国共斗争的可能性，并防止了出现苏联依靠军事占领完全控制东北的局面。不满足之处是担心国民政府对苏联的让步会影响乃至严重削弱美国在中国的主导地位，特别是限制美国未来向东北的发展。

在中苏条约签订的当天，哈里曼就再次向莫洛托夫提出：苏联最好以文字的形式公开宣布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莫洛托夫当即予以拒绝，他说中苏条约已经意味着尊重了“门户开放”政策，而且斯大林已经多次做过口头保证，苏联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哈里曼仍然坚持苏联必须发表书面声明。他在会谈后向杜鲁门政府报告说：“除非施加强大的压力”，否则他怀疑美国人是否真能得到那个声明。[135]

8月2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知哈里曼，他希望了解中苏双方对公开发表一个尊重“门户开放”声明一事的态度。第二天，他又指示哈里曼，尽快会见苏联领导人，“清楚和有力地解释美国公众和舆论的重要性”，以及“强调美国公众对远东事件，特别是对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局势的发展，有浓厚的兴趣”，而斯大林的口头保证不能满足这种形势，中苏条约亦“无法保证充分的机会均等和不受歧视的自由”。他要求哈里曼说明，美国所坚持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就是针对东北铁路和港口的经营和使用问题，务必请苏联领导人在他们的声明中“使用清

楚和确切的措辞”。[136]

27日，哈里曼当面向斯大林转达了贝尔纳斯的要求。斯大林表示可以接受美方的建议，不过苏联方面需要美方保证，国民政府应该发表一个同样内容的声明。[137]31日，哈里曼和凯南与苏联外交部代表举行谈判。苏方代表提出，他理解这一声明是关于在全中国“门户开放”的问题的。凯南则强调，声明就是针对东北地区的；美国之所以特别注意这一点，是因为它与中苏条约中解决东北问题的条款有关。[138]结果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苏联的态度如此，国民政府对发表此类声明也有所顾忌。当时国民政府正迫切希望公布中苏条约，将苏联对中国内部问题的保证公之于世。它在东北问题上关注的重点是确保能够顺利接收东北行政权，相比之下，港口和铁路是否对美国“开放”等是次要的。当宋子文向国民政府汇报美国的建议时，外交部给他的答复是，还没有研究有关的细节，这需要由正在伦敦开会的外长王世杰决定。最后，国民政府以中苏条约对“门户开放”已经有了足够的保证为借口，使杜鲁门政府的努力只能不了了之了。

杜鲁门政府在采取上述外交行动的同时，也试图限制苏军在东北的作战行动。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苏达成了关于双方海空军在东北活动范围的协议，但没有划分地面部队的行动界线。美军方曾经提出，美军可以在中国大连和朝鲜登陆，条件是日军投降先于苏军占领该地区。当然，这个设想被证明完全是幻想。不过，在中国战场的其他地区，美军的行动确实是有影响的。8月1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魏德迈发出指令称，美军准备控制中国的要害港口和交通要道，魏德迈应准备帮助国民政府将其军队运送到各关键地区，而美军控制的地区只可以交国民政府接收，驻华美军不得与国民政府的军队以外的其他军队和机构交往，等等。[139]

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麦克阿瑟指示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转告苏军指挥部，他已经下令在太平洋地区对日全部作战行动结束之前，只要不影响美军安全，应立刻停止进攻日军。迪恩在转交麦克阿瑟的电报时，加上了一句，希望“苏军通知其部队颁布同样的命令”。[140]迪恩长期在莫斯科处理与苏联的军事合作，多次与哈里曼共同参与涉及亚太问题的谈判，对美苏在这一地区的关系不乏了解和理解。把他的行动解释成技术性问题或工作疏忽，都是很难有说服力的。而且，麦

克阿瑟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完全不用多此一举，把美军的行动通知苏军。

苏军参谋长安东诺夫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答复麦克阿瑟说，美军的要求肯定是一种误解，只有苏军最高指挥官才能决定苏军应于何时在战场上结束作战行动。同一天，苏军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政府发表的投降公告只是一般性的宣言，它还未向日本武装部队发布停战令，因此“苏联远东武装部队将继续进攻日本”。[141]

17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在答复日本关东军提出的停战建议时，指责该建议对东北日军投降问题只字未提。他限令日军必须从20日12时起，全线停止一切对苏军的作战行动，就地缴械投降。18日，日军通知远东苏军总指挥部，日军准备履行全部投降条款。华西列夫斯基于同日命令苏军各方面军：“鉴于日军的反抗已被摧毁，而道路不通的情况却严重阻碍我军主力迅速前进，完成既定任务。为了立即占领长春、奉天、吉林和哈尔滨这几个城市，必须派出专门编组的、装备精良的快速支队。……不要怕它们离自己的主力太远。”[142]苏军各部队立即执行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迅速向各大城市和主要港口挺进。至25日，苏军已完全控制东北全境，主力推进到长城沿线，前锋直抵张北地区并与部分八路军部队会师。杜鲁门政府试图限制苏军作战行动显然是没有用的。

杜鲁门政府在解决东北问题时显得如此束手无策，关键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实力不足。它既不能使苏联发表公开声明来保证东北“门户”对美国开放，又无法限制苏军对整个东北地区的军事占领。剩下的唯一办法是支持和援助国民政府恢复对东北的统治，从而达到限制苏联的目的。8月27日，哈里曼与斯大林会谈后，就曾尝试利用赫尔利转告蒋介石，苏联希望国民政府最近就能派军队接收东北。[143]在华盛顿，美国领导人也告诉国民政府的代表，东北还没有中共军队，苏军将很快撤退，目前那里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中国军队前往接收。

杜鲁门政府的本意当然是敦促国民政府尽快派军队进入东北，但产生的效果却是双重的。国民政府一方面于8月底9月初制订并公布了接收东北的纲要和计划，并组建了东北行营；另一方面却仍然抱定外交接收有望成功的幻想，不做足够的实际准备。

9月上旬，美军观察员发现中共军队正向陕西、山西和察哈尔集

结。他们报告称：如果那类情报属实，估计中共军队很可能是在努力控制进入东北的通道。[144]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也向国务院报告：中共军队已经奉命进入东北，与苏联合作接受日军投降；估计苏联会鼓励中共军队在苏军撤出后接管东北，苏联地方当局对蒋介石的态度不会像苏联领导人那样缓和。

9月11日，蒋介石指示在华盛顿的宋子文立即同美国领导人交涉，请他们务必决定于本月向国民政府提供运兵舰船；按照国民党军队目前的计划，有关部队12月初才能到达东北，而那时苏军会以国民党军队未能到达为借口，将东北政权交给中共接收。[145]宋子文接到电报后立即打电话给时任美国国务院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向他转告了蒋介石迫切要求美国协助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送3个师约30000名官兵。宋子文还表示希望能尽早见到杜鲁门总统本人。[146]

9月14日，宋子文会见了杜鲁门和海军上将李海，讨论美国如何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宋子文在会见中要求杜鲁门政府务必协助国民政府将军队从广州直接送往大连，否则中共军队就会捷足先登。杜鲁门当时的答复是，美国不会直接参与关于接收东北的谈判，但可以提供运兵舰船。他还保证美国将协助国民政府在日军占领地区“取得和平和安全”，而且“申明了向东北运兵的重要性”，命令美军方立即开始筹办，而李海表示可以满足蒋介石的要求。[147]

会谈结束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指示魏德迈尽快提供一份报告，说明美国帮助将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到底需要什么装备。随后根据魏德迈的答复发布指示声称：“美国的政策是在被解放地区建立必要的中国军队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特别是在满洲，要尽可能地快。”[148]同一天，9月18日，杜鲁门指示艾奇逊告诉宋子文，在西太平洋的美海陆军部队已经接到命令，从即日起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港口，具体计划由魏德迈向蒋介石说明；只要国民党军队准备完毕，即可使用美国舰船。[149]美军方还为将国民党军队从大连运到沈阳制订了运输计划。正是因为得到了美军的支持与合作，蒋介石才决心在兵力不足、运输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遥远的南方调动精锐部队在大连登陆。

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失败后，改由营口和葫芦岛登陆，同样是与驻华美军协调行动的结果。9月下旬，魏德迈根据美军部的指示，与蒋介石达成秘密协议，由美军抢先控制从北平到山海关的交通线。宋子文曾经向艾奇逊说明，国民党军队无法依靠铁路线向东北运送军队，而魏

德迈同蒋介石达成的协议，为国民党军队从陆路出关提供了保障。[150]

魏德迈的计划得到麦克阿瑟的有力支持。9月底，美军代表麦克罗告诉奉蒋介石之命前往联络的廖耀湘，麦克阿瑟已收到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报告，认为中共军队在平津地区的军事行动是苏军控制那一地区的前奏。为了防止中共军队夺占平津，他决定派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在渤海湾的港口登陆，抢先控制那一地区。在中国登陆的美军得到的命令包括：部署受降事宜，与护路部队协同占领北平到山海关的铁路线，指挥并控制沿线日军，收缴日军武器和军用仓库，控制天津日军司令部，保护通信设备，美军在塘沽、天津、秦皇岛等地区如受到中共军队攻击，可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至10月下旬，美军已经控制天津到秦皇岛的铁路线。25日，杜聿明在上海与第七舰队指挥官金凯德达成协议，由美国第七舰队负责，运送国民党军队到营口和葫芦岛。蒋介石急于使第十三军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就是为了夺取锦州和锦西，与控制山海关内铁路线的美军配合，完全控制北宁线。

11月初，由于苏军的阻挠和中共军队的抵抗，国民党军队抢先进入东北和在华北战略集结的计划均告失败。蒋介石遂决定，海运东北的部队在秦皇岛登陆，经山海关向东北进攻，企图将正向东北集中的中共军队主力截为两段，一举切断华北解放区与东北的联系，然后各个击破。这种军事冒险是在美国的协助、怂恿之下进行的。

在整个平津地区，国民党部队集结了4个军，全部由美军运送。秦皇岛到山海关的铁路由美军修筑完成。根据魏德迈的估计，如果没有美军协助保护天津到山海关的交通线，国民党军队的4个军仅仅够在平津一带维持治安和巩固阵地之用。美军为了使国民党军队腾出手来进入东北，还担负起了在华北的护路工作，为此甚至不惜重新武装已被缴械的日军。在天津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车站和城市，到处可以看到星条旗下站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不仅如此，美军还直接参与指挥国民党军队作战，为国民党军队运送补给，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北宁线上中共军队控制的留守营车站和山海关附近的石门寨阵地。事实表明，驻华美军的介入是推动国民党军队不惜武力打入东北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驻华美军对加剧东北地区局势的紧张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从抗战结束到1945年11月中旬，美国、苏联、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围绕东北展开了一场激烈复杂的外交和军事争斗。在这个阶段最初的较量中，中共军队抢先进入了东北，并在东北北部地区占据了有利的地

位，具有特殊意义。这预示着列强主宰东北地区命运的时代走向终结，任何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均不能忽视或否认中共力量的存在及其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发展表明，解决东北地区的问题如此，解决中国问题也一样。中共在夺取东北的斗争中显示出来的实力和战略决策水平，已经预示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力量对比都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

[1] 《苏“满”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1935年3月23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187～189页。

[2]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the President”，October 17，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370.

[3]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自重庆呈蒋委员长关于开罗会议日志“附一：政治问题会商经过”》，1943年11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527～528页。

[4] 参阅“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the President”，December 15，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379。

[5] 《与蒋主席的会谈》，1944年6月23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81页；另参阅《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5—1945.12》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9～11页。

[6]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60页；另见“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the President”，December 15，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379。

[7]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第424页。

[8] “Roosevelt-Stalin Meeting”，February 8，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p.766-771.

[9] “Conversation Regarding the Entry of the Sovite Union into the War Against Japan”，February 10，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p.894-895.

[10]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 to the President”，December 15，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379.

[11] “Conversation Regarding the Entry of the Sovite Union into the War Against Japan”，February 10，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895.

[12] 参阅〔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第444～447页。

[13] “Conversation Regarding the Entry of the Sovite Union into the War Against Japan”，February 10，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895.关于苏联提供的协议和哈里曼的修改，见“Draft of Marshall Stalin’s Political Conditions for Russia’s Entry in the War Against Japan”；“Mr.Harriman’s Suggested Changes in Marshal Stalin’s Draft of Russia’s Political Conditions for Russia’s Entry in the War Against Japan”，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p.896-897。

[14] 参阅〔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第447页。

[15]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p.305-306.

[16]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p.307-308.

[17] “The Secretary of War （Stimson）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May 12，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876-877.

[18]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Forrestal）”，May 21，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880-882.

[19]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第525页；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310。

[20] 《蒋主席自重庆致行政院长宋子文指示与杜鲁门总统商谈旅顺处理方案之步骤电》，1945年6月8日；《蒋主席自重庆致行政院长宋子文指示与杜鲁门总统商谈旅顺问题时应注意之点电》，1945年8月8日。以上均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554～555页。

[21] 《行政院长宋子文与美国总统杜鲁门第三次会谈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556页。

[22] “Memorandum of The conversation，by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4，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901-903；《行政院长宋子文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杜鲁门讨论有关旅顺、大连租界问题谈话纪录》，1945年6月1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563～564页。

[23] “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5，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903-904.

[24]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315.

[25]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to the President Truman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3，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912.

[26]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 to the President”，December 15，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379.

[27] “The Secretary to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Moscow，July 4，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914-915.

[28]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to the President Truman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5，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915.

[29]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Hurl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6，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918-919.

[30] “The Secretary to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Moscow，July 6，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916-917.

[31]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the President Truman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9，1945，*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924.

[32]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the President Truman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9，1945，*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925.

[33] “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Davis）”，July 10，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928-932.

[34] “Memorandum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Grew）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13，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934-941.

[35]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War（Stimson）to President Truman”，July 16，1945；“Memorandum by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July 18，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943，947；“YALTA AGREEMENT AFFECTING CHINA，The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Russell）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0，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 of Berlin*（*The Potsdam Conference*），*1945*，Volume II（Washington 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pp.1238-1241；另参阅Tang Tsou，*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50*（Chicago：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3），pp.281-282；James F.Byrnes，*Speaking Frankly*（New York：Harper Press，1947），p.205。

[36]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p.328-329.

[37] “Memorandum by the Ambassador to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28，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950-952.

[38]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August 5，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955-956.

[39]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第550页。

[40]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第549～550页。

[4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August 11，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971-974.

[42]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79页。

[43]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Washington，August 11，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969-970.

[44]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居里先生听其报告罗斯福总统对史迪威将军地位问题

之意见及讨论战后问题谈话纪录》，1942年8月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680～683页。

[45]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威尔基先生商谈印度问题、美国援华问题、战后中美合作问题及英苏问题谈话纪录》，1942年10月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66页。

[46]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威尔基先生商谈战后稳定太平洋局势问题谈话纪录》，1942年10月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77页。

[47] 《蒋委员长自重庆致蒋夫人嘱与罗斯福总统详商战后远东和平与善后处理之各种政策及告以关于旅顺、大连问题中国只可与美国共同使用电》，1943年6月1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853～854页。

[48]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329.

[49]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第353页。

[50]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Hurl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0［19］，July，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948-949.

[51]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Hurl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0［19］，July 29，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949-953.

[52] “President Truman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Hurley）”，July 23，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950.

[53]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Hurley）”，July 28，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950.

[54]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第537页。

[55] 毛泽东：《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434～435页。

[56] 《晋察冀分局关于积极配合苏联作战的准备工作的指示》，1945年4月18日。

[57] 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第320～325页。

[58]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7、218～219页。

[59] 《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8～280页。

[60] “Briefing Book Paper：Political and Military Situation in China in the Event the U.S.S.R.Enters the War in the Far East”，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p.351-352.

[61]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9页。

[62] 《王若飞同志报告记录》，1945年8月3日，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号：6442/1。

[63] 毛泽东：《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945年8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19页。

[64]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2日。

[65] 毛泽东：《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城市》，1945年8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1～3、6页。

[66] 参见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8、1132页。

[67] 《中央关于到苏联红军占领区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

[68] 见《程耿关于我军已与苏联红军会师向中央的报告》，1945年8月17日；《曾克林谈进军东北和四保临江的有关问题》，《党史通迅》1984年第2期。

[69]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244页。

[70] 《中共中央给各局，各区党委的指示》，1945年8月26日。

[71] Sergei N.Goncharov，John W.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 and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0.

[72] 《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7～258页。

[73]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吕志恒、邹大鹏、余克等指示电》，1945年8月29日。

[74] 《中央关于调四个师去东北开辟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194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4～275页。

[75] 《中央关于东北情况及与苏军代表谈判问题的通报》，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490页。

[76] 《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8～280页。

[77]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President Truman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14，1945；“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Washington，August 22，1945，7 P.M.；“The Ambba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oscow，August 24，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VII，pp.973-974，979-980，981.

[78]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部署致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电》，1945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95页。

[79] 《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28日；《中央关于东北战略方针与部署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日。以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99～301、309～310页。

[80] 《甲乙关于抽调主力卅万控制东北致丙丁电》，1945年10月5日，参阅《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上卷，第509页。

[81] 《东北局关于与苏军交涉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5年10月8日；《辰兄态度积极关系皆好》，1945年10月25日。

[82] 《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99页。

[83] 《中央关于对美外交政策给各局各区各部队的指示》，1945年9月25日。

[84] 《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宣传方针问题的通知》，194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04页。

[85] 《中央关于美军登陆后我之对策的指示》，194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02页。

[86] 《中央关于美若登陆烟台等地我应避免冲突给林浩同志、山东分局的指示》，1945年9月30日。

[87] 《军委关于迅速向东北进军的命令》，1945年9月30日，参阅《刘少奇年谱

（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上卷，第505页。

[88] 《中央关于采取强硬态度拒绝美军登陆的指示》，1945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19页。

[89] 杜建时：《蒋帮劫收平津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5，第35～49页。

[90]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一九〇二—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第314页。

[91] 《中央关于坚决反对美军强修铁路问题给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的指示》，1945年10月25日，参阅《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上卷，第519～520页。

[92] 《军委关于彻底破坏和控制铁路公路迟滞蒋军行动的指示》，1945年9月29日；《中央关于进行交通战阻止国民党军队前进的指示》，1945年10月15日。以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06～307、345～348页。

[93]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80，第83～84页。

[94] 《"九一八"十四周年纪念广播词》，1945年9月1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第74页。

[95] 《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1945年8月1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22～23页。

[96] 《蒋主席致宋子文院长王世杰部长令与苏联商定派往东北人员之运输计划电摘要》，1945年8月1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22页。

[97] 《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为苏军撤退事面陈宋子文院长照会》，1945年10月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16页。

[98] 《外交部次长甘乃光复军令部告国军海运大连经通知苏方电》，1945年10月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17～118页

[99] 《外交部为国军登陆大连事致莫斯科傅秉常大使请洽告苏方电》，1945年10月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18页。

[100] 《南震主任呈蒋委员长告派熊式辉蒋经国赴长春会商接防办法电》，1945

年10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16～117页。

[101] 《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致外交部告苏联询国军登陆大连目的何在电》，1945年10月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18页。

[102] 《傅秉常大使致外交部告苏联反对我军在大连登陆电》，1945年10月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19页。

[103] 《外交部长王世杰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关于中国政府派兵由大连登陆至东北谈话纪要》，1945年10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20～121页。

[104]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到长春后与苏方代表谈话经过之情形》，1945年10月1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21页。

[105] 《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呈蒋委员长告今日会谈最可注意事项函》，1945年10月13日；《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报告十月十三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谈话要点电》，1945年10月21日。以上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22～124页。参阅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第519页。

[106] 《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呈蒋委员长告今日会谈最可注意事项函》，1945年10月1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22～123页；参阅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21页。

[107]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在长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交涉接收东北报告》，1945年11月2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207～208页。

[108] 《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致外交部次长甘乃光反对我军登陆大连照会》，1945年10月1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23页。

[109] 台北《传记文学》第36卷第2期，第36页。

[110] 参阅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23页。

[111]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在长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交涉接收东北报告》，1945年11月2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208～209页；参阅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26页。

[112] 参阅《我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报告书》，1946年7月1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219页；参阅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28页。

[113] 参阅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28页。

[114] 参阅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38页。

[115] 《王世杰部长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谈话纪录》，1945年10月2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25页。

[116] 《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告苏方态度急激变化电》，1945年10月2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26～127页。

[117] 《蒋委员长致熊式辉主任嘱与苏军洽商接防与登陆计划电》，1945年10月28日；《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告决心在秦皇岛天津登陆出关接防函》，1945年10月29日。以上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29、130页。

[118] 参阅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38页。

[119] 《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告二十九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要点电》，1945年10月2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30～131页。

[120] 参阅《蒋委员长致熊式辉主任告务须要求苏军在葫芦岛负安全登陆之责电》，1945年10月3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32页。

[121] 《蒋委员长致熊式辉主任令指挥监督东北各地党部电》，1945年10月2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28页。

[122] 参阅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34页。

[123] 《蒋委员长致何应钦总司令并转杜聿明司令长官令饬登陆接防部队务必忍耐戒慎电》，1945年11月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36页。

[124] 参阅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38页。

[125] 《蒋委员长致熊式辉主任告共军占据葫芦岛国军折回青岛电》，1945年10月2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29页。

[126] 《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报告五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详情函》，1945年11月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40～143页；参阅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39～542页。

[127] 《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告有关空运部队事项电》，1945年11月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43页。

[128] 《熊式辉主任为中共第十八集团军擅行进占营口等事致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备忘录》，1945年11月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39页。

[129] 参阅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42页；《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告苏军政治顾问与蒋经国特派员谈话内容电》，1945年11月1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43页。

[130] 参阅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41页。

[131] 参阅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42～543页。

[132] 《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指示解决东北问题途径函》，1945年11月1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46页。

[133] 《蒋主席致杜鲁门总统告苏联违反条约东北行营移至山海关已危及中国主权完整电》，1945年11月1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47～148页。

[134] Donald G.Gillin and Romon H.Myer，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airy of Cgang Kia-Ngau*（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109-110.

[135]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to President Truman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14，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973-974.

[13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August 22，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979-980.

[137]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9，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979-980.

[138]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

记》，第552～553页。

[139] 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527-528，979-980.

[140] Herbert Feis，*Japan Subdued*：*The Atomic Bomb and the End of the War in the Pacific*（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143.

[141] 《真理报》1945年8月16日。

[142] 〔苏〕亚·米·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柯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第669页。

[143] 关于会谈内容见〔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第552页。

[144]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p.363-364.

[145] 《蒋委员长致宋子文院长嘱商请美政府提早供给船舶运输国军至东北接防电》，1945年9月1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15～116页。

[146] "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President Truman"，September 12，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1207-1208.

[147] "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Vincen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12，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614-615.

[148]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Commanding General，United States Forces，China Theater（Wedemeyer）"，September 18，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565.

[149]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383.

[150] "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President Truman"，September 12，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1207-1208.

第四章 难咽的苦果

一 “最佳方案”

中共军队在东北的迅速发展，以及苏联与中共实际上在东北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均导致东亚国际格局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必将严重冲击美国在战争后期规划的东亚战略格局。

美国战后东亚战略规划的基础是“雅尔塔秘密协议”。杜鲁门政府在战争结束前后处理对苏和对华关系、调解中苏关系以及调处国共矛盾，都是以“雅尔塔秘密协议”为蓝本进行的。继雅尔塔会议的美苏妥协和莫斯科的中苏妥协之后，赫尔利又力促国共妥协，试图通过重庆谈判来彻底完成“雅尔塔秘密协议”为东亚规划的格局。然而事与愿违，杜鲁门政府贯彻其东亚战略的最后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即重庆谈判，并未能解决引起国共冲突的实质性问题，结果最终酿成国共间的大规模内战。

中共在战后争夺实力地位的斗争中，锋芒直指美国东亚战略结构中最重要但又最薄弱的环节，从而使美国的战略部署陷入一片混乱。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驻海参崴的领事馆向杜鲁门政府发出警报说，中共军队已经进入东北，并得到东北苏军的支持。美国的反苏预言家们更是危言耸听，把苏联在东北的意图说成是企图在那里建立傀儡政府，中共则是苏联的最佳代理人。美国在东亚渴望获得的优势地位越来越像海市蜃楼，而蒋介石就像一位扶不起来的天子，尽管国民党军队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军事装备，但仍然不能在同中共军队的较量中占上风。

不仅如此，从日本投降到1945年11月初，驻华美军全力援助国民政府接收，结果在东亚形成了新的战争热点。局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而且很可能一发不可收拾。可是国民政府仍在那里火上浇油。11月中旬，国民政府选择在东北发动外交攻势，一方面是为了向苏联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拖美国下水，逼它在东亚向苏联摊牌。蒋介石知道杜鲁门政府尚不会对东北的前途置之不理，他希望利用美国人几乎无

所不包的欲望，增强国民政府的实力地位。如果东北的形势按照国民政府的设计发展，美苏在东亚的对峙很有可能迅速演变成一场对抗，其前景不难预见。因为这时华北驻有十万余美军，与东北数十万计的苏联军队可以立即形成对峙局面。面对这种危险且尴尬的局面，杜鲁门政府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势在必行。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举棋不定，欲去频回。这一特点的出现仍然可归结于美国东亚政策的基本矛盾，即雄心勃勃、目标宏大却实力不足，以及对自身面临的复杂局面缺乏必要的理解。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军事实力空前增长。但是，美国在东亚面临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除，而且随着野心的膨胀还在进一步扩大，而杜鲁门政府对罗斯福的对华政策除了萧规曹随之外，并没有能够适时地做出其他选择。可以说，杜鲁门政府继承了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宏伟目标，也继承了它的一切难以克服的矛盾。

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包含两个基本原则。其一是继续努力维持国民政府在全中国的统治地位。一方面，在经历对日战争的考验之后，杜鲁门政府对国民政府的前途远不如罗斯福当政时期那样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尽早打败日本这个战略性需求下降后，杜鲁门政府认为国民政府的战略价值已经大幅贬值。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们美国往往认为中国是—个国家，但是事实上，在1945年，中国只是—个地理上的名词。当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1]问题是杜鲁门政府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罗斯福政府在战争期间已经在中国付出的"巨大努力"，它仍然想千方百计地守住东亚大陆这块阵地。面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和美苏抗衡的加剧，杜鲁门政府一时还难以找到更加合适的"伙伴"，只好继续骑上国民党政权这匹"劣马"，参加东亚的角逐。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一直深刻影响着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

其二是美国在援助国民政府之时，一直试图避免直接卷入中国的内部冲突，特别是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杜鲁门政府并非不了解美国在东亚的结构性弱点，以及战后美国国内的基本问题，它断定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一个前途未卜的政权火中取栗，不仅力所不逮，而且得不偿失。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罗斯福政府在处理中国问题时，一贯坚持的原则之一就是反对和不以武力介入中国内部的国共武装冲突。对日战争结

束时，杜鲁门政府公开宣布的政策一直遵循罗斯福时期的这个原则。

上述两个原则既反映了杜鲁门政府在战后处理中国内部冲突的基本方针，也给美国对华政策造成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即如何在不承担超载义务的条件下，继续有效地实现它的东亚计划。这是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解决的问题。美国的目标起着支配作用，而它的原则又限制着它实现目标的手段。美国政府最初并没有意识到，它奉行的原则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显得多么自相矛盾，罗斯福政府看上去只是简单地把目标和使用的手段糅合在一起。事实证明，赫尔利对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估计，以及他对中苏关系所做的充满乐观和自信的报告，无疑对掩盖矛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那些报告使当时的美国领导人信以为真并为之兴奋起来。

对日战争结束前夕，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即向魏德迈发出指令，明确规定该指令中列举的所有行动“仅适用于与美国的基本原则不发生矛盾的范围，即美国不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在中国进行自相残杀的战争”。该指令说明：魏德迈指挥美军采取的行动是基于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以使国民党军队重新控制被日军占领的全部地区，驻华美军应迅速协助将国民党军队调往中国的枢要地区。[2]

8月15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指示魏德迈，驻华美军应根据以下原则采取行动：（1）占领日本、朝鲜和中国沿海的枢要地区；（2）迅速占领日本应为“优先行动”，占领朝鲜并接受那里的日军投降是第二位的任务，占领中国沿海和台湾从属于前两项任务；（3）控制中国的主要港口、交通要道和占领沿海地区，以便在不卷入中国陆地行动的情况下，扩大援助中国战区的军队。[3]至于这种行动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中会产生什么后果，当时尚未引起在华盛顿的美军领导人过多的关注。

9月初，杜鲁门政府与国民政府在华盛顿展开了有关战后美国继续援华问题的谈判。9月5日，杜鲁门根据美军方的建议，批准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6个月的租借物资，其中包括利用美国海空军为国民政府运兵，继续运送已经储存在印度和缅甸的准备供给中国的物资，以及将中国西部地区储存的美军物资转交国民政府。13日，国务院在给杜鲁门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应规定这些援助不被用于内战。14日，杜鲁门向宋子文发表口头声明，宣布美国将帮助国民政府加强军事力量，但补充的援助不得用于内战和支

持不民主的政权。[4]

从日本投降到9月14日杜鲁门发表口头声明，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看上去是清楚的，即援助国民政府迅速恢复对全中国的统治，但这种援助是有限度的，即美国不能被卷入中国内部的军事冲突，亦不支持国民政府在解决内部问题时奉行武力统一政策。

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很快引起驻华美军负责人的疑问。魏德迈向马歇尔报告说，他实际上无法执行华盛顿给他的指令，因为指令中的规定使他的使命“至少被限定在无法实行的程度”；大批有组织的中共军队包围或占领着中国的关键地区，阻止国民党军队接收；美国准备协助国民党军队受降或遣返日军，必然要阻止中共军队的行动，在南京和上海已经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美军在中国任何其他地区都会面临类似的局面；美军实际上承担了在征服中共军队的战争中支持国民政府的责任；如果美军将其行动限于不支持和不介入中国内战，则其必将取消目前正在给予国民党军队的支持。魏德迈承认，他采取的行动与指令中规定的基本原则相冲突。为了解决政策中自相矛盾的问题，他用“最富伸缩性的方式来解释”美军方的命令，以便尽可能牵制中共。[5]

魏德迈的报告并没有立即在杜鲁门政府中引起不安。当时重庆谈判正在进行，根据赫尔利的报告，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并不是没有希望的。而且国民政府尚在集中力量接收华南，国共争夺受降权的斗争暂时主要还限于口诛笔伐。特别是随着美苏在东亚关系上出现紧张，杜鲁门政府多少有些急不可待地要限制住苏联在东亚的行动。所以，美军方非但没有针对魏德迈的疑问设法解释对华政策的矛盾，反而催促驻华美军加紧为国民党军队向北运兵。为了加快国民党军队向北推进的速度，驻华美军几乎动用了一切手段，其中包括在一些交通要道地区对中共军队进行武装示威和挑衅。

从9月底开始，随着国民党军队向北推进，杜鲁门政府不断收到来自中国的报告。这些报告指出：国共在华北和东北的武装冲突中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内战规模正趋向扩大。在这种日渐灼热的气氛中，在华北担负护路任务的美军不断与中共军队发生摩擦，而当地美军指挥官扬言要对中共军队的攻击进行报复。形势的复杂性还在于，中共军队在华北和东北均得到苏联的援助，实力不断增强。美苏在中国内战中各支持一方的局面已经出现，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内战很可能演变成美苏之间的对抗。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这时在华北尚有大批日军未被解除武装。国共双方都企图在内战中利用他们，而美军也在利用部分日军护路。这批数量可观、受过良好训练并且装备精良的日军如果长期在华北存在下去，会使该地区形势难以稳定。[6]总之，这些报告表明形势已“几乎绝望”。[7]杜鲁门政府必须重新研究驻华美军的行动范围，调整对华政策已经刻不容缓。

美国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由驻华美军向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引起的，美国调整对华政策自然从讨论军事问题开始，然后延伸到政治领域。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杜鲁门政府集中讨论的问题是美军是否继续留在中国，是否继续为国民政府向北运兵。

早在美军在华北登陆之前，文森特就向国务卿提出：应提请总统注意了解并重新讨论美国对华政策，如果没有足够的军事理由，美军应放弃在华北登陆的计划。他的建议第二天便被否定。美军方认为，美军目前的行动与原计划相比已经大大削弱。美军控制华北港口，一是为了通过这些港口遣返日军，二是为了协助国民政府阻止正在那里发生的混乱。美军方某些人甚至认为，没有必要担心美国依靠现有的能力卷入中国内战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他们甚至声称已经在那里的6万名美军可以无所顾忌地“从中国的一端走到另一端”。[8]

到10月下旬，美军在华北登陆产生的复杂影响逐步凸显出来，终于在华盛顿引起了关注。10月22日，国务院和陆海军联席会议向美国军政领导人提交的一份政策报告指出：美国为了实现在东亚的目标，应该支持国民政府沿着适合美国有关政策的路线发展，并在发展中国的现代化陆海空军方面给予援助和指导；另外，军事援助和相关的指导应限于保持中国内部的和平与安全，让中国在占领朝鲜和日本中负起责任。至于停止军事援助的条件，则是它被用于支持不符合美国政策的政权、用于自相残杀的战争，或用于侵略性的行动。报告认为，美国政府曾经制定了一项明确的政策，鼓励中国统一和实行民主。鉴于目前中国的形势，应当考虑：（1）重新恢复国共谈判，以改善中国内部的政治条件；（2）应注意苏联的动向，鼓励和支持苏联在伙伴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解决两国共同的问题。[9]这个报告实际上是针对驻华美军援蒋行动引发的严重问题，试图提出一个衡量美国对华政策适当与否的标准，以及要调整对华政策所必须考虑的因素。它无疑是一个信号，表明杜鲁门政府内部将开始就调整有关政策展开讨论。

11月初，杜鲁门政府内部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逐步聚焦于如下几个问题：第一，驻华美军是否应该撤出中国；第二，驻华美军撤出中国会对华北和东北的形势产生什么影响；第三，如果驻华美军不撤出中国，怎样才能避免卷入内战。11月3日，马歇尔打电报给魏德迈，要求了解一些他认为关键性的问题，如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至山海关地区采取了什么行动；这些行动对帮助国民党军队控制日本占领地区是否有必要；在不损害其使命的情况下，海军陆战队撤出该地区的最早日期是何时；如何估计美军撤出对华北的影响。[10]

11月14日，魏德迈在给马歇尔的答复中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天津到秦皇岛地区采取的行动，对保护交通线是完全必要的。目前运抵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已有第十三军、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第九十四军等4个军，它们足以把美军从其占领区替换下来，并同时保护一些有限的地区。但是，国民政府如果坚持要守住现在已占领的所有地区，并企图加以扩大，特别是准备进入东北，肯定需要美军继续替它看住沿海港口和交通要道。魏德迈认为，美国的目的如果只是解除日军武装，那么已经运送的国民党军队足够用了，据此他已无权再运送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到华北地区。他进一步指出，国民政府从平津向北推进和控制东北的战略计划，是根据那里没有中共军队制订的，而且国民党军队完全没有与中共军队作战的准备。在目前已经出现军事困难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应该建议蒋介石，先控制长城以南地区，暂时不要进入东北，因为在华北的中共军队非常强大，它们威胁着所有交通线。而且苏联明确地表现出要在华北和东北造成对中共有利的条件，它正在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设置障碍。[11]

魏德迈的这份报告相当清楚地勾勒了他所认识到的国共在中国博弈的战略大格局，以及美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力量的限度。他的报告实际上也为美军停止援蒋运兵提出了一个现实的构想，即国民党军队不应也无力再扩大占领区，应该暂时停止军事接收东北。反之，根据魏德迈的逻辑，如果美国坚持要帮助国民政府立即恢复对全中国的统治，美军就不能撤出它目前占领的全部地区，并应继续在军事上援助国民政府，特别是为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和东北运兵。

在魏德迈提交上述报告前后，杜鲁门政府接到驻华军政人员提供的类似报告。这些报告说明，驻华美军已经拒绝为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可中共军队正从山东渡海进入东北，并在平津及秦皇岛展开大规模交通

战，破坏铁路和桥梁，而苏联显然希望中共军队控制苏军撤出的地区。驻华美军原定任务不久即可完成，但是，它们所处的地位大部分影响到政治领域，过早撤退不仅会在目前，而且会在将来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任何及早撤出美军的建议，均应考虑到华北的形势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不同之处。

既然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早已经放在维护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上，美国领导人即使面对如此之多的困难和建议，仍然无法抛弃他们的成见。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向国务院和陆海军部联席会议提出了他们的结论。他们在备忘录中首先提出两个问题：（1）美国是否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直到华北和东北的形势稳定为止；（2）是否制订从11月15日开始从中国撤退美军的计划，或者让美军留在那里，直到局势澄清为止。参谋长们的结论是：在美军顾问团建立起来之前，美军应该继续留在中国，并将此一决定通知了魏德迈。[12]然而，这样的决定仍然无法解决驻华北美军已经引发的问题。军方于是便把皮球踢给国务院，让其为军方的决定寻找理由。

随着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急速变化，杜鲁门政府为国民政府运兵的性质正在从根本上发生变化，而美国军政领导人越来越有重新审订驻华美军的行动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的关系的紧迫感。有代表性的是陆军部给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出，美军卷入中国内部的复杂事态后，“可以预见和能够承担的后果是什么？从军事观点看，在远东应决定采取什么军事行动来反对侵略？对此国务院应作一声明，指出美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东北、内蒙、华北和朝鲜的利益冲突中，不能再后退的最低限度是什么”。[13]军事问题从此延伸到政治领域。

经过一番犹豫，至少到11月中旬为止，美军方选择了帮助国民党军队扩大占领区的方针。这无疑是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政府的决定。但是，随着中国内战逐步升级，华北美军与中共军队的摩擦日渐频繁。美国继续在华北驻军，不直接卷入内战已不可能；要帮助国民党军队扩大占领区，不扩大军事援助的规模也不可能。虽然美军主观上并无意愿直接参与中国内战，但仅靠扩大援蒋的规模显然是无济于事的。曾经极度轻视中共军事实力的魏德迈，经过两个月的亲身体会，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军队靠目前的力量——包括美国已经提供的援助，根本不可能稳定地控制华北，更不要说东北了。即使美国扩大援蒋的规模，向华北运送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也不会有什么效果。[14]事实其实是简单明了

的，国民政府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用武力统一中国，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在美国的援助下也不行。文森特在杜鲁门政府内部的争论中就曾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军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到“日军在8年中都做不到的事情”。[15]

另一种办法是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派遣更多的美军代替国民党军队守住华北的阵地，使后者脱出身来进攻中共军队控制地区。问题是美国人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吗？对日战争结束后，美国军队正在大规模复员。根据陆军部的计划，到1946年1月，太平洋地区的90万美军将减少一半以上。即使是这样的速度，也远远不能满足美军官兵在战争结束后渴望回家并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的愿望。此时美国国内正掀起“让孩子们回家去”的运动，魏德迈也收到美军家属寄来的“数以千计的信”，要求迅速让他们的亲人返回家园。在这种形势下，驻华美军只能减少，不可能增加。魏德迈曾经要求美军领导人增派7个师到华北，尽管他声称此举是为“阻止苏俄在华北及东北势力之发展”，[16]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只答应派遣2个师，而且这2个师还是原计划用于占领朝鲜的多余部队。

杜鲁门政府头痛的另一大问题是，国民党军队越是向北发展，与苏联的矛盾就越尖锐。美军扩大在华北的军事行动，肯定会招致苏联的怀疑，加剧美苏关系的紧张。杜鲁门政府为美军在华北的行动所做的公开解释是，他们在那里只是为了协助国民党军队解除日军武装并将其遣返日本。但随着国共军事冲突的升级，这种解释越来越像美军驻扎华北战略要地的借口。反之，东北的苏军是为对日作战进入中国的，苏军驻扎东北是有条约根据的。而且苏联政府一再声明，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即从中国撤军，并且公布了明确的期限。到11月间，苏军已经通知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他们开始执行撤军计划。两相对照，杜鲁门政府在外交上已经很被动了。

美军在华北的行动引起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和指责，也受到中共和中国公众的强烈反对。如果美国不谨慎行事，致使苏联感觉受到威胁，苏联很可能采取相应的措施，或者拒绝从东北撤军，造成美苏军事对峙的局面，或者无限制地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这样必然使美国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国际冲突之中。美国战争援助处的代表麦克鲁从中国返美后，于11月6日向美国政府和军方领导人汇报：美国援蒋运兵是“有高度意义的步骤和证明，说明在整个远东我们支持蒋”，但是，如果苏联决定支持中共，美国就会陷入“真正的混乱之中”。[17]

“美国的法力是有边的”，美军在华的行动必须有所限制。美军即使不想撤出华北地区，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美军留在华北的最乐观的前景恐怕也就是无所作为。尽管美军方有人声称，美军在中国“从这头走到那头都不会受到什么阻碍”，可是事实证明，美军从秦皇岛坐火车到天津，乘吉普到山海关都不安全。[18]美军既要在华北待下去，又不能造成国共内战扩大，以致引起直接卷入国共军事冲突并与苏联发生对抗甚至冲突，唯一的出路就是设法使中国没有内战。11月中旬以后，杜鲁门政府内部的有关讨论就沿着这条思路发展。

11月16日，美国国务院中国处负责人之一庄莱特在他起草的备忘录中声称：如果中共控制了华北和东北，那里就会出现得到苏联支持的共产党政权，这意味着“对日战争徒劳无功”，“建立强大和统一的中国的前景就会消失”，中国将会分裂，从而引起外国干涉，并有可能使“世界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一阵危言耸听之后，他强调美国应该首先考虑自身利益和安全，至于“中国的民主”和“自相残杀”的内战等，应放在第二位。他认为，美国必须继续支持国民政府，尽一切可能帮助国民政府接收日军占领区，特别是接收东北。美国如果不准备参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登陆，就应该把舰船交给国民政府；任何撤退美军和半心半意地援助国民政府，都会摧毁美国渴望达到的目标。[19]

庄莱特的备忘录把美国对华政策中反共和限制苏联的内容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他特别强调，必须保持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贯性，而美国当前在中国的任务是防止苏联与中共控制东北和华北。在他看来，杜鲁门政府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和扩大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

庄莱特的备忘录由文森特转交给副国务卿艾奇逊，不过艾奇逊此时正在考虑的是如何才能尽快遣返驻扎华北的大批日军，以及如何防止国共冲突加剧，以免苏联“冒冒失失地登场”，何况驻华美军此时已奉命暂停为国民政府向东北和华北运送军队，庄莱特此刻提出那样的建议既不切实际，也不合时宜。艾奇逊要求文森特再提供一份“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可供选择的意见书”。[20]美军方也通知魏德迈，国务院非常想了解国民政府是否有能力在没有美国进一步援助的情况下，肃清东北和华北的日军；以及美军撤出或留在华北，到底会对当地的形势产生什么影响，并要求提出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来”。[21]

11月19日，文森特在他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未加论证地提出四个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海军陆战队撤出华北；第二，海军陆战队留在华

北，“任务不变”；第三，海军陆战队不仅留在华北，还要“扩大它们的任务”，以便帮助国民政府控制华北和东北的形势；第四，海军陆战队留在华北，其任务明确规定为仅限于加速解除日军武装将其遣返日本。[22]从当时杜鲁门政府内部的状况看，文森特的这些建议没有一条有可能被采纳。第一条早已被否定；第二条提出美军留在华北又不变更其任务，根本行不通；第三条要求增加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却无法估量“扩大”的限度；第四条提出要限制驻华美军的任务，又无法解决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的基本问题。所有这些选项都被认为行不通很可能就是文森特没有展开其论证的原因。

这期间，魏德迈也根据给他的指令，多次向杜鲁门政府全面报告他对中国形势的看法。魏德迈认为，一方面，国民政府没有能力完成它面临的使国内统一和实行民主改革的任务；没有足够的军事资源用于控制华北，也不可能采取成功的军事行动进攻东北，或用政治手段接收东北的行政权。蒋介石只知道催促美军为他向北增调兵力，并企图使美军成为一种威慑力量，以使国民党军队可以集中力量进攻中共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军继续留在华北，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国共内战和政治纠纷。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变成了“美苏这两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竞技场”“美苏在华北和东北争夺实力地位的斗争已经展开”。如果中共在国共斗争中取胜，就意味着中国将变成苏联的“傀儡国”，而苏联就会实际上控制欧亚大陆。美国曾经决心阻止日本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庸，所以现在美国也不能允许苏联这样做。但是，如果美国直接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就有可能卷入同苏联的战争，这肯定需要增派“远远超过目前在中国战区可以动用的更多的美军”，而这显然是办不到的。魏德迈建议国民政府必须接受现实，限制自己力图控制的范围。他的基本估计是：第一，蒋介石如果接受外国的行政和技术人员的帮助，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国民政府可以控制华南；第二，除非与中共达成协议并认真加以执行，国民政府不可能在数月甚至数年内稳定华北，而现在问题是国共达成协议“为时尚属遥远”；第三，除非与苏联和中共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在许多年内不可能收复东北。基于以上分析和判断，魏德迈向杜鲁门政府建议：立刻撤退驻华美军，同时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对于东北地区，美国可以提出由美英苏三国“联合托管”，从而“杜绝苏联在东北的单方面行动”。[23]

11月26日，由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人事变动，魏德迈立即向刚接任总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陈述了他对中国形势的估计。他在给后者的电

报中提出，在现在的局面下，即使国民政府想暂停接收东北，集中全力巩固长江以北和长城以南地区，如果没有美军的帮助，也是很难实现的；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就算是在靠近海港的地区作战，也没有力量保障供给线畅通无阻。魏德迈再次强调，如果美军不介入国共内战，国民党军队仅靠美国提供援助是不可能控制东北的；如果美军不介入国共内战，仅靠国民党军队完成日军遣返更是不可能；如果不进一步投入更多的美国军事力量，仅靠目前驻华美军和中国战区的军事资源，既不能帮助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也不能完成遣返日军的任务。魏德迈重新提出三个他认为美国必须选择其中之一的方案：或者撤退全部驻华美军，接受国共协商的结果；或者改变给他的指令，并派遣足够多的陆海空军部队，执行援蒋统一和遣返日军的任务；或者由联合国托管东北，利用联合国的资源遣返日军，同时撤出驻华美军和停止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让中国人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不论是通过改革还是革命的途径。[24]

这时在杜鲁门政府中，没有人认为魏德迈的建议是可取的；关于美英苏三国对东北实行“联合托管”，更没有人认为是可以接受的。魏德迈经过两个月徒劳的努力，终于认识到他以往对中共力量的估计是多么不现实，然而在华盛顿的美国将军们却不愿接受魏德迈的经验和判断。11月26日，陆军部和海军部的部长们在给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称：魏德迈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太悲观，“不能作为美国行动的基础”；美国政府多次公布的政策是“统一的中国，特别是将包括东北在内的领土归还中国。现在花费可观的代价赢得了战争，没有仔细检查便放弃任何公布的目标，显然不是令人满意的”。他们认为，美国目前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果继续援助国民政府，就会加剧中国内战，而美国舆论会批评美国政府卷入友好国家的内部事务，并增加与苏联的矛盾；如果改变以往的政策，不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则会产生抛弃一个盟国的不良影响，并有可能导致国民政府垮台，从而在国际事务中失去一个大国的支持。总之，中国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拖延不决，否则就会加强中共的军事实力，并影响苏联或者重新考虑继续履行中苏条约的期限，或者决定正式向中共提供援助。他们建议杜鲁门政府应遵循下述原则制定政策：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不必立刻诉诸武力；政府在澄清对华政策之前，美军继续留在华北；在解决中国内部问题时，应考虑苏联方面的态度，以便国民政府能通过政治途径控制东北。[25]这个建议的目的显然就是要利用驻华北美军继续保持国民政府的实力地位的同时，寻求政治解决国共冲突的途径。

11月27日，国务院和陆海军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专门讨论陆军和海军部长们的备忘录。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内尔纳斯已经向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询问过，国共双方是否有做出妥协的可能性。他得到的答复是，这主要取决于苏联方面的态度。在联席会议上，国务院和军方领导人经过争论，决定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问题：一方面促使国共达成协议，如果蒋介石拒绝合理的妥协，美国就停止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另一方面是与苏联协商，争取苏联支持美国的政策。艾奇逊把这次联席会议讨论的结论概括为：继续帮助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运兵；国共军队在日军撤出的地区停战；通过斡旋促使国共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并迫使蒋介石接受这条路线。[26]

继续援蒋运兵，促成国共停战，改组国民政府——这就是杜鲁门政府从五花八门的建议中选择出来的一个“最佳”方案，也可以说是又回到了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轨道上，不同的只是面临更大的难题。这个方案的实质就是既保证实现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统一和稳定的目标，又避免美国承担超出其能力和意愿的义务。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尚待进一步讨论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个笼统的原则具体化为可行的计划，以及由谁和采取什么手段，才能推动国共关系沿着美国人设想的途径发展。

二 马歇尔上任之后

就在11月27日的联席会议刚刚为调整对华政策勾画出一个轮廓时，赫尔利突然于同一天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猛烈抨击杜鲁门的对华政策，随后他又向杜鲁门递交了辞职书。赫尔利在他的讲话和辞职书中，把他在中国调处国共矛盾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杜鲁门政府在“政策上面的混乱”，以及美国“国务院中很多部门”正努力地“支持共产主义，尤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他声称，杜鲁门政府如果准备实现美国在华的既定目标，不仅需要制定明确的对华政策，而且有必要“全盘改组”那些制定对华政策的机构。[27]12月5日，赫尔利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他在发言中再次指责杜鲁门政府，声称他调处国共矛盾失败是因为国务院内部的亲共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勾结在一起，破坏了他的行动。[28]

杜鲁门政府好不容易刚刚就找到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达成初步共识，赫尔利却发起突然袭击，结果在杜鲁门政府中造成一次“地震”，并在美国政治中引起轩然大波。早在8月25日，赫尔利就在一封给国务卿的信中提到，他准备辞去中国大使的职务。回国述职后不久，赫尔利一再向国务院领导人表示准备辞职。由于当时国共两党领导人正在重庆举行谈判，美国政府尚需进一步观察中国形势的发展，所以美国领导人拒绝了赫尔利的要求，表示他们完全支持赫尔利在中国的努力，并建议他去新墨西哥州的日光下休养，然后再返回华盛顿，那时他“就会对整个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但是，国共在华北的武装冲突爆发后，美国舆论哗然，赫尔利顿时成了众矢之的。他被指责“颠覆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对前驻华大使高斯的辞职和国务院里那些能干的“中国通”遭“清洗”负有责任。苏英两国也通过各种方式谴责赫尔利。中共中央也公开表示，反对他再担任驻华大使。只有蒋介石希望他尽快结束在华盛顿的述职，返回重庆继续帮助国民政府。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谴责之声，赫尔利最初以攻为守，不断发表讲话，摇唇鼓舌，推波助澜，唯恐杜鲁门政府在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问题上走得还不够远。当他意识到这一招于事无补时，便在27日会见杜鲁门后仅两个小时提出辞职。显然，他在这次会谈之前已经准备好了那份很长的辞呈，而会谈的结果又无法使他感到满意。第二天，他又发表公开

声明，在推卸责任的同时借机大大发泄了一通对政府有关部门和杜鲁门本人的不满。[29]赫尔利的言行和美国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他已经失去了影响中国政治形势的资本。杜鲁门政府在重新审视对华政策之际，起用赫尔利去重庆力挽狂澜，显然是不智之举。杜鲁门接到赫尔利的辞职书后，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

为了迅速平息赫尔利辞职引起的混乱，杜鲁门政府立刻采取行动。12月7日，贝尔纳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讲话，反驳了赫尔利对杜鲁门政府的各种指责，并阐明了杜鲁门政府将调整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他在发言中说，杜鲁门政府在支持国民政府的问题上，与赫尔利并没有实质性分歧。但是，美国不可能将它的支持扩大到卷入中国的内部冲突。美国将继续支持中国实现统一、民主和稳定，并且“始终相信蒋委员长领导下的政府，是发展民主中国最满意的基础”。不过国民政府也必须“扩大范围容纳各党派的代表”。关于被赫尔利猛烈抨击的那些国务院的外交官，贝尔纳斯认为，他们报告所观察到的中国的情况和对政府的对华政策提出意见是完全必要的，杜鲁门政府会继续留用他们。[30]贝尔纳斯的这番发言表明，杜鲁门政府既不打算为赫尔利的失败承担责任，也不会因赫尔利辞职造成的冲击就改变已经选择的路线。

杜鲁门政府在批准赫尔利辞职的同时，即宣布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前往中国。11月26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为马歇尔退休举行了告别仪式。杜鲁门曾在仪式结束后，郑重其事地向马歇尔保证：他已经为美国做出重大的贡献，退休后决不会受到白宫的打扰。但是，几天后杜鲁门便自食其言，打电话给刚跨进家门的马歇尔，声称中国的情况非常紧急，希望他能代表自己到中国去。[31]在马歇尔表示服从指派后，杜鲁门随即向全国公布了对马歇尔的任命。

杜鲁门政府以异乎寻常的速度，一举完成批准赫尔利辞职和任命马歇尔的程序，除情况的确“非常紧急”之外，还因为马歇尔具有肩负此等重任的特殊条件。当时影响杜鲁门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基本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美国国内的批评、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及美苏关系。杜鲁门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目的包括：平息美国国内的党派攻讦和舆论的批评；通过调处国共纠纷，使国共关系能按照美国的愿望发展；限制苏联扩大在东亚的影响，而又不至于破坏美苏关系的大格局。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马歇尔的条件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在美国公众眼里，马歇尔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和深厚的民主

修养，因而备受爱戴，被众人寄予厚望。起用这样一位超脱于政党纠纷、人格方面在美国公民看来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人物取代赫尔利，足可以消除美国国内党派纠纷引起的麻烦。

其次，马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美军总参谋长一职，是蜚声世界的著名人物，享有“胜利的组织者”的盛名。战争期间，他在调度欧洲和太平洋两大战场的美军、协调各军兵种及美英等盟国军队共同作战时，显示出卓越的组织和谈判才能。正是由于马歇尔具有“集天下斡旋功夫于一身”的才干，美国领导人才会断定，他一定会像魔术师那样，在调处国共纠纷中创造奇迹。

再次，马歇尔在美国是一位无可争议的战略家，曾经是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总统最重要的军事顾问，陪同他们出席了战争期间每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可以说马歇尔既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了如指掌，又具有强烈的反苏意识。如果有谁既能在战略上透彻地了解美国对华政策所涉及的既广且深的背景，又能从战术上精明计算国民政府在军事行动方面的得失，在美国政军两界恐怕非马歇尔莫属。杜鲁门毫不犹豫地委重任于马歇尔，表明他确信后者是执行新对华政策的最佳人选，他当时实在“想不出一个比他（马歇尔——笔者注）更合适的人来担任出使中国的艰巨任务”。[32]

马歇尔接受杜鲁门的任命后，立刻走马上任。当他开始参与讨论和制定对华政策时，中国政治形势正在发生变化。11月30日，哈里曼报告杜鲁门政府说，他得到的消息证明，苏联已经同意国民政府的要求，决定延缓从东北撤军。[33]第二天，国务院又接到驻华使馆领事史密斯的报告。该报告转述了王世杰11月27日递交的一份备忘录，说明了苏联延缓撤军的情况。报告指出国民政府正急于与苏联达成协议，以便合法地接收东北。[34]美国驻海参崴的领事馆也报告说，苏联延缓撤军会给国民政府更多的时间调动军队；不过苏联正有计划地提高在亚洲的地位，在东北则是迫使国民政府承认苏联在那一地区享有最优的利益。[35]艾奇逊立即召见魏道明，要求他解释中苏之间的协议是否包括其他条款。[36]显然，苏联宣布延缓撤军和国民政府的态度已经引起杜鲁门政府的关注与担心，他们既不愿看到国民政府与苏联达成的这样一笔重要的交易中包含对美国不利的内容，也担心苏联对东北地区的政策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苏军会长期驻扎在那里。

12月初，魏德迈再次向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艾森豪威尔报告

了华北的形势。他指出，驻华美军实际上正为国民政府防守着秦皇岛、天津、北平和青岛，并控制着塘沽到秦皇岛的铁路线；还有大约1万名日军在协助美军护路；除非能协助国民政府尽快向华北增调军队，否则美军无法执行解除在华日军武装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么甘冒卷入中国内战的风险，继续为国民政府向华北运兵；要么立即动用美军的资源遣返日军，而不管国共之间的争执。魏德迈提出，如果美国的政策是支持中国的统一和稳定，就需要执行第一个方案；反之，如果美国只准备遣返日军，就采取第二个方案。他建议杜鲁门政府无论如何要发表一项声明，确定美军驻华北的目的，并宣布美国不向任何人发动攻击，但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有权采取行动，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37]

魏德迈的报告再次证明了驻华美军的处境已非常不妙，他们非但难以执行杜鲁门政府公开宣布的任务，反而要利用日军作挡箭牌。而且由于华北地区国共军事冲突愈演愈烈，魏德迈的建议实际上是要求杜鲁门政府为美军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开绿灯——如果美军还要在中国待下去而不出现伤亡的话。驻华美军的行动当然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尤其是苏联报刊这时开始公开指责美军的行动，抨击美军留在中国不走缺乏正当的理由。

东北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华北美军的处境加快了杜鲁门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国务院和陆海军部在11月27日联席会议上确定的原则必须尽快具体化，以便能够适应迅速变动的形势。

11月28日，贝尔纳斯向马歇尔宣读了由文森特起草的一份题为《在华行动提纲》的文件。该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方面：（1）东北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国民政府重建对东北的行政控制权是中国恢复在东北的主权的唯一途径。美国准备为此帮助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2）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的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军队解除日军武装，并将他们遣送回国。（3）美国在国际上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但不能在中国的内部斗争中用军事介入的方式给予支持。（4）国共停战是完成第一、二两项任务的必要条件。如果得到中国方面的邀请，美国可以参与斡旋国共军队实现停战。（5）美国将以各种方式支持国民政府通过政治谈判，实现中国的统一，这包括改组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并取消中共“自治性”军队。（6）美国要求苏联和英国支持它的政策。该文件最后说明：美国准备以各种合理的方式向中国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援

助，前提是国民政府要沿着美国指出的路线实现和平和统一。[38]国务院起草的《在华行动提纲》基本上反映的是该部门的一贯方针，即援助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以排挤苏联；促成国共停战，以稳定华北局势；改组国民政府，以形成统一中国的政治基础。最终目标是通过政治方式，使中国形成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局面。

马歇尔对《在华行动提纲》并不满意，主要是认为它不够明确，容易引起误解。他要求重新起草一份文件，并解释了他考虑的因素。第一，既要使美国公众明了美国政策“暗示的含义”，又要使蒋介石能在明确的数据的基础上，计算能得到多少军事援助，而且还要使蒋介石注意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将驻在某些指定的港口，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安全。这种方式同时也暗含着美国能够在纯粹政治性的问题上控制蒋介石的行动。第二，马歇尔表示他很清楚，美军驻在中国的某些港口，可以使蒋介石从那里自由地调动他的大部分军队，扩大对华北铁路的控制。第三，马歇尔自己设想，中共可能会为自己的利益而拖延谈判，以便引起更大的混乱，减少国民政府控制东北的可能性，而这种情况肯定会给苏联控制东北创造条件。第四，应该由国务院发表坦率的声明，使美国公众、苏联、中国和英国等，都能清楚地理解杜鲁门政府到底打算做什么。[39]

马歇尔当天即与他的助手一起重新拟订了一份题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草案。这个草案除了重申文森特的《在华行动提纲》中的部分原则外，还加入了一些新内容，包括：美苏均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只有这个政府表现出有能力实现中国的统一；美苏均承认中国有权控制包括东北在内的被解放地区；根据复员和遣返日军的需要，美国将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并协助它运送军队，使它能够控制华北和东北。马歇尔强调，提出这些原则的目的是试图平衡《在华行动提纲》中表现出的更多地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的倾向，并表明美国准备利用外交手段和既有军事地位，向苏联特别是向中共施加压力。[40]

12月8日，文森特重新拟订了一份对华政策文件，其中修改了马歇尔11月28日的草案。相比较而言，这份文件的确更多地强调了要“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迅速解决国共争端，并明确提出：“为了便利安排停战，在拟订中的国民会议达成临时协议之前，美国将不运送国民政府的军队到华北等地区，因为运送军队会损及军事停战和政治谈判的目标。”[41]

美军方立刻对文森特修改过的文件提出异议。陆军部在给马歇尔的

备忘录中指出，如果国务院确定的目标包括统一中国，那么规定解决东北问题将等待国共谈判的结果，这一点很值得怀疑。因为那里的形势已经表明，只有运送更多的国民党军队，才能保证国民政府在最近的将来控制整个东北，而美军为国民政府运兵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所以拖延肯定对中共有利。陆军部建议，为了防止因谈判而拖延时间，应规定在改组国民政府之前取消中共军队。[42]

为了答复陆军部的非难，文森特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建议：如果中共在谈判中拒绝合作，美国可以继续帮助国民政府向华北运兵。但他随即补充说明，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解决办法，因为美国的这类行动不会阻止内战的发生，而且美国这样做是企图使国民政府去做日军没有做到的事。反之，如果蒋介石拒绝合作，美国就应该与中共做出安排，以便迅速遣返华北的日军。[43]

12月9日，马歇尔与贝尔纳斯、艾奇逊、文森特和陆军部参谋赫尔等人在国务院开会，共同研究对华政策问题。他们讨论了马歇尔主持起草的文件和文森特的修改方案。贝尔纳斯首先表示支持文森特的修正意见。他声称中国的强大和统一对美国的利益非常重要，如果不能使国共组成联合政府，苏联最终会控制东北，并对华北保持占统治地位的影响；如果中国自己不能控制东北，就没有使苏联不那样做的办法了。所以，马歇尔应该持有足够的武器，“以便诱导中央政府和共产党政府走到一块儿”，而马歇尔的武器就是美援和帮助国民政府运兵。美军方应该指示魏德迈向东北调运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包括对它们的后勤支援；美军采取行动帮助国民党向华北增调军队，则必须等待马歇尔与国共双方谈判的结果。

马歇尔的军事顾问重申对国务院的方针中存在的矛盾感到担心。国务院主张在停战和达成政治协议之前就向华北增运国民党军队。马歇尔本人则立刻施展出他的调处才能。他曾经支持军事顾问们的意见，但在贝尔纳斯发言之后，他即提到两种可能性：一是中共接受美国的建议，而蒋介石却反对；一是中共反对做出合理的妥协，而国民政府方面采取合作的态度。如果调处中出现其中任何一种情况，美国应该怎么办？贝尔纳斯按照文森特的建议答复说：如果出现第一种情况，就告诉蒋介石，美国将停止给予国民政府的一切援助，与中共协商遣返华北地区的日军；如果出现第二种情况，美国就应该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向华北运兵。[44]

贝尔纳斯的答复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如果杜鲁门政府有意把驻华美军的任务仅仅限于遣返日军，他们根本不必为调整对华政策如此大伤脑筋。只要他们愿意，完全可以同中共方面协商，解决遣返华北地区日军的问题。同样，如果通过协助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运兵就可以保证国民政府取得军事优势，杜鲁门政府也绝不会为促使国共停战操心。马歇尔当然不希望按这种似是而非的答复采取行动。

美国国务院官员和军方领导人的争执相持不下，他们最后接受了麦克阿瑟、魏德迈和斯普鲁恩斯等在亚太的军事指挥官的建议。后者在给杜鲁门政府的报告中说：美国应再运送6个军的国民党部队及其所需的装备到华北和东北；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机，可由马歇尔在完成他的使命的过程中确定。[45]

12月9日的会议实际上采纳的是一种折中方案。贝尔纳斯当天向陆军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内容包括他两天前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发言，以及国务院给魏德迈的最新指示，即：驻华美军可以协助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包括运送必要的装备和补给；在国共达成协议之前，停止向华北运送国民党军队；应妥善准备向华北运兵，但不能通知国民政府；是否实施向华北运兵的计划，应由马歇尔根据两种情况做出决定，一是不妨碍国共谈判，二是谈判失败，为保证美国的长远利益，运兵已属必要。[46]这个方案既否定了贝尔纳斯提出的选择，即在蒋介石不肯合作时，与中共合作遣返日军，也否定了美军方坚持在国共达成协议之前就为国民政府运兵的建议。马歇尔有权决定的是在什么时机将为国民政府运兵的计划付诸实施。会议的决定实际上有两重含义：一是要利用美国援助来加强国民政府在华北和东北的军事地位；二是要利用美国援助作为促使国共谈判妥协的工具。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个方案中自相矛盾的逻辑贯穿马歇尔调处活动的始终。

美国军政领导人争来论去，其实是在什么条件下为国民政府运兵的问题上兜圈子。这种本末倒置的逻辑已经把美国对华政策置于一种荒唐的前提之下。文森特为使美国对华政策仍然保留转圜余地，在第二天起草给马歇尔的指令时，说明杜鲁门总统特别希望马歇尔能说服国民政府，召开代表各党派的会议来解决中国政治统一的问题。目前则应实行停战，特别是在华北地区停战。但是他并没有按照贝尔纳斯的指示，进一步说明一旦马歇尔调处失败，美国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文森特在给贝尔纳斯的备忘录中解释说，如果美国达不到基本目标，应采取什么路

线，最好等待马歇尔到中国后的报告，现在就起草那种指令并不明智。[47]

文森特的建议虽然得到了美国领导人的认可，马歇尔却要追根究底。在12月11日又一次审议美国对华政策的会议上，贝尔纳斯重申，美军有权向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和他们所需要的装备，也有权协助遣返日军和向华北运送国民党军队。但关于后一点，目前应对蒋介石保密，目的是向国共双方施加压力，以便达成停战和组织联合政府的协议。杜鲁门批准了贝尔纳斯的汇报，并表示他会支持马歇尔的一切行动。

马歇尔对贝尔纳斯的决定并不满意。他说根据他的理解，他将利用国共双方对美国是否帮助国民政府向华北运兵这一吃不准的情况，尽量迫使它们做合理的妥协。问题是当蒋介石不肯做“合理的让步”时，美国“倘若放弃对委员长的支持，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个分裂的中国，以及俄国人可能重新在满洲掌权的悲剧性后果。出现这种局势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的失败，并失去我们参加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标”。马歇尔询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否打算继续帮助国民政府向华北运兵。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意味着美国政府要“放弃它引为自豪的行动和正在执行的许多政策”。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的答复是，美国“不得不支持蒋介石，扩大援助国民政府向华北运兵，以便完成遣返日军”。贝尔纳斯补充说明，美国的政策是不再向中国派兵，他已经就此发表过公开声明。杜鲁门立刻表示同意。[48]

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虽然把援蒋运兵说成为了遣返日军，但他们同马歇尔一样，深知那样做的后果，而且非常清楚美国援蒋能力的限度。正是因为他们都看到了调处失败会产生何种影响，美国必须尽可能防止国共谈判破裂。这就是为什么马歇尔在调处期间会一再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11日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反映出美国领导人对马歇尔调处可能失败的潜在担忧，所以他们也为调处失败后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规定了界限，即美国绝对不能直接卷入中国内战。

12月14日，马歇尔同杜鲁门、艾奇逊在白宫最后一次研究对华政策，杜鲁门把有关的文件——“总统给马歇尔的信”“美国对华政策声明”“国务卿、陆军部的备忘录”以及供发表的“新闻电讯稿”等，统统交给马歇尔，并征询他的意见。这些文件概括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和马歇尔可以利用的手段。概括地说，美国的目标是促使中国出现稳定和统一的局面，方法是利用美国的影响，并争取苏联的支持，以促成国共停

战，进而通过政治谈判，将国民政府改组为由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马歇尔在完成其使命的过程中，有权充分利用美国的实力地位，迫使国共双方做合理的妥协，有权决定美国在调处失败后采取的行动路线。马歇尔当场对这些文件表示满意，但他指出：指令中有一条没有见诸文字，即如果不能确保蒋介石做出必要的让步，美国政府仍有必要通过他支持国民政府。杜鲁门当即肯定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49]

同一天，联合参谋部指示魏德迈：驻华美军的任务是协助国民政府解除中国战区的日军武装，以及控制包括东北在内的被解放地区；美军有责任与国民政府协调行动；美国应援助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并提供相应的装备和补给；美军不承担进一步向华北增调国民党军队的任务，除非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专门指令；华北港口除了为向东北运兵所必需者外，不得再用于调动军队；驻华美军应尽可能避免与中共军队发生任何冲突，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不得扩大到用美军的介入影响中国内部冲突的进程。[50]

12月15日，杜鲁门公开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阐述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原则和行动路线。首先，针对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美国的主张是立即停止敌对性的军事冲突，召开有中国各主要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尽快解决目前的纠纷，以促成中国的统一。为了达成统一的目的，国民政府必须扩大其政治基础，容纳其他党派参加。政府改组后，中共应将其“自治性军队”统编于政府军队中。其次，针对苏联在东北的行动，美国强调一切同盟国家均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是中国统一的基础。不仅是美国，苏联也同样有义务保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包括将东北归还中国。再次，针对美国国内舆论的批评和党派攻讦，解释了美军将继续留在华北以完成遣返在华日军的工作，但保证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不会扩展至以美国军事干涉影响中国任何内争的过程”。[51]

杜鲁门选择发表公开声明的时机恰恰是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召开的前夕。杜鲁门政府不仅要通过这个对华政策声明来平息美国内部的批评及稳定中国的形势，而且打算促使苏联和英国都接受一个公之于世的既成事实。根据杜鲁门政府内部历次会议讨论后所确定的方针，贝尔纳斯在三国外长会议开幕伊始，便积极着手争取苏联赞成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他在会议开幕的当天就提出，应将苏军撤出东北问题列入议程，并分发了杜鲁门的声明和有关美军留在华北的备忘录。在19日的会议

上，他又提出苏联应该承担条约义务，支持国民政府，并把拖延遣返日军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在整个会议期间，贝尔纳斯不断吵吵嚷嚷，反复同莫洛托夫争论苏军应撤出东北和美军有必要留在华北等，直到斯大林在接见他时表示苏方可以做出承诺。[52]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于12月27日闭幕。会议发表的公报声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必须广泛地由民主分子参加，并且内战必须停止。他们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公报还说明，美苏两国外长在尽快从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彼此意见完全一致”。[53]三国外长会议发表的这个公报当然是美苏再次协调它们的对华政策的产物。杜鲁门政府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再次促使苏联公开保证支持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特别是保证将东北移交国民政府接收，以及在美军继续留在华北的问题上取得苏联的谅解。会议公报发表后，贝尔纳斯认为美国已经达到了目的。

到12月27日为止，美国政府经过近两个月的反复研究，终于完成了对华政策的调整和马歇尔使华的全部准备工作。调整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无疑基本上延续了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以后奉行的方针，不过它毕竟形成于太平洋战争刚刚结束的新的历史环境中。如果说罗斯福的政策是企图在战后的东亚构建一种新的秩序的话，那么杜鲁门政府经过修正后的对华政策，则是在修补一个在纸上形成、在战后的现实中却摇摇欲坠的格局。这就使它与罗斯福的政策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某些新的特点。

对日战争结束后，杜鲁门政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即国民政府已经不可能凭借武力统一中国，即便有美国的大规模援助，其结果也一样。承认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重新估计中共的实力，是影响杜鲁门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因素。雅尔塔会议结束后，赫尔利和魏德迈曾经一度使美国领导人相信，中共的力量并不可怕，美国只要继续给些援助，国民政府就有可能在与中共的斗争中取胜。现在这个神话终于被事实打破了。

杜鲁门政府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决定再次介入中国内政，调处国共矛盾，企图通过促成国共停战和改组国民政府，保住它对亚太的战略规划。从这个意义上说，自雅尔塔秘密协议签订后，美国两届政府经过将近10个月的努力，不过是兜了一个大圈子，结果又回到了罗斯福的起点。不同的是，基于对日战争已经结束和对国共力量对比的重新估计，杜鲁门政府这一次采取了比罗斯福强硬得多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

（1）选择声望和能力远远超过赫尔利的马歇尔使华，既可以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又可以产生引起各方面重视的戏剧性效果，从而对各方面造成某种心理上的压力；（2）授权马歇尔坦率地告诉蒋介石，“一个不统一的、被内战弄得支离破碎的中国”，不可能得到美国的援助；（3）统一领导美国援华工作，规定一切援华项目是否实施均须等待马歇尔对中国形势做出判断；（4）美国向华北增调国民党军队的准备工作暂时对国民政府保密；（5）加强华盛顿的统一领导，马歇尔在中国的一切行动直接对总统负责，并只接受总统的命令。杜鲁门政府采取这些措施，不论是从主观意图还是从客观效果看，的确都使国民政府受到了更大的约束。

美国再次调处国共矛盾的目的，实际上是试图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去争取蒋介石靠武力得不到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欧洲有许多国家组成了联合政府，其中凡是处于英美势力范围中的国家，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均未取得支配地位。既然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实行民主政治不外乎产生类似西欧国家那样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当然不会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欧洲的经验使美国领导人确信，在民主政治的环境里，“没有理由认为”国民党在夺权斗争中不能“取得胜利”。[54]于是杜鲁门政府又一次拾起罗斯福试验失败的“法宝”。

杜鲁门政府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也是基于在东亚取得对苏联的优势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撮合国共与限制苏联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说罗斯福推动国共联合尚有使国共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积极意义，那么马歇尔调处则完全服务于美国在战后对亚太的战略目标。可以说杜鲁门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包含着限制苏联的意图。正是从在亚太限制苏联的战略出发，在决定为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的问题上，杜鲁门政府内部没有发生过任何争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杜鲁门政府之所以断然决定支援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一方面固然是受对苏联战略的支配，并企图防止中共在东北形成坐大之势；另一方面仍然寄希望于能与苏联保持一定的协调行动，从而限制中共力量在东北的发展。如果苏联能保证并切实履行中苏条约中的有关规定，中共军队在东北肯定会受到限制，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也不会引起什么大的麻烦。然而，在战后世界舞台上，尽管美苏两国的关系居于中心地位，但它们却不能左右所有地区的所有政治力量。特别是在中国，美苏的妥协与斗争虽然影响重大，国共两党的关系毕竟主要按

照自身的规律变化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和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力量的空前集聚，使中国不再会被纳入任何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任何大国都不再能操纵中国的革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之一。杜鲁门政府不理解这个最基本事实的重要性，它的对华政策就很难放在现实的基础上。

三 机会仍然存在

正当杜鲁门政府积极研究和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之时，东亚政治形势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其特点就是有关各方面的关系明显地趋于缓和。毛泽东在10月间曾经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对各方都有好处。[55]这个判断被证明是符合战后初期一个阶段的国际政治的演变的。尤为突出的是在大国妥协的趋势的影响下，不仅杜鲁门政府在调整其对华政策，苏联方面亦在调整其对华政策，国共两党也在调整各自的政策。

对日战争结束后，苏联在东亚地区的政策虽然有所变化，但总的说来，并未超脱战时对华政策的窠臼。它在保持已经获得的实力地位的基础上，继续争取大国之间、主要是与美国协调行动，以谋求合作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主要手段。9月召开伦敦外长会议失败后，杜鲁门政府在解决战后日本管制问题上一度采取自行其是的外交行动，破坏了雅尔塔会议期间达成的美苏协调处理有关东亚国际事务的规范，这引起了苏联政府的不满和警惕。结果是苏联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一方面拒绝参加杜鲁门政府提议设立的所谓“远东咨询委员会”；另一方面在中国东北地区采取强硬措施，通过为国民政府设置障碍、阻止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和援助中共向东北发展等措施，强化自身在东亚的实力地位。苏联的这类强硬措施显然是对杜鲁门政府在管制日本问题上采取强权立场的一种报复和警告，而不是像美国的那些激进的反苏预言家声称的那样，预示着苏联打算“自己干”了。

对日战争结束后，苏联对外政策的主旨是维护来之不易的国际和平与稳定，争取获得有利于恢复国内经济建设的外部条件。因此，苏联领导人在东亚不可能谋求扩张，苏联方面任何追求优势地位的行动最终必定要以维护有关地区的和平和东部边疆的安全为归宿。11月6日，莫洛托夫在纪念十月革命28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不点名地批评了美国对外政策。他说，“任何一个国家，要求在一般的世界大事上起领导作用，正如要求世界霸权一样，原是种轻率的要求。其实，只有经过战争的重大负担，并保证各民主国家对法西斯主义获得胜利的那些共同努力的强国，才对永久的和平有所裨益”。他进一步阐述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原则，声称“苏联对于可能出现的新的和平扰乱者的警觉性，绝不放松。另一方

面，对于那些爱好和平的各强国加强合作的关切，仍然跟从前一样。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苏联《消息报》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评论，更清楚地反映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国际合作反对者并不相信英美苏三国合作的理想，但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要求明天的安定与和平。没有英美苏三国的合作，就没有巩固持久和平的保证。”[56]

苏联显然希望能够维持美苏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合作关系，并通过巩固这种合作关系来维护与苏联毗邻地区的和平和安宁。苏联对华政策是其东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与美国协调关系，苏联必然要谋求改善与国民政府的关系，除了依靠已经获得的实力地位，还打算通过多种外交手段，争取国民政府在美苏之间保持至少是一定程度的中立，同时避免公开介入国共斗争而导致同美国的矛盾尖锐化。至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其发展程度不会给缓和对美对蒋关系带来不可控制的负面影响。东北苏军的行动已经表明，苏联领导人认为如果在与中共的关系上不谨慎，就会在外交上失去主动，为美国国内的反苏势力，甚至推动驻华美军直接干涉国共内战等提供借口。

苏联缓和东亚紧张局势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在矛盾最尖锐的东北地区缓和同国民政府的关系。国民政府宣布撤退东北行营后，苏联迅速做出反应。11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中国外交部，否认东北苏军曾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苏军撤出的地区被中共军队占领是国民政府自己无力完成接收工作的结果；如果国民政府同意，苏军可以暂缓撤出东北，同时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至沈阳和长春等大城市。东北苏军司令部亦通知东北行营的代表，苏联已经准备暂缓撤军，并将加强长春城防，清除暴乱，取缔反国民政府的宣传。[57]

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经过讨论一致认为，解决东北问题首先要将部队空运到长春，以便控制联结南满和北满的战略枢纽。19日，国民政府在答复苏联的照会时提出：接收东北应重新拟订具体办法，经双方同意后实行。所谓具体办法就是协助国民政府接收和阻止中共力量发展同时进行，这包括解除沈阳、长春及其周围机场附近中共部队的武装；苏军必须给予方便，使国民政府通过北宁路和东北各港口运兵能顺利进行；苏军协助国民政府接收行政权，并准许编组保安队。如果上述条件能被接受，国民政府可以同意苏军缓撤一个月。[58]24日，苏联政府在答复中除了保证空运至沈阳和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安全着陆之外，其余条件一

概予以拒绝。苏方照会还说明，苏军在已经撤出的地区无法协助国民党军队运兵，中方所称中共军队在沈阳和长春周围集结，查无实据。照会最后建议，具体问题可以由双方在东北的地方当局协商解决。[59]

11月26日，国民政府照会苏联大使馆，表示接受苏方的部分有关建议，立刻派代表前往长春，以便恢复谈判，协商国民党军队进入沈阳、长春等地的具体办法。[60]30日，彼得洛夫通知王世杰，苏联政府同意延缓撤军一个月，由此引起的具体问题则由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与中方代表当面讨论。[61]苏联在与国民政府协商的同时，亦开始在东北用各种手段，促使中共配合苏联的外交行动。

苏联在东北争取与国民政府重开谈判和延缓撤退苏军的一系列行动表明，苏联对华政策的主要方面仍然是谋求改善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它在东亚与美国斗法时，仍然希望尽可能地中立国民政府，使之不要积极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不要过分反苏，甚至引起华北美军的直接干预。

战后初期，苏联为了创造有利于其重建战后经济的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环境，力争与所有毗邻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不过也应看到，为了达到维护其国家利益的目的，苏联根据它对各邻接国家的政治形势的估计和自身的战略考虑，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种模式。其一是对那些处于苏联防御中心地带的东欧国家，苏联充分利用军事占领的有利条件，坚决支持那一地区的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治力量，帮助它们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从而在欧洲中东部地区为自己建筑了一道坚固的安全墙。

其二是对处于苏联安全防线两翼的国家，苏联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为“中立化”的政策。比如对地处北欧的芬兰，苏联一面争取与其建立友好关系；一面通过签订条约、租借波卡拉半岛的一些地区和海域等行动，建立了海军基地；加之根据1940年的《苏芬条约》，苏联已经控制了卡累利阿地峡，从而严重削弱了芬兰的防御能力。这样芬兰即便有意与苏联为敌，它的边境也无险可守。相比较而言，苏联对中国采取的政策与对芬兰的政策更加接近。

苏联在决定缓和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之时，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对苏联比较有利的态势。除了外蒙古和朝鲜已经建立了对苏友好的政权外，中共军队已经控制热、察两省的广大地区和辽宁的部分地区，在东北其

他地区也在逐步取得新的发展。加之苏联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控制了旅顺、大连和长春铁路，从而使东北北部的主要城市实际上处于被控制状态或战略包围之中，即使国民政府能够占领这些大城市，那里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也已经被严重削弱了。苏联与其冒支持中共军队夺取东北而与美国发生公开对抗的风险，不如通过谈判把已经被掏空的东北交给国民政府，换取外交上的主动地位。

苏联在妥协的同时，又以协助接收为条件，迫使国民政府再做让步。其一是宣布延缓撤退东北苏军，从而继续保持在东北的实力地位。这样做既可以遏制美国势力乘机进入东北，又可以作为要求美军撤出华北地区的外交筹码。其二是利用延缓撤军造成的局面，迫使国民政府在解决东北经济问题时做出让步，接受共同经营东北的部分工矿企业。当时苏联在拆迁东北的厂矿设备之时，又提出中苏在东北进行经济合作，除了获取经济利益外，主要是为了通过彻底控制东北经济，阻止美国资本挤入这一地区。苏联的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东北行营经委主任张嘉璈在到任之前即在美游说，与美国有关部门就双方在东北进行经济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张嘉璈的行动虽然未必有政府背书，但表明国民政府的要员们还是有意在重建东北经济过程中将美国拉入这个地区的。

苏联在完成对东北大城市和战略要地的战略包围及控制海陆交通之后，如果能实现对东北工业的控制，那么东北行政权不论交到谁的手中，都不再可能构成对苏联的威胁。换句话说，苏联的妥协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斗争，意在缓和与国民政府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即使国民政府没有按照苏联的愿望改变其对外政策，从而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它也无力再改变东北的实际状况了。

苏联在东北紧张局势缓解后，继续主动在外交上拉拢国民政府，邀请蒋经国访问苏联。12月25日，蒋经国应斯大林的邀请，到达莫斯科访问。在蒋经国访苏期间，斯大林曾两次与他会谈。根据斯大林谈话的内容，可以将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苏联仍然希望与国民政府建立友好关系，苏联愿意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苏联过去没有，将来也不打算介入国共斗争，它赞成国共两党“和平共存”“和平竞争”；第二，苏联赞成美中苏在东亚地区合作，希望国民政府能奉行“独立政策”，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第三，苏联决不允许美国染指东北，反对美军继续驻在中国。[62]这三点内容的实质，也是改善中苏关系的根本条件，就是国民政府必须在美苏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的中

立，否则中苏关系迟早要逆转，国共问题也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12月31日，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蒋介石在会谈中阐述了国民政府对国共谈判的立场和政策，并询问苏方对中国政局的看法。彼得罗夫表示，苏联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中国，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团结”。[63]这听起来无懈可击的外交辞令在本质上的确反映了莫斯科的真实态度，与斯大林对蒋经国的谈话精神是一致的。至此，国民政府与苏联也基本完成了一次政策协调。

苏联在主动缓和中苏关系的同时，也开始着手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美苏代表在中国问题上一再交锋，他们争论的焦点就是各自从中国撤军的问题。苏联的目标就是迫使美国从华北撤出全部美军。在开幕式上，莫洛托夫首先提出，应将驻华美军撤离问题列入议程；此后又一再坚持，外长会议必须讨论美军在华北驻扎的问题。他指出，日本投降已经几个月，中国华北仍有全副武装的日军，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美国对此当然负有责任。12月21日，苏联方面提出一份备忘录，建议美苏达成谅解，同时从中国撤军；中国的内部问题应在没有其他国家干涉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及其政府自行解决。不过直到斯大林本人会见贝尔纳斯时，苏方才做出了某种妥协。斯大林在这次会谈中表示，苏联可以在美军驻华北问题上做出让步，不过美国领导人应该清楚，美军长期驻华对国民政府并没有什么好处。他还表示苏联赞成杜鲁门政府派遣马歇尔使华，用政治谈判的方式解决国共纠纷。[64]苏联的让步避免了因美军驻华问题的争论而破坏东亚刚刚缓和下来的局面，同时苏联又换取了美方承认苏军可以延缓撤出东北的对等行动。结果是苏联既实现了在东北地区的既定目标，又防止了因苏军延缓撤军可能引起的美苏关系的紧张。

美苏之间的妥协必然影响到国共两党的关系。尽管国共武装冲突从10月中旬开始不断升级，但中共中央当时仍然相信，中国有可能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中共中央判断在重庆谈判结束后6个月左右，是由“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时期”。在国际上，美苏两国的关系仍然是以妥协为主；在国内，国民党将被迫不得不走重庆谈判确定的道路，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是为了争取在华北和东北占优势，以便在有利的条件下实行政治妥协，因此，不能把大规模内战误认为全面内战阶段已经开始。中共中央在给

各地区的指示中说明，中共在这个过渡阶段的方针是：“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65]中共中央这时所说的胜利，就是集中力量，有计划地歼灭向华北和东北进攻的国民党军队，争取控制东北，在华北取得有利地位。10月底、11月初，中共中央再次指出：必须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6个月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然后坐下来同国民党谈判，迫使对方承认华北和东北的自治地位，这样才有可能过渡到和平局面，否则是不可能实现全国和平的。[66]

中共中央提出在向和平阶段过渡时期取得军事胜利，从而实现华北和东北自治的战略方针，同苏联的政策变动有直接关系。中共中央继10月19日发出有关放弃分散方针、守住东北大门、开展全东北工作的指示后，23日又明确提出了要“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67]中共中央这时的判断是，争取东北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阻止国民党军队通过海路和空运进入东北，而如果得不到苏军的允许和帮助，实现这个计划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一面要求在重庆的谈判代表与苏方协商，使苏军于11月、12月两个月延缓撤退；一面指示东北局，务必争取东北苏军同意在两个月内阻止国民党军队经海路和空运进入东北，以及进入东北的部队应按照当地苏军的建议，迅速在安东、葫芦岛和营口等地设防，控制一切重要机场，接收主要城市的政权、工矿企业、兵工厂和武器弹药等。东北苏军当时曾鼓励东北局领导人说，中共在东北应以主人自居，放手开展工作，而苏军也准备协同中共军队，打击沿北宁线向东北进攻的国民党军队。[68]

11月初，中共中央根据“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方针，决定将主要作战方向转到东北。中共中央在给华北和东北前线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11月至12月中旬，将是继华北冲突之后，国共武装争夺东北的另一次高峰，战场是在辽宁南部、锦州、热河和冀东等地区；现在中共军队必须集中可能的力量，争取这场战略性质的决战的胜利，奠定中共在东北的巩固的大根据地，否则国共武装冲突将难以停止。中共中央这时提出，如果能在11月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以及在整训后根本歼灭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就可以控制整个东北；为达此战略目标，中共华北部队必须迅速北进，准备夹击从山海关突入东北的国民党部队；进入东北的部队应以锦州为中心集结力量，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同时应准备破坏葫芦岛码头和北宁路一段，严密控制长春机场并争取全歼国民党军

队的机降部队。[69]

但是，苏联在11月中旬决定并着手改善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后，也很快开始限制中共军队在东北的行动。11月20日，东北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他们根据上级的指示，必须将长春路沿线及各大城市交国民政府接收，因此决定凡苏军驻扎的地区，中共军队均不得进入，并不准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在东北苏军全部撤出东北之前，包括山海关至锦州地区在内的东北全境内，亦不准中共军队作战；中共军队必须退至铁路沿线50公里以外，中共所属机关必须从大城市撤出。苏军代表声称，为了苏联的利益，他们不惜牺牲一切。[70]

东北苏军的行动严重干扰了中共中央预定的战略计划，另外，国民党军队攻占山海关后向北进攻的速度较快，中共东北部队和从华北刚刚到达锦州一带的部队已经很难抓住战机，因此要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形势出现的复杂变化很快就认识到，中共军队要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的所有大城市已经不可能了，关键的原因就是苏联方面为了照顾与美国的关系，不能完全拒绝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和接收各大城市；而中共军队目前尚不能完全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不过，中共中央还是认为，尽管目前出现了困难的局面，但国共两党谁在东北占优势还不能确定，还要根据将来形势发展和国共在东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共军队在东北的主要任务应转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做长期斗争的准备，以争得在“东北之一席地位”及可能的优势。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进入东北的部队应努力在距离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将工作的重心放在群众工作方面。[71]

为了配合东北的战略调整，中共领导人向国内外公开宣布了解决东北问题的主张，声明国共军队在东北南部沿北宁路发生的武装冲突是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共军队已经控制的地区引起的；中共方面原则上不反对国民政府接收长春路，但必须事先协商，而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承认中共在东北的重要地位。中共中央还指示在重庆的中共谈判代表，应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为避免东北地区的内战扩大，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之前应先实行停战。

中共中央在东北调整战略计划的着眼点是争取适应美苏妥协后的形势及其给国共关系带来的影响。中共中央在给各地区中央局的指示中指

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国共之争。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格局中，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扶蒋打共反苏；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方针是打击中共时中立苏联，反苏时则必然连上中共；苏联的对华政策是在形式上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中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斗争中亦经常不联系美国。[72]在此条件下，中共有必要谅解和配合苏联的外交行动，但这种谅解和配合是主动和有原则的，而非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中共中央在了解到东北苏军态度变化的当天即通知东北局，应当服从东北苏军的决定，将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国民党军队，同时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长期斗争；为了争取时间和更有利的条件，东北局应向东北苏军说明，锦州至山海关一带原属中共冀热辽解放区，现在中共军队只能让出营口，不能让出锦州、葫芦岛和北宁路南段。另外，中共军队及干部从大城市和长春路沿线撤退需要若干时间做各种部署和解释工作，希望东北苏军推迟允许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如果东北苏军不接受这些建议，东北局应考虑彻底破坏北宁路的锦州至山海关段，使国民党军队在短期内不能利用铁路迅速运兵。[73]此后，中共中央又基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指示东北局“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依靠发动群众“在东北站稳脚跟，并确立我们对国民党的优势”。[74]

中共中央为了使进入东北的部队和干部的思想适应形势的变化，防止因不理解国际问题的复杂影响而滋生反苏情绪，还特别告诫东北局须充分理解，苏联在11月中旬以后的外交妥协是美蒋在东北采取外交攻势后，中苏关系陷入危机的反映，是一场严重的国际斗争，东北局的工作必须顾及苏联的国际信誉。东北局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一再向各有关部队的官兵和干部解释，苏联为顺利地进行与美蒋的斗争，“必须首先取得主动地位，在外交上站稳脚跟”；中共在东北的工作必须“使苏联在履行中苏条约上毫无困难之处。这是击破美蒋外交攻势、打退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阴谋的必要条件”；由于某一时期条件的变化和策略需要，苏联执行中苏条约的程度和援助中共的态度会有所变化，但其政策的本质一贯不变，目的是保持东亚地区的和平；东北广大干部必须准备自力更生，“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的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75]

中共中央在东北配合苏联的政策调整，就必须缓和与美国的关系。11月下旬，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了一项可以称之为“中立美国”的政策。中共中央提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仍是扶持蒋介石，但目前已经决定

不直接参与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和国民党用武力统一中国，赞成中国和平统一，这种变化有利于中共中央进行政治斗争。为了应对国际国内迅速变化的形势，中共中央提出，“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特别说明：“中立美国”是反蒋斗争的一种策略，目的是减少进行国内斗争的困难。这样做并非不反对美国将中国殖民地化的政策，也非不抗议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更非在美军进攻我们时采取不抵抗政策。对于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应持坚定的立场，严厉地批评和坚决地抵抗。[76]这项在国内斗争中“中立美国”的政策的实质，就是在苏联表示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在外交上与中共隔绝的背景下，利用美苏矛盾与美蒋矛盾，尽可能地排除美国军事干涉的危险。

贝尔纳斯12月7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讲话后，中共中央已经判断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变，其中可能有可利用之处。两天后，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王炳南打电话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周恩来率中共谈判代表团已经到达重庆，由于中国形势的发展取决于美国对华政策，中共方面正等待马歇尔到中国来。[77]18日，中共发言人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表示赞成杜鲁门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希望中国停止内战、通过民主协商改组国民政府的内容。中共发言人的声明改变了以往要求立即无条件撤退驻华美军的主张，仅提出美军应终止超出协助受降范围的行动，以及希望驻华美军能够迅速遣返日军。[78]这实际上是有条件地承认美军可以继续留在华北。当然，中共中央的公开宣传对杜鲁门的声明所做的肯定评价，都有明确范围，对美军在此期间超出受降范围继续为国民政府调动军队的行动，仍然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中共领导人向延安美军观察组说明：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将军队用于解除日军武装，中共军队愿为此与美军合作。

12月19日，中共中央专门就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及中共的对策等问题发布了党内指示。这项指示的内容表明，在美国对华政策明朗后，中共中央“中立美国”的政策有了新的发展，即从一般地对美国不挑衅和避免冲突，转变为在同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时利用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和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的努力，争取政治谈判取得成果。中共中央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指出了赫尔利辞职以及杜鲁门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停止内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约束驻华美军的行动等均表明，“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民

主和平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中共中央“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斗争”。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中共中央在指示中要求各有关部队，对驻华美军及美方人员应持友好态度，避免冲突；对进入解放区的美国记者，应帮助他们自由采访和报道中共控制地区的真实情况，使他们获得友好的印象，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于在中共控制地区降落的美国飞行员和进入中共控制地区的美军人员，应善意接待。[79]在公开宣传中，中共领导人还通过报刊和各种公开场合，表示了欢迎马歇尔使华调处国共争端。

国民政府在争夺华北和东北的过程中，不论是军事还是外交都要仰仗美国的支持。由于杜鲁门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国民政府暂时无法靠武力恢复对华北和东北的统治，蒋介石不得不配合杜鲁门政府，限制在华北和东北的军事行动。

11月上旬，蒋介石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难题，要求驻华美军协助向北调运5个军。驻华美军拒绝了他的要求，美军方面的理由是根据所得指令，他们无权运送国民党军队进行内战，而且他们认为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做好与中共军队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至于向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更超出美军受权执行的任务的范围，美军若同意采取行动，有可能引起苏联的误解，故接收东北应由中苏之间通过谈判自行解决；美军将国民党军队运到东北邻接地带后，将立即撤回。魏德迈很明确地告诉蒋介石，美国既不准备介入中苏在长春的谈判，也不可能派兵进入东北。[80]美国海军在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时，一直谨慎避免发生任何武装冲突，这使国民党军队无法顺利地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

11月17日，蒋介石就撤退东北行营一事打电报给杜鲁门，声称苏联违反中苏条约的有关条款，造成东北局势紧张；这不仅危及中国，也是对东亚和平与秩序的威胁；唯有美中两国采取积极和协调的行动，才能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81]但蒋介石没有从杜鲁门政府那里得到期待中的安慰，他只好再次给杜鲁门打电报，表示国民政府在控制华北之前，将暂时搁置接收东北。同时要求驻华美军再帮他运5个军到华北，以协助接收河北、山东、热河、察哈尔和绥远等省。

蒋介石在玩弄欲擒故纵的手段，利用美国人对苏联的猜忌心理，刺激他们进一步扩大援助。岂知杜鲁门政府虽然有意在华北和东北扩大影响力，却不愿背着太重的包袱和付出太多的代价，参与到与苏联的角逐

中，这与美国的战略利益不符。杜鲁门不管蒋介石赞成与否，直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公开表示反对国民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这对国民政府不啻一瓢冷水。在美国暂停援助和不提供保证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无法加强进攻东北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军队到达锦州后，蒋介石不得不通知杜聿明没有他的手令不准继续前进。此后国民党军队将军事行动限制在沈阳以西和以南地区，致力巩固北宁路的安全，转而集中兵力在热河发动进攻。

国民政府为了防止中共利用国民党军队兵力不足的弱点，在东北继续扩大力量，故在取得苏军允许其向东北运兵的保证后，也对苏联做出让步。国民政府相继恢复长春谈判和派蒋经国访问莫斯科，目的都是通过对苏外交来造成有利的外部条件，以便在集中兵力于南满和热河作战时，利用苏军暂时控制住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线。这就是所谓“外交接收北满，军事接收南满”的战略。

国民政府对苏联的让步包括：第一，同意苏军推迟至1946年2月1日撤出东北；第二，在东北经济问题上做一定妥协。蒋经国在会见斯大林时，陈述了国民政府在东北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的原则，其主旨是以经济方面的让步换取苏联协助国民政府接收东北。[82]蒋介石还否定了张嘉璈将东北经济问题谈判升级为中苏政府之间谈判的建议，他提出经济问题可以部分让步，但不能与苏联合作经营全部东北企业的原则。[83]在对苏联做出让步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开始试探与中共谈判解决华北和东北问题的途径。

从11月中旬到12月底，整个东亚形势从急剧紧张迅速转向缓解。当杜鲁门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之时，苏联和国共两党基于对形势的估计及各自的利害关系，均做出了一定的妥协，从而使国共关系出现了缓和的新转机。在这种缓和的情况下，马歇尔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特别是东北形势的微妙变化表明，杜鲁门政府如果采取有力的措施，是有可能促使中国出现和平局面的。机会是存在的，关键是美国在压蒋妥协方面到底准备走多远。

[1]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李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第71～72页。

[2]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Commanding General，United States Forces，China Theater （Wedemeyer）”，August 10，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 ed.,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pp.527-528.

[3] Herbert Feis, *Japan Subdued*: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End of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143.

[4] 《杜鲁门总统就援华事项对宋子文博士的口头声明》，1945年9月1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953页。

[5]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 Mission*, pp.402-404.

[6] 〔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伍协力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16页。

[7] 《共产党和国民党部队间的冲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73页。

[8]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279页。

[9] "Reported by the State-War-Navy Coordination Committee, SWNCC 83/6", October 22, 1945,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pp.585-589.

[10] "The Chief of Staff, United States Army （Marshal）, to The Commanding General, United States Forces, China Theater （Wedemeyer）", November 3, 1945, The U.S.State Department, ed.,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p.601.

[11] "The Commanding General, United States Forces, China Theater（Wedemeyer）, to the Chief of Staff, United States Army （Marshall）", November 14, 1945, The U.S.State Department, ed.,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pp.627-628.

[12]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Commanding General, United States Forces, China Theater （Wedemeyer）", November 9, 1945, The U.S.State Department, ed.,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p.611.

[13] "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War Department", November 1, 1945, The U.S.State Department, ed.,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p.600.

[14] 《魏德迈将军的报告》，《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91～192页。

[15] "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 （Vince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9, 1945, The U.S.State Department, ed., *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pp.759-760.

[16] 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alt Press，1958），p.345.

[17]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Secretaries of State，War，and Navy”，November 6，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606-607.

[18] “The Navy Department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vember 14，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626-627.

[19] “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Drumright）”，November 16，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630-634.

[20] 〔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15页。

[21] 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p.349.

[22] 〔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15~16页。

[23] 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pp.345-346，452-453；《魏德迈将军的报告》，《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91~192页；“The Commanding General，United States Forces，China Theater（Wedemeyer），to the Chief of Staff，United States Army（Marshall）”，November 14，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627-628。

[24] “The Commanding General，United States Forces，China Theater（Wedemeyer），to the Chief of Staff，United States Army（Eisenhower）”，November 26，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681-684.

[25]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ies of War（Patterson）and Navy（Forrestal）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26，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671-672.

[26] 〔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16~17页。

[27] 《驻华大使（赫尔利）致杜鲁门总统》，《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03~606页。

[28] 参阅Russel D.Buhite，*Patrick J.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p.260-261，273-274。

[29] 《驻华大使（赫尔利）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11月26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03~606页；〔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76~77页。

[30] 《国务卿贝尔纳斯致陆军部的备忘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28页；另参阅《贝尔纳斯声明美国对华政策鼓励各党派互相让步促成中国团结民主》，《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0日。

[31]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77页。

[32]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77页。

[33]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30，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1045-1046.

[34] “The Counsellor of Embassy in China （Smy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1，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1047.

[35] “The Consul General at Vladivostok （Clubb）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6，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1049-1050.

[3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 （Vincent）”，December 1，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1048.

[37] “The Commanding General，United States Forces，China Theater（Wedemeyer），to the Chief of Staff，United States Army （Eisenhower）”，December 2，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755-757.

[38] “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Vincent）”，November 28，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745-747.

[39] “Memorandum by General of the Army George C.Marshall to Fleet Admiral William D.Leahy，Chief of Staff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Army and Navy”，November 30，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749-751；另参阅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p.414-415。

[40] “Memorandum by General of the Army George C.Marshall to Fleet Admiral William D.Leahy，Chief of Staff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Army and Navy”，November 30，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749-751.

[41] “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

（Vincen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8，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759-760.

[42] “Memorandum by Lieutenant General John E.Hull，War Department General Staff，to General Marshall”，December 8，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758-759.

[43] “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Vincen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9，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759-760.

[44]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p.418-420.

[45]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418.

[46] 《国务卿贝尔纳斯致陆军部的备忘录》，1945年12月9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28页。

[47] “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Vincen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10，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763-764.

[48]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p.419-420.

[49]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420.

[50]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Commanding General，United States Forces，China Theater（Wedemeyer）”，December 14，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699.

[51] 《杜鲁门总统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1945年12月15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28～630页。

[52] 可参阅《莫斯科会议的讨论1945年》，《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85页；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p.426-427。

[53] 《莫斯科会议的讨论1945年》，《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85～186页。

[54]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103页。

[55] 《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2页。

[56] 转引自石啸冲《历史转变的年代（1945～1946）》，中外出版社，1946，第161～162、173页。

[57] 《外交部致驻外各使领馆告接防东北困难情形暨苏方态度电》，1945年11月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52页。

[58] 《外交部为另订接收办法与延期撤兵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5年11月1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53页。

[59] 《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复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照会译文》，1945年11月2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54页。

[60] 《外交部为派代表令商接收东北办法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5年11月2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55～156页。

[61] 《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致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同意延期撤退东北苏军照会译文》，1945年11月3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57页。

[62]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问题》，1945年12月30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4，第99～108页；《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24～25、27页。

[63] 《彼得罗夫与蒋介石会谈纪要：国共关系问题》，1945年12月31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109～110页。

[64] 参阅〔英〕F.C.琼斯、休·博顿、B.R.皮尔恩《1942～1946年的远东》，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303～305页。

[65] 《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72页。

[66] 《中央军委关于十一月份作战部署的指示》，1945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95页。

[67] 《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64～366页；《中央关于东北省主席人选及战略重点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3日。

[68] 《东北局关于与苏军交涉经过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45年10月8日；《辰

兄态度积极关系皆好》，1945年10月25日。

[69] 《中央关于组织野战军及反对美舰掩护国民党军在东北登陆给彭真、林彪的指示》，1945年11月4日；《中央关于向东北增调兵力控制东北的指示》，1945年11月4日。以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00～401页。

[70] 《满洲不许作战》，1945年11月20日；有关东北苏军的行动还可参阅《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第505页；《彭真年谱（一九〇二—一九九七）》上卷，第318～319页。

[71] 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9页；《中央关于集中全力放手发动群众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532～533页。

[72] 《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456页。

[73] 《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长春铁路线后开展东满、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31页。

[74] 《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后的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0页。

[75] 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年11月30日，《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第221～224页。

[76] 《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456页。

[77] “The Chargé in China （Robert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17，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487-488.

[78]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8日。

[79] 《中央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1945年12月19日；《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以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94～495、455～456页。

[80] 《魏德迈参谋长上蒋委员长陈述苏军延缓撤退国军进驻长春沈阳之意见备忘录》，1945年12月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59～161页。

[81] 《蒋主席致杜鲁门总统告苏联违反条约东北行营移至山海关已危及中国主权完整电》，1945年11月1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48～149页。

[82]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问题》，1945年12月30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99~108页。

[83] 参阅孙越崎《回忆我与蒋介石接触二、三事》，《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130~134页。

第五章 “无法在水上步行”

一 和平昙花一现

1945年12月21日，马歇尔飞抵上海，历时一年的调处就此开始。马歇尔在到中国之前，曾经派他的助手向史迪威请教经验。史迪威的答复是寓言式的，他说“马歇尔无法在水上步行”。马歇尔到达上海的当天，魏德迈亦坦率进言，向他提出类似的忠告。马歇尔对此颇不以为然。使他相信美国不至于无所作为的原因，除了对美国的影响力估计很高之外，另一个客观的因素就是国共关系此时正在出现新的转机。

“双十协定”签订后，国共两党决定从10月20日起，继续谈判解决受降、解放区政权、军队整编和召开政协等问题的具体办法。随着国共在华北地区武装冲突加剧和双方争夺东北的斗争的展开，从谈判开始后的第二天起，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实际上成为对各自军队在战场上的较量的配合。简单地说，国共之间的军事斗争支配着这一阶段的谈判。

在谈判中，国民党方面除了一如既往地提出应该解决统编中共军队的问题之外，还特别强调恢复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国民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确保国民党军队顺利地向北运兵。中共方面则针锋相对，要求国民党军队立刻停止进攻中共军队、停止进占中共军队控制的地区以及停止向华北和东北运兵，以无条件停战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

在10月21～23日的谈判中，周恩来一再提出警告：如果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军队冲突将无法避免，军队整编问题和政治问题便无从谈起。他建议，首先规定双方军队停止攻击，驻在原防区不动；其次应划分受降区域，双方按规定分别执行受降，互不侵犯。

10月26日，国民党代表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提出以恢复交通为核心的三点建议：（1）铁路交通必须恢复；（2）中共军队从铁路线退出，

其他已占领地区维持现状；（3）叶剑英早日来重庆，商谈军队整编及驻地等问题，国民政府可以保证不向中共军队驻地发动进攻。[1]这一方案双管齐下，一方面可以确保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和东北取得军事优势；另一方面则可通过谈判，统编中共军队。为了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国民党中宣部长吴国桢第二天即发表公开讲话，声称国民党方面已经同意，在华北的中共军队让出铁路线后，其他中共占领地区可维持现状。

为了回击国民政府的政治攻势，中共代表团于27日发表公开评论，指出中共军队退出铁路线是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单方建议，并且已被中共代表驳回。现在华北和其他一些交通隔断的症结是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以及利用日伪军进行内战。[2]29日，中共中央指示谈判代表团应采取强硬态度，“不停止内战，一切无从谈起”。[3]30日，周恩来即在谈判中提出“停止内战的四项办法”：甲，停止进兵、进攻、进占；乙，停止利用日伪军内战；丙，在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北段、陇海东段、津浦、胶济、北宁西段等八条铁路线上双方均不驻军；丁，国民党如向青岛和平津运兵，事先必须经过协商。军事小组只有在确定上述四项原则后，才能拟定具体方案，否则无权解决问题。上述问题如不能先行解决，中共方面同意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开会时必须首先解决停战和恢复交通问题。[4]

国民政府急于恢复交通就是为了向华北和东北运兵，因此不可能接受中共方面的建议。为了抵制中共方面提出的关于铁路沿线不驻军的建议，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避开“三停”等问题，于31日提出一个由铁路警察护路的方案。10月30日，国民党又提出六点反建议：（1）国共双方向各自的军队下令停止进攻；（2）中共军队沿铁路干线两侧退出10公里；（3）由国民参政会组成交通考察团，分赴各地考察交通；（4）国民党军队如需要沿所涉八条铁路运兵，可以事先与中共方面协商；（5）于1946年1月商定中共军队整编办法；（6）立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5]第二天，双方代表拟定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具体办法，商定分别请示各自的最高决策层后，再继续商谈。

如前所述，11月初国共争夺东北的斗争达到一个高潮。为了配合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计划，中共中央指示谈判代表团立即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华北地区受降由中共军队负责，以及国民党军队不得开入东北。后经数度电报往返讨论，决定将谈判方针定为在不束缚自己手脚的条件下，保留伸缩余地，基本原则是先停战，然后讨论恢复交通。

11月8日，周恩来根据中央指示在谈判中提出了新的四项条件：（1）国民党军队应全面停止进攻解放区；（2）国民党军队从进占地区全部撤退；（3）国民党军队从八条铁路线上撤退；（4）取消各地“剿匪”命令。[6]国民党方面以此方案没有明确答复他们的六点反建议为理由，拒绝讨论。谈判自此陷入僵局。

随着国共冲突向北移动，11月10日开始，国共谈判中争论的焦点逐步集中到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先向东北运兵的问题。为了换取顺利向东北运兵，国民党方面表示，国民党军队可以停止对中共军队的进攻和进占行动，但不同意撤出已经占领的地区。中共代表则坚持，不允许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并拒绝了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拉美苏“从旁斡旋”的建议。周恩来当时提出了两个原则性的建议：（1）先停战再谈其他问题；（2）先解决政治问题，再解决军队整编。结果在将近一个月的谈判中，双方未能就任何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谈判于11月17日中断，25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

从表面看，国共这一阶段谈判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双方都试图通过谈判，为取得战场上的有利地位创造条件，以及取得政治宣传的效果，但就实质而言，国民政府拒绝无条件停战，才是谈判不能取得进展的症结。因为争论的一切问题，都是国民党军队进攻华北中共控制区引起的，而且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军事行动反映出蒋介石在处理国共争端时，更倾向于将使用武力。

到11月底，以东北局势缓和为契机，国共两党也开始着手恢复谈判。这时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基本上处于一种新的均衡状态。中共军队在华北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如果美国继续为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运兵，显然会使形势更加不利于中共军队。在东北，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共军队既无法阻止国民党军队开入，也不能阻止其接收仍被苏军控制的长春路沿线的大城市。

另外，国民党军队虽然处于战略进攻的地位，但实际上也是困难重重。例如兵力严重不足，在华北地区不能维持任何一条铁路线畅通无阻。而且国民党军队战线太长和兵力不足的弱点，靠美军的海运和空运援助也无法克服。在东北，苏联延缓撤军看起来暂时对国民政府有利，但在苏军撤退之前，国民党军队仍无法越雷池一步。国民政府要根本解决东北接收的各种问题，还有赖中苏关系进一步改善，但中苏关系的改善又谈何容易，国民政府肯定要付出较多代价才行。

在国共对抗处于暂时均衡的状态下，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更为灵活和进取的政策，主动提出恢复谈判，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的地位。国民政府也不得不接受现实，与中共展开谈判并在政治、军事等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从而换取驻华美军的援助。这时国民党军队的计划是先集中兵力控制热河地区，开辟第二条进入东北的通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政府是在继续将谈判作为配合军事进攻的手段。这是当时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基本特点，也是马歇尔面临的基本现实。

马歇尔到中国后，首先着手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协调同国民政府的政策，迫使国民政府接受全面停战；其二是争取中共中央接受美国扮演调解人角色，从而为他的调处取得立足点。

12月21日，马歇尔在重庆第一次会见蒋介石。会谈一开始，他就向蒋介石陈明立即停战的利害关系。马歇尔指出：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是美国是否援华取决于国共争端能否和平解决；除非蒋介石采取明确的行动解决目前的停战问题，否则在中国继续保持美国的力量是非常困难的。他认为不论从对美国公众的影响，还是从国民政府的切身利益考虑，拖延停战都没有什么好处。蒋介石告诉马歇尔，他认为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维护中国的统一，而取消中共军队则是维护中国统一的根本途径；国民政府目前的方针首先是占领华北，只要在那里有足够的军队，就可以迫使中共妥协。其次，蒋介石表示，希望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能达成协议，促使苏联履行条约义务，国民政府将据此决定在东北采取何种行动；另外还要看能否调动更多的国民党军队，而这一点正需要与马歇尔协商。[7]

马歇尔和蒋介石的会谈凸显了美国与国民政府的基本分歧。马歇尔主张立即停止内战，这既是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其他一些问题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马歇尔如果不能迫使国民政府接受停战，他在中国一天也站不住脚。但蒋介石却直截了当地要求美国为他继续向华北战场运兵，把在华北取得军事优势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不过他在这一点上是输定了，因为马歇尔已经得到明确的指令，停止为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运兵。实际上没有美国的运输工具作后盾，国民政府是很难再打下去的。

双方的第二个基本分歧是华北和东北两个地区哪一个地区应该是战略重点。蒋介石显然是以华北为军事斗争的重点，东北问题则暂时搁置，他指望通过与苏联的外交折冲来暂时稳住那里的形势。马歇尔则正

相反，他希望以国民政府完成接收东北作为战略的重点，而以华北停战作为尽早控制东北的条件。这一分歧不过是赫尔利调处时期美蒋的一个基本矛盾的继续。美国是着眼于取得对苏联的优势，试图尽快把苏联从东北排挤出去；蒋介石则着眼于国共斗争，企图缓和中苏关系，将战略重点放在在华北取得对中共的军事优势。

马歇尔当然不可能改变杜鲁门政府的既定方针，听任蒋介石自行其是。他在实践华北停战、控制东北和实现中国统一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时，紧紧抓住制止华北内战这个关键环节。结果产生了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即当马歇尔声称是为国民政府权衡利弊之时，却表现为赞成中共中央提出的无条件停战的建议。

分歧尽管存在，马歇尔和蒋介石还是找到了基本的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是取消中共的“自治性军队”。蒋介石声称，读了杜鲁门声明之后，他“加强了”取消中共军队的决心。马歇尔立刻表示，“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能有两支独立的军队”。他认为中共中央是否会接受美国的方案，还有待观察，如果中共中央在这方面表现出缺乏诚意，就会失去美国的同情。[8]

第二个共同点是限制苏联。利用杜鲁门政府内部存在的对苏联的强烈猜忌，煽动其反共情绪，是蒋介石的拿手好戏。马歇尔被任命为特使后不久，驻美大使魏道明就告诉他，解决国共争端的关键是苏联到底会采取什么态度。只要杜鲁门政府对苏联采取坚定立场，中共问题就不难解决。[9]马歇尔到中国后，蒋介石更是滔滔不绝地向他灌输，的确存在苏联侵略东北和赤化中国的严重危险；中共中央的一切策略变动，都被蒋介石解释成受苏联指使的结果。马歇尔据此立刻断定，他遇到了在德国与苏联打交道时相同的情况。他打电报要求国务卿贝尔纳斯证明，国民政府在对苏外交中“遇到的困难，是否完全类似我们自己（美国）在欧洲所遇到的困难。或者苏联在这里的政策是否是蓄谋阻挠实现一个有效而统一的中国”。贝尔纳斯答复说，苏联目前准备“履行其对华条约，不会有意去干什么事情，破坏我们为统一中国所做的努力”。[10]

贝尔纳斯的答复显然不足以消除马歇尔的疑虑。在12月26日的一次会谈中，马歇尔再次向蒋介石表示，根据后者和宋子文介绍的情况，苏联“勾结”中共及其控制东北的策略，与它在世界其他地方与美国打交道时使用的手段一样，所以，确定中共是否与苏联有联系这一点的确非常重要。[11]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疑神疑鬼是支配马歇尔调处全过程的一个

重要因素，几乎影响马歇尔改变其调处策略的每一次变动。

12月23日，马歇尔首次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中，马歇尔特别强调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声称，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且在太平洋地区部署了巨大的陆海空军力量，因此有义务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定。正是付出的代价、承担的义务和对未来战争危险的担忧，促使杜鲁门政府派他到中国来，帮助解决国共之间的争端。马歇尔说这番话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共中央接受他的调处。马歇尔进一步说明，杜鲁门政府认为“中国必须寻找达成协议的基础，以便结束中国存在两支军队（的局面），那种情况意味着存在两个政府——两个国家”，而中国“应该只有一支军队，而且这支军队是为国家服务的”。换句话说，中国统一的关键就是统一中国军队。马歇尔调处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这一目标迈进的。

周恩来在这次会谈中向马歇尔说明，中共中央赞成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中的主要之点，因为它符合罗斯福曾经提出的政策，即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中国。中共中央的要求是首先立即无条件停战，其次政府必须民主化。目前的中国政府是国民党的“一党政府”，这是中国存在两支军队的基本原因。中共中央的谈判原则是先政治民主化，再军队国家化。中共中央同意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成联合政府，并可接受蒋介石在联合政府中保有领袖地位，承认国民党在政府中的第一大党的地位。[12]

周恩来的谈话基本上界定了中共中央能够与马歇尔合作的范围，实际上也是表明可以有条件地接受马歇尔参与调处国共争端。另外，周恩来提出的建议至少在形式上与马歇尔的设想有不少吻合之处。当然马歇尔也很清楚，既然要当调停人，首先就要使冲突的双方均认可他作为调停人的身份。为此他不做出公正的姿态不行，不对中共中央让步肯定也不行。

经过一系列的会谈和准备，马歇尔于12月29日向杜鲁门报告说，对于如何解决国共之间的分歧，特别是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不过目前还不是公布这些看法的时候。[13]虽然马歇尔以后也从未详细解释过他的这些“看法”，但根据他来华后一直到1946年3月11日回国述职这段时间里采取的行动，可以基本看清楚他调处的思路，即首先实现停战，为解决其他问题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其次推动政协谈判取得成功，为整军奠定基础；最后完成统编中国军队，实现中国的

政治统一。

12月16日，中共谈判代表团在抵达重庆时，叶剑英就在机场发表声明，重申了中共的一贯主张。他表示希望首先停止军事冲突，军队整编要视政治谈判情况而定。19日，周恩来宴请邵力子，再次提出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无条件停战。27日，国共谈判正式恢复。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转交了无条件停战的三点建议：（1）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均暂时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2）与避免内战有关的一切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解决；（3）为保证实施上述两项办法，应在政协会议指导下，组织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的地区进行考察，随时提出报告，公之于世。[14]

国民党方面对中共代表团的建议最初仍持强硬否定的态度，拖延不予答复。马歇尔为此于30日会见了国民党代表，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放弃“相当不妥协的立场”。[15]面对马歇尔的指责，国民党方面经请示蒋介石，向中共代表团提出建议，由国共两党代表和美方代表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具体讨论解决与停战有关的问题，并说明蒋介石已经决定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31日，国民党代表向中共代表团提交书面答复，声称国民党方面主张将停战和恢复交通两个问题并列解决，其目的是继续强调应以恢复交通作为停战的条件。[16]

中共代表团27日提出的三点建议和国民党方面31日的复文表明，双方的基本分歧点仍然集中在前一阶段未能解决的主要问题上。国民党方面强调有条件地停止军事进攻，无条件地恢复交通，并以恢复交通为停战的先决条件。中共则坚持首先无条件停战，然后协商解决其他问题。马歇尔的调处实际上正是从解决这一基本分歧着手，促使国共双方做出妥协。

1946年1月1日，马歇尔指示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停战计划，这项计划体现了他在停战谈判中奉行的基本方针，即促成华北停战和确保顺利地向东北运兵。2日，马歇尔分别向蒋介石和周恩来提出一份停止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的备忘录。他综合国共双方的意见，提出五点建议，其中前四点是实质性内容，包括：（1）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2）停止一切军事调动，国民党军队为接收而开入东北及其在东北境内的调动属于例外；（3）停止一切破坏交通的行动；（4）一切军队维持其现时的地位。[17]这份备忘录对于理解马歇尔调处的思路极为重要，它大致概括了马歇尔力图促使国共双方让步的关键内容。

首先，在备忘录的第一条中，马歇尔不附加任何条件地提出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这显然符合中共的主张，是要求国民政府做出让步。这一条件看上去非常简单，实际内容却相当复杂，它既反映了马歇尔制止中国内战的决心，也涉及根本改变国民政府的战略计划。蒋介石在1945年11月中旬已经重新修改了战略方针，决定首先集中兵力进攻华北解放区，控制华北战略要点，打通主要的铁路线。他曾经明确地告诉马歇尔，控制华北地区是迫使中共屈服的主要手段。[18]国民党代表在谈判中的一再拖延搪塞，无非都是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但事实已经表明，国民党军队继续在华北发动军事进攻的结果是，不仅使交通无法恢复，而且国民党军队根本无力再抽兵北上进入东北。这当然不符合杜鲁门政府的战略意图。为了使国民党军队从华北抽身，转赴接收东北，以及顺利遣返华北的日军，马歇尔坚决迫使蒋介石接受美方的方案，立即在华北停战。马歇尔采取的措施包括：拒绝为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运兵，冻结美军控制的华北各港口，拒绝蒋介石要求立即商谈整编中共军队的建议。马歇尔称，为了实现立即停战，暂时不讨论使问题复杂化的其他项目，所以在前述他的五点建议中的第五点是停战以后“将发布其他训令与命令”。[19]马歇尔以这些措施向蒋介石证明，如果不按美国的旨意行事，国民政府就什么也别想得到。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蒋介石除了配合马歇尔的行动，是没有其他选择的。

其次，马歇尔是以立即停战为条件，换取中共方面接受美军为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的“合法性”。在马歇尔的备忘录中，恢复交通是作为一般的条件，并没有特别予以强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歇尔对此不重视，而是说他并不打算以此作为立即停战的条件。但是，马歇尔的停战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保证国民党军队可以向东北调动。由于美国准备利用海路帮助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恢复华北陆路交通问题的紧迫性自然被削弱了。马歇尔在与周恩来的私下会谈中一再说明，根据中苏条约和美国与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不仅国民政府必须接收东北，而且美国有义务协助它完成这一使命。他要求周恩来接受他的建议，并将其正式写入停战令中。

当时中共中央基于对东北形势的估计，认为中共军队尚无法阻止国民政府接收长春路及其沿线的大城市，也不可能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因此在东北问题上做某种妥协是难以避免的。周恩来向马歇尔说

明，凡涉及国际的条约，中共方面不干涉；国民党军队可以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地方，但军队调动必须事先与中共方面协商，以免引起军事冲突。另外，有关东北问题的条款不得写入停战令正文，理由是国共两党与美国等三方面主要是解决中国内部冲突，凡涉及国际问题，均不能撇开苏联讨论接收东北。马歇尔遂表示可以不在停战令正文中写入东北运兵问题。[20]

在基本问题上取得谅解之后，张群、周恩来和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于7日正式开会，讨论发布停战令的细节。会谈一开始，张群便提出国民党军队必须接收热河省的赤峰和内蒙古的多伦。他声称，根据国民政府与苏军达成的协议，除东北外，华北的某些地区也应成为例外，国民党军队为了接收可以在那里调动军队，特别是赤峰和多伦应由国民政府接收。他据此提出，华北和东北以外应由国民政府接收的地区均属例外；在这些地区可以实行停战，但军事调动不能受限制；即使赤峰和多伦以南的地区，如果有类似情况，也应用类似的办法解决。

周恩来针对张群的建议指出，华北各地区已经由国共双方接收完毕，那里的受降权是国共之间争论的问题，与中苏条约无关；为了能够达成停战协议，中共方面可以让步，将接收东北问题包括在停战令正文中，但同时须声明“在东北九省的所有军事行动应通过协商安排”。至于赤峰和多伦，周恩来提出可以考虑改变谈判方式，邀请苏联代表参加讨论。

张群当即拒绝了周恩来的后一条建议，声称根据中苏条约国民政府有权向东北调动军队，这一问题不能与中共协商。而且中苏已就接收赤峰和多伦做出了安排，没有必要再与苏联讨论。

周恩来遂又提出：赤峰和多伦已被中共军队接收，因此涉及内政问题；既然国民政府声称接收华北某些地方与接收东北等，都是以中苏条约为根据，那么在此谈判中不妨为接收这些地区制定明确的原则。张群仍然表示不能接受，他坚持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的行动不能受到限制，接收赤峰和多伦可以援引接收东北的方式，但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21]

这场争论持续到1月9日，仍然没有结果，周恩来不得不提醒张群，国民党方面实际上仍然是坚持有条件停战，这表明它不准备停止敌对行动，由此引起的后果应由国民党方面承担全部责任。至此停战谈判陷入

僵局。

关于赤峰和多伦的争论具有重要的背景。停战谈判期间，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在热河地区的军事进攻。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之后，利用苏军延缓撤退的机会，将兵锋转向西面的热河，企图打通承锦线交通，开辟陆路进入东北的通道，同时切断华北解放区与东北的联系。1月4日，国民党军队动用4个师的兵力，沿承锦线向西发动进攻，结果被中共军队阻击于平泉、古山一带，无法前进。因此国民党方面企图借谈判之机，为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创造条件。如果国民党军队控制赤峰和多伦，既可以对华北中共军队形成包围的态势，又可以使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意图十分清楚，对热河争夺战给予极大的关注。中共中央在给华北部队的电报中指出：国民政府推迟接收东北，集中兵力先取承德和张垣，目的是在停战前控制战略要点，隔断华北与东北的联系，从而降低中共的地位，并动摇杜鲁门政府目前的调处政策，迫使中共在谈判中接受其苛刻条件。因此，能否取得热河争夺战的胜利，是决定中共“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的问题。[22]

为了挫败国民党军队控制热河的企图，中共中央于1月9日指示重庆谈判代表团，拒绝国民党方面将热河、察哈尔作为停战例外地区的要求，并应该向马歇尔声明，由于国民党军队在热河、察哈尔发动进攻，内战尚未停止，美军应停止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魏德迈1月5日声明将新六军运往东北，亦应停止。中共不反对部分国民党军队到东北接收主权，但国民政府始终拒绝协商国民党军队安全进入东北的办法，因此一旦发生冲突，责任全在国民党方面。[23]显然，中共中央基于热河地区此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向马歇尔施加压力，利用他急于向东北运兵的企图，迫使他压国民政府让步。周恩来当天便向马歇尔转告了中共中央的立场。

华北停战和向东北运兵是指导马歇尔参与停战谈判的基本方针，国民党方面坚持控制赤峰和多伦的行动显然影响到华北停战。马歇尔对张群的建议事先是了解的。在1月6日会谈时，张群即提出热河应与东北一样，作为可以调动军队的例外地区。马歇尔当时即表示反对，认为中共不可能接受。他建议不要提热河全省，只提赤峰和多伦。他当时认为那里仍由苏军占领，国民政府可以为接收主权派军队前往。张群被迫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但马歇尔当时曾声明，他不能保证中共方面肯定会接

受。[24]在中共明确表示华北内战不止，就不能同意国民党向东北运兵的情况下，马歇尔调来处去，结果不能前进一步，他当然不能允许谈判出现这种结局。9日晚，马歇尔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赤峰和多伦问题，后者表示可以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在停战协议中不涉及这两个城市的归属。[25]可以肯定，如果不是马歇尔施加了压力，蒋介石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让步的。

赤峰和多伦的争论所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国民政府如何根据中苏条约接收东北。周恩来提出，应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确定一个统一的原则，因为在东北无疑会遇到在赤峰和多伦碰到的同样问题，即根据国民政府与苏军达成协议需要接收的地方如果已经被中共军队控制，应如何处置。中共中央提出的原则是国民党军队只能从苏军手中接收地方，不得争夺已由中共军队接收的地区，否则必然导致武装冲突。国民党方面则坚持，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的行动不受限制。中共方面为了避免拖延谈判时间，当时并没有坚持必须就此达成协议，只是要求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的数量应有所限制，并每日向军调部报告军队调动的情况，同时指出如果这一问题长期悬而不决，难免会引起严重后果。[26]

由于国民党方面在赤峰和多伦归属问题上做出妥协，停战谈判迅速取得进展。1月10日，国共代表签署了停战协议，蒋介石和毛泽东随即分别向国共双方军队发布了停战令，抗战胜利后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暂时结束。和平局面的出现为马歇尔进一步调处创造了良好的气氛。马歇尔对此相当兴奋，他把停战协议称为“中国取得有效统一的非常重要的奠基石”。[27]

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在政协会议召开期间，马歇尔埋头于制订整军计划，并没有以调处人的身份参加会议。马歇尔始终将调处重心放在解决军事问题方面，在他看来，解决政治问题不过是为解决军事问题奠定基础。他自称一直试图避免过多卷入政治问题的争论，以免陷于“发号施令的地位”，招致各方面的批评。当然，国民政府并不希望马歇尔参与讨论政治问题也是他回避的重要原因。蒋介石深知美国人对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特殊兴趣，他宁愿把马歇尔的调处限制在解决军事问题的范围内。

但是，马歇尔没有直接参与政协谈判并不等于他对解决政治问题没有自己的方案，也不等于他对解决政治问题没有施加影响。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声明已经公开阐明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政治民主化、改组国民党一

党政府为联合政府的基本立场。根据这一精神，马歇尔不介入政协谈判是不可能的。

正当政协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马歇尔于1月21日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草案。这份草案首先提出“规定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成立一临时政府，以统治权赋予委员长作为全中国的主席”。其次提出一项“临时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务委员会由14人组成，在行使职权时，应以在表决时获得多数票赞成或反对为准则；总统在双方票数相等时，有决定性投票权。该法案还规定，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非经国务委员会同意，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性事务的法令；各地方政府暂由颁发此法令时之现有行政官员管理；在行政官员未确定的地区，由国务委员会成立专门的小组委员会，国共各派代表二人组成，以选派该地区的临时行政官员。[28]

马歇尔的方案一方面保证使蒋介石获得政府中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特别是关于地方政府的规定，无异于否定了国民党消灭解放区政权的要求。难怪蒋介石读了马歇尔的方案后，认为他提出了“共党所不敢提者”，并且“足以召亡国之祸也”。[29]

不管蒋介石如何愤慨，马歇尔都要执行杜鲁门政府的既定方针。他向蒋介石提出，“有两个因素使他（蒋介石）绝对有必要与共产党尽早就建立统一的政府和军队问题达成一项协议。第一，在目前形势下，中国很容易受到俄国小规模渗透的危害，从而加强共产党政权，而国民政府在中国西北及满洲对俄国的相对地位逐步削弱。第二，美国陆海军力量显然不能继续在中国长期驻留”。[30]马歇尔在这里既是陈明利害，也是施加压力。国民党最终被迫接受政协决议，马歇尔的重大影响不容忽视。

政协会议闭幕的当天，周恩来向马歇尔表示，中共领导人很重视马歇尔在调处时所持公正合理的态度；中共中央准备以马歇尔此种态度所体现的原则为基础，在地方和全国性问题上与美国合作。[31]根据中共中央当时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周恩来的谈话不能被一般地解释为仅仅是一种策略，他对马歇尔的评价符合此后中共领导人的一贯看法。

马歇尔此时在中国政治民主化方面所采取的行动，远比赫尔利最初调处时更为坚决。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正如马歇尔本人向蒋介石说明的那样，如果中国长期处于不统一的状态，就不能阻止

苏联通过中共政权向中国渗透。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政权会被逐步削弱。为了防止苏联的影响扩大，阻塞苏联渗透的渠道，除了尽快实现政治统一，没有别的路可走。中共方面已经一再声明，民主是中国统一的基础，国民党不在民主改革方面让步，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当然，杜鲁门政府要求蒋介石做这种让步，也是基于有把握通过民主改革，继续维持住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而且周恩来已经表示，联合政府成立后，中共仍然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承认国民党为第一大党。马歇尔吃了这颗定心丸，自然会更加相信，美国式的民主一定会再一次被证明是战胜共产主义的灵丹妙药，也足以使国民政府起死回生。从更现实的需要考虑，赫尔利调处的经验证明，中共提出先政治民主化，然后军队国家化，并不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是坚定不移的原则。马歇尔如果不能做到迫使蒋介石在政治上让步，就无法使中共交出军队。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马歇尔看来是吸取了赫尔利的教训。

杜鲁门在声明中将“取消中共自治性军队”置于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之后，已经表明美国政府解决中国政治和军事问题的程序。马歇尔忠实地贯彻了杜鲁门政府的意图。尽管他在民主改革问题上的出发点是利害关系，但客观上毕竟推进了政协谈判，顺应了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潮流。他在推动政协谈判方面的建树应该予以肯定。马歇尔本人对政协会议的结果亦津津乐道，他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说：“事情进展得相当顺利，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进行得很好，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提供了比较明确的基础。我曾经极为秘密地送给委员长一份临时宪法，会议把此宪法的细节都包含了进去。通向制宪会议的道路看来是稳妥的。”[32]这番话表明，马歇尔当时的确真诚地赞成政协决议。

停战谈判和政协谈判完成之后，马歇尔立刻开始着手解决军队整编这个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马歇尔指导整军谈判的方针除了包括取消中共军队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外，还包括另外三个重要的设想。

第一，大幅度削减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的中国军队的数量。在这一点上，马歇尔与国民政府仅仅要求整编中共军队有所区别，与中共要求整编全国军队基本一致。1月13日，马歇尔询问魏德迈，基于对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考虑，中国需要复员多少军队。魏德迈的答复是：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过于庞大，已成为国民政府的“癌痛”，必须予以裁汰，如此才能稳定中国的经济，保证国家的财政能集中支持一定数量的军队，从而使之真正有实力。[33]他据此拟订了一个复员国民党军队的计划。[34]

马歇尔正是在这个计划的基础上制订了军队整编的数量和比例的方案。

第二，马歇尔认为，整编后的中国军队应遵循美国的建军传统，从属国家，不干涉国内政治事务。将整军谈判安排在政协会议之后，就是要营造一种符合他的设想的气氛。马歇尔强调的这个原则符合政协会议关于军队问题的决议。政协决议中的军事问题决议明确规定，整军的原则是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35]

中共中央当时接受了这个原则。中共领导人认为，马歇尔根据这个原则制订的整军方案尽管有许多内容仅仅是他的幻想，但是对于破坏国民党军队中地方系的原系统是彻底的，所以中共中央指示重庆代表团，应在原则上赞成他的意见。[36]马歇尔的确认真执行了杜鲁门政府取消中共“自治性军队”的方针，但这并不等于他会按照蒋介石的办法，把中共军队简单地统编到国民党军队之中。马歇尔是试图以基本平等的态度，同时整编国共两党的军队，使之成为独立于党派斗争之外的国家武装力量。这是他在整军问题上与蒋介石的又一个不同之处。

第三，马歇尔不仅希望按照美国的军事制度使中国军队“国家化”，而且要使中国军队“美国化”。作为一个军事领袖，马歇尔对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不乏深刻的理解。中国军队可以独立于中国内部的党派斗争，却不能脱离美国的影响。马歇尔曾经是史迪威争取中国战区指挥权的积极支持者，他深刻了解史蒋矛盾的背景。透过史迪威在中国战区遇到的重重困难，马歇尔不会看不到，不控制中国军队，美国就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的政治形势；而要控制中国军队，就必须使中国军队“美国化”。

对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在马歇尔尚未卸去总参谋长的职务时，美国陆海军部和国务院曾经提出一份备忘录，特别说明了由美国训练、指导中国军队的重要性，要求国民政府从其他国家取得军事援助之前应与美国达成协议。1月13日，魏德迈向马歇尔建议，不要复员国民党军队的A类师，即美国装备和训练的39个师；他也不赞成对他“业已委以重任或预定将要委以重任的部队做任何变动”。在魏德迈的计划中，保留下来的国民党军队正是以那些美式编制的师为核心。[37]魏德迈的建议是马歇尔整军方案的重要基础。马歇尔使中国军队“美国化”的设想，不仅包括国民党军队，而且包括中共军队。他在整军谈判中明确提出，整编结束后，美国将向保留下来的10个师的中共军队提供训练并提供11个步兵营、11个野战炮连的机械化装备。这一计划获得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的

批准。正是从这种考虑出发，马歇尔更重视整编的成功，在国共军队的比例上表现得并不像国民党方面那样斤斤计较。

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和准备，整军谈判于2月14日正式开始。马歇尔自信为谈判所做的准备工作细致周到，因此谈判一开始，便坚决执行第一要“整”，第二要“快整”的方针。

整军谈判围绕马歇尔提供的整军方案展开，国共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整编后双方保留军队的比例、整编军队的时间与程序，以及整军方案使用什么名称。

国共军队的比例是自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在重庆谈判期间，赫尔利曾经提出国共双方的军队按5：1的比例整编，结果被国民党方面拒绝。此后周恩来又提出，中共方面可让步为按7：1缩编军队，即在当时保留43个师，以后再按此比例裁减。国民党方面仍不同意，他们坚持中共军队最多只能保留20个师。结果重庆谈判未能就这一关键问题达成协议。国共双方同意另设军事小组，具体商谈整编计划。

马歇尔来华后，经过仔细研讨，试图一举突破国共保留军队数量的比例这个难题。在整军谈判开始之前，马歇尔向国民政府提交一份草案，建议整编完成之后，国共军队的比例应为2：1，即一共编60个师，其中中共军队占20个师。另外在海空军中，中共军队应占30%，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行政训练。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惊，立即指示张治中转告马歇尔务必予以修改。马歇尔在他修改后的草案中规定，整编后国共军队的比例为5：1，海空军一项则完全删去。[38]

即便如此，马歇尔的方案仍使国民政府相当被动。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在谈判中提出，根据过去的计划，当国民党军队保留254个师时，中共军队为20个师；如果国民党军队削减至50个师，中共军队应低于20个师。他建议双方的比例为6：1，即中共军队保留15个师。周恩来则提出，在第一阶段整编后，中共军队应保留20个师；如果能缩短整编过程，中共方面可以削减更多的军队。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马歇尔提出一项折中方案，即在整编第一阶段的前9个月，国民党军队削减为105个师，中共军队削减为20个师；至第12个月，国民党军队削减为90个师，中共军队削减为18个师。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国民党方面不得不表示，可以接受按5：1的比例整编军队。

双方在达成的协议中具体规定，目前国民党军队裁编成90个师，中共军队裁编成18个师。整编全部完成后，全国军队编成60个师，其中国民党军队50个师，中共军队10个师。根据这个方案，整编第一阶段结束时，中共军队比原提出数少两个师；至整军全部结束，中共军队则比国民党方面提出的6：1的比例多一个半师。这个方案基本上反映了国共双方妥协的结果，蒋介石却声称，这个方案是国民党方面“最大之损失”。[39]

马歇尔显然并不将国共军队的比例看成绝对重要的问题，他更关心的是使中共方面接受整军方案。只要能使中国军队脱离党派影响，再经过美国装备和训练，结果都是一样的。

关于整军方案的名称，马歇尔提出的最初草案标明为《整编中共军队并使之合编为中国政府军队的基本方案》。在2月21日的讨论中，周恩来提出整军方案的名称应改为《军队国家化的基本方案》，理由是原名称不能包括方案中的全部内容，而且不符合政协关于军队问题的决议。张治中当即表示，这样的改动违反了“双十协定”第九条的规定。马歇尔于是提出，名称是否可改为“中国军队复员和统编为国家军队的基本方案”。

第二天张治中提出，应根据重庆谈判商定的办法，将整军方案的名称定为《中共军队改编为中国国民政府军队的基本方案》。他的理由是除了“双十协定”第九条的规定外，国民党军队是合法政府的武装力量，如果整编这支军队，会危害它的地位。按照张治中建议的逻辑，国民党军队仅仅是缩编，军队国家化不过是将中共军队统编到国民党军队里。张治中的逻辑既不符合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马歇尔使军队脱离党派影响的指导思想。

周恩来在发言中表示赞成马歇尔的修改意见。他指出政协决议规定军队国家化的原则，这不仅仅适用于中共军队，国民党军队亦须如此，而马歇尔的建议基本包含了整编军队的全部内容。为了避免国民党方面长时间的纠缠，周恩来提出了折中办法，将整军方案定名为《中国军队整编和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的基本方案》。张治中表示希望美方表态。马歇尔立刻表示根据协商和他的理解，整军方案将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定名。

关于整编的程序和时间，是马歇尔在谈判中最关心的问题。他的基

本原则就是“尽快”，但落实这个原则却遇到来自国共双方的阻力。国民党方面虽然愿意整编中共军队，以达到取消或控制对方的目的，但也担心，国民党军队官兵会因整编受中共军队的政治影响，军心不稳。张治中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在一年之内混合编组国共军队，其结果“利害参半”。因此，他在谈判中涉及这一问题时始终消极应付，声称一切均视马歇尔和中共代表的意见而定，自己不提任何方案。

中共中央虽然主张执行政协决议，准备在整军问题上以某些让步换取中共军队的合法化和国家民主化，但，也考虑到，军队在中国政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必须谨慎行事。因此整编要有一个过程，不可急于行事。至于与国民党军队混编，中共方面原则上坚决反对。由于国共双方在整编的程序和时间上均持谨慎的态度，在混编问题上又有根本分歧，谈判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长时间的争论。

谈判开始后，双方便就协议中使用“统编”还是“混编”发生争论。国民党代表提出，国共军队整编成60个师之后，即应完成“混编”，即只有一支国家军队，而不应再有国军与共军之分。周恩来则坚持只能使用“统编”一词，以免造成误解，实际上是根本否定“混编”。由于这两个词的区别显而易见：“统编”可以理解为统一编制，不等于将军队混合；“混编”的含义可以是不分程度和级别地混合编组军队。几经争论，双方最后一致同意，在协议中使用“统编”一词。

关于统编，国民党方面没有拿出具体方案，周恩来则主动提出了统编的程序和时间表。他指出，统编中的一些措施对中共是全新的问题，因此中共主张分阶段逐步完成之。在统编的第一阶段，国共军队应各自完成复员整编，亦即12个月以后开始实行统编。他提出的理由是国共双方的军队经历了18年的敌对之后，要统一在一个旗帜下并非易事，急于求成会产生各种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且中共军队缺乏正规训练，还需要准备一段时间，才能达到正规化的标准。

马歇尔的方针是整编完成后，立即实现双方军队在一定级别上混合编组。他没有理由反对周恩来提出的逐步统编的建议，但决不同意将统编长时间拖延下去。他主张整编开始后4～6个月，即着手在一定级别上混合编组。他提出的折中方案是整编开始6个月以后，先以军为单位混编；从第7个月开始，每月编成一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由国共各一个军组成，共编组4个集团军，驻扎于华北地区；整编开始后第13个月起，再以师为单位混合编组。至于中共军队的正规化训练，马歇尔表示

美军可以在中共控制地区的选定地点举办军事训练学校，培训中共军队的下级军官，这样就可以避免拖延时间。

商谈的结果是马歇尔的建议被国共双方代表接受。这个方案对国民党方面来说，既可以达到混编的目的，又可以避免立刻混编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中共方面来说，由于混编的级别较高、影响不大，而且半年以后才开始实行，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观察形势和做好准备工作。

2月25日，三人小组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这个方案被马歇尔视为得意之作。在整军协议签字仪式上，马歇尔称这个整军方案是“中国的希望”，他还措辞激烈地谴责了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自利自私，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40]这既反映了马歇尔对整军协议的重视，也表明他对这个协议可能被破坏不无担忧。

马歇尔到中国后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使国共谈判取得重大突破。停战、政协和整军三大协议的签订一度使中国展现出和平、民主和统一的前景。马歇尔能一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客观环境固然是重要的因素，而他本人在调处中尚能保持客观、冷静和公允的态度，也是同样重要的原因。如果这些主客观因素能够继续存在，1946年的中国历史将有可能向与后来不同的方向发展。

二 马歇尔与东北内战

从1月停战谈判开始至2月25日国共达成整军协议，中国大地曾一度有希望出现和平的局面。然而，这一线希望很快因东北燃起内战之火而破灭。从1月7日至14日的营口争夺战开始，国共军队在东北的武装冲突愈演愈烈，并逐步向关内蔓延，最终演变成全面内战。美苏两国及国共双方在东北地区的妥协是马歇尔使华有望取得调处成功的主要背景，围绕东北问题展开的复杂纠纷是促使杜鲁门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马歇尔来华后接连处理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难题，唯独在东北问题上束手无策。调处东北内战的失败是马歇尔整个调处失败的开端，也是他调处失败的关键所在。

国民政府在战后解决东北问题时，一贯坚持一家独占的原则，拒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也拒不讨论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限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行动的建议。国民政府的基本策略是把国共争夺东北的斗争扩大为国际纠纷，利用国民政府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和签署的相关国际协议，使国民政府独占东北的要求合法化，进而使其为独占东北采取的军事行动合法化。

在停战谈判和整军谈判期间，国民政府一直矢口否认国共在东北一些地区已经形成对峙的局面。国民党方面在谈判中声称，东北问题的本质是国际问题，没有内政问题；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行动有中苏条约为根据，因此不能受到国共谈判的限制。鉴于东北有国共和苏联三方同时存在的实际状况，国民政府奉行一家独占的方针，否认中共军队在东北存在的事实，必然会导致它最终凭借武力争夺东北。

从1945年11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逐步改变了一度实施的争取控制全东北的战略计划，并公开提出用政治方式解决东北问题，包括主张在东北成立包括中共在内的地方性民主联合政府。停战协议签订后不久，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具体方针，即在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方面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41]

在停战谈判期间，周恩来曾经多次向马歇尔说明，中共中央承认国民政府有权根据中苏条约，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行政权。但东北问题不仅仅是外交问题，而且包含内政问题。中共军队已经占领东北许多城

镇、厂矿、交通线和乡村，并建立了地方政权。基于这种现实，解决东北问题必须区分内政与外交。为防止发生武装冲突，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必须事先与中共方面协商，运兵数量必须有所限制。[42]经过谈判，中共方面认为，军事三人小组实际上达成若干默契，包括国民党军队在东北驻军不得过多；在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队只能进入东北；国民党军队经过华北解放区的其他交通线向东北运兵，事先必须与中共协商；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应按时向军调部报告调动情况。在整军协议中规定，国民党军队将在东北驻扎5个军。中共方面据此理解，调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最多不应超过5个军。[43]这种理解是有根据的，不应被视为误解。

马歇尔解决东北问题基本上遵循两个原则，即保证国民政府在东北居于统治地位，以及尽量避免引起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东北是美国和苏联在东亚抗衡的焦点。从对苏战略出发，杜鲁门政府绝对不允许东北出现国共分庭抗礼的局面。在美国领导人看来，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无异于打开苏联向中国渗透的渠道；只有国民政府独家经营东北，或至少在东北占压倒优势，美国人才能放心。

另一方面，马歇尔虽然坚决执行杜鲁门政府的既定方针，支持国民政府恢复对东北的统治，但并不等于他认为美国为达此目的可以不惜诉诸武力。马歇尔当时的顾虑有三：第一，如果爆发国共内战，苏军可能以东北秩序混乱为理由，再次延迟撤出东北；第二，国民政府并没有能力在东北用武力征服中共；第三，东北内战会蔓延到华北，战端一启，牵动全局，驻华美军将再遇尴尬局面。[44]

马歇尔在东北问题上执行的是一种相当矛盾的政策，那么是否可以说，只要马歇尔同意美军为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就一定会导致武装冲突？显然不能用简单的是与否做结论。因为中共中央毕竟没有否认国民政府有接收东北的权力，也没有否认国民政府在东北的存在，尽管这种承认是有条件的。如果马歇尔能够像解决其他问题一样，持慎重和务实的态度，履行军事三人小组已经达成的默契，东北内战还是有可能避免的。问题是马歇尔并没有这样做，他偏偏要去扮演江湖魔术师的角色，其认真的程度令人瞠目，也难怪中共领导人后来会讥讽他的调处是在演“文明戏”。

马歇尔调处东北内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月24日到3月27日，调处的中心是争取向东北派遣停战执行小组。谈判的结果是达成了

一项实际上无法生效的向东北派遣执行小组的协议。

马歇尔提出向东北派遣执行小组的建议，是由国共军队在营口展开的争夺战引起的。营口是国民党军队一直企图控制的重要港口，目的是使海运的国民党军队可以从那里登陆。1月7日，也就是停战令公布前三天，国民党军队向营口中共守军发动猛烈进攻，企图在停战前抢占这一战略重镇，以便为向东北运兵做准备。经过三天激战，国民党军队于10日攻占营口。之后，中共军队决定趁对方立足未稳，在13日夜24时停战令生效之前夺回营口。13日拂晓，中共军队向营口发动反击，当晚即攻入市区，将国民党守军包围在原市公署、海关和邮局等三个孤立的据点中。24时停战令生效后，中共军队奉命停止射击，维持现状。但被围的国民党军队却借机发动反攻。于是中共军队再度发动进攻，于14日晨全歼国民党守军1700余人。

营口争夺战显然属于停战令生效后的遗留问题。马歇尔在接到营口冲突的报告后，于1月24日向国共双方提出一份备忘录，建议军调部立即向营口派出执行小组，而且将来发生类似事件，可依例采取同样行动。[45]马歇尔的建议立刻得到中共代表的赞成，但由于国民党代表坚决反对，军事三人小组一直未能就此问题达成协议。

马歇尔提出向东北派遣执行小组的建议，看起来治标不治本，实际上却是深谋远虑的一着棋。这一点随着围绕东北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明显。2月9日，马歇尔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披露了他解决东北问题的全盘计划。他在电报中指出："过去一个月在中国业已完成的许多事情能否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处理满洲动荡的局势。"美国在东北问题上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其中包括：（1）实现中国统一，有统一的中国军队，建立联合政府和恢复交通；（2）美军尽快撤出中国，避免苏联发出对英国在希腊驻军那类的指责；（3）中国宣布准备向日本派遣军队。"由于中国具有国内统一的明确事实，由于美国战斗部队撤退而使龃龉消失，以及由于中国军队参加驻日盟国占领军而提高了它的地位，中国到那时就可以将满洲问题提交远东委员会。"[46]

马歇尔的判断是清楚的，就是准备把解决东北问题纳入美国对苏战略的轨道，试图使中国最终能按照美国的愿望，用一个声音对苏联讲话。按照他的设想，只要苏联没有中国内部纠纷作为借口，美国就有机会通过外交手段迫使苏联放弃对东北的干涉。当然，如果他的设想真的变成现实，东北问题最终必将成为一场国际争端，东北必难逃再次成为

大国竞技场的命运。

在限制苏联的考虑的支配下，马歇尔到中国后，一面极力为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创造条件，一面鼓励国民政府在中苏合作经营东北企业的谈判中务必采取强硬立场。马歇尔的行动得到杜鲁门政府的有力支持。2月间，杜鲁门政府向苏联和国民政府发出措辞强硬的照会，表示不能坐视美国在东北的利益因中苏间的妥协而受到损害。[47]它还与英国一起，单方面公布了“雅尔塔秘密协定”，从而煽动起反苏情绪。

但是，马歇尔和杜鲁门政府的这些行动并非没有问题。马歇尔的设想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实现中国的统一，这在他给杜鲁门的电报中说得非常明确。在中国还没有实现统一的情况下，加之中共军队在东北发展迅速，美军为国民党军队向东北大规模运兵，必然会助长蒋介石和国民党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气焰，由此引起中共军队的坚决反击也是必然的。对国民政府的意图马歇尔看得也很清楚，况且鼓励国民政府对苏采取强硬态度，难免会招致苏联的报复，在东北造成对国民政府不利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将向东北派遣执行小组作为临时性的缓冲办法，既可以缓解东北冲突地区的紧张局势，避免因东北发生武装冲突而打乱马歇尔的战略部署；又可以使美军代表进入东北合法化，为苏军撤退后直接插手东北做准备。可以设想，如果军调三人执行小组能够顺利进入东北，苏军撤出后，那里出现的局面将会是美国在国共之间纵横捭阖。马歇尔一直深信，三人执行小组不能进入东北，那里的形势将会演变成对国民政府的致命威胁，尽管蒋介石的看法完全相反。

从1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军队第七十一军、新六军和新一军被陆续运抵东北南部，这一地区的武装冲突亦随之逐步升级。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不去从苏军手中接收地方，而是以锦州至沈阳的铁路线为中心，四出攻掠，先后进占盘山、台安、新民、阜新和彰武等地区。由于东北地区形势日益紧张，中共中央断定解决东北问题，已成为时局的关键，因此必须争取尽快同国民政府谈判解决东北问题。[48]这一方面是为了配合中共中央在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保证将东北工作的重心顺利地转移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方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东北苏军这时正极力反对中共军队在东北作战，他们担心大规模冲突会导致美军借机直接进入东北。[49]

2月2日和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东北问题。会议决定，目前还是要争取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争取在东北与国民

党方面和平合作。中共中央指示重庆代表团，应主动与国民党方面谈判解决东北问题，向对方提出国共应共同接收东北，东北政府应民选，立即向营口派遣三人执行小组，驻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不得超过10万～15万人等建议。[50]15日，中共中央发表公开讲话，详细介绍了中共在东北已获得的地位及其组织和实力，并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四项原则，其核心就是必须承认中共在东北已经拥有的重要地位。[51]

为了确保在谈判中居于有利地位，中共中央在政治上采取主动行动的同时，亦指示东北局在军事上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方面，必须采取自卫立场，不刺激对方，并尽可能争取苏军在外交上配合中共方面的和平合作方针；另一方面，根据东北国共武装冲突暂时难以避免的情况，中共中央要求东北部队在自卫的条件下，争取打一两个胜仗，杀一下国民党军队的威风，使之不敢在东北为所欲为。[52]

如果说中共中央在东北是执行以和平合作为主、以军事行动配合谈判的方针，那么国民政府恰恰相反，是以谈判配合军事进攻，更倾向用武力解决问题，拒绝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1月22日，国民党方面正式拒绝向营口派遣执行小组，理由是担心那样做会引起与苏联的纠纷。周恩来曾经于 2月14日、15日、18日、19日的三人小组会议上和这期间与张治中的双人会谈中，一再提出通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但国民党方面一再拖延，不置可否。2月20日，马歇尔再次提出派遣执行小组进入东北，亦遭到国民党代表的反对。[53]

2月间，马歇尔一直专心于整军谈判。他对东北问题非常重视，却并不急于解决。2月20日的建议被国民党方面否定后，他没有再为制止东北冲突采取其他措施。21日，周恩来曾经向他提出三点建议，他仅仅表示赞成，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项关于东北的政策，以避免误会。然而他并没有为制定那项政策探索可行的途径。[54]2月28日至3月5日，军事三人小组出巡华北，视察解决停战令生效后的遗留问题，进一步稳定华北形势。直到3月6日三人小组返回重庆，马歇尔才认为已有必要争取尽快解决东北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马歇尔看到华北局势基本稳定，认为可以集中精力于东北；另一方面是因为马歇尔已经决定于3月11日回国述职，他希望在行前能控制住东北形势。但这时重提向东北派遣执行小组问题，为时已晚。

从3月11日开始，苏军从沈阳沿长春路逐步向北撤退，国共争夺苏军撤出地区的斗争随之展开。国民党军队在美军帮助下，经过一个多月

的调兵遣将，在东北南部地区已经集中5个军的兵力，准备以沈阳为中心，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发动所谓的“扇形攻势”。与此同时，在美国的鼓动下，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为转折点，国民政府对苏联的政策开始转向强硬。蒋介石这时认为，美国舆论谴责苏联正“日渐积极”，而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几使人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将来临之感矣”；马歇尔正越来越向国民党倾斜，他“对共党阴谋，似有略进一层之认识”。[55]结果，不仅国民政府公开拒绝苏联在东北经济问题上的要求，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还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要求“切实交涉”以促使东北苏军“迅即撤退，交由国民政府派军接防”。[56]军事准备的完成和外交接收的失败，使国民政府越来越倾向在东北走军事冒险的道路，蒋介石缺的只是美国持续不断的支持和援助。

3月9日，蒋介石在与马歇尔会谈时，对向东北派遣执行小组一案提出五点附加条件：（1）执行小组只解决军事冲突，不干预政治事务；（2）执行小组应随国民党军队进止；（3）国民政府有权接收长春路及其沿线两侧30公里内的地区，中共军队应从这一地区撤出；（4）国民党军队有权进入铁路沿线各矿区；（5）中共军队不得阻碍国民政府接收主权。[57]蒋介石向马歇尔提出如此复杂而又苛刻的条件，其用意无非是执行小组要么不进入东北，要么进入东北后成为掩护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的工具。

3月初，中共中央对东北形势的估计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国民政府拒不谈判东北问题，而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到处进攻中共军队，抢占地盘，致使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逐步加强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指示东北局，国民政府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发动军事进攻，企图击溃我方军事力量；一面利用外交手段，使苏联将更多的城市交给它接收。因此，国共在东北的军事对抗和冲突将持续一个时期，东北中共军队必须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共军队目前不再向东北增兵，如果国民党军队增兵数超过5个军，则采取报复行动。[58]

3月4日，毛泽东向到延安访问的马歇尔重申了中共解决东北问题的一贯方针。3月10日，周恩来向马歇尔递交了中共对东北问题的声明。声明指出：中共方面曾经表示同意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条件是它向北接收，而非向西进攻；1月间又表示赞成马歇尔提出向东北派遣三人执行小组的建议。然而这些行动均由于国民政府拒绝谈判解决东北问题而未能产生任何结果。为了顺利及合理地解决东北争端，中共方面今后将

按照两个原则进行谈判：（1）东北的内政和外交分别解决，中共不介入中苏外交，不干涉中苏谈判；（2）军事和政治同时解决，中共在军事方面已做重大让步，承认整编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保持军事优势，国民政府亦应承认，政协决议的民主原则适用于东北，改组东北政务委员会和各省、市政府，实行地方自治的联合政纲。[59]第二天，周恩来在与马歇尔会谈时再次强调，在东北地区，政治和军事两个问题必须同时解决。[60]周恩来的谈话比之前2月21日提出的仅包含军事问题的三项建议前进了一大步，这表明中共中央在东北形势即将进入转折的时刻，仍然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的分歧。

马歇尔经过与蒋介石和周恩来商谈，于3月11日提出一项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的“命令草案”。这个草案有两个特点：第一，只谈军事和外交接收，不谈国共在东北的冲突问题；第二，几乎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全部附加条件。[61]马歇尔在当天向周恩来说明，不能接受政治和军事同时解决的要求，他的理由是美军人员“厌恶”卷入政治事务的争论。这听上去更像是个借口，因为马歇尔本人就深入地介入了政协谈判，而且对此举津津乐道。在这里马歇尔不是厌恶卷入政治事务，而是不希望在苏军没有撤完之前讨论东北的内政问题。马歇尔的草案受到中共方面的坚决反对，因为它肯定会助长国民政府凭借武力独占东北的气焰。

3月11日的“命令草案”是马歇尔态度开始变化的重要标志。由于马歇尔在东北形势发展的关键时刻向国民政府全面让步，他的调处从此很难再保持公正。此时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深受正在爆发的冷战影响，由此导致对苏联战略的偏见使马歇尔贬低了东北地区内政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不愿意承认中共在东北已取得有利地位的现实。关内局势的初步稳定又使他产生了有条件、有资本可以对中共强硬一些的幻想。这是他调处东北内战的一个致命误判，这个误判使他与蒋介石殊途同归。

马歇尔在回国述职期间仍然很关注东北形势，并督促美方代表吉伦（Gilem，Alavan C.）积极调处，尽快向东北派出执行小组，但东北内战局面实际上已经无可挽回。国民政府在美军协助运兵的支持下，很快把东北变成中国第一个大规模内战的战场。3月27日，国共达成向东北派遣执行小组的协议。[62]事实很快证明，这项协议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无法贯彻执行。

马歇尔在东北的第二阶段调处开始于4月上旬，调处的中心是长春问题。就在国共达成向东北派遣执行小组的协议的第二天，国民政府东

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通知军调部，不准执行小组进入东北。经吉伦一再交涉，蒋介石才于3月30日向熊式辉发出指示，东北行营不得拒绝三人执行小组进入东北，以及不得让三人执行小组妨碍国民政府接收。意即三人执行小组可以进入东北，但行动必须限制在国民政府允许的范围内。[63]4月3日，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到达沈阳，结果被国民党军队扣押在机场。三人执行小组中的国民党代表则以他们的领导尚未到达为借口，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国民政府显然是在制造障碍，以便拖延时间，造成三人执行小组无法在东北展开工作的既成事实。

面对国民政府的阻挠，美方代表仅仅决定在没有制定具体原则之前暂停进入东北。马歇尔了解情况后，立刻打电报给吉伦，指示他建议召开国、共、美三方会议，就地迅速解决问题，否则不能离开沈阳，要用有力的手段达成有效的协议。[64]4月7日，吉伦奉命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指责国民党方面借故拖延时间，阻碍三人执行小组前往冲突地点调查。他要求蒋介石立刻采取行动，否则就会破坏东北已处于摇摆之中的平衡。在美方的督促下，执行小组于第二天就调查问题达成协议。[65]但美方所坚持的仅仅是调查，这对制止内战不可能起实际作用。14日，军调部派三位委员到沈阳视察，行期三天，来去匆匆，可以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调查旅行”。而向东北派遣三人执行小组的协议就这样被国民党方面破坏了。

国民政府阻挠执行小组进入东北看来是有预谋的行动。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声称东北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在主权接收完毕之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国民政府对东北“只有接收主权，推行国家的行政权力，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任何人不得借外交困难，要挟政府以自立，国民政府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66]蒋介石的讲话不啻是一份宣战书，点燃了东北的内战之火。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此时亦命令所部国民党军队，迅速抢占各战略要点，并限令立即攻占四平。

蒋介石之所以敢于如此不顾一切地破坏向东北派遣三人执行小组的协议，并公开发表好战讲话，同美方的态度有直接关系。军调部的美方代表尽管在执行小组进入东北问题上与蒋介石有分歧，但在保证国民政府控制东北这一点上是与蒋站在同一边的。进入东北的三人执行小组中的美方代表曾经接获的密令明确要求由国民党军队占领所有村镇、城市

及交通线上的要点，并单独管理所有铁路、公路、水上和空运交通、交通设备、铁路两侧30公里以内的地区，以及单独占领所有工厂、煤矿、电厂和其他设备的地区。[67]事实表明，美方坚持向东北派遣执行小组，主要是为了在避免冲突的条件下，保证国民政府的接收能顺利进行。因此，美方只要求蒋介石同意向东北派遣三人执行小组，对蒋介石加于执行小组的苛刻的限制条件则始终不置一词。

美方继续为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是助长蒋介石气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杜鲁门政府一面试图避免东北发生内战，一面又不惜帮助挑起内战的国民政府谋求军事优势。3月28日和31日，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和周恩来分别向美方提出抗议，反对美军继续协助国民政府向东北运送军队。吉伦在答复时声称，停战令规定可以向东北调动国民党军队。至于中共代表指责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超过5个军，吉伦认为那是中共方面以整军方案为标准提出的非难，而整军方案的规定只适用于12个月以后，目前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数量不应受此限制。[68]吉伦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则把周恩来的抗议说成仅仅是一种威胁。吉伦无非认为，中共解决东北问题离不开马歇尔的调解，因此他们对美国的抗议不过是虚张声势，不会根本影响其对马歇尔调处的态度。马歇尔默认了吉伦为国民党方面做出的辩解。本来，美军停止运送国民党军队是制止东北内战最有效的手段，然而美方代表恰恰对此不肯做任何妥协。美方代表的行动对国民党挑起东北内战来说是在推波助澜，对于马歇尔的调处，则无异于自掘坟墓。

4月初，由于国民党方面破坏派遣执行小组进入东北的协议和美军继续向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东北大规模内战已经是一触即发。中共中央根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计划，曾经准备将长春路及其沿线的大城市让给国民党接收。但是，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不是积极向北接收，而是在南满四出攻城略地，致使东北的战略布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重新修订战略计划，于3月下旬多次向东北局发出指示，要求“不惜一切重大牺牲，保卫北满，保卫战略要地”“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面”。[69]

中共中央重订战略部署的依据是东北外交和军事形势的变化。从1月开始的中苏解决东北经济问题的谈判拖拖拉拉，一直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这期间中苏关系从缓和转向恶化。因此东北苏军在北撤回国过程中，不断给国民党军队设置障碍，致使国民党军队向北推进根本跟不上

苏军撤退的步伐。另外，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将主要兵力用于打通承锦交通和争夺南满战略要点。其结果是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共军队被迫向北收缩，而国民党军队向北接收兵力不足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东北苏军的撤退自然给中共军队造成了在东北北部发展的极好机会。中共中央当时还估计，经美方调处，东北停战协议是有可能达成的；在达成东北停战协议和三人执行小组到达之前，中共军队如能控制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将会提升中共的谈判地位，从而更有利于和平解决东北问题。[70]

3月27日，周恩来在谈判中仍然表示，国民政府如果同意东北停战，还可以确保它在长春和哈尔滨的地位，但国民政府继续采取拖延解决的态度。4月8日，国民党军队向四平发动进攻，遭到中共军队的顽强抵抗。由于四平久攻不下，国民党军队根本无法到达苏军已撤离的长春。

4月9日，时任国民党谈判代表的陈诚忽然改口，表示同意在东北地区停战。这显然是缓兵之计，目的是争取增援时间。两天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为争取停战后的有利地位，最好于苏军撤出后两天之内占领长春。中共中央第二天便指示东北局，按周恩来的建议采取行动。[71]中共军队遂于18日向驻守长春的国民党收编的原伪军姜鹏飞部发起攻击，当日即占领长春。随后中共军队又相继占领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

中共军队占领长春是在东北内战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为了配合谈判和实施保卫北满计划而采取的具有战略性的军事行动。但是，它毕竟发生在国际矛盾尖锐、复杂的东北地区。在苏军撤退过程中，中共军队第一次断然夺取东北大城市，无疑预示着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4月间，毛泽东起草了题为《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党内文件，并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中传阅。毛泽东在文件中指出，美苏迟早还要妥协，但妥协的范围不是无限制的，而且美苏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72]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的战略总的说来是在适应美苏妥协的前提下，尽可能争取最好的条件；那么占领长春的行动和毛泽东起草的文件则表明，中共中央正在下决心冲破美苏格局的束缚，按照中国的实际形势，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从4月开始，中共中央对美

国对华政策的批评日趋尖锐，同样是这种变化的反映。

就在中共军队占领长春的当天，马歇尔返回中国。他认为此刻中国的局势已经全面恶化。4月8日，吉伦曾经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四项办法：（1）东北的中共部队停止调动；（2）中共军队从中苏条约涉及的铁路线及其附近的地区撤出；（3）中共军队从占领的铁路线及其沿线的城镇后撤至少一天行程的距离；（4）中共军队按上述办法撤退时，国民党军队不得追击。[73]吉伦这个建议的倾向性十分明确，目的就是要保证国民党军队占领苏军撤出的交通线和战略要点。第二天，周恩来在三人小组会议中拒绝了吉伦的建议。他提出东北必须先停战，然后才有条件讨论其他问题。谈判至此中断。中共军队占领长春后，国民党方面借机扩大东北内战，声称国民党军队不占领长春便无停战可言，东北内战由此迅速白热化。

马歇尔这时除了继续奉行自相矛盾的政策外，并没有为制止东北内战找到什么新办法。他的指导思想仍然是避免冲突同时确保国民党军队的优势地位。首先，马歇尔并不赞成国民政府借争夺长春而扩大内战。他认为，如果国共冲突加剧，苏联可能会以护路为理由，继续在长春以北的铁路线上驻军。而且国民党军队全力向北推进，势必会使兵力分散和战线太长等弱点更加凸显，有被中共军队各个击破的危险。其次，一旦东北内战蔓延到关内，他前三个月的努力必将付之东流。不论上述哪一种情况发生，都会影响杜鲁门政府在中国的战略目标。另外，基于力求使国民政府控制东北的战略考虑，马歇尔又不得不支持国民政府控制长春。长春是联系南北满的战略枢纽，长春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国民政府在东北的地位。失去长春，国民政府就会失去对东北北部的控制权，东北就会形成国共分庭抗礼的局面，而这正是马歇尔一开始调处就在竭力避免的。

为了摆脱面临的困境，马歇尔设想以长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一方面要求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以换取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另一方面要求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并延缓进入长春，以此换取中共中央在东北北部做更多让步。两者之间孰缓孰急，则随长春争夺战的形势而定。在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之前，马歇尔以向中共施加压力为主，直至不惜放手让国民党军队攻打。

马歇尔到重庆不久，即向国民党方面指出，现在形势已经极为严峻，美国海军目前不会也无力在中国支持一场规模巨大的内战。蒋介石

完全清楚美国的战略意图，他指责美国援助国民政府并不如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更有力；美军不加强向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可能给国民政府的接收带来灾难性后果。东北行营向蒋介石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困难是缺乏后续部队和物资接济，除了四平、长春一带尚属顺利外，在其他各地区均难以支撑，甚至沈阳都受到威胁。面对这种局势，马歇尔决定同意美海军为国民政府向东北运送更多的军队，并向蒋介石提出了具体的运输计划。[74]实际上马歇尔在华盛顿期间就向魏德迈表示过，为国民党军队再增运两个军到东北并不违反之前国共达成的协议。[75]

马歇尔的行动受到中共方面的谴责。周恩来向马歇尔指出，美国违反整军协议继续为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是导致东北内战的重要因素。解决东北问题的关键，一是美国停止为国民党军队运兵，二是立即停战。而且由于东北已经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整军协议中规定的国共军队在东北的比例不再适用，中共军队的数量必须增加。马歇尔在会谈中为美国援蒋运兵进行辩护，不过他除了重复吉伦的观点外，也未提出什么新的理由。[76]

4月23日，马歇尔起草了一份东北停战令草案。他在草案中提出四点建议：（1）国共双方军队必须于接到命令后的24小时内立即停战；（2）根据整军协议，确定双方军队在东北的位置，国民党军队的第五十四军、第九十三军继续调入东北；（3）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必须根据三人执行小组的专门指令进行；（4）东北的政治问题由国共协商解决，目前暂时维持现状。[77]马歇尔在这里表现出的意图同以往是一致的，问题是随着国民政府向东北调入的军队越来越多，停战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低，蒋介石的态度也就越来越强硬。

24日，蒋介石向马歇尔提出东北停战的条件。他声称停战的前提是中共军队将长春让给国民党军队，然后（1）在东北实行1月10日的停战协议；（2）双方军队调动应根据整军协议进行，目前继续完成国民党的第五十四军、第九十九军两个军向东北的调动；（3）长春路沿线30公里以内由国民党军队接收，中共军队不得阻碍；（4）长春路沿线30公里以外中共控制区的政治问题，由国共协商解决。[78]这其实就是一个要求中共单方面妥协的方案。

蒋介石要求中共执行整军协议的规定，他却要向东北运送9个军，而东北的政治问题被限制为中共控制地区的政治问题。他提出执行1月停战协议，无非是重申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的合法性，并要求中共军队

退回原防，其余的地方均由国民政府随意接收。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连马歇尔都认为提出来毫无意义，徒增双方的对抗和猜忌。马歇尔苦口婆心，力陈利害，蒋介石却无动于衷。他所需要的美援已经到手，马歇尔的劝告与美国运输舰相比，太不实惠，根本没有说服力。

马歇尔在交涉无结果后，再次向国民党方面让步，于29日把蒋介石的四项条件转告周恩来。他声称：中共军队让出长春是妥协的唯一基础，否则他就退出调处。马歇尔做这样的威胁太不自量力了，因为即便马歇尔在那里调处，美国军舰也没有停止将国民党军队和武器装备运进东北，中共也并没有因此就屈服于压力。马歇尔把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估计得太高。周恩来当时明确告诉马歇尔，蒋介石的条件不可能被接受，因为国共的分歧不单纯在长春一地的归属，而是先打仗、再谈判，还是相反。中共方面的原则是先停战，停止调动军队，派遣三人执行小组到冲突地区监督停战，然后讨论东北的军队布防、复员、调整军队比例等问题。周恩来说中共并不谋求控制东北，只是要求在新组成的东北地方政府中能有合理的地位，并通过和平协商，在民主的基础上决定东北的前途。马歇尔对周恩来的答复是，他看不出与蒋介石讨论中共的建议有什么用处，国民政府的停战努力已被中共军队占领长春所破坏，所以他决定退出调处。[79]

马歇尔曾经一再声称，中共军队占领长春是东北发生大规模内战的根本原因，他退出调处是为了向国共双方施加压力。实际情况是中共军队占领长春是在东北已经发生内战，而美国又无力制止的情况下发生的。可以肯定地说，即使中共军队不占领长春，东北也绝不会因此出现和平局面。马歇尔对此一清二楚，可以说他的辩解有些虚伪。马歇尔退出调处是在国民党军队全力围攻四平，而他承诺继续为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调进两个军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他实际上是接受了蒋介石打下长春再谈其他问题的立场。马歇尔的调处和美国援蒋运兵本来是两个相互制约的因素，但马歇尔退出调处，美国军舰却在继续为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这实际上是在向中共施加压力。如果说马歇尔3月11日提出的东北停战草案是他调处策略转变的开端，那么他4月29日退出调处的声明则标志着这个转变的完成。其结果是他在调处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在国共两党的心目中，他都变成了可以利用来推行某种策略的缓冲器。

马歇尔退出调处的目的是借“战场上的事态发展”打破国共谈判的僵局。换句话说，他是希望利用国民党军队取得军事优势来迫使中共改变

立场。然而事与愿违，不仅四平争夺战旷日持久，而且东北的战火开始向关内蔓延。国民党军队一面在东北大打出手，一面不断向中共中原部队发动蚕食性进攻。中共中央为了配合保卫四平和长春，开始在南满采取军事行动，并于5月初在锦承路沿线发动交通战。山东的中共军队亦在津浦路沿线地区出击，进逼徐州国民党守军。马歇尔对东北内战引起的连锁反应焦虑万分，尽管他声明退出调处，却始终坐卧不宁，一刻也没有停止幕后活动。

5月4日和8日，马歇尔分别会见时任国民党代表的徐永昌和俞大维，提醒他们注意，如果不尽快解决东北问题，肯定会波及华北。他提出一项折中办法，即中共军队撤出长春，由军调部在长春设立前进指挥所，国民党军队6个月左右之后再进入该城。[80]5月10日，马歇尔根据蒋介石的要求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全面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战略地位。他在备忘录中指出，考虑到无法确定中共军队未来会采取何种行动、苏联会有什么反应以及交通运输的状况等因素，国民政府必须妥协，否则会引起军事、经济和财政各方面的混乱。妥协的具体方案是先南后北，将国民党军队配置于长春和长春以南各点，同意中共军队配置于哈尔滨以西至满洲里；待达成协议后，国民党军队再向北推进；政治问题可以通过划定军队防地求得解决。他警告蒋介石，国民政府“在东北的军事实力是软弱的，中共在东北则拥有战略上的优势”；国民政府如不采取灵活态度，就会丢掉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华北亦将随之崩溃。[81]

马歇尔此时对东北形势的估计还是冷静的、有预见性的。但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解决办法却很成问题。他向蒋介石提出先继续稳定华北，阻止东北内战向华北蔓延；在东北则先控制东北南部，巩固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的阵地，然后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东北北部的前途。这个方案虽然基本上没有超出他最初的设想，却已经大大地后退了一步，即承认了国民党军队用武力夺取东北南部战略要点的既成事实。

马歇尔为了推行他的计划，一面报告杜鲁门，美军准备停止向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一面向蒋介石提出四点建议，其核心是以在长春设立军调部长春指挥所和延缓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换取中共军队撤出长春和长春以北的关键城市。[82]

尽管马歇尔已经绞尽脑汁，蒋介石却不买账。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四平战役中取得了进展，所以蒋介石在5月12日向马歇尔提出了新的附加条件，即中共军队不能控制哈尔滨。他还要求马歇尔再等一等，不要主

动去找中共代表会谈。[83]为了进一步影响马歇尔，蒋介石还向马歇尔透露了斯大林邀请他访苏的消息。如果蒋介石在这一关键时刻通过对苏妥协解决东北问题，对马歇尔当然是一种负面强刺激，因蒋此举无疑会提高苏联在东北的地位。面对这一新情况，马歇尔只好暂时搁置他的“折中”方案。此后，他一再拒绝了中共代表为解决东北问题而提出的建议。

5月23日，中共军队撤出长春，国民党军队随后占领该城。以长春争夺战的结束为标志，马歇尔调处东北内战的第三阶段开始。马歇尔此时的战略一如既往，即支持国民政府控制长春和长春以南的地区，通过谈判解决长春以北的问题。作为交换条件，可以允许中共在东北北部的边远地区有一席之地。马歇尔对长春的既定目标已经通过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实现了，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忘乎所以。他非常清楚，中共军队主力没有严重损失，国民党军队如果再向北发展，困难会越来越多，而且苏联有可能因为感受到威胁而态度强硬。因此，他以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为契机，力主国共立即停战。为此他难免要更多地向国民党方面施加压力。

蒋介石对马歇尔的战略概念是了解的，他知道国民党占领长春后会面临马歇尔的压力。为了对付“既令人讨厌又不可缺少”的马歇尔的纠缠，蒋介石决定亲自到东北前线视察，以便直接掌握前线的局势。5月23日，他乘飞机前往沈阳，蒋此行赠给马歇尔一服甜药，即告诉后者他特别支持美方代表在三人执行小组中有最后决定权，否则东北停战就没有保证云云。[84]

马歇尔显然相信了蒋介石关于占领长春即停战的保证。他不仅无条件地把自己的专机借给蒋介石夫妇使用，而且于蒋介石离开南京的当天，向周恩来转达了蒋介石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三项条件。马歇尔特别强调了赋予美方代表决定权这一条的重要性，并声称由于蒋介石离开南京，除此三项条件外，就没有谈判的基础了。[85]马歇尔第三阶段的调处竟然以这种基调开场，这说明了他仍然存在利用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胜利压迫中共让步的侥幸心理。然而形势的发展很快迫使他不得不放弃这种打算。

蒋介石到东北后，显然是受到战地指挥官的影响，决心乘占领长春之势，进一步扩大战果。5月24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从沈阳两次致函马歇尔，就东北停战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她在第一封信中声称：作为停战的先决条件，中共不得阻碍国民政府根据中苏条约接收主权，不

得阻碍恢复全国的铁路交通，必须同意赋予军调部中美方代表最后裁决与决定之权。[86]在第二封信中，她进一步提出，中共军队在东北只能驻扎于新黑龙江省或旧吉林省境内。[87]不久后，蒋介石又指示宋子文向马歇尔说明，只要东北的中共军队溃败，关内问题就会更容易解决，马歇尔不必为此担忧，目前最好不要插手进行调处。[88]

直到这时，马歇尔才明白他轻信了蒋介石。蒋介石不仅否定了两天前对三人执行小组进入长春所做的承诺，而且欲在占领长春后继续向北发动进攻，这使马歇尔彻底丢掉了向中共讨价还价的资本。周恩来在答复蒋介石的条件时指出，目前是中国形势发展的转折点，马歇尔应有所抉择，如果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后仍不罢手，任何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战争将不可避免地蔓延到关内。为了拉住马歇尔，利用他与蒋介石在停战问题上的矛盾，周恩来还表示可以考虑美方代表的最后决定权，条件是需要对其范围做出规定。[89]

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后继续扩大武装冲突的行动，使蒋介石靠武力夺取全东北的计划与马歇尔“稳定关内”“先南后北”方针的矛盾很快凸显出来；中共在谈判中有争有让和在热河发动交通战，使马歇尔既感到华北地区的稳定受到威胁，又认为在停战问题上还有文章可做。5月26日，马歇尔在向杜鲁门汇报东北形势时说，他准备采取行动，敦促蒋介石在东北实行停战。[90]至此他终于决定向蒋介石施加压力。26日和31日，马歇尔两次致函蒋介石，毫不客气地指责他的行动是自食其言，并要求他命令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和追击。马歇尔在此期间还与国民党要员频繁接触，警告他们必须注意，中共军队主力并没有因失去长春而遭受严重损失，国民党军队却因战线太长而处于不利地位，在热河则更无优势可言；一旦锦榆地区有失，国民政府肯定会失去夺取长春后一度出现的有利的谈判地位，明智的做法是立即停战，并允许三人执行小组进入长春。他还声明，如果国民党方面不接受劝告，他就宣布退出调解。[91]

马歇尔的强硬态度在南京的国民党要员中引起不安。宋子文和王世杰立刻致函蒋介石，声称必须顾及马歇尔的面子。国民党军队能够大批进入东北全靠马歇尔的努力，现在不能使他在美国的地位受影响。他们建议允许三人执行小组进驻长春，因为这个小组不可能马上发挥实际作用，却可以给各方面一个安抚。[92]面对马歇尔的压力，蒋介石仍然采取拖延的方针。他一面继续在东北逗留，避免与马歇尔直接接触；一面指示宋子文转告马歇尔，三人执行小组可以进驻长春，但暂时不得开始

工作。[93]

马歇尔在以压蒋停战为主时，并没放弃以东北停战为条件向中共讨价还价。他先后向周恩来提出承认三人小组中的美方代表最后决定权、保证恢复交通以及退出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要求，结果均被周恩来拒绝。中共在谈判中强硬对抗的同时，加强了在热河和东北南部地区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在东北南部发动了鞍（山）海（城）战役，连克鞍山、营口和大石桥等战略重镇，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团，并促使驻守海城的一八四师直属队及一个团起义，这使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受到震动。中共军队的反击无疑增强了马歇尔的危机感，使马歇尔与蒋介石的矛盾更加尖锐。

马歇尔在四面碰壁之后，终于意识到除了向国民政府使出杀手锏，他已经无路可走了。6月5日，马歇尔打电报给杜鲁门，他终于决定不再安排美国海军运输船运送国民党军队和给养，直到东北停战谈判结束为止。[94]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拉法和新库地区正遭到中共军队的沉重打击，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被歼1800余人。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在南、北、西三个方向均受挫，在东北的进攻实际上已经到了极限。蒋介石被迫于 6月6日发布东北停战令，周恩来亦于同日发表东北停战声明。持续了将近半年的东北内战暂时平息。[95]

东北内战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马歇尔一直坚持为国民政府谋求在东北的军事优势，鼓励国民政府奉行对苏强硬政策，放手让国民党军队夺取长春，这些均是促使蒋介石不惜破坏已经达成的协议，在东北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重要原因。尽管马歇尔主观上并不希望东北发生内战，而且最终采取了压蒋停战的措施，但这不仅为时已晚，而且也不足以消除东北爆发大规模冲突造成的恶果。此时国共关系已极度恶化，中国形势又一次走到了根本转折的关头。

三 重蹈覆辙

6月东北休战是中国形势发展到关键时刻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东北内战虽然已经波及关内，但是尚未根本动摇全局。5月10日，国共达成汉口停战协议，相对缓和了中原形势，使关内的这个热点尚不至于立刻引发大规模冲突。[96]如果东北休战局面能长期持续，不能说中国没有实现和平的一线希望。当然，这只是就当时的客观态势而言。国共在关内和关外两个热点地区的冲突被控制住，看来只是暂时的，导致双方矛盾激化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和平的一线生机能否转变为光明的前景，既取决于当时国共谈判的结果，也取决于马歇尔调处的效果。

6月6日停战令发布后，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是在不损害中共战略利益的前提下，继续争取实现和平。在东北停战令发布的当天，周恩来在同马歇尔会谈时说，彻底解决东北问题的关键是不能接受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允许国民党军队有权接收苏军驻扎过的全部地方。周恩来一再强调，苏军撤退后，东北已无外交问题，国共争端只能通过双方谈判协商解决。[97]

6月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有关东北问题的谈判情况。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目前仍须“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98]两天后周恩来返回南京，随即将中共中央的决定通知马歇尔，并表示由于马歇尔仍有谋求和平的愿望，中共方面仍可与他合作。为了延长休战时间，周恩来还向马歇尔提出一个具体的谈判程序。他建议先解决停战及有关的军事问题，再谈政治问题，从而避免谈判长期拖延。[99]

国民政府同意东北休战是被迫的。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一味北进，客观上已经造成其部队孤悬于铁路交通线、三面受敌的局面。加之马歇尔决定美军停止为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和军用物资，使得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已经没有多少继续进攻之余地。然而，蒋介石并不愿承认东北战场已经形成的新的军事态势，他仍然企图凭借表面上的军事优势，利用休战期间的谈判，逼迫中共中央在降与战之间做出选择。因此，东北休战期间的谈判一开始，国民政府便采取强硬态度，而且停战的条件越提越苛刻。

蒋介石在6月6日发布的停战令中公开宣布：国民党军队停止进

攻“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100]同一天，他还致函马歇尔，提出应限制军调部长春前进指挥所的行动范围，要求该机构“先作准备工作，俟具体办法解决之时再行开始其任务”。事实上，如果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军调部长春前进指挥所将难免形同虚设。他在同一封信中还提出三项要求：（1）中共方面必须保证在东北首先执行整军方案；（2）恢复交通的决定权应交给美方代表；（3）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主权的行动不受限制。[101]国民党谈判代表徐永昌随后分别于10日和11日两次转告马歇尔，蒋介石认为马歇尔在谈判中应该享有最后决定权，而长春前进指挥所最好在15天以后开始工作。[102]

蒋介石对马歇尔采取这种讨价还价的办法，还是试图在东北造成一种不可能约束国民党军队军事行动的似战似和的局面，从而向中共中央施加军事压力。蒋介石的立场使东北停战后的缓和形势已经变得没有任何保障，局势始终紧绷，随时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东北休战后国共双方的谈判方针表明，马歇尔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几乎又回到原点，即能否实现停战。不同的是持续了三个多月的东北内战，已使杜鲁门政府的调处政策本身的矛盾彻底暴露，而且越来越尖锐。马歇尔这时再也不可能像他刚到中国那段时间那样，进行被认为算是公正的调处，甚至做做样子都很难。

如前所述，杜鲁门政府在1945年底调整对华政策时有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无论如何要维持住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二是无论如何要避免美军直接卷入中国内战。派遣马歇尔赴华调处国共冲突，是当时杜鲁门政府能找到的在不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前提下，维持住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的唯一办法。如果蒋介石下决心要发动内战，杜鲁门政府当然不可能因此就抛弃他。但这并不等于杜鲁门政府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并相信国民政府能够依靠武力消灭中共。支配杜鲁门政府（包括马歇尔在内）的基本看法是，国民政府并没有能力靠武力统一中国，内战对于国民政府肯定是一场旷日持久和不可能取胜的战争；其结果不仅有可能把美国拖下水，而且会导致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经济崩溃；一旦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进攻，为争取外部援助，中共就会更加积极地向苏联靠拢；而且苏联在东北内战发生后，已经表现出对国共内战不会袖手旁观的意向。

杜鲁门政府的上述基本看法没有因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取得暂时的胜利而改变。马歇尔反而从国民党军队的暂时胜利中，认识到国民党军队

的军事优势有多么脆弱，他认为国民党方面“对共产党力量估计的太低，而一个长期残酷的冲突或不可避免”。[103]而一旦国民政府在东北军事失败，其后果将是严重的。8月14日，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报告中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如果美国“被排斥在中国大门之外，用不了几十年就会出现这样的后果：苏联的扩张势力将控制满洲和中国内地的人力、原料和工业生产。那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就会在中国海及中国南方面临一个苏联的势力范围，这种势力范围同（日本人）1941年在那里所建立的颇为相似。不同的只是，苏联还可能会在欧洲和中东取得占压倒地位的优势”。[104]姑且不论这种预言是否合乎逻辑，其中表现出来的严重担忧却是一目了然的。

那么，美国怎样才能不被排斥在中国之外呢？尊重中国人民的意志，让他们自己决定中国的命运，任中国历史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吗？这一点美国领导人似乎想都没有想过。7月2日，马歇尔打电报给国务院，要求对中国形势的发展提供政治指导。艾奇逊的答复不外是同意马歇尔的估计，认为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中国问题仍是最稳妥的行动策略。[105]9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为重新考虑美国在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向国务院提交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指出，由于中国内战会引发种种不利的后果，杜鲁门政府应坚持其既定的政策目标，促进中国的政治统一，为达此目标，第一步还是要先促成国共停战。[106]

显然，在杜鲁门政府看来，只有避免爆发国共全面内战，美国才能在中国发挥其影响力。如果马歇尔调处失败，美国势必要重新估量对华政策，调整在整个东亚的战略。而这种调整的实质就是要从东亚大陆地区向后撤退，它迟早要放弃中国这块阵地。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提出的美国梦想将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变成一场噩梦。尽力避免出现这种结果才是马歇尔在国共关系濒于全面破裂之际，仍然不遗余力地斡旋其间的主要原因。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国际大环境的变化，马歇尔的调处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新限制。从3月开始，美苏关系进入冷战阶段，国际上美苏两大营垒的政治分野越来越清晰，它们之间的对立也越来越尖锐并向各地区蔓延。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使它在东亚对国民政府的依赖加强了。也就是说，为了“遏制”苏联向亚太地区的扩张，美国愈来愈需要加强国民政府的实力地位，把国民政府纳入反苏战略的轨道，使中国确实能起到“屏障”的作用。因此，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在潜移默化地发

生相应的变化，转向一面调处国共争端，一面增加给国民政府的援助。正是在遏制苏联的世界战略的带动下，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逐渐从主导地位转变成仅仅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

3、4月间，马歇尔回国述职。这期间，他在华盛顿为向国民政府增加援助而四处游说。6月13日，国务卿贝尔纳斯向众议院提交《拟予中华民国以军事顾问和援助的法案》。[107]这个法案的出炉无疑与马歇尔在华盛顿的40天游说有密切关系。结果是杜鲁门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援助由帮助其向内战地区运兵，扩大到提供各种军事和财政援助。这一决定无疑会冲击马歇尔的调处活动，因为杜鲁门政府向国民政府提供的援助越多，马歇尔控制蒋介石的能力就越弱，国共停战的可能性就越小。客观地看，马歇尔对局势的控制必然会随着美援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有气无力。

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动固然是限制马歇尔调处活动的客观因素，但是，既然他也是这一变动的支持者和执行者之一，这种变动就不可能不在他本人的态度中反映出来。如果说苏军从东北全部撤出之前，马歇尔担心的主要是如果不能稳定中国形势，就无法把苏联从东北排挤出去；那么苏军撤出东北之后，他更关心的则是争取和巩固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优势地位，阻止苏联再通过中共渗透进来。

马歇尔为国民政府谋求优势地位当然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他必须把为国民政府谋求优势的行动控制在不至于在中国引起全面内战的范围内。正是基于这种考虑，马歇尔一方面反对杜鲁门政府内部有关停止援助国民政府以保持中立的主张，坚持认为继续援华是影响国民政府和向中共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则试图把美援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避免鼓励国民政府发动毫无胜利希望的全面内战。马歇尔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既然奉行这样一种走钢丝的政策，其结果之一就是不得不在实际上扮演起蒋介石的心腹顾问的角色，尽管他们两人之间还是会不时地发生一些龃龉。

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动和马歇尔支持援助国民政府及为其在东北谋求军事优势的态度等，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确信，杜鲁门政府早晚会跳到国民政府的战壕里。在5月东北四平大战之时，蒋介石还需要借口前往东北视察，以回避与马歇尔的直接会谈。6月休战以后，他认为已经可以直接同马歇尔讨价了。东北停战令发布以后，军事三人小组的会谈集中于恢复交通、东北停战和国共军队的配置等问题。经过马歇尔

调处，军事三人小组相继达成了关于恢复交通和东北停战等协议。中共方面为维持暂时停战的局面，在谈判中多次做出让步；尤其在军事三人小组中的美军代表决定权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这是国共能就东北停战达成协议的关键。然而，中共方面一再表达的维持东北停战的意愿并没有换来国民党方面相应的让步，后者反而在修改整军方案的谈判中不断提出新的更苛刻的条件。结果是谈判一再陷入僵局。

国民党方面的强硬态度的确引起马歇尔的不满和不安。此时东北地区的内战刚刚停止，小规模冲突还时有发生；华北形势则是危若累卵。由于东北地区暂时平静，国共双方的注意力都转向了关内，结果是热河、山西、山东和中原等地区的局势迅速紧张起来。6月13日，马歇尔在给蒋介石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共不可能接受国民政府就军队配置问题提出的修改意见；为了促使中共在热河、察哈尔和山东等问题上妥协，国民政府应该在东北问题上做出让步。马歇尔的意图无非是要维持住东北已经形成的平衡，利用承认东北的现状，与中共在华北讨价还价，使中共让出热、察两地和山东的某些战略要点。如此国民政府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那些地区，从而在华北取得战略优势。马歇尔还提出，如果同时取得热、察两地有困难，国民政府还可以降低对察哈尔的要求。他最后提醒蒋介石，谈判的目的是使国民政府不遭到困难，除非真正影响重大战略利益的得失，否则蒋介石应避免提出使谈判拖延不决和根本不可能被中共方面接受的条件。[108]

马歇尔虽然企图限制国民政府漫天要价，但他毕竟是为国民政府在华北取得战略优势出谋划策，是在国民政府的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而已。然而，这仍然远远无法满足蒋介石已经大大膨胀起来的胃口。6月17日，蒋介石要求马歇尔向中共代表转达五项条件：（1）中共军队应于9月1日以前撤出热察两地；（2）国民党军队进占烟台和威海卫；（3）中共军队应于7月1日前撤出6月7日以来在山东攻占的地区，中共撤出地区由国民党军队接防；（4）国民党军队再向天津地区增派一个军；（5）在东北的中共军队撤出占领的各据点，包括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等，将上述各地交由国民党军队接防。[109]

蒋介石提出这些条件无异于公开否定1月停战谈判的全部成果。马歇尔亦感到这太过分了，所以他要求俞大维和徐永昌转告蒋介石，撤回所提条件。但国民党方面根本不予理睬。6月20日，马歇尔在会见时任国民党谈判代表的俞大维时施加压力说，美国不会在中国支持一场内

战；国民政府必须修改其建议，删去涉及热、察两地和山东地区的一些条款；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调动两个军应分批进行；应允许中共军队控制某些铁路，以及由中共军队继续控制赤峰，并且应将休战期再延长5天。[110]马歇尔提出这些建议固然反映了他对国民党方面的不满，但其实质是在接受蒋介石的条件的基础上，做出了若干修改，以便缓和矛盾，避免过分刺激中共。

不过，他提出上述那些修改毕竟也是一种姿态，反映出他非常担心谈判有可能立刻破裂。6月18日，马歇尔在向杜鲁门详细汇报谈判情况的电报中指出，中国的形势非常危急，国民党军队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苏联可能会公开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111]马歇尔在与蒋介石的一些谈话中，还反映出他担心的另一个后果。他向蒋介石指出，国民政府认为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中共可以很快被击溃，这种观点把中共的力量估计得太低。内战将是一场残酷的冲突，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必然导致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经济崩溃。[112]

经马歇尔交涉，蒋介石于6月21日宣布，东北休战延长到30日。蒋介石此时宣布延长休战期，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已经完成围攻中共中原部队的准备，第二天即开始发动全面进攻，而东北地区局势继续缓和，有利于关内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是因为马歇尔催逼甚急，延长东北休战期既在战略上对国民党军队有利，又可以照顾马歇尔的面子。蒋介石的这一决定可谓一举两得，他一面摆出宽宏大量的样子，另一面却没有忘记索取回报。他在向马歇尔转告东北休战期延长的同时，即提出两项新的附加条件：一是胶济铁路沿线的中共军队必须于8月1日以前撤退到铁路两侧30公里以外的地区；二是6月30日以前，必须修订军事三人小组和军调部的一致表决程序，给予美军代表最后决定权。[113]第一条是向中共讨价还价；第二条是给马歇尔一些甜头，对马歇尔表示信任。

在东北休战延长期的谈判中，中共代表为了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以完成军事准备，表示同意将在华北地区中共军队的重新配置问题列入谈判议程，这实际上是同意对整军方案进行修改。而国民政府却得寸进尺，在修改整军方案的建议中一再加码，要求中共军队必须于协议签订后做到：（1）10天内撤出6月7日以后在山东、山西占领的所有城镇；（2）10天内撤出华北铁道的济青线、津浦线和临枣线；（3）一个月内撤出承德、古北口和苏北。国民党方面还拒绝了中共代表提出的每

达成一项协议便立刻签署的办法，声称如果修改整军方案不能达成协议，宁可一个协议也不签署。[114]

国民政府提出的修改整军方案的建议和向中共中原部队发动全面进攻的行动已经表明，所谓的谈判不过是为了敷衍马歇尔。马歇尔对国民政府的意图并非心中无数，但他仍然抱着休战期谈判开始时的幻想，企图用维持东北既成事实，换取中共妥协。6月26日，马歇尔告诉周恩来，国民政府同意双方在东北地区的驻军比例可由1：14改为1：5，即3个中共师与15个国民党师。马歇尔这是想用中共在东北增加两个师来交换中共军队放弃其控制的华北诸多战略要点。这种想法的产生只能证明，他真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周恩来在答复时指责了这是国民政府的无理要求，但为了推迟全面内战，他表示中共军队可以撤出某些地区，条件是：国民党军队不准进驻；整编期间，双方军队分别驻在不威胁对方的地点；双方控制的某些地区可以不驻防，该地区民政由改组后的政府决定。[115]

6月27日，马歇尔向蒋介石转达了周恩来的建议。蒋介石在会谈中称，必须首先解决军事问题，否则政治问题无从解决。他进一步提出，中共军队应在10天内撤出苏北、胶济铁路、承德、古北口、哈尔滨和山东省。他可做的妥协是这些地区由国民党军队在一个月内进占。中共军队在此一个月内，还要从其他应该撤出的地方撤退，国民党军队可延缓两三个月再开入那些地区。至于中共军队撤出地区的地方政权，蒋介石只字未提。马歇尔当时便指出，中共根本不可能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他建议蒋介石放宽要求，在江苏、热河、哈尔滨、新黑龙江省、兴安省、嫩江省和察哈尔省的民政问题上让步，亦即中共军队撤出这些地区后，暂时维持地方政权的现状，然后通过谈判加以解决。[116]

此时蒋介石已经无意再通过谈判解决国共之间的各种争执了。他对马歇尔的建议不置一词，反而在第二天提出了新的军队整编四项原则。（1）在整军修正案中，国共双方军队总比例不变。（2）军队整编问题应整个解决，不得首先单独解决东北问题。（3）双方军队进入防区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三个月。（4）国民党方面的停战条件包括：①中共军队在协议签订10天内撤出6月7日后在山东和山西攻占的城市；②中共军队于协议签订后的10天内退出胶济全线、临枣支线和临城至徐州的铁路线；③中共军队在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撤出承德、古北口和苏北。[117]

蒋介石提出的上述对整军协议的修改方案与其说是谈判条件，不如

说是最后通牒，对此，中共代表立即予以拒绝。6月30日，也就是停战令到期的当天，马歇尔与蒋介石举行了一次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的会谈。[118]会后，国民党方面以宣传部名义发表了一份停战令期满后国民政府“和平方针不变”的声明。[119]这算是蒋介石给马歇尔的一个交代，但中国保持和平的最后一线机会也就这样消失了。

6月休战谈判由于国民党方面不断设置障碍而破裂，中共中央也认为已无法阻止国民党方面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全面内战之势已无可挽回。不能否认马歇尔主观上的确希望能阻止全面内战爆发，但他奉行的政策却使他越来越像是国民政府的说客。马歇尔这时已经明白，蒋介石和国民党已决心奉行武力消灭中共的政策，这是中国政治局势恶化的关键原因，他在29日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明确无误地指出了这一点。问题恰恰在于，在冷战爆发的背景之下，马歇尔尽管认识到这一点，却更加不愿采取措施迫使蒋介石改变态度。在整个6月休战谈判中，马歇尔对国民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尽管措辞尖锐，但实质上都是在国民党方面建议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些修正意见。马歇尔在给杜鲁门政府的报告中一再为他所谓的秉持公正辩护，但从这些报告中也不难看出，马歇尔对国民政府的每一次指责，都伴随着一次妥协。

马歇尔在6月谈判中的态度使蒋介石看到摊牌的时机已到。在 6月30日会谈中，蒋介石告诉马歇尔，他正准备于10月中旬召开国民大会。[120]早在1945年初，蒋介石为了对抗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就曾宣布召开国民大会，这成为战时最后一次国共谈判破裂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当时曾致函赫尔利，声明蒋介石的这一行动表明，国民政府“正固执地坚持独行其是”，“一方面表明他们没有实施民主改革的丝毫诚意。另一方面并为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与国民政府之间在这些情况下可能继续的谈判，不留余地”。[121]

这一次蒋介石可以说是故技重演，在向中共中原军队发动全面进攻的同时，公开以召开国民大会来对抗政协决议。马歇尔对此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反而声称他“颇为感动”。[122]马歇尔显然没有从赫尔利调处失败中汲取足够的教训，结果他终于踏上了与赫尔利一样的归途。

在收到马歇尔“感动”的反馈之后，蒋介石于7月2日向周恩来发出单方面声明，宣布国民党准备尽早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的此次谈话也成了1946年国共谈判的转折点。第二天，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97

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自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以后，国民党方面相继通过在东北挑起内战，破坏了停战协议；又通过6月东北休战谈判，撕毁了整军协议；现在又通过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彻底撕毁了政协决议。马歇尔与中共、民盟和其他民主人士在年初经过两个月共同努力获得的成果，从此被破坏殆尽。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马歇尔在其中的作用。当蒋介石在东北挑起大规模内战之时，马歇尔一度放手让国民党军队打出个究竟来，结果把停战协定这个被他称为中国统一的“奠基石”打得粉碎；当蒋介石在6月休战期谈判中提出修改整军方案时，马歇尔还努力为他出谋划策，以便成功地同中共讨价还价，结果他称为“中国的希望”的整军协议被一步步撕得粉碎；当国民党方面单方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时，马歇尔竟对这种撕毁政协决议的行动“颇为感动”，结果是彻底堵住了他所称的中国“通向制宪会议的道路”。

6月谈判失败和中国爆发全面内战是对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巨大冲击。尽管马歇尔在国民政府的泥塘里越陷越深，但他对中国内战会给美国的东亚战略带来何种程度的负面影响还是有所了解的。正因为如此，他并不甘心承认调处失败已成定局这个事实，仍然企图为摆脱困境寻找一条出路。

7月3～10日，由王世杰、陈诚、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等国共代表召开会议，讨论中共控制地区的地方政权问题。在6月休战谈判期间，周恩来曾经提出，为了实现和平，中共军队可撤出某些地区，条件是不得破坏那些地区的既有政权。[123]后蒋介石表示同意组成一个特别小组，讨论中共军队撤出地区的地方政权问题。五人小组谈判开始后，国民党代表提出，中共军队必须撤离热河的承德以南地区、东北的安东地区、山东的胶济铁路沿线和苏北地区；中共军队撤出后，必须交出地方政权，然后国民政府才能发布永久性停战令。中共代表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既然地方政权涉及的问题复杂且广泛，双方应该首先停战，然后予以讨论。结果是谈判一直在1月停战谈判中提出的老问题上兜圈子。由于国民政府坚持有条件的停战，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马歇尔这时认为，国民政府的态度已使停战不可能先于其他问题获得解决，于是又幻想从解决政治问题上找出路。他同新上任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经过讨论决定，将调处的重点从军事停战转向尽快组成一个有各方代表参加的国府委员会。马歇尔认为这样

做可能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中国的政治统一至少具备一个形式，美国政府可以有个交代；二是可以通过立法行动限制政府的行政权力，也就是加强控制蒋介石的权力。随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分别向蒋介石和周恩来建议，立即组织一个国、共、美三方代表参加的特别小组，讨论组织国府委员会的问题。[124]

结果是在8月5日，蒋介石很痛快地告诉司徒雷登，他同意组成一个“小型的非正式的五人小组”，由司徒雷登担任主席，讨论组织国府委员会的问题。[125]这个新方案可以说正中蒋介石的下怀。由国共美三方组织特别委员会来讨论改组政府，这一行动本身就违背了政协决议，无异于承认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是合法的。而且蒋介石自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后，一直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中共在政治问题上妥协。马歇尔此时着手讨论改组政府，实际上是对蒋介石又让了一步，客观上起到了配合国民政府策略的作用。组织起这样一个所谓的特别委员会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不可能有任何约束，只会给国民政府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即假装国民政府正在着手讨论政治改革。

随后不久，蒋介石为五人小组规定了工作目标：（1）实行1月10日的停战令；（2）执行2月9日恢复交通的命令；（3）实行2月25日的整军方案。他还提出，在讨论具体实施这些协议之前，中共必须接受五项条件：（1）苏北中共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2）中共部队撤离胶济路；（3）中共军队撤出承德和热河省的承德以南地区；（4）东北中共军队退至规定的两个半省内；（5）中共军队撤出6月7日以后在山西和山东占领的地区。[126]蒋介石对马歇尔可以说是以不变应万变，不管马歇尔如何绞尽脑汁，蒋介石总是守住他的一定之规。如果接受蒋介石提出的这些先决条件，五人小组根本不可能按马歇尔的设想工作，这不能不说是对马歇尔的嘲弄。

尽管如此，8月6日，司徒雷登回到南京的当天，就向周恩来转达了蒋介石的六项条件。[127]之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多次会见周恩来，提出中共应接受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条件，哪怕是部分也行，这样他们就可以敦促国民党方面召开非正式的五人小组会议，接着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和组织国府委员会，从而实际上形成一个经过改组的政府，其中有中共代表参加。之后他们就可以建议杜鲁门政府“千方百计协助改革和改组国民政府计划”。司徒雷登还声称，如果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就会在履行协议时得到公平待遇，并且向全世界表明其希望中国和平的诚意。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其实是又一次弹起了赫尔利调处时期提出的“先插进一只脚趾”政策的老调。中共中央即便按照他们的条件表示“和平的诚意”，中国仍无和平可言；如果按他们的建议派代表参加政府，结果还是要放弃“政协决议”，换来的至多不过是派几个人到国民政府中“去做官”而已。这样的交易中共中央在赫尔利调处时没有接受，现在当然也不会接受。所以中共中央在接到周恩来有关与司徒雷登谈话的报告后一天即回复：“蒋的五条绝不能接受。”[128]

至于杜鲁门政府到底是否会因为中共妥协就能帮助和推动改组国民政府，中共中央这时已经不抱什么幻想了。由于杜鲁门政府已经开始执行更积极地援助国民政府与调处国共矛盾两者并行的双重政策，以及其本人一再自食其言——不论是有意还是被迫的，马歇尔在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的地位已经直线滑落。他们不可能相信正在向国民党军队提供装备和物资的杜鲁门政府真的会“千方百计”地改组国民政府。实际上，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公开抨击杜鲁门政策了。

6月22日，毛泽东撰文评论美国援华法案，指出中共中央曾经在杜鲁门政府宣布履行莫斯科外长会议公报、国民政府保证停战和履行政协决议的条件下，未反对美国向中国提供某些军事援助；现在中国的现实是这些条件都已被破坏了，因此中共坚决反对美国以各种形式对国民政府的一切军事援助。[129]6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一项党内指示中说明，美国对华军事干涉日益露骨，国民政府的美国殖民地色彩日益显著，对此必须发动群众展开斗争。[130]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公开抨击杜鲁门政府的“援蒋政策”是企图取代日本，变中国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要求美国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131]这样公开给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定性，在马歇尔来华后还是第一次。第二天，周恩来将宣言转交马歇尔，并向他说明，中国正处于历史转变时期，美国有必要做出明确选择；明智的政策是不向内战中的一方提供援助，同时继续进行其调处工作。[132]

7月7日宣言发表后，中共军队与驻华美军的军事摩擦开始明显增加。13日，驻北宁路留守营车站的美军小分队因进入中共控制地区并向民兵开枪射击，被中共冀东地方部队解除武装。28日，驻塘沽芦台的美军与中共军队发生冲突，爆发了安平镇事件，这是中共军队与美军第一次发生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8月12日，中共中央在给周恩来的指示中说，今后一段时间主要靠军事斗争的胜利，在谈判中对马歇尔可持保留

态度，对美国的错误政策要彻底清算和批评。[133]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以中共中央7月7日宣言为标志，中共对美政策再次从争取合作转向对抗，与马歇尔的谈判不过是为了配合军事行动的一种方式。

由于蒋介石提出无理要求和中共代表的坚决拒绝，马歇尔提出的组织五人特别委员会的方案刚一出笼就夭折了。马歇尔尽管对中共进行了一番名副其实的讹诈，可他心里还是明白，这时谈判的根本障碍还是在于国民党军队正围攻中原中共军队，以及蒋介石为推动其武力政策而在谈判中漫天要价。他对蒋介石执迷不悟颇感愤慨且情绪经常难以控制。马歇尔在这期间的一系列会谈中一再向蒋介石指出，他的威望才是“中国最大的本钱”，如果国民政府方面再不做出令人满意的让步，就会在国内外把这个本钱丢掉。到那时，杜鲁门政府不会向挑起内战的国民党提供援助。他进一步要求国民政府在中共军队撤出地区的地方政权问题上妥协，并立即停止扩大正在进行中的军事进攻。8月8日，马歇尔很正式地告诉蒋介石，不要以为美国调处是为了使中共就范，国民政府目前的政策只能导致中共控制全中国，而且会为苏联的干涉提供特殊的机会；中共两个月来一直主张停止冲突，而国民党却明显地表现出缺乏诚意。[134]

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公开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他们的调处失败。他们在声明中说，现在谈判的症结是撤军地区地方政府的性质难以解决。[135]为了加强声明的效果，马歇尔建议杜鲁门以发私人信件的方式向蒋介石重申美国对华政策。结果杜鲁门于“马司联合声明”发表的同一天，通过驻美大使顾维钧转交给蒋介石一封信。杜鲁门在信中说，除非在和平解决中国内部问题方面在短期内真正取得进展，否则就不能指望美国舆论对中国保持慷慨大方的态度，到那时他就有必要向美国人民重新解释政府的立场。[136]

8月18日，杜鲁门下令停止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华法案中可能与内战有关的部分货品，不再批发给予国民政府的属于作战物资的出口许可证。国务卿贝尔纳斯也会见了正在巴黎开会的王世杰，表示对国民党方面在谈判中的态度“深感忧虑”。[137]马歇尔和杜鲁门政府在8月间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表明，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不肯妥协，破坏了马歇尔关于召集特殊小组会议、讨论组织国府委员会的计划；这个计划在马歇尔看来，是目前能够控制中国局势、避免内战无限制扩大的唯一出路。而蒋介石对此却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显然激化了国民政府与杜鲁门政府之间的矛盾。

杜鲁门政府的行动的确在国民政府中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王世杰一向认为，国民政府不能让马歇尔调处彻底失败，否则国民政府在外交上就会完全失去回旋余地。他在8月14日向蒋介石报告说，美国舆论虽然反共，但这种趋势充分发展还有待于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如果国民政府目前不对马歇尔让步，杜鲁门政府仍有可能采取一些不利的措施，美国舆论将会随之发生变化。他进一步分析指出：美国对华政策是和平与民主并立，但更重视的是停战。[138]这是在暗示蒋介石在这方面还是需要做些文章的。陈布雷亦向蒋介石建议，杜鲁门政府重视停战甚于民主是准确的评价，因此当前最好能缓和国共关系。[139]

蒋介石对这些建议不以为然，他不相信杜鲁门政府在冷战方兴未艾之时，会置国民政府于不顾。国民党内好战的军事领导人亦认为，美国担心内战无非是看不上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只要国民党军队取得对中共军队的军事胜利，杜鲁门政府的疑虑就会消失。这正是当时支配国民党领导集团的主要看法。蒋介石在给杜鲁门的复信中，除了敷衍几句准备配合马歇尔调处工作之外，就是把内战责任统统推给了中共。他声称杜鲁门政府真要想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就应该向中共施加压力。[140]言外之意就是杜鲁门政府应该给国民党军队更多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中国才能实现和平。蒋介石在后来会见马歇尔时，不仅继续坚持他提出的那些停战的先决条件，而且询问国民大会如无中共代表参加，美国将持何种态度。

显然，蒋介石此时已经有恃无恐了，他对杜鲁门政府暂时禁运部分军用物资并不觉得是个实质性的威胁。事实如美国国务院后来公布的白皮书所指出的那样，杜鲁门政府颁布这项禁令正值国民政府已经“贮有充足的器材、逐渐加紧它的军事攻势的时候”，因此它“显然没有效果”。[141]况且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仍有大量剩余物资等待出售，蒋介石相信，唯利是图的本性使杜鲁门政府很难放弃赚取利润的机会。就在杜鲁门宣布禁运12天之后，即8月30日，杜鲁门政府就同国民政府签署了转售太平洋诸岛剩余物资的协定，它提出的唯一理由是这些剩余物资不是军事装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杜鲁门第二天还写信告诉蒋介石，只有消除中国内战威胁，才便于美国进一步实施其援华计划。[142]

在6月休战谈判结束后的三个月里，马歇尔使尽了浑身解数，仍然不能前进一步。国共谈判的主题一变再变，离实质问题的解决却越来越远。马歇尔挖空心思设想出来的所谓先解决政治问题、用立法约束行政

权力的模式，被证明是毫无价值的，实在太不现实。首先，这个设想的前提就是否定中共代表提出的先无条件停战再谈其他问题的主张，中共中央不可能接受。其次，这个设想否定了政协决议，以致它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就是为召开拟议中的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自然不可能同意停战。实际情况是自这个设想被提出后，不论是蒋介石还是马歇尔，都把注意力放在使中共提交参加国府委员会和国大代表的名单上，使停战变成了要求中共政治上彻底让步的交换条件。

马歇尔的行动至少在客观上再一次鼓励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靠武力消灭中共的决心。就在马歇尔不厌其烦地向中共代表兜售他的“杰作”时，国民党军队继8月29日攻占承德后，又于9月底向张家口发动进攻。国共关系终于走到了全面破裂的关头。

国民党军队向张家口发动进攻之后，马歇尔显然意识到他退出调处的时刻已经到来。经过两天穿梭式的毫无实际意义的游说，马歇尔于10月1日通知蒋介石，除非迅速达成协议并停止战争，否则他将请杜鲁门召他回国，美国终止调处活动。[143]他同时将此信息传递给中共代表。

马歇尔的行动在国共两党中引起不同的反应。蒋介石很有些舍不得已经变成他的“心腹顾问”的马歇尔。自马歇尔提出组织五人特别小组的建议后，蒋介石一直企图通过他说服中共在政治上妥协，交出参加国民大会的名单。在没有彻底利用完他的所有价值之前，让他离去的确是“不可思议的”。10月2日，蒋介石通知马歇尔，他同意命令国民党军队对张家口的进攻停止5天。在此之前，他把“最大限度的让步”交给了马歇尔，包括：（1）国府委员中，中共8名，民盟4名，无党派人士1名，共13名，中共立即交出中共方面的名单和出席国大代表的名单；（2）规定中共军队的驻地，并限期移入那些驻地。[144]

马歇尔认为，蒋介石提出的这些要求是根本不可能被中共方面接受的。10月3日，他与司徒雷登经研究后共同提出了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可以用来与中共交换的条件：（1）中共提出参加国大代表的名单；（2）国府委员会名额中，中共占9名，民盟4名，共13名；（3）中共军队撤出苏北和大同周围地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马歇尔这时竟然还认为中共有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145]很可能是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暂时胜利使马歇尔也开始犯起低估中共力量的错误。由此观之，在这一点上，他此时与蒋介石如果还有什么区别的话，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了。

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中央对于马歇尔声明他将退出调处不置可否。当马歇尔提出暂停进攻张家口的条件时，中共代表断然予以拒绝，因为中共代表之前已经声明了在此问题上的态度：第一，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张家口，并将进攻的部队撤回原驻地；第二，在关内执行停战令的规定，国共双方军队撤出1月10日停战令生效以后占领的地区。这两点内容已经表明，中共中央极大地提高了当下停战的门槛，可马歇尔仍然执迷不悟。中共代表在会谈中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以暂停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作为讨价还价的条件，这表明他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146]马歇尔本来应该从中领悟到，中共代表实际上也是在指责他此刻竟然还为国民党方面说项。

10月8日，王炳南向司徒雷登转达了周恩来提出的三点答复：第一，休战应无时间限制，国民党军队应撤回原阵地；第二，有关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的议题不应受蒋介石的建议的限制；第三，中共不准备立刻答复蒋介石10月2日的备忘录，周恩来已无返回南京之必要。[147]至此马歇尔仍不死心，他第二天秘密飞往上海，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这次会谈是通过吉伦请周恩来吃午饭，而事前并未通知周恩来有马歇尔出席，才得以实现的。然而，尽管马歇尔如此费尽心机，他从周恩来的谈话中得到的信息却是：他的“调停努力结束了”。[148]

马歇尔10月调处的最终失败使他彻底失去了调处人的资格。此后他曾退居幕后导演第三方面调处，但被证明不过是一场短暂的闹剧。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时任国民党军队参谋长的陈诚声称，“也许3个月至多5个月”，便能完全打败中共军队。11月15日，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召开。周恩来于第二天发表声明说：“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当局一手关闭了。”[149]中国的全面内战已经打起来了，国民党包办的国大也召开了，马歇尔终于无事可做了。他认为中共方面“已不打算再接受美国按以往方针进行的调解”，他们已经把他“看成不受欢迎的人”。于是马歇尔打电报给杜鲁门，请求将他召回。[150]

1947年1月7日，杜鲁门政府宣布从中国召回总统特使马歇尔。第二天，号称“和平使者”、宣称以向中国传播和平福音为使命的马歇尔在中国内战的大炮声中离开南京。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功勋卓著、蜚声世界的美国将军为了实现美国的梦想，在中国整整奋斗了1年零10天，最后的命运仍然不免落在“水”中。杜鲁门政府在召回马歇尔的同时即宣布任命他为国务卿，这或许会多少冲淡一些马歇尔本人使华结局的悲剧

气氛。但是，失败就是失败。如果杜鲁门政府足够明智的话，本应从中吸取深刻教训，更早地从中国的内战中“脱身”。然而，事实是美国决策者们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继续步履蹒跚，其后果已经被历史证明是灾难性的。

[1]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25页。

[2] 《中共代表团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提议》，1945年10月27日，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9，第814~819页。

[3]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43页。

[4] 《中共代表向国民政府代表提出停止内战的四项办法》，1945年10月29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第22页；《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26页。

[5] 《政治协商会议延期》，《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73页。

[6] 《中央关于宣传与谈判等问题致周恩来、王若飞电》，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8~29页；《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26页。

[7] 《马歇尔与蒋介石会谈纪要》，1945年12月21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第814~819页。

[8] 《马歇尔与蒋介石会谈纪要》，1945年12月21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第814~819页。

[9] 《驻美大使魏道明呈蒋主席告与马歇尔特使晤谈要点电》，1945年12月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46~47页。

[10]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General Marshall”，December 29，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824.

[11] “Notes by General Marshall on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and Madame Chiang Kai-shek at Their Country Residence”，December 26，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p.814-815.

[12] 《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要》，1945年12月23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第820~824页。

[13] “General Marshall to President Truman”，December 29，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p.826.

[14] 《中共代表团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1日。

[15] “General Marshall to President Truman”，January 1，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p.1.

[16] 《政府代表复中共代表团信》，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1日。

[17] 《马歇尔特使上蒋主席提出国共双方停止军事冲突令稿之备忘录》，1946年1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63页。

[18] 《马歇尔与蒋介石会谈纪要》，1945年12月21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第817页。

[19] 《马歇尔特使上蒋主席提出国共双方停止军事冲突令稿之备忘录》，1946年1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63页。

[20]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35页。

[21] 《军事三人小组会谈记录》，1946年1月6、7、8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第877～915页。

[22] 《军委关于保卫承德、张垣的战斗部署给聂荣臻等的指示》，1945年1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7～8页。

[23] 《中共中央给重庆代表团的电报》，1946年1月9日。

[24] 《马歇尔与张群会谈记录》，1946年1月6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第877～884页。

[25] 《军事三人小组会谈记录》，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第946页。

[26] 《军事三人小组会谈记录》，1946年1月8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第917～924页。

[27] 《军事三人小组会谈记录》，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第965页。

[28] 《附：马歇尔特使所提“临时政府组织法”建议案节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71页。

[29] 《蒋主席批阅马歇尔特使所提“临时政府组织法”日记》，1946年1月23日，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70～71页。

[30] “General Marshall to President Truman ［Extract］”，January 24，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pp.142-143.

[31] “General Marshall to President Truman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February 1，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pp.151-152.

[32] “General Marshall to President Truman”，February 4，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p.206.

[33] “General Marshall to Lieutenant General Albert C.Wedemeyer”，January 13，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pp.178-178.

[34] “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Plans Staff of Lieutenant General Albert C.Wedemeyer”，January 13，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pp.177-188.

[35] 《马歇尔致张群周恩来备忘录》，1946年1月24日，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8～1947.3）》，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第78页。

[36] 参阅《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42页。

[37] “General Marshall to Lieutenant General Albert C.Wedemeyer”，January 13，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pp.178-178.

[38] 《张治中回忆录》（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739～740页；“General Marshall to Lieutenant General Albert C.Wedemeyer”，January 13，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pp.178-178；《马歇尔提出军队整编计划草案》，《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第969～974页。

[39]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37页。

[40] 《新华日报》1946年2月26日。

[41] 《中央关于停战后我党对满洲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0～21页。

[42] 《中共中央发言人关于东北现势与中共对东北问题的主张答新华社记者问》，1946年2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74～78页；《周恩来致马

歇尔关于中共对东北问题立场的声明书》，1946年3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第1104～1109页；《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50页。

[43] 《中央关于停战后我党对满洲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0～21页；《中共中央发言人关于东北现势与中共对东北问题的主张答新华社记者问》，1946年2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74～78页；《周恩来致马歇尔关于中共对东北问题立场的声明书》，1946年3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第1104～1109页。

[44] 《马歇尔将军对形势的估计》，《中美关系资料选辑》第1辑，第207～208页。

[45] 《满洲战地小组》，《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03页。

[46] “General Marshall to President Truman”，February 9，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pp.428-429.

[47] 《红军从满洲搬走“战利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17页。

[48] 《中央关于目前东北的工作方针的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60页。

[49] 《彭真关于有人警告东北绝不能打》，1946年1月26日。

[50] 《中央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1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50页。

[51] 《中共中央发言人谈中共对东北问题主张》，《新华日报》1946年2月16日。

[52] 《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9页。

[53] 《满洲战地小组》，《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03页。

[54]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45～646页。

[55]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28、46、49页。

[56] 《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1946年3月16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1049页。

[57] 《满洲战地小组》，《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03页。

[58] 《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方针给东北局和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3月13日；《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3月15日。以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89～91、92页。

[5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General Marshall”，March 10，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Ⅸ，pp.529-535.

[60]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50页。

[61] 《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华书局，1981，第72页。

[62] 《满洲战地小组》，《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03页。

[63] 《蒋委员长为军调部执行小组进入东北事指示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遵令践约电》，1946年3月3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97页。

[64] “General Marshall to Lieutenant General Alavan C.Gilem，Jr.”，April 6，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Ⅸ，pp.737-738.

[65] 《吉伦将军呈蒋主席“停止东北军事冲突方案”》，1946年4月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09页。

[66] 《蒋主席严正说明东北问题方针》，重庆《中央日报》1946年4月4日。

[67] 《军调部致东北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密令》，1946年3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94页。

[68] 《满洲战地小组》，《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05~206页。

[69] 《中央关于控制长春、哈尔滨及中东路保卫北满给东北的指示》，1946年3月24日；《中央关于东北停战前坚决保卫战略要地给林彪、彭真等的指示》，1946年3月25日；《中央关于东北目前工作方针给东北局及林彪的指示》，1946年3月27日。以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00~101、102~103、104~105页。

[70] 《中央关于东北停战前坚决保卫战略要地给林彪、彭真等的指示》，194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02~103页。

[71]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57页。

[72] 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946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5页。

[73] 《吉伦将军呈蒋主席“停止东北冲突方案”》，1946年4月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08~109页。

[74] 参阅《马歇尔将军对形势的估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08页。

[75] 《魏德迈参谋长上蒋主席报告与各方领袖及马歇尔特使晤谈电》，1946年4月1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12页。

[76] 《马歇尔将军对形势的估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08页。

[77] “Minutes of Meeting Between General Marshall and General Chou En-lai at House 28，Chungking”，April 23，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pp.792-793.

[78] “Proposal by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for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in Manchuria”，April 25，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pp.795-796.

[79] 《建议的折中办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09～210页。

[80] “Minutes of Meeting Between General Marshall and General Hsu Yung-chang at General Marshall’s House”，May 4，1946；“Memorandum by General Hsu Yung-chang to General Marshall”，May 8，1946.See 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pp.813，820.

[81] “Memorandum by General Marshall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May 10，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pp.824-828.

[82] “Summary of General Marshall’s Proposals for a Compromise Solution of the Manchurian Issues”，May 11，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p.833.

[83] 《蒋委员长条示关于东北停战之原则》，1946年5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24页。

[84] 《蒋主席复马歇尔特使同意其建议原则并告以政府基本立场函》，1946年5月2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36页。

[85] 《建议的折中办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10页。

[86] 《蒋夫人致马歇尔特使申述蒋主席对于停止冲突与恢复和平统一之意见函》，1946年5月2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27～128页。

[87] 《蒋夫人为前函补充意见致马歇尔特使函》，1946年5月2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28～

130页。

[88] 《蒋主席致宋子文院长嘱告马歇尔特使国军进入长春无碍于和平统一函》，1946年5月2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29～130页。

[89]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68～669页。

[90] “General Marshall to President Truman”，May 26，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Ⅸ，pp.902-903.

[91] 《蒋委员长的建议》，1946年5月2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12页。

[92] 《王世杰部长为在长春设军调处分部事上蒋委员长电》，1946年5月25日；《宋子文院长上蒋主席报告已转函马歇尔特使并说明政府不能容忍共党缺乏诚意电》，1945年5月26日。以上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30、131页。

[93] 《准备休战的办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13～214页。

[94] “General Marshall to President Truman”，June 5，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Ⅸ，p.979.

[95] 《蒋介石关于东北暂时停战的声明》，1945年6月6日；《周恩来关于东北停战的声明》，1946年6月6日。以上见《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第1306、1307页。

[96] 《军事三人小组达成关于停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1946年5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5月11日。

[97]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70～671页。

[98] 《中央关于力争和平与准备大打给郑位三的指示》，1946年6月10日；《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关于目前时局的谈话》，1946年6月14日。以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87、188～195页。《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70～671页。

[99] 参阅《休战期间的谈判》，《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14～215页。

[100] 《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第146页。

[101] 《蒋主席为东北国军停战事致马歇尔特使函》，1946年6月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76～177页。

[102] 《蒋主席日记摘录》，1946年6月10～1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

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78～179页。

[103] 《休战期间的谈判》，《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16页。

[104] “Colonel Marshall S.Carter to General Marshall”，August 14，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Ⅹ，pp.27-28.

[105] 《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第191页。

[106] “Draft Policy 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Embassy in China”，September 6，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Ⅹ，pp.147-148.

[107] 《1946年的对外援助》，《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71页。

[108] “Memorandum by General Marshall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OSE 168”，June 13，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Ⅸ，pp.1042-1044.

[109] 《休战期间的谈判》，《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15页。

[110] “Minutes of Meeting Between General Marshall and General Yu Ta-wei at 5 Ning Hai Road”，June 20，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Ⅸ，p.1105.

[111] “General Marshall to President Truman”，June 17，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Ⅸ，pp.1099-1101.

[112] 《休战期间的谈判》，《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16页。

[113] 《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第171～172页。

[114] “Memorandum from the Headquarter of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June 25，1946，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Ⅸ，pp.1193-1194.

[115] 参阅《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77～678页；《军事整编协议的修改及有关政治问题》，《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218～2219页。

[116] 《军事整编协议的修改及有关政治问题》，《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19页。

[117] 《蒋主席向马歇尔特使提示整军原则四项》，1946年6月2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89页。

[118] 《蒋主席与马歇尔特使商谈整军方案及军队驻地问题谈话纪要》，1946年6

月3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90～194页。

[119]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停战令期满惟政府和平方针不变之声明》，1946年6月3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94～185页。

[120] 《蒋主席与马歇尔特使商谈整军方案及军队驻地问题谈话纪要》，1946年6月3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93页。

[121] 《共产党的答复》，1945年3月9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51页。

[122] 《蒋主席与马歇尔特使商谈整军方案及军队驻地问题谈话纪要》，1946年6月3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后初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93页。

[123] 《马歇尔特使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变通办法谈话纪要》，1946年6月2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185～186页。

[124] 《五人小组的建议》，《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26～227页。

[125] 《五人小组的建议》，《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26页。

[126] 《五人小组的建议》，《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26～227页。

[127] 《司徒致国务卿》，1946年8月7日，〔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尤存、牛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第8页。

[128]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85页。

[129] 《毛泽东主席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解放日报》1946年6月23日。

[130] 《中央关于动员各群众团体要求美国改变对华反动政策的指示》，1946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16～217页。

[13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解放日报》1946年7月7日。

[132] 《中央关于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公报后我党对策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72～273页。

[133]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85页。

[134] 《马歇尔与司徒雷登的联合声明》，1946年8月10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27～228页。

[135] 《总统特使（马歇尔）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联合声明》，《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664～665页。

[136] 《杜鲁门总统致蒋电》，1946年8月10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70～671页。

[137] 《王世杰部长呈蒋主席告美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F.Byrnes）对我国近况深感忧虑电》，1946年7月2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207页。

[138] 《王世杰部长呈蒋主席告我如不停战使马歇尔陷于失败则美国舆论逆转于我不利电》，1946年8月1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210～211页。

[139] 《附：陈布雷主任对王世杰部长寒电研究之意见》，1946年8月1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211页。

[140] 《蒋委员长复电》，1946年8月28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30页。

[141] 《共产党对美国援华的憎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32页。

[142] 《杜鲁门总统致蒋电》，1946年8月31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30页。

[143] 《马歇尔将军考虑退出》，《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39～240页。

[144] 《蒋主席致马歇尔特使声明对于解决时局可能让步之最大限度备忘录》，1946年10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第221页。

[145] 《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第300页。

[146] 《共产党的态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44页。

[147] 《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第310页。

[148] 参阅《司徒致国务卿》，1946年10月9日，〔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8页。

[149] 《国民大会的召开》，《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55页。

[150] 《马歇尔将军拒绝继续为调解人》，《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262～

263页。

结语

1944年至1946年是世界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转向战后时代的关键期。在这历史性的年代中，美国政府先后派遣特使赫尔利和马歇尔代表两任总统出使中国，调处国共矛盾。这在当时是中外瞩目的重大事件，对后来中美关系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论是赫尔利还是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的结果都是铩羽而归。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面对着同样复杂而困难的问题，而且因为他们在贯彻从本质上看是一致的对华政策。本书的论述突出地证明了，尽管1944～1946年跨越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两个阶段，以及美国政府内部存在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争论，在中国国共斗争也进入转折的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却保持着明显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这是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失败的主要原因。

从历史的进程看，赫尔利和马歇尔调处国共关系的失败，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转折点。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曾给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巨大的援助，建立在共同反对日本侵略扩张基础上的中美同盟本来可以使美国与中国发展更友好、正常和稳定的关系，并使美国对中国的和平与发展有所贡献，但是，美国的罗斯福和杜鲁门两届政府却无法适应中国急剧变化的现实，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推行了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艾奇逊在1949年发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中把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揭示得一清二楚。他说："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基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在政府能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的途径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另一个目的是协助国民政府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症结就在于，美国要协助"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的国民政府，当时并无意"沿着民主的途径进步"和"使中国得到和平"，而美国政府却把国民政府当作"唯一的选择"，企图通过维持国民党政权来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

事实表明，1944年至1946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在恶性循环中转圈。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赫尔利和马歇尔不可能有多大作为，结果难免殊途同归，一样走上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政权的道路。当然，这

并不是说赫尔利和马歇尔对美国奉行不现实的对华政策不负有责任。他们不仅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而且都参与制定美国的对华政策，有时甚至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作茧自缚或许最能恰当地形容他们在中国调处的结局。

赫尔利和马歇尔调处失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此后几十年的中美关系历史演变中，处处可以感受到这种影响的存在，今天的美国政府仍然可以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

参考文献

一 史料集、文选

《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重庆出版社，1989。

本书编译组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尤存、牛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华书局，1981。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重庆出版社，1992。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七编《战后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北京外国语学院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4。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8～1947.3）》，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中央日报五十年来社论选集》，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3、7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6、199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二 年谱与大事记

《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李先念年谱（一九〇九—一九四八）》，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一九〇二—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三 回忆录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瞿同祖、赵曾玖译，商务印书馆，1976。

〔美〕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万高潮、卫大匡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4。

〔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伍协力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英〕F.C.琼斯、休·博顿、B.R.皮尔恩：《1942～1946年的远东》，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达州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台北："中央"日报社，1980。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李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陈启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75。

〔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

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80。

〔美〕威廉·李海：《我在现场：罗斯福、杜鲁门顾问回忆录》，马登革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苏〕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万成才译，新华出版社，1980。

〔美〕魏德迈：《魏德迈报告》，台北：光复书局，1959。

〔美〕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王益、王昭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苏〕亚·米·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三 著作

〔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译，新华出版社，2001。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刘维宁等译，北京出版社，1984。

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台北：“中国美术印刷厂”，1964。

《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郭荣赵：《中美战时合作之悲剧》，台北：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1979。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

〔美〕杰克·萨姆森：《陈纳德》，石继成、许忆宁译，东方出版社，1990。

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

石啸冲：《历史转变的年代（1945～1946）》，中外出版社，1946。

〔英〕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徐曰彪编《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四 英文文献

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alt Press，1958）.

James F.Byrnes，*Speaking Frankly*（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47）.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well’s Command Problems*（Washington D.C.：Office of the Chief Military，Dept.of the Army，1956）.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well'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 D.C.：Office of the Chief Military，Dept.of the Army，1953）.

Donald G.Gillin and Romon H.Myer ed.，*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airy of Cgang Kia-Ngau*（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Elliott Roosevelt，*As He Saw It*（New York：Duell，Sloan & Pearce，1946）.

Joseph W.Esherick，edited，*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Ⅱ *Despatches of John S.Service*（New York：Random house，1975）.

Donald G.Gillin and Romon H.Myer，edited，*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airy of Chang Kia Ngau*（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1989）.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

Herbert Feis，*Japan Subdued*：*The Atomic Bomb and the End of the War in the Pacific*（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

Herbert Feis，*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Henry L.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48）.

John Paton Davis，*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New York：Norton Press，1972）.

Russel D.Buhite，*Patrick J.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thaca，N.Y.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

Sergei N.Goncharov，John W.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 and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Theodore H.White，*The Stiwell Papers*（New York：W.Sloane Associates，1948）.

Sumner Welles，*Seven Decision That Shaped History*（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50）.

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

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4，China*，Volume VI（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7）.

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ume VII（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

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5）.

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The Far East，China，*Volume* IX（*Washington 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艾登 Eden，Anthony

艾其森 Atcheson，George，Jr.

艾奇逊 Acheson，Dean

艾森豪威尔 Eisenhower，Dwight David

安东诺夫 Antonov，N.

包瑞德 Barrett，David D.

贝尔纳斯 Bynes，James F.

彼得洛夫 Petrov，A.A.

伯德 Bird，Willis H.

陈纳德 Chennault，Claire L.

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

戴维斯 Davis，John P.

德帕斯 Depass，Morris B.

迪恩 Deane，John R.

杜鲁门 Truman，Harry S.

高斯 Gauss，Clarence E.

格鲁 Grew，Jopseph C.

哈尔西 Halsey，William Frederick Jr.

哈里曼 Harriman，W.Averell

赫尔 Hull，Cordell

赫尔 Hull，John E.

赫尔利 Hurley，Patrick J.

华莱士 Wallace，Henry

华西列夫斯基 Vasilevsky，Aleksandr Mikhailovich

霍普金斯 Hopkins，Harry

吉伦 Gillem，Alvan C.

居里 Currie，Lauchlin

凯南 Kennan，Hon George

李海 Leahy，William D.

卢登 Ludden，Raymond

罗斯福 Roosevelt，Franklin

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vsky，Rodin Yakpvlevich

马歇尔 Marshall，George C.

麦克阿瑟 Arthur MacArthur，Jr.

麦克罗 McClure，Robert B.

麦瑞尔 Merrill，Frank

梅乐斯 Miles，Milton

莫洛托夫 Molotov，V.M.

纳尔逊 Nelson，Donald

尼米兹 Nimitz，Chester William

丘吉尔 Churchill，Weston Spencer

舍伍德 Sherwood，Robert E.

史迪威 Stilwell，JosephW.

史密斯 Smith，Robert

史汀生 Stimson，Henry Lewis

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斯大林 Stalin，Joseph

斯科比 Scobie，Ronald Mackenzie

斯普鲁恩斯 Spruance，Raymond Ames

斯退汀纽斯 Stettinius，Edward Reilly

田贝 Denby，Charles

铁托 Tito，Jesoph

韦尔斯 Welles，Sumner

魏德迈 Wedemeyer，Albert

文森特 Vincent，Hon.John Carter

谢伟思 Service，John S.

庄莱特 Drumright，Everett F.

后记

回溯20世纪40年代中美关系历史中的一段往事——美国的罗斯福和杜鲁门两届政府深度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直接参与调处国共矛盾，固然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过程对于美国外交历史来说极为独特，以及在当时的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包括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历史命运和很长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前景，毕竟，美国调处国共矛盾的失败导致了那个历史阶段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终结。不过，在中美建交4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感受到这段历史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对于研究中美关系历史来说，继续研究和思考这段历史也还是有启发、有意义的。所以再版这本书是值得的，希望读者能从中受益。

这本书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撰写的，这次再版是第三版了，如果算上繁体字版的话，也可以说是第四版。我这次主要做的是修订文字和注释；有的章节补充了新的内容，主要是根据新的档案，对有些事件的过程或我的一些判断等，做更充分的叙述和解释。可以肯定地说，过了这么多年，我对这段美国对华政策所涉及的各方面以及它给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美中关系乃至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等，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和看法，但这些通过修订这本以叙事为主的书是很难呈现的，那需要另写一部专门的著作。好在这本书的叙事还是自成一体的，内容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其价值的，所以新版本保持了原有的框架和主要内容。这本书再版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这里表示由衷的感谢。

牛军

2020年11月于八仙别墅闲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牛军著.--3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0

ISBN 978-7-5201-8871-5

I.①从… II.①牛… III.①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作用-国共合作-研究 IV.①D8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67001号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

——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第三版）

著者/牛军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宋荣欣

责任编辑/李丽丽 石岩

文稿编辑/李蓉蓉 等

责任印制/王京美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3.5 字数：292千字

版次/2021年10月第1版 202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871-5

定价/9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54
装帧设计 / 王子君

启微

1944—1946 年是 20 世纪里特殊的几年。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看，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结束到战后美苏爆发冷战的关键时期；从中国历史看，它又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并最终爆发全面内战的关键时期。在这两年多里，美国政府先后派遣了赫尔利和马歇尔两位将军以总统特使身份赴华调处国共矛盾。他们直接深入参与了当时的国共谈判，结果均以失败告终，这对整个东亚地区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本书利用大量档案资料，细致叙述、深入分析了这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以及美国、苏联、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等四方之间的互动及影响。对于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本书不容错过。

从 赫 尔 利 到 马 歇 尔


启微官方微博


ISBN 978-7-5201-8871-5

9 787520 188715

定价：99.00元



肖瑜 江艺鹏——著

从蜜月走向对抗

冷战初期的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研究（1948~1953）

From Honeymoon to Confrontation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Israel in the Early Cold War (1948-1953)

二战前苏联政府为什么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战后斯大林为什么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
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莫斯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苏联和以色列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什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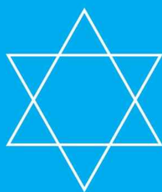
肖瑜，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史学博士学位，曾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历史学系访学（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研究方向为俄国史、中俄关系史和中东史。曾在 *Israel Affairs*、《世界历史》、《中共党史研究》、《冷战国际史研究》和《学术研究》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江艺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在读，本硕阶段就读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取得中山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曾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历史学系访学（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研究方向为中苏关系史、苏联对以色列外交政策史。



From Honeymoon to Confrontation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Israel in the Early Cold War (1948-1953)

从蜜月走向对抗

冷战初期的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研究

（1948~1953）



肖　瑜
江艺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大史学丛书》编辑说明

中山大学历史学科肇始于学校创立之日，近百年来，始终在中国学术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即在中山大学筹设。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由此兼祧两校史学之学脉。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岑仲勉、梁方仲、朱希祖、刘节、朱谦之、陈序经、罗香林、容肇祖、端木正、戴裔煊、梁钊韬、朱杰勤、金应熙、陈锡祺、蒋湘泽、何肇发等多位大师、名家，先后在历史学系任教，为历史学系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和优秀的传统。他们的学术事业，构成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精彩篇章，他们创设并发展的诸多学术领域，至今仍为历史学系具有特色和优势的学术园地。其教泽绵长，历史学系历代学人均受沾溉，濡染浸润，以研求学问为职志，以守护学风为己任。

近数十年来，历史学系同仁奋发有为，在继承前辈学术传统基础上，依托新时期不断改善的治学条件，把握当代史学发展趋势，在学术道路上艰辛求索，在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与敦煌学、宋史、明清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外关系史、历史人类学、东南亚史、国际关系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学术领域，勤奋治学，作育英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历史学系学者的研究既体现了深耕细作、发幽阐微的朴实学风，也突出了跨学科交叉的特色，以及对学术理念和方法执着追求的精神。近年，历史学系之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均曾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学科亦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学科，显示了历史学系学术实力整体上的提升。

为了集中展现历史学系学者们的学术成果，历史学系从2015年就开始筹划出版《中大史学文丛》。《中大史学文丛》第一批著作从2016年开始已经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时隔几年，在前辈学者优良学风的引领下，历史学系诸多中青年学者的学术成果也陆续问世。我们觉得有必要继续计划和推进《中大史学文丛》的出版。这一计划提出之后，得到了历史学系诸多中青年学者的积极回

应。经过历史学系学术委员会组织审核，2019年有七本专著列入中山大学学科建设专项经费出版资助计划，以《中大史学丛书》名称出版。由于七本专著的作者治学领域各异，且各有学术联系，《中大史学丛书》将由不同出版机构出版，但在作者和编辑的共同努力下，应同样能体现历史学系作为一个学术集体的风貌。

我们希望今后能够将《中大史学丛书》持续出版下去，将历史学系同仁的学术成果展现出来，及时总结学术成果，以便筹谋更好的未来发展计划，持续地推进历史学系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

《中大史学丛书》编委会

2020年12月

序言

很高兴得知肖瑜和江艺鹏的用心之作《从蜜月走向对抗——冷战初期的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研究（1948～1953）》即将出版。通读全稿，感觉此项研究成果学术品味的厚重。

巴勒斯坦分治暨以色列建国，是二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大事，不仅颠覆性地再造了中东政治格局，而且永久改变了地区社会生态环境，无论是冷战期间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的多次热战，还是中东政治格局万花筒般的演变。

一战后获得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权的大英帝国，在这场博弈中输得干干净净。本书的两位作者通过发掘史料，特别是引证冷战后新披露的史料，透彻地展示了斯大林在围绕巴勒斯坦前途而展开的复杂诡异的多方博弈中做出的精明决策，通过清晰地梳理逻辑关系，否定了对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种种不实猜测，并对斯大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看似矛盾的犹太政策进行深入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这本书对从事中东研究的学者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了解历史，也对理解当下中东的复杂博弈有所帮助。书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耶路撒冷“俄国财产”问题的生成及其对苏以关系的影响，以及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复杂博弈，有助于读者丰富对苏以关系的认识。俄罗斯同耶路撒冷的历史联系和俄国东正教财产在耶路撒冷的客观存在，是俄罗斯在中东掌握一定话语权的重要资本。缺乏对俄以特殊历史关系和现实关系的了解，特别是缺乏对东正教纽带作用以及东正教文化圈犹太移民影响的了解，很难对某些中东事务做出比较准确的分析。

人们常对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大发议论，对俄罗斯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和苏联在阿以冲突中的作用重视不够，这就妨碍了对复杂中东冲突的准确理解。事实再清楚不过了：没有苏联集团的5张赞成票，分治决议不会获得通过，二战后中东的历史还不知道会怎样书写。实际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仅限于政治和法律层面，以色列从美国争取到

的资金支持全部来自美国犹太社团，并非美国政府。美国严格遵守联合国对巴勒斯坦及其周边国家的武器禁运政策，也没有向以色列提供任何军事支持。由于犹太地下组织的几十个武器藏匿点在1946年6月被英军发现，1947年初的犹太武装仅装备了1万条旧步枪和1挺重机枪，根本无法赢得必将到来的战争。面对阿犹军事实力的绝对失衡，有意支持巴勒斯坦分治的苏联接受了犹太方面的请求，授权捷克向犹太复国组织出售武器，并在战前制止了捷克同阿拉伯国家的武器交易。苏联缩小阿犹军事实力差距的操作，为以色列在战争初期抵御阿拉伯联军的进攻提供了切实的军火保障，及时运抵以色列的捷克新型战机则在埃及军队逼近特拉维夫时发挥了关键的恐吓作用，是导致埃及军队撤退的重要因素。显而易见，离开了捷克军火，1949年的停火线不会是现在地图上标示的走向。可以说，以色列得以建国离不开美国和苏联共同的政治支持，而以色列国得以生存，又离不开苏联在违规出售军火上对以色列的绝对偏袒。

不仅如此，开战6周后美苏联手促成的第一次停火，既为以色列提供了整饬内部扩充兵员的机会，也为其继续补充军火提供了充裕的时间。一个常被人们忽视的细节是：在安理会表决进一步武器禁运时，苏联投的是弃权票，摆出了不阻止的姿态，致使英国不得不停止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而捷克却对禁运决议置若罔闻，布拉格—以色列武器空运通道继续保持畅通，直至以色列胜券在握。与此同时，美苏两国在停火期间相继宣布同以色列互派使节，强化了对以色列的政治支持。美苏的默契配合，不仅仅是对以色列的共同偏袒，实质上是两强左右战后世界格局意志的展现，阿拉伯方面和英国有苦难言。至于阿拉伯参战国在停火期间的纷争内斗及其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根本利益的历史性伤害，则是另外的话题。本书作者对捷克武器交易的相关论述和史料引用，是非常必要和到位的。

需要指出的是，也正是苏联，在1955年转而武装以色列的敌人，安排捷克同埃及签订了大批苏联军火供应协议，助长了纳赛尔的勇气，为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演变为战争进行了重要铺垫。战争爆发后，美国和苏联又联手逼迫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撤出占领埃及国土的军队，进一步挤压了英法在中东存在的空间。

从支持巴勒斯坦分治并安排捷克为以色列提供军事保障，到假手捷克大规模武装埃及，苏联在中东联手美国排挤英国的战略意图是非常清

晰的，苏联的这一意图同美国不谋而合，为日后美苏在中东的大博弈挪开了绊脚石。

中国中东关系的研究者对本书的兴趣或许更大。在巴勒斯坦分治和阿以战争的是非问题上，中国朝野意见不一。国民政府对分治方案的立场同英国的比较接近，认为分治有可能引发流血，苏联的目的在于染指中东，但犹太人的愿望应得到关切。分治决议表决当日，《中央日报》以“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的方式宣布：“对圣地分治计划，我不拟投反对票。”实际表决时，国民政府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投了弃权票。随后的《中央日报》对愈演愈烈的阿犹冲突做了连续报道，以色列建国前夕又做了整版图文并茂的背景介绍，日后对战争进程的醒目报道则不断，立场都是中性的。

相比之下，解放区报纸的报道则同苏联的立场保持一致，对战争起因和进程的报道一边倒支持以色列，对以色列建国的报道冠以“犹太人结束两千年流浪生活，近东成立以色列国”的标题，将战争爆发的原因归结为“英帝国主义策动的结果”，指责英国在宣布放弃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同时，与“阿拉伯各国反动政府先后订立了各种秘密协定，同意将巴勒斯坦分割给它们，挑动这些国家的反动统治者准备和进行这次反犹战争”。而“犹太方面正在做坚决的正义的抵抗”。以新华社名义发布的报道对美国、英国和苏联的立场则总结为“英美矛盾趋尖锐，苏联同情以色列国遭侵略”。这些以新华社名义发出的报道和评论在时间上往往滞后两周左右，基本摘编自苏联英文外宣刊物《新时代周刊》的文章或该刊转载的塔斯社电文。国际时政刊物《世界知识》和东北解放区新华书店出版的《巴勒斯坦问题真相》等中文书刊的表述均同苏联的立场保持一致。总体看来，中国各派媒体要么保持中立，要么支持以色列，只有北平出现了民间团体组织声援阿拉伯国家的游行。

作为中国中东关系的研究者，将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社会各方对阿以冲突的立场作客观比较，并结合本书相关论述做进一步思考，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随着中东时局的发展和苏以关系的恶化，新中国的相关立场也出现了调整。本书第五章论述的苏联国内反犹运动也对中国造成了一定影响。1953年1月13日，塔斯社公布了被西方称为“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的报道和《真理报》社论，宣称“以犹太医生为主的暗杀和间谍集团通过医疗手段谋害苏联领导人”。1月16日的《人民日报》便头版头条转载，日后在国内民族身份认定工作中也转为采取更

谨慎的政策。

但是，中国和以色列的外交接触没有受到直接影响。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谈判返程时在缅甸停留，专门批准邀请以色列驻缅甸公使出席中国使馆的招待会，并同以色列外交代表进行了友好交谈，后又出于外交需要，安排以色列驻莫斯科公使访华。尽管1956年苏伊士战争后中国中断了同以色列的外交接触，但在次年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期间，毛泽东主席仍应以色列共产党主席米库尼斯的请求，同赫鲁晓夫交涉苏联压制犹太文化的问题。几个月后，新版犹太祈祷书就出现在莫斯科各个书店，并被转送到以色列。毛泽东的义举感动了以色列首席拉比赫尔佐格。1973年5月，中国驻雅典大使误入以色列使馆，中以关系再次触动了以色列媒体。以色列《最新消息报》用心良苦，不仅追忆了50年代中期中国和以色列在缅甸的外交接触，刊登了以色列前总理艾什科尔1965年致周恩来总理请求发展双边关系的信件影印件，还以《毛主席被要求干预苏联犹太事务》为题目，首次披露了上述史料，并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照片，一组报道用了整整了两个版面。多年后，老赫尔佐格之子哈伊姆·赫尔佐格当上了以色列第6任总统，他在1992年中以建交后立即访华，特意在招待会上同致力于中以早期外交接触的中国驻缅甸前大使姚仲明握手致谢。2021年，哈伊姆·赫尔佐格的儿子伊萨克·赫尔佐格又当选以色列第11任总统。历史回顾就是这样引人入胜，文化纽带也是这样结成的。

尽可能发掘和利用历史档案，是历史研究者进行研究的重要方法。肖瑜博士在书中详列了相关档案线索和学界的各种见解及相关著述，并依据可靠的史料和严谨的逻辑分析对关键争议点直抒己见，在苏联犹太政策研究领域里做出了显著贡献。笔者对他的研究工作有比较多的了解，从十几年前他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到论文完成，同他做过多次深入讨论，很赞赏他潜心学问，谦逊而又倔强的学术秉性，这也是沈门弟子应有的学风。

殷罡

2021年10月17日肖瑜书稿序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东地区作为国际政治焦点一直被世人关注。宗教分歧、民族仇恨、领土纠葛、经济摩擦、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以致武装冲突，都使得这一地区处于随时可能出现动乱的状态。

巴勒斯坦问题的起因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众所周知，以色列是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下建立的，特别是苏联的支持更具有实质意义。以色列成立于冷战初期，在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对抗的年代，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往往都是针锋相对，然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莫斯科和华盛顿同时选择了支持犹太人建国的政策。特别是苏联方面，从1947年4～5月联合国大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会议开始，就坚定不移为犹太人摇旗呐喊。如果没有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支持，作为现代以色列国成立的政治保证和法律基础的《巴勒斯坦将来处理（分治计划）问题的第181（二）号决议》就不可能通过。1948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为以色列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此外，在苏联的默许下，大批东欧犹太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巴勒斯坦，保证了以色列的人口数量和充足兵源。在很大程度上，以色列正是依靠这些武器装备和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才打赢了这场战争。

当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西方观察家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苏联会支持犹太人。考虑到苏联自沙俄时期就存在的反犹主义传统以及苏联政府多年来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敌视态度。二战后初期斯大林的亲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确让人难以理解。直到今天，国内外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依然众说纷纭。

斯大林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建国的政策发生在1948年，但是历史却要求我们从多年以来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关系发展变化来进行追根溯源。在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个问题上，苏联领导人的态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苏德战争爆发之前，一直强烈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苏德战争期间，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有所缓和，但是并未从根

本上改变其敌视政策；1947～1949年，苏联政府开始不遗余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保证了以色列的成立。

那么二战前苏联政府为什么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战争期间苏联和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如何进行交往，战后斯大林为什么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在犹太人建国过程中莫斯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本书所要关注的问题。作者拟在详细研究和解读近二十年来公布的苏联和以色列档案文献的基础上，以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关系发展变化为线索和切入点，逐步分析这些问题。

- 绪论
- 第一章 1945年之前的苏联犹太政策
  - 第一节 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犹太人
  -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犹太外交
  - 第三节 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与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往来与合作
- 第二章 二战后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建国政策的形成
  - 第一节 战后初期苏联的大国合作战略
  - 第二节 英美在犹太人问题上的矛盾
  - 第三节 莫斯科来电与苏联巴勒斯坦政策的转变
- 第三章 以色列建国前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支持
  - 第一节 苏联集团在联合国对犹太人的支持
  - 第二节 大批东欧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
  - 第三节 来自东欧的军事援助
  - 第四节 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原因分析
- 第四章 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问题与苏以关系的破裂
  - 第一节 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问题之由来
  - 第二节 冷战初期苏以双方在“俄国财产”问题上的互动
  - 第三节 苏以双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分歧及其对财产问题的影响
  - 第四节 苏联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第五节 “俄国财产”问题的最终解决
- 第五章 二战后苏联国内的反犹政策与苏以断交
  - 第一节 苏联犹太人民族意识的觉醒
  - 第二节 战后苏联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 俄文文献
  - 二 英文文献
  - 三 中文文献
- 后记

绪论

本书主要通过研究冷战初期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的发展变化来探究二战后斯大林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的原因、苏联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苏以关系恶化的原因。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主要基于五个方面考虑。

第一，以色列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下建立的，而苏联方面的支持则更具有实际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关注较少。因缺少相应的档案文献作支撑，一些有限的研究成果也多具有主观推测的性质。冷战结束后，与此问题相关的各国档案文献尤其是苏联档案的解密，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能。通过对多方档案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综合探究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深层次原因。

第二，斯大林在极力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同时，又在国内发动了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为标志的大规模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并扩展到东欧。1952年的“医生间谍案”更是把苏联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由此可见，斯大林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与其对国内犹太人的政策具有某种互动性。通过对这种互动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二战后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复杂性。

第三，苏联政府从十月革命起就把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视为反动势力，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政府突然改变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敌对立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苏联的中东政策是其冷战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斯大林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则是这一时期苏联中东[1]政策的晴雨表，通过研究这一问题，对探索斯大林冷战战略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四，苏联和以色列关系的发展变化与二战后美苏关系逐步由热变冷，直到发生冷战密切相关。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考察冷战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展现形式。这正是目前冷战史研究的新特征之一。

第五，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一部学术专著。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力图起到填补学术空白的作用。

国外学术界（包括俄国史学界和西方史学界）对战后初期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研究一般来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

从冷战时期开始，欧美学者就很重视对苏联中东政策的研究，但大部分对苏联意图的官方解释和专家意见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由于缺乏足够的材料和交流，欧美学者只能通过苏联政府的对外宣传和实际行动来猜测最高决策层的想法。

1959年，英国历史学家沃尔特·Z.拉克（Walter Z. Laqueur）的《苏联与中东》[2]在美国出版了，这本书的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经贸、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他认为巴勒斯坦对苏联而言是次要的，支持犹太人建国是斯大林在心不在焉的时候批准的。还有些学者认为苏联的政策是进攻性的。在革命意识形态和传统的俄国帝国主义思想的综合驱使下，苏联的中东政策是其全球扩张战略的一部分。苏联利用二战后西方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下降，借助阿犹冲突的机会对该地区进行势力渗透。这些学者认为由于苏联方面的阻挠和破坏，美国政府未能成功缓解当地冲突，这是导致该地区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3]然而，这些学者过分夸大了当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冷战初期的档案资料在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开始解密，这为学术界提供一个了解冷战期间西方国家的决策机制、设想以及进程的机会。学者们试图勾勒出苏联对以色列政策的发展过程，从而探究苏联决策的内在逻辑。这些著作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为后人指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苏联的中东政策在根本上虽然是进攻性的，但也是谨慎务实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应激性的，而不是有计划的。其目标只不过是希望该地区保持动荡不安的状态，以此削弱西方大国的力量。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是以色列历史学家雅科夫·罗伊（Yaacov Ro’i）的专著《苏联在实践中的决策：苏联和以色列（1947—1954）》[4]。书中对苏联决策的国内外环境、苏以关系的演变过程都进行了深入分析。略显遗憾的是，作者在论及苏以关系逐渐恶化的过程时，刻意淡化了以色列外交政策偏向西方阵营对这一过程的影

响。此外，美国学者阿诺德·卡拉默（Arnold Krammer）的专著《被遗忘的友谊：以色列和苏联集团（1947—1953）》[5]的关注重点也是以色列本身，他认为苏以关系恶化的原因是苏联从1949年开始拒绝为以色列提供充足的援助。其中，他特别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在苏以关系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仔细梳理出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运输武器的详细过程。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从二战一直到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政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包括冷战进程的推动力、美苏之间的地缘战略对抗、苏联对传统国家安全的关注等。[6]这一观点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因为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有助于深入理解苏联政府的决策过程。这种观点还认为苏联渴望作为超级大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拥有像美国一样的影响力与威望。

雅科夫·罗伊认为苏联在耶路撒冷问题被重新提交讨论的时候强调巴勒斯坦“俄国财产”的重要性，可能是为了增强自己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影响力。[7]这个观点启发了笔者从“增强国际影响力，提高国际地位”这一角度来思考大国在参与处理国际事务中的行为逻辑。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者们几乎完全以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还有以色列的资料为依据，重点关注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政策，这导致了学者们习惯于从西方和以色列的视角来看问题。于是，这些研究就成为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对外关系研究的一种延伸。由于缺乏苏联档案的支撑，学者们对于很多问题只能做出逻辑上的推测。在研究方法上，受到以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的深刻影响，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势力扩张、苏联与英美两国的权力对抗等问题。在大多数学者看来，苏联决策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对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

尽管如此，在苏以关系研究领域中，学界还是出现了具有启发性的著作。1990年，以色列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秘约瑟夫·戈夫林（Yosef Govrin）运用大量一手材料写成了《从对抗到分裂：以色列与苏联关系（1953—1967）》[8]一书。该书研究的时间范围与本书并不一样，强调意识形态与心理因素在苏以关系恶化过程中的作用，也提到了现实利益因素的影响，提醒学者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苏以两国关系的历史。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

2000年，由以色列外交部、俄罗斯外交部、以色列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等6家政府和学术机构在莫斯科和伦敦联合出版了《苏联-以色列外交关系档案选编（1941—1953）》。[9]公布了495件有关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的原始档案文件，这其中包括苏联领导人与以色列领导人[10]之间的书信电报往来，苏联驻中东地区的外交人员发给苏联外交部[11]的电报、信件和书面报告等。2003年，在俄罗斯出版了由著名学者纳乌姆金主编的《近东冲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文件选编（1947—1956）》[12]，公布了147件有关苏联与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来往的资料文件。这些原始档案的解密为研究分析苏联支持犹太建国这一问题提供极大便利。

随着苏联档案逐渐解密，学者们能够接触到的材料越来越多。这无疑推动了对苏联政府的决策过程和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时，“新冷战史”[13]研究的理念也为学术界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学者们抛弃了以往仅仅从现实政治方面来分析历史的做法，逐渐关注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内容。在这个阶段，以充足的材料为支撑，学者们对很多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分析，这使得研究更加精细化，研究范围更广泛，研究对象更多元。[14]进入21世纪，在以历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为代表的冷战史研究权威学者领导下，学术界不再局限于以往研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逐渐把眼光转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小国家和当地组织）在冷战时期的历史作用，例如东南亚、西亚北非地区。代表性的专著就是文安立的《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15]，这本书叙述了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干涉的相关历史。虽然这本书对于阿以战争未予深入讨论，但书中展现出冷战在第三世界的表现，激励学者们去探究与冷战初期中东问题相关的历史。

苏以关系档案解密后，俄罗斯和西方史学界相继出版了一些利用档案材料进行研究的高质量论著。

在俄罗斯史学界，俄罗斯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梅德韦杰夫的《斯大林与“医生案件”（新史料）》[16]、伊萨耶夫的《历史的教训：苏以关系（1948—1951）》[17]以及姆列钦的两部专著《为什么斯大林建立了以色列》与《约瑟夫·斯大林——以色列的缔造者》[18]，等等。

梅德韦杰夫认为：斯大林支持以色列并非是要把以色列变成苏联的仆从国。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的斯大林很清楚以色列需要一个强大的靠山，以色列将会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此举的目的是要给英美特殊关系“打进一个楔子”。[19]按照梅德韦杰夫的说法，以色列的亲美方针是有利于苏联的，一切尽在斯大林的掌控之中。

伊萨耶夫的文章利用了大量苏联外交部的解密文件，详细叙述了1948～1951年苏联在以色列国家建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对于这一事件的原因论证得并不充分。

姆列钦的两本专著尽管也使用了大量的苏联解密档案，但由于缺少学术著作所必要的注释，因此，很难被看作是严谨的学术著作。

在西方史学界，这一时期法国学者劳伦特·拉克尔（Laurent Rucker）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无疑是走在前列的。2001年，他在巴黎用法文出版了自己的专著《斯大林、以色列与犹太人》[20]。这部书是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在这一领域中唯一一部利用苏联解密档案进行研究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拉克尔的主要观点是二战后斯大林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的冒险遭到失败之后，苏联依然未能放弃利用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达到自己重新向中东扩张的战略目的，而欧洲犹太难民问题是英美矛盾的一个诱因。出于对英国的厌恶，斯大林把牌押在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上。

在这部书中，拉克尔通过自己的研究把苏联开始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时间界定在1947年夏天，而这正是马歇尔计划出台、西方阵营开始形成之时。斯大林希望利用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来离间英美，从而分化瓦解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他的这种观点和俄罗斯学者梅德韦杰夫的观点有相似之处。

拉克尔本人对斯大林支持犹太人建国的政策评价并不高，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举措，是继土耳其、伊朗事件之后的又一次外交冒险。他认为从1949年开始，以色列就逐渐倒向了美国，斯大林在削弱英国的同时增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而苏联本身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

此外拉克尔用了大量篇幅描述了二战期间的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以下简称“犹委会”）的历史。

他认为，与苏联支持犹太人建国的对外政策相比，其国内犹太问题则要复杂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苏联就成立了“犹委会”。“犹委会”最初成立的目的是号召国外犹太人特别是美国犹太人支援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希望依靠美国犹太社团的政治影响来帮助罗斯福总统放弃大西洋彼岸的孤立主义，促使美国加入到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中来。“犹委会”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产物，但是在二战后，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自命为苏联犹太人的代言人，而不是充当官方规定的对外宣传员的角色，这就犯了斯大林的忌讳，在他看来“犹委会”已经成为一个犹太代表机构的雏形。因此，苏联当局对此颇为不满，再加之二战后苏联当局支持犹太人建国的政策激发了苏联犹太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当苏联犹太人对建立以色列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时，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暗杀了“犹委会”领导人米霍埃尔斯，取缔了“犹委会”，并在国内发动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政治诉讼案件，掀起了二战后苏联国家反犹运动的高潮。拉克尔认为，斯大林本身的举动是古怪和不可捉摸的。他出于对英国人的厌恶建立了以色列，而他对苏联犹太人的不信任驱使他发动了反犹运动。《斯大林、以色列与犹太人》这部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使读者较为清楚地了解了斯大林统治后期苏联的权力运作机制。它在西方史学界的影响力很大，该书自从2001年正式出版以来，除拉克尔本人之外，西方很少再有学者涉足这一课题的研究。

2004年，拉克尔在俄罗斯的《俄国与犹太世界》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了一篇文章：《意想不到的同盟：20世纪40年代的苏联与以色列》[21]；一年之后，他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的冷战公报上发表了《莫斯科的意外之举：1947～1949年的苏以同盟》[22]。拉克尔的这两篇论文对于其原有观点做了一定的修正和补充。他首先提出了斯大林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建国的这一决策发生在1947年4月28日。这一天，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巴勒斯坦特别会议的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葛罗米柯收到了来自莫斯科高层的电报，电报内容是“我们必须考虑到犹太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空前灾难。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我们应该准备两种不同的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建立一个包含两个民族的二元制国家；第二种方案是把巴勒斯坦分割为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如果第一种方案由于阿犹关系恶化而无法实行的话，那么就应该考虑第二种方案。”[23]但是对于斯大林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来宣布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拉克尔在自己的论文中却只字未提。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或不能苟同，或认为论据不足。

首先，关于苏联支持犹太人建国是为了离间英美特殊关系这种观点，到目前为止，档案文献并未提供任何有力证据。英美两国的确在犹太难民问题和阿犹分治问题上存在严重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并非是斯大林离间所致。恰恰相反，斯大林正是利用了英美之间的矛盾，通过支持犹太人建国，扩大了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总之，英美矛盾给了苏联进入中东地区的机会，而离间英美特殊关系并非苏联的目的和主旨。

其次，笔者并不认为斯大林支持犹太人建国是其外交决策的失误。因为，苏联至少成功地把大英帝国逐出了巴勒斯坦地区。作为经验丰富的现实主义政治家，斯大林在进行外交决策时自然经过了一番详细周密的考虑。要解读战后苏联支持犹太人建国的原因，就必须要从苏联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化着手，同时也要考虑战后斯大林关于世界的安排和战略决策，拉克尔的著作对于这两个方面的分析略有欠缺。

显然，拉克尔在研究苏联支持犹太人建国这个问题上受到了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在冷战研究中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学派”（Traditional School）的影响。该学派认为苏联对外政策是进攻性的，是希望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者来离间英美两国，瓦解西方阵营，进而达到自己的外交战略目的。

在中国史学界，中国学者对苏以关系的研究也是以苏联的中东政策和巴勒斯坦问题的研究为起点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来很多优秀的国外著作，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知识基础。例如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国著名学者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的著作——《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肥沃的新月地带》[24]。这本书简洁而明晰地梳理出英国、俄国和德国在中东地区的扩张活动。[25]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各大研究所纷纷出版了相关文件集，这些文件集包括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的《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26]、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京办事处编的《巴勒斯坦问题和巴解组织》[27]、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编的《巴勒斯坦问题历史概况》[28]以及由尹崇敬主编的《中东问题100年：1897—1997》[29]，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

2002年，沈志华先生总主编的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0]问世，其中第25卷和第28卷收录了关于“犹委会”的85份原始档案，其中部

分涉及了苏联支持犹太人建国的问题，为国内学者展开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学界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的专著有刘竞、张士智和朱莉合著的《苏联中东关系史》，还有赵伟明的《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等。[31]而已发表的论文包括赵克仁的《试析前苏联对以色列建国前后态度和政策的演变》、邵丽英的《俄国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发展趋势》、张建华的《简论苏联的犹太人问题》、车效梅的《苏联对以色列建国政策透析》、杨曼苏的《苏以关系发展的历程》、姜天明的《美英苏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的政策及影响》、徐娅囡与吴建章的《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动机分析》、余建华和康璇的《苏联对犹政策的历史考察》。此外还有一些硕博士论文，例如李鹏程的《1947—1957年苏联对以色列政策的演变》、梁桂胜的《从合作到分裂：1947—1953年苏联-以色列关系研究》以及哈云青的《从蜜月到断交——1948—1953年苏以关系研究》。[32]

纵观上述研究成果，部分国内学者认为苏联支持犹太建国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出于对劫后余生的欧洲犹太人的同情。[33]这显然是受到了两份材料的影响，分别是1947年5月14日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第一次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以及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的自传。[34]笔者认为，苏联的政治动机可能非常复杂，但是绝非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因为斯大林在支持犹太人建国的同时，又在其势力范围内发动了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为代表的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政治诉讼案件，这就使得同情论很难站住脚了。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斯大林希望借此机会拉拢犹太人，把英国人逐出中东，进而达到入主中东的战略目的。[35]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苏联支持犹太人建国有三重目的：“一是为了把英国人逐出中东；二是希望把以色列变成一个亲苏联的国家，进而与美国争夺中东和地中海的战略控制权；三是如果前两个目标受挫，那么就把以色列作为一个‘不和的金苹果’抛向中东，以便为苏联干预中东事务提供机会。”[36]另外，笔者利用最新解密的苏联和以色列外交档案撰写而成的3篇论文《对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原因之再考察》[37]、《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的苏联因素》[38]和《冷战与苏联犹太政策的变化（1947—1953）》[39]对苏联支持犹太人建国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西方学术界对于外交史的研究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强调小国外

交对大国政策的反作用。这样的方法论有助于研究者从更深的层次理解大国外交政策与小国国内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它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大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实现其建立民族国家的千年夙愿，与美国和苏联等大国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对于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的美国因素以及美以特殊关系的研究，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涌现出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因此笔者在这里不一一列举。关于苏联和东欧集团在犹太人建国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却往往被人忽视，这正是本书所重点考察的问题。

笔者认为，苏联在二战后初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对犹太人建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苏联的外交战略及其中东政策的变化决定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这一历史进程的速度和程度。当然，不能否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一历史进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然而，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言："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支持，以色列国至少不会在1948年出现。"[40]这一结论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本书作为历史研究的成果，有必要讨论一下本书所用的文献和史料。

兰克学派认为历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据事直书"[41]。通过对史料的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能够还原历史的史料无非就是档案文件、文献记载和口述史料，其中最基本的还是档案文件。离开了档案文件，史学研究就成了空中楼阁。前文提到的《苏联-以色列外交关系档案选编（1941—1953）》和《近东冲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文件选编（1947—1956）》是本书使用的基本史料，除此之外，本书还利用了一些苏联和英美等国与巴勒斯坦问题和犹太人问题相关的档案文献。

（1）1994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纳乌莫夫主编的档案集《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斯大林的最后一次枪决》[42]。这实际上是一本在对苏联"犹委会"领导人进行法庭审判时的速记文献。

（2）1996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出版了由科斯迪尔琴科主编的档案集《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1941—1948）》[43]。这部档案集详细描述了苏联"犹委会"从成立到最终覆灭的一些情况。

（3）罗纳德·海姆（Ronald Hyam）主编的《工党政府与大英帝国

的终结（1945—1951）》[44]档案集，这部档案集中收录了许多二战后初期英国政府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文件，包括内阁备忘录和决议以及外交部、殖民部、国防部等多个部门的备忘录。

（4）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和迈克尔·帕契基（Michael Partridge）主编的《英国外交事务文件》[45]部分收录了英国外交部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备忘录和研究报告、英国驻中东地区的外交使节发回外交部的评估报告以及英国外交官与中东国家领导人的会谈记录和往来信件以及电报等。

（5）《美国外交文件（1945—1949）》[46]收录了美国外交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评估报告以及美国驻中东地区的外交人员就巴勒斯坦问题发给华盛顿的信件和电报等。

这些档案文件与苏联和以色列解密档案相互佐证，为学界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一课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结合选题设计和学术史的回顾评述，本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如下。

（1）为什么苏联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前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个问题上，苏联领导人的态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苏联领导人一直强烈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苏德战争期间，斯大林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有所好转，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敌视政策；1947～1949年，苏联领导人不遗余力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保证了以色列国的建立和巩固。1949年以后，以色列在外交取向上开始倒向美国，苏以关系逐步恶化，最后走向彻底决裂。笔者将在书中对各个历史时期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变化进行分析，力求回答这一问题。

（2）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斯大林支持犹太人建国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苏联巴勒斯坦政策的变化与其冷战战略形成的关系是什么？

二战后初期，对于巴勒斯坦的未来和前途命运问题，苏联官方的说法一直是强调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民主的巴勒斯坦国。面对欧洲日趋严峻的犹太难民问题，苏联的态度是：犹太难民问题不能靠移民巴勒斯

坦来解决。只有在彻底根除法西斯主义、实现欧洲民主化的同时给犹太人一个正常的生活条件，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47]由于犹太人口数量在巴勒斯坦地区处于绝对劣势。苏联的态度显然不符合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然而，从1947年4月28日开始，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这究竟是为什么？法国学者拉克尔在自己的论著中并未提及，本书试图通过多国原始档案文献的相互对比印证，来解答这一问题。

（3）苏联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苏联集团对犹太人建国的支持不仅仅体现在联合国第181号（二）决议表决中的那5张赞成票，还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不够。笔者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此问题做出回答。

（4）为什么斯大林在支持犹太人建国的同时又在国内发动了大规模的国家反犹运动？

美国著名犹太思想家和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自己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把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归为有史以来极权主义的两种真正形式。[48]指出反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笔者认为斯大林的反犹主义既不像希特勒那样，与民族的、种族的问题密切相关，也不像俄国那样与宗教矛盾密切相关。斯大林的反犹主义主要是政治性的，是为其政策服务的。从二战前苏联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到二战后支持犹太人建国，无一不是如此。苏联从来就没有单纯为反对犹太人而存在的反犹主义。如果犹太人效忠斯大林，效忠布尔什维克，那他们就有可能成为苏联统治集团的一分子，如果犹太人或犹太组织站在苏联当局的对立面，或者威胁到了苏联当局的利益，那么苏联方面是要坚决对其进行镇压的。笔者将对苏联各个时期的犹太政策进行分析，加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5）二战后苏联和以色列的关系从蜜月走向对抗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从1949年下半年起，以色列就开始倒向西方，苏以关系开始从蜜月逐渐走向对抗，苏联在1953年2月宣布中断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苏以

交恶的原因涉及以色列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关系，二战后苏联的反犹政策以及苏联对阿拉伯国家政策等。究竟是哪些因素最终导致苏以交恶则是本书着重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谈谈本书的章节结构及主要内容。

本书的正文部分共分为五章。加上绪论和结语一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书的选题价值和国内外学术史概况以及本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第一章追溯了沙皇俄国时期犹太人的历史状况和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政府对犹太人的政策。在本章中，笔者力求通过考察苏联的犹太政策来揭示二战前苏联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原因。笔者想澄清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苏联的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和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Zionism）的区别。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里，斯大林主义还没有表现出与反犹太主义同一含义的特征。斯大林对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批判，实质上与对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压制没有区别。苏联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都拒绝承认排犹主义或歧视犹太人问题仍存在于苏联社会，强调苏联宪法保障各民族一律平等，而他们所反对的只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第二章是本书的核心章节，笔者打算以二战后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演变过程为背景来探讨苏联支持犹太人建国政策的逐步形成，着重分析斯大林的外交战略与苏联巴勒斯坦政策转变的内在联系。二战战后初期（1945～1947年），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这一时期发生了三件影响苏联与西方关系的重大事件：希腊危机、土耳其危机和伊朗危机，使得苏联与西方的关系由热变冷，并逐渐走向冷战。因此，研究斯大林的外交战略对于考察苏联支持犹太人建国政策的最终形成以及冷战起源等问题都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章主要讲述在以色列建国前后，苏联和东欧集团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苏联和东欧集团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特别是1947年底，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发生严重倒退的时候，苏联在联合国始终与以色列的立场保持一致。不仅如此，1948年5月，即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苏联通过捷克

斯洛伐克等国为以色列提供了数量可观的武器装备。在苏联的默许下，大批东欧犹太人不断涌入巴勒斯坦地区，保证了以色列的人口数量和军队动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以色列正是依靠这些武器装备和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才打赢了这场战争。

第四章将展开论述苏联政府如何处理巴勒斯坦的“俄国财产”问题与耶路撒冷国际化问题。1947年，《巴勒斯坦将来处理（分治计划）问题的第181（二）号决议》规定了耶路撒冷为一个国际化的自由市，它既不属于阿拉伯人，也不属于犹太人。苏联当时也投了赞成票。但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想把耶路撒冷作为国家的首都，而苏联政府却继续支持耶路撒冷国际化，于是双方的意见出现分歧。1949年底耶路撒冷问题被重新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以色列反对按照1947年联合国大会《巴勒斯坦将来处理（分治计划）问题的第181（二）号决议》实现耶路撒冷国际化，但苏联坚持这一原则。而以色列政府则以巴勒斯坦的“俄国财产”问题作为筹码，要挟苏联改变立场。1949年底1950年初，苏联的立场出现多次反复：支持耶路撒冷国际化——有意改变立场——1949年12月投票支持耶路撒冷国际化——1950年4月17日宣布不再支持耶路撒冷国际化。在这个过程中，苏联需要考虑中东地区的各种政治力量，其中包括以色列、外约旦、其他阿拉伯国家、英国和美国。这一节重点论述苏联在1949年底1950年初对于耶路撒冷问题的立场经历“先维护后放弃”的过程。笔者认为耶路撒冷国际化问题是苏以关系从蜜月走向对抗的重要转折点。

第五章探讨的是苏联为什么在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同时又在国内发动大规模的国家反犹运动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犹太人沉睡已久的民族意识得到了觉醒。二战结束后，斯大林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中东政策又极大地激发了苏联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斯大林看来是非常有害的，它与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是相违背的。因此，战后斯大林在国内发动反犹运动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战后初期，斯大林之所以没有立即发动反犹运动，一方面是因为斯大林仍希望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是苏联支持犹太人建国的政治需要。但是，冷战的爆发使得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了与西方进行对抗，斯大林在国内也加强了管控。在斯大林看来，犹太人是苏维埃政权潜在的敌人，是不值得信任的，所以要坚决予以镇压。由此可见，苏联支持犹太人建国的对外政策与其迫害犹太人的对内政策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并无矛盾之处，其根本出发点

就是维护苏联的利益。

[1] 这里所说的“中东”，指的是指亚、非、欧三大洲相连接的地区。这个名称是过去欧洲人的说法，他们按照距离欧洲的远近，把东方各国分别称为“近东”、“中东”和“远东”。中东地区的范围，没有明确的划分，特别是“中东”和“近东”没有严格界限。本书提到这一地区时统称为“中东地区”，但是对所转引档案文献中的称谓，则保留其原有的译法——“近东”。

[2] Walter Z.Laqueur，*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iddle East*，New York：Praeger，1959.

[3] Robert O.Freedman，*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70*，New York：Praeger，1982；Walter Laqueur，*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East*：*The Soviet Un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1958-1968*，New York：Macmillan Press，1969.

[4] Yaacov Ro’i，*Soviet Decision Making in Practice*：*The USSR and Israel 1947-1954*，New Brunswick & London：Transaction Books，1972.

[5] Arnold Krammer，*The Forgotten Friendship*：*Israel and the Soviet Bloc 1947-1953*，Urbana，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4.

[6] George Breslauer，“On Collaborative Competition，” in George Breslauer ed.，*Soviet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Boston：Unwin Hyman，1990.

[7] Yaacov Ro’ i，*Soviet Decision Making in Practice*：*The USSR and Israel 1947-1954*，p.451.

[8] Yosef Govrin，*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53-1967*，*From Confrontation to Disruption*，London and Portland，OR：Frank Cass，1998.

[9]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б.док.1941-1953гг.В 2 кн.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0；*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1941-1953*（*DISR*），London：Frank Cass，2000.

[10] 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之前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

[11] 1946年，苏联人民委员会改称苏联部长会议，隶属于原人民委员会的各人民委员部也纷纷改名，例如，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改为苏联外交部，内务人民委员部改为内务部等。

[12] Наумкин В.В.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В 2 т.Отв.ред.Москва：МФД，2003.

[13] 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4] Yehoshua Freundlich，“A Soviet Outpost in Tel Aviv：The Soviet Legation in Israel，1948-53，” *Journal of Israel History*：*Politics*，*Society*，*Culture*，Vol.22，No.1，2003，pp.37-55.

[15] Odd Arne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16] *Медведев Ж.А.* Сталин и “дело врачей”，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1，С.78-103；№2，С.99-119.

[17] *Исаев Г.Г.*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1948-1951гг.//Журнал Политэкс.2006.Том 2.№ 3.С.114-130.

[18] *Млечин Л.М.* Зачем Сталин Создал Израиль？Москва：《ЯУЗА》《ЯКСМО》，2005；*Млечин Л.М.*，Иосиф Сталин-Создатель Израиля. Москва：《ЯУЗА》《ЯКСМО》，2006.

[19] *Медведев Ж.А.* Сталин и “дело врачей”，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С.99.

[20] Laurent Rucker，*Staline*，*Israël et les Juifs*，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1.

[21] Laurent Rucker，“The Unexpected Alliance USSR and Israeli During the 1940’s，” *Russia and Jewish World*，No.2，2004，May 24，2020，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http：//www.russkiivopros. com/index.php？pag＝one&id＝77&kat＝6&csl＝19.

[22]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46，2005.

[23]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46，pp.16-17.

[24] 〔英〕理查德·艾伦：《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肥沃的新月地带》，艾玮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220页。

[25] 〔英〕理查德·艾伦：《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肥沃的新月地带》，艾玮生等译，第220页。

[26]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27]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京办事处编《巴勒斯坦问题和巴解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京办事处，1980。

[28] 西北大学伊斯兰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历史概况》，陕西人民出版社，1973。

[29] 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1897—1997》，新华出版社，1999。

[30]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5、2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1] 参考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时事出版社，2006。

[32] 参考赵克仁《试析前苏联对以色列建国前后态度和政策的演变》，《西亚非洲》1993年第4期；邵丽英《俄国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发展趋势》，《西亚非洲》1999年第4期；张建华《简论苏联的犹太人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车效梅《苏联对以色列建国政策透析》，《西亚非洲》2003年第4期；杨曼苏《苏以关系发展的历程》，《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姜天明《美英苏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的政策及影响》，《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4年第2期；徐娅囡、吴建章《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动机分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余建华、康璇《苏联对犹政策的历史考察》，《史林》2007年第2期；李鹏程《1947—1957年苏联对以色列政策的演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梁桂胜《从合作到分裂：1947—1953年苏联-以色列关系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哈云青《从蜜月到断交——1948—1953年苏以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33] 参见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126～128页；赵克仁《试析前苏联对以色列建国前后态度和政策的演变》，《西亚非洲》1993年第4期；邵丽英《俄国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发展趋势》，《西亚非洲》1999年第4期；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第25页。

[34] 葛罗米柯在1947年5月14日联合国大会第一次特别会议上特别强调了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到的不幸和苦难。这种不幸和苦难是难以用笔墨所描述的。参见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б.док.1941-1953гг.Т.1.С.215。果尔达·梅厄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道："在1947年秋天，当联合国进行辩论的时候，我觉得苏联集团之所以支持我们，还因为俄国人自己为自己的胜利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并且还因为他们深切地同情犹太人，深切地同情遭受了纳粹分子的如此深重灾难的犹太人，俄国人清楚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参见〔以〕果尔达·梅厄《梅厄夫人自传》，章仲远、李佩玉译，新华出版社，1986，第217页。

[35] 参见车效梅《苏联对以色列建国政策透析》，《西亚非洲》2003年第4期；姜天明《美英苏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的政策及影响》，《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4年第2期；徐娅囡、吴建章《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动机分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

[36] 宋永成：《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悲剧》，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第121页。

[37] 肖瑜：《对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原因之再考察》，《学术研究》2011年第8期。

[38] 肖瑜：《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的苏联因素》，《西亚非洲》2010年第8期。

[39] 肖瑜：《冷战与苏联犹太政策的变化（1947—1953）》，《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40] 参见Aron Lustinger，*Stalin and the Jews*：*The Red Book*：*The Trage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and the Soviet Jews*，New York：Enigma Books，2003，p.170。

[41]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3页。

[42]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М：Наука. 1994.

[43]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 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6.

[44] Ronald Hyam，*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45-1951*，London：HMSO，1992.

[45] 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eds.），*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BDFA*）：*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Maryland：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9.

[4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5-1949*，Washington D.C.：GPO，1969-1977.

[47]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2.Д.8.Л.107-109.//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193-195.

[48] 参见〔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454～459页。

第一章 1945年之前的苏联犹太政策

第一节 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犹太人

犹太人是一个古老独特的民族，它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坚定的宗教信仰。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他们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因此反犹主义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沙皇俄国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反犹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也一直延续到了苏联时代。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制定新的犹太民族政策以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反犹问题就成了摆在苏维埃政权面前的一个难题。

长期以来，由于相关档案文献迟迟未能解密，学术界对苏联犹太民族政策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有限的成果也只是建立在一些苏联官方的公开出版物以及移居到西方去的苏联犹太人回忆录的基础之上[1]，而这往往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个人偏见。

近年来，随着苏联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2]，俄罗斯和西方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苏联犹太人的论文和专著。[3]但这些著作往往过于突出表现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认为斯大林主义继承了沙皇俄国的反犹主义传统，斯大林主义中暗含着反犹主义的因素，甚至把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等。笔者并不认同这些观点。斯大林也许并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大国领导人，他不应以个人好恶行事。事实上，以列宁和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为解决苏联社会中存在的反犹主义问题，曾做出过大量的努力。

中国学界对二战之前的苏联犹太问题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笔者尚未找到相关专著。[4]

那么，反犹主义是否真的是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本章试图利用近年来已经解密的苏联档案文献，以二战之前苏联的犹太民族政策为切入点对此问题加以阐述。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使得俄国犹太人的遭遇已经悲惨到了难以生存的地步。19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俄国的兴起，大批犹太人投入到俄国的革命运动中去，他们坚信，只有推翻沙皇专制政权，才能实现俄国犹太人的彻底解放。据苏联著名历史学家M.波克罗夫斯基（M.Покровский）的估算，当时在所有革命政党的组织者当中，犹太人所占比例达到1/4到1/3。[5]

列宁极力倡导“宗教信仰自由，所有民族一律平等”[6]，强烈谴责反犹主义运动，故而得到了不少俄国犹太人的拥护。许多犹太人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并在党领导层中占据了重要地位。1917年8月，在俄共（布）选举产生的21名中央委员会委员中，犹太人就占5名，分别是Л.Д.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Г.Е.季诺维也夫（Г.Е.Зиновьев）、Г.Я.索科利尼科夫（Г.Я. Сокольников）、Я.М.斯维尔德洛夫（Я.М.Свердлов）、Я.С.乌里茨基（Я.С.Ульцкий）。[7]他们在十月革命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领导作用。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提高。1917年11月，苏俄政府通过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正式废除了沙皇政府制定的一系列迫害和歧视犹太人的政策。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和语言习俗都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认，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和其他民族一样享有了平等的政治地位和自由发展的权利。[8]

1918年8月，新政府公布了关于犹太学校的第一个苏维埃布告。20世纪20年代是苏联文化的发展时期。到1931年，从4年制的初级学校到师范学院和中等技术学院的犹太人学校共1100所，学生13万人。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还设有“犹太系”。1919年，犹太人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一家犹太大剧院。苏维埃政府对它特别关心，随着明斯克的犹太戏剧学院、基辅戏剧学院犹太系以及明斯克犹太大剧院的成立，犹太人的戏剧艺术繁荣起来了。截至1934年，苏联一共有18个常设的犹太剧院。20世纪30年代，只占苏联总人口2%的犹太人，在文化部门和医学部门中的比例却达到了16%；此外犹太学生占全国学生比例的14%；在科研领域中，有13%的科学家是犹太人。[9]

此外，苏维埃政府从犹太人中招募了大量的文职人员和外交使团人员，以至于在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中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委员会。[10]另外在当时的556名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中，有448名是犹太人，占总数的80%以上。[11]

不仅如此，犹太人在科技、医学、文学、音乐、艺术和文化教育等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为苏联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俄罗斯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评论道："犹太人在革命年代、国内战争时期和苏维埃政权的最初10年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人尽皆知的。"[12]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指出："犹太人的解放是我们革命最美好的成果之一，给予犹太人同俄国人平等的权利，让我们从思想上抹去了可耻和血污的痕迹。"[13]

如上所述，与反犹主义活动猖獗的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苏联犹太人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

尽管犹太人在苏联革命和建设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但是犹太人能否构成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在苏联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在犹太人问题上，列宁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观点，认为犹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民族了，犹太人已经既没有地域，又没有共同的语言。[14]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书中对该观点做了进一步的概括，他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5]。根据斯大林的定义，尽管犹太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等，那么就不能说他们是一个民族。斯大林说："例如俄国的、加里西亚的、美国的、格鲁吉亚的和高加索山区的犹太人就是如此，在我们看来，他们并不是统一的民族……如果他们中间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宗教、共同的起源和民族性格的某些残余。"[16]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理论上并不承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但是实际操作中，又不得不把犹太人看作是一个民族，以便处理有关事务。[17]1921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称犹太人为其境内少数民族之一。[18]

这样看来，苏联政府在制定犹太民族政策方面经常会有自相矛盾之处。另外还有若干实际困难，令其无法用处理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方式来处理犹太人问题，原因如下。

（1）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沙皇时期的犹太人定居区被彻底废除了，犹太人散布到苏联境内的各个地区，但是在每个加盟共和国都不超过100万人。因此，根本无法像其他民族那样按照"民族自决"原则来组成加盟共和国。所以尽管苏联的犹太人口多达300万[19]，甚至比一些加

盟共和国的人数还要多，但是苏联政府仍不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自治共和国或加盟共和国。

（2）犹太人在苏联境内未能形成一个固定区域以便行政管理。1928年3月，为了解决在沙皇时期就存在的犹太定居区的犹太居民的工作问题，苏联政府在远东的比罗比詹（Биробиджан）建立了犹太垦殖区，希望借助犹太人的力量开发远东。同时也希望借此获得西方犹太人在财力、物力上的支持。[20]1934年5月，苏联政府又宣布比罗比詹为犹太自治州。但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工业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有一技之长的犹太人更愿意留在内地发展而不愿意到荒凉的远东去。

（3）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对土地并无附着力，流动性很大。绝大多数苏联犹太人从事贸易、工业或在城镇机构工作。他们由于生活的需要，散布在各大城市，自然无法像其他民族一样集中管理。[21]

综上所述，犹太人在苏联社会中处于及其尴尬的地位。他们具有少数民族的特性，但却无法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建立自己的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

对于犹太人问题，列宁曾引用卡尔·考茨基的话说："要消除对异族居民的仇视，只有使异族居民不再是异己的，而和全体居民融合在一起。这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可行的办法。"[22]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在制定犹太政策之时，主要强调的是同化。这种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沙皇俄国遗留下来的反犹主义问题，因此并不能说此时的苏联政府采取了排斥或歧视犹太人的政策。

事实上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任何场合都拒绝承认苏联社会存在反犹主义问题。1931年，斯大林在答复"犹太电讯社"关于反犹主义的提问时指出："民族的和种族的沙文主义，是野蛮残暴时期所特有的仇视人类性情的残余。反犹主义只能对剥削者有利……因此，作为坚定不移的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们，要成为反犹太主义的毫不妥协和不共戴天的敌人。在苏联，反犹太主义作为强烈敌视苏维埃制度的一种现象，会受到最严厉的批判。根据苏维埃的法律，狂热的反犹太主义分子会受到死刑的处罚。"[23]如前所述，苏联犹太人地位大为提高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许多学者认为苏维埃政权在十月革命后依然执行的是反犹主义政

策。[24]一般来说理由有以下两点。

首先，从1918年起，苏维埃政府就开始封闭犹太教堂和宗教机构，限制犹太人的宗教生活，禁止公开讲授犹太教义。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身就是一场世俗化的运动，反对一切宗教行为。封闭犹太教堂这一事件本身不能被看作是纯粹针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反犹主义行为。布尔什维克当局对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批判，实质上与对其他宗教文化的批判没有区别。

其次，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苏联党内斗争日趋严重，斯大林最主要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都是犹太人。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斯大林在与党内反对派进行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战争。[25]这种说法也不能完全成立，因为当时的苏联党政机关中有许多要员是犹太人，其中既有斯大林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也有忠于斯大林的Л.М.卡冈诺维奇（Л.М. Каганович）、М.М.李维诺夫（М.М.Литвинов）、Л.З.麦赫利斯（Л.З.Мехлис）、Л.П.贝利亚（Л.П.Берия）等，像В.М.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М.И.加里宁（М.И. Калинин）、К.Е.伏罗希洛夫（К.Е.Ворошилов）、А.А.安德烈耶夫（А.А.Андреев）这些关键人物以及斯大林多年的私人秘书娶的都是犹太人。马林科夫的女婿也是犹太人，斯大林的秘书室里也有两个犹太人。[26]俄罗斯历史学家爱德华·拉津斯基也说：“斯大林当然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他从来不以个人的好恶行事。”[27]

很多学者在著作中列举了犹太人在苏联遭受迫害的种种事实，希望能以此证明斯大林主义与反犹主义具有某种共性。[28]他们的证据是确凿的，但是笔者不大同意由此得出的结论，原因是沙俄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反犹主义传统一直根深蒂固。尽管以列宁和斯大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但是要消除这种陋习的影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苏联依然长期存在着严重的反犹主义情绪，其原因如下。

（1）在许多俄国人眼里，犹太人是以一种贪婪、守财、狡黠、多虑的高利贷者和投机商人的形象出现，尽管苏维埃政权在政策上批判反犹主义，但普通民众对犹太人仍有很强的抵触情绪。

（2）在十月革命期间，犹太人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中占有极大的比例。革命胜利以后，政府部门的很多重要岗位都被犹太人所占据。

在经济建设时期，由于苏联犹太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他们在求职或者就业方面比其他人更容易获得机会。因此，在一些人眼里，犹太人占用了他们本该拥有的资源，自然遭人嫉恨了。

但是这种反犹主义情绪多半存在于普通民众之中，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当时苏联领导层中出现了某种反犹主义迹象，也不能说明苏联当局开始实行了反犹主义政策。因此，学者们把苏联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反犹主义问题归结在苏联领导人头上，是很不客观的。

事实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犹太人。“一五计划”开始后，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和熟练的簿记员、管理员、商业工作者、官员、宣传工作者、工程师、教员和科学家。当时苏联人口中文盲占绝大多数，因此，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犹太人能更快地适应了这些工作岗位。随着大小工厂的建立，犹太产业工人的数目也不断地扩增，事实上他们比俄罗斯农民更符合工厂岗位要求。犹太人适应城市生活，他们具有高度的领悟力，很能驾轻就熟地操纵复杂的机器。到了1933年，犹太人从事重工业的人数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数高出很多，小买卖已不再是他们的收入来源。因此，犹太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变成了苏联工业生产的重要劳动力。

正如“犹委会”领导人、苏联人民演员C.M.米霍埃尔斯指出：“在这个国家里……几千年来犹太人第一次感到自己同其他各民族平等相处，亲密无间。……种田的犹太人开上了拖拉机，工厂里的犹太人操起了机床，高等学府也向犹太人敞开了大门。他们有的参了军，有的下了矿井，有的进了实验室。在苏联各民族的大家庭里，犹太民族拥有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在真正的兄弟友情之中，苏联各族人民携手并肩创造自己的未来，打造自己的幸福。”[29]

一些学者在研究苏联犹太政策之时往往把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概念混为一谈。[30]事实上，在苏联的政策表述上，这两者是分得很清楚的。苏联政府一直强调苏联宪法保障各民族一律平等[31]，它所反对的只是犹太复国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形成于19世纪末，它作为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犹太复国主义者广泛运用国家、主权、社会、文化等现代概念提出的一套理论程序及行为规范，并通过多种方式向犹太人社团推广，从而成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反映了世俗犹太文化

的最高水平及最新形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激发了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并激发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移民潮，从而为以色列国的诞生奠定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

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格格不入。双方无论是在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民族政策上，都存在重大分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具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特点，是极其危险的。苏联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与苏联领导人所信奉的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根本对立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大多源于犹太教。根据犹太教的教义：犹太人是上帝唯一的“选民”，散居于世界各地，只是暂时停留，他们的目标是等待救世主弥赛亚的来临，带领他们回到故土——巴勒斯坦。马列主义者则认为，国家不是永远存在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国家也就自然消亡了。

（2）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苏联政府关于解决反犹问题的方式有着根本不同的考虑。前者认为，解决反犹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而后者认为，反犹问题是阶级矛盾与民族压迫的产物。只有消灭了剥削阶级，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犹太问题也自然而然不复存在了。

（3）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犹太民族必须保持其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反对其同化于当地民族。苏联政府在处理犹太人问题时强调的是同化，而这种同化政策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相悖的。

（4）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是作为对欧洲反犹主义的回应出现的。而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苏联领导人都拒绝承认在苏联社会存在反犹主义或歧视犹太人的问题。因此，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苏联的存在就显得很多余了。

（5）布尔什维克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敌视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多年以来苏联和英国关系不正常的体现。1917年11月英国发表的《贝尔福宣言》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大批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这里实际上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大本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包括英国在内的协约国武

装干涉苏俄革命。在此后的20多年中，苏联和英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因此，苏联领导人直观地认为，由英国人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英国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代言人，换言之，是英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工具。于是，在苏联境内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就很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或英国间谍而处决。

综上所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苏联的传播是绝对被禁止的，违者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32]但对于普通犹太人而言，只要他们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就能够被当局所包容、所接纳，甚至能进入到布尔什维克的高层领导机关中去。有充分证据表明，布尔什维克中的犹太人要比非犹太人党员更加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理念，也更加认同苏联当局的同化政策。[33]这种认同在笔者看来是发自内心的，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种认同。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均普遍认为反犹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但笔者并不认为二者一定有必然联系。二战之前，苏联政府在制定犹太民族政策上强调的是谴责反犹主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如前所述，苏联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有一定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的。但是双方也存在共同点，那就是都希望最终解决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反犹主义问题。只不过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采取的是同化政策，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是要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民族国家。

在改善犹太人地位的问题上，苏联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社会所存在的反犹主义问题也并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苏联领导人在犹太民族理论方面的纠结也是其无法根除反犹主义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后，犹太人问题一直是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最尖锐的民族问题之一，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极大地激发了苏联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犹太外交

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正式爆发。战争初期，由于斯大林对德国的攻击准备不足，苏联红军在各条战线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到1941年7月3日，德军已经侵占了立陶宛全境、拉脱维亚的大部地区、白俄罗斯西部地区、乌克兰西部的部分地区。仅在苏德战争的前5个月里，苏联境内就有大约50万名犹太人惨遭纳粹杀害。[34]

纳粹军队的暴行激起了苏联人民的强烈愤慨，而面临灭顶之灾的苏联犹太人更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去。1941年8月16日，苏联著名的犹太演员米霍埃尔斯、著名犹太作家Д.贝尔格森（Д.Бергельсон）、犹太诗人П.马尔基什（П.Маркиш）、Л.克维特科（Л.Квитко）以及犹太新闻记者Ш.爱泼斯坦（Ш.Эпштейн）等8位犹太文化名人联名致函苏联情报局（Советско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35]副局长С.А.洛佐夫斯基（С.А.Лозовский），提议“举办一次邀请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犹太人参加的犹太人大会”。这次大会的目的是“动员全世界犹太人的社会舆论投入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和积极支援苏联正在进行的伟大的卫国战争”[36]。

1941年8月24日晚，第一次犹太人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有1000多位犹太各界名流参加。米霍埃尔斯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率先向全世界犹太人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讲。随后，贝尔格森、马尔基什、著名作家И.爱伦堡（И.Эренбург）和爱泼斯坦等人先后做了发言。他们不仅愤怒地控诉了纳粹分子对欧洲各国犹太人特别是苏联犹太人正在进行的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而且一致呼吁全世界的犹太人投身到反对法西斯暴徒的神圣战争中来，“并积极支援正在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苏联人民”[37]。许多来自苏联党政机关、文化科学机构以及部队的重要人士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通过了《告世界犹太兄弟书》。苏联官方不仅对当天的会议进行了国际直播，而且在次日的《真理报》刊登了所有发言者的演讲稿，并且对会议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38]

1942年4月，根据苏联情报局的提议，并报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苏联成立了“犹委会”。这是苏联在二战时成立的一系列反法西斯委员会[39]的其中之一。战争期间，“犹委会”尽管组织上并不隶属于苏联情报局，但是苏联情报局却在实际上对“犹委会”的工作进行领导。

苏联成立“犹委会”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西方国家的犹太人当中为苏联争取援助，动员全世界的犹太人来支援苏联的卫国战争。该委员会成立后，立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成功地组织了第二次犹太人代表大会，并向全世界做了电台转播。在苏联情报局的领导下，“犹委会”采取包括创办希伯来文报纸、向国外寄送材料、组织犹太人代表大会等形式，以大量事实向世界揭露纳粹惨无人道的罪行；报道了苏联红军同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并通过和欧洲、北美的犹太人组织（其中也包括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进行联系，为苏联政府争取了大量的国际援助。“犹委会”的建立标志着苏联政府对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敌视态度开始发生改变。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反法西斯各大国就已经在考虑二战后世界安排的问题了。1941年8月14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大西洋宪章》（*The Atlantic Charter*），宪章共8条，主要内容是：“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反对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变更；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恢复被剥夺权利的国家；努力促使一切国家取得世界贸易和原料的平等待遇；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全面的合作；在彻底摧毁纳粹暴政后确立和平，以使各国人民都能在其疆土之内安居乐业，使全体人类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不虞匮乏；一切人类可以横渡公海大洋，不受阻碍；放弃使用武力，在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建立之前解除侵略国的武装，以减轻爱好和平的人民对于军备的沉重负担等。”[40]

根据《大西洋宪章》所规定的基本原则，苏联将失去1939～1940年在欧洲建立东方战线时候所获得的土地。[41]斯大林对丘吉尔和罗斯福未同自己商量就发表了这样的宣言感到非常恼火，却又无可奈何。

1941年12月英国外交大臣罗伯特·艾登（Robert Eden）访问苏联，斯大林明确地向艾登提出了自己的要求：①恢复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前的边界；②要求战后同芬兰和罗马尼亚结成军事同盟，有权在上述两国建立自己的陆、海、空军基地。作为交换条件斯大林给英方的好处是：建议英国同比利时和荷兰建立军事同盟，并建立军事基地以及在挪威和丹麦建立海军基地。针对英国提议的二战后在欧洲成立某种联邦的思想，斯大林说：“苏联不反对在欧洲建立某种国家联邦。”[42]艾登对斯大林如此详尽而坦率地陈述了他对战后欧洲问题的想法表示感谢，对于斯大林所提的意见总体上表示赞同，但是有关恢复苏联1941年以前边界

的建议，艾登以事未先和自己的同僚以及美国盟友进行商议为由而予以拒绝。[43]此后几天的谈判依然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但由于双方坚持各自的意见而毫无进展，最终仅发表了一份内容简单的会谈公报。

1941年12月26日，也就是斯大林同来访的艾登会谈结束后不久，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关于筹备欧洲国家战后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应当着手准备战后和平的理由。洛佐夫斯基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采纳。[44]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42年1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任主席的外交资料筹备委员会。确定委员会的任务是搜集和整理国外有关战后安排的现有协定、相关计划和方案，特别是直接涉及苏联的方案和计划等。1943年9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李维诺夫任主席的和约与战后安排委员会和以伏罗希洛夫为主席的停战问题委员会。

1942年5月19日，莫洛托夫前往伦敦就《苏英合作互助条约》问题继续进行谈判，莫洛托夫此行另一个任务是敦促英、美尽快开辟第二战场。5月21日，莫洛托夫在同丘吉尔和艾登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就明确表示："恢复苏德战争之前的苏联边界对我们来说是最低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能让步的……此外，由于这场战争是德国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所以，仅仅恢复以前的边界是不够的。我们要求苏联的西北和西南边界的安全能够在未来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在谈到苏联同波兰边界问题时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声明，它将尽一切努力同波兰政府在互惠的基础上友好地达成协议。"[45]同1941年12月时相比，莫洛托夫此时不仅提出了要求承认苏联1941年以前边界的问题，还提出了要求西方盟友向苏联提供最低程度的安全保障。

从当天晚上开始，莫洛托夫同艾登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5月23日，艾登向莫洛托夫提交了新的条约草案。艾登表示："新条约与旧条约之间的唯一区别就在于，一方面，它把使英国和苏联在谈判中遇到的困难问题搁置起来；另一方面，英国人建议签订一个为期20年的互助条约，借助这个条约他们打算把在莫斯科达成协议的东西确定下来，也就是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两国都将共同行事。这不排除以后就英国和苏联感兴趣的其他问题签订协定的可能性。"[46]

当天，莫洛托夫和И.М.迈斯基（И.М.Майский）把新条约草案的内容报告给莫斯科，在附言中说："我们认为，这一条约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它是一个苏联不需要的空洞宣言。”[47]但是，斯大林在5月24日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驳斥了他的意见，斯大林指出：“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一个空洞的宣言，我们认定它是一个重要的文件。条约草案中没有关于边界安全的问题，但这或许不错，因为我们有了行动自由。边界问题，或者确切地说保障我们国家某些地段边界的安全问题，将通过武力解决。”[48]显然，深谋远虑的斯大林看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后来的事实证明，苏军进驻东欧获取了比此时要求大得多的利益。5月26日，莫洛托夫同艾登签订了苏英关于战时同盟和战后合作的条约。

要求西方盟友承认1941年时苏联的边界，也就是承认苏联同德国“密谋”在欧洲侵夺的领土，这是苏联在战争中追求的基本目标。针对英国对苏联要求的抵制态度，斯大林做出了暂时搁置分歧，未来以武力解决的决定。如果说斯大林在1942年5月做出这个决定时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的话，那么，至于能否实现这一愿望则要取决于战争形势的好坏。到了1943年初，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这种打算有了现实的可能性。不过，即使苏联以武力解决了边界安全问题，还存在新攫取的领土能否得到国际法意义上承认的问题。斯大林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同西方合作才能确保这些用武力获取的果实。

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可以被看作是斯大林追求二战后大国合作意愿的一个重要表现。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从帝国主义总危机理论出发推行世界革命战略。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看来，俄国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成功的一部分才能得到保障，反之，俄国革命就有成为第二个巴黎公社的危险。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列宁缔造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因此，共产国际的成立既有推行世界革命的目的，又有确保俄国革命果实的动机。斯大林掌管国家政权后，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对苏联国家安全来讲，世界革命已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共产国际就逐步成为斯大林推行对外政策的工具。在20世纪30年代末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共产国际为适应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而不断更改路线方针，这给各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带来极大混乱，此时的共产国际已经成为苏联推行对外政策的负担。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就萌发了解散共产国际的想法，由于苏德战争的突然爆发，共产国际被赋予了在法西斯占领领土上开展游击运动的使命，配合苏军对德作战的任务。因而，共产国际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问题在于，斯大林为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获胜后，苏德战场的战局明显出现好转的时候突然做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考虑到随后即将召开讨论战后安排和加速对德作战问题

的德黑兰会议，并结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起草的关于战后安排问题的报告来看，显然斯大林是在为战后国际安排做准备工作。正如沈志华教授说："这说明莫斯科的考虑绝不仅仅着眼于战争的胜负，其中还蕴含着斯大林为战后国际安排和苏联外交政策奠定基础的长远打算。"[49]

斯大林向西方表示诚意的另一举措是派遣苏联"犹委会"代表出访美国。

早在"犹委会"成立不久，西方犹太人组织就希望能邀请"犹委会"代表团出国访问。1942年8月，英国犹太人自治联合会（The Anglo-Jewish Association）和巴勒斯坦胜利联盟[50]为了开展为红军募集1000辆坦克和500架轰炸机的运动，曾主动邀请苏联"犹委会"派代表团出席它们于同年8月下旬分别在伦敦和巴勒斯坦举行的犹太人代表会议。8月18日，"犹委会"责任书记爱泼斯坦专门为此致函A.C.谢尔巴科夫（A.C.Щербаков）、Г.Ф.亚历山德罗夫（Г.Ф.Александров）和洛佐夫斯基，建议"犹委会"派代表团参加这两次会议，[51]但是没有得到批准。1942年，美国犹太人作家、艺术家与科学家委员会（The American Committee of Jewish Writers，Artists and Scientists）和俄国战争救济犹太委员会（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Russian War Relief）曾多次到苏联驻美大使馆和总领事馆询问是否能派苏联犹太人代表团赴美访问。后来这两个美国犹太人组织又直接与"犹委会"进行联系甚至在电报中列出了他们请求派出的代表团成员名单。1943年初，美国犹太人作家、艺术家与科学家委员会名誉主席、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与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会晤时，再次建议苏联方面派遣代表团赴美访问，同时向"犹委会"发来了由其亲自签名的邀请函。[52]谢尔巴科夫认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之前派出"犹委会"代表团是不妥当的，因此婉拒了西方犹太人组织的邀请。[53]直到1943年2月底3月初，"犹委会"代表团出国访问一事才被苏联政府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苏联成立"犹委会"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该委员会与世界上一些犹太人组织进行合作，为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争取国际援助。但是为什么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战争形势已经发生好转的情况下，苏联政府反而要派"犹委会"代表团访美呢？一些学者认为尽管当时战争形势已经好转，但是苏联国内的经济形势依然很严峻。"如果没有大量的金钱、武器、粮食、衣服和药品的输入，这个遭受战争破坏和掠夺的国

家就可能难以为继。”[54]在这种形势下苏联仍然非常需要盟国的援助。[55]这些学者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主要是依据前“犹委会”领导人И.С.费费尔（И.С.Фефер）1952年5月在法庭上的证词，费费尔说：“在他和米霍埃尔斯赴美前夕，谢尔巴科夫和洛佐夫斯基曾指示他们同犹太资产阶级组织建立联系，争取金钱和物质上的援助以满足战争需要。”[56]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苏联政府此举是为了平息“埃里希-阿尔特事件”[57]（дело Г.Эрлиха и В.Альтера）对苏联外交所造成的重大冲击。[58]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笔者认为苏联政府此举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向西方（特别是美国）展示苏联渴望与其合作的诚意。此外苏联“犹委会”代表团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那就是向国外有影响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试探它们对苏联将要在克里木半岛（一般指克里米亚半岛）建立犹太人自治共和国的反应，并希望美国方面给予未来的克里木犹太人自治共和国物质上的援助。[59]

1943年6月17日，苏联“犹委会”代表团代表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飞抵美国。他们受到了美国各界犹太名流的热烈欢迎。从6月17日～10月20日，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在美国各地进行了紧张而又热烈的宣传活动。他们参观访问了华盛顿、纽约、费城、芝加哥、匹兹堡、底特律、波士顿、洛杉矶、旧金山等15座美国大城市，会见了美国政界、科技界、文化界、艺术界的一大批社会名流，与美国犹太人作家、艺术家与科学家委员会、俄国战争救济犹太委员会、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等许多主流犹太组织的代表进行了会谈，接受了无数家新闻媒体的采访，在美国媒体和许多大型群众集会上发表了多次演讲。他们不仅向美国的民众尤其是犹太人宣传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而且与许多犹太名流和主要的犹太组织达成谅解，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除此之外，苏联“犹委会”代表团还肩负着两项更重要的使命。

第一，向美国方面抛出在克里木建立犹太人自治共和国计划。

代表团按照莫洛托夫的指示与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领导人讨论了苏联战后将在克里木成立一个犹太人自治共和国的问题。希望美国的犹太人组织给予未来的犹太人自治共和国一定的物质援助。这个共和国不仅是作为苏联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而且也作为来自整个欧洲的犹太难民居住的地方。美国政府拒绝给犹太难民办理签证，英国人也千方百

计地阻挠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因此，此时除了苏联之外，遭到纳粹杀戮的欧洲犹太人并没有其他可供避难的地方。[60]斯大林希望通过在克里木建立犹太人自治共和国的方式在战后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给苏联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克里木半岛也不例外。为了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苏联政府抛出“克里木方案”，目的就是通过向西方犹太人示好的政策预先取得美国社会的支持，以援助苏联犹太人的名义获得大量资金，用来发展苏联的冶金和煤炭工业。斯大林想通过这种方式从西方筹集100亿美元的资金。[61]

但遗憾的是，二战结束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苏联与英美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斯大林不得不谨慎地对待在克里木建立犹太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问题。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如果在克里木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那么，在美国闹得很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会在苏联取得立足点，万一战争爆发，克里木就会成为美国在苏联南方的基地。”[62]于是，1946年6月25日，苏联取消了筹备已久的克里木计划。

第二，为苏联搜集原子弹情报，加速原子弹研制进程。

“犹委会”代表团的出访加强了苏联与美国犹太科学家的感情联系，对苏联获取原子弹研制情报做出了巨大贡献。时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局局长的П.А.苏多普拉托夫（П.А.Судоплатов）中将在回忆录里说：“在接近爱因斯坦周围学者专家圈的情报活动中，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如果不是这些‘友人’的帮助，斯大林根本不可能如此迅速、完整地获得有关‘曼哈顿原子弹计划’的机密情报。”苏联之所以能够在1949年8月造出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比美国预计的时间至少提前了18个月，甚至3～10年，靠的就是西方科学家提供的情报。[63]

“犹委会”代表团对西方国家的访问大大加强了国外犹太人和苏联犹太人之间的民族认同感，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犹太人组织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在西方舆论界中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亲苏氛围，有效地遏制和孤立了西方的反苏势力。无论在苏联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把这次访问看成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著名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给“犹委会”代表的一封信里写道：“你们加强了我们与苏联犹太同胞的联系……也对苏美之间建立一个真诚合作的良好氛围做出了贡献。”[64]而爱因斯坦所说的这种真诚合作的良好氛围正是斯大林所追求的。

在1943年11月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追求边界、势力范围和确保苏联在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中地位的目标基本都得到了实现。

对于斯大林提出的恢复苏德战争之前的苏联边界问题，罗斯福和丘吉尔表示认可。由于苏联红军在战场上进展迅速，英美领导人这么做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默认而已。1941年末1942年初，在苏英同盟条约谈判期间，斯大林就已经提出了这些要求，当时英国方面对此百般阻挠，如今的胜利充分证明了斯大林当初做出的“搁置分歧，未来以武力解决”决策的前瞻性和正确性。斯大林清楚地懂得，要想让西方盟友在二战后兑现这些承诺：一方面需要苏军对上述地区有效的占领；另一方面只有通过维持大国合作才能确保那些通过战争获取的果实。

第三节 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与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往来与合作

1917年11月《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英国根据《贝尔福宣言》和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训令，在巴勒斯坦确立了委任统治制度。英国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当局在早期一直采取的是“扶犹排阿”的政策，支持犹太人在当地的移民和定居活动。

但是到了193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发动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这给纳粹德国和意大利向中东地区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两国利用巴勒斯坦问题，蓄意挑动阿拉伯人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并宣传德意才是阿拉伯人真正的朋友。1939年3月，德国撕毁《慕尼黑协定》，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欧洲上空笼罩着战争的阴云。面对即将爆发的大战，英国必须加强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并保持该地区的稳定，但当时英国能部署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却很有限，因此很需要阿拉伯人的合作和支持。为争取阿拉伯人在大战中同英国人合作，英国就不得不考虑牺牲犹太人的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无论如何英国人都不担心犹太人会倒向纳粹德国。

1939年5月17日，英国殖民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白皮书》（以下简称《1939年白皮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1）英国政府明确宣布“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国家并不是它政策的一部分，它认为这种政策违反了委任统治书所规定的对阿拉伯人的义务，违反了它从前对阿拉伯人的保证”。

（2）在五年后英国政府即认为它对“犹太民族家园”的义务已经实现，英国的目标是在十年内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新国家将与英国签订保护条约以便保证它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但《1939年白皮书》也规定巴勒斯坦独立的前提是在十年过渡期内阿犹关系得到改善，否则独立将被推迟。

（3）在移民问题上，《1939年白皮书》推翻了以“经济吸纳能力”决定移民数量的做法，规定从1939年4月起的5年内总共允许7.5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地区，此后进一步移民必须经过阿拉伯人同意，如

果阿拉伯人反对，将不再允许犹太人迁入。非法移民人数将从移民配额中扣除。

（4）过渡时期内，给予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一切权力来限制和禁止土地转让，对于犹太人购买土地给予严格限制。[65]

英国《1939年白皮书》是对《贝尔福宣言》的全面修正，是英国巴勒斯坦政策的重大改变，这标志着英国已经放弃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1939年白皮书》中对于犹太移民数量和犹太人获得土地的限制将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永远处于一种少数民族的地位，这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1939年白皮书》发表的第二天，即5月18日，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The Palestinian Jewish Agency）向国际联盟递交了抗议书，并发表了如下声明：

> 委任统治当局在刚发表的《1939年白皮书》里出台了新的巴勒斯坦政策，否定了犹太民族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重建民族家园的权利。……犹太人认为，这是纯粹的背信弃义以及对阿拉伯恐怖主义的投降。……三代犹太先驱者已经显示了他们在建立民族国家方面的强大的力量，而且从今天起，我们要以同样的力量来捍卫犹太移民、捍卫犹太家园、捍卫犹太人的自由！[66]

1939年8月，第21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号召犹太人与《1939年白皮书》作斗争。但是在不久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在战争初期，希特勒的闪电战几乎横扫了整个西欧。1940年6月，法国投降，英军被迫退出欧洲大陆，战争形势对于英国来说不容乐观。此时的中东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补给训练基地。然而直到1942年秋英军在北非战场上的阿拉曼战役中取胜之前，英国在中东的地位一直都受到德、意军队的威胁。英国此时在中东地区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巴勒斯坦局势不至于影响到战争全局，所以尽管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迫害和屠杀不断升级，但英国为取悦阿拉伯人依然严格地执行了《1939年白皮书》的移民政策，这引起了犹太人的极大愤怒。

在战争的形势下，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议，经过反复的讨论与协调，大多数人认为，大敌当前，犹太人应该以克制的态度对待托管当局，要继续保持与英国政府的合作。于是，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发表声明说："目前，犹太人所关心的事情是保卫民族家园以及大英帝国的胜利。我们虽然竭力反对《1939年白皮书》，但我们没有把矛头指向英国。我们认为纳粹德国强加给英国的战争同时也是强加给犹太人的战争。我们将在许可的范围内给英国军队和英国人民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67]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以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执行主席的身份号召犹太人："就像没有《1939年白皮书》一样与大英帝国并肩打击希特勒；就像没有战争一样与《1939年白皮书》斗争到底。"[68]

但是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领袖们也清楚地看到，想再依靠大英帝国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几乎是不可能了，因此必须在国际社会寻求更广泛的支持，而拥有大量犹太人口的苏联正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要争取的重点对象之一。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以及英法奉行绥靖政策的不利局面之下，苏联为了保证西部边界的安全，着手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外交行动。1939～1940年，苏联兼并了波兰东部的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扩大了西部疆域，建立了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所谓的"东方战线"。

在新占领的领土上生活着200万名犹太人，其中包括德占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30万名犹太难民。[69]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对于这些犹太人的命运非常关心。从1941年起，他们开始就这个问题和苏联方面进行接触。

1941年1月，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在伦敦会面了迈斯基。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双方的对话竟是从一桩生意谈起，见面伊始，魏茨曼就极力向苏联大使推销巴勒斯坦的柑橘，并建议苏联用皮货来进行交换，这对于双方都有利，迈斯基表示会将此事报告给莫斯科。但是迈斯基同时也注意到魏茨曼对这桩生意的结果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按照惯例，苏联是不从国外进口水果的，显然魏茨曼此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谈生意。果然，接下来魏茨曼话锋一转，谈到了犹太民族的地位和前途问题。他指出："目前世界上

的犹太人大约有1700万人，其中有1000万人生活在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这些犹太人处于相对较好的条件下，至少不会受到肉体消灭的威胁。他所担心的是那些生活在东南欧、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犹太人。如果纳粹取得战争的胜利，他们将都会被消灭。如果英国获胜，他们也不会得到多少好处。英国人不喜欢犹太人，以巴勒斯坦地区为例，英国委任统治当局认为阿拉伯人比较听话，而犹太人是一群令人生厌的人，所以英国人的胜利对于犹太民族来说也并非是福音。为了最终解决这个问题，魏茨曼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那就是把巴勒斯坦的100万名阿拉伯人迁徙到伊拉克去，然后再从波兰和其他国家向巴勒斯坦移入500万名犹太人。”迈斯基被这个近乎疯狂的建议惊呆了，随即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巴勒斯坦目前的阿拉伯居民只有100万人，就算把这些阿拉伯人全部迁走，那里又如何能容得下500万名犹太人？”

尽管这次会谈双方并未就任何实际问题达成协议，但这是到目前为止笔者在档案材料中所能看到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与苏联外交官的第一次直接对话。这次会见表明当英国人拒绝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的请求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寻求新的支持者，而且魏茨曼向莫斯科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苏联犹太人并不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考虑争取范围之内。这充分显示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希望与莫斯科进行合作的诚意，而接下来爆发的苏德战争也使得苏联逐渐改变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

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刚从美国回到伦敦的魏茨曼又一次拜访了迈斯基。他此行的目的是希望以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名义对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犹太人代表大会和对《告全世界犹太人书》做出回应。但是考虑到过去苏联政府对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敌对态度，魏茨曼想就此事征求一下迈斯基的意见。迈斯基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找不出任何理由来反对你们发这样的电报。”但是迈斯基同时希望魏茨曼能号召其他犹太人团体也对《告全世界犹太人书》做出回应。魏茨曼说：“英国很多犹太团体已经采取行动对来自苏联的呼吁做出回应。在英国，犹太人没有得到任何机会表达自己对战争的看法。在巴勒斯坦，英国人尽量阻止犹太人建立自己的武装，英国军队里只有一个犹太师。但是在这场战争中，犹太人的声音第一次从苏联传出，这让他感到非常高兴。”

魏茨曼向迈斯基提到了他的美国之行，他说：“最近的6～7个星期，美国公众对战争的兴趣正在减弱。美国人大概是这么考虑的，俄国

人很善战，他们和英国人一起能够消灭希特勒，而美国人过多的卷入战争没有意义。”[70]魏茨曼认为这种情绪是非常轻率和不能容忍的。他认为，如果能让美国犹太人受到相应的刺激，他们就会狂热地反对希特勒。这也就是他要致电响应苏联犹太人的原因。[71]

1941年9月8日，魏茨曼代表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对《告全世界犹太人书》做出公开回应。其主要内容如下：

> 我们收到了你们的全世界犹太人团结起来与希特勒和他所做的一切作斗争的呼声。我们将在这个号召下彻底团结起来。从一开始，希特勒就选择了犹太人作为自己的牺牲品。在一个又一个被奴役的国家里，每一次他都变本加厉地推行自己的铁腕政策。法西斯分子要在全世界推行他们的政策。现在他们已经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对于你们所遭受的苦难，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到痛心。然而，我们又为苏联红军的英勇战斗而感到骄傲。这种信念从未丧失，甚至在最黑暗的时候。那些沦陷区的犹太人当之无愧的肩负起了抗击纳粹的使命。那些自由的犹太人，也在和侵略者进行战斗。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50万名犹太人都在为这场战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有10万名犹太人参军，在犹太军事组织中或者在英国海军或空军中服役。他们在黎巴嫩、阿比尼西亚（今埃塞俄比亚）、希腊、克里特岛和叙利亚进行忘我的斗争。还有几千人渴望参军。一旦有一天，敌人胆敢进犯巴勒斯坦，我们会和你们一样进行英勇斗争的。
>
> ……
>
> 致你们兄弟般的问候，请给予自己的同胞以信任，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不会背叛自己的事业。[72]

1941年10月9日，当德军逼近莫斯科的时候，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主席本-古里安在伦敦会面了迈斯基。

本-古里安首先介绍了他所领导的巴勒斯坦犹太总工会，他表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最近8年一直领导犹太工会运动。本-古里安说：“在巴勒斯坦的50万名犹太居民当中有12.5万人是犹太总工会的成员。工会是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领导力量。差不多所有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建立的居民点，都存在工会组织，工会组织是按照公共生活原

则建立起来的。虽然按照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居民点，但是工会运动目前还不具有共产主义特征。”[73]他还指出：“我们对苏联非常关心，原因首先是我们想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你们打败德国人；其次是我们想消除你们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某些偏见。阿拉伯恐怖分子在战前的暴动中攻击我们，尽管领导他们的不是阿拉伯工人运动或其他阿拉伯人民的进步组织。但是他们却得到了莫斯科在道义上的支持。我不想再提已经发生过的事，但是目前苏联对未来巴勒斯坦的态度是我很在意的，因为在战争结束后，苏联至少将是主宰世界命运的三个大国之一。”[74]本-古里安继续说：“当前莫斯科最关心的是战局，我们希望能派遣由2～3个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去。（一）明确一下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援助苏联。（二）确认一下，莫斯科方面是否清楚巴勒斯坦的工会运动在犹太民族和整个工会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75]迈斯基说：“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但是如果能让美国人明白援助苏联的重要性就太好了，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坦克、飞机和大炮。”[76]本-古里安回答道：“这些我们都能办到，也许还能帮你们更大的忙。我在美国工会运动中有很多不少朋友，其中一些人和美国政府的关系非常近。他们会给你们帮助的。”[77]

关于和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这几次谈话，迈斯基都详细地报告给了莫斯科。这几份报告很可能直接影响到二战后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态度的转变。

对于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能否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苏联的立场至关重要。获得拥有数百万犹太人口的苏联的支持对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们继续加强与苏联外交人员的接触。笔者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有三个：①希望莫斯科能够同意滞留在苏联境内的波兰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地区。②希望苏联方面释放被关押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③让苏联领导人相信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是符合苏联利益的。[78]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们除了和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进行接触之外，也在尽一切可能与苏联驻中东地区的外交使团进行联系。在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帮助下，1942年1月，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驻开罗代表伊利亚·爱泼斯坦（Elia Epstein）拜会了苏联驻土耳其大使C.A.维诺格拉多夫（C.A.Виноградов）。爱泼斯坦向苏联大使提出了三点请求：①由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派遣一个野战医院编制的医生携带药品到苏德前线

去。②由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派遣1～2名代表常驻莫斯科以便处理目前苏联境内犹太难民的移民申请问题。③请求苏联政府释放关押在苏联监狱中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79]事后，爱泼斯坦在写给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政治部主任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大使对犹太问题表现得非常无知。爱泼斯坦说："我对是否能收到莫斯科的正面答复深表怀疑。在与维诺格拉多夫的谈话中，我明白了，大使对外交决策上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任务仅仅是直接向苏联当局汇报，我希望他们能够打破僵局，这样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同时爱泼斯坦还认为与苏联外交官接触，向他们解释我们的目标也是十分必要的，"即便这种对话暂时无法引起他们对我们事业的兴趣"[80]。

1942年3月2日，魏茨曼寄给迈斯基一份有关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备忘录。与此同时在给迈斯基的信中，魏茨曼满怀深情地写道："苏联的经济理论已经体现在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国家建设构想中。集体所有制（而不是贪财的私营企业）是犹太经济组织的主要原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来没有认为和苏联的社会思想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和苏联一样在发展计划经济，这是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途径。……很大一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苏联有着亲密的、私人的联系。他们对苏联人有着强烈的好感，对苏联人民在反抗纳粹和保卫人类和平方面的英雄事迹心存感激和给予肯定。"[81]

在备忘录中，魏茨曼对目前欧洲日趋严重的犹太难民问题表示忧虑，他指出：

> 反犹主义现在已经成为希特勒凝聚法西斯势力的重要武器，而中欧和东欧各国的反犹主义传统则又进一步推动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嚣张气焰。由于纳粹的大屠杀，欧洲的犹太人数量将会大大减少。即便如此，在二战后，中欧和东欧各国也还将面临更严重的反犹主义问题。对于劫后余生的欧洲犹太人来说，移民巴勒斯坦地区是他们最好的选择。……目前犹太民族与巴勒斯坦地区的联系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巴勒斯坦已经成为大多数犹太人想要移民的地区，已经成为犹太人想要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唯一地区。1918～1941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从6万人增加到了50余万人，从占当地居民人口的1/10增加到了目前的1/3，当地犹太居民的比例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高。巴勒斯坦的经济并不发达，而在那

> 里犹太人将建设属于自己的经济生活。……目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已经得到了260万公顷土地中的150万公顷。在这里居住着50余万名犹太人。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居民同样也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近20年阿拉伯人的数目增加了2倍。巴勒斯坦地区这么好的条件足够200万~300万名犹太人生活15~20年的。犹太人除了巴勒斯坦地区再也没有别的选择。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别的国家能有这么大的领土接纳200万~300万犹太人，能够在自己的疆域里组织这样的犹太居民点。美国不行，大英帝国的自治领也不行，南美也没有这样的国家。据我所知，苏联曾建议在热带国家或者北极建立犹太移民点，但是这个计划从未实施过。
>
> 我们不能允许过去的隔阂和误会成为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发展新关系的障碍。尽管我们对苏联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种种政策有所不满，然而我们却从未敌视过苏联政府……[82]

魏茨曼试图让苏联人相信，二战后对于东欧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来说，移民巴勒斯坦地区是他们唯一的机会。过去的误会不应该成为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障碍，他希望苏联领导人能够关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关注犹太人问题。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策略被证明是有效的。1942年8月，苏联驻土耳其大使馆一秘C.C.米哈伊洛夫（C.C.Михайлов）和使馆的新闻专员H.Г.佩特连科（H.Г.Петренко）应邀到巴勒斯坦参加胜利联盟成立大会。这是苏联外交人员第一次正式访问巴勒斯坦地区。他们会见了“伊舒夫”（Yishuv）[83]的领导人、英国高级专员以及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阿拉伯人代表。两名苏联外交官对于巴勒斯坦犹太人所取得的成绩赞叹不已。但是，他们对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这一敏感问题却只字未提。即便如此，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对苏联人的这次访问依然感到满意。犹太民族社会委员会主席伊扎克·本-兹维（Yitzhak Ben-Zvi）说：“我们与苏联人的交往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苏联代表第一次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在工作和战斗。”[84]

从1943年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苏联政府之间的来往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1943年5月27日，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创始人纳胡姆·古尔德曼（Nahum Goldmann）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总统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给莫斯科方面递交了一份苏联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关系备忘录。备忘录中谈到了苏联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两点历史原因：（1）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苏联内部意识形态问题的斗争，沙俄时期在俄国犹太人的生活中影响最大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最终解决犹太问题是要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家，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则认为解决犹太问题的办法是世界革命。（2）苏联方面始终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英国在近东地区统治的工具，是大英帝国在这个地区的代言人。[85]

古尔德曼在备忘录中指出，这两点历史原因现在都已经消除了。因为"苏联已经存在了20年，苏联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争执早已成为了过往云烟。苏联的新一代犹太人不懂得这些，其他民族的人则根本不会考虑这些因素。在当前，苏联和英国已经不是敌人，而是战时的盟友了。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对抗的这两个历史原因已经消除了，它们将开始新的相互关系"[86]。所以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完全应该达成谅解。此外，古尔德曼在备忘录中还分析了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建立相互关系并保持友谊的必要性。他说："尽管目前无论从道义上还是现实政治上苏联都还没有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表示支持。"[87]但是他对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苏联一贯坚持民族自决原则。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苏联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这几十年来，犹太民族所遭受的磨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犹太人应该像其他民族那样来建设自己的生活。对于那些失去容身之处和毫无生活保障的欧洲犹太人来说，移民巴勒斯坦是最好的出路。俄国（苏联）没有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传统，它一定会对欧洲的犹太人问题感兴趣的。在巴勒斯坦地区，只有犹太人坚定不移地为反对轴心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尽管绝大多数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都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深受共产主义社会组织形式的影响，希望按照公正和平等的原则建立新的社会。巴勒斯坦地区的集体居民点以及其他形式的劳动组织，大都是建立在合作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巴勒斯坦地区的第一批移民和建设者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来自俄国（苏联）和东欧的犹太人。他们对苏联政府怀有天然的好感。实际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苏联政权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并不存在内在的矛盾。相反，这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战争结束后，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家是解决欧洲犹太问题的唯一现实的

方案。这将是对犹太人在几千年来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最好的补偿。”[88]

在备忘录的最后，古尔德曼强调说：“苏联领导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反苏的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复国主义组织所执行的政策都不具有任何对抗性。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完全是进步的运动，它自然而然的把轴心国当作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并支持那些与纳粹分子作斗争的力量，除此之外，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如此强烈的希望建立一种好的社会秩序，他们走得比苏联更远，所进行的是比苏联规模更大的一种社会试验，尽管这些试验者的做法并不能完全被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者真心希望他们能和苏联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89]

而在这时，苏联方面似乎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努力也开始有了一些积极的回应。1943年9月12日，魏茨曼在伦敦与迈斯基又进行了一次会谈。迈斯基告诉魏茨曼说：“苏联人理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并确信将和你们站在一起。但俄（苏联）仍有些担心，因为巴勒斯坦的面积太小了。”[90]

这次会谈之后，迈斯基从伦敦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在埃及停留并访问了巴勒斯坦地区。他和妻子在圣地停留了两天，拜望了英国驻巴勒斯坦地区高级专员哈罗德·麦克米查尔（Harold McMichael）。随后在本-古里安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耶路撒冷附近的两个基布兹（kibbutzim）[91]。在与本-古里安的谈话中，迈斯基说：“犹太问题是二战后必须解决的问题，有人告诉我，巴勒斯坦没有足够的空间，我必须要了解事实真相，了解巴勒斯坦的潜力究竟如何。”[92]迈斯基对于“基布兹”具有浓厚的兴趣。这让本-古里安感到振奋。本-古里安在给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的报告中写道：“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另外一个国家（指苏联）开始对我们的问题感兴趣。”[93]

但是直到二战结束，苏联官方既没有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作出任何承诺，也没有答应他们所提出的任何条件。二战时期，苏联人的策略主要是利用“犹委会”来打犹太人这张外交牌——通过该委员会向西方国家索要援助。1943年5月，苏联政府派遣“犹委会”领导人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访美时，曾严格地规定了他们的权限和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立场。这个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促使苏联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德国及其仆从国并在美国发起援助苏联红军的运动”[94]。

巴勒斯坦仍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而英国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计划，因此“犹委会”代表团被禁止在建立犹太国问题上发表任何意见。[95]由此可见，苏联在对德作战期间尽量不破坏与盟友的关系。既然英国是盟友，那它对其委任统治地的“主权”就是不容置疑的。苏联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千方百计和他们取得联系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苏联对其在巴勒斯坦建国计划的支持，而在二战时期，苏联方面认为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作出任何承诺对自己都是没有好处的”[96]。

1943年7月，古尔德曼和魏茨曼先后邀请出访美国的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访问巴勒斯坦，1943年8月初，犹太总工会在美国的代表梅罗姆·梅里姆斯基亲自拜望米霍埃尔斯，邀请他和费费尔在返回苏联的途中访问巴勒斯坦。尽管米霍埃尔斯对与“伊休夫”的代表直接会面非常激动，对巴勒斯坦犹太人怀有深情，但是，由于没有得到苏联政府的批准，他不得不表示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犹委会”都无权做出这个重大决定。他建议梅里姆斯基向苏联发一个正式邀请，并与苏联驻美大使馆联系。当“犹委会”代表团在英国访问时，胜利联盟也向“犹委会”发出邀请，希望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能访问巴勒斯坦。但是，“犹委会”以急召米霍埃尔斯回国参加委员会改组为名婉拒了这一邀请。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回国途中在开罗中途停留时，一个记者追问他们有无可能访问巴勒斯坦，他们推脱道：“我们很高兴能前往巴勒斯坦访问……但是我们没有收到这方面的邀请。”[97]

总之，在苏德战争期间，苏联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非常暧昧。一方面利用“犹委会”与包括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内的国际犹太人团体进行合作，为苏联政府争取国际援助；另一方面，为了不得罪英国，又不愿意对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明确表示支持。

[1] Robert Conquest，*Power and Policy in the U.S.S.R.*：*The Struggle for Stalin's Succession*，*1945-1960*，New York：St.Martin's Press；*Борщаговский А.М.* Записки Баловня Судьбы，М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 Я помню...Москва：Прогресс-Академия，1992；*Шейнис З.С.* Провокация века，Москва：Независимое изд-во ПИК，1992；*Маркиш Э.* Столь Долгое Возвращение...Тель-Авив，Редисловие，1989.

[2]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4；*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Rom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1948.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6.

[3] *Ваксберг А.М.* Сталин Против Евреев//Детектив и политика，1992，№3.С.150-208；*Борщаговский А.М.* Обвиняется Кровь，Москва：Прогресс-Культура，1994；*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В Плену у Красного Фараона，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ечледования Евреев в СССР в Последнее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4；*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Тай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талина，Власть и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1；*Брент Д.*，*Наумов. В.* Последнее Дело Сталина，Москва：Издельство Проспект，2004.

[4] 张建华：《简论苏联的犹太人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高麦爱：《斯大林时期苏联对犹太人的政策》，《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唐裕生：《前苏联的反犹政策与犹太移民潮》，《世界民族》1995年第1期；刘心华：《苏联境内犹太人问题探讨》，《问题与研究》1986年第7期。

[5]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Евреи，История по Брокгаузу и Бухарину.Москва-С-Петербург，2003.С.238，转引自郭宇春：《俄国犹太人研究（18世纪末—1917年）》，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第166页。

[6] ﹝苏联﹞列宁：《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年和1896年）》，《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71页。

[7] 据统计，1917年1月，布尔什维克党员总数是23600人。在1917年之前加入布尔什维克的犹太人共958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的犹太人总共是1175人，参见Thomas E.Sawyer，*The Jewish Minority i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Avalon Publishing，1979，pp.111-112。

[8]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第127～128页。

[9] Zev Katz，Rosemarie Rogers，Frederic T.Harned，*Handbook of Major Soviet Nationalities*，New York：Free Press，1975，pp.358，376-377.

[10] 郭宇春：《犹太人与俄国革命运动》，《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1] 唐裕生：《前苏联的反犹政策与犹太移民潮》，《世界民族》1995年第1期。

[12] ﹝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下册，何宏江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996页。

[13]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450页。

[14] 参见﹝苏联﹞列宁《崩得在党内的地位》，《列宁全集》第8卷，中共中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6，第67～68页。

[15] ﹝苏联﹞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9，第64页。

[16] ﹝苏联﹞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第64、66页。

[17] 1932年12月27日，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颁布了“苏联身份证规则”。依据该规则，自1933年起，公民身份证必须注明个人所属的民族，因此苏联犹太人的身份证上清楚写着“犹太族”。参见R.Beermann，“Russian and Soviet Passport Laws，” *Bulletin of Soviet Jewish Affairs*，No.2，1968，pp.61-62。

[18] William Korey，“The Legal Position of Soviet Jewry，” in Lionel Kochan（ed.），*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76.

[19] COPY：WA，Appendix，*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26.

[20] ﹝美﹞泽夫·卡茨主编《苏联主要民族手册》，费孝通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第362页。

[21] 刘心华：《苏联境内犹太人问题探讨》，《问题与研究》1986年第7期。

[22] ﹝苏联﹞列宁：《崩德在党内的地位》，《列宁全集》第8卷，第70页。

[23] *Шварц С.*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Нью-Йорк：Издельство им.Чехова，1952，С.100.

[24]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С.8，Ваксберг А.И，Сталин против евреев，Детектив и политика，1992，№3 С.150-208.

[25] Aron J.Katsenelinboigen，*The Soviet Union*：*Empire*，*Nation*，*and System*，New Brunswick & London：Transaction Pubishers，1990，p.169.

[26] ﹝美﹞泽夫·卡茨主编《苏联主要民族手册》，费孝通等译，第362页；*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С.131，

[27] ﹝俄﹞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李惠生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第658页。

[28] Lionel Kochan，*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New York：Institute of Jewish Affairs，1978，pp.47，303.﹝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下册，何宏江等译，第965页；﹝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

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魏小明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第330页。

[29]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С.37-38.

[30] 参见*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 С.8；Ваксберг А.И.Сталин против евреев.Детектив и политика. 1992.№3. С.150。

[31]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4卷，第127～128页。

[32] Shimon Redlich，*Propaganda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Russian*：*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1941-1948*，Colorado：East European Quarterly，1982，p.13.

[33] COPY：CZA Z5/1377，*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63.

[34] Nora Levin，Naomi Levine，*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Paradox of Survival*，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0，p.401.

[35] 苏联情报局是1941年6月24日成立的，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领导，负责掌管战时苏联官方的情报交流和海外宣传工作。

[36] 关于在莫斯科举办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的建议，可参考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5.Д.35.Л.64-65.//*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С.35-36。

[37] *Эренбург И.* Братья-евреи Всего Мира，《Известия》，26 августа，1941г.//*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1948，С.38.

[38] Братья-евреи всего мира. *Правда*，25 августа，1941 г.

[39] 这些委员会有全斯拉夫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犹委会”、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学者反法西斯委员会。

[40]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337～338页。

[41] 关于苏联建立“东方战线”的过程，可参见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40～41页；还有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239～244页。

[42] АВПРФ.Ф.048.Оп.48.П.431.Д.10.Л.34-50.//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1941-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Т.1：22 июня 1941 г.-8 мая 1945 г.Сост.Г.П.Кынин，Й. Лауфер.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6.С.124-135.

[43] АВПРФ.Ф.048.Оп.48.П.431.Д.10.Л.34-50.//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1941-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Т.1：22 июня 1941 г.-8 мая 1945 г.Сост.Г.П.Кынин，Й. Лауфер.С.124-135.

[44] АПРФ，Ф.013.Оп.4-а.П.11，Д.4.Л.1-3.//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1941-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Т.1：22 июня 1941 г.-8 мая 1945 г.Сост.Г.П.Кынин，Й. Лауфер.С.143-144.

[45] Визит В.М.Молотова в Лондоне в мае 1942 г. *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У.Черчиллем，А.Иденом и Переписка с И.В.Сталины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7.№6.С.125-129.

[46] Визит В.М.Молотова в Лондон в мае 1942 г.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У.Черичллем，А.Иденом и переписка с И.В.Сталины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1. С.164-169.

[47] Визит В.М.Молотова в Лондон в мае 1942 г.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У. Черичллем，А.Иденом и переписка с И.В.Сталины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1. С.172-173.

[48] Визит В.М.Молотова в Лондон в мае 1942 г.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У. Черичллем，А.Иденом и переписка с И.В.Сталины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1.С.172-173.

[49] 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50] “胜利联盟”是巴勒斯坦犹太人旨在支援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而成立的一个民间组织。战争期间，胜利联盟通过募捐等活动为苏联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胜利联盟成立一年之后，成员就发展到了2万多人，在巴勒斯坦地区有了100个分部。胜利联盟不仅仅是一个亲苏组织，它的成员中包括了各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犹太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也有一些犹太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参与其中。胜利联盟并不为莫斯科所控制，因此苏联政府对它的活动和宗旨也有所怀疑，但是苏联方面不能不承认胜利联盟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参见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al-Political History（RGASPI），f.17，o.125，d.86，l.27，转引自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46，p.3。

[51]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1948，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ия История，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С.204.

[52] Shimon Redlich，Kirill Mikhailovich Anderson，I.Altman，*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London：Psychology Press，1995，p.218.

[53]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 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4.С.169.

[54] Arkadi Vaksberg，Antonina Bouis，*Stalin Against the Jews*，New York：Knopf，1994，p.108.

[55] 宋永成：《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悲剧》，第56页。

[56]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 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С.24.

[57] 埃里希和阿尔特是两位波兰犹太工人运动领袖，1941年10月，他们便向贝利亚和斯大林提出了建立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的建议，但是在他们提出建议后不久就突然被捕，苏联政府没有宣布任何拘捕他们的原因。1952年5月16日，埃里希在古比雪夫监狱自杀；1943年2月17日，阿尔特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处决。*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1948，С.24，26.

[58] 宋永成：《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悲剧》，第56～57页。

[59] 在克里木建立犹太人自治共和国的想法在20年代就产生了。1943年在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动身前往美国之前，这一想法又复苏了。根据Г.В.科斯迪尔琴科的证实："……1943年夏天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抵达了美国之后，得到了莫洛托夫对于就在纳粹分子被从克里木赶出之后从物质上支持犹太人迁居到克里木一事同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谈判的批准。"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В Плену у Красного Фараона，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ечледования Евреев в СССР в Последнее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С.429.

[60] *Медведев Ж.А.* Сталин и "Дело Врачей"，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1.С.93.

[61] 〔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魏小明等译，第335页。

[62] 〔苏联〕尼·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372页。

[63] 参见宋永成《二战期间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代表团的盟国之行评

析》，《世界历史》2012年第1期。

[64] Shimon Redlich，Kirill Mikhailovich Anderson，I.Altman，*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p.114.

[65] Charles L.Geddes（ed），*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New York：Praeger，1991，pp.185-199.

[66] 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bin（edited），*The Israel-Arab Reader：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New York：Penguin Books，2008，pp.44-49.

[67] David Ben-Gurion，*Israel：A Personal History*，translated by Nechemia Meyers and Uzy Nystar，New York：Funk & Wagnalls，1971，pp.53-54.

[68] David Ben-Gurion，*Israel：A Personal History*，translated by Nechemia Meyers and Uzy Nystar，p.54.

[69]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46，p.2.

[70] АВП РФ.Ф.059.Оп.1.П.352.Д.2404.Л.158-159.//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20-21.

[71] АВП РФ.Ф.059.Оп.1.П.352.Д.2404.Л.158-159.//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20-21.

[72] COPY：BG ARCHIVES，*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p.10-11.

[73] COPY：BG ARCHIVES，*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p.11-12.

[74] COPY：BG ARCHIVES，*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12.

[75] COPY：BG ARCHIVES，*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12.

[76] COPY：BG ARCHIVES，*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13.

[77] COPY：BG ARCHIVES，*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13.

[78] 早在1947年7月17日，两位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的代表罗纳尔德·E.诺伊曼

（Ronald E.Neumann）与莫里斯·L.别尔茨维克（Maurice L.Perlzweig）就与苏联驻美大使K.A.乌曼斯基（К.А.Уманский）对这几个问题进行交涉过。乌曼斯基表示，那些在苏联境内的波兰犹太人现在已经成为苏联公民，而且绝大部分人对自己的现状感到满意，他们并不愿意移民巴勒斯坦。对于目前被关押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乌曼斯基表示，苏联方面之所以逮捕他们是因为他们进行了反苏活动，而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于未来巴勒斯坦的地位问题，乌曼斯基的回答却很含糊，说未来巴勒斯坦的地位当然要由一次国际会议来决定。苏联将作为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参见COPY：CZA S25/486，*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p.5-7。

[79] COPY：CZA S25/486，*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21.

[80] COPY：CZA S25/486，*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21.

[81] COPY：WA，*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25.

[82] COPY：WA，*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p.26-28.

[83] 伊舒夫在希伯来语中的原意为“居住”“定居”，后来引申为犹太社团。

[84] COPY：CZA J89/125，*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p.41-42.

[85] COPY：CZA Z5/1377，*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p.61-62.

[86] COPY：CZA Z5/1377，*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62.

[87] COPY：CZA Z5/1377，*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62.

[88] COPY：CZA Z5/1377，*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64.

[89] COPY：CZA Z5/1377，*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65.

[90] MINUTES：WA，*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68.

[91] 基布兹是犹太人建立的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农庄。

[92] MINUTES：WA，*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68.

[93] MINUTES：CZA S100/40，*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71.

[94] АВП РФ.Ф.07.Оп.4.П.29.Д.30.Л.3-5.//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 док.1941-1953гг.Т.I.С.75.

[95] АВП РФ.Ф.07.Оп.4.П.29.Д.30.Л.3-5.//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 док.1941-1953гг.Т.I.С.75.

[96] АВП РФ.Ф.0118.Оп.7.П.4.Д.5.Л.26-28.//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 док.1941-1953гг.Т.I.С.109.

[97] Shimon Redlich，*Propaganda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Russian*：*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USSR*，*1941-1948*，Boulder：Colorado，1982，pp.146-147.

第二章 二战后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建国政策的形成

第一节 战后初期苏联的大国合作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战争期间进行的一系列会晤使得西方国家从事实上承认了苏联的大国地位。斯大林开始以胜利者的姿态成为英美政治上的强有力的伙伴。与此同时，战争使得苏联在人口和物质上都遭受了极大损失，苏联并没有表现出与其国际地位相符的经济实力。一个躺在废墟上的国家是不能和西方国家在军事技术领域相抗衡的。因此，面对越来越难以琢磨的国际政治局势，这就要求苏联领导人明确其两极格局下的战略方针。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于战后初期苏联外交政策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总的来说，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追求控制和扩大其势力范围；另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所采取的只是温和的、谨慎的和防御性的政治对策。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前，上述两种观点的代表——无论是传统学派[1]还是修正学派[2]，都很少能接触到苏联的档案材料，其结论主要是依据对苏联领导人公开言论及其行为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推断。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档案逐步对外开放，研究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行为是古怪的和反复无常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是无所作为的；斯大林的远东政策与欧洲政策一样，都是“盲目的”“毫无内在联系的”[3]。也有人认为，斯大林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保护其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不愿直接与西方对抗。[4]还有人认为，二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战略的基础是建立在可能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估计上的，总体上是一种积极防御战略，冷战开始后才迅速转变为阵营对抗战略。[5]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不能全面或准确地反映出二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战

略目标，特别是没有勾勒出这一时期斯大林对外政策变化的轨迹，从而难以正确地理解苏联对外政策的实质。

了解战后苏联的目标是什么，这对理解盟国在二战结束前的外交和搞清冷战本身的起源都至关重要。俄罗斯方面迄今为止仍未公开有关苏联战后计划、意图等方面的档案，尤其是能直接反映苏联领导层对西方盟友的真实想法，及将来与西方盟友的关系会怎样的文件非常稀缺，所以这场争论很难有定论。直到现在，史学界有关该领域所得出的结论和判断仍是通过苏联外交辞令和在战争期间的外交往来文书、备忘录以及偶然找到的一些非官方的苏联政府内部通告演绎、推导出来的。

对于斯大林来说，维护苏联国家安全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而确定有利于苏联的边界、建立苏联势力范围和确保苏联在欧洲和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也是苏联考虑战后安排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为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二战时曾多次开会讨论战后和平与安排的问题。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及有关机构也在这方面提出了各种设想和计划。在这些设想和计划当中，由苏联三位著名的外交家兼西方问题专家迈斯基、葛罗米柯和李维诺夫在1944年1月至1945年夏写的报告最引人注目。李维诺夫作为莫洛托夫的副手，任外交人民委员部战后秩序与和平条约筹备特别委员会主席；迈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员部副委员，负责赔偿规划；葛罗米柯任苏联驻美大使，领导苏联在联合国谈判的准备工作。尽管他们的报告所关注的角度和内容不尽相同，但主题却一样，都把眼光定位于未来苏联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上。

迈斯基的报告

迈斯基的报告是1944年1月10日由他亲自向莫洛托夫递交的，他在报告中设计了未来“30～50年”苏联外交政策的战略原则。迈斯基写道：“在今后30～50年必须保证苏联在欧洲和亚洲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在最近10年当中，苏联的首要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迈斯基反复强调苏联和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保持友好关系的必要性。他指出：“如果近期欧洲不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那就没有理由认为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关系会恶化。无论是从自己战后经济恢复的需要出发，还是从维护和平的目标出发，苏联都希望同美国和英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因为要达到上述目的同这两个国家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无论美国还是英国，同苏联都没有

（也不见得会有）领土和经济争端，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基本上不涉及苏联。相反，美国在实行自己的帝国主义计划时会希望苏联至少保持中立。”随后，迈斯基具体论述了苏联外交应遵循的基本方针：一是领土方面的要求，苏联的边界应以1941年边界为基础进行局部的调整；二是制定各种措施防止法西斯国家东山再起；三是与苏联利益相关的周边国家国内体制应该建立在按照“人民阵线”主张提出的广泛民主原则的基础之上。同时他指出“要在这些国家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恐怕不得不从外部，即首先是由苏联、美国和英国施加种种影响”，强调苏联在“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面前不应当有所犹豫而止步不前。[6]

迈斯基预见到了苏联在中东地区进行“经济、文化和政治影响力”扩张的“新机遇”，但是他警告苏联政府要在中东地区谨慎行事，避免同英国和美国发生冲突。在迈斯基看来，殖民地将会成为英美竞争的重要角逐场，在这些地区美国会努力“通过经济手段排挤英国”。所以，即使苏联在这些殖民地没有经济利益，对它来讲也将会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尽快在这方面做好准备”[7]。

迈斯基指出，大英帝国是一个处于缓慢衰退中的“保守帝国主义”国家。战后对其利益的主要威胁将来自于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后者将挑战英国在其殖民地和世界贸易中的特权地位。“英美之间的矛盾将渲染战后时期的世界形势。”英国的外交将会考虑“用美国牌来对付苏联，用苏联牌来对付美国”，但最终“全球地位斗争的利益将会把英国推向苏联这一边”。迈斯基坚持认为苏联“可能的和可行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应当是“加强同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友谊”[8]。

迈斯基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认为没有必要改变现有的秩序。美国则相反，它迄今为止只拥有极少的殖民地，美国想要通过“委任统治”的方式寻求进入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殖民地的道路。它期望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能够很快成为“委任统治地”的真正主人。英美在殖民地问题上正酝酿着巨大的冲突，而这些冲突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苏联的态度。

迈斯基甚至强烈认为如果战时的合作能够继续，经济强国美国将能够对苏联进行巨大的援助。他认为，战后苏联的首要任务是经济重建，因此对美国的经济援助会“极为感兴趣”（相对而言，对英国感兴趣的程度就没那么高），迈斯基把西方的经济援助列为苏联经济重建的第三个主要支柱，仅次于国内资源和战争赔款。[9]

葛罗米柯的报告

葛罗米柯的“关于苏美关系问题的报告”（1944年7月14日）看上去更像一份个人汇报。他认为二战后美国很有可能“会乐于同苏联在经济和政治上开展合作”，而且这种合作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后国际关系的性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葛罗米柯对美国目前的对外政策进行了详细分析，内容如下。

（1）美国已经走出孤立主义，将保持积极参与世界范围的国际事务；由于罗斯福的政策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而且从长远来看，即使1948年后美国防御战略可能出现变化，但“因合作而带给美国的根本利益”依然存在，因此这种参与对苏联也许仍会有利。

（2）美国很愿意看到战后德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弱化。除了在安全方面的考虑之外，还因为美国金融资本家不希望德国成为美国在欧洲的强劲对手。

（3）美国和苏联在经济上存在互补性：美国人需要寻找新的市场和原材料；而苏联则需要寻求技术援助、技术转让和科研合作。[10]

葛罗米柯递交这份报告之时，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在苏联与英美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这一大背景之下，葛罗米柯的这份报告对美国战后基本利益进行了良性的解读。他认为苏联在战后依然有机会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这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

李维诺夫的报告

李维诺夫曾就战后安排问题先后向莫洛托夫递交过三份报告：《关于苏英之间合作的基础（1944年11月15日）》、《关于同美国的关系（1945年1月10日）》和《关于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1945年1月11日）》。

这三份报告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内完成的，而且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对三大国将来关系分析的主体。

有关对美国和英国的报告在设计上非常相似。每一份都全面、客观地从历史角度分析了该国同苏联的关系，随后还有从个人角度分析的汇总和对策。

就苏美关系而言，李维诺夫从双方地缘政治利益、美国对苏联区域一体化的长远打算入手，强调苏美关系传统以来积极的一面。他赞同并引用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本杰明·韦尔斯（Bejamin Welles）的观点："在所有大国中，苏联与我们的利益冲突是最小的。"但是，在战后一系列问题的冲击下，这一积极历史关系的规范性还会存在吗？回答这一问题时，李维诺夫从苏联战时外交政策最关心的部分——1941年苏联西部边界问题——出发来思考。他并不认为苏联回到以前的边界对华盛顿方面而言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后者对这个区域兴趣不大。美国总统罗斯福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所以他会对此作出恰当的反应。刚开始他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提出异议，而"最终还是会向事实屈服，承认我们所希望的边界"，对巴尔干地区的问题也一样。[11]

李维诺夫认为，战后美国肯定会寻求新的市场，而同时苏联在重建方面的潜力很大，因此双方可能会出现新的共同利益区，这也许会构成"苏美关系中的新的经济基础"。而双方的另一个合作基础大概会是殖民地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苏联"甚至可能支持美国（反对殖民）的期望"，而"这要看苏联与英国关系究竟如何了"[12]。

作为美国问题专家，李维诺夫指出苏美双方拉近关系的主要阻力有二：美国国内的社会舆论；美国宪法反对与他国结成长期政治同盟的传统。这里他又一次十分尖锐地指出："美国和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必然会使双方关系紧张，美国人将会意识到和我们尽可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必要性，因此我们也不必急于联合其中一方对付另一方。"

在结尾，李维诺夫个性鲜明地强调美国社会舆论至关重要。他清楚地看到它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的独特性，并指出："毋庸置疑，我们对美国国内民意的影响必定会对两国政府的紧张关系及其性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如果没有公众的同情，任何合作与和解的行为都无法产生理想的结果。"[13]

李维诺夫的第二份报告非常生动地对苏英关系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概括。总体上看，与苏美关系比起来，他认为这种关系对苏联而言是更亲密、更重要的（尽管历史上消极面更多一些）。因为原先的一些冲突（宣传、俄国债务）已不复存在，而其他矛盾也已不再那么突出了：英苏可以借用双方对伊朗条约的模式合作性地化解两国在伊朗和阿富汗的竞争；而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英国也不会拒绝适度修改《蒙特勒公

约》（*The Montreux Convention*）。在李维诺夫看来，英苏之间的主要矛盾不过是“在战后时代继承了过去欧洲大国均势的模式。随着苏联实力增长、德国被打败、法国和意大利被削弱，苏联将成为欧洲唯一的陆上强国，这可能会激化这个矛盾”。但李维诺夫认为问题本身就包含了解决办法：“这个问题会有力地驱使英国同我们达成协议。而只有在根据欧洲的地缘原则、和平划分安全范围这个基础之上，该协议才是可行的。”李维诺夫在报告中写道：“以此为标准，我们最大的安全范围应包括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英国的范围无疑应包括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而挪威、丹麦、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应成为‘中立地带’。”[14]奇怪的是，在李维诺夫两个月后完成的下一份报告（《关于区域和势力范围问题》）中，他对这些国家的划分稍微做了修改：这次挪威归到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而英国的势力范围延伸到了瑞典、丹麦和意大利。李维诺夫接着还建议：“这六个国家（即挪威、土耳其、南斯拉夫、丹麦、意大利和瑞典）还有待于双方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15]

在李维诺夫看来，在经济合作、共同抵御美国在远东的扩张，以及就近期而言满意地解决《租借法案》方面，两国都有着共同利益，有关英苏间协定的基本动机会因此而增加。他建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赶紧在战争结束前同英国达成“君子协定”，这是因为后者“早已开始匆忙地在为自己拼凑一个安全体系，而且似乎没和我们有什么合作。一旦这个所谓的西方区域成为既成事实，到那时英国在和我们谈判时的处境就会有利得多……”[16]

李维诺夫对战后世界设想的大概框架是由英国和苏联对欧洲实行战略共管，与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世界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划分各自的安全地带。

对我们今天来说，三位苏联外交家的这些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它使我们更广泛地窥探到苏联精英内部对外交政策以及他们对苏联战后在安全需求、国家利益和存在的弱点等方面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很珍贵的资料。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因帝国主义间的争斗而四分五裂，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等，虽然这些文章与布尔什维克的“旧思想”还保留着大量的连续性，但它们对资本主义西方做出的一些假设，并认为资本主义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等，这都已经与布尔什维克

的传统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

尽管这些报告由三位不同的外交家拟就，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点。

第一个共同点是苏联最基本的安全利益和对战后世界安排的关注。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很自然的。由于俄-苏传统以来的不安全感都会受到大战的损伤而加剧，苏联显得格外关注安全问题。即使如此，三位作者都没有把安全作为是对全球霸权或“世界革命”的绝对论的解释（除迈斯基偶尔有这方面的倾向），他们仍有限地从现实政治角度提出了战略目标。1941年的边界、德国和日本战败、苏联周边的“友好政府”（尤其是在西部边界）——毫无疑问，眼下这些战略目标是苏联一切有关战后未来走向的出发点，对此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他的将领都没有丝毫隐瞒。

这些报告的第二个共同点更让人吃惊：他们一致认为要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战后世界秩序，苏、美、英三大国间的合作是新秩序唯一有效的基础，并且认为这种新秩序有助于保护苏联的利益。这当然是苏联在战争期间的官方立场，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苏联“西化派”，这些人出于职业原因，倾向与西方合作。“西化派”相信苏联最重要的安全利益不仅是同美国和英国和解，更重要的是要实现这些利益还需要苏、美、英三国之间的合作。相对传统的布尔什维克所持的西方威胁论观念而言，这种看法暗示着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对西方的敌意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已经变得相当温和，他们更多地视西方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非问题本身，至少有一段时期是这么认为的。反过来，这种反思只能被看成是在战争期间与英美合作逐渐产生的一个结果，他们渐渐把英美看成是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坚定的反对者，而且这两个国家承认苏联的安全利益，并且在经济上可以持续为苏联战后重建提供急需的援助。

综上所述，那么苏联和英美在战后继续保持合作关系的性质就成了关键问题。在这点上李维诺夫、迈斯基和葛罗米柯之间没有重大分歧：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把战后合作看成是基于在世界范围内划分势力范围的大国协调。他们认为这种“三警察”模式的合作能够保证苏联三个主要战略要求：继续打击德国和日本；继续使苏联参与世界事务的讨论；将苏联战后的边界和势力范围合法化。

苏联这些外交家（尤其是李维诺夫）也知道硬性划分势力范围将带

来的危险，这可能会导致这些区域相互敌对，因此他们强调大国间继续保持合作和划分它们各自的势力范围是一个很重要的预防措施。

但任何一个战略三角要想达到稳定似乎还需要另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三个中心大国要彼此分开并且是相对平等、互相制衡，从而可以排除其中两个大国联合来对付第三个大国的风险或至少可以把这种风险降到最低。因此李维诺夫、迈斯基和葛罗米柯（尤其是李维诺夫和迈斯基）认为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坚信英美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他们在文中非常清晰地阐明了这个观点。

这些报告向我们展现苏联世界观的全景和面临的危险系数，苏联人把德日侵略的复活看成是主要的潜在危险，而认为英国（主要由于其实力不足）或美国（距离更遥远）都不可能在近期对苏联构成严重的威胁。考虑到“英美矛盾”，联合反苏的想法被认为是不现实的，这给苏联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额外的回旋余地。虽然基于意识形态划分苏联和英美两大阵营的状况依然存在，但是双方在阻止新的战争和侵略上又有了新的共同利益，而这掩盖了原来的对抗，使之退而求其次——至少暂时是这样的。这种观点强调通过保持同盟性质上的合作，减少德日军国主义重新抬头带来的危险性。

通过对三位苏联外交家报告的分析，不难看出在战后初期，苏联希望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大国合作是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基调，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和造成的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面临的困难重重。这自然就需要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抗衡。

第二，雅尔塔体系是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缔造的，它使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保障，总的来说，斯大林对于雅尔塔体系是满意的。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这一体系的构筑都符合苏联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从芬兰经波罗的海三国到东欧，从近东经蒙古、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到南千岛群岛（北方四岛），苏联通过战争和雅尔塔体系获得的政治权益，实现了长期以来追

求建立广阔的环苏联安全缓冲带这一战略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与西方盟国建立合作和协调关系的结果。因此，斯大林首先需要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现和平共处，唯有如此，才能以最小的代价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第三，只有同英美继续保持合作，才能源源不断地从西方国家那里获得援助用以苏联的战后重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援助对于苏联的经济建设来说至关重要，前文笔者提到，迈斯基曾把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作为苏联战后经济重建的三大支柱之一。

总之，只有采取合作的方针才能维持雅尔塔体系的存续，维持雅尔塔体系就能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在这方面，斯大林原则上是遵守与西方划定的势力范围界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对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

在西方的史学研究中，谈到杜鲁门主义的产生时，往往把希腊问题与土耳其和伊朗事件相提并论。其实，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来看，这两者在实质上有很大区别。如果说苏联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表现出一种积极姿态，那么对于希腊问题则明显采取了保守和消极的方针。根据1944年10月斯大林与丘吉尔达成划分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斯大林把希腊划给了英国。[17]对于斯大林来说，正是希腊之“失”，才有东欧之“得”。这个交易充分说明，在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的序列中，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是摆在第一位的，至于革命，如果无助于保证苏联的根本利益，则是不会纳入苏联对外政策考虑之中的。结果，当1945年2月12日签订要求希腊解放军予以遣散的《瓦尔基扎协定》（*The Treaty of Varkiza*）时，斯大林在雅尔塔三大国首脑的聚会上表示，“对英国在希腊的政策是完全信任的，无意进行干预”[18]。

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战后的远东战略主要有两点：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时期在满洲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得到保证，而斯大林对美国的回报是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和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19]

纵观斯大林在战后初年的所有外交举措，对于苏联奉行的是与西方

大国合作的对外政策方针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这种合作中已经隐含着分裂的因素。除了在国家利益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以外，还有以下的原因。

首先，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苏联与西方大国本来就是敌对的。战争期间结成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结束、共同的敌人消失后，这种同盟关系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

其次，虽然罗斯福与斯大林同样主张战后实行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但罗斯福的本意是通过几个大国掌管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性组织，在协调大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安排国际事务，以求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至于美国的利益，罗斯福相信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门户开放政策就可以得到保证。但其他西方大国首脑（譬如丘吉尔）却没有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实力和新的思维，罗斯福可以对斯大林进行容忍和忽略，他的继任者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却未必会继续容忍和忽略，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罗斯福的去世已经预示了大国合作的黯淡前景。

最后，与罗斯福合作政策的内涵不同，斯大林主张的大国合作，本质上是因循历史上由主要战胜国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传统做法，试图以雅尔塔体系取代凡尔赛体系而重建以美苏两国为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几十年来，苏联一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在国际事务上受到压抑和歧视的“孤岛”心态以及大俄罗斯主义的复仇心理，使战后的斯大林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苏联从此可以参与主宰世界命运的决策了。因此，尽管奉行大国合作的政策，但在《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尚未顾及的地方，苏联还是不时地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扩张行迹。这集中体现在了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

伊朗和土耳其均属于中东地区，历史上，这一地区一直是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进行角逐的场所。19世纪以来，控制土耳其两海峡以及南下波斯湾取得一个重要的不冻港，一直是沙俄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1917年十月革命后，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而自顾不暇，无力再争夺这些战略要地，于是苏俄的势力几乎完全退出了中东地区。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苏联重新开始关注中东地区。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目标中，伊朗和土耳其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这些

均是雅尔塔体系尚未确定或有待调整其势力范围的地区。在伊朗问题上，苏联采取的是一种咄咄逼人的与西方对抗的一种姿态。斯大林拒绝从伊朗撤军，支持伊朗国内反对党，甚至陈兵边界对伊朗政府加以武力威胁。在土耳其问题上，斯大林试图以实力为基础，通过恫吓和讹诈手段，要求对1925年缔结的《苏土友好中立条约》进行重大修改。但是在英美两国的强大压力之下，苏联方面不得不选择退却和妥协。[20]

土耳其海峡危机和伊朗危机对于战后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通过对这两次危机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斯大林的行为就其本身来讲，虽然有扩大苏联在近东势力范围的动机，但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对英美的强硬态度，苏联采取了妥协和退却的方针。苏联从伊朗的撤军，同它从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撤军一样，表明斯大林的扩张企图是有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产生直接的对立和冲突。

第二，英国在伊朗和土耳其危机时均得到美国的强有力支持。迈斯基、李维诺夫和葛罗米柯在各自的报告中所反复提到英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两个地区均未得到体现。不仅如此，英美两国在远东、东欧以及德国问题上均保持了一致的立场。这显然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

第三，苏联的外交冒险加强了英美之间的协调与认同。这在客观上促成了西方国家的联合。苏联与西方本来就不牢固的合作关系出现了裂痕，双方开始猜疑、敌视和对立。如果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没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共鸣的话，那么凯南的“遏制理论”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则表明苏联在近东的行为已经使西方大国感到自身利益受到侵犯，并由此引起了它们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的调整。因此，可以认为土耳其和伊朗事件成为苏联与西方大国之间形成集团对抗局面的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斯大林主观上希望与西方继续保持合作关系，但是到了1947年，苏联和英美两国的关系已经开始由热变冷，英美两国在战后已经结成了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实际上是针对苏联的。显然，意识形态和战略期望等原因，苏联的决策层高估了英美间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同时也高估了西方对苏联地缘上新一轮扩张所能承受的忍耐力，于是才有了斯大林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冒险。

尽管英美两国在战后许多问题上都保持了一致的立场。但是，只有在巴勒斯坦地区，英国政府始终得不到美国盟友的任何支持，英美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的前景以及欧洲犹太难民的处置问题上存在着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矛盾也给了苏联重新离间英美关系和插手巴勒斯坦事务的机会。

第二节 英美在犹太人问题上的矛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共有约1000万犹太人，由于纳粹的大屠杀，到1946年时，仅有约400万犹太人幸存下来。[21]

纳粹大屠杀在客观上促进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它从精神上促进了犹太民族意识的觉醒，无论宗教观念和政治信仰是什么，约600万死难的同胞使得犹太人接受了这样一个认识，没有祖国的犹太人只能任人宰割，要避免这种灾难的重演，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巴勒斯坦去，去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二战前，全世界犹太人中真正赞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只有少数人；而到了战后，大多数犹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信徒。

纳粹大屠杀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是激起了世界各国对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世界各国公众先是对大屠杀的事实感到震惊，进而对犹太民族的悲惨遭遇产生深切的同情。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应该有一个能使其安全得到保障的民族家园。公众的这种思想和感情很容易转变成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巴勒斯坦社团的同情和支持，进而影响本国政府战后对巴勒斯坦政策。

二战期间，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一直没有停止反对英国《1939年白皮书》。以本-古里安为首的新一代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认为，英国已经从《贝尔福宣言》的立场上严重倒退，所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能再依靠英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随着轴心国对巴勒斯坦地区威胁的逐渐消除，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考虑和英国摊牌。1942年5月，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纽约比尔特莫尔饭店召开了一次会议，约有600人出席会议，与会者多数是美国犹太人，也有部分来自其他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会上以魏茨曼为首的温和派提出要求废除《1939年白皮书》，主张对英国采取慎重的对策。但是以本-古里安为首的激进派则提出要求立刻结束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将巴勒斯坦建成一个犹太国家。双方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激进派占了上风。会议通过了一个《比尔特莫尔纲领》（*Biltmore Programme*）。这一纲领比以前所提出的一切要求都更为激进，它号召实现《贝尔福宣言》的“原始目标”，重申犹太复国主义者对《1939年白皮书》的强烈反对，纲领要求承认巴勒斯坦犹太人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尔特莫尔纲领》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最后一段。

会议断言，如果犹太人无家可归的问题得不到圆满解决，二战胜利后新的世界秩序就不可能建立在和平、正义和平等的基础之上。会议强烈要求打开巴勒斯坦大门，赋予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控制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和建立国家的必要特权，包括开发无人占用的和未耕种土地的特权；巴勒斯坦地区将作为一个犹太国而并入民主的新世界。[22]

《比尔特莫尔纲领》的通过，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逐渐从主张温和渐进路线的魏茨曼手里转移到了代表激进派的本-古里安手中。随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开展了一系列游说和宣传活动，以争取美国政府和民众的支持。1944年3月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赞同英国的白皮书政策，希望巴勒斯坦向犹太人敞开大门。[23]随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也呼吁英国向欧洲犹太难民开放巴勒斯坦，让巴勒斯坦成为一个自由而民主的犹太共和国。[24]

欧洲战事刚一结束，1945年5月27日，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执委会就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①立即宣布将巴勒斯坦建成一个犹太国家；②授予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一切必要的权利，以便吸引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前来巴勒斯坦定居，并最大限度地开发本地区的一切资源，尤其是土地和劳动力资源；③提供国际贷款和其他援助，以促进巴勒斯坦地区的经济发展等。同时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也向"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提出了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犹太共和国的计划。[25]同年7月，一直较为亲犹的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工党上台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指望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会因此有所改变，而且工党领袖艾德礼在竞选时也确实表示过，只有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占人口的多数，犹太民族家园才有存在的意义。[26]但是不久以后犹太人就失望了，实际情况表明，新的工党政府并不打算改变《1939年白皮书》的政策。[27]

英国国力在大战中被严重削弱，为了保持自己在中东的传统地位，对付苏联的扩张和美国的排挤，比战前更需要保持和加强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在英国的同意之下，阿拉伯国家于1945年3月成立了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从一开始就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看待，认为在巴勒斯坦地区只能成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因此，为了继续同阿拉伯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英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继续坚持《1939年白皮书》的立场。即使是在感情上比较亲犹的工党政

府也不可能改变这一事实。

由于英国政府不打算改变《1939年白皮书》的立场，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领导人决定采取行动：一方面加大非法移民的规模和速度，从事实上冲破《1939年白皮书》，使其成为一纸空文；另一方面，准备采取极端措施来摧毁英国的委任统治。

从1945年9月开始，犹太地下恐怖组织[28]在巴勒斯坦对英国发动了一系列“警告性打击”：“哈加纳”（Haganah）的突击队“帕尔玛赫”（Palmach）击沉了三艘英国用于拦截犹太非法移民的小型军舰，“斯特恩帮”攻击了海法的炼油厂，杀死了一名工人。影响最大的是10月31日犹太人对巴勒斯坦铁路系统的袭击，这次进攻旨在“扰乱巴勒斯坦全境的铁路交通”，袭击造成了严重后果，巴勒斯坦铁路有50处被切断，另外还有10余名英国军警和铁路员工伤亡。[29]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当局与犹太人的关系恶化到“犹如侵略军与充满敌意的占领区人民一样”[30]。英国不得不向巴勒斯坦地区增派军队，但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945年，共有184名英国军人死在巴勒斯坦，还有371人受伤。[31]

1946年初，犹太地下武装反对英国委任统治的恐怖活动进一步升级，流血冲突频繁发生。至此，犹太复国主义者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同英国彻底决裂的道路。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美国政府一直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属于大英帝国的内部问题。除了国会偶尔出于争取犹太人选票的需要而不得已做出的一些姿态之外，基本上不干涉巴勒斯坦事务。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开始积极参与巴勒斯坦事务，而欧洲犹太难民问题成为美国介入该地区事务的最好借口。

欧洲犹太人首选的移居地是英美等西方国家，但是战后英美等国并不愿意接收大量犹太移民[32]，这样一来，在多数人看来巴勒斯坦已经成为欧洲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的唯一去处。美国总统杜鲁门支持这些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移居到巴勒斯坦去，而英国政府却担心这样做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因此坚决反对。

首先，杜鲁门总统之所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选择支持犹太人是迫于美国公众的压力。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组成了规模庞大的游说集团，通过举办大量

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集会，呼吁美国政府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种集体行动在促进美国公众舆论同情犹太复国主义者，推动杜鲁门总统支持巴勒斯坦分治方案和承认以色列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一些国会议员、政府高官以及各界名流组建了美国巴勒斯坦委员会，成员有1.5万人以上，这其中包括17名州长、61名参议员、150名众议员，这一组织的成立本身就说明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巨大影响。[33]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及其支持者的推动下，1945年7月2日，54名参议员和250名众议员共同签署了一封致杜鲁门总统的公开信，同一天，美国48名州长中的40人向杜鲁门总统写信，敦促总统在犹太难民问题上采取行动，支持向巴勒斯坦进行大规模移民和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34]除此之外，美国的公众舆论也对犹太人的要求给予强有力的支持。[35]

其次，杜鲁门总统之所以支持犹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考虑到美国犹太人的选票。

在美国，犹太人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犹太人的选票在任何全国性选举中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在总统选举中，纽约州拥有47张选票，而当选总统所需要的票数是246张。在纽约州的1300万选民中有1/3是犹太人，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纽约州犹太人的政治选择往往能决定总统选举的结果。除了纽约州之外，宾夕法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也拥有大量犹太选民，这两个州在总统选举中所占的选举人票数分别是36张和27张。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杜鲁门总统违背他们的意愿，那将会使民主党在各种选举中丧失大量所必需的选票。[36]此外，犹太人也是民主党政治捐款的一个重要来源。[37]

而相对于犹太人来说，阿拉伯人在美国并没有倡导自己主张和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因此，这些有利于犹太人的因素在杜鲁门总统对巴勒斯坦问题决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美两国就巴勒斯坦问题和欧洲犹太难民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均未能达成一致。随后在万般无奈之下，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在1947年2月18日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处理。[38]

这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了一丝不安。因为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

合国完全是前景难料的事情。1947年3月，犹太代办处官员爱泼斯坦在一封信中认为：

> 我担心现在联合国的构成使分治获得2/3多数票的可能性很小，首先联合国55个成员国中有8个实际上组成了一个伊斯兰集团——5个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英国及其自治领再加上荷兰、希腊、比利时也必须被算作是可能投反对票的国家，如果再把拉丁美洲国家、苏联及其卫星国以及印度、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等亚非国家算在内，则分治方案几乎没有希望获得通过。[39]

阿拉伯人对英国人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却毫不担心，他们相信苏联集团将最终支持他们。[40]

第三节 莫斯科来电与苏联巴勒斯坦政策的转变

在1945年2月举行的关于战后世界安排的雅尔塔会议上，巴勒斯坦问题并没有被列入会议议程。然而，苏联官方已经开始研究战后苏联的巴勒斯坦政策。1945年7月，和约与战后安排委员会主席李维诺夫向苏联政府递交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报告。李维诺夫在报告中详细讲述了巴勒斯坦的地缘政治情况，并分析了当地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冲突的原因。李维诺夫在报告中认为，回到“祖先的国度”是犹太人自古以来的愿望。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降临的概念总是和他们返回巴勒斯坦联系在一起，这种重返巴勒斯坦的运动同时也带有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很多传统犹太人都渴望在晚年返回巴勒斯坦，如果实现了这个理想，他们在阴间的生活就会过得很好。很多民族主义的犹太学者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精神中心。19世纪末，反犹主义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罗马尼亚得到了发展。在俄国南部对犹太人的洗劫使得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的行动有了一定的现实性。犹太手艺人和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了避难也开始利用富有的犹太人的慈善事业寻找迁往巴勒斯坦的途径。尽管在1917年英国人颁布了《贝尔福宣言》。但是后来英国人解释说，建立犹太民族之家并不意味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犹太人对于这样的解释当然不能同意，坚持要英国政府许诺他们成立犹太国，在这个国家里，他们应该成为完全的主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不应该成为少数民族，于是他们大规模向巴勒斯坦移民。1919年，巴勒斯坦有63.5万阿拉伯人和5.8万犹太人，到了1939年3月末，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经激增到42.2万人。二战结束后，英国人依然根据《1939年白皮书》坚持执行限制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政策。这就意味着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将永远处于少数民族的地位，这对于犹太人实现建国的梦想是大为不利的。因此，战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英国殖民当局冲突不断。李维诺夫在报告的结论部分指出：“由于苏联方面既不受阿拉伯人影响，也不受犹太人影响，因此，在有效的解决方案出台之前，苏联政府应提出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来代替英国的委任统治政策。如果这个要求被英美拒绝，苏联政府可以要求苏、美、英三国对巴勒斯坦进行集体托管。”[41]但是这个提议被英国和美国拒绝了，英美两国是绝不可能把巴勒斯坦这么重要的战略地区交给苏联或让苏联参与托管的。在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向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提出建议：“希望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作为交换条件，苏联从伊朗

北部撤军。这个提议同样也遭到了贝文的拒绝。”[42]

苏联方面对巴勒斯坦地区提出的托管要求实际上是在试探英美两国的底线和对苏联扩张势力范围的承受能力，而伦敦方面是无论如何也不希望苏联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因为这将给苏联重新进入中东地区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鉴于英美特殊关系的存在，英国无法拒绝美国参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而正如前文所述，英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当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刚成立的时候，苏联驻黎巴嫩公使Д.С.索罗德（Д.С.Солод）就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近东局局长И.В.萨梅洛夫斯基（И.В.Самыловский）写了一封信。就巴勒斯坦局势和英美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的事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索罗德在信中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英美矛盾在地中海沿岸的集中点。美国要开采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因此地中海东南沿岸的稳定和通往阿拉伯的输油管非常重要。在美国人看来，埃及和巴勒斯坦距离沙特阿拉伯和地中海沿岸的世界干线是最近的，是建造这个输油管道终端最理想的地点，但是美国不希望这个输油管道终端设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内。埃及和英国签有保护条约，因此美国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向埃及渗透都不可避免会和英国发生冲突；尽管巴勒斯坦地区目前仍处在英国的控制之下，但由于当地的犹太人问题没有处理好，这给了美国绝好的机会，在巴勒斯坦无论是建立犹太民族之家还是建立犹太国都有利于美国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取代大英帝国在该地区的特权。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美国人开始独立提出解决巴勒斯坦犹太人问题的方案。”[43]

在信的最后，索罗德建议苏联应该积极参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因为欧洲的犹太难民不只是存在于英美占区，在苏占区也有大量犹太难民。巴勒斯坦不仅是大英帝国的海上交通线，也是苏联与其他港口相连接的海上通道。”[44]

在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苏联在犹太难民问题上不再保持沉默。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近东司司长В.Г.捷卡诺佐夫（В.Г.Деканозов）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副部长Я.А.维辛斯基（Я.А.Вышинский）的一份报告中认为，苏联继续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保持沉默是危险的，这种沉默会被美国、英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看作是对《英美调查委员会报告》的一种妥协。对这个问题他提出了4点意见。

（1）没有联合国参与而组建的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无权讨论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2）欧洲的犹太问题不能靠移民巴勒斯坦来解决。只有在彻底根除法西斯主义、实现欧洲民主化的同时给犹太人一个正常的生活条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犹太问题。

（3）英国必须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从巴勒斯坦撤军。

（4）在建立民主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条件成熟之前，巴勒斯坦应该由联合国托管。最后，捷卡诺佐夫建议："我们不应该在联合国讨论的时候提出该问题，这个问题应该由阿拉伯国家提出，然后我们表示赞成。"[45]

如果苏联方面采纳了捷卡诺佐夫的4点建议，那么对于渴望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就是极其不利的。如果只是建立一个单一的巴勒斯坦国的话，那么在当地人口处于劣势的犹太人将无法在未来的巴勒斯坦国中处于领导地位，也就无法实现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梦想。如果不允许欧洲犹太难民移民巴勒斯坦的话，那将会使犹太人在当地永远处于少数民族的地位。

1946年9月，苏联驻美大使H.B.诺维科夫（H.B. Новиков）在华盛顿给莫洛托夫发了一封题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电报。[46]这篇报告详细分析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以及美国在全球的扩张行为，并着重提到了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

1.诺维科夫首先在电报中强调了英美在近东和地中海地区存在严重的矛盾，而这个矛盾的焦点就是巴勒斯坦

诺维科夫认为二战后，大英帝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其统治基础已经动摇，特别是在印度、埃及和巴勒斯坦这些地区。美国和英国尽管在远东地区的政策保持一致，但是在近东地区，两国存在着很深的矛盾。

如果说美英在远东地区立场保持一致的话，那么双方在近东和地中海地区远远未能达成协议。双方之所以存在分歧，这是因为如果英国在地中海地区对美国做出让步的话，那对整个大英帝国而言，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在向近东的扩张中，美国最大的和最难以对付的竞争对手便是英国。它们之间的激烈竞争是妨碍英国和美国就划分近东势力范围达成谅解的主要因素，而这种可能的划分是要直接以损害大英帝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为代价的。

地中海和近东地区是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这一地区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极大地吸引了美国人。因此美国对于支持英国在近东地区的统治完全不感兴趣，美国更愿意由自己来直接控制地中海和近东地区这一战略要地。

巴勒斯坦是表明美英近东政策存在着尖锐矛盾的一个缩影。美国一直在那里表现出很大的主动性，频频向英国发难。如美国要求允许来自欧洲的10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美国赞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事业而公开表示出对巴勒斯坦的兴趣，实际上只是表明美国资本试图干预巴勒斯坦事务并进行经济渗透而已。

美国资本加紧了对近东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对其石油工业的渗透。在所有拥有石油资源的近东国家（伊拉克、巴林、科威特、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美国都获得了石油开采特许权，美国资本只是在1927年才首次打入近东国家的石油工业，但现在却控制了近东已探明石油储藏量的42%，这还不包括伊朗。在全部已探明的268亿桶石油中，110亿桶以上的开采特许权是属于美国的。美国的石油公司竭力想要在各个国家（常是一些大国，如沙特阿拉伯）进一步攫取石油开采特许权。因而，它们计划修建一条贯通阿拉伯地区的石油管道，以便把美国在沙特阿拉伯和地中海东南岸国家开采的石油输往巴勒斯坦和埃及的港口。

美国海军舰队在东地中海非常频繁的活动也反映了英美在近东地区关系的不稳定性。这种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同英帝国的基本利益相冲突。美国舰队的这些活动同美国在近东的石油和其他经济利益无疑是密切相关的。

无论如何都应当记住，诸如美国战舰“密苏里”号访问黑海海峡和美国舰队访问希腊，以及美国外交活动显示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兴趣，都是有其双重含义的。一方面，它表明，美国已决定加强在地中海地区的影响以维护其在近东国家中的利益，并且已选择海军作为推行这一政策的工具；另一方面，这些事件也是在对苏联进行政治和军事示威。美国在近东地位的加强将意味着对苏

联南部地区构成新的威胁。[47]

2.诺维科夫在电报中详细说明了英美之间的复杂关系

他认为英美之间是一种合作和竞争的关系。一方面，美国把英国视为最大的潜在对手；另一方面，英国又最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把全球的一些地区划分为美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将能创造一种机会，即使不能预防它们之间的竞争至少也能够减少这种竞争。同时，这种划分有助于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合作。

英国需要美国的贷款来重建其因战争而崩溃的经济。为了得到贷款，英国被迫做出了重大的让步。英国可通过美国的贷款来恢复经济，而这笔贷款同时也为美国资本向大英帝国的渗透打开了大门。所谓英镑集团在当时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相对较小的范围里，现在这一范围已经扩展，它为美国同英国自治领、印度和其他英镑集团国家（埃及、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贸易，提供了机会。

美国显然是赞同与英国结成军事同盟的，但是事情尚未发展到这一步。因此，诺维科夫认为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富尔顿”号召缔结英美军事同盟以建立对世界的共同统治的演讲，并没有正式得到杜鲁门或贝尔纳斯的正式支持。

即便美国现在尚未走到同英国建立军事同盟的地步，但在实际上，它们在军事问题上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二战结束已一年有余，设在华盛顿的英美联合司令部还继续存在。英美军事领导人也经常保持着私人联系。当时，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到美国旅行，便是这种联系的证明。具有独特意味的是，作为同美国军事领导人会谈的结果，蒙哥马利元帅宣布英军将根据美国的模式进行改建。两国海军之间也进行着合作。因此，只要注意到英国海军参加了当时由美国在地中海举行的军事演习以及美国海军在北海举行的军事演习就足够了。

虽然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双方暂时达成了协议，但是英美现在的关系仍然受到内部矛盾很大的侵蚀，它们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

对英国而言，美国的经济援助隐藏着危险。首先，英国在接受贷款时，发现自己正处于对美国某种财政依附的状态之中，要摆脱这种状态

并不是容易的。其次，美国贷款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那就是英帝国的附属国很有可能转向美国。例如加拿大日益摆脱英国的影响，投向了美国的怀抱。随着美国在远东地区地位的巩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逐渐开始投靠美国。在近东那些力图摆脱英帝国束缚的阿拉伯国家里，其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批人倾向于同美国打交道。近东很有可能成为英美矛盾的焦点。[48]

尽管目前尚未发现斯大林如何看待这份电报的文献，不过，诺维科夫在电报中讲述的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估计和分析，是奉莫洛托夫之命而作，且在莫斯科受到极大重视。由此可以判断，在审视了电报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之后，斯大林完全有理由认为苏联重返中东地区的机会来临了。

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策略显然吸取了处理土耳其和伊朗危机时的教训，而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策略——那就是要求英国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来处理。鉴于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地位，只要英国人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苏联就有了介入该问题的机会。同时，斯大林也就有了介入中东地区其他问题的机会。斯大林当然不希望巴勒斯坦变成第二个外约旦[49]，由于他无力直接阻止这类条约的签署，于是希望能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介入巴勒斯坦问题。斯大林的策略无疑是高明的，他想使苏联在中东地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又不付出任何代价。

苏联开始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关注的同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在竭尽全力与苏联进行接触，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1946年5月21日，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代表古尔德曼通过即将访苏的墨西哥社会活动家文森特·托雷多（Vicente Toledano）向苏联转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写道：

> 多年以来，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一直希望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我们曾多次提议派代表到莫斯科去。但是一直没有收到答复。于是就有这样一个印象，我们仅想和英美两国讨论这个问题，而把苏联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
>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得到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支持。由于苏联和5个阿拉伯国家都有外交关系，这就使得阿拉伯国家能够通过大使或者公使向苏联政府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没有政府，也没有正式的代表在莫斯科，

我们就得不到这样的机会，所以苏联人了解阿拉伯人的观点，不了解犹太人的态度。在不远的将来，巴勒斯坦问题很有可能要交给联合国来解决，所以我们应该让苏联政府得到有关这一问题的所有实际材料和犹太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意见和决定。阿拉伯人的媒体经常宣传说苏联支持阿拉伯人，在大部分犹太人心目中也认为苏联是支持阿拉伯人的，但我不相信这是事实。因此，我们希望能和苏联政府代表就巴勒斯坦问题在莫斯科进行协商，或者和莫洛托夫先生在任何一个由你们选择的地方来进行协商。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和犹太人民有权向苏联政府叙述我们的立场和观点。[50]

尽管这时苏联政府的态度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并不算有利，但个别的犹太政治家对最终获得苏联的支持还是表示了乐观。

1946年6月28日，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政治部阿拉伯方面的负责人艾利亚胡·萨松（Eliahu Sasson）在给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驻华盛顿代表伊利亚·爱泼斯坦的信中指出：

尽管苏联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到目前为止尚不明朗，但是我们从中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的。与有争议的其他地区（黎巴嫩、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相比，苏联的意见更倾向于把巴勒斯坦问题国际化。

大英帝国在组建联合调查委员会的问题上邀请了美国参加而把苏联排斥在外，这是斯大林难以接受的。苏联感到愤怒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英国人通过和外约旦重新签署条约而把外约旦变成了英国控制整个阿拉伯地区的军事基地，在斯大林看来外约旦已经成为英国进攻苏联南大门的跳板。由于没有机会阻止这种条约的签订，苏联目前正试图用某种方式间接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

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英国人最终还是要把这个问题交给某个有苏联参与的国际会议上去讨论的。那时，苏联就有了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官方授权，同时苏联也可以介入中东地区的其他问题。由此可见，苏联是作为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的对立面存在的。苏联给所有在阿拉伯世界的共产主义组织、所有的外交代表，所有阿拉伯世界的共产党人的指示

是，对阿拉伯的政治家们施加压力，需要把巴勒斯坦问题和其他地区性问题交给安理会或者联合国大会去解决。

> 苏联希望自己能成为中东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国家而不打算付出任何代价。苏联人认为，英国的调解政策是不会成功的。这种政策将使英国人付出他们所收获十成中的九成为代价。举个例子，为了保证其通往印度的交通线，保证其中东地区石油的份额和军事基地，英国人必须给阿拉伯人付出高额的代价：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军，从埃及离开，然后就是约旦的独立、与伊拉克的重新签约、与犹太人的冲突、允许美国资本深入巴勒斯坦，与法国的冲突等，苏联不准备付出这些代价，它只想收获，苏联想要由自己来左右这些事件的发展……[51]

在信的最后，萨松乐观地写道："我好像觉得这幅图案越来越清晰。巴勒斯坦问题将由联合国大会或者联合国安理会来决定。我们不用担心苏联人会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恰恰相反，他们会对我们采取友善的态度。这并不是因为苏联人喜欢犹太人而厌恶阿拉伯人，而是从和英国人进行较量的角度出发。如果有人会失败的话，这肯定是阿拉伯人和英国人。"[52]

1946年2月，英国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召开的伦敦圆桌会议宣告失败，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英国继续在巴勒斯坦统治下去极为困难，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英国内阁经过辩论认为阿犹之间的冲突已不可调和，于是在1946年2月18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下院宣布："英国政府本身根据委任统治条款无权把国家授予阿拉伯人或者犹太人，甚至也无权把国家交予他们分别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决定既不能接受阿拉伯人或犹太人的计划，也不能强制执行我们自己的决议，因此，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把问题交给联合国。我们想把英国政府过去25年来在巴勒斯坦执行委任统治的经过摆在联合国的面前。我们将说明，委任统治已证明在事实上是行不通的……我们请求联合国考虑我们的报告并提出解决的办法，而我们本身则不打算提出任何特别的解决办法。"[53]同一天英国内阁还确定了撤出印度的日期。

1947年4月2日，英国政府授权其常驻联合国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正式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提出了英国的要求：将巴勒斯坦问题列入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英国将根据《国际联盟关于将巴勒斯坦交给英国统治的委任统治训令》向联合国大

会报告对巴勒斯坦的管理情况并将要求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条的规定对巴勒斯坦的未来政府提出建议。[54]

对于英国人的这一举动，苏联外交人员很快就做出了分析。1947年3月6日，苏联外交顾问Б.Е.什泰恩（Б.Е.Штейн）在给维辛斯基的报告中指出英国决定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来解决是出于以下原因。

（1）英国人和阿犹双方的谈判都陷入了死胡同，提出让两个民族都接受的方案已经是不太可能了。

（2）维持巴勒斯坦的现状需要大量的军队和物资，目前这对于英国人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3）1946年英国和外约旦签署了条约，使得英国有可能把其近东地区的主要战略基地由巴勒斯坦转移到外约旦。

（4）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什泰恩认为，“英国人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绝不意味着放弃巴勒斯坦，也不意味着它要将自己的军队从巴勒斯坦撤离。这只是一个十分灵活的外交手腕，因为贝文推断联合国的任何一个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都绝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英国人认为自己依然是巴勒斯坦的统治者，任何一个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没有英国人的同意都是不可能通过的。英国殖民大臣柯里奇·琼斯更是直截了当地说：‘英国人并不打算放弃委任统治。’他们只是保留了自己在巴勒斯坦的地位以及军队的同时，把责任抛给了联合国，为自己赢得了时间”。

在该报告中，什泰恩还分析了美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巴勒斯坦对于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它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还具有经济利益。英国人留在巴勒斯坦对美国就意味着通向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管道终端控制在英国人手中；占有巴勒斯坦，就意味着美国在地中海地区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地。众所周知，美国在地中海地区还没有基地。”[55]

关于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什泰恩指出：“在未来联合国的讨论中，苏联应该坚决主张结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56]

1947年4月12日，苏联外交部近东局局长M.A.马克西莫夫（M.A.Максимов）对未来苏联在联合国就巴勒斯坦问题进行讨论时的立场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1）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必须结束。

（2）英国军队必须从巴勒斯坦撤离。

（3）由联合国出面组织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民主的巴勒斯坦国，保证巴勒斯坦境内的各族人民享有平等权利。

（4）欧洲的犹太问题不能靠移民巴勒斯坦来解决。只有在彻底根除法西斯主义、实现欧洲民主化的同时给犹太群众一个正常的生活条件，才能解决犹太问题。[57]

1947年4月15日，马克西莫夫在给近东局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又一次重申了这4点意见。[58]

直到1947年4月中旬，苏联依然没有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国问题提出明确看法，官方的意见只是强调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民主的巴勒斯坦国；对于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一问题，苏联方面也并未表示赞成。真难想象在半个月之后，它的态度会发生180度的转变。

1947年4月28日至5月15日，联合国在纽约召开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会议，苏联政府派出了以副外交人民委员葛罗米柯为首的代表团出席。然而就在4月28日会议开幕当天，葛罗米柯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电报指示，让他立刻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电报指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犹太民族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空前的灾难。"指示葛罗米柯应该准备好两种不同的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建立一个包含两个民族的二元制国家；第二种方案是把巴勒斯坦分成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如果考虑到第一种方案因为阿犹关系恶化而无法施行的话，那么就应该考虑第二种方案。[59]

这封电报标志着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苏联开始站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上，支持他们所主张的分割巴勒斯坦的方案，换句话说就是苏联开始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在接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之后，苏联驻美大使馆工作人员立刻忙碌了起来。4月28日当天，苏联驻美大使馆一秘M.C.瓦维洛夫（M.C.Вавилов）紧急与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驻美代表进行联系，要求他们提供关于巴勒斯坦情况的材料。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代表于28日和

29日两天分别给苏联大使馆寄去了两批材料。[60]尽管苏联外交官并未说明索取这批材料的用途，但是完全有理由推测，这批材料是为葛罗米柯拟定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的演说所准备的素材。从后来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来看，其许多措辞与4月28～29日犹太代办处寄给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备忘录有相同之处。

1947年5月14日，也就是联合国大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特别会议结束的前一天，苏联代表团团长葛罗米柯进行了发言。

葛罗米柯首先提出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是失败的。

>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1922年为了治理巴勒斯坦而设的委任统治制度是失败的，这一制度没有经得起考验。设立委任统治时所规定的目标也并未实现，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在设立治理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制度时所发表庄严的宣言仍然只是宣言，其内容完全没有兑现。……像贝文先生所肯定的现有的政府组织形式，既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所能接受，也非犹太居民所能接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对它提出了抗议。这个政府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不可能得到巴勒斯坦居民的拥护。……巴勒斯坦目前已经变成“一个武装的兵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认真地去谈论保护巴勒斯坦居民的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鉴于巴勒斯坦目前的情况而要求结束委任统治是不奇怪的，他们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没有分歧，联合国在审议巴勒斯坦未来命运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这一事实。[61]

随后，葛罗米柯提到了犹太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苦难。

> 在讨论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委员会的任务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大部分犹太人的愿望是和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巴勒斯坦未来的行政制度相关联的，对这一方面的关心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正当的。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民族遭受非常的不幸和苦难。毫不夸张地说，这种不幸和苦难是不能用笔墨所能尽述的。……在希特勒分子统治领土内的犹太人几乎全部遭到屠

杀。死在纳粹手中的犹太人估计约有600万人。西欧只有大约150万名犹太人在战后幸存了下来。……在欧洲，大量犹太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的生活来源。几十万犹太人正在各国流浪求生和寻找安身之所。其中很多人目前依然滞留在难民营里。……联合国不能对这些犹太难民的情况漠不关心，因为这和《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不分种族、宗教或性别而保护人权的崇高原则是不相符合的。对这些犹太难民的关怀是联合国的一种责任……

苏联代表团认为必须请大会注意到下述的重要情况。过去的经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证明西欧国家都不能对犹太人予以适当的帮助，来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利，使他们免受希特勒分子及其盟国的暴力迫害，这是一个不怎么令人愉快的事实。而这也正说明了犹太人有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愿望。不把这个事实予以考虑而拒绝犹太人拥有实现这个愿望的权利是不公正的，不把这项权利授予犹太民族是没有理由的，因此应把这一问题的研究作为特别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62]

接下来葛罗米柯谈到了有关巴勒斯坦前途问题的解决方案。

众所周知，有关巴勒斯坦前途以及与巴勒斯坦有关的犹太人问题的决定有许多不同的方案。我愿意提一提下列几个方案。

（1）建立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享有平等权利的单一的阿拉伯-犹太联邦国家。

（2）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

（3）不顾及犹太人的权利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

（4）不顾及阿拉伯人的权利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63]

葛罗米柯在演说中逐一分析了这几种方案。他指出：“无论是建立一

个单一的阿拉伯国也好，还是建立一个单一的犹太国也好，都不会使这个复杂的问题得到公平公正地解决，也不会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只有对这两个民族的合法利益给予充分的考虑，才能达成公平的解决方案。苏联代表团认为只有通过建立一个独立的、二元的、民主的阿拉伯-犹太国，才能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充分得到保障。……但由于阿犹关系恶化而导致这一方案难以实现，那么就必须考虑第二种方案。该方案就是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治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在这里葛罗米柯强调：“只有证实了阿犹居民关系已恶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并且不能保证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平共处时，这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才是妥当的。”[64]

葛罗米柯在1947年5月14日的演说是苏联外交史上最著名的演说之一，它标志着历史上曾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苏联开始站在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一边。他在发言中不止一次提到了“犹太民族”这个概念。众所周知，列宁和斯大林在其著作中曾多次否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所以葛罗米柯的这次演说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意义无疑是巨大的。本-古里安对葛罗米柯的演说评价如下：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大国的领导人（杜鲁门总统除外）谈论有关犹太民族悲惨命运的话题。这些话，葛罗米柯是以苏联政府名义讲的，葛罗米柯讲话的重要性和意外性不在于叙述了犹太人的悲剧和苦难，而在于他对目前犹太人问题进行分析后而得出的结论。……全世界第一次听到了苏联代表对我们的认可，犹太人对建立自己的国家充满了信心。[65]

值得注意的是，葛罗米柯在演说中并没有对支持分割巴勒斯坦的计划做出任何承诺，这也让犹太人感到了一丝不安。对此，本-古里安说：“我们也不能过于看重那些国际领袖对我们表示友善的一些讲话。”[66]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卡多根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指出苏联推行的实际上是一种“骑墙”政策。[67]美国外交人员甚至认为，苏联在最后时刻依然会站在阿拉伯人的一边。[68]

1947年5月15日，联合国大会巴勒斯坦特别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一个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危地马拉、印度、伊朗、荷兰、秘鲁、瑞典、乌拉圭和南斯拉夫11个国家组成的“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69]（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UNSCOP），并授权这个委员会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70]同一天，联合国大会巴勒斯坦特别会议做出决议呼吁各国人民，特

别是巴勒斯坦居民，在大会就特别调查委员会报告采取行动之前，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或采取可能造成妨碍巴勒斯坦问题早日解决的其他任何行动。[71]

特别调查委员会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欧洲和美国，在巴勒斯坦调查的时间只有5个星期，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也基本上都在欧洲和美国进行。在欧洲调查期间，特别调查委员会为纳粹大屠杀所引发的悲剧而感到震撼，对犹太人深表同情，而犹太人所表现出来的勤劳、智慧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又赢得了许多委员的好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就巴勒斯坦问题提出建议时可能的选择。另外，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高等委员会”[72]（Arab Higher Committee）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主要管理机构，却把特别调查委员会视为“美国、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精心策划的一个政治阴谋”，以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对待该委员会的相关调查活动。7月16日，阿拉伯高等委员会拒绝了联合国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埃米尔·森德斯特罗姆（Emil Sandström）发出的合作请求。[73]在特别调查委员会到达之时，阿拉伯高等委员会发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举行了15个小时的示威罢工活动，还采取了把调查人员途经的所有村庄的村民都撤离的极端做法，这种态度显然对阿拉伯人是极为不利的。[74]就连英国人也认为阿拉伯人的行为极其愚蠢。这将把联合国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多数成员推到同情犹太人的那一边。[75]

另外，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对联合国特别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极为重视，它所提供的合作以及所表现出的务实态度都给联合国官员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由于阿拉伯人拒绝作证，特别调查委员会在巴勒斯坦的5周时间几乎全部被犹太人所占，而且犹太人显然准备进行妥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愿意从《比尔特莫尔纲领》的极端立场上后退，7月7日，公认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激进派领袖本-古里安向联合国调查人员表示，犹太人对能得到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土地已经感到满意，他已经将这一立场转达给英国人，魏茨曼也向特别调查委员会表达了同样的立场。这样，在1947年7月，分治作为一种原则再次被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摆到了联合国调查人员的面前。事实上，根据英国的解密档案材料，大多数特别调查委员会成员在巴勒斯坦的调查开始之前，就已经倾向于赞成阿犹分治。[76]

1947年9月初，特别调查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了调查报告。报告首先建议结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在经过一段时间过渡后让

巴勒斯坦实现独立。但在独立后建立什么国家这个问题上，特别委员会摆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由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危地马拉、荷兰、秘鲁、瑞典和乌拉圭七国提出的多数派方案；另外一种是印度、伊朗和南斯拉夫三国提出的少数派方案。多数派方案赞同巴勒斯坦实施分治，即委任统治期结束后经过两年过渡期，分别成立一个独立的犹太人国家和一个独立的阿拉伯人国家，圣城耶路撒冷由联合国出面实行国际托管。在两年的过渡期内，仍由联合国委托英国代为管理。少数派方案则主张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包括一个阿拉伯实体和一个犹太实体的联邦国家。澳大利亚由于受英国影响，对两个方案表示不赞成而没有投票。[77]多数派方案的报告并不仅限于一般性的原则，还明确提出了领土划分方案以及宪政条款。领土划分方案是由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森德斯特罗姆的助手保罗·莫恩（Paul Mohn）提出的。该方案以巴勒斯坦英国委任统治当局提供给委员会的一些地图作为基础，除了将内盖夫划分给犹太人之外，这一方案是1937年《皮尔报告》（*The Peel Report*）[78]关于领土划分建议的翻版。即使是赞成多数派方案的国家，在领土划分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意见，乌拉圭、危地马拉、加拿大和捷克斯洛伐克主张将包括内盖夫与加利利在内的巴勒斯坦西部大部分土地划给未来的犹太国，而其他国家则希望建立一个面积更小一些的犹太国。尽管犹太人展开了积极的努力，但仍没能得到加利利。[79]此外，分治方案还存在有巨大的隐患，划给阿拉伯人的雅弗位于犹太国家境内的西部滨海平原，而由国际共管的耶路撒冷则位于阿拉伯国家的腹地。更糟糕的是人口问题，多数派国家在最后一刻划分的分治边界将45%的阿拉伯人口留在了犹太国内，这样，未来的犹太国内的犹太人口和阿拉伯人口分别为49.8万人和40.7万～49.7万人。[80]

印度、伊朗和南斯拉夫代表赞成少数派方案，他们反对分治，认为巴勒斯坦太小而无法容纳两个单独的国家实体，他们不愿看到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主宰犹太人，于是建议成立一个联邦国家。根据这一建议，将由一个9人的国际委员会（阿拉伯人、犹太人与联合国代表各3人）负责这个联邦国家的管理事务，国际委员会在移民和土地转让等问题上拥有决定权。这实际上是《莫里森-格雷迪计划》[81]（*The Morrison-Grady Scheme*）和《贝文计划》[82]（*Bevin Plan*）的翻版。

由于特别调查委员会内部无法取得一致，这两个方案同时提交联合国大会。

这两个报告公布以后，阿犹双方的反应迥然不同，犹太人对于多数派方案所建议的分治方案表示满意，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对这两个方案都表示拒绝。[83]

1947年9月19日，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驻华盛顿代表伊利亚·爱泼斯坦会见了苏联驻美国临时代办C.K.查拉普金（C.K.Царапкин）和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一秘瓦维洛夫。爱泼斯坦很担心苏联会投票赞成少数派方案。查拉普金则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84]这个回答打消了犹太人的疑虑。

1947年9月23日，联合国在纽约召开了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此次大会将对巴勒斯坦的前途命运做出决定。为了保证多数派方案能在大会表决时获得通过，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积极活动。而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则声称联合国无权决定巴勒斯坦的未来，并表示如果强行通过分治决议，阿拉伯国家"将保留采取行动的权利"[85]。

1947年9月30日，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在给纽约的副部长维辛斯基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应该反对大多数国家都赞成的多数派方案。"[86]同一天，莫洛托夫给维辛斯基发了第二封电报，强调："支持特别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多数派方案符合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葛罗米柯同志所提到的建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犹太联邦国家只是我们的一个策略，我们不能主动提出成立犹太国这样的建议。我们的态度是第二种意见要更好一些，这是特别调查委员会经过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应该支持这个方案。我们应该遵循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是值得肯定的。"[87]

1947年10月13日，苏联代表查拉普金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确认了苏联将投票赞成多数派的方案，他说道："在当前的情况下，历史和法律方面的理由只是次要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千千万万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自决权……犹太民族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拒绝他们的这一权利是不公正的……每一个民族都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88]

10月15日，维辛斯基从纽约给莫洛托夫发来电报："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声明使得犹太人非常赞赏，阿拉伯人则显得失望，尽管他们在葛罗米柯讲话之后对我们改变态度还抱有些许希望。叙利亚人在查拉普金发言之前对我说，他们更赞成少数派计划，那个多数派计划，阿拉

伯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尽管阿拉伯人对我们的态度不满，但是他们把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了美国人。”[89]

此时，联合国大会关于犹太难民问题的讨论也在紧张进行。

1947年10月16日，莫洛托夫给维辛斯基发电报，指示苏联代表团应该支持乌拉圭和哥伦比亚代表提出的建议。[90]莫洛托夫在电报中还指示，苏联代表团也应该支持南斯拉夫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即允许设在塞浦路斯岛的犹太难民营中的所有犹太难民都移民巴勒斯坦。[91]苏联人这时已经完全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坚定的支持者了。

1947年10月26日，莫洛托夫给斯大林提交了一份由维辛斯基起草的备忘录。其中谈到了英国在巴勒斯坦结束委任统治后的过渡时期以及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备忘录的大意是要求从1948年1月1日起取消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英国军队将在委任统治取消后的3～4个月内从巴勒斯坦撤出，委任统治取消后的1年为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由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托管。维辛斯基在备忘录中指出，所有这些意见都征得了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的同意。[92]由此不难看出，此时苏联已经和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就英国结束委任统治后的一些事宜取得了一致意见。

1947年11月26日，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卡多根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英国准备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卡多根说：

>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接受了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担负起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工作，但这个民族之家是绝不以损害巴勒斯坦原有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为条件的。当时人们认为委任统治的这一目的能在两种民族的同意和合作下获得实现，时间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多年徒劳无益的努力之后，英国政府断定要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都同意的基础之上在巴勒斯坦达成妥协是不可能的，而委任统治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我已经通知了特别调查委员会，我国政府已经因上述原因而决定放弃委任统治权，并预定在1948年8月1日完成撤军的工作。[93]

同一天，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再次强调苏联将投票赞成分治，并说明了原因。

众所周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巴勒斯坦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它之所以对巴勒斯坦问题感兴趣，是因为苏联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是一个大国，和其他大国一样，对于维护国际和平负有特殊责任……

当巴勒斯坦前途的问题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进行讨论的时候，苏联政府指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两个最可接受的方法。第一是建立一个单一的、民主的阿拉伯-犹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将享有同等的权利；如果阿犹关系恶化，使他们不能生活在一起，苏联政府通过它的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了第二种办法，那就是把巴勒斯坦划分为两个自由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

那些反对分治的人都认为这个决定会损害阿拉伯人的利益，但是苏联代表团不同意这种观点。分治建议既不是针对阿拉伯人的，也不是针对犹太人的。苏联代表团认为这个建议符合两个民族的根本利益。

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宣称，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是一个错误的举动，这种观点不能被接受的。因为犹太人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内与巴勒斯坦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也不应该忽视犹太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悲惨遭遇。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所受的灾难，要比其他任何民族更深重。而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西欧国家能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犹太人，使他们免受纳粹的暴行。

……某些阿拉伯国家代表企图歪曲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黎巴嫩代表曾两次在这个问题上指责苏联政府。但是我再次指出，分治建议和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不是针对阿拉伯人的。我们深信，这样的解决方案不仅符合犹太人的根本民族利益，也符合阿拉伯人的根本利益。

苏联政府和人民对阿拉伯民族在过去的遭遇深表同情，现在仍然这样，苏联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为了摆脱殖民依附关系的最后枷锁所做的努力仍抱有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苏联代表团深信，阿拉伯人依然期待苏联支援他们为合法利益而进行的

斗争，依然期待苏联政府支援他们为摆脱外国依附关系的最后残余而做的努力。

> 苏联代表团坚信，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的决定，是符合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的。这个决定是符合民族自决原则的……在分治的基础上寻找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将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因为这符合犹太民族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合法要求……
>
> 从讨论的一开始，就有一些代表团，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团，企图说服我们这个问题不属于联合国的权限范围之内。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联合国不仅有权力来考虑这些问题，而且鉴于目前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也有责任采取必要的决定……正因为如此，苏联代表团才支持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的建议……[94]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讨论之后，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11月29日就巴勒斯坦分治方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的结果是33票赞成，13票反对和10票弃权。大会最终以超过2/3多数通过了《巴勒斯坦将来处理（分治计划）问题的第181（二）号决议》。分治决议的主要内容有三点。①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应尽快结束，无论如何不得迟于1948年8月1日；委任统治国的武装部队应逐步撤离巴勒斯坦，并应尽快撤完，无论如何不得迟于1948年8月1日；阿拉伯独立国和犹太独立国以及耶路撒冷国际特别政权，应于委任统治国武装部队撤退完毕后两个月内在巴勒斯坦成立，无论如何不得迟于1948年10月1日；大会通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到阿拉伯和犹太两个独立国成立的时期，应视为过渡时期。②在委任统治结束后两个月内成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和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犹太国的总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6.4%），阿拉伯国总面积为1.12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2.8%）；③圣地耶路撒冷及其附近郊区村镇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由联合国管理，指定托管委员会代表联合国担负管理当局的职责。[95]

在表决过程中，苏联的立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斯大林控制了联合国5个成员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的票。如果苏联集团投反对票或者是弃权票，那么建立以色列所必需的2/3的多数选票就不能得到。尽管得到了苏联集团的支持，但是分治决

议能否通过表决依然充满变数。此时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对多数派能顺利通过表决起到关键作用。在联合国大会表决前，依照来自白宫的命令，美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全面的幕后游说活动。白宫和国务院高级官员直接参加了对一些国家的游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向一些原先对分治态度未定或反对分治的国家施加了各种形式的压力。例如，原先在联合国公开表示反对分治的菲律宾和海地迫于压力投下赞成票，美国威胁法国说如果反对分治就会终止对其援助，于是法国代表在距投票开始前不到两小时收到巴黎的指示："投赞成票。"[96]在冷战开始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时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反而在支持犹太人建国这一问题上形成了默契。

[1] 关于"传统学派"可参见Authur Schlesinger，Jr.，"Origins of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Vol.46，No.1，1967，pp.22-52；Jerald A.Combs，*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Two Centuries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220-234；Geir Lundestad，"Moralism，Presentism，Exceptionalism，Provincialism，and Other Extravagances in American Writings on the Early Cold War Years，" *Diplomatic History*，Vol.13，No.4，1989，pp.527-546。亦可参见尹良武《冷战史学管窥》，载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人民出版社，1990，第347～355页。

[2] 关于"修正学派"的一般性概述，可参见Jerald A.Combs，*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Two Centuries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pp.235-257；Bradford Perkin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Twenty-Five Years After，"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Vol.12，No.1，1984，pp.1-18；Anders Stephanson，"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Reynolds（ed.），*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p.30-35。典型的修正派著作包括Gabriel Kolko，*The Politics of War*：*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3-1945*，New York：Random House，1968；Joyce and Gabriel Kolko，*The Limits of Power*，*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5-1954*，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8；Thomas G.Paterson，*Meeting the Communist Threat*：*Truman to Reag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Vol.2，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3] 〔英〕罗伯特·康奎斯特：《斯大林——国家的破坏者》，伦敦1991年，第271页；〔美〕R.C.拉克：《1938—1945年斯大林对西方的企图：冷战的起源》，斯坦福1995年，第166页；〔美〕奥德·韦斯塔德：《冷战与革命：苏美对抗和中国内战的起源》，纽约1993年，第118页，转引自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根据俄国档案的新材料）》，《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4] 〔俄〕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斯大林在远东的目标：从雅尔塔到1950年的中苏条约》，提交香港“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月）的论文，转引自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根据俄国档案的新材料）》，《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5] 郑羽：《阵营对抗：冷战开始后斯大林的对外战略》，《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2期。

[6] АВПРФ.Ф.6.Оп.6.Д.14.П.145.Л.1-41.//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1941-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Т.1：22 июня 1941 г.-8 мая 1945 г.Сост.Г.П.Кынин，Й.Лауфер.С.333-360.

[7] АВПРФ.Ф.6.Оп.6.Д.14.П.145.Л.1-41.//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1941-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Т.1：22 июня 1941 г.-8 мая 1945 г.Сост.Г.П.Кынин，Й.Лауфер.С.27.

[8] АВПРФ.Ф.6.Оп.6.Д.14.П.145.Л.3，4-5，8-9，23-26，34-40.//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1941-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Т.1：22 июня 1941 г.-8 мая 1945 г.Сост.Г.П.Кынин，Й.Лауфер.С.333-360.

[9] АВПРФ.Ф.6.Оп.6.Д.14.П.145.Л.27-29.//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1941-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Т.1：22 июня 1941 г.-8 мая 1945 г.Сост.Г.П. Кынин.Й. Лауфер. С.333-360.

[10] АВПРФ.Ф.6.Оп.6.Д.603.П.45.Л.15-26.//Vladimir O.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CWIHP Working Paper，No.13，1995，p.6.

[11] АВПРФ.Ф.6.Оп.7.Д.173.П.17.Л.47，转引自Vladimir O.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CWIHP Working Paper，No.13，1995，p.10。

[12] АВПРФ.Ф.6.Оп.7.Д.173.П.17.Л.50，转引自Vladimir O.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CWIHP Working Paper，No.13，1995，p.11。

[13] АВПРФ.Ф.6.Оп.7.Д.173.П.17.Л.52，转引自Vladimir O.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CWIHP Working Paper，No.13，1995，p.12。

[14] АВПРФ.Ф.6.Оп.6.Д.149.П.14.Л.54，转引自Vladimir O.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Ⅱ：*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CWIHP Working Paper，No.13，1995，p.12。

[15] АВПРФ.Ф.6.Оп.7.Д.173.П.17.Л.60，转引自Vladimir O.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Ⅱ：*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CWIHP Working Paper，No.13，1995，p.12。

[16] АВПРФ.Ф.6.Оп.7.Д.173.П.17.Л.60，转引自Vladimir O.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Ⅱ：*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CWIHP Working Paper，No.13，1995，p.12。

[17]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第2分册，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75，第337～338页。关于英苏《百分比协定》一事，尽管丘吉尔回忆录中已经承认，但是苏联方面却一直矢口否认。而近年来苏联解密档案的新证据却证明了的确存在这样一个协议。参见АПРФ. Ф.45.Оп.1. Д.283.Л.3-16.//*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1944-1947гг.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18-30。

[18]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265页。

[19] 关于这个观点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20] 有关伊朗危机的详细论述，参见*Егорова И.И.* Ир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5-1946 гг.：по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м Архив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3.С.24-42；有关土耳其危机的详细论述，参见*Улунян А.А.* Греция и Турция：Взгляд из Аппарата ЦК КПСС.1946-1958гг.//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ва：ИВН РАН.1998.С.36-45。

[21] 〔以〕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416页。

[22] Bernard Reich（ed.），*Arab-Israel Conflict and Conciliation*：*A Documentary History*，California：Greenwood Press，1995，p.53.

[23]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22页。

[24]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23页。

[25] Walter Laqueur，*The History of Zionism*，New York：Schocken Books，1972，pp.586-587.

[26] A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65-166.

[27] A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p.171.

[28] 犹太地下恐怖组织存在着众多的派别。“伊尔贡”（Irgun）成立于1936年，其宗旨是建立一个包括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犹太国家，主张同时打击英国人和阿拉伯人。它对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领导的哈加纳所采取相对克制的政策十分不满；“莱希”（Lehi）又称“斯特恩帮”，它在二战中从“伊尔贡”中分裂出来，是犹太地下恐怖组织中立场最为激进的一个派别。

[2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5，Vol.8，p.805.

[30] A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p.47.

[31] Amikam Nachmani，*Great Power Discord in Palestine*：*The Anglo-American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the Problems of European Jewry and Palestine 1945-46*，London：Routledge，1987，p.21.

[32] 美国在整个战争期间总共只接收了7万名犹太移民，同一时期英国共接收了1万名犹太人。参见Wasif F.Abboushi，*The Unmaking of Palestine*，Boulder，Colo.：Lynne Reinner，1985，p.151。

[33] Aaron Klieman，Adrian L.Klieman（ed.），*Mobilizing for the War Effort*，*1940*，New York：Routledge，1991，p.352.

[34] Aaron S.Klieman（ed.），*Palestine in Postwar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Affairs*，New York：Routledge，1991，pp.251-252，255.

[35] Eytan Gilboa，*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Israel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Lexington Mass.：Lexington Books，1987，p.16.

[36] 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eds.），*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BDFA*）：*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Part IV，Series B，Vol.2，p.524.

[37] Margaret Truman，*Harry S.Truman*，New York：Morrow，1974，p.421.

[38] 参见全克林《英国与阿-犹冲突（1945-1949）》，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第42～100页。

[39] William R.Louis，*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1945-1951*：*Arab Nationalism*，*the United States*，*and Postwar Imperi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489.

[40]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BDEE*），Series A，Vol.2，Part I，p.67.

[41] АВП РФ.Ф.07.Оп.12а.П.42.Д.5.Л.1，30-38.//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121-122.

[42] COPY：CZA S25/486，*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118.

[43]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2.Д.6.Л.6-10.//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138-141.

[44]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2.Д.6.Л.6-10.//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141.

[45]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2，д.6，л.6-10，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138-141.

[46] АВП РФ.Ф.06.Оп.8.П.45.Д.759.Л.21-39.这份解密文件最早发表在俄文杂志《国际生活》（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90，No.11，С.148-154.）上面。不久后，美国杂志《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Vol.15，No.4，1991，pp.527-537.）刊出了英文本。

[47] АВП РФ.Ф.06.Оп.8.П.45.Д.759.Л.21-39.//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90. №11. С.151.

[48] 详见*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осква：ИВИ РАН.1998.С.6-7。

[49] 1946年3月22日，外约旦同英国签订《伦敦条约》，废除了英国的委任统治，英国承认外约旦的独立，但保留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特权。

[50] COPY：CZA Z6/11/17，*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p.129-130.

[51] COPY：CZA S25/485，*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p.135-136.

[52] COPY：CZA S25/485，*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p.136-137.

[53] 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eds.），*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BDFA*）：*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Part IV，Series B，Vol.2，p.186.

[54] Charles Geddes（ed.），*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pp.246-247.

[55] АВП РФ.Ф.018.Оп.9.П.17.Д.77.Л.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 док.1941-1953гг.Т.I.С.188-189.

[56] АВП РФ.Ф.07.Оп.12а.П.42.Д.6.Л.134-14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190-191.

[57]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2.Д.8.Л.107-109.//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193-195.

[58] АВП РФ.Ф.018.Оп.9.П.17.Д.77.Л.6-1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199-200.

[59] 目前，我们还不能看到这份电报的原件，也无法知晓这封电报的发电人是谁，但是在1947年10月23日A.季莫菲耶夫（А.Тимофеев）在给苏联外交部所起草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份电报的存在，并详细地介绍了该电报的内容。АВП РФ.Ф.018.Оп.9.П.17.Д.77.Л.25-28.//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 док.1941-1953гг.Т.I. С.257.

[60] COPY：ISA 93.03/2268/16，*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p.182-187；COPY：ISA 93.03/2268/16，*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p.187-189.

[61]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Официалиные отчёт Первой специально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Том I.Пленарные заседания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й.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28 апреля-15 мая 1947 года.Нью-Йорк.1947.С.83-87.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211-212，213-214.

[62]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Официалиные отчёт Первой специально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Том I.Пленарные заседания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й.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28 апреля-15 мая 1947 года.Нью-Йорк.1947.С.83-87.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214，215，216.

[63]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Официалиные отчёт Первой специально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Т.I.Пленарные заседания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й.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28 апреля-15 мая 1947 года.Нью-Йорк.1947.С.83-87.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216.

[64]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Официалиные отчёт Первой специально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Т.I.Пленарные заседания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й.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28 апреля-15 мая 1947 года.Нью-Йорк. 1947.С.83-87.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б.док.1941-1953гг. Т.I.С.217，218.

[65] COPY：CZA S53/12C，*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p.198-199.

[66] COPY：CZA S53/12C，*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199.

[67] 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eds.），*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BDFA*）：*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Part IV，Series B，Vol.2，p.212.

[68] Yaacov Ro'i，*Soviet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The USSR and Israel*，*1947-1954*，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Books，1980，p.83.

[69] 以下简称"特别调查委员会"。

[70]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61页。

[71]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62页。

[72] 阿拉伯高等委员会是在1936年4月25日成立的，由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伊·阿明·侯赛尼（Haj Amin al-Husayni）主持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部落和政党的领导人组成。

[7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7，Vol.5，p.1107.

[74] Philip Mattar，*The Mufti of Jerusalem*：*Al-Hajj Amin Al-Husayni and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p.65-86.

[75] 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eds.），*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BDFA*）：*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Part IV，Series B，Vol.4，p.203.

[76] Ilan Pappé，*The Making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1947-1951*，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1994，pp.24-25.

[77] 参见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71页。

[78] 为了调查1936年巴勒斯坦发生大规模骚乱的原因，并提出确保和平的措施，英国政府任命的以皮尔勋爵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即皮尔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37年7月7日与英国政府一起发表的报告，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即巴勒斯坦分治计划。拟议中的阿拉伯国家建立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地区，而在面积较小的、不到3000平方公里的地区，也就是在不足西巴勒斯坦面积1/5的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犹太国家包括整个加利利和沿海地带，阿拉伯国家包括犹地亚、撒玛利亚和整个内盖夫。耶路撒冷及其郊区由英国人管辖。

[79] Ilan Pappé，*The Making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1947-1951*，pp.30-31.

[80] 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eds.），*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BDFA*）：*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Part IV，

Series B，Vol.4，p.195.

[81] 《莫里森-格雷迪计划》，又称为《莫里森计划》和《省自治计划》。这是1946年7月31日英美两国代表提出的计划，主要内容是在处于委任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建立单一的联合托管制度。

[82] 在1946年至1947年的伦敦会议上，当《莫里森-格雷迪计划》失败之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提出了《贝文计划》，力图继续维护《莫里森-格雷迪计划》提出的建议。该计划得到英国外交家哈罗德·比雷（Harold Beeley）的建议，故又名《贝文-比雷计划》（*Bevin-Beeley Plan*）。

[83] 〔英〕乔治·柯克：《1945—1950年的中东》，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第405页。

[84] COPY：ISA 93.03/92/35，*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222.

[85]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63，64～65页。

[86] АВП РФ，Ф.059.Оп.18.П.17.Д.116.Л.10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251.

[87] АВП РФ，Ф.059.Оп.18.П.17.Д.116.Л.109.//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251-252.

[88] 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eds.），*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BDFA*）：*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Part IV，Series B，Vol.4，p.231.

[89] АВП РФ，Ф.059.Оп.18.П.41.Д.301.Л.351-352.//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252.

[90] 乌拉圭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提出立刻允许3万名犹太儿童移民巴勒斯坦；哥伦比亚代表团提出立即允许15万名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

[91] АВП РФ，Ф.059.Оп.18.П.17.Д.117.Л.60.//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253.

[92] АВП РФ，Ф.06.Оп.9.П.22.Д.267.Л.72-73.//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260-261.

[93]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62～63页。

[94]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Т.2.Отв.ред.В.В.Наумкин.С.8-13.

[95] 参见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71～92页；肖宪《中

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第126页。

[96] Michael J.Cohen，*Truman and Israel*，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170.

第三章 以色列建国前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支持

第一节 苏联集团在联合国对犹太人的支持

联合国巴以分治决议一通过，立刻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一致反对。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总理和外交部部长于1947年12月8日至17日在开罗召开了一次会议，发布了一项声明，宣称阿拉伯人“决心为反对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的决议而战，并且遵照真主的意志，决战至最后胜利”。该声明表示阿拉伯联盟已经同意“采取决定性的手段”来防止巴勒斯坦分治。[1]

分治决议在联合国刚刚获得通过，巴勒斯坦的阿犹双方立即陷入暴力冲突，冲突很快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非正规武装也开始介入。

随着巴勒斯坦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也开始表现的犹豫不决。如前文所述，在美国国内，对于是否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建国一直存在两种不同意见，杜鲁门总统之所以持支持态度，很大程度上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以及为了争取国内犹太人选票的需要；国务院和军方的高级官员则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方面考虑反对支持犹太人建国。1947年10月20日，美国国务院和陆、海、空军的情报部门联合准备了一份名为《巴勒斯坦当前局势》的文件，指出如果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将最终导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战争，而美国公众对犹太人的同情将可能迫使美国采取一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这不仅会损害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声誉，而且美国的战略利益将会由于整个地区的不稳定而受到威胁。[2]1947年11月28日，这几个部门准备的名为《分治决议的后果》的文件进一步指出，在阿犹战争的情况下，除了苏联会从中渔利之外，美国由于支持分治方案，其声誉会再一次遭到损害，美国在中东或其他阿拉伯地区的石油和商业利益将遭到重

创。[3]11月24日，负责近东和非洲事务的国务院官员撰写了一份强烈反对分治的备忘录，提出为了避免卷入一场国际困境中，美国应该谨慎对待巴勒斯坦分治方案，因为这将很可能导致美国出兵巴勒斯坦。[4]但是这些部门的建议并未被杜鲁门总统采纳，美国最终还是对第181（二）号决议投了赞成票。但是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通过之后的现实情况使得杜鲁门总统逐渐改变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原有立场。

分治决议通过以后，英国方面拒绝与联合国进行合作，并宣布它将在1948年5月14日之前撤出在当地驻扎的10万军队和警察。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阻止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暴力冲突的方式之一就是武装干预。如果使用武装力量的话，那么作为分治方案主要倡议者的美国和苏联就必须提供军队，这将给苏联提供插手中东事务的机会，而此时美国民众普遍反对出兵干预。1948年2月底，美国国务院曾组织了一系列民意测验，这些测验表明美国公众对分治的支持率从1947年11月的65%下降到了38%。[5]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策开始改变。

1947年12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宣布美国将对中东地区实施武器禁运。国务院的一份文件规定，如果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要求美国提供军火的话，美国就告诉它去找英国人或者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去要。[6]犹太人是武器禁运最大的受害者，因为阿拉伯人依然能从英国那里获得军火。犹太人曾多次向美国政府要求解除武器禁运，但都没有成功。[7]在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看来，联合国分治决议仅仅是一个“建议”，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可以接受它，也有权拒绝它。在分治决议通过以后，巴勒斯坦爆发了战争，而且阿拉伯国家反对分治的态度也十分强硬，许多美国国务院官员和军方的官员认为分治的前提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美国国防部部长詹姆斯·V.福雷斯特尔（James V.Forrestal）认为美国低估了阿拉伯国家所能做出的反应，支持分治并不是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是由于犹太人的压力所造成的。同时福雷斯特尔还认为，支持分治将会使美国再也无法使用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了。[8]

美国国务院新成立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48年1月给国内发了一封长电报。凯南提出，美国应该改变其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政策，因为分治政策将为苏联向中东地区派驻军队提供方便。苏联军队将会被用来在巴勒斯坦地区维持秩序。苏军进入巴勒斯坦

将有利于苏联政府在当地派遣间谍、开展宣传、颠覆当地的阿拉伯政权，并用所谓的人民民主政体取而代之。苏联在巴勒斯坦驻军则意味着苏联将可从侧翼包抄希腊、伊朗和土耳其，并对美国在地中海东部的势力范围构成潜在的威胁。根据凯南的判断，苏联暗地里将会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提供武器，使得当地的混乱局势进一步升级。最后，凯南得出结论，巴勒斯坦分治计划有利于苏联实现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目标，该计划将动摇当地的非共产主义政权的统治基础。[9]

凯南的电报，显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加之巴勒斯坦的局势不断恶化，杜鲁门总统感到有必要对巴勒斯坦政策进行调整。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在1948年2月向杜鲁门总统建议，如果联合国无法实施分治决议，而又无法提出能被双方都接受的替代方案，就有必要在一段时间内实行某种形式的托管。[10]

1948年2月24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伦·奥斯丁（Warren Austin）把安理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权限解释为禁止使用武力[11]，从而消除了美国军队承担任何责任的可能性。接着在3月19日，奥斯丁向安理会建议："鉴于巴勒斯坦的局势日益恶化，我国政府认为应由联合国托管委员会在巴勒斯坦建立临时托管以维持和平。"[12]美国代表的这项建议意味着美国在分治政策上的立场有所改变。

1948年3月30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安理会第275次会议上发言，谴责了美国阻挠联合国大会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实施。葛罗米柯指出：

> 苏联政府现在认为，并且也一直认为，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将巴勒斯坦划分为犹太和阿拉伯两个独立国家是一个公正的决议。因为它符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基本民族权益……这项决议不是联合国随随便便做出的，而是经过长期的、彻底审议的结果……美国也投票赞成了这个计划，并且成为这个计划的积极辩护者。但是今天的情形怎样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美国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它不但拒绝支持这个决议，而且提出了撤销这个决议，并且为此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建议。美国这种旨在阻挠联合国已经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行为让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大吃一惊。这意味着美国的统治集团早已不考虑联合国的利益了……美国并不关心巴勒斯坦前途问题以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关系问题的公正解决，而只是关

心它自己在近东的石油利益和军事战略地位……阻挠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实施，对于联合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此美国应负全部责任……美国提出的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所谓联合国临时托管制度的新建议的目的是……在维持巴勒斯坦秩序的借口下把巴勒斯坦变为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基地……对巴勒斯坦实行托管不仅不会消除那里的紧张局势，而且还剥夺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13]

尽管苏联方面反对，但是联合国安理会依然决定在1948年4月1日召开特别会议，对巴勒斯坦的未来前途进行讨论。4月9日，莫洛托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汇报了他给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下达的最后指示："苏联代表团将捍卫联合国第181号（二）决议，投票反对美国提出的托管方案。"[14]

当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出现改变的时候，只有苏联依然坚持支持巴以分治决议。从1947年5月14日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起，苏联已经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了。

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美国巴勒斯坦政策的转变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在苏联的支持下，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拒绝了美国所提出的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的建议，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执委会主席本-古里安号召犹太人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不仅要捍卫联合国决议，还要捍卫犹太国的边界，犹太人有权利要求联合国给予其道义上的和物质上的支持。犹太代办处耶路撒冷政治部领导人果尔达·梅尔松（Golda Meyerson）[15]宣称："我永远也不会同意托管，除了建立独立的犹太国之外，我也不会同意其他任何决定。"犹太恐怖组织"斯特恩帮"（Stern Group）[16]的发言人在3月22日声称："美帝国主义与英国占领者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我们将被迫与之战斗的话，我们将为犹太国而战斗，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企图。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目前的形势，我们几乎可以确信，我们在斗争中并不是孤立无援的。"3月24日，伊尔贡的发言人也对"背叛了犹太人事业的美国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表示："如果美国军队被派往巴勒斯坦来实现托管的话，我们将与之决一死战，我们对待美国人就像对待英国占领者那样。"[17]

为了缓解强大的政治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在1948年5月12日正式宣布放弃对托管方案的支持。同日，杜鲁门在白宫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是否要立刻承认即将成立的犹太国的问题。

对此，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表示坚决反对，甚至不惜威胁要与杜鲁门决裂。[18]但由于杜鲁门总统的坚持，马歇尔不得不违心地表示同意承认以色列。

1948年5月14日，在巴勒斯坦飘扬了30年的英国国旗被降了下来，委任统治正式宣告结束。当天下午4点，犹太国家民族委员会在特拉维夫博物馆举行了简短的立国仪式。本-古里安宣读《独立宣言》，标志着以色列正式成立。11分钟以后，美国政府即宣布“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临时政府”，但是这一决定是在国务院和军方持反对态度的情况下做出的。[19]

5月15日，以色列临时政府外交部部长摩西·夏里特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了电报：“我满怀敬意地通知您，请求您向您的政府汇报，昨晚，由各个犹太组织选出的犹太国家民族委员会举行会议，在英国的委任统治结束后，以联合国大会1947年11月29日决议为基础，独立的犹太国家在巴勒斯坦宣告成立，这个国家被称为以色列……我以以色列临时政府的名义请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以色列国给予官方承认。我希望你们尽快地承认以色列国。我相信，它一方面将巩固苏联和苏联人民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犹太人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在整体上看将有助于在国际关系中实现和平与公正。我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对苏联人民的感谢。”[20]

5月18日，莫洛托夫给摩西·夏里特回电：“我在5月16日收到了你们的电报……我宣布，苏联政府决定正式承认以色列及其临时政府。苏联政府希望，犹太人民主权国家的建立将有助于巩固巴勒斯坦和近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苏联政府确信苏联和以色列的友好关系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21]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布正式外交公报承认以色列的国家。

5月24日，摩西·夏里特给莫洛托夫发电报：“我们收到了你们在5月18日的电报，我们非常感谢苏联政府承认以色列……希望以色列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建立更加深厚的友谊。我请求得到你们的答复，你们是否同意以色列国立即向莫斯科派遣代表团建立公使馆或者临时代办处，同时请求苏联方面派遣同级别的代表团前往特拉维夫。”[22]

5月25日，莫洛托夫回电：“我在5月24日收到了你们的电报，苏联政府同意以色列向苏联派遣公使或者临时代办。同时，苏联也准备向特

拉维夫派遣代表团。”[23]

1948年8月17日，苏联驻以色列公使П.И.叶尔绍夫（П.И.Ершов）向以色列临时政府总理本-古里安递交了国书。[24]8月26日，以色列驻苏联公使果尔达·梅厄也向苏联政府递交了国书。[25]苏以两国正式建交。

以色列国宣布成立后的第二天，即1948年5月15日，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5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对以色列发动“圣战”，并相继派兵进入巴勒斯坦，于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这次战争也被称为第一次阿以战争或者巴勒斯坦战争，而以色列人则称其为独立战争。

阿拉伯国家宣称它们发动的是保卫宗教圣地、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帮助巴勒斯坦兄弟建立国家的圣战。由于有备而来和先发制人，再加上军事力量上的优势，阿拉伯方面在战争初期攻势凌厉，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新生的以色列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很快便召开了特别会议，研究调停问题。经过各方面的协调，交战双方在1948年5月30日达成了一项协议，要求交战双方停火4周，并委派瑞典红十字会会长福克·伯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的调停人。经过伯纳多特的斡旋，阿以双方同意从6月11日起停火4个星期。

停火期间，伯纳多特提出了一个解决阿以争端的新方案：那就是把巴勒斯坦这块委任统治地和外约旦合并为一个经济联盟。在这个联盟里，有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双方可以通过一个中央议会协调它们的共同利益。遇到分歧时（例如在移民问题上）有向联合国申诉的权利；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有返回家园并收回其财产的权利。此外，伯纳多特还建议对11月的分治计划进行某些领土划分方面的调整，使其符合目前的军事形势。他建议把内盖夫（南巴勒斯坦）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作为交换，把加利利西区的全部或一部分划入犹太领土；把耶路撒冷城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自治地则享有市政自治权；在海法建设一个自由港（包括输油管终端和炼油厂），在卢德设立一个自由航空站等。[26]

以色列政府在1948年7月7日的答复中，对伯纳多特的计划表示了强

烈不满，它认为这项建议危害极大，既鼓励了阿拉伯人的侵略，又伤害了犹太人的感情。更重要的是该项计划将从根本上改变自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决议案中有关领土的各项规定。[27]在苏联的支持下，以色列方面拒绝了这个计划。[28]

7月9日，战端重启，4个星期的停火使得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以色列在补充了军火和兵力后，实力大增，开始由防守转为进攻。到7月18日根据联合国决议第二次停火时，以色列已经在这10天的战斗中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得的领土，已经3倍于他们在第一个月战斗中所获得的领土。[29]这一时期，联合国调解人伯纳多特和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了。伯纳多特曾向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摩西·夏里特提出抗议，说摩西·夏里特反对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并丝毫不顾及世界的舆论，并肆无忌惮地威胁他。而一部分以色列报纸意味深长地揭露这位联合国调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曾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与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有过暧昧的勾搭。现在又成为“英美帝国主义”和“石油利益”的一个代理人。当时的以色列政府和国内整个报界都对伯纳多特及其联合国观察员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而苏联方面也一再指责伯纳多特在1939年苏芬战争期间，曾为芬兰招募志愿军。1948年9月17日，犹太恐怖组织成员在耶路撒冷郊区暗杀了伯纳多特伯爵和他的助手。

在伯纳多特事件中，苏联和东欧集团又一次坚定地站在了以色列一边，它们谴责英国和美国，说它们为了满足其在南巴勒斯坦的战略和石油利益，对已故的伯纳多特伯爵的建议施加了影响[30]，而对伯爵本人被暗杀这件事，苏联代表则轻描淡写，一带而过。

1948年11月24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要求侵入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军队马上撤离，并声称以色列正在为自由和独立进行着武装斗争。[31]

此外，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苏联又一次站在了以色列一边——它否决了联合国大会的第194号决议。[32]

第二节 大批东欧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

移民是以色列的立国之本。以色列能够顺利建国，来自东欧国家的大量犹太移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犹太人能够顺利移民巴勒斯坦，是和苏联的默许态度分不开的。

以色列建国之前，受英国政府在1939年颁布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白皮书》的制约，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大都是非法的。尽管起初苏联官方声明不支持欧洲犹太难民移居巴勒斯坦，但实际上仍对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在东欧吸收移民提供了便利条件。

早在1945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驻华盛顿代表古尔德曼就给当时的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写信，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对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自由移民巴勒斯坦提供方便。[33]

从1946年开始，在苏联的允许之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和罗马尼亚政府就移民问题展开谈判。布加勒斯特方面同意5万名犹太人离开罗马尼亚移民巴勒斯坦，但前提是他们放弃自己在罗马尼亚的财产，此外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还不得不为这些罗马尼亚犹太人支付人头税。[34]

1946年5月，第一艘载有1700名犹太人的轮船离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港前往巴勒斯坦。1947年底，犹太复国主义者还试图组织1.5万名罗马尼亚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但是这个计划最终流产。[35]

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与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方面的谈判也在进行当中。1946～1948年，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一共接纳了6万名犹太非法移民，其中80%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36]

1948年5月，以色列的成立为全世界犹太人合法地移民巴勒斯坦打开了方便之门，大批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造成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极大恐慌。一些国家希望继续对犹太移民进行限制。在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苏联代表发言指出：“犹太移民问题是以色列的内部事务，有些安理会的代表曾就犹太移民威胁到周边阿拉伯国家安全的问题进行讨论。我认为除了以色列本身的自卫行为，我们还不知道任何一起由以色列军队发起的对他国的武装入侵，相反，以色列是被迫去击退来自其他

国家的武装力量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这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自卫行为。”[37]

这一时期，以色列和罗马尼亚之间关于移民问题的谈判遇到了一些小麻烦，根据以色列代表莫迪凯·纳米尔（Mordechai Namir）和罗马尼亚外交部部长安娜·波克尔（Ana Pauker）在1948年7月所达成的协议，每个月将允许5000名罗马尼亚籍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安娜·波克尔并没有向纳米尔提及对这些犹太人是否有限制标准。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从1948年3月开始，罗马尼亚政府就已经开始禁止熟练工人、医生和工程师向外移民了。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坚决反对那些处在重要岗位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38]事实上到了1948年底，罗马尼亚就不再允许本国犹太人移民了。

于是在1948年12月，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摩西·夏里特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专门就东欧国家的移民问题在巴黎举行了会谈。

会谈中，摩西·夏里特一再强调了移民对于以色列国的重要性。摩西·夏里特指出："在一战期间，俄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结果到今天还能感受得到，在我们的政府中，在一些重要部门和岗位，许多人都是来自俄国……在一战之后，以色列国建国先锋队的责任是由来自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担负起来的。所以，如果犹太人想建国，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使我们东欧盟友中的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来。”

接下来，摩西·夏里特分别谈了东欧国家犹太人的情况。他说："南斯拉夫目前有8000多名犹太人，南斯拉夫政府允许其中的一半人在自愿的前提下移民巴勒斯坦；保加利亚有3.5万～4万名犹太人，他们当中有几千人愿意移民，以色列政府已经和保加利亚政府达成了协议将接收他们；波兰有7万～8万名犹太人，在波兰，如果犹太人想移民的话，他们随时都可以离开，但是对于那些处在重要岗位的犹太人还是有移民限制的，不管怎样，这对于以色列是比较有利的；匈牙利有20万犹太人，对那里的情况我们还并不清楚；而罗马尼亚的情况就显得比较糟糕，那里有35万名犹太人，罗马尼亚犹太移民是以色列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源泉，这个国家也存在移民传统，但是现在我们恰恰在罗马尼亚遇到了困难。”维辛斯基对摩西·夏里特解释说："东欧国家和以色列一样年轻，对于一切有可能不利于他们国家利益的事情都会很敏感。大国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也许不是问题，而小国则会把困难看得过大，这是很自然

的。”摩西·夏里特说：“你们不能想象以色列对苏联的情感有多么深，维持与苏联的友谊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罗马尼亚，35万犹太人丧失了属于自己的一切，被纳粹摧毁的犹太社团还没有来得及重建，要知道在罗马尼亚重建犹太社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让罗马尼亚的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来不仅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也是人道主义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也许罗马尼亚需要这些犹太人，但是该国有1800万人口，对它来说失去10万名犹太人算不了什么，而对于以色列来说，得到这10万名犹太人就可以立刻使他们投入我们的国家建设中来，并能为保卫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接下来维辛斯基谈到了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交往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摩西·夏里特的解释是：“这些富有的美国犹太人认为自己也是以色列的公民，他们是在帮助犹太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以色列将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而不是别人手中的傀儡。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我们（指的是苏联和以色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成功地阻止了伯纳多特计划的通过。”谈话的最后，维辛斯基表示：“你们的意见我会转达给我的政府，转达给莫洛托夫，甚至是更高级别的领导人。”[39]显然，维辛斯基在这里指的这位更高级别的领导人就是斯大林了。由此可见，莫斯科高层对以色列在东欧国家吸收移民是相当重视的。1949年4月，以色列驻苏联大使果尔达·梅厄在返回以色列之前又一次向维辛斯基提出了关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犹太人移民的问题。希望苏联方面能劝说这两国的政府放宽对犹太人移民的限制。[40]

与此同时，以色列外交人员继续就犹太人移民问题在布加勒斯特与罗马尼亚政府进行谈判，但是依旧没有效果。直到1949年底，罗马尼亚政府终于再次对犹太人打开国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联政府对罗马尼亚政府施加的压力。在1950年有47041名罗马尼亚犹太人到达以色列，紧接着1951年，又有40625名犹太人离开罗马尼亚向以色列移民。

在布达佩斯，以色列外交人员与匈牙利政府进行的谈判也并不顺利。从1948年中至1949年底，只有大约10000名匈牙利犹太人通过非法途径移民以色列。[41]苏联对待东欧国家的犹太人移民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政策。犹太人问题在东欧属于比较敏感的问题，如果只允许犹太人向外移民而不允许其他人移民的话，有可能会在东欧地区掀起新一轮的反犹主义浪潮，这种情况是不利于东欧国家人民民主政体的稳定。因此，尽管苏联政府鼓励东欧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去，但在政策上还是给予了这些国家一定的自主权。

从1948年中至1951年，东欧国家先后向以色列输出了超过30万名犹太移民，人数超过了同一时期以色列移民的半数以上，具体数字见表3-1。

表3-1 东欧各国前往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人数统计（1948年中至1951年）

国家	移民人数
罗马尼亚	117950人
波兰	106414人
保加利亚	37260人
捷克斯洛伐克	18788人
匈牙利	14324人
南斯拉夫	7661人

资料来源：Marie-Pierre Rey，*Juifs et émigration juive dans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soviétique: handicap ou atout?1917-1991*，Historiens et Géographes，No. 322，1991，p. 254。转引自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 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 46，p. 35。

尽管苏联对于以色列在东欧国家吸收犹太移民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但是对于本国犹太人的移民要求则给予了严格限制。1948年9月15日，以色列驻苏联公使果尔达·梅厄在会见苏联外交部近东司司长巴库林时指出："要解决犹太人问题，只有靠大量犹太人移民以色列这一途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说："绝大多数犹太人都会留在自己的国家，而不会移民以色列。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犹太人在苏联从未受到歧视和压迫，要最终解决其他国家的犹太人问题，只有在该国彻底实现民主化。"[42]

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资料，1945～1955年，仅有500名苏联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43]而以色列方面的材料显示，在1948～1955年，移民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有131名，这其中只有9名犹太人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离开苏联的。[44]1952年4月6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A.Б.波德采罗布（A.Б.Подцероб）给莫洛托夫的一份书面报告中写道：1948～1951年，苏联移民局一共收到了65份苏联犹太人要求移民巴勒斯坦的申请，其中只有10份获得了批准。[45]

由此可见，苏联方面的态度很明确，就是限制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

列。官方的说法是苏联不存在反犹主义，也不存在阶级矛盾和民族压迫，因此苏联犹太人没有必要移民以色列。但在笔者看来，实际情况是由于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人口数量急剧下降，百废待兴，因此在战后实行了限制人口外流的政策。总体而言，犹太人在苏联受教育程度较高，所以苏联方面希望犹太人能留在国内为苏联的经济建设服务。因此，以色列的移民政策与战后苏联的人口政策是相悖的，这也是后来以色列倒向美国及苏以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

新生的以色列国在很多问题上需要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对苏联犹太人移民这个敏感问题，以色列领导人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只是向苏联政府提出，希望苏裔犹太人的亲属能够移民以色列。[46]

第三节 来自东欧的军事援助

在苏联的支持下，东欧的大量犹太移民保证了以色列的人口基数和军队动员能力。但是，犹太人要想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除了移民之外，还必须要有大量的武器装备才能保证国家的独立和安全。1947年，本-古里安曾对哈加纳[47]现有的武器装备情况做过一次彻底的清查，情况见表3-2。

表3-2 1947年哈加纳的武器装备情况

武器种类	数量
来复枪	10073 支
冲锋枪	1900 支
中型机枪	186 挺
轻机枪	444 挺

资料来源：David Ben-Gurion，*Israel*：*Years of Challenge*，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3，p. 21。

犹太武装力量仅有1挺重机枪，没有大炮，也没有反坦克武器、防空武器和装甲车，没有空军和海军，通信器材也很缺乏。这些武器大部分还是英国军队淘汰下来的，很多枪支都已无法使用。[48]

犹太人只要宣布建国，就意味着要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打仗，而靠这点武器装备是远远不够的。早在1947年春，联合国开始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本-古里安就开始派人前往欧洲和美国收集和采购军火，进行战争准备。然而，1947年12月5日美国宣布对巴勒斯坦及其邻国施行武器禁运[49]，军火采购工作并不顺利。于是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将注意力放在了东欧。

1947年7月，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欧洲处处长摩西·斯奈（Moshe Sneh）就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弗拉基米尔·克列门蒂斯（Vlagimir Clementis）开始了购买武器的谈判。1948年3月，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代表埃胡德·阿弗里尔（Ehud Avriel）与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副部长贝德里奇·赖辛（Bedřich Reicin）将军举行了一次会谈，捷克的雷森将军向以色列代表阿维尔保证，尽管向犹太人出售武器还需要得到总理克里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国防部部长卢德维克·斯沃博达

（Ludvík Svoboda）将军和内务部部长瓦茨拉夫·诺塞克（Václav Nosek）的批准，但是他认为问题不大。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的一些废旧枪支和坦克甚至可以通过军队直接进行出售。在得到捷克斯洛伐克高层官员的允许之后，1948年3月，犹太人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斯柯达兵工厂签订了合同，购买了4500支P18毛瑟步枪、200挺MG34型机枪、504万发7.92毫米步枪弹，总价值45万美元。犹太人把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武器的计划称之为“巴拉克行动”（Balak Operation），把这次行动称为“巴拉克行动1”。为了掩人耳目，购买这批武器时，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代表隐去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埃塞俄比亚代表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字。[50]

从1948年3月31日至5月20日，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1948年5月14日之后称为以色列政府）先后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了3批武器装备，分别称为“巴拉克行动2”、“巴拉克行动3”和“巴拉克行动4”。而历次运输的武器种类、数量及其总价值，详见表3-3、表3-4和表3-5。

表3-3 “巴拉克行动2”的武器种类、数量及其总价值

武器种类	数量
P18 毛瑟步枪	10000 支
ZB34 轻机枪	815 支
ZB37 重机枪	600 支
7.92 毫米步枪弹	1600 万发
9 毫米派拉贝鲁姆手枪弹	150 万发
	总价值 252.8 万美元

表3-4 “巴拉克行动3”的武器种类、数量及其总价值

武器种类	数量
P18 毛瑟步枪	10000 支
各类机枪	3400 挺
各类子弹	3000 万发
	总价值 446.7 万美元

表3-5 “巴拉克行动4”的武器种类、数量及其总价值

武器种类	数量
ZB37 重机枪	75 挺
反坦克炮弹	100 万发
各类子弹	5000 万发
	总价值 70 万美元

资料来源：АВП РФ，Ф. 0118，Оп. 2，П. 3，Д. 11，Л. 60－61.//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б. док. 1941－1953гг. Т. I. С. 280－281。

根据最新解密的苏联和以色列的档案来看，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在卖给犹太人武器的同时，也与埃及和叙利亚进行着武器交易的谈判。[51]

1948年2月5日，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代表摩西·夏里特会见了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希望苏联方面能够阻止捷克斯洛伐克向阿拉伯国家出售武器。[52]

1948年6月5日，苏联外交部近东司司长巴库林在给副部长佐林的报告中说："必须通过我们驻布拉格和贝尔格莱德的大使用适当的方式让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明白，以色列代表提出购买火炮和飞机并运往巴勒斯坦的请求是合理的。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做出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实行武器禁运的决议，但是约旦、伊拉克和埃及是完全有机会从英国人的仓库和基地得到他们所必需的武器。[53]佐林在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指出："在适当的时候必须让哥特瓦尔德注意到，他们出售给阿拉伯国家的武器将会使巴勒斯坦的局势更加恶化。英美帝国主义将会利用这种混乱的局面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政权。"[54]

由于苏联方面的介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终止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军火贸易谈判，答应仅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提供武器。

1948年4月中旬，巴勒斯坦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战争状态。为了加紧备战，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已经不再满足于购买轻型武器了，开始向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提出购买包括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战斗机在内的重型武器了。

梅塞施密特系列战斗机曾是纳粹德国空军的王牌战斗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实际上成了纳粹的兵工厂。特别是在1944年以后，德国本土的工厂遭到盟军的轰炸损失惨重，于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兵工厂都接到了命令生产梅塞施密特战斗机的零部件，然后在布

拉格的卡科维斯（Cakovice）兵工厂和阿维亚（Avia）兵工厂进行组装。二战结束后，梅塞施密特战斗机的技术落入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手中。卡科维斯兵工厂对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进行了改进，研制出了梅塞施密特S-199战斗机。捷克斯洛伐克希望把这种飞机出口以赚取外汇，但是与国际市场上其他飞机相比，梅塞施密特S-199战斗机的机型不大受欢迎，因此销路并不好，但是到了1948年4月，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向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提出了购买这种飞机的请求。1948年4月23日，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正式签署了购买飞机的合同。犹太人一共购买了10架梅塞施密特S-199战斗机，每架飞机售价为4.4万美元，这其中包含了飞机的备用零件、机载炮、机关枪和炸弹等。尽管犹太武装中有不少曾在战争期间服役于英国空军的犹太飞行员，但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驾驶梅塞施密特S-199战斗机。因此，在与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合同中还包含了为犹太人秘密培训一批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的条款。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选择了位于布拉格以西75英里靠近扎台茨镇（Zatec）的一个秘密机场作为培训犹太飞行员的基地。尽管已经购买了10架飞机，但是这些飞机暂时还未交付使用，于是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把工作的重点转到了培训飞行员上。1948年5月5日，8名犹太学员被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派往捷克斯洛伐克学习驾驶梅塞施密特S-199战斗机的复杂技术，但是这些满怀热情的犹太飞行员表现并不好，只有3名在二战中有过飞行经验的学员完成了全部课程，另外5名被捷克斯洛伐克指挥官建议转到其他地方继续学习飞行。

1948年5月17日，10架梅塞施密特S-199战斗机终于被运抵扎台茨空军基地，并于5月21日运到了以色列。而此时，埃及军队已经推进到了距离特拉维夫30公里的地方。这10架新型战斗机对于以色列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它们为阻止阿拉伯军队的进攻起到了重大作用。[55]与飞行员培训课程相比，以色列对于伞兵培训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够。1948年5月底，以色列代表阿维尔在与雷森将军的一次会谈中，偶然间提到了关于伞兵培训的事情，雷森将军出人意料地同意了。

由于时间紧迫，哈加纳决定不从以色列派遣人员过来，而是在东欧各个使团中间抽调人员到捷克斯洛伐克接受培训。于是在1948年6月10日，一支由50人组成的伞兵训练营被组建了起来。这支队伍被带到了位于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的一个训练基地。在这里他们每一个人都穿上了捷克斯洛伐克士兵的制服，严格的训练课程开始了。训练的重点为突击队训练、侦察、炸弹使用、野外生存能力等，课程等级为绝

密，为了避免引起美国与英国大使馆人员的注意，以色列学员得到命令，周末外出时必须穿普通市民的服装，任何时候都禁止在训练营外讲希伯来语。伞兵训练的课程进行了两个月，于1948年8月中旬结束，学员们结业之后，被送往扎台茨空军基地，然后飞往以色列，这批学员日后成为以色列伞兵部队的核心力量。[56]

以色列正式成立不久，也就是1948年5月19日，与捷克斯洛伐克政界有着良好关系的阿维尔被任命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值得注意的是阿维尔是以色列任命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同时，在布拉格的以色列军事采购团成员大都被任命为使馆的工作人员。5月20日，阿维尔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签署了一份新合同，购买了15架梅塞施密特S-199战斗机。

1948年7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又和以色列政府签署了一份军售合同。布拉格方面提供59架英国喷火式战斗机及其零部件，这些飞机和零部件是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由皇家空军移交给捷克斯洛伐克的。1948年合同商议价格为每架飞机2.3万美元，比之几个月前以色列订购的梅塞施密特S-199战斗机来说，价格要便宜得多。

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5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提供了价值1300万美元的轻重武器。1948年下半年，以色列又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购买了900万美元的武器。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和以色列政府先后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了价值220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捷克斯洛伐克和以色列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51年。[57]

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曾经说过：“毫无疑问，与捷克的武器交易是对我们的最大帮助，它拯救了我们，没有这些武器我怀疑我们能否挺过第1个月。”[58]

首任以色列驻莫斯科公使果尔达·梅厄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独立战争的头6个星期内，我们主要依靠（虽不是完全）哈加纳在东欧买到的炮弹、机枪、大炮，甚至飞机。那时连美国也宣布对中东禁止出售和运送武器……5月18日苏联承认以色列国对我们有巨大意义。”[59]

以色列一直希望苏联方面能够直接对以色列进行军事援助。以色列外交官一到莫斯科，就希望能同苏联方面的权威人士就这个问题展开谈判。1948年10月6日，以色列驻苏联公使馆官员约哈南·拉特纳（Yohanan Ratner）上校会见了苏军副总参谋长A.安东诺夫

（A.Антонов）大将（犹太人）。拉特纳提出：“希望苏联方面能够帮助以色列培训军官并向以色列提供一些苏联缴获纳粹德国的武器装备。安东诺夫建议以色列方面就所提要求列出一个详细清单。”[60]

11月9日，以色列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本-古里安给拉特纳上校发了一封电报，就以色列要求苏联提供的武器列了一份详细的清单。其中包括45辆T-34坦克、50架战斗机等。[61]拉特纳把这份清单交给了巴库林。巴库林表示，他将把这份清单转交给上级。但是巴库林指出，由于联合国要求对巴勒斯坦实行武器禁运，苏联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会很困难。巴库林说：“的确是有一些国家违反了联合国决议，但是如果我们向你们提供武器被发现了，那将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62]1948年11月24日，巴库林就这个问题给佐林提交了一份报告。巴库林在报告中写道：“针对以色列政府所提出要求我们提供重型武器的问题，我建议进行以下答复。苏联政府十分关注以色列的命运以及犹太人所享有独立和自由的权利，但是根据联合国决议，我们不能对巴勒斯坦交战各方提供武器。关于类似问题的答复我们已经通过葛罗米柯同志转达给了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63]

总之，苏联方面不愿意直接出面和以色列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而更愿意站在幕后，由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出面对以色列提供武器装备。

第四节 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原因分析

如前所述，二战后苏联和东欧集团给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道义上、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全方位的支持和援助。斯大林的这个决定几乎出乎所有西方观察家的预料。就是在苏联领导层内部，也有很多人不理解。那么，这其中的奥妙究竟何在？

1947年11月5日，也就是在联合国大会对巴以分治决议进行投票的前几天，苏联驻伊拉克临时代办A.Ф.苏尔塔诺夫（A.Ф. Султанов）给苏联外交部近东司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苏尔塔诺夫分析了苏联支持犹太人建国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有利因素是：会使全世界犹太人对苏联抱有好感，这其中也包括美国的犹太人。如果犹太国从英美银行和美元外交中脱离出来，可以成为中东地区革命的一个因素。对于不利因素，他谈了六点：①支持犹太人将会使整个阿拉伯世界疏远我们；②将会使英国人和反动的阿拉伯联盟高层联合起来，这对于阿拉伯国家人民民主力量的发展和苏联外交的开展是很不利的；③这将刺激阿拉伯联盟、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组成反苏的穆斯林同盟；④这将会对人民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带来不利影响；⑤犹太国将有可能成为美国人向中东地区扩展的基地；⑥在英国的挑唆之下，阿拉伯国家将不再相信苏联人是支持它们的。[64]总的来说，苏尔塔诺夫认为苏联支持犹太建国是弊大于利的。

然而，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的斯大林，在支持犹太人建国的问题上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在这里可以尝试分析一下二战后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原因。

中东地区尤其是巴勒斯坦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角逐的场所，但是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苏俄的势力就完全退出了中东，于是该地区就成了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苏联重新开始关注中东地区。这时，摆在斯大林面前的就有三个选择：要么支持阿拉伯人，要么支持犹太人，要么继续无所作为。而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苏联，在中东地区无所作为则显然不符合它的大国地位，那么就只剩下了前两种选择。

如果选择支持阿拉伯国家，就意味着苏联支持建立一个泛阿拉伯联

盟，但是在中东地区的苏联外交人员认为所谓的阿拉伯联盟是不可靠的。1943年，苏联驻土耳其安卡拉大使馆一秘在提交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建立泛阿拉伯联盟更多的是英国的意愿，而非阿拉伯世界本身。英国促使这一计划，是以加强其在中东地区的统治为目的的。[65]而另一位苏联外交官说："泛阿拉伯联盟的成立对于苏联而言是有害的。它将作为一种工具，以防止苏联加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66]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苏联在阿拉伯国家中显然没有太多的外交活动空间。阿拉伯国家基本上都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如埃及仍处于法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伊拉克和约旦由哈希姆王朝统治，这些政权都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战后，英国为了保持自己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地位，对付苏联的扩张和美国的排挤，比战前更需要加强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而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要求建国的热情很高，与英国殖民当局的冲突日趋激化。这在斯大林看来，支持与英国直接对抗的犹太人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

尽管种种迹象表明，苏联并不信任阿拉伯人，但是也没有立刻站在犹太人一边。直到1947年4月中旬，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始终让人琢磨不透，来自中东地区的苏联外交人员的报告源源不断送往莫斯科，苏联高层也在反复考虑自己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

1947年4月28日，葛罗米柯在纽约收到的来自莫斯科的神秘电报是苏联开始支持犹太人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最早注意到这封电报的是法国学者劳伦特·拉克尔，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苏联在这一时间改变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敌视态度，拉克尔的文章对此并没有进行解释。[67]

要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就必须从1947年3月至4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分析。

前文我们所提到的伊朗危机和土耳其海峡危机使得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合作逐渐发生动摇。苏联与英美等战时盟国的分歧和矛盾也越来越深，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中，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他以不点名的方式公开谴责苏联的制度及其生活方式，并宣布美国将予以抵制的决心。杜鲁门认为，美国的政策就是要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以抵御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强加的征服企图。[68]

杜鲁门讲话之后，1947年4月9日，斯大林在同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哈罗德·斯坦森（Harold Stassen）的谈话中对此进行了反驳。斯大林说："如果双方开始彼此谩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那就不能得到合作。"斯大林举例说："他和罗斯福都没有彼此漫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这就大大有助于他和罗斯福建立相互的合作，并赢得了对敌的胜利。"斯大林重申，美苏仍有合作的可能，只要双方有此愿望的话。[69]与杜鲁门的讲话相比，斯大林的公开回应还算是比较"温和"的。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做出了继续与西方进行合作的姿态。

1947年3～4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着重讨论了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但是苏联和西方国家对于赔款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同。对于西方来说，解决德国问题实际上是处理一个有着重要经济意义的问题——德国的工业及其资源，尤其煤炭产业曾是战前欧洲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在德国一直保持着不同的占领区而没有统一的经济政策，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只能是停滞不前。而苏联只是想在德国那里得到200亿美元的赔偿用于战后的经济重建。在政治上，苏联方面关心的是消除德国复活的可能性。[70]

莫斯科外长会议并没有在西方和苏联之间的分歧上架起一座桥梁。西方国家拒绝批准苏联的赔款提议。由于赔款问题得不到解决，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在德国政治体制安排上始终不妥协，也不同意西方国家提出的在所有占领区制定临时性的统一经济政策。会谈拖延了三个多星期，各方都不断地重复着对方显然不愿接受的要求。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于4月15日和斯大林进行了专门的对话。

马歇尔说："战争结束之初，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苏联一样得到了如此多的赞誉。这赞誉源于苏联在战争中的贡献。在战争期间，美苏之间出现了一些误解，但是马歇尔相信，历史证明，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战争为美苏两国营造了良好的合作氛围。"斯大林指出，苏联方面也这样认为，战争拉近了苏美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一起战胜了共同的敌人。随后，马歇尔在谈话中提到了苏美关系问题，他说："尽管美国和苏联的政治制度和执政理念不同，但是，美国并没有任何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苏联的意图。美国不追求对其他国家的控制。美国想对一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免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混乱现象，而一旦出现这种混乱现象是不可能建立起民主制度的。"马歇尔希望苏美之间能够

恢复理解和信任，就像它们在战时那样。如果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中能够取得某些成果，那么这将是它们之间恢复信任的开端，这将有利于今后的和平。斯大林答复说："马歇尔做得很对，开诚布公和真诚是今后信任和合作的唯一基础。……苏联战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苏联政府现在忙于国内恢复工作。早在两年前你们就曾向苏联政府询问，战后苏联需要书面形式的贷款，美国应该为苏联分配多少订货。这是1945年1月的时候加里曼向我们询问的。苏联政府提交的备忘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答复，其中指出，如果可能并且条件合适的话，苏联政府希望从美国得到30亿~60亿美元或者更多的贷款。但是，两年过去了，苏联政府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任何答复。斯大林不想就此指责美国政府行为的欠妥，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两年过去了，还没有得到答复。"关于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斯大林持乐观态度，他说："今天的这次会谈是第一场角逐，是一场试探性的角逐。当各方都相互试探完之后也许就会相互妥协。或许，今天的这次会谈不会取得显著的成果。但不应该悲观。下次会谈或许会取得成果。"[71]

从斯大林和马歇尔的会谈情况来看，尽管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使得美苏关系出现了裂痕，但是通过与马歇尔的谈话，让斯大林重新看到了与美国继续保持合作进而获得美国资本援助的可能性。这或许是斯大林改变其巴勒斯坦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文我们提到，犹太人在美国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犹太人的游说集团甚至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外交决策，而斯大林在这个时候对苏联的巴勒斯坦政策做出调整，明确表示支持犹太人建国是有深意的。这意味着苏联在英美矛盾中选择了支持美国。

战后苏联的重建迫切需要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而此时的大英帝国业已衰落，指望英国人的援助是靠不住的，美国是唯一有实力对苏联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的西方大国。于是，在与马歇尔进行谈话之后，斯大林很快就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了支持犹太人的决断。笔者认为斯大林在此时做出这一决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

第一，向美国显示了苏联愿意继续维持苏美合作关系的诚意。这在1947年5月斯大林再次接见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斯坦森时得到了证实。在回答斯坦森提出的斯大林是否认为苏联的经济与美国的自由企业经济能够共存的问题时，斯大林回答道："苏美不但能够共存，而且还能进行合作……我们的导师列宁说过，两种制度的合作是可能的。"[72]

第二，通过支持犹太人建国来赢得美国犹太社团的好感，寄希望于犹太人的院外集团能对美国的外交决策施加影响，促使美国继续与苏联维持在战时结成的合作伙伴关系。事实证明，苏联的政策在美国的犹太社区打开了一个缺口，《消息报》在一篇名为《美国犹太新闻界欢迎葛罗米柯的讲话》的文章中写道："葛罗米柯的讲话不仅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对整个犹太民族都有着重大历史意义，因为他支持犹太人民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可以预料到葛罗米柯对苏联立场的解释将迫使美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团和美国政府改变它们现在犹豫不决的立场，使它们清楚自己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观点。"[73]塔斯社报道葛罗米柯收到了众多祝贺电报，尤其提到了来自拥有150万成员的美国犹太工人委员会的贺电。[74]

第三，通过支持犹太人建国有利于争取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犹太财团对苏联进行经济援助。利用犹太人向西方索取援助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传统。从20世纪30年代的比罗比詹犹太自治州开始算起到二战期间所成立的"犹委会"，再到1943年提出的克里木犹太人自治共和国计划以及二战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尽管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是都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外交思想，那就是利用苏联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之间天然的联系，向西方寻求援助，促进苏联的经济建设。

1947年是美苏冷战战略确立和冷战格局形成的一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实际上已经为美苏关系破裂埋下了伏笔。特别是1947年6月马歇尔计划正式提出之后，苏联方面经过短暂的试探和犹豫，终于认清了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向苏联和东欧进行经济渗透的一个工具。于是苏联宣布退出马歇尔计划，与此同时也禁止东欧国家参与马歇尔计划。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加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别与保加利亚等六个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即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纳入了苏联模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奠定了苏联-东欧集团的经济基础。不仅如此，在1947年9月，苏联还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的协调中心，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斯大林的目的是要通过这种政治组织模式加强对东欧各国以及欧洲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控制。

1947年下半年，当与西方合作的幻想破灭之后，苏联在外交政策上

就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进而走上了与西方集团进行对抗的道路。这个时候，冷战就真正开始了。

冷战的到来意味着斯大林希望获得美国犹太资本援助的愿望落空了。而就在1947年底，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严重倒退，其主要表现有两点：①对巴勒斯坦交战各方实行武器禁运（实际上是针对犹太人的）；②美国代表在联合国提出要废除联合国大会第181号（二）决议，由联合国出面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当美国的政策出现倒退的时候，苏联政府一如既往地支持犹太人，其原因究竟何在？笔者试图通过已经解密的苏联档案文献对此给出自己的解释。

首先，斯大林通过支持以色列建国成功把英国逐出了巴勒斯坦地区[75]，英国人撤出之后，巴勒斯坦这块战略要地自然成了美苏两国都觊觎的目标。而在这个时候，对于新生的以色列国来说，确定在两极格局之中的外交政策至关重要。在斯大林看来，如果以色列选择倒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那么苏联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就有了立足之地和代言人。如果以色列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而在美苏之间选择中立，它也会因为苏联对它的支持而对苏联采取亲善的政策，这同样也符合苏联的外交利益。退一步说，如果以色列倒向西方，那么与以色列势不两立的阿拉伯国家就会因此倒向苏联，美国也会因扶植以色列而深陷在中东地区的泥潭里。这样苏联则可以置身事外，在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前提下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76]而后发生的历史事件也证明了这一切。可以说，在支持犹太建国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实际上做了一笔很好的“买卖”。

其次，巴勒斯坦地区相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要远大于对苏联的重要性。该地区动荡不安符合苏联的战略利益。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曾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指出：“对于美国来说，巴勒斯坦地区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美国希望把通向沙特阿拉伯的输油管道的终端设在巴勒斯坦。”[77]因此，美国迫切希望该地区的局势保持稳定。但是以色列，既好像是希腊神话中帕里斯的金苹果一样被抛到了巴勒斯坦，又好像是一个被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自它成立开始，中东地区就再无安宁之日。因此，斯大林既然已经选择了支持以色列建国，那就应该让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的一股新的政治势力继续存在下去。对于斯大林来说，与其让美国和英国控制巴勒斯坦，倒不如让这一地区长期陷入战乱之中，而后者显然更符合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

最后，众所周知，在斯大林的外交战略中，欧洲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远东地区。如果美国因为支持以色列建国而陷入中东地区的泥潭，这将大大减轻苏联在欧洲和远东地区的军事压力。事实上，在1948年初巴勒斯坦局势陷入混乱之时，美国政府的确考虑过出兵巴勒斯坦。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驻华盛顿代表爱泼斯坦曾向苏联驻美临时代办查拉普金透漏，美国国防部正在研究向巴勒斯坦地区派驻军队的可能性。[78]由于中东地区没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如果美国真要向巴勒斯坦地区派驻军队的话，只有从欧洲或远东就近调兵，这样一来，势必会削弱美国在欧洲和远东的防御力量。这对于苏联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总之，二战后斯大林支持犹太人建国并非出于对犹太人的同情，支持犹太建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对于新生的犹太国是否会倒向苏联，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的对外政策目标中并无过多考虑。由此也不难解释斯大林为什么会在支持犹太建国的同时，又发动了以“犹委会”案件和“医生间谍案”为代表的大规模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

英美矛盾给了苏联进入中东地区的机会，苏联抓住这个机会，在将英国人逐出巴勒斯坦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势力和影响扩展到了中东和地中海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苏联的支持实现了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夙愿。

[1] 参见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93～94页。

[2] Aaron S.Klieman（ed.），*The Struggle for Statehood*：*Focus on the United Nations*，New York：Garland Pub.，1991，p.99.

[3] Aaron S.Klieman（ed.），*The Struggle for Statehood*：*Focus on the United Nations*，pp.119-120.

[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7，Vol.5，pp.1281-1282.

[5] Arieh J.Kochavi，*Post-Holocaust Politics*：*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Jewish Refugees*，*1945-1948*，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350.

[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8，Vol.5，pp.1300-1301.

[7] CODED TEL：ISA 130.09/2308/1，*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285.

[8] William Roger Louis，*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1945-1951：Arab Nationalism，the United States，and Postwar Imperi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498.

[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8，Vol.5，pp.546-554.

[1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8，Vol.5，pp.637-640.

[1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8，Vol.5，pp.651-654..

[1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8，Vol.5，p.743.

[13] 参见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98页。

[14] АВП РФ，Ф.06.Оп.10.П.15.Д.160.Л.4-7.//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290-292.

[15] 果尔达·梅尔松就是后来的首任以色列驻苏联公使梅厄夫人——果尔达·梅厄。

[16] “斯特恩帮”，是犹太恐怖组织“莱希”的蔑称。

[17]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3.Д.11.Л.123-130.//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293-294.

[18] Michael T.Benson，*Harry S.Truman and the Founding of Israel*，Westport：Praeger，1997，pp.155-157.

[19] 参见〔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李石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204页。

[20] ISA 130.02/2424/19，*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281.

[21] АВП РФ，Ф.89.Оп.1.П.1.Д.4.Л.5.//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 1941-1953гг.Т.I.С.305.

[22] ISA 130.09/2308/1，*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285.

[23] АВП РФ，ф.06，оп.10，п.46，д.622，л.17，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C.308.

[24] АВП РФ，Ф.89.Оп.1.П.1.Д.3.Л.14-15.//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348-349.

[25] ISA 130.02/2385/3，*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327.

[26] 参见〔英〕乔治·柯克《1945—1950年的中东》，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第456～457页。

[27] 参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7月增编，第27～30页，文件S/870。转引自〔英〕乔治·柯克《1945—1950年的中东》，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第458页。

[28] 16 октября 1948，АВП РФ，Ф.07.Оп.21б.П.49.Д.39.Л.86.转引自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46，p.38。

[29] 〔英〕乔治·柯克：《1945—1950年的中东》，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第463页。

[30] 〔英〕乔治·柯克：《1945—1950年的中东》，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第473～475页。

[31] Govrin Yosef，*Israeli-Soviet Relations*，*1953-1967*：*From Confrontation to Disruption*，London：Frank Cass，1998，p.26.

[32] 该决议允许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返回家园，同时阿拉伯难民有权对自己的财产损失进行索赔。参见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46，p.34。

[33] CZA Z6/2298，*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p.97-98.

[34] Uri Bialer，*Between East and West*：*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1948-1956*，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80.

[35] Idith Zertal，*From Catastrophe to Power*：*Holocaust Survivors and the Emergence of Israel*，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238.

[36]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46，p.30.

[37] Yaacov Ro'i，*Soviet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The USSR and Israel*，*1947-1954*，p.238.

[38] This account is based upon Robert Levy，"Ana Pauker and the Mass Emigration of Romanian Jewry，1950-1952，" *East European Jewish Affairs*，Vol.28，No.1，1998，pp.69-86.The article is based on documents from the Romanian archives.转引自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46，p.31。

[39] ISA 130.11/2502/8，*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p.414-419.

[40] ISA 130.02/2457/14，*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465.

[41] Laurent Rucker，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46，p.32.

[42] 15 сентября 1948.АВП РФ.Ф.089.Оп.1.П.1.Д.2.Л.8.转引自15 сентября 1948，АВП РФ，ф. 089，оп. 1，п. 1，д. 2，л. 8，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369。

[43] Источник.Документы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Вестник архив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российскому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у журналу 《Родина》 №1.1996. С.154-155.

[44] Uri Bialer，*Between East and West*：*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1948-1956*，p.146.

[45] АВП РФ.Ф.022.Оп.5а.П.66.Д.9.Л.131-133.//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I.С.342-343.

[46] АВП РФ.Ф.089.Оп.1.П.1.Д.2.Л.17-19.//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411-412.

[47] 哈加纳（Haganah），犹太复国主义军事组织（1920-1948），1920年由在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移民建立。

[48] David Ben-Gurion，*Israel*：*Years of Challenge*，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3，p.21.

[4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7，Vol.5，pp.1300-1301.

[50] Pinchas Vaze，*Rechesh*，Tel Aviv：1966，pp.184-185，转引自Arnold Krammer，*The Forgotten Friendship Israel and the Soviet Bloc*，*1947-1953*，p.94。

[51]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3.Д.11.Л.60-6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280-281.

[52] CZA S25/1702，*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264.

[53] АВП РФ.Ф.098.Оп.1.П.1.Д.6.Л.3.//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 1941-1953гг.Т.I.С.314.

[54] *Mezhdunarodnaya Zhizn*'，No.10，1998，p.87.转引自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46，p.32。

[55] Avigdor Shahan，*Kanfei Hanizahon*，*The Wings of Victory*，Tel Aviv，1966，p.63.转引自Arnold Krammer，*The Forgotten Friendship Israel and the Soviet Bloc*，*1947-1953*，pp.90-91，96。

[56] Arnold Krammer，*The Forgotten Friendship Israel and the Soviet Bloc*，*1947-1953*，pp.92-94.

[57]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46，p.32.

[58] Z.Shiff，Stalin ora lesapek neshek le'yisrael'，*Ha'aretz*，3 May 1968（Hebrew）.转引自Uri Bialer，"The Czech-Israeli Arms Deal Revisited，"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8，No.2，1985，p.313。

[59] 〔以〕果尔达·梅厄：《梅厄夫人自传》，章仲远、李佩玉译，第217页。

[60] ISA 130.09/2325/4，*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376.

[61] ISA 130.09/2325/3，*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400.

[62] Yaacov Ro'i，*Soviet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The USSR and Israel*，*1947-1954*，p.156.

[63] АВП РФ.Ф.089.Оп.1.П.1.Д.5.Л.17.//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 1941-1953гг.Т.I.С.433-434.

[64]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3.Д.11.Л.62-64.//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265.

[65] 8 октября 1943.АВП РФ.Ф.087.Оп.7.П.5.Д.12.Л.153-154.转引自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46，p.7。

[66] АВП РФ.Ф.087.Оп.7.П.5.Д.12.Л.7.转引自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46，p.7。

[67]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46，pp.16-17.

[68] 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1分册，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第92、94页。

[69]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58，第526页。

[70] Scott 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1947*，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9，1994，pp.6-7.

[71] АВП РФ.Ф.06.Оп.9.П.71.Д.1104.Л.29-39.//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АТЕРИК》.2004. С.408-413.

[72] Geoffrey Roberts，“Moscow and the Marshall Plan：Politics，Ideology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1947，” *Europe-Asian Studies*，1994，Vol.46，No.8，p.1374.

[73] Известия，20 мая 1947.

[74] Tass Town Service，23 May 1947/SWBI，26 May，1947，转引自徐娅囡、吴建章《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动机分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

[75] 莫洛托夫的助手、后担任驻丹麦大使的韦特罗夫曾转述过斯大林的原话：“让我们同意建立以色列吧！这对阿拉伯国家来说就像锥子扎进屁股一样，迫使它们背向不列颠。最后不列颠在埃及、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影响将会完全被破坏。”参见〔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魏小明等译，第341页。

[76] 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斯大林曾经说过：“以色列将会长久地成为美国身上的‘一根刺’。”参见Медведев Ж.А.Сталин и “Дело Врачей”.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2003.№1.С.99。

[77] АВПРФ.Ф.06.Оп.8.П.45.Д.759.Л.21-39.//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90.No.11. С.149.

[78] АВПРФ.Ф.0118.Оп.2.П.2.Д.11.Л.65-7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I.С.283-284.

第四章 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问题与苏以关系的破裂

第一节 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问题之由来

“俄国财产”（Русское имущество）指的是18世纪以来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前往巴勒斯坦建立海外教会并在当地购置的财产，其中包括大小教堂、学校、供朝圣者过夜的房舍以及养老院等设施。[1]这些财产主要位于耶路撒冷的中心地区，其地理位置颇为重要，是沙俄政府通过宗教途径扩大海外影响的基础。[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向其他参战国承诺战后共同瓜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人的土地。[3]1916年5月，英法俄三国代表秘密缔结了所谓《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规定英法将分别统治伊拉克南部和叙利亚大部分土地，而英国还间接占据了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地区。彼时，俄国政府的实力正在迅速衰落，已无暇顾及远在东方的扩张，仅要求划出一块国际飞地用以管理宗教事务。[4]1917年10月，俄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巨大的变化，布尔什维克成功夺取了政权并宣布退出一战。由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海外东正教教会失去了来自沙俄政府的资助。阿拉伯地区的俄国东正教教会为了维持生计，就把位于耶路撒冷的地产出租给英国驻军使用。[5]战争结束之后，英法双方在圣雷莫会议上达成协议：由英国政府对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进行委任统治，而“俄国财产”也随之收归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管理当局所有。[6]布尔什维克上台后下令废除沙俄政府此前签署的秘密协定，可是这个新生政权当时得不到英法两国政府的承认，英法双方认为沙皇政府很快就会夺回权柄，因此决定保留俄方对中东地区的利益诉求。

1923年5月，苏联政府趁着苏联贸易代表团前往伦敦之际，向英国方面提出“收回”在巴勒斯坦的俄国东正教教会财产，但并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回应。[7]苏联驻英国使馆代表K.拉科夫斯基（К.Раковский）再次声明：位于巴勒斯坦的俄国东正教教会财产属于苏联政府所有，任何

人在未经苏联政府同意的情况下都无权处理这些财产。[8]随着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逐步巩固，英国政府开始提防苏联势力对中东地区的渗透。英国外交部表示巴勒斯坦“俄国财产”的所有权问题仍存在争议，除非有法律文件能证明苏联政府拥有财产继承权，否则无法把这些财产交给苏方。[9]面对英国方面抛出的法律问题，苏联政府束手无策，只好暂时作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英国在中东地区稳稳地站住了脚跟，而苏联政府要求“收回”财产的计划也被迫按下暂停键。

苏联国内经济在战争期间遭受重创，需要来自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资助进行重建。因此苏联政府不愿意破坏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希望维护雅尔塔体系下的战后国际秩序。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出：“构建未来和平和战后秩序时的目的，应当是造成一种局势，使得在长时期内，至少在欧洲和亚洲，苏联的安全得到保障，和平得以维持。”[10]此外，战后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体现出这份报告的主要思想。为了维持雅尔塔体系划定的大国势力范围，迈斯基还指出苏联不能为泛阿拉伯运动提供援助，以免同英国发生冲突或产生矛盾。[11]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中东事务局补充说：“苏联不应插手中东地区的阿犹冲突，以免影响‘俄国财产’的顺利解决。”[12]

然而，苏联政府在近东地区也不会坐以待毙，仍然尝试着进行小范围的势力渗透。二战后期，英美两国政府划分在近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加紧夺取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资源。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bian-American Oil Company）筹划建设一条横跨阿拉伯国家、连接波斯湾油田与西顿、黎巴嫩港口设施的石油管道。[13]1945年3月31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С.И.卡夫塔拉泽（С.И.Кавтарадзе）向莫洛托夫报告，英美的石油输送管道将会经过巴勒斯坦，建议苏联政府在巴勒斯坦设立领事馆，以便监视英美在阿拉伯地区的石油政策，还有为当地的“俄国财产”和苏联公民提供保障。[14]同年6月，苏联政府派出了以全苏东正教教会新牧首为首的代表团，让他们与巴勒斯坦当地的俄国东正教教会建立联系。[15]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也表示支持在阿拉伯地区展开反对西方强权的独立斗争。苏联方面的行动很快引起了英国情报人员的注意。为了阻止苏联势力进入巴勒斯坦，英国方面继续以法律问题为由拒绝与苏方讨论“俄国财产”问题。1948年5月14日，英国政府提前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英国驻军也迅速撤出这个地区。随后犹太自卫军占领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大部分领土，犹太领袖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成

立。新政府的成立为“俄国财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苏联与以色列开始进行交涉。

“俄国财产”问题对于苏联政府的中东政策有着特殊意义。冷战初期苏联政府在伊朗和土耳其的行动受到西方大国的阻挠。为了保障苏联南部边界的安全，苏联领导层决定把扩张的目标转移到近东地区。[16]而接管“俄国财产”自然成为苏联势力向近东地区渗透的一条捷径。[17]可是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苏以双方关于“俄国财产”问题的交涉被迫中断。苏联政府通过接管“俄国财产”来扩大自身影响的计划也破产了。笔者试图通过梳理苏以双方对“俄国财产”问题的交涉过程，探究该问题在苏以关系变化过程中的作用，以此分析苏联政府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第二节 冷战初期苏以双方在“俄国财产”问题上的互动

早在二战期间，苏联政府内部就提出了接管“俄国财产”并在巴勒斯坦扩大影响的主张。1943年，苏联人民委员部俄国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主任Г.Г.卡尔波夫（Г.Г.Карпов）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文件，建议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正式提出“收回”位于巴勒斯坦的东正教教会财产，以此增强俄国东正教教会在当地的影响力。[18]根据苏联方面调查所得，“俄国财产”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其他财产则分布在橄榄山（Mount of Olives）、雅法（Jaffa）和伯利恒（Bethlehem）等地，它们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价值。[19]苏联政府如果成功接管“俄国财产”，就能在近东地区建立多个据点，为自身势力的渗透和扩张打下基础。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进一步指出，苏联政府应通过外交、政治和文化措施扩大在巴勒斯坦的影响。[20]而“俄国财产”自然就成为苏联势力向近东渗透的突破口。二战结束后不久，苏联方面投票支持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将来处理（分治计划）问题的第181（二）号决议》，促成了犹太人在阿拉伯地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目标的实现。以色列建国之后，苏联政府迅速承认了新生的以色列政府。苏以两国政府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苏联外交人员前往特拉维夫设立大使馆，以色列方面也成立了对苏友好关系协会，还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在苏以双方友好交往的气氛中，关于“俄国财产”问题的交涉也随之被提上日程。

苏联政府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就着手进行准备交涉“俄国财产”问题。1948年5月，在苏联外交部的示意下，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驻耶路撒冷的领事帮忙保管位于巴勒斯坦的“俄国财产”的档案。这些档案被保存在英国-巴勒斯坦银行的耶路撒冷分部。[21]后来在苏以双方的交涉中，这些文件就成为“俄国财产”问题的基本依据。以色列方面也很重视“俄国财产”问题，其相关事务被委派给犹太代办处的伊扎克·拉宾诺维奇（Yitzhak Rabinovich）专门负责。拉宾诺维奇认为如果转移“俄国财产”的所有权，首先需要与原来的财产负责人取得联系。但是，这个任务不具备完成的现实条件，很多财产负责人在战争期间纷纷外逃。大部分人直到战后还留在外约旦控制区。当时以色列和外约旦双方处于敌对状态，重新与他们建立联系就要动用大量的资源。而苏联方面也不同意以色列政府去联系这些人，提议苏以双方绕开他们直接商谈财产问题。[22]为了争取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支持，以色列政府表示愿意配合苏联政府的工作。于是，苏以双方在该问题上顺利地

达成了共识，相关的具体工作也开始逐步展开。

财产登记资料显示，这些“俄国财产”分别属于：（1）沙俄政府；（2）俄国宗教使团（Рус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3）皇家正教巴勒斯坦协会（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Палести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4）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23]经过苏以双方的交涉，沙俄政府的财产被重新登记在苏联政府的名下，以色列方面也承诺将尽快移交这些财产。而俄国宗教使团已经名存实亡，其财产暂时由耶路撒冷当地的东正教教会代为保管。由于委托宗教机构来处理教会财产更为合适，苏联政府决定派出莫斯科正教会人员去负责洽谈。1948年9月10日，列昂尼德修士大司祭（архимандрит Леонид）被任命为莫斯科正教会代表团的团长[24]，并前往耶路撒冷拜访当地的东正教教会神职人员，劝说他们接受莫斯科正教会的领导。[25]在苏联驻以色列大使叶尔绍夫的协助下，莫斯科正教会代表团控制了耶路撒冷的东正教教会及其管理的财产。苏联方面实际控制了这些财产，但是未经以色列官方的认可。

纵观所有“俄国财产”，最重要的是位于耶路撒冷的“俄国区”[26]（Russian Compound）。“俄国区”主要包括圣三一大教堂、朝圣者住所、医院、领事馆和谢尔盖庄园，形成了一个风格独特的建筑群。[27]“俄国区”里面的建筑物保存完好，内部陈设非常精美。这些财产原本属于皇家正教巴勒斯坦协会和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所有。皇家正教巴勒斯坦协会是沙俄政府设立的一个研究机构，主要负责收集巴勒斯坦地区的情报，而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亲自担任该协会的主席。[28]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俄国区”的建筑物被用作政府机构的办事处，例如移民局和公共工程局。1948年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军队占领了耶路撒冷西部新区，随即也控制了城内的这些财产。[29]这部分财产属于社会机构和私人所有，苏以双方的意见存在很大分歧。以色列政府指出没有法律文件能证明苏联政府的继承权，而苏联政府则认为新成立的皇家正教巴勒斯坦协会本身就有权接管这些财产。双方对该问题的意见分歧很大，都不肯妥协。在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落入谁手犹未可知，遂为苏以双方稍后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分歧埋下伏笔。

综合整个处理情况来看，大部分“俄国财产”还没移交到苏联政府手里，仍然在以色列政府的控制之下。直至1949年年末，双方对财产问题

的交涉还没有取得实质进展。事实上，以色列方面答应移交财产不过是权宜之计，它根本不愿意把“俄国财产”交给苏联政府。以色列政府忌惮苏联势力的渗透，不想让苏联政府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据点，同时又想得到苏联政府的支持。以色列政府担心拒绝移交财产要求会得罪苏联领导层，使以色列在外交上失去一个强大靠山。除了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苏联政府还授意捷克斯洛伐克售卖武器给犹太人武装组织。苏联和东欧国家对这个新生国家的帮助是不可忽视的，这也让以色列政府意识到争取苏联支持的重要性。出于对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以色列政府不便直接拒绝苏联接管“俄国财产”的要求，遂利用所有权问题来推迟正式移交的时间。以色列政府牢牢控制住位于耶路撒冷的“俄国区”，占用主要建筑为政府办公大楼[30]，不承认莫斯科正教会代表团的财产所有权，不肯将沙俄政府的财产移交给苏联大使馆。[31]苏联驻以色列大使馆多次提出抗议，仍然得不到以方的正面回应。[32]经过双方对“俄国财产”问题的商谈，苏联政府意识到以色列方面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这让苏联领导层对以方心生嫌隙，为苏以双方的外交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俄国财产”问题的相关交涉陷入僵局之时，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在国际社会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苏以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矛盾重重，致使解决“俄国财产”问题的希望更加渺茫。这场争论扩大了苏以双方之间的分歧，而有关财产问题的交涉亦受到牵连。以色列政府向苏联方面移交“俄国财产”的工作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第三节 苏以双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分歧及其对财产问题的影响

1947年11月29日，在美苏等33国赞成，阿拉伯11国和古巴、希腊13国反对，英国等10国弃权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第181（二）号决议》。该决议规定耶路撒冷市应建立为一个在特殊国际政权下的独立主体，并由联合国管理。[33]为了让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得以通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接受了耶路撒冷国际化的规定。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摩西·夏里特说道："如果把圣城国际化这一条从分治决议中删去，该决议就无法获得必要的多数支持……"[34]当时犹太领导人被迫接受了这个规定，视之为建国的代价，其实他们从未放弃在耶路撒冷建都的梦想。[35]摩西·夏里特慨叹道："犹太人希望耶路撒冷成为犹太人的，阿拉伯人希望耶路撒冷属于阿拉伯各国的，而世界想让耶路撒冷实现国际化。"[36]

1948年5月14日，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成立。数小时后，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发动了对以色列的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正式爆发。[37]战争期间，耶路撒冷城被以色列和外约旦分区占领，以色列军队占据耶路撒冷西部，而外约旦军队夺取了东部。[38]双方都认为自己有权占领这座"圣城"，不愿意让耶路撒冷接受国际共管，反对联合国大会实行第181（二）号决议的相关规定。联合国调解专员伯纳多特提出由联合国来管理耶路撒冷，遭到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代表的强烈反对。同年11月20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强调第181（二）号分治决议是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唯一方法。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摩西·夏里特高兴地说："苏联代表们在安理会上表现出他们不仅是我们的盟友，还是我们的使者。"[39]这次战争取得的成果大大助长了以色列领导人的扩张野心。在以色列政府看来，联合国对耶路撒冷的动荡局势毫无对策，更无法约束阿犹双方的争夺，所谓联合国大会第181（二）号决议的相关规定只是一纸空文。因此以色列政府提出与外约旦政府谈判，企图在抛开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的情况下商量如何瓜分耶路撒冷。[40]岂料该消息一经传出就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和外约旦双方的谴责。联合国也被迫开会重新讨论"耶路撒冷问题"：这座城市接受国际共管还是由以色列和外约旦两国政府分治。[41]

1949年6月，以色列政府提出了一个用来取代联合国大会第181（二）号决议的新方案：以色列和外约旦双方分区占领耶路撒冷，并将基督教圣地交由联合国管理，以保证外国人能够自由出入。[42]这个新方案起初得到了英美两国代表的认同。英美两国本来就反对实行联合国大会第181（二）号决议，因为它们担心耶路撒冷接受国际共管之后，苏联势力会趁机渗透近东地区。有了英美两国政府的支持，这个新方案被提交到联合国讨论。[43]然而，外约旦政府立即对以色列的新方案提出了抗议。基督教圣地大部分位于外约旦军队占领的老城，以色列的新方案实施之后，外约旦政府将被迫交出部分占领区。[44]鉴于新方案无法协调以色列和外约旦双方的利益，英美也不想继续支持以色列方案，因此它并没有进入联合国大会的投票阶段。此时以色列政府可谓孤立无援，既不能与外约旦达成共识，又失去了英美对以方的支持。为了阻止耶路撒冷接受国际共管，以色列政府被迫向苏联政府求助。

如果苏联政府放弃支持第181（二）号决议的立场，那么就降低了联合国对耶路撒冷进行国际共管的可能性。[45]而以色列政府认为这是有可能达成的目标。以往苏联政府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伸出了援手，例如支持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赞成以色列进入联合国。如今再让苏联方面出手帮忙，以色列政府还多了几分底气。因为以色列政府控制着耶路撒冷西部的“俄国财产”，苏联政府很可能为了获得财产决定支持它正式占领“圣城”。以色列驻苏联大使馆顾问阿里耶·列瓦维（Arieh Levavi）在交给以色列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了“俄国财产”问题对于苏以关系的特殊意义。他认为位于耶路撒冷的宗教财产很重要，对苏联政府而言不是小问题。[46]于是，以色列政府向苏方求助时，提醒苏联政府考虑耶路撒冷问题对“俄国财产”问题的影响。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摩西·夏里特对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查拉普金说：“若联合国按照第181（二）号决议来执行，耶路撒冷名义上是接受国际管理，其实就是处于英美的控制之下，到时苏联政府就无法插手耶路撒冷的事务，更不可能接管当地的‘俄国财产’。”[47]对此，苏联代表没有做出什么回应。苏联政府的立场似乎还没确定下来。

以色列的新方案破产后，“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48]（Palestine Conciliation Commission，PCC）也制定了其他方案，可是那些方案都不具备实行的条件。[49]在联合国大会正式召开之际，由澳大利亚提交的一份提案进入了投票环节。1949年12月9日，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以38票赞成、14票反对、7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决

议》，即第303（四）号决议。该决议以澳大利亚提案为基础，重申了1947年第181（二）号决议的原则，规定耶路撒冷成为一个接受国际共管的城市。[50]美国代表反对通过这个决议，认为其不符合现实条件。[51]最终，这个提案在苏联和东欧国家、阿拉伯各国（除了外约旦）以及大部分拉美国家的支持下被宣布通过。[52]以色列政府不满意联合国大会投票结果，遂决定直接迁都耶路撒冷。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发表声明说："我们宣布以色列从不自愿放弃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从不放弃信仰那些经历了数千年的民族意识、人民团结精神以及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和锡安山的权利……我们不能把1947年的联合国大会决议视为有约束力的规定，因为联合国未能成功地执行这些规定……"[53]以色列政府加快了占领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步伐。1949年12月11日，以色列内阁宣布耶路撒冷为其政府所在地，即以色列的首都。同月20日，以色列政府机构开始转移到西耶路撒冷。[54]

针对苏联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的表决，以色列方面立即做出反应。[55]以色列政府决定停止有关"俄国财产"问题的洽谈，苏联政府之前为此所做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苏联不肯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提供帮助，以色列政府就直接与苏方撕破了脸，取消了双方关于"俄国财产"问题的交涉。那为什么苏联政府仍然要支持耶路撒冷接受国际共管呢？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查拉普金在联合国大会上说："联合国两年来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过程，很清晰地表明前管理国英国并没有放弃控制巴勒斯坦的意思，它企图用另一种方式建立对该地的控制。"[56]苏联代表也对以色列方面说："支持耶路撒冷接受国际共管是符合苏联政府一贯的政策路线，其目的在于削弱外约旦和英国在近东的力量，从而打击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野心。"[57]这两段话的意思基本上是一致的：苏联政府试图阻止英美扩大在近东地区的力量。然而，与其说苏联代表在解释投赞成票的原因，不如说他趁机抨击英美干涉近东事务。所以苏联政府赞成耶路撒冷接受国际共管或许另有因由，例如"俄国财产"问题。

以色列政府在财产移交问题上多次推搪，使苏联政府重新考虑有关"俄国财产"问题的交涉事务。以色列方面占用了这些财产，以此逼迫苏联政府改变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立场。至此，以色列政府俨然成为苏联政府接管财产的主要障碍。摆脱财产问题对自身的掣肘，就成了苏联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联合国大会通过重申1947年第181（二）号决议的提案，规定耶路撒冷处于国际共管之下，那么苏联政府至少能参与耶路撒冷的管理事务，其中就包括处理"俄国财产"问

题。尽管英美极力阻止苏联插手近东事务，但很难完全排除苏联力量的影响，到时苏联政府也会制定出新的应对措施。所以，苏联政府在1949年12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支持耶路撒冷接受国际共管，意在扭转“俄国财产”问题交涉时遭遇的困境，为日后解决该问题争取更加有利的条件。

到了1950年4月，苏联政府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立场又有了新变化。这件事情要从1950年的3月开始说起。1950年3月16日，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向斯大林提出建议，主张苏联不再插手与耶路撒冷相关问题的讨论。到了4月17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Я.А.马立克（Я.А.Малик）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声明，正式宣布苏联方面不再支持实现“耶路撒冷国际化”计划。该文件指出，鉴于194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决议难以实行，“苏联当局认为继续坚持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是不可能的，并相信联合国能够想出让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能接受的方法来解决该问题”[58]。苏方突然改变立场的决定令各国代表感到愕然。[59]刚开始以色列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以色列方面准备设宴招待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但苏联外交部下令禁止苏联代表赴宴，以免引起国际社会的误解。[60]显然，苏联政府并没有打算支持以方的耶路撒冷政策。那么，苏联政府为何不再参与讨论耶路撒冷问题呢？这也许和苏联政府对美国近东政策的评估有很大关联。

美国政府在近东地区的政策转变引起了苏联方面的关注，而这种变化最先体现在耶路撒冷问题上面。起初，杜鲁门政府对耶路撒冷问题的相关讨论表现冷淡，倾向于阻止以色列对外约旦采取猛烈攻势。当以色列和外约旦准备私下谈判时，美国政府开始积极把控耶路撒冷问题的走向。美国方面为了掌控耶路撒冷问题，要求必须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调解。[61]可是以色列和外约旦双方仍然互不相让，令杜鲁门政府无计可施。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讨论，耶路撒冷问题仍未得到解决。[62]与此同时，美国在近东地区的行动也让苏联政府感到巨大的威胁。苏联驻黎巴嫩与叙利亚公使索罗德在工作报告里指出：“自1950年1月以来，英美两国在近东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虽然美国方面尝试掩饰这一矛盾，但英国在阿拉伯地区的行动仍经常受制于美方的力量。”[63]据此，索罗德认为：“美国人正在公开地把英国人赶出去，起初在沙特阿拉伯、希腊、土耳其和伊朗，接着在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后将会到伊拉克和约旦，直至美国完全控制整个近东。美国的计划给我们带来了直接的安全威胁，近东地区将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最后就会把矛头指向苏

联。”[64]总之，美国政府加快了增强自身影响力的步伐，有意将整个近东变成反苏反共的桥头堡，筑起一道抵挡苏联势力扩张的坚固防线，而此举将会对苏联南部领土的安全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正值冷战两大阵营对峙之际，美苏双方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任何政策变动都有可能触动对方的敏感神经。长期以来，耶路撒冷一直被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视为“圣城”，在近东各国民众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因此，美国政府参与调解耶路撒冷问题有助于提升自身的政治声望，为美国日后逐步控制近东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美国方面的政策得以顺利实行，近东各国就会沦为美国遏制苏联扩张的武器。与此同时，以色列、叙利亚和埃及也请求苏联方面提供援助，帮助它们抵挡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65]为此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都极力营造出一种兵临城下的紧迫感，似乎“以色列政府无法保护自己，阿拉伯联盟内部分崩离析”[66]，它们随时都会沦为美国政府的傀儡。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苏联领导人必须进行相应的部署。于是，苏联政府将在近东的战略重点从“进攻”调整为“防守”[67]，旨在阻挠美国达成控制整个近东地区的目的。而苏联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立场也随之改变。一方面，苏联政府宣布不再支持联合国监督耶路撒冷接受国际共管，以防美国人趁机利用联合国把持近东事务；另一方面，苏联政府不想理会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求助，也不赞同以色列政府建都耶路撒冷的决定。

此时东亚地区的局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苏联政府密切关注着朝鲜半岛的情况，无暇顾及近东地区的情况，更不想介入耶路撒冷问题。后来，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获得联合国合法席位，苏联代表宣布退出安理会和其他接纳国民党代表的联合国机构。[68]因此，相关耶路撒冷问题的讨论也就完全没有苏联代表的参与了。[69]“俄国财产”问题自然也没有进展，苏以双方失去了协商解决该问题的基础。由此可见，“俄国财产”的战略价值在于加快苏联政府在近东地区建立据点的步伐，从而迅速实现渗透计划。当苏联在近东的主要目标变成阻止美国势力的扩张，接管“俄国财产”的计划就可以暂缓进行。

第四节 苏联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苏联政府不支持以色列占据耶路撒冷，这是苏以双方关系出现微妙变化的一个信号。从耶路撒冷问题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决定改变支持以色列政府的一贯立场，开始对以色列实行新的外交政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影响因素是方方面面的。

首先，“俄国财产”问题令苏以双方出现龃龉，使苏联政府考虑改变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

战后初期，阿拉伯各国政府普遍奉行“亲英”或“亲美”的外交路线，于是一个由犹太人建立的新生国家便成为苏联势力向近东渗透的突破口。以色列国的成立严重激化了阿犹双方的矛盾，导致近东地区陷入频繁的战争之中，迫使西方大国不得不耗费精力去调解地区冲突，最终必然会间接地缓解苏联政府在欧洲的压力。[70]为此，苏联政府在1947年极力促成犹太人独立建国一事。等到犹太人建国之后，苏联政府对以色列政府实行友好政策，具体表现为迅速承认以色列政府、帮助以色列军队购买武器、支持以色列进入联合国等。可是，苏联的这些帮助渐渐无法满足以色列方面的需求了。对于以色列政府来说，大规模的领土扩张是其巩固政权的重要途径。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政府趁机进行对外扩张，占领了包括部分耶路撒冷在内的不少土地。而“俄国财产”作为其“战利品”之一，自然让以色列政府难以割舍。所以，面对苏方接管“俄国财产”的要求，以色列方面只好虚与委蛇。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政府也了解到苏联方面有意借此实行渗透计划，而为了阻止苏联势力的渗透，以色列政府绝不会任由“俄国财产”落入苏联政府之手。

于是以色列方面强行占有位于“俄国区”的财产，还阻止苏联方面开展接管财产的工作。这种不合作态度令苏联政府非常反感，而以色列政府的反苏倾向也愈发明显。[71]以色列国内的媒体大肆抨击苏联领导人的外交决策，包括苏联方面对耶路撒冷问题的处理。[72]由此可见，当以色列强占“俄国财产”并肆意攻击苏联政府时，它在苏联近东政策中的地位就大大下降了。莫洛托夫多年后回忆说：“如果苏联政府决定拉拢以色列，就要承担进入一个陌生环境的风险。”[73]以色列在地理上距离苏联的领土太过遥远，又无法充当苏联势力进入近东地区的跳板，这些都促使苏联政府抛弃了对以色列政府的友好政策。

其次，随着美以双方的联系不断频繁，苏联政府对以色列政府的“中立”外交政策产生疑虑，并促使苏联方面考虑改变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

建国初期，以色列政府声称要实行“中立”的外交政策，力图在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然而，这种“骑墙派”的态度是相当不可靠的，苏联政府始终在提防以色列政府突然宣布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从1949年年中开始，苏联驻以色列大使在提交给莫斯科方面的报告中反复强调，以色列政府内部存在强烈的亲美倾向，希望苏联方面做好应对措施。[74]这准确地概括出以色列政府的外交取向。在以色列政府的外交政策中，维持以美友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目标。[75]以色列建国初期，大批移民的涌入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局势也随之变得更加动荡。若不能及时获得境外援助，以色列将难以渡过这个难关。美国犹太财团积极地提供了物资与金钱，为以色列政府解决燃眉之急。外国资本的引进也让美国方面得以掌握以色列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维系以美双方的密切联系是关乎以色列生死存亡的问题，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就是其必然选择。在以色列政府内部也有很多亲美分子，其中总理本-古里安的表现尤为积极。他多次亲自飞往华盛顿，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希望美以双方建立经济与军事合作关系。[76]

随着以美双方的合作日益加深，以色列政府逐渐变成苏联政府要提防的对象。1950年3月25日，苏联国内的《文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特拉维夫的追随者》的政论，这篇文章辛辣地嘲讽以色列政府打着“中立外交”的幌子，追随美国反苏反共政策的步伐。[77]此时的以色列政府开始阻止国内对苏友好关系协会展开宣传工作[78]，严格限制苏联文学作品进入以色列国内，同时却大力鼓励美国商品的进口和美国宣传品的传播。[79]这证明以色列政府走上了“亲美敌苏”的道路，以色列将成为美国在近东的忠实盟友，帮助推动美国近东政策的顺利实施。以色列政府渐渐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苏联政府若支持以色列政府占领耶路撒冷，就很可能将这座城市送到美国人的手中。所以，苏联政府不会支持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政策，以免落得“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下场。

最后，苏联国内的“反世界主义”运动及其犹太政策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彼时，苏联国内正在进行“反世界主义”运动，该运动起源于苏联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政治批判行动。1946年8月9日，苏联政府开始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展开大批判。[80]在苏联最高

领导层的推动下，这场运动迅速扩大为一场残酷的大清洗，随后在1948年进入了政治斗争的高潮期。苏联犹太人在政府文化部门担任了大部分的要职，自然也就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受害者。[81]苏联政府发动的“反世界主义”运动在以色列国内遭到猛烈的抨击，以色列政府要求苏联政府批准苏联国内犹太人移居以色列。[82]苏联政府对以色列政府回答说，苏联国内不存在所谓“犹太问题”，也没发现任何犹太公民有移居以色列的需要。[83]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指出，犹太人在苏联拥有与其他公民一样的平等权利，苏联的国家建设也需要苏联公民的积极参与。让苏联人民移居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去，这也不符合苏联国家的基本原则。[84]以色列驻苏联大使馆也在加强与苏联国内犹太人的联系。[85]苏联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苏联犹太人当中的传播保持着警惕的态度。苏联方面下令监视以色列驻苏联大使馆人员的日常生活，阻止他们与苏联国内犹太人进行私下接触。[86]而以色列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以色列驻苏联大使馆向苏联犹太人派发宣传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材料[87]，以色列国内媒体大肆攻讦苏联政府迫害苏联国内犹太人的行为[88]，就连以色列政府内部的“亲苏派”人员也遭受打压。[89]这些进一步激化了苏以之间存在的矛盾，加快了苏联政府改变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步伐。

总而言之，在这些综合因素的推动下，苏联政府调整了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从此苏联方面已不愿意继续为以色列政府提供外交上的帮助了。这种转变不但加速了苏以双方关系的恶化，还反过来加强了苏联政府原先的猜想：以色列政府正在走上一条“亲美敌苏”的道路。1950年3月10日，苏联驻以色列大使向苏联外交部报告说：“以色列政府拒绝配合苏方人员移交‘俄国财产’，这正是以色列政府敌视苏联政府的表现之一。”[90]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摩西·夏里特提出访问莫斯科，却迟迟得不到苏联方面的回应。[91]

事实上，随着冷战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以色列政府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亦步亦趋，明显地倒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1951年10月，英、法、美、土耳其四国政府联合发表关于组建“中东司令部”的宣言，宣称中东各国需要团结对抗外部力量的威胁。[92]以色列政府向莫斯科方面表示不会加入任何针对苏联的军事集团[93]，背后却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协议。[94]以色列方面的这些举动都被苏联领导人看在眼里，以色列政府的外交路线已经选择了与苏联敌对的阵营。于是，当以色列政府宣布耶路撒冷为新首都并要求各国大使馆迁

往耶路撒冷之时，苏联驻以色列大使馆决定按兵不动、静观其变。[95]至此，苏以双方的对立局面已经形成了。

第五节 “俄国财产”问题的最终解决

“俄国财产”曾经被誉为“俄国在圣地的事业”（русское дело на святой земле），其体现的是沙俄政府渴望建立“第三罗马”的梦想。[96]而这种梦想的产物到了冷战时期却焕发出新的“光彩”，成为苏联政府近东战略的一部分。当苏联政府有意重返近东之时，“收回”这些“俄国财产”就被视为最便捷的途径。

苏联政府拒绝支持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政策之后，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了与苏联关于“俄国财产”问题的交涉。在小国与大国的交往中，小国有时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赢得主动，可是谈到国家的对外政策，占据主动位置的往往还是大国。以色列在“俄国财产”问题与耶路撒冷问题上都是赢家，却失去了苏联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以色列政府反复阻挠苏方接管“俄国财产”的计划，苏联政府对以色列政府的态度也自然发生了变化。归根究底，苏联政府关注的不是以色列的利益，而是美国政府的近东政策及其对苏联国家安全的影响。美国政府对耶路撒冷问题变得热切起来，苏联方面感受到巨大的安全威胁，并迅速做出了防守的部署。其实美国政府当时还没有在近东站稳脚跟，还要借助英国的力量来加强自己的影响，因此美国政府对近东事务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想利用联合国来操控“耶路撒冷之争”的走向。然而，美国政府到底还是低估了耶路撒冷问题的棘手程度。这场争论不仅是一场世俗的政治谈判，更是关于宗教权益的谈判。[97]耶路撒冷作为世界三大—神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圣城”，其地位问题自然受到众多国家及其民众的高度关注，这场争论波及的地理范围远远超出了近东地区。当美以双方关系变得愈加密切之时，美国政府亦逐步陷入近东冲突之中，再也难以轻易地抽身而出。而苏联政府为了破坏美国政府控制近东的计划，决定不再参与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讨论，极力塑造一种尊重近东人民自决权的形象，同时也在等待重返近东的有利时机。

冷战初期苏联政府的近东政策还不稳定，因此其外交政策的变动相当频繁，处处充满了不确定性。除了与以色列政府的外交关系之外，苏联政府也一直关注着阿拉伯各国反抗西方大国的独立运动。从苏联外交部收集到的情报来看，阿拉伯各国政治动荡，相互争斗，缺乏足以抵抗英美的实力。大部分阿拉伯国家还处于英美的控制之下，其余的在外交上也是极不可靠。叙利亚方面常常与苏联政府保持联系，可是叙利亚政

府不够强势，难以维持国内局势的安定。埃及和外约旦都想领导阿拉伯统一运动，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按照当时的近东局势来看，苏联政府进行大规模渗透的时机尚未到来，所以苏联政府的最佳策略就是转攻为守、以静制动，一方面不参与调解阿以双方的争端，另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批判英美两国政府。

受到苏联国内犹太政策的影响，苏以双方关系进入了迅速恶化的阶段。随后发生的斯兰斯基案件和“医生间谍案”使国际社会哗然，一时间苏联国内犹太人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以色列国内的犹太民众情绪激动，甚至有人跑到苏联大使馆去扔炸弹。这次爆炸案件成为激化苏以两国政府之间重重矛盾的导火索，以色列政府声称找不到扔炸弹的暴徒，而苏联政府也立即宣布苏以双方断交。[98]直到赫鲁晓夫时期，苏以两国政府才恢复了外交关系，但是双方关系早已不复往昔。而“俄国财产”问题到了1964年才有所进展。苏以双方签订了关于出售“俄国财产”的协约，苏联政府把大部分“俄国财产”卖给以色列政府，而以色列方面则以柑橘来支付这笔费用，所以该协约也被人们称为“柑橘协定”。在这份协约的基础上，以色列政府接受了苏联政府“收回”少量财产的要求，包括东正教传教团的大楼、圣三一大教堂和谢尔盖庄园等。[99]但相关的移交工作拖延了很久，甚至到苏联解体时还没完成。2008年12月，俄罗斯联邦政府正式接管谢尔盖庄园，苏以双方关于“俄国财产”问题的谈判终于画上句号。

从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时期开始，苏联政府要求接管“俄国财产”的尝试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牵涉到许多复杂的政治问题。其间，苏方接管“俄国财产”的要求被迫让位于苏联政府在国际政治上的核心利益。近东地区的地理位置距离苏联国土太过遥远，以致苏联政府对当地问题的处理能力有限，这就要求苏联领导层及时根据地区局势和国际局势进行政策调整。由于苏联政府对近东政策做出了调整，“俄国财产”问题就只能留待日后解决。国际政治问题不总是关于前进和攻击，适当时候也需要后退和等待，而且当选择后退与等待的时候，对原本设定的目标也要进行相应修改，学会后退与懂得进攻无疑是同样重要的。而研究有关“俄国财产”问题交涉的意义则在于更全面地认识苏联政府在冷战时期实行的政策，更客观地评价这些政策的效果与意义。

[1] Dov Yaroshevski，“Beyond the ‘Russian Property’ Discourse，1917-1953，” *Journal of Israel History*：*Politics*，*Society*，*Culture*，Vol.22，No.1，2003，p.57；文

庸、乐峰、王继武主编《基督教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第128页；邵丽英：《俄国在耶路撒冷财产的起源、变迁及影响》，《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

[2] АВП РФ.Ф.012.Оп.6.П.81.Д.177.Л.1-6.//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1.С.131-134；Uri Bialer，*Cross on the Star of David*：*The Christian World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1948-1967*，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6，pp.147-149.

[3] ［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哈全安、刘志华译，东方出版中心，2015，第221页。

[4] ［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哈全安、刘志华译，第221页。

[5] 邵丽英：《俄国在耶路撒冷财产的起源、变迁及影响》，《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

[6] Dov Yaroshevski，"Beyond the 'Russian Property' Discourse，1917-53，" *Journal of Israel History*：*Politics*，*Society*，*Culture*，Vol.22，No.1，2003，p.57.

[7] Dov Yaroshevski，"Beyond the 'Russian Property' Discourse，1917-53，" *Journal of Israel History*：*Politics*，*Society*，*Culture*，Vol.22，No.1，2003，p.59.

[8] Dov Yaroshevski，"Beyond the 'Russian Property' Discourse，1917-53，" *Journal of Israel History*：*Politics*，*Society*，*Culture*，Vol.22，No.1，2003，p.59.

[9] Dov Yaroshevski，"Beyond the 'Russian Property' Discourse，1917-53，" *Journal of Israel History*：*Politics*，*Society*，*Culture*，Vol.22，No.1，2003，p.59.

[10] 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

[11] 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

[12] АВП РФ.Ф.0118.Оп.7.П.4.Д.5.Л.26-28.//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1.С.108-110.

[13] 谢华：《冷战的新边疆：美国第四点计划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174页。

[14] АВП РФ.Ф.0118.Оп.8.П.4.Д.2.Л.9-10.//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1.С.112-113.

[15] АВП РФ.Ф.089.Оп.1.П.2.Д.12.Л.3-4.//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1.С.331-332.

[16]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Washington：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No.46，2005，p.35.

[17] Uri Bialer，*Cross on the Star of David*：*The Christian World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1948-1967*，p.159.

[18] ГА РФ.Ф.6991.Оп.1.Д.29.Л.101-109.

[19] АВП РФ.Ф.012.Оп.6.Д.81.Л.1-6.//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 1941-1953гг.Т.1.С.131-134.

[20] АП РФ.Ф.3.Оп.63.Д.237.Д.52-93.

[21] AVP RF，F.0118，OP.2，P.3，D.11，L.168，*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282.

[22] 这些财产负责人中间存在一些反苏分子，他们不愿意把教会财产交给苏联政府。

[23] Uri Bialer，*Cross on the Star of David*：*The Christian World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1948-1967*，p.153.

[24] АВП РФ.Ф.089.Оп.1.П.2.Д.20.Л.74.//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 док.1941-1953гг.Т.1.С.405-406.

[25] АВП РФ.Ф.089.Оп.1.П.2.Д.12.Л.34-35.//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1.С.445-446.

[26] 现今耶路撒冷市的市政厅、法院和警察局都位于“俄国区”。

[27] “Jerusalem Architectural History：The late Ottoman Period（1850-1917），” Jewish Virtual Library，May 22，2020，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erusalem-architecture-in-the-late-ottoman-period.

[28] Derek Hopwood，*Russian Presence in Syria and Palestine 1843-1914*：*Church and Politics in the Near East*，Oxford：Clarendon Press，1969，p.104.

[29] Dov Yaroshevski，“Beyond the ‘Russian Property’ Discourse，1917-53，” *Journal of Israel History*：*Politics*，*Society*，*Culture*，Vol.22，No.1，2003，p.59.

[30] АВП РФ.Ф.059.Оп.24.П.52.Д.322.Л.141-145.//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445-446.

[31] ISA 130.11/2501/18，*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9-1953*（*DISR*），Part 2，pp.668-670.

[32] ISA 130.11/2501/18，*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9-1953*（*DISR*），Part 2，pp.668-670.

[33] *Israel's Foreign Relations Selected Documents 1947-1974*，pp.92-110.

[34] Z.Sharef，Three Days，London：W.H.Allen，1962，pp.111-112，转引自Michael Brecher，"Jerusalem：Israel's Political Decision，1947-1977，" *Middle East Journal*，Vol.32，No.1，1978，p.15。

[35] 1947年11月29日通过的《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第181（二）号决议》的规定包括阿以双方分治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国际化方案。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为了实现建立犹太国的理想，只能被迫接受耶路撒冷国际化方案。

[36] 内阁会议备忘录，1949年2月23日，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所藏，转引自Peter L.Hahn，"Alignment by Coincidence：Israel，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Partition of Jerusalem，1949-1953，"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21，No.1，1999，p.667。

[37] 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第282页。

[38] 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第284页。

[39] ISA J 1/3445，*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Part I，pp.390-391.

[40] Gadi Heimann，"Divide and Rule：Israel's Tactics Regarding the Jerusalem Question and America's Response，1949-1950，" *Cold War History*，Vol.17，No.1，2017，pp.21-38.

[41] Gadi Heimann，"Divide and Rule：Israel's Tactics Regarding the Jerusalem Question and America's Response，1949-1950，" *Cold War History*，Vol.17，No.1，2017，pp.21-38.

[42] Gadi Heimann，"Divide and Rule：Israel's Tactics Regarding the Jerusalem Question and America's Response，1949-1950，" *Cold War History*，Vol.17，No.1，2017，pp.21-38.

[43] Gadi Heimann，"Divide and Rule：Israel's Tactics Regarding the Jerusalem Question and America's Response，1949-1950，" *Cold War History*，Vol.17，No.1，2017，pp.21-38.

[44] Gadi Heimann，"Divide and Rule：Israel's Tactics Regarding the Jerusalem Question and America's Response，1949-1950，" *Cold War History*，Vol.17，No.1，2017，pp.21-38.

[45] АВП РФ.Ф.022.Оп.2а.П.12.Д.4.Л.103-104.//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71-73.

[46] ISA 130.11/2514/15，*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9-1953（*DISR*），Part 2，p.485.

[47] ISA 93.01/2202/5，*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9-1953*（*DISR*），Part 2，p.556.

[48] 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又称为“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The United Nations Conciliation Commission for Palestine，UNCCP）于1948年12月11日根据联合国第194号决议成立，旨在调解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之间的冲突。

[49] Peter L.Haln，“Alignment by Coincidence：Israel，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Partition of Jerusalem，1949-1953，”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21，No.3，1999，p.674.

[50] 参考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第284页。

[51] Peter L.Haln，“Alignment by Coincidence：Israel，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Partition of Jerusalem，1949-1953，”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21，No.3，1999，p.674.

[52] Michael Brecher，“Jerusalem：Israel’s Political Decisions，1947-1977，” *Middle East Journal*，Vol.32，No.1，1978，p.18.

[53] Divrei Ha-knesset，iii，p.221，转引自Michael Brecher，“Jerusalem：Israel’s Political Decision，1947-1977，” *Middle East Journal*，Vol.32，No.1，1978，p.19。

[54] Michael Brecher，“Jerusalem：Israel’s Political Decision，1947-1977，” *Middle East Journal*，Vol.32，No.1，1978，p.20.

[55] Gadi Heimann，“Divide and Rule：Israel’s Tactics Regarding the Jerusalem Question and America’s Response，1949-1950，” *Cold War History*，Vol.17，No.1，2017，pp.21-38.

[56]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203页。

[57] ISA 130.02/2443/5，*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9-1953*（*DISR*），Part 2，p.576.

[58] АВП РФ.Ф.059.Оп.24.П.27.Д.154.Л.68-69.//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158-159.

[59] АВП РФ.Ф.059а.Оп.7.П.13.Д.4.Л.1-3.//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В 2 т.Отв. ред.В.В. Наумкин.С.124-125.

[60] АВП РФ.Ф.059.Оп.24.П.27.Д.154.Л.76.//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179.

[61] Gadi Heimann，“Divide and Rule：Israel’s Tactics Regarding the Jerusalem Question and America’s Response，1949-1950，” *Cold War History*，Vol.17，No.1，2017，pp.21-38.

[62] Gadi Heimann，“Divide and Rule：Israel’s Tactics Regarding the Jerusalem Question and America’s Response，1949-1950，” *Cold War History*，Vol.17，No.1，2017，pp.21-38.

[63] АВП РФ.Ф.0106.Оп.9.П.12.Д.1.Л.1，12.//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В 2 т.Отв. ред.В.В. Наумкин.Т.1.С.114.

[64] АВП РФ.Ф.0106.Оп.9.П.12.Д.1.Л.1，12.//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В 2 т.Отв. ред.В.В. Наумкин.Т.1.С.114.

[65] АВП РФ.Ф.059.Оп.24.П.52.Д.332.Л.62-65.//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В 2 т.Отв. ред.В.В. Наумкин.Т.1.С.111-113，114-116.

[66] АВП РФ.Ф.087.Оп.13.П.22.Д.7.Л.30-35.//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В 2 т.Отв. ред.В.В. Наумкин.Т.1.С.116.

[67] 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136页。

[68] ISA 93.03/84/21，*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9-1953*（*DISR*），Part 2，pp.676-677.

[69] 1950年12月14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468号决议，宣布取消为在耶路撒冷确立持久国际制度的拨款。参见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第285页；以及Michael Brecher，“Jerusalem：Israel’s Political Decisions，1947-1977，” *Middle East Journal*，Vol.32，No.1，1978，pp.13-34；Gadi Heimann，“Divide and Rule：Israel’s Tactics Regarding the Jerusalem Question and America’s Response，1949-1950，” *Cold War History*，Vol.17，No.1，2017，pp.21-38。

[70] ISA 130.02/2403/16，*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9-1953*（*DISR*），Part 2，pp.731-733.

[71] АВП РФ.Ф.089.Оп.3.П.6.Д.8.Л.211-226，262-264.//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140.

[72] АВП РФ.Ф.089.Оп.2.П.3.Д.13.Л.7.//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 1941-1953гг.Т.2.С.99-100.

[73]〔俄〕菲利克斯·丘耶夫：《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菲·

丘耶夫日记摘编）》，刘存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第84～85页。

[74] АВП РФ.Ф.089.Оп.2.П.3.Д.10.Л.6，8-13.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140；АВП РФ.Ф.089.Оп.3.П.6. Д.8.Л.211-226，262-264.//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47-51，140.

[75] АВП РФ.Ф.089.Оп.3.П.6.Д.8.Л.211-226，262-264.//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140.

[76] Avi Shlaim，“Israel between East and West，1948-195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36，No.4，2004，pp.657-673.

[77] Прудков. “Гель-авивский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 Ачесо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5 март 1950.

[78] АВП РФ.Ф.089.Оп.3.П.6.Д.8.Л.211-226，262-264.//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140.

[79] АВП РФ.Ф.089.Оп.3.П.8.Д.1.Л.1，5-7.//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164.

[80] 〔俄〕Е.Ш.祖布科娃：《1945-1964年的社会与改革》，转引自马龙闪《苏联战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清洗运动》，《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

[81] 〔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下册，何宏江等译，第966页。

[82] ISA 130.11/2514/1，*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9-1953*（*DISR*），Part 2，pp.598-600.

[83] ISA 130.09/2325/3，*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9-1953*（*DISR*），Part 2，p.673.

[84] АВП РФ.Ф.059.Оп.24.П.27.Д.154.Л.5-6.//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119.

[85] ISA 130.02/2382/29，*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9-1953*（*DISR*），Part 2，p.581.

[86] ISA 130.02/2384/15，*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9-1953*（*DISR*），Part 2，pp.651-652.

[87] АВП РФ.Ф.089.Оп.3.П.8.Д.1.Л.1，5-7.//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163.

[88] АВП РФ.Ф.059.Оп.24.П.52.Д.332.Л.141-145.//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161.

[89] АВП РФ.Ф.089.Оп.2.П.4.Д.29.Л.218-221.//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112.

[90] АВП РФ.Ф.089.Оп.3.П.6.Д.8.Л.211-226，262-264.//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140.

[91] АВП РФ.Ф.059.Оп.24.П.52.Д.332.Л.199-200.//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188.

[92] 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136页。

[93] Note *Verbale*from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USSR，8 December 1951，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1941-1953，Part2：May 1949-1953，p.757.

[94] АВП РФ.Ф.059.Оп.26.П.58.Д.362.Л.81-84.//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309-311.

[95] АВП РФ.Ф.059.Оп.28.П.57.Д.346.Л.36-37.//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358-359.

[96] Dov Yaroshevski，“Beyond the ‘Russian Property’ Discourse，1917-53，” *Journal of Israel History*：*Politics*，*Society*，*Culture*，Vol.22，No.1，2003，p.59.

[97] 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第300页。

[98] 1953年2月9日特拉维夫当地时间22时35分，一颗巨大的炸弹在苏联驻以色列大使馆范围内爆炸。大使馆建筑本身遭受严重损毁，苏联驻以色列大使的夫人、总务长的夫人与司机受重伤被送院治疗。参见АВП РФ.Ф.059.Оп.30.П.53.Д.311. Л.45-46.//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421-422。

[99] Uri Bialer，*Cross on the Star of David*：*The Christian World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1948-1967*，pp.161-164.

第五章 二战后苏联国内的反犹政策与苏以断交

第一节 苏联犹太人民族意识的觉醒

二战后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建国的政策在外交上无疑是成功的，但是斯大林未能料到苏联的亲犹太复国主义政策会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它极大地激发了苏联犹太人沉睡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苏联犹太人误以为政府已经改变了多年以来对国内犹太复国主义的镇压政策，当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正式成立之后，苏联犹太人和全世界犹太人一样欢呼雀跃，欣喜若狂。

作为苏联国内唯一的官方犹太人组织，“犹委会”自然就成了国内犹太同胞倾诉的主要对象。犹太大学生、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以个人和集体名义发出的信件、电报和询问不断涌向“犹委会”、《团结报》编辑部以及其他一些组织。其中参与人员有莫斯科某些高等院校（法学院、化工学院、外国语专科学校、化学机械制造学院）部分大学生、敖德萨的基洛夫机床制造厂的许多工人，还有苏联国家黑色冶金轧钢设备研究院和武器工业部的工程师、苏联军队的军官以及其他一些人。

苏联犹太公民的信件和申请主要涉及如下问题。

（1）犹太居民对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表示支持，对正式承认以色列国表示感谢，对利用阿拉伯人服务于一己之私利的英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巴勒斯坦奉行的政策表示谴责。

敖德萨的基洛夫机床制造厂的工人M.魏因施泰因（M.Вайнштейн）、C.尼森鲍姆（C.Нисенбаум）和M.赖梅杰尔（M.Раймедер）在信中写道：“我们作为苏联犹太人，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由天才的斯大林同志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己的国际威望支持了巴勒斯坦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我们对在巴勒斯坦挑起流血战

争的英帝国主义者及其爪牙们的行径感到义愤填膺。”[1]乌克兰人民演员M.戈利德布拉特（M.Гольдблат）在信中写道：“悉知苏联政府关于承认犹太人国家的决定之后，我像所有苏联人一样，深深地为自己亲爱的祖国，为我们的苏联政府、为敬爱的斯大林同志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毫无疑问，全体苏联人一致拥护政府的这一决定。”[2]

（2）但是也有不少信件明显流露出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信件的写信人对苏联犹太公民和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犹太人不加区分，并且把以色列视为自己真正的祖国，有把以色列置于苏联之上的倾向。

例如，公民H.C.罗森施泰因（H.C.Розенштейн）在给“犹委会”的信中写道：“一旦在巴勒斯坦取得胜利，全世界的犹太人将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的祖国，在那里他们将成为自由的和平等的公民。当然，我们苏联犹太人对移居以色列连想都不会去想。我们在这里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第二祖国。俄罗斯人以及全苏联的各民族帮助我们从民族压迫中解放出来，我们将同他们一起共同生活，为我们国家的幸福而共同劳动。”[3]耐人寻味的是这封信的作者把苏联当作他的第二祖国，那第一祖国显然是以色列了。公民佩雷尔穆特尔（Перельмутер）表示说：“目前，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犹太人已经大大地扬眉吐气，我们已经成了拥有平等权利的民族……这不仅仅是一场争取以色列国独立的斗争，而且也是一场为我们的未来，为争取民主和正义的斗争。”卫国战争参加者、预备役中尉、联共（布）党员，同时是莫斯科国立师范学院研究生的X.C.扎姆斯基（X.C.Замский）在来信中写道：“巴勒斯坦犹太民族的领袖们，不论其意识形态信念如何，都是在从事一个正义的事业并因而受到全民族的尊敬和感谢。在这决定民族命运的时刻，我不能仅仅做一个‘喝彩助威者’。现在需要的是干实事、发扬积极主动精神和做出牺牲。对这些事件袖手旁观就是对民族的背叛。积极参与这些事，不仅是每个犹太人的义务，而且也是他们的权利……成为一名犹太军队的士兵是我的梦想。”[4]

（3）许多苏联公民建议给巴勒斯坦犹太人以具体的帮助，以支援他们每年为以色列国而进行的斗争。

列宁格勒高等院校的36名犹太大学生联名写信，要求“犹委会”在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对阿拉伯军队入侵以色列国的抗议，他们提出了以下几个要求。① 立即开展对以色列政府的募捐活动；②请求苏联政府批准组建志愿军开赴巴勒斯坦支援以色列军队；③如果这些要求得到批准

后就即刻开始组建部队；④与以色列政府建立联系并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向其提供帮助。

公民M.别尔曼（M.Берман）对“犹委会”的活动提出批评，认为该委员会在支援巴勒斯坦犹太人方面没有表现出积极性。他在给“犹委会”的信中指出：“在犹太民族经历艰难而又至关重要的时刻，不能仅仅满足于讲几句漂亮话（这种事留给我们的美国‘朋友’好了）。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动员苏联的犹太人捐出现金用于购买武器。派遣志愿人员加入犹太军队——这才是“犹委会”应当完成基本的，总的来说也是唯一的任务。”公民佩雷尔穆特尔（Перельмутер）坚持认为，应当“在‘为了民主国家以色列’的口号下，采取一切措施组建苏联犹太人的志愿军团”。

许多苏联犹太人表示愿意以志愿者的身份帮助以色列国。莫斯科铁路交通工程学院的大学生B.X.沙弗兰（B.X. Шафран）希望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犹太军队，他认为这样做是尽到了一个犹太共青团员的义务。提出类似申请的还有：苏军预备役大尉A.M.谢尔佩尔（A.M.Серпер）、苏联国家黑色冶金轧钢设备研究院工程师C.И.福尔曼（C.И.Фурман）和他的两个儿子（三人均为卫国战争参加者）、莫斯科法律学院的80名犹太大学生的代表列文（Левин）以及其他一些人。医生Л.Б.戈尔曼（Л.Б.Гельман）已经请求“犹委会”预付给他一些钱，以便充作前往巴勒斯坦支援犹太人的路费。当苏联政府决定承认以色列国时，向《团结报》编辑部发出致敬电函的苏联知名犹太人有：作家爱伦堡、Д.贝尔格森（Д.Бергельсон）、X.阿杰米扬（X.Аджемян）、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Б.祖斯金（Б.Зускин）、世界象棋冠军M.博特温尼克（M.Ботвинник）等人。[5]

1947年12月27日，犹太戏剧界在莫斯科工艺博物馆礼堂举行晚会，纪念已故的犹太作家M.C.孟德尔（M.C.Менделе）诞辰。米霍埃尔斯即兴表演了《便雅闵三世游记》当中的几幕戏。他在开场白中朗诵道：便雅闵启程去寻找“应许之地”时问一个陌生人，“通往以色列故土的路怎么走？”“刚好就在这个时候葛罗米柯同志给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米霍埃尔斯解释，他指的是苏联在联合国支持巴勒斯坦分治和以色列的建立。结果整个礼堂群情激昂，人们狂喊着表示支持。米霍埃尔斯的女儿H.C.沃夫西（H.C.Вовси）后来回忆说：“好像他告诉所有人都要去以色列似的，每个人都从他们的座位上跳起来，疯狂鼓掌，超过了10

分钟。”[6]

甚至连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布尔什维克犹太工作人员，也感染了这种情绪。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犹太妻子Г.Д.戈尔布曼（Г.Д.Горбман），在以色列国成立的那天一语惊坏了自己的家人：“今天我们可有自己的祖国了。”[7]公开表达对新生的犹太人国家具有好感的还有莫洛托夫的妻子П.С.热姆丘日娜（П.С.Жемчужина）。她在1948年11月8日与驻莫斯科的以色列大使果尔达·梅厄会谈时说：“希望你们健康。如果你们那里一切都好，在各地的犹太人都会好了。”[8]

在苏联，犹太人的这种狂热的思想感情能够得到宣泄的唯一公众场合是犹太教堂。以色列建国以后，每到周末，都能得到来自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犹太人的祝福和祈祷。作为唯一主要的犹太人机构，“犹委会”办公地自然被认为是唯一一个对以色列表示支持的集合地点。[9]

1948年10月4日，犹太人的新年节日，聚集在莫斯科犹太教堂门前的人们，高兴地接受了首任以色列驻苏联公使果尔达·梅厄的问候，数万名犹太人参加了这一自发的游行活动。梅厄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那天教堂前的街道变了样，挤满了人，男女老少，包括红军军官、战士、十几岁的青少年和抱在父母怀里的婴儿，成千上万，挤的像沙丁鱼一样。平时假日只有2000左右的犹太人来教堂，今天近5万人等着我们……这些好心、勇敢的犹太人是来和我们在一起，表示我们的亲属关系，并庆祝以色列国的建立的……”[10]

尽管莫斯科犹太人亲以色列的游行活动，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违背政府的官方路线，但是，游行活动没有经过官方批准，这就破坏了斯大林主义的基本原则——只允许自上而下进行那些“自发性”的活动。因此，当局觉得这是“破坏性的”活动，这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巨大愤怒。

根据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忆，斯大林深深地感受到犹太复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在1948年底，斯大林对自己心爱的女儿说：“你不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整整感染了上一代人，而现在他们又在感染年轻一代……犹太复国主义者还为你挑选了第一位丈夫。”[11]

惊恐的“犹委会”领导人，企图与所有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划清界限。在1948年10月21日召开的“犹委会”会议上，委员会主席团委员М.И.古贝尔曼（М.И.Губельмен）确定地说：“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

态度从来也没有改变过。我们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同对待一切极其反动的运动一样。”[12]“犹委会”的工作人员及其机关报《团结报》反复地强调苏联犹太人的祖国是苏联，而不是以色列。[13]但是，这些忠诚的保证已经无济于事了。斯大林已经准备消灭“犹委会”，发动反犹主义运动了。

第二节 战后苏联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

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苏联政府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建国的同时，在其国内掀起了一场“反世界主义”运动，其目的是加强与外界的隔绝并在知识分子中清除任何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14]梅德韦杰夫指出：“‘反世界主义’的斗争具有明显的反犹性质。在当时的日常生活用语中，‘世界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几乎是同义词。”[15]就连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也承认“反世界主义”运动具有公然的反犹主义性质。[16]苏联当局之所以一反常态地发动大规模的反犹太主义运动，是由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因素所决定的。这与斯大林支持犹太建国和在冷战期间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

冷战爆发之后，为了与西方抗衡，苏联急需在国内及其势力范围整肃纪律，加强思想控制。“反世界主义”运动就是苏联采取加强思想控制的措施之一。但由于苏联犹太人和西方联系最广，受西方影响最大，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随着运动的开展，人们开始怀疑苏联犹太人对苏联是否忠诚。在报纸上出现了大量关于抨击“无根的世界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根据统计，60%的知识分子被指责为犹太人。还进行了所谓的假名揭发运动，即揭露那些知识分子的原犹太姓名。[17]

“反世界主义”运动开始后，苏联中层领导和布尔什维克普通干部开始将反犹主义当作党的一项正式路线。“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成了“犹太人”的代名词，它意味着苏联犹太人赞同西方犹太人的世界观，所以无法完全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反犹运动与斯大林周围政治力量平衡的改变相吻合。马林科夫被降职后，贝利亚被禁止过问一切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务。并且开始出现了一些传言，说莫洛托夫和他周围任用的人都是犹太人。[18]在官方的支持下，无论是政界还是科技文化界，大批犹太人遭受开除或免职的厄运。

在反犹主义浪潮开始席卷全国之时，身为“犹委会”主席的米霍埃尔斯为了维护犹太人的权益，与费费尔一起专程拜会了莫洛托夫，对官方的“反犹政策”提出了抗议。莫洛托夫承诺在适当的时候会采取措施。[19]但是米霍埃尔斯的这种不合时宜的干预明显地将自己置于政府的对立面。

显然，斯大林担心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利用米霍埃尔斯巨大的个

人声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米霍埃尔斯拥有很高的世界知名度，这样的人无疑也一定有异乎寻常的强烈个性，因此在那个时代，不可能通过法院审判这块遮羞布对他按常规方式进行逮捕和审讯。[20]

经过反复权衡，斯大林最后采取了一种最为省事的惯用手段——秘密处死米霍埃尔斯。根据解密的档案材料记载，斯大林授命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国家安全部部长B.C.阿巴库莫夫（B.C.Абакумов）全权处理此事。阿巴库莫夫委派苏联国家安全部第一副部长C.И.奥格利佐夫（C.И.Огольцов）、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长Л.B.察纳瓦（Л.B.Цанава）中将和Ф.Г.舒布尼亚科夫（Ф.Г.Шубняков）上校去执行这次任务。1948年1月12日晚，米霍埃尔斯最终死于苏联内务部人为制造的一起车祸中。[21]

实际上，在暗杀米霍埃尔斯之前，苏联当局已经开始准备改组“犹委会”了，1947年7月19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副部长Л.巴拉诺夫（Л.Баранов）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副部长B.格里戈良（B.Григорян）联名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A.A.日丹诺夫（A.A.Жданов）写信指责“犹委会”在宣传工作中犯有民族主义错误，没有对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势力掀起的反苏运动给予应有的回击。[22]也就在这个月，联共（布）中央做出了改组“犹委会”的决定，该决定指出：

> “在战争年代，为动员国外犹太人参加与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斗争而成立的该委员会，它在战后已经不能胜任这些任务。‘犹委会’擅自担负起在苏联犹太居民中开展工作这一并不属于它职能范围的工作，而置国外犹太人运动于不顾。委员会没有利用其同国外犹太人民主报刊的联系来反击英国和美国的帝国主义及其反动代理人，而在外国犹太人居民中进行的反苏、反民主运动。在‘犹委会’发往国外的材料和在该委员会机关报《团结报》上经常不正确地反映苏联犹太人的生活；委员会还脱离苏联的实际情况去显示苏联犹太人的文化成就，而对苏联其他民族对犹太文化发展的影响视而不见；经常对俄罗斯人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避而不提。委员会没有利用自己同国外犹太人学者、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家的联系，并从那些人那里获取对苏联有益的科学技术和政治信息。为了从根本上改进‘犹委会’的工作，联共（布）中央决定改

组‘犹委会’。”[23]

在米霍埃尔斯被暗杀后不久，1948年3月26日，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就“犹委会”的严重问题给苏联部长会议递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苏联国家安全部查明“犹委会”的领导人是积极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面向美国人，实质上在进行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犹委会”工作中的亲美倾向在该委员会领导人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的美国之行之后，开始特别明显地表露出来，他们在美国与知名的犹太活动家建立接触后，而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受雇于美国情报机关。委员会主席团前主席米霍埃尔斯战前就是一个著名的民族主义积极分子，曾经是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犹太人的一面旗帜。”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把已经流产的克里木犹太人自治共和国计划重新提了出来，并成为“犹委会”领导人试图分裂苏联的一个重要罪证。[24]

尽管如此，斯大林并没有立刻做出查封“犹委会”的决定。这仅仅是因为苏联亲以色列政策的需要，而“犹委会”或许还能在这其中发挥一点作用。

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本来就是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所以，它既不希望国内犹太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也不希望“犹委会”与以色列联系过密。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苏联政府这一时期分配给“犹委会”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帮助政府搜集有关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情报。在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委会”就开始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外交部按月提供相关情报。无论是国外友人来信还是与国外犹太组织代表的会晤，只要是涉及以色列的有价值的情报，“犹委会”领导人都会向上级汇报。不过“犹委会”给苏联当局提供最多、最重要的情报还是有关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建国事件的反应。根据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巴拉诺夫的要求，“犹委会”代理责任书记Г.М.海菲茨（Г.М.Хейфец）把所有打电话、来信或者亲自来到“犹委会”对以色列表示支持的人的姓名、职业、单位、住址都直接复制并交给了巴拉诺夫。[25]与此同时，《团结报》代理主编Г.М.日茨（Г.М.Жиц）也把编辑部收到的相关信件和评论呈报给巴拉诺夫。[26]

二是配合政府进行必要的陪衬性宣传，但这种宣传是受到严格限制的。1948年4月，费费尔和海菲茨曾向莫洛托夫建议：“‘犹委会’应该对

联合国全体大会通过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决议表示支持，以便增加世界犹太人对苏联的同情。”结果遭到否决。[27]5月19日，“犹委会”主席团专门开会研究讨论有关以色列的问题。它所能做的事情仅仅是就以色列的成立给以色列临时政府总统魏茨曼发去一封贺电，指出“这是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这份寥寥数语的贺电，都要经过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苏斯洛夫、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和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的层层审批，最后在签发时还去掉了“犹委会”主席团成员在贺电末尾的签名。[28]

从1948年9月开始，苏联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苏联侦查机关获得的文件表明，“以色列政府采取了亲美和敌视苏联的立场”，正在抛开苏联“同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秘密结盟”。这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以色列的政策。[29]而苏联国内犹太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令苏联当局感到头痛。成千上万的苏联犹太人不仅要求援助以色列，为以色列而战，而且许多人竟直截了当地要求移民到自己真正的祖国——以色列去，这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尽管苏联政府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并且默许东欧国家的犹太人可以移民到以色列去，但是关于苏联本国犹太人的移民要求，苏联当局是严格进行限制的。所以，从1948年9月初开始，苏联政府已经准备调整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了。

1948年9月7日，《团结报》刊发了一篇言辞犀利的文章，文中猛烈地抨击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领导人。[30]紧接着，《真理报》在1948年9月21日刊登了著名犹太作家爱伦堡的一篇文章——《关于一封信的理由》。这篇文章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由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授命爱伦堡写的。爱伦堡认为在巴勒斯坦出现的以色列并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反犹主义问题，在文章中指出：“犹太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全世界都实现共产主义。以色列英勇的战士，粉碎了英国雇佣军的进攻，但是我们知道，犹太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在巴勒斯坦军事斗争的胜利，而取决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取决于伟大的国际主义的胜利，取决于工人阶级对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胜利。我们对以色列那些劳动人民的斗争表示同情；对他们抱有好感的并不只是苏联犹太人，还有苏联全体人民。不过任何一个苏联公民都明白，他们的事业不能只是一个民族性质的国家，还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看待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包括以色列国），都像是在黑暗森林里徘徊的旅行者一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永远不会受资本主

义国家剥削制度的诱惑。苏联犹太劳动者的命运并非和以色列联系在一起，而是与进步势力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苏联犹太人和全体苏联公民一起正在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将看到的不是近东，看到的而是未来。我认为，追求正义的以色列劳动者应该离犹太复国主义神秘论者远一点，他们应该向北看——苏联，那里的人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31]爱伦堡的这篇文章对苏联犹太人来说无疑是一颗充满警告意味的子弹。[32]9月25日，《团结报》也发表了爱伦堡的这篇文章，并且在一篇社论中重复了他的观点。

两个月之后，即1948年11月6日，《团结报》主编日茨在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的信中写道：最近，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的建立，部分苏联犹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表露出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情绪的主要表现是美化犹太国家，赞扬它的民族模式和演示这个国家已明显显露出的资产阶级性质及其政府政策的反社会主义民主倾向。以色列国公使拜谒莫斯科的犹太教堂被抱有犹太复国主义情绪的人们利用来公开赞扬以色列国。在明斯克和日梅林卡就发生了煽动犹太人集体前往巴勒斯坦的事件。

鉴于这些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团结报》加强了在苏联犹太人中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宣传，报纸列举具体事实指出，苏联犹太人唯一的祖国是苏联，其中也包括犹太人都有着无限的机会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报纸引用在苏联犹太人生活中和犹太人自治州建设中的许多实例指出，“只有在我们国家，在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基础上，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才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苏联犹太人在一切方面与苏联其他民族都是平等的……[33]”

爱伦堡和日茨的举动激起了苏联犹太人的强烈愤慨，一位“来自莫斯科署名为‘头发花白’的老人”在给“犹委会”的一封信中写道：“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爱伦堡在《团结报》上发表的没有任何评论的文章。很难相信你们同意爱伦堡的观点。……没有爱伦堡犹太民族照样生活。在我看来，如果伟大的米霍埃尔斯读了爱伦堡在《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他会因愤怒和悲伤而在自己的坟墓中辗转反侧。我们要求你们在报纸上表达你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见，犹太民族不想听到爱伦堡的建议。”[34]还有一封信件的言辞更为犀利：“伊利亚·爱伦堡已经开始狂吠，小狗日茨跟着乱叫。他想展示自己也知道如何狂吠。好了，他们命令爱伦堡写文章，但是您呢？或许您想得到一根额外的香肠？您为什么扮演白痴？毕

竟您十分清楚，‘在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犹太人从所有重要的职位上被解雇。您知道许多机构现在已不接收犹太毕业生，即使它们接收，也是按照一定的限额。您比我更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爱伦堡厚颜无耻地以全体苏联犹太人的名义讲话，他没有这个资格，而您也根本没有任何资格代表犹太人讲话。”[35]

在苏联这样的社会，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认同和支持必然要被当局看成是对国家的不忠和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背叛，特别是在以色列倒向西方[36]和美苏冷战的前提下，与以色列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苏联犹太人势必会被看作是西方的“第五纵队”。斯大林后来曾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指出：“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37]为了消除苏联犹太人因为以色列建国而引发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犹太复国主义情绪，斯大林随即在国内加强了“反世界主义”的运动。而“犹委会”与西方的联系最为广泛，是斯大林心目中“世界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因此，它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1948年11月20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做出了查封“犹委会”的决定，理由是该委员会已经成为反苏宣传的中心，并且经常不断地向国外情报机关提供情报。同时查封的还有“犹委会”的报刊出版机构。[38]

1948年底1949年初，几乎所有的“犹委会”成员都被逮捕了。1949年1月28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反世界主义”运动，矛头直指犹太人。“苏联政权机关和部门，首先是在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层里，几乎开始全面的解除‘犹太人’的职务。”[39]

1952年5月，军事法庭在莫斯科开始对1948～1949年被逮捕的“犹委会”成员进行秘密审判。法庭主席A.切普佐夫在开始听取案件之前，通报了政治局的决定：14名囚犯之中应该有13名被判处死刑。1952年8月，对政治局点名的人员进行了处决。被枪决的人员之中有：洛佐夫斯基、作家和诗人费费尔、马尔基什、克维特科、Д.Р.贝尔格尔松（Д.Р.Бергельсон）、Д.Н.戈夫施泰因（Д.Н.Говштейн）和莫斯科博特金医院原主治医生Б.А.舍梅利奥维奇（Б.А.Шимелиович）。[40]

1951～1952年，斯大林把自己反犹太人的立场，扩展到苏联的整个势力范围内。1952年年底，在苏联集团国家里，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反犹太人的审判，其宗旨是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原中央总书记P.斯兰斯基和布拉格领导层的其他代表。在进行审判过程中，绝大多数囚犯

具有犹太人出身这一点，被多次地进行强调。斯兰斯基被指控犯有“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罪行。11名囚犯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捕捉“犹太复国主义代理人”和“世界主义分子”的这种行动，也扩展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41]大量的犹太人从科研机关、教育机构和工矿业部门中被驱逐出去。反犹运动也波及了军队，这一时期，有63名犹太将军和111名上校被迫退休，到1953年，高级军官中已经没有犹太人。[42]

“医生间谍案”使反犹运动达到全民性的高潮。1953年1月13日，塔斯社发表了关于逮捕一批“医生破坏者”的消息。这是根据前几天一位名为季马舒克女医生的揭发而采取的行动。季马舒克揭发说：“克里姆林宫有多名著名医生企图用有害的治疗方式，使病人逐渐死亡的方法来谋害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苏联安全机构逮捕了9名长期为国家领导人看病的医生，指控他们涉嫌谋害这些领导人。这9个人当中有6人是犹太人。同日，《真理报》发表了《披着教授和医生外衣的卑鄙的间谍和杀人犯》的社论。社论指出，这个恐怖集团是被美国情报机关收买，由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犹太联合救济委员会’招募，从事卑鄙的间谍活动。”[43]“医生间谍案”在全国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排犹运动。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从医疗机构、研究所和医院赶出，许多科研机构因此而减少了半数以上的工作人员，不少出版社在选题计划中删掉了犹太作者所写的书。甚至被捕医生研制出来的药品也遭到了禁止，尽管这些药品早已得到了公认。[44]到了斯大林去世的时候，在党的区委书记中也很难找到一个犹太人了。[45]

苏联的反犹主义政策严重影响了苏联和以色列的关系，1953年2月9日，苏联驻以色列公使馆遭到以色列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46]尽管以色列方面表达了道歉和赔偿的意向[47]，苏联依然于12日宣布与以色列中断外交关系。[48]至此，苏以关系正式宣告破裂。

[1]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608.Л.5-10.//*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С.296.

[2]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608.Л.5-10.//*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С.296.

[3]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608.Л.5-10.//*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С.296.

[4]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608.Л.5-10.//*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С.296-297.

[5]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608.Л.5-10.//*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С.297-298.

[6] Louis Rapoport，*Stalin's War Against the Jews*：*The Doctor's Plot and Soviet Solution*，pp.90-91.

[7] *Платонов О.А.*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Эпоха Сталина.Москва：Московитянин. 1996，С.340-341.

[8]〔以〕果尔达·梅厄：《梅厄夫人自传》，章仲远、李佩玉译，第239页。

[9] Shimon Redlich，Kirill Mikhailovich Anderson，I.Altman，*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p.110.

[10]〔以〕果尔达·梅厄：《梅厄夫人自传》，章仲远、李佩玉译，第236页。

[11] *Аллилуева С.И.* Двадцать Писем к Другу.М：Известия.1990.С.124.

[12] ГА РФ.Ф.8114.Оп.1.Д.1054.Л.213-236.//*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С.305.

[13] ГА РФ.Ф.8114.Оп.1.Д.1054.Л.213-236.//*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С.305.

[14]〔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魏小明等译，第365页。

[15]〔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下册，何宏江等译，第966页。

[16]〔苏联〕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刘白岚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1980，第140页。

[17] Hilary L.Rubinstein，Dan Cohn-Sherbok，Abrahan J.Edelheit，W.D.Rubinstein，*The Jews in the Modern World*：*A History since 1750*，New York：Arnold，2002，p.194.

[18]〔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魏小明等译，第340～341页。

[19] Shimon Redlich，Kirill Mikhailovich Anderson，I.Altman，*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p.82.

[20] 〔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魏小明等译，第341页。

[21] *Борщаговский А.М.* Обвиняется кровь.С.5-8.转引自*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С.358。

[22]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58.Л.132-133.转引自*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С.347。

[23]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58.Л.134-135.转引自*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С.348-350。

[24] Це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ФСБ РФ.转引自*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С.359-370。

[25]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445.Л.54-55.转引自*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С.292-295。

[26] Shimon Redlich，Kirill Mikhailovich Anderson，I.Altman，*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pp.392-393；宋永成：《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悲剧》，第124～125页。

[27] Shimon Redlich，Kirill Mikhailovich Anderson，I.Altman，*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p.114.

[28]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С.35，140.

[29] *Платонов.О.А.*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X век.Эпоха Сталина，С.345.

[30] Shimon Redlich，Šimʹôn Redlîḵ，*Propaganda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Russian*：*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1941-1948*，pp.165-166.

[31] АП РФ.Ф.3.Оп.65.Д.7.Л.167-177.//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 1941-1953гг.Т.1.С.375-383.

[32] Aron Lustinger，*Stalin and the Jews*：*The Red Book*：*The Trage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and the Soviet Jews*，p.176.

[33] ГА РФ.Ф.8114.Оп.1，Д.10，Л.329-331.//*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С.298-299.

[34] ГА РФ，ф.8114，оп.1，д.20，л.38，*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С.308-309.

[35] Aron Lustinger，*Stalin and the Jews*：*The Red Book*：*The Trage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and the Soviet Jews*，p.410.

[36] 关于战后以色列倒向西方的原因，许多学者都谈到过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①以色列和美国关系密切。很多犹太人是从美国移民而来的。犹太人在美国表现不俗。由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在美国的犹太富翁可以组成院外集团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苏联犹太人就不具有这个优势。参见余崇健《美以“特殊关系”初探》，《西亚非洲》1988年第6期。②以色列吸引外来移民的政策与苏联当时的人口政策和民族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战后苏联希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犹太人留在国内为苏联的建设服务，因此对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加以种种限制。参见邵丽英《俄国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发展趋势》，《西亚非洲》1994年第4期。

[37]〔俄〕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李惠生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359页。

[38] РЦХИДНИ.Ф.17.Оп.162.Д.39.Л.140.//*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С.371-372.

[39] *Люкс Л.М.*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Политике Сталтин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9. №7.С.50.

[40]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В Плену у Красного Фараона，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ечледования Евреев в СССР в Последнее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С.147-150.

[41] *Люкс Л.М.*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Политике Сталтин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9. №7.С.53.

[42] 参见Nora Levin，*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pp.529，531。

[43] 参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486～487页。

[44] 参见〔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下册，何宏江等译，第848～849页。

[45]〔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东欧犹太人移居美国以及他们发现与创造生活的历程》，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第750页。

[46] АВП РФ.Ф.059.Оп.30.П.53.Д.311.Л.45-46.//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1941-1953гг.Т.2.С.421-422.

[47] ISA 130.11/2507/7 ，*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9-1953* (*DISR* ） ，Part 2 ，p.875.

[48] АВП РФ.Ф.089.Оп.6.П.15.Д.4.Л.2-3.//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док. 1941-1953гг.Т.2.С.429-430.

结语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认为反犹太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的确，在二战后斯大林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发动了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和“医生间谍案”为代表的大规模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笔者在这里也无意给斯大林的反犹主义行为进行平反。但是斯大林的反犹主义，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种族的，更不是日常生活习俗的。斯大林的反犹太主义纯粹是其政策的需要。

在俄国革命的年代（1898～1917），境内的犹太人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分化，一部分人积极参加十月革命，成了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这批人的主要代表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捷尔任斯基等人，而一部分人则拥护“崩得”[1]的政治主张，还有一部分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信徒。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当局对于“崩得”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了严厉镇压。“崩得”党于1921年宣布解散，而在苏联境内活动的大批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也遭到逮捕甚至杀害，但这种镇压并不针对犹太人。

在苏联，“崩得”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正是要与其争夺犹太群众，因此一定要坚决镇压。而普通犹太人，只要安分守己，或者成为布尔什维克及其拥护者，就能被当局所包容。有充分证据表明，犹太布尔什维克要比非犹太党员更加反对“崩得”和犹太复国主义，更加认同苏联当局对犹太人的同化政策。[2]而这种认同是发自内心的，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理想的一种认同。

很多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列举了大量斯大林在大清洗时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的事实，希望以此证明斯大林主义与反犹主义具有某种共性。[3]他们的证据是确凿的，但是笔者并不大同意他们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尽管苏联犹太人在大清洗时遭到严重迫害，但是在苏联境内的其他民族也同样遭受了这种迫害。尽管很多学者在提到斯大林主义时都特别强调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事实上，占苏联人口最多的俄罗斯人的利益在苏联时代也遭到了忽视。俄罗斯历史学家夏金在其主编的高校历史教材《祖

国现代史》中明确指出：“人口最多的俄罗斯人在苏联恐怕是最无权的。”[4]因此仅仅把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单列出来对苏联境内其他民族来说是不公正的。对于斯大林来说，谁要是反对他，或者是威胁到他的地位，他就要消灭谁。至于这个人是犹太人还是俄罗斯人，对于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来说并不重要。这也可以解释即使在大清洗的时代，苏联党和国家机关中，仍然有大量犹太高级官员的存在，因为他们是忠于斯大林的犹太布尔什维克。

二战后，斯大林之所以选择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的政策，具有外交方面的考虑，其中原因前文已经提及，这里不再重复，事实证明斯大林的巴勒斯坦政策从外交角度上来说是极为成功的。

首先，斯大林利用英美之间的矛盾成功地把英国人逐出了中东地区。

其次，斯大林利用了犹太人对美国政府的强大政治影响迫使美国政府和苏联一起创建了以色列国，赢得美国犹太人的好感，给英美特殊关系成功地打入了一个楔子，使美国深深地陷入中东地区的泥淖之中。直到今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外交困境依然存在。

最后，尽管以色列最终倒向西方，但是苏联政府很快在中东地区找到了新的盟友，那就是作为以色列对立面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等国）。建立以色列所造成的后果自有美国人承担，苏联不付出任何代价就成了在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斯大林之所以做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决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认为战后苏共的地位已经巩固，“崩得”党人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在苏联早已绝迹。新一代的苏联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没有什么联系，犹太复国主义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概念，这是斯大林的失策之处，他低估了犹太民族数千年以来生生不息的民族意识。这种沉睡已久的民族意识一旦觉醒，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以色列成立之后，苏联犹太人像全世界犹太人一样欢呼雀跃，欣喜若狂，甚至一些老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也对以色列表示强烈的好感，这让斯大林始料未及。

苏联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党内斗争和30年代的大清洗以及卫国战争。二战后，他们对自己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或多或少

地产生了怀疑。而以色列国的成立以及战后苏联的亲犹太复国主义政策使得他们认为可以自由地抒发自己的这种情感。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在斯大林心目中，国内犹太问题和支持以色列建国完全是两个概念。

随着美苏冷战爆发，加之以色列从1948年下半年起就有了倒向西方的苗头，这使斯大林对苏联犹太人极为不信任。在冷战时期，强化内部，整肃纪律是必然的，于是就有了对犹太人的大清洗，这种清洗是政策的需要。斯大林对内对外政策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切有利于苏联的原则。

从此之后，犹太人问题成了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最尖锐的民族问题之一。苏联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强烈，与国家和政府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苏联政府的反犹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犹太人的民族感情，也违背了马列主义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最严重的后果是使苏联犹太人产生了一种离心倾向，从而成为社会的一个不安定的因素。

[1] 崩得，全称为“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成立于1897年10月7日，是俄国的一个世俗犹太人社会主义政党。

[2] CZA Z5/1377，*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49（*DISR*），Part 1，p.63.

[3] Shimon Redlich，*Propaganda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Russian*：*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1941-1948，p.13；Lionel Kochan，*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1978，pp.47，303；Martin Gilbert，*The Jews of Russia*：*Their History in Maps and Photographs*，Merton College，Oxford：1976，p.33；〔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下册，第965页；〔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第330页。

[4] *Щагин. Э. М*，Новейш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XX-начало XXI века，Книга 2，Москва，Влодос，2008，С.295.

参考文献

一 俄文文献

（一）俄文档案材料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48.Часть первая.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о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0.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46.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о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2.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45.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о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9.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1948.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6.

Наумкин В.В. （Отв Ред）.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1947-1956）.Москва：МФД.2003.

Наумов В.П. （под ред.）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 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4.

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Встречи.Беседы. Дискуссии：Докумменты.комментарии.1941-1945.Москва：Наука. 2004.

Ржешевский.О.А. Визит В.М.Молотова в Лондон в мае 1942 г.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У.Черичллем&А.Иденом и переписка с И.В. Сталины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1.

Ржешевский.О.А. Визит В.М.Молотова в Лондон в мае 1942 г.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У.Черичллем.А.Иденом и переписка с И.В. Сталины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7.№ 6.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Г.Н. （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9-1952.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АТЕРИК》.2006.

Советско-англ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1941-1945.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1.1941-1943.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83.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Сб.док.1941-1953гг. 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0.

（二）俄文报纸和期刊

Безбородова И.В.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и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е в СССР：из истори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 делам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и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х НКВД-МВД ССС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й период （1945-1953）.//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7.№ 5.

Братия евреи всего мира！《Правда》.25 августа 1941 г.

Ваксберг А.М. Сталин против евреев.// Детектив и политика.1992.№3.

Волобуев О.В. Крымскотатар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м ЦК КПСС（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50-х - середина 80-х гг.XX в.）// Отечес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4.№1.

Второй митинг предсетавителей евре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авда》.25 мая 1942 г.

Данилов В.Д. Сталин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начала войны：план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Отечес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 3.

Егорова И.И. Ир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5-1946 гг. : по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м архив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4.№3.

Загорский А.В.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7.№6.

Земсков В.Н. Судьба 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 （1930-1954 гг）.//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4.№1.

Зубкова Е.Ю. Кад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чистки в КПСС （1949-1953гг.）.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9.№4.

Илизаров Б.С. Сталин：Штрихи к портрету на фоне его библиотеки и архив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0.№4.

Исаев Г.Г.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1948-1951 гг.// Журнал Политэкс.2006.Том 2.№ 3.

К евреям всего мира.《Правда》.25 мая 1942 г.

Люкс Л.М.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политике Сталин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7.

Малкин В. Семь писем Лидии Тимашук.Новое время. 1993.№ 28.

Медведев Ж.А.Сталин и 《дело врачей》.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1.

Митинг в Нью-Йорке в честь Михоэлса и Фефера.《Правда》.16 июля 1943 г.

Наумов В.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 г.Новая и на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5.

Наумов В.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7.№ 4.

Нежинский Л.Н. & Челышев И.А.О доктринальных основах совет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Отечес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 1.

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м 《Деле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12.

Подлый шпион и убийцы под маской профессоров-врачей. 《Правда》.13 января.1953 г.

Похороны С.М. Михоэлса.《Правда》.17 января 1948 г.

Пыжиков А.В. 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группа：путь во власти （1946-1949）.//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1.№3.

Пыжиков А.В. Последние месяцы диктатора （1952-1953гг）.// Отечес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2.№2.

Рейман М.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и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оветск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3.

Сенявский А.С. XX съезд КПСС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7.№1.

Сидоров А.В. Сталинизм：опыт и уроки осмысления.// 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 КПСС.1990.№7.

Симонов Н.С. Термидор.брюмер или фрюктидор？Эвалюц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власти：прогноз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3.№4.

Михоэлс С.М. 《Правда》.15 января 1948 г.

Чубарьян А.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востока изапада//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1.№3.

Эренбург И.Г. По поводу одного письма.《Правда》.21

сентября 1948 г.

（三）俄文专著

Адибеков Г.М. & Андерсон К.М. & Роговая Л.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заседаний 1919-1952.Каталог.Том III.1940-1952.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1.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Культура и власть от Сталина до Горбачева.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1917-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4.

Артизов А.Н. & Наумов О. 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б）-ВКП（б），ВЧК-ОГПУ-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1917-1953 гг.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1999.（Россия.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Бабиченко Д.Л.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фронт”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1932-1946 гг.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ЭРД.1994.

Блюм А.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0.

Брент Д. & Наумов В. Последнее дело Сталина.Москва：Изд-во Проспект.2004.

Бруцкус Ю. Истоки русского еврейства.// Еврейский мир：Ежегодник на 1939 г.М.：РПО 《Мосты культуры》，2002.

Будницкий О.В. Российские евреи между красными и белыми（1917-1920）.М.：РОССПЭН.2006.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45 год.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о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9.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46 год.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о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2.

Гайдук И.В. & Егорова Н.И. &Чубарьян А.О.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Москва：Наука. 1999.

Дижур И.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евре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Еврейский мир：Сборник.1944 г.

Жуков Ю.Н. Тайны Кремля：Сталин.Молотов. Берия. Маленков. Москва：ТЕРРА-Книжный клуб.2000.

Игорь Бунич. Завещание или Дартаньян из НКВД.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Нева”.Москва：ОЛМА-ПРЕСС. 2003.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осква.1998.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5.

Киселев А.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осква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1945-1947.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2000.

Козлова В.А. & Мироненко С.В. & Эдельман О.В.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Надзор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 по делам 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й агитаций и пропаганде. аннотированный каталог.март 1953-1991.Москва.1999.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В плену у красного фарао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евреев в СССР в последнее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4.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Тай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талина.власть и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1.

Куманев Г.А. Рядом со Сталиным：откровенны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Москва：Былина.1999.

Леонид Млечин. Зачем Сталин создал израиль？Москва：《ЯУЗА》《ЯКСМО》.2005.

Леонид Млечин. Иосиф Сталин -создатель Израиля. Москва：《ЯУЗА》.《ЭКСМО》.2006.

Петрова Н.К.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е комитеты в СССР：1941-1945гг.Москва：ИРА РАН.1999.

Платонов О.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Эпоха Сталина. Москва：Московитянин.1996.

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41-1991г.. 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1999.

Солженицы А.И. Двести лет вместе （1795-1995）.Часть I-II，М.：Русский путь.2001-2002.

Соловьев С.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щих времён：В 15-ти кн.М：СПб，1962-1966，Кн.1.

Судоплатов П. Разведка и Кремль.Записки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го свидетеля. М：Гея，1996.

Фатеев А.В. Образ врага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1945-1954 гг.Москва：И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1999.

Шварц С.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Нью-Йорк：Изд-во им.Чехова.1952.

二 英文文献

（一）英文档案材料

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London：Frank Cass，200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5*，Vol.8 Washington，D.C.：GPO，196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6*，Vol.7 Washington，D.C.：GPO，196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7*，Vol.5 Washington，D.C.：GPO，197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8*，Vol.5 Washington，D.C.：GPO，197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9*，Vol.6 Washington，D.C.：GPO，1977.

Harry S.Truman，*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d*：*1946*，Washington，D.C.，1962.

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eds），*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BDFA*）：*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V*（*1946-1950*），Series B，Middle and Near East，Vol.1，2，4，6，8（Bethesda，MD：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9）.

Ronald Hyam（ed.），*British Document on the End of Empire*，Series A，Vol.2，Part I，Part II，Part III，London：HMSO，1992.

（二）英文报纸和期刊

Avraham Grinbaum，“Rehabilitation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Report No.7，” translated introduced and annotated，*Soviet Jewish Affairs*，Vol.20，No.2-3，1989.

Geoffrey Roberts，“Moscow and the Marshall Plan：Politics，Ideology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1947，” *Europe-Asia Studies*，1994，Vol.46，No.8.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46，2005.

Laurent Rucker，“The Unexpected Alliance USSR and Israeli During the 1940s，” *Russia and Jewish World*，No.2，2004，May 24，2020.

M.Altshuler and S.Ycikas，“Were there Two Black Books about the Holocaust in the Soviet Union？” *Jews and Jewish Topic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Vol.1，No.17，1992.

Shimon Redlich，“The Crimean Affair，Jews and Jewish Topic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Vol.2，No.12，1990.

Thomas Mayer，“Arab Unity of Action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1945-48，”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22，No.3，1986.

Vladimir O.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CWIHP Working Paper*，No.13，1995.

V.Dubson，“The Archive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Jews and Jewish Topic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Vol.3，No.16，1991.

（三）英文专著

Aaron S.Klieman（ed.），*Palestine in Postwar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Affairs*，New York：Routledge，1991.

Aaron S.Klieman（ed.），*The Struggle for Statehood：Focus on the United Nations*，New York：Garland Pub.，1991.

Aaron S.Klieman（ed.），*Mobilizing for the War Effort*，1940，New York：Routledge，1991.

Abraham J.Edelheit，Hershel Edelheit，*History of Zionism：A Handbook and Dictionary*，Colorado：Westview Press，2000.

Ahron Bregman，*A History of Israel*，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

A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London：Heiemann，1985.

Amikam Nachmani，*Great Power Discord in Palestine：1945-1946*，London：Frank Class，1987.

Arieh J.Kochavi，*Post-Holocaust Politics：Britain，the United States and Jewish Refugees，1945-1948*，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

Arkadi Vaksberg，*Antomina Bouis Stalin Against the Jews*，translated by Antonina W.Bouis，New York：Vintage Books，1994.

Arno Lustiger，*Stalin and the Jews：The Red Book：The Trage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and the Soviet Jews*，New York：Enigma Books，2003.

Arnold Krammer，*The Forgotten Friendship：Israel and the Soviet Bloc，1947-53*，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4.

Arnold Krammer，“Soviet Motives in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1947-48，” in Lustick（ed.），*Triumph and Catastrophe*，New York & London：Garland Publisher，1994.

Aron J.Katsenelinboigen，*The Soviet Union：Empire，Nation，and System*，New Brunswick & London：Transaction Pubishers，1990.

Bernard Reich（ed.），*Arab-Israeli Conflict and Conciliation*：*A Documentary History*，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95.

Charles L.Geddes（ed.），*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New York：Praeger，1991.

David Ben-Gurion，*Israel*：*A Personal History*，translated by Nechemia Meyer & Uzy Nystar，New York：Funk & Wagnalls，1971.

David Ben-Gurion，*Israel*：*Years of Challenge*，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3.

Eytan Gilboa，*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Israel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Lexington，Mass.：Lexington Books，1987.

Govrin Yosef，*Israeli-Soviet Relations*，*1953-1967*：*From Confrontation to Disruption*，London：Frank Cass，1998.

Harold Wilson，*The Chariot of Israel*，New York & London：Weidenfeld & Nicholson，1981.

Hilary L.Rubinstein，Dan Cohn-Sherbok，Abrahan J.Edelheit and Willi D.Rubinstein，*The Jews in the Morden World*：*A History since 175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02.

Idith Zertal，*From Catastrophe to Power*：*Holocaust Survivors and the Emergence of Israe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John Snetsinger，*Truman*，*the Jewish Vote and the Creation of Israel*，Stanford，California：Hoover Institute Press，1974.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Washington：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2005.

Leslie Stein，*The Hope Fulfilled*：*The Rise of Modern Israel*，London：Praeger，2003.

Lester Samuel Eckman，*Soviet policy towards Jews and Israel，1917-1974*，New York：Shengold Publishers，1974.

Lionel Kochan，*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Margaret Truman，*Harry S.Truman*，New York：Morrow，1974.

Martin Gilbert，*The Jews of Russia*：*Their History in Maps and Photographs*，Oxford：Merton College，1976.

Michael Cohen，*Palestine and the Great Powers，1945-194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

Michael J.Cohen，*Palestine and the Great Powers，1945-1948*，Princetion：Princetion University Press，1982.

Ole Smolansky，"The Soviet Role in the Emergence of Israel，" in Louis and Stookey（eds.），*The End of the Palesine Mandat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6.

Philip Mattar，*The Mufti of Jerusalem*：*Al-Hajj Amin Al-Husagni and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Robert J.Donovan，*Conflict and Crisis*：*The Presidency of Harry S.Truman，1945-1948*，New York：Norton，1977.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Great Britain and Palestine，1915-1945*，New York：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46.

Scott D.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1947*，CWIHP Working Paper No.9，1994.

Shimon Redlich，*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Psychology Press，1995.

Shimon Redich，*Propaganda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Russian*：*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1941-1948*，Boulder：Colorado，1982.

Shimon Redlich，*Propaganda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Russian*：*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1941-1948*，Boulder：East European Quarterly，1982.

Theodor Herzl，*The Jewish State*：*An Attempt at A Modern Solution of the Jewish Question*，London：H.Pordes，1967.

Thomas E.Sawyer，*The Jewish Minority in the Soviet Union*，Boulder：Westview Press，1979.

Trecor Burridge，*Clement Attlee*：*A Political Biography*，London：J.Cape，1985.

Uri Bialer，*Between East and West*：*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1948-195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Uri Bialer，*Cross on the Star of David*：*The Christian World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1948-1967*，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5.

Viktor Fischl，*Moscow and Jerusalem*：*Twenty Years of Relations between Israel and the Soviet Union*，London & New York：Abelard-Schuman，1970.

Walid Khalidi，*The End of the Palestine Mandat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6.

Walter Laqueur，Barry Rubin（ed.），*The Israel-Arab Reader*：*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New York：Penguin Books，1969.

Walter Laqueur，*The History of Zionism*：*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Establishmo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London：The European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2003.

William Korey，“The Legal Position of Soviet Union，” in Lionel Kochan（ed.），*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William Roger Louis，*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1945-1951：Arab Nationalism，the United State，and Postwar Imperi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W.F.Abboushi，*The Unmaking of Palestine*，Boulder：Middle East，North African Studies Press，1985.

Yaacov Ro’i，*Soviet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The USSR and Israel，1947-1954*，London：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Books，1980.

Yaacov Ro’i，*Soviet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The USSR and Israel，1947-1954*，N.J.：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books），1979.

Yosef Govrin，*Israel-Soviet Relations：1964-1966*，Jerusalem：Hebrew University Press，1978.

Yosef Litvak，“Polish-Jewish Refugees Repatried from the Soviet Union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orman Davies & Antony Polonsk（eds.），*Jews in Eastern Poland and in the USSR，1939-46*，London：Macmillan，1997.

Zev Katz，*Handbook of Major Soviet Nationalities*，New York：Free Press，1975.

三 中文文献

（一）中文档案材料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5、2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1897—1997》，新华出版社，1999。

（二）中文期刊及论文

车效梅：《苏联对以色列建国政策透析》，《西亚非洲》2003年第4期。

高惠群：《苏联犹太人今昔》，《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4期。

郭宇春：《俄国犹太人研究（18世纪末—1917年）》，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郭宇春：《犹太人与俄国革命运动》，《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姜天明：《美英苏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的政策及影响》，《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4年第2期。

刘心华：《苏联境内犹太人问题的探讨》，《问题与研究》（台北）1986年第7期。

全克林：《英国与阿-犹冲突（1945-1949）》，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邵丽英：《俄国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发展趋势》，《西亚非洲》1999年第4期。

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宋永成：《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悲剧》，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唐裕生：《前苏联的反犹政策与犹太移民潮》，《世界民族》1995年第1期。

徐娅囡、吴建章：《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动机分析》，《当代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

杨曼苏：《苏以关系发展的历程》，《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

余建华、康璇：《苏联对犹政策的历史考察》，《史林》2007年第2期。

张建华：《简论苏联的犹太人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

赵克仁：《试析前苏联对以色列建国前后态度和政策的演变》，《西亚非洲》1993年第4期。

郑羽：《阵营对抗：冷战开始后斯大林的对外战略》，《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2期。

（三）中文专著及中文译著

〔俄〕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李惠生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

〔俄〕菲利克斯·丘耶夫：《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菲·丘耶夫日记摘编）》，刘存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列宁全集》6、7、8、9、10卷，人民出版社，1987。

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何宏江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

〔英〕马丁·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1933—1951）》，第二卷（上），周启朋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魏小明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斯大林选集》上、下，人民出版社，1979。

〔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哈全安、刘志华译，东方出版中心，2015。

谢华：《冷战的新边疆：美国第四点计划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4。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徐新：《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

〔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年：一部历史》，杨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杨辉：《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商务印书馆，2004。

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张倩红：《以色列史》，人民出版社，2008。

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时事出版社，2006。

后记

本书是在本人博士论文《苏联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基础上写成的，但侧重点放在冷战初期苏联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上。

从2005年选择这个课题作为我的研究方向到现在已经有16个年头。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曾得到我的两位博士生导师高毅先生和沈志华先生的悉心指导。2002年秋，我有幸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俄国苏联史方向硕士研究生，2004年转为硕博连读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高毅教授。由于我的第一外语是俄语，为了使我更好地发展，系里特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冷战史和国际关系史著名专家沈志华教授为我的指导老师，实际上负责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工作。因此，我非常幸运有了两位博士生导师。

高毅教授是一位宽厚仁慈的长者，他治学极为严谨，思想深邃，视野开阔，淡泊名利，多年来，他在思想和治学方法上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高毅教授有自己独特的指导学生的方法，强调用理论分析、研究和概括问题。我觉得这些年能在史学方面有些许进步，应归功于高毅老师的殷切指导。

本书写作的主要参考材料是苏联历史解密档案，在这方面，沈志华教授提供的帮助是十分重要的。多年来，他慷慨解囊，出资从俄罗斯购买收集档案材料，并把这些资料无偿提供给国内学者，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的苏联史研究，其高风亮节，在学术界有口皆碑。我衷心感谢沈志华教授多年来对我的严格要求。沈教授曾经说过，如果要写一篇1万字左右的论文，至少要看100万字的外文材料，做出10万字的摘要和读书卡片。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我接受了沈老师对我的严格史学训练，翻译了上百万字的俄文和英文档案文献资料。但是囿于个人天生愚钝，先生所教本领尚不能完全掌握，些许思考凝结在本书中，这不仅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更多的是沈志华老师的教诲。

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殷罡教授。殷罡教授是当

初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帮助我调整了论文的章节结构，并在语言和措辞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我博士毕业后，殷老师又引荐我加入中东学会。殷罡教授可以说是我工作后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进的重要领路人，而且殷罡老师还不辞辛劳为本书作序。

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金东吉教授（韩国籍），2007～2009年这段时间，和我讨论相关问题最多的就是金东吉教授，他为我介绍了当时国际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帮我拓展了思路，开阔了视野，在博士论文正式答辩之前，他甚至花了大量时间修改文章的语句和措辞，金老师真是我的良师益友。

特别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宋永成教授。当初我们的博士论文选题撞了车。后经协商，宋老师继续研究苏联犹太人问题，而我则专攻冷战初期的苏联与以色列关系。在英文档案和资料搜集过程中，宋老师为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多年来，每当我在研究中遇到问题或思路不畅，我总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宋老师，宋老师总是对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彼此已结下深厚的友谊。

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许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建华教授，他们在我写作过程中给我提供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正是他们的无私帮助才让我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了进一步思考，少走了不少弯路。

特别感谢我的合作搭档、本书的第二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6级博士研究生江艺鹏，本书的第四章和导论的部分内容由江博士完成，江博士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读硕士研究生时曾参与了我的课题，并为本书的完成付出了许多辛勤的劳动。

特别感谢本书的组稿编辑张晓莉女士、郭白歌女士以及责任编辑李明伟先生，他们为编辑我的专著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也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

特别感谢我的工作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正是由于单位的慷慨资助，本书才最终得以问世。

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工作的高暖学长，是她在美国留学时不辞辛劳在加州大学图书馆为我找到并复印了与本课题相关的一本法文专著，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

为我提供过参考意见、文献帮助和技术支持的还有中山大学梁碧莹教授、邱捷教授、袁丁教授、朱卫斌教授、温强教授、潘一宁教授、龙秀清教授、周立红教授、曾记老师、华南师范大学张来仪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姚昱教授、周娜老师、梁桂胜博士、东北师范大学詹欣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教授、翟韬老师、外交学院施展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吕雪峰老师、当代中国研究所徐铁杰老师、长春大学王洋老师、华北电力大学贺艳青老师、山西师范大学樊白玉老师、美国休斯敦的郭云霞女士、中山大学何启航同学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感谢双亲的养育之恩，尽管生活清贫却从不反对我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他们的教诲令我铭记终生。在我读博士和工作期间，妻子胡保华女士在教育孩子和家务劳动方面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不仅如此，她还帮我翻译整理了大量的英文资料，让我真切地体会到“相濡以沫”的含义。

从事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辛的事业，在这一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各位史学前辈、同行以及诸多朋友的帮助，没有大家的鼎力协助，就没有这部专著。在此，我真诚地向大家致以衷心的感谢！

肖瑜

2021年10月27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蜜月走向对抗：冷战初期的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研究：1948-1953/肖瑜，江艺鹏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1

ISBN 978-7-5201-9023-7

I.①从… II.①肖…②江… III.①苏联-外交关系-研究-以色列-1948-1953 IV.①D851.22②D83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86477号

从蜜月走向对抗

——冷战初期的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研究（1948～1953）

著者/肖瑜 江艺鹏

出版人/王利民

责任编辑/郭白歌 李明伟

责任印制/王京美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8 字数：223千字

版次/2021年11月第1版 202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9023-7

定价/12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54
装帧设计 / 王子君

From Honeymoon to Confrontation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Israel in the Early Cold War (1948-1953)

以色列是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下建立的，特别是苏联的支持更具有实质意义。以色列国建立后迅速获得苏联政府的承认。随后，苏以关系进入蜜月期，但双方关系从1949年底开始逐渐恶化，到1953年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二战前苏联政府为什么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战后斯大林为什么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莫斯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苏联和以色列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什么？作者在详细研究和解读近年来公布的俄罗斯、英国、美国和以色列档案文献的基础上，以二战后初期苏联和以色列关系发展变化为线索，逐步分析这些问题。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定价：128.00元

以公理争强权

顾维钧传

金光耀 著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家，给中国外交史留下了不应忘却的遗产」

公理 强权

启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金光耀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78年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学习，先后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和法学博士（国际关系）学位。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和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中华民国史》（第十卷，合著），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合编）等。

以公理争强权

顾维钧传

金光耀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留着辫子的顾维钧扶着自行车，一个晚清少年对新事物新风尚的追求



1920年，顾维钧作为中国出席国际联盟第一次大会的代表率团出席会议



巴黎和会前后的顾维钧



巴黎和会后，决定设立“国际联盟委员会”，中国入选，由顾维钧代表出席



北京政府时期穿外交礼服的顾维钧



1932年，顾维钧与国联调查团抵达大连。与他同走在前排的是英国人李顿爵士



1930年代初顾维钧与黄蕙兰在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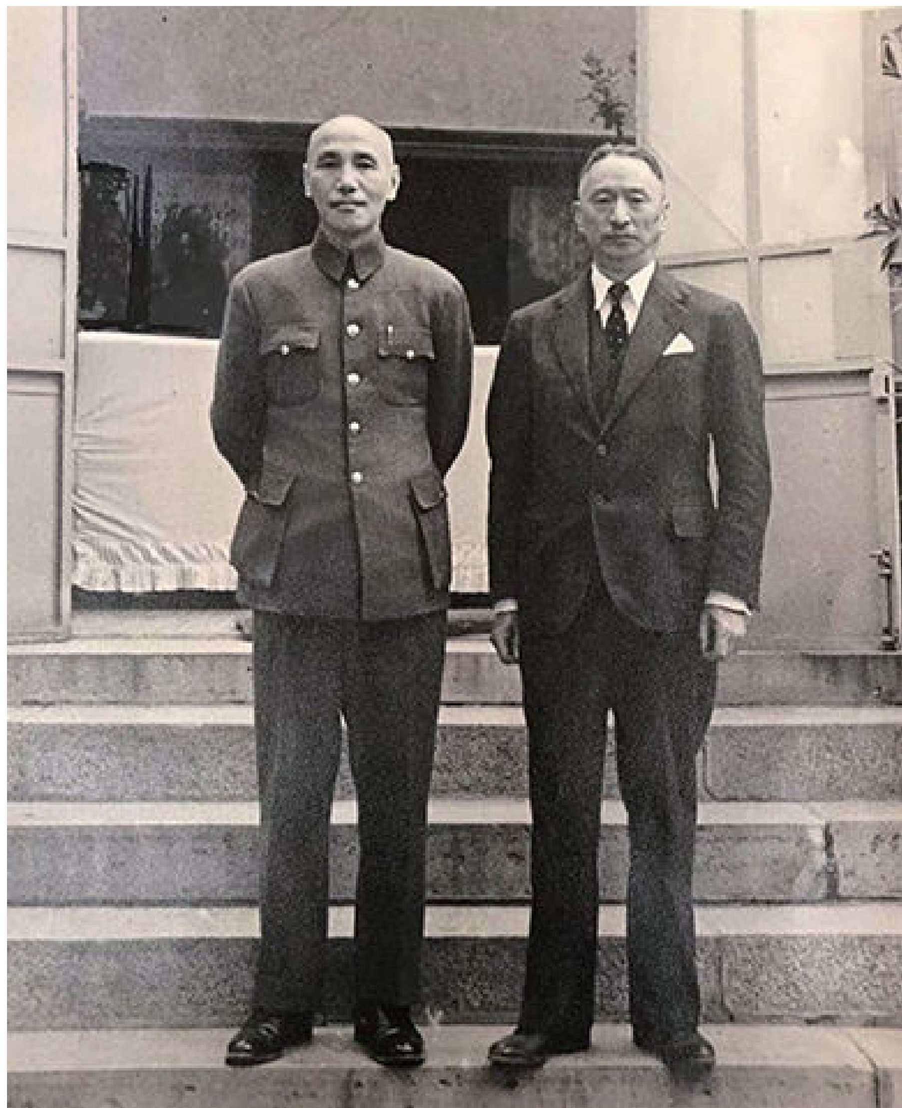
任驻法公使期间的顾维钧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美、英三国的首席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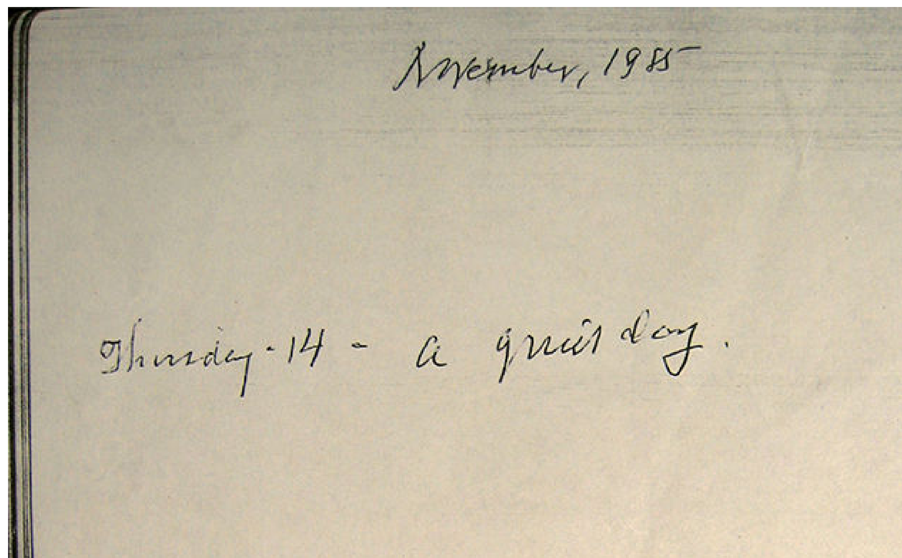
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



1940年代后期顾维钧与蒋介石



顾维钧在国际法院工作


November, 1985

Thursday · 14 – a quiet day.

顾维钧最后一天的日记



严幼韵向顾维钧做最后的告别

- 第一章 从黄浦江畔到哈德逊河边
    - 一 租界里长大的富家孩子
    - 二 校园中的明星学生
    - 三 留学生活动的先驱
    - 四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 第二章 外交界的年轻人
    - 一 初入民国官场
    - 二 “二十一条”交涉中的美国牌
    - 三 华盛顿最年轻的公使
    - 四 “远交美以制近逼之日本”
    - 五 未雨绸缪备和会
- 第三章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声音
    - 一 巴黎雄辩威名扬
    - 二 周旋于代表团内外
    - 三 拒签和约
    - 四 华府会议再发声
    - 五 山东问题的结局
- 第四章 北洋外交的主角
    - 一 出长外交
    - 二 解决中俄悬案
    - 三 终止中比条约
    - 四 申张主权
- 第五章 在派系政治的旋涡中
    - 一 外交官登上国内政坛
    - 二 内阁频繁更替中的总长
    - 三 依违于直奉之间的总理
    - 四 “外交系”中的派系政治
- 第六章 国难当头
    - 一 张学良的外交高参
    - 二 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
    - 三 国联调查团的中国顾问
    - 四 密谋改善中苏关系
- 第七章 抗日外交第一线
    - 一 在国联讲坛上
    - 二 驻节巴黎
    - 三 为抗战声辩
    - 四 争取国际援华
- 第八章 战时中英关系的推动者
    - 一 不和谐的盟国关系
    - 二 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
    - 三 新约交涉过险滩
    - 四 筹划宋氏兄妹访英
- 第九章 参与创建联合国

    - 一 对战后国际组织的期望
    - 二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 三 多党多派的中国代表团
    - 四 宪章签字第一人
- 第十章 重返华盛顿
    - 一 蒋介石委以重任
    - 二 尽心竭力争美援
    - 三 台前幕后忙游说
    - 四 自由主义者的无奈
- 第十一章 “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
    - 一 “一国三公”、四面楚歌
    - 二 朝鲜战争的冲击
    - 三 一波三折的“共同防御条约”
    - 四 心力交瘁别坛坫
- 第十二章 人间重晚晴
    - 一 国际法院法官
    - 二 婚姻与家庭
    - 三 月是故乡明
    - 四 民国外交的见证人
- 结语 “以公理争强权”的外交家
- 主要征引文献
- 后记

第一章 从黄浦江畔到哈德逊河边

一 租界里长大的富家孩子

顾维钧，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出生于上海。赴美留学及步入外交界后以英文名V.K.Wellington Koo而闻名于国际社会。

虽然出生在上海市区，顾维钧对自己的祖籍嘉定县（属江苏省，今为上海嘉定区）怀着浓浓的乡情，一生以嘉定人自居。

顾家祖上从昆山迁来嘉定，至顾维钧祖辈已成嘉定城中大户人家。顾维钧父亲顾溶，字晴川，1856年出生，自幼“资禀明达，性行笃淳”。[1]但顾溶刚懂事，家中就经历了剧变。1860年，太平军进占嘉定城，此后三年，多次进出。兵荒马乱中，顾溶的父亲被太平军抓获，并被索要赎金，顾家倾其家产将人赎了回来。但因监禁中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顾溶的父亲回家不久就去世了。顾溶的母亲邹氏与嘉定城中许多人一样，为避战乱，拖着年幼的儿子并怀抱着更小的女儿，逃往上海的租界。[2]

正如顾溶的墓志铭所言，“嫠母茕雏，资产如洗”，邹氏拖儿带女到上海后，只有依靠嘉定传统的刺绣手艺养家糊口，拼命地做针线活，在暗淡的油灯下干到深夜。大户人家的传统，使邹氏在为生计奔忙时也不忘督促儿子学习，只是家境艰难，顾溶学习的重点不是传统的诗书，而是“攻著作于计然”，期望着学点本事可以早点谋生，“托生涯于货殖”。[3]

顾溶14岁时进入一家杂货店当学徒。结婚成家后，他在岳父的报关行里工作，有了固定的收入，家境开始好转。但当顾溶23岁的妻子蒋福安刚怀上第四个孩子的时候，报关行因经济衰退倒闭，顾溶一时失去了工作。蒋福安为此十分担忧，她已经有了两男一女，生活的重压使她不愿再添孩子增加家庭的负担。她指望用某种民间偏方进行流产，但这一偏方并不见效。不久，顾溶有了更好的工作。因此，顾溶夫妇视腹中的第四个孩子给顾家带来了好运。顾溶有了新工作后，搬进了小南门梭子

弄的一幢大房子，第四个孩子顾维钧就出生在新房子中。

顾溶的新工作并不是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中说的在轮船招商局任事，这还要到几年之后。这份新的工作是在朱葆三的慎裕洋行管账，做总账房。出生于浙江定海的朱葆三年幼丧父，14岁时来到上海的五金店做学徒，靠着勤奋和聪明，逐渐被提拔为总账房和经理。后来自立门户，开办了慎裕五金店，店址最初在老城厢的新开河，后来搬到了紧挨着外滩的福州路13号，名称也改为慎裕洋行。随着生意规模的扩大，朱葆三要聘一个人做总账房，就找到了与自己年轻时经历相似的顾溶。顾溶没有辜负朱葆三的厚望，管账后得到了“账法精通，品行纯正”的好评。[4]

遇见朱葆三是顾溶人生的转折点。地处公共租界中心区域的慎裕洋行是人来人往的重要社交场所。顾维钧晚年仍然记得父亲在福州路的办公点是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各种重要人物见面的地方。[5]慎裕洋行紧挨着外滩9号轮船招商局的北门。1892年，顾溶得到盛宣怀的赏识，进轮船招商局，“年三十七，见器于武进盛公宣怀，不次擢之”。[6]顾溶的新职位是招商局新船“快利”轮的坐舱。“快利”轮是招商局专跑汉口—宜昌航线的，当时刚投入运营，排水量870吨，是航行于汉口—宜昌航线的四艘轮船中吨位最大的［另三艘是招商局的“固陵”轮（304吨）、太古洋行的“沙市”轮（811吨）、怡和洋行的“昌和”轮（677吨）］。坐舱负责轮船的客货业务，相当于乘务经理。顾溶与另一位坐舱林朝钧随“快利”轮首航抵达宜昌时，当地官商“以炮竹相迎”，“共放鞭炮二十余万响”，盛况空前。“快利”轮经营汉宜航线获利很大，到1900年，除去各项开销，“结余二十四万二千余金”。[7]但顾溶在“快利”轮干得并不十分愉快。在1895年给郑观应的一封信中，他抱怨说，“所有在船卖票、收交客位水脚银两及进退司事一切等，均伊（张午峰）一人经理，溶稍稍询问，即含糊答复”。另有他人给盛宣怀的信称，“张顾二人素不相能……同舟龃龉”。[8]

1901年，袁树勋出任上海道台。朱葆三为维护与官府的关系，将顾溶推荐给袁树勋，让顾帮袁主理财政，“辟掌支应”。顾溶很快就得到袁树勋的赏识，因理财成绩显著，不久就“晋三品衔”。上海道台要经手许多钱款，这些钱平时存放在哪个银号或钱庄，袁树勋并无定见，全听朱葆三的，因此那些银号钱庄的经理都要到慎裕洋行来找朱葆三，以至于当时有“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说法。顾溶在这之中自然起

了重要作用。1908年袁树勋升任山东巡抚，顾溶仍为袁做事，“办外海拯济”。[9]顾溶手头阔绰后，在家乡嘉定置田2300亩，捐出来办“承裕义庄”，为族中子弟办学，并赡养族中贫困者。袁树勋在1911年专为顾溶写了《嘉定顾氏承裕义庄碑记》，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10]在为袁树勋做事时，顾溶与盛宣怀的往来也没有中断。1909年，顾溶受盛宣怀委派任汉冶萍公司的查账董事。1911年5月，顾溶再次受到盛宣怀重用，出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总办，并加二品衔，任直隶候补道。[11]

从顾维钧出生到长成少年的过程中，顾溶从一个“账法精通”的账房先生，逐渐成为一个与盛宣怀、袁树勋这样的晚清重臣有密切关系的官商。其中，朱葆三的作用是关键的。因此，不管顾溶到哪里去任职，他与朱葆三的关系都没有中断过。1905年顾维钧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填写的顾溶的联系地址还是慎裕洋行所在的福州路13号（租界的中心区域）。[12]作为一个官商，顾溶不仅为顾维钧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他在政商两界周旋的丰富经历也对少年顾维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顾维钧漫长一生的最初16年，就是在上海租界内这样一个富裕的官商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与当时的富家子弟一样，顾维钧刚过了四岁就与他的二哥一起进私塾读书。[13]私塾在公共租界内苏州河北的唐家弄，离苏州河南的顾家约三里路。[14]顾维钧的启蒙老师姓朱，是一个参加了十多次科举考试却都落榜的老童生。私塾的学费每年六块银元。二十多名学生中年龄大的有十五六岁，顾维钧是年龄最小的。他从认字开始，后来读经书、背诗歌。不管学什么，朱先生都要求大声朗读。顾维钧在私塾读了六年，根植下对中国文化的亲近和热爱，也打下了传统学问的初步根底。以后他步入外交界，不仅以精通英语、擅长英语写作和演讲闻名，处理中文文书也得心应手，这是得益于私塾的训练，也是他与有些留学生的不同之处。直到晚年，他还能随口诵读几十首唐诗。[15]

在私塾读了六年后，顾溶认为顾维钧应该有更好的老师，集中精力读经书和八股文章，走传统的科举道路，重振顾家门风。此时的顾溶已在上海政商两界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位官员正好为自己的子女请了一位有名的学者做家庭教师，顾溶就将顾维钧送到这位朋友的家中。这所家馆的老师严厉而无情，整个氛围与原先的私塾截然不同。顾维钧一踏进去就不喜欢，虽然顾溶让轿夫押着他去了几天，但最后不得不顺从顾维钧的意愿，允许他回到原来的私塾去。

1898年，顾维钧听从姐夫蒋昌桂的建议，进入设在公共租界昆山路的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预科学习。这是在沿海地区刚兴起的新式学校中的一所，由基督教公理会开办。与传统的私塾不同，课程中有英文、算术、地理等，教师中有刚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顾维钧在中西书院住读，每周一上午父亲顾溶陪他一起从家中出发，到福州路13号后，父亲去慎裕洋行上班，余下的一半路程他由仆人送去，每周六坐黄包车回家。[16]刚过十岁的顾维钧在这所学校开始学英文，接触西方文化，并显示出在学习上的天赋。在同学中，他年龄最小，但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尤其在班级的英语拼字比赛中，总能拔得头筹。入学一年后，在全校350名学生的各科考试中，顾维钧的总成绩是第八。而他却不满意这个成绩，因为数学考卷中少写了两个数字，否则可以排名第一的。[17]

1901年1月，顾维钧又一次听从姐夫蒋昌桂的劝说，去考圣约翰书院。在等待考试成绩时，他又去报考了南洋公学。发榜时，他被两所学校都录取了，而他最终选了圣约翰书院，3月入学。[18]

圣约翰书院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1879年创办的教会学校，教师主要由美国人担任。1891年正式成立大学部，为中国最早提供现代大学课程的学校。因此，有学者称，“中国之有大学，自教会大学始。中国之有教会大学，则自圣约翰大学始”。[19]

顾维钧进圣约翰书院时刚过13岁，读的是预科。虽然已办了20多年，但书院招收的学生并不多。在顾维钧入学的前一年，书院读正科（即大学）的学生一共43人，读预科的学生一共125人。因为学费昂贵，学生都来自富裕人家。预科学生中家庭出身为商人的有80人，学者的有25人，牧师的有20人。[20]规模不大的圣约翰书院是一所人才荟萃的学校，民国年间许多外交官如施肇基、严鹤龄、宋子文等都在这所学校学习过。而顾维钧的老师中有刚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回国任教的颜惠庆，顾维钧上过他的英文翻译课。[21]颜惠庆后来与顾维钧一样，也担任过民国政府的外交总长。在这所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里，顾维钧对美国有了最初的了解。

顾维钧在中西书院和圣约翰书院读书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成之时。甲午战争的失败、义和团事件后《辛丑条约》的签订，是晚清历史上十分沉重的篇章。在租界中长大的顾维钧，对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特权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在中

西书院读书时，有一个周六，他像往常一样坐黄包车从学校回家。过外白渡桥上桥时，车夫拉得很慢，跟在后面的一辆马车上的英国人急着要去跑马场赌马，嫌黄包车挡了他的道，就用马鞭抽打黄包车夫。顾维钧气愤地回头用英语斥责这个英国人："你是绅士吗"（Are you gentleman）？顾维钧知道对英国人来说，这是很严厉的斥责。每次来往学校要经过外白渡桥南边的外滩公园，他看见公园有不准华人进入的规定，认为英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气焰太嚣张。[22]

到圣约翰书院读书后，顾维钧骑自行车到地处梵王渡的学校去。一次，骑自行车的顾维钧为避开马路上的车辆，在静安寺路上跟着一个英国男孩骑上了人行道。英国警察放过了前面的男孩，却将他扣下了。同样骑车，却面临不同的处理，仅仅因为前者与警察一样是英国人。这件事对少年顾维钧有很大的刺激。晚年手书回忆录提纲时，他将这件事和外白渡桥的事列为读书期间不能忘记的两件事，并在与记者谈到外白渡桥那一幕时说，这让我觉得一定要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23]民族主义意识就这样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

20世纪初，即使在上海的租界内，自行车也是一件奢侈品。顾维钧有一张手扶自行车在照相馆拍的照片。照片中的顾维钧留着当时中国人都有的辫子，穿着长衫，左手夹着一顶中式礼帽，脚穿一双布鞋。留辫子的少年手扶新潮的自行车，十分形象地反映了生在传统社会的顾维钧对新事物、新风尚的追求。另有一张照片，顾维钧头戴西式宽边礼帽，身穿一套深色西服，上衣敞开着，白衬衫上映着花格领结，脚穿一双白皮鞋，一副洋场少年的派头。这几张照片，都有"宝记Pow Kee"的馆铭。"宝记"是晚清民初公共租界内最有名的照相馆，老板叫欧阳石芝，是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学生和同乡。当时去"宝记"拍照是上海滩富商和文人的时尚。这显示出租界生活对顾维钧的另一层重要影响，即西方文化对一个十多岁少年的示范效应，以及由此导致的他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和接受。在租界和教会学校的氛围中，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与民族主义意识同时进入顾维钧的心中，交汇融合，形成一种能够包容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意识。这在顾维钧年少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不会褪去的底色。

顾维钧入圣约翰时，学校为顺应社会潮流，聘请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中国教师。顾维钧的中文教师就是一位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新派人物，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派主张。十来岁的顾维钧对社会变革和

政治运动缺少深刻的理解，但像同时代大多数受到新思想影响的读书人一样，他已经开始向往变革。他在晚年回忆时说，“主要是由于新教师的思想的缘故，我和我的同学越来越感到需要变革。但这里所说的变革，并不是政府机构的变革，也不是重大政治制度的变革，因为我年岁太小，对这些还不能理解。我们只是感到有些事不对头，需要新方法和新思想”，“模模糊糊地希望维新运动能够成功”。[24]

20世纪初，正是近代中国留学运动蓬勃兴起的时期。由于得风气之先，圣约翰书院中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到国外去求学。这对向往西方文化的顾维钧有着很大的影响。他的同班同学施炳元和施赞元也准备出国留学，并劝他同行。施家兄弟有一个叔叔叫施肇基，1887年入圣约翰书院学习三年，后来赴美学习，获得康奈尔大学的学位，此时已在晚清政府中任职，被期望出国留学的学生视为成功的榜样。去国外接受正规西方教育的渴望，使顾维钧决定与施家兄弟同行。

顾维钧的母亲极力反对，她不明白儿子为什么要远渡重洋去异国他乡学习。顾溶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商人，并不反对儿子出洋，并允诺承担儿子赴美留学的费用。虽然与顾溶相识多年的两江总督端方提出要为顾维钧提供官费，但被顾溶婉言谢绝了，他认为官费应给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学生，而他自己能承担这笔费用。[25]决定出国后，顾维钧找裁缝做了几套西服，这使他很兴奋，因为这是属于他自己的西服，以后照相不用再穿照相馆提供的西服了。他还去理发店剪掉了辫子，理发师在动手前反复问他是否真的要剪掉，最后收了他双倍的价钱。临行前，顾维钧全家又去了“宝记”照相馆，顾维钧和两位兄长一起与父亲母亲各合影一张。顾维钧留着平头，一身西装，系着领带，而他的父亲和两位兄长的后脑都拖着辫子，穿着传统的长衫。这正是20世纪初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在一个传统家庭中的投影。年轻人向往变革，要去国外见世面，而年长的迈不开步子，还停留在传统社会中。顾维钧的母亲在“宝记”合影时神色安详，但到他离家的那一天，她哭喊着拉着他不让走。[26]

1904年9月8日，顾维钧还未从圣约翰书院毕业，就与几个同学一起乘坐“蒙古”号（Mongolia）轮船离开上海赴美国留学。[27]虽是自费留学，但他与湖北省的官费生同行，由圣约翰的前辈学长、担任湖北留美学生监督的施肇基带队。

这里有必要将顾维钧与施肇基两人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放在一起做一番考察。顾维钧在上海租界内长大，而施肇基的家乡在离上海不远的吴

江县。上海在19世纪中叶开埠后取代广州，迅速成为中外交往的中心城市，在这一华洋杂处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耳濡目染，不仅对对外交往不觉陌生，而且还有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从家庭出身看，顾维钧的父亲是个官商，施肇基则出身于一个丝商家庭。两人的家庭不仅生活富裕，而且父辈都因经商与外国人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外面的世界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从所受教育看，他们在少年时就得风气之先进入圣约翰书院接受西式教育，然后又都到美国留学。顾维钧与施肇基的这些相同之处，也是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中国外交官的共同点。多年以后，顾维钧与施肇基自然就成为中国外交界的同事。

二 校园中的明星学生

施肇基留学时在康奈尔大学学习，于是就将他带的这批学生都安排在位于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附近。顾维钧与另一位中国学生孙嘉禄进了坐落在蒙图尔瀑布村的库克学院学习语言和预科。

1904年10月，施肇基将顾维钧和孙嘉禄带到库克学院，交给校长诺顿（A.H.Norton）。多年后，诺顿十分骄傲地谈起这一天，因为施肇基和顾维钧这两位后来成为中国驻美国大使的中国人同时来到了他的学校。[28]诺顿见到顾维钧问的第一句话是，“你为什么来美国学习？”顾维钧的回答直截了当：“我来这里要通过学习成为一名政治家。”[29]

库克学院是一所男女合校的农村寄宿学校，面向附近村庄的居民。一年的学费包括食宿是900美元，这在美国是很便宜了，但折算成中国通行的白银约1200两，足够一个中等家庭十年的开销。

诺顿非常热情地接受了中国学生，但一些从未见过中国人的师生却另有看法。有一名女教师见到中国学生入校，曾考虑辞职不干，但在几个月后，顾维钧和孙嘉禄的刻苦学习和出色成绩使她改变了想法，反而希望美国学生都能像中国学生一样努力学习。有一些美国学生联合起来，给校长诺顿发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说如果学校不让中国学生走，他们就离开学校。诺顿的回答是：“我很抱歉你们想离开，因为我希望你们愿意留下；但我想，你们不得不收拾行李走人，因为那些中国孩子将留下。”最后那些美国学生不得不改变主意，没有离校。其中一个叫帕克·布朗的学生多年后写信给诺顿为此事道歉，并为有顾维钧这样出色的同学而感到高兴。[30]由于整个学校，实际上也是整个村庄，只有顾维钧他们两个中国人，这为他们提供了学语言的良好环境，加上学习刻苦，他们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顾维钧和孙嘉禄都以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原定两年的预科学习任务。

预科毕业前夕，顾维钧面临着学什么专业和去哪所大学的选择。与他同在库克学院的孙嘉禄准备去康奈尔大学学工程，并极力劝说顾维钧与他同去。孙嘉禄的理由是中国需要大批工程师建造铁路和桥梁，而做工程师也是一个生活有保障的职业。但顾维钧的志向是学政治学和外交学。顾维钧之所以具有这一志向，是因为想为国家做些有益的事，而在上海这座近代中外交往最密切的城市所亲身感受到的外国人根据不平等

条约在中国所享受的种种特权，使他想在外交方面做些事情。父亲在这方面对他也有影响，顾溶希望他能够进入政界。决定学外交和政治后，顾维钧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还在圣约翰书院学习时，顾维钧就仰慕哥伦比亚大学的名声，知道这是一所著名的大学，它的国际政治学科十分有名；他还知道学政治学的严锦荣是第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库克学院学习期间，他翻阅过哥伦比亚大学的介绍，发现上面所列教授的名字有不少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因此认定这就是他应该去的学校。[31]

顾维钧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考试，通过后被哥大录取为新生。在口述回忆录时，顾维钧说，入学考试除了化学其他各科都及格，但他显然记错了。根据成绩单的记录，入学考试并没有考化学，没有及格的是英语阅读和历史科目中的古代史两门，通过的科目有英语、英国史、美国史、德语和包括代数、几何、三角函数在内的数学。[32]

1905年9月，顾维钧开始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所常青藤名校的学习生活。20世纪初，美国国内种族歧视还很盛行，排华风潮在各地尤其是西部屡见不鲜。相比之下，坐落在纽约哈德逊河边的哥伦比亚大学却以友善的态度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而不管其肤色和种族。纽约是一座国际化的移民城市，就城市气质而言，中国的城市中上海与其最为接近，在租界中长大的顾维钧对哥大和纽约的环境不会陌生。也正因为此，20世纪上半叶有许多中国留学生来到这所著名的大学学习。入学半年多后，《纽约时报》报道了哥大学生群体的多样性，顾维钧与其他3位分别来自南非、伊朗和印度的学生被作为国际学生的代表报道。这篇文章称他“只有17岁，但他的想法在许多方面比一些年长的美国同学还要开放和民主”。[33]因为这种国际化的氛围，顾维钧一进哥大就有“回家”之感，从未感到有何不适。

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教育水平很高，顾维钧入学时虽然还没有后来享有盛誉的核心课程，但他接受的就是典型的通识教育。第一学年的课程都是必修的，包括英语、历史、物理、德语、哲学、化学、体育、数学、法语和生理学，这充分反映了哥大本科教育的特点。[34]第一学年的英语课有两门，其中一门是朗诵课，顾维钧修读了两个学期，这门课为他参加演讲和辩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35]

虽然在圣约翰书院时接受的已经是美国式的英语教学，但进入哥大这样的顶尖大学学习，顾维钧开始还是不能完全适应。第一学期五门课

程，一个B，三个C，一个D。但他的学习能力很强，第二学期八门课，已经是一个A，四个B，三个C了。哥伦比亚大学有一规定，攻读文学学士学位的学生必须修拉丁文甲班的课程，这一课程是以在中学学过四年拉丁文为基础的。而顾维钧从未学过拉丁文。为了能修这门课以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利用一年级升二年级时的暑假开始学拉丁文，结果用六周的时间学完了中学四年的课程，取得了修课的资格。一年后，他在拉丁文甲班的考试中得了A。[36]

第二学年开始，顾维钧的课程除英语外，集中于历史、政治和经济，因为他希望以国际法和外交为主修目标。他选修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Beard）教授的三门课：1832年改革法案前的英国史、美国政党和比较政治学。比尔德此时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在哥伦比亚大学刚开始他的教学和研究生涯，日后他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顾维钧参加了比尔德组织的模拟美国政党全国大会，学生按州分成不同的代表团，每个代表团提名自己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顾维钧被指定在模拟共和党大会上发言，提名当时的众议院议长坎农为总统候选人。这一经历使他能够更好地理解比尔德教授在课堂上讲授的美国政党制度。教顾维钧欧洲大陆史的老师是肖特威尔（James Shotwell），他在巴黎和会时是美国代表团的顾问。[37]

在三年级的时候顾维钧修满了大学本科四年所需的学分，1908年9月新学年开始时，他注册为政治系的研究生，主修国际法。根据学校要求，需要有两个副科，顾维钧最初选了罗马法与比较法学、古代史，后来将后者改成了宪法。哥伦比亚大学在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方面拥有一支一流的教师队伍，为继续深造的顾维钧提供了一个优良的学习环境。攻读硕士学位时，讲授宪法和行政法的教授是后来担任过袁世凯顾问的古德诺（Frank Goodnow），顾维钧对他的评价是“一位第一流的教师”，经常向他请教。[38]讲授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课程的都是当时具有国际声望的著名教授。这个一流的师资阵容使顾维钧获得了以后作为一个优秀外交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理论和学术素养，也使他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深受他的美国老师的影响。在哥大读书期间，对顾维钧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授穆尔（John Moore）。顾维钧80多岁的时候，有人问他，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谁？他回答说是穆尔教授。[39]穆尔是国际法权威，编有多卷本的国际法巨著《国际仲裁》，当时有不谈穆尔就不用谈国际法的说法，而且他还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担任过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其间处理过与中国相关的

事务，如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权利主张和中国对美国排华法案的不满。[40]不过因为生病请假，1908年和1909年的两个学年穆尔没到学校来。顾维钧的硕士学习是在顶替穆尔讲授国际法的斯科特（George Scott）的指导下完成的。[41]

顾维钧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卡尔德拉”号案件的历史与法律》（History and Law of the Case of Caldera）。[42]“卡尔德拉”号是一艘挂智利国旗的三桅帆船，1854年10月在九龙附近的一个海湾遭到海盗抢劫，中国地方当局获悉后抓捕了海盗，并缴获了部分货物。船上的一些货物属于美国人，并在美国投了保。1858年底，美国投保人通过美国公使提出了损失货物的索赔要求，尽管美国政府指定的负责调查美国商民损失的两名委员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见，美国驻华公使还是支持了索赔要求，支付了5万多美元。这笔钱来自1858年中美上海谈判时商定的清政府给美国的赔款。顾维钧研究的就是半个世纪前发生在中美两国间的这件外交和法律案件。这篇约5000个单词的硕士论文就像一篇法庭上的辩护词。在仔细梳理事件过程的基础上，顾维钧引证国际法和中美间的条约，逻辑严密地论证道，“卡尔德拉”号案件完全是一起海盗事件，因此中国政府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美国没有条约权力就发生在一艘智利船上的案件向中国提出任何要求；中国政府获悉情况后立即逮捕并惩处了海盗，并缴获了部分货物，所以没有任何责任。论文的结论是：中国政府不应支付损失货物的赔款。[43]这篇论文的选题表明顾维钧对近代中外关系的重视，他学国际法的目的十分明确。整篇论文显示了顾维钧对国际法和其他法律文件的掌握和运用，也显示出他在校园辩论和演讲比赛中锻炼出来的论辩能力。他后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严谨、雄辩、注重法理的演讲风格和处事能力在这篇硕士论文中已初露端倪。论文写作期间穆尔还在病假中，但论文中引用了穆尔的《国际仲裁》，可见穆尔对顾维钧的影响。

1909年6月，顾维钧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当他与1909级的同学一起高兴地参加本科毕业典礼时，他比同学们多了一个硕士学位。顾维钧此时已是哥大校园中的明星学生。他的名声不仅在于作为一个外国学生，用同样的时间多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更在于他在专业学习之外，踊跃参加课外活动，显示出过人的精力和才干，在校园中引起广泛的关注。

1905年11月，入学不久的顾维钧就申请参加了新生辩论协会。

1906年1月，该协会组织辩论赛，辩题是排华法案是否利于美国。顾维钧与其他两个美国同学组成队伍作为正方，最终赢得了比赛。这是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赢得的第一次辩论赛，是他成为辩论明星的开始。当时，同为常青藤名校的哥伦比亚、康奈尔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每年要举行一次三校辩论赛。1908年，顾维钧通过校内竞争获得了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三校辩论赛的资格，成为第一个参加这项传统赛事的中国学生。因此，哥大代表队一到比赛地康奈尔大学所在的伊萨卡，就引起当地报纸的关注，舆论对这位中国学生评头论足道："穿着得体，一身棕色的西装配着棕色的格子真丝领带，插着琥珀色的领带夹。他的英语几乎没有外国口音。他的整个打扮与在美国通常看到的中国人甚至是中国的上层人物形成了明显的对比。"[44]这场辩论赛的辩题是国会是否应该要求所有从事跨州业务的公司持有联邦许可证，哥伦比亚大学作为反方，顾维钧担任二辩。哥大最终战胜了康奈尔。但伊萨卡当地的报纸对顾维钧的两位队友的表现评价不高，一辩表现"紧张"，三辩"没有做出所需要的有力的总结"，对顾维钧却不吝赞美之词："顾是哥大队表现最好的人。顾对英语的掌握出奇的好，讲得流利轻松。他表现优雅，虽并非总是充满说服力。他的反驳十分得体。"[45]

辩论队获胜不仅在哥大校园内赢得一片赞扬和欢呼，也吸引了纽约当地报纸的报道。销量最大的《太阳报》采访了凯旋的顾维钧，刊出了半版的专访。顾维钧回答了为何如此执着于辩论赛以及辩论与自己今后职业生涯的关系："一个人需要通过学习和写作积累自己的词汇量。如果一个人考虑以后投身公职，没有什么比参加大学辩论赛所获得的素质对他的帮助更大了。"细心的记者注意到顾维钧在谈自己的获胜之道时，并没有去贬低对手，因此这样来描写他："他像一个老派的外交官。虽然他正准备在现在的学校继续攻读法学的研究生学位，但他承认——他很少的几个承认中的一个，因为他并不总是直接回答——最终会进入外交界服务。"[46]

顾维钧还对当报纸编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份学生自己编辑的校报《哥大旁观者》（*Columbia Spectator*）。这是美国校园中历史最悠久的校报之一，负责向全校师生报道学校的各种新闻，并登载师生所写的评论文章，是哥大师生了解本校各种活动的主要渠道。二年级时，顾维钧申请进《哥大旁观者》做编辑，被编辑部选中录用，从副编辑开始，一步步做起，到1908年4月被选为《哥大旁观者》的总编辑，成为美国大学校报中首位担任总编辑的

中国人。一个月前刚因辩论赛专访过顾维钧的纽约《太阳报》马上报道了这一新闻，称这个具有卓越才能的辩论者是哥大校园中最有人气的学生之一。[47]

担任总编辑后，顾维钧与编辑部的同学一起改进校报，特别是增加了对教师的报道。这一改进引起了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as Butler）的关注，他专门给顾维钧写了封信，称赞他和他的同学们的工作，并说整个校园都在赞赏校报新编辑部成立后出现的变化。顾维钧后来回忆总编辑的工作时说，“这段经历是很有益的。它确实大大有助于我提高写作能力和密切与同学的关系”。[48]后来做外交官时，顾维钧善于与媒体交往和周旋，与他在校园中办报的经历有关。

除辩论和编报外，顾维钧还积极参加校园中其他很多活动。他通过竞选成为由7名学生组成的学生代表委员会的一员，这个委员会是代表全体学生与学校行政当局打交道的。在这样的竞选中，他学会了与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打交道，以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只要有人来向他拉票，他都同意，但要求对方也投票给他。顾维钧还参加了戏剧社、语言社、法语协会、基督教协会、棋社、田径协会、曲棍球协会、赛艇协会等许多社团的活动，并在二年级生节庆表演中登台演出。作为哥大的一名优秀学生，顾维钧获得机会参加了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家宴，两人就政治哲学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互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日后顾维钧出任中国驻美公使时与担任总统的威尔逊建立密切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顾维钧以一个外国留学生参与这么多的校园活动，并担任了一些重要的工作，确实显示了他的才干和在校园中的影响。而这些课外活动也锻炼了他的组织才干和公关能力，这是一个外交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哥伦比亚大学是常青藤名校，学生大多来自美国精英阶层家庭。与这些学生一起学习和参加校园活动，是顾维钧了解美国社会的主要渠道，他对美国的认识主要是通过精英阶层获得的。成为外交官后，他与美国政府、媒体等各界人士交往自如，与这段学习经历密切相关。

哥伦比亚大学宽松的氛围和顾维钧自己的努力使他完全融入了美国的校园生活，因此哥大校长巴特勒称赞顾维钧是外国学生中善于适应新环境的典型。比尔德教授告诉纽约《太阳报》，顾维钧是“这所大学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多年后，当顾维钧的儿子进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校方还称他是哥大历史上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49]确实，在这所常青藤名

校中，顾维钧毫不逊色于美国本土最优秀的学生。

三 留学生活动的先驱

20世纪初顾维钧留学美国期间，正是中国留美学生人数快速增长的时期。顾维钧到美国的前一年，中国留美学生才50人，到1911年已增长了十多倍，达到650人了。[50]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近代中国变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感，使留美学生产生了结社的愿望。在美国最早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是旧金山、伯克利等地的留学生于1902年在旧金山成立的“留美中国学生会”，此后美国东海岸的中国学生也成立了留学生组织。[51]

顾维钧积极参与了中国留美学生的社团活动。1905年他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就担任了纽约中国学生联谊会的主席。那年冬天，清政府派出考察西方立宪政治的五大臣考察团来到纽约，顾维钧代表纽约的中国学生欢迎考察团，陪同他们参观哥伦比亚大学，考察团的随员中有带顾维钧到美国来的施肇基。[52]

美国东部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是在1905年8月成立的，顾维钧成为东部学生会成立后创办的会刊《中国留美学生通讯》（*Chinese Students' Bulletin*）的主编。1906年8月，东部学生会在麻省的阿默斯特举行第二届年会，顾维钧担任年会的议程委员会主席，参与了年会的组织工作。从这次年会一直到留学结束回国，除了1908年的年会，顾维钧参与了东部学生会每届年会的组织工作，担任了东部学生会的一些职务，帮助处理了许多事务。1906～1907年，除继续负责《中国留美学生通讯》的编辑工作外，他还担任东部学生会的英文秘书。1907年8月，在麻省的安多弗举行的第三届年会上，顾维钧以英文秘书的身份做工作报告。这次年会后，《中国留美学生通讯》改名为《中国留美学生月刊》（*Chinese Students' Monthly*），顾维钧担任主编。《中国留美学生通讯》篇幅有限，改成《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后内容大为扩展，成为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影响很大的刊物。后来，他还主持过东部学生会章程的修改。1910年8月的第六届年会上，顾维钧当选为东部学生会主席，并最终于1911年促成了美国东部、中西部、西部的中国学生会合并成统一的中国留美学生会。[53]1910～1911年，在担任东部学生会主席，并作为《中国留美学生月刊》顾问期间，顾维钧处理了900多封信，可见他对学生会工作之投入。在结束任期的述职报告中，顾维钧特别强调，在参与学生会活动的过程中，学生会成员学得了美国文明的基本精神，即

服务与真诚的合作，而学生会乃至中国的未来都将建立在此基础之上。[54]这是顾维钧对学生会工作的总结，也是他自己多年参与学生会工作的体会。这一工作使顾维钧在留学生中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譬如后来也做外交官的王正廷这一时期也是学生会的积极分子，他和顾维钧在学生会的工作有交集。

顾维钧没有参加东部学生会1908年暑期的年会，因为这一年的暑假他回国了。这是他留学美国4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父母急切地希望他回家，主要是关于他的婚姻问题。还在顾维钧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按习俗为他安排了亲事，办了隆重的订婚仪式。但顾维钧没有也不可能见到他的那位未婚妻，年少的他对父母的安排还不太理解，以一种局外人的心态看待这件事。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顾溶来信，希望儿子回家成亲，说他们兄弟姐妹五个，就只剩他一个还没成家了，作为父亲，这成了自己的心病。接受了新思想的顾维钧当然不愿接受这桩老式婚姻，但在父亲和大哥的反复催促和劝说下，决定回家一次。

回到上海家中后，顾溶坚持要他立即结婚，在儿子回绝后开始了绝食。大哥顾维新也来劝说。在这样的压力下，顾维钧只得屈从，对大哥说，既然父亲把这事看得这样严重，他当然不想使父亲不愉快，甚至生病，表示愿意履行结婚仪式，以使父亲高兴并顾全其面子。[55]新娘是上海滩上的名医张聋髯的侄孙女，与顾家可谓门当户对。传统的婚礼仪式办得很热闹，但新婚第一夜顾维钧却睡到了母亲的卧室里。回美国时，顾溶一定要儿子将新娘一同带去，否则不许他走。顾维钧不得不再次屈从于父亲的意愿。

到了美国后，顾维钧就有了主动权。抵达纽约的第一天，他就将新娘送到了一百多公里外的费城，让她住在一个美国家庭中学英语。每逢假日，他会到费城去看望她，像朋友一样见面。按顾维钧自己的话说，两人真正做到了以朋友相处。在她来到美国一年，对美国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后，顾维钧正式提出了离婚的问题。她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局。此后，她继续留在美国学习了一段时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才回国。临行前，顾维钧还去为她送行。顾维钧的第一次婚姻就以这样一种尚属友好的方式结束了。[56]

顾维钧面临的婚姻问题在20世纪初的留学生中并不罕见。同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又都在美国做过外交官的胡适和蒋廷黻，

也都是幼年由家庭安排订了婚的。胡适与顾维钧一样是12岁订婚，蒋廷黻更是在5岁就订婚了。胡适在留学时与美国女子韦莲司（Edith Williams）坠入情网，但最终服从母亲的意愿与传统乡村女子结婚。蒋廷黻到美国后给父母写信要求解除婚约，最后以不同意就不回国迫使父母让步，并通过自由恋爱与留美女生结婚。[57]这三位哥大博士，胡适没能摆脱旧传统，蒋廷黻毅然决然地追求新生活，顾维钧则通过迂回的方式挣脱了传统的束缚。

1908年回国省亲返回美国不久，顾维钧就经历了留学生涯中对他日后人生道路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件事。年底，清政府派遣的奉天巡抚唐绍仪以专使大臣名义到达华盛顿。唐绍仪此行是为答谢美国政府将庚子赔款核减额退还中国，他还希望趁此机会来接洽东三省借款，探寻与美国在东三省合作的可能性。唐绍仪访美使得中美合作和结盟一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被美国媒体问到对此的看法时，顾维钧说，暑假回国时，他遇到的政商两界人士就鼓励他在美国尽力呼吁两国的合作。他认为这样的合作能使中国进步得更快，美国的对华贸易也能从中获益。“中国人单纯、率真，做生意和在政治上交往都很诚实。他们不会用外交来欺骗，不像某些邻近的岛国，嘴上说要做这件事，实际上却想着并正在做另一件事。”[58]这是顾维钧在美国媒体上对中国外交事务最早的表态，其中表现出的对中美友好的期望和对日本的厌恶是他以后几十年外交活动的基调。

唐绍仪本人是中国最早的官费留美学生，即120名留美幼童之一，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因此对留美学生十分关注。访美期间，他提出邀请104名中国留学生作为他的客人来华盛顿度圣诞节假期。作为留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顾维钧在被邀之列。被邀留学生的名单是中国驻美使馆秘书颜惠庆确定的。[59]唐绍仪邀请留学生来使馆，是为了认识并了解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国的未来需要他们。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在使馆的欢迎宴会上，唐绍仪鼓励留学生们努力学习，回国后将大有作为。顾维钧被一百多名留学生推选为代表向唐绍仪致辞答谢。顾维钧简短的发言得到唐绍仪的赏识，他当面称赞他的发言，并向他表示祝贺。这次与唐绍仪的见面成为后来顾维钧进入民国外交界的重要铺垫。在华盛顿期间，顾维钧与中国留学生在唐绍仪的带领下去白宫见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60]

从华盛顿刚回到纽约，就传来袁世凯被清政府罢免的消息。因为刚

与唐绍仪见过面，知道唐与袁之间的关系，暑假回国对国内情况也有所了解，顾维钧认为袁世凯以及他周围的一批人是代表中国未来方向的“进步政治家”，所以在美国记者问到他对袁被罢免的看法时，他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袁世凯的同情，认为袁世凯和围绕在他身边许多能干的人推行的新政成效明显，要退回到过去是荒谬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61]

顾维钧晚年在回忆留学生活时谈到，中国留学生不属于任何党派，很少表达政治见解，但他们关心祖国的前途。[62]对袁世凯被罢免的表态就是出自这样的关心。在哥大求学期间，顾维钧与到纽约的孙中山有过一次见面，也表明了他对政治人物的关注与党派无关。他后来回忆了与孙中山的这次见面：

> 那时我正在哥大读政治学，在阿姆斯特丹大道的一幢学生宿舍里。除了卧房外，我还有一间小小的书房，内有书橱数件，满藏中西文书籍。我记得孙先生一进来以后，对书非常注意，对我的中国书、外国书，四面八方看得很有兴趣。到了晚上七点多钟，是吃晚饭的时候了，我就请孙先生和我这位江同学到一百廿五街去吃中国饭。饭后他想回我那里去谈谈，就一同再到我的宿舍去，一谈就谈到十二点半的样子，他的兴致一直很好。——他一共耽搁了三天。第二天又到我那里来，另一位在哥大研究矿学的郑先生，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和前天一样吃过晚饭后再作长谈，非常尽兴。第三天他就走了。我觉得他的确是青年的领袖，他虽然岁数比我们大——那时他已有四十多岁了！可是他的见地，他的热忱，都是和我们青年一样的。[63]

顾维钧关于中国国内政治消息的来源主要是美国的报纸。他曾受《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之邀，帮助该报翻译有关中国的电讯中所涉及的复杂事态和人名、官衔等，编辑也常常会问他对消息可靠性的看法。这不仅使他得以更详尽地了解国内发生的一切，也使他与美国报社的编辑有了直接接触，了解美国报纸的运作。后来顾维钧在北京政府外交部任职时十分重视外国报纸的作用，并善于与外国记者交往，这与此一经历是分不开的。

因为有自己办报和帮美国报纸翻译的经历，顾维钧还主动给美国报纸写稿，向美国读者阐述他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看法，尤其在辛亥革命后，直面美国媒体关于中国局势的错误报道和评论。1912年1月2日，顾

维钧给纽约《太阳报》投过一封信，针对美国报纸上出现的中国应该先行君主立宪制然后再发展到共和制的主张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中国不必像那些报纸所主张的那样由君主制经君主立宪再走向共和制，这与美国自己的政治制度也不相符。美国媒体不能因为中国人民总体上不如今天的美国人民开明，而对中国人民建立共和政府的热情冷漠对待，视而不见。他充满感情地指出，中国人民正在做美国人民在1776年、1781年、1789年所做的一切，努力为共和政体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64]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留美学生会为推动赞同民国的舆论成立了“爱国会”，推顾维钧为会长。该会的宗旨是“非政治，非干涉，非革命，非党派，非宗派”。[65]虽然学生会对该会寄予厚望，但成立后并无大的活动，顾维钧也在三个月后回国了。不过，该会宗旨多少反映了顾维钧对国内政治的态度。

2月底3月初，北京城中发生兵变，并蔓延至天津、保定等地。美国一些媒体由此预测中国局势将恶化。顾维钧延续了过去对袁世凯的信任和对刚成立的民国的期望，在3月初给《纽约时报》写信，指出骚乱仅发生在直隶一省内的少数几个城市，且是清朝军队的残余所为。“因此，从这些不法行为推断民国政府不稳定或不能维持国内秩序是错误的”，并相信随着袁世凯宣誓就职，秩序就将恢复。他呼吁美国尽快承认“太平洋彼岸最年轻的姐妹国”。[66]在这些给美国报纸的信件中，顾维钧表达了一个留学生对新生的民国和共和政体的期望和支持。

留学期间，顾维钧对校园活动和留学生活动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同时一直关注着国内政治的发展。在美国的校园中他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而身处海外也使他对自己的祖国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1911年，在回答基督教青年会的马特（John Mott）关于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后对自己祖国的态度有何变化的问题时，顾维钧写道：

> 我注意到，每一个中国学生在旅居国外一年后，对中国的态度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但总是向好的方面变化。通过比较和对照，他开始抛弃原先的傲慢与偏见，而更真实地观察中国。在痛苦绝望之际，他常常会放纵自己的情感，在较为持重的同胞面前毫无约束地对处于困境中的祖国贸然做出评判，还可能激烈地指责中国的每一件事情。但是，他心中对中国的爱一点也不亚于他的同胞，而经深思熟虑后他总能对中国有一个

更为清醒的认识，并因而激发他以更坚定的决心更积极地投身于服务祖国的事业中。

在西方所受的教育使他有可能比他那些没有机会出国学习的同胞对一个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出于自信，面对民众喝彩赞同的狂潮他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能被蛊惑民心的政客斥责为“带有偏见的”或“卖国的”。但是，毫无疑问，他对祖国的爱与他的同胞一样真诚，只是更为审慎而不那么狂躁。[67]

顾维钧描述的是他观察到的中国留美学生的一般心态，也是他的夫子自道。在美国所受的教育，虽使他深受西方思想观念的影响，但他始终没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没忘记年轻人留学报效国家的责任。同时，他又认识到，留学期间在思想观念上发生的变化，由于与中国的传统观念存在很大的反差，会与国内同胞的普遍认识发生冲突。作为一个学业尚未结束的年轻留学生，顾维钧对学成后回国服务充满期待，同时对服务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境也有清醒的预判。以后在外交界服务时，他也确实遇到被人指为“卖国贼”的情况。

四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1909年同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顾维钧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他的指导教授就是1910年结束休假回到学校的穆尔。穆尔开设了国际法、外交史和美国外交史三门课，顾维钧全都选修了，尽管他已修过斯科特开设的同样名称的三门课。顾维钧十分尊敬穆尔，经常就学习上的问题去向他请教。穆尔明白顾维钧的志向，完全按照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他。他花费很多时间与顾维钧讨论将来要从事的职业，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些什么，特别要求他在法律上下功夫，认为这对日后处理外交事务会十分有用。因此，顾维钧在哥大的法学院学了除司法程序以外的所有法学课程。

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时，顾维钧确定的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这个题目出自斯科特的建议。[68]论文拟由九章和一个导论组成。导论部分准备提供中外关系的一般背景、外国人在华地位、约束中国的条约的性质，以及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享受的治外法权。正文部分的重点是评析外国向中国提出权利要求的全部案例，以及解决这些权利要求的一般原则。[69]论文的提纲得到穆尔教授的认可，认为这是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题目。于是，顾维钧开始搜集资料，进入写作阶段。

论文开始写作后，顾维钧利用留学生的活动将自己的思考与他人分享。1909年12月2日，他在哥大中国学生俱乐部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在华外国领事裁判权：问题及解决的建议”。在这场两小时的演讲中，他详述了在华治外法权体系的实际运作情况及其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并提出了终止列强享有的治外法权特权的一些步骤。[70]这是顾维钧博士学位论文中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1911年，顾维钧在用中文刊行的《留美学生年报》时事感言栏目发表《中国外交私议》。他在开篇指出：鸦片战争以来，“昔之堂堂华夏，今降而为第三等国”，丧失之权益有战败后而不得已者，也有非不得已者，即无形之放弃，“其为吾衮衮诸公而甘心放弃者，亦何可胜道哉。此事之最可痛而害尤深者也”，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外交应对的失误上。因此，“中国不欲定外交方针则已，中国而欲定外交之方针，必先自保存未丧失之权利始”。在列举了中国丧失的租界里的领土权、赋税权以及外

国人游历内地等权益后，他感叹道：“呜呼，强邻眈眈，风雨卷欧美而来；禹域茫茫，大利随江河日去。”随后指出：“中国外交之所以败坏决裂而无可收拾者有三故焉。一曰无法理之思想，朝野上下不知法理为何物……二曰无统系之办法，部臣与疆吏异意，督抚与僚属殊方……三曰无胆识之外交家……始则延宕以避之，继则婉词以缓之。”在顾维钧看来，中国外交亡羊补牢之计在得外交之人才：

> 所谓外交人才者，其必有法学上高等之学识，料事决谋之果敢，所谓足智足勇是也。难者曰：智者尚矣，而勇者何为哉？我国当国事衰弱之秋，无海陆军以为后盾，而欲以姜桂之性言外交，毋乃启强邻之怒而速自亡之机乎？余答曰：否。当今日之世虽曰有强权无公理，然国际交涉之时诚能以公理争强权，则强权者亦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而抹杀公理也。[71]

这是目前看到的顾维钧在留学期间用中文发表的唯一一篇文章。文章讨论的重点是近代以来中国丧失的条约权益，也正是他在撰写中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文章结论部分提出的解决中国已丧失的权益需要具备法学知识的外交人才，是顾维钧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动力，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以公理争强权”预示了国际法的学习对他此后处理外交事务的影响。在阐述强权不能抹杀公理后，顾维钧还写道：“不观乎嘉庆晚年，法国当大创之余，其使臣达里兰卒能操纵英俄普奥四雄于维也纳会议乎？”达里兰（今通译塔列朗，Charles de Talleyrand-Périgord），是19世纪初的法国外交家，担任过多届政府的外交大臣。1814年拿破仑法国战败后，他代表法国参加英、俄、普、奥四国操控的维也纳会议，在各国间纵横捭阖，实现了维护法国利益的目标。顾维钧显然将塔列朗看作一个成功的外交家，后来他进入外交界，可以看到塔列朗对他的潜在影响。

1912年2月中旬，正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的顾维钧接到中国驻美使馆要他去华盛顿的通知。到了使馆后，公使张荫棠告诉他刚担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事后顾维钧知道这出自不久之后担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的推荐，但他当时对此毫无心理准备，遂以尚未完成学业为由予以婉拒。穆尔获悉后却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告诉顾维钧，攻读国际法和外交学的博士学位就是为了担任政府公职，而袁世凯的邀请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极力主张顾维钧接受邀请回国服务。当时顾维钧的博士学位论文只完成了导论和另外三章，他为难于论

文尚未完成。穆尔在阅读了已经完成的部分后表示，导论这一章已足够作为一篇完整的博士学位论文了，并着手安排有古德诺、比尔德等教授参加的答辩。在穆尔的鼓励和支持下，顾维钧最终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并以原论文的导论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提交，于3月29日顺利通过了答辩。[72]

完成答辩后，穆尔让顾维钧找答辩老师中最年轻的比尔德帮助解决论文的出版问题。比尔德表示，出版方面的一切事务可由他来负责，校对则由比尔德太太承担，顾维钧只要抓紧完成一篇序言就可以了。顾维钧的博士学位论文最后以《外人在华之地位》（*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法丛书的第126种于1912年出版。作者名下注明其是中华民国总统的英文秘书，顾维钧的序言则是在回国途中于4月16日完成的。[73]《外人在华之地位》是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七年学习的结晶，体现出顾维钧在美国学界影响下对中国对外关系的看法，这些看法成为其后来外交活动的思想根源。

在写于大西洋途中的序言中，顾维钧阐述了《外人在华之地位》的宗旨："外人因通商、传教、游历和其他事务大量来华后，他们在华期间之地位问题，在今日不仅广受关注，且日益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要及时解决因中外人民交往而产生的五花八门有时甚至复杂的问题，需要准确地了解外人根据法律及条约所享有的权利、特权和豁免权，以及这些权利、特权和豁免权运用的限度和制约。这样的了解因外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而更显迫切。"他指出，目前尚无一本全面讨论外人在华地位的专著，因此该书"有志于此"，显示其在学术上开拓的雄心。[74]全书共19章，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前条约时期（The Pre-conventional Period），共7章，涉及公元120年至1842年外人进入中国的历史、外人在华所获权利、中国历代政府对外人的法律管辖、中国对外贸易的规章和组织等内容，叙述较为概要，约占全书七分之一的篇幅。下编为条约时期（The Conventional Period），共12章，是全书的重点。顾维钧在这部分剖析了近代以来治外法权、通商口岸、租界、外人在华旅行和在内地经商权、外人在华传教权的起源和演变，尤其对近代以来对中国危害甚大的治外法权，从它在中国的产生、它对外人的保护、应用的范围及限度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讨论，约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75]这显示出顾维钧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在被迫打开国门后所丧失的主权。

在逐项考察外人在华所享权利和特权后，顾维钧指出，尽管列强声

称中国人是排外的，但外人在华享有在其他国家无法得到的各种特权。他认为，这些特权虽有条约依据，但最初却是凭借“剑的帮助”获得的，并且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善宽厚，外国人才得以和平地享受这些特权。[76]在这里，顾维钧显然想说明，中外关系中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并不是像一些外国人所说的在于中国人的“排外”，而那些依靠“剑的帮助”获得的特权，其条约依据是存在问题的。

在分析中外关系的现状时，顾维钧认为，传教和通商是产生中外矛盾的两个主要根源，这是因为在华的外国人主要就是由传教士和商人构成。传教引发的教案近代以来层出不穷，皆以中国让步赔款而结案。他指出教案并非信仰不同引起的宗教之争，而是中国百姓对基督教的无知导致他们误信关于外国传教士做荒诞之事的传言，或是传教士的宗教狂热和鲁莽。他认为，随着中外之间互相了解的加深和对教案的妥善处理，虽间或还会有教案，但传教将不再会成为中外交往中的主要问题。[77]

至于中外间在商业交往中产生的问题，顾维钧认为这是与治外法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解决的方法是以单一的中国法律和法院体系取代治外法权，同时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自由游历和居住，实际上就是主张在维护主权基础上的“门户开放”。他指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中外双方共同的努力，如果中国或任何一个国家只想得到而不愿付出，那么中国无法恢复领土主权，而外国也无法获得在华商业自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相互忍耐和互惠让步是最好的政策；历史证明，重要的国际问题不遵循这些普通的原则就无法得到和平的解决。换言之，只有理智的合作才能使各方实现自己合法的目标，无论是司法的还是商业的。”他以乐观的语气写道，由于中国和列强都开始认识到，公正和平稳的国际关系必须建立在国家间诚挚友善的基础上，这样一种合作正在来临。[78]

不仅对中外间的商业交往，而且对中外关系的总体发展，顾维钧也寄希望于这样的合作。他认为，“如果中国人民为复兴祖国所做出的充满理智和爱国热情的努力，能得到列强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那么一个强大的进步的中国肯定会百倍迅速地崛起，而进步和强大的中国意味着远东的永久和平”。[79]

通观顾维钧的《外人在华之地位》，可以得出如下看法。

第一，顾维钧选择这样一个课题撰写他的博士论文，与他选择国际法和外交作为他的主修课程一样，有着很强烈的现实关怀。如他在前言中所说，外人在华地位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及时解决因中外人民交往而产生的五花八门有时甚至复杂的问题，需要准确地了解外人根据法律及条约所享有的权利、特权和豁免权，以及这些权利、特权和豁免权运用的限度和制约。这样的了解因外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而更显迫切”。[80]少年时代在租界长大的经历是这一选题的最初动因，顾维钧是出于改变不平等的中外条约关系的愿望来研究这一课题的。

第二，尽管《外人在华之地位》仅仅是顾维钧最初的博士学位论文撰写计划中的导论部分，论文的答辩在时间上又很仓促，但它在学术上仍有其自身的价值。这是讨论外国人在华条约权利的第一本专著，在相同课题的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因此出版后即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英文本出版三年后，就有日译本问世。[81]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韦罗壁（Westel Willoughby）颇有影响的同类著作《外人在华权益》要到1920年才出版。[82]

第三，《外人在华之地位》已显示出顾维钧日后处理中外关系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张中外间基于相互忍耐和互惠的合作，二是重视中外关系的法理基础，强调中外间存在的问题要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前一点使他在对外交涉中以灵活有时甚至是妥协的方式求得问题的解决，后一点则使他注重将国际法的原则运用到中国的外交事务中，给中国的外交带来以往未有的新因素。顾维钧在租界中长大，形成了包容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意识。他在博士学位论文中表现出来的对待中外关系的基本立场，是他从小形成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立场对顾维钧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活动产生了持续影响。

1912年4月5日晚上，顾维钧离美返国前，哥伦比亚大学1909级同学、《哥大旁观者》报和顾维钧参加过的各社团的同学以及老师，在哥大俱乐部为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英文秘书和即将离开哥大举行晚会。会场中特地挂起了刚成立的中华民国的国旗。在多位参加者发言回顾他的留学生涯并表达美好祝愿后，顾维钧致答词，表达了结束留学生活之际对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的感激之情：

> 我非常激动，不知该如何开始。作为一个缺少实际经验的年轻人，我认为今天晚会给予我的荣誉让我受之有愧。我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所说的都发自肺腑。虽然我很高兴应召为

中华民国服务，但我很遗憾我不得不马上离开这个国家，离开我的同学和朋友。我会将你们的美好祝愿和对这个国家以及这所伟大学校的美好印象带回中国。我想，今天的晚会是我得到各位热情款待和帮助的最好证明。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有你们的帮助和热心。

前些天我去拜访几位教授时，他们要我以最简短的语言谈谈我对这所大学的印象。哥伦比亚大学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公正和友谊。每一个教授和同学总是乐于十分体贴地帮助我。我要强调我们这所伟大学校的国际性。我在离开中国之时就想进哥伦比亚大学。从轮船扬帆起航的那天我就下决心要成为哥大之子。在哥大的七年我从未为这一决定有过丝毫的后悔。我将带着最美好的记忆回国。你们和所有的人以最温文尔雅和彬彬有礼的方式接待我，现在该轮到中国表达回报之心了。你们中的任何人到中国来都会受到最高贵的接待。[83]

晚会上代表教师发言的是哥伦比亚大学首位汉学教授夏德（Friedrich Hirth），他祝顾维钧回国后前程远大，并幽默地说希望以后致辞时可以称呼他为“顾博士阁下”。夏德没有料到的是，仅仅三年多后，他就可以这样称呼顾维钧了。

第二天，4月6日，顾维钧在纽约港乘坐“格兰特总统”号（President Grant）离开了美国。此时，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有六七百人，顾维钧是这第一代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

哥伦比亚大学七年的留学生活对顾维钧日后从事外交活动并成为闻名于世的外交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流师资使顾维钧获得了作为一个优秀外交官所必须具备的国际法基本理论和学术素养，校园活动和中国留学生的社团活动锻炼了他处理和应对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留学期间结识的老师、同学则使他获得了此后进行外交活动尤其是对美外交时宝贵的人脉关系。也许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哥大这所常青藤名校脱颖而出，给了他超强的自信。进入外交界后头几年，虽然年轻资浅，他却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勇于付诸实施。

顾维钧做好了投身外交报效国家的准备，中国的外交界会怎样接纳一位常青藤名校的博士呢？

[1] 《清荣禄大夫从一品封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嘉定顾公墓志铭》（以下称《墓志铭》）拓片，嘉定博物馆藏。此墓志铭为晚清官僚、同光派诗人樊增祥撰写。

[2] 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说父亲4岁离开嘉定，墓志铭记顾溶“八岁而孤”。按墓志铭写虚岁，顾溶8岁即1863年。笔者倾向墓志铭的说法。

[3] 《墓志铭》。

[4] 宁波帮博物馆编《朱葆三史料集》，宁波出版社，2016，第41页。朱葆三长女的外孙女徐女士告诉何勇（原联合国秘书处中文组组长），从小就从外婆（即朱葆三长女）那里知道，顾溶是朱家的总管家。何勇的微信来信，2020年9月5日。

[5] 顾维钧：Topics for Memoirs，1958年6月26日，手稿，徐景灿提供。

[6] 《墓志铭》。

[7] 《林朝钧、顾溶致盛宣怀函》（1892年6月），盛宣怀档案，上海图书馆藏，档号：105707。该档案以下不再一一标明藏所。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295页。

[8] 《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第603页。

[9] 《墓志铭》。高超群：《做生意与做人——清末民初商界巨子朱葆三的一生》，《银行家》2003年第5期。

[10] 《嘉定顾氏承裕义庄碑记》，民国《嘉定县续志》卷12《碑碣》。

[11] 《汉冶萍公司致顾晴川、施亦爵函》（1909年6月22日）、《顾溶致盛宣怀函》（1911年5月），盛宣怀档案，档号：012521、022465。

[12] 顾维钧成绩单（Koo’s Academic Transcript），杨雪兰提供。

[13]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他3岁去上学，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第5页。但他在手书的Topics for Memoirs中写的是1892年2月去上学。

[14] 顾维钧与徐景灿的聊天录音，1980～1985年，纽约。

[15] 顾维钧与徐景灿的聊天录音，1980～1985年，纽约。

[16] 顾维钧：Topics for Memoirs。

[1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6页。

[18] 圣约翰书院录取名单见《申报》1901年1月26日，第4版。

[19]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前言第7页。

[20]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第275页。

[21] 《颜惠庆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顾维钧序，第3页。

[22] 台湾广播公司记者阮次山采访顾维钧特别报道（录音），1977年2月19日。

[23] 台湾广播公司记者阮次山采访顾维钧特别报道（录音），1977年2月19日；顾维钧：Topics for Memoirs。

[2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2、19页。

[2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3页。

[26] 顾维钧与徐景灿的聊天录音，1980～1985年，纽约。

[27] 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pp.527-564.

[28] Charles Hurd to Wellington Koo，June 22，1977（徐景灿提供）。Hurd是美国西北大学化学系荣休教授，诺顿校长是其继父，1902年与Hurd的母亲结婚。

[29] *Cook Academy Bulletin*，October，1946，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30] Charles Hurd to Wellington Koo，June 22，1977.

[3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28页。《顾维钧回忆录》将第一位获得哥大博士学位的中国人音译为叶庆云，应为严锦荣，见Li Chen，“Shattering the Glass Ceiling：The World’s First Chinese Ph.D.Graduate，” *The Law Teacher*，published online：1 November，2018。

[3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9页；顾维钧成绩单。

[33] *The New York Times*，15 April，1906，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34] 顾维钧成绩单。

[35] 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36] 顾维钧成绩单；《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8～39页。

[37] 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4页。

[3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4～35页。

[39] Koo to Yorken，July 21，1971.

[40] Stephen G.Craft，“John Bassett Moore，Robert Lansing，and the Shandong Ques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2（May 1997），pp.231-249.

[41] 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42] 《顾维钧回忆录》的译者因没见到论文原文，将Caldera按词的本来意思译成了“破火山口”。该硕士论文见*Jus Gentium*，Vol.4，No.2，2019，pp.655-666。

[43] Koo，History and Law of the Case of Caldera，参见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44] *Ithaca Daily News*，28 February，1908，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45] *Ithaca Daily News*，29 February，1908，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46] *The Sun*，15 March，1908，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47] *The Sun*，22 April，1908，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48] *Columbia Spectator*，10 October，1908；《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2～43页。

[49]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7页；*The Sun*，22 April，1908；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第110页。

[50]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第45页。

[51] Stacey Bieler，“*Patriots*” *or*“*Traitors*”？*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M.E.Sharpe，Inc.，2004，p.171；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周子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24、26页。

[5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1页。

[53] 李永胜：《顾维钧与中国留美学生会》，《史学集刊》2020年第3期。

[54] Koo，“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Eastern Allianc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7，No.1（November 1911），p.93.

[5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54页。

[5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60～61页。另据《申报》记载，1913年顾维钧与唐宝玥结婚后，顾张氏携陈姓律师于8月在上海地方厅起诉顾维钧重婚，被法庭以不在管辖范围为由发回；10月顾张氏前往南市第一初级厅再次起诉，仍未准行。《申报》有文章说此事最后“慑于国务总理之势而止”。见《申报》1913年8月21日第7版、10月25日第10版；剑秋：《民国二年风流史》，《申报》1914年1月16日，第13版。

[57] 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第174～176、195页。

[58] *New York Herald*，8 October，1908，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59] 《颜惠庆日记》第1卷，上海市档案馆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第55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64页。

[60] C.T.Wang（王正廷），“One Week with Our Special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4，No.4，1909，pp.245-250.

[61] “People Will Revolt，” *Los Angeles Times*，6 January，1909，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6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66页。

[63] 《顾维钧对民国史几个问题的自述》，《传记文学》（台北）第174期，1976年11月，第99页。

[64] “Confusing Counsel From America to the Revolutionists，”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7，No.4，1912，pp.352-353.

[65] P.W.Kuo，“President' s Letter，”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7，No.4，1912，p.363；“The Ai-Kwoh-Hwei，”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7，No.3，1912，p.222.

[66] V.K.Wellington，“Present Disorders 1，000 Miles from Its Seat Are Not Fatal，” *New York Times*，7 March，1912，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67] Koo to John Mott，Janurary 28，1911.该信原件由徐景灿提供。马特是

194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68]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第270页。

[69]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71、73～74页。

[70]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5，No.3，1910，p.161.

[71] 《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版权页上署辛亥年六月出版，但封二署庚戌年留美学生会出版）。内页留美学生会职员肖像中有会长顾维钧。

[7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77～78页。通过答辩的时间据*Columbia Spectator*，2 April，1912。据后来帮助顾维钧撰写回忆录并且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唐德刚教授的看法，其实这篇引言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是"不够"的，顾维钧获得的是他人无法获得的殊荣。而且由于回国时间紧迫，论文的最后定稿还是穆尔帮助完成的。见唐德刚《广陵散从此绝矣——敬悼顾维钧先生》［《传记文学》（台北）第283期，1985年12月］及其与笔者的谈话（1995年7月1日，上海复旦大学）。

[73] Vi Kyuin Wellington Koo，*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1912.1925年，该书中文版《外人在华之地位》由北京政府外交部图书处出版。

[74] Koo，*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pp.7-8.

[75] Koo，*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pp.62-227.

[76] Koo，*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pp.350-351.

[77] Koo，*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pp.352-353.

[78] Koo，*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p.355.

[79] Koo，*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p.356.

[80] Koo，*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pp.7-8.

[81] 顧維鈞（著）、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総務部交渉局第一課（訳）『支那ニ於ケル外国人ノ地位』南満洲鉄道総務部交渉局、1915。

[82] Westel Willoughby，*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Johns Hopkins Press，1920.

[83] *Columbia Spectator*，April 9，1912.

第二章 外交界的年轻人

一 初入民国官场

中国的外交体制在晚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外事务开始由“夷务”向近代意义上的外交转化。但此时办外交的人仍由出身士大夫的传统官员担任，如李鸿章、曾纪泽、郭嵩焘等。19世纪80年代初留美幼童返国后，不少人进入各地官署或驻外机构，协助办理外交或“洋务”。这是留美学生进入中国外交界的开始。20世纪初，这批最初进入外交界的留美学生中已有人担任外交要职，如驻美公使梁诚、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外务部尚书梁敦彦等。尽管留美幼童回国后进入外交界的人数按比例不能算少，但因为留美幼童总人数有限，故就整个晚清外交界尤其是高层而言，留美学生仍只是少数。[1]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六部之前。此举虽迫于列强压力，但清政府内对外交体制改革已有呼声。[2]按列强要求，外务部侍郎中必须有一人通西文西语。这为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人升迁高级官员开辟了一个专门的通道。从实施情况看，这一规定实际上主要为留学生提供了机会，如唐绍仪和梁敦彦先后担任外务部侍郎和尚书。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也使原先主管外交的官员如章京、大臣只是兼差而不是正式职官的状况得到改变，从1907年起驻外使领馆也设置正式职官，这就为职业外交官的出现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3]与之相关联，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并对“游学毕业生”进行考试，授予他们相应的功名，这又为留学生担任官职提供了新的途径。例如1906年对留学生的考试，赐进士出身的10人几乎都是留美学生，第一名陈锦涛、第二名颜惠庆、第五名施肇基日后都进入外交界，并在北洋时期担任过外交总长。[4]清末外交制度上的这些变化为留学生日后在民国外交界的发展做了重要铺垫。

在请顾维钧担任英文秘书的同时，袁世凯任命陆征祥为新政府的外

交总长。陆征祥是在广方言馆和京师同文馆学习法文后，被派往驻俄使馆开始外交生涯的，属于晚清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外交官。虽然还没能够接受完整系统的西方教育，但他有外语能力，又有出使与外国人直接交往的经历，这是优于李鸿章那一辈的地方。陆征祥任外交总长后按西方国家外交部的模式改组前清外务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从事外交的人员均须受过专门训练，外交职位由职业外交官担任。陆征祥认为，“凡是办政治，尤其是办外交，决不可用外行”。[5]1912年6月，外交部颁布部令，重组本部，部内人员除已经总统任命及收文和电报两处的事务人员外，“一律解散，另候新令，再行到署”。此举使外务部留下的无法胜任外交工作的人员离开外交界，而为具有专业背景的人留出了位置，“旧制既废，新制更始，自此次解散后，新制旧制顿若两界”。[6]顾维钧归国之后将要进入的外交界已是旧貌换新颜了。

1912年4月下旬，顾维钧乘坐火车，穿越欧亚大陆回到中国。此时，民国成立刚刚四个月，而袁世凯正式登上总统的位置还不到两个月。

到北京的次日下午，唐绍仪亲临顾维钧下榻的六国饭店来见他，随即带他去中南海总统府见袁世凯。第一次见到袁世凯，顾维钧的印象是“坚强、有魄力”，“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7]在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的同时，顾维钧还被唐绍仪聘为国务院的秘书。身为国务总理的唐绍仪一共聘了8个秘书，除顾维钧外年龄都在四十开外，且在官场中历经磨炼。24岁的顾维钧是其中最年轻、资历最浅的，但发布任命时却位列第四，可见唐绍仪对他的偏爱。[8]

唐绍仪与袁世凯私人关系密切而特殊，唐绍仪在晚清官场的步步上升离不开袁世凯的提携与支持。但唐绍仪毕竟是留过洋的，出任国务总理后想依据《临时约法》来行使内阁权力，与独断专行的袁世凯产生了分歧，最终在任命直隶总督问题上闹翻，于6月中旬辞职。由于亲见唐、袁两人称兄道弟，一下子又分道扬镳，顾维钧十分震惊，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政治的扑朔迷离和官场的错综复杂。按当时秘书随总理共进退的惯例，他辞去了国务院秘书的职务，同时也辞去了在总统府的职务，跟随唐绍仪到了当时北方政坛失意人士的避风港天津。

唐绍仪见顾维钧连总统英文秘书一职也一并辞去十分惊讶。他认为辞去国务院秘书是应该的，而总统英文秘书则不该辞去，顾维钧才刚刚

开始自己的事业，在总统府任职是很好的机会。此时，袁世凯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到天津来见唐绍仪，并请顾维钧回总统府继续任职。唐绍仪也劝他回北京，并认为他合适的职位是在外交部，回北京后可以在总统府和外交部同时任职。唐绍仪的这番劝说决定了顾维钧此后的人生道路。

几年前在华盛顿第一次见到顾维钧时，唐绍仪就十分欣赏他的才干，因此将他推荐给了袁世凯。此次顾维钧来天津住在利顺德饭店，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唐绍仪几乎每天请他到自己家里来吃饭。这位刚下台的总理大人有一待字闺中的千金叫唐宝玥，英文名May，通常被称为唐梅。吃饭之外，唐绍仪总是让顾维钧陪女儿出门，或闲逛，或买东西。唐宝玥比顾维钧小两岁，会说英语，这在女孩中十分罕见，马上就赢得顾维钧的好感。唐宝玥对这位谈吐不凡、稍后有京城三大美男子之称的哥大博士也是一见倾心。离开天津时，顾维钧要先回上海探望父母，唐绍仪一听就说唐宝玥也要到上海去看望她的姑妈，请顾维钧顺道陪同。这样，两个年轻人一路上又多了倾心交谈的机会。从上海回来后，顾维钧就与唐宝玥订婚了。此时，袁世凯来请唐绍仪做媒人，要将自己的第五个女儿许配给顾维钧，唐绍仪告诉他顾维钧已经定亲了。[9]一年后的1913年6月2日，两人年轻人要按计划结婚时，唐绍仪却要求他们将婚期推迟一天，因为再次结婚的他也已定下要在这天办婚礼。唐绍仪的字与顾维钧的字一样，也是少川。最后，老小两个少川相隔一天在上海的虹口公园举办了婚礼。两张结婚照刊登在《妇女时报》同一期上。[10]

1912年8月，顾维钧探亲后回到北京，继续担任总统英文秘书，并于8月16日被任命为外交部秘书，[11]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此时外交部在总、次长下仅设4个司及由4名参事组成的参事室和4名秘书组成的秘书处。

在总统府，顾维钧负责袁世凯会见外交使节和外国显要人物时的翻译，起草在外文报纸刊登的政府声明或公告，以及处理总统的英文往来函件。袁世凯与英美重要人物的会见都有顾维钧在场。1913年11月，新到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向袁世凯递交国书，由顾维钧翻译芮的颂词和袁的答词。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老师古德诺来华担任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古、袁两人的会面交谈，均由顾维钧担任翻译。袁世凯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的会谈，也是他担任翻译的。对外事务之外，总统府内有些国内事务也会交给顾维钧来

办。1913年3月4日，全国禁烟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顾维钧就作为总统代表到场致辞。[12]

由于得到袁世凯的赏识，顾维钧在总统府并非仅仅承担英文秘书的工作。1913年，中英就西藏问题开始谈判，英国公使朱尔典以他与袁世凯的私人关系要好，常常直接到总统府与袁世凯面谈，此时顾维钧就充任两人间的翻译。但有时袁世凯不便或不愿见朱尔典时，就派顾维钧去英国驻华使馆与朱尔典会谈。这样，顾维钧就直接参与到中英有关西藏的交涉之中。

中英西藏交涉在两个地方同时进行。一在印度的西姆拉，由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代表举行谈判。一在北京，除袁世凯与朱尔典面谈外，顾维钧与朱尔典先后进行了十余次会晤。在西姆拉会议举行前，顾朱会晤的焦点是西藏代表的身份问题。英国企图借此让西藏摆脱与中国固有的统属关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顾维钧对此据理驳斥，认为这不符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历史关系，也有违中英间的现有条约。西姆拉会议开始后，西藏与内地的划界成为焦点。英国千方百计要将青海、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划入西藏范围，朱尔典在会谈中辩称此举是想让青海成为缓冲地带。顾维钧当面反驳："设置中立之境或是有益双方之事，然何必以中国完全管辖之领土为之哉，如贵公使所言，中国吃亏亦不太甚乎？"当朱尔典提出清政府对靠近川藏边界的西藏地区没有实施过管辖权时，顾维钧一一列举清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历史事实，并反问："若欲追溯古史为根据，则唐时吐蕃当并印度，元朝版图亦列入印度，焉能为证据？"[13]1914年4月27日，出席西姆拉会议的中国代表陈贻范迫于英国压力画签约稿，但同时声明如果政府不同意则此举取消。顾维钧知悉此事后，于5月1日向朱尔典抗议，代表政府不予承认。但朱尔典表示"一经双方画行即为定局"。顾维钧辩驳道，按照国际惯例，谈判时的全权代表，"凡遇重大之举，如画行签押之类，仍须请示本国政府，奉到训条后方可举行"。况且中国政府不承认此次所签订的约款，是因为"画行之前曾向英员声明，画行与签约当分为两事，如未奉政府允准签押，则画行当即取消，是陈使之画行非单独画行，系附有条件者"，因此中国政府不承认该画行草约的合法性，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14]此后，中英交涉陷入僵局。

中英西藏交涉是顾维钧参与的第一次重要外交交涉。他的对手朱尔典，在华30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有着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丰富

经验。顾朱会晤时，朱尔典之外，英方还有他的中文秘书和曾骑马游遍西藏的武官，中方则顾维钧单枪匹马一人。但每次会晤前，顾维钧都做了大量准备，弄清所谈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并请教蒙藏事务局的专家。[15]因此，在与朱尔典的交锋中，他总能做到胸有成竹、针锋相对，既能坚定地守住国家主权的底线，又能熟练地运用自己的国际法知识有理有据地驳斥英国的无理要求。朱尔典此前与许多晚清官员打过交道，总能凭借英国的强势占据上风，这次却在比他小30多岁的年轻外交官前碰了钉子，只能自嘲地对顾维钧说，自己没有得过博士学位，因此辩论中说话没有那么流利。顾维钧则反唇相讥道，公使先生在华从事外交多年，经验丰富，在与中国官员交往中总能如愿以偿。[16]顾维钧在中英西藏交涉中的表现，当得起他留学期间在《中国外交私议》中对外交人才所提的“足智足勇”这四个字。

与朱尔典的会谈，顾维钧既是总统袁世凯的代表，也是外交部的代表。1913年4月，顾维钧由秘书升任署理参事，9月正式任参事。[17]当时外交部设总长、次长各一人，次长下设参事四人，排名在司长之前。在外交部，顾维钧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与英语国家的驻华使馆即英国和美国等使馆的联系。由于中外间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列强外交使节与中国政府商讨问题，不是按通行的外交惯例拜访外交部，而是常常要中国外交部派人去他们的使馆，就如中英西藏交涉时顾维钧去英国使馆那样。因此，作为外交部的秘书或参事，顾维钧实际上承担着中外间直接交涉的任务。

顾维钧在外交部的另一工作是负责与外国记者及在华出版的外文报纸打交道。在外交部未设新闻司和新闻发言人的情况下，他承担的实际就是这一性质的工作。留学期间办报的经验使他能自如地做好这件事。1914年7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总编辑到北京约见袁世凯并采访。会面中这位总编提了关于战争及对中日关系影响的许多问题，袁世凯事先没有准备，无法当场回答。顾维钧建议总统在会面后给记者一份书面声明。起草声明的任务当然就落到了顾维钧身上。由于美国人第二天上午就要离开北京，顾维钧只得通宵工作，起草声明的英文稿，并请外交部的助手译成中文。第二天早晨，顾维钧将中文稿递给袁世凯，袁看后认为很好，无须改动。于是，他赶到火车站将英文稿交给了美国人。[18]有关北京政府的新闻稿，不仅仅是英语国家，其他语种的国家也在顾维钧的职责范围之内，如1913年中俄关于外蒙古交涉的新闻也是顾维钧负责。[19]

顾维钧还经手北京政府资助外国新闻机构的工作。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George Morrison）好几次就受北京政府资助的外国新闻机构发出错误报道之事致函顾维钧，要他管管这类事，停止这一浪费金钱并有损国家声誉的做法，相信他“定会慎密处理”这类事的。[20]这一工作使顾维钧与一些在华外国记者建立了联系，这一关系网后来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发挥了作用。

在外交部工作期间，顾维钧建议成立档案科和翻译科，前者旨在纠正以往档案保存中的问题，后者是为了向外交总长、总统府和国务院及时报告外国报纸上的动态。顾维钧做的这些事情使民国初年的外交部在专业化的程度上迈进了一大步。

顾维钧在与外国使馆和媒体交往中的表现赢得了外交总长和次长的信任。作为参事，每遇外交大事，他总会被邀参加高层讨论，而他也总能发表自己的看法。遇到外交部内部意见不一时，外交总长出于对他的信任，通常会站在他的一边，采纳他的建议。

但顾维钧的勤奋和才干也遭到一些同事的妒忌和不满。那些进入官场已经有几十年的同事，看见比自己小一辈的顾维钧因为有国外留学的经历，刚入职就到处抛头露面，受到上司的青睐，心里自然不平衡。外交部参事室中，有一位同事是顾维钧的亲戚，在官场已混了20多年，作为过来之人，劝告他说：“在北京官场，多做事，多犯错误；少做事，少犯错误；不做事，不犯错误。这就是在官场上一帆风顺的奥妙。”顾维钧感谢这位亲戚的好意，但他在美国所受的教育让他认识到，担任公职就是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自己学习国际法和外交就是要为中国的外交服务，现在有了机会，当然要全力以赴。[21]

在繁忙的政府公务之余，顾维钧对组织回国留学生的活动充满兴趣和热情，就如留学期间在紧张学习之外对留学生会投入了许多精力一样。当时北京已经有了留美学生、留英学生和留法德比学生的留学生小团体，这些团体是社交性质的，每年聚餐几次，回忆一下留学时光。顾维钧不满足于这种社交性的留学生团体，希望留学生们可以定期集会，请美国或中国各界的著名人士来演讲，也可以就大家关心的问题举办讨论会。这个主意得到清华校长周诒春的响应。周是耶鲁毕业的，也参加过美东留学生会，因为清华校园在郊区，具体的筹办工作就交由顾维钧负责。在组织和推进欧美同学会活动时，顾维钧与美国公使芮恩施多次联系，并请他帮助筹款建同学会的图书馆。在顾维钧的推动下，几个分

散的留学生会最终合并成立了“欧美同学会”。[22]1913年10月18日，欧美同学会在位于西交民巷的同学会本部举行盛会，到会者百余人。作为发起人的顾维钧以同学会主任干事的身份主持集会并致欢迎词，请专程到会祝贺的外交总长孙宝琦、教育总长汪大燮致辞。[23]对留学生团体的热心，显示出顾维钧强烈的留学生群体意识，希望通过留学生的集体力量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

二 “二十一条”交涉中的美国牌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德等列强都卷入了欧洲大陆的战争，对中国一直有野心的日本企图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扩大在华权益。这是顾维钧进入外交界后第一次面临影响国运的外交危局。

大战的消息传到中国，北京政府决定采取保持中立的方针，以免战祸波及中国。8月6日，北京政府宣告中立，公布了“局外中立条规”。当天，顾维钧赴美国驻华使馆会晤代办马慕瑞（John MacMurray），表示北京政府希望由中美日三国共同倡导在远东限制战区，请求美国帮助中国实现中立。顾维钧解释说，将中立范围不限于中国，是希望日本能够同意并参加。[24]但北京政府尚未等到美国的明确答复，日本就已对中国联络美国的做法提出责问。8月8日，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与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的交谈中指责中国有联美之意。8月10日，日本驻华代办小幡酉吉直接到外交部，称中立是“关系东方重大事件，中国何径先向美邦提议”。[25]日本的公然反对使北京知难而退，“原拟联合日美，日不赞同，出头无益”。[26]

与美联络受挫后，北京政府又转向了英国。英国与日本签有同盟条约。8月11日，顾维钧前往英国使馆会晤朱尔典，在向英国通报中国向美、日倡言中立事由后，主要探询英日在华对德国作战的可能性，并请朱尔典有这方面的确切消息后能够以非正式的方式通知中国。[27]

8月15日，日本在与盟友英国未完全取得一致看法的情况下，向德国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与日本，以便日本将来交还中国。8月23日，日本迫不及待地向德国宣战，日军随即在山东登陆，向青岛推进。面对列强在中国领土上开始交战，袁世凯急忙在总统府召开会议，除内阁总长外，两名国务院参事伍朝枢、金邦平以及外交部参事顾维钧都应召参会。伍朝枢留英，金邦平留日，也都是学法律的。袁世凯请这三位在不同国家学习法律的留学生参会，是想听听他们从国际法视角提供的意见。顾维钧被请出第一个发言。他说，中国已宣布中立，交战双方都应尊重中国的中立，日本军队在山东登陆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此保卫国土以维护中立完全正当。伍朝枢赞同顾维钧的意见。但陆军总长段祺瑞表示，中国军队如对日作战只能坚持

48小时。于是，袁世凯无奈地说，中国没有能力尽到中立国的义务，只能援引日俄战争时的做法，划出一交战区让日本经此区域进军青岛。起草中国政府有关交战区的声明及执行细则的任务被交给了参会的三位参事。[28]

但日本并不满足中国划定的交战区域，进而向北京政府提出，要划山东省境内黄河以南一大片地区为中立外区域，名义上是便利日军行军作战，实际上妄图长期占领。北京政府不愿应允，欲将日军的行动限制在沿海岸地区。8月27日，顾维钧前往美国使馆会晤马慕瑞，向美方提出，根据美日1907年罗脱-高平协定，日本在华行动须事先征询美国，因此日军在山东登陆，应获得美国的同意，表达了希望美国出面干预日本的意愿。但马慕瑞回答说，罗脱-高平协定的适用范围只是中国的内乱，而非针对外国，并且通常被看作协定的这个文件只是双方的联合声明，不具备法律意义，由此拒绝了中国的请求。[29]

11月上旬，日本军队占领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英军开始从山东撤走，但日军丝毫不见撤军的迹象。1915年1月7日，北京政府正式照会日本和英国驻华公使，宣布取消原先划定的战区，恢复中立状态。但日本于1月12日复照，反咬一口，指责中国政府“独断处置，实属轻视国际礼仪，不顾邦交，措置诚有未当”，蛮横地声称不承认取消战区，日军行动不因此受约束。[30]

日本拒绝撤军使山东问题成为北京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顾维钧与国务院参事伍朝枢等为此拟了一份题为《山东问题之分析》的稿子。这份稿子详细列举了因日军进兵山东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检讨已经采取的政策，如中国对于此次战事有无划出战区之必要；也包括日军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及赔偿，如日本擅自行使管辖权、伤害人民生命之抚恤；还包括今后交涉中中国会面临的和须应对的问题，如日本欲永久占领青岛为己有应如何对付、处置青岛时如何对付英国等。[31]从所列举的问题看，顾维钧和他的同事已经充分认识到日本强占青岛的严重后果，但苦无良策，没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因应之道。就在拟定这份稿子几天后，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以违反外交礼仪的方式直接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了勒索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有五方面的内容：第一号有关山东的权益，第二号有关东北的权益，第三号有关长江流域的权益，第四号有关福建的权益，第五号涉及聘请日人担任北

京政府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中日合办警察等问题。日本“二十一条”的提出使北京政府面临严峻的挑战，外交上如何应对成为棘手的难题。

袁世凯连夜召开会议，与国务卿徐世昌、陆军总长段祺瑞等商讨对策，决定派人去日本探询日本内阁真实意图及其对华要求的最低限度，并决定交涉步骤应逐项商议以延缓时日，并认为不应让“二十一条”之事对外泄露。[32]袁世凯此时定下不泄露的原则，除了日本要求对“二十一条”内容绝对保密外，也有自己的考虑。除了担心国内的反对派借此事引发政潮，更担忧的是其他列强获悉后联手行动，使中国在外交上更为被动。1月24日，一份递交总统的条陈分析道，“二十一条”提出后英法俄必定会跟在日本后面一起参与瓜分，袁世凯阅后批示“援引均沾，须留意”，并将该件批转给外交部，[33]表明他不让泄露“二十一条”之事确有防止列强联手引起瓜分的考虑。

面对突如其来的外交危机，作为负责与英语国家联系的外交部参事顾维钧，首先想到的是中国“急需从国际上获得外交方面的支持”，“而根据世界的形势，唯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的是美国”，因此“有必要让华盛顿了解‘二十一条’的内容，也应该告知伦敦”，“中国保护自己的唯一途径是尽力争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支持”。顾维钧知道日本已威胁中国对此事必须保密，政府也允诺了，但他向总统和外长说明，这种允诺是在威胁下做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34]但如前所述，袁世凯因为担心列强“援引均沾”，并不打算对外披露“二十一条”的消息。

尽管如此，有关“二十一条”的消息在北京的外交官中还是很快就传开了。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是北京最早获悉这一消息的少数几个外交官中的一个。1月22日，他获悉日本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求一事，并知道这些要求完全损害“门户开放”政策和中国的主权。两天后，他知道了日本的要求一共有“二十一条”，它使中国面临着最严重的危机。随后几天，他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又陆续提到，日本的要求具体涉及南满的行政权、中日合办汉冶萍和矿产权等。2月1日，芮恩施在给国务卿布莱恩（William Bryan）的电报中引述了他认为“二十一条”中最重要的一些条款，包括中日合办警察，聘日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及购买日本军械等第五号的内容。[35]

可以看出来，芮恩施的消息是相当灵通而且很准确的。他的消息来

源正是北京政府负责与美国驻华使馆联络的顾维钧，用芮恩施自己的话说，顾维钧充当了北京政府与美国使馆之间的“联络官”。[36]芮恩施是1913年来中国担任公使的，他向袁世凯递交国书时与后者的第一次见面就是顾维钧担任翻译的。来中国前，芮恩施在威斯康星大学担任了十多年的政治学教授，与古德诺等联合发起创办了美国政治学会，并担任第一任副会长。而顾维钧的导师穆尔担任过这个学会的会长，因此他与顾维钧的关系就超出了外交场合的公务往来。作为驻华公使，芮恩施积极参与并推进已回到国内的留美学生的团体活动，建议留美学生仿照美国政治学会创建中国社会政治学会。[37]顾维钧正是北京留美学生团体的热心组织者，因此芮、顾两人的交往在公私两个方面均十分密切。在想到要让华盛顿了解“二十一条”之事时，顾维钧向芮恩施通报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了。

顾维钧还与芮恩施达成默契，将有关“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给在北京的美国记者，希望通过美国舆论对日本施加压力。1月25日，《芝加哥新闻》报道：“日本的要求使局势紧张，若中国接受则成日本附庸。”1月27日，《纽约时报》在第三版以“日本向中国提出多项要求”为题发表来自北京的消息，称“这些要求如果得到满足，所有相关区域就会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而其他列强的条约权利就会受到损害”。[38]在这前后，京津沪各地的中外文报纸相继刊登有关“二十一条”的消息。

有关“二十一条”的消息通过中外报刊传播，有违袁世凯的本意，一旦消息泄露北京政府就十分为难了，尤其是它根本无法管束外国报纸。2月2日，北京政府政事堂在北京各报刊上刊登通告，严禁外交人员向新闻媒体泄露消息，违者依法惩治，希望从源头上加以控制。[39]但这份通告刚发出，袁世凯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2月3日，袁世凯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给日本元老松方正义写了一封1500字的密函，其中提到驻华公使日置益告诉他，日本政府决定在3月下旬之前逼迫中国“将廿一款囫囵承诺”，所以必须阻止中国“将要求各款故意漏泄，借此激励舆论，或煽动商民排斥日货，或依赖其他强国以牵制日本”。这封密函经总统府秘书翻译后呈交给了袁世凯。[40]与此同时，日本在中日交涉开始后屡屡指责中国泄露消息，进行恫吓。2月5日，中日就“二十一条”进行第二次会谈。一开头，日置益就提出2日第一次会谈的消息已泄露，上海某外国报纸4日的北京通讯还报道了上月18日见总统事。“此次交涉事件，彼此均应保守秘密，业经面告大总统及孙总长。且按国际交涉之例，亦必系议定之件始克发表，今则业已泄漏，殊不可解。”[41]日本的态度使

袁世凯对泄露消息有了不同于先前的理解，于是改变了最初不向列强透露“二十一条”的做法。

2月6日，袁世凯派政治顾问莫理循访问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告诉他日本向中国提出的要求有“二十一条”，其中包括要求长江流域的特许权。而英国一直视长江流域为它的势力范围。9日，顾维钧再访朱尔典，询问“英国政府是否掌握日本所提要求的全部内容”，强调中国“有理由相信，日本并未向列强传达‘二十一条’全文”，并特别向朱尔典指出，日本所提要求中包含长江流域铁路问题、中日合办警察及战争物资共享等三项。[42]在这之前一天，外交总长陆征祥业将“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内容告诉了俄国驻华公使。[43]这样，北京政府从最初不愿泄露消息，唯恐列强联手瓜分中国，变为主动联络，透露消息，以争取列强支持来制约日本。顾维钧与美国使馆的联络沟通迈出了最初的重要一步。

这之后，顾维钧与芮恩施的来往就更为频繁了。按顾维钧的说法，“我每次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在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而芮恩施在回忆录中写道，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顾维钧博士始终充当中国外交总长和我之间的联络官，尽管我也同时会见中国外交部的其他许多官员。在讨论谈判的各个阶段进行的情况时，顾博士曾多次和我在一起进行长时间的有意思的讨论，研究外交策略和进行分析。在这方面，我很钦佩他的敏锐的洞察力”。[44]在这过程中，他们两人间的了解和默契又进了一步。

有关中日交涉“二十一条”的消息逐渐公开后，各国通过各种渠道想进一步了解详情。面对来自列强询问的压力，日本政府欲盖弥彰，于2月8日由驻美大使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大加删减的十一条。[45]在这前后，日本也向其他列强通报了十一条。芮恩施获悉这一消息后，请美国驻日大使告知日本送交的十一条的内容。14日，美国驻日使馆将十一条内容电告芮恩施。[46]顾维钧是北京政府中最早知道日本又抛出十一条的人之一。他从美国驻华使馆处获悉该内容后连夜翻译并报告：“今晚间接觅得日本政府通告英俄美法四国政府之条文十一款，谨即译请钧览。”袁世凯获悉这一消息后，于2月16日让他的另一名英文秘书蔡廷干请莫理循找一份日本给英国的十一条副本，显然是要与顾维钧呈报的十一条互为对照，以进一步判断日本的意图。[47]

十一条与“二十一条”出入甚大，如果各国听信日本的十一条，就不会太关注中日间的交涉，中国也就很难去争取列强来制约日本，而这正

是日本政府希望看到的。芮恩施注意到，顾维钧等中国官员对可能出现的局面忧心忡忡，“深恐公众舆论默然同意这个受到较少谴责的文本，从而鼓励日本更强烈地迫使中国接受全部要求”。从一开始顾维钧就主张通过让美国等国家了解情况而获取支持，此时他认为中国到了公开“二十一条”全文的时候了。2月17日，北京政府决定将“二十一条”全文告知美、英等国。三天后，芮恩施从北京政府外交部得到了“二十一条”全文的英译本。[48]从1月18日日本向北京政府递交“二十一条”起，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顾维钧“有必要让华盛顿了解‘二十一条’的内容”的主张终于为北京政府所采纳并付诸实施。

中国将“二十一条”全文内容告知美、英等列强后，日本的外交气势一时受挫。英国驻华记者观察到，“自探知日本未将‘二十一条’而仅以十一条通告列强以来，北京吃紧情形稍松”。面对舆论压力，日本驻美大使则赶紧向美国国务院解释，报纸上所载“条款过于张大”。[49]受挫的日本对中国的做法十分恼火。2月22日中日举行“二十一条”交涉的第三次会谈，会谈一开始，日置益就宣读日本外务大臣的电报，指责“中国当局故意泄漏”。[50]在中日谈判开始前，日本就力图将北京政府中与英语国家有联系并且与新闻界来往密切的人排除在谈判人员之列，要求出席人员只能有3人，即外交总长、次长之外，只能带一个秘书，而不是中方最初提出的5人。如果是5人的话，按顾维钧自己的判断，他是“必定在数的”。[51]

尽管日本强烈反对中国向美、英等国通报“二十一条”交涉，但顾维钧与美国使馆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正如芮恩施所说，“他仍继续同我来往，因为这是正当的”。不过，为了掩人耳目，顾维钧有时也不得不从后门溜进美国使馆。从芮恩施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每次中日会谈后一两天，他都有一份关于会谈的详细报告，并反复提醒国务院，日本在谈判中一直在强逼中国接受第五号的内容。[52]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北京政府得以向美国政府传达相关的信息和中国的愿望。

芮恩施接二连三有关“二十一条”的报告没能引起华盛顿足够的重视。美国政府先是天真地认为，所谓的第五号内容可能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而被日本删除，所以有了十一条；当日本无法掩盖“二十一条”，向美国表示第五号内容仅是让中国友好考虑之“希望”，并非日本坚持之“要求”时，国务卿布莱恩又信以为真，还认为这是美国质询的结果。直到3月中旬，美国才向日本送交了表达对“二十一条”看法的照会。这是中

日“二十一条”交涉后美国政府的第一次正式表态。按照会起草者之一、国务院顾问蓝辛（Robert Lansing）的话说，这份经美国总统威尔逊修改的照会“语调是和缓的”，“避免了威胁的念头”。它声称：“美国不妒忌日本在东方的突出地位和中日互利的密切合作，也无意阻碍日本或影响中国反对日本。相反，美国的政策是维护中国的独立、完整和商业自由，并保障美国在华合法权益。”[53]

美国的照会使日本政府对美国可能干预中日交涉的担忧减轻了，却使北京政府大为失望。3月23日，袁世凯亲自出马找芮恩施长谈，希望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同时，北京政府争取在北京的美国侨民向华盛顿呼吁。4月8日，在北京的美国传教士向美国政府发了一份长长的请愿电报，呼吁作为西方最大的共和国美国站在东方最大的共和国中国一边“伸张正义”。从北京向华盛顿发这份长电的费用高达7000美元，是北京政府支付的。[54]顾维钧在外交部负责英语国家事务，又经手对外国新闻机构的资助，显然参与了此事。

北京政府的外交努力通过芮恩施和美国传教士对华盛顿产生了影响。4月14日，威尔逊在给布莱恩的信中写道，美国应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显示自己是中国主权的支持者。第二天，布莱恩致电芮恩施，授权他以非正式、非官方的方式表明美国从未放弃在华任何条约权益。[55]芮恩施代表美国政府的表态使北京政府受到鼓舞，认为“英美对于此事，舆论渐激”。在此后的中日会谈中，中国代表的态度明显趋于强硬。[56]

4月底5月初，中日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陷入僵局。5月7日，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次日，北京政府开会讨论应对之策。二十多年后，顾维钧在给叶恭绰的信中谈到在会上他提出，“日方最后通牒实则外强中干，希望速了”，因此“力主对于第五款尽可声明拒绝商议，不必承认日方之保留”。[57]会议最后决定除第五号内容外接受最后通牒，回答日本的复文由顾维钧起草。复文十分简短，对第五号明白表示不能接受。复文的措辞得到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总统袁世凯的认可。正式送出前，外交部将复文先给日本公使看，日本公使提出对于第五号应加上“容日后协商”的词句，北京政府最终竟予接受。北京政府送交复文后，顾维钧建议就中日交涉的全过程及被迫接受最后通牒的情况发表一份声明，因为和平时期一个国家接受有损国家主权的最后通牒是很不寻常的，必须给历史学家留下真实的记录，并自告奋勇承担这一任务。当时因发烧

住院的顾维钧请澳大利亚记者端纳（William Donald）来帮忙，由他口述，端纳记录，连夜完成了声明的英文稿，然后交外交部译出于5月13日发表。[58]

这份声明以《北京政府外交部关于中日交涉始末宣言书》发表，概述了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北京政府接受最后通牒期间中日交涉的全过程，分别列举了“二十一条”中中国已经接受的条款和予以拒绝的条款。整个声明的语调是相当温和的。声明在表示北京政府不得不接受日本最后通牒所开条件后又称：“如列强对于保持中国独立及领土完全暨保存现状，与列强在中国工商业机会相等主义所订之各条约，因此次中国承认日本要求而受事实上修改之影响者，中国政府声明非中国所致也。”[59]这表明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已结束的情况下，顾维钧对美国依据“门户开放”政策干预中日交涉结果仍抱有一丝希望。

5月11日，美国政府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照会，称中日两国达成的任何协定，若有损美国在华条约权利、中国行政或领土完整以及与中国有关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概不予承认。照会的口吻与顾维钧起草声明中表达的期望似乎相符，但美国的目的并不是进行干预。蓝辛在起草这份照会时告诉布莱恩：“它（指照会）不能阻止日本达到强迫中国接受要求的目的，但它表明了对可能影响美国和中国利益的各种权利的完全保留。”[60]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是顾维钧进入外交部后经历的第一次影响全局的对外交涉。作为外交部的一个参事，顾维钧还不能对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他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执行政策，而是充分利用与芮恩施的关系密切中美之间的交往，尤其在向美国透露“二十一条”这件事上推进了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王芸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编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时，认为“二十一条”交涉中中国的外交“错误甚少”，在评论了袁世凯、陆征祥等最高层人物的表现后，他也称赞了官位不高的顾维钧的外交活动，指出所有这些“皆前此历次对外交涉所少见者”，给出了很高的评价。[61]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远东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此次涉及日、德、美、英诸列强的外交交涉，带给进入外交界时间还不长的顾维钧一个十分重要的机会，使他能够观察和了解中国对外关系的全局。还在美国留学时，他就认识到日本外交的欺骗性，指出言行不一致是日本外交的特征。[62]日本趁欧战出兵山东，随即提出“二十一条”，将它对华侵略

的野心暴露无遗。这使顾维钧看清日本是对中国最大的威胁。而在英国等传统列强忙于欧战时，美国在远东和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上升了。正是基于对中国外交全局这样的判断，中日交涉一开始，顾维钧就认识到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支持的只有美国，因此让美国了解情况，推进其为中国发声。对顾维钧以后的外交来说，参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最大的影响就是对中国外交的首要威胁和主要盟友有了清醒而坚定的认识，形成了联美制日的主张。这一主张，随着顾维钧越来越深地参与到中国外交事务中，也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对外政策。而对最高决策层来说，其通过中日交涉认识到中国外交需要顾维钧这样的年轻人。

三 华盛顿最年轻的公使

中日交涉刚刚结束，袁世凯就决定重用顾维钧，将其放洋出任驻外公使。1915年7月11日，袁世凯发布总统令，任命顾维钧为中国驻墨西哥公使。[63]以27岁的年龄和从未在驻外使馆工作过的资历而言，这一任命是颇不寻常的。这也成为中国外交史上前无古人，也可能是后无来者的一项纪录。

根据顾维钧的回忆，这一任命起因于驻美公使夏偕复在对美外交中的重大失误。1915年初，夏偕复在既未征得袁世凯同意，也未事先请示外交部的情况下，擅自向美国国务卿提议，应当邀请袁世凯总统出面调停结束世界大战，并说这是袁本人的意愿。北京政府在芮恩施前来询问此事时，方才知晓，袁世凯大怒之下命令外交总长孙宝琦立即将夏偕复撤职调回。但夏偕复是孙宝琦的内弟，驻美公使一职又是他力荐的，因此，孙宝琦恳请袁世凯由他来承担责任。此后不久，陆征祥接替孙宝琦出任外交总长，他与袁世凯商议后，决定派顾维钧去华盛顿出任中国驻美使馆参赞，主持馆务，为日后出任公使打下基础。陆征祥告诉了顾维钧这一安排，但顾维钧认为不妥，以资历尚浅为由请另委派一位新公使。最后，陆征祥又拟定了一个新方案，任命顾维钧为驻墨西哥公使，以增加资历，为避免刚到任就离开对墨西哥失礼，发布任命后让他先去伦敦见驻英公使施肇基，然后改派驻美公使。[64]不过，根据外交部次长曹汝霖的回忆，顾维钧任驻美公使，是他向袁世凯推荐的。[65]

顾、曹两人的回忆不尽相同，其实说的是各自经历的一个方面。调换夏偕复是北京政府急于派顾维钧赴美的主要因素，但夏与美国联络调停大战之事，外交部并非毫不知情，[66]而袁世凯要在对美外交上重用顾维钧不只是因为此事。曹汝霖的推荐应该也属实，顾维钧在外交部的工作，他作为次长都看在眼里，况且他们两人还是嘉定老乡，在总统面前美言几句是很自然的事。但曹汝霖不会是唯一向袁世凯推荐顾维钧的人，外交总长陆征祥肯定也是推荐之人，安排顾维钧去做使馆参赞的决定就是他与袁世凯商量后做出的。实际上，对常在自己身边工作的顾维钧，袁世凯已有直观的了解和基本的评判，尤其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顾维钧积极联络美国的主张和活动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顾维钧放洋出使，袁世凯下达的谕令中有一条是“联英、美、俄以防日”，并具体表明中国“练陆军助英、美，英、美出海军助我，利益互换”，顾维钧称

赞此“远交近攻之要图”，“精论至当，谋虑深远，钦佩莫名”。[67]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争取美国制约日本正是顾维钧在“二十一条”交涉中的主张和做法。袁世凯的这一谕令透露出他派顾维钧出使有加强与美联合的意图，这正是重用他的主因。

8月上旬，顾维钧离京南下，从上海乘船前往北美。同行的有40名清华庚款留美学生。《申报》称顾维钧顺道与清华副校长赵国才一同护送学生赴美，这显然是政府故意施放的烟幕，因为该报的另一则报道称顾此行“似有代夏使驻美之希望”，北京政府之真实意图已成为公开的秘密。[68]

8月底，顾维钧抵达美国旧金山。此时顾维钧有可能出任驻美国公使的消息也传到了大洋彼岸，正在美国国内的芮恩施奉国务院指令延缓返华，专程赶到旧金山与他见面。9月3日和4日，顾芮两人晤谈了三次，其中顾维钧探询的一个重点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牌。因为与芮恩施很熟，顾维钧直接问道：“美政府对华政策如何，两国亲交有何方法？”芮恩施的回答也很直接，说美国政府曾认真研究，“以亲华助华为政策”，他到北京后会与英国驻华公使接洽，以便“一致进行”，并表示美国的政策目标是“挫谋中国者之野心”。芮恩施未挑明对中国有野心者是谁，对他和顾维钧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顾维钧在汇报与芮恩施会晤的电报中说，会晤的话题是遵外交总长的电令进行的。[69]这也表明顾维钧此行确实有推进联美外交的任务。

顾维钧抵达美国之时，正是国内袁世凯酝酿帝制的敏感时期，不免会引起舆论的关注和联想。按顾维钧自己的说法，他竭力避免与帝制复辟有任何纠葛，要求等待改任驻美公使期间，政府不安排他任何涉及帝制的任务。[70]顾维钧的这个回忆故意“遗忘”了他此行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这并不是他在口述回忆中的唯一一次遗忘。

在与芮恩施的会谈中，顾维钧就确认了关于帝制的传闻，虽然他告诉芮恩施袁世凯本人对此是迟疑的，但芮恩施通过这次会谈得出的结论是，顾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在欧美为袁称帝制造舆论和打好基础。[71]芮恩施的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在旧金山逗留数日后，顾维钧赴美国中部的芝加哥。在这两个大城市，他与“美国官、绅、商、学、报各界重要人物处处来往”，其中大多数人会询问帝制一事，有同情者，有反对者。顾维钧都详加说明，称民

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爱国心发达甚速”，一般民众“知非有强固永久政体，不足图富强、谋立国”，他为国体变更辩护，说是“以救国为前提”，并且是“民心之趋向”。顾维钧在给外交部的电文中表示，“现奉钧电，自当竭力进行”，表明他向美国各界解释帝制确是奉命而行。[72]

不过顾维钧的使命并不仅仅是说明和解释，他还发挥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特长，推动美国媒体为中国国体变更做宣传。9月下旬，顾维钧联系了一家美国报纸，交给该报请人写好的稿子，刊登于报纸的头版。该文称，袁世凯反对改变国体，但政界、商界请愿恢复帝制，军队全体赞成帝制，因此袁本人抵挡不住赞成之声。在顾维钧运动下，该报还刊发了古德诺赞成君主制的文章。[73]

12月中旬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后，顾维钧联系在新闻界有影响的记者端纳、密勒（Thomas Millard）等在美国主要媒体上发声。12月13日，密勒在美国《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首都日报》（*Daily Capital Journal*）、《周日电讯报》（*The Sunday Telegram*）等报发文，强调袁世凯接受帝制本身并不会带来动荡，因“大多数中国人倾向帝制，且赞同袁继续做中国领袖”，只有在出现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动荡。而日本是倾向于制造混乱的。[74]在引导帝制舆论方面，顾维钧积极主动，花了很大力气。从密勒的言论来看，在鼓吹帝制时也有对日本侵华野心的揭露和警示，这又是与顾维钧联美的初衷一致的。

前面提到过，顾维钧留学时曾于1912年1月2日给纽约《太阳报》投过一封信，针对美国报纸上出现的中国应先行君主立宪制然后再行共和制的主张提出尖锐的批评，明确指出中国不必经君主立宪再走向共和制。[75]仅仅三年多的时间，他对共和的看法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呢？

从顾维钧向美国各界所做的说明和推动媒体发表的文章来看，对帝制复辟除了解释是“民心之趋向”，政界、商界和军队都赞成，还特别强调中国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体，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富强。辛亥革命在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帝制的同时，也瓦解了从晚清起不断走向衰落的中央集权。民国成立后，军阀政治的萌芽就已出现，北京政府缺乏必要的统治权威。在此背景下，这种认为中国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张，并非顾一个人的想法，当时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此种认识相当普遍，对“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的信奉使他们能够容忍袁世凯的独裁。[76]而因

为有在袁世凯身边工作的经历，顾维钧在帝制期间的活动还包含着他个人对袁世凯的好感。他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袁世凯处理外交事务“颇有经验”，虽是总统，“实际上同时又是外交总长”，在对外关系上亲力亲为，煞费苦心，“对政府所做的一切亲自承担了责任”，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物”。[77]因此，顾维钧对帝制的态度包含着对袁世凯的肯定和信任，以及对袁领导下中国强盛的期望。1916年1月29日，帝制已经推行，顾维钧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会的讲演中，表示只有一个统一且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够成功应对中国的复杂形势，最近实行的帝制就是这样一个举措。面对美国的知识精英，他充分发挥他的演讲才能：“给我们十年，我们会给你一个强大的中国。”[78]这显示出他对袁世凯领导中国的信心，强国的愿望使他愿意接受袁世凯这样一个强人。但复辟帝制最终使袁世凯身败名裂，所以顾维钧晚年口述回忆时就“遗忘”了这段重要的史实，从中不难看出他后来对自己卷入帝制运动的否定态度。

1915年10月25日，北京政府发布总统令，任命顾维钧为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担任过总编辑的哥伦比亚大学《哥大旁观者》次日就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分享了这位校友重返美国的喜悦和荣耀。

任命颁布时，顾维钧还在英国，11月下旬回到美国。按照外交礼仪，他必须递交国书后才能正式履行公使的职责。但美国方面却等不及了，国务院希望顾维钧能以中国公使的身份出席威尔逊总统与高尔特夫人（Edith Galt）的婚礼，提出只要将国书内容通过电报发到华盛顿，并附一份给国务院的副本，他们就可以安排递交国书了。12月16日，递交国书仪式举行。顾维钧致颂词时称：“中美睦谊素敦，利益相共，极愿将两国已有之亲善利益更谋发展，惟冀美政府推诚相助。”威尔逊在答词中说：“中美两国日益亲密，遇事必极力相助。”并特地称赞顾维钧“贵公使熟悉本国情形，学问优长，办理外交，自必浃洽”。[79]两天后，顾维钧参加了威尔逊总统第二段婚姻的婚礼。早在留学期间，顾维钧就参加过当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威尔逊的家宴，两人就政治哲学、美国行政管理以及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向进行过深入交谈，彼此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80]在中国外交官中，不管是晚清出使的还是当时驻外的，还没有人与驻在国元首有过密切的私人交往，这成为顾维钧开展对美外交的独特优势。

到任之初，除了推动帝制舆论、加强中美邦交外，争取美国借款也是顾维钧着力甚多的一件事，当然这与前两件事也密不可分。顾维钧争

取的第一笔美国借款是与利益坚顺公司（Lee Higginson & Co.）商谈的。这笔借款在他上任前就由北京政府财政部委托驻美使馆经办，以作充实实业、市政、教育及其他事业之用。顾的前任夏偕复在与利益坚顺公司代表商谈时，该公司代表提出须有代表中国在美国办理财政之权。1915年10月29日，北京政府财政部同意委托该公司为经理人在美发行中国债票，但中国政府仍有权自行委托其他公司经理其他债票。[81]

顾维钧上任后接过此事。至1916年3月下旬，该借款大体谈妥之际，国内政局因袁世凯帝制复辟而扑朔迷离动荡不定，美国舆论对此多有报道。利益坚顺公司遂“疑虑丛生，推诿延宕”，“要求待询各重要美人之意见后再商”。顾维钧向该公司代表尽力解释仍无成效，于是充分利用他在美国的人际网络，联络“与中国感情素好之人”，然后让利益坚顺公司去询问这些美国人，打消他们的顾虑。同时他还联系媒体，“将中国大局无碍情形，密托美人著论登报”。经顾维钧“反复晓譬，几致舌敝唇焦”，利益坚顺公司最终同意与中国政府签订借款合同。[82]4月7日，顾维钧代表北京政府与利益坚顺公司签署了《六厘金币库券合同》。合同规定，利益坚顺公司承担出售总额为500万美元的中国金币库券，期限3年，年息6厘；该公司先垫付100万美元给中国政府。[83]

借款达成的消息传回时，正是国内反袁运动高涨之际，反袁力量将此看作对帝制的支持，极力反对。唐绍仪以国会议员代表的身份致电美国国务卿，抗议借款给“背誓叛国”的袁世凯，并不承认借款有效。同时因舆论认为顾维钧是借款中“最出力之一人”，唐绍仪还在《申报》上刊登致顾维钧的公开电：

> 华盛顿中国公使顾维钧先生鉴：报传袁借美款二千五百万，已由公签字。若然，是无异甘心助逆，与全国国民为敌。兹由旅沪国会议员二百十六人公推仪向驻京美使及华盛顿美政府声明，袁世凯背誓叛国，已失其政府资格，此项借款国民绝对不负偿还之责外，请立将该约向前途声明作废。稍留余地，以与国民相见。速复。唐绍仪。[84]

唐绍仪是顾维钧的岳父，电文刊登在影响甚广的《申报》上，又有“稍留余地，以与国民相见”这样尖刻的言语，顾维钧收到电文后“甚为不快”。但唐绍仪不仅是他的岳父，也是他进入官场的引路人，此时又是南方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顾维钧不得不忍下心中的不快，给唐绍仪写了一封长信详加解释。[85]这是顾维钧第一次经历外交与国内政治交织

在一起的困境。

由于反袁力量的反对，利益坚顺公司付出首笔钱款后裹步不前。日本则出于反对美国资本进入中国，大肆渲染借款会引起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离间中美之间的关系。随即，袁世凯去世后政局进一步动荡，利益坚顺公司的借款在实交119.1万美元后就搁置了。[86]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组阁。混乱的政局和空虚的国库使北京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日本为进一步控制中国，又扣留存在横滨正金银行中的中国盐税余款。芮恩施对日本趁火打劫的做法十分恼火。从5月底到6月中旬，他接连给国务卿蓝辛发出4份密电，呼吁华盛顿贷款给中国，以抵消日本在中国的影响。他认为，作为目前唯一能给中国实际财政支持的大国，局势的发展已要求美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如果要阻止日本完全控制中国的财政，美国的银行界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他建议，美国应该给中国一笔1500万美元的银行贷款。[87]蓝辛接到芮恩施的电报后，向威尔逊做了汇报。同时，他还会见了美国银行团的代表，建议他们立即向中国政府提供400万或500万美元的贷款，以帮助中国政府应付行政上的急需。但是，美国银行团成员认为，向中国政府提供行政贷款会受到善后借款协议的约束，而提供非行政贷款则应由美国政府正式提出，并提供必要的担保。[88]由于为美国银行团在海外投资提供明确的担保不符合威尔逊政府的政策，蓝辛没有进一步要求美国银行团采取行动。但国库空虚的北京政府已无法等待下去了，财政总长陈锦涛于9月下旬授权顾维钧直接向美国银行界商谈借款，设法至少借到500万美元。[89]

这是顾维钧上任不久接手的又一个借款任务。几经询问后，顾维钧锁定了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双方谈判的难点在贷款的担保问题上。自晚清中国政府大量举借外债后，每笔借款都以中国的关税、盐税、烟酒税或厘金等作为抵押，并由外籍顾问监督、管理相应的税收。这些规定自然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有志于改变中外关系中不平等现象的顾维钧希望能改变举借外债中的这种状况。他上任不久，在与担任过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的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的会谈中，就表示美国银行界贷款给中国不应在担保方面提出苛刻要求，否则中国宁愿不向外国借款。[90]此次贷款谈判，芝加哥银行仍按往常的惯例提出要由烟酒税来担保，并由银行派代表对烟酒税进行监督。顾维钧向银行指出，不应提出对税收进行监督这样的政治性要求，希望纯从做生意出发，为向中

国贷款开一个好的先例。在顾维钧的努力下，芝加哥银行最终放弃了派代表对中国的烟酒税进行监督的要求。11月16日，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与芝加哥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国政府向芝加哥银行举借500万美元，以烟酒税为担保，发行国库券，期限3年，年息6厘。芝加哥银行还获得2500万美元补充贷款的优先借贷权。[91]除了没有对中国的烟酒税派人进行监督，这一借款合同与这一时期签订的其他借款合同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在改变传统的举借外债方式上，顾维钧只向前迈出了很小的一步。

这笔借款一签署就遭到了英、法、俄等国银行家的反对，理由是有违1913年善后借款的有关规定。日本更是故意散布谣言，说芝加哥银行因为有德国背景才同意了这样一笔旨在反对协约国的借款。美国政府是支持这笔借款的。因此在列强表示反对后，威尔逊总统要求蓝辛指示芮恩施以明确的语言坚定地表明美国政府的态度。12月上旬，芮恩施根据华盛顿的指示，分别会见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和列强驻华外交代表，表示芝加哥银行借款并未损害他国在华权益，也未与现有的各种协定发生抵触，因此任何排除美国银行家与中国正当合作的企图，都将遭到美国政府的坚决反对。[92]美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保证了芝加哥借款合同的顺利履行。借款中的风波实际上体现了美日两国在对华资本输出方面的激烈竞争，这使顾维钧进一步观察到美日在远东的矛盾和冲突。

出使华盛顿第一年，因为与帝制运动有牵连，争取借款又与国内政争有关联，顾维钧身心疲惫，萌生过退意。1916年9月下旬，有媒体称被任命为外交总长的唐绍仪有意另派人出任驻美公使，另有媒体称这与顾维钧和帝制运动的牵连有关。随即，顾维钧称病请辞，但未获批准。辞职的消息还流传了一些时日，直到1917年初，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发表消息，确认顾维钧仍将担任中国公使，传言才终止。[93]

四 “远交美以制近逼之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远东的国际关系格局，并由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中国最初从弱国立场出发制定中立政策，以图置身事外。但中立政策的失败和日本趁机扩大侵华，使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必须采取新的外交策略。顾维钧联美制日的主张顺应了中国外交面临的这一变化。与一些仅仅提出政策建议的人不同，顾维钧驻节华盛顿，在开展对美外交中可以身体力行地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从而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

直到1917年初，美国还未卷入世界大战。但德国此时开始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于是2月3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并于同日指示美国驻各中立国使节照会驻在国，照会表示“相信如果各中立国采取与本政府相似的行动，将有助于世界和平”。这一照会更多是一种外交姿态，并非真要各国仿效美国。但一心要推动中美合作的芮恩施却对这一指令有自己的理解，认为就是要让中立国跟随美国采取行动，以阻止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因此，“我的明确的任务就是说服中国按照我国政府的建议赞同美国的行动”。2月4日，接到国务院指示当天，他就拜访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劝说中国追随美国。此后几天，他除继续与黎元洪和段祺瑞见面外，还拜访了外交总长伍廷芳和财政总长陈锦涛等人。[94]

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当天，顾维钧将此消息通报外交部，并提供了未来局势可能发展的信息：“政界议论，如德国无意外举动，美国当不致宣战。”几天后，又将探询所得欧洲中立国的态度报告外交部：“欧洲中立国虽抗议德国封锁，但均不赞成对德绝交。”[95]此时，顾维钧只是通报情况，对中国该如何应对并无建议。

北京政府最高层对芮恩施的游说表现出不同的反应。黎元洪虽赞成外交总长伍廷芳追随美国的建议，但在与芮恩施会谈中却表现出怀疑和不赞成的态度，认为中国保持完全的中立较为稳妥，因为他担忧一旦追随美国，中国就会参战，这会增强掌握军权的段祺瑞的势力。[96]段祺瑞在这之前对中国参战就有考虑，芮恩施劝说后他精明地看出这对中国，包括对他自己派系的发展是一个机会，因此向芮恩施提出若中国参战美国需承诺的条件，包括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受外国控制、中国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享受充分权利、美国给中国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97]此

时北京与华盛顿的电报线路恰巧发生故障，芮恩施无法将段祺瑞的要求通报国务院，更无法获得明确的指示。急于推进中美合作的芮恩施自己做出决断，向北京政府表示如果中国追随美国，美国将给予援助。尽管芮恩施同时表示这并非明确的承诺，尚需美国政府正式认可，但段祺瑞内阁得到这一答复后于2月9日决定向德国提出抗议照会，并口头照会芮恩施，一旦美国对德宣战，中国至少对德绝交。[98]

但是华盛顿并不赞成芮恩施鼓励中国追随美国的做法。威尔逊获悉后，在给国务卿蓝辛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可能正在引导它（中国）冒毁灭的危险。"在国务院给芮恩施的指令中，威尔逊加上了这样的词句：美国政府"不希望使中国陷入危险"。[99]美国政府担心的是这会给日本进一步控制中国提供机会。芮恩施还要执着地向华盛顿表达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的机会，但他没能说服威尔逊和蓝辛改变主意。在3月12日给芮恩施的电报中，蓝辛明确地表示，芮恩施误解了2月3日的指令，国务院坚持不向中国做任何承诺的立场。[100]

芮恩施允诺的美国财政支持无法兑现，而原先反对中国参战的日本政府却在此时改变了态度，赞成中国向德国抗议的举动，并进而鼓励对德绝交，同时又意味深长地表示对中国未事先与日本接洽感到遗憾，显露出在中国参战问题上要与美国一争高低。2月中旬，日本政府委派寺内正毅首相的私人代表西原龟三来华，商谈对华借款事宜。

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不同态度对北京政府最高层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对德绝交和参战问题，段祺瑞主要是从国内角度而不是亲美或亲日的角度来考虑的，他认为，"吾国最难是财政，参战后，各国对我财政能有所援助，则政府办事方能顺利"，且参战还可以一扫北洋军队中已有之暮气。[101]所以，在芮恩施允诺美国将给中国财政援助后，段祺瑞内阁立即通过向德国提出抗议的决定。但在美国财政援助没能兑现的情况下，段祺瑞又在对德问题上转向了主动来商谈对华借款的日本，筹划按日本要求立即对德绝交。黎元洪最初在对德问题上意存犹豫，主要就是担心段祺瑞趁机扩张势力，因此虽在芮恩施劝说下一度倾向赞成对德绝交，但当段祺瑞在这一问题上成为主导力量时，他又极力主张在对德外交上持审慎态度。3月初，黎段矛盾激化，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围绕对德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府院之争的第一回合以黎元洪让步、北京政府于3月14日宣布对德绝交而告一段落。

顾维钧对国内府院之争的复杂背景并不了解。3月17日，他将中国

对德绝交一事通知美国国务院。此后，他更密切关注美国对德立场。4月2日，威尔逊向国会演讲对德宣战事，6日国会通过对德宣战，他都及时向国内报告。[102]当然，他更关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4月5日，即美国对德正式宣战前一天，顾维钧拜访国务卿蓝辛，除探询美国对德政策外，并询问如果中国对德作战，美国是否有意接济。蓝辛回答道“如中国事实上确向德作战，美国允接济”，并表示，“为中国计，为全局计，中国宜先从容布置，待时而动”，流露出希望中国及早准备的意愿。[103]

蓝辛的态度和美国正式对德宣战，使顾维钧两个月来观察所产生的思考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想法。4月9日，他给总理段祺瑞和外交总、次长发了一份长电，开头就表明自己“有不能已于言者”，欲将自己对中国参战及外交全局的想法向高层一吐为快。在他看来，中国对德先抗议，后绝交，参战已势在必行。但究竟是追随美国参战还是加入协约国参战，“利害出入洵属毫厘千里”。顾维钧的态度十分明确。他指出加入协约国参战有四害。第一，已表示与美一致，若转而加入协约国，美方不免疑我诚意，在我自失信用。第二，日本国策在趁欧战之机控制中国，将以协约国名义，借口助我作战，在我内部擅自行动，甚至逼迫中国允从一切。第三，英法将以强力使用我原料和人力，届时从则失主权，不从则背盟约。第四，英法默认日本为东亚霸主，将更便利日本控制中国。而随美参战则有四利。第一，与美各自处第三交战团地位，不受人迫，仍保行动之自由。第二，加入协约国义务必重，权利未必多，而美之于我，不独无所求，且有能力与意愿助我。第三，日本对我始终有野心，终必思动，英法碍于同盟不便干涉，更无余力助我，而美国谊当还助，并有余力顾我防患未然。第四，战后国际外交上获益不浅。[104]

不难看出，“四害四利”立论的出发点就是“联美制日”，这是顾维钧在“二十一条”交涉中就形成的看法，经过两年的实践和思考，表述更为完整和系统。这一看法不仅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国际格局变化的分析，也基于对与中国有关联的列强的总体判断。在顾维钧看来，列强中绝大多数与中国都有利害冲突，“如英之于西藏，俄之于蒙古，日之于山东，葡之于澳门，均属未了问题”。所以与这些国家，即便中国想与他们接近，“亦难持久”。而美国与其他列强完全不同，“美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显示了对美国的充分信任。这种信任在顾维钧以后的外交生涯中一直延续着。正是出于对美国的信任，他强调“诚”对于弱国在与强国交往中的重要性：“交必出于诚，方可不分强弱而均得其益，若以利交，终归于强者。”这份洋洋千余字的长电表达的是

顾维钧对中国外交的基本看法——“远交美尚足以制近逼之日本”。[105]

出使之后，顾维钧给国内的电报，大多是报告各种信息，间或会附上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有时也会就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建议。但像这份长电，系统地对中国外交的全局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做出深入的分析，还是第一次，在当时的驻外使节中也不多见。出使海外才一年多，他就希望自己的思考能对整个中国外交有所推进。因此，这份电报不像通常那样只发外交部，而是一并发给了国务总理。

长电发出后，顾维钧意犹未尽，一周后又向段祺瑞和外交总、次长发出一电。在4月9日的电报中顾维钧虽主张追随美国参战，但在具体时机上尚提出“不宜过急”。4月16日的电报中，他力主马上采取行动，因为一周来“情势又经一变”，中国既然对德绝交，“已处于不得不战之地”。立即参战的理由有二。一是美宣战后中南美多国跟进，而停战呼吁又接踵而起，此时参战，“国家荣誉，所关非浅”。如果“迟疑瞻顾，或转瞬而和议宣传，入战不便，中立难堪，时机一失，莫可挽回”。二是美国国会马上要通过参战拨款，若在通过前参战可获接济，否则将被排除在外。美日两国仍然是顾维钧考虑的重点：“美日两国素不相能，日本忌吾甚切，美则利吾强盛。”因此他建议北京政府“当机立决，自行宣战”。[106]

发出上述两电后，顾维钧又多次拜访国务院，与蓝辛等人交谈，讨论一旦中国参战美国对华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4月26日，他又托英国友人安排，与到访美国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会晤，询问英国对中国参战的看法。格雷表示，不管追随美国，还是加入协约国，要点在参战。[107]对追随美国参战，顾维钧抱着极大的热情。

但此时中国国内的政局却发生急剧的动荡。段祺瑞内阁在对德绝交后，为获取日本的支持进一步谋求对德宣战，黎元洪被迫同意将参战案提交国会。但参战案在国会遭拒。段祺瑞控制下的督军团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却干脆于5月23日罢免了段祺瑞。段祺瑞遂赴天津策动督军团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府院之争趋于激烈。

芮恩施对中国混乱的局势十分关注，他向蓝辛建议美国与其他列强共同发表一个声明，重申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不谋求领土与特许权。蓝辛接受了这一建议。6月4日，美国政府照会中国，表示“中国参加对德作战，或继续其与德政府现行关系是次要之事，当务之急是恢复和继

续其政治统一”，“对中国的政府形式或执政者，美国的兴趣仅在于其友谊能有助于中国。但美国对中国维持一个统一的负责的中央政府深感兴趣，并衷心希望中国为自己和世界的利益立即消除派系政争”。蓝辛要求芮恩施以非正式方式将照会内容告知反对黎元洪的督军团首领。[108]对在府院之争中处于下风的黎元洪来说，美国的照会是一个支持。

美国发出照会的次日，在府院之争中站在黎元洪一边的外交总长伍廷芳通过芮恩施致电顾维钧，向他通报督军团反对黎元洪的情况，指示他请求蓝辛和威尔逊发表声明支持黎元洪。顾维钧获悉府院之争激化的消息后，“深为惊骇”，于6月10日致电外交部请转呈总统黎元洪：

> 窃念国基未固，几经动摇，已甚危险。况欧战尚烈，和议无期，东亚均势既破，外交益难对付。此间各界谈论均谓为中国大局计，为世界计，极愿中国自保和平，方免意外之患等语，足见其深悉我国之现情，并竭诚忠告之雅意。钧默察外交大势，亦见险象环生，今见报载某督军拟遣兵进逼北京，更为焦灼。盖恐兵事一起，干涉立至，以我国内多故，反中强邻觊觎之计。用敢以钧个人名义电请徐东海力主和平，劝各方面捐除意见，均以国家为前提，万勿轻动干戈，致召外来之大患。钧职居外交，本不敢于内政妄有所陈。特身处海外，国际情势见闻较切，反观国内益用寒心，祸福所关，难安缄默。区区苦衷，谅邀垂鉴。[109]

两个月前的长电专论外交，这份电报却是因国内政争影响外交格局而发。在顾维钧漫长的外交生涯中，这样对国内政争直接发表意见的做法并不多见。他呼吁各方捐除意见，为国家计万勿轻动干戈，主要是担忧“兵事一起，干涉立至”，关注的还是外交，尤其是对“强邻觊觎”的担忧。顾维钧为险象环生的国内政局焦灼难安，但在外交部收到他电报的那天，即6月14日，张勋率领辫子兵进京了，乱成一团的北京城中已无人关心他的意见了。

“强邻觊觎”马上从担忧变成现实。美国与日本在远东的竞争与矛盾因其他列强忙于欧战而日益激化。日本政府希望在世界大战结束前能与美国在远东尤其是中国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巩固其在中国的优势地位。美国对德宣战后，关注的重点转向欧洲，也希望在远东缓和与日本的矛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于6月14日通知美国政府，前外相石井菊次郎被任命为特使，将赴美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顾维钧对日本这个强邻的外交一直高度关注，石井访美的消息马上引起他的警觉。6月16日，他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面时对石井访美表示关切，询问美国是否会承认日本在华拥有特殊利益，一眼看清了石井此行与中国的关联。[110]他也将这一消息马上报告国内。6月26日，他进一步分析了石井访美的目的并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顾维钧对石井访美的基本判断是："名为磋商，实将密提中国问题，而使美国俯就范围，用意至险。"这一判断基于他对日本对华政策的认识。他指出，日本对中国的大政方针是乘机渐进操纵中国，对其他列强则先谋束缚其在华发展自由，鼓吹日本在华特别优越之地位。他对日本对华施行的各种诡计看得十分清楚，"今日下哀的美敦书，明日发要求条件，后日议中日交亲"，但换汤不换药，目的就是要控制中国。他预判石井访美会涉及三个问题：一，日本在华优势地位；二，对华经济同盟；三，日本在山东地位。他提出应将日本对华野心向美通报，希望美国政府不与他国讨论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留待大战结束后再共同协商妥善解决。因为相信美国对华"向无野心"，所以他认为这次交涉"不至有意损及我国"。[111]从后来美日谈判和签订的协定来看，顾维钧对日本的分析和判断是深刻和准确的，而对美国的对华态度则太过乐观了。

8月下旬，石井菊次郎抵达华盛顿。日本政府给石井的公开指示是与美国讨论太平洋防卫等与世界大战有关的问题，但秘密指示包括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在华有至高无上的利益。美国政府对石井访美十分重视，对日本拟提出在华之特殊要求也有警觉。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朗（Breckinridge Long）在一份备忘录中认为，美国不应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优先地位"及在南满、东蒙和山东的特殊地位。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卫理（Edward Williams）指出，如果承认了日本的优先地位，美国就无法反对俄国、英国、法国提出相同的主张，"我们也就实际上赞同被剥夺在华投资的所有机会"。他们两人主张，美国最好的对策是在大战结束前"回避和拖延"讨论中国问题。[112]拖延到战后的建议与顾维钧的主张不谋而合。但国务卿蓝辛却准备在中国问题上与日本达成妥协。

从9月6日至11月2日，蓝辛与石井举行了12次会谈。会谈的内容涉及美日双方在大战中的协作、日本继承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以及中国问题。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中国问题上。在第一次会谈中，蓝辛就提出美日双方应该联合或同时重申"门户开放"政策。石井表示，日本政府当然赞同并会像以往一样遵循这一政策，但重申"门户开放"政策必须以承认日本在中国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前提。蓝辛表示美国不能接受"至高

无上”的提法，但愿意对日本在中国“基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利益”予以考虑，“理解日本的人口压力和工业扩张的需要”。为了说服日本放弃“至高无上”而接受“特殊”的提法，蓝辛解释说，这样的措辞“为双方做出合适的解释留下了足够的余地”。这一解释最终得到日本的认可。蓝辛又提议美日宣布不利用目前形势谋求在华特权，日本最初予以反对，在美国的坚持下，同意作为美日协定的秘密条文。[113]11月2日，蓝辛与石井以交换照会的形式达成了协定，其主要内容是：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尤其在与其属地邻近的地区有特殊利益；这样的特殊利益并不意味着歧视他国的贸易和无视中国的商业权利；美日两国否认他们有任何企图损害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意图。

蓝辛与石井会谈期间，对会谈内容高度保密，连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无法获悉详情。顾维钧在华盛顿想方设法去了解会谈的内容。他频繁访问国务院，并多次与蓝辛直接会晤。有时也通过关系，设法获取内幕消息。他最为关心的就是日本在华特殊地位问题，但美日均不愿在谈判期间对外泄露，“关防益密”。10月6日，顾维钧拜访蓝辛，询问谈判进展，蓝辛告诉他美国将承认日本在华有“特殊利益”。10月13日，他再与蓝辛见面，要他解释“特殊利益”的确切含义，蓝辛说这与优越利益或特别势力不一样，只是因中日地理邻近而产生，与政治经济也无关。顾维钧明白，蓝辛是在安慰他，日本原先的要求已被美国拒绝，现在只是承认一个地理事实，但这样的解释仍使他忧心忡忡。[114]

蓝辛与石井互换照会时商定，双方于美国时间11月6日在美国和日本同时公布这一协定。但国务院有官员在3日就向顾维钧透露了协定内容。5日，顾维钧拜访蓝辛，正式获得协定的文本，当即再请蓝辛对日本在华有“特殊利益”进行解释，蓝辛称只指商务，不涉及政治。顾维钧表示中国没有参与这一协定，因此并无遵守义务。[115]

北京政府获悉《蓝辛石井协定》后，向美国政府提出照会，称中国政府不受他国条约之束缚。11月12日，顾维钧向蓝辛递交了这份照会，表示中国舆论对美国“颇示失望”。蓝辛再次解释日本在华“特殊利益”基于其地理邻近，这只是叙述了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顾维钧紧紧追问，如果是事实为何要写进协定。蓝辛不得不辩称，这是为了换取日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承认，而这一交换是有利于中国的。他接着说，中国也可以对自己的近邻国家应用同样的原则。[116]一位美国学者在评论蓝辛最后一句话时说，不幸的是，中国不仅没有能力到其他国家宣称“特殊利

益”，甚至没有力量防卫自己的独立和主权。[117]作为中国驻美的外交代表，不难想象顾维钧听到蓝辛辩解时的无奈。但基于对远东国际形势的理解和对美国的信任，他对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仍抱很大期望。

1917年秋，在《蓝辛石井协定》签订前后，顾维钧在纽约做过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说：

> 中国和美国为我们树立了国家间关系的具体榜样：两国间的交往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之上，关系和睦，充分理解。一个多世纪的贸易往来，87年的传教工作，70多年的外交关系以及近半个世纪的教育合作，充满着长久的友好和睦的感情。因此，无论中国人与美国人在何处见面，他们都能毫无保留、互相信任地进行畅谈。他们间既无猜疑也无摩擦。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与日俱增。这两个国家做到的其他国家也可以做到。[118]

这种旨在推进中美关系的演讲，是顾维钧驻美期间经常做的活动。例如在华盛顿美国商会一次题为“互相依赖及公共利益”的演讲中，他也强调两国利益的一致：“中美两国之利益实在一并行线上进行，有特别之共同关系”，“除中美两国而外，他国亦无能协力同心谋太平洋商务与远东经济之发展”。并特别指出，在中国美国人要比其他国家的人受到更友好的对待。[119]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练就的演讲术，成为顾维钧履行公使职责的重要手段。

五 未雨绸缪备和会

早在日本以对德作战为由进占山东后，北京政府就认识到山东问题须待战后和会方能最终解决。中国对德宣战加入世界大战后，参加战后和会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北京政府开始了具体的谋划和准备。立志改变中国对外关系状况的顾维钧，更是敏锐地认识到，战后和会是中国外交“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120]

顾维钧驻节华盛顿，工作的重点是中美关系，但他的视野很开阔，注意观察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美国参战前，他多次向外交部报告美国与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外交往来的情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十四点计划”，主要涉及和平、贸易、殖民地三项议题，提出了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设想的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蓝图，即国际联盟、贸易自由和民族自决。顾维钧对此十分敏感，当天以密件形式致电外交部，并就其内容分析道：“与我国相关最切者即第五款，谓解决各属地问题，须以开诚公道为重，使属地人民之利益与要索政府之权利相提并重；及第十四条，谓组织万国公团，各国彼此担保政治独立与领土完全，不分大小，一体待遇。”第五条显然与外国在华各租借地有关，这其中当然包括了前属德国、现为日本所占的胶州湾租借地。第十四条即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构想，顾维钧对此十分看重，认为是“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后来与参与拟订“十四点计划”的威尔逊总统顾问豪斯（Edward House）有过多次讨论。[121]在当时的中国外交官中，顾维钧对国际组织最为重视。

4月下旬，北京政府外交部成立议和筹备处，专门讨论战后和会问题。参与讨论议事的有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陈箓等十余人。5月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驻外各公使，征求他们对于和会筹备工作的意见。电文称：“现距和局虽远，亦应及早筹备。如各国对华政治倾向及政治中心人物对华态度及议论，并我国应与何国提携、从何入手等事，均与我国参预和会有密切关系，希派员专司调查，随时电部，并望发表卓见，以备参考。”[122]

顾维钧对战后和会早有关注，接外交部电报后即回复了一封长电。他报告说，因为到任以来，对此问题“倍加注意”，所以“先从搜集材料入手”，为详尽之研究做准备，“各种材料经年累月之搜罗，累积盈筐”。根

据这些材料，顾维钧将与和会相关的问题分为六类：（1）各国对待中国之政策问题；（2）中国由欧战直接发生之问题；（3）中国所希望解决之问题；（4）各项国际公法之问题；（5）维持世界和平之问题；（6）欧洲各国之特别问题。在他看来，前三类问题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第一类各国对华政策关系我国命脉，洵属首要之图。”第二类问题如日本占领德国胶州湾租借地，“日、德调查必详，研究必细，事论驳诘，必以我国为鹄的，亦属重要”，必须要有充分准备。第三类是中国希望解决的问题，“能办到一分，即是挽回权利一分，若有预备，届时可相机提议”。这里，顾维钧提出了要解决中外间因不平等条约而存在的问题。他举日本攻占山东为例，指出“各租借地之存在与否实与将来世界和平有关”，希望将修订中外间条约列入战后和会的议题。后三类问题与中国关系不大或完全没关系，但即使如此，顾维钧也建议应有准备。如对第六类问题，他明白各国不会与中国商量，但中国若有准备，“倘偶议及，应付裕如，足动人观感”，也会增加中国外交的得分。[123]在5月21日给外交部的另一份电报中，他又指出，“欧战发生，均势破坏，其方有余力且素主门户开放等主义，足为我助者，厥惟美国”，[124]重申了他之前的看法，表达了在和会上要与美国合作的立场。

与其他各驻外公使回复外交部的电报相比，顾维钧的电报是十分详尽并具体的。除驻法公使胡惟德在这之前也提出修约的主张外，其他驻外公使主要是回答外交部“与何国提携”的询问，而对参加和会应“从何入手”的询问，回答问题的视野就不如顾维钧那样开阔了。[125]从顾维钧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他是从中国外交的全局出发来思考问题并提出对策的，因此将与大战并没有直接关联的修约问题也提了出来。

顾维钧的电报对外交部议和筹备处讨论的议题产生了影响。议和筹备处在讨论战后和会时，除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山东问题，还涉及了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和《辛丑条约》等并非直接与战争相关的问题。[126]顾维钧与美国合作的主张自“二十一条”交涉后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这次也得到外交部的肯定。外交总长陆征祥在给顾维钧的一封电报中称赞他“对于和议，热心筹划，素所钦佩”，并告诉他“中国政府方针，抱定美总统历次演说要旨，作为加入大会时惟一之根据”，要顾维钧据此与美政府积极接洽。[127]这一和会方针显然吸纳了顾维钧的建议。

对和会筹备提出建议之外，顾维钧还利用留学期间形成的人际网络，联络美国政界、学界的重要人物，为中美关系和战后和会积聚人

脉。自近代被迫打开国门后，中国因为缺少外交人才，常聘用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为中国外交出谋划策，甚至折冲樽俎。1868年，清政府第一个派往国外的使团就由刚卸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率领。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后，清政府聘请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福士达（John Forster）为李鸿章赴日谈判的顾问。此后，福士达长期担任中国驻美使馆顾问。顾维钧到华盛顿时，他还是使馆的顾问。顾维钧能与蓝辛建立个人关系，在蓝辛、石井谈判期间多次与他会面，就少不了福士达的帮助，因为这位前任国务卿是现任国务卿的丈人。1917年下半年，福士达去世了。对于这个空出来的重要位置，顾维钧马上想到了他的老师穆尔教授。

1918年1月15日，顾维钧致电外交部，提出战后和会事务繁多，必须“以欧美著名国际法家之意见为后盾”，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穆尔就是当今“国际法学泰斗”，他对中国情形熟悉，对华“感情亦佳”，如若聘请他，“不特我国筹备和会可请襄助，裨益匪浅，本馆平时交涉亦得借资咨询”。1月23日，外交部复电同意了顾维钧的意见。1月26日，顾维钧给穆尔写信，要与他当面讨论要事。事情进展得很顺利。3月30日，穆尔签了一份担任中国驻美使馆法律顾问（为期三年）的合同。法律顾问的职责是负责使馆的“所有法律事务”，包括谈判条约等。这一职位的薪金是一个季度1000美元，一年4000美元。合同是秘密的，穆尔没对任何人提起此事，所以在美国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一身份。[128]

1918年10月，大战临近结束，顾维钧在华盛顿的活动更为繁忙。但恰在此时，他经历了丧妻之痛。唐宝玥因“西班牙流感”于10月10日去世，[129]留下了两岁的儿子和一岁的女儿。顾维钧在使馆为妻子举行殓礼后，一度考虑辞职，但在国家用人之际，最终还是下决心报效国家。

刚办完妻子的丧事，顾维钧就接到外交总长陆征祥的电报，告诉他国务会议已决定派他先赴欧洲参加和会，“协商各政府接洽，并布置一切报界舆论”，同时指示他邀请穆尔同去。[130]于是，顾维钧马上去见穆尔，请他担任中国出席和会的“技术代表”。穆尔对这一邀请十分兴奋。作为一个享有盛誉的国际法专家，他很想参加和会，但已经获悉威尔逊总统不会请他参加美国代表团，因为他不需要与旧式外交有关联的老派人士。中国的邀请来得正是时候。但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与使馆的顾问不同，这一公开的身份必须让美国政府知道并征得其同意。

穆尔去见蓝辛，将中国的邀请告诉了他。蓝辛马上提到他的丈人福

士达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1907年海牙保和会一事。对穆尔任职中国代表团，他并不反对。但几天后，蓝辛却告诉他，威尔逊对此坚决反对，理由是一个美国人在和会上成为非美国政府的代表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会引起他代表的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冲突。随后，助理国务卿朗告知顾维钧，美国政府反对中国在和会上聘用美国人，如果中国届时需要听取意见，“美国代表团乐意提供”。[131]

一心想去参加和会的穆尔对政府的阻拦很不高兴，他给蓝辛写信抱怨，并提到聘用外国人是近几十年中国外交的惯常做法，还举了蒲安臣的例子。私底下在给女儿的信中，穆尔怀疑这一禁令牵涉个人因素。对此，顾维钧与他的老师持相同看法。他告诉穆尔，福士达病重时将自己的外孙杜勒斯（John Dulles）推荐给他，希望由杜勒斯来接替他使馆顾问的职位。但顾维钧认为杜勒斯缺少经验，回绝了这一推荐。后来，福士达太太又来对顾维钧说，如果杜勒斯不合适，使馆顾问的职位可以空一段时间，待她的女婿蓝辛卸任国务卿后来接任。师生交谈后终于明白，福士达家族将中国使馆顾问的职位看作自家禁脔。[132]穆尔很遗憾无法与自己的得意门生一起去巴黎，但他向顾维钧表示，和会“筹备事宜愿继续襄助”，对酬劳也没提具体要求。因此，顾维钧“仍随时密与讨论，以收咨询之效”。[133]驻美使馆随员金问泗，工作同时在哥大跟穆尔读国际法硕士，就根据顾维钧的安排去询问关税自主和领事裁判权收回问题，包括研究方法和相关材料，穆尔“周详指导，受裨良多”。[134]后来在巴黎和会上穆尔对顾维钧帮助甚大。

穆尔是顾维钧出使海外主持馆务后，自己做主提出聘请的第一个外国顾问。虽然这是晚清以来中国外交的惯常做法，但顾维钧与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可以与外国顾问没有语言障碍、推心置腹地进行交流，尤其他与穆尔有师生关系，更便于充分发挥外国顾问的作用，并通过他们去建立、扩展人际交往圈。正式顾问之外，他也经常临时性地聘请外国人，或者通过邀请外国人到中国旅行的方法请他们为中国办事发声。1915年底，他就建议北京政府邀请美国经济学教授精琦（Jeremiah Jenks）访华，以便后者能在美国报纸上多发表有利于北京政府的言论。这一建议得到北京政府的同意，给精琦支付了14000银元作为川旅杂费。[135]他还向北京政府建议资助美国人密勒5000美元，使他能撰写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影响美国舆论。[136]在与驻在国各界人士打交道、联络他们推进中国外交方面，顾维钧办得积极而稳妥，是同时代外交官中的佼佼者。正因为如此，北京政府会派他先赴欧洲，布置与和会

有关的“报界舆论”。

[1] 据统计，留美幼童服务外交界共有21人，占留美幼童总人数六分之一稍强。见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54～257页。

[2] 参见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三联书店，2017，第7章第1节。

[3] 参见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第10、11章。

[4] 《颜惠庆自传》，吴建雍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52页。

[5] 罗光：《陆征祥传》，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第64页。

[6] 外交部主事吴成章等编《外交部沿革纪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4～5页。

[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85页。

[8] 《申报》1912年5月10日，第1版。

[9] 这是根据顾维钧对徐景灿所说，顾维钧口述录音由徐景灿提供。

[10] 《妇女时报》1913年第10期。

[11] 《申报》1912年8月18日，第2版。

[12] 《申报》1913年3月10日，第3版。

[13] 许详：《民初中英涉藏事务交涉之补证——基于“顾维钧档案”的研究》，《民国档案》2020年第2期。

[14] 许详：《民初中英涉藏事务交涉之补证——基于“顾维钧档案”的研究》，《民国档案》2020年第2期。

[1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14～115页。

[1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15页。

[17] 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第55页。

[1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11～112页。

[19] 《莫理循致顾维钧函》（1913年11月24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册，刘桂梁等

译，知识出版社，1986，第268页。

[20] 《莫理循致顾维钧函》（1913年12月16日、1914年1月27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册，第288～291、303～304页。

[2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08～109页。

[2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35～138页。

[23] 《申报》1913年10月20日，第6版。

[24] 李毓澍主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第9～10页。

[25] 李毓澍主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19、22页。

[26] 李毓澍主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29页。

[27] 李毓澍主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26～28页。

[2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19～121页。

[29] Charge d’ 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10，1914，*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14，Supplement，p.187.

[30] 李毓澍主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657页。

[31] 伍朝枢、顾维钧等所拟《山东问题之分析》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161页。

[32] 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第273页；尚小明：《“二十一条”交涉的另一条管道——总统府相关活动透视》，《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

[33] 《中日交涉宜延缓不可开议》（1915年1月2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电子档案），档号：03-33-084-02-001。

[3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23页。

[35] 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rary 23，24，26，27，*FRUS*，1915，pp.79-80；Reinsch to Bryan，Feburary 1，1915，in Arthur Link ed.，*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32，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170.

[36]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李抱宏、盛震溯译，游燮庭校，商务印书馆，1982，第115页。

[37] 马建标：《“进步主义”在中国：芮恩施与欧美同学会的共享经历》，《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38] Noel Pugache，*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New York，1979，p.149；*New York Times*，27 Janurary，1915，p.3.

[39] 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76页。

[40] 尚小明：《“二十一条”交涉的另一条管道——总统府相关活动透视》，《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

[41] 李毓澍、林明德主编《中日关系史料——二十一条交涉》（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第21页。

[42] 侯中军：《英国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

[43]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2卷，武汉出版社，1990，第858页。

[4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23页；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第116页。

[45] Japanese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9 Feburary，*FRUS*，1915，p.21.

[46] 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5 Feburary，*FRUS*，1915，p.90.

[4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档号：1039-373；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册，第402页。

[48]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第108页；*FRUS*，1915，p.99。

[49] 《驻英施公使电》（1915年2月1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3-085-02-017；《驻美夏公使电》（1915年2月1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3-085-02-006。

[50] 李毓澍、林明德主编《中日关系史料——二十一条交涉》（上），第55页。

[5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22页。

[52]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第115页；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3，26 Feburary，6 March，*FRUS*，1915，pp.97-99。

[53] Robert Lansing，*War Memoirs of Robert Lansing*，New York，1935，p.283.

[54] 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张玮瑛、

曾学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第110页。

[55] *Wilson Papers*，Vol.33，pp.520-521.

[56] 王纲领：《欧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第54页；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1980，第215页。

[57] 《顾维钧致叶誉虎（恭绰）函》（1938年12月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Columbia University，box 31。

[5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25～127页。

[59] 《东方杂志》第12卷第6号，1915年，第1～6页。

[60] *Wilson Papers*，Vol.34，p.140.

[61] 王芸生纂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大公报社，1933，第398页。1980年该书重版时，此段评论被删除。

[62] *New York Herald*，8 October，1908，转引自Li Chen，“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63] 《申报》1915年7月14日，第2版。

[6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38～140页。

[65]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第114页。

[66] 1914年底，外交部指示夏偕复便中向美提及调停事，《发驻美夏公使电》（1914年12月1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7-001-01-009。参见罗毅、金光耀《北京政府筹备参加欧战和会考析》，《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67] 《收驻美顾、驻英施公使电》（1915年12月1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32-03-001。参见承红磊《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68] 《申报》1915年8月4日第10版、8月8日第2版。

[69] 《收驻墨顾公使电》［1915年9月7日（4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43-03-001。

[7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41页。

[71]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第134～135页。

[72] 《收出使墨国顾公使电》（1915年9月2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

号：03-13-032-01-001，转引自承红磊《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73] 承红磊：《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74] 承红磊：《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密勒又译米勒，1911年在上海创办《大陆报》（*China Press*），任主笔。1916年创办《密勒氏评论》（*Millard' s Review*）。

[75] “Confusing Counsel From America to the Revolutionists，”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7，No.4，1912，pp.352-353.

[76] 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第46页。

[7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90～392、85页。

[78] 承红磊：《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79]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5年12月1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44-019-01-001。

[8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44页。

[81] 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5卷，档案出版社，1991，第348～350页。

[82]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5卷，第357～358页。

[83]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59，第1173页。

[84] 《申报》1916年4月13日第3版、4月16日第6版、4月18日第2版。

[8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46页。顾维钧在回忆中将唐绍仪的电文与1916年11月的芝加哥借款联系在一起，但从其回忆的电文内容看，应是这笔借款，芝加哥借款已在袁世凯死后了。

[86]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5卷，第347页。

[87] Reinsch to Lansing，May 27；14，15 June，1916，*Wilson Papers*，Vol.37，pp.234-236.

[88] *FRUS*，1916，pp.134-138.

[89]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44～145页。

[90] Memorandum：Mr.Straight Called on 16 December，19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039-395。

[9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45～146页；《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5卷，第654～659页。

[92] 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2，18 December，*FRUS*，1916，pp.145，148；Lansing to Wilson，4 December 1916，*Wilson Papers*，Vol.40，p.140.

[93] 《申报》1916年9月26日第2版、9月30日第2版、11月2日第2版；*Columbia Spectator*，29 September，1916；6 January，1917。

[94]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第187页；*Wilson Papers*，Vol.41，p.175。

[95] 《收顾公使电》（1917年2月3日、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6-01-005、03-12-006-01-010。

[96] 张国淦：《对德奥参战》，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3卷，第79～80页；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第187～191页。

[97] 张国淦：《对德奥参战》，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3卷，第75～76页。

[98] *Wilson Papers*，Vol.41，pp.175-178；*FRUS*，1917，Supplement，p.407.

[99] *Wilson Papers*，Vol.41，pp.175，187.

[100] *Wilson Papers*，Vol.41，p.229；*FRUS*，1917，Supplement，p.419.

[101] 张国淦：《对德奥参战》，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3卷，第76页。

[102] 《收顾公使电》（1917年4月2日）、《呈大总统电》（1917年4月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6-01-043、03-12-006-01-048。

[103] 《美国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近代史资料》总38号，中华书局，1979，第183页。

[104] 《美国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4～185页。

[105] 《美国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5页。

[106] 《电外交部》（1917年4月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6-01-051。

[107] 《致国务总理外交总次长电》（1917年4月2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6-01-033。

[108] *FRUS*，1917，pp.46-49.

[109]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7年6月14日（10日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039-287。

[110] Polk to Williams，20 June，1917，*State Department Files*，Microcopy No.337.711.9312/22.

[111]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7年6月27日（26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3-076-01-001。

[112] Medeleine Chi，*China Diplomacy*，*1914-191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108-109.

[113] *FRUS*，*Lansing Papers*，*1914-1920*，Washington，1939，Vol.2，pp.433-437，445-449.

[114]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7年10月9日（6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3-076-01-011；《收驻美顾公使电》［1917年10月16日（13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3-076-01-012；《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58～159页。

[115]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7年11月7日（5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3-076-01-025。

[116]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7年11月15日（12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3-076-02-017；Robert Lansing，*War Memoirs of Robert Lansing*，New York，1935，p.304。

[117] Medeleine Chi，*China Diplomacy*，*1914-1918*，p.114.

[118] Reginald Wheeler，*China and the World War*，New York，1919，pp.153-155.

[119] 《驻美公使顾维钧在华盛顿美国商会演说》，《申报》1916年3月23日，第11版。

[12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64页。关于北京政府对和会的筹备工作，参见罗毅、金光耀《北京政府筹备参加欧战和会考析》，《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121]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8年1月11日（8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7-002-01-007；《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63页。

[122] 《发驻英等各使电》（1918年5月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7-002-01-044。

[123] 《致外交部报告研究议和情形函》（该件无日期，当在1917年5月上半月），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8-02-011。

[124] 《函外交部》（1918年5月2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8-02-012。

[125] 罗毅、金光耀：《北京政府筹备参加欧战和会考析》，《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126] 《议和筹备处会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039-373。

[127] 《发驻美顾公使电》（1918年10月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7-01-001。

[128] 《电外交部》（1918年1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8-02-001；Wellington Koo to J.B.Moore，26 Janurary，1918，box 38，*Moore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Koo to Moore，30 March，1918，box 94，*Moore Papers*，转引自Stephen G.Craft，“John Bassett Moore，Robert Lansing，and the Shandong Ques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2（May 1997），p.233。

[129] 《申报》1918年12月21日，第10版。

[130] 《发驻美顾公使电》（1918年10月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7-01-001。

[131] Lansing to J.B.Moore，October 30，1918，*Moore Papers*；Memorandum of Long-Koo Conversation，November 26，1918，*Breckinridge Long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转引自Stephen G.Craft，“John Bassett Moore，Robert Lansing，and the Shandong Ques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2（May 1997），pp.233-234。

[132] Stephen G.Craft，“John Bassett Moore，Robert Lansing，and the Shandong Ques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2（May 1997），p.235.

[133]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8年11月8日（5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7-01-001。

[134] 《金问泗、郭云观致顾维钧》（1918年11月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8-02-024。

[135] 承红磊：《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136] 《函外交部》（1918年5月2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8-02-012。

第三章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声音

一 巴黎雄辩威名扬

1918年11月11日，持续了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中国期待已久的和会召开在即。

11月14日，顾维钧致电外交部："风闻和会地点大约在巴黎，计年内、年初可开会。"[1]中国出席和会代表的选派问题就此被提上日程。停战当天，与顾维钧关系密切的美国记者密勒称，"顾在华盛顿有名望，很受重视"，一旦被任命为和会代表，"必定能以这种身份发挥重要作用"。[2]持相同看法的也有中国的外交官。驻法公使胡惟德不止一次向外交部建议，顾维钧应该在中国代表团的名单中，但他同时将驻日公使章宗祥也列入这个名单。[3]胡惟德希望中国的和会外交能在美、日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但是，外交部对在和会上依靠哪个国家已有主意。

11月27日，外交总长陆征祥致电顾维钧，告诉他"政府业经决定，派祥与施、胡二使为大使，另派执事与魏驻使为大使兼专门委员，参列议席"。[4]即由外交总长陆征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五人出任和会代表。除陆征祥外，其余四人均系驻欧美国家的外交使节。而胡惟德建议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被排除在外。在要面对与日本有关问题的和会上，不派驻日公使，表明了北京政府的态度。

在这之前，11月21日，陆征祥给顾维钧发了一份近两千字的长电，要求他通过蓝辛向威尔逊表达中国参加和会时对美国的期望，并具体指示了与美国谈话的内容。陆征祥对中国"不顾内乱"追随美国对德参战的过程做了详尽的叙述，以此表达对美国尤其是威尔逊总统的看重，"现中国全国人民之眼光，无一不注意于美大总统，以为可以为中国一援手者，惟在美总统一人"。表明了希望美国在和会上支持中国的愿望。陆征祥在电报结尾提到，"此电只发尊处，不发他馆"。[5]表达了对顾维钧的

倚重，也表明了对美外交的重要性。

外交部的参会方针与顾维钧一直呼吁的联美主张是一致的。陆征祥直接参与了“二十一条”交涉，对顾的这一主张有亲身的体认，此时在电文中表达中国“不得不依赖美国之赞助”，要求顾维钧加强对美外交。正是通过这样的互动，联美的主张在中国外交界逐渐被接受认同，并付诸实施。

根据陆征祥的指示，顾维钧于11月25日与国务卿蓝辛见面，向他递交了一份非正式备忘录，阐述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的基本要求。这份备忘录是根据陆征祥11月2日电报指示由顾维钧拟定英文稿的。[6]顾维钧在备忘录中明确指出中国向和会提出的要求基于三个原则，即领土完整、维护主权和经济财政独立，“遵循这三个原则不仅对于维护中国的独立，而且对于实现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1月8在国会演说中提出的伟大计划，都是必不可少的”。顾维钧着意将中国的要求与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联系在一起，就是要赢得美国的同情，争取美国的支持。备忘录详尽阐述了基于这三个原则中国将提出的具体要求：根据领土完整原则，中国将要求取消在华租界和租借地；根据维护主权原则，中国将要求取消《辛丑条约》规定的外国军队在京津地区的驻兵权以及领事裁判权；根据经济和财政独立原则，中国将要求获得关税自主权以及取消列强在华势力范围。[7]这是和会召开前，中国向外国政府第一次完整系统阐明对和会的期望和要求。

次日，顾维钧又去白宫拜见威尔逊，进行了15分钟的会谈，向他直接表达中国的期望，并了解他对中国的立场。在简单重申递交蓝辛的备忘录内容后，顾维钧表示，“中国人民期待着总统和他所代表的伟大国家帮助他们实现这些公正的要求和愿望”。威尔逊称自己对中国始终抱有同情心，“乐意尽己所能在和会上支持中国”，并“与中国代表团合作”。但是他又坦承，中国与其他列强间的秘密条约十分棘手，这会使“十四点计划”在远东的推行殊为不易。顾维钧看出威尔逊对国际联盟更为关注，因此保证中国一定全力支持。[8]威尔逊的谈话虽然简短，却概括了他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立场，即同情并愿意支持中国，但也明白中外间秘密条约将给这种支持带来的麻烦。而在他的议程上，中国问题排在国际联盟之后。

此后，顾维钧还与助理国务卿朗谈了两次，并在29日与蓝辛又会谈了一次，目的都是在进一步阐释中国对和会的要求。蓝辛表示，之前匆

匆浏览备忘录后并没记住主要内容，但顾的解释使他抓住了要点。[9]11月最后几天顾维钧与美国最高决策层的接触是中国为参加巴黎和会的重要准备，它向美国表明了中国的要求和期望，也得到了美国支持中国的承诺。

12月1日，顾维钧乘船离美赴欧，11日抵达巴黎，与同日到达巴黎的驻英公使施肇基以及驻法公使胡惟德会合。此时，中国政府的首席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尚在旅途之中，在巴黎的中国代表虽群龙无首，但马上就开始了工作。与刚抵达巴黎的美国代表团沟通是顾维钧关注的重点。他与施肇基和胡惟德一起走访国务卿蓝辛，并单独与威尔逊的顾问豪斯会面，进一步沟通中美间对和会的看法。顾维钧还去见了美国代表团顾问肖特威尔教授，在哥大时他上过后者的欧洲大陆史课程。[10]

由于在华盛顿使馆时对和会问题已开展研究，顾维钧为代表团拟了一份工作计划，开列了7个问题，让大家分头去准备。他自己承担了其中的4个问题，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归还租借地、取消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和恢复中国关税自主。[11]但此时他发现，自己对和会的准备和设想与政府的指令并不一致。

11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中国驻法使馆，给中国代表团发出训令。这份训令开列中国参会的普通原则是：保持与世界各国平等之地位，与美国“应始终一致，力与提携”，欧洲问题听从协约国多数意见。中国希望向和会提出的问题则是之前已向美国政府提出的三项原则：领土之完全、主权之恢复、经济之自由。此外还有对德奥如何恢复国交、撤销彼此条约等具体问题。[12]训令中没有提及大战与中国最为密切的山东问题。正如唐启华指出的，这反映了北京政府在美日之间力图保持平衡、脚踩两只船的态度。北京政府希望能依赖日本善意，解决山东问题，收回胶州湾；依赖美国善意，提出希望条件。[13]

顾维钧是到巴黎后知道政府这一立场的。12月20日，他与施肇基、胡惟德一起致电外交部发表意见。他们认为，中国希望提出的问题并非由此次战争直接产生，但事关“我国前途”，应当“悉心研究，协力进行”。表示出一定程度的谨慎。对山东各问题，他们认为，此皆因战争直接产生，“损我主权领土尤多”，因此建议应在会上“相机提出”。[14]表明了对政府训令忽略山东问题的不同看法。

但北京政府并未就山东问题做出直接答复。12月27日，顾维钧在巴

黎与美国代表团某成员会晤时，被问到中国对山东问题所持立场，他只能以外交口吻回答说：“此次和会，我国首重保障领土完全之原则，所询各端正在筹商之中，陆总长抵法后，可望商定。”次日，顾维钧致电外交部，询问政府对山东等问题“抱何方针”，希望政府在山东问题上有明确指示。1919年1月5日，外交部回电称，“山东系中国腹地，尤不愿他国有特殊势力”，对于山东等问题“自以保障领土完全为原则，已与陆专使详洽，陆到时，请与商定”。[15]仍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陆征祥是于1月11日清晨抵达巴黎的。此前陆征祥指示顾维钧加强与美联合，但他在赴欧途中先经日本，也打算与日本政府接洽沟通，虽因担心美国反对而减少与日本官员的接触，但在山东问题上仍对日承诺按中日成议办理，即不提交和会。[16]1月15日，顾维钧陪同陆征祥去见美国国务卿蓝辛，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中国参会代表的人数问题。[17]顾维钧见到陆征祥后，自然会向他提出山东问题并表达自己的看法，外交部的电报也是请顾与陆商定办法。虽然缺少两人交谈的记录，但是陆征祥抵达巴黎一星期后，对山东问题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1月18日，在给外交部的电报中，他明确表示“山东问题即须提出”，请国内电告有关山东铁路借款合同，否则，“勉强提出，措词稍有不符，不但遭彼反诘，且可发生极危险之影响”，表明将向和会提出山东问题。[18]这一变化显然是受了顾维钧的影响。

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由于只获得两个席位，中国代表团由陆征祥和王正廷出席。在开幕式上，威尔逊与中国代表握手时问道：“顾维钧博士应该在这里，他人呢？”王正廷尴尬地解释说，中国只获得两个席位，代表们只能轮流出席。[19]

1月22日，中国代表团举行第二次工作会议，讨论与会基本方针，陆征祥未出席。会议决定向和会提交议案先从与欧战有直接关联的德奥方面入手，但可在议案中略提中国对其他事项之希望，以观反应。会议还议定对德奥议案六条大纲，包括废除中国与德奥间一切条约及以往德奥所占之一切权益，并公推顾维钧起草这一议案。与会者认为，“二十一条”为日本“胁迫我国承认”，此次应提交和会，力争废除；而山东问题应由“中国提出议案，直接向德国要求退还中国”。[20]

1月23日，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议。陆征祥首先通报刚收到的中日间关于山东济顺、高徐铁路的换文。顾维钧第一次确切知道中日间有这样的秘密换文。陆征祥发言后，他马上表明自己的态度：“关于山东问

题，所有领土权、路矿权，似应归一案录议。”因为自“二十一条”以后中日间各种条约换文，“均由欧战发生，仅属战期内之暂行办法”；“现在和会已开，一切由欧战发生之问题，正须求永久之解决，我国山东问题，亦可公诸大会议决”。这一意见成为代表团的主导看法，决定将因战争而发生的中德、中日问题，“先在大会提出纲要”。[21]这次会议做出的决议，超出了北京政府给代表团的训令。

然而，中国代表团还未完成向大会提出山东问题的准备，日本就抢先提出这一问题。巴黎和会开幕后，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各派两名代表组成“十人会”，为和会最高机构，一切重要问题皆由十人会决定。1月27日上午，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在十人会上临时动议，要求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企图撇开中国造成既成事实。但美国出席十人会的威尔逊和蓝辛提出，有关中国事宜应先听取中国方面的说明，于是十人会决定请中国代表于当日下午3点到会。[22]威尔逊此时没有失诺，他的提议挫败了日本的阴谋，帮助了中国。

当天中午，在十人会正式通知到达之前，美国代表团顾问卫理将情况先期通报中国代表团，请预做准备。这一消息对代表团犹如“一个晴天霹雳”。陆征祥根据卫理建议称病不赴会，代表团其他成员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局面沉默不语。顾维钧遂提议根据代表的排序，应由王正廷和施肇基赴会。施肇基说他对山东问题没有准备，而顾维钧对此素有研究，应由顾出席。王正廷则表示，如果非要他出席，应由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最后决定由王、顾两人出席十人会，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23]

此时离下午3点开会时间已经不多了，顾维钧想到的是要先争取美国的支持。会前半小时，他与王正廷赶往美国代表团驻地拜访蓝辛。顾维钧告诉蓝辛，由于事出突然，他无法查阅文件准备发言，因此希望会议能给一段时间让他做准备。蓝辛认为这一请求是合情合理的，会议可以给中国代表团24小时进行准备，并保证美国将尽全力支持中国。顾维钧在谈话中担忧地提起中日间关于山东铁路的换文，显然已认识到该换文对中国的严重不利。[24]

下午3点，王正廷、顾维钧偕代表团秘书魏文彬走进十人会会场。会议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宣布开会后，日本代表牧野首先发言，称“日本政府认为有正当理由要求德国无条件让与”其在胶州湾和山东的权益，根据日本对大战的贡献，这些要求是“合理和公正的”。由于与蓝辛已有商定，顾维钧只简短说明，山东问题关系

中国利益甚大，希望待中国表达意见后再行审查定议。会议决定给中国代表一天时间准备，于次日发言。[25]

下午会议结束后，顾维钧立即与陆征祥一同去拜访威尔逊。在陆征祥与威尔逊做了礼节性寒暄后，余下的时间就是顾维钧与威尔逊围绕山东问题的交谈。顾维钧先重申了几小时前向蓝辛表明的中国要求直接归还山东的立场，然后解释了德国掠夺胶州湾租借地时的情况、胶济铁路的重要性、山东省的战略地位以及该地一旦成为外国势力范围的危险性，并且强调“二十一条”提出后中日间签订的条约必须交由和会审议，因为战争改变了日本夺取胶州湾时的情况。做完阐述后，顾维钧问威尔逊中国以这样的方式向和会提出山东问题是否合适，政治学学者出身的威尔逊认为这些阐述在法理上是十分完美的。他建议顾维钧发言时要像牧野那样直截了当，并对牧野以赤裸裸的语言要求山东权益感到又惊又恼。顾维钧希望威尔逊总统在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时站在中国一边讲话，威尔逊表示一定尽力帮助中国。[26]因为之前对山东问题已有关注和研究，顾维钧向威尔逊的阐述表明，仅仅几个小时他就对次日发言有了基本的构想。

会谈结束后，顾维钧和陆征祥又与卫理共进晚餐。席间，陆征祥不得不将中日胶济铁路换文相告，卫理当即表示这使美国帮助中国变得十分困难，“譬如脚下踏板已经抽去，何以措辞”。晚餐后，代表团在顾维钧寓所讨论应对之策，商定一面向大会提出，一面请政府将相关铁路合同提交国会，再令国会否决，“以民意为政府后盾”。[27]

代表团其他成员离开后，顾维钧连夜准备发言稿。来自驻美使馆的代表团秘书金问泗记下了当晚的情况：顾维钧“就平时搜集的资料，作十分透彻的勾稽，深宵写稿，成竹在胸”。[28]他的老师穆尔也提供了及时的帮助。因为穆尔使馆顾问的身份是秘密的，此事当时没人提及。1月中旬，穆尔完成了一篇题为“中国租借地”的备忘录，专论山东问题，长达29页，于1月14日寄给顾维钧。[29]27日晚上，这篇文章应该就在顾维钧的案头。

1月28日上午11点，顾维钧和王正廷偕代表团秘书赵泉再次走进位于法国外交部内的十人会会场。会议在讨论托管制后进入山东问题，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这是顾维钧第一次在国际外交讲坛上发表演说，面对的是列强巨头，问题又如此重要，所以尽管在哥大读书期间参加了无数次演讲和辩论比赛，他仍不免有些紧张，“初似发言稍颤，既乃侃侃而

谈”。虽然前一天做了准备，但他完全脱稿发言。[30]

顾维钧开头就表明他是“代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即四亿中国人说话”，这使他深感责任重大。随即，他从文化、经济、战略等方面阐述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山东省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块圣地”。根据威尔逊的建议，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大会所倡导的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使“中国有权要求山东主权的归还”。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演讲者，他不失风度地提到日本将德国势力清除出山东的“贡献”，并表示感谢，但马上就接着说，如果以出卖同胞的天生权利来表示感激，“将是对中国和世界的失职行为”。牧野在回应顾维钧的发言时，故意提到中日间已有协议，并友好地交换了意见。威尔逊抓住机会问牧野能否将中日间协议提交和会，牧野尴尬地表示须请示政府。他随后辩称，胶州湾的转让必须在日本与德国达成协议之后，届时可由日中两国直接讨论。顾维钧立即表示不同意牧野的说法，并清晰地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中国相信日本对中国和世界做出的不会占据山东的保证，但在直接归还与间接归还问题上，中国宁愿一步到位直接归还。至于中日间的协议，这是在“二十一条”谈判后期日本最后通牒情况下中国政府被迫同意的，充其量只是因战争产生的临时性协议。并且，这些协议因为中国对德宣战，根据国际法情势变迁的原则已无法执行。再者，中国对德宣战已废除中德间相关条约，因此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已归中国。而且，即使这些条约未予废除，德国也无权转让给他国。[31]

顾维钧与牧野的交锋时间不长，仅半个多小时。他的发言用语平实，有理有据，无懈可击。发言一结束，威尔逊总统就离座走过来向他表示祝贺。随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外交大臣贝尔福（Arthur Balfour）、美国国务卿蓝辛也来向他祝贺。蓝辛在自己的会议笔记中写道：“他（顾）的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则评论道，顾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32]当天中午会议刚结束，称病未出席的陆征祥就致电外交部报告十人会情况，称日本代表在会上“答复支吾”，英美法各全权代表均露不满意之颜色。而对顾维钧的发言，各强国代表“屡有美意之表示，现于颜色”，发言结束后各国代表以中国理由充足，“均与顾王两使握手”。[33]

顾维钧的发言是中国政府的代表第一次震动国际外交舞台的成功演讲。发言当天，顾维钧离31岁生日还差一天，在老谋深算的欧美巨头占

据舞台中心的国际外交界，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崭露头角，一举成名。顾维钧发言的准备时间，从卫理通报算起，不满24小时。但他为这一时刻的准备，从他进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国际法和外交学时就已开始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卡尔德拉”号案件的历史与法律》说理透彻，层层辨析，逻辑严密。28日十人会上的发言风格与之一脉相承，不用激烈的语词，不直接怒斥对方，充分发挥法律和逻辑本身的力量。这是他在哥大学习国际法和演讲实践的结果。“二十一条”交涉的经历和驻美期间对远东外交的关注，使得顾维钧对山东问题早有准备，不致仓促上阵。当然，穆尔的帮助也十分关键。在那份“中国租借地”的备忘录中，穆尔指出，中国应该明确要求主权国家的权利得到承认，并指出战争发生使租借地的情况已发生了变化，还指出中国给德国的租借地并没有放弃其主权等。[34]穆尔备忘录中的这些观点，在顾维钧的发言中都有体现。

顾维钧的这个发言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出现在中国近代外交的关键时刻。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中国渐成潮流，改变不平等的中外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巴黎和会是近代中国首次以战胜国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和会筹备过程中，包括顾维钧在内的一些外交官提出修约建议，预示着修约将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诉求。顾维钧的发言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他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率先发出中国的声音，占天时之先。顾维钧发言的场合也占尽地利之便。这是在巴黎塞纳河边凯道赛（Quai d’ Orsay）的法国外交部大楼，是欧洲外交的中心。十人会上，英、美、法等列强首脑都在现场，顾维钧的发言引起他们的关注，也吸引了国际媒体。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结合造就了顾维钧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

顾维钧的发言改变了代表团内最初获悉日本提出山东问题时的沉闷气氛。代表团顾问、驻丹麦公使颜惠庆在日记中写道：“顾向委员会前作了很好的发言。”在北京，总统徐世昌收到报告后，称赞“顾使在会中陈述各节，洵为探骊得珠，条约等件交会决定，尤属扼要”，“深堪嘉尚”。山东省籍国会议员张玉唐等致电代表团顾、王专使，称“公等雄辩，声震环宇”，“不独山东之幸，实全国所渴望，乞坚持不让”。[35]

但日本对顾维钧的发言十分恼火。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面见代理外交总长陈箓，对中国1月28日的表态提出抗议。小幡的矛头直指顾维钧，称“顾氏此举，是漠视日本之体面，且违反外交之惯例”，

又说“顾氏欲假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殊予日本以不快之感”，[36]企图通过北京政府施压中国代表团。美国方面对日本向北京政府施压一事十分关注。威尔逊获悉后告诉蓝辛，“我认识到此事的严重性”，让他给芮恩施去份电报，要芮鼓励中国政府站稳脚跟。威尔逊还叮嘱蓝辛，“可向顾建议按他认为正确的道路走下去”。蓝辛随后在与顾维钧的会面中给其鼓劲：“日本公使在京饶舌，望贵政府不为所动，贵代表在会所持态度甚为正当，如能坚持到底，当可得良好结果。”顾维钧答道：“府院来电均属坚持，内外一致，决不为所动。”[37]

1月28日十人会后，顾维钧赶紧准备拟提交和会的山东问题说帖。2月11日晚，代表团在顾维钧寓所开会，他将说帖稿交付讨论审议。王正廷提出，说帖中关于“二十一条”问题“措词尚觉太轻”。顾维钧解释说，说帖专论山东问题，对“二十一条”“先仅伏根”，留待以后详释。这一解释获代表团同意。两天后，代表团决定说帖在送交和会及英国和日本前先送美国一份。顾维钧特别提出，给日本的那份不要附上中日间全部密约，“恐生枝节”。[38]

2月15日下午，中国拟向和会递交说帖前，日本代表团秘书吉田茂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顾维钧出面接待。吉田指责顾维钧1月28日的发言，称如与牧野“预为接洽，岂不甚佳”？顾维钧反问道，牧野先在十人会背着中国提出山东问题，中国“即使欲接洽，何从接洽起”？吉田顿时语塞。[39]

顾维钧起草的说帖全称为《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益之直接归还说帖》，分四部分。前两部分分别概述德国和日本侵占山东的过程，后两部分“中国何以要求归还”“何以应直接归还”是整个说帖的重点所在，详论中国要求收回主权的理由。在这份洋洋万言的文件中，顾维钧仍以擅长的国际法作为立论的依据。他认为山东各项权益归还中国，“实不过依据公认之领土完整原则为公道之一举”，深信“和平会议对于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关于山东省之他项德国权利之直接归还，必能认为合于法律公道之举”。[40]

这份说帖得到美国代表团的肯定，称其“理由充分，措词得体，语气和平，阅之颇为满意”。[41]说帖的目的就是要争取列强尤其是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美国的回应使中国代表受到鼓舞。在和会上中日的第一轮交锋中，中国代表团暂居上风。

二 周旋于代表团内外

2月14日，美国总统威尔逊离开巴黎返回美国，与国会沟通他最为在意的国际联盟问题。山东问题被和会暂时搁置。这一搁置使中国代表团无法趁热打铁，失去了解决山东问题的时机，也使代表团内部从成立之初就因代表排序存在的矛盾趋于激化。

巴黎和会根据对战争的贡献大小，将参会国分为几等，英、美、法、意、日为第一等大国，可派5名全权代表，中国列为三等，只可派两名全权代表。但北京政府对和会期望甚高，先委派了5名代表，并都在和会开幕前到了巴黎。这成了外交总长、首席代表陆征祥一抵达巴黎就面临的棘手问题。当知道虽只有两名代表，但每次会议代表可以轮换，并不限于固定两人后，陆征祥决定代表团全权代表仍为5人，排列顺序是：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顾维钧知道在官场中名次排列的前后意义重大，主动提出他本人排第五为宜。陆征祥为代表的排序煞费苦心，既然顾本人提出，他便将顾与施的位置做了调换。因为王正廷代表南方政府，陆本人对他的排名有过承诺，不能挪后，而魏宸组负责起草中文文电和代表团内务，无须靠前。1月17日，陆征祥致电北京，按陆、王、施、顾、魏的排列，请正式任命中国出席和会的全权代表。[42]

如果北京政府接受陆征祥的提议，代表的排序不至于引发代表团内部的矛盾。总统徐世昌收到陆征祥来电后，交外交委员会讨论并提出意见。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晚清就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做章京，后来担任过驻英公使和外交总长，对外交圈很了解。最初他以为中国可以有三人出席和会，但排名靠前的三人，陆能力不够，王缺外交经验，施是怕多事的官僚，对这份名单甚为踌躇。负责外交委员会秘书事务的叶景莘建议将顾维钧提至第二位，因为他发来的电报最多，“二十一条”交涉后的英文声明颇为得体，且熟悉中日问题。汪采纳这一建议后报徐世昌，获得同意。代理部务的外交次长陈箓看到新的排序叫苦不迭：“这是要捣乱了。”对北京政府来说，这样的排序有很现实的考虑，陆征祥身体虚弱，一旦无法支撑，“可请顾出席相助会议”，而王正廷毕竟是南方的代表。[43]

1月21日，徐世昌的委任电到达巴黎，代表排序为陆、顾、王、

施、魏。[44]这一排序使顾维钧陷入尴尬的境地。施肇基是顾维钧赴美留学的带路人，魏宸组在顾刚回国时已是国务院的秘书长，代表南方政府的王正廷民国刚成立就担任署理工商总长，后又任参议院副议长。与他们相比，顾维钧资历最浅，年纪最轻。出于减少内部摩擦的愿望，顾维钧要求陆征祥维持之前致电北京的排序，还主动去施肇基下榻的旅馆做解释。但陆征祥不愿变更北京的训令，施肇基一听代表排序就“面色铁青，愠然不语”，对顾的继续解释一言不发。顾维钧明白，这一排序“必将使代表团成员之间难以相处”。[45]

代表排序问题使王正廷和施肇基对陆征祥心生怨恨，并将顾维钧归在陆征祥一边。因为有成见，代表团内在不少问题上产生分歧，意气之争层出不穷。前面提到2月11日代表团第14次会议上，王正廷提出顾维钧起草的山东问题说帖“措词尚觉太轻”，但自己却不愿在和会上就此代表中国发言。代表团第4次会议上，魏宸组根据陆征祥的意见提议此后会议在顾维钧寓所而不是代表团所在的旅馆举行，王正廷立即反对，显然因为提议出自陆征祥，且是在顾维钧寓所。和会期间，顾维钧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联盟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关于国联的备忘录。王正廷和施肇基对顾起草的文件吹毛求疵，严词批评。在顾维钧看来，“他们的批评显然并不准确，因为批评得不对题，看来主要是有意使陆总长和我难堪”。[46]

代表团顾问、驻丹麦公使颜惠庆在他的自传中对代表团内矛盾评论道：“代表团内重要代表的意见分歧，自始即难望和衷共济，而首席代表复缺乏整饬纪律能力，难使各代表谨遵命令。当时所面临的任务何等艰巨，人人公忠礼国，困心衡虑，通力合作，尚恐于事难济。何况党见深固，尽情倾轧，口舌争辩，虚耗光阴，无补实际。大敌当前，竟有人不惜运用阴谋，争取席次。此种行为，岂特令人齿冷，实为国事痛心。”[47]颜惠庆的自传是1946年完成的，当事人都还在世，除了称陆征祥软弱，没有指名道姓其他人。但颜惠庆在日记中留下了清晰的记录。

1月29日，颜惠庆刚到巴黎，就听到施肇基扬言如受排挤将辞职不干。此后，颜惠庆几次记下施肇基在代表团内争吵、发脾气，称施“易激动又野心勃勃”，并与王正廷“通力合作”。2月21日，他听到王正廷散布顾维钧将与曹汝霖女儿结婚的传言。[48]曹汝霖当时被视为亲日派代表，这一传言旨在败坏顾维钧的名声。从颜惠庆的日记看，他与王、施、顾都有应酬往来，并无明显的个人偏好。但他对王施通力合作使陆

征祥一筹莫展、代表团运作受阻是不满的，特别对施是语含讥评的。

顾维钧在代表团内争中的表现，颜惠庆日记也有记录。2月15日，顾维钧与颜惠庆共进午餐时，讲述了自己被任命为全权代表的经过以及施肇基对此的暴躁反应，显然是要澄清代表排序与他无关。[49]2月20日，代表团第21次会议上，王正廷责问陆征祥和会记录中中国全权代表名次为何前后有别，施肇基接着询问代表名单送和会共有几次，陆征祥“眼泪汪汪”地回答，代表名单送和会时曾“擅将施顾次序更调，未先与诸同事商量，实深抱歉”，说话口气根本不像外交总长和首席代表。颜惠庆在日记中还记，王正廷说名单排序的变化肯定是“顾在幕后操纵，想名列第二”。而顾维钧在会上对变更排序的总统令表示反对，随后以健康理由离会了。[50]此后两天顾维钧未参加代表团活动。23日，外交部电令到达，同意按陆征祥最初开列的次序，并另外专电顾维钧，慰勉他“不沾沾小节”，他才“心平气和了”，但对王正廷的指责仍然心绪难平，希望要说明一下“从不争地位”，被颜惠庆劝阻了。[51]

这场因代表排序引发的内争，顾维钧是被动的卷入者。无论是陆征祥最初将他排第三，还是后来北京政府将他升至第二，都不是他的本意，更非他“幕后操纵”。如果首席代表陆征祥果断处事，坦率沟通，矛盾不至于如此尖锐。颜惠庆就近观察的结论是：“陆的软弱是一切纠纷的根源。”[52]对于排名往后靠而且不明就里，王正廷与施肇基当然是不满的，除了陆征祥，怨气就洒向了顾维钧。顾维钧在和会上的发言赢得广泛赞誉，也是一个诱发因素。内争激烈的2月上半月，代表团收到的国内来电，无论是总统的，还是国会参众两院的，还是以山东代表自居的国会议员的，开头都称“顾王两使”。[53]王正廷读到自然更为不快。

就顾维钧而言，主动向陆征祥提出排名靠后，应该是出自内心的，毕竟他年资最浅。在向施肇基解释时，他说，除了公务的考虑，还有个人的理由：“我比你年轻十岁，我比你多十年的机会。”[54]这是他的自信和坦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争取并依靠美国的支持是代表团的共识，作为驻美公使，顾维钧不用担心自己在代表团中的实际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不过，尽管他对排名不在乎，但卷入内争的旋涡后，颜惠庆注意到，他也“易于激动，难以控制自己”。[55]尤其对王正廷散布他与曹汝霖女儿订婚的传闻怒不可遏，两人就此结下怨恨。对外交事务中发生的内争，顾维钧还缺少应对的经验。此次内争在他内心留下了长久的影响。二十多年后，他与朋友谈起时仍无法冷静地叙述：“施王均视余运

动，故对余种种为难，不堪言之。”[56]

全权代表的排序，外交部2月21日电同意了陆征祥最初开列的次序，即陆、王、施、顾、魏。但陆征祥在收到1月21日总统令后，向和会做过一次改动，将施顾次序互换，顾排到了施前面。于是，陆征祥将此情况报告，请北京再做确认。3月4日，国务院回复，全权代表的排序确定为陆、王、顾、施、魏。[57]

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使生性懦弱的陆征祥知难而退。和会开幕第二天，他就致电北京，以身体虚弱请派“素负〔孚〕元老重望、精力强健之大员”来法国，自己愿做个帮手。[58]此后，又几次流露退意。3月8日，他干脆不辞而别，离开巴黎赴瑞士休养。3月下旬，北京政府以总统谕令的形式加派陆征祥“为全权委员长，所有和会事宜，即由该委员长主持一切”，并给予“便宜行事”之权，其他人员“概不得以个人名义对外擅行发表”，提升了陆在代表团内的权力。[59]于是，陆征祥返回巴黎，代表团内因排名顺序产生的矛盾才稍稍平息，但裂痕已难修复。

代表团虽然内争不断，好在起草向和会提交文件的工作并没有完全停顿下来。顾维钧将主要精力放在文件准备上。2月28日，顾维钧将初拟的对德奥要求草案交代表团会议讨论。3月3日，他完成了租借地问题备忘录草案。3月6日，他完成的对德奥要求修正案在代表团通过。此后中国代表团又向和会提出中国希望条件。希望条件共七项，其中撤退外国军警、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三项为顾维钧所撰写。[60]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先后提交了四个重要文件，即山东问题说帖、对德奥要求条件、废除中日民四条约说帖和中国希望条件。中国希望条件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向列强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在近代以来的中外交涉中意义重大。这四个文件中，第三个文件由王正廷主持起草，顾维钧主持起草了前两个文件和最后一个文件近一半的内容。他在代表团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北京政府对他的看重并非没有道理。代表团中虽有不少留学欧美的外交官，但以国际法为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的就顾维钧一人。在起草文件时，他也确实发挥了他的专业特长。3月初，颜惠庆在读完租借地备忘录的草案后，就称赞“这是一份完全根据法律而具有权威性的备忘录”。[61]

顾维钧在代表团中还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开展对美外交。3月14日，美国总统威尔逊返回巴黎。顾维钧与威尔逊和美国代表团其

他成员频繁接触，力争使山东问题获得有利于中国的解决。

3月24日，顾维钧介绍梁启超和张君劢与威尔逊会面，利用这次机会主动提出山东问题，询问是否存在和约签订前尽早解决山东问题的可能性。威尔逊回答说，山东问题的解决要写进和约，随后问道，日本要求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先归日本再由其归还中国，是否意味着它将占有胶济铁路而归还胶州地域。顾维钧答道，日本不仅要占有铁路，而且还会就归还胶州湾租借地向中国勒索其他权益，如在胶州设日本专有租界。如果日本在山东得到铁路和专有租界，那么山东的归还对中国而言只是徒有虚名。因为胶济铁路贯穿山东全省，连接北京，一旦被占，就如扼住中国的喉咙，将危及中国的独立，因此山东问题的解决事关远东和平。顾维钧的阐述得到威尔逊的赞同。他乘势提出，是否由和会再召集一次会议听取中日双方的阐述。但威尔逊忙说无此必要，他已理解中国的立场和原则，山东问题解决办法可“于和约内规定，未必再邀中国出席”。[62]

4月上旬，顾维钧又先后拜会了美国代表团顾问豪斯与国务卿蓝辛。顾维钧告诉对方，“中国的唯一希望是美国。如果威尔逊总统有意坚持公正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就能得到满意的结局”。他强调山东问题必须尽早解决，以便写进和约。由于3月下旬十人会已改为由美、英、法、意四国首脑组成的四人会，顾维钧希望四人会能对此问题做出决定。他还指出，一旦山东问题得不到圆满解决，中国国内将会出现亲日倾向，这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希望以日本影响的上升来刺激美国采取行动。与蓝辛会谈后，顾维钧根据会谈内容准备了一份备忘录，请蓝辛转交给威尔逊。威尔逊于4月12日得到备忘录后认真阅读，并在“否定中国的要求会危及它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经济富强”“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美国政府进行斡旋”等句子下做了记号。[63]

顾维钧的奔走努力，对美国代表团进一步认识到山东问题的重要性和中国要求的合理性，起了重要作用。4月16日，在由美、英、法、意四国外长和日本代表参加的五人会上，蓝辛提出德国在华权益应归还中国，“惟先由本会暂收”，认为由日本收回交中国与由和会收回交中国并无差别。日本代表牧野当即“起而抗议，以青岛问题中日已有成约，应交由日本转交”。由于英、法、意三国外长对此保持沉默，蓝辛“深恐激生意外”，将提议搁置。次日，和约起草会上，美国代表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不同之处是将德国权益交和会改为交美、英、法、意、日五国，牧

野虽仍反对，但交五人会后“将该条通过”。[64]

中国代表团虽不能参加五人会，但可以通过美国代表团了解事情进展。4月17日上午，顾维钧引导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及代表团顾问、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与威尔逊见面，并再提山东问题。威尔逊表示，对蓝辛的提议“确以为然”。当天，顾维钧将山东问题说帖再递交威尔逊一份。[65]

直到此时，可以说，顾维钧的对美外交进展顺利，威尔逊、蓝辛在山东问题上都支持中国的立场。但4月22日，风云突变。意大利代表团因为对阜姆的领土要求遭各大国拒绝而宣布退出和会。这使和会的最高机构四人会成了三人会，五大国只剩四大国。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果日本再因山东问题步意大利后尘，整个和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威尔逊认识到面临的严峻形势。使和会进行下去以实现成立国际联盟的计划，是威尔逊在和会上的首要目标。这样，在山东问题上面对日本的蛮横立场时，他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对中国的态度也就因此发生了变化。

4月22日上午，缺少了意大利首相的三人会听取日本对山东问题的陈述。此时，日本代表团已经得到东京的指示，如果对山东问题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就不在和约上签字。因此，牧野在三人会上态度强硬，坚持日本必须拥有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英国和法国在1917年与日本签订过密约，承认其在华利益，此时都站在日本一边。威尔逊一方面表示必须考虑中国的困境，一方面又说要维护日本的尊严，处于左右掣肘的境地。最终，他提议让中国到三人会再陈述一次。[66]

4月22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又一次出现在和会最高会议。会议在威尔逊住处召开，出席者是美英法三巨头和中国的陆征祥与顾维钧。主持会议的威尔逊一开始就列举了中日1915年条约和1918年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特别提到了中国驻日公使对中日条约“欣然同意”的表示，实际上是在向中国代表团表明，由于中国自己与日本签订的这些条约，美国已无法给予先前承诺的支持和帮助了。威尔逊发言后，陆征祥请顾维钧代表中国答复。顾维钧明白威尔逊的潜台词，立即据理答道，中日间的条约“都是‘二十一条’的结果，是日本最后通牒的结果”，中国人认为它们与中国和其他国家间的条约不是一回事。

在这次为时75分钟的会议中，顾维钧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来自

劳合·乔治。这位英国首相在顾维钧发言前对日本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一事毫无所知，此时发问道，让日本根据中德条约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或根据中日条约承认日本在山东地位，两者之间中国愿意选择哪项？顾维钧稍做考虑后明确回答，两者都是中国不能接受的，同时又指出日本的条约比德国的条约对中国危害更大。尽管顾维钧对中国的立场做了出色的阐述和辩护，但这一次却没能得到威尔逊的赞扬。威尔逊此时已背离了自己“十四点计划”中提出的废除一切密约的主张，反而认为“遵循一个坏的条约要比撕破它好些”，并劝说中国先让步，待国联成立后情况自会好转。对此，顾维钧马上回应称：“与其疗治于发病之后，何如防范于未病之先。”但英法首脑坚持他们必须履行对日条约义务，威尔逊趁势说，即使中日间条约的合法性存在问题，但英法与日本间的条约是没有疑问的。[67]

这次会议使中国在山东问题上一下子陷入失败的险境。面对美国尤其是威尔逊态度发生变化的现实，顾维钧与代表团一起考虑调整直接归还山东的要求。4月23日，顾维钧为代表团起草了一份给美国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开头就明确表示，中国不能接受劳合·乔治二者择其一的办法，并责问：“将中国的权益和未来因此而牺牲于日本的扩张政策是公正的吗？”备忘录指出，如果山东问题得到公正解决，远东至少会有持续半个世纪的和平，而如果以英法与日本间的条约为基础解决，那就是在播下死亡的种子。顾维钧建议，山东问题的解决可由德国将其权益交给五大国，以便最终归还中国。实际上就是按美国在五人会上的提议办理。第二天，顾维钧将备忘录交给了威尔逊。[68]与中国代表团最初直接交还的方针相比，间接交还是一个退让，但显示了顾维钧依靠美国解决山东问题的苦心。

4月30日，在和会决定山东问题前夕，顾维钧仍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他致函威尔逊，提请他关注两点：第一，如果根据中国代表团24日提出的妥协方案解决山东问题，英法并没有违背它们对日本做出的承诺；第二，如果按日本的愿望解决，就是肯定日本以最后通牒方式强迫中国签订1915年条约的合法性。[69]他对威尔逊仍抱着希望。

但是，威尔逊已经要放弃自己原先的理想和做出的承诺了。他感到了山东问题的棘手，与此相比，意大利问题只能算是“茶壶里的波澜”。他明白，“如果我遵循公正和正义的原则，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就不会签和约，我就将承担阻扰世界和平的责任”，而“如果我们要求日本退让而

它拒绝，那意味着我们只能诉诸武力”，但这又是美国不愿也无法做到的。因此，“我唯一的希望是能找到一个保住日本人面子而让国联来决定以后事情的办法”。[70]于是，为了国联和所谓的“世界和平”，威尔逊不得不对日本做出让步。在他的国际政治的天平上，中国的分量太轻了。

4月30日，三人会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形成了和约中第156、157、158条款。威尔逊明白这一决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4月29日，他几乎一夜未眠，但又自我安慰地说，这是“从肮脏的过去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71]中国山东的权益就这样被威尔逊的“理想”牺牲了。

三 拒签和约

三人会决定通过当天，威尔逊让美国代表团新闻秘书贝克（R.S.Baker）将消息通知中国代表团，并解释美国的为难之处。贝克知道这是一项棘手的任务，只能硬着头皮在当晚前往中国代表团驻地吕特蒂旅馆（Hotel Lutetia）。出面接待的是顾维钧与王正廷。贝克说明情况后，顾维钧表示对威尔逊"前后在会竭力维持之意，至深感谢"，并直言相告："惟结果如此，非常触望，亦无可隐讳。"在场的美国记者加拉法尔（Patrick Gallagher）注意到，顾、王两人获悉对中国不幸的消息时，"脸色苍白，焦虑万分"，但仍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尽可能显得镇定自若，"人们不得不赞赏他们保持尊严的姿态"。贝克离开后，顾维钧对加拉法尔说，中国代表团在获得和会正式通知后将立即提出正式抗议。[72]此时代表团尚未商议，顾维钧的这番话表明他对和会有关山东问题决议一开始就持反对立场。

5月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山东问题决议通过后的第一次会议，讨论应对之策。会议认为有三种选择：（1）照意大利办法全体离会回国；（2）不在和约上签字；（3）签字但不承认山东问题条款。但第一种办法，因中国与意大利地位不同，影响有异，无法采取。第二种办法，则对德和约除山东问题外，还有撤废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且不签和约对德仍处于战争状态，日后中德直接订约是否有利也属疑问。而第三种办法，列强又可能不会答应。代表中还有意见认为，英美法三国居中周旋，不无善意，"我仍不认，于国际感情能否无碍，似均不可不加审慎"，倾向于接受和会决定。代表团内对几种办法权衡再三，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决定"拟电中央，请示办法"。[73]

尽管代表团尚未形成统一意见，顾维钧已开始起草代表团的正式声明。5月3日，中国代表团将顾维钧起草的声明送交新闻界。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对会议的决定感到极大的失望和幻灭"，"如果像暗示的那样，三人会是为了挽救国联而全部认可日本的要求，中国当然不应抱怨，而应该相信为了成立国联这样崇高的事业做出牺牲是一种责任。然而，中国代表团还是希望三人会能够明白，让强国日本放弃它因扩张欲望而产生的要求比让弱国中国交出理应属于它的东西更为合适，因为这更符合即将成立的国联的精神"。[74]声明中说中国可以为了国联做出牺牲，只是外交辞令，接下来一句日本放弃它的要求方符合国联精神才是

实质。这一声明延续了顾维钧在和会上发言的风格，不用激烈的语词怒斥对手，而是用法律和正义来阐明自己的立场。

5月6日，和会全体大会公布对德和约。陆征祥当即在大会上发表声明，称中国对和约山东问题条款“不能不表示其深切失望之情”，因为这些条款“未顾及法律公道及中国之安宁”，若和会不能予以修正，“本代表团对于上述条款实有不能不保留之义务，并请将声明各节列入记录”。[75]这样，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正式表明了对山东条款的保留态度。

两天后，5月8日，国务院的电报到达巴黎，认为日本对中国“着着进逼，殊堪痛愤”，指示陆征祥“在我国只有坚持，断难承认，如果总约案内加入此条，我国当然不能签字”。北京政府这一指示受到了国内政治的影响。电报的后半段提到5月4日北京学生“聚众千余，以还我青岛为词，高揭旗帜”。[76]因此，不签字主要是针对国内舆论的。但对德和约除了有关山东条款，还涉及中德关系和国际联盟，因此，陆征祥接电后马上询问，要求给予明确的指示，即不签字，“是否全约不签，抑仅不签胶州问题一条”？[77]

国内此时因山东问题交涉失败而爆发了五四运动，群情激昂，舆论汹涌，要求收回山东主权。北京政府面对国内政治的压力，最初主张不签字，随后权衡再三，于5月中旬指示在对山东条款保留的前提下签字。但列强中英、法均反对保留签字，代表团中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北京政府面临着保留不成是否签字的抉择。5月21日，国务院和外交部发电指示陆征祥，第一步为保留签字，如保留不成，“应即全约签字以保国本”。[78]

对德和约宣布后，顾维钧明白山东问题已成定局，保留签字是中国的最后办法，如保留不成就应拒签。由于不愿接受山东问题的条款，顾维钧决定离开巴黎，并订好了船票，准备5月底动身。但收到北京政府要他留在巴黎的电文后，他退掉了预订的船票，为保留签字做最后的努力。[79]

5月20日，顾维钧陪同陆征祥访晤蓝辛。5月22日，顾维钧又面见豪斯。对于中国保留签字，蓝辛和豪斯都予以支持。蓝辛表示，如保留不成而不签字，“则咎不在中国”。豪斯还建议顾维钧专门去拜访威尔逊，并相信威尔逊对此不会反对。[80]

但豪斯的判断错了。5月27日，顾维钧与陆征祥拜访威尔逊。这是和会通过山东问题条款后，威尔逊第一次与中国代表团成员见面。在威尔逊对和约做了一番解释后，顾维钧直接提出了保留签字的问题："现在中国人民，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全体主张不签和约，政府顾念民情一致之主张，又不愿破坏协约各国对敌之联合，万不得已定签字而保留之计。"威尔逊此时最关心的还是国际联盟，担心中国此举会影响和会的最后结局，因此表示："此于法律问题有关，我不敢骤答，务请与著名公法家慎加考量。"[81]威尔逊的态度增加了保留签字的难度。

5月28日，中国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和会如不接受保留签字的应对之策。此时国务院和外交部21日发出的保留不成就签字的电报还未到达。王正廷首先在会上发言，明确表示："不能保留，则万不能签字。"但发言者中也不乏主张保留不成就签字者，驻意公使王广圻、驻法公使胡惟德都在此列。他们认为，"签字一层，苟利于国家，毅然为之，不必为个人毁誉计"。顾维钧立场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夫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施肇基也主张不签。会上两种对立的意见难分上下，陆征祥没有表态，只是表示"取决审慎研究，再行决定"。[82]

以委员长身份主持代表团并有"便宜行事"之权的陆征祥自己不拿主意，将难题上交北京，认为代表团中两种意见"互有利害，究竟孰为较善"，难以定夺，请"详审裁定，立速电示"。在会议结束当天发出的这份电报中，陆征祥也告诉北京，主张拒签者中，王正廷和施肇基原先都主张签字，但现在态度改变了，而顾维钧"原在不签字一方为多"，即前后皆不主签字。[83]根据邓野的研究，陆征祥本人实际上是主张签字的，只是签字的责任不能由他来承担，必须另派他人。[84]

因此，5月29日收到国务院和外交部21日电报明令"全约签字"后，陆征祥只能再提辞职之请。6月9日，他密电北京政府总理钱能训，以所患之病"伏根颇深，非力加调养不可"为由，请"开去外交总长"一职，并推荐驻法公使胡惟德"接长外交，用明令发表，请其留欧签字"。[85]陆征祥的辞职电到达北京的时候，总理钱能训已经辞职，连总统徐世昌也提出了辞职，政局动荡，政府无暇顾及陆征祥辞职一事。而陆征祥不待北京回电，已于14日住进医院，称"旧病骇发，异常困惫"，医生意见"现在不能用心，须将公事一切放下"，并提议"派顾使在会签约"，将代表团

事务交顾维钧负责。[86]

5月28日会议是中国代表团最后一次会议。由于内部意见难以统一，陆征祥随即躺倒不干，代表团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停止运作。6月初，施肇基离开巴黎返回伦敦。王正廷虽在巴黎，但毕竟代表南方政府，且与顾维钧多有龃龉，不参与顾出面之事。魏宸组自始就只负责团内事务。这样，进入6月后，5个全权中就只有顾维钧代表中国出面交涉了。

6月5日，顾维钧拜会美国代表团斯科特（James Scott），与他讨论中国保留签字的法律问题。斯科特谈了三点看法：（1）中国像任何一个独立国家一样有权决定以何种方式签署或拒绝签署对德和约；（2）是否行使这种权利应由中国自己决定；（3）保留签字对日本在三人会上所做声明无任何影响，这是互不相干的两件事。顾维钧询问是否可以将这些看法告诉威尔逊总统，斯科特表示他不反对。在这之前，顾维钧与蓝辛见面时，也希望对方同意他将其支持中国保留签字的态度告诉威尔逊。[87]这表明，顾维钧想利用美国代表团其他成员的意见来影响威尔逊，争取他对中国保留签字的支持。

但北京政府此时改变了原来先保留，保留不成则签字的立场。6月上旬，北京政府获悉日本在三人会上对于交还胶澳主权及继承德国在山东经济权益的限度有过保证，日本外相也有交还的声明。因此6月中旬后，北京政府几次电令代表团，“为收还青岛计，为参战权利计，为国际地位计，均有全约签字之必要”，随后进一步认为保留一层即使能够办到，也无须提出，“不必多此一举”。[88]

顾维钧没有遵从政府“不必多此一举”的指令，直到6月下旬对德和约签字临近前，仍在为保留签字做最后的努力，力争为山东问题获得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公开的国际承诺。

6月24日中午，顾维钧去见和会秘书长杜塔斯塔（Paul Dutasta），明确表示中国代表团“愿于德约签字时，将关于山东条款声明保留”。但杜塔斯塔答称，“照订约通例”，只有签字或不签字两种办法。顾维钧立即指出保留签字“不无成例”，并举了1815年维也纳公约时瑞典保留签字的先例，表明他对保留签字从法理上已反复思考。杜塔斯塔只能表示需请示和会主席。当晚6点半，顾维钧再见杜塔斯塔。杜氏称，已请示大会主席即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保留签字“势不能行”。顾维钧表示，保留

签字已是中国“委屈筹商”之不得已办法。但杜氏坚持不能保留是“原则之办法”，顾维钧又转而提出，中国可不在和约内注明保留，“而另筹一种正式之手续，于开会前数分钟前，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留，一面即分函各国”。这是希望通过保留形式上的让步，即从约内保留转向约外保留，实现保留签字的目标，其关键是要通过“正式之手续”。杜氏明白顾的提议是另一种“不满意之表示”，答应再报告大会主席。25日傍晚6时，杜塔斯塔约请顾维钧见面，转达克里孟梭不能保留的意见，“此项约内只有签字与否两层办法”。顾维钧希望这一表示并不包括约外保留，但杜氏表示“系指各项保留”。[89]这使顾维钧十分失望。

顾维钧的希望始终寄托在美国身上。与杜塔斯塔会面一结束，他就于晚上8点去拜访威尔逊总统，告诉他“国内人民对于山东问题主张绝对不能签字，异常愤激”。威尔逊不赞同保留签字，但提出“于不得已之中，似可另筹一转圜之法，中国可备一正式通告或宣言，即声明中国在和约中关系山东问题，将来于相当之时间、适宜之机会，有请求继续讨论之权”。威尔逊的办法与顾维钧前一天向杜塔斯塔的提议相似，但刻意回避了保留两字。威尔逊称自己非国际法专家，请顾维钧明天上午与蓝辛面商，还说已请法国外长与顾接洽，听取中国的意见。[90]从安排顾维钧与蓝辛和法国外长见面来看，威尔逊确想为中国找到“转圜之法”。

26日上午10时，顾维钧根据威尔逊安排与美国国务卿蓝辛会面，讨论昨晚威尔逊所提办法。蓝辛认为，中国要求保留，“无非欲日后有权要求复议”，威尔逊的提议“于声明书中既将此层说明，则中国将来重提之权利已有保证”，认可了声明的保留效用，并称若保留不成拒签，和会最高机构“或不坚拒”。蓝辛还向顾维钧表示，在顾与法国外长沟通后，中国提出的声明书，他可参与斟酌最后的文本。[91]蓝辛的表态使顾维钧看到了保留签字的希望。

与蓝辛会面后，顾维钧接着于11点半与法国外长毕勋（Stephen Pichon）会面。毕勋一开头就表示，他是受和会最高机构的委托与顾见面的，表明了会谈的正式性。顾维钧发言首先指出“此次和会解决山东问题，我侪认为不公道”，因此“中国委员并非不愿签字，惟对于山东几款必须保留”。毕勋称“约内保留一层殊多未便”，此种做法“并无先例”。顾维钧再举维也纳公约之例，毕勋仍坚持“万难办到”。顾维钧退而求其次，提出“如保留字样实不能于约内声明，则附于约后亦可勉允”。附于约后，即作为和约的附录，仍是和约的一部分。毕勋仍不同意。顾维钧

再退一步，提出“如果约内保留万做不到，则约外保留非办不可”。毕勋将这一提议做了笔录，表示要向和会最高机构报告。[92]

27日下午5点半，顾维钧再与法国外长毕勋会面。毕勋代表和会正式答复顾维钧，“会长言未签以前，不能允许有提出保留之事”，但可在签字后“酌备一函交会”。顾维钧争取保留签字的要点是从法律上保留中国重新提出山东问题的权利，因此问毕勋签字后保留“有无效力”。毕勋答同样有效。顾追问：“效力既同，和会何不于签字前接受我函？”毕勋坚称“未签以前不准有保留”。顾维钧是学国际法的，当然明白同样是保留，但签字前后法律含义大为不同。签字前提出，保留与签字是连在一起的，具有法律效力；而签字后提出，那就是马后炮，是不相干的两件事了。和会实际上拒绝了中国约外保留的提议。至此，顾维钧起身答复：“若不能保留而签字，我全国民心必益忿激。中国为顾重和会全局，已一再让步至于极点，会中尚不能承认，深为可惜。准此情形，恐中国委员团未能签约。万一中国委员不签约，中国政府不能负责，其责任当在和会。”[93]在外交场合，顾维钧十分注重礼仪，即使在1月28日与牧野当面辩驳，也注意不出“恶言”，但此次与毕勋会面，最后时刻起身作答，可见他心绪难平，无法接受和会对保留签字的拒绝。他的回答表明，已经下决心不签约。

与毕勋会面后，顾维钧马上给威尔逊写了一封信，通报交涉情况，并写道：“接受中国保留重提山东问题权利的声明，对和会最高委员会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毕勋对此并无解释），而对中国代表团却意义重大，因此我恳请您运用您友好的影响力，以使中国代表能够签约而不致牺牲他们的民族荣誉感和自尊心。中国不愿拒签和约并退出和会，除非每一个体面的妥协方案都遭拒绝。”在信中，顾维钧附上了他起草的中国声明保留的文稿：“在今天签署对德和约之时，鉴于不公正的156、157、158款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权利转让日本，而不是归还给对此领土享有正当主权并在大战中作为协约国伙伴的中国，中华民国全权代表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宣布，他们的签约不能被理解为中国不能在合适的时候要求重新考虑山东问题。对中国的不公正最终应根据远东永久和平的利益加以纠正。”[94]虽对威尔逊支持中国以声明形式保留签字仍抱希望，但屡屡遭拒后已做好不签的准备。

写完给威尔逊的信和声明稿后，顾维钧赶往陆征祥养病的圣克卢德医院，向他通报最后交涉的情况，并将声明稿交他过目。陆征祥虽赞同

签字，但对主张保留的声明也“毫不迟疑地签署了”。当晚圣克卢德医院外面聚集了许多留学生和华侨，反对签约，并扬言要杀死签约的代表。有一位女留学生在大衣口袋里用“手枪”对准了代表团的秘书长。这位女留学生叫郑毓秀，后来成为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夫人。多年以后，顾维钧与她见面，知道当时她的口袋里并不是手枪，而是一根树枝。[95]

6月28日下午3时是对德和约的签字时刻。清晨，顾维钧约见和会秘书长杜塔斯塔，杜氏拒绝了中国发表声明的要求。中午，驻法公使胡惟德送往和会的声明稿也被拒绝。此时，顾维钧明白，“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96]

28日下午，中国代表团致电外交部报告最终未赴和会签约情况：“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碍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仍完全被拒。”这一节节退让的经历让代表团忍无可忍。“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何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详审商榷，不得已决定不往签字。”同时，在巴黎的四位全权代表共同请辞，“明令开去祥外交总长、委员长及廷、钧、组等差缺”。代表团还向报界散发声明，“中国代表团既多方调和而不可得复，鉴于一切可保国家体面之迁就办法，无不见拒，则惟有遵循其对于国家及对于国民之义务”，不往签约。[97]

代表团电报发出后，下午5时，北京政府国务院“万急”电报才姗姗来迟，通知代表团因国内群情愤激，“政府仍决定保留”，改变了之前不保留签约的指令。此时代表团已采取拒签的行动，这一命令失去了实际意义。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北京政府很可能是在得知最后会议已经召开之后才发出电谕的”。[98]

从1月28日到6月28日，列强巨头的纷纷赞扬，变成了和会上的处处碰壁，顾维钧沮丧到了极点，那一天留在他心中的记忆是：“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在中国历史上。”[99]

中国合理的要求被拒的这天是一个悲惨的日子，但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的决定维护了国家的尊严，打破了近代以来与列强交涉中“始争终

让”的惯例。正如邓野所指出的，拒签的行动开创了一个敢于抗争的先例，对此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100]拒签顺应了国内民意，得到了舆论的称赞。7月5日，全国学生联合会致电中国代表团：“国人得我国未签德约消息，感佩诸公不辱使命，尚祈坚持到底，勿为外力胁迫。”7月8日，全国和平联合会致电代表团以为声援：“诸公力拒签约，举国佩慰，请勿辞职，愿为后盾。”[101]主张抵抗日本、拒签和约的直系将领吴佩孚获悉拒签消息后，在给总统徐世昌的电报中称赞道：“亦见我国外交尚有人也！”[102]

对德和约签约的最后关头，顾维钧是中国代表团最为忙碌的人，担负起整个代表团的重任。从24日中午到28日凌晨，他一个人先后7次与和会秘书长、美国总统、美国国务卿、法国外交部长会面，还给威尔逊写信，力争保留签字。在交涉中，他有专业能力，如以维也纳公约瑞典一事反驳保留签字无成例；能够灵活应对，通过妥协寻找解决方法，即从约内到约后，到约外，再到声明；但妥协并不放弃底线，也就是一定要有“正式之手续”。在一再被拒后，他则起身作答，正气凛然，身体力行地“以公理争强权”。三十刚过，顾维钧娴熟高超的外交技能不逊于他面对的任何一位欧美对手，包括威尔逊这样的资深政治家。Wellington Koo因此在国际外交界赢得了尊重和声誉。

在美国留学期间撰写的《中国外交私议》一文中，顾维钧对塔列朗作为一个战败国的外交家，能纵横捭阖于大国操纵的维也纳会议大加赞赏。巴黎和会是维也纳会议一百年后的国际会议，顾维钧在会上与日本唇枪舌剑、与列强争辩呼吁时，心中不能说没有塔列朗的影子。塔列朗虽是战败国的外交家，最终取得了成功，而顾维钧代表的中国还算是战胜国，却铩羽而归。不能不说，个人的外交才干无法超越国运。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带有他一直主张的联美制日的鲜明特征。从和会筹备时期起，他就积极与美国高层联络，争取其在和会上支持中国，成为中国代表团与美沟通的主要渠道。这些活动对美国在和会前期支持中国起了重要作用。而威尔逊在和会后期所采取的立场，与顾维钧对美国所抱的期望产生很大的落差。但另一方面，美国代表团中蓝辛等人对中国代表团的同情和不同程度的支持，包括中国拒签后提议将对华外交关系升至大使级，又使他看到美国在中国的外交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如他自己所说，“从那一片黑暗中觅得了一丝光明”。[103]这也是威尔逊食言后，顾维钧并未放弃联美制日主张的原因所在。

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后，和会事宜并未完全结束。7月上旬，代表团筹商善后办法，确定应将目标集中在两件事上，即接洽美国以期补签对德和约，以及签署对奥和约。[104]

6月28日中国拒签当日上午，蓝辛根据威尔逊指令提出八点调停方案交给日本，其要旨是要日本做出承诺，明确其归还山东权益和撤出军队的期限。提出调停方案后蓝辛于7月11日离法。与美国代表团接洽沟通之事仍由顾维钧承担，他与美国代表怀特（White）和波尔克（Frank Polk）有过多次会面交谈，希望美国的调停方案被日本接受后，中国可以补签对德和约。但日本于8月2日由外相内田发表声明，重弹老调，实际上拒绝了美国的提议。8月14日，顾维钧致电外交部，认为“就目下情形，在我似仍以暂不补签为宜”。[105]补签交涉无果而终。

签署对奥和约是中国代表团和会善后的另一重要工作。反对拒签对德和约的各种意见中，有一条理由就是中国由此不能加入国际联盟了。但顾维钧与蓝辛等人讨论后发现，通过签署对奥和约中国也可以成为国联成员国。9月10日，陆征祥与王正廷代表中国签署对奥和约，中国成为国联成员国。

8月23日，北京政府电令中国代表团，“奥约签字后，委员团应即解散，陆总长即行回国，王专使、魏专使偕同回国”，“顾专使暂留巴黎”。[106]陆征祥等离开后，顾维钧留在巴黎继续处理和会善后问题。

和会后期，事务不如前期那样繁重紧张。稍得闲暇的顾维钧在公务之余，在个人生活方面办成了一件大事。他在一个社交场合看见了一位华人小姐的照片，随即提出要与她见面。这位小姐是爪哇华侨首富“糖王”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她马上被从意大利叫到了巴黎。擅长外交辞令的顾维钧求婚的方式却很直接：我有两个孩子，需要一位母亲，成为我的妻子能够受邀进白金汉宫、爱丽舍宫和白宫参加国事活动。没有多久，黄蕙兰就成了顾维钧夫人。[107]

四 华府会议再发声

1920年6月，顾维钧结束和会事务，于月底返回美国。回到华盛顿不久，北京政府于8月上旬任命顾维钧为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随后于下旬改派他为驻英公使，与施肇基互换任所。[108]改派驻英是为了让顾维钧便于出席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还在巴黎和会进行、国际联盟尚未成立之时，陆征祥就向北京政府建议派顾维钧为中国出席国联的代表，认为他“才大心细，干练勤能”，“我国适宜之员无出其右”。和会期间，顾维钧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联盟委员会”，为盟约的制订贡献了中国的意见。[109]

顾维钧于11月初抵达巴黎。10日，他与黄蕙兰在布鲁塞尔中国驻比利时公使馆举行了婚礼。婚礼十分隆重，中国驻法国和西班牙的外交官也赶来参加，新娘十分高兴。但婚礼结束回到旅馆后，黄蕙兰发现顾维钧已在工作，正同时口述指示和备忘录，四个秘书围着他在做记录。当晚，他们乘夜车去日内瓦，要赶上参加国联第一届大会。[110]

在国联第一届大会期间，顾维钧力主“分洲主义”，积极与参会小国联络沟通，最终使中国当选国联行政院非常任理事国。行政院常任理事国是英、法、日这样的大国，而非常任理事国只有4席，因此这一当选是中国外交的一大成功。与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受挫相比，更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意义。1921年8月，顾维钧还被选为行政院第14次会议主席，并因此担任国联第二届大会临时主席，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词。[111]

1921年3月，哈定（Warren Harding）出任美国第29任总统。此时，美国在太平洋上面临着并不太平的局势，日本在大战期间的扩张已威胁到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日关系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为了制约日本势力的扩张，确保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也为了顺应国内要求裁军的和平运动，美国政府决定召开一次有关裁军的国际会议。英国对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也有自己的期望。美、英之间经过磋商，最终决定由美国倡议在华盛顿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裁军和远东问题。

顾维钧在6月下旬通过外交渠道获悉英国有意召集一次有关远东问题的国际会议，此时美英间还未就会议之事最后商定，但他敏锐地觉察到此事对中国的意义，立即向外交部报告，并建议“在我无论究能加入与否，似以及早准备为得”。[112]

7月4日，顾维钧拜访英国外交大臣寇松（George Curzon）。寇松是位资深政治家，在外交界以难打交道而闻名，但与顾维钧却很谈得来，每次会面通常要超过预定的时间。在这次会谈中，寇松告诉了顾维钧英美正在筹划有关远东问题的国际会议，并会邀请中国参加。顾维钧马上表示，中国政府肯定乐意接受邀请，并会提出修改关税和收回租界、租借地等要求。他还主动提出山东问题，询问该问题是否会包含在会议的议题中。寇松答道，山东问题主要是中日间的问题，但列强对此有兴趣，可以在会上进行讨论。会谈中，顾维钧还提出，希望英国摆脱英日同盟的束缚，成为远东公正的仲裁者。会谈后，顾维钧马上向外交部报告，认为“此次会议于我国前途关系重大”，建议政府及早筹备并给予指示。[113]

8月11日，美国总统哈定正式向英、法、日、中等八国发出参加华盛顿会议的邀请。8月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复照接受邀请。8月18日，总统徐世昌令外交总长颜惠庆专任会议筹备事宜，组建中国代表团。鉴于巴黎和会时代表团排名造成内部矛盾，颜惠庆此次处理十分谨慎。他先通过私人渠道得到顾维钧愿在排名上居于驻美公使施肇基之后的承诺，随后10月6日总统令正式任命施肇基、顾维钧、大理院长王宠惠、伍朝枢为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代表，由施肇基任首席代表。[114]任命代表南方政府的伍朝枢与巴黎和会时任命王正廷一样，是为了对外显示举国一致，但伍朝枢并未赴美参会。

早在7月中旬，顾维钧就向北京政府提交了他对中国参会的看法。他认为，此次会议“主要目的在远东问题，而尤以我国为远东问题之中心点。是此项会议与我国前途关系较之巴黎和会尤属重要”。这一判断基于他在巴黎和会的悲痛经历。中国问题因在和会上排在次要地位，最终因列强间的利益交换而被牺牲掉了。强调华盛顿会议的重要性就是提醒政府要避免巴黎和会的结局。顾维钧建议中国在会议上的提案应“求实际而不贪多”，具体可分为甲乙两部。甲部为原则，计有四种：（1）要求各国担保尊重我国主权及领土完全，以杜外患；（2）要求废除条约上各种不公平之束缚限制，求自由发展；（3）申明赞成各国在华工商业均等主义，并于全国一律遵守；（4）宣告我国建设计划大纲，以慰各国期望。乙部为具体问题，亦有四种：（1）商订实行担保尊重我国主权及领土完全办法，英、美对此点颇为注意，由我提案，“可望以我国看法为协商主观”；（2）要求解决山东问题及“二十一条”问题；（3）重提在巴黎和会上所提之希望条件七条；（4）国内建设办法。第四项事关

内政，本无对外宣告之必要，但我国政局与会议关系綦切，我如不提，彼必质问，或致代为建议。他希望，各项原则与具体问题，“亟应通盘从长决议”。[115]

顾维钧虽提出向会议的提案应求实际而不贪多，但事实上，上述原则和具体要求已涵盖了在当时情形下中国应向会议提出的所有主要问题。四项原则中的前两项是对巴黎和会前向美国递交的备忘录中领土完整、维护主权和经济财政独立三原则的重申。具体问题的第三项延续了中国向巴黎和会提出的希望条件，具体问题的第二项是巴黎和会未解决的、国内最为关注的山东问题。从列出的这些问题看，顾维钧是将华盛顿会议看作巴黎和会的继续，1919年6月28日那一天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他希望这次能完成和会未完成之任务。原则第三项是赞同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在这之前，中国政府还未对美国的这一政策正式表明过态度。顾的这一建议，目的在于以美国倡导的原则来制约当时侵华势头最盛的日本。此前他向北京政府分析过美、英等国“于我收回领土主权原则，固系完全赞成，而于维持机会均等主义”，“亦视为根本”，所以中国在谋求从日本手中收回权益时，“不得不稍寓顾念欧美各国之希望，俾唤同情，免有梗阻”。[116]其实质还是联美制日。

10月24日离英赴会前，顾维钧再次拜访寇松，探询英国对华会的态度。寇松谈了三点。（1）中日可在华盛顿于会外交涉山东问题，英美愿予以帮助。美国是中国的朋友，而英国可以影响日本。（2）中国应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中国的出路在于列强的合作而不是竞争。（3）中国应默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发展，以换取中国长城以南地区的安定。顾维钧并不完全赞同寇松的看法，但他请求英国政府能在华盛顿支持中国代表团，尤其在山东问题上能站在中国一边。寇松对此不愿给予明确的保证，只表示英国将以友好的精神对待中国问题，但希望中国不要在会上以中美为一团体，以英日为另一团体。[117]寇松的谈话表明，英国在远东问题上仍然倾向日本，尤其表现在要中国在东北地区对日本做出让步。但与巴黎和会时完全站在日本一边相比，英国的态度又有微妙的变化，即不愿中国将英日视为一体，并表示愿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施加影响。与7月4日同寇松的会面一样，顾维钧都特别提到山东问题，表明他对此特别关注。

10月26日，顾维钧与正在欧洲的王宠惠一起离英赴美。与此同时，由130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于10月底抵达华盛顿。

在中国代表团启程前夕，北京政府外交部于10月17日给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位代表发出密电，阐明对会议之期望："此次太平洋会议关系我国前途之巨为前所未有......在政府最切之希望，欲于此次会议之后，中国在二十年中不使国际地位发生危险，故所积极注意者，厥有三事：一、......中日为唇齿之国，亲善自属首图。中英关系密切，亦应互相提携。惟英日同盟若仍得以继续，则中英、中日之解决不易达到。自应竭力设法先将该同盟解散为第一步办法。二、美日两国以利害冲突之故，此猜彼忌，设使一旦失和，我国介在两大，自必首当其冲......欲避去危险，应如何设法防范，或由与会国订立公断专约，或将中国沿海沿边一带如山东、福建、满蒙等处宣告永久局部中立，总以无碍我主权独立，保全我疆土治安为标准，请酌量研究办理。三、现在中央财政困难已达极点，罗掘乏术，借贷无门，若不增加岁入，内外公债无法整理，政府势将瓦解。各国如果诚意援助，莫若许我关税自由。承认原则后，万一一时未能实行，至少须先将税率即予增加一倍，值百抽十。"外交部强调此三点"为我国对于太平洋会议重要目的"。[118]

10月31日，外交部向代表团发出训条。训条包括主要提案六项：（1）英日续盟问题，应设法他国提出；（2）取消势力范围，否认特殊利益；（3）取消蓝辛-石井协定及其他类似之条约、协定；（4）与会国共订公断条约；（5）关税自由及关税目前应商问题；（6）定期召集会议讨论远东国际重要问题。次要提案六项：（1）胶澳善后问题；（2）"二十一条"问题；（3）修正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国际间立于平等地位；（4）成约地位问题；（5）外侨纳税问题；（6）裁厘加税问题。外交部特别指出："我国提案之中，最注意者厥有四端：一、取消英日续盟；二、取消特殊地位；三、订立公断条约；四、关税自由。"[119]

这两份电报集中体现了北京政府对华盛顿会议的看法与期望。与巴黎和会时相比，北京政府对华盛顿会议对中国的重要意义有较清醒的认识，这明显是受顾维钧之前电文的影响。北京政府外交部所拟向会议提出的要求，准备得也较为详尽，但将中日亲善作为"首图"之事，对美日矛盾不是主动加以利用，而是主张消极防范，甚至考虑再取局外中立之法，这与顾维钧希望以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来制约日本在华扩张的外交主张截然不同。在具体策略上，外交部将取消英日续盟列为中国在会上首要之事，而将山东问题列为次要问题，也考虑欠妥。事实上，会议期间山东问题成为中国代表团的首要任务，而当时国内舆论也强烈主张解决山东问题。这表明外交部并没有完全采纳顾维钧在这之前提出的建

议。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有美、英、法、日、意、中、荷、比、葡共九国。美国国务卿休斯（Charles Hughes）以东道国身份任会议主席。会议按议题分为限制军备和太平洋远东两个委员会，前一个委员会只有美、英、法、日、意五国参加，后一委员会由与会九国组成。

在中国代表团内，三位全权代表的具体分工是：施肇基负责外国驻华军队撤军和撤销及移交外国邮局问题；顾维钧负责山东问题、关税问题及租借地、势力范围、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等问题，并监督代表团的对外宣传工作；王宠惠负责收回租界和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120]从分工来看，施肇基虽是首席代表，但顾维钧承担着最多的工作，包括最为国内关注的山东问题。

11月16日，太平洋远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国三位全权代表全部出席。在休斯致辞后，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向会议提出了“用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概况原则”，即十项原则。

十项原则的主要内容是：（1）各国尊重并遵守中国领土完整及政治行政独立，中国不以本国领土割让或租借于任何国家；（2）中国赞同“门户开放”，即有约各国在中国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3）各国不预先通知中国，不得订立直接有关中国或太平洋及远东和平之条约；（4）各国在华特权暨一切成约均应公布，未公布者概作无效，公布者应予审定；（5）中国政治、司法、行政之行动自由上现受之限制，应立即或于情势许可时废止；（6）中国现时之成约无限期者，须确定期限；（7）解释与特权有关之条约时，应依照有利于让予人之原则；（8）将来如有战争中国不加入时，应完全尊重中国中立之权利；（9）应订条约以便和平解决太平洋与远东国家纷争；（10）应订条约以便随时召集会议，讨论有关太平洋与远东之国际问题。[121]

从内容上看，十项原则的主要部分与顾维钧向北京政府提出的建议是一致的。第一项是整个十项的主旨，第二项是为达到联美制日而推行的政策，第四、五、六项是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是十项中最实质性的内容。这几项正是顾维钧建议向会议提出的原则问题。第八、九、十项则是北京政府在10月底给代表团的训令中提出的。因此，十项原则是三位全权代表在综合顾维钧的建议和北京政府训令的基础上拟定

的，其主要部分可明显看到顾维钧建议的影响。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希望条件说帖着重阐述需加以修订的各种特权不同，十项原则并没有直接提出具体问题，而是着眼于基本原则。在当时列强不肯放弃已获取的在华特权的情况下，直接提出具体问题，势必遭拒或一时纠缠难决，而提出列强难于反对的原则却可为具体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先奠定一个法理上的基础。这显示了顾维钧这批外交官的智慧及重视国际公法的特点。十项原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第一次正式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这正是顾维钧倡导的联美制日外交方针的体现。

十项原则是由三位全权代表拟定的，提交会议前未交中国代表团内讨论，这引起一些不满。17日的代表团会议上，代表团顾问黄郛“陈述十原则之不同，达二小时以上”。代表团内个别成员也有批评，主要集中在“门户开放”这一点上，认为一旦因开放发生纠葛，“必是我国吃亏”。[122]

但与会各国代表对中国提出的十项原则“有普遍良好之反应”。当日散会后，顾维钧抓紧时机与各国代表交谈，沟通对中国提案的看法。法国总理认为“中国提议甚佳”，顾趁势请他会中“遇事相助”。英国和比利时代表表示“中国提议规模阔大”，葡萄牙代表则称“中国所提宗旨稳健”。[123]

顾维钧最初建议中国在会上率先提出议案的一个主要考虑是“可望以我国看法为协商主观”。中国提出十项原则后，英国代表询问此提案是否应在其他问题之前讨论，美国国务卿休斯明确表示，“因中国已有提案，故拟先讨论”。在此后的议程与程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休斯再次表明，在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取得进展前，最好不要提出其他问题的议程。[124]这样，太平洋远东委员会在讨论中国问题时，首先就要从中国的议题开始。中国由此取得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1月19日，太平洋远东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十项原则。各国代表对中国所提原则均表赞同，即使日本代表也不得不声明，无条件无保留地赞成“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两天后，美国代表罗脱（Elihu Root）在太平洋远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宣读了会议委托他起草的决议案：（1）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2）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3）尽吾人力所能及，为世界保护各国在中国全境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4）不得因中国现在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或优先权利而减少友邦人们之权

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125]罗脱提出此草案前，与顾维钧有过一小时的会谈。[126]

从美国对华政策来看，罗脱提案重申了海约翰（John Hay）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罗脱在发言时就表示，因曾与海约翰共事过，他对“门户开放”有一种“个人偏好”。与海约翰的声明相比，罗脱提案增加了“尊重中国主权”的内容。但罗脱提案的第四条却是美国希望与日本达成的一个交易。罗脱告诉顾维钧，这一条一方面维护了日本在东北的地位，另一方面以不妨碍他国的既得利益为交换。由于寄希望于联美制日，顾维钧未对罗脱提案的不妥之处提出异议，但向会议表示中国不必列为该提案的发表宣言国。[127]

罗脱提案在会上通过后，太平洋远东委员会的重心从一般性原则讨论转向具体问题。关税是讨论具体问题时涉及的第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在中国代表团内，关税问题由顾维钧负责。

对顾维钧来说，这不是一个陌生的课题。在巴黎和会前，他就基于经济财政独立的原则准备向和会提出关税自主的要求，这一要求后来列入向和会提交的希望条件说帖。离英参会前，他就关税自主问题专门询问了英国原驻华公使朱尔典，并表达了中国收回关税主权的愿望。[128]

北京政府对关税问题也十分关注，将此列为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最为关切的三件事之一。但与顾维钧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恢复中国主权这一角度看重关税问题不同，北京政府主要着眼于解决国内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正因为如此，北京政府在会议讨论关税问题前夕，于11月17日致电代表团，拟依据日本的提议，在现行关税实际值百抽三七（即3.7%）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达到实际值百抽四六（即4.6%），要求代表团据此向会议提出，以解燃眉之急。[129]被财政困境弄得一筹莫展的北京政府只想先渡过眼前难关，连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值百抽五都无信心达到。这与顾维钧对关税问题的主张有着很大不同。因此收到该电后，顾维钧等复电外交部，希望勿“因小失大”，而应“忍痛须臾，以免牵动会议”。[130]

11月23日，顾维钧代表中国在太平洋远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就关税问题发言。他没有按北京政府的指示仅提微弱的增税要求，而是依据自己的思路从主权角度阐述关税问题：“世界各国均有自定关税之权，中国现行关税制度，实侵犯中国之主权。兹以中国代表团名义，应请恢复

中国关税自主权。”在分析现行协定关税制度损害中国主权及其造成的危害后，顾维钧提出：“请各国允认将关税自主权交还中国。中国政府提出此项请求，并无干涉现行海关管理之意，因现行之海关管理，一般认为满意，而且办理得法。中国亦无干涉支配海关款项之意，因已经抵押为清偿外债之用。盖中国之所以请求允认其关税自主权者，乃在订定税则及区别等级之权利。”最后，他提出从1922年1月1日起，对进口税先值百抽十二又五（即12.5%）。[131]

顾维钧主张的关税自主权仅涉及订立税则的权利，没有包括海关行政管理权。这显然是因为他考虑到中国海关的现状，期望在美英的支持下通过渐进的办法逐步收回关税自主权。这种渐进温和的方法是顾维钧外交活动的一个特点。

为讨论中国的关税问题，会议专门成立了一个分股委员会，由美国人安德伍德（Oscar Underwood）任主席。中国关税分股委员会于11月29日开第一次会议，至1922年1月4日，共举行6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顾维钧提出六点具体建议：（1）现行值百抽五之进口税应增加至切实值百抽十二又五；（2）中国允于1924年元旦裁废厘金，各国允于进口税上增加某种附加税；（3）五年内立约重订关税制度，进口税最高税率为值百抽二十五；（4）陆路进出口关税减免应即废止；（5）中国与各国关于关税税则的条约，自此次协定签字后十年即废止；（6）中国自愿声明，对现行海关行政制度不做根本之变更。[132]顾维钧的这些建议，既有立即付诸实施的内容，又有在一定时期内须达到的目标，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渐进方案。

各国代表对顾维钧的这一计划反应不一。美国代表安德伍德表示在原则上赞成，但他仍坚持中国增税应基于政府对款项的需求程度，因此第一步办法“似可将中国加税之需要先行调查，其他问题稍缓再考量”。顾维钧反对这一做法，因为这样的调查本身就涉及中国的主权，“难免不受中国人民之指摘”，而列强也“无干预中国内政之理”。英国代表提出，将目前实际实行的进口税征收先改为切实值百抽五，以后再逐渐增长，7年后在废除厘金的前提下，可增至中国希望的值百抽十二又五。日本代表认为，日本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三分之一，中国增税对日本影响太大，“最受痛苦者亦惟日本”，因此只赞成在现行税率上增加百分之三十。顾维钧对此立即予以反驳，指出照此中国只能值百抽四七（即4.7%），连值百抽五都达不到。[133]

日本的反对成为解决关税问题的主要障碍，由此顾维钧又灵活地表示中国可参照英国的提议，并与美英代表积极沟通，寻找解决关税问题的途径。

此时，北京政府正经历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特别希望关税问题尽快解决，“以救眉急”。12月28日，国务院、外交部、财政部联合致电代表团，诉说国内困境：“旧历年关在即，库空如洗……为目前救急计，暂时勉允立即加征关税百分之三十，或根据小幡公使面称之百分加五十，于明年二月实行开征，以纾急困。”同时要代表团宣布实行值百抽七五（即7.5%）后将保证偿还外债。北京政府的这一立场，不同于顾维钧在交涉中主张先切实值百抽五并且不对增税用途做出保证的做法。对此，顾维钧等回电时指出，“在我库空如洗，增税一厘，固可减一厘之痛苦”，但若对增税附加条件做出承诺，“不独有碍主权，国体攸关，且亦饮鸩止渴，隐患弥深”，表示将一方面要求增税，一方面坚持不对增税款项加以限制，以“不失兼顾之意”。[134]此后，北京政府频频电催代表团，请优先解决加征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顾维钧对北京的指令并未完全听从，仍按自己的主张与列强进行交涉，以尽可能争取中国权益。经他与各国代表多次沟通，分股委员会采纳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如将讨论中国关税问题的特别委员会改为临时性质的特别会议，以防止委员会成为永久机构，侵犯中国主权。1922年1月5日，分股委员会将最后议决的中国关税问题解决方案提交太平洋远东委员会第17次会议，获得通过。其主要内容是：以切实值百抽五为标准尽快修订税则；由签字国组织一特别会议，从速筹划废除厘金及征收附加税。由于对中国关税问题的处置仅涉及修订税则，顾维钧又在会上就中国关税自主权发表正式声明，表示中国虽承认这一决议，“然并无放弃恢复关税自主之意，并欲于将来有适当机会时将此问题重行讨论”。[135]

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关税问题的决议，并没有完全解决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甚至也没能完全满足顾维钧代表中国提出的相当温和的要求。这是由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外关系的格局决定的。但作为一个弱国政府的代表，顾维钧为恢复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尽了最大的努力，取得了部分成功，为此后关税会议的举行和关税问题的逐步解决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恢复关税主权的漫长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五 山东问题的结局

山东问题是顾维钧在中国代表团内负责的又一重要任务，也是巴黎和会悬而未决后留给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最为棘手的问题。

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后，顾维钧对山东问题念兹在兹。1920年1月对德和约各签字国交换批准文本后，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派代表商议解决山东问题。北京政府对此提议感到“允拒两难”，允则有承认对德和约及日本因此而获取的山东权益之虞，尤其将招致国内舆论的反对；拒则山东问题主动权为日本所得。此时还在巴黎的顾维钧向政府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山东问题，今昔情形不同，日政府既将交还办法请我商议，似难拒绝”，主张与日交涉。但注重国际法的顾维钧又指出，中日交涉的法律依据不能是双方于1915年和1918年签订的条约，而应以巴黎和会三人会记录“为日本已允之条件，再图较为满意之解决”。[136]此时国内舆论将与日直接交涉视为对日退让，一片反对声浪，北京政府没有采纳顾维钧的建议。

美国发起华盛顿会议后，日本担心山东问题列入会议对己不利，再提与中国直接交涉。9月10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顾维钧，请他探询英国政府看法，并陈述自己的意见。顾维钧于9月21日复电，指出日本为避免山东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已做出一些让步，因此国际社会“望我能与开议，我如拒议，则在彼为有辞，在我为孤立”。他建议，为不丧失外交上的主动权，对日本提议应“择其可允者”，如归还胶州湾，“即行承认原则，使其不能收回”，对其余各项则应做出声明加以限制，“以免有默认山东条约之嫌”。他提出中日交涉的地点以华盛顿为宜，“俾至不能就绪之时，仍可设法交会办理”。[137]先将对方已经让步的予以接受，使其不能收回，而对其余中国权益则声明并未放弃，这是顾维钧常用的外交手法。他赞成有条件地与日本直接交涉，同时又主张这一交涉放在华盛顿进行，以与华盛顿会议产生关联，一旦陷入僵局可求助会议的帮助。但国内舆论仍普遍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北京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将顾维钧的建议搁置一边。

10月下旬，顾维钧在伦敦与寇松和美国驻英大使会晤，了解到英国和美国对中日关于山东问题交涉的态度是一致的，即希望在华盛顿会议之外由双方谈判解决。这与顾维钧建议的中日在华盛顿交涉有共通之

处。但北京政府直到11月上旬仍寄希望于将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讨论。

11月10日华盛顿会议正式开幕前两天，顾维钧与施肇基、王宠惠联名致电外交部，就山东问题“请速密示，以资应付”。11月14日，顾维钧等再次致电北京，认为将山东问题向会议提出，“难望他国相助，政府如拟会外解决，宜从速决定进行，俾在会议期内了此悬案，否则对他项要求既受牵制，或遭完全失败，即鲁案问题于会议告竣以后更不易要挟日秉公解决”。北京政府外交部于11月15日电示：“总以各方面情势为解决此案之标准，诸公审度时会相机进行，随时电告为盼。”[138]顾维钧等赞同会外交涉的倾向在电文中已表露得相当明显，只是由于事关外交决策，顾维钧等希望北京能给予明确指示。但外交部的复电言辞闪烁，所谓“相机进行”，即如巴黎和会拒签和约时那样，将最后决定权推给了代表团。

由于北京政府外交部没有明确指示，代表团内部又有不同意见，顾维钧等虽赞同，却不敢贸然答应美英的中日会外交涉提议，而是希望美英站在中国一边进一步调停。11月17日，顾维钧会晤英国代表贝尔福，再次强调中国舆论始终反对直接交涉。贝尔福遂提出，可考虑将中日商定的解决办法交会议通过，作为会议解决事项之一。这一提议实际上将中日交涉与华盛顿会议联系在了一起。北京政府外交部获悉这一消息后，电示代表团：“所称由该二国（即美英）发起介绍讨论及商定后仍由大会通过两层，如能办到，即希商酌进行，但不能由彼预定范围。”[139]北京政府终于同意了中日在会外交涉山东问题。

接到北京政府上述电报后，顾维钧与施肇基于11月29日午后访晤美国国务卿休斯和英国代表贝尔福。在顾、施两人的坚持下，美、英两国最终同意，休斯和贝尔福于中日交涉第一次会议时到场介绍，以后每次中日交涉美英均派代表列席，中日交涉的议决案须提交华盛顿会议，倘议而不决，山东问题仍提交大会。次日，休斯在太平洋远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宣布，请中日两国自行谈判山东问题，美英各派代表列席，并称无论谈判结果如何，均须报告大会。[140]这样，中日有关山东问题的交涉最终既未采取日本提议的与华盛顿会议无关的直接交涉，也未如北京政府最初所愿正式提交会议，而是采取了在华盛顿会议外中日交涉的方式。这正是顾维钧在9月下旬建议的方式。由于休斯在太平洋远东委员会宣布了中日交涉一事，交涉时又有美英代表到场，并且中日之间的

议决案要提交会议，这一交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与华盛顿会议联系在一起。因此，会外交涉更接近中国的愿望，对中国较为有利。

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各界对会议十分关注，期盼中国外交不再重蹈巴黎和会覆辙。11月29日中午，由全国商教联合会派到华盛顿就近观察会议的国民代表、上海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到代表团驻地，表示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并询问代表团对此持何立场。施肇基没有正面回答，尽管此时外交部同意会外交涉的指示已经到达。在华盛顿的国民代表和中国留学生获悉中日将在会外交涉山东问题后十分不满，认为会外交涉就是直接交涉，就是对日让步。12月1日，中国留学生到代表团驻地，高举“反对直接交涉”的标语抗议。顾维钧出面向学生解释，说反对直接交涉并不意味必须将山东问题提交大会，二者间还有美英调停的第三种途径，但这一解释并没能使激动的学生平静下来。[141]当天，顾维钧与施肇基、王宠惠联名通电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及各民间团体，说明会外交涉的原委，保证“于国家主权领土两无损伤”，争取国内舆论的理解和支持。[142]国民代表和留学生对会外交涉的反对立场，对代表团接下来的交涉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增加了谈判交涉中灵活处置的难度。

12月1日，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会外交涉正式开始。至1922年1月31日交涉结束，中日间共举行了36次会谈，中国参加的是施肇基、顾维钧和王宠惠三位全权代表，日本参加的是币原喜重郎、出渊胜次和埴原正直。美英方面在休斯和贝尔福第一次出席致辞后，分别由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马慕瑞与英国原驻华公使朱尔典列席。在中国代表团的分工中，山东问题由顾维钧负责，因此会谈中顾维钧是中方主要发言人。

因为日本已经宣布归还胶州湾，山东问题的焦点就是胶济铁路的归属。这是中日交涉中分歧最大、争辩最激烈，费时也最多的议题。双方的分歧集中在中国以何种方式收回该路。日本坚持中国向日本借款赎路，以求继续控制该路；中国则提出或以现款赎路，或以国库券12年内分期付款，但3年后可一次付清，以尽快地完全收回路权。在这一复杂的交涉过程中，顾维钧灵活应变，起了关键的作用。1922年1月初，日本利用其驻华公使小幡与北京政府总理梁士诒会晤一事大肆宣传，称中日在北京会商借日款赎路已有端倪，由此引起中国国内政局动荡，会外交涉突生变局。在这之前，由于顾维钧等的努力，日本谈判代表对中国以国库券赎路已有允意，但在这之后，日本代表态度又趋强硬，坚持借

款赎路。在会外交涉陷入困境的情况下，顾维钧等请美英出面帮助，最终美英答应做非正式调停。[143]

1月9日，美、英代表分别非正式向中日提出四种调停方案。这四种方案的主要内容是：甲、日本政府自协定成立后3个月内将胶济铁路转移于日本资本团，日本资本团再根据商定的日程将铁路转移给中国银行团，中国银行团以债券形式偿付路价，期限12年，3年后得一次还清，还清前聘日人为总工程师；乙、向日本财团借款赎路，期限12年，3年后得一次还清，还清前聘日人为总工程师；丙、中国以现款赎路，聘日人为车务长、会计长；丁、中国以国库券赎路，期限12年，3年后得一次还清，还清前聘日人为车务长、会计长。[144]

美、英的四种调停方案综合了中日双方在此前谈判中的主要诉求。顾维钧等在向北京政府报告调停方案时指出：“我国争点，一为不用借款形式，二为保守用人权。现在英、美将此两点分晰调剂，以便最后折衷解决，并望双方能多择数种，庶易彼此接近。此在调人用心良苦，惟在我仍亟待详审。”[145]他们对这四种方案的意见是：“甲种用意颇巧，惟执行时丛生困难。乙种用人条件较轻，第察国内外舆论，对于借款形式恐多波折。丙种不近情，已详九日汉文电。至于丁种可无借款问题，惟管理权不免暂操诸彼。现探闻东邻代表颇注意该种。我为求早日解决鲁案起见，丁种或须一并采择，但应声明所用两项，日员仅为助理，其主任仍用华人。”[146]由于知道政府无法筹集到一大笔现款赎路，顾维钧等主张在丁种方案的基础上做些调整，对日方用人权做出限制。

日本在美英介入调停后，不得不做出一些退让，也倾向于丁种方案。1月18日，日本代表向贝尔福提出在丁种方案基础上修改的新方案：同意中国以国库券赎路，期限15年，5年后可先行付清；该路雇中日会计长各一人，职权相同，并雇日人为车务长。[147]

此时华盛顿会议已进入尾声，美英急切希望中日会外交涉能取得成果，因此对日本的新方案很满意，认为日本放弃借款，同意中国以国库券赎路已做出了重大让步。1月19日和22日，休斯和贝尔福两次约顾维钧、施肇基等前往休斯寓所，劝说中国接受日本的新方案。休斯认为，日本的提案并非完善或公平，但“华会将闭幕，现在确切解决之时机已到中国国民与代表之前，失此不图，则机会决不再来，即欲再行集会，势亦有所不能”。他告诉中国代表，“不必留此问题仍不解决，而放弃一切已得之利益也”。顾维钧等理解美英的调停，但对日本的提案仍尽力设法

修正，提出在用人上，应改为日人在华人下任副车务长、副会计长，这样的安排在日本12月20日的方案中出现过。休斯和贝尔福建议折中修改为日人享有同等权力。这两次会晤后，顾维钧等均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汇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窃以为所提解决办法，未予中国以完全公道，但可得亦不过如此。大会事项系于本问题之解决者甚多，似应各方兼顾，并于中国对外关系之前途，详为考虑也。"[148]通过与休斯和贝尔福的会谈，顾维钧等对美英态度有了更贴切的了解，而休斯建议的不放弃已得之利益也正是顾维钧处理外交难题的基本思路，因此上述电报是在向北京政府建议接受日本的新提案。

1月25日，美国总统哈定亲自接见施肇基，进一步施加影响，希望中国接受日本方案，并表示若中日谈判破裂，美国虽同情中国，"恐中国于五年内未必即能逐出日本也"。同时，休斯指令驻华公使舒尔曼（Jacob Schurman）向北京政府表明美国的态度，如果中国选择中断谈判，将招致可预料的灾难，届时就无法指望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了。[149]

北京政府外交部对美英提出的四种调停方案，最初的看法与顾维钧等并不完全相同。由于受到国内舆论的压力，外交部最认同丙种方案，因为"合人民心理"，只是该方案需要的现款无法筹措。[150]在收到顾维钧等的电报以及美国和英国驻华公使通报美英政府意见后，外交部明白美英的调停是"最后办法"，"虽不能完全满国人之望，特事势如斯"，于是在1月26日电示代表团，称"本部深知代表苦心争持，备历艰辛"，现"时机迫促，如实无商量余地，只可就此决议，仍照原议报告大会公认为要"。虽然外交部在电文中还提出希望能为现款赎路留一余地，但对此能否实现并无信心，也不要求代表必须坚持，实际上接受了顾维钧等的建议。因此，同一天，外交部给代表团发出签订有关山东问题协定的全权证书。[151]

1922年2月4日，在休斯和贝尔福到场的情况下，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代表中国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条约对胶济铁路的处置采用了日本最后提出的方案，同时对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归还中国、日本军队从山东撤退等事项做了规定。[152]巴黎和会留下来的山东问题终于有了一个结局。两天后，《九国公约》签署，华盛顿会议结束。

对中国而言，华盛顿会议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国际会议。近代以来，在中国与列强的交涉中，这是第一次没有丧失反而争回了一些权益

的外交活动，与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成功离不开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由此激发的以“五四”为标志的爱国运动这一历史背景，而顾维钧、施肇基这批外交官也为此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努力。

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外交活动，与北京政府外交部的主张存在着一些分歧。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某些主张，如反对与日直接交涉和主张现款赎路，从表面上看要比顾维钧的主张强硬些，但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应付国内的舆论，而并非解决问题。例如，现款赎路需2500万美元，而当时已募集的款项尚不足50万美元，现款赎路根本办不到。[153]相比之下，顾维钧更注重问题的实际解决。然而，当时一些激进的舆论对顾维钧的做法颇多非议，或指责其“迫于英美胁威”，或批评其“让步过多”。[154]这些看法对以后的历史学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这里实际上涉及如何看待外交活动中的妥协问题。民众要求彻底废除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立即收回中国应有的权益，当然有其正当性。但是对于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折冲樽俎的外交官来说，顾维钧必须审慎地考虑所面临的现实，采取适当的策略，以尽最大可能争取最有利于中国的结局，寻求问题的解决。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中国并不具备不妥协便立即争回所有丧失的国家主权的条件。因此，在声明保留以后完全收回主权的前提下，在一些问题上做出局部妥协，以先争回某些权利，实在是中国当时切实可行的选择。正如顾维钧自己所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作个人立身之箴言，但不适用于一国之外交。[155]

华盛顿会议期间，顾维钧的外交活动贯穿着联美制日的方针。从会前向北京政府建议赞成“门户开放”原则，到会上将这一主张列入中国的十项原则，都是他联美外交方针的集中体现。近代以来，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主动地公开赞同由外国提出的一项对华原则。从华盛顿会议的结局看，顾维钧的联美外交取得了成效，举国关注的山东问题的最后解决就与美国的调停和对中国的支持大有关系。会议最后阶段美国对中国施加影响，希望中国接受日本方案，以求会议圆满结束，但这与巴黎和会上威尔逊逼迫中国在主权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不同。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在中日之间总体上是倾向于中国的，其调停也是有利于中国的。美国对中国的这些支持使顾维钧切身体会到联美对中国外交的意义。华盛顿会议临近结束时，顾维钧与施肇基等致电北京，请以总统徐世昌名义致电哈定总统，“直接道谢其友谊的斡旋，俾山东问题和平解决而除去扰乱远东平和之根源”，并请外交总长颜惠庆面见美、英驻华公使，表达对

休斯和贝尔福“调停之谢意”。[156]对顾维钧以后的外交活动来说，华盛顿会议上联美的经验影响十分深远。

[1] 《驻美顾公使电》（1918年11月14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59页。

[2] 《密勒来函》（1918年11月11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册，第769页。

[3] 《收驻法胡公使电》（1918年10月1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7-002-02-031。

[4] 《陆总长来电》（1918年11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2-008-02-081。

[5] 《发驻美顾公使电》（1918年11月2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7-01-001。

[6] 《发驻美顾公使电》（1918年11月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7-01-001。

[7] Informal Memorandum by Koo，25 November，1918，*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

[8]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at an Audience with President of U.S.Wilson at the While House，26 November，19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039-375。

[9] Memorandum of an Interview with Mr.Lang，26，27 November，1918；Memorandum of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Lansing，29 November，19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039-375。

[10] Conversation between Mr.Lansing，Hoo We-teh，Alfred Sze and Koo，December 18，1918；Conversation with House，18 December，1918，*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J.T.Shotwell，*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New York，1937，p.92.

[1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70～171页。

[12] 《发法京中国使馆电》（1918年11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7-01-001。

[13] 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45页。

[14] 《收法馆电》［1918年12月29日（20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

号：03-13-067-01-001。

[15] 《收驻美顾公使由法京来电》［1918年12月30日（28日发）］；《发驻美顾公使电》（1919年1月5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第24～25页。

[16] 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第127页。

[17] 《发外交部电》（1919年1月1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10-05-001。

[18] 《发外交部电》（1919年1月1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10-05-001。

[19] Patrick Gallagher，*America's Aims and Asia's Aspirations*，New York，1920，p.197.

[20]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七十五次》，第2次会议录，张一志编《山东问题汇刊》（1），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第142页。

[21]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七十五次》，第3次会议录，张一志编《山东问题汇刊》（1），第143～144页。

[22] *FRUS*，*Paris Peace Conference*，Vol.3，pp.739-940.

[2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83～184页。

[24] Memorandum of an Interview with Lansing，27 Janurary，1919，14：30，*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

[25] Secretary' s Note of a Conversation held in Pichon' s Room，27 Janurary，1919，*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提到牧野在这次会上公然表示日本与英法俄意之间有秘密谅解，见该书第7卷第263页。但上述会议记录并无此表述。

[26] Memorandum of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W.Wilson，27 Janurary，1919，5：45 p.m.，*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

[27] 《发外交部电》（1919年1月2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10-05-001。

[28] 金问泗：《从巴黎和会到国联》，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第17页。

[29] Stephen G.Craf，"John Bassett Moore，Robert Lansing，and the Shandong Ques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2，1997，p.237.

[30] 金问泗：《从巴黎和会到国联》，第17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85页。

[31] 顾维钧演说的英文记录稿和中文翻译见金光耀、马建标选编《顾维钧外交演讲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第11～20页。

[3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86页；Robert Lansing，*The Peace Negotiations*，*A Personal Narrative*，NewYork，1921，p.253；金问泗：《从巴黎和会到国联》，第18页。

[33] 《发外交部电》（1919年1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10-05-001。

[34] Memorandum on Leased Territories in China，转引自Stephen G.Craft，“John Bassett Moore，Robert Lansing，and the Shandong Ques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2，1997，pp.237-238。

[35] 《颜惠庆日记》第1卷，第815页；《收外交部电》［1919年1月31日（30日发）、2月1日（1月31日发）］、《收山东国会议员电》（1919年2月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06-01-001、03-13-006-02-001。

[36]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67～270页。

[37] *Wilson Papers*，Vol.54，p.548；《发外交部电》（1919年2月1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

[38]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七十五次》，第14次会议录，张一志编《山东问题汇刊》（1），第157页。

[39]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七十五次》，第18次会议录，张一志编《山东问题汇刊》（1），第160页。

[40] 金问泗编《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上海，1931，第15～30页。

[41] 《收法京陆总长（征祥）电》（1919年2月19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48页。

[4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73～174页；《发外交部电》（1919年1月1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10-05-001。

[43] 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中华书局，1960，第146页；《收外交部电》（1919年1月2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06-01-001。

[44] 《收国务院来电》（1919年1月2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06-01-001。

[4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75～176页。

[4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81页；《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七十五

次》，第4次会议录，张一志编《山东问题汇刊》（1），第145页。

[47] 《颜惠庆自传》，第100页。

[48] 《颜惠庆日记》第1卷，第815、823、825、827页。

[49] 《颜惠庆日记》第1卷，第824页。

[50]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第21次会议录，张一志编《山东问题汇刊》（1），第166页；《颜惠庆日记》第1卷，第826～827页。

[51] 《收外交部电》（1919年2月2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06-02-001；《秘笈录存》，第80页；《颜惠庆日记》第1卷，第827～828页。

[52] 《颜惠庆日记》第1卷，第827页。

[53] 《收国务院来电》（1919年2月1日）、《收参众两院电》（1919年2月13日）、《收山东国会议员电》（1919年2月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06-02-001。

[5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76页。

[55] 《颜惠庆日记》第1卷，第829页。

[56] 《顾维钧日记》，1946年5月1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6。

[57] 《收国务院电》［1919年3月7日（4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06-03-001。

[58] 《发外交部电》（1919年1月19日、20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10-05-001。

[59] 《秘笈录存》，第115页。

[60]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七十五次》，第30、34、37次会议录，张一志编《山东问题汇刊》（1），第172、174～177页；金问泗编《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第31～48页。

[61] 《颜惠庆日记》第1卷，第831～832页。

[62] Memorandum of an Audience with President Wilson，24 March，1919，*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

[63] An Interview with Colonel House，2 April，1919；An Interview with Mr.Lansing at Hotel Crillon，4 April，1919，*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A Memorandum by Wellington Koo，8 April，1919，*Wilson Papers*，Vol.57，pp.298-301.

[64] An Interview with E.T.Williams，21 April，1919，*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发外交部电》［1919年4月19日（电报尾署1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2-001。

[65] 《发外交部电》（1919年4月1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2-001；V.K.Koo to W.Wilson，17 April，1919，*Wilson Papers*，Vol.57，p.431。

[66] 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第257～258页。

[67]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Four（Three），22 April，1919，*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发外交部电》（1919年4月2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2-001。

[68] Koo to Wilson，24 April，1919，Enclosing a Brief Memorandum，*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

[69] Koo to Wilson，30 April，1919，*Wilson Papers*，Vol.58，p.270.

[70] From the Diary of Dr.Grayson，*Wilson Papers*，Vol.58，pp.110-113.

[71] The Diary of R.S.Baker，30 April，1919，*Wilson Papers*，Vol.58，p.270.

[72] 《陆征祥致外交次长》（1919年5月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4-001；Patrick Gallagher，*America's Aims and Asia's Aspirations*，pp.335-336。

[73]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七十五次》，第74次会议录，张一志编《山东问题汇刊》（1），第199页。

[74] Thomas Millard，*The Shandong Case at the Conference*，Shanghai，1921，pp.31-33；Wunsz King，*China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in 1919*，St.John' s University Press，1961，pp.25-26.陆征祥致外交部电称声明是2日送新闻界，但该电无声明内容，《发外交部转国务院电》（1919年5月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4-001。

[75] 《发外交部电》（1919年5月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4-001。

[76] 《收国务院来电》（1919年5月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3-001。

[77] 《发国务院电》（1919年5月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4-001。

[78] 《收国务院电》［1919年5月20日（15日发）］、《收国务院外交部电》

［1919年5月29日（21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3-001。北京政府对签约的决策，参见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7章；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第298～301页。

[79] Patrick Gallagher，*America's Aims and Asia's Aspirations*，p.354.顾维钧要离开巴黎一事已报告过北京，外交部27日电有“若顾使已行”句，显然已知他的计划，并似已劝阻，《发法京陆总长（征祥）电》（1919年5月27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89页。

[80] 《发外交部电》（1919年5月20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4-00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Colonel House，22 May，1919，*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

[81] 《发外交部电》（1919年5月2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4-001。

[82]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七十五次》，张一志编《山东问题汇刊》（1），第203页。

[83] 《收法京陆（总长）征祥电》［1919年6月2日（5月28日发）］，《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03～204页。

[84] 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第206～208页。

[85] 《收法京陆（总长）征祥电》［1919年6月14日（9日发）］，《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14页。

[86] 《发外交部电》（1919年6月1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6-001。

[8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James Scott，5 June，191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Mr.Lansing，29 May，1919，*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

[88] 《收国务院外交部电》［1919年6月13日（11日发）、6月24日（19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5-001；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第317～318页。

[89] Interview with Dutasta，24 June，1919，*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发外交部电》（1919年6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6-001。

[90] 《发外交部电》（1919年6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6-001。

[91] 《发外交部电》（1919年6月2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6-001。因该电27日发，电文中写今晨见蓝辛，故唐启华书将此次会面误

为27日（见该书第322页）。但电文中有“昨晚见威总统”句，应是该电拟于26日晚，发于27日。

[92] 《发外交部电》（1919年6月2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6-001。

[93] 《发外交部电》（1919年6月2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6-001。电文中记，说最后一段时“顾使起云”。

[94] V.K.Koo to W.Wilson，27 June，1919，Enclosure of Koo to Wilson，*Wilson Papers*，Vol.61，p.289.声明稿中文本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52页。

[9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07～208页。

[9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08页。

[97] 《发外交部电》（1919年6月28日、2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6-001。顾维钧在回忆录中称，作为排名前两位的代表，陆征祥与王正廷的印章已送交和会（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11页），但1946年5月他与人交谈时称，两人印章已盖在和约正本上，只是他不愿将此告诉国人，见《顾维钧日记》，1946年5月1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6。

[98] 《收国务院电》［1919年6月28日（27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5-001；《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10页。关于北京政府的拒签决策，参见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第214～216页。

[99]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09页。

[100] 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第226页。

[101] 《申报》1919年7月5日第10版、7月8日第10版。

[102] 《吴佩孚致徐世昌电》（1919年7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016-64。

[103] 《收国务院来电》（1919年7月2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7-03-001；《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06页。

[104] 《发外交部电》（1919年7月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9-02-001。

[105] 《收法京陆总长（征祥）电》［1919年7月31日（26日发）］，《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86～287页；《收法京顾公使（维钧）电》［1919年8月17日（14日发）］，《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320页；A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ith Frank Polk，2 August，1919，*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

[106] 《国务院致陆专使电》（1919年8月23日），《秘笈录存》，第253页。

[107]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95～99页。

[108] 《申报》1920年8月11日第3版、8月28日第6版。顾维钧回忆说是10月返回华盛顿，应为误记，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15页。

[109] 《发外交部电》（1919年6月1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3-068-06-001；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第25～38页。

[110]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104～105页。

[111] 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第24、128～129页。

[112] 《发外交部电》（1921年6月30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9-001-01-001。

[113] Curzon to Alston，8 July，1921，*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以下简称*DBFP*），First Series，Vol.14，London，1966，pp.329-331；《驻英顾公使电》（1921年7月4日、5日），《秘笈录存》，第310～312页。

[11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17～218页；《秘笈录存》，第387页。

[115] 《驻英顾公使电》（1921年7月16日），《秘笈录存》，第333～334页。

[116] 《收驻美顾公使电》（1920年10月19日），中研院近代史所编《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第272页。

[117] 《收顾公使电》［1921年10月26日（24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9-016-03-015；Curzon to Alston，24 October，1921，*DBFP*，First Series，Vol.14，pp.451-452。

[118] 《发英京顾、王，美京施代表电》（1921年10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309-307。

[119] 《发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1年10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309-307。

[12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21页。

[121] 中华民国外交部编《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中华民国外交部印行，1923，第59～60页。

[122]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第120页；李景铭：《太平洋会议日记》，《近代史资料》总7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69～70、72页。

[123] 《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1年11月16日），《秘笈录存》，第402页。

[124] 《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1年11月16日），《秘笈录存》，第400页；U. S.Department of State，*Conference on the Limitation of Armament*，Washington：GPO，1922，p.858。

[125]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65页。

[126] 罗家伦：《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东方杂志》第19卷第2号，1922年，第26页。

[127] *Conference on the Limitation of Armament*，p.880；金问泗：《从巴黎和会到国联》，第39页；《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67页。

[128] 《顾使与朱尔典谈话》（1921年10月25日），《秘笈录存》，第421页。

[129] 《外交部致代表团暨驻英、法、日本各公使电》（1921年11月17日），《秘笈录存》，第420页。

[130] 《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1年11月25日），《秘笈录存》，第420页。

[131]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第72页。

[132]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第264页。

[133]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第265～270页。

[134] 《国务院、外交部、财政部致代表团电》（1921年12月28日）、《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1年12月29日），《秘笈录存》，第452～453页。

[135]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132～133页。

[136] 《收法京顾专使电》（1920年1月28日），《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上册，第10页。

[137] 《发驻英顾公使电》（1921年9月10日）、《收驻英顾公使等电》（1921年9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039-307。

[138] 《收驻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1年11月11日、16日）、《发太平洋会议代表电》（1921年11月15日），《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上册，第342、345、343页。

[139] 《收驻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1年11月20日），《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上册，第345页；《外交部致代表团电》（1921年11月26日），《秘笈录存》，第410页。

[140]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第100页；《收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1年12月3日），《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上册，第348～349页。

[141] 何思源：《华盛顿会议中山东问题之经过》，《东方杂志》第19卷第2号，1922年。

[142] 《收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1年12月3日），《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上册，第348～349页。

[143] 《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2年1月7日），《秘笈录存》，第485～486页。

[144] 《收施、顾、王代表电》［1922年1月11日（9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05-012-03-026。

[145] 《收施、顾、王代表电》［1922年1月11日（9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05-012-03-027。

[146] 《收施、顾、王代表电》［1922年1月18日（16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05-012-03-035。

[147]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22 Janurary，*FRUS*，1922，Vol.1，p.942.

[148] 《收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2年1月21日、24日），《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上册，第414、416页。

[149] 《施、顾、王代表电》（1922年1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05-012-03-042；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22，25 Janurary，*FRUS*，1922，Vol.1，pp.942-945。

[150] 《外交部致代表团电》（1922年1月22日），《秘笈录存》，第496页。

[151] 《外交部致代表团电》（1922年1月26日），《秘笈录存》，第497～499页。

[152]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第208～212页。

[15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28～229页。

[154] 童志仁：《再记华盛顿会议中山东问题之经过》，《东方杂志》第19卷第9号，1922年；《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上册，第369页。

[155]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80页。

[156] 《收施、顾、王代表电》［1922年2月4日（2日发）］，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05-012-03-045。

第四章 北洋外交的主角

一 出长外交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顾维钧于3月上旬返回伦敦任所。3月底，他奉政府之命离英回国，汇报会议情况并商讨如何执行华会决议案。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取得的些许进展，如举行关税特别会议、山东问题的善后，都要具体落实。这是中国外交需要面对，也是国人盼望予以解决的问题。

1922年5月10日上午，顾维钧搭乘的轮船抵达上海公和祥码头。这是7年前他从上海出发任驻外使节后第一次回国。与华盛顿会议期间国民代表和激进舆论的批评指责不同，上海公众对华会代表顾维钧的到达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申报》在本埠新闻版头条以醒目的标题“顾维钧博士昨晨抵沪”予以报道，并配发了他与夫人黄蕙兰下船和王正廷到码头迎接两张照片。[1]顾维钧在上海逗留半个月，各种团体纷纷邀请他去做演讲。仅5月20日一个下午，他就去了联太平洋会、职业教育社和华侨联合会三处做演讲。在嘉定同乡举办的欢迎会上，主持者致辞时说，嘉定向来有名的人物大多是文学家，而顾维钧以外交家折冲坛站，为世界瞩目，同乡无不景仰，与有荣焉。顾维钧母校圣约翰的校长卜舫济（Francis Pott）主持了他在美国大学俱乐部的午餐演讲。[2]

在演讲和接受媒体采访时，顾维钧强调了华盛顿会议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华会开辟了“外交上之新途径”，列强“纸面上声明表示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并归还中国少许已丧失之权益。因此，中国外交今后的重点在两个方面。“第一层将未失者加以保障，使以后不再失；第二层将已失者愈多收回愈佳”，也就是“切实保守中国现有主权”“逐渐收回已失权利”。至于具体的外交应对，顾维钧提出要“务求实际”，不能希冀于速战速决，一蹴而就，而应“循序渐进，前仆后继，多一分努力，则于成功路上自增一分痕迹”。[3]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的进展使顾维钧敏锐地认识到，中国外交的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了保障已有主权、

收回已失权益的新阶段。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务求实际”，“循序渐进”。顾维钧的这些见解正是此后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基本方针和具体策略。

顾维钧根据自己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经历看清了中国外交的任务，但离国多年的他没有考虑到动荡变化的国内政局会对外交产生多大的影响。5月28日中午，顾维钧抵达北京，外交总长颜惠庆、华会代表王宠惠等以及一些大学生来车站欢迎，“极一时之盛”。但当顾维钧去向颜惠庆报告华会及执行会议决议事宜时，却发现这位外交总长对外交事务闭口不谈，反而表示，他本人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外交总长后想休息一下，希望顾维钧来接替他的职位。顾维钧对此毫无准备，听到后大吃一惊。[4]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更为震惊。6月2日中午，总统徐世昌在总统府设宴招待顾维钧，一同参加的有署理总理周自齐等内阁成员和蔡元培等社会名流。席间，徐世昌谈兴甚高，问顾维钧关于华盛顿会议和英国的情况，丝毫没有任何迹象会发生什么大事。午宴即将结束喝咖啡时，徐世昌突然告诉大家，今天是为顾公使洗尘，也是与诸君告别，因为马上就要从总统位上引退休息了。午宴一结束，徐世昌就坐车离开总统府直奔火车站，随即离开了北京。[5]徐世昌是在直系的逼宫下不得不告别北京政坛的。

顾维钧到达北京时，国内政局正处于急剧动荡之中。作为文人总统的徐世昌，在军阀称雄的年代，凭借八面玲珑的权术，在各派系之间保持平衡，在总统的位置上已坐了4年。1922年4月，直奉两大军阀之间爆发战争，结果奉系战败，退至关外。直系获胜后，北京政府完全在其控制之下，不愿再让他人占据总统位置，于是演出了逼宫闹剧。逼走徐世昌后，直系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号，推出张勋复辟时被推翻的黎元洪复任总统，以便为直系首领曹锟最终上台铺平道路。

黎元洪就任后，任命颜惠庆署理总理，出面组阁。颜惠庆为了组织一个被广泛认同的内阁，托王宠惠转告顾维钧，想请他担任外交总长。稍后，又传来消息，颜惠庆请他担任教育总长，因为外交总长要留给施肇基。这些瞬息即变的消息让顾维钧十分纳闷，他疑惑自己“既没有经历过北京的政治生涯，又是刚刚回国，为什么会被选中”，“对国内的政治现状觉得有些茫然无绪”。[6]

其实，还在顾维钧回国前，就有媒体预测他要参与内阁改组并出任外交总长了。这一预测的依据是，在直奉战争中获胜的直系在外交上要

倚重顾维钧或颜惠庆这样的职业外交官。[7]而公众与舆论对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多有好评，无论谁组阁，选择华会代表入阁有助于内阁名单被国会顺利通过。然而，组阁者的选择还需照顾到各派政治势力，内阁的职位毕竟有限，僧多粥少。颜惠庆虽有意延揽顾维钧，但又有自己的考虑，还要在各派间取得平衡，最后只得舍弃顾维钧，给他安排了一个不是内阁成员的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顾维钧对没有入阁并不介意，毕竟他的兴趣在外交方面。

颜惠庆内阁维持了不到两个月就倒台了。8月5日，王宠惠出面组阁，请一同参加华盛顿会议的顾维钧担任外交总长，这时他34岁。此时，距民国成立才10年，但因政局动荡多变，顾维钧已是北京政府第12位外交总长了。[8]从这时起至1927年6月张作霖军政府上台的近5年时间里，内阁如走马灯般调换，除了在1924年底至1926年上半年间的一年多时间以及其他几次短暂的间断外，顾维钧在7届内阁中出任外交总长，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北京政府最后几年的外交事务。

从驻外使节到外交总长，虽都是处理外交事务，角色变化却很大。驻外使节处理的只是中国与驻在国一国的外交事务，相对单一。顾维钧还担任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代表那样的专使，处理的事务比较专门和集中。但外交总长要面对全局，处理的事务就繁重复杂多了。好在顾维钧出使前担任外交部秘书和参事时，参与过中英西藏交涉和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对外交全局不算太陌生。而他在驻外使节期间积累的经验和参加国际会议获得的声望对他出任外长也有助益。

1922年8月9日，出任外交总长的第4天，顾维钧在外交部会见了美、英等国驻华公使。这是新外长与外国使节的礼节性见面。在与美国公使舒尔曼会晤中，顾维钧强调，“鄙人前后寄居海外十有四年，其间居留贵国者有十二年之久。鄙人此次职掌外部，凡事盼与贵使互相赞助，俾中、美历来之友谊，日益巩固”，并希望在美国支持下“实行华会所订条约”，“彼此同心共进，两国邦交之亲善，可操左券”。虽也曾驻节英国，但在同一天的会见中他对英使馆却无如此热情的表达。[9]

改变中国与列强关系的不平等状态是顾维钧投身外交界时抱定的目标。出任外交总长后，他就朝着这一目标一步一步地迈进。民国初年顾维钧刚进外交界时，外交部要与外国使节商讨问题，都是“反主为客”，派人前往外国驻华使馆，而不是按通行礼仪请外国使节来外交部。作为外交部的秘书，顾维钧经常去的就是美国、英国这些说英语国家的使

馆。对这种不合外交惯例的做法，他深感惊异。[10]任外交总长后，他着手改变已习以为常的这一做法，有要事召见外国使节来外交部商谈。有一段时间，他在杜锡珪内阁中任财政总长，也将这一做法带到了财政部。在他到任前，财政总长就职后都要去拜访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安格联（Francis Aglen），尽管后者是财政部属下的官员。顾维钧一上任，部属告诉了他这一惯例，但他坚持要让安格联到部里来见总长，改变了以往丧失尊严的做法。[11]

但晚清以来中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使列强在对华交往中习惯了高人一等的傲慢态度和蛮横做法。顾维钧要坚持有尊严的平等交往并非易事。1923年7月，顾维钧出任高凌霨内阁的外交总长。此时，一年前被直系推出的总统黎元洪又被直系逼下台离开了北京，总统位暂时空缺。根据民国宪法，在这种情况下，高内阁作为摄政内阁代行总统的权力，结果因此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外交风波。

7月中旬，日本新任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抵达北京。按国际外交通例，新任使节到达任所的第一件事，是拜访驻在国外长送交国书副本，请求安排觐见国家元首正式递交国书，以取得代表本国与驻在国政府开展外交活动的资格。芳泽抵京后，以照会通知外交部已经到任，并于7月19日到外交部见次长沈瑞麟。但无论照会或见面，均未提及呈递国书事，也未送交国书副本。7月21日，外交部派秘书熊垓去日本驻华使馆面见芳泽，催促尽快递交国书。芳泽以国书交给摄政内阁不妥为由予以拒绝。[12]在芳泽看来，日本天皇签署的国书不能递交给一个摄政内阁。这是蔑视驻在国主权的无礼做法。说到底，日本自认是一个强国，中国低它一等。

7月23日，顾维钧正式到外交部上任，当天即派人去日本使馆再次催交国书，日方称须等待政府训令，仍拒绝了中国的要求。新外长到任须以公文通知各国使节，并做礼节性拜访，而芳泽不交国书则没有名分，无法与之直接来往。为解决这一难题，7月24日，外交部交际司司长陈恩厚召日本使馆参赞根津到外交部会面，告诉日方因未交国书，新外长到任的公文或暂缓给日使馆，待定下递国书日期再送；或公文抬头只书公使馆不书公使本人名字。根津参赞请示后答复，芳泽认为外交部送公文和日本使馆递国书是两回事，同时表示芳泽希望25日来外交部祝贺顾维钧上任。陈恩厚当即以电话联系顾维钧，顾维钧表示欢迎芳泽来外交部。但次日，因外交部发给日本使馆通知新外长到任的公文只书公

使馆，而未书公使芳泽之名，被日本使馆退回外交部，芳泽也没有如约到外交部来。[13]中日间因国书引发的矛盾升级了。

顾维钧不能容忍芳泽有违外交惯例的无礼做法，坚持如果芳泽不先拜访外交总长送交国书副本，就不具备日本驻华公使的正式资格。陷入僵局后，芳泽去找内阁的其他总长。于是，内阁中两个总长向顾维钧提出，可否在非官方的宴会上，以个人名义将芳泽介绍给他。顾维钧对这一提议感到既可气又可笑。因为这不是他与芳泽之间的私事，而是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大事，有关国家的尊严。[14]对芳泽的做法，英文的《北京日报》也有评论，称呈递国书乃外交礼节通例，芳泽照会中国外交部，既未提及国书，也未送国书副本，不合常理。[15]

在顾维钧的坚持下，芳泽只好做出让步。中日双方最后商定，由日本使馆照会外交部，称芳泽所带国书写有黎元洪名字，不便呈递，待新总统选出另换新国书并请觐见呈递，同时将现国书副本送外交部。随即外交部复照，称国书正本呈递事当由双方进一步接洽办理。[16]这一外交风波终以日本使馆补交国书副本而告结束。

刚处理完芳泽国书事件，顾维钧在对外交涉中又面临着另一件更为棘手的事。1923年5月上旬，津浦铁路上一列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火车在山东临城附近被以孙美瑶为首的一群匪徒劫持，车上的旅客被绑架为人质，其中有外国人20余人，绑匪以此向政府勒索。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劫车案最终以北京政府收编孙美瑶部、孙部释放全部人质而告解决。

但围绕劫车案的中外交涉却并未因外国人质获释而结束。列强认为中国政府无力维持秩序损害了在华外人权益，于是提出赔偿、确保铁路安全和惩办当事人等要求。英国甚至考虑进行海军示威，增加在华北的军事力量，建立外国控制下的铁路警察，只是由于美国不主张对华采取过于激烈的行动而作罢。1923年8月10日，驻华外国公使团向北京政府递交了由16国驻华公使署名的联合抗议照会。照会不仅提出了苛刻的赔偿要求，如每一个外国人被拘押期间中国政府须按累进加偿的办法每天支付100元至500元不等的赔偿金，还直接援引《辛丑条约》要求中国政府按外交使团开列的名单惩办与事件相关的官员，以及要求改组铁路警察并由外国武官监督等。公使团还以威胁的口吻声称：“倘中国政府继续姑容或放任此种扰害，并不主剿除此项损害在华外人权（疑脱‘利’字——引者注）与利益之匪患，外交团不得不采取何种办法，以保护外人

在华之生命财产权利与利益。”[17]公使团的这一做法沿袭了晚清以来列强与中国政府交涉时的惯用手段。

收到联合照会的当天下午，北京政府召开国务会议，认为有关赔偿问题可以同意，但惩罚官员、重组铁路警察等因涉及中国主权无法同意，并决定筹组由外交、内务、陆军、财政、交通五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讨论联合照会相关之要求。[18]

作为外交总长，顾维钧认为，临城事件是一个不幸事件，但它并不是由所谓中国国内的排外运动引起的，而是在一个偏僻地区少数盗匪的个别行为，是一个偶发事件。类似的事件在美国的西部荒原也会发生。因此，中国政府出于对被押外国人的同情，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偿，但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对事件的处理更不能有损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也不应违反或超越关于在中国领土上保护外国人的国际法准则。顾维钧这一看法早在其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国际法时就已形成。他在《中国外交私议》中指出：“凡有华人暴动，扰及外国侨民之事，苟非因地方官之恣意疏忽而酿成者，则我政府有捕缉惩办之义务，而无赔偿之责任。此国际法例也。”[19]

8月22日，顾维钧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会晤，提出“使团为临城案来照要求未免太过”，强调临城案“不能与仇外案相提并论”。对于赔偿，他表示可以办到的中国都会尽力去办，但改组铁路警察、惩罚官员等事涉及中国主权，当由中国自行处置。舒尔曼在会晤中称，公使团照会所提要求并不算严苛。顾维钧对此不能认同，坚持事件的处理不能损害中国主权，“让中国总须自己放手去做，不能听别国干涉”。[20]

9月24日，顾维钧以外交总长身份答复了公使团的联合照会。复照称，中国政府对临城案之愤慨不亚于公使团，但此案“并非排外举动，亦无特种仇视外人之表征”，“实出于土匪之不法行为”。针对公使团照会提出的赔偿要求，照会回复称“详论本案事实，实不能谓本国政府负有赔偿损失之责任，但鉴于外人被掳之情形暨所尝之艰苦，本国政府自愿本优厚之精神，给予公平之偿恤”，但对累进加偿予以拒绝。针对公使团援引《辛丑条约》，复照明确表示，该条约“于本案不适用”，“终以为引用《辛丑条约》实非正当或必要之保障。倘若坚持，非特有牵动中国人民良感之虑，而于外人生命财产之安全亦无所增益也”。对于惩罚中国官员，复照表示：“本国政府所不能允从外交团之要求者，实因按照条约，凡惩处中国官吏、人民，皆须由中国政府依照中国法律办理。”[21]顾维

钧在复照中表达了对匪徒劫车的愤慨和痛恨，也承认铁路维护需要改进，相关官员需要惩处，但强调所有这些应由中国政府自行处置。这份复照有理有节，既表达了中国妥善处理事件的愿望，又坚持了主权不容干涉的立场，体现了顾维钧处理对外交涉时维护主权、据理力争的一贯做法。

但是，列强不满意中国的复照。公使团认为“中国政府似未领会本外交团关于此项紧要之点”，英国更是认为复照“骨子太硬，不能满意”。对中国坚持主权原则下的平等交往，他们还不愿意接受。10月4日，公使团再次照会外交部，驳斥顾维钧照会中的申辩，声称“不得不维持八月十日联衔照会所注意之各点及办法，全部相应照请贵国政府仍按照上述照会内所指定各项办法施行”。[22]

顾维钧接到外交团第二次照会时，北京政局正面临着新的动荡。10月5日，曹锟通过以金钱收买议员的方式当选总统，引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此时，列强的态度对曹锟能否在总统位置上坐稳显得尤为重要。公使团决定利用中国国内的政治危机，以不出席总统就职仪式相要挟，逼迫北京政府在临城劫车案交涉中就范。10月10日，曹锟就任当天，外国公使均未露面。列强的承认是北京政府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于是，曹锟不得不在临城案上让步，将其拜把兄弟山东督军田中玉免职。顾维钧也只得再拟照会送交公使团，对列强未接受9月24日照会“殊以为怅”，但接受了列强关于赔偿的要求，而对维护铁路安全，仍表示为中国内政，“未尝放弃”。[23]由于田中玉免职满足了列强惩处中国官员的要求，各国公使于10月15日觐见曹锟。曹锟在外国公使的贺声中当上了总统，而临城案终以中国让步而了结。

临城案以外交让步的方式结束遭到舆论的抨击。《东方杂志》上一篇标题为《临城劫车案的对外屈服》的文章直指顾维钧：“以外交上非常的屈辱交换元首怀仁堂的一握手。可怜轰轰烈烈的青年外交家，为维持中国国际地位而就职的外交总长，竟办成如此屈辱的外交！”[24]临城劫车案的处理反映了顾维钧在北京政府任职期间因国内因素的制约，在对外交涉中所面临的困境。在军阀政治的年代，北京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其他派系的挑战，外交部也连带受到指责，尤其是有利于当政者的对外交涉。而作为军阀操控之下的中央政府的外交主管，在对外交涉中也要受制于实际掌权者和国内的政治需要，就如临城案的最终让步。对临城案这样由国内问题引发的外交交涉，有学者称之为“国门内的

外交”，这种外交往往受内政问题的牵制，外交官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顾维钧自己则称这类对外交涉，“与其说它属于外交，不如说它属于内政”。[25]晚年谈起临城案时，他仍难忘当年面对的困境。“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黑点”，“我不幸正好担任外交总长，此时政府并无总统，只能冲在前面承担谈判重任，既要以合理的手段平息外交使团的不满，又要保证我国的主权”。[26]

国门内的外交虽要受制于内政，但外交总长毕竟代表中国与列强打交道，地位特殊，有时要与外国谈判签订与中国权益有关的条约，更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顾维钧处理美国和日本公司要求在华设立无线电台一事，颇能反映他处世立身的原则和在对外交涉中作为一个中国外交官的尊严。

1920年代初，美国和日本的公司都想要在中国建立无线电台，两国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此，美国驻华公使和日本驻华公使都来见顾维钧，催促中国政府尽快做出有利于本国的决定。据顾维钧自己的回忆，“不止一次，日本公使刚离开外交部，美国公使就要求见我；有时则是美国公使刚走，日本公使就来”。[27]日本公司的申请最初是向北京政府的海军部提出的，而美国公司的申请是向交通部提出的。顾维钧认为，无线电台通信设施，并非专供军用，因而应归交通部管，以便能为中国公众服务。所以，他对美国公司的申请持同情态度。但是，海军部和交通部各执己见，内阁对此问题总是议而不决，无法做出决定。

美国公司的代表对这一僵持局面等不及了，执意要到顾维钧在铁狮子胡同的私宅登门拜访。这位代表在顾宅直截了当地表示，只要美方的申请获得批准，他的公司愿意捐赠15000美元，由顾维钧随意支配使用。顾维钧对这种公然行贿的手法十分恼怒，立即送客。随后，他在外交部召见美国公使舒尔曼，告诉他如果美国政府确实希望在中国设无线电台的申请获得批准，那么由这个代表来办理此事是不合适的。舒尔曼表示对发生这样的事情十分懊丧，并答应让该美国公司马上换人。[28]

相比国门内的外交，国门外的外交给了顾维钧更能施展的空间。顾维钧出任外交总长，正是华盛顿会议结束之后，列强在会上允诺的与中国有关的问题需要具体落实。英国在华盛顿会议闭幕时提出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威海卫租借地是1898年被英国强租的，租期25年。1922年10月，中英就归还事宜在威海卫开始谈判。谈判的焦点在威海湾中的刘公岛。英方在归还威海卫租借地时，提出要继续租借该岛10年，期满后英

方仍有权续租。中方对此反对。中英双方僵持至1923年2月移往北京继续谈判，至6月达成草案。该草案允许英国海军租借刘公岛部分房产10年，期满经双方同意后才可交还中国，并且英国海军每年4月至10月可在岛上避暑。[29]

草案提交到外交部后，顾维钧认为有关刘公岛的安排不妥。按此规定，刘公岛的租借可以无限期延续而成为永久性的，因为租约的终止需要经英国政府的同意。顾维钧主张修改为只有双方政府均同意才能续租，这意味着期满后中国有权终止租借。中国谈判代表梁如浩认为英国已主动提出归还威海卫，在威海湾中一个小小的刘公岛并不重要，他与顾维钧就此进行了辩论。但顾维钧认为，刘公岛虽小，却控制着整个威海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只要是中国领土，无论面积大小，都不应主动租给外国。否则，就会开创一个先例，让其他列强效仿。[30]

1924年春，顾维钧直接接手中英谈判后，多次会晤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James MacLeay），希望早日商谈结案。[31]双方焦点仍然在刘公岛的续借上。顾维钧要求将双方同意才能停止续借的条款删去，麻克类则坚决反对。最后经多次磋商达成协议，有关刘公岛的条款改为“期满后，经两国政府同意后，得适用原条件续借”。[32]双方还商定，如果期满两国政府不能就该岛续租达成协议，则交国际仲裁。在刘公岛续租问题上，顾维钧力争将原先草案中须经两国政府同意才能交还的规定删去，旨在申明中国对领土的主权；而双方有分歧交国际仲裁，则是将一时无法解决的10年期满难题搁置起来的妥协办法。在谈判中，顾维钧对麻克类说，我们现在何必自找麻烦呢？我们双方都不能预料10年后的形势。如果形势发展顺利，10年后中英两国不仅能够成为朋友，而且可能成为盟国。到那时，经过中国政府的同意，英国海军不仅可以使用刘公岛，还能够使用中国其他地方。因此，现在完全可以将10年期满的问题搁置起来。[33]

但中英就威海卫交还刚形成一致看法，北京政局就再次动荡。10月，北京发生政变，曹锟被冯玉祥赶下台，内阁跟着倒台，顾维钧随即离开了北京。新任外长王正廷履职后，准备与英国签署协议，但麻克类却以中国国家元首发生变化等理由拖延搪塞。[34]已经商定的威海卫归还协议在北京政府时期一直未能签署。

二 解决中俄悬案

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在与各大国的关系中，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十分特殊。十月革命后，中国驻俄公使以俄国内乱为由于1918年2月离职回国。1920年9月，北京政府发布总统令，称“中俄两国正式邦交，暂难恢复”，原俄国驻华公使“久已失去其代表国家之资格”，因此不承认其公使身份，停止其外交官待遇。[35]两国政府间正式的外交关系中断了。

苏俄政府成立之初面临着被孤立和封锁的国际环境，为摆脱外交困境，其非常希望发展对华关系。1919年7月，苏俄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Lev Karakhan）的名义发表了对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即“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政府“向中国夺取之一切侵略品，如满洲及他种地方”，将中东铁路“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放弃庚子赔款及领事裁判权等其他特权。[36]1920年9月，苏俄政府又以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的形式发表“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提出了推进两国关系发展的八项具体建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但该宣言没有第一次宣言中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的允诺，改为由中俄两国政府另订专门条约。[37]加拉罕的两次宣言在中国各界受到广泛关注和欢迎，为改善两国关系提供了契机。

但是，中国与苏俄间的关系也存在着障碍。1921年6月，苏俄政府因与白俄军队作战，擅自派兵进入时在中国版图内的外蒙古。当年底，苏俄政府与外蒙古当局签订了苏蒙条约，确认双方政府互相承认，互派外交领事代表，苏军可以驻扎外蒙古。苏俄政府的这一行为，使本来就对苏维埃政权心存疑虑的北京政府，在处理对苏外交时更为谨慎。因此，苏俄政府先后派出优林（Ignatius Yourin）、裴克斯（Alexander Paikes）等人来华，寻求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都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1922年8月12日，顾维钧第一次出任外交总长后一个星期，苏俄政府派遣的又一名使者越飞（Abram Joffe）抵达北京。越飞是苏俄政府重要的外交官，曾率团参加了对德媾和的《布列斯特和约》谈判。8月15日，顾维钧与越飞第一次见面。越飞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从兹中俄间之交通及两国邦交关系得以恢复”，表明此次使命的目的。顾维钧接过越飞

的话头，表示“目下有一绝好机会足以促进两国之感情者，即贵国方面自动的撤退在外蒙之红军是也”，并说“贵国方面如能迅予办理，则为中俄间亲善之最好机会，且其他各问题亦易于解决也”。顾维钧的话柔中带刚，抓住苏俄急于恢复邦交，实际上提出了从外蒙撤军是两国关系改善的先决条件。对此，越飞解释说，“现在红军驻在外蒙，对于蒙事并不干涉，而地方之秩序及通商之安宁，则赖以维持。故该处华人、俄人及蒙古人中颇有请求红军留驻外蒙者在也”。如果苏俄军队全部撤出，对“中国方面、俄国方面或蒙古方面是否裨益，殊难逆料”。[38]表明苏俄并不愿从外蒙古撤军。

顾维钧在接手处理对苏关系之初，就直截了当地提出苏军从外蒙古撤军问题，这是因为他认为此事涉及中国主权，如不妥善解决，两国间正常的外交关系就无从谈起。此外，当时中国朝野对外蒙古问题也十分关注，如处理不当得不到舆论的认同，要推进中苏关系也会非常困难。

8月下旬，顾维钧与越飞又举行了几次会晤。越飞急于两国间开始正式会谈，通过谈判解决双方间一切问题，“以便恢复外交、政治、经济及商务之往来”，即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顾维钧仍坚持先要解决两国间“重要各悬案”，并告诉越飞，要将所有问题一并解决，“未免希望过奢”，“至恢复各项关系之一层并无提及之必要”，仍坚持两国关系的完全恢复须在各悬案解决之后。[39]

顾维钧所指两国间各悬案，除苏军从外蒙古撤军外，还有中东铁路问题。中东铁路是俄国根据1896年与晚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在中国东北境内修建的铁路干线。铁路建成后，沙俄政府非法攫取了路区内驻军、设警、司法、行政等条约中并未规定的权益。在与越飞见面时，顾维钧提出希望能根据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将中东铁路无条件归还中国。但苏俄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宣布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着眼点是争取中国民心，对沙俄依据强权获得的这一巨大权益实际上根本不愿放弃，更不用说无条件归还了。11月6日，越飞率领的苏俄代表团致外交部节略，声称“倘以此项宣言为俄国完全放弃其在中国利益之结果，则未免太不公允”。并辩解说，宣言“虽曾声明抛弃帝制政府之侵略政策，并允抛弃俄国以此项政策在中国所得之权利，惟此项问题未经中俄自愿协商解决以前，则俄国在中国之权利尚未失效”。因此，中东铁路路权“倘由俄国让与中国人民之时，则俄国对于该路之利益仍不消灭”。[40]苏俄仍要保持中东路权益。

对苏俄代表团关于中东铁路的这一解释，顾维钧完全不能同意，要求越飞对加拉罕第一次宣言中无条件归还、毫不索偿之意“再行专案声明”，并指出“此事根本办法，仍以该路完全移交我国为最扼要”。越飞的答复竟称，所谓无条件归还、毫不索偿，“查1919年及1920年宣言书内并未载有此项辞句”，完全予以否认。[41]越飞对加拉罕第一次宣言中关于中东铁路内容的否认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正式收到的加拉罕第一次宣言，是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外交事务全权代表杨松受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全权委托交给中国驻伊尔库茨克领事馆的。该文本为法文，有无条件归还字句。1921年7月，外交总长颜惠庆会晤远东共和国代表时提到“列宁当初曾有将该路完全无条件交还中国之宣言”，该代表也未予以否认。[42]但当中国政府真要依据加拉罕第一次宣言来解决中东铁路问题时，苏俄政府却予以否认，表明它对沙俄侵华的遗产仍是依依不舍的。面对两国之间的又一悬案，顾维钧与越飞之间的会谈就更难取得进展了。

越飞对中苏间交涉进展缓慢十分不满，在给外交部的节略中，措辞强硬地表示：“倘中国政府继续藐视俄人利益，则俄国终必至迫不得已将其自愿给与中国之允许自由出之矣。”即收回已做出的各项承诺。在与顾维钧会面时，越飞当面告诉他，如果北京政府不愿与苏俄发展双边关系，他将去南方与孙中山商谈双边合作事宜。顾维钧感觉到了越飞这番话中对北京政府的威胁。[43]1923年1月中旬，越飞离京南下。一个星期后，他与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越飞离开北京时，因为内阁与国会之间的矛盾，顾维钧已与内阁其他成员一起集体辞职。随后，他在家赋闲了几个月，直到1923年7月再次出任外交总长。在这之前，由于《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后苏联与南方政府的关系迅速升温，北京政府担忧苏联政府会弃北而联南，一改之前态度，转而谋求改善两国关系，于1923年3月任命王正廷为中俄交涉事宜督办。1923年9月初，苏联政府新派的全权代表加拉罕到达北京。

9月6日，顾维钧会晤加拉罕，欢迎他奉派来华，并希望之前越飞在华期间未能启动的中俄会谈可以开始，以解决“中俄间一切悬案”。[44]与顾维钧会晤后三天，加拉罕向顾维钧送交了苏联政府委派其为驻华全权代表的国书副本。加拉罕此举看似循通常的外交礼仪，实际上暗藏玄机，用意深远。因为中苏间并无外交关系，若中国正式接受国书，即意

味着承认两国存在邦交，而这正是苏联屡次派遣代表来华的主要目的。顾维钧对加拉罕的用意十分清楚，以外交部名义回复，表示对国书副本“现正在考量之中，一俟适当之时，即行奉达”。以外交辞令回避接受国书之事，实际上还是坚持先解决两国间悬案再行恢复邦交的立场。加拉罕对顾维钧的回复十分不满，认为“此措辞等于未曾答复”，称“中国现在情状四分五裂，北京政府已失去其中心之点，列国有乘此时机提出共管之议，其能奋斗为中国帮忙者，惟独俄国耳”，表明北京政府本身并不稳固，不应先提条件，苏联无法接受先解决悬案的立场。[45]

两国间是否应先解决悬案也成为王正廷与加拉罕之间谈判的焦点。王正廷最初根据顾维钧与越飞会晤时所谈，提出两国间一切悬案通过谈判讨论解决，但加拉罕坚持两国正式邦交恢复前不与北京政府进行谈判。最后两人商定，先通过谈判“将各项大纲签订一种协定”，大纲包括恢复两国邦交，同时规定在协定签字6个月内须完成具体细目的协商。[46]与顾维钧坚持的先解决悬案再恢复两国邦交的做法相比，王正廷与加拉罕达成的谅解是各退一步的妥协，将解决悬案与恢复邦交合在了一起。

王正廷与加拉罕随后开始的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双方在外蒙古、中东铁路等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但国内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在加拉罕两次宣言的感召下，纷纷要求政府正式承认苏联。1924年2月，北京大学李大钊、胡适等47名教授致函顾维钧、王正廷，不满中苏交涉迄无进展，认为俄国革命推翻帝制后，“显扬民治，实吾良友”，呼吁政府尽快“复其故交”。北京教育会、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等6团体也致函王正廷，称“凡我国民谓宜正式承认，恢复邦交，早成舆论”，要求其“即日无条件承认苏俄，然后双方协议中俄间一切案件”。[47]舆论的呼声对王正廷是一个压力，促使他加快谈判的进程。

1924年2月25日，王正廷提出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3月1日，加拉罕对王正廷草案提出了苏方最后修正案，并要求中方尽早答复。在交修正案时，加拉罕希望王正廷对苏方修正案表态“个人已赞同，并设法向中政府维持”，以图在此后谈判中占据先机。王正廷谨慎地回答道：“不能说予个人已赞同，不过已极力设法容纳阁下之意思耳。”[48]

3月8日，王正廷向国务院内阁会议报告与加拉罕交涉进展，指出双方在两国间旧约、外蒙古、中东铁路等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认为加拉罕对所提最后修正案不肯再做修改，此案“虽去中国提案甚远，然本国收回

之权利已然不少”，因此主张接受苏方修正案。但内阁会议没有接受王正廷的建议，而是议决由各部分头研究后再行讨论，讨论结果仍须由王正廷与加拉罕进一步磋商。[49]

内阁各部对王正廷草案和苏方修正案进行研究后都写下了签注，总体上对王正廷的草案和加拉罕的修正案表示不满，对两国间旧约、外蒙古、中东铁路等关键问题均提出了修改意见。[50]3月11日后，王正廷几次出席内阁会议，报告与加拉罕交涉最新进展，内阁则告知各部签注意见，并请王正廷依各部意见与加拉罕再行交涉，顾维钧特别提醒王正廷“蒙古部分极为重要”。参加内阁会议的农商总长颜惠庆注意到，王正廷对内阁提出的意见“十分沉默”，却显示出“急于想取得问题的解决”，即尽快结束与加拉罕的谈判。按王正廷自己的说法，3月13日内阁会议后他与加拉罕“作最后之谈判，经彻夜之力争”，考虑到“案经久悬，英意两国既承认于先，诚恐迁延贻误，且国人亦同声主张从速解决。外察大势，内审国情，觉此案实不能再事迟疑”，于是在3月14日凌晨与加拉罕签署了协定。[51]

王正廷在未按内阁指令并未获授权的情况下签署协定引起内阁的强烈反对。顾维钧在当天早晨获悉此消息后就给王正廷打电话，告诉他签署未获政府审议批准的协定是失职行为。对协定本身，顾维钧认为有三方面的内容必须修订。第一，协定规定废除沙俄与中国签署的以及与其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但没有提到苏俄与外蒙古签订的苏蒙条约，这实际上是默认了这一条约。第二，对于苏军从外蒙古撤军问题，协定规定苏军将在双方商定条件后撤出，这使苏联可以条件未商定而长期驻兵外蒙古，中国则处于听任苏联摆布的被动境地。第三，协定规定原俄国东正教教会在中国的所有地产权须移交苏联政府，但由于东正教在中国地产根本无法确认，中国无法履行这一条款。[52]顾维钧提出必须修改的三条中，两条与外蒙古有关，延续了他之前与越飞会晤时所持立场。

北京政府内阁其他成员如财政总长王克敏和陆军总长陆锦对王正廷签署的协定也持反对意见，内阁最终拒绝了这一协定。加拉罕获悉北京政府的决定后，于3月16日向王正廷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紧急照会，限3日内批准已签字之协定，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北京政府负责。收到王正廷转送来的照会后，内阁开会讨论，认为该照会“迹近哀的美敦书，实违国际惯例”，两国谈判中未能解决之处，实际皆因加拉

罕“对于我国主权未能十分尊重”，因此所有责任应由其负责，并决定请王正廷按此回复加拉罕。3月19日，未能如愿的加拉罕直接照会外交总长顾维钧，声称与中国政府正式代表之谈判业已结束，拒绝重行讨论已议定并签字的各项协议，并以苏联政府名义“警告中国政府勿铸足以影响于苏俄与中国政府将来邦交上不可补救之错误”。[53]

如前所述，因为加拉罕之前两次宣言放弃在华特权，中国舆论与社会各界希望政府尽快承认苏联，建立邦交。获悉北京政府不承认王正廷签署的协定后，许多团体发表宣言、通电，反对政府举动，甚至吴佩孚领衔的一些督军和将领也要求立即无条件承认苏联。有些舆论和团体将矛头直指主持外交且反对王正廷签署协定的顾维钧。北京大学师生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面见顾维钧，领队是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要求政府马上批准中苏协定。北京学生联合会开会决定致函警告顾维钧，敦促他签署中苏协定，信函的语气有着青年学生特有的率直和火爆：“倘先生犹执迷不悟，则敝会一息尚存，誓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为殷鉴。伏望先生察之。”[54]所谓赵家楼故事，即五四运动当天北京学生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之事。火烧赵家楼后顾维钧在巴黎拒签和约，获得国内一片叫好，但不到5年，他却被学生列入该火烧痛打之列了。顾维钧在铁狮子胡同的住宅虽没有遭遇赵家楼被烧那样的事，但后来确有两名大学生以考古研究所给外交总长送出土古印的名义给顾家送来了一颗炸弹，结果炸伤了管家和厨师。京师警察厅调查后认为此事是王正廷幕后策划的，顾维钧不认同这一判断，但认为可能是一些在政治上支持王正廷的人干的。[55]

3月20日，北京政府发布总统令，责成外交部接手对苏谈判，迅速与苏联代表继续商议协定。这样，顾维钧就接替王正廷直接承担起对苏交涉的责任。3月22日，顾维钧以节略形式致函加拉罕，对其3月19日照会所持立场“深为诧异”，对限期3天必须批准的要求“尤难承认”，同时表示“中俄间关系极为重要，中国政府仍不变更愿与苏俄政府恢复邦交之诚意，深盼迅速继续谈判，俾得早日解决”，并通知加拉罕，他本人“现已遵令准备与贵代表继续商议”。[56]

3月25日，加拉罕回复顾维钧，措辞仍十分强硬，再次为苏联政府所采取的行动辩护，称两国间谈判业已结束，继续进行“实为无益，本全权代表不得已声明断然拒绝此项交涉之任何进行”，坚持必须先恢复邦交，“如贵外交总长及中国政府对于苏联政府交涉如真抱有热诚及坚定之

愿望，鉴于现时情形，第一步必须采用立即恢复两国正式邦交之手续，此节办到时，贵总长节略内所提及本代表已预备开始之交涉途径方能实现也”。[57]

加拉罕坚持先复交再谈判的立场，就是要逼中国政府认可王正廷已签署的协定。顾维钧对此不能接受，但他并不希望两国交涉陷入僵局或完全破裂。这与他面临的社会舆论压力也有关。4月1日，顾维钧再次致函加拉罕阐述中方的立场，指出加拉罕借口谈判已经结束，“坚拒继续商议”，是“不欲尽力免除解决中俄关系前途之任何障阻”；而以3天期限“加诸他方”，则“迹近恫吓”。在指出苏方不利于推进双边关系的不当举措后，顾维钧又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表示中方愿意将已经签署的协定看作草约，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并对草约提出三点修改意见：（1）草约中废除帝俄与第三者签订有损中国主权之条约，应改为包括俄国政体变更以来，即苏俄政府与第三者签订有损中国主权之条约；（2）苏军从外蒙古撤兵具体办法可由双方协商，但撤兵不应附有条件；（3）在华俄国东正教会产业待将来详细讨论。顾维钧表示：“以上三点本国政府愿与贵代表商榷，俾得圆满之解决。如果贵代表果有建立中俄邦交之诚意，本国政府深信贵代表当能予以同意，倘贵代表以为修改协定预稿有重大困难，则本国政府本和平之精神及早日开始邦交之素愿，亦可同意将此项修正之点于协定签订时以换文行之。”[58]这一函件既直率指出苏方拒绝继续商议的不当举措，坚持中方修订王正廷已签协定的立场，又提出了中方的具体解决方案，并且考虑到苏方不愿修改已签协定，提出以换文形式确认修改意见。顾维钧的回复有理有节，表现了推进双边关系的极大诚意，也充分显示出解决谈判困境的外交智慧，为中苏重开谈判创造了条件。

由于此前已公开采取十分强硬的立场，加拉罕对顾维钧的函件并未正面回复，但他毕竟也希望中苏交涉能尽快打破僵局。4月上旬，顾维钧发高烧卧病在床，加拉罕派他的秘书前来问候病情。加拉罕的秘书祝愿顾维钧早日康复后，以私人名义表示，顾维钧应与加拉罕见面一谈。顾维钧当然明白这一表示的含义，回答说因为高烧不能起床，如果加拉罕能来寒舍，乐意与他见面。就这样，顾维钧与加拉罕在铁狮子胡同顾宅秘密见面了，他们就双方间的分歧交换了意见。随后，两人的秘书开始了一系列非正式谈判，双方的沟通“时续时止”。但自5月中旬起，双方来往的频率加快，“往返磋商不下二十余次，渐能接近，至5月下旬，始能将修正各点及商议各件，议定办法”。[59]其间，为避免外界的干

扰，外交部参事朱鹤翔等白天在顾维钧家中磋商，晚间赴苏联驻华代表处交换意见。5月30日，内阁在顾维钧家中召开特别会议，顾维钧将与加拉罕所议定各条款交内阁审议，当即获得通过。同日，北京政府以总统令给予顾维钧全权签约证书。[60]

5月31日，顾维钧与加拉罕在外交部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作为协定附件的7个声明书。其主要内容是：（1）俄国自帝俄以来与中国或第三者所订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条约概为无效；（2）苏联放弃帝俄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3）苏联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4）苏联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该路有关中国主权事务概由中国官府办理。[61]

在这个最终签订的协定及附件中，顾维钧认为王正廷与加拉罕签署的协定文本必须加以修改的三项内容都最终得到了修订。协定签订后向国务会议报告时，顾维钧说明了这三项内容修订的具体情况。关于第一项内容，原协定只写帝俄政府与第三者所订条约，这样就无法包括苏俄与外蒙古所订条约。经谈判力争，双方在声明书中写明“自帝俄政府以来凡与第三者所订定之一切条约”。顾维钧在国务会议上说，“所谓帝俄政府以来，即包括俄国临时各政府及苏联政府而言”，这就将苏俄政府与外蒙古所订条约包括在内了。关于第二项内容，原协定规定苏联从外蒙古撤军，将于撤军之条件商定后进行，顾维钧认为撤军办法虽可讨论，但不应附加条件。“经再四切商，取消‘条件’字样。该代表初则坚拒，继允考量，最后以我力争，删去‘条件’字样，另加修正，以示尊重领土主权。”关于第三项内容，原协定规定俄国在华教产完全移交苏联政府。顾维钧认为，按照中国法律，外国政府及人民，除各国教会外，不得在内地购置地产，若允移交，会开一先例，引发政教关系上许多问题。且俄国教产散处各地，无法确认。最后根据中方提议，确定此问题按中国法律，由双方将来商定。参加国务会议的颜惠庆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顾的报告受到欢迎。”[62]这三项内容中的前两项都与外蒙古相关。顾维钧与越飞第一次见面就主动提出此问题，自此以后，他一直坚持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尊重和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之上。

顾维钧与加拉罕关于中苏协定的谈判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外界毫不知情，因此协定签订的消息一经发布，舆论“深以为异”，“中外报纸突闻此讯，均为讶然”，不少报纸“称此举为顾维钧外交之胜利”。[63]这

与3月中旬北京政府拒绝王正廷签署的协定，并指定顾维钧接手对苏谈判时的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舆论对顾维钧多有抨击，不少人还从顾王私人恩怨的角度来解读顾维钧对王正廷签署协定的反对。但从顾维钧对外蒙古问题的一贯立场和最后签订的协定文本来看，他对王正廷签署协定的反对主要出自他对中国主权的维护和对苏联对华政策的警觉。但顾王两人在巴黎和会期间就结下的恩怨确实也是不可完全忽略的因素。顾维钧于1923年7月再次出长外交时，王正廷已在主持中苏谈判，但直到次年3月上旬将中苏协定文本递交内阁会议，王正廷一直未向作为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报告相关情况，这使顾维钧很不满。与顾王两人来往均很密切的颜惠庆在参加内阁会议讨论中苏协定时，就注意到顾维钧"对王抱有敌意"。吴佩孚的谋士白坚武也将顾王分歧看作"争私见之故"。[64]

根据杨天宏的研究，顾维钧与王正廷两人在对苏谈判中的外交手段也有很大差异。[65]王正廷作为中国政府对苏谈判的代表，不顾自己的官方身份加入社会各界"无条件承认苏俄"的潮流中，在外交谈判中成为顺应民众呼声的政治家，而非与苏联代表斤斤计较国家利益的谈判对手，使自己在对苏谈判中处于被动的地位。顾维钧则从一开始就确定将解决两国间的悬案作为两国邦交恢复的先决条件，以占据外交谈判的主动。从中苏谈判的焦点外蒙古问题来看，王正廷满足于苏联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主权的原则性表态，却不在意苏蒙条约对中国主权的实质性侵犯。顾维钧在此问题上始终坚持维护中国主权，但在谈判处于僵持时，也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办法，将中国的要求写入与协定具有同样效力的声明书。王正廷在对苏谈判中的不足，正是顾维钧所批评的外交家应避免的失误，即不应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不要做讨好公众的事。在他看来，"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能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66]从中苏协定谈判的整个过程来看，顾维钧基本上是照此去做的。当然，中苏协定最后能够签署，王正廷最初付出的努力不应否认。在上海发行的英文报纸《大陆报》社论评论道"此事草创之功，当然属诸王正廷氏，而最后成绩，则为顾维钧氏所得"，应是公允之言。[67]

中苏协定的签订结束了十月革命后两国间国家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将双边关系奠定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之上。苏联政府宣布放弃旧俄政府在华享有的特权，在民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顾维钧在协定签订后的一次演说中深有感慨地说，中国以前同大国签订的条约都是被迫就范

的，“但现在这次协定的性质，却是完全两样的”。[68]但中苏谈判过程中，苏联在外蒙古等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又表明，旧俄时代的外交传统对其仍有很大的影响。正是顾维钧的努力使中国在协定中争得了更为平等的内容。

中苏协定的签订受到全国各界的欢迎，对仍束缚着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协定签订后不久，全国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而这又推动了顾维钧主持的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活动。

三 终止中比条约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由此引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全国。在朝野各界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中，北京政府在对外交涉中顺应形势，发起修约外交。6月24日，北京政府照会驻华公使团，提出“宜将中外条约重行修正，俾适合于中国现状暨国际公理平允之原则”。修约外交是巴黎和会以后北京政府对外交涉的继续。

顾维钧在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暂别政坛，离开京城。北京政府提出修约外交时，他正在上海做寓公。1926年5月，顾维钧重返北京，不久再次入阁，出任财政总长。10月上旬，他以代理国务总理的身份组阁，因段祺瑞下台后元首虚位，他摄行总统的权力，并兼任外交总长，成为修约外交的主角，在修订不平等条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与比利时之间的条约是修约外交面对的第一个与外国到期需修订的条约，也是顾维钧主导修约外交后面临的直接和严峻的挑战。

北京政府于1925年6月向公使团提出修约照会后，公使团于9月4日复照，仅对华盛顿会议议决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做出回应，对修约之事则予以回避。北京政府外交部由此认识到，向列强同时提出修约，“列国彼此牵制，共同商改诸多窒碍”，因此，修约应循“单独磋商之一途。单独磋商之进行，在平时自以根据商约期满废止之规定，最为平和”。[69]1926年期满条约中有中国与比利时通商条约。中比条约于1865年签署，次年10月为两国政府批准。比利时根据这一条约获得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设立租界权等特权。到1926年10月，中比条约将满60年。根据该条约第46条规定，条约每满10年可以修订。虽然条约仅规定比利时有修约之权，但外交部条约司认为，根据国际法惯例，中国也有此权，比利时“自无拒绝中国请求废约之理”。外交部条约司还指出，当时正在进行的关税和法权两个会议，“前途颇多暗礁”，而在关税和法权之外，还有其他应废除的列强在华不平等特权，中国对此“宜有所表示，使列强知我国际忍耐磋商外，尚有其他项办法”，即中国应主动采取修约行动，而提出中比修约是“第一机会”。[70]

1926年4月16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胡惟德照会比利时驻华公使华洛思（Warzée d’ Hermalle），告知对方中比条约于当年10月27日期满

后，“一律失效，并应缔结新约，以代旧约”，表示中方愿在平等的基础上尽快与比利时磋商签订新约。4月27日，华洛思复照胡惟德，认为根据中比条约，“惟独比国方面可有提请修改条约之权”，虽然比利时政府可考虑中国修约之要求，但须待中国政局稳定及关税和法权会议结束之后，才可商议修约之事，拒绝了北京政府的修约要求。[71]

北京政府向比利时提出修约之时，政局正经历着又一轮动荡。4月20日，临时执政段祺瑞下野。5月13日，颜惠庆组阁摄行临时执政，并兼代外交总长。5月31日，华洛思拜访颜惠庆，提出在关税和法权会议结束之前旧约继续有效。颜惠庆回答道：“会议自是会议，订约自是订约，两种不必混而为一。”华洛思又提出，在两国旧约到期新约未成之时，应有一临时办法。[72]6月1日外交部致华洛思备忘录，表示在旧约期满而新约未能完成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另觅一种能保护比国毫无疑问之利益，而又不损及中国正当之权利之临时办法”。[73]

9月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向比方提出临时办法五条，允许比利时在新约未订之前继续保有原有的领事裁判权等特权，但以6个月为期限。华洛思于9月29日复照外交部对临时办法五条不予接受，坚持在新约签订之前旧约继续有效。[74]实际上，比利时政府并无通过谈判与中国缔结一个平等新约的诚意，而是想通过拖延新约的签订来继续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因此坚决反对临时办法有明确的期限。这就是顾维钧再次主持外交后面临的情况。

10月14日，顾维钧以总理身份主持国务会议，将中比修约问题提交会议讨论。参会者中有人认为，国内局势“纷纭多故”，与列强关系“趋势日非”，此时如直接提倡废除旧约，恐引起列强反感，“促其协以谋我，不得不郑重考虑”。会议最终决定依据平等相互原则与比利时修订新约，修约期间旧约期满暂维持原状，但须订期限以示限制，并声明期满后新约未成，中国政府对于旧约保留自由取决之态度。[75]国务会议决定虽未提6个月期限，但强调中国有自由取决之权，就是要保留中国中止条约的权力。

国务会议后，顾维钧在给吴佩孚的密电中阐明了自己的考虑：“惟国民方面与政府主张虽属一致，而进行不必同途，在国民不妨极鼓吹之能事，而政府则必求事实之可行。与其以废约为名，或反引列强之协以谋我，不如重根本改订条约之事实，将旧约之有损国权者，逐一修改，尤为切实易行，泯去痕迹。”[76]表明他有用民意推进修约之意。

10月18日，比利时驻华公使华洛思通过私人谈话间接表示，比利时政府对中方至今未答复比方9月29日照会十分不满，已决定将此案提交海牙国际法庭。顾维钧得此消息后约华洛思于次日下午面谈。10月19日下午会晤时，华洛思首先表示比方9月29日照会“最为平允”，但北京政府竟搁置三星期之久未做答复，随后称如不能于本月25日前答复，比方将交海牙国际法庭公断。面对华洛思咄咄逼人的威胁口吻，顾维钧冷静答复：接任总长后已将半年来双方往来文件仔细看过，两国对旧约有修改之必要持一致看法，比方也同意旧约期满失效，分歧只在旧约期满新约未成的临时办法，并称已命中国驻比公使王景岐向比方提出临时办法，待比利时政府答复。[77]

10月23日，华洛思向外交部递交备忘录，提出比方临时办法新草案，除要求关税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享受他国同等待遇外，另提临时办法期限“待至最惠国情形许可之时，关税会议竣事揭晓之际，根据平等及尊重领土主权二主义缔结新约之日为止”，仍要推延临时办法期限。顾维钧收到备忘录后即与华洛思见面，强调临时办法应首先规定旧约期满失效，并应规定新约在6个月内完成，如6个月内因故未成，届时再商。当天下午外交部对比利时备忘录提出修正案，重申顾维钧对华洛思的口头表达，即旧约到期“应视为已失拘束之能力”，新约须在6个月内订成。[78]

10月27日是中比条约期满之日。此前一天，顾维钧再次会晤华洛思，告诉他：“明日为约期届满之日，必须办决此事。本总长切盼明日准与贵使签订临时办法。”[79]但27日华洛思递交比方备忘录，对临时办法期限提出新修改，即新约如6个月内不能订立，“一方得于3个月之前通知，要求将本协定再施行6个月。以后均照此限类推，至新约实行为止”。28日下午顾维钧约见华洛思，表示对比方27日备忘录“实难同意”。华洛思遂提出，临时办法期满可延6个月，如再欲延期，任何一方可提请仲裁。顾维钧对此也不同意，称“解除不平等条约乃谓本国国民一致之志愿，而愿意继续临时办法与否，又为缔约国之主权，此二层不能付诸公断”。并明确告诉华洛思，临时办法必须确定期限，“否则临时办法无限期延长与未停止旧约有何区别”。与华洛思会晤后，顾维钧主持特别内阁会议，决定对临时办法期限修改为“如6个月期满，经双方之同意，临时办法得延长之，并经任何一方之3个月预先通知，得废止之”，意在保持中方废止旧约的主动权。当晚10点，外交部参事朱鹤翔奉顾维钧之命将中方新的修正案通知华洛思，并希望比方接受，“否则事关两国

邦交，本部总长不负其责”。[80]

北京政府提出修正案后，比方置之不理。一周后，11月4日，外交部催促比方接受中国修正案。5日，华洛思回复外交部，予以拒绝，并称将提交海牙国际法庭。当日，顾维钧召集外交部办理比约的条约司司长钱泰等商议应对，决定将交涉结果报告内阁会议，并请终止中比条约。递交内阁的议案在详述交涉经过后指出，中方为达成解决方案，“委屈迁就，无非冀新约克底于成，乃舌敝唇焦，节节退让。比政府始终未能相谅，最后欲以六个月之临时办法为无期之延长。虽经许以双方同意可以延长，犹遭拒绝。其不以诚意相待，欲将旧约中之片面权利继续维持，盖已无可讳言”。但各种交涉办法，“用之已尽，无由再拖，惟有按照公法情势变迁可以废止之原则”，宣布中比条约“自期满日期失效”。11月6日，顾维钧主持内阁会议，通过了外交部的议案。[81]

当天，北京政府发表由顾维钧起草的终止中比条约的宣言。这一宣言条分缕析，从事实、法理上说明中国要求修约的合理性和终止条约的正当性，指出中国之所以要限期修约，“其根本用意在顺从中国人民一致之希望，使中比关系因同治四年中比条约而受不平等地位，得可解放。盖此用意，实出诸中国全国对外欲达同臻平等关系之志愿”。宣言阐述了中国修订不平等条约的基本立场和对建立中外间平等关系的愿望：

> 溯自民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即抱一种果决愿望，使中国在国际团体中得与其他各国处于平等地位，并使其得尽一部分能力，以求人类志愿之完成。此种原则，为中国全国热望所在，是以时时奉为圭臬。顾中外各国间设一日无平等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之可言，则此种愿望之实现，决难成就。自近百年来，中国受压迫而订立不平等条约，于中外人民之间，造成歧异不同之待遇。至今日实为对于各国种种不满及轇轕之原因。夫国与国之关系，既与人与人之关系相同，必也交换相互利益，能使彼此睦谊，足垂久远，而后缔结邦交之主谛乃见。故此项不平等之中外国际关系，实非理所应有。[82]

这段话是顾维钧的心声流露，显示了他的外交抱负和志向，也顺应了中国人民要求废约的呼声。当时，中国旅居比利时及欧洲其他国家的侨胞组织了旅欧华侨废除中比条约代表团，强烈要求废除中比条约。国内各界和舆论也十分关注中比交涉进程，对北京政府修约交涉进展缓慢

多有批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派代表面见顾维钧，指责外交部对办理中比修约的方针“完全不肯宣布”，并请公布办理条约人员的姓名籍贯，“俾国人周知注意，使其完全负责”。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致电外交部，批评其“一再迟延，漫不进行，诚不知是何居心”。上海总工会宣言：“北京政府与比公使秘密交涉，希图延长，吾人誓不承认！”[83]这些舆论对顾维钧是压力，也是助力。11月2日，顾维钧在与法国驻华公使玛德（Damien Martel）会晤时，对后者关于中比修约的询问回答说，“各省人民及地方法团舆论一律主张废弃旧约”，“现在中国人民国家观念日益发达，是以对于不平等条约佥主废弃”，并希望中法间关于越南边界通商章程的谈判也能加快，显示其有意识地以中国民意来推进修约。[84]

近代以后，中国在与西方国家谈判交涉中，遇有争执，最终总是根据西方国家的意志和愿望来解决问题。以巴黎和会为起点，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批外交官开始一步步地改变这一局面。终止中比条约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一个缔约国公开、正式反对的情况下，采取主动行动，宣布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顾维钧自己将此看作“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认为，“中国有必要这样做，不仅因为中国根据情况变迁原则在国际法面前有充分理由，而且因为中国有必要开创一个先例，证明中国决心行动起来，以结束一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85]原先持批评态度的舆论在北京政府终止中比条约后，也给予政府正面的评价，称此举为“破天荒之大英断”。苏、浙、赣、川等省工商界团体联合声明，称：“我国人民一致公认顾维钧为全国人民之代表，责司废除一切不平等旧约，换订双方平等新约之任。无论何国之条约，顾代表均有全权，废旧立新。”[86]

北京政府在自身统治遭遇严重危机之时采取如此果断的行动，与南方政府在南北政治竞争中开始占据上风密切相关。南方政府激进的废约外交反衬了修约外交的保守，北伐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也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调整包括外交在内的政策。终止中比条约可以增强北京政府在国内政争中的合法性，这是顾维钧做出这一决策的国内政治背景。

中比条约虽已宣布终止，但作为外交总长，顾维钧知道事情并未结束，善后问题仍须全力应对。11月9日，顾维钧在外交部内新成立的条约研究会首次会议上称“修改不平等条约，不但人民希望，政府亦同此宗旨”，并指出此次终止中比条约“比较的似出于外交常轨之外”，“就约论

约，作法理上之解释，比国似较我有所根据”。因此，他认为，“此事吾国可认定系政治问题，非法律问题，若提倡提交国际联盟大会，似较提交国际法庭为有伸缩余地，且可唤国际间一般舆论界之同情”。对比利时将此事提交海牙国际法庭一事表明看法。[87]

11月26日，比利时政府正式向海牙国际法庭提交中比条约案。如何应对比利时政府此举，在条约研究会内产生两种不同的主张。曾任国际法庭副法官的条约研究会副会长王宠惠和条约研究会成员、司法总长罗文干反对中国出庭应诉。王宠惠认为，对国际法庭判决如予遵守不妨出庭，否则以不出庭为好，若因判决不利而半途退出，反为不妙。罗文干认为，中国对比约既以政治手段始，自应以政治手段终，若一半用政治手段，一半用法律手段，吃亏必大。以外交总长身份担任条约研究会会长的顾维钧则力主中国应出庭，“我若不出席法庭，外人将谓我不但对比废约，且对国际法庭，亦不肯承认，影响甚大”，列强“将诋毁中国蔑视国际义务，违背公约，将来群起责难，办事更形棘手”。顾维钧预判出庭“失败必十居八九”，但此“失败只限于比约，不出席恐牵动全局，两者相较，似还以出席为是”。而且，“我国一经派员出席，此案必成世界问题，如数年前之山东问题，然或者能因此唤起世界人士一部分之同情，收有一部分之效果”。[88]顾维钧主张出席国际法庭，不仅仅考虑中比条约一事，还顾及中国与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关系。

条约研究会最后商议决定，征求各驻外使馆和著名国际法专家意见。在国际法专家中，北京政府选择了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蓝辛在内的4人。除蓝辛建议中国暂缓答辩以待比利时下一步举动外，其他几位国际法专家皆认为中国不能逃避或不应放弃出庭辩护，并提出了各自的应对建议。[89]

顾维钧的主张与著名国际法专家相似，这是他以国际法处理外交事务的一贯主张。早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他指出的中国外交败坏的三个原因中居第一位的就是“无法理之思想，朝野上下不知法理为何物”，显示出以公法办外交的思想。[90]作为一个学国际法出身的外交官，他习惯按国际法来思考国际关系和办理外交事务，并且重视中国做出的国际承诺。这是他认为中国应出庭的主要原因。

但是，中国国内的局势发展和列强对华政策的变化使比利时政府不得不调整将方案提交国际法庭的做法。此时，南方政府发起的北伐战争迅速向北蔓延，北伐军已进占长江流域。南方政府反对北京政府的修约

外交，主张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列强开始调整对华政策。12月18日，英国提出对华新政策备忘录，承认“中国政治上虽见分裂，而强有力之国民运动，已同时发生，其目的在要求国际之平等。此项运动，若不予以同情而加以谅解，殊不合于各国对华之真意也”。建议参加华盛顿会议各国应发表宣言，声明待中国组成有权力之政府时，将与之交涉“修改条约之事及其他悬案”。[91]英国这一举动对其他列强对华政策（包括比利时处理中比条约）产生了极大影响。正如王正廷后来评论说，中比双方“方在相持间，英国突然发表对华新建议案，颇于比国以甚大之冲击。盖比国在海牙诉讼，深仰英、法为之张目，英既表示同情于中国，比国顿失一种精神上之后援”。同时，中国留比学生在比国的宣传和比利时民众主张和平解决的呼声，使“中比形势，遂骤然变更”。[92]

1927年1月5日，已经因中比条约终止而失去公使身份的华洛思以私人名义会晤顾维钧，寻求两国关系的“补救之方”。顾维钧告诉他，“现在唯一办法，只有根据相互平等及尊重领土主权原则迅速议定新约”。华洛思一改之前与中方交往时的强硬态度，称比利时政府在国内需应付国会内反对党质问，因此希望中国在关税最惠国待遇和比人在华法律地位等问题上有所表示，以使比政府“可得转圜地步”。顾维钧一方面坚持原则，直言比方不应提最惠国待遇，“免生无谓枝节”，一方面又灵活应对，表示愿对比方要求给予“友好考量”，“以便早日开议新约”。[93]

比利时方面对顾维钧的表态做出积极回应。1月12日，华洛思再次会晤顾维钧，告知比方已通知国际法院“停止一切行动”，同意两国即时开议新约，还称比利时政府为表示善意，将在中比议约开幕之日，自行宣布将比利时在天津之租界交还中国。顾维钧答称，中国对比利时政府“终能明了中国现在民情”深感欣慰，请比方正式递交照会，中方将立即答复，并于1月17日开始商议新约。[94]

1月17日，中比新约谈判在外交部大楼正式开始。顾维钧在开幕致辞中称，比利时政府对中国政府建议以平等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缔结新约，予以友好之答复，此为新约谈判之基础。“深信此次各表同情，互相了解，以进行谈判，必能于极短时间内，得美满之结果也。”华洛思在答词中表示，在此次谈判前，比利时政府将“凡足以破坏互相信任空气之一切误解，依中国之愿望，加以消弭”，并宣布将天津比利时租界交还中国，希望谈判“奏美满之效也”。[95]

比利时政府对中国宣布终止中比条约，最初沿袭列强对华一贯之强硬做法，企图通过国际法庭迫使中国退让，但最终不得不“依中国之愿望”，回到谈判桌前开议新约。这首先是民族主义浪潮下中国民众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的结果，但北京政府尤其是主持外交的顾维钧坚持原则灵活应对，也为中比重开谈判铺平了道路。

但中比新约谈判并没有如顾维钧所期望的那样于短时间内取得成果。双方谈判先因停止国际法庭诉讼问题而延迟，待谈判正式开始后，中方于3月向比方提交草约大纲。但此时北伐军节节胜利，北京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而南方政府也宣布北京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不承认其签订的条约。于是，中比新约谈判停止了。这再次表明，顾维钧无法完全按他自己的意愿开展外交活动，而是受制于国内政治的影响。

四 申张主权

1926年10月顾维钧再度出长外交后还面临着对外交涉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首先就是万县惨案。这一年的8月29日，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万流”轮在四川云阳江面撞沉中国木船三艘，溺死64人，其中56人为川军杨森部官兵。当“万流”号抵达万县时，杨森派官兵赴该轮调查出事经过，却遭泊在江面的英国军舰阻扰，并开枪击伤川军士兵两人。英船这样的撞沉事件此前已有数起，均未处理。杨森遂将停靠在万县的太古公司的“万县”号和“万通”号两轮扣留，以图促使“万流”号肇事案早日解决。9月5日下午，英国军舰从重庆、宜昌驶来，“用大炮轰击县城两岸陈家坝南津街及省长行署等地，焚毁民房商店一千余家，人民数以千计”，万县繁华之区悉为灰烬。[96]事发后，北京政府外交部致函英国驻华使馆提出交涉。英国使馆于9月20日以节略形式致外交部，竟称杨森扣留英船为事件发生之直接原因，甚至指责杨森行为与水寇无异，还声明保留英政府对此案一切权力。

顾维钧接手此案时，外交部对英方9月20日节略尚未答复。他认为这一事件的性质是严重的，英国海军这一恃强逞凶、蛮横无理的行径是与国际法原则和惯例背道而驰的。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获得在中国内河航行的特权，并恃武力推行“炮舰政策”，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事端，损害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已非鲜见。顾维钧认为，中国必须对英国罔顾事实的节略做出回答，说明事件真相，从国际法角度说明事件的严重性，就此向英国提出抗议。抗议照会是顾维钧本人精心起草的。照会首先陈述事件经过，反驳英国节略掩盖事实真相、强词夺理地称炮击万县为“自卫”的谬论，表明英舰所为是“蓄意用武”，严正声明中国政府“不得不责成该英舰及太古公司对于此次不幸事件负其责任”。照会接着指出英舰在两国邦交正常状态下攻击万县无辜平民，违反了国际公法，中国政府“对于此种任意损害生命财产之举动，不能不痛加反对”。照会还指出，英舰在中国的内河航行权，虽有条约依据，但此种特权“他国断不肯轻以授之外国兵船”，中国因已有条约，“故曲予容忍”，点出了此种特权的不平等性质。但英舰的行为“与条约规定之文字精神实相违反”，甚至超越了不平等特权。在照会中，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保留中国政府一切权利，以备将来另提充分赔偿万案生命财产损失之要求，以及其他公平解决之条件”。[97]这份照会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英舰炮击万县损害生命财产的严正立场。它没有就事论事，仅仅将事件作为中

国与英国的一般纠纷，而是通过国际法来剖析英国行为的实质，揭示列强“炮舰政策”的不平等条约根源，将事件的处理纳入整个修约外交的进程之中，努力维护中国主权。因此，顾维钧自己十分看重这一照会，认为它成为处理此类事件的一个范例。[98]

罢免把持中国海关多年的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是这一时期顾维钧维护中国主权的又一重要举动，由此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

1927年1月12日，顾维钧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名义发布总统令，宣布自2月1日起开征华盛顿条约所规定的关税附加税。次日，顾维钧以外交总长名义照会各国驻华使馆，请各国予以赞同。北京政府决定开征附加税，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枯竭，急需筹措资金，顾维钧由于主持内阁，征收附加税就成了他摆脱财政困境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实行关税自主收回中国丧失的主权是顾维钧的一贯主张和愿望，而征收附加税是实行关税自主的过渡措施。早在巴黎和会开幕前，他就向美国表达了中国希望获得关税自主的要求。华盛顿会议期间，他代表中国提出关税自主的要求，使列强答应在会后3个月内召开关税特别会议，讨论废除厘金和征收附加税问题。但关税会议迟至1925年10月才得以举行，由于列强的阻挠和国内政局的动荡，会议在1926年5月停顿后再也无法复会，附加税当然也无从开征了。1926年10月，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向不平等条约发起冲击，撇开外人控制的海关，开征百分之二点五的内地税。这一税率与华盛顿会议规定的附加税相同，可说是变相的附加税。列强的对华政策此时也开始变化。英国在12月18日提出的对华新政策备忘录中，“力主各国对于华会附加税，应以无条件准中国全国立行征收”。[99]这些因素合起来，使顾维钧抓住时机，发出开征附加税的命令。

北京政府让海关来负责征收附加税。自19世纪中叶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关闭的国门后，海关就在外人的控制之下。19世纪末清政府在英国的要求下同意，在英国对华贸易额于各国对华贸易中占第一位时，由英国人担任中国海关的最高职务总税务司。此时担任总税务司的安格联就是英国人，自1911年任此职，已有16年了。安格联不仅掌管着北京政府的财政主要来源关税，还握有保管内外债基金的大权，是一位控制着政府财政命脉、可以在金融财政界呼风唤雨的洋大人。当时北京政府的内阁如走马灯般更换，总理、总长任职的周期也越来越短，但总税务司的位置却稳如泰山。京城的政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总统易换，总税务司难摇。”总税务司名义上虽由中国政府任命，但安格联对北京政府的命令

向来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不以为然。

北京政府宣布征收附加税时，安格联正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汉口等口岸城市。北京政府即电召其回京商讨征收附加税事宜。安格联非但不从命返京履职，反而向各地税务司发出命令，拒绝征收附加税。税务司易纨士（Arthur Edwards）根据安格联的指示致信财政部和税务处称，海关只能征收经条约批准之关税，只有有关各国一致同意后海关才能征收附加税。财政总长汤尔和对此答复说，征收附加税符合华盛顿条约的规定，安格联认为附加税超出华盛顿条约所允许范围的看法是错误的，总税务司是中国政府任命的官员，应该执行政府交给海关征收附加税的命令。但安格联仍拒绝听从北京政府的命令。[100]

对安格联这种傲慢无礼无视中国政府的做派，顾维钧已非第一次领教。1926年6月顾维钧出任财政总长后，财政部官员建议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总税务司安格联，并说之前的财政总长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他虽是财政部属下的官员，权力却很大，财政部的债券没有海关的担保和总税务司的点头是无法发行的。不过，顾维钧还是打破旧规，将安格联约到了财政部来见面。但后来财政部要发行债券，遭到安格联的拒绝，顾维钧对此极为愤怒。此次安格联再次抗命，顾维钧当然无法容忍。

1月31日，财政总长汤尔和呈文请免去安格联总税务司职务："该总税务司兼旬以来，逗留沪汉，既不回京供职，亦不将上项命令转行各关税务司遵办，饬拟办法，迄未据复，多方借延，不惜贻误要政。似此抗令玩公，不能忠于所事，实未便再予姑容。"当天，顾维钧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名义颁布总统令，免去安格联总税务司职务，改派易纨士代理。[101]顾维钧罢免安格联，是对其抗命的惩处，但又任命一个英国人继任，表明其并不完全抛开已有的惯例，不想由此引发与列强的激烈冲突。舆论对此看得很清楚："政府中诸西洋博士，又洞悉外情，以为行使职权，只免其个人，仍尊重条约，决无关碍。"[102]

但在当时的中外关系格局下罢免安格联，仍然是激烈之举，在外交界引起巨大震动。总税务司一职设立以后，中国政府虽名义上有任免之权，而实际上人选的决定权皆在英国政府手中。罢免的决定对列强把持中国海关要职的旧规是一个冲击。中国舆论对此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时报》指出"京中向有'总统易换，总税务司难摇'之言"，安格联此人"以洋财神之资格，据洋迷信之优势，握财政金融之命脉（海关）十余

年，其本国及其个人所获之利益，殆难数计，而于中国之利益，则算筋算骨，扣出扣入，毫不放松”。《大公报》的评论说：“北京政府突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发表总税务司安格联免职令。自总税务司用客卿以来，未有之创举也。”《晨报》评论道：“安格联向有太上财政总长之称，既握海关全权，又负保管内外债基金之责，操纵金融，左右财政，历来当局，无不仰其鼻息。而安格联之允诺，可以生死内阁；安格联之言动，又可以高低公债，虽安之滥用职权，有以致此，而官僚财阀迷信外人，实为主因，举国人心之愤慨，已非一日。此次当局毅然罢免，无不痛快。”[103]

列强尤其是英国对北京政府的罢免令十分震惊。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Miles Lampson）获悉北京政府将罢免安格联的消息后，在与顾维钧会晤时，以强硬的口吻警告说，免除安格联会使海关面临崩溃的危险。罢免令公布后的2月1日，蓝普森到外交部，再次表达不满，称北京政府此举“是对海关完整性的蓄意攻击，是对迄今海关所保护的中外利益的毁灭性一击”。[104]

2月7日，在蓝普森的倡议下，荷兰、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驻华公使集体前往外交部面见顾维钧。荷兰公使欧登科（William Oudendijk）作为领衔公使代表各国公使对征收附加税和罢免安格联提出抗议。蓝普森直接询问罢免安格联的理由。顾维钧回答，这是中国政府内部事务，作为公使无权过问和干涉。蓝普森又称以关税担保的中国公债持有人和英国银行代表的身份询问，顾维钧回答说，罢免安格联的理由十分简单，就是他“抗命”。蓝普森称这一指责没有实质内容。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各国公使强调如果海关为北京政府征收附加税，南方的国民党政权就将趁势破坏整个海关行政的完整性。由于海关的完整对于北京政府的财政来源尤其是北京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意义重大，对于各国公使这一语带要挟的回答，顾维钧只得调整语气，表示北京政府将重新考虑整个问题。各国公使作为一个整体前来外交部专门谈一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公使们的联合施压使顾维钧十分不快，认为“这是一次不愉快的会见”。蓝普森在会见后则认为，“顾博士似乎被我们说得有点不知所措”，“在争论中远不如平常能言善辩”。[105]

2月8日，内阁会议讨论六国公使抗议一事，认为罢免安格联事关国家威信，绝对不能退让，但附加税的具体实施可以重新考虑。会后，顾维钧与司法总长并兼税务督办的罗文干商量，决定请此时不担任内阁职

务的王宠惠去英国使馆与蓝普森沟通，探寻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106]

蓝普森见王宠惠来访，明白他来是为了找到令各方“保全面子”的解决办法。在坚持让安格联复职还是谋求妥协之间，蓝普森选择了后者。在与顾维钧的几次会晤后他认识到，让北京政府撤销成命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由英国人继任总税务司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事关英国利益，如果处理不当，会危及英国人继任此位。几经反复，蓝普森与王宠惠达成共识，对安格联的罢免改为准其请假回国，并由税务处致函安格联，嘉赏其劳绩，一年内仍给予总税务司待遇。[107]

2月10日，顾维钧在关税会议委员会上报告事件经过，称“目下外交内政因此事转多纠纷，不得不变通办理，惟政府既已下令，自难撤销，以损威信”，拟通过税务督办致函安格联准假一年。参会的罗文干、王宠惠、颜惠庆等均表同意。会议还决定，另立征收附加税处，附设于海关内，由海关与财政部会同办理。[108]

罢免安格联是北京政府在政权根基摇摇欲坠之际做出的超乎寻常的举动。但顾维钧说：“这不是一时的冲动，内阁从各种观点的角度作了讨论，在完全明了这次行动的意义和可能发生的各种反应的情况下作出了最后的决定。”“任何一个外国政府，如果它的官员像安格联一样行事的话，不论其职位多高，它也会像中国政府一样将其革职。”[109]担任过内阁总理和外交总长的颜惠庆的评论也持相同的看法：“从法治与政纪立场上看，此举非常恰当有理。”[110]这与终止中比条约一样，是出于维护中国主权而采取的行动。事件最终经妥协得到解决，一方面是时局使然，因为南北政权的对立，削弱了北京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方面，也与顾维钧处理外交争端的理念有关，只要中国有所得，就可考虑做出一些让步。他说过，“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111]在安格联罢免事件中，中国政府最终调换了倨傲无礼的安格联，并且由财政部会同海关征收附加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事件过去后，蓝普森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的函电中写道：“目睹安格联离开中国，尤其是在这样羞辱、令人恼怒的气氛中离去，我很难过。”他还担心由英国人担任总税务司的惯例“是否还能够保持”，说明其至少已经不像以往那样确定无疑了。安格联在给蓝普森的信中也表示，“很遗憾在这个关键时刻被迫放弃

领导权”，不无伤感地承认离开的方式缺少了以往一直享有的“尊严”。[112]从这两封信中不难读出“安格联们”在失去了以往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趾高气扬的“尊严”后恼怒而无奈的心态，也可看到北京政府对安格联罢免事件的处理冲击了中外间的不平等关系，伸张了中国的主权。

[1] 《申报》1922年5月11日，第13版。

[2] 《申报》1922年5月13日第13版、17日第14版、21日第13版。

[3] 《顾维钧博士昨晨抵沪》，《申报》1922年5月11日，第13版；《顾维钧演讲国民外交》，《申报》1922年5月18日，第13版。

[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38页。

[5] 《徐世昌退位后之政局》，《申报》1922年6月6日，第6版；《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39页。

[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39～242页。

[7] 《战后之内阁问题》，《申报》1922年5月12日，第6版。

[8] 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不仅更替频繁，且任职情况混杂，有的是正式担任，有的是署理，有的是代理，有的是任命而未就，还有下台又上台任职多次的。这里将各种情况合在一起，有上述情况之一就算一位，而不论其任职次数。参见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上册，第55、63、76页。

[9] 《总长会晤美舒使问答》（1922年8月9日）、《总长会晤英馆克参议问答》（1922年8月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1-002-02-017、03-11-006-02-001。

[1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03～104页。

[1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84页。

[12] 《日本芳泽公使呈递到任国书问题》，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09-003-02-016；《熊垓赴日本使馆晤会芳泽日使问答》（1923年7月2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09-003-02-010。

[13] 《陈司长与日本馆根津参赞会晤问答》（1923年7月2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09-003-02-012。

[1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25页。

[15] 《译英文北京日报七月卅号》，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09-003-02-020。

[16] 《补七月十九日日本芳泽公使致沈部长照会一件》（1923年8月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09-003-02-017。

[17]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2卷下，中华书局，2016，第748～751页。

[18] 应俊豪：《“丘八爷”与“洋大人”——国门内的北洋外交研究（1920～1925）》，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09，第279页。

[19]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27～329页；顾维钧：《中国外交私议》，《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

[20] 《美馆会晤问答》（1923年8月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1-003-02-003。

[21]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2卷下，第753～755页。

[22] 汪朝光：《临城劫车案及其外交交涉》，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第399页；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2卷下，第758页。

[23]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2卷下，第758～759页。

[24] 引自汪朝光《临城劫车案及其外交交涉》，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第402页。

[25] 应俊豪：《“丘八爷”与“洋大人”——国门内的北洋外交研究（1920～1925）》，第493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23页。

[26] Koo to Pao-chin Chu，12 November，1968，*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4.

[2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19页。

[2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19页。另参见吴翎君《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97～198页。

[29] 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151～152页。

[3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51～352页。

[31] 《英馆会晤问答》（1924年3月26日、5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1-007-02-002、03-11-007-02-009。

[32] 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第153页。

[3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53页。

[34] 《英馆会晤问答》（1924年11月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11-007-03-013。

[35]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35页。

[36]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56～57页。

[37]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87页。

[38] 《总长会晤劳农新代表姚飞问答》（1922年8月1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2-462-02-008。

[39] 《收总长会晤劳农代表姚飞问答》（1922年8月2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2-473-03-014。

[40] 《苏俄代表团致中国外交部节略》（1922年11月6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95页。

[41] 《外交部答苏俄代表节略》（1922年11月11日）、《苏俄代表致中国外交部节略》（1922年11月14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97～398页。

[42] 见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59页注1。

[43]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95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17～318页。

[44] 《顾总长会晤喀拉罕问答》（1923年9月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2-556-04-037。

[45] 《朱鹤翔往晤喀拉罕问答》（1923年9月1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32-556-01-038。

[46]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05页。

[47] 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2月18日，第6版；3月1日，第3版。又见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93～294页。

[48]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与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谈判记录》（1924年3月1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41页。

[49]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42页。

[50] 杨天宏：《中苏建交谈判中的“顾王之争”（1923～1924）》，《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51]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24～125页；《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通电报告交涉经过》，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68页。

[5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4页。

[53]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51～254页。

[5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9～340页；《申报》1924年3月24日，第7版。

[5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42～345页。

[56] 《外交部复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节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59页。

[57] 《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致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节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63页。

[58] 《外交部复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节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63～264页。

[59]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46页；《外交总长顾维钧出席国务会议的报告》（1924年6月5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82页。

[60] 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225页。

[61]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70～277页。

[62] 《外交总长顾维钧出席国务会议的报告》（1924年6月5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82页；《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48页。另参见杨天宏《中苏建交谈判中的“顾王之争”（1923～1924）》，《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63] 《申报》1924年6月2日，第4版。

[6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3页；《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26页；杜春和、耿来金整理《白坚武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470页。

[65] 杨天宏：《中苏建交谈判中的“顾王之争”（1923～1924）》，《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6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97页。

[67] 《申报》1924年6月7日，第4版。

[68] 波赖：《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正中书局，1935，第149页。

[69] 《中比条约说帖》（1926年1月1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69-01-006。该件实为外交部条约司呈文。

[70] 《中比条约说帖》（1926年1月1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69-01-006。

[71]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下，第923～925页。

[72] 《比馆问答》（1926年5月31日）、《致驻比王公使》（6月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69-02-010、03-23-069-02-013。

[73] 《致比华使备忘录》（1926年6月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69-02-014。

[74]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下，第927～928页。

[75] 《电驻比王公使》（1926年10月1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71-02-004。

[76] 《顾维钧致吴佩孚密电稿》（1926年10月16日），胡震亚选辑《吴佩孚与顾维钧往来函电（1923年8月～1927年4月）》，《民国档案》2009年第4期，第31页。

[77] 《电驻比王公使》（1926年10月18日）、《总长会晤比华使问答》（1926年10月1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71-02-005、03-23-071-02-016。

[78] 《收驻比使馆备忘录》《总长会晤比华使问答》《致比华使备忘录》（1926年10月2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71-03-001、03-23-071-03-004、03-23-071-03-002。

[79] 《总长会晤比华使问答》（1926年10月2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71-03-016。

[80] 《总长会晤比华使问答》（1926年10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72-01-001。

[81] 《议案稿提出阁议》（1926年11月5日）、《呈上大总统比约事》（1926年11月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72-01-007、03-23-072-01-006。

[82] 金问泗编《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第59～65页。

[83]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下，第982～983页；《申报》1926年10月31日，第13版。

[84] 《总长会晤法玛使问答》（1926年11月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03-23-072-01-011。

[8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57～358页。

[86] 《时报》1926年11月10日、13日，转引自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第196页。

[87] 《条约研究会第一次开会成立会议录》（1926年11月9日），转引自罗毅《外交系与北京政治：1922～1927》，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3，第140页。

[88] 罗毅：《外交系与北京政治：1922～1927》，第141～142页。

[89]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第377～380页。

[90] 顾维钧：《中国外交私议》，《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

[91]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112～113页。

[92] 王正廷：《中国近代外交概要》，外交研究社，1928，第125页。

[93] 《顾维钧会晤华洛思》（1927年1月5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下，第946～948页。

[94]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下，第948～949页。

[95]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下，第951～952页。

[96] 方庆秋、吴菊英：《万县惨案电报一束》，《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97] 金问泗编《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第354～355页。

[9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54～355页。

[99]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1分册，第115～116页。

[100] 张丽：《安格联的平衡之策及其破产》，《兰州学刊》2017年第9期。

[101]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中，第797～798页。

[102] 《时报》1927年2月10日，引自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中，第801页。

[103]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中，第798～801页。

[104] 《蓝普森致张伯伦》（1927年2月4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中，第816页。

[105] 《蓝普森致张伯伦》（1927年2月15日）、《马慕瑞致国务卿》（1927年2月8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中，第821～822、834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309～310页。

[106] 《申报》1927年2月10日，第7版；《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11页。

[107] 《蓝普森致张伯伦》（1927年2月15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中，第822～824页。

[108]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中，第802页；习五一：《论顾维钧内阁征收海关附加税和罢免安格联事件》，《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109]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13页。

[110] 《颜惠庆自传》，第205页。

[111] 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90。

[112] 《蓝普森致张伯伦》（1927年2月15日）、《安格联致蓝普森》（1927年2月11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中，第827、831页。

第五章 在派系政治的旋涡中

一 外交官登上国内政坛

顾维钧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驻外使节岗位上度过的，但1922年回国后一直到北京政府垮台，却有好几年的时间在北京政府中担任总长甚至总理。这正是民国历史上政局最为动荡混乱的时期。作为一个已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外交官，顾维钧身不由己地卷入到国内派系政治的旋涡中。

1922年5月底，顾维钧刚到北京不久，就遇上徐世昌被直系逼宫、黎元洪接替总统的政局动荡。6月中旬，颜惠庆署理总理，出面组阁，最初请顾维钧出任外交总长，后来因为内阁位置有限，转请他担任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长，虽不是内阁成员，也是一个政府职位。7月底，颜惠庆离职。8月5日，王宠惠代理总理，请顾维钧出任外交总长。9月19日，王宠惠正式组阁，顾维钧继续担任外交总长。在直系赶走徐世昌之后的北京政局中，各种政治派别争相角逐内阁职位，而向来与国内政治无甚干系的顾维钧却屡屡被邀入阁，甚至有舆论称他可能出来组阁。[1]而像他一样的外交官颜惠庆和华盛顿会议代表王宠惠也于此时异军突起，获得组阁权。一批在外交界享有盛誉的外交官在这样一个政治动荡期集中进入北京政治的中心，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外交与内政互动的结果。

这年2月结束的华盛顿会议是晚清以来中国第一次没有丧失反而争回了一些国家权益的外交活动。外交官在国际上为维护国家权益所做出的努力在国内各界得到广泛认可，他们在国内的声誉也因此得到提升。顾维钧及与他一同出席华盛顿会议的王宠惠回国时都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王宠惠于3月回国，下旬到达北京时，各界集会予以盛大欢迎。[2]顾维钧5月回国初在上海受到的欢迎前已述及。5月下旬到达北京后，北京大学、北高师等学校争相邀请他去演讲。北大校长蔡元培为顾维钧至北大演讲亲撰启事，称“顾公使近年历驻美英及在巴黎会议、国际联盟、

华盛顿会议之成绩，全国共见”，“此青年外交大家，实我国大学学生之模范人物也”。[3]6月中旬，顾维钧至天津小住，天津青年会及南开、中西、成美等多所学校纷纷邀请其前往演讲。[4]这都显示出民众对顾维钧的高度肯定。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顾维钧等华盛顿会议代表的肯定不仅仅在于赞赏其外交业绩，还包括对其推进国内政治的殷切期望。北京学界代表在欢迎顾维钧时就表示："对于顾先生今后的希望，我们深信好的政治，是以民众为基础的，现在国内政治腐败，达于极点。顾先生年壮力强，将来接重多多。我们希望顾先生今后不染一点旧官僚之习气，仍本民意民情向前做去。"[5]

民众将国内政治的希望寄予原本应在国际舞台上折冲樽俎的外交官，实在是出于外交与内政不堪之现状。华盛顿会议结束后，国内民众对按照华会上列强与中国的约定，开始修订关税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寄予厚望。但华会刚结束，国内就发生直奉之间的军阀战争，随后得胜的直系将徐世昌赶出京城，北京政局陷入混乱之中。关心时局的人们不仅担心政局持续动荡下去，更对由此可能使华会成果付诸东流忧心忡忡。《大公报》上署名“远公”的一篇短文这样评论顾维钧在天津的演讲：“吾人对于顾使表示极诚之欢迎，岂非感其华会之功乎？夫顾使之勋猷，昭昭乎，妇孺皆知，无待吾人之赘述。而听其演说，不能无感焉。当此华府闭会，友邦所期望于我国，至于殷且厚，而当事者，方骛权利之争，又孰有国家观念者。国家乃吾民之国家，非少数军阀官僚政客之国家也。乘此绝好时机，吾民不自爱其国，求所以自立于世界，而听彼军阀官僚政客之倒行逆施，不其将陷吾艰难缔造之民国于万劫不复之地位。……试观今日之时局，政争迭起，兵祸相寻，贻吾民无穷之痛苦者，非彼军阀官僚政客乎？倘仍无所觉悟，不独其依赖之积习，振其自决之精神，吾恐内乱糜矣。则华会所得，终成泡幻。”[6]这一评论反映了当时许多人的忧虑。

正是这种对时局的忧虑产生了蔡元培、胡适等人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指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主张“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并且认为正是好人不出来，所以总长、次长都被旧官僚占去了，因此号召“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7]因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的表现而得到国内民众和舆论充

分肯定的外交官，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并被寄予厚望。这是顾维钧等回国受到热烈欢迎的原因所在。1922年底，《密勒氏评论》做了“中国当今十二伟人”的问卷调查，12人中有顾维钧、王宠惠、王正廷这三位参加过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外交官，顾维钧高居第三位，列在孙中山、冯玉祥之后。[8]可见这些外交官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不仅民众和舆论如此，政界和军阀也十分看重职业外交官。到1920年代初，外交部各级官员已由专业背景很强的职业外交官构成，其他人员已不可能进入这一专业化程度相当高的部门。因此不管哪一派政治力量组阁，外交总长一职不得不请职业外交官出任。而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主导北京政局的直系比起其他军阀派系尤为重视这批新崛起的外交官，直系赶走徐世昌后就主张新内阁中应包括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成员。这一时期政潮汹涌，内阁不稳。各派政治势力相争不下时，没有派系色彩的外交官反而成为各派可以接受的人物。而当内阁总理难产时，名列各部之首的外交总长也因而成为优先考虑的人选。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军阀和政客都认为这些职业外交官能够得到列强的认可，由他们出长外交甚而组阁，整个政府更易得到列强的支持，而这在动荡的政局中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顾维钧这些外交官处理外交事务获得很大自主空间的国内政治因素。而顾维钧等外交官在办外交的过程中，确也获得列强的信任，使列强更愿意看到由这些人执掌北京政府的外交部乃至内阁。1922年1月华盛顿会议还未结束时，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就向兼代总理职务的颜惠庆表示，他的代理将有助于山东问题的解决。8月初顾维钧出任外交总长时，舒尔曼又称：“中国外交得如公等者，本使敬为中国得人贺。”[9]

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的些许成果和会后中国国内政局迅速恶化之间形成的反差，使民众在对时局忧虑之时寄希望于在国际舞台上有成功表现的外交官。直系对新崛起的外交官的看重，和列强对中国政局所具有的影响，更增强了外交官在动荡政局中的地位。在派系林立的北京政坛，短时间内集中进入内阁的这些外交官因此获得了一个“外交系”的称号。[10]

与这一时期的其他派系不一样，“外交系”既不像直系、奉系那样是一个掌握军队占据地盘的军事政治集团，也不像“政学系”或“研究系”那样是一个有相对明确的首领、稳定的成员乃至固定的活动场所的政治派

别。但这个由职业外交官组成的群体，又确实被政界与舆论作为一个单独的派别与其他众多派系相提并论。进入内阁担任外交总长后，顾维钧成为这一群体中的重要成员。

顾维钧留学时选择外交和国际法为自己的专业，就是立志要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此时转而介入国内政治，除了政局演变的客观因素，还在于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外交与内政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国内南北分裂、军阀混战不已的状况，使他在对外交涉中备感非同寻常的艰辛。而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更使他期望国内有一个稳定的政局和一致的民意，以使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所得能够付诸实施。但现实却令人失望。

顾维钧在天津青年会演讲时谈到动荡的国内政局令他在对外交涉中遭受了窘迫和耻辱。他提到在欧洲时曾与一著名外交家谈东亚局势和中国遭强邻紧逼之状况，希望其能支持中国，该外交家则反诘道：“何以中国以如是辽阔之幅员、富厚之天产、众多之人民，竟不能自强其国，而反以外侮为忧乎？”顾维钧坦言当时“心中百感俱集，几至无词以答”。而在华盛顿会议上，“鄙人与我国其他代表，将收回租界、中国关税自由、撤回洋兵等案，竭力提出，希望各国表示同情于我，将各案通过。惟是各国代表对我代表所称述者，非不极端表示同情。然至提议中国问题时，无不曰现在中国内乱频仍，南北尚未统一，收回领事裁判等事，今日尚非其时。当时鄙人等私衷之惭窘与愤慨，是非言语所能形容”。顾维钧认为华会期间，美国舆论持同情中国、支持中国的主张，“无如我国内争不息，坐使他人得所借口，而所希望各事，亦竟不能如志，为可痛耳”。顾维钧作这篇演讲时，北京刚经历了直系驱徐迎黎的闹剧。有感于国内时局的现状及对外交涉的亲身经历，他在结束演讲时说：“现在大局日坏，南北至今分裂，吾人应早自决，以国民之资格，促进南北之统一。使强有力政府早日成立，则吾辈所希望者，又何难件件办到。吾辈须知自决云者，须有一定之宗旨，譬如驾一叶之扁舟，飘摇于汪洋巨浸之中，只要认定一方向，则早晚终必达得目的地。不然，飘摇不定，日晚间必至触礁沉没。吾愿诸君深味此言，并勿忘欧洲某大外交家反诘鄙人之词。人人奋发图强，则我国之前途，正有无穷之希望也。”[11]在天津的另一次演讲中，顾维钧谈到了国内民众对外交的贡献，认为巴黎和会的拒签和华盛顿会议的结果皆与民众的奔走呼号相关，并进而言道：“对外如此，对内亦然。望我青年，不分党派，不分殄域，作全国一致之主张。废督也，裁兵也，皆可迎刃而解。”而他本人回国后之最大希

望也是“中国早日统一”。[12]

与顾维钧一同进入王宠惠内阁担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在当时是这样表述外交与内政关系的：“我国积弱由来甚远。外交胜败每以内政为衡。”“言外交者，必先言内政。内政不修，则无外交。”[13]这可看作被称为“外交系”的这批人的共识，也是他们最终卷入国内政治的主观动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宠惠和罗文干都在胡适发起、蔡元培领衔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

顾维钧一到北京，还没投入政坛，就加入了王宠惠、罗文干和胡适等人的朋友圈。这些人尽管有的在政界，有的在学界，但都有留学的经历。顾维钧在结束留学刚回国时就组织过欧美同学会，热心联络归国的留学生。到北京不久，他就与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一起发起了一个茶话会。茶话会的地点就在顾维钧位于铁狮子胡同的大院，所以他还是茶话会的东道主。顾维钧的这所宅院已有300年的历史，是明朝末年吴三桂为陈圆圆所建，占地几十亩，有小桥流水、长廊楼阁，共200多间屋子。顾维钧刚到北京时，一位失势下台的官员要避祸离京，但怕大院被没收，就借给了他。后来，黄蕙兰让她的父亲出钱买了下来，又花钱重新装修，装上了暖气系统和浴室。

顾维钧与蔡元培等发起茶话会的目的是“讨论今日切近的问题”。6月20日，茶话会在顾宅举行。参加者除四位发起人外，还有胡适、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林长民、陶孟和、李石曾等“二十多位欧美同学”，讨论的主题是统一。胡适对茶话会很为赞赏：“这种谈话会，无论怎样无效果，总比那‘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留学生生活要高一点。”因此他与罗文干一起提议，继续定期办下去，每次由四五个人做主人。[14]这样，以后几个月中，顾维钧铁狮子胡同的大院就成为学界和政界的归国留学生聚会议政的场所。

6月27日，第二次茶话会又在顾宅举行，参加者多于第一次，讨论的话题是中国是否要实行邦联制。此后在7月14日的茶话会中讨论了省自治的问题。[15]茶话会讨论的“今日切近的问题”都不是外交问题，而是国内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与顾维钧在天津演讲中提到的“废督”“裁兵”一样，都指向制止内乱、南北统一这样的内政根本问题，表明他与参加茶话会的学界人物有相近的看法。

从顾维钧到北京最初一个月的言和行，已可看出他对国内政治的关

注和热情。

二 内阁频繁更替中的总长

从一个已有国际声誉的外交官转入国内政治舞台，顾维钧最初并无准备也不太愿意，不过因对内政与外交之关系已有一番认识，“勿忘欧洲某大外交家反诘鄙人之词”，并深望“强有力政府早日成立”，所以他最终并非毫不情愿地入阁担任外交总长。

1922年8月5日担任王宠惠代理内阁的外交总长是顾维钧进入北京政府内阁的开始。在黎元洪接替徐世昌的政局动荡期，直系吴佩孚主张由参加过华盛顿会议的代表组成内阁，王宠惠因此代理总理主持内阁。他首先想到的是请顾维钧出长外交，亲往铁狮子胡同顾宅密谈两小时，“共商新政计划”，请顾入阁为自己帮忙。舆论称顾与王“私交甚深，且同为外交系之中坚分子”。在王宠惠的力邀下，顾维钧改变原来不入阁的想法，但声明“专以王代阁任内为度”。[16]但一旦入阁，他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变化。9月19日，黎元洪在吴佩孚压力下任命王宠惠署国务总理。当王宠惠对正式组阁裹足不前时，顾维钧则从旁积极鼓励。王内阁组成后，舆论称“奔走有功者，厥惟顾维钧”。[17]

在王宠惠的新内阁中，顾维钧继续担任外交总长。时评称他“为新外交系中特出之才，其外交学识尤长，久已脍炙人口。舍去驻英公使本职，就任外长，设非王署阁，顾决不肯轻允牺牲个人之宗旨”。[18]在这届内阁中，总理王宠惠、财政总长罗文干、教育总长汤尔和都署名于《我们的政治主张》，倡导好人要出来，组织一个好政府，因此这届内阁也就被称作“好人政府”。顾维钧虽不是《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署名者，但与王宠惠和罗文干均是顾宅茶话会的发起者，政治理念相同，又都被时人视为外交系，在新内阁中成为同道。王内阁得到吴佩孚的支持，因此舆论称王宠惠内阁是“洛方（即吴佩孚）与所谓外交系结合成功”之结果。有论者则指出“好人政府”与“外交系”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19]

“好人政府”登台，对之最为关注的莫过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署名者和顾宅茶话会的参加者了，而前者就是后者的核心成员。但他们对王内阁受制于吴佩孚颇为担心。9月8日，在顾宅茶话会上，有参加者请王宠惠就政府的计划谈谈想法。“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是《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对今后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要求，前两者一下子办不到，因此参加者就提出了第三点。但被动荡政局搞得焦头烂

额、此时还没完全下决心正式组阁的王宠惠没好气地回答："那能有工夫做计划？"茶话会的气氛由此紧张起来。顾维钧忙起身说："今天天太晚了，下回再聚会，请诸位即用'今日政治计划'做讨论的题目。"胡适对顾维钧出面打圆场称赞道"少川究竟是漂亮的人"，但又称若王宠惠说此话，岂不漂亮？[20]茶话会因王宠惠等人入阁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9月22日，即王宠惠新内阁组成三天后，顾宅茶话会的争论更为激烈。王宠惠到会就大发牢骚，称除了应付财政危机造成的"吃饭""过节"问题，别无政策。胡适发言则回应顾维钧前次会上出的讨论题目"今日政治计划"，提出应"消除奉直私斗"，实际上是要王内阁表明不受直系吴佩孚控制的立场。担任过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秘书的叶景莘说，"希望王内阁用华盛顿会议的议决案作大政方针的依据，这个内阁可叫做'华府会议善后的内阁'。一切政策都可包在这个大题目里"。蔡元培马上呼应赞成："王内阁在今日大家的眼里只是一个洛阳武人的内阁；若能用华府会议作标题，可以使王内阁的旗帜一新。"参加者也都赞同。眼看王宠惠成为众人指责的对象，顾维钧又出来为王解释："亮畴不是全无计划，不过他此时迫于现状，不愿作空谈……"[21]

顾维钧"迫于现状"的解释，确实道出了王宠惠内阁也包括他自己入阁后面临的困境和无奈。"外交系"登上政坛时，社会声誉甚佳，各界期望很高，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源。但他们能够入阁和组阁，靠的是直系的支持，因此在国内政治中并无多少自己的施展空间。顾维钧称王宠惠"不愿作空谈"，可看作他对茶话会上各种对王内阁批评及建议的含蓄回应，进一步显示出顾维钧、王宠惠这些入阁者与以在野身份议政者之间的分歧。两拨人之间的关系因入阁者越来越深地卷入国内政治而不可避免地走向破裂。10月27日，顾宅茶话会上，王宠惠和罗文干又大发牢骚，使其他人都不满意，最后蔡元培提议茶话会停止，要开也须等王宠惠等退出内阁之后。这表明入阁者与在野者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大家坐不到一起了。胡适对茶话会上三位入阁者的评论是："亮畴竟是一个无用之人；钧任（罗文干）稍胜，但也不能肩此重任；少川稍镇静，头脑也稍明白，但他终为罗、王所累，不能有为。"[22]在胡适看来，顾维钧是入阁三人中头脑稍明白因此也稍镇静的。而这三人中，顾维钧之前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他实际上延续了办外交的处事方式。

面对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国内政治，顾维钧确实是以办外交的经验来办"内交"的。茶话会的停办只是原先志趣相近的朋友圈的分裂，双

方的争执还只在唇枪舌剑，而其他派系对内阁的攻击是顾维钧入阁面临的更严峻的挑战。

王宠惠内阁得到直系洛（阳）派吴佩孚的支持，吴的心腹孙丹林和高恩洪分别出任内务和交通总长，成为内阁的重心。舆论对此看得十分清楚："王亮畴不过为洛阳傀儡，而孙丹林、高恩洪实操中枢之全权。王氏胸无所主，每有国务会议，辄听由孙、高把持。"[23]这招致直系中（天）津保（定）派的嫉妒，他们暗中策划倒阁。而国会中的各政治派系对新内阁也不满意，尤其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吴景濂是在民国政坛上翻滚了多年的政客，掌握着国会中最大的政治派系益友社，一直觊觎着内阁总理的权位。直系赶走徐世昌后引来的总统黎元洪在内阁与国会之间则偏向内阁。顾维钧是这样描述入阁后所面临的复杂政治关系的："以内阁为一方，以总统为一方，以国会为第三方，再加上所谓的'实力派'，这就再次形成了一种四角安排。"对政府的实际工作来说，这种关系使"互相之间的政治利害冲突一直非常激烈"。[24]

内阁成员确定后应将名单提交国会批准，但吴景濂一派放出风声，称会对孙丹林和高恩洪投否决票。王宠惠为了不使国会得到推翻内阁的机会，就决定不将内阁名单提交国会。吴景濂当然不能容忍这一无视国会的行为，不断催总统黎元洪将内阁名单送到国会，黎元洪则不予理会。内阁与国会的摩擦促使财政总长罗文干拒绝给国会支付必要的经费，吴景濂就带着议员登门找罗文干索取国会经费。内阁与国会的冲突逐步升级。

在这场与国会的冲突中，与王宠惠和罗文干相比，顾维钧仍然"头脑明白"、处事镇静。按他自己的话说，"担任了内阁与国会之间的联络员"。[25]王宠惠不愿出席国会接受质询，有几次顾维钧就代表内阁去国会，他认为这是根据宪法行事。面对议员的质询，他态度诚恳，有礼貌地回答，尽可能说明真实情况，因此得到议员们的鼓掌欢迎，称其应付质询很得体。他还有意识地以"中国式方法"处好与议员的关系，同时宴请议员和内阁各部总长，客人常多达三五桌，尽力疏通各方关系。有一次，顾维钧在外交部大楼设宴，请了国会领袖和内阁成员，希望让双方坐到一起进行说和。但吴景濂一见到王宠惠就直面斥责："你是总理吗？你是什么总理？你对宪法还有丝毫尊重吗？"尽管顾维钧忙打圆场说："别提这些事了，我们喝酒！"宴会还是不欢而散。《申报》获悉此事后评论道："顾维钧之宴会席上，吴景濂与王宠惠互相诋谟，面红眦

裂，不欢而散。则国会之于内阁已到极端地步，直不可掩之事实也。”[26]

《申报》评论称国会与内阁关系“已到极端地步”，这一看法一针见血。11月18日，吴景濂以财政总长罗文干签订奥地利借款展期合同有渎职受贿行为，逼总统黎元洪下令拘捕罗文干。当天晚上，顾维钧参加海军总长李鼎新在海军俱乐部举行的宴会，包括罗文干在内的内阁成员都参加了。但宴会后刚回家，顾维钧就得到罗文干在家中被军人带走的消息。[27]这就是政坛上轰动一时的“罗案”。

“罗案”是吴景濂在津保派支持下打击王内阁及其背后洛派的举动。吴佩孚最初对吴景濂的做法予以驳斥，但在津保派首领曹锟支持将罗文干案交法庭后，也只得表示静候法庭的判决了。没有了吴佩孚的支持，王内阁也就无法延续下去了。11月25日，顾维钧与王宠惠一同辞职，“好人政府”只维持了两个多月就垮台了。此时距顾维钧出任外交总长仅111天。两天后，众议院又通过了查办顾维钧的议案，称顾作为外交总长预闻奥地利借款合同，应一同惩办。[28]

“罗案”是顾维钧进入国内政坛后遇到的第一次挫折。他与王宠惠、罗文干三人被北京的外国使馆圈视为得到吴佩孚保护的“进步的自由主义的少年中国派”，王内阁的倒台被看作这些年轻有为的政治家的出局。[29]这些被视为“外交系”的人遭到吴景濂等政派的攻击，根本原因是他们被看作吴佩孚洛派操纵内阁的工具，由此成为派系冲突的焦点。舆论对此有精到的评论，“此次阁潮如为排斥外交系而生，则如此结果可以暂安”，但如为国会以及直系内保洛派之暗斗，“仍不能一朝安也”。[30]因此王阁倒台后，各政派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斗。

此时的北京政坛，不管哪一派得势，都不得不倚重职业外交官来掌管外交。顾维钧辞去外交总长后，王正廷、施肇基两位参加过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外交官先后被请出，短暂担任外交总长，王正廷还同时代理了20多天的总理职务。施肇基被提外长最终未能在国会通过，当时有报道指出这与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相关，吴欲另提他人，“以铲除外交系”。《申报》则称“系议员多数忌克华府会议出力人员”，足见此时其他政派对半年多来外交系在政界影响骤长之忌惮了。[31]此后由并非职业外交官的黄郛出任外交总长，其间曾邀顾维钧、王宠惠、施肇基等商议外交事务，[32]但黄郛很快因“金法郎案”辞职。这样，外交总长一职又成为政坛的焦点。此时的内阁总理是在倒王宠惠内阁时兴风作浪的张绍

曾，他生怕出现没有外长而无法维持内阁的局面，于是在1923年4月初，不待顾维钧同意就下令派其署理外交总长，可见顾维钧这样被视为“外交系”的人物已无法从北京政坛上轻易“铲除”了。“罗案”后不到半年，顾维钧又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

胡适知道此消息后，以诚恳的口吻给顾维钧写了封信：“我以为张内阁非可与共事之人，而今日之民气与国势皆不足为外交后盾。此次，先生出任外交，别无他种正当之justification（理由），只有‘为国家而牺牲’一个动机尚可得国人的原谅与佩服。先生如果真是为国家外交的重要而出，则不可不先有几种基本的主张：对中日的问题，究竟希望争到什么地步？对中俄的交涉，究竟希望如何进行？……若先生久已胸有成竹，自不妨忍暂时的苦痛，以图政策之进行。若对于这些问题本无主张，徒以情而难却，轻于一试，则先生进退失据，徒为一班无耻的政客作‘搨末梢’之器，那就不免使我们大失望了。”[33]胡适是以朋友身份来劝顾维钧不要出长外交的。

顾维钧听到张绍曾要揽他入阁的消息后，就去面见总统黎元洪，表示担任外长一职国会能否通过是一问题，而本人也无此能力，请黎“另行物色贤能，以免贻误外交”。[34]顾维钧不愿再度出任外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罗案”尚未了结，罗文干仍在被拘押之中，而他本人也因该案被国会查办，因此他坚持以“罗案”解决为出任前提。顾维钧虽不愿马上接任外交总长的职位，但他的想法与胡适劝阻他的理由是不同的，因此并没有关死入阁的大门。

但“罗案”尚未解决、外交总长一职仍虚位以待之时，北京政局急剧变化，直系开始上演逼黎元洪交印的闹剧，以为曹锟登台铺平道路。此时发生不久的临城劫车案尚未解决，列强中对中国进行“国际共管”的呼声甚嚣尘上。内乱外患更突显了“外交系”在政局中的特殊角色。与一年前直系驱徐迎黎时相比，由于有了1922年下半年的政坛经历，顾维钧和“外交系”其他人在直系导演的这一幕政治闹剧中显得要老练多了，并不完全是被动的角色。

6月上旬，直系逼宫日紧，黎元洪先后请颜惠庆、顾维钧出面组阁，希望依靠直系能够接受的“外交系”渡过难关，保住总统的职位。顾维钧与颜惠庆对黎元洪的邀请均有允意，两人虽暗中有竞争，但还是互相予以支持。黎元洪最初属意颜惠庆，顾维钧曾至颜府劝其出山。颜惠庆退却后则极力荐顾以代己。6月8日中午，黎元洪在总统府邀顾维钧、

颜惠庆、王正廷等“外交系”人士午餐，席间讨论由顾出面组阁事，至席散时此事业已确定，顾维钧对此并不拒绝。但当晚回家后，有人告诉他黎元洪一日不离京，政局一日不安，劝阻他不要助黎。于是，顾维钧即打电话给黎元洪，坚拒组阁。但此后几天，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相互间以及与黎元洪、张国淦等人之间走动仍十分频繁，东厂胡同黎府几乎每日都有顾、颜、王的踪影，直至13日他们一起送黎出京。[35]

黎元洪被逼走后，直系为维持北京局面，并为在外交上取得列强对变动后政府的承认，迫切需要外交系参加甚至主持新内阁，尤其力促顾维钧就任外长。[36]国会中与直系有关联的议员也致函顾维钧，催促其早日就职：“阁下自派署以来，谦让未遑，莫肯就职，同人等曾一再敦促，未蒙采纳。”如今政局变化，“敦请阁下，旦夕就职，出任艰巨”。[37]而一部分反直议员则离开北京，与其他反直派为阻止直系掌权，纷纷反对“外交系”加入内阁为直系撑台。包括顾维钧在内的“外交系”因此卷入了政治旋涡的中心。当时《顺天时报》一篇评论从列强的角度道出了外交系在北京政局中的重要性：“由外国而观，北京政府所以较广东政府、黎氏政府更为重要，再申言之，北京政府所以为内外所重视者，因有外交总长之故也。由斯而观，外交总长一席之虚悬，实为内外轻视北京政府之原因。倘长此久悬不决，恐难免灭亡之虞，此直派所以竭尽一切手段，而促顾外长就职也。”[38]顾维钧与颜惠庆、王正廷等“外交系”中人此时对北京政局这潭浑水已有切身的了解，明白直系中有津、保、洛的分歧，国会内又有各派的纷争，因此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对直系邀请既未坚拒，也未慨然允诺，而是称“尚在审慎考虑之中”。[39]7月初，在反直舆论的压力下，顾维钧离开京城暂避风头，赴西山“养病”。[40]颜惠庆与王正廷也都暂离京城。

但至7月中旬后，京城各种势力尤其是直系内各派请“外交系”出山的呼声日高，暂时主持内阁的高凌霨更是力邀顾、颜、王三人同时入阁相助。吴佩孚的心腹白坚武也给吴献策，让他电催顾维钧“赶行就职，维持内外现状”，并要吴给曹锟等发电请他们也劝顾就职，称顾与财政总长王克敏若不就任，“京况益难矣”。[41]7月中旬，顾、颜、王三人几乎同时返回京城，顾维钧并对报界表示要颜惠庆、王正廷一同上台方肯就职。[42]

在直系的力邀下，7月23日，顾维钧宣布就任外交总长，不过颜惠庆、王正廷并未能随他同时入阁。在同记者谈话时，顾维钧称此举“专为

外交”，因为“数月以来，外交积案甚多”，并表示“外交一事，本应超出国内政治旋涡之外，国内党派纷竞，不过阋墙之争，仍属一家之事。兹因此而旷废对外必要之处置，致列强失其交涉之对手，则影响于国际地位与国家资格者，危险莫可言状”。他声称作为外长，“决不为一方有所活动”。[43]但从当时报刊报道所透露的信息来看，顾维钧在拖延月余后此时就职，并不仅仅是其个人“专为外交”的行为。有媒体称，顾维钧就职前与颜惠庆、王正廷一起商定，由顾先上任，颜、王再谋登场。而就在顾维钧上任4天后，冯玉祥出面邀集各方人士，提出请颜惠庆出长农商并兼总理、王正廷出长司法。[44]《东方杂志》的一篇时事评论对此时的“外交系”做了这样的分析：“平常所称为接近直系的外交系，实并不完全为直派而活动，又不曾出力帮助直派以打击反直派，颇可称之为中立派。外交系七月底因直派想利用他们加入内阁以装门面，曾有组织超直派内阁的企图，当时传说，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将乘保定改造内阁的时机拉王克敏及二三名流组织超直派内阁，一面借以打破‘直派即中央’的北京政局，一面以中间人资格向反直派说话，以便进行解决时局。”[45]外交系组织“超直派内阁”的意图和活动，只是舆论的推测。不过，自6月初以后顾、颜、王三人来往密切，共商进退，并在政局动荡之际跃跃欲试却是有迹可循的。顾维钧与颜、王等人此时欲参加内阁，固然主要出自外交上的原因，期望以此结束无外交当局处理中外交涉的局面，尽力维护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对整个政局并非毫无想法。顾维钧在就任外交总长后对外国记者说：“中国目下因政治上之发展，不但经过一种危险的过渡时期，且政府反得一种极大之经验。中国之共和政体，此时系一试验时期，亦为亚洲所仅有者。”[46]这番专向外国媒体表达的看法，透露出这些有留学美国背景的外交官对共和政体在中国发展的期望，这也可说是他们参与内阁的一个潜在动因。

顾维钧出任外交总长结束了黄郛离职后内阁无外长达4个月的局面，也使掌控内阁的直系得以全力以赴推进“最高问题”，将曹锟推上总统之位。因此不管顾维钧如何表白入阁“专为外交”，“超出国内政治旋涡之外”，“决不为一方有所活动”，反直各派均视顾维钧入阁为投靠直系，助曹锟上台。国民党系的褚辅成率领离京国会议员致书顾维钧，驳斥其所谓专为外交、维持国际地位的言论：“所谓维持国际地位者，无非运动外人承认北京之伪政府耳；所谓维持全局安宁者，无非断送国权、挹注外资，以燃北京残局之死灰而助直派之战费耳。”并告诫顾维钧：“国人以满腔之热诚期待我公者甚远大，而公乃勇于自杀、为虎作伥，此真傀儡公者所快意，而爱护公者所痛心也。一念之差，迷途未远，望公熟

思，及早回头。若其执迷不悟，是公自绝于国人，而国人必有以处公者矣。言尽于斯，惟公自择。”[47]

杨永泰领衔的另一批离京议员以更犀利的语言斥责顾维钧：“悍然竟就伪职，好官自做，人言何恤。”并嘲讽其所凭借的外交声望：“足下遭逢时会，少年知名于国际，虽华而不实，器小易盈，然能进之以锻炼，不得谓非前途有望之器也。仆等本爱人以德之义，窃惧其堕入浊流，使白圭有玷，虽曰可磨，君子终惜其非完璧焉。故不惜时以不入耳之言来相劝勉，弗图足下炫于目前之虚荣，而甘为军阀乱党之鹰犬。”最后以严厉的口吻敦促顾维钧悬崖勒马：“足下果犹有丝毫之天良未尽泯没者，则请速自断决，孑然引去，犹不失为知几之明哲也。若必恋恋不舍，积怨既深，终有报复之一日。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请足下自思果有抵抗民怨之毅力否耶？苟其无之，则悬崖勒马，急流勇退。”[48]

反直政派之外，原先参加顾宅茶话会的学界人物也加入抨击的行列。几个月前胡适尚以诚恳的口吻劝顾维钧不要“为一班无耻的政客作‘掮末梢’之器”，此时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刊发多篇文章对其进行猛烈的批评。一篇题为《中国的泰勒兰》的文章，将顾维钧比作19世纪初纵横捭阖于维也纳和会的法国外交家塔列朗，以尖刻的语言奚落他：“顾维钧自负其才，甘为人用。唐少川（绍仪）可以用他，袁慰亭（世凯）可以用他，陆子欣（征祥）、徐菊人（世昌）也可以用他。将来何论什么人具有实力，全都可以用他。倘使为好人所用，他也可以做些好事体；倘使为坏人所用，也就可以做些坏事。他本是一个‘人用之才’，随人转移，我们也不必用‘审慎出处’的话去劝勉他。”[49]如前所述，顾维钧内心确以塔列朗自许，这篇文章点出了顾维钧以外交之才甘为当政者所用的要害。

其他报刊也充满类似的批评。《民国日报》连续几日以《全国共弃之顾维钧》为标题，刊登各界批顾的言论。一则消息称，顾维钧派人接其母亲去北京，但其母因顾助曹而拒绝，反敦促顾离京回南方，并言：“儿不来，此生不复相见。”女权同志会获悉后致函顾母，对其行为大加赞赏后又请其“严词责训，再电京师，促少川先生敝屣荣华，克日南下，庶令誉得之挽回”。也有人公开致函顾维钧，痛斥其“卿本佳人，何为作贼”。[50]

此时舆论对顾维钧的尖刻而激烈的批评，与一年多前他刚回国先经上海后到北京时的一片赞誉形成强烈的反差，“青年外交大家”成了“为虎

作伥”的帮凶。直系逼走黎元洪就是要将曹锟推上总统之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举遭到其他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顾维钧却为其火中取栗，遭到舆论的痛斥也就不足为奇了。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后，在外交上充分信任顾维钧。内阁中有直系阁员欲干预外交官的任命，曹锟明确表示：“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干预？这件事完全由顾总长决定。”[51]几次内阁变动，都有人提出要更换外交总长，但均遭曹锟拒绝。曹锟将外交完全放手交给顾维钧，固然因为在当时的中外关系格局下，与列强驻华使馆保持正常的联络是北京政府生存的必要条件，而此事只有委诸顾维钧这样的外交官，但也与曹锟、吴佩孚比其他军阀更看重顾维钧有关。直系的倚重和信任给了顾维钧相当的空间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在外交事务方面施展身手，而在派系林立的北京政治中这又反过来使得他十分注重与直系包括直系内各派之间的平衡关系。直系因外交而倚重顾维钧及外交系，外交系因要开展外交并立足政坛亦不能没有直系的支持。这一时期特殊的内政和外交环境使直系和外交系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依靠的共生关系，当然这一共生关系并不是对等的。

顾维钧出任内阁职务时表示是为维持国家体面而尽匹夫之责，这未尝不是实话，但一旦进入政坛，其实无法完全抵御权力的诱惑和侵蚀；而且随着在政坛中越陷越深，他也增加了对权位的迷恋。黄蕙兰对此看得很清楚，顾维钧“并不讨厌来自他的地位的权势和荣誉”。[52]外交系中其他人在这一点上也都相似。1924年1月中旬，当顾维钧、颜惠庆、王宠惠都成为内阁总长后，王正廷就对能否也成为内阁一员十分在乎，甚至含蓄地威胁如未能如愿将参加其他派系。[53]

北洋时期政局的特点就是动荡多变，而顾维钧由于曹锟的信任，从1923年7月起连续担任外交总长达1年4个月，在其他总长频繁更换的情况下，实属罕见。1924年7月初，孙宝琦辞去总理职务，按总理缺席由总长中排位第一的外交总长代理的规定，曹锟任命顾维钧代理总理。顾维钧推辞不准后接受了这一职位。这一代理时间不算太长，9月14日，颜惠庆出任总理。在组阁过程中，颜惠庆考虑过由自己兼任外交总长，而安排顾维钧去担任农商总长，但曹锟坚持外交总长还是要顾维钧担任，甚至宁可放弃让颜惠庆任总理也要让顾留任。[54]于是顾维钧在颜惠庆内阁中继续担任外交总长。

颜惠庆内阁是一个短命内阁。在颜内阁成立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

上，颜惠庆副署了曹锟对奉系的讨伐令，帮助直系完成了开战的法律程序，随之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关内外打响了。直奉双方正激战之际，10月下旬直系阵营的冯玉祥阵前倒戈，率部杀回北京逼曹锟交出总统大印，颜惠庆内阁也一同倒台。顾维钧不得不离开了外交部。

像当时绝大多数下台或失意的政治人物一样，顾维钧离开北京后去了天津。他在天津有自己的房产，在天津小住一阵后南下上海。随后一年多的时间中，顾维钧没有官职，但仍与政界人士保持接触，了解政坛的种种动向，尤其是外交方面如关税会议的进展。1925年11月，顾维钧应吴佩孚之电召赶往武汉，吴就关税会议事“面授机宜”，请顾与各国公使和商人沟通，转达吴的意见。[55]他还经常与罗文干、汤尔和在吴佩孚亲信孙丹林任职的银行里相聚，互通信息。他们四人都曾在王宠惠内阁中任职。在北京政坛中沉浮了一阵后，顾维钧似乎已不太甘于寂寞了。

寓居上海期间，顾维钧回故乡嘉定为唐宝玥落葬。唐氏病逝后，顾维钧在美国置玻璃棺以殓遗体，随后运回国内，安放于嘉定城西门顾氏宗祠内。1924年10月，军阀齐燮元、卢永祥交战，嘉定成为战场。兵士见玻璃棺豪华，将其打开，期望有所收获。据当时报纸记载，因为入殓时“抽气成空”，开棺后“其尸如生”。战事结束后，顾维钧专程返乡安排落葬，玻璃棺外再置一外棺，“丧仪甚盛”。[56]

三 依违于直奉之间的总理

1926年春，原本兵戎相见的直奉两系联起手来攻打冯玉祥，迫使其下野，随即控制了北京政局。在上海做寓公的顾维钧一直关注着北方政局。4月中旬，在孙丹林的安排下，顾维钧以为吴佩孚祝寿的名义赴汉口，而主要目的是商谈北京的政府改组事宜。吴佩孚请顾维钧到汉口是要请其担任直系准备推出的颜惠庆内阁的财政总长，顾维钧对担任此职并不愿意，表示兴趣仍在外交方面。但对吴佩孚请他出面与各方沟通，推动颜惠庆内阁尽快登台却并不推却，因为他对时局已有自己的判断。在汉口期间，顾维钧向媒体表示，“国内战事已至终了时期，吴、张、孙必能合意，共组一合法政府”，相信直奉的吴佩孚和张作霖以及占据东南五省的孙传芳能够联合起来控制北京政局。[57]因此，从4月下旬到5月上旬，为了为吴佩孚组织新一届内阁，顾维钧往来于沪、汉、京之间，在赋闲了一年多后显示出重返北京政坛的强烈意愿。在北京仔细观察政治风向为登台做准备的颜惠庆注意到顾维钧在汉口那边“很卖力”。[58]

5月5日深夜，顾维钧衔吴佩孚之命抵达北京。在北京政局敏感之际到达，面对媒体的提问，顾维钧并不避讳来京目的，称此行“受吴佩孚托催颜惠庆就职”。次日，他先见颜惠庆，递交了从汉口带来的内阁名单，他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晚上又见奉系少帅张学良，代表吴佩孚与奉方沟通。[59]在直奉联合组阁过程中，顾维钧为未能来京的吴佩孚积极奔走，成为吴在北京的重要代言人。

5月13日，颜惠庆宣告复职，并由内阁摄行总统职权。[60]顾维钧成了颜阁的财政总长。担任颜阁教育总长和外交总长的分别是王宠惠、施肇基（在海外未就，由颜惠庆自兼）。三位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全部进了内阁，加上颜惠庆，10名阁员中外交系占了4名。颜惠庆在劝王宠惠入阁时，称“这是欧美留学生的首次机会”，显示出他虽由吴佩孚主导推出来组阁，但也有自己的考虑。[61]与赶走黎元洪后直系一手遮天的局面相比，直奉之间貌合神离的联合，看上去似乎更有利于组织一个“超派系”的政府。在北京政府中长期任职的李景铭这样观察此时的颜惠庆：“颜惠庆固素抱乐观主义者也……自太平洋会议后，以为各国予中国以有为之机，际此人才毕集，身居元首地位，适值贞下起元之时，故于五月十三日摄阁。”[62]

但颜惠庆对时局的估计太过于乐观了。直奉之间虽在军事上已经联手，但对北京政府的安排则各有打算。由于奉系拒绝合作，颜惠庆内阁根本无法正常运作。舆论称颜惠庆是“单人跳舞”，内阁成员均以各种理由躲避，连顾维钧也以家事为由离京赴津。[63]拖至6月22日颜惠庆不得不辞职。实际上在军阀掌控北京政治的格局下，并不存在颜惠庆或顾维钧他们所想象的欧美留学生的机会。

颜惠庆辞职后，由吴佩孚的亲信海军总长杜锡珪代理内阁总理。顾维钧在杜阁中继续担任财政总长。财政总长并不是顾维钧所希望的职位，所处理的事务对他来说也相当陌生。但在直奉围绕内阁的明争暗斗中，总长职位的接受或拒绝并非个人意愿所能决定。

财政总长的主要职责是为政府筹措各种经费。吴佩孚让顾维钧出任此职，当然希望他能为其部队多调拨军饷。9月上旬，北伐军攻克吴佩孚的大本营汉口。率部撤离的吴佩孚急需军费，于9月18日致电顾维钧告急：“需饷甚急，望设法速为筹拨。”次日，吴佩孚又亲笔写信给顾维钧求援：“敬希无论如何先筹三百万汇下应用，以鼓士气而策万全。”[64]

顾维钧收到吴佩孚的函电时，离中秋节只有两三天的时间了，他正为钱款事忙得焦头烂额。当时过节称为“节关”，财政部至少要筹到三四百万现款应付各方，才能安然过关。为筹集这笔钱款，顾维钧专门设宴请各大银行代表，请他们认购“秋节库券”。但银行界巨头张嘉璈因顾维钧刚出任财政总长就修改银行给政府贷款的过高利率而记恨在心，故意刁难，不予合作。结果，顾维钧只筹到100余万现款，于是提出行政机关薪金发40%，军警薪饷和教育部门薪金发70%，以此应付节关。

尽管顾维钧为筹款费尽心机，但北京的军警拿不到全薪就不满意。就在吴佩孚致电顾维钧催拨军饷的当天，京畿宪兵司令率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包围正在举行内阁会议的国务院，点名要找财政总长，并表示不见现款不散，任何人不得离开国务院。顾维钧与内阁同僚“被困于内阁会议室，饮食全无”，直到次日凌晨4点，才获准离开。但军警仍寸步不离地跟着顾维钧到了他在铁狮子胡同的大院，聚集在院内，守候着索要钱款。陪同顾维钧回家的总理杜锡珪只得去找来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向军警当面做出保证，军警才离开顾宅。这时已是上午9点了。事后知道此消息的颜惠庆在日记中写道：“内阁阁员们昨日被军警包围。顾遭侮辱，几乎挨了揍。”这是顾维钧在做外交总长时没有遇到过的事，晚年回忆时他说，这是“政治生涯中最值得回味的一页”。[65]

京畿宪兵司令是奉系的人，因此军警索饷实际上有政治示威的意味，表明奉系不再希望吴佩孚的人一手控制内阁了。经历过阁潮的颜惠庆对此看得很清楚："现奉系在北方已成为最高权威了。"[66]因此，杜锡珪内阁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直系吴佩孚对北京政局影响力的下降是因为其在与北伐军的交战中屡遭重创，失去了与奉系争锋的资本。而因为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步步进逼，奉系仍需维护北方阵营至少形式上的团结，所以还不便直接出面全盘接收直系主导下的内阁。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阁总理就应该是一个直奉双方都能接受的人。[67]在京城中，这样的人就只有顾维钧了。

从1922年8月第一次入阁后，顾维钧就一直是直系支持的人。1926年春夏，他又作为吴佩孚的代言人在京城四处活动，所以直系当然乐见其出来主持局面。顾维钧与奉系原无多少来往，但他在"内交"上也能长袖善舞。1926年5月返回北京后，他与奉系少帅张学良开始接近。最初是代表吴佩孚与奉系谈公事，随后就有了个人之间的来往，关系密切起来。铁狮子胡同的顾宅有一个50英尺宽、80英尺长的跳舞厅，喜欢玩乐的张学良成了舞厅的常客。黄蕙兰与张学良的太太也是来往密切的好朋友。[68]杜锡珪辞职要请顾维钧接替，当然要得到奉系的首肯。10月3日，阎锡山收到的一份关于北京政情的报告，内称："顾少川得汉卿（即张学良）之赞助，可以就职，并拟另组阁员，以期顺手。"[69]显然，因为张学良这一重要因素，奉系支持顾维钧组阁。

10月5日，顾维钧就任外交总长并兼代总理，因为与颜阁和杜阁一样是摄政内阁，所以他也行使总统的权力。如果说从财政总长回到外交总长任上是他自己所希望的，代理总理主持内阁则多少有些迫不得已。当天顾维钧先去外交部，然后到国务院，在以代理总理身份演说时诉说不得不代阁的心情："（民国）十五年至今战乱，杜代阁维持数月，煞费苦心，因病告倦，弟勉承乏，自惭亦无建树，惟外交案不易决，国际地位日堕，不得不勉为支撑一时。"并称代阁只是"暂支短局"。重返外交部，顾维钧也是大叹苦经，"此次来部，已第三次，惟觉此次困难，远过往昔，明确待决悬案、交涉棘手之案极多，甚为提心"，表明入阁仍是为外交而勉为其难。[70]顾维钧对内阁没做大的更动，自己空出的财政总长一职交给了奉系推荐的潘复。按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由依附于张作霖和吴佩孚的人士组成的联合内阁"。[71]

虽说是联合内阁，但奉张的影响力已经远在直吴之上了。时评就指

出："顾阁貌为吴佩孚系下之政府，而重心实已转移。"顾维钧与"京津之奉要人周旋"密切，"奉方可以不居操纵中央之名，转得其实也"。[72]

但顾维钧并不因此就疏远了吴佩孚。舆论对此看得很清楚："顾之于吴，则仍拟于不即不离之间，维持一二。"[73]担任代理总理后，顾维钧与吴佩孚之间仍密电往来频繁，从组阁的人选，到中比修约的考虑，顾维钧都向吴佩孚报告，有所沟通。对吴佩孚推荐的印铸局长人选，顾维钧则予接受并发表任命；而对奉系推荐的盐务官员，他也发电向吴询问，以示尊重。[74]在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派系政治中，顾维钧处事十分稳重、圆滑。

当然，此时与奉系的关系更为重要。随着吴佩孚在军事上的失利，1926年底张作霖的部队从关外陆续进入华北，实际控制了北方。顾维钧十分明白，"军政是同出一辙的，军事形势改变之后，往往紧跟着政治上也要有相应的变化"，"所以有必要改组内阁以反映改变了的军事形势"。[75]11月上旬和下旬，顾维钧两次发出辞职通电，表示在"险象骤生"之际，愿意"让贤"。但顾维钧的这两个通电，更多的是在奉直力量更替之时对奉系的一种表态。颜惠庆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明白这种手法，知道发通电只是表面文章，在他看来，"顾仍想干下去"。[76]

对顾维钧的辞职通电，张作霖虽以不过问政治予以敷衍，但实际上已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对中央政治的直接干预了。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随后，天津传出内阁将置于安国军总司令之下的消息。[77]于是，12月17日，顾维钧内阁发出第三次辞职通电。12月下旬，张作霖进京后，顾维钧与他有多次面谈。顾维钧"将困难情形详细披陈"，张作霖虽"仍殷殷以维持相责"，却对新内阁提出了具体要求："阁员现不在京者甚多，自应补充改组，总须整齐完全在职，庶政令可以进行，观瞻亦可维系。"即维持顾为总理，但内阁成员需调整。随即，张作霖提出由张景惠出任陆军总长，以替换直系的蒋雁行。吴佩孚此时对内阁的组成已无影响力，此前对顾维钧也已明言内阁事由张作霖"就近主持"。但要更换直系人马，顾维钧仍不忘致电吴佩孚，以婉转的口吻与之商量，以示对吴的尊重。吴佩孚当然不会有异议，只能接受。[78]顾维钧在直奉之间的周旋于此可见一斑。

1927年1月12日，内阁在奉系主导下改组。顾维钧由代理总理成为署理总理，仍由内阁摄行总统权力。内阁成员中，"有几名吴佩孚的人被忠于张大帅的人所接替"。[79]新一届内阁组成时，南方的北伐军已进入

长江中下游地区，列强中如英国和美国也先后宣布对华新政策，声明愿与能代表中国人民或有权力谈判的当局来往，北京政府的正统性受到挑战。顾维钧在此时出面主持内阁，一方面是因为奉系还不愿直接站到前台，需要顾维钧维持，另一方面确有他几次入阁时所表示的“专为外交”的考虑。作为代理和署理总理，顾维钧只能十分勉强地维持着内阁。但在外交方面，他做出了终止中比条约和罢免安格联的决定。这是北京政府后期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两件大事。

北方的政治格局在1927年春又经一变。3月初，张作霖与吴佩孚之间在河南发生战争，这是北洋军阀史上最后一次有规模的混战。4月中旬，战争以吴佩孚失败而告终，张作霖扫除了北京政坛上最后一个有威胁的对手。于是，奉系不再需要顾维钧为他们出面维持内阁了。奉系阁员纷纷拆台离去，内阁会议“屡屡停开”。时评称：“顾维钧虽尚有不舍之意，而实已不成局面。”[80]有过以往几年政坛沉浮的经历，顾维钧明白，张作霖要指向“最高问题”了，“实现他做中国元首的毕生野心（这也是中国军阀们的共同野心）”，“了解到这一切之后，我有了准备，并希望解除我自己的一切政治职责”。[81]

6月16日，孙传芳等安国军将领通电拥戴张作霖由安国军总司令改做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替代原内阁。当天，顾维钧宣布辞职，并致函内阁，称：“胃病复发，深为痛苦。中西医士皆言病根甚深，药石难效，非静养不可。新阁未成立前，重要政务应请胡惟德召集阁议决之。外交现正紧急，故内阁已任命王荫台〔泰〕代理。”[82]所谓胃病，只是为辞职所找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与3年前冯玉祥占领北京后立即离京不同，此次辞职后顾维钧往京郊的西山暂避，这是耐人寻味的。几天后，张作霖的把兄弟、担任过黑龙江督军的吴俊升来到西山见顾维钧，代表张作霖请他回京。第二天，顾维钧即返京去见张作霖。尽管张作霖坚持要顾维钧接受一个他愿意担任的官职，顾维钧还是推辞了。但答应了张作霖的另一个要求，即留在北京城内。按顾维钧自己的说法，“我既与政府无正式联系，也未离开北京，而是与新政权保持了友好的和私人之间的关系”。顾维钧此时已经看出，张作霖的部队不足以战胜南方的国民党军队，而民心也在南方这一边，但他还是选择了留在北京，其在南北对抗中的倾向是很明显的。[83]

四 “外交系”中的派系政治

在北京政府任职的几年里，顾维钧不仅卷入了北洋军阀的派系政治中，与颜惠庆、王正廷等被舆论称为“外交系”的同僚之间也因对权位的竞争以及个人不和而时有矛盾和纷争。“外交系”虽不同于“政学系”“研究系”那样的政治派别，然而在派系政治的环境中，它的政治行为与那些真正的政治派别又有一些相同的特征。

“外交系”以外交声望而进入北京政坛，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等又皆以外交专才而自居，外交总长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内阁职位。因此他们之间对权位的竞争主要围绕外交总长一职展开，尤其在他们都有机会入阁之时，这种竞争会相当激烈。1922年6月黎元洪入京后，颜惠庆获得组阁的机会，尽管他想尽力将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安排进内阁，洛阳吴佩孚方面也极力推荐顾维钧入阁任外交总长，但他并不愿将外交总长一职交给顾维钧，而是想由自己兼任。拒绝顾维钧任外交总长的理由是生怕影响中日关系，因为顾被看作中国反日政策的倡导者，日本对他十分反感。最后颜惠庆安排顾维钧去担任财政讨论委员会的委员长。[84]1923年初，张绍曾组阁，王正廷欲获得外交总长职位而向张预约，但张绍曾却任命王为司法总长，向国会提交的外交总长是施肇基。王正廷对这一安排十分不满，不愿就任司法总长一职。按顾维钧的说法，王正廷因此以自己曾任参议院副议长的影响力使施肇基的提名未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85]1924年初孙宝琦出面组阁，准备安排颜惠庆（颜惠庆的妻子是孙的妹妹）接替顾维钧担任外交总长，但曹锟坚持由顾维钧留任该职，最后孙宝琦拟任颜惠庆为内务总长，而曹锟正式发表时又将颜改为农商总长。[86]从颜惠庆愿意入阁和对外长职位的看重来看，在孙宝琦最初的提议被曹锟否决时他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

孙宝琦内阁仅维持了半年就因孙与财政总长王克敏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总辞职。由于外交部列于各部之首，曹锟于7月初任命外交总长顾维钧代理总理。此时顾维钧与颜惠庆都是下一任正式总理的热门人选，而两人对此职位均颇为心动，跃跃欲试。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谈到此事时，称自己对总理一职没有什么兴趣。但根据颜惠庆的日记记录，顾维钧一代理总理就与颜多次讨论内阁形势。而当传出颜惠庆将组阁的消息时，他则“感到失望”，并进一步了解颜对此事的态度。[87]颜惠庆最初虽向曹锟、顾维钧等表示不愿组阁，其实也是一种姿态，主要担心组阁无

法获得通过。因此当获悉曹锟“有诚意”，在筹款方面极具能力的王克敏“肯协助”后，他立即开始为组阁活动起来，如设宴招待“愿意协助”的江苏人士，“为合作问题”与陆军总长陆锦交谈，并着手酝酿内阁成员的具体构成，显得十分积极。[88]由于颜顾两人均有意于该职，因此存在着明显的竞争关系，当时舆论也都关注于此。7月中旬《华北正报》就刊登了关于“顾颜之争”的文章，但他们两人都不希望媒体炒作此事，于是联名写信给该报予以澄清。颜惠庆最初也颇为注意与顾的关系，欲“避免与顾维钧发生误解”。[89]但事实上颜惠庆和顾维钧彼此都在为总理一职进行活动，相互间不可避免地会暗中较劲，所以最终此事多少还是影响了两人间的关系。颜惠庆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多次记录下他人对顾维钧的负面评价，他的朋友中有人请他留神顾的活动，甚至痛斥顾为“大阴谋家”。[90]而颜惠庆本人也将此时两人间的关系形容为“同室操戈”，认为顾维钧为争取总理职位进行了“阴谋活动”，因此有时会“显得有些神经过敏”，对一些不利于己的政治活动他会怀疑顾维钧是“幕后策划者”，当顾无望成为正式总理时，他又认为顾因恋栈想延长代理总理的时间。[91]此时颜惠庆对顾维钧已缺少基本的信任。

当颜惠庆出任下届总理已成定局之时，外交总长一职的归属又加深了颜顾之间的隔阂。颜惠庆在年初孙宝琦内阁中未获该职，如今自己出面组阁想再次亲兼，并以此为组阁的条件，而让顾维钧去任财政总长。但曹锟仍坚持外交之事全权委诸顾维钧，即使换总理也不能换外长，于是颜惠庆不得不做出让步，另兼列于外交总长之后的内务总长。而经过这番周折，顾维钧担任颜惠庆内阁的外交总长时，已感到“心情并不舒畅”，因为颜让他当外长“很勉强”，“并非出自他的本心，只是由于曹锟总统和他的拥护者的坚持”。[92]

此后顾维钧与颜惠庆两人围绕外交总长的职位还有过一次暗中交手。1926年5月颜惠庆被吴佩孚推出来组阁，他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名义任命仍在驻美公使任上的施肇基为外交总长，然后以施未到职为由自己兼代外交总长，而顾维钧则被任命为他本人并不愿意担任的财政总长。由于有了以往的经历以及此时复杂的局势，顾维钧对该职位“持冷淡态度”。[93]6月下旬，颜惠庆内阁被迫辞职，由杜锡珪代理总理。这时颜惠庆向杜推荐的外交总长却是并无驻外使节经历的蔡廷干，于是顾维钧只得再任财政总长。[94]与以往极力重用外交专才的情况相比，颜惠庆的这一举动是耐人寻味的。

“外交系”内因个人不和产生的纷争以顾维钧与王正廷间最为激烈。顾维钧与王正廷两人之间的恩怨可追溯到巴黎和会期间。当时王正廷因与顾维钧将娶曹汝霖女儿的谣言有关，而使顾维钧对其大为恼火，两人间的关系由此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痕。[95]当顾王两人都进入北京政府后，他们个人间的过节甚至影响了中国的对外交涉。这就是前面已经提及的1924年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谈判。中苏谈判中顾维钧与王正廷的冲突，与他们两人之间对苏联对华政策的不同理解及外交应对策略的差异有关，但两人间的个人过节与成见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顾维钧对王正廷谈判数月不向其报告颇为不满，因此在审议王提交的已草签的条约时，多了一层挑剔，参加内阁会议的颜惠庆就看出顾“对王抱有敌意”。[96]支持顾维钧的吴佩孚的谋士白坚武则认为，顾维钧对王所提意见“近于无意识”，主要是顾王两人“争私见之故”。[97]顾王矛盾是圈内人所共知的事。但在1923年夏直系逼走黎元洪后短暂的政治真空期，顾维钧与王正廷一度又走得很近。

这些事例显示，在外交系内部的纷争中顾维钧是一个主要角色。在外交系中，就在北京政府中的资历而言，顾维钧远不及其他几人。1912年，当24岁的顾维钧回国担任袁世凯的秘书并进入北京政府外交部时，颜惠庆是外交部的次长，王正廷是署理工商总长，王宠惠是司法总长，而之前后两人还分别担任过武昌起义时湖北军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但在巴黎和会上一举成名后，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声望已不在上述几人之下了，他因此获得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出长外交的机会，也因此更易于成为矛盾的中心。此外，还有一不容忽视的因素。顾维钧曾这样评价外交系的其他几人：“王正廷是个很能干的人物，当然他在外交方面不曾受过任何特殊训练。但在颜惠庆向我推荐他时，认为这个问题无关紧要。”而王正廷的博士称呼“只是美国公众随时准备赠与任何外国政治家以表示恭维的通常头衔。我想王或许后来被授予过某种荣誉学衔，但他从未获得过任何学术上的博士学位。颜惠庆博士和施肇基博士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也都没有攻读过也未获得过任何学院或大学的博士学位，但照样被人称为颜博士和施博士。中国外交界历来有一个传统，即政府当权者考虑外交官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是讲外语的能力。如果某人曾在国外求学，并获得过西方大学的学术头衔，那么他就具备了在外交界供职的一切条件。而外交人员必须具备起码的国际法和外交史方面的知识这个问题，却从未引起国家高级当局的重视”。[98]而顾维钧本人恰恰是以国际法和外交为专业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当然会认为出任外长于他是实至名归的。顾维钧的这一观念为

他与其他几人的关系增加了紧张因素。

就在外交界的资历而言，“外交系”诸人中当首推颜惠庆。1908年他就入中国驻美使馆任二等参赞，一年多后回国进入外务部。“外交系”于1920年代初出现于北京政坛，固然有前述的各种因素，但与颜惠庆出面组阁时有意识地安排外交人才有很大关联，可以说他是“外交系”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因此“外交系”中其他几人都与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99]顾维钧与颜惠庆的关系较为特殊复杂，两人间有过师生和上下级关系。顾维钧在圣约翰读书时，上过颜惠庆的翻译课，刚回国进外交部时颜是次长。两人又因外交总长和总理两职产生过竞争。两人间虽因此互有看法，但关系并未完全恶化，因为顾颜两人在外交方面有着相当一致的立场，他们间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来自彼此间的“瑜亮情结”。1924年9月颜惠庆成为总理后就表示要与担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合作，对顾所主张的外交方针也持肯定的态度。[100]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谈道：“颜和我一直是好朋友，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经常看法一致。一般说来，我们都坚持维护中国的主权，愿意尽自己最大努力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平等的地位。我们都认为有关中国主权的问题，中国不应该屈从于外国。”[101]在“外交系”中，除了顾维钧与王正廷之间个人恩怨太深以至于关系太僵之外，与其他人之间的分歧或纷争并未演进到激化的程度。

有着留学美国背景的“外交系”在进入国内政坛时，有按照西方模式推进国内政治的潜在愿望。但是在军阀操控的派系政治中，外交系实际上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他们在内政方面的愿望根本无法获得实现。顾维钧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他对国内政治不感兴趣，无意卷入国内各派纷争，还谈到“外交系”的力量就在于“不参与他们之间的倾轧，超脱于各派斗争之上。这样，各军事集团就能利用像汤（尔和）、王（宠惠）、罗（文干）、颜（惠庆）和我自己这些文官。我们在人们的心目中，被认为是独立的，未直接卷入政治斗争，更没有参与旨在统治国家的军事斗争”。[102]颜惠庆在自传中也有相似的表示。不过从前面所述来看，顾维钧的这番表白显然并非他当时的想法，而在时人眼中，他们也不是完全独立的。这些话其实是顾维钧在经历了派系政治的倾轧之后产生的对派系政治的厌恶，折射出他和“外交系”诸人入阁卷入国内政治不算成功的经历。正是这一经历使他此后学会了对政治保持距离，也对他与国民党的关系产生了影响。

但在北京政府中任职留下的不全是苦涩的记忆，正如黄蕙兰所说顾维钧不讨厌来自他的地位的权势和荣誉。因为出任过摄政内阁总理，这就与一般的总长不一样。1941年6月，顾维钧即将从驻法大使转任驻英大使，法国维希政府要授予他一级十字勋章，这是法国的最高奖章，专授国家元首。顾维钧认为不妥，告诉法方切勿如此行事。但法方回答说，因为他担任总理时摄行总统的权力，所以授予这个勋章是完全有理由的。顾维钧非常认可这一答复，认为“法国确实在处理有关礼宾方面的问题上经验丰富，十分在行”。[103]从中不难读出顾维钧对被尊为国家元首的自得。这种自得也传染给了黄蕙兰，她自称“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夫人”。[104]

由于顾维钧在北洋后期多次在内阁中出任要职，尤其在1927年初北伐军已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后，还担任总理出面组阁，因此被舆论和南方政治力量视为北洋要员。1928年7月初，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进占北京后，庆祝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有一项就是要求中央政府通缉北洋“腐化官员”，顾维钧名列其中。7月10日，国民政府委员会开会议决，对顾维钧等“劣迹昭著”的北洋官员十余人“一体通缉，归案惩办，以儆奸邪，而申国纪”。列席国府会议的有已经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105]国民政府还下令没收顾维钧在铁狮子胡同的大院和天津等处的房产。

于是，顾维钧只得离开中国，赴欧洲躲避国内的政治风浪。此时，距他从驻英公使任上回国在北京政府中任职已过了6年。

[1] 《专电》，《大公报》1922年7月19日，第3版。

[2] 《欢迎王代表与赎路年限》，《顺天时报》1922年3月25日，第2版。

[3]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6月6日。

[4] 《顾公使在津演讲记》，《大公报》1922年6月16日，第10版。

[5] 《欢迎顾维钧代表志》，《大公报》1922年5月29日，第2版。

[6] 远公：《顾使演说之感言》，《大公报》1922年6月16日，第7版。

[7] 《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

[8] 杨天宏：《军阀形象与军阀政治症结——基于北洋时期民意调查的分析与思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9] 王聿均：《舒尔曼在华外交活动初探（1921～19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1969年。

[10] 除了顾、颜、王宠惠三人外，未加入颜阁、王阁但在政界和外交界都有影响的王正廷被舆论列入“外交系”。在王阁中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虽无直接的外交经历（担任过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但因与王、顾关系密切，也被看作“外交系”成员。还有于1923年初短暂回国的施肇基也被视为“外交系”成员。参见金光耀《外交系初探》，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第194～197页。

[11] 《顾专使在青年会之演说》，《大公报》1922年6月16日，第3版。

[12] 《顾公使在津演讲记（续）》，《大公报》1922年6月17日，第9版。

[13] 罗文干：《狱中人语》，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第112、118页。

[1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704页。

[15] 《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710、728页。

[16] 《新内阁发表后之新形势》，《大公报》1922年8月7日，第6版。

[17] 《专电》，《大公报》1922年9月21日，第3版。

[18] 天籁：《王署阁果然实现矣》，《大公报》1922年9月21日，第2版。

[19] 《王内阁发表之经过（二）》，《申报》1922年9月23日，第10版；罗毅：《外交系与北京政治：1922～1927》，第59页。

[20] 《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790～791页。

[21] 《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804～806页。

[22] 《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870页。

[23] 《傀儡内阁动摇之内幕》，《民国日报》1922年10月20日，第3版。

[2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6页。

[2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9页。

[2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9页；《申报》1922年11月19日，第6版。

[2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50～251页。

[28] 《申报》1922年11月29日，第6版。

[29] Robert Jarman，eds.，*China Political Report*，Archive editions limited，2001，Vol.2，p.437.

[30] 《内阁改组说》，《申报》1922年11月26日，第3版。

[31] 《专电》，《大公报》1923年1月25日，第3版；《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1月26日，第3版。

[32] 张梓生：《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解剖》，《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1923年，第20页。

[33] 《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第13页。

[34] 《顾维钧长外已定之情形》，《益世报》1923年4月6日，第3版，转引自罗毅《外交系与北京政治：1922～1927》，第83页。

[35]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卷，第256～260页；《民国日报》1923年6月12日，第3版；《益世报》1923年6月10日，第3版，转引自罗毅《外交系与北京政治：1922～1927》，第88页。

[36] 《本社专电》，《民国日报》1923年6月24日，第2版。

[37] 《摄政内阁大起暗潮矣》，《益世报》1923年6月23日，第3版，转引自罗毅《外交系与北京政治：1922～1927》，第94页。

[38] 《顾外长之就职》，《顺天时报》1923年7月25日，第2版。

[39] 《顾少川出处未定》，《大公报》1923年6月28日，第2版。

[40] 《专电》，《民国日报》1923年7月7日，第2版。

[41] 《颜、顾、王之态度》，《晨报》1923年7月14日；《白坚武日记》，第429页。

[42] 《民国日报》1923年7月12日、14日。

[43] 《顾外长昨午就职情形》，《大公报》1923年7月24日，第2版；《申报》1923年7月24日，第4版。

[44] 《本社专电》《冯玉祥职权的上帝化》，《民国日报》1923年7月25日第2版、7月29日第3版。

[45] 《时局迁延中各方内部的活动》，《东方杂志》第20卷第13号，1923年，第3～4页。另一篇时评则提到“外交系诸人据传竟有要保定通电停止最高运动的要求”，见《长期政变中的国际共管声》，《东方杂志》第20卷第12号，1923年，第9页。

[46] 《顾外长与外报记者之谈话》，《顺天时报》1923年7月27日，第2版。

[47] 《离京议员复顾维钧书（其一）》，《申报》1923年7月30日，第6版。

[48] 《离京议员复顾维钧书（其二）》，《申报》1923年7月30日，第6版。

[49] 顾实：《中国的泰勒兰》，《努力周报》第65期，1923年8月。

[50] 《全国共弃之顾维钧》，《民国日报》1923年7月25日第10版、7月27日第10版。

[5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68页。

[52]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132页。

[53]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10页。

[5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2页。

[55] 《顾维钧奔走沪汉之任务》，《申报》1925年11月13日，第13版。

[56] 《唐夫人埋玉记》，《申报》1925年11月21日，第11版。

[57] 《申报》1926年4月21日，第5版。

[5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7～280页；《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328页。

[59] 《本馆要电》《各社要电》《顾维钧到京后之行动》，《申报》1926年5月8日第4、5版，5月14日第6版；《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332页。

[60] 因直系认为颜惠庆出任总理是恢复1924年10月北京政变时被推翻的内阁，故称复职，而此时无总统，故由内阁摄行总统职权。

[61]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330、335页。

[62] 李景铭：《一个北洋政府官员的生活实录》，《近代史资料》总6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55页。

[63] 《僵局中之政府与时局》，《申报》1926年5月27日，第5版。

[64] 胡震亚选辑《吴佩孚与顾维钧往来函电（1923年8月～1927年4月）》，《民国档案》2009年第4期，第29页。

[65]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370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91～293页。

[66]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371页。

[67] 罗毅：《外交系与北京政治：1922～1927》，第125页。

[68] 李纶波：《王怀庆二三事》，《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18～119页；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159页。

[69] 《北京钱孟材致太原阎督帅江电》（1926年10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转引自罗毅《外交系与北京政治：1922～1927》，第126页。

[70] 《申报》1926年10月6日，第4版。

[7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96页。

[72] 《顾阁与奉方之关系》，《申报》1926年10月11日，第5版。

[73] 《顾阁与奉方之关系》，《申报》1926年10月11日，第5版。

[74] 胡震亚选辑《吴佩孚与顾维钧往来函电（1923年8月～1927年4月）》，《民国档案》2009年第4期。

[7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97页。

[76]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387页。

[77] 《津议拟设临时内阁》，《申报》1926年12月4日，第5版。

[78] 《顾维钧致吴佩孚密电》（1927年1月7日、8日）、《吴佩孚致顾维钧密电》（1927年1月9日），胡震亚辑《吴佩孚与顾维钧往来函电（1923年8月～1927年4月）》，《民国档案》2009年第4期，第34页。

[79]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97页。

[80] 《北京通信》，《申报》1927年5月1日，第9版。

[8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99页。

[82] 《顾维钧已辞摄阁》，《申报》1927年6月17日，第7版。

[8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01～303页。

[8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2、273页。

[85] 《张阁将成与巨变将至》，《大公报》1922年12月25日，第3版；剑公：《张阁成立与最高问题之昨讯》，《大公报》1923年1月5日，第3版；《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57～258页。《大公报》1923年1月26日第3版也有报道称“施被参议院否决，实出于王正廷破坏所致”。

[8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4年1～6月）》，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3，第89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0页。

[8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1页；《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55～158页。

[88]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56～157、161页。

[89]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56、159页。

[90]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56、158、162、164页。

[91]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65～166、169页。

[9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2～273页。颜惠庆内阁是9月14日宣布的，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赞成将顾留在阁内”。《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73页。

[9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80页。

[94]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349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82页。

[9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92～193页。参加过巴黎和会的梁和钧对此事的回忆与顾的回忆稍有不同，见胡有瑞、卢申芳《“王正廷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近代中国》第29期，1982年。

[9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7页；《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26页。

[97] 《白坚武日记》，第459、470页。

[9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6～337页。

[99] 1924年夏颜惠庆与顾维钧暗中竞争总理职位时，王正廷就站在颜一边，在国会中为颜积极活动。《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60页。

[100]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179、183页。

[10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2页。

[10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97页。

[103]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中华书局，1986，第585页。

[104]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155页。

[105] 《北京祝捷大会余音》《国府通缉安福余孽》，《申报》1928年7月9日第9版、7月11日第8版。

第六章 国难当头

一 张学良的外交高参

顾维钧于1928年底抵达欧洲。此后的几个月中，他主要住在巴黎，但也与黄蕙兰一起去地中海边的尼斯及摩纳哥等地休闲度假。摩纳哥是著名的赌城，顾维钧偕夫人出现在那里，引起媒体的关注，称“顾博士夫妇环游欧洲，忘情政治舞台，逍遥于欧洲著名消闲别墅”。[1]

但作为一名外交官，顾维钧其实是无法沉溺于欧洲的湖光山色之间的。虽远在欧洲，他仍关注着国内政局和与中国有关的外交动态，经常与欧洲各国政界人物见面交谈，以了解国际局势的变化及对中国的影响。一次，在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长贝特洛（Philippe Berthelot）谈话时，顾维钧问他对苏联的看法。贝特洛说，从欧洲的标准来看苏联还不算一个强国，但在远东，它的军事实力具有明显优势，因此中国与其打交道必须小心谨慎。此次谈话后，顾维钧给罗文干发了一封电报，请他转告张学良，必须谨慎处理东北的对苏关系。[2]

顾维钧此时关注苏联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是因为中苏关系正面临着危机。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后，颇想在东北干一番事业，包括从外人手中收回一些主权。在东北占据中国权益的主要是日本和继承旧俄的苏联。日本不仅在东北侵占大量权益，而且一心想吞并东北，进而染指整个中国。但年少气盛的张学良没有将直接威胁中国的日本视为主要对手，而是将矛头指向了苏联。1929年7月上旬，东北地方当局查封了苏联在东北的贸易机构，撤销了中东铁路苏籍局长的职务，并下令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的苏联人在12小时内离开中国。7月中旬，苏联做出强硬反应，宣布对华绝交，断绝中苏间铁路交通。7月下旬，中苏在边境地区开始发生军事冲突，随后发展成一场延续数月的中东路战争。

因此，收到顾维钧的意见后，张学良发电报请他立即回国到沈阳

来。这样，在欧洲待了半年多时间后，顾维钧打道回国，于9月底抵达沈阳。当晚，张学良就与他见面，参加会面的还有罗文干。会谈的主题围绕着与苏联的关系。此后，每周至少有三次，张学良会邀请顾维钧去打高尔夫球，实际上主要是聊局势。顾维钧与张学良前些年在北京就有了来往，此时就走得更近了。他发现张学良对中苏间已经发生的军事冲突前景非常乐观，就问道："假如你发现你的对手手里真正有好牌，你怎么办呢？"张学良思考了一会，给了一个不是答复的答复："我自有对策。"[3]

张学良将顾维钧请到沈阳，是要借重他的外交才干。但顾维钧毕竟仍在国民政府的通缉名单上，因此回国的消息一经传出，并有报道称张学良将请国民政府取消对其通缉令，南方国民党势力便纷纷发声反对。国民党上海各区党部呈请市党部严缉顾维钧。上海国际法学会在顾维钧尚未回国但已有消息传出其将参与对苏外交时，就请国民政府"必须协拿到案，明正典刑"。[4]缉拿顾维钧的呼声都指出他是军阀余孽，助长内乱，在直奉操控的北京政府任职成为顾维钧的政治包袱。面对舆论的压力，张学良马上否认向国民政府保荐过顾维钧。顾维钧自己也对报界表明："此行不问政治，专心实业。"[5]

所谓不问政治只是敷衍媒体的表态，但专心实业却也不全是一句假话。还在北京政府任职期间，顾维钧在外交部的一位同僚因为需要用钱，就将黑龙江齐齐哈尔附近一块二平方英里的土地以2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他。张学良知道他有这块地，此时有意再送给他同样面积的一块土地。顾维钧以无功不受禄为由辞谢了张学良的好意，但在1930年2月按实价购买了7000垧地，差不多二平方英里。新购买的土地在东北军屯垦的洮安，顾维钧制订了开垦计划，成立了垦荒公司，请了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系毕业的陶略矦担任经理主持其事。公司雇了佃农，最早开张的第一村有几十家佃户，村子里盖了几排新房，每户人家住一座平房，有四间屋。公司还雇了持枪的保安。[6]对经营实业，顾维钧确也花了些心思。

当然，顾维钧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外交事务。顾维钧刚回国激起的反对声消退后，张学良即与南京方面沟通，国民政府于1929年12月下旬撤销了对顾维钧的通缉令，一同撤销的还有对梁士诒和王克敏的通缉令。十天后，张学良聘任顾维钧为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7]

此时，掌控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是蒋介石，但各实力派仍凭借军事力

量占据着各自的地盘。1930年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结成反蒋联盟。5月，以反蒋联盟为一方、蒋介石为一方的中原大战爆发了。7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改组派和以邹鲁等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等政治反蒋派聚集北平，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政治反蒋派与军事反蒋派联合起来，筹划在北平另立国民政府。控制东北的张学良成了反蒋派和蒋介石竞相拉拢的对象，作为张学良外交高参的顾维钧由此卷了进去。

1930年8月，顾维钧与张学良一起到北戴河避暑度假。8月18日，汪精卫派郭泰祺持其亲笔信赴北戴河见顾维钧，告诉他反蒋各派将另组政府，由阎锡山当主席，汪精卫当行政院长，请他出任外交部长。[8]顾维钧没有接受反蒋派的邀请，但也未中断与他们的联系。这反映的是张学良的立场。张学良对反蒋各派推他担任反蒋联军副司令一职沉默以对，但也没有公开表示站在南京一边，他还在观察局势的发展和两边的力量对比。9月1日，反蒋派在北平宣布成立国民政府，推选阎锡山任主席，并定9月9日举行就职典礼。就在北方政局变化的关键时刻，顾维钧于3日上午抵达北平，并从车站被接去汪精卫家参加为他接风的午宴。汪精卫再次请顾维钧出任外交部长。顾维钧问汪精卫，他们的政府是否已取得国际承认的保证，并称一个不被列强承认的政府是无用的。[9]虽然顾维钧仍表示对政治没有兴趣，但他问汪精卫的话却是意味深长的。

顾维钧的态度最终还要取决于张学良的立场。此时舆论纷传张学良要倒向反蒋派，并会派顾维钧加入反蒋政府。蒋介石抓紧对张学良的拉拢和施压，9月4日致电进行劝阻，逼其表态。蒋介石派到沈阳的张群和吴铁城也积极活动。张学良权衡再三，于5日致电蒋介石表明态度，称“近日谣言百出，实已辩不胜辩”，顾维钧等赴北平皆因私事，“不能即谓其有何作用”，已令其速归，“以免淆惑听闻”。当晚，张学良还向张群、吴铁城表示，“予之拥护中央始终不渝”。张学良的表态使蒋介石松了一口气，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张汉卿（学良）尚能知大体，对于余电恭维如命也。”[10]

顾维钧参加汪精卫接风宴后在4日还表示在北平“尚有数日留”，但因为张学良的电召，5日清晨即离开北平返回北戴河。[11]这一时期，顾维钧是作为张学良的代表与汪精卫等反蒋势力来往的。张学良脚踩两只船时，需要有人与反蒋派周旋保持联系，顾维钧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但张学良一旦亮明自己的态度，他当然就要离开反蒋派聚集的北平了。

这一年夏天在北戴河度假的颜惠庆以局外人的身份观察北方政局，他评论道："张汉卿在最后时刻改变了主意，这样顾等人就上当了。"[12]颜惠庆是根据他自己在北京政坛派系政治中沉浮的经历做这番评论的，但顾维钧此时与张学良在一条船上共进退，于他而言，是算不了上当的。

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巧电"，呼吁"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静候中央措置"，并率20万东北军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张学良倒向蒋介石一边后，顾维钧与原先并无交往的国民党方面越走越近。10月下旬，顾维钧回上海为母亲举行丧礼，上海市长张群亲临致丧，出席者近千人，极一时之盛。张群在大华饭店办茶话会，外交部长王正廷之外，顾维钧也在被邀之列。[13]

东北军主力入关后，东北防务被削弱，给虎视眈眈的日本军国主义以可乘之机，其加快了侵华步伐。1931年6、7月间，日本在东北接连制造了"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并大肆煽动战争狂热，为全面侵占东北制造舆论。正在北戴河避暑度假的顾维钧，从日本的新闻报道中读到日本政府和军部正加紧部署，尤其少壮派军人煽动抗议"中村事件"，判断事态严重，会进一步发展。他告诉也在北戴河避暑的张学良秘书长王树翰和奉天省长臧式毅等人，日本人会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也许会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迫使中国在处理事件时妥协就范。王树翰等认为顾维钧所谈十分重要，请他去北平与张学良深谈。顾维钧虽未答应去北平，但给张学良写了封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张学良接信后，专门派飞机来接顾维钧到北平，要与他详谈。但见面后，顾维钧觉得，张学良并不认为局势如他判断的那样严重，于是留下一封信，表示怕会发生大事，但愿不发生，然后返回北戴河去了。此时是7月份。[14]接着发生的事情表明，张学良对顾维钧的预警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是犯了多大的错误。

9月18日，顾维钧从北戴河回到北平。[15]当天深夜，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的计划，炸毁了沈阳北部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道，却诬称中国军队挑起事端，向东北军北大营驻地发起突然袭击，并用大炮轰击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9月19日早晨6点钟，张学良的顾问端纳给顾维钧来电话，告诉他沈阳发生的事情。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起，张学良请他立即去商量要事。见面后，与十来位东北军将领讨论了一整夜仍苦无对策的张学良要顾维钧谈谈他的看法。在了解事变情况后，顾维钧向张学良提出两个建

议：第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事变；第二，立刻派一位能说日语的人去找在旅顺的日本总督以及南满铁路总裁。顾维钧认为，诉诸国联是为了引起世界各国和公众舆论的注意，给日本以某种压力，使它不再扩大在东北的侵略行动。但由于对诉诸国联究竟能产生多大效果并不抱太大的指望，他又希望能派人去探听在东北的日本负责官员的真正态度，以便为事件的解决寻找可能的途径。作为一个外交官，顾维钧对九一八事变的最初反应就是寻找外交解决的办法。张学良认为顾维钧的第二个建议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但在顾维钧的多次陈述下，感到派个人去也不会有害处。但对顾维钧的第一个建议，张学良立即赞成，并请他与在北平的外交使节联络。[16]

当天，顾维钧以张学良的名义访晤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他告诉英国公使，张学良正考虑依据国联章程或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对日本提出控诉，并询问如果中国采取这一行动，英国能否带头响应。蓝普森表示，以他个人的看法，根据英国与日本的关系，英国不会单独采取行动。[17]

英国是国联的支柱，蓝普森的态度对中国寻求国联解决事变是一个打击。此后数日，由于国联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反应消极软弱，以及判断日本发动事变“不过是寻常寻衅性质”，张学良对依靠国联解决失去信心，转而倾向于对日直接交涉，以“免除事件扩大”，尽快了结事端。[18]顾维钧在与蓝普森交谈中也表示，国联的权力有限，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无法采取有效行动，因此，中日之间的直接谈判可能是解决事端的关键途径。[19]这样，事变发生几天后，张学良与顾维钧都不排除通过中日直接交涉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然而，这一方针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应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二 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从江西“剿共”前线赶回南京，于21日召集军政要员开会，商讨对日方针，决定一面先行提出国际联盟，诉诸公理；一面团结国内，共赴国难。虽然国联对日本侵华的反应不及中国预期，但蒋介石仍坚持须依靠国联来解决事变，认为“国联虽不可尽恃，亦非尽不可恃”，“中央所以尽力于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少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于此”。[20]

9月下旬，蒋介石两次致电张学良，要其来南京，“对外交事须待面商”。张学良先派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到南京，代表他见蒋介石。但蒋介石对万福麟所表达的“单独交涉”“急求速了”方针不能赞同，表示“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21]此后，蒋介石再次电邀张学良来南京，张学良遂派顾维钧南下。

10月1日，顾维钧乘张学良的专机抵达南京。刚下飞机，他向媒体表示：“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凡个人意见所及，当向政府建议，以供采择。张副司令对东省事件，认为国家整个问题，一切听中央交涉解决。张氏与中央日有电报往还，本人此来，系附带作详细之陈述。”[22]表明他是作为张学良的代表来南京的。

蒋介石获悉顾维钧到南京的消息，当晚在日记中写道“顾少川对于外交亦有相当研究，是为一平时之好手也”，流露赞赏之意。到南京次日，顾维钧在吴铁城陪同下拜见蒋介石，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当天，顾维钧被聘为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23]特种外交委员会是九一八事变后为应对外交危机而成立的机构，由考试院长戴季陶任委员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任副委员长，委员有蒋介石、孔祥熙、于右任、陈立夫、陈布雷等。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已因事变而辞职，特种外交委员会担负着外交决策的重任。顾维钧并非国民党党员，刚到南京就成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蒋介石还有任命其为国联代表的考虑，可见在外交上对其之倚重。这是顾维钧在国民党政权中担任的第一个职务。退出北京政府后，顾维钧在许多场合表示过要脱离政界，甚至离开外交界，但九一八事变引发的民族危机又将他推到了中国外交的第一线。顾维钧的一生注定是要与中国的外交联系在一起的。

与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官交谈后，顾维钧看出张学良与蒋介石对处理事变的不同方针。他认为，在北平的人倾向于与日本直接接触，以寻找收回事变后被日本所占领土的办法，而南京政府则反对以任何形式与日本直接接触。[24]顾维钧本人也倾向于直接交涉，因此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中，顾维钧成了沟通在北平的张学良与在南京的蒋介石之间不同意见的主要渠道。刚到南京，他向蒋介石说明，张学良在对日方针上“始终与政府一致”，以打消蒋的担忧。后来11月下旬，蒋介石计划北上，张学良有顾虑，不想让蒋到北方来，顾维钧又在蒋面前予以疏通。[25]

国联在中国提出日本侵略问题后，于9月30日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命令其军队从速撤出自9月18日以来所占领的地区。10月5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为撤兵问题照会日本外相币原。但10月9日，币原在答复中国照会时提出，在日本撤兵前中日两国政府必须先直接交涉，“两国间应速协定可为确立通常关系之基础大纲数点，此项大纲协定后，国民感情见缓和时，日军始能全行撤退于满铁附属地内”。[26]日本的方针是撇开国联，由中日两国政府直接交涉解决事端。

特种外交委员会讨论日本的这一要求时，出现了意见分歧。一些委员主张拒绝日本关于中日直接交涉的要求，而要其遵守国联决议案撤出自事变以来占领的地区。顾维钧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在讨论中说，指望日本听从国联的决议撤军是不可能的，而根据国联盟约，它也无权强制推行它的决议。因此，他主张在国联的监督和帮助下，中日两国直接谈判解决存在的一系列问题。[27]顾维钧的这一主张得到戴季陶、宋子文和另外几位委员的支持，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舆论及民心都不赞成对日直接交涉。

顾维钧主张对日直接谈判，是因为作为一个外交官，他认为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常方法，而不管这争端有多么严重。如果中国对日本的提议完全拒绝，那么就正中日本之计，使日本可以实行其抗拒国联的策略。在日本外交军事双管齐下的情况下，中国若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全盘方针从容应对，一旦失去国际同情，外交形势将更为严峻，单独面对日本更为不利。华盛顿会议期间中日在美英列席下直接谈判解决山东问题的先例，也是顾维钧采用直接交涉策略的重要原因。他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提到，“两国直接交涉终难避免。如能由第三者加入旁听，如华府解决山东问题之例，实属上策”。[28]

直接交涉要得到蒋介石的赞同。10月15日，顾维钧与戴季陶、宋子

文在宋家中讨论外交方针，蒋介石亦到场。顾维钧向蒋介石表示，对日方提出的直接交涉总要有所准备。蒋介石答称，如果直接交涉，“至少须设法办到华府办法，由第三国代表旁听为宜”，立场有所改变。次日清晨，蒋介石约见顾维钧。顾维钧再次提出，“此事关系甚大，恐不能全恃国联，亟望政府速定具体方针与步骤，庶不至拖延愈久，收拾愈难”。经过一番讨论，蒋介石同意“撤兵后，如能得国联或第三国之代表加入为公证人，亦可开始交涉”，有条件同意直接交涉，并要顾维钧根据已有草案提出对日交涉大纲若干条。[29]

此后数日，顾维钧倾全力于制订一个对日交涉的大纲。10月19日早晨，顾维钧与蒋介石、戴季陶、宋子文、颜惠庆进行商讨，确定了具体方案。这个方案关于日本撤兵的内容为：（1）日本赶速撤兵，限十日内；（2）日本撤兵后，我方即须接收，须有中立国人员监视；（3）日军未撤完前，国联行政院不能闭会；（4）日本撤兵的时间和地点，应有商议，中立国人员也要参加。针对币原照会提出的两国应定基础大纲，该方案提出中日两国间任何问题不得以武力解决；保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及行政统一；日本尊重中国在东三省实行“门户开放”或机会均等之原则；遵从国联盟约和《非战公约》，中日两国不能解决之问题要在国联协赞下用其他国际方法解决。[30]这是一个调和了诉诸国联与对日直接交涉两种途径的折中方案，期望在不抛开国联或第三国的情况下，通过一定形式的谈判使日本最终撤兵。它显示了顾维钧在对外交涉和对内协调中务实的精神和圆滑的手段，面对复杂情况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中国政府根据这一方案进行外交努力，国联行政院于10月24日又通过一决议案，要求日本在11月16日前完成撤兵，然后中日开始直接交涉两国间悬案。但日本对这一决议案投了反对票，并于10月26日发表声明，反要求中国尊重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条约权利，将日本撤兵与所谓日本在中国东北之条约权利联在一起。

日本反对国联的决议使顾维钧感到问题的棘手：“国联结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未免令吾进退维谷，夜长梦多，殊堪忧虑。”但他认为中国仍可努力，应该“请各列强分头劝告东京开始自动撤兵，以便转圜”，“留与日接洽余地”，并“谋一无损双方体面而有利吾国主张途径”。10月28日，蒋介石邀顾维钧面谈，他将此意做具体说明，得到蒋的肯定，“深以速觅两全之途径为然”。[31]

但几天后，蒋介石的态度就改变了。11月2日，蒋介石邀顾维钧午宴，参加者有戴季陶、李石曾、于右任、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蒋介石在谈话中表示："日军未撤尽以前，不与日方作任何接洽，即将来撤兵后如何开议，手续问题亦不拟先表示。"[32]这样，蒋介石又回到了原先不以任何形式与日本直接接触而寄希望于国联的立场。蒋介石的这一变化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宁方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粤方开始携手有关。[33]但寄希望于国联的方针因为国联的软弱和日本的强蛮必然使中国的外交陷入僵局，无法取得进展。于是，蒋介石决定重用顾维钧，以应付日本侵华引发的外交困局。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担任了3年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因民众抗议国民政府对日外交软弱并遭示威学生痛打而辞职。国民政府随即任命了施肇基继任外长，但施肇基正代表中国在国联活动，并未回国就任，由次长代理部务。11月23日，国民政府任命顾维钧为代理外交部长。5天后，改任署理外交部长。顾维钧最初并不愿接受这一任命，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谈了最终接受的过程："近日蒋主席及国府诸公，屡以外交一席至关重要，嘱弟暂为应代，迭经陈明种种理由，坚辞至再。顾终以国难当前，谅难督责，今日即正式发表代理。"[34]顾维钧明白，蒋介石是精明的现实主义政治家，知道必须面对对日谈判，但迫于国内舆论压力无法公开表明，而顾维钧主张对日直接交涉，又不是国民党人，因此将他推到了前面。[35]

劝说顾维钧接受外交部长职务的国府诸公中有财政部长宋子文。顾维钧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了出任外长的三个要求：（1）为了有效执行外交部长的职权，对驻外使领馆应定期发放经费；（2）对外交人员的选任，由外长全权办理，而不须经过政府的特别指示；（3）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决策机构有权讨论、决定重要问题，但有关外交的决议，外长应事先得到通知。这三项要求都获得同意。[36]前两项要求基于顾维钧在北京政府主管外交的经验，第三项要求表明他明白出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与担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的不同。

11月30日，国民政府举行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仪式。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出席，并发表长篇演讲。蒋介石在演讲中说："外交之折冲樽俎，其效力之远，收效之大，有远胜于军事十倍千倍者。亦在乎任之专，而信之笃，使外交当局，得以负责勇进，以收最后之胜利。""今顾署部长就职于危难之秋，受命于存亡之交，深信其必能力肩艰巨，不辱

使命”，“布展其抱负，发挥其长才，俾我国外交得以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庶不负政府与国民期望之殷也。”这篇演讲词由蒋介石手书，显示出其对依靠顾维钧以实现外交解决的厚望。[37]

仪式结束后，顾维钧到外交部就任，对全体人员致辞，称“本人两年来未问政治，今因国难当前，迭接中央党政当局及蒋主席电召来京，参加特种外交委员会，嗣奉令代理外交部长”，“今后希望大家本数年来勘助王部长、李部长之精神，来勘助本人。如有意见，尽可随时提出，以供研究，本人对事当负全责，对人毫无问题”。[38]

接长外交后，顾维钧即寻找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九一八事变的新途径。11月23日，他在已答应出任代理外交部长后对记者说，“依据华盛顿《九国条约》，可请将两当事国纠纷之文件，实行公布，并召开国际会议，根据《九国条约》，以求解决之途径”。[39]在国联难有作为的情况下，这一谈话透露出希望美国介入中日冲突的想法。

这时，东北的局势在进一步恶化。沈阳沦陷后，东北的军政机关并未撤至关内，而是迁至锦州，以显示中国坚持东北主权的决心。但日本军队为占领整个东北，决心夺取锦州，将中国政府机构完全逐出关外。因此，锦州一时成为中日问题的焦点。顾维钧对锦州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认为“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而“东省全失以后，所有边患或将次第引起，患隐无穷，关系全国尤大。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40]顾维钧保全锦州的方法是争取列强的支持以维持锦州的中立，如果不行则只有以本国实力进行抵抗。

11月24日晚，顾维钧在美国驻华公使詹森（Nelson Johnson）家中与美、英、法驻华公使会晤，提出了和平保住锦州的设想。他提出，为避免中日在锦州发生冲突，可在锦州及邻近地区建立中立区，倘日本坚持，中国军队可以撤出该地区，但日本必须向三大国保证不进入该地区。顾维钧向三国公使强调，最后一点即日本向三大国保证是中立区计划的关键。他希望三国公使能探询他们各自政府对此建议的反应，三国公使均表示会请示本国政府。[41]

25日早晨，特种外交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顾维钧的中立区方案。随

后，顾维钧面见蒋介石商讨，获得蒋的同意。[42]当天，国民政府外交部就锦州中立区发表声明，称中国已向国联行政院提议设立中立区域，“如行政院正式采纳此项建议，中国可将锦州一带军队撤至关内。同时，中国政府通知英、法、美在京公使关于设立中立区之意义与方法，请代为转达各国政府。其办法如下：为避免任何冲突及合法解决满洲问题起见，中国循日方之坚请，业已预备将锦州军队撤至山海关，惟须日方给一保证，能使英、法、美满足，表明日方不将军队开入该区，使不侵犯中国之行政权与警权”。

顾维钧提出锦州中立区计划，出于这样两个考虑：日军已开始向锦州进军，中立区计划可避免东北全境陷于日军之手；中立区计划的实现必须由日本向英、法、美等国做出保证，这是让大国尤其是非国联成员的美国介入中日冲突的有效途径。借助西方大国是顾维钧处理对日问题的一贯思路。此外，这也与顾维钧对日本国内政治的了解和判断有关。顾维钧署外交部长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按外交惯例到部祝贺，并表示日本可接受通过列强提出的锦州中立区建议，离开时还转达币原外相的私人口信，希望两国外长能够找出对双方都公允和满意的解决办法，并说尽管在日本国内有压力，仍会为此努力。[43]顾维钧与币原在华盛顿会议上是对手，但最终毕竟解决了山东问题，这一经历增进了彼此的了解。顾维钧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少壮派激进军人所为，而币原的对华外交政策与军人不同。他当然明白，币原的出发点是日本的利益，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总比通过军事手段解决要好，这就是他作为一个外交官的想法。

但列强对中国有关中立区的建议并无积极的回应。11月26日，美国公使詹森告诉顾维钧，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建议中国军队从锦州撤至山海关，以避免进一步冲突；美国不愿介入中立区计划，也不愿提供担保。[44]而英、法两国对中立区的建议则没有直接表态。11月下旬，顾维钧多次会晤英、法两国驻华公使，希望在英、法控制下的国联能采取强硬些的措施。顾维钧告诉他们，国联解决中日问题的方案，至少要增加三条保证：（1）日本停止敌对行动；（2）日本在确定的期限内撤军；（3）以某种形式的中立国监督使日军撤退。他强调，确定日本撤军的期限十分关键，这是中国对国联的最低要求，否则，无法解决目前严重的局势。[45]

有关锦州中立区的外交交涉尚在进行之中，但消息一经传出，立即

在中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遭到民众的激烈反对。走在最前列的是全国各地的学生，南京、上海、北平、山东等地的学生团体代表纷纷来到外交部，质问顾维钧。

顾维钧进外交部后担任代理次长的金问泗后来写道：

>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吾国民情激昂，学潮澎湃。顾外长就任无多日，金陵大学数十人，到部请愿，反对锦州中立之议，要见顾氏。适顾氏往中央党部开会，不在外部。我以代理次长接见，谓非外长不可。乃与党部打电话，请顾氏返部。陈立夫先生接话，谓可请学生往党部，又不肯往。我乃请其派代表二三人，在客厅接谈，将其请愿各点写出，允为转陈部长……此后数日，学生们又几次结队成群来部，高呼口号，遍涂标语而去。[46]

在出任外交部长的最初几天，顾维钧差不多每天要与几批学生代表见面，向他们解释外交政策，要他们相信他本人捍卫中国权益的决心。12月2日，徐州学生请愿团1300余人到南京，顾维钧回答他们的提问时表示，“交涉方针，仍本不撤兵不谈判原则”，“一方信任国联和平处置纠纷，一方在原则上仍力求自卫”。[47]这样的会面最初还能起到沟通的作用，学生代表会向集结在外交部外面的大批学生做些解释。但随着日本在东北的步步紧逼和国民政府的应对迟缓，学生越来越不满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大批学生包围外交部，有的在墙上大书“打倒卖国贼顾维钧”的标语。

社会各界对顾维钧锦州中立区的主张也强烈反对，每天有大量的电报潮水般地涌到外交部。上海抗日救国会的电报称：“不对日直接交涉之主张，已见动摇，就任伊始，应请努力奋斗，以今日全国民众愤激状况，视‘五四’者何如？”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的电报警告顾维钧：“公长外交，即直接交涉，划锦州为中立区，卖国求荣，不惜为曹、章、陆之续。若不幡然变计，国人将以对曹、章、陆者对公。”江苏同乡会的电报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不改变现行政策，就炸掉顾家的祖坟。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顾维钧谈到了民间的激烈反应，“京沪各界亦复函诘责，学界态度，尤为激昂，今日外部亦被学生终日包围，无从办事”，“北平学生示威到部，捣毁颇剧”，并颇为委屈地表示，这是“国人误解，认为辱国”，“似此愤激情形，和平方法恐终无效”。[48]

即使在国民党内，对锦州中立区的计划也是意见纷纭。蒋介石虽是国民政府的实际掌权者，但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争斗与对抗不断。有些人反对划锦州中立区，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做法不利于中国；而有些人反对这一计划，就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希图利用这一点迫使蒋下台。

面对国内的强烈反对和列强的消极反应，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锦州中立区之议。12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东三省事件应积极进行，于国联切实保证之下解决；而锦州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顾维钧明白，锦州中立区的计划难以推进下去了。此后，他向美国、法国驻华外交官表示，中国并不赞成锦州中立区计划，并告诉美国外交官，“没有美国的合作，问题无法得到公正的解决”，由华盛顿会议有关各国举行关于中日问题的会议是“最佳方案”，以此探询美国介入中日冲突的可能性。[49]在顾维钧的对外交涉中，寻求美国的支持总是处在优先地位。

由于锦州中立区计划引起国内反对风潮，顾维钧明白已很难在外交部长职位上有所作为了。12月初，他提出辞呈，但未获批准。随后，国内政局更加动荡。12月15日，蒋介石因党内反对派逼迫而辞职。由于国民政府面临重新改组，而顾维钧又是蒋介石请出山的，22日，他再次提请辞职，终获批准。距国民政府公布他代理外交部长的任命，正好一个月。辞职当天，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顾维钧坦露了自己的心情：“此次不避危难，勉当重任，明知无补时限，坚挚难辞，未获如愿。任事以来，昕夕焦劳，心力俱瘁，殊觉不支，准即乞退，离京休养。”但他认为在这一个月中自己还是为国尽职的：“此次临危受任，为期虽短，聊尽匹夫之责。”[50]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三个月中，顾维钧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冲突。他先倾向于中日直接谈判，后又提议锦州中立区计划。这些主张均遭民众和舆论的激烈批评。作为一名外交官，顾维钧除了寻找外交解决的途径，并无其他施展才干的空间。由于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总体上为放弃军事抵抗，只依赖外交交涉，使得外交无所凭借。加上国联的软弱和日本的蛮横，外交交涉毫无转圜余地。因此，顾维钧这三个月外交活动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然而就其个人而言，除对通过币原寻求外交解决显得过于乐观外，对局势的分析和应对的策略尚属得体，即使遭到广泛抨击的锦州中立化提议，他也做好“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的准备，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的基本立场。

辞去外交部长后，顾维钧来到上海，准备稍事休息后北上，到张学良身边以备外交咨询。然而事与愿违，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他仍留在了南方。1月27日，下野后准备重掌大权的蒋介石召顾维钧到南京商谈外交，告诉他因外交无人主持，准备另设外交委员会，请顾维钧参加。[51]第二天，日本在上海挑起新的战争，“一·二八”事变发生。

事变发生后，顾维钧在上海与国民党军政要人张群、吴铁城、黄郛、蒋百里等每天晚上相聚，讨论军情及相关问题。一日，中国军队追击日军至租界边，因担忧引起国际纠纷而停止追击未进入租界。顾维钧知道后叹息道，穷追敌军之际，正不必因租界而有所踌躇，此乃百年一次的机会，错过未免可惜。[52]显露出他处理外交事务中刚强的一面。

当时国民党中央在上海设办事处，下有外交组，顾维钧被聘为委员，参与到“一·二八”事变后的外交调停中。此时日本希望上海事件单独先行解决，中国方面也有人赞同此点。但顾维钧“力持不可”。因为英、美等国在上海有更多利益，事变后积极介入调停，顾维钧认为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机会，坚持中日间问题须一并解决，否则东北问题“益将棘手”。[53]由于国联调查团来华在即，他希望先促成中日在上海的停战，以待国联调查团到来后，将上海战事与东北问题一同解决，谋得有利于中国的结局。为此，他与英、美、法三国外交官多次接触，寻求上海停战的办法。2月28日，在英国驻华海军司令的安排下，顾维钧与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登上英舰“肯特”号，与日本首相私人代表松冈洋右和日本海军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作私人谈话”3小时，达成撤兵谅解五点。[54]国民政府认可了五点谅解，但日本政府未予回复。稍后，国联调查团抵达上海，顾维钧转向陪同调查团的工作。

三 国联调查团的中国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诉诸国联时，多次向后者提议组织国联调查团来华调查事变真相，希望以此制止日本的侵略。但由于日本的反对，国联一直无法就中国的提议做出决议。1931年11月下旬，日本占领齐齐哈尔并向锦州进逼之后，自认为对中国东北全境的占领已是既成事实，转而同意国联派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企图改变在国联中的被动地位，并以此拖延时间，使国联在调查期间不再采取对日本不利的行动。于是，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通过了有关中日冲突的第四个决议案，决定派遣调查团赴远东调查一切危及国际关系、破坏中日和平或一切足以影响中日两国友谊的事件，同时规定调查团不得过问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涉，不得干涉中日两国军队的行动，调查团的任务只是就中日双方有争议之点写成报告，并不追究责任所在。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由英、法、美、德、意五国各派一人组成。英国人是代理过印度总督的李顿（Victor Lytton）爵士，法国人是担任过驻越南法军司令官的克劳德（Henri Claudel），美国人是曾任菲律宾副总督的麦考益（Frank McCoy）。因为李顿担任团长，所以国联调查团也被称为“李顿调查团”。作为当事国的中日两国派出了各自的代表，中方是顾维钧，日方是吉田茂。顾维钧和吉田在调查团中的正式头衔是顾问。

接受参加李顿调查团的任务后，顾维钧集中了不同领域的专家，都是富有外交经验及对东北问题素有研究者，主要成员是以前在北京政府外交部工作的同事和部下，参加过巴黎和会的前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担任秘书长，担任过外交部参事的钱泰负责文件起草工作。顾维钧先列出调查团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清单，交一个或几个胜任的人对相关问题写出备忘录，每一份备忘录写出后交顾维钧审阅，再做适当修改后由他最后核准。顾维钧自己则起草一份涉及整个中日问题的备忘录《关于中日纠纷问题之总说帖》。李顿调查团来华后，顾维钧向调查团提交了1份总说帖和28份分说帖。这些文件历数日本侵略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等事实，立论严谨，说理充分，对调查团了解日本侵华行径起了重要作用。[55]

李顿调查团于3月14日从日本到达上海。17日晚，顾维钧假荣宗敬

在西摩路的荣宅设宴招待李顿代表团，中国方面出席的有孔祥熙、宋子文、吴铁城等。顾维钧在宴会上致辞，表达欢迎之意：“诸君或系政治家，或系军事家，或系外交家，著名于世界。国联指派诸君来华调查中日纠纷，可谓人选确当。鄙人欢迎诸君，因诸君系正义及和平之信徒。国难期间，虽不能作盛大欢迎，然欢迎却是恳诚的、热烈的。”接着阐述中国对调查团的期待：

> 君来自远方，无成见，定能用公平眼光，观察中国……诸君调查期间，当能发现中国人民于中日关系的问题，民气极为激昂。但是诸君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便知中国人民的愤慨，实在是武力政策对付中国的反响。表示愤慨之方式，虽各有不同，或用语言，或用文字，或在购买外货上表示区别，但无论用何种方式表示，原因却都在中国以外，且均非中国所控制者。换言之，九月十八日以后各种事变，影响尤为重大。贵调查委员会的使命，不但中国重视，世界各国亦深为关切。具有远大眼光之政治家，苦心孤诣，用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导世界于和平。然而此项约章，是否能为国际关系之健全原则，是否有保障和平之效力，现在已成绝大疑问。和平公约，能否实行，世界前途如何，现均成为问题。然而国联对于现在远东问题，异常关切，不断努力于维持和平，力图一种永久之解决，加之美国对于维持和平诚挚之合作，贵团诸君就地调查真相，鄙人深信对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必有相当办法，和平公约尊严，必能重行恢复也。

顾维钧请调查团从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来观察中日冲突，并将其与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关系之健全原则联系在一起。李顿被顾维钧的致辞所打动，在当晚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他用漂亮的寇松式的英语做了非常雄辩的讲演。”[56]

作为调查团的一员，顾维钧的任务是为调查团在中国的工作提供各种帮助和便利，并向调查团表明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李顿甫抵上海，顾维钧就表示，愿意为调查团在华之行尽最大的努力——为调查团提供各种资料和便利；联系安排调查团想会面的任何人和团体；安排访问或视察相关地区。顾维钧也向李顿阐明中国的基本立场，即在上海停火以后，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也必须立即停止并且撤军。顾维钧告诉李顿，满洲问题即东北问题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

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国际问题，因为它的解决有利于国际和平。在两人的会谈中，李顿提出了满洲中立化的建议。顾维钧回答说，这可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以探索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只要有助于中国恢复对东北领土的管辖，国联的帮助就可以接受。他强调，解决满洲问题必须要做到日本撤军和恢复中国的主权。[57]

李顿调查团抵华后，先在上海视察硝烟未尽的“一·二八”战场，并斡旋中日在上海的停战谈判。日本政府希望调查团在南方多逗留些时日，延缓进入东北的时间，为此坚持调查团应赴汉口等地了解中国的一般情况。顾维钧明白，时间拖延越长，东北问题就越复杂，对中国也越不利。张学良也给他来电报，对此表示担忧：“日本设计在用上海事件移转各国对东北视线，兼以压制我中央政府，俾允所求。及见所谋未遂，则又极力使上海事件与东北问题分离，假退让作交换地步。各国自身商务受痛，自然乐为仲连，使上海早日平静。吾人迁就解决，似正中日人分开东北问题之奸计。国联调查团本为东北事件而来，现羁留上海，一面疲于应酬，一面忙作部分问题之和事佬，劳精疲神，北来无期。日人期此机会在东北巩固其伪国，恐调查团到时已成强弩之末。”[58]因此，顾维钧极力劝说李顿及调查团尽快北上。在他的努力下，李顿调查团在3月下旬离开上海，原定在汉口的视察，也只象征性地逗留了一天。

3月29日至4月1日，调查团在南京与蒋介石、汪精卫等进行了四次会谈，顾维钧都参加了。会谈中，汪精卫希望调查团尽快去东北调查事变真相，并表示，中国政府任命的代表顾维钧将全力协助调查团的工作。[59]

4月9日，李顿调查团抵达北平。顾维钧陪同调查团会见了张学良。调查团来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赴中日冲突的主要地点东北实地调查，但顾维钧能否与调查团一起进入东北却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日本政府为了阻止调查团的正常调查，反对顾维钧进入东北，理由是东北的局势还不正常，日本无法保证顾维钧在东北的人身安全。同时，日本故意散布各种消息，对顾维钧施加心理压力。法国和比利时驻华公使先后到铁狮子胡同来见黄蕙兰，告诉她他们从本国驻东京的使馆获得可靠的机密消息，如果顾维钧去东北的话，他的生命安全会受到威胁。他们劝说顾太太不要让丈夫去冒这一不必要的生命危险。李顿调查团也收到相关的消息，称中国代表在中国东北出现会引起骚乱，如果调查团由顾维钧陪同前往，日本当局将不会对出现的后果负责。[60]

是否随调查团进入东北成了摆在顾维钧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也是舆论关注的焦点。顾维钧专门给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发去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决心：如果我遭到任何不测或者为国牺牲，我认为那是极大的光荣。作为中国代表那是我的应尽之责。我早就决定献身于中国的事业；在执行任务时，我自己就像任何一名被召唤去为国战斗的战士一样，义无反顾。[61]

4月12日，顾维钧在北平接受日本记者采访，列席的还有美国与中国的记者。他向媒体坦然表明自己的态度：

> 日记者问：对于长春来电，所谓满洲国者拒绝中国代表顾维钧博士入满之举，态度如何？
>
> 顾答：中国遵照上年十二月十日国联行政院决议案，任命代表为调查团之参加员，与日本政府之任命代表为参加员，其情事相同。两方参加员，均为国联调查团份子，故委员长李顿爵士前曾声明对于任何参加员赴满之拒绝，将视为对于调查团全体之拒绝。
>
> 问：今日已有满洲国存在之事实，是否为调查团及顾代表所知悉？
>
> 答：中国对于所谓满洲国之存在，未经正式承认，所称由长春发往南京之电报，业已退发电地点，调查团亦不承认此种政治组织。调查团之目的，在调查满洲之整个情形，尤其关于上年九月十八日以后之举动，自“九一八”以后所发生之事变，连同所谓满洲国在内均在调查范围之内。
>
> 问：顾代表将不顾可以料见之危险，毅然赴满？
>
> 答：在任何情势之下，代表有偕同赴满之必要。关于调查团全体之安全问题，据鄙人所知，委员团业已向国联报告，国联当然对于东方所派委员之安全，有适当之处置。
>
> 问：执事既不承认满洲国之存在，然则关于调查团之安全，据执事见解，是否应由日本负责？
>
> 答：中国并不准备令日本负责。对于安全问题，将为如何

适当之处置，应听由国联决定执行之。但满洲既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故国联如不能筹有适当之办法时，中国自必于全体调查团入满时，周密派队护送。

问：谣传此次满洲国拒绝中国代表之举，系有日本之背景，执事之意见如何？

答：此项之举动背景如何，鄙人并不重视，因日本与满洲种种活动之关系，将为调查团彻底调查之一。[62]

顾维钧的坚定态度得到李顿的支持。他告诉日本人，“如果没有中国的顾问，调查团就不会去满洲；如果反对中国的顾问，将被看作是反对整个调查团”，要求他们为调查团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活动自由，并根据国联决议提供安全保证。[63]如果调查团无法进入东北开展调查，日本在国际舆论面前将更为被动。面对李顿的强硬态度，日本政府被迫做出让步，不再坚持反对顾维钧进入东北，但声称不能保证他在东北的安全。

在着手准备东北之行时，走陆路还是走海路又成了一个问题。顾维钧向李顿建议，调查团从陆路坐火车由山海关进入东北。这样，一进入东北就是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侵占的地方。而日本坚持派军舰接送调查团到大连。顾维钧认为，大连在事变之前就为日本所占，并非此次调查开始的合适地点。[64]虽然李顿认为顾维钧的建议合情合理，但在日本的反对下，调查团最终采取了一个妥协的办法：调查团部分成员在麦考益率领下由陆路进入东北。顾维钧和调查团的另一部分人包括李顿乘坐船只先到大连。顾维钧乘坐的是中国海军的一艘巡洋舰。

几经周折到达东北后，顾维钧面临的是十分险恶的环境。日本政府虽最终没能阻挠顾维钧进入东北，但他一到东北，就对他实施十分严密的监视。顾维钧住的旅馆，有日本军警日夜值班。顾维钧一走出自己的房间，就有人紧跟其后。即便是上厕所，也有人一直跟到门口。还有人在黑夜从窗户闯进顾维钧秘书的房间。即使李顿也对日本人提供的“保护”十分不满，认为到东北的第一个星期就是“一个恶梦”，所以易发脾气，也很抑郁，原因之一是“操心顾维钧博士的安全”。[65]

不仅行动受到限制，顾维钧在东北期间还确实遇到了生命危险。顾维钧有每天散步的习惯，工作再忙，也要忙里偷闲去运动一下。日本人发现他的习惯，在调查团到哈尔滨后谋划在其散步时行刺，并故意将这

一消息传播出来，以对其进行恐吓。顾维钧获悉了这一消息，“昨今哈市盛传对弟及团员等将有轨外行动，并谣称中国代表已遇刺”。他明白日本人下此毒手并非不可能，但他又不愿就此改变散步的习惯，让日本人认为是屈服于他们的恫吓。第二天，他叫上比平常更多的人，包括同行的顾问端纳，一起去散步。途中，有三个中国学生要靠近顾维钧，被突然冲出的日本人带走了。事后，顾维钧得知，这一天日本人确实计划对他行刺，但三个中国学生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后来，日本人还计划炸火车，用对付过张作霖的办法来对付顾维钧，只是由于顾维钧未乘坐那趟火车，才没有出现第二个皇姑屯事件。[66]

面临险恶的环境，顾维钧以过人的勇气和智慧冷静应对。在给张学良并转外交部长罗文干的电报中，他写道：“弟在此地表面力持消极态度，使彼方稍松监视，以便从中周旋。”[67]虽身受严密监视，许多求见者遭到逮捕，但顾维钧仍想方设法与东北各界包括在东北的外籍人士进行联系，以求揭露日本侵略的真相。以下这封电报可见他的努力及艰难：

> 吾国代表团在沈备受日警监视，华人来访者遭逮捕，往见者被阻，但尚能借助西人暗通消息，搜材料以供调查团参考。吾团抵长春后，被监视益严，即外国顾问出外，亦有便衣日警强制同车，车后复有电驴相随，寸步不离，形同押解……江日（三日）有美教士二人来访，弟在房中接见。忽有长春警察特务共五六人叩门欲入，坚询来客姓氏及所谈何事，弟拒不以告，一面由刘参议访日代表团，未能设法。适李顿秘书阿斯德来访，目睹情形殊为愤慨，一再斥责。该员等乃问中国代表团见客是否得有警厅许可，该西人等来访事先已否请示警厅。因阿氏痛斥无礼，几酿冲突。酌告以代表见客经李顿委员会许可，警厅无权干涉，彼始离去。当经弟备文向调查团转为抗议，并查明警厅是否颁有禁令，并请保障代表见客之自由。惟是日人处处仗其实力在手，横施胁迫，即调查团亦不能任便行动。如此情形，所谓调查，殆成画饼。至身体之危险与精神之痛苦，犹属事之小者耳。[68]

直接的交往十分困难，就通过间接的联络。顾维钧通过各种渠道，收到许多东北民众写给他的信。这些出自不同阶层的信有一个共同的内容：表达东北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决心。有一封信写道：“我们在请愿书

上向调查团所说的话是日本人口述的，我们并不同意……你们会在这信中发现我们真正的感情。”有一封出自两个教员的信，询问顾维钧对还在坚持抵抗的马占山、李杜等有何话要说，表示愿意秘密转达。不少东北民众还对顾维钧不顾个人安危来到东北表示敬意：“大人重阁国念，不避危险，深蹈虎穴……大人之功绩，万民衔感，举世同钦。”[69]所有这一切表明，东北人民坚决反对日本的侵占。顾维钧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东北人民反对日本人，这是对日本所谓“满洲国”是由中国人倡议创立之说最好的驳斥。

作为李顿调查团的中国代表，顾维钧除了将他获得的东北民意报告调查团外，还向调查团就开展实地调查提出各种建议。每到一地，他总要向调查团开出一张应访谈人员的名单。这些人是他反复考虑精心选择的。例如，挑选美国花旗银行和英国汇丰银行的中国经理，是因为他们可以较少顾忌日本的威胁。为了避开日本人的干扰，顾维钧还会提出访谈的地点。例如，在沈阳，他建议调查团在美国人梅尔斯的住所会见接受访谈的中国人。在调查团到达长春约见伪满洲国执政溥仪前，顾维钧建议应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谁陪同溥仪来到长春的？伪满洲国的发起者究竟是谁？伪满洲国与日本当局是怎样的关系？作为执政的溥仪有什么权力？后来调查团见溥仪时，向他提出的基本上就是顾维钧所建议的这些问题。[70]

5月4日，李顿调查团就中日双方在东北的军队状况发表初步报告。由于报告涉及所谓的“满洲国”，顾维钧发布声明表明中国的立场。第一，日本军事当局所称“满洲国”字样，应由调查团说明，此为国联秘书长所不容者，除中日双方外，不能默认有第三者。如目前未便辨明，亦应声明保留将来发表意见，以明态度。第二，不能承认所谓“满洲国”军队得替代日本军队，而使日军卸责。第三，不能承认因“满洲国”军队之无力维持东北治安，而日本军队得继续不撤。[71]

李顿调查团在东北实地考察一个半月时间。顾维钧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对调查团了解日本侵略东北的真相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结束东北之行后，李顿给顾维钧的信写道：“我们在哈尔滨时你给我写信指出，由于行动自由受限以及中国人受到的恐吓，你无法充分履行作为代表团顾问的职责，将中国方面的证人介绍给我们。我们完全知道你面临的阻碍。如今满洲之行已经结束，我希望能够告诉你，尽管面临诸多困难，我们已经获得了中国方面的证据。我们不仅获得了中立方的

信息，也私下访谈了许多中国人。我们还收到了两千多封中国方面的来信，正在翻译和分类。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满洲的六周时间已获取了对于理解中国方面立场的充分信息。我们希望你知道此点，并很高兴你会将此消息转告贵国政府。”[72]

6月初，李顿调查团从东北返回北平，着手起草报告书。在调查团起草报告书期间，顾维钧与各代表保持接触，力图使他们接受中国的观点，揭露日本侵华的真相。当日本关东军司令被任命为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时，顾维钧马上提醒李顿注意这一事实，“此举与日本吞并朝鲜前的举动一样”，“表明日本承认在我东北各省建立的非法政权并最终吞并这片领土的企图”。报告书初稿出来后，他仔细审阅，以求报告书在叙述事实方面能如实反映中国政府的观点和中国提供的情况。6月中旬，汪精卫、宋子文和罗文干从南京专程北上，顾维钧安排他们与李顿进行了3次会谈，以对报告书的拟定施加中国方面的影响。[73]

除了积极协助、配合李顿调查团的工作，顾维钧还认为，中国不能放弃自身的努力，应该利用各种途径特别是经济手段对日本施加压力。7月中旬，他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日方态度显著无可理喻，在我亟应设法自救，以助国联力之所不逮。一面外交军事积极准备进行，一面尤以经济抵制完全操之于我，轻而易举，亟宜努力，秘密提倡。”他还同时致电《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和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希望他们以自己的声望“登高一呼”，号召对日经济抵制，“力与国内商界领袖密筹长期奋斗办法，手续务求严密，宗旨务求贯彻，使举国商界同心一德，努力进行，毋稍懈怠。示我人心未死，保我民族精神、国家前途”。[74]

8月下旬，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起草工作完成，顾维钧在调查团的使命也告一段落。

四 密谋改善中苏关系

1932年上半年，顾维钧主要致力于协助李顿调查团的工作，但他的外交视野并没有仅局限于国联一途。在他看来，为对付日本的侵略，中国的外交还另有施展的空间，苏联就可以是中国对付日本的重要外交伙伴。虽然1929年中东路战争后，中苏之间中断了正常的邦交，但苏联与东北在地理上接壤这一事实，决定了它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因此，顾维钧主张并推动中苏关系的正常化。

4月23日，随李顿调查团逗留沈阳期间，顾维钧会见了苏联总领事齐那门斯基（Zinamensky）。当时正传闻苏联在与伪满洲国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顾维钧在劝阻苏联不要与伪满建立关系后表示，“中国与苏俄之间外交关系的恢复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希望推进两国间关系的进展。他向齐氏表明了自己对东北问题及两国关系的基本看法：东北问题对中国至关重要，也值得引起苏联的重视。如果中苏合作找到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途径，不仅东北问题本身可以解决，中苏关系及苏联与美国的关系也能得到解决。这样，苏联就能与中国和其他列强站在一起，孤立日本，从而确保远东和平。齐氏对顾维钧的看法表示赞同，并答应向莫斯科报告。[75]

与齐那门斯基会谈结束当天，顾维钧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外交部长罗文干和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就对苏关系对解决东北问题以及整个中国外交的重要意义提出自己的看法：“东省问题，将来无论用外交或武力解决，苏俄态度关系匪浅。”“目前苏俄对日利害根本上与我相同，设使日军侵入俄境，势必抵抗。其对北满权力不愿为日侵夺，然亦不肯因此单独与之抗衡。倘吾国不与接近，彼必由消极反对政策改为与日敷衍。”“吾若不及早与俄接近，从长协定一切问题，恢复邦交，日必先发制吾，届时日俄或俄满成立协约，则吾虽有国联与美主持公道，恐日本以（已）无后顾之忧。”“即无日俄或俄满协约，国联与美欲实在解决东省问题，亦不能不得苏俄之赞助也。假使外交不能奏效，在吾最后须诉诸武力，则苏俄对吾之政策尤为全局关键之一。”顾维钧向国民政府建议：“苟能妥拟交涉方案，慎选使节，折冲得人，当不难消释前嫌，预防后患，以收外交之效而祛内顾之忧。”[76]

顾维钧提出对苏关系建议时，朝野上下也出现恢复中苏邦交的呼

声。5月2日，外交部长罗文干对记者谈外交时说，“迩来恢复中俄邦交声浪日高，政府对此问题正熟筹中。设苏联果有诚意，依据平等互惠原则与我国复交，则我亦不妨善意考虑，以促实现”。[77]5月中旬，《申报》接连两天发表时评，提出“试问我国今日在外交上之与国何在”这一问题。在分析美、英、法各国对华关系之长短后，指出“独有苏联为太平洋问题中最应注目之一要角”，“我对苏联复交，在外交之局势上可收互相依庇之效”。[78]

在这一背景下，国民政府将对苏复交提上了议事日程。5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原则上议决积极准备对苏复交，并责成外交部长罗文干和驻日公使蒋作宾起草复交方案。5月下旬，罗文干与蒋作宾草拟了《中俄复交意见书》。罗、蒋两人提出，对苏复交前，对外应先与美国等国联络，表明“中国政府并无与苏联为任何军事或政治上结合之意思”；对内应做适当宣传，表明“防共与复交纯属绝对二事”，“俾对内对外，不致发生误解”。关于复交的具体步骤，他们认为有两个途径，一是不附加任何条件，通过互换照会恢复两国关系；二是两国先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然后复交。[79]6月上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决定，着手与苏联谈判恢复邦交，具体步骤采纳罗、蒋建议的第二个途径，即以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为复交的先决条件。

由于对改善对苏关系已有建议，因此6月初刚从东北回到北平，顾维钧就收到罗文干的信函，请他对复交方案发表看法，提供“真知灼见”，以作“政府指针”。[80]

顾维钧对罗、蒋建议并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批准的先缔约再复交的方针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两国间如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则类似订同盟条约，“在我如欲收效，须将两国间重要悬案及将来彼此对外政策，开诚交换意见，先资谅解，否则误会未祛，易滋纠纷，且多流弊”。因此，先订约必然使两国关系的发展拖延时日，甚至遇到障碍。顾维钧的看法是，发展对苏关系“重在谅解，不在订约复交，既有谅解，订约复交徒为形式”。[81]从中国外交的全局着眼，他希望尽快推进中苏关系。

基于这一看法，并且罗、蒋在《中俄复交意见书》中也提到派专使赴苏“准备与苏商议”，顾维钧提出利用他自己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在之前谈判中苏建交时建立起来的个人关系，派私人代表赴苏沟通两国关系。这一建议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首肯。

顾维钧选派的私人代表是一名在中国已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加拿大建筑师何士（Harry Hussey）。何士民国初年来华，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聘请的建筑师，参与了协和医学院的建筑设计。[82]来中国后，他与顾维钧建立了终身友谊，与加拉罕也相识，是充当中苏沟通私人代表的合适人选。顾维钧为何士的秘密使命亲拟了四份文件：训令大纲、训令专条、口授各点和致加拉罕信函。

“训令大纲”阐明了国民政府的对苏方针和推进邦交的具体做法：

> 一、最近各领袖在南京一度会议，决定设法与苏联成立一种谅解，俾便从速恢复两国外交上之关系，并以此种关系置于好意的及邻谊的巩固基础之上。此项决定旋由政府军政当局第二次牯岭会议确定。
>
> 二、其进行方法系派遣私人可靠代表前往，一以免除他方面过分注意，一以使尽量自由交换意见一层易于办到，以备将来派遣正式代表商订协定，使两国关系置于巩固的及友谊的基础之上。
>
> 三、假使对于专条内所指各项问题，原则上成立谅解，乃由双方派遣全权正式代表，在天津或海参崴或其他双方同意之地点会晤，以便根据此项谅解，商订协定。
>
> 四、倘苏联方面提出有须讨论之问题，可予考量。

“训令专条”列出了中苏双方应互相沟通达成谅解的一些问题及中国的期望：关于日本侵略东北问题，提出苏联可通过参加国联行政院讨论、参加有关国际会议、对中苏日三国接界地方由三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等方法与中国合作；关于中东路问题，提出应询问苏联是作价让予中国还是继续保留权益；关于外蒙古问题，要求苏联保证不加干涉。此外，还提出双方表示愿订互不侵犯协定等问题。“口授各点”强调了“以谅解好意为基础”恢复两国关系的方针，并表示“中美苏三国之合作可以保证东亚和平，中国可为他两国之介绍者”。在致加拉罕的信函中，顾维钧表示，何士的使命“系得汪精卫和罗文干两先生之同意。再者，鄙人与何士君结交已二十年，伊为鄙人最为信任之友。凡鄙人所知南京政府之各种意见，当由何士君向阁下开诚转达。盼望阁下亦以同样之开诚信任态度，将贵政府意见告知何士君”。“希望通过何士君与阁下秘密交换意

见，俾得从速恢复邦交，并将两国邦交置于谅解好意之巩固基础之上。”[83]

顾维钧在“训令大纲”和“训令专条”中虽也提到双方商订协定，但并不作为复交的先决条件，而是强调双方应达成谅解，以从速恢复邦交，这是何士使命的主要目标，也是顾维钧认为改善和推进中苏关系的关键之点。这与国民政府既定的以缔约为复交先决条件的方针存在着差异。

6月下旬，何士衔命赴苏。在何士赴苏之际，国民政府对苏外交正三管齐下，齐头并进。南京命令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利用出席国际军缩会议之便，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就中苏复交事进行接触。根据南京的指示，颜惠庆在与李维诺夫交谈中，提出了先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再复交的主张。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中国使馆的官员王曾思也奉令向苏联外交部东方司司长转达中国政府缔约复交的意愿。

顾维钧是在何士出发之后从报上获悉对苏交涉同时还有其他两条渠道，而且中国方面在交涉中提出了先缔约的要求。虽然目标同为推进中苏复交，但颜、王的交涉方针与何士使命大相径庭。于是在7月1日，顾维钧从北平给在南京的罗文干发了一份电报，表明自己的看法：

> 鄙意对俄重在谅解，使两国间利害相同之各点彼此彻底了然，方可冀于东案收国际上协力之效。倘未得此种谅解，则无论先复交或先订互不侵犯条约，在彼已不重视，在我恐亦无裨实际，殊非彻底解决之方。再者，此事进行，一面固须极端机密，以防他方破坏，一面似尤宜确定步骤，以免或有参差。管见所及，率直奉陈，仍请兄商承精卫院长酌夺进行为盼。[84]

电报中对南京既同意何士使命，又命令颜、王等交涉，多管齐下而方针不一，委婉地表达了不满。

但南京并不愿放弃将先缔约再复交作为对苏交涉的既定方针。由于颜惠庆与李维诺夫接触之初，李氏表示对中国的提议可以考虑，南京对实现先缔约再复交相当乐观。罗文干告诉顾维钧，颜李会谈“尚属接近”，对中国的提议李氏“允考虑后早日答复”，并表示何士使命可与颜李会谈同时进行，并行不悖。[85]

然而，中国先缔约再复交的提议在颜李会谈进行不久就遭到了苏联

的拒绝。7月6日，李维诺夫告诉颜惠庆，苏联不赞同中国的提议，因为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若没有这样的关系，将会大大降低两国间协议的重要作用”。但是，“一旦中华民国同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得以恢复，我国政府就将准备着手讨论同中华民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苏联政府的立场是：“不反对立即无条件复交，此举之后，互不侵犯条约将是复交的自然结果。”[86]先缔约还是先复交成了中苏交涉中的一个难解之结。

7月15日，何士抵达莫斯科。但他的使命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顺利。到莫斯科后，何士虽然很快就与加拉罕的秘书见了面，并请其将顾维钧的信函交给加拉罕，但却一直无法与加拉罕本人会面。加拉罕推托与何士会面的理由是，他的上司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正在日内瓦与中国代表颜惠庆商谈两国复交之事，因此他有所不便。不过何士在给顾维钧的电报中，仍乐观地表示不日可与加氏晤面。[87]

罗文干在获悉此情后致电顾维钧询问：“如始终被拒，殊觉进退维谷，兄意如何？”[88]顾维钧在获悉何士无法见到加拉罕后，一面指示何士告诉苏方，这一使命并不与颜惠庆和李维诺夫之间的会谈冲突，反而有助于加快两国的复交，一面于7月21日致电罗文干再次表达对中苏交涉的意见：“对俄事订约复交先后次序原非旨要，重在将两国间利害各点开诚交换意见，使彼此彻底谅解。否则，无论订约复交，恐仍不能对东案收国际上协力之效果。”此电仍指出与苏联达成谅解为改善中苏关系之关键，含蓄地批评了先缔约再复交的方针，并强调改善对苏关系对东北问题的重要性。对于何士之行，顾维钧提醒罗文干，“此事经兄赞同后方肯首途”，“今颜王等既在与俄接洽之中，喀氏（即加拉罕）未能即见某君（即何士）自属意料中事项”；“如喀氏仍以颜李正在谈判进行踌躇不见，则可电某君离俄赴瑞，将所携非正式训令密交颜代表，接洽后即回国。事虽未成，于我无损”。原先对何士使命满怀期望的顾维钧显得颇有些无奈。[89]

顾维钧发出此电次日，就收到罗文干的一封电报。该电首先转述了王曾思对何士之行的报告：“何士求见加拉罕，日来仍无端倪，现又书面请求。据近来经验以测之，恐仍难达其目的。苏联注重实际，不重面子，注重权责，不重个人。对于用私人名义交换意见一节，向所婉拒……难望变更。”虽然罗文干未对王曾思的电文加以评论，但接下来的一段话表明了他的态度：“现在似此情形，此间只好拟令颜代表与李维诺

夫商谈复交手续。何士行止究将若何，祈裁示弟。”[90]实际上表达了终止何士使命的意思。

何士使命最初曾获得罗文干的支持，因此罗的这一态度令顾维钧十分不快。收到该电当晚，他复电罗文干，表示对何士之行的看法与他“相左”：“何士此行并非去卖个人面子，王委员未免误会。不过兹事体大，关系重要，不得不设法明了彼此真意，俾达到我方此次复交之目的，而免日后之纠纷……但临渴掘井，本无两全之道。尊意如以为时机迫切，请即由兄照尊旨电令颜代表与李维诺夫商谈复交手续，一面即由弟照马电（即21日顾致罗电）所陈，电告何士离俄赴瑞，将所携文件面交颜代表后克日回国。”[91]

毕竟顾维钧在外交界的资望高过罗文干，而且何士使命又确实是其同意的，接到顾维钧来电后，罗文干急忙回电解释，表示自九一八事变后，“俄事一再蹉跎，致成难题”，自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对俄复交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入手后，即先后令王曾思和颜惠庆与苏方接触，但进展不大。“是时兄适有派某君赴莫与加氏私人接洽之议，弟等亦认为此着未始非打开僵局之一法，故予赞同。”但目前苏联坚持先复交，政府对此认为“时机尚早，则苏联既未直接催迫，似可暂搁置”。对于何士使命，罗文干认为，“如能办妥，宁非佳事？惟证之既往接洽情形，某君终能晤见喀氏，亦难成功。在兄见于国际形势，欲借私人接洽与俄彻底谅解；在政府因洞悉俄方态度，欲依复交订约顺序渐次获得谅解。骏人（颜惠庆字——引者注）在欧与李维诺夫会晤较易，故令商谈。殊途同轨，原无异致”。罗文干表示，在目前情况下，何士只能先赴日内瓦，将所持训令交颜惠庆后回国。[92]

罗文干的这一电报表明，由于坚持先缔约再复交的方针，南京将颜李会谈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主要渠道。这样，何士使命实际上就显得多余了。顾维钧接电后即致电何士，告诉他继续留在莫斯科只会面临困境，而无法取得任何进展，要他结束使命离苏赴瑞士。[93]8月4日，何士到达日内瓦，次日与颜惠庆见面，仍照顾维钧意见反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94]顾维钧一手谋划的何士使命就这样无果而终了，其主因是国民政府先缔约再复交的方针。顾维钧此时的主要工作在李顿调查团，但对改善中苏关系倾注了很大精力，显示出对中国外交全局的总体思考和把握。

中苏之间的谈判一直拖到1932年的年底才打破僵局。12月12日，

在中国放弃先缔约再复交的方针，接受了苏联无条件复交的主张后，颜惠庆与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互换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照会。此时，顾维钧作为中国出席国联的代表也在日内瓦。他后来回忆道："我同苏联恢复关系出人意料，在日内瓦引起轰动，给人以良好印象。因为时机适宜，此举使日本慌了神，使中国在国联的朋友得到鼓舞。"[95]中苏最终复交的进程表明，顾维钧重在双方达成谅解的方针要比先缔约再复交的方针更切实可行，更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苏关系。

[1] 《顾维钧大出风头》，《申报》1929年7月3日，第15版。

[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01～402页。

[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04～405页。据《申报》报道，顾维钧于9月27日抵达沈阳，见该报1929年9月29日，第4版。

[4] 《顾维钧不容活动》《严缉顾维钧》，《民国日报》1929年9月4日第1版、10月9日第4版。

[5] 《大公报》（天津），1929年10月8日第1版、10月12日第1版。

[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08～409页。垦荒公司的情况来自顾维钧保存的一组照片，见Series XI，Photographs，*Wellington Koo Papers*。

[7] 《顾维钧等撤销通缉》，《申报》1929年12月24日第6版、1930年1月7日第8版。

[8] 《申报》1930年8月20日，第9版；《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10页。

[9]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10页；《申报》1930年9月4日，第9版。

[10] 《蒋介石日记》，1930年9月4日、5日；《申报》1930年9月6日，第8版。

[11] 《申报》1930年9月5日第8版、9月7日第4版。

[12]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606页。

[13] 《顾维钧母昨日开丧》《王正廷顾维钧会见》，《申报》1930年10月21日第11版、10月30日第10版。

[1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12～413页。

[15] 《新闻报》1931年9月19日，第8版。

[1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13～414页。

[17] Lampson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19 September，1931，*DBFP*，

Second Series，Vol.8，pp.665-666.

[18]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以下称《绪编》）第1册，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第259页。

[19] Lampson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3 October，1931，*DBFP*，Second Series，Vol.8，p.706.

[20] 《绪编》第1册，第281、291页。

[21] 《绪编》第1册，第281页；《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3日。

[22] 《申报》1931年10月2日，第8版。

[23]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日；《顾维钧贡献对日外交方针》，《申报》1931年10月3日，第4版。《蒋介石日记》记3日与顾维钧谈外交。

[24] Lampson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7 October，1931，*DBFP*，Second Series，Vol.8，pp.715-716.

[25] 《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0月16日、11月27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13页、第2期第5页。

[26]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4辑，台北，1984，第904页。

[2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16页。

[28] 《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0月14日、15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11～12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17页。

[29] 《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0月15日、16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12～13页。

[30] 《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0月19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15页；《革命文献》第35辑，第1220～1221页。

[31] 《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0月25日、28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19～20页。

[32] 《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1月2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20页。

[33] 参见蒋永敬《顾维钧诉诸国联的外交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

[34] 《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1月23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

致张学良密电选》（上），《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64页。

[3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25页。

[3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19～420页。

[37]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称《事略稿本》）第12册，台北：“国史馆”，2004，第419～421页；《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30日。

[38] 《申报》1931年12月1日，第8版。王部长即王正廷，李部长为王辞职后的代理部长李锦纶。

[39] 《顾谈对日外交意见》，《中央日报》1931年12月24日，第7版。

[40] 《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稿》（1931年11月25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4页。

[41] Interview with Mr.Johnson，1 December，1931，*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稿》（1931年11月24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4页。

[42] 《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稿》（1931年11月25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4页。

[43] Interview with Mr.Shigemitsu，30 November，1931，*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21页。

[44] Interview with Mr.Johnson，26 November，1931，*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稿》（1931年11月26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5页。

[45] Note of a Converstation between Dr.Koo and M.Wilden，25，28 November，and with Miles Lampson，26 November，1931，*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

[46] 金问泗：《从巴黎和会到国联》，第73页。

[47] 《顾维钧答学生问》，《益世报》（天津）1931年12月3日，第2版。

[48] 《各团体忠告顾维钧》，《新闻报》1931年12月4日，第13版；《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23～424页；《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稿》（1931年12月5日、16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10～11、15页。

[49] Interview with Mr.Wilden，4 December，1931；Conversation between Dr.Koo and Mr.Peck，13 December，1931，*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

[50] 《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稿》（1931年12月22日、24日），《九一八事变后

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16页。

[51] 《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稿》（1932年1月28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17页。

[52] 金问泗：《从巴黎和会到国联》，第86页。

[53] 《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稿》（1932年2月2日、4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18页。

[54] 《顾维钧致王树翰等转张学良密电稿》（1932年3月1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20页。

[55] 《申报》1932年3月14日，第1版；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6卷上，第237页。

[56] 《顾维钧欢迎词》，《申报》1932年3月18日，第1版；《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致其妻子信件》（上），《民国档案》2002年第2期，第27页。寇松为1919～1924年的英国外交大臣。

[57] Conversation with Lytton，15，27 March，1932，*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Koo to Lytton，17 March，1932，*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5.

[58] 《张学良致顾维钧》（1932年3月2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6。

[59] 《1932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四次会议记录》，*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5。

[6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28页；李顿4月11日日记，《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日记》，王启华译，《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第21页。

[6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28页。

[62] 《顾维钧接见日本记者》，《申报》1932年4月13日，第7版。

[63] 李顿4月14日日记，《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日记》，《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第22页。

[64] 《顾维钧与李顿会谈记录》（1932年4月1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

[65] 《李顿给妻子的信》（1932年4月28日、5月9日），《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致其妻子信件》，《民国档案》2002年第2期，第41页；第3期，第33页。

[66] 《顾维钧致张学良并转罗文干、汪精卫、蒋介石电》（原件无日期），*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6；《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35～438页。

[67] 《顾维钧致张学良转罗文干》（1932年5月1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

box 6。

[68] 《顾维钧致张学良并转南京罗文干、汪精卫、蒋介石》（1932年5月），*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6。

[69] *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6；《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35页。

[70] *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5.

[71] 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第451～452页。

[72] Lytton to Koo，7 June，1932，*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5.

[73] Koo to Lytton，29 July，1932，*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5；Conversation with Lytton，19，20 June，1932，*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

[74] 《顾维钧致汪精卫》（1932年7月）、《顾维钧致史量才、黄任之》（1932年7月1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6。

[75] Conversation with Zinamensky，23 April，1932，*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

[76] 《顾维钧致汪院长、蒋委员长、罗部长、宋副院长》，*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3。原件只署漾日，根据电报内容，当为1932年4月23日。

[77] 《罗文干谈外交》，《申报》1932年5月3日，第8版。

[78] 《论对苏复交与防遏共产》《从国际情势谈到中苏复交》，《申报》1932年5月12日、13日，均第3版。

[79] 《中俄复交意见书》（1932年5月），*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3。

[80] 《罗文干致顾维钧》（1932年6月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3。

[81] 《顾维钧致罗文干》（1932年6月2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3。

[82]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中华书局，1988，第509页。

[83] 四份文件均见*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3。其中致加拉罕函署“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作于北平”。

[84] 《顾维钧致罗文干》（1932年7月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3。

[85] 《罗文干致顾维钧》（1932年6月29日、7月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3。

[86] 《李维诺夫致颜惠庆的信》（1932年7月6日），《近代史资料》总7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198～199页。

[87] Hussey to Koo，20，24 July，1932，*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3.何士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此次访苏，曾赴加拉罕办公室做一长谈，见Harry Hussey，*My Pleasure and Palaces*：*An Informal Memoir of Fourty Years in Modern China*，Doubleday，New York，1968，p.311。但他致顾维钧的电报中未提到与加拉罕见面。

[88] 《罗文干致顾维钧》（1932年7月2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3。

[89] Koo to Hussey，22 July，1932；《顾维钧致罗文干》（7月2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3。

[90] 《罗文干致顾维钧》（1932年7月2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3。

[91] 《顾维钧致罗文干》（1932年7月2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3。

[92] 《罗文干致顾维钧》（1932年7月2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3。

[93] Koo to Hussey，July 27，1932，*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3。

[94] 《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676～677页。

[95]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第98页。

第七章 抗日外交第一线

一 在国联讲坛上

1932年9月，顾维钧在离任驻英公使整整十年后，再次赴海外出任中国驻外使节，回到他最擅长的岗位上。

这一年上半年，在任命顾维钧为李顿调查团顾问时，国民政府就考虑在调查团完成实地调查后，派他赴日内瓦在国联讲坛上代表中国。而作为中国驻国联代表的颜惠庆因独木难支，也在催促南京请有国联经验的顾维钧及早赴欧。[1]中国驻国联代表通常同时出任中国驻欧洲某个国家的使节，如顾维钧出任中国驻国联首任代表时是驻英公使。因此，国民政府决定让顾维钧仍出使伦敦，以收驾轻就熟之效。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使顾维钧的任所从伦敦换到了巴黎。差不多在任命顾维钧的同时，国民政府决定任命郭泰祺出任驻法公使，顾维钧也将郭介绍给了法国驻华公使。但郭泰祺与法国公使会面后，却来与顾维钧商量要互换任所。原来，郭泰祺发现法国人不愿讲英语，而他自己又不懂法语，到法国不免尴尬。在当时的中国外交官眼中，伦敦的地位要高于巴黎。因为近代以来英国一直是在华影响最大、投资最多的国家，出使英国要比出使法国重要、显赫得多。但顾维钧还是答应了郭泰祺的请求。因为他认为，巴黎是观察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场所，是欧洲传统的政治中心，与国联总部日内瓦也近在咫尺。此外，他还有一个个人的考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学过法语，多年不用，已经生疏，但他一直有说好法语的愿望，喜欢法语的优美、文雅，认为它适合于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外交事务，是外交场合的正式语言，一个好的外交官应该能用法语交谈。行政院长汪精卫同意了这一调换。[2]有意思的是，9年以后，郭泰祺的驻英大使职位又是由顾维钧接替的。

10月初，顾维钧抵达巴黎，主持中国驻法使馆。上任伊始，虽然使馆事务繁杂，但顾维钧的主要精力不得不花在国际联盟方面。到巴黎还

不满一个星期，国书尚未来得及递交，他就匆匆赶往日内瓦，履行作为中国驻国联代表的职责。此后，他就频繁来往于巴黎和日内瓦之间。

中国驻国联代表团由三位代表组成。首席代表是颜惠庆，还有一位代表就是驻英公使郭泰祺。此外，还有几十名随员，都是各方面的专家。在中国的驻外机构中，国联代表团称得上规模庞大了。此时的驻法使馆只有十一二人。国民政府对国联的看重于此可见一斑。

顾维钧到日内瓦时，中国代表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应对刚发表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李顿调查团在中日两国实地调查历时半年，于8月底完成报告书，10月初经各代表签署发表，交国联审议。这一报告书共有十章，前八章着重叙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局势，后两章提出解决中日争端的建议。顾维钧对报告书的基本看法是："前八章关于事实的叙述，看来是正确地反映了满洲的形势，但最后两章（包括建议）则似乎很受既成事实的影响。报告书还应该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说明日本一贯的扩张政策，以及为执行这种政策而长期准备的满洲军事行动计划。"[3]

10月11日，顾维钧与颜惠庆、郭泰祺联名致电南京，就中国在即将举行的国联行政院会议讨论李顿报告书时应取对策提出建议：

> 李顿报告，迭探各方空气，并经惠等详加研究，原报告九、十章过于迁就事实，与前八章不相呼应，自未能尽满人意。但东案发生，业逾一载，三省人民，水深火热。拖延愈久，收拾愈难。如国内一时别无办法，似可接受报告书为讨论之根据。

同时，他们认为，在接受报告书时应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不承认日本侵略所得之结果、保留赔偿责任等。[4]

对完全依靠国联解决中日问题，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就持保留态度，但既然出使国联，就希望充分利用国联这一讲坛，争取各国支持，创造有利于中国的外交局面。正如他在代表团内部讨论时所表达的："李顿报告书及其建议，无论修改与否，日本方面都会断然拒绝。重要的是，在中国一方应该确定并表现出公正合理的立场，这样做既可获得国内广泛的支持，又能引起国际舆论的重视与同情。"[5]

顾维钧等的建议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基本认可。外交部长罗文干给代

表团的指示称："李顿报告书经政府当局审慎考虑后，认为在不妨害中国主权、领土与行政完整秩序之下，有不少部分可按其原则进行东北问题之磋商。"但"九、十两章建议，几完全注重日本希望与其在东三省之实力，而将九月十八日责任弃置不顾。吾国不能不要求国联为必要之修正"。罗文干还转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对于报告书宜采取温和态度，不可表示过度之反抗。"国民政府对国联仍寄予较高的期望，"中国政府对于国联之信仰始终不变，深信经此次调查团努力之后，国联必能确定办法，为中、日谋一公平适当之解决"，延续了"九一八"以来依赖国联解决的方针。[6]

中国驻国联的三位代表只有一人可以代表中国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并发言。顾维钧来日内瓦之前，这一工作是由颜惠庆担任的。因为国联行政院将讨论李顿报告书，而顾维钧自始至终参加了李顿调查团的工作，颜惠庆向外交部提出由顾维钧接替他在行政院的工作。外交部同意了这一建议。

11月21日，国联行政院开始讨论李顿报告书，行政院会议也就成了中日两国唇枪舌剑的战场。顾维钧代表中国出场，日本代表是以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而闻名的松冈洋右。"一·二八"事变时，顾维钧在上海与他见过面。首先发言的松冈极力为日本的侵华政策辩护，不但对李顿报告书中的事实部分予以否认，而且对被中国代表认为已过于迁就日本的最后部分也加以拒绝。作为一名外交官，松冈能言善辩，在行政院会议上极尽玩弄辞藻之能事。顾维钧承认，他的确是一个对手。但论辩论技巧，顾维钧毕竟是常青藤名校辩论赛中的佼佼者，更何况正义和公理在中国一边。

轮到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了。他一开头就针锋相对地驳斥松冈的论点，指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其大陆政策的具体表现，并一一列举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华侵略行径。在称赞李顿调查团工作的同时，顾维钧依据报告书的调查结果提出三条补充原则：第一，不得纵容侵略；第二，被侵略国家对被侵略造成的损害有索赔的权利；第三，日本撤军是解决争端的先决条件。发言的最后，顾维钧将中日争端的解决与维护国联宗旨联在一起，以引起行政院成员的关注："《报告书》对一些事实的调查和结论进行了透彻的论述。现在是国联采取快速并有效行动的时候了。继续优柔寡断将不仅给三千万东北人民带来更多的流血和更深的苦难，而且将不可挽回地动摇世界人民对这伟大的和平体制的普遍信

心。”“这将不仅置中国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而且国联本身的地位也受到挑战。”[7]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顾维钧与松冈继续舌战。路透社记者报道称：“中国代表顾维钧与日代表松冈相对而坐。当松冈演说时，顾代表默坐静听，面色异常安详。”在激辩中，顾维钧不仅义正词严，也时有诙谐的语言，以增强论辩的效果。松冈多次指责中国民众抵制日货是排日，是变相战争，顾维钧回答道，抵制日货是一种自卫措施，是中国民众的一种抗议形式，随即话锋一转，“若抵制日货为变相战争，则中国甚欢迎日本之排华，而不欢迎日本之占领东三省也。”这番揶揄日本的话引得全场大笑，而松冈之尴尬可想而知。[8]

顾维钧的发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1月28日，国联行政院不顾日本的反对，通过将李顿报告书送国联全体大会的提案。12月6日，国联大会召开关于中日问题的特别会议，通过决议将中日问题交十九国委员会，要求该委员会研究李顿报告书，草拟建议提交全体大会。十九国委员会是国联为处理中日问题而成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

为使十九国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尽可能有利于中国，顾维钧与各国代表广泛接触，向他们阐释中国的立场，争取对中国的支持。12月12日，他与颜惠庆、郭泰祺邀请英国外交大臣西蒙（John Simon）午餐，告诉他中国认为国联最低限度应该做到：（1）通过李顿报告书中的调查结果；（2）发表一项不承认“满洲国”和不与“满洲国”合作的声明；（3）对拟议中的调解规定一个基础。对于一个领土被侵占的国家，这些要求实在是低得无法再低了。但西蒙认为，中国的第一项要求是有力的，而其他两项要求却是不明智的，因为会被日本看作对它的威胁而遭到反对。[9]英国最担心的就是激怒日本。

英国是国联的台柱，西蒙的态度使中国代表团对国联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前景产生担忧。12月15日，顾维钧与颜惠庆、郭泰祺联名致电外交部，就接下来的外交应对提出建议：“国联懦弱无能日益表露，吾人至相当时机，如决议案与我方希望相距太远，须有坚强之表示。或由代表团退席辞职，或由政府表示变更政策之意。以国联既不能公平解决东案，中国只得另谋出路，同时采取积极自卫自救办法。”提醒政府做好采取强硬政策的准备。[10]

尽管事态发展不尽如人意，但中国代表团并没有放弃外交上的努

力。各国驻日内瓦的代表很多也是本国驻巴黎的代表，顾维钧以驻法公使的身份积极与这些外交官会晤沟通，争取他们对中国的支持。那些中等国家如波兰、捷克、西班牙对中国更具同情心，顾维钧与他们的联络也就多一些成效。

1933年2月14日，十九国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中日冲突的报告草案。10天后，国联特别大会除日本投票反对外通过了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李顿报告书的调查结果，不承认“满洲国”，对中日冲突提议由当事国双方在国联组织的委员会帮助下进行谈判。它大体上符合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最低要求，表明顾维钧等的外交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果。日内瓦外交界对报告的普遍反应是，这是中国在道义上和外交上的胜利，而日本则完全被孤立了。

顾维钧与颜惠庆、郭泰祺在对该报告加以研讨后，向国民政府汇报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个报告对中国有利和不利之处各有三点。有利之点是：中国对东北的主权获得承认；国联会员国承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承认“满洲国”；日本在东北铁路区以外的军事行动及扶持“满洲国”的行动均遭到谴责。不利之点是：日本撤军将取决于日本是否愿意与中国谈判；对日本一旦拒绝国联建议无应对办法；若日本不接受此报告，而中国宣布东北自治，无异于中国受到惩罚。对于中国下一步应如何行动，他们的看法是：“报告书的通过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并给我方以行动自由。但如我国不决心依靠自己行动来坚决捍卫我领土，则其价值即将消失，而历时十七月之外交努力亦将完全付之流水。”[11]

在国联通过中日冲突报告书之前，日本军队已于1933年元旦开始将战火烧向长城沿线，相继占领了山海关等处，华北门户洞开。1月10日，顾维钧等致电国内，表达对局势的担忧：“东案发生已逾一载，人则得步进步，我则节节退让，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抵抗之声愈高，疆土之蹙愈甚。”“窃念山海关如华北屏蔽，天险一失，平津震动，并非局部之地方问题。”进而提出：“天助自助者。我人苟不积极奋斗，则事实正成，恐国联亦与友邦爱莫能助。应请于拒绝局部忍辱了事之外，更与地方长官熟筹全局，积极收回榆关，徐图恢复东省，以减少列邦之鄙视而增国联之助力。”呼吁政府加强抵抗。[12]

2月下旬，报告书在国联特别大会通过之际，日本军队又大举进攻热河，呈将热河并入“满洲国”之势。在此时刻，顾维钧认为，国联既已

通过报告书，而日本仍在扩大侵略，中国的外交方针就应有一变更，不必在国联再做无谓之周旋。2月26日，他与颜惠庆、郭泰祺联名致电外交部，提出重要建议：

> 东案报告书通过，国联方面告一段落，此后外交如何运用，全视我国抵抗程度而定。友邦爱我者均望我决心尽力抵抗，庶国联得从容布置……年余以来，日人占领我土地，屠杀我人民，我在国联宣布日人罪恶，而国内方与信使往来，杯盏酬酢，世界各国认为奇事。彼日人进攻热河，欲避免战争名义，借伪国维持治安为名。然伪国既为报告书所否认，自无道德、法律上之根据。现是非既明，我已胜诉，应早日宣布绝交，以正世界视听，使他国不易借口谓中国并未认为战争，盟约第十六条无须适用也。以上两端务祈提出讨论，早计大计。[13]

这一建议的要旨是，军事上全力抵抗，外交上对日绝交；以抵抗为外交后盾，以外交助军事抵抗。顾维钧等提出对日绝交主张，是希望国联能因此对日本扩大对华侵略实行制裁。根据国联盟约第十六条，只有一个国家诉诸战争时，才能对其实行制裁。但是，有的国家责问中国驻国联代表团，既然中日之间仍存在着外交关系，就表明中国不认为日本对中国进行了战争，那么怎么能要求国联对日本实行制裁呢？因此，顾维钧等希望通过对日绝交争取外交上的主动，使国际社会加强对日施压，更希望国内在军事上尽力抵抗，以实力作为外交之后盾。

绝交与否牵动整个国策。因此电报发出次日即收到外交部回电，告知代表团政府正审议他们的建议，并要他们速报绝交的详细方案。顾维钧他们提出对日绝交，是将之作为应对日本扩大侵略整体方针中的一环，其先决条件是抵抗侵略的意志和能力。但是2月底热河前线失守的消息接踵而至，有的部队不战而退，有的指挥官甚至阵前投敌。这使在国联大会上宣称中国要坚决抵抗的顾维钧他们十分难堪。按顾维钧的话说，“颇像讲坛上的发言人，台上说得天花乱坠，而台下发生的事实却完全相反”。于是，2月28日，顾维钧与颜惠庆、郭泰祺联名致电外交部请辞国联代表之职：

> 各国论者，以我军凭崇山峻岭之险，有主客攻守之异。而战线屡缩，失地频闻。友我者对于我国是否真心抵抗，群来惶问；忌我者谓我本无自助决心，国联原可不必多事。惠等待罪

海外，无法答辩。且自报告书公布后，军事方面重要甚于外交。将来外交前途，多视军事为转移。惠等心余力拙，应付乏术。应请准于开去代表职务，另委贤能接充。[14]

辞职电表达了对军事抵抗不力以及由此造成的外交无所凭恃的不满，但辞职请求未获国民政府批准。在国联代表岗位上继续尽职的顾维钧在3月上旬接连致电南京，仍呼吁政府在军事上全力抵抗，在外交上对日绝交。他认为："绝交一事，俟热河军事结束，更难进行，此后外交之运用，自愈难着手矣。""窃谓日人蓄意并吞中国，热河不已，将及华北，华北不已，将及华南。际此国家存亡之交，宜有坚毅果决之谋，恐非局部应付所能渡此难关。"他催促国民政府尽快决策，并告知军事真相，"不致对外论调太离事实也"。[15]

3月13日，蒋介石给代表团发来一电，阐述了南京的对日方针：

尊处对绝交各电均悉。顷钧任（罗文干字——引者注）兄来谈，弟以日军既夺东省热河，又攻沪榆，本无国交可言，故绝交乃迟早问题。现东北军后退，中央军反攻华北，亦准备应战，故以军事战线愈小抵抗愈易。如即绝交，宜顾虑者数端：一、沿江海被封锁，则我兵力分，攻守皆难；二、军火多自外来，现在弹药尚可持一月，如来源断绝，我既乏抵抗力，各国尚未加入制裁，则抵抗何能持久；三、财政全仗关通各税，长江为经济中心，苟日本报复财政，愈加困难；四、共匪尚炽，亦宜分力应付。兄等处境困难，及不绝交十六条亦难适用，弟固深悉。惟军事实情不得不详告。弟意如日本已对我先行封锁，或各国有共同制裁办法，彼时乃绝交最好时机。且此时外交方面既得胜利已告段落，此后当重在军事实际之抵抗，并拒绝妥协，遵守公约及各议决，虽仅召回蒋使（驻日公使蒋作宾——引者注），而未绝交，各友邦或能相谅如何。复钧任兄。[16]

几天后，外交部长罗文干给代表团发来一电，进一步解释了蒋介石的对日方针，称蒋介石虽也认识到国联大会通过报告书后，外交上已告一段落，对通过绝交促使国联对日制裁，"未尝不赞同，惟实行时间不得不审慎考虑"，若日本对中国实行封锁或进攻平津，"则我方一面拼死抵抗，一面实行绝交"。而目前绝交恐"引起日方报复，如封锁港口，甚至扰乱华北或扬子江流域，则我方饷械两缺，应付益觉为难"。罗文干请顾

维钧等体谅“军事当局之苦衷”，“仍设法在国际间周旋”。[17]

顾维钧对南京解释的理由并不赞同，他草拟了一份致罗文干的电报，征得颜惠庆和郭泰祺同意后，联名发往外交部：

> 承示军事当局之困难，弟等深为了解，对介公苦衷尤所佩仰。所云俟日方封锁或攻平津再行断交，窃谓封锁无异对我宣战，日人始终欲避战争之名，恐牵涉各国船务商业，引起国际共同制裁，故迄未实行，非待我先绝交也。至俟日进攻平津再行绝交，似表示我对东省、热河有轻重之分，而于日人所谓关外非我领土之谬说，反有证实之嫌。窃意最好俟军事布置稍为妥帖，即行绝交。[18]

顾维钧的看法是，既然中国自“九一八”以来致力于诉诸国联解决中日问题，那么在国联通过报告书而日本扩大侵略之际，就应该乘势采取强硬的外交措施，对日绝交。这是依靠国联方针的逻辑结果。否则，中国在国联一年半的努力仅仅换来一纸报告书，而对日本的侵略却无法起到一点制约作用，那就是外交上的失败。

但南京的国民政府却另有一番考虑。蒋介石3月13日电报所述顾虑者数端，要点就是中国尚未做好全面抵抗的准备，立即对日绝交反而于中国不利。3月下旬，汪精卫从欧洲回国重新出任行政院长，也赞同蒋介石不立即绝交的主张。南京的立场是，因为未做好准备，不可采取刺激日本的政策。4月1日，汪精卫致电日内瓦中国代表团，表明政府面临的困境：“军数复杂，防备空虚。上个月内仅能对内整理，对外防御，一切反攻收复失地均谈不到。”因此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无法对日绝交：“国联经济绝交之进行，固足以困日本，若日本因此向我急攻，则布置未周，全盘动摇，尤为可虑。”针对顾维钧撤回驻日使节的建议，汪精卫于4月7日再次致电代表团予以反对：“撤回驻使，等于日只损面子，于我无大利益，不如侧重请国联以经济援助中国。”[19]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顾维钧能够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才识，向最高决策层建议他认为最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方针。但外交方针的最终决定权不在像他这样的外交官手中，而决策层考虑问题的视角并非只有外交一途。南京迭次来电使顾维钧认识到，政府害怕绝交后日本宣战，问题还不仅仅是没有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政府正在对江西的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围剿”，要先解决国内问题，所以害怕内外两面作战，腹背受敌。他

看出来，“政府首先解决江西共产党问题的决心，较全力遏制日军对华北不断入侵的决心为大”。[20]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提出锦州中立区计划，民众和舆论认为太软弱，斥责其为“卖国贼”。此次他持强硬立场，建议对日绝交，却又为决策层所拒绝。外交官的才干固然重要，而其能否施展，又有多少施展空间，还要受制于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顾维钧提出对日绝交，还因为他看重国际联盟。作为制订国联盟约的参与者，他坚定地主张维护国际正义和世界和平。尽管执行盟约希望渺茫，他仍然不肯轻言放弃，这是他一直信奉并坚持的“以公理争强权”。

但顾维钧又是一个能审时度势的外交官，国际上大国的反应使他认识到援引国联盟约第十六条以对日制裁不切实际，而国内全面抵抗尚需时日，于是在4月下旬对汪精卫上述两电做出回复：“日人野心不戢，得寸进尺，意在逼我直接妥协。就其范围，我拟准备期间增加抵抗力量，诚属善计。惟国力薄弱，同时仍宜运用国际，俾直接制裁或间接物质助我之目的。否则，日久各国渐形冷淡，或将视为已成之局，届时再图挽救，未免事半功倍。故鄙意我一面仍根据我国际立场继续进行觅援，一面团结全国，积极准备，庶内外协力，收效较易。”[21]期望在政府既定方针之下，继续通过外交寻求对中国的支持。

国民政府反对在外交上对日绝交，而在华北对日军事抵抗虎头蛇尾。5月31日，华北当局与日军代表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一线，日本军队撤至长城沿线，中间地带为非武装区。这一协定实际上承认了长城线为伪满洲国的“国界”。协定谈判期间，顾维钧就风闻有关消息，十分担忧中国过于退让，但函电询问，国民政府均予以否认。直到协定签署，他才获悉具体内容。对此，顾维钧十分失望，他认为，“塘沽协定”的“某些条款，显然不妥”，“有一些不当的政治含义，迟早必将引起纠纷”。而它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就显得更不合时宜了。它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愿意通过让步解决与日本的严重纠纷，并且愿意默认日军侵略所造成的现状”。[22]

“塘沽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国民政府的外交交涉重点，从“九一八”以来依赖国联解决中日争端，转向对日有限度的直接周旋。这一转变使得中国驻国联代表团的作用大为下降，因此协定签订后，顾维钧等向外交部建议撤销中国驻国联代表团。这一建议被行政院长汪精卫所否决。

由于日本已在3月下旬退出国联，顾维钧在国联的工作转向了争取对中国的援助，即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所说的“继续进行觅援”，具体工

作就是推进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顾维钧在国联积极活动，推动国联成立了对华技术合作会。在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他说明中国的立场及技术合作的性质，特别强调技术合作“系纯粹技术的，而决无政治之性质”，以消除一些国家的疑虑和来自日本的压力。在国联确定技术合作代表时，他力挺同情中国并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国联秘书处卫生股股长拉西曼（Ludwig Rajchman），使拉西曼最终成行，技术合作顺利推进。[23]

二 驻节巴黎

出使欧洲之初，国联的工作虽十分繁忙，但顾维钧善于在纷繁的工作中分出轻重主次，尽职地承担起驻法公使的职责。

一名使节最重要的工作，是与所在国政府及领导人建立起互相信任的良好关系，以利于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30年代的法国，政局动荡，内阁变动频繁。在顾维钧出使法国不到10年的时间里，法国政府经历了20次左右的改组。内阁像走马灯一样更换，有的执政一年，有的仅3天。注意到法国政局的这一特点，顾维钧尽可能广泛地与各派政治力量建立联系，不仅与当政者来往，也与那些在野的政党领袖保持沟通的渠道。这样，不管哪派政治力量上台组阁，顾维钧都不会有手足无措之感，双边关系并不会因为法国国内政治的变化而受到太大的影响。

在与众多法国政府官员的来往中，顾维钧特别看重关键性的人物。他认为，与法国政府打交道，外交部的秘书长十分重要。外交部秘书长是一个常任官职，在内阁经常变动的情况下很具影响力。新上任的外交部长对外交问题尤其是远东问题并不一定熟悉，这时秘书长的意见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Alexis Leger）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顾维钧到任后不久，莱热出任秘书长，一直到他离任都任此职，是他与法国政府沟通的重要渠道。

除了与政界首脑保持密切的来往外，顾维钧与法国各界都有接触。他认为，要了解一个国家，就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各个方面，分析各种势力所起的作用，然后与之建立联系。在这一点上，他与前辈老派的外交官不同。那些老派外交官通常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只与驻在国的外交部打交道，因为语言方面的限制，他们无法与更多的人来往。在顾维钧看来，法国的新闻界非常重要，有好几家报纸是不同政治势力的喉舌，了解这些报纸的编辑是了解政治家的重要途径。在法国知识界中，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和大学的教授有很高的声望，他们的看法受到政府的重视。此外，法国天主教徒众多，教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充分认识到这些不同势力的影响，顾维钧与各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从而被认为是巴黎外交官中消息灵通者之一。[24]他的法语也在与法国人的交往中越说越流利。法国人不愿说英语，外交部秘书长莱热的英语十分娴熟，但与顾维钧见面从来不说英语，即使在顾维钧说法语遇到困难、费劲地寻找最

正确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也是如此。不过这样时间一久，顾维钧的法语就运用自如了。[25]

当时的中法外交，除了争取法国在国联支持中国，处理与印度支那相关的问题也占了很大部分。印度支那在地理上与中国相邻，在历史上有密切的交往，有许多华人居住在这块法国最大、最富饶的殖民地上。中国与印度支那法国殖民当局之间陷入僵局的问题，会移交到巴黎来解决。1933年底，印度支那当局反对中国对大米征进口税，双方的谈判在南京破裂后，就由顾维钧承担起向法国外交部和殖民部交涉的重任。两国间在西沙群岛问题上产生争议，也是通过顾维钧与莱热进行沟通的。[26]

巴黎是欧洲重要的外交中心，因此身为驻法使节，顾维钧关注的不仅仅是中法间的外交关系，而是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应采取的对策。他认为，“世界上任何重要地方发生了事情，中国都应该了解，因为这些事情常常会影响中国”。[27]在巴黎，他与各国外交官有着广泛的联系，以了解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他对美国、苏联、德国情况的掌握常常会超过驻在这些国家的中国使节。可以说，他是当时最具全球视野的中国外交官。

顾维钧与中国驻欧洲各国的使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常交换意见。对于那些到巴黎或欧洲其他地方访问的重要人物，他也抓住机会与他们讨论外交问题，并了解国内的情况。这期间，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李石曾等都做过驻法使馆的座上客。

由于巴黎和会的声名和在北京政府的经历，顾维钧虽才过不惑之年，但在外交界已被看作资深外交家。那些与他年岁相差不多但资历却浅的外交官都视他为前辈和可依靠的“后台”，而他对他们也特别关照。中国驻国联代表团中就有几位这样的外交官，其中金问泗在哥伦比亚大学穆尔教授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随后担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随员，并在“九一八”后担任过外交部的次长；钱泰也参加了巴黎和会，顾维钧任外交总长时，他担任过条约司司长；胡世泽则随中国代表团出席过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顾维钧到任不久就向外交部长罗文干推荐了这三个人，建议在承担驻国联代表团工作的同时，任命他们为驻欧洲小国的使节，一方面是适应对欧洲国家外交的需要，一方面也是对这些人以往为国服务的奖励。外交部接受了这一建议，任命金问泗为驻荷兰公使，钱泰为驻西班牙公使，胡世泽为驻瑞士公使。[28]在这一时期的国

联外交中，这几位公使都是顾维钧的得力帮手。

要开展外交就要与驻在国各界人士来往，少不了各种交际应酬，但在这方面顾维钧却面临着不小的困难。这倒不是他不善于应酬，对此他可说是一个天生的外交家。问题是物质条件太差。首先是使馆馆舍过于破旧。顾维钧到巴黎上任时，使馆只租用了一幢大楼的第一、二层，楼上还住着其他房客，共用一个大门和楼梯。顾维钧第一天去使馆上任，正碰上楼上有房客出殡。虽然他并不迷信，但以一国公使身份，走进挂着黑纱的大门去履新总不是滋味。而他刚在办公室坐下，电话铃声响起，是来问订电影票的。原来这幢楼的另一半是个电影院。这样一个场所做使馆，根本无法招待客人，更谈不上广交朋友。到巴黎的第二天，他在给外交部的电报中就提出这一问题："馆前张贴戏目，尤碍观瞻。亟宜觅屋迁移，以维体面。"[29]此后，顾维钧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一面请政府同意购房并备好钱款，一面寻找合适的房屋。由于经费以及找房的不易，直到1937年3月，中国使馆才搬入花了500万法郎买下的新楼。新馆与西班牙使馆为邻，临近法国总统官邸爱丽舍宫。新馆搬迁不久，正好孔祥熙来法国，称赞这里是中国最好的驻外使馆。[30]

使馆经费拮据是另一个问题。在整个民国时期，这也是中国驻外使馆面临的普遍问题。1933年3月14日，顾维钧致电外交部报告驻法使馆经费不敷使用、亏欠严重：

> 法馆前积欠电报房租等费，人言啧啧。法外函电代催，殊碍体面。抵法后，各外帐均按时清付，信用稍复。大部谅同此旨。惟到任五月，筹垫不赀。上月承汇另款万元，不敷归垫，更难为继。本月房租及前代办任内欠租共四万五千佛郎，瞬即届期。恳速拨另款两万元电汇为祷。[31]

中国驻国联代表团面临同样的困境。驻法使馆发出电报后几天，顾维钧又与郭泰祺联名致电外交部恳请拨款："我团两周来，库空如洗。因电报局再次催付时，警告说，今后一切文电，除预先付费者外，概不受理。拟恳迅即电汇三千英镑为祷。"但使馆经费不足的状况并非一两封电报催款就可以解决的。驻国联代表团从4月到6月底都没有收到国内的汇款，此时拖欠的电报、印刷等费用已达7000美元了。[32]

好在应付经费不足的困境，顾维钧有其他中国驻外使节无法拥有的优势。出身南洋糖王家庭的太太黄蕙兰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使他免于捉

襟见肘的尴尬，可以在巴黎外交界广交朋友。驻法使馆新馆第一次正式宴会的宾客是法国总统勒布伦（Albert Lebrun），餐桌上的一套镀金餐具是黄蕙兰结婚时的嫁妆，当年花了一万英镑定制，宾客对此无不赞赏，为宴会增色不少。[33]

1934年6月，顾维钧获准离欧回国，一方面是向国民政府汇报欧洲以及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中国在国联活动的情况，一方面是想借此了解国内在对日问题上的全盘方针。

回到国内，顾维钧先后到南京和庐山见了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报告在欧洲的情况。根据与汪、蒋的谈话和自己的观察，他明白，国民政府在依靠国联的政策受挫后，对国联已不抱希望，对英、美是否会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也无足够的信心，因此对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期望以此赢得备战的时间。

顾维钧回国述职，引起各界关注。9月23日，上海市商会、全国商会联合会、中国红十字会、环球中国学生会等十多家团体设宴招待顾维钧，出席者有虞洽卿、陈光甫、杜月笙等各界名流。宴会主持人称赞顾维钧“两载星轺，不辱使命”，请其就中国外交发表“宏论”。顾维钧在演讲中说：“国人对外交见解，有两见解：一谓弱国无外交，一谓正惟弱国始须外交。此两说皆可谓确，而亦皆可谓不全确。国无强弱，皆有赖外交，惟其方法则不同。而弱国之外交，尤关重要。因强国外交可较为大意，以稍有所失，尚有其他方法补救，弱国则不能一毫松懈。”此正道出一个弱国外交官的心声。对于国际形势，他指出，“远东情形，亦在风云紧张之中，我国正如风雨中之孤舟，其处境万分困难”，因此“必须全国有一致之意志，始能发为一致之行为，同心一德，始能挽救国难”，希望全国上下团结对敌。[34]

回国不久，兼任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请副部长徐谟转告顾维钧，想调他去华盛顿担任驻美大使，以此推进与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更为密切的交往。获此消息后，顾维钧马上致函汪精卫：“徐次长传达尊旨甚感。美馆使务繁剧，植使（施肇基字植之——引者注）老成练达，应付裕如。弟连年奔走，形神交疲，恐难胜任，辱承垂意，弥增惭惶，尚祈酌夺。”[35]除了其中提到的理由外，其实顾维钧还担心巴黎和会因排序产生的误会在两人间重演。但汪精卫坚持已做出的决定，请在上海休假的顾维钧到南京去面谈。顾维钧这才明白，汪精卫想推行与美国交往更为密切的新政策，而施肇基不能很好地予以贯彻，因此要用顾去替换施。

推进对美关系一直是顾维钧所主张和期盼的，所以他虽然开头仍然没有答应，但随即就做好赴任的准备，并开始与徐谟商量具体事务。但因为施肇基不愿离任，并通过孔祥熙说项，顾维钧最终未能成行，与驻美大使擦肩而过。[36]

回国述职，原本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报纸上时有顾维钧假期将满即将返任的消息，但随即又告知要延期了。最后顾维钧在国内待了近两年才返回巴黎，主要是中法外交关系从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造成了延宕。中国自清末与各国互派使节，但只有公使，而无大使，因各国皆轻视中国。1924年，苏联的加拉罕成为第一位外国驻华大使，但中国当时并未向莫斯科派驻大使。直到1932年中苏复交后，颜惠庆才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国民政府以此为契机，向各国提出升格外交关系。1934年夏回国前，顾维钧奉命向法国外交部提出这一要求。但法国方面对此并不热情，议会通过的程序又有拖延，一直到1936年1月，才通知中国同意外交关系升格，在各大国中是最晚的。

在等待中法外交关系升格期间，顾维钧在国内的日子，与驻外使馆时相比，显得十分悠闲。除了有时见记者接受采访外，就是会朋友，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不时还会打几圈麻将。有一次蔡元培专程到青岛来看他，顾维钧托人准备了一坛50年的陈年老酒，招待喜欢喝黄酒的蔡元培。两人品着佳酿畅谈，三个小时没有离座。[37]

但顾维钧并没有完全闲着，他的精力又转向了投资。前面提到，九一八事变前相对空闲的时候，顾维钧在东北投资垦荒。此时他的兴趣是西北的石油开发。还在投资东北垦荒时，他就听一位去过甘肃玉门的俄国人说，那里有一条“淌着黑水的河”，当地居民用河水点灯。因此他与几位银行界的朋友组成一个投资集团，准备着手石油资源的勘探和开发。[38]但九一八事变后他忙于外交事务，这件事就搁了下来。此时在国内，有了时间，于是石油开发一事又进入顾维钧的视野。

1935年7月，顾维钧联合之前合作过的银行家周作民、钱永铭，以及南洋富商严恩槱和张盛隆，向国民政府实业部申请特许专探专采甘肃、新疆和青海三省石油，要求给予“探勘石油之经营权，其年限五年”，“探勘工作费用均归呈请人或其组织之公司担任”，并保证“五年内找不到有工业价值之油矿，特许权废止”。国民政府相关各部会同审查后，以“各种矿业依总理遗教，应归国营，惟目前国库竭蹶，无力经营，与其弃置，似不如利用民资提早开采”为由批准，并与11月20日正式颁

发特许状。随后，顾维钧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煤油探矿公司。[39]

国民政府核准时称各种矿业按孙中山遗教应归国营，这是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中提出的。但因为财力有限，国民政府在1935年4月允许民间资本参与矿业开发，顾维钧等人正是抓住了这一时机。要开发油矿资源，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在技术、设备和资金方面都要有外国的合作。还在向政府申请过程中，顾维钧就委托其加拿大好友何士与美国石油业联络。何士以顾维钧代表身份与美孚石油公司主席帕克（P.W.Parker）、董事会主席瓦尔登（G.S.Walder）洽谈，并将商谈情况及时报告顾维钧。因为国民政府不准外资进入石油开发，顾维钧等从政府获得的特许状也有“全用华资”的规定，为规避相关法规，顾维钧提出先注册一家中外合资的矿业投资公司，中美资本各占一半，然后由这家公司与中国煤油探矿公司合作。这样，与美孚的合作就成了两个中国法人的合作。[40]

此后，按照顾维钧设计的模式，美孚石油公司挑选的地质学家韦勒（Marvin Weller）和苏顿（Fred Sutton）来华，于1937年底结束在西北地区的考察，并与中国地质学家孙健初一起完成《西北甘肃、青海两省地质考察报告》。该报告断言，“石油即将出现于甘肃西北部”，该处“将成为一最有价值的产地”，并提出从国防需要看，“当不惜一切代价以求其成”。[41]此时中国煤油探矿公司因为没有按规定如期开发石油，特许状已被政府收回，但韦勒等的报告书为后来玉门油田的开发奠定了基础。顾维钧在此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在国民政府中的人脉和在国际上的声望，对美国地质学家赴西北完成考察起了关键作用。[42]从中也可看出，对于投资，顾维钧也颇有兴趣和眼光。

1936年3月下旬，顾维钧从上海乘船离国，于4月中旬抵达巴黎，成为中国驻法国首任大使。返法之后，由于中法之间并无重要的外交事务，顾维钧的主要精力在观察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研究对日问题。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顾维钧敏锐地觉察到，这表明日本将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在此情况下，南京正在推行的通过对日谈判谋求妥协的策略毫无成功的希望。因此，他一方面积极与法国、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外交官接触，争取这些国家在远东支持中国，一方面向南京报告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希望能推动中国外交方针的调整。外交部长张群也在此时发电征询他对外交政策的意见。

11月26日，顾维钧给张群发了一份长电，阐明其对中国外交的看

法：

> 我国处境危急，地位孤立。各国对我虽多表同情，均非为我奥援。临难求助，呼应不灵，盖无与国所致也。惟选择与国，宜与彼此国策相容而不背为最要。前此我与德、义（意）接近，凡军事上之一切人才器械，大都取之于彼，当为一时权宜之计，原非得已。现德、义与日结合，实际上同以侵略、主战、反对国联为政策，是不特与我国策国情相背，恐于我国前途有害……现英、法、俄、美均属持盈保泰，无侵略野心。美则虽未加入国联，其对盟约上一切维持和平办法，素表赞成。且此四国，均与远东有领土及其他重要关系。其对日本之侵略国策，尤与我国目前利害相同。而于外交、军事、财政或工业上，均有能力助我。故如我于保全领土主权行政完整之固定范围内，实无与日本妥协之望，则宜速谋与此四国接近。

这份长电对中国外交全局有通盘的考虑和具体的对策，并直指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不当之处，如与日本妥协“无望”，与德国接近“于我国前途有害”，而此时国民政府与德国的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发展迅速。顾维钧在电报中强调，外交要旨在“选择与国”。英、法、俄、美就是在外交、军事、财政和工业诸方面有能力助我的“与国”，“我国处今日情况，在亚与苏俄同利害，在国际上与英、法、美同立场，能合作也”，明确主张为对付日本侵略，中国需与英、法、俄、美合作。[43]但张群此时正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就调整中日关系进行会谈。会谈数月虽无进展，外交部发言人在12月7日发表谈话仍表示，“张部长对于川越大使为两国邦交诚恳努力之精神，非常钦佩，尤希望于最短期内，依川越大使之努力，得以消除障碍，顺利进行也”。[44]因此，顾维钧长电中对中国外交的建言没有引起决策层的重视。

这份电报发出后不久，西安事变爆发了。远在巴黎的顾维钧一时无法了解事件的内幕，好在外交部副部长徐谟及时致电驻荷兰公使金问泗通报情况，并请他转告顾维钧。金问泗于12月15日收到来电当日即告知顾维钧。了解情况后，顾维钧对张学良采取这样的行动并不感到意外。12月16日，他以个人名义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电报，希望他以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迅速释放蒋介石。[45]

随后，顾维钧赶往意大利的热那亚，与事变后急着回国的汪精卫见面。汪精卫上一年遇刺后辞去行政院长一职到欧洲养病，但仍是国民党

内举足轻重的人物。获悉事变消息后，汪精卫准备了一份声明，明确表示反对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也不赞成与苏联接近。顾维钧对此并不同意。他向汪精卫表明，中国对外应该争取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对内应促进与共产党的谅解。因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危险来自日本，所以应该设法使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军并肩作战，打击共同的敌人日本。汪精卫问顾维钧蒋介石还有没有可能重新上台，顾维钧回答有此可能。汪精卫对此答复很惊讶，因为他认为蒋介石没有出来的可能，即使出来也威信扫地，不足以号令天下。与顾维钧见面后第二天，汪精卫就登上驶向中国的船只，踌躇满志地想回国收拾局面。船离开意大利次日，蒋介石从西安回到了南京。[46]

在驻外使节岗位上，顾维钧十分注重舆论宣传工作。还在赴法上任前，他就告诉外交部长罗文干，中国在国际上的舆论宣传大大落后于日本。要获得各国的同情和支持，必须花功夫加强这方面的工作。[47]到日内瓦后，顾维钧在中国代表团内设了新闻处，请曾留学美国的杨光泩负责。1933年杨光泩调回国内任职，并兼任在上海的英文报《大陆报》总经理。但顾维钧仍请他为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做舆论宣传工作，将中国代表团在国联的发言编成英语小册子广为传播。[48]

从民国初年进外交部工作后，顾维钧就一直看重外国记者的作用，在驻法期间仍然如此。法国《巴黎时报》记者杜博斯克（Andre Duboscq）经常访问中国，所写有关远东的文章在法国乃至欧洲都有影响。但他以往受日本资助，发表文章多偏向日本。驻法使馆发现后，就与他积极沟通联络，并按季度给予资助，提供中国方面的资料。在驻法使馆的影响下，杜博斯克文章的基调逐渐发生变化，对中国政府及经济发展都有正面的报道。1936年底，顾维钧获悉杜博斯克准备于次年赴华游历3个月，即给外交部发电报，建议资助其8000元经费，使其游历结束返欧后能为中国做宣传，此举“所费不多，收效必巨”。[49]

全面抗战爆发后，对外宣传任务更重，但国内对战事第一线北平、上海的报道传到巴黎时间迟缓，内容简略，且时常消息混乱冲突。驻法使馆就根据各种消息来源，自己编写报道，并以官方身份发表宣言，交法国报纸刊登。顾维钧还通过任职以来建立的人脉，请法国社会名流或政治家撰写支持中国抗战的文章。但这些工作都需资金推动，“法报势利，殆非金钱资助不可”，而使馆原本就拮据的经费中并无用于此项的专款，为此，顾维钧催外交部“请速统筹”。[50]

为做好国际宣传，顾维钧还与在巴黎的共产党人吴玉章有来往。1937年底，吴玉章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到巴黎开展国际宣传工作，其间托顾维钧通过使馆向国内发了两份加强国际宣传工作的电报，一份是给蒋介石的，另一份是给八路军汉口办事处的周恩来和陈绍禹（王明）的。给蒋介石的电报称："先生领导全国坚决抗敌，中外同钦。章久居海外，深感国际宣传重要，政府亦早见此。窃以国际宣传，欲收实效，贵有统一领导机关，尤宜派遣政府与各界代表团一致工作。关于扩大与统一国际宣传，章已有意见书航空邮上，乞酌裁赐复，章自当竭力从旁襄助。"给周恩来和陈绍禹的电报称："电悉援华运动美英较强，法仍弱。昨各大使谈话，一致同意设立国际宣传机关，惟须待政府核准接济经费。可否由兄转请政府，先拨五万元以利进行。"[51]从后一封电报看，顾维钧与吴玉章讨论了国共合作的国际宣传机关，以期统一开展国际宣传。

三 为抗战声辩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军队在北京城外的卢沟桥边挑起事端，将侵华的战火烧向华北。中国军民开始了全面抗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一方面宣示最后关头已到，决心应战，并调集军队开赴华北前线，另一方面不放弃以外交手段解决事端。所谓外交手段就是诉诸国联和争取列强出面调停。7月12日，外交部长王宠惠致电顾维钧，表示中国正考虑就日本侵华向国联提出申诉，请他就此与法国政府接触，了解其态度。[52]

顾维钧在获悉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认为，中国抗击日本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不能指望靠一次战役就能阻止日本军队的进犯。作为一名外交官，应该唤起列强与各国人民对中日战争的关注，揭露日本侵华真相，使国际社会明确日本是侵略者，必须对其进行制裁，并积极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53]这是民族危亡之际历史赋予一个外交官的责任。

根据外交部的指示，顾维钧与法国外交部进行了接触，探讨中国诉诸国联的前景。由于国联在处理九一八事变以及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事件中所显示的软弱和无能，作为国联主要成员国的法国认为，中国不可能从日内瓦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但法国并不反对中国向国联提出申诉。

顾维钧对国联的局限也有相同的认识，但赞成向国联提出申诉。因为有丰富的国联外交经验，他马上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提出申诉。王宠惠来电中提到将按国联盟约第17条提出申诉。这条是针对国联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冲突。但根据这条，接下来就要运用有关制裁的第16条，这是英法等国不会赞同的。所以，顾维钧考虑可以使用第11条，即尚未达到交战阶段的一般纠纷，这样可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为此，他专门与法国和比利时的国际法专家讨论，希望根据国联盟约找到最有利于中国的申诉办法。[54]在中国的外交官中，他是最注重国际条约和国际法的。

在为诉诸国联做准备时，顾维钧也在考虑其他外交途径。7月下旬，他在与法国外交部长会面时，探讨了举行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

国会议的可能性，提出根据该条约第7条签约国在有需要时可以进行协商。[55]显然，顾维钧希望不是国联成员国的美国能够介入中日问题，而诉诸国联是无法做到此点的。但此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美国政府不愿在远东采取任何有可能得罪日本的行动，对英国有关联合调解的建议，也不予以积极回应。在此情况下，顾维钧认为中国外交应以争取苏联的军事合作为第一步，化解美、英、法等国怕被拖入战争的畏惧心理，然后再争取它们的物资援助。他在巴黎与苏联驻法大使就此进行过商谈。7月下旬，他应此时在欧洲访问的孔祥熙之邀赴伦敦，与孔及驻英大使郭泰祺讨论对日抗战的外交应对，就先争取苏联的支持达成一致看法，由他起草致电外交部提出这一建议。[56]

7月底，华北前线局势恶化，北平、天津相继失守。而此前外交部来电还说中国军队在廊坊、丰台、通州等处获胜。听到北平这座古城落入日军之手，正在频繁与法国和其他国家驻法国的外交官会面的顾维钧十分沮丧，感到无脸见人。获悉中国军队从天津撤出的当天，他在日记上写道：“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消息。中国养兵百万又有何用？”[57]

8月13日，日本将侵华战争扩大至上海。上海及其邻近地区不仅是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区，也是英、美等西方列强在华利益最为集中的地方。国民政府认为，列强对上海战事的关注必定超过对华北战事的关注，因此一面调集大军开赴淞沪前线抵抗，一面决定尽可能利用国联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国联毕竟是中国能将日本侵华事实公之于世的唯一的国际组织。

作为中国驻国联的首席代表，顾维钧又一次肩负代表中国走上国联讲坛的重任。9月中旬国联大会开会前，他积极活动，与国联官员和各国外交官探讨中国向国联申诉的问题。9月11日，顾维钧会见国联秘书长爱文诺（Joseph Avenol），要求国联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予以制裁，但爱文诺表示，制裁在目前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在明白中国不能指望国联采取像制裁那样强硬的措施后，顾维钧退而希望通过中国的申诉，国联起码能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发表一个反对侵略者的宣言。而实际上，要国联做到这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9月12日，中国代表团正式向国联递交了中国政府的申诉书。次日，国联大会开幕，中国的申诉被列入会议议程。顾维钧要求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以便让各国可以首先讨论中国的申诉，这一要求得到爱文诺的认可。9月15日，顾维钧在国联大会上发言。1932年末国联讨论李

顿报告书时，顾维钧的主要对手是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双方要展开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此时因为日本已退出国联，发言的对象不同了，顾维钧确定发言的宗旨是激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使世界舆论了解事件的真相及其与世界的关联。他首先指出日本的侵略使无数手无寸铁的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丧命，连英国驻华大使乘坐的小车也在上海附近遭日军飞机扫射，并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其既定的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如果日本的侵略不受到制止，列强在远东的利益就会继续遭到挑战。因此，中国的抗战不只是在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主权，也与各国的利益息息相关，“和平是无法分割的；和平的持续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他站在国联讲坛上，向各国发问：“能让日本一直这样漠视国际法和条约义务而不受到任何惩罚吗？我们把违反当作必然吗？我们准备眼睁睁地看着它无节制地伸展触须、破坏世界的和平和秩序吗？”[58]顾维钧的发言总能打动听众，发言结束后，英、法、苏等国代表纷纷向顾维钧表示祝贺。法国哈瓦斯通讯社报道说，“大会议场内，产生异常热烈之印象，不仅顾氏演语毕后，自讲坛退席时掌声雷动，嗣后由译员译成法语之后，听者亦大为鼓掌，此为国联会议场中向所未有”。[59]

然而，这些廉价的赞扬于事无补。在实质性问题上，国联怯于表明鲜明的态度，只愿息事宁人地进行消极调停，甚至对谴责日本为侵略者都畏首畏尾。9月下旬，侵华日军对上海、南京等中国城市非军事目标肆意轰炸，造成中国平民重大伤亡。顾维钧在劝说法国政府就此向日本提出抗议的同时，决定利用这一时机要求国联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在国联的顾问委员会上，他发言说：

> 如果国联在强权面前不能捍卫公理，它至少可以向全世界指出谁是为非作歹的人。如果它不能制止侵略，它至少可以斥责侵略。如果它无力执行国际公法和盟约的原则，它至少可以让人们知道，国联并未弃之不顾。如果它不能防止对无辜男女老少的残酷屠杀和对财产的疯狂毁坏，它起码可以表示它愤怒的感情，并借以加强文明世界的普遍要求，立即停止这种非法的、灭绝人性的空袭兽行的行动。[60]

顾维钧希望在日本对中国城市和平民野蛮轰炸的事实前，国联至少能站在人类正义和国际公理的立场上有所表示。9月30日，他草拟了一个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草案，准备向顾问委员会提出。但是，国联秘书处生怕会刺激日本，要求中国撤回这一决议草案。尽管顾维钧坚持

绝不撤回，但对秘书处的行径十分愤慨，认为其“胆怯、操纵和诡计，实在是太卑劣了”。[61]

当中国代表团继续在国联努力之时，国联的主要支柱英国却不想让中日问题局限在国联范围之内，而由它自己承担过多的责任。10月初，英国驻国联代表提议召开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商讨以协商办法解决中日冲突。英国提议的目的是希望将棘手的日本侵华问题从国联转向一个专门的国际会议，使不是国联成员国但却是华盛顿条约签字国的美国也介入。这一办法既可以使英国得以摆脱在国联的困境，又可以谋求与美国在远东问题上的合作。由于事先并无所闻，国联其他成员国包括作为观察员的美国对这一提议都颇感突然。顾维钧马上明白，英国的这一提议是想“把烫马铃薯扔进华盛顿公约的篮子里”，硬塞给美国政府。[62]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虽在英国提出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之际，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声言要制止国际上正在蔓延的毫无法纪的“侵略瘟疫”，但由于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牵制，他并不想成为会议的倡导者，也不愿会议在美国举行。经过一番周折，会议定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除《九国公约》签字国外，另邀请与远东有重大利益的国家参加。中国政府于10月19日任命顾维钧和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比大使钱泰为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

如前所述，对于援引华盛顿《九国公约》召开有关国际会议，顾维钧在7月下旬就有过考虑，目的也在于使美国不要置身事外，因为它毕竟是远东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他曾向南京提过建议并试探过法国等国的反应，但并未代表中国政府做过正式提议。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的建议后，顾维钧立即考虑中国应采取的对策。他认为，如果日本出席这个会议，中国应就解决东北问题、华北问题等提出一套具体方案；而如果不出席，中国则应集中精力建立与各主要大国的联合战线。他将自己的看法报告外交部，请政府研讨后尽快确定中国参会的具体方针，以免会议召开后，时间紧迫无法及时获取指示。[63]

参加会议的列强尽管各有各的算盘，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希望通过斡旋在中日间达成停火，并要求日本与会接受调停。但是中国赞成召开这样一次会议，首先是希望会议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其次是希望列强能在物质上援助中国。因此，会议尚未召开，顾维

钧已经看出中国与列强之间在希望会议达成的目标上大相径庭。

远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对此形势也十分明白。在给顾维钧等的电报中，国民政府明确中国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方针是："一、依照当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须认识清楚。二、但我方对各国态度，须极度和缓；即对义（意）、德二国，亦须和缓周旋，勿令难堪。并须表示会议成功之希望，我方求在《九国公约》规定之精神下，谋现状之解决。此系我方应付之原则……三、我方应使各国认识会议失败责任应由日本担负，切不可因中国态度之强硬，而令各国责备中国。四、上海问题应与中、日整个问题同时解决，切不可承认仅谋上海问题之解决。五、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办法。六、我方同时应竭力设法使英、美赞成，并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64]因此，顾维钧代表中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实际上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试图从会议的失败中争得列强的同情，为中国争取外交上的主动，为制裁日本侵略创造条件。

11月3日，布鲁塞尔会议开幕。顾维钧虽屡次代表中国在国际讲坛上发言，但为准备此次会议的讲稿却绞尽脑汁，因为中国面临着极为艰难的境地。一方面，参会的大国不仅自己不愿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而且力劝中国克制，以免激怒日本，影响日本参会的可能性，而中国政府也定下了不承担会议失败责任的基调。另一方面，会议开幕后两天，日本军队在金山卫登陆，冲破中国军队的防线，淞沪前线局势趋于恶化，中国在外交上更为不利。在仔细考虑各种因素并反复斟酌后，顾维钧认为，中国在会上的发言虽措辞和语调可以平缓，但必须要求会议伸张正义，表明中国为争取公正的和平而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希望的和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发言稿不断修改，直至3日凌晨才完成。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口授我最后几段演说稿时，精神体力均感到疲劳之极。直至凌晨4时30分才完成。几位僚属彻夜进行抄写翻译和复印。"[65]

会议开幕当天下午，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由于深感肩上的重任，开始发言时，他出现了少有的紧张。在列举日本对华侵略的事实后，他驳斥了日本拒绝参会的声明。发言的重点是呼吁各国捍卫国际秩序和《九国公约》的神圣原则，提醒他们如果日本的侵略不被制止，世界就会陷入一场大战，所有大国都不能幸免于外。会议对顾维钧寓刚于柔的发言反应颇佳，注重外交辞令的英国外交官称他掌握了"涵蓄的艺术"，舆论则称"措词和平、主张坚决"。[66]

会议期间，顾维钧十分注意会外的舆论宣传，以配合会中的外交活动。11月8日，他致电正在美国的胡适等人，请他们“努力宣传”，向美国人解释中国的参会方针，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以影响美国的舆论和政策。[67]

外交舞台上的较量离不开国家实力的支撑。当中国代表团在布鲁塞尔折冲樽俎时，国内的军事形势却在急剧恶化。为赢得外交上的主动，顾维钧力促国民政府在淞沪前线顽强抵抗，坚守防线。他认为，中国有许多理由必须这样做：首先，中国的抗战尚未引起国际社会应有的关注，一般西方人认为这场战争与世界局势和全球和平无关。只有中国继续战斗，才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促使他们了解这场战争对西方的意义。其次，西方国家的民众以及政治家认为中国抵抗日本毫无成功的希望，因此向中国提供援助无济于事。如果中国军队能够取得一些胜利，改变西方的看法，就有助于从西方大国得到物资援助。再次，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国在华的最大利益，这将促使西方国家关心上海的战事。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将在国际社会产生巨大的心理效果，而这是在内地作战所无法做到的。因此在上海已失守而消息尚未到布鲁塞尔时，他在给孔祥熙的电报中还表示：“如我能支持匝月，局面可望好转。”[68]

从军事的角度看，中国以精锐部队在上海死守，与日本军队拼硬仗，并不符合国民政府既定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而在艰苦抵抗两个多月、淞沪前线已肯定无法守住的情况下，在战略上也应该采取有组织撤退的行动。从外交的角度看，淞沪前线的死拼硬打虽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关注，改变对中国抗战的看法，为争取援助创造一些条件，但中国既已认为布鲁塞尔会议不可能取得成功，以军事上孤注一掷的行动来换取外交上并不确定的成果，代价太大，并非明智的抉择。不过，作为一个外交官，顾维钧期望以抵抗侵略的决心来增强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筹码，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对于是否坚守上海，国民政府和军队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蒋介石持与顾维钧相同的看法，在前线军队已按计划从淞沪战场第一道防线后撤时，亲自下令继续坚守，以配合布鲁塞尔会议。结果，进退失据的中国军队战败。11月12日，上海失守。淞沪之战结束后，军方人士对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中国代表妄议军界事务颇多指责。[69]

布鲁塞尔会议从筹备阶段到会议开幕后，列强极力邀请日本与会，以便进行调停。但日本一再予以拒绝，而列强却仍抱希望，期待日本进

一步的答复。对此，顾维钧向美、英、法出席会议的代表指出，不能让日本一直拖延下去，“每拖一日，中国之牺牲甚大”，会议应对日本表示强硬态度。[70]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蔑视使列强感到不快。顾维钧抓住时机，在会上发言指出，日本已将和解及调停的大门关闭，各国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停止对日本提供战争物资及信贷，转而向中国提供援助。在顾维钧的推动下，会议于11月15日通过了一个声明，语气比以往稍趋强硬，表示如日本固执其与《九国公约》其他签字国相反的意见，各国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共同立场。

随后，会议休会一周，以便各国代表与本国政府进行沟通商讨。顾维钧此时明白会议已无成功的希望，于是抓紧休会间隙与各国代表频繁接触，探讨会后采取进一步行动支持中国抗战的可能性。11月15日和17日，顾维钧两次与美国代表戴维斯（Norman Davis）会面，提出应考虑采取援助中国削弱日本的举措，并具体提出物资援助“恐缓不济急，如能由英美法三国驻远东之海军联合示威，当能见效”，希望三国海军以军事演习的方式支持中国，威慑日本。但戴维斯回答说，三国在远东现有海军不足以进行示威，予以推脱，并称美国国内舆论对政府牵制甚大。[71]顾维钧还向苏联代表提出，请苏军在蒙古与中国东北交界处进行军事演习，也遭苏联代表的拒绝。

11月22日，布鲁塞尔会议复会。由于与会各国都无意采取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行动，24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一纸宣言后草草收场。顾维钧对各国推诿责任无所作为的表现十分不满，在会议最后一次发言中提出严厉的责问：

> 你真相信一纸原则宣言或忠实于誓言的虔诚表白，就足以使其在世界上得到遵守或尊重吗？拒绝给中国以援助，是否意味着中国应该停止抵抗侵略，或者在无足够手段的情况下，能无限期地抗战下去？在清楚而有力地证实了目前冲突中，日本和中国的政策在法律上的区别之后，你是否还认为在侵略者和受害者之间，无需作实际上的区别对待？由于拒绝停止向日本提供继续侵略中国所需的物质和经济资源，你不是似乎已经作了这样的表示吗？[72]

对布鲁塞尔会议的结果，顾维钧认为中国“并不太感到幻想破灭”，因为中国从未奢望会议能取得有效的成果；但同时又是“非常失望的”，这不是因为会议本身，而是由于在远东有巨大利益的大国不愿采取任何

措施来制止日本的侵略。他称会议是“一次流产的国际会议”。[73]

布鲁塞尔会议期间，未参会的德国政府指令其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在中日之间牵线搭桥，进行调停。对陶德曼调停，蒋介石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停火，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希望能借此停止日本正在推进的军事行动。而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对德国调停中日战争颇为积极。11月中旬，孔祥熙接连致电顾维钧，通报陶德曼调停情况，希望顾维钧与美、英、法等国外交官接触，探询这些国家联合德国和意大利共同调停中日战争的可能性，并表示国内局势十分危急，“我方精锐丧失甚巨，故在现地支持暂久，殊难预料”，“长此以往，实伤国家元气”。[74]

11月下旬，布鲁塞尔会议结束后，孔祥熙更是将陶德曼调停看作立即解决中日战争问题的捷径。12月1日，孔祥熙将陶德曼转达的日本条件通报顾维钧，称“比会（即布鲁塞尔会议——引者注）失败，军事不利，国联既无切实助我办法，国内又险象环生”，询问他“德之提议停战交涉，我应否接受，请详电示”。次日，孔祥熙再电顾维钧，催促他与法国及英、美外交官联络，明确列强支持抗战及是否参与德国调停的立场，“目下情势，间不容发”，“列强如能充分援助，我当尽力抗战，否则亦应早予明白告我，使我作最后决定，免误此次德国斡旋良机”。[75]孔祥熙接受调停的意向十分明显。

全面抗战开始后，顾维钧认定中国外交的任务是争取国际社会在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资上的援助，而不是与日本交涉停战，更不是媾和。因此，对陶德曼调停，他颇不以为然。11月上旬，获悉调停传言时，他就致电外交部表明自己的态度，“德国就其国际立场及为己所谋之主张，若参加调停，非特不能为我协助，恐反足以妨碍英美等国之斡旋努力”，对德国调停表示反对。[76]接到孔祥熙多次电报后，顾维钧致电外交部副部长徐谟，询问孔祥熙的看法究竟是其个人意见还是政府决策。徐谟回复说，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领导人都赞同调停。[77]12月4日，顾维钧致电孔祥熙，表明自己对陶德曼调停的看法：

> 查德国对我国虽有感情，究为日之同盟，其出任调停，为中国耶？为双方耶？抑为日本？不无可疑。且彼于国联公法条约公道向不重视，惟武力是尚，与日义（意）同臭味，与我国策适相反。将来能否为我向日力争主权亦是疑问……鄙意如我军事上实难支持，不得不从速设法缓和，以苏喘息，则于原则

上接受德方调停之先，宜采取下列步骤。（一）以我国实情与德愿调停及所提条件密商美总统，询其能否由美即出调停，或会同英法德共同调停。（二）并以我国军事实情及德愿调停二层密告苏联，问其能否即时设法于军事上予我援助，且须告以我国对共同防共条件决不愿同意，以免其顾忌而停止现有接济。（三）告德（甲）任何议和条件须以不违反《九国公约》之原则为主；（乙）须知日本撤退在华军队与停止一切非法行为之保障；（丙）我须与各列强继续维持同样友好邦交，不能偏于任何一方。

顾维钧还提醒孔祥熙，对日本所提条件，应要求德使具体说明。[78]因为对德国的不信任，顾维钧对陶德曼调停原则上是反对的，但对政府若接受调停也有具体建议，重点是加强与美国及苏联的沟通。

顾维钧刚发出电报，就收到孔祥熙又一封电报，称“对日方针当视列强能否切实助我，如彼等无切实办法，是友邦强我与日妥协。支持至年底，原无不可，所虑者，到时仍无办法，而时机错过，使我徒受巨大牺牲，前途危险益甚”。[79]孔祥熙的意思很明白，如果列强对中日战争仍无动于衷，中国就将按日本提出的条件接受德国调停了。

然而，此时日本的态度发生变化。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开出了新的更为苛刻的条件。12月下旬，国民政府决定予以拒绝，陶德曼调停终告失败。中国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外交活动也告一段落。

四 争取国际援华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加强外交活动，派出一批重要官员担任特使赴欧洲各国。孙科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被派往莫斯科。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与法国有很深的渊源，所以来到法国。汪精卫的得力助手陈公博被派到伦敦和罗马。担任过保定军官学校校长的军事家蒋百里则前往德国。这些人都没有做过外交官，他们的使命不涉及一般的外交往来，而是以各自的资历、声望和人脉推进与有关国家的关系，为中国抗战争取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这些特使到欧洲后，都要来巴黎与顾维钧商讨外交事宜，有些还通过驻法使馆接收和发送电报。中国驻伦敦、柏林、布鲁塞尔等地的使节也常通过电话、信函以及直接见面与顾维钧交流对时局和外交应对的看法。中国驻法使馆一时成了中国驻欧洲外交官的中心。这不仅是因为使馆地处巴黎，交通便捷，更因为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声望和经验，成为时局动荡之际人们倚重的对象。顾维钧自己也没有过多考虑与其他同僚间的平级关系，甚至外交部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他只是认为自己在中国外交界服务的时间要长一些，经历比其他人丰富些，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贡献更多的才智。他常常与中国驻其他国家的使节联系，告诉他们法国政府的看法，自己在做什么，并要求他们对驻在国政府相应行事。[80]顾维钧这样的主动性在同时代的中国外交官中并不多见。除了责任感之外，也与他认为外交部协调总揽不够，使驻各国的使节缺少对他国和全局的了解有关，而这对开展外交是不利的。在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中，他指出，“方今世局紧张，各国连锁关系日密”，但“我国内外各方之欠缺沟通”，因此建议外交部“将内外与主要各国商议接洽情形，每周或随时密示梗概，俾隔阂既祛，应付有资，而收效或亦较易”。[81]

布鲁塞尔会议结束后，顾维钧深感对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应有一个全球的视野和清醒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对抗战的外交方针做一全面检讨。12月下旬，顾维钧与国内派出的特使陈公博、李石曾、蒋百里和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驻德国大使程天放、驻比利时大使钱泰，在巴黎使馆就各国对华政策及如何为抗战寻求有效的外交支持进行了讨论。经过几天讨论后取得的共识是，对待中日间的战争，德国和意大利“别有怀抱”，执行着与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完全不同的政策。而在后四国中，英、法、苏都在等待美国带头采取行动，“惟美国马首是瞻”，因此，整个中日问题的关键在美国。在此情况下，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

接近美国，弄清美国的态度。12月29日，讨论的结果归纳成一份参与者都赞同的电报稿，以陈公博的名义向蒋介石、汪精卫和孔祥熙报告。[82]

两天后，顾维钧又发一长电给蒋介石、孔祥熙和外交部长王宠惠，进一步阐发对中国外交的看法。顾维钧认为，抗战指望于外交“最切者”为制裁日本、军火援助和英、法、苏、美的干涉。制裁因为意大利退出国联，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反对，致国联“残破”而无法实行。军火援助因为英、法扩充军备需用于本国而无法提供；苏联虽对华接济较多，但为防日本仇视报复，也有限度；美国则受中立法案牵制。对英、法、苏、美干涉的可能性，顾维钧分析道，英、法军备扩充尚未完成，欧洲局势日趋紧张，无法在远东有所作为。苏联若无英、法、美合作，也不会单独进一步对华援助。而美国若无英国在远东的合作，则无法采取积极行动。但这些国家均希望中国继续抗战，因“我继续抵抗一日，即多消磨日本一分之实力，亦即多消磨一分日德义集团之权力”。他对抗战国际环境的总体判断是：“中日战事不了，反使欧洲苟安，因其苟安而大局不定。故英法俄诸多顾虑，不能积极助我，而美亦不能在远东与太平洋得英法之充分合作。此是我国于国际上不能得充分援助之症结所在。”但他认为，德国和意大利不能也不愿拖延下去，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终将“开幕”。[83]

随着欧洲局势的进展，尤其是英、法两国对德国的绥靖政策，最终导致了牺牲捷克的《慕尼黑协定》，顾维钧对列强力量消长及其对远东的影响有更清晰的认识。他认为英、法对德国屈服退让，不仅仅影响欧洲，也影响远东的形势。因为欧洲局势的牵制，英国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政府在远东不愿触犯日本，希望以此换取日本尊重英国在远东的权益，尤其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这个老牌列强在中日之间对日本的偏袒和同情，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在远东局势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给政府的电报中，顾维钧提出，对中国外交而言，最重要的是，一方面继续争取苏联的援助，另一方面积极接近美国，因为如果要争取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使各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美国的态度最为关键，“各国均以美为枢纽”，即使实行制裁以外之办法，“自目前欧洲形势观之，亦当以美为重心”。[84]将对美外交置于中国外交的首要地位，是顾维钧步入外交界后的一贯主张。虽然自华盛顿会议以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直接介入对美外交，但只要时机合适，就会提出此主张，并力促付诸实施。

顾维钧关于中国外交以美国为重心的主张，与此时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外交上对美国的日益重视是一致的。1938年1月，蒋介石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表示，美国“于世界各国之和平与秩序，更于远东国际之公平及和睦，向居领导之地位”，“此次远东大难之应付，各国均盼美国之合作，诚以美国政府对于共谋国际和平与安全，向已公认为各国之前驱”。9月，孔祥熙在致新任驻美大使胡适的电报中，也明确指出：“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头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85]由于对美国在远东的重要作用有日益清醒的认识，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在1938年中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调整。无论在战略方针上，还是在具体策略上，对美外交在中国外交中都上升至首要地位。顾维钧的建议推动了中国外交方针的调整，也使他多年来的主张终于成为付诸实施的政策。

虽驻节欧洲，对美外交不是分内事，顾维钧却倾注很大的精力，尽力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他与先后担任驻美大使的王正廷和胡适经常函电往来，或询问美国远东政策的最新动向，或对开展对美外交提出具体建议。不过，也许因为两人间以往的过节，王正廷对他的询问含糊其词，不愿明确答复，使他颇为不满。

1937年底，与陈公博等讨论形成美国对中国外交十分关键的共识后，顾维钧专门致电王正廷，询问美国对远东局势的具体政策。王正廷的复电词意含混，称美国政府态度始终未变，又神秘兮兮地称美国已有各种办法，“因内容秘密，未便电告，以防泄漏”。顾维钧去电进一步询问，所谓未变是指罗斯福总统“防疫演说”的主张，还是指不愿卷入远东冲突的政策，并要其就美已有办法之内容略示一二。但王正廷并没有进一步答复，顾维钧就去问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蒲立德告诉他王正廷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因为美国政府有关远东事务的重要情况都会向他及时通报。后来，顾维钧还给正在美国宣传抗战的胡适写信询问此事。[86]

顾维钧与胡适之间的沟通就要顺畅多了。1938年3月19日，胡适给顾维钧写了7页纸的长信，阐述他对国际局势尤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看法，希望顾维钧对此进行评论。同时他回复顾维钧关于王正廷所说美国已有办法的询问，称王对你们做大使的尚且“未便电告，以防泄漏”，“何况对我们无官的老百姓呢？”[87]顾维钧与胡适的往来信函，对中国外交和国际局势有很坦率和深入的交流，但两人对王正廷都无好感。7月下

旬，国民政府决定以胡适替换王正廷为驻美大使，但王正廷还想多待些时日，使已下决心牺牲几年学术生涯投身抗战外交的胡适又生退意。顾维钧在此时对胡适予以鼓励，并通报王正廷恋栈的信息。胡适对顾维钧表示感谢时，以调侃的口吻说到王正廷："您可能很有兴趣知道我们的朋友C.T.（王正廷英文名字的缩写——引者注）仍在纽约忙于举借另一笔'巨额'借款，在美国无人知晓他已获假并将离美。"胡适最后于9月中旬正式被任命为驻美大使时正在欧洲，顾维钧与他一起商讨了寻求美国援助的途径及应采取的交涉方式，并提醒他要特别注意了解罗斯福总统的看法。[88]

胡适提到的王正廷忙于举借的巨款，实际上毫无进展，虽然王正廷向国内报告仍称"大借款成功，确有把握"。[89]而向美国借款的最终成功，却是顾维钧在巴黎促成的。顾维钧与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38年7月26日，顾维钧赴蒲立德官邸，与正在巴黎休假的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顾维钧坦率地向摩根索说明中国局势的严重性后，提出"我国决心继续抗战，惟财政与物质深盼友邦援助"，询问欲从美国获得财政援助，取何办法最好。摩根索马上回应，中国可以再派曾谈判中美白银协定的银行家陈光甫赴美，与他本人具体商讨，他将尽最大努力与中国达成协议。摩根索不与驻美大使王正廷商谈援华，却直接回应顾维钧的询问，是因为对王的不满。王正廷在美国为争取援助开展活动，但他主要通过寻找代理人，为此付出许多活动经费。摩根索明确告诉顾维钧，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根本无法从美国获得需要的贷款。[90]顾维钧与摩根索谈话后立即报告政府。正为外援无着落而一筹莫展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立即回电，对获得美方"开诚相见之良好结果"大加赞赏，表示已令陈光甫尽快赴美，并要顾维钧在摩根索逗留巴黎期间与他"切商第二步具体办法"，并趁此机会"再促英法之援助"，"尤为企盼吾兄手腕灵敏，必不致失此良机"。[91]

此后，陈光甫奉命赴美，在交涉中与顾维钧保持沟通，最终于12月与美国达成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这是全面抗战以来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第一笔借款。驻美大使胡适认为："此款成于我国力最倒霉之时，其富于政治意义至显。"蒋介石称："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孔祥熙致电顾维钧，称赞他对这笔重要借款做出的贡献。[92]身为驻法大使的顾维钧促成了美国对华借款，足以表明他在中国外交中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这一时期，顾维钧对法交涉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中国战争物资假道越南过境运输问题。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本对中国海岸实行封锁，企图阻断中国从国际上获取战争物资的通道。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中国的海上通道被完全切断。此后，中国获取国外物资援助的通道只有三条，即中国与苏联间的西北交通线、英国控制下的缅甸与云南间的滇缅公路和法国控制下的越南与云南间的滇越铁路。在这三条通道中，西北交通线和滇缅公路都是公路，且前者路途遥远，后者地形复杂，运输能力都无法与滇越铁路相比，何况苏联援华物资尤其是大型装备都需要通过海运使用这一通道。因此，全面抗战一开始，国民政府就电令顾维钧与法国政府沟通，保证援华物资假道越南顺利通过。蒋介石也指示正在欧洲的孔祥熙、李石曾就此与法国政府进行交涉。[93]

顾维钧于1937年8月2日与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Yvon Delbos）见面时提出了假道越南运输的问题，希望法国政府保证中国经由印度支那（主要是越南）将军用物资运入中国的过境权，并提醒他这一权利是中法之间的条约规定的。顾维钧提到的条约是中法于1930年签订的《中法规定越南及中国边省关系专约》。但德尔博斯说，印度支那事务归殖民部管，将此事推托搪塞过去。实际上，法国政府担心中国军用物资经印度支那通过会引起日本反对，危及它在中国及远东的利益。8月16日，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就坦率告诉顾维钧，如果法国允许利用印度支那运输武器弹药，日本可以认为这是敌对行为，就有可能进入上海的法租界，甚至在印度支那制造麻烦。因此，假道运输不是归外交部还是殖民部管的问题，而是法国“总政策”的问题。[94]

正是基于对远东利益的考虑，法国政府于1937年10月中旬决定禁止军用物资经印度支那过境运往中国，并于18日通知中国使馆。获悉法国政府这一决定后，顾维钧马上口授一份致法国外交部的备忘录，反对这一做法，并在当天约见莱热进行交涉。顾维钧告诉莱热，中国的过境权是有条约根据的，禁止过境将严重削弱中国对日抗战的力量。莱热辩解说，法国担心若允许中国借道运输，日本会轰炸滇越铁路，损害法国资本，甚至侵占海南岛直接威胁印度支那，而法国在远东并无足够的军事力量。由于顾维钧不断强调禁止过境运输对中国抗战的影响，谈话结束时，莱热松口说，由飞机运军火可予考虑，惟请严守秘密。因为事关中国抗战获得外援的生命线，向来注重外交礼仪的顾维钧，在一小时的会谈中，“有时谈得相当激动”。[95]

10月20日，顾维钧与外交部长德尔博斯会面，在听了顾维钧的解释后，德尔博斯承认他没有考虑到禁止过境对中国产生的严重后果，并表示会提请内阁重新审查这一问题。10月30日，顾维钧再次与莱热见面，莱热表示先前做出的决定“只是理论上的”，法国政府已决定允许中国全部已订购的物资不受阻碍地通过印度支那。[96]法国在过境运输政策上“理论”与实施间的差异反映了它对远东局势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它不愿因此刺激日本，另一方面也担心中国抗战垮台对其远东利益的负面影响。于是，一些军火通过越南秘密运往了中国。

但是，日本发现过境运输后向法国提出抗议，法国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又重新执行禁运令。1938年2月，莱热告诉顾维钧，去年10月的禁令仍将执行。[97]顾维钧多次走访外交部进行交涉，但都无法得到满意的答复，尤其是4月新内阁组成后，外交部部长博内（George Bonnet）对实行禁令持十分僵硬的立场。好在顾维钧对法国政界十分了解，知道新内阁的殖民部部长孟戴尔（George Mandel）与外交部态度不同，而殖民部部长可以向印度支那总督发指示，于是就直接去找孟戴尔。4月下旬，孟戴尔上任没几天，顾维钧就与他见面谈话，希望印度支那可以成为中国获得海外物资的重要通道，并提醒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数万华工在法国军队的后方辛勤劳动，立下汗马功劳。孟戴尔表示，他知道中国想扩大通过印度支那的运输量，他对此持积极的态度。两个月后的6月29日，在孟戴尔的寓所两人又有一次秘密交谈。孟戴尔告诉顾维钧，他赞成给中国运输军需物资的过境便利，虽然外交部对此有不同意见。当顾维钧提到有一批运往中国的装甲车滞留在印度支那时，孟戴尔说他已与总督沟通过，让总督不必遇事都向殖民部请示，实际上暗示其便宜行事。[98]

1938年10月下旬，日本攻占广州，切断了经香港进入内地的海上通道，滇越铁路的重要性更为突显。顾维钧认为日军在华南发起进攻是其“南进政策”的开端，接下来就会威胁法、美在远东的殖民地印度支那和菲律宾，以及接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因此要抓住时机争取这些国家加强援华。10月下旬，他与孟戴尔多次见面，告诉他自己对局势的判断，强调中国与法国在印度支那方面有许多共同利益。当时有两艘装运从德国和苏联获得的军火的船正在途中，因为日军进攻广州无法按原计划驶往香港，国民政府希望改停印度支那，船上军火经滇越铁路运往中国。顾维钧先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此事，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转而又找孟戴尔，并建议他饶过外交部来安排。孟戴尔答应马上向总理报告，并

尽快给予答复。两天后，孟戴尔告诉顾维钧，已允许这两艘船在西贡靠岸，地方当局接手后再北运转往中国。他会派一名特别代表专程前往西贡办理此事，但不会让外交部知道。这样，顾维钧与孟戴尔两人通过隐秘、曲折的办法为这两船军火打开了前往中国的通道。作为一名外交官，绕开驻在国的外交部，对正常的外交往来而言是很不寻常的。但顾维钧认为，在非常时期这种做法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这增强了中国的抗战能力，同时保护了法国的权益。[99]顾维钧的积极沟通以及法国政府内有识之士对远东事务的全盘考虑，使过境越南运往中国的军火一直没有中断。1938年累积运送货物7000多吨，其中包括飞机、坦克。到了1939年，运送货物量急剧增长，超过了6万吨。[100]这是顾维钧以他的外交才干为中国抗战做出的重要贡献。

1939年2月，日军侵占海南岛，显示出南进与英美等西方列强对抗的意图。蒋介石将这一事件称为“太平洋上之九一八”，决定利用日本造成的这一机会，推进与列强在远东的军事合作。美国此时虽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并已迈出援华的步子，但其行动仍受国内因素的制约。因此，国民政府将合作的重点放在英、法两国。3月24日，外交部致电顾维钧，要求他与法国政府就中英法三国在远东的全面合作进行商讨，并告知外交部所拟三国合作的四项原则：

> 一、中英法三国对于远东之军事及经济合作，应于适当时期邀请苏联参预，并通知美国请其作平行行动，以期对我采取一致步骤，共同维持在远东之权益。二、参预对日作战各国不得单独与敌停战或议和。三、在军事方面，中国允许尽量供给兵力及物力，其他国家允许尽量调遣海空军至远东为共同之作战……四、在经济方面，参预各国允许尽量共同维持各该国法币及商务，并共同对敌实施制裁。

外交部电报强调“此事系蒋委员长发动”，“上开原则已经蒋委员长核准”。[101]

还在2月获悉日军侵占海南岛的消息后，顾维钧就去拜访外交部部长博内，告诉法方日本此举是配合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的行动向法、英等国施加压力，建议法国政府对此做出强烈反应，并抓住时机推进与英、美在远东的合作。[102]对联络各大国在远东合作对付日本侵略，顾维钧之前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就向美国和苏联的代表提出过。接到外交部来电后，他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果敢而又及时的计划，约法国外交部秘

书长莱热进行会谈，并在会谈后应其要求送了一份备忘录，书面说明中国的具体构想。在向外交部汇报与莱热会谈情况时，顾维钧询问“此次我向英法提议保卫办法已否密告美俄接洽？”并就推进这一计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现欧局紧张，英法对远东问题，遇事每商之华府，惟美之马首是瞻，料彼此次亦必以我所提与美商谈。如我未与美接洽，应否电由胡使密告美政府，或由钧密托此间美大使径电罗斯福总统接洽。[103]

虽然是推动中英法合作，顾维钧仍将美国看作实现这一个合作计划的关键。

顾维钧的建议被外交部采纳。4月10日，外交部分别致电顾维钧和驻美大使胡适，请他们与美方沟通。顾维钧于4月18日向蒲立德通报了中国对远东合作的构想，请他转报罗斯福。[104]

顾维钧与法国政府的接洽并不顺利。法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在欧洲，对远东局势及其与欧洲的关联缺少深刻的认识。为推动法国政府接受中国的倡议，顾维钧与外交部和内阁官员广泛接触，包括对过境运输大力支持的殖民部部长孟戴尔。在与外交部亚洲司官员会谈时，该官员称中英法提携合作“时机或已成熟”，但美国应一起参与，而法方“不便启口”，希望中国先与美国沟通，法国可以随后跟进。[105]但美国由于受中立法的束缚和国内孤立主义的掣肘，并不愿在多国合作方面有所作为。5月5日，外交部获悉美国不会参与远东合作后致电顾维钧，称：“本部默察美方语气，如英法进行至相当程度，美或可采取适当之平行行动，但格于政制，不能预受拘束。在此情形下而论，英应有基于了解之合作，而美则可望其临时事实上之合作。但前者现在即应进行，后者至适当时期协助促进。”顾维钧对美国的反应自然非常失望，对外交部电报的分析也很不满，称之为“言之无物，无所裨益”。[106]

法国对远东合作原本就畏首畏尾，美国的态度更使它裹足不前。5月16日，顾维钧向外交部报告在法推进远东合作面临的困境，“虽经向法当局再三催促，尚无确复。查少数阁员颇表同情，但大部分集视线于欧洲，不暇顾及远东，并不能完全了解欧亚局势之连锁关系”，因此目前只能“从侧面进行”，实际上就是无奈地搁置了。法国政府对中国有关远东合作提议的消极态度——按美国驻法大使的话说，就是它甚至忘了地

图上还有一个中国——使得这个有可能改变远东国际局势的计划最终胎死腹中。[107]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随之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爆发了。欧战的爆发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英、法与德国的战争为中国与英、法结为一体，共同对付德、日法西斯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英、法全力应付欧洲的战争，产生了在远东对日妥协的可能性。如何趋利避害，成了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顾维钧认为，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应该将国际局势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各大国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重新评估。此时，孙科和李石曾都在法国，顾维钧又请驻英大使郭泰祺和驻比大使钱泰来巴黎。11月初，他们连着几天讨论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国外交应采取的对策。顾维钧提出，目前国际局势尚有利于中国，但在以后的6个月内将恶化而不利于中国，因此应向重庆建议，利用当前的时机，力促美国对日本采取更有力的政策。顾维钧与孙科、李石曾、郭泰祺、钱泰最后联名向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汇报讨论的结果：

> 抗战到底，为我国既定政策。自欧战发生，国际形势丕然大变。我国平日所恃以为友者，为英、法、苏、美四国，现在英、法、苏三国均有事于欧西，其全力足以压迫日本者为美国。是以我国外交运用，宜特别注重美国。为达到我国抗战目的，增加我国抗战力量起见，可否密向美国接洽询商：第一步，请其向日本警告，根据条约公平解决中日问题，达我抗战目的，使日本退出中国。如日本不接受，则请其（一）劝告英、法，勿对日本让步，牺牲中国；（二）商约停止期满后，以经济方法压迫日本；（三）增加美国对于中国之援助。是否有当，尚祈裁酌。[108]

整个电报的宗旨是促请政府继续加强对美外交，延续了顾维钧之前的主张，但超越了其驻法大使的职责。但在顾维钧看来，向外交决策最高层提供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和外交全盘方针的建议，是驻外使节的责任。在这一方面，他在中国驻外使节中是最为主动、积极的。11月11日，蒋介石给顾维钧回电，并请其转其他四人：

> 御（六日）电悉。卓见亟佩。中央对美运用步骤与尊意大致相同。现正在探询美当局之真意。察其表示挺身警告，似尚

对敌有所顾虑。仍以尊电末拟三项较易接近。深盼兄等在欧美亦依此分头努力也。[109]

加强对美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决策和执行层的共识。但顾维钧遵照蒋介石指示在法国“分头努力”，却遇到重重困难。自卷入欧战后，由于无暇东顾，法国对日政策日趋软弱，而安抚日本谋求对日修好的倾向却日益加深，同时法国国内政局也动荡不定。虽经顾维钧努力，中法两国于12月拟定了一项以中国钨砂换取法国军火的计划，1940年2月又签订了《叙昆铁路借款合同》，但不久，法国就在德国进攻下败退。6月上旬，法国政府撤出巴黎。

6月10日下午，顾维钧离开巴黎，随法国政府迁移。一路上秩序十分混乱，第一个晚上通宵行车，至次日上午8点才到达目的地，这段不到200公里的路程平时只要4个小时。而到了目的地后，却不容易找到法国政府的官员，因为政府还没有选定办公场所。在给郭泰祺的电报中，顾维钧谈到了离开巴黎后的困境：“此间政府五日两迁，弟星夜追随，饥寒交迫，疲乏异常。现内阁改组，军人当权，行将单独媾和，影响所及，亦不利我合作事。”[110]法国政府最后迁至南部小城维希，几乎所有国家的大使都住在一家旅馆里，每个大使馆只有两个房间。食物十分匮乏，只能凭票定量供应。这成为顾维钧外交生涯中一段不寻常的外交官生活。

顾维钧在给郭泰祺电报里说的军人当权，就是刚出任总理的贝当（Henri Petain）元帅。贝当一上任，就下令法军停火，放弃战斗，随后于6月22日与德国签订了条件十分苛刻的停战协定，向德国投降。正如顾维钧所预料的，法国对德单独媾和后，将不利于中国的抗战。贝当政府在远东完全向日本屈服，于9月下旬与日本签订协定，允许日军可从印度支那登陆并自由过境，以进攻中国。还在法国与日本谈判这一协定时，顾维钧就反复敦促法国政府不应对日退让，更不能损害中国对日抗战，并提出过书面和口头警告。协定签订后，顾维钧起草了一份抗议书，经外交部审定后送交法国政府。但这些交涉都无法改变贝当政府的远东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顾维钧在法国已很难为中国的抗战开展有效的外交活动了。

[1]《颜惠庆致外交部》（1932年7月2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674页。

[2]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8～9页。

[3]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8页。

[4] 《颜、顾、郭致外交部》（1932年10月1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

[5]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71页。

[6] 《罗文干致代表团》（1932年10月16日、1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

[7] 金光耀、马建标选编《顾维钧外交演讲集》，第21～40页。

[8] 《顾维钧两次舌战松冈（路透社电）》，《申报》1932年11月25日，第3版。

[9]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97页。

[10] 《颜、顾、郭致外交部电》（1932年12月1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9。

[11]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176～178页。

[12] 《颜、顾、郭致外交部转国民政府》（1933年1月1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9。

[13] 《国联代表团致外交部》（1933年2月2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9。

[14]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192～193页。

[15]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194～195页。

[16] 《蒋介石致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1933年3月1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9。

[17] 《罗文干致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1933年3月1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9。

[18] 《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致罗文干》（1933年3月2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9。

[19]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214页；《汪精卫致顾维钧、郭泰祺》（1933年4月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4。关于国民政府反对对日绝交，参见鹿锡俊《1933年中国对日绝交计划的浮沉》，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04～219页。

[20]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241页。

[21] 《顾维钧致汪精卫》（1933年4月2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9。

[22]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239、245页。

[23] 张力：《顾维钧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国联的技术合作》，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220～233页。

[24]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6页。

[25]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29页。

[26]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4年4月1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0。

[27]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9页。

[28]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120～121页；第5分册，第156页。

[29]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2年10月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9。

[30]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34页；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191页。

[31]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211页。

[32]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211、243页。

[33]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35页；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102页。

[34] 《市商会等十四团体昨晚宴顾维钧》，《申报》1934年9月24日，第8版。

[35] 《顾维钧致汪精卫》（原件无日期），*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0。

[36]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21～323页。

[37]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13页。

[38] 《顾维钧回忆录》第9分册，中华书局，1989，第481～482页。

[39] 皇甫秋实、贾钦涵：《顾维钧与中国西北石油开发》，《复旦学报》2017年第1期，第74页。

[40] 皇甫秋实、贾钦涵：《顾维钧与中国西北石油开发》，《复旦学报》2017年第1期，第75页。

[41] 张叔岩编著《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石油》，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第62～63页。

[42] 皇甫秋实、贾钦涵：《顾维钧与中国西北石油开发》，《复旦学报》2017年第1期，第78页。

[43] 《顾维钧致张群》（1936年11月2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3。

[44] 《绪编》第3册，第690页。

[45] 张力编辑、校订《金问泗日记（1931～1952）》上册，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6，第240页；《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70页。

[46]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371～375页；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47] 《顾维钧致罗文干》（1932年7月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7。

[48] Kuangson Young（杨光泩）ed.，*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Press Bureau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1937.

[49]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6年12月31日、1937年1月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7。

[50]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7年8月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7。

[51] 《吴玉章致蒋介石》（1937年12月12日）、《吴玉章致周恩来、陈绍禹》（1938年1月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7。

[52]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61页。

[53]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108页。

[54]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61、471页。

[55]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28页。

[56]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18页。

[57]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28、434页。

[58] 金光耀、马建标选编《顾维钧外交演讲集》，第87～94页。

[59] 《顾维钧痛述日本暴行》，《申报》1937年9月16日，第2版。

[60]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02～503页。

[61]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06页。

[62]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68页。

[63]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7年10月1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5。

[64] 《外交部致顾维钧等》（1937年10月2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5。

[65]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609页。

[66] 金光耀、马建标选编《顾维钧外交演讲集》，第119~126页；《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610页；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165页。

[67]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174页。

[68]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678~680页；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186页。

[69] 《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中华书局，1990，第290页。

[70]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182页。

[71]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196、202页。

[72]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692页。

[73]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696页。

[74] 《孔祥熙致顾维钧》（1937年11月15日、19日、2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6。

[75] 《孔祥熙致顾维钧》（1937年12月1日、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6。

[76]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176页。

[77] 《顾维钧致徐谟》（1937年12月4日）、《徐谟致顾维钧》（1937年12月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6。

[78] 《顾维钧致外交部转孔祥熙》（1937年12月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6。

[79] 《孔祥熙致顾维钧》（1937年12月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6。

[80] 《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中华书局，1985，第270页。

[81]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9年4月2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

[82] 《陈公博致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1937年12月2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1。

[83] 《顾维钧致蒋介石、孔祥熙、王宠惠》（1937年12月3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5。

[84] 《顾维钧致外交部并转呈蒋介石、孔祥熙》（1937年10月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9。

[85]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以下称《战时外交》）第3册，第78～7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第1页。

[86] 《顾维钧致王正廷》（1937年12月29日）、《顾维钧致胡适》（1938年3月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1，13；《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65页。

[87] 《胡适致顾维钧》（1938年3月1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3。

[88] 《胡适致顾维钧》（1938年7月27日、8月13日、8月2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3；《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09页。

[89] 《战时外交》第1册，第79页。

[90] 《战时外交》第3册，第134页；《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71页。

[91] 《孔祥熙致顾维钧》（1938年7月3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6。

[92]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5、8页；《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322页。

[93] 《战时外交》第2册，第732页。

[94]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20、522页。

[95]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47～553页；《战时外交》第2册，第735～736页。

[96]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55、565页。

[97] 《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59页。

[98] 《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92～94、142～145页。

[99] 《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32～235、240～241页。

[100] 刘卫东：《印支通道的战时功能述论》，《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但据巴斯蒂论述，1939年通过印度支那运往中国的物资达到了20万吨，见巴斯蒂《法国

远东结盟论（1931～1940）》，杨天石、侯中军编《战时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580页。

[101] 《外交部致顾维钧》（1939年3月2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7。

[102] 《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360～361页。

[103]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9年4月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

[104] 《外交部致顾维钧》（1939年4月10日）、《顾维钧致外交部》（1939年4月1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7，40；《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15页。

[105]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9年4月2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

[106] 《外交部致顾维钧》（1939年5月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7；《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460页。

[107] 《顾维钧致外交部》（1939年5月1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433页。

[108]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128～129页。

[109]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129页。

[110] 《顾维钧致郭泰祺》（1940年6月1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0；《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285～287页。

第八章 战时中英关系的推动者

一 不和谐的盟国关系

1941年4月初，顾维钧接到重庆外交部电报，要调他转任驻英国大使，接替即将出任外交部长的郭泰祺。这一消息虽来得突然，但离开驻法大使任所却是他期盼已久的。1940年夏刚迁至维希不久，顾维钧听闻重庆拟将胡适从驻美大使任上调离，便一反常态，多次致电外交部，主动请缨希望接任此职。这种主动谋求职位的举动对顾维钧来说是罕见的。后来胡适继续留任，听到消息后，他显得有些失望，急切地询问转往他处任职的可能性。而在此前一年，蒋介石和外交部长王宠惠欲调其出任驻苏大使时，他是婉言谢绝的。由于在驻法大使任上已无所事事，顾维钧在给外交部副部长徐谟的电报中表示，若无合适的岗位，他将考虑请长假甚至退休，因为“我的目标是服务”。[1]顾维钧在维希萌生退意并不奇怪。维希这座小城无法提供他施展身手的外交舞台，实现他为中国外交服务的抱负。此时同辈外交官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都已先后离开驻外大使职位，淡出或完全退出外交界，对他多少也有些影响。但国民政府对顾维钧与对其他几人不一样，不想让他退下来，而是将他调任到重要的驻英大使岗位上。与同辈相比，顾维钧确有其不一般之处，是处于战争中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外交人才。顾维钧当然十分乐意接受这个新职位。

不过，顾维钧调任伦敦一事，在中英两国关系上却引起了一场小风波。按说，以顾维钧在国际外交界的声望和二十年前就曾出使英国的资历，英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提名他再度使英应表欢迎。但是，英国政府最初对顾维钧使英的反应却不积极，反而旁敲侧击地询问中国为何不从国内选派人员。由于英国政府没有明确表示接受，国民政府的正式任命迟迟不能发表。但顾维钧调任的消息已经传开，日本通讯社还趁机声称这表明中法关系彻底破裂。已经离开维希在葡萄牙焦急等待的顾维钧只得给外交部副部长徐谟发私人电报询问缘由。原来，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

学位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热衷驻英大使一职，他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Kerr）私交很深，后者也希望由留英学生而不是留美学生出任驻英大使，因此伦敦没有及时回复中国的提名。最终由于中国政府的坚持，英国还是同意接受顾维钧为驻英大使。1941年5月9日，国民政府的任命正式发表。[2]

7月初，顾维钧抵达伦敦上任。虽然是第二次作为中国政府的使节来到英伦三岛，一切似乎驾轻就熟，但他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此次奉派使英，顾维钧直接从欧洲大陆赴英，无法回国，也就没有接到政府有关对英外交的正式训令。他想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外交界，自己比外交部主管和其他驻外使节的资历都要老，所以就不需要训令了。但他对自己的任务十分明确，就是广泛宣传中国抗战对于世界的意义，并为抗战争取各种形式的援助。[3]

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国民政府就寻求西方列强尤其是英、美两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出于维护自身在远东利益的需要，英国对制止日本侵华也有所动作，在某些时候如卢沟桥事变后的一段日子里比美国要更为积极。但从总体上说，英国对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妥协的政策，不断地以让步来换取与日本的短暂相安。1938年5月，英国与日本签订了有关中国海关的协定，1939年7月又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侵华造成的“中国之实际局势”及其在占领区内享有“特殊之要求”。1940年7月，英国政府更是在日本的逼迫下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切断了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英国的这些行为以及中英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关系，使国民政府高层包括蒋介石在内，对英国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蒋介石在谈到英国远东政策时称之为“老谋深算”，在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见面时，当面批评英国“素以半殖民主义国家估计中国”。[4]而在英国方面，由于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欧洲，大多数人对发生在远东的战争不甚了了，漠不关心，不少人对中国还抱有传统的轻蔑态度。表面上风平浪静的中英关系隐藏着许多暗礁。

面对中英双方相互认知的巨大落差，上任伊始顾维钧就十分重视宣传。7月初他从葡萄牙赶往伦敦上任，就是因为接受了“中国之战委员会”（The China Campaign Committee）的邀请，要在其组织的集会上向英国公众演讲。演讲当天正是全面抗战爆发四周年，顾维钧阐述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中国人民的血泪不仅使国家免于毁灭，而且给整个世界的自由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果中国不坚持抵抗，日本的战争

机器早就扑向其他国家。面对英国公众，他也称赞了英国对希特勒德国的英勇抵抗，最后呼吁反法西斯国家携手合作，“彼此间合作越是密切，他们的最终胜利就越提前，并且越有把握”。[5]这样的演讲，或对官员，或向公众，是顾维钧驻英大使期间的日常功课。对于各界的邀请，他尽可能有请必到，以广交友，唤起对中国的关心。他还动员一些在英国的中国人一起来做此项工作，其中有教师、艺术家、银行家和报人。他会列出一些问题和要点，供他们演讲时参考并使用，以增进英国公众对中国抗战的了解。[6]

入住二十年前就待过的位于波特兰街的中国使馆，顾维钧对使馆人员做好对英外交提出具体要求：“办公不必客气，有意见须（1）直说，不说反误事，但直说非谓可无礼貌；（2）个人认定一门英国问题，随时留心研究，不久可成为专家，于公于私均属有益；（3）彼此同事须有同舟共济之心，和衷互助，在外各有所长而各人不能尽有各种长处，故不得不互相合作；（4）凡有见到可以改良之处，或有可报告政府参考者，不妨来陈，不分职位之高卑，均愿接谈。”[7]

当然，顾维钧外交工作的重点还是英国政府。8月中旬，外交部长郭泰祺给他来电，对英国不重视对华关系表示不满，请其推进加强，并要其密商英国政府，促英方对日本危害滇缅路交通的行为明确表态，“此举于加强反侵略阵线及我国抗战精神上均极重要”。[8]电报刚发出，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联合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发表了。这是英、美准备联合反对法西斯的重要信号。《宪章》发表后，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致函斯大林通报两人会谈情况，但对中国却并无任何表示。蒋介石虽对《宪章》发表感到高兴，但对英美不能平等对待中国颇为愤懑。郭泰祺致电顾维钧，要其向英方表露中国的不满之意，并探询其真实意图，“如果彼等对远东确议有具体办法，与外国洽商合作计划，介公当可释然”。8月21日，顾维钧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Robert Eden）见面，后者只谈到英国已认识到远东事态对英国的重要性。[9]

其时，美国政府支持的由美国人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率领的美国空军志愿队刚成立，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也能组织一支同样的英国空军志愿队，援助中国的抗战。在给顾维钧的电报中，郭泰祺诉说了日军轰炸给重庆造成的灾难——“敌机连日昼夜轰炸，致吾人不遑寝食，百务几陷停顿”，请他“商促英方协同美方早日组织国际空军义勇团”。并

提出英方可组为第二团，“将来由两国公推一指挥官在军委会下服务”。8月26日，蒋介石亲自致电顾维钧，请他再与英方商量，并提出英方可派驻新加坡的空军援华，若新加坡发生战事，仍可返回，“如此一举两得，无须另增人员”。但顾维钧与英国方面商谈，英国却表示爱莫能助，并说英国自己缺少飞行员，许多人还在美国受训，回绝了中国的要求。[10]11月初，蒋介石直接致电丘吉尔，指出在日本即将攻击云南的危急形势下，英国的空中支援对中国来说必不可少，“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在马来西亚的英国空军与美国的合作能付诸实施，支援美国空军志愿队和中国空军”。[11]这封电报由顾维钧递交。丘吉尔回复蒋介石的电报称，根据英国的情报，日军接下来攻击的目标不是云南而是华南，但英国正考虑尽其所能给予陈纳德航空队最大帮助。稍后，顾维钧访晤艾登，再次表达中国对空军支援的期望：“惟望以空军助华一层，务必尽力为之。”[12]

1941年12月7日晚，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到英伦三岛，震惊了英国朝野和在伦敦的外交使团。前一天，顾维钧在英国援华会演讲时还指出，日本加紧军事部署，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是为了要挟美国让步。因为他认为，日本不至于愚蠢到孤注一掷冒举国覆没的危险。因此珍珠港事变的消息让顾维钧感到惊诧，但也备感振奋，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天过得非常兴奋、紧张，也令人十分称心。”[13]因为，中国不再孤军抗日了，终于与英美面对共同的敌人。

面对战局的急剧变化，顾维钧认为中国应抓住时机促进反法西斯各国之间的合作。8日，他致电重庆提供自己的意见：

> 窃意我宜速向英、美、和（荷）表示愿以全力与彼合作，共同对日，以获全胜。既属在我应有之表示，且借为提订四国攻守同盟之初步。如美向德、义同时宣战，我亦宜一致办理，借示精神团结，并先期告美，全示友谊。[14]

12月9日，国民政府发表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文告。中国的抗日战争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岁月终于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为一体，中国与英、美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

虽驻节英伦，负责处理中英关系，但顾维钧仍不忘思考中国外交的全局，并将自己的思考所得报告决策层，以期对外交方针有所贡献：“英、苏重心均在欧洲，其重视德国固在意中。惟此层不特与我不

利，即为世界整个战局着想亦非上策……窃意惟美地位较为客观，当能了解我方主张之正当，而出为主持较有力量。和与澳及纽丝兰（新西兰）与我利害较多相同，或亦可赞附我议。似宜分头速向美与和、澳、纽等洽商进行。”在给宋子文的电报中，他也强调，反法西斯盟国间的合作，“关键在美”，将对美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重点。[15]

珍珠港事变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国民政府抓住时机寻求国际对华援助。1941年底，国民政府向美国提出5亿美元贷款的要求，与此同时也向英国提出贷款要求。12月29日，蒋介石在重庆通过英国大使卡尔向英国政府提出1亿英镑贷款要求后，立即致电顾维钧请其在伦敦“积极进行，以期速成”，并具体指示“此次借款手续决非普通财政与商业借款可比，故不便先商用度办法而后告款额”。[16]即先确定贷款额度，而不能对使用方法有所约束，这也是中国向美国提出的贷款要求。

顾维钧接电后即与英方接洽贷款事宜，先后与英国外长艾登和财长会谈，强调对华贷款对于“挽救民众之心理”极其重要，请英方着眼于双方的政治关系，而“勿顾虑手续与条件”。艾登对顾维钧的说辞“颇动容”，财长也“态度颇佳”，但并没有立即就贷款问题给予肯定的答复。[17]在此期间，中美关于贷款的谈判经过一番周折后，美国同意按中国的要求不附加任何条件提供5亿美元贷款。美国贷款确定后，罗斯福希望英国能同时宣布对华贷款，以彰显盟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立场。1942年2月2日，英国内阁举行特别会议，决定给中国5000万英镑贷款。会后，艾登立即将此消息通知顾维钧。次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通知了蒋介石，对未能照“请求之全数供给中国”，请予谅解，并表示贷款之用途“由中英两国政府商酌决定”。[18]

英国对华5000万英镑的贷款是在美国决定对华贷款后仓促确定的。对于如何使用这笔贷款，中英两国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由此使两国间原本就不太和谐的关系产生了新的矛盾。已经与德国生死作战两年多的英国本身经济状况糟糕，有赖于美国提供的财政援助，它宣布向中国提供援助主要是一种姿态，意在进行宣传，增强中国的士气，并向美国表明，对于中国的抗战它与美国是站在一起的。因此，宣布贷款决定后，英国迟迟未与中国开展具体磋商。但国民政府认为，英国既然做出了承诺，就不应该背信弃义，它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因此一再指示顾维钧尽快与英方交涉贷款事宜。这一要求的提出，也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和提升有关。1941年12月下旬，

在蒋介石于重庆召集的有英美等国代表参加的讨论远东军事合作的会议上，宋美龄直言："应明白通知英美两国，不能希望中国不得援助而可无限制继续其抗战。"[19]

顾维钧身在伦敦，了解英国的财政窘况，也目睹艾登在谈到贷款问题时的狼狈相。作为中国外交官，顾维钧认为中国政府要求英国兑现承诺是完全正当的。而作为驻英大使，他又理解英国方面的力不从心，认为中国应考虑它的难处。在与英方交涉时，财政部官员告诉顾维钧，英国原本计划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后来增加至5000万英镑，主要是为了对中国抗战表示支持，并认为双方对此有默契。[20]为解决这一难题，顾维钧设法让重庆明白，中英之间的贷款问题只有采取折中办法，双方都做些让步。

但急需财政援助又对英素无好感的蒋介石坚持英国必须履行其贷款承诺。4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愤愤写道："对英国借款不签约之举动，应严斥之，英人不可予以体面也。"[21]次日，他致电顾维钧：

> 美国借款已如约交付，而英国借款至今尚滞疑不定，未知何故？英国贷华大款，助我抗日，且其本身亦在困难奋斗之中，对我慷慨应援，使我全国军民闻之兴奋不置，此不仅中与（国？）政府所感谢而已。乃允许至今，时已两月，尚未签字，又使我军民因感奋而失望。请转告英政府，务望早日签字，其所有条文性质，不宜越出美国条文之外，以英与美皆为我盟国，其对我经济共同之义务，不可有宽苛之分，更使我军民对英发生其他感想。如果必须另订有拘束或限制之条件，则中国为两国感情与战友关系计，不敢接受，不如不借之为愈。惟无论借与不借，皆应从速决定，并正式宣布为要。[22]

蒋的电报字里行间充满对英拖延的不满。顾维钧接电后，于4月20日访晤艾登，告诉英方，"此次借款，应重视盟约国共作战友之宗旨，事属政治性质，不应加以拘束用度，应与美一致"。[23]顾维钧按蒋介石指示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但语气则委婉了许多。经顾维钧与英方多次商谈，5月13日，艾登向中方送交了英方的借款合约草案。该草案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政府应中国政府之要求，准备以5000万英镑借与中国，但以战时在英镑区内购买战争必需品为限，并允以其中1000万英镑担保中国发行国内公债。这个草案与蒋介石关于中英借款协议"不宜越出美国条文之外"的要求相差甚远。顾维钧在向重庆报告时称，该草案"虽未能尽

如我方之所期，其中已有重要改进之处”，并指出“英国作战为日较久，对于援助中国，其财力不免稍逊”。英国上一个财政年度短缺270亿英镑，顾维钧希望让国民政府明白英国有它自己的困难。[24]

同时，顾维钧和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郭秉文继续与英方交涉，希望能对草案再做修改。5月30日，顾维钧专程赴艾登在乡间的寓所进行商谈。6月3日，他又在艾登的安排下与丘吉尔会面。虽然英国对草案又做了些局部修改，但仍无法使国民政府满意，尤其在以英镑担保发行公债方面双方分歧甚大，交涉陷入僵局。英国在贷款问题上的态度使蒋介石对英国更为不满。7月20日，顾维钧收到蒋介石的电报，指示他不要再向英国提贷款一事，也不要乞求任何其他援助：

> 请切勿对英再提借款与发起助华事，此不仅徒增国耻，而不啻为人愚弄，无论如何勿再求助为要。[25]

晚年口述回忆录时，顾维钧称贷款“是战时中英两个盟国间产生误解的一个主要问题，它给这两个战时盟国的关系蒙上了不幸的阴影”。[26]

贷款问题之外，影响中英关系的还有印度独立问题。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希望调解英国与印度的矛盾，确保中国抗战的国际交通线。访印期间，蒋介石坚持要拜访正被英印当局监禁的印度民族领袖甘地（Mohandas Gandhi），这引发了中英两国的矛盾。访印结束刚返回昆明，蒋介石就致电顾维钧，嘱其乘便向丘吉尔转达对英国对印政策的看法：“余完全以客观态度，不敢不至诚实告。对于印度政治问题，此时若不急速解决，则危机必日甚一日，如待敌机轰炸印度，人心奔溃时，再言解决，恐已过晚。至待敌军入印以后，则更无办法。”次日，蒋介石自感如此率直之语似不妥当，怕引起丘吉尔误会，又致电顾维钧，请根据英国舆论对其访印反应再定是否向丘吉尔转达。[27]蒋介石坚持认为，从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考虑，英国政府必须满足印度要求独立的愿望。但英国政府尤其是丘吉尔却认为打赢战争是首要任务，印度独立问题无法在战争期间解决。顾维钧奉命向英方表达中国政府的看法，蒋介石与丘吉尔就印度问题的许多电报往来也由他传递。由于中英两国意见相左，印度问题成为顾维钧与英方打交道的一个难题。

1942年初的缅甸战役也加深了中国对英国远东政策的不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主动向英方提出，派遣军队协助英军防守缅甸，以保证中国获得国际物资的滇缅公路的畅通。但英国担忧中国在缅甸的影响

由此增强，影响其战后统治，直到日军向缅甸发起攻势的最后一刻才同意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然而，在缅甸的英军并不打算与中国军队并肩对日作战，而是利用中国军队掩护其撤退。4月17日，在日军突破多道防线、战局危急之际，蒋介石致电丘吉尔，对英缅军“既不能取得人民合作，更无坚强之战斗意志”表达不满，请英国派300架以上飞机迅速增援缅甸。顾维钧将电报送交英方后，丘吉尔答复称，英国因受制于物资供应、路途遥远等因素，无法派遣中国所期望的空军，只是空洞地表示“将尽力之所及，支持缅甸战争中之盟国陆军”。[28]

5月初，缅甸战役失败。中国方面对英国军队在战争中的表现颇多不满。6月3日，顾维钧与丘吉尔见面，告诉他中国“对于缅甸战事至为失望”。丘吉尔则因整个战局不利，会谈开始时脸色严峻，与顾维钧往常与他见面时完全不同。随后，顾维钧平静的神态使他也恢复常态，表示英国并未轻视中国战区，希望中国对英国在印度问题上的立场和对远东战场的战略，“万勿误会”。顾维钧回应称，“中英两国相需相因，深望合作不只战期，且及于将来”。[29]

顾维钧虽与英国高层频频沟通，却无法改变矛盾不断的中英关系全局。中英之间是反法西斯盟国，两国关系的走向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密切相关。重庆方面因为对英国有怨气，与对英外交相关的事情并不都向驻英使馆通报。身为驻英大使，顾维钧对日益紧张的中英关系忧心忡忡，但国内信息却不通达，在给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一封电报中，他大叹苦经：“近中英间迭起事端，互伤感情。弟亦深以为虑，夙夜筹思补救。所苦者，以昧于各案经过，不易从中疏解。遇英方对弟有所表示，亦每以不明事实，只能以空泛之言设法缓和。”他希望国内能将各种情况包括军事方面的情况及时通报，以便他在伦敦通过外交途径与丘吉尔和艾登当面沟通。顾维钧认为，丘吉尔和艾登“对弟尚推重，遇事开诚相见，弟如能接洽事实，对彼殆无不可谈，而谋一扫既往之误会，增进今后之感情”。因为昧于国内情况，他向宋子文表示欲回国一次，向蒋介石当面陈说中英关系。[30]

在这之前，1942年3月19日，顾维钧已经致电蒋介石表示“颇思回国述职，请面示机密”，希望与最高决策层商讨中英关系，并担心“日后时局变化更多，旅行更难”而无法回国。但当时中英贷款交涉正在进行中，蒋介石以“此时伦敦工作重要”为由，没有同意他回国。7月下旬，贷款交涉陷入僵局，中英关系矛盾重重，顾维钧再生回国述职之意。8月7

日，他致电蒋介石，表示“近来关于中英间各问题及此间情形，有待面陈或请示机宜者匪鲜”，希望能于下月回国。这次，蒋介石同意他回国了，但“回国日程待下月再定”，嘱其可先做准备。[31]

拖延回国的原因是英国议会代表团即将访华，需要顾维钧在伦敦做些前期工作。10月初，顾维钧从伦敦启程回国。长途旅行前，需要注射预防伤寒、霍乱、黄热病的针剂，因为时间紧，没法按常规分期注射，而是连续注射，结果引起不良反应，浑身发抖并发烧。战时旅行困难且危险，从伦敦到重庆花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顾维钧甚至做好了飞机被击落的准备。10月14日他抵达重庆。此时，距顾维钧上次离开中国已有6年多了。

此次回国，虽有陪同英国议会代表团的任务，但顾维钧认为最重要的目的是与决策层讨论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中英关系。刚到重庆，他就感受到国民党高层包括蒋介石在内对英国的不满和冷落。10月9日，美国和英国采取平行行动，同时宣布与中国谈判废除治外法权。蒋介石最初决定在第二天庆祝双十节集会上宣布此事时只答谢美国，而不提英国，最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劝说下，才勉强在讲话中对英国表示感谢。[32]但在致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感谢电中，蒋介石对美英的亲疏显露无遗。给丘吉尔的电报是寥寥数行的例行公文，给罗斯福的电报不但内容多，且充满个人感情，称自幼就对美国的“自由钟”“独立厅”，“寄以热烈之向慕”。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也只记美国放弃不平等条约，而对英国不着一字。[33]

目睹这样的情况，顾维钧将向最高层尤其是蒋介石阐述自己对中英关系的看法作为头等要事，希望能够消除中英不和的根源，为两国关系铺平道路。蒋介石虽对英国满怀怨恨，但对顾维钧回国述职十分重视。10月15日，顾维钧回国第二天，蒋介石就召见他讨论对英外交。顾维钧对此早有准备，以与丘吉尔、艾登等英国政要的谈话和使馆搜集的机密情报为依据，向蒋介石报告英国对华基本态度和对华政策的特点，包括双方在贷款、印度和缅甸等问题上的分歧，让他了解中英不和的症结。[34]此后，蒋介石多次约他长谈对英关系和外交方针，在日记中记下谈话内容的就有三次，还不包括专门讨论中英新约的两次。

11月23日，蒋介石与顾维钧夜谈。虽然明白蒋介石对英没有好感，顾维钧仍然坦陈自己的看法，强调中美英三国结盟应该成为中国战时和战后外交的核心，并指出中英结合是十分有益的，美国可以充当“媒

人”，从道义上保证中英联盟。谈话后，顾维钧感到蒋介石听进了他的话，已在认真考虑这一问题。他的这一感觉是对的。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一大段顾维钧的谈话，其中有“彼主张树立中英美为核心之外交基础，以建立世界长期和平”。[35]

12月13日，送走英国议会代表团后，蒋介石邀顾维钧去他在重庆黄山的寓所住了一个晚上。下午他们一起登山散步，晚饭后又谈至十点。这一次长谈，蒋介石讲了他个人对英国反感的一些缘由，如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滑头、丘吉尔8月间关于印度问题来信的无礼（以至于他不屑答复）。这使顾维钧了解到，中英关系除了实质性的重要问题外，还与私人间的关系有关。第二天下山时，顾维钧感到，“同委员长度过的二十四小时非常有益，而且很愉快。我了解到我想知道的有关政府政策，尤其是委员长的个人见解。这次访问还使我更清楚地了解到委员长与英国人之间的摩擦和误解的诸多原因”。[36]

在重庆期间，顾维钧还与宋子文、孔祥熙、王宠惠等重要官员见面，与他们沟通对中英关系的看法，重申向蒋介石表达的观点。10月下旬，他与刚从美国回来的宋子文交谈多次。宋子文是外交部长、他的上司，谈话中明确表示中国不会从中英结盟中得到任何好处，但顾维钧还是力陈中英结盟的三个理由：第一，虽然中国不能指望英国给予大量援助，但英国的海、空军力量，以及它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在世界上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第二，中国应力争结成ABC三国联盟（America美国，Britain英国，China中国），在战后世界中起主导作用，而中英之间的纠纷会妨碍这个目标的实现；第三，中英结盟将有助于巩固中国在世界上作为大国的地位，因为目前只有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与孔祥熙会面时，他说，中国要在世界上与列强平起平坐，就不仅应该与美国，而且应该与英国合作共事。[37]顾维钧是从战时和战后中国外交的全局来考虑中英关系的，并努力让决策层明白搞好中英关系对中国自身的好处。

顾维钧关于中英关系以及中国外交全局的看法得到最高决策层尤其是蒋介石的重视。1943年3月6日，顾维钧赴黄山面见蒋介石，进行了此次回国的最后一次长谈。与前几次主要阐述自己的看法不同，顾维钧希望蒋介石就对英外交做出明确的指示。蒋介石虽对英仍无好感，称其外交手腕历来诡计多端，但对中英关系态度已发生明显变化。他对中美英三国结盟从原先冷淡转向持肯定态度，并表示如果美国受和平时期不加

入联盟的制约，也赞同中英双边结盟。对英国对华贷款，他赞同顾维钧提出的充分考虑英国自身困难的折中办法。顾维钧感觉到，蒋介石非常认真地考虑了他之前几次谈话中提出的看法，并接受了其中的一些建议。对顾维钧回国述职期间为疏通中英关系做出的努力，蒋介石十分肯定，会谈后在日记中记下预定要做的9件事的第一件事就是“发顾大使特别费”。[38]

对驻外使节站在驻在国一边称赞驻在国的言语，蒋介石通常是排斥甚至厌恶的，在日记中讥讽这样的外交官“几乎忘其为中国之使节，而变为其驻在国之宣传员矣”。[39]但顾维钧对英国的介绍，不是单纯的赞扬，而是为了让最高层了解英国的实际情况；对中英关系的分析和建议，不是局限于一国大使的眼光，而是立足于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全局，并且他也懂得如何表达，可以让最高层听得进自己的想法。因此，蒋介石对顾维钧所谈非但没有上述日记中显露出的反感，反而十分尊重他对中英关系和中国外交的建议。

蒋介石对英态度的改变对国民党高层影响很大，许多官员都认识到中英关系的重要性，重庆对英关系的气氛有了明显改善。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感觉到，自顾维钧回国后，中国报刊上原先常见的反英观点消失了。宋子文由此称赞顾维钧对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顾维钧自己也很欣慰，因为通过自己的努力，政府主要领导人认识到英国在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重要性。[40]

面对中英间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国内对英国的普遍不满，顾维钧让最高决策层了解驻在国的想法、它的难处和它在中国外交全局中所处的地位，从而缓和了原先紧张的中英关系。这是一个驻外大使对国家最好的服务。

二 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

中英间虽然存在矛盾，但两国都有想推动双边关系友好发展的人士，由此有了英国议会代表团对战时中国的访问。

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驻华大使馆就向英国外交部建议，派员到中国访问，以改善对华关系，但因为时机不成熟而搁置。[41]1942年3月中旬，英国议会上院议员纳逊勋爵（Lord Nathan）与顾维钧交谈，表示经商本国外交部同意，拟派议会代表团访华，由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议员各一名组成，探询中方意见。顾维钧立即向重庆外交部报告此事，对英方提议表示支持：“窃以中英现属盟国，此间朝野对我感情浓厚，民间尤重视我国抗战，凡足增进联络之举，有裨两国邦交，能否过华，我国政府亦欢迎。”并询问4月底启程是否合适。外交部将此电送交蒋介石，蒋介石批示：“应极欢迎，但春季雨水与轰炸较多，如秋季十月中到华，则为最好。”[42]

接到重庆肯定的回复后，顾维钧与英国外交部沟通，转达中国政府的欢迎之意。英方希望由蒋介石以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面邀请。顾维钧于4月22日向外交部报告英方要求，并表明自己的态度：“窃以如蒙委员长允诺，最属适宜。”重庆很快复电表示赞同。5月1日，顾维钧将此决定通知英方。[43]

英国议会代表团最后由上院的保守党议员艾尔文（Ailwyn）勋爵、自由党议员泰弗亚（Teviot）勋爵和下院的保守党议员卫德波（Scrymgcour Wedderburn）、工党议员劳森（J.Lawson）组成，并有一名随团秘书。顾维钧认为“访华团的组成堪称理想，在我看来，它很能代表英国人民”。9月22日，顾维钧在使馆设宴招待代表团，来宾还有艾登、上院议长等英国政要。艾登在致辞中说，议会代表团在中英关系史上是空前第一次，将推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对顾维钧推动此事大为赞赏，称其为“英中友谊的主人”。[44]

顾维钧10月中旬回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接待英国议会代表团。一到重庆，他就协助政府制订接待代表团的计划。他认为，接待计划既要考虑到使代表团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情况，使他们对中国的抗战意志和精神面貌有一个良好印象，也要考虑到战争时期不能过分铺张，欢乐气氛不能太浓。他建议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参政会的领导人要出席讨

论接待的筹备会议，接待省份的省主席也要参与到接待计划的制订中。这些建议都得到了采纳。[45]

11月10日，英国议会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重庆，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访问。顾维钧随蒋介石的代表吴铁城等中国官员到机场迎接。代表团成员都是第一次来中国，除顾维钧外与中国其他官员都不相识，顾维钧在主客间穿梭往来，介绍彼此相识，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在现场的《大公报》记者注意到了顾维钧在欢迎人群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顾大使在这里是旧友重逢，伦敦和重庆，随着他的谈笑而更熙洽、融和。"[46]

11月14日，蒋介石夫妇邀英国议会代表团到黄山官邸度周末并设宴款待。席间，顾维钧充当蒋介石与代表团交谈的翻译。工党议员劳森谈兴甚浓，讲了丘吉尔在议会上与反对党议员斗智的故事，经顾维钧翻译后蒋介石听得开怀大笑，称丘吉尔真是厉害，是一个精明、强干的领袖。劳森讲得兴起，语速越来越快，内容也越来越难翻译了。顾维钧怕出错，请求一旁的宋美龄帮忙，但宋美龄夸他翻译十分出色，不需她再来插手。[47]与代表团的这次会面给蒋介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顾维钧居间传译功不可没。会面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英国议员团此次来访，不啻其为英国议会空前重大之举，而其重视我国在东方将来之地位，丘吉尔等已有悔悟之表示，则可断言，从此对英当可放宽一步矣。"而在10月底，英国议会代表团因途中行程耽误，未能按计划抵达重庆，蒋介石还认为是"其心多有暗鬼"，"此种贼胆心虚疑惧自私之心理，惟英国人所独具也，可鄙之至"。[48]半个月间，对英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英国议会代表团抵达重庆时，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即将举行。顾维钧认为，国民党应该邀请代表团参观全会的一次公开会议，以表达对代表团的欢迎，这会增加代表团对中国的了解，也有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国民党的中央全会从未邀请过外国代表团，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做法。顾维钧的建议提到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最初孔祥熙坚决反对，但戴季陶、孙科、邹鲁等元老表示支持，最终采纳了顾维钧的建议，同意邀请代表团到会参观。[49]

11月16日上午，英国代表团来到国民党十中全会会场，顾维钧将四位代表一一介绍给与会者。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致欢迎词："此次英国议员团抵重庆，正值本党开十中全会，时会相逢，无任欣幸。四位团员合则为代表英国人民，对我国人民空前之访问，到渝以来，我国各界

欢迎之热烈，可见我政府与民众重视此次访问之意义；分则可谓英国之大政党之代表。余兹以我中国国民党总裁之名义，并代表本会向诸君致诚恳之欢迎。今日本会承诸君莅临参观，一睹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情形，不胜快慰。英国现为我共同抗战之友好盟邦，余深盼议员团此举，成为我中国国民党与英国之三大政党间联络难得的机会，此不特有裨同盟国为争取自由与民主精神之共同奋斗，且亦可促进战后中英两国之友好合作也。”这篇简短而热烈的欢迎词是顾维钧起草的，表达了对中英友好合作的祝愿和对中英关系的期望。随后，英国代表团四位成员分别致辞，表示能列席国民党全会是“很大的光荣”。自由党议员泰弗亚致辞时几次提到孙中山，每次讲到孙中山名字，就转身向主席台上的孙中山像鞠躬以示崇敬。当天，顾维钧也向全会报告，谈英国时局与国际形势，其内容和演讲风度给参会者留下深刻印象。[50]

顾维钧对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将对中英关系产生的积极影响充满期望。在中英文化协会举办的欢迎茶会上，顾维钧在演讲中说，他离开伦敦回国时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在重庆欢迎接待议会代表团，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另一个是代表团的访问能够大获成功，虽然访问才刚开始，还没结束，但已可确定会取得成功。这一成功是访问团诸君的成功，更是中英关系的成功。[51]对代表团的访问参观，顾维钧精心安排，细致地照顾到每位成员。泰弗亚是一位化肥专家，希望与中国的同行进行交流，顾维钧就为他专门安排了一次茶话会，请来农业部副部长钱天鹤和农业专家金宝善，让他有机会与同行讨论自己的化肥理论。后来，顾维钧还陪他去访问了农学院。[52]

11月25日，英国议会代表团离开重庆，去其他城市访问，顾维钧全程陪同。第一站是西安。到西安次日，顾维钧与代表团前往潼关前线，通过望远镜观察黄河对岸的日军。随后观看中国军队演习，陪同的蒋纬国上尉给顾维钧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待人亲切、为人勤奋，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此后两天，代表团去华清池，看了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藏身的岩石，参观了中央干部训练团等处。在西安的几次招待会上，顾维钧都登台讲话，主要谈外交关系，也介绍英国战时情况，强调人民在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中的重要作用。[53]四天的西安之行结束时，代表团特意委托顾维钧向蒋介石表示感谢。顾维钧致电蒋介石，称：“英议员团到陕四日，所受各界欢迎之热烈、招待之盛厚，颇为感动，参观各处印象甚佳，尤以潼关第一师、赤水第七十八师及第七军分校之军容肃、士气旺，对钧座之精神远注，钦佩万分。泰弗亚勋爵等以纬国兄长才干练，

品德超群，为难得之青年军官，十分器重，嘱代道贺。”[54]

离开西安，代表团来到成都。在成都期间，顾维钧陪同代表团参观访问了中央军校和中央航空学校，与四川大学的教授进行了座谈。代表团还访问了在中央航校附近的英国皇家空军营地，这里住着缅甸陷落后来到中国的英国飞行员。因为战时供应困难，这些飞行员的生活状况不好，情绪低落。尽管英国飞行员不是来中国参加抗战而是因为战败撤退过来的，顾维钧认为中国政府还是应该帮助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因为这有益于两国关系。后来，他建议蒋介石在圣诞前夕以他个人名义给飞行员送些食品和皮背心，蒋介石接受了他的建议，当天就记在预定要做的事情中。[55]虽然参观的行程安排很满，代表团还是去游览了成都和附近的古迹，如武侯祠、都江堰。顾维钧与四位英国议员在都江堰的悬索桥前合影留念。但踏上悬索桥，顾维钧感到“胆战心惊，因为当我们一步步小心翼翼地在桥上挪动时，吊桥在空中来回摇晃。一步失足就会掉入下面的激流之中”。[56]

昆明是英国议会代表团的最后一站。在这里，代表团受到了和之前在其他城市一样的隆重热烈的欢迎。他们参观了陈纳德的美国驻华空军指挥部，访问了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卫德波以代表团的名义向在露天广场的几千名学生讲话。原本没有安排顾维钧在西南联大讲话，但集会结束后，联大学生一定要他讲话。于是，他以轻松诙谐的语调做了简短的讲话，受到联大学生的欢迎，学生们发出阵阵欢呼声和笑声。[57]

英国议会代表团一个月的访华十分成功，结束访华前，顾维钧建议访问团给蒋介石本人发一个电报，表达谢意。代表团接受了这一建议，请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向蒋介石转呈了感谢函：“临别依恋，盛情深感，吾等此次访华，颇感兴趣，尤承各方款待殷勤，顾虑周到，益觉愉快安适。吾等对于阁下当前所负艰难之工作，谨致竭诚之祝意，同时敬请接受吾等对于阁下暨贵国人民之景仰与真挚之友谊。”[58]

12月10日下午，英国议会代表团离开昆明返国。送走代表团后，顾维钧即给蒋介石发电报告：“访华团全体五人已于今日下午一时半起飞返国，钧与滇党政军长官各界代表，均到机场欢送。”[59]

英国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是中英关系史上的空前之举。由于双方政府的重视，特别是蒋介石的直接过问，代表团访华取得了很大成功。访问增进了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顾维钧对此评论道：“访华团

对战时中国的精神面貌、政府的政策、人民的气质以及中国在战争中面临的问题均获得了一个总的印象。另一方面，这次访问使一部分住在过去被认为是闭塞地区的中国人对英国取得了一个激励人心的印象。”[60]

作为驻英大使，从最初对英方提议的推进，到协助制订详尽周到的接待计划，再到代表团抵华后的居间周旋、全程陪同，顾维钧是代表团成功访华的关键角色。送走代表团后，一回到重庆，顾维钧即应蒋介石之召汇报代表团访华情况。蒋介石对他的汇报感到满意，认为代表团访华“大体尚佳”。[61]

英国方面对顾维钧为代表团访华做出的努力也十分赞赏。1943年下半年，顾维钧返回任所后，代表团成员专为他举办了一次宴会。宴会间，担任过外交大臣的西蒙勋爵致辞，说一个好大使必须具有两种美德，那就是既要使驻在国了解本国，又要能使本国了解驻在国，而顾维钧在这两方面都有杰出表现，是当之无愧的好大使。[62]

三 新约交涉过险滩

顾维钧回国期间，适逢中英两国就废除治外法权、签订新约在重庆进行谈判，他参与了这一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意义重大的谈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取消列强在华特权，顾维钧一直视之为投身外交界服务祖国的首要目标。巴黎和会期间，他参与起草的“中国希望条件”说帖第一次将中国的这一愿望昭告于世。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尽管处理事变十分急迫，他仍调阅国民政府与英国等国有关治外法权交涉的材料，将此视为外长任内的重要任务。[63]出任驻英大使后，顾维钧非正式地向英国外交部提出，英国最好及早主动提出废除治外法权，作为给中国的礼物，因为这一法权战后势在必废之列。他还设法了解英国各界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各界打算把香港归还中国，但要留到战后去解决。[6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内废约呼声日益高涨。1942年8月29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一百周年的日子。当天，《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弹指百年！》，表达已成为四强之一的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心。《大公报》社论《江宁条约寿享百年》指出，《南京条约》及由其派生的其他一切不平等条约，“都应该埋葬了，相信我们的朋友也必然愿见这种历史残骸付诸火化，不留余烬！”[65]

中国废约的要求和呼声，以及中国与美国、英国成为共同作战的反法西斯盟国的事实，使美英两国协商后同意一起终止在华治外法权，与中国另订新约，并于1942年10月9日双十节前夕将这一决定通知中国。

中国各界对美、英宣布将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十分兴奋。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双十节接获美英自动放弃对我中国治外法权、重订新约之通告，此乃为总理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能由我亲手达成，衷心快慰，实为平生惟一之幸事也。”[66]但蒋介石又认为，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华享有许多特权，“领事裁判权之外，尚有其他同样之特权，如租界及驻兵与内河航行、关税协定等权，应务望同时取消，才得名实相符也”。因此，他指示尚在美国的宋子文向美方间接表示，中国“甚望其将过去所有各种不平等条约，一律作废，整个撤消”。[67]对于英国，国民政府还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要求。

10月下旬，中国与美国和英国就废除治外法权并签订新约开始谈判。中美间的谈判在华盛顿进行，中英间的谈判则在重庆进行。中美谈判经过一个月的磋商，双方在11月下旬达成共识，只待对条约的文字修订后正式签约。

中英间的谈判却远没有中美谈判那样顺利。对于中国提出在废除治外法权的同时取消内河航行权与沿海贸易权等问题，英国在谈判中一直坚持不予放弃，力图尽可能维持在华特权，并且还节外生枝地提出英人在华购置不动产的问题。中美间的新约谈判在11月底大体就绪后，英国方面感到很大的压力，如再不与中国达成协议，就会在对华关系上凸显与美国的差异。正如英国外交部一名官员在一份内部文件中所说："如果美国已经让步，我们大概也只能如此做了。"[68]最后，英国被迫放弃在华内河航行权与沿海贸易权，而中国政府也做了让步，同意互相给予对方侨民购置不动产的权利。

但中英谈判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难题，这就是九龙租借地问题。九龙租借地又称"新界"，与香港岛、九龙半岛合称为香港。英国政府通过1842年的《南京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先后强占了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又通过1898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了九龙新界。

中英谈判开始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在中英新约草案中加入了有关九龙租借地的条款，明确提出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应予废止"，"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69]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向英国外交部报告时认为，中国的要求只是九龙租借地，没有涉及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建议政府接受。但英国外交部明确答复薛穆，绝不考虑九龙租借地问题，因为这与有关治外法权的谈判无关。[70]

英国不愿谈判九龙租借地，是因为不愿放弃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视九龙新界为维护香港统治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中国提出要求后，英国政府决定拒绝这一要求，并以此作为对中方谈判的底线。但在中国国内，要求归还九龙新界的呼声十分高涨。蒋介石对此态度坚决，对英国不愿谈九龙租借地问题十分不满，"余决心非令其同时撤消，则宁使不予接受也"，即使不签新约也在所不惜。[71]

12月中旬，顾维钧送走英国议会代表团，一个月繁重的陪同任务结

束了。从昆明回到重庆，顾维钧从主持中英谈判的外交部长宋子文那里获悉，双方的谈判已因九龙新界问题而陷入僵局。顾维钧明白，这个问题是一块礁石，双方的谈判在此遇到险滩触礁了。中国坚持以英国终止它对九龙新界的租借权为签约条件，而英国则强硬表示九龙新界问题不在英国原先承诺的范围之内。双方在谈判桌上互不相让，谈判面临破裂的危险。宋子文请顾维钧帮助解决这一难题。

12月19日下午，顾维钧与宋子文讨论中英关系。宋子文告诉他“九龙问题，仍是棘手”，已要求薛穆电告伦敦重新考虑英方立场。顾维钧此前对英国各界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专门有过了解，与丘吉尔见面时也几次谈到香港问题，知道英国朝野主张将这一问题放到战后解决。因此，他对宋子文表明自己的看法：“欲早了约事，须另筹办法，分为二事，先签约，后续议租借地事。”也就是说，不必将九龙租借地问题与签订废除治外法权的新约绑在一起，而是将两件事分开解决。这与中国在谈判中一直坚持的立场完全不同。与顾维钧讨论前，宋子文与蒋介石的立场一致，主张九龙租借地问题必须一并解决，但听了顾维钧的意见后，十分重视，将相关文件给他送去，要与他做进一步商讨。[72]

12月22日，顾维钧与英国大使薛穆见面，讨论如何解决谈判面临的僵局。顾维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主亟宜设法挽救。”薛穆给艾登的电报更详细地记下了顾维钧与他会面的情况。顾维钧告诉薛穆，新界问题拖延不决会损害两国关系。他向英方建议，由英国政府在条约之外发表一个与华盛顿会议上关于威海卫问题类似的声明，表明英国政府打算将九龙新界归还中国，并在稍后讨论相关安排。薛穆表示英国政府可在战后与中国讨论这一问题。但顾维钧说，如果英国政府不表示愿意终止租借，就无法使中国政府满意。[73]顾维钧提到的华盛顿会议上关于威海卫的声明，指的是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在会议闭幕时发表的一项声明，答应将威海卫租借地交还中国，但需由两国政府的代表就归还方式和细节谈判达成协议。华盛顿会议后，中英两国就此展开谈判，顾维钧担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时参与了这一谈判。顾维钧想以威海卫的事例提醒英方，可以参照此例解决九龙租借地问题。

与顾维钧会面的第二天，薛穆收到英国政府的最新指示，授权他向中国政府表明九龙租借地不在新约范围之内，但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可以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予以讨论，并通过换文的形式明确在战后“考虑租借地的期限”。英国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松动了一步，表示可以换文形式承

诺战后讨论。12月25日，薛穆将英国政府的立场告诉宋子文。宋子文当场表示，所谓租借地期限的说法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实际上表明，英国非但不愿立即解决九龙租借地问题，而且还想在战后继续保有九龙租借地，可以与中国讨论的只是租借的期限问题而已。[74]

当天下午，宋子文召集会议，讨论中英谈判。与会者除顾维钧外，还有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外交部副部长吴国桢等，他们都是外交决策层的主要人物。王宠惠、吴国桢都认为蒋介石对九龙租借地问题非常坚持，如果问题无法解决，谈判势将破裂，新约无法签订。由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权威及在重要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其他人即使有自己的看法，也不愿提出。这时，宋子文问顾维钧有何良策，实际上是要其表明签约与九龙租借地问题分为二事的主张。

顾维钧对此已有准备，开宗明义就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是缔结新约，还是坚持收回九龙租借地，如果坚持后者，那就无从打破僵局；如果将签约放在首位，那就总能找到办法。对中国来说，有必要在新约与九龙租借地之间做出取舍。顾维钧认为，签署废除治外法权的新约毕竟是中国外交上的一个胜利，而九龙租借地问题，中国可以找到体面而不放弃原则的退让办法，就是要求英国声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意愿，并准备为此与中国开始谈判。他拿出已准备好的计划草案交给与会者。此时吴国桢提出，因为美国已同意签约，英国最后终将让步，意即中国不必退让。顾维钧答称并非如此，因为事关殖民地调整的原则，英国会坚持下去。会议最后赞同顾维钧的主张，同意避免与英国的谈判破裂，并将此意见呈报蒋介石。这样，顾维钧将签约与九龙租借地问题分开处理以破解中英谈判僵局的主张，得到了国民政府外交决策层的认同。会上有人建议就将顾维钧的方案报蒋介石，但顾维钧认为不妥，因为这个方案英国未必会全部接受，最后可能还会有调整，若蒋介石批准后成为中方的底线，谈判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75]谈判原则确定后，顾维钧仍在考虑调整的空间。

12月26日上午，宋子文将昨天讨论的结果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考虑后，同意以换文的形式由英方声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意愿。这是蒋介石对中英新约谈判立场的重要转变。就在四天前，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下“英国对废弃特权，仍不肯交还九龙租借地，余仍坚持收回之主张，否则宁不订新约也”。[76]谈判处于僵局中，中国最高层的态度出现了关键性的变化。

12月27日上午，宋子文将顾维钧叫去，告诉他蒋介石改变后的立场，并要他去见薛穆，做进一步沟通。见面时，顾维钧告诉薛穆，英国政府必须明确声明愿意将九龙租借地归还中国，否则中国政府就不会接受任何解决方案。归还之事可在条约之外解决，实际安排也可在战后进行，但归还的声明必须做出，否则中国就不签约。薛穆在会谈中反复解释，条约对中国十分有利，拒绝签约是很难理解的决定。最后，顾维钧以个人身份对薛穆强调，如果英国不明确归还的意愿，条约就无望签署，因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已对民众做出承诺。顾维钧后来回忆说，会谈是坦率的，但气氛有时很紧张，薛穆对谈判将会破裂颇为沮丧。[77]

与薛穆会谈后，顾维钧立即去见宋子文，告诉他根据自己的判断，英国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不会让步太多，因此对中国来说，即使暂时牺牲九龙租借地，也要签署中英新约。在与薛穆的会谈中，顾维钧的语气是坚定的，向英方传达出中国不会签约的强硬信息，以尽可能迫使对方让步。但在中国决策层内部的讨论中，顾维钧是冷静的，将自己认为可能的最坏结果告诉最高层，以争取做出最有利于国家的理智决策。他向宋子文建议，应该与蒋介石当面谈一次，向他汇报与薛穆会谈的情况和对此的看法。[78]

12月27日晚上，顾维钧与宋子文赴蒋介石官邸与蒋介石共进晚餐。在座的还有王宠惠和吴国桢。顾维钧先报告上午与薛穆会谈情况。讨论中，蒋介石问顾维钧关于威海卫租借地收回的情况，表明他对分开处理已有考虑。在回答蒋介石关于九龙租借地问题的询问时，顾维钧提出，中国可向英方表示“交还九龙问题应继续讨论”，即由中国单方面声明收回九龙租借地的立场，与先前要求英国发表声明做出承诺的做法相比，又有改变。这是顾维钧与薛穆会谈后做出的调整，他认为这一办法更为现实稳妥。实际上，宋子文和王宠惠与顾维钧看法相似。去蒋介石官邸前，王宠惠还向顾维钧提出说服蒋介石的建议。但在蒋介石面前，他们都不敢坦陈自己的想法。顾维钧的言语最后打动了蒋介石——“听取少川报告，加以再三考虑结果，如中英新约不能与中美新约同时发表，此固为英国一时之打击，表示吾人对英之不满，然大体着想，此约于我之利益最大，不宜为九龙局部问题而致破坏全局，且于同盟国之形势亦多不利。故决定让位，只要其换文中对九龙交还问题愿继续讨论，使我民众不过失望而已”。蒋介石当晚在日记中所记想法，就是顾维钧反复表达的观点。在蒋介石官邸的讨论最后决定，为获得最有利的谈判结果，由宋子文通知薛穆，签约一事仍须待九龙问题解决，“加以催促”，施加最后

的压力。若英方仍不让步，再提出中国单方面声明的办法。蒋介石表示，中国可拖延至12月31日再做最后的退让。顾维钧的主张终成为中国最高层的决策。这一结果，让他“又惊又喜”。[79]

12月28日，宋子文与薛穆会谈，要求英国重新考虑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的立场，向中国表明愿意终止租借，否则中国不会签约，并表示谈判的前景十分严峻。薛穆感受到宋子文话语中的分量，在会谈后向外交部报告时认为，如果英国不发表中国所要求的声明，中国真的会拒签条约，使英国陷入困境，两国关系也会严重倒退。[80]但是，薛穆所表示的担忧并未能打动英国政府。28日英国内阁开会，艾登报告中英谈判情况，认为目前的情况十分棘手，但仍坚持治外法权与租借地是完全分开的两件事，无法接受中国的立场。内阁会议赞同艾登的主张。会后，艾登在给薛穆的电报中指示说，英国唯一可做让步的是将原来所拟换文中“租借地的期限”中“期限”一词删除，而“顾博士（27日）所建议的方案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如果中国仍坚持，我们只得放弃签约”。[81]

12月30日，薛穆将英国政府的最后立场通知宋子文，并递交了英国照会的草案，表示英国同意在战后讨论九龙问题。宋子文将英国答复的内容告诉顾维钧时，神情十分沮丧。但顾维钧对他说，这一答复并不出乎意料，因为早就料到英国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是不会让步的。现在中国只有签约与不签约两个选择，而签约肯定对中国更为有利。宋子文同意顾维钧的说法，但认为最后的决定权在蒋介石那里。

当天傍晚，顾维钧与宋子文、王宠惠再次赴蒋介石官邸。在宋子文报告目前情况后，顾维钧告诉蒋介石，如果中美签约，而中英未能签约，将给世人造成盟国出现分歧的印象，不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目前情况下，中国的最佳选择就是先签约，然后声明保留随时提出九龙租借地问题的权利。这样既向公众表明了政府的立场，也确保了中国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国的法律地位。蒋介石虽对英国的做法十分愤怒，“此可忍孰不可忍”，但并未改变27日讨论中已确定的不因九龙问题而导致谈判破裂的立场，“然余既决定签订新约为主要方针，故亦不愿因此争执，乃以不提九龙问题，只以将来再谈一语作口头声明”。讨论中，顾维钧提出在签约前中国先声明对九龙租借地的保留立场，为以后的谈判预留基础。但蒋介石认为不必多此一举：“余以为连此保留之声明亦不必先提，只要此正约签订后，则九龙、香港必为我军先行进占，造成事实，虽无文字之保留，亦何妨耶。”[82]

第二天凌晨5时醒后，蒋介石担心英国方面再有变化，在日记中记下：“深虑与英国订新约事，我虽不要求其对九龙问题作有何保留之约言，而彼或反要我作九龙不在平等条约内之‘声明’或‘换文’时，否则，彼竟拒绝签订新约，则我政府惟有作自动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声明，不承认英国在华固有之权利，在战后用军事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狡狯必无可如何。此乃最后之手段，如彼亦无所要求，则我待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作‘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之谈判，以为日后交涉九龙问题之根据。”[83]当天上午，蒋介石召宋子文来官邸，决定最后签约。

1943年1月11日，中英关于废除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特权的条约在重庆签署，顾维钧参加了签署仪式。条约签署后，外交部长宋子文向英国提出照会，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历时两个多月的中英新约谈判终以双方签约而告结束。

在中英新约谈判过程中，顾维钧提出的签约与九龙租借地问题分开处理的原则是谈判走出困境的关键。在顾维钧看来，废除治外法权是英国人给中国“送上门的礼”，中国应先收下这第一份礼，同时表示在等待第二份礼，这样才有助于盟国间的合作，而这在战时是极为重要的。[84]由于英国政府确定了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不让步的强硬立场，如果中国坚持九龙租借地问题与签约一并解决的立场，中英谈判只有破裂一途。就此而言，顾维钧的主张对于中英新约的最终签署，对于治外法权在中国的废除，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顾维钧对中英谈判中棘手的九龙租借地问题的处理，显示了他在外交交涉中的一贯主张。他说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作个人处世立身之箴言，但这一箴言不适用于一国之外交，因为国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在外交上，必须始终考虑对方，如果每一方都坚持百分之一百的成功，那么任何谈判都不可能成功。他认为，在谈判中应以做到百分之五十为目的，如果取得百分之六十就有所获，应该满足了。[85]中英新约谈判正是他这一主张的一次典型运用。

中英新约谈判中，除了与英方交涉，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向对方施加压力外，顾维钧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中国外交决策层内部的沟通上，以期自己的主张能成为中国的对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民众的普遍呼声，英国宣布放弃治外法权后，中国政府和民众都希望一并废除英国根据不平等条约享有的其他特权，包括九龙租借地。中国坚持抗战五年

多，并在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后成为与美国、英国、苏联并列的“四强”之一，这一意愿更为强烈。所以蒋介石最初会持宁可不签约也要收回九龙的立场。对决策层来说，舆论与民意也是坚持强硬立场的一个主要因素。如在12月25日宋子文召集的讨论中，王宠惠和吴国桢都强调九龙问题不解决，中国舆论是不会满意的，也不会将签署的新约看成外交上的胜利。但顾维钧认为对一国的外交来说，舆论与民意是重要的，但做外交决策时唯一要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不应为了顺应民意讨好公众而不顾及国家利益。[86]因此，他不受舆论的影响，而是按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去说服同僚。宋子文和王宠惠原先持与蒋介石相同的立场，都是在听了顾维钧阐述的主张后改变想法的。

但宋子文和王宠惠虽接受了顾维钧的主张，却不愿去向蒋介石说明，不敢向他表达不同的看法，因此12月27日和30日两次与蒋介石的重要见面，宋子文都请顾维钧出场，由他去向蒋介石说明情况。与在官场多年的官僚患得患失的心态不同，顾维钧认为外交官的职责就是将自己对外交政策的分析和建议告诉最高决策层。而蒋介石确实听进了顾维钧对中英谈判的主张，最终拍板决定签约。对顾维钧这样的做法，宋美龄称赞他“时刻考虑本国政府的威望，而从不考虑个人得失”。[87]

四 筹划宋氏兄妹访英

为消除中英之间的不和与误解，促进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顾维钧努力沟通两国领导人间的了解。1942～1943年，他积极筹划、推动宋子文、宋美龄兄妹访问英国，其中宋美龄访英未果所经历的曲折反映了中英间并不和谐的双边关系。

1942年刚回国述职，顾维钧就应宋美龄之邀于11月3日在重庆与她见面。谈话一开始，顾维钧就说，英国希望邀请她作为政府的贵宾前往访问，并说英国王后和好几位著名的英国女士都有这样的愿望，他建议她接受这一邀请。但宋美龄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访英的建议。她认为她的访问不会成功，因为她会坦率地向英国方面包括丘吉尔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不可能得到英国的理解，反而会引起他们的不快。宋美龄提到她4月19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里面谈到她与蒋介石对印度的访问，也指出西方必须要修正对东方的观念，这肯定让英国很不高兴。顾维钧告诉她，丘吉尔虽然可能当面反驳她，但也会赞赏她明辨是非的勇气，并因此更敬佩她。在顾维钧看来，双方能够沟通总是一件好事。但宋美龄仍然表示不愿去英国访问，还说英国对中国的抗战没有给予什么援助。[88]宋美龄的态度反映了国民政府高层对英国的普遍看法，即因近代以来不平等关系对英国的反感，以及对英国没有像美国那样支援中国抗战的不满，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远东的糟糕表现则增加了国民政府对英国的蔑视。

与顾维钧谈话半个月后，宋美龄去美国访问。宋美龄此行虽有治病的安排，但也担负着宣传中国抗战、开展对美国政府和民间外交工作的使命。宋美龄出众的口才和迷人的个人魅力给美国公众和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深了美国公众对中国抗战的了解，推进了战时中美关系的发展。

宋美龄访美引起英国朝野的关注。中央社驻伦敦记者报道，宋美龄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已使英国人民发生深刻之印象与敬佩”。英国政界及非官方人士称，宋美龄“既能使美国为之倾服，如渠一旦来英，自亦可使伦敦及英国人士为之倾服”。英国朝野对宋美龄访英更为期盼，认为访问“能格外增进中英两国间诚挚之友谊与谅解”。[89]1943年2月24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以下院领袖身份在议会宣布，英国政府希望

宋美龄访英，整个下院报以热烈欢呼。艾登称，去年年底已向宋美龄正式发出邀请，后来又发出过邀请，此次完全可以相信“此一高贵之夫人能在返华前来访吾国”。[90]

宋美龄美国之行的成功和英国方面的反应，使顾维钧越发认为宋美龄应该访问英国，以对中英关系带来同样的积极效应。他希望利用还在重庆的时间，在高层中推动此事。回国述职后，蒋介石交给他制定外交礼仪规章的工作，具体与宋霭龄商定。在与宋霭龄讨论礼仪规章时，顾维钧提出了宋美龄访英一事，希望她能去说服自己的小妹。在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谈话时，他也提出此事，认为宋美龄访问美国后不去访问英国，相形之下亲疏悬殊可见，会引起英国的种种推测和误解。而且以他对英国的了解，英国人甚至比中国人更看重“面子”问题，如果中国故意采取亲近美国而冷落英国的做法，将对两国关系产生不利影响。陈布雷赞同顾维钧的看法。[91]

2月下旬艾登在英国议会表达希望宋美龄访英后，顾维钧与蒋介石有一次见面，当面提出宋美龄访英的问题。此前与顾维钧的多次谈话，使蒋介石对中英关系的态度已有变化，对宋美龄接受英国邀请去访问并不反对。2月2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对英方的邀请“却之不恭”。但此时印度的甘地正在狱中绝食，蒋介石认为时机不合适，可在甘地绝食结束或被释放时再做正式答复。因此，蒋介石告诉顾维钧，他对英方的回复故意含糊其词，但赞成顾维钧返回英国时先去美国，与宋美龄直接商量解决此事，并在她那里待些时间，以便她需要时给予协助。这次会面后，顾维钧认为蒋介石是赞成宋美龄接受邀请访问英国的。[92]

3月下旬，顾维钧经印度、北非抵达华盛顿。一见到正在美国的宋子文，顾维钧就提出宋美龄访英问题。此前几天（3月21日），丘吉尔就战后问题发表演说，其中谈到由英、美、苏组成一个理事会，而故意不提中国，将中国排除在外。因此，宋子文对顾维钧说，若他处于宋美龄的地位，此时就不会去访问英国。但他接着又说，也许正是为了丘吉尔这篇讲话宋美龄更应该去一次，这显示出排除了个人意气之后他作为外交部长的看法。因此，在顾维钧强调宋美龄访英对中英关系全局的重要性后，宋子文同意他的看法，认为他应该与宋美龄当面讨论，并尽快做出决定，不能让英国一直等待下去。[93]

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的宋美龄此时在旧金山，顾维钧在华盛顿停留了一天就从东海岸飞往西海岸。宋美龄对丘吉尔充满“约翰牛”气味的演

说十分反感，且蒋介石在丘吉尔演说后也发来电报，指示对“访英问题，不必肯定，亦不必答复”，[94]因此她更不愿访英了。顾维钧对宋美龄说，无论从战时还是战后看，中国都需要维持与英国的友谊，中美之间的友谊是重要的，但仅仅有此是不够的，中国的外交应该以形成美、英、中即ABC核心为目标。为此，中国的外交要讲实际，不能意气用事。宋美龄对顾维钧所说有所心动，同意对国际关系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只要对国家有利，可以去英国访问。随后，宋美龄关心在英国将会受到什么规格的接待，并表示不能低于美国给她的规格。[95]

3月27日，尚未决定是否访英的宋美龄对顾维钧说，她希望与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先见一次面。顾维钧此时已获悉艾登定于3月30日离开美国，根本无法从东海岸赶到西海岸来。但在宋美龄的坚持下，顾维钧还是飞往华盛顿去见艾登。艾登表示他必须如期赶回英国，并对丘吉尔的演说做了解释，称那是针对欧洲讲的，并无轻视中国之意，随即再次表达英国欢迎宋美龄访问的愿望，并保证将给予皇家最高欢迎礼仪。他半开玩笑地对顾维钧说，如果中国不满意英国人对宋美龄的接待，可以砍掉他的脑袋。在向宋美龄报告与艾登会面的电文中，顾维钧又一次劝说她做出肯定的决定。[96]

虽然已有电文报告，宋美龄还是要顾维钧飞到西海岸去当面商量。已经卸任大使还留在美国的胡适知道后说，让连续旅途奔波的顾维钧第二次飞西海岸太不体谅人了。待顾维钧飞往洛杉矶后，宋美龄忙于在好莱坞等处演说，根本顾不上见他。直到第五天，宋美龄离开洛杉矶，乘上前往美国东部的火车后才召顾维钧到她的车厢里，说她已决定前往英国，时间定在5月初，要顾维钧为她准备演说稿，供她访英之用，演讲的内容由他决定。顾维钧对此当然很高兴。在这之前，中国驻英使馆已根据顾维钧的指示预订了伦敦的旅馆套房及郊外别墅一所。与宋美龄谈话后，顾维钧立即致电驻英使馆，嘱咐为访问做准备，并向英国外交部打听接待事宜。[97]

与宋美龄一同乘坐火车到达美国东部后，顾维钧着手准备演讲稿。但4月下旬，宋美龄又改变主意，告诉顾维钧，身体不适难以成行，并说蒋介石也在催她回国。5月上旬，宋美龄正式决定推迟访英行程。这消息对顾维钧来说，如同当头一棒，令他十分失望。[98]

恰在此时，英国首相丘吉尔于5月中旬来到华盛顿，参加美英首脑讨论军事战略的会议。丘吉尔通过罗斯福总统夫人传话，表示愿意与宋

美龄见面。顾维钧对这一主意十分支持，认为两人见面谈一次，胜过外交官间谈十次，对两国关系会产生积极影响，也可对宋美龄不去访英有所弥补。

正在纽约治病的宋美龄希望丘吉尔能从华盛顿前来纽约与她会面，并将安排会面的任务交给了顾维钧。顾维钧提出，丘吉尔能来纽约当然最好，但如果公务繁忙抽不出时间，两人的见面可由中国驻美大使或外交部长宋子文或他本人出面，在华盛顿设宴请两人参加，也可由宋美龄自己在华盛顿请丘吉尔到她的旅馆来喝茶。但为宋美龄安排行程的她的外甥孔令侃坚持要丘吉尔来纽约，认为是丘吉尔想见宋美龄，还说宋美龄是女士，丘吉尔应该前来拜访。[99]

顾维钧奉命专程去华盛顿与英方联系。丘吉尔果然忙于参加美英首脑会议，无暇前来纽约。这时，罗斯福出面帮忙了，请宋美龄到华盛顿来参加白宫的午餐会。这样，宋美龄与丘吉尔就能在华盛顿见面了。顾维钧传达这一消息时，建议宋美龄可以提前一天到华盛顿，然后由丘吉尔来拜访她。远在重庆的蒋介石知道丘吉尔到华盛顿后，虽还不知道罗斯福的安排，也认为宋美龄应该与丘吉尔见一面，在5月14日给宋子文的电报说："三妹既不访英，则乘丘在美之机，最好与之会晤一次，此乃政治上之常道，不能专尚意见与感情，照现在外交形势似有谋晤之必要也。"[100]因此，宋子文知道罗斯福的邀请后认为，宋美龄无论如何应该接受邀请来华盛顿，否则中英间的误会将加深。但宋美龄以另有安排为由拒绝了邀请。白宫为尽可能促成宋丘两人见面，又提出午餐会可推延几天，宋美龄仍然回绝。她告诉顾维钧，与丘吉尔见面是给他增光，她不会帮他这个忙。[101]

宋美龄拒绝前往华盛顿会见丘吉尔以及不接受访英邀请的举动，使已经不和谐的中英关系再遭挫折。蒋介石对宋美龄意气用事批评道："固执己见，而置政策于不顾。"英国方面当然更为不满，驻英使馆给顾维钧的报告称，丘吉尔的女儿说宋美龄不来英国是因为不喜欢英国。罗斯福总统知道宋美龄最终拒绝来华盛顿后大呼"那个女人疯了"。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中国官员访问伦敦时，薛穆的夫人还对此耿耿于怀，称宋美龄拒绝访英邀请是英国的莫大耻辱。[102]

在顾维钧看来，宋美龄访英不是可有可无的一般礼仪活动。英国邀请宋美龄访英是为了加强两个盟国间的关系，尤其在宋美龄接受罗斯福邀请访美并获得成功后，英国更盼望她访英。正是出于对英国政府的深

切了解，顾维钧努力推动宋美龄访英以及面见丘吉尔，期望以此改善两国关系。但这一切努力最终付诸东流。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十分失望的感受：

> 这些日子我一直反复思考着中英两国之间在感情和关系上所出现的日益扩大的鸿沟。尽管我全力以赴，力图改善这种情况……但两个月来又发生了许多事件，使得局面每况愈下，令人灰心之至。尤其痛心的是，只要稍具常识或略加克制，这些事件和枝节琐事，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实在太无必要了。

他认为，宋美龄拒绝访英和不见丘吉尔两事“完全无法解释”，“处理欠妥”。[103]最终的结局使他深感遗憾。1945年春宋美龄再想访问英国时，英国人的态度已完全不同，顾维钧对此也意兴阑珊。[104]

在劝说宋美龄访英同时，顾维钧也在积极推动外交部长宋子文访英。还在1942年9月，顾维钧就致电时在美国的宋子文，转达英方对他的邀请，并主张接受这一邀请：“你将不仅是自珍珠港事变以来，且是自我们对日作战以来，第一个来此的中国政治领袖，你来访的重要性将由英国方面最高的诚挚及实质上的成果所展现。”但当时顾维钧即将回国述职，宋子文也将回国参加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两人商定将访英日程推后。[105]在国内和美国逗留期间，顾维钧与宋子文有过多次交谈，讨论中英关系。宋子文对英国长期以来对华的帝国主义做派十分反感。顾维钧对此完全理解，认为丘吉尔确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当然要予以反驳。但与宋子文不同的是，他认为，作为一个外交官与英国打交道，在表达的方式上可以婉转一些，这样中国的观点更容易被对方接受。不过，对宋子文访英两人持相同看法，宋子文还对顾维钧说，两人要通力合作，改善中英关系。[106]

宋美龄访英计划告吹后，中国政府高级官员访英，沟通双方间存在的隔阂，讨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了。1943年6月17日，宋子文从美国致电蒋介石请示访英事宜：“英、美方面均希望文早日赴英，与其政府交换意见，俟鄙恙调治复元，即拟首途。此除观察英国各派势力及方针，并促成实践攻缅计划外，拟引起彼国朝野注意中国建设合作之机会。英国一般论调，每以战后中国必不愿与其合作。故此举如能成功，对英一切交涉必有良好影响，无论战后能否实现，此时不妨表面上非正式示意。如何？尚祈察夺指导，俾有遵循。”蒋介石接电后批示：“既允访英，待康复后应即往访为宜。”[107]

7月24日，宋子文抵达伦敦，开始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访英之行。一到伦敦，宋子文就与顾维钧商议与英方会谈的议题以及向英方提出的方式。在英期间，宋子文与包括丘吉尔、艾登在内的英国政要举行了16次正式会谈。顾维钧作为驻英大使，安排并参加了宋子文在英期间的所有活动。

宋子文与英方会谈的主要议题涉及重开缅甸战场、战后中英经济合作和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三个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中英双方分歧很大。宋子文在会谈中直言坦陈，气氛不免紧张，甚而陷入僵局。顾维钧以其娴熟的外交手段和灵活的态度，化解会谈中出现的尴尬局面。7月26日，宋子文与艾登第一次会面，表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但艾登却提出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问题，双方的立场截然对立。顾维钧及时提出，双方可各自提出一份备忘录，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以便进一步商谈。宋子文和艾登都赞同这一提议，会谈得以继续进行。[108]

8月3日，顾维钧陪同宋子文出席有英国三军参谋长参加的讨论缅甸作战的会议。宋子文将中国对缅甸作战已做准备和对英期望坦率陈述，但英方的回复则避重就轻，闪烁其词。顾维钧感到宋子文“说得铿锵有力”，表达了中国收复缅甸、打击日本的决心，但英国人并没有决心通过一场大战来收复缅甸，而是希望首先打败希特勒德国，将日本和远东问题暂时搁置一边。会后，顾维钧根据宋子文的指示为其起草向蒋介石的报告。[109]

顾维钧的精心安排以及与宋子文的密切配合，使宋子文访英进展顺利。正如有学者指出，由于英国坚持帝国主义立场和宋子文对英国的戒备心理，宋子文访英无法用“成功”或“失败”这类词来概括。[110]因为，从访英的主要议题看，中国并没有取得明显的外交进展。但从访英前宋子文对顾维钧所说要改善中英关系来看，此次访问仍有其积极意义。离开英国前，宋子文总结此次访英说，这次访问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解决了什么具体问题，而在于他同英国政府的领袖们建立了联系。[111]

宋子文访英之后，顾维钧还安排了中国访英团对英国的访问。还在英国议会代表团即将结束访华之时，顾维钧就建议英国代表团向中国政府表示希望将来中国的代表团能访问英国，代表团接受了这一建议。1943年6月，英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薛穆正式表达了邀请中国代表团访英的愿望。蒋介石将此事交给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办理，请其拟定访问团名单。[112]王世杰最后确定的访英团成员有国民参政会成员王云

五、胡霖、杭立武和立法委员温源宁，由其本人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委员身份率团。蒋介石在访英团出访前专门约见其成员面谈，关照应注意事项，并致函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和丘吉尔介绍代表团。[113]

中国访英团于12月3日抵达伦敦。顾维钧参与安排访英团的行程，参加了大多数的活动。12月10日，顾维钧受邀在英国皇家水彩协会举办的中国近代画展上致开幕词，他特地安排访英团一同出席。1944年1月6日，顾维钧为中国代表团访英举办宴会，邀请艾登出席。1月25日，顾维钧陪同访英团去首相官邸拜访丘吉尔，宾主交谈甚欢。[114]访英团最初预定行程一个月，最后在英访问一个半月。结束访问时，英国《泰晤士报》以“远东之友谊”为题发表社论。《中央日报》在代表团回国后发表题为“访英团回渝”的社论，祝贺访问圆满成功。[115]

顾维钧出使战时英国，正是中英两国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而双边关系矛盾重重的时期。作为大使，他努力在两国间进行沟通，让英国政府和人民了解中国，也让中国政府高层了解英国。相比较而言，他花了更多的精力来消除中国高层对英国的成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推进了两国的战时合作。正如担任过英国外交大臣的西蒙勋爵称赞顾维钧时所说，他在沟通两国相互了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杰出表现，是当之无愧的好大使。

[1] 《顾维钧致徐谟》（1940年7月20日、11月9日）、《徐谟致顾维钧》（1940年7月23日、11月1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5；《顾维钧致蒋介石、王宠惠》（1939年7月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0。

[2] 《徐谟致顾维钧》（1941年5月15日）、《伦敦使馆致顾维钧》（1941年5月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9；《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563～565页。

[3]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页。

[4] 《战时外交》第3册，第38页。

[5] 金光耀、马建标选编《顾维钧外交演讲集》，第224～226页。

[6]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页。

[7] 《顾维钧日记》（1941年8月2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5。

[8] 《郭泰祺致顾维钧》（1941年8月1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8。

[9] 《郭泰祺致顾维钧》（1941年8月18日、20日）、《顾维钧致外交部》（1941年8月2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8。

[10] 《郭泰祺致顾维钧》（1941年8月5日、15日）、《蒋介石致顾维钧》（1941年8月2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8；《顾维钧致外交部》（1941年8月2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1。

[11] Chiang Kai-shek to Churchill，3 November，1941，*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1.

[12] 《战时外交》第2册，第188～189页。

[13]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4页。

[14] 《顾维钧致外交部》（1941年12月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1。

[15] 《顾维钧致外交部》（1941年12月12日）、《顾维钧致宋子文》（1941年12月1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1。

[16] 《蒋介石致顾维钧》（1941年12月3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38。

[17]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2年1月5日、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56。

[18] 《战时外交》第2册，第260页。

[19] 《战时外交》第3册，第90页。

[20]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0～61页。

[21] 《蒋介石日记》，1942年4月17日。

[22] 《战时外交》第2册，第261～262页。

[23] 《战时外交》第2册，第262页。

[24] 《战时外交》第2册，第263～268页。

[25] 《蒋介石致顾维钧》（1942年7月2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56。

[26]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1页。

[27] 《战时外交》第3册，第434～435页；《蒋介石日记》，1942年2月23日。

[28] 《战时外交》第3册，第130～131、139～140页。

[29]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2年6月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55；《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2页。

[30] 《顾维钧致宋子文》（1942年4月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55。

[31]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2年3月19日、8月7日）、《蒋介石致顾维钧》（1942年3月23日、8月1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9。

[32]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06页。

[33] 《战时外交》第3册，第713～714、752页；《蒋介石日记》，1942年10月10日。

[34] 《蒋介石日记》，1942年10月15日；《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93页。

[35]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20～121页；《蒋介石日记》，1942年11月23日。

[36]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53～157页；《蒋介石日记》，1942年12月13日。

[37]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04～105、240页。

[38]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228～234页；《蒋介石日记》，1943年3月6日。

[39] 《蒋介石日记》，1942年11月16日。

[40]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95页。

[41] 肖如平：《蒋介石与抗战时期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3期。

[42] 《战时外交》第2册，第121页。

[43] 《战时外交》第2册，第122页；《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75页。

[44]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77页。

[45]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23～124页。

[46] 《中英关系史之一新页：英议会访华团抵渝》，《大公报》（重庆）1942年11月11日，第2版。

[47]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26～127页。

[48] 《蒋介石日记》，1942年11月14日上星期反省录、10月28日。

[49]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25页。

[50] 《大公报》（重庆）1942年11月17日，第3版；《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28页。

[51] 《中英文协茶会四篇演词全文》，《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11月15日，第2版。

[52]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29页。

[53]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31～133页。

[54] 肖如平：《蒋介石与抗战时期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3期。

[55] 《蒋介石日记》，1942年12月13日。

[56]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34～138页。

[57]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42～143页。

[58] 肖如平：《蒋介石与抗战时期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3期。

[59] 《战时外交》第2册，第127页。

[60]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49页。

[61] 《蒋介石日记》，1942年12月13日。

[62]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381页。

[63] *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

[64]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5、334页。

[65] 《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8月29日，第2版；《大公报》（重庆）1942年8月29日，第2版。

[66] 《蒋介石日记》，1942年10月10日上星期反省录。

[67] 《战时外交》第3册，第712、714页。

[68] Minute by J.Brenan，2 December，1943，FO371/31664，英国国家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69] 《战时外交》第3册，第765页。

[70] Seymour to Codagan，17 November，1942；Codagan to Seymour，4 December，1942，FO371/31663/F7822.

[71] 《蒋介石日记》，1942年10月24日上星期反省录。

[72] 《顾维钧日记》，1942年12月1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5。

[73] 《顾维钧日记》，1942年12月2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5；Seymour to Eden，22 December，1942，FO/371/31665/F8408。

[74] Eden to Seymour，23 December，1942，FO371/31665/F8397；Seymour to Eden，25 December，1942，FO371/31665/F8457.

[75]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70～172页；《顾维钧日记》，1942年12月2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5。

[76] 《蒋介石日记》，1942年12月22日、26日。

[77] Seymour to Eden，27 December，1942，FO371/31665/F8482；《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73页。

[78] 《顾维钧日记》，1942年12月2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5；《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73～174页。

[79] 《顾维钧日记》，1942年12月2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5；《蒋介石日记》，1942年12月27日；《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74页。

[80] Seymour to Foreign Office，28 December，1942，FO371/35681/F512.

[81] Cabinet Records，28 December，1942，CAB65/28；Foreign Office to Seymour，28 December，1942，FO371/31665/F8482.

[82] 《顾维钧日记》，1942年12月3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5；《蒋介石日记》，1942年12月30日；《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76～177页。

[83] 《蒋介石日记》，1942年12月31日。

[84]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7～18页。

[85]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80页。

[86]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72页；第1分册，第397页。

[87]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09页。

[88]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07～109页。

[89] 《英伦期盼蒋夫人往游》，《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3年2月22日，第2版。

[90] 《英政府殷望蒋夫人访英》，《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3年2月25日，第2版。

[9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200～201页。

[92] 《蒋介石日记》，1942年2月26日；《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212、

256页。

[93]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256～257页。

[94] 《战时外交》第1册，第818页。

[95]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262～263页。

[96] 《顾维钧致宋美龄》（1943年3月2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56；《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265～266页。

[97]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275页；《顾维钧致陈代办》《陈代办致顾维钧》（1943年2月）、《顾维钧致驻英使馆》（1943年4月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52，56。

[98]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280、286页。蒋介石4月中旬给宋美龄电报“催归”，见《蒋介石日记》，1943年4月15日。

[99]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298页。

[100] 《战时外交》第3册，第229页。

[10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300～302、309页。

[102] 《蒋介石日记》，1943年5月18日；《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310页；《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761页。

[103]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311～312、344页。

[104]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08页。

[105] 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1，第89～90页；《顾维钧宋子文往来函件》（1942年9月29日、3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8。

[106]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256、315、318页。

[107] 《战后外交》第3册，第247～248页。

[108]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353页。

[109]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357页；《战时外交》第3册，第254～256页。

[110] 陈谦平：《民国对外关系史论（1927～1949）》，三联书店，2013，第291页。

[11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362页。

[112]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42页；《战时外交》第2册，第127～128页。

[113] 《战时外交》第2册，第129～130页；《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5日。

[114] 《英伦中国画展》，《大公报》（重庆）1943年12月11日，第2版；《顾维钧欢宴艾登》，《中央日报》1944年1月7日，第2版；《战时外交》第2册，第133页。

[115] 《英报盛赞我访英团》，《大公报》（重庆）1944年1月25日，第2版；《中央日报》1944年3月28日，第2版。

第九章 参与创建联合国

一 对战后国际组织的期望

1944年8月至1945年6月，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先后参加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在战后参与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秩序的国际组织充满期待。1942年6月，国防最高委员会下属的国际问题讨论会在对战后国际组织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后，拟定了一份“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这是中国关于战后国际组织的第一份正式文件，集中了当时众多国际事务专家的意见。[1]1943年10月30日，美、英、苏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中国虽未与会，但在美国提议并坚持下一同签署了会议通过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向全世界宣告，四国将继续对轴心国作战，直至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并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2]莫斯科宣言首次明确表示美、英、苏、中四国将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并确立了四大国为该国际组织重心的设想，奠定了日后联合国的最初基础。

1944年5月，美国政府制订了一个初步计划，拟邀请中国、英国、苏联三国代表赴华盛顿开会商讨筹建国际组织。但5月中旬《纽约时报》报道称，英国将出面召集英、美、苏三国会议讨论国际组织事宜，中国不在被邀之列。蒋介石获悉后，急电驻美大使魏道明探明详情。魏道明与美国务院沟通，被告知该报道纯系推测，并无根据。5月31日，魏道明去白宫拜访罗斯福总统，后者明确告诉他“决不忘却中国，彼等只要三国，余必要四国”。蒋介石获悉后立即致电罗斯福表示感谢，“阁下与赫尔国务卿深切注意，中国必须参加此次会议，余更为欣感”，“盖东方人民如无代表，则此会议将对于世界之一半人类失去其意义”，俨然以东方人民代表自居，并表明“中国向来主张早日成立此种机构，如其可能，并望在战时结束以前成立”。美国发起的这次会议定于8月在华盛顿

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由于苏联以尚未与日本开战为由，不愿与中国坐在一张会议桌上，最后只得采取开罗会议模式，即第一阶段为美、英、苏三国会议，第二阶段为美、英、中三国会议。7月10日，魏道明将这一安排报告重庆，蒋介石批示“应可赞成”。[3]

接受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邀请后，王世杰任主任的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外交部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等对成立新的国际组织提出了各自的方案。尽管已有多个方案在手，蒋介石仍想知道顾维钧的看法，他于7月26日致电伦敦，嘱其报告英国方面参加会议的准备情况，并就“我国应取之立场及注意事项”，“以研究所得电告为盼”。[4]

自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联盟名存实亡后，顾维钧对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予以高度关注。他草拟过一个计划，并经常加以修订。1944年4月中旬，美国副国务卿斯退丁纽斯（Edward Stettinius）访问伦敦时，顾维钧与他就国际组织一事进行过商谈。[5]因此对中国应取之立场，顾维钧早有周详之考虑。8月6日，他给蒋介石发了一份近两千字的长电，在报告了英国对会议的准备情况后，详尽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关于中国对国际组织应取的基本立场，他提出：

> 至我国应取立场，窃意似宜仍本我国酷爱和平公道之精神及集团安全之原则，着重世界整个和平机构为基础，区域组织仅为其一部分，遇有要事或承中央机构之命执行，或自议决，亦须得中央机构之核准，以其名义行之。（2）［原文漏标（1）——引者注］确定会员国施行经济与军事制裁之义务，以免临时须付表决或多方推诿不行，一如国联盟约之弊。（3）实施制裁大纲应预为规定。（4）设立国际军事委员会随时调查研究国际军情，改善实施办法。（5）凡法律之一切争执应规定各会员国均有提交法庭审判之义务，不准例外。（6）被委任统治地不必分甲乙丙三等，一律以助其达成自治为共同宗旨，由国际机构随时斟酌情形予以自治或独立，以免曲解国联盟约所许间接并合之弊，并应规定由国际机构派员视察该地之权。（7）采取及加强盟约第十九条所载会员国得请修改条约之权，俾消弭国际间之纠纷而巩固和平机构之基础。

关于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应取之态度与策略，顾维钧认为：

> 此项商谈世界和平机构组织会议，虽系专门讨论性质，其

结论仍须报告各政府审核后，另由全权代表共同决定，然关系亦匪浅鲜。英、美、苏三国自以为今番出大力抗战，胜利后恐不免各图操纵，彼此疑嫉。不特英美间，即英苏与美苏间难免有各自为谋、主张不同之点。我国地位虽列四强之一，似宜慎重发言，减少提案为得。此番苏联虽参与另一集会，不与我直接商议，然其提案亦必由英美转商于我，以求一致。窃意我宜避免提出与任何一国正面冲突之主张，而多事居间调和、折中三国方案，俾增加我参预此次会议之贡献为上策。

顾维钧在电文中还指出了中国参加会议应注意的事项。如关于种族平等问题，他认为这是“国际和平要素之一”，但鉴于该问题的复杂性，中国以不提为宜，“如有直接间接违反此项原则之规定，应不予赞同或予以保留”。对于国际机构的投票表决问题，他主张如改国联的全体一致原则为多数原则，则应包括全体常任会员国方为有效，“以重我地位也”。[6]

综观顾维钧的电文，对国际组织他主要吸取了国联在30年代面对法西斯侵略时无所作为的教训，强调新的国际组织的中央机构必须具有权威，尤其关注制裁问题，明确规定会员国有实施制裁之义务，并应预先规定实施制裁大纲，以避免国联之弊端。对中国与会的方针和策略，顾维钧则在权衡中国在四强中地位和会议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主张采取现实、灵活的立场，“多事居间调和”，以尽可能确保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顾维钧的电文前，国民政府外交决策层内就成立新的国际组织已有多个方案，其中以王世杰和王宠惠的方案最为重要。王世杰于7月20日以军委会参事室名义向蒋介石呈报关于国际安全和平组织问题之主张要点，主张国际组织应尽速在战争结束前成立，战争结束共同敌人消灭后，困难将增加。他还强调国际组织应有充分力量，对于侵略国负有执行经济、政治与军事制裁的责任，并应具有执行军事制裁之充分力量，即成立强有力之国际空军。但王世杰虽认为四大国应为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却不主张四大国享有过大之特权，因为“我如主张其他特权，势必增加各小国对我之反感。且四国纵令享有其他特权，实际上我亦未必能利用，其能利用此种特权者，实际上将为英、苏等国。彼等利用此权时，容或予我以不利”。[7]

王宠惠于7月24日向蒋介石递交了题为“我方基本态度与对重要问题之立场”的方案。他认为，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我方似以暂不正式提

出整个对案为宜”，“倘我方正式提出整个对案，过重现实，则无甚意义；太重理想，则与美国立场相去悬殊，恐难成立。故转不若就美方所拟草案依照我国立场，提出补充或修改案也”。虽不提整个对案，他仍阐述了对国际组织的基本主张，即国际组织“以愈坚强有力为愈宜”，并应“尽早成立”；中国应与美、英、苏取得平等地位同样参与；议案表决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对侵略应有明确定义，如何应用制裁也应有具体规定；应设置国际警察或国际空军等。[8]

总体来说，这几个方案对国际组织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即都主张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国际组织投票表决取多数通过原则，国际组织应能对侵略实行经济和军事制裁。但顾维钧更强调通过法律程序确定会员国承担制裁的义务，而另两个方案则寄希望于设立国际警察或国际空军。顾维钧和国民政府外交决策层的这一基本立场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民意，当时中国舆论界对新的国际组织普遍抱有相同的期望，这是从国联面对日本侵华束手无策的惨痛经历中获得的教训。[9]但有关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强在新的国际组织中的地位，这几个方案间存在着差异。顾维钧与王宠惠都主张维持战时形成的四强格局，中国应与美、英、苏三国同等参与国际组织，享有大国特权，“以重我地位”，并据此确定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策略，即减少提案、避免与其他大国冲突、重视美国意见，以确保中国的大国地位及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地位。而王世杰对此则有不同看法，认为四强不应享有过大之特权，因为中国未必能利用大国地位，而这反而会增加小国的担忧，再者英、苏享有特权也不利于中国，因此主张淡化大国的特殊地位。

8月中旬，王宠惠综合外交决策层各种意见修订了自己原先的方案，做出两条重要增补。第一条增补为“凡美国草案所未提及之各项重要问题，如一时不易获得一致意见者，我方宜相机决定提出与否及主张至如何程度，必要时宁可留待他日继续商洽，此时不必有所坚持，总以促成会议有初步成果为主”。他吸纳了顾维钧“增加我参预此次会议之贡献为上策”的意见，对与会方针取更灵活策略，更重视美国意见。第二条增补有关投票表决多数通过原则，加上了“中、美、英、苏四国所投之票，必须在赞成之列方能成立”。[10]这一增补直接采纳自顾维钧的电文，进一步强调了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特殊地位。王宠惠修订后的方案得到蒋介石的批准。8月18日，蒋介石将此方案电达在美国的孔祥熙，指示其“对照前电改正”。[11]

顾维钧的建议不但为王宠惠所吸纳，也得到蒋介石的重视。8月下旬，蒋介石指示参会的中国代表团：“一、此次会议，系初步商谈之性质，吾人希望其成功，对于若干困难问题，我方不必坚持，因在将来联合国之大会中，仍可提出解决。二、对于苏联，虽不共同会议，但仍宜设法联络。”[12]这一指示显然也采纳了顾维钧的意见。

顾维钧最初并不在中国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人选之列。蒋介石同意按开罗会议模式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后，7月13日，在美国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致电蒋介石，报告与罗斯福会晤时，罗斯福希望由其代表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并表示“总统既要弟参加，不便表示异议”，还说“原留美国及大使馆并弟此次带来各员，当可勉敷支配”，表达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强烈愿望。蒋介石收到此电后，一度考虑同意，但并没有立即予以答复。7月24日，孔祥熙再致电蒋介石，建议派外交部长宋子文来美，协同进行会议之事。[13]行政院副院长官阶在外交部长之上，孔祥熙此电再次表达了率队参会的愿望。

孔祥熙24日的电报正好与蒋介石23日发给他的电报交叉而过。在23日的电报中，蒋介石告诉孔祥熙，已决定派外交部副部长胡世泽为中国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代表，并请他在华盛顿就近指导。[14]但孔祥熙并不满足于仅负指导之责，于8月1日又致电蒋介石，以“美方将由赫尔国务卿主持”，情形与前不同为理由，提出“我方出席人员因英美出席者阶级较高，讨论问题范围亦广，恐须由弟率同魏（道明）大使、蒋（廷黻）处长、胡（世泽）次长等出席参加为宜”。蒋介石接电后批示，交王宠惠和王世杰两人研究后再做决定。[15]

王世杰对孔祥熙和胡世泽印象不佳，认为两人“均非胜任愉快之人”，与王宠惠商讨后于8月7日向蒋介石提出，不宜派孔祥熙率团参会，建议胡世泽之外加派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和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为代表。外交部长宋子文也赞同此议。[16]8月10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通知这一决定：“英、美两国皆以外次为首席代表，以地位相当而论，兄仍以就近指导为宜。兹经再四斟酌，除前派定胡世泽次长外，加派顾大使、魏大使及商团长为代表，并指定空军毛邦初、海军刘田甫、陆军朱世明为专门委员。又为表示我国重视此会议起见，拟另由国内派浦薛凤、张忠绂二人来美任专门委员，以备咨询接洽。”[17]

国民政府决定加派顾维钧为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代表，显然与他8月6日电报中所提主张及他代表中国出席国联的丰富经验有关。驻节

伦敦的顾维钧虽对这一任命出乎意料，但又认为由他来率领代表团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胡世泽和魏道明在外交界的资历都不如他。[18]但在由谁充当首席代表率领代表团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类似当年巴黎和会时代表团内部因排名问题引发纷争的一幕。

王世杰、王宠惠提出加派代表后，外交部长宋子文在向行政院提出新人选时，认为就地位而言，外交部副部长并不低于大使，胡世泽又任命在先，因此排成胡、顾、魏、商的顺序并获通过，并按此通知美、英驻华大使。而外交部在分别致电顾维钧与魏道明时，并未明确排名顺序，只是称“除执事外，另派胡次长、魏（顾）大使、商团长为代表”。这使驻美大使魏道明接到电报后认为他排名第一。作为驻在国大使，他确实也希望担任首席代表，于是就按魏、胡、顾、商的顺序通知美方。[19]

孔祥熙在收到蒋介石8月10日电报后，一方面表示“当遵钧意办理”，另一方面对自荐率团出席会议一事进行解释，称美国国务院与“一般国家外交部有别，其地位居部之上，实际言副国务卿并非次长”，且美国率团参加的副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因赫尔年高体弱，正代行国务卿之职，言下之意，由他出席才算地位相当，可见其仍未放弃率团意愿。在14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孔祥熙又提到赫尔询问其能否出席会议。蒋介石接该电后批示：“美国若由赫尔出席主持，则我国可由兄出席，俾得解决主任代表人选问题也。”[20]但15日，蒋介石决定指派顾维钧为首席代表，并于16日致电通知孔祥熙：“我方可以顾大使任首席代表，但仍请兄就近予以指导。”[21]这样，国民政府在最初任命胡世泽后三个多星期、增派顾维钧等代表后近一个星期才正式任命了首席代表。与宋子文将外交部副部长胡世泽列在首位相比，蒋介石的这一决定表明了他对顾维钧的信任和重视。

但是这一决定使已经以首席代表自居的魏道明十分尴尬。8月17日，他致电蒋介石，称此事“难免引起猜测，发生不良印象……我代表团原无两使同时出席之必要。如必须变更，为顾全对外关系起见，只有于开会前一二日，由职借病不能列会，改由顾大使出席较为适宜”。陈布雷在将该电交蒋介石时批注“此事乃系电讯往返误会而起”，请蒋亲自回复。19日，蒋介石致电魏道明进行解释：“此事全由外部电使馆时措词稍欠明确所致。政府当时先派胡次长为代表，继又派少川兄及兄与启予兄为代表，期以充实我方代表之阵容。以诸兄地位资望相等，故即以令派先后为次序。嗣为便利会议进行起见，经中酌定，就四代表中指定少

川为首席代表，已通知英美并发表新闻，并迭电庸兄接洽。此次会议关系重要，务望兄为国宣劳，一同出席，以利进行而全大局。”[22]这一因排名引起的风波经蒋介石出面调解才告平息。

人在伦敦的顾维钧对排名风波并不了解。在接获任命后，他即报告重庆：“正洽订机位，期尽速成行。”他是在8月25日抵达美国后才从胡世泽那里了解此事的，认为“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也让他马上联想起巴黎和会代表团内所经历的麻烦。[23]

二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美国发起的商讨筹建国际组织的会议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因此得名。敦巴顿橡树园是一座美丽而奢华的英国式庭园，离白宫不远，有十来分钟的车程。大门的上方刻着一句拉丁文格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很恰当地体现了会议为战后世界播种和平的良好愿望，只是参会四国的想法并不完全相同。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第一阶段于8月21日至9月28日在美、英、苏三国间进行。虽然由于苏联与美、英之间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行使范围和会员国资格问题上无法取得共识，但三国还是在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新的国际组织名称为“联合国”；联合国设四个基本机构，即大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和国际法院；大国在安全理事会中有常任席位；大会重要决议由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一般决议以简单多数决定。

顾维钧到美国时，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第一阶段已经开始。在他来之前三天，孔祥熙已向美、英代表团送交了一份《国际组织宪章中之要点》的文件，阐述中国对制定国际组织章程所持的基本观点。孔祥熙的这一做法与顾维钧“减少提案”、灵活应对的与会方针不同，与重庆的指示也不尽一致。7月29日，蒋介石给孔祥熙电报中明确指示，王宠惠方案“为我代表赴会议时讨论应付之根据”。而王宠惠方案开头就表明“暂不正式提出整个对案”。但孔祥熙与魏道明商量后认为，如果中国不在会议第一阶段美、英、苏商讨时提出自己的主张，以供三国参考，待三国决议后，其便更难采纳中方意见，因此于8月15日致电蒋介石提出，“拟将我方主张以备忘录形式先期送交大会提供参考”。因为此时已决定顾维钧任首席代表，蒋介石接电后回复道：“请与顾大使等商酌，如决定送达，请先将全文电示后再提为盼。”[24]但由于美、英、苏第一阶段会议将于8月21日开始，孔祥熙遂不待与顾维钧商量，即根据王宠惠、王世杰等国内寄达方案匆匆综合成《国际组织宪章中之要点》于8月22日送交美、英代表团。就中国参会而言，当然应向会议表明自己的立场，尤其在不能参加第一阶段会议的情况下，更应该由此让自己的意见受到关注并被考虑。但问题在于，孔祥熙先前对战后国际组织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匆忙完成的这份文件与重庆指示和顾维钧对会议所持主张不同，因此顾维钧抵达美国知道后十分惊讶。[25]对孔祥熙来说，此举实际上还

包含着为代表团定基调、显示自己是实际负责人的意味。

8月28日，顾维钧到美国后与孔祥熙见面，讨论代表团参加会议事宜，一同参加的有胡世泽和胡适等人。会议一开始，孔祥熙就表示自己对代表团的工作负有指导之责，顾维钧明白，这是要表明他才是代表团真正的团长。顾维钧最为关心的是已经交给美、英代表团的文件是否作为中国政府的正式方案，孔祥熙称只是提供给美、英代表团作为参考。顾维钧提出，代表团应该拟订一个更加灵活、留有余地的方案，并且中国的方案也应非正式送交苏联代表团一份。[26]

顾维钧担心孔祥熙递交给美、英代表团的《国际组织宪章中之要点》内容过于全面而且刻板，不利于彼此的沟通，这是基于他对美、英两国对国际组织所持看法的了解，事实证明这并非过虑。美国国务院官员亨培克（Stanley Hornbeck）就对顾维钧表示，中国的提案包含的都是“应当的条款”。他以建造大楼为例，说中国提案包括了所有现代化甚至豪华的设施，苏联则要建造一个满足安全最低要求的简单大楼，美英则处于两者之间。如果各国的计划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否决，中国的计划就会被否决。因此，在与美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首席代表、副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见面时，顾维钧对已提交的文件专门做了解释：“我方书面所提要点，系综核我政府各机关于收到美英方案前所草各案之主张，借资交换意见，并非硬性的整个对案。我方主要目的在促进会议之成功，俾早日建立和平机构之基础。”[27]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第一阶段原来计划于9月上旬结束，随即开始中国参加的第二阶段会议。但是，因为苏联坚持争端当事国有表决权，会议陷入僵局。苏联代表表示要等待国内的指示，而莫斯科却迟迟不予答复，第一阶段会议就这样拖延下来了。在此期间，顾维钧与美、英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了解第一阶段会议的进展。9月8日，顾维钧与美国代表团格鲁（Joseph Grew）见面。格鲁告诉他，第二阶段会议有望几天后开始，并问中国期望第二阶段会议开几天，能否在三四天内结束，顾维钧回答，第二阶段会议不会比第一阶段会议长，中国的态度是尽早结束讨论，成立新的国际组织。[28]但几天后，美国代表团告知中国代表团，由于苏联代表团还没有收到莫斯科的指示，第一阶段会议无法结束，中国参会的时间只得再往后推。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已在华盛顿等候多日，而美、英、苏三国的代表却在敦巴顿橡树园内一拖再拖，顾维钧叹道：“这对中国代表团的忍耐力是个考验。”他认为，与将中国列为

四强之一的莫斯科宣言相比，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在这方面几乎倒退了一步”，“很显然，中国只能面对既成事实——第二阶段会议只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29]

几经推迟后，中、美、英第二阶段会议终于在9月29日开幕了。但会议正式的讨论应顾维钧的要求于10月2日开始，他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代表团希望有足够的时间研究第一阶段达成的协议。[30]

顾维钧此举是为了统一代表团内部的意见。此时，对第一阶段会议已达成的草案取何态度，在中国代表团内出现了意见分歧。驻美大使魏道明、代表团空军专门委员毛邦初等认为，三国草案与中国的实际要求相差甚远，中国应该提出自己对国际组织的所有建议，与美、英两国进行从容不迫的讨论，不论美、英或者苏联的代表有无可能接受；中国要表现出愿意为会议做出充分的贡献，不能让第二阶段会议草草了事。但顾维钧认为，这一立场是不切实际的，根据“现时之国际情势，与我国之地位，我方对于该建议书（即三国草案），似不宜坚持修改，或拒绝同意”，因为一方面三国草案“需要补充之处固多，但其业已列入者，对于我国之权益，似尚无不利之点”；另一方面，美英两国参加第二阶段会议，主要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声望”，而不是听取重要意见，所以，为了装点门面而延长会期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顾维钧主张，“中国代表团应该做出适当的妥协”。最终，顾维钧的意见占据了上风，代表团决定取现实的态度：“我方主要目的在促成此次会议之成功，使四国能提出一国际和平安全机构方案。再此次会议，原系初步商谈性质，一切现时不能解决之问题，仍可留待将来联合国全体会议中提出讨论，是以我方对于各项问题，可不必坚持，并可借以表示我国爱好和平及与各友邦合作之精神。但对于和平安全机构之重要意见，我方仍应提出并详为说明，一则可使世人明了中国之正义立场，二则又作为将来在大会中或将再行提出之张本。”同时，“我国现时处于四强之一之地位必须维持”。代表团决定，在第二阶段会议期间以补充意见的方式向美英表明中国的看法。[31]

10月2日，第二阶段会议举行首席代表会议，中国代表顾维钧、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和英国代表吉布（Gladwyn Jebb）均出席，中国方面出席的还有胡世泽和代表团秘书长刘锴。这次会议旨在向中国方面具体说明第一阶段会议的未决问题，特别是美英与苏联在安全理事会投票问题上的分歧。顾维钧在听了说明后表示，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国际组织的根基。随后，顾维钧提

出，他希望在全体会议上做一次发言，陈述中国的主张和立场，就美英苏草案提出中国代表团的补充意见。会议商定，全体会议在次日举行。[32]

10月3日上午，顾维钧代表中国提出补充意见七点并做说明：（1）维持和平与安全必须根据正义与国际公法之原则，以免新的国际组织沦为强权政治的工具；（2）保障各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以增加各国特别是小国的安全感；（3）对侵略应予定义，并尽量列举侵略的各种行为；（4）组织国际空军，以作为安全理事会权威的象征和采取行动的手段；（5）国际公法的方针与修订应由大会倡导，以有利于推进符合国际公法原则的安全；（6）国际法庭应能强制裁判；（7）应促进教育和文化合作。[33]中国代表团的补充意见改变了孔祥熙提交方案中面面俱到的做法，就几个重要问题表达了中国的主张。七点补充意见并非全是顾维钧的个人主张，而是综合了其他方案，如第三、四、七点即出自王宠惠和王世杰的方案，但整个补充意见带有顾维钧本人的鲜明印记，即特别强调国际公法。

对中国提出的七点补充意见，美国和英国代表团并不完全赞同，三国就分歧之处展开了讨论。对于第一点，英国最初认为国际法是不明确的，当出现争端时，国际法只会引起争论。经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美国表示支持中国的立场，英国才同意列入《联合国宪章》。对于第二点，美英方面坚持第一阶段草案中“主权平等”字样已包含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含义，因此不必列入，最后中方不再坚持此点。对于第三点，美英方面均反对给侵略下定义，因为一方面难于对侵略下令人满意的定义，另一方面原草案已说明将制止侵略，于是顾维钧表示对此问题可做进一步考虑，实际上予以搁置。对于第四点，美英明确表示根据实际情况无法予以同意。对于第五点，美英接受中国的要求，同意联合国大会应负责提倡研究国际公法。对于第六点，美英原则上同意，但又称：“此问题复杂，可由修订法庭法规之专家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于第七点，美英同意“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应特别设法促进教育以及其他国际文化合作。[34]讨论结果，美英接受了中国补充意见中的第一、五、七点，对第六点表示原则接受，第三点留待以后讨论，而对第二、四点则予以拒绝。

在讨论中国补充意见的同时，美英方面提出希望尽快结束第二阶段会议，于10月9日同时在四国首都公布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文件。美英代表强调，美英苏“三国草案经长时期之讨论磋商始得成立”，而对中国“前

提出之要点，亦经特为注意加入”，因此希望中国政府能予以同意。[35]这样，在补充意见未被全部接受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面临是否同意并完全接受第一阶段会议结果的抉择。面对代表团内存在的不同意见，顾维钧坚持与会的基本方针，认为促成会议的成功和维持中国的四强地位是首要之事。10月2日，他致电重庆当局，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顾维钧认为，美英苏三国草案“整个目的期在以实力保障国际之公安，注重实际之效率，不尚理论之空谈，欲矫国联盟约规定空疏之病，故凡与此目的无直接之原则，概不阑入”；该草案对中国主张之主要问题如制裁侵略等均已采纳，虽有数点未被列入，原因在于“其出发点之不同，故特从略”，但“草案全部对我国家权益似无不利之处”，且美英苏三国已定下发表日期，如变更日期须与苏联商量，“夜长梦多，稽迟时日”。据此，顾维钧对中国在会议中所处的实际地位做了分析，并对应取的相应对策提出自己的看法：

> 钧等察英美首席代表语意，此次会议英美邀我参加，乃系形式之举，与莫斯科会议三强发表宣言请我署名于后同一意义。形势如此，倘我对其草案坚持修改，不予同意，则三国政府同时将其发表，我独向隅，不特四强团结之精神不克保持，我国国际地位亦有影响。钧等思维再四，惟有在开会期间仍将我国立场及主张提出讨论予以阐明外，敢请从速授权，对此事相机办理，至本周最后必要时对草案表示我国政府之同意，一面仍请迅速准备届时公布手续，使四国同时发表之议可成事实。[36]

这份电报显示出顾维钧对中国在四大国所处的实际地位有准确和清醒的认识，但同时又力图确保这一名实尚有差距的大国地位。顾维钧的建议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10月6日，外交部长宋子文复电：“准予授权，相机办理。”[37]

这时，在如何公布会议结果的问题上，中、美、英三方之间出现了分歧。最初，顾维钧与斯退丁纽斯商定，会议结束时同时发表两个公报，分别公布两个阶段会议的结果，并在第二个公报中写入被接受的中国三点补充意见。但英国方面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第二阶段会议结果如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容易引起误会，以为苏联对此拒绝；而与苏方接洽获其同意又耗费时日，因此提出只以四国名义公布美、英、苏三国草案。对中国来说，英国提议不及中美已商定之办法，但顾维钧予

以理解并接受，认为此举至少可以向世界表示四强意见一致，视草案为四国共同建议。[38]

但当公报草案送交中国代表团时，又出现棘手问题。苏联起草的公报草案只提三国政府达成协议，故意不将中国与三国相提并论，排除在大国之外。英国起草的公报草案虽然提到四国，将中国包括在内，但由于此时会议已到最后关头，英国又趋向于与苏联达成妥协，接受苏联的公报草案。事关中国的国际地位，顾维钧表示中国不能让步。僵持不下之际，顾维钧展现出超群的外交智慧，提出在公报中完全删除相关段落，这样就不会涉及三国或四国的问题。各方代表最终接受了顾维钧的建议。[39]第二阶段会议于10月7日结束，10月9日公报如期在四国同时发表。

作为首席代表，顾维钧对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与代表团内有些人坚持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进行从容不迫讨论的主张不同，顾维钧根据中国在四强中所处的地位和会议进行的实际情况，力主采取现实、灵活的应对，不拘泥于某些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获得会议成功为首要目标。这一务实的主张获得国民政府最高层的支持，成为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基本方针。

顾维钧以会议成功为首要目标，最主要的考虑是要确保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中国虽是莫斯科宣言的四个签字国之一，但由于苏联和英国对自己的轻蔑，会议期间又恰因史迪威事件同美国关系紧张，加之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四强之一的地位是十分脆弱的，在会议上也处于不利的境地。正如魏道明在代表团会议中所说，中国是“居大国地位，内心有小国忧虑”。[40]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是否应该并能够成为一个大国，是此时中国对外政策中一个具有全局性的问题。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就主张，中国不必强求大国地位，因为中国无法像美、英、苏那样真正享有大国特权。这一主张承认并接受中国与美、英、苏三国间存在差距的现实。顾维钧虽也承认这一现实，却在此基础上采取积极进取的应对，为中国参会定下“我国现时处于四强之一之地位必须维持”的基调，将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作为对外交涉的主要目标，并以灵活的策略和应对保证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大国地位。当然，由于中国本身的国力，这一大国地位是打了折扣的。

与美、英、苏三国相比，中国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但顾维钧务实灵活的应对，使中国最大可能地对会议和此后的联

合国的成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提出的补充意见，经讨论后被采纳三点，日后都写入《联合国宪章》，达到了“增加我参预此次会议之贡献”的目的。

会议公报发表当日，孔祥熙向蒋介石报告会议结果，称“国际间对我观感颇佳”，因为中国代表团“本正义立场，态度正大，根据政府指示，应付得法”。孔祥熙这些话并不全是自诩，美国国务院亨培克有相同的评价。他告诉胡适，美国代表团对顾维钧和中国代表团巧妙而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深感钦佩。[41]

三 多党多派的中国代表团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后，美、英、苏三国首脑在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上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行使范围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根据苏联的建议达成共识：有关需采取经济、政治或军事制裁解决的争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即使是当事国也有权投票；而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的争端，争端当事国不参加投票。三国首脑还商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请柬由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及法国临时政府发出。[42]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中国的大国地位由此得到确认。

2月上旬，宋子文给顾维钧发来电报，请他在英国了解雅尔塔会议的情况后立即回国。顾维钧明白，这是要让他为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做准备工作了。3月1日，顾维钧回到重庆，发现首先面临的是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

参加旧金山会议是一个外交问题，讨论的是《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但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却与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2月12日，雅尔塔会议公报发表后，此前已经提出联合政府主张的中国共产党决定抓住这一机会，向反对联合政府的国民党提出中共要参加旧金山会议。2月18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要求派代表参加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当天，周恩来致电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提出中共的要求：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国民党的代表只应占代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中共代表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应占三分之二。国民党代表中还应包括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如此方能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愿”，并要赫尔利将此意见转达罗斯福总统。[43]2月24日，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向国民党的谈判代表王世杰提出，请考虑由中共派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但王世杰以中共已拒绝参加国民党提出的“战时内阁”为由，表示“不知如何能使中共参加对外会议”，拒绝接受中共提议。[44]3月7日，在收到王若飞关于蒋介石有可能指派中共方面人员参加旧金山会议的电报后，毛泽东批示应“提出我方出席人选，免蒋随意委派”。周恩来据此起草致王世杰信函，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国民党一手垄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不但不公平，不合理，而且表示了分裂的立场。”并提出中共将由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

参加代表团，“如不采纳，将对国民党代表团在国际会议的一切言行保留发言权”。信函经毛泽东修改后于9日发出。[45]

蒋介石反对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同样坚决反对中共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认为“此次国际会议乃为各国政府会议而非各国之党派会议，如果中共参加此会议，则各国自置其于何地”。因为中国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已经定局，蒋介石态度十分强硬：“如我政府不参加，则此会其能有效乎？”[46]

顾维钧虽多年远离国内政治，但主张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必须能真正代表全中国，因为当时美、英两国舆论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已有批评，包含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表团可以扭转国际上对中国国内政治不统一的看法，增强中国在会议上的地位。政争止于国内，这是外交与内政发生矛盾时顾维钧的一贯主张。但回到重庆，他发现国民党内的普遍看法是不能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参加代表团。他的一些亲近的朋友发现他有这样的想法，都劝他不要向蒋介石提起，以免自找麻烦。但他坚持认为，一个多党多派的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47]

3月6日晚上，顾维钧与蒋介石见面，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认为代表团应有广泛的基础，包含具有各种政治主张的代表，以便向世界昭示，代表团是真正的全国性代表团，并主张代表团应有一名妇女代表。但蒋介石对顾维钧的提议不以为然，认为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没有什么其他党派，代表团人数不要太多，只要有三五人就足够了。不过他对包括几个无党派代表人物也表示了兴趣。[48]一个三五人的小型代表团并不是蒋介石的个人想法，而是国民党高层的共识。2月22日，蒋介石召王世杰商谈中国代表团事，王世杰就提出“代表名额三名似已足”。顾维钧将他与蒋介石的谈话通报宋子文时，宋子文也说“他宁可要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小型代表团”，也就是他本人、王宠惠和顾维钧。[49]

但顾维钧的提议还是对蒋介石产生了影响。与顾维钧谈话次日，蒋介石改变了主意，拟定了一份代表团名单，不是三五个人，而是九个人：宋子文、王宠惠、顾维钧、魏道明、王世杰、张君劢、王云五、胡霖、胡适。[50]其中最后三人王云五、胡霖、胡适都是无党派代表，张君劢则是民主社会党领袖。

但这份代表团名单中仍无共产党人。3月中旬，宋庆龄约顾维钧见面，提出中国共产党希望在代表团中占有两个名额。同时，苏联方面也对国民党施加压力。3月15日，苏联驻华大使约见蒋经国，以“恫吓”的口吻要求国民党指派中共代表参加代表团。但蒋介石仍坚持原有立场，不肯做出让步。对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说项，蒋介石称此“乃为十五年来第一次”，因为此前她“从不愿与我谈政治”和中共问题。对苏联出面，蒋介石认为这表明中共“已经山穷水尽”。因此，他打定主意，“仍置之不理，视若无睹，彼将于我奈何也”。[51]

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不接受建议，不愿在代表团中容纳共产党人，顾维钧颇感失望，但事涉国民党的基本政策，他也无能为力。事情最终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介入而出现了顾维钧所期望的结局。3月22日，重庆收到落款日期为3月15日的罗斯福致蒋介石电报，称：“余愿使阁下知悉，如阁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治结合或政党在内，余预料不致有何不利情形，实则此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若能容纳此类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而阁下对于统一中国之努力，势将因阁下此种民治主义之表示，而获得实际援助。”罗斯福还有意指出，“美国两大政党之代表，在美国政府代表团内均有其地位”，其他国家如加拿大也都采取相同举措。[52]

罗斯福电报到达重庆时，蒋介石正在昆明。宋子文给顾维钧看了电报抄件，说这纯属官样文章，甚至怀疑罗斯福是否真正重视这份电报。但顾维钧持不同看法，认为尽管罗斯福在电报中将代表团问题说得轻描淡写，语气谨慎，充满外交辞令，但确实希望代表团中有共产党的代表。因为次日顾维钧将经昆明赴美国，宋子文请其将这份电报面交蒋介石，并讨论代表团的组成。[53]

3月23日上午，顾维钧抵达昆明后，立即乘坐蒋介石派来的汽车去他住处。蒋介石看了罗斯福的电报后，“起初似乎颇感兴趣，继而显得心烦意乱”，强调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共产党代表参团只会增添麻烦，并问顾维钧罗斯福提出这一建议意图何在？顾维钧解释说，这与中国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有关，因为在各大国中，中国最易受别国攻击，而罗斯福支持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可能对中国在大会上的地位有些担心，因此希望看到中国代表团显得越强有力越好。虽然知道蒋介石对接纳共产党人持反对意见，顾维钧仍向他建议，对罗斯福的电报应留有余地，不要把大门关死。蒋介石当然听出了顾维钧的弦外之

音，但谈话结束时仍坚持不让共产党人进代表团。[54]

当天下午，蒋介石再读罗斯福电报，感觉“其措辞委婉，余意渐转矣”。王世杰也在当日致电蒋介石，报告在与宋子文商量后，建议在中共所提三人中派秦邦宪一人，无论秦是否愿去，可显示“宽大”，罗斯福也“不能有何闲言”。反复权衡后，蒋介石决定“用逆来顺受之法”，“派中共一人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以政治方法全在现实”。但这一决定使他“忍痛极矣”。[55]3月25日，蒋介石提前结束云南行程返回重庆，连夜与宋子文商量代表团人选事。26日早晨又约王世杰商谈，决定中共代表指派董必武。随后，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十人名单。[56]当天，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对他15日电报所提建议表示感谢，并告知中国已派定十名代表，“其中六人为国民参政员，即国民党以外之共产党及其他两反对党各一人，暨无党派者三”。[57]

3月27日，国民政府发表代表团名单，成员为：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驻英大使顾维钧、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王宠惠、驻美大使魏道明、前驻美大使胡适、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吴贻芳、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李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君劢、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董必武、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胡霖。[58]其中，董必武作为共产党代表，李璜和张君劢分别是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领袖，胡适、吴贻芳和胡霖是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代表团的。顾维钧向国民党高层推荐过董必武，在任驻法大使期间他与董必武有过一面之缘，讨论过中国的对外关系。

中国代表团由宋子文任首席代表，但在两个月的会议期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与美国洽商财政及其他外交事务，有关会议事宜诸如向大会的提案、代表团的内部事务等问题，皆交给顾维钧，让他全权处理。顾维钧最初推托让王宠惠出面负责，因为他的年龄和资历都更资深，但宋子文认为顾维钧对国际事务更有经验，这样后者就成为代表团事实上的首席代表。对顾维钧来说，出席国际会议驾轻就熟。他自己也认为，要准备有关新的国际机构的提案，他比其他代表更为合适。

中国代表团由各派政治力量的成员组成，为使大家能够一起工作，顾维钧于4月初抵达美国后，首先拟定了代表团的工作原则。这些工作原则是：（1）每位代表都应该有事做，以增强责任感，不致因无所事事而专挑别人的毛病，这是他以前参加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得到的经验；（2）所有代表不论政治背景如何，享有同等权利，比如每位代表都会获得会议的全部文件，都有一套同样的房间；（3）重大问题须由

全体代表集体商议做出决定；（4）各位代表可自由接见记者，但谈话不许涉及中国内政，国内政治问题应在国内谈，而不该在国际会议上谈，因为代表们代表的是全中国，而不是某一个政党，“无论如何，家丑不要外扬”。代表团还为此制定了接待记者的规则。顾维钧提出的这些原则得到全体代表的赞同，奠定了相互间合作共事的基础。[59]

为使各位代表都有事可做，顾维钧细致地规定了代表团的具体分工。旧金山会议的最高机构是由各国代表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以及由部分国家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下设4个委员会，4个委员会下还有12个专门委员会。出席指导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都是首席代表，中国代表团在宋子文缺席时由顾维钧出席。负责宪章总则的第一委员会由王宠惠和代表团顾问徐谟出席，负责联合国大会的第二委员会由顾维钧与外交部副部长胡世泽出席，负责安理会的第三委员会由顾维钧与胡适出席，负责国际司法组织的第四委员会由王宠惠和魏道明出席。其余代表也都参加了各个专门委员会，如董必武参加的是第二委员会下的大会机构与程序专门委员会，吴贻芳参加的是该委员会下的经济与社会合作专门委员会。[60]

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英国、苏联代表团抵达旧金山后都举办了记者招待会，顾维钧提出中国代表团也应举行记者招待会，全体代表都应出席，以向国际社会展示代表团团结统一的形象。但王宠惠、魏道明反对这一主意，生怕各国记者会提出难以应付的问题，而胡适、吴贻芳、李璜等赞同这一主张，虽然他们中有些人不希望自己来回答记者的提问。最终代表团采纳了顾维钧的建议，于5月1日在旧金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全体代表都坐上了主席台，一共有600多名外国记者到场。国共问题自然成为各国记者关注的重点。有记者要求主持招待会的宋子文向大家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让他们“看看他究竟是否看上去危险”。此时，宋子文亲切地称董必武为“我的朋友”，并强调“我们已共事20余年”，而董必武也彬彬有礼地起身向记者鞠躬致意，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整个记者招待会气氛轻松，代表团成员表现自然，给记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顾维钧称宋子文在会议期间并不是一味维护国民党，总是用开阔的眼界来看问题。[61]

代表团中有6人是非国民党党员，因为力主团结，顾维钧与他们有许多沟通，实际上成了这些人的联络官。他与董必武有频繁的往来。董必武到美国的当天就来拜访顾维钧，顾维钧也对他做了回访。会议期

间，凡有建议或问题，董必武都会来找顾维钧商量，但遵循团内的规则，从来不提及国内政治。顾维钧对他有很好的印象，在日记中写道，“董是一个上了年岁读过古书的人，为人和蔼可亲，但颇机敏”。他对董必武的秘书章汉夫也有很好的评价：“他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杰出人物，为人善良而谦虚，不引人注意但很能干。”[62]不过，顾维钧不知道的是，代表团中非国民党代表的行踪都有随团的国民党人盯着，并向重庆最高层秘密报告。如代表团专员郑震宇就向侍从室秘书报告张君劢、李璜和董必武的情况，称他们“到目前为止态度尚佳”。[63]

这样一个规模的代表团难免会产生矛盾，此时顾维钧的作用就非常关键。4月下旬，宋子文将他请外国顾问起草的准备在开幕式上的演讲稿交各位代表传阅，王宠惠等认为稿子中对国联失败攻击太狠，“辞不得体”，“徒然刺激”支持国联的国家，要求修改，并对如此重要的演讲稿只给各代表三小时考虑时间表示不满。宋子文做事习惯自己决断，交代表传阅只是一个形式，并不准备改动讲稿，还厉声斥责主张修改的外交部副部长胡世泽。王宠惠对宋的态度十分愤慨，而其他代表则“默然”不作声。顾维钧知道后，立即去找宋子文，劝他接受建议修改讲稿，删去不必要的段落。宋子文对此很不高兴，表示对所讲内容负责，但在顾维钧反复劝说下，最终还是对讲稿做了修改，将其他代表的意见容纳进去。[64]这场可能引发代表团内部矛盾的风波，因为顾维钧出面而平稳解决了。

旧金山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内部基本上做到了团结合作，以举国一致的形象达到了在大会上增强中国地位的目标。这与巴黎和会时代表团内部矛盾重重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顾维钧起了主要作用，做出了很大贡献。

四 宪章签字第一人

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在给蒋介石提交建议方案后才入选代表团不同，旧金山会议从一开始顾维钧就参与了筹备和政策制定。从伦敦回重庆时，顾维钧带回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相关资料。回到重庆后，3月14日，外交部副部长吴国桢将该部草拟的出席旧金山会议方案送交顾维钧，请其审评。3月27日，宋子文将最后定稿的方案送呈蒋介石。3月31日，蒋介石审核完毕。[65]

外交部拟定出席旧金山会议的方案共七点，分别为（1）国际法院规程应行注意之要点，主张在此问题上，中国“对外可暂勿作硬性主张，并与英美协商，在可能范围内，与苏联采取一致态度，避免不必要之摩擦”。（2）设立领土代管制度之原则，“代管领土之目的在于改善被代管领土之人民经济教育状况，促进其社会福利，并扶助其完成自治或独立”。（3）对于区域组织问题之意见，认为“区域组织流弊甚多，且易为大国所把持”，而“太平洋区域组织对中国远不若对英国有利”，因此应在草拟《联合国宪章》时，将其权力“尽量设法缩减”。（4）中国所提已经英美接受之三项建议编入宪章问题，主张将其编入宪章。（5）对于中国所提而未经英美接受各项建议之态度，认为这些建议既然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未被英美接受，而此次中国为召集国之一，“似不便再行提出”。（6）各国对敦巴顿橡树园议案之意见与中国应取之态度。针对不少国家减少理事会职权扩大大会权力的呼声，主张凡已经规定者，中国不便提出异议，但未经规定者，“我国可酌量赞成增加大会职权”；针对一些国家关于常任理事国为当事国时不应投票的主张，提出中国应表明已同意雅尔塔会议的相关决定，“未便再作主张，惟对于常任理事为争议国时仍得投票一点，不必为之辩护”。（7）解散国际联盟之步骤。[66]

这个方案的重点在前三点，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之前的几个方案中已有涉及，并曾列入向美、英提出的《国际组织宪章中之要点》，只是由于美、英方面的原因，像领土代管制度和区域组织这些问题在敦巴顿会议中并未展开，而此方案与之前相比其基本立场并无多大变化。该方案的第四、第五点是对中国在敦巴顿会议所提补充意见的处理方针，第六点是围绕各国对敦巴顿草案反应的具体应对，第七点是关于国联的善后，这几点都是较为具体的策略方针。因此，总体而

言，外交部为旧金山会议准备的这个方案与顾维钧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应对是一脉相承的。外交部的方案延续了对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关注。在美苏两国在大战中形成的合作已出现裂痕之时，提出“与英、美协商，在可能范围内，与苏联采取一致态度，避免不必要之摩擦”。虽力图在三大国间保持平衡，但基点是向美国靠拢。这也是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基本态度：“美方有何主张，中国必然赞同。”[67]由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框架在敦巴顿会议已经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也因出席敦巴顿会议及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而得到保证，外交部方案的重点转移到了国际法院、领土代管制度和区域组织这些与中国本身利益相对不那么直接的问题上，更多地表达了中国对联合国组织本身的关注。

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前有多个方案不同，这次只有外交部一个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外交决策层中没有不同看法。离开重庆前，顾维钧专门去拜访王世杰，与他讨论旧金山会议。在顾维钧看来，王世杰是高层中对国际组织研究得最多的人。王世杰对外交部没有仔细考虑就接受雅尔塔会议有关安理会投票方式提出批评，对方案中没有包含国际空军的内容也表示不满。这都与顾维钧的看法不同，尤其关于安理会投票方式，因为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关。顾维钧将此看作中国的首要目标。但王世杰却认为，中国宁可不要参与大国的行列，因为这样反而可以畅所欲言，在二等强国中当一个代言人，地位倒是很硬的。[68]

顾维钧于4月上旬抵达美国，先到华盛顿，与驻美大使魏道明和王宠惠一起商讨中国参会事宜。在顾维钧到达前三天，美国为使旧金山会议顺利进行，由国务卿斯退丁纽斯邀约英、苏、中三国驻美大使讨论会议程序问题。美国提出，会议应设主席一人，由美国人担任，另设副主席三人，由英、苏、中三国人分任。但苏联主张设主席四人，由四个发起国轮流主持会议，以体现平等原则。英国在美苏间调和，表示可接受四个主席轮流主持公开会议，但美国国务卿应是会议指导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主持重要的工作会议。但苏联坚持不接受任何其他方案。顾维钧与王宠惠一到华盛顿，魏道明就将此问题提出讨论。顾维钧表示，中国当然应该支持美国方案，但如果美、英对苏采取妥协，我们也不反对美国代表缺席时由其他三国轮流主席。魏道明和王宠惠对此都表赞同。但对于苏联取何态度，意见并不完全一致。魏道明认为无须过多考虑苏联提案，顾维钧则稍有不同，认为不要生硬地反对苏联提案，不必在会上冒犯苏联。最后，以顾维钧意见为主向重庆发电请示，电文中有“避免有不赞成苏方提议之嫌”之句。[69]

重庆接到代表团电报后，蒋介石立即给予指示：“关于联合国大会主席事，我方可赞助英大使提议由美代表担任，但应事前向苏表示，依照国际惯例，国际会议主席多推由地主国担任，故我赞成美方担任。”当日稍后，中国代表团又接到蒋介石第二个电报指示，嘱顾维钧不用特意向苏联去做解释，只要便中说明就可。[70]此后，在四国讨论中，中国代表团均表示支持美国立场。有关会议主席的争执一直延续到大会正式开幕后，才在全体会议中以表决方式通过英国方案。[71]

旧金山会议于1945年4月25日正式开幕。与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只提出有限的补充意见不同，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对联合国及其宪章进一步表明中国的看法，提出新的提案。根据四大国商定，所有提案在提交大会或各委员会前，必须先经四大国审查批准。5月初，中国代表团向四国审查修正案小组会提出对《联合国宪章》草案的三项新的修正案，即：（1）国际间如有危害和平事件发生，安全理事会应有权采取临时办法；（2）国际法院之判决，争执中一方不能遵从时，安全理事会在另一方申请下，可采取它认为必要的措施使裁决生效；（3）当非会员国为国际争议之一造，或当非会员国将争议事件送交大会或安全理事会时，此等非会员国在国际组织中之地位及安全理事会对此等非会员国之权力，在宪章中应有说明。[72]这三项修正案是汲取国际联盟在侵略发生后不能迅速做出反应或无法采取有效行动的教训，针对《联合国宪章》草案中相应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中国的看法。顾维钧与宋子文一同参加了四国小组会。讨论中国修正案时，对第一项，英、苏赞成，美国最初称须稍加研究，但最终还是认为这一修正案基于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束手无策的教训，填补了安全理事会执行程序中的一个空白。对第二项，美国表示反对，认为这涉及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主权国家的司法权等复杂问题，由于美国坚持己见，中国表示保留自己的立场。对第三项，苏联起初稍有疑问，但后来也予以赞同。这样，中国三项修正案中两项被四国小组会接受而提交大会并最终被写入宪章。[73]

在5月3日四国小组会讨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时，英国重提它在敦巴顿会议上提出而被否决的提议，即非常任理事国应根据对安全贡献之大小来确定，意在增加中等国家主要是英联邦国家入选的机会。顾维钧当即以口头修正案的形式，建议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应考虑地域平等分配的原则，实际上就是给欧美以外的小国、弱国更多更公平的机会。这延续了顾维钧在国际联盟初创时提出的“分洲主义”主张。最后，中国提案与英国提案同时作为四个发起国的修正案向大会提出，而

中国的提案最终获得大会通过被写入《联合国宪章》。[74]

根据蒋介石4月9日给代表团的指示，在旧金山会议期间美苏发生矛盾或冲突时，中国代表团应站在美国一边，而不必太顾及苏联的反应。顾维钧虽将与美国合作并支持美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基本原则，但对苏联的态度并不像蒋介石指示的那样毫不顾及。他认为由于苏联对自己的主张持强硬立场，美、英两国“颇感烦恼”，“会议进行难望一帆风顺”。中国夹在中间，地位比较微妙，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考虑，不必刻意冒犯和惹恼苏联人。[75]因此，会议期间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实际主持人，顾维钧对美苏冲突虽偏向美国，但并不放弃在两国间居中调停的机会。4月底，大会刚开幕不久，指导委员会下属的分配小组开会，决定各专门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参加分配小组的苏联代表是驻美大使葛罗米柯（Andrei Gromiko），他坚持为乌克兰争取一个专门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提出应该担任第三委员会下的强制行动专门委员会主席。美国已考虑将这个职位给南美国家，因此予以反对，提出可以给其他专门委员会主席职位，但提议遭到苏联代表的拒绝。小组会议无果而散。会后，葛罗米柯主动约顾维钧交谈，表示可由中国出面提出适当办法，如美国能同意，苏联也可同意。显然，葛罗米柯认为顾维钧可以在美苏两国间进行斡旋。苏联方面松口后，顾维钧提出新的方案与美国代表沟通，最后促成双方在此问题取得一致，解决了两国僵持不下的难题。[76]

虽持总体上支持美国的立场，但在涉及《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讨论中，顾维钧并不完全迁就美国的意见，而是尽可能表达中国的主张。这在有关托管制度的讨论中表现最为突出，这也是旧金山会议中各国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托管制度，也称领土代管制度，是美国最初提出的概念，即在国际组织监督下由受托国对殖民地进行管理，意在取代殖民地制度。但这一主张遭到最大殖民帝国英国的强烈反对。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言，他对美国关于托管制度报告的每一个字都不同意，只要他当首相一天，就绝不让出英帝国遗产的任何部分。[77]而美国对托管制度的看法在大战后期发生变化，认为太平洋地区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必须在美国控制之下，因此主张将太平洋地区列为所谓的战略地区另类处理。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英、苏三国就托管制度达成谅解，托管领土仅适用于：（1）国联的现有委任统治地；（2）此次战争中割自敌国之领土；（3）自愿要求置于托管制度下之领土。[78]这一谅解意味着托管制度将不涉及英国的已有殖民地，是美国对英国的一大让步。中国对托管制度有自己的主张。在为敦巴顿会议准备的几个方案中，军事委员会

参事室的新国联约章草案和外交部方案都提到对托管地（或称国际治理地）的管理，而王宠惠方案则从中国与会主要目标出发，提出该问题“似不必由我方先行提出”。[79]外交部为出席旧金山会议拟定的方案中第二点也是关于托管制度的。该方案主旨为，托管制度的目的是“改善被代管领土之人民之经济教育状况，促进社会福利”，尤其是要“扶助其完成自治或独立”；被代管领土若“政治发展已届成熟者”，应“将其独立之日期及早公布”，“其政治发展尚未成熟者，应逐渐予土人以参加当地议会之权，使其能早日获得自治及独立”。[80]与三大国在雅尔塔会议达成的谅解相比，中国的主张最明显的特点是以殖民地独立为托管制度的最终目标，符合托管制度提出时的本来意义。

旧金山会议期间，美国提出的结合托管制度建立战略地区的提案遭到一些与会国家特别是小国的反对。中国代表团认为，建立战略地区的设想与以往国联委任统治制度一样，而有违于托管制度的基本目标。虽然中国代表团因与会方针未便直接反对美国的提案，但提议在《联合国宪章》有关托管制度的章节中，对托管地的未来前途，须在自治之外加上独立的字样。5月17日，专门委员会讨论托管制度时，美、英及法国、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均反对中国的提案，反倒苏联代表表示赞同。美国代表的发言措辞十分专断，称中国的建议没有说服力，“应予否决”。顾维钧代表中国四次起立发言，“态度异常坚决”，“会场空气异常紧张，形成中国与英美尖锐之对立”。[81]专门委员会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只能休会进行会外协商。美国代表为此专门拜访顾维钧，表示只要中国与美、英等国意见一致，可以在托管理事会中给中国一个永久性席位。顾维钧答道，中国在此问题上并无特殊利益，也无意为自己谋求特殊好处，只是希望将民族独立这一点包括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82]由于中国的坚持，“独立”两字最终被列入《联合国宪章》第十二章阐述托管制度目的的条文中。中国还在五国（四国加上法国）协商时提出，一旦托管安排遭到侵犯，应提交联合国大会或安全理事会以采取行动。但由于其他四国都不同意，而未被送交会议讨论。[83]

顾维钧在专门委员会上与美、英观点对立的发言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代表团专门委员毛邦初向蒋介石报告此事，并对顾维钧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美、英在此问题上立场强硬，中国为获得被压迫民族同情，只要在会上“略作表示”就可以了，“无力争之必要”。[84]在顾维钧的外交活动中，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尤其是在旧金山会议这样重要的国际场合，是十分罕见的。这实际上涉及顾维钧对会议的定位。参加敦巴顿橡

树园会议时，顾维钧将确保中国的四强地位作为首要目标，因此与美、英商讨中多有妥协。但旧金山会议中国作为发起国之一，大国地位已经确定，顾维钧不用像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那样心有顾忌，可以放开表达中国的立场了。托管地的最终独立是外交部方案确定的原则，得到了最高层的同意，顾维钧本人也持此主张，因此会“态度异常坚决”。“独立”两字被写入《联合国宪章》，正是顾维钧所期望的以公理争强权的结果。

由于在讨论托管制度时与美、英发生正面冲突，会议第二天讨论侵略定义时，顾维钧调整应对，改变原来赞同对侵略定义的主张，而不发言，附和美、英立场。这就回到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时的立场，当时中国代表团补充意见第三条提出对侵略要定义，因为美、英的反对而搁置。毛邦初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对顾维钧此举也有批评，认为与托管制度的表态相比，是“本末倒置”。

随着会议的进展，《联合国宪章》接近拟定完成。5月19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请示签字事：“关于国际组织公约之签订，美英两国均将由全体代表共同签字。此次我国各代表皆能诚切合作，步调一致，如能采取同样办法，当更可增加对外良好观感。倘蒙核准，乞饬外交部电给代表全权签字证书。”5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与外交部代理部长吴国桢一起致电宋子文等全体代表，授以全权签署《联合国宪章》。[85]随后，代表团会议讨论决定，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时中文本签中文，洋文本签洋文，后加一括号，内签中文。中国代表在会议闭幕时用国语致辞。[86]

旧金山会议历时两月，6月25日，全体大会通过《联合国宪章》。第二天正午12点，大会举行宪章签字仪式。首先由发起国签字，中国在发起国中按英文字母列于首位，代替宋子文出任首席代表的顾维钧因此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用毛笔签署下自己的中文名字，随后中国其他代表一一签字。签字结束后，发起国代表相继致辞，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

> 今天是我们全体联合国极其重要的一天。吾现在代表中华民国签字于新安全组织之大宪章时，心里发生无穷的感想。我们一生已两次遭遇了世界上侵略势力所造成的大流血大破坏。此次战争中国是第一个被侵略的国家。今日联合国能在隆情厚谊的美国旧金山制定奠立世界和平基础之大宪章，实觉无限愉快。现在欧洲胜利既已完成，对日最后胜利不久亦可取得，余

个人深信并深望这世界安全组织，一本各国始终不断的合作精神，能使我们的子孙不致重遭战争的苦痛，而得享受和平与幸福。[87]

发起国代表致辞后，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将顾维钧介绍给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称赞他在会议形势微妙、需要圆通处理时，帮了大忙。[88]

6月27日，蒋介石给顾维钧和全体代表及顾问与专门委员发来电报表示祝贺："联合国会议圆满闭幕，世界和平之理想益致具体化。诸君宣勤坛坫，为国家获致佳誉，为人类创奠宏业。两月辛劳，夙夜非懈，曷胜佳佩，特电慰问。"[89]

《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及随后联合国的成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中国作为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因为在战争中做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而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是，由于中国与其他三大国美、英、苏之间存在的实力差距和不平等关系，以及国内动荡复杂的政局，中国的这一地位在联合国成立前并不是完全确定的。作为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首席代表，顾维钧将确保中国四强之一的地位作为首要目标，在中国参会方针的确立和会议的具体应对中，均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至旧金山会议时，中国的大国地位已基本无忧，顾维钧又将中国关于联合国的主张向大会提出，如在非常任理事国的地域分布、托管地的最终独立等问题上，完全从道义原则出发，与其他大国考虑一己私利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代表中国为《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对联合国及战后国际秩序的考虑中，顾维钧将中国在其中所处的地位作为头等重要的事情，但也不忘考虑联合国和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在争取国家利益时坚持公理和正义。这就是他投身中国外交时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我毕生的愿望是，在世界大家庭里，应使中国享有适当的地位，并且中国应对维持和促进世界安全与福利作出应有的贡献。"[90]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顾维钧参加了巴黎和会，以拒签和约的行为维护了国家尊严，并参与了国联盟约的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顾维钧又参加了旧金山会议，参与了《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使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像他这样参加了两次大战后的两个重要国际会议、参与了两个国际组织创建的外交官，在全世界都没有几个；而作为自己国家的主要代表在两次国际会议中都发挥重要作用

的，只有顾维钧一人；从巴黎和会到旧金山会议，顾维钧是中国外交从受压抗争到正常应对、中国国际地位从弱国到四强之一上升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1] 《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要点》，1942年7月4日王宠惠呈蒋介石，《特交档案：外交——对国联、联合国外交》第17卷，台北“国史馆”藏。“国际问题讨论会”成立于1941年，旨在讨论研究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中日问题及国际自由平等等事宜，参见《国际问题讨论会规则纲目及人员聘任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国防档》，档号：005/1。

[2] 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台北：“国史馆”，2001，第57～58页。

[3] 《战时外交》第3册，第825～830页。

[4] 《蒋介石致顾维钧》（1944年7月2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0。

[5]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391页；Pao-chin Chu：*V.K.Wellington Koo*，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Hong Kong，1981，p.163。

[6]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4年8月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5。

[7] 《王世杰拟“我政府关于国际安全和平组织问题之主张（要点）”》（1944年7月20日），《特交档案：外交——对国联、联合国外交》第17卷。

[8]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呈蒋委员长》（1944年7月24日），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157～161页。

[9] 如《东方杂志》刊登的王云五《战后国际和平问题》、史国纲《怎样维持战后的世界和平》、杜光埙《论重建世界和平的基本问题》等文及重庆《大公报》社评《战后世界和平机构的性质》，见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88～103页。

[10] 《战时外交》第3册，第868～869页。

[11] 《战时外交》第3册，第867页。

[12] 《出席国际和平组织会议代表团会议纪要》（1944年8月2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4。

[13] 《孔祥熙致蒋介石》（1944年7月13日），《领袖特交文电（七）》，台北“国史馆”藏；《战时外交》第3册，第831页。

[14] 《蒋介石致孔祥熙》（1944年7月23日），《领袖特交文电（七）》。

[15] 《孔祥熙致蒋介石》（1944年8月1日），《特交档案：外交——对国联、联

合国外交》第17卷。

[16] 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第626页。

[17] 《蒋介石致孔祥熙》（1944年8月10日），《领袖特交文电（七）》。

[18]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391~392页。

[19] 陈布雷在魏道明8月17日致蒋介石电文上的批注，《领袖特交文电（七）》。并参见Mona Yung-Ning Hoo，*Painting the Shadows*：*the Extraodinary Life of Victor Hoo*，Eldridge & Co.，1998，pp.95-96。

[20] 《战时外交》（三），第837、864页。

[21] 《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15日；《战时外交》第3册，第865页。

[22] 《魏道明致蒋介石》（1944年8月17日）、《蒋介石致魏道明》（1944年8月19日），《领袖特交文电（七）》。

[23] 《战时外交》第3册，第866页；《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394页。

[24] 《孔祥熙致蒋介石》（1944年8月15日），《特交档案：外交——对国联、联合国外交》第17卷；《蒋介石致孔祥熙》（1944年8月16日），《领袖特交文电（七）》。

[25]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393页

[26] Note of a Meeting at the Apartment of Dr.H.H.Kung，28 August，1944，*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4；《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395页。

[27] Note of Conversation with S.Hornbeck，5 September，1944；《顾维钧、魏道明、胡世泽、商震致宋子文并转蒋介石》（1944年8月3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0。

[28] Note of Conversation with J.Grew，8 September，1944，*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7.

[29]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00、405页。

[30] *FRUS*，1944，Vol.1，GOP，Washington，1966，pp.850-851.

[31] 《中国代表团报告书》（1944年9月29日）、《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1944年9月3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4；《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17~418页。

[32] *FRUS*，1944，Vol.1，pp.851-859.

[33] 《顾维钧等致宋子文并转蒋介石》（1944年10月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0；*FRUS*，1944，Vol.1，pp.864-865。

[34] 《顾维钧等致宋子文并转蒋介石》（1944年10月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0；*FRUS*，1944，Vol.1，pp.865-866。中美双方关于讨论的记录基本一致，惟关于第三点稍有出入。顾维钧的电文称，美方表示"此问题仍在考虑中，并可由大会再行讨论"。

[35] 《顾维钧等致宋子文并转蒋介石》（1944年10月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0。

[36] 《顾维钧等致宋子文并转蒋介石》（1944年10月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0。

[37] 《宋子文致顾维钧》（1944年10月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0。

[38]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18～419页；《战时外交》第3册，第892页。

[39]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19页。

[40] 《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1944年9月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4。

[41] 《战时外交》第3册，第900页；《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22页。

[42]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135、172页。法国后来未接受发起国的地位。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58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617页。

[44] 《王世杰日记》上册，第680页。

[4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83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619页。

[46] 《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20日。

[47]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09页。

[48] 《蒋介石日记》，1945年3月6日；《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75页。

[49] 《王世杰日记》上册，第679页；《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76页。

[50] 《蒋介石日记》，1945年3月7日。

[5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80页；《蒋介石日记》，1945年3月16日、17日上星期反省录。

[52] 《战时外交》第3册，第906页。

[53]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89页。

[54]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90～493页。

[55] 《蒋介石日记》，1945年3月23日、24日；《王世杰致蒋介石》（1945年3月23日），《领袖特交文电（七）》。

[56] 《蒋介石日记》，1945年3月25日、26日；《王世杰日记》上册，第687页。

[57] 《战时外交》第3册，第907页。

[58] 《我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人选发表》，《中央日报》1945年3月27日，第2版。

[59]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03～504、512页；《代表团设立访员招待处办理规则》，*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0。

[60] 《中国代表团报告》，*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1。

[61] 《中国代表团记者招待会记录》（1945年5月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0；《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13～514页。

[62]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10页。

[63] 《郑震宇致萧自诚》（1945年5月19日），《领袖特交文电（七）》。

[64] 《毛邦初致蒋介石》（1945年5月20日），《领袖特交文电（七）》。

[65] 外交部：《有关国际和平机构各项问题之方案》（1945年3月），*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9；《外交部长宋子文呈蒋委员长拟具出席旧金山会议各种问题方案》（1945年3月27日），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364～372页；《蒋介石日记》，1945年3月31日。

[66] 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364～372页。

[67] 《宋子文致蒋介石》（1945年4月17日），《领袖特交文电（七）》。

[68]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89～490页。

[69] 《魏道明致外交部》（1945年4月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2；《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97页。

[70] 《吴国桢来电》（1945年4月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2。

[71] 《顾维钧致吴代部长》（1945年4月2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3。并参见Ruth Russell，*A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1940-1945*，Brookings Institution，1958，pp.634-636。

[72] 《中国代表团会议结论》，第6次会议，1945年5月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5。

[73]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33、34号电》（1945年5月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3；Ruth Russell，*A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1940-1945，pp.651，675-676，892-893。

[74]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34号电》，*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3；Untied Nations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Docu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London and New York，1945，Vol.3，p.624。

[75] 《顾维钧致外交部》（1945年5月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3；《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16页。

[76]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24～525页；《战时外交》第3册，第909页。

[77]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188页。

[78]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225页。

[79] 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137、148页；《战时外交》第3册，第833页。

[80] 外交部：《有关国际和平机构各项问题之方案》（1945年3月），*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9。

[81] 《毛邦初致蒋介石》（1945年5月21日），《领袖特交文电（七）》。

[82]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30～531页。

[83] Ruth Russell，*A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1940-1945*，pp.836-837.

[84] 《毛邦初致蒋介石》（1945年5月21日），《领袖特交文电（七）》。

[85]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5年5月19日）、《蒋介石、吴国桢致代表团电》（1945年5月2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2，80。

[86] 《中国代表团会议结论》，第46、49次会议，*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5。

[87] 《顾代首席代表签订新安全组织大宪章时演词》，*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3。

[88]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34页。

[89] 《蒋介石致顾维钧》（1945年6月2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2。

[90]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08页。

第十章 重返华盛顿

一 蒋介石委以重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参加完旧金山会议回到英国不久的顾维钧听到消息后兴奋无比，立即下令使馆悬挂国旗。当天，他在日记中激动地写下：“我长期盼望、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不息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从进入外交界之初反对“二十一条”，到巴黎和会上与日本代表激辩，再到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国联调查团、出使欧洲争取援助，顾维钧外交活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20世纪上半叶日本是对中国主权侵犯最大的国家，如今这个敌国终于被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一起打败，亲身经历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侵华全过程的顾维钧，怎能不为此感到兴奋和激动呢？！

然而，抗日战争结束后，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并没有迎来和平，国内政局面临着新的危机和动荡。对于国共两党的分歧和冲突，顾维钧最初就像对北洋时期纷乱的政争一样，在政治上不卷入任何一派，只注重外交，所以他会力主共产党人参加旧金山会议。

不过，在驻英大使任内顾维钧的政治身份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1942年，顾维钧在蒋介石的劝说下加入了国民党。[2]1945年5月，正在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顾维钧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两百多人组成，国民党内各派系为委员席位争夺十分激烈，但蒋介石还是安排党龄才三年的顾维钧任中执委。获此消息后，顾维钧致电蒋介石：“得悉忝任中委，惶感交集。窃钧党资浅薄，贡献毫无，遽膺重寄，深虑勿克胜任。惟有守遵中央方针，禀承总裁训示，益加勤奋，为国报效。尚恳时赐指导，俾资遵循。”[3]这份电报主要是礼节性的，顾维钧对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并不很看重，仍习惯于以一个超党派的人士看待和谈论国内政治问题。就在发出这份电报前几天，顾维钧与宋子文在旧金山有一次交谈。谈到国共问题时，顾

维钧赞成联合政府，认为让共产党加入政府比让他们与政府对立要好，这有利于政府掌控整个局面。[4]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共产党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赴巴黎出席世界职工代表大会途中抵达伦敦，邓发给顾维钧带来了周恩来的介绍信和毛泽东对他的问候。邓发告诉顾维钧，毛泽东知道他建议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要包括中共代表在内。顾维钧对中共高层的问候很高兴。邓发在伦敦期间，顾维钧与他进行了几次会面交谈，坦率讨论国共问题。11月22日，两人一起进餐时，顾维钧谈了他对国共关系的看法："我看不出两党政策之间有什么大的区别，任何国家只有统一才能强大。在战后世界现代强权政治的考验中，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和军队，中国就起不了自己应有的作用。三十年来，我一直为此而努力工作。现在日本的危险终于消除，所有的中国人应该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新国家。一个政党的权力和成功，与整个国家的更高的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顾维钧看来，国共两党都希望中国强大，因此它们之间的不和实无必要，也不值得赞许。在这期间，顾维钧还在使馆为出席世界青年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代表团中包括了来自国共两党的代表。顾维钧在致辞中，强调代表团内应始终保持统一阵线。他遵循的仍是政争止于国内的信条。[5]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就国共问题进行谈判，顾维钧对此非常关注。1946年1月10日，国共和谈商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获悉此消息，顾维钧十分高兴，认为"此次国共谈判成功，全国统一升平在望"，期盼联合政府的组成。[6]

1946年2月代表中国出席完在伦敦举行的联合国第一届大会后，顾维钧回国述职，于3月9日抵达重庆。此时，政治协商会议已结束，国民党正根据政协会议决议酝酿改组政府。因为顾维钧在国共问题上的中立态度，蒋介石与宋子文都考虑由他出任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蒋介石还要顾维钧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当顾维钧表示自己没有资格成为国大代表时，蒋介石保证为他安排一个席位。媒体也在此时传出顾维钧有望出任外长的消息。[7]顾维钧对外长一职并不拒绝。在等待政府改组期间，国内政局成为他关注的重点，也是他与国民党高层会面时的主要话题。

5月14日，顾维钧与外交部长王世杰有一次长谈，在国际问题之外讨论了国共问题。王世杰认为，解决共产党问题有三种选择：第一，将共产党排除在政府之外，让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自行其是；第二，对共

产党做出让步，让他们参加到政府中来，但这会产生一个任何事情都做不成的软弱的政府；第三，以武力解决。针对王世杰的三个选项，顾维钧回答说，中国最需要的是有一个进行重建的稳定时期，如果采取第一种选择，不安定的局面将阻碍重建工作的开展。第三种选择则无论中国人民或国外公众都不会理解和支持，对国民党而言等于自杀。因此，国内外的形势要求中国走第二条道路，它至少可以缓和紧张局面并提供合作的机会。即使成功希望不大，依然要朝此方向努力。[8]

两天后，顾维钧与宋子文见面，也谈到了国共问题。宋子文说，他对共产党没有信心，因为共产党参加政府的目的就是阻碍和削弱政府，以便最后接管政府。顾维钧提醒宋子文，正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美国特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渴望两党实现和解，由此间接地表达了他的看法。[9]

第二天，5月17日，蒋介石请顾维钧一起晚餐。顾维钧到蒋介石的官邸后，发现他是唯一的客人，不免有些惊异。其实，在前一天，蒋介石就定下要约他来专谈外交。在晚餐后两小时的谈话中，蒋介石在了解了顾维钧对国际局势和美、苏政策的见解后，又询问他对国共问题的看法。顾维钧直率地告诉蒋介石，他应该在扩大了的政府里，坚定不移地与中共合作，而不是凭借他的军队优势来解决问题。如果局势停留在目前的状态，政治动乱和经济不稳定就会继续下去，这就不可能从国外获得有效的援助，中国的国际地位就会进一步下降。顾维钧还是从中国外交的视角来看国共问题。尽管他知道蒋介石对国共问题有与他不同的看法，仍然当面表达了自己的主张。[10]

在顾维钧与王世杰、宋子文和蒋介石交谈的5月中旬，国民党大批军队已进入东北，向中共军队发起攻势，一时占据优势。由于国共冲突日益尖锐，政府改组一事被搁置一边，顾维钧也就无缘再度出长外交。此时，马歇尔正代表美国政府在国共间进行调停，对美外交成为国民党对外事务中的头等大事，于是国民党最高层决定将顾维钧调往华盛顿，出任重要的驻美大使一职。

还在旧金山会议刚结束时，行政院长宋子文就已准备将顾维钧调往华盛顿，并向蒋介石汇报获得批准，只是由于需要顾维钧在伦敦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这一任命才没有马上发表。随后，国民党最高层有了让顾维钧任外交部长的考虑。因此，让顾维钧任驻美大使是旧事重提。与伦敦的职位相比，顾维钧当然更看重到华盛顿任职，他始终认为对美

外交是中国外交最重要的任务。因此，当1945年7月下旬宋子文告诉他蒋介石已同意他任驻美大使后，他随即询问新的任命什么时候可以公布，流露出赴华盛顿的急切心情。[11]

在接受转任华盛顿的使命后，在国内继续逗留期间，顾维钧对国共两党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主张国民党容纳共产党转向赞同以武力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6月10日晚，蒋介石宴请天主教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田耕莘等，顾维钧参加作陪。晚宴后，顾维钧与其他客人一起告辞时，蒋介石叫住了他，要与他单独谈话。当蒋介石再次提出国共问题时，顾维钧表示，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使用武力不失为一项办法，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必要的，因为不把政府统一起来并实行对全国的统治，要重建国家甚至保持和平都是很困难的，并举了林肯为维护联邦统一而战的事例。但他又说，自己作为一个文官，无法评价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只有蒋介石才能判断以武力谋求政治统一的政策是否明智。顾维钧认为，如果国民党的武力确实能给全国带来统一，那么就可以使美国人相信中央政府能够在全国实施法律和命令。[12]

距上一次与蒋介石谈话相隔仅二十来天，处事向来稳重的顾维钧对国共问题的看法何以发生如此急剧的变化呢？

这主要与顾维钧对当时东北局势以及苏联在其中所起作用的认识有关。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了国共两党激烈争夺的地方，苏联在东北的介入使局势更为错综复杂。5月底6月初，顾维钧赴东北考察，亲身感受到国共在东北激烈的军事对抗和苏联对东北局势的影响。到沈阳后，他与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有次长谈。熊式辉告诉他，东北的局势源于苏联的干预，他们阻碍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并暗中帮助共产党军队发展。苏联正窥测时机向中国提出要求以便攫取东北权益。负责东北经济接收的张嘉璈带顾维钧去看了机器已被苏联搬运一空的两家工厂，并告诉他东北局势如虎踞山岗，这头猛虎不会静待太久，随时准备扑向山下的猎物。顾维钧明白张嘉璈口中的猛虎就是苏联。东北的记者也追问顾维钧对苏联运走中国物资的看法。[13]此前顾维钧对中苏两国政府于1945年8月签署的条约就极感失望，对苏联通过条约索取中国权益的做法不满。东北之行使他认为国共问题并不仅仅是原先认为的国内政治问题，而与苏联的干预直接相关。

回国期间与国民党高层官员的接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顾维钧此次回国，待了3个多月。在此期间，除与蒋介石多次会面外，他与宋子

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王世杰、吴铁城、李宗仁、熊式辉、杜聿明等都有过交谈，有的还不止一次。在这些交谈中，国民党的文官对国共问题的前景几乎都持悲观态度，表示对与共产党合作不抱希望，而国民党将领又大多倾向于武力解决，自恃军事力量比共产党强好多倍。由于长期驻节海外，对国内情况了解有限，这些国民党高层官员反复阐述的观点对顾维钧就有很大的影响力了。当他认为国共之间不可能通过政治途径达成妥协，而且国共问题也不仅仅是国内问题时，他原先所持的中立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与首次使美为袁世凯推动帝制舆论相似，顾维钧仍期望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使顾维钧对国共问题的立场发生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即将出任驻美大使。此时美国特使马歇尔正在调处国共矛盾，美国政府实际上已介入中国的国内政治了。作为代表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打交道的外交代表，顾维钧也就无法像以往那样完全回避国内政治问题了。

国民党高层确定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后，蒋介石希望他尽早赴美履职。6月14日晚，顾维钧离国前夕，蒋介石与他做了一次长谈。蒋介石强调宣传工作是对美外交的重点，并对在美开展宣传的具体内容做了以下三点指示。第一，政府始终对共产党让步并与其达成协议，但共产党人却不遵守协议。第二，中国必须实现统一才能走向强大繁荣。没有统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有所作为。和平统一是可取的，但是面对一个拥有独立军队的政党，政府不能只是采用政治手段。第三，关于美国对中国“一党专政”的批评，政府正在稳步扩大政府基础。蒋介石还叮嘱顾维钧在美做宣传，要“联系在美之英人宣传家，为我协助”，因为英国人在美国有特殊的影响力。蒋介石要求顾维钧最好不要迟于7月1日到达华盛顿，因为在这以后中国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时期。[14]在做这番表示时，蒋介石正在部署向共产党发起全面进攻的最后军事准备。12天后，国共之间的全面内战就爆发了。这次临别谈话表明蒋介石是将派遣顾维钧出使美国与解决共产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希望通过他的宣传活动和外交经验影响美国的舆论和政策，以获得美国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全力支持。这使得顾维钧这次出使美国与他以往出使海外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成为他对美交涉的主要任务。

在漫长的外交生涯中，顾维钧历经袁世凯、皖系、直系、奉系和国民党等各届政府，面对纷乱的政争，他总是力图与国内政治保持距离，专注于外交事务。但这一次他面临的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国内外形势。

国共冲突是20世纪中国最激烈的两大政治力量的角逐，并且牵涉到美国与苏联两个大国，而美苏之间的冷战此时已经拉开帷幕。顾维钧是从巴黎和会走上国际舞台的外交官，他所熟悉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立志于以公理争强权，擅长在与列强的交涉中纵横捭阖，维护作为弱国的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有着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冷战格局，对他来说，超出了以往的外交经验范围。因此，东北的所见和国民党高层的所言使他最终在国共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从而使他外交生涯的最后一段时期与国民党政府联系在了一起。

6月下旬，顾维钧返回伦敦，向英国政界告别。7月5日，顾维钧飞抵华盛顿，再度成为中国驻美使馆双橡园的主人。6天后，美国政府也任命了新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

顾维钧抵达美国正是中国国内全面内战爆发之时，因此向美国政府说明中国的局势成了他上任伊始的第一件事。7月16日，顾维钧向杜鲁门总统递交国书时，杜鲁门询问了国共对抗的情况。顾维钧回答说，中国的局势不十分安定，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在国内实现和平、统一和民主；这些目标能否达到要看国内各方势力能否合作，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但该党的合作态度似有不足，它没有履行与政府业已达成的协议，似在一心扩大其影响与实力，拖延和解，缺乏对等的合作精神。[15]

此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向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发起进攻，为了尽可能使国共不完全破裂，美国特使马歇尔决定向蒋介石施加最后的压力，他与司徒雷登一起代杜鲁门起草了一封致蒋介石的信。8月10日，杜鲁门将此信交给顾维钧转送蒋介石。信中提到刚发生在昆明的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刺杀的“李闻血案”，指出这是“企图采取强权、军队或秘密警察，而不是采取民主方法，来解决主要的社会问题”，要求蒋介石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并在短期内取得进展，否则，“我有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的立场的必要”，希望能从蒋介石那里尽快得到“令人鼓舞的好消息”。[16]

顾维钧从美方接到这封信后，认为它表明杜鲁门“对中国目前局势极为失望”，整封信“措词严峻，甚至唐突”。他一面立即将信译成中文以最快方式送交蒋介石，一面向美方探询杜鲁门此信的真实意图。8月12日，他请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的远东司司长范宣德（John

Vincent）共进午餐，了解到美国政府并没有置国民党政府于不管的想法。餐后他立即向蒋介石报告："经向美方探询，此举用意似尚不恶，重在我方此时有所表示，采一切实步骤以明我政府之宽宏态度，而反映共方缺乏诚意。"[17]

蒋介石刚接到杜鲁门信时，对其态度和措辞非常气愤，"其语意之侮辱、压迫殊难忍辱"，"直觉美国外交之无礼与可惜"。待顾维钧电报到达后，他了解了美国的底牌，因此写了封敷衍搪塞的回信，由顾维钧于8月28日交给杜鲁门。回信中将中国国内问题完全归咎于共产党，坚持"共产党必须放弃其武力攫取政权、推翻政府及建立一个犹如目前东欧的集权的政权的政策"。[18]

在向美国朝野说明中国国内局势时，顾维钧集中表述了这样几个观点：第一，中国必须统一，如同南北战争期间的美国一样，不过解决办法应以和平方式为先；第二，中国局势实质上是世界局势的一部分，在世界局势中，苏俄是推进国际安全与合作的主要障碍；第三，中国人的天性具有民主气质；第四，美国人根据中国共产党宣传使用的标语口号来衡量中国情况十分危险。这样的说明已经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按蒋介石的意愿为其政策做辩护了。

二 尽心竭力争美援

当蒋介石将内战的战火烧向全国而又在战场上接连失利之时，美国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就对国民党政权的生存显得至关重要，争取美援也就成了顾维钧对美外交的首要任务。

美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以延长《租借法》和转让剩余物资等方式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大量援助。但由于美国政府尚希望通过马歇尔调停解决国共问题，因此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仍遮遮掩掩，尤其对国民党政府的大笔贷款要求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以美国进出口银行名义给予的对华5亿美元指定用途贷款也一直未予动用。1947年1月马歇尔结束在华使命，宣告美国政府调停政策的失败。回国后的马歇尔随即出任国务卿，在华调停失败的经历对马歇尔此后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2月上旬，远东司司长范宣德根据马歇尔的指示重估美国对华政策，提出将视中国情况“改进”的程度，即中国政府按美国的期望进行改革的进程，来决定美国对华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援助，而如何认定“改进”，美国政府应持“同情而不是苛求和挑剔的态度”。范宣德还提出，美国的援助应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复兴和改革，而不应提供助长或鼓励中国内战的军事援助，但以不使国民党政府无法抵御共产党的军事进攻为前提。[19]

2月17日，顾维钧请求会见马歇尔。这是马歇尔就任国务卿后顾维钧与他的第一次会面，要求美国对华提供经济援助是会谈的主要议题。此前一天，蒋介石刚发表声明，承认中国的经济“已届非常严重之时”，并宣布法币大幅度贬值，与美元的比价从7000多比1下调为12000：1。[20]会谈中顾维钧在提及蒋介石的声明后，即向马歇尔提出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2000万美元商品贷款，以用于购买棉花和小麦的要求。他强调，中国提出这笔贷款请求，不仅是希望能得到具体的物资支持，更期望贷款能对中国民众的心理产生影响，因此希望美国政府能发表有关援华的政策声明。但马歇尔明确表示这样一笔贷款目前实现的可能性很小。[21]在马歇尔看来，尽管美国政府迟早要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但在其还未迈出改革的步子时，提供援助只会推迟改革。

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发表了此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总统咨文，声称世界上“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杜鲁门主义”虽是直接针对希腊和土耳

其局势提出的，但标志着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一出台就引起顾维钧的高度重视，认为这“应该适用于远东，更主要的是适用于中国”。[22]在内战中处于困境的国民党政府对此极为兴奋，随即加快了向美国求援的步伐。

4月6日，外交部长王世杰致电顾维钧，称政府将于两周内完成改组，此后将向美国提出借款请求，询问其对推动美国援华的意见，以及在尚未动用而将于1947年6月底期满的进出口银行5亿美元贷款之外，是否另提借款要求。顾维钧于4月18日答复王世杰，认为根据美国政府屡次表示对华援助须视中国政局改善程度，“现拟于我政府改组后提出借款，应合时机”；但进出口银行5亿美元贷款须由该行个别审定每项具体用途后才能动用，“恐于我目前财政经济缓不济急”，因此，顾维钧建议“宜扩大数目，增加五亿美元以应急需”，用于购买棉花、汽油、交通工业器材和稳定金融。由于进出口银行的贷款系采用商业办法，“条件精细，期限缩短，于我国现情形颇多不利”，顾维钧提出另增的5亿美元援助请求“不能不用政治性质借款，如希土之例，由美政府专案向国会提出通过”。顾维钧还指出，美国现“力图减税节流”，而“对我既往运用借款之效率，咸认为不甚显著”，因此要获得美国的援助，需“提出切实精审方案，俾美政府与国会双方均感我实事求是”。[23]顾维钧这份电报，提出要求美国增加5亿美元贷款，达到10亿美元的金额，并且提出将新增的贷款定为政治性质，与“杜鲁门主义”挂起钩来，这成为国民党政府此后争取美援时说服美国的主要依据。

顾维钧发出电报的当天，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改组，由张群出任行政院长，并吸收了青年党等小党派负责人和一些社会贤达参加政府，以求改变形象，博取美国政府的好感。改组后的国民党政府随即着手向美国提出援助的请求。4月27日，刚辞职下台的前行政院长宋子文通过傅泾波转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中国政府将向美国提出巨额棉麦借款、军火援助及完成装备八又三分之一飞行大队等要求。当日，蒋介石又直接向司徒雷登重复了这一要求。而司徒雷登通过其他渠道也获悉南京将通过驻美大使提出正式的援助要求，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官员都希望获得大额商品贷款。[24]5月6日，外交部长王世杰致电顾维钧，指示其向美国务院递交以他名义签署的照会，正式向美方提出借款的要求，并“特别注重三点”：（1）中国“无意以借款弥补预算决算之收支差额”；（2）“借款将纯为建设之用”；（3）原定5亿美元之数不够，“故请美方将借款数目定为10亿”。王世杰还要求顾维钧在向美方交涉时，“措词方

面至希坚定，俾免彼方视为试探”。[25]王世杰的要求显然是根据顾维钧4月18日的建议提出的，显示出在华盛顿第一线与美方交涉的顾维钧对南京决策的影响力。

5月8日，顾维钧拜访马歇尔，正式提出国民党政府的10亿美元借款要求。顾维钧在会谈中说明了中国的局势及对经济援助的需要，强调仅靠原先安排的进出口银行的5亿美元贷款无法应对目前的局势，并保证美国的援助不会被用来弥补财政上的赤字。他解释说，由于单靠指定用途的5亿美元贷款无法满足中国的需要，因此奉命提出10亿美元贷款，其中一半用于购买美国的物资和设备，一半用于恢复交通、农业和建立发电厂等。马歇尔虽表示他一向热心于为中国提供援助，也欢迎最近中国政府改组所带来的进步迹象，但他希望顾维钧能将中国的要求以非正式的备忘录形式递交给他，以便他亲自做进一步的研究，然后与中国方面再行讨论。根据参加这次会谈的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范宣德的看法，马歇尔有关非正式备忘录的要求与中国的意图并不一致，中国方面实际上希望通过公开的请求引起美国国会和公众的同情，以有助于得到大笔贷款。不过顾维钧对这次会谈的结果还是表示满意，在当天给外交部的电报中，他报告在会谈中“以我政府名义及坚定口吻提出”，马歇尔听后“颇动容”。[26]

5月13日，顾维钧向马歇尔递交了一份非正式备忘录，重申了与马歇尔会谈时提出的10亿美元借款要求，并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原则上接受这一要求，中国政府将递交正在准备中的更详尽的计划。但美国国务院认为在仔细研究并与财政部、进出口银行和国会领袖协商前，无法做出中国所希望的“原则上接受”的承诺。[27]但国民党政府已无法等待下去了。5月15日，王世杰致电顾维钧，告诉他“政府坚盼借款数目为十亿元”。几天后，王世杰又将借款详细计划送至驻美使馆，要求尽快与美方达成协议。[28]因此，5月27日，不待美方做出原则接受的承诺，顾维钧又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正式的备忘录，详尽解释了中国提出借款的考虑、借款的性质和用途，表明中国希望原来由进出口银行提供的5亿美元贷款用于购买各项建设计划所需要的装备和物资，而新申请的5亿美元用于购买棉花、小麦等，以使中国政府能用这些物品换取货币，应付国内开支。这份备忘录最后建议中美两国立即就10亿美元数额达成谅解，或至少在1947年6月30日前就进出口银行的5亿美元贷款签订正式协议。[29]

接到备忘录后，马歇尔与他的主要助手副国务卿克莱顿（William Clayton）、助理国务卿索普（Willard Thorp）及范宣德等于6月11日讨论了对华援助问题。克莱顿列举了要将6月底到期的进出口银行5亿美元贷款重新指定用途的各种难处，表示对此感到悲观。但马歇尔表示中国最近局势的发展使他担忧，也使他确信美国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制止局势恶化，尽管他坦言并不清楚知道该做些什么。这次讨论达成的共识是，不再考虑对进出口银行的5亿美元贷款重新指定用途，但应立即在具体项目的基础上给予中国贷款。[30]

6月17日，顾维钧根据马歇尔的建议与副国务卿克莱顿会晤，再次介绍了5月27日备忘录，表明中国希望美国尽快实现两笔5亿美元的贷款，并强调由于中国的形势非常紧急，美国对华贷款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克莱顿明确表示要对进出口银行的5亿美元贷款重新指定用途是不可能的，而第二笔5亿美元贷款需要美国国会批准，这就要有详尽且成熟的计划，使国会确信贷款能产生预期的效果。[31]

然而，南京方面对美援已十分急迫。6月下旬，外交部电示顾维钧，向美国政府就援助问题提出三点新的要求：（1）进出口银行5亿美元贷款必须重新指定用途；（2）美国政府至少给予中国2亿美元商品贷款以购买棉花；（3）希望美国政府发表正式通告，表明决心援助中国长期经济建设。顾维钧接电后向外交部表示，“一面遵照承示三点进行，尤以促订五亿元总额为要，一面催促美方早日通过若干具体计划，以收速效”。[32]

6月23日，顾维钧将南京的三点新要求通报给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索普，让其先转告马歇尔。两天后，顾维钧约晤马歇尔，就三点要求做了一次长谈。对于第一点，美国方面表示，进出口银行的5亿美元贷款重新指定用途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可以通过提出认真准备的方案从银行获得贷款。当顾维钧说大使馆已有多个完全齐备的方案，其总数刚超出5亿美元时，马歇尔当即指出这是不合适的，因为会被认为是为凑5亿这个数目，中国的援助方案应总数少些，但要精些。对于第二点，美国认为可以考虑，但2亿美元的数额太大。由于进出口银行的5亿美元款项展期无望，顾维钧“期盼美政府对我所请其他五亿元及长期建设协助，作一正式表示，以安我民心，此举为对华心理作用甚大，不可少”。对于第三点，马歇尔最后同意按顾维钧的建议发表一个声明。[33]

与马歇尔会晤结束后，顾维钧根据美方要求，从原拟提出请美方审

批的40多个项目中挑选出21个项目，其挑选原则是：（1）目前受战事影响较大者缓提；（2）资料过于简单或条理有欠明晰者缓提；（3）增加农业项目比例，因美方注重于此；（4）总额不宜过大，以免反致拖延。6月28日，顾维钧向国务院提出这21个总额为2.68亿美元的项目。两天后，顾维钧将这些项目正式递交进出口银行。[34]

但美国进出口银行认为中国无法有效地运用美国贷款进行经济建设，决定5亿美元贷款于6月底期满后不再延期。顾维钧对进出口银行的这一决定十分不满，认为该银行的董事、原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从中作梗，起了很坏的作用。蒋介石接到顾维钧报告后，对美国贷款落空失望之极，一肚子怒气洒向了高思，对其“态度及刁难情形不胜愤慨，其侮辱欺凌，可谓已极”。[35]

顾维钧代表南京国民党政府加紧推进求援活动之时，马歇尔与美国国务院也因中国局势的变化正在考虑调整对华政策，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作为政策调整的信号，马歇尔于7月初决定派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使华。虽然当时普遍认为，美国政府有关对华援助的正式决定将待魏德迈结束其使华行程后才能做出，但顾维钧并未因此而停止其求援活动。7月下旬，他会见助理国务卿索普讨论2亿美元棉花贷款事宜。8月上旬，他向进出口银行递交2亿美元贷款的方案。但是，美国方面除放宽对中国通过商业渠道获得军火的限制外，对顾维钧递交的求援计划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这一时期顾维钧代表国民党政府进行的求援活动，只是让美方了解到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及其迫切性。但他向南京提出的建议则定下了国民党政府求援活动的基调，即尽可能拓宽美国对华援助的渠道，并增加援助数额。

按顾维钧的说法，1947年11月是美国对华援助政策变化的一个转折点。这是因为，国务院在考虑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到10月下旬已明确国民党如果没有外援，要扭转共产党得势的趋势希望甚小，而“显然外援的来源就是美国”。[36]在美国国内，亲国民党势力在这期间对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展开攻势，指责政府迟迟不向中国提供足够的援助。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务院和马歇尔就援华问题的态度逐渐明朗起来。

11月10日，马歇尔在国会两院外交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交援欧计划时表示，美国“应该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作某种经济上的支援与协助”。次日，在参院外交委员会审查援欧计划的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范登堡（Arthur Vandenburg）称如援华计划不包括在援欧计划内，则援欧计

划就是一“单关系方案”，美国的政策“不能贯彻”，并追问马歇尔援华约需多少款项。马歇尔回答确数尚未决定，但从1948年4月至1949年6月约需3亿美元。[37]

马歇尔的这一表态与他此前的立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顾维钧对此十分敏锐，立即于11月13日前去与马歇尔会晤，请他就在国会的表态做进一步解释，并就他所说援华将从1948年4月开始，提出“我国目前需要紧急救济，并不亚于欧洲之法义奥”。马歇尔承认，他没想到国会会提出援华问题，援华日期与数额“均系因议院突将助华问题提询，不得不临时答复”，尚无具体计划，而法国、意大利、奥地利三国需要援助比中国更为急迫。对此，顾维钧反复说明，中国“通货膨胀日益危险，非于四月前获有紧急援助，难免现状更将恶化”，因此希望美国将中国在1948年4月以前所需紧急援助与法、意、奥三国“同时办理”。在会晤结束后给外交部的电报中，顾维钧称，马歇尔听了他的说明后“似为动容”。[38]在这次会晤中，顾维钧根据美国将向欧洲国家提供紧急援助的新情况，将重点放在争取美国同时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方面。会谈后，顾维钧向南京建议，为推动此事，南京方面也应做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工作，请其致电马歇尔，“俾收内外同时进行之效”。他还提醒南京，此时报纸上对美国在援华方面的批评应格外谨慎，以免增加麻烦。[39]

顾维钧关于美国政府将援华与援欧联系在一起放在同等重要地位的建议，再次获得南京的采纳。11月17日，外交部致电顾维钧，表示希望美国制定对外援助方案时，不将中国摈除于紧急援助之外，并同时宣布长期援华计划。[40]11月21日，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政府递交一份备忘录，强调中国日益严重的经济状况已无法等待至来年4月，希望能提供临时性的紧急援助，从1948年1月起每月至少2500万美元。[41]于是，为获取紧急援助，顾维钧在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求援活动。

新的援华计划需要国会的通过，顾维钧在继续与国务院交涉的同时，积极与国会内外的亲国民党人士接触，争取他们对援华的支持，推动他们在国会提出相关议案。在给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中，顾维钧报告，共和党要人已“允助我紧急援助”，并“密函上院领袖，公开主张一律予我紧急法案”。[42]蒲立德是此时顾维钧交往最为频繁的一名亲国民党人士。1930年代蒲立德任美国驻法大使期间，两人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此时他虽已从大使的职位上退下，但与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都有来往，在政界有很大的影响力。马歇尔提出援欧计划后，顾维钧向蒲立德

力陈应将对华援助列在一起的必要性，并多次与他讨论美国援华的具体问题。在这之前的10月中旬，蒲立德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向美国人民报告中国》的长文，鼓吹美国应在三年内向国民党政府提供13.5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帮助蒋介石打败共产党。因此，顾维钧的请求得到蒲立德的积极回应。他向顾维钧表示，他在国会和政府中有许多朋友，可以推动援华计划的通过。[43]亲国民党的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也是顾维钧经常拜见的对象。马歇尔在国会两院外交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交援欧计划时，周以德当场发言，要求向中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11月25日，周以德又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议案，要求给中国增加紧急援助款项6000万美元，而开始的日期正是国民党政府提出的1948年1月1日。

周以德的议案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获得通过后，顾维钧立即为此拜访助理国务卿阿穆尔（Norman Armour），催促国务院支持这一拟议中的紧急援助项目，尽快提出具体使用计划，以使这笔紧急援助款项能与法国等国同时开始动用。但美国国务院却摆出种种理由，先称中国情况不如欧洲几国紧急，继称国务院正制定一项长期援华案，如另提紧急援助，反将影响长期援助，就是不愿推动此项紧急援助。顾维钧竭力说明长期援助与紧急援助“无混为一谈之必要”，并强调中国国内“情形严重，需助紧急”，如先给予紧急援助，有助“前方士气，后方民心”，而且也“有俾长期援助计划”。最终，美国务院表示对顾维钧的请求“容加研究”。这次会谈后，顾维钧感到，美国国务院在对华援助问题上“态度似不易变更”。[44]

顾维钧明白，美国国务院及马歇尔在对华援助方面迟迟不能下最后决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国民党政府无法有效地使用美国的援助，从而白白浪费大把美元。在上述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马歇尔坦承他对美援能在中国发挥百分之七十的作用都无把握。因此顾维钧认为要推动美国尽快援华，中国自己也需有所作为，于是他再向南京建议，向美国提出的受援计划必须“注重能即开始实行者”，尤其要表示中国政府“决心改革，而于美朝野以最有效之影响”。此后，行政院长张群就在公开声明中表示，政府已下决心对行政、财政、经济与军事做彻底的改革，“欲求获致外援最大之效力，应即在国内实施一适当而现实之自助方案。此方案应首重财政与经济目前急需之改革方法”，以向美国示意，美援不会在中国被浪费掉。[45]为使美国对中国有一较好印象，有助于获得援助，顾维钧还提醒南京，专程来美商订援助条款的代表团“人数宜少，以免铺

张”。由于在与美会谈中，美方对美国货轮受限不能行驶至汉口表示不满，顾维钧又建议暂时放宽这一限制，以增加美国对华好感。[46]

周以德提出的6000万美元紧急援助款项最后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被卡住，整个款项被大幅度削减至1800万美元。1948年1月6日，顾维钧为此拜访助理国务卿索普，提出在1800万美元之外另增援助中国的款项，并要求国务院将援华置于与援欧同等重要的地位。但索普表示，1800万美元的援助属于临时性质，国务院将在近期提出长期援华计划。言下之意，美国不会考虑另外提供临时性的紧急援助。顾维钧遂将会谈的重点转移到长期援华计划上，追问其总数、向国会提出的时间等问题。但索普并未给予明确回答，只是说援华计划总数尚待马歇尔最后核定。[47]

此次会谈后，顾维钧向外交部报告美国国务院援华态度，并提出应对之策："美政府意旨仍坚主欧洲第一，欲先将欧案通过，再议华案。现议会方面对欧案意见纷纷，争论必烈，讨论时间势必拖延，一般推测或需至四、五月间。美国朝野反对积极援华者正拟利用政府此项心理，亦附声欧洲第一重要，意欲拖延华案，夜长梦多，以待我国不测之变动，而达其破坏之目的，似不能不设法抵制。钧与此间美友洽商，咸以华案情势紧急，为数之小比援欧者不可同日语，问题亦较简单，最好以能先通过华案为上。即不能办到，亦须与欧案同时通过。然此间政府方案恐转移非易，当酌向提议。一面已预先商托友好向议会方面鼓吹推动。"[48]顾维钧仍希望通过将援华与援欧绑在一起的手段推进求援活动。

在临时性的紧急援助计划受挫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只得将求援的重点放到长期援华计划上，希望借此一揽子地解决美国援华问题。1月18日，外交部长王世杰致电顾维钧，指示他向美方提出总额为15亿美元的四年援华计划，同时请求美国在最初的四五个月内先给予一笔接济。王世杰强调，"此时不必过分顾及美政府或国会能否接受，而重在说明我国期望与计划"。[49]次日，顾维钧带领专为商谈美援具体细节而来美国的技术代表团去见马歇尔时，提出中国在1948年急需一亿美元的军援贷款，或者在拟议中的援华计划中增加一亿美元，准许用于支付军需品，并希望能当面从马歇尔那里了解美国援助中国的总政策。在会晤中，马歇尔虽表示愿考虑军援贷款计划，但总是闪烁其词，不愿详细解释美国的援华政策。[50]

此后，顾维钧一面继续频繁走访国务院，推动援华；一面则充分利用美国国内在援华方面出现的不同意见，与蒲立德、周以德等人积极联络，依靠这些人向议会方面鼓吹推动。他曾将一份亲国民党的美国各界人士的名单交给蒲立德，告诉他国会可请这些人在援华问题上作证，希望通过国会对国务院施加压力。[51]国民党的求援活动、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终使美国政府提出了援华计划。

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由国务院起草的经济援华方案，要求国会拨款5.7亿美元支援国民党政府，其中5.1亿美元用于购买粮食和工业物资，其余6000万美元用于少数特定工业项目及交通复兴。整个计划为期15个月，而不是国民党政府要求的4年时间。虽然这个援华方案比马歇尔原先提到的款项增加了2亿多美元，但顾维钧对这个以临时性救济为宗旨的计划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它与援欧计划“大不相同”，字里行间“没有丝毫热情”。原因在于整个方案仅仅涉及经济援助，而未提及向国民党提供此时它最急需的军事援助。当天，顾维钧就去拜访助理国务卿索普，一方面对美国政府提出该案表示谢意，并催促美方尽快通过该案，以使中国得到这笔贷款；另一方面又再次向美方提出一亿美元军事贷款问题，建议在经济援助之外另加这笔贷款。[52]

但美国国务院在援华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在援华方案提出后向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宣读的声明中，马歇尔称，自日本投降以来，美国已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给了中国许多重要的援助，因此国民党政府要维持其自身，“则大部分的工作必须由中国当局自己去做，任何人都不能越俎代庖”；而如果美国不断扩大援华规模的话，就有可能“直接参与中国的内战，或直接卷入中国的经济危机，或两者兼备，以致听任其资源倾入无底的深渊”。在另一声明中，马歇尔明确表示这一方案与援欧方案不同，“美国在行动上不当置身于对中国政府的举措及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事务直接负责的地位”。[53]马歇尔的这些话表明，国务院认为美国已向中国提供了足够的援助，继续增加对华援助是美国不该也无法做到的，至于提供这笔5亿多美元贷款之后，国民党政府能否生存下去就得看它自己了。

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顾维钧全力以赴致力于争得美援尤其是军事援助。针对马歇尔和国务院的做法，他进一步联络国会议员和其他亲国民党势力，希望通过国会推进军事援助性质的贷款。在与国会共和党议员接触中，一些议员考虑对5.7亿美元的贷款另行指定用途，转向

购买军火、稳定货币及增加建设，顾维钧就向他们说明，若以减少经济援助的方式提供军援，实于中国不利。他向国会议员强调，对中国而言，“经济与军事援助同样紧急”，“短期与长期援助均属需要”。[54]蒲立德仍是顾维钧联络的重要对象。他告诉蒲立德，马歇尔在他的声明中所说的并不符合事实，而是夸大了美国的对华援助。蒲立德要顾维钧向他提供美国援华军事物资的清单，以便交国会议员向马歇尔发难。在递交给蒲立德这样一份清单后，顾维钧又与他商讨推动国会通过援华计划的最好办法，提出应制定像援助希腊和土耳其那样的修正案以对华提供军援，并使对华经援成为欧洲复兴计划的一部分。之后蒲立德到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便建议向中国提供一亿美元用于军援。顾维钧还将中国方面拟定的两份备忘录给他——一份是关于援华法案的修正案，另一份是关于军援法案的草案，以供他转交在国会中的朋友。[55]

杜鲁门提交援华方案后，国会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开始讨论。由于1948年是美国大选之年，共和党、民主党的两党之争对援华方案的最后通过也有影响。顾维钧对此十分注意：“本年将有大选，故政府与议院要人一切举措均不无政治意味，因此援华方案之关系，恐尚多变化，使我于推进应付工作，亦增困难。”[56]他特别重视与那些反对国务院当时的援华政策而在国会中有影响的共和党议员的联络，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和众议员周以德等人。

3月下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讨论对华援助问题时，最初多数议员以国务院未提军事援华，主张否决军事援华的提案。顾维钧明白这一讨论对中国至为关键，因此在国会中积极游说，并通过“重要友人数人分头疏通，直至半夜今晨得通过一亿元专款”，即在经济援助款项之外另拨一亿元专款，实际可用于购买军事装备。[57]由于这一专款数额不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的1.5亿美元专款，顾维钧又设法推动参议院增加数额。3月26日，顾维钧特地去拜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争取他在参议院以最有利于中国的方式通过援华法案。顾维钧向范登堡提出两个要求：第一，中国急需军援，因此希望将专款数额增至1.5亿美元；第二，国务院提出的5.7亿美元作为经济援助不变，军援作为追加数字。范登堡直言相告，第一点有可能办到，而第二点几乎没有希望。由于范登堡对蒋介石能否在军事上再坚持下去表示怀疑，顾维钧极力使他相信，蒋介石是一个坚强的人，决不会放弃斗争，所需的只是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58]顾维钧的这些话语打动了范登堡。几天后，当范登堡发现外交委员会向参议院提交的报告中包含许多贬低国民党政府的

言辞时，他撤回了这一报告，并在参议院发言赞扬蒋介石，驳斥反对援华法案的论点，支持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顾维钧获悉后在日记中称赞“范登堡的话字字珠玑。他的发言有力地支持了援华法案”。[59]

3月30日，参议院通过援华法案。次日，众议院也通过了援华法案。4月2日，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经磋商调整两院法案不同之处后通过了最后的援华法案，规定对华援助以一年为限，授权美国政府提供总数为4.63亿美元的对华援助，其中1.25亿美元为特别赠款，由中国政府自行决定其用途。虽然由于平衡了各种不同意见，最后通过的援华法案中没有“军援”的字眼，但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可使用1.25亿美元的特别赠款购买军事装备。这笔特别赠款的安排突破了国务院原先不向中国提供军援的限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民党政府的愿望。近半年来一直在为美援忙碌的顾维钧松了一口气，他明白特别赠款“包括了军事援助（尽管没有明白说出来）”，因此结果是“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是令人满足的”。[60]这笔特别赠款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顾维钧活动的结果。

援华法案在国会通过后，尚待国会参众两院的拨款委员会核定拨款的实际数额，中美两国政府也须签署相关的双边协定规定援助的实施细则。4月9日，顾维钧拜会副国务卿洛维特（Robert Lovett），商讨执行援华计划的手续问题，催促美方在国会确定实际拨款之前能采取措施使部分援华款项先行使用。但洛维特表示双方首先要签署一个草约，规定先行使用援华款项的细则。顾维钧向美方表示希望这样一个草约尽可能简单。4月30日，根据美国国务院提供的稿本，顾维钧与马歇尔就如何先行使用美国援助互换照会。按照会规定，在正式签署双边援助协定前，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援助除某些例外仍按1947年10月双方签署的救济援助协定的规定办理。[61]在这之前，顾维钧希望美国对华援助应仿照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模式，而不是沿袭处理救济问题的规定，因此对该照会内容并不十分满意，但为使美国尽快实施援助计划，也只得接受美方对援助的安排。

中美互换照会后，1948年援华法案的部分援助开始实施。但该法案在国会两院的拨款委员会审核时，却发生了一些周折。6月初，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审议援外法案时，削减了整个对外援助计划，对华援助款项也相应地从援华法案确定的4.63亿美元削减至4亿美元。顾维钧获悉后，立即找众议员周以德了解情况。随后又约见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布里奇斯（Styles Bridges）等人，希望他们能使参议院的拨款法案仍保

留4.63亿美元的数额。但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审议援华款项时，国务院的代表提出援华款项不应涉及军事援助，因为军事援助可能因国民党的失败而损坏美国的声誉，并可能使美国卷入同苏联的冲突。为此，顾维钧专门约请布里奇斯到大使馆会谈，具体反驳国务院的论点，并专为其准备一份备忘录，详细说明中国急需军事援助的情况，以及国务院的作梗使中国难以获得军火的困难。顾维钧的话语打动了布里奇斯，他专门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责问国务院为何拖延援华法案的实施，要求他向国会做出解释。[62]在此情况下，参议院通过的拨款法案仍维持了4.63亿美元的数额。最后，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经过协调后确定的拨款法案规定向中国提供总数4亿美元、为期12个月的援助，但可用于购买军事装备的1.25亿美元特别赠款数额维持不动，削减后的经济援助计划的数额为2.75亿美元。[63]这样，最后付诸实施的美国援华计划，尤其在军事援助方面，与美国国务院的初衷并不一致，而更符合国民党政府的期望。

7月3日，中美经过数月谈判后签署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援华法案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至10月3日，即援华法案通过6个月后，1.25亿美元特别赠款使用了88275170美元，约占70%，经济援助计划的2.75亿美元动用了97908000美元，约占35%，另有价值22285000美元的化肥和汽油正在采办之中。[64]

只是滚滚而来的美元并没能扭转国民党在军事上的颓势。就在这些美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之时，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接连败退。9月24日，山东省省会济南被人民解放军攻克。这是国共全面内战开始后国民党失守的第一座大城市。于是国民党政府紧急呼吁美国加大援助，发起了新的求援攻势。9月28日，蒋介石电令顾维钧向杜鲁门转交一份特别密电，请杜鲁门亲自干预，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军事援助。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顾维钧掂出了它的分量，感到“密电措辞极为迫切，语气近乎告急，说明军事局势确实十分严重”。为尽快将电报送到杜鲁门手上，顾维钧并不像往常一样由国务院转交，而是直接送交杜鲁门的私人参谋长李海（William Leahy）。[65]这种超乎外交常规的做法此后因局势的紧张成了常态。

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使顾维钧在向美国求援时有了新的想法。他认为，仅仅是货币形式的援助已经不够，必须争取美国政府直接提供武器和弹药，参与到中国的内战中来。先前在与美国商讨双边援助协定时，顾维钧还十分注意维护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和权益，而此时他

却主张在争取美国援华时，应避免提出中国的主权问题，不必担心美国干涉或侵犯中国的主权。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本质上不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借重美国的力量解决共产党问题后，什么时候叫它撤，它就会撤。[66]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党政权，顾维钧已经将自己投身外交界的初衷即恢复中国丧失的主权搁置一边了。而蒋介石此时为了挽回败局，也期望美国能介入中国的内战。11月9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以急切的口吻请求迅速增加军事援助，发表一项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强有力的声明，并派遣一名高级军事顾问共同拟订援助方案，包括参加指挥作战。[67]

11月11日，顾维钧访晤马歇尔出国期间代理国务卿职务的洛维特，希望在杜鲁门正式答复蒋介石前知道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函电的态度。洛维特公事公办地回答道，增加军事援助要由国会决定，发表声明得由总统本人决定，而派遣高级军官则根本无法办到。顾维钧对洛维特的答复十分不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很冷淡，毫无同情心”，“整个谈话虽然彬彬有礼，但令人沮丧”。[68]11月24日，顾维钧又拜访杜鲁门总统，当面提出蒋介石11月9日函电中的三项要求。杜鲁门对此也只是泛泛地表示愿予以考虑。[69]

顾维钧仍在竭尽全力地争取美国加强援华，但与半年多以前援华法案通过前后相比，他的求援活动处处受阻，因为美国政府正着手调整其对华援助政策乃及整个对华政策。国民党政府因济南失守而急于获得更多的美援，而美国也因济南一战对中国国内的局势有了新的评判。济南被人民解放军攻克次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向马歇尔报告时称，“济南失守对政府影响的确切性质尚难预测，但肯定是严重的”，“公众对政府生存能力的信心必定降到新的低点，并且肯定将立即在经济领域内显现出来”。[70]此后一段时间，司徒雷登和美国驻华各地的领事发回国务院的电报都是关于国民党政府接连败退的消息，并请示如何应对局势及对华政策应如何变更。10月26日，马歇尔给司徒雷登发了一封长电，在对后者所发的报告进行评论后指出，“总之，采取第1971号电报建议（即增加对华援助）的方法，有违于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切基本考虑，这将使美国直接卷入中国的内战中，并将使美国政府在军事和经济上为中国政府承担责任，而其代价是无法估计的，因为此时美国在全世界承担着与援外计划相关的繁重义务”。[71]十天后，司徒雷登召集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高级军官和大使馆的武官讨论军事形势，与会者得出的一致结论是“任何数量的军事援助都无法挽救目前日益恶化的局势，

除非美国军队参与作战”，“而美国军队的参战是不可能的”，“中国或美国都没有充分的时间来采取军事措施挽救这一军事形势”。[72]正是认为增加军事和经济援助无法挽救局势，也非其能力所及，美国政府才将国民党政府的求援要求搁置一边，不予理睬。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3月明确表示反对参议院所提出的以15亿美元作为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新的援华法案，而建议国会只延长1948年援华法案到期后尚未动用的约5400万美元的使用期限。美国国会后来根据国务院的这一建议于1949年4月中旬通过了新的法案。

顾维钧这一时期的求援活动四处碰壁，心情十分沮丧，对处理对华事务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屡有怨言。在一次与马歇尔会面遭到冷遇后，他在日记中对马歇尔评论道：

> 过去三十多年中，我至少和十几个国家的三四十位外交部长谈过活，打过交道，其中包括六位美国国务卿，但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难以开诚布公交换意见，不仅在普遍关心的问题上如此，而且在即使是中美双方特殊关心的专门问题上也如此。谈话的气氛几乎一直是生硬而拘谨的。[73]

顾维钧重返华盛顿的主要使命是争取美援。但对是否以及如何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美国国内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主张。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国务院对军事援助不甚积极，只愿意在经济上援助国民党政府，但将国民党政府自身的改革作为先决条件。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尤其是国会内外的亲国民党势力则不满国务院的做法，积极主张全面援助国民党政府。按照通常的外交渠道，顾维钧在美国寻求援助首先面对的正是对援华消极的国务院。但他没有被动地接受这一不利的局面，而是凭借对美国政治的深切了解和丰富的人脉关系，一方面按常规与国务院打交道，另一方面积极联络国会内外的亲国民党势力，向他们介绍情况，提供材料，争取国会议员的支持，并通过国会向国务院施加压力，从而影响了美国援华政策的制定。因为身处第一线，顾维钧向南京提出的许多建议，也成为国民党政府争取美援的基本方针。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而言，他都是双边关系中的关键人物。

但随着军事和经济上的失败，国民党在美国的求援活动失去了最基本的依据。美国政府逐渐与之拉开距离，即使亲国民党势力仍为它积极奔走，也难于扭转整个局势。顾维钧的求援活动由此陷入了困境。

三 台前幕后忙游说

在争取美援的过程中，游说美国朝野是顾维钧的主要手段，这也是他驻美期间的经常性活动。作为驻外大使，顾维钧一向很看重与驻在国朝野各界的广泛接触，以此进行沟通并取得对方的信任，达到预期的外交目标。而他善于应酬的交际才能和出色的口才也使他能游刃有余地周旋于社会各界。蒋介石派顾维钧重返华盛顿，正是希望发挥他这一优势，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使美国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

顾维钧离华赴任前，蒋介石与他最后一次谈话中，特别强调了在美国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指示他注意与在美国的英国“宣传家”和天主教等宗教团体多联系，因为他们对舆论的形成有影响。顾维钧则表示，商界与教育界也同样重要，而尤其应利用广播电台，并结交各界知名人士，向他们介绍中国情况。蒋介石对顾维钧的话十分重视，指示他做任何他认为有效的事来推进宣传，并保证在经费上予以支持。[74]蒋顾谈话中说的宣传就是在美国朝野进行游说。顾维钧抵美后向蒋介石提出，进行宣传游说每月需经费5000美元，请先拨6个月3万美元，但具体使用“仍实支实报，务求事属有济，款不虚耗，届时再审核效果，酌为增减”。蒋介石接电后，立即令财政部按每月5000美元给驻美使馆拨款。常规经费之外，还经常有特别经费。如1946年12月，蒋介石给驻美使馆一次性增拨6个月特别机密费3万美元。1950年3月，又让人给顾维钧送来一张2万美元的支票，作为特殊支出的费用。[75]

上任伊始，顾维钧确定了在美国进行游说宣传的四个要点（见本章第一节）。在上述几点中，顾维钧特别强调中国统一的重要性，以此作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依据。他告诉美国人，“我所期望之中国和平、统一、民主三端，统一实为先，国不统一，任何新政难收全效”。[76]但在杜鲁门主义出台后，遏制共产主义成为美国全球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顾维钧相应调整了在美宣传的重点。他从原来强调内战是因为中国必须统一，转而强调解决共产党问题是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和苏联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此来争取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

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是顾维钧在美国进行游说的主要目标。作为一名大使，国务院自然是顾维钧跑动最勤的政府机构，国务卿是他会见较多的美国官员。但他并不忽视与级别稍低的官员会面。他常

凭借私人关系，以不泄漏消息来源或不向南京报告为保证，从国务院官员那里探询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情况，以寻求应对之策。如前述1946年8月10日杜鲁门致蒋介石信，顾维钧就通过请远东司范宣德来使馆午餐，探得该信“并无恶意”，向蒋介石做了报告，然而并未向蒋提及消息来源，也未提与范宣德的会面。[77]

在与政府官员的会面中，顾维钧很注意利用美国政府内不同部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按他自己的话说，“我没有错过任何机会利用那些对美国政府政策持不同见解的内阁成员的同情和有利态度”。[78]如国防部与国务院在对华政策上主张不一致，他就有意识地与国防部官员尤其是助理部长格里菲斯（Paul Griffith）保持密切来往，以此推动美国加强援华，并借此探询政府决策内情。这样的做法自然会引起国务院的不快。

在国会议员中，参议院前后两任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康纳利（Thomas Connally），以及亲国民党议员周以德、诺兰（William Knowland）等都是顾维钧经常拜见的重要对象。其他人如参议员布里杰斯、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兰格（William Langer）、麦卡伦（Patrick McCarran），众议员博尔顿夫人（Frances Bolton）、麦科马克（John McCormack）、富尔顿（James Fulton），也在驻美使馆所开列的有固定联系的国会议员名单上。顾维钧常利用各种机会与国会议员在宴会和其他社交场合见面，向他们介绍国民党的观点，倾听他们的意见，设法引起国会对中国问题的足够关注，并向议员提供相关资料，甚至由使馆为一些议员代拟发言稿或议案的草案。例如，1946年12月，顾维钧亲自为范登堡拟了一份美国应无条件加强援助国民党的说帖，交范氏与杜鲁门讨论对华政策时用。[79]

在社会名流中，顾维钧与《时代》周刊老板卢斯（Henry Luce）、“飞虎将军”陈纳德、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柯尔伯（Alfred Kohlberg），尤其是蒲立德来往密切，通过他们影响议员、舆论以及政府的对华决策，也听取他们的各种建议。此外，因“宗教界于美国舆论势力亦大”，“教育、工商、实业、妇女各界要人左右舆论，其效亦宏”，顾维钧也积极予以联络。[80]

顾维钧很看重私人关系在游说中的作用。他认为，对周以德、蒲立德这样国民党的真诚朋友不必通过金钱来游说，但不能因此而忽视相互间的感情联络。1948年4月初援华法案通过后第二天，顾维钧就致电蒋

介石，称“此次美援案获有今日结果，美友中蒲立德君出力最多”，建议蒋介石以个人名义邀请蒲立德再次访华，“借示友谊”。他还向蒋介石提出，蒲立德“素爱我国工笔画及古玩，其他议会助我友人亦多同好”，请在国内采办或在美购买后分别赠送这些人。此后根据蒋介石“就近购赠”的指示，顾维钧购得一对12寸翡翠雕凤，以蒋介石名义赠送，蒲立德十分高兴。当获悉参议员诺兰的儿子即将结婚时，顾维钧致电蒋介石，建议以蒋的名义送礼。周以德访华前夕，顾维钧专电外交部，为他安排会见蒋介石、行政院长张群、外交部长王世杰，并特别指出“该议员一向拥戴我政府，实为中国挚友”，请在其访华期间“予以适当招待，但宜力避铺张，免招指摘，反于其回国后发言活动有所不便”。[81]对于结交朋友、笼络感情，顾维钧十分在行，分寸感掌握得恰到好处，照顾到方方面面。由此建立起的私人关系为他的游说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顾维钧在美国进行游说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新闻舆论界。临行前与蒋介石的谈话中，他就提到了广播电台的重要性。顾维钧认为影响新闻舆论界不能仅仅依靠向他们提供中国人自己写的文章和小册子，而更应该与之直接接触，当面沟通。一旦他们对国民党有了信任，由他们为国民党说话，更易获得美国公众的认可。因此，顾维钧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通报中国的情况。他还常举行与报刊主要负责人、专栏作家和资深记者编辑的非正式座谈会，以对话的方式来解释中国的局势。他认为，这种方式比正式的记者招待会更为有效。他还自己出镜上电视，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会见媒体”栏目与美国著名记者一起讨论中国问题。记者的提问十分尖锐，但按节目主持人的说法，顾维钧的回答有力、有礼。“会见媒体”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时事评论栏目，与顾维钧一起讨论的记者说，这档节目的观众有1000多万，参加这样的节目要胜过他演讲一百次，他是“一支单人大军”。[82]根据驻美使馆负责对外宣传官员的一份统计，从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初的四个月间，由于顾维钧本人的活动，有美联社、合众社、《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十多家主要媒体按顾维钧所解释的观点和提供的材料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文章和报道。[83]

向美国社会各界发表演说是顾维钧的又一重要活动，即直接向美国公众进行游说，通过公众舆论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熟悉美国政治运作的顾维钧知道，美国公众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他频繁奔赴美国各地，出现在大学、社会团体和俱乐部的演讲台上，可说是当时演说任务最繁忙的大使。有时，他一天

要做4次演讲，使用英语、法语等不同的语言。凭借着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练就的演说才能，顾维钧也总能吸引住美国的听众。1948年4月中旬的一天，他在匹兹堡做了两场演说。其中一场演说的题目是“远东形势的国际利害关系”，他讲了35分钟，而接下来的提问延续了45分钟。提问者中有一些被顾维钧认为对国民党不是十分同情或友善的人，但他没有回避那些带挑战性的问题。演说结束后，一些听众向顾维钧表示，他们转而信服他的说法了。[84]

在进行游说和宣传时，顾维钧主张要将事实真相以最合适的方式告诉美国官方和公众。他认为，政府应该让使馆充分了解国内的情况，有政策变化应提前告知，并提供全部事实，以便在第一线做宣传的人可以视情况而采取灵活的对策，事实“宛如作战之弹药，无事实即不能办有效之宣传，若仅仅辟谣或于事后辩正，效力甚微”。[85]但实际上政府对所采取的政策及相关的事实真相往往不能全部提供，尤其到内战后期，使馆无法获得国内的真实情况，顾维钧在游说中常感到捉襟见肘，无法施展。

在游说活动中，顾维钧有两个重要的助手——使馆公使衔参赞陈之迈和使馆秘书兼新闻发布官顾毓瑞，前者主要负责与国会的联络，后者主要负责与新闻舆论界的联络。上述由顾维钧本人直接进行的游说活动基本上不是以金钱来推动的。对于金钱与游说的关系，顾维钧说过，“企图用收买的办法在美国扩大宣传，只会把事情越弄越糟。因为一旦这种做法被发现，反应就会非常不利。另一方面，真诚朋友的帮助总是更起作用的。因为那些丝毫没有想要报酬或报答的中国的朋友们，站出来支持中国的事业，他们的话就会更有分量”。[86]重返华盛顿之初，顾维钧是照此行事的。他为在美国游说向南京申请的专款，主要是用于一般的交际、雇人收集资料等。但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接连失败而产生的对美援的迫切需要，以及为了挽回国民党在美国一落千丈的形象，从1948年起，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开始更多地使用以金钱推动的各种手段，顾维钧也就被卷入这一类游说活动中去了。

用金钱推动游说的一个手段是资助亲国民党的院外集团。例如，1949年6月，顾维钧要求外交部增拨一笔专款，其中资助中国应急委员会（China Emergency Committee）每月3000美元，一次资助6个月共18000美元，资助全美妇女协会4000美元。[87]中国应急委员会是这一年3月成立的旨在向美国政府施压以增加对华援助的团体。它的主席是

亲国民党企业家麦基（Frederick McKee），众议员周以德是它的全国咨询委员会成员。

资助院外集团是为了间接地疏通国会议员，此外还有直接疏通议员的手段。1948年2月，顾维钧致函外交部长王世杰，曰：

> 兹有一事奉商者。日昨某议员之挚友密告之迈（即陈之迈——引者注），谓援华关键既在议院，彼愿充本馆与议员间之联络员，从事疏通联络。该议员为某领袖之一，声望经验均足左右议案。惟此项工作在在需费，估计须支五万美元。其数虽巨，但须与该议员之法律顾问分润，该议员及其至友与法律顾问（原手稿此处有五个字字迹不清——引者注）。窃以此类联络工作似属有用。前年英国所得三十七亿五千万元借（款），闻亦聘有联络员多人疏通议员，卒得通过，所费甚巨。现某对我所索者，在彼目中为数甚微，全为开销必需用途，而在我外汇奇绌之时，或有难乎筹措之虑。又此项工作最宜秘密，否则有损无益。故即能筹措，其实施方法亦须谨慎。弟意最好由商业机关出面聘为顾问，须付款项亦由该机关直接交付，不由使馆出面办理，以防泄漏影响。细思中国银行、中央通讯社或世界贸易公司等中择一代理最为妥贴……[88]

此事后来如何进展，《顾维钧文件》中没有进一步的材料，《顾维钧回忆录》对此也一字未提。但从以下所述事例来看，当能得到南京的批准。

国民党以金钱推动游说活动的主要手段是雇佣代理人。这一时期国民党究竟雇了多少美国人为其进行游说活动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并非个别现象。根据美国国会的统计，到1951年还有10个登记过的国民党代理人仍在活动，当然这不会是总数，因为还有未登记的代理人。[89]这其中几个重要的代理人就是由驻美使馆聘用的。

驻美使馆聘用的一个重要说客是威廉·古德温（William J.Goodwin）。古德温是美国两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担任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司库，转投共和党后担任过西部五个州的共和党政治顾问。1948年3月31日，古德温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驻美办事处公共关系顾问的名义被聘用。按国民党对外公开的说法，聘用古德温是“为了让美国人及其政府和国会，以及工业、金融界的领导人更好地理解（资源）委

员会的目标和政策”，以吸引美国资本投资于中国的工业，因此这一任务是非政治性的。[90]但实际上，古德温从事的都是政治性很强的游说活动，与他保持联系的不是资源委员会驻美办事处，而是顾维钧手下的公使陈之迈。这也就是前面顾维钧给王世杰信中所说“不由使馆出面办理”，而找一家其他机构代理的办法。根据合同，古德温一年的聘用费是3万美元，其中包括酬金、法律顾问费和其他一切相关费用。但研究国民党游说活动的美国学者凯恩（Ross Koen）认为这3万美元仅仅是报酬，国民党还支付了其他费用。确实，1948年9月因《援华法案》通过，古德温就得到1万美元的额外补助。加上这笔补助，古德温第一年获得4万美元，他用于游说的支出是22857美元，纯报酬至少是17143美元。当时驻美使馆一等秘书的月收入是315美元，古德温的报酬应该说是非常丰厚了。[91]

古德温为国民党进行游说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国会议员。通常他会出面设宴，邀请国会议员与顾维钧、陈之迈等同桌交谈，规模一般在十人左右，目的在于向议员说明国民党的立场，争取他们在国会中对国民党的支持。1949年1月25日，古德温在大都会俱乐部设晚宴，出席者共13人，包括尼克松（Richard Nixon）等6名参议员，驻美使馆参加的是顾维钧、陈之迈和使馆秘书顾毓瑞。席间，顾维钧向议员们强调了共产党一旦控制全中国的严重后果。2月1日，古德温安排另一次晚宴，邀请共和党参议员巴特勒（Butler）、民主党参议员伊斯特兰（James Eastland）和5名来自两党的众议员与顾维钧见面。顾维钧请这些议员发表一项支持中国的政策声明，派一个由军事及其他方面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去中国，并制订一项援助国民党的计划。几天后，古德温又以同样的方式安排顾维钧与另一批国会议员见面。[92]驻美使馆在1949年3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古德温非常积极地与国会领袖接触，已安排了6次晚宴和几次午餐，使顾维钧有机会向他们表达国民党的观点。[93]

安排与议员见面是公开的活动，私下里古德温还有事要做，就是向议员提供有关中国的材料，甚至为他们起草发言稿，以便他们在国会中为国民党说话。1948年10月，古德温帮助参议员米利金（Milikin）起草发言稿，有关中国的内容特地征询了陈之迈的意见。他告诉陈之迈，这篇发言十分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以塔夫脱（Robert Taft）为首的一大批参议员的观点。报告发表后，所有的重要报纸都予以报道。1948年总统大选前，古德温自己并介绍陈之迈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提供了大量有

关中国的材料，为共和党攻击民主党的对华政策提供炮弹。[94]

古德温受聘之初，主要与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保持密切联系，对民主党议员关注相对不多。但在1948年11月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出人意料失败后，国民党急于摆脱向共和党一边倒的尴尬境地，在陈之迈的推动下，古德温加强了与民主党议员的联系，运动南方各州的民主党议员在对华问题上与共和党站在一起。古德温与两党都有很深的渊源，对此他十分自得："我在国会很有影响力，因为两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尊重我，并完全相信我的真诚，而不管我在政治上或商业上担任怎样的职位。"[95]

古德温作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驻美办事处公共关系顾问"的聘期是一年。1948年11月，他向陈之迈提出，希望在次年3月期满后续聘一年，并将聘用费提高到5万美元，他保证会使国会在次年春天通过一个大规模的援华法案。陈之迈在向顾维钧报告时建议，可视古德温能否使国会通过新的援华法案再做决定。[96]多半是因为国会没能通过新的援华法案，聘期期满后古德温没有被续聘。但他屡屡向陈之迈表示继续为国民党进行游说的意愿，在给顾维钧的信中甚至提出可以"只要求经费，而放弃酬金"。[97]1949年7月6日，古德温以中华新闻社公共关系顾问的名义被驻美使馆再聘一年，聘用费25000美元。顾维钧向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报告时称，最后拍板做出决定的是"在纽约的幕后实权人物"，即此时在纽约的宋美龄。经宋美龄修改批准的古德温的聘书上写着："以期影响美国立法，使之有利于国民政府之大业。"[98]

古德温在第二个聘期内很快就遇到了麻烦。9月18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刊登了题为《蒋在国会搞院外活动》的文章，揭露国民党以一年25000美元雇用古德温游说国会一事。其他报纸也纷纷就此事大做文章，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在美国舆论的压力下，中华新闻社打算发表声明，表示对古德温之事并不知情，但马上被顾维钧制止。后来，顾维钧口述回忆录时也表示，驻美使馆与雇用古德温一事毫不相干，也毫不知情。其实，此事经美国媒体披露后影响极坏，几乎成为国民党出钱进行游说的代名词，这才是顾维钧后来推托说不知情的缘由。1950年4月10日，古德温的合同被提前解除。[99]

古德温的游说活动主要集中于国会，虽然他对新闻媒体也做工作，但在这方面离国民党的期望有很大距离。驻美使馆负责新闻舆论工作的秘书顾毓瑞对此有这样的评论："古德温的工作是称职的，但肯定不是第一流的。他的接触范围有限。他没有也无法影响新闻和广播界。"为此，

顾毓瑞在1949年初建议顾维钧另聘一流的公共关系专家专门对媒体开展工作，并重点推荐了诺曼·佩奇（Norman Paige）。[100]

佩奇是一名电台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担任美国广播公司（ABC）驻远东的记者，战后自己在菲律宾开办了三家商业电台，大为获利。顾毓瑞在1949年5、6月间与佩奇进行了多次接触，探讨其为国民党对美国媒体开展工作的可能性。佩奇对此工作很感兴趣，在6月上旬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自己的工作设想。在备忘录中，佩奇表示他将与驻美使馆的官员保持密切联系，用大部分时间与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等地的媒体领导人接触，尽全力通过新闻、广播、影片等向美国公众宣传国民党的政策，重点是发动一场强调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将威胁美国安全的“恐怖”战役。佩奇提出完成这些任务每月的最低费用是2500美元，其中2000美元是薪金，500美元是工作经费。[101]顾毓瑞在与佩奇接触后得出这样的印象：“他似乎非常熟悉新闻和广播界，因此能在这一领域内做出色的工作。”于是向顾维钧建议由国民党在美国的某一机构出面聘用佩奇。与此同时，陈之迈根据自己获得的情报也向顾维钧报告，佩奇是一个优秀的作者、组织者和行政管理者，在美国的广播和杂志圈联系广泛，并且在大电台的主管中享有很高的声誉。[102]

在顾毓瑞和陈之迈的共同推荐下，顾维钧决定以中华新闻社公共关系顾问的名义从1949年7月起聘用佩奇9个月，每月费用2500美元，任务是与电台联系安排广播节目，并且每周在大报上、每月在杂志上各安排发表两篇文章。驻美使馆负责与佩奇联系的是顾毓瑞。顾维钧刚做出这一决定，就于7月19日收到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的电报，要求他与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等重要的专栏作家以及电台评论家建立密切联系，向他们提供信息并提出建议，以此影响美国的舆论，为此将拨给特别经费。顾维钧遂向叶公超报告了聘用佩奇一事，要求每月拨给3500美元，其中2500美元是佩奇的薪金，1000美元是各项支出，首期9个月一共31500美元。9月10日，外交部核准了这笔费用。[103]

在9个月的聘期中，佩奇进行了两次工作旅行，尤其对国民党以往关注较少的西部地区倾注了很大精力。在工作旅行中，佩奇访问了全美各地40余家有影响的报纸，让它们接受并使用国民党提供的材料。这40余家报纸每天的读者总共约有5000万人。

西部的一些主要报纸如《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波特兰日报》（*Portland Journal*）、《洛杉矶镜报》（*Los Angeles Mirror*）、《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原先的社论都持批评国民党的立场，佩奇就重点上门游说，使它们的出版商和编辑改而采取对国民党同情的态度。据佩奇向使馆的报告，经过他9个月的努力，一条能够向美国媒体输送有利于国民党的材料的渠道已经建立起来。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只剩一家大报《圣路易斯邮报》（*St.Louis Post-Dispatch*）尚未改变反对国民党的立场。佩奇是电台记者出身，每到一地，必访问当地电台。经他做工作后，这些电台最显著的变化是有利于国民党的报道在头条新闻中的比例增加了。在加州，他还专门去访问好莱坞，与各大制片公司商讨以电影的形式宣传国民党的可能性，其间与米高梅公司就拍摄陈纳德“飞虎队”的故事片进行了探讨。[104]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佩奇9个月聘期内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顾维钧对此非常满意，因此在1949年12月向宋美龄提出，希望在佩奇的合同到期后，由她出钱继续雇佣佩奇。但此时古德温事件风波刚过，宋美龄以无经费为由予以拒绝。[105]1950年3月15日，顾维钧致电叶公超，认为佩奇过去9个月的工作非常成功，建议续聘他6个月或9个月。叶公超予以同意。4月4日，顾维钧与顾毓瑞、陈之迈一起与佩奇见面，通知他原先的合作将延续下去，同时对他的工作提出新的具体要求：要着重宣传国民党军队士气的提高、政局的好转、中国大陆人民的不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苏联背景，要着重报道“事实”，既有新闻，又有资料数据，让“事实”引导人民得出有利于国民党的结论，而不要总是敦促报纸撰写有利于国民党的社论。[106]

佩奇续聘后仍以主要精力赴各地旅行，联络报纸和电台。在1950年10月给“使馆”的报告中，他写到，从1949年7月受聘至今，已在全美旅行了10万英里。[107]1950年12月上旬，在顾维钧安排下，佩奇赴台湾访问。访台的经费预算是3000美元。在台湾的一个多月中，他先后与蒋介石、宋美龄、陈诚、叶公超、吴国桢、孙立人等晤谈。回到美国后，佩奇再次周游全美各地，向媒体和公众做宣传。据他自己说，这使美国公众对台湾的看法普遍有好转。[108]佩奇最初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美国西部，1951年上半年，他又根据顾维钧的建议对南方和新英格兰地区进行了访问，以便与那里的媒体领导人建立密切的联系。

顾维钧对佩奇推动报纸和电台宣传国民党的工作评价很高，称赞他采用“悄悄地”同出版商、专栏作家、电台和电视评论员、经理人员进行

接触的办法，“宣传工作是相当成功的”。[109]因此每当佩奇聘期届满，他都力主续聘。1951年1月，佩奇获续聘9个月。7月，顾维钧致电叶公超，请在这一个聘期期满后，再聘用佩奇。但叶公超没有赞成，理由是“外汇短绌，又值所谓游说问题甚嚣尘上，为避嫌计，与Norman Paige合同拟不续签”。顾维钧接电后，立即回电表明自己的看法：“贝奇（即佩奇）君向专心于联络报界及广播方面重要人物，俾助宣传唤起美民众注意，对美国会及政界从无接触，应不至涉及所谓游说之嫌，突然解聘，恐反滋揣测。”在顾维钧的坚持下，叶公超同意续聘佩奇一年。[110]1952年1月，由于外汇短缺，佩奇同意将其薪金和经费削减百分之二十。10月下旬，顾维钧向正在美国访问的叶公超提出佩奇续约问题，建议再续约一年，并为此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叶公超同意了这一要求。但12月，叶公超以外汇短缺、预算无法平衡为由决定不再与佩奇续约。中华新闻社对佩奇以该社公共顾问名义活动却不归该社管辖一直就不太情愿，况且佩奇一人的报酬就等于该社全年的预算，自然支持这一决定。[111]至此，从1949年7月起，佩奇以中华新闻社公关顾问名义被驻美使馆雇佣达三年半之久。

古德温和佩奇虽是为驻美使馆工作，但都有个资源委员会或中华新闻社公关顾问的对外公开身份。除了这种以公开名义开展的活动外，驻美使馆还以暗中资助的方式请美国人做宣传，这就是伊曼纽尔·拉森（Emmanuel Larsen）和他的《远东通讯》（*Far Eastern News Letters*）。

1948年2、3月间，拉森在与陈之迈、孔祥熙商讨并得到资助的承诺后，创办了《远东通讯》。陈之迈是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联系人。《远东通讯》是月刊，有关中国的新闻皆反映国民党的观点，其材料大多由陈之迈提供，每期的内容也是在与陈之迈讨论后确定的。该刊发行量不算大，但在所有大学图书馆和相当规模的公共图书馆中都有陈列，关心远东事务的人都能读到。一些亲国民党的美国人告诉陈之迈，《远东通讯》在为国民党做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国民党的中华新闻社办的《中国杂志》（*China Magazine*）大，后者因为完全是“宣传”而“无人阅读”。陈之迈认为，《远东通讯》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渠道，使得国民党能够在一般媒体不合作的情况下发表有利于自己的观点和材料，而不被认为是“宣传”。[112]

《远东通讯》的经费主要由驻美使馆资助。根据陈之迈给顾维钧的

报告，《远东通讯》的开办费2000美元来自孔祥熙，通过陈之迈分两次资助。开办后，陈之迈根据顾维钧的指示，以拉森给美国报刊写读者来信宣传国民党观点的形式给其报酬，至1948年12月初，这样的报酬一共给了1500美元。此外，陈之迈从自己每月300美元的活动经费中不时给拉森50美元或100美元的资助，至1948年12月累计达1200美元。顾毓瑞也从自己的活动经费中另外资助了拉森200美元。这些款项共计4900美元。此外，《远东通讯》按驻美使馆的要求加印增刊也会得到补助。1948年8月，共和党众议员巴斯贝（Busbey）在国会做了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长篇发言后，陈之迈请拉森将该发言作为增刊印行一万份免费发放，为此支付给拉森400美元稿费、120美元赴芝加哥与巴斯贝联系的差旅费和257.9美元的印刷费。10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题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博尔顿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对国民党十分有利，但过于冗长。陈之迈请拉森将其缩写后作为《远东通讯》增刊发行，为此支付了550美元。[113]由于《远东通讯》每期的发行并不赢利，而且还有亏本，陈之迈在12月初专门致信顾维钧，说明它的财政窘况，请顾维钧予以特别考虑。顾维钧对陈之迈该信的批复是：“已由余支出转付，免留痕迹。”[114]虽具体资助多少不得而知，但想对外遮掩使馆与拉森的联系则是十分明显的。

顾维钧与驻美使馆在美国进行的游说活动，按美国法律来说，有的是合法的，有的则是非法的。顾维钧对国会议员、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和舆论界的游说是合法的，因为向驻在国说明本国的情况并施加影响是使馆的正常职责；但为议员代拟讲稿、起草议案就卷入了美国国内政治，不是外交官该做的事了。至于雇用代理人进行游说，美国于1938年通过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规定，所有“代表外国政府、外国政党和其他外国政治委托人进行政治宣传和其他活动”的人必须“向公众曝光”，这包括代理人必须向司法部登记，报告本人和外国委托人的姓名及住址、与委托人签订的合同、活动的性质和范围、接受的金钱及其具体用途，并递交政治宣传的文本。[115]古德温两次受雇都向司法部做了登记，但他实际从事的是与法律条文规定不相符的活动。古德温第一次受雇是作为资源委员会公关顾问登记的，但他根本不是为资源委员会而是为驻美使馆工作，从事的是与资源委员会毫不相干的活动。因《援华法案》通过，古德温在1948年9月得到1万美元的额外补助，但在司法部却无此项记录，即他未按规定报告。[116]至于顾维钧向王世杰提出的通过巨款运动议员以使议案通过，那就完全是违反美国法律的活动了，所以顾维钧主张由商业机构出面，尽可能将事情做得隐蔽些。

以金钱推动的游说活动在1948年以后迅速展开，与国民党因国内失败急切需要美援相关。这样的游说活动需要大量金钱，顾维钧在1949年时感叹“人财两乏”，因为各项游说活动“均需巨款方能实施”。[117]

这一时期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除了顾维钧主持使馆开展的以外，正在美国的宋美龄和孔祥熙也在推进。对于在美游说活动政出多门，顾维钧出任大使后不久就向王世杰提出，在美宣传工作应有“适当划一之指导”。但这一状况始终没有改变。在一次驻美外交官员的内部会议中，顾维钧抱怨说，在美宣传游说，“使馆理应主持，但经费不统一，用人无权，而中央派至美国之宣传负其使命工作，咸不与使馆接洽，亦无片纸只字之报告到使馆，以收统一之效”，一些人获得一些皮毛之见，就赶紧向国内报告急于邀功。[118]这种政出多门、互不协调的做法给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带来了负面影响，也给后人了解国民党游说的全貌增加了困难。

四 自由主义者的无奈

1948年秋，当顾维钧在为争取美援不遗余力地奔忙时，中国国内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9月下旬，济南失守之际，蒋介石几夜未得安眠，叹道："以济南失陷，对外对内关系太大，有损于政府威信莫甚，政局、外交、经济更为拮据。"[119]此后，国民党在战场上失利的消息接踵而来，国内各方面人士也纷纷来美，滞留不归以寻退路，驻美使馆中人心浮动，有人还提出了离职要求。

1948年底，蒋介石的心腹陈布雷因对时局绝望而自杀。1949年初，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也因同样原因而自杀。顾维钧与两人都有来往，消息传来，对他震动很大。这一时期，国内来人很多，与他们见面，顾维钧都要询问军事方面的情况以及推行金圆券造成的后果。他对急剧恶化的局势十分不安，对国民党短时间内在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溃败感到困惑，与当时许多人一样思考着其中的原因。在一则日记中，他写道：

> 局势是可悲的。它说明过去多年我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有某些错误。忽略了在治理国家中应当注意人民意愿的原则，以致损害了中国。中国古训"民为邦本"，意义至深。按现代的意义说，人民是国家的股东，政府不过是董事会。董事会不可能一直违反股东的利益进行经营而不遭到股东的怀疑，失去他们的支持，以致引起抗议和反对。[120]

顾维钧的这一分析显然触到了国民党失败的主因，即人心的背离，也显示出信奉英美式民主政体的他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不满。顾维钧自认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在英国目睹了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内阁在大选中被工党击败，随后在外交场合看到工党的外相贝文和刚下台的前外相艾登相互间可以毫无拘束地交谈，称赞这是真正的民主制度。[121]然而，对民主制度的称赞和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却没有让他在时局动荡之际放弃为这个政权服务。1948年12月，刚结束在欧洲的访问来到华盛顿的驻加拿大大使刘锴告诉顾维钧，他与驻欧洲各国的大使如驻法大使钱泰、驻苏大使傅秉常等讨论了一旦共产党攻占南京后如何应对的问题，他们有主张立即辞职的，也有不赞成的，但普遍都对现政权不满，觉得变一变对中国来说会好一些。但顾维钧对此看

法不以为然，认为即使南京陷落了，战斗还会继续下去，总会有一个代表中国的政府，尽管也许设在广州或重庆。这表示了他继续追随国民党政权的意愿。[122]

在对国民党统治表示不满的同时还继续追随国民党，主要原因在于顾维钧对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的看法。如前所述，在赴华盛顿上任时，顾维钧已认识到国共之间不可能通过政治途径达成妥协，国共问题也不仅仅是国内问题，他原先所持的超然中立的态度因此发生了变化。随着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进军并将它的各项政策在各地付诸实施，既受中国传统思想熏陶又接受了西方教育的顾维钧，对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对立感。他认为，共产党背离了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走极端地接受并鼓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看法与当时冷战正酣的国际局势完全合拍，而顾维钧又恰身处反共意识强烈的美国，自然会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苏联全球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亚洲沦于共产党之下，即使目前苏俄在欧洲失败，它最终仍将获得胜利。如果它失去亚洲，即使眼前在欧洲得胜，它也完不成世界革命和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世界的目标”，“而中国则是亚洲的关键”。[123]

1948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宣布了一批国民党战犯。在43人的名单上，顾维钧榜上有名，列在第22位，排在宋美龄、阎锡山等人之前。在这份战犯名单中，顾维钧是唯一的驻外大使，更是唯一在1928年北京政府垮台后被国民政府也通缉过的人。顾维钧被共产党宣布为战犯，显然是因为他在国共内战中竭尽全力为国民党争取美援。对于名列战犯，顾维钧没有太激烈的反应。当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听到消息表示惊讶时，顾维钧还说，对他而言这是“一种荣誉”。[124]然而，被列入要惩处的战犯名单后，在正进行战略决战的国共之间，顾维钧就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余地了。

统治了中国20多年的国民党此时确已是一座将倾的大厦。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军事上一败再败和内部桂系的压力下发表文告，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按中共提出的条件进行和谈。顾维钧此时对国共和谈不抱希望。在蒋介石下野前夕致蒋的电报中，他认为，“共党决无诚意言和，必仍图恃武力压迫政府无条件降服，以造成共党把持之政府”。1月下旬，他又致电蒋介石、李宗仁等，请他们在与共产党打

交道时务必坚持体面的和平，反对按中共的条件进行和谈。[125]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

蒋介石下野后，仍在自己的老家溪口发号施令，通过亲信嫡系继续掌控着国民党尤其是军队。李宗仁在南京城中虽顶着代总统的头衔，却很难行使实权。远在大洋彼岸的顾维钧感觉到国内混乱的局势，有一阵子大使馆的武官甚至连国防部是在南京还是广州或其他什么地方都无从得知，也不清楚谁在当国防部长。

面对纷乱的政局，顾维钧在应对“内交”方面像往常一样十分老到。他既接受南京的指令，也与溪口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他仍称其为总统，并报告在美交涉的一切情况，包括李宗仁私人代表甘介侯来美后的活动。在他看来，“引退”并非辞职。[126]因此在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他对前者靠得更近。顾维钧的这一态度使李宗仁十分恼火，认为他“玩忽法统”，完全听命于蒋介石，而对自己则“完全采敷衍态度”，这是他另派甘介侯来美的主要原因。[127]

让顾维钧感到更为棘手的是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态度，这是他作为驻美大使必须面对的问题。当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战场上溃败之时，美国政府认定美国的援助已无法挽救这个正在崩溃的政权，也无法阻止共产党夺取全中国，因此对国民党的求援无动于衷，敷衍了事。在与美国高层官员的交往中，他得到了这样的印象：“一旦蒋委员长决定下台，美国人决不会为他洒一滴眼泪。”[128]尽管如此，顾维钧对获得美国的援助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而是认为关键在国民党自己能否采取措施进行改革，以取得美国的信任。1月底，顾维钧与天主教大主教于斌讨论国内局势，提出国民党迫切需要改革的六个方面：（1）组成一套无私、有勇气和有经验的顾问班子帮助蒋介石；（2）重组军队，由忠诚、精干的军官担任指挥；（3）用有为的年轻人替换老年官员；（4）各省主席任用文官以恢复老百姓的信任与合作；（5）照顾及任用大学生；（6）在经济和贸易方面采取自由竞争的政策。他认为，如果蒋介石重新掌权并实行这些改革，美国就不会抛弃中国，美援就会源源不断地进来。作为外交官的顾维钧对改进国内政局提出如此具体的计划，以至于他自己也认为自己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政治家。[129]

大厦将倾之际，主张国民党必须改革，同时仍寄希望于蒋介石，这不仅仅是顾维钧一个人的立场。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蒋廷黻和4月下旬从国内来美国的胡适都有相似的看法。4月27日，顾维钧与刚到纽约的胡

适以及蒋廷黻一起午餐，话题是如何挽救局势。当天顾维钧回华盛顿处理使馆事务，胡适与蒋廷黻继续交谈时谈到了国内糟糕的经济和军事状况对蒋介石声望的打击，但认为蒋介石仍坚持反共。[130]

5月2日，胡适在华盛顿驻美使馆与顾维钧晚餐，国内局势是他们讨论的主题。第二天，胡适带着一份使馆起草但经他修改过准备发往国内的电报稿回到纽约，与蒋廷黻讨论。蒋廷黻对电报稿提出修改意见，包括国内应在仍掌控的南方范围内促进各派团结、鼓励新人与新政策等。胡适接受了修改意见。[131]5月6日，这份由胡适最后改定的电报由顾维钧领衔向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等国民党高层发出，在顾维钧后面签名的依次是胡适、于斌、蒋廷黻，以及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代表刘师舜、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代表张彭春、远东委员会代表李惟果等。除于斌外，其余6人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

电报称，由于“长江不守，京镇苏杭不战而陷”，美国国内对华“失败主义气焰遂更高涨”，使馆因此连日召集专家商讨对策，一致认为国民党“只有事实上的大改善”，才可以扭转美国政府的失败主义心理，继续获得美国的援助，以支撑住战局。电报提出必须立即着手进行的三项事情：

> 第一，眼前亟需军事上有所表现，必须在大陆上明定必守的区域，全力固守，建起一个自由中国的规模，尤须在有利地带予共军以有效的打击，始可以使世人相信我尚有斗志，尚有力量。第二，必须使世人昭知我国军政各方各派系实已精诚团结，一致反共，一致为民族国家奋斗。第三，必须使世人相信我政府实能扫除旧习，充分用新人，行新政，争取人民的拥戴。以上三事，实为恢复友邦信心、转移世界舆论的要图，而尤以军事上能撑得住为最要。我若真能撑住一个自由中国，则友邦援助必来无疑。[132]

这份电报虽由胡适定稿，使馆却是发起者，并拟出了初稿，电报中主张的三点是顾维钧此时反复强调的国民党要获得美援的三个前提：抵抗、团结、争取民众支持。电报表明顾维钧、胡适等人有相同的看法。蒋介石、李宗仁等收到电报后都有回复，称赞顾维钧等“忠忱谋国”，“所提三点确为当前最重要之方针”。[133]

电报发出后两天，顾维钧与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杜勒斯

（John Dulles）就中国局势及国民党应该如何赢得美国政府的好感和支持进行交谈。顾维钧表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重建一个新内阁，全部由胡适、晏阳初、吴国桢、孙立人这些美国人熟知的富有才干的人组成，并且实行改革的计划。杜勒斯赞同这一看法，认为这是纠正美国国内对国民党偏见的唯一办法。[134]顾维钧的这一主张是上述电报所提方案的具体化。这一方案并不是抛开蒋介石、李宗仁这些人另起炉灶，而是“补天”，是在承认他们掌控权的基础上引入新人，增加活力，以取得美国的信任。此后几个月，顾维钧为组建一个由有留美背景的自由主义者所组成的内阁，推动国民党改革，倾注了很大精力，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在这一过程中，他与胡适、蒋廷黻来往密切，互动频繁。

6月4日晚，顾维钧与蒋廷黻在华盛顿有一次长谈。他表示，美国能否援华取决于国民党自身能够做些什么。在重申团结、抵抗、争取民众支持三项主张时，他强调团结不仅是领袖之间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合作，还包括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作。为达到此目标，顾维钧提出应让胡适出来担任行政院长，并有权挑选内阁成员。在回答蒋廷黻关于新内阁成员的询问时，顾维钧谈了他所考虑的内阁重要职位的人选，如由蒋廷黻本人或王世杰任外交部长，孙立人任国防部长，陈光甫或蒋廷黻任财政部长，晏阳初任经济部长，而其他几个不太重要的部长职位应该留给西北马家集团、国民党、川系、桂系等。顾维钧设想的这个内阁是由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学生为主的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在这个内阁中国民党被视为与桂系一样的一个派系，但并不完全排斥蒋介石。蒋廷黻告诉顾维钧，前些天与胡适谈过，他也有相同想法，可以齐心合力一起来做。顾维钧说，这是拯救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和最后一张牌了，目的就是通过实行改革取得美国的援助。[135]第二天，顾维钧又在驻美使馆双橡园召集会议，出席者有青年党的曾琦以及于斌等人。在会上，顾维钧强调了与蒋廷黻交谈中提到的各点。[136]

顾维钧等人在美国酝酿新内阁之时，国民党在国内正要更换内阁，任命胡适出任外交部长。顾维钧获悉这一消息十分兴奋，将此看作自由主义者组阁的第一步，立即给胡适送去祝贺，胡适这才知道自己被任命的消息。6月16日，顾维钧与胡适在双橡园就此问题进行了3小时的长谈。顾维钧力劝胡适接受外长一职，但胡适对此有种种顾虑，一是认为蒋介石并不愿意他接受此职，二是对李宗仁的度量大小有看法，三是与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有宿怨，且不满阎内阁的人员组成。顾维钧竭力说服胡适，称出任外长是为下一步准备的台阶，接下来就是成为一个由具

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新人组成的新内阁的首脑。这样一个内阁是美国人乐意看见的，因此应该按美国的期望行事，以保证获取美国的援助；而没有美援，国民党的处境就会非常危险。他对胡适说，你“是我们的王牌”，成败在此一举了。但胡适仍不为所动，说即使出任行政院长，没有一个自己挑选的班子也不能做成什么事，但说可能会在9月回国后组织一个像政党那样的自由主义社。[137]

6月21日，胡适致电阎锡山坚辞外交部长：“日夜自省，实无能力担任此职。”并称“适在此为国家辩冤白谤，私人地位实更有力量”，即以一介平民身份反能为国民党做些事情。[138]第二天，他给顾维钧看了电报稿。6月23日，顾维钧与胡适、蒋廷黻共进午餐。席间，顾维钧仍竭力劝说胡适出山担任行政院长，并说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针对胡适关于在蒋介石与李宗仁对立的情况下无法有所建树的疑虑，顾维钧给他出主意说，可任用50来个无职务无头衔也不领薪俸，但是有地位、有声望的人，充当他的代表，在国民党各派领袖之间、各派领袖与内阁之间、中央政府与各省之间进行联络沟通，说服国民党各派将全部权力交给内阁，捐弃个人分歧，实现真正的合作。这一通过个人间的沟通解决派系分歧的办法，与顾维钧自己在北京政府任职的经历有关，也与他外交官的职业习惯相符。顾维钧还说，胡适是一位无个人企图、不谋私利的自由主义者，因此最适合出来领导新内阁。胡适回答说他不能胜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因为生性不愿向任何人发号施令。顾维钧马上说，这是一种美德，足以保证内阁通过坦率和充分的讨论，以民主的方式形成决议。参加谈话的蒋廷黻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顾维钧“极尽其能言善辩之口才”力图说服胡适。但胡适仍坚持己见，不肯出山，并推举了蒋廷黻、王世杰等人作为替代人选，这使蒋廷黻十分恼火。[139]

在劝说胡适接受外长并为组阁做准备的同时，顾维钧向胡适建议，以被任命而未上任的外交部长的身份与美国政府官员见面，沟通两国关系。胡适对此未持异议。顾维钧在7月1日与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会面时提出这一要求，艾奇逊当面表示愿与胡适见面一叙。但胡适于7月中旬抵达华盛顿后，艾奇逊却食言不肯与其会面。胡适对蒋廷黻谈起此次华盛顿之行，坦陈十分“沮丧”。在回答宋子文关于艾奇逊为何避见胡适的询问时，顾维钧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艾奇逊不愿影响尚未接受新职的胡适做出最后决定，另一是胡适曾公开批评马歇尔的对华政策。[140]

虽然一时无法说服胡适，但顾维钧并没有完全放弃。7月25日，顾维钧在纽约与宋子文见面，组成一个由留美学生构成的新内阁是两人交谈的主题，他们都认为这是挽救时局的唯一途径。顾维钧对宋子文说，由蒋介石主持军事并在其支持下将政治和政府事务交给新内阁，就可以摆脱目前的困境，并影响美国政府，重新获得美援。[141]

8月21日，顾维钧在其纽约下榻的酒店与宋子文、胡适、蒋廷黻和贝祖诒等讨论国内局势和应对之道，讨论从下午1点开始一直到5点半结束，持续了4个半小时。除了美国国务院发表不久的白皮书和向联合国控诉苏联问题外，讨论集中在如何通过自身的改革以获得美国的支持和援助。顾维钧谈了他与司徒雷登、参议员诺兰等谈话的内容，这几个美国人都说如果中国实行自救，美国就会帮助中国。但谈到自救，胡适仍固执地表示不愿出任外交部长或行政院长之类负责任的公职，不想陷入进去，并对自由主义者出来帮助政府以使美国相信中国自救的愿望不抱希望。讨论中，蒋廷黻对胡适的一再拒绝很不耐烦，对胡适说你去做中国的甘地吧，我们去找一位中国的尼赫鲁。[142]9月初，在与司徒雷登见面时，顾维钧仍主张一个自由主义者组成的新内阁。[143]

顾维钧和蒋廷黻等所期望并极力推动的新内阁主张，在1949年夏热闹了一阵后，就偃旗息鼓了。被顾维钧视为“王牌”也即实施这一计划关键的胡适，始终坚持不接受任何公职。胡适之外，顾维钧他们实在找不到一个能够顶替的角色，尽管蒋廷黻说要另去找一位中国的尼赫鲁，最终仍然一无所获。新内阁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去补天。虽然他们主张自由主义者在新内阁中应获得全权以便能够收拾局面，因此国民党包括蒋介石必须退居幕后，但如顾维钧对宋子文所说，这样的往后靠只是暂时的，是为了应对美国政府中对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越来越多的反对，一旦渡过难关，仍可拥护蒋介石再当领袖。[144]虽然顾维钧他们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但蒋介石根本不愿放弃一点点实权，这就注定了新内阁计划根本无法付诸实施。而这些有留美经历的自由主义者虽对政治有兴趣，也有一番抱负，但对自己去趟政治这潭浑水又都有程度不同的顾虑。蒋廷黻在劝胡适出山时以入水做比喻，说那潭水看上去很可怕，但一旦你跳进去了，就会觉得很愉快。[145]然而，当胡适提名由他来替代时，他却也不愿跳进去，并且还很恼火。

推动新内阁计划的着眼点是争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顾维钧多次向美国方面表示自由主义者自救改革的决心和新内阁的前景，以鼓励美国

对中国局势的信心。美国政府对受过美国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一向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这些人能在中国发挥重要的作用，就像马歇尔曾说的，中国的关键在于自由主义者在政府中和少数党中担起领导作用。但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美国政府认识到，没有人能够挽救这个政权了，故已经决定采取从中国“脱身”的政策。对这一点，倒是胡适比顾维钧看得要清楚些。他认为，让自由主义者出来协助国民党，“使美国相信我们自救的真诚愿望是无济于事的”。[146]

在与顾维钧一起酝酿新内阁之时，蒋廷黻还在筹划组建一个新政党——中国自由党。蒋廷黻组党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45年，希望在国民党之外另组一个反对党。1947年下半年他出任驻联合国代表后不久，向顾维钧提起组党的问题。顾维钧赞同这个设想，与他讨论了党纲和章程。后来因为国内局势变化，他们“这方面的兴趣也就衰退了”。[147]

1949年夏，蒋廷黻再提组党之事。8月29日，他与胡适讨论组党问题，列了一份发起人的名单，蒋廷黻、胡适、顾孟余、翁文灏、傅斯年、陈光甫、郭泰祺、于斌等之外，顾维钧也在其中。9月7日，蒋廷黻将他与胡适讨论后拟订的中国自由党党纲交顾维钧征求意见，并请他担任自由党的发起人。9月14日，顾维钧回复蒋廷黻，愿意担任自由党发起人，并赞同党纲。他还对党纲提出修改意见，建议增加收取党费作为收入的规定，并公布财务和决算报告。信函发出后，顾维钧想到自己还是国民党党员，特别还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于是于次日又致函蒋廷黻，表明接受自由党发起人是以放弃国民党党籍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为条件的，在此之前还不适合做发起人。[148]与新内阁计划一样，自由党计划也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顾维钧对此的热情随后就减退了，虽然蒋廷黻为此的努力延续到1951年。

在漫长的外交生涯中，除了1920年代参加北京政府的那几年，顾维钧基本上不参与国内政治，并以此作为一个外交官的行事准则。新内阁计划以及自由党组党则有违于他以往恪守并标榜的原则。但在国共两党战略决战的时代大背景下，担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要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对外交涉中，顾维钧一向主张依靠美国。而在他看来，美国此时希望中国出现一个由自由主义者领导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是获得美援、挽救时局的关键。所以，他就十分起劲地参与到推动新内阁的活动中了。按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必须按出钱的老板定的调子演奏”，“按美国的期望行事”。[149]一个以恢复中国丧失主权为己任

的外交官，这样来定位与美国的关系，可见此时的顾维钧对美国依赖之深了。这种对美国的依赖和信任，是他从留学时开始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对美国的认同与亲和感在外交事务上的反映。早在第一次出使美国期间，他就认为美国与其他列强不同，“对于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随着与美国打交道越来越多，他更是相信，美国“在本质上并不是帝国主义”，这是他按美国调子行事的思想基础。[150]

从政治理念上说，顾维钧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是他积极推动新内阁的内在动因。在新内阁计划的几个关键角色中，胡适、蒋廷黻和顾维钧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都信奉自由主义，但对新内阁和现实政治的态度却有很大不同。胡适虽有心推动政治进步，但始终不愿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就不愿直接介入政治之中。蒋廷黻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却热衷投身政治，下决心通过自己的行动推进自由主义政治。新内阁计划搁浅后，两人仍念念不忘政治改革。1950年7月下旬，两人与顾维钧见面，谈到国内政局时，胡适说土耳其总统伊诺努（Ismet Innonu）由于选举失败和平交出政权，意思是国民党和蒋介石也应如此。蒋廷黻则说蒋介石最好就做纯粹法理上的“元首”，而不干预权力的实际运作。[151]与胡适、蒋廷黻相比，顾维钧虽有相同的政治理念，但因为多年来从事外交的经历，在处世行事上要更为现实些，更懂得随机应变，在理念上不如胡、蒋那样执着。新内阁计划有可能时，他积极予以推动。而当该计划无法实行，局势剧变必须做出选择时，他并无太大困难地又回到先前的立场上，认为蒋介石在中国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继续为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在美国朝野奔走。

[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55页。

[2]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中华书局，1988，第402页。

[3]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5年5月3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82。

[4]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37页。

[5]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11～612页。

[6]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6年1月1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2。

[7] 《蒋介石日记》，1946年3月12日；《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75、684页；《申报》1946年3月16日，第1版。

[8]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96页。王世杰当天日记无与顾维钧谈话记

录，见《王世杰日记》上册，第789页。

[9]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98页。

[10]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702页；《蒋介石日记》，1946年5月16日、17日。

[11] 《宋子文致顾维钧》（1945年7月25日）、《顾维钧致宋子文》（1945年8月3日、12月1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49，52。

[12]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720页；《蒋介石日记》，1946年6月10日。

[13]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712～714页；《苏运走东北物资事，顾维钧在沈谈我之准备》，《益世报》（天津）1946年6月1日，第1版。

[14]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725～727页；《蒋介石日记》，1946年6月15日。

[15]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5页。

[16]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第671页。

[17]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6年8月1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9～20页。

[18] 《蒋介石日记》（1946年8月15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71页。

[19] *FRUS*，1947，Vol.7，Washington，1972，pp.789-793.

[2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714～715页。

[21] *FRUS*，1947，Vol.2，pp.1066-1068；《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49～53页。

[22]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87页。

[23]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4月1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24] *FRUS*，1947，Vol.2，pp.824，1107-1108。

[25] 《王世杰致顾维钧》（1947年5月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36。

[26] *FRUS*，1947，Vol.2，pp.1114-1115；《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5月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27] *FRUS*，1947，Vol.2，pp.1119-1121.

[28] 《王世杰致顾维钧》（1947年5月1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36；《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43页。

[29] *FRUS*，1947，Vol.2，pp.1126-1128.

[30] *FRUS*，1947，Vol.2，pp.1132-1133.

[31] *FRUS*，1947，Vol.2，pp.1136-1139；《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50～154页。

[32]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6月2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55页。

[33] *FRUS*，1947，Vol.2，pp.1147-1149；《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6月2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34]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6月24日、2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67～168页。

[35] 《蒋介石日记》，1947年7月2日。

[36]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51页；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第166页。

[37]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11页；《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11月1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38]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11月1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39]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11月1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40] 《外交部致顾维钧》（1947年11月17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1册。（本文所用台北“外交部”档案，承蒙台湾师范大学吴翎君教授提供，特此致谢）

[41] *FRUS*，1947，Vol.2，pp.1223-1224.

[42] 《顾维钧电》（1947年11月22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1册。

[43]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52页。

[44]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12月16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1册；《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68～269页。

[45]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12月3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38；《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17页。

[46]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7年12月21日）、《顾维钧致外交部》（1948年1月6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1册。

[47] 《顾维钧致外交部》（1948年1月6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2册。

[48] 《顾维钧致外交部》（1948年1月12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2册。

[49] 《王世杰致顾维钧》（1948年1月18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2册。

[50]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91～293页。

[51]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97页。

[52]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99～304页。

[53]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19～422、1008页。

[54] 《顾维钧致外交部》（1948年2月26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4册。

[55]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07～310页。

[56] 《顾维钧致外交部》（1948年2月26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4册。

[57] 《顾维钧致外交部》（1948年3月23日），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国援华》第5册。

[58] Note of Conversation with Vandenberg，26 March，1948，*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5；《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23～325页。

[59]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27页。

[60]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30页。

[61]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593～1596页。

[62] *FRUS*，1948，Vol.8，pp.102-103.

[63]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55～358页。

[64] 驻美使馆发《白宫发布截止10月3日经济军事援华款项运用情况》，台北“外交部”档案，档号：471，《美援统计资料》。

[65] *FRUS*，1948，Vol.8，p.175；《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503页。

[66]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505～506页。

[67] *FRUS*，1948，Vol.8，pp.201-202.

[68] *FRUS*，1948，Vol.8，pp.199-200；《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529页。

[69]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Truman，24 November，1948，*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5；《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553～557页。

[70] *FRUS*，1948，Vol.7，p.473.

[71] *FRUS*，1948，Vol.7，p.516.

[72] *FRUS*，1948，Vol.7，p.543.

[73]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23页。

[74] 《蒋介石日记》，1946年6月15日；《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726页。

[75]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6年8月16日）、《蒋介石致顾维钧》（1946年8月17日、12月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138；《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713页。

[76]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21页；《顾维钧致蒋介石》（1946年8月1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77]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0页。

[78]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99页。

[79]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6年12月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80]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6年8月1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

[81]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8年4月3日、28日，1950年7月8日）、《顾维钧致外交部》（1947年10月1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38，167，137。

[82]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494页。

[83] 《顾毓瑞致顾维钧》（1949年3月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3。

[84]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32页。

[85] 《顾维钧日记》，1949年4月2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7。

[86]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16页。

[87] 《顾维钧致叶次长》（1949年6月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35。

[88] 《顾维钧致王雪艇》（1948年2月2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9。

[89] *Congressional Quarterly*，1951，p.941.

[90] The Employment of William J.Goodwin，*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58.

[91] The Employment of William J.Goodwin，*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58. 罗斯·Y.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商务印书馆，1984，第52页；《顾毓瑞致顾维钧》（1949年2月3日、1950年6月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0。

[92]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26～27、32～33页；《陈之迈致顾维钧》（1949年1月3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0。

[93] 《顾毓瑞致顾维钧备忘录》（1949年3月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0。

[94] 《陈之迈致顾维钧》（1948年10月28日、8月1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0。

[95] 《陈之迈致顾维钧》（1948年11月11日）；Goodwin to Kohlberg，9 December，1948，*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0，158。

[96] 《陈之迈致顾维钧》（1948年11月1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0。

[97] 《陈之迈致顾维钧》（1949年5月1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0。

[98] The Employment of William J.Goodwin；《顾维钧致叶公超》（1949年9月1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58；《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381、733页。

[99] The Employment of William J.Goodwin，*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58；《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381页。

[100] 《顾毓瑞致顾维钧》（1949年2月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0。

[101] Memorandum by Norman Paige to Joseph Ku，9 June，1949，*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0.

[102] 《顾毓瑞致顾维钧》（1949年5月25日、6月10日）、《陈之迈致顾维钧》

（1949年6月2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0。

[103] 《叶公超致顾维钧》（1949年7月19日）、《顾维钧致叶公超》（1949年7月26日）、《外交部致驻美使馆》（1949年9月1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3。

[104] Memorandum by Norman Paige，14 March，1950，*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3.

[105]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536页。

[106] 《顾维钧致叶公超》（1950年3月1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9；《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727页。

[107] Memorandum by Norman Paige，24 October，1950，*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9.

[108] 《顾维钧致叶公超》（1950年6月1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9；《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中华书局，1989，第300～301、320页。

[109] 《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中华书局，1993，第606页。

[110] 《顾维钧致叶公超》（1951年7月23日、8月7日）、《叶公超致顾维钧》（1951年8月6日、8月2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9。

[111] Memorandum Employment of Mr.Norman Paige，25 September，1952，*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9；《顾维钧回忆录》第9分册，第618、652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0分册，中华书局，1989，第380、507、517页。

[112] 《陈之迈致顾维钧》（1948年6月14日、12月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0。

[113] 《陈之迈致顾维钧》（1948年8月12日、9月21日、10月18日、12月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0。

[114] 《陈之迈致顾维钧》（1948年12月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0。

[115] *Congressional Quarterly*，1951，pp.942-943.另参见熊志勇《简析对美国国会的游说》，《美国研究》1998年第3期。

[116] The Employment of William J.Goodwin，*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58；*Congressional Quarterly*，1951，p.955.

[117] 《顾维钧致叶公超》（1949年5月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35。

[118]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6年9月2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23；《顾维钧日记》（1949年4月2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7。

[119]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25日。

[120]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10页。日记中“民为邦本”为汉字，见《顾维钧日记》，1949年3月1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0。

[12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07页。

[122]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589~590页。

[123]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27页。

[124]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34页。

[125]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9年1月1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7；《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31页。

[126]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7页。

[127]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第724~725页。

[128]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4页。

[129]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30页；《顾维钧日记》，1949年1月2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7。

[130] 《顾维钧日记》，1949年4月2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6；《蒋廷黻日记》（*Tsiang Tingfu Diaries*），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1949年4月27日。

[131] 《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第758页；《蒋廷黻日记》，1949年5月3日、5日。

[132] 《顾维钧等致蒋介石、李宗仁等》（1949年5月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70。

[133] 《蒋介石致顾维钧等》（1949年6月11日）、《李宗仁致顾维钧等》（1949年5月1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70。蒋介石的电报是一个月后从台湾高雄发出的，开头说明因“辗转传递，今始诵悉”。

[134]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118页。

[135]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125~127页。

[136]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127页。

[137] 《顾维钧日记》，1949年6月16日；《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144~

145页。

[138]《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第788页。

[139]《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158～160页；《蒋廷黻日记》，1949年6月23日。

[140]《蒋廷黻日记》，1949年7月17日；《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202页。

[141]《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205～206页。

[142]《顾维钧日记》，1949年8月21日；《蒋廷黻日记》，1949年8月21日。

[143]《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366页。

[144]《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207页。

[145]《蒋廷黻日记》，1949年7月25日。

[146]《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211页。

[147] 陈红民：《蒋廷黻与夭折的“中国自由党”（1947～1951）》，《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480～481页。

[148]《蒋廷黻日记》，1949年8月29日；《蒋廷黻致顾维钧》（1949年9月7日），中国口述史计划，第11盒，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481～482页。

[149]《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137、145页。

[150]《顾维钧1917年4月9日电》，《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5页；《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506页。

[151]《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56～58页。

第十一章 “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

一 “一国三公”、四面楚歌

在中国的国共内战中，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各种形式的援助，但大把大把的美元并没能挽回国民党在战场上的颓势。1948年底，美国政府开始确信，国民党的最终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于是，美国决策者开始重新审视并调整其对华政策，认为继续承担对国民党援助的义务“并不是一种好的外交”，美国“需要改变航向的自由”。[1]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一百多万军队被歼灭。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占领南京。随着国民党败局已定，美国政府决心与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

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对国民党态度的改变，使代表国民党政权处在对美外交第一线的顾维钧，面临着外交生涯中前所未有的困境。多年后回首这段日子时，他感叹道：“这时实在是我最为困窘的日子。一切来自中国的消息都是那么令人沮丧，而我仍要继续工作，在美国政府颇不友善的态度下为国家尽心竭力。”他深感自己“已如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2]

杜鲁门政府要从它陷得很深的中国内战中脱身，实际上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为替失败的对华政策辩护，回应国内共和党的攻击指责，也为了让美国公众对国民党的最后崩溃不致感到太突然，杜鲁门政府在1949年初决定准备一份文件，详尽地说明美中关系的状况，推卸失败的责任。这份文件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通常称之为《美中关系白皮书》。

顾维钧较早就获悉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这样一份文件，并且意识到文件的公布将对国民党产生负面影响。6月下旬，他致电外交部，报告了美国准备发表白皮书的情况，认为此事“殊值注意”。外交部得知后指示顾维钧，“此项白皮书如经公布，对我政府深为不利，希洽国务院探询

真情，相机劝阻”。[3]

7月1日，顾维钧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会面，提出了白皮书问题。他说，国民党一直在寻求美国政府的道义支持，迄今尚未获得肯定的帮助。而白皮书的发表，其结果不仅会进一步削弱国民党的地位和威信，而且会给共产党过去几年来所进行的反国民党宣传提供更多的材料。他向艾奇逊提出，希望美国政府不要马上决定发表白皮书。在美国政府决策层中，艾奇逊是力主发表白皮书的，但当面并未回应顾维钧的要求，只是说将把这一意见转告杜鲁门总统，请其决断。几天后，在与国务院官员会面时，顾维钧继续强调，白皮书证实了共产党所说的国民党的短处和缺陷，这就是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也会使美国政府自己丢脸，成为一个跟国民党站在一起的“帝国主义”政府。[4]

顾维钧的这些活动无法阻止美国决策者的既定计划。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白皮书在宣传美国对中国的“传统友谊”、美化其对华政策时，详尽叙述了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给予国民党的各种援助，同时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没有笔下留情。白皮书附有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一封信。艾奇逊在信中说，“中国内战的不幸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其能力的合理限度之内所曾经做或能够做到的，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这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5]这番话意在表明，国民党的垮台与美国无关，美国政府做了该做的一切，失败的原因在于蒋介石，而不是美国。这正是美国政府发表白皮书的意图所在。

顾维钧对美国发表白皮书的第一反应是“美国已经一笔勾销了国民党中国”，狠狠地踢了它一脚。在未收到外交部指令的情况下，顾维钧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不长，对着媒体的镜头，顾维钧只念了一分钟，但却花了四个小时撰写定稿。顾维钧在声明中说：“对华白皮书的公布是一不寻常的步骤，特别是在我国为遏制共党侵略和捍卫国家独立进行殊死斗争之际。这一大卷书多为美国对事态的看法，当然，中国方面还有它的观点。中国政府正在研究白皮书的内容，并将发表看法。不管过去的所作所为该不该算在国民政府的帐上，今天的基本事实是，中国正在与受到国际共产主义援助和唆使的共党侵略奋力搏斗。”在声明的最后，顾维钧向美国呼吁：“决心继续为反对共产党侵略而斗争的中国当能成功地赢得美国对其目的和努力的更好理解，并完全取得它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6]

这是国民党方面对白皮书的最早回应。由于认定对美外交的首要目

标仍是争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顾维钧避免在声明中对美国国务院进行直接的批评，尽管他对白皮书十分不满。8月16日，国民党政府对白皮书的声明在广州发表，顾维钧对该声明的评价是："白皮书公布十天之后发表的这份声明过于温和，并有意含混其词。论点也未击中要害。"[7]

白皮书的发表不仅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了巨大冲击，在国民党内也造成了很大混乱。白皮书在最后部分引述了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于1949年5月5日致杜鲁门信中的一段话："可惜由于我们当时的政府没有能够对这项援助作正当的使用，未能做到政治、经济与军事上适当的改革，致使你们的援助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我们的国家目前所处的窘境应归咎于当时的贻误。"[8]李宗仁给杜鲁门写这封信，是想与蒋介石的失败划清界限，以便美国政府接下来能够支持他。但这一表述，正好被美国国务院用来证明美援没有发挥作用的责任全在国民党自己。国民党内最高层尤其是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虽说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李宗仁信件的公开，将这一矛盾完全暴露于公众面前，对国民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顾维钧是国民党政府驻美国的外交代表，但对这样一封由代总统致美国总统的信竟毫不知晓。白皮书公布此信后，顾维钧与李宗仁派驻美国的代表甘介侯联系，希望能获得信件的全部内容。甘介侯虽然口头上答应，但一直拖延，就是不肯将信件交给顾维钧。

国民党内的矛盾和分裂使顾维钧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此时蒋介石已到了台湾，在广州有李宗仁，还有行政院长阎锡山。李宗仁在美国有自己的代表，阎锡山也派了自己的代表来美国。在美国还有宋美龄、宋子文等人。这些人都会分头去找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谈中国问题，并各自向国内报告，相互之间却封锁消息。这种多头并进的状况，使顾维钧左右掣肘，难以施展身手，却不能公开抱怨，只能在日记中大叹苦经："一国何啻三公。"[9]

尽管对国民党内的矛盾和分裂不满和无奈，顾维钧却没有停止为这个败退中的政权服务。白皮书发表后，顾维钧在大使馆内开会，要求使馆人员在以后的两三周内，从各个具体问题的侧面，准备一系列文章发表，以便持续反击并借此削弱白皮书的影响。他自己也出马撰文，经陈之迈修改后于9月中旬定稿。这篇题为《中国是值得拯救的》文章发表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11月号上。文章以极具煽动性的词语开头："中国正在火上，经受共产主义的灼灼烈焰炙烤。爱好自由的人民

的伟大任务就是阻止这场大火的蔓延。”在追述美国对华政策时，文章突出了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问题上的不同，尤其讲到马歇尔调停时期的政策捆住了国民党的手脚，针锋相对地反驳白皮书的观点。文章强调“中国是值得拯救的，也仍然能够被拯救”，但关键是时间，拖延帮助中国将影响整个亚洲。[10]

顾维钧竭尽全力想让美国政府和公众相信国民党中国是能够被拯救的，但事实却无情地嘲笑了他撰写的文章。该文发表时，广州已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从南京退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只得再次败走，撤至重庆。在此之前，顾维钧向美国国务院官员保证，国民党白崇禧部队可以守住湖南南部，广州作为政府的最后堡垒是稳固的，蒋介石与李宗仁的合作也大有进步。但随即传来的消息却说，因为蒋介石不给白崇禧部队军饷，以及将自己的部队从粤北撤走，白崇禧指挥的防线崩溃了，只得率部仓促撤往广西。[11]这一状况颇像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在国联的经历，在台上说得天花乱坠，下台后却发现事实完全相反，好像挨了一巴掌，而此时顾维钧所承受的心理打击则远远超过当年。

随着国民党在大陆控制的区域急剧缩小，台湾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在准备从中国大陆脱身时，美国政府考虑将台湾与大陆分开来处理，并将蒋介石的势力阻止在台湾岛之外。在蒋介石于1949年5月下旬到达台湾后，美国又考虑培植取代蒋介石的势力。对美国的这一意图，处在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看得很清楚，采取了隐忍退让的策略，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而对美国属意的人选则处处提防，设置障碍，将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美国政府最终发现有关国民党和台湾的事情无法饶过蒋介石，只得回过头来仍与他打交道，但对是否予以全力支持却下不了最后的决心。[12]

11月3日，美国驻台北“总领事”根据国务院指示向蒋介石当面宣读了艾奇逊给他的电报，称美国对国民党在台湾“治理不当”很不满意，美国的态度取决于国民党自身改革的情况；目前已批准的美国援助还将继续，今后是否提供新的援助，则要看国民党自己表现如何，并要国民党保证在岛上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然后美国再实施援助方案。蒋介石对批评其治理不当面露不满，当天在日记中称美方措辞“傲慢不驯”，但会面结束后又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国务院在白皮书发表后“转圜之地步”，给自己下一台阶，接下来就会向他提供援助。[13]基于这一判断，蒋介石决定抓住时机，要求美国加强军事援助。

11月9日，顾维钧收到蒋介石的密电，通报了美国政府的最新表态，以及在这之后陈诚发表的呼吁美国加强援华派遣军事顾问团的声明。蒋介石此电的目的是要顾维钧积极推进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援助。但顾维钧对美国政府的表态有不同的理解。收到电报当天，他与刚出任助理国务卿的巴特沃思（Walter Butterworth）会面，了解艾奇逊给蒋介石电报的由来和美国政府的真实态度。巴特沃思称此电是为了说明美国政府对台湾的关切，但台湾当局竟据此提出要美国派军队“协防”台湾，简直是异想天开。这一回答使顾维钧明白，包括巴氏在内的国务院官员对蒋介石的憎恶丝毫未变。艾奇逊给蒋介石的电报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恐吓，是逼迫蒋介石在台湾推行改革，自己承担起防卫的责任。因此，陈诚敦促美国加强“援华”的声明“实际上是文不对题”。[14]

顾维钧的这一判断抓住了美国政策的实质。美国政府此时确实无意对蒋介石或台湾承担任何责任，只是担心停止援助会进一步招致国内反对势力的攻击和损害国民党已经很低落的士气。基于对美国政策的这一理解，顾维钧仍坚持先前的看法，认为获得美援的先决条件还是国民党进行美国所期望的改革，由美国政府属意的人出来主持政局。于是，他向台北提出建议：“我于提出（美援）请求之前，宜先由我自动调整主持台岛省政之人选，以表示我决心抗共，欢迎与美合作之诚意，而免美政府中反对助我者之怀疑与阻梗。”[15]只是此时他心目中的人选已不是胡适，而是美国人多次向他提起的吴国桢了。此前，美国海军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Oscar Badger）在11月上旬和12月上旬两次向顾维钧表示，台湾需要有一位致力于改革的文官出任省主席，而吴国桢是最合适的人选。[16]吴国桢也是一位留美学生，抗战后期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抗战胜利后担任上海市市长，被认为是一位能干的官员。

顾维钧向台北提出建议时，蒋介石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也正考虑接受美国的提议，于是在12月15日任命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做出这一安排后，蒋介石认为可以向美国提出增加援助的要求了。12月16日，叶公超密电顾维钧，内容是关于一份代号为“艾利斯”（Alice）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向美国开出了求援的清单，包括在军事上帮助国民党装备6个陆军师、16艘巡逻艇，在技术上派遣陆海空军顾问三四十人协助策划训练，在经济上延长未用完的援华款项并帮助稳定台币、发展工农业等。台湾当局表示：“如美国政府接受吾人之请求，给予吾人以次所列技术的物质的援助，中国政府决不因之而忽视其自己的责任或丝毫松懈其自己应有之努力。”叶公超要求顾维钧将这份备

忘录译成英文后亲送国务卿或副国务卿，请他们尽快予以考虑并转杜鲁门总统，并告诉他此项要求在台湾只有三四个经手人知道，不要泄露给在美国的其他中国人。[17]

接到“艾利斯”备忘录后，顾维钧特地去拜访白吉尔。白吉尔是美国军方中主张加强援蒋的重要人物，“艾利斯”备忘录就是根据他不久前向台湾提出的建议加以修改而成的。顾维钧去见白吉尔是为了与他讨论备忘录中一些具体问题的表述，并了解国务院对援蒋问题的最新态度，以使备忘录尽可能顺利地被国务院接受。会见后，顾维钧对“艾利斯”备忘录做了修改补充，列出了原先缺少的军事援助款项的分类数额。12月23日，他将修改过的备忘录英文稿送交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思，并向巴氏强调，台湾当局“认识到毕竟它必须自助，它所要求的任何援助只是为了帮助它更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把责任推给旁人”。[18]顾维钧和台湾当局期待美国政府对“艾利斯”备忘录做出积极的反应。

但就在顾维钧向美方递交备忘录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向驻外使馆发出一份有关台湾问题的内部文件。该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台湾可能为共产党军队攻克，因此必须做好宣传舆论准备，以尽量减少此事对美国威信的影响。宣传的要点是台湾没有特别的军事意义和战略价值，美国并未承担“拯救”台湾的责任，而且这样做对美国害处极大。[19]这份被称为“第28号特别命令”的文件表明，美国国务院急于要从与蒋介石和台湾当局的牵连中摆脱出来。

国务院的文件是内部文件，顾维钧当时并不知晓。但他通过军方的渠道获悉，在12月29日举行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军方不顾国务院的反对，主张向台湾当局提供援助。在向台北报告这一信息时，他称，该“会议的气氛相当良好，在新的一年开始时，出现这种有利的气氛，显示着会有一定的事态发展”。[20]顾维钧的语调相当乐观，显然认为这一发展是朝着有利于台湾当局的方向进行的。但是，这一次顾维钧的判断错了。

1950年1月5日上午，顾维钧从新闻中知道了国务院“第28号特别命令”，觉得十分惊讶。下午，杜鲁门总统就台湾问题发表正式声明。在这份声明中，杜鲁门表示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尊重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称：

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

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力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21]

美国政府这一完全从中国脱身的表态，对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国民党来说，是十分沉重的打击。这也出乎此前对形势估计较为乐观的顾维钧的预料。不过，顾维钧明白，军方与国务院之间、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仍然存在，而且即使是杜鲁门的声明也未将今后援助国民党台湾当局的门完全关死，因为杜鲁门强调的只是“现在美国无意”干预和卷入。在声明发表当天给台北的电报中，顾维钧提醒台湾当局高层，对在声明发表前临时插入的“现在”两字，以及现场杜鲁门不愿答复记者就此的提问，应“特为注意”。[22]他主张对杜鲁门声明应做谨慎的反应，不宜即刻发表公开回应。

顾维钧对杜鲁门声明的分析，显示出他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各派政治力量的了解。当台湾当局高层对杜鲁门声明一片惊慌之时，他看出了隐藏在公开声明后美国决策层内存在的矛盾。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有两派不同的意见。军方主张向台湾当局提供在美国监督之下的一定规模的军事援助，尽可能长地维持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因为这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安全利益。但国务院认为，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向国民党提供援助并不能挽救这个已经腐败透顶的政权，它的失败只会使美国丧失威信，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台湾对美国的安全并非那么重要。杜鲁门的声明表明在这两派的争执中，总统站到了国务院这一边。但军方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主张。在国会中，共和党中的亲国民党势力则抓住声明攻击民主党政府及其对华政策，掀起新一波的反对声浪。这样，杜鲁门声明发表后不久，美国国内对国民党的态度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起来。

在美国的亲国民党势力中，有一些人对蒋介石没有好感，认为国民党失败的最大责任就在于蒋介石。他们主张继续援助国民党，但蒋介石必须离开，并就此与顾维钧接触。最早向顾维钧提出此点的是从中国回来不久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49年9月2日，顾维钧与司徒雷登会面。在顾维钧提出自由主义者组阁一事后，司徒雷登表示，最好是请蒋介石交出政权，出洋考察。不过，司徒雷登没有说这一主意是他个人的，还是代表政府提出的。[23]

司徒雷登还只是提出建议，并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接着就有人带着具体的方案来找顾维钧了。担任过美国驻苏大使的戴维斯（Joseph Davies）带了里基特（William Rickett）来与顾维钧见面。顾维钧知道后者是一位著名的特工，称他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追随者”。里基特向顾维钧提出，如果蒋介石愿意离开中国，美国政府负责保证他的安全。蒋介石可以携带他的一切财物，美国为他装备一艘完全由他支配的游船，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任何国家。里基特表明这个主意是经过白宫研究的，并作为白宫的意见告诉顾维钧，请他作为中间人转告蒋介石。多半是认为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接受这一方案，而且相信蒋介石还能够掌控权力，顾维钧没有按美方的要求转达这一消息。直到1953年10月蒋经国“访问”美国，时过境迁，顾维钧才将此事告诉了蒋经国。[24]

1950年3月16日，一个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挪威人布约尔塞特（Brynjolf Bjorset）来见顾维钧，直截了当地提出美国政府和美国商界已不信任蒋介石了，他应该走开，把权力交给他人。此前的3月1日，蒋介石已经在台北“复行视事”，重新走到前台。因此，顾维钧明确回答布氏，这不是切实可行的建议，现实终归是现实。[25]

在这之前，李宗仁以治病的名义已于1949年底到了美国。蒋介石“复行视事”，还有着“代总统”头衔的李宗仁自然不满。他的私人代表甘介侯在美国报刊上发表声明，谴责此举为“违宪”行为。对蒋李冲突，顾维钧仍然倾向蒋介石一边。他劝说李宗仁顺从不可避免之事，即应该接受现实，并说如果公开发泄对蒋的愤怒，就会损害美国对台湾的继续援助。[26]时局动荡之际，顾维钧对国民党高层政治看得十分清楚，相信只有蒋介石才能掌控局面。

这一时期，顾维钧的外交活动集中于推动美国的政策朝着有利于台湾的方向转变。3月下旬，美国国务院发生人事变动，腊斯克（Dean Rusk）取代巴特沃思出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与前任不同，腊斯克主张援助蒋介石。因此，他一上台，顾维钧就认为“他对问题不抱偏见”，也就是不像巴特沃思那样厌恶蒋介石和国民党。4月20日，顾维钧与就任新职的腊斯克第一次会面，美援是他们会谈的重点。顾维钧首先提出，美国应重新考虑杜鲁门声明中所宣布的不提供援助的政策，随即建议如果目前还难于从根本上改变业已宣布的政策，可先给台湾当局少量纯粹用于防御的援助作为政策修正的开始，并列举了地面雷达站、沿海巡逻用的小型海军舰艇等。这次会晤比原计划延长了一个小时。腊斯

克虽在会谈中表示，杜鲁门声明所宣布的政策仍是现行的政策，但在会谈后几天就向艾奇逊进言，建议向台湾当局提供援助。[27]

与腊斯克几乎同时到国务院担任顾问的杜勒斯，是国务院中正在上升的援台势力的另一主要代表。顾维钧与他保持着密切往来。在与腊斯克会谈后次日，顾维钧邀请杜勒斯到使馆双橡园午餐，讨论美国的对台政策。席间，杜勒斯对顾维钧关于敦促恢复军援可先从防御项目开始的主张表示赞同，并愿意在国务院讨论对台政策时施加影响，尽管他不能肯定这影响究竟有多大。[28]顾维钧向腊斯克和杜勒斯提出的先提供防御援助的建议，并非来自台湾当局的指示，而是他自己为了推动美国逐步改变政策而向美方提供的一个方案。

对积极主张援台的军方，顾维钧更是往来密切，特别是与助理国防部长格里菲斯经常会面，讨论恢复军事援助的问题。

6月初，顾维钧从与美国官员的交谈和新闻报道中已经感觉到，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6月12日，杜勒斯告诉他，国务院对台湾当局的态度近来有所好转，存在重新考虑对台提供军援的可能性。这一切使顾维钧认为，“美国要改变远东政策已初见端倪”，只是尚须等待合适的时机。[29]这一时机出乎意料地很快就出现了。

二 朝鲜战争的冲击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消息传到美国，还是24日星期六的晚上，顾维钧正在新泽西州的乡间度周末消夏。尽管是朝鲜半岛上发生的事情，他马上想到的是美国将做出怎样的反应："不知美国将如何应对？它不可能对此置之不理，因为这是对美国威望的直接挑战。"[30]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朝鲜战争发表声明，除命令美国军队支援韩国军队外，还命令美国海军进驻台湾海峡，称："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31]两天后，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这样，在卷入朝鲜战争的同时，美国入侵了中国的领海。

杜鲁门的声明改变了他1月5日声明中尊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将台湾归还中国的立场，提出了美国决策层内酝酿已久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但与此同时，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又为台湾当局提供了它所期望的武装保护。顾维钧在杜鲁门正式发表声明前获得了声明文本，读了之后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由于美国向台湾提供了武装保护伞，他认为美国的对台政策"是往好的方面变化"；另一方面，对声明中有关"台湾地位未定"的内容，他认为"措辞是粗暴的，简直很蛮横。官方声明中使用如此措辞以对待友好国家，实属罕见"。当天向台北报告时，他特别提醒台湾当局注意杜鲁门声明中有关"台湾地位未定"的内容：

> 细察宣言措词不无深意，其明言台湾将来地位须待诸日后决定，一面因现既改变态度，与元月间宣言不得不有自圆之说，一面亦欲对各种可能解决留一回旋余地，不先自作拘束。如所列属确，是未必均与我有利……综此情形，我对美宣言不宜轻先表示态度，似须慎重考虑，既不宜予美以刺激，亦不必过为颂扬。[32]

同一天，顾维钧还向正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的蒋廷黻建议，不要评论杜鲁门声明中有关台湾地位的那段话，因那段话有不利于台湾当局

的可疑含义；如果一定要表示意见的话，可以就美国政府承担阻止大陆对台湾武力进攻一事表示赞赏。[33]

杜鲁门声明传到台湾，岛内舆论在肯定其“协防”台湾的同时，对其中“台湾地位未定”的论调也有指责。这一情况反馈到美国，引起美国的不满。于是，顾维钧电告台北，对杜鲁门声明不要做考虑欠周的新闻报道，或感情冲动的评论，以免激怒美国政府和公众，“不利于我，盼今后避免此类有损合作之表示”。叶公超回复称，顾的意见已引起重视，并已指示各报馆不要发任何带刺激性的评论。[34]

尽管对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不满，台湾当局还是将朝鲜战争看作改变自身不利处境的战略机遇。杜鲁门声明发表当天，叶公超从台北给顾维钧打来电话，就根据联合国决议拟派军队去朝鲜半岛一事征求其意见。顾维钧表示，不要具体说明将提供何种援助，只需表明在保卫台湾安全的前提下，愿意贡献最大的力量。并建议派军队之事，在正式向联合国提出前，应先与美国政府磋商，并严守秘密，不使美国为难。在同美国达成某种默契之前，连联合国也不通知。[35]

然而，台湾当局对派军队一事很是急切，而且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会接受这一提议。6月29日清晨，叶公超再次给顾维钧打来电话，告诉他台湾已决定派一支33000人的陆军部队赴朝鲜半岛，并说已将该决定的备忘录用电报发来，请其送交国务院。当天下午，顾维钧将该备忘录交给了腊斯克。[36]

但台湾方面没有接受顾维钧有关此事须秘密进行的提醒，未待美方对备忘录做出回复就将派兵一事在媒体上予以披露。7月1日，美国国务院回复“使馆”，对台湾当局派兵一事婉言拒绝，称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应由麦克阿瑟和台湾军事当局双方派出的代表进行讨论，以确保台湾防务之需要。顾维钧对美国的回复很失望，更对台湾当局在美国未答复前就公布此事颇为不满，认为在处理微妙的外交问题上缺乏协调，是一个失策，但想挽救已为时太晚了。[37]

当然，美国拒绝台湾当局派兵的原因要比台湾提前公布消息复杂得多。着眼于朝鲜战场本身，美国需要有他国军队的参与和支持。但从整个远东局势看，美国生怕台湾当局借此拖美国下水，使朝鲜战争扩大化，最后演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期盼，确是此时国民党内许多人的普遍心理。

7月18日，叶公超来电，传达蒋介石指示，要顾维钧回台湾讨论局势。7月31日，顾维钧抵达台北。抵台后，他与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见面，交流对局势的看法。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不是迫在眉睫，也是不可避免的，认为这会给国民党起死回生提供最好的机会。他们都想听听顾维钧对此的意见。顾维钧完全不赞同这一看法。他告诉这些高官，世界大战就是美苏之间的冲突，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不打算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除非是被动应战。而苏联尽管摆出一副踌躇满志甚至妄自尊大的姿态，但也不愿意发生世界大战。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根本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国民党秘书长张其昀召集的圆桌讨论会上，当顾维钧以十分肯定的口吻直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时，他看到失望的表情出现在与会者的脸上。[38]

在台期间，顾维钧与蒋介石有四次面对面的谈话。他向蒋介石详细介绍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最新发展，以及从总统到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会领袖对台湾当局和国民党的态度。蒋介石最为关心的是能够获得美国多少援助。顾维钧告诉他，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已经面临非常困难的境地，因此双方必须相互了解，共同致力于坦率而又友好的政策，以便保持最密切的合作。他还婉转地向蒋介石表示，美国国内包括有些首脑人物并不喜欢他，因此在目前的特殊情况下，应该把声誉和自豪的问题放在一边，谋求建立一种坚定、实际和可靠的合作基础，要比美国人还更实际些。[39]

这是顾维钧第一次来到台湾。自幼就为中国地大物博而自豪的他，目睹自己所服务的国民党就局限于这样一小块地方，深感惶惑不安。在与“行政院长”陈诚谈话时，他直称台湾为一个小岛。更让他惊讶的是，因为经费拮据，陈诚要裁减驻海外的“使馆”和代表团。这让一直致力于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顾维钧，确实感受到了国民党的没落。[40]

顾维钧此次回台，前后停留17天，行程排得满满的。其间，他有130起约会、13场演讲，包括在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中央评议会上报告国际局势。

8月17日，顾维钧离开台湾当天，蒋介石特地召见他，要他返美途中在东京停留一下去见麦克阿瑟，转达“组织东亚反共同盟军”并归美国指挥的口信，探询麦氏的反应。[41]此前麦克阿瑟刚“访问”过台湾。麦氏“访台”时，蒋介石提出派军队赴朝鲜战场事未被接受。但蒋介石并不死心，希望以顾维钧在外交界的人脉再去劝说。同时，蒋介石也希望顾

维钧此行可代他表达对麦氏支持的感谢，因为麦克阿瑟“访台”后在美国国内遭到强烈批评。

8月18日，顾维钧在东京盟军最高司令部拜会了麦克阿瑟。在表达蒋介石对麦克阿瑟“访问”台湾的感谢之后，顾维钧转告了蒋介石希望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愿望，称蒋介石从与麦克阿瑟的私交出发，愿意派15000人的军队赴朝鲜半岛，以“志愿军”而不是官方的名义在麦克阿瑟指挥下作战，并说蒋介石尽管没有打赢共产党，但他与共产党作战的经验在朝鲜战场上是绝对必要的。但是，麦克阿瑟拒绝了顾维钧带来的蒋介石的提议，认为台湾当局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安全和防务。顾维钧明白，麦氏这样回复是因为华盛顿对此问题已做出决定。[42]

顾维钧刚回到华盛顿，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苏联代表马立克（Yakov Malik）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Trygve Lie），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并“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它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43]第二天，美国政府就迅速做出回应。美国代表奥斯汀（Warren Austin）在安理会发表声明，拒绝关于侵略的指控，称美国对台湾并无领土野心，并建议安理会指派调查团赴台湾调查。稍后，安理会投票表决，通过将控美侵台案列入议程。美国为使台湾问题进入安理会，也投了赞成票。

顾维钧认为美国政府的做法“简直有点出乎意料”。但是，他又明白，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政策是单方面行动，还没有国际上的支持，因此想借此机会在国际讲坛上阐明美国的立场，并争取他国对美国的支持。[44]

美国的做法在台湾引起强烈反响。此前一年，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向联合国控诉苏联违反中苏条约，但美国没有全力配合，致使控苏案提出年余，仍无实质进展。而对中国大陆提出的控诉，美国则立即回应，并提出派调查团，使台湾当局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国民党高层反对派遣调查团到台湾，视之为损害国际地位和尊严的举动，准备就此问题在安理会上行使否决权。“外交部长”叶公超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孤掌难鸣，于是给顾维钧打越洋电话求援，请他将自己的意见发个电报给台北，以做他的后盾。[45]

9月5日，顾维钧按叶公超的吩咐给他发了一封长电。电报开头指

出，“美拟要求查明真相实属不得已之应付政策”，并非自愿。但此事对我方前途关系重大，采取何种对策，必须慎重研究。顾维钧称，根据他的了解，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都会同意美国派遣调查团的建议，如果我方单独反对，恐难如愿，而如果行使否决权，则会影响美国与我方的合作，并引起美国的反感，这样就掉进了苏联设置的陷阱。顾维钧在电报中强调，最复杂的地方在于台湾的地位问题，因此首先要确定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他接着说，自杜鲁门声明以来美国一再宣称台湾的地位应留待将来确定，之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部分地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但美国也承认台湾现在由国民党控制着，是政府所在地，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认为“美之看法未必于我损多益少”，最后决策时一定要慎重考虑。[46]顾维钧此电的主旨就是接受现实，不要与美国发生矛盾，影响其对台湾当局的支持。

此前蒋介石已下决心对联合国派遣调查团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对叶公超担心此举会得罪美国毫不在意，认定“我为自卫，如其不谅，自所不恤也”。收到顾维钧以及蒋廷黻不赞同行使否决权的电报后，蒋介石非常不满，“蒋廷黻、顾维钧来电皆不敢赞同余对调查台湾案投否决票。明是理直气壮之事，而若彼偏解为不对”。但这两位在第一线的资深外交官的意见还是产生了影响。9月9日，蒋介石召集会议，与会者大多认为“以使用否决权得罪美为大不可”，蒋最终只得“勉从众意”，但心中颇为不快。[47]

9月19日，顾维钧应约与腊斯克见面。腊斯克告诉他，美国已决定要将台湾问题提交联合国全体大会，目的是希望联合国分担在台湾海峡维持现状的责任，以及保证将来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此前控美侵台案已列入安理会议程，联合国大会由全体会员国组成，美国此举是希望更多国家参与进来。在询问美国提交大会的着眼点是什么后，顾维钧抱怨美国的政策扑朔迷离，并追问腊斯克主要目的是否在于拖延时间，以待事态发展再做决定。顾维钧的话直截了当，但暗藏机锋，他注意到腊斯克一下子脸都红了。腊斯克以不要向台北报告为条件坦率相告，这样做是因为无法确定苏联是否会挑起更大的冲突，所以为了保证美国的防务不受危害，台湾的安全必须有所保障，也因此，美国乐于看到台湾能维持现状。[48]两天后，美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提出大会应研究台湾问题。

对于美国提出将台湾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台北方面十分焦虑，担

心引起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有损其国际地位。台北与驻华盛顿的“使馆”和驻纽约的联合国“代表团”之间，函电交驰。顾维钧与蒋廷黻等在美官员也保持密切往来，交流彼此看法。

10月20日，顾维钧与杜勒斯会面。杜勒斯此时不仅是国务院的顾问，也是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代表。顾维钧对杜勒斯说，根据美国政府承认的《开罗宣言》等文件，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而台湾的地位问题本身也不在联合国的职权范围之内。杜勒斯解释道，美国政策的目的是防止台湾地区发生麻烦，冻结台湾现状的政策对台北不无好处，因此希望台北不要过分反对美国的立场，使美国政府为难。并请顾维钧向台北转达美方的这一立场。[49]

顾维钧接受了杜勒斯的解释。当天傍晚，他与蒋廷黻见面时转述了杜勒斯的看法，并表示赞同。因为知道蒋廷黻在此问题上有不同看法，顾维钧力陈接受美国立场的必要，指出因为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危如累卵，最好还是现实一些，按美国的建议应对。蒋廷黻表示可以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50]

但台北接到顾维钧报告后，并不接受美国的立场。蒋介石与陈诚、王世杰讨论时，明确指出反对联合国组团来台。11月1日，叶公超据此给蒋廷黻、顾维钧来电，指示如安理会打算派调查团应提异议，甚至行使否决权也在所不惜。[51]

11月4日，顾维钧到纽约与蒋廷黻就此问题交换看法，商讨对策。随后，他将商谈情况和自己的建议致电叶公超。顾维钧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应向联合国建议推迟辩论台湾问题，但由于大会已做出决定，应要求将辩论限制在台湾与太平洋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而不是台湾的地位问题，派调查团赴现场确无必要。[52]

但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入朝作战，美国关注的重点转向朝鲜战场，不再急于在联合国大会辩论台湾问题了。11月15日，杜勒斯约见蒋廷黻，提出推迟辩论台湾问题，希望台湾予以支持。[53]这与顾维钧此前提出的建议相同。随后，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此问题推迟讨论。

朝鲜战争爆发初期，顾维钧处于台湾当局对美交涉的第一线。战争导致的东亚国际格局剧变，使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面临难以应对的外部环境。顾维钧对台湾危如累卵的现实有较为准确的评估，并据此提出

顺应美国政策的建议。这种以维持国民党当局生存为首要目标的现实考虑，是他作为一个弱国外交官的习惯应对，也延续了在外交事务上对美国的依赖。但他的建议并不为最高决策层所认可，蒋介石对其不敢“理直气壮”也很不满。就外交来说，顾维钧这一时期并无建树，没有什么成绩可言。这并非他江郎才尽，而是时代使然。他纵有高明的外交才干，但犹如在滚滚洪流中一叶扁舟上的艄公，根本无法逆流而上。

三 一波三折的“共同防御条约”

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出任美国第34任总统，这是二十年来的第一位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虽是军人出身，但在1948年退出现役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1949年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会表彰杰出校友顾维钧，授予其汉密尔顿奖章，主持授奖仪式的就是艾森豪威尔。

2月2日，上任不到半个月，艾森豪威尔就在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宣布，新政府将改变杜鲁门声明中规定的第七舰队既阻止大陆对台湾进攻，又要求台湾停止对大陆进攻的“双重任务”，将不再使用第七舰队屏障中国大陆。艾森豪威尔的这一新政策意味着仍要阻止大陆解放台湾，但国民党却有了进攻大陆的可能。这一政策改变被称为“放蒋出笼”，受到台湾当局的欢迎。

在改变对台湾海峡政策的同时，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希望尽快结束这场耗费巨资却仍没能打赢的战争。然而，当艾森豪威尔将朝鲜停战提上议事日程后，台湾当局有了新的不安全感。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时，公开的理由是美军在朝作战的需要。一旦朝鲜停战，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便无停留的理由，台湾当局有失去美国保护之忧。此外，台湾当局对杜鲁门政府有条件的有限援助一直不满。在艾森豪威尔就职前，叶公超当面向艾氏转达蒋介石的两项意见：“以往美国对台湾在政治军事上均采取敷衍态度，可谓使其不死不活。”“倘将军就职后确将采取更积极之政策，则对台湾之军援似应作通盘之重新考虑。”[54]所谓通盘考虑就是希望美国能与台湾当局签订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以条约的形式保证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支持。

3月19日，顾维钧根据台北的指示，向国务卿杜勒斯正式提出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顾维钧指出，这样一个条约在军事上可能与美国已给台湾当局的援助差别不大，但在外交上却象征着美国对国民党国际地位的支持，在心理上也将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杜勒斯开始以外交辞令表示很欣赏这一建议，但随即提出了条约的适用范围，即除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外，对其他仍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沿海岛屿应如何处置。杜勒斯认为，如果将沿海岛屿包括在条约范围之内，一旦大陆进攻这些岛屿，美国将被迫承担它目前并不准备承担的责任；而如果不包括沿海岛

屿，又将对国民党造成损害，使人们认为这些岛屿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杜勒斯的这番表白显示了美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处境。从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出发，它希望台湾在国民党手中，作为其在远东推行遏制政策的重要支点。但它不希望由此卷入中国的内战之中，因此不愿承担对沿海岛屿的防御责任。被杜勒斯称为善于将复杂问题加以澄清的顾维钧当即提出，可采用台湾与日本签订“和约”的形式，其措辞是条约将应用于目前和今后在国民党统治下之地区，这就可满足条约所需解决的问题了。[55]

会谈结束时，杜勒斯虽表示对台湾当局的建议将予以研究，但此后并无下文。因为美国政府为保持外交上的灵活性，不想公开表明它对沿海岛屿的立场。顾维钧在与国务院官员和国会议员的私下交谈中虽仍提到此事，但也没有再向美方正式提出缔约。他明白，美国改变政策的时机尚未成熟。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他认为，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对我台湾战略上自不能放弃，且因民众注视，仍主多方支持。但积极援助我达成收复大陆则时机尚远，军援经援在可能范围内或可增加，但数量不能多”。[56]

1953年秋，台湾当局的“外交”重点一度转向希望与韩国、泰国等国一起通过条约的形式获得美国的援助。当这一目标无法实现时，台湾当局再次向美国提出缔约问题。

1954年2月初，顾维钧收到叶公超的电报，告诉他去年11月尼克松副总统“访台”时，台湾当局非正式提出条约问题，此后草拟了条约方案交给美方，但迄今没有进展，指示顾维钧密切关注该事的发展。2月23日，叶公超又给顾维钧发来一电。该电称，在缔结条约不可强求的情况下，“我国目前之政策应置重点于中美安全条约之缔结，以全力促其早日观成”，“请吾兄在美继续接洽，尽力推动”。叶公超要顾维钧与美国国务院官员先行商谈，并密请与国民党友好的国会议员策动此事。[57]此后，叶公超又几次来电催促，要顾维钧向美国务院施加压力，加速事情的进展，最好在4月下旬有关印度支那的日内瓦会议开幕前能使美国做出肯定的决定，以抵消日内瓦会议对台湾当局的不利影响。

接到叶公超的电报后，顾维钧马上准备了相关的备忘录递交美国务院，并与国务院官员进行接触。但从杜勒斯到国务院的其他官员都在忙着为日内瓦会议做准备。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Walter Robertson）告诉顾维钧，此事在日内瓦会议前不可能有结果。在此情

况下，顾维钧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如果有关条约的谈判不能很快开始，美国应先发表一声明，表明它愿就这一条约进行谈判，这将有助于消除台湾当局的疑虑。国务院对此建议仍采取敷衍推诿的态度。[58]

美国政府对“共同防御条约”的冷漠态度，使顾维钧对继续全力推动此事产生了疑虑，认为缔结这样一个条约对台湾来说利弊参半。5月13日，他致电叶公超谈了自己的看法：

> 棠案（台湾对“共同防御条约”的代号，英文代号为Clara——引者注）即使克日成立，于一般心理上固不无裨益，然实际于我保卫台湾及争取军经援助，难期骤获进步。而于我军事上之主要举动自由反攻，加上一契约上之拘束权，权衡得失，似乎利弊参半。如棠案于现在国际局势动荡变幻之时，仍为政府坚定政策，钧自当于见杜卿时力催，否则，拟轻描提询，以视其反响，暂观局势之演变。

但叶公超不赞同这一意见，回复顾维钧说：“棠案主要的目的在将双方现行互助防卫关系置于立法基础之上，并备参加扩大区域安全组织之地步。就作用言，政治实重于军事。……故仍请兄早日约晤杜卿，积极推动。”[59]

于是，5月19日，顾维钧到国务院拜见杜勒斯。杜勒斯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变化。尽管顾维钧强调条约的防御性质，但他发现，杜氏在回答时非常谨慎，遣词用句十分小心，时常做沉思状注视窗外，不愿对缔约做出任何承诺。此后因为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控制下的沿海岛屿发起进攻，7月1日顾维钧见杜勒斯时，请求美国政府宣布对沿海岛屿的安全表示关注，并声明这些岛屿处于第七舰队的巡逻范围之内。但杜勒斯明确回答，美国政府不愿发表任何正式的声明，因为这会引起过多的关注，但美国海军正关注着局势的发展。[60]在国务院屡屡碰壁后，顾维钧又频频约见国会议员和其他政府官员，只是这些活动未能发生作用。

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台湾海峡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顾维钧认为，这为美台之间缔结“共同防御条约”提供了机会。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他表示炮击金门表明大陆有可能再进攻其他沿海岛屿，而这些岛屿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防卫至关重要，因此美国应给予同情、资助和支持。[61]

美国对金门炮击引发的台湾海峡危机马上做出反应。9月12日，美国国家安全会议根据杜勒斯的建议决定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随后，美国请新西兰充当提案国。10月上旬，美国务院决定由助理国务卿饶伯森“访问”台北，直接向蒋介石提出新西兰提案。

美国国务院没有按惯例将饶伯森赴台之事通知顾维钧和正在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的叶公超，也未事先告知台北。顾维钧是从合众社的新闻稿中获悉这一消息的，这使他十分费解和惊讶，也很尴尬。他立即前往国务院探询，但与他见面的官员对饶伯森赴台目的讳莫如深。直到10月15日，饶伯森返回美国的当天，顾维钧才从台北来电中知道，饶伯森与蒋介石会谈就是为了提出新西兰提案。当天，顾维钧还收到台湾方面请饶伯森带来的蒋饶会谈纪要和蒋介石给叶公超、顾维钧的手书密信。蒋的密信曰：

> 公超部长、少川大使二兄大鉴：此次劳君（即饶伯森——引者注）突如其来，诚出于意想之外，其所说的不外重蹈马歇尔已经铸成大错的覆辙，但对劳君的关系与此事的方针不能不作一决定……
>
> 第一，钮西兰（即新西兰——引者注）提案对中美皆无一利而有百害，最好请美竭力劝阻不提，根本打销。此为第一希望。
>
> 第二，如不劝止上项提案，则钮提案中最好说明现在战争中之各岛屿皆为中华民国之领土，而且为其政府所控制保卫者。应由联合国阻止共党侵略，停止双方战争行动。此为第二希望。
>
> 第三，如钮案不能照上之意详述，则美国对此提案态度之说明，应由其代表详细说明上项我方之意、美在此项原则下支撑钮案之理由，则我方代表可暂不发言。否则，我代表必须由自己说明上项战争起因，以表明立场。此点甚关重要，余对劳君不啻重复申述矣。
>
> 第四，钮案提出之同时，美国发表正式声明，中美两国现正积极进行互助协定之中，其原则已获同意，或双方对原则已大体同意之意。

…………

第七，今日所谈多为原则问题，余现特指定叶、顾二君为余全权代表在美商讨一切具体办法、手续与文字，以及正式商讨双边协定之代表，而协定应以我方所提之草约为根据。

…………

中正手启

十月十四日九时[62]

此信是在饶伯森离台登机前刚写完交其带来的，台北来不及留底，蒋介石在信末还写有“本函阅后请寄还存案”的附言。这使顾维钧感到，饶伯森访台提出新西兰提案对台湾当局确是很大的冲击，一切都是在极其匆忙之中办理的。

所谓新西兰提案，就是由联合国出面处理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冲突，使美国不用卷入沿海岛屿问题。但将属于中国内政的国共对峙交由处理国际争端的联合国，也就认可了“台湾地位未定”，也有可能带来“两个中国”的问题。因此，蒋介石认为此提案“无一利而有百害”。

顾维钧一收到蒋介石的手书，就赶往纽约，要去见正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叶公超。蒋介石的信函顾维钧是上了火车才拆开看的。当天正值飓风来临，火车因电线被刮倒而停运，顾维钧第二天上午才到达纽约。从中午到傍晚，顾维钧与叶公超和蒋廷黻边阅读信函，边讨论，持续了6个多小时。在讨论中，顾维钧认为，应首先弄清美国这一行动的动机和目的，它是否想通过联合国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因为美国一直想把台湾这一棘手的问题，尤其是沿海岛屿问题推给联合国，所以首先要驳倒新西兰的提案。出于这一考虑，10月20日，顾维钧和叶公超一起与饶伯森会谈时，主要强调了新西兰提案问题，指出在“两个中国”的说法甚嚣尘上之际，该提案的后果特别严重，而并未谈及美台间的条约。[63]会谈后，顾维钧起草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台湾当局对新西兰提案的看法，于10月23日递交给国务院。

由于台湾方面对新西兰提案反应强烈，为安抚台湾当局，美国政府决定根据蒋介石在与饶伯森会谈中提出的要求（即蒋介石致叶顾密信第四条），开始“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

11月2日，美台谈判在华盛顿开始，前后共进行了9轮，历时3个星期。台湾方面叶公超参加了7轮，顾维钧参加了全部9轮。美国方面国务卿杜勒斯出席了第一轮和最后一轮，主要谈判者是助理国务卿饶伯森。谈判中，美台双方的争执和分歧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新西兰提案，台湾当局希望美国阻止新西兰向联合国提出；二是条约的适用范围，美国政府要将其限制在台湾和澎湖列岛；三是美国要求台湾当局保证，在征得美国同意之前不对大陆采取任何进攻性军事行动。

关于第一点，由于在谈判过程中台湾当局意识到美国根本不会放弃新西兰提案，因此不得不改为请美国在新西兰提案提出前先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关于第二点，顾维钧在1953年第一次向杜勒斯提出缔约要求时，提到可用“目前和今后”在国民党控制下的领土这样的措辞。经过多轮磋商，最后在条约的正式文本中写道：“所有‘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并将适用于经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64]在秘密换文中，美国只明确其条约义务限于台湾与澎湖，给“经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留下了模糊的空间。关于第三点，在台湾当局的要求下，美国同意不列入条约正文，由台湾当局在秘密换文中做出保证。由于谈判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对国民党控制下的浙江沿海岛屿发起海空进攻，形势对台湾当局非常不利，因此它做了很大让步，基本接受了美国的要求。只是出于面子上的考虑，台湾当局请美国将对其不利的限制写入秘密换文。美国也算给了台湾当局这一点点“面子”。

“美台条约”谈判至11月23日结束，双方商定在12月2日正式签约。12月1日，台湾当局授予叶公超和顾维钧签约全权，授权的电报是分别发给两人的。但是，叶公超与顾维钧见面时只字不提授权签约事，想由他本人独自签订条约。顾维钧认为这是叶公超被委派签署的第一个条约，而且又是蒋介石极为看重的条约，所以他想在外交史上留下一个印迹，这是很自然的，是人之常情。[65]12月2日，叶公超与杜勒斯在华盛顿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美台条约”签署后尚待各自立法机构审核批准，条约中涉及的美国所承担的防御区域及责任等敏感问题成为条约审批过程中的焦点。12月8日，顾维钧就台北询问有关美方审批条约的情况报告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根据美国政府的惯例和运作程序，总统将在1955年1月将条约递交国会，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最早将在1月底或2月初才能完成对条约的审议并交参议院全体表决。对于作为条约附件的换文，台湾当局希望美

方不予公布。但顾维钧认为，美国国内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不允许政府方面向国会隐瞒任何与条约相关的信息，所以换文的内容最终难免会泄露。[66]

“美台条约”签署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做出强烈反应。12月8日，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同台湾当局蒋介石签订的条约，指出该条约“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防御性的条约”，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性的条约”，是美国“对中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行为”。[67]《人民日报》在1955年元旦社论中表示，要粉碎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这个战争条约。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下的大陈岛、一江山岛等浙江沿海岛屿实施大规模空袭。新的军事形势使美国在条约谈判过程中刻意回避的沿海岛屿问题凸显出来。

1月12日，顾维钧为大陈诸岛形势紧急约见助理国务卿饶伯森。顾维钧首先表示，尽管对大陈诸岛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存在不同看法，但如果台湾当局失去这些岛屿，心理上的打击将十分深远。因此他呼吁美国采取对策，以制止事态的恶化，并提出五点具体请求：（1）美国政府尽快发表正式声明，确认它在沿海岛屿有利害关系和对目前局势的关注；（2）美国应派一名高级军官作为总统特使赴台北，与台湾当局共商局势；（3）美国明确保证为沿海岛屿防卫提供补给支持；（4）第七舰队应派分队至大陈岛周围，在安全距离内执行巡逻任务；（5）迅速向台湾交付军援计划中规定的急需项目，如飞机、驱逐舰和登陆艇。[68]

在沿海岛屿军事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国内一些原就反对与台湾签订“防御条约”以免被拖入中国内战的人，更是反对批准这一条约，主张通过联合国在台湾海峡实现停火，使台湾与大陆分开。顾维钧对这一将导致“两个中国”的主张忧心忡忡，及时向台北报告各种相关言论。而随着1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对大陈岛和一江山岛攻势日趋猛烈，台湾方面更急切地希望美国表明它对沿海岛屿的立场。1月18日，蒋介石致电叶公超，对第七舰队近日不敢进入大陈岛附近，表示“此为最令人不解者”，要求立即与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联络，请美方就大陈诸岛的形势给予明确而充分的答复，“其对大陈究竟主张我军固守或放弃，从速明确详告”，并保证第七舰队在大陈岛区域经常巡逻，以给台湾当局在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69]

但就在蒋介石发电报当天，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协同作战，一举攻克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1月19日中午，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Arthur Radford）讨论大陈岛区域新的局势，做出鼓励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出的决定。[70]于是，围绕着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出的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一轮新的交涉。

1月19日下午，顾维钧与叶公超同往国务院与杜勒斯会谈。这已是两人当天第二次与杜勒斯见面了，这次是在美国做出鼓励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出的决定之后。会谈一开始，杜勒斯就宣布美国政府向台湾当局提出的建议：第一，国民党军队自大陈诸岛自动撤退，美可提供海、空军掩护；第二，美国愿与台湾当局“协同采取确保金门区域安全之紧急措施”；第三，在从大陈撤军后，美国或其他第三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停火建议。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与其在条约谈判期间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立场相比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将美台“共同防御”的区域扩大至原先被排除在外的金门区域。由于此举可能使美国在介入金门的过程中与大陆发生军事冲突，而“美台条约”此时还未生效，因此杜勒斯告诉叶、顾两人，艾森豪威尔将会请求国会授予他必要时采取行动的权力。面对美方从大陈岛撤军的要求，叶公超表示国民党军队仍有坚守的决心和士气，但因事关重大须报告台北做最后决定。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叶公超询问美国对位于大陈与金门之间的马祖列岛持何态度，顾维钧则强调靠近台湾北部基隆的马祖与靠近台湾南部高雄的金门对防御台湾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希望美国承担更多的防御责任。但杜勒斯表示美国只负责帮助维护金门地区的安全，马祖如何处置由台湾当局自己决定。[71]

顾维钧对美国的这一决定十分失望，认为这表明美国无意帮助台湾当局“反攻大陆”，而只想致力于维持现状。[72]与杜勒斯会谈后，顾维钧与叶公超联名致电蒋介石和“行政院长”俞鸿钧，在报告会谈内容并强调杜勒斯态度甚为坚决后，就台湾方面如何应对提出了看法。他们认为，是否从大陈、马祖等岛撤军，台湾方面应有一妥善计划，以不使沿海岛屿在撤军后落入大陆之手。而如果接受美国建议，有关撤军的技术问题也须与美方详细会商。对于美方提出协防金门，该电表示当然“无可反对”，并指出美国在此用了协同确保金门“安全”的字样，这比“防御”的范围要广，意味着允许台湾当局对阻止中共以进攻金门或以台湾为目的的军事集结可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对于美国关于停火的建议，他们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应向美国讲明，“此项建议将导致‘两个中国’之局势，美

国朝野之主张‘两个中国’者将因此而变本加厉”。[73]整个电报的基调是赞同美国建议中的前两点，而反对第三点。

蒋介石收到此电后，“甚费踌躇”，“郁悒非常”，1月21日复电指示应对方针。蒋介石表示由于美国拒绝协防大陈，因此不得已接受美国提议从大陈撤军，同时接受美国协防金门区域。但蒋介石要求必须告诉美方，“放弃大陈在战略上实属错误，中美双方在军事上，将来必受严重影响”，且使台湾“民心士气大为沮丧”。因此在撤出大陈前，要求美方必须做到：第一，全力协助所需之运输工具；第二，第七舰队必须立即加强在大陈区域的活动，以阻止大陆军队突袭，并与台湾当局详定撤退计划；第三，美国协防金门区域与台湾当局撤出大陈的声明同时发表。由于对美国政府的意图存在疑虑，担心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承担对金门的防御责任后，会以此替代“共同防御条约”，使条约的正式批准无限期拖延下去，蒋介石同时要求催促美方迅速通过条约。而对美方提出的向联合国建议停火的方案，蒋介石表示坚决反对。在电报的结尾，蒋介石特别强调，从大陈撤退是为减少美方困难而做出的重大牺牲，因此上述要求美方做到的三点“可视为我同意撤出大陈之先决条件”。[74]

1月22日，顾维钧与叶公超一起去见助理国务卿饶伯森，根据蒋介石来电指示，强调了国民党军队从大陈撤退的三个先决条件，催促美国尽快批准“共同防御条约”，反对向联合国提出停火建议，以免导致“两个中国”。由于此前一天杜勒斯已对美方协防马祖做出承诺，顾维钧特别提到，美国应在台湾宣布撤退计划的同时发表协防金门和马祖的声明。饶伯森表示艾森豪威尔的咨文不会具体提到金门和马祖。叶公超指出，台湾关心的不是总统咨文，而是美国决定协防金门、马祖的声明，这个声明必须与台湾从大陈岛撤退的声明同时发表。顾维钧接着强调这是蒋介石的看法。根据顾维钧会谈后的记录，“饶伯森对这种解释表示感谢，没有提出进一步的反对意见”。因此在会谈后顾维钧起草的致蒋介石的电报中，叶、顾报告“双方同意当在美国会授权之后，彼此商定日期同时发表”。[75]

1月24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递交咨文，请求授予他在台海地区采取紧急行动的权力。次日，众议院以410票对3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艾森豪威尔的请求，随后提交参议院。由于预计参议院将很快通过此案，顾维钧与叶公超于1月27日走访饶伯森，再提美方应发表协防金门、马祖的声明。但饶伯森表示，杜勒斯已将总统协防金门、马祖的决定通知台

湾方面，美国政府不会再公开声明协防金门、马祖。顾维钧虽强调公开声明效果不同，但并没有继续讨论这一问题。[76]

1月28日上午，叶公超和顾维钧就双方发表声明之事约见杜勒斯。顾维钧提出，决议案通过后，台湾“甚盼美方能作一声明”，表明正与台湾“磋商采取巩固外岛防御之措施，以增强台澎之安定”，以与台湾方面的声明相呼应。杜勒斯表示赞同，并当即指示一同参加会谈的饶伯森“拟稿备核”，并称参议院可在一两日内通过，艾森豪威尔可在1月31日签署决议案并印发声明。会谈结束后，叶公超和顾维钧即致电蒋介石报告会谈情况，并送上他们根据杜勒斯意见修改的台湾方面的声明草案。[77]在他们看来，美台同时发表声明一事已安排妥当。然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却连外交经验丰富的顾维钧也深感意外。

1月28日下午，美国参议院通过关于台海地区的决议案。次日上午，艾森豪威尔签署决议案，并随即发表声明。由于决议案早于预期的时间通过，也由于美国方面对声明一事不如台湾当局那样看重，因此杜勒斯忘了将国务院已拟好的声明稿交给艾森豪威尔，所以发表的声明稿中并无原先商定的与台湾当局“磋商”和为从大陈撤退“提供帮助和支援”等词句，更未提及金门与马祖。这与台湾当局预期的美国声明大相径庭，而美国方面根本没意识到此事有何不妥，饶伯森还对顾维钧说，他认为声明很不错。声明发表后，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均离开华盛顿外出休假，一个去打高尔夫球，一个去钓鱼了。[78]

这一状况使顾维钧与叶公超陷入困境之中。1月29日下午蒋介石对1月27日叶、顾与饶伯森会谈后所做报告的复电到达使馆。与顾维钧当天交涉时的感受不同，蒋介石对饶伯森坚持美方不会公开声明协防金门、马祖的表态感到“不胜震骇”。因为根据叶公超和顾维钧在1月22日与饶伯森会谈后的报告，蒋介石认为双方已“商定美方协防金马声明与我撤出大陈声明同时发表，此二者为中美间相互约束之诺言”，所以美方“忽翻前议，殊属不堪想象，我方对此绝对不能考虑”。[79]稍后获悉艾森豪威尔的声明后，蒋介石反应更为激烈，认为美国欺骗了他，并对叶公超、顾维钧对美交涉十分不满，在日记中发泄道：“我国之所谓外交家，其凡到最后重要成败关头，其脑筋昏沉卑劣，几乎似无智觉之孩稚，殊为痛心。如此外交，焉能不受人轻侮欺诈耶？”“叶、顾乃为中国有名之外交家，而其无识、无力如此，诚不知国家如何能生存于此世界之上矣。”[80]

对于艾森豪威尔声明一事，台北主要是蒋介石看得远比在华盛顿的顾维钧和叶公超严重。由于台北与华盛顿之间的时差及译电需费时间，这一时期台美之间的交涉和电报往来多次出现交叉现象，顾维钧在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双方都非常混乱。"[81]蒋介石的强硬立场使顾维钧和叶公超缺少了之前谈判中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由于知道原先草拟的声明稿已被蒋介石否定，他们在致台北的电报中提出此后声明稿的修改可在台北进行。[82]实际上是在建议将台美谈判的重心转至台北，显露出对在华盛顿继续进行交涉力不从心的心态。

1月31日，艾森豪威尔致电蒋介石，表示其根据国会授权决定帮助防卫金门和马祖以对付武装攻击，但双方公开声明的词句不应超出国会决议案的范围，即不应出现金门、马祖字样。这是美国政府旨在安抚蒋介石强烈不满的举动。艾森豪威尔的电报2月1日到达台北，因为明确表示协防金门、马祖，消除了蒋介石原先的疑虑，随即调整关于发表声明的立场，改为只要求美国同意台湾方面在自己的声明中提到协防金门、马祖。[83]

此后，经过几轮磋商，最后台湾当局基本按照美国的意愿改定了声明稿，于2月7日发表："为适应抵抗国际共产集团权力之新形势，决定重行部署外岛军事，将大陈岛屿之驻军转移使用于金门、马祖等重要岛屿，以集中兵力，增强台湾、澎湖及其外围岛屿之防务。"[84]这样一来，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的撤走，似乎就不是败退，也不是听从于美国的安排，而是主动的战略调整了。

台湾当局声明发表的当天，美国开始帮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地区撤退。2月9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共同防御条约"。

听到美国国会最终批准"共同防御条约"的消息，顾维钧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交涉从大陈岛撤退的最后关头，连续不断地与美国官员会谈使他累出了咽喉炎，医生建议他停止社交活动和谈话，让声带得到休息，但他没法做到这一点。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顾维钧少了往日交涉过程中的自信和从容。在叶公超与杜勒斯签署条约的当天，他在日记中写下的感受不是松了一口气，而是"夜长梦多"。[85]

这一时期美台之间的交涉以华盛顿为主要舞台，由叶公超、顾维钧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全权代表台湾当局。叶、顾两人对蒋介石的指示当然是全盘照办的，但他们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将之付诸实施的，在一些关键

问题上不如蒋介石强硬。例如叶、顾两人在1月27日与饶伯森会谈后向台湾方面报告时没感觉有何严重问题，而蒋介石接读电报后却“不胜震骇”。华盛顿与台北之间的时空距离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差异。

就顾维钧而言，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从与美方会谈的过程看，叶公超较为直接，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

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是顾维钧外交生涯最后阶段最重要的活动。这一条约锁定了美台之间此后20多年的关系。由于完全站在台湾当局的立场上，顾维钧为这一条约做出的努力，实际上对中美关系的全局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整个谈判过程中，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这就为美台之间最后达成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四 心力交瘁别坛站

人的活动总是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使顾维钧的外交活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他仍继续为已经败退的国民党四处求援时，这位往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长袖善舞”的外交家，已无法从容不迫地应对各种棘手的外交难题，由此萌发了退出外交界的念头。

顾维钧最早是在1948年夏向金问泗谈起退休想法的。金问泗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时是顾维钧的助手，在外交界长期追随顾维钧，顾与他的关系亦师亦友。金问泗此时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当时顾维钧为争取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在美国国会议员和国防部等官员中积极游说，对国务院对华政策有含蓄的批评，引起对国民党已有厌恶之感的国务院的反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南京表示，中国驻美大使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胡适了，间接地表达了对顾维钧的不欢迎。因此，顾维钧对即将从美国去南京的金问泗说想卸任大使，并请他转告政府高层，万一美国提出要中国更换驻美大使时不致感到太突然。面对中美关系的困局，顾维钧想到了退休，想“从中国的政治旋涡和中美关系的迷宫中引退”，让其他比他更合适的人来接替他处理中美关系。[86]顾维钧与在美国的宋美龄和其他人谈话中也几次流露出退休之意。但是，蒋介石仍要顾维钧担任驻美大使这一重要职务，以应对困难重重的中美关系。顾维钧自己也明白，此时挂职而去会使人感到临难苟免，急于离开国民党这条下沉的船，而且有可能美国政府不会再接受新委派的大使，使馆只能由留守的代办来维持，这将给国民党造成很大的冲击。[87]因此，他只得继续留在华盛顿支撑局面，等待合适的时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顾维钧是在第二天早晨获悉这一消息的，他立即意识到，这“很自然地给我这个国民党政府的正式代表，造成了一个极端严重的局面”。1950年1月6日，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国民党驻英“大使”称英国的承认是来自以前的同盟者的沉重打击，是“活埋”国民党的行为。[88]在这前后，一些亚洲和欧洲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顾维钧深感一下子处于极不寻常的尴尬境地。因为驻节美国多年，顾维钧在华盛顿与各国的外交代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但其中不少国家承认了北京，它们的代表就不能再与顾维钧来往了。当顾维钧出现在一个社交场合，他们就把

头扭过去，好像他根本不存在。顾维钧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在向外交使团人员致意时，现在不得不小心一点了。这么多国家已经承认中共政权，在社交或公共集会上不论我问候他们的大使还是他们向我致意都是不恰当的。"[89]对于不到30岁就在华盛顿外交界崭露头角的顾维钧来说，这种滋味又岂是尴尬两字所能道尽的！

外交困境之外，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在美国引发不少棘手的麻烦事，让顾维钧叫苦不迭。除了前面提到的蒋介石与李宗仁的明争暗斗，让顾维钧有"一国何啻三公"之叹，蒋介石的亲信和亲戚、代表国民党空军长期驻美的毛邦初公开倒戈，与台湾当局对簿公堂，担任过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叫板蒋介石，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所有这些事让国民党在美国公众面前出丑丢脸，也让使馆工作更为艰难。正是这样的内外交困使顾维钧感到自己像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需要退下来休息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恢复了对台湾当局的军事援助，双方关系度过了最动荡不定的时期。顾维钧认为此时可以提出退休了。1951年11月，他与来访的董显光见面，谈了退休的打算。董显光此时担任《中央日报》董事长，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人，顾维钧希望他的意愿可以通过董显光转达给蒋介石。顾维钧告诉董显光，他打算来年提请辞职，原因与政治无关，只是为了个人考虑。他说了两个理由：第一，多年来无假日无休息连续工作已十分疲惫，常感力不从心，由年轻些的人来担任此职更为合适；第二，需要考虑老年的生计问题。如果退休早些，还可以写作为生，否则再拖几年，体衰力竭，就无法这样工作了，而自己几十年积蓄的私产已化为乌有，要为退休后的生活着想。董显光答应会将他的话原原本本向蒋介石报告，不过他认为至少在最近两年内台北不会让他离开华盛顿的。[90]

1952年10月，叶公超来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顾维钧向他正式提出了辞职的请求。除了重申向董显光表达的两个理由外，顾维钧还强调，目前对美关系已有改善，此时退休适逢其会，并说稍后会将辞职书交给他，请他回台北转交蒋介石。但叶公超反对顾维钧此时退休，并且认为蒋介石也不会同意他辞职，所以不愿收下他的辞职书带回台北。由于顾维钧在1949年极力劝说叶公超接受"外交部长"一职，并允诺全力支持，叶公超的反对，使他只得表示暂缓求去，以免让叶为难。[91]

顾维钧在华盛顿的职位上一待又是近两年。1954年6月4日，叶公超给顾维钧发来一封密电，告诉他蒋介石要请他去台北担任"考试院长"。

这一消息来得非常突然，使顾维钧大感意外。第二天，叶公超专门打来长途电话与他谈此事。叶公超说他也感到意外，并且不知道这一决定的幕后内情，但判断蒋介石的用意是好的，是希望顾维钧在他身边就“外交”事务提供咨询，因为原来担任此角色的王世杰已经被解职了。叶公超告诉他，可以观望一段时间，不必急于回复。[92]

但顾维钧认为对蒋介石的要求不能拖延答复。考试院是根据孙中山五权制构想设立的五院之一，名义上是与行政、立法等院平行的重要机构，但实际上在政府运作中并不起什么重要作用。它的职责是选拔人才，但并无任命之权，考试院长是一个位尊而权轻的闲职。顾维钧认为，如果蒋介石要酬答他多年的劳绩让他升迁，这是最合适的职位了。因为是一个闲职，接近顾维钧所向往的退休生活，反复权衡后，顾维钧于6月9日请叶公超转呈蒋介石，表示感谢并愿意接受蒋介石的美意，但又谦称对“考试院”缺少知识和经验。顾维钧的这一答复考虑周全，表达了对蒋介石的尊重和顺从，但又以缺少经验为自己留下了退路，因为他对这一任命能否最终实现，还是有些疑虑的。[93]

答复蒋介石后，顾维钧仍就“考试院长”一事征求几位在美国的重要人物的意见。宋子文建议他坚决辞谢这一职位。胡适认为他最好接受“外交部长”而不是“考试院长”的职位，并说这是蒋介石用升迁的方式让他退休。7月11日，顾维钧去见宋美龄。宋美龄对“考试院长”一事不以为然，认为华盛顿的职位更为重要，不能中途换马，对他说即使已经接受，也应该继续留在华盛顿工作，并说已将这一看法告诉蒋介石。[94]

见宋美龄一周后，顾维钧遵蒋介石指示赴台湾，“考试院长”是他此行的一个心结。抵达台北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就召见顾维钧。寒暄过后，蒋介石问顾维钧打算什么时候回华盛顿，顾维钧立即听出了话外之音，对“考试院长”一事心中也有了答案。于是，他主动提起此事，感谢蒋介石请他出任“考试院长”，但表示自己一直从事外交，不熟悉“考试院”的职责，无法胜任这一工作。蒋介石听后笑着说，这只是酝酿“考试院长”人选时提出来的，华盛顿的工作更重要，更需要有经验的人。后来，张群告诉顾维钧，请他任“考试院长”确是讨论人选时的一个考虑，是他建议蒋介石让叶公超先告知他，以便他坦率表明自己的想法。但顾维钧对蒋介石最初让叶公超来电，随后又当面一笑置之，还是觉得非常奇怪。[95]此次回台，蒋介石对顾维钧仍是礼遇有加。7月24日，国民党中央评议会举行每月一次的午餐会，“五院院长”和国民党元老都出席。

蒋介石让顾维钧坐在他的右边，左边是“监察院长”于右任，并让顾维钧简要报告国际局势和美国远东政策。[96]“考试院长”一事是顾维钧退休前的一个插曲。

虽然蒋介石对顾维钧说华盛顿需要有经验的人，但随着美台关系的改进和美国对台湾当局援助的增加，蒋介石转而希望有一个自己更亲信的人在华盛顿处理对美关系。1956年1月初，蒋介石让叶公超致电顾维钧，要他近期回台北议事。顾维钧是个聪明人，能从官样文章中读出隐含的意思。接到电报，他马上想起国民党在纽约办的一份中文报纸说过的话：“顾维钧老矣。”这种有意无意在报纸上出现的话并不是没有目的的。他又联想起一年多前的“考试院长”之事，明白此行与他的职位有关。由于早有退休之意，他决定大大方方地提出辞职。[97]

1月22日，顾维钧抵达台北。一下飞机，就问来接机的叶公超召他回台湾的目的。叶公超告诉他，蒋介石对华盛顿的职位已另有人选。叶公超的话证实了顾维钧的预判。当晚顾维钧拜见蒋介石，报告对美“外交”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时间仓促，也可能因为蒋介石并未有所暗示，顾维钧没有提及辞职一事。但蒋介石认为顾维钧应该明白此行的目的，对他不主动提出辞职大为不满，当天在日记中写道：“顾甚想继续连任驻美大使，似无自动辞职之意，人不自知，奈何。”[98]

1月26日，顾维钧第二次见蒋介石，主动提出辞职，表示年岁已大，华盛顿的职位需要一位更年轻的人。蒋介石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请他与“副总统”陈诚商谈。第二天，顾维钧去见陈诚。陈诚对他说，他可以辞去华盛顿的职位，但必须担任“特命巡回大使”，对南美和欧洲的国家进行“亲善访问”。顾维钧认为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使命，坚辞不就。1月28日，顾维钧离开台北临上飞机时蒋介石再次约见他。蒋介石也提出了“巡回大使”，并具体提到顾维钧可利用与英国首相艾登及其他内阁部长的关系，说服英国的对华政策朝着有利于台湾方面的方向变化。顾维钧表示，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任务，因为过去出使英国受到崇高的礼遇，而现在英国不承认台湾当局发的护照，他甚至无法获得赴英的签证。最终，蒋介石认可了顾维钧辞职的请求。

当顾维钧离开蒋介石官邸时，蒋介石起身送他到起居室门口，而没有像以往那样陪他出来，送他上车。十多年后口述回忆录时，顾维钧仍清楚地记得这个细节，可以想见当时对蒋介石在他即将结束外交生涯之际的这一举动是如何感慨系之的。蒋介石自己可能也认为这样对待一位

资深外交家有些不合适，随即让副官叫住送顾维钧出门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说是另有吩咐。待张群再出来送顾维钧时，转告了蒋介石的话，要请顾维钧担任“总统府资政”。顾维钧推辞一番后，接受了这一荣誉性的虚职。[99]

返回华盛顿后，近一个月台北没有进一步的消息，顾维钧遂于2月28日正式递交了书面辞呈。3月8日，蒋介石致电顾维钧，同意他辞职，并将派董显光继任他的职位。[100]5月8日，顾维钧离开双橡园，结束了10年驻美的使命，也结束了在中国外交界漫长的服务生涯。此时，距他首次赴华盛顿担任中国驻美公使已过了整整40年。

顾维钧提出辞职时，希望台湾方面能派年轻人继任，但台湾当局任命接替顾维钧职位的董显光竟比顾维钧还大9个月。只因为董显光担任过蒋介石的英文老师，是蒋介石的亲信。当年台湾的《联合日报》就此专门发了一篇社论，对台北换人之本意有所揭示和评论：

> 国府驻美大使顾维钧退休，由驻日大使董显光继任，这消息传闻已久，至昨日（4月5日）行政院例会正式通过任命董显光为驻美大使，始完全证实。董与顾年龄相若，都有退休资格，此次一进一退，年龄显然不是一个基本因素。据说更重要者，是台北嫌顾对美宣传工作做得不够，顾亦自知朝里无人难做官，故毅然提出辞职，决定从事著述，急流勇退，顾毕竟是聪明的。
>
> 顾系一职业外交家，为国宣劳已逾四十年，现虽老迈，其经验学识与声誉仍值得政府借重，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自己亦未必忍心偷闲。然而，在台湾政治环境下，以一个缺乏特殊关系的外交能手，荣膺大使的重任，八面玲珑，不遭猜忌，已煞费苦心，欲轰轰烈烈，表现成绩，更谈何容易。……
>
> ……大使难做，固有非局外人所能想象者。平心而论，顾氏显与董氏不可同年而语。董系蒋经国的“太老师”，素又为宋美龄所深信，历史深长，关系密切，出任驻美大使诸多方便。顾则缺乏此种特殊关系，位高招忌，出任驻美大使徒见其活受罪而已。
>
> 顾氏退休矣，为其个人着想，确是非常聪明，吾人愿庆贺

其从此无官一身轻，不必再受罪。为国家着想，则显然是一种莫大的损失。一代外交家从此归隐，吾人于惜别之余，深望国府念其当年曾在国际上为国家放过异彩，立过不朽之功，授予文官最高勋章，以资表彰，而励来者。……[101]

此篇社论所述并不完全准确。顾维钧在口述回忆录时没有细述从外交界退休的感受，但他将这篇社论从报纸上认真地剪下来，保存在自己的日记本中，从中不难揣度他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心境。

[1] *FRUS*，1948，Vol.8，p.146.

[2]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71、102页。

[3] 《顾维钧致外交部》（1949年6月23日）、《外交部致顾维钧》（1949年6月2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8。

[4] 《顾维钧致蒋介石》（1949年7月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7；《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182、186页。

[5]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1页。

[6]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231、235～236页。

[7]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244页。

[8]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45页。

[9] 《顾维钧日记》，1949年8月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7。

[10] *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34.

[11]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438页。

[12]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第289～300页。

[13]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第300～301页；《蒋介石日记》，1949年11月3日。

[14]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496～497、502～508页。

[15] 《顾维钧致王世杰》（1949年12月1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5。

[16]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508、531页。

[17] 《叶公超致顾维钧》（1949年12月16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5。

[18]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536～544页。

[19]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第304～305页。

[20]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553页。

[21]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10页。

[22] 《顾维钧致外交部》（1950年1月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5。

[23]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366页。

[24]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367、562页；《蒋介石日记》，1953年10月23日。顾蒋的记载稍有差异。顾维钧没有谈到与里基特见面的具体日期。蒋经国在告诉蒋介石该事时说，顾维钧称1950年2月有一个英国人向他提出，但没提此英国人的姓名。但两人都谈到了会送一艘船给蒋，应是同一件事。

[25]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565～566页。

[26]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603页。

[27]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736～738页；*FRUS*，1950，Vol.6，pp. 333-335。

[28]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741～742页。

[29]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765、778页。

[30]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1页。

[31]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89～90页。

[32] 《顾维钧致叶公超》（1950年6月2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5；《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7页。

[33]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8页。

[34] 《顾维钧致叶公超》（1950年7月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5；《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39～42页。

[35]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8～9页。

[36]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11～12页。

[37]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24页。

[38]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86～87页。

[39]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85～86页。

[40]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88～90页。

[41] 《蒋介石日记》，1950年8月17日。

[42]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93～95页。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68页。

[44]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99页。

[45]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103页。

[46] 《顾维钧致叶公超》（1950年9月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5。

[47] 《蒋介石日记》，1950年9月5日、7日、9日。

[48]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136～139页。

[49]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147～148页。

[50]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149页。

[51] 《蒋介石日记》，1950年11月1日；《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152页。

[52]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153～154页。

[53]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161页。

[54] 《叶公超与艾森豪威尔会谈记录》（1953年1月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7。

[55] 《顾维钧与杜勒斯会谈记录》（1953年3月1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87。

[56] 《顾维钧致蒋介石》（1953年4月1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7。

[57] 《叶公超致顾维钧》（1954年2月2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8。

[58] 《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第198～199页。

[59] 《顾维钧致叶公超》（1954年5月13日）、《叶公超致顾维钧》（1954年5

月15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52。

[60] 《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第202、209～210页。

[61] 《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第302页。

[62] 《蒋介石致叶公超、顾维钧》（1954年10月1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5。

[63] 《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第349～350、364～366页。

[64] 《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第595～596页。

[65] 《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第478页。

[66] 《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12～13页。

[6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30页。

[68] 《顾维钧与饶伯森会谈记录》（1955年1月1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95。

[69] 《蒋介石致叶公超》（1955年1月1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5。

[70] *FRUS*，1955-1957，Vol.2，p.43.

[71] 《叶公超致蒋介石、俞鸿钧》（1955年1月2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5；《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68～72页；*FRUS*，1955-1957，Vol.2，pp.46-50。杜勒斯在当天与艾森豪威尔的讨论中也提到了马祖，但未拿定主意。见*FRUS*，1955-1957，Vol.2，p.42。

[72] 《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67页。

[73] 《叶公超、顾维钧致蒋介石、俞鸿钧》（1955年1月2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5。

[74] 《蒋介石致叶公超》（1955年1月21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5；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0册，台北："国史馆"，2015，第411页。

[75] 《叶公超、顾维钧致蒋介石》（1955年1月2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5；《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85～92页。

[76] 《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109～112页。

[77] 《叶公超、顾维钧致蒋介石、俞鸿钧》（1955年1月28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5；《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121～125页。

[78] 《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127页。

[79] 《蒋介石致叶公超、顾维钧》（1955年1月2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5；《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129～130页。

[80]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0册，第418页。

[81] 《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144页。

[82] 《叶公超、顾维钧致沈昌焕》（1955年2月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5。

[83] 《沈昌焕致叶公超》（1955年2月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45；《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154页。

[84] 《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185页。

[85] 《顾维钧日记》（1954年12月2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8。

[86]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99～403页。

[87]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102页。

[88]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408、469页。

[89]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469页。

[90] 《顾维钧回忆录》第9分册，第481～483页。

[91] 《顾维钧回忆录》第9分册，第608～610、652页。

[92] 《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第155～157页。

[93] 《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第159页。

[94] 《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第164、166～169页。

[95] 《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第236、277～278页；第12分册，第713页。

[96] 《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第235页。

[97] 《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713页。

[98] 《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713～715页；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0册，第539页。

[99] 《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717～719页。

[100] 《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730页；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0册，第554页。

[101] 台湾《联合日报》1956年4月7日。

第十二章 人间重晚晴

一 国际法院法官

1956年5月从驻华盛顿的职位上退休时，顾维钧已经过了68岁生日，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早在考虑退休时，他就盼望着摆脱繁忙的公务，享受生活的乐趣，做一些自己喜欢做而不是不得不做的事。他希望做的事有三件：第一，休息或度假以消除长期紧张工作带来的疲劳；第二，写一些东西和做一些研究，并开始准备回忆录的写作；第三，依靠在国际事务和国际法方面的经验和学识以及人脉，为大公司或国际法律咨询机构工作，或自己开一家法律事务所，以解决退休后的经济来源。[1]

离开华盛顿后，顾维钧搬到纽约市郊外住了下来。但不久，他就接到台北的电报，希望他接受提名，参加在联合国进行的国际法院法官的竞选，以递补由于徐谟在6月底去世所留下的国际法院空缺。顾维钧对徐谟十分了解。他是在中国驻美公使馆作为顾维钧的随员开始外交生涯的。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出任外交部长，他是次长。1946年联合国选举首批国际法院法官时，顾维钧代表中国将他介绍给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各国代表团，为他顺利当选助力颇多。徐谟在国际法院法官任上去世时，尚有一年多的任期。

对于台北的要求，顾维钧表示乐于从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的专业就是国际法，当然希望有机会运用当年所学，何况国际法院法官还有着优厚的薪俸，正好解决晚年生活的后顾之忧。但顾维钧要当选国际法院的法官并非易事，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资历和声望不够，而是因为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以及由此带来的新中国国际声望的提高，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发生了变化。

1956年12月，联合国举行国际法院法官空缺的选举。根据联合国章程，法官选举由安理会和大会分别进行投票，在两处都获得高票者当

选。但选举中出现了复杂的结果。在安理会的三次投票中，顾维钧均获得绝对多数，而在联合国大会的十多次投票中，顾维钧都未能超过日本提名的候选人。僵持之下，美国出面了。国务卿杜勒斯说服日本首相吉田放弃竞选国际法院法官，作为补偿，美国答应在第二年的安理会选举中支持日本获得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样，1957年1月，顾维钧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同时获得多数，当选“国际法院法官”。与徐谟轻而易举当选首任法官相比，这次选举困难重重，顾维钧对此感慨万千。[2]

1957年4月，顾维钧到国际法院赴任。由于徐谟所留任期到1958年2月终止，顾维钧刚到任就面临着又一次竞选。由于已在任上，这次选举波澜不惊。1957年10月，顾维钧再次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这次是完整的9年任期。

国际法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联合国的司法机构而设立的，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是法院规约的当然参加者。国际法院的职责是根据国际法解决国际争端，并向联合国有关机构提供法律方面的咨询意见。国际法院由15名法官组成，法官虽然通常由他自己的国家提名参加竞选，但当选后并非意味着代表本国，而被认为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他们的工作是国际性的。

国际法院设在荷兰的海牙。这是一座靠近北海的美丽城市。自1899年、1907年在此举行两次国际和平会议后，海牙就成为永久性的国际法中心。国际联盟的国际常设法院也曾设在海牙。顾维钧来到海牙后，在离国际法院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海牙，只在短暂的休庭期间才回到纽约。

离开服务了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界，来到国际法学界，顾维钧对早年学习的国际法并无荒疏之感。根据国际法院的传统，对案件的审议各位法官可以各抒己见，讨论中也时常出现意见分歧，但审议和讨论的内容不对外公开，而是在法官投票表决后当庭宣布最终结论。虽已过古稀之年，顾维钧在国际法院的工作仍像在外交界那样一丝不苟。10年任职期间，国际法院一共召开了200多次会议，他从未缺席过一次。这期间，国际法院共研究和判决了17个案件，他参加了所有这些案件的秘密审议和公开审理，担任了其中3个案件的起草委员会委员，还对其中的8个案件发表了书面意见。有的意见书刊登在法国和德国的国际法学会专刊上，受到国际法学界的重视。[3]

在这17个案件中，有西南非洲案，该案被认为是“国际法史上，历时最久、案情最为复杂之案件”。[4]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原是德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其根据国联盟约有关委任统治的规定被交由南非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联终止，委任统治地或独立，或改为联合国托管地。南非趁机提出管理西南非洲已有多年，要求将该地并入南非。此举遭到联合国大会否决，并通过决议将西南非洲置于托管制度之下，南非应定期向联合国托管理事会递交西南非洲报告书。但南非反对递交报告书。1960年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将南非告上国际法院，要求判其在西南非洲行为违反国联盟约和《联合国宪章》。但南非申辩称埃、利两国并无法律权益可以提起诉讼。国际法院对此案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审议。1966年投票时，参加投票的14名法官以7比7持平，最后法院院长投出决定票，以8比7赞同南非，否决了埃、利两国的诉讼权。[5]

顾维钧不赞同这一判决，投了反对票。根据国际法院规约，法官对法院之判决可以表示个别意见。顾维钧对此案发表了反对意见。在参加投票的国际法院法官中，只有顾维钧既参加了国联盟约的制定，又参加了《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对委任统治制和托管制的宗旨和实质都有深刻的理解。旧金山会议上，他还就托管制度与美、英等国争辩，最终将“独立”写进了《联合国宪章》关于托管制度目的的条文中。因此，顾维钧的反对意见，旁征博引，立论严谨，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提出委任统治制讲起，梳理历史发展脉络，引证国联盟约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剖析原告被告各自的诉求，最后得出结论：埃、利两国有对本案之实质法律权益，南非有对联合国负责之义务。[6]

顾维钧的反对意见基于他对西南非洲案的深入研究，几年间他为此案写下了十多本笔记。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在联合国托管事务部工作，负责非洲事务。她看见父亲在西南非洲问题上倾注了那么多精力，有些不解，就问他为什么对此问题这么感兴趣。顾维钧回答说，以往在外交界服务，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代表政府的，自己有不同想法必须保留，如今在国际法院是第一次能够真正表达个人的意见。[7]顾维钧的反对意见建立在严密的法理基础上，但他站在西南非洲一边，内心不会不想到自己代表中国与列强争辩的经历，不会不想到自己“以公理争强权”的抱负。

1964年，国际法院正副院长任期将满，顾维钧的同事中有人建议他

出来任院长。但当顾维钧知道来自澳大利亚的法官希望获得院长的职位，就表示绝不与他人竞争。这样，在3月国际法院法官的投票中，他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这主要是一个荣誉性职务，除非院长因病或因故不能出席时才会代行院长职务，但顾维钧3年“副院长”任期内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

1965年10月，在顾维钧任期结束前一年，台湾方面来函，请他竞选连任“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复函称，自己已决定退出国内外一切公职，并推荐了几名有资格接替他的人选。但台湾当局担心其他替代人选声望不如顾维钧，落选可能性很大，不接受顾维钧的推辞。在台湾方面的反复恳求下，顾维钧勉强同意出来竞选连任，并表示应首先与美国接触获得其支持。但这次美国的态度与上次完全不同，非但不予支持，反而建议顾维钧以年迈为由退出候选人行列，因为美国政府已承诺支持菲律宾人竞选国际法院法官。于是，1966年10月26日，顾维钧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正式表示出于健康原因放弃“国际法院法官”的候选资格。[8]

对在国际法院任职十年的经历，顾维钧自己有一总结：

> 这是我的一生公职中，我最欢喜及适意的职位。原因有三。（一）我在哥伦比亚大学领的是国际公法学博士。因此，我供职于海牙法庭，可谓用其所学。（二）国家间有争执无法解决时，便把争端提交国际法庭请求依法解决。双方的律师都是国际闻名的法学家。我对他们的辩论极感兴趣。（三）法庭有法官十五人，都是著名人物。有些曾当过总统……我们相处甚笃，住同一旅馆，有时一同步行到法庭办公。此外，我讲句老实话，国际法庭的法官地位是很高超的，既不受其本国政府的控制，也不受联合国的干预。全世界均尊重他们的独立和自由。不像充任本国政府的官吏，即至高至上有若总统总理，时常会有麻烦事情搅扰精神，令人寝食难安。同仁都是君子人士，彼此毫无权力的冲突。时常相见如宾。国际争端是不常见的。[9]

二 婚姻与家庭

顾维钧从国际法院退休后，从荷兰回到美国，在纽约曼哈顿最繁华的地段公园大道租了一套公寓，真正开始了退休生活。这时，他已经过了78岁。

在这之前，顾维钧已经与结婚30多年的黄蕙兰离婚了。离婚前，他们两人已经貌合神离地生活很多年了。

顾维钧与黄蕙兰，郎才女貌，黄蕙兰还会说多种欧洲语言，两人的婚姻在一般人看来天造地设，十分般配。但实际上两人的生活习性相差甚远。黄蕙兰的父亲是印尼“糖王”、华侨首富，她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自幼长住欧洲，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耽迷于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顾维钧任职北京政府时期，黄蕙兰与外交使团尤其是公使夫人们交往应酬，欢快融洽，这是她喜欢的生活。顾维钧当时已是有国际声誉的外交家了，但在黄蕙兰眼里，他与西方人在一起还不能像她那样愉快自如。而两人的感情在经过一见钟情的热烈初恋后，在北京生活时已经冷淡下来了。黄蕙兰认为，他们的生活在物质上是满意的，但她与顾维钧并不相爱。[10]

顾维钧任驻法公使期间，他与黄蕙兰的婚姻出现了问题。1934年回国述职时，顾维钧与他后来的太太严幼韵有了密切来往。张学良是这一段来往的直接见证人。1990年，张学良对帮助顾维钧整理过回忆录的唐德刚说，西安事变前，也就是顾维钧回国述职那段时间，他与顾维钧打麻将，同桌的还有严幼韵。黄蕙兰怒气冲冲地来了，拽着顾维钧走，顾坐在那里就是不走。黄蕙兰拿着茶水从顾维钧的头上浇下去，顾端坐着还是不走。黄蕙兰指着严幼韵当面开骂，严也是端坐不动。[11]

有一张顾维钧留下的照片可以为张学良的口述提供一个注脚。1936年初，顾维钧回法国前，在上海与送行的朋友聚会时拍了一张合影。60位多位朋友中有银行家周作民、京剧名角梅兰芳等各界名人。顾维钧与黄蕙兰作为主人坐在前排正中的位置，严幼韵紧站在顾维钧的背后，而严幼韵的丈夫杨光泩远远地站在第五排即最后一排的边上。[12]

顾维钧返任后不久，杨光泩被派往巴黎，负责在欧洲为抗战做宣传，严幼韵也随之来到了巴黎。这一期间，顾维钧参加外交活动的照片

上，有几张可看到严幼韵在场。黄蕙兰有一天在日记中不无怨恨地写道："这位风流大使又像个夜行人一样溜出去会他的女相好了。"1938年，难以忍受的黄蕙兰直接给孔祥熙写信求助，要求将杨光泩调离巴黎。杨光泩原有可能出任驻捷克公使，但最终孔祥熙将他调离开欧洲，去了亚洲的菲律宾。[13]

1946年顾维钧重返华盛顿，严幼韵在抗战结束、丈夫杨光泩在战争中为国捐躯后来到纽约，两人重续前缘。黄蕙兰在她的回忆录中抱怨说："维钧每个星期要到纽约去度周末，从星期五一直待到下个星期二，与他那位在联合国工作的女相好相会。"她与顾维钧的关系也越来越糟糕，"维钧似乎变得日益高大。他为所欲为，不与我商量。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旁"，"如果没有客人，维钧和我从不同桌进餐"。[14]

不过除了亲近者，华盛顿外交界看到的仍然是雍容华贵、殷勤待客的大使夫人。顾维钧保存下来的这一时期照片中，许多拍摄于社交场合，照片上黄蕙兰的笑容要比在场的顾维钧更自然更灿烂。在这些场合，她如鱼得水，十分享受大使夫人的荣耀。场面应酬之外，黄蕙兰对顾维钧的外交活动也有实际的帮助。如1950年底的一个周末，顾维钧正在纽约，塔夫脱参议员有急事要约见他。黄蕙兰与顾维钧通话后，就代表他去与塔夫脱见面会谈，将事情办妥。[15]

与顾维钧和黄蕙兰都熟识且自己有过外交官经历的袁道丰对黄蕙兰有这样的评论："顾大使得此良伴，周旋于外国政要与使团之间，也可以说天助自助。虽说他只管太太的账，但直接或间接的得到的便利大约不会少的。""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如林的当中，最出色的中国大使夫人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中外人士都对她表示尊敬，就是多年貌合神离的顾公维钧，对她肆应外交的功绩也不能忘怀。"宋美龄在人们交口称赞顾维钧的外交贡献时，就特别提醒说："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呀。"[16]

1956年1月底，顾维钧从台北返回华盛顿当晚，告诉黄蕙兰他已辞职。次日一早，黄蕙兰不辞而别，离顾维钧而去。[17]没有了大使夫人的头衔，她不愿再与顾维钧维持有名无实的婚姻了。此后，黄蕙兰一直住在纽约。1993年12月，百岁生日那一天，她无疾而终。

顾维钧晚年与其相伴的夫人就是严幼韵。严幼韵出生在一个典型的

近代商人家庭。她的祖父严信厚17岁时离开浙江宁波附近的农村，来到上海在银楼学生意。后入李鸿章幕府，得到署长芦盐务帮办的官职，开始以盐务起家，并投资工商业，成为东南地区有影响的大商人。20世纪初，上海各界商人组织总商会，他出任上海商务总会首任总理。严幼韵出生于1905年，两岁时严信厚去世了，但留下一份丰厚的家产，可以说她也是含着金汤匙来到人世的，从小就过着无忧无虑的富家生活。

1925年，严幼韵进沪江大学读书。沪江是一所教会学校，有严格的校纪校规，学生被要求住校，每月只能回家一次。严幼韵感到校规太过严厉，读了两年后，正好复旦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就转校来到校园氛围宽松得多的复旦读商科三年级。

因为是第一届女生，复旦的女生宿舍尚未建好，这正合严幼韵不愿住校的心意，因此就坐自备轿车从地处静安寺的家中来校上课。轿车配有司机，车牌号是84号。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沪语“爱的花”。严幼韵长得漂亮，父亲在南京路上开着“老九章绸布庄”，各种衣料随她挑，因此每天更换的服装总是最时髦的，令人眼花缭乱。“爱的花”这一外号也就不胫而走，更传出复旦校园，出现在上海的报章上。与严幼韵同届的商科男同学章宗钰回忆道：

> 那时校花Eighty Four译名“爱的花”，不仅在复旦而且在全上海是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打扮入时，无法形容她的美在何处，至少她上下午服装不同。徐文台学长说她是一“衣服架子”，因为她家是开绸布庄的；好有一比，萧子雄女同学和她寸步不离，一高一矮，一美一丑。例如邱正伦教授的公司理财课，她俩每次必迟到，门声响处，皮鞋答答，大家一定“向右看”，弄得邱教授讲“Issue Bond，Issue Bond”，接着说不下去，足证其魔力之一般。
>
> “爱的花”做功课大有一套，遇到要交习题或报告，她会电话某位男同学，说要借他的习作一看，闻者无不欣然听命，归还时洒上一些香水示意，甚至一位周同学正本报告被她拿去交卷，认为是“受宠若惊”！[18]

1929年夏天，复旦大学第一批入校的女生中有4人可以毕业了，严幼韵名列其中。但临近毕业，学校注册部公布“缺课逾四分之一不能参与大考”名单，严幼韵也榜上有名，且名列第一，注明是戏剧学缺课逾四分

之一，按例不能参与大考，于是毕业就成了问题。因为是校园名人，一时议论纷纷，连《申报》都刊登消息。复旦大学实行学分制，如果缺几个学分，可以通过暑期课程补足。但据说严幼韵不愿在酷暑中来学校上课，而是另想办法。复旦还有一规定，学生在课外阅读中有心得写成论文，经相关科目的教授审阅后如获肯定，亦可得到相应的学分。严幼韵最终交了一篇论文补齐学分，终于毕业。[19]

毕业前夕，严幼韵遇见了杨光泩。杨光泩第一次看见严幼韵时，她正自己开着那辆“爱的花”轿车。他一见钟情，马上请朋友介绍认识，以后就不断地送花、约会、看电影、跳舞。杨光泩不到而立之年，但已是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帮办和条约委员会成员。杨光泩出生在湖州丝商家庭，其祖父在19世纪末来上海开丝行。1920年，杨光泩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获庚款资助赴美留学，四年后获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留学期间，杨光泩担任过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学生随员，还担任过《中国留美学生月刊》主编，只是比顾维钧晚了十多年。1927年，杨光泩受聘于母校清华，担任政治学和国际法教授，并兼北京政府外交部顾问。1928年初，北京政府大势已去，杨光泩受邀南下，加入国民政府。[20]

面对这样一位前程似锦的外交官的追求，严幼韵当然无法拒绝。1929年9月8日，严幼韵与杨光泩结婚了。婚礼在他们经常去跳舞的大华饭店举行，这也是9个月前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的地方。出席婚礼的有千余人，证婚人是外交部长王正廷。新郎是年轻有为的外交官，新娘是复旦校花、名门闺秀，这样的婚姻，自然成为媒体追捧的对象。[21]

1930年，新婚不久的杨光泩出使海外，严幼韵随夫出洋，开始了外交官夫人的生活。杨光泩先在伦敦任总领事，随后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国联会议。他与严幼韵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在日内瓦。在严幼韵的记忆中，那段日子里，他们就是不断地整理行李、搬家，由于每次调动，杨光泩必须马上熟悉新的工作，搬家的杂事必须由她自己来做。顾维钧是中国驻国联代表，常从巴黎来日内瓦。那时中国外交界的年轻人，只要有机会都想结识顾维钧并向他请教，杨光泩也不例外。严幼韵与顾维钧也因此相识。1933年夏天，杨光泩夫妇还与顾维钧夫妇一起去蒙特卡洛度假。[22]

1934年，杨光泩奉召回国，出任在上海出版的《大陆报》总经理和

总编辑。《大陆报》是一份有国际影响的英文报纸，该报的社评大多由杨光泩执笔。国民政府挑选他担任此职，就是要借重他的专业素养加强对外宣传，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支持。顾维钧回国述职期间，与杨光泩多有来往，杨光泩就《大陆报》股权事宜多次请教顾维钧。[23]公务之外，两人私交也很亲近，有一次一同去杭州满觉陇观赏桂花，不过被记者发现同行的不是黄蕙兰和严幼韵，而是两位“妙龄女友”。[24]

1937年，杨光泩再度被派往欧洲，常驻巴黎做对外宣传，严幼韵随即从国内赶来与丈夫团聚。如前所述，第二年，杨光泩被派往菲律宾出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当时菲律宾尚未独立，中菲间没有设使馆，驻马尼拉总领事就是中国在菲律宾的最高外交代表。1939年初，严幼韵带着他们的三个女儿也来到了马尼拉。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爆发，日军同时向驻菲律宾的美国军队发起攻击。面临战争的炮火，杨光泩沉着镇定，一面与侨界领袖联络，会商应变办法，协助华侨疏散；一面开始烧毁华侨抗战捐款存据和其他重要文件，并奉国民政府命令，销毁在美国印制、运往中国途中搁置在马尼拉的大宗法币。美军司令麦克阿瑟从马尼拉撤走时，要杨光泩一同走，但他表示因未接国民政府撤退命令，所以必须恪尽职守，坚守岗位。

1942年1月2日，日军攻占马尼拉。两天后，杨光泩与留守总领事馆的另七名外交官遭日军拘禁。当日军士兵来到杨光泩在战争爆发后居住的马尼拉饭店时，他十分镇静地拿起早就准备好的一包衣服告别妻女。被日军拘禁期间，杨光泩严词拒绝日军要其向华侨募款的要求。4月17日，杨光泩和七名外交官惨遭日军杀害，为国捐躯。抗战胜利后，194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十周年的日子，国民政府派专机将杨光泩等烈士的忠骸运返祖国，在南京举行庄重的公祭和公葬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杨光泩这位抗日外交烈士也充满敬意。1987年11月17日，江苏省和南京市政府举行纪念杨光泩等烈士公葬40周年仪式。

丧失丈夫的巨大打击没有击垮严幼韵。作为母亲，她要照养三个女儿，最小的女儿才刚过三岁。作为总领事夫人，她感到有责任照料好其他七位外交官的妻子儿女。于是，她刚到马尼拉时租下的三个卧室的屋子，就成了这些外交官家属共同的家园。除了每个卧室要住两户人家外，客厅里也还得住人，整个屋子一共住了近20个人。

生活虽然艰辛，但严幼韵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屋子里留有一架旧钢琴，空闲的时候她会去弹奏挪威作曲家辛丁（Christian Sinding）的曲子《春之声》。严幼韵的大女儿杨蕾孟此时已过十岁，她清楚地记得母亲在整个战争期间从未显现出任何忧虑的神态。因此这段艰难的日子，在严幼韵女儿的记忆中却留有一些儿时的童趣。[25]

1945年3月，美军攻占马尼拉后，严幼韵和她的三个女儿在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安排下，搭乘第一艘携带美国平民回国的轮船前往美国。随后，她在联合国礼宾司开始了自己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担任礼宾官。此时，顾维钧与严幼韵，一在华盛顿，一在纽约，周末就是两人见面的日子。1953年，严幼韵护照到期，顾维钧专门写信给叶公超，请求给她办外交护照，而不是按常规办公务护照。[26]1959年9月，两人在墨西哥城终于正式办了结婚仪式。此时，顾维钧71岁，严幼韵54岁。

虽然相爱多年，并已步入老年，顾维钧对严幼韵仍是情意绵绵。刚到海牙一人独居时，他给远在纽约的严幼韵写诗寄托相思之情：

夜夜深情思爱人，

朝朝无缄独自闷。

千种缘由莫能解，

万里邮航一日程。[27]

严幼韵对顾维钧的爱，更多地体现在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上。每天凌晨，顾维钧熟睡一段时间醒来后，她已准备好一杯热牛奶和几块饼干，放在床头柜上，让他喝下后继续睡觉，唯恐他从晚餐到早餐空腹时间过长，于身体不利。顾维钧退休后生活安逸，健康长寿，得之于严幼韵者良多。

如果不算父亲定下的与张氏的婚事，顾维钧一生有过三位夫人。有人称之为顾维钧的婚事三部曲：一主贵，与唐宝玥结婚，借以发展政治地位；二主富，与黄蕙兰结婚，得以多财善舞；三主爱，与严幼韵结婚，相亲相爱，白头偕老。能从婚姻中得到的，顾维钧都得到了。顾维钧自己说，三位夫人中，他最喜欢严幼韵，因为她最了解他、照顾他。[28]

因为顾维钧的声望，他的婚事和情史是公众瞩目的。但他本人却不

愿多讲，在几百万字的口述回忆录中一语带过。唐德刚帮他做口述回忆时，已熟读了黄蕙兰那本有趣的自传，但因为与顾维钧之间始终是敬而远之的关系，不敢就此向他提问一句。女儿顾菊珍对父亲的浪漫史也有好奇心。有一次看到一本英语畅销书上写顾维钧一共有过28个女人，就在家中餐后闲聊时问父亲这叙述是否真实，顾维钧脱口而出回了一句："Only twenty-eight？"（只有28个吗？）既不否定，也不肯定。顾菊珍对父亲滴水不漏的外交官回答只有敬佩。[29]

顾维钧的晚年生活过得非常有规律。他上午9时许起床，稍做活动后，开始早餐。早餐十分丰盛，持续时间要一个半小时，一面饮食，一面读报纸。顾维钧每天看的英文报纸是《纽约时报》，中文报纸是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和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

每天下午，顾维钧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这是他的健身之道。虽住在纽约这个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中央公园仅一步之遥。公园里树木繁茂，绿草如茵，湖面如镜，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那时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顾维钧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遇到这种情况，他也不失幽默感，每次散步总要带些现金，说是不能让抢劫者空手而归。散步之外，他还喜欢游泳。90多岁时，还从跳板上跳入游泳池。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麻将。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是为他安排牌局。顾维钧打麻将，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这是一种'统战'，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对于输赢，他认为，"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30]他还自订了几条玩牌守则，其中有：受人欢迎，首重牌品，旨在消遣，大小勿论。准时赴约，不得迟到，圈数决定，不增不减。[31]

顾维钧的另一消遣是画画。退休后，他专程赴香港拜师学习作国画，并认真研读画谱。他的画题材固定，大多是梅、兰、竹、菊，有传统文人画的神韵，也是他处世立身之道的一种写照。他也画过工笔牡丹，是专为严幼韵画的，题词"春长在"。严幼韵一直挂在自己卧室的床头上，直到2017年她112岁去世。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乐事，是看到儿女孙辈欢聚一堂。顾维钧有三子一女。

长子顾德昌和女儿顾菊珍是唐宝玥所生。顾德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担任过中国驻美使馆空军武官，从空军退役后在台湾经商，晚年移居美国，1998年去世。

顾菊珍1917年出生在华盛顿。在英国伦敦大学学的是物理，但受父亲的影响对国际事务有兴趣，从1947年开始进联合国工作，一直在托管事务部，凭自己的才干升至“非洲事务司司长”。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她给予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及中国代表团很大的帮助。退休后，她与丈夫钱家骐遍访欧美许多城市，搜集顾维钧照片，并为《顾维钧回忆录》的中译本出版做出很大贡献。2015年，顾菊珍98岁时去世。

顾维钧与黄蕙兰生有二子。顾裕昌也在联合国任过职，因不满法律部太官僚化而辞职经商，任职期间写过一份讨论安理会投票程序的文件，离开后许多年仍被使用。顾福昌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就去经商。裕昌和福昌都先于父亲在1970年代末去世，顾维钧为之伤感不已。

严幼韵与杨光泩有三个女儿，因此顾维钧还有三个继女。由于早年丧父，她们视顾维钧如同亲生父亲，相互间十分亲热。长女杨蕾孟一生从事编辑，在美国多家著名出版社如哈珀与罗出版社、利特尔与布朗出版社担任过编辑或总编辑，许多有影响的书包括基辛格担任国务卿期间的回忆录《动乱年代》三卷本都出自她的手下。她编著的最后一本书就是母亲严幼韵口述的《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2020年，杨蕾孟去世。幼女杨茜恩担任过房产公司的总裁、中式烹饪教师，后来在家相夫教子，因病于1992年去世。

三个继女中次女杨雪兰与顾维钧最亲近。杨雪兰1935年出生于上海，与姐姐一样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她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早年在广告公司工作，获得过业界最高荣誉。后来至通用汽车公司担任副总裁，这是以往女性没有担任过的职位。美国通用在中国投资20亿美元的项目——在上海生产别克轿车，她起了关键作用。她也是热心中美文化交流的社会活动家。2014年，由她出面牵线，召集相关各方，最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完成顾维钧文件的电子化，使这套总共有17万页的珍贵资料回归故里。2020年，杨雪兰因病去世。

有爱妻相伴，有儿孙绕膝，有健康的身体，有安逸的生活，顾维钧的晚年是幸福的。

三 月是故乡明

由于长年担任驻外使节，顾维钧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但是，他对祖国、对故乡一往情深，始终怀着一颗中国心。

顾维钧的英文说写均十分出色，即使在英、美社会中，也堪称一流。他出使英国时，有一次与丘吉尔单独商讨中英外交问题，结束时已是晚上9点。丘吉尔说，会谈内容重要，但无人记录，我日理万机记不了那么多，能否请你写一份备忘录午夜送来。顾维钧答，午夜太匆忙，请改为明天中午。第二天，顾维钧送去备忘录，丘吉尔不仅称他记忆力好，更夸他英文流畅清晰。[32]而丘吉尔本人是公认的驾驭英文的大师。但退休后，脱离繁忙的公务，顾维钧还是钟情于自己的母语。有人问他，在中英文两种书中，以读何者较为称心愉快。他答："是中国书，我们的'根'究竟是中国啊！"[33]

晚年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后，他能够如愿阅读自己喜欢的书，大多是中国的典籍。他有一套清光绪己亥年（1899）刻本"四书"，陪伴他周游了欧洲和美洲。古色古香的线装书外包着西式的硬封面，显示了主人对古书的爱护，也是主人眷恋故土的内心写照。读书之余，他喜欢抄录唐诗中的名句和中文格言。有朋友知道他有这一喜好，告诉他唐绍仪去世前留下的一句话："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他特地标注："中山县唐绍仪于民国廿七年秋遇害前一日所作之对。"[34]

外交舞台上的顾维钧总是西装革履，即使退休后出现在公众场合，他仍然是一身西装，给人们留下从思想到外表都很西化的印象。但平时在家中没有客人的话，他却喜欢穿中式服装。他百看不厌的电视节目是台湾拍摄的连续剧《香妃》，对美国电影却没有一点兴趣。他也喜欢京剧，抄写了《武家坡》《空城计》《碧玉簪》等京剧唱词。

1946年顾维钧去华盛顿任驻美大使时，没有想到此去一别再也无法回到大陆。但当时国共内战一触即发，离开故土时心中不免感慨系之。他写过一首七绝，起首两行是："白云底下望山河，祖国将离感慨多。"表达的就是这一心情。[35]

1954年夏顾维钧回台湾时，蒋经国安排他去金门岛参观，这是他1946年离开大陆后离大陆距离最近的一次。站在岛上，望着清晰可见的

大陆海岸和后边的层峦叠嶂，闻得到大陆吹拂过来的和风气味，顾维钧十分激动，期盼着能够回到故土。[36]

当内战的硝烟散尽，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顾维钧为近代中国外交所做出的贡献。1972年，毛泽东指示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章含之去看望顾维钧。这件事当时无人知晓。章含之对此事是这样记叙的：

> 1972年9月我正准备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在一次临行前的指示谈话时给了我一项特殊任务，要我去看望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先生。主席说他很敬佩顾维钧的外交才华和为人。当时顾老先生已八旬高龄，退休后在美国当寓公。毛主席嘱咐我说不要用官方名义去看望他，也不必提是毛主席要我去的。因为顾老先生与我父亲也可称是世交，我可以用晚辈名义去看望他。顾老先生的女儿是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位局长，可以请她安排。毛主席说要我向顾维钧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并且邀请他回大陆看一看。毛主席还要我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
>
> 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于这年10月5日在纽约顾老先生女儿住所拜访了他并共进晚餐。那时老人虽已高龄，但精神极好，并步履矫健。他极有兴趣地问了大陆许多情况，但却回避了访问大陆的邀请。一年前我们刚刚取代台湾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时计划访问大陆的确时机尚不成熟。可惜的是，一直到顾老先生逝世，他都未曾有机会回到故土亲眼看一看家乡的变化。
>
> 10月9日，我从纽约刚到北京，马上接到通知，要我第二天晚上去主席那里汇报与顾维钧会面的情况。这是我到外交部工作后唯一一次与毛主席单独在一起谈话。主席对会见问得非常仔细，也很谅解顾维钧暂时不便回大陆访问。[37]

顾菊珍后来说，安排在位于曼哈顿东城的她家里见面，是为了避人眼目，生怕被人看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过顾维钧并不知道章含之是奉毛泽东之命，只将她看作故人章士钊的女儿。[38]

1978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发表建交公报，宣布自

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台湾当局产生了巨大冲击。1979年1月5日，蒋经国亲笔致函顾维钧，称其“洞察美国国会与国务院心态最深”，请对当前局势提供“宝贵之启迪指引”。蒋经国这封手书由台湾“外交部次长”杨西昆于1月17日送到顾维钧家中。顾维钧阅后，亲笔回复蒋经国，称美国此举“虽与国际道义相悖”，“但不得不勉予接受其已成事实”，与美国维持邦交以外之实质关系实为接下来的“努力目标”，并强调继续保持台湾与美贸易额远超大陆与美贸易额的优势是当务之急，“俾以贸易实绩争取支持，并作后图”。[39]这是顾维钧最后一次向台湾当局就对美“外交”提供意见，此时他已91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后，向美国派遣正式的外交代表。中国驻美使馆有好几位外交官来拜访过顾维钧，向这位外交界老前辈表示敬意，也向他请教，顾维钧都予以接待。[40]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和统战部部长的张承宗退休后访问美国，于1985年6月到公园大道的顾府拜访。在这之前，他已通过到上海访问的顾菊珍向顾维钧赠送过《嘉定风光》画册和《上海经济》杂志。此次张承宗带了一幅寿星图赠送给顾维钧夫妇，他们非常高兴。交谈中顾维钧询问并赞扬“改革开放”的政策，问候邓小平，关心叶剑英的健康。张承宗感到，顾维钧虽旅居海外，但他的心紧紧地和祖国联系着。[41]

尽管海峡两岸仍然对立，但顾维钧始终以一个中国人自居。按顾维钧在国际法院任职的经历，他可以获得联合国护照，但他坚持持有中国护照。有一年全家要去欧洲度假滑雪，他的护照因过期正在更换新的，家人要他去领一本联合国护照以便同行，他拒绝了，结果这次已安排好的全家度假只能取消。[42]

虽1946年赴华盛顿任职后未能再回大陆，但是顾维钧始终牵挂着故土，尤其是家乡嘉定。顾维钧最后一次回嘉定是1946年离国前。那年5月4日，他从上海市区赴嘉定扫墓，先后至城里的顾家祠堂、祖母邹氏墓地和在马陆的顾溶夫妇墓地及唐宝玥墓地。[43]此后，嘉定就成了他永远的乡愁。

晚年，只要遇到上海来的人，他都要问是否去过嘉定，并老是惦念着要吃家乡的塌棵菜和罗汉菜。97岁时，他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示意图，图中央赫然耸立着城中的古塔。也是在这一年，他用毛笔为家乡书写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诗句。浓浓的思乡之情跃然

纸上。[44]

四 民国外交的见证人

晚年顾维钧还进行着一项巨大的工程，那就是将自己一生的外交经历口述记录下来。

顾维钧的外交生涯几近半个世纪，亲历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冷战初期众多的外交大事，这样的经历不仅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因此，他刚退出中国外交界，美国著名的出版社麦克米兰公司、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道布尔戴出版社就找上门来，约请他写回忆录，并允以优厚的稿酬。顾维钧斟酌再三，都谢绝了。他虽然下决心要写自己的回忆录，但认为公开发表回忆录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写回忆录就必须抛开私人情谊如实写出，而他要叙述的人大多还健在，涉及他们的功过是非，他们不会无动于衷。[45]

但顾维钧到海牙国际法院任职不久，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来信了。该校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韦慕庭（Martin Wilbur）正主持一项中国口述史计划，请寓居在美国的昔日民国显要做口述，先后应邀参加这一计划的有李宗仁、胡适、陈立夫等人。像顾维钧这样的民国外交元老，韦慕庭当然不会错过。在由自己决定公开发表时机的条件下，顾维钧同意参加母校的口述历史计划。

1959年起，顾维钧开始接受访谈，每年从国际法院休假回纽约三个月，就是口述访谈进行的时间。哥大中国口述史计划聘请了两个全职研究员夏连荫和唐德刚，两人一起负责对顾维钧的口述访谈，由夏连荫主问。但完成顾维钧的童年部分后，她嫌工作量过于浩大，就退出了。唐德刚手头虽还有李宗仁和胡适的口述历史要做，但还是抵挡不住顾维钧这个名字对他的诱惑，就全盘接过手来。

顾维钧是个历史方面的有心人，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保留了几乎所有的往来电稿信函和各种文件，每天又有写日记的习惯，而且记得很详尽。但1931年前的电稿文件大多留在天津旧宅中散失了，这也是后来成稿的口述回忆录在这之前的部分相对简要，在这之后详尽的原因所在。

对口述回忆录，顾维钧像对待外交交涉一样，认真、仔细，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每次口述之前，他先查阅相关部分的文件和日记，思考

再三形成腹稿后开始口述。口述以英语进行，他字斟句酌，语速缓慢，通常先对主题做一概述，然后向访谈者指出文件及日记中可用的材料，一些重要的文件则照录全文。每次访谈均用录音机记录，事后由专人听写誊录成英文初稿。顾维钧对初稿做增删补充后，交访谈者修订，此后再由顾维钧审核，最后两人当面商讨后定稿。[46]

访谈者唐德刚认为顾维钧是他所做的口述访谈中最容易进行的前辈。他还做过另两位民国名人的口述，其中胡适太忙，没时间事先充分准备，而李宗仁只粗通文墨，又没有任何文件可资参考，常信口开河。顾维钧讲一口极标准、极清晰、极有条理的美式英语，在唐德刚听来，“简直是高山流水，清响怡人”，女秘书听音打字，可以通顺流畅。唐德刚说，他在美数十年，中西政要学要，阅人多多，像顾维钧这样清晰有条理地回忆自己的经历，“实无第二人也”。[47]

有时顾维钧的记忆也会发生误差，尤其是对北洋时期的事情。一次，他把金法郎案中一段事张冠李戴了，唐德刚更正他的错误，顾维钧不服，说是“事如昨日”。直到唐德刚拿出他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顾维钧才服输，说：“唐博士，这一章错了。下礼拜，我俩重行写过。”[48]

因为顾维钧在海牙任职，口述每年只能进行三个月。唐德刚做完“驻英大使”这一段后，离开口述史计划，去做大学教授了。后续的口述访谈由另两位博士接手，到最后结束整个口述，录音时间总共有500多个小时。顾维钧从海牙退休回到纽约后，发现因为管理和经费等方面的问题，录音并没有被完全整理出来。于是他以办外交的韧劲，与哥大方面锲而不舍地交涉，终使主持者另外筹得专款，重新雇请秘书听音打字，整理出英文稿11000页。唐德刚经历了这一过程，从旁相助力争，事后心有余悸地说若不是顾维钧在哥大旦夕坐索，几十盘录音带可能会不知所踪。差不多同时在哥大参加中国口述史计划的陈立夫，完成口述后返回台湾，只能函催，结果一无进展，口述稿无疾而终。不过由于新筹的经费还是有限，要缩短听音打字的工时，整理时将顾维钧与唐德刚两人间极有史料价值的精彩对话略去不少。唐德刚大叹可惜，称这些被略去的内容是顾维钧在中国权力核心翻滚数十年的精华所在。[49]

顾维钧漫长的外交经历使他的口述回忆录实际上等同于一部民国外交史，是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对外交涉的实录。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引用，又使这套回忆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口述回忆录英文稿11000页，后来译成中文有13册600多万字，这样规模的个人回忆录在中国前

所未有。顾维钧曾对人说：“回忆录完全根据事实，绝不虚构捏造，更不诽谤他人。完全是历史性的客观的忠实叙述。”[50]开始口述回忆录时，顾维钧已经71岁了，最终完成时则是88岁的老翁了。他是以一种较平静的心态，以民国外交见证人的身份叙述往事的。他的回忆录称得上是一部信史。当然，由于顾维钧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留下的文件电稿又十分庞杂，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他对自己经历的事情不可能没有记忆缺漏。如九一八事变后对中苏关系的推动就遗忘了，而对1940年代末的游说活动则闪烁其词，没有全盘道出。

1976年5月28日，顾维钧将回忆录英文原稿赠送给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在捐赠仪式上，他以诙谐的语调说：“我的唯一遗憾是嫌我自传太长——约11000页！但是我却有一借口，如果这借口是有点合理的话，就是我服务公职太早，超过了半个世纪，由1912年至1966年。……因此，我只得尊重空间，而牺牲简略。我希望将来学者参考这稿本时，会原谅我的苦衷的。”

口述回忆录完成后，不少出版商对之发生兴趣。纽约有一家出版社计划将原稿打字稿缩印成书，分20册分期出版，5年出齐，但终因投资过大、销路不确定而作罢。稍后，在顾维钧要求下，哥大请《纽约时报》属下的美国缩微公司将回忆录制成缩微胶卷。

口述回忆录由哥伦比亚大学发起主持，因此以英文完成，对顾维钧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他在交给哥大作为回忆录最后附加页的附言中对此做了说明，并说：“由于我毕生致力于中国的对外关系，如果我的回忆录能被译成中文，我将不胜欣慰和感激。”基于这一原因，顾维钧要求哥大将口述回忆录缩微胶卷复制一套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顾维钧口述回忆录的完成，在海峡两岸引起关注。台湾传记文学社此前刊登过顾维钧回忆巴黎和会的文章，也刊登过其他人写顾维钧的文章。该社社长刘绍唐与顾维钧早有通信往来，向他约过稿。1977年4月5日，刘绍唐给顾维钧写信，表示对将英文回忆录译成中文极感兴趣，并提出具体办法，“逐段翻译，逐期发表，不久即可分册出版，本社愿负担翻译中文之稿费，至版权与版税当归先生所有”。刘绍唐还提出了两个翻译人选——与顾维钧熟识并写过他许多故事的退休外交官袁道丰、翻译过颜惠庆回忆录的姚崧龄。刘绍唐此时已组织翻译了颜惠庆、蒋廷黻等人以英文完成的回忆录，自认对此事完全有把握。但顾维钧回忆录规模大，篇幅与颜、蒋回忆录不可同日而语。顾维钧对回忆录翻译成中文的

困难有充分的估计，因此在刘绍唐来信上批注："该社能否担任翻译？"对刘绍唐的提议表示疑虑。[51]后来确如顾维钧所料，传记文学社因版权、经费、人员等因素而无法推进译事。

1980年春，顾菊珍找到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中国外交官陈鲁直，希望国内有研究机构对顾维钧的回忆录有兴趣。5月初，陈鲁直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通报此事。主持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大年立即决定："申请外汇，购买缩微胶卷，组织力量翻译，全文出版，一字不删，一字不改。"这年9月顾菊珍回上海探亲访问，刘大年专门请她来北京，当面商讨翻译出版事宜。10月，顾菊珍与丈夫钱家骐来到北京。因为是第一次与大陆学术研究机构接触，顾菊珍说话十分谨慎，提出顾维钧的回忆录"作为历史资料，可以供内部参考，有些内容不宜于在国内公开出版"，还表示回忆录"没有必要全部出版。是否出选本，是内部出，还是公开出，一切由国内决定"。但刘大年明确表示一字不删、一字不改的翻译出版原则，顾菊珍听后既高兴又震惊。[52]

此后，近代史研究所委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组织翻译。1982年初，顾菊珍在纽约宴请外交部条约法律司法律顾问贺其治和陈鲁直，代表顾维钧就译事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回忆录的版权属哥伦比亚大学，希望国内有关部门就出版回忆录问题通知哥大；第二，希望由学术机关如近代史所编译，最好不用政协的名义；第三，回忆录中1947年以后的部分有些话今天不宜在国内出版，应做删节。[53]

近代史所获悉并与有关各方商量后，刘大年于7月30日致信顾菊珍，表示对三点建议完全赞同，"回忆录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研究所署名编译，归学术界著有信誉的中华书局出版。完全尊重老先生的意见，对某些稿页将作适当删节。关于出版此书，知会哥伦比亚大学一节，目前已致函哥大校长"。刘大年还告诉顾菊珍，译稿第一册已经完成，顺利的话第二年7、8月间可以见书，希望顾维钧能为中文版写个前言，"或者对回忆录本身作些说明，或者抚今思昔，发一点感想，或者对祖国的统一，对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说些话都是有意义的"。顾菊珍接信后即向顾维钧报告。关于前言，顾菊珍回复说，可用顾维钧送交哥大的回忆录附言，"此文虽属后言性质，亦可当作Author’s note（作者谨言——引者注）附在中文版代替作者前言"。[54]

1983年5月，《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第1分册出版。刘大年立即在给顾维钧送去的书上题词"顾老先生为寿"。落款是后学刘大年。顾维钧

收到书后十分高兴，尤喜欢刘大年题写的“为寿”两字。他立即签名回赠刘大年一本回忆录。[55]

《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的出版，使一直有心翻译却无力做成的台湾《传记文学》刘绍唐十分不高兴。他于1984年1月致函顾维钧，盯住译者的出版说明中所写中文版承顾维钧本人“欣然同意”，追问究竟情形如何。顾维钧接信后回复一函，答道：“弟年迈记忆力衰退，念此事已不甚清楚，但似曾通信一次，当为此事也。”[56]回忆录中文版翻译出版事宜皆由顾菊珍代表顾维钧出面处理，顾维钧从未写过一信，但他回复“似曾通信”实际上认可了“欣然同意”，也肯定了与近代史所的合作。此事的处理也可见顾维钧外交手腕运用之自如。

顾维钧有生之年看到了回忆录中文版前三卷的出版，这是他晚年最高兴的事。他希望回忆录不仅对研究外交史的中国学者“有所补益”，而且能为众多的读者“提供一面反映过去的镜子”，使他们知道“今天的历史来源于昨天”。[57]

晚年，还有一件使顾维钧高兴、激动的事。1984年9月18日，中国与英国两国代表团就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达成协议。根据最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9月20日，《纽约时报》对中英两国达成协议做了报道。当天吃早餐时，顾维钧读到这条消息，高兴地从报上剪下来，小心地珍藏起来。[58]1942年中英谈判新约废除领事裁判权时，他就表示要等待香港问题的解决。40多年后，正向百岁迈进的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让人遗憾的是，顾维钧没能看到香港正式回归祖国，也没能看到他的回忆录中文版全部出齐。

1985年11月14日晚上，顾维钧临睡前像往常一样进浴室洗澡，一边还与浴室外的严幼韵说第二天打麻将请哪些客人来，洗完澡后就倒下了。严幼韵走进浴室，看见他蜷缩在浴垫上，就像睡熟了。[59]几小时前，他刚刚写完一生中最后一天的日记。这天的日记十分简短，只有一句话：“这是安静的一天。”

[1] 《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720页。

[2] 《顾维钧回忆录》第13分册，中华书局，1994，第9~12页。

[3] 《顾维钧回忆录》第13分册，第30页；黄武智：《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之个别意见与反对意见（1957～1967）》，台北：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4，第5～6页。

[4] 黄武智：《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之个别意见与反对意见（1957～1967）》，第212页。

[5] 黄武智：《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之个别意见与反对意见（1957～1967）》，第217页。

[6] 黄武智：《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之个别意见与反对意见（1957～1967）》，第198～209页。

[7] 作者对顾菊珍访谈，1997年8月27日。顾维钧关于西南非洲的十多本笔记藏于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

[8] 《顾维钧回忆录》第13分册，第64页。

[9]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第241页。

[10]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144页。

[11] 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第43～44页。

[12] 金光耀、赵胜土编著《一代外交家顾维钧》，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第116页。

[13]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195～196页；顾严幼韵口述，杨蕾孟编著《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魏平译，新世界出版社，2015，第73～74页。

[14]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240～241页。

[15]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174、177页。

[16]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第11、19页；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213页。

[17]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第257页。

[18] 章宗钰：《最忆是复旦》，载彭裕文、许有成主编《台湾校友忆母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488页。

[19] 《复旦大学的毕业女生》，《申报》1929年6月19日，第27版；独声：《严幼韵姑娘的毕业问题》，《申报》1929年8月26日，第26版。

[20] 《杨立林（杨光泩之妹）致杨蕾孟、杨雪兰、杨茜恩》（1989年11月），徐

景灿提供。

[21] 《杨光泩今日结婚》，《申报》1929年9月8日，第16版。

[22] 顾严幼韵口述，杨蕾孟编著《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第47页。

[23] Kuangson Young to Wellington Koo，23 July，1935，徐景灿提供。

[24] 《顾维钧之闲情逸致》，《申报》1934年10月1日，第13版。

[25] 顾严幼韵口述，杨蕾孟编著《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第101页。

[26] 《顾维钧致叶公超》（1953年12月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169。

[27] 顾严幼韵口述，杨蕾孟编著《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第182页。

[28]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第6、17页。

[29] 唐德刚：《编撰〈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8页；顾菊珍口述，1998年4月，纽约东城顾菊珍家中。

[30]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第13~14页。

[31] 《九九寿星顾维钧博士所述玩牌守则》，徐景灿提供。

[32]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26~27页。

[33]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第2、234页。

[34] 顾维钧留下的纸条，徐景灿提供。

[35] 这首七绝用钢笔写在一张纸上，现藏上海市嘉定博物馆。

[36] 《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第253、265页。

[37]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第111~112页。

[38] 顾菊珍口述，1998年4月，纽约东城顾菊珍家中。

[39] 《蒋经国致顾维钧》（1979年1月5日）、《顾维钧致蒋经国》（1979年1月23日），由徐景灿提供。

[40] 唐德刚：《广陵散从此绝矣——敬悼顾维钧先生》，《传记文学》（台北）第283期，1985年12月。

[41] 张承宗：《红艳千般》，学林出版社，1990，第424页。

[42] 杨雪兰口述，2018年12月8日，上海嘉定。

[43] 《顾维钧日记》，1946年5月4日，*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216。

[44] 顾维钧画的嘉定城示意图和书写的诗句均藏于上海市嘉定博物馆。

[45] 《顾维钧回忆录》第13分册，第6页。

[46] 袁道丰：《外交丛谈》上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第150～151页。

[47] 唐德刚：《编撰〈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10页。

[48] 唐德刚：《广陵散从此绝矣——敬悼顾维钧先生》，《传记文学》（台北）第283期，1985年12月。

[49] 唐德刚：《编撰〈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13、15页。

[50] 袁道丰：《外交丛谈》，第153页。

[51] 《刘绍唐致顾维钧》（1977年4月5日），徐景灿提供。

[52] 王玉璞：《〈顾维钧回忆录〉再版感言》，王玉璞给笔者的打印稿；赵庆云：《〈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风波》，《读书》2016年第1期。

[53] 赵庆云：《〈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风波》，《读书》2016年第1期。

[54] 《刘大年致顾菊珍》（1982年7月30日）；《顾菊珍致刘大年》（1982年10月11日），徐景灿提供。

[55] 王玉璞：《〈顾维钧回忆录〉再版感言》。

[56] 《顾维钧致刘绍唐》（1984年1月22日），徐景灿提供。

[5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附言。

[58] 笔者在顾维钧的遗物中发现这张夹在笔记本中的剪报。

[59] 顾严幼韵口述，杨蕾孟编著《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第271页。

结语 “以公理争强权”的外交家

唐德刚多次强调过一个观点：近代中国百余年来，只出过“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和顾维钧，而顾维钧就是那“半个”。他这样说的依据是，顾维钧虽做了一辈子外交官，从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到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但都是为人作嫁衣，奉命工作，自己一辈子也未享受过决策权。因此与李鸿章、周恩来比，只能算半个外交家。但资中筠不赞同这一看法，以为此说不公，以顾维钧的外交表现，无论如何当得起一个外交家，而且是杰出的外交家。[1]唐德刚是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外交家，资中筠则从外交家本人的作为来评判，后一种评判标准更能揭示外交家在外交史上的地位。

唐德刚说的“两个半外交家”对应的是近代中国的三个时期：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外交家的作为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处于晚清的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清醒地认识到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顺应变局，从传统夷务向洋务然后向近代外交转变，对国际法也有所了解，确实是晚清最善于与列强打交道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决策上仍受清廷制约，且处于大变局的开端，无法摆脱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以所学国际法审视晚清外交，对之有严厉的批评，称国门被迫打开后中国所丧失之国权，“为吾衮衮诸公之所甘心放弃者，亦何可胜道哉”。在晚清主持外交者中，顾维钧视李鸿章为“我国胆识俱到之外交家”，但也有批评，指出其于庚子年从上海提军北上，欲道出租界，为工部局所阻，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竟“噤口无声，而出他途”，李鸿章尚如此，其他“碌碌诸公更何论乎”。[2]

顾维钧写该文是辛亥革命前夕，距李鸿章主持外交已经过去了十年。在美国学习多年后，他对世界大势有了自己的判断：“当今日之世虽曰有强权无公理，然国际交涉之时诚能以公理争强权，则强权者亦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而抹杀公理也。”[3]顾维钧的这一看法准确地预判了20世纪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也成为他此后从事外交所信奉的原则。

顾维钧写该文时强权政治仍主宰着世界，但几年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倡导公开外交、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在顾维钧看来，这提出了“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4]即他所期望的能与强权抗争的公理。1919年巴黎和会上，顾维钧代表中国的发言和最后拒签和约，就是身体力行地以公理争强权。然而，公理争强权并不一帆风顺。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违背自己的承诺，被中国舆论痛斥他口中的“公理”是“一文不值的空话”。强权虽一时占据上风，但顾维钧的言行挑战强权，彰显公理，赢得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尊重，并由此奠定他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地位。他坚信强权不能一手遮天。确实，即使在美国国内，威尔逊的决定也遭反对，美国代表团内蓝辛等人对中国拒签巴黎和约亦表示支持，表明公理不会被完全抹杀，在与强权抗争中会逐渐得到彰显。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在国联讲坛上谴责日本侵略，进一步彰显公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参与筹建联合国，终使公理压倒强权，中国也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顾维钧在世纪初就看准了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变化的大势，投身外交后代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坚持以公理争强权，是顺应时代潮流并站在潮头的中国外交家。至于说顾维钧一辈子未享受过决策权，并不完全准确。巴黎和会拒签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做出的一次决策。北京政府时期，终止中比条约和罢免安格联都是顾维钧主持内阁时做出的重要外交决策。正因为如此，资中筠认为顾维钧在外交上有比李鸿章更大的自主裁量权。[5]

顾维钧进入外交界，正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清末民初逐渐走向专业化的外交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顾维钧适逢其时，脱颖而出。民国初立，首任外交总长陆征祥提出：“凡是办政治，尤其是办外交，决不可用外行。”于是，刚取得博士学位的24岁的顾维钧在担任袁世凯英文秘书的同时进入外交部。此后，他在27岁时出任中国驻美公使，31岁代表中国在巴黎和会发言，34岁担任外交总长。这是转型时代的年轻人才会有的机遇，但能否抓住机遇还得看个人才干和禀赋。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巴黎和会上代表中国发言，按代表团成员资历，轮不到最年轻的顾维钧，但其他人都无准备，又临阵退缩，结果对中日问题早有研究的他当仁不让地挺身而出，为国家争公理，也为个人赢得声誉。

巴黎和会及此后的华盛顿会议不仅使顾维钧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也得到国内各界广泛认可，被蔡元培称为“此青年外交大家，实我国大学学生之模范人物也”。[6]顾维钧出任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时，外交

部已成为专业化程度相当高的部门。军阀混战的年代，内阁更替频繁。但不管哪一派势力组阁，外交总长都不得不依靠顾维钧这样的职业外交官，由他们出面去与列强打交道，以求得列强的承认，曹锟总统任内在外交方面更是放手于顾维钧。由此，顾维钧得以在修约外交中有所表现，进一步提升了外交声誉。

国民政府取代北京政府后，国民党以党治国，外交决策权归于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个人。顾维钧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在短暂担任外长时要求国民党中央将有关外交的决议事先告知。但他仍对外交政策积极建言，如1933年初与颜惠庆和郭泰祺一起建议对日绝交，1942年底中英新约谈判最后关头提出签约与九龙租借地问题分开处理。顾维钧敢于提出与决策层明显不同的意见，凭借的是在北京政府时期积累起的经验和声誉，这是他在以党治国的体制内得以发挥外交才干的资本。而国民党政府与军阀时期的北京政府一样，也需要职业外交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作为职业外交官，顾维钧对中国的国力有清醒的认识，在他从事外交的绝大部分时间中，是以弱国来定位中国的外交并采取相应策略的。对弱国外交，他在一次公共演讲中说："国人对外交见解，有两见解，一谓弱国无外交，一谓正惟弱国始须外交。此两说皆可谓确，而亦皆可谓不全确。国无强弱，皆有赖外交，惟其方法则不同。而弱国之外交，尤关重要。因强国外交可较为大意，以稍有所失，尚有其他方法补救。弱国则不能一毫松懈，其获得结果也固不易，而获得结果后，常不能充分利用之。"[7]因此，每逢重大交涉，顾维钧如履薄冰，准备充分。他认为，弱国外交最有用也是经常要使用的策略就是"拖延时间"。对弱国来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能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不能玉碎的。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因为对方也这样要求的话，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所以他强调，在谈判中"当你已达到百分之五十的地步，而正接近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时，应当小心不要有任何可能引起谈判破裂的言谈和行动，而失去你那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因此如果你的目标是要达到百分之七十，就应特别小心，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那百分之七十的目标，取得谈判成功"。但同时代的外交官并不都能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指出，中国外交的一个大毛病就是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8]

顾维钧深知弱国外交之不易，但也深知弱国外交并非没有施展的空

间。早在留学期间他就特别看重塔列朗，称赞其“操纵英俄普奥四雄于维也纳会议”，颇有仿效其在国际舞台代表中国纵横捭阖的志向。[9]塔列朗被歌德誉为“19世纪第一外交家”，外交生涯持续40多年。就外交才干而言，顾维钧可与塔列朗一比，但就两人所经历的相隔百年的两个国际会议——维也纳会议和巴黎和会来说，塔列朗操纵四雄获得了成功，顾维钧却饮恨塞纳河畔。[10]这让人不得不感叹，个人的外交才干无法超越国运。

尽管身处弱国，但顾维钧投身外交时内心深处却有让中国跻身大国之列的愿望，只是在他漫长的外交生涯中，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很短一段时间内，才有将这一愿望付诸实施的机会。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前，他向蒋介石建议的参会方针是保证中国的“四强”地位，以获得与美、英、苏平起平坐的大国资格。旧金山会议上，他在托管地问题上与美、英代表正面冲突，坚持以公理争强权的立场，稍显大国气概。可惜的是，这样的时刻在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中稍纵即逝。中国的国力及所处的时代，使顾维钧基本上是以一个弱国外交家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他也习惯了这样的角色。

在外交战略上，自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起，顾维钧就主张“联美制日”。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顾维钧屡屡向政府呼吁确立以美国为重心的外交战略，强调“我国外交运用，宜特别注重美国”。[11]中国传统外交向主张“以夷制夷”，但并不确定固定的联合对象，而是随机应变。顾维钧的“联美制日”主张将美国作为长久的联合对象，在近代中国转型期倡导新的外交战略。“联美制日”的主张是基于顾维钧对远东国际局势的认识。20世纪上半叶，日本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而美国在远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因此“远交美尚足以制近逼之日本”，确是中国外交上最为可行的选择。重点对美外交也是顾维钧留学美国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对美国的认同与亲和感在外交事务上的反映，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与其他列强不同，“对于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在本质上并不是帝国主义”，这是重点对美外交的思想基础。[12]这也是民国时期许多像他一样的留美学生如同样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宋子文和胡适具有的看法，因此他们被称为民国外交的“亲美派”。不过，“亲美”并非是没有限度的。在有关台湾地位的问题上，他对美国政策有可能导致海峡两岸分离的状态高度警觉，对一个统一的中国的认同设定了“亲美”的限度。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内政局动荡，政府更替频繁。如何应对纷乱

的内争，是每一个外交官无法回避的问题。顾维钧的外交生涯经历了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各个时期，这在同辈外交官中是绝无仅有的。北京政府后期，他一度较深地卷入到政治漩涡中，品尝过派系政治倾轧的苦涩滋味，对国内政治及其与外交的关系有切身的体认。在思想理念上，顾维钧信奉美式自由主义，但在国内政治中，他并不像胡适、蒋廷黻那样或不懈鼓吹，或执着推行。在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力图与国内政治保持距离，专注于外交事务。晚年口述回忆录时，他说："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末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13]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但到顾维钧最后一次出使华盛顿时，他面临的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国内外形势。国共之争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两股政治力量的决斗，并且牵涉到美国与苏联两个大国，而美苏之间的冷战此时已经拉开帷幕。顾维钧是从巴黎和会走上国际舞台的外交官，他所熟悉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擅长在与列强的交涉中纵横捭阖，维护和提升作为弱国的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有着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冷战格局，对他来说，超出了以往的知识和经验范围。顾维钧曾批评民国初年不同的军事和政治派系依附某一个外国势力，或日本，或俄国，来巩固支撑其政治前程，指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不自觉地使自己成为某个外国的外交政策的工具，这永远是一个难以向人民大众交代的问题"。[14]而他外交生涯最后阶段的对美外交，正是他自己所批评的有了党派和政治利益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

顾维钧将外交看成由外交官从事的专业工作，反对民族主义兴起后出现的"人民外交"（这是《顾维钧回忆录》中的用法，当时人和学界通常用"国民外交"一词）。他说，"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成功为口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15]

因为强调专业性，顾维钧特别看重外交官的专业素质。国民党主政后以党治国，将不少党内人员安排进外交部，顾维钧私下批评道，这些人缺少"外交经验"，"非合于外交生活与工作"。[16]他认为外交官必须具

备四种素质：（1）适当的基础知识；（2）精通一门或更多的外语；（3）实际的谈判经验；（4）国际会议的经验。专业素质之外，他还特别强调必须有从事外交的气质，他说见过不少人受过良好的训练和教育，但气质上却不适合担任谈判工作。[17]这可看作顾维钧的夫子自道，对此他是颇为自信甚至自负的。顾维钧外表俊美，这拜先天所赐。而他柔中带刚的发言风格，从在外白渡桥上斥责鞭打黄包车夫的英国人“Are you gentleman”的少年时期就已形成。此后长年的外交工作，使外交家气质融入他的一言一行，乃至血液之中。女儿顾菊珍问他一生有过几个女人，这是在家中餐桌上的闲聊，但顾维钧十分自然地随口反问“只有28个吗？”完全是外交场合的条件反射，所以顾菊珍说外交官习性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帮顾维钧做口述并与他交往了20多年的唐德刚也说，顾维钧“一辈子生活中，无时不刻不在办外交”，“永远披上了一件鲜明的外交家的大礼服”。[18]

顾维钧是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有着强烈的中国情怀。在同辈人中，他为中国外交服务时间最长。在外交舞台上，他有为中国以公理争强权的高光时刻，也有不少委曲求全的苦涩记忆。在结束口述回忆录时，顾维钧谈到在外交生涯中遇到的各种不寻常的困难，称“也许是1911年推翻满清之后，一个要享有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合法地位并在世界中发挥应有作用的新中国在它的孕育和诞生之时就已经继承下来了”。[19]顾维钧的这句话很有历史感。他的个人经历是近代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他所面临的困难和经历的失败在他所处的时代是难以避免的。在今天，回望顾维钧漫长的外交生涯，巴黎和会上的发言和拒签和约以及旧金山会议上代表中国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是他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的永远印记。

[1] 唐德刚：《编撰〈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1页；资中筠：《外交家的幸与不幸——重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财新网，2017年8月19日。

[2] 顾维钧：《中国外交私议》，《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顾维钧这里的叙述并不准确。李鸿章于该年7月被清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后从广东抵上海，因率卫队200人，英领事不允登岸，解除武装后允20人进租界。见窦宗仪编著《李鸿章年（日）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第418页。

[3] 顾维钧：《中国外交私议》，《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

[4]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8年1月11日（8日发）］，外交部档案，档号：

03-37-002-01-007。

[5] 资中筠先生与作者的微信通话，2020年9月5日。

[6]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6月6日。

[7] 《市商会等十四团体昨晚宴顾维钧》，《申报》1934年9月24日，第8版。

[8]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64页；第1分册，第396～397页；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9] 顾维钧：《中国外交私议》，《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

[10] 有关顾维钧与塔列朗的比较，见金重远《顾维钧与塔列朗：一个比较研究》，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443～454页。

[11] 《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128～129页。

[12] 《顾维钧1917年4月9日电》，《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5页；《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506页。

[1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97页。

[1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97～398页。

[15]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97～398页。

[16] 《顾维钧日记》，1946年5月3日。

[17]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697页。

[18] 唐德刚：《编撰〈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7页。

[19] 《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第745页。

主要征引文献

中文文献

未刊档案

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樊增祥：《清荣禄大夫从一品封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嘉定顾公墓志铭》，嘉定博物馆藏。

顾维钧文件（*Wellington Koo Papers*），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

顾维钧与徐景灿的聊天录音（1980～1985年），纽约，徐景灿提供。

蒋介石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

台湾广播公司记者阮次山采访顾维钧特别报道（录音），1977年2月19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档案。

已刊史料、回忆录、日记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2。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

杜春和、耿来金整理《白坚武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顾严幼韵口述、杨蕾孟编著《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新世界出版社，2015。

《顾维钧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1993。

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

胡震亚选辑《吴佩孚与顾维钧往来函电》，《民国档案》2009年第4期。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2004。

金光耀、马建标选编《顾维钧外交演讲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金问泗：《从巴黎和会到国联》，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金问泗编《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上海，1931。

《金问泗日记（1931～1952）》，张力编辑、校订，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6。

《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日记》，王启华译，《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

《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致其妻子信件》，朱利译，《民国档案》2002年第2、3期。

李景铭：《太平洋会议日记》，《近代史资料》总75号。

李景铭：《一个北洋政府官员的生活实录》，《近代史资料》总67号。

李毓澍主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李毓澍、林明德主编《中日关系史料——二十一条交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台北“国史馆”，2015。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编者印行，1957；第2辑，编者印行，1960。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中华书局，2016。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三联书店，1959；第三册，三联书店，1962。

《王世杰日记》，林美莉编辑、校订，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颜惠庆日记》，上海市档案馆译，档案出版社，1996。

《颜惠庆自传》，吴建雍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

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台北“国史馆”，2001。

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武汉出版社，1990。

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张一志编《山东问题汇刊》，文海出版社，198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1、2期。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4、35辑，台北，1984。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

中华民国外交部编《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编者印行，1923。

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

变》，中华书局，1988。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编者印行，2000。

报刊

《大公报》《东方杂志》《留美学生年报》《民国日报》《努力周报》《申报》《顺天时报》《益世报》《中央日报》

著作

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1。

陈谦平：《民国对外关系史论（1927～1949）》，三联书店，2013。

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黄武智：《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之个别意见与反对意见（1957～1967）》，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4。

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三联书店，2017。

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罗光：《陆征祥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张伟瑛、曾学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东大图书公司，1998。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王纲领：《欧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台湾学生书局，1988。

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王正廷：《中国近代外交概要》，外交研究社，1928。

吴翎君：《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杨天石、侯中军编《战时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周子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应俊豪：《“丘八爷”与“洋大人”——国门内的北洋外交研究（1920～1925）》，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09。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袁道丰：《外交丛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

论文

陈红民：《蒋廷黻与夭折的“中国自由党”（1947～1951）》，《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承红磊：《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侯中军：《英国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

胡有瑞、卢申芳：《“王正廷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近代中国》第29期，1982年。

皇甫秋实、贾钦涵：《顾维钧与中国西北石油开发》，《复旦学报》2017年第1期。

蒋永敬：《顾维钧诉诸国联的外交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

李永胜：《顾维钧与中国留美学生会》，《史学集刊》2020年第3期。

罗毅：《外交系与北京政治：1922～1927》，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3。

罗毅、金光耀：《北京政府筹备参加欧战和会考析》，《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刘卫东：《印支通道的战时功能述论》，《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马建标：《“进步主义”在中国：芮恩施与欧美同学会的共享经历》，《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尚小明：《“二十一条”交涉的另一条管道——总统府相关活动透视》，《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

唐德刚：《广陵散从此绝矣——敬悼顾维钧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283期，1985年12月。

王玉璞：《〈顾维钧回忆录〉再版感言》，王玉璞给笔者的打印稿。

王聿均：《舒尔曼在华外交活动初探（1921～19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1969年。

习五一：《论顾维钧内阁征收海关附加税和罢免安格联事件》，《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肖如平：《蒋介石与抗战时期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3期。

许详：《民初中英涉藏事务交涉之补证——基于“顾维钧档案”的研究》，《民国档案》2020年第2期。

杨天宏：《军阀形象与军阀政治症结——基于北洋时期民意调查的分析与思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杨天宏：《中苏建交谈判中的“顾王之争”（1923～1924）》，《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张丽：《安格联的平衡之策及其破产》，《兰州学刊》2017年第9期。

赵庆云：《〈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风波》，《读书》2016年第1期。

资中筠：《外交家的幸与不幸——重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财新网，2017年8月19日。

英文文献

未刊档案

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Tsiang（Tingfu）Diaries，Harvard-Yenching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Wellington Koo Papers，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

Wellington Koo，*Topics for Memoirs*，June 26，1958，manuscript.

已刊史料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First Series，Second series，London.

Lansing，Robert，*The Peace Negotiations*，*A Personal Narrative*，New York，1921.

Lansing，Robert，*War Memoirs of Robert Lansing*，New York，1935.

Link，Arthur ed.，*Papers of Woodrow Wils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1986.

United Nations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Docu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London and New York，1945.

U.S.Department of State，*Conference on the Limitation of Armament*，Washington，1922.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Lansing Papers*，*1914-1920*，Washington，1939.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Paris Peace Conference*，Washington，1942-1946.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years-related.

Young，Kuangson ed.，*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Press Bureau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1937.

报刊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Columbia Spectator

专著

Bieler，Stacey，"*Patriots*" *or* "*Traitors*"？：*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M.E.Sharpe，Inc.，2004.

Chi，Medeleine，*China Diplomacy 1914-191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Chu，Pao-chin，*V.K.Wellington Koo*，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1.

Hussey，Harry，*My Pleasure and Palaces*：*An Informal Memoir of Fourty Years in Modern China*，New York：Doubleday，1968.

Koo，Vi Kyuin Wellington，*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12.

Pugache，Noel，*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New York，1979.

Shotwell，J.T.，*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New York，1937.

论文

Chen，Li，"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most Diplomat and International Judge，" *Jus Gentium*，Vol.4，No.2，2019.

Chen，Li，"Shattering the Glass Ceiling：The World's First Chinese Ph.D.Graduate，" *The Law Teacher*，published online：1 November，2018.

Craft，Stephen，"John Bassett Moore，Robert Lansing，and the Shandong Ques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2，1997.

后记

我于1999年初完成《顾维钧传》，列入石源华主编的“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于该年底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因为该套丛书对篇幅有统一要求，而且当时我刚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阅读顾维钧档案，还来不及消化所有史料，所以《顾维钧传》只是我对顾维钧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在限期交稿后，我就一直想重写一本更详尽的顾维钧传。但完成那本传记后不久，我的研究兴趣转向新的领域，重写之事就拖了下来。此后有出版社再版“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时，希望重印《顾维钧传》，但我不想原封不动地再版，而重写或修改又抽不出时间，只能婉言谢绝了。但此事一直挂在心头。

2020年暑假，我终于下决心了却这桩心事，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新冠疫情肆虐而只能宅在家中，反而可以心无旁骛地从事研究和写作。此外，在新研究领域中的探索有些艰辛，面临困难，进展不顺，就想到回老本行吸收一些新能量，将原先拖下来的事情先完成。

尽管一直关注着民国外交史领域，但差不多20年后重新全力投入对顾维钧的研究时，我最为感叹的是如今可供利用的民国史料已今非昔比了。当年到台北花一个月时间只能查阅数个卷宗的北洋时期外交档案，如今坐在书桌前按着鼠标就可轻易获得。顾维钧担任过总编辑的哥伦比亚大学校报《哥大旁观者》，之前在哥大图书馆也不易查得，现在不仅全套上网，还提供检索功能。这些年出版的多种大型成套资料集以及蒋介石日记等史料，都极大地丰富了史料来源。近年来民国外交史以及其他领域如留学生史的新进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成果，使我可以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下叙述和审视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以往语焉不详或没有弄清的问题，如顾维钧父亲顾溶的身世、顾维钧与袁世凯称帝的关系，在史料来源开拓后得以澄清；原来没有充分展开的问题，如顾维钧与北洋政治以及参与联合国的筹建，因为自己做了专题研究，则新列章节予以论述；即使旧版中已有叙述的，也都依据新史料或新研究改写，以更充分全面地展现顾维钧的外交活动。因此，现在完成的这本顾维钧

传是在旧版基础上重写的一本新传，篇幅从之前的20万字出头扩展到40万字，差不多翻了一番。

本书最基本的史料当然还是顾维钧文件集（*Wellington Koo Papers*）。顾维钧是一个历史的有心人，他不仅口述了600多万字的回忆录，还保存下外交生涯中经手的几乎所有文件（除北洋时期的大量文件留在北京和天津的住宅散失外），这是他那一代外交官中绝无仅有的。1997年8月到1998年7月，我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系统地查阅了顾维钧捐赠给母校的225盒文件。在此之前，还没有学者能够这样系统地查阅顾维钧文件。因为那时中国学者还很少有机会那么长时间待在美国，而美国学者无法细读顾维钧文件中许多中文手稿。那一年中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去珍本和手稿图书馆，用到纽约后刚买的第一台手提电脑录入感兴趣的文件，有时也会直接抄录在卡片上。午间休息时，坐在图书馆对面行政主楼前的台阶上，吃着早上出门前自己准备的三明治，身边总有几只萌态可掬的松鼠和停下来觅食的鸽子陪伴，春日或秋阳下会闭眼小憩片刻。这是我从事历史研究中难忘的一段经历。2019年4月，我重访哥大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查阅顾维钧家属新捐赠的57盒文件。午餐后特地到行政主楼前的台阶上小坐，仍有松鼠和鸽子来到身边，用新奇的眼光瞅着我，显然已非当年阶上物。如今顾维钧捐赠的225盒文件，在杨雪兰女士和金以林研究员的推动和主持下，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合作完成了数字化，国内学者不到哥大也能方便地使用这批珍贵史料了。

我对顾维钧的研究开始于跟随汪熙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后，汪先生要求我完成一部顾维钧与中美关系的专著，列入他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因为忙于其他事务，汪先生交办的这件事拖了下来。好些年，每次去拜见汪先生，心中都很忐忑，也很愧疚。如今这本书，是向汪先生在天之灵补交的一份作业。我也很高兴能借此机会致敬我的硕士导师余子道先生。余先生今年已九十高龄，仍笔耕不辍，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在研究顾维钧的这些年间，我有幸得到顾维钧亲属的关心和支持。1997年8月，我刚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阅读顾维钧文件，就在那里遇到了也来查阅档案的顾维钧女儿顾菊珍女士。此后，她邀请我去在曼哈顿东城的家中，并告诉我，我们谈话的客厅就是当年顾维钧与章含

之见面的地方。我从哥大回国后不久，与已经到上海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中国发展和亚太地区顾问的顾维钧继女杨雪兰女士相识，在她的全力支持下，于2000年9月在复旦大学举办了“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年逾八十的顾菊珍也专程从纽约赶来参会。会后不久，我正好到纽约参加学术会议，杨雪兰安排我去见顾维钧夫人严幼韵女士。见面的地方就是顾维钧晚年居住的公寓。那年严幼韵已是95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谈笑自若，给人感觉就是一位80岁左右的老太太。当时我正着手编顾维钧的画传，顾菊珍和杨雪兰提供了许多照片，但有些照片的时间或其中的人物难以确定，就去问严幼韵。她的记忆十分清楚，对我的问题一一作答。2006年初，我有幸再次在纽约拜访已过百岁的严幼韵，她以亲手调制的龙虾沙拉热情待客。对一个研究者来说，能与研究对象的亲属这样贴近地来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有助于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她们对我的研究十分关心，并尽力给予各种帮助，但从不过问我在研究中对顾维钧功过得失的评判。如今，她们三人都已先后去世，本书的完成是对她们以往支持的最好回报和纪念。严幼韵和顾维钧的外甥女徐景灿女士提供了许多留在顾维钧家中的珍贵资料，顾菊珍的女儿袁英英女士提供了顾菊珍与顾维钧的通信，她们对我的研究一直给予支持，在此予以特别感谢！

开始写作本书时，我十分自然地想到要将书稿交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不仅是因为该社在出版界和学术界享有的声誉，还因为该社资深策划徐思彦女史和总编辑杨群先生在我研究顾维钧之初就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我以博士学位论文以及研读顾维钧文件为基础写成的几篇论文就是经他们审阅修改后发表在《历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这么多年后，能将顾维钧研究的成果再次交给他们，并且被他们接受，我深感荣幸。我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总编辑宋荣欣女史，她获悉我的写作计划后一直予以关心并提供各种帮助。我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陈肖寒博士，他的专业精神让人敬佩，成稿后还存在的错误包括一些不易察觉的错误都被他一一发现，得以在付印前订正，使本书能够以现在的面貌与读者见面。本书中的顾维钧照片经樊琳女士精心修整，也在此表示感谢。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受益于以前指导过的学生的最新研究成果。马建标、承红磊、罗毅诸君对北洋时期外交的研究，使我对相关史事的叙述更为全面丰富，也使我得以修正过去研究中的某些判断。这样的收获是写作过程中最为愉快的经历。马建标和罗毅还仔细通读初稿，帮助

订正行文叙述中的一些错误，并提出修改意见。我以前指导过的学生龚志伟博士帮助释读顾溶墓志铭，黄飞博士和还在读的博士生许浩、李蔚暄、卢宇扬帮助查阅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从1999年完成《顾维钧传》到现在，倏忽之间，已过了22年。完成本书后，我对顾维钧及民国外交的研究就会告一段落，接下来将转回这些年从事的研究课题，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慢慢前行。

金光耀

辛丑岁末于上海新江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金光耀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2

ISBN 978-7-5201-9427-3

I.①以… II.①金… III.①顾维钧（1888-1985）-传记 IV.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40936号

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

著者/金光耀

出版人/王利民

责任编辑/陈肖寒

责任印制/王京美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10）5936702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20.75 插页：0.375 字数：476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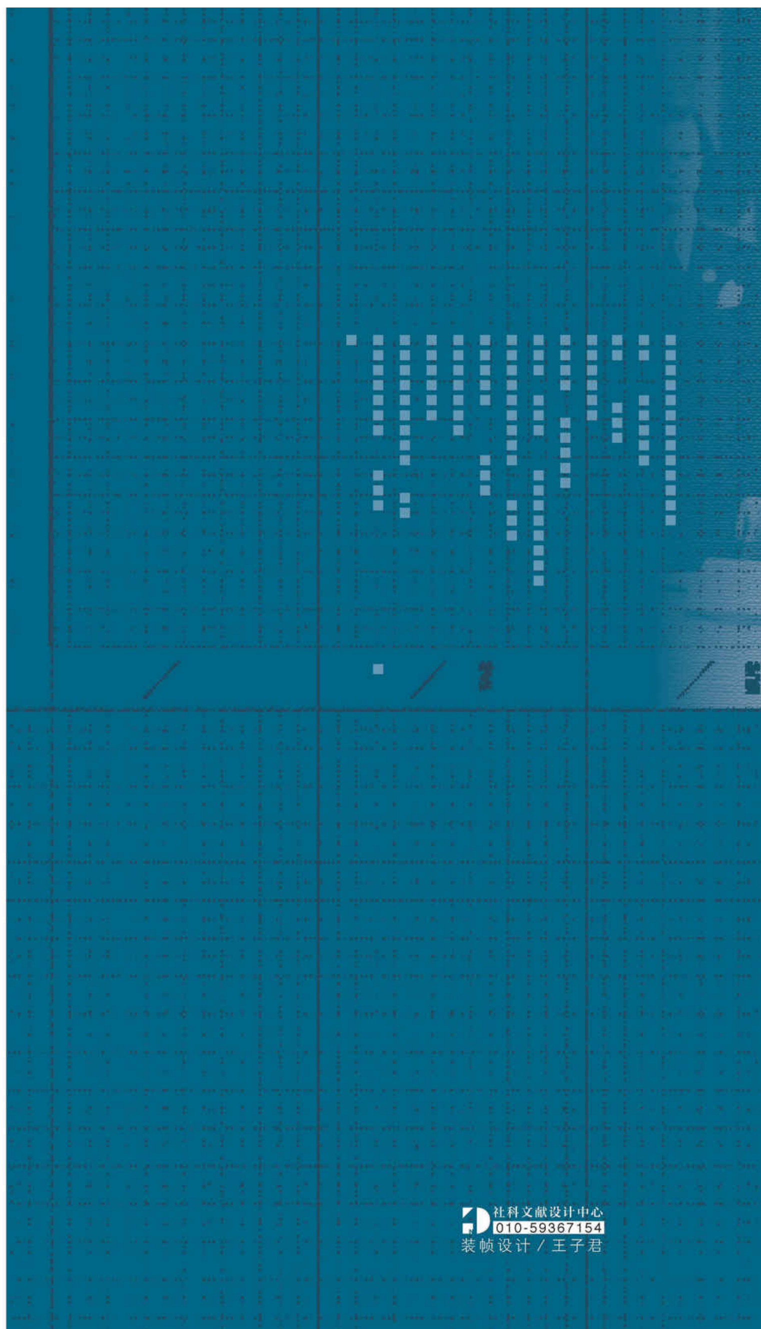
版次/2022年2月第1版 202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9427-3

定价/89.00元

读者服务电话：400891886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54
装帧设计 / 王子君

顾维钧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家，经历了民国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外交事件，是民国外交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与同时代的外交官相比，顾维钧对外交方针和应对策略有自己的思考和总结，给外交史留下了不应忘却的遗产。

顾维钧的一生丰富多彩。他有过三段婚姻，三位夫人从不同的方面助他一臂之力，成为他的好伴侣。

启微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ISBN 978-7-5201-9427-3

定价：89.00 元

启微

溃败之路

НА ПУТИ К КРАХУ

1904~1905年俄日战争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俄] 奥列格·阿拉别托夫 著
(Oleg Airapetov)
周健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奥列格·阿拉别托夫（Oleg Airapetov）

历史学博士，现任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是目前俄罗斯历史学界首屈一指的军事史专家，其研究领域为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的外交-军事政策。

封面图片：辽阳战役（1904）

溃败之路

НА ПУТИ К КРАХУ

1904~1905 年

〔俄〕奥列格·阿拉别托夫 著
(Oleg Airapetov)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周 健 译

俄日战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引言
- 第一部分 外交背景
  - 1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外交政策下的远东
  - 2 第二阶段：向远东扩张
  - 3 第三阶段：远东的动员——崛起之路
  - 4 甲午战争：敌友关系的转换
  - 5 《马关条约》修订的初步结果
  - 6 俄国远东政策的巴尔干后方
  - 7 博斯普鲁斯还是远东？
  - 8 欧洲的稳定、远东的动员、新盟友的结交与失去
  - 9 旅顺港的攫取：原因与结果
  - 10 俄日两国在朝鲜的冲突
  - 11 “和平渗透”的结果：义和团运动与对清战争
  - 12 战争或合作：彼得堡与东京的抉择
  - 13 远东抉择的外交背景：从巴尔干到波斯
  - 14 对日战争一触即发
- 第二部分 战争
  - 15 战前：陆军、海军及战区状况
  - 16 开战
  - 17 双方的计划、俄国战争机器的优势与劣势
  - 18 国际局势、军事行动的开端和马卡罗夫的牺牲
  - 19 库罗帕特金出任总司令、朝鲜失守
  - 20 关东州和旅顺港战役的开端、日军夺得制海权
  - 21 辽阳：本该决出胜负的会战
  - 22 辽阳之后：旅顺港和沙河
  - 23 第二太平洋舰队的决策、组建和起航及赫尔事件
  - 24 旅顺港的结局：第一太平洋舰队的覆灭
  - 25 黑沟台：改变战争进程的最终尝试
  - 26 奉天会战：指挥危机的巅峰
  - 27 奉天会战：灾难性的撤退
  - 28 四平街对峙、陷入僵局的陆地对抗、迈向和谈的第一步、继续出征的俄国舰队
  - 29 对马
  - 30 对马之后：日本与俄国的处境
  - 31 朴次茅斯：谈判与和平
  - 32 休战与和平：内政的影响因素
  - 33 革命背景下的复员
  - 34 败军战胜革命
- 结语
- 译后记

引言

2014年是俄日战争爆发110周年，与纪念这场战争爆发100周年不同，这一年对该战争的研究并未骤增。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历史是门关注事件发生百周年的科学。201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社会各界的注意力普遍集中于此。然而，从俄日战争周年纪念活动的影响来看，关注俄日战争并非无益。目前，某些西方国家仍固执己见地将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战争列入日程，因此抵制这种政策迫在眉睫。

在我看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注，无论如何都不应影响我们冷静而审慎地对待1904～1905年发生在远东的俄日战争。无论是俄日战争本身，还是当时的国际背景，都对俄罗斯帝国的内部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充满趣味性和启发性的课题。

对于俄日两国而言，这场战争已经成了重要的象征性事件。日本因战胜了拥有欧洲顶尖军队和庞大舰队的俄罗斯帝国而赢得了加入大国俱乐部的权利。此外，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早在1895年就已经占领了台湾），同时迫使朝鲜屈从于己。1904年2月10日，日本对俄宣战并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参战主要是为了保护朝鲜："朝鲜的不可侵犯性始终都是我们格外关心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国家与我国的传统关系，更是因为独立存在的朝鲜对我国的安全至关重要。"[1]战后，日本又发表了其他宣言，例如在远东首次明确提出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此同时，日本的胜利也成了美日关系恶化的导火索，中国东北日本占领区"敞开的大门"紧紧地关闭了。[2]

至于朝鲜，在俄日两国签署了《朴次茅斯和约》后，日本便不再关注它的独立问题了。正如一位日本作家所说的那样："朝鲜半岛犹如一把瞄准日本心脏的匕首，因此与朝鲜建立紧密的政治、军事联系对于确保日本的安全是十分必要的。"[3]1911年，日本吞并朝鲜并使其成了自己的殖民地，然而很快对日本而言拥有朝鲜半岛这把"匕首"就已经无法满

足其野心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俱乐部成员的日本开始有目的地进行军事训练：训练陆军以备与苏俄开战；训练海军舰队以备与美国开战。[4]这是日本继甲午战争和俄日战争后迈向1945年的第三步。事实上，在1904年几乎没人能够预见这段历史的结局。

对于俄罗斯帝国而言，1904～1905年远东的局面已经预言了战争的结局。没有什么是比无法结束一场失败的战争更糟糕的了。早在1811年，卡拉姆津（Н. М. Карамзин）就曾指出：“为了稳固专制制度，国家权力是必不可少的。”[5]在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前夕，保守派批评家列昂季耶夫（К. Н. Леонтьев）指出，在不远的将来，俄罗斯帝国将“进入冰冻期”。在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统治时期，稳固的专制制度向百姓展现了强权的冷酷及它在没有重大军事冲突情况下的威力。应当指出，沙俄此举并非徒劳。亚历山大三世本人坚决拥护无限制的专制制度，与该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他的导师波别多诺斯采夫（К. П.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6]

1880年代，民粹主义运动以失败告终，政治“安抚”达到了高潮。[7]地方自治活动家罗季切夫（Ф. И. Родичев）指出：“从1881年到1894年，在这13年间，社会生活和思想运动明显减少了。参加改革派会议的人日渐减少，百姓也越来越不愿意参与密谋了。”[8]这种局面令统治者感到欣慰。20世纪初，作为自由主义阵营领导者之一的马克拉科夫（В. А. Маклаков）在回忆起1880年代社会动向时指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专制制度依旧保持着它的魅力。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1860年代的改革，而是因为专制制度足以体现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力量。正因如此，人们对君主制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引起百姓的憎恶，反而成了人们崇敬的对象，这并非毫无道理。”[9]

虽然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乐观。国家的决策者坚信他们比其他人更了解俄国，因此在如此“光明”的前景下他们无所畏惧。1882年1月，斯拉夫派保守主义者卡韦林（К. Д. Кавелин）指出：“这种观念幼稚、可笑，如果它长期左右国家政策的制定，那么最终一切将以最可悲的悲剧收场。”[10]任何转化成为政策的意识形态幻想都将对国家构成极大的威胁。拥有完全权力的政府必须能够预感到国家所面临的危险，因为完全的权力等同于完全的责任。当时俄国农村的处境极为艰难，国家的农业扶持政策依旧倾向于贵族土地所有

者。在1880年代中期，地主在贵族银行的贷款额度比农民在农民银行的贷款额度高出七八倍。[11]

1890年代初期，农村问题日渐尖锐，最终上升到了国家层面。1891年，农作物歉收，饥荒席卷二十余州，有些地区甚至空无一人。在农村随处可见被钉死了的房屋，这是“涌向世界各地的逃荒者留下的小木屋”。[12]俄国杰出的立宪民主党人、国内政策研究者认为，这场危机已成为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13]这场灾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各界的声音也不容忽视。托尔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指出：“今年由于农作物歉收，大家都紧绷着神经，人们总是吃不饱饭。”[14]

到了年底，政府为了解决饥荒问题拨付的7200万卢布已经花掉了6000万，但是收效甚微。此时，国家的金融稳定性受到了威胁。时任财政大臣维什涅格拉茨基（И. А. Вышнеградский）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企业家，他反对继续拨款解决灾荒问题，[15]主张出口谷物、缩减居民生活必需品开支。[16]柯罗连科颇为准确地描述了这项政策的结果：“我们已经习惯了向农村索取，却没有给予的能力。”[17]在饥饿和流行病面前，被政府视为农村信仰支柱的乡村神职人员的弱点暴露无遗。教会学校动荡不安、牧师与教民之间摩擦不断，这一切都只是开端。[18]

此时，在1880年代溃不成军的自由主义运动似乎又重获新生，顽强地耸立在与饥饿和随之而来的流行病斗争的土地上。[19]米留科夫（П. Н. Милюков）回忆称：“1891年是公众情绪的转折点。这一年在伏尔加河流域爆发的饥荒震惊了整个俄国社会。”[20]在自由主义运动中，人们拒绝服从政府提出的援助饥民的号召。他们赞成托尔斯泰的观点：“捐赠法是最高权力机构自行确立的，其他任何权力机构都不能废除它。”[21]国家需要有文化的人，而他们的数量也在增加。《解放》（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杂志的编辑斯特鲁维（П. Б. Струве）在该杂志第1期第一篇社论中写道：“无论1880年代的社会形势多么严峻，它都无法抑制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和兴趣，无法遏制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22]面对如此形势，必然无法找到其他出路解决饥荒问题。

研究社会运动的历史学者科列罗夫（М. А. Колеров）指出：“众所周知，1891年的饥荒对俄国社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政府颁布的旨在‘切断’社会自发资助活动的限制措施，为稳定局势所做的徒劳无功的

尝试，强制要求新闻媒体、食堂、集资机构等非政府性援助单位办理许可证，这些举措都为反对派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891年，人们对国家和政府的信心逐渐坍塌，他们不再坚信国家是充满力量的、政府是不可战胜的。事实上，此时的镇压型政权与社会舆论和社会自发性组织呈对立之势，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悲剧。毫无疑问，这场饥荒为双方的较量提供了恰当的借口、合适的背景。在此情况下，存在这样一种推断：声名狼藉的政府主动退出，自愿为反对派的自我肯定和发展留出空间。1891年，处于社会道德舆论批判中心的不仅是政府的厚颜无耻，还有民粹派的'乌托邦主义'。此时，人们对社会主义改革寄托了全部的希望，但是改革的设想需要建立在古老的农民经济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依旧行之有效的基础上。"[23]1891年，国家民族主义同盟、斯拉夫派和温和民粹派的内在缺点暴露无遗。

此时，新的革命浪潮悄然而至，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受欢迎。然而，政府依旧在与饥荒、自由主义者及日渐缩减的谷物出口量做斗争。但是从整体上看，社会各界基本保持团结并且承认政府的权威性。这是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从他已故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那里继承的宝贵"遗产"。然而，到了1905年沙皇政府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在很大程度上，这已经预示了俄日战争的结局。对中日冲突的干涉使人们坚信俄日两国必将开战，而彼得堡方面几乎恰逢其时地表明了维护专制制度不可侵犯的决心。

1892～1893年灾难过后，政权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对抗并未结束。1894年春天，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某位喉舌指出："对地方自治局活动范围的限制是政府压制近期日益活跃的地方运动的手段之一。"[24]特维尔地方自治局与地方行政长官不睦已久。在这两年里，面对饥荒和流行病，双方甚至就赈灾资金的分配问题发生了正面冲突。[25]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后，人们对自由主义变革的期望日趋强烈。[26]所有人都期待着改革，"所有人都毫无头绪却满怀希望地看向年轻的沙皇尼古拉二世"。[27]

1894年11月1日（俄历10月20日），年轻的君主发表了登基宣言。他宣誓将秉承先人遗训治理国家，即"始终将维护俄罗斯的和平繁荣、强盛荣耀以及为忠诚的臣民谋福祉作为唯一目标"。[28]就这样，尼古拉二世给了地方自治局模糊的希望，地方自治局的成员也逐渐活跃了起来。地方自治局的温和派和自由派开始聚集。[29]1894年末，当日本海陆两军战胜清政府基本已成定局时，特维尔地方自治局期待尼古拉二世推行

改革（沙皇登基后通常会实施改革）。1894年12月20日，地方自治局通过了上书沙皇的提议，上书文件由州会贵族领袖罗季切夫执笔。[30]

该文件既对新任沙皇的登基宣言做出了明确回应，同时也简要地阐述了地方自治局的自由主义纲领及自由主义者的期待。他们呼吁尼古拉二世与人们对话：“我们期望，无论是政府代表还是人们都能坚定不移地遵守法律法规，这样我们的幸福感将会不断增强。因此，在俄国代表君主意志的法律应当时刻高于政权内部个别人的个人意志。我们坚信，个人权利和社会机构的权利将受到保护，变得不可侵犯。陛下，我们期待有朝一日社会机构有机会、有权利就与之相关的问题发表意见。这样，无论是政权代表还是普通百姓的想法和诉求都能上达天听。陛下，我们期待在您的治理下俄罗斯能够发展一切社会力量，沿着和平与真理的道路不断前进。我们相信，在与忠于沙皇、忠于祖国的各阶层社会代表沟通的过程中，陛下所领导的政权必将找到助您实现伟大帝国构想的新力量。”[31]这份文件在地方自治局成员的一片掌声中通过了。读罢此函，罗季切夫欢呼道：“先生们，此时此刻，我们在向尼古拉二世表达我们的期望、我们对未来的信念以及我们的抱负。尼古拉二世万岁！”[32]

虽然他们对这位年轻的沙皇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希望沙皇能够肯定他们的倡议。[33]人们满怀对俄国内政新时期的期待开始了新一年的生活。1895年1月20日，农业部召开了农业委员会会议，私有制土地代表出席了该会议。尽管新年的第一场会议十分普通，但人们对它期望良多。[34]1月26日，财政大臣收到圣谕，要求财政部每年向“科学家、文学家、政论家本人或其遗孀、遗孤”发放五万卢布援助金。[35]此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36]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地方自治局也开始积极筹备上书事宜。[37]过高的期望最终迎来了失败的结局。尼古拉二世将特维尔人的上书交给波别多诺斯采夫并且让他批复。在这位年轻沙皇的眼中，波别多诺斯采夫是一位可靠的顾问，因为他能告诉自己：假如先皇面对此种情况，他将怎么做。[38]早在1881年，波别多诺斯采夫就曾明确表达过自己的信条：在他看来，宪法是虚假的，是“俄国走向末日”的标志，议会是坐满了“废物和人渣”的“座谈室”。[39]圣主教工会教院总监甚至起草了警告书。内务大臣杜尔诺沃（И. Н. Дурново）向尼古拉二世进言，提议对上书者实施行政处罚。[40]最终，罗季切夫被剥夺了与尼古拉二世会面的资格，同时被禁止从事地方自治活动。[41]

1895年1月29日，尼古拉二世夫妇在冬宫的尼古拉耶夫大厅接待了

贵族、哥萨克、城市及地方自治局的代表。来自20个地方自治局的代表向沙皇递交了两份上书，其中一份依旧来自特维尔地方自治局。在招待会上，尼古拉二世说道："我很高兴看到各阶级代表齐聚一堂，表达忠心。我相信在场各位的忠心与诚意。但是，我听说在地方自治局的会议上，某些人竟妄言要参与内政，这简直就是胡思乱想。所有人都应当明白，我必将全力以赴地为人民谋福祉，如同先父一样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制度的根基。"[42]关于当天发生的事情，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写道："1895年1月17日：在进入尼古拉耶夫大厅前，想到即将面向贵族、地方自治局及城市代表发表讲话，我感到惶恐不安。"[43]

很快，尼古拉二世的讲话被刊登在了各大报刊上。次日，尼古拉二世接待了多个代表团，但是这次一切进展得很低调，没闹出什么大动静。[44]事实上，前一天尼古拉二世在讲话时出现了口误：他将"毫无依据"（беспочвенными）说成了"毫无意义"（бессмысленными），更确切地说，"毫无意义"一词是被他高声喊出来的（当时他将演讲稿放在了手中的帽子里）。[45]尼古拉二世"大声疾呼"的画面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46]根据官方报道，招待会圆满结束："洪亮的'万岁'声响彻尼古拉耶夫大厅。"[47]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社会反响和不容乐观的公众情绪。人们普遍认为，此次会面是政府在向反对派宣战，[48]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斯特鲁维回忆道："很难描述这场风波，尼古拉二世1月17日发表的关于'毫无意义的梦想'的讲话传遍社会各界。"[49]

那时，"与其说沙皇的讲话是被恶意批判的对象，倒不如说是被嘲笑的话题"。[50]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拉姆兹多夫（В.Н. Ламздорф）伯爵在1月31日（俄历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城市里，陛下昨日的讲话遭到了强烈批判，此番话语让人们感到十分难过。"[51]同日，在首都出现了一封写给尼古拉二世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您的讲话现在已经传遍了整个文化界，乃至整个俄罗斯。在此之前，没人了解您，但是从昨天开始您已经成了名人，像您这样的名人肯定容不下'毫无意义的梦想'。"[52]这封信的结尾写道："是您率先宣战的，这场战争不会让您久等。"[53]这封信是以罗季切夫名义发出的。[54]事实上，这封信的作者是斯特鲁维。[55]在冬宫举行完社会各界代表招待会的三天后，彼得堡方面通过决议，准备干涉日中冲突。

在此后的几年里，国内外政治势力多次交锋，这为远东未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黑土区农民的处境十分艰难。面对短缺的土

地，农民不得不签署苛刻的租地条约。然而由于种植水平低下、农民毫无权利，当粮食和土豆减产时，农民的负债又增加了。如果说1871～1875年农民的负债额为400万卢布（占税额的10%），那么到了20世纪初农民的负债额已经高达5500万卢布（是税额的1.77倍）。[56]1902年春季发生了农民暴动。3月，波尔塔瓦州的54个庄园在4天内被摧毁，而后暴动蔓延到了哈尔科夫州。[57]为了镇压暴动，政府不得不出动军队，最终出现了人员伤亡。[58]4月15日，作为对政府的反击，社会革命党人组织了针对内务大臣西皮亚金（Д. С. Сипягин）的暗杀活动。

这一切都令尼古拉二世感到不快，因为此时的彼得堡正在等候一位盟友的到来。5月20日，法国总统埃米勒·卢贝（Émile Loubet）抵达俄国首都。沙皇政府隆重地接待了这位贵宾：演出、舞会、阅兵、烟花。23日，卢贝离开了俄国。[59]次日，枢密院签署了最高法令，规定：受灾的土地所有者可获得80万卢布的补偿，这笔款项先由国库垫付，而后每年向参加暴动的农民所在的村庄、村社额外征收罚款充入国库，罚款自1902年下半年开始征收。[60]反对派称这项举措为“无差别的惩罚性赔款”。[61]农民暴动已然发生，尽管政府已经知晓了农村混乱的状况，却无动于衷。一切都停留在口头上，或谴责或许诺。

1902年8月至9月，在库尔斯克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此次演习原计划于1900年8月进行，然而义和团运动打断了该计划。除了时间发生变化外，其他事宜全部按照原计划进行。从演习日程上看，共有154个营、76个骑兵连、1支哥萨克部队参加。此外，出动火炮348门。[62]演习部队分为两支：一支是由莫斯科军区司令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大公领导的莫斯科军；另一支则是由陆军大臣、侍从将军库罗帕特金（А. Н. Куропаткин）领导的南方军。9月7日，库罗帕特金上将抵达军演区。[63]10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和作为总裁判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大公抵达军演区。次日，尼古拉二世抵达军演区。[64]

在库尔斯克火车站，尼古拉二世接见了贵族和地方自治局代表。他承诺要进行改革，要让贵族和地方自治局成员加入州委会。尼古拉二世在向贵族表态时说道：“地方上的贵族们，你们是维护俄罗斯道德和秩序的支柱力量，巩固你们的地位是我时刻关心的事情。”至于地方自治人士，沙皇建议他们发展地方经济。[65]这是内务大臣普列韦（В. К. Плеве）提出的政治纲领，得到了沙皇的全力支持。[66]9月14日，尼古

拉二世造访库尔斯克，在贵族代表的陪同下出席了亚历山大三世纪念碑的揭幕式。仪式完成后，尼古拉二世前往州长府。[67]在此聚集了来自库尔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奥廖尔州、沃罗涅日州的乡长和村长。面对他们，沙皇发表了简要的讲话，指出："在波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制造暴动的罪人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应当记住亚历山大三世在莫斯科加冕时对乡长们所说的话：'你们应当听从贵族领袖的话，不要相信荒谬的谣言。'"[68]

后来演习开始了，库罗帕特金上将的名字在俄国变得家喻户晓。在演习中，他展现了自己率领大部队作战的指挥风格，后来在中国东北他依旧保持这种指挥风格。由基辅军区部队和敖德萨军区部队组成的南方军有两支步兵军、一支联军及一个骑兵师，共计88.5个营、49个骑兵连、1支哥萨克部队、46个炮兵连（216门火炮）。南方军扮演侵略军，它需要穿越基辅附近的第聂伯河，经由库尔斯克州和奥廖尔州进击莫斯科。[69]由莫斯科军区部队和维尔诺军区部队组成的莫斯科军则扮演守军，其军事力量包括两支步兵军和一支联军，共计77.75个营、36.5个骑兵连、1支哥萨克部队及198门火炮。按照作战计划，它应向奥廖尔州和库尔斯克州推进，迎击并驱逐侵略军。[70]在演习的第一阶段，南方军因军力不足向"敌人"做出了退让。它计划逐步撤退到库尔斯克，占领此地作为防御堡垒，等待增援。此后，尽管库罗帕特金领导的南方军军力有所下降（此时共有79个营、40个骑兵连、1支哥萨克部队及180门火炮），但它仍以微弱的优势略占上风，而后在奥廖尔州转入反攻。军演计划书中记载："将为参与军演的部队配备精良的技术设备，如电报机、电话、热气球等。同时，将检验摩托兵的行动能力以及在没有无线电报机的条件下使用信鸽传递信息的能力。在军演过程中，双方可调用铁路或公路运输军备物资。"[71]上述计划均在实战中得到了落实。

事实上，在这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使用了一系列新型技术设备，如侦察型热气球、战地电话等。与此同时，新型通信设备也得到了有效利用：累计铺设了29条电报线路、20条电话线路，创建了9个电报站、11个电话站。[72]除此之外，作战部队还尝试了在轻型汽车和载重汽车上搭建临时参谋部。由于这项新技术并不成熟，试验以失败告终。[73]同样地，使用6吨和10.5吨的蒸汽机车牵引3节平板车（每节平板车的载重量为3～4吨）向军队运送粮食的尝试也未取得成功，其原因在于此类设备不适合在俄国的道路，特别是在桥梁上通行。在夜间进行训练和战斗是此次演习的另一项创新。[74]根据南方军的军演报告可知，在后来

的军事行动中库罗帕特金上将领导的南方军战胜了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领导的莫斯科军。[75]

当库罗帕特金作为司令拥有独立指挥权时，他延续了在突厥斯坦[76]战役中形成的作战风格（那时他所指挥的部队人数不足千人），指挥军队将战线延伸至警戒线附近，最终摆脱了危机。这很容易做到。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军事演习来说，这种打法属于常规的传统作战方法，而非库罗帕特金的独创。这种常规的作战方法多次出现，例如，莫斯科军派骑兵部队突袭南方军的粮仓和面包房，虽然突袭成功，但在真正的战争中这种作战方法是绝不可行的。[77]总而言之，尽管双方都进行了创新性尝试，但是演习本身是按照完全过时的方案展开的，双方仿佛都在参加拿破仑时代的战争。哥萨克部队分散包抄，骑兵展示骑术，步兵伴着鼓声和军号声发动进攻，炮兵连则暴露在明处，驻扎在地图标注的位置上。[78]

在这场精彩的“表演”中，库罗帕特金的对手并不走运。这场演习的一位参与者指出：“北方军接连败退，因此最终陆军大臣‘战胜了’大公也就不足为奇了。库罗帕特金亲自制订演习计划，挑选最优秀的部队，并且任命自己为南方军的统帅。”[79]在为期两周的军演的最后阶段，他的战绩成功地超越了所有人。莫斯科军撤退到卡斯托尔诺耶村附近的一个防御堡垒，在那里他们开辟了全断面掩体，埋伏了炮兵连，拉起了铁丝网，布置好了陷阱。1902年9月16日，南方军在平原对防御堡垒发起进攻，随后步兵和骑兵遭遇峡谷地势，因此他们不得不冒着枪林弹雨穿越峡谷。[80]此次进攻，南方军共出动了64个营和100门火炮。南方军的报告中写道：“很明显，第八军和第十军配合得十分默契。随着进攻的开展，我方军团逐渐逼近莫斯科军，形成合围之势，最终我军在波利安发起总攻，在敌军后方拿下了敌军。在军号声中，我军凯旋，士气大增。”[81]

莫斯科军司令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却认为：“演习中的最后一场战役发生在库尔斯克附近的卡斯托尔阵地。这表明库罗帕特金并不清楚在使用新型武器的现代战争条件下，应当如何攻打被敌军占领的防御阵地。在我军炮兵连扫射‘敌军’根据地后，库罗帕特金指挥近20个营组成了一个不甚坚固的链状包围圈，而后亲自率领一众部下在前方发动进攻。”[82]当陆军大臣率领整支部队出现在森林边缘时，总裁判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83]同时莫斯科军也大为

震惊。应当指出，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将参谋部设在了根据地前线的一个小山峰上，并且悬挂着印有常胜将军格奥尔吉图案的军旗，因此他的参谋部格外显眼。莫斯科军的炮兵连隐蔽地驻扎在山脚下，库罗帕特金率领步兵悄然靠近此地。当南方军的骑兵部队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军后方两三千米处并对其发起突袭时，步兵还在路上。[84]但是南方军参谋部认为，这场演习已经达到了预期效果。[85]

莫斯科军参谋部的战地记者回忆道："与大多数莫斯科军的军官一样，我对库罗帕特金的作战计划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这场演习中，他目光精准，率领将士打击我方最薄弱环节。至今我仍然记得，在结束演习的卡斯托尔战役中他们的进攻是多么迅速，攻势是多么猛烈。我们本应隐蔽地分散在山丘上，观察战争进程的莫斯科军参谋部出乎意料地成了敌方打击的重点。"[86]面对这场危险的奇袭，莫斯科军并未惊慌失措。那时，伪装隐蔽在山脚下的炮兵连奋勇抵抗，向南方军骑兵部队连续开炮。然而在这种作战条件下，远距离的炮火打击无法重创骑兵部队。在此情况下，军演被叫停了。很快，尼古拉二世从南方军中走了出来，出现在众人面前。[87]他对库罗帕特金的表现十分满意，在9月16日（俄历9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最后一刻，当南方军的白衬衣充满整个战场时，这景象实在是太美了。"[88]

有趣的是，1902年10月，日本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日本天皇同样出席了演习。在演习中，日本第六师团和第十二师团进行了空降、登陆战和遭遇战演练。在军演中，日军首先演练的是迂回战和反击战，其炮兵部队的作战方式让俄国军演中的南方军在卡斯托尔战役中几乎没有获胜的希望。对于俄军来说，这不是秘密。据《军事汇编》（Военный сборник）观察员特别记载："我在南津村前的炮兵连观察炮兵是如何作业的。他们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事情，不发出一点声响，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自己毫无关系，所有人如同互不相识。纪律严明、井然有序的炮兵连为作战指挥减轻了负担。"[89]当然，日军在演习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与俄军在库尔斯克演习中所暴露的问题大有不同。

在进攻卡斯托尔阵地后，南方军被判定为军演的获胜方。莫斯科军参谋长索博列夫（Л. Н. Соболев）将军直言："虽然库罗帕特金的军事行动受到众将领［其中包括他未来的参谋长萨哈罗夫（В. В. Сахаров）将军、他未来的下属司令考利巴尔斯（А. В. Каульбарс）］的高度赞

扬，但这与他身处高位不无关系。”在读罢对库罗帕特金满是溢美之词的军演报告后，大公甚至发誓要与陆军大臣再来一场类似的竞赛。[90]库罗帕特金成功地包装了自己。毫无疑问，在演习中对军队“内行的、高明的”领导也使其知名度大幅提升。莫斯科军参谋部战地记者回忆道：“每次演习结束后，在与同行交流时，我们总能听说关于库罗帕特金将军对待演习时刻警觉、毫不松懈以及在军旅生活中一切从简的事迹。库罗帕特金将军以身作则，为整个部队树立了榜样。”[91]

军演结束后，参加军演的六支部队接受检阅。[92]9月18日，163.25个营、85.5个骑兵连、1支哥萨克部队及408门火炮整齐地排列在宽阔的阅兵场上。受阅部队包括90名将军、552名校官、3388名尉官及89121名士兵。数万名军人向观礼台行注目礼。尼古拉二世与伊朗国王站在观礼台中央，备受瞩目。[93]尼古拉二世对军演和阅兵非常满意。[94]阅兵结束后，他颁布诏书嘉奖众人，并且特别表扬了陆军大臣：“很高兴，在演习中我全程见证了您高超、娴熟的军事指挥能力，以及在完成作战任务时可资借鉴的军事行动力。”[95]若干年后，库罗帕特金率军出征，施展拳脚。但是，当面对难以调遣的后备兵力时，他只能“耐心地”撤退。

在俄国军队中，将军总是佩戴着黄黑色的圣乔治徽章，周围聚集着一众随员和卫兵。然而在未来的沙河战役中，库罗帕特金不得不亲自率领最后一支后备军发起进攻。[96]

据库罗帕特金参谋部的一位军官回忆：“除了哥萨克部队统一着装外，其他部队着装各异，令人惊讶。司令本人则始终都穿着灰色的将军制服，系着银色的围巾，正式的阅兵服与普通的生活装竟出乎意料地搭配在了一起。随员有的穿着常礼服，有的穿着皮夹克，有的穿着军装上衣，还有穿着衬衫的。在战地办公室工作的丹尼洛夫（Н. А. Данилов）上校虽然不承担任何作战任务，却在制服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勋章。他似乎将自己当成了1812年战争中的英雄人物。”[97]见微知著，在俄日战争中俄国战败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战争爆发前，俄国内政存在诸多问题，这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和远东的未来冲突产生了直接影响。1903年4月19日至20日，在基什尼奥夫发生了一场死伤人数众多的屠杀事件——45人遇难、71人重伤、350人轻伤，700余所房屋及600余间店铺被洗劫一空。[98]据传言，沙皇政府与这场屠杀关系密切：内务大臣普列韦参与策划了屠杀事件；或者说，至少维特（С. Ю. Витте）及其自由主义阵营的盟友[99]积极主张从宽处理

实施屠杀的暴徒。[100]此前，顽固而残酷的普列韦似乎是维特的“天敌”。[101]在屠杀事件发生前夕，维特与在德国出版发行《解放》杂志的斯特鲁维站在同一阵线上，共同反对普列韦在犹太问题上的立场。[102]然而事发后，斯特鲁维一方不得不怀疑政府为何对屠杀事件和普列韦的过错竟宽容至此。[103]

1903年5月18日，《泰晤士报》（*The Times*）援引驻俄通讯员情报，刊登了一封普列韦在屠杀发生前写给比萨拉比亚州州长冯·拉宾（В. С. фон Раабен）少将的一封信，信中包含如下建议：“内务大臣，内务部办公厅，1903年3月25日№ 341号绝密函，致比萨拉比亚州州长先生：据我所知，目前在委任您管辖的地区，正在酝酿一场反对犹太人——剥削当地人的罪魁祸首的骚乱。虽然当前城市居民普遍躁动不安并且企图寻找机会表现自己，但是考虑到过分严苛的措施将引发未被革命宣传和反政府势力煽动的群众的不满，因此请阁下务必尽快找出遏制骚乱发生的办法，同时切勿诉诸武力。”[104]《解放》杂志翻译并转载了《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同时对信函的真实性未持保留意见，甚至还补充道：“这正是内务大臣向比萨拉比亚州州长下达的命令。对此，原本持怀疑态度的人应当明白，在基什尼奥夫屠杀事件中，独裁者普列韦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105]

报道刊登后，普列韦最初甚至对此信以为真。一方面是因为“密函”伪造得十分高明，足以以假乱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普列韦在签字时经常不详阅文件。[106]这封密函被视作政府含糊地承认了参与屠杀事件的证据，[107]并且被欧美媒体大肆转载。不久后事件发生了反转，真相得以澄清。[108]经调查发现，这封密函是伪造的。[109]事实上，依据政府的工作习惯推断，这封密函的虚假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面对即将到来的骚乱，为避免承担责任，拉宾少将立即请示军事当局能否对骚乱进行武力镇压。后来，事态的发展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了。在我们亲爱的俄国，每当出现危情，官员在未接到明确指令的情况下不敢擅自行动。在军事当局和民事当局正为谁应当对此承担责任而相互推诿时，屠杀事件发生了。[110]内务大臣以拉宾的不作为为由免去了后者的职务（顺便说一句，维特任职总理期间并未因戈梅利屠杀事件惩处政府官员）。

此外，普列韦在《政府公报》（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上发表声明，澄清密函造假事实，《泰晤士报》《每日新闻报》《慕尼黑新闻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并附评：“上述内容为虚假信息，内务大臣

从未给比萨拉比亚州州长写过包含此内容的信函，也没有任何信息可以证明在比萨拉比亚州即将发生骚乱。”[111]然而，没人相信这些保证性声明。俄境内接受审查的报刊只转载了内务部的声明，却未发表任何评论。[112]《泰晤士报》通讯员因散布虚假信息被俄政府驱逐。[113]《解放》杂志继续谴责普列韦阻碍对事件真相的调查，[114]以期激起民愤。[115]

基什尼奥夫屠杀事件对美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美国犹太移民数量激增。1889～1898年，41.86万名犹太人逃离俄国移居美国。为了引起国际社会对基什尼奥夫屠杀事件的关注，犹太移民在美国27个州的55座城市举行了77场集会。对此，华盛顿官方未出面干预，然而此事并未就此了结。[116]在俄日战争前夕，日本形势艰难，东京方面陷入财政危机，并且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此时，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在听闻俄政府参与策划基什尼奥夫屠杀事件后，决定向日本伸出援手，隶属于库恩雷波公司的美国希夫银行向日本提供巨额贷款。[117]密函伪造事件使人们不由自主地相信：俄政府内部存在矛盾，因而政府个别成员借机散布虚假消息并与反对势力广泛接触，这使国家威严扫地，同时也促进了东京与美国某些银行的金融往来。

距离1895年1月在冬宫举行招待会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在此期间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这对国内局势造成了直接影响。1904年7月28日，普列韦遇刺身亡。这一消息令许多人“心情愉悦”。1894年底，曾呼吁建立法治社会的人已经不再排斥使用恐怖手段了。斯特鲁维指出：“博戈列波夫、西皮亚金、波格丹诺维奇、博布里科夫、安德烈耶夫以及普列韦的尸体既不是情节剧中的突发奇想，也不是俄国史上的浪漫事件，这些尸体预示着垂死的专制制度的必然结局。”[118]俄国在中国东北、黄海、日本海战争中的接连失利催化了国内诸多问题（如农业、种族、劳工等）的集中爆发。此时，能否夺得旅顺港成了战争成败的象征；对日本而言，旅顺港是“统治权”的象征。[119]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期待旅顺港陷落引发俄国革命的人而言，旅顺港的结局同样具有象征意义。1904年8月，《解放》杂志编辑感叹：“步旅顺港血腥命运后尘的不是东京，而是彼得堡。在那里必有清算，在那里必有报应。”[120]

1905年1月2日（俄历1904年12月20日），俄国太平洋舰队对日投降，被迫交出旅顺港。3日，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写道：“夜里，我从斯捷谢利（Стессель）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驻军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已向日军投降并割让旅顺港！此时，我内心苦痛，虽然他们

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但是我仍愿相信我军必能收复要塞。全体守军都是英雄，他们已经做完了能做的一切，甚至更多。”[121]14日（俄历1905年1月1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向海陆两军下达命令，借此向全国人民宣布了战败的消息。在命令的结尾处，沙皇说道：“我与整个俄罗斯都相信，我们胜利的时机即将到来，上帝必将祝福我亲爱的军队和舰队，赋予你们击垮敌人的猛烈攻势，维护我们祖国的荣誉与荣耀。”[122]后来，沙皇的希望落空了。

1905年1月，布尔什维克断言：“旅顺港的沦陷拉开了推翻沙皇制度的序幕。”[123]现在看来，这个预言完全正确。此时，斯大林没有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他认为是时候清算君主制度了：“沙皇的军队已然势弱，沙皇的舰队正走向灭亡，最终他们在旅顺港屈辱地投降了，这再次表明沙皇的专制制度行将就木。”[124]斯特鲁维指出：“远东的暴风骤雨唤醒了俄国人民一个世纪以来的政治梦想。”[125]1905年初，他预言全社会团结一致反对专制制度的决定性时刻即将到来。[126]在外国势力的推动下，专制制度受到了广泛质疑。列宁指出：“专制制度已被削弱，即使最不相信革命的人也开始相信革命了。对革命的普遍信任正是革命的开端。”[127]

受审查的媒体甚至也发出了批判的声音：“日本的胜利绝非偶然。在国内生活水平整体提升前，不要妄图我们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国家的有识之士已经格外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不惧习惯于发战争财、罔顾百姓苦难的好战分子虚伪的嘶吼，呼吁尽快结束这场打着爱国主义幌子的战争。”[128]当时，无论是民众还是军队，气氛都不乐观。在彼得堡酝酿着恐怖事件。1905年1月16日，工厂开始罢工。19日，在主显节游行时，炮兵意外地向冬宫发射了一枚榴霰弹。尽管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没人能够保证这不是早有预谋的事件。[129]很快，这件事就传到了奉天，只是未能引起军官的愤慨。此时，那里的所有人都在关心能否尽快签订和约。大家都感觉到了：在遥远的俄国，非同寻常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130]

此后，尼古拉二世离开首都，前往皇村。1905年1月22日，在彼得堡爆发“血腥星期日”事件，这拉开了俄国首轮革命的序幕。根据官方说法，一众平民向沙皇递交请愿书，提出“无礼的政治要求”，进而与军队发生了冲突。截至1月22日晚，共有76人死亡、233人受伤；次日，死亡人数达到96人，受伤人数达到333人。[131]在处理此事时，沙皇政府

因循守旧，一边展现“实力”威吓民众，一边安抚民众。24日，沙皇敲定了手握重权的彼得堡总督人选，[132]那就是以行事果决而闻名的特列波夫（Д. Ф. Трепов）少将。[133]27日，俄国东正教主教公会规劝、号召教徒顺从政府。[134]

2月1日，尼古拉二世在皇村召见工人代表团并且用“慈悲的话语”赢得了他们的欢心。他要求工人停止骚乱，重返工作岗位，不再提出令政府无法接受的要求。此外，他还承诺：“在照顾我的工人们的过程中，我将竭尽所能地改善工人的生活，通过法律途径制定满足工人需求的措施。我相信工人的诚意以及对我坚定不移的忠诚，因此我原谅了你们的过错。”[135]召见结束后，尼古拉二世设宴款待工人代表，而后派人将他们送上了开往彼得堡的专列。[136]此后，沙皇的讲话被大肆宣传。即使君主如此“仁慈、慷慨”，也无法消解国内的危机。自由主义阵营表态将全力支持革命：“沙皇的讲话简直令人无法容忍。这就是挑衅，是沙皇亲手埋下的、随时可能炸毁皇位的炸弹。”[137]

2月17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遇害。[138]自1891年起，他一直担任莫斯科总督。1905年1月14日，他自请卸任莫斯科总督一职，而后改任莫斯科军区总司令。[139]此时，国家已陷入混乱。政府一如既往地期待对外战争能够取得胜利，以便扭转国内的斗争局势。2月23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在莫斯科下葬。[140]当日，喀琅施塔得（Кронштадт）为即将前往远东舰队的海军少将涅鲍加托夫（Н. И. Небогатов）送行。临别时，他们的对话别有深意，透露出了某种凶险的意味：“他们与港口亲密无间，没人想过保卫者不得不与它告别，也许这一别就是永远。据说，海防装甲舰将永远留在东方。”[141]3月3日，尼古拉二世签署并发表了《关于号召各级政权与民众团结中央政府共抗外敌、肃清叛乱、抵制国内骚乱的宣言》。[142]

在公布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死讯后，尼古拉二世号召全体臣民团结在皇位周围。[143]此时，角色已发生转换。尼古拉二世向社会各界提出法案研讨草案（由所谓的“布雷金杜马”拟定），并广邀各界人士参与对话。在宣言发表的同一天，即1905年3月3日，尼古拉二世签署了任命布雷金（А. Г. Булыгин）为内务大臣的诏书，并于次日颁布该诏书。[144]在奉天会战的最后阶段，远东驻军得知了此事。3月6日，《满洲军公报》（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援引沙皇的话：“我将在祖先加冕之地继续履行沙皇职责——整合俄国领土、建设俄国大地。今

后，我计划在上帝的帮助下招贤纳士，在百姓中选取受人们信任的贤者参与国家立法方案的探讨与初步制订。”[145]

众所周知，尼古拉二世内部团结的号召并未奏效。很明显，宣言和诏书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颁布的，因此人们对它们的效力心存疑虑。[146]在军队中，这些新闻未能引发特别关注、激发热情。此前，在政治倾向方面，多数军官已经或多或少地偏向了知识分子一方，但是他们依旧保持着集体精神和对誓言的信仰；而绝大多数出身农民的士兵可能会关注任何事情，但唯独不会关心代表机构的命运与政府的前途。至于农民，很容易理解，土地与和平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农村因过剩的人口而窒息，因此农民渴望实现“土地再分配”。可惜，后来的改革措施未能解决问题，因此也无法疏导农民的情绪。可以说，土地问题为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埋下了隐患。在俄国农村，自发的土地征收者战胜了自发的保皇派。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征收土地也无法解决尖锐的土地短缺问题。储备着地主、修道院、宫殿及其他“份地”的部门始终无法解决农村不可调和的土地矛盾。

1905年，俄国社会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歇斯底里，与政府翻起了旧账，并且不愿与之进行任何对话。这无疑是在为历史悠久的沙皇俄国乃至俄国社会本身挖坟掘墓。到了1918年，曾在1905年为克柳切夫斯基（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去政治化号召喝倒彩的大学生，成了社会主义的打击目标。1905年，由于缺乏沟通的纽带，皇权无法与社会各界进行对话。俄国国内爆发了一场不宣而战的“内战”，此时只有正规军才是政府稳固的靠山。在此情况下，沙皇政府亟须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

尼古拉二世无法成为尼古拉一世的翻版。他在实施军事独裁与做出退让之间摇摆不定，最终选择了后者。1905年10月30日，尼古拉二世签署了《完善国家秩序宣言》，赋予国家杜马立法权。[147]于是，多方期待已久的沙皇与民众之间沟通的纽带出现了。然而首战失利，政府与社会各界仍未能展开对话。第一届国家杜马在其存在的72天里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驻俄大使乔治·迈尔（George Meyer）对“俄国第一议会”印象深刻，在写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信件中评价道：“俄国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实验，但组织不力、准备不充分……当我看到工人和农民有产生共产主义情绪的迹象时，我不禁为俄国的未来感到担忧……当然，我不认为俄国会立即崩溃，但是皇权与杜马之间的斗争迟早会发生……很

有可能如此。今天政府把持着财政和军队，但是三年后渗透到人们脑中的新思想、新学说将会渗入全军。到那时，谁能说得准政府能否指望士兵服从军官镇压骚乱呢。”[148]不到三年，这个预言就成了现实。

众所周知，胜利有一百个父亲，而失败却是个孤儿。当同时代人就俄日战争的起因和俄国战败的原因发问时，某些人已经给出了答案。可以说，维特和库罗帕特金与俄日战争以及俄国的战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每个身居高位的回忆录作者都试图撇清自己在往事中的责任，一方面是外交责任，另一方面是军事失利的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1917年革命前，许多说法几乎都以假乱真了。

毫无疑问，其中最成功的“神话缔造者”当属维特。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维特毫无疑问是一位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但是他的个人格局限制了他取得较高的成就，在他身上清楚地体现出了阴谋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曾公开表达对维特崇拜之情的斯特鲁维指出：“他天生就是一个没有思想、缺乏原则的人。”[149]他没有自恋的毛病，但很明显能从中获得愉悦的体验。在维特所呈现的俄日战争史中混入了个人色彩：回忆录作者受权治理国家的时期是凯旋史；失去权柄的时期是战败史。对此，谢尔盖·尤里耶维奇冷静地分析道：“这些人不仅沉迷于自己的想象，有时甚至信口雌黄。”[150]尽管维特有着毋庸置疑的说谎天赋，但是显而易见，其谎言是虚假而呆板的。

同时代的批评家指出：“彼得堡的官僚很了解维特，他们总是这样评价他：聪慧、极端无知、不讲原则、急功近利。维特的回忆录如同镜子一般映射出了他的这些特质。”[151]科科夫佐夫（В. Н. Коковцов）认为，这些特质反映了一个普通乃至陈腐的官员形象：“自吹自擂，将虚构的故事套用在自己身上，炫耀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但不止一次地被与之密切接触的人戳穿，这种事情通常发生在不利于维特本人的情况下。”[152]

这并不代表维特是那种简单的人。在自我保护和自我夸赞方面，维特练达而机敏。正如某位批评家指出的那样：“正如我们所见，他既能宽恕他人（如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的罪过，关爱他人；也能仇视他人（如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等），并且为了满足自己的仇恨心理……而牺牲真理。”[153]如果维特在回忆录中未表现出这些颇为特殊的品质，那么他尚有机会维持住自己杰出国务活动家的形象。

若非如此，他走投无路。古尔科（В. И. Гурко）指出：“总的来说，对他人深深的鄙视是维特待人态度的基础。然而，这种特质并未妨碍他成为一个天性善良且富有同情心的人。”[154]也许数十年前，伯爵的同时代人在1951年对他的评价是正确的：“很可惜，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维特撰写了回忆录，留下了最丰富且最真实的关于这段俄国史的资料。但是与此同时，它们也暴露了维特根深蒂固的庸俗性。在这些资料中，不难发现他对将其解职的君主的怨恨，对成功取代他上位的斯托雷平的仇视。革命派在维特看来只不过是‘沙皇的临时工’，因此不是敌人。维特回忆录的这些特征引起了冷静乃至积极面对这段历史的人们的反感。”[155]

也许，正是维特回忆录中大量丰富多彩的虚构事件与真相相互交汇产生的庸俗化和公式化的效果，才使其在苏联的史料研究中极其幸运地占有一席之地，那时他的表述经常成为某种极具吸引力的研究对象，因此数十年来许多研究者致力于对其进行评价。在某些科学协会中，对维特的个人崇拜最终演变成了类似于某种异教或党派的中心。在那里，若不显露出对偶像的热爱，那就应当受到“责罚”。无论是爱还是恨，对于史学分析来说都是过于强烈的情绪。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件事情了。

面对战败，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在对1904～1905年远东所发生的事情的阐释中，有一个粗浅的（也是传播最广的）说法，即战争前夕，俄国对日本和日本人几乎一无所知，国内弥漫着对胜利盲目乐观的情绪。维特自然也参与编造了这个谎言，由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维特的反对者也未戳穿它。在此基础上，还加入了许多其他虚假信息。显然，在公众舆论面前，与在充分认知到邻邦危险性的情况下依然缺乏及时应战的意愿或能力相比，将战争失败归咎于因信息闭塞而低估了潜在敌人的说法显得更加情有可原。

事实上，俄国掌握着许多获取与日本相关情报的渠道。在与岛国居民及其文化接触之初，专家在谈到他们时总是带着明显的敬重与好感。[156]可以说，“扶桑国”从未走出俄国社会与媒体的视野。自1860年代起，俄国军事刊物开始密切关注日本的动向。1895～1904年，这种关注变得尤为密切。在这十年里，与日军和日舰相关的出版物数量大幅增加。日本的军备增长是显而易见的，其武装力量的实力与危险性毫无疑问也是众所周知的。早在世纪之交，俄国已将大日本帝国视为潜伏在局部地区附近相当危险的敌人。[157]除军事刊物外，在与军队、舰队关联

较小的刊物上也时常出现与日本相关的报道。例如，《欧洲公报》（ВестникЕвропы）指出，日本的工业、商业、新闻业和文学事业已经得到空前发展。该报社的编辑定期接收并查阅三种日本插图月刊。[158]

正因如此，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远东陆海军力量急剧增加也就合情合理、不足为奇了。经过长期休整，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在太平洋沿岸的活动日趋活跃，但这完全是被逼无奈的。以克里米亚战争为鉴，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俄国虽边疆遥远、防守薄弱，但是守护边疆仍是必要的。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对此进行了准确而生动的描述。

手榴弹拉响的第一百天，

马拉霍夫血迹斑斑的土堆旁，

棕黄色头发的英国士兵，

在嘶哑的鼓声中发起进攻。

而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堡垒，

还沉浸在往日宁静的睡梦中，

跛脚的中尉戴上手套，

伴随着晨光巡视本地驻军。[159]

在不得不放弃太平洋地区部分领土的情况下，亚历山大二世巩固并扩张了尼古拉一世在亚洲攫取的领土。1863～1864年波兰起义后，由于英俄关系逐渐恶化，加之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改革问题，俄国放弃了北美洲的领土。1867年3月30日，俄美两国在华盛顿缔结了领土（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买卖条约。[160]俄属美洲与英属加拿大接壤，边境线极长，仅阿拉斯加的海岸线就长达6000俄里，因此对俄国而言保护俄属美洲领土不受侵犯是个棘手的问题。[161]1850年代中期，俄属美洲的人口约1万，其中仅有六七百名俄国人（其中包括200名来自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驻军）。[162]1860年代中期，阿拉斯加的人口数量增至1.78万，其中俄国人、芬兰人及拥有欧洲血统的外国人仅有800余人。[163]关于俄属美洲的人口曾出现过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5万，然而这并无依据。[164]

俄国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151.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165]彼得堡方面认为，这笔交易对美俄两国互惠互利。俄国期待能以此促进西伯利亚的开发和太平洋沿岸贸易的发展。[166]10月19日，美国政府代表在阿拉斯加完成了领土移交手续。[167]交易所得资金被划入1867年预算外铁路建设基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俄国铁路事业的发展。[168]

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俄国的远东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882年5月，沙皇要求尽快解决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问题。[169]俄英两国在中亚及巴尔干地区的对抗再次警醒俄国，使其意识到了太平洋沿岸偏远领土的危险和劣势。1886年，在摆脱了库什卡和保加利亚危机后，俄国决定修建贯通符拉迪沃斯托克与车里雅宾斯克的西伯利亚铁路。由于技术和资金原因，这项庞大工程的筹备工作一直持续到1891年。[170]

在上述三个阶段，远东地区本身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在与巴尔干、阿富汗、中国等关系恶化的条件下，它也只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无论是彼得堡的氛围还是远东的局势都发生了改变。亚历山大三世的继承者深受纳粹主义思想的影响，一直在找寻夺取出海口的机会。严格地讲，在俄国远东地区有出海口，这个出海口——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是世界最好的不冻港之一。然而受到地理因素的限制，无法在此修建铁路，因此这座城市丧失了成为俄国海军基地的可能。

堪察加港口位置不佳，因其位于太平洋边缘北部海岸，故远离主要的贸易航线和重要的战略据点。因此，只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创建海军基地，最初俄国海军并未完全看好此地。该港口位于内海沿岸，每年的结冰期长达数月。最初为了克服这一障碍，舰队暂时停泊在了位于日本的锚地。然而，这只是治标之法。当时的人们认为，以纲领性目标命名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沿岸的这片海域，从本质上看已经属于日本了。

甲午战争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俄国驻中国、日本军事代表沃加克（К. И. Вогак）上校在1894年10月2日向沙皇递交的报告相当明确地提出：“日本的优势在太平洋。”[171]在此情况下，俄国统治东方的计划又怎能实现呢？在确认了这一危险因素后，彼得堡方面决定介入日中冲突，并且要求日本修订《马关条约》。此后，俄日合作走向尽头。实际上，远东问题是诱发俄日军备竞赛的导火索。应当指出，俄日军备竞赛不只发生于两国对阵的前方。1899年，为了巩固滨海军区和关东地区的

后方，俄国在合并伊尔库茨克和鄂木斯克军区的基础上创建了西伯利亚军区，以此作为俄国远东阵地的后方。[172]

多年来，俄国扩军备战成效显著。面对巡洋舰曾不堪一击、注定要迅速灭亡的小型分舰队已经脱胎换骨，发展为名副其实、拥有制海权的主力舰队（7艘舰队装甲舰对日本6艘舰队装甲舰；4艘装甲巡洋舰对日本8艘装甲巡洋舰）。[173]滨海边疆区及阿穆尔河（黑龙江）[174]沿岸地区的军事实力由1894年的30.5个营、5个连、9支本地部队、33支哥萨克部队（30506人）和74门火炮增至108个营、8个技术连、66支哥萨克部队和骑兵连（约10万人）、168门野战炮、24门骑兵炮、12门山地炮。[175]截至1898年，远东的最高战术单位为旅，并且阿穆尔军区司令部未将组建远东军司令部的计划提上日程。1898年以后，远东的最高战术单位变为军，阿穆尔军区司令部也开始筹备远东军司令部了。[176]

英方预计，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俄国部署在远东的兵力无论如何都能完成防御任务。[177]在军事行动期间，连接俄中两国的铁路和有组织的备战部署使满洲军化身为庞大的军团。截至1905年3月23日，四平阵地的俄军人数为455470人、火炮有1129门。[178]1889年滨海地区的国防支出仅为92250卢布。1896～1900年，为应对与日中两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俄国的军费支出达到了3300万卢布，每年合600万～700万卢布。同一时期，俄国在太平洋沿岸的国防支出也达到了375万卢布，每年合47万～80万卢布。[179]也许这还不够，但是俄国负担不起更多的支出了。

俄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很难使我们相信它对远东毫不关注、低估潜在敌人甚至对其一无所知、对战争盲目乐观等一系列说辞。再者说，无论是在彼得堡还是在旅顺港，俄国人长期就战争的不可避免展开了讨论，然而战争还是突然爆发了。当然了，许多期待已久的事情都发生得猝不及防。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得不说，不知彼得堡为何如此自信，认为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只能由俄国发动，日本不敢挑起战争。显然，这是一个谬论，但很多人信以为真。例如，总参谋部尼古拉科学院的听众不相信与日本的战争就在眼前："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个岛国被刻画成了某种微型的、玩具式的国家……我们被自己国家庞大的规模蒙蔽了，因此在我们看来，岛国似乎是个安全的邻居，它岂敢与我们这种大国在军事上一对一地交锋。"[180]这种自信演变为俄国政治决策的基础。1904年2月8日，在日本与俄国断交后的第二天，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甚至还写

道："早上，我就日本问题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不发动战争。"[181]

结果，正如战后的一首讽刺诗所指出的那样：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无法避免战争，

但是到处宣扬，

战争，当然不会爆发……

"哦，不会的……"我们狡猾地断言，

忘记了以前的罪过。

日本人的确太弱了，

与俄罗斯开玩笑可不好啊……[182]

当然，也有例外。在战争前夕，某些刊物毫不动摇地坚称日本是可以实现其目标的大国，[183]但是这种观点并非主流。低估潜在的敌人必将导致悲惨的结局，俄国也不例外。俄国将兵力分散到不同的战线上，结果无论在哪条战线上都无法占据决定性优势。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其代价无法重估。这是一场灾难，然而许多人却刻意回避这一事实。时至今日，最早开始研究这场战争的一位研究者在1908年发表的观点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显然，到目前为止，许多人仍然确信，远东遭遇毁灭性的灾难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不热衷政治侵略，其余所有国家，特别是'口蜜腹剑的'日本几近病态的贪得无厌。我们用漂亮的说辞麻痹自己，放弃悲伤的真相，使自己沉浸在愉悦的错觉中。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有所亏欠。"[184]

19世纪末期，在战略上，俄国通常无法将兵力合理地集中到关键战线上，这使得帝国的优势无从发挥，因为没有哪个帝国能够同时在所有利益战线上保持强势。在整条边境线上树敌，对于大国而言，这种危机也是致命的。20世纪初期，俄国未能避免此类问题。与此同时，陆海军绝不理想的指挥模式也使俄国丧失了成功摆脱危机的可能。若要探究悲剧发生的原因，就必须结合史实分析背景，了解在佩夫切斯基桥、总司令部、海军大厦或冬宫做出决策的背景。决策的缘由及远东战败的本质

是本书关注的主题。

[1]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 СПб.1908. Т.1. С.4.

[2] Тверской П.А. Америка и Япония. Письмо из Америки.//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 Журнал истории-политики-литературы.（далее ВЕ）. 1906. №9. С.169.

[3] Хаттори Т. Япония в войне 1941-1945. М.1973. С.22.

[4] Футида М.，Окумия М. Сражение у острова Мидуэй. М.1958. С.39-40.

[5] Карамзин Н.М. Записка о древней и новой России. М.1991. С.22.

[6] Полунов А.Ю.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России. М.2010. С.292-293.

[7] Колеров М.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дежавю оппозиции：голод 1921-го как голод 1891 года.//Русский Сборник：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Редакторы-составители：О.Р. Айрапетов，Мирослав Йованович，М.А. Колеров，Брюс Меннинг，Пол Чейсти（далее РуСб）. М. 2004. Т.1. С.237.

[8] Родичев Ф.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очерки о русском либерализме. Newtonville. 1983. С.83.

[9] Маклаков В.А. Власт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 закате старой России：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Париж. 1936. Ч.1. С.15.

[10] Из писем К.Д. Кавелина к графу Д.А. Милютину. 1882-1884 гг.//ВЕ. 1909. №1. С.10.

[11] Степанов В.Л. Н.Х.Бунге. судьба реформатора. М.1998. С.190.

[12] Гарин Н. По Корее，Манчжурии и Ляодунскому полуострову. СПб.1904. С.5.

[13] Корнилов А.А.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XIX века. М.1993. С.413.

[14] Л.Н. О голод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2 томах. М. 1984. Том 17. 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С.160.

[15] Ламздорф В.Н. Дневник 1891-1892. М-Л.1934. С.201；203；212.

[16] Степанов В.Л. Ук.соч. С.234-235；239.

[17]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В.Короленко. В голодный год.//ВЕ. 1894. №1. С.423.

[18] Полунов А.Ю. Ук.соч. С.281.

[19] Керенский А.Ф. Росси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ереломе：Мемуары. М.，1993. С.17.

[20] Милюков П.Н.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1991. С.120.

[21] Толстой Л.Н. Голод или не голод.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2 томах. М. 1984. Том. 17. 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С.191.

[22] От редактора.//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Штутгарт. 18 июня（1 июля） 1902 г. №1. С.4.

[23] Колеров М.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дежавю…//РуСб. М. 2004. Т.1. С.237.

[24] Внутренне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894. №3. С.393.

[25] Внутренне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894. №5. С.369.

[26] Андреев Д.А. Как мечтания из «безумных» стали «бессмысленными»：к истории речи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17 января 1895 года.//Вестник Волгогра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 4，История. 2011. №2（20）. С.38.

[27] Струве П.Б. Ф.И. Родичев и мои встречи с ним. Глава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Возрождение. Париж. 1949. №1. С.27.

[28]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 1649 г.（далее ПСЗ）. Собрание третье. СПб.1898. Т.14.1894. Отделение первое.№11014. С.626.

[29] Ольденбург С.С.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Белград.. 1939. Т.1. С.48.

[30] Родичев Ф.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С.84.

[31] Струве П.Б. Ф.И. Родичев…//Возрождение. Париж. 1949. №1. С.30.

[32] Родичев Ф.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С.86.

[33] Родичев Ф.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83.

[34]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Неделя. 15 января 1895 г. №3. С.73-74.

[35] Помощь ученым и писателям.//Неделя. 22 января 1895 г. №4. С.106.

[36] Внутренне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895. №2. С.861-862.

[37] Родичев Ф.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С.87.

[38] Полунов А.Ю. Ук.соч. С.296-297.

[39] Речь К.П.Победоносцева о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Произнесена 8 марта 1881 года в Зимнем дворце)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далее РуА) . М. 1907. Вып.5. С. 103-104.

[40] Андреев Д.А. Как мечтания…//Вестник Волгогра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 4 , История. 2011. №2 (20) . С.39 ; 41.

[41] Родичев Ф.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С.87.

[42]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Их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м Величествам депутаций от дворянства , казачьих войск и областей , земств и городски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управлений.//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8 (30) января 1895 г. №14. С.1.

[43] Дневники Николая II. 1894-1918. М.2011. Том 1. 1894-1904. С.182.

[44] Внутренне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895. №2. С.861.

[45] Ламздорф В.Н. Дневник 1894-1896. М.1991. С.126.

[46] Родичев Ф.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С.88.

[47]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Их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м Величествам депутаций от дворянства , казачьих войск и областей , земств и городски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управлений.//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8 (30) января 1895 г. №14. С.1.

[48] Милюков П.Н. Ук.соч. С.121.

[49] Струве П.Б. Ф.И. Родичев…//Возрождение. Париж. 1949. №1. С.31

[50] Гурко В.И. Черты и силуеты прошл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в изображени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СПб. 2000. С.35.

[51] Ламздорф В.Н. Дневник 1894-1896. М.1991. С.126.

[52] Струве П.Б. Ф.И. Родичев…//Возрождение. Париж. 1949. №1. С.32.

[53] Струве П.Б. Ф.И. Родичев…//Возрождение. Париж. 1949. №1. С.34.

[54] Родичев Ф.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С.88.

[55] Струве П.Б. Ф.И. Родичев…//Возрождение. Париж. 1949. №1. С.31-32.

[56] Рихтер Д. По воспросу об обеднении черноземного центра России.// ВЕ. 1902. №3. С.322 ; 325.

[57] Гурко В.И. Ук.соч. С.138.

[58] Ольденбург С.С. Ук.соч. Белград.. 1939. Т.1. С.180.

[59] Пребы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8（21） мая 1902 г. №101. С.2-3；Пребы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1（24） мая 1902 г. №104. С.2-3.

[60] Действи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Именной Высочайший указ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ющему Сенату.//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4（27） мая 1902 г. №106. С.1.

[61] 1 июля（14 июля） 1902 г.//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Штутгарт. 2 июля（15 июля） 1902 г. №2. С.19.

[62] Большие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маневры в 1900 году.// Разведчик. 1900. №487. С.164.

[63] Прибавление к №187-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го всетника 26 августа（8 сентября） 1902 года. С.1.

[64] Курские маневры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14） сентября 1902 г. №191. С.1.

[65] Курские маневры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14） сентября 1902 г. №191. С.1.

[66] Гурко В.И. Ук.соч. С.278-279.

[67] Дневники Николая II. 1894-1918. М.2011. Том 1. 1894-1904. С.680.

[68] Курские маневры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3（16） сентября 1902 г. №192. С.1.

[69] Отчет о большом маневре в Ку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в 1902 году. Южная армия. Киев. 1903. С.37-38；45.

[70] Отчет о большом маневре в Ку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в 1902 году. Московская армия. М.1903. С.2-3；34

[71] Большие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маневры в 1900 году.// Разведчик. 1900. №487. С.164.

[72] Среднев А. Кабельн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военно-телеграфной роты 3-го саперного батальона на больших маневрах под г. Курском；с 9-ю рисунками в тексте.//Инженерный журнал（далее ИЖ）. 1903. №№6-7. С.943-945.

[73] Отчет о большом маневре в Ку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в 1902 году. Южная армия. Киев. 1903. С.341-342；350-353；Отчет о большом маневре в Ку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в 1902 году. Московская армия. М.1903. С.230-233.

[74] Драке Л. В период больших Курских маневров 1902 г.（Отрывоч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Киев. 1911. №3-4. С.31；35；Г. Р-ко.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правка к 25-летию 2-го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 батальона.//ИЖ. 1902. №№11-12. С.1435-1436.

[75] Отчет о большом маневре в Ку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в 1902 году. Южная армия. Киев. 1903. С.153-154.

[76] 突厥斯坦总督区（Turkestan）是俄罗斯帝国在中亚河中地区建立的行政单位，成立于1867年，辖区包括锡尔河州、七河州、撒马尔罕州、外里海州、费尔干纳州等地。故本书使用的突厥斯坦指沙俄的这个总督区。——编者注

[77] Драке Л. Ук. соч.//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Киев. 1911. №3-4. С.31.

[78] Краснов П.Н. Накануне войны. Из жизни пограничного гарнизона. Париж. 1937. С.18.

[79] Ишеев П.П. Осколки прошлого. Нью-Йорк. 1959. С.60.

[80] Отчет о большом маневре в Ку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в 1902 году. Московская армия. Москва. 1903. С.122-123.

[81] Отчет о большом маневре в Ку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в 1902 году. Южная армия. Киев. 1903. С.154.

[82] Соболев Л.Н. Куропаткин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Краткие заметки бывшего командира 6-го Сибирского армейского корпуса. СПб. 1910. С.288.

[83] Соболев Л.Н. Куропаткин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Краткие заметки бывшего командира 6-го Сибирского армейского корпуса. СПб. 1910. С.288-289.

[84] Драке Л. Ук. соч.//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Киев. 1911. №3-4. С.35-36.

[85] Отчет о большом маневре в Ку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в 1902 году. Южная армия. Киев. 1903. С.154.

[86] В.А.［пушкин］Куропаткин.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СПб.1906. С.3.

[87] Драке Л. Ук. Соч.//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Киев. 1911. №3-4. С.36.

[88] Дневники Николая II. 1894-1918. М.2011. Том 1. 1894-1904. С.681.

[89] Сигинус. Из Японии.//Военный сборник (далее ВС) . 1903. №11. С.220 ; 231.

[90] Соболев Л.Н. Ук. соч. С.287-288.

[91] В.А. [пушкин] Куропаткин...С.3.

[92] Отчет о большом маневре в Ку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в 1902 году. Южная армия. Киев. 1903. С.159-161 ; Отчет о большом маневре в Ку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в 1902 году. Московская армия. М.1903. С.138-139.

[93] Специальные телеграмм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елеграфного агентств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7 (20) сентября 1902 г. №196. С.1.

[94] Дневники Николая II. 1894-1918. М.2011. Том 1. 1894-1904. С.681.

[95] Действи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ысочайшие рескрипты.//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8 (21) сентября 1902 г. №197. С.1.

[96] Геруа Б.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моей жизни. Париж. 1969. Т.1. С.164 ; 170.

[97] Геруа Б.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моей жизни. Париж. 1969. Т.1. С.164.

[98] Гурко В.И. Ук.соч. С.299-300.

[99] Витте С.Ю.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1994. Т.2. С.203.

[100] Лопухин А.А. Отрывки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по поводу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гр. С.Ю. Витте) . М.-Пгр.1923. С.14-15.

[101] Погожев А. Из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 В.К. фон Плеве.//ВЕ. 1911. №7. С.265.

[102] К еврей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Штутгарт. 19 марта (1 апреля) 1903 г. №19. С.340.

[103] 7 мая (20 мая) 1902 г.//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Штутгарт. 8 мая (21 мая) 1903 г. №22. С.4.

[104] “The Anti-Semitic Outrages at Kishineff , ” *The Times* , 18 May 1902 , p. 10 ; Перевод по верси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ой 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3 (26) мая 1903 г. №107. С.2.

[105] К Кишиневскому погрому.//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Штутгарт. 8 мая (21 мая) 1903 г. №22. С.379.

[106] Гурко В.И. Ук.соч. С.300.

[107] Лопухин А.А. Ук.соч. С.15.

[108] Гурко В.И. Ук.соч. С.300

[109] Лопухин А.А. Ук.соч. С.16.

[110] Гурко В.И. Ук.соч. С.301-302.

[111]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3（26） мая 1903 г. №107. С.2.

[112] Гурко В.И. Ук.соч. С.301.

[113]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903. №7. С.377.

[114] К Еврейскому погрому.//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Штутгарт. 19 мая（1 июня）1903 г. №23. С.424.

[115] После Кишиневского погрома.//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Штутгарт. 2 июня（15 июня） 1903 г. №24. С.442.

[116] Энгель В.В.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ус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На примере «паспортного» вопроса 1864-1913. М.1998. С.24；30.

[117] Ed S. Miller，“Japan’s Other Victory：Overseas Financing of the War，” in John W. Steinberg，et al.，eds.，*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World War Zero*. Leiden：Brill，2005，pp. 471-472.

[118] Конец ф.-Плеве.//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Париж. 19 июля（1 августа） 1904 г. №52. С.33.

[119] Норригаард Б.В. Великая осада. Порт-Артур и его падение. СПб. 1906. С.30.

[120] Обличение гнили.//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Париж. 2 августа（15 августа）1904 г. №53. С.50.

[121] Дневники Николая II. 1894-1918. М.2011. Том 1. 1894-1904.

[122] Приказ армии и флоту.//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14）января 1905 г. №1. С.1.

[123] Ленин В.И. Падени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1967. Т.9. Июль 1904-март 1905. С.158.

[124] Сталин И.В. Рабочие Кавказа，пора отомстить！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1954. Т.1.1901-1907. С.74.

[125] Струве П.Б. Политика внутренняя и политика внешняя.//Patriotica. Россия. Родина. Чужбина. СПб. 2000. С.79.

[126] Комитет Министров и Комитет реформ.//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Париж. 20 января (7 января) 1905 г. №63. С.220.

[127] Ленин В.И. Падени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1967. Т.9. Июль 1904-март 1905. С.159.

[128]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905. №2. С.839.

[129] Гурко В.И. Ук.соч. С.404-406.

[130] Нодо Л. Письма о войне с Японией. СПб.1906. С.137-138.

[131] Действи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1 (24) января 1905 г. №7. С.1.

[132] Именной высочайший указ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ющему Сенат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3 (25) января 1905 г. №8. С.1.

[133] Действи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4 (27) января 1905 г. №10. С.1.

[134] Действи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6 (29) января 1905 г. №12. С.1.

[135]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20 января (2 февраля) 1905 г. №15. С.1.

[136] Внутренние известия.//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20 января (2 февраля) 1905 г. №15. С.3.

[137] П.С. Он прощает их.//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Париж. 9 февраля (27 января) 1905 г. №65. С.241.

[138]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5 (18) февраля 1905 г. №28. С.1.

[139] Высочайшие рескрипты.//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 (14) января 1905 г. №1. С.1.

[140]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0 (23) февраля 1905 г. №32. С.1.

[141] Проводы отряда 3-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0 (23) февраля 1905 г. №32. С.3.

[142] ПСЗ. Собрание третье. СПб.1908. Т.25.1905. Отделение первое. №25852. С.132-133.

[143] О призыве властей и населения к содействию Самодержавной Власти в одолении врага внешнего , в искоренении крамолы и в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смуты внутренней.//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8 февраля (3 марта) 1905 г. №39. С.1.

[144] Рескрипт министру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9 февраля (4 марта) 1905 г. №40. С.1.

[145]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 Издание Штаба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Мукден. 21 февр. 1905. №198. С.1.

[146] П.С. Рескрипт и манифест.//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Париж. 18 марта (5 марта) 1905 г. №67. С.280.

[147] ПСЗ. Собрание третье. СПб.1908. Т.25.1905. Отделение первое. №26803. С.754-755.

[148] R.R. Rosen ,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 vol.2.London : Alfred A.Knopf , 1922 , p.12.

[149] Струве П.Б. Граф С.Ю. Витте. Опыт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Patriotica. Россия. Родина. Чужбина. СПб. 2000. С.183.

[150] Гурко В.И. Ук.соч. С.49.

[151] Лопухин А.А. Ук.соч. С.4.

[152] Коковцов В.Н. Из моего прошлог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1992. Т.1. С.89.

[153] Горбовский Л. Морские деятели старого режима и их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 освещении графа С.Ю. Витте.//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далее МС) . 1922. №5-7. С.304.

[154] Гурко В.И. Ук.соч. С.49.

[155] Тхоржевский И.И. Витте.//Последний Петербург.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камергера. Спб.1999. С.51.

[156] Япония.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иеромонаха Николая директору Азиатского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П.Н. Стремоухову.//РуА. М. 1907. Вып.4. С.572-575.

[157] Иванов К.В.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в русской военной печати конца XIX-начала XX века.//РуСб. М.2009. Т.6. С.76-90.

[158]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896. №1. С.407-408.

[159] Симонов К.М. Поручик.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 томах. М.1966. Т.1.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Поэмы. Баллады. Песни. Вольные переводы. С.30.

[160] Вавилов М.И. 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в русской Америке. Из записок очевидца. 1867 г. Приложение. Высочайше ратифицированный договор об уступке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евер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колоний.//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далее РС) . 1886. Том 49-50. Вып.2. С.557-560.

[161] Афанасьев Д.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влад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и действий ее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Составил П.Тихменев) .//МС. 1864. №2.С.33.

[162] Фрейганг А. Отчет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за 1856 год.//МС. 1858. №2. С.26-27 ; А.В. Отчет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за 1857 год.//МС.1859. №1. С.20 ; А.В. Отчет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за 1858 год.//МС. 1960. №1. С.1-2 ; Головин [П.Н.] Обзор русских колоний в Северной Америке.//МС.1862. №1. С.29-38.

[163] Вавилов М.И. 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в русской Америке...//РС. 1886. Том 49-50. Вып.2. С.555.

[164] Афанасьев Д.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владения...//МС. 1864. №2.С.35.

[165]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ека. М. 1997. С.145.

[166] Милютин Д.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1865-1867. М.2005. С.430.

[167] Вавилов М.И. 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в русской Америке...//РС. 1886. Том 49-50. Вып.2. С.551-552.

[168] Степанов В.Л. Ук.соч. С.100.

[169] Нилус Е.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Кита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Харбин. 1923. Т.1. 1896-1923. С.5.

[170] Нилус Е.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Кита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Харбин. 1923. Т.1. 1896-1923. С.6.

[171] Каширин В.Б. «Русский Мольтке» смотрит на восток.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е планы Главного Штаб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о время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под ред. О.Р. Айрапетова (далее РЯВ) . М.2004. С.154.

[172] Авилов Р.С. Сибирский военный округ (1899-1906 гг.) :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14. №7. С.15-17.

[17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Рабо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описанию действий флота в войну 1904-1905 гг. при Морском Генеральном Штабе. 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2-4.

[174] 为便于中文读者阅读，下文将统改为黑龙江。——编者注

[17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Работа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описанию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284；364；379.

[176] Данилов Н.А. Подготовка в широком смысле воюющих сторон перед войной и обстановка перед сражением под Тюренченом.//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 в Николаев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ординарного профессора Николаев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полковника А.Байова. СПб. 1906. Ч.1. С.5.

[177] The Russo-Japanese War. Complied by the General Staff，War Office，London，1906，Part 1，p.31.

[178]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6. Сыпингайский период. С.15.

[17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282；295.

[180] Рябинин А.А. На войне в 1904-1905 гг. Из записок офицера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армии. Одесса. 1909. С.3.

[181] Дневники Николая II. 1894-1918. М.2011. Том 1. 1894-1904. С.787.

[182] Гарфильд（Глагол） С.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Поэма на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мотивы.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07. С.5.

[183]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904. №1. С.379.

[18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от начала до Ляояна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 Лекц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полковника Комарова. 1908/9 учебный год. СПб.1909. С.2.

第一部分 外交背景

1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外交政策下的远东

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不得不在黑龙江沿岸地区领土划分问题上做出巨大让步，因此俄国在该地区的政策长期处于空白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9世纪中叶，俄国在此地的政策被迫发生转变。

1839年，英国为维护向中国出口鸦片的权利，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出口中国的大量鸦片均产自英属印度。在军事实力方面，特别是海上实力，英国具有显著优势（中国的战船和海防炮陈旧过时，几乎无法击伤登陆中国海岸的英国战舰），战争的结果早已注定。[1]1842年8月29日，中英两国签署《南京条约》，宣告战争结束。根据该条约，清政府同意向英国割让香港岛；承诺支付用于赔偿英国在海关被焚毁鸦片的600万银元及1200万银元的战败赔款，并且向英国商人赔偿300万银元的损失；向英国开放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广州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在上述城市设立领事馆。闭关锁国的“天朝”重新开启了与英国的贸易，鸦片贸易也在其中。[2]

《南京条约》使本已陷入严重危机的中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之后，以太平天国运动为首的反清运动如火如荼，外国人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这场危机。在无法废除《南京条约》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试图暗中抵制它。1856年6月，法国传教士在广西的西林县被捕，在经历了长期的酷刑折磨后被斩首。10月，英国以地方政府不愿展开调查为由，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法国参战，法国的及时加入解决了英国兵力匮乏的问题（1857年春，印度爆发了起义，因此英国无法从印度抽调军队）。

同期，俄国在远东的活动日益活跃，然而与军事行动相比，俄国更

倾向于非武力活动。当时，黑龙江流域被视作清国疆域。西方地图学家认为，黑龙江的江口隐没在沙土中，出于同样的原因萨哈林岛也被视为半岛。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俄国在远东的政治利益仅限于保护鄂霍次克海的毛皮贸易。最初，此事由1846年9月出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的穆拉维约夫（Н. Н.Муравьев）负责。[3]1846年，俄美公司康士坦丁号舰船驶出鄂霍次克海，前往黑龙江下游地区进行勘察。勘察结果虽然令水手们大失所望，却令坚决反对开发此区域的最高文官涅谢尔罗德（К. В. Нессельрод）感到欣慰。在向尼古拉一世汇报时，涅谢尔罗德称，黑龙江下游无法通航，萨哈林岛只是个半岛。对此，尼古拉一世做出严厉批示："很遗憾。与黑龙江这条毫无用处的河流相关的问题就此作罢。"[4]1848年8月，在向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派遣由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伊（Г. И. Невельский）指挥的贝加尔号运输船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849年5月，贝加尔号抵达阿瓦恰湾。[5]

1850年春，涅维尔斯科伊勘察队深入黑龙江江口，在此建立了根据地——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虽然涅维尔斯科伊的勘察活动未经上级批准，同时也未获得涅谢尔罗德的支持，但是最终他得到了沙皇的支持。[6]尼古拉一世简要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俄罗斯的国旗一旦在那里升起，就不应降下。"[7]1853年5月，俄国礼貌地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出兵支援侵华英军的提议。[8]由于远东地区的归属问题仍不明晰，萨哈林岛和滨海边疆区仍旧面临着被第三国侵占的危险。

1853年春，东西伯利亚总督兼军队司令穆拉维约夫奏明尼古拉一世，提议将划界问题授权地方政府处理。1854年初，沙皇批准提议，下令："在解决此问题时，应尽量避免火药味。"[9]1853年9月19日，涅维尔斯科伊率领3名军官、73名水手乘尼古拉一世号舰船前往萨哈林岛。在登陆阿尼瓦湾南部岛屿后建立堡垒，声明该岛为俄国所有。[10]1854年4月，穆拉维约夫向黑龙江沿岸调派部队，以巩固黑龙江下游和鄂霍次克海沿岸的俄国驻地。俄国在该区域的活动明显加强。这对于抵御来自英法两国的威胁意义重大。[11]5月23日，俄国舰队驶入黑龙江水域，这是17世纪以后俄国对该流域沿岸的首次勘察。[12]

1855～1856年，俄国继续向黑龙江沿岸调派兵力。涅维尔斯科伊的勘察行动极大地提升了俄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在远东军事行动结束后，穆拉维约夫1855年9月开始与清政府进行谈判。最初，他提议未来两国的边界应沿黑龙江划定，但遭到了北京方面的坚决反对。此外，在

克里米亚战争前夕，俄国向日中两国派遣由海军上将普提雅廷（E. B. Путятин）领导的代表团，以便维系与中国的陆地贸易、开启与日中两国的海上贸易。[13]18世纪下半叶之后，俄国一直企图渗透日本。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俄国曾试图通过建立外交关系达成目的，但未取得积极成效。[14]1821年，俄国决定终止这些尝试，但是允许遭遇海难并在俄国海岸获救的日本人登陆库页岛，在当地人的帮助下返回祖国。[15]1852年，俄国最后一次尝试将这些人遣返日本，当时计划让他们乘坐缅什科夫大公号远洋舰抵达下田港，但是计划失败了，俄舰不得不在距离港口5海里处停泊，让日本人在此下船。[16]

在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与日本周旋的同时，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Perry）以雷霆手段实现了渗透日本的目标。[17]1854年，普提雅廷抵达日本长崎，谈判开始。谈判之初，德川幕府坚持以侮辱性礼节接待这位欧洲使臣，例如只允许使臣乘日本船只上岸，要求使臣赤脚走进接待处，要求使臣站着谈判等。普提雅廷严厉拒绝了日方的要求并且坚持立场，后来谈判节奏明显加快。[18]回国后，海军上将在报告中指出："根据陛下的至高意志和外交部的指示，我探索出了一套与大和民族打交道的行动体系，即与之进行短暂而友好的交流；在不侮辱本民族尊严和使臣身份的情况下，以宽容的态度遵守日本的法律、习俗；在谈判时，平静而坚定地完成国家给使臣的委托。在君主英明的领导下，我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这一体系，直至在日本逗留的最后一天，在从未破坏日俄友好关系并且为之打下坚实基础的情况下，我有幸实现了事先考虑已久的预期目标。"[19]

事实证明，普提雅廷的确精明强干。[20]俄国舰船在登陆库页岛之初做出了某些略显过分的事情，以此为由，日本官员试图限制外国人在本国领土上的行动自由。[21]总体而言，此时的俄日关系仍以友好、互信为基调。[22]1855年2月7日，日俄两国在下田签订了首个贸易条约《日俄和亲通好条约》。此后在日俄通商过程中，俄国享受最惠国待遇；两国建立了"真挚的友谊与长期和平的关系"；臣民受政府庇护；两国疆域以择捉岛和得抚岛为界，择捉岛以南归日本所有，得抚岛及千岛群岛的其他部分归俄国所有，萨哈林岛归两国共同管辖；日本开放一系列对俄贸易港口。[23]

1858年，为了满足太平洋舰队的需求，俄国决定在萨哈林岛开采煤炭，由此激发了俄国占领整座岛屿的野心。在日本的抵制下，愿望落

空，东京方面毫不退让，坚持以北纬50°划界。因此，事关萨哈林岛命运决议的制定被推迟到了将来。[24]1858年8月19日，日俄两国在江户（今东京）签订条约。该条约进一步确认了《下田条约》的条款，并且增加了对俄开放通商港口的数量，赋予俄国人在日购买、租赁房屋和土地的权利；针对俄国出口的商品，如木材、煤炭、金属、武器、蒸汽机等降低5%的关税。[25]日本仅对俄国出口的酒精饮料征收高额关税（35%）。上述条款对俄国极为有利，因为当时日本向英法征收的商品关税高达20%~35%。[26]作为回报，日本人同样获得了在俄国的自由贸易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背景下，欧亚国家达成了上述协议。

侵华军事行动最初发生于香港、广州、上海等中国南方城市，然而到了1858年，侵略目标转向了中国北方。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占领了作为京津两地海防门户的大沽。26日，英法陆战队兵临天津港。6月4日，英法两国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清政府再次支付赔款，增加对外通商港口的数量。[27]军事失利、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表面上的支持及在签订《天津条约》时以普提雅廷为代表的俄国的态度影响了清政府在中俄边界划定问题上的立场。[28]

1858年5月28日，穆拉维约夫与黑龙江将军奕山在黑龙江右岸瑷珲城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条约规定：从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归俄国所有；中俄两国边界沿乌苏里江划定；乌苏里地区保持开放，由中俄两国共同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及松花江仅允许中俄两国船只通航；两国承诺为黑龙江沿岸贸易提供优惠待遇，允许满洲大臣管辖下的满洲人继续在黑龙江左岸居住。[29]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为清朝罪犯流放之地，此地满人众多，甚至形成了村落。[30]《瑷珲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自行遣散了该地区的居民，将农民迁回东北。[31]1858年6月13日（俄历6月1日），普提雅廷与清政府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签订《天津条约》，该条约使俄国同时获得了在华的陆地贸易权和海上贸易权。[32]

在整个过程中，在两艘炮舰、若干艘轮船、驳船及两个西伯利亚主力营（第13营和第14营）的威吓下，俄方甚至无须向中方开火就获取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在此情况下，俄国士兵充当起了协助本国居民搬迁的劳动力，帮助他们沿黑龙江从外贝加尔的乌斯季-斯特列尔卡搬迁至兴安岭河口（全程980俄里）。移民来自外贝加尔的450个哥萨克家庭。[33]作为移民者的外贝加尔哥萨克由以下三类人构成：俄国欧洲的国有制农奴、因土地匮乏而难以生存的当地人及守备营士兵。他们肩负起了开发

阿穆尔和其他远东地区的使命。[34]开发过程十分艰难，来自维亚特卡、彼尔姆、坦波夫及沃罗涅日的农民用时两年抵达定居地，迁徙距离达一万俄里。在侵占阿穆尔地区后的十年里，俄国垦荒支出高达3000万卢布，而开发成果却不尽如人意。[35]

普提雅廷的出使成果令北京方面倍感失望。《瑷珲条约》签订后，俄国著名汉学家、1850～1859年北京东正教负责人、大祭司帕拉季（Палладий）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清政府眼中，我们的影响力已经大幅下降。最初，清政府认为我们可以成为战争的调停者，然而我们不愿意；但是现在，清政府认为我们无法担任调停者，即使我们愿意，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我们的能力也十分有限。我们的所作所为玷污了我们的政策。在清政府看来，我们用含糊其词的承诺换取我们的所需，不付出任何回报。尽管如此，这也不足为虑，对于他们而言，这就是政治。"[36]他认为，扭转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即兑现向中国运送武器的承诺。[37]在条约签署后，作为"回报"，西伯利亚"赠予"清政府10000支线膛枪、60门装有弹药的要塞炮，并且对华派遣教员。[38]这些武器被送至中俄边境，[39]然而北京方面很快就对此失去兴趣、不予理睬，直至1860年才再次注意到它们。[40]哥萨克移民家庭开始开发这片绵延1137俄里的新疆土，后来他们成了组成山区骑兵部队、平原步兵部队的主力。[41]

1858年7月4日，咸丰帝批准《天津条约》；1859年6月，清政府禁止英法公使进入北京换约。6月25日，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在海河水域，英法舰船遭预置的障碍物拦截，受炮火阻击而惨遭失败。[42]继续开战是不可避免的。在联军舰队的支持下，8090名英国士兵、4200名印度士兵及7650名法国士兵连续侵占包括辽东半岛沿海地区、芝罘港及大沽港；1860年8月24日，侵占天津，联军逐渐逼近北京。9月22日，咸丰帝率领朝廷逃离北京。10月18日，联军侵占北京郊外的皇家行宫——圆明园。24日，联军进入北京，未遭到清军的奋力抵抗。[43]当英法联军出现时，御林军甚至弃城而逃。尽管中方多次声明，先前俘虏的26名联军使节状态良好，但是最终只有13个人活着回来了。被送回的13人及13具尸体表明他们曾遭受酷刑。作为报复，英法联军决定火烧圆明园（因为这些使节正是在此受刑的），并且要求向受害者家庭提供赔偿金、严惩施暴者。[44]

尽管英法联军取得了上述胜利，但是其结局远非乐观。他们无法也

不愿深入中国。以此为契机，清政府邀请俄国公使、陆军少将伊格纳季耶夫（Н. П. Игнатьев）伯爵在谈判中进行调解。[45]1859年初，他奉命抵达北京，并且手握重权。俄政府向他下达了严禁干预中国国内冲突的指令，禁止他援助冲突中的任何一方。俄政府极为担心："在内讧、各方势力、全民意愿的影响下，清政府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将会中兴。如果您对清政府的中兴有足够的把握，那么请您务必毫不动摇地与之建立联系。务必注意，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通过武力保护满洲人的利益。"[46]

最初，伊格纳季耶夫的地位十分尴尬。英法联军和清政府以普提雅廷为鉴，不愿相信俄国并且试图将其"撵下"谈判桌。只有平民对俄国人怀有好感，因为使团领袖经常竭尽所能地阻止，或者说是限制胜利者实施抢劫和暴力行为。最终，利用英法联军之间的矛盾和对清政府的了解，伊格纳季耶夫顺利地成了在参战国之间斡旋的调解人。[47]俄国外交官成功地缓解了英法两国对清政府的压力。10月24～25日，清政府与英法两国在北京分别签署了确认《天津条约》的《北京条约》，其主要条款有：清帝为海河事件致歉；赋予英法两国在京设立常驻使馆的权利；清政府支付800万两白银，200万两用于赔偿商会损失，600万两用于补偿军费损失。此外，清政府还需向遇难使节的家属提供死亡赔偿金，法方20万两白银和英方30万两白银。[48]1860年12月14日，伊格纳季耶夫与清政府签署《北京条约》，借此俄国领土从乌苏里江扩展到了日本海和朝鲜边境。[49]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俄国得以喘息。

[1] Мертваго Д. Очерки морских сношений и войн европейцев с Китаем.// МС.1883. №11. С.111-115；То же.//МС.1883. №12. С.59-87；То же.//МС.1884. №1. С.63-92；То же.//МС.1884. №2. С.1-34.

[2] Мертваго Д. Очерки морских сношений и войн...//МС. 1884. №2. С.34-39.

[3] Вейнберг Л. К истории военных событий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1847-1855 гг.）.//МС. 1898. №5. С.2-3.

[4] Вейнберг Л. К истории военных событий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1847-1855 гг.）.//МС. 1898. №5. С.4.

[5] Вейнберг Л. К истории военных событий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1847-1855 гг.）.//МС. 1898. №5. С.4-5.

[6] Тимченко-Рубан Г.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к русским владениям Приамурья，

Сахалина и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ВС. 1909. № 10. С.164-167.

[7] Вахтин В. Адмирал Невельской и 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МС. 1890. № 1. С.25.

[8] Попов А. Цар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в эпоху Тайпин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далее КА) . М.-Л.1927. Т.2. (21) . С.184.

[9] Вахтин В. Адмирал Невельской...//МС. 1890. № 1. С.38.

[10] Огородников С. К биографии адмирала Г.И. Невельского. Рапорт капитана 1-го ранга Невель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у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и командующему войсками в оной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ми , 16 октября 1853 года , по делу занятия острова Сахалин.//МС. 1899. №12. С.58-70.

[11] Баранов А.Е. На реке Амуре в 1854-1855 гг.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фицера штаба Н.Н. Муравьева.//РС. 1891. Том 71. Вып.8. С.351-353.

[12] Вахтин В. Адмирал Невельской...//МС. 1890. № 1. С.38.

[13] Попов А. Цар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КА. М.-Л.1927. Т.2. (21) . С.186.

[14] Буйницкий 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сношений образованного мира с Японией.//МС. 1860. №10. С.78 ; 80-84.

[15] Сбигнев А. Попытки русccких к заведению торг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Японией , в XVIII и начале XIX столетий.//МС. 1869. №1. С.71.

[16] Сбигнев 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главнейших событий в Камчатке. 1816-1856.//МС. 1869. №8. С.99.

[17] Экспедиция коммодора Перри в Японию.//МС.1854. №8. С.393-397.

[18] Из дневника Воина Андреевича Римского-Корсакова.//МС.1896. №2. С.168.

[19] Всеподданнейший отчет генерал-адъютанта графа Путятина. О плавании отряда военных судов наших в Японию и Китай. 1852-1855 год.//МС. 1856. №10. С.43.

[20] Действия России и Нидерландов к открытию Японии для торговли всех народов.//МС. 1855. №3. С.2-3.

[21] Шиллинг Н.Г.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старого моряка.//РуА. М. 1892. Вып.5. С.146-147.

[22] Из дневника Воина Андреевича Римского-Корсакова.//МС.1896. №6. С.191-192.

[23] Юзефович Т. [П.] Договоры России с Восток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Пб.1869. С.276-279.

[24] Тимченко-Рубан Г.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к русским владениям Приамурья , Сахалина и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ВС. 1909. № 10. С.180-181.

[25] Юзефович Т. [П.] Ук.соч. С.279-285.

[26]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ека. М. 1997. С.158-159.

[27] Мертваго Д. Очерки морских сношений и войн...//МС. 1884. №4. С.57-90.

[28] Тимченко-Рубан Г.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к русским владениям Приамурья , Сахалина и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ВС. 1909. № 12. С.192-197.

[29] Юзефович Т. [П.] Ук.соч. С. 251-253.

[30] Максимов С. На Востоке. В Манчжурии.//МС. 1864. №1.С.74-75.

[31] Письма об Амурском крае.//РуА. М. 1895. Вып.3. С.378-379.

[32] Юзефович Т. [П.] Ук.соч. С.253-259.

[33] Венюков М.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заселении Амура , 1857-1858 гг.//РС. 1879. Том 24. Вып.1. С.91-93 ; 98.

[34] Максимов С.В. Заселение реки Амура.//МС. 1861. №10. С.209 ; 215.

[35] Афанасьев Д. 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 и его назначение.//МС.1863. №11. С.28-29 ; 41-42.

[36] Дневник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Палладия за 1858 г.//Известия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далее ИМИД) . СПб. 1912. №2. С.275.

[37] Дневник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Палладия за 1858 г.//Известия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далее ИМИД) . СПб. 1912. №2. С.275.

[38] Отчетная записка , поданная в Азиатский департамент в январе 1861 года генерал-адъютантом Н.П. Игнатьевым о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сношениях его во время пребывания в Китае в 1860 году. СПб. 1895. С.306.

[39] Попов А. Цар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КА. М.-Л.1927. Т.2. (21) . С.198.

[40] Отчетная записка , поданная в Азиатский департамент...С.306-307.

[41] Венюков М.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заселении Амура...//РС. 1879. Том 24.

Вып.2. С.280.

[42] Мертваго Д. Очерки морских сношений и войн...//МС. 1884. №5. С.151-153.

[43] Бутаков , Тизенгаузен. Обзор войн , веденных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против Китая с 1840-42 , 1856-1858 , 1859 и 1860 гг.//Сборник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 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Азии. Издание Военно-Уче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Главного Штаба. СПб.1884. Вып.VIII. С.214-216 ; 310-313 ; Мертваго Д. Очерки морских сношений и войн...//МС. 1884. №6. С.91-161 ; То же.//МС.1884. №7. С.128-131.

[44] Отчетная записка , поданная в Азиатский департамент...С.194 ; 211-212.

[45] Отчетная записка , поданная в Азиатский департамент... С.234.

[46] Попов А. Цар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КА. М.-Л.1927. Т.2. (21) . С.199.

[47] Отчетная записка , поданная в Азиатский департамент...С.8-9 ; 12 ; 99-100 ; 226-227 ; 234.

[48] Бутаков , Тизенгаузен. Обзор войн...//Сборник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 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Азии. Издание Военно-Уче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Главного Штаба. СПб.1884. Вып.VIII. С.320-322 ; Мертваго Д. Очерки морских сношений и войн...//МС. 1884. №7. С.147-149.

[49] Юзефович Т. [П.] Ук.соч. С.259-269.

2 第二阶段：向远东扩张

俄国远东政策活跃的下一阶段与英俄在中亚的大对抗密切相关。俄国在远东的成就很快就对中俄关系造成了影响。1877～1878年，北京成功击溃了阿古柏。[1]清政府取得上述成就的时间与英国挑起第二次英阿战争的时间基本一致。

应当指出，早在1871年5月，突厥斯坦总督、侍从将军冯·考夫曼（К. П. фон Кауфман）命令俄军向以伊宁为中心的伊犁地区进军，此后当地的官员成为俘虏并被关押在韦尔内山上。[2]就这样，俄国行政机关接管了这个多民族、多宗教的杂居地区。1871年10月，北京提出在伊犁重设中方行政管理机构的请求。考虑到北京当时基本不可能向伊犁调派军队，而俄军守备部队也不可能服从清政府伊犁将军的命令，因此考夫曼同意了该请求。作为交易，俄国甚至获得了与清朝自由通商的优惠条款。双方约定，当清政府做好准备向此地派遣足以维持秩序的部队时，俄国方可归还占领区。[3]1872年底，沙皇主持召开特别会议，通过决议：在清政府有能力恢复在伊犁的政权时才将此地归还清国。虽然米柳京（Д. А. Милютин）对此表示反对，但俄政府还是决定：只有在北京过于弱势而无法掌控该地区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将伊犁并入本国版图。[4]

1878年，在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告捷后，俄国面临着从伊犁撤军的问题。此前，俄军在伊犁修建了诸多防御工事、兵营。截至1881年，上述举措的花费加上十年来相关军费支出，俄国在伊犁的开销高达226.54万卢布。[5]1879年3月16日，米柳京主持召开会议，就伊犁的未来归属问题展开讨论。陆军大臣指出："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为了维护国家尊严，我们应当诚实地履行承诺。我们一再重申将归还伊犁，但前提条件是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在北部天山的划界问题上，特别是在保证服从我们的伊犁中国人的安全问题上做出积极让步，满足我们的多项要求。"[6]

1879年10月2日，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Н. К. Гирс）、俄国驻华公使布策（Е. К. Бюцов）与清政府钦差崇厚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根据该条约，俄军从伊犁撤退，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及塔尔巴哈台地区斋桑湖以东土地划归俄属。此

外，清政府还需做出特赦承诺，并且赔偿俄国500万卢布的“代收代守”伊犁兵费及恤款。然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拒绝批准此条约，准备与俄国开战，同时希望获得在此地活动频繁的英国的支持。1880年3月，突厥斯坦、东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军区司令部收到了准备与清政府断交的指示。[7]

此时，俄国处境十分艰难。即使在1880年黑龙江沿岸军区兵力得以增强后，那里也仅有11550人和32门火炮。[8]如与清军发生冲突，其军力完全不足以保全该地区。与此同时，突厥斯坦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在伊犁仅有若干支中队和哥萨克部队，并且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清政府已在通往伊犁的干道上大量屯兵。俄中双方兵力悬殊——1.54万对10万。[9]面对中俄冲突，伦敦已经做好了趁火打劫的准备。1880年7月，应清政府之邀，戈登（Charles Gordon）将军抵达北京。他不仅在远东家喻户晓，而且在中国也拥有良好的军事声誉。他向清政府提议：“如果贵国发动战争，那么就烧毁北京郊区，让皇帝和档案资料撤离北京，将其安置在中原地区，然后再与俄国打五年游击战，（那时）俄国就无法对贵国造成任何伤害了。”[10]他的建议使清政府确信与俄国发生冲突是毫无前途的，虽然这可能违背了戈登最初的意愿。尽管这个建议绝对符合逻辑，但它无法说服北京赞成通过引发冲突的方式解决中俄争端。

另一方面，圣彼得堡绝不愿意因为一块俄国实际不需要的领土而冒险发动战争。1880年底，俄军总司令部亚洲事务负责人索博列夫将军递交报告，阐述中俄一旦爆发战争时的作战计划，并且排除了俄军“一击必胜”的可能。为了对清军施加决定性打击，需向远东地区调派2～3个军，频繁调用舰队封锁中国港口并且派遣陆战队完成登陆任务。为此，所需军费高达两三亿卢布。[11]

俄国在滨海边疆区的据点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此地仅有房屋493栋，居民8800人，其中朝鲜人和中国人占3900人。如果说朝鲜人愿意加入俄国国籍，那么中国人则很少这样做，因为他们在此工作几年后通常会返回家乡。除此以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有几座可容纳2000名士兵的营房，显然每间营房都有空位。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一座依赖进口的城市。

1878年，滨海边疆区的贸易进口额为175.6万卢布，出口额仅为104521卢布。[12]由于没有连接远东与欧洲中央地区的铁路，俄国只能依靠海运向远东输送军队、粮食和弹药。俄国既不具备相应的运输能

力，也不具备在太平洋上制衡英国舰队的海上实力。1880年8月末，在海军中将列索夫斯基（С. С. Лесовский）的指挥下，太平洋舰队——2艘装甲护卫舰、3艘巡洋舰、8艘炮舰进驻符拉迪沃斯托克。同年秋天，若干个沿海炮台修建完工。[13]

改变远东局势非朝夕之功。与此同时，俄国不得不考虑中国未来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1881年，清政府向德国订购了2艘装甲舰；同年12月，该系列的第一艘战舰（配备4门12英寸口径、2门150毫米口径的火炮）下水。[14]1883年4月，战舰被运至德国基尔进行武装，而后应由德国船员开回广州。由于中法关系恶化，战舰运送受阻。1883年，北京又向德国订购了4艘驱逐舰。1884年，一艘装有2门8.27英寸口径和1门5.97英寸口径火炮的轻型装甲巡航舰（重型巡洋舰）再次下水。[15]联想清政府所有舰船出现在太平洋上的情景，俄国无法淡然处之。1878年以后，俄国经济衰退，因此与“天朝”维持贸易关系至关重要。1880年12月，圣彼得堡决定向北京做出让步，但是这些让步不应威胁俄国在远东的前景。[16]恰当的时机、彼此的退让使双方得以寻求一个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1881年2月24日，在俄国侵占盖奥克泰佩后的一个月，吉尔斯、布策与钦差大臣曾纪泽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以解决伊犁问题。根据条约，俄国将伊犁的大部分地区归还中国，自清政府特派大臣抵达塔什干之日起的3个月内完成领土移交，居民有权迁居俄国，伊犁西部地区归俄国管属。此外，清政府还需向俄国支付900万卢布，用以补偿俄国代守伊犁所用兵费及俄民所受损失。[17]同日，中俄两国约定款项支付流程。清政府承诺，自批准本条约后，两年内缴清这笔款项。按照条约签署时的汇率，金额折合1431664英镑2先令。[18]1881年8月19日，该条约获得批准。[19]1881年3月，俄国逐步向清政府移交伊犁政权。8月25日，俄军开始撤离伊犁。[20]

很明显，远东地区的划界推进了中英联盟的形成。很快，联盟显现加强之势。中亚地区的对抗再次影响了政治大环境。1882年5月，亚历山大三世对西伯利亚铁路方针做出批示：“勘测刻不容缓；务必在大臣委员会上探讨西伯利亚干线方针。”[21]1881年初，除梅尔夫绿洲[22]外，土库曼全境划入里海东岸地区。在盖奥克泰佩被占领后，梅尔夫几乎立即引发了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媒体的特别关注，因为此地独立于俄国政权之外。梅尔夫人骁勇善战，曾多次突袭邻邦。1855年，他们击溃了4万

西瓦军；1860年，他们用32门火炮击溃了2万波斯军，波斯军仅有数百骑兵幸免于难，其余被俘、被杀。由于被俘者众多，梅尔夫的奴隶价格从300卢布跌至5卢布。[23]该绿洲被誉为“世界王后”“通往印度的钥匙”。1882年，乔治·阿盖尔（George Argyll）公爵将当时的局面命名为“梅尔夫恐慌”。[24]公爵指出：“这是一个可怜的村庄，最多就是个满是肮脏窝棚的贫瘠小镇，没有任何掩护，或者说只有土堆掩护。这是个土匪窝。”[25]

1884年1月13日，梅尔夫绿洲土库曼族代表召开会议，决定加入俄国。2月12日，梅尔夫长老在阿什哈巴德宣誓效忠沙皇。[26]阿里汗诺夫-阿瓦尔斯基（М. Алиханов-Аварский）中尉为促成此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游说梅尔夫长老，让他们在效忠俄国与战争之间做出抉择。长老们做出了一致的选择。[27]1884年3月14日，在反俄势力做出微不足道的反抗后，科马罗夫（А. В. Комаров）将军率领俄军进驻梅尔夫绿洲，随后解放了当地的奴隶，其中贴金人、波斯人、布哈拉属民近700人，他们获得了重返故乡的机会。[28]因奴隶问题而对呼罗珊[29]发动的袭击停止了。在当地很快就流传起了这样一句话：“真主安拉派沙皇来保护我们免遭土库曼人袭击。”[30]

继梅尔夫之后，其他土库曼部落也加入俄国。此时，英国外交部的“梅尔夫恐慌”有增无减。比利时军事观察员敏锐地指出：“‘梅尔夫恐慌’终将会被俄国威胁赫拉特的噩梦所掩盖。”[31]英国纸媒大肆制造恐慌的舆论氛围，鼓吹英属印度俄国威胁论。[32]某刊物指出：“虽然梅尔夫被征服了，但是亚历山大三世失去了并且永远无法重新获得英国人的信任。”[33]英国议会公开表示，由于赫拉特距离梅尔夫240英里，距离奎达514英里，赫拉特的命运已经完全掌控在了俄国人手中。[34]

1880年，土库曼继续积极修建铁路。1882年底，土库曼加紧修筑克孜尔-阿尔瓦特至撒马尔罕的铁路。该线路全长1126英里，于1888年竣工。[35]这些变化同样引起了伦敦的注意。据英国媒体报道，从里海海岸延伸至克孜尔-阿尔瓦特217英里的铁路正是俄国准备进军印度的有力证据。[36]

很快，这种担忧被清楚地证实了。由于土库曼部落与阿富汗边界不清，喀布尔一口咬定土库曼部落是阿富汗的属民，引发了双方严重的争议，即通往英属印度、开伯尔山口最便捷的路线以及前往赫拉特的必经之路的归属问题。首先应当指出，潘迪绿洲[37]的土著居民是土库曼部

落。英国的立场简洁明了、始终如一，即完全支持酋长国主张，认为它是绝对合乎规律且尊重历史的。[38]1884年6月，阿富汗人在潘迪绿洲逮捕了一名俄国旅行者。俄国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后来阿方释放了被捕者。虽然该事件得以解决，但是尚未敲定的划界问题引发了各方的担忧。[39]1885年2月，此地开始爆发小规模冲突。[40]3月，在英国人的唆使下，阿富汗开始向库什卡河沿岸派兵。随后，阿方在库什卡划界谈判中频繁挑衅。[41]对此，科马罗夫将军命令下属尽量避免冲突。[42]在俄属库什卡河左岸只有3座俄军哨所，且每个哨所仅有几名驻军。[43]趁俄软弱，阿方立即采取挟制措施。阿军建造了若干个多面堡，靠近俄军哨所，侮辱哨兵。因俄军未做出武力反击，阿军的挑衅愈演愈烈。显然，冲突的爆发无法避免。[44]

3月30日，一支由2600名骑兵和1900名步兵组成的阿富汗部队向争议地区挺进。当日，在阿军拒不接受撤军提议后，科马罗夫率兵击退阿军，取得胜利。[45]俄阿火拼分外激烈，伯丹系列步枪大显神威，射击总数为122021发，每支步枪的子弹射击数为85～95发。[46]土库曼骑兵与俄军步兵联手抗击阿军。在阿军落败后，俄土联军发起反攻、追击，[47]阿军四散而逃，丢下4门英国野战炮、2门英国山地炮、2门阿富汗山地炮。[48]在对战发生前的几天，当地气候潮湿，降雨连绵不断；当天，天降大雪，道路泥泞，马匹足迹无从辨别，因此追捕逃兵效果欠佳。在库什卡河左岸及跨河大桥上堆满了阿富汗士兵的尸体。[49]战俘的证词和相关资料均表明，阿军的此次行动受英国指使。[50]

土库曼土著居民——撒拉尔部落和贴金部落欢庆胜利。他们憎恨阿富汗人，故而因其战败欢欣鼓舞。[51]战后，仅掩埋尸体就用了若干天。在科马罗夫的部队中，1名军官、10名士兵战死，3名军官、29名士兵负伤。[52]俄国这支1500人的队伍，在4门火炮的支援下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绩，不仅给喀布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是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53]这场微不足道的冲突向中亚证明了俄国的实力，各部落开始派遣代表团寻求科马罗夫的庇护。[54]冲突的发生是出乎意料的，因为解决争议问题本应是英俄划界委员会的职责。[55]这一新闻引发强烈反响，伦敦怒火中烧。英国首相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在下议院发表讲话，谴责俄国侵略阿富汗，提议政府拨付特别费用100万英镑。该提议获得一致支持。[56]4月27日，议会表决通过1100万英镑的军费拨付提案。[57]俄英关系陷入严重危机，英国媒体开始为赫拉特的命运痛苦呻吟，仿佛科马罗夫的部队即将攻城而入。

1884年，查尔斯·麦格雷戈（Charles MacGregor）将军的著作《印度国防》（*The Defence of India*）在英国出版，其中谈到了坚决抵制俄国侵略印度计划的必要性。麦格雷戈认为，侵占赫拉特是俄国图谋侵略最重要的英属殖民地印度所迈出的第一步，他呼吁在英属印度边境全线，首先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构建与俄国对抗的防御体系。[58]阿富汗认可英国解决印度国防问题的激进观点，[59]其中的关键在于赫拉特。麦格雷戈断言："俄国占领赫拉特将对英国在印度的政权构成极大威胁。"[60]他呼吁英国与德国、土耳其、波斯结盟，突袭俄国在外高加索和高加索地区的属地。[61]他在书中写道："只有将俄国赶出高加索和突厥斯坦，才能真正解决印俄问题，我郑重声明，我对自己的见解确信无疑。"[62]该书一经出版，便激怒了英国当局，然而在库什卡战役后，该书所表达的思想给执政者带来了许多启发。

伦敦下达了加强建设印英联军的命令，印军扩编12000人，英军扩编11000人，最终印军增至128636人，英军增至70000人左右且配备414门火炮。[63]事实上，在印度爆发1857年起义后，几乎所有的炮兵部队都集中在了欧洲。当地部队1/3的军官是英国人，印度军官指挥中队和骑兵。印英联军中的印度士兵主要来源于以下地方部队：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这些由当地大公供养的部队属于封建民兵组织，士兵通常缺乏训练、武器不足，因此只适合维持秩序。1885年春，危机达到高潮，为了保护后方阵地，英国决定建立印英联合作战部队（由2.5万英军和3.1万印军组成）和后备师（由0.6万英军和1.35万印军组成）。[64]

英国海军部一直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俄国巡洋舰的增加情况。1885年3月，英国盘点了本国的巡洋舰，共计29艘：1艘装甲巡洋舰、5艘甲板装甲巡洋舰、23艘轻型巡洋舰。除此之外，还有6艘可用作袭击舰的商船"志愿舰"，2艘正在舾装的一等巡洋舰，1艘近期即将下水的巡洋舰。在波罗的海上分布着3艘甲板装甲巡洋舰和12艘轻型巡洋舰；在黑海上分布着2艘轻型巡洋舰、1艘"志愿舰"；另外12艘巡洋舰分布在俄国领水之外。在此情况下，以宗主国为据点的英国舰队可以轻易封锁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这令俄国人坐立不安。1885年3月14日，海军部向英国政府提议与日本、中国、法国、美国及某些南美中立国家展开秘密合作，一旦爆发英俄战争，便可游说这些国家不向俄国巡洋舰供应煤炭和淡水。与此同时，鉴于国际法未对此类问题做出规范，且有伦敦开创的不良先例（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曾向南方提供袭击舰），因此军部专家承认这项任务的艰巨性。[65]

有趣的是，俄罗斯帝国舰队的领袖严重质疑巡洋舰战争的前景，认为本国的舰队实力绝对无法胜任海上战争，并且在海上获得补给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在英俄两国发生冲突时，俄政府下令，要求位于境外水域的本国舰船驶入中立国港口。1885年4月，英国开始监视俄国舰船。在海上，每艘俄国战舰都被一两艘英国战舰监视跟踪。在此情况下，俄国海军部开始武装部分商船；加强防御措施，如进行速成训练、武装布雷船、新建沿海炮台（特别是在此时防护薄弱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前往重要军港和商港的通道上埋设大量水雷。俄军在喀琅施塔得水域埋伏水雷1230枚、芬兰堡523枚、维堡180枚、德文斯克141枚，在塞瓦斯托波尔、刻赤、敖德萨、新罗西斯克、波季、巴统等地水域均埋伏了水雷，总计2000余枚。[66]

虽然英属印度总督达弗林伯爵（The Earl of Dufferin）对俄国威胁论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依旧奉命筹备军队，以便在必要的情况下保卫赫拉特。[67]3月9日至31日，应印度总督之邀，阿富汗埃米尔做客总督府夏季公馆。[68]达弗林伯爵试图说服埃米尔允许英军借道阿富汗。在此，埃米尔偶然得知了关于库什卡战役的消息。[69]

根据阿卜杜·拉赫曼汗的说法，他之所以与达弗林见面，“是为了向俄国证明我是英国的朋友”[70]。在会晤过程中，英方决定向阿富汗提供物资援助，并且授予埃米尔荣誉宝剑。拉赫曼神气活现地手持宝剑，声称：“我希望能用这把宝剑为英国政府扫除一切敌人。”[71]在库什卡战役后，英国在阿富汗的权威遭到严重动摇，因此这一承诺对英国而言格外重要。[72]为了让阿富汗对英国的实力充满信心，英属印度政府计划向喀布尔支援2000万卢比、2万支步枪、4门重型火炮、2门榴弹炮、1门山地炮及其配套的弹药装备等物资。为应对与俄国即将爆发的战争，英国政府甚至推迟了征服缅甸的计划（1886年征服缅甸）[73]。

截至1885年6月，英国始终在积极筹建一支由16艘战列舰组成的海军舰队。[74]然而，此事并未引发英俄冲突，因此英国无法向欧洲盟国寻求帮助。除了英俄问题外，英国还被非洲问题所累。自俾斯麦联盟建立后，虽然对英国占领埃及耿耿于怀的法国被孤立在外，但是英国仍警惕地关注着法国海军力量的增长及与法国的殖民地竞争，特别是在非洲的殖民地竞争。1885年春，法国的行动出人意料。1882年3月，法国对东京（越南北部）采取军事行动。尽管法国的军事行动获得了当地盟军的支持并且占据武装优势，但是最初的行动并不顺利。[75]

从海上作战到河上作战，法军都有舰队支持——2艘装甲舰、1艘二等巡洋舰以及2艘炮舰。[76]这种辅助优势在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清军还是越军，都无法抵挡法军的炮火。1883年8月25日，在对沿海要塞进行封锁和炮击后，安南（越南中南部）的统治者被迫承认法国对安南和东京的保护国地位。[77]和平不会就此降临。法国继续封锁海岸，截断军队和武器运输。[78]此后不久，法越两国爆发新冲突。[79]此时，法国舰队实力大增，拥有4艘装甲舰、5艘一等和二等巡洋舰、16艘炮舰及6艘运输舰。[80]1883年12月，在东京驻扎的法军从4000人增至15000人（其中包括欧洲部队、非洲步兵、地方警察），同时配有88门火炮。在舰队的协助下，法军迅速占领了沿岸地区与河流通航地区。[81]1884年5月11日，中法两国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承诺从东京撤军；法国不向中国索要军费赔偿，保证中国与越南北部毗邻边界的安全。[82]实际上，此时的巴黎已经掌控了东京和安南。

此后，法国从新殖民地撤军5000人，留下近6000名欧洲士兵与当地的辅助部队（约6000人）共同驻守此地。此外，还留下了26艘军用船只、18艘内河炮舰及10艘运输船。在此情况下，经常出现划界问题。法国希望将谅山划入殖民地范围，然而中国认为这是其疆土，因此在那里与法军对抗、拒绝撤军。1884年6月，法军不宣而战，再次展开军事行动。清军以9艘蒸汽式海防帆船（在法国专家的帮助下建造的）、2艘铁炮舰及12艘军用帆船迎战法军的4艘装甲舰、7艘二等巡洋舰、3艘三等巡洋舰及10艘炮舰。虽然清军试图抵抗，但是由于与法方实力差距悬殊而彻底落败。1884年8月23日，中国舰队被摧毁。[83]

1884年10月，中国人被逐出多数争议领土；11月，法国舰队封锁台湾。[84]1884年底，两国暂时停止了军事行动。在扩充驻军的同时，法国组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85]此后，法军登陆台湾。2月15日，法军用撑杆水雷袭击清军海防帆船和护卫舰，致其沉没。[86]在台湾的军事成就弱化了法军对东京的勘察。[87]1885年3月27～28日，清军精锐部队在谅山击败了法军。[88]此次战败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军事声望，并且引发了3月30日的政府危机。[89]

至于德国，与同英国结盟对抗俄国相比，它更倾向于与俄国达成协议。1885年5月4日，普鲁士威廉王子——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写信告知亚历山大三世：威尔士亲王在访问柏林时透露，英国政府不愿受侵略主

义者支配发动战争。他还补充道："站在我的立场上，我由衷地恭喜您。科马罗夫将军大获全胜，这令我们乃至全军上下欢欣鼓舞。我向您保证，我们所有同志都真心爱戴为您而战的部队。我与俄罗斯军官一样，希望胜利永远伴随陛下左右。但是，很遗憾我无法用自己的鲜血为它而战！"[90]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多余的。

伦敦呼吁俾斯麦调解阿富汗问题，但是遭到了俾斯麦的断然拒绝。俾斯麦指出："即使最轻微的干涉……都能使英国摆脱俄国的仇视，而使其转嫁到我们自己身上。"[91]这种场景无论如何都是"铁血宰相"不愿见到的。1885年5月27日，俾斯麦致信威廉一世，指出："对俄国直接或间接施加哪怕最轻微压力，甚至提出维护和平的友好建议都将招致俄国的仇恨。毫无疑问，俄国如果担心战争期间来自德国或奥地利的威胁，那么就不会与英国开战。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轻微暗示足以使俄国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但是也足以重新激发并且增强俄国本已消除了的对我们的不信任感，进而导致俄国政治的刀锋转向西方。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保持谨慎，避免向彼得堡传递任何信息，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信息，以免彼得堡认为我们在施压或者陛下在暗示俄国不要破坏和平。"[92]

同时，俄国也不希望开战。亚历山大三世5月1日召开会议，决定与英国就阿富汗问题进行对话。[93]1885年5月12日，两国就伦敦方面提出的"维护两国尊严"的提议展开讨论。[94]事实上，1885年的和平局面很难打破。英国1878年占领塞浦路斯岛，接着在1882年占领埃及。英国的扩张行为加剧了英法、英土关系的恶化，因此伦敦不希望在与俄国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开放黑海海峡。君士坦丁堡立即以同意开放黑海海峡要挟英国在埃及问题上做出让步，这让英国无法接受。此外，所有大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法国都警告奥斯曼土耳其不要开放黑海海峡，因为这是违背其义务的。奥斯曼土耳其也不愿成为英俄两国解决中亚冲突的舞台。[95]

1885年4月16日，英国海军部在探讨加强黑海海峡的武装防卫问题时得出结论：除非大量派遣陆战队占领海峡，并且使土耳其卷入战争，否则无法与俄国在黑海抗衡。尽管英国未将俄国黑海舰队（2艘装甲舰、4艘轻型巡洋舰、4艘小型轮船、12艘布雷艇、2艘运输舰）和塞瓦斯托波尔、巴统（最可能遭受攻击的重要目标）的加固工程视为危险的障碍，[96]但是它们将地中海中队的侦察范围限制在了达达尼尔海峡之外。至于波罗的海水域，喀琅施塔得、芬兰堡的防御工事是公认的通过

直接进攻无法攻克的，英国专家高度赞扬俄国自1878年以后在这些要塞所做的工作。据他们推断，只有在炮击或进攻防守薄弱甚至完全没有防御的商港时，如奥布、里加、雷瓦尔（今爱沙尼亚的塔林）、维堡、温道和利巴瓦（今拉脱维亚的文茨皮尔斯和利耶帕亚）等，英国舰队才可能取胜。[97]

在此局势下，“鲸鱼与大象”之间的冲突，这是欧洲媒体沿用俾斯麦的说法，是不可能爆发的。在此，必须为德国宰相正名，他一直反对“鲸鱼”进入黑海水域。[98]战争于俄国无益，因此谈判得以恢复。1885年9月10日，谈判以英俄两国签订《伦敦议定书》告终。根据协议，富有争议的潘迪绿洲划归俄属，通向赫拉特的祖尔法加尔山口划归阿属。[99]1887年7月22日，两国签订《彼得堡议定书》，沿阿姆河进一步划分俄阿边界。[100]彼得堡和伦敦坚信，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此类问题，这对于1895年的最后一次俄阿划界至关重要。通过此次划界，帕米尔的大部分地区划归俄属；作为俄属土库曼和英属印度之间缓冲区的“瓦罕走廊”划归阿属。[101]中亚危机再次证明了俄国在远东的弱势地位，因此巩固远东势在必行。

[1] P.Hopkirk，*The Great Game*：*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Kodashan International，1992，pp.387-388.

[2] Терентьев М.А. История завоеван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Пб. 1906. Т.2. С.50-52.

[3] Терентьев М.А. Ук.соч. СПб. 1906. Т.2. С.56-57；Милютин Д.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1868-начало 1873. М.2006. С.434.

[4]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П.А. К вопросу завоеван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к столетию историка. Сост. Л.Г. Захарова，С.В. Мироненко，Т. Эммонс. М.2008. С.82.

[5] Терентьев М.А. Ук.соч. СПб. 1906. Т.3. С.254.

[6] Дневник Д.А. Милютина 1878-1880. М.1950. Т.3. С.124.

[7] Дневник Д.А. Милютина 1878-1880. М.1950. Т.3. С.233.

[8] Кондратенко Р.В. Манзовская война. СПб. 2004. С.129.

[9] Симонов Н. Сибирский казачий №1 Ермака Тимофеева полк в Кульджинском походе 1880 года.//ВС. 1895. №6. С.243-244.

[10] *Russia in the East，1876-1880：The Russo-Turkish war and the Kuldja crisis as seen through the letters of A.G. Jomini to N.K. Giers*，Edited by Chrales and Barbara Jelavich.Leiden：Brill，1959，p.99.

[11] Кондратенко Р.В. Мор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80-х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СПб. 2006. С.56-57.

[12] Чайковский 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или Ольга.//МС. 1880. №12. С.26；29.

[13] Авилов Р.С.，Аюшин Н.Б.，Калинин В.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войска，фортификация，события，люд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13. Ч.1. «Назло надменному соседу» 1860-1905 гг. С.40.

[14]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Китайский броненосец Ting-Yuen.//МС. 1882. №2. С.27-29.（第一艘战舰指定远号。——译者注）

[15]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Китайский броненосец Ting-Yuen.//МС. 1883. №2. С.37；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Новейшие суд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флота.//МС.1883. №7. С.30；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Китайский броненосный корвет Tsi-Yuen.//МС.1884. №1. С27.（这艘巡洋舰是济远号。——译者注）

[16] Дневник Д.А. Милютина 1878-1880. М.1950. Т.3. С.285-286.

[1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9-1916.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М.1958. С.54-60.

[1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9-1916.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М.1958. С.60.

[1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9-1916.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М.1958. С.66-67.

[20] Терентьев М.А. Ук.соч. СПб. 1906. Т.3. С.261.

[21] Нилус Е.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Харбин. 1923. Т.1. 1896-1923. С.5.

[22] 又称马雷，是中亚土库曼斯坦马雷省的一个绿洲城市。马雷古城在撒马尔罕与巴格达之间，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交通重镇。——译者注

[23] Алиханов-Аварский М. Закаспийски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1881-1885.//ВЕ. 1904. №9. С.85-87.

[24] N. V. Tcharykow，*Glimpses of High Politics：Through War and Peace，1855-1929*.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31，p. 161.

[25] Мартенс Ф.Ф. Россия и Англия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Пб. 1880. С.63.

[26] Тихомиров М.Н.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Мерва к России. М.1960. С.147；151.

[27] Алиханов-Аварский М. Закаспийски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ВЕ. 1904. №9. С.113-116；118.

[28] Тихомиров М.Н. Ук.соч. С.163.

[29] “霍拉桑”的旧称，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大概包括今伊朗东北部、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大部、塔吉克斯坦全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半部和吉尔吉斯斯坦小部分地区。——译者注

[30] Манацков. Хорасан. Персидский и Афганский.//ВС.1900. №8. С.397.

[31] E. Dearubaix，“L’Angleterre et la Russie en Orient，” *Bruxelles et Leipzig*，No. 27，1885，p. 39.

[32] Hopkirk，*The Great Game*，pp. 418-421.

[33] Charles Marvin，*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Merv*：*what it means and what it must lead to*. London：W. H. Allen，1884，p. 6.

[34] Marvin，*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Merv*，p. 8.

[35] Заметки о Закаспийск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е，с 1880 по 1889 год，Н. Полторанова（бывшего начальника пути и зданий на Закаспийск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е）. Самарканд. 1890. С.40.

[36] Charles Marvin，*The Russian Railway to Heart and India.* London：W. H. Allen，1883，pp. 10-12.

[37] 位于里海沿岸梅尔夫绿洲南部的穆尔加布河及其支流库什卡河附近。——译者注

[38] Терентьев М.А. Ук.соч. СПб. 1906. Т.3. С.245-246.

[39] Алиханов-Аварский М. Закаспийски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ВЕ. 1904. №10. С.473.

[40] Афганское разграничен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1872-1885. СПб.1886. №62. С.187-189.

[41] Тихомиров М.Н. Ук. соч. С.171.

[42] Горный М. Поход на афганцев и бой на Кушке（1885 г.）. М.1901. С.79-80.

[43] Сражение на Кушке. Новое Время. 1885. №3313.//Туркеста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СПб. 1885. Т.390. С.23.

[44] Горный М. Ук.соч. С.81-82.

[45] Тихомиров М.Н. Ук. соч. С.171.

[46] Шеманский А.Д. Годовщина Кушкинского боя.//ВС. 1907. №5. С.34.

[47] Горный М. Ук.соч. С.82-83；Алиханов-Аварский М. Закаспийски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ВЕ. 1904. №10. С.485-486.

[48] Шеманский А.Д. Годовщина Кушкинского боя.//ВС. 1907. №5. С.28；33.

[49] От Зеравшана до Таш-Кепри...//ВС. 1905. №1. С.64；Карандаков Н. Мургабский отряд и Кушкинский бой.//ВС.1910. №3. С.217.

[50] Шеманский А. Кушкинский юбилей.//ВС.1910. №5. С.34.

[51] Горный М. Ук.соч. С.100.

[52] Алиханов-Аварский М. Закаспийски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ВЕ. 1904. №10. С.489.

[53] Подробный рапорт ген. А.В. Комарова см.：Афганское разграничение...№115. С.287-305.

[54] Шеманский А. Кушкинский юбилей.//ВС.1910. №5. С.37.

[55] “Afganistan，Marches des Russes dans l’Asie Centrale，” *Revue Militaire*，no. 4 （1885） ，p. 243.

[56] Hopkirk，*The Great Game*，pp. 428-429.

[57]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оенные приготовления Англии на случай войны с Россией.//МС. 1885. №5. С.1.

[58] Мак-Грегор ［Ч.］ Оборона Индии. Часть 1.//Сборник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Азии. Издание Военно-Уче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Главного Штаба. СПб. 1891. Вып.XLIII. С.146；149.

[59] Мак-Грегор ［Ч.］ Оборона Индии. Часть 1.//Сборник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Азии. Издание Военно-Уче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Главного Штаба. СПб. 1891. Вып.XLIII. С.167-168.

[60] Мак-Грегор ［Ч.］ Оборона Индии. Часть 1.//Сборник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Азии. Издание Военно-Уче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Главного Штаба. СПб. 1891. Вып.XLIII.

С.176.

[61] Мак-Грегор［Ч.］Оборона Индии. Часть 2.//Сборник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Азии. Издание Военно-Уче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Главного Штаба. СПб. 1891. Вып.XLIV. С.100-101.

[62] Мак-Грегор［Ч.］Оборона Индии. Часть 2.//Сборник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Азии. Издание Военно-Уче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Главного Штаба. СПб. 1891. Вып.XLIV. С.115.

[63] Frederick Sleigh Roberts，*Forty One Years in India*：*From Subaltern to Commander-In-Chief*. London：Richard Bentley and Son，1900，p. 503.

[64] Тизенгаузен А. 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Британской Индии.//ВС. 1887. №2. С.282；285-286；295-297；302-303.

[65] Foreign Intelligence Committee，General outline of possible Naval operations against Russia，14 March 1885，Public Records Office（hereafter PRO），Admiralty 1/8869，pp. 2-4.

[66] Кондратенко Р.В. Мор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С.188-198.

[67] A.W.Ward and G.P.Gooch，*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3，pp.8-189.

[68] Терентьев М.А. Ук.соч. СПб. 1906. Т.3. С.249.

[69] Маслов А.Н. Россия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наших новейших приобретений）.//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далее ИВ）. 1885. Том 20 Вып.5. С.419-420.

[70]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Абдурахман-хана，эмира Афганистана. СПб.1901. Т.1. С.325.

[71] Roberts，*Forty One Years in India*，p. 508.

[72]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Абдурахман-хана...СПб.1901. Т.1. С.328.

[73] Roberts，*Forty One Years in India*，pp. 504-506.

[74]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оенные приготовления Англии на случай войны с Россией.//МС. 1885. №6. С.2.

[75] В.Н.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Француз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Тонкин.//ВС. 1883. №11. С.173-196.

[76]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Французская эскадра в Тонкине.//МС. 1883. №9. С.6-12.

[77] Эскадра адмирала Курбе. Записки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ориса Луара , лейтенанта с Triomphante.//МС. 1886. №1. С.144.

[78] Эскадра адмирала Курбе...//МС. 1886. №2. С.154.

[79] Эскадра адмирала Курбе...//МС. 1886. №3. С.101.

[80]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французов в Тонкине и Магадаскаре.//МС. 1883. №11. С.29.

[81] Недзвецкий В.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Француз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Тонкин.//ВС. 1884. №7. С.96-118 ;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Экспедиция французов в Тонкин.//МС. 1884. №1. С.24-27 ; То же.//МС.1884. №3. С.21-22.

[82]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Экспедиция французов в Тонкин.//МС. 1884. №6. С.10-11.

[83]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Начало франк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МС. 1884. №9. С.21-25 ;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французов в Китае.//МС. 1884. №10. С.21-48.

[84]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французов в Китае.// МС. 1884. №11. С.1-10 ;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французов в Китае.//МС.1884.№12. С.1-33.

[85]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французов в Китае.// МС. 1885. №2. С.1-5.

[86]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французов в Китае.// МС. 1885. №3. С.3-5.

[87]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французов в Китае.// МС. 1885. №4. С.1-6.

[88]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французов в Китае.// МС. 1885. №4. С.33-34 ; Недзвецкий В.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Француз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Тонкин.//ВС. 1885. №5. С.86-103.

[89] Тэйлор А. Дж. П. Борьба за господство в Европе 1848-1918. М.1958. С.316 ; Манфред А.З.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союза. М.1975. С.184-185.

[90] Письма Вильгельма Прусского к Александру III.//КА. М. 1923. Т.2.

С.127.

[91]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870-1918. М.1940. С.76.

[92]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870-1918. М.1940. С.77.

[93] Половцов А.А. Дневн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А.А. Половцева. М.1966. Т.1. 1883-1886. С.315.

[94] Половцов А.А. Ук.соч. М.1966. Т.2. 1887-1892. С.135.

[95] Тэйлор А. Дж. П. Ук.соч. С.318.

[96] Foreign Intelligence Committee，Passage of and occupation of Dardanelles and Bosphorus waterway in the event of Turkish opposition，16 April 1885，PRO，Admiralty 1/8869，pp. 1-6.

[97] Foreign Intelligence Committee，General outline of possible Naval operations against Russia，14 March 1885，PRO，Admiralty 1/8869，pp. 4，13-14，16.

[98] C.L.Smith，*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 White at Constaninople*，*1866-189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12.

[99] Мартенс Ф. ［Ф.］ Собрание трактатов и конвенций，заключенных Россиею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СПб. 1898. Т.12. Трактаты с Англиею 1832-1895. С.447-451.

[100] Мартенс Ф. ［Ф.］ Собрание трактатов и конвенций，заключенных Россиею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СПб. 1898. Т.12. Трактаты с Англиею 1832-1895. С.464-475.

[101] Мартенс Ф. ［Ф.］ Собрание трактатов и конвенций，заключенных Россиею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СПб. 1898. Т.12. Трактаты с Англиею 1832-1895. С.498-504.

3 第三阶段：远东的动员——崛起之路

1890年代初，俄国的远东政策明显变得活跃，主要在于1886年底召开的特别会议上通过决议：自1891年起，开始修建连接符拉迪沃斯托克与车里雅宾斯克的西伯利亚铁路（全长7000余俄里）。[1]1891年，铁路建设工作如期展开。竣工后的西伯利亚铁路能够极大地巩固中俄交界处的俄方阵地。截至1895年，该地区的武装力量仍旧薄弱，兵力仅约3万人。自187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在库什卡战役后，俄国时刻提防该地区的英国舰队和清朝陆军，尽量避免与它们发生冲突。1878年，英国海军中将杰弗里·霍恩比（Geoffrey Hornby）率领舰队驶入马尔马拉海，俄国开始加固作为滨海边疆区行政中心、主要港口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防御工事。这一过程十分艰难，因为只能依靠水运向此地输送援兵、武器和弹药。在此情况下，俄国远东军事力量的巩固直接取决于与世界海洋霸主英国之间的关系。

远东军事实力薄弱且顾忌与清军发生冲突，因此俄国太平洋舰队始终驻扎日本。早在1861年4月，太平洋舰队试图在对马岛建立海上基地（即驻泊点）。5月英国护卫舰发现了该工程，并且立即上报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在英国外交代表的支持下提出抗议。鉴于德川幕府倾向闭关自守，同时俄国也不愿破坏与英日两国的关系，因此俄国政府放弃了这一计划。[2]1871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远东的主要港口，每年冬季的结冰期长达4个月。[3]此外，它与陆地相连，虽战时可为巡洋舰提供装备、弹药，却需巡洋舰往返数千海里；必要时，巡洋舰的维修及从运输舰上获得物资补给需另寻僻静岛屿。[4]这座城市淡水资源匮乏，因此尽管农业人口增长缓慢，但也只能勉强维持自给自足。为此，俄国必须从欧洲各州抽调物资，通过海运补给此地。

基于上述原因，1875年长崎成为俄国舰队在太平洋上的据点。俄国巡洋舰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长崎度过——从深秋到初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符拉迪沃斯托克只是一处可供它们夏季停泊的地方。当然，只有在与日本保持睦邻关系的前提下才能如此。1877年，俄国4艘轻型巡洋舰在长崎受到12艘英国舰船（其中包括1艘装甲舰）的长期严密监视。[5]在霍恩比率领英国舰队驶入马尔马拉海后，俄国驻东京代表处一直在等待发起军事行动的电报，以便在接到命令后巡洋舰队能够立即驶

离日本海域开展抵制英国海上贸易的行动。[6]至于依靠舰队兵力保护俄国远东海岸，则无人提及。到了1885年，远东局势未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1885年春，仅有2个旅——东西伯利亚第一旅、第二旅驻守符拉迪沃斯托克，每个旅下设4个营。

此时，英国已经做好了在战争爆发时进攻俄国远东前哨阵地的准备。1885年4月26日，为应对未来与俄国可能爆发的冲突，英国陆战队登陆朝鲜南部岛屿巨文岛（东岛和西岛），意图在此建立基地。[7]在太平洋上，与1艘装甲舰都没有的俄国舰队相比，由2艘装甲舰、3艘护卫舰和4艘单桅炮舰组成的英国舰队占据绝对优势。[8]汉密尔顿港（巨文岛内）本应成为英国太平洋舰队的根据地，因为在英国海军部看来，此处不仅是监视俄国远东的绝佳地点，在必要情况下也是突击俄国港口的最佳位置。[9]1887年2月27日，在俄国承诺不侵占朝鲜领土的条件下，应俄国要求，英国陆战队撤离巨文岛。[10]1880年代末，中国东北的清军（正规军、满洲骑兵和后备军）兵力多达17.5万人，同期整个远东可对抗清军的俄军兵力不足23800人。[11]

1886年8月，由2艘装甲舰和3艘巡洋舰组成的中国舰队造访符拉迪沃斯托克。与之相比，由1艘装甲快速帆船、2艘炮艇和3艘快速机帆炮艇组成的俄国舰队实力明显逊色，[12]这让清廷信心大增。同月，中国舰队抵达日本，舰员与日本警察发生了冲突。[13]1887年秋，中国舰队又新增了2艘英国制造的巡洋舰、2艘德国制造的巡洋舰及1艘德国制造的驱逐舰。[14]彼得堡得出必须加强太平洋舰队实力的结论，因为它的软弱将导致中国和日本“对我们的实力产生误解”。1887年，沙皇政府针对加强远东军队建设的计划展开讨论，然而在财政部的阻挠下计划未能付诸实践。[15]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海洋上，实力差距都不可能迅速消除。

彼得堡担心未来冲突扩大，波及滨海边疆区。1888年5月8日，在远东召开特别会议，指出：“我们在这片区域的政治利益主要集中在朝鲜周围，这与朝鲜所处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因此，在阐释我们对待该国的行为方式时，首先应当朝着促进我国政策实施的合理方向发力。”[16]会上就朝鲜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即占领朝鲜无论是对俄国贸易还是与他国的战略关系均毫无益处，占领朝鲜半岛的意图只会使远东的国际形势日趋恶化。因此，在中英结盟的局面下，承认朝鲜的半独立地位对俄国最有利，这样它既不会完全沦为北京的附庸，也不会成为中国的一个省。

[17]若要达成此目标，必须依靠外交手段。会议简报指出："我们应当努力摆脱中国人在朝鲜问题上对我们不友善的质疑，向他们灌输一个信念，即严格履行《天津条约》就能让我们完全满意。谨记，自信是让亚洲人尊重自己的一种手段。我们不能在中国人面前露出任何破绽，使其认为我们对他们的策略有所顾忌。只要中朝关系不违背上述原则，我们无须过分挑剔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18]在汉城行事也应立足于同样的目标："记住，朝鲜本身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我们必须阻止朝鲜政府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并且建议朝鲜谨慎地避免一切可能为中国干涉提供借口的行为。"[19]这项政策有一个毋庸置疑的优势，无论是彼得堡还是华盛顿和东京都支持朝鲜维持稳定、保持现状。[20]

当俄国军方试图扩充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的军事机构时，必将面临组织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1886年5月，从驻扎在俄国欧洲地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谢夫斯克、坦波夫和兹韦尼戈罗茨基军团抽调若干连队组成东西伯利亚第五机动营。同年走海路调防符拉迪沃斯托克，却未能驻扎城内。那里既没有营房，也没有足够的民宅可供部队驻扎，因此该营的军官和士兵不得不分散在城外的各个村庄过冬。1887年，这支部队进驻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始执行任务。[21]1880年代中后期，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的船舶维修能力十分有限，并且和过去一样没有破冰船。与此同时，根据1888年1月所进行的试验可知：无论是水雷爆破破冰，还是人工或机械切割破冰，都无法保证舰船及时出海。[22]

由此可见，远东的俄国舰船依然无法在本国水域过冬。对俄国而言，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极为必要。若要在远东展开更为积极的活动，没有雄厚的兵力和强悍的舰队是绝不可能的；若要加强远东的军事实力，不建设一条穿越西伯利亚连接滨海边疆区与俄国欧洲地区的可靠交通线路是不现实的。西伯利亚铁路项目预计在12年内完工，耗资约3.5亿卢布。此前，交通部每年的预算约为5600万卢布。在此期间，预算增加60%，其中预留款项平均约为3000万卢布。

事实上，刨除1904～1906年的军费开支，修建西伯利亚铁路耗资约10亿卢布。[23]自1890年开始，黑龙江沿岸地区的武装开支急剧增加。1889年为92250卢布，1890年为481100卢布，1891年为769000卢布，1892年为1177000卢布，1893年为1117000卢布。[24]

在俄国新建铁路之初，东京已然感受到了正在逼近的危机。1868年，日本推行明治维新。此后，日本陆军和海军舰队迅速完成现代化转

变。这一过程甚至在之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了。1859年，荷兰援助日本；而后，法国教官在日本执教；后来，“扶桑国”派遣臣民去美国军事学校求学，并于1870年在本国开设陆军学校。1871年以后，德国教官取代法国教官。[25]很快，日本取得辉煌成就。在日本舰队建设方面，荷兰率先采取行动。1855～1858年，荷兰向日本提供3艘小型战舰。此外，荷兰人还分别于1855年和1857年在长崎、东京建立海军学校，为日本训练未来的军官。[26]很快，英国人取代荷兰人。1873年7月，应日本政府的请求，英国海军代表团——7名军官、18名士官和列兵抵达横滨，他们的到来为东京海军学校的建立奠定了基础。[27]训练效果立竿见影。《海事汇编》的评论文章指出：“借此可以推断，在英国教官和日本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训练取得了丰硕成果。舰队、船队成员的能力将大幅提升，在舰船的操控、保养方面，他们的水平将一日更胜一日。”[28]此时，日本舰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战经验。

1860年，日本舰队中有1艘明轮汽船、2艘荷兰制造的护卫舰（装备10门火炮）、1艘英国制造的快速机帆炮艇及若干艘欧式帆船，这些舰船及相关机械均由日本人操纵。[29]1867年，在镇压北海道武士起义时，日本陆军和蒸汽机船队获得了一次检验所学知识的机会。[30]1869年，阿伯丁的一位公爵下令建造一艘小型装甲舰，后来它成为日本舰队中第一艘此等级的舰船。[31]截至此时，日本舰队已经收编了11艘战舰和8艘运输舰；各位藩主拥有35艘战舰，其中包括蒸汽机船和装甲舰。[32]1870年代中期，日本舰队中有2艘小型装甲舰和5艘蒸汽战舰——护卫舰、炮舰、两桅横帆军舰及皇家巡航艇。[33]

1872年12月28日，日本通过立法规定所有20岁以下的男子必须义务服兵役3年。1875年11月21日，明治天皇颁布诏书，强调该律法必须无一例外地对所有人适用。[34]日本依照英国的模式建立舰队；依照德国的模式建立陆军。1884年，一队日本军官出游欧洲列国，德国及其总司令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于是，日本邀请柏林军事院教授梅克尔（Klemens Meckel）上校到陆军大学举办讲座。[35]自第一批德国教官出现后，历经30余年，日本陆军已然成为德国陆军的精确翻版，他们崇尚能力、知识和纪律。[36]

在德国陆军代表团和英国海军代表团的帮助下，日本在军队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日本军队下设6个陆军师团和1个精锐师团——80个步兵大队、7个工程大队、20个骑兵中队、40个炮兵中队（配备240门

火炮），其中不包括要塞炮兵中队。此外，六大地区的内务部队也可供日本政府调遣。在和平时期，日军兵力为5.7万人；在战时状态下，日军兵力可提升至10.2万人；在调用内务部队和警察的情况下，日军兵力最多可达到19万人。[37]

1874年5月至12月，日本陆军和舰队在台湾展开军事行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清政府对台湾的管辖薄弱，岛上的居民曾切割琉球遇难船只，杀害海难幸存者54人。登岛后，日军陆战队实施了一系列报复行动，惩罚当地居民。10月，清政府与日本在北京签订条约，议定清政府赔付日本白银50万两，日本在12月20日前从该岛撤军。[38]

1877年夏，英国制造的第一批现代装甲舰——扶桑号铁甲舰、比睿号装甲巡洋舰和金刚号装甲巡洋舰抵达日本，[39]它们是未来日本现代化舰队的核心。由于它们的编入，日本舰队实力大增，迅速超越俄国太平洋舰队。截至1877年1月13日，俄国太平洋舰队仅有1艘快速机帆炮艇、4艘海上炮舰、3艘纵帆船、2艘旧式运输舰（即将退役）、4艘小型蒸汽机船、4艘汽艇，蒸汽战列舰总计18艘，装甲战列舰0艘。[40]

1882年，日本通过了一项为期8年、耗资2700万日元的造船计划。根据该计划，到1890年，完成建造32艘排水量为3万吨的舰船。1890年，日本年度军费开支从1000万日元增至1500万日元。[41]1890年，日本的支出预算约为8000万美元，但是由于进口额远超出口额（81728580美元对56603506美元），日本背负了583万美元的外债。这是实现陆军、海军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国内借款比外债高出数倍，达2.59亿美元。税收的重担落在了“扶桑国”人口占比最大的农民的肩上。[42]在这种经济政策的刺激下，战争无从避免，和平只能是强制性赔偿的产物。

1890～1891年，俄国皇位继承人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环球旅行，日本是旅行结束前的倒数第二站。1890年11月4日，未来的沙皇从加特契纳出发，前往奥匈帝国。俄国舰队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迎候他的到来。11月9日，舰队前往希腊的比雷埃夫斯，从那里启程前往埃及的苏伊士和印度的孟买。在埃及和印度，尼古拉拜访了当地的统治者和英国当局代表，狩猎，参观名胜古迹。[43]此后，他陆续访问锡兰、新加坡、爪哇、暹罗、法属印度支那、中国和日本。[44]皇太子的旅行最终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西伯利亚铁路的开工奠基仪式告终。

俄国的亚速夫纪念号、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装甲巡洋舰和扎波罗热号炮舰与皇太子一同在长崎停留。1866年之后，俄国的舰队一直驻扎于此，海军医务室也搬迁至此（1858～1866年在函馆）。[45]俄国军官在日本的生活十分惬意，没人能够预料到“大津事件”的发生。1891年5月11日，皇太子从长崎乘人力车到大津城游玩。游玩途中，皇太子被一名日本警察偷袭，头部连中两刀。与尼古拉同行的希腊王子在危急关头用拐杖打伤刺客的手，救下尼古拉，所幸他的伤势并不致命，恐怖分子也立即被周围的群众和人力车夫击倒。[46]俄国各界对暗杀的第一反应是震惊。

1891年5月12日，在此次访问期间担任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巡洋舰司令的杜巴索夫（Дубасов）上校写道：“应当说，我们十分信任日本人，这种信任是毫无节制的，未曾想，在我们的周围潜伏着危险分子，甚至还是警察。我们以这种方式（乘坐人力车——引者）环游日本……在东方，在日本，对于我们俄国人而言资源丰富：我们在这里比在自己家里地位还高，我们能够得到所需的一切，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最终，一旦与中国开战，日本应该会成为我们唯一的盟友，它的港口将成为我们的作战基地。”[47]

自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后，日本开始谨慎地对待西邻俄国，[48]然而“大津事件”并未对日俄关系造成重大影响。无论如何，在俄国皇太子访问日本的官方报道中未提及此事。[49]1891年5月31日（俄历5月19日），未来的沙皇亲临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奠基仪式。[50]尼古拉将在日本的遭遇看作一名孤独的狂热分子的个人行为，因此他并未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依旧对它着迷。[51]至于政治大环境，亚历山大三世下令遗忘此事。1892年秋，沙皇在向新任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沃（М. А. Хитрово）下达的命令中强调了日本港口作为远东俄国舰船驻泊地的重要性，以及俄日两国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52]。然而，无论是彼得堡还是东京，都无法长期坚持立场。

[1] Нилус Е.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Харбин. 1923. Т.1. 1896-1923. С.6.

[2] Черевко К.Е. Зарождени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VII-XIX века. М. 1999. С. 197.

[3] Чайковский 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или Ольга.//МС. 1880. №12. С.58.

[4]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далее

РГА ВМФ) . Ф. 410. Оп. 2. Д. 4183 , Л. 3-29 , 153 , 155 , 169-180.

[5] Rosen ,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 vol. 1 , p. 35.

[6] Rosen ,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 vol. 1 , p. 36.

[7] Пак Б.Д. Россия и Корея. М.2004. С.152.

[8]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оенные приготовления Англии на случай войны с Россией.//МС. 1885. №5. С.4-5.

[9] Foreign Intelligence Committee , General outline of possible Naval operations against Russia , 14 March 1885 , PRO , Admiralty 1/8869 , pp. 19-20.

[10] Пак Б.Д. Ук.соч. С.168-169.

[11] Кондратенко Р.В. Манзовская война. С.132. ; Тэйлор А. Дж. П. Ук.соч. С.318 ; 624.

[12] Авилов Р.С. , Аюшин Н.Б. , Калинин В.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13. Ч.1. «Назло надменному соседу» 1860-1905 гг. С.56.

[1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280.

[14]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Китайская эскадра на Спитгедском рейде.// МС.1887. №9. С.45.

[1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280-281.

[16]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1932. Т.3 (52) . С.54.

[17]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1932. Т.3 (52) . С.55-57.

[18]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1932. Т.3 (52) . С.59.

[19]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1932. Т.3 (52) . С.60.

[20]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1932. Т.3 (52) . С.61.

[21] Бородовский. Переход 5-го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линейного батальона в новое место квартирования.//Разведчик. 1897. №330. С.123.

[22] Кондратенко Р.В. Мор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С.244.

[23] Романов Б. Очерк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М.-Л.1955. С.19.

[2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282.

[25] Венюков [М.И.] . О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сил и средств Японии и Китая по данным 1869-1870 годов.//ВС. 1871. №8. С.229 ; 233 ; А.К-р.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С.1872. №2. С.194-199 ; В.Н. Зарубежн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Япония.//ВС. 1879. №2. С.234-240.

[26] Чагин. Очерк развития японского флота.//МС. 1898. №7. С.47.

[27]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Морское училище в Японии.//МС. 1874. №6. С.69-70.

[28]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Морское училище в Японии.//МС. 1874. №6. С.76.

[29] Назимов П.Н.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 Японии.//МС. 1861. №10. С.328.

[30] Истомин.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токунгав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на острове Иессо.//МС. 1870. №7. С.97-117 ; Письма лейтенанта Старицкого.//МС.1870. №8. С.13-14.

[31] Венюков М.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О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ах Японии и Китая.//ВС. 1876. №5. С.85.

[32] Чагин. Очерк развития японского флота.//МС. 1898. №7. С.50.

[33] Венюков М.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О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ах Японии и Китая.//ВС. 1876. №5. С.85 ; 87.

[34] Венюков М.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О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ах Японии и Китая.//ВС. 1876. №5. С.83.

[35] Иваво Ояма.//Разведчик. 1895. №225. С.106.

[36] Гамильтон Я. Записная книжка штабного офицера во время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СПб.1907. Т.2. С.27-28.

[37] Ржевуский Г.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ая война 1894-1895 гг. СПб.1896. С.23-24.

[38] Ибис П. Экскурсия на Формозу.//МС. 1876. №1. С.145 ; 147.

[39] Rosen ,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 vol. 1 , p. 38.

[40] Мордовин П.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е судостроение в течение последних 25 лет.//МС. 1881. №8. С.112-113.

[41] Романов Б.А. Очерк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С.17-18.

[42] Черевков В. Из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Японии. 1854-1894.//ВЕ. 1894. №12. С.511-512 ; 522.

[43]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ысочества Наследника Цесаревича на Восток.//ВС. 1891. №6. С.114-135 ; Из писем по пути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ысочества Наследника Цесаревича на Восток.//ВС. 1891. №7. С.9-24.

[44] Из писем по пути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ысочества Наследника Цесаревича на Восток.//ВС. 1891. №7. С.25-35 ; То же.//ВС , 1891. №8. С.135-134.

[45] Русский береговой лазарет в Нагасаки для команд плавающих в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судов (Извлечение из рапорта 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отрядом судов в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от 26 июля 1886 года) .//МС.1887. №5. С.45.

[46] David Schimmelpenninck van der Oye , *Toward the Rising Sun* : *Russian Ideologies of Empire and the Path to War with Japan*. DeKalb :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2001 , pp. 19-20.

[47] На фрегате «Владимир Мономах» (1889-1891) . Из писем адмирала Ф.В. Дубасова к жене.//МС. 1916. №10. С.10 ; 14.

[48] Oye , *Toward the Rising Sun* , p. 20.

[49] Из писем по пути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ысочества Наследника Цесаревича на Восток.//ВС. 1891. №10. С.193-201.

[50] Из писем по пути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ысочества Наследника Цесаревича на Восток.//ВС. 1891. №9. С.28.

[51] Oye , *Toward the Rising Sun* , p. 20.

[52]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ека. М.1997. С.172.

4 甲午战争：敌友关系的转换

朝鲜在日本的侵略计划中占据特殊地位，东京分别于1875年、1882年、1884年试图入侵朝鲜。通常，这些尝试始于朝鲜抵制外国的起义，终于安抚朝鲜、消除日本侵略理由的清军的介入。[1]自1876年2月2日《江华条约》签订以后，每次入侵，东京都试图强迫汉城签署协议，赋予天皇子民在朝鲜半岛行动自由和国籍特权。[2]1884年危机以日中两国签署双边协议告终，双方承诺在无相互行文告知的情况下不向朝鲜派兵。事实上，清政府全方位干涉朝鲜的内政外交。1890年初，高额的税收和腐败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朝鲜南部的反日势力准备行动。[3]1894年2月21日，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沃向彼得堡报告称，日本人正在为抵制即将发生的暴动做准备。[4]3月10日，驻北京公使卡西尼（Артур Павлович Кассини）也汇报了此事，他认为这场暴动具有反日倾向。[5]俄国外交官认为，暴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卡西尼写道："显然，朝鲜的骚乱和暴动令清政府深感不安，唯恐动乱扩大范围，为第三国干预提供借口。"[6]北京自诩拥有"特别干预权"，正准备对朝施加干预。清政府的立场为日本的强硬反击创造了条件。对此，公使声明："我强烈怀疑，在朝鲜拥有重大利益和大量定居侨民的日本能够同意对直接触动自身利益的事件袖手旁观，并且自愿接受清政府所提供的庇护。"[7]1894年5月，朝鲜爆发起义，国王高宗向清政府求助。在朝鲜履行总督职责的清政府重臣李鸿章下令出兵朝鲜，首支入朝的部队仅有1500人。[8]

作为对清政府的回应，东京立即向朝鲜派出等量兵力，并且在朝鲜沿岸集结舰队。6月底，驻朝鲜半岛的日军人数大幅增加，远超清军。此时起义已被镇压，然而维护秩序的外国军队之间的冲突演变为各方均需正视的现实问题。6月22日，李鸿章建议卡西尼担任关于同时从朝鲜撤兵的北京谈判的调解人。[9]彼得堡决定采取行动，但仅限于提出建议，后来希特罗沃试图说服日本接受清政府提议，然而并未成功。他本人认为，实际上，自日本开始动员军队起，事情就已经变得一发不可收拾。[10]1894年7月7日，俄国驻华公使卡西尼表示："东京方面狡猾而隐秘地告知我关于日本政府对于我方提议的答复。根据答复可知，日本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我们的提议。"[11]

朝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快速演变，战争一触即发。1894年7月23日，日本人攻占汉城王宫，高宗及其亲眷被日军俘虏。[12]北京迅速反应，决定增兵朝鲜半岛。海上运兵是达成此目标的最快方法。清政府雇用3艘英国商船，其中2艘——爱仁号和飞鲸号顺利运兵抵达朝鲜，另一艘悬挂着伦敦港旗帜的高升号高速轮船尾随其后。高升号载有1200名士兵、2名将军及其护卫队150人，另有船员75人，其中7人为英国籍。25日清晨，日舰在朝鲜湾口袭击中国舰队，广乙号鱼雷巡洋舰搁浅，济远号防护巡洋舰投降。

在这场战役中，日本不宣而战。面对日舰浪速号的劝降，清军官兵愤然拒绝，日舰遂向高升号开炮，最终在舰长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浪速号击沉了开往朝鲜的高升号。清军官兵和欧洲船员尽数落水，日舰仅对欧洲船员展开救援，对清军士兵开枪射杀。后来，英国接受了日本政府的道歉。海战过后，日本向朝鲜南部增兵5000人。[13]1894年8月1日，日本正式向中国宣战。[14]中日战争的爆发让俄国外交部始料未及，甚至没人能够预测东京的陆战目标。[15]

1894年8月21日，俄国外交大臣主持召开特别会议，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П. С. Ванновский）、海军上将奇哈乔夫（Н. М. Чихачев）、财政大臣维特、外交部次官希什金（Н. П. Шишкин）、亚洲司司长卡普尼斯特（Д. А. Капнист）等人参会，共同商议战争问题。会议主席在向参会人员介绍情况时指出，日本拒绝了李鸿章提出的两国以平等地位共同治理朝鲜的提案。此时，彼得堡仍旧不愿干涉中日冲突。在危机的第一阶段，吉尔斯提议与伦敦、巴黎、华盛顿、罗马和柏林进行磋商，明确各国对远东局势的看法，而后接受英国的提议，伙同他国共同侵占朝鲜，然而此时战争已经爆发。参会者一致认定，俄国不应以任何形式干涉中日冲突；对俄国而言，最佳出路是维持战前秩序。亚历山大三世对这些提议表示赞同。[16]

俄国观察员指出：日本的军事动员能力，铁路、水路的运兵能力均处于理想状态，“这足以令任何一个欧洲大国羡慕不已”。[17]结果快速显现。日本迅速在朝鲜增兵，短时间内通过50艘运输舰运兵25000人。[18]在不通铁路的情况下，为了快速加强朝鲜半岛的兵力部署，清政府决定依靠海路优势再次运兵。在中国舰队中，铁甲舰和装甲炮舰共5艘，其中所有铁甲舰均在1881～1890年从伏尔铿造船厂采购而来。除此之外，1881～1891年，清政府先后收编9艘装甲巡洋舰（6艘为英国建

造，3艘为国产）和41艘德国建造的鱼雷艇。[19]日本舰队共有35艘舰船，大多数产自英法两国，少数为国产，其中28艘处于战备状态。[20]此外，日本还有4艘建于1864～1879年、配备9.4英寸和6.6英寸口径火炮的旧式铁甲舰，其中最大者的排水量为3780吨，航速为13.2节。日本的巡洋舰为新型战舰，排水量为2450～4150吨，航速17.5～19节。另外，日本还有若干艘通信船和40艘鱼雷艇。[21]

1894年9月15日，1.65万名日军击败了1.5万名清军，攻占清军的平壤阵地。先前，清军未能把握时机合理利用长达6周的喘息期建造防御工事。事实上，在战役打响后，大部分清军几乎立即逃跑，而日军的表现则堪称典范。[22]1882年，明治天皇就军事教育问题颁布诏书，明确了日本模范军官、模范士兵的行为准则：应当忠于祖国、“感恩祖国”，对帝国的其他军人和子民彬彬有礼；纪律严明、诚实可靠，在生活中温和待人；当然，必须勇敢无畏。[23]诏书指出：“军人应当崇尚勇敢，要记住，这是日本人的天性，每个人都应当勇敢，否则他就不是日本人。”[24]

1884年，未来的日本陆军总司令大山岩元帅与一队军官同游欧洲。在所见所闻中，他格外关注德国的军事体系，特别是总参谋部，后来它成为东京模仿的典范。日本的地方军事院校邀请德国军官讲学，[25]军事体系的构建成果和学习效果在战场上显现出来。在纪律和训练方面，日军明显优于清军。日本士兵的受训程度很高，首先在“军旗下”服役3年，而后在陆军预备役服役4年，然后在地方部队预备役服役5年。每年，预备役士兵需接受为期60天的集中训练和1天的实战检验。[26]日军迅速将清军赶出朝鲜，对抗的重心转移到了界河鸭绿江附近。

清政府调兵鸭绿江，5艘载有四五千人的运输舰从大连起航，在舰队的掩护下抵达鸭绿江口。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师的主力舰队（2艘旧式装甲战列舰、4艘重型巡洋舰、4艘轻型巡洋舰、2艘鱼雷艇）在此遭遇由伊藤中将指挥的日本舰队（主力4艘装甲巡洋舰、4艘轻型巡洋舰）。日军在舰船质量和船员训练方面占据优势，北洋水师水手在快速射击和备战训练方面不如日本海员。清舰火力涣散，攻防布控毫无章法；日舰的火炮齐射量超清舰的两倍，射速是清舰的5～6倍。若提及弹药质量（中国人用煤炭装弹），日舰的优势令人印象深刻，毕竟弹药的质量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北洋舰队呈楔形梯队前进，铁甲舰和重型巡洋舰位于舰阵中央，它们遭到日本舰队的集中打击，结果1艘重型巡洋

舰被击毁，1艘铁甲舰、3艘重型巡洋舰被击沉。后来日本舰队离开战场，这令清政府有了可能取胜的谈资，但是北洋舰队再也无法与日本舰队在海上抗衡了。[27]很快，日本的陆战成果与舰队的胜利相互呼应。10月24日至25日，日军击败驻守鸭绿江的清军，这再次反映出日本对中国的碾压性优势。[28]

正值甲午战争如火如荼之际，1894年11月2日（俄历10月20日），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继位。1895年1月26日，长期主持外交部工作的吉尔斯因病去世。[29]他去世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А. Б. Лобанов-Ростовский）出任外交大臣。随着领导层的变动，俄国外交政策的侧重点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沙皇支持建立海军且在远东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面对东京在远东问题上日益强硬的立场，尼古拉二世决意展现自己的实力和斗志。

1月29日，尼古拉二世在恭贺自己新婚的贵族、地主、市民和哥萨克部队代表团面前发表讲话，表明了此意。[30]继俄国实施内政改革后，其外交政策也做出一系列调整，它们的成功给沙皇的初步行动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影响。此时，君主立宪制计划与1905年革命几乎同时萌芽。1895年2月1日，在彼得堡再次召开远东问题特别会议，此次会议由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主持。在探讨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时，参会者指出：为保护俄国利益，必须做好干预中日战争的准备。[31]

临时主管外交工作的希什金呼吁俄国按兵不动：“在一定程度上，渤海湾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或许日本在渤海湾沿岸的旅顺港和威海卫所发表的声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利益。但是，如果日本将朝鲜据为己有，我们的利益必将受到侵犯。鉴于日本政府向我们保证它不打算破坏朝鲜的独立性，因此，此时担心此事仍为时过早。”[32]此时，彼得堡几乎对日本的目标和英国可能持有的立场一无所知，因此，会议建议采取行动，联合欧洲各国维持现有秩序；若此计划失败，则再次探讨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但是仅限于以下事宜，如“扩大我们在太平洋水域的舰队规模，使我们在这些水域的海军实力尽可能地强于日本”[33]。

俄国太平洋舰队拥有8艘巡洋舰（分两个级别）、5艘炮舰和4艘鱼雷艇。这些战舰分散停泊在不同的据点，并且俄国未在这些水域布置装甲舰，因此俄国在这些水域处于弱势地位。1895年2月5日，以尼古拉一世级战列舰为首的地中海舰队接到了向远东行进的命令。4月18日，海

军少将马卡罗夫率领该舰队与太平洋舰队会合，[34]他对这片水域了如指掌，舰队的战时作战计划正是由他在1891年制订的。事实上，当时俄国可能与英国爆发战争，人们普遍认为巡洋舰足以应战。[35]

1895年3月5日，俄国海军部向太平洋舰队下达指示（3月23日收到该指示）："之所以要强化太平洋舰队，是为了维护我们与参战国谈条件的权威。很难预测，捍卫我们在东方的利益将把我们引向何方。无论何时，战舰都应储备充足的物资，做好应对各类事件的准备。请阁下瞄准朝鲜或中国的某港口，使其成为舰队的集结地。此前，不要给其他国家提供借口抢占您所中意的港口，因此您的意向必须对下属严格保密。"[36]

此时，日本完全掌握军事行动先机。在黄海遭遇惨败的北洋舰队躲入旅顺港，不再对日本运兵大陆构成威胁。[37]1880年代初，德国教官选择旅顺港作为中国海军基地；1890年代初，中国大力兴建旅顺港周边海岸线的防御工事，因此旅顺港被视为一座无法从海上攻破的港口。旅顺港的陆路防御较为薄弱，[38]守兵训练不利，武器规格十分混乱，老式、新式良莠不齐，步兵持有7个不同系列的步枪。[39]

北洋水师的残存舰队无力干扰日舰，撤回威海卫，在战争结束前一直躲藏在那里。[40]11月3～4日，日本陆战队登陆辽东半岛；5日，占领关东门户金州城和通往金州城的狭长地带，[41]在突击中损失17人。[42]次日，距离旅顺港20英里的小城大连失守。随着战争的爆发，清政府积极强化舰队基地的陆路防御，但是已经无法全面兼顾了。[43]专家评价大连湾是包围旅顺港的"理想的登陆地点兼作战基地"[44]。21日，在经过5个小时的突击后，日军占领了旅顺港。[45]日本仅损失400人，中国损失4000人。据传闻，差异如此之大是因为占领这座城市的士兵发现了被肢解的日军尸体，因此他们展开屠杀。三天里，日军烧杀抢掠，妇孺老幼皆不放过。[46]

旅顺港沦陷后，日本司令部筹划远征山东。为此，日本需要时间。日本的商船舰队拥有179艘汽轮机船和260艘帆船，总排水量分别为88838吨和159085吨。东京既无法同时满足本土和作战部队的需求，也无法组织大规模的登陆行动。[47]1895年1月10日，25000名军人乘坐50艘运输舰从广岛启程，陆战队的运输未经战舰掩护，因为对日本而言，中国舰队不足为惧。14日，陆战队逼近关东，运输舰从那里取道山东。1895年1月20～22日，日本陆军登陆胶东半岛；[48]2月2日，日军对威

海卫发动进攻；12日，日军经过数日猛攻占领了这座要塞，中国的残余舰队不复存在。2艘铁甲舰、2艘巡洋舰和12艘鱼雷艇被日军击沉；10艘大型舰船——1艘铁甲舰、1艘装甲巡洋舰、1艘巡洋舰、1艘鱼雷巡洋舰及6艘炮舰，连同大量小型舰船被日军收缴。丁汝昌及其同僚自杀殉国。日本仅损失了1艘鱼雷艇。[49]

这些胜利不是天皇的陆军和海军所取得的全部成绩。日军不仅占领了中国东北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还占领了澎湖列岛和台湾岛。清政府迅速衰败，但资源尚存。为了进行这场战争，日本动员了6个师团。截至1895年初，日本向大陆派遣了其中的5个师团，总计75000人。[50]1886年，日本总人口约为3900万（其中城市人口约为350 万）；[51]9年后，人口增至41122899人，其中达到兵役年龄且符合兵役条件的青年人数为：1893年248429人，1894年248424人，1895年241913人，1896年286637人。[52]

与敌国日本不同，实际上，中国没有训练有素的后备力量。在此情况下，北京被迫承认战败，在下关与日本展开谈判。3月19日，以李鸿章为首的中国使团乘德国轮船抵达下关，谈判未取得实质性成果。23日，日本陆战队登陆澎湖列岛，月底占领澎湖列岛。24日，日本民族主义者小山六之助暗杀李鸿章。此后，明治天皇同意休战。[53]日中两国再次恢复谈判。4月3日，在谈判结束前，俄国驻华公使卡西尼已将日本对中国提出的赔款要求告知彼得堡。[54]

4月6日，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大公递交谏书，指出：日本的这些要求，特别是针对本应宣告独立的朝鲜的要求，对俄国而言极为不利。洛巴诺夫认为，日本吞并旅顺港的计划侵犯了俄国的利益。另一方面，此前俄国希望欧洲各国联手维持现状，显然这一愿望也落空了。英国拒绝举行抵制日本的游行示威；法国是否认同俄国的计划、是否愿意采取行动仍不可知；德国在远东问题上的立场尚不明朗。[55]当日，外交大臣向尼古拉二世阐述了俄国的备选行动方案。他断言：“我们在亚洲最主要且最危险的对手显然是英国。毫无疑问，它对我们在远东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心怀嫉妒、充满敌意。一旦我们在亚洲遇到任何困难，英国的朋友总是落井下石。每当与俄国发生冲突，英国习惯向清政府施加高压以达成目的。与之相反，作为海洋强国的日本早晚都将与英国成为竞争对手，在本国的水域中至少如此。”[56]

基于洛巴诺夫的提议，俄国制订了两项计划：第一，占领太平洋上

的不冻港。此事极为必要，1894年，在甲午战争开始前，日本政府颁布新令，限制外国舰船在其港口停泊，同一国家在日本港口同时至多只允许停泊2艘舰船。在下关和谈后，新令生效，然而自身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不允许日本长期维持现状。第二，占领中国东北北部地区，支援西伯利亚铁路建设。对于这些计划，清政府必然不愿配合，因此，外交大臣建议与日本达成协议。洛巴诺夫在报告结尾处写道："我们当然可以与其他大国联手，特别是同样担心日本因这场战争而实力大增的英国。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避免受到日本敌对国的影响，以免日后破坏我们与日本政府的良好关系。"[57]

在这份文件提交5天后，即1895年4月11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主持召开大臣会议，会上通过决议，决定继续执行与弱邻中国交好的政策。显然，此时德、法两国支持俄国维持现状的做法。[58]坚决支持向日本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日军撤离中国东北的维特出席了此次会议。维特后来回忆称："那时，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并且这是我一贯坚持的立场。对俄国而言，如果中国这个邻居强大而死板，则最为有利。这是东方安定的关键，也是俄国未来幸福的保障。因此，我很清楚不能让日本渗透到北京周围，并且占领辽东重地。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占领辽东半岛，谁就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何必须阻止日中两国达成上述协议。"[59]

维特在会上指出："如果我们现在允许日本进驻中国东北，那么，为了保护我们的领地和西伯利亚铁路，需要动用成千上万的军人，同时大幅扩充我们的舰队，因为我们迟早会与日本发生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侵华问题上，先与日本和解，而后在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后自食苦果，还是现在下定决心积极干预日本侵华？哪种方案对我们最有利？…… 对我们而言，最为有利的做法是在力图不变更我们在黑龙江及其他占领区边界的情况下，尽量不同时与中国和日本对立，礼貌而不失分寸地对待欧洲各国，积极运作。同时，严正声明我们不允许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南部，如果我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我们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当日本和欧洲各国确信，我们确实已经做好准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将果断行动，那么极有可能不爆发战争。如果事情超出预期，日本不理会我们的外交主张，那么我们则命令舰队驶离驻泊地，袭击日本舰队，炮击日本港口。在此情况下，我们是中国的救世主，中国将感恩我们的援助，然后同意以和平的方式重划边界。"[60]

对于俄国新的政治方针，只有军方包括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将军和总参谋长奥布鲁切夫（Обручев）将军持反对意见。[61]在甲午战争之初，对于俄国干预这场冲突将引发的后果，奥布鲁切夫将军曾清楚地表达过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示威抗议，但是不能做出任何严肃、强硬的举动。若因（英国可能对每一步都施加干预的）示威而导致我们与距离俄国军队中心一万英里的国家开战，那实在是太过冒险且损失惨重。假设我方的计划暂时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将与日本结仇，给自己再树强敌，日本将彻底成为英国对抗我们的武器。俄国在欧洲和中亚已经树敌颇多，因此不要在远东另立强敌。与日本的4000万人口、强大的舰队、组织完善的军队和发达的文化相比，我们在整个东西伯利亚的人口简直微不足道，那里的工厂甚至都没有实现工业化。对于日本而言，一切都是触手可及的，它距离我们在太平洋上的领地仅一步之遥；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几乎在世界的另一端。若与日本为敌，反俄同盟的阵营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在确保俄国西部和高加索（军队集结速度减缓）的战略安全前，在远东问题上任何复杂化的政治关系都将使俄国立于危墙之下。由此得出结论：面对当前局势，我们不应与日本产生争端，而应与日本尽量达成符合我们利益诉求的协议。在向日本提出撤离中国东北的友好建议后，如遭拒绝，我们应当就赔偿问题展开谈判，而非以战争为威胁奉行大公无私的政策。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逼迫日本倒向英国。"[62]

总参谋长始终坚持己见，反对俄国在该地区积极行动、"开疆扩土"，因此他与年轻沙皇意见相左。[63]1895年2月1日，在远东政策问题特别会议上，他对以欧洲大国的集体行动为导向的英俄联手施压日本的主张持反对意见（此前特别会议已通过该提案）。[64]奥布鲁切夫坚信自己的判断，并且发表了一系列补充意见：第一，反对吞并"任何朝鲜岛屿"，实际上是反对变更阿穆尔州边界；第二，反对派遣波罗的海舰队远征太平洋。[65]

奥布鲁切夫1895年4月11日在特别会议上发表的观点确有先见之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参与战争，对我们而言，这至关重要。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拥有4000万人口、工业高度发达且在万里之外的文明国度。一旦开战，对日本而言，所有的军事装备都近在咫尺，而我们却不得不向人口不足150 万的落后地区从远方调运每一杆枪支、每一颗子弹。距离军事行动现场最近的部队抵达战场需3个月，从伊尔库茨克和鄂木斯克出发需5个月。侍从将军奥布鲁切夫坚决主张通

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现在卷入战争也许是被欧洲大国拖入战争，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我们既无法保证西部的安全，也无法保证高加索的安全……我们可以与日本达成一致意见，进而获得我们所需的一切；而中国对我们而言不足为虑。通过与日本达成协议，我们可以占领北满。”[66]

会上，维特的观点占了上风。他指出：“我认为，必须向日本下达最后通牒，我们无法容忍日本破坏中国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原则，因此我们无法赞同日中两国所达成的条约。当然，中国作为战败国被迫签订。日本作为战胜国，应当允许它在某种程度上向中国索要大笔赔款以补偿各项开销。如果日本不赞成此方案，那么除了采取积极行动外，我们别无他法。现在商讨如何采取积极行动为时过早，但是我相信，到时候我们可以炮击日本的某些港口。”[67]显然，俄国未能坚守不干涉他国政治的方针。会上达成了力求恢复战前秩序的决议，决定对东京“先礼后兵”——先提建议，后提要求。[68]后者的基础是俄、法、德结盟。

1895年4月16日（俄历4月4日），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记载了远东政策会议的结果：“会议决定：坚决要求日本人撤离满洲南部和旅顺港。如果他们不听取建议，那么只能诉诸武力。愿上帝保佑，千万不要卷入战争啊！”[69]拉姆兹多夫在日记中记载了尼古拉二世本人对此问题的态度：“总体上，沙皇同情中国，怀疑日本。”[70]1895年4月17日，在特别会议召开六天后，日中代表在下关签署《马关条约》：中国需承认朝鲜独立，这为日本在朝鲜的扩张铺平了道路；将辽宁南部——从鸭绿江起至营口诸地，即辽东半岛让与日本，此外中国需割让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在七年内将库平银两亿两（按照当时汇率折合约3亿卢布）交与日本，用于赔偿军费；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城市、通商口岸从事各类活动；为确保中国履行赔款条约，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日本守备部队（根据条约其人数限制为一个旅团）所需开销的1/4由中国承担。[71]

在《马关条约》签署当日，德皇威廉二世向尼古拉二世保证将对俄国的行动予以支持。次日，他将自己的另一个决定告知沙皇：“统领中国水域德国巡洋舰的海军上将已接到率德国舰队向中国北方港口进发并且尝试与俄国海军上将建立联系的指令。如您不弃，请指示贵方海军上将告知我方驻地方位，并且提前向我透漏您未来的行动计划，以便我能够向我方海军上将下达相应指令。若如此，我必感激万分。”当日，沙皇答复道：“我将向我方海军上将下达与德联系的指令，但是我强烈希望，我

们的武装干涉能以和平方式告终。”[72]以德皇为代表的德国积极推动俄国介入远东局势。4月26日，威廉二世在写给表兄弟的信中指出：“在我的权力范围内，我将竭尽所能地维护欧洲和平，保卫俄国后方，确保无人干涉您在远东的行动。毫无疑问，续写亚洲大陆文明篇章，保卫欧洲、抵制黄种人入侵是俄国未来的伟大使命。对此，我将永远尽我所能向您提供帮助。”[73]尽管如此，尼古拉二世依旧不愿在太平洋上引发军事冲突。

俄国远东发展水平落后。俄国政府甚至无法确保邮路畅通，向通古斯送信甚至需要依靠犬只。1857年，外贝加尔移民迁居黑龙江沿岸，沿江建立了15个村庄。1857年，除西伯利亚十四机动营及其附属炮连的1100名军官和士兵外，此地仅有居民1950人。他们散居各处，最远相距1137英里。[74]同年夏天，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新建35个村庄。[75]目击者称，哥萨克不愿前往新领地，此次搬迁令他们深感绝望，并且伴随着“恸哭”[76]。1858年，依据《瑷珲条约》，俄国开始组建阿穆尔哥萨克部队。[77]1858～1860年，此地出现近100个居民点——村庄、军事哨所，如同黑龙江畔尼古拉耶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戈维申斯克，日后它们将发展成城市。1860年代初，在黑龙江畔居住着近15000人。[78]这为俄国按照新边界巩固领地，进而侵占领土、安排居民落户创造了机会。

1861年，俄国政府确立了一系列移民优待措施，如每户移民家庭可获得100 俄亩的土地，永久免除人头税，免除20年的土地税，免除10年兵役（这些措施实行至1901年，此后土地税免除年限下调至15年，并且所有优待措施有效期仅为3年）。[79]移民过程漫长且代价高昂，并且时常发生意外。途中除丢失牲畜、财产外，移民还时常散居在没有道路、无法从事生产的荒芜沼泽地。1868年，在分布于400英里范围内的乌苏里营的5920名农奴中，仅有1527名男性；788个家庭中仅有1/7的家庭能够确保全年自给自足，而其余家庭只能依靠7～8个月的粮食补贴度日。哥萨克被迫给中国人做工，有的甚至鬻儿卖女换取口粮。[80]1860年代，在乌苏里江地区分布着4万中国人，其中常住居民约1.5万人，其余或为采参人，或为淘金者，或为强盗匪徒。中国居民自认为是清帝子民，服从天朝官员命令，坚信俄国只是暂时占领此地，日后将会还地于清，因此他们按时向清政府纳税。[81]

在此情况下，边境必然无法长治久安。1867年，不愿承认距离符拉

迪沃斯托克50海里的阿斯科尔德岛为俄国属地的中国武装遗民遭到驱逐。此事流传甚广，自1867年底，乌苏里江地区的中国遗民不再躲藏，开始筹备械斗。随着局势不断升温，中国人拒绝服从俄国政权、法律法规，并且公开要求向中国交割领土。1867年12月，中国遗民向纳霍德卡哨所发起进攻，俄国守军艰难退敌。1868年春，阿斯科尔德岛上的冲突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人开枪射杀俄国登岛部队。由此引发了小型战争。“红胡子”——强盗土匪——开始屠杀边境村庄的俄国民众。局势极为紧张，局部冲突立即演变为俄中两国在乌苏里江南部的对抗。[82]只有采取果断行动解除中国遗民武装，击溃“红胡子”部队，逮捕村社领导人才能以儆效尤，恢复秩序。[83]

新领地的局势逐渐转变。1870年代初，整个滨海边疆区人口仅为21500人，其中11000人为俄籍，3500人为朝鲜籍（主要聚居在波西耶特地区），3000人为大清国籍，其余4000人为原居民——吉利雅克人和鄂罗奇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人口约为44000人，其中不包括2000名士兵，此地俄籍居民人数比其他国家多一倍（其中包括满人在内的中国人约10000人）。俄国远东只有外贝加尔相对发达，在远东的51万人口（其中蒙古人21万，布里亚特人12万）中有26万居住于此。俄国的殖民进程逐渐加速。例如1883～1886年，4710人迁入乌苏里江南部地区，国库支出100万卢布。自1887年起，敖德萨-符拉迪沃斯托克沿线的志愿舰队参与移民组织工作。截至1891年，志愿舰队的可支配舰船达10艘，总排水量为25279登记吨。移民虽需自行承担路费，但在抵达目的地后可以获得一笔为期30年、额度为600卢布的贷款。截至1892年，俄国政府又以此方式向乌苏里江南部地区输送6063人。

1892年，俄国阿穆尔州和滨海边疆区常住人口达到182602人（军人除外），其中包括39722名城市居民，50916名农民，26261名哥萨克，14623名“异族人”（即当地的少数民族），33000名依据1858年签署的《瑷珲条约》获得永久居住权的中国人，14684名朝鲜人，447名日本人，117名“其他国籍的外国人”及2832名流放犯。与人口总数高达1300万人的中国东北相比，这片土地堪称人烟稀少。在计算这片土地的人口时，可将萨哈林岛的人口截至1892年的20086人计入其中。1890年代，萨哈林岛南部居民以阿依努人（约3000人）为主，北部以吉利雅克人为主。日本商人、渔民偶尔登陆该岛。1870年代初，此地居住着13000人，其中3000名俄国人，3500名日本人，100名中国人，其余均为当地原住民。岛上的俄国人大多为军人，隶属于一支配备2门山地炮

的步兵营。

后来，情况逐渐发生转变。自1869年该岛成为流放地之后，岛上27.4%的居民为流放犯。他们主要从事煤炭开采工作，这满足了太平洋舰队的需求。除人口因素外，阻碍岛屿开发的另一个因素在于俄国无法保障领地的粮食供应。陆军部力求通过高价采购谷物支持该地农业，因此，1884年在乌苏里江南部地区购买粮食5万普特，1891年购买90万普特。尽管粮食采购增幅如此之大，然而1892年远东依旧面临粮食短缺问题，粮食短缺量为87.7万普特。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的粮食进口填补了25 万普特的粮食缺口，而剩余62.7万普特则依靠中国人从中国东北运入。[84]

例如，1894年，乌苏里江地区从中国东北进口了价值837056卢布的商品，其中牲畜进口额为496235卢布，占进口总额的近60%。同年，中国还向该地出口各类农产品，出口额如下：食用油48201卢布；面粉47790卢布；小麦、春麦、大麦、粟米、大米、黍米和燕麦44136卢布；豆子40828卢布；烟草33207卢布。[85]事实上，中国商人手几乎把持了所有贸易，中国的贸易出口额远高于俄国。1894年，乌苏里江地区出口价值361948卢布的商品，其中俄国制造和外国制造的纺织品的出口额为140230卢布（占出口总额的近40%）；中国制造的商品123557卢布（占出口总额的34%）。[86]与此同时，中国劳工大量输出，建堡垒、铺铁路、架桥梁、播种、收割，他们无处不在。[87]跨越边境从中国涌入的不仅有工人、农民、工匠、商人，还有“红胡子”。直至1890年代，“红胡子”仍是乌苏里南部地区的祸患。[88]

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在远东即使聚集小型部队并为之提供补给也只能依靠河流运输。但是，当时远东的水运尚不发达。在黑龙江上，可动员的船舶包括46艘私人蒸汽机船，载重量从4.8吨至306吨不等；44艘铁驳船和28艘木驳船，总载重量为9468吨。此外，拖船数量明显不足，共5艘。在1894年通航期间，部队需乘坐由18～20根圆木捆绑而成的木筏沿江航行，每只木筏可运送25～35人。[89]1894～1895年，为了扩充阿穆尔地区的兵力，陆军部一直以这种不甚安全的办法运送新兵。在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前，俄国无法从根本上强化这些部队。1895年7月17日，西西伯利亚炮兵旅第五连从韦尔尼（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出发前往远东，其中采用陆路运输的8门火炮、8辆弹药车、6辆板车、1支医疗队及1支由139辆马车组成的雇佣车队直至1896年6月29日才抵达布拉

戈维申斯克。可以说，这场陆路运输所耗费的时间差17天就是一整年！[90]尽管通向远东的运力如此糟糕，但是在甲午战争后俄国仍向日本提出了要求。

1895年4月20日，彼得堡已知悉《马关条约》条款。23日，在俄国外交部的倡议下，俄、法、德三国在东京发起了旨在修订和约条款的联合外交行动，三国公使声称他们的政府建议日本放弃辽东半岛。[91]与俄、法使臣不同，德国公使手段强硬，以战争威胁东京。[92]欧洲三大强国的干预使日本外务省手足无措，同时也令东京感觉屈辱。[93]柏林加入巴黎和彼得堡的阵营完全出人意料。驻巴黎公使、经验丰富的日本外交官表示："我不知道应当如何解释德国的介入，我只能猜测德皇出现了暂时性神经错乱。"[94]事实上，威廉二世身心绝对健康，并且精于算计。他希望在修订《马关条约》后，俄国趁机占领朝鲜港口，而德国紧随其后占领威海卫。1895年8月31日，德皇在写给首相霍亨洛埃亲王的文书中坦露："有例可依的事情总是更容易的。"[95]

在当时的处境下，日本若做出抵抗，基本毫无胜算。在太平洋水域，日本以69艘舰船（功率较小）对抗欧洲三大强国的53艘舰船。在与中国缔结和约时，日本拥有26艘鱼雷艇和43艘大型舰船——10艘是从北洋舰队缴获的，包括1艘炮塔铁甲舰（镇远号，德国制造，1882年下水，在鸭绿江战役中受损，短期内无法参战）。此前，在日本舰队的编制中不存在此类大型战舰。当时，日本从英国订购的2艘大型装甲战列舰——富士号和八岛号（以英国君权级战列舰为设计蓝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设计方案）尚未竣工。中国被缴获的其他舰船包括2艘钢壳巡洋舰、6艘钢壳炮舰和1艘木质炮舰。[96]虽然法国与德国在联合行动方面未达成协议，[97]但是即使不考虑法、德两国的海上威胁，仅俄国舰队就拥有1艘现代化战列舰和3艘装甲巡洋舰，对日本舰队而言，这依旧构成严重威胁。[98]实际上，俄国舰队的处境并不理想，舰船分散停泊在日本各大港口，且弹药储备不足。例如，俄国舰船在长崎的应急物资储备量仅能维持月余。[99]

在甲午战争爆发一年后，马卡罗夫指出："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我们舰队的主要任务是对抗英国。发生在1884～1885年的事件使我们发现了另一敌人，在东方它比英国更危险。"[100]1895年5月3日，考虑到日俄两国随时可能断交，俄国战舰（1艘装甲战列舰、3艘巡洋舰、4艘炮舰和1艘鱼雷艇）驶离日本驻泊地——长崎、横滨和神户，驶向中国港

口。2天后，它们抵达芝罘，在那里驻泊至危机结束。[101]这段时间人心惶惶。7日，舰队接到上级命令，全面进入战备状态。[102]情况十分复杂，舰队司令部既不知晓陆军的作战计划，也未制订对日作战计划。[103]例如，为防守符拉迪沃斯托克部署了5个机动营、3个要塞炮兵连、1个布雷连和1支乌苏里哥萨克部队。[104]冬季，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一如既往地迎来了持续数月的结冰期，因此1892年俄国政府从喀琅施塔得向此地派遣大力士号破冰船，[105]然而很快发现它对当地的冰层基本无能为力。为了使用大力士号破冰船在冰面上开辟航道，士兵们必须提前凿破冰面。[106]1896年，俄国政府从丹麦专门为符拉迪沃斯托克订购了一艘功率更大的破冰船希望号。[107]当时，在乌苏里江南部沿岸地区驻扎着2个机动营、1支哥萨克部队和半个山地炮兵连；萨哈林地区的防御依靠地方部队和民兵组织；而黑龙江口几乎完全暴露，没有防御。[108]

所幸，1895年战争未爆发。5月22日，针对俄、法、德三国所提要求，日本被迫做出让步。这是日俄两国之间的第一次领土冲突。1875年5月7日，两国通过签署《圣彼得堡条约》解决了上一次争端，当时俄国向日本出让千岛群岛中的18座岛屿，条件为日本放弃整个库页岛主权给俄国。[109]东京特别愤怒，因为在战争前夕日本曾向俄国提议缔结中立条约，以保护彼得堡在中国的利益。日本担心可能受到他国干涉，然而在军事行动开始前，日本的提议并未得到回应。此时，欧洲三大列强竟然发表联合声明。[110]尼古拉二世将化解冲突视为个人的胜利，因此在帝国外交领域他试图更为积极地发挥个人领导作用。

实现这一目标突然变得容易起来。1896年8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去世。此后四个月，次官希什金代管外交部；之后穆拉维约夫伯爵出任外交大臣，但于1900年6月去世；后来拉姆兹多夫伯爵成为新任外交大臣，他虽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但时常缺乏在沙皇面前坚持己见的决心。此外，据其部下证实，拉姆兹多夫认为自己没必要忤逆沙皇，因为他将自己摆在了君主意志执行者的位置上。[111]

1895年10月7日，东京放弃辽东半岛，但是要求中国赔偿3000万两库平银。[112]同年11月8日，日中两国在北京签署《辽南条约》，确定中国东北南部占领区的归还事宜。[113]这不仅无益于局势的改善，也无法保证远东的和平。

[1] В-ъ. Общий очерк Кореи.//МС. 1888. №8. С.10-14.

[2] Черты военного быт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з бумаг М.В. Савелова.// РуА. М. 1895. Вып.3. С.404-405.

[3] Oye，*Toward the Rising Sun*，p.119.

[4] Из эпохи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 1894-95 гг.//КА. М.-Л.1932. Т.1-2（50-51）. С.4.

[5] Из эпохи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 1894-95 гг.//КА. М.-Л.1932. Т.1-2（50-51）. С.5.

[6] Из эпохи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 1894-95 гг.//КА. М.-Л.1932. Т.1-2（50-51）. С.6.

[7] Из эпохи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 1894-95 гг.//КА. М.-Л.1932. Т.1-2（50-51）. С.6.

[8] Oye，*Toward the Rising Sun*，p. 119.

[9] Из эпохи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 1894-95 гг.//КА. М.-Л.1932. Т.1-2（50-51）. С.8-9；16-17.

[10] Из эпохи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 1894-95 гг.//КА. М.-Л.1932. Т.1-2（50-51）. С.18.

[11] Из эпохи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 1894-95 гг.//КА. М.-Л.1932. Т.1-2（50-51）. С.29.

[12] Из эпохи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 1894-95 гг.//КА. М.-Л.1932. Т.1-2（50-51）. С.51.

[13]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в Корее.//МС.1894. №11. С.12-15；Действия минами в нынешнюю японско-китайскую войну（Извлечение из сообщения кап.1 р. Витгефта）.//МС.1895. №5. С.14；Кладо Н.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на море во время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 МС.1896.№3. С.8；Вильсон Х. Броненосцы в бою 1855-1895. М.2003. С.459-467.

[14] Из эпохи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 1894-95 гг.//КА. М.-Л.1932. Т.1-2（50-51）. С.54.

[15] A.D.Kalmykow，*Memoirs of A Russian Diplomat*：*Outposts of the Empire*，*1893-1917*.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p.24.

[16]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1888-1903 гг.）.//КА. 1932. Т.3（52）. С.62-67.

[17] Каширин В.Б. «Русский Мольтке» смотрит на восток.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е

планы Главного Штаб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о время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РЯВ. С.154.

[18] Кладо Н.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на море во время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МС. 1896. №3. С.13.

[19]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Китайский флот.//МС. 1894. №9. С.37-38.

[20]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Японский флот.//МС. 1894. №7. С.40-42.

[21]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Японский флот.//МС. 1894. №9. С.39-41

[22] Каширин В.Б. «Русский Мольтке» смотрит на восток...//РЯВ. М.2004. С.155-156.

[23] фон Реймерс В.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развития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 ИЖ. 1905. №9-10. С.960-962.

[24] фон Реймерс В.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развития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 ИЖ. 1905. №9-10. С.961.

[25] Иваво Ояма.//Разведчик. 1895. №225. С.106.

[26] Ржевуский Г.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ая война...С.25.

[27] Стеценко В. Старое и новое. Сражение при Хайянге.//МС.1895. №2. С.2-9 ; Небольсин А. Морская война Японии с Китаем.//МС.1895. №9. С.1-14 ; Вильсон Х. Ук. соч.С.495 ; 504.

[28] Каширин В.Б. «Русский Мольтке» смотрит на восток...//РЯВ. С.156-157.

[29] Некролог Н.К. Гирс.//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7 (29) января 1895 г. №13. С.2.

[30] Дневники Николая II. 1894-1918. М.2011. Том 1. 1894-1904. С.182.

[31]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М.1932. Т.3 (52) . С.67-74.

[32]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М.1932. Т.3 (52) . С.69.

[33]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М.1932. Т.3 (52) . С.73.

[34] С.О. Мака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М.1960. Т.2. С.161 ; фон Врангель В. Отрывки из биографии С.О. Макарова.//МС. 1913. №1. С.31-34.

[35] С.О. Мака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М.1960. Т.2. С.35-36.

[36] С.О. Мака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М.1960. Т.2. С.170.

[37] Ржевуский Г.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ая война... С.25.

[38] Котвич В. [Л.] , Бородовский Л. Ляо-дун и его порты : Порт-Артур и Да-Лянь-Вань. СПб.1898. С.1-2.

[39]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Китай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МС.1894. №12. С.4.

[40] Вильсон Х. Ук.соч. С.522.

[41]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в Корее.//МС.1894. №11. С.4.

[42] Кладо Н.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на море во время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МС.1896. №10. С.3.

[43]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в Корее.//МС.1894. №11. С.4.

[44]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Китай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МС.1894. №12. С.2.

[45] Геф. Порт-Артур.//Разведчик. 1898. №392. С.352.

[46] Котвич В. [Л.] , Бородовский Л. Ляо-дун и его порты...С.5-6.

[47]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Торговый флот.//МС. 1894. №3. С.66.

[48] Высадка японцев для атаки порта Вей-Хай-Вей.//Разведчик. 1895. №238. С.421-422 ; Кладо Н.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на море во время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МС.1896. №10. С.7.

[49]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Китай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МС.1895. №2. С.2-6 ;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Китай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МС.1895. №3. С.4-6 ; Вильсон Х. Ук. соч. С.523-529 ; Кладо Н.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на море во время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МС.1896. №10. С.19.

[50] Ржевуский Г.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ая война...С.23-24 ; 27 ; Като С. Господство в водах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МС. 1910. №5. С.79.

[51] Черевков В. Из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Японии. 1854-1894.//ВЕ. 1894. №12. С.513.

[52] Япония. Численный состав армии в 1911 году.//Сборник Гла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далее Сборник ГУГШ) . 1913. Вып. 49. С.7.

[53]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Китай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МС.1895. №4. С.2-4. ;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1895.№5. С.415.

[54]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От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М.1997. С.135.

[55]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1932. Т.3 (52) . С.74-75.

[56]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1932. Т.3 (52) . С.76.

[57]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1932. Т.3 (52) . С.76.

[58]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1932. Т.3 (52) . С.78-79.

[59] Витте С.Ю. Ук.соч. М.1994. Т.2. С.43.

[60]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1932. Т.3 (52) . С.80-81.

[61]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1932. Т.3 (52) . С.79-80 ; 82.

[62] Каширин В.Б. «Русский Мольтке» смотрит на восток...//РЯВ. С.179.

[63]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М.1932. Т.3 (52) . С.69.

[64]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М.1932. Т.3 (52) . С.73.

[65]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М.1932. Т.3 (52) . С.72-73.

[66]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М.1932. Т.3 (52) . С.82.

[67] Витте С.Ю. Ук.соч. М.1994. Т.2. С.44.

[68]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1932. Т.3 (52) . С.83.

[69] Дневники Николая II. 1894-1918. М.2011. Том 1. 1894-1904. С.195.

[70] Ламздорф В.Н. Дневник 1891-1892. М-Л.1934. С.157.

[71]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делам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895-1905. СПб.1906. С.1-13.

[72] Переписка Вильгельма II с Николаем II. М.1923. С.6-7.

[73] Переписка Вильгельма II с Николаем II. М.1923. С.8.

[74] Бартоломей. Описание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ВС. 1860. №.8. С.342. ; Венюков М.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заселении Амура , 1857-1858 гг.//РС. 1879. Том 24. Вып.2. С.282.

[75] Венюков М.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заселении Амура , 1857-1858 гг.//РС. 1879. Том 24. Вып.2. С.296.

[76] Тихменев Н.М. «Манзовская война» (Первое вооруженное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русских с китайцами в Южно-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 в 1868 году) .// ВС. 1908. №2. С.27.

[77] Бартоломей. Ук.соч.//ВС. 1860. №.9. С.138.

[78]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ека. М. 1997. С.140.

[79] Тиреер. Примо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и ее природные богатства.//ВС. 1908. №7. С.172-173.

[80] Тихменев Н.М. «Манзовская война»...//ВС. 1908. №2. С.28-30.

[81] Тихменев Н.М. «Манзовская война»...//ВС. 1908. №3. С.43 ; 47.

[82] В Южно-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 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октора В.С. Плаксина. 1868 г.//РС. 1891. Том 71. Вып.9. С.595-606 ; Тихменев Н.М. «Манзовская война»...//ВС. 1908. №3. С.19-24 ; То же.//ВС. 1908. №5. С.46-47 ; То же.//ВС. 1908. №6. С.54-55.

[83] Тихменев Н.М. «Манзовская война»...//ВС. 1908. №7. С.42.

[84] Венюков [М.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военного обозрения русских границ в Азии. Первый участок : Остров Сахалин.//ВС. 1872. №3. С.25-26 ; Венюков [М.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военного обозрения русских границ в Азии. Второй участок : Приморский край.//ВС. 1872. №4. С.239 ; Венюков [М.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военного обозрения русских границ в Азии. Третий участок : Амур и Уссури.//ВС. 1872. №6. С.283-285 ; Венюков [М.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военного обозрения русских границ в Азии. Четвертый участок : Маньчжурия.//ВС. 1872. №7. С.22 ; Венюков [М.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военного обозрения русских границ в Азии. Пятый участок : Забайкалье и Халка.//ВС. 1872. №8. С.221 ; Вебель. Ф. Заметка о Приамурском крае.//ВС. 1894. №3. С.161-164 ; 178 ; 180 ; Болховтинов Л. Желтый вопрос на рус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ВС. 1910. №3. С.182-183 ; Бутковский Я. Сахалин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МС. 1874. №4. С.132；Дмитриев Н.，Колпычев В. Иностранные судостроительные заводы，в связи с вопросом о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е заводов Морского ведомства в С.-Петербурге.//МС. 1909. С.137；Ищенко М.М.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рус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ахалина（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в.）.//Краеведческий бюллетень（Южно-Сахалинск）. 1993. №1. С.48；51；77.

[85] Грулев М. Сунгарийская речн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895 г.//ВС.1897. №5. С.148.

[86] Грулев М. Сунгарийская речн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895 г.//ВС.1897. №5. С.149-150.

[87] Надин И. Пятидесятилетие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ВЕ. 1905. №6. С.519.

[88] Надаров Ив. Хунхузы в Южно-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ВС. 1896. №9. С.183-184.

[89] Грулев М. Забайкалье（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озрения）.//ВС. 1898. №10. С.457-459；462.

[90] Поход 5-й батареи Западно-Сибирской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ой бригады с 5 июля 1895 г. по 17 июля 1896 г.//Разведчик. 1897. №360. С.776-777.

[91]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ека（От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1997. С.136.

[92]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дипломатия герм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 конце XIX века. М.1951. С.350.

[93] Кикудзиро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1942. С.17.

[94] Кикудзиро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1942. С.18.

[95] Захват Германией Киао-Чао в 1897 г.//КА. М.1938. Т.2（87）. С.27.

[96]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Проектируемое увеличение военно-сухопутных 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их сил Японии.//МС. 1897. №10. С.22.

[97] С.О. Мака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М.1960. Т.2. С.194.

[98] N. Papastratigakis，Russian Naval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895-1904. PhD dissertation，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2006，p. 104.

[99] Кондратенко Р.В. Российские морские агенты об усилении японского флота в конце XIX-начале XX века.//РЯВ. С.68.

[100] С.О. Мака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М.1960. Т.2. С.192.

[101] фон Врангель В. Отрывки из биографии С.О. Макарова.//МС. 1913. №1. С. 39.

[102] С.О. Мака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М.1960. Т.2. С.175-183.

[103] С.О. Мака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М.1960. Т.2. С.192.

[104] Авилов Р.С.，Аюшин Н.Б.，Калинин В.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13. Ч.1. «Назло надменному соседу» 1860-1905 гг. С.100.

[105] Иессен［К.П.］. Пароход-ледокол «Надежный».//МС.1897. №6. С.123.

[106] Внутренние известия.//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8（30） января 1895 г. №14. С.2.

[107] Иессен［К.П.］. Пароход-ледокол «Надежный».//МС.1897. №6. С.123.

[108]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173.

[109] ПСЗ. Собрание второе. СПб.1878. Т.51. Законы 1876 года. Отд.1. №55696. С.194-198.

[110] Rosen，*Forty Years of Diplomacy*，vol. 1，p. 134.

[111] N. Basily，*Nicolas de Basily Memoirs*：*Diplomat of Imperial Russia*，*1903-1917*. 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3，p. 20.

[11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9-1916.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М.1958. Приложение №4. С.109-110；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делам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С.63-64.

[113]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делам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89-92.

5 《马关条约》修订的初步结果

当代日本历史学者写道："整个国家，包括天皇在内都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为了遏制民众的愤怒，政府不得不请求天皇下达训谕，要求臣民掩藏显露在外的愤怒。在这段痛苦的岁月里，萌生了新的民族主义。"日本当时的口号是"卧薪尝胆""伺机报复"。[1]同时代人不难发现这种情绪。1896年5月2日，马卡罗夫在向统领俄国海军部的阿韦兰中将汇报时指出："局势日渐复杂，现在，日本人已将俄国视作阻碍国家发展的真正敌人。他们认为，俄国已确立全面阻击日本的目标，目前举国上下对我们怀恨在心。在日本，与俄国开战合民意、得民心，一呼百应。"[2]

事实上，修订《马关条约》条款只会使东京坚定发展武装力量、在大陆重新立威的决心。日本驻华代表林董男爵在总结过往经验时表示："如果需要新式战舰，那么我们就必须不计代价地建造新式战舰；如果军队的组织能力不够优秀，那么我们就必须立即着手改进；必要时，我们应调整整个军事体系……如今，日本必须冷静自持，以免引人怀疑；在此期间，我们应当巩固国家权力基础，关注东方动向，洞察时局，伺机而动。日后必会出现合适时机，当那一天到来时，日本将决定自己的命运。"[3]

东京吸取了外交失败的教训，迅速扩充武装力量。早在1871年，在日本进行军事改革之初，日本现代陆军的奠基者山县有朋元帅在编制日本诸岛防卫计划时，已将俄国视为潜在的敌人。[4]现在这个敌人已然浮出水面，但是为了与之抗衡，日本也必须打造现代化陆军、舰队。舰队编制由总排水量为7.9万吨的69艘舰船扩充至总排水量为27万吨的156艘舰船，舰队扩容3.5倍。至1906年舰队扩充计划[5]完成时，日本应当拥有一支由7艘战列舰（其中包括甲午战争的战利舰镇远号）、4艘岸防装甲舰、25艘巡洋舰（其中包括4艘最新型装甲巡洋舰）及145艘鱼雷艇组成的舰队。截至1903年夏，计划基本完成，此时的日本舰队拥有6艘现代化战列舰、1艘旧式战列舰、6艘装甲巡洋舰、19艘不同型号的巡洋舰及74艘鱼雷艇。[6]

在此期间，日本陆军兵力激增。1894年1月1日，日本和平时期的陆

军兵力总计60942人，其中包括2476名军官和58466名士兵。[7]1895年，日本师团的编制大幅增加，并且成立了新的军。一年多以后，到了1897年，战时状态下的陆军兵力增加了近1/3（58353人），达到149995人。[8]1896年4月1日，明治天皇颁布军队重组法令，要求在7年内将步兵师团由7个增加至13个，增设炮兵中队并配备现代化山地炮、野战炮和迫击炮。日本陆军的优势在于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和平时期，日本中队定员136名士兵；经过动员，可增至236名士兵，借此日军的战斗力可大幅提升。此外，预备役部队的待命时间延长至四年零四个月，在1904年战争爆发前，日本所有（！）的军事骨干均经历过甲午战争的洗礼。[9]

截至1904年1月1日，和平时期的日本现役部队总计150745人，其中军官8082人，士兵142663人。战前十年间，日军人数增加了89823人，换言之是十年前的2.5倍。[10]在战时状态下，日本军队下设323个大队、99个骑兵中队、190个炮兵中队（配备1140门火炮），共有军官16874人、士兵358319人。若算上预备役和地方军，陆军人数可达到519996人。事实上，日本的征兵人数和预备役人数远高于预测水平，或可达到1185000人。除此以外，征集却未启用的后备力量多达1542000人，其中755000人应征进入部队，300000人进入地方大队。战争结束前，在俄日战争的舞台上——中国东北、朝鲜和萨哈林岛战区总共聚集了442000人。[11]

日本武器基地产能相对薄弱。在东京有两家步枪厂（和平时期日产能为300支，战时为700～1000支），在大阪有一家火炮厂（生产野战炮和山地炮）和两家火药厂（生产无烟火药）。[12]截至1903年5月1日，日本的13个师团均配备1897型新款连发步枪和1898型速射炮，其中连发步枪共计19.5万支，每支步枪配300发子弹；速射炮共计750门（50门/师团），每门火炮配120发炮弹。[13]显然，对于一心备战的东京，这些准备仍旧不够充分。为了弥补国内的产能缺陷，东京加快国外采购步伐。1896～1904年，为了筹备陆地战争、完善后备力量，日本政府计划拨款81679409日元。然而截至1903年1月1日，实际开支已超过1.2亿日元。[14]对于陆地战争具有重要意义的日本商船增加了1倍以上。如果说，1894年日本商船占世界海上运输总吨位的1%，那么到了1901年，则占2.2%。[15]单纯从数字上看，日本商船总吨位已由167000吨（1893年）增至656745吨（1904年初），并且大部分商船为全新高速或大型（约5000吨）汽轮机船。[16]

[1] Окамото С. Японская олигархия 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М.2003. С.70.

[2] С.О. Мака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М.1960. Т.2. С.201.

[3]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London：Vintage，1989，p. 268.

[4] Окамото С. Ук.соч. С.71.

[5] 日本海军“六六舰队”扩充计划。——译者注

[6] N. Papastratigakis，Russian Naval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895-1904. PhD dissertation，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2006，p. 125.

[7]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391.

[8] фон Реймерс В.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развития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ИЖ. 1905. №9-10. С.964-965；969.

[9] Иммануэль［Ф.］［Б.］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военном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отношениях. СПб. 1906. Вып.1. С.8-9；Свечин А.［А.］，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м данным труда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и други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 Ораниенбаум. 1910. С.20；22.

[1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391.

[11]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404；412；419.

[12] Иммануэль［Ф.］［Б.］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военном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отношениях. СПб. 1906. Вып.1. С.10.

[13] Инабу Ч. Из истории подготовки Японии к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Военные аспекты.//РЯВ. М.2004. С.41-42.

[1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383.

[15] Альконост.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МС. 1915. №5. С.6.

[16] *The Russo-Japanese War*，Complied by the General Staff，War Office.

London，1906，Part 1，pp.39-40.

6 俄国远东政策的巴尔干后方

在远东政策变得活跃的同时，俄国极力维护欧洲和平。与此同时，巴尔干形势已然发生重大变化，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塞尔维亚。自1885年执行冒险政策后，米兰·奥布雷诺维奇（Milan Obrenovic）政权逐渐失去民心。尽管与奥匈帝国缔结了关税同盟，但是该国的经济状况依然举步维艰，工业停留在起步阶段，税负不断增加。米兰的财政政策使王国陷入严重危机。1867年，为了购置军火，米兰首次向外国申请贷款，此次借贷的债权国为俄国。同年，塞尔维亚的负债总计230万法郎。此后，该国借贷的主要对象变为奥匈帝国和德国。结果，1880年塞尔维亚的国家债务增至1600万法郎；1887年增至2.64亿法郎；1895年增至4.14亿法郎。相比之下，政府支出增速相对缓慢。1869年政府支出为1250万法郎；1890年为4620万法郎，1900年为7630万法郎。[1]至于被寄予厚望、与奥匈帝国合作的铁路项目，在世纪之交，塞尔维亚也仅完成了570千米的建设工程。[2]

1887年4月，米兰·奥布雷诺维奇在与奥地利使臣谈话时坦言："您知道吗，除我以外，在塞尔维亚找不出第二个亲奥派，因为贵国导致我的国家彻底破产了。我道德败坏，他们都认为我是叛徒。在此情况下，我要离开塞尔维亚，管它如何呢。"[3]当然，米兰耍了滑头，他一直在努力维持政权。1889年1月2日，他被迫实施新宪法，该宪法与1869年宪法相比更具自由主义倾向。然而，这些让步并没有改善他的处境，于是他开始思考如何将手中政权卖个好价钱。1889年3月6日，为了自己年仅13岁的独子亚历山大，米兰被迫退位。离开前，米兰与议会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他每年可获得30万法郎。此后，令该国臣民无比喜悦的是，这位35岁的"唯一的亲奥派"放弃了盘踞21年的王位并且离开了塞尔维亚。[4]维也纳方面对事态发展走向极为不满。此后不久，奥地利外交大臣卡尔诺基（Кальноки）在评价该事件时指出："没人能比米兰国王更善于对付塞尔维亚人了。"[5]

奥地利外交大臣具有如此立场，完全不足为奇。1889年2月9日，在退位前夕，米兰与奥匈帝国签署秘密协定，将1881年签署的奥塞密约有效期延长至1893年，到那时他的继承人将成年。亚历山大·奥布雷诺维奇（Alexander Obrenovic）继位后，成立了以里斯蒂奇（Ristic）为首的

摄政组织。政府则由激进分子格鲁伊奇（Grujic）将军领导。政治流亡者陆续回国。在将政权正式移交给亲俄派的同时，米兰为自己的继位者提前定下了对奥方针。作为交换，维也纳方面继续为奥布雷诺维奇家族继承塞尔维亚王位保驾护航。[6]他们不仅令奥匈帝国满意，而且令德国满意。德国外交大臣毕洛夫（Bülow）回忆道：“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的米兰国王，虽然由于自己的轻举妄动而给奥地利造成了许多麻烦，但是他一直都是奥地利的追随者，他从奥地利那里获得了丰厚的补贴……米兰离开了令他感到无聊的贝尔格莱德，他在多瑙河畔的卡普亚——在美丽而快活的维也纳享受生活，偶尔去巴黎旅行。在政务方面，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紧随父亲的脚步。因此，维也纳对他们的表现十分满意。”[7]

事实上，米兰在巴黎和维也纳大肆挥霍所得补贴，偶尔申请追加借款，并且以回国相威胁。1891年，他提出希望回归故土、回到儿子身边。以此作为交易筹码，若要他放弃此举，则应支付200万法郎的“赔偿金”。塞尔维亚政府向圣彼得堡申请贷款。亚历山大三世断然拒绝：“我不相信，米兰能够信守承诺不返回塞尔维亚。在他收下这200万法郎后，他将继续哄骗我们，哄骗塞尔维亚。”[8]沙皇的判断是正确的。1892年，因米兰签署了与儿子断绝亲属关系、放弃塞尔维亚公民资格的文件，议会向其拨付百万法郎。在得知此事后，亚历山大三世一针见血地骂道：“米兰真是卑鄙无耻，竟然签署这份文件！”[9]1893年4月3日，亚历山大·奥布雷诺维奇成年，摄政时代终结。1894年1月，米兰返回贝尔格莱德。他十分担心儿子依赖里斯蒂奇等政客。回国后，米兰统帅陆军，开启了陆军的现代化征程。在父亲的建议下，亚历山大重新推行1869年宪法。在越来越多的不满声中，米兰被迫再次离开贝尔格莱德。[10]此时，塞尔维亚正在缓慢地脱离奥地利的主导，偏离原定路线。

保加利亚的情况也与塞尔维亚类似。获得英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支持的斯塔姆博洛夫（С. Н. Стамболов）专政，尽管不受农民待见，却得到了商界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支持。斯塔姆博洛夫逐渐被自己的政策所牵制，成了它的“人质”。为了支持保加利亚伟大的民族思想，他虽然在保加利亚与土耳其的关系上做出了让步，但是拒绝支持马其顿革命党。1889～1891年，贝尔格莱德方面和雅典方面屡次劝说斯塔姆博洛夫在马其顿进行势力范围的友好划分，以便在该省形成统一的反土阵线。他不仅拒绝了该提议，甚至还向奥斯曼政府透露此事。作为回报，他获得了苏丹的许可，允许在斯科普里、奥赫里德和比托里的保加利亚都主教管辖区内开设都主教讲坛。于是，保加利亚人在马其顿的关系网

逐渐扩大。[11]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希腊人在发展民族学校方面自然未受如此“礼遇”[12]。尽管起步较晚，但得益于斯塔姆博洛夫的运作，保加利亚的教育在马其顿开始蓬勃发展。

1865年，在马其顿仅有1所塞尔维亚学校；1866年增至6所；1867年增至32所；1868年增至42所。1889年，第一本塞尔维亚教科书在伊斯坦布尔出版。此后，塞尔维亚学校不再遭到迫害。1895～1896年，在马其顿分布着157所塞尔维亚学校（6831名学生、238名教师）。事实上，其中80所学校（3958名学生和120名教师）位于原塞尔维亚国土。也就是说，这些区域是塞尔维亚居民的聚居区。在都主教的庇护下，保加利亚学校后来者居上，很快便从数量上赶超了塞尔维亚学校。1896～1897年，在马其顿已开设843所保加利亚学校，学生人数达31719人，教师人数达1308人。此外，还有14713名儿童就读于保加利亚幼儿园。[13]应当指出，保加利亚革命者积极干预教育进程，在潜在争议地区试图驱逐异国民族学校和教会代表，其中最活跃的当属1893年在塞萨洛尼卡成立的“内部马其顿革命组织”。该组织致力于团结马其顿和保加利亚，其成员自诩为1870年代中期解放运动的继承者。斯塔姆博洛夫的政策并未受到他们的欢迎。来自马其顿的移民对保加利亚的政治精英阶层和军官团体产生了巨大影响。

由于土耳其在马其顿做出了让步，斯塔姆博洛夫主张保加利亚与土耳其敦睦相交，同时以保加利亚反俄派大公被扣留为由激怒反俄派，后者陷入歇斯底里，斯塔姆博洛夫的政策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不满。1891年3月27日，亲俄分子在索非亚市中心刺杀斯塔姆博洛夫，而后逃之夭夭。[14]此后，独裁者不再信任本国警察、军队乃至首都居民，在鼓励告密的同时，展开大规模镇压。因此，在1893年末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斯塔姆博洛夫反对者人数激增。1894年5月31日，依靠军队和拉乔·彼得罗夫（Рачо Петров）将军登上皇位的科堡的斐迪南一世罢黜斯塔姆博洛夫，这为俄国与保加利亚恢复正常关系提供了可能。[15]对于同时代人而言，一切都很明了：科堡不再需要这位政客，王子也抛弃了他。[16]当然必须做好善后，摆脱独裁者遗留下来的问题。

多数被监禁的亲俄派重获自由，特尔诺沃都主教克利缅特（Климент）也走出了监狱。部分移民获准重返家园。独裁者斯塔姆博洛夫的大部分财产被查封。同时，由于出国护照申请被拒，他也无法走出国门。1895年7月15日，斯塔姆博洛夫在索非亚的大街上被淬毒的弯

刀砍伤头部，留下了致命伤。此次暗杀的主使是马其顿革命者。18日，保加利亚前任独裁者去世。[17]在去世前，他谴责斐迪南一世是这宗谋杀案的幕后黑手。在料理了斯塔姆博洛夫后，斐迪南一世独掌大权。在治国方面，他遵循两个原则："分而治之"和"人尽其才"。

科堡王子是一名工于心计、善于钻营的政治家。他的施政原则是以维护个人权力为前提的。终结了前任君主——巴滕堡的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1885年政变令斐迪南一世记忆犹新，并且使他变得敏感多疑。此外，关于政变的记忆使其内政和外交风格具备了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对后来的诸多事件造成了重大影响。[18]与"全保加利亚沙皇"相熟的特鲁别茨科伊（Г. Н. Трубецкой）回忆道："斐迪南不爱自己的人民。在评价他们时，他毫不避讳地表达自己的轻蔑之情，而我不得不聆听他的这些言论。"[19]在本国臣民的背后，在外国人面前，这位君主确实不克制自己，时常出言嘲讽本国臣民。[20]他刻意推行瓦解国家政治精英阶层的政策，以期使其投靠并依附于自己，最终收归己用。[21]在俄国许多人不曾重视斐迪南一世，但是专家提出警告："科堡的王子们始终都在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既定目标。"[22]这个目标就是权力。

斐迪南一世认为，保加利亚人民只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发财。对贪污受贿和其他滥用职权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亲自赦免这类罪人，在背后收集他们的名单以防万一。在斐迪南一世看来，这就是保加利亚统治者的任务。斐迪南一世断言，当他们占总人口的10%时，君主就安全了。[23]自斯塔姆博洛夫当政之后，国内诽谤、贪腐之风盛行，这为达成上述目标提供了便利。斐迪南一世管理风格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偏爱恶行、不好美德，因此他喜欢让那些因滥用职权甚至犯罪而被自己亲自宽恕或赦免的人围绕在自己身旁。此外，他还认为唆使敌对政党及其领袖相互迫害并不可耻。"保加利亚人终将宽恕我的罪行，但是，他们永远无法原谅我将科堡送上了保加利亚的王位。"[24]

1895年2月，斐迪南一世宣布自己的长子——1894年出生的鲍里斯王子改信东正教，此子为他与波旁-帕尔马的玛丽亚·路易莎（Maria Luisa）公主的婚姻结晶。让后代按照天主教仪式受洗是这场联姻的条件之一。保加利亚宪法规定，只允许登上王位的第一任大公不信仰东正教。承认科堡王子是第一任大公已属破例，而巴滕堡的亚历山大一世也是如此。如今，科堡希望巩固王朝势力，与俄国恢复正常邦交，扶植一名东正教继承者，以期图谋俄国君主之位。1895年7月，特尔诺沃都主

教克利缅特率代表团向亚历山大三世之墓敬献花环。虽然此次拜访属于私人行为，但是大主教克利缅特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接待。克利缅特以“宗教界和人民”的名义请求尼古拉二世宽恕“保加利亚的错误”，并且“向公国释放善意，恢复对公国的强大庇护”。[25]作为回应，尼古拉二世给予他“恢复与保加利亚一如既往友好邦交的希望”[26]。

俄国告知波尔图，承认科堡的斐迪南是保加利亚大公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1896年1月30日，奥斯曼苏丹承认了他保加利亚大公的地位。2月14日，鲍里斯王子按照东正教仪式受洗，尼古拉二世成了他的教父。梵蒂冈的反应极为消极，禁止斐迪南一世踏入天主教堂，直至其长子成人。[27]在鲍里斯受洗的同时，俄国外交代表[28]和土耳其代表抵达索非亚。他们的来临意味着保加利亚已经摆脱了被孤立的境地。[29]俄国恢复了与保加利亚的外交关系。1896年3月，科堡首次出访君士坦丁堡，苏丹接待了他并且授予其马希尔[30]头衔，相当于土耳其的陆军元帅。[31]继宗主国奥斯曼土耳其正式承认附属国领主后，同年5月，俄国、德国、英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希腊、比利时等国陆续正式承认斐迪南一世为保加利亚大公。当月中旬，各国代表纷纷向斐迪南亲王递交国书。[32]在土耳其局势急剧恶化的背景下，俄国与保加利亚的关系最终稳定了下来。

[1] L. S. 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 New York：NYU Press，2002，p. 459.

[2] Шемякин А.Л. Идеология Николы Пашич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и эволюция（1868-1891）. М.1998. С.18.

[3] Киняпина Н.С. Балканы и Проливы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 XIX века.（1878-1898）. Изд-во МГУ. 1994. С.104.

[4] 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p. 457.

[5] Ламздорф В.Н. Дневник 1891-1892. М.-Л.1934. С.70.

[6] Киняпина Н.С. Ук.соч. С.106-107.

[7] Бюлов Б.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Л. 1935. С.98.

[8] Ламздорф В.Н. Дневник 1891-1892. М.-Л.1934. С.62.

[9] Ламздорф В.Н. Дневник 1891-1892. М.-Л.1934. С.160.

[10] 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pp. 451-452.

[11] 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p. 521.

[12] Киняпина Н.С. Ук.соч. 1994. С.115.

[13] *The Other Balkan Wars：A 1913 Carnegie Endowment Inquiry in Retrospect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Recollections on the Present Conflict by George F. Kennan*. Washington，1993，pp. 25，27.

[14] 此次刺杀未创伤斯塔姆博洛夫，却误杀了财政大臣赫里斯托·贝尔切夫。——译者注

[15] 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p. 438.

[16]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894. №6. С.840.

[17] 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p. 438.

[18] George Buchanan，*My Mission to Russia and Other Diplomatic Memories*，vol. 1. London：Little，Brown，1923，pp. 70-71，83.

[19] Трубецкой Г.Н. Рус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1914-1917 гг. и война на Балканах. Монреаль. 1983. С.46.

[20] Папанчев А. Едно престъпно царуване. Фердинанд I Цар на Българите. София. 1923. С.27.

[21] Цар Фердинанд Съвети към сина. София.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 издателство «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 1991. С.22-24.

[22]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894. №6. С.840.

[23] Цар Фердинанд Ук.соч. С.28.

[24] Киняпина Н.С. Ук.соч. С.116.

[25] Столети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Пб. 1902. С.196.

[26] Киняпина Н.С. Ук.соч. С.120.

[27] Папанчев А. Ук.соч. С.36.

[28] Tcharykow，*Glimpses of High Politics*，p. 228.

[29]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896. №3. С.411.

[30] 奥斯曼土耳其高级军官的一等军衔。——译者注

[31] Киняпина Н.С. Ук.соч. С.121.

[32] Столети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197.

7 博斯普鲁斯还是远东？

在俄国完成进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技术筹备工作之际，沙皇尼古拉二世有意试探欧洲各强国的反应。截至1895年，黑海舰队已编入5艘装甲战列舰、2艘鱼雷艇、1艘鱼雷巡洋舰，另有2艘鱼雷艇在建。根据1895年的规划，计划再建1艘装甲战列舰（波将金号）和2艘排水量均为5600吨的巡洋舰。[1]俄国的战列舰已经完全实现现代化：叶卡捷琳娜二世号建于1888年；锡诺普号建于1889年；切什梅号建于1888年；十二使徒号建于1892年；三圣人号建于1895年；胜利者圣乔治号建于1896年。[2]舰队实力强大，装甲舰武装32门12英寸舰炮和40门6英寸舰炮，总齐射量超过12吨，达12257.6千克。

奥斯曼土耳其的舰队编入了6艘大型装甲舰，排水量为6400～9120吨（俄国装甲舰的排水量为8443～13318吨），及10艘小型装甲舰，其中较大的1艘排水量为4887吨，其余9艘排水量为2000～2760吨。在土耳其的众多装甲舰中，仅有1艘哈米迪耶号（6700吨）竣工于1892年，但是该舰采用的仍是老旧的设计方案，其余舰船均建于1874年前。[3]土耳其舰队无法以如此实力对抗俄国。自1880年代后期起，为实现海军现代化目标，苏丹政府通过了若干项计划，如向法国、德国采购巡洋舰、鱼雷艇和炮舰，于1889年建造2艘潜艇，然而这些计划执行得并不充分，有些计划甚至未能实现。为了节约资金，停泊在金角湾港口的多艘装甲舰甚至被解除了武装。在此情况下，如需出海，至少需要准备三天。分散在各个港口的土耳其鱼雷艇多被解除武装，既无船员驻扎，也无煤炭、弹药储备。土耳其采购的潜艇结构不佳，无法下潜。此外，海峡区域沿岸的炮兵连也无法正常作业，因为早在1880年代末炮台和火炮就已老化失修。[4]

与土耳其舰队相比，俄国的装甲舰队优势显著。俄国的海上实力足以摧毁土耳其的海岸防御。1895年3月8日和16日，万诺夫斯基将军主持召开黑海军事筹备问题特别会议。会上，他指出："根据大会海军代表（海军统帅奇哈乔夫元帅和黑海舰队司令科佩托夫中将——引者）的声明，黑海装甲舰队存在的意义在于我们能够在任意时间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不惧沿岸现有的炮兵火力。如有必要，在占据合适位置后，我们的装甲战列舰将打击沿岸炮台，在短时间内浇灭他们的气焰或完全摧毁

它们。”[5]

装甲舰和鱼雷艇主要用于护送陆战队、实施就地掩护。[6]俄国舰队还编入了水星纪念号巡洋舰（1882年开工建造，6门6英寸舰炮），以及萨肯船长号（1889年开工建造）、卡扎尔斯基号（1890年开工建造）、亲兵号（1895年开工建造）鱼雷巡洋舰，它们足以应对博斯普鲁斯海峡（总长度28.5千米，平均宽度650 米，最大宽度3.3千米）的布雷任务。[7]俄土战争末期，在君士坦丁堡指挥俄国警备舰的马卡罗夫曾对海峡的水文条件和洋流方向进行过详细勘察。[8]此外，俄国在黑海还拥有2艘老式岸防装甲舰——“波波夫型岸防装甲舰”——诺夫哥罗德号和海军中将波波夫号。

为了运送陆战队，需要招募13艘汽轮机船组成志愿舰队。1895年夏，据军方估算，若征用9艘汽轮机船，则可同时运载441名军官和16500名士兵。[9]很快，舰队的运输能力大幅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在1888～1896年编入志愿舰队的13艘船舶中，有6艘是1895～1896年买进的。[10]在国家的支持下，类似的采购大多可以实现。国库给予志愿舰队高额补贴，每年拨付资金近60万卢布。[11]这些汽轮机船都是由享誉世界的英国造船厂建造的，每航次可运载25350人。[12]此外，隶属于俄国航运与贸易协会的33艘汽轮机船和12艘纵帆船也具备较为可观的运输能力。在不配辎重的情况下，可运载1611名军官和48541名士兵；在搭载辎重的情况下，可运载1517名军官、23432名士兵、7373匹马和4899辆板车。[13]但是，存在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它们大多常年在境外航行，若要在黑海聚集足以运载陆战队的船舶，且避开敌人耳目，无论如何都很难办到。[14]

为了更加了解作战地形，在黑海舰队司令科佩托夫（Н. В. Копытов）中将的提议下，自1892年夏天起，舰队的军官开始冒充游客陆续前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实施侦察，其中包括参谋长、舰艇编队高级指挥官和低级指挥官、战列舰指挥官、远洋炮艇指挥官、鱼雷运输舰指挥官及水星纪念号巡洋舰指挥官共计3名将官和14名校官。俄国对希腊群岛水域和岛屿的研究也活跃了起来。[15]与此同时，部队在登陆演习中不断积累经验。1890年，演习结果已令沙皇感到满意；1891年，黑海舰队将演习目标设定为在12小时内完成装甲舰的起航准备工作，而敖德萨军区司令部则将演习目标设定为缩短作为陆战队先锋的13师的动员时限至1昼夜内。此时，只剩下某些技术问题有待解决。由于志愿舰队中

的大部分船舶常年处于航行状态，必须解决运输工具的集合问题、陆军与海员的相互配合问题。[16]

1894年12月，黑海海岸防御委员会（成立于1885年）开始着手解决最后一个问题。科佩托夫中将掌握行动的总指挥权。按照最初的计划，陆战队第一梯队的人数应为1.6万~2.3万，配备火炮148门（其中包括36门重型火炮、20门9英寸迫击炮、20门重型和20门轻型6英寸机关炮、20门炮塔炮及32门57毫米口径的速射岸防炮）。[17]1895年夏，陆战队的编制最终确定，其中包括51个营（第13步兵师和第15步兵师的全体兵力、第14步兵师的一个旅、第4步兵旅、1个要塞炮兵营及2个工兵营）、4支哥萨克部队，总计3.5万人，以及80门野战炮、1816匹马和432辆板车。部队运输、登陆所需的一切物资均配备齐全，同时还配备了2~3周的储备物资。[18]

海军技术委员会鱼雷事务总监察员助理、海军中校茨维斯基（Г. Ф. Цывинский）参与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进攻计划的制订过程，并且对其做出了准确而细致的描述："俄国假托演习集合之名，行登陆演习之事，将执行登陆任务的若干个师运送至高加索的一个港口。这支部队由黑海舰队护送。在运输舰上搭载火炮、迫击炮及其炮架——在敖德萨生产的'专用资源'（约100门火炮——引者），为此需要动员黑海商业舰队的全部力量——志愿舰队、俄国航运与贸易协会等。在约定时间，黑海沿岸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电报线路突然全部中断，整支舰队驶入大海，朝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而非高加索方向行进。舰队在夜间闯入并强渡海峡，行至比尤克德雷[19]附近抛锚。"[20]为了迎击在72小时后可能抵达的英国地中海舰队，尾随战舰的运输舰必须协助陆战队上岸，布置雷炮阵地。

委员会会议结束后，茨维斯基被派往马尔马拉海的王子岛实施侦察，他伪装成一名参加当地游泳节活动的游客。据他评价，在黑海方向覆盖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的7个土耳其要塞的位置极差，俄国舰队可在半小时内通过射程范围，攻入土耳其的要塞后方。这位军官回忆道："总参谋长的看法是正确的，强渡博斯普鲁斯海峡不难，难的是防守从南部进攻的舰队（英国舰队——引者）。"[21]因此，在开展军事行动前，俄国陆军部和海军部最担心的就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英国爆发冲突。1890年代初，这种威胁是切实存在的。伦敦方面对本国的军事实力相当自信。1891年9月，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表示："如果俄国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派遣陆战队，它必然无法抢先于英国占领达达尼尔海

峡，因此它难逃成为战俘的命运。”[22]

1890年代初，英国海军部决心正视此问题。英国人仔细研究了俄国黑海舰队的军力增长情况，相应的，通过补充收编新舰船来提升本国地中海舰队的实力。1890年，除鱼雷艇外，地中海舰队的战舰数量由22艘增加至27艘（其中包括11艘装甲战列舰、2艘装甲巡洋舰、1艘装甲冲击舰和13艘无防护战舰），大口径舰炮数量从150门增加至190门，船员人数从5500人增至7700人。1890年，据俄国专家估算，这支舰队的实力比俄国黑海舰队的实力（3艘装甲战列舰、2艘波波夫型岸防铁甲舰、6艘炮艇、3艘巡洋舰和14艘鱼雷艇、61门大口径舰炮、近3000名船员）高出3倍左右。[23]当然，英国舰队司令不可能将本国所有战舰都派往君士坦丁堡，而枉顾后方安危，放弃对埃及、马耳他岛、直布罗陀海峡、塞浦路斯岛、达达尼尔海峡沿岸阵地的掩护。据俄国专家估算，在宣战后的第5天，除鱼雷艇外，英方从马耳他岛驶出的4艘装甲舰、4艘巡洋舰和1艘鱼雷运输舰将靠近博斯普鲁斯海峡。[24]

是的，一天后，这支舰队的战舰数量将大幅增加，装甲舰增至7艘，装甲战列舰增至3艘，无防护战舰增至7艘。此外，随战舰一同抵达的还有鱼雷艇和运输舰的运煤船。决定俄国陆战队能否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是时间因素。[25]在大口径重型舰炮方面，英国比俄国略胜一筹（25门口径10～16.5英寸的舰炮对22门口径10～12英寸的舰炮）；在中口径舰炮方面，英国对俄国具有压倒性优势，114门对33门。[26]1891年的敖德萨军区司令部报告指出：“以我方的舰炮瓦解英国人在小口径舰炮上的压倒性优势是绝不可能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我方舰队和陆战队抵达海岸的同时，必须交给他们足够数量、相应威力的火炮，用以武装我方海峡占领区沿岸高地。对此，最实用的当属6英寸远程炮、野战炮和迫击炮。其中后两种类型的火炮机动性强，几乎可以在任何地点使用且无须架设炮台或建造大型防御工程，因此优势显著。”[27]在鱼雷发射管方面，英国优势突出，力压俄国，104具对43具。为了弥补这种差距，俄国应当在海峡沿岸安装鱼雷发射管。[28]

由此可见，俄国舰队有能力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是若要守住海峡沿岸，则要赶在英国人抵达前建好沿岸炮台，以此作为防御支撑。在英国政客和海员看来，若以如此方式整合部队，时间因素将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英国通过领事机构和商业船舶密切监视俄国黑海舰队和志愿舰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英国海军部的计划，一旦俄方舰队在博斯普鲁

斯海峡方向出现危险性集合或准备登陆海峡沿岸。这些军事行动很难不被发现，英国地中海舰队在收到加密电报后的48时内必须驶离马耳他岛前往达达尼尔海峡。[29]在计算英国人抵达海峡的时间上，俄国人与英国人存在24小时的差异。在1890年代后期，时间问题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时移世易，伦敦方面未必干涉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可能爆发的冲突。

英国计划的弱点在于舰队的行动缺乏大规模陆军部队的快速支援。英国陆军分布各地：印度、埃及、东方和非洲殖民地及本土。当时普遍认为，英属印度陆军实力最强，但是这支部队向印度境外至多能派遣3.5万人（很快，在布尔战争中便证明了这一点）。至于本土陆军军官人数不足，未经训练的人员占2/3。[30]至此，英国舰队逐渐丧失了因特拉法加海战在世界海洋上所确立的主导地位。毫无疑问，它绝对是全球最强大的舰队。1897年，为了纪念维多利亚女王“钻石周年纪念日”，在斯皮特黑德海峡举行了海军检阅，21艘装甲战列舰和54艘巡洋舰接受检阅。[31]截至1897年，虽然英国舰队已拥有62艘排水量超过5000吨的装甲舰，但是潜在对手的实力与之旗鼓相当（排水量超过5000吨的装甲舰，法国有32艘，俄国有18艘；德国有12艘）。[32]作为世界海洋帝国，英国在整个19世纪对世界交通线一贯奉行绝对掌控政策，然而这项政策并非始终适用。

技术上的进步极大地提升了军事造船业的复杂程度，缩短了军舰的过时期限。事实上，各国都在建造装甲舰、巡洋舰、鱼雷艇驱逐舰和鱼雷舰。这场竞赛的局限因素只有一个，即国家财政能力，舰船变得越来越昂贵。[33]到了19世纪末，在欧洲出现了一批新的海上强国。1890年代，这些国家——德国[34]和意大利[35]成功地执行了各自的海军计划。新一轮军备竞赛影响到了老牌强国。自1880年代末之后，奥地利舰队的预算缓慢而持续地增长。[36]1887年，西班牙通过了一项为期10年的造船计划，耗资2.25亿比塞塔（5625万银卢布）。根据该计划，西班牙将建造185艘舰船，其中包括6艘装甲舰、3艘装甲甲板舰、1艘鱼雷巡洋舰、138艘鱼雷艇及其他舰船。[37]

在这场海军军备竞赛中，法国依旧是英国的竞争对手。[38]1895年，法国海军有7艘装甲战列舰（另有2艘在私营造船厂）、3艘岸防装甲舰（另有2艘在私营造船厂）、3艘一等巡洋舰（另有5艘在私营造船厂）、6艘二等巡洋舰（另有4艘在私营造船厂）、1艘鱼雷巡洋舰、2艘

侦察通信舰和1艘潜艇在建并即将竣工。除此以外，在私营造船厂还有2艘三等巡洋舰、2艘鱼雷侦察通信舰、1艘炮艇、7艘远洋驱逐舰、26艘一等驱逐舰和8艘雷击艇在建。[39]

在欧洲以外还出现了新兴的强大舰队。截至1890年，巴西作为拉丁美洲率先组建庞大舰队的国家之一，已拥有53艘军舰，其中有9艘装甲舰、5艘巡洋舰、16艘炮艇和13艘鱼雷艇。[40]1893～1894年的内战使巴西舰队蒙受了些许损失，但是共和国又重新订购现代化装甲舰。[41]当时，在这片区域正在进行军备竞赛。阿根廷[42]和智利[43]也组建了强大的舰队。同样地，远东海军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甚至中国也组建了一支完全现代化的舰队。[44]在这支舰队覆灭后，北京于1895年通过了一项舰队重建计划。按照该计划，清政府拟建6艘装甲舰、12艘装甲巡洋舰、20艘二等和三等巡洋舰及4艘重型雷击舰。事实上，上述所有战舰都是在德国建造的。[45]

日本迅速而自信地扩建了本国海军。1893年2月11日，在上一轮海军建设计划结束之际，日本天皇颁布诏书阐明加强捐输、发展舰队的必要性。同年秋天，国会通过了一项造船计划。根据该计划，近期将在英国建造2艘装甲舰，在日本建造1艘巡洋舰和1艘通信船。[46]1894年，俄国某位观察员指出："日本舰队实力连年增长。"[47]日本在1891～1897年的海军开支为：1891年7430432日元（占预算支出的9.64%）；1892年9063206日元（11.25%）；1893年11339011日元（13.85%）；1894年10444273日元（13.03%）；1895年13704871日元（15.37%）；1896年38352386日元（19.82%）；1897年76807172日元（30.22%）。[48]

在与中国爆发战争前，日本就已订购了装甲战列舰，其中最大者的排水量可达12450吨，其实力与英国该等级最强大的战舰不分伯仲。[49]1897年，该系列第一艘战舰富士号装甲战列舰下水并在英国通过测试。[50]不久后，第二艘战舰八岛号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同年秋天，从英国向日本运输这些装甲舰的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51]

最初，日本在欧洲订购了3艘装甲舰，但是其中1艘应在日本施工。此外，日本还在欧洲订购了2艘一等巡洋舰，并且计划在日本新建2艘巡洋舰。[52]结果，到了1898年，天皇的舰队在英国有3艘装甲舰、3艘装甲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在建；在法国有2艘装甲巡洋舰在建；在德国有1艘装甲巡洋舰在建；在美国有2艘装甲巡洋舰在建。[53]到了1902年，在

建舰船的数量达到了54艘，总排水量达到45890吨；到了1906年，在建舰船的数量增至63艘，总排水量增至69895吨。这为计划的加速实现创造了可能。[54]此外，日本舰队还应收编11艘鱼雷艇驱逐舰和115艘鱼雷艇。军费开支给日本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截至1906年，日本的军费开支超过5.37亿日元，中国的赔款2.61亿日元几乎都用在了国防上。[55]

某些大国如美国的舰队发展呈蓬勃之势。1890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14年的舰队发展计划。该计划设想，截至1903年，在建舰船应有227艘，其中包括100艘鱼雷艇、10艘一等远洋装甲舰、8艘限量载煤一等装甲舰、20艘二等和三等装甲舰、39艘不同类型的巡洋舰。[56]在此之前，美国舰队境况糟糕，“几乎没有一艘军舰可令美国政府夸口，甚至与欧洲主要强国的三等战舰抗衡”。[57]作为对比，不得不提的是这支舰队在1890年仅拥有1艘远洋鱼雷艇和1艘二等雷击艇。在临近水域及沿岸专门执行岸防任务的鱼雷艇队的持续扩容很能说明问题。[58]1890年代中期，美国舰队虽然处于扩张状态并且拥有各级舰船，但是其实力依旧不如德国，甚至在军官和水手人数上也是如此，13460人对21387人。[59]

虽然上述海洋强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妄图统治世界海洋，但是它们中的每个国家都试图掌控“属于自己的”一方水域。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指出：“事实上，在英国以外建造的每艘军舰对我们而言都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它加强了海上势力平衡。”[60]这种局面完全不符合伦敦的利益及其海军战略学说，大英帝国的政策面临新的挑战。各国军舰数量的增长，详见表7-1。[61]

表7-1 1883年、1897年各重要国家装甲舰数量变化情况

单位：艘

国家	1883年的装甲舰数量	1897年的装甲舰数量
英国	38	62
法国	19	36
德国	11	12
俄国	3	18
意大利	7	12
美国	0	11
日本	0	7

由此可见，在1883年，英国装甲舰的数量几乎等于其余国家的装甲舰数量之和（38艘对40艘）；到了1897年，英国的这一优势消失了（62艘对96艘）。不仅如此，前景更糟。如果说美国在1898年仅拥有6艘现代化装甲舰，那么与西班牙开战则迫使华盛顿加速海军建设，于是到了1905年美国就已拥有12艘现代化装甲舰，另有12艘在建。[62]任何一个帝国不可能在方方面面都立即达到强盛。1893年，英国被迫在暹罗（泰国）问题上对法国做出让步；1895年又容忍了德国、法国和俄国在远东的联合示威及美国在委内瑞拉的活动；1897年默认了美国吞并夏威夷群岛；1898～1899年默许了美国继美西战争后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领地扩张。最终在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时期，根据1901年和1902年的条约，伦敦被迫承认在建的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由法国转移至美国。事实上，1901年和1902年的条约消除了英国在这条未来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上的影响力。[63]

1901年春，索尔兹伯里政府第一任财政大臣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在一次私人谈话中阐述了英国表现得出人意料的软弱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握紧拳头，那么我们将拥有一股强大、有效而隐秘的力量……但是，我们帝国的利益分配使这件事变得几乎没有可能。"[64]俄国在亚洲持续扩张的铁路网已对印度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在伦敦看来，这是个极大的问题。为了确保印度的防御安全，军方对兵力的需求越来越多。[65]过去，英国只在欧洲面临利益威胁，此时不同往日，局势已然改变。此外，世界海洋的利益分配也遭遇了大洗牌。如果说过去英国只需寻求一个陆地盟友，那么现在伦敦则不得不寻求一众盟友重新划分海上交通责任区（依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缔结的《地中海协定》《英日条约》《英法条约》等）。

此时的英国舰队已经失去了往日纵横四海的强大实力。英国海军上将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坦言："在远海水域，英国驻军的实力过于薄弱乃至无法作战；军舰的航速过于缓慢乃至无法脱身，换言之，它们已经老化过时了。基于实力因素考量，这些英国舰船的存在只是往日辉煌的证明。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顶级战舰都集中在了欧洲水域。以实力惊人的拉芒什舰队（海峡舰队）为例，该舰队拥有165艘军舰，其中包括11艘一等装甲战列舰、5艘一等巡洋舰、13艘二等巡洋舰。"[66]的确，该舰队的"责任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整个大西洋。

1890年5月，英国将地中海舰队一分为二，一支驻扎在直布罗陀海

峡，另一支驻扎在马耳他附近海域。迫使英国做出如此决定的原因在于法国已将舰队的精锐力量聚集在了土伦，而俄国舰队的实力也有所增强。英国之所以分割地中海舰队，是为了创建两支彼此独立的舰队，一支用以对抗地中海西部的法国舰队，另一支用以对抗可能向海峡发起进攻的俄国舰队。[67]另外，英国人还必须时刻关注俄国地中海小型分舰队（1艘装甲战列舰、1艘巡洋舰、4艘远洋炮艇和4艘鱼雷艇）的动向。自1894年12月开始，这支舰队奉命驻扎地中海东部海域，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停留。[68]1890年代中期，英国地中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在马耳他。当然，这支舰队本身是由完全现代化的战舰组成的。1896年，这支舰队迎来了新成员——11艘装甲战列舰，其典型问题是装甲甲板薄。[69]当这些战舰试图挺进达达尼尔海峡或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雷炮阵地时（这是俄国陆战队应当并且能够在短时间内布置完成的），面对敌方猛烈的炮火，它们注定会因机动能力不足而损失惨重。

1892年3月1日，威廉二世在与英国驻德国武官斯温上校交谈时表示：根据德国情报机构在俄国南部，特别是在塞瓦斯托波尔获得的情报可知，俄国正在筹划建造输送部队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交通工具。在此情况下，德皇格外关注志愿舰队的扩张情况及俄军在黑海的登陆演习。援引德国军事代表团军官的观点，他警告英国上校，一旦俄国展开登陆行动，土耳其人不会做出激烈的反抗。[70]德皇问道：“如果俄国即将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贵国的海军上将（地中海舰队司令——引者）会怎么做呢？他会启程强渡达达尼尔海峡吗？如果他这样做，那么贵国舰队在1877～1878年所积累的道德影响力就完全派不上用场了。在此情况下，相当于把整个西地中海交到法国人手中，任其摆布。”[71]

德皇的算计十分明显。事实上，他并没有隐藏自己的意图，反而竭力提醒伦敦警惕法国海军对英国的利益及其盟友（主要指意大利）所构成的威胁。柏林表示，德国、英国和奥匈帝国应当联手支持意大利，否则英国对亚平宁半岛的影响力恐完全消失。尽管威廉二世当时已经享有一定的声誉，但是他的劝说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1892年3月，针对索尔兹伯里的询问，英国陆军、海军情报部门领导层提交了一份关于不宜在东地中海远端区域调动舰队的备忘录。情报部门提出这一建议的主要依据是1888年法国舰队的中坚力量已从布列斯特换防到了土伦。英国海军部担心，一旦发生冲突，将无法保卫本国冗长的交通线。[72]备忘录的判断引发了首相的双重考量。

一方面，他质疑陆军和海军判断的正确性，是否高估了法国舰队的实力；另一方面，索尔兹伯里对《地中海协定》寄予厚望。根据协定，伦敦方面可以获得来自盟国的援助。[73]但是，与1878年不同，此时伦敦不能完全指望奥匈帝国的支持（意大利及其陆军不在考虑范围内）。在未经柏林批准的情况下，维也纳既不会冒险，也不会有所动作。威廉二世对俄国远东政策的走向十分满意，并且不打算将彼得堡的注意力吸引到巴尔干地区。因此，英国没有可靠的大陆盟友可与之共同对抗俄国。唯一令德皇不安的是英国与俄国可能达成协议。[74]

与此同时，1894年土耳其再次爆发危机——“亚美尼亚”危机。根据《圣斯特凡诺条约》第16款之规定，苏丹必须立即在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地区实施改革。此后，《柏林条约》的第61款又对此加以强调：“土耳其政府必须毫不拖延地改善亚美尼亚地区的生活条件，推行符合当地需求的改革，保障亚美尼亚人的安全，使其免遭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的迫害。土耳其帝国必须定期向各监督国汇报为实现此目标所采取的各项措施。”[75]于是，在圣斯特凡诺所确定的土耳其在亚美尼亚问题上对俄国所承担的义务已经扩展到了所有欧洲国家。最终，改革依旧未能进行。1878年初，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再也不想容忍议会对政权的限制和监督了，因此他解散了对自己唯命是从的议会。

苏丹声称：“我犯了一个错误，即想要效法我的父亲阿卜杜勒·迈吉德，依靠信念和自由主义制度实现改革。今后，我将追随祖父马哈茂德苏丹的脚步。现在，像他一样，我明白了，只有依靠武力，才能统治上帝托付给我的臣民。”[76]此后，他便开始实施臭名昭著的“祖鲁姆”——压迫制度。在国内建立了密不透风的间谍与告密体系，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都必须承担这项义务。严苛至极的报刊审查制度和官方的书信暗查制度（邮局不接收装在密封信封中的信函）成了控制臣民思想的有效机制。[77]就这样，君主的个人权力取代了中央政府制度。1885年7月4日，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怀特（W. White）向索尔兹伯里报告称：“波尔塔（对土耳其政府的称谓——引者）已是徒有虚名，政权完全集中在皇宫。”[78]

1876年改革的发起者遭到了镇压。1876年12月23日宪法的起草者——米德哈特帕夏被苏丹“赦免”。返回土耳其后，他首先被任命为叙利亚省总督，而后被任命为士麦那省（现伊兹密尔）总督。1881年，米德哈特被指控策划暗杀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最初，米德哈特在法国领事

馆避难。后来在威逼利诱下，他被哄骗了出去。最终，他被判处死刑，而后改为终身流放阿拉伯半岛。这位大维齐尔[79]先被押送到了塔伊夫（麦加南部山区的一个城市），而后被运至巴格达，1884年被处死。[80]失败的改革家的首级被当作“礼物”送给了苏丹。在没有外力压迫的条件下，土耳其政府绝不打算履行改革义务，更何况，它还有理由担忧改革的实施会削弱日渐衰落的奥斯曼帝国。

1880年9月7日，德国、俄国、英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法国的大使先后向土耳其外交大臣递交照会，建议土耳其政府履行《柏林条约》第61款，推进改革的有效实施，为西亚美尼亚的和平与安宁提供保障。[81]作为回应，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决定“通过消灭亚美尼亚人来解决亚美尼亚问题”，并且以此作为行动方针。随着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难民不断涌入亚美尼亚诸省（1878～1884年为812193人。1884～1897年又增加了202822人。在此情况下，1897年帝国人口达到了39096294人[82]），为了创建新的省份，不得不变更行政区域边界，结果，基督徒成了少数派。土耳其官员曾公开表示，绝不允许形成“第二个保加利亚”。国外观察员一致认为，亚美尼亚人的处境正在持续恶化。[83]

1891年，在游牧民族库尔德人中间发起了一项建立非正规骑兵——哈米迪耶军团的改革，该骑兵军团由40支部队组成。这个军团的首要任务是监视俄国与土耳其边界、土耳其与波斯边界及境内那些不完全忠于土耳其的地区。[84]在组建库尔德军团时存在的问题是，尽管部落收下了武器和资金，却不提供可靠的支持或哥萨克式的非正规骑兵。土耳其政府对它们的掌控也十分有限。在许多地区，狂热的军团开始互相翻起了旧账、挟私报复。[85]尽管如此，改革仍在继续。截至1899年，哈米迪耶军团63支部队已经拥有兵力5万人。[86]

1886年8月，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向土政府提交了一份西亚美尼亚改革问题备忘录，然而这一外交举措毫无成效，但是伦敦方面也没有继续跟进。参照保加利亚人在巴尔干地区所发挥的作用，英国外交部的某些外交官希望，亚美尼亚人将来也能够在小亚细亚发挥同等作用，即对于腐朽堕落的波尔塔而言，成为介于本国领土与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无论这些计划听起来多么诱人，但是在欧洲大陆深处，英国的影响力（或者武力认可度）十分有限。英国的图谋使俄国忧心不已，因此对于保护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俄国态度消极、行事懈怠。[87]于是，在这种图谋算计和行事风格的影响下，列强在1880年代末至1890

年代初遭遇了“亚美尼亚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列强在土耳其的对抗达到了顶峰，其中德国与英国在小亚细亚铁路特许权问题上的对峙最为激烈。虽然出乎意料，但是对抗就这样发生了。

1886年11月，索尔兹伯里访问君士坦丁堡。在与苏丹会晤时，他试图说服苏丹恢复大规模的铁路建设计划并且委托欧洲（英国）工程师监理。尽管阿卜杜勒·哈米德对此表示支持，但是后来没有下文。[88]无论如何，与英国人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在奥斯曼帝国的铁路建设方面，伦敦成就不高。1856年，在《巴黎和约》缔结后，英国幼发拉底铁路公司宣告成立，这家公司负责建造一条连接波斯湾、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与地中海沿岸的铁路。但是，这个计划有始无终。1858年，英国公司在士麦那地区修建了一小段铁路，而后就失去了资金来源。1871年，德国人尝试建设另一段铁路，但是很快他们就放弃了，被迫将公司股权转让给了一家英国-希腊合资公司。自1888年8月，连接奥斯曼帝国首都与维也纳的铁路竣工，这条干线途经巴黎和柏林，但是不经过该帝国的亚洲省份。因此，在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尚未形成规模可观的铁路网络。[89]

1888年6月，英国驻君士坦丁堡代办向本国政府报告称，英、法金融家的行为令阿卜杜勒·哈米德感到失望，现在他倾向于德国，原因很简单，后者对中东未提出特殊要求。事实上，德国的大资本家也曾举棋不定，然而在1888年9月2日收到了来自俾斯麦的保证后，他们不再犹豫（事实上，他们仍旧有所顾虑，因为总理拒绝保证在这个国家投资）。[90]在保证中，俾斯麦表示该项目将得到德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全力支持。23日，德国公司获得了首个铁路建设特许权，该公司有权扩建伊斯坦堡-伊兹密特铁路至安哥拉（今安卡拉）。最初，英国金融家同意加入该公司，因为伦敦方面认为这对自身影响力不构成特殊威胁。[91]

1887年7月25日，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怀特起草了一份题为《土耳其铁路亚洲段英国各版本施工方案评述》的备忘录，其中明确了英国在针对该问题制定政策时所应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小亚细亚的铁路建设应当符合英国的切身利益；第二，政策应当符合英国领导阶级的利益，同时在铁路建设过程中，必须排除向法国或者俄国移交铁路建设权的可能。[92]至于德国在土耳其的影响力，在英国外交部看来，它是友好的，并且注定不如英国，光荣地排在第二位。1887年11月，英国驻德国武官在一份特别报告中指出，在商业和军事方面，德国在土耳其能够对英国构成严重威胁。这份报告被忽视了。[93]

这是个错误，只是后来才被察觉。

1880年代初，德国开始积极渗透土耳其。自1883年起，以威廉·冯·德·戈尔茨（Wilhelm von der Goltz）将军为首的德国军事代表团开始对土耳其军队进行改组；1887年，在德国大使馆的积极运作和贿赂下，土耳其军队重新武装，配备上了德国的毛瑟枪。[94]1889年11月，威廉二世出访奥斯曼帝国首都。德国外交部强调，这完全是一次私人访问，是皇帝地中海旅行计划的一部分。由于此时德英两国正处于和睦时期，与德皇同行的赫伯特·俾斯麦亲王认为有必要接见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并且向德皇保证伦敦与柏林在该国的利益分配方面不会发生分歧。实际上，这是一次勘察行动。在此过程中，年轻的德国皇帝对土耳其的发展前景深信不疑，并且暗下决心要使土耳其成为德国工业与资本的进军目标。[95]在得出这一结论后，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已然成了柏林的关注对象。

与此同时，阿卜杜勒·哈米德推行的制度引发了一场又一场危机。事实上，持续增加的库尔德骑兵已经脱离了当地政府的控制，对基督徒发起了恐怖袭击。敲诈勒索、抢劫掠夺、强行搬迁，这些土耳其人所惯用的传统管理手段导致越来越多的亚美尼亚人逃离边境、进入俄国。此后，库尔德人占领了这些无主之地。土耳其政府对这一结果似乎并不满足。[96]自1890年起，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活动接连发生：1890年在萨姆松；1891年在安卡拉。1893年，奥斯曼地方政府要求生活在沙逊的亚美尼亚村民纳税。此前，由于亚美尼亚村社已向哈米迪耶军团缴税，他们拒绝二次缴税。作为报复，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袭击了沙逊，摧毁了附近的村庄和城市。根据成员包括俄国、英国和法国领事在内的国际委员会的统计数据可知，在这场屠杀活动中近900人丧生。[97]

1893年10月5日，英国驻埃尔祖鲁姆领事向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报告称：“先生，我有幸向您汇报，生活在该省边界地带的亚美尼亚人正在源源不断地移民俄国……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如果不受政府阻挠或者政府不在通往边境的道路上设置障碍，那么许多亚美尼亚人还将从内地移民境外。”[98]列强建议在土耳其辖境内的亚美尼亚地区实施改革：设立总督管辖区，确保基督徒参与行政管理，缩小哈米迪耶军团的行动范围。面对此项提议，苏丹回应道：“此案将以流血告终。”显然，此前发生的惨案对于土耳其君主而言，由于规模不足，不算流血事件。1894～1895年，在小亚细亚发生了亚美尼亚大屠杀。在此期间，近30万人遇

难。19世纪末的英国历史学家指出："希俄斯、叙利亚、保加利亚、亚美尼亚，这些名称是与土耳其人在过去的3/4个世纪里最典型的事迹息息相关。"[99]

1895年8月，土耳其的暴政遭到了英国的严厉谴责。在欧洲六大强国（英国、俄国、法国、奥匈帝国、德国、意大利）的抗议下，苏丹被迫于1895年10月20日签署诏书，宣布在西亚美尼亚进行改革。然而，这只是一纸空文。这份诏书的出现招致了新一轮的暴虐与杀戮，这场大屠杀始于君士坦丁堡，在1895年的最后三个月里，它席卷了小亚细亚的15个省，其中规模最大的屠杀活动发生在帝国的首都、布拉特宗、埃尔祖鲁姆、迪亚巴克尔、比特利斯和桑尼乌法。在这场令行禁止的大屠杀中，警察和宪兵都参与其中。在这惨绝人寰的24～48小时里，杀戮完全建立在了宗教的基础上，即最大限度地消灭亚美尼亚-格列高利人群。地方政府向亚美尼亚人提供的唯一救助就是允许他们皈依伊斯兰教。[100]

苏丹军队的军饷经常被挪作他用。例如在1895年，军队只获得了4个月的军饷；在1896年的3～9月，军队只获得了1个月的军饷。[101]因此，军官和士兵完全具备参与抢劫的动机。在大屠杀过程中启用了整支军队，有时甚至还调用了炮兵连。亚美尼亚俘虏遭遇了非人的折磨，大批俘虏被活活烧死，掠夺而来的财物在市集随意贱卖。[102]1895年11月11日，德国驻土耳其大使萨尔玛男爵表示："目击者一次次地从那里传回消息，这些消息令人毛骨悚然。埃尔祖鲁姆近郊变成了硝烟弥漫的废墟和荒漠。时至今日，这些村庄的某些地方还在着火。在埃尔祖鲁姆，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就那样弃置荒野，任凭野狗啃食……最后一次大屠杀发生在迪亚巴克尔，其惨烈程度完全超过这里。据法国大使叙述（在那里驻扎着一支较大的法国领事代表团），死难者人数难以估算，因为大量死尸被扔到了燃烧的火堆中。这一切简直惨不忍睹，在偏僻的小巷，在十字路口，他们像对待羔羊一样残害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人。"[103]

数十年来，土耳其政府一直奉行驱逐、消灭西亚美尼亚原生基督徒的针对性政策。对于君士坦丁堡而言，这一政策终于结出了令人满意的果实。[104]根据奥斯曼帝国颇为有限的统计数据，1881年，埃尔祖鲁姆省的亚美尼亚人口为136147人（土耳其人口105565人）；1887年，这些指标分别为106768人和428495人（土耳其人口与库尔德人口之和）；1890年分别为109819人和441671人；1892年分别134967人和

500782人。[105]显然，这还不够，基督徒人口略微显露的增长趋势引起了土耳其政府的警觉，于是土耳其人通过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屠杀活动成功地削减了亚美尼亚人口，特别是在农村。

唯一能够躲过恐怖袭击的办法就是穿越俄国边境。大批亚美尼亚人越过边境，涌入埃希米亚津和梯弗里斯。1896年12月23日，随之而来的是为难民筹措资金的最高法令。难民人数为4.3万～5万，近2600座城市和村庄遭到破坏，568座教堂和修道院被毁，328座教堂和修道院被改建为清真寺。[106]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瓜分了无主的土地。大屠杀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根据俄国领事的说法，到了1898年，在凡省的两个区，在大屠杀发生前登记的919个亚美尼亚院落只剩下291个；与此同时，库尔德人的这一指标从21个增加到189个。[107]土耳其对死难者的官方统计意味深长，8.8万名亚美尼亚人遇难，1293名穆斯林遇难。[108]这说明，为此显然没有必要组织抵抗或起义。

1896年春，沙逊的历史在橄榄城重演。但是，这里的亚美尼亚人组织了防御，击退了掠夺者，甚至还围困了当地的守备部队。在英国大使馆的积极干预下才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屠杀活动。1896年6月，土耳其地方政府在凡城山区策划并实施了一场屠杀活动。8月26日，为了激发人们对本民族生存状况的关注，为了表示抗议，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策划攻占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信贷银行。该银行13点被占领，24点被肃清。经过谈判，恐怖分子被带到了土耳其城外，而后在首都爆发了一场针对基督徒和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屠杀持续了2天。据英国大使馆统计，在这场屠杀中约5500人丧生。[109]具体的死难者人数无法统计，因为大量尸体被沉入海底，乘坐外国船只的目击者在君士坦丁堡港口目睹了这些极其恶劣的场面。[110]俄国代表团对最后一次大屠杀的评价与英国人如出一辙。

8月31日，俄国驻土耳其武官向彼得堡报告称：“在君士坦丁堡，两天内有5500余名毫无自保能力的亚美尼亚人遇害，其中许多人是其他教派的基督徒。确切地说，这场屠杀是政府借有组织的匪帮之手在警察局官员的领导下实施的。在外交使团，特别是我们大使的果断干预下，昨天和今天都较为平静，但是骚乱仍未平息。”[111]根据美国某位情报人员提供的信息可知，土耳其当局事先已掌握了奥斯曼信贷银行即将遭遇劫持的情报，但对此未加阻止，取而代之的是在筹备大屠杀。[112]俄国记者写道：“面对银行遭遇劫持的消息，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居民比土耳

其人更为震惊。他们完全没有做好自卫的准备，在动乱的风波中，对意外的恐惧笼罩着所有亚美尼亚人。突然间，亚美尼亚人不受法律保护了。无论他们出现在哪里，都成了被追打的目标。”[113]

该事件的俄国目击者称：这不是小打小闹的冲突、纷争，而是战争，是对起义的镇压，这简直就是穷凶极恶的、令人作呕的、大规模的杀戮，对人类的猎杀。至少，在我们能观察到的城市的某一区域里就发生了这样的屠杀；但是，我们从别处也听到了同样的消息。[114]在这场猎杀中，30～40名被误认为是亚美尼亚人的希腊人、欧洲人和土耳其人也惨遭杀害。法国目击者在证言中指出，在这场屠杀中存在一句特殊的暗语，即“君主允许杀死亚美尼亚人”[115]。短时间内，这座城市的亚美尼亚居民在经历了杀戮、逮捕、驱逐及其他形式的迫害后，减少到了7.5万人。[116]

关于土耳其人组织的这场大规模的“人类猎杀”的结果，列强看法一致，但是仅此而已。无论是彼得堡还是巴黎，都不支持英国以海军示威为威胁的企图。前者不愿激化海峡地区的局势；后者则希望保全债务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至于德国，威廉二世在亲信的小圈子里表达了对屠杀事件的愤慨，同时向苏丹声明：“镇压亚美尼亚起义是君主的权力。”[117]结果，在俄国的提议下，列强决定采取姑息措施，每个国家向君士坦丁堡派遣第二艘警备舰（依据与土耳其的协议，军舰可在首都泊地长期停留）。必要时，警备舰船员将组成一支军队，在无法阻止大屠杀的情况下，保护欧洲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118]

对于苏丹而言，屠杀事件的唯一后果是彻底地沦为欧洲的“无赖”，格拉德斯通公开称呼阿卜杜勒·哈米德为“杀手苏丹”。此前，索尔兹伯里曾在议会中表示，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支持土耳其对抗俄国，真是下错了赌注”[119]。在1856年《巴黎和约》签订40周年之际，此话并非只是回顾往事，而是在向欧洲表态。1895年，索尔兹伯里提出已经没必要在海峡区域筹备对抗俄国的事宜了，他的观点在政府中得到了无条件支持。[120]是的，此后他才发表上述言论。令首相大为恼火的是海军的固执己见和他们对法国舰队危险性的评价。1896年1月，他发表声明，宣称与美国爆发战争“比未来俄法结盟更可能变成现实”[121]。

此时，英国舰队司令部持不同观点。为了掌握在海峡区域本国舰队针对俄国可能实施的行动予以反击的筹备情况，索尔兹伯里发出了若干封询函。针对第一封询函，舰队司令部的反应极为消极。此后，针对重

新发出的若干封询函，海军部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允许进攻并摧毁驻扎在土伦的法国舰队，顺便说一下，在那里还停泊着3艘俄国装甲战列舰。应当说明，在这一时期，英国海军司令部（约翰·费舍尔、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唯恐敌舰从土伦出发进攻直布罗陀-马耳他交通线或者从比塞大（位于突尼斯的法国海军基地）出发进攻马耳他。第二，由英国或与英国交好的国家接手土耳其在达达尼尔海峡上的防御工事。对于英国史学者格伦维尔的见解，我们很难提出异议："事实上，正如索尔兹伯里所预见的那样，这意味着英国将无法及时抵抗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122]

尽管索尔兹伯里主张积极对抗俄国，但是舰队司令部和内阁均提出反对，这迫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123]应当指出，这一进程始于1891年，此时英国几乎对与德国维持伙伴关系不抱希望。[124]此外，除了俄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占优势，俄国铁路网的延伸，特别是在突厥斯坦总督区的延伸对此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25]索尔兹伯里在1897年1月20的信函中指出：通过海峡的防御状态（防守严密的达达尼尔海峡与几乎开放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苏丹"宁愿遭受俄国的入侵，也不愿接受西方列强的援助"[126]。客观起见，必须指出，据俄国军方评价，达达尼尔海峡防御薄弱，根本无法抑制英国舰队。[127]然而，英国首相则更倾向于听信本国专家的评价，并且以此为基础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在无随行军舰反击陆地炮台的情况下，对于任何以舰队强攻为手段强渡达达尼尔海峡的想法，我们的海军专家都极为反对。如果这样的话，我认为应当放弃英国独自强渡达达尼尔海峡的想法。"[128]

1896年底，博斯普鲁斯海峡侵占计划的命运得以确定。"亚美尼亚危机"为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计划的顺利实施创造了适宜的条件。圣彼得堡犹豫不决。1895年7月5日，该计划的起草者之一、远洋作战的拥趸奥布鲁切夫将军在奏章中再次强调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然性和复杂性："显然，将来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必须做一件事：通过能够直接攻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强大陆战队证明我们反土耳其军事行动的实力。这场战役是艰难的且极其冒险的。但是，从我们的黑海港口到君士坦丁堡36～40小时的航程，这段距离远比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陆路行军距离要短得多。时间的选择与突袭的时机更多地掌握在我们手中。此外，无论如何，在海上我们的兵力损失会更小，并且后方也没有完全堕落的奥地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君士坦丁堡实施陆地突袭怕是要比迅速而突

然地进攻博斯普鲁斯海峡更为冒险。”[129]他提议，为了增强运输舰队的实力，应该建造一批专门用于运输骑兵、步兵、炮兵及其装备的国有舰船。另外，他还提议完善炮兵预备役和布雷兵预备役制度，以便在两三年后培养出可用之才。[130]7月6日，上述提议得到了沙皇的全力支持。[131]

1896年2月25日，为了商议陆战队的组成人数和作战兵力的最终分配问题，陆军元帅古尔科主持召开特别会议。参会者包括陆军大臣、海军统帅、财政大臣、海军司令部和总司令部的首长、敖德萨军区和黑海舰队的司令及陆军和舰队的一众校官。从整体上看，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了运输问题上。尽管志愿舰队和俄国航运与贸易协会的汽轮机船总量足以完成运输任务，但是参会者普遍认为，它们无法在黑海港口悄无声息地完成集结。与此同时，奥布鲁切夫提出的补充买进用作运输舰的汽轮机船的提议也得到了参会者的支持。然而，不愿增加陆军和舰队预算的维特坚决反对该提议。最终，会上通过决议，决定申请购买这些舰船。3月11日，会议主席向沙皇呈递会议纪要，申请获批。[132]就这样，博斯普鲁斯海峡远征计划的实施被再次推迟了。

1896年7月，涅利多夫在彼得堡收到指示，要求他在土耳其推行旨在维持现状的政策。[133]9月18日，他从君士坦丁堡发回报告：“但是至今为止，在亚美尼亚人的努力下，事态进展神速，政治上的崩溃使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认为，维持现有秩序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很可能发生某种形式的政变。这里的局势是如此的动荡不安，以至于大家都能意识到爆发新的骚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不是亚美尼亚人在闹革命，他们曾公开声明，就是穆斯林贱民或不满现状的土耳其人——‘索夫塔’（神职人员——引者）或军人在挑起争端，他们试图发动革命，对此他们都曾公开表态。街头的骚乱一触即发，并且外国殖民者，特别是英法殖民者惶惶不可终日，高声要求本国政府提供庇护。”[134]在此背景下，金角湾的警备舰数量将有所增加，欧洲列强或其他国家的舰队甚至可能闯入马尔马拉海域并且登陆君士坦丁堡，因此，涅利多夫建议调整舰队状态，使之做好出征准备，以便在必要时舰队能够先于英国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135]

东方危机迫使尼古拉二世开启了西欧之旅。[136]1896年9月，沙皇在巴尔莫勒尔城堡（苏格兰）会见英国首相。此事在尼古拉二世的日记中留有简要的记载：“与索尔兹伯里举行会谈。”[137]9月27日和29日两次会谈的俄文版和英文版纪要仍保存至今。[138]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重

点讨论了东方政策问题。索尔兹伯里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此时他已是第三次担任首相了。俄文版会谈纪要显示，在与尼古拉二世谈话之初，他试探性地提议向各国舰船开放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是遭到了尼古拉二世的强烈反对。[139]英文版会谈纪要显示，在会谈之初，尼古拉二世声明，他主张维持现状，在领土方面也是如此；列强中任何国家想要侵占奥斯曼帝国某块领土的企图都将招致其余国家的联合抵制。与此同时，沙皇拒绝支持索尔兹伯里关于推翻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的提议，因为大概不能期待他的继任者将比前任做得更好。[140]

索尔兹伯里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对重蹈覆辙的畏惧将是牵制新任苏丹正常行事的最佳保障。英国首相坦言，他不相信在土耳其的领土上推行“纸上谈兵的改革和宪法”的有效性。此外他认为，只有在列强使馆的监督下，才能确保奥斯曼帝国维持正常统治。随后，对话涉及了关乎英国核心利益的问题——埃及问题。尼古拉二世认为，法国人过于敏感。[141]事实上，索尔兹伯里暗示英、俄两国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若英国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俄国则应在埃及问题上支持伦敦。[142]自1891年夏天起，土耳其多次提议英军撤离埃及，法国为了在该国占据特殊地位对此也并未提出异议。[143]索尔兹伯里不信任执政的赫迪夫，[144]显然想要换掉他，但是若无君士坦丁堡的许可，此事无法独自完成。因此，他追忆往昔，提到了尼古拉一世分割奥斯曼帝国的提议。根据该提议，英国可将埃及收入囊中，法国可将叙利亚据为己有。[145]

回顾历史，尼古拉二世暗示扩大法国的份额是可取的。此后，他强调俄国从未制订过针对印度的挑衅计划。至于波斯和西亚美尼亚，沙皇则强调自己倾向于实施维持现状的政策。他对占领后者的前景并不看好，因为这是一项劳民伤财的事业。并且在他看来，这不仅帮不上亚美尼亚人，反倒会使遗留在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侨民沦为该决议的人质和受害者。与此同时，尽管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在远东将开通一条途经中国东北的铁路，但是沙皇承诺在远东事务上也将奉行维持现状的原则。索尔兹伯里对上述说法未提出反对意见。[146]海峡的未来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沙皇总结道：“俄国没有占领君士坦丁堡或者邻近海峡的土耳其领土的想法。我们只想拥有一扇‘门’，并且具备加固它的能力。”[147]同时他强调，俄国既不打算推翻苏丹，也不打算在地中海打造新的海上强国。[148]

显然，尼古拉二世的立场具有双面特征，对话者也同他打起了太

极。索尔兹伯里提出有必要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特别是法国和奥匈帝国的利益。最后一个理由令沙皇难以保持冷静，他指出，多瑙河君主制仅由执政的君主个人维持，在他逝世后，匈牙利和波希米亚（捷克）及其他斯拉夫省份将独立出来，而哈布斯堡王朝将只剩下“奥地利这块招牌”[149]。索尔兹伯里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是海峡问题除外。他表示，英国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现在完全取决于那些英国无法抛弃的盟友，至少在他与俄国的专制君主交谈时情况如此。[150]如此不寻常的对话可能只意味着一件事：英国不再认为自己在海峡地区是无所不能的了。1897年1月，威廉二世直接询问英国驻德国军事代表，英国与俄国是否正在就分割奥斯曼帝国的问题展开谈判。他所得到的答复是：“得了吧，陛下，您看，我们不能独自为伊斯坦布尔而战，而其他国家也不会为它而战，那么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们。”[151]

继英国之行后，沙皇又赶赴法国。10月5日，抵达瑟堡，随后前往法国首都，在那里法国人举行了热烈的迎接仪式。93万外来人口涌入了200万人口的巴黎。[152]在巴黎发生的一切被称为“俄国周”活动。[153]令柏林、伦敦和彼得堡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法国君主对外交方案的抵制（至少是消极抵制）。法国政府坚决反对俄国的行动计划，他对盟友俄国的最大让步就是同意给予外交支持。[154]然而，该联盟的存在仍然是个秘密，甚至其拥护者在公开场合也不得不称其为“所谓的”联盟。[155]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一切已然明了，许多人都明白，“联盟”这个词与“不变的友谊”这个词组没有显著的差异。[156]

1897年8月，法国总统菲利·福尔（Félix Faure）回访俄国，这为“与”画上了句号。同样地，他也受到了欢迎，尽管气氛没那么热烈。无论如何，这是共和国总统首次访问俄罗斯帝国。[157]8月23日，法国小型舰队——2艘装甲巡洋舰和1艘轻型巡洋舰抵达喀琅施塔得，由此开启了福尔总统对彼得堡及其周边地区的访问之旅。8月26日，在举杯致敬乘波蒂号巡洋舰远道而来的贵客时，沙皇说道：“您的到来为我们两国人民团结友好、众志成城、竭尽全力地维护基于法律和正义的普遍和平创建了新的纽带。”[158]尽管这些话本身很有分量，但是并未使盟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可靠。

不管怎样，1890年代后期，缺乏盟友可靠支持的不只是英国。在此情况下，沙皇尼古拉二世只能暂时舍弃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远征计划，并且在对待土耳其上也选择了传统的“虚弱的邻居”政策。[159]应当指出，

彼得堡方面不相信海军强国不愿采取行动的说辞，时刻保持警惕并且做好了行动准备。是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彼得堡将采取行动。1896年，部分列强向奥斯曼帝国沿岸派遣本国舰船：英国舰队进驻达达尼尔海峡，奥地利舰队进驻塞萨洛尼基海港，法国舰队进驻贝鲁特海港。这清楚地显示了各国为防备土耳其瓦解或分裂而占据的特别利益区域。[160]

1896年11月30日，涅利多夫再次递交了关于占领海峡的必要性的说明文件。[161]12月5日，沙皇在皇村组织召开特别会议，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海军统帅特尔托夫（П. П. Тыртов）中将、总司令部奥布鲁切夫将军、外交部主管希什金、财政大臣维特和被召回俄国的涅利多夫（А. И. Нелидов）出席会议。[162]维特强烈反对在海峡地区采取孤立行动，认为这种做法极其冒险。最终，会上通过决议，只有在欧洲舰队强渡马尔马拉海并且违反禁止军舰进入该海域的国际公约时，俄国才会采取行动。在此情况下，授予涅利多夫使用秘密电报呼叫俄国黑海舰队的权力。这种特别授权足以说明俄国对事态突变的担忧。[163]1897年1月23日，沙皇最终批准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计划。登陆行动的实施范围不会触动君士坦丁堡的利益。同日，尼古拉二世正式批准了行动的总体方案——《对敖德萨军区部队指挥官的集体指示》。[164]

海上行动险象环生，然而海峡危机却未爆发。总之，德国成了系列事件的唯一受益者。1896年9月，威廉二世再次以个人名义出访君士坦丁堡。德国外交大臣比洛随德皇出访，奥斯曼君主病态多疑的人格令他印象深刻：“苏丹特别不信任自己的外交使团、本国的舰队和电力系统。为了防范本国的外国代表机构，苏丹发明了一套复杂的间谍体系。秘书监视使团团长，陆军武官监视秘书，作为同僚的海军武官监视陆军武官，大使监视海军武官……威廉二世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或者不如说，出于自己对苏丹和整个土耳其政府的偏袒，他不想看到这些。”[165]也许，德皇“失明”的原因在于苏丹对铁路特许权问题不抱成见。

德国与阿卜杜勒·哈米德建立联系的时机选择得非常恰当。1893～1898年英国驻君士坦丁堡使馆秘书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回忆称：“自亚美尼亚大屠杀（1893～1896年——引者）发生后，自己的兄弟都认为他冷酷无情，信奉基督教的兄弟自发地访问圣城令他大为恼火。最终，他将修建巴格达铁路特许权交给了德国。”[166]应当指出，对于土耳其人而言，德国在精神上的支持恰逢其时，因为此时他们正担心欧洲列强舰队亮出旗帜，发起进攻。1898年10月18日，德皇夫妇出访

君士坦丁堡。此次出访为国事访问，霍亨索伦夫妇在奥斯曼帝国首都停留了4天。

正是在这次土耳其访问期间，德国工业界争取到了君士坦丁堡至小亚细亚铁路修建特许权，这条铁路奠定了柏林—拜占庭—巴士拉干线（最初的德语名称为Berlin-Bizancium-Basra）的基础。德国人开始驱逐土耳其境内的英国人。英国参与了欧洲列强的海上示威，这激怒了苏丹。在此背景下，威廉二世的数次访问事半功倍，柏林—拜占庭—巴士拉计划也赢得了苏丹的支持。这是一项宏伟的事业，与英国人1856年的构想颇为相似，但是更多的是规模上的相似。在这条铁路干线竣工后，德国可将本国的工业产品运送至波斯湾和红海沿岸（将经由亚喀巴湾港口通向麦加和麦地那的铁路支线考虑在内），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企业家也能从这些地区获得原材料。德国经济蓬勃发展，因此它需要销售市场和原料市场。此后不久，比洛宣称："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想要开拓殖民空间，而在于我们应该开拓殖民地，无论我们是否愿意。"[167]为了延续并发扬1888年在安纳托利亚铁路特许权上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展现德皇与苏丹之间的个人友谊，"3B"计划得以实现。最初，德国的计划未得到充分实施。最终，德国的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在1899年12月24日获得了至巴格达和巴士拉的铁路修筑权。[168]对于柏林和君士坦丁堡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仍未竣工的这项铁路建设工程具有重大意义。

在奥斯曼帝国，德国政策的灵活与伦敦1880年代末的期待背道而驰，德国的政策实施之初便体现出了显著的反英色彩。1899年，比洛在德国国会大厦声明："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外国人神气十足地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世界已经被分割了。'"[169]这些话语与行动相吻合，特别是与柏林建设远洋舰队的计划相吻合。"在海军政策方面，我不过问舰队应该有多大，而会过问它应该有多小。我们即将迎来一场战役。在这场大战逼近德国前，我们必须建造出德国，特别是痴迷于发展海军实力的君主所需的那些舰船。"[170]提尔皮茨回忆道："卡普里维只关心与俄国和法国开战的防御准备工程……他说：首先应当结束'在后天'就要爆发的战争，然后我们才能继续发展舰队。"[171]1890年，卡普里维（Caprivi）接替俾斯麦担任德国首相。这标志着柏林的外交政策有了新方针。同样地，海军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只不过这一过程开始得更早。

1890年代初，德国积极发展商业舰队。此时，德国的商业舰队仅次

于英国，稳居世界第二（779艘对5694艘）；在蒸汽机船方面，超越法国（500艘）和美国（423艘）；在帆船方面，德国落后于英国和美国（1386艘对9277艘和3371艘）。尽管如此，但是帆船舰队的时代已经变为历史。[172]按照当时的逻辑，德国的商业舰队必须掩藏军旗。1889年，威廉二世依据陆军的模式对舰队的管理进行了改革，设立了海军总司令部。[173]

1892～1893年，德国政府通过了1.168亿马克的造船计划。根据该计划，将建造4艘远洋装甲舰、9艘岸防装甲舰、7艘巡洋舰护卫舰、4艘警备舰、2艘驱逐舰。[174]原有的舰队政策即将结束。1888～1889年，德国在造船方面花费了895.5万马克（在帝国海军部花费了206.8万马克，在私营造船厂花费了652.7万马克）。后来，舰队的开支也有所增加：1889～1890年为1081.8万马克（在帝国海军部花费了366.4万马克，在私营造船厂花费了715.4万马克）；1890～1891年为2451.4万马克（在帝国海军部花费了664.3万马克，在私营造船厂花费了1787.1万马克）；1891～1892年，这些指标分别为2598.1万马克、597万马克和2001.1万马克。[175]

1897年，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统领海军部，德国的海军政策几乎立即发生了巨变。为了实现舰队的初步建设，原本计划于1897～1898年拨款建造1艘装甲舰、2艘二等巡洋舰、1艘四等巡洋舰，以3艘现代化巡洋舰替换3艘陈旧的舰船。然而该计划被否决，德皇采纳了新的海军计划，1898年3月23日国会勉强通过了该计划。[176]结果，到了1903年，德国拥有了一支“公海舰队”，它替代了原本只能执行防御任务的舰队：19艘战列舰、8艘岸防装甲舰、12艘装甲巡洋舰和30艘轻型巡洋舰。[177]

随之而来的是德国海军预算的急剧增加。1896～1897年，德国海军预算为1252340英镑（同期英国为8369874英镑，法国为3400951英镑，俄国为2072375英镑，美国为2295811英镑）；1897～1898年，德国的海军预算已增至2454400英镑（同期英国为5193043英镑，法国为3537800英镑，俄国为2530084英镑，美国为2811756英镑）；1898～1899年，该指标已达到2565600英镑（同期英国为9169697英镑，法国为4568676英镑，俄国为2036735英镑，美国为4245255英镑）。[178]这只是未来德国与英国海上对抗的前奏，提尔皮茨坚信，打造强大的舰队是一整代人的事业，他完全不打算在海上与英国对抗，何况此时他的

计划尚未达成。根据他的构想，德国舰队的当务之急是成为向伦敦施压的工具，进而提升德国作为盟友的价值。[179]事实上，自1890年代初期起，两国的实力差距逐渐拉近。截至此时，两国之间几乎没什么差距了。

1895年12月31日，柏林方面收到消息，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代理人詹姆森博士率兵突袭了德瓦士兰共和国，并且企图摧毁它。这项尝试遭遇了可耻的失败。对此，威廉二世犹豫不决，究竟是动员海军陆战队，还是“只是在陆地上”开启反英军事行动。最终，他决定将行动局限在政治游说上。[180]1896年1月3日，他致电布尔共和国的克鲁格总统，祝贺他“不依靠任何友好力量的帮助”捍卫了国家的独立。[181]这令英国外交界感到极为恼火，但是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危机最终还是被压制了。到了1897年，伦敦拒绝延续“地中海协约国”的效力。

这场危机导致德国外交部领导层发生变动，伯恩哈德·冯·比洛子爵接替阿道夫·冯·比伯斯坦（Adolf von Bieberstein）男爵的职位。上任后，他立即收到了霍亨洛埃亲王要求改善与俄国关系的命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改善关系，消除七年前因我们最愚蠢的政策——拒绝续签‘再保险条约’所导致的不良后果。”[182]威廉二世的论述也与他基本相同：“英国人待我如此刻薄，因此，我们才会热切地期望与俄国搞好关系。”[183]1897年8月，德皇在霍亨洛埃和比洛的陪同下造访彼得戈夫，在那里他试图完成这项任务，至少在远东地区使俄国与德国联手。顺便说一下，德皇承诺，在俄国军舰穿越黑海海峡时将予以协助。[184]尽管俄德关系并未实现重大突破，但是威廉显然依旧一意孤行，并且怀着“极大的热情”在土耳其继续实施反英行径。

继君士坦丁堡之后，德皇前往耶路撒冷，于1898年10月29日入城。在敬拜圣墓后，威廉二世11月8日参拜了位于大马士革伍麦叶清真寺内的萨拉哈丁墓。这一时期，英国在中东的处境极为艰难。1898年9月2日，希伯特·基钦纳（Herbrt Kitchener）将军率领2.6万英埃联军在恩图曼会战中击溃了6万马赫迪民兵，并且使苏丹完全服从英国统治。9月19日，英军和沿尼罗河而上的炮艇遭遇了一支由让·巴普蒂斯特·马尔尚（Jean Baptiste Marchand）少校率领的法军部队。这支部队由11名法国军官和150名塞内加尔步兵组成。1896年夏，他们从布拉柴维尔（今刚果）出发，经过14个月的长途跋涉穿越非洲，并于1898年7月10日占领了法绍达（今苏丹科多克）的一处小型黏土堡垒。基钦纳断然要

求法国部队撤离“赫迪夫的领地”，英法战争一触即发。1898年10月底，这场危机得以解除。1898年11月3日，马尔尚收到官方命令，要求他率兵撤离法绍达。后来，法国放弃了对尼罗河上游地区的领土要求。1898年11月初，当伦敦在热烈称赞新贵——喀土穆的霍雷肖·基钦纳时，德皇造访大马士革。联系在击退十字远征军、战胜恐怖的“狮心理查”的勇士坟前所说的话，德皇另辟蹊径，声称：“尊敬的苏丹和分布在世界各地、尊他为哈里发的三亿穆斯林可以完全相信，德国皇帝现在乃至永远都是他们的朋友。”[185]

讽刺的是威廉二世在出发前向索尔兹伯里发送电报，请求索尔兹伯里转达自己对基钦纳胜利的恭贺。[186]在德皇的授意下，大马士革致辞未经修改便发表了，这令陪同威廉二世出行且有意修改致辞的比洛感到十分糟糕。[187]总体而言，德皇出访的奢华阵仗、进入耶路撒冷的盛大仪式、他对苏丹的尊重与敬意，这一切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亚细亚向德国人开放，供其使用。[188]在奥斯曼帝国之外，威廉二世的言辞也引发了连锁反应。1900年，伦敦向科威特提供庇护，按照原定计划，科威特是“3B”计划铁路的终点。[189]德国人无法阻止这件事，但是对于身处困境的苏丹而言，德国的支持是雪中送炭。

1830～1878年，希腊与土耳其因边界问题时常爆发冲突。1879～1881年，曾尝试按照有利于希腊的方式重新划定边界。谈判进行得颇为艰难，但是到了1881年，土耳其最终同意向希腊割让13200平方千米的领土，在其上居住着39万人。对此，双方都不满意，土耳其人因妥协让步而怏怏不乐，希腊人因欲壑难填而牢骚满腹。[190]1895年，克里特岛再次引发危机。根据1868年的组织章程，岛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应为由49名基督徒和31名穆斯林组成的人民会议，基督徒（占岛上人口的4/5，以希腊人为主）与穆斯林（占岛上人口的1/5）权力平等。但是，该章程未落到实处。根据《柏林条约》第23款的规定，苏丹必须在克里特岛上实施改革，将该岛的控制权从臣民手中转移至基督徒总督手中：“土耳其帝国政府必须在克里特岛上认真执行1868年的组织章程；若有变更，需保证公平。在土耳其欧洲部分亦可根据地方需求实施类似章程，但给予克里特的赋税优惠政策除外，同时本条约对行政机构所做之特别规定亦不适用。新章程之规定细则将由土耳其居民广泛参与的特别委员会传达至土耳其帝国各州政府。土耳其帝国政府将对上述组织方案的实施成果进行审查。在指令宣布生效前，土耳其帝国政府须与驻东鲁米利亚的欧洲委员会进行磋商。”[191]

土耳其政府完全未履行上述义务，因此在1885年、1888年和1889年爆发了一系列起义。1895年5月，基督徒亚历山大·卡拉特奥多里（Aleksandro Karatodori）帕夏出任总督，他试图对管理模式实施改革，但遭到了穆斯林的抵制。至于希腊人，除了希腊恢复统一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别无他求。针对该计划，任何让步都被他们视为背叛。[192]两大宗教群体不可能和平对话，甚至共存。1895年9月，岛上发生骚乱，而后迅速演变为公开的起义。12月，岛上成立了反土耳其防御委员会，然而它却无法联合发起游击战争的起义者领袖及其下属部队。

1896年初，总督遭到罢免，土耳其官员瓦利掌权，他下令推迟人民会议的召开。与此同时，土耳其部队陆续登岛。[193]土耳其政府坚称，岛上风平浪静、一切正常，但是岛上的军事部署在持续加强。事实上，在克里特岛上爆发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抢劫横行、暴力肆虐，基督教村庄遭受灭顶之灾。政府对此置若罔闻，事实上，他们对事件的结果感到满意，部队和穆斯林志愿兵组织将希腊人赶入深山，迫使他们离开熟悉的居住地。[194]

该事件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起义，起义领袖宣布与希腊合并。早在1895年，一群年轻的希腊军官在雅典按照“友谊社”（Filiki Eteria）的模式组建了“国家社会”（Ethniki Etaireia）。两年间，其成员人数从60人增加至3000人，代表机构遍布56个希腊城市和83个境外的希腊社团。[195]“国家社会”已经成为援助克里特岛人的中坚力量之一。1897年2月，雅典得到消息：土耳其士兵已经向克里特岛上的希腊人挥动屠刀。这一新闻激发了希腊国内的民族主义热潮，游行示威频繁发生，希腊志愿兵赶赴该岛。1897年2月11日，1500名武装希腊志愿兵登陆克里特岛。[196]

作为对上述事件的回应，希腊政府试图组建巴尔干国家联盟，却无功而返。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不支持雅典关于建立统一的反土耳其阵线的提议。[197]显然，希腊国王惧怕战争并且试图避免战争，但是他更惧怕街头暴乱。最初，雅典寄希望于列强的干预，像从前那样封锁希腊沿岸，使之体面地摆脱危机。也就是说，将不作为归咎于无法抵抗外部敌对力量的干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有悖于伦敦的立场。自亚美尼亚大屠杀发生后，英国的反土耳其情绪极为强烈。这次，曾经以保卫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为名对希腊策划并实施封锁的英国断然拒绝重复这些行为。[198]

英国、法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向克里特岛沿岸水域各派遣了一艘巡洋舰，但是在收到明确的行动指令前，它们只发挥侦察和威慑作用，只有德国拒绝参与海上示威。[199]在外交大臣马歇尔·冯·比伯斯坦制定的第二帝国政策中阐明：“如果我们不前进，那么我们就认真地在反希腊方向上努力。”[200]与本国外交官不同，威廉二世更加尚武好战。他甚至提议对比雷埃夫斯实施海上封锁，摧毁规模不大的希腊舰队，然而德国的提议未得到其他列强的支持。与此同时，独自面对社会舆论压力的希腊政府开始采取行动：向克里特岛继续派遣武装志愿兵，而后派遣希腊的正规军；一支由乔治王子指挥的小型希腊舰队也开始在海岛沿岸展开活动。

达达尼尔海峡周边地区局势的持续恶化再次引发了彼得堡对“欧洲武装干涉土耳其事务”的担忧。1897年1月23日，尼古拉二世批准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远征计划。按照计划，在得到欧洲舰队从地中海驶向君士坦丁堡的情报后，俄国驻土耳其大使应立即向黑海舰队指挥官和敖德萨军区部队司令员拍发电报以作警示，电报内容应为“久无消息”。此后，黑海舰队应当迅速做好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准备（“不以任何形式波及君士坦丁堡”）。登陆行动只能依据沙皇的特别命令推进，在舰队的首次航行中运送兵力30500人；在来自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的104门火炮的护卫下，第二次运兵约23000人，第三次运兵约20000人。[201]

但是，这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1897年3月，外交部对该计划提出强烈反对。拉姆兹多夫不相信，俄国拥有足以支撑该计划的技术保障，他担心该计划一旦失败将产生对俄国极其不利的后果。[202]基于欧洲国家在东地中海似乎达成一致，拉姆兹多夫提出了上述论点。1897年2月18日，列强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克里特问题的解决方案：该岛在苏丹的宗主权下实现自治。这一方案断绝了克里特岛并入希腊的可能。列强给予双方6天时间考虑。最终，土耳其表示接受，希腊表示拒绝。[203]

在海岛周围水域，列强的海军部署明显加强。欧洲舰队规模庞大、实力强盛，事实上与“东方问题”存在利益关系的各方参与者几乎全数到场。匈牙利派遣了1艘装甲巡洋舰、2艘护卫舰和6艘鱼雷艇驱逐舰；英国派遣了10艘装甲舰、6艘巡洋舰、8艘鱼雷艇驱逐舰和5艘鱼雷艇；德国派遣了7艘装甲巡洋舰、2艘侦察通信舰、1艘驱逐舰、5艘一等鱼雷艇和11艘二等鱼雷艇；意大利派遣了7艘装甲巡洋舰、8艘巡洋舰、6艘鱼雷艇驱逐舰；俄国派遣了4艘装甲舰、1艘岸防装甲舰和2艘炮舰；土耳

其派遣了6艘装甲舰、1艘一等巡洋舰和9艘二等巡洋舰；法国派遣了7艘装甲舰、1艘装甲巡洋舰、5艘巡洋舰和5艘鱼雷艇。除了土耳其的战舰和德国的部分战舰外，其余战舰相当现代化。这支舰队的统帅是官阶最高的意大利海军上将。为了防止冲突范围扩大，六国舰队开始对克里特岛实施海上封锁。[204]

威廉二世极力怂恿阿卜杜勒·哈米德发动战争。1897年2月底，在接待处他公开询问土耳其大使："截至目前，为什么贵国部队还未跨越希腊边界？请转告苏丹，如果他珍视我的友谊，他必须有所作为并且竭尽全力。"[205]德皇的支持不仅巩固了德国在土耳其的地位，同时也令土耳其人士气大振，他们在有生力量和组织方面一直优于希腊人。此外，柏林的立场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次列强不会采取实际行动。1897年3月2日，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和雅典发表联合照会，提出了土耳其赋予克里特岛自治权、希腊从克里特岛撤军的提议。苏丹也做出了此类承诺，但是无论是在克里特岛还是在希腊，或是在欧洲，已经没人相信他了。至于雅典，皇室和政府拒绝接受这些提议。[206]

1897年3月15日，希腊开始动员军队，并且在底比斯建立了一个可容纳1万～1.2万人的后备兵营地。土耳其与希腊的紧张对峙以马其顿动乱告终。1889年普查数据显示，在毗邻希腊王国的色萨利，在21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居住着31.2万人，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肥沃的平原上，因此，那里的人口密度非常高，为1415人/平方英里。土耳其人（10%）基本上是地主，犹太人（2%）为城市居民，其余大部分居民是希腊人。1897年4月10日，一支兵力为2500～3000人的希腊志愿兵部队从王国出发攻入色萨利。在突破边境的三个据点并且攻占一系列村庄后，当志愿兵得知土耳其集结大批兵力逼近此地时，他们立即撤退，5天后撤离土耳其。4月16日，他们再次袭击土耳其边境哨所。希腊政府声明无力阻止这些行动，这成了4月17日夜至18日希腊驻土耳其大使要求签发护照的理由。18日，苏丹向希腊宣战。[207]

理论上，希腊唯一的优势就是快速动员的能力。然而在过去的20年间，为了应对马其顿、亚美尼亚和克里特岛危机（1880年、1885年、1895年和1896年），土耳其人多次实施局部动员。在改善土耳其军事系统方面，德国军事代表团发挥了巨大作用。[208]希腊正规军人数稀少：1892年，正规军为28114人；1893年，由于财政原因，政府被迫压缩正规军规模，其人数缩减为22607人。据推测，经过动员，依靠后备

军，希腊军队人数可提升至20万人。应当指出，后备军的训练非常糟糕，无法培养出能力过关的军官和士兵。[209]因此，他们对战争的影响可想而知。1897年4月4日，希腊军队动员完毕，军队人数为66570人，火炮数为136门。与此同时，土耳其军队也在色萨利和伊庇鲁斯集结完毕，军队人数为9.4万人，火炮数为210门。[210]

不久后，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集结了22支野战师，兵力达30万人。[211]此外，阿尔巴尼亚非正规骑兵近1.1万人也加入，很快他们就成了抢劫与杀戮的代名词。土耳其军队开拔了，这支部队装备了马蒂尼-亨利步枪，同时还储备了48万支7.5毫米口径的毛瑟枪和22万支9毫米口径的同系列步枪。在军事行动中重新武装。希腊的海上优势无可非议，拥有3艘炮塔装甲舰、20艘岸防舰及12艘鱼雷艇，然而在军事行动中舰队丝毫未显现出自身的优势。[212]尽管希腊战舰对沿岸地区的堡垒、港口、铁路实施扫射，却无法切断土耳其军队的运输路线。苏丹的舰队只驶出一次达达尼尔海峡，此后舰队的活动仅限于防守该海峡。[213]

希腊人寄希望于保加利亚人的支持，然而希望破灭了。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初，斐迪南亲王身处柏林，马歇尔·冯·比伯斯坦明确地向他指出："希腊人将因自己的冒险政策而遭到应得的痛打，除此之外，他们将一无所获。"事实上，保加利亚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斐迪南一世故作惊讶地问道："难道他近年来没有全力以赴地……强行镇压国内的民族思想吗？"[214]土耳其人沉着冷静，集中力量向欧洲边界的某一区域发力。4月18日至19日，土军的优势已然显现，尽管希军的武装——9毫米口径的毛瑟枪明显优于敌军，但是土耳其步兵仍然沿着整个战线向前挺进。4月23日，希军开始撤退。

撤退途中，希军的劣势迅速暴露：缺乏训练有素且在士兵中享有威望的军官，缺乏严格内在组织关联的志愿军立即失去秩序，与其说志愿军是来巩固正规军的，不如说是来瓦解正规军的。战争仅持续了30天。在兵力和数量比上均优于希军的土军，在色萨利和伊庇鲁斯屡次重创希军。5月6日至7日，希军四散而逃，彻底陷入混乱。土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可以说德国军事代表团功不可没。5月17日，土军前进1254米，抵达两国原来的边界。在雅典爆发了反政府运动，乔治一世请求俄国出面调停。土军逼近温泉关，这对希腊首都构成了真正的威胁。[215]

在此情况下，尼古拉二世致电阿卜杜勒·哈米德，提议停止军事行

动，同时表达祝愿，“希望看到土耳其强大、繁荣，能够维持所辖领土的秩序与安宁”。苏丹赞成沙皇的提议，并且在电报回文中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俄国的大力支持将帮助土耳其从既得的成就中获得应得的利益”[216]。5月20日，经过一系列和谈，希腊与土耳其订立停战协定。此后，列强着手解决克里特岛问题。1897年5月8日和17日，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伯爵与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戈洛夫斯基（A. Gołuchowski）伯爵互通书信，达成维持巴尔干半岛现状的秘密协定——《俄奥协定》。这份密约暴露了两国在海峡政策、奥地利驻扎新帕扎尔郡、建立阿尔巴尼亚王国（这是奥地利的提议）的前景等方面存在的严重分歧，但是两国均拥有合作意向并且约定未来将达成更为具体的协议。[217]戈洛夫斯基渴望尽可能长久地在该地区维持现状。后来，他是这样阐述自己的信条的：“第一，应当尽一切可能避免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爆发冲突；第二，若爆发此类冲突，应制止它们蔓延。”[218]

1897年5月，对克里特岛的海上封锁日趋严密，土耳其军队和希腊志愿军被迫撤离该岛。此后，根据英国、俄国、奥匈帝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协议，列强出兵海岛。[219]为了维持局势稳定，首次登陆早已发生。1897年3月24日，首批俄国部队——第十四步兵团的一个营抵达此地；随后，日托米尔团的一个营和第六山地炮兵连抵达此地实施增援（部队大约每年换防一次）。他们为控制俄国统治区——岛上的4个区提供了保障。[220]1898年夏，一支由2名军官和20名骑兵宪兵组成的宪兵队在此增援俄国“考察队”，随后一支黑山部队（40名士兵和2名军官）加入，共同保卫在这些区域的4个俄国领事馆。这些部队解除了当地居民的武装，重新建立起了统治秩序。[221]

后来，在确保岛上穆斯林居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的前提下，苏丹承认克里特岛拥有自治权。在苏丹任命的总督的管辖下，国际军事力量应确保岛上的和平与安宁。[222]俄国最初提名的总督候选人是黑山公国大公的亲戚，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了采蒂涅和贝尔格莱德的强烈抵制。因此，尽管土耳其提出反对，俄国与英国还是提名由希腊国王之子乔治王子作为总督候选人，法国与奥匈帝国也拥护这一提议。最终他于1898年11月被任命为克里特岛总督。[223]

在与希腊的和谈过程中，土耳其要求希腊支付战败国赔款并且割让色萨利全境。最初，第二个条件只得到了德国的支持，然而到了1897年秋，德皇建议苏丹放弃不合理的领土主张。1897年9月，希腊（其利益

由欧洲六国大使代表）与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签署了一份初步协约。经过对这份协约条文的最终核定，12月4日，两国签署正式和约。根据和约，土军撤离在军事行动中占领的色萨利领土，仅保留几处战略要塞和一处村庄。当然，这只是象征性的收获。[224]希腊被迫支付军费，其中包括苏丹的军队因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开支，此笔款项共计100万土耳其磅。此外，希腊还应支付赔款。[225]

在列强的干涉下，赔款金额从1000万降至400万土耳其磅（9200万法郎）。[226]即便如此，这些条款也令希腊濒临金融破产。1898年3月29日，希腊被迫在俄国、英国和法国的担保下举借1.7亿法郎的外债。此后，在雅典成立了一个国际监管委员会，旨在监督希腊政府正确地偿还借款和其他债务。[227]在化解了希土危机后，苏丹承诺在马其顿推行改革。战争结束后，阿尔巴尼亚人以斯拉夫居民和塞尔维亚周边地区居民为目标的恐怖活动急剧增加。大部分从前线归来的阿尔巴尼亚人坚信，即使犯罪，自己也可以逍遥法外。[228]就这样，可能引发新一轮战争的巴尔干危局暂时得到缓解。

[1] Моисеев С.П. Список кораблей русского парового и броненосного флота（с 1861 по 1917 гг.）. М.1948. С.17.

[2] Моисеев С.П. Список кораблей русского парового и броненосного флота（с 1861 по 1917 гг.）. М.1948. С. 279-280.

[3] Широкорад А. Крах босфорской авантюры.//Наваль. Сборник общества истории флота. М.1992. Вып.2. С.47.

[4] Кондратенко Р.В. Мор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С.265-266.

[5]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далее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205.об.

[6]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далее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205.об.

[7] Моисеев С.П. Ук. соч. С.285-289.

[8] С.О. Мака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М.1953. Т.1. С.276-278；280-282；309-320.

[9]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177.

[10] Поггенполь М. Очерк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Добровольного флота за время 25-летнего 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Пб. 1903. С.233；Приложение

к С.234.

[11] Огородников С.Ф.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развития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орск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за сто лет 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1802-1902 гг.）. СПб. 1902. С.241.

[12] Айрапетов О.Р. Забытая карьера «русского Мольтке».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Обручев（1830-1904）. СПб. 1998. С.277-278.

[13]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Л.177.об.-178.

[14]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Л.215.об.-216.

[15] Асиновская М.Ю. Военно-морская разведка на Балканах в период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Александра III. Подготовка Босфор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8. История. 2004. №3. С.44-45；52-53.

[16] Кондратенко Р.В. Мор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С.272-274.

[17]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Л.179-196.

[18]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214 об.

[19] 此地是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海岸的一处海滨村庄，靠近黑海入口。——译者注

[20] Цывинский Г.Ф. 50 лет 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м флоте. Riga. б.г. С.144.

[21] Цывинский Г.Ф. 50 лет 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м флоте. Riga. б.г. С.150.

[22] Margaret M. Jefferson，“Lord Salisbury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1890-1898，”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39，no. 92（1960），p. 45.

[23]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Л.78；79.об.

[24]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82.

[25]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84.

[26]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Л.92-93.

[27]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96.

[28]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96.об.

[29] Margaret M. Jefferson，“Lord Salisbury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1890-1898，”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39，no. 92（1960），p.46.

[30] Зарубежн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С. 1885. № 6. С. 217-223.

[31]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 243.

[32] Robert K. Massie，*Dreadnought*：*Britain*，*Germany 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 London：The Random House，1991，p. 178.

[33]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Военные флоты в 1893 году.//МС. 1894. №2. С.3-4.

[34]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Судостроение，маневры и дальние плавания в германском флоте в 1892 г.//МС. 1893. №3. С.27-36.

[35] Итальянский военный флот. Статья г. Rocco de Zerbi.//МС.1887. №3. С.57-61；84；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Новые броненосцы итальянского флота.//МС.1893. №1. С.36-37；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Бюджет итальянского флота на 1893-1894 год.//МС. 1893. №7. С.35-36；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Новые броненосцы итальянского флота.//МС. 1894. №7. С.35.

[36] Австрийский военный флот.//МС.1887. №9. С.6-14；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Бюджет австрийского флота на 1894 год.//МС. 1893. №8. С.30.

[37] Генке С. Испанский флот в 1892 году.//МС. 1893. №1. С.109-112.

[38]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Сравнение между броненосцами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и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флотов.//МС. 1892. №6. С.29-37；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бюджет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флота на 1892 год.//МС.1892. №8. С.18-19；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Бюджет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флота и программа судостроения на 1894 год.//МС.1893. №7. С.19-24.

[39] Гуляев Э. Военное судостроение в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флотах в 1893-1894 гг.//МС.1895. №6. С.20.

[40]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Бразильский военный флот.//МС. 1890. №1. С.27.

[41]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Заказ во Франции двух броненосцев для бразильского флота.//МС.1894. №12. С.16-17；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Суда，строящиеся для бразильского флота.//МС.1896. №8. С.34.

[42]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Аргентинский броненосец Libertad.//МС. 1893. №2. С.28-34；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Аргентинский крейсер Nueve de Julio.//МС.1893. №6.С.48-49；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Испытания Аргентинского крейсера Patria.//МС. 1894. №10. С.36；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Спуск аргентинского броненосца General San Martin.//МС.1896. №8. С.37-38.

[43]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Чилийский броненосец Capitan Prat.//МС. 1893. №1. С.43-44；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Спуск чилийского крейсера Blanca Encalada.//МС.1893. №11. С.12；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Испытания чилийского крейсера

Blanco Encalada.//МС. 1894. №9. С.36-37；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Спуск чилийского крейсера Ministro Zenteno и истребителей миноносцев Capitan Orella и Capitan Muniz Camero.//МС.1896. №6. С.21-22；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Суда，строящиеся для чилийского и аргентинского флотов.//МС.1896. №8. С.34-36.

[44]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Китайский флот.//МС. 1894. №9. С.37-38.

[45] де Л. А. Развитие флотов главных морских держав в 1896—1897 г.// МС.1897. №7. С.78.

[46] Чагин. Очерк развития японского флота.//МС. 1898. №7. С.57.

[47]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Военные флоты в 1893 году.//МС. 1894. №2. С.13.

[48] Чагин. Очерк развития японского флота.//МС. 1898. №7. С.61.（括号内的数据均为海军开支占预算支出比例。——编者注）

[49]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Японский броненосец Fusi-Yama.//МС.1895. №6. С.11-12.

[50] де Л. А. Развитие флотов главных морских держав в 1896-1897 г.// МС.1897. №7. С.77.

[51]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Проектируемое увеличение военно-сухопутных 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их сил Японии.//МС. 1897. №10. С.22.

[52]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Проект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 японского флота.//МС. 1896. №2. С.58-59.

[53]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Крейсеры，строящиеся в Америке для японского флота.//МС. 1897. №10. С.25-28；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Суда，строящиеся для Японии.//МС. 1898. №7. С.52-54.

[54] де Л. А. Развитие флотов главных морских держав в 1896-1897 г.// МС.1897. №7. С.75-76.

[55]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Проектируемое увеличение военно-сухопутных 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их сил Японии.//МС. 1897. №10. С.24.

[56]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Программа увелич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флота.//МС. 1890. № 3. С.27-28.

[57] Де Л.А.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север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флота.//МС. 1896. №2. С.17.

[58]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Миноносцы и миноноски всех флотов.//МС. 1891. №2. С.15；19-21；33.

[59] Де Л.А.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север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флота.//МС. 1896. №2. С.22；24.

[60] Тирпиц 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1957. С.203.

[61]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p.247.

[62]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p.250.

[63] Альконост.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МС. 1915. №1. С.67；69.

[64] Keith Neilson，“Great Britain，” in R. F. Hamilton and H. H. Herwig，eds.，*War Planning 1914*.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 177.

[65] Keith Neilson，“Great Britain，” in Hamilton and Herwig，eds.，*War Planning 1914*，p. 178.

[66] Massie，*Dreadnought*，p. XIX.

[67] Colin L. Smith，*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 White at Constantinople*，*1886-1891*.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 136.

[68] С.О. Мака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М.1960. Т.2. С.154；156.

[69] Шершов А.П. К истории военного кораблестроения. М.1952. С.120；см. также：Широкорад А. Крах босфорской авантюры.//Наваль. Сборник общества истории флота. М.1992. Вып.2. М.1992. С.49.

[70] *Salisbury-Balfour Correspondence*：*letters exchanged between the third Marquess of Salisbury and his nephew Arthur James Balfour*，*1869-1892*. Herfordshire Record Society，1988，p. 399.

[71] *Salisbury-Balfour Correspondence*，p. 400.

[72] Margaret M. Jefferson，“Lord Salisbury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1890-1898，”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39，no. 92（1960），p. 46.

[73] Margaret M. Jefferson，“Lord Salisbury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1890-1898，”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39，no. 92（1960），pp. 47-48.

[74]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 Ук.соч. С.241-243.

[75] Мартенс Ф.［Ф.］Собрание трактатов и конвенций，заключенных Россиею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СПб. 1888. Т.8. Трактаты с Германиею. 1825-1888. С.674.

[76] Barbara Jelavich，*History of the Balkans*，*vol. 1*：*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 80.

[77] Алиев Г.З. Турция в период правления младотурок（1808-1918 гг.）. М.1972. С.49-56.

[78] Smith，*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 White at Constantinople*，p. 159.

[79]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以下最高级别大臣，相当于宰相。——译者注

[80] Алиев Г.З. Ук.соч. С.38-39；339.

[81] Геноцид армян в Осм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д ред. М.Г. Нерсисяна. Ереван. 1982. С.5-10.

[82] Jelavich，*History of the Balkans*，*vol. 1*，pp. 80-81.

[83] Геноцид армян в Осм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С.14；18-21.

[84] Edward J. Erickson，*Defeat in Detail*：*The Ottoman Army in the Balkans*，*1912-1913*. Westport，Connecticut：Praeger，2003，p. 14.

[85] Г.Ф. Курды и курдская конница.//ВС. 1896. №4. С.365.

[86] Erickson，*Defeat in Detail*，p. 14.

[87] Smith，*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 White at Constantinople*，pp. 105-108.

[88] Smith，*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 White at Constantinople*，p. 109.

[89] Smith，*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 White at Constantinople*，pp. 112-116.

[90] Smith，*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 White at Constantinople*，pp. 123-124.

[91] Smith，*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 White at Constantinople*，p. 127.

[92] Smith，*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 White at Constantinople*，p. 165.

[93] Smith，*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 White at Constantinople*，pp. 132-133.

[94] Smith，*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 White at Constantinople*，p. 115.

[95] Smith，*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 White at Constantinople*，pp. 122-123.

[96] Геноцид армян в Осм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С.22-24.

[97] H. Sutherland Edwards，*Sir William White*，*for Six Years Ambassador at Constantinople*：*His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London：J. Murray，1902，p. 105.

[98] Геноцид армян в Осм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С.24.

[99] Edwards，*Sir William White*，p. 105.

[100] Charles Eliot，*Turkey in Europe*. London：E. Arnold，1908，pp. 406-408.

[101] Алиев Г.З. Ук.соч. С.49.

[102] Геноцид армян в Осм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С.25-35.

[103]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Ук.соч. С.143.

[104] Сборник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Реформы в Армении. 26 ноября 1912 года-10 мая 1914 года. Приложение №6. Статистика населения 6 армянских вилаетов. Пгр. 1915. С.273-290.

[105] Сборник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Реформы в Армении. 26 ноября 1912 года-10 мая 1914 года. Приложение №6. Статистика населения 6 армянских вилаетов. Пгр. 1915. С.273-274.

[106] Братская помощь пострадавшим в Турции армянам. М.1898. С.XVIII-XX；XXIII.

[107] Геноцид армян в Осм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С.158.

[108] Братская помощь...С.XXIV.

[109] Eliot，*Turkey in Europe*，pp. 409-413.

[110] Геноцид армян в Осм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С.125.

[111] Геноцид армян в Осм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121.

[112] George Washburn，*Fif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and Recollections of Robert College*.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9，p. 246.

[113]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896. №10. С.841.

[114] Братская помощь...Отдел II. С.80.

[115] Братская помощь...Отдел II. С.93.

[116] Washburn，*Fif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and Recollections of Robert College*，p. 249.

[117]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 Ук.соч. С.198-199.

[118]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ека（От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1997. С.104.

[119] J. A. S. Grenville，*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The Clo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Athlone*，1964，p. 25.

[120] Margaret M. Jefferson，“Lord Salisbury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1890-1898，”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39，no. 92（1960），p. 50.

[121] Margaret M. Jefferson，“Lord Salisbury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1890-1898，”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39，no. 92（1960），p. 51.

[122] Grenville，*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p. 26.

[123] Grenville，*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p. 27；Dame L. Penson，*Foreign Affairs Under the Third Marquis of Salisbury*. 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62，p. 8.

[124] Smith，*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 White at Constantinople*，p. 136.

[125] Grenville，*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p. 26.

[126] Harold Temperley，ed.，*Found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eign Policy from Pitt（1792）to Salisbury（1902），or Documents，Old and Ne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8，p. 498.

[127] Pertti Luntinen，*French Information on the Russian War Plans，1880-1914*. Helsinki：SHS，1984，p. 40.

[128] Temperley，ed.，*Found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eign Policy from Pitt（1792）to Salisbury（1902）*，p. 498.

[129]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211.

[130]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Л.217-219.

[131]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210.

[132]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Л.263-265；268-280.

[133] Проект захвата Босфора в 1896 г.//КА. М.-Л.1931. Т.4-5（47-48）. С.56.

[134] Проект захвата Босфора в 1896 г.//КА. М.-Л.1931. Т.4-5（47-48）. С.57.

[135] Проект захвата Босфора в 1896 г.//КА. М.-Л.1931. Т.4-5（47-48）. С.57-58.

[136] Киняпина Н.С. Ук.соч. С.185.

[137] Дневники Николая II. 1894-1918. М.2011. Том 1. 1894-1904. С.297.

[138] Margaret M. Jefferson，“Lord Salisbury’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Tsar at Balmoral，27 and 29 September 1896，”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39，no. 92 （1960），pp. 216-222.

[139] Пономарев В.Н. Свидание в Бальморале и англо-рус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90-х гг. XIX века.//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77. № 99. С.348.

[140] Margaret M. Jefferson，“Lord Salisbury’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Tsar at Balmoral，27 and 29 September 1896，”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39，no. 92 （1960），p. 216.

[141] Margaret M. Jefferson，“Lord Salisbury’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Tsar at Balmoral，27 and 29 September 1896，”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39，no. 92 （1960），p. 217.

[142] Киняпина Н.С. Ук.соч. М.1994. С.185.

[143] Smith，*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 White at Constantinople*，pp. 149-150.

[144] 埃及总督，这是1866～1914年土耳其苏丹赐给埃及统治者的封号。——译者注

[145] Margaret M. Jefferson，“Lord Salisbury’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Tsar at Balmoral，27 and 29 September 1896，”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39，no. 92 （1960），p. 217.

[146] Margaret M. Jefferson，“Lord Salisbury’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Tsar at Balmoral，27 and 29 September 1896，”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39，no. 92 （1960），p. 218.

[147] Пономарев В.Н. Ук.соч.//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77. № 99. С.348.

[148] Margaret M. Jefferson，“Lord Salisbury’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Tsar at Balmoral，27 and 29 September 1896，”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39，no. 92 （1960），p. 219.

[149] Margaret M. Jefferson，“Lord Salisbury’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Tsar at Balmoral，27 and 29 September 1896，”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39，no. 92 （1960），p. 219.

[150] Margaret M. Jefferson，“Lord Salisbury’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Tsar at Balmoral，27 and 29 September 1896，”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39，no. 92 （1960），p. 220.

[151]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 Ук.соч. С.242.

[152] Ольденбург С.С. Ук.соч. Белград.. 1939. Т.1. С.68-71.

[153]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896. №11. С.391-392.

[154] George Michon，*The Franco-Russian Alliance*，*1891-1917*. London：Allen & Unwin，1929，pp. 92-93.

[155]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896. №9. С.354.

[156]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896. №11. С.391-392.

[157]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897. №8. С.812-813.

[158] Рыбаченок И.С. Союз с Францией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 XIX в. М.1993. С.163.

[159] 该政策的核心是在军事威胁的支持下，借助宗教来扩大俄罗斯在奥斯曼帝国基督徒聚居区的影响力。——译者注

[160]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ека（От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1997. С.104.

[161] Проект захвата Босфора в 1896 г.//КА. М.-Л.1931. Т.4-5（47-48）. С.60-64.

[162] Проект захвата Босфора в 1896 г.//КА. М.-Л.1931. Т.4-5（47-48）. С.64.

[163] Проект захвата Босфора в 1896 г.//КА. М.-Л.1931. Т.4-5（47-48）. С.66-67.

[164] РГВИА. Ф.400. Оп.4. Ед.хр.587. ЛЛ.306-310.

[165] Бюлов Б. Ук.соч. С.129.

[166] Eliot，*Turkey in Europe*，p. 420.

[167]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 272.

[168]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 Ук.соч. С.193-194；500.

[169]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 274.

[170] Тэйлор А. Дж. П. Ук.соч. С.344.

[171] Тирпиц А. Ук.соч. С.71.

[172]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Торговый флот.//МС. 1894. №3. С.66.

[173] Жерве Б. Германия и ее морская сила.//МС. 1914. №9. С.147.

[174] Германский морской бюджет в 1892-1893 гг.//МС. 1892. №4. С.149-150.

[175]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Военное судостроение в Германии с 1878 г.// МС.1895. №2. С.13.

[176]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 Ук.соч. С.313；340-342.

[177] Жерве Б. Германия и ее морская сила.//МС. 1914. №9. С.147.

[178]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МС. 1907. №3. С.2.

[179] Романова Е.В. Путь к войне. Развитие англо-герма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1898-1914 гг. М.2008. С.40-41.

[180]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Ук.соч. С.103.

[181] Тэйлор А. Дж. П. Ук.соч. С.378.

[182] Бюлов Б. Ук.соч. С.33.

[183] Бюлов Б. Ук.соч. С.36.

[184] Бюлов Б. Ук.соч. С.72-79.

[185] Peter Hopkirk，*Like Hidden Fire*：*The plot to bring down the British Empire*. New York：Kodansha，1994，pp. 21-24.

[186]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898. №5. С.389.

[187] Бюлов Б. Ук.соч. С.132.

[188]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898. №12. С.786-787.

[189] Альконост.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МС. 1915. №1. С.69.

[190] Недзвецкий В. Греко-турецкая война 1897 года.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оение.//ВС. 1897. №8. С.153；155.

[191] Мартенс Ф.［Ф.］ Собрание трактатов и конвенций...СПб. 1888. Т.8. Трактаты с Германиею. 1825-1888. С.657.

[192] 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p. 470.

[193] Киняпина Н.С. Ук.соч. С.137-138.

[194]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896. №7. С.424-425.

[195] Misha Glenny，*The Balkans：Nationalism，War and the Great Powers，1804-1999*. London：Penguin Books，1999，p. 193.

[196] 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p. 470.

[197] Киняпина Н.С. Ук.соч. С.139.

[198] 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p. 470.

[199] Киняпина Н.С. Ук.соч. С.138.

[200]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 Ук.соч. С.261.

[201] Русско-герм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оект захвата Босфора в 1897 году.//КА. М.1922. Т.1. С.153-154；161-162.

[202] William C. Fuller，*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1600-1914*. New York：Free Press，1992，pp. 371-372.

[203]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 Ук.соч. С.266.

[204]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Морские силы различных держав в критских водах.//МС.1897. №3. С.1-3.

[205]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 Ук.соч. С.266.

[206]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 Ук.соч. С.266.

[207] Недзвецкий В. Греко-турецкая война 1897 года...//ВС. 1897. №8. С.158；160；166-167；Stavrianos L.S. *The Balkans Since 1453*，P.470.

[208] Недзвецкий В. Греко-турецкая война 1897 года...//ВС. 1897. №9. С.67-68；То же.//ВС.1896. №10. С.146.

[209] Albert H. Bickford-Smith，*Greece Under King George*. London：R. Bentley，1893，pp. 241-245.

[210] *A History of the Hellenic Army，1821-1997*. Athens：Hellenic Army General Staff-Army History Directorate，1999，pp. 69-70.

[211] Недзвецкий В. Греко-турецкая война 1897 года...//ВС. 1897. №9. С.69.

[212] Недзвецкий В. Греко-турецкая война 1897 года...//ВС. 1897. №10. С.151；166-167.

[213]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Морские операции последней греко-турецкой войны.//МС.1897. №7. С.13-14.

[214]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 Ук.соч. С.270.

[215] Недзвецкий В. Греко-турецкая война 1897 года...//ВС. 1898. №3. С.53 ; 55 ; 71 ; Erickson , *Defeat in Detail* , p. 15.

[216] Киняпина Н.С. Ук.соч. С.144.

[217]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России с друг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1856-1917. М.1952. С.303-308.

[218] Бюлов Б. Ук.соч. С.253.

[219] Stavrianos , *The Balkans Since 1453* , p. 471.

[220] Русские на Крите.//Разведчик. 1899. №436. С.171.

[221] Отфановский К.К. Русские полевые жандармы на острове Крит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полковника К.К. Отфановского) .//Военная быль (далее ВБ) . Париж. 1967. №84. С.22-23.

[222] Киняпина Н.С. Ук.соч. С.146.

[223] Stavrianos , *The Balkans Since 1453* , p. 471.

[224] Stavrianos , *The Balkans Since 1453* , p. 471.

[225] Недзвецкий В. Греко-турецкая война 1897 года...//ВС. 1898. №3. С.79.

[226] Киняпина Н.С. Ук.соч. С.145.

[227] Столети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194.

[228] Албан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развитии кризис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бывшей Югославии. Документы. М.2006. Т.1. (1878-1997) . С.45-46.

8 欧洲的稳定、远东的动员、新盟友的结交与失去

日渐激烈的军备竞赛，特别是在舰队和炮兵领域的竞赛，给俄国的国家预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898年3月13日，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提议召开一场关于限制军费开支的国际会议。当然，他首先考虑的便是俄国在军备竞赛中难以紧跟潜在对手步伐的这一事实。此外，他还提出了一项在十年内限制俄国与奥匈帝国野战炮兵武装的协议草案，[1]此项提议得到了外交大臣的支持。类似的倡议颇具俄国特色：1868年，俄国主张在彼得堡召开国际会议，商讨爆破枪弹的禁用问题（倡议的发起人恰巧也是陆军大臣米柳京）；1874年，主张在布鲁塞尔召开国际会议，确定军事法规及惯例（该倡议因英国的反对未能实现）。[2]库罗帕特金的提议得到了穆拉维约夫伯爵的支持，他表示："现在，我们在远东正要迈出关键的几步，因此向欧洲证明我们维护和平的意愿迫在眉睫。"[3]

在尼古拉二世的倡议下，1899年5月18日，限制舰队、陆军兵力及军备增长的国际会议在海牙召开。7月29日（俄历7月17日），在沙皇诞辰当日，参会各国签署多项文件。27国代表出席会议，其中包括德国、意大利、法国、奥匈帝国、英国、美国、墨西哥、土耳其、中国、伊朗、日本等。尽管在解决主要问题停止军备竞赛方面未找到可行之法，但是会议通过了《国际纷争和平解决公约》（国际仲裁法院）、《陆战法规惯例公约》以及1864年《日内瓦公约》针对伤病者的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4]（这些条文1868年编制，但是它们不作为强制性的国际法规[5]）。1907年6~10月召开了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44个国家参会，除了第一次参会的国家外，新增了17个中南美国家。此次会议通过了13个公约。1899年和1907年的会议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国际法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许多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只能暂时搁置。讽刺的是，各国代表商定将于1915年再次召开会议。[6]

1896年5月，清政府特命全权大臣李鸿章抵达莫斯科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北京方面高度重视此次外事活动。此前，在修订《马关条约》和归还辽东半岛一事上，俄国向日本施压。借此机会，清政府选派重臣赶赴俄国表达谢意。[7]此外，在战败国赔款方面，俄国也向北京方面施以援手。依据1895年7月6日订立的合同，俄国向清政府提供4亿

金法郎的贷款，年息4厘（以中国的海关收入为担保）。[8]趁李鸿章逗留俄国之机，1896年6月3日，“和平渗透”中国政策的拥护者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和财政大臣维特与李鸿章签署了一项为期15年的中俄防御同盟密约。

根据密约第1款之规定，日本若侵占中国或俄国的领土即触发此约，应立即照约处理。一旦爆发战争，中国应向俄国兵船开放所有口岸，清政府有义务向船队和船员提供全面援助。此外，密约还包含其他可引发严重后果的重要决议。在修建连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铁路方面，彼得堡方面改变了过去沿黑龙江修建铁路的想法，转而谋求借道中国领土。因而密约的第4款规定，北京方面同意接筑一条途经中国领土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以便战时协助俄国运兵入清。[9]最初，李鸿章断然反对签署特许条款，但是后来他改变了主意。[10]

维特极力拥护“借满洲之地，接俄国之路”的方案。[11]一方面，该方案的实施将极大地缩短铁路的里程和修筑的期限；另一方面，在中国的领土上修建铁路改变了西伯利亚铁路的原定使命。维特回忆道：“那时，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看来，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完全不是一项政治军事任务，只是一项关乎内政的经济任务。也就是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希望，依靠这条铁路，使俄国与边陲地区——滨海边疆区建立起最短的联系。换言之，在亚历山大三世乃至尼古拉二世眼中，整条西伯利亚铁路只有经济意义，即只具有防御意义，而没有进攻意义，因此，不应将它当作侵占新领地的工具。”[12]直到1896年，它才演变为这种工具。维特将“和平渗透”视为经济扩张，但是他显然高估了它的作用。伊兹沃利斯基（А. П. Извольский）客观地指出：“作为财政家的维特伯爵认为，唯有物质条件才是在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因此，在判定国际形势时，维特伯爵经常犯下严重的错误。”[13]这次也是如此。

1896年9月8日（俄历8月27日），两国订立建造、经营贯穿中国东北的铁路合同。这条铁路名为大清东省铁路（简称东清铁路）。华俄银行是“中国东省铁路公司”的奠基者，公司股票只准华俄商民购买，公司总办由清政府选派，该总办可在北京常驻，其公费由公司筹给，总办公馆位置由北京指定（第1款）；至铁轨之宽窄，应与俄国铁轨一律（第3款）；凡该公司建造铁路需用料件、雇觅工人等事，清政府皆须尽力相助，各按市价，由该公司自行筹款给发（第4款）；凡该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清政府设法保护（第5款）；凡公司建造、经理、防护等

项所需之地，若系官地，由清政府给予，不纳地价；若系民地，按照时价赎买或租赁（第6款）。自该公司路成开车之日起，以八十年为限，所有铁路所得利益，全归俄国专得；或从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清政府有权赎回（第12款），但是条件十分苛刻。[14]

李鸿章不满这些条款，他试图反对在华修建宽轨铁路、反对俄国享有沿铁路运兵的权利，但是最终他还是妥协了，只谈成了禁止俄国士兵在中国东北停留的条件。[15]事实上，铁路和出让的领土由华俄银行依据治外法权原则实施管理。在中国境内，当时的银行和铁路有权享有的待遇及设施是：专用船舶；军事安全保障；城乡居民据点；发行纸币；建立学校；海关特权（东清铁路所需货品仅需按2/3的比例支付关税）。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俄国均享有军事运输权。除了这些让步，中国还向俄国兵船开放港口。此项经费由俄国国库承担。在东清铁路运行之处，俄国应向北京支付760万金卢布的补偿款；东清铁路公司股本中的1000股分配方案为俄政府占700股，私人（华俄银行领导人）300股。[16]

由此可见，俄政府彻底成了这条铁路的主宰并且对其加以控制，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伪装。1899～1902年驻日公使伊兹沃利斯基断言：“维特伯爵在满洲的事业简直毫无益处，甚至说，这项事业本身就十分危险，对于俄国外交事务尤为致命，可以说，它就是催动俄日战争的根本原因。”[17]我们很难驳斥这一评价的正确性。无论是在直接还是在间接意义上，“和平渗透”的逻辑都使俄国政策日渐偏离正轨，最终招致战争。这是维特始料未及的。他力求通过他认为可靠的方式掌控所得的土地。1897年12月，他曾写道：“从政治军事角度出发，在征用地带迁入稳定的俄国居民，使其自力更生并且成为巩固铁路周边区域的堡垒，这是非常可取的。”[18]

当然，组织迁徙是需要资金的。那时，东清铁路尚未赢利。1897年，租界区收入960万卢布，而铁路的修建、经营保障所需开支高达9270万卢布。截至1900年，上述数据分别增至2190万卢布和2.636亿卢布。[19]对于华俄银行的股东而言，这项事业是有利可图的——股票的股息持续上涨。1897年，股息为7卢布50戈比，1898年为13卢布，1899～1900年为15卢布。[20]1903年7月11日，东清铁路（包括南满铁路区段）正式通车，若将至旅顺港的支线计算在内，其里程可达2400俄里，工程造价374955598卢布12戈比，未竣工部分造价57569255卢

布。[21]东清铁路每俄里的造价超过了15万卢布，而在俄国同类铁路每俄里造价不超过6万卢布。[22]

尽管征用地带的中国元素已被抹除，但仍未达到维特梦寐以求的效果。始建于1897年9月的哈尔滨成了东清铁路的首府乃至这片区域的行政文化中心。这座城市毗邻松花江，在成为城市之前，这里只散落着三三两两的农家小屋和一家废弃的酿酒厂。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前夕，已有近7.5万名中国人和5000名俄国人居住于此。[23]在阿穆尔地区铁路干线空缺、人口稀少的背景下，东清铁路的修筑使西伯利亚铁路的里程大幅缩短，通过投机节约了资金的俄国在中国东北积极兴建铁路。在描述1896年合同所引发的后果时，某位对日战争的参与者兼研究员的观点是正确的："当我们的祖国正遭受混乱与无序的侵扰时，我们却在敌对国家修筑了数千俄里的铁路。"[24]与此同时，该合同的签订对外交也造成了严重影响。

俄国承诺捍卫中国领土完整，遏制日本侵略势力卷土重来。此时，蓄意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不只是东京。1883年，德国太平洋舰队在中国水域活动，这支舰队由常年停泊在芝罘的4艘舰船组成。起初，德国人将这些军舰视为保护本国臣民及在华利益的工具。必要时，这些舰船可协助陆战队登陆，令地方政府有所忌惮。[25]1890年代，德方的活动变得更加活跃，德国的舰队规模也有所扩张。到了1897年，这支舰队已收编2艘旧式装甲舰（1874年建造的）和6艘现代化巡洋舰。[26]这足以展现德国的实力。

1897年11月4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半岛被杀。德国以这桩命案为借口，出兵侵占胶州湾的青岛港及周边地区。自1895年秋，德国外交界和海军始终在中国寻找港口，最初选定了3个地方：厦门港、大鹏湾和上海附近的舟山群岛。考虑各方因素，柏林放弃了这三个选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德国不愿与英国形成对立。毫无疑问，英国会将德国兴建基地和商港的行为视作对其传统影响区的入侵。青岛具备如下优势：气候条件比南方更有益健康；靠近山东煤田；港口可迅速演变为中国的石油进口中心；依靠这处港湾可以控制通往中国首都的海上通道。这些就是德国人选择留在青岛的原因。1895年，德国向北京提出初步要求，但是遭到了拒绝。[27]

1897年3月，德国人再次尝试租赁该港口，但是仅实现了向青岛派遣防御草案编制委员会的目标。未等来俄国占领朝鲜港口消息的德国公

使认为，至于德国占领胶州湾，可借鉴东清铁路章程的出台。针对该提议，清政府甚至不愿参与讨论，并且再次严词拒绝。[28]显然，出于这个原因，1897年8月德皇在彼得戈夫与俄国沙皇会面时表示，愿意将不属于自己的青岛拱手让与沙皇。[29]1897年8月10日，霍亨洛埃告知穆拉维约夫："针对德皇陛下的问题，俄国是否属意胶州湾？沙皇陛下是如此回复的，实际上，俄国对于如何确保自己能够顺利进入上述港湾颇为关心，虽然已经得到了一个更靠北的港口，但是，对于上述港口俄国仍有企图。德皇的问题令沙皇尼古拉感到不适。针对在必要时且在征得俄国海事机关同意的前提下德国舰船能否在胶州湾锚定这一问题，全俄罗斯君主陛下的答复是否定的。"[30]

尽管俄国不赞成德国占领该港口，但是随后德皇立即命令本国太平洋舰队筹备在青岛过冬的事宜，声称已与俄国海事机关达成一致，然而这一说法纯属子虚乌有。[31]山东命案发生后，柏林方面反应异常，不做任何表面功夫。1897年11月7日，德皇在写给尼古拉二世的信中解释道："天主教传教使团受我庇护，因此必须惩罚这些中国人。我希望，依据我们在彼得戈夫的私人谈判，您能赞成我的舰队驶入胶澳，以便我方从那里出发抗击强盗，这是唯一方便的港口。我必向天主教会证明，我有能力保护他们。必须严惩滋事者，造福全体基督徒。"[32]事件爆发之初，威廉二世满怀热情地想要"保护基督徒及其仆人和使者"[33]。即便如此，俄国也不同意德国占领青岛。

189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6日），尼古拉二世在电报中表达了自己对遇难者的同情，同时指出："对于您向胶澳派遣德国舰队的命令，我无法表示赞同或不赞同。近日我才得知，在1895～1896年，我们只是临时接手这个港口。我担心，严厉的惩罚措施将在远东引发焦虑不安的情绪，进而加深中国人与基督徒之间的隔阂。"[34]俄国军舰指挥官收到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参与"德国人的暴力行动，时局只不过是他们行动的借口，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达到那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目的"[35]。11月8日，在警告德方俄国舰队可能出兵青岛后，负责德国事务的俄国代办收到了一份颇具和解意味的行动说明。穆拉维约夫报告称："我们希望德清事件能够和平解决，而且在其他列强的干涉下也不会节外生枝。"[36]

当天，俄国向北京发送相关指示。俄国在强调不支持立即采取强制措施后，建议清政府以德方满意的方式尽快对命案展开调查。[37]俄国

君主在致德皇的电报中所暗含的担忧，很快便得到了证实。1897年11月14日，在海军上将奥托·冯·迪特里希（Otto von Diederichs）的指挥下，由3艘军舰组成的巡洋舰队驶入青岛。从军舰上下来200余人，他们立即切断了电报线路。而后，在海上扫射的威胁下，中国守备军被迫撤离青岛，并且将武器、弹药和仓库留给了德国人。[38]次日，清政府宣布愿意按照惯例做出赔偿，措施如下：处决罪犯；给予受害者及其亲属资金补偿；今后若地方官未采取措施预防谋杀案件的发生，将严惩地方官。[39]

得知德国在山东的行动后，李鸿章火速拜访了俄国驻京使团，以期向自己的俄国盟友寻求帮助，因为他坚信在莫斯科已与俄国结成可抵挡任何列强入侵中国领土的防御联盟。[40]1897年11月16日，负责中国事务的俄国代办报告称："中国人极为震惊，惶恐不安。李鸿章以清政府的名义诚恳地寻求建议与帮助，唯恐德国人使用武力强占该港。"[41]清政府求援的态度越来越坚定。当日，李鸿章请求俄国向青岛派遣舰队，从而逼迫迪特里希的舰队撤离中国水域。最初，海军少将杜巴索夫（Ф. В. Дубасов）收到了要求向山东沿岸派遣部分军舰的指令，这给北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然而彼得堡很快便推翻了这一决议，对事件的发展听之任之。清政府无比失望，因为第三国的干预是它摆脱困境的全部指望。[42]

1897年11月20日，威廉二世发表宣言，宣称：德国在山东海湾的行动与俄国无利害关系，德国期望提高本国在中国的威信。根据德皇的说法，柏林的影响力简直低到令人无法容忍。宣言主要是用来回应尼古拉二世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显然，德国目前正在遭受清政府的不公待遇。作为君主，我应当通过各种方式彻底纠正这一切。我认为，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亚洲，德国君主都对俄国君主陛下的政策予以支持。现在，在行动前，我想知道俄国君主的观点，即俄国君主是否与自己想法一致，现在对行动计划进行任何变更都是在助长清政府及其民众践踏德国尊严和利益的不正之风。"[43]

事实上，德国早已采取行动，完全不在意外界的看法。威廉二世在"卑躬屈节"的同时，也暗含威胁的意味。对于彼得堡而言，若试图阻止德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的行动，那么俄德关系恐急剧恶化；反之，若不这样做，那么作为盟友的俄国在中国的威望将一落千丈。最终，作为对北京求援的回应，俄国政府表示只能抵抗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略。不久后，在李鸿章请求俄国为清政府的一笔新贷款做担保时，维特的答复

相当冷硬，远非盟友的姿态。他提出的条件是扩大俄国在中国东北和蒙古的权力，修筑东清铁路支线至黄海沿岸地区。[44]11月23日（俄历11月11日），外交大臣向沙皇上奏，奏章开篇写道："1895年远东的复杂局势促使我们的海军部门设法在太平洋为我们的海军舰队寻找可靠的基地。此前，我们的军舰一直在日本港口过冬、临时停泊，满足其他需求。"[45]

洛巴诺夫认为，为了回击德国在山东的行动，俄国陆战队有必要登陆大连湾和关东地区。[46]在回应洛巴诺夫的观点时，沙皇总结了自己对俄国远东政策及海洋问题出路的看法："我始终认为，未来，我们的开放港应当位于辽东半岛或朝鲜湾的东北角。"[47]

[1] К истории первой Гааг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1899 г.//КА. М.-Л.1932. Т.1-2（50-51）. С.70-73.

[2] Мартенс Ф.［Ф.］Восточная война и Брюссель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1874-1878 г. СПб. 1879. С.99；103；137；о предложениях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м. там же：Приложения №№1-2，С.1-36.

[3]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ека（От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1997. С.117.

[4]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870-1918. М.1940. С.119-122.

[5] Мартенс Ф.［Ф.］Восточная война и Брюссель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С.96.

[6] Нольде Б.Э. Втор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мира》. Очерк.//ВЕ. 1908. №4. С.490.

[7] Соловьев Ю.Я.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ипломата 1893-1922. Минск. 2003. С.50.

[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9-1916…С.67-69.

[9]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России с друг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1856-1917. С.292-294.

[10] Нилус Е.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Харбин. 1923. Т.1. 1896-1923. С.18.

[11] Нилус Е.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Харбин. 1923. Т.1. 1896-1923. С.14.

[12] Витте С.Ю. Ук.соч. М.1994. Т.2. С.47.

[13] Извольский А.П.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1989. С.84.

[1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9-1916...С.74-77.

[15] Нилус Е.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Харбин. 1923. Т.1. 1896-1923. С.21.

[16]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От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М.1997. С.140.

[17] Извольский А.П. Ук.соч. С.84.

[18] Переписка Витте и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а (1895-1905 гг.) .//КА. М.-Л.1928. Т.5 (30) . С.99.

[19] D.McDonald , *United Government and Foreign Policy in Russia , 1900-1914.*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 p.13.

[20] Нилус Е.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Харбин. 1923. Т.1. 1896-1923. С.20.

[21] Нилус Е.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Харбин. 1923. Т.1. 1896-1923. С.123.

[22] Гурко В.И. Ук.соч. С.310.

[23] D.Wolf , *To the Harbin Station* : *The Liberal Alternative in Russian Manchuria* , *1898-1914.*Stanford : Str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 pp.26-27 , 32 , 35.

[2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от начала до Ляояна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 Лекц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полковника Комарова...С.6.

[25] Морское дело за границей. Германский отряд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МС. 1883. №3. С.29 ; 32 ; 35.

[26]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Морские силы различных держав в китайских водах.//МС. 1898. №4. С.7.

[27]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 Ук.соч. С.359-361 ; Тирпиц А. Ук.соч. С.109-116 ; Захват Германией Киао-Чао в 1897 г.//КА. М.1938. Т.2 (87) . С.28-29.

[28] Захват Германией Киао-Чао в 1897 г.//КА. М.1938. Т.2 (87) . С.30-33.

[29] Бюлов Б. Ук.соч. С.77.

[30] Захват Германией Киао-Чао в 1897 г.//КА. М.1938. Т.2 (87) . С.34.

[31] Захват Германией Киао-Чао в 1897 г.//КА. М.1938. Т.2 (87) . С.34.

[32] Переписка Вильгельма II с Николаем II. С.21.

[33] Бюлов Б. Ук.соч. С.102.

[34] Переписка Вильгельма II с Николаем II. С.21.

[35] Захват Германией Киао-Чао в 1897 г.//КА. М.1938. Т.2 (87) . С.38.

[36] Захват Германией Киао-Чао в 1897 г.//КА. М.1938. Т.2 (87) . С.39.

[37] Захват Германией Киао-Чао в 1897 г.//КА. М.1938. Т.2 (87) . С.39.

[38]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 Ук.соч. С.370.

[39] Захват Германией Киао-Чао в 1897 г.//КА. М.1938. Т.2 (87) . С.45.

[40] Соловьев Ю.Я. Ук. соч. С.57-58.

[41] Захват Германией Киао-Чао в 1897 г.//КА. М.1938. Т.2 (87) . С.46.

[42] Захват Германией Киао-Чао в 1897 г.//КА. М.1938. Т.2 (87) . С.51-55.

[43] Захват Германией Киао-Чао в 1897 г.//КА. М.1938. Т.2 (87) . С.48.

[44]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От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М.1997. С.142.

[45]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1932. Т.3 (52) . С.103.

[46]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1932. Т.3 (52) . С.106-107.

[47]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88-1903 гг.) .//КА. 1932. Т.3 (52) . С.102.

9 旅顺港的攫取：原因与结果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出海口问题一直困扰着俄国海军。波罗的海、黑海及日本海的出海口无法满足俄国的需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的出海口距离太远，并且与大陆无紧密联系。受墨西哥湾暖流影响的摩尔曼斯克沿岸地区荒无人烟；科拉半岛及其不冻港人烟稀少，1880年代此地的居民大多来自挪威和芬兰，并且这里不通铁路，煤炭是港口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而最近的煤矿则位于新地岛和斯匹次卑尔根群岛。[1]

俄国唯一可随意进出大西洋的不冻港——叶卡捷琳娜港在1890年代事实上荒无人烟。1899年，在它西面的海岸上，在一个较大沿海村庄的对面建起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港（摩尔曼斯克），然而由于没有铁路，这个港口迅速衰败了。1910年，在那里仅有374名居民。从科拉半岛的圣角到俄国与挪威接壤的边界，在摩尔曼斯克整条海岸线上（近1500俄里）常住居民仅约3000人672户。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地区占地面积为130210平方俄里，1914年这里的人口为12456人。在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前夕，这里的铁路刚刚建成。[2]1890年代，挺进太平洋似乎是最合理的方案。

由于清政府拒绝了俄国的要求，1897年12月1日，尼古拉二世派遣太平洋舰队麾下军舰突袭旅顺港。由此可见，维特的“和平渗透”政策从一开始便是个错误。没有武力的加持，它是行不通的。首先，俄国以保护中国领土完整的名义威胁日本；然后，俄国又为了逼迫清廷就范而打破原则，并且以武力相威胁。俄国舰队一如既往地驻扎在日本长崎，在那里两艘英国巡洋舰警惕地监视着它，因此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俄国指挥部担心晚于规定时间抵达旅顺港；另一方面，俄国人不愿与英国人发生冲突。

俄国向外放出消息称，舰队将以保护俄国臣民为借口前往朝鲜，因此只有一组军舰被派往旅顺港。但是这个谎言没能骗过任何人，几小时前，英国观察员已经出发并前往关东州沿岸了。先于俄国军舰抵达该城市的英国人曾试图阻止他们进入港口。尽管如此，1897年12月1日，俄国的2艘巡洋舰和1艘炮艇仍旧出现在了港口的驻泊地。不顾俄方警告，英国巡洋舰也立即驶入海港。尽管它只在海港逗留了几个小时，但是这

一事实连同英国政府的谎言加速了该事件的结束进程。英国人宣称，他们的军舰在中国港口逗留是为了进行友好访问，在向俄国政府致以友好的问候后便离开了。当时俄国政府对准备租赁基地之事避而不谈。[3]

俄、英两国在远东的矛盾日益激化，这立即引起了柏林的关注。1897年12月17日，威廉二世会见俄国驻德国大使奥斯滕-萨肯伯爵（Н. Д. Остен-Сакен），并且发表个人见解，认为德、俄两国应在中国问题上团结一致、相互支持。威廉二世说道："为了不将自己的利益与英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我决定选择胶州港，其地理位置正处于俄国行动范围的边界。将来，无论与贵国为敌的是日本人还是英国人，他们都将是我的敌人；争端的挑起者无论是哪个国家，只要想以武力阻碍贵国计划的实施，那么德国舰队必将与贵国军舰并肩作战。"[4]德国迫切希望在太平洋上推进俄、法、德三国合作。[5]他一再与俄国外交官慷慨地分享自己的理念："对于德俄联合部队而言，日本不足为惧，而英国永远不会下定决心这样做。"[6]

针对柏林在英俄关系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此项政策完全符合比洛的观点："德国应当在两国间不偏不倚地保持中立。德国的政策应当像天平上的指针，而非游移不定、来回摇摆的摆锤。"[7]在怂恿邻国"激活"远东的同时，柏林坚信彼得堡、东京、伦敦与北京之间的冲突必将加剧，这迟早会削弱俄国对欧洲事务的关注度。在此过程中，德国在欧洲政策天平上的"指针"作用必然会有所加强。

1898年1月4日，清政府畏缩了，接受了柏林的基本要求：向德国出租青岛50年，并附修建防御工事、维持守备之权；以潮位线最大处为起点，建立宽为100里的中立地带，只允许德军驻扎。此后，德国外交部又要求将租期延长至99年。6日，应德国的要求，租期被延长了。[8]在双方就租界外的铁路修筑权和矿藏开采特许权问题进行了短暂的谈判后，3月6日，德国强迫清政府接受了为期99年的以青岛湾为中心半径50千米的山东领土租界条约。[9]于是，这颗"无棱的珍珠"——提尔皮茨这样称呼青岛[10]——落入了德国之手。

最终，彼得堡方面（通过行贿）成功地解决了与清政府关系中出现的第一个问题。俄国向清政府官员秘密分发100万卢布，[11]仅李鸿章一人就于1898年3月28日收受了50万两白银。[12]1898年3月27日，在德国与清政府签署《胶澳租借条约》的三周后，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为期25年的旅顺港、关东州租地条约，且俄国有权续约。根据该条约，旅顺

港享有军港地位，仅向俄国、清政府兵船开放，不向他国兵、商船只开放；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享有同等待遇外，其余地方面向各国商船开放。此外，俄国还获得了南满铁路的修筑权，通过这条铁路，东清铁路、西伯利亚铁路延伸至旅顺港军事基地、大连港（俄国人称为达里尼港）通商口岸。[13]

租地条约签署次日，俄国舰队在杜巴索夫（Ф. В. Дубасов）少将的指挥下登陆旅顺港和大连湾。清军不战而退，撤出了俄国所划定的占领区。[14]1898年3月29日的俄国政府报告中记载："该条约是比邻大国之间友谊的自然结晶和直接产物，两国应竭尽全力维护广阔边境领土的安宁，造福两国治下臣民。在3月15日的外交活动中，通过了俄国海军和平占领友国领土及港口的决议，这充分地证明了博格多汗[15]政府完全正确地领会到了与我们达成协议的意义。"[16]

尼古拉二世盛赞该协议的订立是"兵不血刃的胜利"。于是，自然而然地，威廉二世站在德国的角度对此事进行了评价。3月28日清晨，他造访俄国驻柏林使馆。奥斯滕-萨肯伯爵报告称："就俄国最终取得大连湾和旅顺港的所有权一事，他亲自委托我向我们的神圣君主传达自己的恭贺之情。德皇陛下说道：'您应当知道，我始终都在关注尼古拉皇帝的各种政治成就。我们二人都坚信远东大有可为，这令英国不喜！现在，是时候让英国明白：受贸易野心的驱使，在全球范围内针对所觊觎的各处提出享有特权和优先权的主张是徒劳无益的了。这样，当其他列强未经它的许可而在同一地区谋求利益时，它便不再高呼背叛了。'"[17]

德国君主的反英言论冗长而尚武，这使俄国外交官在向彼得堡汇报会面情况时不禁感叹："尽管德皇体内流淌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液，但是他对英国的积怨再次令我震惊。听他的口风，可以这样说，他正在寻找变语言为行动的有利时机。"[18]显然，德皇在大使馆的谈话中有所保留，当日他决定给尼古拉二世写一封私人信函："我由衷地恭贺您在旅顺港大获全胜。我们俩好好派兵把守渤海湾入口，为自己赢得应有的尊重，特别是在黄种人中间。在朝鲜达成的精彩协议使您成功地平息了日本人的愤怒，我认为，这就是外交的典范，这就是先见之明。在伟大的旅程中，您能实地考察远东问题，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实话实说，您现在就是北京的主宰。"[19]

事实上，在与清政府签订条约的前一天，第一批俄国士兵就已登陆旅顺港。他们乘萨拉托夫号运输舰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抵达此地。在

这支陆战队中编入了一个下辖2个营的步兵团、一个装备8门火炮的炮兵连、一支哥萨克部队、半个工兵连和一所有50个床位的野战医院分院。[20]这座城市的守备部队对清政府的变故一无所知，因此对他们而言，陆战队的抵达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在这支小型综合部队现身关东州沿岸前，没人清楚他们去往何方、意欲何为。1898年3月17日，在抵达驻泊地后，因中国人对于订立条约有所迟疑，于是俄国步兵不得不在运输舰上逗留了数日。一旦遭到拒绝，俄方部队将武力占领中国领土。[21]待镇守那里的2000名清兵撤出后，陆战队第一梯队立即登陆上岸。当地居民迅速瓜分剩余财物，据为己有。此次登陆的参与者写道："根据需要，我们不得不安抚他们，并且保护一众房屋免遭彻底的劫掠与破坏。随后，我们的部队才被放了进来制止盗窃和动乱。"[22]

尽管进度被打乱了，但是结局没出任何差错。3月28日，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Кирил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大公在城市海湾入口处的黄金山山顶的旗杆上升起了俄国国旗。几天后，清政府国旗依旧悬挂在俄国国旗旁边，后来才被降下。9天后，俄国陆战队登陆大连。即将撤退的清军部队和当地居民并未做出抵抗。在通往金州的要冲上，俄国侦察队遭遇当地守备部队伏击，但无人员伤亡。[23]除此之外，别无冲突。总而言之，最初中国人对俄国部队占领半岛漠不关心。后来，他们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对人力的需求以及与本国政府相比更为宽松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种转变。[24]

对于许多俄国外交官而言，这样的收获简直出乎意料，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开玩笑道：亚瑟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俄国驻北京公使卡西尼。[25]事实上，旅顺港名称的由来与1850年代末曾抵达此地的英国水手有关。在鸦片战争时期，旅顺港沿岸仅有数十座农家小屋，绝无城市之规模。[26]正如威廉二世所预言的那样，英国对所发生的事件大为不喜。国际争端在所难免。对于俄国租借旅顺港一事，索尔兹伯里政府反应强烈。1898年5月14日，张伯伦（J. Chamberlain）在议会上发表讲话，措辞极为严厉，俄国彻底激怒了阿尔比昂。[27]张伯伦说道："如果与魔鬼进餐，那么你必须随身携带很长的汤勺。"

在这句话中，魔鬼暗指俄国。此外还应明白，在英语中"长勺"的另一重含义是"刺刀"，这样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理解他后续的论述了："未来，我们必须在中国与俄国清算，在阿富汗也是如此。英国本应向俄国宣战，但是如果没有盟友，我们就无法重创俄国……如果未来我们打算

奉行孤立政策，这正是该国至今所奉行的政策，那么大清帝国的命运走向极有可能与我们的愿望和利益相悖。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决定实施开放政策，以确保我们所有的竞争对手都享有同等的贸易条件，那么我们就不能纵容我们的侵略主义者满世界地给我们招惹是非。同时，我们不应放弃与列强结盟的想法，结盟对象的利益诉求应与我们绝对接近。”[28]

张伯伦清晰地阐明了英国远东政策的前景。正如英国代理外交大臣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这是通往与俄国开战之路的重要里程碑。”[29]英国媒体开始积极探讨英日联盟问题，与此同时，东京方面率先提出就远东问题进行磋商的提议。[30]在中国海域，英、日与俄、法的海上对抗已初具规模：英国投入了2艘装甲舰、3艘装甲巡洋舰、5艘防护巡洋舰、1艘无防护巡洋舰、4艘单桅纵帆炮舰和4艘鱼雷艇驱逐舰；日本投入了2艘装甲舰、7艘防护巡洋舰；法国投入了1艘装甲巡洋舰、3艘防护巡洋舰和1艘无防护巡洋舰；俄国投入了6艘装甲巡洋舰、1艘防护巡洋舰、2艘单桅纵帆炮舰和2艘装甲炮艇。英、日舰队在吨位和军备方面占优势，它们拥有更强大、更新型的军舰。以火炮为例，英国舰队拥有192门大口径火炮、152门小型火炮；日本舰队拥有165门大口径火炮、205门小型火炮。[31]尽管俄英关系急剧恶化，但是无论如何尚未演变为军事对抗。英、法1898年秋在苏丹爆发的法绍达冲突、1899年结束的以布尔战争为开端的南非危机断绝了这种可能。无论如何，截至当时，伦敦暂时处于“光辉的孤立”状态，没有能够为它的大陆利益而战的盟友。

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彼得堡方面不计划深入被英国视为贸易重心的长江流域。1899年4月16日，俄、英两国缔结条约，在中国划分铁路利益区。借此，两国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双方相互让步：俄国承认长江流域是英国的主要势力范围；作为交易，英国承认中国的“塞外”地区——东北和蒙古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尽管彼得堡与伦敦的关系没有太大的进展，但是俄中关系已然恶化。李鸿章痛斥该条约意图瓜分中国领土；清政府声明，因无大清帝国代表的参与，故俄、英两国私下订立之条约对中国无效。[32]

亚洲的时局进展引起了维也纳和柏林的广泛关注。自然而然地，英俄关系的恶化也令他们热情高涨。[33]德国和俄国先后占领了进京的海上要塞，为了寻找平衡，1899年7月1日，英国向清政府租借威海

卫，“租期与俄国租借旅顺港期限相同”[34]。此时，远东遭遇了罕见的复杂局势，欧洲三大强国——德国、俄国和英国分别占领了北京和日本附近的三处海军基地。与此同时，俄国（旅顺港）与英国（威海卫）的基地针锋相对。正如格雷（E. Grey）所指出的那样：“维护中国统一的神圣原则只对日本适用，而对在日本战胜清政府后宣扬该原则的欧洲列强却不适用。”[35]这为未来阴暗的前景埋下了伏笔。东京方面疑心重重，暗流涌动。

[1] Козлов М.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 значении Мурманского берега в гидр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и морском отношениях.//МС. 1883. №9. С.25.

[2] Из статистики Архангель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по данным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отчета）.//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3（26） февр. 1916 г. №35. С.5；Мурман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Русский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й путь к незамерзающему морю как важный фактор в Великой войне）.//ВС. 1916. №2. С.52；54；Мурманское окно на морской простор.//ВС. 1916. №4 С.165；177.

[3] Цывинский Г.Ф. Ук.соч. С.165-167.

[4] Вильгельм II о занятии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ей Порт-Артура.//КА. М.1933. Т.3（58）. С.151.

[5] Вильгельм II о занятии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ей Порт-Артура.//КА. М.1933. Т.3（58）. С.152.

[6] Вильгельм II о занятии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ей Порт-Артура.//КА. М.1933. Т.3（58）. С.152；154.

[7] Романова Е.В. Путь к войне… С.68.

[8] Захват Германией Киао-Чао в 1897 г.//КА. М.1938. Т.2（87）. С.59-60.

[9]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делам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С.325-330.

[10] Тирпиц А. Ук.соч. С.110.

[11] Переписка о подкупе китайских сановников Ли-Хун-Чжана и Чжан-ин-Хуана.//КА. М. 1922. Т.2. С.286-293.

[12] Переписка о подкупе китайских сановников Ли-Хун-Чжана и Чжан-ин-Хуана.//КА. М. 1922. Т.2 С.292.

[1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9-1916…С.78-79.

[14] Мышлаевский А.З. 1900-1901 гг.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в Китае. СПб.1905. Ч.1. С.8；Цывинский Г.Ф. Ук. соч. С.167.

[15] 俄国人对清帝的称呼，源自蒙古对清帝的称谓。——译者注

[16]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делам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С.339.

[17] Вильгельм II о занятии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ей Порт-Артура.//КА. М.1933. Т.3（58）. С.154.

[18] Вильгельм II о занятии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ей Порт-Артура.//КА. М.1933. Т.3（58）. С.154.

[19] Переписка Вильгельма II с Николаем II. С.23.

[20]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 Порт-Арту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2008. Т.1. С.46-47.

[21] Соловьев Ю.Я. Ук.соч. С.60-61.

[22] Боев И. Порт-Артур.//Разведчик. 1898. №420. С.953.

[23] Дессино. Порт-Артур.//Разведчик. 1900. №489. С.199.

[24] фон Шварц А.［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 СПб. 1908. Ч.1. С.17.

[25] Дессино. Порт-Артур.//Разведчик. 1900. №489. С.33.（亚瑟港即西方人对旅顺港的称呼，俄文为Порт-Артур，而俄国驻北京公使卡西尼的俄文全名为Артур Павлович Кассини，其中Артур与亚瑟港中的“亚瑟”完全相同，故俄国人借此开玩笑。——译者注）

[26] Котвич В.［Л.］，Бородовский Л. Ляо-дун и его порты... С.1.

[27] 不列颠最早的名称。——译者注

[28]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С. Ук.соч. С.418.

[29] Grey of Fallodon，*Twenty-five Years*，*1892-1916*，vol. 1. New York：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1925，pp. 37-38.

[30] Записки графа Хаяси об англо-японском союзе.//ИМИД. СПб.1913. №5. С.322.

[31] Мор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Морские силы различных держав в китайских водах.//МС. 1898. №2. С.4-6.

[32] Попов А. Англо-рус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разделе Китая（1899 г.）.//КА. М.-Л.1927. Т.6（25）. С.111-134.

[33] Gyula Andrássy，*Bismarck*，*Andrássy and Their Successors*.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27，p. 413.

[34]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делам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С.352.

[35] Grey of Fallodon，*Twenty-five Years*，*1892-1916*，Vol.1，p.24.

10 俄日两国在朝鲜的冲突

日本在中国需要一块利益空间，在朝鲜需要一处安全的战略基地。此时，海岛帝国已然察觉了欧洲列强对于实现这些计划的威胁。石井菊次郎回忆道："新的敌人不是野蛮的部落或者蒙古人，而是世界上最强大、最贪婪的两个国家——德国和俄国。在新形势下，日本不得不赌上一切，冒险铲除新的威胁……唇亡齿寒，如果中国丢掉了领土，那么日本也难逃悲惨的命运。显然，通过西方列强在东方的扩张行动可知，清政府很快就会丢掉领土。"[1]中国的局势变化使日本坚信与俄国大战在即。1898年，欧洲列强和日本的在华政策引发了华人的排外运动。在朝鲜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俄日冲突十分尖锐。

自1885年后，俄国外交使团一直在汉城逗留，因此俄国在高宗宫廷的影响力日渐增强。1895年10月8日，在日本驻朝鲜公使三浦梧楼子爵策划的政变中，亲俄方针的拥护者、反日政党的领袖闵妃被残忍地杀害了。具有亲日倾向的内侍刺了闵妃几刀，然后将她丢出窗外，而后这个流血不止的女人被淋上了火油，烧成了灰烬。国王无能为力，因为他害怕本国士兵。

朝鲜的皇家卫队人数不多——仅有近万人。这些军人皆按日本和清政府模式接受训练，主要承担宫廷守卫或护卫省级高官之责。自1888年起，美国人负责指导朝鲜军队的训练事宜；到了1895年，日本教官接手了这项任务。后来，日本人几乎彻底掌控了这支规模不大的朝鲜军队，他们对在首都的全部5个营和分布在各省的8个营中的2个营进行训练，但是不追求达到良好的训练效果。在此期间，朝鲜军人主要发挥警察职能，而其中大部分军人，特别是供职于地方的军人几乎只存在于纸面上。在俄国的坚决抗议下，三浦梧楼被召回日本。在海军上将科尔尼洛夫号巡洋舰抵达仁川后，俄国外交使团的护卫队从陆战队抽调人手，扩充至160人。[2]

1896年2月11日，高宗与王位继承人一同逃出了受日本人控制的宫殿，藏身于俄国公使馆。在那里，他签署诏书罢黜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员。很快，大部分被罢黜的人被百姓杀害了，因为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3]在此，两国签署协议，将朝鲜军队的训练权交给以总参谋部普佳

塔（Д. В. Путятой）上校为首的俄国军事代表团。普佳塔上校曾担任总参谋部军事训练委员会高级文员。1896年10月至12月，俄国首批教官队伍已经能够对保卫王宫安全的守备营（800人）进行训练了，这支教官队伍包括2名下级军官、10名士官和1名军医。[4]半年后，在从了解远东实际情况、供职于东西伯利亚第三和第十机动部队的精英中选拔出来的俄国专家的指导下，朝鲜士兵的战斗训练和射击训练成果喜人。训练是依据俄式规程进行的。[5]

1901年，上述事件的见证者回忆道："那时，我们影响力达到了顶峰。我们的邻国正苦于遭受美国和日本的摆布——前者希望依靠朝鲜的公职人员建立商业企业、投机倒把；后者在釜山、元山及其他许多城市打好基础后，出兵驻守占领区，这引起了朝鲜人的恐慌。此外，它还图谋占领朝鲜的最佳区域以建立本国殖民地。俄国政府的义举则为朝鲜直接参与、影响本国事务奠定了基础。在驻朝军官普佳塔上校的号召下，我们黑龙江沿岸地区的教官赶赴朝鲜。在上校的领导下，训练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三个月后，朝鲜士兵已经很棒了，身手敏捷，技艺高超……"[6]

在最短的期限内，俄国军官完成了对朝鲜首都2个营的训练，这为朝鲜国王返回王宫创造了条件。在1896年2月底，高宗开始离开公使馆，留宿宫中，然而直到1897年3月他才彻底回宫。同年7月，另一支教官队伍抵达朝鲜。普佳塔计划在三年内打造一支6000人的朝鲜精锐部队，在此基础上兵力可扩充至4万人。[7]1896年5月14日，日、俄两国代表在汉城签署了一份关于确保高宗安全返回王宫的协议。[8]朝鲜时局的演变趋势令东京寝食难安。对于日本而言，朝鲜半岛是一座天然且唯一的连通大陆的桥梁。从日本国情出发，控制这条要道事关重大。

俄国军界也认识到了这个浅显的事实。1901年，《军事汇编》向读者介绍道："殖民化问题是关乎日本生存的问题。很难想象，失败将迫使日本永远放弃对朝鲜的图谋，并且最终与新秩序和俄国日渐增强的势力达成和解。后来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就是教训。为了在朝鲜达到宣传目的，日本人通过实施校园渗透、安排儿童游玩活动、节日庆典、民间娱乐、分发书籍等手段向朝鲜人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朝鲜、日本两姊妹与清政府弟兄利益完全一致，因此应当和睦相处，共同抵御来自北方的巨熊——俄国的侵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鼓动性的宣传取得了成功。"[9]当时，朝鲜对其他国家暗藏敌意，特别是在对待欧洲国家上相

当传统。[10]

1898年3月，日本政府试图以承认中国东北是俄国特别利益区为条件，换取彼得堡在朝鲜问题上的让步。最初，俄国拒绝了该提议，但后来妥协了。尽管俄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持续增强，但是很快在朝鲜便出现了有组织的排外抗议活动，并且势头渐盛。1898年3月22日至23日，俄国教官被迫离开朝鲜。显然这种妥协无法令双方满意，因此双方继续就朝鲜问题展开磋商。最终，彼得堡与东京订立协约。4月25日，俄国驻日本公使罗森（P. P. Розен）与日本外相西德二郎签署协定，承认朝鲜完全独立且内政不受干涉。与此同时，俄国承诺不妨碍日本在朝鲜的贸易，而电报租让权则由两方瓜分：俄国边境至汉城段归俄国所有；朝鲜海峡至汉城段归日本所有。[11]此外，双方还同意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不向该国派遣军事教官。[12]事实上，这意味着日本已经在朝鲜占据统治地位。在经济方面，日本在朝鲜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令俄国难以企及的水平。

1880年代初期，朝鲜的贸易伙伴只有中国和日本。[13]1882年5月21日，朝鲜与美国签订开国通商条约；同年6月6日、30日，朝鲜分别与英国、德国签订此类条约。[14]尽管如此，各项外贸指标几乎保持不变，日本处于领先地位。1886年，日本与朝鲜的贸易额为250万美元。同期，俄国与朝鲜的贸易指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仅为1.4万美元。1898年，情况依旧如此。在朝鲜的进出口额度中，日本占比90%以上。实际上，俄国的贸易几乎完全局限在朝鲜北部地区。在半岛南部，日本贸易占主导地位。1898年，抵达朝鲜北部港口的俄国船舶共计15艘（2艘帆船和13艘汽轮机船），总装载量为11326吨，占港口进出口量的7.3%。同年，抵达朝鲜北部的日本船舶共计379艘（其中152艘为汽轮机船），总装载量为97103吨，占朝鲜港口货运量的62.5%。1899年，抵达朝鲜北部港口的俄国船舶增至30艘（15243吨，占货运量的7.8%），日本船舶增至551艘（139185吨，占货运量的71.2%）。显然，尽管俄国的贸易指标有了相对增长，但是它们依旧严重地落后于日本的指标。[15]由此可见，日元在朝鲜备受青睐不无根据。人们乐于在结算时使用它。[16]

日本外相认为，俄国为了巩固在中国的地位，以便日后有机会插手朝鲜事务，因此需要和平。1900年1月，穆拉维约夫指出：“依据1898年协议，我们向日本承诺朝鲜有权保持领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试问，

若要违背诺言，现在我们能否应付与日本所发生的纠纷？同时应当充分意识到，我们在太平洋沿岸的地位尚无保障，在地位巩固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失去我们通过牺牲和努力换来的一切成果。对于该问题，军事机关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在目前的条件下，在朝鲜进行任何军事行动，对俄国而言都是艰巨的、昂贵的且几乎徒劳无功的事情。唯有通过加固旅顺港的防御、修建铁路支线使其与俄国相连，我们才能在远东事务中坚持己见，如有必要，还可给予远东武力支持。”[17]与此同时，在列强的侵略下，中国爆发了严重危机。

[1] Кикудзиро И. Ук.соч. С.9.

[2] Корф Н.А.，Звегинцов А.И. Военный обзор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и. СПб. 1904. С.70；В-ъ. Общий очерк Кореи.//МС. 1888. №7. С.3-4；Симонов Д. На досуге в Корее в 1897 г.//ВС. 1901. №11. С.214；Пак Чон Хе Россия и Корея 1895-1898. М.1993. С.16；22；24-30；56；63.

[3] Симонов Д. На досуге в Корее в 1897 г.//ВС. 1901. №11. С.215.

[4] Русские инструкторы в Корее（Извлечение из отчета поручиков Афанасьева 1-го и Н. Грудзинского）.//ВС. 1898. №11. С.34-37；39；42.

[5] Хабаровск.//Разведчик. 1898. №412. С.786；Симонов Д. На досуге в Корее в 1897 г.//ВС. 1901. №11. С.206-207.

[6] Симонов Д. На досуге в Корее в 1897 г.//ВС. 1901. №11. С.204.

[7] Пак Чон Хе. Россия и Корея...С.57-58.

[8]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делам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С.146-148.

[9] Симонов Д. На досуге в Корее в 1897 г.//ВС. 1901. №11. С.215.

[10] Андо К. Очерки Кореи по япон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МС. 1882. №6. С.90-91.

[11]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делам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С.159-160.

[12]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делам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С.346-348.

[13] Андо К. Очерки Кореи по япон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МС. 1882. №6. С.88.

[14] Д.М. Об открытии Кореи для внешней мор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МС. 1883.

№5. С.68-69.

[15] Корф Н.А.，Звегинцов А.И. Военный обзор...С.74；217；Пак Чон Х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и Корея. М.1997. С.39.

[16] Гарин Н. По Корее，Манчжурии и Ляодунскому полуострову. СПб.1904. С.268.

[17] Цар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о задачах России на Востоке в 1900 г.//КА. М.-Л.1926. Т.5（18）. С.16.

11 “和平渗透”的结果：义和团运动与对清战争

1890年，光绪帝成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开始倾向于按照日本模式推行改革，这招致了保守者的责难和来自慈禧的质疑，后者在帝国的管理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898年9月21日，在光绪帝推行变法的100天后，中国国内爆发政变。迫于慈禧的命令，光绪帝将国家的统治权让与她，而他自己则被软禁了起来，他最亲密的变法战友也遭到了处决。慈禧恢复了自己对大清帝国的绝对统治，然而这根本无益于改善该国局势。1898年，中国出现了抵制洋人的活动，这些活动的核心组织是一个名为“义和拳”（意为“正义与团结之拳”）的秘密社团，该组织呼吁从洋人和基督徒手中解放中国。清政府无法通过武力镇压已然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因此希望利用它解决自身的内政与外交问题。在担心权力落入维新派之手的同时，慈禧决定借助秘密社团将洋人赶出中国，而后再镇压他们。

局势不断恶化。自1898年后，中国诸多省份饱受旱灾和洪灾之苦。1898年夏，黄河泛滥导致近20万人死亡，近500万人背井离乡。在此期间，由于无力供养军队，清政府开始缩减军队规模。例如，在河南近70%的士兵被退役。在这个饥饿的国度，他们中的大多数加入了起义者的队伍。[1]1898年10月，北京爆发了抵制洋人的运动。在此期间，为了保护公使馆，一支综合部队——50名英国人携带2门速射炮、50名哥萨克和50名俄国水手、50名德国士兵进入京城。但是，1899年3月这支部队离开了北京，这座城市仿佛又归于宁静，大规模的动乱及对“使馆区”长达两个月的包围似乎没留下任何痕迹。[2]

清政府与各国外交官保持联络，并且装模作样地采取措施保护使团。[3]1900年4月17日，光绪帝在《京报》上发布谕令，严令地方政府遏制暴动和叛乱。[4]与此同时，慈禧在密令中号召：“我下令立即铲除所有洋人——男人、女人和儿童。不要留下任何活口。那样，我们的帝国即可摆脱令人厌恶的崩溃的根源，我的臣民也将重获安宁。”[5]

1900年4月18日，俄国驻京公使向外交部汇报称：“很遗憾，近期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他们从山东省出发进入直隶，涌向北京。在队伍中

打头阵的是特使，他们分散地潜入周围的村庄，成功地从当地的居民中招募到了大批拥护者。这些密使宣称自己拥有金刚不坏之身，他们歇斯底里的状态给村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坚信，一旦进入密使们所宣传的那种癫狂状态，自己便可以刀枪不入。在中国北方，迷信和饥荒随处可见，在饥饿的人群中，拳手们看到了促进义和团发展的良机。他们尚未发起大规模的运动，因此很难确定其人数。在首都郊区已经发现数百名义和团成员。很可能，在北京城内也潜伏着他们的追随者。至少，他们的口号已经在这座城市中口口相传。毫无疑问，他们打击的目标是洋人，因此在他们的旗帜上印着‘扶清灭洋’字样。”[6]

他们格外仇恨中国的基督徒，到处对基督徒发动袭击。[7]俄国公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忆道：“更别提各类商业企业、铁路公司及其他公司了，它们大肆谋求与中国利益直接相悖的各种特权。传教士——中国人的宗教启蒙者甚至以全面剥削中国、中国的财富和百姓为己任。”[8]面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面对洋人兴建铁路和搭建电报线路的行径，赤贫的中国百姓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恨。他们将天朝农作物歉收和自然灾害归咎于“洋鬼子”。中国这场动乱以1900年5月的义和团运动告终。起义者的旗帜上绘有“拳头”，因此欧美国家也将这场运动称为“拳民起义”。[9]

1900年5月，“拳民” 事实上已攻占北京。在大街小巷的房屋上，红色布条随处可见，百姓以这种方式表达对起义者的好感。[10]“拳民”开始攻击洋人和基督徒，并且大肆残害他们。义和团与“白鬼子”之间的斗争演变成了驱逐与外国相关的一切——宗教、书籍、商品、专家、生产工具及各种技术工艺。目击者回忆称：“在谁那里一旦发现外国的东西，那么他将遭受毫不留情的迫害。那些抽烟卷、戴夹鼻眼镜、拿外国雨伞、穿外国袜子的人也遭到了惩罚。六名学生因为拥有钢笔和外国书报而失去了生命。”[11]慈禧政府对所发生的一切心知肚明，在起义者红色旗帜上赫然印着的口号有“顺清灭洋”“打基督，平民心”“只打洋人和基督徒，绝不碰华人”等。[12]

政府军未出面制止“拳民”运动，中国首都局势日渐紧张。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在中国遇难，此前日本使馆书记官也在中国遇害，他们的尸体都遭到了肢解。事实上，在1900年6月20日至8月14日，自5月起一直被封锁的北京使馆区遭到了围困。直到最后一刻，使团的领袖都无法相信事情发展到了如此地步。[13]清政府建议各国外交官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甚至同意沿路保护他们、将他们安全送达港口，然而没人

相信这些承诺。[14]一位自1895年起便定居北京的俄国外交使团医生指出，从方方面面上讲，“北京的围困事件”完全不合常理：它搞得大家措手不及，所有人都未曾料到事态进展如此迅速，局面如此残酷，平民百姓已陷入暴怒和绝望。[15]尽管如此，上万名起义者仍旧未能占领使馆区。在525名士兵和军官的保护下，近900 名欧洲人和美国人及3000名中国基督徒在此避难。[16]在此期间，慈禧下令派遣正规军支援“拳民”。[17]

东清铁路和南满铁路均遭到了起义者的攻击。无论是“使馆城”的外交官，还是众多军人都对此深感意外。通过彼得堡对中国动乱的反应可以看出，俄国对中国当时的局面知之甚少。俄国外交官科罗斯托韦茨（И. Я. Коростовец）回忆道：“说实话，在我部（外交部——引者）电报中所谈及的事务，如俄国在远东的任务、与中国两百年的友谊以及与列强在支持合法的清政府方面所达成的共识都是老生常谈。所有这些论述都未能针对我们的问题给出具体的答复。总而言之，他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和偏见。”[18]当然，动乱是必须遏止的，但是避免与清政府的关系恶化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俄国进退两难，既不能对骚乱置之不理，也无法过分积极地参与对起义者的镇压。

1900年6月17日（俄历6月4日），穆拉维约夫在向沙皇呈递的奏章中汇报称：“事实上，我们在中国的立场与其他列强的立场完全不同。首先，我们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全长八千余俄里；其次，在满洲修建铁路我们雇了六万余名华人；最后，我们已经与邻国维持了近两个世纪的友好关系。看来，俄国不宜公开领导反清运动，以便在暴动结束后我们能够与天朝恢复睦邻关系。我们在中国的4000兵力决不允许列强在未与我们协商的情况下采取任何政治行动。”[19]俄国驻关东州政府的反应与彼得堡方面别无二致。在事件之初，没人想到可能会与清政府发生冲突。旅顺港上流社会，乃至关东州首席长官无不镇定自若，他们正关注着其他事件。

《城市报刊》记者回忆道：“1900年5月14日，星期日，五个月前出任关东省总督兼驻军司令和舰队司令的海军中将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列克塞耶夫（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为旅顺港上流社会举办了上任后的第一场舞会。这场在太平洋沿岸举办的舞会简直妙不可言……在各色灯光的照射下，在从未间断的温柔声浪中，旅顺港、远东和大连湾的权贵勋爵、青年才俊伴着七彩霓虹和氤氲香气纵情享乐，他们喜笑颜开、目光炯炯、肩背挺直……”[20]这是个喜庆的日子，中国爆发起义

的消息也未能破坏它愉悦的氛围。没人愿意将它视为真正的威胁。天朝长期动荡不安，他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21]中国的内陆问题并未引发关东州上层的担忧。到了1900年春，旅顺港陷入了困局，毗邻的中国领土瘟疫肆虐。此外，军方还担心与日本发生冲突。由于俄国与日本在朝鲜马山港的让步问题和萨哈林岛的渔业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与此同时，大批中国劳工从南满铁路辞工，离开了这座城市。[22]

俄国守备部队军官回忆道："为了应对英、日舰队的突袭，狂热的武装防务运动屡次打破了旅顺港的平静生活。人们坚信此事必将发生，以至于夜间当商船靠近鸠湾或进入塔河湾时被误认为敌舰而触发警报。"[23]1900年5月初，俄国打算，若清政府出现问题，则向该国派遣一支兵力不超过100人的小型陆战队。[24]5月29日，一支由海军少将维塞拉戈（М. Г. Веселаго）领导的舰队——伟大的西索伊号战列舰、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号巡洋舰、普萨德尼克号和盖达马克号鱼雷巡洋舰、高丽人号炮舰以及雷鸣号驱逐舰驶离旅顺港，驶向通往天津的要道——位于海河入海口的大沽口。此后，由72名船员组成的部队登陆大沽口。5月31日，这支部队抵达北京，守卫俄国使馆。[25]很快，局面明朗了起来。事实证明，尽量避免动荡的想法是错误的，但是那时很多人都犯下了这个错误。

在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中将西摩尔的号召下，驻守天津港的全体船员和海军陆战队成员组成了一支联合部队：英军915人、德军45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意军40人、奥匈军25人。6月10日，部队开拔前往北京。在遭到了义和团的连番阻击后，这支部队在距离京城22千米处被迫后退。26日，在克服了巨大困难并且遭受了重大损失后，这支部队撤回天津。[26]此次出征惨遭失败，勉强支持国际联军的天津洋租界也受到威胁。在此情况下，列强不得不就近从守备部队调派人手支援联军。此后不久，清政府向列强宣战。自然，俄国的旅顺港也无法避开这些事件而独善其身。清政府开始疯狂地加固通往天津的要道和大沽口要塞。

1900年6月10日早晨5点，阿列克塞耶夫收到沙皇诏书命令他向北京派遣陆战队。在旅顺港的守备部队中，只有东西伯利亚第三旅已做好充分准备，于是它承担起了进军北京的任务。俄国始终疑心日本，因此11日仅向大沽口要塞派遣了东西伯利亚第十二步兵团、1支哥萨克部队

和1个工兵排辅以4门火炮。事实上，阿列克谢耶夫不愿放那支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的部队离开旅顺港。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日本陆军和舰队也参与其中。同日，俄国军舰运送东西伯利亚第九步兵团、50名哥萨克士兵以及4门火炮、4门机关炮赶赴前方。[27]在“北京事件”发生之初，旅顺港的态度十分古怪。阿列克塞耶夫告诫俄国陆战队第一梯队：“你们前往中国是为了达成和平的目的，而非引发军事冲突。关东州条件艰苦，你们在这里服役需要付出巨大的艰辛，拥有坚毅的精神，你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维护和平的能力。现在你们即将赶赴新阵地承担另一项使命，我坚信，在那里你们也同样优秀，就如同你们在这里一样。你们要坚毅，要忍耐，要严格遵守纪律，不要冒犯平民。谨记，俄国士兵首先是基督徒，因此，对无害之人要怀有仁慈之心。你们的祖先曾屡次证明了这点。”[28]

这支部队尚未做好应对强势抵抗的准备，并且此前也未接受过相应的训练。远征军的一名成员指出：“关于敌人的信息和概况，我们一知半解、不甚明了。在旅顺港时，在梯队准备启程前，我们以为这次出征无关紧要，只是一次前往北京的愉快徒步，甚至认为无须在天津逗留。我们对清军评价很低，认为他们就是一群勉强装备着燧发枪和弩箭的乌合之众；要塞和堡垒上的枪炮装备完全不值一提，毕竟清军还配备了木制大炮和用于恐吓敌人的龙舟。至于精锐部队，那就更加稀少了，寥寥无几。拳民的武器只有刀剑和长矛，因此不足为惧。带着令人愉悦的错觉，我们启程了，未曾想形势比预想的严峻得多。”[29]俄国军队不仅要占领天津，还要守卫天津。在此过程中，俄国军队损失惨重，兵力损失高达15%，4名军官、50名士兵丧生，8名军官、200名士兵负伤。此外，在由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的联军中，死伤俄军约200人。[30]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同时号令全体臣民消灭敌寇，违者将遭到严酷的惩罚。慈禧在懿旨中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31]最初，彼得堡将与清政府可能爆发的战争视为可以依靠某些伎俩轻易解决的殖民地争端。“义和拳拳民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戳破了这些幻想。为了镇压这场起义，必须动员黑龙江沿岸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并且在后者中组建两个军。于1884年成立的黑龙江沿岸军区下设10个营、10支哥萨克部队、5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1个要塞炮兵连。十年后，步兵兵力仅增加了10个营。[32]尽管如此，军队的士气仍旧有所提高，他们不惧怕战争了：“揪住蛮子[33]的辫子打就对了，仅此而已。”[34]

中国东北的局势江河日下。1898年和1899年，在铁路修筑期间，“红胡子”在局部区段实施偷袭；到了1900年，袭击变得普遍起来。地方政府派遣部队援助“拳民”。[35]面对危机，维特立即放弃了他所宣扬的“和平渗透”。1900年7月20日（俄历7月7日），他写信给西皮亚金称：“我建议，无论如何都要尽可能地集结兵力。损失钱财事小，丧失威望事大。”[36]亡羊补牢，为时晚矣。节约开支与“和平渗透”政策使俄国既损失了钱财，也丧失了威望。1898年，东清铁路的守备力量从2000人增至5000人。显然，这股力量不仅不足以保卫铁路，甚至也无法满足铁路沿线的巡查需要。中国东北南部的守备力量尤为薄弱，从铁岭至关东州边界仅有590名守备军，在铁岭、辽阳和营口等大城市也仅有674名守备军（477名步兵和197名骑兵）。1900年6月14、28日和7月4日，俄国政府颁布数条命令，要求将东清铁路的护卫力量增至1.1万名军士。在军事活动爆发后，这自然无法实现。[37]

当时已有的5支守备部队和5个铁道加强营无法妥善应对当时的状况，因东清铁路建成区段被毁而造成的损失就高达7010万卢布。此时，俄国已经丧失了对东清铁路和南满铁路多数区段的控制权。在7月14日至28日的两个星期内，由恩格罗斯（А. А. Гернгросс）少将及其副手米先科（П. И. Мищенко）上校领导的守备部队的骨干力量被困哈尔滨。恩格罗斯，城市守备部队长官设法抵挡了“拳民”的进攻。[38]是的，在东北他们不是起义者，而是由地方长官统领的部队。[39]妇女和儿童被迫沿松花江撤回安全的哈巴罗夫斯克，因此，城内的俄国公民人数锐减（从5000人降至3000人）。[40]没来得及逃入哈尔滨或关东州的铁路职员，一旦落入清政府之手便会遭到严刑拷打，而后被公开处决。[41]

东清铁路因“拳民”的进攻而蒙受了巨大损失，因起义所产生的支出和工程费用高达71745878卢布。[42]1900年6月13日，俄政府下令从华沙和维尔纳军区向远东调遣3个编入炮兵营的步兵旅；22日，下令动员西伯利亚和黑龙江沿岸军区的后备军，并且要求黑龙江沿岸军区进入战时状态。一星期后，关东州也接到了后备军动员命令。7月5日，俄政府下令从基辅军区和敖德萨军区抽调2个编入炮兵营的步兵旅前往黑龙江沿岸地区执行换防任务。[43]

7月6日，沙皇颁布诏书下令组建东西伯利亚第五步兵旅，下设4个团；[44]9日，沙皇下令组建旅顺港要塞步兵团，该团需在俄国欧洲部分完成组建，而后前往常驻地。[45]7月8日，沙皇下令攻入中国东北。7月

14日，在这项命令落实前，清军就开始炮击布拉戈维申斯克了。市内一片恐慌，百姓弃城而逃。清军试图沿黑龙江拦截俄国船只。7月20日，西伯利亚军区和谢米列奇耶州开始实施动员。三天后，俄政府决定组建4支在中国活动的部队——第一、二、三步兵团和一支陆战队。黑龙江沿岸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共召集了101887名预备役士兵，动员了53个营、43个骑兵连和哥萨克部队、18个步兵连和骑兵连。[46]

显然，这还不够，在与中国接壤的漫长边境线上，绝大部分区域尚未设防。黑龙江沿岸的局势相当凶险。因遭遇清军炮击，在沿河180俄里的范围内通信断绝。早在1885年，曾就建立黑龙江沿岸军事舰队的计划展开过讨论；到了1893年，该计划被重新提起。由于资金短缺，该计划一经提起便被驳回。结果，1900年俄国不得不临阵磨枪，用锅炉钢板充当色楞格号和松花江号汽轮机船的护板，并且在其上安装火炮。这些自制的炮舰在与清军炮手对战的同时，既确保了枪炮子弹的供应，也为沿河进入布拉戈维申斯克提供了安全保障。[47]

此前，由于担心清军可能在黑龙江右岸采取行动，俄方强行驱逐了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国人。在这座拥有3万人口的城市中，除后备营外，几乎没有任何兵力和用于武装后备兵员的武器弹药。为了避免侨居俄国的华人向同胞施以援手，俄国当局对他们实施暴力侵害。驱逐行动伴随着殴打和劫掠，大批逃亡者溺水而亡。少数侥幸乘船逃脱的流亡者背负叛徒之名，死在了清军的枪下。即便逃亡者能够活着上岸，上岸后他们也会被处死。其余流亡者被迫泅渡黑龙江，但是成功者甚少。[48]

局势越发严峻，只有掌控黑龙江才能确保俄国边境的安全，但陆军人数明显不足。以分布在黑龙江沿岸的哥萨克部队为例，在河流左岸从波克罗夫斯克站至扎别洛夫斯基村1800俄里范围内，截至1899年1月1日，该区间的人口为24562人，其中（各年龄段的）哥萨克男子为11363人，哥萨克女子为10568人。[49]甲午战争期间，该地区的防卫工作不得不求助于农民自卫民兵团。依据1900年的规定，年龄在21～45周岁的各阶层男子必须加入民兵团。1900年7月，在该区段组建了32支分队（其中2支队伍是由朝鲜人组成的），共计4131人，然而黑龙江沿岸军区仅收到了26944支步枪。要知道，在事件爆发之初，俄国只打算派遣2个团、1个炮兵连和1支哥萨克部队应付局面。

1900年秋，为了镇压起义，已经沿俄国境内铁路和海路运送10万名士兵。东清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无法提供与清军对战所需的全部运力。

自动乱爆发之初至1900年10月1日，俄国沿西伯利亚铁路累计运送人员54410人、马11407匹、货物188200普特。与此同时，从俄国欧洲部分出发沿海路累计运送20000余人、货物百余万普特。最终，俄国向中国东北累计派遣了126个营、118支哥萨克部队和336门火炮，其中大部分兵力和武器来自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及黑龙江沿岸地区，少部分来自俄国欧洲部分。[50]

欧洲列强联手美、日两国出兵中国镇压起义，这场国际惩罚性征讨的领袖是德国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8月6日，威廉二世曾在电报中向尼古拉二世提议由瓦德西担此大任。[51]1900年7月9日，德皇下令组建德国东亚军团，军团成员多为志愿兵。最初，军团下设8个营、3个骑兵连和4个炮兵连（军官和士兵1.1万余人，9月扩编7600人）。7月27日，第一批前往中国的德国士兵乘船出发；8月10日，德国最后一艘赶赴中国的运兵船扬帆起航。[52]德皇自欺欺人地站在了受辱者的立场上。7月27日，在不来梅港为远征军饯行时，他告诫本国士兵："不要仁慈怜悯，不要留下俘虏！在一千多年前，在匈奴国王艾特泽尔统治时期，匈奴人留下了他们的权力印记，在童话传说中他们的事迹至今仍存。你们也当如此，因你们的事迹，德国人的名字应当被中国铭记千年，以至于无论何时中国人都不敢直视德国人。"[53]

瓦德西的部下无法彻底执行这些建议，因为主要的军事行动在他们抵达中国（1900年9月27日）前便已结束。陆军元帅本人9月24日抵达大沽口。当时，在渤海湾至北京沿线区域驻守着来自日本、俄国、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和奥匈的军官、士兵及海军陆战队队员，其中日军20934人、俄军13234人、英军8353人、德军8178人、法军6757人、美军5608人、意军2541人以及奥匈军494人。[54]在最后几场军事行动中，俄军和德军成功地攻下了渤海湾沿岸的众多要塞。尽管清军拥有大量现代化武器，其中包括机关枪和重型火炮，但是他们依旧无法守住这些要塞。[55]此后，联军开始实施惩罚行动并且组织阅兵。[56]

在军事行动高潮时期，维特主张即使不实施"和平渗透"政策，也应实施限制性军事渗透政策，他提出应当放弃占领北京。1900年7月27日（俄历7月14日），他写道："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必须极力限制无序范围的扩大化。并且，一旦在我们的地盘（中国东北）上建立起了秩序，我们就打道回府。"[57]但是，无论这项计划多么完美，它终究无法变为

现实。7月14日，联军攻占天津。欧洲人的成就迫使慈禧改变态度，向被围困的外国使馆示好。7月20日，她派人送去了西瓜、南瓜、黄瓜、茄子等食品。很快，战火被再次点燃。7月底，在“使馆区”已经能够清楚地听见枪声了。8月14日，联军攻占北京，慈禧连同朝廷官员逃离北京。后来，义和团运动被彻底镇压，中国东北实际上成了俄国的占领区。1900年8月，在占领北京后，俄政府立即声明不打算出兵吞并占领区，并且计划在与清政府达成协议后撤兵。[58]12月22日，联军向清政府驻北京全权代表提交联合照会，提出了对起义者、政府和国家的惩罚纲领。[59]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根据该条约，清政府必须在39年内向列强支付4.5亿海关两的赔款；向柏林和东京派遣“赎罪使团”悼念遇难的外交官，在他们被杀处竖立纪念碑；大规模惩办支持“拳民”的罪人；摧毁大沽口地区的防御工事；推行一系列方便洋人在华行动的改革。[60]俄国部队占领中国东北一事引起了日本的极大恐慌。在日本看来，盘踞在中国东北的俄军已然对朝鲜构成了威胁。[61]1901年1月22日，日本驻俄公使向俄国外交部提交本国政府照会。东京方面提醒彼得堡方面注意1898年的协议仍在有效期内，因此，日本在中国东北“享有完全特殊的地位，若俄国拒绝声明将撤离该省，我国政府难免有所疑虑”。[62]

俄国驻日本公使拉姆兹多夫注意到，在此期间，日本人的外交积极性迅速提升。1901年2月22日，伊兹沃利斯基致信外交大臣称：“当然了，为了保全利益，日本政府正在努力寻求其他利益国的支持。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外交界正在竭尽全力地煽动包括英国、德国及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抵制我们在满洲的行动。众多迹象表明，东京正在加强自身对动荡的满人朝廷的影响力：毫无疑问，东京必然会在暗中向满人朝廷提供各类资金，而满洲问题也为东京提供了一个充当中国和满人朝廷利益捍卫者的契机。日本政府的近期目标是针对俄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在甲午战争后逼迫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主张的联盟。若结盟失败，日本或将放弃各种利益，或将下定决心单打独斗。目前，无法预料日本政府是否拥有足够的勇气选择后者，哪怕是冒着与俄国兵戎相见的风险。”[63]

[1] Калюжная Н.М. Восстание ихэтуаней（1898-1901）. М. 1978. С.35-36.

[2] Мышлаевский А.З. Ук.соч. СПб.1905. Ч.1. С.16.

[3] Попов П.С. Два месяца осады в Пекине. Дневник：18 мая-31 июля ст.ст. 1900 г.//ВЕ. 1901. №2. С..518-519.

[4] Боксер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КА. М.-Л.1926. Т.1.（14）. С.10-11.

[5] Сидихменов В.Я. Маньчжурские правители Китая. М.1985. С.188.

[6] Боксер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КА. М.-Л.1926. Т.1.（14）. С.9.

[7] Попов П.С. Два месяца осады в Пекине...//ВЕ. 1901. №2. С.524.

[8] Евреинов Б.Н. Осад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Миссий в Пекине май-август 1900 г.//ИМИД. СПб.1912. №4. С.125.

[9] Сидихменов В.Я. Ук.соч. С.176-177.

[10] Попов П.С. Два месяца осады в Пекине...//ВЕ. 1901. №2. С.524.

[11] Калюжная Н.М. Ук.соч. С.200.

[12] Калюжная Н.М. Ук.соч. С.26.

[13] Евреинов Б.Н. Осад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Миссий...//ИМИД. СПб.1912. №4. С.135.

[14] Попов П.С. Два месяца осады в Пекине...//ВЕ. 1901. №2. С.527.

[15] Корсаков В.В. Пекинские события. Лич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б осаде в Пекине，май-август 1900 года. СПб.1901. С. XIII.

[16] Сидихменов В.Я. Ук.соч. С.190.

[17] Пу И（Генри）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моей жизн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Пу И-последн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Китая. М. 1968. С.33.

[18] Коростовец И.Я. Росс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Пекин. 1922. С.49.

[19] Боксер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КА. М.-Л.1926. Т.1.（14）. С.15.

[20] Янчевецкий Д.Г. У стен недвижного Китая. Дневник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Нового края》 на театр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Китае в 1900 году. СПб.-Порт-Артур. 1903. С.2.

[21] нчевецкий Д.Г. У стен недвижного Китая. Дневник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Нового края》 на театр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Китае в 1900 году. СПб.-Порт-Артур. 1903. С.6.

[22] Санников Н. Печилийский отряд и сводная саперная рота этого отряда；с чертежом и 2-мя рисунками в тексте.//ИЖ. 1903. №6-7. С.841.

[23] Санников Н. Печилийский отряд и сводная саперная рота этого отряда；с чертежом и 2-мя рисунками в тексте.//ИЖ. 1903. №6-7. С. 842.

[24] Коростовец И.Я. Ук.соч. С.12；Дацышен В.Г.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война. Маньчжурия 1900. СПб. 1996. С.54.

[25] Янчевецкий Д.Г. Ук.соч. С.8.

[26] Сидихменов В.Я. Ук.соч. С.191.

[27] Санников Н. Печилийский отряд и сводная саперная рота этого отряда；с чертежом и 2-мя рисунками в тексте.//ИЖ. 1903. №6-7. С.846-847；851-852.

[28] Янчевецкий Д.Г. Ук.соч. С.83.

[29] Санников Н. Печилийский отряд и сводная саперная рота этого отряда в Китайскую войну 1900 г.；с 8-ю рисунками в тексте и 1 картой.//ИЖ. 1904. №1. С.50.

[30] Санников Н. Печилийский отряд и сводная саперная рота этого отряда в Китайскую войну 1900 г.；с 8-ю рисунками в тексте и 1 картой.//ИЖ. 1904. №1. С.90-91.

[31] Калюжная Н.М. Ук.соч. С.216.

[32] Редигер А.Ф. История моей жизн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ра. М.1999. Т.1. С.316.

[33]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人对乌苏里华人的蔑称，从广义上讲包括来自中国东北周边区域的季节性移民和经水路抵达乌苏里的山东劳工。——译者注

[34] W. Из жизн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юнь 1902 г.-март 1903 г. Южно-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Печилий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Япония и Южная Манчжурия.//ВЕ. 1904. №4. С.435.

[35] Нилус Е.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Харбин. 1923. Т.1. 1896-1923. С.187；192.

[36] Письма С.Ю. Витте к Д.С. Сипягину（1900-1901 гг.）.//КА. М.-Л.1926. Т.5（18）. С.32.

[37] Овсяный ［Н.］［Р.］1900-1901 гг.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в Китае. СПб.1910. Ч.3. Отдел 1. Северная Манчжурия；Отдел 2. Южно-Манчжурский район. С.52；244.

[38] Суров А. Крат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казачьего войска и настоящее его состояние.//ВС. 1900. №10. С.354；Соколова 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погроме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по линии Восточно-Китайск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в 1898 году.//ИВ. 1906. Том 106. Вып.12. С.817.

[3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12.

[40] John W. Steinberg，et al.，eds.，*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p. 35.

[41] Янчевецкий Д.Г. Ук.соч. С.587.

[42] Янчевецкий Д.Г. Ук.соч. С.587.

[43] Разведчик. 1900. №505. С.562；№507. С.602；Овсяный［Н.］［Р.］1900-1901 гг.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в Китае. СПб.1910. Ч.3. Отдел 1. Северная Манчжурия；Отдел 2. Южно-Манчжурский район. С.4.

[44] ПСЗ. Собрание третье. СПб.1902. Т.20.1900. Отделение первое. №18945. С.860.

[45] ПСЗ. Собрание третье. СПб.1902. Т.20.1900. Отделение первое. №18947. С.864.

[46] Овсяный［Н.］［Р.］1900-1901 гг.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в Китае. СПб.1910. Ч.3. Отдел 1. Северная Манчжурия；Отдел 2. Южно-Манчжурский район. С.3-5；13；Никитина К. Осада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а китайцами в 1900 году（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ИВ. 1910. Том 122. Вып.10. С.211-212；214-215.

[47] Н.Т.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б Амурской канонерской флотилии и обороне Амура.//ВС. 1908. №6. С.206；208；Никитина К. Осада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а...//ИВ. 1910. Том 122. Вып.10. С.223.

[48] Верещагин А.В. По Манчжурии. 1900-1901.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ссказы.//ВЕ. 1902. №1. С.113-114；Соколова 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погроме в Маньчжурии...//ИВ. 1906. Том 106. Вып.12. С.827-828.

[49] Суров А. Крат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казачьего войска...//ВС. 1900. №10. С.354.

[50] Записки генерала Куропаткина 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Итоги войны. Berlin. 1911. С. 123；132；125-126；151；Данилов Н.А. Подготовка в широком смысле воюющих сторон перед войной и обстановка перед сражением под Тюренченом.//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СПб. 1906. Ч.1. С.5；Иммануэль［Ф.］［Б.］Ук.соч. СПб. 1906. Вып.1. С.4；Овсяный［Н.］［Р.］1900-1901 гг.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в Китае. СПб.1910. Ч.3. Отдел 1. Северная

Манчжурия；Отдел 2. Южно-Манчжурский район. С.14；Дацышен В.Г. Ук. соч. С.56-57.

[51] Боксер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КА. М.-Л.1926. Т.1.（14）. С.22.

[52] Недзвецкий В. Океанские перевозки германских，английских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войск.//ВС. 1901. №4. С.66-67.

[53] Бюлов Б. Ук.соч. С.164.

[54] Овсяный ［Н.］［Р.］1900-1901 гг.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в Китае. СПб.1910. Ч.2. Действия на Печилийском побережье по взятии г. Тянь-Цзина. С.108-109.

[55] Агапеев А. Бэй-Тан（Из личных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ВС. 1902. №1. С.42-46.

[56] W. Из жизн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ВЕ. 1904. №4. С.445-446.；То же.//ВЕ.1904. №5. С.8.

[57] Письма С.Ю. Витте к Д.С. Сипягину（1900-1901 гг.）.//КА. М.-Л.1926. Т.5（18）. С.34.

[58] Попов П.С. Два месяца осады в Пекине...//ВЕ. 1901. №3. С.7；22.

[59] Боксер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КА. М.-Л.1926. Т.1.（14）. С.46-49.

[6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9-1916...С.84-90.

[61] Наканун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Декабрь 1900 г.-январь 1902 г.）.//КА. М.1934. Т.2（63）. С.7.

[62] Наканун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Декабрь 1900 г.-январь 1902 г.）.//КА. М.1934. Т.2（63）. С.9.

[63] Наканун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Декабрь 1900 г.-январь 1902 г.）.//КА. М.1934. Т.2（63）. С.15.

12 战争或合作：彼得堡与东京的抉择

俄国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英国与日本关系的复苏。1901年4月16日，日本驻英国公使林董子爵收到指示："日本政府尚未就与英国结盟一事发表最终意见，现委托公使阁下以个人名义与英国政府沟通，了解他们对结盟的态度，以便使日本政府在解决该问题时不受牵制。"[1]伦敦方面迫切希望拥有一个区域性的盟友，东京方面需要来自外部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而彼得堡方面在撤离中国东北的期限问题上始终含混不清。1901年3月25日，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正式拒绝了日本政府关于发布俄中关系公告的要求。拉姆兹多夫声明，俄国无法接受第三国干涉彼得堡与北京之间的关系，他补充道："俄国一旦确认满洲的秩序得以重建，清政府在北京重新站稳了脚跟并且有能力保障满洲的安全、把控满洲的局面，若无其他列强的干预，俄国将立即从中国撤军。"[2]

与此同时，英日两国在伦敦展开协商。1901年6月15日，林董通知东京：英国同意结盟。[3]拉姆兹多夫不赞成因中国东北问题而激化与日本的矛盾。1901年7月1日，他表明立场："在这件事情上，维护俄国的尊严极为重要。俄军撤离中国领土的理由绝不能是迫于国际复杂局势的压力，或者利益国提醒俄国履行曾做出的庄严承诺，撤退主张应当且只能由帝国政府率先提出。"[4]维特和库罗帕特金坚决反对撤退计划。他们认为，无论如何此时尚未形成对俄国有利的条件，因此他们的行动方向十分明确。

1901年8月1日，俄国外交大臣向陆军大臣和财政大臣致密函。他指出："毫无疑问，从政治角度上看，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中国领土若能划归俄属，这将极大地提升俄国在亚洲各民族中的影响力；若能掌控连接西伯利亚铁路和被太平洋水域铁路支线所贯穿的中国领土，则能减轻在建道路的施工负担，保证俄国在远东地区不折不扣地完成本国的历史使命。毕竟，目前太平洋水域的不冻港已在我们手中。"[5]尽管此类行动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是拉姆兹多夫依旧坚决反对将它们付诸实践。

外交领袖认为，在政治上没有"成人之美"一说。在他看来，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同意以牺牲中国领土为代价扩充俄国领地，遑论日本。[6]拉

姆兹多夫向维特和库罗帕特金提问道："在当前的军事实力下，俄国在应对日本的挑战时是否胜算十足，占领满洲莫非真能带来如此巨大的军事、战略和财政利益，以至于值得俄国以身犯险？"[7]然而，他并未得到明确的答复。外交大臣算错了一件事，在欧洲只有一个国家意图与俄国发生冲突，至少准备与之发生间接冲突。巩固在中国东北和黑海的军事地位、公开声明与殖民地的老对头法国结盟，俄国的这些行动令英国政府如坐针毡。1901年，在坎大哈省陆军元帅罗伯茨的领导下，英国陆军部制订了针对俄、法两国不同版本的作战计划。[8]

罗伯茨元帅对同时进攻这两个国家持怀疑态度。针对俄国，英国计划在以下4个方向采取行动：中亚，从印度出兵发起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和旅顺港；高加索；摧毁黑海水域的俄国商业舰队。此时若采取第一种方案，兵力不足的英印部队（75030人，增援部队不足16000人）在突厥斯坦行军，必将面临因补给困难而导致的各种问题；至于第三种和第四种方案，它们能否成功实施显然取决于土耳其的立场，并且这两个方案实际上未将可能爆发的陆地战纳入考虑范围。于是，就只剩下第二种方案了。此前，符拉迪沃斯托克入选难以攻克的要塞之列，因此旅顺港被英国视为理想的进攻目标，此事英国不打算亲力亲为，而是寄希望于未来的盟友日本。此时，伦敦方面唯恐俄国借助盟友法国的财力加强军力，因此计划威胁法国的殖民地，其目标主要是各大港口，如比塞大港（地中海）、达喀尔港（西非）、马提尼克港（西印度群岛）、迭戈-苏亚雷斯港（马达加斯加岛）、西贡港（印度支那）、吉布提港（红海）等。[9]

在伦敦协商期间，日本驻英国公使起草了同盟条约草案，其中包括6点：支持中国"门户开放"；维持中国的领土现状；授予日本在朝鲜的行动自由权；同盟国一方若与在第三国支持下的其他国家爆发战争，另一方应予以援助；双方应长期结盟；同盟的行动范围仅限于远东。[10]尽管英方对此未提出重大异议，但是自1901年夏双方始终无法从私人协商过渡到国务谈判。1901年8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出访欧洲和美国，阐述本国的外交前景。伊藤伯爵认为，若俄国提出的条件可为东京接受，那么日本可与俄国达成协议。并且他不相信日本与英国具有达成协议的前景。正因如此，在对谈判结果毫无期待的情况下，他批准了日本外交官在伦敦与英方展开谈判。[11]事实上，此前他们曾以协商的名义进行过谈判，但是林董未经授权，因此只能徐徐图之。1901年10月8日，日本驻英公使获得授权；16日，谈判正式开始。[12]

1901年9月16日（俄历9月3日），伊兹沃利斯基向彼得堡汇报了伊藤博文的行程，同时指出伊藤此行对东京意义重大：“尽管此次出行完全是私人行为，但此行的政治意图极为明显，即旨在近距离了解欧洲内阁的想法。虽然伊藤伯爵已经隐退，但是他在受日本天皇倚重的高官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此行的结果将极大地影响日本外交政策的走向。”[13]此前，伊藤博文并未向俄国驻日公使隐瞒自己的观点。这位日本元老的视线主要聚焦在朝鲜，特别是朝鲜北部，即那些可能成为日本殖民对象的领土。为实现该计划，东京必须做出决断，是与俄国结盟，还是与俄国对立。[14]11月6日，英方向日方提供了盟约草案。该草案包含4项条款，其内容与日本先前提交的条约草案几乎完全对应，仅有一处例外，即伦敦坚持将英属印度划入联盟的行动范围。[15]

1901年11月25日~12月4日，伊藤博文访问彼得堡，再次试图与俄国就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划分问题达成协议。此时，日本已经做好了向俄国出让关东州的打算，并且期望以此换取俄军撤离中国东北并在那里宣布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回报。然而，迎接这位日本高官的却是礼貌而冷漠的会晤。[16]针对朝鲜问题缔结新的日俄条约的提议遭到了拒绝。日本起草的条约包含5款：两缔约国承认朝鲜独立；不得利用朝鲜领土实施相互敌对的战略目标；确保朝鲜海峡的通航安全；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自由和工商业自由，其中包括东京有权向朝鲜政府提出建议，在必要时，如为镇压起义可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本条约应取代此前日俄两国就该问题所签署的全部条约。[17]

12月5日，拉姆兹多夫向尼古拉二世递交了与伊藤博文的谈判报告。在报告中，俄国外交大臣指出，他向日本访客指出其提议完全是“符合日本利益的特惠条款”清单，一旦落实了上述条款，朝鲜的独立将成为一纸空文。拉姆兹多夫称：“鉴于俄国与朝鲜半岛相互毗邻，帝国政府无法认同日本的这种安排。”[18]俄方提出对应方案。在保持日方所提出的前三款和最后一款不变的情况下，俄方对第四项条款进行明显的改动，并且新增了第五款和第六款（俄方的条约草案共包含七款）。俄国仅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工商业领域享有特权和行动自由；但是，东京若向汉城提出建议或派遣军队，需预先经与彼得堡协商一致（第四款）。若发兵半岛，日军在岛上的逗留时间必须严格遵守限制，期满务必召回。此外，日军不得在俄朝边境逗留（第五款）。日本在朝鲜所享有之特权，在与中国毗邻之地俄国亦应享有（第六款）。[19]

伊藤使团的访问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他依旧期望与俄国达成协议，并且认为不必急于与英国结盟，然而东京并不支持他的观点。[20]东京方面相信未来无法与彼得堡就朝鲜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种想法并非毫无依据的臆测。12月10日，库罗帕特金曾向拉姆兹多夫阐述过他对该问题的看法："我相信，在先前我所圈定的边界范围内，即使我们一直把持着北满，我们也很有把握避免与日本决裂。因此，在与日本缔结新条约时，我们不应付出太大的代价。彻底放弃朝鲜并且将它让给日本，这种代价实在是太过高昂了。"[21]陆军大臣对日本的条约草案提出了新要求。这些要求不但进一步限制了日本在朝鲜的行动自由，同时还扩大了俄国政策在中国东北的影响力。这些内容出现在1901年12月14日（俄历12月1日）经尼古拉二世批准并送往柏林递交给伊藤博文的最终版文件中。[22]

在前往伦敦的途中，伊藤博文途经德、法两国。他的俄国之行引起了英国的极大不满。英国外交部敦促日本外交部门尽快确定结盟事宜。针对英国人所提供的同盟文件，东京方面略加修改（如使用"大清帝国"替代"清国"，使用"大韩帝国"替代"朝鲜"等），进而将谈判拖延到了11月底。[23]此时，日本没必要再继续耽搁下去了。1902年1月30日，英日两国缔结了为期5年的同盟条约。该条约明确了英国在中国及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利益；伦敦和东京承诺，一旦同盟国一方与第三国爆发战争，另一方严守中立（第二款）；如同盟国一方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其他国家作战，另一方应直接给予军事援助（第三款）。[24]由此可见，该条约是旨在对抗俄国及其盟友法国的区域性合作协议。

作为对英日同盟的回应，俄国外交部更倾向于发表声明宣布本国在华政策保持不变。1902年3月17日（俄历3月5日），俄国对英日同盟条约做出官方回应："在对英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向俄国就此问题发布的友好通告表示认同后，帝国政府对该条约的缔结反应相当平静。中国动乱爆发后，俄国的政治指导方针从未改变：俄国要求友邻中国及朝鲜始终保持独立性和不可侵犯性；俄国希望维持当前的局面，在远东地区彻底实现和平。"[25]事实上，对于英日同盟而言，保持立场不变的做法未必是上策。这种做法可能促使英、日外交部门在俄国屯兵中国东北的谈判中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无论是对因布尔战争而损伤元气的英国而言，还是对结交了欧洲同盟的日本而言，这都极为有利。

据英国专家估算，截至1902年3月25日，日本已部署18.2万名受训

士兵应对陆战行动；同时部署了17万名士兵守卫日本群岛。东京自身的运力足以迅速转运3个师团：42000名军官、士兵，17100名担架兵、后备兵，16830匹马。据计算，如有必要，野战部队可集结30 万人兵力（这比英国的预测值超出10万人）。伦敦对东京发动战争的财力水平和日军陆战的后勤保障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日本的行动目标极为明确：中国东北、旅顺港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地区的俄军兵力约11.2万人，配备150～180门火炮，其中野战部队6万～7万人，配备130门火炮。[26]1902年，日本向盟国提交了对俄作战整体规划。第一，若春季或夏季开战，则在陆战队登陆的同时，派兵包围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港要塞，然后迅速挺进哈尔滨，占领东清铁路和南满铁路的重合区间；第二，若在冬季开战，则先派兵登陆辽东半岛，同时包围旅顺港，然后靠近哈尔滨；春季，待沿岸冰雪融化后，派兵登陆并包围符拉迪沃斯托克，同时向哈尔滨发起总攻。[27]

一旦爆发军事行动，东京希望伦敦能够给予财政支持，并且在必要时协助日本实施海上管制、执行舰队护航任务。如有必要，日本愿意协助英军对战法属印度支那。英国人对日本提出的对俄作战计划，特别是冬季作战计划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令英国人感到疑虑的是日军能否迅速攻占俄国要塞，日本人能否高效地利用铁路实现军队补给（伦敦方面担心俄国骑兵袭击铁路致其瘫痪）。此外，英国人也对距离问题（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哈尔滨相距400英里，旅顺港与哈尔滨相距600英里）和双线作战组织问题提出了质疑。[28]1902年7月，英日两国达成协议：双方互换情报信息；共同编制英语版和日语版的中国东北、朝鲜及印度支那的地图和参考资料；一旦爆发战争，日本人在使用英国的电报线路时将享受特惠政策。[29]至此，伦敦相信日俄战争即将爆发。

在拒绝与日本达成同盟协议后，彼得堡陷入了困境：俄国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没有从其他列强那里获得实质性的支持。1902年4月7日，迫于英美两国的压力，俄国与清政府订立条约，规定在18个月内俄军分批撤离中国东北：在先前的6个月内，俄军撤离奉天省西南部地区；在中间的6个月内，俄军彻底撤出奉天省；在最后的6个月内，俄军撤离黑龙江。[30]事实上，彼得堡不急于履约，至少不打算完全履约。1902年，俄国政府在东清铁路护路队（数千兵力）基础上组建了外阿穆尔军区边防兵团。很快，近2.5万名边防军驻扎此地。[31]

1903年2月7日，在外交大臣主持召开的特别会议上通过决议，决定

采纳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提出的关于俄军不参与控制中国东北及与北京展开谈判的提议。[32]2月10日（俄历1月28日），尽管沙皇批准了关于仅从吉林省南部和奉天省撤兵的奏折，但是俄军还是“无限期地”驻守吉林省和黑龙江省。[33]远东局势岌岌可危，然而此时尼古拉二世依旧认为俄国有机会在巴尔干大展拳脚。1903年1月18日（俄历1月5日），沙皇亲自确立以下目标：“我们在警惕东方的同时，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西方。”[34]

[1] Записки графа Хаяси об англо-японском союзе.//ИМИД. СПб.1913. №5. С.323.

[2] Наканун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А. М.1934. Т.2（63）. С.21.

[3] Записки графа Хаяси об англо-японском союзе.//ИМИД. СПб.1913. №5. С.324.

[4] Наканун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А. М.1934. Т.2（63）. С.31.

[5] Наканун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А. М.1934. Т.2（63）. С.33.

[6] Наканун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А. М.1934. Т.2（63）. С.34.

[7] Наканун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А. М.1934. Т.2（63）. С.35.

[8] “Military needs of the Empire in a war with France and Russia，” PRO，War Office（WO）106/48，pp. 1-67.

[9] “Military needs of the Empire in a war with France and Russia，” PRO，WO 106/48，pp. 32-33，52.

[10] Записки графа Хаяси об англо-японском союзе.//ИМИД. СПб.1913. №5. С.323.

[11] Кикудзиро И. Ук.соч. С.37-40.

[12] Записки графа Хаяси об англо-японском союзе.//ИМИД. СПб.1913. №5. С.325

[13] Наканун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А. М.1934. Т.2（63）. С.37.

[14] Гурко В.И. Ук.соч. С.322.

[15] Записки графа Хаяси об англо-японском союзе.//ИМИД. СПб.1913. №5. С.326.

[16] Витте С.Ю. Ук.соч. М.1994. Т.2. С.211.

[17] Наканун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А. М.1934. Т.2（63）. С.46.

[18] Наканун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А. М.1934. Т.2（63）. С.44.

[19] Наканун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А. М.1934. Т.2（63）. С.46.

[20] Записки графа Хаяси об англо-японском союзе.//ИМИД. СПб.1913. №5.С.330-331.

[21] Наканун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А. М.1934. Т.2（63）. С.49.

[22] Наканун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А. М.1934. Т.2（63）. С.50-53.

[23] Записки графа Хаяси об англо-японском союзе.//ИМИД. СПб.1913. №5. С.328.

[24]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делам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С.527-530.

[2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9-1916...Приложение №4. С.114.

[26] “Memorandum of the proposed conference between Naval and Military representatives of Great Britain and Japan as to joint action in the event of war，” PRO，WO 106/48，pp. 447-449.

[27] “Memorandum of the proposed conference between Naval and Military representatives of Great Britain and Japan as to joint action in the event of war，” PRO，WO 106/48，p. 450.

[28] “Memorandum of the proposed conference between Naval and Military representatives of Great Britain and Japan as to joint action in the event of war，” PRO，WO 106/48，pp. 451-452.

[29] “The military resources of Russia，and propable method of their employment in a war between Russia and England. Secret，” PRO，WO 106/48，p. 436.

[3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9-1916...С.91-93.

[31] Троицкий В. Заамурский округ пограничной стражи на охране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в кампанию 1904-1905 гг.//ВС. 1908. №8. С.64；75.

[32] Первые шаги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1888—1903 гг.）.//КА. 1932. Т.3（52）. С.123.

[33] Дневник Куропаткина с 17 ноября 1902 по 6 марта 1903 г.//КА. М. 1923. Т.2. С.28.

[34] Дневник Куропаткина с 17 ноября 1902 по 6 марта 1903 г.//КА. М. 1923. Т.2. С.20.

13 远东抉择的外交背景：从巴尔干到波斯

尼古拉二世密切关注巴尔干局势，这与欧洲动向不无关系。1900年2月7日（俄历1月25日），他批准了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伯爵的奏章。奏章称，“为了维护我们在土耳其东部、中亚、波斯和远东的主要利益”设定下列任务：①说服苏丹终止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修筑防御工程、在黑海沿岸修筑铁路的计划；②与阿富汗恢复直接外交往来；③在里海东岸和突厥斯坦军区继续加强战备工作；④在波斯积极实施工程勘察，筹备修建奥伦堡—塔什干—德黑兰—外高加索铁路；⑤支持俄国在波斯的工商企业的发展；⑥在恩泽利修建港口，在里海地区发展航运和正规的邮电、电报通信；⑦继续加强黑龙江沿岸军区和关东部队的建设；⑧加速武装旅顺港，同时将旅顺港铁路支线接入西伯利亚铁路；⑨在太平洋水域供养一支规模庞大、装备精良的舰队；⑩继续制订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占领计划。[1]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认为，上述任务的重中之重是“长期军事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2]。

1900年，奥地利与罗马尼亚续订秘密军事条约。1901年10月，俄国驻维也纳军事代表获取了该条约的文本。事实上，该条约的主要对抗目标是俄国、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后两个国家作为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显然深受多瑙河君主国的影响。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在收到这一情报后，认为必须与塞尔维亚，特别是与保加利亚订立条约。当时，索非亚与布加勒斯特之间的关系远非和睦。两国之间横亘着多布罗加。无论是罗马尼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都希望完全掌控它。两国君主对待彼此态度消极。英国驻保加利亚政治代理人回忆称：“如果像卡罗尔国王和斐迪南王子这样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人能够成为朋友，这将非常奇怪。事实上，两位君主相互讨厌，并且都不相信邻国的政策。”[3]

库罗帕特金认为，与保加利亚结盟可以制衡罗马尼亚，特别是在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交恶的情况下。陆军大臣准备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发展类似的同盟关系，但是坚决反对做出以牺牲邻国利益为代价助其实现领土扩张的承诺。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主持起草与保加利亚结盟的条约草案。然而，在陆军大臣与外交大臣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拉姆兹多夫坚持，只有在缔约国中的一方遭到袭击的情况下，军事条约方可生效。此外，外交部提议增加一项条约义务——“采取一切手段避免与土耳

其及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国家发生冲突”。陆军大臣亲手划掉了这些条款，并且在空白处写道：“俄国不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问题上作茧自缚。”[4]这不是对遥远将来的算计。

1902年春，在敖德萨军区司令部、黑海舰队、总参谋部和海军总参谋部作战机关的参与下，海军部主办战略演习。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为守方主帅，陆军大臣为攻方主帅，陆军元帅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基辅军区司令员德拉戈米罗夫（М. И. Драгомиров）上将、海军部司令均参加演习，阿列克谢耶夫代表总参谋部参加演习。[5]先前制订的进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模拟方案完全失效。陆军大臣大肆干涉部下乃至向工兵连连长下达指令，并且他针对出现的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震惊了所有人。某位演习参与者回忆道：“最终，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令我大失所望，我对这位英勇的突击队长能够更上一层楼完全不抱希望。他时常谈论自己在布哈拉的战绩。在演习过程中，一旦涉及向登陆地提供各类登陆补给时，他总是盛气凌人地表示，这很简单：装载补给物资的汽轮机船全速挺进目标海岸，板车直接抵达汽轮机船下方接收物资，然后再按各部所需分配、转运物资。”[6]

演习结束后，双方达成共识，认为有必要修改先前制订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进攻计划，同时加强对陆战队的训练。同年，沙皇下令在黑海海域建造装甲战列舰，未来它们不仅要在黑海航行，还要执行远航的任务。俄国计划在黑海部署12艘装甲战列舰，同时配备相应数量的巡洋舰和鱼雷艇。按照该计划，截至1903年，需在黑海海域部署2艘装甲战列舰——金口约翰号和叶夫斯塔菲号，以及3艘鱼雷艇。[7]伴随着这些计划的实施，海军部的预算连年上涨。1895年为54923509卢布，1896年为57966000卢布，1897年为59902175卢布，1898年为67050000卢布，1899年为83065000卢布，1900年为86628015卢布，1901年为93597666卢布，1902年为98318984卢布。[8]

1902年初，俄国与保加利亚编制军事协定草案。草案规定：缔约国若遭遇罗马尼亚和奥匈帝国联合进攻，俄保两国将为彼此提供军事援助；缔约国若与上述两国中的一国发生个别冲突，两国将为彼此提供外交援助。此外，若塞尔维亚遭到入侵，两国则应向塞尔维亚提供支援。虽然保加利亚大公斐迪南被任命为巴尔干地区陆军总司令，但是行动计划是由俄国总参谋部一手制订的。保加利亚授权俄国使用自己的港口，同时将舰队和交通工具交由俄国海军调遣。1902年5月，保加利亚大

公、科堡王子斐迪南率领索非亚市沙皇解放者纪念碑修筑委员会成员抵达俄国。随行的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仓科夫（Д. Цанков）向尼古拉二世递交申请，邀请沙皇出席纪念碑的开工典礼。似乎，俄国与保加利亚之间的矛盾冲突已被抛诸脑后。1902年5月31日，两国的陆军大臣在彼得戈夫签署协议，同年7月双方互换批复文书。协议第三条规定，保加利亚领土具有不可侵犯性。[9]

在索非亚方面看来，这份文件不仅是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后相互亲近的巅峰之作，更是掌控圣斯特凡地区的保障，还可能借机成功突围，在彼得堡的支援下占领杜布鲁贾。[10]对于协议条款如此有趣的解读，出乎彼得堡的意料。保加利亚陆军高层着手制订对土作战计划。1904年初，斐迪南一世批准了包含色雷斯进攻计划的第一版作战方案。直至1912年，这份文件都是保加利亚制订未来军事计划的基础。1908～1911年，随着文件的补充完善，保加利亚人甚至将君士坦丁堡列为军事打击的对象。[11]

1902年8月，在库尔斯克附近，四大军区——莫斯科军区、维尔纳军区、基辅军区和敖德萨军区集结兵力进行演习。从本质上讲，此次演习具有反奥倾向，演习的任务是击退从西南方向入侵俄国的军队。[12]波斯国王穆扎法尔丁·阿里·沙（Mozaffar ad-Din Shah）在应邀观看帝国军事演习时吹捧道："波斯与俄国应当建立牢不可破、永世长存的友谊。"[13]在演习结束前，两位君主的目光始终聚焦参演部队，随后他们一同检阅了六支部队。沙皇在评价演习的同时，还发表了一些反英言辞。[14]在伊朗，俄国与英国严重对立。俄国外交官在评价两国在该地区的关系特点时措辞如下："极端地互不信任和稍加掩饰的敌意"，迈什德领事馆与大不里士领事馆的对立尤为严重。[15]1897年秋，在达姆施塔特探亲的尼古拉二世接见了英国外交官。在谈话过程中，他相当清楚地阐明了自己对伊朗的看法。沙皇不相信处于附庸地位的弱小缓冲国能够一直存在，期待波斯腐败而软弱的政府成为俄罗斯帝国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屏障希望渺茫。因此，在尼古拉看来，尽管俄国不需要新的领土，但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消除在中亚横亘在伦敦与彼得堡领地之间的障碍——波斯。[16]

1899年初，陆军大臣下令盘点俄国在亚洲及其周边区域的兵力。高加索军区屯兵32万，喀山22万，西伯利亚4万，突厥斯坦和里海东岸地区7.5万，黑龙江和旅顺港沿岸8万，兵力总计73.5万。根据计算，若要

彻底保障边疆防御安全，在中亚地区至多能集结12万兵力。一旦开战，俄国计划动员位于突厥斯坦的3个军和驻守高加索的1个军。[17]然而，在外里海铁路与俄国欧洲铁路接轨前，在技术层面这项计划无法实现。若以三个星期为限，俄国在阿富汗边境可集结3万～4万兵力；若以40天为限，可集结7.5万～8万兵力。[18]1899年5月，外里海铁路与撒马尔罕—安集延铁路（其中一条支线通往塔什干）接轨，部分问题得以解决。1901年3月，梅尔夫—库什卡区段铁路竣工。在中亚，此时俄军后方的处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即便如此，1901年3月前，俄国始终无法解决这条阵线上的核心问题，即塔什干—奥伦堡铁路的修筑问题，直到1906年初这条铁路才全线贯通。

突厥斯坦军区在1900年的作战计划中设定目标为占领马扎里沙里夫、喀布尔、赫拉特和霍罗桑，这完全符合沙皇的心意。然而，这只是总体设想，计划的制订者也承认，军区没有充足的兵力去完成如此庞大的任务。谁都不打算在这条阵线上增派兵力。[19]显然，在阿富汗无法确立任何可行性目标，不但如此，甚至连在那里部署少量兵力也无法做到。此外，部队离开突厥斯坦基地后的供给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最后应当指出，与软弱的政府相比，强硬的政府令两国更为不满，俄英两国不得不针对在第三国发起联合行动的事宜进行协商。但是，对话的提议未得到回复，两国的竞争愈加尖锐。1901年，一位到访德黑兰的英国人指出："在这里，人们普遍认为俄国正在将英国赶出波斯。"[20]

自1870年代起，英国似乎在波斯确立起了稳固的地位。1872年，波斯国王纳赛尔丁（Naser al-Din）与英国金融家路透（Reuter）男爵签署了无限制条件的铁路修筑、森林与矿山开采、矿藏（黄金、白金及其他贵金属除外）开发、路桥建筑及国有银行、电报局、工厂、磨坊开设协议，协议有效期长达70年。此外，路透男爵还租下了波斯海关，租期25年，每年需向国库上缴海关纯收入的60%，向沙赫上缴20%。1889年，英国人拿到了波斯的烟草特许权。事实上，英国人高估了德黑兰的实力。此时，波斯国内爆发了严重的反英运动，甚至对王位构成威胁。[21]1892年，受反对者的影响，沙赫废除上述协议，并且向英国支付了50万英镑的赔款。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波斯的财政陷入混乱。同年，英国首次提议在波斯划分势力范围，而该提议并未得到俄国的支持。

1899年底，俄、英两国开始就向德黑兰提供联合贷款一事展开谈

判。此事为两国在波斯保持利益与势力的平衡提供了保障，为彼得堡与伦敦的进一步和解奠定了基础。尽管沙赫政府未对这笔贷款提出异议，但是在布尔战争爆发后谈判被迫终止。[22]如此一来，事情变得简单起来。非洲南部的争端突然间成了一笔亏本的买卖，它使英国国库损失近2.5亿英镑。[23]结果，伦敦的行动尽管暂时却严重受限。索尔兹伯里侯爵在议会发言时指出："其他国家可以放款，但我们不能。下议院始终无法保证印度的贷款，显然，他们也将拒绝向东方需要支援的盟国提供财政援助。然而其他国家可以。任何尝试扭转这种不利处境的行动都是白费力气。真正的朋友是能在他那儿借到钱的朋友。"[24]

英国的颓势日渐明显，这促使俄国政府倾向于独立行事。1900年1月26日，波斯与俄国缔结2250万卢布的贷款协议，还款期限为75年，年利率为5%。波斯需以除南部省份外的其他各省的海关收入作为还款担保。债务国一旦违反贷款的还款条例，则需将海关的管理权移交给受俄国控制的波斯信贷银行。此外，在未经俄国许可的情况下，波斯政府在10年内不得再与其他国家产生新的长期借款。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俄国以3.5%的年利率从法国那里获得了同样金额的贷款，[25]因此，向波斯发放贷款不仅确保了俄国在该国的地位，同时是一次成功的银行投机活动。

19世纪末期，俄国的金融家和商人成功挤走了英国同行，此事发生在俄国传统的势力范围，即波斯北部。1904年6月20日，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В. Н. Коковцов）在俄国在波斯的财政、经济政策特别会议上指出："应当承认，在沙赫政府未提供任何实际保障的前提下，在德黑兰创办波斯信贷银行是俄国企业界在波斯的伟大创举。在地方机构的支援下，这家银行的业务在短期内迅速拓展，规模日渐庞大。为此，俄国国库支出高达1130万卢布，其中波斯信贷银行借贷480万卢布。波斯信贷银行业务范围的持续扩张充分证明了已开展事业的正确性及其金融可行性。此外，这家银行也成了在英国资本运作下建立的波斯帝国银行的劲敌，它成功地打压了后者，这体现出了该机构的政治意义。"[26]

波斯的年外贸总额上升到800万英镑，俄国与波斯之间的贸易额持续上升。如果说，1889～1890年，该国的外贸总额为700万～750万英镑，英国及其印度殖民地所占份额高达400万英镑，而俄国不足200万英镑，那么到了1900～1901年，情况则大为不同。此时，波斯的外贸总额增至800万英镑，其中大英帝国所占份额降至192万英镑（24%），俄

国增至450.1万英镑（56.3%）。[27]结果，这引发了人们对英国的国王银行[28]所发行纸币的信任危机。白银涌入俄国的突厥斯坦，在那里拒收波斯货币。1901年10月，俄国与波斯订立新的贸易协议，该协议于1902年12月获批。根据协议条款，俄国商品的出口税大大降低，反之，俄国鲜少涉足的贸易领域的关税向上浮动。[29]在此基础上，俄国在波斯的贸易地位得到了持久的改善。

在波斯，俄国教官接替奥地利人执行军事任务。1878年，在英国人的积极协调下，奥地利教官才得以进驻波斯，执行训练任务。然而在奥地利军官还没做出成绩时，俄国1879年建立的所谓的“哥萨克旅”便已迅速取代了他们。[30]1880年代初，“哥萨克旅”既是“自由的哥萨克”，又是“一个旅”。最初，这支部队的应征者不多（750人），其中还包括外高加索人。尽管如此，5名俄国教官和几名列兵仍旧无法保证训练达到应有的效果。更准确地说，这支部队应当被称为御前效命的非正规骑兵。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配备火炮的“哥萨克旅”已然称霸波斯陆军，成为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了。这支部队驻守德黑兰，听从俄国上校的指挥。[31]

当年游历波斯的一位俄国旅行家指出：“已故的沙赫纳赛尔丁曾经尝试重振军威，但是他一无所获；现任波斯沙赫口袋空空，故而不再关注波斯军队。沙赫连年累月地拖欠军饷，因此也无法向他们提出任何要求。唯一令沙赫感到欣慰的就是哥萨克旅——1000名骑兵、500名步兵和一支配备8门火炮的炮兵营，这些火炮还是来自我们政府的馈赠。这支部队完全独立，除了沙赫以外，他们不效忠任何人，他们服从俄国上校科索格夫斯基（Коссаговский）的指挥。”[32]正是由于这支部队的存在，新任沙赫才能兵不血刃地继承王位，他并没有忘记这一点。俄国在德黑兰的影响力正在增强，然而与英国不同，这没有引发任何不满。里蒂希（П.А. Риттих）通过人格化的手法以旅长为媒介展现了俄国在波斯的影响力：“无论我们才华横溢的将军为波斯的社稷做出了多大的贡献，都必须承认波斯人民为他倾倒。我恰好见过科索格夫斯基在下属和百姓中间的样子。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众人的主宰，无论是士兵，还是普通百姓都会执行他的意志。”[33]

英国驻波斯湾商船的完全垄断地位也遭到了挑战。19世纪、20世纪之交，停泊于此的40艘商船中仅有1艘未悬挂英国国旗。1901年，敖德萨直达班达阿巴斯的轮船航线开通。在俄国航运与贸易协会的组织调度

下，轮船定期往返于俄国南部与波斯湾之间。每年，该协会可获得20万卢布的国家补贴（其中不包括每海里2卢布的轮船通航补贴）。[34]俄国外交部在1901年的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在黑海与波斯湾港口之间实现通航的重要意义："出现在波斯湾南岸和阿拉伯港口的俄国商船旗终将摧毁当地居民的思想观念，即认为在波斯湾只能出现英国元素，英国在波斯湾享有特别统治权。"[35]

班达阿巴斯港很可能成为连接波斯湾与俄国铁路的终点，各方对该港口的兴趣与日俱增。[36]结果，1901年，俄国轮船向此前只有英国商船进出的班达阿巴斯港输入了价值2746英镑的货物。当然，这与英国在该港口的输入额575000英镑相比完全不值一提。[37]但是，此事触动了伦敦敏感的神经，因为这意味着俄国对班达阿巴斯起了贼心、英国的完全垄断地位遭到了挑战。这说明旅顺港的悲剧可能重演，有必要打造另一个威海卫实现制衡。法国武官在向本国政府汇报时指出，俄国已经做好了向波斯湾沿岸进发的准备。[38]1901年和1903年，俄国军舰现身波斯湾。瓦良格号和阿斯科尔德号巡洋舰造访阿曼、布什尔港和科威特港，并且悬挂圣安德烈海军旗在波斯湾沿岸港口示威。[39]这场旨在表明波斯湾并非英国内海的示威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40]

俄国在加强对波斯和巴尔干半岛政治干预的同时，也加快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远征筹备进度。1903年3月至4月，在彼得堡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普罗托波波夫（А. П. Протопопов）将军出任委员会主席，主席的人选充分地体现了俄国对远征计划的态度。此人是"博斯普鲁斯海峡计划"的拥趸，曾于1881～1888年在巴尔干半岛（希腊、君士坦丁堡）担任军事代表，为实施该计划收集情报。委员会得出以下结论：必须增加敖德萨军区的兵力。在实施远征博斯普鲁斯海峡军事动员的第1天，应调遣3.4万兵力；截至第16天，派遣16万兵力。根据俄国军方的计算，第1天，俄国陆战队在该地区将遭遇1.7万～1.8万名敌军；第16天为21.6万。事实上，这种兵力对比对俄方较为不利。委员会提议：建造12艘可以直逼海岸的小型装甲舰（半数装甲舰在近5年内竣工）和4艘军事运输舰，与轮船公司达成专门的运输协议，在敖德萨港建立常驻登陆营，弹药储备增加一倍，增加水雷储备，建造水雷运输船，完善登陆装备。若要实现上述计划，需花费4100万卢布。[41]

1901年的英国军事侦察报告指出："在俄国把控黑海门户前，在我们眼中，俄国还是个半发达国家。对于英国而言，俄国是妨碍本国实现

志在必得使命的主要障碍。1854年和1878年，英国走在了俄国的前面，这既得益于我们的海上实力和金融实力，也离不开我们的贸易破坏力和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俄国最大的敌人。然而，这种不可侵犯性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当今，在印度西北边界是与阿富汗接壤的西北边界；俄国已经备好战场，在与土耳其开战时，它可以向印度施压，进而阻止英国向苏丹派兵、提供财政或其他支援。”[42]1903年8月，敖德萨军区再次组织演习，演习发生在奥恰科夫附近的金布恩沙嘴和黑海沙嘴区域。1903年7月，切什梅号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号战列舰已完成对登陆地的侦察，陆战队应搭乘蒸汽机船运送的舢板进行登陆。[43]1903年夏，黑海舰队进行了不间断的演习，其间考察了影响登陆作业的诸类要素，如水雷的铺设、鱼雷攻击的防御及岸防炮的扫射等。最终，1903年8月，在奥恰科夫附近举行了双边演习。[44]演习的目的在于：

第一，打磨黑海舰队在海峡对战英国地中海舰队的作战技能（在第聂伯湾模拟战斗）。其间制订的作战计划耐人寻味：叶卡捷琳娜二世号和罗斯季斯拉夫号战列舰需分别对抗3艘“维多利亚女王级”战列舰，而三圣人号和十二使徒号战列舰对抗2艘同级别的英国战舰。以此类推，对巡洋舰的安排也大致如此：每艘巡洋舰需对抗3艘潜在的敌舰，而果敢号驱逐舰对抗整整8艘英国驱逐舰。

第二，对士兵进行自1896年后被敖德萨军区忽视的登陆战实训，在实战中检验陆战队的组织能力和军区参谋部基于1885年的演习经验所制订的《登陆战指南草案》的实用性。[45]

在演习中制订的作战方案简直是异想天开。按计划，两个登陆梯队——塞瓦斯托波尔陆战队和敖德萨陆战队应在奥恰科夫的锚地汇合，塞瓦斯托波尔陆战队搭乘军舰抵达，敖德萨陆战队搭乘由敖德萨军区参谋部租赁的运输舰抵达。陆战队的运输事项由海军少将涅鲍加托夫负责。[46]舰队扫射假想敌目标奥恰科夫炮台，而后陆战队开始登陆作业，铺设水雷，击退潜在的英国敌军。[47]可以说，演习极为失败。舰队无法压制奥恰科夫炮台的炮火，搭载陆战队的舢板存在超员问题和安全隐患（漏水）。此外，军舰误将舢板当成假想敌并且向其开火；陆战队冒着巨大的风险搭乘军舰直接登陆；登陆工具的组装与拆卸耗时较长；船舶跳板结构的承重能力不强，容易断裂；舰队炮手发现岸防部队在火炮操纵方面毫无经验。[48]

敖德萨部队的转运安排极为糟糕。在军区参谋部的坚持下，上述搭载将士和马匹的交通工具几乎全部超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先确定陆战队的人数（278名将军和军官、6573名士兵、488只马匹、32门火炮及其弹药车），而后再按照这一数字调整现有轮船的载重。事实上，卫生设施、粮食和饮水供应几乎未得到保障，多数士兵从未得到食物，他们不得不在生锈的甲板上和衣而卧。在超载问题和航行速度不同的影响下，搭载着敖德萨部队的5艘舰船从敖德萨出发抵达奥恰科夫耗时36～40小时，而非计划的18～20小时。[49]9月1日，陆军军官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射击坚德拉岛周边舰队。[50]演习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所积累的登陆战经验没有派上任何用场，更遑论海陆两军的协同作战。海军军官与陆军军官无休止地相互埋怨，并且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合作伙伴的行动不利。无论如何，远东局势的恶化最终迫使彼得堡方面放弃了包括进击波斯湾在内的某些计划。[51]

在巴尔干半岛酝酿着另一轮危机。1902年12月，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访问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他试图说服保加利亚大公斐迪南和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奥布廉诺维奇不要采取可能激化该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同时以塞尔维亚的政策配合俄国的政策。贝尔格莱德的局势令穆拉维约夫最为头疼。[52]早在1891年，拉姆兹多夫曾对亚历山大国王做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可怜的男孩尽管有父母双亲，但是在教育方面他与孤儿无异，他很可能成为像他父亲一样的恶棍。”[53]回国后，米兰对儿子性格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1898～1900年，前国王不仅指挥军队，也统治着国家。自然而然地，社会各界对退位归国的前任君主的情绪都转移到了他的继承者身上。1899年，国王遭遇暗杀，然而暗杀行动并未得逞，此后国王展开报复性镇压。塞尔维亚始终无法摆脱政治危机。从1878年到1903年，塞尔维亚王国陆续更换过20届内阁。[54]

当亚历山大·奥布廉诺维奇决意迎娶他母亲娜塔莉亚王后的侍女、捷克工程师的遗孀德勒格·玛什（Драга Машин）后，人们对他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1900年7月23日，不顾众人的谴责，亚历山大与她结为夫妇。最初，各方对这段婚姻的看法并不太糟。某些圈子认为，这段婚姻为孤立被迫留在维也纳的米兰提供了契机，毕竟他反对亚历山大与德勒格结合。在亚历山大下达特赦令后，部分侨居国外的老国王的政敌欣然归国，其中尼古拉二世同意在婚礼上担任男主婚人——这个因素关系重大。[55]然而，国王夫妇未能维持住这一成就。据奥地利特使披露，对于没来得及进宫道喜或者怀疑她能否诞下王位继承者的所有人，新王

后立即展现出了傲慢、邪恶、贪婪和残酷的一面。[56]

以王后为中心，甚至出现了一个册立她的兄长尼科季姆·鲁涅维茨（Никодим Луневиц）中尉为王位继承人的计划。然而，后者已经因自己不知分寸的行为引发了陆军的抵制。新一代王室的前景堪忧。[57]国王试图改变人们对自己和德勒格的态度，为此，他以王后的名字命名学校、村庄和部队，甚至让她的生日成为公休日。结果，人们对国王夫妇的恨意却不减反增。1901年7月23日，米兰的反对派政党——激进分子赢得议会大选。[58]在穆拉维约夫访问贝尔格莱德后，俄国外交部最终放弃了邀请国王夫妇来彼得堡做客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这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声誉。[59]1902年12月，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访问贝尔格莱德。此间，国王夫妇给他留下了双重印象："国王并不糊涂，但是严重发福、显出老态，并且敏感多疑。有时候，他似乎不太正常，当我关注他时，他大为感动。德勒格是一位不太年轻却很丰满的漂亮女人。她很聪明，拉拢并依靠俄国，对她最好予以安抚。"[60]1903年5月，亚历山大·奥布廉诺维奇被任命为俄国某支部队的首长。

然而，这对于提高塞尔维亚王朝当权者的威望于事无补。1903年春，塞尔维亚王国危机四伏，局势逐渐失控。1903年3月23日，学生在贝尔格莱德示威游行，最终与警察爆发冲突，数人丧生，近百人被捕。塞尔维亚社会对待这些事件的态度无疑是消极的。5月19日，国王下令进行新一届的内阁选举。选举是在警力威胁与行政限制的氛围下进行的，激进派政党拒绝参选。国王希望得到军方的支持；与此同时，在军界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Драгутин Димитриевич）上尉策划的阴谋日趋成熟。6月10日至11日夜，在米哈伊尔·奥布廉诺维奇（Михаил Обренович）遇害纪念日，28名军官闯入皇宫，击杀亚历山大·奥布廉诺维奇和德勒格。[61]当日，德勒格的两位兄长也在宫里中枪身亡。与此同时，首相、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及若干名忠于国王的军官在家中遇难。[62]

6月11日凌晨3点50分，一切都结束了。朝着皇宫行进的部队以友好的口号——"乌拉！"传递着政变胜利的消息，同时响应密谋者的号召高呼："彼得·卡拉格奥尔基维奇（Петр Карагеоргиевич）万岁！"此后，塞尔维亚成立临时政府，其成员包括来自不同党派的6名代表和政变的4名参与者。在议会的全力支持下，彼得·卡拉格奥尔基维奇当选新任国王，同时恢复了1889年宪法。1903年6月24日，侨居国外45年的彼得回

归贝尔格莱德，登上王位。1903年9月8日，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在本次选举中，激进分子大获全胜，其领袖尼古拉·帕西奇（Никол Пашич）领导政府。[63]1902年，在《政治自白书》中，他在阐述自己的信念时说道："对我而言，与实现塞尔维亚人的政治自由相比，实现塞尔维亚全体人民的民族自由是更为伟大的理想……只有自由并遵从宪法的塞尔维亚，才能成为团结全体塞尔维亚人的中心，这就是我宣扬激进原则的本意。"[64]

尽管塞尔维亚改朝换代，但是在该时期，马其顿却是巴尔干半岛的危机中心。20世纪初，按照地理概念和传统划分，在该地区分布着3个土耳其省——塞萨洛尼基、比托拉、科索沃。该地区为欧亚陆路交通的汇合处，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和种族成分极为复杂。[65]我们可以通过该地区主要港口的贸易额判断此地的重要性。1890年，4450艘船舶抵达塞萨洛尼基港口，贸易额高达1.6亿法郎。[66]该地区地理条件恶劣，仅有三成的土地适于农业耕种，其余为多林山地，是开展游击行动的理想环境。[67]此地的基督徒与土耳其人不睦已久。但是还应指出，此地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摩擦不断，教堂和学校是摩擦的中心。自1898年后，马其顿基督徒与土耳其地主之间的摩擦日渐增多。自土耳其侵占该地后，基督徒以租赁的方式拥有土地，而土耳其地主却连年涨租。农民向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求助，地主向土耳其政府求助。1898～1902年，此类冲突累计爆发132起，遇难者达512人。[68]

在与土耳其人的冲突中，该地区一股新势力——阿尔巴尼亚人依靠自身强大的实力脱颖而出。在该时期，其人口接近百万，其中穆斯林占70%，东正教信徒占20%（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天主教信徒占10%（在斯库台里地区，今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地区）[69]。不同的方言、相互对立的宗教信仰、各自为政的部落氏族使他们一直都无法成为与马其顿对抗的独立势力。"断层的"、多余的山民或是侵扰、劫掠邻邦，或是背井离乡。阿尔巴尼亚的基督徒更喜欢侨居意大利。1901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仅在西西里岛就居住着近20万讲阿尔巴尼亚语的移民及其后裔。穆斯林偏爱移民君士坦丁堡，这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喜欢少数民族代表而非土耳其人围绕在他周围有关。苏丹的皇家近卫军和驻扎在奥斯曼帝国首都的第一军的成员主要是阿尔巴尼亚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大维齐尔的职位由阿尔巴尼亚人费里德帕夏担任，他一直庇护着自己的同胞。[70]

1897年，无论是奥匈帝国还是俄国，对于巴尔干半岛日渐紧张的局势都漠不关心。为了维持现状，两国趋于和解。维也纳和彼得堡都担心半岛上的土耳其影响区局势失控。1902年12月3日（俄历11月20日），俄国发布《政府公告》，其中包含向土耳其提出的改革建议，[71]以及对马其顿事态发展的官方看法："在谴责斯拉夫民族强行改变受国际条约保护的巴尔干半岛现有秩序各种行径的同时，帝国政府曾屡次表达对马其顿问题的看法。时至今日，帝国政府仍旧坚持己见。因此，我们认为，为了维护塞尔维亚政府和保加利亚政府的利益，在阐明竭尽所能地维护巴尔干半岛和平、遏制危险的宣传活动的必要性同时，重申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政府的善意提议颇为合理。"[72]

1903年2月4日，俄国、奥地利驻土耳其大使发表联合照会，要求土耳其推行改革。[73]针对改革方案，2月21日，维也纳与彼得堡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来，改革方案得到了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支持。[74]在库罗帕特金看来，俄奥协议"似乎不会带来什么好处"[75]。他的质疑并非毫无依据。土耳其政府不愿在外界的压迫下实施改革，因此他们急忙宣布：在苏丹的带领下，将推行更大规模的改革。与此同时，依靠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政府发动了一场迫害基督徒的恐怖袭击。局势变得复杂起来，随时可能失控。君士坦丁堡的政策令马其顿解放运动的支持者大失所望，因为他们将局部冲突推上国际舞台的想法受到了威胁。[76]最终，在马其顿革命者的协助下，在本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组织了一场"比托拉地区的伟大革命"——参与革命的某位领袖是如此称呼它的。[77]

1903年6月，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在塞萨洛尼基策划了几场爆炸事件；1903年8月2日，在圣伊利亚日那天，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积极分子在马其顿的比托拉地区组织起义，起义领袖是尼古拉·卡列夫（Никола Карев）。8月2日夜至8月3日，8支起义军——750名革命者攻占克鲁舍沃城。此后，近2.6万人加入起义军，其中大多为未经训练且装备欠缺的农民。8月12日，在7门火炮的支援下，1.8万～2万名土耳其士兵发起反攻，确切说是大规模的惩罚行动。8月13日，土耳其人占领克鲁舍沃。起义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残酷镇压——200余座村庄、12000栋房屋被摧毁，数千人遭屠杀，近7万人无家可归，其中许多人被迫逃往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78]马其顿起义使巴尔干半岛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为了安抚该地区，彼得堡和维也纳不得不相互配合。

1903年10月3日，俄奥两国在米尔茨施泰格（奥地利）签署马其顿改革协定，其制定依据为1903年2月21日的改革方案。协定规定：俄、奥两国有权在马其顿诸省设立“民政官”，即改革监督员；重组土耳其宪兵队；在考虑基督徒利益的情况下变更行政结构，重建行政、司法机关；在各省中心地区设立由等量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组成的混合委员会，在俄、奥两国顾问的指导下处理政治和刑事案件；免除被土军烧毁的居民点一年的课税。两国政府再次要求苏丹“采用更加有效的监管方法”。[79]

10月3日，俄、奥大使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如果说，从一方面看，两国政府完全承认土耳其帝国政府有权力、有责任镇压这场在委员会恶意煽动下爆发的骚乱；那么，从另一方面看，他们不禁对在镇压中遭受暴力和暴行侵害的平民百姓生出怜悯之心。鉴于此，我们认为必须向惨剧的牺牲者提供帮助。关于援助丧失一切生产资料的平民，帮助他们回归故土并且在废墟上重建村庄、教堂和学校的具体举措，已在上文条例中向贵国政府提出详细建议，敬请采纳。俄、奥两国政府强烈希望，经过各方的不懈努力，动荡不安的地区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两国政府坚信，上述大公无私的建议将被相关各方悦纳。”[80]与此同时，两国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将上述要求告知索非亚，当地人民欢欣鼓舞，因为科堡王子必须为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居民提供保护。[81]

此前，俄、奥两国也将协定计划告知了英国。1903年10月2日，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对该计划表示认同，并且提议扩大协定范围。英国官方的反馈信息表明：“在英国政府看来，无论哪种方案，只要不受外国人监督并且让完全服从土耳其政府的穆斯林总督去执行，那都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82]伦敦提出两个备选方案：第一个方案，任命基督徒总督，既不从柏林国会成员国的公民中选出，也不从巴尔干各州的公民中选出；第二个方案，保留穆斯林总督，下设基督徒副总督。[83]10月13日，米尔茨施泰格协定摆在了苏丹面前，协定条款令奥斯曼帝国政府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84]10月22日，俄、奥大使向大维齐尔提交新版改革方案，几天后法国也对该方案表示支持。12月2日，阿卜杜勒·哈米德被迫同意欧洲列强的集体要求。[85]

苏丹在外交中坚持“分而治之”的原则，在内政方面，他力求遵循同样的原则。如果想让彼得堡和伦敦在巴尔干半岛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相互对立，那么不用采取多么特殊的手段，只需挑唆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马其顿相互迫害。如此一来，受俄、奥两

国监视、始于马其顿的宪兵重组计划很可能毫无建树。截至1905年，马其顿宪兵改革计划应基本完成。列强商定，该计划由1名意大利将军率领25名来自不同民族的军官共同执行，各国分别管理一处行政区域：俄国—塞萨洛尼基，奥匈帝国—斯科普里，意大利—比托拉，法国—塞雷斯，英国—兹拉马。尽管德国未分得特定的行政区域，但是德国人控制着塞萨洛尼基的宪兵军官学院和国家官员培训学校。[86]1903年12月21日，意大利政府宣布本国候选人埃米利奥·德吉奥迪斯中将担任国际宪兵部队负责人。[87]

俄日战争时期，在米尔茨施泰格协定的基础上，俄国与奥匈帝国于1904年10月15日在彼得堡秘密签署中立声明。声明规定，缔约一方在与巴尔干半岛以外的第三国爆发冲突时，另一方应保持中立。在维也纳和彼得堡都遵守“针对土耳其事务的既定政策”的条件下，本声明始终有效。[88]

[1] Цар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о задачах России на Востоке в 1900 г.//КА. М.-Л.1926. Т.5（18）. С.17-18.

[2] Цар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о задачах России на Востоке в 1900 г.//КА. М.-Л.1926. Т.5（18）. С.20.

[3] Buchanan，*My Mission to Russia and Other Diplomatic Memories*，vol. 1，p. 65.

[4] Валентинов В. Ук. соч.//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Труды комиссии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ю опыта войны 1914-1918 гг. М.1919. Вып.2. С.123-124.

[5] Ельшин А.Я. На суше и на мор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ор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Издание Общества бывших русских морских офицеров в Америке（далее МЗ）. Нью-Йорк. 1945. №3. С.126；128.

[6] Ельшин А.Я. На суше и на мор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ор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Издание Общества бывших русских морских офицеров в Америке（далее МЗ）. Нью-Йорк. 1945. №3. С.127.

[7] Петров М.［А.］ Подготовка России к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на море. М.-Л. 1926. С.69；85.

[8] Огородников С.Ф.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развития...С.259.

[9] Валентинов В. Ук. соч.//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Труды

комиссии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ю опыта войны 1914-1918 гг. М.1919. Вып.2. С.125-126；Принос към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та история на България 1878-1925. Под ред. Кесякова Б.Д. София. 1925. Т.1. С.20-21.

[10] Радославов В. България и световната криза. София. 1923. С.8；31.

[11] Крапчански В.Н.，Христов Г.Р.，Възелов Д.Д.，Скачоков И.К. Кратък обзор на бойния състав，организацията，попълването и мобилизацията на Българската армия от 1878 до 1944 г. София. 1961. С.53；55.

[12] Отчет о большом маневре в Ку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в 1902 году. Южная армия. Киев. 1903. С.1；45；Отчет о большом маневре в Ку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в 1902 году. Московская армия. М.1903. С.2；34.

[13] Берар В. Персия и персидская смута. СПб. 1912. С.285.

[14] Отчет о большом маневре в Ку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в 1902 году. Южная армия. Киев. 1903. С.159-161；Отчет о большом маневре в Ку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Высочайш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в 1902 году. Московская армия. М.1903. С.138-139.

[15] Kalmykow，*Memoirs of A Russian Diplomat*，p. 24.

[16] Buchanan，*My Mission to Russia and Other Diplomatic Memories*，vol. 1，p. 169.

[17] Luntinen，*French Information on the Russian War Plans*，p. 55.

[18] Luntinen，*French Information on the Russian War Plans*，p. 56.

[19] Fuller，*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p. 365.

[20] H. J. Whigham，*The Persian Problem*：*an examination of the rival positions of Russia and Great Britain in Persia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Persian Gulf and Bagdad railway*. New York：C. Scribner’s，1903，p. 332.

[21] Kalmykow，*Memoirs of A Russian Diplomat*，p. 51.

[22] Берар В. Ук. соч. С.280-281.

[23] Niall Ferguson，*Empire*：*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London：Allen Lane，2003，p. 276.

[24] Jennifer Siegel，*Endgame*：*Britain*，*Russia and the Final Struggle for Central Asia*. London：I. B. Tauris，2002，p. 10.

[25] Берар В. Ук. соч. С.284-285；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ека（От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1997. С.124.

[26] Англо-русск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в Персии в 1890-1906 гг.//КА. М.-Л. 1933. Т.1（56）. С.50.

[27] Whigham，*The Persian Problem*，pp. 334-336.

[28] 此处为俄国通用的对波斯帝国银行（Imperial Bank of Persia）的称呼。

[29]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ека（От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1997. С.126.

[30] Percy Sykes，*A History of Persia*，vol. 2. 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15，p. 475.

[31] Алиханов-Аварский М. В гостях у шаха. Очерки Персии. Тифлис. 1898. С.222；Косоговский В.А. Из тегеранского дневника полковника В.А. Косоговского. М. 1960. С.4；138；Высоцкий. Персидская казачья бригада.//ВБ. Париж. 1967. №87. С.11.

[32] Риттих П.А.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Персии и персидскому Белуджистану.// ВС. 1901. №5. С.186.

[33] Риттих П.А.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Персии и персидскому Белуджистану.// ВС. 1901. №5. С.186.

[34] Погребинский А.П.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М.1959. С.60.

[35] Романова Е.В. Путь к войне... С.95.

[36] Siegel，*Endgame*，p. 10.

[37] Whigham，*The Persian Problem*，pp. 63，68，71；Ментешешвали И.Ш. Закавказье в англо-русски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х в 1880-1914 гг. Тбилиси. 2001. С.42-44.

[38] Luntinen，*French Information on the Russian War Plans*，p. 57.

[39] Ведомость судам，находящимся заграницею.//МС. 1903. №3. С.4；Коваленко А.В. На《Варяге》в Персидском заливе в 1901 г.//МЗ. Нью-Йорк.1952. №1-2. С.53；60-61；То же.//МЗ. Нью-Йорк.1952. №3. С.32-40.

[40] Козлов Д.Ю. Нарушение морских коммуникаций по опыту действий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лота в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1914-1917）. М. 2013. С.130.

[41] Петров М.［А.］Подготовка России...С.86.

[42] The military resourse of Russia，and propable method of their employment in a war between Russia and England，p.14，PRO，WO 106/48.

[43] РГА ВМФ. Ф.243. Оп.1. Д. 9722. ЛЛ.1-2；4-5.

[44] РГА ВМФ. Ф.243. Оп.1. Д.9723. ЛЛ.1-3.

[45] РГА ВМФ. Ф.243. Оп.1. Д.9720. ЛЛ.6-6. об.；31；42.

[46] РГА ВМФ. Ф.243. Оп.1. Д.9720. Л.2；30；Ф.243. Оп.1 Д.9721. Л.8.

[47] РГА ВМФ. Ф.243. Оп.1. Д.9720. ЛЛ. 23；42.

[48] РГА ВМФ. Ф.243. Оп.1. Д.9723. Л.48；Ф.243. Оп.1.Д.9720. ЛЛ. 23-25；33.

[49] РГА ВМФ. Ф.243. Оп.1. Д.9720. ЛЛ. 2-3；31 об.

[50] Отдел Рукопис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далее ОР РГБ）. Ф.855. Карт.1. Ед.хр.31. Л. 18. об.

[51] Luntinen，*French Information on the Russian War Plans*，p. 58.

[52] Tcharykow，*Glimpses of High Politics*，p. 233.

[53] Ламздорф В.Н. Дневник 1891-1892. М.-Л.1934. С.126.

[54] Киняпина Н.С. Ук.соч. С.106.

[55] Z. Сербские дела. Письмо из Белграда.//ВЕ. 1900. №11. С.401.

[56] 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p. 452.

[57]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 1903. №7. С.367.

[58] 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p. 453.

[59] Tcharykow，*Glimpses of High Politics*，p. 234.

[60] Дневник Куропаткина с 17 ноября 1902 по 6 марта 1903 г.//КА. М. 1923. Т.2. С.16.

[61] 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pp. 453-454.

[62] Шемякин А.Л. Убиение генерала Павловича. Как в Белграде расстреливали георгиевского кавалера.//Родина. 2007. №9. С.65-68.

[63] 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p. 455.

[64] Шемякин А.Л. Идеология Николы Пашича...С.191.

[65] Stavrianos , *The Balkans Since 1453* , p. 521.

[66] В.Н. 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сведения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Балкан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Военн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и стастика Македонии и соседних с нею областей Балкан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Составил болгар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капитан Бендерев) .//ВС. 1891. №6. С.97.

[67] В.Н. 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сведения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Балкан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Военн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и стастика Македонии и соседних с нею областей Балкан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Составил болгар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капитан Бендерев) .//ВС. 1891. №6. С.92.

[68] *The Other Balkan Wars* , p. 33.

[69] Stevan K. Pavlovich , *A History of the Balkans* , *1804-1945*. London : Routledge , 1999 , p. 103.

[70] Stavrianos , *The Balkans Since 1453* , pp. 497 , 501-502.

[71] Реформы в Македонии 1902-1903.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переписка. СПб.1906. Т.1. С.1.

[72] Реформы в Македонии 1902-1903.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переписка. СПб.1906. Т.1. С.2.

[73] Реформы в Македонии 1902-1903.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переписка. СПб.1906. Т.1. С.19.

[74] Реформы в Македонии 1902-1903.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переписка. СПб.1906. Т.1. С.27-30 ; 33.

[75] Дневник Куропаткина с 17 ноября 1902 по 6 марта 1903 г.//КА. М. 1923. Т.2. С.16.

[76] *The Other Balkan Wars* , p. 34.

[77] Радославов В. Ук. соч. С.9.

[78] *The Other Balkan Wars* , p. 34.

[79] Реформы в Македонии 1903-1905...СПб.1906. Т.2. С.1.

[80] Реформы в Македонии 1903-1905...СПб.1906. Т.2. С.2.

[81] Реформы в Македонии 1903-1905...СПб.1906. Т.2. С.2-3 ; 6-7.

[82] Реформы в Македонии 1903-1905...СПб.1906. Т.2. С.4.

[83] Реформы в Македонии 1903-1905...СПб.1906. Т.2. С.4.

[84] Реформы в Македонии 1903-1905...СПб.1906. Т.2. С.7-8.

[85] Реформы в Македонии 1903-1905...СПб.1906. Т.2. С.9 ; 16-18 ; 39.

[86] Erickson , *Defeat in Detail* , pp. 43-44.

[87] Реформы в Македонии 1903-1905...СПб.1906 Т.2. С.44.

[88]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России с друг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1856-1917. С.333-334.

14 对日战争一触即发

1896年4月，马卡罗夫写道：“尽管俄国的实力远超日本，但是在远东我们很难发挥出与对手相匹敌的实力。”[1]这个道理浅显易懂，但是沙皇不愿相信。自1903年后，别佐布拉佐夫（A. M. Безобразов）集团对尼古拉二世外交政策的影响日渐增强。别佐布拉佐夫由退役的禁卫军骑兵上尉摇身一变成了御前大臣。“别佐布拉佐夫派”倡导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实施不负责任的冒险政策。别佐布拉佐夫认为，这项政策可以挽救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使其免遭外国资本的劫掠，而俄国也可避免与日本开战。他提议：加强滨海边疆区军队建设；在朝鲜占据主导地位；加紧建设西伯利亚铁路；“建立一家新公司——‘东亚实业公司’，以便与日本在商业领域讨价还价。”[2]事实上，俄国在朝鲜进行林业开采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木材质量优良（75%的木材为落叶松，15%为云杉和冷杉，6%为雪松，4%为阔叶树种），木材供应量充足（在布里涅尔朝鲜森林特许权[3]的支撑下，沿鸭绿江运输的原木总量由2万支增至70万支），同时还存在着大批廉价劳动力。[4]因此，令人感到费解的是俄国究竟要与远东邻国进行何种商业谈判，毕竟日本绝不打算与任何国家分享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

1898年5月18日（俄历5月6日），尼古拉二世下令出资7万卢布购买中朝边界鸭绿江流域的森林特许权，次日特许权落入俄国政府手中。随后，别佐布拉佐夫集团打算以朝鲜北部的自然资源为掩护大干一场，其中包括部署军队。[5]然而，当军队高层得知该计划时，他们对此并不上心。1902年12月14日，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在与别佐布拉佐夫谈话时，果断地否定了这项计划。库罗帕特金在日记中写道：“我警告别佐布拉佐夫，这种行为只会让我们蒙羞。至于朝鲜，我坚决认为，在那里定居的俄罗斯人口应当尽量减少。当我们的人开始遭遇屠杀，我们必须出征，然后就会引发对日战争，这是我最担忧的情况。”[6]然而，别佐布拉佐夫集团已经行动起来了。1903年3月，远东事务委员会负责人阿巴扎（A. M. Абаза）少将在向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汇报时提及尼古拉二世有意向鸭绿江流域增派士兵——从300人增至600人，后者大为震惊，因为他先前并不知道那里还有俄国士兵。身穿清朝服装的“列兵”伪装成伐木工，把武器藏在手推车上。海军中将阿列克塞耶夫拒绝了这一申请，仅向特许区调派了40名预备役士兵。[7]

总而言之，库罗帕特金极力反对中国东北活动计划。1903年4月28日，他开启了远东考察之旅。6月8日，库罗帕特金及其随员乘坐阿斯科尔德号和诺维克号巡洋舰前往日本。[8]6月9日（俄历5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别佐布拉佐夫正在不遗余力地盘剥满洲的财富。但是对于俄国而言，这真是当前的第一要务吗？我们俄罗斯帝国、高加索、西伯利亚拥有更为庞大的自然财富，但是由于缺乏知识、精力和资金，这一切都被弃之不理。有人号召我们去满洲同外国人争夺财富，难道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水平不足以利用我们眼前的财富吗？谁需要它？俄国？不，完全不是。国内还有许多工作、许多难题及许多比'鸭绿江畔林区事务'重要得多的艰巨使命有待完成。那么，谁将通过这些事务坐收渔利呢？就是那一小撮利用本国或外国资金创办企业的人。"[9]评价正中要害。别佐布拉佐夫曾经承诺1903年通过鸭绿江畔森林特许权可获利500万卢布，1904年为1000万卢布。然而到了1903年底，别佐布拉佐夫组织开采的木材仅能保障一艘轮船所需，由于当时租赁了2艘轮船，第二艘轮船所用木材不得不从美国采购。[10]

此时，俄国的政策一边倒地向远东方向倾斜。无论是彼得堡，还是帝国偏远地区，对远东的认识都具有片面性。据阿列克塞耶夫所属参谋部的外交委员会证实，阿列克塞耶夫认为必须集中精力拿下中国东北。科罗斯托韦茨（И. Я. Коростовец）回忆道："按照阿列克塞耶夫的观点，确保我们在满洲的地位不受动摇的最佳方案就是与日本达成协议，因为只有日本才会与我们发生严重的对抗。只要在朝鲜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就可以与日本达成协议或者要求日本保持友好中立立场。阿列克塞耶夫称，迟早我们将做出这些让步，但是这将在迫于压力且好处全无的情况下发生。他发起火来，谴责彼得堡故意忽视事实，忽略他的进言。"[11]政见不合致使行动混乱。俄国在朝鲜的行动，日本人已有所察觉，毕竟1902年上半年日本就已掌控朝鲜半岛。

日本在汉城、釜山和元山均部署了由1～2个中队组成的小型守备部队（如有必要，可随时动员驻地附近的日本人，将其扩充为联队——1500人并配备5门火炮）。此外，日本还占领了汉城—仁川段（38千米）、汉城—釜山段（550千米）铁路，控制着沿岸39座灯塔。朝鲜72%的对外贸易涉及日本。1900年，日本的舶来品约占朝鲜进口商品总量的80%。即使是在与俄国接壤的朝鲜北部地区，日方势力依旧占据主导地位。1898～1902年，以平均数计算，每年抵达朝鲜北部开放港口的俄国商船为32.8艘（占朝鲜货物进口量的7.5%），日本商船为539.6

艘（占朝鲜货物进口量的66.9%）。[12]

俄国从中国东北撤军的速度持续放缓，这引起了日本极大的不满。1903年4月21日，在山县有朋位于京都的室兰别墅召开了日本最高领导人会议。与会者就以下问题达成一致意见：①如果俄国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军，那么日本将提出抗议；②利用日渐激化的中国东北问题，与俄国就朝鲜问题展开谈判；③迫使彼得堡无条件地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权；④为了彻底解决问题，作为对俄国在朝鲜问题上所做让步的回报，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于是，会上通过了“满韩交换”计划，伊藤博文是该计划的积极拥护者。在这项决议通过后不久，当东京方面得知俄国在鸭绿江上的活动时，无论是支持与俄国缔结协议的主和派，还是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主战派的心情都极为沉重。[13]

1903年6月10日，俄国陆军大臣访问日本。下关是库罗帕特金访日的第一站。在抵达下关的次日，他便发表了自己对远东政策的看法：“俄国的兵力和财力极为紧张。即使没有战争，如果我们想再向远东投入大量的兵力和财力，那么就只能削弱我们在西部边境的实力了。我们的敌人玩弄的就是这套把戏。一旦开战，我们就不得不集中大量兵力全力应战。即使战争胜利，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西部边境的实力也将大不如前。打下这场胜仗，朝鲜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这块新的领地，在50、75、100年后对俄国而言也许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现在对我们而言，它是需要我们做出巨大牺牲的沉重负担，是导致我们与日本常年产生纷争的根源。毫无疑问，战败的日本一有机会（比如在欧洲战争中）就将在朝鲜袭击我们，那时我们的基地近在咫尺，可以迅速集结所有兵力和物资，因此我们将占据有利地位。”[14]

此次访问顺利进行。库罗帕特金受到了明治天皇的接见，并且会见了日本陆军的最高级指挥官，他们给俄国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陆军绝非无能之辈：“我可以毫不羞愧地承认，我所见到的杰出的日本将军的水平不比我们差。谨慎而客观地讲，日本的军事实力与欧洲国家不相上下。在防御时，我军一个营可以抵抗日军两个大队；然而在进攻时，我们却不得不派出双倍兵力。日本人不逊于土耳其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为我们打造新的‘普列夫纳’和‘杜布尼亚克’，[15]如果指挥不力，在那里5～6个俄国士兵也对付不了1个躲在不显眼的战壕里的土耳其人……在战争之初，我们不能出现败绩，这至关重要。否则，日军和全体日本民众都将士气大振。当我军入侵日本时，我们将遭到全民的打

击。日本人都是狂热的爱国者，他们勇敢刚毅。现在，日本学校正在向学生灌输军事爱国主义。”[16]在谈判过程中，日本陆军大臣和外务大臣明示库罗帕特金，东京希望日本在朝特权能够得到认可；如此一来，日本也愿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殊权益。[17]6月30日，库罗帕特金离开日本，乘巡洋舰前往旅顺港。[18]此次访问令他坚信：“近几年，俄国在远东的行动必须以与日本保持和平关系为基础。”[19]7月14日，库罗帕特金离开旅顺港前往哈尔滨，7月28日返回彼得堡。[20]

总体而言，库罗帕特金对远东的俄军实力（如果算上边防部队，此时兵力可达11.5万人）感到满意。对此，将军给予高度评价：“最后，怀着愉悦的心情指出：远东军已经成功地掌握了近期的实战经验；现在，在英勇而权威的高级将领的指挥下，通过军事训练，他们的水平稳步提升。黑龙江沿岸军区和关东州的年轻部队可以经受住任何战争的考验。”[21]陆军大臣之所以给出如此好评，背后的原因相当简单。

远东不是大臣的利益核心。返回彼得堡后，他致信基辅军区司令德拉戈米罗夫（Драгомиров）将军。在信中，他直言：在巡视符拉迪沃斯托克及回程期间，他始终担心在西部阵线可能爆发战争。因此，他随身携带奥匈帝国地图、利沃夫和佩列梅什利要塞平面图、俄国总参谋部编制的奥匈帝国指南。闲暇时，在火车上，他对利沃夫和佩列梅什利要塞周围的环境展开了深入研究，制订了最佳进攻路线，并且在地图上标注了俄军炮兵连的布局。他要求德拉戈米罗夫将军立即向军区参谋部总军需官转交他的方案设想。在确定具体的攻占目标后，再向他反馈信息。[22]当时，对于陆军大臣这种徒劳无益的工作，基辅军区司令极为反感。[23]

有趣的是，库罗帕特金出访期间，正值日本军方对俄关系政策发生松动。1903年6月8日，大山岩元帅在东京主持召开参谋本部部长会议。各部部长一致反对“满韩交换”计划，主张将俄国赶出中国东北和朝鲜两地。日本缺的是时间。据他们估算，在不久的将来，日本极有可能战胜大陆上的敌人，战争赔款到时候足以抵偿军费支出。他们用两句俗语作为结论：“上下一心，其利断金”和“以少胜多”。大山元帅不支持属下的观点，他只说了一句：“你们要记住，俄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尽管如此，6月22日，元帅向天皇上书《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其中强调了朝鲜对于维护日本安全的重要意义，指出目前日本在该地区占据军事优势，提议以“满韩交换”为基础加速解决朝鲜问题。[24]

次日（6月23日），在东京召开帝国议会，会上探讨了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提议。日本外交官声明，在处理与俄国的关系时应遵循四个原则：维护中国和朝鲜的独立性和不可侵犯性，在两国的贸易和工业领域保持均势；彼此承认日本在朝鲜、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共同商定特权保护措施；彼此承认在保护本国利益地区或镇压起义的情况下日本和俄国有权向利益地区派遣武装力量，一旦目标达成，部队应立即撤退，维护铁路和电报线路运行秩序的守备部队不受本条款限制；日本享有协助朝鲜实施内政改革的特权。在日本政府内部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保护本国在朝鲜利益的最佳手段就是限制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外务大臣提出的诸项原则中的第1项，清楚地佐证了这个观点。[25]

在此情况下，小村要求严格遵守上述原则，并且通过以下措辞结束了帝国议会的讨论："如果日本遵循上述原则而与俄国达成协议，那么日本的权益将得到保障。但是很明显，此类条约若想获得俄国的认可，那是极为困难的。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在谈判伊始日本必须下定决心，为了达成目标不惜一切代价。"[26]经过数小时的讨论，帝国议会采纳了小村的计划，决定在朝鲜问题上不做任何让步。但是彼得堡方面也不打算退让，时而展现强硬的立场，时而拖延谈判。

1903年8月12日（俄历7月30日），俄国设立统管阿穆尔州和关东州的远东总督府，侍从将军[27]阿列克塞耶夫出任总督。总督有权与邻国进行外交谈判，受权统管上述地区的海陆两军。[28]在阐明新职位的权责时，沙皇亲自写道："我的远东总督是该地区海陆两军的总司令，他高举俄国旗帜，为我们在太平洋沿岸的正当利益提供可靠保障。"[29]

在俄国设立总督府的同时，日本驻俄国公使栗野慎一郎男爵向拉姆兹多夫递交俄日协议草案。事实上，这是一份在中国和朝鲜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拉姆兹多夫和阿列克塞耶夫坚决反对该协议。[30]日本提出的在朝鲜让天皇臣民拥有行动自由的提议似乎有些过分，就连保守政策的拥护者维特也有同感。在拉姆兹多夫和库罗帕特金的支持下，维特提议做出些许让步。1903年8月15日，他被迫离任。此前不久，8月12日，俄国同意与日本就中国东北和朝鲜问题展开谈判，然而谈判很快陷入僵局。谈判地点定在了东京，这为俄国拖延谈判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俄国公使总是借口需与彼得堡进行磋商。大战前夕，果决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显然，俄国不具备这种优势。

在谈判过程中，彼得堡希望在中国东北获得行动自由，为此提议将

朝鲜北部地区（以北纬39°线为界）变成中立区。1903年10月30日，日本做出了些许让步。同日，小村男爵向俄国公使罗森转达新的提议。日本愿意承认中国东北是俄国的势力范围，但条件是俄国承认朝鲜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国和朝鲜是独立且不可侵犯的。此时，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及其在“铁路建设领域”的保护权得到了认可，东京甚至愿意接受在中朝边界两侧50千米内划定中立区的想法。作为交易，日本要求获得可供实现战略目标的朝鲜领土的使用权，但是沿海地区除外，以免对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的航运造成威胁。12月11日，罗森拒绝了这些提议。东京确信，谈判毫无前途。10天后，日本再次提交协议草案，此次的提议更为严苛，要求必须针对中国东北问题进行磋商。28日，日本政府召开特别会议。会上核准了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成员班子，调整了军部的地位，此外还通过了加速建成汉城—釜山段铁路的决议。[31]事实上，这是日本政府组织的一场军事会议。

俄国政客对此一无所知，继续保持以往的行事作风——威胁与拖延相交替。阿列克塞耶夫大力倡导这种处理方法。早在当年9月，总督就曾提议在对日谈判中采取最强硬的态度，斩钉截铁地声明俄国准备动用武力捍卫自己在中国东北的利益。[32]实际上，面对日本人的一系列挑衅（特别是在济物浦发生的俄国海军遇袭受伤事件），阿列克塞耶夫不敢进一步展现俄国的实力。[33]

在彼得堡外交使团新年招待会上，尼古拉二世在与日本特使谈话时指出：“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34]与此同时，1903年12月底，在沙皇组织召开的远东问题特别会议上，已经通过了向日本让步的决议。据库罗帕特金证实，尼古拉二世表示：“开战，当然是不可能的。时间是俄国最好的盟友，每年我们都会变得更加强大。”[35]很久以前，关于时间因素，东京曾得出过相似的结论。

1903年7月，日本参谋本部着手制订朝鲜侵略计划。8月，日本人开始集中收集朝鲜、中国东北和俄国的情报。[36]12月底，他们开始派遣北京的谍报组织深入中国东北，伺机破坏东清铁路。[37]这立即对“红胡子”的活动产生了刺激，同时也使由外阿穆尔军区边防兵团（2.5万人）负责监管的2377俄里的东清铁路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38]显然，这些兵力不足以应对当时的局面。在日本人的参与下，“红胡子”为祸关东，俄国甚至必须派遣军队与之抗衡。[39]旅顺港附近的电报线路遭到破坏，边防哨所遭遇袭击。[40]铁路全线增设防御工程；桥梁附近增设防

御阵地，甚至还配备了火炮。[41]在辽阳战役爆发前，为了加强哨所防御，又调来了27个步兵连。[42]

威胁与让步并举，对于可能发生军事对抗毫无准备——这导致事态的发展与俄国的期望渐行渐远。1904年1月12日，东京召开帝国议会，与会者得出一致结论：与俄国谈判完全没有任何希望，但是多艘战舰即将竣工，投入运行尚需时间。[43]1904年1月13日（俄历1903年12月31日），日本向俄国下达最后通牒，但是没有明确规定答复日期。此时，无论是在朝鲜还是在中国东北，东京均要求彼得堡让步，并且呼吁维护中国领土的不可侵犯性。[44]阿列克塞耶夫极力主张采取军事行动回应日本的无理要求，但是出于某种原因，1月16日他申请亲自前往彼得堡汇报情况。对于远东的事态走向，他并不担心。[45]此时，局势日渐紧张。时任驻日海军武官的鲁辛上将回忆道："整个1903年都令人惶恐不安。"

夏天，日本12支陆军部队、1个近卫师团全部完成紧急集合演练、核查动员及局部动员，全体预备役士兵已整编入伍。实际上，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已完成军事动员。[46]应当指出，民众拥护动员并且渴望入伍，期望赶赴大陆与俄国人搏杀。此时，日本国内的好战情绪高昂。[47]日本的军事教育体系、日军的状态和训练水准给观摩1903年秋季演习的俄国军事观察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报告结论被刊于1904年1月出版的《军事汇编》，它听起来更像是警告："从士兵到元帅，整个军队狂热且匆忙，也许有时这并不合理，但是这种状态坚定且持久。迄今为止，在艺术领域，日本人巧妙地借鉴邻邦，他们稍加改进便能使其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完美的状态……日本人能否将战争的艺术提升至如此高度呢，只有公正的未来才能给出准确且权威的答案。"[48]

1903年12月初，鲁辛向旅顺港汇报称，现役日本舰队每天都往返于基地和佐世保进行射击和机动航行演练。1904年1月13日，他汇报称，日本政府已租赁40艘汽轮机船，其中7～10艘（排水量为3万吨）用于满足舰队需求，其余轮船（排水量为9万吨）为陆军所用，足以同时运载2个师团的兵力。此外，日本还关闭了驶向澳大利亚、印度、欧洲和美洲的轮船航线。据俄国海军武官估算，一旦开启军事行动，这些轮船可供调遣，其吨位足以运载4个师团的兵力。[49]

大批日本民众离开俄国。1904年1月13日，旅顺港的日本商户开始抛售商品，陆续停业。20日，东西伯利亚步兵师的7000名军官和士兵离

开要塞，被送往鸭绿江。28日，远东总督收到俄国驻东京武官的电报，得知日本正在进行军事动员。30日，旅顺港要塞收到动员令，要求守备部队和舰队做好战前准备，同时密切关注俄、日战舰和运兵船的动态。2月5日，日本平民撤离旅顺港，[50]末班轮船被急于撤离的日本平民挤得水泄不通。这一幕引人深思，但是令人震惊的是此事并未引起当局的不安。[51]

1903年12月底，驻日陆军武官和海军武官商定，轮流向旅顺港发送电报（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担忧）。电报停发，则代表警报。1904年2月4日，鲁辛经日方批准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告知俄方全体日本专家和部分预备役士兵已经加入舰队。[52]6日，鲁辛试图通知彼得堡日本已经开始总动员。[53]警报不只来自东京。1月中旬，停泊在芝罘的扎比亚卡号警卫舰的指挥官曾收到英国友人的警告：近期，日本人将对俄国舰队进行鱼雷攻击。不相信无线电技术的他立即起锚赶赴基地，向总督传递这一情报。总督指责指挥官危言耸听，并且责备他未经允许离开驻地。[54]

1904年2月2日，俄国对日本的要求做出回应。彼得堡同意与日本订立协议并且做出让步，但是为时已晚。[55]尽管如此，俄国仍未完全妥协。俄国虽然放弃了在朝鲜划定中立区的要求，承认日本在动乱时期有权向半岛派兵，同意未来贯通中国东北和朝鲜的铁路，但是要求东京在协议中保留“不利用朝鲜领土实现战略目的”以及“放弃对满洲沿岸的特殊利益诉求”的措辞。[56]

2月4日（俄历1月22日），电报从俄国首都发出；5日，电报从总督府发出。这份照会被日本电报局延迟派送，直至8日才送达东京。2月5日，日本宣布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当俄国公使罗森男爵问道断交是否意味着开战时，日本外务大臣小村男爵否认道：“噢！不，暂时不会开战。”[57]同时，小村男爵认为，天皇之所向陆军和海军颁发诏令，这与彼得堡在朝鲜和中国东北问题上的立场及谈判延误密切相关。诏令的措辞毫不含糊地表明后续的行动方向：“中国和朝鲜领土的完整与日本的独立生存关系密切。因此，为了我们的独立和生存，在确保行动自由后，我下令终止与俄国的谈判。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臣民以忠诚和英勇实现我们的目标，维护帝国的荣耀。”[58]

2月6日（俄历1月24日），日本驻俄国公使栗野男爵向拉姆兹多夫递交断交照会和本人的辞呈。按照计划，日本使团将于2月10日离开彼

得堡。[59]日本公使甚至向俄国外交官保证，战争大概是可以避免的。拉姆兹多夫对此深信不疑。次日，他致信陆军大臣："陛下几乎不会宣战，因为这完全不符合俄国的利益。但是，我很担心，我们在远东的勇士们注意不到某个突发的、能够轻易引发真正战争的军事事件，此时完全不会发表任何庄重的战争宣言。"[60]2月8日，在日本宣布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的第二天，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写道："早晨，我开会讨论了日本问题，决定不能率先发动战争。"[61]

显然，日本可以自行选择开战时机的想法在彼得堡没有市场。军界是个例外，但是他们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62]沙皇庞大的计划使俄国的政策和战略陷入僵局。找准一个方向投入全部资源，这样的俄罗斯帝国是强大的。若兼顾多个目标，那将一事无成。俄国的政策同时在多个方向上发力，因此不可避免地与英国和日本产生了利益冲突。在风云变幻的复杂时局下，如果说东京的利益重心在朝鲜，那么伦敦的利益重心则在波斯，特别是波斯南部地区。1903年11月，伦敦再次向彼得堡提议瓜分亚洲：将阿富汗和西藏划入英国势力范围；将波斯一分为二——北部划入俄国势力范围，南部划入英国势力范围。作为交易，英国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既有权益。该提议遭到拒绝。

虽然彼得堡方面对阿富汗和西藏兴味索然，但是他绝对不会放弃进入波斯湾的机会，包括按照旅顺港的模式修筑铁路、建立海军基地。[63]基于英国在华利益角度，就重要性而言，中国东北不如长江、黄河流域的内地省份。日本的想法与英国类似。然而，为了确保自身在朝鲜的统治地位，日本必须在中国东北击败俄国。这正中英国下怀，因为一旦战败，俄国在通往印度的要道——波斯的地位将被削弱，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些利益国的算计下，俄国在中国东北乃至朝鲜的利益都是虚无缥缈的，那些最终导致与英、日、清关系恶化的政策毫无用武之地。

1904年2月5日（俄历1月23日）夜，日军司令部命令第十二师团登陆朝鲜。6日清晨，日舰在朝鲜湾俘虏了俄国商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号。同日，隶属于东清铁路航运公司的奉天号运输船和2艘捕鲸船——米哈伊尔号和尼古拉号遭遇拦截，随后驶向日本港口。[64]国际法规定，不得扣押在宣战前驶离敌国港口的船舶。[65]在向拉姆兹多夫呈递日俄断交诏书前，甚至在日本驻俄公使栗野慎一郎得知此事前，这些敌对行动便已经悄然发生。2月8日，日本人占领了位于马山和釜山（朝鲜）的俄国电信局。[66]日本决定在完成战备工作后立即展开军事行

动，而它的对手却不是这样打算的。时间确实是俄国的盟友，同时也给予其教训。

[1] С.О. Мака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М.1960. Т.2. С.215.

[2] Вонлярлярский В.［М.］Мо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1852-1939. Берлин. 1939. С.125；127.

[3] 1896年9月，俄国商人布里涅尔从朝鲜政府那里获得了为期20年的日本海中郁陵岛、图们江上游、鸭绿江流域的森林开采特许权。——译者注

[4] Корф Н.А.，Звегинцов А.И. Военный обзор...С.100-101.

[5] Пак Чон Х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и Корея. М.1997. С.82-84.

[6] Дневник Куропаткина с 17 ноября 1902 по 6 марта 1903 г.//КА. М. 1922. Т.2. С.12.

[7] Дневник А.Н. Куропаткина. М.1923. С.38；44.

[8] Отчет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ра по поездке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в 1903 году. СПб. 1903. Ч.1. Осмотры войск，воен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и заведений. С.1-2.

[9] Дневник А.Н. Куропаткина с 27 мая 1903 г. по 6 июня 1903 г.// Российский архив.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в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XVIII-XX вв.（далее РоА）. М.1995. Т.6. С.398.

[10] Дневник Куропаткина с 21 августа 1903 г. по 27 ноября 1903 г.//КА. М. 1923. Т.2. С.86.

[11] Коростовец И.Я. Ук. соч. С.48.

[12] Корф Н.А.，Звегинцов А.И. Военный обзор...С.74；217；Пак Чон Х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С.39.

[13] Окамото С. Ук.соч. С.97-100.

[14] Дневник А.Н. Куропаткина с 27 мая 1903 г. по 6 июня 1903 г.//РоА. М.1995. Т.6. С.410.

[15] 第十次俄土战争中土耳其的两处重要据点，易守难攻，俄军付出了惨重代价才攻下两地。——译者注

[16] Дневник А.Н. Куропаткина с 27 мая 1903 г. по 6 июня 1903 г.//РоА. М.1995. Т.6. С.418.

[17] Дневник А.Н. Куропаткина с 27 мая 1903 г. по 6 июня 1903 г.//РоА. М.1995. Т.6. С.419-421.

[18] Отчет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ра по поездке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в 1903 году. СПб. 1903. Ч.1. Осмотры войск，воен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и заведений. С.2.

[19] Дневник А.Н. Куропаткина с 27 мая 1903 г. по 6 июня 1903 г.//РоА. М.1995. Т.6. С.439.

[20] Отчет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ра по поездке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в 1903 году. СПб. 1903. Ч.1. Осмотры войск，воен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и заведений. С.2.

[21] Отчет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ра по поездке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в 1903 году. СПб. 1903. Ч.1. Осмотры войск，воен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и заведений. С.154.

[22] Лукомский А.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Берлин. 1922. Т.1. С.16.

[23] Лукомский А.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Берлин. 1922. Т.1. С.16.

[24] Окамото С. Ук.соч. С.106-107.

[25] Окамото С. Ук.соч. С.107-109.

[26] Окамото С. Ук.соч. С.109.

[27] 沙俄时代武职的最高荣誉，阿列克塞耶夫是当时俄罗斯帝国在远东唯一拥有侍从将军头衔的人。——译者注

[28] ПСЗ. Собрание третье. СПб.1905. Т.23.1903. Отделение первое. №23319. С.875-876.

[2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61.

[3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33-34.

[31] Окамото С. Ук.соч. С.137-139.

[3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36.

[3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56.

[34] McDonald，*United Government and Foreign Policy in Russia*，p. 72.

[35] Дневник А.Н. Куропаткина...С.114.

[36] Инабу Ч. Из истории подготовки Японии...//РЯВ. С.42.

[37] Когда японцы открыли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 //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й конницы (далее ВРК) . 1910. №2. С.57.

[38] Троицкий В. Заамурский округ пограничной стражи...//ВС. 1908. №8. С.64 ; 75.

[39] Третьяков Н. 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 на Кинджоу и в Артуре.// ВС. 1909. №1. С.55-56.

[40] D.W. Письма с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ВЕ. 1904. №8. С.497.

[41] Троицкий В. Заамурский округ пограничной стражи...//ВС. 1908. №9. С.67.

[42] Троицкий В. Заамурский округ пограничной стражи...//ВС. 1908. №10. С.31.

[43] Окамото С. Ук.соч. С.140.

[44]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От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М.1997. С.159-160.

[45] В штабе адмирала Е.И. Алексеева (Из дневника Е.А. Плансона) .//КА. М.-Л.1930. ТТ.4-5 (41-42) . С.159.

[46] Русин А.И. Письма и заметки о флоте.//МЗ. Нью-Йорк.1945. №1. С.2.

[47] Сакурай Т. Живые ядра. Очерк боевой жизни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 по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Пб.1909. С.8.

[48] Сипигус. Из Японии.//ВС. 1904. №1. С.216.

[49] День 26 января (8 февраля) 1904 г. в Порт-Артуре.//МЗ. Нью-Йорк.1944. №1. С.13.

[50] Francis McCullagh , *With the Cossacks* ; *being the story of an Irishman who rode with the Cossacks throughout the Russo-Japanese War*. London : Eveleigh Nash , 1906 , pp. 29-33.

[51] Заев А.Н. Начало войны с Японией. По впечатлениям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 мичмана с миноносца в Порт-Артуре.//МЗ. Нью-Йорк. 1944. №1. С.38.

[52] Русин А.И. Письма и заметки о флоте.//МЗ. Нью-Йорк.1945. №1. С.2.

[53] Из преды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Донесения морского агента в Японии А.И. Русина（1902-1904）. Вводная статья，подготовка текста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В.А. Петрова.//Русское прошлое. СПб. 1991. №.6. С.86.

[54] Дудоров Б.П. Вице-адмирал А.И. Непенин（опыт биографии）.//МЗ. Нью-Йорк. 1956. №4. С.19.

[55] Свечин А.［А.］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 Ук.соч. С.8.

[5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69-70.

[57]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168.

[58]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 Мейдзи（в1904-1905 гг.）. Составлено Морским Генеральным Штабом в Токио. СПб. 1909. Т.1.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 С.13.

[5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78.

[6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174.

[61] Дневники Николая II. 1894-1918. М.2011. Том 1. 1894-1904. С.787.

[6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175.

[63]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ека（От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1997. С.126；128-129.

[64] Адариди К. Начало войны 1904-1905 года в освещении японского юриста.//Разведчик. 1908. №917. С.363；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 1909. Т.1.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 С.32.；То же. СПб. 1910. Т.3.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ой эскадры. С.2.

[65] Селецкий Г. 646 дней в плену у японцев. СПб.1910. С.17.

[6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79.

第二部分 战争

15 战前：陆军、海军及战区状况

1904年初，俄国舰队包括14艘装甲战列舰（8艘在建，其中5艘为“博罗季诺级”的最强战舰，原计划1905年投入运行）、3艘岸防装甲舰、6艘一等装甲巡洋舰、8艘一等防护巡洋舰（3艘在建）、5艘二等巡洋舰、14艘炮舰（1艘在建）、9艘鱼雷巡洋舰、31艘鱼雷艇（13艘在建）、3艘鱼雷艇驱逐舰（1艘在建）。在绝对数量上，俄国舰队的实力远超日本舰队。日本舰队的主体包括6艘最新型装甲战列舰和6艘装甲巡洋舰（不久后又增加2艘），即所谓的“六六舰队”。日本舰队实力分布均衡，同类型军舰实力在俄国之上，在航速方面领先俄国舰队2节。同时，日本舰队在装甲和大口径火炮方面也占据优势（日本装甲舰的船舷装甲平均覆盖率为60%，俄舰约33%；日本舰队218门火炮，俄国舰队146门）。此外，日本还拥有6艘岸防装甲舰、7艘一等巡洋舰、11艘二等巡洋舰、8艘炮艇、4艘鱼雷巡洋舰、47艘鱼雷艇。[1]

俄国舰队分布在四个相互独立且相距较远的海上战区——波罗的海、地中海、黑海和太平洋。分布在太平洋上的俄国舰队收编了7艘装甲战列舰、4艘一等装甲巡洋舰、5艘一等防护巡洋舰、2艘二等巡洋舰、6艘炮舰、25艘舰队驱逐舰、10艘鱼雷舰、2艘鱼雷巡洋舰、2艘鱼雷艇驱逐舰。1艘装甲战列舰、2艘一等巡洋舰、1艘二等巡洋舰、7艘舰队驱逐舰、4艘鱼雷艇和3艘运输舰，在海军中将维列尼乌斯（A. A. Вирениус）的率领下正赶赴远东。[2]在军事行动爆发前，他们未能及时赶到。马卡罗夫曾试图说服海军部将这些战舰送到远东，然而它们却返航驶向吉布提。[3]没错，最初这是一个明智的想法，即利用维列尼乌斯的舰队拦截从欧洲出发向敌方输送军用物资的船舶。维列尼乌斯扣押了3艘英国轮船，但是在伦敦的强烈抗议下不得不将它们释放，而后维列尼乌斯舰队返航波罗的海。[4]

与此同时，日本在意大利采购的2艘装甲巡洋舰已经从地中海起航驶向日本。1904年4月，它们顺利抵达日本沿岸港口。于是，在突击力方面，日本舰队在远东占了上风，日本的装甲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共14艘，俄国为12艘。在装甲舰的航速方面，俄国为16～18.5节，日本为18～18.25节，因此日本的装甲舰队具有速度优势。在舰队的火炮装备方面，两国不相上下。俄国装甲舰队拥有20门12英寸口径、8门10英寸口径、82门6英寸口径的舰炮；日本有24门12英寸口径和84门6英寸口径的舰炮。在此情况下，俄国在旅顺港仅部署了1艘装甲巡洋舰（配备2门8英寸口径和8门6英寸口径的舰炮）；而日本却能集中动员8艘装甲巡洋舰，其上共配备1门10英寸口径、30门8英寸口径和106门6英寸口径舰炮。[5]在以下方面日本同样处于优势地位：一、二等巡洋舰（12对7），炮舰（8对6），鱼雷舰队（28艘舰队驱逐舰、19艘鱼雷艇、19艘鱼雷艇驱逐舰对2艘鱼雷巡洋舰、24艘舰队巡洋舰、10艘鱼雷艇和鱼雷艇驱逐舰）。[6]

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兵力主要分布在介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旅顺港之间的海面上，两地之间隔着对马海峡、日本海和黄海，且无中转基地。俄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部署了3艘一等装甲巡洋舰、1艘一等防护巡洋舰，在朝鲜的济物浦（今仁川）部署了1艘一等巡洋舰。拥有自己的造船基地，这是日本的一大优势。无论是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是旅顺港，都不具备这一优势。俄国两大海军要塞与日本海岸相距甚远，因此无法成为合适的对日作战基地。旅顺港距离日本则更为遥远，对此提尔皮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升旗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想要不失颜面地降旗，有时需要付出颇为昂贵的代价。”[7]

为了维护自己旗帜，俄国已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当时，旅顺港海军基地只能控制北京—天津的海路门户，对岛国日本的海上交通要道却无可奈何。1900年2月27日，海军中将特尔托夫（П. П. Тыртов）写道：“毋庸置疑，旅顺港对于我们控制北京和中国北部地区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旅顺港掌控北海湾，我们就能成为那里的主宰。但是就制衡日本而言，其战略意义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这与日本鞭长莫及的地理位置及朝鲜南部的绝佳海湾不无关系。朝鲜南部海湾不仅可供敌国舰队长期停泊，还可切断相距1100海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旅顺港之间的各种联系。”[8]

至于南满俄国要塞的筹建问题，最初各部意见不一、各行其是。由

于财政部厉行节约，在大战来临之际，无论是陆地阵线还是海上阵线均未彻底完工。俄国舰队的一位军官回忆称："俄国的这个据点，在我们拿下它的时候就是这种半损毁状态，而日本人就是这样把它还给中国的。"[9]在1894年11月的袭击中，城市损毁得并不严重——袭击只持续了5个小时左右。然而在《马关条约》修订后，日本军队在撤离城市和港口前搬空了一切有用之物。[10]匆忙间，无法带走的就使其彻底报废。[11]

1898年3月14日，在占领要塞后，杜巴索夫少将立即向特尔托夫中将汇报称："目前整个防御工事系统只剩下了一堆砂土、石料，必须将现存的大部分防御工事清理至最初的地基状态，我们才能加以利用。"[12]杜巴索夫完全清楚俄国在此建立海军基地的前景："想要旅顺港，就必须守住大连湾，后者是敌军实现战略登陆的绝佳海湾，因此必须同时加强大连湾的陆防和海防，并且防御工事的覆盖程度不应低于旅顺港。"[13]太平洋舰队司令提醒海军部高层注意：除了把控通往北京的海航路线外，旅顺港别无用处。由于旅顺港远离日本海岸（距离对马海峡550海里）、朝鲜西部海岸（350公里）及符拉迪沃斯托克且无中转基地，旅顺港无法完成其他使命且易攻难守，同时还拉长了俄国舰队在远东的海上交通线路。[14]杜巴索夫在报告结尾处写道："即使旅顺港接入西伯利亚铁路，那也无法消除这些劣势。只有在铁路网络得到重大发展的情况下，这种连接才是有效的，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辽东半岛地势狭长，敌军一旦从海上发起进攻，这种连接将被切断。"[15]

为了在内港入口处制造出防御工事完备的假象，俄军在中国陈旧的炮台上，也就是说在废墟上架起了几门火炮。几天后，坦波夫号和彼得堡号汽轮机船运送8门9英寸口径的迫击炮、6门6英寸口径的迫击炮和6门57毫米口径的速射炮抵达此地。安装这些火炮需要9.2万卢布，然而财政部拒绝拨付此笔款项。陆军大臣只能依靠部门内部借贷，即挪用其他款项解决该问题。[16]1898年5月8日，杜巴索夫向库罗帕特金提出了加强旅顺港和大连湾防御的构想。[17]4天后，陆军大臣做出回应：沙皇下令只对旅顺港加强防御，在其防御阵地部署150门火炮。[18]

1898年11月，在这些阵地上仅有7座炮台，其上架设了32门火炮。按计划，截至1899年1月，其数量需增至21座和110门。在规定期限内，俄国未能彻底完成该计划，但是已经安装了102门火炮。[19]基地偏远的位置和财政问题都影响着计划的实施。尽管如此，加强远东阵地势

在必行。1899年1月，200门火炮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279门火炮抵达旅顺港。[20]事情进展得格外缓慢，有时被严重拖延。此时，彼得堡竟然有空关心守备部队的精神生活：1899年初，尼古拉二世下令向旅顺港剧院运送首都皇家剧院多余的服装，共计1008套。[21]

城内兵营不足，士兵不得不拥挤地生活在散落于金州附近的35座“营班”——中国的土坯营房里。[22]最初，预计在“营班”中安排守备部队7000人，后来安排了1万人。[23]在中国部队撤退后，这些建筑多被当地百姓损毁，当务之急是完成对它们的翻修。密集的居住条件、劣质的水源及恶劣的气候导致病患急剧增加，其中传播最广的疾病当属痢疾和伤寒。[24]当地既没有军营、官邸，也没有排水工程。随着守备部队的增加，饮用水和粮食甚至出现了短缺，因此不得不从日本和芝罘进口。[25]此外，城内甚至没有合适场地用来开设医院。1898年5月15日，一家预计可容纳200名士兵和10名军官同时住院治疗的医院从敖德萨出发，搭乘弗拉基米尔号轮船赶赴旅顺港；26日，医院抵达该市，由于没有合适的场地，直到8月中旬医院才开始诊治病患。最终，医院仅设置了100个床位。按照该院医生的说法，痢疾在这里是一种流行病。[26]

1901年，已建成可供15个连、1支哥萨克部队、1个炮兵连、2个军需部门使用的营房，35间军官宿舍、8间带厨房和面包房的食堂、3间旅顺港综合性医院也陆续竣工。当年年底，在旅顺港和大连已开设可同时收治400名士兵和20名军官的综合性医院，每家野战应急医院也可同时收治200名士兵和10名军官。部队从茅草房和“营班”搬入军营，此后部队的病患数量急剧减少，但仍处于较高水平。1901年，关东守备部队共有士兵14280人、军官322人，其中染病人数高达8060人，死亡人数为181人。和过去一样，痢疾（8.638%）、各类胃肠疾病（3.607%）、伤寒（1.016%）和性病（5.558%）仍是最常见的疾病。由于卖淫活动实际上不受政府管控，最后一种疾病在当地居民中间迅速传播。在部队从茅草房和“营班”迁出前，与之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27]

至于胃肠疾病，那是气候条件与淡水不足共同引发的慢性疾病。[28]唯一的河流和一处小型淡水湖泊中的水源无法饮用。湖泊是在海湾分隔下形成的，水中含盐，因此既不适合饮用，也不适用于军舰锅炉。[29]市内唯一的蓄水池是由法国工程师在1887年建造的。随着人口的增长，它逐渐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了。结果到了1902年，经过专业工厂特殊处理的淡化海水成了市内俄国居民（17709人，军人除外）唯一的饮

水来源，这家工厂每日可处理好2万桶（246000升）饮用水。有些富裕的居民则采购从日本进口的矿泉水。直至1902年底，海军和陆军调拨资金修建了几座蓄水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居民饮水困难问题。[30]

在占领旅顺港的同时，俄国还收获了一座气候恶劣、潮湿、通过官道与中国东北相连的半岛。每至春、秋时节，官道难行，畜力运输受阻。[31]中国的村落主要是依靠羊肠小道或牲口行走的小路相互连接，这些道路绝不适合双轮推车和四轮大车。[32]1898～1902年，俄国政府不得不在关东州修建5条公路，其中不包括通往旅顺港要塞及旅顺港、大连湾、金州、貔子窝市内街区的公路。[33]海军基地的选址也不理想。军港入口狭窄，大型舰船只能在涨潮时进港，这与德国威廉港的海军基地非常相似。[34]由于水位较低，港内大部分区域不适合舰船泊驻，在旅顺港东部建造了以石砌岸壁为码头的人工水域，唯有此处可供远洋舰和装甲舰靠岸停泊。[35]

然而，东部水域大部分区域水位较浅，涨潮和退潮的水位落差可达396.5 厘米。在水位下降时，停泊在此的装甲舰深陷泥潭，由于水底淤泥堆积，排除了舰船受损的风险。港口其他区域面积较小，同时至多容纳10艘中型舰船。尽管港口西部相对开阔，可惜水位深度欠佳。旅顺港唯一的优势就是几乎绝对挡风，即使港外狂风暴雨，港内锚地也近乎风平浪静。若整修港口且使之达到可接受水平，则需投入一定的时间和金钱。1901年，在港内西部水域开始了疏浚工程，施工效率相当之高（一年半内，27万立方俄丈的砂土被推入海中），即便如此，在战争爆发前依旧未能竣工。[36]

各部门在远东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了辽东半岛的发展，但是在俄国占领此地最初的一年半除外。1898年4月26日（俄历4月14日），沙皇颁布了《关东半岛陆军部和海军部相互协作准则》，其中特别指出："太平洋舰队司令对关东半岛的海、陆两军享有最高指挥权。"[37]1899年9月25日（俄历9月13日），沙皇下达258号命令，颁布《暂行关东州统治规则》。关东州首席长官阿列克塞耶夫中将已总揽租借地的陆军（有权指挥远东军区）、海军（有权指挥太平洋舰队及军港）和民事大权（有权主管高加索地区的民政部门，同时拥有某些附加权力）。

但是，在《暂行关东州统治规则》中还包括以下条款："将在建的达里尼市[38]确定为俄国财政部特别直辖市，并定位为自由港；铁路管理

权另行规定。”[39]后来，大连商港和南满铁路归维特的亲信、东清铁路总工程师尤格维奇（А. И. Югович）管辖，然而他长期居住在距离此地600俄里的哈尔滨。维特既不厚待军方，也不赏识他们的计划。结果，在俄国驻华的前沿阵地出现了两权并立、相互对立的情况。[40]

1898年，大连湾是一处拥有不到百户人口的滨海小村庄，而非一座城市。财政部下定决心在那里创建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核心商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希望将那里建设成可与香港、上海或旧金山比肩的发达城市。[41]最初，财政部就为特辖市划拨了92平方俄里的土地！[42]财政大臣计划通过向私人售卖土地收回城市建设资金。[43]1902年4月9日，维特签署土地拍卖组织规程。[44]繁荣的景况未能如期而至，而维特所领导的财政部也未曾披露过这座城市的建设支出。时至1903年，财政部首次公开“大连港口、城市建设工程第一阶段施工总成本”为1885万卢布。

此外，在施工总成本中还包括其他支出。完工后，这些支出应达到5700万卢布；1904年工程进度已完成3/4，用于大连的实际支出约为4300万卢布，这比财政部公布的数字的2倍还多（1911年6月，从东省铁路公司达里尼分公司的账户上核销了44857508卢布71戈比）。俄国对这座港口寄予厚望，它应当成为西伯利亚铁路和东清铁路的终点。按照最佳的情况设想，此地能够从荒芜之地迅速演变为一座拥有40万人口的城市。维特从港口和行政区入手打造自己最欣赏的产物，修建某种具有“中式哥特风”、混搭式的华丽建筑。旅顺港《新边疆报》对大连的建筑评价道：“俄国高官在浪漫主义领域飞奔的古怪念头。”[45]

维特本人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为这座城市选定了名称和建造者。他对大连毫不吝啬。[46]按照设想，这座城市将成为俄国在远东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和贸易中心。然而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贸易领域，它都难堪大用。1864年，俄国轮船首次进入松花江驶向吉林。除船员外，船上还搭载着即将与中国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俄国代表及25名士兵；其后拖着一艘载有5000普特原煤的驳船。借此机会，俄国人对松花江的航道和地形进行了首次评估。当时，近10万人定居吉林。[47]1896年，第一艘俄国内河货轮进入松花江；1881年，第一艘俄国海轮抵达营口。然而，1894年，在中国东北唯一的开放港仅停泊了6艘轮船。不久前，1891年曾有116艘德国货轮抵达此港。[48]从经济学角度看，半岛计划是个“难产的死胎”，它是“目的与手段南辕北辙”的政治产物。[49]

俄国在大连投入了大量资本。同时代人写道："在对行政区的建筑优势表示怀疑的同时，必须对工程的成就做出公正评价：那里的房屋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50]英国《每日邮报》通讯员对这位工程师进行了回应，他讽刺道："与美国像蘑菇一样生长的城市相比，大连从萌芽到成熟的成长速度要快得多。这座城市的根基是某个人的想法，这座城市也是那个人一句话就能建成的。"[51]这座城市分为三个部分：行政区、欧洲贸易区和中国贸易区。1902年，维特造访此地，对所见所闻甚是满意："街道已铺成了公路，房屋四周花园林立，排水系统已经建成，供电和临时供水系统也已就位。房屋由石材修砌而成，大多是双层建筑，风格各异。"[52]财政大臣格外关注城市建筑问题，明令禁止在欧洲区建造土房、木屋。[53]在港口区域已建成3座防波堤坝，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工程。此外，在港口沿岸和防波堤坝处已加筑了混凝土护面，起重船、拖船、驳船和浮桥也已进驻港口。[54]维特希望将港口打造成中国东北主要的贸易门户："作为贸易城市，大连未来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满洲沿东清铁路运至此地的货物量。"[55]

事实证明，这些希望是不切实际的，大连没有发展起来："维特这样的大臣，像魔术师一样在光秃秃的土地上建起了整座城市，但是他没有实力让人搬进来，哪怕是他寄予厚望的那些人。"[56]在这座港口设施配套完备的城市中几乎没有平民。在国有住房中居住的都是铁路员工和建筑工人。截至1903年，市内尚未建成一处私人住宅，仅有15家俄国商铺和75家日本商铺开门营业。在此情况下，为了拉动城市贸易，规划开设一家不受俄国天主教会管控的天主教社区，并且允许犹太人在那里定居。[57]然而，这于事无补。1903年9月，造访大连的英国记者称："那就像一座死城。我们在那里只能看见士兵和公职人员。士兵在街道上缓慢地行走着，如果不遇见迎面走来的行人，他的脚步声将逐渐远去直至消失。"[58]1904年5月26日，关东州要塞司令斯捷谢利（A. M. Стессель）下达指令，要求俄国民众——约400人集体撤离大连。[59]

一名曾在旅顺港工作的外交官回忆道："大连……最初是维特最欣赏的结晶，更确切地说，它也是那群受到他的启发渴望创建俄罗斯殖民帝国的人最欣赏的产物。因此，大连成了政府特殊关照、慷慨解囊的对象。与此同时，隶属陆军部管辖的旅顺港却成了被刻意忽视但又无法躲避的邪祟。在大连，城市设施日趋完善，公路和排水系统完备，甚至还规划了公园，但是除了官员（主要是波兰官员），几乎没有任何居民。所有居民——俄国人和中国人都聚集在旅顺，拥挤地生活在中国的房子

和窝棚里。”[60]1901年，阿列克塞耶夫在向沙皇上书时指出：“由于关东州的物价高昂，军官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军官家庭的物质条件无法令人感到完全满意。”[61]

在俄国政府入驻旅顺港后，其人口迅速增长。1898年，旅顺港人口总量约为7000人。[62]当时，旅顺港是关东州社会生活的中心，而守备部队集会则是旅顺港的中心。来访的艺术家在这里表演，戏剧演出也在这里上演。[63]1899年，在该市居住着995名俄国人，其中仅有131名女性。后来，城市的人口结构日趋正常。1904年初，旅顺港的居民总量（军人除外）达到42465人，其中女性为4297人，儿童为3455人，俄国居民为17709人，中国居民为23494人。与大连不同，旅顺港不只存在国有住房。到了1903年，此地共有房屋3263栋（其中私人住宅360栋）、公寓5186套。1899年初，在旅顺港有400余家中国店铺；截至1904年初，市内共有1712家工业贸易企业、700家贸易商店和商业企业及895名走街串巷的货郎，甚至还有160名车夫（在大连仅有2名）。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带肩章的人是关东半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主力。维特曾幻想在中国实现“经济的和平渗透”，却陷入了国库埋单的死循环。“商业与军大衣无法共存”的教条明显不符合现实。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遥远的关东州，都是如此。[64]

显然，没人愿意承认这件事。尽管大连是南满铁路的终点，但是90%的旅客还会沿着大连—旅顺港“支线”继续前进。这令某些人大为不满。1902年，东省铁路公司收到上级指令，要求公司在关东—长崎和关东—符拉迪沃斯托克航线上运行的所有轮船在大连卸货，不得前往旅顺港。[65]在俄国入主关东州之初，殖民政策拥护者就清楚地知道：这里的粮食储备明显不足。[66]英国1901年的军事侦察报告显示：“要塞的粮食供应必须完全依靠海运和满洲铁路。”[67]俄国驻太平洋海军基地从中国东北以外的中国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日本采购面包、鱼肉、蔬菜、木材、干草、燕麦等各类物资。因此，物资运送主要依靠海上运输。1902年1月1日至12月1日，经大连转运，旅顺港城区接收各类海运物资累计38568吨66904件。要知道，转运和使用“支线”都是需要花钱的。[68]1903年，800艘商船抵达大连，其上装载着1800万普特（合计288000吨）的货物，其中煤炭和茶叶占据较大的进口份额！[69]

至于舰队士兵所需的主食黑面包，进口货简直与俄国原产食品不是一回事！更糟糕的是，在港口深度增加后，运输舰直接停靠在了防波堤

坝附近。这样，敌人就能藏身运输舰，待其停靠后直接登陆旅顺港，进而占领铁路枢纽。尽管俄国军方曾考虑过一旦战争爆发港口存在被摧毁的可能，并且屡次申请加强对大连的防御，然而在战争爆发后俄国才着手建立海军防御。后来，虽然建成2座可架设4门火炮的炮台，但是在日军登陆前夕弹药才被运到貔子窝附近。[70]事实上，海军基地的选址并不理想。

1872年，托特列边（Э. И. Тотлебен）[71]指出："目前，只有在掩护守备部队和战争物资的地方储存足够的炸弹，要塞炮兵连才能与攻城炮兵连一较高下，我们才能在要塞打持久战。"[72]19世纪末，这位俄国筑城工事巨擘已享有极高的威望，可惜他的影响力仅限于军事工程圈。在修筑旅顺港要塞时，显然受到了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要塞建设者回忆道："财政问题迅速凸显，它凌驾于其他问题之上，陆军大臣已提交用以核算海军基地实施陆上防御所急需物资的必要数据，当时他不得不极力压制自己的需求。"[73]事实上，自1856年以后，俄罗斯帝国已将海防组织工程完全交由陆军部负责。[74]但是，这个远离俄国领土的滨海新要塞的防御系统恰好成了财政部厉行节约的"靶子"。

为了确保要塞的海防实力，需要部署42门10英寸口径的火炮（根据要塞的实际计划，申请部署22门，最终批准10门）、96门6英寸口径的火炮（申请部署36门，最终批准20门）、56门11英寸口径的卡内特式火炮、28门9英寸口径的火炮、28门6英寸口径的火炮（重190普特）、128门57毫米口径的速射炮、89门11英寸口径的臼炮、14门9英寸口径的海防迫击炮。上述装备及其安装支出预计1141.3万卢布，弹药支出预计3170.2万卢布，因此仅要塞海防炮兵装备所需的国库支出便高达4311.5万卢布（装甲战列舰耗资600万卢布）。[75]要塞陆地阵线防御性工程（其中包括修筑公路和要塞铁路）的造价预计1000万卢布，海上为800万卢布。上述数据不包含炮兵装备和军港建设支出。[76]要塞炮兵部队12752人（9个营）部署如下：为每门海防炮配备12名炮兵（海防炮总计481门），陆战炮配备8名炮兵（陆战炮总计850门）。在此基础上加上31个步兵营（24800人）和辅助部队，要塞守军应增加至3.8万人。文章指出："我们滨海要塞的驻陆边防部队的兵力绝不能少于3.5万人，由此可见，可能遭遇陆路袭击的滨海要塞的守军规模与陆地要塞近乎齐平。"[77]

1899年，上校工程师韦利奇科（К. И. Величко）奉命进驻旅顺港

编制要塞修筑计划。他在那里的见闻给他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他写道："如此地势，如此土壤和地表特性，我们在任何一处要塞都不曾遇到。跌宕起伏的地势、圆锥形的孤峰将众多陡峭而绵延的山脉分隔开来，因此我们需要布置大量的防御工事，以便它们相互掩蔽、相互支援，形成火力联系。此外，在深谷处存在许多交叉阵地，在此需增设炮台、掩体和暗堡。"[78]对潜在危险的准确认知也无力回天，毕竟从一开始缩减陆地阵线已成定局。陆军高层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劝导建筑者"不要惧怕制高点"，应当"通过正在建造的防御工事"来弥补地形上的不足。[79]

依据沙皇批准的要塞建设计划，关东州守备部队不得超过11300人。这样，守卫半岛既不至于引发"危险的政治关系"，其开支也不至于太过高昂。1900年1月31日，计划获批。此时，关东州的兵力已达到计划所规定的上限。[80]增兵计划与财政大臣的立场相悖。维特认为，拥有1.2万兵力的守备部队足以掌控关东州，因此他极力反对要塞增兵计划和俄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发展计划。[81]减员计划同时波及符拉迪沃斯托克，甚至还抑制了符拉迪沃斯托克防御发展计划的实施。在抵达旅顺港前，韦利奇科视察了这座要塞，并且按照库罗帕特金的指示尽可能地削减了要塞的守备兵力。[82]尽管旅顺港很早便开始了防御工程施工，但是，1899年，受资金链断裂的影响，工程长期中断。结果，在大战爆发之际，要塞甚至连初步防御计划都未达成。

维持要塞运转需要1500万卢布，"陆上军用设施"（营房、仓库、医院、学校、教堂等）需要1204.7万卢布，港口设施需要3242.4万卢布，要塞、城市及港口施工需要5947.10万卢布。事实上，截至1904年，已向要塞发放的陆防资金为4235530卢布，海防资金为1333000卢布，即所需资金的1/3左右。此外，向陆上非防御性工程拨款5519544卢布，港口非防御性工程拨款11699845卢布。因此，资金缺口高达3801.6万卢布。[83]在1904年以前的五年里，俄国政府平均每年向各大要塞共拨款800万卢布，用于支持"防御性和非防御性工程"，[84]其中旅顺港每年平均分得150万卢布，仅在1902年增加了40万卢布。[85]

在此情况下，要塞守备部队只能相机而动。中国原有的防御工事质量欠佳，因此无法直接使用。总参谋部亚洲支部以潜在敌人的炮兵连无6英寸以上口径的火炮为由，坚持仅需修筑可抵抗此口径火炮进攻的防御工事。[86]这绝非明智之举，此时没什么事情能够阻止日本购买更大威力的攻城炮。缩减要塞的必要开支导致要塞通道的水雷防御系统薄

弱，已铺设的水雷防御能力明显不足。[87]要塞的海防很难得到认可，显然它并不成功。按照韦利奇科的设计，需在此架设140门火炮，然而最终决定缩减至124门，即每俄里大约部署6门火炮，当时普遍认为该指标的设定“颇为合理”[88]。尽管如此，这项目标也未彻底实现。大战爆发前，在海防阵线上的22座炮台只架设了112门火炮。除数量指标外，还应考虑质量指标。在射击机动舰时，9英寸和11英寸口径的迫击炮（总计33门）完全无效，而57毫米和37毫米口径的速射炮也是如此。事实证明，唯有10英寸和6英寸口径的舰炮才能打击敌舰，然而此类舰炮仅有25门。[89]

按计划，陆上防御分为2道防线：外部防线（22俄里）和内部防线（约6.5俄里）。其中在外部防线上计划建造8座堡垒、9处防御工事、6处永久性炮台和4座多面堡，内部防线为4座多面堡。最初，计划在此架设399门火炮和48挺机枪。这些防御工事和武器装备只适用于抵制敌军的快速进攻，应对正常的围攻却收效甚微。1903年，在旅顺港陆地的炮台上仅有280门火炮可投入使用。因此，在战争爆发后，俄军不得不火速调运武器、弹药。1904年7月21日，在旅顺港要塞已架设518门火炮和29挺机枪。远程重型火炮数量不足、要塞迫击炮几乎完全缺失（后来从海上调来了8门9英寸口径的迫击炮），这对要塞防御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此外，弹药储备也不充足（每门10英寸口径的舰炮仅储备了150枚炮弹）。[90]

尽管资金短缺，然而在战争爆发前旅顺港的防御工程已完成50%左右。这意味着，在要塞的陆地阵线上已围绕老城区建起了中央保护区；拟建的6处永久性堡垒，1处竣工，3处大体完工，1处在建，1处破土动工；7处临时性防御工事，1处竣工；4处永久性炮台有3处竣工；要塞的所有前哨均设防。[91]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取得上述成果实属不易。在此期间，要塞的建设者把握住了偶然出现的机会。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同盟国趁机强占了天津军火库——清政府最大的军械仓库，并且以收缴战利品的名义清缴军火。[92]

由于军火库被俄军占领，同盟国承认俄军享有对军火库及其储备物资的处置权。[93]旅顺港行政当局设法从那里运走了铁甲、钢带、板材、铸铁制品、铅、锡、火药、沉底水雷及其他诸多物资。后来在修筑要塞时，这些物资都派上了用场。当时的工程报表显示，建材价格低得惊人（例如，铁甲护板为0.75戈比/普特）。[94]由于资金短缺，要塞未

制订粮食和饲料保障计划。这并不稀奇，因此在战争爆发后必须囤积后备粮草。由于时间仓促，要塞甚至无法充分利用辽东半岛上的资源。[95]

面对如此境遇，军事当局自然也没钱加固辽东半岛的“门户”——金州地峡。根据1898年5月7日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在俄国租借半岛后，金州城自治并由中国地方政府管辖。在俄军抵达前，金州是关东的行政中心，为了避免激怒清政府，俄国决定做出让步。[96]1900年6月，在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后，俄国守备部队进驻金州。那时，野战防御工事——2座多面堡和12座炮台的修筑工程才开始缓慢推进。事实上，早在1898年，杜巴索夫就曾提议加固金州地峡的防御工事，后来该建议被屡次提出。由于建筑资金短缺，加之后来认为在后方存在完全暴露的大连，加强地峡防御毫无意义，于是此事就此作罢。[97]

韦利奇科提议务必重视大连和金州的防御，两地的防御可能覆盖整个半岛。[98]1900年，他提出警告：“大连港商业化程度越高，码头、煤炭等港口设施服务范围越广，那么它就越能为敌人所用。”[99]关于攻城部队可能利用大连—旅顺港铁路一事，韦利奇科深感不安。这些疑虑被一句简单的解释直接驳回了，即舰队必将保障大连的安全。财政部已向舰队投资上亿卢布，因此认为耗资3000万卢布建立防御区是完全多余的，同时在大连仍未设防。[100]

维特竭尽所能地限制舰队经费。1898～1903年，海军部申请2.01亿卢布建设太平洋舰队。在对该申请做出答复时，维特声称，财政部已拨付5亿卢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为了做出折中的决策，尼古拉二世甚至亲自出马。最终，财政部虽然同意拨款1.94亿卢布，但将造船期限延长至1905年，同时缩减了拟建船舶的数量。[101]1903年2月28日（俄历2月15日），陆军大臣在向沙皇汇报时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表述：“陛下对我说，他承认远东危在旦夕，与其说这是日本人造成的，不如说这归咎于陆军部和财政部代表的相互拆台。现在，他完全支持陆军部。”[102]

但是，现在做什么都晚了。1903年5月，库罗帕特金曾提出过自己的见解：“除了在旅顺港修筑防御工事外，务必尽快在金州阵地建造防御工事（城防堡垒）……目前，大连是关东州的薄弱环节，它就是将来给敌人准备的军事基地，我们必须想清楚：怎样才能避免大连轻而易举地被敌人拿下？因此，最好盘活大连，而不在那里修筑像旅顺港一样的防

御工事。”[103]受战前节约举措的影响，俄国在远东没有合适的船舶维修基地。

由于没有合适的船舶维修基地，舰队的战舰必须定期从太平洋赶赴波罗的海，此行长途跋涉且费用不菲。例如，1902年，伟大的西索伊号和纳瓦林号战列舰、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号和纳希莫夫上将号巡洋舰就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起航前往喀琅施塔得进行养护。为满足这4艘战舰航行所需的物资需求（煤炭、燃油、水、粮食），国库累计拨款50万卢布。[104]早在1895年5月，《马关条约》修订危机告一段落，在太平洋舰队司令员和指挥官会议上，有人提议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打造成一流港口，并且开设一家能够按照各型号舰船、火炮需求制造大型部件的兵工厂。此外，还有人提议在此建造鱼雷艇，因为从波罗的海出发的鱼雷艇经过漫长的航行（约14000英里）后机件磨损严重且无处可修。[105]

十年期间，这些未发生重大变化。日本拥有4处船坞（2处针对大型舰船，1处针对鱼雷艇，1处针对100吨举力的小型浮船坞）。[106]在俄国远东唯一可对大型舰船进行复杂检修的地方就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坐落于此的尼古拉皇太子码头有能力接收装甲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107]在那里还有维修团队——港务公司，有近700名俄国工人。旅顺港的船坞可接收排水量低于6000吨的船舶。此外，在大连也修筑了2处船坞，它们可接收排水量低于1500吨的船舶。另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港各有1处在建的针对大型船舶的船坞，预计将于1906年竣工。[108]由于旅顺港的船坞过窄、过小，装甲舰和巡洋舰无法驶入。如此看来，舰队在主基地并无维修基地可用。[109]顺便说一句，这便说明了装甲巡洋舰成群结队地驻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缘由，在那里进行日常维修价格低廉且更为便捷。经济原因导致兵力分散。[110]

俄国驻远东的海上要塞内既无弹药厂，也无铸造厂；滨海地区的本地煤炭不合适船用；储备物资的补充基本依靠海运，一旦战争爆发，只能依靠铁路运输填补物资消耗。[111]在此情况下，战备问题、首次遭遇袭击的反应对俄国而言至关重要。海军上将阿列克塞耶夫认为，一旦断绝外交关系，俄国有必要立即发动海上军事行动，并且阻止大批日军登陆。[112]1903年9月28～30日，太平洋舰队进行了阻止日本登陆辽东半岛的模拟演习。准备不足、行动不力，他们暴露了俄国国防的重大缺陷。[113]

身处喀琅施塔得的海军中将马卡罗夫已然看清了近期事态发展的前

景。1904年1月22日，他写信给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试图说服他尽快向远东调运岸防炮穿甲弹被帽，他指出：“与日本开战是不可避免的，也许近期就会翻脸。我们的舰队已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港做好了准备。与敌人的热战即将爆发，这场极为艰难的战争对俄国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为了确保俄国获胜，一切能够加强我们舰队实力、提高攻防能力的物资都应派上用场。俄国需要这场胜利，为此已经投入了太多。”[114]情况格外糟糕。太平洋舰队在军舰上仅有一套完整的弹药储备。此外，还有一套弹药不足，12英寸和10英寸口径的舰炮弹药缺失50%，6英寸口径的缺失60%，75毫米口径的缺失100%。战前，4艘轮船承担起了弹药运输任务，但是其中1艘被日本人截获，1艘被迫返航，仅有2艘抵达旅顺港。[115]

马卡罗夫相信自己。与俄国舰队的其他海军上将相比，他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完全掌握了无条件地转达上级命令的艺术。[116]他的副官回忆道：“他个性鲜明（对此我万分钦佩），对例行公事的作风深恶痛绝，相应的，他也憎恨惯用的公文手法——‘继续驱赶野兔’，即为了逃避解决问题的责任而在文件上写下相应的字句（尽管毫不拖沓），然后将文件转发别处，提请‘参考或给出结论’。”[117]俄国官僚主义这一不可磨灭的特征，对于海军将领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战前他时常念叨着：我不明白，我们怎么能安心地睡大觉呢，俄国正面临严峻的危机。”[118]毫不奇怪，在海军部许多人对马卡罗夫不怀好意，因此在开战前各方仍在争论修筑俄国远东要塞的拨款问题，这也就不足为奇了。1904年2月6日，在日军发动进攻的几天前，一列载有鱼雷装备的火车离开圣彼得堡驶向旅顺港。[119]

[1] Золотарев В.А.，Козлов И.А.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Борьба на море. М.1990. С.46；54.

[2]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отдел. Ведомость судам，находящимся в заграничном плавании.//МС. 1904. №1. С.1-7.

[3] С.О. Мака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М.1960. Т.2. С.566-567.

[4] Золотарев В.А.，Козлов И.А. Ук.соч. С.133.

[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2-4.

[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4-14.

[7] Тирпиц А. Ук.соч. С.233.

[8] Цар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о задачах России на Востоке в 1900 г.//КА. М.-Л.1926. Т.5 (18) . С.20.

[9] Цывинский Г.Ф. Ук. соч. С.169.

[10] Геф. Ук.соч.//Разведчик. 1898. №392. С.352.

[11] Котвич В. [Л.] , Бородовский Л. Ляо-дун и его порты...С.28.

[12]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 Порт-Арту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2008. Т.1. С.43.

[13]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 Порт-Арту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2008. Т.1. С.43.

[14]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 Порт-Арту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2008. Т.1. С.45.

[15]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 Порт-Арту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2008. Т.1. С.46.

[16] Тимченко-Рубан Г.И. Нечто о Порт-Артуре и вообще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репостной обороны. СПб. 1905. С.2 ; 41.

[17]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 Порт-Арту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2008. Т.1. С.63-64.

[18]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 Порт-Арту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2008. Т.1. С.64.

[19]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 Порт-Арту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2008. Т.1. С.72-74.

[20] Luntinen , *French Information on the Russian War Plans* , p. 54.

[21] Разведчик. 1899. №430. С.42.

[22] Дессино. Порт-Артур.//Разведчик. 1900. №489. С.200.

[23] Котвич В. [Л.] , Бородовский Л. Ляо-дун и его порты...С.30.

[24] Дессино. Порт-Артур.//Разведчик. 1900. №489. С.200.

[25] Коростовец И.Я. Ук. соч. С.6.

[26] Х-г. Госпиталь в Порт-Артуре.//Разведчик. 1899. №469. С.854-855.

[27] Всеподданнейший отчет 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ойсками Кванту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за 1901 г. Б.м. б.г. С.3；5-6；11-12.

[28] Хвостов А. Русский Китай. Наша первая колон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ВЕ. 1902. №10. С.655.

[29] Берг В.Ф.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Порт-Артуре.//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далее ВИВ）. Париж. 1954. №4. С.16.

[30] Тиреер. Порт-Артур и его интересы до учреждения наместничества.//ВС. 1904. № 1. С.188；192；фон Шварц А. ［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 СПб. 1908. Ч.1. С.31.

[31] Дебогорий-Мокриевич Л.［И.］Квантунские грунтовые дороги.//ИЖ. 1909. №4. С.461.

[32] Котвич В.［Л.］，Бородовский Л. Ляо-дун и его порты...С.36.

[33] Дебогорий-Мокриевич Л.［И.］Ук.соч.//ИЖ. 1909. №4. С.462.

[34] Вильсон Х. Ук.соч. С.300.

[35] Кван-тонг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летом 1898 года.//МС. 1900. №7. С.61-62.

[36] Тиреер. Порт-Артур и его интересы...//ВС. 1904. №1. С.180-181.

[37] ПСЗ. Собрание третье. СПб.1901. Т.17.1898. Отделение первое. №15890. С.859.

[38] 大连被沙俄占领时期的名称，俄语“Дальний”意为“遥远的”。——译者注

[39] Дессино. Порт-Артур.//Разведчик. 1900. №489. С.201.

[40] Тимченко-Рубан Г.И. Нечто о Порт-Артуре...С. 97；103；Коростовец И.Я. Ук. соч. С.2；Величко К.И. Русские крепости в связи с операциями полевых армий в мировую войну（критико-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по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 Л.1926. С.30.

[41] Боев А. Талинван.//Разведчик. 1899. №451. С.514.

[4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35.

[43] Нилус Е.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Харбин. 1923. Т.1. 1896-1923. С.166.

[44] Временные правила о продаже и отдаче в аренду с торгов участков в гор. Дальнем.//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1（24） мая 1902 г. №104. С.1-2.

[45] Тиреер. Порт-Артур и его интересы...//ВС. 1904. №3. С. 191；193；Тимченко-Рубан Г.［И.］ Нечто о Порт-Артуре и вообще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репостной обороны.//ВС. 1905. №6. С.113；120；125-126；Высочайше утвержд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с Обществом Кита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расчета по отошедшей к Японии части назван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по морскому пароходству эт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 по устройству им гор. Дальнего и порта в этом городе.//ИМИД. СПб.1912. №2. С.52.

[46] Нилус Е.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Харбин. 1923. Т.1. 1896-1923. С.160.

[47] Н.Щ. Плавание по Сунгари в Манджурию до города Гирина.//МС. 1866. №5.С.37-38；46-47.

[48] Дацышен В.Г. Ук. соч. С.36.

[4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от начала до Ляояна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 Лекц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полковника Комарова...С.28.

[50] Тиреер. Порт-Артур и его интересы...//ВС. 1904. №3. С. 195.

[51] Норригаард Б.В. Ук.соч. С.8.

[52] Нилус Е.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Харбин. 1923. Т.1. 1896-1923. С.163.

[53] Временные правила о продаже и отдаче в аренду с торгов участков в гор. Дальнем.//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1（24） мая 1902 г. №104. С.2.

[5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35-36.

[55] Нилус Е.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Харбин. 1923. Т.1. 1896-1923. С.165.

[56] Норригаард Б.В. Ук.соч. С.10.

[57] Тиреер. Порт-Артур и его интересы...//ВС. 1904. №3. С. 196-197.

[58] McCullagh，*With the Cossacks*，p. 5.

[59]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стории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 Порт-Артур（Дневник инженер-штабс-капитана В.В. Сахарова）.//ВС. 1907. №1. С.218.

[60] Коростовец И.Я. Ук.соч. С.52.

[61] Всеподданнейший отчет 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ойсками Кванту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за 1901 г. С.4.

[6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151.

[63] Хвостов А. Русский Китай…//ВЕ. 1902. №11. С.191.

[64] фон Шварц А. ［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 СПб. 1908. Ч.1. С.22；25；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войск для городов.// Разведчик. 1895. №221. С.221；Тиреер. Порт-Артур и его интересы...//ВС. 1904. №1. С.188.

[65] Тиреер. Порт-Артур и его интересы...//ВС. 1904. №1. С.188.

[66] Геф. Ук.соч.//Разведчик. 1898. №392. С.350.

[67] “The military resources of Russia，and propable method of their employment in a war between Russia and England. Secret，” PRO，WO 106/48，p. 11.

[68] Дессино. Порт-Артур.//Разведчик. 1900. №489. С.200；Тиреер. Порт-Артур и его интересы...//ВС.1904. №3. С. 196-199.

[6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36.

[7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39-40.

[71] 俄国上将工程师，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托特列边为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工程做出了杰出贡献，1863～1877年担任俄国工程部队总监察长，1876年出任黑海岸防总指挥官。——译者注

[72] Величко К. Крепости и крепостные железные дороги.//ИЖ. 1898. №1. С.17.

[73] Тимченко-Рубан Г. ［И.］ Нечто о Порт-Артуре и вообще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репостной обороны.//ВС. 1905. №3. С.91.

[74] Тимченко-Рубан. ［Г.И.］ Порядок заведы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обороны берегов с суши.//ИЖ. 1898. №6-7. С.801.

[75] Буйницкий Н. Об устройстве приморских крепостей.//ИЖ. 1899. №4. С.449-450；Тимченко-Рубан Г.И. Нечто о Порт-Артуре...С.3.

[76] Буйницкий Н. Ук.соч.//ИЖ. 1899. №7. С.867.

[77] Буйницкий Н. Ук.соч.//ИЖ. 1899. №4. С.456.

[78]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Влияние данных борьбы за Порт-Артур на устройство сухопутных крепостей.//ИЖ. 1907. №1. С.16.

[79] Тимченко-Рубан Г.И. Нечто о Порт-Артуре...С.5.

[80] Тимченко-Рубан Г. [И.] Нечто о Порт-Артуре и вообще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репостной обороны.//ВС. 1905. №3. С.93；98.

[81] Цар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о задачах России на Востоке в 1900 г.//КА. М.-Л.1926. Т.5 (18) . С.24.

[82] Авилов Р.С. , Аюшин Н.Б. , Калинин В.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13. Ч.1. 《Назло надменному соседу》 1860—1905 гг. С.158.

[83] Тимченко-Рубан Г. [И.] Нечто о Порт-Артуре и вообще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репостной обороны.//ВС. 1905. №4. С.75；85；107；То же.//ВС. 1905. №6. С.112-113.

[84] Ивков Д.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Главного Инженер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за время 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 24 декабря 1862 г. по 20 декабря 1913 г.//ИЖ. 1915. №1. С.20.

[8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487.

[86]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 СПб. 1908. Ч.1. С.40；54.

[87] Филимонов И.Г. Дефекты минной обороны в минувшую кампанию 1904—1905 годов.//ВС. 1907. №1. С.144.

[88]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 СПб. 1908. Ч.1. С.93-94.

[89] Соломонов. Из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ой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 1907. №2. С.146-148.

[90]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 СПб. 1908. Ч.1. С.97；99；101；102；104.

[91]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Влияние данных...//ИЖ. 1907. №1. С.19；24.

[92] Тимченко-Рубан Г. [И.] Нечто о Порт-Артуре и вообще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репостной обороны.//ВС. 1905. №4. С.102.

[93] Янчевецкий Д.Г. Ук.соч. С.209.

[94] Тимченко-Рубан Г. [И.] Нечто о Порт-Артуре и вообще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репостной обороны.//ВС. 1905. №4. С.102.

[95]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 СПб. 1908. Ч.1. С.130-134.

[96] Дессино. Порт-Артур.//Разведчик. 1900. №489. С.199.

[97] Тимченко-Рубан Г.И. Нечто о Порт-Артуре...С.43；фон Шварц А.В. Укрепление Киньчжоуской позиции.//ИЖ. 1906. №1-2. С.6-7.

[98]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 СПб. 1908. Ч.1. С.54.

[99]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 СПб. 1908. Ч.1. С.55.

[100]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 СПб. 1908. Ч.1. С.56-57.

[101] Папастратигакис Н. Большая военно-мор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в начал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РЯВ. С.123.

[102] Дневник Куропаткина с 17 ноября 1902 по 6 марта 1903 г.//КА. М. 1923. Т.2. С.31.

[103] Дневник А.Н. Куропаткина с 27 мая 1903 г. по 6 июня 1903 г.//РоА. М.1995. Т.6. С.404.

[104] Казьмичев Б. Вторая 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эскадра.//Возрождение. Париж. 1964. №155. С.53.

[105] С.О. Мака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М.1960. Т.2. С.187-188.

[10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21.

[107] Костенко В.П. На 《Орле》 в Цусим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участника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на море в 1904-1905 гг. Л.1955. С.38.

[108] Дмитриев Н. , Колпычев В. Иностранные судостроительные заводы.//МС. 1909. №5. С.118.

[10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45-46.

[110] Дудоров Б.П. Вице-адмирал А.И. Непенин…//МЗ. Нью-Йорк. 1956. №4. С.16.

[111]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25.

[112] Rosen ,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 vol. 1 , p. 240.

[113] Черкасский М. Военные идеи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русского и японского флотов в 1903-1905 гг.//МС. 1914. №7. С.76-78.

[114] С.О. Мака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М.1960. Т.2. С.142.

[11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46.

[116] Семенов В. Адмирал Степан Осипович Макаров.//ВЕ. 1910. №3. С.62.

[117] Семенов В. [И.] Расплата. СПб.1907. ЧЧ.1 (Порт-Артур) -2 (Поход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 С.2.

[118] фон Нидермиллер А.Г. От Севастополя до Цусим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Русский флот за время с 1866 по 1906 гг. Рига. 1930. С.117.

[119] Тимченко-Рубан Г. [И.] Нечто о Порт-Артуре и вообще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репостной обороны.//ВС. 1905. №4. С.88.

16 开战

天皇麾下海军军官冲向战场。1904年1月26日，晓号舰队驱逐舰指挥官在日记中写道："我坚信，在海上我们能够痛击俄国人。也许他们也是好士兵，但是他们没有实战经验，因而他们的舰队也不足为惧。"[1]这份对敌人的评价与真相并无太大出入——太平洋舰队进入了"武装预备役"状态，驻守港口；其余军舰战前每年的出海天数不超过20天，其余时间都在基地度过。事实上，基地被舰员当成了水上营房。"打消积极性"是远东总督特有的管理手段，其实质就是费尽心机地打压自己的部下。即使是高级指挥官也不能与之意见相左，否则便不可原谅，因此他周围满是阿谀奉承之辈。加之，军官时常从一艘战舰轮值到另一艘，因此这就清楚地解释了在舰员队伍充足的情况下阿列克塞耶夫却无法在远东打造一支充满战斗力的舰队的原因了。[2]

俄国舰队停泊在了外锚地。军事行动一旦开始，舰队能迅速投入战斗，无须顾及涨潮或落潮，无须考虑内港通道是否可用。但是，这显然也留下了许多隐患。1904年2月8日（俄历1月26日），马卡罗夫在写给海军大臣阿韦兰（Ф. К. Авелан）的信中指出："军舰在开放的锚地停泊将为敌人提供夜袭的可乘之机。无论如何警惕防范，也不能阻止如狼似虎的敌人在夜间出动大量的鱼雷艇乃至汽艇向我军舰队发起猛攻。对我们而言，这种袭击的后果十分严重，因为防护网无法覆盖整个船舷，此外，在很多军舰上还没有加装防护网。每天夜间，停泊在旅顺港开阔锚地的舰船务必加强警戒，派出巡逻舰巡逻，同时警惕鱼雷袭击。"[3]

俄国司令部的举动出乎意料的草率。自1903年夏天以后，旅顺港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时常收到关于日本进行军事动员、日军开展运输舰登陆训练的消息，自9月以后还收到了日本计划登陆朝鲜的消息。[4]1903年12月底，阿列克塞耶夫恳请尼古拉二世批准在西伯利亚省和远东进行军事动员并且宣布上述地区（包括中国东北）进入战时状态，立即戒严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港，但遭到了沙皇的反对。1904年1月8日，沙皇批准了这些举措，但是占领鸭绿江除外。4天后，陆军大臣通知总督只允许宣布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港进入战时状态，但是不允许在西伯利亚进行动员。总督手握重权，却不急于使用。他一直在等待，并且于1月17日再次申请占领鸭绿江阵地。22日，申请获批，同时总督还接到了在

不戒严的情况下提高部队战备等级的命令。23日，总督接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戒严命令。[5]

在此，不得不探讨一下战争的突发性。敌对行动突然爆发。1904年2月7日，当俄、日断交的消息传出后，阿列克塞耶夫欣喜若狂，他明白战争已经开始了："但愿能结结实实地抽他们耳光，这总比无休止的纠缠要好。"[6]事实上，一切仅限于此，旅顺港的守备部队和舰队没接到任何指令。继1903年9月的演习后，直到1904年2月1日，俄国舰队才执行了当年的首次出海任务，并于一昼夜后返航。在接到阿列克塞耶夫的命令前，谁也不敢加强防御，直到2月10日，总督才下令要求这样做。[7]此前，总督对待防御态度敷衍。

加强防御的举措包括两艘巡洋舰必须从黄昏到日出不间断地执勤，执勤舰应当随时做好出海的准备。自2月1日以后，出海的仅有执勤的鱼雷舰，航行距离不到20英里并且开着军用照明（探照灯）。[8]2月2日，军舰加装了防雷网，此后每天夜间进行反鱼雷攻击演习。[9]尽管指挥舰员常守在舰炮周围执勤，但是演习无法提高他们的警惕性，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演习节奏，何况每次演习都选在同一时间，这毫无意义，只会让驻泊在锚地的军舰上的舰员感到疲乏。"在舰员准备充分且合理作业的情况下，鱼雷及其伴侣鱼雷艇在行家手中威力惊人，这与我们先前想象的一样。"在总结上述武器在甲午战争中的应用时，维特捷夫特（В.К.Витгефт）如是说。[10]到了1903～1904年，俄国舰队似乎忘记了这个真理。

日本人频繁出海，其中包括关东州地区。"嗯，我们已经对这些地方了如指掌了！"1904年2月2日，晓号驱逐舰指挥官在日记中写道："整个冬天我们都在那里，至少去过20次了。每处海湾、每座灯塔我都如此熟悉，仿佛它们就是日本的。"[11]

与此同时，日本舰队还掌握了俄国舰队的作业情报。自2月6日起，日本人迅速撤离旅顺港和大连。商贩低价抛售货品，商铺附近人头攒动。8日晚，关东州的日本居民跟随领事抵达芝罘，随后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这艘轮船还经过了俄舰阵地。[12]奇怪的是，此事并未引起舰队的不安。日本人的离去未对驻军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13]

夺取制海权是后续战役取胜的决定性条件，因此日本军部决定利用俄国兵力分散且备战不足的缺点大做文章。2月6日，日本舰队离开了佐

世保基地。水手们兴高采烈，其中一名水手在日记中写道：“我提前为每个俄国佬的死亡而感到开心，我是如此痛恨这个民族，因为他们阻挡了大日本帝国的强盛之路。”[14]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大将认为俄国大型战舰可能藏身大连，因此他将鱼雷艇部队一分为二，一支进攻旅顺港，另一支进攻大连。[15]执行突击的鱼雷艇总计10艘。[16]鱼雷艇指挥官接到命令，要求他们锁定装甲舰和巡洋舰发动鱼雷袭击。[17]部署在旅顺港港外锚地的俄国军舰为日本人执行这项命令提供了便利。

此时，俄国军舰呈4列交错停泊，灯火通明，舷窗紧闭，小口径舰炮也已装弹完毕。[18]实力最强的军舰部署在一线——外海，射击扇面覆盖其余区域的3/4。[19]在“袭击之夜”，不久前出海并返航的列特维赞号和胜利号战列舰正在明亮的电灯下从运煤驳船上卸煤。[20]在行动前，日军指挥官收到了简短而明确的指令：“按照既定的计划发动进攻。祝您圆满成功。”[21]未在通往旅顺港的要道上铺设水雷，要塞和舰队因此遭遇了最致命的打击。1904年2月9日晚，在城市灯光、灯塔及俄国舰船探照灯的指引下，敌人轻而易举地抵达我们的舰队基地附近。每天2艘军舰执勤，并且他们还会派出汽艇拦截、检查从海上驶来的船舶。[22]此时，舰队绝大多数的军官既不相信可能与日本开战，也不相信日本人胆敢“以一流舰队侵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23]

袭击的参与者回忆道：“灯塔闪闪发亮，整座城市灯火辉煌，其中最明亮的地方就是舰队所处的位置，尽管现在我还无法通过望远镜看到那里。真的，这些愚蠢的俄国佬没有任何觉察，他们安然入睡、愚蠢地祈祷，像往常一样将自己交托给上帝并且寻求他的庇护。‘好吧，’我心想，‘今夜就让我们成为你们的上帝吧。’”[24]2艘俄国鱼雷艇在远海要道巡逻，这显然不够。况且，对于巡逻舰而言，重点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如何作业。在巡查过程中，巡逻舰不仅开着航行灯，同时还要执行“不动用作战武器、按照路程节约原则巡航，一旦发现任何情况务必以最快航速返回锚地报告信息”的指令。[25]日本的鱼雷艇与俄国的鱼雷艇擦肩而过，日本人认为自己没被发现。事实上，巡逻舰指挥官正在执行先前收到的指令。在发现日本的鱼雷艇后，俄舰加速冲向旅顺港。在敌人发动进攻的同时，他们刚好赶到。[26]

结果，就像期待已久的事情通常会发生一样，战争突然爆发了。开战不久，斯捷谢利（A. M. Стессель）将军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关于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26日那天我们未做任何讨论。虽然所有人都确

信大战在即。”[27]海军和陆军波澜不惊。舰队司令官斯塔尔克（О. В. Старк）中将的夫人为了庆祝自己的命名日举办了一场舞会，同时邀请了诸多海军军官。当日，舰队暂停演习，据说是为了筹备新一轮的演习。最初的几声炮响被误以为是演习的例行警报。[28]从军官的角度看，它们不可能是别的，毕竟当时还未宣战。[29]对于阿列克塞耶夫下令要求执行的那些措施，舰队并未严肃对待，认为那是高层刁钻古怪的要求，现在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30]陆军的情况也差不多，警报拉响后，部队慌忙出动，有的没配枪弹，有的带着哨兵的装备。[31]

突袭持续了17分钟，从23：33到23：50，而俄军的反击则开始于23：47，也就是说只反击了4分钟。[32]当时完全没有秩序可言，最初炮兵放弃开火，认为这是个误会并且将敌军的鱼雷舰当成了我军的。[33]探照灯信号操作笨拙，甚至找不到敌军的鱼雷艇。所有军舰乱射一通，一线军舰竟然没被己方的炮弹击中简直就是奇迹。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没能立即搞清状况，误以为发生了骚乱，因此不断发出停火信号。[34]事实证明，大多数的海防炮台是无用的摆设，由于压缩机缺油（正在计划更换），大口径的重型火炮无法射击。[35]2月10日，总督府军事办公厅厅长普兰逊（Г. А. Плансон）在日记中写道：“日军的突袭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总而言之，谁也没想到日本是如此蛮不讲理，毕竟日本公使尚未离开彼得堡，我们的人也未离开东京。”[36]

夜袭导致1人中弹身亡、6人溺水毙命、6人在医院葬身火海，32名水手在爆炸中中毒。[37]此次袭击，日本仅损失了1艘鱼雷艇。相比之下，俄国舰队损失惨重：停泊在旅顺港的外停泊地的帕拉达号巡洋舰和2艘俄国装甲战列舰列特维赞号、皇太子号受损严重。[38]在被炮弹击穿后，皇太子号船身进水，船体侧倾18度。如果侧倾角再增加2度，战舰极有可能发生侧翻。[39]日本舰队的行动高效、专业。在向东京汇报时，东乡表示：“在作战时我们士气高涨，仿佛这场战斗是在演习中发生的一样。”[40]在17分钟内，8艘日本鱼雷艇累计发射16枚鱼雷。次日，在港内锚地的浮体上发现了其中3枚。[41]

第二次和第三次袭击分别发生于2月9日00：30和00：50，尽管后两次袭击均被舰队击退，但是第一次突袭所造成的损失相当巨大。[42]正如舰队某位军官所指出的那样：“在港口修复巨型装甲舰上巨大缺口的可能微乎其微。”[43]在旅顺港没有干码头，在此维修受损军舰几乎是不可能的。马卡罗夫一语成谶：“如果现在我们不将舰队停在港内锚地，等

到遭遇首次夜袭后我们也必须这样做，此时我们必须为这个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44]2月9日上午，日本舰队在旅顺港附近扣押了载有要塞物资的满洲号轮船，2.7万枚炮弹和80万份肉罐头落入敌手。[45]

1904年2月9日（俄历1月27日），在得知舰队遇袭后，尼古拉二世颁布对日宣战诏书，其中指出："殄念维持和平的重要性，为巩固远东的和平倾尽全力。出于维护和平的目的，我同意日本政府所提出的修订帝国间有关朝鲜问题的现存协约。但未及交涉终了，日本甚至不待受理俄国政府最终答复，便照会终止交涉并断绝与俄国的外交关系。日本政府未提前通告断交，便令本国鱼雷艇突袭我驻扎在旅顺港要塞锚地的舰队。我接到远东总督关于此事的报告后，即刻命令以武装力量回击日本的挑衅。”[46]

2月10日，东京正式宣战。[47]明治天皇诏书将两国的矛盾和战争爆发的原因归咎于彼得堡的政策，因拖延耽搁导致朝鲜、中国东北协议签署受阻："帝国之重在于保全朝鲜，此非一日之故。不仅因两国累世之关系，实朝鲜之存亡关系帝国安危。然俄国不顾其与清国名约以及对列国累次宣言，已然占据满洲，且益加巩固其地位，终欲吞并之。若满洲归俄国领有，则无由支持保全朝鲜，远东之和平亦根本无望。故朕值此之机，殷切期望通过妥协解决时局问题，以维持恒久和平，我有司向俄国提议达半岁之久，屡次交涉，然俄国丝毫不以互让精神应对。旷日持久，徒然迁延时局之解决，表面倡导和平，暗中扩张海陆军备，欲使我屈从。足见俄国自始毫无爱好和平之诚意。俄国既不容帝国之提议，韩国之安全方濒危急。事既至兹，帝国原本欲依和平交涉求得将来之保障，近日唯有求诸旗鼓之间，此外别无他途。”[48]于是，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1] «Акацуки» пере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 Из дневник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офицера Нирутака. СПб. 1905. С.4.

[2] Семенов В.［И.］Ук.соч. СПб. 1907. ЧЧ.1-2. С.37；124.

[3] С.О. Мака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М.1960. Т.2. С.557.

[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332.

[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138-140.

[6] В штабе адмирала Е.И. Алексеева...//КА. М.-Л.1930. ТТ.4-5 (41-42) . С.7.

[7]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делу о бое 28 июля.//МС. 1917. №3. С.5.

[8]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156-159.

[9] Заев А.Н. Ук.соч.//МЗ. Нью-Йорк.1944. №1. С.37.

[10] Действия минами в нынешнюю японско-китайскую войну (Извлечение из сообщения кап.1 р. Витгефта) .//МС.1895. №5. С.21.

[11] 《Акацуки》 пере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7.

[1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179-180.

[13]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 СПб. 1908. Ч.1. С.146.

[14] 《Акацуки》 пере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10.

[15] 《Акацуки》 пере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13.

[16]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 1909. Т.1.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 С.54.

[17] 《Акацуки》 пере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14.

[18]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179.

[19] Ненюков Д. [В.] Вероломное нападение японцев на Порт-Артурскую эскадру.//Морской журнал. Прага. 1929. №1 (13) . С.10.

[20] Иениш Н.В. Война с Японией надвигается. Адмирал Старк проявляет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ую энергию.//ВБ. Париж. 1965. №75. С.9.

[21]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 1909. Т.1.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 С.49.

[22]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 1909. Т.1.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 С.55.

[23] Келлер П.Ф. Две параллели и вывод.//Морской журнал. Прага. 1937. №8（116）. С.3.

[24] 《Акацуки》 пере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23.

[2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179.

[26]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 1909. Т.1.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 С.55；59.

[27] Письмо ген. А.М. Стесселя ген. В.Г. Глазову о начале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А. М.-Л.1926. Т.3（16）. С.219.

[28]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 1909. Т.1.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 С.59.

[29] Побилевский Н. Дневник артурца. 27 января - 23 декабря 1904 года.// ВС.1910. №1. С.71.

[30] Келлер П.Ф. Ук.соч.//Морской журнал. Прага. 1937. №8（116）. С.3.

[31] фон Шварц А. ［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 СПб. 1908. Ч.1. С.148.

[32] Денисов Б.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торпедного оружия 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ую войну.//МС.1935. №11. С.13.

[33] Подгурский Н.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б осаде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 1906. №4. С.178.

[34] Ненюков Д.［В.］Вероломное нападение...//Морской журнал. Прага. 1929. №1（13）. С.11-12.

[35] Иениш Н.В. Война с Японией надвигается...//ВБ. Париж. 1965. №75. С.12.

[36] В штабе адмирала Е.И. Алексеева...//КА. М.-Л.1930. ТТ.4-5（41-42）. С.163.

[37]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217.

[38] 《Акацуки》 пере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36.

[39]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 СПб. 1908. Ч.1. С.148.

[4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 СПб.1908. Т.1. С.7.

[41] Денисов Б.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торпедного оружия...//МС.1935. №11. С.13.

[4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202-204.

[43] Подгурский Н.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б осаде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 1906. №4. С.185.

[44] С.О. Мака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М.1960. Т.2. С.558.

[4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

[46] ПСЗ. Собрание третье. СПб.1907. Т.24.1904. Отделение первое. №23936. С.78.

[47]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 1909. Т.1.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 С.14.

[48]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 1909. Т.1.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 С.15.

17 双方的计划、俄国战争机器的优势与劣势

日本首批被俘军官中的一位说道："我们知道，俄国是个强大的国家并且资源比日本丰富，但是俄国的强大限于欧洲，在这里，在亚洲大陆这边，俄国不如我们。"[1]俄国将军队从欧洲调派至亚洲需要时间。日本的行动计划正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时局为日本创造的这种优势为基础的。东京清楚日本无法进行持久战，无论是物力、财力还是人力，国家都负担不起持久战的消耗。据参谋本部预测，日本获胜的概率为50%；据海军军令部预测，在海上取胜或将付出折损半数军舰的代价。在战争开始前，日本的军事领导层和政府甚至已经开始思考应当如何结束战争了。[2]

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且拥有40万兵力的陆军，其中不乏参加过甲午战争的军官和士兵，计划被派往中国东北执行登陆计划。按计划，在登陆后他们应当迅速击溃俄国驻守在辽阳以南的兵力，同时占领防御工事尚未完工的旅顺港。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俄国陆军的有生力量逊于日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旅顺港俄军兵力不足13.3万。日本人计划在俄国增援部队到达前消灭这些兵力。一旦日本人的计划成功实现，到时他们将占领哈尔滨，切断哈尔滨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联系，那时俄国基本再无翻身的可能。

西伯利亚铁路的起点塞兹兰与辽阳相距6968俄里。那时，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特快列车全程需要走14天。运送陆军部队需要96列火车，从莫斯科到哈尔滨的陆军专列全程需要走30天。理论上，通过单线铁路运送陆军耗时45天；实际上则需要50～60天，甚至可达69天。军用补给列车在路上所需的时间更长，为2～2.5个月。战争之初，每日仅有4趟军用列车发车，沿西伯利亚铁路驶向东方，其中还搭载着军用物资（在战争结束时，每日的发车数量增加了4～5倍）。东清铁路自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1904年5月，其通过能力[3]仅为9对列车，其中军用列车占5对。7月14日，这条铁路的通过能力增至最大，上述数据变为12对和8对。

铁路通过能力的提升耽误了尚未完全竣工、长度为1442.25俄丈

（3077.18米）的兴安岭隧道的施工进度。兴安岭隧道修筑环境异常艰苦，花岗岩山体、复杂的通风条件和低温。战争爆发2天后，第一列军用列车通过隧道。在军事行动期间，隧道仍在继续施工。由于积冰严重，为了清除隧道里的冰层，每日必须将火车推入隧道。此时，尚未竣工的还有环贝加尔湖铁路，这里的施工条件因永久冻土层、大量花岗岩和无林区域的存在变得极为复杂。1903年底的铁路状况基本排除了每日通行3对列车的可能。解决贝加尔湖沿线交通拥堵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跨湖交通。

大型破冰船贝加尔湖号和安加拉号每昼夜运行2.5航次，每航次运载28节车厢和2300人。采购轮渡、修筑专用码头耗资6744340卢布（这与远东陆军每年的军需支出相当），虽然最初计划支出300万卢布。4月中旬至12月末，每年至多可在湖上航行7个月。若天气正常，渡湖需7个小时，但是秋季时常刮起强风，每月可能有3～4天无法通航。1904年1～2月，天气极为寒冷，破冰船甚至被冻住了。此时既无法使用轮渡运输军用列车，它们也无法在1904年2月直接铺设在冰面上的临时支线上行驶，因为蒸汽机失灵了。为了减轻重量，从列车上卸下了蒸汽锅炉，然后拉动机车在贝加尔湖的冰面上滑行。由于在冰面上屡次形成裂痕和冰窟，不得不经常移动临时支线。

后来，乘坐军用列车的部队下车了，一些人步行前进，一些人乘坐马牵引的货车前进，彼此间相距数十米。此外，还有部分人员和货物依靠雪橇运输。为了解决部队的餐饮和取暖问题，直接在冰面上建起了一座中转站——巨大而温暖的木制营房，在那里发放免费的开水和小吃。截至1904年3月14日，从贝加尔湖西岸已累计向东岸运输1300节车厢。自5月以后，贝加尔湖号沿着在冰冻的湖面上凿出的专用航道航行，流冰期过后，几乎湖上所有的轮船都加入了运输行列。1904年8月，环贝加尔湖铁路交付使用，未通车距离缩短至80俄里，这为部队的分批运输创造了可能。1904年晚秋，这条铁路彻底竣工。[4]

最初，俄国陆军总司令并未制订任何作战计划。为了打败日本人，他认为必须组建一支规模在6个军左右的陆军部队。这构成了库罗帕特金总体计划——向尼古拉二世阐述的战争思想的基础。据颇受其弟瓦西里·古尔科（В.И. Гурко）将军照拂的弗拉基米尔·古尔科（Вл. И. Гурко）证实：总司令提议逐渐从中国东北撤兵，避免在中国东北内部发生冲突，然后集结兵力发起反攻，最终陆战队登陆日本甚至生擒日本

天皇。[5]总而言之，库罗帕特金制订的不是作战计划，而是局势发展轮廓。在他看来，制订总体作战计划“相当容易”。1904年2月15日（俄历2月2日），他在奏章中对总体作战计划做了陈述。

1.舰队争夺制海权。

2.日军的登陆与我军的对抗。

3.在集结足够的兵力前，开展防御工作和广泛的游击战。

4.转向反攻：

a从满洲驱除日本人；

b从朝鲜驱除日本人。

5.登陆日本。击败日本本土部队。与民族起义做斗争。[6]

库罗帕特金对作战计划的介绍令苏霍姆利诺夫（В. А. Сухомлинов）记忆犹新。据他回忆，总司令的计划无论是逻辑性还是杜撰细节的丰富性都令人叹为观止：“合情合理地、一环扣着一环地向前推进，最后将行动目标过渡到日本诸岛，结语简洁而引人入胜：‘天皇被俘！’”[7]俄国某位批评家将库罗帕特金与苏沃洛夫（Суворов）进行了对比。在远征意大利前，苏沃洛夫在拒绝奥地利宫廷事务大臣的计划时说道：“我以穿越阿达河为行动的起点，并且将在神喜悦的地方结束我的征程。”批评家指出：“苏沃洛夫清楚地知道行动开始的地点和方式，却不知道它的终点在哪里；而库罗帕特金清楚地知道战争是如何结束的，却不知道它应当如何开始，这就是库罗帕特金与苏沃洛夫作战计划的主要区别。”[8]

受对西伯利亚铁路通过能力保守估计的影响，俄国的作战计划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战事拖延策略。按计划，陆军应撤退至北部铁路附近，依靠增援部队逐渐扩张规模，然后从中国东北山区转移至辽阳的平原地区，继而发动反攻。1903年，远东总督府参谋部制订了3套作战计划——对日作战计划、对清作战计划和与两个邻国同时开战的作战计划。使哈尔滨成为向俄国驻中国东北部队提供补给的中转基地，在辽阳集结部队是上述计划实现的基础。[9]

概括地讲，大约在战争爆发前十年，俄国的行动计划大体成型。

1895年，在向日本下达修订《马关条约》的最后通牒时，行动原则就已基本确立。那时，日本人位于中国东北的南部，在那里没有现代化通信手段。若当时爆发军事行动，按计划，俄国陆军将在吉林北部地区集结。一旦敌军深入北方，那么他们将立即失去数量和补给优势。在铁路施工取得成效后，这些计划也屡次随之变更。最初，计划在中国东北集结6支预备役部队。据当时推断，只有在俄国与德国、奥匈帝国爆发战争的前提下，日本才会出动。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和日本陆军增兵与动员计划顺利实施后，俄国决定用两支陆军部队——第十军和第十七军替代两支预备役部队。在战争期间，预备役部队的数量又缩减了2个。军队的运输和集结都需要时间。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俄国陆军的有生力量不如日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旅顺港共有13.3万兵力。除去两个要塞的守备部队，分散在营口至鸭绿江沿岸的野战部队仅有7.3万兵力，分布在辽阳的仅有3万兵力。若以惯用的行动逻辑进行分析，则意味着为了争取时间俄军需要向中国深处撤退。俄国推算，转折点将出现在战争的第二阶段。这些推算是在低估了日本的动员能力的前提下进行的。[10]

第一阶段的行动仅限于防御，计划在朝鲜建立小规模的阻截队，进而与日本人展开积极的游击战。该方案是在参考了布尔人对抗英国人的经验后得出的，然而俄国人却完全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当时俄国在朝鲜尚未赢得当地民众的普遍支持，大部分朝鲜民众受日本人的操控。这远非俄国指挥部犯下的最危险的错误，更可怕的是他们严重低估了日本的动员能力。据俄国指挥部估算，针对陆地战，日本可动员的陆军（35.8万人，其中21.7万人为预备役士兵）兵力不超过20万人，至多25万人，因此便排除了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和旅顺港阵线同时行动的可能。事实上，在战争过程中，日本累计动员110余万人，前线的陆军兵力始终保持在50万人左右。[11]

与此同时，日本人也犯下了严重错误，他们低估了俄国铁路的运输能力和旅顺港的防御潜力。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敌人，都将面临令人恼怒的意外。战前严重的失算在战争中阴差阳错地使敌人的计划濒临崩溃。此外，俄国的计划还有一处重大缺陷，即使陆地大获全胜并且在海上也彻底地摧毁了日本舰队，由于没有足够的运输舰，俄国也无法在日本诸岛展开军事行动。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在海上还是陆地上，对士兵和水手的训练、对部队和舰队的指挥质量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此

方面，精心模仿英、德两国教育与管理体系的日本优势显著。

至于俄国的军事体系，已然显现出了改革后的全部弊端，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便已初见端倪。在1877～1878年战争期间担任多瑙河陆军部队武官的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上校，对1904年的俄国评价道："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科学组织战争方面，它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即使是现代化的舰队和装备精良的陆军本身也无法确保胜利，因为最近发生的事件已经明确地证明了这件事……显然，目前在远东发生的事件证明，尽管俄国经历了上次与土耳其的战争，但是它未能从中吸取教训，因此，与1877年的对土战争一样，1904年的对日战争它依旧准备不足。"[12]对于装备颇为精良且自1904年夏天以后在兵力方面不弱于日本的俄国陆军而言，在"野战"中的这种准备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拆分部队"，也就是说将赶赴前线的部队分散成若干分队，结果用某位参战者的话来说，最后形成了"由各分队组成的'大杂烩'"。第二，低估了参谋部对大型军事队伍指挥与管理的重要性，进而导致部队管理失控。第三，高估了预备役部队的能力，在动员阶段对他们的协调不够重视。

究其本质，俄日战争是对依托于1874年改革而形成的庞大预备役部队的首场考验。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绝不能与之相提并论。那时候除了1876年的局部动员外，从军队的动员到集结乃至开战，中间几乎用了3年时间。这段时间足以从应征入伍者中选拔人才组建作战部队。在对日战争中没有类似的机会。例如，1904年5月经过动员的陆军第十军仅有10天的备战时间；同年7月初和7月末分别经过动员的陆军第十七军和西伯利亚第五军仅有两星期的备战时间。[13]在战争过程中，备战期限才被逐渐拉长：陆军第十六军1904年10月23日接受动员，11月27日启程赶赴前线，准备时间略超一个月。[14]与此同时，动员活动像过去一样，组织得极为糟糕。[15]动员推进缓慢，不管怎样，最初没人着急。与亚洲敌人的殖民地战争不用付出太多努力。[16]乱糟糟的部队，彼此互不习惯的军官和士兵，时常在不熟悉且不习惯的环境中"从车上跳下来"直接投入战斗，因此往往无法收获良好的战果。结果，在付出了损兵折将的代价后，不得不在前线进行调整。

关于训练对部队素质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事实加以判断。1877～1878年，应征入伍者大多是在军旗下长期服役并且熟悉武器的士兵。1904～1905年，陆军的情况与前者不同，35～40岁预备役

士兵的比例持续上涨：战争开始时为30%，辽阳战役时为53%，沙河战役时为57%，奉天战役时为72%，战争结束时为58%。[17]俄国的应征年龄始于21周岁，当时的服役期限为5年。这意味着，大部分应征参加对日战争者是在别丹式步枪的旗帜下服役的，因此他们对于新式武器——在1893～1895年改装的莫辛系列连发步枪不甚了解。大多数40岁左右的预备役士兵根本不适合服兵役。[18]

轻武器，尤其是机枪的优点未受到重视。几乎全军战士都未能正视这种新型武器的优点。1900年初，德拉戈米罗夫将军在《侦察兵》（Разведчи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颇有特色的文章《您的刺刀将对它做些什么呢？》。某家法国报社寄给他的文章也是如此命题的，其中附上了一张照片：英国射击场内被柯尔特机枪从1097米、914米、731米和457米处射中的靶子。射击是在没有瞄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在不少靶子上出现了斑驳的弹孔。在射出的2250发子弹中，1220发上靶，命中率为54.22%。

基辅军区司令员依旧固执己见，轻武器可怕的威力并未使他信服："那些接受过刺刀训练的人也能平静地完成射击；那些只接受过射击训练的人不愿适应刺刀，通常完全无法适应它。他太过期望敌人的子弹不会打在自己身上，否则事情就变得尴尬了。在战斗中消灭他人，自己却不冒着死亡的危险，这是不行的，这种自我保全是令人不愉快的。这简直就是抓住飞禽在它的尾巴上撒盐[19]。"[20]在与布尔人和马赫迪派的战争中，英国人使用了机枪。这令俄国人相信这种武器只能用于防御。与此同时，在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战斗中，俄国军队首次使用机枪，但是效果显著。[21]此次经验依旧未被及时地重视起来。

1901年春，俄军成立了5个机枪连，每个机枪连拥有8挺机枪，其中1个机枪连隶属于东西伯利亚第三步兵旅，另外4个分别隶属于华沙军区第四、第六、第八和第十六步兵师。[22]因此，军事行动爆发之初，在远东仅有1个机枪连和8挺机枪。最初的冲突向双方展现了这种武器在防御中的强大效力。[23]在金州守卫战中，舰队开始向陆军移交从军舰上拆下来的机枪。[24]在两军交战之际，俄国被迫弥补先前的过失。1904年，俄国陆军部采购了246挺马拉枪（仅收到16挺）、411挺车载机枪（仅收到56挺）。山地炮的情况则好些，预订240支，实收112支。[25]

1905年，44个机枪连和31支骑兵-机枪队在俄国欧洲地区接受训练，他们所配备的是莫辛-纳干步枪（轻机枪）。除了4个机枪连外，剩

下的机枪部队均被派往中国东北。在奉天战役开始前，他们全数抵达并且加入陆军。[26]此外，1905年在作战地区又组建了10支机枪分队，其中调用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12挺坦克机枪中的2挺。在骑兵团中组建了若干支配备着莫辛-纳干步枪的骑兵-机枪队。[27]选择莫辛-纳干步枪是极为失败的，实际上，它只有一个优点——轻便（8.2千克），其余的满是缺点：手提机枪的组装和拆卸极为烦琐，存在大量不可更换的部件，经常卡壳，在密集的射击中也不可靠。[28]

俄国的山地炮集中部署在了高加索地区、敖德萨和基辅军区。如此部署是因为当时预测作战区域可能位于小亚细亚、喀尔巴阡山脉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因此，直至1903年底才提出为在中国东北的部队配备山地炮的问题就不足为奇了。当时，司令部对速射野战炮更感兴趣。[29]结果，俄国驻中国东北南部的部队几乎没有山地炮。第三集团军军需部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认为，山地炮的缺失导致俄国部队在山区作战疲软无力，而机枪的意义在防御中已经彻底显现：“有时候，这种可怕的武器能够完全歼灭攻击我们的敌人。”[30]

步兵对抗潜在敌人的战术训练水平不高。野战炮兵同样存在问题。[31]虽然俄国炮兵拥有新式的速射野战炮，但是他们从未接受过隐蔽阵地的射击训练。更有甚者，以陆军第十六军为例，在开往中国东北的列车上，他们收到了新型武器。[32]无论是高层指挥官还是炮兵军官，都不了解新型武器的状况和威力。战前没人对这些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33]结果在打了几场败仗后，俄国人开始钻研新的作战方法。在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领导下，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对满洲集团军的炮兵连进行了培训。结果在瓦房沟附近，俄国的炮兵让敌人大惊失色。埋伏在大石桥附近的西伯利亚陆军第一军甚至能以76门火炮压制日军186门火炮的火力进攻，同时掐断日本步兵进攻俄军阵地。[34]

[1]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58.

[2] Окамото С. Ук.соч. С.142.

[3] 铁路的通过能力指的是铁路在单位时间内（通常指一昼夜）能通过或接发的最多列车对数、车辆数或吨数。——译者注

[4] Кравченко Н. На войну！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очерки военного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СПб.1905. С. 10；12；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СПб. 1909. Т. V. С. 1200；1203；1206；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690-694；Свечин А.［А.］，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 Ук. соч. С.16-17；Нилус Е.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Харбин. 1923. Т.1. 1896-1923. С.109-110；113；Dowbor Musnicki J. Moje wspomnenia. W. 1936. S.75；Теттау［Э.］Восемнадцать месяцев в Манчжурии с русскими войсками. СПб.1907. Ч.1. С.19；22；Боткин Е.С. Свет и тен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5 гг.（Из писем к жене）. СПб.1908. С.4；Грулев М. Забайкалье（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озрения）.//ВС. 1898. №10. С.458；Янушкевич Н.［Н.］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роль интендантства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армиях на войне.//ВС. 1910. №4. С.152.

[5] Гурко В.И. Ук.соч. С.346；Редигер А.［Ф.］Ук. соч. М.1999. Т.1. С.376；В.А.［пушкин］Куропаткин…С.6-8；Теттау Э. Куропаткин и его помощники. СПб.1913. Ч.1. С.33.

[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 Кн.1.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С.100.

[7] Сухомлинов В.［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Берлин. 1924. С.151.

[8] Теттау Э. Куропаткин и его помощники. Спб.1913. Ч.1. С.34.

[9] Флуг В. План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ертывания войск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случае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с Японией，1903 года，освещении труда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ВС. 1910. №12. С.54；56-57.

[10] Свечин А.［А.］，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 Ук. соч. С.37；40；Свечин А.［А.］Тактические урок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СПб. 1912. С.4；11.

[11] Bruce W. Menning，“Miscalculating One’s Enemies：Russian Intelligence Prepares for War，” in David Wolff，et al.，eds.，*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World War Zero*，vol. 2. Leiden：Brill，2007，pp. 59-61.

[12] Frederick Arthur Wellesley，*With the Russians in Peace and War*；*recollections of a military attaché*. London：E. Nash，1905，p. 111.

[13] Куропаткин А.Н. Отчет генерал-адъютанта Куропаткина. Варшава. 1906. Т.4. С.182-185.

[14] Адариди К. Юрьевцы в состав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армии с 5-го января по 19-е февраля 1905 г.//ВС. 1906. №1. С.77-78.

[15] Адариди К.М. Пережитое. 1903-1905 гг.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ВИВ.

Париж. 1968. №31. С.5-7.

[16] Рябинин А.А. На войне в 1904-1905 гг...С.7-8.

[17] Свечин А.［А.］，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 Ук. соч. С.28；Свечин А.А. Предрассудки и боева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М.2003. С.174.

[18] Оболенский В.В. Записки о войне офицера запаса. М.1912. С.6.

[19] 此处为俄语俗语“ловить птицу насыпанием соли на хвост”的直译，表示激怒某人、引发某人强烈的反感。——译者注

[20] Драгомиров М. Что сделает ваш штык против этого？//Разведчик. 1900. №481. С.481.

[21] Санников Н. Печилийский отряд и сводная саперная рота этого отряда；с чертежом и 2-мя рисунками в тексте.//ИЖ. 1903. №6-7. С.873-874.

[22] Федоров С. Пулеметные вопросы.//ВС. 1909. №7. С.131.

[23] Куропаткин А.Н. Записки генерала Куропаткина 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Итоги войны. Berlin. 1911. С.281.

[24] Третьяков Н. 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ВС. 1909. №2. С.74.

[25] Куропаткин А.Н. Записки...С.281.

[26] Федоров С. Пулеметные вопросы.//ВС. 1909. №7. С.135.

[27] Федоров В.Г. Оружейное дело на грани двух эпох（Работы оружейника 1900-1935）. М.1939. Ч.2. С.4.

[28] Конно-пулеметчик. Еще о пулемете в коннице.//ВРК. 1910. №12. С.547-549.

[2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1. 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 С.553-554.

[30] ОР РГБ. Ф.855. Карт.1. Ед. хр. 34. Л.42.

[31]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 General Staff，*The Russo-Japanese War*，part 1. London：Printed for H. M. S. O. By Harrison and Sons，1906，p. 29.

[32] Адариди К.М. Пережитое...//ВИВ. Париж. 1968. №31. С.7.

[33] Нечволодов［П.П.］Отрывки из моих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ий журнал. Орган правления русских артиллеристов во

Франции. Париж. 1927. №4. С.4.

[34] Майдель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Великом Князе Сергии Михайловиче.//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ий журнал. Орган правления русских офицеров-артиллеристов во Франции. Париж. 1930. №10-11. С.11 ; Ипатьев В.Н. Жизнь одного химик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Нью-Йорк. 1945. Т.1. С.284.

18 国际局势、军事行动的开端和马卡罗夫的牺牲

沙皇尼古拉二世对远东爆发军事行动的第一反应就是希望战争能够得到一劳永逸的结局，其结果就是日本被彻底削弱，“从而使其不再拥有部队和舰队”。作为未来和约条款方案，彼得堡就拒绝履行与日本以平等关系签署的1875年和约和吞并对马岛问题展开了讨论。1904年2月18日（俄历2月5日）颁布的宣战诏书指出，俄国不仅是为了本国的荣誉和尊严而战，更是为了太平洋的“统治权”而战。在因这种语气而感到惶恐不安的拉姆兹多夫的干预下，外国政府才听到了如下解释，这句话意指“应当以世界强国的姿态统治本国的太平洋沿岸地区”[1]。总体而言，1904年初的国际局势对俄国有利。

1904年2月13日，清政府宣布中立，这尤为重要。在战争爆发后的前几天，清政府在渤海地区积极调动部队，在辽河和蒙古聚集兵力，这引起了俄国司令部的恐慌。俄国司令部担心，在辽东沿岸冰层融化后，日本陆战队将登陆辽东，届时清政府将调派陆军支持日本。[2]开战后，俄国外交界几乎立即获得了德国善意中立的保证，巴尔干半岛的俄奥关系也得到了调节。所有与俄国接壤的国家，如瑞典、奥匈帝国、罗马尼亚、土耳其和波斯都保持中立。法国政府对俄国和日本代表交代道：“谨记，法国与俄国是盟友，还应牢记法国与日本也不是敌人。”[3]

彼得堡无法指望盟友巴黎提供武装支持，事实上彼得堡也不需要，因为英日同盟条约即将生效。日本的拥护者英国和美国坚决要求限制冲突的范围，客观而言这对于拥有巨大军事潜能的俄国更为有利。[4]没有多少人对它将凯旋表示怀疑。1904年初，伦敦甚至在两种猜测之间摇摆不定，日本将要遭受哪种失败，会不会是彻底而毁灭性的失败？英国首相亚瑟·贝尔福认为，无论结局如何，无论是作为法国的盟友，还是作为对印度的潜在威胁，或是作为对波斯具有显著影响的国家，抑或是欧洲和平的潜在破坏者，俄国的实力都将减弱。[5]这些想法很快便得到了证实。我们的军事行动相当失败。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日本人夺得了海上优势，这让他们的部队获得了登陆朝鲜的机会。1月16日，高宗向沙皇宣布，一旦日本与俄国爆发

战争，朝鲜将保持中立。没人愿意尊重这种中立，因为朝鲜自身也无力捍卫它。[6]2月6日，3艘载着陆战队先遣部队的运输舰从佐世保出发前往半岛沿岸，执行护航任务的是联合舰队第四战队（4艘巡洋舰和1艘无防护巡洋舰），这是海军少将瓜生外吉的舰队。[7]2月7日，这支舰队封锁了济物浦。此时，瓜生的舰队扩大至1艘装甲舰、5艘一等和二等巡洋舰、8艘舰队驱逐舰。俄国的警卫舰瓦良格号巡洋舰和高丽人号炮舰，连同松花江号轮船都与外界断了联系。在驱逐舰的掩护下，日本运输舰开始向半岛沿岸运兵。

1904年2月9日，瓦良格号指挥官海军上校鲁德涅夫（В.Ф.Руднев）收到瓜生发来的开战公告和要求瓦良格号离港的最后通牒。如若不然，日本舰队将进攻停泊在济物浦港内锚地的俄国舰船。在突围未果并且与日本舰队搏击35分钟后，瓦良格号和高丽人号撤回港内，瓦良格号被击沉，高丽人号和松花江号轮船被凿沉。敌人未耗损一兵一卒。俄国驻汉城使团、舰队船员及一支小型护卫队被疏散至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巡洋舰上，而后分别前往新加坡、上海、香港和西贡，再从那里返回俄国。在英国使团的监督下，24名重伤水手留在了红十字会医院。[8]在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济物浦成了日军补给的主要据点。[9]

2月9日，东乡平八郎率领由6艘装甲战列舰、5艘装甲巡洋舰和4艘两个等级的巡洋舰组成的舰队出现在旅顺港附近。海军大将希望利用鱼雷艇发动夜袭并且在俄国基地外停泊港歼灭俄舰。三笠号旗舰发出指示：“皇国兴废在此一战，诸君当需愈加奋力。”[10]然而在与俄国舰队和海防炮对决时，东乡未能取胜，由于忌惮俄国鱼雷艇的袭击，他不得不率领舰队撤回后方。[11]战斗持续了近40分钟，俄方也未获得巨大的成功。日本人14次命中俄国战列舰，但是未对其构成重创，没留下一处漏水点。然而，塞瓦斯托波尔号和波尔瓦塔号战列舰却撞到了一起，后者被撞出了一个窟窿。最重要的是，日本人未能及时摧毁受损舰船，彻底歼灭不容忽视的敌人——停泊在旅顺港的舰队。[12]

未讨到便宜的日本人将行动的目标转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巡洋舰队。开战前，要塞远未达到最佳状态，要塞的岸防阵线无法全面掩护要塞与海洋之间的各条要道。[13]战争爆发时，在此停泊着3艘一等巡洋舰（俄罗斯号、留里克号和格罗莫鲍伊号），勇士号轻型巡洋舰、被改装为巡洋舰的列那号运输舰及10艘鱼雷艇。[14]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寒冬已然到来。1903年底，这些舰船便开始筹备过冬：铺盖防寒物资、在过道

铺设木板、使用木盾遮蔽炮架等。[15]1904年初，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自1月15日以后，煤炭和弹药被运到了船上，而一切非必要物资和易燃品都被送到了岸上。2月9日晚，舰队已完成作战准备，和平时期的白色军舰被粉刷成了战时的黑色。[16]

战前俄国舰队的海上作战计划可谓五花八门，然而在维护海上霸权和阻止敌舰自由往返朝鲜沿岸方面，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17]在旅顺港遇袭后，阿列克塞耶夫上将立即命令巡洋舰队出海并且加入太平洋舰队。[18]这条命令完全未得到执行。2月10日，在海军少将耶森（К.П.Иессен）的指挥下，巡洋舰驶入日本海并且击沉了2艘日本商船。14日，在避开敌舰后，它们成功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19]2月12日，日本舰队出现在俄罗斯岛附近，但未贸然进入炮火射程。10天以后，上村彦之丞率领5艘装甲巡洋舰和2艘轻型巡洋舰再次靠近该岛，同时向防御工事开火，但收获不大。[20]在日本海上的行动未对日本外贸的主营业务构成威胁。1902年，横滨、神户和大阪3个港口的贸易额为4.74亿日元。换言之，这三个港口占日本帝国外侧诸岛——太平洋沿岸外贸总额的90%。[21]到访横滨的船舶最多，船舶进港数量日均14.5艘，神户为14艘，大阪为1.5艘，分别占日本港口船舶日均进港总量的43%、41%和5%。[22]

尽管俄国巡洋舰取得了偶然的成功，却未能成功阻断敌人的军事运输。这立即对朝鲜的局势构成了影响。2月18日，日本中队登陆镇南浦港。3月29日，此地已成为2个步兵师团的登陆地和据点。[23]2月27日，日本人已完成对第一军第三师团和驻济物浦的第十二师团转运，汉城被占领了。[24]事实上，在即将开战之际，日本驻半岛的军事机构已经颇具规模。为了进行深度侦察，米申科（Мищенко）将军奉命率领骑兵部队潜入半岛，外贝加尔骑兵旅（12支哥萨克部队、6门火炮）——赤塔哥萨克第一军、阿尔贡哥萨克第一军、外贝加尔哥萨克第一炮兵连是这支队伍的中坚力量。随着东西伯利亚第十五步兵团骑射部队的加入，这支队伍又壮大了。利涅维奇为米申科设定的目标是歼灭敌军骑兵部队，同时应避免“我们人数本就不多的骑兵队在战斗的第一阶段就被击垮”。米申科行事谨慎，将人数本就不多的部队分为若干个侦察组，并且极力避免发生冲突。[25]

与此同时，俄国舰队损失不断。1904年2月11日，叶尼塞号布雷舰被调往大连湾。由于大连湾并未设防，为了对抗潜在的敌军陆战队，高

层决定在港口要道布置水雷阵地。尽管海上风雪交加，但是极端严峻的局势迫使布雷舰加紧作业。2月10日，320枚水雷被运上布雷舰。11日傍晚，大连湾基本已被水雷覆盖，此时的叶尼塞号还存有82枚水雷，指挥官决定次日继续布雷。布雷过程中，被狂风吹离阵地的己方水雷击中舰船，爆炸随之而来，同时还引爆了舰上的弹药。布雷舰在15分钟内沉入水中。博雅林号巡洋舰率领4艘鱼雷艇奉命前来救援，由于没有水雷分布图，博雅林号不幸触雷，它以15度倾斜角栽入水中，海水灌入舷窗，船员弃舰撤离。此时，它仍旧浮在海面，暴风雪过后第三日才沉入海底。训练不足导致船员和指挥官能力欠佳，2艘重要的舰船也因此折损。[26]2月28日，在日本人的威压下，停泊在上海的警卫舰满洲人号炮艇被迫解除武装。与清政府的谈判持续到3月初，此后该炮舰被解除了武装，在缔结和约后它才驶离上海。[27]

2月18日，海军中将马卡罗夫被任命为太平洋舰队司令，升为上将，拥有舰队和太平洋港口的指挥权。[28]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总督离开了旅顺港。离任前，他在奉天将马卡罗夫到任前的舰队指挥权交给了海军中将斯塔尔克（O.B.Старк），并且指示后者务必保全舰队战舰，特别是装甲舰。[29]对于海上局势的掌控，日本军部信心不足。为了巩固初期的战果，东乡决定组建一支由5艘装载着石渣的运输舰组成的船队，按计划，它们应当在旅顺港出口处自爆沉底。如果日本人的计划成功了，那么俄国舰队将被困在港内。由于航道地形狭长且水位低浅，俄国舰队可能长期无法脱困。这支船队的船员是从志愿者中选拔出来的。2月23日和24日，企图冲入航道的船队被击溃了。[30]

1904年3月8日，马卡罗夫抵达旅顺港，接替了毫无主见的斯塔尔克。在等候指挥权正式交接的同时，他巡视诸舰并且在阿斯科尔德号巡洋舰上升起了自己的旗帜。他的到来及他愿意以舰为家的表态令海军将士士气大增。所有人都期待他能放弃“保全舰队”的战略并且进行积极的反攻。颇具象征意义的是，当日装甲战列舰列特维赞号驶入港内锚地的东部水域。[31]在敌舰袭击期间，它被迎面发射的炮弹击中，留下了一处约3.7米×10米的缺口，进水约1500吨。经过长时间的搁浅，这艘俄国顶级战舰成了一处固定的目标，同时还妨碍其他舰船的自由进出。[32]

列特维赞号的维修与脱浅都极为成功。军事行动的经验交流与培训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卡罗夫。他设法鼓舞俄国舰队的士气，并且组织维修受损舰船。[33]随他一同到来的还有波罗的海船厂的工人，通过他

们的努力，维修进度明显加快。[34]此时，必须加快进度。春天日益临近，4月沿岸的冰雪即将消融，来自日本陆战队的威胁成倍增加。[35]马卡罗夫与前几任司令官不同，舰队的某位军官回忆道：“权力和指挥权在他手中不是体现暴政、残酷、专横或侮辱的工具。”[36]

战争开始前，旅顺港的工匠不足百人，辅助工作雇中国人完成，在响起了战争的第一声炮响后，中国人就离开了。1904年2月12日，波罗的海船厂接到命令，向旅顺港派遣200名经验丰富的工匠。3月29日，工匠抵达旅顺港，直至要塞投降那日，他们一直在船上作业。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在被困时期受损的皇太子号、列特维赞号、胜利号、塞瓦斯托波尔号装甲战列舰及巴扬号一等装甲巡洋舰才得以修复。舰船水下的漏洞必须借助沉箱[37]进行修补，这些木制沉箱需要预先在岸上制作出来，然后再将其拖拽到舰船受损一侧。这项工作极为艰巨，需要全天候轮班进行。列特维赞号在67天内修复完毕。在该小组和奥布霍夫兵工厂匠人小组的共同努力下，旅顺港战时的维修能力大幅提高，后来惠及要塞的陆上阵线。[38]

在完成对受损舰船的维修前，马卡罗夫设想动员舰队的鱼雷艇和巡洋舰力量并且使之相互配合，进而形成一支在海军少将耶森领导下出海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巡洋舰分队——它们应对敌国舰队有所牵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碍敌军登陆关东。舰船维修完毕后，马卡罗夫计划与东乡展开争夺制海权的决战。[39]俄国和日本的轻型部队在关东要道上多番较量，双方各有胜负。3月9日至10日，果敢号和守卫者号驱逐舰在旅顺港要道巡航。后者在与敌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失事，马卡罗夫率领诺维克号和巴扬号一同营救该舰成员，但是并未成功。[40]战斗结束后，敌人试图扣留该舰，但是一名俄国舰员怒吼着打开了通海阀，舰船沉没了。日本人搭救了其中的三名船员。[41]

太平洋舰队的动员活动正在悄悄地进行。与此同时，日本人再次企图封锁旅顺港出口。第二次尝试发生在1904年3月27日，最终被俄国舰队和海防炮击退。3月10日和12日，日军炮击内港——埋伏在老铁山山脊开火，依旧无功而返。炮兵的对决未给双方带来特别的损失。[42]与之相比，水雷战更加高效，日本人的手段更为高明。在战争之初由于缺乏明确的作战计划，相应地在布雷作业中各方也不够协调，对俄国舰队的行动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最初，俄军手中甚至没有己方的雷区地图，博雅林号因此遇难。在防御过程中，俄方舰船累计交付1066枚水雷，日

方为1300枚。[43]当然，数字没有决定性意义。与俄国的水雷阵不同，日本的具有进攻性特征，因为它们是用来限制俄国舰队驶入公海的。此外，正是水雷武器帮助天皇的舰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04年4月13日，在舰队出海途中，马卡罗夫乘坐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装甲战列舰触雷爆炸，这是日本布雷舰在当日前夜悄悄布下的，马卡罗夫当场毙命。[44]

“没收到任何危险预警，舰队在海防炮的掩护下航行，日舰与我们保持着距离，然后我们收到了用餐指令，马卡罗夫的司令部在舰桥上集合。在这里发生了爆炸，‘威力令人难以置信’。”[45]在空中升起了巨大的火浪，烟柱是船高的二倍有余，几秒钟后爆炸再次袭来，主力炮塔被毁，随后装甲舰向一侧倾斜，海水迅速灌入其中，此时舰尾的螺旋桨仍在旋转，摧残并杀害企图逃生的人们。[46]这艘巨舰在1.5分钟内沉没，只有7名军官和73名水兵幸免于难，30名军官和624名水兵葬身海底。[47]看到这一幕的记者描述道：“舰队仿佛被冻在了原地，没发出丝毫声响，没有任何轻微的动作。”[48]胜利者号装甲舰几乎同时触雷，但不致下沉，最终返回港口。[49]

在胜利号被炸得发生侧倾后，舰队和炮台方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50]惊慌失措间，俄国军舰和海防炮兵连将爆炸归咎于敌方的潜艇进攻，于是开始胡乱射击水中一切可疑的对象。未造成更多的损失，这真是个奇迹！次日，在清扫航道时，一枚日本水雷出现在众人面前。[51]在观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沉没场景时，日本布雷军官的第一反应是：“杀死马卡罗夫上将才是我们的头等大事。”[52]与海军上将一同殒命的还有其司令部的指挥官和大批军官，以及伟大的军旅画家韦列夏金（В.В. Верещагин）。[53]参与救援的盖达马克号鱼雷艇找到了马卡罗夫的大衣，[54]舰队士气低沉。[55]俄国水兵抱怨道：“连个领头的都没了。”[56]

马卡罗夫去世后，远东总督接管了舰队的指挥权。事实上，舰队的指挥权应当由海军上将斯克里德罗夫（Н.И.Скрыдлов）接管，然而后者在日军对要塞实施陆地封锁前未能抵达旅顺港。维特捷夫特成了舰队真正的指挥官。据他的下属描述：“他是个善良的人，工作起来不知疲倦。”虽然他本身也是一名勇敢的军官，但是他不具备前任司令官的特质，[57]没有特殊情况，他不愿率领舰队冒险出海。与此同时，他拘谨地接受了海军上将阿列克塞耶夫的命令，后者要求放弃海上的积极行

动，转而加强要塞防御。虽然日本人也存在某些过失，然而在管理方面占据优势，因此制海权——赢得这场战争胜利的最重要条件仍旧掌控在日本手中。此时，俄国舰队依旧保持着庞大的规模。对于派遣陆战队登陆辽东半岛一事，东乡平八郎犹豫不决。

战争爆发之初，防御工事迅速出现在通往旅顺港的陆上要道附近。1904年1月，大多数堡垒和防御工事尚未完工，防御阵地尚未封闭。因此，旅顺港要塞实际上无自保之力。[58]在俄国军舰遭遇夜袭后，在此立即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工作，可惜有时候这些工作毫无用处。由于缺乏要塞动员计划，建筑施工毫无章法，正如某位英国战地记者指出的那样："场面极度混乱。"[59]匆忙间，旅顺港要塞的某些事宜无法依据原则进行，例如观察员的装甲头盔、火炮的防弹炮塔尽管缺失，但没有替代品；与此同时也无法为防守部队建造舒适的掩体。[60]2月至3月，每日有1.2万人在修筑防御工事。[61]

在旅顺港封锁期间，日本舰队12艘军舰触雷折损，其中令他们最为痛心的损失是5月15日因触碰阿穆尔号布雷舰所布置的水雷而沉没的两艘装甲战列舰——八岛号和初濑号。俄国首次体会到了远离日本及其海军基地的好处。第一艘战列舰几乎在50秒内沉没，完全重复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命运。水雷爆炸引爆了弹药箱，在装甲舰上空腾起了一朵黑云，随后发生了第二次爆炸。当两朵黑云散去后，初濑号只剩下舰首还未沉入水中。[62]最初，维特捷夫特不相信日本装甲舰失事，甚至下令复核情报。旅顺港上下欢欣鼓舞，尽管如此，除鱼雷艇外俄国舰队依旧原地待命。[63]

爆炸后18小时，在向日军基地沿岸拖拽的途中，第二艘受损的战列舰沉没了。爆炸发生在俄国海军眼前，在旅顺港正前方，原本由3艘装甲战列舰和2艘轻型巡洋舰组成的敌军舰队瞬间只剩1艘一等巡洋舰完好无损。但是，即便如此，维特捷夫特依旧不敢违抗总督的命令，趁此良机出海围剿日本舰队。[64]日本舰队陷入恐慌，发了疯似的向水面开火，与俄国军舰失事的场面并无二致。[65]埃森（Н.О.фон Эссен）回忆道："日本舰队惊慌失措，也许认为附近有潜水艇，因此迅速逃离，并且朝着周围的水面射击。"[66]片刻之后，受损的敌军战列舰只剩下一艘，慢慢地纠正倾斜并且向东移动。在此情况下，只有14艘鱼雷艇驶出内港，却不敢发动进攻，因为敌军的3艘巡洋舰紧贴八岛号航行。[67]最终，八岛号被拖走了，并且在俄军哨所目之不及的地方沉没了。在遭受

了这些损失后，日本舰队实力大幅下降。同日，即5月15日，日本两艘装甲巡洋舰相撞，结果其中的一艘吉野号沉没了。[68]东乡不得不向天皇汇报称：“今天是我们舰队最不幸的一天。”[69]

[1]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Конец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От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М.1997.С. 164；Fuller，*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p. 375.

[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2.Ч.1.От начала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до боя под Вафаньгоу 1 июня.С.30-31.

[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1.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С.81-83.

[4]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Конец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От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М.1997.С. 169-170.

[5] Романова Е.В.Путь к войне...С.81-82.

[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Кн.1.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291.

[7]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10.Т.2. Совмест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и армии по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3；7.

[8]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м а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СПб.1908.Т.1.С.7-8；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09.Т.1.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С.38；43；46-47；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Кн.1.Де 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295-315.

[9]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The Russo-Japanese War*：*Reports from British Officers Attached to the Japanese and Russian Forces in the Field*，vol. 1. London：H. M. Stationery Off.，1908，pp. 3-5.

[10] Золотарев В.А.，Козлов И.А.Ук.соч.С.83.

[11]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09.Т.1.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С.62-67.

[1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Кн.1.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243-245；264-265.

[1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1.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С.528-529.

[14]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10.Т.3.Де 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ой эскадры.С.1.

[15] Иванов-Тринадцатый К.Н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ом отряде крейсеров.// ВБ.Париж.1965.№75.С.33.

[16] W.На отряде крейсеров.//Армия и флот.1914.№2.С.4-5.

[17]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Кн.1.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65-91.

[18] Дудоров Б.П.Вице-адмирал А.И.Непенин…//МЗ.Нью-Йорк.1956. №4.С.17.

[19]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10.Т.3.Дейс 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ой эскадры.С.3-4.

[20] Авилов Р.С.，Аюшин Н.Б.，Калинин В.И.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Владивосток.2013.Ч.1.«Назло надменному соседу» 1860-1905 гг.С.222-223.

[21] Егорьев В.Е.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ий отряд крейсеров 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ую войну.//МС.1937.№3.С.128.

[22] Егорьев В.Е.Операци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ого отряда крейсеров в июле 1904 г.//МС.1937.№4.С.9.

[2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Кн.1.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124.

[24]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10.Т. 2.Совмест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и армии по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7-10.

[25] Матковский А.Конница 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ую войну.//ВС.1911. №2.С.28-31.；Гершельман Ф.Конница в 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и в былые времена.// ВС.1911.№6.С.74.

[2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Кн.1.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335-351.

[27]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Кн.1.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331-334.

[28] С.О.Макаров.Документы.М.1960.Т.2.С.563.

[2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Кн.1.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389-391.

[3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Кн.1.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395；399-401.

[31] Семенов В.［И.］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61-62.

[32] Зборовский И.Подъем эск.брон.«Ретвизан».//ВБ.Париж.1957.№25.С.16-17.

[33] С.О.Макаров.Документы.М.1960.Т.2.С.639-652.

[34] Берг В.Ф.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Порт-Артуре.//ВИВ.Париж.1954.№4.С.19.

[3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Кн.1.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439.

[36] Шмитт В.П.Адмирал С.О.Макаров в Порт-Артуре.//МЗ.Нью-Йорк.1944.№1.С.46.

[37] 法语caisson，此处意指在船舶维修过程中针对船体水下部分发挥局部排水作用的盒子。

[38] Подгурский Н.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б осаде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6.№5.С.203-207；Дмитриев Н.，Колпычев В.Иностранные судостроит ельные заводы.//МС.1909.№5.С.118；А.Н.［емитц］Беглый очерк морских операций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МС.1912.№4.С.155；А.Н.Беглый очерк...//МС.1912.№7.С.127；Зборовский И.Ук.соч.//ВБ.Париж.1957.№25.С.15-16.

[39] Золотарев В.А.，Козлов И.А.Ук.соч.С.97.

[4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Кн.1.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465-466.

[41] Селецкий Г.646 дней...С.87；127-131.

[4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Кн.1.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439-440 ; 475-479 ; 492-494 ; 503-510.

[43] Денисов Б.Минная война у Порт-Артура в 1904 г.//МС.1935.№6.С.87 ; 94-95.

[44] «Акацуки» пере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106-109.

[45] 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Кирил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Гибель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а».// Армия и флот.1914.№6.С.2.

[4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Кн.1.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543-544.

[47] Семенов В. [И.] 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100-101 ; Шмитт В.П.Адмирал С.О.Макаров в Порт-Артуре.//МЗ.Нью-Йорк.1944.№1.С.56.

[48] Кравченко Н.На войну ! ...С.86.

[49] С.О.Макаров.Документы.М.1960.Т.2.С.638-639.

[50] Кравченко Н.На войну ! ...С.88.

[51] Подгурский Н.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б осаде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6. №5.С.228-229 ; Побилевский Н.Дневник артурца...//ВС.1910.№1.С.84.

[52] «Акацуки» пере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111.

[5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Кн.1.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546.

[54] Кравченко Н.На войну ! ...С.92.

[55]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08.Ч.1.С.162.

[56] Семенов В. [И.] 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104.

[57]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Порт-Арту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2008.Т.2.С.555.

[58]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 СПб.1908.Ч.1.С.150.

[59] фон Шварц А.Влияние борьбы за Порт-Артур на устройство сухопутных крепостей.//ИЖ.1907.№1.С.35.

[60] Подгурский Н.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б осаде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7. №3.С.217.

[61] фон Шварц А.Влияние борьбы за Порт-Артур...//ИЖ.1907.№1.С.47.

[62] Кефели Я.И.Взрыв и гибель «Хатузе».//ВБ.Париж.1953.№4.С.15-16.

[6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3.Кн.2.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до морского боя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С.36-37.

[64]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09. Т.1.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С.163-165 ; Семенов В. [И.] 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127.

[65]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08.Ч.1.С.187.

[66]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Порт-Арту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2008.Т.2.С.560.

[67]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Порт-Арту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2008.Т.2.С.560.

[68]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09.Т.1.Вое 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С.160 ; 168-169.

[6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 ма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СПб.1908.Т.1.С.55.

19 库罗帕特金出任总司令、朝鲜失守

在马卡罗夫悲剧性死亡前，俄国陆军部队的指挥权发生了变动。1904年2月21日（俄历2月8日），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出任满洲集团军总司令。25日，沙皇向其颁发嘉奖诏书，历陈其自1898年担任陆军大臣以后领导陆军部取得的各项成就，同时授予他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钻石勋章。沙皇在诏书中指出："您的功业尚未圆满。号召英勇的部队保卫俄罗斯的荣誉与尊严及其在远东主权的时刻即将来临。出于对您卓越军事天赋、战略修养及丰富战斗经验的认可，朕属意将当前在满洲对抗日军的陆军交由您全权指挥，故解除您陆军大臣之职。"[1]

尼古拉二世的选择几乎无可指摘，这是一位英勇的军官，在远征突厥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时期、在俄土战争中声名鹊起；在穿越巴尔干期间，他成了斯科别列夫（М. Д. Скобелев）的参谋长。后者声望惠及了他。他关爱士兵，巧妙而明显，因此许多人喜欢他。[2]正如1897年俄国武官评价的那样，库罗帕特金"极为聪敏、野心勃勃，他的名声很好，梦想着自己能与苏沃洛夫和斯科别列夫齐名，为此他竭尽全力"[3]。陆军军官认为他出类拔萃，他的一切都是依靠个人才能取得的。马丁诺夫（Е. И. Мартынов）将军指出："在担任陆军大臣期间，库罗帕特金展现出来的军人作风、对军官和士兵的关怀进一步提升了他在军队中的知名度。"[4]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部队爱戴并且信任库罗帕特金。显然，邓尼金是正确的，他断言："应当承认，选择库罗帕特金不仅是君主的过失，也是全俄罗斯的过失。"[5]1904年2月28日，在调令下达一星期后，伴随着掌声和"乌拉"的欢呼声，库罗帕特金离开了圣彼得堡。首都各界热烈欢送，仿佛他已经赢得了胜利。[6]3月15日，将军抵达辽阳。最初，他对当地的局面颇为满意。4月10日在向维特汇报时，库罗帕特金表示："在熟悉当地各项事务的同时，遍访陆军部队。物资不错，颇为充足，当然还远远不够。但是，军队的状态已经相当不错了。日本人正在拖延，尚未采取果决的行动，我们正好可以抓住机会增强实力、积极备战。东清铁路进展顺利，军用列车在南部支线的日通过量很快就能达到7对，然后9对，然后12对。铁路工程扎实稳固。"[7]

与此同时，这位陆军司令几乎立即与远东总督——帝国在远东名义上的海、陆两军总司令对立。这种矛盾是沙皇任命库罗帕特金的必然结果。2月17日（俄历2月4日），尼古拉二世致电阿列克塞耶夫："我认为，任命步兵上将库罗帕特金将军为陆军司令行使统领陆军之权，任命海军上将马卡罗夫为舰队司令行使统领海军之权，对您大有裨益。"[8]3月9日，沙皇在诏书中做出如下指示："在遵循总督总体指示的前提下，您可以自行确定军事行动方针。"[9]在作战的基本原则方面，库罗帕特金与阿列克塞耶夫持有不同观点，两权并立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库罗帕特金认为，在增援部队抵达前必须坚持被动防御。与之相反，阿列克塞耶夫要求满洲部队积极行动，吸引并牵制日本陆军，阻止他们跨过鸭绿江、进犯旅顺港。

俄国骑兵部队在朝鲜的行动收效甚微。在越过鸭绿江后，俄国骑兵遭遇了朝鲜士兵的强烈抵抗，同时他们未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10]此外，朝鲜百姓经常替日本人做事。[11]兵力稀少并且时常撤退，严重地影响了那些本就摇摆不定的朝鲜人对俄国的信心。[12]1904年2月和3月，在朝鲜活动的整个骑兵旅竟然无法确定前方究竟是哪支日本部队及其兵力状况，因此无法向参谋部提供准确的情报。[13]2月21日，日本步兵中队占领平壤。27日，在部分市民的协助下，日军掌控该市。[14]随后，日本骑兵中队抵达该市，俄国司令部对此竟然一无所知。[15]

3月底，冰雪消融，坚硬的冻土化为一地泥泞，在那里没有公路，河流泛滥。[16]米申科的骑兵部队——2000柄马刀和6门火炮——仅与日本人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在此过程中，敌军损失极少，仅有个别几人毙命、数人负伤。[17]黑木男爵的第一军（3.5万兵力、128门火炮）盘踞朝鲜半岛。事实上，米申科的部队在朝鲜毫无用武之地，最终被调离鸭绿江。与此同时，阿列克塞耶夫与库罗帕特金之间的争端以采取姑息方案告终。

为了维持界江鸭绿江附近的骑兵屏障，抽调陆军中将扎苏里奇（М. И. Засулич）的"东满"支队（2.5万兵力、78门火炮）在此防守。大多数士兵刚刚应征入伍，对日本人缺乏了解。西伯利亚步枪手是个例外，他们服役已久且在1900年接触过日本人。他们对敌人的素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九连城区域，俄军开始修筑防御阵地。鸭绿江右岸地势高耸，左岸低矮，黏土层近2米厚。战斗来临前，只来得及构筑炮兵掩体和带胸墙的步兵掩体。在部队挖掘战壕的同时，新兵也在接受训练。3

月31日，米申科仓促返回。此时，江上开始出现流冰，部队的渡江日期推迟到了4月2日。次日，日本人进驻鸭绿江另一侧的朝鲜城市。实际上，俄国人未收到任何消息，无论是朝鲜人还是中国人都不能为他们提供可靠的情报。此外，对敌方的偷袭也未见成效。此时，敌人留出的准备时间基本耗尽。[18]

部队躲入挖好的战壕，火炮掩体准备就绪，同时在后方的山丘底部搭起了帐篷营地。此时，对岸的侦察队已经完全摸清了俄军的炮台位置，因此无须谈论隐蔽问题。[19]日方的防御阵地极为坚固，一处接一处的丘陵，丘陵前方是一处宽约2千米的开阔沙地，还有一条宽约100米而难以穿越的河流。在日本人眼中，与俄国人的首次交锋意义重大，首战告捷将提振士气，表明日本人能够战胜新的敌人。[20]扎苏里奇严格执行避免与敌军发生严重冲突、制止敌军前进的命令。他向下属解释称，日后的战斗用不上预备役士兵，因此他打算“谨慎作战”[21]。扎苏里奇将手中的兵力化整为零，使其在鸭绿江沿岸150俄里长的阵线上分散驻扎、观察敌情。[22]当然了，他的兵力不足以覆盖鸭绿江整个流域。

由卡什塔林斯基（Н. А. Кашталинский）少将领导的俄国前卫部队驻守鸭绿江沿岸前线，阵线长度为38～40千米；扎苏里奇率领主力部队驻守在遥远的后方。结果，日军以4万兵力配以大量火炮（20门120毫米克虏伯榴弹炮和72门野战炮）打压俄军的6000兵力和30门火炮。4月30日上午，日军开始全面渡江。在日军3个师团的主攻方向上，俄军仅有2个连与之对抗。与俄方的2个炮兵连对抗的攻方完全占据炮战优势。很快，攻方主导战局。日军炮轰暴露在开阔阵地上的俄军炮兵掩体。这个过程不过短短几分钟。当俄军试图将火炮转移到备用阵地时，无论是炮兵还是马匹都被炸死了。日军步兵强渡鸭绿江，袭击俄国步枪兵。在此过程中，日军的损失微不足道——死伤不足300人。与此同时，日军在距离九连城8俄里左右的河流上搭起了一座木制浮桥，两个步兵联队借桥渡河。他们在俄军阵地附近实施侦察。后来，日军又搭起了4座浮桥。虽然俄国炮兵试图阻止日军搭桥，但未能如愿。

5月1日清晨，黑木为桢彻底包围了九连城，进而发起攻势。火拼异常激烈，防御部队累计射出了80 万颗子弹，每挺机枪平均发射4万颗子弹。在扫荡所有物资后，西伯利亚步枪兵被迫撤退。掩护他们撤退的是处境极为艰难的炮兵连和机枪队。步枪兵不得不在炮火中突围而出。炮兵和机枪手损失惨重。俄军残部在“上帝保佑沙皇”的军乐声中发动了刺

刀战，但日军拒不迎战，在包围他们后开枪扫射。旅长和校官战死后负责组织进攻的神甫负伤，32名军乐师死伤16人。[23]扎苏里奇的部队损失63名军官、2324名士兵以及22门火炮、8挺机枪。日军炮兵损失为零，有生力量累计死亡率不足俄军的2/5——38名军官、938名士兵。[24]

4月20日（俄历4月2日），库罗帕特金在日记中写道：“没有乘胜追击，这是日本人的一大失误。否则，很可能彻底击垮我们的部队。”[25]似乎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4月28日，将军致信陆军大臣：“日本人在鸭绿江附近行动起来了，我愉快地期待着他们进入满洲，甚至愿意为他们搭建一座‘金桥’，只是希望他们谁也回不去故乡。”[26]然而，陆军首战失利，这极大地振奋了日军的士气。战后，黑木为桢在报告中指出：“亲王和其他军官大受鼓舞，部队士气大振。”[27]这场战役彻底颠覆了日本人对俄国陆军的印象，俄军的表现令人唏嘘。[28]

[1]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Война с Японией.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с 26-го января по 18 февраля.//ВС. 1904. №3. С. 287.

[2] В.А.［пушкин］Куропаткин...С. 37.

[3] C. van Dyke，*Russian Imperial Military Doctrine and Education*，*1832-1914*. New York：Praeger，1990，p. 116.

[4] Мартынов Е.И. Из печального опыта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СПб. 1906. С. 15.

[5] Деникин А.И. Путь русского офицера. М.1990. С. 110.

[6] Рерберг Ф.П.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тайны великих побед и необъяснимых поражений. Записки участника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члена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описанию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6-1909 гг. Мадрид. 1967. С. 79.

[7] Переписка С.Ю. Витте и А.Н. Куропаткина в 1904-1905 гг.//КА. М.-Л. 1927. Т.6（19）. С. 66.

[8]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СПб.1910. Т.2. Ч.1. От начала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до боя под Вафаньгоу 1 июня. С. 29.

[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СПб.1910. Т.2. Ч.1. От начала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до боя под Вафаньгоу 1 июня. С. 29.

[10] Агапеев В. Разведка летучего отряда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2000 верст.//ВС.

1908. №10. С. 154.

[11] Гамильтон Я. Ук.соч. СПб.1906. Т.1. С. 65.

[1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СПб.1910. Т.2.Ч.1. От начала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до боя под Вафаньгоу 1 июня. С. 68.

[13] Винекен А. Японская кавалерия в минувшую кампанию 1904-1905 гг.//ВРК. 1910. №1. С. 12.

[14]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The Russo-Japanese War*，p. 8.

[1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 СПб.1910. Т.2. Ч.1. От начала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до боя под Вафаньгоу 1 июня. С. 75.

[16] Линда К. Тюренчен（Операции на Ялу в апреле 1904 г.）. Вильна.1908. С. 3-4.

[17] Матковский А. Конница 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ую войну.//ВС. 1911. №2. С. 30-33.

[18] Цабель С.А. Полевые позиции，укрепленные в 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и планы）.//ИЖ. 1907. №11-12. С. 1521-1522；Краснов П.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осточный отряд на реке Ялу. Бой под Тюренченом. СПб.1911. С. 6-11.

[19] Ше-ин М. Пролог к Тюренченскому бою（Из жизни орудийной батареи 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ую войну）.//ИВ. 1904. Том 97. Вып.7. С. 150-151.

[20] Гамильтон Я. Ук.соч. СПб.1906. Т.1. С. 57；67；80.

[21] Линда К. Тюренчен... Приложение №5. Выдержки из рапорта генерал-лейтенанта Засулича командующему Манчжурской армией от 13 мая 1904 г. №120. С. 53.

[22] Комаров. Бой под Тюренченом и Вафангоу.//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 СПб. 1906. Ч.1. С. 30.

[23] Комаров. Бой под Тюренченом и Вафангоу.//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 СПб. 1906. Ч.1. С. 32；Гамильтон Я. Ук.соч. СПб.1906. Т.1. С.72；83；97；101；Линда К. Тюренчен... С.13.；Краснов П. Ук.соч. С. 30-33；37；54；Сражение под Тюренченом 18-го апреля 1904 года（По официальным источникам）.//ВС. 1906. №4. С.39-47.

[24] “Losses at the batlle of Ya-lu，” *The Russo-Japanese War*，Complied by the General Staff，War Office. London，1906，Part 1，Appendix C，p.13a.

[25] Дневник А. Н. Куропаткина (31 марта - 21 ноября 1904 г.) .//КА. М.1935. Т.1 (68) . С. 77.

[2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 Т.2. Ч.1. От начала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до боя под Вафаньгоу 1 июня. С. 138.

[27] Линда К. Тюренчен…Приложение №4. Донесение генерала Куроки , 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1-й армией , от 1 мая 1904 г. С. 50.

[28] Рябинин А.А. На войне в 1904-1905 гг…С. 7.

20 关东州和旅顺港战役的开端、日军夺得制海权

日本军部在得知马卡罗夫逝世的消息后，决定着手登陆辽东半岛。九连城大捷——与欧洲军队的首次较量提振了日军获胜的信心。按计划，从广岛向辽东转运陆军大将奥保巩的第二军需要动用80艘运输舰。在此过程中，四五艘运输舰结为一组在军舰的掩护下前进。[1]1904年5月3日，日本海军大将再次试图使用运输舰封锁旅顺港出口。这次动用了10艘轮船，但是依旧未能成功。[2]尽管如此，海上航行仍在继续。5月6日，奥保巩的部队开始登陆貔子窝，[3]此地距离大连60千米。33艘搭载着陆战队的运输舰和掩护它们的军舰在靠岸前夕已被俄军的瞭望哨发现，但俄国舰队未采取任何措施拦截日本船队。[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库罗帕特金既未收到与所发生事件相关的详细信息，也未收到日军登陆的情报。直至5月12日，在确认日军登陆后，库罗帕特金甚至将其视作佯攻。[5]13日，日军3个师团携火炮完成登陆。此次登陆意在确保日本舰队的海上航行更为安全稳妥，在漫长的白天一举占领并控制大连及其现有港口。[6]

日本陆军渴望战斗，战士们梦想着为当年被迫修订《马关条约》报仇雪恨。某位日本军官写道：“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等待洗刷屈辱的时机！当不可战胜的帝国陆军再次登陆这片土地时……沉眠地下的数千英灵向到来的同志们致意，他们的英魂似乎无法在这片被撕裂的土地上寻求安宁。”[7]摆在奥保巩面前的任务是切断旅顺港与辽阳之间的铁路联系。几天后，他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项任务。5月16日，他统率的16个大队的先遣部队遭遇3支东西伯利亚步枪兵团，结果迫使对方向辽东半岛的门户——金州地峡方向撤退。[8]随后，他们折返俄国陆军满洲集团军后方，第二军也向此地进发。

金州地峡与旅顺港相距约60俄里，与大连相距约20俄里。地峡宽约3俄里，每侧浅滩宽约2俄里。退潮时，浅滩范围扩大2倍——4～8俄里。在占据优势高地的俄军阵地前方是被3.5俄里城墙所包围的金州城。[9]俄军阵地位于向北倾斜的缓坡与向南倾斜的陡坡的坡顶交会处（金州南山）。在坡顶处可清楚地看到长约5俄里的山谷，2.5万人口的城市是射击的唯一障碍。此处防御阵地方方正正，设有四个大门——南门、北

门、西门和东门。[10]俄国在地峡的防御工事竣工于1900年，由于养护不当已经衰败，[11]弹药库进水，沟渠堵塞，城墙倒塌。工程师冯施瓦茨（А.В.фон Шварц）大尉在递交给远东总督的报告中指出："关东的钥匙已经生锈了，大门已经完全敞开了。"[12]

尽管库罗帕特金在造访远东期间曾下令要求确保防御工事完好无损、长期可用，但是由于缺乏资金，事情就变成了这样。1903年，旨在实现该目标的拨款由计划的1.9万卢布降至5000卢布。[13]因此，在战争爆发前，战壕和炮台都荒废了，其中仅有两处掩体上面架着两根杆子、撒了些土作为掩护。[14]在前往旅顺港的途中，海军上将马卡罗夫在此停留时强调必须加强地峡防御。[15]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地峡防御工程才再次动工。[16]在日本陆战队登陆前，工程无法竣工。

开工时间恰逢寒冬腊月，寒风冷雪浇灭了当地居民外出劳动的意愿，召集百姓参与挖掘工程十分困难，他们纷纷逃离辽东。[17]最初，每日只能召集50～60人参加施工，此外工人还消极怠工。[18]因此，使用中国劳力无法解决问题。施工条件极度恶劣，铁锹挖不动土，洋镐数量不足。[19]在极短的时间内，东西伯利亚第五军指挥员特列季亚科夫（Н.А.Третьяков）上校组织完成了堑壕挖掘、铁丝网架设工程，并且在多处埋了地雷。在施工过程中征用了近5000名中国苦力。[20]与此同时，饮用水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地峡饮用水稀少。在一个半月里已成功找到水源并且挖掘了5口水井——足以保障12000人的饮水需求。[21]最后，在极短的期限内，该军收到8万卢布的资金，但是只来得及使用6.3万卢布。[22]

炮兵装备相对较好：4门6英寸口径的火炮、4门6英寸口径迫击炮，以及从清政府手中缴获的87毫米口径火炮、俄国速射炮和活塞炮共计14门。[23]从清政府手中缴获的火炮是1900年的战利品，这些火炮产自德国，尽管有些过时，但是威力颇大。问题在于适用此种火炮的炮弹储备明显不足，每门火炮仅储备了40颗炮弹。此外，还在阵地上部署了10挺机枪。斯捷谢利将军调派东西伯利亚第五军步枪兵团——3500名兵力赶赴金州城和地峡执行防御任务。由于金州城城墙敦厚，被野战炮击毁的可能性极低。面对城防工事，日本步兵很可能纠集兵力发起进攻，因此俄军决定将金州城作为前沿阵地。步枪兵团下设11个连，3个驻守城内，其余9个沿着未竣工的防御阵线分散设防。显然，斯捷谢利不打算在这处完美的阵地上耗费大量兵力加强防御。陆战队在后方步步紧逼，

而舰队却无动于衷，故金州危矣。[24]

在司令部看来，步枪兵团不必忧心，因为日本人不可能向整条阵线同时发起进攻，他们必将选出一个攻击目标。出于某种原因，日军不愿“遵循”该计划，他们的行动以非同寻常的刚毅著称。5月25日，在3艘从海湾一侧扫射俄军阵地的炮舰的支援下，奥保巩率军（35000人，配备198门野战炮和48挺机枪）突袭金州阵地。防御工事难以承受舰炮的摧残。此时，俄军阵地共有3800人、57门要塞炮和10挺机枪。他们的后方是傅克（А.В.фон Фок）将军领导的东西伯利亚第四步枪兵师——13700人。后来，海狸号炮舰加入战斗，在一段时间内火力支援俄军防御。[25]日军不计损失，持续进攻。在兵力方面，日军以量取胜——有生力量23：1，火炮2.5：1，这些优势使奥保巩可以放手一搏。[26]

战局激烈。当日的战役以日军战败告终，日军损失惨重。次日，日军再度发起进攻，每个俄军都遭遇了一个日军师团的袭击。在金州战役持续的两天内，日本陆军的用弹量竟然超过了甲午战争。在此过程中，特列季亚科夫既未得到手握4万兵力的斯捷谢利的支援，也未得到在后方指责他是懦夫的傅克的支援，因此被迫撤兵。[27]总而言之，傅克与特列季亚科夫关系淡漠，经此一战，他们的关系已经到了无可缓和的境地。[28]黄昏时分，在阵地剩余志愿兵的掩护下，俄军撤离阵地。在黑暗中，恐慌是不可避免的。不时发出“日本骑兵！”的叫喊声加重了队伍的恐慌情绪。在步枪兵指挥官整顿纪律后，特列季亚科夫命令军乐团演奏进行曲，此后队伍变得井然有序。在防守过程中，西伯利亚步枪兵累计损失450人；在撤退过程中，该军累计损失650人（特列季亚科夫本人认为，该军损失了1500名步枪兵和75名军官）。日军739人死亡，5459人负伤。[29]俄军的阵地炮几乎都未带走，部分火炮已被炸毁，火炮的炮闩几乎都被拆了下来。[30]

日本陆军虽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但胜利地进驻了辽东半岛。尽管明知俄军在撤退途中没有在中间阵地设防的可能，但是日军未乘胜追击。在黑暗中，各支队伍混成一片，其间多次走火、相互射击。[31]俄军如此迅速地放弃了金州，这个消息完全出人意料。5月26日，撤离大连港的命令突然下达。[32]如此看来，谁也不打算捍卫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沦陷是不可避免的，俄国人听之任之。可惜，俄军未能正确地安排撤退事宜。尽管防波堤坝被部分炸毁、起重装置遭到破坏、码头的闸门被海水淹没、部分房屋起火，但是损坏并不严重，日军很快便修复

了。[33]大连的军营和仓库状况良好，火车站和电报局也是如此，此时它们已归日本人所有。[34]

日军急需的铁路和港口维修车间，甚至为大连提供照明用电的发电机都未销毁。日军将部分发电机送到了阵地上，为那里的探照灯供电。[35]匆忙间，俄军弃港而逃，舰船已转移至旅顺港；铁路机车也向那里进发，后来才发现俄国居民还未撤离。结果，近400人（男人、女人和儿童）步行撤退，他们雇佣苦力搬运部分家什、行李。[36]前一天，日本炮舰摧毁了部分铁路，这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夜间，铁路修缮完毕并恢复通行，最后几批撤离者登车。[37]显然，由于铁路通车较晚，日军截获200余节车厢，包括客运车厢、货运车厢。在撤退途中，俄国部队在铁路桥上制造了多起爆炸。[38]

日军占领城市和港口后，乃木希典大将率领第三军在此登陆，野津道贯大将率领第四军登陆大孤山。日本第一军、第二军和第四军奉命对抗俄国驻中国东北的兵力，第三军奉命攻占旅顺港。1894年，乃木大将曾经攻占旅顺；现在，他收到指示——迅速突击拿下此地，而后增援主力部队。此时，要塞防御成了关乎战争结局的首要因素。5月10日，库罗帕特金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应当尽早调集兵力，然后全力前进。在秋天到来前，决定性的战役不会爆发。同时，应当确保旅顺港拥有完善的防御工事及满足16个月所需的物资储备。"[39]

5月27日，维特捷夫特召开海军将领会议。会上通过决议：留守海港，等待恰当时机突围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40]如何确定这个时机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此时，舰队司令得到承诺：很快，要塞就将获得陆军的支援，基地的危机也将随之解除。[41]金州和大连的接连失守引发了总督对旅顺港和舰队命运的担忧。阿列克塞耶夫认为，要塞充其量只能支持两三个月。6月4日，总督致电库罗帕特金，命令他采取最果决的措施吸引敌军兵力，让日军远离旅顺港，然而库罗帕特金却不愿采取积极的行动。库罗帕特金的行为很好理解。当时，日本拥有三支陆军——黑木为桢的第一军、奥保巩的第二军、野津道贯的第四军，共计11.5万兵力；而满洲集团军兵力不足9万。俄国陆军阵线过长，其兵力零散地分布在140俄里的山区沿线阵地和200俄里辽阳至瓦房店的铁道线附近，此外再无后备兵力。向前推进只能使陆军部队从瓦房店站出发沿铁道线继续前进150俄里。[42]

库罗帕特金并未掌握多少关于日军的可靠情报。除了一些未经证实

的传言和自相矛盾的情报外，大批骑兵——7个哥萨克军几乎未向他提供任何信息。[43]远东总督和陆军司令摇摆不定、意见不一，结果，面对威胁谁也找不出相应的破解之法。[44]6月6日，为了搭救旅顺港，总督阿列克塞耶夫命令库罗帕特金即刻转守为攻。当日，满洲集团军司令命令西伯利亚陆军第一军司令施塔克尔贝格（Г.К.фон Штакельберг）在瓦房沟附近集结兵力，并于6月10日前集结完毕。6月7日，施塔克尔贝格收到司令冗长的指令——进攻的终极目标就是夺回金州阵地。实际上，对于在此阶段发动进攻，库罗帕特金持反对意见，因此他采取了治标之道——命令进攻部队保存实力，打压敌军弱势兵力，避免与敌军优势兵力作战。[45]

施塔克尔贝格并未掌握关于日军的任何情况，俄国部队盲目冒进。上至将军本人、参谋部军官，下至普通士兵都信心满满地认为日军经不住打击，很快就会向沿岸地区撤退。[46]在既没有地图也不了解地形的情况下，西伯利亚陆军第一军频频出错。随军的法国记者描述道："军舰就这样启航了，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了解这片未知海域的舵手。这哪是航海啊！"[47]起初，军团的先锋部队萨姆索诺夫（А.В.Самсонов）少将统帅的骑兵队击退了敌军的骑兵侦察分队。此时，俄国骑兵队状态不佳，日夜兼程和粮食短缺令他们疲惫不堪。此外，萨姆索诺夫无从获取有效的情报。6月7日，他的哥萨克部队已与日军结下了梁子。此后，日军向先锋部队不断施压。[48]

6月14日，在距离旅顺港135千米、距离辽阳225千米的瓦房沟附近5千米处的得利寺村，施塔克尔贝格的部队（26个营、19支哥萨克部队、96门火炮）遭遇了奥保巩的第二军（48个大队、216门火炮）。[49]这场以铁路为中心、发生在距离前线12千米处的战役完全是由日军发起的。起初，三路日军发起进攻，一路深入俄军右翼迂回包抄。[50]俄军阵地准备不足的缺点顿时暴露。俄国部队仅有几天时间（5月27日至6月1日）加强防御。无论是劳动力还是洋镐等挖掘工具都颇为匮乏。竣工的步兵掩体仅有半数为立射掩体，其余均为跪射掩体。[51]

在多石土质地带，无论如何，战壕的挖掘进度都不会太快。炮台位于高地上方，炮兵阵地开阔空旷，炮兵掩体深度欠佳，并且缺少炮兵撤退的坡道。依据司令的命令，为了保存实力，俄军在战斗中仅投入部分兵力，用以对抗日军的优势兵力。在山地炮方面，日军立即占据了绝对优势（俄方阵地仅有4门山地炮——1901年从清政府处缴获的战利

品），日本炮台的隐蔽也堪称完美。部署在明处的俄国炮台很快就被敌人的炮火淹没了。[52]日军的火力格外密集。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俄国炮兵不得不浪费时间试探敌军的位置。在这场决斗中，俄军的结局早已注定。[53]

在这场战争中，日军通常采用防御行动。对进攻部队的炮火支援通常在1千米处中断，以防己方步兵受到“友军炮火”的伤害。在扫射结束前，日军经常停顿片刻，而后向进攻者发动猛烈的炮火袭击，同时己方步兵也发动反攻。[54]在瓦房沟战役中，他们正是如此。6月15日上午，施塔克尔贝格向日军发起反攻，进攻一直持续到日本包抄部队出现前，后者的出现对铁路构成了断交威胁。[55]先前骑兵侦察队发回了敌军正在逼近的情报，但是军团参谋部未加理会。[56]从骑兵报告敌情到派兵增援，其间过了近四个半小时。[57]

此时，日军已完成防御工事的加固，并且挖好了壕沟。在准备就绪的前线阵地上，日军等来了俄国步兵缺乏准备的攻击。此后，日军发起进攻。临近中午，施塔克尔贝格下令撤退。在这场战役中，俄军损失124名军官、死伤3348名士兵，日军损失兵力1163人。在沿着唯一的坡道撤退时，一门火炮被击毁了，这挡住了其他人的退路。俄军在战场上留下了17门火炮。撤退过程极为糟糕。在黑暗中，步兵部队误将哥萨克侦察队当作敌军并且发起攻击。结果，在朝自己人开火的同时，也造成了一时难以平复的恐慌。幸运的是，日军并未追击。[58]

美国现代历史学者对此做出了恰当的评述：“当俄国人就大战略争论不休时，日本人有条不紊地抓住了主动权，并且毫不犹豫、毫不动摇地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这正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59]在瓦房沟战役后，日军又对俄军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将他们赶出了中国东北的南部山区。无论在哪里，日军几乎都采用了同样的战术——前线猛攻配合大量兵力的迂回包抄；而俄军却不知变通，在防御阵线上始终均分兵力，将主动权让给敌人。因此，日军能够在主攻方向上集结兵力。俄军的反攻就像在库尔斯克的演习中一样，从不借助地形优势，而是一味地使用密集的作战队形。结果，他们不得不撤退。[60]

在这些冲突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当属7月23～24日爆发的大石桥战役。库罗帕特金认为，尽管此处阵地防御完备，但是在此进行决战对俄军不利。[61]在山上的优势高地建有多面堡、多层掩体、机枪和火炮阵地，在后方有专用通道和桥梁。[62]控制大石桥意味着掌控通向营口

的铁路交通，营口是可与旅顺港保持直接联系的唯一港口，此时这种联系岌岌可危。作战双方都很坚毅，战士的表现无懈可击，俄军步兵顽强地抵抗日军的炮火，甚至发动了刺刀战。日军虽被击退，但俄军被迫撤退。在灼人的烈日下，撤退异常艰辛。与此同时，他们时常面临缺水的问题。在士兵中间首次爆发了愤怒的情绪："无论我们如何坚持，他们还是会下令撤退。"[63]

在大石桥战役中，双方损失相对较小，俄军累计折损44名军官、1006名士兵，日军损失66名军官和1123名士兵。[64]当然了，双方的死伤人数无法体现出这场战役的意义。撤退造成的诸多后果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营口失守后，东乡平八郎宣布自6月26日起彻底封锁通往旅顺港的海上要道。[65]尽管如此，由于在中国东北山区陆军决战尚未爆发，日本的战前行动计划未能完全实现。此时，俄军司令正在加固辽阳的防御工事，并且计划依靠防御拖垮大山岩，使日军精疲力竭，而后俄军转入反攻。

6月16日，库罗帕特金指出："在与旅顺港合作前，如果日军决定调动全部兵力进攻满洲集团军，以便将我们赶出南满，那么我将乐见其成。我们将进入山谷，在那里笨拙的大车将使我们受益，在山中部署的火炮也不再是我们沉重的负累，那些我们无法建造的大型车辆也没了用处。在山谷中，我们的部队能够更加自由地呼吸，我们的骑兵也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日军的通信线也将延长。"[66]俄国司令准确地描述了在平原上展开行动的全部优势，剩下的事情就是要如何利用它们了。

在此情况下，日本的成败就取决于乃木希典能否在两国陆军爆发决定性战役前占领旅顺港了。此外，日军还应解决俄国舰队威胁日本海上交通线的问题，这是东乡平八郎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距离旅顺城市20千米的青山和16千米的狼山就是所谓的"山隘阵地"——远离城市的要冲。在战争爆发前，由于经济原因未在此处设防。在傅克将军的倡议下，1904年4月，俄国对"山隘阵地"进行了勘察。金州失守和大连撤军给部队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因为士兵们看到了防御工事的修筑过程并且坚信它们是坚不可摧的。

在要塞修筑坚固可靠的防御工事需要一定时间。6月14日，俄军司令部决定在青山设防，于是开始在阵地上修筑防御工事，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因为既没有掩体，也没有协助炮兵连直达优势阵地的道路。在日军发动攻击前，工程持续推进。7月26～28日，在"山隘阵地"发生激

战，47名军官和2066名士兵战死。7月28日黎明，俄军撤退，在阵地上留下了5门被击毁的火炮。经过48小时的鏖战，部队撤入狼山。此地几乎未设防，只有几处隐蔽在一人多高的高粱和玉米地里的堡垒和掩体。在这里什么也做不了。7月29日，日军发起进攻。在日军猛烈而高效的攻击下，本就准备不充分的俄军阵地陷入混乱。30日清晨，冒着敌军制造的枪林弹雨，俄国部队开始撤退。日军夺得通往要塞的要冲。在狼山日军便可看到前方俄国的防御工事。[67]

身处乃木希典阵营的英国军事记者认为，倘若俄国人有机会加强要冲的防御，那么旅顺港将变得难以靠近。[68]维特的节约政策抹杀了这种可能。几天后，临时建成、由5个军分别把守的俄军防御阵地全部沦陷（西伯利亚第五军损失惨重）。由于这些阵地没有重兵把守，它们只能拖延要塞被攻占的时间。日军逼近旅顺港要塞外围的防御工事。在此，他们大失所望。要塞的备战水平远高于侦察队所报告的水平。在东西伯利亚第七步枪兵师师长孔德拉坚科（Р.И.Кондратенко）中将的全力推进下，要塞的防御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依靠无准备的突袭猛攻，则绝无制胜的可能。[69]在要塞的陆地防线上，部署396门火炮和48挺机枪，后备移动式火炮60门。[70]

俄国巡洋舰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舰队的行动严重地影响了日军的围困计划，尽管最初它们的行动并未取特别的成就。5月15日，分舰队遭受巨大损失。耶森搭乘勇士号巡洋舰出海侦察，该舰在大雾中迷失了方向，并且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西南方向20海里处触礁。直到6月15日，该舰才成功脱险返回港口，后来它不再参加任何战斗。[71]此后，海军上将别佐布拉佐夫短期接管了巡洋舰队的指挥权。分舰队频繁出海，这对日本的航运构成了严重威胁。例如，1904年6月12日至19日，在远征朝鲜海峡时，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舰队击沉了2艘日本运输舰（其上运载着士兵和军用物资），迫使1艘运输舰触礁，截获并扣押了1艘英国轮船。此外，随着被击沉的运输舰一同葬身海底的还有一批本应被送到乃木希典手中的重型火炮——11英寸（280毫米）口径的攻城榴弹炮。就这样，乃木希典也失去了在几个月内迅速摧毁俄国长期防御工事的机会。[72]此后，日本司令部决定，为军用物资运输舰配备护航舰。[73]

尽管如此，日本的海上运输安全依然无法得到保障。7月17日至8月1日，俄国巡洋舰队再次出海。俄舰穿越津轻海峡进入太平洋，而后抵达东京湾海域。途中，舰队击沉了几艘日本纵帆船，扣押了2艘英国货

船和1艘德国货船并且上船搜查军事违禁品。当俄国舰队遇到近海航行的京都丸轮船时，并未将其击沉，因为船上的50余名乘客多为女性。8月初，俄国巡洋舰队累计击沉敌军的7艘轮船和4艘帆船，扣押并俘虏英国、德国轮船各一艘。[74]在积极出动期间，被巡洋舰队击沉的运输舰的总载重能力高达20000吨，另有10艘战利舰被运至符拉迪沃斯托克，载重量合计16000吨。[75]

俄国巡洋舰队的行动对日本的外贸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业界认为它不再安全。为了满足军事需要，日本大肆动员运输舰队，因此中立船队承担起了90%的贸易运输工作。[76]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物资尤为重要。为了实现海上拦截，俄国政府曾组织远程封锁。志愿舰队的2艘轮船彼得堡号和斯摩棱斯克号被改装成辅助巡洋舰，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由于海峡禁止军舰通航，船上的武器装备被隐藏了起来。它们驶入印度洋，在那里逗留了3个月，累计拦截并搜查了19艘轮船。后来，来自波罗的海的4艘辅助巡洋舰——顿河号、乌拉尔号、捷列克号和库班号在大西洋加入了它们的战斗行列。从整体上看，俄国辅助巡洋舰的收获欠佳。在中立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抗议下，俄国被迫终止了对日本远程封锁。巡洋舰队累计搜查50艘轮船，英国轮船居多，其中5艘被击沉、4艘被扣押，其余的均被放行。[77]

无论如何，俄国巡洋舰战争对中国东北前线的进程，特别是旅顺港的围困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密集围攻开始前，要塞人口总计47016人，其中战斗人员34503人、非战斗人员4189人、伤员病号2324人、关东州舰队舰员3500人以及由当地居民和港口工人构成的13个社区的平民2500人。[78]要塞现役火炮646门、机枪62挺。乃木希典的第三军拥有兵力8万余人、火炮474门。此时，日军士气高涨。在审视中国东北时局后，乃木将军胜券在握，决定即刻开战，无须等待新的攻城炮的到来。[79]攻占金州令日军备受鼓舞。为了见证凯旋的时刻，日本议员和外国代表搭乘满洲丸号轮船抵达战场。[80]8月7日，日军开始扫射俄国前线阵地，而后对大孤山和小孤山高地发动攻击。在不计损失的强攻下，8月9日夜，日军最终占领高地。[81]在进攻过程中，日军损失8000余人，部队精疲力竭，需要喘息。[82]

在大孤山和小孤山被攻占后，旅顺港的港内锚地进入了日军远程炮的射击范围。尽管港口被群山包围，但是在针对水域的连贯射击面前，军舰在基地停泊将变得毫无意义。[83]1904年5月17日，在乘坐末班火车

离开旅顺港前，阿列克塞耶夫下令调遣舰员和舰炮保卫要塞的陆防阵线。结果，装甲舰被拆除了大量6英寸口径的舰炮，舰员人数也遭到了削减。在经历了三个月的停航后，舰船性能大打折扣。为了协同作业，俄国舰队只能将航速保持在14节左右，此时日本舰队的航速已达18.3节。由此可知，日本舰队在航速方面更胜一筹。[84]5月底，斯捷谢利邀请维特捷夫特登上高地。在那里，斯捷谢利指出：一旦高地失守，内停泊港将无法再为俄国舰船提供可靠的容身之地了。此后，舰队司令率领参谋部的军官和军舰指挥官重登此山，同时提出要求，希望舰炮能够阻挠日军的进攻。[85]

6月22日，总督告知维特捷夫特，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此时日本在海上只有3艘装甲战列舰，其余的不是被击沉了，就是在码头维修。除此之外，据他所知，日本已损失了22艘鱼雷艇和10艘加强雷击舰，并且多艘巡洋舰受损。因此，阿列克塞耶夫认为，现在正是出海突围、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绝佳时机。[86]23日，维特捷夫特率舰队驶出旅顺港并且遇到了日本舰队——4艘装甲舰和4艘装甲巡洋舰，据传正在维修的富士号和晓号及几乎沉没的敷岛号战列舰赫然在列。鉴于日舰在航速上占据优势，维特捷夫特决定立即返航。在旅顺港沿岸水域，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触雷。夜间，被迫在白狼湾停泊的战列舰击退了日本鱼雷艇的进攻。次日清晨，战列舰被驳船拖回港内锚地。原本用于维修列特维赞号的沉箱现在被移至塞瓦斯托波尔号附近，维修时间预计不少于4个星期。此前，俄国舰队并无出海计划。此次失利招致总督的非难，他谴责维特捷夫特未遵循突围指令。[87]

7月3日，布拉科夫中尉号驱逐舰突围进入被围困的要塞。他传达了阿列克塞耶夫的最新指令："谨记，只要舰队能够安全地停留在旅顺港内，那么就按兵不动。否则，请提前出海，如果可能的话，不要参加战斗，直接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88]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这都是一条奇怪的指令。即便如此，舰队司令依然试图执行总督的命令。维特捷夫特不相信舰队能够突围成功，因为他了解舰队的实力。他担心敌军的鱼雷艇在对马海峡发动进攻。尽管如此，他依旧打算履行职责。7月5日，维特捷夫特在对阿列克塞耶夫做出回应时指出："我不应承受任何指责。我做事诚实，如实汇报事态进程。至死，我都要努力保持诚实。对于舰船遇险，我问心无愧。上帝终将宽恕我。日后，一切都将真相大白。"[89]

无论如何，离开旅顺港是必然的。8月9日，日本陆军开始使用远程

炮轰击停泊在港内的舰船。尽管敌人未能瞄准这片区域的任何目标，但是依旧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列特维赞号被击中7次，波尔塔瓦号被击中2次。尽管未遭重创，但是等待确实失去了意义。[90]8月10日，皇太子号旗舰发出信号："舰队听令，沙皇谕旨，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91]在舰队司令与舰长会议上，多数将领支持总司令的观点，反对离港。维特捷夫特本人公开表示："预感自己将要死去，无法领导舰队。"[92]他率领6艘装甲战列舰、1艘装甲巡洋舰、2艘一等甲板装甲巡洋舰、1艘二等巡洋舰和8艘舰队驱逐舰驶离旅顺港。据推测，为了协助太平洋舰队突围并且在海上吸引日本舰队的部分火力，符拉迪沃斯托克巡洋舰分舰队即将出海。由于无法与符拉迪沃斯托克取得直接的联系，俄国舰船无法协同作业。执行封锁任务的日本舰队构成是4艘装甲战列舰、4艘装甲巡洋舰、8艘两个等级的巡洋舰和18艘舰队驱逐舰。[93]

舰队的离去为旅顺港的守军带来了喜悦和希望——他们认为，在波罗的海增援部队抵达前，作为战斗力量的舰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将得以保全。[94]维特捷夫特的舰队以12～13节的航速前进着。[95]提速是不可能的，离港不久，俄国军舰接连发生故障。皇太子号率先出现操舵装置失灵的问题，列特维赞号随后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这与军舰长期停泊不动有关。在此期间，大部分炮兵也没有机会练习射击，因此他们的训练水平必然有所下降。[96]由于舰员曾被派往陆地防线参加防御，全员回归显然是不现实的，舰员空缺只能依靠在旅顺港停留的舰船船员补齐。[97]出征前，列特维赞号战列舰尚未修理完毕，此前舰体在吃水线下中弹。离开旅顺港时，在战列舰的艏舱中有500吨水，在压载舱中也有500吨水。[98]当然，这一切都对舰队的航速造成了影响。

舰队武装水平也不均衡。根据书面数据，俄国舰队拥有106门6英寸口径的火炮，事实上，其中22门已支援陆防阵线，6门无法使用。日本战舰拥有138门6英寸口径的火炮，而维特捷夫特的舰队实际上仅拥有78门。总体而言，在中型和重型火炮方面，东乡平八郎以182门舰炮力压俄舰的104门舰炮。[99]俄国以15门12英寸口径的舰炮（其中1门架设在塞瓦斯托波尔号上的舰炮无法使用[100]）对战日本16门同口径的舰炮，以8门10英寸口径的舰炮对战日本2门同口径的舰炮。此外，日本舰队还架设了12门8英寸口径的舰炮，俄国舰队没有此类舰炮。[101]由此可见，尽管俄国军舰在中口径舰炮、航速和装甲方面不如敌人，但是在小口径舰炮方面占据优势。俄国舰队在三个半小时内驶出外港。[102]俄国军舰于10：30驶出内港，日本巡逻舰立即发现了这一情况，一个小时

后，两国舰队针锋相对。[103]

日本舰队由4艘装甲战列舰和2艘装甲巡洋舰组成。在发现情况后，东乡立即调派1艘装甲舰、几艘巡洋舰和鱼雷艇增援。战前，俄国战列舰屡次出现操控失灵。12：20，日进号巡洋舰开火，[104]随后日舰投入战斗，俄国的皇太子号和日本的三笠号旗舰吸引了大量火力。这是一场炮手之间的决战，双方各有输赢。战争爆发之初，无论是日本舰队成员还是俄国舰队成员，训练水平基本一致；在军事行动中，他们的水平也同步提升。经过两小时的激战，14：30双方停火散开。16：30，东乡平八郎舰队凭借速度优势赶超维特捷夫特舰队；16：45，双方再次开战，俄国舰队占上风。[105]与敌人的火力相比，俄国舰队的火力毫不逊色。[106]日本旗舰三笠号战列舰中弹22次，受损严重，所有舰炮近乎报废。此外，俄国炮兵还成功击中了晓号和富士号战列舰。[107]此时，日本舰队的弹药储备基本见底，东乡也做好了撤退的准备。

法国观察员、这场战争的研究者对战役的决定性时刻进行了如下描写："在满目疮痍的指挥室中，这位领袖看见了保持阵型不变的俄国舰队正在加强火力，他看见了军舰受损的甲板以及跟随在他后面、受损格外严重的三笠号。他仿佛看见了彻底放弃了撤退想法的海军上将维特捷夫特正在靠近自己，为了挽救战争的命运、捍卫俄国的荣耀，他勇敢地投身战斗，决心与舰队共赴黄泉。海军大将东乡预见到了即将发生的、近在眼前且不可避免的血腥冲突，一部充满鲜血和死亡的悲剧。也许双方都将遇难，但是到了那时，现在正准备从利巴瓦起航的俄国舰队就可以在这片海域自由航行了……他即将下达准备撤退的命令。此时此刻，海军大将东乡突然悲从中来，他意识到自己的舰队已经是强弩之末，然而俄国舰队也同样备受煎熬。"[108]

俄国舰队司令站在舰桥上，拒绝返回指挥室。面对询问，海军上将回应称：自己死在哪里都一样。战役的决定性时刻就这样到来了。18：00，一发12英寸的炮弹击中舰桥。巨大的冲击力将维特捷夫特炸得粉碎，只剩下一条腿。舰队的领航员和信号副官中弹身亡，参谋长和数名军官负伤。5分钟后，皇太子号的指挥室受损，大副和总舵手死亡，舰长和多位高级军官负伤。旗舰彻底失控，开始发生偏转，但是无人发出"旗舰失控"的信号。列特维赞号装甲战列舰挺身而出、扭转局势，它向三笠号发动猛攻，吸引敌舰炮火。[109]

列特维赞号舰长辛斯诺维奇（Э.Н.Щенснович）上校一直期待着能

够亲自摧毁敌人的旗舰。[110]现在，实现这个愿望的机会恰好摆在了他的面前。东乡舰队集中火力攻打该舰。黄海海战的亲历者证实，当时的炮火极为密集：“有时候，列特维赞号连同它的桅杆完全消失在了由水柱、烟幕和浮沫组成的巨型‘穹顶’下。”[111]尽管日舰的重型炮弹未击中列特维赞号，但是在空气中爆炸的弹壳碎片击中了指挥室。辛斯诺维奇负伤，头部伤势较轻，腹部严重受伤。列特维赞号战列舰停止了进攻。后来，没人愿意继续冒险。与此同时，日舰也暂停了对俄国旗舰的炮击。三笠号原地转弯，其他日舰紧随其后。[112]

与此同时，俄国舰队的部分战舰自发地追随本国旗舰，并且避免与皇太子号相撞。俄方阵型大乱，日方立即把握机会采取行动。[113]转弯后，日本舰队再次阻挡俄国舰队向北航行。[114]作为相互配合且步调一致的作战单位，日本舰队的实力远超俄国。这场战役的参与者伊耶尼什（Н.В.Иениш）中尉回忆道：“我们失败的真正原因完全不是物资匮乏或伤亡惨重，而是舰队完全缺乏组织，不是日本人打败了我们，是我们自己害死了自己。”[115]在这场战役中，双方未损失一艘军舰，但是日本人赢得了胜利，俄国舰队被迫撤退。这正是日本海军大将战前设定的目标，但是他的计划未涉及作战的风险。也就是说，一旦战败，他将失去制海权，进而导致战争失败。在俄国军舰出海的前一天晚上，日本人在旅顺港附近埋伏了水雷。东乡计划逼迫维特捷夫特舰队返航，俄国舰队一旦触雷，他将派遣鱼雷艇巩固胜果。[116]

如果说日本司令的计划未能完全实现，那么已经阵亡的俄国舰队司令的计划则满盘皆输。18：05，俄国舰队彻底陷入混乱。皇太子号发出信号：“海军上将向海军少将乌赫托姆斯基（П.П.Ухтомский）大公移交指挥权。”然而身处佩列斯韦特号装甲战列舰的海军少将所读到的信息却是“海军上将移交指挥”，之后便没了下文。经过多次修正后，海军少将乌赫托姆斯基在佩列斯韦特号上发布指令：“跟我走。”由于军舰的桅杆已经被压断，信号装置只能捆绑在舰桥的扶手上，几乎没人注意到它。战列舰“在不同的时刻”纷纷掉头返航，“毫无章程”。海战结束后，由于俄国舰队缺乏统一的指挥系统和可靠的通信渠道，某些舰船的返航目的地是舰长自行决定的。[117]

关于这场海战，日本的官方说法是：“他们的军舰，在队形遭到破坏后似乎失去了明确的目标，开始各行其是。”[118]在这场战役中，日军累计损失170人，[119]没有一艘军舰被击沉，但是能够挑战日本舰队制海

权的俄国主力舰队遭到了灭顶之灾。俄国舰队狼狈逃窜，佩列斯韦特号、胜利号和波尔瓦塔号战列舰在权力号鱼雷艇的护卫下退入旅顺港。部分战列舰和巡洋舰迷失了方向，它们沿着各自的航线航行。8月11日清晨，列特维赞号、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连同帕拉达号巡洋舰、无畏号和机敏号鱼雷艇一同加入了停泊在旅顺港附近的舰队残部。[120]俄国战舰从不同方向驶向旅顺港，船体上留下了许多清晰可见的被敌军炮弹击中的痕迹。[121]

守军军官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上，在经历了一场大战后，我们的舰队返航了。它们的状况惨不忍睹。佩列斯韦特号和列特维赞号受损严重。佩列斯韦特号的一个发动机被摧毁，2门10英寸口径的火炮被击毁，右舷分布着多处弹孔。其余军舰或多或少负了伤，几乎不再适合继续作战了。"[122]尽管俄国军舰返回了自己的基地，但是在那里它们不仅无法得到全面的维修，而且在日本陆军的火力范围内。最终，在旅顺港内停泊了5艘战列舰、1艘装甲巡洋舰和4艘鱼雷艇，其余军舰则驶入了中立港并且遭到羁押。只有诺维克号轻型巡洋舰试图突围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它从太平洋方向绕过了日本诸岛，但是在萨哈林岛南部海岸遭遇了2艘日本巡洋舰，被迫与之交火，结果受损严重，在阿尼瓦湾附近沉没。在途经日本人在旅顺港入口处布置的水雷阵时，俄国军舰未遭遇重大损失。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因受损严重仍在海面漂浮，随后接受了维修。日本鱼雷艇的进攻持续到深夜，但是并未成功。[123]

8月12日，海军上将耶森率领俄罗斯号、留里克号和格罗莫鲍伊号巡洋舰驶离符拉迪沃斯托克，对于此时的旅顺港舰队他们已经无能为力。[124]俄国军舰适合在世界海洋上执行单舰截击任务，而非炮战。它们行动半径大、装甲薄、船舷高、便于海上航行，但是它们也是庞大且便于炮火打击的目标，并且没有掩体。日本的装甲巡洋舰是战前采购的，虽然在体积和续航力方面不如俄国战舰，但是装甲、航速（20～21.5节对18～19.8节）和舰炮的隐蔽性能更佳。[125]8月14日，在朝鲜海峡，俄国舰队遭遇了海军中将上村彦之丞的4艘装甲巡洋舰。经过长时间的激战，在留里克号失事后，俄国舰队被迫逃离。在操舵装置受损后，留里克号失控，最终被日舰击沉。这是战争期间唯一被舰炮摧毁的装甲舰。8月16日，其余战舰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并且终止了针对海上交通线的各种行动。[126]

在行动期间，这支俄国巡洋舰分队累计摧毁了15艘日本船只、2艘

运载军用物资的外国货轮，扣押并占有了5艘货轮。[127]自1904年下半年起，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阵线上，敌人集中力量进行水雷战，特别是在1905年，水雷战格外活跃。和平时期水雷储量不多，它们在旅顺港应用得更广。在扩充军火库方面，双方都需要时间。1904年全年俄方舰队累计部署了326枚水雷，1905年部署了1117枚。日本人也是如此，1904年他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部署了75枚水雷，1905年这项指标增至715枚。[128]尽管俄国舰队屡战屡败，日本舰队几乎完全夺得了制海权，但是与过去一样，它们依旧是日本舰队的威胁，后者对于龟缩在旅顺港里的它们依旧无可奈何。此外，对于东京而言，波罗的海舰队准备增援太平洋第一舰队，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因此，乃木希典大将的第三军再次担负起了加速攻占旅顺要塞的使命。

此前，日军通过发放传单的方式劝降守备部队，同时散播日军辽阳大捷的消息。8月16日，日军以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的名义向驻旅顺港的俄国陆军和海军司令部提交正式提案，提议在日军发动猛攻前进行投降谈判。[129]参谋总长传达了日本天皇的劝降命令。[130]一名日本陆军少佐举着白旗穿越前线，将其送到俄军手中。[131]这位日本军官是乃木希典参谋部的山冈少佐。严格地讲，山冈少佐向斯捷谢利的参谋长列伊斯（B.A.Рейс）上校转交了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日军总司令代表天皇提议允许妇女、儿童、神职人员和外国居民离开要塞。[132]第二封信的作者是乃木和东乡，其中表达了对旅顺港英勇守军的敬意和亲切保证，同时指出要塞必将沦陷——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他们相信这一天即将到来。

在第二封信的结尾处，日军司令直白地威胁道："若我军以武力占领要塞，那么我军将严格履行开明国家的战争法条例。要塞根据提前约定的完整流程投降与屈从武力毫无章法的投降差异巨大。阁下作为军人应当明白，在后一种情况下，在国际法范围内，战胜方不得不使用残酷的手段。"[133]尽管俄国司令部做出答复的最后期限是8月17日上午10点，但是斯捷谢利中将、旅顺港要塞司令斯米尔诺夫、海军上将乌赫托姆斯基几乎立即写信驳回了该提案。8月16日，乃木希典收到回信："交出旅顺港要塞的提议与旅顺港的处境完全不符，无益于捍卫俄国的荣誉和尊严，因此我们没必要进行谈判。"[134]斯捷谢利以指令的形式向守备部队通报了日军的劝降提议和他的答复。[135]在第二封回信中，俄方简洁而礼貌地拒绝了日方所提出的允许妇女、儿童等人离开要塞的提议。司令部担心，告别的场景将对守军产生负面影响。[136]俄国部队继续积极抵

抗日军；因屡次偷袭失利，日军损失惨重。[137]

8月19日上午6点，日军炮轰俄国要塞，随后大举进攻角山。对于日军而言，占领角山意义重大。各种口径的火炮齐聚阵前，炮火格外密集。[138]此地防御工事薄弱，因此退敌能力有限。角山后方的高山（日本史称“二〇三高地”）防御坚固，即使是6英寸口径的火炮也无法对守备部队造成严重的伤害。二〇三高地是控制城市和港口的优势高地，是瓦解俄军防御的关键。[139]在岩崖上修筑防御工事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各处都需要开山劈石。修筑胸墙和掩体所需的土方需要依靠驴、骡拉上山。[140]当日，俄国舰队召开舰长会议。会上通过决议：留守基地，在海防炮的掩护下行动，抽调水兵支援守备部队，以舰炮火力支援要塞防御。[141]

8月20日，日军发起总攻，并于当日占领角山。日军以异常猛烈的炮火摧毁了俄军土木防御工事。这正是对战前节约的“回报”。防守部队死伤约1100人，进攻部队死伤约1600人。阵地上散落着被击毁的武器——2门火炮、4门6英寸口径的野战炮及2门12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142]日本步兵在进攻中毫不惜命，他们用勇气和坚毅弥补了因急于求成导致的战前准备不足。[143]在强攻过程中，先前取胜的日本陆军第六旅团损失兵力2100人，下属的两个联队仅剩448人。[144]经过三天的连续炮击，第三军的弹药储备几近枯竭，这加速了日军的折损。[145]8月23日夜，日军夜袭失败，拒绝出战的第八联队被押回后方接受惩罚。第八联队的士兵被迫接受6～8个小时的操练，不久后该联队被遣散了，部分士兵被迫前往大连充当装卸工人。[146]

强攻于8月24日结束，攻城部队收效甚微但损失惨重，他们被迫由进攻转向包围。[147]据第三军参谋部统计，日军在战斗中死伤14000人。[148]在夏日的阳光下，俄军阵地前尸体堆积如山，弥漫在城市中的臭味让人无法呼吸。[149]在阵地上，尸臭味完全令人无法忍受，即使向日军分发浸透着氨水的毛巾也于事无补。在某些区域，每一个半小时必须轮岗一次。[150]俄国守军损失近3000名兵力。[151]显然，如若没有舰炮（向陆防阵线调派的1门6英寸口径、10门75毫米口径、9门47毫米口径和8门37毫米口径的火炮）和抽调上岸的舰员（21名军官和2246名士兵）的协助，保持防御是不可能的。[152]

围困要塞需要大量的物资和援兵。此时有的、完善的交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乃木的难题，否则要塞的围困计划将难以实现，甚至无

法实现。大连——维特“最欣赏的结晶”——依旧未受到保护。战争开始前，港口刚刚装配一新，日本攻城部队和舰队享受到了它所带来的便利。正如英国记者所指出的那样，攻方“条件优越、优势明显”[153]。从长崎出发的运输舰抵达大连仅需48小时，物资装卸需12小时。货运列车每日两班，早晚各一班。仅需3小时便可抵达攻城军队的物资分配站。[154]乃木的增援部队从大连登陆中国，5小时后他们便出现在了旅顺港附近的战壕中。[155]从要塞返回港口时，列车上搭载着伤员。对于日本而言，大连这座城市已然成了一座大型医院兼后方仓库。轻伤伤员占据着所有未受损的房屋，重伤伤员则被直接送回了日本。18艘医院船在大连—长崎线上往来穿梭。[156]

某位战时在东乡平八郎的舰队停留7个月并且在乃木希典占领大连后造访过那里的英国人指出：“日本人认为，使大连湾变得坚不可摧，这绝非难事。港湾中停泊着许多船舶、炮舰、巡洋舰、辅助巡洋舰、运输舰和医院船，即便如此，港内还有很多空位。”[157]如果没有配套的港口设施，日军便无法装卸11英寸口径、不可拆卸的克虏伯攻城炮。日军拥有24门此口径的迫击炮，其中18门部署在了旅顺港附近。[158]至于重达30吨的280毫米口径的重型迫击炮，若无起重装置和铁路的协助，其装卸和运输几乎无法实现。[159]日本的陆军基地安插在青山与狼山的过渡地带，这是可以躲避俄军侦察且距离围困阵线最近的地方。[160]

日军从大连陆续运来了攻城炮所需的弹药以及修筑阵地设施——掩体、11英寸口径迫击炮的地基等所需的全部物资。[161]按照设计，俄国要塞的防御体系至多只能抵御6英寸口径火炮的进攻，因此它们难以招架这些重型火炮。[162]乃木的第三军获得了修筑攻城炮场和旅顺港临时铁路所需的一切物资，所有重型武器被运至包围圈外围。日军的物资集散重地与俄军堡垒相距仅3千米左右。[163]物资被分装在手推车上，而后由士兵推走。与此同时，被围困的守备部队也在紧锣密鼓地调运物资，每日近2000匹马参与运输。[164]因此，淡水和草料时常供应不上！

击退日军的攻击，只能拖延要塞沦陷的时间。必须对阿列克塞耶夫做出应有的评价，总督对当前的局势洞若观火。8月31日，他致电乌赫托姆斯基，在谴责旗舰返回旅顺港的同时，还批驳了8月19日舰长会议的决议：“你们决定留在旅顺港，这将使舰船遭遇无法挽回的损失，它们将落入敌手。因此，返港后务必竭尽全力筹备突围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事宜。这正是陛下的指示，迄今依然有效。”阿列克塞耶夫要求乌赫托姆

斯基传达自己的命令并且尽快离开旅顺港，同时任命海军上校韦林（Р.Н.Вирен）担任战列舰、巡洋舰舰队司令。[165]

在接到旅顺要塞进攻失败的消息后，大山岩决定进攻驻扎在辽阳附近的满洲集团军。战争继续，尽管日军取得了一系列胜果，但是他们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南部的计划几乎完全落空了。日本需要迅速取胜并且给俄国陆军造成致命的打击，以此颠覆两国陆军兵力在大陆的平衡状态，使和谈问题变得迫在眉睫。1904年7月，在启程前往中国东北时，总司令大山岩对时任海军大臣的山本权兵卫男爵说道："我将做好准备迎接满洲会战，但是我期望你能告诉我战争停止了。"[166]现在，日本参谋本部计划切断库罗帕特金与俄国之间的通信线路。[167]

[1]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2.Ч.1.От начала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до боя под Вафаньгоу 1 июня.С.214-215.

[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Кн.1.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502-599.

[3] 今普兰店皮口。——译者注

[4] фон Шварц А.［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08.Ч.1.С.173-174；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3.Кн.2.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до морского боя 28 июля（10 августа）в Желтом море.С.6-7.

[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2.Ч.1.От начала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до боя под Вафаньгоу 1 июня.С.204.

[6]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 General Staff，*The Russo-Japanese War*，part 2，pp. 8，10.

[7] Сакурай Т.Ук.соч.С.6.

[8]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3.Кн.2.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до морского боя 28 июля（10 августа）в Желтом море.С.45-57.

[9] Третьяков Н.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ВС.1909.№1.С.59.

[10] фон Шварц А.В.Укрепление Киньчжоуской позиции.//ИЖ.1906. №1-2.С.2；4.

[11] Третьяков Н.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ВС.1909.№1.С.59.

[1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1.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С.515.

[1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Кн.1.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33.

[14] фон Шварц А.В.Укрепление Киньчжоуской позиции.//ИЖ.1906. №1-2.С.6.

[1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Кн.1.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до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429-430.

[16] фон Шварц А.В.Укрепление Киньчжоуской позиции.//ИЖ.1906. №1-2.С.6-7.

[17]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1.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С.516.

[18] фон Шварц А.В.Укрепление Киньчжоуской позиции.//ИЖ.1906. №1-2.С.11.

[19] Третьяков Н.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ВС.1909.№1.С.57-59；61-63.

[20] фон Шварц А.В.Жизнь и мысли.Дела и встречи.//Архивы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Буэнос Айрес.1950.Т.2.С.106-108；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Порт-Арту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2008.Т.2.С.19.

[21] фон Шварц А.［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08.Ч.1.С.213.

[22] фон Шварц А.В.Укрепление Киньчжоуской позиции.//ИЖ.1906. №1-2.С.45.

[23] фон Шварц А.［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08.Ч.1.С.215.

[24] Третьяков Н.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ВС.1909.№1.С.59；61-63.

[2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3.Кн.2.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до морского боя 28 июля（10 августа）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С.70-75.

[26] фон Шварц А.В.Атака и оборона Киньчжоу.//ИЖ.1906.№3.С.217；240.

[27] фон Шварц А.［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08.Ч.1.С.256.

[28] Фок А.В.Киньчжоуский бой.//РС.1910.Том 142.Вып.4.С.109-110.

[29] Третьяков Н.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ВС.1909.№2.С.74-85；То же.//ВС.1909.№3.С.83；Bruce W. Menning，*Bayonets Before Bullets*：*The Imperial Russian Army*，*1861-1914*.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2，p. 160；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Порт-Арту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2008.Т.2.С.19.

[30] фон Шварц А.［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08.Ч.1.С.256.

[31]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стории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 Порт-Артур（Дневник инженер-штабс-капитана В.В.Сахарова）.//ВС.1907.№1.С.218.

[32] Норригаард Б.В.Ук.соч.С.13.

[33] фон Шварц А.［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08.Ч.1.С.219；252-253.

[3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СПб.1908.Т.1.С.159.

[35] Кватц В.Бой на «Зеленых горах».//Братская помощь.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ый，военно-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журнал（далее БП）.М.1909.№1.С.26.

[36]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стории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 Порт-Артур（Дневник инженер-штабс-капитана В.В.Сахарова）.//ВС.1907.№1.С.218.

[37] фон Шварц А.［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08.Ч.1.С.252.

[38]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СПб.1908.Т.1.С.159.

[39] Дневник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31 марта - 21 ноября 1904 г.）.//КА.М.1935.Т.1（68）.С.78.

[4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3.Кн.2.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до морского боя 28 июля（10 августа）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С.94-95.

[41]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3.Кн.2.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до морского боя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С.110-111.

[42] Сапожников.Бой под Вафангоу.//ВС.1907.№5.С.36-38 ; 40.

[4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2.Ч.1.От начала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до боя под Вафаньгоу 1 июня.С.269-270.

[44] Стейнберг Дж.В.Причины пораж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 оперативная точка зрения.//РЯВ.С.237.

[4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2.Ч.1.От начала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до боя под Вафаньгоу 1 июня.С.362-363.

[46] Нодо Л.Они не знали (Ils ne savient pas...) Письма военного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газеты «Le Journal» о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в кампанию 1904 г.М.1905.С.6.

[47] Нодо Л.Они не знали (Ils ne savient pas...) Письма военного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газеты «Le Journal» о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в кампанию 1904 г.М.1905.С.8.

[48]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2.Ч.1.От начала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до боя под Вафаньгоу 1 июня.С.361-362 ; 379-381.

[4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3.Кн.2.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до морского боя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С.199.

[50] Стейнберг Дж.В.Причины поражения...//РЯВ.С.240.

[51]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2.Ч.2.Бой под Вафаньгоу и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у Ташичао.С.25-26.

[52] Цабель С.А.Полевые позиции , укрепленные в 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и планы) .//ИЖ.1907. №11-12.С.1523-1524 ; Сапожников.Бой под Вафангоу.//ВС.1907.№5.С.40 ; 45 ; 49 ; М.Х.3-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стрелковый полк в бою под Вафаньгоо 1-го и 2-го июня 1904 г.//ВС.1910.№10.С.61.

[5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2.Ч.2.Бой под Вафаньгоу и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у Ташичао.С.28.

[54]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в бою полевой артиллерии по опыту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Статья лейтенанта 5-го батальона крепостной артиллерии Виктора Каянека из «Streffleur militarische Zeitschift».//ВС.1912.№7.С.109 ; 111.

[55] Стейнберг Дж.В.Причины поражения…//РЯВ.С.240.

[56]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 , *The Russo-Japanese War* , vol. 3 , p. 156.

[57] Комаров.Бой под Тюренченом и Вафангоу.//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СПб.1906.Ч.1.С.47.

[58] Сапожников.Бой под Вафангоу.//ВС.1907.№5.С.49 ; 62 ; М.Х.3-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стрелковый…//ВС.1910.№10.С.62 ; 65-66.

[59] Стейнберг Дж.В.Причины поражения…//РЯВ.С.234.

[6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от начала до Ляояна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Лекц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полковника Комарова…С.65 ; 67 ; 74.

[61] Дневник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 (31 марта - 21 ноября 1904 г.) .// КА.М.1935.Т.1 (68) .С.84.

[6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3.Ляоянский период.Ч.1.Обстановка в первых числах июля.Июльские бои.Перерыв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период дождей.С.68-69.

[63] Рябинин А.А.На войне в 1904-1905 гг…С.17 ; 22-24 ; 31 ; 38-40.

[6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3.Ляоянский период.Ч.1.Обстановка в первых числах июля.Июльские бои.Перерыв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период дождей.С.90-91.

[6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ма 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СПб.1908.Т.1.С.62 ;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3.Кн.2.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до морского боя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С.116-117.

[66] Дневник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 (31 марта - 21 ноября 1904 г.) .// КА.М.1935.Т.1 (68) .С.83.

[67]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08.Ч.1.С.259 ; 265 ; 270 ; 298 ; 364 ; 367 ; 373 ; 380 ; 382 ; Кватц В.Бой на «Зеленых горах».//БП.М.1909.№1.С.28. ; То же.//БП.М.1909. №3.С.20.

[68] Бартелетт Э.Порт-Артур.Осада и капитуляция.СПб.1908.С.44. ; Норригаард Б.В.Ук.соч.С.40.

[69] Третьяков Н.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ВС.1909.№3.С.88-94 ; То же.//ВС.1909.№4.С.80-81 ; Побилевский Н.Дневник артурца…//ВС.1910.

№3.С.63-64；Письмо ген.А.М.Стесселя ген.В.Г.Глазову...//КА.М.-Л.1926.Т.3（16）.С.219.

[70] фон Шварц А.Влияние борьбы за Порт-Артур...//ИЖ.1907.№1.С.43.

[71]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10.Т.3.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ой эскадры.С.38.

[72] Золотарев В.А.，Козлов И.А.Ук.соч.С.123.

[73] Сеппинг Райт С.Т.С адмиралом Того.Описание семимесячной дейс твительной службы под его командой.СПб.1907.С.32.

[74]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10. Т.3.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ой эскадры.С.53-54.

[75] Свечин А.А.Предрассудки...С.166.

[76] Свечин А.А.Предрассудки...С.166.

[77] Золотарев В.А.，Козлов И.А.Ук.соч.С.131-143.

[78] фон Шварц А.［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08.Ч.1.С.120.

[79] Семенов В.［И.］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178.

[80] Норригаард Б.В.Ук.соч.С.19.

[81] Семенов В.［И.］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178.

[82] Норригаард Б.В.Ук.соч.С.29.

[83] Семенов В.［И.］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178.

[84] William McElwee，*The Art of War*：*Waterloo to Mons*.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4，p. 289.

[85] фон Шварц А.［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10.Ч.2.С.40-41.

[86] Ильин Н.К 50-летию начала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МЗ.Нью-Йорк.1955.№1.С.8-9.

[87]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3.Кн.2.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до морского боя 28 июля（10 августа）в Желтом море.С.164-169；179-182；212.

[88] Семенов В.［И.］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177.

[89] Ильин Н.К 50-летию начала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МЗ.Нью-Йорк.1955.№1.С.9.

[9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3.Кн.2.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от перерыва сообщений с Порт-Артуром до морского боя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С.320-321.

[91] Семенов В. [И.] 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184.

[92]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Порт-Арту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2008.Т.2.С.578.

[93] Золотарев В.А. , Козлов И.А.Ук.соч.С.106.

[94]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10.Ч.2.С.40.

[95] Семенов В. [И.] 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187.

[96] Иениш Н. [В.] Шангтунский бой 28 июля 1904 г. (по наблюдениям с палубы эскадр.Миноносца «Беспощадный») .//ВБ.Париж.1963.№60.С.17.

[97]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5.Кн.3.Мор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Захват японцами миноносца «Решительный» в Чифу.С.29.

[98] Иениш Н. [В.] Шангтунский бой…//ВБ.Париж.1963.№60.С.21.

[99] Подгурский Н.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б осаде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6.№11.С.145.

[10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5.Кн.3.Мор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Захват японцами миноносца «Решительный» в Чифу.С.30.

[101] Золотарев В.А. , Козлов И.А.Ук.соч.С.106.

[10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5.Кн.3.Мор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Захват японцами миноносца «Решительный» в Чифу.С.32.

[103] Семенов В. [И.] 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187.

[10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5.Кн.3.Мор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Захват японцами миноносца «Решительный» в Чифу.С.36 ; 39-40.

[105] Семенов В. [И.] 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187-189.

[10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5.Кн.3.Мор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Захват японцами миноносца «Решительный» в Чифу.С.48.

[107]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09.Т.1.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С.215-216 ; Золотарев В.А. , Козлов И.А.Ук.соч.С.108-110.

[108] Оливье Э.Уроки морских войн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испан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СПб.1907.С.90.

[109] Семенов В. [И.] 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192 ;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5.Кн.3.Мор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Захват японцами миноносца «Решительный» в Чифу.С.49-50.

[110] Иениш Н. [В.] Шангтунский бой...//ВБ.Париж.1963.№60.С.16.

[111] Иениш Н. [В.] Шангтунский бой...//ВБ.Париж.1963.№60.С.21.

[112] Иениш Н. [В.] Шангтунский бой...//ВБ.Париж.1963.№60.С.21.

[113]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Порт-Арту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2008.Т.2.С.585.

[114]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09.Т.1.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С.214.

[115]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Порт-Арту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2008.Т.2.С.640.

[116] McElwee , *The Art of War* , p. 290.

[117] Семенов В. [И.] 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192-193 ;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5.Кн.3.Мор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Захват японцами миноносца «Решительный» в Чифу.С.51-56.

[118]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09.Т.1.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С.214.

[11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ма 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СПб.1908.Т.1.С.94.

[12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5.Кн.3.Мор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Захват японцами миноносца «Решительный» в Чифу.С.56-58.

[121]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10.Ч.2.С.42.

[122]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стории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 Порт-Артур Дневник инженера-штабс-капитана В.А.Сахарова.//ВС.1907.№2.С.210.

[123]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09.Т.1.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С.218-223 ; 245 ; Золотарев В.А. , Козлов И.А.Ук.соч.С.110-111.

[124]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10.Т.3.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ой эскадры.С.70.

[125] Егорьев В.Е.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ий отряд крейсеров...//МС.1937.№3.С. 117 ; 123.

[126]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10.Т.3.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ой эскадры. С.73-74 ; 80.

[127] Золотарев В.А. , Козлов И.А.Ук.соч.С.129.

[128] Денисов Б.Минная война у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 1904-1905 гг.//МС.1935. №10.С.27-28.

[129]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стории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 Порт-Артур Дневник инженера-штабс-капитана В.А.Сахарова.//ВС.1907.№2.С.211-213.

[13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ма 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СПб.1908.Т.1.С.350.

[131] Побилевский Н.Дневник артурца...//ВС.1910.№3.С.68.

[13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6.Кн.4.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и действия морских команд при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сле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до конца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С.49-51.

[133]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10.Т.2. Совмест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и армии по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104.

[134]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10.Т.2. Совмест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и армии по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105.

[135]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10.Ч.2.С.91.

[13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6.Кн.4.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и действия морских команд при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сле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до конца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С.53-54.

[137] Норригаард Б.В.Ук.соч.С.99.

[138] Подгурский Н.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б осаде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8.№3.С.251.

[139] Третьяков Н.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ВС.1909.№7.С. 115.

[140] Костюшко.Ноябрьские бои на Высокой горе по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ИЖ.1909.№3.С.253 ; 256.

[141]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6.Кн.4.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и действия морских команд при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сле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до конца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С.4-6.

[142]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10.Ч.2.С.117-118 ; 200.

[143] Сакурай Т.Ук.соч.С.202 ; 214.

[144] Бартелетт Э.Ук.соч.С.70.

[145] Бартелетт Э.Ук.соч.С.87. ;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10.Ч.2.С.199.

[146] Бартелетт Э.Ук.соч.С.115.

[147]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10.Т.2. Совмест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и армии по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106-116.

[148]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 , *The Russo-Japanese War* , vol. 2 , p. 376.

[149] Подгурский Н.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б осаде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8.№3.С.258.

[150] Бартелетт Э.Ук.соч.С.89.

[151]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10.Ч.2.С.198.

[15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6.Кн.4.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и действия морских команд при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сле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до конца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С.65-68 ; 103.

[153] Джемс Д.Осада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7.№1.С.200 ; Бубнов М.Порт-Артур.//МС.1907.№4.С.2-3.

[154] Бартелетт Э.Ук.соч.С.214 ; 216.

[155] Врангель Ф.Английский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 на японской эскадре.//МС.1906.№1.С.19.

[156] Бартелетт Э.Ук.соч.С.9 ; 208. ; Норригаард Б.В.Ук.соч.С.129.

[157] Врангель Ф.Ук.соч.//МС.1906.№1.С.19.

[158]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 СПб.1910.Ч.2.С.292.

[159] Джемс Д.Осада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7.№1.С.200.

[160] Бартелетт Э.Ук.соч.С.44.

[161] Норригаард Б.В.Ук.соч.С.157.

[162] Джемс Д.Осада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7.№1.С.200.

[163] Бартелетт Э.Ук.соч.С.143.

[164] Бубнов М.Порт-Артур.//МС.1907.№4.С.2-3.

[16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6.Кн.4.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и действия морских команд при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сле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до конца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С.7.

[166]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142.

[167]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45.

21 辽阳：本该决出胜负的会战

在辽阳附近，俄日两军开始对峙：库罗帕特金麾下15万兵力、483门火炮，大山岩麾下13.5万兵力、592门火炮。俄国的骑兵兵力是日本的三倍之多，步兵兵力多31个营。会战爆发前，西伯利亚第五军和陆军第一军抽调16个营和24门火炮增援满洲集团军。[1]敌军失去了后方的距离优势，它与日本相距1200余千米，其中近1000千米为海路。截至此时，日方海上运输安全尚无保障，并且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登陆地到日军后方多是条件恶劣的土路，若调用已掌控的南满铁路，则需准备大量符合俄国轨距标准的机车。[2]

俄军在充分部署的阵地上展开防御。他们坚信集团军司令一定能将敌人引入陷阱。某位军官回忆道："对于在这个中国城镇周围部署的防御工事，将士们信心满满。历经数月，上千名工人在此挖掘的底部插满尖锐木桩的陷阱、遍布各处的铁丝网必将阻止敌军靠近堑壕和辽阳城墙。"[3]阵地后方是烟台矿区，[4]这对于保障铁路运输能力尤为重要，矿区日均开采1.5万普特（240吨）原煤。[5]3月底至6月，在这三个月里，整座城市都在积极设防，通往辽阳的要道已被两条防御带覆盖。[6]

首先是绵延14俄里、以太子河为界的核心阵地，其防御非常牢固。在城防工事外围，俄军还构筑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部署了8座堡垒（2个连驻守1座）和8座棱堡（1个连驻守1座），碉堡之间依靠堑壕相连，配备208门野战炮的21个炮兵连驻守此道防线。在防御工事前方，或架铁丝网，或挖陷阱，或埋地雷。第二道防线位于城市南墙前方俄军阵地的左翼，其上部署2座堡垒、4座棱堡、5座眼镜堡以及3座架设着19门火炮的炮台。第三道防线位于跨河大桥右翼，其上部署2座堡垒、2座眼镜堡以及5座架设着36门火炮的炮台。[7]所有长期防御工事都被很好地隐蔽了起来，因此日军无法轻易确定打击目标。为了方便射击，防御工事前方区域已被清理干净。[8]在探明日军火炮的威力后，在阵地前方增设防御工事——躲避敌军炮火袭击的可靠掩体。此外还修筑了以堑壕为主体的前沿阵地，俄军在此的主要任务是抵制日军的首轮进攻、确定他们的主攻方向。[9]这是一套强大的防御体系。对于日军"敢于夺取辽阳"，众人表示怀疑。[10]

日军司令，作为德国军事理论的一贯支持者，计划绕开俄军阵地，包围俄国陆军，切断他们唯一的补给线路——铁路。受色当战役的启发，日军不打算正面攻击防御工事，进行无意义的战斗。另一方面，俄军的管理体制极大地削弱了自身的优势。库罗帕特金在前线部署了64%（128个营）的兵力，侧翼部署了5%（10个营）的兵力，其余兵力完成其他作战任务。[11]在战斗打响前，总司令又将61个营、30支哥萨克部队连同136门火炮、8挺机枪划入后备部队。米申科的骑兵部队和陆军第十七军对阵地的侧翼实施近程防御，另有8支部队对阵地侧翼实施远程防御。此外，部分兵力被划入城防部队，负责守卫公路、兵站、信鸽邮递站点。俄军后备部队的管理体制极为混乱，各级指挥官均可向后备部队发号施令。这一切都增加了军队管理的难度。[12]后来，桥头堡的防御突然出现了缺口。8月17～18日，太子河暴发洪水，浅滩被淹，先前竣工的7座桥梁中的4座被毁，[13]结果陆军第十军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可怕的酷热紧随其后，脱水、中暑的病患加重了卫生系统的负担。[14]

8月25日，大山岩发动进攻，长期战役就此拉开帷幕。库罗帕特金始终担心俄军遭遇围困，他一再表明消极防御的立场，这相当于将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让给了大山岩。双方在辽阳附近展开了顽强且血腥的战斗。俄军坚守阵地，日军勇猛进攻，双方不计损失地投入战斗。尽管进攻部队损失惨重，却无法突破防线。进攻过后，在通往俄军堑壕的要冲上尸横遍野、伤者无数。[15]英国随军（日军）观察员表示，这是令人绝望的一天。[16]日军的处境颇为艰难，参谋部担心俄军可能发起反攻。[17]8月30日傍晚，局势明朗了起来，俄军不会撤退，因为西伯利亚第一军已经击退了所有的进攻。与此同时，大山岩的参谋部收到情报，称库罗帕特金准备撤出辽阳。后来事实证明，这就是无稽之谈，但是日军司令部还是决定远距离迂回包抄俄军阵地。此前，日军第十二师团已被调往太子河右岸。[18]

按计划，日军第十二师团应当潜伏在俄军后方和侧翼，同时与黑木为桢的第一军保持联系。此时，黑木的部队正在进行深入包抄辽阳的危险行动。日军在太子河附近仅安插了一个近卫师团和一个步兵旅团。前几日，两者大败。[19]第十二师团的兵力损失相对较小，此时大山岩参谋部对它寄予厚望。[20]尽管俄军在防守方面大获全胜，但是他们难以为继，防御压力接近极限。[21]8月30日夜间，该师团几乎是在俄军巡防部队（其阵地与太子河相距7～8千米）的眼皮下暗渡了太子河。此时，

日军的运兵船极有可能遭到攻击。第十二师团的到来使侧翼和后方极度脆弱的黑木为桢得到了可靠的掩护。[22]他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23]为了掩护第十二师团渡河，日军总司令向前线施压。

为了在前沿阵地牵制俄军，大山岩打造了一处强大的火炮阵地猛攻西伯利亚第一军和第三军——234门野战炮和山地炮、72门重炮对战俄军的82门野战炮。8月31日上午，日军开始战前炮火准备。为了支援步兵攻击，日本炮兵对火炮火力进行了巧妙的集中。步兵一如既往地走在前列，不计死伤损失。由于进攻部队与炮兵之间缺乏联系，情况变得较为糟糕，前者时常被后者击中。两天内，两个俄国军团累计损失兵力6239人，日军损失11899人。[24]尽管勇敢而顽强的进攻部队被再次击退，但是冗长的前线和空虚的后备力量使俄军难以保持胜果。[25]在8月31日的作战过程中，库罗帕特金决定从前沿阵地撤至核心阵地，同时缩减阵线长度——由24俄里缩减至14俄里。9月1日夜，俄军相继撤退，疲惫不堪的日军并未展开追击。[26]尽管日军已然逼近，但是俄军此次撤退依旧秩序井然。[27]依据作战部署，此次撤退应当是佯退，库罗帕特金希望将敌人引入俄军的主防阵地。[28]

虽然俄军战士们对此次撤退有些不满，但是核心阵地牢不可破的防御又令他们倍感安心。与此同时，辽阳俄国街区的居民陆续离开了这座城市。[29]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自8月30日起，医院和部分铁路设施被光明正大地运往了北方城市。[30]9月1日13：30，日军开始炮击这座城市，主要目标是华人街区和车站。[31]起初，日军使用榴弹炮和野战炮进行射击，但是很快他们便动用了攻城炮。炮弹击中了弹药库，引起了爆炸，熊熊大火冲天而起。为了避免阵地部队误以为这是来自后方的密集步枪炮火，守城部队不得不通过电话将敌军的行动告知前线。[32]

当日，俄军司令在日记中写道：“部队英勇作战。日军的每次进攻都以战败收场，且伤亡惨重。他们的尸体遍布我军阵地要冲。陷阱里堆满了尸体。我们缴获了多门火炮，日本人的军鞋也被我们收缴了。有时甚至进行刺刀战。17日，日军突袭伊万诺夫的第三军；18日，施塔克尔贝格的第一军被突袭。两日，我军死伤7000余人。尽管如此，我军依旧士气高昂，反攻指日可待，黑木为桢率领残部向太子河右岸的施官屯村逃窜。第十七军兵力太过薄弱，无法拦截这支部队。这绝不可能是战略包抄。”[33]

在俄国陆军参谋部出现传言，蒙受巨大损失的日军准备撤至海城。

[34]在库罗帕特金看来，实施决定性反攻计划的关键时刻到了。9月1日，正值色当战役纪念日，黑木将军的第一军——24000名兵力、60门火炮——潜入了辽阳阵地的大后方。这种迂回战术完全出乎俄军司令部的意料。[35]9月1日，辽阳遭到日军的连续炮击，俄军撤退的节奏加快了。铁道营的士兵冒着日军的炮火，从铁道支线尽头拉出了2列装载着火棉和火药（1500普特）的列车并且将它们停在了车站北侧的铁道上，物资得以保全。[36]

据满洲集团军参谋部估算，敌军在阵地外围部署了3万～3.5万名兵力。库罗帕特金决定利用黑木为桢与大山岩主力部队失联的劣势以及自身的兵力优势，集中火力打击日本第一军。为此，他召集了5.7万名步兵和5000名骑兵——92个步兵营、4个工兵营、79支哥萨克部队和骑兵连，动用了352门火炮。[37]8月31日，日军的进攻被尽数击退，撤离核心阵地，总参谋部相信，胜利的号角即将吹响。[38]

9月1日，俄军司令三言两语地表达了自己对战局的看法：“今日集合，明日逼近，后日进攻！”[39]事实上，他对俄军的实力完全没有信心，弹药消耗量高得惊人。战斗打响前，除炮台和炮场的弹药储备外，辽阳站还有近10万发的弹药储备。截至8月31日傍晚，仅剩2.4万颗炮弹。一旦发起进攻，俄军可能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司令下令即刻准备从哈尔滨调运物资。[40]9月2日，俄军93个营集结完毕准备反攻，但是日军抢在了库罗帕特金的前面率先发动进攻。辽阳后方的低矮山脉成了黑木为桢的第一军与施塔克尔贝格的西伯利亚第一军争夺的焦点。[41]严格地讲，这里由两三处高六七十米的多岩山丘组成，它们耸立在“将整个平原（宽1.5～2千米）围得密不透风的高粱地的上方”[42]。

刚刚抵达烟台站的第五十四步兵师遭遇了黑木为桢的先头部队。俄军的这支部队是由一群完全没有任何作战经验且刚刚应征入伍的新兵组成的，尼古拉耶夫斯基学院[43]教授奥尔洛夫（Н.А.Орлов）少将担任师长。征兵期间，俄国陆军对于在动员期间组成的编队的训练和协调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连士兵的训练时间也无法予以保证。在该领域具有绝对权威的卢科姆斯基（А.С.Лукомский）中将指出：“在国内各军区的动员行动中，准备最充分且训练效果最佳的当属基辅军区和华沙军区，维尔诺军区、彼得堡军区和莫斯科军区差强人意，其他军区令人大失所望。”[44]

在动员过程中，后备旅被编入不同的师，师的规模至少扩大了2

倍。日本情报机关数据显示，在军旗下服役十年及以上的俄国预备役士兵竟然只接受过三个月左右的训练，这不足以令他们做好战斗准备。[45]事实上，日本人错了。1904年春夏两季，俄国预备役士兵的训练期限还不及三个月。此外，在漫长的旅途中指挥官无法获得应有的锻炼，军事训练、指挥演练无从开展。与此同时，大量抵达战区的军官，从连长到旅长只能在赶赴前线的途中了解部队情况。上述情况极为普遍，只有少数例外。[46]如果司令部未给下属分派任务，那么在赶赴前线的途中无所事事的人们只能自己找些乐子，打牌、酗酒在军用列车中都有自己的市场。[47]

在辽阳“下车”直接参战的第五十四步兵师无法发挥自身的作战实力，这不足为奇。作为尼古拉耶夫斯基学院研究苏沃洛夫远征意大利军事行动的专家，第五十四步兵师师长无论局势如何都格外推崇进攻。1895年，他曾坚定地表示：“每支队伍的领袖都应优先考虑进攻行动，因为进攻能使成就达到最大化。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我们才应防守，但那也是暂时的。进攻需要坚强的意志、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甚至在对敌作战优越性存疑的情况下也不应放弃进攻。逃避责任的人自然倾向于防守。当然，应当考虑战区的地形特征，但是最重要的数据还是我军和敌军的有生力量。果断坚毅的决定可以提振我军的士气，打压敌军的士气；在很大程度上，这将抵消地形的弊端。”[48]

这也许就是奥尔洛夫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准则，然而他忘记了自己所领导的部队在训练水平和协调能力方面与苏沃洛夫所领导的在进攻中“可无视地形弊端”的部队大有不同。在增援部队赶到前，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参战士兵回忆称：“高粱地化为绵延不断的沼泽，周围泥泞不堪、无路可走，除了缓步前行外，别无他法。”[49]未弄清状况的奥尔洛夫部队匆忙地奔向了这片泥潭。格鲁阿（Б.В.Герya）少将回忆道：“这是一支没打过仗且不年轻的队伍，在烟台站刚下火车，他们便被派去反击躲在高粱地里的日军了。我们留着大胡子的奔萨人，在开阔的田野里长大的孩子们，在这里彻底地迷路了。面对日军的榴霰弹，他们瑟瑟发抖。队伍被打散了，后来他们在烟台艰难地会合了。”[50]

由一群35～40岁且没上过战场的预备役士兵组成的第五十四师被指派了一项难度极高的任务，[51]这是一个错误，与普通的战败相比其后果更为严重。在占领高地后，上午奥尔洛夫在将队伍排成一列长约3千米的纵队后便带队离开了。[52]进攻的参与者回忆道：“伸手不见五指的

黑夜降临了。高粱地里漆黑一片，无法确定方向，无法保持联络，无法进行作战指挥。尽管如此，他们依旧努力地向前行进。疲倦的人们在高粱地里前进：有人被绊住，有人跌倒，有人落后，有人掉队……”[53]奥尔洛夫的指挥水平令人失望。从远处观察这场战役的英国武官指出：“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掩护先头部队或侦察兵的进攻，甚至允许先头部队在两排山丘之间草木稀疏的低矮丘陵和峡谷中呈紧密队形行进。在这里，俄军被打得溃不成军，最终被彻底击退。”[54]

9月7日，库罗帕特金在日记中写道：“在高粱地里我军彻底战败了，他们互相开火，互相拼刺刀。”[55]第五十四师损失惨重，奥尔洛夫也负伤在身。目击者称：“预备役士兵逐渐分散开来，起初还相对有序地向后撤退，很快，他们的队伍就彻底溃散了。”在拼杀的过程中，日军仅损失了181人，俄军损失了1502人，这主要归咎于俄军自己人相互射击。部队完全迷失了方向，在撤退途中向四周开火，奥尔洛夫部队的12个营在战场上全军覆没，此事给满洲集团军上下造成的精神负担远比它的实际后果更为严重。[56]

当然，这场战役给敌军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汉密尔顿指出：“陆军参谋本部认为，这是天降福泽，因为日军在那里备受威胁且作战武器质量欠佳。参谋本部断定，奥尔洛夫部队全都是预备役士兵。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第一次进入这片复杂地区的日军，在俄军刚刚决定离开掩体时，便能出其不意地拦截他们并且轻而易举地击破他们的计划，毕竟俄军应当对此处的地形了如指掌。”[57]

结果，在这场进攻后，俄军乱作一团。在近邻的后方，没人知道附近发生了什么，敌人在哪里。[58]第五十四师曾被戏称为“奥尔洛夫快马”。将部队士气和战斗能力提升至最佳状态需要一定的时间。为此，库罗帕特金派遣斯塔里查（М.С.Столица）中将整顿第五十四步兵师的秩序，后者对此非常抵触。1904年8月末，这项任务对他而言几乎是无法完成的：“我想，部下会说：这就是送来了一条狗！但是，我相信他们无法变得像狗一样：军官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士兵们几乎都是预备役士兵，尽管有些人长期在役。总而言之，这不是俄国部队……现在我正逐渐向他们渗透基督教的信仰，但是这真的很难。”[59]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训练磨合，适应特殊作战条件的第五十四师在不计兵力损失的情况下已经能够发动进攻了。[60]

会战期间，与奥尔洛夫部队一同执行任务的还有萨姆松诺夫

（A.B.Самсонов）中将的骑兵部队，配备了6门火炮的19支哥萨克部队。他们驻守矿区前方高地，捍卫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阵地，但是无法掩护阵地两翼。萨姆松诺夫一直坚持到晚上，然后被迫撤退，因为他发现由于两翼空虚，部队已经被日军包抄了。[61]各级指挥机构的连番失误导致俄军失去了被库罗帕特金视为反攻基础的烟台矿区和一系列重要的山区据点。[62]奥尔洛夫溃败的消息传出后，库罗帕特金已经在考虑撤退的问题了。[63]俄军后方和左翼极有可能遭到敌军的袭击。在奥尔洛夫战败后，西伯利亚步枪兵团赶赴平原，与占领平原附近山脉的日本步兵对峙。[64]

烟台高地距离南满铁路仅12俄里，高地失守立即威胁到了俄军的通信。[65]在西伯利亚第一军的坚守下，烟台站得以保全。[66]施塔克尔贝格接到的命令非常“符合库罗帕特金的风格”：占领并驻守烟台站，“尽可能避免与日军的优势兵力作战”[67]。尽管如此，日军依旧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切断满洲集团军与铁路的联系。异常密集的战斗和冗长的交通线导致日军的弹药储备几近枯竭。炮兵连向西伯利亚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9月1日，近100门速射炮炮击日军阵地。[68]

野战炮的弹药消耗量急剧攀升，辽阳仅存的弹药储备约2.6万枚炮弹被消耗一空。炮场上的弹药数量时常发生变动，因此无法确定其储量。此时已无法指望施塔克尔贝格成功退敌，因为他已经开始撤退了。满洲集团军需要增援，但是库罗帕特金手中没有可调用的后备兵力。[69]另一边，黑木为桢的处境同样艰难，假如俄军拥有较高的指挥水准，他将陷入复杂的困局。在意识到局势的复杂性后，大山岩加强了对俄军防御阵地的攻势。日军的进攻被全线击退。即便如此，由于俄军火炮弹药储量不足（弹药的消耗速度令陆军总司令惊诧不已，某些火炮的射击发数为800发，而非原定的400发。此外，装载了16万颗炮弹的列车未能及时赶到），生怕敌军突破左翼阵线的库罗帕特金撤销守城命令，并且于9月3日傍晚命令俄军全线撤退。[70]集团军向奉天撤退，“在那里集结、补员，以便再战”。[71]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在战斗中，库罗帕特金屡次变更作战任务，有时甚至朝令夕改，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混乱。[72]现在，一项庞大的撤退任务摆在了司令部面前。辽阳火车站7条轨道中的5条被卫生列车和未卸载的货车占据着，5000节此类车厢被运往奉天。[73]波洛夫佐夫（П.А.Половцов）直言：“我们在辽阳的胜利变成了失败。他（库罗帕

特金——引者）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并且满洲集团军再也不会取得辽阳那样卓越的战绩了。总司令失去了陆军的信任。”[74]那些继续信任他的人越发相信战事即将出现转机，然而转机并未出现。[75]概括地说，这正是当时军官群体心理的真实写照。军队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惊慌失措。在撤出辽阳时，总参谋部的一位军官在看到不计其数的辎重列车消失在地平线上时，反复地念叨着："你们看，你们看…… 这就是色当……"[76]

事实上，北上转移井然有序，并未爆发恐慌和动乱。[77]在从主阵地的桥头堡向辽阳城撤退时，俄军炸毁了太子河上的桥梁和渡口，卸下了河上的浮桥。[78]尽管如此，此时撤退的辎重部队和炮兵连也需承受极大的风险。9月4日至5日晚上，俄军开始向奉天撤退。[79]9月5日13：30，伤员、机车、电报设施全数转移，铁道兵和工兵开始拆除枕轨。中午，日军开始炮轰辽阳站。[80]尽管出现了恐慌的迹象，但是危机很快就过去了。之所以如此，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撤退途中，部队和支队保持原班人马，领导他们的指挥官也是与之相熟的军官。俄军的一阵炮火反击迫使日军的火炮保持沉默。秩序得以恢复，撤退继续进行。[81]

观看俄军撤退过程的劳恩施泰因（E.A.von Lauenstein）中校惊异于俄国步兵的自制和秩序，他们在桥上纹丝不动地站了两个小时，炮兵连和辎重部队就在他们面前走过。中校认为，德国军队做不到这一点。[82]撤离时，铁道队特种兵有序地摧毁了铁路。[83]8月25日，俄军撤至浑河。[84]撤退部队未遭到追击。与前线俄军激战到最后一刻且胜负未决的黑木部队，现在不得不奉命监视俄军撤退。[85]9月4日至8日，俄军在撤退途中没见到日军的一个骑兵，没听到日军的一声枪响。这真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在泥泞难行的道路上，满洲集团军的主力部队在行军途中陷入混乱，失去了秩序与安定。[86]

在辽阳会战中，日军损失了23000人，俄军损失了16000人。大山岩虽未实现自己的围攻计划，却成功地逼退了俄军。1904年秋随俄军出征的德国观察员凯梅勒（Kaemmerer）将军回忆称："全世界，至少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期待辽阳变成第二个色当。在这场被中断了的战役中，日军虽然获得了胜利，却未抓到一名俘虏、未缴获一件战利品。这是一场吞噬了2万条生命却毫无结果的消极胜利。日本无法经常赢得这样的胜利，但俄国可能继续遭遇这样的失败。"[87]

德国军官的观点基本正确，尽管他弱化了日军的成就和俄军的损

失。撤退和战败，即便只是战术也无法赢得战争的胜利。库罗帕特金的计划，击垮日军、解封旅顺港的计划全都化为了泡影。战争最终变成了一系列的防御战和撤退行动，这一事实严重地打击了俄军的士气。尽管如此，俄军依旧顺利地撤退到了奉天北部70千米处。在增援部队抵达前，战斗力被严重削弱的日军无法乘势北上。

俄军总司令对麾下纪律严明的部队充满信心。1904年9月16日，他汇报称："未来部队也将保持忘我奉献的作风，对此我满怀信心。当时尽管形势艰难，但是撤出辽阳确有必要。"[88]这些言辞竟未遭到质疑。的确，所有的回忆录作者几乎都注意到了俄国士兵的高尚品德、面对失败时出色的承受能力。另一位德国军官泰陶（E.Tettau）少将在观察俄军在九连城战役后的表现时，率先发现了这种品质："应当指出，他们没有给人留下打了败仗的印象。此时，我们首次发现，后来经常注意到，俄国士兵很快就能适应并接受战败的阴影和影响。他们能够迅速地从打击中恢复过来。战败一周后，他们一切如常，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89]

据泰陶证实，辽阳会战后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俄军的精神风貌，显然再次恢复如初。自撤离辽阳以后，仅过去了一个星期，俄军便又重新振作了起来。很难看出，这支军队在不久前刚刚脱离险境。"[90]普斯科夫军团指挥官格鲁列夫（M.B.Грулев）回忆道："在撤离辽阳、进驻新阵地的几天后，我军便迅速地恢复了常态。这种恢复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两个新的军（来自的俄国的第一军和第六军）的增援、弹药物资的补给，更是精神层面的，他们迅速地遗忘了辽阳的撤退行动，更不相信自己遭遇了祸端。但是事实是，最终日军将我们赶出了辽阳阵地，并且站在了我们的地盘上。"[91]1904年末，在沙河战役失败后，俄军的心态也是如此。[92]能够挫伤俄军士气的唯有一事，即对领导阶层的不信任。总司令令人不解的行为加深了众人的不信任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柏林军事学院毕业生、德国将军汉斯·冯·塞克特（Johannes von Seeckt）总结了自己指挥军队的经验："最重要的问题是行动。行动分为三个阶段：因思想而萌生的决策、命令或准备执行、执行。这三个阶段均受意志支配。意志植根于品格，对于行动者而言，品格远比智慧重要。缺乏意志的智慧毫无价值，缺乏智慧的意志危在旦夕。"塞克特的理论完美地阐述了库罗帕特金"不知疲倦"的行动的走向与结局。第二军某位军官回忆道："主事人的意志处于左摇右摆的不稳定状

态。因此，消极的防御指令、加强阵地防守的命令以及准备迎击敌军进攻的嘱托，时常与号召部队英勇向前的进攻计划、克敌取胜的宏伟设想同时发布。所有这些使军队的行动变得慌乱、琐碎，使进攻前的准备工作变得杂乱无章。”[93]

[1] Данилов Н.А.Ляоян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СПб.1906.Ч.1.С.89；91.

[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3.Ляоянский период.Ч.1.Обстановка в первых числах июля.Июльские бои.Перерыв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период дождей.С.1-2.

[3] Гасфельд Н.Пол век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бывшего офицера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службы.Париж.1950.С.46.

[4] 抚顺煤矿的支矿。1899年，部分矿区被东清铁路公司的俄国人租采。——译者注

[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3.Ляоянский период.Ч.1.Обстановка в первых числах июля.Июльские бои.Перерыв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период дождей.С.11.

[6] Цабель С.А.Ляоян.Мукден.Тьелин（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и планы укреплений позиций）.//ИЖ.1907.№6-7.С.721.

[7] Цабель С.А.Ляоян.Мукден.Тьелин（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и планы укреплений позиций）.//ИЖ.1907.№6-7.С.720-721.

[8]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The Russo-Japanese War*，vol. 2，p. 627.

[9] Цабель С.А.Ляоян.Мукден.Тьелин...//ИЖ.1907.№6-7.Там же.С.721-723.

[10] Любицкий 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СПб.1906.С.73.

[11] Данилов Н.А.Ляоян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СПб.1906.Ч.1.С.91.

[12] Троцкий В.Боево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артиллерии в Ляоянском бою.//ВС.1911.№9.С.72-73.

[1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3.Ляоянский период.Ч.3.Ляоя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и отступл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к г.Мукдену.С.8-9.

[14] Данилов Н.А.Ляоян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СПб.1906.Ч.1.С.87.

[15] Н.З.Бой под Ляояном 17 и 18 августа 1904 год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11-летнего добровольца) .К 30-й годовщине войны.//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ий Вестник.Орган связи всех русских артиллеристов за рубежом. Белград. 1934. №12.С.1-4.

[16]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The Russo-Japanese War*，vol. 1，p. 240.

[17]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58.

[18] Троцкий В.Боево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артиллерии в Ляоянском бою.// ВС.1911.№10.С.61.

[19]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96.

[20]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58.

[21]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3.Ляоянский период.Ч.3.Ляоя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и отступл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к г.Мукдену.С.79-80.

[22]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100-101.

[23]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The Russo-Japanese War*，vol. 1，p. 418.

[24]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61-63；65.

[2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3.Ляоянский период.Ч.3.Ляоя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и отступл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к г.Мукдену.С.81-83.

[26]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67-68.

[27] Данилов Н.А.Ляоян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СПб.1906.Ч.1.С.186.

[28]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от начала до Ляояна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Лекц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полковника Комарова...С.79.

[29] Любицкий 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С.84.

[3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3.Ляоянский период.Ч.3.Ляоя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и отступл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к г.Мукдену.С.87.

[31] Данилов Н.А.Ляоян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СПб.1906.Ч.1.С.191.

[3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3.Ляоянский период.Ч.3.Ляоя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и отступл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к г.Мукдену.С.145.

[33] Дневник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31 марта - 20 ноября 1904 г.）.//КА.М.1935.ТТ.2-3（69-70）.С.104.

[34] Данилов Н.А.Ляоян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СПб.1906.Ч.1.С.194.

[35] Керсновский А.А.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М.1994.Т.3.С.71.

[3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3.Ляоянский период.Ч.3.Ляоя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и отступл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к г.Мукдену.С.146-147.

[37] Троцкий В.Боево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артиллерии в Ляоянском бою.//ВС.1911.№10.С.70；74.

[38] Нодо Л.Они не знали...С.27.

[39] Керсновский А.А.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М.1994.Т.3.С.71.

[4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3.Ляоянский период.Ч.3.Ляоя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и отступл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к г.Мукдену.С.174.

[41] Свечин М.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от начала кампании до сражения под Ляояном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ВС.1907.№4.С.66-67.

[42]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124.

[43] 全称为尼古拉耶夫斯基参谋部军事学院，是沙俄时代专门培养高级军官的教育机构。——译者注

[44] Лукомский А.С.Ук.соч.Берлин.1922.Т.1.С.21.

[45]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6.Т.1.С.274.

[46] Редигер А.［Ф.］Ук.соч.М.1999.Т.2.С.201.

[47] Гусев С.Я.Из дневника корпусного контролера（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ую войну 1904-1905 гг.）//ВС.1910.№10.С.229.

[48] Орлов Н.А.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в бою трех родов оружия，по итальянскому уставу.//Разведчик.1895.№233.С.309.

[49] Комаровский.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ерхнеудинца 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ВРК.1911.№7.С.267.

[50] Геруа Б.В.Ук.соч.Париж.1969.Т.1.С.158.

[51] 掩护烟台矿区满洲集团军的左翼。——译者注

[52]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124.

[5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3.Ляоянский период.Ч.3.Ляоя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и отступл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к г.Мукдену.С.214.

[54]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124.

[55] Дневник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31 марта-20 ноября 1904 г.）//КА.М.1935.ТТ.2-3（69-70）.С.105.

[56] Свечин А.［А.］，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Ук.соч.С.224-225.

[57]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125.

[58] Нодо Л.Они не знали...С.28.

[59] Баланин Д.Тяжелые годы（из писем покойного ген.-майора М.С. Столицы）//ВС.1908.№7.С.76.

[60] Баланин Д.Тяжелые годы（из писем покойного ген.-майора М.С. Столицы）//ВС.1908.№7.С.77.

[61] Гершельман Ф.Конница в 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и в былые времена.//ВС.1911.№6.С.85-86.

[62] Дневник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31 марта - 20 ноября 1904 г.）//КА.М.1935.ТТ.2-3（69-70）.С.105.

[63] Любицкий 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С.97.

[64] Свечин М.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ВС. 1907. №4.С.67.

[65] Данилов Н.А.Ляоян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СПб.1906.Ч.1.С.210.

[66]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ойна с Японией.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с 13 августа по 10 сентября.//ВС.1904.№ 10.С.201-202.

[67] Троцкий В.Боево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артиллерии в Ляоянском бою.//

ВС.1911.№11.С.62.

[68]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127.

[6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3.Ляоянский период. Ч.3.Ляоя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и отступл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к г.Мукдену. С.246.

[70] Дневник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 (31 марта-20 ноября 1904 г.) .//КА. М.1935.ТТ.2-3 (69-70) .С.104 ; 106.

[71] Данилов Н.А.Ляоян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СПб.1906.Ч.1.С.229.

[7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от начала до Ляояна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Лекц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полковника Комарова...С.103.

[73] Караульщиков Л.А.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Военные сообщения и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е войска.//ИЖ.1906.№.6-7.С.715.

[74] P. A. Polovtsoff , *Glory and Downfall* : *Reminiscences of A Russian General Stuff Officer*. London : G. Bell , 1935 , p. 65.

[75] Рябинин А.А.На войне в 1904-1905 гг...С.53.

[76] Грулев М. [В.] В штабах и на полях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фицера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и командира полка 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СПб.1908.Ч.1.С.282.

[77] Любицкий 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С.99.

[78]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3.Ляоянский период.Ч.3.Ляоя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и отступл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к г.Мукдену.С.265-266.

[79] Свечин М.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ВС. 1907. №4.С.69.

[80] Данилов Н.А.Ляоян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СПб.1906.Ч.1.С.229 ; 242.

[81]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3.Ляоянский период.Ч.3.Ляоя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и отступл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к г.Мукдену.С.288.

[82] В.А. [пушкин] Куропаткин...С.101.

[83] Троицкий В.Заамурский округ пограничной стражи...//ВС.1908. №10.С.31.

[84] Данилов Н.А.Ляоян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СПб.1906.Ч.1.С.244.

[85]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127；132.

[8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3.Ляоянский период.Ч.3.Ляоя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 и отступл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к г.Мукдену.С.291-292.

[87]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Недзвецкий В.Указа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ВС.1905.№2.С.242.

[88]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ойна с Японией.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с 13-го августа по 10-е сентября.//ВС.1904.№10.С.214.

[89] Теттау Э.Восемнадцать месяцев...Спб.1907.Ч.1.С.115.

[90] Теттау Э.Куропаткин и его помощники.СПб.1914.Ч.3.С.105.

[91] Грулев М.［В.］ В штабах и на полях...СПб.1909.Ч.2.С.3.

[92] Сестра Нина.Шахэ.Как было.//ВЕ.1909.№9.С.123.

[93] Новицкий В.Ф.От Шахэ к Мукдену（от наступления - к обороне）. Критик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зимнего периода манчжурской кампании 1904-1905 гг.СПб.1912.С.14.

22 辽阳之后：旅顺港和沙河

辽阳会战以日军胜利告终，然而这种胜利完全不是大山岩元帅所期待的。日军的时间依旧紧迫，敦促乃木希典大将尽快占领旅顺港以便增援中国东北行动的命令再次下达。旅顺港的局势不断恶化。自9月17日以后，马肉取代了牛肉、猪肉和罐头肉被端上了守备部队的餐桌，最初每周4顿荤菜。[1]9月19日，日军向要塞发起了第二轮进攻，11英寸口径的迫击炮首次登场。对于守城部队而言，这些迫击炮的出现完全出乎意料且令人不快。现在，日军的炮弹能够打到要塞中的任何掩体，不仅如此，舰队的安全也遭到了严重的威胁。[2]

日军强攻的目标是长山、高山及覆盖其上的“自来水”堡垒和“沙鸡”堡垒。图谋强攻的日军火力异常强大，每分钟射向堡垒的炮弹超过70发。[3]某位要塞守军在9月20日（俄历9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高山和长山湮没在了炮火的阴霾中，爆破弹黑色的烟柱时而穿透战场上经久不散的浓烈白烟。长山上似乎一颗石子都没有，这里就是人间炼狱。”[4]日军的首次袭击被击退了，并且损失了大量兵力。然而，进攻仍在继续。乃木希典打算采用人海战术拖垮俄军，结果，9月20日日军攻陷堡垒。此后，日军顺利地占领了长山。现在，俯瞰全城和内港的高山——要塞防御的关键——已经进入了日军的直线射击范围。在长山阵地，日军可对高山阵地及其要冲和后方进行平行扫射。为了拿下高山阵地，日军发动了多次强攻。9月21日，日军在一天内向高山阵地发动了五次进攻。9月22日，战斗暂停。此番厮杀日军损失7500人，守军损失1500人。[5]

在最后一轮决定性的进攻中，野战炮发挥了巨大作用。部署在高山阵地的两门野战炮成功地截击了日军前仆后继的进攻部队。[6]当时，驻守高山阵地的波德古尔斯基（Н.К.Подгурский）中尉和一支水兵部队大放异彩，他们配备的“手雷”——“制式手榴弹”杀敌无数。[7]最初，这种武器在日军中广泛应用，在近身搏杀中，它们的威力给守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的出现有时甚至引起了俄军的恐慌。不久后，要塞开始生产这种武器，日产量达1000枚，后来转为全天生产，日产量高达2500枚。[8]手榴弹的原材料为中国老式火炮的炮弹、47毫米口径火炮报废的弹壳。它们在高山阵地得到了重用。[9]经过3天的激战，日军死伤

无数，清理尸体的工作在夜间交由华人进行。白天，日军向他们开火。华人用了五六天的时间才将阵地清理完毕。尸体的腐臭味让高山阵地的守军感到窒息。[10]

1904年10月2日，日军动用11英寸口径的攻城炮轰击旅顺港，3号堡垒率先成了日军的主攻目标。某位要塞守军回忆称：“尽管这些炮弹中的大多数没有爆炸，但是，一旦爆炸，威力骇人。如此局面，加上我军从辽阳撤退的消息，使旅顺港‘阴云密布’。唯有迅速赶到的陆军才能拯救旅顺港，显然，我们的军队短时间内无法抵达。”[11]很明显，面对这种武器的攻击，守备部队无处可藏，只能用洋镐深挖岩层。[12]与此同时，一场针对俄国增援部队、来势汹汹的地雷战已经拉开了帷幕。

当日，库罗帕特金清楚地意识到，在旅顺港失守前，等待大山岩再次进攻设防的奉天阵地毫无意义，因此他决定由防守主动转向进攻。1904年9月25日，环贝加尔湖铁路竣工，增援部队增强了对满洲集团军的支援力度。库罗帕特金麾下9个军共有195000名兵力、678门火炮和32挺机枪。[13]9月中旬，进攻准备基本完成。此次的进攻目标是占领太子河右岸，即收复烟台矿区和辽阳。[14]据俄国情报机关反馈的信息可知，日本人在城市北部建立了两道防御阵线。战俘报告称，受酷寒气候影响，日军患病率攀升。[15]10月2日，俄军司令在下达命令时指出：“是时候迫使日军遵从我们的意愿了，因为现在满洲集团军足够强大……”[16]

在向部队宣读命令后，战士们满怀热情地接受了它，军中士气大振。[17]进攻的另一层用意在于协助友军解围旅顺港。[18]10月5日（俄历9月22日），库罗帕特金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清晨，我为胜利祈祷，恳求上帝赐我智慧。必须取胜，必须尽快搭救旅顺港。所有的英雄主义都有其局限性。守备部队已死伤14000人，弹药匮乏。为了将弹药和粮食送入要塞，我想尽了办法，但是奏效的仅是一小部分。”[19]当日，俄军发动进攻，在沙河开辟战局。心情愉悦的士兵们勇往直前，希望彻底告别那段撤退的历史。许多军官对胜利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若想取胜，必须得到增援部队的支援，同时补足损失惨重的指挥官队伍。[20]日本人也在怀疑，到最后他们也无法断定，俄军能否冒险抓住这次机会。[21]

大山岩手下共有15万兵力和648门火炮可供调配。库罗帕特金将部队分为两支队伍——西部集团和东部集团。按计划，前者应当以正面进

攻的形式牵制驻守铁路沿线平原地区的日军兵力，而后者应当绕过沙河上游山脉打击驻守山区的黑木部队，同时深入敌军后方挺进辽阳。由此可见，当时库罗帕特金正在谋划自己的“色当战役”。在计划实施过程中，主、客观障碍并存。由于缺乏对山区地形的研究并且没有可靠的地图，俄军无法选定理想的主攻方向。在陌生地区作战要求高级指挥官彼此密切联系并且具有一定的决策权，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俄军将领都不具备，于是这立即阻碍了这次军事行动的进程。[22]

最初，日军迅速撤离前线阵地，与主力部队会合。燃烧的日军仓库令参加这场战役的俄国士兵喜上眉梢。[23]进攻部队并未进行有力的追击。按照作战计划，俄军应巩固已占领的中间屏障（沙河），进攻幅度每昼夜不超过5千米。[24]与过去一样，地图的准备情况依旧十分糟糕，地图短缺的问题不仅困扰着作战部队，甚至也困扰着总参谋部。[25]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如此，10月8日俄军竟然再次控制了整个沙河河谷。当日，俄军的进攻部队意外地进入了日军的防御阵地。[26]山区的防御格外坚固。在缺乏山地炮、野战炮掩护的情况下，没有战区地图的西伯利亚步枪兵不得不服从总司令的指挥，在难以通行的地带顶着敌军的炮火发动进攻。由于身处峡谷，施塔克尔贝格的东部集团无法发挥自身的兵力优势，于是停止了进攻。借此机会，大山岩变更部署，发动反攻。10月10日至17日，沙河会战进入第二阶段。[27]

此时，俄军的西路集团在平原上遭到了两路日军的围攻。俄军开始撤退，此后库罗帕特金向施塔克尔贝格下达了撤退指令。在平原上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其中发生在双峰山和万宝山的战役尤为惨烈。该地区的山脉地形独特，支脉向西延伸，山丘高耸于平原之上。10月16日上午，日本第一军占领万宝山，[28]俄军沙河阵地进入日军炮击范围。10月17日，在5个团的支援下，普季洛夫（П.Н.Путилов）中将率领东西伯利亚第二步枪兵旅攻入万宝山，歼灭日本守军，缴获14门火炮和1挺机枪。日军死亡1500人，俄军伤亡近3000人。奉库罗帕特金之命，俄军并未乘胜追击。为了庆贺胜利，俄国人将此地命名为“普季洛夫山”[29]。

在反击中，日军动用了11英寸口径的迫击炮，因而大获全胜。无人料到，野战部队在战斗中，特别是在山区会使用攻城炮。重型炮弹直接摧毁了俄军的野战工事。[30]俄国的重型炮也加入了战斗，但是效果奇差。与其说炮击发挥了实际作用，不如说它带来了精神慰藉，因为日军并无人员伤亡。[31]在战斗持续的两周内，尤赫诺夫斯基步兵团伤亡格

外惨重。兵力损失招致愤怒情绪，华人成了宣泄的出口，但凡可疑便被当作间谍羁押起来。会战结束前，经常抓捕此类“间谍”。[32]他们的命运十分悲惨，通常无须任何审判便可随意处决。[33]俄军转入进攻后，阵地局势趋于平稳。俄、日两军精疲力竭。最终，俄军损失41351人，其中11000人丧生；日军损失20000余人，其中近4000人丧生。[34]在沙河会战中，俄军累计损失43门火炮和60辆弹药车。[35]

库罗帕特金的计划再次落空，进攻沙河并未缓解旅顺港的困境。在遭遇重创后，俄军总司令再次回归传统——观望策略，着重加强奉天的防御工事。1904年4月至6月，俄军曾在这里积极设防；在撤离辽阳后，防御活动变得更加活跃。[36]库罗帕特金谋划着在这里得到增援，凭借优势兵力对抗日军未来的进攻，并且在击退进攻部队后转入反攻。这一计划正中敌军下怀。在沙河会战中，日军已然出现了弹药短缺的问题。日本曾试图增加国内的弹药产量，但是并未成功，因此只能从国外订购。无论是完成订单还是向作战部队交付弹药都需要时间。[37]与此同时，日军也在积极加强位于奉天前方的防御阵地，修筑多处可部署多排步枪火力的堡垒，并且在其前方铺设障碍物。[38]库罗帕特金的观望策略帮助大山岩摆脱了弹药危机，同时加快了乃木希典攻占旅顺港的进程。

1904年10月23日和26日，尼古拉二世连续发布任职命令，任命库罗帕特金将军为陆军总司令，满洲集团军一分为三：步兵上将利涅维奇（Н.П.Линевич）领导第一集团军，比尔德林格（О.-Ф.К.Гриппенберг）领导第二集团军，骑兵上将考尔巴尔斯（А.В.Каульбарс）领导第三集团军。此前，三人分别担任阿穆尔沿岸军区、维尔纳军区和敖德萨军区的司令。[39]10月25日，阿列克塞耶夫被免去远东总督之职。离任前，他正在研究沙皇提出的在战争胜利后将中国东北并入俄国的计划（1905年，西伯利亚人口为5760169人[40]）。当时普遍认为，这种补偿已经足够了，因为日本定然不愿支付赔款。直至10月23日，阿列克塞耶夫依然坚持将赔款条件写入未来的和约。[41]

总督离任后，司令部正式接管了海、陆两军的指挥权，库罗帕特金成了俄国远东军事力量的唯一指挥者。日本军部再次敦促乃木希典尽快占领旅顺港。日本炮兵中队的活动日益活跃，针对内港的炮击精度也日益提升。10月9日至31日，日军11英寸口径的火炮41次击中俄舰，120

毫米和6英寸口径的火炮26次击中俄舰。10月30日，悬挂着红十字会旗帜的安加拉号医院船被日军2发直径为11英寸的炮弹击沉。[42]当日，日军向要塞发动第三轮进攻。英国驻守备部队参谋部的一名军官指出："对旅顺港的第三轮进攻，简直是一场可怕的悲剧。相比之下，之前的进攻只是摩擦与前奏。"[43]

在几周的时间里，日本军官和士兵一直在等待进攻俄国要塞的命令。[44]11月3日，"扶桑国"庆贺天皇诞辰，乃木的第三军奔赴前线，以期为天皇献礼。[45]10月30日，日军开始进行炮火准备。在炮战中，日军同时动用了摧毁长期防御工程的爆破弹，清空俄军步兵堑壕的榴霰弹以及破坏力强大、直径为280毫米的巨型榴弹。[46]当日，1800余颗直径为11英寸的炮弹向要塞飞去。在第三轮进攻中，日军的重型炮累计发射2万余颗炮弹。日方阵营的开炮场面骇人听闻。"数以千计的炮弹、数以万计的弹片爆裂开来，烟雾弥漫，整片区域仿佛披上了一层蓝色的毛毯，压制了所有明亮的色调，柔化了所有尖锐的线条，它们在山地峡谷中聚合，仿佛是傍晚的薄雾。缠结错杂的白烟、淡红色的尘柱时刻不停地闪烁着，在它们温柔的遮蔽下，在金色和铜色的掩映下，阳光不再刺眼，到处都是斑斓的色彩。"[47]乃木参谋部所在阵地的景象是："大火仿佛将山丘吞没了一般。"[48]

阵地上的幸存者留下了更多平淡的回忆。要塞的保卫者表示，日军的攻城炮使我们的防御工事变成了一堆"碎屑、砂土、铸铁、石块和死尸"[49]。尽管如此，令攻城部队吃惊的是，他们的突击部队遭遇了密集的射击，[50]步兵死伤极多。[51]他们仍未放弃进攻，经过两天血腥的搏杀，日军终于在距离俄国堡垒最近的两个要冲上站稳了脚跟。此后，他们不得不继续围困要塞。那块被占领的阵地从日军那里获得了一个颇为生动的名称——"血坡"[52]。11月27日，负伤的208名军官和5933名士兵在那里集合。尸体的清理工作和伤员的搜寻工作在当日未能结束。此时，乃木已经无力发动进攻。[53]第三轮进攻的失败不仅威胁到了大山岩部队的安危，并且东京认为，这可能打破海上力量的平衡。日本首都收到消息，从波罗的海派往远东的俄国舰队已经驶入印度洋。

[1]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6.Кн.4.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и действия морских команд при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сле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10 августа）1904 г.до конца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С.109.

[2]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Порт-Арту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2008.Т.2.С.432.

[3]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10.Ч.2.С.257.

[4] Побилевский Н.Дневник артурца...//ВС.1910.№5.С.45.

[5] Джемс Д.Осада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7.№1.С.210 ;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стории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 Порт-Артур (Дневник инженер-штабс-капитана В.В.Сахарова) .//ВС.1907.№3.С.247-248 ; Подгурский Н.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б осаде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9.№2.С.209 ;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10.Ч.2.С.270 ; 276 ; Menning , *Bayonets Before Bullets* , p. 168.

[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6.Кн.4.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и действия морских команд при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сле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до конца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С.115.

[7] Третьяков Н.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ВС.1909.№7.С. 128-129.

[8] Бортновский А.Ручные гранаты по опыту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ВС.1910.№1.С.90.

[9] Подгурский Н.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б осаде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8. №2.С.95-97.

[10] Костюшко.Ноябрьские бои...//ИЖ.1909.№3.С.257 ; Третьяков Н.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ВС.1909.№8.С.53.

[11] Бубнов М.Порт-Артур.//МС.1907.№3.С.6.

[12] Третьяков Н.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ВС.1909.№8.С.57.

[13] Menning , *Bayonets Before Bullets* , p. 179.

[1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4.Шахэ-Сандэпу.Ч.1.Сражение на реке Шахэ.С.46.

[1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4.Шахэ-Сандэпу.Ч.1.Сражение на реке Шахэ.С.76.

[16] Дневник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 (31 марта - 20 ноября 1904 г.) // КА.М.1935.ТТ.2-3 (69-70) .С.114.

[17] Врангель П.Н.В тылу японцев во время боев при Шахэ.//ИВ.1909.Том

118.Вып.11.С.544.

[18] Любицкий 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С.121.

[19] Дневник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 (31 марта - 20 ноября 1904 г.) // КА.М.1935.ТТ.2-3 (69-70) .С.114.

[20] Гусев С.Я.Из дневника корпусного контролера...//ВС.1910.№11.С. 225.

[21]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 , *The Russo-Japanese War* , vol. 1 , p. 433.

[22] Menning , *Bayonets Before Bullets* , p. 184.

[23] Врангель П.Н.В тылу японцев во время боев при Шахэ.//ИВ.1909.Том 118.Вып.11.С.550.

[24] Левин Н.М.Атака Путиловской сопки.Эпизод из сражения на реке Шахэ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М.1939.С.10-11.

[2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4.Шахэ-Сандэпу. Ч.1.Сражение на реке Шахэ.С.142.

[26]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196.

[27] Menning , *Bayonets Before Bullets* , p. 184.

[28] Левин Н.М.Ук.соч.С.12-13.

[29] Левин Н.М.Ук.соч.С.25-26.

[30] Гусев С.Я.Из дневника корпусного контролера...//ВС.1910.№12.С.181.

[31] Полторацкий А.Бой у Бенгсиху в цонце сентября 1904 г. , по японским сведениям.//ВС.1914.№4.С.93.

[32] Гусев С.Я.Из дневника корпусного контролера...//ВС.1910.№11.С. 231 ; 235.

[33] Оболенский В.В.Записки о войне...С.64.

[34] Menning , *Bayonets Before Bullets* , p. 184.

[3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4.Шахэ-Сандэпу.Ч.2.Зимний период кампании и сражение при Сандепу.С.17.

[36] Цабель С.А.Ляоян.Мукден.Тьелин (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и планы укреплений позиций) .//ИЖ.1907.№6-7.С.725.

[37]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146-147.

[38]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4.Шахэ-Сандэпу. Ч.2.Зимний период кампании и сражение при Сандепу.С.2.

[3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Из дневников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 и Н.П. Линевича.Л.1925.С.57；Куропаткин А.Н.Отчет...СПб.1906.Т.3.С.31.

[40] М-ч А.Племенной состав и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Сибири.//ВС.1907. №1.С.182.

[41] В штабе адмирала Е.И.Алексеева...//КА.М.-Л.1930.ТТ.4-5（41-42）.С.199-200.

[4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6.Кн.4.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и действия морских команд при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сле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до конца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С.150；164-165.

[43] Джемс Д.Осада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7.№3.С..

[44] Бартелетт Э.Ук.соч.С.179.

[45] Норригаард Б.В.Ук.соч.С.170.

[46] Бартелетт Э.Ук.соч.С.185.

[47] Норригаард Б.В.Ук.соч.С.171.

[48] Бартелетт Э.Ук.соч.С.185.

[49]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Порт-Арту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2008.Т.2.С.153.

[50] Норригаард Б.В.Ук.соч.С.172.

[51] Бартелетт Э.Ук.соч.С.188-189.

[52]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Порт-Арту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2008.Т.2.С.154.

[53] Джемс Д.Осада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7.№3.С.212.

23 第二太平洋舰队的决策、组建和起航及赫尔事件

在俄国舰队仍停泊旅顺港、日军尚未占领的情况下，海军增援部队的抵达速度事关重大，因为它很可能改变海上争霸的最终结果。然而，这场战争打得俄国措手不及，受时局影响，俄国难以把控时间因素。[1]与此同时，航程相对较短的路线方案（塞瓦斯托波尔—达达尼尔海峡—苏伊士运河—新加坡—旅顺港）也无法实现。苏丹拒绝放行俄国军舰，毕竟他不想帮助自己的宿敌。此外，君士坦丁堡拥有一个完美的借口：英国不断威胁土耳其，如若违反国际海峡制度，将封锁达达尼尔海峡。[2]

在此情况下，即使能够穿越黑海海峡，俄国军舰也不必指望穿越苏伊士运河。抽调波罗的海舰队部分军舰出征远东的筹备计划是海军上将斯克雷洛夫（Скрыдлов）在1904年4月动身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前提出的，因此海军少将罗杰斯特文斯基（З.П.Рожественский）成了该计划的落实者。舰队先锋——新型装甲舰尚未完工。[3]1904年8月23日（俄历8月10日），沙皇在彼得戈夫主持召开会议，会上首次将波罗的海舰队分舰队前往远东支援太平洋舰队的可行性问题提上议程，并且探讨了分舰队的组成结构和远征计划。

假如将目的地定为舟山群岛，远征舰队需要航行150天，耗费24万吨煤炭。[4]结果，事实证明正如罗杰斯特文斯基预料的那样，在增援部队抵达前，俄国既无法保全旅顺港，第一舰队也无法占领中国中立地区的领土，同时很难在太平洋上占领敌国岛屿用作临时基地。因此，他积极主张远征远东。1904年9月14日，计划通过审批，开始落实。[5]

9月30日（俄历9月18日），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大公在日记中写道："对于向远东派遣远征舰队，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此举对于实现战争目标、平息对舰队寄予厚望的社会舆论至关重要；另一种观点认为，派遣波罗的海舰队出征为时已晚且毫无意义，毕竟日本舰队的实力比我国舰队强三倍。"[6]顺便说一句，第二种观点是由亚历山大·米哈洛维奇大公提出的，他认为舰队"去那里简直就是找死"[7]，然而他的观点

并未受到重视。事实上，海军部之外的思想和情绪左右着决策的制定。[8]

当时，以克拉多（Н.Л.Кладо）为首的某些俄国海战理论家在新闻媒体上大肆鼓吹舰队远征的益处。他们认为，即使是陈旧的舰船，只要武装上了现代化的火炮，就能在海上与日舰对抗。[9]甲午战争结束后，克拉多曾对日本和中国海军将领犯下的错误进行过严肃的批评。1896年，他将日本胜利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优质的军舰、优秀的舰员、不间断的操练以及日复一日持续进行的射击演练，不仅涉及穿甲弹，还涉及爆破弹。[10]1904年，在《新时代》（Новоевремя）他化名“普里博伊”[11]发表观点。[12]

至于俄国舰队对现代化战争的准备程度，即使是盟国法国也未给出较高的评价。俄日战争爆发前夕，法国就对俄国舰队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性表示怀疑。[13]1882～1902年，5版毫无关联的造船计划相继出台，俄国舰队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14]由此出现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军舰的数量明显落后于质量，对此大家心知肚明，决定派遣舰队出征远东的那些人除外。“哎，我们对第二舰队确实没有信心，” 10月10日“绿宝石级”二等巡洋舰的驻舰医生指出：“尽管从外表上看它是如此威武。众所周知，新舰竣工十分仓促，其余都是当之无愧的老爷舰，早就应该退役了。它们从未经过真正的测试，从前就有一大堆毛病。”[15]

在4艘“博罗季诺级”装甲战列舰中，仅有1艘——亚历山大三世号经过测试（1903年夏），但是测试结果糟糕透顶。直至1904年夏季，甚至秋季，俄国才开始对“博罗季诺级”的其他军舰进行机械和火炮测试，1904年夏季尚未竣工的奥列格号一等巡洋舰、珍珠号和绿宝石号二等巡洋舰的待遇也是如此。在现代化军舰的航行与射击测试方面，只有奥斯利雅比亚号战列舰、阿芙乐尔号一等装甲巡洋舰和2艘用作巡逻舰的轻型巡洋舰——斯维特兰娜号和阿尔马兹号经过全面检测。[16]一半以上的军舰是过时的老爷舰，其上安装着不同体系、各种口径的老式舰炮。鉴于存在从国外采购战舰提升舰队实力的可能，从波罗的海起航的第二太平洋舰队将离港时间推迟了一个月。[17]

1905年4月，第二舰队指挥部高级信号副官斯文托尔热茨基（Е.В.Свенторжецкий）写道：“第二舰队是突击建成的，在役舰船要么刚刚竣工，要么陈旧过时，对于各式各样的舰船，舰队来者不拒，这不是什么秘密；舰员的招募同样未经专业筛选，这似乎是当时最好的办

法了。这些完全没做好准备的舰船就这样浩浩荡荡地拔锚起航了，舰队必须以最快的航速沿着最长的航线赶赴战区。在在建舰船陆续竣工并通过常规验收的同时，舰员也在瑞威尔[18]完成了短期战斗训练，然而这对于提升舰队实力没有明显的益处。海军上将关心的是，舰队何时才能彻底集结完毕、开拔出征。这项工作是在俄国各界不断的催促下进行的。当时，俄国社会普遍谴责季诺维·彼得洛维奇（Зиновий Петрович）不愿尽快出兵远东、解救旅顺港。但是，您必须承认，发出这种吆喝声的那些人完全不了解舰队的备战机制，他们不明白训练舰队需要多年的积累，而非两三星期的突击。舰员未经训练，舰船便是敌人可以轻松捕获的猎物。这正是俄国社会的糊涂之处，大街小巷都充斥着火速派舰出征的呼声。”[19]

从喀琅施塔得出发的舰队抵达瑞威尔后，舰员在那里接受了为期数周的紧急训练，训练成果显著，舰队已经可以勉强地机动了。某位军官回忆道："罗杰斯特文斯基白天黑夜都在工作，并且采取了一些专横甚至刚愎自用的措施。"[20]这些措施有时似乎不近人情，但是海军上将面对的是"一堆近期完工的舰船、一群没有出过海的新兵、一帮新上任的指挥官和军官"[21]。大多数问题无法及时解决，"战斗训练情况令人深感遗憾"。1904年9月11日，鹰号装甲战列舰的造船工程师在日记中写道："新舰的各个部门完全不在状态，舰员既未掌握战列舰的运行机理，也不能熟练操作武器装备。此时，尚未开始任何机动训练和作战演习。在舰队中，海军岸防步兵和从田间招募的新兵占了一半。他们对大海没有概念，也未听到过炮声，即便如此，四个月后，舰队必须进入太平洋战场，在那里与经验丰富的敌人搏杀。我们只能盼望艰难的远征能够成为训练舰员的最佳场合。"[22]

9月25日至10月2日，舰队进行6英寸口径和小口径的火炮实弹射击演练。舰队收到5210颗炮弹，而非预期的12000颗。[23]在离开瑞威尔前，战舰的大口径舰炮仅发射了两三颗炮弹。事实上，这不是演习，而是对舰炮的测试。即便如此，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艘战舰参与射击。从预备役部队招募的军官、士官和水兵不符合海军服役要求的占总数的1/3左右，其中大部分水兵是未经训练的新兵，他们1904年入伍，因而没时间训练。[24]

至于火炮训练缺陷，在远征途中也无法弥补，在每艘战舰上只配备了1个基数的重型舰炮弹药和1、2个基数的小口径舰炮弹药。[25]由于海

军部弹药储备不足，无法提高弹药基数。如果成功突围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整支舰队的弹药基数可能上调一半，但是受损舰船无法维修，因为在那里既无可容纳大型战舰的码头或机修车间，也无可替换受损舰炮的12英寸口径火炮。[26]在此情况下，派遣舰队是一次盲目的冒险，此次行动完全不具备支援旅顺港的先决条件。

显然，在旅顺港失守前，舰队无法抵达要塞附近；即便成功抵达，舰队在那里既无法找到安全的泊驻地——港内锚地随时可能遭到炮击，也无法为饱受日军炮火摧残并且不得不向要塞陆防阵地调派士兵和火炮的第一太平洋舰队提供有效的支援。另外，若无第一舰队的配合，实力虚弱的第二舰队难以支撑战局。在舰队驶离波罗的海前，第二舰队最英勇、最有经验的指挥官断言远征必败——补给、武器、物资和组织方面的缺陷太过明显。[27]

罗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只能发挥一个作用：在海上招摇过市，向日本示威，逼迫日本缔结和约，但前提是俄国陆军取得胜利。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舰队需要基地，哪怕只是临时基地，最初海军上将对此极为坚持，但是显然这个要求无法达成。事实上，对于远征的胜利，罗杰斯特文斯基本人也不抱太大希望。他之所以执行这项任务，是因为他无法指出它是不可能完成的。[28]10月9日至10日（俄历9月26日至27日），沙皇在瑞威尔锚地对即将出征的舰队进行了检阅。此后，舰队转移到了亚历山大三世港（利巴瓦）。[29]1904年10月15日，俄国战舰驶离利巴瓦，正式出征。总而言之，尽管面临着一系列困难，但是军官们依旧信心满满、斗志昂扬。[30]此次航行的参与者指出：“一支由各种类型、不同舰龄和规格的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在既无海军基地，也无煤炭补给据点的情况下，敢于开启如此漫长的征程，这在全世界的舰队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31]

舰队必须绕过欧洲和非洲（因为无法进入苏伊士运河）航行18000海里才能抵达目的地，在此期间需要消耗50万吨煤炭。由于没有自己的中转基地，俄国舰队只能在中立港（以法国的港口为主）驻泊。法国作为中立国家，无法向俄国舰队提供煤炭补给，后来德国的美洲汉堡公司成了舰队的煤炭供应商。[32]航行之初，受机组人员经验不足的影响，舰队以7～8节的航速行进，实际上舰队的正常航速可达14～15节。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于胜利的前景深信不疑。10月19日（俄历10月6日），他对威廉二世说道：“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战争俄国必将坚持到底，直到最

后一个日本人被赶出满洲。只有这样，两个好战的国家才能进行和谈。愿上帝保佑我们。”[33]

10月19日，在旗舰上升起了海军将旗——罗杰斯特文斯基晋升为海军中将、侍从将军。[34]在离开丹麦海峡时，舰队提升了防御等级。6月有消息称：日本可能出动鱼雷艇偷袭舰队。此时，海军部已对贝尔特海峡和斯卡格拉克海峡展开监视。[35]航海业务长警告属下航行途中可能遭遇战斗，极有可能是鱼雷袭击。[36]此时，时常传出英国可能协助日本舰队进入欧洲水域的传言，舰队指挥部绷紧了神经。[37]

10月21日至22日夜间，在英国北海赫尔海区的多格尔沙洲附近，舰队误将英国的拖网渔船当成了日本的鱼雷艇并且对其发动进攻，史称“赫尔事件”。[38]10月21日傍晚，舰队驶入能见度不足3链[39]的浓雾海域，即便如此，舰队继续以正常航速前进。早晨天气转好，但是紧张的氛围仍未得到缓和，司令下令提防4艘没有灯光的“鱼雷艇”。[40]

在离开丹麦水域前，罗杰斯特文斯基收到了从白海向波罗的海航行的巴坎号军用运输舰指挥官的报告。报告称，在挪威一处荒芜的峡湾附近，他碰到了几艘未悬挂任何旗帜、形迹可疑的鱼雷艇。舰队司令立即下令时刻提高警惕，做好退敌准备。在舰队启程时，跟随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号和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同出海的堪察加号维修船因发生机械故障而落在了后面，落后大部队10海里左右。[41]

21：00～23：00，维修船发射遇袭信号。维修船表示，敌方的鱼雷艇发动袭击，打掉了船上几门75毫米的火炮。在收到堪察加号的突袭报告时，3艘恰好截断舰队航道的单筒轮船出现在了舰队的视野。[42]堪察加号的信号几乎在同一时刻中断了，这被舰队当成了维修船失事的证据。渔民点燃了照明弹，然而战列舰的信号兵却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四管鱼雷艇。紧绷的神经几乎误导了所有人，俄国舰队相信，有人以某种方式发起了进攻。[43]

挡在俄国舰队前面的渔船正在拉网，无法迅速收网或放网，因此无法快速驶向一侧。结果，俄国军舰开始从船舷两翼向四面八方开火。短时间内，鹰号装甲战列舰的炮手就已打出了500发75毫米和47毫米直径的炮弹和20发6英寸直径的炮弹。在恐慌中，机枪甚至也开火了。[44]渔民们拉起了足以证明他们是平民的船帆，然而这也无济于事。[45]站在舰炮旁边的是一群毫无经验的士兵，他们首次面对如此场景，内心的恐

惧可想而知，只有狂打猛攻才能消除自己的恐惧。至于军官们的停火命令，他们没能立刻听到。[46]结果，一艘拖网渔船中弹沉没，一艘中弹受损，两名渔民遇难，几名渔民负伤。在炮火中，俄国舰船遭到误伤，特别是阿芙乐尔号屡次中弹。[47]10月21日上午，舰队发现了5艘鱼雷艇的踪迹，于是立即拉响警报、准备退敌，但是很快发现那是自己人，因此并未开炮。[48]

英国的反应极为激烈。对落水渔民见死不救的事实影响极为恶劣。英国舰队开始招募预备役部队。应伦敦的要求，俄国舰队被扣留在了西班牙的维哥港。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和大西洋舰队（本土舰队）聚集在直布罗陀海峡。[49]欧洲期待着宿敌——英国与俄国之间的碰撞。对于预期的碰撞，巴黎坐立难安。巴黎担心，俄国的实力被进一步削弱将迫使法国向德国低头并且任其摆布。柏林立即邀请彼得堡进行正式缔结同盟关系的谈判。威廉二世幻想着建立一个大陆反英联盟。然而，德国的提议遭到了俄国的拒绝，在未经法国同意的情况下，俄国拒绝与德国达成协议，俄法联盟得以保全。与此同时，在促使伦敦和平解决“赫尔事件”方面，法国也付出了不少努力。[50]这些努力是及时且富有成效的，加之英国海军部认为，舰队尚未做好积极行动的准备，[51]因此英国的行动止于威胁。

已经背负了一场战争的尼古拉二世也不愿冒险，因此他立即向爱德华七世寄送了一封私人信函。沙皇对此事深表遗憾，提议将事件移交海牙国际法庭审理裁决。伦敦同意展开独立调查（在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和奥匈帝国海军上将的主持下进行[52]）并将此案交由仲裁法院裁决。联合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显示，遭遇俄国舰队炮击的还有位于渔船附近的阿芙乐尔号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号巡洋舰，它们也被当成了日本舰船；不分青红皂白地开火是俄国舰队炮兵训练不利的恶果。[53]委员会一致认定，当时在那片海域不存在日本或其他国家的鱼雷艇；罗杰斯特文斯基确实收到了要求他提高警惕的情报。[54]仲裁法院判决俄国政府支付65000英镑（约合60万卢布）的赔款。[55]10月28日，在维哥港的罗杰斯特文斯基向自己的属下宣读了沙皇的电报：“在精神上，朕与您和我所珍视的舰队同在。我相信，误会很快就会消除。全俄罗斯满怀信心、充满希望地看向你们。尼古拉。”[56]这个消息并未激发水兵们的热情，但是很快他们就能出海了。1904年12月28日，俄国舰队抵达马达加斯加。此时，旅顺港的命运已成定局。

[1]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выяснению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Цусимского боя.//МС.1917.№9.С.1.

[2] Fuller，*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p. 402.

[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6.Поход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С.6-7.

[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6.Поход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С.11.

[5]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выяснению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Цусимского боя.//МС.1917.№9.С.7-8.

[6] Из дневника Константина Романова.//КА.М.-Л.1930 Т.6（43）.С.96.

[7] Из дневника Константина Романова.//КА.М.-Л.1930 Т.6（43）.С.94.

[8] фон Нидермиллер А.Г.Ук.соч.С.48.

[9] Казьмичев Б.Вторая 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эскадра.//Возрождение. Париж. 1964.№155.С.52.

[10] Кладо Н.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на море во время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СПб.1896.С.2-3；7.

[11] 俄语“Прибой”，意为惊涛拍岸。——译者注

[12] Кладо Н.Л.Современная морская война.Морские заметки 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СПб.1905.Приложение II.Мор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Прибоя в газете «Новое Время» с 29-го января по 14-е апреля.С.310-378.

[13] Luntinen，*French Information on the Russian War Plans*，p. 143.

[14] Черкасский М.Военные идеи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русского и японского флотов в 1903-1905 гг.//МС.1914.№7.С.67.

[15] Кравченко В.［П.］Через три океан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рача о морском походе 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ую войну 1904-5 г.СПб.1910.С.11.

[16]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выяснению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Цусимского боя.//МС.1917.№7.С.4.

[17]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выяснению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Цусимского боя.//МС.1917.№9.С.8.

[18] 今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译者注

[19] До Цусимы.//КА.М.1934.Т.6（67）.С.195.

[20]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В.Витгефта.//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60.№4.С.117.

[21]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В.Витгефта.//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60.№4.С.118.

[22] Костенко В.П.Ук.соч.С.142.

[2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6.Поход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С.20.

[24]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выяснению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Цусимского боя.//МС.1917.№7.С.6-7.

[25]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выяснению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Цусимского боя.//МС.1917.№7.С.8.

[26]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выяснению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Цусимского боя.//МС.1917.№9.С.11；15.

[27]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выяснению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Цусимского боя.//МС.1917.№7.С.7.

[28] Коковцов В.Н.Из моего прошлого...М.1992.Т.1.С.72.

[2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6.Поход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С.22-23.

[30] Чегодаев-Саконский А.На «Алмазе» от Либавы через Цусиму — в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3.

[31] До Цусимы.//КА.М.1934.Т.6（67）.С.196.

[32] McElwee，*The Art of War*，p. 293.

[33] Переписка Вильгельма II с Николаем II.М.1923.С.69.

[34] Чегодаев-Саконский А.Ук.соч.С.6.

[3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6.Поход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С.26-28.

[36] Чегодаев-Саконский А.Ук.соч.С.4.

[37] Семенов В.［И.］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252.

[38] Rosen，*Forty Years of Diplomacy*，vol. 1，p. 250.

[39] 1链＝0.1海里或185.2米。

[40] Чегодаев-Саконский А.Ук.соч.С.6-7.

[41] Казьмичев Б. [П.] Гулльский инцидент.//Возрождение.Париж.1958. №75.С.45.

[42] Семенов В. [И.] 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252-255.

[43]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В.Витгефта.//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60. №4.С.119-119.

[44] Костенко В.П.Ук.соч.С.196-200.

[45] Гладких С.А.Забытые герои.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в биографиях , дневниках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военных моряков. СПб.2013.С.179.

[4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6.Поход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С.33.

[47] Семенов В. [И.] 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257 ;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выяснению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Цусимского боя.// МС.1917.№7.С.9.

[48] Чегодаев-Саконский А.Ук.соч.С.9.

[4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6.Поход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С.39-41.

[50] Тэйлор А.Дж.П.Ук.соч.С.431-432.

[51] Романова Е.В.Путь к войне...С.50.

[52] Rosen ,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 vol. 1 , p. 251.

[53] Таубе М.А.«Зарниц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трагической судьбе пред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оссии (1900-1917) .М.2007.С.52-71 ; 76-79.

[5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6.Поход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С.47-48.

[55] Казьмичев Б. [П.] Гулльский инцидент.//Возрождение.Париж.1958. №75.С.49 ; Massie , *Dreadnought* : *Britain* , *Germany 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 , p. 596.

[56] Семенов В. [И.] 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270.

24 旅顺港的结局：第一太平洋舰队的覆灭

1904年11月26日，乃木希典对旅顺要塞发起了第四轮强攻，当日突击队被彻底击退。随后，他组建了一支2600人的敢死队发动夜袭。在80名水兵和机枪炮火的反击下，进攻再次失败。在短短两天的战斗中，日军损失4500人，俄军损失了1500人。[1]此时，日军将主攻方向调整为高山阵地，英勇的特列季亚科夫上校率西伯利亚步枪兵团镇守此地。经过一个月，此地的防御明显加强：使用钢轨、半英寸厚的铁板、2沙绳（2.32米）厚的填充土层加固掩蔽工事。[2]此类防御工事完全能够承受6英寸口径的火炮攻击，然而11英寸口径的火炮却能轻易穿透它们。永久性混凝土防御工事也是如此。6英寸直径的炮弹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其击碎，随后只能通过土方回填的方式完成修复。现在，近一米厚的混凝土顶一旦被击中，也将四分五裂。[3]在日军攻城过程中，11英寸直径的炮弹（士兵们将其称为“机车弹”）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日军在旅顺港周围部署了474门火炮，其中包括18门11英寸口径的迫击炮，最远射程可达10千米，炮弹重达220千克。日军向旅顺港累计发射了150万颗炮弹，其中包括35000颗11英寸直径的炮弹。[4]所幸，日军发射的11英寸直径的炮弹并未全数引爆。在更换了炮弹中的定距引信后，日军将炮弹投掷到了俄军11英寸口径的海防迫击炮后方。[5]

日军继续猛攻高山阵地，但凡能够打击阵地的武器几乎全部启用。[6]1904年11月27日至29日，炮火极为猛烈，日军每日发射800～1000颗此类炮弹，这足以摧毁山岩上的防御工事，“半间农房那么大的”巨型花岗岩被炸得掉了下来。[7]11英寸直径的炮弹贯穿3.5米厚的岩层。石块碎渣发挥了额外的破坏作用。[8]在日军的炮火下，阵地犹如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山顶硝烟弥漫、遮云蔽日，时常闪现爆炸的火光。[9]最终，山上的防御工事被摧毁了，旅顺港核心阵地守军的尸体残骸堆满了废弃的掩体和堑壕。[10]日军的炮火摧毁了22座掩蔽工事，破坏了无数堑壕。[11]那时，俄国士兵将这种重炮炮弹称为“大炮弹”[1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说法逐渐为人们所知。

11月28日，日军再次开火。29日清晨，日军几乎占领了整座高山，随之而来的是俄军猛烈的反攻。上午，山上的日军被清理一空。30日上午，炮击和强攻再次上演，战斗异常顽固。[13]防守部队遭受了极大的

损失：海军部队死伤1404人；[14]东西伯利亚第五步枪兵团损失14名（共23名）军官、17名（共26名）代理准尉、[15]1251名士兵。团长负伤，同时遭遇二次震伤。[16]无论付出了多么惨重的损失，日军依旧坚定无畏、舍生忘死地扑向阵地。[17]守军背后并无增援部队。旅顺港的形势越发艰难，最终斯捷谢利调派600余名医务人员支援前线。[18]

12月2日，高山阵地沦陷，400余名守卫者长眠于此。[19]后来，俄军未能夺回高山阵地。东西伯利亚第四炮兵营营长伊尔曼（В.А.Ирман）中将亲自率队发动反攻。日军8次击退反攻部队。[20]在枪林弹雨中，俄国步兵无法突围登顶。战斗期间，防御部队损失近5000人，日军损失7500人。[21]高山阵地失守后，孔德拉坚科说道："好吧，现在的旅顺港已经危在旦夕了。"[22]当日，日军在高山阵地上部署了一处瞭望台，立即被俄军的炮弹击中并炸毁。此后几天，日军修复阵地。12月5日，乃木希典决定锁定目标、实施精准打击。[23]次日，俄国舰船遭遇炮轰，高山阵地与攻城炮保持电话通信，实时校准火力方向。[24]

城市和港口完全暴露在了日军的火炮下。11英寸直径的炸弹陡然落下击穿甲板无数，随后一声巨响造成极大破坏。[25]1904年12月6日，要塞和舰队正在缓慢地走向灭亡。[26]那日，列特维赞号被击沉——14颗11英寸直径、6颗6英寸直径的炮弹击中舰体。次日，佩列斯维特号战列舰、胜利号战列舰、狄安娜号巡洋舰被击沉。俄国的舰船一艘接一艘地或沉没，或失能。[27]12月8日，斯捷谢利主持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将1905年1月14日（俄历1905年1月1日）定为要塞防御的最终期限，前提是"未发生显著改变要塞围困状况的特殊事件"。[28]与此同时，要塞的处境日益恶化。

在所有俄国舰船中，只有由埃森（Н.О.фон Эссен）中校统率的塞瓦斯托波尔号装甲巡洋舰12月9日驶入外港准备突围。[29]面对舰队残部骇人的伤亡数据，维伦[30]只能说："做你们想做的吧！"[31]直到12月16日，塞瓦斯托波尔号才击退了日本鱼雷部队的围攻。在此过程中，日方出动了由30艘鱼雷艇、2艘布雷舰和3艘鱼雷炮舰组成的10支鱼雷艇部队，其中两艘鱼雷艇中弹沉没。日本人发射了42枚鱼雷，2枚命中，分别击中舰首和舰尾。突围出海的计划化为泡影，塞瓦斯托波尔号唯有自沉。[32]俄国太平洋舰队就这样灭亡了。

12月15日，11英寸直径的重炮击中二号堡垒，前往堡垒讨论作战计划、颁发奖励的孔德拉坚科中将当场阵亡。爆炸发生时，会议正在进

行，与将军一同遇袭的还有要塞前线参谋部的17名骨干军官——9人当场毙命，7人负伤，1人重伤不治随即身亡。孔德拉坚科的逝世令防御部队深感绝望。显然，他是无可取代的。[33]即使并无此事，要塞仍旧死气沉沉。市内所有的行动必须在夜晚进行，日军的机枪火力已经覆盖了城市的大部分区域。旅顺港医院拥挤不堪、人满为患，维生素C缺乏病泛滥，痊愈的病人越来越少，治疗疾病的药物几近枯竭。[34]

12月22日，斯捷谢利向库罗帕特金拍发电报请求立即支援："旅顺港已经没有多少健康人了。11英寸炸弹摧毁了一切，无论是堡垒还是要塞内部设施都未幸免。舰队的舰船被尽数击沉。我们防御了11个月，并未得到任何支援。我没收到您的消息。日军什么都不放过。我甚至不知道陆军究竟在哪里。现在我请求陆军驰援，我再次重申，情况万分紧急。"[35]1905年1月1日（俄历1904年12月19日），日军占领鹰巢阵地——优势高地。日军在此对俄军第二道防线展开侧翼进攻。傍晚，连续数日遭受日军重炮摧残的俄国守军开始撤离库罗帕特金眼镜堡。俄军被迫撤至第三道防线，即最后一道防线，此处并未设防。此时，日军可锁定全市，实施精准打击。守军部队剩余兵力1.35万～1.4万人，防御范围18.5俄里，粮食储备至多维持一个月。

要塞失守已成定局。1月1日，斯捷谢利向乃木提出谈判邀请，商定投降事宜。海军上将维伦提前收到消息，因此有时间炸毁舰船。此后，端正号鱼雷艇被派往芝罘，艇上暗藏秘密文件和各舰旗帜，鱼雷艇突围成功。[36]次日，日军总司令做出答复，表示同意谈判。1905年1月2日，关东筑垒地域司令、侍从将军斯捷谢利向军事委员会宣布了自己的投降计划。于是，守军摧毁了所剩无几的物资、武器和防御工事，爆炸声陆续响起，火势蔓延开来。干船坞连同此前中弹在此停泊的舰船、维修车间、港口设施均被炸毁。[37]三日后，俄国签署投降文件。[38]

该决议令俄军将士愤怒不已，某些将士企图搭乘驳船逃跑，然而沿岸的逆风吹灭了他们逃跑的希望。他们没有坚持抵抗立场，因为看不到成功的希望。[39]基于客观事实，应当指出，要塞的防御潜力所剩不多。1905年初旅顺港的一位缔造者写道："旅顺港英勇的捍卫者们，他们的付出远超他们的义务，他们的行动可圈可点，甚至值得期待。要塞虽然沦陷了，却为维护我军野战部队的利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40]1905年1月5日，斯捷谢利和乃木正式会面，在彼此尊重的氛围下，双方互相恭维并发表保证性声明。[41]

投降后，斯捷谢利致电沙皇："臣斗胆向陛下汇报，除神职人员、医务人员和官员外，要塞全部守军沦为战俘。签署约据的军官及其仆从和残障人士获准回国。双方代表团已缔结协议：陆军少将雷斯（Рейс）、海军上将先斯诺维奇（Щенснович）代表我方。签署协议当日，已从阵地交出8000名守军；已从医院、医疗站交出4000人（有能力、有意愿转移的人员）；非战斗人员、辎重兵和卫生员1300人；边防军、工程兵、野战炮兵和要塞炮兵3500人。目前，在医院休养的伤员、病患共计13135名，其中包括近300名截肢伤员；军官、代理准尉和官员164人。上述指标仅涉及陆地部队。红十字会暂时驻守旅顺港。"[42]投降文件第7款规定：在签署一份保证不再参与这场战争的特殊文件后，军官可以离开要塞、回归祖国。签署约据的军官可以带走自己的勤务兵。[43]在收到斯捷谢利的电报后，尼古拉二世立即做出答复："准许每位军官依从个人情况自主选择，或签署不再参与本战争的保书返回俄国，或与士兵共进退。感谢英勇的守军和您的精彩战斗。"[44]

在围攻过程中，日军累计损失10.5万人，或死、或伤、或患病。在俄军投降时，乃木麾下仅有9.7万人。[45]自第一颗炮弹发射以后，旅顺港攻守战持续了328天。俄国陆军1.3万人战死、病死，舰队损失1.7万兵力。防守注定失败。投降时，俄军有1.35万～1.4万兵力，患病比例接近40%，与医院中的伤员、病患人数大致相同。日军在旅顺港缴获546门火炮（不包括舰炮）、32252支步枪、82670枚炮弹（其中包括许多与俄国火炮型号不符的中国老式炮弹）、3000千克火药、250万发子弹、1920匹马以及8万吨煤炭、粮食储备，可满足守军23～48天需求的各类食品。[46]舰队的剩余舰船在浅湾自沉，每逢退潮，舰体就会露出水面。自1905年8月起，日本人开始打捞舰船并且将它们运回本国基地修缮，很快，翻修完毕的俄国舰船被编入日本舰队。[47]

在要塞防御的最后几天里，库罗帕特金决定在日军后方组织一场大规模的破坏行动。1905年1月3日，他下令准备对营口港发动骑兵突袭。[48]俄国情报部门称，日军在此设有巨型仓库，但是俄方并未掌握准确数据，因此只能对仓库储量进行推测。[49]为了实施突袭，成立了一支以米申科中将为首的突击队。[50]原东清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助理、曾参与镇压义和团并因此获得圣乔治三等功勋章的米申科是一名"满洲通"[51]。他骁勇善战、身强体壮、意志坚韧，不惧损失和责任，深受下属爱戴。[52]突击队在4天内组建完成，从俄国三大陆军军团的骑兵部队集中抽调了71支哥萨克部队和骑兵连、22门火炮和4挺马克沁机枪。[53]

与许多步兵部队一样，骑兵部队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各队人马在加入突击队后无法互相融合，零散的哥萨克部队和骑兵连取代兵团出现在队伍之中，而他们的指挥官却在执行一些毫无意义的任务。[54]现在，必须将四分五裂的骑兵部队重新融为一个整体。在指挥官被告知行动目标前，他们的下属部队已经对此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四天内创建了若干个新师团，凡是能调用的力量，其中包括独立的哥萨克边防部队、骑兵志愿军部队几乎都派上了用场。[55]某些骑兵部队，如顿河哥萨克第四支队精神振奋，对于突袭的前景充满信心。他们一路上，甚至在奉天的街道上都在讨论如何实施突袭、朝哪个方向进击等问题。军官、报社通讯员纷纷向米申科提出请求，要求加入他麾下的部队。[56]

库罗帕特金积极干预队伍的组建进程。第二集团军参谋部成员诺维茨基（В.Ф.Новицкий）表示："作为对上述命令的补充，23～25日还收到了总司令部下达的数条命令，其内容涉及米申科将军麾下多支骑兵部队的组织与补给问题，如从科萨戈夫斯基（Косаговский）中将的队伍中抽调骑兵、辎重运输以及粮食储量、营口和海城—盖州地区的地图问题。在阅读这些文件时，你将惊讶地发现，统领25万人的军队首领竟然醉心于这些琐碎的行政命令，甚至过问营团、哥萨克部队和志愿兵部队的分配问题，位高权重的军队领袖竟然将自己对细枝末节的想法强加于集团军司令和部队指挥官。"[57]然而，对于某些"琐事"特别是部队并未做好长线袭击的准备，总司令并未过问。例如，在部队中没有日语翻译，因此缴获战利品、抓获战俘完全没有意义，文件无法阅读，战俘无法审问。[58]

突袭目标营口的情报收集工作组织不力。俄方并未掌握日军兵站的确切信息，守军人数从三四百到四五千不定。事实上，在米申科率兵出击前，日军将守备部队增至1200人。[59]同行的辎重运输部队准备也不充分：提前征集的驴骡大多瘦弱不堪，驮具大多质量低劣。[60]1月7日，米申科宣布发动突袭，1500个驮包随军上路，每名骑手还需随身携带2天的口粮。结果，突击队每日平均行进31俄里，这与步兵急行军的速度基本持平。此时，侦察兵日行七八十俄里。行军过程中，地图问题再次凸显。在骑兵手中，几乎没有一张地图是完全精确的。他们手中的地图只标注了大型居民点，周边区域一片空白。日军的补给路线是大连—大石桥—辽阳，而米申科部队的袭击目标却是位于补给路线一侧且已上冻的营口港。某位参与者称，由于管理混乱，突袭变成了"爬行"。

如此行军，何谈出其不意，何谈克敌制胜。尽管米申科确定了摧毁城市和港口的目标，但俄国骑兵无法占领营口。按照惯例，大约1/4的兵力参与进攻，其余兵力捍卫后方、保护物资。突袭失败，部队被迫撤退。在整个突袭过程中，骑兵部队竟未摧毁该区域四座桥梁中的任何一座（骑兵连里的工兵被当作普通的骑兵差遣），他们的成就可归结为：歼灭了日军的几支后方中队（至多3个中队），摧毁了600架四轮大车和3.5万普特的补给物资，摧毁了若干所军需仓库，策划两列火车相撞事故，损毁铁路路基和电报柱——日军在6小时内完成抢修。突袭唯一的亮点在于撤退，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俄国骑兵成功脱身。当时，营口在押俘虏234人，在此次行动中19人获救。在突袭过程中，米申科损失了40名军官、361名士兵。[61]突袭行动构思良好，但执行不力。俄国骑兵行动缓慢，英国驻日军观察员甚至猜测，米申科部队与步兵同行。[62]关于突袭，日本人在报告中写道：“这支部队想必已是疲惫不堪。”[63]

1905年1月14日（俄历1月1日），库罗帕特金向沙皇拍发电报。在电报中，他瞒报俄军损失（军官3死、11伤，士兵15死、59伤），极大地美化了突袭成果：“今日已收到我军骑兵部队的两份行动报告。12月28日晚间，击杀敌军一个半步兵中队和半个骑兵中队；只因天色变暗，才使少数日军得以分散逃脱。12月29日夜间，我方侦察部队破坏铁路路基、切断电报线路、颠覆两列蒸汽机车。”[64]无论如何，此次行动无法为反攻创造有利条件，突袭的结果不仅打击了俄军的士气，还以一种极不光彩的方式瓦解了他们对司令部的信任。

[1] Menning，*Bayonets Before Bullets*，p. 170.

[2] Третьяков Н.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ВС.1909.№9.С.43.

[3] фон Шварц А.Влияние борьбы за Порт-Артур...//ИЖ.1907.№2.С.253；То же.//ИЖ.1907.№4-5.С.562.

[4] Menning，*Bayonets Before Bullets*，p. 169.

[5] фон Шварц А.［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10.Ч.2.С.306.

[6] Джемс Д.Осада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7.№4.С.209-210.

[7] Костюшко.Ноябрьские бои...//ИЖ.1909.№3.С.285.

[8] Третьяков Н.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ВС.1909.№9.С.43.

[9] Джемс Д.Осада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7.№4.С.211.

[10] Третьяков Н.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ВС.1909.№10.С.54.

[11]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6.Кн.4.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и действия морских команд при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сле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до конца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С.225.

[12] Третьяков Н.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ВС.1909.№11.С.64.

[13] фон Шварц А.［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10.Ч.2.С.462-473.

[1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6.Кн.4.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и действия морских команд при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сле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до конца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С.236.

[15] 代理准尉，1904年的上士军衔。

[16] Костюшко.Ноябрьские бои...//ИЖ.1909.№5.С.584-585.

[17]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6.Кн.4.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и действия морских команд при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сле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до конца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С.224.

[18] Костюшко.Ноябрьские бои...//ИЖ.1909.№3.С.292；313.

[19]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The Russo-Japanese War*，vol. 2，p. 405.

[20] Костюшко.Ноябрьские бои...//ИЖ.1909.№5.С.569-573.

[21] фон Шварц А.［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10.Ч.2.С.488-490.

[22] Костюшко.Ноябрьские бои...//ИЖ.1909.№5.С.574.

[23]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10.Т.2. Совмест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и армии по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167.

[24] Бартелетт Э.Ук.соч.С.282.

[25] Подгурский Н.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б осаде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9. №2.С.212.

[26] Костюшко.Ноябрьские бои...//ИЖ.1909.№3.С.313.

[27]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6.Кн.4.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и действия морских команд при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сле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до конца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С.247；251-256.

[28] К Порт-Артурскому судебному процессу.Журналы совета обороны крепости Порт-Артур.//ВС.1908.№2.С.313.

[29]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Порт-Арту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2008.Т.2.С.611-614.

[30] 俄国海军上将，1904年8月接替乌赫托姆斯基担任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译者注

[31]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6.Кн.4.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и действия морских команд при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сле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до конца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С.257.

[32] Джемс Д.Осада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7.№4.С.211；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 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09.Т.1.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в Порт-Артуре.С.275-288；Денисов Б.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торпедного оружия...//МС.1935.№11.С.14.

[33] Третьяков Н.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ВС.1909.№11.С.59；Побилевский Н.Дневник артурца...//ВС.1910.№8.С. 69；фон Шварц А.［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10.Ч.2.С.530.Берг О.Ф.Смерть генерала Кондратенко.//РС.1914.Том 157.Вып.1.С.173-174.

[3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6.Кн.4.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и действия морских команд при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сле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до конца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С.295-296.

[3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6.Кн.4.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и действия морских команд при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сле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до конца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С.304.

[36] фон Шварц А.［В.］，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10.Ч.2.С.614-617；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6.Кн.4.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и действия морских команд при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сле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до конца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С.330-332.

[37] Джемс Д.Осада Порт-Артура.//ВС.1907.№4.С.223 ; Побилевский Н.Дневник артурца...//ВС.1910.№8.С.75 ; Падейский С.Л.Порт-Артур.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на Куропаткинском люнете.//ВС.1910.№11.С.88-90 ;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10.Т.2. Совмест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и армии под Порт-Артуром.С.174-176 ;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6.Кн.4.Действия флота на южном театре и действия морских команд при обороне Порт-Артура после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в Желтом море 28 июля (10 августа) 1904 г.до конца осады крепости.С.334-335.

[38]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СПб.1908.Т.1.С.417-420.

[39] Третьяков Н.5-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полк...//ВС.1909.№12.С.66-67.

[40] Тимченко-Рубан Г. [И.] Нечто о Порт-Артуре и вообще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репостной обороны.//ВС.1905.№3.С.89.

[41]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343.

[42]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11 (24) января 1905 г.№7.С.1.

[4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СПб.1908.Т.1.С.418-419.

[4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СПб.1908.Т.1.С.424.

[45] Норригаард Б.В.Ук.соч.С.260.

[46] Иммануэль [Ф.] [Б.] Ук.соч.СПб.1906.Вып.3.С.92 ; 94 ; Свечин А. [А.]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Ук.соч.С.315 ; 320 ; фон Шварц А. [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 Оборона Порт-Артура.СПб.1910.Ч. 2.С.617 ; 619.

[47]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10.Т.4.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и овладение о.Сахалином. С.223-224.

[48] Новицкий В.Ф.От Шахэ к Мукдену (от наступления - к обороне) .Критик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зимнего периода манчжурской кампании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Приложение №22.С.75.

[49] Вадбольский.Набег на Инкоу.//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 СПб.1907.Ч.2.С.3.

[50] Новицкий В.Ф.От Шахэ к Мукдену (от наступления - к обороне) .Критик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зимнего периода манчжурской кампании 1904-1905 гг.СПб.1912.Приложение №22.С.75.

[51] Разведчик.1908.№921.С.409.

[52] Вадбольский.Набег на Инкоу.//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 СПб.1907.Ч.2.С.5-6.

[53] Свечин А. [А.]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Ук.соч.С.320.

[54] Вадбольский.Набег на Инкоу.//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 СПб.1907.Ч.2.С.48.

[55] Свечин А. [А.]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Ук.соч.С.320.

[5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4.Шахэ-Сандэпу.Добавление к части второй.Набег на Инкоу.С.5.

[57] Новицкий В.Ф.Ук.соч.С.46.

[58] Деникин А.Майский набег генерала Мищенки.//ВС.1906.№8.С.18 ; 23.

[5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4.Шахэ-Сандэпу. Добавление к части второй.Набег на Инкоу.С.55.

[60] Вадбольский.Набег на Инкоу.//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 СПб.1907.Ч.2.С.16.

[61] Караульщиков Л.А.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армии к войсковому саперному делу.//ИЖ.1906.№1-2.С.83 ; Деникин А.Майский набег генерала Мищенки.//ВС.1906.№8.С.35 ; Усов А.По поводу статьи А.Деникина «Майский набег генерала Мищенко».//ВС.1907.№1.С.38 ; Филимонов Н.Участие 4-й Донской казачье дивизии в набеге на Инкоу.//ВС.1908. №12.С.126-132 ; McCullagh , *With the Cossacks* , pp. 161-162 , 181-184 ; Свечин А. [А.]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Ук.соч.С.324 ; Шатилов П.Н.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 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ВИВ.Париж.1974.№44.С.10-13.

[62]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 , *The Russo-Japanese War* , vol. 2 , p. 13.

[6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ма 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СПб.1909.Т.2.С.46.

[64]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6.янв.1905.№152.С.1.

25 黑沟台：改变战争进程的最终尝试

在收到旅顺港沦陷的消息后，第二集团军司令格里彭贝格（О.К.Гриппенберг）提议，在乃木希典部队抵达奉天前发起反攻。库罗帕特金勉强同意了，但是拒绝抽调后备兵力支援行动。俄国第三集团军现役兵力已从1904年10月的21万人增至1905年1月的30万人；人员质量也有所提升，军官共计5600人，每个营约有15名军官；在武器装备方面共有1186门火炮、60门攻城炮、90门迫击炮（其中30门为攻城臼炮）及44挺机枪。[1]与其他在日军进攻前两三个月竣工的阵地不同，此地的防御工事是在日军逼近时建造的，并且是在冬季。工程进展极为艰难。分散的乡村和院落化作防御据点，土房石屋（平房和酒厂）成为防御中心。[2]

日军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在着手布置自己的阵地，以便应对未来的战局。格里彭贝格不赞成对日军重兵把守的堡垒发动正面进攻。他认为，战斗的意义在于打击日军，而非占领黑沟台村，因此他提议使用7个团的兵力深入侧翼包抄敌军。库罗帕特金拒绝为这场战役提供增援，而考利巴尔斯也不愿以第三集团军的兵力支援附近的友军——第二集团军。据格里彭贝格证实，他表达过自己的担忧，在日本堑壕一线爆发战斗将迫使俄军撤至二线，如若这样，不如大胆地先发制人。[3]

第二集团军司令的意见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据格里彭贝格的参谋长鲁斯基（Н.В.Рузский）中将证实：“库罗帕特金从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几乎一直在自说自话。他的目标十分明确：在库罗帕特金将军唾沫横飞的游说下，在其他参会者的支持下，迫使格里彭贝格将军同意按照他所提出的计划发动进攻。”[4]利涅维奇1905年1月12日（俄历1904年12月31日）所写的日记也证实了此事。当日，库罗帕特金主持召开会议，全体陆军司令及其参谋长、总司令参谋长出席会议，“格里彭贝格开始发言。他指出，现在不能发动正面攻击，因为日军将击退进攻；除掩体、港口和据点外，日军在各处部署了成排的铁丝网、狼坑和地雷阵地，因此我军必须长线迂回。但是，库罗帕特金打断了他的话，声称必须从侧翼发动进攻，并且指了指黑沟台。考利巴尔斯开口指出，从侧翼攻向正面是不可能实现的。没人询问我（第一集团军司令——引者）的意见”。[5]会议一场接一场地召开。

时任参谋长的阿列克谢耶夫中将也参加过此类会议。他断言，领袖们对于未来战争取胜不抱信心。1905年1月18日（俄历1月5日），他写道："我个人对于即将采取的行动没有好感，并且不指望这些行动将取得广泛的成功。为了蝇头小利，我们大费周章。我们的目标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我们将为占领一座村庄而自豪。"[6]当日，在拜访格里彭贝格和考利巴尔斯后，利涅维奇在日记中写道："两人都为即将到来的艰难反攻叹息不已。格里彭贝格为此忧心忡忡，并且对胜利不抱希望。"[7]很快，即将发起进攻的消息传遍了全军。与将军们不同，军官和士兵对未来满怀希望，并且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8]

进攻前夕，参谋部无法开展任何组织工作。即使在一个集团军中，这也绝非易事。出于对格里彭贝格的不信任，库罗帕特金越过第二集团军司令，与参谋长对接。据第二集团军参谋部的工作人员雷贝格（Ф.П. Рерберг）上校回忆："鲁斯基立即屈从于他，失去了舍身为国的勇气和冲动，他开始侍奉两个'主人'——库罗帕特金和格里彭贝格（他的参谋部也是如此）。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他的状态很糟，但又不能下定决心摆脱困局。"[9]这种局面极为复杂，军中呈现双权并立的格局，相互抵触的命令纷至沓来。

此时，总司令抽空视察已抵达的部队。1905年1月18日，第九十八尤里耶夫斯基步兵团抵达奉天。作为第十六步兵的组成部分，这支部队被库罗帕特金划入预备役部队。22日，他骑着白马现身检阅现场。现场的一位军官回忆道："在对我部的到来表示欢迎后，他骑着马走来走去。同时，他说陆军欢迎贵客的到来，但是想要回国，除了击败日军别无他法；以后，俄军不再撤退。随后，库罗帕特金将军召集全体军官，向他们阐述应当如何发动攻势，提醒他们关注近迫作业[10]的重要性。最后，他声明俄军将不再撤退，我们即将打败日军。"[11]当时俄军正在谋划进攻，但是犹豫不决，进展不顺。指挥是俄军最薄弱的环节。按计划，第一联合步枪兵团参谋部参与作战指挥，但是在进攻开始前4天参谋部才组建完毕，开始正常运行。[12]

1905年1月23日，第三集团军参谋长马尔特松（Ф.В. Мартсон）抵达奉天，19名军官与他一同抵达，很快又有3名军官陆续抵达。直至2月13日，陆军野战指挥部门的人员需求才基本得到满足。自1月21日以后，4名中校陆续加入军需部门。[13]即便如此，参谋部仍旧无法立即以正常模式开展工作。[14]马尔特松与阿列克谢耶夫之间的关系远非理

想，但将军们未加理会。无论如何，在参谋长抵达后，军需部长必须将全部精力集中到自己的工作——作战工作上。然而，提高工作效率需要时间，阿列克谢耶夫火速调派抵奉军官熟悉部队和地形。复杂的时局令他寝食难安：“唯一不好的是，在重要的日子来临前，这些人才聚在一起。在重要的日子里，他们必须与不太熟悉的人并肩作战。”[15]

在写下这些文字后的第三日，俄军发起进攻。泰陶指出：“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一场会战能像黑沟台会战一样如此清晰地反映出俄国司令部的龌龊无能。十万大军竟然无法消灭敌军几个骑兵中队，盯着这个倒霉的村庄整整五天，这一切只因指挥部不够果决，无法下定决心确定可行目标并全力以赴地实现它。”[16]可以说，泰陶的观点并非完全正确。在进攻之初，即战役的关键阶段，俄国指挥部要么缺席，要么犯糊涂，甚至对于战区一无所知。诺维茨基上校认为：“在部队指挥和参谋人员的业务素养方面，参谋部的各级人员均无法令人满意：所有长官都在向部队发号施令，而非管理部队，在和平时期不擅管理的他们完全无法发挥参谋部的效力。”[17]

再者，个人的领导试图强行取代参谋部的工作。库罗帕特金经常对第二集团军司令的命令横加干涉，导致第二集团军指挥部门几近瘫痪。正如格里彭贝格的一位同僚所指出的那样：“总参谋部束缚了我们的手脚。”[18]在此情况下，何谈部队之间的协调、配合。1月27日（俄历1月14日），阿列克谢耶夫写道：“更糟糕的是，所有的命令都缺乏协调性和严格的顺序性，这使战斗变得更为艰难。1月12日，我奉命投奔20俄里之外的格里彭贝格。据他所言，在攻占黑沟台村之前，我军将不再攻击阵地附近的其他村庄。”[19]

1905年1月25日，进攻开始。阵地浓雾弥漫，而后急剧降温，同时刮起了强风，下起了大雪，侦察难度有所提升。施塔克尔贝格将军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发起进攻。虽然该军在辽阳损失惨重，但是在坚定、刚毅的指挥官的领导下，它成了俄国陆军的中流砥柱。施塔克尔贝格“身体虚弱，却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和毅力”[20]。该军的进攻取得了成功，但是进展缓慢。在格里彭贝格麾下的120个营、92个骑兵连、436门火炮中，仅有40个营、14个骑兵连和140门火炮参战，占第二集团军军力的30%左右；次日，参战指标有所提升，64个营、4支哥萨克部队、220门火炮，达到了第二集团军军力的50%左右。其余部队几乎完全无动于衷。[21]“可以说，第二集团军在1月12日转入进攻将是一个错误：1月12日，

只有施塔克尔贝格男爵的东西伯利亚第一步枪兵团准备就绪，转入进攻”，雷贝格上校的见解不无依据。[22]尽管俄军的进攻兵力足以碾压日军，但是由于缺乏应有的协调，在战斗中各支部队分散作战。

1月26日清晨，库罗帕特金抵达苏亚屯站（第三集团军参谋部列车的所在地），检查医院和附近的两个后备兵团。阿列克谢耶夫是这样描述后续事件的：“显然，他什么也不知道，只是期待着黑沟台行动。中午12点左右，炮兵团团长接到电话，得知第十军已在我军附近发动进攻，现请求炮火支援。这条消息既重要，又突然。显然，事实表明，我军右翼部队应当与第十军同时发动进攻。为了打击敌军，必须提前进行诸多谋划，最重要的是，在我军对面阵地持续开炮期间，对其进行猛烈炮击。”[23]

与此同时，对黑沟台村和北台子村的炮火准备不可谓成功。发动进攻前，在马尼科夫斯基（A.A Маниковский）上校——俄国当时最优秀的炮兵将领之一的领导下，俄军进行了两天半的炮火准备，火力范围仅覆盖敌军前线1.5俄里。在炮击即将发动时，除炮火准备军官和炮兵旅指挥官外，又出现了2名指挥官——陆军第八军炮兵司令（他的出现或多或少还可解释得通）和库罗帕特金将军派来的伊万诺夫将军（Н.И.Иванов）。总司令与军团司令下达了相互矛盾的指令，结果导致马尼科夫斯基的工作成果完全付之东流，俄军的火力混乱失控。[24]为了攻下村庄，俄军动用72门火炮，其中包括48门为三英寸口径的速射炮（对于攻克野战碉堡几乎毫无助益），8门榴弹炮、12门迫击炮和4门攻城炮。450颗三英寸的榴霰弹、62颗榴弹、84颗迫击炮弹和12颗子母弹炮击北台子村。在黑沟台和北台子争夺战中，俄军累计发射1448颗三英寸的榴霰弹、207颗攻城炮弹和106颗迫击炮弹。事实上，50门火炮用于两村阵地，22门火炮仅用于攻打北台子阵地。[25]

与此同时，气候条件对俄国炮兵作业存在消极影响。那天大雾弥漫，随后还刮起了强风。[26]《俄国言论》（Русскоеслово）通讯员在被战时检查机构扣留的电报中写道：“粉尘是如此……火炮射击几乎彻底瘫痪了。黑沟台附近地势陡峭，大角度的仰角射击对迫击炮的压缩装置造成的损伤巨大，这延长了攻占据点的时间。”[27]迫击炮在射出190颗炮弹后立即出现故障，此后攻打敌军防御阵地的重任落在了8门榴弹炮和4门攻城炮的肩上。战前俄军未对黑沟台实施侦察，地图上的村庄仅概括地体现为一条长约1.5俄里的街道。俄军炮火覆盖范围被迫扩至两

倍，因此无法达到足够的火力密度。[28]

在第三集团军参谋部，两军的联合行动沦为了第十四师的孤立进攻。阿列克谢耶夫亲眼见证了这一切："大家奔向总司令。最初，他冷静而自负地表示，他命令格里彭贝格放下一切，专心进攻黑沟台。5分钟后，画风突变。第十军的进攻随时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越级汇报的电话、电报同时涌来。库罗帕特金立即放下了自己总司令的身段，开始扮演起各种角色，如果可能，他甚至打算替连长下令。最终，进攻被成功地遏制了。"[29]对于下属司令的各种命令，总司令经常横加干预。[30]库罗帕特金禁止任何人调遣第十军和第十五师；而格里彭贝格认为，一个师的兵力不可能拿下黑沟台。[31]

即便如此，俄军仍旧发动了进攻。至于司令部的工作究竟如何，以下事实可供参考：在库罗帕特金果断地越过指挥官取消全部行动计划后，他才在第三集团军参谋部弄清了第二集团军最终的作战部署。在震惊之余，阿列克谢耶夫指出："我不明白，在收到作战部署后，为何不按地址立即转交文件。"[32]结果，第十四师发起进攻，既无支援，也无指挥。从10：00到18：00，双方激烈交锋。最终，俄军攻占了黑沟台的邻村，而非黑沟台，因为俄军手中没有详细地图。[33]1877年尼科波尔围困之初的景象再次上演，顺便提下，考利巴尔斯上校时任第八骑兵师师长。在那场战役中，炮兵火力部署极其糟糕，也未制订要塞防御计划。[34]

1894～1896年，俄国对与本国接壤地区进行了首次勘察，[35]对中国东三省地形的测绘、勘测则始于1901年。自1899年之后，辽东半岛进入俄国的勘测视野。与此同时，滨海边疆区和阿穆尔州地图绘制工程也在持续进行。于是，俄国北境与中国南境沿岸的测绘事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从此地出发，沿通信路线前行，可抵达中国关内。例如，1899年俄国人从哈尔滨码头出发一路向北对松花江及附近3俄里区域进行勘测，最终绘制出了覆盖辽阳以南地区——从辽东半岛至鸭绿江口的南部地图。在将它翻译为日语后，日本重新出版。然而对于辽阳以北地区，俄国陆军知之甚少，他们手中只有路线示意图，在所标记的路线之间存在大片空白。直到1907年，最后一次中国东北地形勘测资金才拨付到位。[36]

通过以下事例，可以判断出时局的窘迫性：在抵达前线后，第二集团军参谋部立即着手绘制阵地后方地图；两星期后，在进攻开始前赶制

出了2500份地图，并计划向各部分发。为了与总司令参谋部协同作战，格里彭贝格向库罗帕特金提供了几份新地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后者竟然下令没收并烧毁地图。库罗帕特金的命令并未得到执行，否则俄军几乎无地图可用。[37]在黑沟台附近出现的失误并非偶然，类似的失误正是参谋部内乱的恶果。

最初，不明所以的俄军宣布进攻目标已经达成，甚至还立即拍发电报向沙皇传达胜利的喜讯。[38]据泰陶回忆道：“攻占黑沟台的消息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全军，狂喜过后，大煞风景的消息随即传来。”[39]实际上，俄军攻下了进攻目标附近一处名为北台子的小村庄，两者之间隔着一片结冰的池塘。[40]真正的黑沟台村位于俄军攻占村庄的东南方。此外，又传来了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日军加固了以酒厂为基础建立的防御堡垒，就地取材在堡垒周围砌上了黏土墙并且预留了射孔、炮眼。此外，日军还部署了堑壕、鹿砦和铁丝网，号称无法摧毁的“多面堡”就此诞生。借此，黑沟台被成功地楔入俄军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阵地之间。[41]

在损失了24名军官、160名士兵后，俄军发现自己的进攻毫无意义。[42]军队报刊称：“在这个大村子的东北耸立着一处强大的内堡，它周围环绕着三排人工障碍，因此我军的野战炮和机枪炮火几乎不能伤它分毫。若事先未做准备，则无法攻克内堡。在断定此事后，我军撤离黑沟台阵地，那里炮火连天、无法驻足。”[43]最初，驻守此地的是日本骑兵部队的先锋旅团，后来步兵旅团赶来支援。德国驻日军总司令部的观察员指出：“这种局部攻击无法帮助俄军夺取持久的胜利。”[44]时间被平白地消耗了。大山岩元帅开始向此地加派兵力，事情正朝着格里彭贝格此前担心的方向发展——在日军的防御阵地与之发生正面冲突。

1月28日，对战役取胜丧失信心的库罗帕特金收到情报，日军在第三集团军前线组织动员。此后，他下达了撤退命令。该命令在军中引起公愤。虽然情报未经证实，但是此时已经没人着急核实情报的真假了。[45]总司令已经承认进攻失败。阿列克谢耶夫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即便现在，也可以说我们仍旧存在诸多不足。正如先前所说的那样：必须让每个人在自己职责范围内行动，同时承担责任。我们缺少知识和能力；和平时期，为了面子工程我们付出了大量劳动。当然，我们也做到了。但是，正如1877年那样，这一目标将通过大批军人极为艰苦的努力才能达成。与那时相比，牺牲者更多。毕竟，现在面对的是不同的武

器、不同的敌人。”[46]十年后，他已坐上高位，获得了比库罗帕特金更大的权力，却以同样烦琐的规矩约束下属。

从不惧怕承担责任的第二集团军司令不愿屈从库罗帕特金，他决心离去。[47]面对库罗帕特金的重重束缚，他无计可施。阿列克谢耶夫表示，在后续的战役中，格里彭贝格是唯一表现出决心和毅力的人，但是他无法扭转乾坤。俄军阵地死气沉沉。在与彼得堡动乱相关的流言从俄国传入军中后，军中的氛围变得更加压抑了。1月29日（俄历1月16日），阿列克谢夫写道："我感觉军中寂静得犹如坟墓一般，它埋葬了俄罗斯的胜利与成就。俄罗斯啊，向我们派遣一个对自己、对子弟兵充满信心且意志坚强、精明强干的人吧！但是，俄罗斯不会派来这样的人！！带着沉重、压抑的心情，我在《满洲军公报》上读到了彼得堡事件。在这里，我们与敌人浴血奋战；当代人也许无法理解战争的目的，但是子孙后代一定会理解并珍视我们的付出。然而，彼得堡的流血事件却是我们赎罪的祭品；在此情况下，俄国的流血牺牲只会让敌人拍手称快，让友人满腹狐疑。”[48]

对于在俄国发生的事件，《满洲军公报》的报道颇为负面。1月24日，该报刊登了1月19日（俄历1月6日）主显节那天在彼得堡发生的灾难，当时枪弹就在沙皇不远处发射。据报道，在帝国首都报刊停发，174家企业和印刷厂倒闭，92859人参与罢工。总司令的第一反应是限制"非军事人员或东清铁路工作人员"进入军队驻地。库罗帕特金下令对此类人员实施特殊的通行制度。[49]1月26日，军报上刊发了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悲剧的详细报道。76人死亡、223人受伤，足以说明动乱的规模。毫无疑问，革命者和加邦团伙被贴上了罪魁祸首的标签，毕竟他们的要求是俄国工业界无法接受的。此外，1月21日早晨，"他们的宣传带有明显的革命特征"[50]。与此同时，日军试图告知俄军俄国的现状以及旅顺港的沦陷过程。[51]

黑沟台战役结束后，格里彭贝格断定，正是因为库罗帕特金三番五次地干涉才让他失去了取胜的良机。为此，他抑郁成疾，或者说他递交了病退报告。在向沙皇递交的奏章中，他主动请辞，并且声明，在丧失主导权的情况下，他完全无法指挥军队。[52]事实的确如此，库罗帕特金不仅在此次失败的进攻前干涉部队的指挥，战时也随意干涉，甚至还不停地调整给低级指挥官的指令。当然，没人向沙皇汇报这些事情。在战斗中，库罗帕特金屡次阐述自己的"战略储备观"，认为存在未遭攻击

的部队是他的重要成就。[53]总司令试图说服格里彭贝格留任，同时坚称一切如前，于是遭到了后者的拒绝。[54]

那时，库罗帕特金决定支持格里彭贝格因病离任的说法。在与考利巴尔斯的交谈中，他表示过去从未想过，一个67岁的人会这样崩溃。阿列克谢耶夫完全理解第二集团军司令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但是对于他行为的评价，据推测，与历史上传统的说法并不一致：“我完全无法赞成格里彭贝格的决定——在危急关头弃军队而去，但是我不禁为他的坚毅所折服，即使在离开前，也不愿充当别人手中的玩偶。我们的司令（考利巴尔斯——引者）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将按照吹哨人的节奏翩翩起舞。”[55]

2月2日，格里彭贝格离开军队，并且拒绝与库罗帕特金见面。此举在军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连普通士兵都清楚高级将领之间存在分歧。一名军官回忆道：“此事引发了极大的误解，各种各样的假设和见解层出不穷。”[56]法国记者回忆称：“黑沟台战败的消息使全军灰心丧气，随后这种情绪变成了愤怒。”[57]在离开时，格里彭贝格认为有望回归，因此并未对自己的参谋部下达任何指令。1月18日，高级指挥官——陆军第四军指挥官梅洛夫（Мылов）中将出任第二集团军代理司令。[58]

这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汉密尔顿将军清楚地指出，日军的组织体系确保他们在对抗庸才时取得成功。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西欧乃至俄国，领袖地位比才干重要，如果领袖无法为自己赢得部队的尊重和敬仰，那么他将无法展现自身所有的才能。如果卓越、敏捷、勇敢、受部下敬仰且拥有杰出军事才能的俄国名将斯科别列夫现身战场，我认为，日本人会相信欧洲还存在某些他们尚未考虑的因素。”[59]

随着格里彭贝格的离去，这一问题恰好得到了解决。阿列克谢耶夫从库罗帕特金的参谋部得知，总司令向沙皇推荐了几个候选人：苏霍姆利诺夫、苏霍京、巴吉扬诺夫、格罗杰科夫、比尔德林。阿列克谢耶夫不太相信苏霍姆利诺夫能够成功上位，他认为库罗帕特金倾向于选择与自己一样优柔寡断的人。尽管如此，众人对这条新闻的反应依旧能说明问题：“如果第一位候选人当选，那是再好不过的了；第二位也勉强凑合；至于巴吉扬诺夫，他只会耍脾气、扮小丑，而格罗杰科夫完全不适合这个位置。”[60]苏霍姆利诺夫名声在外并非偶然。在1902年的库尔斯克演习中，总司令库罗帕特金的表现极为出色，当时他的参谋长正是苏霍姆利诺夫将军。在前往中国东北前，库罗帕特金曾举荐他担任总参谋

长。[61]

最终，考利巴尔斯暂代第二集团军司令之职，1月12日接管集团军。随后，在漫长的早餐和午餐时间，他开始以习惯的方式提高自己的威信。集团军参谋部将军巴热诺夫（П.Н.Баженов）回忆称："1892年结识考利巴尔斯将军，那时我是他麾下高加索第十五师的旅长，我总能在他身上发现自夸的倾向，但是我从未想过，这种特质在他担任集团军司令后能够发展到如此程度。每日的早餐、午餐期间，他必然向我们讲述自己年轻时的功绩，有时甚至不着边际地乱说，但是对于他人的功绩绝口不提。他幻想着听众对他的叙述信以为真并且完全信服他。"[62]

对于自己的新部下，他依旧以鼓励为主："与其说格里彭贝格没有语言天赋，不如说考利巴尔斯太爱讲话……他虽然不年轻，却像见习军官一样平易近人、热情冲动、诚实正直……作为高级将领，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对局势的看法过分乐观，无条件地相信俄军将会取得胜利。"[63]然而，这种行为并未激发其他人的信心。泰陶对新任司令官印象不错，也许是因为将军没向德国军官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泰陶表示："我认为，他对战争的后续进程没有信心，并且不相信这支军队（第二集团军——引者）能够给战争带来胜利的转机。"[64]显然，信心不足是考利巴尔斯决定带着自己参谋部的原班人马——敖德萨军区的军官上任的主要原因。[65]

这引发了诸多问题和冲突，其中一个问题持续了许多年。格里彭贝格在任时期，鲁斯基担任第二集团军参谋长，然而在从维尔纳抵达中国东北后，他和他的同僚被迫与第三集团军军需管理部门的同僚调换位置。汉密尔顿写道："显然，日本人的纪律性使他们失去了个性特征。我深信，如果黑木与乃木调换位置，军中的每一份子都将为获得了另一位杰出的领袖而欢欣鼓舞。"[66]在俄国军队中，则是另一种风气。阿列克谢耶夫直言：调到一支规模较小、地位较低的军担任一个不太重要的职务，对鲁斯基而言就是"一种纪律处分"。回国后，他们将被踢出总参谋部军官的队伍。值得称赞的是，阿列克谢耶夫并未接受鲁斯基的职务，但是在这场与个人意愿相悖的冲突中体现出了此人的处事风格。[67]阿列克谢耶夫不喜欢冲突局面，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不愿主动化解冲突。他希望彼得堡否决考利巴尔斯的任命提案，那么危机将自动解除。[68]

1905年2月10日，考利巴尔斯正式出任第二集团军司令，12日正式入主集团军司令部。直至21日，他才了解阵地和部队的情况。[69]第二

集团军准备再次进攻黑沟台，参谋部再次遭遇临时重组。至于第三集团军参谋部，全部成员已于1月23日投入工作，20天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在接到库罗帕特金下达的鲁斯基留任命令后，考利巴尔斯计划带走总参谋部的4名上校和参谋长马尔特松将军。这样，作为来自华沙军区的“外人”，后者将离开亲密的同伴。陆军第十七军指挥官比尔德林将军出任第三集团军临时司令。对于自己的任命，他颇为不满。[70]同样感到不满的还有鲁斯基。在与考利巴尔斯的谈话中，阿列克谢耶夫毫无力度地对参谋部的重组计划表示抵制。第三集团军参谋部同僚洞悉了这场战争的规律——俄军的排、连、营在战场上完全不比日军差，但是队伍规模越大越不如日本人。在战争中，指挥事关重大。[71]作为军需部长，阿列克谢耶夫对军队指挥体系的重要性有着绝对正确的认知：“毕竟，连长和营长无法发动战争，他们需要引导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力量薄弱，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俄罗斯，这是一切事务推进困难的罪魁祸首。”[72]

考利巴尔斯带走了两名上校——巴比科夫（Н.А.Бабиков）和克拉斯诺库茨基（Н.В.Краснокутский）及一名少将艾赫果列茨（А.Р.Эйхголец）。[73]他们是考利巴尔斯的亲信，在敖德萨时便已入选参谋部“第一梯队”。巴比科夫是军需部长的高级副官，即他的助理和第一副手。对于他的调离，阿列克谢耶夫感到惋惜。后来，帕尔斯基（П.Д.Парский）上校接替了他的职务。由此可见，无论是格里彭贝格还是考利巴尔斯，在与自己的亲信在各自的职位上工作两个月后都遭到了调动。因此，他们不得不结识新人、适应新的人际关系。如此说来，巴比科夫确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军官。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与被视为撤换对象的鲁斯基相比，新官上任的考利巴尔斯更信任他。结果，巴比科夫——司令的代理人开始无视参谋长和军需部长。[74]参谋部上下立即察觉到了核心人物的地位变化，在此情况下参谋部的工作陷入了瘫痪状态。[75]

此时，第二集团军准备再次突击黑沟台，为此调集了28门6英寸口径的攻城炮、4门4.2英寸口径的线膛炮、28门6英寸口径的迫击炮以及8门8英寸装载20千克火棉炮弹的迫击炮。每门攻城炮配备156颗炮弹；8英寸迫击炮配备40颗火棉炮弹。火炮阵地接入了移动式窄轨铁路网。西伯利亚第三集团军指挥官伊万诺夫领导炮兵。率领骑兵部队驻守第二集团军右翼的连年坎普夫（П.К.Ренненкампф）将军指出：“这次应当完全指望主力部队的炮火准备，第八军、第十军和步枪兵团分布在敌方阵

地的6点钟和12点钟方向，在对距离进行精确测量的情况下，累计应发射278颗速射炮弹、40颗榴弹、40颗野战迫击炮弹、38颗攻城炮弹。炮兵领袖断言，从六点钟方向发射这些炮弹足以摧毁敌军阵地上的全部村庄，而后步兵只需占领被毁村庄，掩护并协助炮兵转移到新阵地。”[76]

突破前线的基础是使用“大炮冲锋”战术。十年后，奥德联军在加利钦对抗俄军时也采用了这种战术。不同之处在于，在作战方案的执行上，俄国司令部缺乏果断和统一。会议一场接一场地召开。2月21日，阿列克谢耶夫出席会议。当日，库罗帕特金命令第二集团军在4天后转入进攻状态，从左翼包抄奥保巩部队。此时，乃木希典的部队仍在旅顺港附近，无法赶来。对于俄军而言，此时尚有微弱机会扭转不利局势。然而与过去一样，俄军司令部依旧无法胜任摆在他们面前的这项工作。比如，在司令部交换意见时，承诺协助考利巴尔斯进攻的既不是第三集团军司令，也不是参谋长，而是阿列克谢耶夫。[77]阿列克谢耶夫对此解释称，2月17日，在库罗帕特金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发生了争执：“考利巴尔斯和马尔特松对话的言辞颇为激烈，直至散会双方也未握手言和，就这样，我成了参谋部之间沟通的纽带。”[78]

库罗帕特金一如既往地要求全军上下保持警惕，伺机突袭。总司令的说法难以服众。黑沟台首战失败后，没必要重提此事。连年坎普夫将军困惑地说道：“所有转入进攻的命令似乎从未保密过，军队的运行机制颇为复杂，因而无法出乎意料地向敌军发动进攻。在敌军准备充分的前提下，很难发动奇袭，遑论在白天而非夜间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准备、发动进攻。”[79]最高司令部的踟蹰不定让俄军倍感沮丧，满洲集团军命运的操纵者逐渐失去了军队的信任。与此同时，库罗帕特金不愿相信，麾下的状态远不如最后一场大战时的状态了，因而继续以抽象而机械的态度对待他们。

沙河战役结束后，野战医生写道：“在过去的25年里，士兵频繁调动，他们在不停地思考，他们不想单纯地执行命令，他们需要弄清为什么必须这样做或那样做。显然，他们正在质疑是否需要战斗……不同的宗派和政治煽动者也播下了自己的种子。最后，在部队中保留大量预备役人员是极大的过错。这些业务水平落后的人大多年老多病，原本靠种地或出卖某种手艺为生，他们已经习惯了平静的家庭生活，也许时常幻想回归这种生活。”[80]带着这种心情，俄军走向了俄日战争的决战阶段。将领们也会产生怀疑的情绪。某位参与进攻黑沟台的俄国军人认

为，通过这场战役得到的主要经验是“不应进攻设防的村庄”，他的结论未必值得怀疑。[81]

在这些日子里，阿列克谢耶夫坦言：“犹豫和恐惧是我们的痛处和毛病。我们不愿承担任何风险，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对付设防的村庄。小目标、大损失——原地踏步，敌人掌控战局，应当并且能够掌控战局的原本是我们（阿列克谢耶夫的部下——引者）。不，我们不应给我们的司令部制造更多的痛苦了，现在还无法预见结局。”[82]俄军被迫放弃进攻，主导权最终落入日军之手。在此基础上，俄军走向了这场战争的终局会战。临时组建的参谋部缺失统一的行动机制，高层将领之间相互倾轧，总司令的行动计划朝令夕改。1905年2月18日，在奉天战役开始前不久，阿列克谢耶夫对库罗帕特金评价道：“统帅应当具备才能、运气和决心。我不谈知识，没有知识无法工作。评价才能现在还不是时候。尽管他军事运气不佳、完全没有决心，但是在战争中需要敢打敢拼，不能瞻前顾后。”[83]

在增援部队抵达前，库罗帕特金再也找不到击败奥保巩的机会了。在黑沟台会战中，俄军累计损失12000名兵力，其中7000名兵力来自西伯利亚第一集团军；日军损失近9000名兵力。[84]第二集团军呈直线形部署，并且没有后备兵力。俄军司令部因内讧和重组使敌军多了十天的准备时间。此外，俄军的进攻目标非但不是敌军的后方，反而是敌军精心部署的防御阵地。[85]由于缺乏应有的参谋部指挥机制，总司令对参谋部指挥的越级干预导致了混乱和失败。看来，西伯利亚军区司令苏霍京中将的观点是正确的。在总司令陆续任命了考利巴尔斯麾下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的军长乃至连长后，惊讶之余，苏霍京讽刺道，在中国东北出现了3位连长——考利巴尔斯、利涅维奇和格里彭贝格，营级以上将领都归库罗帕特金领导。[86]这种指挥体系导致总参谋部及其指挥的军队彻底陷入混乱状态。[87]由于缺乏可靠的指挥体系，满洲集团军即将遭遇惨败。

[1] Куропаткин А.Н.Отчет...СПб.1906.Т.3.С.32；37.

[2] Цабель С.А.Позиция 2-й Маньчжурской армии на р.Шахе.//ИЖ.1906.№9-10.С.993-994.

[3] Гриппенберг О.［К.］ Изнанка «операции охвата левого фланга расположения армии Оку» в январе 1905 г.По поводу сочинения ген.-ад.Куропаткина «Бой под Сандепу».СПб.1909.С.4；12；Куропаткин

А.Н.Отчет...1906.Т.3.С.33.

[4] Рерберг Ф.П.Ук.соч.С.143.

[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Из дневников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 и Н.П.Линевича. С.59.

[6]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2.Л.57.

[7]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Из дневников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 и Н.П.Линев ича.С.63.

[8] Суханов П.37 пех.дивиз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1904-5 гг.//БП. М.1909.№4.С.32.

[9] Рерберг Ф.П.Ук.соч.С.145.

[10] 在敌人直接瞄准的火力威胁下构筑掩体的作业。——译者注

[11] Адариди К.Юрьевцы в состав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армии с 5-го января по 19-е февраля 1905 г.//ВС.1906.№1.С.82.

[12] Рерберг Ф.П.Ук.соч.С.113.

[13] Отчет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енерал-квартирмейстера 3-й Манчжурской армии за время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СПб.1907.С.324；Парский Д.［П.］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мысли о последней войне（1904-1905 гг.）.СПб.1906.С.10.

[14] Парский Д.［П.］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мысли...С.28.

[15]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Л.1 и об.

[16] Теттау Э.Куропаткин и его помощники.СПб.1914.Ч.2.С.282.

[17] Новицкий В.Сандепу.//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 СПб.1907.Ч.2.С.85.

[18] Рерберг Ф.П.Ук.соч.С.145.

[19]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2.об.

[20] Musnicki J. Moje wspomnenis，SS. 76-77；79.

[21] Новицкий В.Сандепу.//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 СПб.1907.Ч.2.С.68-69.

[22] Рерберг Ф.П.Ук.соч.С.169.

[23]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3.

[24] Рерберг Ф.П.Ук.соч.С.170.

[25]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СПб.1909.Т.III.С.647.

[2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4.Шахэ-Сандэпу.Ч.2.Зимний период кампании и сражение при Сандепу.С.206.

[27] Отчет о применении цензуры на театре войны.Составлен Цензурным отделением Штаба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генерал-квартирмейстера.Харбин.1905.Приложение №54.С.50.

[28] Гриппенберг О. [К.] Ук.соч.С.48. ; Баженов П.Н.Сандепу-Мукден.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чевидца-участника войны.СПб.1911.С.57.

[29]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3.

[30]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алее ГАРФ) .Ф.Р-5793.Оп.1.Ед.хр.16.Л.9.

[31] Гриппенберг О. [К.] Ук.соч.С.4.

[32]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3.об.

[33] Свечин А. [А.]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Ук.соч.С.15-16 ; Геруа Б.В. Ук.соч.Париж.1969.Т.1.С.159.

[34] А.Р.Под Никополем (Из прошлого) ; с двумя чертежами и рисунком.//ИЖ.1901.№1.С.4 ; 11 ; 34.

[3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1.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С.163-164.

[36] Архив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музея артиллерии , инженерных войск и войск связи (далее АВИМАИВиВС) .Ф.6.Оп.7/1.Д.233.ЛЛ.221 ;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Обзор работ астрономических , геодезических и 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 исполненных в 1899 г.//ВС.1901.№4.С.49-51 ;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1.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С.166-168 ; 170.

[37] Рерберг Ф.П.Ук.соч.С.157-158.

[38] ГАРФ.Ф.Р-5793.Оп.1.Ед.хр.16.Л.9.

[39] Теттау Э.Восемнадцать месяцев...СПб.1908.Ч.2.С.245.

[40] Новицкий В.Сандепу.//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 СПб.1907.Ч.2.С.73.

[41] Баженов П.Н.Ук.соч.С.58. ; Никулишев Б.Атака и оборона населенных пунктов.//ВС.1913.№9.С.3.

[4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4.Шахэ-Сандэпу.Ч.2.Зимний период кампании и сражение при Сандепу.С.248.

[43]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17 янв.1905.№163.С.1.

[4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черк принца Карла фон Гогенцоллерна.//Новое слово.СПб.1912.№2.С.41.

[45] ГАРФ.Ф.Р-5793.Оп.1.Ед.хр.16.Л.10.об.

[46]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4.

[47] ГАРФ.Ф.Р-5793.Оп.1.Ед.хр.16.Л.7.об.

[48]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6.

[49]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11 янв.1905.№157.С.1-2.

[50]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13 янв.1905.№159.С.2-3.

[51] Суханов П.37 пех.дивиз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1904-5 гг.//БП.М.1909.№4.С.31.

[52] Сорокин А.И.Ук.соч.С.250-251 ; Баженов П.Н.Ук.соч.С.94.

[5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Из дневников...С.60 ;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12.

[54] Баженов П.Н.Ук.соч.С.94.

[55]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12.об.

[56] Адариди К.Юрьевцы в составе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армии с 5-го января по 19-е февраля 1905 г.//ВС.1906.№1.С.83.

[57] Нодо Л.Письма о войне с Японией.С.148.

[58] Баженов П.Н.Ук.соч.С.95 ; 97-98.

[59]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28.

[60]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26.

[61] Редигер А. [Ф.] Ук.соч.М.1999.Т.1.С.348 ; 381.

[62] Баженов П.Н.Ук.соч.С.120.

[63] Рерберг Ф.П.Ук.соч.С.192.

[64] Теттау Э.Восемнадцать месяцев...СПб.1908.Ч.2.С.264.

[65]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15.

[66] 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26.

[67]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Л.15 ; 16.

[68]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22.об.

[69] Каульбарс А.В.2-я армия под Мукденом.По поводу т.III соч.Ген.-адъют.Куропаткина «Сражение под Мукденом».Одесса.1908.Ч.2.С.5.

[70]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Л.23 и об. ; 24 ; 25.

[71] Парский Д. [П.] Причины наших неудач в войне с Японией. Необходимые реформы в армии.СПб.1906.С.19.

[72]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19.

[73] Отчет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С.335.

[74] Баженов П.Н.Ук.соч.С.110 ; 133 ;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 Л.24.

[75] ГАРФ.Ф.Р-5793.Оп.1.Ед.хр.16.ЛЛ.11.об.-12.

[76] Ренненкампф П.К.Мукде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20 дневный бой моего отряда от Цинхэчена до Мацзяндана.СПб.1908.С.2.

[77] Каульбарс А.В.Ук.соч.С.5-6.

[78]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33.

[79] Ренненкампф П.К.Ук.соч.С.1.

[80] Боткин Е.С.Ук.соч.С.75.

[81] Добророльский С.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укденской операции с 7-го по 25-е февраля 1905 года.//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 СПб.1907.Ч.2.С.146.

[82]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26.об.

[83]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32.

[84] Menning B.W. *Bayonets Before Bullets* , P.186.

[85] Андрианов П.2-я Манчжурская армия в дни Мукденских боев.// БП.М.1909.№1.С.7.

[86] Баженов П.Н.Ук.соч.С.10.

[87] Рерберг Ф.П.Ук.соч.С.207.

26 奉天会战：指挥危机的巅峰

1905年2月初，满洲集团军拥有377.5个步兵营（27.6万名步兵）、144个骑兵连和哥萨克部队（15727名骑兵）、11.75个工兵营（2144名工兵）、1089门野战炮、178门攻城炮和榴弹炮、78门迫击炮、56挺机枪。[1]随着乃木希典部队的加入，日本在奉天附近的军兵力达到27万人，同时集结了1000门火炮和254挺机枪。俄军总司令担心后方铁路的安全。在战斗打响前，日军的两个骑兵中队——各由100名精锐骑兵组成——从辽阳出发深入俄军后方实施突袭。2月12日，一个中队炸毁了位于四平街以北120千米处范家屯站附近的铁路桥桥板（17小时后修复），18日又袭击了距离四平街270千米的窑门站[2]。后方的护路队无法发现并歼灭这一小股兵力。日本骑兵成功地逃脱了俄军的猛烈追击。

总参谋部收到紧急报告，其中一个日本中队竟被当成了一支由4个骑兵中队、4个机动步兵中队和3000名“红胡子”组成的队伍。“红胡子”确实经常攻击俄国铁路，通常队伍规模不大。即便在人数上超过俄军部队，那也无法与之抗衡。在武装行动期间，俄军共击退胡匪对东清铁路的110次袭击。然而在日军的两个中队实施突袭后，据俄军参谋部估算，对交通线构成威胁的敌军兵力约3万人。结果，库罗帕特金又向外阿穆尔边防兵团的护路队增派25000人和36门火炮。事实上，从奉天至伏尔加河桥梁，西伯利亚铁路沿线都有俄军驻守。在满洲，每俄里铁路配备28名护路军，这一人数向西逐渐减少，在伏尔加河附近仅有2～3名护路军。[3]日本骑兵中队仅有几人负伤，却诱使俄军从前线抽调大量兵力，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一结果而自豪。[4]此次突袭后，日军联手胡匪进攻后方铁路的消息受到高度重视。据俄方估算，部队人数为5000～10000人。[5]

面对每个威胁，真实的或假想的，俄军总司令的反应都如出一辙——坐立不安、手忙脚乱。在乃木部队撤离旅顺港前，日本人曾放出消息称，可能率军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结果，库罗帕特金立即决定从第一集团军的每支部队中抽调一个连组建一个联合旅。这支临时组建的部队被派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参与新部队的筹建。[6]就这样，即兴发挥的总司令失去了大量兵力。第四顿河哥萨克旅、陆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一步兵师第二旅——12个营、8个骑兵连、34.5支哥萨克部队（约1万人）以及

24门步兵炮、12门骑兵炮被撤至距离奉天最近的后方。[7]日本骑兵研究者不偏不倚地指出："在关键时刻，300名骑兵从重要据点引出至少8000名士兵，也可能是20000名士兵。日本骑兵完全可以为如此辉煌的战绩而自豪。"[8]在此应当补充说明，日军司令部在部队指挥方面的不同之处。

据战争期间担任大山岩元帅副官的田中中将证实，参谋本部在奉天会战期间并无任何异动。战役开始之初，参谋本部的工作基本完成；战斗期间，元帅和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大部分时间在打槌球，有时候会暂停一会儿对作战方案进行细微的调整。在辽阳会战中，黑木也很平静。奉天会战结束后，在俘虏俄军的同时，一名英国记者也被日军俘虏，在交谈中英国人仅对俄国士兵的素质做出了高度评价，至于俄军将军，他不看好任何人："他们都是一路货色。"[9]

作为对日本骑兵中队行动的回击，1905年2月17～22日，吉伦施密特（Я.Ф.фон Гилленшмидт）上校率领4支哥萨克部队潜入日军后方突袭海城，结果未对日军的部署造成任何影响。应当指出，尽管在突袭营口后俄国骑兵饱受抨击，但是此次突袭仍旧体现了俄国骑兵良好的能力。吉伦施密特下达秘密指令，要求麾下部队5天行进375俄里，即日行75俄里。[10]的确，俄国骑兵像日军中的同行一样，也做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轻微地损毁了一座10俄丈（21米）的单跨铁路桥。与库罗帕特金及其幕僚相比，日军参谋本部更沉得住气。[11]

最初，俄军司令部计划在浑河桥头堡防御阵地削弱敌军战斗力，然后发起反攻。阵地始建于1904年4月，最初用于掩护渡口，后来不断扩建，进而形成了一处辅助阵地。[12]考利巴尔斯麾下的满洲第三集团军驻扎于此。桥头堡防御坚固，其上分布着3座多面堡、4座眼镜堡及大量射击掩体和单兵战壕。阵地前方设有铁丝网屏障和2道狼坑，在通向第一道防线沿途的每处防御工事前方预埋了10颗地雷。[13]在阵地后方铺设了一条20俄里的道路，在浑河上方架设了6座桥梁，部分用于行人交通，部分用于车辆通行。[14]旅顺港失守后，俄军失去先机，计划随之发生改变，但是作战方法并未改变。

俄军停止了对黑沟台的进攻。利涅维奇在2月18日（俄历2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众人坚决要求俄军迅速出击、压制日军，但库罗帕特金一拖再拖。"[15]事实上，一再拖延的不只是总司令。2月23日，考利巴尔斯命令军队休整。司令不想在星期一发动进攻，他认为这天不是吉

日，因此将行动推迟到了2月25日，星期二。在某种程度上，考利巴尔斯的迷信想法竟然得到了印证。2月24日，库罗帕特金拒绝派遣后备兵力支援部队；从星期一向星期二过渡的那个夜晚，库罗帕特金绕过考利巴尔斯调走了其麾下的西伯利亚第一军。[16]总参谋部收到情报称，敌军纠集大批兵力——11.5万～12.5万人，意图进攻考利巴尔斯8.6万人的第二集团军。[17]

当然了，考利巴尔斯对此一无所知，仍在筹备进攻。进攻黑沟台前，在俄军尚在祈祷时，敌军阵地响起了枪炮声。从筹备到取消进攻敌军防御阵地，这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且严重地打压了俄军的士气。[18]按计划，进攻将于2月25日6点开始。俄军阵地停止了炮火准备，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凌晨2：00，第二集团军参谋部接到取消进攻的命令；早晨5：30，军团、部队参谋部陆续接到命令；上午7：30，不明所以的初级指挥官和士兵收到命令。对于进攻取消的解释是行动计划泄露。此后，部队司令部遭遇改组。[19]第三集团军的情况与第二集团军基本相同。西伯利亚第六军参谋部军官回忆称：“2月24日半夜11点左右，满洲第三集团军接到命令，要求第三集团军继续驻守现有防御阵地，同时做好与第二集团军协同作战的准备。2月25日，第二集团军将对敌军的左翼阵地发动进攻。相关命令已经开始执行，然而凌晨2点左右行动暂停，集团军参谋部收到电报，得知第二集团军的进攻时间被推迟了。”[20]2月25日上午，库罗帕特金开始从浑河桥头堡撤军。[21]他的计划再次落空。

1905年2月25日，日军在奉天附近发动进攻。大山元帅调集部分兵力突击俄军前线防御阵地，同时派遣乃木部队对俄军侧翼、后方进行迂回包抄。俄军阵线绵延150千米（部署防御部队）。利涅维奇率领的第一集团军有107000人、370门火炮和22挺机枪，把守45千米的左翼阵线；考利巴尔斯的第二集团军有100000人、439门火炮和24挺机枪，把守长约25千米的右翼阵线；第三集团军有68000人、266门火炮和10挺机枪，把守长约20千米的中央阵线。日军集结了5个军的兵力，有270000人、1062门火炮和200挺机枪。[22]自动武器威力巨大，俄军将其称为“魔鬼的灌溉”，与火炮相比，他们开始倚重机枪。[23]日本步兵同样倚重机枪。日军报告指出：“奉天战役期间，我军已收到足量机枪，战斗力因此大幅提升。军官和士兵对这种武器的威力深信不疑。战斗打响后，全军上下都在迫切地等待着从我方阵地传出机枪的嗒嗒声，如同农民在闷热的酷夏期待甘霖一般。”[24]

甲午战争末期，日本陆军收到了一批马克沁机枪，但没来得及使用。然而，通过观察清军拥有的几种机枪，日本人发现了这种武器的威力。1895年至1904年，日本人进行了大量试验。在试验过程中，日军司令部倾向使用霍奇斯基式机枪。俄日战争期间，机枪已经进入战场。[25]结果，在战争之初几乎没有自动武器的日军开始大规模使用机枪；战争末期，每个日军师团已拥有一个机枪中队——7、8挺机枪。日军报告指出：无论是在击退俄军反攻时，还是在我军准备进攻时，使用这种武器都能高效地实现作战计划。[26]在奉天会战中，这种影响再次显现，日军在防御手段上占优势，这使他们可以在主攻方向上集中兵力，在次要区域节约兵力。

对于俄军而言，奉天会战成了辽阳会战的扩大化翻版，并且结局更为惨烈。日军采取了惯用的包围战术，试图切断俄军的铁路干线。大山元帅曾在普法战争期间担任日本驻德国司令部代表，作为普鲁士战略的拥趸，他一直致力于实现自己的“色当”构想，但是此次他放弃了曾在辽阳实施的单向包抄战略，转而采用双向包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制定战略时，俄军习惯比照欧洲战场的军事行动，思维固化，认为军事行动必须始于内部交通线。在中国东北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日军通过多次佯攻诱使俄军总司令彻底陷入圈套，使其逐渐丧失了对部队的把控。在为期两周的会战开始之初，库罗帕特金便已落入圈套。一旦发现日军进攻利涅维奇集团军，第二集团军的所有进攻筹备则被取消，部分兵力奉库罗帕特金之命，用第三集团军军需部长阿列克谢耶夫少将的话来说，“像疯狗一样扑向……左翼”，“军中一致判定，在那里没有多少日军，日本人在那里的行动像往常一样，尽管活跃，却属佯动。显而易见，他们摸清了我们总司令的性格：经过一再地引导，一切可调动的力量都被派往这片山区，在这里兵力难以部署。一言以蔽之，我军一半兵力聚集在了这些山隘和窄道上”。[27]

俄军不仅部队被四处调动，就连他们的指挥官也是如此。例如，2月25日，连年坎普夫将军及其参谋部的部分军官在被剥夺骑兵部队的指挥权后，被派往利涅维奇集团军组建新部队。艾赫果列茨将军接手连年坎普夫的部队。但是不久后，考利巴尔斯的爱将无法应对战事并且开始撤退。结果，库罗帕特金绕过第二集团军司令恢复了连年坎普夫的职务。后者返回原部队，继续指挥部下。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天内。[28]类似的举措只能激起司令部和士兵的愤怒。当博洛托夫旅被派去支援伊万

诺夫将军麾下的西伯利亚第三军时，该军指挥官的第一反应是：“库罗帕特金为什么要浪费自己的后备兵力呢？这不是总攻，他不必为我们操心。尽管黑木每天都发起猛攻，但是他也承受了巨大的损失——某些师团已被彻底歼灭。我军位置优越，小日本绝无机会体会我们英勇的西伯利亚步枪兵刺刀的厉害。”[29]此事发生在2月24～26日。

在惨剧发生前的一周里，俄军依然相信在此次会战中将大获全胜。3月1日，克拉斯诺夫在军报上发表如下言论：“新的一年幸福地开始了。全副武装的满洲集团军强大而威严，他们已经感知到即将到来的胜利。无论是日本人的传单，还是准备放弃抵抗、接受失败的后方的可怜哀号，都无法惊扰、刺激我军。我军前线阵地堑壕中的将士们坚信，上帝将赐予我们荣耀！”[30]然而，此时惊扰俄军的并非日本人的传单或即将投降的后方的奸计。

2月27日，俄军侧翼骑兵连发现了日军的迂回运动。3月1日，日军大部队的运动轨迹清晰起来，某些部队甚至已经深入俄军阵地4俄里。[31]当日，侦察部队报告称，在俄军左翼实施包抄的日军隶属乃木将军麾下。在交火时，面对日军自信而有力的进攻，俄军炮兵部队甚至还未摆好阵型。他们慌忙逃窜，躲入满洲集团军后方。[32]当发现乃木的行踪时，俄军已无计可施。

在得知日军的迂回行动后，库罗帕特金大肆干涉第二集团军的管理，使原本混乱的管理雪上加霜。库罗帕特金的干预不成体系、毫无意义。在西伯利亚第一军被调走后没过几天，士兵再次整装出发，此时朝着相反的方向，集团军右翼急行军。一位见证了士兵艰辛旅程的英国记者写道：“尽管这种漫无目的的摇摆令大家疲惫不堪、灰心丧气，但是他们以备受瞩目的勇气和坚韧抵抗了乃木的猛烈进攻。”[33]不要忘记，部队的转移是在酷寒中完成的，早上7点零下17.1摄氏度，中午零下2.8摄氏度，晚上9点零下8.1摄氏度。[34]士兵的体力不是无穷无尽的。

自辽阳战役之后，野战部队所拥有的重炮数量稳步上升。在奉天附近，日军以170门重炮对战俄军158门重炮。然而在日军发动进攻的同时，俄军的攻城炮被撤出阵地，运往后方。[35]总司令以“重炮用处不大”为由，禁止野战部队组装11英寸重炮打击敌军工程；未经总司令部许可，重炮所在阵地的指挥官甚至无权支配它们。[36]显然，这是为将来的撤退做准备。重炮的撤出令士兵感到沮丧，因为此后不久日军立即使用重炮轰击俄军阵地。俄军的野战炮无法对抗日军11英寸的火炮。2

月26日，阿列克谢耶夫得知库罗帕特金准备撤退。在军需部长的坚持下，第三集团军司令比尔德林将军给总司令写了一封信，但未收到答复。[37]

部队从右翼向左翼移动，途中遭遇日军的猛烈打击，考利巴尔斯集团军的实力因此削弱。2月28日，库罗帕特金提醒第三集团军司令，后备兵力大多已经支援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了。[38]为了加强危险区域的防御，库罗帕特金只能组建临时部队，这是惯用手段。结果，这导致部队布局混乱，集团军司令甚至不清楚他们麾下包括哪些部队。

在奉天附近，“部队组建热潮”达到顶峰：为了掩护从侧翼撤退的部队，从3个集团军的11个军、16个营及43个不同的兵团抽调兵力组建联合部队——51个营，骑兵将军拉乌尼茨（М.В.фон дер Лауниц）担任这支部队的总参谋长。[39]在联合部队的协助下，第二集团军撤出半包围圈。[40]在联合部队中，除了51个营以外，还编入了20个3/4支哥萨克部队和骑兵连以及（从5个炮兵连抽调的）132门火炮。不仅如此，联合部队被拆分成4支独立分队，同时下设更小规模的编队。为了组建新的作战单位，司令部从部队中抽调连、排，甚至班。部队的融合达到了混乱的程度，部队不了解指挥官，指挥官也不熟悉部队，大家像邻居一样。拉乌尼茨参谋部（姑且使用这一术语，拉乌尼茨不得不开始领导自己的班子——1名总参谋部上校和2名侍从将军的副官）通过电话与总司令保持联络。不久前进驻部队的指挥官既无法得知战事的一般情况，也无从接收具体的行动指令，更不知道拉乌尼茨部队的确切位置。更加糟糕的是，这些分队几乎无法得到正常的补给，管理极为困难，有效调用绝无可能。在此情况下，各分队只能进行分散的独立防御。[41]

部队管理杂乱无章。例如，2月14日至15日，某骑兵部队——14支哥萨克部队、6门火炮屡遭改组。不久，4名将军曾对他们发号施令，然而部队从未收到任何积极备战的命令，仅收到一条从北侧保护奉天的命令（500名骑兵）！[42]至于拉乌尼茨的联合部队，他们不仅需要掩护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还应击退敌军。[43]俄军的战斗力逐渐下降，他们的规模逐渐减小。以第三集团军为例，会战开始后不久，集团军仅剩下40个营，相当于最初的三个军只剩下了一个。阿列克谢耶夫写道：“但是这哪里是一个军！不，这是三个军残留的一堆碎片，其他碎片被揉成一个营调入第二集团军！这哪是什么组织啊！这就是一床用碎布头拼成的破被。在它面前，所有的法律、规章和原则都昏沉入睡。”[44]

未经库罗帕特金批准，考利巴尔斯绝不行动。3月2日，关于谁才是第二集团军司令的问题，众人完全理不清头绪。第二集团军参谋部军官指出：“近日，2月17日至22日，抽调各部兵力临时组建的军消失了，我们第二集团军的几个营也不知去向了。”[45]

在被军事检查机构扣留的电报中，《新时代》通讯员奥利金斯基（别廖佐夫斯基）汇报称：“首先，直至2月22日，我们尚未形成一支完整的、齐全的作战部队。整个团、整个营，甚至个别连队脱离战术单位，一会儿被派到左翼，一会儿被派到右翼，两地通常间隔70～80俄里……被调来调去，混在一起的不仅是部队，还有他们的首长……我断言，没人知道：自己站在谁旁边，谁站在自己的左边或右边，自己的首长在哪里。传令军官是最可怜的人。当撤退突然开始时，原本混乱的部队四散而逃。”[46]只有西伯利亚第一军和第二十五步兵师井然有序。[47]

结果，遇到极大阻碍的乃木暂停行动，黑木顺利地攻破了已被削弱的利涅维奇将军第一集团军的防线。奉天会战成了俄军管理体制危机的鲜活例证。在等待反攻命令的同时，部队也在为此筹谋，但是他们大失所望。[48]在280毫米迫击炮的支援下，日军对“沙鸡”堡发起强攻。当然，俄方的防御工事无力抵抗此类炮弹。据目击者称，炮弹相当密集：“堡垒被炸成了一座喷射火焰和铁块的真火山。”[49]日军的炮火格外猛烈。第四军的任务是保护阵地上的俄军，该军士兵冲锋在前，不计损失。[50]于是，日军的强攻被击退了。3月2日，“沙鸡”堡驻军4次退敌；次日夜间，由于后方面临包抄威胁，驻军被迫放弃阵地。[51]

3月3日，俄军开始撤离前线阵地，这使他们备受打击。“他们行动迟缓；彻夜难眠、身负重担的人们走得很慢，确切地说，他们以此掩饰自己不愿放弃决战阵地的情绪。”[52]3月7～8日夜间，库罗帕特金开始从浑河桥头堡——原本准备发动反攻的地方撤军。撤退是临时决定的，一些经过训练的士兵刚刚抵达桥头堡，此时五座桥只能确保两个军顺利撤退。[53]人们在黑暗中行走，不知道前进的终点，不理解上级的命令，没人知道谁挨着自己，众人焦躁不安。[54]

许多仓库集中分布在桥头堡的正后方。它们更靠近前线，以便在转入反攻后缓解军队的弹药补给压力。[55]此时，俄国人没时间带走仓库里的物资。撤退时，他们放弃了巨大的仓库，尽管里面储存着军鞋、粮食、谷物、面包干、冻鱼、冻肉。最初，俄军并未焚毁仓库，因为担心在浑河阵地上弥漫的浓烟将引来日军的火力。仓库卫兵奉命撤离，一些

指挥官允许士兵“享用”这些补给。许多人不理解它们为什么不可触碰，并且突然下达的撤退命令使众人精神崩溃。此后，局面极其混乱。[56]为了防止冲突，上级下令砸破酒桶，但于事无补。士兵们像蝗虫一样猛扑过去，拼命从酒桶和在地上蔓延的“酒泉”中汲取一切。[57]很快，现场再无秩序可言。

目击者回忆道：“由于无法运走，大量伏特加、面包、罐头及其他食品、饮品被抛向士兵，可以轻易地想象当时的场景，假设你周围有成千上万人，近日他们食不果腹，暴怒的人潮从东西南北同时涌来，抢夺食物，其中许多人立即搬走一箱箱沉甸甸的食物，毫无疑问，走不了一英里，他们就得放弃。与此同时，人们愤怒地斥责每个试图将自己赶出罐头堆的人。有些人坐在地上，用军刀或刺刀刺破罐头盒，直接吃掉里面的东西……有些人撬开了足够自己吃一周的罐头。在食物面前，他们倍感饥饿，他们如此兴奋，以至于有时竟未发现已经割伤了手指。伏特加酒桶周围的场景更加糟糕。人们用刺刀扎破酒桶，用斧头、短剑砍碎酒桶，直至酒桶遍体鳞伤流出佳酿。狂热的人们围在破洞周围，试图用嘴直接汲取珍贵的液体，或者用帽子、沙丁鱼罐头空盒接住它们，甚至连散落在周围的日军炮弹的碎片也被当成了容器。”[58]

第二集团军参谋部军官回忆称：“那时不知是谁点燃了谷堆和高粱秸垛，士兵和哥萨克开始抢劫——洗劫仓库。他们粗暴而急迫地撬开箱子，或用挖掘工具，或用步枪枪托。在这场意外的‘战斗’中，我见证了几支步枪的损毁（枪托颈部折断）。当时不仅能够听到斧头和枪托的敲击声，还能听到箱板和木桶的破裂声，甚至还可以清楚地听到数百普特的精制方糖在罐子破碎后洒向地面的簌簌声。士兵们贪婪地抓起方糖放入兜中、塞进衣襟和大衣，随后扣紧短皮袄、军大衣；之后，再在步枪上横挂一两双新皮靴。至于无处可塞的咸鱼，则被串在了刺刀上。我前面是一个标兵营，大量蔷薇色的咸鱼代替标兵徽章在他们的刺刀上来回晃动。参与仓库清理的部队瞬间溃散，秩序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军官高声呼喊，精疲力竭，但是没人听从他们的指挥，因为对抢劫的渴望已经压制了部队纪律感（或许出于嫉妒和愤怒，他们不希望让日军得到仓库）。”[59]人们抓住手中的一切，但是很快意识到自己无法带走它们，在走了一两百步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战利品”，将它们仍在地上，踩进泥里。幸运的是，日军并未开火、追击，否则这群人将无法过河。[60]

另一方面，夜间撤退组织不力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应当给

步兵和炮兵分配两条不同的撤退路线，但是他们被分配到了同一条路线，结果两队人马混在了一起。[61]很快，第三集团军便猜到了上级即将下达焚毁仓库的命令；未及命令下达，筋疲力尽、饥寒交迫的部队便已无法抵抗仓库的诱惑。[62]此事发生在夜间，军官很难维持秩序。此时，道路左右燃起大火，火光照亮了桥头堡，炮声轰鸣，在燃烧的仓库中弹药陆续爆炸。[63]一位指挥官回忆称："这一切都令人烦躁，使人厌恶。"[64]撤退时，前线附近的军队物资发挥着极为恶劣的作用，几乎到处都出现了同样的场景。在第二集团军撤退途中，他们也来到了仓库附近。直到最后一刻，那里都保持着近乎完美的秩序，卫兵坚守岗位，大型木制板房附近的过道也被仔细地打扫过。但是，销毁财产的命令刚下达，"从敌人手中挽救仓库"的狂欢即刻开始。由于没有可靠的军事警察，为数不多的卫兵被撤退部队冲散了。[65]

第二集团军参谋部军官回忆道："从三合屯向营盘撤退的场景十分悲凉：熊熊燃烧的仓库和村庄照亮了无边的黑暗；医院和各类辎重部队惊慌失措、毫无秩序地穿过浑河；许多人仍在收拾行李。车轮碾压结冰的地面发出隆隆的响声，其中还掺杂着不协调的叫喊声以及炮弹在火中爆炸的声音；某处正在慌乱地拆除军需仓库，在那里还能听见醉汉的叫骂声……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浑河渡口人群拥挤，混乱不堪。后来我得知，我军的医院监察员季莫费耶夫上校——一个热情开朗的好人在混乱中被自己手下抢劫仓库的士兵重伤，后来不治身亡。"[66]季莫费耶夫是库罗帕特金的妻弟，1905年6月伤故。为了阻止士兵抢劫仓库，他用左轮手枪威胁他们，然后被士兵开枪打伤。[67]

此时还有一个问题——过河。浑河本身被冰雪覆盖且河道较窄，40米左右，但是河岸地势较高，两岸之间的距离则是河道的3～4倍。俄军仅在桥梁两侧铺设了上坡道和下坡道。在后无追兵的情况下，撤退部队才躲过一劫。[68]对于掩护部队而言，废弃的仓库没有任何吸引力，因此他们的行动井然有序。在击退日军猛烈的进攻后，某些部队随即撤离，中断了与日军的近地对决，在那里能够听到日军前线哨所的谈话。[69]最后5个营搭建了铁轨马车道并且有序撤离，他们几乎在日军的眼皮底下运出了部分可拆卸的铁轨路基。所幸日本人给了俄国部队渡河的机会，此后才发动进攻。[70]

[1]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5.Мукде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Ч.1.События，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Мукденскому

сражению，и самое сражение до приказания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об отходе III и I армии к Хуньхэ.С.1-2.

[2] 今吉林德惠站。——译者注

[3]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Действия в Манчжурии.//ВС.1904.№12.С.258-261；Троицкий В.Заамурский округ пограничной стражи...//ВС.1908.№8.С.31；То же.//ВС.1908.№11.С.54；Винекен А.Японская кавалерия в минувшую кампанию 1904-1905 гг.//ВРК.1910.№3.С.103；Левицкий Н.А.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М.1938.С.241-242；Свечин А.［А.］，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 Д.Ук.соч.С.18.

[4]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The Russo-Japanese War*，vol. 2，pp. 64-65.

[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5.Мукде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Ч.1.События，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Мукденскому сражению，и самое сражение до приказания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об отходе III и I армии к Хуньхэ.С.88-89.

[6] Свечин А.［А.］，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Ук.соч.С.342.

[7]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5.Мукденское сраж ение.Ч.1.События，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Мукденскому сражению，и самое сражение до приказания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об отходе III и I армии к Хуньхэ.С.84.

[8] Винекен А.Японская кавалерия в минувшую кампанию 1904-1905 гг.//ВРК.1910.№3.С.104.

[9] Stanley Washburn，*Field Notes from the Russian Front*，vol. 1. London：A. Melrose，［1915］，p. 65；McCullagh，*With the Cossacks*，p. 339；Гамильтон Я.Ук.соч.СПб.1907.Т.2.С.22；49.

[10] Гершельман Ф.Конница в 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и в былые времена.//ВС.1911.№7.С.62.

[11] Караульщиков Л.А.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армии к войсковому саперному делу.//ИЖ.1906.№1-2.С.84；Левицкий Н.А.Ук.соч.С.244.；Свечин А.［А.］，Романовский Ю.Д.Ук.соч. С.344.

[1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5.Мукде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Ч.1.События，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Мукден скому сражению，и самое сражение до приказания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об отходе III и I армии к Хуньхэ.С.36.

[13] Мау Н.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война.//ВС.1909.№5.С.32-33.

[1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5.Мукде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Ч.1.События，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Мукден скому сражению，и самое сражение до приказания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об отходе III и I армии к Хуньхэ.С.37.

[1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Из дневников...С.73.

[16] Каульбарс А.В.Ук.соч.Одесса.1908.Ч.2.С.7；11；17.

[17] Андрианов П.2-я Манчжурская армия в дни Мукденских боев.// БП.М.1909.№1.С.8-9.

[18] Н-ч.Тяжелые дни Мукденских боев（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запасного）.// РС.1910.Том 141.Вып.1.С.114-115.

[19] Ренненкампф П.К.Ук.соч.С.1-2.

[20] Оболешев Н.Действия VI Сибирского корпуса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в период стояния на реке Ша-хэ и в Мукденском бою.//ВС.1905.№10.С.156.

[21] Оболешев Н.Действия VI Сибирского корпуса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в период стояния на реке Ша-хэ и в Мукденском бою.//ВС.1905.№10.С.156.

[22] Левицкий Н.А.Ук.соч.С.239.

[23] Юденич Н.Форты-капониры и их вооружение.//ИЖ.1907.№3.С.455.

[24] Тактика пулеметов（перевод с японского）.//Сборник ГУГШ.1910. Вып.10.Отдел II.С.36.

[25] Тактика пулеметов（перевод с японского）.//Сборник ГУГШ.1910. Вып.10.Отдел II.С.32.

[26] Тактика пулеметов（перевод с японского）.//Сборник ГУГШ.1910. Вып.10.Отдел II.С.34.

[27]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Л.39；44.

[28] Ренненкампф П.К.Ук.соч.С.3-5.

[29] Polovtsoff，*Glory and Downfall*，p. 70.

[30]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16 февр.1905.№193.С.3.

[31] Матковский А.Конница 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ую войну.//ВС.1911.№2.С.45；Гершельман Ф.Конница в 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и в былые времена.//ВС.1911. №8.С.67.

[32] ГАРФ.Ф.Р-5793.Оп.1.Ед.хр.16.Л.16.об.

[33] McCullagh , *With the Cossacks* , p. 225.

[34]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13 февр.1905.№190.С.2.

[35]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в бою полевой артиллерии по опыту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Статья лейтенанта 5-го батальона крепостной артиллерии Виктора Каянека из «Streffleur militarische Zeitschift».//ВС.1912.№7.С.111.

[36] Соболев Л.Н.Ук.соч.С.119.

[37]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Л.45 и об.

[38] Отчет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С.29.

[39] Теттау Э.Восемнадцать месяцев…СПб.1908.Ч.2.С.266.

[40] Андрианов П.2-я Манчжурская армия в дни Мукденских боев.//БП. М.1909.№1.С.21.

[41] Мюллер Н.122-й пех.Тамбовский полк в Мукденских боях.//ВС.1907. №7.С.23 ; Соболев Л.Н.Ук.соч.С.150-151 ; Рерберг Ф.П.Ук.соч. С.229 ; Геруа Б.В.Ук.соч.Париж.1969.Т.1.С.166.

[42] Деникин А.Мукденские дни в конном отряде.//ВС.1907.№3.С.45.

[43] Добророльский С.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укденской операции с 7-го по 26-е февраля 1905 года.//ВС.1906.№6.С.31.

[44]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50.об.

[45] Геруа Б.В.Ук.соч.Париж.1969.Т.1.С.165.

[46] Отчет о применении цензуры на театре войны…Приложение №29.С.21.

[47] Геруа Б.В.Ук.соч.Париж.1969.Т.1.С.166.

[48] Деникин А.Мукденские дни в конном отряде.//ВС.1907.№2.С.44.

[49] Нодо Л.Письма о войне с Японией.С.208.

[5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черк принца Карла фон Гогенцоллерна.// Новое слово.СПб.1912.№2.С.43.

[51] Нодо Л.Письма о войне с Японией.С.209.

[52] Мюллер Н.122-й пех.Тамбовский полк в Мукденских боях.//ВС.1907.

№5.С.81.

[53] Соболев Л.Н.Ук.соч.С.170；186；Парский Д.［П.］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мысли...С.50；Ренненкампф П.К.Ук.соч.С.149.

[54] Н-ч.Тяжелые дни Мукденских боев...//РС.1910.Том 141.Вып. 3.С.589.

[55] Парский Д.［П.］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мысли...С.50.

[56] McCullagh，*With the Cossacks*，p. 247.

[57] Гусев С.Я.Из дневника корпусного контролера...//ВС.1910.№12. С.197.

[58] McCullagh，*With the Cossacks*，p. 247.

[59] Рерберг Ф.П.Ук.соч.С.211.

[60] Н-ч.Тяжелые дни Мукденских боев...//РС.1910.Том 141.Вып.3. С.594.

[61] Мюллер Н.122-й пех.Тамбовский полк в Мукденских боях.//ВС.1907. №6.С.39.

[62]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4.Л.20.об.

[63] Гусев С.Я.Из дневника корпусного контролера...//ВС.1910.№12. С.198.

[64] Мюллер Н.122-й пех.Тамбовский полк в Мукденских боях.//ВС.1907. №6.С.40.

[65] Рерберг Ф.П.Ук.соч.С.211.

[66] Парский Д.［П.］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мысли...С.51.

[67]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5.Л.37.

[68] Мюллер Н.122-й пех.Тамбовский полк в Мукденских боях.//ВС.1907. №6.С.43.

[69] Розеншильд-Паулин［А.Н.］Чжанчжуанцза.//ВС.1909.№2.С.62；64.

[70]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4.Л.21.

27 奉天会战：灾难性的撤退

1905年3月9日，库罗帕特金下达撤退命令，却无力组织。在撤离城市期间，奉天会战迎来了灾难性的失败结局。10日，总司令参谋部在奉天后方官道隘口处的撤退部署无法令人满意，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与辎重部队、后勤部队——370个营的30余万人、近1000门火炮和上万辆辎重车挤在一处。[1]在混乱无序的前进途中，辎重车、医用物资车、牛群造成了巨大而可怕的混乱。[2]部队在激战后撤退，经过田野时，亡者、伤者隐蔽其间，他们孤立无援。撤退途中鲜少停留，一旦停下，人们便如同失去意识一般昏睡过去。当时，日本骑兵正在逼近的传言足以引起众人的恐慌。[3]在撤出奉天时，被“部队临时组建行动”搞得四分五裂的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混在了一起，第三集团军的撤退相对有序。

3月9日18：00，军需部长麾下的准校斯韦钦上尉电话告知阿列克谢耶夫，日军已经跨越浑河抵达西伯利亚第四军前线，企图闯入奉天城外蒲河村附近的俄军后方。当日上午飓风肆虐，俄军阵地尘土飞扬，能见度不足十步。日军在沙尘暴的掩护下，穿越结冰河面。19：00左右，总司令得知日军突围。晚上9点，第三集团军参谋部接到库罗帕特金下达的从官道撤离的命令。全体军官火速集合，在阿列克谢耶夫的指挥下编写部队撤退计划。参谋部通过电话确认命令，并于22：00结束工作。命令如下：“俄历1905年2月24日，晚上9点至10点，东营盘，命令第三集团军在夜幕降临之际沿官道撤离桥头堡，勿入奉天。在第三集团军从桥头堡撤离前，第二集团军牵制敌军，而后沿铁路撤离，同时从西侧掩护第三集团军。”[4]

撤退之路充满艰辛。扑面而来的狂风裹挟着沙土和烟尘，不仅模糊了撤退者的视线，同时也损坏了武器：枪栓堵塞，扳机失灵。[5]当时视线范围不足几步，撤退部队既无法确定位置，也无法与友军保持联络。[6]撤退部队人潮涌动，逐渐混在了一起：“在骑兵目之所及的广阔区域内满是撤退部队，所有人都在念叨一句话：去奉天！”[7]奉天是清政府声明的中立城市，因此俄军不能占领它，只能沿城墙绕行，那里自然没有道路和桥梁。持续不断的风暴增加了撤退的难度。撤退部队只能将出发时间向后推迟几小时，从3月9日23：00推迟到3月10日1：00。辎重

车队、炮兵和步兵几乎是摸索着前进，前进的队伍蜿蜒蛇行。与此同时，各军与集团军参谋部和友军失去了联系。[8]

3月10日下午4点左右，第三集团军开始向后方撤退。在进入官道后，阿列克谢耶夫看见官道上第二集团军、第三集团军的部队、火炮和辎重车乱作一团："密密麻麻的大车从周围的小道不断涌入，它们随意地站成几排，车队一直延伸到了北边，这一过程几乎持续到了上午10点，现场毫无秩序可言。我们第三集团军人数不多，直到11点才动身出发。"[9]实际上，3月10日清晨的局面更加糟糕。混乱导致拥堵，停下的纵队比前进的多。在拥挤的道路上，部队混在了一起。对于早上6：00的撤退场面，第二集团军参谋部将军描述道："在离开奉天前往官道的途中，我们立即撞见了如此混乱、如此触目惊心的撤退场面，这彻底颠覆了我对无序撤退的认知。大车、火炮、部队（将他们称为人群更为准确）从奉天大大小小的街道上、从四面八方涌入官道；在城市出口附近，人们混乱无序、无法前进。那里也有浮桥，不知出于何种需要，近期它们一直停靠在奉天附近，类似于浮桥的舟桥纵列是最庞大笨重、最没用的工具。战争期间，它们从未派上用场，其宽度（约220米）和深度无法匹配河岸，也许只有在鸭绿江才能用到它们。然而，俄军经常为它们忙前忙后，耽误前进。[10]此外，伤员运输车、火炮阵地辎重车、弹药车也堵在那里。总而言之，这三类辎重车辆、炮车和人群仿佛都有自己的队伍；所有车辆不仅没有分类排列，甚至还不成行，一行的队伍能延伸出两行、三行，甚至十行……现场一团乱麻，每个人都自顾自地向前走，因此经常进入其他车道。不幸的是，城外不远处的道路为高山隘口，在那里发生了拥堵。这清楚地表明，军队领导的极度失职、对辎重车队放任不管正是造成这场混乱的罪魁祸首。"[11]

事实上，即便此时，军队领导仍在发号施令并且进行了无数次的即兴"完善"。辎重车队在官道的黏土路面上前进、上坡、下坡绝非易事。道路（约17米）与架设在谷地和溪流上的桥梁（4～4.5米）宽度差异又增加了车队行进的难度。[12]下面以东西伯利亚第一舟桥营为例，讲述一下军队领导是如何使撤退部队溃散成乌合之众的。在撤出辽阳时，舟桥兵推着笨重而庞大的辎重车跟着后卫部队一同撤退。那时，为了避免遭受重创，部队吃尽了苦头。[13]

在奉天附近，舟桥营接到命令，要求在3月9日21：00撤离奉天。1小时后，部队开始有序撤退：一辆车接着一辆车，排成一列。营长在日

记中写道：“在遇到第一处谷地时，那里只有一条通道，在通过它时，排在主干道上的后方车辆的秩序大不如前，他们想要找寻其他通道。由于找寻未果，在谷地陡坡前，上述纵队变成了五六排平行队列，尽管如此，在他们面前也只有一条通道。在第一列辎重车队穿越谷地时，第二列在等候；第二列穿越时，第三列在等候，以此类推。通过这种方式，辎重车队得以保持完整。与此同时，某位指挥者发现，辎重车队以这种方式通过谷地并不合理，因此下令每列同时放行一二辆辎重车通过谷地。在每列分别放行2辆车后，后车只能在其余5列分别放行2辆车后，即放行12（2×6）辆车后才能追赶同一列的前车；此后还需通过两座浮桥。就这样，辎重车队的秩序被完全打乱了，而遇到的谷地却越来越多。在以这种方式通过谷地、溪流时，指挥官完全无法指挥车队。”[14]因此，在从蒲河向官道撤退的过程中，舟桥兵损失惨重，这不足为奇。某些部队混成营，不仅失去了所有板车，同时失去了全部物资。[15]

眼看指挥撤退部队、恢复纪律毫无希望，阿列克谢耶夫派遣自己的部下整顿车队秩序，引导撤退者从沿途宽阔处绕过隘口，由于地面冻结，才有此可能。[16]然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撤离奉天的军官回忆道：“在冬天，如果不走大道，那么在中国东北行军则十分艰难；地里满是犁沟和被割断的1/4俄丈高的高粱秆。”[17]在隘口后方1千米处出现了一条道路，军队曾驻扎此地，人群从道路的左侧或右侧涌入。与此同时，军需部长试图与奉天附近失联的西伯利亚第六军建立联系。[18]8：00左右，先头部队离开山区进入公路，此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第六军指挥官回忆道：“在长15～20俄里、宽5～7俄里的广阔区域内，虽然有几处丘陵，但几乎完全没有植被，在充足的阳光下，30万人的军队连同辎重走走停停。炮火从三个方向轰鸣而来，场面如此宏大……人们无法立即弄清这是怎么回事。部队仍在前行，在我看来，大批人马几乎毫无空隙。辎重车队绵延不绝。队伍极为缓慢地移动着。自大军撤退的场景映入我们眼帘之初，我就感觉部队原地不动，并未前进。”[19]

面对一条两岸地形陡峭的河流、几处谷地和溪流，无论如何，拉着数千米横排、乱哄哄的人群也无法加快行进的脚步。奉天火车站及其周围的仓库也都位于城外，恰好在部队撤退路线附近。在火车站附近坐落着军械仓库，即陆军军需物资总库，里面存放着3600余车皮的谷物和面包干、1000余立方俄丈的煤炭及大量草料。显然，撤退部队无法转移这些军需物资。3月9日晚上，列车组陆续驶离奉天，一个车头通常牵引52～55节车厢（是规定车厢数的两倍多！），8～16列火车为一组，发车

间隔为8分钟。铁路工作人员表现出了超强的自制力和组织力，得益于他们的付出，疏散工作顺利开展，在此过程中并未发生事故和人员伤亡。3月10日5：45，最后一组列车出发了。车厢顶部趴满了人，恐慌的情绪开始蔓延。[20]最终，只有1500节未卸车的车厢被转运至哈尔滨，其余物资均被焚毁。[21]当天上午，军需仓库起火，火光冲天而起，这一幕使驻扎在城市周边的部队心情沉重。[22]不久后便出现了物资供应问题。

在寒冷的2月战斗了两个星期的人们早已疲惫不堪，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短期内再次出现的考验。此时，正在盘点剩余的库存物资。由于官道“交通拥堵”、通行缓慢，各队人马不得不在原地逗留，粮食、白酒、制服等物资消耗殆尽。看到俄军撤退，许多“自由的”商人开始抛售以酒水为主的货品。某些商铺开门营业，醉醺醺的士兵在偷走白兰地、朗姆酒和葡萄酒后从那里蜂拥而出。大批醉汉流落街头，在城市和火车站之间漫无目的地游荡着。一些华人洗劫了被俄国人抛弃的小镇。在撤退期间，车站附近大量俄国醉汉落入日本人和中国人之手，他们多被杀害。[23]辽阳之后，他们不再畏惧俄国人。[24]英国记者回忆道：“为破坏而破坏的激情在士兵中间蔓延开来，在这种激情的刺激下，士兵几乎失控。允许部队抢劫自己的仓库，就如同让猛虎品尝鲜血一般。”[25]撤退途中所做的一切几乎都在加深部队的溃散程度。

在撤退时，俄军需在被日军包抄的两翼之间通行。3月10日，日军部队从两翼聚拢，其间距已缩减至24俄里。[26]联合部队在牵制敌军的同时，竭尽所能保持防御状态，他们后方飞扬的尘土清楚地表明军队和辎重车队还在转移途中。最终，由于没有援军和火炮掩护，掩护部队开始撤退。[27]埋伏在附近的日军立即阻击撤退者。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写道：“这群败类广泛地分散在阵线周围，尾随彻底陷入混乱的人群。无论是公告还是军刀，或是左轮手枪的威胁，都无法约束那些进入狭窄逼仄但尚未被敌军彻底封锁的空间的人群。”[28]士兵扔下步枪，有时甚至用枪指着指挥官。[29]部队在拥挤的道路上缓慢前行，在道路左右不时地响起日军的枪炮声，这一切都令疲于奔命的人们感到压抑。[30]上午9点左右，日军炮击辎重车道，撤退部队陷入恐慌。[31]

起初日本炮兵不敢开火，因为他们的火炮距离俄国人太近，然而在首轮炮击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32]波特金医生分析道：“在任何一家剧院中，都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警报响起——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

众人聚在一起，但是想要离开剧院，他们必须经过狭窄的通道。此时就会出现拥挤和恐慌；极度紧张的人群将完全失去理智：忘记血缘、等级、情感和上帝，只顾着自己逃命。这种反应不次于前些日子的英雄主义……”[33]一位试图整顿秩序的年轻军官在绝望中自杀了。[34]此时，唯一受控制的部队是比尔德林担任司令、马尔特松和阿列克谢耶夫担任参谋长的参谋部护卫队。一名下级军官提议派遣卫队骑兵攻击日军火炮，几支有序撤退的部队回击了日军炮火，危机得以解除。此后，比尔德林和马尔特松继续前进，只有阿列克谢耶夫坚持领导，确切地说，试图领导撤退部队。[35]

基本上，这种领导已经演变为在撤退的人群中找出秩序尚存且有军官指挥的部队，然后军需部长派遣部队掩护撤退。混乱雪崩似的蔓延，在与敌军侦察队发生视线接触时，俄军士气全无。[36]尽管如此，撤退部队仍旧时常遇到井然有序的日军中队，既可能是配备了火炮和机枪的营队，也可能是炊事班队伍，此时众人都慌忙地奔向官道附近的防御工事。阿列克谢耶夫麾下的帕尔斯基上校回忆道：“队伍中士兵茫然的面孔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37]

对于在日军火力范围内的临时掩体而言，拥有己方的火力支持尤为重要。最初，在炮兵连指挥官的部署下，火炮直接瞄准日军，迫使日军停火，危机暂时解除。[38]在混乱中，很难指挥炮兵作战。在炮击指定目标后，总有炮兵随意离开阵地。在日本步兵逼近时，炮兵既不愿冒险开火，也不愿将他们引到路上。下午1点左右，日军的交叉火力再次笼罩撤退部队。[39]在蒲河附近的盆地，俄军最终瓦解。据阿列克谢耶夫描述：“俄历2月25日，军队（阿列克谢耶夫的部下——引者）不再抵抗。”[40]恐慌的情绪在撤退部队和辎重车队中蔓延开来，此后再无恢复秩序的可能。集团军参谋部军官试图召集溃军、将15～20人编为一组，然而下濑火药一旦爆炸，他们就四散而逃。受惊的马匹拉着辎重车疾驰而去，伤人无数；炮兵部队的马匹尤为强壮，它们横冲直撞，扫荡挡在它们前面的一切。[41]

此时，身处奉天西侧、骑兵部队的邓尼金观察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一些部队秩序尚存，勉强应战；其他部队分崩离析，迷失方向，他们来回奔跑，撞上了日军的枪口。人们时而聚在一起，时而四散而逃，他们无助地寻找摆脱死亡绝境的出路。我们的侦察兵成了他们的灯塔……整片区域，凡目之所及皆兵荒马乱之景：朝不同方向疾驰的辎重

车辆、医院篷车，骑兵不知所踪，狂奔的马匹，散落的箱子和胡乱堆放的辎重，总司令部的辎重也不例外……我初次见识到战争的恐慌。”[42]

此时，军队已经失控。辎重兵纷纷卸下马匹上的套索、骑马逃窜，至于此类事件的规模，我们可以通过第二、第三集团军的物资损失推算。撤退途中，两军损失29门速射炮、46座炮架、44辆双轮前车、547辆弹药车、9辆弹药车前车、279辆双轮弹药车、753辆双轮物资车、489辆不同用途的辎重车及79座行军灶。泰陶认为，在撤离奉天途中，俄军损失近6000辆辎重车。[43]毫无疑问，损失大多发生在官道上。辎重的损失加快了可控部队的瓦解，对此参谋部无能为力。士兵扔掉手中的武器，抢夺散落的物资，第三集团军参谋部的财产也未幸免。此时，趁火打劫者对辎重车队胡作非为。[44]

在这片几平方千米的区域内，死者、伤者随处可见，醉汉也混入其中。在盆地出口处，重新聚集的集团军参谋部只能看到一幅惨景：“在宽广而平坦的土地上，人们四处奔走逃窜；破烂的板车随处可见，散落在地的各类物资胡乱堆积，有些已被火舌吞没；满眼都是逃跑的人群，许多马匹横尸荒野……这就是一幅逃亡的景象！”[45]次日，德国军官在与胜利者一同踏上这片土地时惊讶道：“俄军撤退时所走的这条道路惨不忍睹。短短的几千米，到处都是死尸、东倒西歪的火炮和辎重车。这场撤退具有仓皇逃亡的特征。”[46]

撤退途中，俄军彻底陷入混乱。对于整顿部队和辎重车队的行进秩序，军官无计可施。在渡河或穿越溪流时，没人遵守秩序；在通过为数不多的几座桥梁和浅滩时，人们甚至大打出手。[47]在向铁岭撤退途中，后卫部队眼前出现了大批被随意丢弃的军队物资——板车、灶具、纸张、面包干、装着火药的镀锌箱子等。[48]逃亡途中，士兵丢弃背包、手榴弹和弹药包，这不足为奇，因为溃军扔下了所有自认为多余的东西。过度劳累的人马即使坐在冰凉的地面上也能立即入睡。[49]所幸，由于兵力损耗严重（损失近7万兵力），日军放弃追击。据波洛夫佐夫回忆：“显然，日军也已疲惫不堪，因此并未追击我们。假如他们派出几支精悍的骑兵中队追击我们，那么将出现可怕的灾难，但是他们放我们离开了。”[50]令许多人不解的是，撤退途中，俄国骑兵从未尝试抗击日军骑兵，毕竟前者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150个骑兵连对16个骑兵中队。[51]

事实上，日军未能立即察觉俄军撤离“包围圈”的行动。3月10日中

午，日军逼近俄军的中央阵地——第三集团军驻地。下午4点左右，奥保巩出军奉天，结果遭遇后卫部队的截击。[52]3月10日，日本的官方报告更为乐观："我军于今日上午10时占领奉天，近期谋划的行动目标业已达成。"[53]无论如何，日军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并且赶在俄军完全撤退前完成了此事。阿涅菲尔德（А.П. фон Ганненфельд）少将的部队被引入城内，巷战过后被迫投降。在总参谋部的科尔尼洛夫（Л.Г.Корнилов）中校——第一步枪兵旅参谋长的组织下，来自3个步枪兵团的17个连不仅能够维持秩序，有组织地撤退，还能吸纳自发撤退的队伍。面对来自三个方向密集炮火的压迫，科尔尼洛夫部队不仅带走了几挺机枪，还拿走了第十步枪兵团的旗帜。晚上7点，沿铁路路基撤退的科尔尼洛夫部队与主力部队会合。尽管军队高层对后卫部队不管不问，但是他们依然坚持战斗；直至傍晚，仍旧无法与集团军参谋部和总司令参谋部取得联系。[54]

利涅维奇的第一集团军沿铁路撤离奉天，并且在战斗力得以保存后掩护人群撤退。事实上，在库罗帕特金的干涉下，利涅维奇麾下的两个军沦为被掩护的人群。第一集团军损失巨大——2门野战迫击炮和2门榴弹炮，仅有29门三英寸口径的速射炮得以保全；1名将军、3万余名士兵被俘，死伤人数高达6万，5个军失去旗帜（后来成功找回4面军旗，其中包括战俘手中的军旗）。[55]

辽阳之后，假如库罗帕特金能够有条不紊地撤军，那么俄军既不会遭此横祸，也不会产生彻底战败的感觉。严格地讲，"色当惨剧"——彻底包围并击垮军队——不止发生过这一次，但是如此重大的损失没人知道俄军还能再承受几次。当然，这指的不仅是人员和物资的损失。泰陶指出："每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清楚，显然，在奉天会战后，战争已无转机。事实的确如此，尽管俄军能够补足人员和武器的损失，能够从国内获得日军无法企及的物资，却无法提振低落的士气、恢复士兵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对己方军力的信心。最重要的是，无法恢复对长官的信任。"[56]

直至3月10日傍晚，俄军撤退部队仍未恢复秩序。黑暗中，怀疑日本侦察兵就在附近的逃亡者为求自保胡乱开枪，混乱的枪声引发了恐慌和拥堵。11日上午，第二集团军、第三集团军混合部队仍未撤离官道。为了掩护集团军向铁岭转移，11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克服重重障碍组建了一支由12个营和3、4门火炮组成的掩护部队。[57]

日军在3月10日至11日夜间的官方报告中写道：“数万俄军停留在奉天以北，他们筋疲力尽，在恐慌中全军向北撤退。”[58]在日军的炮火下，掩护部队撤离阵地，损失惨重。[59]

3月10日的恐慌导致俄军损失了大量的机动部队，因此在向四平街撤退时，俄军不得不面对补给不足的问题。与其说逃亡者们连续数日没吃上一口热饭，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得到任何食物。在奉天会战的最后几日，库罗帕特金临时提出的“部队组建”计划打乱了部队的供给体系。3月10日，他命令辎重部队向北撤退，此时部队与军需仓库彻底失联。补给匮乏只能加剧混乱，同时增加俄军在奉天会战的损失。[60]俄军疲劳过度，疲惫不堪的士兵倒在路边，旋即陷入昏睡。撤退的亲历者回忆道：“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尽快到达铁岭，在那里撤退部队的阵地已准备妥当，那里的一处匪帮据点成了我们辎重部队的落脚地。”[61]

铁岭坐落在奉天以北64俄里处，通往铁岭的要道已经设防。部署铁岭阵地的初衷在于：一旦俄军沿群山与辽河之间的隘口向北撤退，在阻击日军的同时，可以确保俄军顺利渡河。铁岭阵地可容纳两个军，其上设有24座炮台、2座堡垒、3座眼镜堡、9座多面堡，每座工事需部署一两个连。在防御工事之间分布着堑壕和交通壕。铁岭的防御工事始建于1904年6月，8月短暂停工，而后工期持续至11月。1905年初，防御工事基本竣工。[62]此外，在这座城市里有一座后方军需仓库，但是俄军必须坚持走到那里。在官道上，人们抛弃了暂时多余的一切，疲惫而饥饿的牲畜不再是人们的帮手了。

指挥二等辎重车队撤退的西伯利亚第六军监察员回忆道：“一生中，我从未见过这种场景，每走一步都能遇到跌倒或还剩最后一口气的马匹、骡子和毛驴；路上散落着各种各样的物资，高粱、燕麦、靴子、布匹、制服等。我甚至在匣子里看到了一台全新的辛格尔牌的小型缝纫机。一路上，遇见的都是没有军官指挥的下士，他们面色阴沉、两手空空，不拿任何武器。我问他们：‘你们要去哪里？’他们回答道：‘跟着人群走。’是啊，他们还能回答什么呢。在脱离部队且无人指挥的情况下，他们不知道部队在哪里，就只能遵循自我保护的本能‘随大溜’。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下士还是指挥人员，都不知道自己可以托付的部队在哪里。沿东清铁路建造的工兵桥，在撤退之初因无法承受辎重车和火炮的重量，无一例外地全部垮塌了……”[63]

沿途的军需仓库被部分烧毁；若无上层批示，撤退部队即使抵达尚

存的仓库，也无法获得粮食和饲料。此举并不合理，部队和后方已经脱离了参谋部的控制。在日军逼近时，仓库被付之一炬，饥饿的士兵只能眼巴巴地望着浓烟四起的仓库。在很大程度上，第三集团军军需部长组建的掩护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部队组建后，军队损失显著下降。铁道队和后卫部队秩序尚存：在撤退时，他们炸毁桥梁、摧毁铁路路基；哨所中的报务员坚守至最后一刻，在摧毁一切无法转移的设备后，跟随最后一批士兵撤离阵地。尽管此前通信畅通，但后方的参谋部不知去向。[64]3月12日晚上5点左右，撤退士兵分批抵达铁岭，第三集团军司令比尔德林将军和参谋长马尔特松将军已在那里等候阿列克谢耶夫。此后，库罗帕特金的参谋部才与他们取得联系，命令第三集团军在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的掩护下撤入后方。切断与日军的联系、争取时间是整顿部队秩序的唯一出路。在阵地交界处成功牵制日军的同时，利涅维奇的第一集团军大规模地撤离阵地。[65]

在阵地集结之初，部队秩序井然。局势不容乐观，在寒冷的北风中，疲惫和混乱湮没了防御的希望。[66]军队在铁岭仍未恢复组织和纪律。[67]辎重车横七竖八地停在城市的街道上，互不相让，军队后勤完全瘫痪。某位参与撤退的连队指挥官表示：“好在日军追击不力。”[68]此时，坚守这座设防城市的想法已被人们抛诸脑后。疲惫而饥饿的人们聚集在仓库附近，最初谁也不敢做出开仓放粮的决定，毕竟很久都未收到上级的指示了，这引起了士兵和军官的不满。奉天火车站事件随时可能重演。西伯利亚第六军稽查员古谢夫（С.Я.Гусев）回忆道：“现在，总军需官下令允许部队凭军官签名的便条领取粮食和草料，其上需标明部队名称和人数。仓库附近的场景难以言表。饱受饥饿折磨的人群包围仓库，你推我搡地抢夺着圆面包、面包干、米粒和食盐。巨大的食物堆几分钟就被瓜分一空。”[69]在火车站，士兵们冲进车厢，一名试图维持秩序的军官遇害。[70]

在此情况下，军队依然无法自保。是的，他们已经无法被称为军队了。据与阿列克谢耶夫一同抵达的帕尔斯基上校描述：“城里发生了可怕的内乱，仓库和运送伤员北上的火车站附近是重灾区；这里人头攒动，各路人马乱哄哄地聚在一起；这里似乎有很多逃兵，据说有些是在铁岭以外很远的地方抓获的。后来，战斗到最后一天的人们揭露了在市内发生的各种丑事：逃兵抢劫仓库、武力占领火车席位——迫害伤员；试图制止暴行并且维持秩序的军官多番受辱。这就是奉天灾难对后方的影响！”[71]撤退途中，军队损失不断，俄国人始终在为糟糕的管理埋单。

医院和卫生部队率先撤离奉天，总司令并未设法将他们留在铁岭，尽管按照库罗帕特金的计划铁岭应当成为撤退的终点。俄军的状态打破了总司令的计划，他们继续向位于奉天以北约200千米的四平街撤退，并于3月22日在四平街会合。[72]3月16日至17日午夜，日军占领铁岭。[73]

[1]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51.об；Соболев Л.Н.Ук.соч.С.219.

[2] Оболенский В.В.Записки о войне...С.107.

[3] Багоцкий Ф.Бой под Тахентунем и в японском плену.//ВС.1907.№2.С.87；90-91.

[4] Добротин С.Участие рот 12-го сибирского Барнаульского полка 24-го и 25-го февраля 1905 года в боях под дд.Киузаном и Ленхаучи.//ВС.1910.№11.С.72；Отчет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С.39；336；Парский Д.［П.］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мысли...С.54；Соболев Л.Н.Ук.соч.С.194；297；Теттау Э.Восемнадцать месяцев...СПб.1908.Ч.2.С.353.

[5] Суханов П.37 пех.дивиз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1904-5 гг.//БП.М.1909.№4.С.41.

[6] Добророльский С.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укденской операции с 7-го по 25-е февраля 1905 года.//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СПб.1907.Ч.2.С.219-220.

[7] Рерберг Ф.П.Ук.соч.С.216.

[8] Соболев Л.Н.Ук.соч.С.190；201；203；208.

[9]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52.

[10] Киселев.Понтонер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за время со 2-го июля по 12-е декабря 1904 г.//ИЖ.1905.№2.С.177-178.

[11] Баженов П.Н.Ук.соч.С.299.

[12] Соколов П.Маньчжурские грунтовые дороги и их исправление во время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ИЖ.1906.№.1-2.С.137.

[13] Киселев.Понтонер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за время со 2-го июля по 12-е декабря 1904 г.//ИЖ.1905.№2.С.193-194.

[14] Киселев.Понтонер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с 12-го декабря 1904 г.по 14-е июня 1905 г.//ИЖ.1905.№6-7.С.835.

[15] Томиловский.Участие 1-го понтонного батальона 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1904-1905 гг.//ИЖ.1907.№.2.С.266-270；Потери понтонер 25 февраля 1905 года.Командир 1-го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Понтонного батальона，полковник Киселев.//ИЖ.1907.№6-7.С.60-62.

[16] Парский Д.［П.］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мысли...С.55.

[17] Максимовский Н.На войне.//ВС.1908.№1.С.7.

[18] Парский Д.［П.］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мысли… С.56.

[19] Соболев Л.Н.Ук.соч.С.210.

[20] Теттау Э.Восемнадцать месяцев...СПб.1908.Ч.2.С.349；351；Рерберг Ф.П.Ук.соч.С.233.

[21] Караульщиков Л.А.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Военные сообщения и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е войска.//ИЖ.1906.№.6-7.С.715.

[22] Багоцкий Ф.Бой под Тахентунем и в японском плену.//ВС.1907.№2.С.87；Деникин А.Мукденские дни в конном отряде.//ВС.1907.№2.С.53；57.

[23] Добророльский С.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укденской операции с 7-го по 26-е февраля 1905 года.//ВС.1906.№6.С.36；А.Н.Гибель отряда генерала Церпицкого в Мукденском сражении.//ВС.1907.№4.С.76；Добророльский С.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укденской операции с 7-го по 25-е февраля 1905 года.//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 СПб.1907.Ч.2.С.232；McCullagh，*With the Cossacks*，p. 249.

[24] Рябинин А.А.На войне в 1904-1905 гг...С.55.

[25] McCullagh，*With the Cossacks*，p. 249.

[26] Добророльский С.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укденской операции с 7-го по 26-е февраля 1905 года.//ВС.1906.№6.С.30.

[27] Добротин С.Участие рот 12-го сибирского Барнаульского полка 24-го и 25-го февраля 1905 года в боях под дд.Киузаном и Ленхаучи.//ВС.1910.№11.С.80-82.

[28]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52.об.

[29] Оболенский В.В.Записки о войне...С.114.

[30] Добророльский С.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укденской операции с 7-го по 25-е февраля 1905 года.//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 СПб.1907.Ч.2.С.231-232.

[31] Добророльский С.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укденской операции с 7-го

по 26-е февраля 1905 года.//ВС.1906.№6.С.37 ; Гусев С.Я.Из дневника корпусного контролера...//ВС.1910.№12.С.203.

[32]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 , *The Russo-Japanese War* , vol. 2 , p. 277.

[33] Боткин Е.С.Ук.соч.С.80.

[34] Любицкий 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С.212

[35] Парский Д. [П.]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мысли...С.56-57.

[36] Грулев М. [В.] В штабах и на полях...СПб.1909.Ч.2.С.316.

[37] Парский Д. [П.]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мысли...С.58.

[38] Любицкий 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212.

[39] Отчет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С.44 ; Соболев Л.Н.Ук.соч.С.225.

[40]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53.

[41] Добророльский С.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укденской операции с 7-го по 25-е февраля 1905 года.//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 СПб.1907.Ч.2.С.232 ; Парский Д. [П.]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мысли... С.60.

[42] Деникин А.И.Путь...С.145.

[43] Соболев Л.Н.Ук.соч.С.213 ; Теттау Э.От Мукдена до Портсмута. СПб.1914.С.1.

[44]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52.об ; Карт.1.Ед.хр.34.Л.24.об.

[45] Парский Д. [П.]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мысли...С.60-61.

[4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черк принца Карла фон Гогенцоллерна.// Новое слово.СПб.1912.№2.С.45.

[47]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5.Мукде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Ч.2.От отхода к реке Хуньхэ до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ия на Сыпингайских позициях.С.214-215.

[48] Богоцкий Ф.Бой под Тахентунем...//ВС.1907.№3.С.64.

[49] Гусев С.Я.Из дневника корпусного контролера...//ВС.1910.№12.С.204.

[50] Polovtsoff , *Glory and Downfall* , p. 73.

[51]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 , *The Russo-Japanese War* , vol. 2 , p. 233.

[52] Левицкий Н.А.Ук.соч.С.284.

[5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ма 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СПб.1909.Т.2.С.90.

[54] Куропаткин.А.Н.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до Мукденских боев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б.г.б.м.С.78-79 ; Добророльский С.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укденской операции с 7-го по 25-е февраля 1905 года.//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СПб.1907. Ч.2.С.235 ; Парский Д. [П.]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мысли...С.62.

[55]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5-е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Обзору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с 13-го января по 12 февраля.//ВС.1906.№3.С.239 ; Добророльский С.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укденской операции с 7-го по 25-е февраля 1905 года.//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 СПб.1907.Ч.2.С.236-237.

[56] Теттау Э.От Мукдена до Портсмута.С.1.

[57] Парский Д. [П.]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мысли...С.63 ; 65 ; 67 ; Соболев Л.Н.Ук.соч.С.235.

[58]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ма 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СПб.1909.Т.2.С.91.

[59] Н-ч.Тяжелые дни Мукденских боев...//РС.1910.Том 141.Вып.3. С.600-603.

[60] Янушкевич Н. [Н.]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роль интендантства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армиях на войне.//ВС.1910.№4.С.135-136.

[61] Гусев С.Я.Из дневника корпусного контролера...//ВС.1911.№11. С.204.

[62] Цабель С.А.Ляоян.Мукден.Тьелин (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и планы укреплений позиций) .//ИЖ.1907.№6-7.С.727-728.

[63] Гусев А.И.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участника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ВС.1910.№9.С.87.

[64] Гусев А.И.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участника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ВС.1910.№9.С.87.

[65] Геруа Б.В.Ук.соч.Париж.1969.Т.1.С.186.

[66] Рябинин А.А.На войне в 1904-1905 гг...С.183-184.

[67] Оболенский В.В.Записки о войне...С.116.

[68] Суханов П.37 пех.дивиз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1904-5 гг.//БП.М.

1909.№4.С.42.

[69] Гусев С.Я.Из дневника корпусного контролера...//ВС.1910.№11. С.207.

[70] Любицкий 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С.216.

[71] Парский Д. [П.]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мысли...С.69.

[72] Добророльский С.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укденской операции с 7-го по 25-е февраля 1905 года.//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 СПб.1907.Ч.2.С.236 ; Соболев Л.Н.Ук.соч.С.152 ; Парский Д. [П.] Причины наших неудач в войне с Японией.Необходимые реформы в армии.СПб.1906.С.75.

[73]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ма 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СПб.1909.Т.2.С.129.

28 四平街对峙、陷入僵局的陆地对抗、迈向和谈的第一步、继续出征的俄国舰队

1905年3月15日，库罗帕特金被撤去总司令之职。两天后，他向利涅维奇移交指挥权。[1]这是一位在尼古拉一世执政期间毕业于军校的七旬老人，在军中享有“老爷子”之称。当然，这个称谓与年龄无关，在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看来，这说明“他没那么位高权重”。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对新任总司令的评价颇为公正、中肯：“他是个有天赋的人，但是这种天赋只适合指挥一个师。”[2]与此同时，一项艰巨的任务正摆在他的面前——恢复部队对司令部的信心，重整军队使之成为日军不可小觑的力量。

4月初，波特金医生指出：“利涅维奇接手了一个烂摊子。据传，全军上下仅剩18万兵力。当然，这个数字颇为准确，截至目前，只有个别规模不大的部队正在赶来。至于对兵力损失的推算也基本准确——近10.7万！伤员、病患人数高达6.5万，死亡人数近2万，其余或逃跑或被俘！火炮所剩无几——31门，因此并非每个炮兵连都能分到火炮。日军折损12万兵力。”[3]事实上，俄军的初始兵力约为455470人，其中作战部队217745名步兵、12861名骑兵，同时配备1129门火炮。俄军损失惨重的两个步兵团近乎全军覆没，仅剩三四百人。[4]步兵上将巴捷亚诺夫（М.И.Батьянов）出任第三集团军司令。[5]如此看来，在军事行动活跃期间，集团军司令——考利巴尔斯和比尔德林——在位时间均不足两个半月。此后，在军队管理方面并未发生其他变动。是的，也无法发生其他变动。新官上任十天后，阿列克谢耶夫表示：“可悲的是，库罗帕特金及其参谋部在任期间那种特有的、毫无节制的混乱状态已经被新班子继承了。”[6]

德国总参谋部认为，俄国不会输掉战争。比洛回忆道：“总参谋部认为，即使日本人在陆上和海上持续获胜，也无法迫使俄国缔结和约。日本人能占领萨哈林，也能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但是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某个地方他们不得不驻足；在俄军再次投入战斗前的几个月里，日本人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进行战前准备。虽然库罗帕特金将军铸成大错，但是在反击中他将发挥非凡的才干。我们总参谋部认为，在这个紧要关头，俄国必须保持克制。”[7]对此，应当增加补充条件，即最高司

令部必须保持克制。显然，这种品质正是他们欠缺的。尽管总司令的变更在全军上下赢得一片欢呼，但是背后依然存在许多“暗伤”。大多数军官和士兵不再期望胜利，军队可以防守，却不能进攻。[8]此时，几乎没有什么振奋军心的好消息。

1905年4月3日晚上，与伤员一同滞留奉天的红十字会队伍越过前线。医院处境艰难，自俄军撤离小城后，一些中国人开始抢劫烧杀抢掠。日本人阻止了这些暴行。[9]当时还有460名重伤的俄国士兵和405名日本伤员、病患未从陆军医院撤离；尚有大批医护人员陪在他们身边。日军依据所奉行的战争条例将他们“遣送回国”。由26名医生、9名女护士和65名卫生员组成的以古尔科夫为首的团队被送至四平街，同时另有200余人被送往芝罘，走海路回国。古尔科夫的功绩备受关注，总司令在写给皇太后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的电报中报告了他的事迹。[10]此后，未来的杜马议员在全俄罗斯声名鹊起。

至于库罗帕特金——第一集团军司令，在很大程度上依旧能够左右俄军的决策，他一如既往地号召众人保持耐心，同时表示：只有正确地使用兵力才能一击即中。他在6月8日（俄历5月26日）写给维特的信中表示：“我们已经为战役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迫不及待地期待它的到来。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转入决定性反攻。在此情况下，难道还要提及‘无中生有’甚至侮辱俄国的和谈吗？日本人拼尽全力与我们打陆地战。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无力扩充军队，现在已是他们胜利的巅峰。我们只需继续增派兵力（我要补充一句，我们出兵太慢，截至目前尚未补足队伍，但是我们已经得到了增援，并且增援部队将源源不断地赶来）。再次重申：只要不出大错，我们就能在陆地上站稳脚跟，进而赢得胜利。日本人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他们也曾失误。尽管我们曾经遭遇挫折，但是毫无疑问，我们也在吸取教训、完善自己，我们的部队和指挥官的战斗水平也有所提升。”[11]库罗帕特金的最后一项见解难以服众。

新任总司令与他的前任一样，也是被动防御的支持者。为了成功拦截日军的进攻，部队在恢复秩序后层层设防。仅在第二集团军阵地便已修筑了95座野战碉堡、100座桥梁、450千米的道路，另有60座村庄化身防御据点，同时部署了35万平方米的人工障碍物。[12]在45俄里的阵线上，在这些防御工事之间，第二集团军部署了五个军的兵力。平均而言，每450步，即每个直线射程部署一处防御据点。[13]因此，谁也不会

在此发动进攻，没人会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在这些在建的防御阵地上，利涅维奇下达首条军令，深入后方沿四平街修建新的防御阵线。因此，即使四平街阵地前线变得牢不可破，也没人能够保证，一旦日军迂回包抄，辽阳和奉天的悲剧不会重演。[14]为了缓解朴次茅斯的谈判局势，沙皇于8月20日提议转入进攻，然而沙皇的提议在四平街的各大会议上石沉大海，会议得出进攻是不可取的最终结论。[15]

与此同时，日军兵力几近枯竭，若想恢复军力，必须重新征兵、训练新兵，同时新建6个师团，获得10亿日元的军费。为了充分执行上述措施、筹备新一轮的大会战，至少需要一年。这意味着，日军在中国东北已经无力发动进攻了。在收到奉天会战的捷报后，山县有朋元帅3月10日觐见天皇，劝说天皇是时候派遣外交部采取行动了。当日，他向政府阐明同样的立场，同时向新闻界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继续与顽固的敌人作战是愚蠢的。"[16]身处中国东北的大山元帅率先做出反应。3月13日，大山致函帝国参谋本部，敦促他们立即采取正确的外交措施："奉天会战后，我们的军事行动应当与我们的政策完美契合。换言之，无论我们决定在追击敌人的同时继续进攻，还是坚持阵地战方针，如果我们的军事行动无法与国家政策相契合，那么即将到来的、可能牺牲数千生命的战斗将徒劳无功。如果将军事成就定义为我国的政策目标，那么我军将做出无谓的牺牲。"[17]

3月23日，参谋总长向政府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山县认为，军事行动已经进入了决定性的第三阶段。他断言，即使战争持续数年，日本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尔滨，俄国也不会求和，"将来，我们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和谈仍旧遥不可及。有些事情，我们必须深思熟虑。首先，敌人在国内仍有大量兵力，而我们已经全数出动；其次，敌人不缺军官，而我们自战争伊始便已损失大量军官，他们难以取代……简而言之，第三阶段意义重大，稍有差池，我们辉煌的胜绩将化为乌有。现在，我们务必保持谨慎"。[18]日本军方意见一致，他们主张和谈。3月23日，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男爵应诏返回东京汇报战事进展，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服国家领导阶层立即展开谈判。面对前来接站、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参谋本部次长长冈外史，儿玉源太郎冷冰冰地说道："长冈，别犯糊涂。纵火之人需灭火，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19]

敌人处境艰难绝不代表他必然溃败，日本军方有意进行谈判只能证明他们在成功的巅峰时期依旧头脑清醒。即使在消耗战层面，成功地撤

退也无法为俄军赢得任何优势。只有在中国东北成功发动反攻并且对日军造成难以恢复的重创，才能迎来军事行动的转折点，最终改写战争结局。然而，俄军的主要问题在于，陆续抵达的增援部队恰好无法发动进攻。诚然，与日军不同，这与物质因素无关。在整场战争中，前线的事态发展从未如此依赖于军队士气。

尽管俄国爆发革命，但是铁路一如既往地向军队输送物资，只是有时遭遇阻碍。此时，铁路时常断交。1905年3月，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滞留了4500车皮近400万普特的货物；与此同时，在俄国欧洲地区和西伯利亚近500万普特的货物等待运输。军用列车行进缓慢，从乌拉尔到哈尔滨通常需要2～2.5个月，鲜少走40～45天。[20]尽管如此，继奉天之后，增援部队和补给物资——194个营、48支哥萨克部队、916门火炮及496挺机枪依旧被运往满洲集团军。1905年9月初，截至四平街停战协定签署前，共有130个营、48支哥萨克部队、468门火炮、332挺机枪及10.5个工程营抵达四平街。[21]但是，与这些部队和物资一同抵达中国东北的还有国内的革命新闻。在四平街，据一名团长说，大家都失去了希望和斗志。[22]俄国陆军司令部对舰队寄予厚望，如果俄方能够夺回制海权，那么在陆地上取得任何胜利都将重振军威。

直至奉天战役结束，第二太平洋舰队仍旧驻足马达加斯加，在那里稍事休息。从丹吉尔到马加达斯加（即从大西洋到印度洋）一路充满艰辛，煤炭随时面临断供威胁。煤炭供应商仍是德国人。对于舰员而言，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艰巨的任务。为了减少装煤次数，舰船必须装满煤炭，从而导致过载航行。斯文托尔热茨基中尉写道：“巨轮更像煤炭运输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煤炭问题掉以轻心，因此舰船只能增加储备。战列舰的煤炭储量远超1100吨的额定标准，高达2500吨。所有空隙都塞满了煤炭。75毫米口径的火炮等完全不适合海上作战的炮台被紧紧地封住，用作煤坑。任何能被找到的空隙，如走廊、船楼端部、艉楼等处都被燃煤填满。肮脏污浊的环境令人无法忍受。”[23]

1904年12月29日，舰队得知太平洋舰队已不复存在，停泊在旅顺港锚地的舰船已被日军攻城炮击穿。消息一出，舰队士气瞬间低落至冰点。与此同时，日本极力谴责法国违反中立条款，迫于压力，俄国舰队被迫驶离条件便利的法国迭戈苏亚雷斯（马格达斯加北部的安齐拉纳纳）基地，驶向诺西贝岛。[24]当时，诺西贝岛是马达加斯加西北部的一个小渔村，既没有港口，也没有维修车间，甚至连电报站都没有。[25]

1905年1月9日，舰队抵达诺西贝岛，在此偶遇海军少将费尔克扎姆（Д.Г. фон Фелькерзам）的队伍——2艘装甲舰、3艘巡洋舰、7艘鱼雷艇和9艘运输舰。志愿舰队1904年12月28日穿越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洋到达诺西贝岛。一系列舰船需要紧急维修，于是在甲板上开始了昼夜不停地作业。[26]在法国殖民当局的殷勤关照下，无所事事的船员逐渐走向堕落。在远离文明的海湾里，舰队也不得安宁。据远征的参与者回忆："自称歌手甚至明星的当地美女——法兰西女郎（有真有假）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在那里很快便开起了许多表演下流歌舞的咖啡馆，不计其数的地上和地下赌场蓬勃发展。"[27]军官甚至指挥官沉溺其中，酗酒玩乐，对本职工作漫不经心。[28]

罗杰斯特文斯基迅速遏制狂欢，对包括运输舰在内所有舰船实施严格管理。[29]尽管纪律得到了保证，但是舰队的精神状态越发偏离正常。即使在诺西贝岛停泊期间，舰队仍然事故频发，问题接踵而至。在拔锚前，由于不确定在中立港能否购置物资，舰队匆忙配置补给。[30]很快，他们便付出了代价。最初，罗杰斯特文斯基派回了两艘毫无用处的运输舰。[31]此后，装载冻肉的埃斯佩兰斯号冷藏船抵达诺西贝岛，但是冷藏舱突然出现故障，冻肉必须抛出舱外。[32]

2月15日，"绿宝石级"巡洋舰驻舰医生在日记中写道："由于冷藏船损坏，埃斯佩兰斯号上的冻肉腐败变质。大量腐肉被丢入公海，然后被水流冲回舰队锚地，在海岸附近搁浅，整片区域臭气熏天。可想而知，舰队的心情并不舒畅。"[33]700吨腐肉被倒入海中，埃斯佩兰斯号被迫返航。[34]舰员几乎只能以罐头为食，气候恶劣、淡水匮乏导致患病人数激增。[35]海军上将认为，在法国殖民地长期逗留对舰队不利，对日本人有利，他们可以趁机整顿1904年战役后的现役舰船。[36]

此时，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证明在诺西贝岛逗留的合理性：在舰队离开彼得堡前，海军部计划从智利（3艘）和阿根廷（4艘）采购装甲巡洋舰。如果新舰采购计划得以达成，那么俄国舰队的实力至少可以提升1.5倍。最初，计划将采购的巡洋舰运至马达加斯加。[37]尽管俄国已经确定了舰船清单和采购价格，但是由于谈判拖沓，计划尚且停留在纸面上。[38]即便交易达成，也需招募舰员并且给他们留出时间掌握新技术。罗杰斯特文斯基头脑清醒，从不指望此类计划能够达成。[39]1905年1月20日，海军上将收到彼得堡的命令，要求舰队在马达加斯加等待增援舰队的到来，2艘巡洋舰、2艘辅助巡洋舰和2艘鱼雷艇正向他们驶

来。[40]

显而易见，旅顺港沦陷后，第二太平洋舰队远征的最初目标必然无法达成。远征之初，舰队指挥官和舰员的自我定位就是后备力量，而非独立部队。现在第一太平洋舰队不复存在，显然，第二舰队无法独立发挥现役舰队的作用。[41]然而，海军部不愿为此负责——下达舰队召回指令。在俄国当时的背景下，谁也不敢这样做。与此同时，革命情绪高涨，对战争胜利的渴望也在膨胀。克拉多大力倡导俄国应为争夺制海权做出最后的、关键性的努力。

他的论证是各种合理表述的奇特融合：为了赢得最终的胜利、收复旅顺港并且恢复对朝鲜的控制，必须夺得制海权；在承认日本舰队强于第二舰队的条件下，得出结论，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从波罗的海派遣所有可能派遣的舰船。[42]他甚至提议向远东派遣彼得大帝号战列舰，同时坦言："它确实很有年头了（1872年下水，1877年服役——引者），但是，众所周知，它非常坚固……"[43]克拉多号召动用一切力量对付敌人，"乃至最后一门舰炮"[44]。他坚决要求在太平洋上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同时声称："猜测某艘舰船毫无用处，便不派上前线，这是犯罪。"[45]这种奇特的观点是远离海上战争的人们所共有的。[46]

后来，问题上升到了政治层面。1905年1月，《欧洲公报》热情洋溢地报道称："深受高涨的爱国热情的鼓舞，克拉多决定，在大错尚未铸成前，公开表达自己的担忧，在社会舆论面前发出警报。他斗志昂扬地策划了第三舰队的快速组建计划，不久后，计划将付诸实践。因此，克拉多先生热门且具有说服力的文章不仅吸引了大量读者，同时还打动了大批陆、海官僚，呼吁他们立即着手实现计划。若无公开宣传，在春季前计划将对外保密。"[47]克拉多化身时代英雄。因违纪问题，扣押并禁闭克拉多的命令引起了全民的愤慨。[48]在得知海军上将禁止克拉多在公共场所发表言论后，民众送给他一把荣誉匕首。[49]

最终，速战速决的方案和胜利的前景使政府在与"内部敌人"的斗争中重振雄风，舰队命运的主导机构由海军部变为内务部。彼得堡决定扩充第二舰队的实力，派遣由海军少将涅鲍加托夫统率的第三舰队。第三舰队由几艘岸防战列舰和老爷舰组成，罗杰斯特文斯基拒绝将它们编入第二舰队，因此它们一直停在俄国。现在，无论如何，罗杰斯特文斯基都必须接受它们。[50]此外，舰船的舰员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他们需要在远征途中学习各类知识。涅鲍加托夫对舰队不抱任何希望。"你们将

牺牲自己。”出征前他对舰队军官说道。[51]令人惊讶的是，涅鲍加托夫竟然将舰队完好无损地带到了马达加斯加。

罗杰斯特文斯基在一封私人信函中指出：“这些残破的舰船一旦加入舰队，不仅无法提升舰队的实力，反而还会削弱舰队的实力……留在波罗的海的废物不是援兵，而是负担……我对这群糊涂蛋无计可施：为什么他们不学无术却有用武之地，而我空有才华却无处发挥。我认为，它们将成为舰队负担和虚弱的根源。”[52]罗杰斯特文斯基参谋部的高级信号副官对司令的观点并无异议。1905年2月3日（俄历1月21日），他写道：“我们正在等待增援：日复一日，也许等来的是奥列格号和两艘鱼雷艇，但这是增援吗？第三舰队，先生们，发发慈悲吧！派来的这些舰船显然一无是处。出于礼貌，舰队只能勉强接受尼古拉号、阿普拉克辛海军大将号、莫诺马赫号和水星号……为什么要给日本人送去更多的战利品呢？他们已经收获满满！至于我们将如何处理这些舰船，没人知道答案，假如上将拒绝在诺西贝等候它们，那么它们只能返回俄国，毕竟让它们单独前往战区是极其危险的。第三舰队，这是俄国最后的海上资源，但是接下来呢？第二舰队完全没有制胜的把握。不要幻想胜利，您不会听到胜利的消息。”[53]

在涅鲍加托夫舰队抵达前，第二舰队依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马达加斯加逗留期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指挥官、海军上校叶戈里耶夫（E.P.Егорьев）在日记中写道：“总而言之，如果排除4艘同级（“博罗季诺级”——引者）战列舰，那么舰船的多样性将令人震惊。几乎每艘舰船都是名副其实的‘孤品’，完全可以保存在博物馆里供后代参观……”[54]在出征后的两个半月里，第二舰队只进行过2次实战射击，并且10英寸和12英寸的舰炮仅发射了3～5枚炮弹，射击成绩颇为糟糕。老式战舰表现最佳，本应成为舰队中坚力量的新式战舰表现最差。舰队没有用于演习的弹药基数，因此无法进行实战演练和炮火训练。涅鲍加托夫在亚丁湾组织了射击演练，结果更糟，目标靶板无一破裂。第二次射击演练有所进步，然而舰队的训练水平仍不理想。罗杰斯特文斯基必须做出选择：要么训练舰队，承担在决战中弹药匮乏的后果；要么弹药充足地赶赴战场，接受炮手训练不足的事实。[55]在训练中，他们遵循的原则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56]在射击演练过程中，苏沃洛夫大公号的75毫米舰炮误射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号，所幸后者并未发生人员伤亡和重大损失。[57]

3月16日，舰队驶离马达加斯加，沿法属印度支那航线驶向越南沿岸。叶戈里耶夫指出："在大批运输舰的衬托下，我们舰队看上去似乎在为大型商队护航。"[58]令人惊讶的是，这支"商队"竟然一路平安。舰队以7节的航速穿越金兰湾，其间航行28天。在此期间，舰队累计修复112处故障，即平均每天修复4处。在未经测试的舰船上，机械系统、操舵装置和锅炉故障频出。[59]航行途中，舰队难以保持队形。横队和纵队时常过度延伸，具有速度优势的舰船时常绕过、超越落后舰船。[60]舰队形势严峻，煤炭超载导致包括疟疾在内的多种疾病不断侵袭舰员。[61]

1905年3月21日，俄国政府委托巴黎转达和谈的初步条件，同时试探日方态度。俄国提出拒绝支付赔款，拒绝割让本国领土和远东铁路，绝不放弃在太平洋上保留舰队的权利。4月初，日本做出回应，拒绝接受上述条件，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62]东京已于3月8日以非官方手段通过美国特使试探停战的可能性。[63]当然，在此情况下，俄日两国未就停战条件达成一致意见。3月底，日本军界最终确定了对外交部门的要求；与此同时，俄国的提议也沦为日本公开表达不满的工具。在此情况下，他们通过自己的伙伴，而非俄国的盟友发声。针对美国总统通过陆军部长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提出促成和谈的可能条件：获得赔款，控制朝鲜、旅顺港和萨哈林，日本外交界做出回应。[64]

不断遭遇战败的国家定然无法维持外交地位。就连最初对俄国的越界行为视而不见的法国，向俄国释放善意的中立国也开始抗议俄国舰队在本国殖民地水域逗留时间过长，其理由是在对日战争中法国未与俄国结盟。严格地讲，俄舰在法属印度支那附近拦截并检查悬挂中立旗帜商船的行为令殖民当局惶恐不安。[65]

4月11日，罗杰斯特文斯基在西贡河沿岸地区向彼得堡拍发两封电报，暗示有必要将舰队召回波罗的海。电报措辞模棱两可，既表达出坚定决心，也有模糊的暗示："如果舰队仍需驻守符拉迪沃斯托克，如果那里还有养活三万人的余粮，如果舰队仍有弹药，那么必须前进，刻不容缓，不必等待涅鲍加托夫……如果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派遣舰队为时已晚，那么有必要将其召回俄国。"[66]海军上将没有勇气表明自己的立场。面对当时的局势，沙皇更倾向于命令舰队不必等待援军直接奔赴符拉迪沃斯托克。后来，罗杰斯特文斯基得知，要塞基地防守紧固，要塞与俄国的联系丝毫没有中断。尽管获准独立行动，但是海军上将仍在等待被自己称为"破烂"的第三舰队。显然，他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尼古

拉二世将改变主意，然而他的算计落空了。当时身处皇村的普鲁士亨利王子致电柏林："沙皇决意再战，无视和平游说。他将全部赌注押在了即将抵达巽他群岛的罗杰斯特文斯基身上。目前，沙皇心态平和、状态正常。"[67]

从军事角度来看，派遣第二舰队出征属于战略误判。不仅如此，彼得堡几乎被这个错误绑架了，现在召回舰队意味着俄国在国际舞台上颜面扫地，俄国政府在国内威信尽失。无论是俄国国内，还是满洲集团军，都希望波罗的海舰队能够扭转乾坤。俄国社会对舰队出征远东寄予过高期望："他们期待这支多灾多难的舰队能够创造两个同样难以实现并且无法实现的奇迹：在落井下石的中立国的包围下，穿越无尽的阴谋和危险，从利巴瓦出发成功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并且顺利避开日本舰队。"[68]在此，需要对这句话进行阐释。如果海军军官将第一个要求视为奇迹，那么全俄罗斯都在期待第二个奇迹。众所周知，后来事与愿违。

[1]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Обзор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с 11 февраля по 12 марта.//ВС.1904.№4.С.244.

[2]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6.Л.19 и об.

[3] Боткин Е.С.Ук.соч.С.79.

[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6.Сыпингайский период.С.15-16.

[5] Парский Д.［П.］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мысли...С.89.

[6]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4.Л.5.

[7] Бюлов Б.Ук.соч.С.301.

[8]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4.ЛЛ.8；12.

[9]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The Russo-Japanese War*，vol. 2，p. 173.

[10]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208.26 марта 1905 г.С.1-2；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211.29 марта 1905 г.С.1.

[11] Переписка С.Ю.Витте и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 в 1904-1905 гг.//КА.М.-Л.1927.Т.6（19）.С.77.

[12] Теттау Э.От Мукдена до Портсмута.С.11；13.

[13] Геруа Б.В.Тактика технических войск.//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Николаевской Военной Академии.1911.№14.С.167.

[14] Парский Д. [П.] Причины наших неудач...С.77 ; 80 ; 90.

[1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6.Сыпингайский период.С.258-261.

[16]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150-151.

[17]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152.

[18]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153.

[19]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154.

[20] Янушкевич Н.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роль интендантства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армиях на войне.//ВС.1910.№4.С.151-152.

[21] Теттау Э.От Мукдена до Портсмута.С.7.

[22] Рябинин А.А.На войне в 1904-1905 гг...С.185.

[23] До Цусимы.//КА.М.1934.Т.6 (67) .С.196.

[2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6.Поход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С.107-108.

[25] Казьмичев Б.Вторая 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эскадра.//Возрождение. Париж. 1964.№155.С.66.

[2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6.Поход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С.75-76 ; 103-106.

[27] Семенов В. [И.] 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307.

[28]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В.Витгефта.//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60.№4.С.123.

[29] Семенов В. [И.] 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307.

[30] Костенко В.П.Ук.соч.С.124.

[31] Семенов В. [И.] 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316.

[3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6.Поход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С.113-114.

[33] Кравченко В. [П.] Ук.соч.С.53.

[34] Семенов В. [И.] 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317.

[35] Казьмичев Б.Вторая 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эскадра.//Возрождение.Париж. 1964.№155.С.67.

[36]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выяснению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Цусимского боя.//МС.1917.№7.С.15.

[37]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7.Тсусим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С.6.

[38] Коковцов В.Н.Из моего прошлого...М.1992.Т.1.С.74.

[3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7.Тсусим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С.7.

[40]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выяснению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Цусимского боя.//МС.1917.№7.С.15.

[41] До Цусимы.//КА.М.1934.Т.6 (67) .С.197.

[42] Кладо Н.Л.Современная морская война...Приложение III.После ухода Второй эскадры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С.384-401 ; 434-438.

[43] Кладо Н.Л.Современная морская война...Приложение III.После ухода Второй эскадры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С.438.

[44] фон Нидермиллер А.Г.Ук.соч.С.49.

[45] Кладо Н.Л.Современная морская война...Приложение III.После ухода Второй эскадры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С.459.

[46] Гурко В.И.Ук.соч.С.441.

[47]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1905.№1.С.377.

[48]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1905.№1.С.377.

[49] фон Нидермиллер А.Г.Ук.соч.С.49.

[50]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выяснению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Цусимского боя.//МС.1917.№7.С.9.

[51] Корецкий М.П.Крейсер I ранга «Владимир Мономах» в бою с японцами у острова Цусима 14/15 мая 1905 г.//МЗ.Нью-Йорк.1955.№2-3.С.24.

[52] Золотарев В.А. , Козлов И.А.Ук.соч.С.158.

[53] До Цусимы.//КА.М.1934.Т.6 (67) .С.198.

[54] Вокруг старого света в 1904-1905 году (Путевые заметки капитана 1-го ранга Евгения Романовича Егорьева , командира крейсера «Аврора» за время похода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МС.1915.№8.С.32.

[55] Семенов В. [И.] Ук.соч.СПб.1907.ЧЧ.1-2.С.313-316 ;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6.Поход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С.177-179 ; 281 ; 288 ;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выяснению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Цусимского боя.//МС.1917.№7.С.16 ; Костенко В.П.Ук.соч.С.315-319.

[56]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В.Витгефта.//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60.№4.С.123.

[57] Чегодаев-Саконский А.Ук.соч.С.68.

[58] Вокруг старого света в 1904-1905 году...//МС.1915.№8.С.33.

[59]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выяснению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Цусимского боя.//МС.1917.№7.С.19.

[6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6.Поход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С.193.

[61] Кравченко В. [П.] Ук.соч.С.89.

[62]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Конец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От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1997. С.177.

[63]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151.

[64] N. E. Saul , “The Kittery Peace , ” in John W. Steinberg , et al. , eds. ,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 , vol. 1 , p. 491.

[6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6.Поход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С.228.

[66] Золотарев В.А. , Козлов И.А.Ук.соч.С.162-163.

[67] Бюлов Б.Ук.соч.С.302.

[68] Помни Цусиму ! //Морской журнал.Прага.1930.№5 (29) .С.93.

29 对马

1905年4月21日，法国当局以日本的抗议活动为由要求俄国舰队在24小时内驶离印度支那。次日，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出海。法国笛卡尔号巡洋舰护送舰队抵达领海。俄国舰船在此停留。船上缺乏必要的煤炭储备，因此必须在公海依靠运煤船填装燃料。此外，舰队必须在此等候涅鲍加托夫的到来。[1]5月9日，第二舰队、第三舰队在越南沿岸会合。此前，罗杰斯特文斯基抵达法国殖民地沿岸补充粮草和淡水，但是在法国人的要求下他被迫放弃。10日，舰队再次依靠运输舰加煤。燃料被储存了起来，以备后用，燃煤四处堆放，在炮台、起居室、餐厅等地随处可见。加煤作业持续了整整四天，这引发了法国当局的强烈抗议。13日，舰队出海。[2]

俄国特混舰队拥有8艘装甲战列舰（其中3艘为老式战舰）、3艘海防战列舰、6艘一等巡洋舰（其中有3艘老式巡洋舰和1艘弱舰）、3艘二等巡洋舰（其中1艘弱舰）、1艘辅助舰巡洋舰、9艘鱼雷艇、4艘运输舰和2艘驳船。[3]这些数据不能代表战斗力水平。在装甲方面，俄国装甲舰的水平明显不如日本。平均而言，船舷无防护面积——俄舰为60%，日舰为39%；厚度大于6英寸的装甲防护面积——俄舰为17%，日舰为25%；厚度小于6英寸的装甲防护面积——俄舰为23%，日舰为36%。[4]舰员心情复杂，人们濒临崩溃。正如舰队司令所指出的那样：“战斗力尚存，但是信心全无。”[5]

涅鲍加托夫抵达后，罗杰斯特文斯基在向特混舰队下达指令时说道：“长期积累的作战经验和在战斗中的射击实战是日本舰队的两大法宝。谨记，不要模仿他们快速射击，不要白白地浪费炮弹，必须根据反馈结果校准每次射击。执行这项指令，我们就有获胜希望，所有军官和全体舰员才能体会成功的喜悦。”[6]事实上，我们的舰队无法在炮战中指望与日本保持平等。如果战争伊始第一太平洋舰队俄国炮兵的实力与他们的对手不相上下，那么如今东乡麾下的舰队早已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自攻占旅顺港后，日本海军大将一直积极训练麾下部队，对炮兵的训练尤为严苛。实训期间，不吝惜炮弹的日本海军用掉了5个弹药基数，随后还更换了舰炮。[7]

俄日战争是现代装甲舰队的首场较量。当时普遍认为，舰炮几乎无法对舰队装甲舰造成损伤。1866年意大利与奥地利舰队之间的利萨海战结束后，鱼雷攻击和冲撞袭击成了公认的摧毁装甲舰的可靠方式，甲午海战的经验并未受到重视。黄海海战为东乡提供了正确评估舰炮威力的良机。日本人在正确评价自身作战经验的同时，还虚心听取英国海军顾问的建议。综合贝尔斯福德上将和东乡的顾问——海军上校马修·福林（Matthew Fring）的观点：在战斗的第一阶段，利用火炮的速射优势和炮弹的爆炸力优势摧毁敌舰炮兵部队，而后一举歼灭丧失反抗能力的敌舰。

在对马海战爆发前的一个半月，在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协助下，日本舰队更新了火力操控协调系统。在更为先进的现代化装弹技术的支持下，日本舰队的射击速度远超俄国舰队。亲历黄海海战、身处苏沃洛夫大公号旗舰的俄国军官回忆道："这种打法我生平未见，甚至不敢想象。炮弹倾泻而下，一发接着一发……"[8]俄国舰队的20门12英寸口径的舰炮，每分钟齐射6次，日本舰队的16门舰炮则是12.8次。日本舰队在齐射量和齐射水平方面远超俄国。俄国舰队所有舰炮（下至120毫米上至12英寸口径）的齐射量为19366普特，其中炸药重约484普特，即齐射量的2.5%。日本舰队的齐射量为53520普特，其中炸药重约7493普特，即齐射量的14%。平均而言，俄国舰船的火力强度不到日本舰船的1/15。[9]

这是战前节约政策导致的恶果——重型厚壁炮弹价格低廉且易于生产，但是爆炸威力十分有限。[10]这种节约思想与俄国舰队战前观点不谋而合。按照当时的认知，在炮弹中装入少量炸药即可确保它们在击穿装甲时发挥强大的威力。[11]远征途中，俄国军官才意识到自己的炮弹威力不足。在击中目标时，它们只能留下口径大小的窟窿，但是不会重创敌舰。[12]俄国生产的穿甲弹内含1%～2%的炸药（在德国、奥匈、荷兰和丹麦，该标准为1.3%～1.5%；在法国为2%～3%；在意大利为1.5%～4%；在英国为3.5%～5.5%），爆破弹内含2%～3%的火药（在德国、奥匈、荷兰和丹麦，该标准为3.5%～5.3%；在意大利为3%～7%；在法国为10%～20%；在英国为8%～13%）。[13]日本以英国为榜样发展海军。在炮弹的射击速度、威力和精确度方面，日本舰队远超俄国，日本海军炮手的命中率比对手高出2倍左右。[14]

1905年5月27～28日，海军中将罗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在对马海峡

被海军中将东乡平八郎统率的日本舰队彻底击败。海战始于尼古拉二世加冕纪念日当天。俄国舰船升起了桅顶旗。在短暂的试探性交火后，日本舰队快速出击。[15]奥斯利雅比亚号战列舰的炮手回忆道："日本人射击水平很高，并且倚重装有'下濑火药'的重型爆破炸弹。'下濑火药'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型炸药，在爆炸过程中产生大量黑色浓烟，因此日本人能够一眼看出自己的炮弹是否命中目标，这极大地简化了他们的瞄准过程。对于无防护的船舷和甲板，这些炮弹破坏力惊人，炸出数平方米大小的窟窿。它们不仅能在击中船体的情况下重创舰船，即使落水也能撕裂船身。落水后，将产生大量具有强大穿透力的碎片。"[16]

在战斗开始后的40分钟内，奥斯利雅比亚号中弹沉没。海战首日，日本舰队累计歼灭3艘新型舰队装甲舰、2艘一等巡洋舰、1艘辅助巡洋舰、3艘鱼雷艇、2艘运输舰和1艘驳船。此外，还有1艘舰队装甲舰——罗杰斯特文斯基的苏沃洛夫大公号旗舰几乎被大火焚毁。[17]舰上火光四起，烟囱、桅杆不见踪影，炮塔被彻底摧毁。此外，发生火灾的还有千疮百孔、侧倾严重的亚历山大三世号。[18]战斗继续。很快，亚历山大三世号战列舰彻底倾覆。随后，苏沃洛夫大公号遭遇鱼雷攻击，被彻底击沉。[19]此前，伤势过重、昏迷不醒的罗杰斯特文斯基被部下转移到了毕尔多夫号鱼雷艇上。苏醒后，罗杰斯特文斯基将指挥权移交给海军少将涅鲍加托夫，同时命令舰队继续赶赴符拉迪沃斯托克。[20]

次日，在日本舰炮的摧残下，1艘海防战列舰、2艘一等巡洋舰和2艘鱼雷艇惨遭歼灭。夜间，敌人依靠鱼雷袭击击沉了俄方的2艘战列舰、1艘一等巡洋舰、1艘一等装甲巡洋舰。5月28日，涅鲍加托夫率领2艘舰队装甲舰、2艘海防装甲舰向敌军投降，此前躲藏在毕尔多夫号上的罗杰斯特文斯基也惨遭俘虏。除此以外，日本舰队还缴获了悬挂着两艘红十字会旗帜的医院船：一艘（奥廖尔号）由于违反医院船规程——搭载从商船上扣押的日本俘虏——沦为日本舰队的战利品，另一艘（科斯特罗马号）在经过搜查后被释放。在这场海战中，日本舰队俘虏俄国官兵6106人，其中包括2名指挥官；[21]消灭166名军官、79名士官和4937名舰员。俄方仅有2艘二等巡洋舰（其中一艘在圣弗拉基米尔海湾触礁后自沉）和2艘鱼雷艇突围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剩余舰船陆续逃入中立港口，在那里遭到扣押。[22]5月29日，金刚石号巡洋舰率先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它的到来让当地居民喜出望外，人们涌上街头迎接即将到来的舰队。他们相信，其余舰船将陆续抵达。最初，没人愿意相信战败的消息。次日，继金刚石号到岸后，格罗兹尼号和威武号鱼雷艇先

后抵达。此后，人们再也没等来其他舰船。[23]

东乡在向天皇报告时指出："两支作战舰队在实力上不存在明显差距，我相信，敌方的军官和舰员以极大的热忱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为自己的祖国而战。"[24]即便如此，俄国海军的英雄主义精神依然无法扭转司令部因诸多失误和误判造成的恶劣局面。日方包括三笠号（中弹30发）在内的多艘舰船频繁中弹，但是俄国炮弹质量低劣，因此未能重创日本舰队（三笠号仅有8名舰员丧生）。敌人在夜袭中只损失了3艘鱼雷艇。[25]决战回合，日本舰队仅有113名官兵阵亡、424人负伤。[26]

[1]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6.Поход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С.234-235.

[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6.Поход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С.296-297；312；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В.Витгефта.//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60.№4.С.124.

[3]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о Цусимском бое.//МС.1917.№8.С.48.

[4] Смирнов М.Сражение в Корейском проливе 14-го и 15 мая 1905 года.//МС.1913.№4.С.95.

[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7.Тсусим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С.10i.

[6] Кравченко В.［П.］Ук.соч.С.117.

[7] Семенов В.［И.］Ук.соч.СПб.1912.Ч.3.Бой при Цусиме.С.35；Гончаров Л.Г.Некоторые тактические уроки Цусимы.//МС.1935.№6.С.31.

[8] Семенов В.［И.］Ук.соч.СПб.1912.Ч.3.Бой при Цусиме.С.35.

[9] Смирнов М.Сражение в Корейском проливе 14-го и 15 мая 1905 года.//МС.1913.№4.С.97-98.

[10] Шталь А.Цусима.//МС.1923.№5.С.X.

[11] Кладо Н.Л.Сила и состав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флота.//ВС.1903.№2.С.73.

[12] Чегодаев-Саконский А.Ук.соч.С.68.

[13] Кладо Н.Л.Сила и состав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флота.//ВС.1903.№2.

[14] Шталь А.Цусима.//МС.1923.№5.С.X.

[1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7.Тсусим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С.119；133.

[16] Казьмичев Б.Вторая 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эскадра.//Возрождение.Париж. 1964.№156.С.72.

[17]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 1910.Т.4.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2-й Тихоокена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и овладение о. Сахалином. С.174.

[18]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В.Витгефта.//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60.№4.С.131.

[19]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10.Т.4.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2-й Тихоокена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и овладение о.Сахалином. С.174.

[20]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7.Тсусим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С.162-164.

[21]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10.Т.4.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2-й Тихоокена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и овладение о.Сахалином. С.174.

[22]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о Цусимском бое.//МС.1917. №8.С.48-49.

[23] Чегодаев-Саконский А.Ук.соч.С.164.

[24] Рапорт адмирала Того о сражении в Японском море 14-го и 15-го мая 1905 г.//ВС.1906.№6.С.90.

[25]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море в 37-38 гг...СПб.1910.Т.4.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2-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эскадры и овладение о.Сахалином. С.93.；Золотарев В.А.，Козлов И.А.Ук.соч.С.176-177.

[26]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СПб.1909.Т.2.С.38；Семенов В.［И.］Ук.соч.СПб.1912.Ч.3.С.46.

30 对马之后：日本与俄国的处境

对于俄国而言，战争开局和终结都被贴上了惨败的标签。社会氛围不可能不受影响；同时，社会氛围也对军队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这场战争中的常胜国日本的处境远非理想。日本的任何一场胜利都无法对俄国重要的中心城市构成威胁。例如，战争之初，可被称为中心城市的唯有哈尔滨，占领哈尔滨便可切断俄国远东与西伯利亚之间的联系。1905年3月30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一次会议上拟定了军事行动的三个目标：占领哈尔滨；驱逐朝鲜北部的俄国陆军；迅速攻占萨哈林。[1]

当时，第一个目标难以达成。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哈尔滨地处北方边陲，日军即使在四平街大获全胜，也不能保证将其占领。据日军司令部推算，攻占哈尔滨至少还要进行三场会战，然而日军的后备兵力和物资仅可支撑一场会战或维持6个月的军事行动。况且自开战之后，战争规则从未改变：一旦遭遇严重失败，日本将失去翻盘的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尽管利涅维奇不愿发动进攻，同时俄国已经爆发革命，然而满洲集团军仍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强大力量，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它的存在。5月15日至24日，重组的米申科部队（45支哥萨克部队、6门火炮和2挺机枪）再次突袭了日军后方法库门。尽管俄国骑兵试图从营口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但是此次行动仍不成功，因为日军早已做好了防范。日军的损失相对较小——两个中队的兵力和几座小型仓库。俄国骑兵部队牺牲了14名军官和187名士兵，234人被俘，2挺机枪、近200匹骡马被缴。[2]尽管如此，俄国骑兵这场失败的突袭也能说明日本步兵的战斗力有所下滑。

此时，日本人即使在朝鲜采取某些行动，也不会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调派中坚力量，即使那里的海上防御缩减为零。为了增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海防实力，彼得堡于1904年10月通过铁路向该市运送了4艘潜艇（尚未组装），并于12月上旬送达该市。[3]截至1905年3月，在通航前，已有14艘潜艇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并且组装完毕，但是只有8艘准备出海。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作为俄罗斯岛与阿斯科尔德岛之间的巡逻船）在海上只能发挥心理作用，因为它们的存在或多或少掩护了岛上尚未架设火炮的在建炮台。[4]

战争伊始，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驻军相对较少，地面兵力18000人、海军3000人、民间志愿兵360人。谷物和面粉储备仅能维持一年，肉制品罐头最多四个月，面包干最多两个月。[5]情况逐渐发生变化。1905年1月23日，总司令下令将城市划入一级要塞。3月14日，新任要塞司令陆军中将卡兹别克（Г. Н. Казбек）到任。为了击退日本可能发动的袭击，他掀起了一股备战热潮。在被围困的五个月里，守军片刻不停地修筑防御工事：将要塞外围防线从32俄里扩建至80俄里，铺设了250俄里路况良好的土路、7俄里的宽轨铁路，敷设了1000俄里的电话和电报线路，建成3座无线电台，部署了近2000枚水雷，建成了可容纳5万人的军营，储备了可维持6万人生存一年半的粮食。此外，还在筹备铺设150俄里的窄轨铁路，筹建37家医院。在此情况下，守备部队中预备役士兵占比约为60%；某些预备役士兵集中的部队占比高达80%。[6]要塞守军并不可靠。[7]尽管如此，继旅顺港之后，在解决满洲集团军以前，日本人不愿意冒险围攻俄国的另一座要塞。

军事行动陷入僵局。与1878年的俄国一样，1905年的东京进退维谷，战争胜利了，但是战胜国无法享受胜利果实。日本政府认为，奉天之后的僵局是整场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日本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几近枯竭。在每1000万名适龄男性中，近200万人因战争需要而被动员，近100万人被送上前线。[8]在军事行动期间，4.94万名日本军官、士兵、舰员丧生，27192人病亡（相应的，俄国的指标分别为31630人和12983人）。[9]东京需要和谈，并且希望通过和谈摆脱财政危机。最初，东京计划索赔6亿至10亿美元。[10]日本为俄日战争付出的代价是甲午战争的8.5倍，是1903年国家收入的6.6倍，是国内课税进项的11.7倍，总计1730050000日元。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以关税收入和烟草专卖权作保大量举借外债，总额高达80570000日元（实际借款689590000日元）。同时发行了六笔国债，总额高达783460000日元，实际借款729137000日元。[11]

俄国的财政损失累计达到65.54亿卢布，其中半数以上——39.94亿卢布用于满足军需，这笔巨资源于国外贷款和国债资金。战争外债高达21.76亿卢布，并且须在1909年还清。[12]由于卢布走势持续平稳，与陷入财政危机的日本相比，俄国的财政环境相对宽松。然而，此时的俄国已经掀起了1905～1907年革命的浪潮。这是影响战争走向的另一个要素，客观而言，它影响了东京的行动计划。支持俄国革命者的游行示威活动在欧洲各国首都相继展开，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和英国的

社会舆论一边倒地谴责俄国。自1905年10月17日宣言颁布后略微趋于平稳的俄国有价证券的汇率再次下跌。[13]

1904年3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拨款3万日元资助针对西伯利亚铁路的破坏活动；1905年2月，再次拨款4万日元。此外，日本出资100万日元（当时日元和卢布的汇率大致相等）通过芬兰和波兰的社会党人资助俄国革命。[14]现代历史学者评价称："少数民族代表发挥着中间人、'烟幕弹'的作用……"他们背着与沙皇制度斗争的俄国同志与日本情报机关勾结。[15]我们可以结合约翰·格拉夫顿号轮船的经历评价这种联系。社会革命党人用日本人的钱购买武器，然后运回俄国。1905年9月7日，轮船在芬兰海岸附近搁浅并被炸毁。当局从轮船残骸中打捞出了9670支步枪、近4000把刺刀、720支左轮手枪、400000颗步枪子弹和122000颗左轮手枪子弹、近3吨炸药、2000支雷管以及13英尺的缓燃导火线。[16]革命者在国内发动战争。

另外，通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委员会于1905年7月下旬至1905年8月上旬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散发的题为《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人的来信》的传单，也可看出受外敌鼓动的人们对战争的态度。社会民主工党人使工人确信，在太平洋上保留舰队或在远东加固防御工事符合沙皇的利益，而非人民的利益。他们号召工人通过铁路罢工促进军队缔结和约，罢工最好具有普遍性，但局部罢工未尝不可："我们要让车里雅宾斯克—哈尔滨全线停运。我们的大罢工将对沙皇专制制度造成致命的打击，同时拯救数以万计被遗弃在满洲的兄弟。"[17]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中国东北，后方对前线的影响不断增强，因此俄军实力未见提升。

在部队运输途中，士兵几乎无事可做。每逢军事列车进站停车，列兵最常见且最普遍的需求就是找点东西读读。当然，这为革命宣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18]据哥萨克军官回忆："这些硬塞给俄国预备役士兵的传单搞得他们纪律涣散、士气低落……"[19]这不足为奇，毕竟增援部队的列车途经西伯利亚，那里正是反政府分子极度饱和的地区。自战争爆发后，当局对西伯利亚铁路的管控日渐加强，设立征用地段（1.5～2俄里）和两条警戒线（长度达100俄里），并且在上述区域实施军事戒严制度，其中包括管控政治不可靠分子。[20]当时，此类人群应被赶出征用地段。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管控力度逐渐减弱。

对马海战结束几天后，日本向美国政府提出和谈倡议。西奥多·罗斯

福总统表示，海战结局出乎意料，他期待日本获胜，然而从未指望俄国舰队能被彻底击垮。西方国家对彼得堡的敬畏大打折扣。西奥多·罗斯福坦言：“此前，我认为俄罗斯随时能够征服世界……在我看来，各方的恐惧情绪已经不复存在了。”[21]各方对待俄国的态度有所好转，如果不是因为恐惧，那就是因为对日本产生了怀疑。此时，欧洲列强惧怕革命胜利的潜在后果。革命一旦成功，世界政治的主宰者必须对幅员辽阔但不稳定的俄罗斯帝国有所打算。

6月3日，德皇威廉二世致信尼古拉二世，呼吁缔结和约：“单纯就军事战略而言，在朝鲜海峡的失败浇灭了扭转乾坤的全部希望。现在，日本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向中国东北输送用于围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后备兵力、武器弹药和储备物资。若无舰队支援，要塞恐难长久抵抗。如果希望利涅维奇集团军的战斗力水平恢复如初，那么至少需要输入三至四个军的新鲜兵力，即便如此，也无从预测战争的结局，无法知晓日后他们在大型会战中能否后来居上……为了实现自己的宏图伟业固执地违背人民的意愿，继续将成千上万的子民派到战场上送死，这难道是统治者的担当？或者说，只是因为他是如此理解国家荣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难道不用对血流成河的牺牲、对成千上万条无辜终结的生命负责？此外，祂——主、万王之王——要求尘世的统治者关心造物主恩赐给他统治的臣民的福祉。国家荣誉至高无上，但前提是整个国家愿意竭尽全力捍卫它。”[22]

威廉二世极力倡导展开谈判，并且提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调解此事的最佳人选，同时毛遂自荐：“也许，我应该提醒你关注时局，在所有国家中，毫无疑问，日本人最尊重美国，因为这个拥有可怕舰队的强大发达国家距离他们最近。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能够影响日本人并且促使他们审慎地对待自己的要求，那么这个人必定是罗斯福总统。如果你有意促成此事，我可以与他私下联络，毕竟我们是至交好友，我的公使也与他关系融洽。”[23]6月4日，德皇通过美国驻柏林公使将向尼古拉二世提出的建议透露给了美国总统。5日，圣彼得堡收到威廉的信件。6日，收到华盛顿相应指示的美国驻俄公使求见沙皇。7日，美国公使获准觐见。[24]

谈话主题颇为明确。6月6日在皇村召开了一场特别会议，海军大臣阿韦兰上将（侍从将军）、陆军大臣萨哈罗夫（侍从将军）、宫廷大臣弗列杰里克斯伯爵（侍从将军）、弗拉基米尔大公、阿列克谢·阿列克谢

耶维奇大公以及陆军、海军上层将领出席会议，沙皇亲自主持会议并提出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基于俄国当前状况，为了协助利涅维奇在对日作战中达成克敌取胜的目标，我们能否满足他所提出的要求？

第二，近期，敌人如突击萨哈林岛、黑龙江口和堪察加半岛，我方现有兵力能否击退敌军？

第三，假如日本人攻占萨哈林岛、黑龙江口和堪察加半岛，在缔结和约时，中国东北的胜利将导致何种结果？

第四，是否应该立即尝试缔结和约？[25]

利涅维奇要求向远东派遣两个军的兵力，每个军下辖三个师，同时在满洲集团军后方部署8万后备兵力。与此同时，总司令要求派遣“年轻士兵”，即现役士兵，而非预备役士兵。陆军大臣汇报称，准备向远东派遣两个军，但是每个军下辖两个师；针对要求的8万后备兵力，目前只能派出1.35万人。此后，帝国在欧洲、高加索和突厥斯坦的军队中仅剩78400名年轻士兵。他认为，在此情况下，很难壮大这些地区的陆军队伍，进行新一轮——第九轮局部动员难度极高。况且，即使取得胜利，利涅维奇也将再次要求加派增援部队。[26]

动员问题不仅体现为财政困难和组织困难。如果说首轮动员只有2%的人拒绝参军，那么随着战争的进行，逃避兵役的人群与日俱增，到了1905年初的第七轮动员，这项指标升至6%～8%。[27]随着这种趋势的蔓延，强行征兵可能加速国内政局的恶化。在基本摸清日本在和谈中即将提出的各项要求后，会议决定派遣增援部队，但是不再进行新一轮的动员。[28]事实上，符拉迪沃斯托克、萨哈林和堪察加已身处险境，因此与日本展开谈判符合俄国利益，尽管大多数参会者承认，没有军事胜利支撑的和谈对于稳定国内局势并无帮助。

针对议和问题，侍从将军萨哈罗夫的认知颇为清晰：“就目前的局势而言，不能结束战争。在我们完全战败，没打一场胜仗甚至没有任何成功事迹的情况下，议和是耻辱的。这将有损俄国的声望，并且使俄国长期脱离强国行列。这场战争必须继续进行，不为物质利益，只为洗刷污点，在俄军有所成就前，这个污点将一直存在。如果战争未以胜利告终，那么国内的纷争也将无法平息，甚至无法缓和。”[29]海军中将、侍

从将军杜巴索夫附和称："无论和谈条件如何，它们都将对俄国的声望造成沉重的打击。对于未来的俄国而言，这种失败堪比'重症顽疾'。"[30]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在进行会议总结时提出："平心而论，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和谈条件，那么战争就得继续打下去。"[31]

6月7日，美国总统邀请参战各方出席和谈条约磋商会议。东京立即对华盛顿的提议表示认同。在此情况下，12日，尼古拉二世被迫接受和谈的邀请。在日本的坚持下，谈判地点选为美国大西洋海岸的朴次茅斯市——日本人不愿在欧洲进行谈判。[32]显然，在不远的将来，战争会结束，因此东京决定实施既定计划中的最后几步。对马之后，日本彻底掌控制海权，同时入侵俄国本土，日本政客理所当然地将萨哈林岛视为这场战争的战利品。萨哈林岛不仅因丰富的渔业、林业和煤炭资源而闻名，同时还拥有大量已探明的石油资源。[33]海岛的防御布局已于1903年敲定。按计划，4支地方部队和16个由当地居民和流放犯组成的民兵团承担海岛的防御任务。[34]事实上，岛上仅有12个民兵团，其中8个分布在萨哈林岛北部，4个在萨哈林岛南部。表面上，每个民兵团拥有200人。[35]

7月21日，日本陆战队启程，从小樽港至北海道，海军大将片冈七郎的第三巡洋舰队严密护航。日本人担心，近期符拉迪沃斯托克巡洋舰队可能采取行动。[36]23日，4艘日本巡洋舰逼近萨哈林岛。次日，日本第十三师团——近10万名步兵携36门火炮和12挺机枪搭乘运输舰登岛。日军师团主要由年长的预备役士兵组成，毕竟日本的精锐兵力已被派往中国东北。舰队的支援弥补了这一缺陷，陆战队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东京急不可耐，毕竟冬季、秋季和春季，日军几乎无法在岛上作战。陆战队登陆前，3500名正规军携4挺机枪在岛上潜伏，但是未能摸清海岛的防御状况。实际上，岛上仅有8门老式火炮，状况不佳，甚至可能对己方炮兵构成威胁。在地图上几乎无法找到这座海岛，通往海岛的几条道路路况恶劣。

20世纪初，岛上人口接近4万，其中当地居民约为4000人，流放犯25000人，农民（早期的流放犯）9000人，其余2000人多为官员、军人和商人。俄国部队的兵力不到日军的一半并且只有4挺机枪，全岛几乎没有炮兵驻扎。除此以外，俄方的大量兵力1500人左右是临时招募的。民兵团志愿兵多是岛上曾经的囚犯，他们加入萨哈林岛的防御部队是为了得到赦免，在民兵团服役一个月可以抵消一年的刑期。2月10日，奉

远东总督之命，在岛上颁布了民兵团志愿兵条例。1904年，被发配到岛上的居民获得了重返家园的机会。虽然当局为他们配备了别丹式步枪，然而许多枪支的瞄准镜早已损坏，同时没有足够的子弹可供射击训练，许多民兵甚至从未开过枪。保障驻岛部队粮食供应也是一大难题。

萨哈林部队的军官包括监狱狱警、后备军官和几名戴罪的军官。在日军陆战队登陆前的几周里，满洲集团军派出10名军官登岛组织战斗训练，然而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组织训练。苦役犯们不仅厌恶服刑的岛屿，同时憎恨使他们联想起过去的押解人员的军人。此外，这些人并不团结，有按照犯罪行当拉帮结派的，有参加同乡会的……对于日军而言，岛上的志愿兵不足为惧，甚至还能给俄军制造麻烦。志愿兵是一群武装的“暴徒”，他们不能（几乎全体）且不愿（绝大多数）参加战斗。最高司令部最初期望他们在海岛深处展开游击行动（库罗帕特金），后来却命令他们做好沿岸退敌的准备（利涅维奇）。

事实证明，在日本陆战队登陆后，组建完毕的民兵团数量仅为书面数据的一半；民兵团的规定编制为200人，但是每个民兵团的实际人数仅有120人，甚至80人。岛上部队无法完成最高司令部下达的任务。在枪炮声响起后，对于军事行动毫无准备的民兵团志愿兵四散而逃。在战斗中，岛屿的守军800人身亡，4540人被俘；日方只有39人死亡，121人负伤。在此情况下，撤退同样对正规军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8月1日，萨哈林岛督军利亚普诺夫（М.Н.Ляпунов）投降。[37]与他一同投降的还有64名军官、3819名士兵和民兵（其中包括非战斗人员）。除步枪外，日军缴获野战炮2门、机枪5挺。[38]

崎岖难行的道路、苍蝇、蚊虫成了日本步兵行军途中最大的敌人。岛上的原住居民支持日本人。[39]作为侵略者的俄国人行为恶劣，他们烧杀抢掠，抓捕并公开处决人质。农民被迫劳作、上缴果实，却食不果腹。此时，日元已在海岛流通。[40]堪察加半岛为数不多的民兵团表现较好，当地居民和猎人击退了登岛的日本陆战队。结果，在两艘巡洋舰驶入阿瓦恰湾后，民兵团被迫撤入山中。[41]

因此，日本继续执行3月30日计划的部分方针——在和谈开始前，出兵占领萨哈林岛。当时，俄国外交界的首要任务是避免缔结侮辱俄国尊严的和约，保护俄国在远东的主要利益。6月20日，科科夫佐夫（В.Н.Коковцов）在写给拉姆兹多夫的信中指出：“如果将维护俄国的利益理解为拒绝在使西伯利亚与太平洋保持紧密联系的远东地区做出让

步，那么意图达成长期而坦荡的和解条约应该没有障碍，但是不能指望和约永久有效。从经济和文化角度上看，我认为，目前有必要将俄国在远东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关于俄国边界不可侵犯乃至俄国远东、乌苏里斯克边疆区及其他地区的势力范围，不必过于计较。然而，维护在远东驻泊的舰队时，无须考虑此类限制。连接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西伯利亚铁路的海上航线以及将这条航线延伸至松花江沿线属地的轮船交通必须完全受我国支配，或者至少受我方势力的独家影响。”[42]1905年夏，谁也无法保证通过谈判能够达成上述目标。

[1]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161.

[2] Гершельман Ф.Конница в 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и в былые времена.//ВС.1911.№7.С.65.

[3] Плотто А.В.Начало подводного пла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МЗ.Нью-Йорк.1947.№2.С.27；30.

[4] Плотто А.В.То же.//МЗ.Нью-Йорк.1947.№3.С.24-25；26；29.

[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1.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С.529.

[6] Революция 1905-1907 гг.в России.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ысший подъем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07 гг.Вооруженные восстания.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05 г.отв.ред.А.Л.Сидоров.М.1955.Ч.1.С.237；239；240.

[7] Революция 1905-1907 гг.в России.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ысший подъем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07 гг.Вооруженные восстания.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05 г.отв.ред.А.Л.Сидоров.М.1955.Ч.1.С.242.

[8]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178.

[9] Урланис Б.Ц.История военных потерь.Войны и народонаселение Европы.Людские потери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в войнах XVII-XX вв.（истори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СПб. 1994. С.133.

[10] Ed. S. Miller，“Japan’s Other Victory：Overseas Financing of the War，” in John W. Steinberg，et al.，eds.，*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vol. 1，p. 479.

[11]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176-177.

[12] B. V. Ananich，“Russian Military Expenditures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1904-1905，” in John W. Steinberg，et al.，eds.，*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vol. 1，p. 450.

[13] Отражение событий 1905 г.за границей.//КА.М.-Л.1925.Т.2（9）.С.33-55.

[14] Akashi Motojirō，*Rakka ryūsui*：*Colonel Akashi's report on His Secret Cooperation with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parties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Selected chapters translated by Inaba Chiharu and edited by Olavi K. Fält and Antti Kujala. Helsinki：SHS，1988，pp. 16，69，74.

[15] Куяла А.Японский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штаб и вопрос о согласованных анти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1904-1905.// РуСб.М.РЕГНУМ.2011.Т.10.С.114.

[16] Сулакова А.Финн Циллиакус и 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Родина.2013. №5.С.92.

[17]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есной и летом 1905 года.Апрель-сентябрь.Под ред.Н.С.Трусовой，А.А.Новосельского.М.1957.Ч.1.С.192.

[18] Парский Д.［П.］ Причины наших неудач...С.96.

[19] Степанов Е.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казачьего офицера.//ВРК.1911.№9. С.361.

[20] Комарова Т.С.На сопках Маньчжурии...（Енисей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в годы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04-1905 гг.）.Красноярск.2013.С.19-20.

[21] N. E. Saul，"The Kittery Peace，" in John W. Steinberg，et al.，eds.，*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vol. 1，p. 493.

[22] Переписка Вильгельма II с Николаем II.С.103.

[23] Переписка Вильгельма II с Николаем II.С.105.

[24] Романов Б.А.Конец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Воен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24 мая 1905 г.в Царском Селе）.//КА.М.-Л.1928.Т.3（28）.С.190.

[25] Романов Б.А.Конец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Воен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24 мая 1905 г.в Царском Селе）.//КА.М.-Л.1928.Т.3（28）.С.191.

[26] Романов Б.А.Конец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Воен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24 мая 1905 г.в Царском Селе）.//КА.М.-Л.1928.Т.3（28）.С.191-195.

[27] Allan K. Wildman，*The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The Old Army and the Soldiers Revolt*（*March-April*，1917）.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 46.

[28] Романов Б.А.Конец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А.М.-Л.1928. Т.3（28）.С.195-204.

[29] Романов Б.А.Конец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А.М.-Л.1928. Т.3（28）.С.202.

[30] Романов Б.А.Конец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А.М.-Л.1928. Т.3（28）.С.203.

[31] Романов Б.А.Конец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А.М.-Л.1928. Т.3（28）.С.204.

[32] Портсмут.//КА.М.1924.Т.6.С.16.

[33] И-в А.Оборона Сахалина 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ую войну 1904-1905 гг.// ВС.1909.№ 11.С.30.

[3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1.Событ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е войне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этой войне.С.245.

[35]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9.Второстепенные театры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Ч.2.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на острове Сахалине и на западном побережье Татрского пролива.С.94.

[36]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The Russo-Japanese War*，vol. 2，p. 484.

[37] П.В.Командировка на Сахалин в 1905 г.//ВС.1906.№12.С.190-191；203-204；Тоже.//ВС.1907.№3.С.181；198；То же.//ВС.1907.№4.С.182-183；189；198-200；То же.//ВС.1907.№5.С.208；210-212；И-в А.Оборона Сахалина 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ую войну 1904-1905 гг.//ВС.1909.№ 11.С.39-45；То же.// ВС.1909.№12.С.25-27；Дикс М.Разгром Сахалина（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ИВ.1906.Том 106.Вып.12.С.881；Месснер Е.Не множеством побеждают.// Вестник военных знаний.Сараево.1929.№2.С.12-13；Урсын-Прушински С.Бои на острове Сахалин во время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Краевой бюллетень（Южно-Сахалинск）.1995.№3.С.59；66；77.

[38]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СПб.1910.Т.9.Второстепенные театры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Ч.2.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на острове Сахалине и на западном побережье Татрского пролива.С.128-129.

[39]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The Russo-Japanese War*，vol. 2，p. 486.

[40] Дикс М.Разгром Сахалина...//ИВ.1906.Том 106.Вып.12.С.894-896.

[41] Сильницкий А.П.14 месяцев на службе на Камчатке.//ИВ.1909.Том 118.Вып.11.С.527-530；539.

[42] Портсмут.//КА.М.1924.Т.6.С.16.

31 朴次茅斯：谈判与和平

在尼古拉二世的提议遭到了几位职业外交官的婉拒后，维特率领俄国代表团参加俄日谈判。[1]在拉姆兹多夫的反复劝谏下，尼古拉二世艰难地下达了这一任命。[2]罗森男爵、马尔坚斯（Ф.Ф. Мартенс）与维特同行。俄国代表团处境艰难。美国媒体一致声援日本，认为日本提出的赔款要求完全合理。[3]另一方面，沙皇坚决反对割让俄国领土、支付战争赔款。[4]代表团搭乘德国威廉二世号轮船从瑟堡前往美国，大批记者同时登船。航行途中，维特不排斥与他们交谈，他表现得沉着冷静。[5]在即将抵达纽约之际，维特从科科夫佐夫处得知：日本人继续占领萨哈林岛，并且派遣陆战队登陆海岛对面地区；彼得堡认为，敌军可能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推进，最终侵占要塞；与此同时，利涅维奇的集团军正被逐出中国东北及其领地。这些消息无法对维特产生积极的影响。[6]显然，俄国战败已无悬念，谈判前夕的外交处境颇为艰难。

美国的社会舆论极度仇视彼得堡政府，并且极为同情革命者和日本，究其原因在于担心俄国在太平洋的过度扩张和犹太问题的进一步恶化。革命期间的大屠杀催化了这种情绪，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也在输出类似的情绪。[7]事实上，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通过美国银行库恩-洛布公司向日本提供的贷款（1904年5月5000万美元，1904年11月5800万美元，1905年3月1.5亿美元，1905年7月1.5亿美元）维持了这场战争。[8]1905年7月7日，美国同意协助日本完成旅顺港和辽东半岛的交割事宜，并且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权。8月12日，英日同盟条约再次签订，条约期限延长十年。[9]与首次缔结的同盟条约不同，第二次同盟条约规定，若缔约一方与他国（暗指潜在的宿敌——俄国和法国）发生战争，另一方应向盟国提供军事支援，英属印度也属盟国范围。[10]

1905年7月14日，在前往朴次茅斯前，为了阐明俄国陆军的现状和近期军事行动的前景，维特专程拜访了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大公。结果不容乐观：类似于辽阳和奉天的惨败完全出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意料。相反，他认为，俄军有实力转入反攻并且将日军驱逐到鸭绿江和关东州以外地区，但是为此预计耗费10亿卢布，损失20万兵力。与此同时，日本仍旧占据海上优势，因此

敌人完全可能占领萨哈林岛及滨海边疆区的大部分区域。[11]1905年夏，俄国无法接受类似的结果。这个被革命侵袭的国家既无法和平地展开后续的动员，也无法从国库抽调足够资金支持军事行动，并且几乎没有任何举借外债的机会。[12]尽管如此，维特依旧要求俄国司令部组织进攻，即使取得小规模的胜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俄国代表团的处境。

利涅维奇不打算发动进攻，他犹豫不决，担心革命能做到日军做不到的事情，即切断集团军在中国东北的铁路供给线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委员会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活动，大肆宣传革命。1905年9月初，该委员会甚至谴责维特不急于缔结和约，因为沙皇每天向他拨付400卢布的伙食费和5000卢布的特别经费。布尔什维克的传单鼓动人们“自谋生路”[13]。不难想象，类似的话语会对工人和士兵产生何种影响。“人民公敌——沙皇政府正在口蜜腹剑地歌颂和平，我们只能团结起来，在铁路沿线展开大罢工并且逼停所有列车。士兵愿意帮助我们。但是，为达目的，则需各位同志精诚合作”，此种行径被奉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唯一方案。[14]

与此同时，日本人抓紧时间商定对策。谈判开始前，在东京就和谈方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态度坚决，主张要求俄国支付战争赔款、承认朝鲜藩属日本、出让关东州和至哈尔滨段的南满铁路、限制俄国使用东清铁路（商业用途除外）、授予日本在滨海边疆区沿海和沿河地区发展渔业的权利，授予日本舰船从黑龙江三角洲至布拉戈维申斯克区间自由通航的权利，开放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并且允许日本臣民自由贸易，在上述城市开设日本驻符拉迪沃斯托克领事馆。[15]实际上，日本政府和军界都不相信，谈判将达成上述目标。1905年4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确定了经天皇批准的日方谈判目标清单，其中包括必须达成的目标（迫使俄方承认日本在朝鲜自由行动权，撤离中国东北，出让关东州和南满铁路部分区段）和期望达成的目标（迫使俄方支付赔款、交出停留在中立港口的俄国舰船、割让萨哈林岛及周边岛屿、在滨海边疆区沿岸授予日本船舶自由捕鱼的特权，解除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武装并且使其成为商港）。[16]

显然，这些期望达成的目标难以彻底实现，并且日本的社会舆论不会轻易放过主导本国谈判的代表团团长。因此，天皇立即从候选人中撤出了日本最权威的国务活动家——伊藤侯爵。此外，日本首相、陆军大

将桂太郎也拒绝了率团出征的荣誉。对于日本政客而言，未来的和谈几乎就是一个陷阱；对于俄国政客而言，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在四面楚歌的局势下，出于各种原因，大多数俄国人不会原谅日本所做出的让步，即使这是在俄国战败后日本审时度势的决定；而大多数日本人也不会原谅日本对俄国做出让步的举动，即使日本提出的谈判要求过高。后者不难理解，日本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损失，进而导致民族情绪激昂。

出任日本代表团团长的小村男爵在自己的谈判纲领中极为准确地表达了这种情绪。小村完全适合充当潜在的“替罪羊”：与政府中的多数成员相比，他年轻（50岁）且野心勃勃；与桂太郎不同，他的辞职不会引发政府危机；他不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萨摩、长州、土佐等藩的后代。小村的任命成了对谈判不利的潜在威胁。当然，他本人也清楚时局，因此必须保持强硬的态度。一旦谈判面临破裂的威胁，若未经政府批准，小村无权自主决定谈判的命运。[17]在此情况下，东京与朴次茅斯通信颇为频繁，彼得堡也是如此。日本人无法破译俄国人的外交密信，因此不得不求助于英国密码学家，后者有时也爱莫能助。[18]1905年7月8日，日本代表团启程前往美国。在为他们送行时，数以万计的民众高呼“万岁”。小村对与他同行的下属说道：“当我回国时，这些热情的民众将变成骚乱的人群，我将遭到他们的辱骂或射击。此时此刻，我们最好享受一下他们高呼‘万岁’的氛围吧。”[19]

战场上的胜绩、盟国的支持都是日本代表团的坚实后盾。对于维特而言，唯有外交能力才能是自己的依靠，因为自己背后的国家在革命的风暴中自顾不暇、集团军司令部也不愿冒险发动反攻。他的外交思路格外清晰。7月6日，他在写给库罗帕特金的信中指出：“我们需要远东尽快实现持久的和平。我们最近几十年来取得的成就将化为乌有。必须平息俄国的动荡，理性地建立朝气蓬勃的新生活。在未来20～25年内，我们必须经营自己，在对外关系中保持冷静。我们不能在国际舞台上尽情发挥，是的，我们必须忍受这件事。内部局势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无法平息动乱，那么我们将失去在19世纪获得的大部分财富。”[20]

俄国代表团团长怀着这种心情启程前往美国，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异常艰巨。俄国密码学家解决了敌方外交密码的破译问题，因此外交部能够阅读东京与驻中国、欧洲使馆之间的大部分密函，这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外交任务。然而，俄方未能成功地保守这个秘密。外交部办公室的

一名雇员向日本驻柏林公使告密，称俄国人正在窃读日本外交官之间的密函。结果，谈判前夕日本更改了外交密函的密码，俄国代表团的损失显而易见。维特不得不盲目行动。[21]俄国代表团团长决定引导谈判所在国的社会舆论为己所用。在维特离开巴黎前，美联社曾对其进行采访，并且发布题为《为了和平，不惜一切代价》的报道。[22]

抵达纽约后，在谈判开始前，维特已经取得了诸多成就。首先，他与希夫和其他欧洲团体的代表成功会晤。[23]1905年7月23日，维特汇报称："维特的到来确实减轻了美国社会对我们的敌意，甚至扭转了他们幸灾乐祸的态度。在部分公众身上显现出了同情俄国的迹象。在谢尔盖·尤里耶维奇巧妙而机智的斡旋下，在几乎没有优质媒体为我们发声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24]尽管如此，美国并未改变外交方针，因此不应高估这些成就。8月4日，维特在与西奥多·罗斯福会晤时表示：俄方坚决反对在"折损俄国声誉"的条件下缔结和约。显然，他的主张未能得到罗斯福的支持。罗斯福认为，最好尽快停战。次日，在两国代表团会面时，他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观点。[25]此时，唯有向日本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才能加速谈判。

8月5日，谈判双方乘坐美国巡洋舰塔科马号（日本代表团）和查塔努加号（俄国代表团）抵达牡蛎湾，在登上五月花号总统舰后，双方展开首次会晤。在第一次非正式会晤后，双方决定前往朴次茅斯，俄国代表团乘坐五月花号，日本代表团乘坐海豚号巡洋舰。[26]8月8日，两国代表团抵达朴次茅斯。次日，谈判开始。[27]在形式上，这场谈判是关于谈判原则的磋商。8月9日，双方签署初步议定书，文件以法文（俄国代表团）和日文（日本代表团）书就，且为机密文件。在向媒体发布声明前，必须获得双方参会代表的一致认可。[28]在两国代表团首次会晤前一周，罗斯福向罗森透露：日本人将索要赔款，同时要求俄方割让被日军占领的萨哈林岛。[29]这一消息很快便得到证实。

谈判伊始，日本外务大臣向俄方提出了一系列苛刻条件。在8月10日上午的第一场谈判中，这些要求便已提出：①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拥有特权；②俄军撤离中国东北，同时放弃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全部财产，承认机会均等原则；③日本将占领区归还中国，辽东半岛除外；④全面恢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归还北京在中国东北发展工商业的权利；⑤将萨哈林岛和邻近岛屿让与日本；⑥将旅顺港和关东州的租赁权让与日本；⑦将旅顺港—哈尔滨区段的南满铁路让与日

本；⑧限制俄国对东清铁路的使用权，仅限工商业用途；⑨赔偿日本军费开支；⑩将停泊在中立港口的俄国军舰交由日本处置；⑪限制俄国在远东保留舰队的权力；⑫授予日本臣民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的海岸、海湾、港口、支流捕鱼的权利。[30]基于外交技巧，日方决定在谈判中回避“赔款”一词。此外，在罗斯福的建议下，小村放弃了索要符拉迪沃斯托克或限制俄国加固沿岸防御的要求。[31]

在谈判中，维特展现出了超凡的外交能力，将拒绝与让步巧妙结合。对于谈判纲领的要点，他本人概括为：①绝不能表现出我们希望媾和，必须给外界留下这种印象，陛下之所以同意和谈，是因为停战几乎成了世界各国的一致愿望；②端着架子，让自己的表现符合俄国——最强大帝国代表的身份，仿佛面前的问题微不足道；③铭记媒体在美国的巨大作用，在与媒体打交道时，务必保持客气周全的态度；④拉拢美国这个极端民主的国家的民众，在与平民打交道时，务必保持完全平和的态度，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傲慢，必须完全民主；⑤犹太人在美国影响力巨大，特别是在纽约和全美媒体面前，绝对不能对他们怀有敌意，无论如何，这完全符合我对犹太问题的一贯看法。[32]

8月12日，维特正式回应日方要求。他对次要且明显无法推脱的条件做出让步，其他条件一概拒绝。[33]维特的策略开始为俄国赢得越来越多的有益成果，他坦言：“能够取得这些成就得益于自己的策略符合美国公众的情感需求，并且已向日本做出了美国社会舆论认为俄方应当做出的让步。”[34]维特表示，在某种程度上，“8月15日，在与左右当地社会舆论、拥有大量资本且给予日本政府资金援助的美国犹太领袖的会晤中”，他已经化解了对方强烈反俄的情绪。[35]

维特对会晤的结果颇为满意。他汇报称：“罗森男爵认为，我的言辞对当地的社会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如何，这也将震慑日方，毕竟在我对面坐着的都是日本银行的大股东。”[36]美国的舆论开始向有利于俄国的方向转变。雅各布·希夫和他旗下的银行有意向日本索要赔偿，同时要求东京归还贷款。不仅如此，在日方做出较为危险的决策前，这家银行有意阻碍他们的军事行动。美国金融家告知日本代表团，他们将停止向东京发放贷款（在战争结束后的三个月内，日本向伦敦和柏林累计偿还1.07亿美元的贷款）。[37]

对于交出停泊在中立港口的舰船、支付赔款、割让俄国领土、限制俄国对东清铁路的使用权和在远东的武装权力等要求，维特予以回绝。

维特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尽管战局不利，但是在遥远的殖民地战场上俄国无所畏惧。8月17日，在针对赔款问题进行协商的过程中，伯爵指出："假如被日军占领的是莫斯科，也许你们可以提出这种要求。"[38]俄国代表团继续与媒体代表保持亲切的沟通；然而据美国记者称，日本人曾当面"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39]。记者蹲守在日本代表团下榻的宾馆，每天都在大厅提出一些"空洞无聊"的问题。至于维特，他时常与记者们开怀畅谈，无论他们对谈判进程发表何种看法。[40]

数次谈判濒临崩溃，最终萨哈林岛的归属问题成了争论的焦点。日方提出或吞并海岛抵偿赔款，或俄国出资赎回被占领的海岛，同时拒绝放行停泊在中立港口的俄国舰船，并且主张限制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俄方情报表明，最后一项要求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支持。[41]双方剑拔弩张。8月19日，维特致电沙皇，声称谈判已经破裂。未经沙皇的批准，他无法做出让步："每个配被称为人的人对祖国都心存热爱。这种感情使我无法同意侮辱我的祖国的和谈条件，我承担不起这种责任。"[42]

8月22日，罗斯福致电尼古拉二世，劝说他尽快同意出让萨哈林岛南部。罗斯福表示："（我认为）如此解决问题对俄国有利。尽管日本财政吃紧，但是仍能再战。倘若如此，俄国臣民浴血奋战得来的滨海地区将落入日本之手。至于萨哈林岛，俄方军事专家承认，只要北部岛屿留在俄国手中，便可完全确保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安全。"[43]目前尚不清楚罗斯福引用的是哪位军事专家的观点，但是罗斯福向彼得堡拍发的电报是维特经手的。沙皇决定坚持原则——"寸土不让，分文不出"。然而，迫于法国和美国的外交影响，8月25日尼古拉二世同意割让海岛北纬50度以南土地，同时严词拒绝任何形式的赔款。[44]调停者罗斯福当日写道："与俄国、日本的和谈代表团交涉让我熬白了头，日本人索求无度，而俄国佬比小日本更差劲，他们愚钝并且不说实话。"[45]

8月27日，东京收到小村的报告。在报告中，小村提出了终止谈判的计划。山县有朋、山本权兵卫、大山岩和儿玉源太郎一致要求继续和谈。大藏大臣支持军方的意见。[46]8月28日，日本代表团在朴次茅斯最后一次提出了有助于本国摆脱财政危机的和解方案。他们提议，俄国支付12亿日元赎回萨哈林岛北部地区，并且以此为由拒绝赔款。[47]维特的立场保持不变。当日，东京方面召开帝国会议，随后召开元老院会议，最终决定命令小村接受和谈条件，剔除索赔条款。自1903年之后，这是日本第四次召开帝国会议。第一次召开于1903年6月23日，决定与

俄国谈判；第二次召开于1904年1月12日，决定向彼得堡下达谈判的最后通牒；第三次召开于1904年2月4日，决定与俄国开战。[48]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当时的和谈对日本的重要意义。日本代表团成员从美方同僚处获悉，彼得堡准备做出让步，该消息对日方的决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49]

8月29日，双方就和约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日本不再要求俄国赎买北萨哈林岛。[50]俄方提出，在日本承诺不在拉彼鲁兹海峡[51]从事军事活动并且允许俄国船舶自由进出海峡的情况下，同意出让海岛南部地区。[52]当日，俄国代表团秘书在日记中写道："总而言之，维特坚持己见。他认为，与战争相比，和平对俄国更加有益。毫无疑问，从战区赶来……并且几乎没有带来任何令人欣慰消息的鲁辛中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维特的决策。此外，利涅维奇提出的反攻要求也未得到积极地落实。"[53]后来，鲁辛断言：他坚信有必要继续开战。维特要求利涅维奇对此表态，但是后者不置可否。1905年9月5日（俄历8月23日），双方缔结和约。[54]当时，《朴次茅斯和约》条款让俄方颇为满意。[55]谈判结束后，为了纪念两国停战，在圣公会救世主大教堂举行了庄严的祷告，[56]日本代表团缺席仪式。[57]两天后，维特和罗森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表彰。[58]

俄国承认朝鲜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东京开始有条不紊地整顿朝鲜秩序。日本关于朝鲜的军事预算降至57%，从1905年的2426087.5日元降至1906年的1379617日元。陆军参谋部缩编，但是军部中央管理部门的支出增至15倍，忠于日本的宪兵群体的支出增至28倍。驻朝宪兵开销占日本驻朝鲜军费开销总额的3/4。此外，日本在朝鲜驻扎了24个大队、8个骑兵中队和若干支辅助部队，同时还部署了36门山地炮。[59]事实上，日本驻朝公使伊藤伯爵已经掌控了这个国家。1907年，高宗试图派遣朝鲜代表参加海牙国际法会议，却遭到了日本政府的公开干涉。此后，日本外务大臣访问汉城，高宗被迫退位。[60]1911年8月29日，日本吞并大韩帝国，赐名"朝鲜省"，并且在朝鲜设立日本总督府，但是俄国臣民在此仍能享受最惠国待遇。

在这场战争的主战场，中国无疑是失利的一方。在这场战争中，近2万华人死于战火，数十万华人沦为难民，财产损失折银6900万两。[61]俄国将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关东州租赁权让与日本，同时还出让旅顺港至长春（宽城子）区间的南满铁路，仅就这段铁路和大连的建造费用而言，俄国的支出便已高达125761108卢布71戈比。[62]此外，萨哈

林岛的南部也划归日本。在此情况下，日俄两国彼此承诺，不再加固岛上的防御，不妨碍船舶在拉彼鲁兹海峡和鞑靼海峡的自由通航。俄军各部在同一时期内全数撤离中国东北。俄国准许日本臣民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峡之俄国所属沿岸一带享有捕鱼权（第11款）。

和约第13款规定，双方应“尽快”向彼此交还俘虏。此外，俄国有义务补偿日本留养俄国战俘的开支：“俄日两国政府速将俘虏彼此交还；双方一俟交还俘虏完毕后，将虏犯自被掳或投降之日起至死亡或交换之日止，所有因照管及留养该犯之一切费用细账互相交换后，俄国政府应需从日本实用数目中扣除俄国实用数目，尚差若干，当由俄国速偿日本。”[63]沙皇同意了这一要求，条件是“确保战俘享有与这笔支出相符的待遇，满足他们的留养和治疗需求”。[64]

关于俄国战俘的留养规程颇为体面，[65]然而现实与文件相差甚远。[66]既发生过谋杀，也曾纵容革命者进入关押俄国俘虏的集中营进行反政府宣传、[67]分发革命文献，[68]还曾挑唆士兵与军官发生冲突。[69]但是总体而言，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基本遵守了国际公约。日本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条件尚可，1030名俘虏死于疾病，613名俘虏重伤不治（就当时的条件而言，这个数字相对较小）。[70]与日本不同，俄国更加看重俘虏的留养问题（铺盖、饮食和医疗等），依据“俄国军衔等级规章”给予战俘相应的待遇。[71]然而，日本并未按照规章起草者的期望对待俘虏。日本留有72445名俄国俘虏（其中包括1445名军官），半数人员在旅顺港被俘；俄国留有2083名日本俘虏，108名军官和1975名士兵。经过谈判，最终确定了彼得堡与东京用于维持俘虏生存的开销差额是45931949卢布31戈比。1907年2月23日，这笔款项由伦敦经手支付给日本政府。[72]

[1] Rosen，*Forty Years of Diplomacy*，vol. 1，p. 257；Витте С.Ю.Ук.соч.М.1994. Т.2.С.375-376；Извольский А.П.Ук.соч.С.14-15.

[2] Мир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Портсмуте в 1905 г.Дневник И.Я.Коростовец，секретаря графа С.Ю.Витте во время портсмут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Июль-сентябрь 1905 г.//Былое.1918.№1（29）.С.180-181.

[3] Портсмут.//КА.М.1924.Т.6.С.18.

[4] Коковцов В.Н.Из моего прошлого...М.1992.Т.1.С.80.

[5] ф.-Ш.В.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мериканца о портсмут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В.1912.Том 129.Вып.9.С.992-995.

[6] Портсмут.//КА.М.1924.Т.6.С.22-23.

[7] N. E. Saul，“The Kittery Peace，” in John W. Steinberg，et al.，eds.，*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vol. 1，p. 486.

[8] Ed S. Miller，“Japan’s Other Victory：Overseas Financing of the War，” in John W. Steinberg，et al.，eds.，*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p. 473.

[9]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делам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736-740.

[10] Anglo-Japanese Agreements of August 12，1905，pp. 1-2，PRO，WO 106/48.

[11] Витте С.Ю.Ук.соч.М.1994.Т.2.С.545-546.

[12]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М.Портсмут.Очерк.//ВЕ.1908.№6.С.476.

[13]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есной и летом 1905 года.Апрель-сентябрь.М.1957.Ч.1.С.201.

[14]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есной и летом 1905 года.Апрель-сентябрь.М.1957.Ч.1.С.201.

[15]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156-157.

[16]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162-163；172-173.

[17]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170-171.

[18] T. Minohara，“The ‘Rat Minister’：Komura Jutaro and U.S.-Japan Relations，” *The Russo-Japanese War*，vol. 2，p. 559.

[19]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207.

[20] Переписка С.Ю.Витте и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 в 1904-1905 гг.//КА.М.-Л.1927.Т.6（19）.С.80.

[21] T. Minohara，“The ‘Rat Minister’：Komura Jutaro and U.S.-Japan Relations，” *The Russo-Japanese War*，vol. 2，pp.559-560.

[22] N. E. Saul，“The Kittery Peace，” in John W. Steinberg，et al.，eds.，*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vol. 1，p. 499.

[23]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М.Портсмут.Очерк.//ВЕ.1908.№6.С.481.

[24] Портсмут.//КА.М.1924.Т.6.С.25.

[25] Мир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Портсмуте в 1905 г...//Былое.1918. №1（29）.С.203；207.

[26] N. E. Saul，“The Kittery Peace，” in John W. Steinberg，et al.，eds.，*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vol. 1，p. 500.

[27] Мир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Портсмуте в 1905 г...//Былое.1918. №1（29）.С.212；То же.Былое.1918 №2（30）.С.110.

[28] Протоколы Портсмутской мир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 текст договор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ю и Япониею，заключенного в Портсмуте 23 августа（5 сентября） 1905 года.СПб.1906.С.1.

[29]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М.Портсмут.Очерк.//ВЕ.1908.№6.С.492.

[30] Протоколы Портсмутской мир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С.5-6.

[31] Мир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Портсмуте в 1905 г...//Былое.1918. №2（30）.С.112-113.

[32] Витте С.Ю.Ук.соч.М.1994.Т.2.С.397.

[33] Мир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Портсмуте в 1905 г...//Былое.1918. №2（30）.С.120-122.

[34] Начало войны 1914 г.Дневник А.А. Половцева.1905 г.//КА.М. 1923.Т.4.С.63.

[35] Портсмут.//КА.М.1924.Т.6.С.33.

[36] Портсмут.//КА.М.1924.Т.6.С.33.

[37] Ed S. Miller，“Japan’s Other Victory：Overseas Financing of the War，” in John W. Steinberg，et al.，eds.，*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pp. 481-482.

[38] Мир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Портсмуте в 1905 г...//Былое.1918. №2（30）.С.141.

[39] ф.-Ш.В.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мериканца о портсмут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В.1912.Том 129.Вып.9.С.996.

[40] ф.-Ш.В.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мериканца о портсмут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В.1912.Том 129.Вып.9.С.997-999.

[41] Мир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Портсмуте в 1905 г...//Былое..1918.

№3（31）.С.60.

[42] Портсмут.//КА.М.1924.Т.6.С.37.

[43] Мир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Портсмуте в 1905 г...//Былое.1918.№3（31）.С.63.

[44] Портсмут.//КА.М.1924.Т.6.С.39-40.

[45] N. E. Saul，“The Kittery Peace，” in John W. Steinberg，et al.，eds.，*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vol. 1，p. 503.

[46]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212-213.

[47] Протоколы Портсмутской мир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С.67-68.

[48]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56.

[49] Кикудзиро И.Ук.соч.С.56-57.

[50] Протоколы Портсмутской мир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С.80.

[51] 又称宗谷海峡。——译者注

[52] Мир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Портсмуте в 1905 г...//Былое.1918.№3（31）.С.75.

[53] Мир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Портсмуте в 1905 г...//Былое.1918.№3（31）.С.74.

[54] Русин А.И.К истории мир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Портсмуте в 1905 г.//МЗ.Нью-Йорк.1944.№4.С.254.

[55] ПСЗ.Собрание третье.СПб.1908.Т.25.1905.Отделение первое.№26762.С.712-716.

[56]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М.Портсмут.Очерк.//ВЕ.1908.№6.С.509.

[57] Мир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Портсмуте в 1905 г...//Былое.1918.№6（34）.С.161.

[58]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М.Портсмут.Очерк.//ВЕ.1908.№6.С.509.

[59] Россов П.Корейская армия.//ВС.1909.№10.С.227；231-232.

[60]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1907.№8.С.817.

[61] D. Wolf，“Intelligence Intermediaries：the competition for Chinese spies，” in John W. Steinberg，et al.，eds.，*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 , vol. 1 , p. 306.

[62] Высочайше утвержд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с Обществом Кита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расчета по отошедшей к Японии части назван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 по морскому пароходству эт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 по устройству им гор.Дальнего и порта в этом городе.//ИМИД.СПб.1912.№2.С.51-52.

[63] ПСЗ.Собрание третье.СПб.1908.Т.25.1905.Отделение первое.№26762. С.715.

[64] Портсмут.//КА.М.1924.Т.6.С.40.

[65] Япон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о содержании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ВС.1904.№11. С.283-290.

[66] Л.К.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Японии.//БП.М.1909.№5.С.87-89.

[67] Шулатов Я.А.На пути к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 российско-япо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1905-1914 гг.Хабаровск-Москва.2008.С.36-38.

[68] Семенов В.Цена крови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Расплаты» и «Боя при Цусиме») .//ВЕ.1909.№7.С.26-27 ; Селецкий Г.646 дней...С.148.

[69] Л.К.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Японии.//БП.М.1909.№5.С.93-95.

[70] Урланис Б.Ц.Ук.соч.С.315.

[71] 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ВС.1904.№8.С.285-297.

[72] Шулатов Я.А.Ук.соч.С.34-35 ; 40.

32 休战与和平：内政的影响因素

1905年9月1日（俄历8月19日），在克服谈判危机——解决萨哈林岛和赔款争议后，俄日双方在朴次茅斯缔结停战协议。[1]9月13日，俄日两国司令部代表在四平街签署相应文件，双方代表在两军阵地之间的“无人区”会晤。日军代表故意迟到，旨在逼迫以奥拉诺夫斯基少将为首的俄军代表团恭候胜者。[2]根据停战条约，自9月16日12时起，双方终止军事行动。按照规定，双方军人不得进入对方阵地，但是前哨和侦察部队可以同时展开侦察。军队从防御阵地撤回营地，然后向不同方向疏散，在1906年4月15日前完成分批动员。[3]9月18日，海军上将耶森与岛村速雄签署海上休战协定。应俄方请求，日方同意立即放行载有粮食的运输舰前往堪察加半岛。[4]

割让领土在俄国引发了各界不满，牵头缔结和约的代表团领袖维特伯爵遭到了严厉的谴责。小村寿太郎的处境同样艰难。缔约前夕，东京清楚地知道，日本无法彻底实现谈判目标，这将导致国内社会陷入紧张局面。《朴次茅斯和约》条款激起了日本社会的强烈不满。日本报刊一致要求政府下台、继续对俄作战。[5]日本首都和诸多城市被迫降下国旗，送殡的白布布满城市的大街小巷，民众散发传单，呼吁进行爱国抗议。[6]1942年，日本知名外交史领域专家清泽洌指出：“日本的这段外交史令研究者感到惊讶……当时，日本的社会舆论坚决要求外交部门奉行强硬的外交政策，但是政府颇为谨慎……在对俄战争中，小村的外交结果在东京引发了史上最严重的骚乱。在外事领域，日本民众与政府的合作总是以战争爆发为起点，以战争结束为终点。外交被当作软弱的代名词，甚至能够激怒民众……自德川时代以来，日本社会始终认为，政府只有采取强硬立场才能实现外交目标；如若未能达成预期目标，则归咎于政府未能坚持这种立场。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否认，奉行强硬的外交政策是日本舆论的主流观点。舆论天生就是不负责任且情绪化的。结合我国的国际政策，必须考虑民族精神这一重要因素。这一因素的显著特征就是时刻渴望扩张。”[7]

日本社会得知《朴次茅斯和约》的条款后，立即表现出了这种情绪，暴乱当即发生。在东京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9月5日，大批民众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集会，呼吁政府继续对俄作战。尽管政府此前已经下

达过集会禁令，但是仍有3万人参会。为了驱散集会者，警察被迫使用冷兵器，而后动用热武器。结果，次日真正的暴乱吞噬了整座城市。内务大臣的官邸起火，13座教堂被摧毁，500余名警察和士兵负伤。暴民伤约2000人，死17人，被捕者约2000人，其中308人被起诉。[8]

至于俄国，尼古拉二世于1905年10月14日（俄历10月1日）批准和约，并于10月18日颁布《俄国与日本恢复和平关系的宣言》。[9]“在前途未卜的道路上，我们的祖国经历了诸多严峻考验和血腥的战争灾难。在与勇敢而强大的敌人的顽强战斗中，我们神圣的军队勇往直前、舍身忘我、不惧牺牲、厥功至伟。如今，这场艰苦而艰难的战争业已告终，祖国愿再次与睦邻大日本帝国携手共创和平繁荣的东方盛世。现向敬爱的臣民宣告俄日两国恢复和平邦交，我坚信，你们将与我一同祈祷，在上帝的指引下坚定信仰，祈求上帝保佑国家的未来，从人民中选出有能力巩固并完善俄国内部结构、从事广泛工作的合适人选。”[10]

国内的革命仍在继续，尼古拉二世在继续退让与实施军事独裁之间游移不定。1905年2月16日，奥地利驻俄国大使埃伦塔尔（A.Erenthal）伯爵准确地预言道：“理性地判断，俄国必将发生比现在我们所目睹的事件更加糟糕且影响更大的事件。上层没有脑子，政府没有可用之人，下层浑浑噩噩。在俄国，各阶层的反抗体现在方方面面：无所作为、通过愚蠢的闲聊打发时间。”[11]当时，政府高层认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是打破这种局面的不二人选。1905年10月，奉沙皇之命，大公接任近卫军总司令和彼得堡军区总司令的职务。在幕僚和驯犬师的陪同下，大公离开图拉的佩尔希诺私家庄园，骑马赶赴莫斯科搭乘火车。在近百俄里的骑行途中，大公等人穿越动乱地区。在抵达莫斯科后，大公搭乘由铁路工程师驾驶的机车头赶赴首都——政治罢工导致铁路瘫痪。[12]

1905年10月28日，即10月30日宣言签署前夕，在与沙皇讨论宣言草案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依旧无法下定决心。[13]此后，大公接见了乌沙科夫（M.A.Ушаков）——“国家货币发行局”的工作人员，此人与祖巴托夫组织往来密切。乌沙科夫“代表人民发声”，意图说服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俄国推行宪法制度。谈话之初，大公忐忑不安、针锋相对，不久后他平静了下来，不再反对乌沙科夫的提议。“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他相信完成这项事业是他的天职。在国家事务领域，他是一位朝气蓬勃、知识渊博的专家。这个人就是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伯爵。我

深信，为了陛下和俄国的利益，殿下您将欣然与之携手加速事业进程。恳请殿下与他一道砥砺前行，为国为民谋求福祉，荣耀沙皇陛下。如果您将投身这项伟大的事业，那么我坚信成功与荣耀必将降临。”[14]

1905年10月30日，沙皇在彼得戈夫召开会议。会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反常态地对维特的计划表示支持，同时声明，“由于军力不足”，无法在国内实行军事独裁。[15]这恰好与1904年夏维特所提出的主张相贴合。那时，维特站在了与上流社会达官显贵利益相悖的立场上，它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失败主义”立场。1904年9月1日，辽阳战役时期，维特在写给库罗帕特金的信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尽管普列韦先生的下场是咎由自取的，可怕的是没人同情他的遭遇……对您而言，这不是坏事，毕竟此前普列韦先生是导致俄国陷入这场倒霉战争的关东匪军的灵魂。现在，此事毫无疑问。我断言：这是一场倒霉的战争，我们无法预见它的结局；无论在战争中取得何种胜利，俄国也得不到好处。毫不夸张地说，即使胜利，战争也将招致一系列恶果，而非成就。”[16]俄国战败，维特有望实现自己的抱负。

1905年4月7日（俄历3月25日），他在写给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指出，必须推行对俄国有利的政策。他解释称：“我认为，如果政府无法满足人民对公平的需求和愿望，那么它将被迫屈从于轻率冒失的欲望。如果没有这场疯狂而不幸的战争，那么政府还能继续与这股强烈的社会欲望做斗争，甚至可以动用警力。但是，战争使当局的内核暴露在外。这些牺牲和灾祸不会无故消失。如果政府敷衍了事，无法彻底掌控民心，那么我们大家都将灭亡。最终，新兴的俄国公社将赢得胜利。不幸的是，政府萎靡不振，对此全然不知。”[17]维特深信，放弃独裁、向民众让步是大势所趋，他的想法几乎从未改变。

在离开美国返回俄国的途中，1905年9月21日在巴黎逗留时，针对这一问题，维特慷慨陈词：“如果我们不思进取、不转变思想，人民暴动和经济崩溃将向我们袭来。”[18]在专制制度遭遇反对派一致抵制的背景下，受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对部队缺乏信心的影响，在维特的不断游说下，沙皇确信让步能够平息祸乱。1905年10月30日（俄历10月17日），沙皇颁布《关于改善国家秩序的宣言》诏书，赋予国家杜马立法权。[19]在沙皇签署相关文件后，参会人员从彼得戈夫乘船返回彼得堡。据与他们同行的奥博连斯基（А. Д. Оболенский）大公证实，此时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愉快而满足。在谈及维特时，他说：“今天是10

月17日，王朝在博尔基获救（指1888年皇家列车在博尔基车站附近发生的脱轨事件——引者）的十七周年纪念日。在我看来，今天所发生的历史性事件拯救王朝于危难，足以彪炳史册。”[20]

次日，维特会见国内外媒体代表，并且呼吁他们支持新政：“现在，我以俄国公民而非朝臣或官员的身份与各位交流。恳请各位协助我平息各种社会思想。唯有你们能够担此大任。在恢复秩序前，没人能够做出成绩。”[21]令维特惊诧不已且大失所望的是，自己的号召并未得到自由主义阵营的支持，他的期待落空了。事实上，宣言的结局也是如此。至于革命者们，他们的积极性日渐高涨。[22]立宪民主党杰出活动家回忆道：“宪法已经颁布并且承诺落实，现在是时候兑现承诺了。然而，政府却又打起了自己的算盘。解放运动的那些本质属性是它制胜的法宝，但是如果想要利用这些胜果，那么政府将反受其害。”[23]

“十月宣言”的颁布并未平息混乱，即使在首都也是如此。自由党人和全体左翼分子已将斗争的目标确定为逼迫政府以宣言为基础召开立宪会议。[24]1905年10月31日，大臣会议成员波洛夫采夫在日记中写道：“尽管阴雨绵绵，但是在街道两旁人流涌动，一些人举着三色旗，另一些人举着红旗。双方爆发冲突，最终以命案收场。”[25]1905年，恐怖袭击的受害者达到591人（233人丧生、358人受伤）；次年，这项指标几乎增长了近两倍——1588人（768人丧生、820人受伤）；到了1907年，受害者人数激增至2543人（1231人丧生、1312人受伤）。直到1908年，恐怖事件才开始逐渐减少——394人丧生、615人受伤。对此，政府只能以暴制暴，以政府恐怖对抗革命恐怖。1905年，72人被判处死刑，处决10人；1906年，450人被判处死刑，处决144人；1907年，1056人被判处死刑，处决456人；1908年，1741人被判处死刑，处决825人。[26]显然，司法判决日渐严苛。1905年的死刑执行率仅为13.89%，1906年升至32%，1907年增至43.18%，1908年高达47.39%。但是，政府的难题绝不是打击恐怖分子。

那些激进的政党原本无意推动革命进程，然而糟糕的是，他们将推动革命当作与政府斗争的武器。诚然，与革命者不同，自由党人对于最终目标的构想并不统一。有时，他们的目标完全不切实际。关于国家杜马的选举，马克拉柯夫（В.А.Маклаков）回忆道：“他们大肆嘲讽西欧的制度，并且摇唇鼓舌地评价道，西欧的一切都已经过时了，出于某种原因，他们经常说起新西兰。简而言之，众人情绪激愤，场面相当混

乱……他们宁愿吵闹、集会，也不愿做些实事。”[27]选举的结果可想而知。克雷扎诺夫斯基（С.Е. Крыжановский）回忆道：“这是一场野蛮人的集会，俄罗斯大地似乎向彼得堡输送了全部的野蛮、妒忌和愤怒。如果听从这些自称代表人民的意志、表达‘人民内在渴望’的野蛮人的想法，那么必须承认，即使再过一百年，俄国也只能依靠外在的制约而非内在的凝聚力维持运转。我认为，推行开明专制是唯一的救赎之法。”[28]

[1] Протоколы Портсмутской мир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С.96.

[2]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Действия в Манчжурии.//ВС.1905.№10.С.244；247.

[3]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2 сент.1905 г.№367.С.1；Портсмут.//КА.М.1925.Т.7.С.27.

[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несения японских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х сухопутными и морскими силами.СПб.1909.Т.2.С.188-190.

[5]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235-236.

[6] Портсмут.//КА.М.1925.Т.7.С.3-4.

[7]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61.

[8] Окамото С.Ук.соч.С.286-297.

[9] Протоколы Портсмутской мир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С.107.

[10] ПСЗ.Собрание третье.СПб.1908.Т.25.1905.Отделение первое.№26765.С.731.

[11]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дипломаты о революции 1905 г.//КА.М.-Л.1932.Т.4（53）.С.152.

[12] Лейб-драгуны дома и на войне.Париж.1931.Вып.4.С.6.

[13] Манифест 17 октября.//КА.М.1925.Т.11-12.С.73-74.

[14] К истории манифеста 17 октября.//КА.М.1923.Т.4.С.416.

[15] Манифест 17 октября.//КА.М.1925.Т.11-12.С.75.

[16] Переписка С.Ю.Витте и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 в 1904-1905 гг.//КА.М.-Л.1927.Т.6（19）.С.71.

[17] Переписка Витте и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а (1895-1905 гг.) .//КА.М.-Л.1928.Т.5 (30) .С.112.

[18] Мир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Портсмуте в 1905 г...//Былое.1918. №6 (34) .С.180.

[19] ПСЗ.Собрание третье.СПб.1908.Т.25.1905.Отделение первое.№26803. С.754-755.

[20] Манифест 17 октября.//КА.М.1925.Т.11-12.С.76.

[21] Манифест 17 октября.//КА.М.1925.Т.11-12.С.100.

[22] Извольский А.П.Ук.соч.С.18-19.

[23] Маклаков В.А.Власт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 закате старой Росси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Париж.1926.Ч.3.С.403.

[24] Внутренне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1905.№11.С.363-363.

[25] Дневник А.А.Половцева.1905 г.//КА.М.1923.Т.4.С.78.

[26] В годы реакции.//КА.М.-Л.1925.Т.8.С.242.

[27] Шидловский С.И.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Берлин.1923.Ч.1.С.102-103.

[28] Крыжановский С.Е.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 бумаг С.Е.Крыжановского , последн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Берлин. б.г.С.82.

33 革命背景下的复员

在1905～1907年革命期间，军队继续效忠政府。与此同时，对于武装部队而言，战争的恶果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除。在远东，各大集团军的复原问题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在军事行动结束后，招募的预备役士兵完全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加入革命阵营。依据1905年9月13日在中国东北达成的停战协议，各军的遣散工作应于1906年4月15日前结束。10月14日，沙皇批准《朴次茅斯和约》，并于四天后发表对日和平宣言。[1]同日，集团军获准立即遣散军官、预备役士兵及全年服役时间不足三个月的志愿兵。复原工作始于中国东北以及在帝国内部部署的其他部队和机构。18日，部队复原的消息传到了四平街。[2]随后，军队高层开始制定复原的流程，确定撤退的期限。21日，利涅维奇下令军官、士兵以及满洲集团军的随员可以返回俄国，但前提是务必遵守复原流程。[3]然而，军队未能如愿返乡，在他们的后方——赤塔乃至哈尔滨都已发生动乱。早在“十月宣言”颁布前，动乱便已爆发。

10月28日，赤塔的报务员开始罢工。在铁路工人的支持下，示威者试图占领军械库。库房守卫开枪射击；在混战中，一名试图攻击军官的工人负伤。此后不久，罢工得到了男子中学、女子中学、实科中学、职业学校高年级学生的支持。28日14：00，部队与赤塔失去了联系。利涅维奇下令保护铁路和电报设施，同时派遣扎哈罗夫上校率领两支铁道部队和一个通讯连赶赴中国东北边境站点。后来，又派出一个通讯连和一支铁道部队支援扎哈罗夫部队。次日，东清铁路工人罢工。在满洲站，扎哈罗夫逮捕了部分报务员，同时派遣通讯连接替他们的工作。此后，情况略有好转。11月1日，哈尔滨的民用电报恢复服务。但是在联络彼得堡时，总司令不得不提前联络北京。[4]

1905年11月3日，环贝加尔湖铁路停运，伊尔库茨克和哈尔滨当局向满洲集团军司令部请求部队支援，但是未能如愿。此时，利涅维奇甚至无力控制哈尔滨的局面。6日，铁路工人加入了经过车站附近的报务员罢工队伍。[5]11月4日，利涅维奇接到命令，优先遣散伤员、病患、日本交还的战俘和预备役军官。[6]最后一个群体对现行军事体系的忠诚度令人怀疑。俄国政府需要优秀的军官在秋季训练新兵、镇压革命。既定的遣散流程在普通的预备役士兵中间引发了强烈的不满，他们急于回

家、盼望复原。在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暴乱频发的背景下，这种情绪格外危险。

显然，不能指望总司令在“国内阵线”上展现出果决的品质。为了做出决断，他要求掌握乌拉尔以西地区的情况，然而满洲集团军参谋部对此含糊其词。此时，无法与彼得堡建立可靠联系。[7]电报局瘫痪，总司令袖手旁观，并且未采取任何措施从中国套取情报。集团军参谋部传出了可怕的谣言，莫斯科已被大火吞没，死伤人数超过4万。[8]不难想象，这些谣言将对士兵造成何种影响！

中国东北时局突生变故。11月5日12时左右，哈尔滨收到了“十月宣言”的消息。为了广泛散播这条新闻，报务员暂停罢工。谁也无法保证罢工者不会散布虚假信息：“宣言”的新闻刚一爆出，随即便传出了莫斯科军区叛变政府的消息。[9]据一位军官回忆：“十月十七日的宣言震惊了所有人。哈尔滨陷入‘骚乱’。”起初，骚乱表现为部分俄国居民举着红旗游行，另一部分人则举着沙皇的肖像游行。革命的支持者逐渐增加，军人甚至也参与了游行。[10]截至11月5日晚，3000余人举着红旗在哈尔滨游行。利涅维奇被迫同意释放先前被捕的罢工激进分子。[11]结果，集团军远东后方的动乱愈演愈烈。11月12日，符拉迪沃斯托克发生暴动。

要塞的驻军并不可靠。事后，陆军中将卡兹别克报告称：“守城的陆战部队全都是战时由来自俄国各个角落的老弱部队拼凑而成的，他们迅速合并形成了一支不成体统的杂牌军，其中40%的人意外地跻身于要塞军官之列。”[12]9月26日，日本人解除了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围困。停火后，3.8万余名预备役士兵无法理解驻守要塞的原因和继续修建防御工事的必要性，纷纷要求返回家乡。日益猛烈的革命宣传激发了他们的不满情绪。[13]

应当指出，1903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人口约为2.6万，其中土生土长的俄国居民仅有1.2万。[14]目前，归国的俘虏和复原的预备役士兵遍布市区。一些人无法离去，一些人被迫等待。在驻军中，军人和公民各占一半。显然，无论是涣散的纪律和在短时间内无法恢复的秩序，还是城市的诱惑，都加剧了城市的灾难。[15]铁路成了混乱与暴虐的重灾区。[16]无法返回家乡的复员人员开始抛售个人财产。结果，复员的士兵和舰员在市场上与华人大打出手。不久后，市内发生暴动，军队施压平息暴乱。我们可以通过受害者的人数判断事件的规模：在参与平乱的群体中，1名军官、13名士兵丧生，6名军官和22名士兵负伤；在人群

中，2名士兵、13名舰员、6名平民、3名外国人丧生，另有32名士兵、52名舰员、22名平民、12名外国人（以华人为主）负伤。直到11月14日，暴乱才得以平息。[17]

要塞司令对守备部队完全没有信心。据他所言，他手里握着的是一根“腐烂的拐杖”，一不小心，它就会散架；与此同时，还要收容7万名战俘。[18]同时代人回忆道：“野兽一般的士兵搅得城市不得安宁，城市遭遇了空前的苦难。他们野蛮而疯狂地攻击城市。他们什么都抢，随即毁坏抢劫所得，然后将其丢弃。”[19]在动乱中，近1/3座城市在大火中化为废墟。11月14日，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要塞司令、海军少将格列韦向海军大臣别利廖夫（А.А.Бирилев）汇报称：“毫无疑问，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继续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运送战俘是行不通的。”[20]

尽管如此，也不能让战俘滞留日本。推迟后备兵力的复原时间是导致符拉迪沃斯托克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解决部队复原问题迫在眉睫。11月中旬，利涅维奇下定决心镇压罢工。为此，他急需可靠的部队，对罢工者实施武力威慑。然而，无论是预备役士兵还是与平民往来密切且急于回归家庭的士兵都无法担此重任。11月16日，总司令命令陆军第十六军司令普列韦中将和扎哈罗夫上校带兵奔赴赤塔，而后赶往伊尔库茨克，整顿秩序。结果，三天后，铁路停运了。[21]

11月18日，利涅维奇向军队下达第2433号指令。实际上这不是命令，而是向士兵发出的遵纪号召。军队高层声明，铁路罢工是导致复原暂停的罪魁祸首，同时还公布了按照入伍时间确定的退伍顺序：从开战之日算起，1904年9月1日前应征入伍的人员第一批回国；1904年9月1日至1905年3月1日应征入伍的人员第二批回国；其余人员第三批回国。按计划，回国途中，3名军官（1名首长、2名助理）和1200名士兵同乘一趟专列。[22]在第2433号指令中，竟未提及违纪处分。最初，在处理军队中与革命进程相关的事件时，军事当局近乎渎职。1905年，陆军部提高了士兵的津贴和配给标准。这是对“经济需求”的一种回应，然而正如某位头脑清晰的见证者所指出的那样：“之所以出现这种需求，是因为与复杂的人权问题相比，物质问题更容易为大众所理解，然而不满情绪的根源却在于前者。那些制造混乱的人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以此为基础在军中进行政治宣传。”[23]

11月19日，满洲集团军后方主帅纳达罗夫（И.П.Надаров）中将告知各部，复员工作已于14日陆续展开，首批返乡人员以滨海地区、阿穆

尔州、外贝加尔州、原关东州的预备役士兵为主，因为他们首批入伍并且在前线的服役时间最长。军队将领试图安抚暂时不能返乡的余部：“预备役士兵们！你们期盼的那个重返故土、得见亲眷的时刻即将到来！时间越长，剩下的人越少。你们并不孤单，所有现役将军、军官和你们甘苦与共，士兵们抛家舍业，几乎在与家乡相距万里的战场上度过了两年时光。现在，战争结束了，他们每个人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却滞留满洲！战士们，你们也应履行职责，站好最后一班岗。在轮到自己启程前，请耐心地等待，毕竟全体士兵不能在同一天启程！”[24]这只是将军一厢情愿的想法，显然，他在争取时间。

复原遥遥无期，从赤塔出发的客运列车（每天至多2趟）的运行状况也完全取决于司机的心情，军用列车一班未发。11月底，预备役士兵无一人离开中国东北。[25]与此同时，在向士兵派发的宣传单中，革命者声称，他们原本计划协助部队尽快返乡，但是碍于司令部的拖延，计划未能实现：“大贪官阿列克塞耶夫、别佐布拉佐夫之流巧取豪夺，将国库洗劫一空。现在，他们没钱送你们回乡了，毕竟途中得向你们发放粮食、铺盖和津贴。是的，他们害怕，一旦放你们回家，你们将看到他们无耻的劫掠以及家乡混乱、破败的景象。”[26]沙皇批准了部队撤离中国东北的日程安排。总参谋部参谋长帕利岑（Ф.Ф.Палицын）不希望优势军队过早地撤离中国东北，因为他完全不相信日本人。但是，为了支援莫斯科和彼得堡军区镇压革命运动，陆军第一军和第十三军依据日程安排先行撤离了中国东北。[27]

此事在中国东北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正如阿列克谢耶夫所写的那样：“士兵们不理解，为什么零四年八九月抵达此地的后备军要给零五年同期抵达的骨干军让路。”[28]这些预备役士兵多为俄国欧洲地区的农民，他们本就思乡心切，国内发生变故的谣言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于回家的渴望。在家庭和亲人随时可能遭遇不测的时刻，男子汉们自然希望回到家人身边，与他们共同面对。军官，特别是从波兰王国远道而来的军官也挂念自己的亲人。[29]在满洲集团军参谋部出现了海上转移复原人员的声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结束后便已开此先例[30]），然而最初彼得堡并不支持这种做法。1905年12月底，阿列克谢耶夫指出：“40万后备兵力变成了一群意志薄弱、歇斯底里、冥顽不灵并且只想回家的娘们。”[31]

后来，不得不启动极其昂贵的海运计划。在计划的制订过程中，海

运转移的军官和士兵人数逐渐攀升，最初四万，然后六万、八万，最后竟然高达十万。然而，轮船数量有限，无法容纳这么多人。5艘适合转运部队的志愿船已经全部到位，在日本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不停奔走——运送俘虏。截至1906年2月初，共有10名将军、2名海军上将、1066名军官、51330名士兵和8783名海军战俘乘船回国。[32]在首批回国的战俘中，在登上俄国轮船后，俘虏有了不服从指挥的迹象。高级将领，特别是罗杰斯特文斯基遭到了威胁，有人扬言要找他们报仇。[33]铁路运输的效果不好，何况西伯利亚干线周边的局势也在迅速恶化。在被俘期间，军官和士兵被囚禁在不同的集中营里，然而在回国途中列车席位随机分配，并未考虑过俘虏的部队归属问题。军官人数不足，并且不认识自己的新下属。例如，负责在火车上管理海军少将涅鲍加托夫舰队600名海军战俘的3名军官——1名海军大尉和2名海军中尉竟然全部来自旅顺港。

据事件的亲历者回忆："我们无法与这支陌生的部队进行任何内部或外部的沟通。当时群情激愤，在部队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前，俘虏的起义刚被镇压。无政府状态极有可能在列车上全面爆发。事实的确如此，途中感觉不到当局强力约束的部队开始为所欲为：酗酒、打砸餐车、威胁车站站长；有一次，他们责骂站长故意阻碍列车发车，全然不顾站长关于'会车'的解释，在另一列火车即将沿着相同的路线迎面驶来的情况下，试图擅自启动列车。"[34]在与海军中将梅勒-扎卡梅尔斯基（А.Н.Меллера-Закомельский）男爵的部队会合前，全列仅有40名曾在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海防装甲舰上服役的水手在帆缆军士的领导下保持团结、遵守纪律，他们是军官唯一的依靠。[35]

俄军司令部没有疏散战俘的经验，至少从未面对过如此规模的战俘。除此以外，上次战争的经验也派不上任何用场，毕竟从巴尔干半岛撤退的是团结一心、留有战斗力的俄军部队。疏散的速度落后于复原的速度，这不可避免地将加重俄军后方的负担。就目前的局面而言，不能阻拦应征入伍的预备役士兵撤退，否则军队将彻底失控。11月17日，总司令批准驻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来自滨海边疆区和内部省份"的预备役士兵（5000人左右）退伍。《满洲军公报》报道："士兵们欢天喜地地接受了命令。市内一片寂静，餐馆全部停业。国内外的轮船停满了锚地，目前还没开始卸荷。"[36]很快，一切就开始了，几乎所有可用的轮船（俄国的、德国的、比利时的、英国的）都赶来运送退伍部队。如若不然，这座城市将彻底脱离军事当局的掌控。1906年2月17日晚，缅甸

号率先抵达敖德萨，1850人回归故土。截至1906年2月，俄国轮船累计运送12146人回国，外国轮船运送了73486人。[37]事实上，截至1906年4月，在铁路运输彻底恢复前，70艘轮船沿符拉迪沃斯托克至敖德萨航线累计运送军官1500余人、士兵12万人以上。[38]

1905年11月至1906年1月，俄军的处境尤为艰难，铁路和通信几近瘫痪。军中谣言四起、难以澄清，比如英国陆战队登陆敖德萨，英国舰船在喀琅施塔得附近停泊，数支德军闯入华沙，起义导致近两万人丧生等。[39]退伍人群聚集在四平街。为了收拾残局，司令部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留在中国东北或前往西伯利亚。在此情况下，这群人需要找到容身之所和赚钱的行当，三言两语无法说清此事。显然，铁路部门也没有太多岗位，空岗极少，毕竟日本人占领了南满铁路的部分区段，现在原南满铁路工作人员的就业也成问题。12月2日，部队陆续离开前线，乘车前往哈尔滨。两日后，五趟军用列车由此出发驶向俄国。[40]由于罢工仍在继续，司令部的处境每况愈下。例如，12月3日本应向军队发放160顶暖棚，却只发放了6顶。[41]

起初，部分将领担心落实“公民自由”方针将引发不良后果，但是在未得到上级授意的情况下，他们不敢抵制革命。值得注意的是，满洲集团军两任总司令——前任库罗帕特金和现任利涅维奇担心，违反“十月宣言”的基本主张将加剧军队危机。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展，库罗帕特金预言，俄国即将成为联邦共和国，此后激进的社会党人将发动内战、干预欧洲政治。[42]利涅维奇期待，拿破仑式的人物出面平定暴乱，此前他不愿与激进分子发生过多的冲突。1906年1月9日，库罗帕特金对利涅维奇说道：“我们的祖国处境艰难，需要骨干兵力平定暴乱，然而我们却派出了反叛的后备部队。因此，我们不仅没能为祖国镇压暴乱增添助力，反倒拖了后腿。”[43]

[1]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С.1905.№11.С.273.

[2]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3 окт.1905 г.№398.С.1；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3 окт.1905 г.№400.5 окт.1905 г.С.1.

[3]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3 окт.1905 г.№413.18 окт.1905 г.С.1.

[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Из дневников...С.110-111；Теттау Э.От Мукдена до Портсмута.С.75；Революция 1905-1907 гг.в Росси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тачка в октябре 1905 г.отв.ред.

Л.М.Иванов.М.-Л.1955.Ч.1.С.242-243.

[5]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7.Л.19；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Из дневников...С.113.

[6]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3-е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Обзору военных событий» с 12 ноября по 13 декабря.//ВС.1906.№1.С.241-243.

[7]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7.Л.19.об.

[8]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7.Л.17.

[9]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7.ЛЛ.19.об.-20.

[10] Ск-л.В.По Манчжурии домой.Путевые заметки.//ВЕ.1906.№8.С.452-453.

[11] Теттау Э.От Мукдена до Портсмута.С.75-76.

[12] Революция 1905-1907 гг.в России.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ысший подъем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07 гг.Вооруженные восстания.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05 г.отв.ред.А.Л.Сидоров.М.1955.Ч.1.С.242.

[13] Теттау Э.От Мукдена до Портсмута.С.239；248.

[14] Отчет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ра по поездке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в 1903 году.СПб.1903.Ч.1.Осмотры войск，воен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и заведений. С.78.

[15] Движение в войсках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КА.М.1925.Т.11-12. С.307.

[16] Движение в войсках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КА.М.1925.Т.11-12. С.308-309.

[17]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417.7 ноября 1905 г.С.1-2.

[18] Революция 1905-1907 гг.в России.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ысший подъем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07 гг.Вооруженные восстания.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05 г.отв.ред.А.Л.Сидоров.М.1955.Ч.1.С.240；243.

[19] Сильницкий А.П.14 месяцев на службе на Камчатке.//ИВ.1909.Том 118.Вып.11.С.541.

[20] Революция 1905-1907 гг.в России.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ысший подъем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07 гг.Вооруженные восстания.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05 г.отв.ред.А.Л.Сидоров.М.1955.Ч.1.С.229.

[21] Теттау Э.От Мукдена до Портсмута.С.75.

[22]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 417.7 ноября 1905 г.С.1.

[23] Грулев М. [В.] Злобы дня в жизни армии.Брест-Литовск.1911.С.2 ; 4.

[24]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3-е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Обзору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с 12 октября по 13 декабря.//ВС.1906.№1.С.243.

[25]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7.ЛЛ.30 ; 38.об ; 45.об.

[26] Революция 1905-1907 гг.в России.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ысший подъем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07 гг.Вооруженные восстания.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05 г.отв.ред.А.Л.Сидоров.М.1955.Ч.2.С.892

[27] Редигер А. [Ф.] Ук.соч.М.1999.Т.1.С.512.

[28]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7.Л.33.

[29]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7.Л.32.об.

[30] Рерберг Ф.П.Ук.соч.С.54.

[31]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8.Л.13.об.

[32]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5-е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Обзору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с 13-го января по 13-е февраля.//ВС.1906.№3.С.244 ; 247.

[33] Семенов В.Цена крови...//ВЕ.1909.№7.С.24 ; 26.

[34] Дудоров Б.П.Адмирал Непенин.СПб.1993.С.135.

[35] Дудоров Б.П.Адмирал Непенин.СПб.1993.С.136.

[36]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420.10 ноября 1905 г.С.1.

[37]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4-е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Обзору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с 14 декабря по 12-е января.//ВС.1906.№2.С.237 ;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5-е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Обзору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с 13-го января по 13-е февраля.//ВС.1906.№3.С.248-249.

[38] Теттау Э.От Мукдена до Портсмута.С.96.

[39]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8.ЛЛ.19.об ; 48.

[40]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433.23 ноября 1905 г.С.1.

[41] Из дневника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 (с 23 окт.по 23 дек.1905) .//КА.М. 1925.Т.7.С.58.

[42] Из дневника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С 23 декабря 1905 года по 12 марта

1906 года.//КА.М.-Л.1925.Т.8.С.70-71.

[43] Из дневника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а.С 23 декабря 1905 года по 12 марта 1906 года.//КА.М.-Л.1925.Т.8.С.12.

34 败军战胜革命

1905年是革命者的一场演练。四平街司令部依旧无法与彼得堡保持可靠的联络；战败等候归国的预备役士兵在铁路沿线胡作非为。无论如何，俄军已经进入了军事行动结束后的最艰难时期。陆军部计划向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地区同时派遣两支围剿部队整顿秩序。为了将出兵计划提前告知利涅维奇，1905年11月中旬，陆军部使用了三种联络方式：经由鄂木斯克信使传信；经由北京信使传信；经由欧洲、美国和日本电报传信。[1]12月26日（俄历12月13日），尼古拉二世向利涅维奇下达诏令。

沙皇态度坚决："西伯利亚干线的持续动乱、铁路工人与合法当局的对抗为害国家、军队，延误撤退时机。为铲除恶行，特命连年坎普夫中校即刻出兵西伯利亚、外贝加尔铁路沿线地区平定暴乱，教化乱民彻底归顺合法当局，特许连年坎普夫动用于此目标有益之诸般手段。报务人员、铁路职工心生反叛，现出兵弹压反叛、对抗势头，解救我军于危难境地，深信将军势不可当……转告连年坎普夫，俄国和我期待他积极寻求解决之法，扫除障碍，平定铁路职工暴乱，迅速恢复国内核心干线畅通。令出如山，刻不容缓。"[2]

俄军突然发现，镇压起义似乎不难。在几名果敢的指挥官的领导下，几支可靠的部队就能完成这项任务。1905年12月22日至23日（俄历9日至10日），莫斯科爆发起义。对于镇压起义而言，市内警力杯水车薪。起义伊始，驻军态度消极、三心二意。25日，莫斯科总督、侍从将军杜巴索夫向内务部求援，提议至少从彼得堡"抽调一个步兵旅"支援莫斯科。[3]当日，谢苗诺夫近卫军被派往莫斯科，他的上级指挥官收到沙皇诏令："目前，依据既定规程，须诉诸武力，强势出击，除非遭遇严重损失，否则无须停火……此举务必断绝后患。"[4]

1906年1月1日（俄历1905年12月19日），军队成功镇压了起义。此前，镇压起义的重担几乎完全落在了谢苗诺夫团的肩上。令众人吃惊的是，政府军的损失相对较小，12月22日至1月1日，死者、伤者总计62人。[5]有趣的是，在政府军动用武力后，舆论导向迅速转变。谢苗诺夫团的军官回忆称："我们进入了一座完全瘫痪的恐怖之城，走在荒芜的

街道上，路障随处可见。混乱的射击打破了沉寂。两个星期后，谢苗诺夫团离开克里姆林宫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欢乐的人们夹道送行，街上传出美妙的音乐。”[6]

1905年12月27日，尼古拉二世下令采取紧急措施保护铁路。根据诏令，铁路管理部门有权对铁路周边地区实施军事化管理。此后，军队将领接到行动授权和开始行动的命令。1906年1月4日，梅勒-扎卡梅尔斯基将军率兵离开莫斯科，赶赴西伯利亚。[7]此前，一名军官着便装从鄂木斯克出发，并于1906年1月5日抵达利涅维奇参谋部，转交尼古拉二世的电报——任命骑兵上将连年坎普夫将军为西伯利亚铁路平乱远征军指挥官。[8]1906年1月15日，首趟运兵专列驶入俄国。[9]连年坎普夫的部队隐藏在这列火车上。无论是连年坎普夫还是梅勒，都以杀伐果断、精力充沛著称。1905年11月，塞瓦斯托波尔爆发起义，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梅勒表现出色。此次出征人数不多。梅勒麾下仅有一个加强连（隶属于立陶宛近卫军）和2门野战炮。然而在平乱部队抵达后，铁路沿线驻军的状态大为改善——首鼠两端的驻军迅速恢复士气，纪律也有了保障。

1906年1月17日，梅勒-扎卡梅尔斯基致电沙皇：“目睹大量后备兵员丧失军人气节，深感痛惜。臣必将竭尽所能恢复秩序。萨马拉—兹拉托乌斯特区的铁路完全正常，双向畅通；电报局已经复工。铁路管理委员会功不可没。臣深感羞愧，若提前20日抵达，或将避免诸多损失。”[10]此次平乱，俄军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例如，1906年2月3日，连年坎普夫部队在赤塔附近发展壮大，拥有16个连、2门山地炮、12挺机枪和18挺马拉机枪，沿铁路行进的东西伯利亚第五步枪师的行事作风也完全符合士兵宣言的要求。[11]

次日，革命者和叛变的第三铁道营士兵投降，因此在几乎未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政府军从他们手中夺回了城市的控制权。与此同时，政府军在赤塔缴获大量武器。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包括12091支三线步枪（返还4425支）、1110支来复枪（返还681支）、8197支伯尔丹步枪（返还9000支，大量步枪被盗）、4713支骑兵步枪（返还3040支）、2支哥萨克步枪（全部没收）、莫辛-纳甘步枪子弹35184发（返还7200发）、火药3普特13俄磅（全部没收）。[12]事实上，政府军所缴获的军械（冷兵器除外）足以武装赤塔全城的成年居民。毫无疑问，纪律严明、作风强硬的平乱部队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

此时，在伊尔库茨克发生的事件几乎是1917年3月彼得格勒事件的预演。在那里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委员会提出诸多要求，除立即强制复原全体后备兵员、向伤者发放抚恤金、改善士兵物资配给条件外，他们还要求废除死刑，解散军事法庭、军事监狱、纪律部队，取消“士官”军衔和军官头衔，向士兵敬礼、使用敬语“您”称呼士兵，从士兵中选拔初级指挥人员，根据士兵的意见罢黜对士兵“粗暴无礼、残酷严苛”的军官。[13]由此可见，如若任其发展，军队秩序必遭破坏。

“士兵与哥萨克联盟”在赤塔崛起。1905年11月底，联盟代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提供的铁路车间召开会议，会上决定向俄国政府提出下列要求：①在俄国境内增开军事列车，每日不少于16班次；不得根据入伍期限和武器保有情况拆分部队；两日内撤回铁路沿线的全部驻军，压缩军事列车行驶时间至17天以内；②立即发放差旅费；③上调伙食费标准，若向伊尔库茨克行军，每日至少发放50戈比的伙食费；在抵达伊尔库茨克后，每日至少发放30戈比的伙食费；野外行军，需在车站提供热食；铁路需向士兵提供免费的探亲车票；④向预备役士兵发放一次性补贴，未婚男子最高15卢布，已婚男子最高35卢布；⑤服役期间，确保哥萨克人与其他同业阶层待遇齐平；⑥上调现役士兵和哥萨克的津贴，无差别地上调士兵月薪至5卢布，下调军官薪资；⑦改善军营条件；⑧完善医疗体系；⑨改善岗哨环境，取消不必要的岗哨；⑩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度（在军中！！！），限制部队训练时间为每日3小时；⑪取消管理机构，选拔士兵组织工作；⑫维护士兵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上级需对士兵使用敬语“您”；在称呼军官时，只需在名字后面加上“先生”二字；若无军事任务，士兵有权离开营地，便装出行；⒀废除戒严令，不得安排士兵和哥萨克代替警察工作；⒁彻底免除当局对个别将领的纪律处分，取消禁闭室，废除负重罚站措施；⒂参会自由和游行自由，无须军官的许可或参与；⒃结社自由；⒄罢工自由；⒅组建图书馆，对文盲实施义务教育。[14]

事实上，此类文件正是著名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第一号命令”的前身。1906年2月初，得益于俄国政府军的积极行动，西伯利亚铁路最终恢复畅通，梅勒的部队功勋卓著。陆军大臣雷迪格尔（А.Ф.Редигер）将军回忆称：“这项任务看起来艰巨且危险，却以微不足道的兵力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此事主要归功于他个人（梅勒-扎卡梅尔斯基——引者），他以刽子手般的作风鞭笞、击杀铁路全线叛军，这令罢工者和反叛者惶恐不已。”[15]随着这些部队的胜利出击，自1905年10月起每日至多通行

一趟列车的铁路交通逐渐恢复。

罢工对铁路造成了严重打击，例如导致列车无法驶离乌拉尔、车站煤炭断供等。在军队的干涉下，秩序得以恢复。1906年2月13日，梅勒致电沙皇："西伯利亚和后贝加尔至赤塔的铁路已恢复通行；货物和暖棚已向东启运。车头已被依次改建，煤炭正在陆续运达。铁路沿线的革命分子已被开除、抓捕、消灭，少量在逃。目前，西伯利亚第四军精锐部队驻守铁路。最好尽快向革命分子聚集的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增派一个师，以加强驻军兵力。"[16]1906年初，除41班卫生列车外，铁路每日还可通行5班军用列车。1905年11月14日至1906年1月21日，铁路累计运送3576名军官、277322名士兵。[17]

至此，中国东北危机已然化解。1906年2月12日，维特在一场私人谈话中得出以下结论："①俄国依然忠于君主制；②俄国完全可以指望忠诚的军队。"[18]维特——"十月宣言"的奠基人对事件的结果深感失望。[19]至于将领们，此事过后他们也有所感悟。在输掉了与外敌的战争后，将军们突然重拾信心，毕竟战胜内敌竟然如此轻松，这令他们惊讶不已。

[1] Редигер А. [Ф.] Ук.соч.М.1999.Т.1.С.521.

[2] Революция 1905-1907 гг.в России.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ысший подъем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07 гг.Вооруженные восстания.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05 г.отв.ред.А.Л.Сидоров.М.1955.Ч.1.С.152.

[3] Революция 1905-1907 гг.в России.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ысший подъем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07 гг.Вооруженные восстания.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05 г.отв.ред.А.Л.Сидоров.М.1955.Ч.1.С.676-677.

[4] Революция 1905-1907 гг.в России.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ысший подъем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07 гг.Вооруженные восстания.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05 г.отв.ред.А.Л.Сидоров.М.1955.Ч.1.С.677.

[5] Революция 1905-1907 гг.в России.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ысший подъем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07 гг.Вооруженные восстания.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05 г.отв.ред.А.Л.Сидоров.М.1955.Ч.1.С.864.

[6] Лампе А.А.Убийство генерала Мина.//Часовой.Париж.1956.С.10.

[7]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Из дневников...С.153；162.

[8]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Из дневников…С.124.

[9]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Из дневников…С.126.

[10] К истории карательных экспедиций в Сибири.//КА.М.1922. Т.1. С.335.

[11] Революция 1905-1907 гг.в России.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ысший подъем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07 гг.Вооруженные восстания.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05 г.отв.ред.А.Л.Сидоров.М.1955.Ч.2.С.966-967.

[12] Революция 1905-1907 гг.в России.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ысший подъем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07 гг.Вооруженные восстания.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05 г.отв.ред.А.Л.Сидоров.М.1955.Ч.2.С.970.

[13] Революция 1905-1907 гг.в России.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Высший подъем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07 гг.Вооруженные восстания.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05 г.отв.ред.А.Л.Сидоров.М.1955.Ч.2.С.1015-1019.

[14] Движение в войсках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КА.М.1925.Т.11-12.С.339-342.

[15] Редигер А. [Ф.] Ук.соч.М.1999.Т.1.С.521-522.

[16] К истории карательных экспедиций в Сибири.//КА.М.1922.Т.1. С.343.

[17]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3-е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Обзору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с 12-го ноября по 13-е декабря.//ВС.1906.№1.С.241 ; Рус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4-е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Обзору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с 14-го декабря по 12-е января.//ВС.1906.№2.С.237.

[18] Дневник А.А.Половцева.1906 г.//КА.М.1923.Т.4.С.89.

[19] Извольский А.П.Ук.соч.С.21.

结语

1906年一本俄国杂志概括道：“过去的一年，可以说是俄国的灾祸之年，内忧外患层出不穷，正如法国人描述本国的1870年一样，这真是‘糟糕的一年’。”[1]1904～1905年俄国在中国东北经历的惨剧直接印证了某些简单的真理。在战略方面，根据美国历史学者的定义，俄国的失误主要在于：一方面，“兵戎相见毫无意义”；另一方面，“永远不要开始没有把握完成的事情”。[2]1905年12月28日德国总参谋部参谋长备忘录结论正是在这些论点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份文件是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针对同年11～12月的军事演习所做的总结：“在战争中，中国东北的打法绝不可取，即缓慢地将敌人从一个阵地引向另一个阵地，一连数月无所事事地与敌军对峙，直到最后敌对双方精疲力竭，决定缔结和约。应当尽快在一条战线上摆脱敌军的纠缠，以便腾出手来对付另一条战线上的敌军。”[3]这便是施利芬的继任者1914年8月制订的著名的“闪电战”计划的基础。

在分析中国东北军事行动的过程中，俄军行动迟缓、参谋人员文化水平低下、俄军将领无法看透敌人的作战方法，这些令后人感到震惊。在大型会战中，敌人的战略几乎一成不变，日方发动进攻，封锁俄方中心阵地，同时绕至俄军后方，迂回包抄右翼阵地。在九连城、瓦房沟和辽阳战役中都是如此。然而，每场战争都走向了同样的结局：补给路线遭遇威胁的俄军仓皇撤退；在进攻中累得筋疲力尽的日军不再追击。库罗帕特金一边撤退，一边吸收逐渐抵达的预备役部队。军队人数确有增加，从表面上看，俄军主帅的计划似乎很成功。后来却出现了许多意料之外的状况——总参谋部软弱无能，库罗帕特金大肆干预作战计划的执行细节。结果，人数越多，军队越弱。库罗帕特金孤身一人自然难以应付整个集团军的指挥工作。在他的干涉下，沙河和黑沟台进攻惨遭失败，奉天撤退饱经磨难。

所有人都清楚，不能再出现类似的失败了。总参学院在战争概述中

指出："现在，针对1904～1905年俄日战争事件的研究已经细致入微，每名军人有必要且必须这样做；对我们俄罗斯人而言，则更应如此。回顾战争悲剧的同时，我们应当铭记沉重的历史教训，通过积极的活动治愈我们的创伤，通过勇敢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使我们亲爱的祖国在历史进程中实现精神和物质的全面提升。"[4]尽管已从错误中得出基本正确的结论，但是俄国仍旧无法彻底纠正19世纪六七十年代所犯下的错误。毕竟，允许俄国纠正错误的时间所剩无几，国库里的钱财已被战争和革命消耗殆尽。《朴次茅斯和约》缔结后，俄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莫斯科、黑龙江沿岸地区、西伯利亚、远东等地，战胜革命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906年2月，帝国欧洲部分的斗争仍未结束，同时已经成了阻碍陆军完成重要任务——提升战备实力的沉重负担。

在1906年的前十个月里，民事当局累计征召部队2230次，迫使部队动用武力158次。这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据陆军大臣回忆，军队被当成了警察部队："他们继续无耻地滥用军力，不仅要求军队守卫银行、金库和监狱，还要求他们把守邮局、电报局乃至葡萄酒商店！部队本应守卫铁路、护送列车、押送用于加强警力的弹药，然而在填补警力空缺的同时，军中士兵的缺口日益增大。例如，在华沙，下士奉命走上街道协助或代替警察工作。高加索地区的军队境遇最为糟糕。在此情况下，军队陷入混乱，不再进行训练，下士一旦成为警察，很快就不是士兵了。"[5]

与革命（还算成功）的斗争和国家财政的崩溃导致军队作战能力急剧下降。显然，俄国政府几乎并未从上一场战争中汲取教训。[6]此事不足为奇，毕竟为了吸取教训就要进行军事训练，但是此时军费短缺。与此同时，军队的战斗力也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卢科姆斯基（A. C. Лукомский）将军回忆道："俄国欧洲地区的动员机制被彻底摧毁，这是盲目动员造成的恶果；加之，如果考虑到远东军队主要依靠和平时期的紧急备用物资（炮兵物资、军需储备、卫生备品）维持生存，那么便很容易理解当时俄国欧洲地区的混乱状态了。"[7]1906年，俄国政府的预算赤字约为7.83亿卢布；同年，供养远东驻军、部队复原、消除战争影响所需支出高达9.195亿卢布。为了凑齐上述款项，政府不得不举借外债22.5亿瑞士法郎（7.045亿卢布）、发行短期国债3.364亿卢布。尽管如此，截至1907年1月1日，俄国剩余的黄金储备仅可发行1200万卢布。[8]军费严重匮乏。

1906年底，军械总局被来自华沙、基辅和彼得堡军区的抱怨声淹没。抱怨的本质在于：军区军械部门没有收到应得的用于武器维修和射击训练的物资和经费，甚至连手持式枪械也未收到。实际上，根据当时的规定，经费应在年初拨付。无论是从远东归来的部队，还是留守部队，均未收到任何资金。[9]1907年1月26日，为了审查前一年获批紧急贷款的军事部门的开支，扎别林（А.Ф.Забелин）中将主持召开特别会议。结果发现，部队射击训练的资金缺口为243773卢布！同时，还需拨付181070卢布用于训练新兵、供养从远东归来的部队！后来，这个问题也未解决。1907年5月和7月，在财政大臣、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国家审计长的参与下，就此问题召开会议。

1907年8月8日，沙皇批准拨付181070卢布，用于"满足从战场归来的各支部队1906年度的弹药供给、指派给远东部队的俄国欧洲地区部队的新兵射击训练需求"。[10]这几乎意味着，这些部队1907年的射击训练计划已被打乱，并且未分得任何训练物资。

变化始于1909～1910年。俄国政府竭尽所能地加强军力。正如马克斯·冯·霍夫曼（Max von Hoffmann）将军——原黑木将军参谋部德军代表所指出的那样："毫无疑问，在对日战争中，俄国人学到了很多。假如在与我们对战时，他们表现得像在满洲时一样——优柔寡断、鲜少发动进攻且力度有限，面对来自侧翼的威胁畏畏缩缩，保留毫无用处的后备兵力，那么战争对我们而言将容易得多。"[11]

海军的情况与陆军类似，缺乏统一且独立的行动计划中心，缺乏对战略优先方向问题的应答，军舰的零散分布与上述原因关系密切。舰队成了一个汇报单位，而非一支相互配合的海上力量。因此，出征途中舰队无法合理地把握时机、相机行事。俄国海上战争史的主流观点认为："不得不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在战前的最后几年里，无论是我国舰队还是日本舰队，它们的规模都在迅速扩大，特别是日本舰队；日本舰队成功地完成了配套任务，而我们却未能完成这项任务。毫无疑问，这是导致我们失败的最后一个因素。在此情况下，提出日本是海洋型国家、俄国是大陆型国家并无依据。尽管我们国家没有多少水手，但是我们拥有专业的海事人员和军人，然而他们却受到了错误的训练。"[12]武器装备在没有得到专家指导、接受充分训练的士兵手中，无法对敌人构成威胁。

对日战争结束后，俄国舰队在太平洋和波罗的海销声匿迹。这种状

态持续了很久。俄日战争和1905～1907年革命之后，舰队长期处于压抑状态，这种结果合情合理。1907年，海军部的支出降至8771.1万卢布；在开战前一年——1903年，海军部的支出高达100405000卢布。与1903年相比，海军部的对内拨款金额大幅下调：造船经费下调1600万卢布（降低39%），武装经费下调400万卢布（降低42%），港口建设与养护经费下调1100万卢布（降低59%），舰船航行经费下调700万卢布（降低51%）。这是俄国舰队自成立后最艰难的一年，只有舰队成员的薪资保持不变。[13]假如不再发展舰队，那么俄国整个波罗的海沿岸都将失去保护、暴露在外，在不远的将来黑海也将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旅顺港的防御英雄——埃森、利文、高尔察克等人在恢复舰队的战斗力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

在此期间，俄国在军事方面不堪一击，相应的，外交政策也受到了制约。在中国东北的败局迫使俄国放弃了边境对抗和一系列与海峡邻国签署的消除彼此之间因外交失败而导致的诸多矛盾的协议。可惜，在经受了战败和革命双重打击后，苟延残喘的俄国无法在外交领域取得成功。1908年，伊兹沃利斯基遭遇了“外交上的对马之战”[14]，这正是对马海战的直接后果。与此同时，对马海战发生于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同一天。对于沙皇而言，这个巧合令他颇为不悦。[15]在我看来，他在1907年5月27日（俄历5月14日）的讲话中准确地表达了这种感受：“在对马海战中惨烈阵亡的舰队将使纪念日永远蒙羞！”[16]

未来，俄日战争对列强的影响将在另一个不易发现的方面显现。显然，亚洲国家战胜欧洲帝国唤起了彼得堡的敌人和亚洲臣民非殖民化的希望。无论是1885年和1896年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败绩，还是1885年法国在越南东京的败局，都未产生如此轰动的效果，毕竟这些战争规模有限。日本的胜利震撼并鼓舞着年轻的尼赫鲁和埃及未来的复兴社会党人的导师。日本的胜利使他们相信在与大英帝国的对抗中存在获胜的可能。[17]

1905年2月和10月的局面与1917年2月的局面格外相似。在命运的引领下，包括阿列克谢耶夫、鲁斯基、科尔尼洛夫、邓尼金、马卡罗夫在内的将军走上了撤退的官道。在2月的这些日子里，奉天会战的参与者不仅遭到了来自军方的严厉批评，还遭到了来自国家的严肃申斥。1905年3月，斯特鲁维写道：“专制制度，在那个难以触及的地方被撼动并击垮了……军队将继续忠于专制制度吗？不，不应如此，也不会这

样。”[18]总体而言，斯特鲁维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毕竟1905年的革命者和1917年的反革命者都急于做出成绩。事实的确如此，君主制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始于1905年的革命引起了未来的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关注和思考。我认为，这些想法对于理解12年后他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在他看来，俄国是一艘既没有船舵，也没有经验丰富的“上尉”、睿智理性的“中尉”的大船。也许，这是阿列克谢耶夫首次对沙皇及其政策做出批判性评价：“很难通过电报内容判断俄国的现状，但是，据我推测，我们国内的情况相当危险。骚动的情绪正在寻找宣泄的出口。我们应当采取措施疏导社会情绪，然而积聚已久的情绪不会等待这些措施，而是冲破所有障碍、倾泻而出，以某种形式给予我们教训。为了和平地解决问题，需要一个能人主持局面，并且不能浪费时间。可惜，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时间白白地浪费了……”[19]

任何失败都将引发当代人对于变革的思考。变革的程度通常取决于失败方对悲剧性事件的评价。与沙皇不同，阿列克谢耶夫对俄日战争的记忆主要与奉天有关。将军“二月沉思”的内容远超军事改革范畴。2月23日至27日这几天都是他人生中最为黑暗的时期。在我看来，他对奉天之战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最高统帅部参谋长1917年的各种行为。事实上，此前反对派已经表达过类似的情绪。1916年2月25日，针对左翼分子在杜马会议上委婉提出的革命建议，普里什克维奇（В.М.Пуришкевич）回应道：“战争有时是革命之母，但是每场在战争的阵痛中诞生的革命都是人民对政府无力抗击敌人、保卫国家而感到失望的结果。”[20]

在1904～1905年对日战争中战败的将领突然发现，复原军队的难度不亚于征兵入伍、集中兵力和为军队提供补给；与外敌相比，内部战后渴望回家的士兵更加危险。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在一支小型但绝对可靠的精锐部队面前，革命这类敌人不足为惧。在梅勒-扎卡梅尔斯基和连年坎普夫将军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地区成功经验的指引下，派遣满洲集团军老将伊万诺夫率领圣乔治勋章获得者营于1917年2月前往彼得格勒镇压暴乱完全符合逻辑。这种经验——失败和胜利是俄日战争给俄国和世界留下的珍贵遗产。

这笔遗产启发日本在俄国内战期间实施武装干涉、占领萨哈林岛北部。东京依靠武力迫使苏联接受共存条约。1925年1月20日，两国缔结

《苏联与日本关系基本原则公约》，为了使侵略者撤离北萨哈林岛，莫斯科做出重大让步："鉴于日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愿向日本公民、企业、会社出租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境范围内开采矿产、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开采权。"[21]苏维埃政府承诺，自日军撤离俄国领土之日起的五个月内，与日本签订为期四五十年的北萨哈林岛租赁合同。此外，除森林采伐权、煤炭开采权外，日本还将得到岛上至少50%的石油，同时还将获得极其优惠的租赁条件。[22]

众所周知，让步并未阻止日本政客对苏联的攻击。每次他们都受到1904～1905年经验的启发。1945年，相互猜忌、满腹牢骚的日子画上了句号。8月28日，苏联出兵肃清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上的日军。当日，苏联海军军旗在旅顺港上空冉冉升起。[23]9月2日，斯大林在俄日战争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中总结道：

> 日本早在1904年俄日战争期间便已开始侵略我国。众所周知，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的谈判仍在继续，利用沙皇政府的弱点，日本不宣而战，出其不意、用心险恶地抨击我国，偷袭俄国旅顺港舰队，致使俄国数艘军舰瘫痪，日本舰队抢占胜利先机。在此过程中，日本舰队击毁俄国三艘一流战舰。结果，三十七年后，日本再次使用这种阴险的招数对付美国。1941年，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致使美国多艘军舰瘫痪。众所周知，在对日战争中，俄国惨遭失败。另一方面，日本利用沙皇俄国的失败，意图通过强占萨哈林岛南部地区在千岛群岛站稳脚跟，进而彻底封锁我国东部出海口。同时，封锁通往堪察加半岛和楚科奇港口的全部出口……显然，从俄国手中夺取整个远东是日本的既定目标。
>
> 日本对我国的侵略不止于此。1918年，在我国建立苏维埃体制之初，日本利用英国、法国、美国对苏维埃国家的敌对态度并且以此为契机再次攻击我国，侵略远东，洗劫苏维埃远东，折磨我们的人民长达四年之久。
>
> 这并非日本全部的罪行。1938年，日本再次进攻我国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哈桑湖地区；次年，日本再次进攻哈拉哈河附近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意图分裂苏维埃领土、切断我们的西伯利亚铁路干线、断绝远东与俄国的联系。

事实的确如此，苏维埃军队以让日本人感到屈辱的方式击退了他们对哈桑湖和哈拉哈河地区的进攻。同样地，我们还成功地消除了1918～1922年日本的军事干预，日本侵略者被赶出我国远东。但是，俄日战争期间，1904年俄军的惨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我们国家的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且期待，日本被击败、污点被抹除的那日终将到来。四十多年来，我们老一代的人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你们看，这一天已经来临！今天，日本承认战败并且签署无条件投降文件。

这意味着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将回归苏联。从今往后，它们再也不是分隔苏联与海洋的工具了，再也不是日本侵略我国远东的基地了，它们将成为苏联直通海洋的要道、我国抵御日本侵略的基地。[24]

[1] Иностр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1906.№1.С.361.

[2] Менниг Б.Ни Мольтке，ни Мэхэн：стратегия 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РЯВ.С.15.

[3] Отчет о веденной в ноябре и декабре 1905 г.Начальником Прус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военной игре.Варшава.1910.С.2.

[4]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ообщениях...СПб.1906.Ч.1.С.I.

[5] Редигер А.［Ф.］Ук.соч.М.1999.Т.2.С.81-82.

[6] 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The Memoirs of Marshal Mannerheim*，translated by Count Eric Lewenhaupt. New York：E. P. Dutton，1954，p. 75.

[7] Лукомский А.С.Очерки из моей жизни.//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1.№6.С.61.

[8] Сидоров А.Л.Финансов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России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1914-1917）.М.1960.С.22-24.

[9] АВИМАИВиВС.Ф.6.Оп.7/1.Д.233.ЛЛ.49.об.；65；94 и об.；95；193.

[10] АВИМАИВиВС.Ф.6.Оп.7/1.Д.233.ЛЛ.221-222；271.

[11] Гофман М.Война упущенны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М.-Л.1925.С.2.

[12]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 гг...Пгр.1917.Кн.7.Тсусим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С.46

[13] Нордман Н.Наши морские бюджеты.//МС.1913.№11.С.122；127.

[14] 1908年，维也纳宣布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成了奥匈帝国的下一个目标。在俄国的支持下，塞尔维亚开始公开支持波斯尼亚塞族人的抵抗运动。1909年，奥匈帝国要求俄国承认吞并波斯尼亚。最终，还没有准备好跟维也纳正面对抗的俄国接受了维也纳的条件。俄国国内对政府的外交冒险与最终的软弱作风怒不可遏，媒体纷纷指责波斯尼亚危机是一场“外交上的对马之战”，伊兹沃利斯基被迫引咎辞职。——译者注

[15] Дневники Николая II.М.1991.С.315.

[16] Дневники Николая II.М.1991.С.366.

[17] Маркс Ст.«Браво，храбрый тигр Востока！»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и подъем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в британском Египте и Индии.// РуСб.М.2007.Т.4.С.89-107.

[18] П.С.Мукден.//Освобождение.Париж.18 марта（5 марта） 1905 г. №67.С.280.

[19] ОР РГБ.Ф.855.Карт.1.Ед.хр.33.ЛЛ.6-6.об.

[20]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Четвертый созыв.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тчеты.1916 г.Сессия четвертая.Пгр.1916.С.1514.

[21] Документы истор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М.1963.Т.8.С.73.

[22] Документы истор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М.1963.Т.8.С.75-77.

[23] О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Информбюро.Оперативная сводка за 28 августа.//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29 августа 1945 г.№203（6191）.С.1.

[24] Обращение тов.И.В.Сталина к народу.//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4 сентября 1945 г.№208（6196）.С.1.

译后记

本书作者奥列格·阿拉别托夫先生是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研究领域主要为19世纪至20世纪初沙皇俄国时期的外交史和军事史。2014年正值俄日战争爆发110周年，本书俄文版的出版备受俄罗斯学界的关注与推崇。

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从表面上看是领土和利益诉求高度重合的欧洲老牌强国与亚洲后起之秀在中国领土上爆发的一场恶战。事实上，这是一场“群架”，在两国背后列强早已结成利益同盟，蒙受战争苦难的却是无辜的中国百姓。本书从俄方视角阐释俄日战争的根源、战前准备、战争的进程及后果，同时立足于国际视角深刻剖析影响双方外交和军事决策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阿拉别托夫先生承袭了俄罗斯史学一贯的实证主义传统，在书中大量引用奏章报告、君主日记、电报书信、作战日志、回忆录等原始档案文献，数据丰富，论据翔实，呈现的历史人物有血有肉，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

对我来说，本书的翻译存在一定的挑战性。近年来，我虽一直从事俄语翻译专业的教学工作，同时对历史文献翻译有所涉猎，积累了些许翻译经验，但深知翻译此类学术专著不仅需要语言过关，有时更需理解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为了圆满完成这本书的翻译任务，我系统地阅读了关于俄日战争的名家论著。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中的人名、地名（特别是旧地名和别名）均仔细查证；对书中的史实事件，在确保译文准确、流畅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呈现作者的立场。

翻译这项工作既是语言的输出，更是思想的输入与融合。作为译者，在翻译中有困惑、有犹豫、有纠结，但更有拨云见日的豁然开朗、柳暗花明的快乐欣喜。拙记末尾，我要真诚地感谢本书编辑李期耀老师的信任、帮助和理解，以及在校对和编辑过程中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辛勤劳动。同时，还要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周国长老师的热心引荐和专业指导。最后，感谢我的爱人董树亮一如既

往的支持和关爱，你是我前进的动力和坚强的后盾。

限于译者水平，译作如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周健

2021年3月31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溃败之路：1904-1905年俄日战争/（俄罗斯）奥列格·阿拉别托夫（Oleg Airapetov）著；周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7

ISBN 978-7-5201-8314-7

I.①溃… II.①奥…②周… III.①日俄战争-研究 IV.①K3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81742号

溃败之路：1904～1905年俄日战争

著者/〔俄〕奥列格·阿拉别托夫（Oleg Airapetov）

译者/周健

出版人/王利民

责任编辑/李期耀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20 字数：428千字

版次/2021年7月第1版 202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314-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21-3114号

定价/12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周 健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现任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欧语系翻译（俄语）专业教师，研究方向为俄汉翻译对比、俄罗斯文学。

启微
UGEYE



启微微博二维码

启微
UGEYE



ISBN 978-7-5201-8314-7

定价：128.00 元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

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

（1937~1941）

启微

齐锡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齐锡生

芝加哥大学博士，主修国际关系和政治学，1967~1992 年任教于北卡罗来纳大学，1992~2002 年参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建校工作并任历史系主任，研究兴趣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内政外交、国际关系理论和军备战略问题，作品《中国的军阀政治》《剑拔弩张的盟友》影响甚巨。

年轻时业余爱好包括做木工、修房子、修汽车、爬山、射击等，老来希望能够学会弹钢琴和说西班牙语，目前仍在做学生。



封面图片：重庆大轰炸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惠允使用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

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

齐锡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齐锡生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201-3014-1

I.①从… II.①齐… III.①中美关系-抗日战争-史料-1937-1941 IV.①K265.06 ②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6887号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

——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

著　　者/齐锡生

出 版 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宋荣欣

责任编辑/李期耀 郭锡超

出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5.25 插页：0.75 字数：549千字

版　　次/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201-3014-1

定　　价/11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沈阳街道上任意射击人群

《良友》第62期，1931年10月（上图）



保卫卢沟桥的二十九军战士〔小方/摄〕

《良友》第**130**期，**1937**年**7**月（下图）



上海之火《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1947**（上图）



武汉外围战《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1947**（下图）/



主持美國對華大借款之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氏，在華盛頓與美國朝野各方過從甚密，其夫人張女士（右）時與宋氏出入交際場中。最近援華會在華盛頓憲法堂華舉行，宋氏夫婦亦參加盛會，旁坐者爲華盛頓日報主辦人梅爾夫人。

Dr. T.V. Soong, Director of the Bank of China, secures huge loan from U.S. to keep the Chinese dollar alive. Dr. Soong had many intimate friends in U.S. and his brilliant career as China's No. 1. financier has won admiration and respect from the people of U.S. Mrs. Soong is also popular in the social circles in Washington. She is seen here with her husband at the China Relief Dinner.

宋子文夫妇在华盛顿的交际

《良友》第**167**期，**1941**年**6**月



RESORT HOTEL IN THE NATION'S CAPITAL
The SHOREHAM
Connecticut Avenue at Calvert Street
Washington, D.C.

機進言（甲）美艦隊在太平洋者是否可久駐不調往大西洋（乙）日本如果侵略安南則其第二步必侵佔和屬印度無疑故對安南及暹緬問題只望其以美國之權益與立場及時出而維持正義此實無形中遏制日本之南進政策惟一時機也（丙）美對俄最近之關係有否進步美俄對日本之方針完全合作一致之可能否（丁）日機無日不狂炸重慶美國如能警告其停止濫炸否則即實行禁運汽油必能生效也 中正 宥（廿六日）

1940年6月26日，蒋介石发给宋子文的电报

吴景平、郭岱君编著《宋子文与他的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姐夫長來電：

今日計已安抵美國為祝。聞法降德後國際形勢劇變，然亦無足為奇。英法既海軍似能聯合作戰，歐局不至速了。惟在此時期內日本在遠東必肆無忌憚，偏所欲為，變本加厲，尤其對於安南停運，實於我軍心民心大受影響。美國若傍觀到底，不速干涉，則於我抗戰不利甚懇美政府為我國設法援助也。見羅總統時，請先注重第一點，即歐戰現階段中國聞法降德對於遠東影響太大，尤其安南交通斷絕，中國抗戰形勢甚為不利。其對於中日問題解決之法與和戰之道，請其詳示。其他以下各點請相



大轰炸后的重庆街道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惠允使用





1941年12月22日，胡适与罗斯福会面后在白宫留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授权使用

出版说明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2017年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繁体字版。本社经作者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对其内容观点尽可能维持原貌，俾使读者全面了解台湾学者的学术主张，并以为两岸共修抗战史书之准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8月

谨以本书献给

舅父钱超然先生

舅母马吉琴女士

他们那一代人本该享有的花样年华

却在民族的灾难中销蚀殆尽

序

中国在1930和1940年代对日本的作战，是中国近代史上民族命运的转折点。当然，日本早在19世纪末期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参加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且后来居上，成为掠夺中国土地和资源最凶狠的国家。从割占台湾开始，继之占领东三省，再继之在华北扶植地方政权，在这数十年中，无论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纵或有抵抗的意愿，却没有抵抗的效果，以致日本食髓知味，最终导致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中日两国爆发全面战争。

自中华民族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现代化外交关系以来，抗战最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和西方的交往，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国家。列强在中国瓜分土地（租界、势力范围），控制中国的各种资源（工、农、矿业），僭越和分割中国的行政权（包括海关、邮政、铁路、内河航行、驻军屯兵、经济实业发展，乃至司法管辖，等等）。其方法就是以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迫使中国屈服。

但是到了1945年大战结束时，中国的国家地位彻底改观。列强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在主权和治权上成为一个充分独立自主的国家。更甚于此者，中国成为亚洲的领袖，而日本则完全成为战败国。在战后新建立的国际秩序里，中国还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一切发展不但将19世纪以来中国在和西方国家交往过程中所遭受的屈辱一扫而空，而且使中国跃升为新世界的领袖和维持世界和平发展的磐石。这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蜕变。

众所周知，导致此项蜕变的最关键因素是，中国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立即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结为全球性战略盟友，对抗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轴心国同盟。而其中特别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中国和美国的结盟。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太平洋战区、中美同盟关系等重要课题，几乎从大战刚结束就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每隔数年就会有中外文佳作问世。笔者在几年前也做过一些梳理的努力。[1]“二战”受到学界重视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西方列强一致参与的全球性大战。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到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长达53个月的中美关系，却很少引起学术界关注。特别是在英文学术论著中，多则一笔带过，少则只字不提，造成学术上一大片空白。

其实，就中美关系发展而论，抗战前半段四年的外交来往，正是为后半段四年的同盟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

一天，美国政府不但极力邀约中国成为盟友，而且推崇中国是世界抵抗法西斯阵营的四个领袖国之一。

然而在这53个月中，中美关系到底经历了何种变化？特别是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的大课题：决策过程是什么？由何人执行？中国的外交目的是什么？谈判的技巧如何？美方的反应是什么？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内，总体的得失又当如何评价？何以在1937年7月卢沟桥战事爆发时，美国政府认为事不关己，而到了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政府却十万火急地促请中国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

以上这些问题，都值得学术界去进一步探讨，因为它们对于了解中国外交策略的构思和中美外交关系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努力。这也是本书希望达到的目的。

在本书研究过程中，作者非常注意使用原始文件，除了参考堆积成山的官方档案之外，还尽量把中美两国关系人性化，而不是引用冷冰冰的官方文献、文告或宣言。在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领域里，学者经常运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这个概念来解释外交行为，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行之四海而皆准的钥匙，可以科学客观地解释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殊不知“国家利益”的界定因人而异。这在抗战的前半段中美外交关系上极为明显。因此本书尝试把这些领袖人物的形象、个性、心理状态、内心的盘算策划尽量予以呈现。在这个过程中，举凡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光甫、胡适等人的私人档案、日记等，都给了作者极大的启示，也不免影响到本书的写作风格和分析方式。这些都敬候读者指教。

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并非一气呵成，而是经过相当岁月，其间或是由于教学责任，或是由于其他研究课题占了优先，所以虽然研究目标从未转移，但是进度却时快时慢。在这漫长时段里，首先要感谢一些学术单位予我慷慨的经费或假期支持。它们包括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的研究金，香港科技大学 的研究金和学术假期。它们出了钱之后即使多年都没有看到成果，也没有向我施加任何压力，真是大度。而我的责任感告诉我，无论花多长时间，都应该尽力完成此书。

在这段漫长的研究岁月里，让我获益最大的是几个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无论是高层行政人员还是基层执行人员，都展现出高度的专业素养和乐于助人的态度，使得我获得完全满意的服务和善意的指点，大大提高了我使用资料的速度和效率。这些单位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善本书和手稿收藏馆（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台北的“国史馆”[2]，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没有那些敬业和热心的工作人员的指引和协助，本书大概难以问世。

最后，在写作和出版的过程中，作者也得到了许多亲朋好友的鼓励。特别是陈永发教授看过稍早的全稿，林载爵先生协助审核全书各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对本书文字的润色和严谨的校对，大大地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在此向他们诚挚致谢。

[1]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引号为中文简体字版编辑所加，此类情况下同。——编者注

- 第一章 摸索一个务实的对美外交政策
  - 一 国民政府在开战初期的作为
  - 二 中美关系的发展和胡适的外交使命
  - 三 中国早期战事失利对内政和外交的影响
  - 四 对于抗战前途的展望
  - 五 中国主动展开对美外交
- 第二章 胡适受命出任驻美大使
  - 一 国民政府对美政策重点的具体化
  - 二 政策成果的初步检查
  - 三 中立法和禁运事务
  - 四 对于促进国际合作的努力
  - 五 胡适对于中国坚持抗战的贡献
- 第三章 1937～1939年胡适和陈光甫对中国对美政策的影响
  - 一 胡适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 二 陈光甫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 第四章 寻求一个新的对美政策：1939～1940年来自各方的压力
  - 一 国际环境剧烈变化
  - 二 国内情势加速恶化
  - 三 中国对美国观感的改变
  - 四 中国逐渐摸索出一个新的对美政策
- 第五章 1940年以后外交作风的改变
  - 一 宋子文被任命的背景
  - 二 宋子文使命的实质与权限
  - 三 宋子文的新作风和新阻力
- 第六章 1940年下半年中美关系大幅扩展
  - 一 促成重庆政府外交政策改变的背景和因素
  - 二 中国对美外交实质上的扩展
  - 三 越南和缅甸通道的关闭
  - 四 中国争取国际合作的努力：时机、动机和展望
  - 五 蒋介石在1940年的感情世界
- 第七章 1941年：美国迈向中国外交舞台中央
  - 一 内外情势
  - 二 中美关系开始质变
  - 三 蒋介石个人在对美外交关系上角色的转变
  - 四 宋子文推行“个人外交”的努力
  - 五 1941年中国对美外交的几个里程碑
  - 六 对个人外交的评估
  - 七 个人外交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案例

- 第八章 租借法案带来的希望和失望
  - 一 租借法案：一个崭新的局面
  - 二 中国政府如何应对租借法案
  - 三 中国对陆军武器的要求
  - 四 中美差距的外在原因
  - 五 派遣军事代表团赴华
  - 六 太平洋战争前租借法案军火援助的总检讨
- 第九章 最后的冲刺：中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中的努力
  -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
  - 二 危机终于来临
  - 三 中国开始全方位处理危机
  - 四 中国政府处理危机的评价
  - 五 危机回顾
- 第十章 结论
  - 一 中国决心抗战和西方列强的反应
  - 二 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角色
  - 三 中国的外交和外交官
  - 四 历史评价

第一章 摸索一个务实的对美外交政策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并非仅导因于卢沟桥局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它其实导源于一些极为复杂的背景，其中包括国际局势的剧变和中国在1930年代政治局势的持续动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的重大转折。它象征着日本完全无视美国所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正面挑战西方国家在中国为保持其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利益所做的协调和努力。经由九一八事变，日本明确表示意图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独霸地位，然后试图逐步推展至华北和蒙古。为此，日本向世界高调宣示它和中国具有特殊关系，而且对东亚的和平安定负有特殊责任，不容西方列强插足。为了在武力上能够和西方国家一争高下，日本首先要求在海军军备上和西方国家获得平等待遇。当日本此项要求遭到拒绝时，它立即单方面退出1936年签订的伦敦裁军公约，以便能够摆脱在亚洲地区发展受到的限制。当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行为受到国际谴责时，又不惜悍然退出国际联盟。

当然，此时欧洲局势的变化也间接帮助了日本展开新一轮的扩张行为。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崛起和结盟，彻底动摇了西方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设计的和平稳定体系。希特勒的崛起，德国退出国际联盟（1933）和重整军备（1935），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1935），德意两国联手干预西班牙内战（1936），这一连串发展都对英国和法国构成极大的威胁，同时也使它们更不敢阻挡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行为。

而此时世界上另外两大强国——苏联和美国在面对这些危机时又各有自己的盘算。尽管苏联为欧亚两大洲的局势感到忧心忡忡，但是仍然认为最佳对策是避免和日本及德国产生冲突。苏联此种心态在1936年德、日、意三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益形显著。苏联政府的如意算盘，是让中国单独承受日本侵略的苦果，以帮助自己避开日本扩张的锋芒。

相对而言，美国政府在初期对于欧洲局势的变化并未高度警惕，对于亚洲局势更是认为事不关己。当时美国社会的孤立情绪高涨，很少人有兴致插足欧洲事务，更不愿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更有进者，当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力相当薄弱，而它和日本的商业关系又大大超过和中国的商务往来，因此就实际利益而言，也无意为中国打抱不平。果不其然，面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此后的侵华事件，美国政府的反应最多只是发表谴责宣言和拒绝承认日本行为的合法性，但是从来没有向中

国做出任何实质协助的承诺，更不必说帮助中国去积极抵抗日本了。

然而就中国本身而言，尽管国际环境对中国从事大规模作战不利，但其国内情况却使它急速走上抗日的道路。最主要的原因是“满洲国”事件和日本继之对华北的侵略，这些都促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白热化。它主要的表现方式包括在城市中的大规模抗议游行活动，抵制日货、学生运动，最后甚至导致1936年的西安事变。尽管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领袖们历来的主张是“攘外必先安内”，而他们借重德国军事顾问所训练的新式军队又尚未完成，但是形势比人强，抗日的进度不得不急速提前执行。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领袖们也曾经希望争取更充分时间去完成地方政府的税收和行政改革，并说服分据各省的军事实力派参加全国抗日大同盟。但是由于日本侵略速度加快，蒋介石只能提出警告，如果日本侵略仍旧持续进行的话，则中国到了“最后关头”，只能不顾一切地进行全面抵抗。到了1936年中期，中国政府声明不会再忍受日本对中国主权进一步的侵犯。[1]对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支持者而言，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的挑衅行为，显然已经把中国推向了这个“最后关头”。结果是，蒋介石认为中国已经退无可退，只能全面抗日。[2]

一 国民政府在开战初期的作为

战争一旦开始，国民政府首要急务并不是从事外交运作，而是全神贯注在战场作战。主战派领袖的全副精力都放在应付千变万化的战局上。他们不但要赶紧拟订地区性和全国性的作战计划，争取国内各种政治军事团体支持战争（而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反对政府和反对抗日的），重新分配中央军和地方军的职守，而且还要动员全国财力物力去支持军事行动。这中间当然包括借由一切手段获取武器弹药，俾使士兵得以进行战斗。在中国近代史中，没有一个其他时期的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生存所遭受的艰辛，能够和1937年的国民政府相比拟，特别是日本已经满怀信心地宣示，它在三个月内必定使中国灭亡。

当时中国政府如果还有余力去运用外交手段抵抗日本侵略，其重点也是放在欧洲，而不是美国。国民政府最初的努力是求诉于国际联盟和欧洲的强国，比如说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态度，则一直等到它的重欧轻美策略明显失效之后才开始转变。这期间所经历的是：国际联盟和华盛顿公约各国完全无法制裁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相继采取袒日政策，欧洲国家既不愿也不敢为中国而触怒日本，以免引起后者对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进行报复行动，而原先由德国和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及经济援助也益趋不可靠。这一连串发展使得中国政府终于体会到美国对于抗日大业的关键性。事实上，这个过程前后历时两三年，最终说服中国领袖们，把中美关系从他们外交政策视野的边缘，移位到它的中央。

本章的目的就是要回顾中国政府在开战之初对美国如何评估，及其主政者当时究竟想要经由对美外交达到何种目的。

（一）1937年中国政府对美国的衡量

1937年中国政府领袖们在推行对美外交时，看到几个重要的阻力。

首先，他们了解美国人民普遍不愿意牵涉进国际纷争，而只想置身事外，保持美国的独立。他们了解美国一般人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充满反感，认为其他列强背叛了美国人的理想主义，一味追求各自的私利。因此尽管美国拥有丰厚的军力和财力，但其民情反对涉足国际事务，而只是想在国际上采取孤立主义，避免国际纠葛。

其次，他们认为美国人对于亚洲事务尤其冷漠。即便美国人民可能同情中国被日本侵略的遭遇，但也不可能采取实际行动去帮助中国。对

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中日战争只不过是遥远地区两个陌生国家之间的争执，与美国核心利益毫不相干。纵使罗斯福此时已经把日本看成亚洲崛起的隐忧，这个观点依然未能得到美国人民的普遍认同。事实上，美国驻法国大使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在1937年7月底就曾经坦白告知顾维钧大使，由于美国民间舆论反对介入中日战争，中国不可奢望获得美国援助。[3]按照蒲立德的分析，唯一能够说服美国人民参加战争的途径，是诉诸他们的荣誉感，如同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只是可惜他们对中日战争完全觉得事不关己。[4]

最后，中国领袖们相信，美国还有一个和欧洲国家的重大不同之处，那就是，美国在中国并没有重大商业利益。他们知道，凡是和亚洲国家有密切贸易往来的美国商人，都不希望美国卷入亚洲地区的纷争，以免妨害他们的商业利益。由于这些商界人士在美国政坛拥有高度影响力，因此他们特别反对美国干预中日战争。比如说，美国南方的棉花商人就担心美日之间局势紧张将会导致棉花无法出口到日本市场去。

因此，依照中国领袖们的分析，中国最切合实际的指望就是设法促进一般美国民众对中国局势加深了解，使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好过对日本的观感。经由这种从人民基层做起的努力，中国或许能够在美国塑造一个更有利的氛围，让美国政府领袖们敢于对亚洲事务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5]

一旦蒋介石受到以上这些看法的影响而去设法提高美国对中国的关心时，他接着就需要去物色一位得力的官员去完成此项任务。在正常情况下，此项任务当然应该由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来承担。但是蒋介石对于王正廷的能力却完全缺乏信心，因为王氏既无组织能力，又有严重的个人缺点。

就组织能力而言，当时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职员工作效率低落，其肇因本来就是民国时期政府多年来忽视中美关系。比如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使馆值勤的最高职位官员是一位76岁的参赞，50年前就已经离开中国，他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留美学生对于该事件的反应竟会如此激烈。使馆内部的作业杂乱无章，以致在事变发生时，居然找不到一份精确的中国地图。虽然国民政府事后曾经多次努力改善其在美国的形象，但是收效甚微。它选派了资深外交官颜惠庆主持馆务，但是随即又把颜惠庆调到日内瓦去从事更重要的外交任务，那就是向国际联盟提交中国的控诉。颜惠庆的离职使馆务受到更大打击，因为他把馆内仅存的几位干练职员一扫而光地带去了欧洲。[6]简而言之，中国驻美使馆在美国是个空衙门，无所事事，混日子而已。

王正廷大使本人缺乏领导能力，不能提高使馆的效率。在中日战争爆发时王大使到任还不满一年，因为他是在1936年8月才从施肇基手中接任大使职位，而施氏本人也只有一个很短的任期。前后几任驻美大使的任期都是如此之短，使得中国的对美外交缺乏连贯性。虽然王正廷曾经留学美国，而且年轻得志，在北洋政治圈中很早就崭露头角，但是他

仍然是一位旧派官僚，先后在几届北洋政府中任职，对于旧式官场作风非常娴熟，而在华盛顿任职时，却很少走出使馆去结交美国权要，更不必说和一般美国人民群众建立关系。在王正廷的主持之下，大使馆职员士气低落，极端无能。[7]所有这些缺点都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去寻找一位适任的外交官去加强对美外交。

（二）胡适外交生涯的源头

最初动意让胡适承担外交使命的念头，并非来自蒋介石，而是来自汪精卫。早在1933年，汪精卫就曾经打算请胡适担任中国驻德国公使，后来又提议胡适出任驻美国大使。尽管胡适并非外交专业出身，但是汪精卫极力推崇胡适，认为他的外交才能远远超过当时中国的职业外交官。[8]然而胡适两次都婉拒了汪精卫的好意。

因此，当胡适在1937年接受蒋介石任命成为中国政府派遣赴美的特别使节时，表明他本人的态度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而且他下定决心要为国家做出一番贡献。

纯从胡适个人品质着眼，他无疑是当时中国人中少数最合格的外交代表，尤其适合出使美国，因为他不仅是在美国完成学业（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而且在美国学术圈中人脉甚广（如杜威）。胡适在归国后，立即成为全国知名人物，除了在几所高等院校任教外，还针对1920和1930年代中国重大的政治、哲学、文学、教育等议题发表过许多极具影响的言论和文章，流传极广。他在学术界的成就和热心于改革的活动力，使他成为当时少数能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望的中国学者。

然而纯从政治角度着眼，则胡适未必是一位适当的外交人选。他本人多年来一直极力避免涉足实际政治，既排拒党派色彩，也不曾和当权者有亲密的私人接触，更非国民党政府政策的支持者。事实上，胡适还不时对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加以严厉抨击。当然最重要的是胡适对日本的态度和蒋介石截然相反，为此经常冒犯后者。仅仅这一个理由，就足够让胡适的外交才能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二人心中产生极端相反的评价。

（三）胡适对中日关系看法的演变

1.胡适在卢沟桥事变前的和平主张

要想充分了解卢沟桥事变后胡适在美国所展开的外交活动，我们必须先了解他早先在1930年代对中日关系的态度。理由有二。其一是，他

在1937年以前对和平的观点，后来屡次被他的政敌加以运用，来证明他一贯反对政府的抗战基本国策，因此不适宜主导中国的对美外交。

其二是，他从一位和平论的鼓吹者成为一位坚定主战派的这一巨大转变，也更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胡适外交生涯中所受到的来自国内政府的阻力，以及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和美国政府打交道的一些做法的由来。

众所周知，胡适在战前长期是和平运动的舆论领袖，但是在和战问题上，他的公开言论和私下信念之间其实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并不表示胡适言不由衷或是假冒伪善，其真正的理由是，他认为他的公开言论必须表现出乐观态度，以维持中国的民心士气，而他私下对局势的看法其实趋向更悲观。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适在日记中透露，他其实早就料到这类事件会发生，而他对中国本身的无能的愤怒，远远超过他对日本残暴的谴责。[9]

在讨论中国外交处境时，胡适也和当时其他许多国人一样，严辞谴责那些向日本人出卖国家利益的中国人。[10]然而在所有1930年代中日关系的危机中，胡适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国力太弱，无法和日本人作战。因此中国必须向日本让步，以求换取更多的时间去增强国力和赢取国际支持。在当时中国舆论压倒性地主张抗日的声浪中，胡适坚持己见，认为和平是挽救中国的唯一途径，以致激怒不少反对者，把他贬称为投降派。[11]

胡适对中国本身羸弱无能的失望，还夹杂着一丝事出无奈的对日本的赞许，认为日本现代化和自强运动的成绩，实在应该被中国用来作为学习的榜样。[12]令胡适特别赞许的，是日本人民所拥有的某些品质（如节俭、纪律、对中国艺术和哲学的珍惜）。他甚至认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赢得胜利，正好证明黄种人可以经由竞争去击败白种人。而他本人在日本旅行时所受到的日本人民有礼貌而毫无歧视的接待，也正好和他在西方国家受到的种族歧视待遇形成强烈对比。这都增加了他对日本的好感。[13]

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因胡适的“主和言论”而误认为他是一位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者”。胡适既没有为日本的侵略行为开脱，也没有盲目迷信和平是最好的途径。他只是认为，无论中国人在情绪上如何慷慨激昂地声讨日本，只要是中国国力继续软弱不振，和平就是当前最务实的出路。

胡适在1930年代的政论中一贯伸张两个观点。

其一，他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同时不遗余力地运用各种渠道试图说服日本人民——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只能给他们自己的国家带来灾难。[14]胡适要求日本人千万不可蒙蔽自己，以为仅靠“中日亲善”的宣传伎俩就可以化解中国人的仇恨心。事实上，胡适所最担心的是，中国人民对

日本的仇恨已经高涨到宁可冒着自己亡国的灾难，也发誓要达成毁灭日本的目的。[15]

其二，他同时也劝告本国同胞，千万不可对中国前途存在虚幻的乐观。他警告国人，日本对华的领土野心远远没有达到让它满足的地步，而且在中国彻底降服之前，日本的侵略行为将不会停止。因此他也呼吁国人千万不可心存侥幸，以为太平洋地区一旦发生大战，中国的困境就可以迎刃而解。他指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亚洲肆意妄为，正是因为西方国家只关心它们自己的问题。[16]

基于上述理由，胡适主张，解救中国危机的出路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17]他同时指出，解救中国之道绝不是依靠发泄情绪而已。恰巧相反，他大声谴责那些鼓动反日情绪的群众运动健将，认为他们只知道耍嘴皮去发泄个人情绪，而不愿意为了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付出辛劳血汗，他直指这种人最为无耻。他把自己的主张讲得清楚干脆：中国只有依靠苦干，而不是玩耍嘴上功夫，才能成为强国，才能洗刷国耻。[18]基于这个理由，胡适主张，人民对过去历史上所发生的国耻事件，每一天都应该牢记心头，而不是只逢每年的周年日才去举行虚有其表的追念。[19]胡适同时指出，抵御外侮的先决条件是改革内政。[20]因此国人若在中国变成强国之前整日叫嚷雪耻复国，只是逃避现实，自欺欺人，毫无意义。胡适最强调的论点是，中国绝不可以贸然陷入一场全面性战争，而因此摧毁了将来自立图强的希望。

以上简短的回顾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在中国人民普遍要求政府立即进行全面抗日之际，胡适却依然坚持要求政府采取和平方针。胡适从来不自认为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反而强调自己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在国家处于极端危机状态下，他依然能够维持头脑清醒，以理性态度去分析世局。对他而言，中国面临的选择非常简单：只要中国能够强盛，则以前历史上所有丧失的权益都可以收回。但是如果中国继续羸弱，则绝不可轻易从事战争。1933年，胡适在他著名的文章《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生命可以延续数千年，因此当代中国绝不可以为了逞一时之快，只求取眼前的报复而牺牲一切。因为这样的报复既无意义，也无法实现。他引用了法国的例子：它要等了48年之后（1918），才把1870年割让给德国的失土（Alsace and Lorraine）收回。他鼓励中国人也应该发扬同等的决心和毅力，先埋头苦干把中国变成强国，然后才去跟日本人算账。[21]

如果我们细心研读胡适言论就可以发现，他其实不断地在修正他对中日关系的想法。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头几个月中，他主张接受日本政府所提的条件作为谈判基础。等到日本悍然拒绝国际联盟调停后，他改而认为和日本谈判并不能产生任何积极成果。然而这也并不表示谈判破裂就必须走向战争。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在个人良心上无法鼓励中国人民牺牲生命去维护国家的权益。说到最后，胡适既不主战，也不主张屈服，而是希望以拖延时间的方法来换取一个机会，使中国得以变成强国。[22]胡适引用了美国政府1932年初所宣布的“不承认”主义（史汀

生主义，Stimson Doctrine），以及国际联盟在处理中日“满洲国”事件纠纷时所采取的支持中国的立场，它们都让胡适相信中国应该坚决拒绝和日本进行任何谈判，除非谈判的内容是如何恢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23]

2.胡适转变成主战派的心路历程

胡适究竟是在何时从主和派变成主战派？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不少学者相信胡适立场改变的契机是淞沪会战，而胡适本人的某些文字也确实可以被用来支持这个观点。但是也有其他迹象显示，他的改变在稍早时节即已萌芽。根据胡适自己记载，1935年6月10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要禁止一切中国人民反日言行，这一发展使得胡适相信，中国必须从事武装抵抗。[24]到了1936年初，胡适在《大公报》《时事新报》的公开言论已经毫不掩饰地显示对日本的敌意，以致激起日本驻华外交人员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25]

1937年4月，胡适在致好友蒋廷黻的信中坦言，他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变成一个彻底的“反日者”，因为他对日本感到可悲和可耻。并且他相信日本武力扩张的成果已经超越其所能消化的程度。如果日本人不能及早自我反省，则灾难必将不可避免。[26]

这些文字显示，胡适的私下态度和他的公开言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我们无须怀疑胡适的爱国心，也不必像当时某些报刊把他看成亲日派。[27]但是即使当1935年他在私下已经承认中日之间不免一战时，依然不遗余力地想防止战争爆发，或是至少尽量延缓战争的爆发。

1937年初，胡适在一篇登载于《外交学报》（*Foreign Affairs*）的文章里写道：

概而言之，对于远东局势不外有两种看法。持第一种看法的人士认为，该地区的争端完全无法经由和平手段予以解决。这种人可以被称之为失败主义者。与此同时，另外依然有些乐观主义者，他们认为最近太平洋地区所产生的权力均势上的改变，说不定会为有远见和进取心的政治家提供一个机会，去找到和平解决的方案。本文作者在未来几页文章里，将会申述为什么我把自己列为少数乐观主义者的理由。[28]

当战争终于爆发时，胡适立即赶上庐山参加会议（7月12日），而此时他依然怀着一丝希望，如果华北守军可以就地阻挡日军攻势，则就可以将战争局部化。虽然此项希望很快破灭，但胡适仍然坚信中国此时绝不可进行全面战争，因为他估计中国还需要10年的准备和训练，才有能力保卫国土。情况既然如此，则中国政府除了向日本妥协之外，别无其他选择。[29]

在一封写给蒋廷黻的私信里（1937年7月31日），胡适把他对和战

的想法做了最完整的分析，同时还对中国和苏联各自面临的困境进行了一番比较。蒋廷黻和胡适一样，其立场也是主和反战。如同蒋廷黻所指出的，尽管苏联的国力远远超越中国，但是依然极力追求和平。因此中国更应该加倍努力避免战争才对。但是胡适还比蒋廷黻更进一步地指出，两国间的重要差别是，苏联有足够的力量可以避免战争，而中国却没有同等的力量。按照胡适的分析，苏联的力量来自它有抵御外侮的军事武力，还有对内部严密的控制力，而中国两者都缺乏。难怪胡适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力量去抵御外侮，也没有力量去接受丧权辱国的和平条件而还能维系国家的统一。因此，中国的悲剧乃是，尽管国家领袖们竭尽全力去避免战争，然而战争终究无法避免。[30]

虽然胡适对局势的看法如此悲观，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对维持和平的努力。为此胡适在7月30日求助于另外一位朋友高宗武（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是日本事务专家，政治立场接近汪精卫），敦促中国政府务必保持和日本政府外交沟通的渠道。他同时也希望中国有领袖能够拿出政治家的担当，去寻求中日冲突的和平解决方案。

当胡适在次日（7月31日）得知蒋介石已经做出对日抗战的决定时，仍然要求政府不可放弃以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的可能性。[31]在此后两周中，胡适一再呼吁中国应该忍辱负重寻求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他所持的理由相当简单：既然中国必定会战败，然后被迫寻求和平，就不如及早寻求和平，以免国家遭受大幅破坏。在和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私人接触中，胡适甚至建议他们可以以承认“满洲国”作为争取和平的条件。[32]

8月6日，胡适再度为和平做出新努力。他把一封未署名和未标示日期的长信（胡适亲笔书写，共4页）委托陈布雷（蒋介石私人秘书）转交给蒋介石。胡适在信中建议中国政府可以以承认“满洲国”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日本归还其他从中国夺走的领土，从中国境内撤走军队，放弃一切不平等条约下的特权，并承诺此后永远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主权。

胡适建议中日两国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两国同时也各自与苏联签订同样的互不侵犯条约，以维持亚洲地区的全面性和平。最后，日本还应该重返国际联盟。[33]无可置疑的，这是胡适在这个和战最后关头对于和平问题所提出的最完整的方案，也是他为和平所做出的最大让步。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并不是主张让东三省永远脱离中国主权，而只是把它当成权宜之计，他的最终愿望是让“满洲国”人民能够经由公民投票方式重新回归中国。

依照胡适的乐观想法，日本政府必定会欢迎他的建议。他同时也提出警告说，当前中国国家命运寄托在中央军之上，因此绝不可以让中央军去冒溃败的危险。[34]蒋介石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胡适，但是在7日召开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却极力讪嘲胡适的建议内容。其他与会领袖则表现出高度愤慨，参谋总长程潜将军甚至公开指斥胡适是汉奸，居正则要求政府将胡适立即逮捕法办。[35]

要想了解胡适对和战问题的态度，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去看他本人的文字。胡适在1937年8月6日致蒋介石的长函里开宗明义地写道："介石先生：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36]胡适列举了三个理由：（1）近卫内阁是一个主张和平的内阁，他内心希望不让军人干涉他的外交政策；（2）日本本身财政有困难，因此也需要和平；（3）中国好不容易达到国家统一的雏形，靠的就是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中央军），万一这个军队被摧毁，则"国家规模就很难支持，将来更无较光荣的和平解决的希望了"。

在不战的前提下，胡适认为中国的外交努力目标应该有两个：一是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求中国可以获得50年和平建设机会；二是运用目前手中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用外交方法恢复新失的疆土，保全未失的疆土。

50年中国和平建设的思考根据是什么？和过去几年一样，胡适还是引用了欧洲历史，指出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之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然后卧薪尝胆44年才去挑战德国，收复国土，恢复国家荣誉。鉴于此时中日之间军力差距远远超过当年的普法之间，因此中国需要保证获得50年的和平建设时间，才可能达到同样效果。

那么中国又如何能够说服日本让中国有50年的和平建设机会呢？胡适提出的"壮士断腕"建议就是放弃东三省，以换取日本尊重中国在其他地区的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性。而他也判断日本将会接受此项安排，因为东三省是日本在亚洲大陆最大的领土野心。最后胡适写道："如果先生认清国家五十年的和平，是值得一切牺牲的，那么，只有掬至诚请求政府与国人给先生全权作战前之最后一次和平努力。"[37]

事实上，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周内，很少有政府领袖对于抗日有高度决心或是整体战略计划。胡适在此期间所持的立场基本上和汪精卫及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最为接近。这些人主和的理由一是中国国力过弱，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二是此时开战对中国国家利益和国民党都大为不利，反而有利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38]

但是更多政府领袖在面对如此巨大国难时，变得手足失措。他们既害怕中国会在战争中遭受惨败，又害怕中国如果惧战将会导致国内分裂。这些人唯一的选择是把"和"与"战"的选择权完全交给蒋介石，然后无条件地追随蒋介石接受一切后果。[39]

最后，还是有一小群领袖坚信中国除了抗战之外，别无他路可走。比如说王世杰就认为，即使中国委屈接受和平也将会无力量维护和平，因为中国本身缺乏力量监督日本忠实履行和平条款，而西方列强也没有任何意愿作为中日和平的担保人。这样就可能使中国为和平而做出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因为日本在未来仍然可以无止境地要求中国做出新让步。如此说来，和平只能给中国带来灾难和内部分裂，而给日本更充足的时间去准备下一波的侵略行为。[40]

（四）蒋介石抗战思想在1937年的演变

1.蒋介石的主战言行

有趣的是，相对胡适而言，蒋介石本人的态度也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大致而言，从7月7日得知日军在华北地区向宋哲元部队开火之后，他就不断地推测日本寻衅的动机究竟何在，是想趁中国备战准备尚未完成之前迫使中国屈服？是与宋哲元为难，逼使华北独立？中国的决心应战是正确的时机？全面战争果真是日本的利益所在？这些疑问一直在蒋介石心中盘绕。但是无论如何，他决定派遣中央军赶往华北积极备战。[41]关于卢沟桥事件，蒋介石的态度是，“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动员六师北运增援，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42]从字面看来，此时只有做出“决心”的表示，才能为未来“和平解决”铺路。是和是战尚在观望之中。

在此后的十余日中，蒋介石仍然无法判断日本的真实动机到底是要维持华北战局的局部化，抑或是要使之扩大，但是他本人则利用这段时间争取四川、广西地方军人同意出兵到江南地区作战。[43]7月19日，蒋介石写道：“应战之宣言既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7月26日又写道：“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至此，作战的决心已经形成。

在这些动乱日子里，蒋介石全神贯注的大事是作战，对于外交问题无法分心照应。7月15日，他在日记中提到，英美两国似乎有意调停冲突，但是一日之后，两国政府只是各自建议中日双方应该寻求解决争端，而没有采取共同行动，因此并没有产生效果。而蒋介石本人也没有表态。一直到25日，蒋介石才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告以中国的冲突非常危险，希望列强能够给予密切注意，但是仍然没有向它们提出具体要求。[44]

到了7月底，蒋介石开始思考政府在长期抗战的需要下必须迁都，此时他考虑的地点是武汉、长沙或是广州。[45]到了8月7日，中国政府对于在江南地区的作战准备已经有了信心。“动员各部集中者已十分之八矣。”日本当然也知道中国要在淞沪进行作战的企图，12日，当中国政府得知日本有运输舰8艘或将载兵抵达上海，蒋介石迅速下令沉船封锁吴淞口。沪战随之而起。[46]依照蒋介石此时估计，“倭寇战争持久时期约可一年”，[47]而且内心充满乐观，“惟望神圣保佑中华，使沪战能急胜也”。[48]可见蒋介石对于淞沪会战，从最初开始，其重点并不是借此虚晃一招希图引起国际干预，而是有预谋地集结一切政府能掌握的精锐之师，在淞沪地区主动挑衅日军，求取“急胜”，摧毁敌人锐气。

2.和战选择的纷扰和胡适的转变

关于是和是战的问题，几乎从卢沟桥事变一开始，主和派的势力就很大，立场也很明显，并不躲躲闪闪，对蒋介石造成很大的困扰。蒋介石在7月19日日记中抱怨："决定发表告国民书，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独赞成吾意也。"[49]7月下旬，中国政府探知，日本派了西园寺的孙子到中国来探测中方的意态。但是在此时刻蒋介石个人对于战局的判断充满乐观。他认为东京政府对于和战问题已经丧失决定权，理由是在中国前线的少壮派军人根本不听指挥。因此即便是东京政府示意求和，中日之间的冲突也不会停止。依照这个推理，中国即使响应和谈也不能维护国家利益。反之，如果坚持抗战，其实前途并不晦暗。因为依据他的判断，"若我能持久，则倭必不能久持也"。他所持的理由是日本经济根本无法支持长期抗战。[50]至7月29日平津失守，蒋介石依然毫不泄气，反而说："倭寇欲以占领平津求告一段落，其弱点益露矣。"[51]而他对于自己一手缔造而由德国顾问训练的中央军的表现，也感到信心十足："余得享余手造之收成，天之所以赐余者，何独厚耶？能不勉励？"[52]

但是国内主和派的言论和活动显然是个不断的干扰。蒋介石在9月8日写道："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又写道："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次日更写道："除牺牲到底外，再无他路，主和之见，书生误国之尤者。此时尚能议和乎？"难怪蒋介石会感叹："对外非难，对内为难。"又说："内部复杂，唯有逆来顺受耳。"[53]

几日之后淞沪战局开始逆转，但是蒋介石似乎并没有为之沮丧，他写道："各部死伤大半，已觉精疲力尽，若不坚持到底，何以慑服倭寇，完成使命也？"[54]次日，他的决心似乎更加坚定。在讲了一大篇对敌坚韧战斗的战术之后，他总结性地写道："虽至最后之一兵一弹，亦必与敌在阵中抗战到底，上下共存一息尚存此志不懈之决心，凡我中国之寸土尺地，皆之洒满吾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血迹，使我世世子孙，皆踏此血迹而前进，永久不忘倭寇侵略与惨杀之痛史，必使倭寇侵略之武力，摧毁灭绝，期达我民族斗争最后之胜利。吾知以我将士过去牺牲之壮烈悲惨，总理与阵亡将士在天之灵，必能佑辅我军将士完成复兴民族之使命也。"[55]

一旦蒋介石下定了如此坚毅的抗战决心，他对于胡适这种唠叨不舍地为和平奔走当然就益发感到不耐，特别是胡适的活动似乎是受到汪精卫支持。蒋介石认为胡适的主和论调只能打击国人士气，因此反而加强了他自己的决心，不容抗战的准备工作受到影响。蒋介石此时唯一做出的让步，就是答应汪精卫和胡适，不会命令外交部长王宠惠去彻底关闭中国政府和日本外交接触的渠道。在8月初，当胡适仍在不厌其烦地鼓吹和平论的同时，蒋介石政府已经秘密决定把首都从南京迁往一个内地城市，以便进行长期抗战。[56]

岂知一个戏剧化的转变是，淞沪会战爆发最终让胡适从一名苦口婆心的主和派转变成为一名旗帜鲜明的主战派，而且从此坚决反对和日本

进行任何调和试探。到了9月初，胡适开始对以前主和派的同志们（汪精卫、陶希圣、高宗武）宣称，和平要比战争困难一百倍。[57]胡适这种剧烈的转变当然很快就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而后者在此时也正在物色一位恰当人选到美国去推动外交关系。[58]

但是胡适个人立场的转变并没有立即影响到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大计。虽然蒋介石在9月初决定派蒋百里赴德国和意大利进行外交工作，与此同时，也决定派胡适赴美。然而这两个外交使命的根本差别是，蒋百里赴欧洲是负有具体的军事战略外交使命，而胡适赴美则不过是去摸着石子过河，因为美国在中国外交上的重要性尚未显露出来。在开战的头三个月内，蒋介石在日记中第一次把注意力放在外交问题上是在9月底。而他所希望的，是九国公约会议能够如期召开，并希望对德国和意大利能够加强外交活动。至于美国，则是希望它能够召开太平洋会议，借此鼓励英国和苏联在亚洲事务上能够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当然，如果美国能够对日本施行经济制裁，则最为理想。但是中国政府此时并没有形成具体方案。[59]

换言之，中国政府的外交关注点仍旧停留在重欧轻美阶段。到了10月底，淞沪会战败象已露，然而蒋介石的外交方针并未随之修正。中国政府在九国公约会议上所要采取的态度是：（1）不妥协，但是不拒绝列强调停；（2）如调停失败则责任由日本担负，促使列强对日本不满而采取经济制裁；（3）淞沪战争和华北战争必须同时解决，而不可分割处理。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预测，如果日本无法尽快结束淞沪战争，则它将拒绝出席九国公约会议。[60]换言之，中国政府除了在淞沪战争中坚持抵抗之外，在外交上则把重点摆在九国公约会员国，争取它们的同情和支持，并且判断日本政府当会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因此而激怒列强去采取经济制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此时外交努力的目标并不指望列强采取武力制裁。

蒋介石在10月底对于中国抗战的大策略和外交关系，做了一个通盘性分析，在此值得我们细心研读。他写道：

十年以来对倭之决心与初意：

甲、如我与之妥协，无论至何程度，彼少壮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一切信义，继续侵略不止也。

乙、即使解决东北问题，甚至承认，彼以后亦必侵华，毫无保障，一时妥协，不惟不能凑效，徒自破坏人格与国格而已。

丙、倭之望我与之妥协者，其唯一目的为破坏我人格，使中国无领导中心也。

丁、此次抗战，无论结果与成败如何，但如不抗战而与倭寇妥协，则今日国乱形势，绝非想象所能及也。

戊、倭寇非先击败我革命军，确实处置中国后，决不敢对俄开战。故我国虽欲与倭谋妥协以待机，绝不可能。

己、总之倭寇对我，一得国际动摇机会，必先向我进攻。此无可挽回，亦不能用任何策略转移者也。

庚、此次抗战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继起而复兴。况国际形势，非由我自身牺牲，决不能唤起同情与干涉耶？

辛、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今九国公约会议已有召集确期，国际盟约亦有较好之决议，此乃抗战牺牲之效果也。

最后他写道："如此次再不抗战，则国民之精神消沉，民族等于灭亡矣。"[61]

蒋介石的这一大篇日记中的私语，可以说是把心中的话说得淋漓尽致。

但是我们在此还可以做出一点分析。首先，他把对日必须抗战而不可求和的理由（甲、乙、丙、丁），说得比当时许多政治领袖和学者要更全面和更透彻。这是他"十年来"思考的结果，自然有其深刻之处。其次，他对抗战必须不惜一切牺牲进行到底的理由（戊、己和庚的前半部）也再三强调。虽然他没有采用"苦撑"一词，但是含义高度重叠。最后，他当时的看法也是中日冲突最后解决脱不了列强的干涉（辛）。九国公约会议和国际联盟都是政府外交活动的焦点，赢得它们的同情使日本孤立，或是动用经济制裁手段使日本屈服。但是一切这些国际变化可能性的前提，都是非要中国先做出重大牺牲不可。至于蒋介石心目中所谓国际行动到底能够带来何种后果，蒋介石写道："宗旨。只要第三国参加保证，则可调停。若中倭直接妥协，则任何条件皆不愿问。惟有抵抗到底，虽至灭亡，亦所不惜。""停战必有保障与撤兵日期。"11月初，日方又委托德国传达媾和条件，并提出防共协定，遭到蒋介石"严词拒绝"。[62]

3.1937年底和谈气焰再度高涨和蒋介石的对策

但是11月是中国抗战的一个内忧外患夹攻的月份，此时淞沪会战的败象更为明显，而且已经无可挽回，于是求和之议再度活跃。依照蒋介石的说法，"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63]11月下旬，国军的溃败局面更加惊人，战败的士兵沦为打家劫舍者。"抗战结果，东南财赋之区，反成为散兵游勇抢劫之场。此乃战前未曾想到之事，痛心疾首，无逾于此。实为抗倭惟一之致命伤也。"蒋又写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

如是之易为，果何所据也？”[64]

因此蒋介石把注意力放在把国民政府迁往四川和筹划大局上，同时试图坦诚告知英、美、法、苏等国，中国抗战的能力有限，如果不能得到国际组织的制裁行动，则抗战前途将大受威胁。[65]但是即便处此逆境，蒋介石的信心似乎丝毫没有动摇，他在日记中写道：“战败敌军，制服倭寇之道，今日除在时间上，作长期抗战，以消耗敌力，在空间上谋国际干涉，与使敌军在广大区域，驻多数兵力，使之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方能制敌之死命，贯彻我基本主张。此旨万不可稍有动摇。国际局势不可视为沉寂无望，全可由我自造之也。”[66]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在蒋介石宏观战略思想中，已经开始注意到把“时间”和“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中国战场上加以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的坚决抗日并不纯粹是意气使然，而是显然经过深度的理性思考。作为主战派最高领导人，他并非对于主和活动一无所知。相反的，在七七事变后相当一段时期中，他收到大量关于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和各种不同身份的日本人之间进行和谈接触的情报。这些情报来自周作民、郑介民、陈仪、高宗武、董道宁和袁良等人。[67]

尽管如此，他在11月底淞沪会战全盘崩溃之际，却很理性地把长期抗战能够带来的最恶劣后果做了一番梳理，其内容非常有趣。他写道：

考虑长期抗战之最恶场合：

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

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

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了（聊）生

丁、人民厌战，共党煽动，民心背弃

戊、政客反动离间，各处伪政权纷起

己、各国与倭妥洽，瓜分中国

庚、倭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

辛、财政竭蹶，经济枯梏，社会纷乱。[68]

七十多年后重读这些话，不禁令人感慨万千。依照蒋介石推想，长期抗战的最恶劣的场合不啻是一个火焰炕。在不同程度上，这八个最坏的结局都先后出现。其中唯一比较离题的是（庚）项，中国没有沦为西班牙，但是在抗战最后几天却果真成为日本和苏联的战场。

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使蒋介石当时对于这个火炕看得很清楚，但是依然横了心往里面跳。而他所持的理由在上述引用的10月31日的日记中

已经说得非常明白。在这个意义上，蒋介石并不是一位闭着眼睛带领国家瞎碰乱撞的头脑简单的军人，反而是一位明知其会导致他个人和国民党政权遭遇粉身碎骨命运，但仍旧勇往直前的民族主义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德国大使再度趁中国新败之时转达日本的和平条件时，蒋介石依旧断然拒绝。[69]当然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要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和平呼声。依他形容："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此时若果言和，则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且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害，而不知敌人之危害甚于我也。不有主见，何以撑持此难关耶？"[70]

1937年12月是一个更难熬的月份。南京的防卫瞬息瓦解，日军展开全面总攻击。此时国民政府面临的是一场此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大灾难。12月26日，蒋介石在心力交瘁情况下生了一场大病，高烧至华氏101.2度（38.4℃），不能起床。当晚德国大使却转来日本最新的和谈条件，主要内容是：（1）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承诺与日本共同防共；（2）某些地区划为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组织；（3）中日两国建立经济合作；（4）中方向日方赔款。日方的附带条件是日军在谈判进行时不停战，而且中方代表必须到日方指定地点和日方进行直接谈判。蒋介石在看到德国转来的条件后第一个反应是大为高兴，认为日方条件既然如此苛刻，则终于可以让主和派从此死心。因此他除了置之不理外，还以为中国内部不致再发生纠纷了。[71]

岂知蒋介石仍然低估了主和派的信念和能耐。当他次日向国防会议报告日方条件时，与会者居然热心议和，而老一辈政治人物的言行也令他感到特别气愤。"于右任等且评余为优柔而非英明，此种胡涂凭（评）论固不足计较，但一经失势，则昔日趋炎附势者，今皆变为投石下井矣。本党老糊涂亡国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72]这番话说得既火冒三丈，又沉痛无奈，但是非常准确地表露了蒋介石力排和谈众议，而要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到了1937年最后的几天，蒋介石把坚持抗战的决心表露得更无回旋余地。他写道："外战如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又说："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73]就在这一天，蒋介石还是委曲求全地与主和派的大佬进行沟通，指望能够争取到他们的支持。29日的日记中写道："约于（右任）居（正）谈抗战方针不可改变，此种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也。"次日的日记再度透露他对主和派的忧心忡忡："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74]

这些文字在此后四年的抗战辛苦过程中，一直很忠实地代表蒋介石的立场。

二 中美关系的发展和胡适的外交使命

回顾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周内，中国政府在争取国际支持的努力中，最显目的措施就是派遣特使代表团赴西方国家。它最初的重点无疑是欧洲列强，因为它们都和中国有长远而又复杂的政治和商务关系（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和苏联）。美国也顺便被当作一个次要的国家一并处理。[75]

国民政府对于列强的外交关系显然采取了差别待遇。它派往欧洲的特使团都是经过长时期筹备，并且收到指令必须和中国驻各国使馆保持密切合作。唯有派赴美国的特使团仓促组成，也没有接受任何指示要去和中国驻美使馆进行合作。在这些特使团中，最重要的一个无疑是由孔祥熙所率领的团。不但孔本人在中国政府中拥有最高官阶，而且其他团员也都是部长级官员，是由权力核心的重量级人物组成，以便达成具体的财经政治目的。孔祥熙代表团其实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前（1937年4月1日）已经自国内出发，名义上是参加英国乔治六世国王的加冕庆典，实际上的秘密任务是争取西方列强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实现中国全面对日抗战的计划。

孔祥熙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比利时，并且和许多国家的元首会谈，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6月中旬，孔祥熙趁访问行程中一个空当赶去美国，希望能够得到借款，但是没有成功。[76]等到中日战争爆发，孔祥熙又兼程赶返欧洲（7月14日），继续争取欧洲列强对于中国抗战的支持。孔祥熙特使团前后在国外停留共六个半月，其中在美国逗留时间不足一个月。[77]在此期间，除了孔祥熙之外，中国政府还派遣了其他高阶层代表团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支持。

相比之下，蒋介石到淞沪会战开始之后（1937年8月13日）才把部分注意力放到美国，而且派遣代表团的动机只不过是进行宣传工作而已。碰巧正在这个时节，胡适刚刚放弃了他的和平活动，使得蒋介石可以在8月19日任命他为特使去美国争取舆论支持，除此之外并没有交付任何具体使命，基本上任由胡适自由发挥。而胡适在接受此项任务时，心中同样不知道究竟能够达成何种效果。[78]

虽然胡适代表团是中国政府派往美国的第一个特使代表团，但是它显然缺乏政治力度，这一点从它的成员即可看出。代表团是由政治圈外人士所组成，其中包括一位大学文学哲学教授（胡适本人）和两位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教授（钱端升和张忠绂）。他们只是北京大学的同事，既非蒋介石的亲信，又在美国政治圈中缺乏广阔人脉。他们更非政府经过深思熟虑而后任命的人才，而只是由王世杰一人推介仓促组成。[79]

除了政治分量微薄之外，这个代表团也缺乏具体使命。蒋介石指示王世杰去和胡适商定一个整体外交计划，但是王、胡二人并未完成此项任务。换言之，代表团到底去美国做什么和如何做，从未在政府高层中取得共识，甚至没有经过策划。[80]当时政府内部对美外交的笼统概念，只是去争取美国舆论对中国抗日能够给予同情和声援而已。[81]

依据当时中国政府的观点，既然美国属于西方国家，则当然应该去争取它的支持，但是支持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则并未明确界定。然而尽管有这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胡适依然在离华赴美的当天（1937年9月8日）充满豪情地预测，他有能力争取到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82]

事实上，这几位大学教授要等到上了开赴美国的轮船之后，才有机会首度去思考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达成了两项协议：一是向美国民众解释中国为何必须抗日，以求获得美国人的同情；二是劝告美国人民不可在国际事务上继续奉行“孤立主义”。教授们自己在心理上也做出准备，了解他们的工作可能费时费事，在短期内未必能够取得成效。[83]除此之外，他们也想不出到底美国人民还能如何帮助中国。

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缺乏政策焦点的特性，也同样在它当时对美的定向广播工作中显示出来。这些向美国人民做广播的中国领袖，包括宋美龄、宋子文和外交部长王宠惠。[84]而当蒋介石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面谈如何打击日本侵略行为时（7月23日），也只能敦促美国密切注意中国局势的发展，给予中国道德支持和维护国际法尊严，如此而已。[85]中国政府其他领袖也无人向美国提出具体的经济或军事支持项目。

至于胡适本人，他获得任命的理由既不是因为他具有政治实力，也不是因为他享有中国政府或美国政府特殊的信赖，而是因为大家认为他对美国社会比较熟悉，又是在美国有知名度的中国学者。对于一个无关紧要的外交任务而言，他看起来是一个适当人选，不致产生高风险，而且说不定还可以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果。从最低限度来看，三位教授应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公关团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或许决定让他们尽其所能地见机行事，做出一些好成绩来。

由于上述理由，因此即使在胡适抵达美国任所之后，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工作依然远远落后于它在欧洲各国的活动，以及对国际组织的重视。[86]

胡适代表团成员抵达美国之后，很快就得到一个初步结论，认为中国政府对美国群众的宣传工作收效太慢，因此他们应该从美国领袖层着手争取支持。他们（尤其是钱端升）首先拟订的目标是设法接近罗斯福周围的有力人士，争取他们给予中国借款、军火、运输设备等援助。但是当美方人士问及具体内容时，教授们却无法列出中国所需要的物资以及如何解决运输问题。当他们询问中国驻美使馆和李国钦时，也未能得到回应，因为后者本身尚未从国内接到任何争取美援的指示。[87]这几

位学者本人对于中国抗战的军备、财务、交通、军队可谓完全是门外汉，难怪他们在面对美国官员时提不出具体方案。

显而易见地，教授们的工作都只能够摸索前进，或是根本漫无目标。结果是，胡适刚到美国头几个月的工作完全没有进展，以致另外两位教授很快就觉得兴味索然，而要求早日打道回府。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展。在中国国难当头的时刻，它派驻到美国的外交代表团居然会觉得无可作为，而想回家？而胡适典型的解决之道就是劝他们多读些书以便消磨时间。[88]胡适本人也很快就发现，原来王正廷大使根本没有意愿向胡适代表团提供协助。[89]实际上，胡适的代表团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各自为政，互不往来。

三 中国早期战事失利对内政和外交的影响

中国不久在淞沪战争中的败绩严重地挫伤了它的作战能力，并且迫使政府更加费神去发展对外关系。

一连串军事溃败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局面。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力量在胡适离华赴美时达到最高峰。蒋介石属下的中央军是当时中国国内训练最严格、装备最精良的一支现代化作战部队，它们有效控制了长江下游五六个省份。这些省份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最成功的省份，拥有丰厚的财政资源。就是这些资源，才使得蒋介石有足够勇气和本钱去争取战略主动权，并且采用他自己选择的方法去主动向日军出击。不幸的是，一旦这一波战争失败而十年培养出来的精锐之师伤亡殆尽之后，蒋介石不但被迫放弃了战略主动权，而且在此后的抗战中再也无法将其夺回。在此后七年的抗战中，蒋介石不得不一再和地方实力派妥协（包括共产党在内），才能继续进行作战。他的权力根据地的丧失，在抗战后半段对国民政府的处事能力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90]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局面下，蒋介石个人的态度逐渐变成中国是否继续抗战的关键。这个态度可以分成几方面来了解：一是来自内部和外部要求谈和的压力；二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倾向；三是如何处理中国内部的关系以保证抗战得以持续？

（一）内外夹攻的和谈压力

就来自外部的和谈压力而言，日本和西方国家是双管齐下，而且有时呈互相配合之势。我们一般以为，以日本军力之盛以及其战斗进行之顺利，它必然是充满信心，坐待中国屈膝求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便是在1938年初，日本刚在淞沪和南京取得空前胜利，就开始各种形式的和平试探。而蒋介石却仍然斗志高昂，把日本的和平攻势看成一项阴谋。他在1月初的日记中写道：“注意：一，倭寇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应即严拒。”[91]几日之后，他又得到另外一种启示，写道：“敌国急于求和，而外张威声，其实外强中干。”“敌军愈进，则其对内对外之危险亦愈大也。”

换言之，纵然京沪战役之惨败打破了蒋介石原先想要取得地区性胜利的设想，但他已经开始转而产生一种新思维和信心，认为战争只要能够延长，就会对中国愈加有利。和谈的引诱力自然随之减少。而到了1938年1月中旬，蒋介石的抗战决心益发坚定，似乎中国在抗战中完全没有屈居下风。比如说，他在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一星期中，敌

人以宣战，否认国府与继续军事行动等等威胁逼迫，无所不至，可云极矣。以余视之，不值一笑。无论出于如何举动，皆不能摇动我抗战之决心与信心。彼本未停止军事，何谓继续。并未受有拘束，何谓自由行动。此种外强中干以进为退，求和不得，进退维谷之丑态毕露，盍不早日觉悟，明言撤兵为得计也。”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这种嬉笑怒骂的语气正表现出他顽强的斗志。如果吾人不是已经知道国军新近遭受的严重挫折，还会误以为中国军队是战场上的胜利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国家命运处于如此极度严峻的状况下，蒋介石私下的这些言论，究竟是他具有超乎常人的洞烛先机能力，还是一意孤行，无视于现实，甚乃自欺欺人？是他特具打不倒的刚毅精神，还是生活在自我封闭的虚幻空间中？这些都是值得从事抗战研究的学者进一步认真探索的问题。

就日本而言，它此时最依赖的国际传达信息渠道是德国，特别因为德国此时供应中国大批武器和顾问，使它对中国所能产生的影响力远非其他西方国家所能项望。因此，蒋介石在1月16日只好“对德大使明言，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92]日本在经由德国探索和平之路碰壁之后，在2月下旬又改求意大利介入。[93]

与此同时，让蒋介石感到更具威胁的是，英国也想借此机会把它自己在远东的处境和它与德国及意大利关系问题一并予以解决，而这就可能促使英国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参加德国和意大利共同向中国施压的行动。这当然会对中国更加不利。而日本虽然和英法两国的关系远不如和德意两国那么接近，但是只要有机可乘，日本政府仍然不会轻易放过。它在1938年9月就玩了一手。根据蒋介石的记载，“昨日英国代办携其大使转达倭寇要求划汉口为安全区之意见书见告，阅之发指。面斥英使之不当受倭之要求转达。彼并言法大使亦同意，可知英法帝国主义毫无公理与公义，而惟以势利是尚也。痛恶之至”。[94]

岂知中国的相应不理，并没有让日本放弃和谈的企图。到了4月初，“敌又托德国间接探和意。可鄙也”。[95]

3月间一则有关日苏关系的传言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传言大致是说日本可能在4月发动对苏联的攻击。[96]假如这个信息属实，则当然是中国求之不得的大事。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之后，蒋介石又得到了另外一种领悟，那就是日本故意施放攻打苏联的谣言，其目的是向中国施压。他推测的理由是，如果日本真要攻打苏联，则它显然应该保持高度机密以达成奇袭效果。而如今如此大张旗鼓地宣扬，其真正目的是希望中国政府信以为真，进而诱使中国政府相信日本必定会在发动攻打苏联之前，全力终止抗战。这样或许可以迫使中国政府抓住机会结束中日战争。换言之，日本根本没有攻打苏联的计划，但是非常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响应它的和平试探。[97]从这个分析来看，蒋介石观察国际事务也颇具独特的想法。

在早期这些列强企图插手中日和谈事务的活动中，美国也并没有完全缺席。比如说，当时胡适和美国政府部门接触最亲密的是赫尔（Cordell Hull）国务卿和高等顾问亨贝克（Stanley K. Hornbeck，又译为洪贝克、霍贝克）。当他们告诉胡适，美国政府中颇有一部分官员主张中日和谈时中方应该要求上海方面日军撤退，但是华北方面则任由日军占领时，胡适立即回复，日军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原状。而胡适对于政府外交方针的大局，也认为应该着重在布鲁塞尔的国际联盟会议上争取到一个“光荣可靠的和局”，或是退而求其次地去促成太平洋国际组织（当然包括英、法、澳、荷等国）。[98]

综观1938年的前半年，日本累次使用它自己、德国、意大利等渠道传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的意愿，都没有在蒋介石身上产生预期效果。1938年7月，意大利又向国民政府做和谈试探。“意大使又欲来为倭寇说项转圜矣。当置之不理。该大使之卑劣与其国格相等矣。”[99]但是对于国民政府的其他领袖和某些民间舆论领袖，则产生了相当效果。如众所周知，汪精卫和他的支持者在政府中并非少数，虽然胡适的立场在1937年底已经从主和成为主战，但是他在知识界的许多朋友仍然对于抗战表示悲观，他们并非“亲日”，而是恐惧战争会使中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国运。而在国民政府内，除了汪精卫及其亲信们之外，或许主张谈和最力、倡导“见好就收”言论的人，就是孔祥熙。蒋汪之间的和战歧见，还可以因浓厚的派系和争权色彩使之复杂化，而蒋孔之间则根本没有这些问题。简单的区别就是两人个性不同和判断不同。

早在1938年初，蒋介石在拒绝德国大使调停时，就想借此机会打击国内主和者的气焰。他写道：“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内部稳定矣。”[100]而就在此时，日本政府也宣称从今以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可说是间接地帮助了蒋介石的立场。但是主和气氛在国民政府某些高层官员中持续弥漫，他们总想打开一条“挽救”国家的出路，因此各种活动不断在暗处进行。这就难怪蒋介石到了6月底仍需严重警告孔祥熙不可涉身其事。[101]

（二）蒋介石的心态

为什么蒋介石从抗战一开始就如此坚持？他的信念是用何种语言表达？导致他坚持的因素又可能有哪些？我们在此无法对蒋介石的心理状态和政治盘算做一个总结性的处理，但是有些因素可以从他的言行中探窥一二。

蒋介石在此时的日记中不时宣泄对日本和抗战的看法。尽管他的王牌军队在开战后已经丧失殆尽，但是他的斗志显得无比高昂，甚至令人产生他几乎无睹于现实，到达了一意孤行的地步。因为蒋介石的内心不是存着打胜仗的希望，而是他不为打败仗的可能性而退缩。

早在1938年开春，他就写道：“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102]3月底他又写道：“和战问题，降不如战，败不如亡。若我不降，则我无义务而责任在敌，否则敌得全权而我全责，民不成民，国不成国，则存不如亡也。敌国政府无权失信，若我放弃东北，徒长敌寇侵略之野心，永无和平之一日。只要于国有利，则一切和战责任，我愿不顾一切负责断行，但此非其时也。”[103]几天之后，他又写道：“宁使民心悲壮而牺牲，毋使民气消沉而屈服。”[104]

能够在如此恶劣情况下维持蒋介石斗志的最大因素，当然是他的个性，不管我们称之为惊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不服输的精神，或是独排众议一意孤行的胆识，都是历史上许多领袖所表现出的特质，难以量化。除此之外，日军在华的暴行肯定也在感情上给了他极大的冲击。早在1938年1月22日，南京屠杀的事件已经传入蒋介石耳中，他当时对于事件的规模和凶残真相，可能尚未获得全面性了解，但是写道：“敌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深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105]在1938年5月，蒋介石看到了一些照片，极可能是南京大屠杀的景象，使他大受震撼。他在日记中写道：“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惨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106]又写道：“敌寇残暴凶横实古今无例，若不消灭，何以维持人道？”[107]同样的情感不时会在日记中宣泄。例如在6月底，蒋介石又写道：“倭寇残暴凶横惨无人道，不知东北同胞在敌蹄蹂躏之下何以过生？若不与倭寇奋斗到底，将何以救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耶？”[108]7月，蒋介石又写道：“见寇军残杀我平民同胞之照片，痛愤乃至瞑眩，极忧东方民族之仇雠相板，不知何日得了也。”[109]9月初，蒋介石写道：“每念人民受战祸之烈，与妇孺受敌军蹂躏之酷，不禁肠断心裂。战事完结时应对妇孺与灾民定一特别永久法律以爱护之。而对于刻刮人民之贪污尤应最密防制也。”[110]才隔一天又写道：“每见民众之菜色与妇孺之苦痛，不堪言状。所谓动心忍心之实情，非此不得而知也。”[111]

这类言辞至少能向读者提供一些蒋介石心理方面的线索，去体会为什么他对抗战会表现出如此坚定的态度。

（三）如何理顺国内问题

至于如何处理中国内部关系，务使抗战得以长期持续进行，这个命题在淞沪失败之后随即浮出水面。早在1938年开春蒋介石就已经着手思考，万一武汉失陷，则国民政府下一步就必须退守大西南，特别是四川和云南。在此之前，蒋介石的抗日部署只是着重和日本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军事冲突，而其最大的努力则只是试图说服各省派兵到江南地区参战而已。不过国民政府这项努力的成绩却极为有限，除了广西比较爽快送兵开赴淞沪战场之外，其他各省实力派都推诿责任，甚或在内心上根本就觉得事不关己，甚至可能暗中指望所谓“中央军”在遭受日军打击之

后，就可以相对地调整地方和南京政府的关系，间接达到帮助地方势力抬头的效果。

岂知一旦国民政府失去老根据地，一种崭新的国内政局盘算就突然产生。蒋介石最早体察到这个问题的迹象是1938年1月2日，他开始盘算，“万一武汉失陷退守川黔，则国内变化与倭寇压迫之推想”，就变成不可逃避的难题了。而这个新形势所可能产生的困难，最初却远远超过蒋介石的估计。比如说，在1月20日四川军人刘湘病逝时，蒋介石最初的反应是持高度乐观态度，认为四川将从此纳入国民政府的有效统治范围，成为抗战大后方基地。但是此项估计完全错误，他很快就遭到严重阻力。因为没有过几天，他就发现四川问题远远大过刘湘一个军人。难怪他在一周后就写道：“处理川局须和缓安定。”“晚会报，为川事又须废（费）尽精力矣。”才隔不了几天，他再次提醒自己“川情只有缓和处之”。[112]

此后几个月时间内，如何处理四川问题俾使抗战得以继续变成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重大问题。蒋介石在日记中几乎不断为四川问题而忧心忡忡。他先是指望派何应钦入川，借着何氏军事领袖的气势去压制四川省籍军人的不合作态度。此计显然不通，继之又指望借重四川社会名流刘航琛去动以乡情，使四川军人就范，所以说，“川局似以缓处为宜，应用航深（琛）”。[113]才不过几天之后，显然此路依然不通，蒋介石只好“对川事，暂从放任，勿心急之”。[114]换言之，蒋介石认输了，把川事暂且冷却一番。但是他依然不断地和宋子文、白崇禧及其他川籍人士探讨如何打破四川不合作的僵局，但是显然又找不出有效的方法。因此蒋介石在3月初才会有非常灰色的感触，他写道：“对内忍耐，与其亡于敌，不如让于军阀。”[115]

但是随着国军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四川问题实在无法拖延下去。到了3月下旬，如何说服四川军人出兵抗战，如何取得他们允许将中央政府机关迁至重庆办公和推行政令政策，都必须做出有效安排。[116]8月初，战局的逆转使得中央政府机关必须转移到重庆办公。但是即便到了1938年底，四川仍是一个让蒋介石感到头痛的问题。[117]而这个现象在整个抗战时期，都没有获得解决。

四川历来的政治军事和财经重心本是成都，而成都又正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是非地。国民政府为了躲开成都而在重庆另起炉灶，建设新基地，其本身就是一项委曲求全而又非常艰巨的工程。而一旦出了重庆市范围，国民政府的政令就会受到地方上大小军人的挑衅和阻挠。正因为地方军人也逐渐体会到，国民政府侵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并非一个短暂的现象，而将会是一个无限延长的局面，无论是国民政府的政策需要在西南各省推行，还是许多外省籍的军队开始从前线撤退到西南去整编和驻防，都是自清末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这让地方军人好不容易才培养成型的势力范围一瞬间受到极大的冲击，自然造成了许多新的摩擦点。因此难怪到了1938年底，除了四川问题令人头痛不断之外，蒋介石对于云南龙云的态度也开始感到难以处理。[118]然而在1938年底，当蒋介石

环顾情形时，仍然提醒自己，“宁对外大败，毋使国内大乱。大乱则四分五裂，外侮更无已时，而国势更危矣”。[119]当时重庆政府内外交逼的压力可以想见。

在以上和中日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因素之外，蒋介石对于国际情势的判断和对外关系的处理，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去了解。至少有三方面是和中日战争有重要的间接关系的。

（四）对外关系

1.对于德国和苏联关系的处理

如读者所熟知，国民政府抗日的军事本钱，无论是技术指导还是武器供应，最大的依靠是德国。而在中日开战之前，德国也是在全部西方国家中以最热切的态度响应中国各种军事现代化和国防需求的国家。因此无论在魏玛政府时代还是希特勒取得政权之初，中国对德的外交政策都是小心翼翼地培养中德关系，蒋介石甚至把次子蒋纬国送到德国习武，其双重目的就是向德国示好，同时掌握德国的军事技术。说得简单些，只要德国军事援助的渠道能够维系通畅，则中国的抗日就有了强力后盾，无须培植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军事关系。

不幸的是，中日战争的开始和德日关系的改变，使得中国政府这个长期既定国策受到重大冲击。由于德国认为德日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中德关系，因此积极向中国政府软硬兼施地要求终止对日抗战。这让国民政府面临一项根本性的选择。中国原本就是为了抗日而精心培养中德友好关系，如果现在德国希望中国停止抗日，则中德关系还有什么价值？

因此不难理解的是，国民政府屡次拒绝德国不请自来的和平建议，最后宁可冒着和德国决裂的风险，排斥了一连串德国传递的和平方案。最后德国终于失去耐心，在1938年5月下旬正式通知国民政府要撤回所有在华服务的德国军事顾问并停止对华武器输入，威胁中德军事关系将全面破裂。仅仅几天后，蒋介石也感到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宣泄久藏心底希望德国能够在世界舞台上遭受挫败的秘密想法。[120]

由于德国态度之转变使得国民政府大增警惕，因此它也开始筹划在必要时找到能取代德国的国家的可能性。此时国民政府的设想是在军事上最能取代德国的国家只有苏联而已，因此在蒋介石亲自主导下，中苏之间秘密达成了若干协议。1938年初，中国政府订立了一个大目标，要向苏联借贷两笔款项，其中4亿元是购买苏联飞机，另外4亿元是购买苏联的武器和弹药。[121]但是即便是淞沪和南京的大挫败，似乎还没有让蒋介石产生挫折感。他在2月间检讨中国战局时，仍然颇具信心地写

道："外交形势日劣，惟有自强自立。此时武器人力尚能持久，不足为虑也。"[122]到了5月，蒋介石日记中写道："对俄军械借款完成。"[123]

中国政府在不久后又签订聘用苏联军事专家的协定，并在7月把苏联顾问派赴各个国军单位服务，等于是全面性取代了德国顾问原先的职责。而且一如过去对待德国顾问，蒋介石命令各个军事单位"对顾问诚正与工作条规，并供给材料"。[124]到了该年10月，蒋介石得到情报称苏联政府已将北伐之前曾经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加伦将军（General Galen或Vasily Blucher）拘捕时，显然为了眷念旧情，也是为了珍惜人才，立即两度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能够聘请其返回中国参加抗日工作，企图挽救加伦的生命。与此同时又做出决定，要向苏联"多购重轰炸机"。[125]这一切都显示，蒋介石希望苏联能够帮助中国摆脱德国威迫向日本求和的压力，以武器和人员全盘接替德国的军事功能，而不致干扰中国的抗战。

虽然中国和德国及苏联就武器的交涉分别以单线进行，由不同渠道和专人负责，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重要无比。如果和苏联的谈判缺乏进展，则中国政府对于德国就必须采取和缓态度。如今苏联借款和武器运送一旦得到保证，则中国政府就无须再对德国低声下气了。怪不得这个因果关系使他在5月首次敢于推想：何种情况可能使德国在国际竞争中遭受失败命运，而且接下来又断然通知德国大使，中国政府将允许德籍顾问全部返回德国。[126]苏联取代德国策略的成功，使得中国政府没有理由积极地去向其他西方国家争取新的武器供应来源。这种此消彼长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值得我们在试图了解国民政府此时外交运用时作为重要参考。

但是无论是德国或是苏联，一旦它们成为中国抗战倚重的对象时，就会自然而然地运用这些援助作为它们对华政策中实现其本国利益的筹码。中苏之间的军事扶持关系开始不久，中国政府就感到彼此之间问题重重。在8～9月，蒋介石显然对于苏联武器供应的情况感到不满，抱怨苏联迟迟不肯签订购买武器的协定。[127]当时武汉正受到日军进攻威胁，他两度直接写信向斯大林要求苏联能够在9月中旬之前将第二批武器运送到中国，岂知斯大林的对策却是不予理睬。蒋介石在私下抱怨说："对敌国易，对友邦难，受人接济，被人轻侮，此种苦痛若不能大忍，则决不当此重任也。"过不了几天，当蒋介石召见苏联大使强调中国的需要时，所得到的结果却是让他感到对方"挟货骄人"，使他大为愤怒。即便如此，蒋介石仍然不得不承认，苏联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已经大大地超过英国和法国，因此也无法过分对之加以责难。[128]

2.蒋介石对于欧洲局势将如何影响中日战争的思考

照理说，中国此时为了埋头抗战早已自顾不暇，对于欧洲列强之间的纷争自不应有太多精力加以关注。但是事实则不然，因为这些列强在亚洲和中国内地都各自有强大的利益所在。即便是中国不想去操心欧洲

事务，欧洲列强也不会放过中国，而是会为了其自身利益去主动干预中国事务。这样就逼得中国政府也必须密切注视欧洲局势的发展，做出及时的相应决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瞬息万变的欧洲局势，蒋介石心中其实并没有一个明晰的概念，究竟欧洲局势如何演变才会对中国抗战前途最为有利？因此毫不奇怪地，他的看法随着时间在改变，时或前后矛盾。但是自抗战开始以来，他有一个不曾改变的信念，那就是欧洲列强相互之间关系的消长，很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他虽然不能预测这个影响具体如何，但是期望能对中国有益。正是为了争取这个机会，中国更必须坚持抗战，不可半途而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938年开春时节，他的看法会是“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又说“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形势到底必变，倭寇到底必败也”。[129]至于为什么倭寇必败，蒋介石当时并没有进一步说明。

到了1938年夏末秋初，欧战到底会不会爆发，已经是蒋介石脑中经常思考的问题。如前所言，到了5月底中德关系恶化之时，蒋介石还认为欧战如果发生，则可能导致德国失败。而到了9月中旬，他却写道：“欧战如能不起，则于中国总有利也。”才过不了几天，蒋介石却又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欧洲于我最后胜利，总有补益也。”[130]不过蒋介石的语气并不坚定。诸如谁会参加欧战、欧战何时可能发生之类问题，只是刚刚进入他的思维，尚未形成定见。

不过到了9月中旬，蒋介石对于欧洲局势的看法，逐渐趋向复杂和细腻化。依他所见，如果欧战爆发，则首先，日本可能趁机向中国宣战，借此振振有词地封锁和控制英国和法国在中国境内的租界；其次，中日战争在未来的欧战停战会议上可以借外力一并解决；最后，中国也可以趁机敦促英国和法国，在国际联盟组织里通过决议制裁日本侵略行为。[131]

到了9月底，国际联盟通过引用国联盟约第16条对日本施行制裁，但具体做法则由各个会员国自行决定。这个发展在蒋介石眼中，代表着西方各国已趋向愿意承担把日本视为侵略国而付出的代价。这个发展对于中国的士气和秉持的法律主张显然是一大鼓舞。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写道：“如果欧战爆发，于我将来对倭之战略应重新考虑，此于倭寇是否参战攻俄，实为一大关键。然无论如何，欧战果起，则对倭更需作战到底。”[132]以上可见蒋介石分析欧洲事务渐趋明朗化，那就是，中国在欧战发生的局面下，更需要对日抗战到底，才能阻止日本从欧洲的乱局中渔翁得利。

但是蒋介石也推想到，假使欧战不爆发，则欧洲列强就更有精力去牵制日本，而对中国有利。蒋介石也察觉到，中国政府内有许多领袖乐观地认为欧战爆发对中国最为有利，但是他也看出一个相反的可能性，那就是一旦欧战爆发，列强忙于应付欧洲事务，而日本又决定不参加欧战的话，其结果将可能使日本更敢于扩大侵略中国，而不必担心受到列

强制裁。[133]

此时最让蒋介石体会到中国抗战和欧洲事务休戚相关的，是苏联的态度。前文已经提到，虽然在1938年前半年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把苏联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武器来源国，但是苏联运送武器的速度一直让中国感到不满。即使经过再三催促，苏联方面也并未采取积极行动，其用意似乎是观望中日战争的变化。1938年夏季之后，随着国民政府西撤，武汉成为日军进犯的下一个主要目标，而国民政府也希望经由苏联的武器供应可以巩固武汉防卫，但是苏联却无动于衷。等到10月初，欧洲军事局面紧张，苏联开始担心国民政府可能放弃武汉的防守甚至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斯大林才主动向蒋介石提出承诺，可以向中国提供装备60个师的武器和500架飞机。这个动作让蒋介石不禁感叹，国家间“只有利害，毫无信义，更无是非。弱国惟有公理与信义是从。凡不义之物非礼之事，虽至穷困败挫，亦不能有动于中。区区武器何足为意？且其已订之物尚不能如期交货，则其示意之事更不足计矣”。[134]换言之，虽然蒋介石拒绝把斯大林的承诺当真对待，但是他进一步了解到欧洲局势和中日战争之间的密切关系。

四 对于抗战前途的展望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中国政府从未和世界强国进行过长期战争。事实上，在此前一百年间，中国在抵御外侮的努力上，总成绩是屡战屡败。以中国经济的落后，或许即使有一个统治有效的政府，也无法从这个落后的农业经济结构里榨取出足够的剩余物资，去进行一场大规模而长期的现代化战争。

即便是在抗战最初的数月中，这个困境已经非常明显。战争的费用和资源的损耗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中国政府战前最坏的打算，变成一个最无法克服的困难。中国的军火储藏量急剧减少，而政府又缺乏外汇去向国际市场购买军火作为补充。虽然政府不得已发行大量公债以图弥补赤字，但是收效甚微。[135]战争过了一周年时，孔祥熙的秘密报告指出，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由于失去大量领土，政府的总税收只有1.8亿元（法币），而支出却超过15亿元（法币）。[136]换言之，政府的支出超过收入的8倍。

面对这些境况，法币必然急速贬值，外币的黑市价格急速升高。事实上，有些政府领袖开始相信，外币储存量的降低才是中国财政最大的困难，其对中国生存的威胁甚至超过战场上的军事挫败。[137]

五 中国主动展开对美外交

本章以上几节反复地说明中国内政情况、中日战争的进展和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处境，其目的就是要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政府改变对美政策的历史背景。

中国政府在甫一开战立即陷入严重财政危机，导致国民政府领袖认为只有列强的援助才能帮助中国免于全盘溃败。由于缺乏外汇，中国政府被迫以原料支付购买外国武器的款项。这种交易方式对于中国当然极为不利，其原因是中国的原料生产力相当有限，而运输更是一大困难，以致中国根本无法出口大量原料去支付采购武器所需的款项。因此，中国政府的希望是马上就能获得西方武器，但是将来以输出原料作为偿还。中国政府更希望的是能够直接从外国获得借款，以之购买武器。

基于这些考虑，蒋介石才开始在他的全球战略视野里，提高了对美国的评价。大约在1938年早春，蒋介石眼中美国所能扮演的角色开始复杂化。比如说，首先，他认为美国对远东问题大概会改变政策，不可能长期对远东问题置身事外。依他估计，罗斯福大概在今后一两年内会对远东问题采取更积极措施。到了4月初，蒋介石注意到美国通过立法提升海军力量，同时英美两国也充实军备。他认为这是对日本的一个重大打击。其次，他相信由于日本越来越了解它不可能以武力屈服中国，因此也将会更努力地把英美两国拉进中日战局，企图利用两国的干预去迫使中国接受向日本寻求妥协。[138]

除了这两个推测性的想法之外，更具体的是，他开始首度向罗斯福提出要求给予中国经济援助。[139]正如蒋介石告诉孔祥熙的（2月初），他认为从英国得到经济援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因为英国基本上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国家，而从苏联得到经济援助的希望也不大，因为它自己也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因此，美国最可能帮助中国，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舆论可以产生重大影响力。虽然蒋介石本人并非一位民主制度的信奉者，但是他或许是受到妻子宋美龄或是妻舅宋子文的影响，因此相信只要美国人民能够明确表达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则美国国会必定会顺从民意，而罗斯福也会对中国进行实际支持。蒋介石同时也认为，罗斯福对于亚洲危机不但具有准确了解，而且有决心去处理亚洲问题。因此，从中国的对美政策着眼，最需要做的就是去影响美国舆论。这也就能解释蒋介石为何授权孔祥熙可以编列每个月10万元美金的预算，在美国推展民间宣传活动。[140]显而易见的，蒋介石到了此时已经渐渐开始体会到美国的重要性，而且开始探索一些方法去争取美国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求美国协助的性质、目的和程度，仍然极为

有限。蒋介石在1938年1月30日致罗斯福一封长信，十之七八是讲客套话，称赞美国的立国精神和对华友谊，只有到了最后一段才讲到实质性问题："吾人急迫之愿望，则美国即于此时在经济上及物质上，予中国以援助，俾得继续抗战。"至于援助的金额则未置一词，显然中方只知申论主旨而并没有产生方案向美方提交。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接下来说："至其他美国所可采之有效办法，足使阁下意想中之最后解决得以实现，则惟阁下之裁夺。"[141]换言之，中国政府没有具体企望，一切听由罗斯福"裁夺"。至于罗斯福意想中的解决方案是否也符合中国的意想，则更是遥远话题。

也就是在这个环境下，中国政府开始更积极地思考如何展开对美国外交工作。在中国政府并不指望得到美国援助之前，王正廷大使的作为未曾引起政府重视。但是一旦抗战的需要提高了美国的重要性，政府就无法再对王正廷的外交能力视若无睹了。

（一）王正廷大使的缺失

总的来说，在王正廷的主持下，中国对美外交在三方面出了大问题：公共关系、借款和官方来往。

1.公共关系

在公共关系领域中，中国政府最基本的目标是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日的支持，而王正廷本人也是中国官员中最早强调美国公共舆论重要性的一位。王正廷的看法是，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颇为暧昧，但是美国人民则显然同情中国。因此他建议中国应该准备长期地增加对美宣传经费，争取美国舆论转向对中国有利，借此导使美国政府采取亲华政策。[142]

具体地说，王正廷的计划是开展一个全方位的宣传攻势，动员美国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分子去支持中国的抗战。虽然王正廷的观点颇为有道理，但是他的实施计划却是极度商业化。他的方法并不是经由个人努力去接近美国群众，也不是借舆论力量去影响美国人民，而是去雇用美国人经营的公关广告公司去影响美国人，为此不得不花钱雇用一大批美国人士作为帮手，其中包括国会议员、宗教领袖和新闻记者等。[143]

事实上，王正廷本人并不了解如何去估量民意支持度，而他属下的使馆职员又多属无能，其结果只是浪费公款而已。在这种情形下，无怪乎王正廷会所托非人，用了一群待价而沽的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而他们在美国社会中毫无威望，根本没有能力去改变一般人民的态度。简言之，公关活动完全失败。

2.借款交涉

王正廷在借款方面表现得同样无能。王正廷和美国的银行界不熟悉，又和联邦财政部缺乏联系，导致他的借款方法显得杂乱无章。他采取最简便省事的方法，就是雇用美国商业人士做代理（掮客）去和银行打交道。不幸的是他所用非人，找了一批自私自利的银行家、律师和一些自我吹嘘有内线关系可以直通财政部的个人，他们大肆夸耀可以替中国借到大量贷款，引诱王正廷上钩。

由于王正廷热衷于借款，但是又缺乏能力去评估这些"掮客"的渠道和能耐，更不知道他们工作的虚实，以致付出了大笔佣金却得不到实质性结果，只落得受骗上当。[144]

王正廷的另外一个致命伤是好大喜功。1937～1938年，他同时开始了几项借款谈判，其中包括一个1000万美元、一个105亿美元和一个6亿美元的借款，而且一度误导重庆政府以为成功在望。然而在花费了大笔佣金之后，却一事无成。[145]

另一个让情况恶化的因素则是孔祥熙，因为他不但放任王正廷去胡作非为，而且不时把王正廷完全不切实际的吹嘘电报转呈给蒋介石和政府领袖们，并且附加上自己的赞誉之词。孔祥熙这种玩忽的处理方式产生了极严重的后果，使重庆政府误以为大批美国借款指日可待。[146]

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一直等到1938年初才被宋子文拆穿。宋子文明白指出王正廷的借款谈判是一场"骗局"，只是让不讲道德的美国银行家耍弄中国而已。[147]即便在宋子文开始抨击之后，王正廷和孔祥熙还是没有立即收敛。1938年5月，孔祥熙再度向蒋介石报告称，美国可能近期内会给中国一笔巨额借贷，金额达6亿美元。一如往常，孔祥熙向蒋介石宣称，此项借款即将达成协议，而实际上完全出自王正廷的冥想。[148]

王大使对于财务的无知实足令人震惊。他对借款可能达到的成果凭空想象，他对借款的努力懒散无章，他向国内政府长期提供虚假信息。其结果是，重庆的领袖们在战争环境极度困难的情形下，屡屡被王正廷的乐观报告所鼓舞，然后希望又被现实所粉碎，并且因此一再贻误军国大计。王正廷和孔祥熙不但缺乏判断力，更缺乏现实感。他们的错误情报让中国政府至少损失了一年的宝贵时间，未能及早探求其他的国际财政支持途径。

更糟糕的是，王正廷与他所雇用的中间人签订了许多措辞不严谨的雇用合同，[149]让他不久就陷入几个诉讼案。[150]有些中间人还向美国政府提出诉求，更让中国政府难堪不已。[151]

3.官方外交接触

王正廷大使对美国政治的无知和缺乏判断力，也到了惊人地步，并且直接伤害到中国国家安全。王正廷的坏习惯是不主动了解和分析美国政策，而是直接向美国政府提交书面问卷，要求后者逐条提供答案，然后由他转交给中国政府作为自己的工作成绩，或是径自把他对美国政策的误解向国内政府呈报。[152]比如说，王正廷向蒋介石报告称，美国政府将于1937年底之前向日本宣战，事后证明这是他完全听错了罗斯福的话语。在1938年2月，他又向中国政府报告，美国政府已经决定要对日本施行新一轮的制裁行动，而事实上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考虑此类行动。[153]此类误判和误报最终彻底摧毁了政府对他的信任。

就在这个关节口上，胡适也从华盛顿向国内发出了一连串电报，抱怨王正廷的无能和中国驻美大使馆拒绝向胡适代表团提供合作的真相。这些报告当然更加强了政府对王氏的不满。[154]到了1938年6月，一个事件终于使政府的不满表面化。

此时宋子文直接向蒋介石抱怨称，广东省政府之前曾经交给王正廷7万美元，委托他购买防空用的高射机关枪，但是这些武器从未运达国门。蒋介石为之大为愤怒，要求王正廷立即提出说明。[155]但是王氏却无法提出。

雪上加霜的是，不久中国政府又接到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的直接抱怨，指称王正廷无能。摩根索不但是美国财经界的重要人物，还是联邦政府首长中最同情中国的人物，其亲华色彩超过国务卿和其他联邦官员。摩根索访问欧洲时，直截了当地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声称（1938年7月27日），美国政府将永远拒绝和王正廷谈论借款事项，理由是王氏只晓得一味依赖中间人。摩根索的严厉批评终于让中国政府认识到王正廷实在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大阻碍，必须尽快予以清除。中国政府当即接受了摩根索的建议，派遣陈光甫赴美，启动了新一轮的借款谈判。

与此同时，王正廷的工作表现在重庆也遭到严厉指责，尤以傅斯年和周鲠生的攻击最为尖锐。[156]由于国内社会普遍认为王正廷和孔祥熙有亲密的私人关系，因此大众也认为后者必须对中国对美外交失败负连带责任。也可能正因为孔祥熙对王正廷的呵护，使得宋子文也参加了批王的行列。1938年7月，宋子文公开指斥王正廷两次处理对美借款的失误为可笑，同时还提醒蒋介石，王正廷在一连串处理财务问题上不干净。宋子文警告蒋介石说，由于王正廷已经在华盛顿变成笑柄，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尽快委派新大使赴美。宋子文的警告显然产生了效果，蒋介石在次日的日记中，就开始考虑驻美大使的人选。[157]

（二）胡适成为候选人

当蒋介石本人也逐渐体会到需要另组一个新团队去改善对美外交时，他同时决定这个新团队不但应该有能力改善与美国官方的关系，还应该有能力和美国民间建立沟通渠道。而胡适由于人已经在美国，又在美国民众中享有知名度，因此看起来是一位合适的大使人选。[158]再者，由于胡适相当熟知王正廷的缺失，因此理应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胡适看起来非常适任大使一职，那就是在中国领袖们的外交视野中，美国的重要性仅仅是较前产生了些微的提升而已。中国政府此时还没有把美国看成可能影响中国抗战前途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此，中美关系仍然可以托付给一位国内政治权力圈子之外的“外人”去掌管，这无关紧要。而胡适恰好具有这种身份。在此可以附带一提的就是胡适最重要的身份是学者。20世纪中国政治领袖对学者的态度和学者在政治圈里的地位和分量，都是一个值得后人深入钻研的课题。

在此我们可以提出的例证是，就在1938年春天，蒋介石还想要延揽国内的人才，成立一个类似智囊团性质的组织，在国家大事上向他提供意见。当时列入名单者包括张君劢、胡适、王世杰、张嘉璈、张季鸾、张群、蒋廷黻、朱家骅、周鲠生、左舜生、傅斯年等。读者可以注意的是，在此11人名单中，至少有8～9人是纯粹的知识分子。[159]在这个情况下，蒋介石信赖胡适使美，可谓合情合理。到了8月中下旬蒋介石已经相信，政府应该更积极推展对美外交，而且还希望胡适能够安排回国一次进行咨询。胡适回国虽然未能安排，但是在蒋介石心中已经做出决定。因此蒋介石在8月底致函孔祥熙，催问后者有关胡适大使任命和陈光甫赴美事项是否已经办妥，是否需要由他亲自出面写信去敦请胡适。[160]

以上这些迹象显示，胡适被派去美国的最初动力，来自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尊崇他的“美国通”的扎实功夫。但是此后一年中，王正廷的工作不力，政府企图加强对美宣传，加上蒋介石对学者的尊重，使得胡适以“人在现场”的优势，顺理成章地成为大使继任人，并获得蒋介石的热心推动。但是孔祥熙还在想安排他自己偏爱的人选，甚至不惜抬出美国财政部来做挡箭牌。据孔祥熙宣称，该部官员私下告诉孔，“似以适之使美不甚相宜”。[161]但是这些均不能动摇蒋介石的意志，而美国财政部的保留语言出自孔祥熙的转述，反而促使蒋介石致电王宠惠外长追问胡适使美事的进展如何。[162]

或许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外交部终于在1938年9月17日正式发文任命胡适接替王正廷出任驻美大使，为中美关系开拓了一个新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为了胡适任命大使之事，居然还需要三番两次地去催促外交部，原因就是对美外交并非国民政府外交的重点，因此此时依然在孔祥熙和王宠惠的掌握之下。

[1]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第13册，第522～523页；第14册，第38页。

[2]关于抗战前的中日政治军事关系，请参阅张力《总论》，吕芳上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军事作战》，“国史馆”，2015，第3～18页；郭岱君主编《重探抗战史（一）：从抗日大战略的形成到武汉会战（1931—1938）》，联经出版公司，2015。

[3]《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5，第424～425、472～474页。

[4]顾维钧与蒲立德大使谈话（1938年2月21日），《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65～66页。

[5]亨贝克与顾维钧谈话（1937年11月16日），《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658～659页。

[6]颜惠庆离职后，大使馆的正式编制包括秘书一人、科员一人、美国籍打字员一名，再加上一些从留学生中招聘的暂时性和兼职的事务员。参见微尘《如此外交》，《独立评论》第138号，1935年2月17日，第2～5页。

[7]《胡适的日记（手稿本）》，远流出版公司，1989，1938年1月15日、1939年7月6日。

[8]《汪精卫致胡适信》（1933年4月28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黄山书社，1994，第194～198页；《唐有壬致胡适函》（1933年11月24日），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第1册，远景出版社，1982，第73～74页。

[9]《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9日。

[10]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独立评论》第44号，1933年4月2日，第4页。

[11]有关胡适在1931—1937年对于和战问题的言论，参见蒋永敬《胡适与抗战》，《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

[12]《胡适致陈英斌函》（1935年7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第2册，中华书局，1973。

[13]任骏、蒋耘：《胡适与蒋廷黻》，未刊稿，第5页。

[14]胡适：《日本人应该醒醒了》，《独立评论》第42号，1933年3月19日，第2～4页。

[15]胡适：《敬告日本国民》，《独立评论》第178号，1935年11月24日，第10～14页。

[16]胡适：《今日的危机》，《独立评论》第99号，1934年5月6日，第24页；《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册，1933年6月4日，第2～6页。

[17]胡适：《内田对世界的挑战》，《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第2～3页；《国际危机的逼近》，《独立评论》第132号，1935年1月，第2～4页。

[18]胡适：《整整三年了》，《独立评论》第119号，1934年9月23日，第2～4页。

[19]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8～13页。

[20]胡适：《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独立评论》第45号，1933年4月2日，第6～8页。

[21]胡适：《全国震惊以后》，《独立评论》第41号，1933年3月12日，第2～4页；《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独立评论》第44号，1933年4月2日，第2～5页。

[22]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6日，第2～5页。

[23]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独立评论》第44号，1933年4月2日，第2～5页。

[24]Chih-p'ing Chou，ed.，*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Taipei：Yuanliu Publishing Co.，1995），p. 698.此时正值所谓《何梅协定》签订之时。

[25]《翁文灏日记》，1936年5月21日。原件藏台北“国史馆”，下略。

[26]《胡适致蒋廷黻函》（1937年4月25日），参见耿云志《七七事变后胡适对日态度的改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194页。

[27]有关1950和1960年代中国大陆一些学者的言论，参见耿云志《七七事变后胡适对日态度的改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193页。

[28]Hu Shih，“The Changing Balance of Forces in the Pacific，” *Foreign Affairs*，vol. 15，no. 2（January 1937），reprinted in Chih-p'ing Chou，ed.，*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p. 701.

[29]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联经出版公司，1984，第1611页；耿云志《七七事变后胡适对日态度的改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186～198页。

[30]《胡适致蒋廷黻信》（1937年7月31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第200～201页。胡适在1948年1月12日所附的一张纸条上的文字显示，上述给蒋廷黻的信件可能并未寄出，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第202页。

[31]《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31日。

[32]王世杰对于他和胡适谈话的记录，参见《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3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33]胡适信件的原件，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特交档案·中日战争》第33辑《和平酝酿》：45688。以下所引该馆所藏档案，不再注明。

[34]《胡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部分日记》，《近代史资料》1995年第2期。

[35]会议上多数人不但否决和平，同时决定加速备战。参见《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7日、11月21日。

[36]《胡适致蒋介石函》（1937年8月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622002。

[37]《胡适致蒋介石函》（1937年8月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622002。

[38]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1937年10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事实上，当时许多人都担心战争的代价可能太大。参见张忠栋《胡适五论》，允晨文化公司，1987，第111页。

[39]《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3日。

[40]《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3、5日。

[41]《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7、9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下略。

[42]《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0日。

[43]《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0～17、23日。

[44]《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4、15、25日。

[45]《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31日。

[46]《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4、7、12日。

[47]《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3日。

[48]《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4日。

[49]《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9日。

[50]《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6日。

[51]《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9日。

[52]《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31日。有关七七事变中日双方的信息沟通渠道、决策过程和南京—东京—北平三地中日政府及前线军人的角色和互动关系的最新诠释，参见郭岱君主编《重探抗战史（一）》第一章。

[53]《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8、9、11、25日。

[54]《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10日。

[55]《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11日。

[56]《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5、6日。

[57]《胡适致蒋廷黻函》（1938年1月1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第2册，第364页；《胡适笔记》（1938年1月12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第202页。

[58]关于胡适被选为驻美特使的背景，请参阅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氏著《民国百人传》第1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第113～213页。

[59]《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30日。

[60]《蒋介石日记》，1937年10月23日。

[61]《蒋介石日记》，1937年10月31日。

[62]《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1、5日。

[63]《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20日。

[64]《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30日。

[65]《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15、17日。

[66]《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30日。

[67]《特交档案·中日战争》第27辑。这些情报对于研究和谈非常有参考价值。

[68]《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30日。

[69]《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6日。

[70]《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13日。

[71]《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6日。

[72]《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6日。

[73]《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9日。

[74]《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9、30日。

[75]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7年9月7日、1938年5月1日，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3。

[76]王松等：《孔祥熙和宋霭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180~197页。

[77]孔祥熙一直到10月14日才返抵国门。细节请参阅刘绍唐编《民国大事日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陈兴唐《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78]《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7年8月19日；王世杰《傅先生在政治上的两三事》，《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1976年1月，第12页。

[79]《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30日、9月4日。

[80]《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21、29日。

[81]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7年9月7日。

[82]张忠栋：《胡适五论》，第111、114页；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氏著《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13~213页。

[83]张忠绂：《迷惘集》，文海出版社，1978，第115~116页。

[84]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7年9月12日；余伟雄：《王宠惠与近代中国》，文史哲出版社，1987，第104~105页。

[85]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7年7月23日。

[86]《王世杰日记》，1937年10月22日。

[87]《钱端升自纽约致陈布雷电》（1937年12月2日），《特交文电·领袖事功之部（8）领导革命外交——对美关系》第2册：26021841。同样电报见《胡适致陈布雷电》（1937年12月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3143。

[88]《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27日。

[89]胡适的抱怨信，见《王世杰日记》，1938年1月2日。

[90]详情见Hsi-sheng 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7-45（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chap. 3-5。

[91]《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日。

[92]《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16日。

[93]“倭又托意大使来调停，可鄙。其固穷可见也。”《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23日。

[94]《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4日。

[95]《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4日。

[96]《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21日。

[97]《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4日。

[98]《胡适致陈布雷电》（1937年10月1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2010。

[99]《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14日。

[100]《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17日。

[101]“嘱孔不可另行接洽。”《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23日。

[102]《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日。

[103]《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23日。

[104]《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30日。

[105]《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2日。

[106]《蒋介石日记》，1938年5月13日。

[107]《蒋介石日记》，1938年5月14日。

[108]《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29日。

[109]《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19日。

[110]《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日。

[111]《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3日。

[112]《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7、31日。

[113]《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8、11日。

[114]《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14日。

[115]《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5日。

[116]《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19、27日。

[117]《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5日、12月10日。

[118]《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17日。

[119]《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31日。

[120]“不能引起世界大战，恐不易使德国失败也。”《蒋介石日记》，1938年5月20、26日。

[121]《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7日。蒋介石日记没有指明款项的币制，依他的习惯，应该指的是法币。其中用4亿元购买飞机一项值得注意。在此抗战初期，中国已经想要购买大批飞机，这和后来美国指责蒋介石天真幼稚，只想靠美国空军击败日本的揣测完全违背，不过是少数美国将领的自作聪明而已。

[122]《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22日。

[123]《蒋介石日记》，1938年5月1日。有关苏联飞机和陆军武器援华的情形，参见H.H. Kung Papers，Box 10，Folders 1，2，4，Hoover Institution。

[124]《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1日、7月7日、8月30日。

[125]《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15日，10月13、14、15日。

[126]《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14日。“下午会德大使，告其解除德国顾问契约。我不愿其国民为中国关系而违反其政府命令也。”

[127]《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3日。

[128]《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8、17日，10月6日。

[129]《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10、13日。

[130]《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6、24日。

[131]《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8日。

[132]《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28日。

[133]《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29日。

[134]《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6日。

[135]《徐永昌日记》，1937年12月18日、1938年2月23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王世杰日记》，1938年2月16日。

[136]《王世杰日记》，1938年7月7日。政府领袖如孔祥熙、何应钦、徐堪和邹霖就战时问题所作的秘密报告，参见《王世杰日记》，1937年7月27日、8月7日，9月8、9、11日，11月5日。又见《徐永昌日记》，1939年1月29日。

[137]《王世杰日记》，1938年5月19日、7月25日。

[138]《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1日，4月8、9日。

[139]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8年1月30日。

[140]参见《蒋介石对孔祥熙的指示》（1938年2月6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2010.30/4450.01-009，#12716。

[141]《蒋介石致罗斯福函》（1938年1月3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第1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78～79页。

[142]《王正廷致蒋介石电》（1937年9月27日），《特交文电·领袖事功之部（8）领导革命外交——对美关系》第2册：26015844。

[143]这些人每个月向使馆要求支付的服务费用大约是1.2万美元。参见《王正廷致蒋介石电》（1937年10月12日），《特交文电·领袖事功之部（8）领导革命外交——对美关系》第2册：26015005。

[144]有关这些交易的细节请参阅Mr.K.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4，C-1，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有关双方的法律诉讼详情，参见Case of Rudolf Hecht vs. UTS，Group A，Box 4，Folder C2；《翁文灏日记》，1938年9月4日；李传玺《做了过河卒子：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145]《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71页；《王世杰日记》，1938年3月15日。

[146]《孔祥熙自诺曼底Normandy致蒋介石电》（1937年7月17日）、《王正廷致蒋介石电》（1937年9月20日）、《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7年11月23日）、《王正廷致蒋介石电》（1937年12月7日），《特交文电·领袖事功之部（8）领导革命外交——对美关系》第1册：26031380、26015269、26010601、26021856。

[147]散见1938年1—8月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和王正廷之间有关借款谈判之往来电文，《特交档案·外交》第40册《美国经济援助》：48696-48709。

[148]《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8年5月17日），《特交文电·领袖事功之部（8）领导革命外交——对美关系》第2册：27014660。

[149]A. P. Laissue案件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8年7月11日。For the case of Rudolf Hecht，see K. P. Ch'en file on the “Case of Rudolf Hecht vs. UTC”，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4，C-4.

[150]Hu Shih letter to Kung，January 24，1940，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F-3.

[151]《翁文灏日记》，1938年8月14日、1939年6月5日、1940年2月14日；《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2月13日，Mr.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K. P. Ch'en letter to Kung，February 15，1939，Mr.K.P.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4，C-1；“China Loan Agent Sues for $1000000”，*New York Times*，February 9，1940；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G-2；《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1日，1939年7月6日、9月14日、10月21日，1942年2月4日；《孔祥熙致陈光甫电》（1939年7月4日），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F-3。

[15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Department of State，written by Hornbeck，December 13，1937，Hornbeck Papers，Box 59，Hoover Institution；《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37页。

[153]《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65～66、270～271页。

[154]《王世杰日记》，1938年1月2日。

[155]《蒋介石致王正廷电》（1938年6月8日），《特交文卷·交拟稿件》第8册：517。

[156]《王世杰日记》，1938年7月23日。

[157]《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8年7月15日），《特交文件·亲批文件》第45册：3281；《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16日。

[158]《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71～272页。

[159]蒋介石1938年3月6日手示，《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126006。

[160]《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21日；“适之任大使事，务请即日发表。”《蒋介石致孔祥熙函》（1938年8月2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131022。

[161]《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8年8月2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3188。

[162]《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7日。

第二章 胡适受命出任驻美大使

胡适被任命为大使一事显示蒋介石对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似乎做了一个更全面的思考。在德国屡次背离中国之后，蒋介石外交政策的重点首先还是苏联。在他的规划中，蒋希望欧战爆发之前能够说服苏联早日签订中苏共同防御日本的条约，并且互相承诺不会和日本单独签订和平条约。但是与此同时蒋对美国外交也有了新的估计。他希望能够敦促美国重申其传统的远东政策，对日本采取坚定立场。在蒋看来，只要英美两国能够表现坚定立场，则苏联就不至于向日本软化。基于这种思考，蒋介石的结论是："故欧战起后，美国远东政策，关于中国之命运至巨。"[1]

一旦美国在中国政府的外交视野中分量增加，接下来的问题当然就是如何去达到最大效应。

一 国民政府对美政策重点的具体化

蒋介石首先认为美国大众舆论影响其外交取向甚巨，其次他认为国会将顺从民意授权总统在外交事务上采取有力措施，第三他认为罗斯福具有足够的见识和决心去谋求解决远东冲突之道。基于这些信念，蒋介石认为中国必须致力于争取美国的民意。而此时国际联盟同意接受中国的申诉，也让蒋介石益加相信美国的民意趋向将会对国际联盟的态度产生重大影响力。因此，蒋介石指示孔祥熙和王宠惠（9月20、21日）从速加强在美国的宣传工作。[2]

蒋介石同时也把他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向汪精卫和孔祥熙做了详尽阐述。依据他的推论，既然国联已经受理了中国有关日本侵略东三省的指控，“则以后，制裁枢纽全力在美国，务请对美外交尽我全力设法推动”。这短短几句话表示：（1）蒋介石此时还在忙于军事，对美外交政策的具体事务依然委托汪精卫、孔祥熙的行政院和王宠惠的外交部去操劳。（2）但是蒋介石已经开始关注对美外交，而且也产生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应对之道，是指望胡适、陈光甫和李国钦共同联络舆论界，向各方推动宣传，并且敦促行政院向驻美使节“多发给宣传费为要”。[3]隔一日又发电孔祥熙，“对于美国宣传经费，务请不惜一切，托驻美可靠人员竭力做有计划之宣传”，并指示孔祥熙立即汇10万美金作为宣传费用。[4]由此可见，蒋介石对美关系的第一步棋是增加宣传，希望能够改变美国民意，转向敌视日本，同情中国，支持国联对日本侵略行为加以制裁。蒋介石如此重要的一个外交策略念头，其来源出自何处尚需学者进一步去考究，是他自己想当然尔？是左近亲信的进言？是宋美龄的意见？本书作者目前尚无答案。

在传达蒋介石的指示时，孔祥熙也提醒胡适，世界各国都一致期望美国在国际局势中采取领导地位，因此他作为新任命的驻美大使将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并且敦促胡适为促进中美关系做出最大努力。[5]

就在胡适就任大使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契机之时，蒋介石也给中日关系做了一个更为果断的决策。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是否有因果关系，本书作者目前并无直接史料可以评断，但是两者的同时发生，则很可能说明蒋介石此时的心态。此处所指的事件是，即便是中日战争已经超过一年，但是各种和谈努力仍然非常活跃，其中一位著名人士是天津特别市市长萧仙阁，他经常向国民政府传递各种来自日本的和平试探。1938年9月28日，蒋介石向萧氏做出如下指示：

请与对方（日本）坚决表明如下：一。原状未复，诚信未孚，即未有以平等待我中国之事实证明以前，决不允商谈任何协定，不但军事协

定之字样不得涉及于停战协定之中，即经济协定在原状未恢复以前，亦不能商谈。至于兄等携来经济协定之原稿，无异亡国条件，更无讨论余地。二。停战协定只可订明停战之时间，地点，与日本撤兵，及恢复七七以前原状之手续与月日。此外不能附有任何其他事项，此应特别注意。三。停战之日即为停战协定发表之日，决不可以停止进攻若干日，为签订协定之时间。换言之，中国于停战协定未签订之前，绝不愿停战。此应郑重声明。四。原状未恢复，且未有以平等待我之事实证明以前，绝不能再提军事协定，且绝无保留之余地。否则请明告对方，无从再约续谈也。[6]

1938年10月8日，蒋介石又对另外一位未具名的和谈活动人士发表“面训”，其要点包括：

2.我方绝对不要求停战，更不害怕汉口失守，尽有力量支持长期抗战。此层应使对方彻底认识……4.此次谈判系对方主动，我方诚意与之商洽。对方不得故意扭曲事实，散布不利于我方之宣传，否则认为对方毫无诚意……6.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7]

这的确是两份引人深思的文字。如果读者不熟悉国民政府在淞沪会战中的惨败，而此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战区又屡战屡败的历史的话，仅从字面上看，还会误以为这是一篇出自战胜国之手的招“和”书。而蒋介石语气果断，条件强硬，指明日本必须无条件地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一切原状，还需要做出以平等对待中国的具体表现之后，中国政府才愿意商谈停战，而且中国政府在签订停战协定之前依然保留继续作战的权利。换言之，日本必须完全放弃七七事变以来的全部侵略成果。

这个文件也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西方历史学者对国民政府抗战的分析。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定国民政府从来不曾认真抗日，淞沪会战不过是中方以军事姿态逼使西方列强及早介入调停工作，不幸此计不售，中方反而是损失惨重。但是如果检视中方所提的上述条件，则显然远非西方列强的任何调停努力所能达到的成果。这些差距实足令人警惕，以想象力取代史料的做法，绝非治史的正道。

也就是在中国政府如此表达坚定抗战立场的同时，外交部发给胡适的指令，对他驻美大使的职责说得更为具体：

第一，胡适应该搜集美国的政治情报，供中国政府拟定更好的对美政策；

第二，胡适应该尽量争取美国经济援助，争取美国修改其中立法，将侵略国家和被侵略国家加以区别，并且对日本实施军火禁运；

第三，胡适应该促成美国和英国与法国在远东的合作，共同抵制日本。[8]

这些指示显示，国民政府对美国的期望已经比王正廷任职大使时期

提高了许多，而且变得更为具体，但是依然相当低调，既没有要求建立盟友关系，也没有要求美国直接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本章的目的是讨论胡适任大使期间的四项重要工作和检讨他的成绩。这四项工作分别是：促进中美之间的互相了解；借款谈判；改变美国对中立法和武器禁运的政策；增加国际合作的实质内容。本章也将会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胡适对鼓励中国政府坚持继续抗战所做出的贡献。虽然这并不包含在政府给他的指令之内，但是对于中美关系依然产生了重大影响。

前文曾经提及，孔祥熙内心可能并不赞同蒋介石对美宣传的基调。孔氏认为，对美宣传工作的性质其实相当微妙，如果执行不当，可能适得其反，因为美国人民对于外国人用金钱手段来向他们进行宣传，向来心存反感。[9]即便如此，孔祥熙还是遵照蒋介石指示前后向美国汇了20余万美元，此时再汇5万美元。在中国外汇拮据的情况下，如此大笔美金的支出，也可以显示出蒋介石对于对美宣传的高度期望。

然而蒋介石所构思的对美宣传政策并未按照计划展开，到了1938年夏天，美国本身的政情也发生了变化。6月，美国国会对于外国政府在美国利用宣传手段鼓动美国舆论一事，视为属于以非法手段干涉内政而深切反感。国会为此还通过了一项取缔办法，规定凡是任何人为外国做宣传，都必须首先向美国政府注册和详细填表申报，否则一经查出将处以两年徒刑或罚款两万美元。至于中国政府原本打算联络国会议员的方案，则更需要小心从事，因为一旦被发现，将会造成重大政治事件。也正是这个环境的改变，使得李国钦和陈光甫赶紧把蒋介石以前拨给的宣传费退还，改而把指望寄托在胡适的免费宣传途径之上。但是孔祥熙还是认为在美宣传一事，依然应该以低姿态和分散方式进行，所以先后选派了梁士纯、于斌、张彭春三人赴美进行，并拨款1.8万美元作为活动费。[10]

这个宣传规模就比蒋介石原来设想的要缩减许多。这段公案说明的一件“小事”是，当时赴美从事外交工作的那几位人士的守正不阿，的确值得赞佩，因为那些钱大可以不了了之，无须交回国库。但是他们的操守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这段公案说明的一件“大事”却是，政治领袖们制定政策的动机和实践的成果之间往往可以产生大幅度误差。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对美没有宣传，而是说蒋介石心目中的宣传政策没有实现，而胡适的宣传工作又受到了蒋介石的责难。这个讽刺也难以逃脱读者的关注。

在此还可以做出另外一个注脚，那就是由孔祥熙主导的宣传工作，成果也并不令人满意。到了1940年5月，陈光甫致电向孔祥熙直言，孔氏所派出的人员工作效率非常差，他们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反而让美国政府无法响应。因此他建议以后的对美宣传工作应该统一指挥，方能奏效。[11]如此说来，中国政府当时在美宣传的重头戏，还真是只有胡适一人单肩独挑。

二 政策成果的初步检查

（一）促进中美两国的了解

鉴于中国政府在抗战前对于美国政府政策取向的重视程度远远不能和英国、法国、苏联与日本相比，因此尽管有不少留美学生归国后进入中央政府成为领袖，但是政府有更多领袖对于其他国家的事务更为熟悉。比如说，日本和苏联事务专家在中央政府的外交部门中早已确立了稳固的地位，而对美国事务的情报基本上还需依赖驻美大使馆提供。

一旦美国的重要性增加，蒋介石就感到需要有人可以咨询有关美国的政局和如何与美国政府进行沟通。由于美国此时正是孤立主义情绪弥漫全国之际，美国人民对日本侵华行为并不了解，因此，若想改变美国政府对借款、中立法和购买武器的立场，则必须首先改变美国人民的认知和争取他们的支持。而就这两项任务而言，胡适的资历又似乎让他成为最佳人选。

作为一位典型的学者，胡适的阅读范围和题材兴趣极广，他有剪贴报纸的习惯，然后把所读到的资料大量回报给重庆政府，或是放进他对美国公众的演讲之中。毫无疑问，这些好习惯使他对美国社会政治的了解或许超过其他国家的驻美外交官们。

和王正廷相比较，胡适也做出更大的努力去结识美国政府的领导层，比如国务卿、财政部长，甚至罗斯福本人和他的家人。[12]而胡适和亨贝克的亲密关系则更不寻常。亨贝克是国务院远东事务部门的负责人，对于美国政府制定中国和远东政策具有高度影响力。胡适和他之间的交情好到可以彼此直呼其名，彼此之间经常传递便笺和通电话，胡适和亨贝克夫人（Vivienne Hornbeck）也是朋友。这层关系使得胡适对于国务院思考国际问题的思路非常熟悉。亨贝克不时成为胡适在国务院的内线消息来源，当然有其优势。但是随之而来的风险，也就是胡适或许过分依赖亨贝克这条内线，以致亨贝克的情报，他对美国行政单位内部的关系和政策，以及他本人的许多观点和立场，也都被胡适照单全收，成为唯一的权威来源。其结果是胡适有时会省略独立的思考和分析，把自己的判断束之高阁。说得更白些，胡适对于美国政府的分析思路和政策走向判断，有时会不自觉地被亨贝克牵着鼻子走。

和王正廷相比，胡适风度优雅，博览群书，谈吐机智诙谐，很容易赢得美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信赖与尊敬。这些个人品质帮助胡适更容易从各种渠道获取情报，比起中国以前历任驻美大使均大有过之。

从胡适的工作成果看，他向重庆政府的报告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充满对美国政治事务的解读和分析，这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和国会未来可能采取的措施、选举对于政府政策取向可能产生的后果等，内容极为丰富。这些报告不但要比王正廷的报告写得好，而且大大提升了蒋介石对于美国政治的掌握。[13]这些报告充分展示出胡适作为一个勤奋学者的优势，也显示了他的文笔和表达才华。

但是，胡适的情报搜集工作也有它的局限性。他的学者本色，让他的报告内容对于美国的内政外交在大方向上常有精辟的分析，但是对于美国政府的具体运作却鲜有实质性的描述。而后者对于中国政府官员制定对美外交政策往往最为重要。从表面上看胡适到处演讲，他似乎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交游广阔的外交官，但是从他自己的记载中，只能看到他如何把自己的知识和见解传达给对方，却很少看到他如何从对方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和情报的例子。因此他的这些看似热闹的“广结善缘”，其功能多属“单向性”，他能够借此类活动而向中国政府提供的政治线索非常稀少。

胡适的“君子风度”或许使他在和一般人接触时无法降低身份去见缝插针和刨根究底，更不方便去探听内幕消息，而他在大使馆内也没有设立一个情报搜集机制。这或许也因为他此前的人生经验中，根本没有做过这类工作所致。其结果是，他的报告对于大局的“分析性”很强（或是学究气味太深），但是对于具体的事务却没有足够的参考价值。同理推之，他的报告对于长程性的政治发展常有精辟的阐述，但是对于美国政府逐日的运作细节却不甚熟悉。说白了，他的报告读起来经常像是学术论文，而不像是政治情报。

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胡适报告的品质和数量都较前大为改善，但是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内部的组织编制并没有显著改善。胡适对于大使馆和其他城市的领事馆都没有做出改进的努力。反观美国的驻华大使馆，即便是低阶的馆员也都搜集情报，广泛接触中国社会各阶层，并且提交各自的分析报告。但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馆员依然是呆坐馆内处理文书工作。胡适似乎并没有督促他们打进美国社会，也没有把这批旧式官僚予以汰换，改任一批具有现代思想和作风的年轻有为之士。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已经不少，但是很少被延揽参加使馆工作。其结果是，使馆的重头戏全都落在胡适一人身上。在胡适的日记和他与外交部之间的大量文电来往中，他几乎从未要求增加大使馆和各地领事馆的编制或办公预算，以提高工作效率。

更有进者，虽然胡适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给蒋介石（有时也给孔祥熙）写报告，但是他对外交部却经常不予理睬，以致外交部官员不时抱怨他们对于美国情况颇为隔绝。[14]这种情况可能显示胡适在内心自认为与蒋介石和孔祥熙是同一个等级的人物，而不是外交部体制下的一个外派官员。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胡适的贡献又远远不止于提供信息，他经常

会“自告奋勇”地对重庆政府提出各种坦诚直率的“诤言”。胡适在这方面的表现不但大异于王正廷，而且也超越了绝大多数的职业外交官。一般在中国传统官场爬上来的外交官都会明哲保身，绝不质疑长官的指示。即使在他们不同意上级指示的内容时，也只是采用拖延或是阳奉阴违等手段进行消极抵抗或暗中破坏，绝不明目张胆地表达异议。然而胡适身为一位学者，完全没有想在中国政府内经营个人的宦途，而又对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感到无限骄傲，不容受到限制。结果是他和上级的立场经常相左。当他不同意外交部的训示时，不但会公然反对，而且还会向中国其他驻外使节广为散布，直言无隐。[15]这就难免让外交部更加难堪。

胡适历来不齿一般政府官员缺乏勇气向蒋介石实话实说，或是质疑后者决策的正确性，因此他自己更是务求达到尽言责的标准。胡适认为蒋介石如果做出错误的决定，原因多半是下属向他提供了错误信息。因此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胡适打定主意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纵观胡适给蒋介石的报告，他经常企图纠正蒋介石对美外交的一些“不正确”的观念或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有时胡适不免被自己的“高见”所陶醉，乃至开始以“授课”的语调对蒋介石大开讲座。而蒋介石尽管未必接受胡适的论点，却对他的高谈阔论一贯保持礼貌。这一点也颇能显示出蒋介石的风度。有少数几次，当蒋介石实在无法忍受胡适的训诲姿态时，也还只是委婉地抗议称，他并不是如胡适所指的对于美国一无所知。而胡适作为一个非国民党党员，蒋介石竟然把他安置在驻美大使这个位置上长达四年之久，这本身也是蒋介石尊重胡适的一种表示。在此不禁令人联想到，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把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外交职位交给有外交长才的人士，而他们却和国民党或是蒋介石本人并无政治渊源。除了使美的胡适，其他两位是出使苏联的蒋廷黻和先后出使法国、英国、美国的顾维钧。

胡适不但对蒋介石扮演了一个忠心耿耿的批评者角色，对于其他中国领袖的态度也一贯如此。只要是他衷心认为有益于中美关系，便始终是以礼貌庄重的态度直言无隐，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一个例子就是他在1943年批评宋美龄在纽约处理外交活动的行为不当。[16]在这一方面，胡适的表现实在可圈可点，是一个称职外交官的楷模。或许他付出的政治代价就是在1942年（9月11日）被魏道明取代，而他本人原本是希望做到抗战结束。总的来说，胡适处理中美关系前后一共五年，其中四年担任驻美大使，仅就时间的长度而言，已经看得出蒋介石对他的尊重了。

从促进中美相互了解这项工作而言，胡适在中国政府的外交作风上的确树立了一个新风范，那就是拉近和驻在国人民群众的关系。在此之前，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开拓公共关系的业务上远远落在日本之后。日本入侵东北之后，中国驻美使馆也曾经收到过许多来自美国民间团体的要求，鼓励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虚假宣传进行有效反击，但是使馆内无人有能力处理此项工作。可笑的是，驻美使馆反而利用美国报纸上的舆论作

为响应，而这些报纸的言论既无表达中国立场的踪影，又不能提供来自中国的现场实况。

相形之下，日本人却尽量主动地为它在中国的罪行求开脱。不但日本外交官经常出现在美国公共视线内，日本人还能巧妙地运用经济力量去进行收买工作，改头换面地以学术团体或是民间组织的幌子进行公关活动。其结果是，日本几乎霸占了美国的舆论市场，散布对中日冲突的片面说辞。[17]

胡适在其任大使期间立即彻底地改变了这个宣传上的劣势。他展示出高度的主动性和语言能力，接触到美国人民，其能力和成就超过了19世纪中叶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任何一位中国外交官。因为毫无疑问地，他最能和美国的人民做直接的沟通。在胡适使美期间，其最杰出的表现就是能够以无限的热忱去接近美国人民，鼓动他们对中国产生好感，增进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了解，进而支持中国对日本的抗争。胡适本人也对他这方面的成就感到最为自豪。而他达到此项成果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懈地在全北美洲各地进行大规模公开讲演活动，真可谓无远弗届。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1938年1～3月的51天之中，胡适总共访问了9个美国城市和11个加拿大城市，面对大学生和市民团体发表了56场公开演讲。[18]

总计起来，胡适做了几百场讲演，行程不下数万英里，遍及美国和加拿大所有的大城市及主要大学校园。[19]这种成就不但远远超过了此前所有的中国驻美使节，也可能为同时期其他国家的驻美使节所望尘莫及。令胡适特别感到骄傲的是，他替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国际知名度，但是几乎完全没有成本。[20]

尽管有这些令人瞩目的数字，但是胡适公共关系活动的成果依然应该接受实事求是的评价。如前所言，蒋介石一旦决定要在美国展开大规模的公共关系攻势，就急不可待地想要付诸执行。尽管中国政府此时面临重大军事挫折和财政困难，但是他依然愿意花费大笔经费去推动此项工作。此时孔祥熙被蒋介石委托去支持此项工作，因此他立即转告已经在美国的陈光甫和李国钦与胡适取得联系，展开工作，并且从国内电汇了5万美元作为活动经费。想不到陈光甫和李国钦的反应却完全不热情。除了前述美国国会通过法案（1938年6月份）规定所有替外国从事公共活动的美国人必须预先向政府注册之外，还进一步提出警告，中国运用国会议员作为说客可能会让后者遭受批评，甚且危害他们的公职，因为美国国会议员依法不可以替外国从事游说工作。他们更警告称，中国政府雇用美国人替中国工作企图影响美国政府决策，很可能结果适得其反，因为美国人打心底厌憎外国政府干预他们的内政。换言之，在陈光甫和李国钦眼中，蒋介石所向往的公关活动（雇用美国专业公关人士或具有影响力人士替中国做事）已经和美国时局格格不入。[21]在这种情况下，胡适能够以大使身份和美国人民直接沟通的能力，就变得更为及时而又难能可贵了。

胡适在公众场合讲演的兴趣和才华，从年轻时即已显示出来。在学生时期，他已经屡次赢得演讲比赛。他养成的好习惯是每次在演讲前必定花费大量时间去搜集资料，写好讲稿，再经多番修订和勤奋演练，务求完善。他在做准备工作时，不但会勤读报刊找资料，而且会广泛征求别人的意见。[22]根据其本人的估计，他为了能做出一小时的讲演，通常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做准备。[23]在成为大使之后，这些好习惯都变成他的重要政治资本。在他工作范围里，最让他称心快意的事就是能够做公开演讲，其听众包括学生、学者、教会、商会和各式各样的民间团体。换言之，美国社会里凡是可能关心国际事务的人都是他倾诉的对象。

至于演讲的题目和内容，则他最偏爱的是文化、历史和哲学，但是他也花许多时间讨论和中日战争直接有关的课题。一般而言，他的写作尽量避免政治色彩，读起来像是一位教授的学术论文。[24]即便是他讨论日本侵略的演讲和写作，也是强调理性分析而避免感情发泄，更不会破口大骂。因此其特色是保持尊严而又心平气和。他的这些努力是为了增加美国人对日本侵略的反感和对中国的同情，但是他很少向美国人提出在物资上帮助中国的要求。[25]

作为一位学者型的外交官，胡适还着意保持和国民政府之间的距离。他经常谈到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当前的困难和对未来的憧憬，但是颇为刻意地避开中国政府当前政策的内容，特别避开不谈的是国共之间的摩擦。一般来说，胡适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一位中国的爱国者，而不是一个政府的代言人。[26]在私人场合，他有时甚至会强调他是为了国家而“屈就”大使公职。这两者所表现的其实是同一个心态。

胡适本人对于他的演讲能力感到自豪，对他的成果也感到满意。依照他的估计，美国民间的舆论在他就职大使之后两三个月就开始明显转向同情中国。他察觉到有一部分美国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局势可以影响全世界，因此值得美国关心。中国政府也看出来，美国的民意从1938年中期之后，已经逐渐偏向同情中国和谴责日本，更多的美国人民开始支持修改中立法和严厉谴责日本禁止美国船只在长江上航行的权利。[27]在胡适看来，代表美国民意亲中反日转向最好的证明，是一些重要报纸上的社论。[28]

毋庸置疑，胡适的演讲在美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他让美国人民了解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这样就更帮助他们萌生了对中国的同情心和反日情绪。其次，他对日本在华暴行提供了具体而生动有力的指控，并且试图说服美国人民，他们必须帮助中国，因为西方国家必须保护它们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利益。

胡适巧妙地发挥了对英文运用自如的技巧，加上他熟悉美国人的文化和历史，因此他不但遣词用字深得其中奥妙，还能领会美国人的感情，使得听众感到是在和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谈，而不是面对着一位外国使节。[29]

胡适在演讲中经常强调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点，使听众感受到中国人民面临的困难并非发生在一个遥远异族的身上，而是似乎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一般。在电视机还没有进入美国一般家庭之前，胡适这种勤奋的公共演讲把中国苦难的信息和场景，带进了许多美国人的客厅，并且深深地植入他们的脑海。这实在是一项非凡的成就。

胡适马不停蹄地到处演讲，不但让他有机会散布中国的观点，也使他能够更准确地掌握美国民众对中国和亚洲的观感。他的演讲也使得中国问题得以在美国的公共媒体上占据一个重要的版面。对美国人民而言，胡适成为他们对于中日抗战最权威的消息来源。而胡适从这许多和美国社会密切接触中所提炼出的报告在送回重庆之后，对于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了解，当然也产生了重大作用。

除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之外，胡适是在美国媒体中曝光率最高的中国官员，而他的亲和力和知名度甚至可能超过蒋氏夫妇。值得一提的是，胡适的活动大大地激励了在美华侨的士气和社会地位，其中感受最深的可能是留美学生群体。因为之前他们都因历任中国大使的不露面和不作为而感到羞愧和沮丧。如今胡适不但形象清新活跃，而且把那些在美国为日本侵略行为粉饰的宣传家的气焰都压下去了，这就使中国的侨民感到无比骄傲。更何况，胡适到处出席华侨社会的各种社团活动，表现出特有的亲切和随和。这一切都远非以前在美中国官员所能比拟。

胡适多次穿梭北美洲大陆做公开演讲的时机，正和美国舆情逐渐转向同情中国的趋势不谋而合，或者两者互为因果。[30]美国国民态度的改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美国人在华目击的日军暴行、日军对中国城市的轰炸、日军对在中国内河航行的英美两国兵舰的攻击、日本兵对在华西方人士的粗暴举动等。胡适及时把美国人的注意焦点放在这些事件之上，让美国人自己目击的罪行成为中国控诉日本最有力的素材。

当然，胡适真正要克服的困难，是如何把美国民间的同情心，转换成其政府对中国的实质援助。而美国人民在这方面并没有显示出明确的态度，对于中日交战双方也没有采取明确政策。在有关美国银行是否应该向中日两国同时贷款一事上，绝大部分美国人在1937年9月份的民意调查中都持否定态度。[31]在问及美国是否应该向中日双方同时出卖武器一事上，1937～1938年两年中，美国民意逐渐支持向中国卖武器而向日本实行禁运。[32]但是在1939年，当美国人被问到美国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手段去维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时，大部分人只愿意对日本实施武器禁运，而只有极少数人认为应该以武力去维护这些利益。[33]只有等到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利益受到日本直接威胁时，美国人才开始认为美国可能必须使用武力去维护这些利益。[34]

换言之，尽管美国舆论已经渐渐认为中日战争并非仅是两个亚洲国家间的冲突而与美国无关，并在1941年夏天开始认为美日之间可能发生战争，其动机却并非出自对中国局势的关心，而是出自对欧洲局势的关心，同时也是出自对日本危害欧洲国家在东南亚利益的关心。如此说

来，尽管胡适正确地预测世界大局的发展对中国有利，但是美国民意的转变并不能视为胡适的功劳，因为世界大势远比胡适的影响力要大得多。日本要控制亚洲和太平洋所造成的危机、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崛起对欧洲均势的破坏、欧洲和亚洲发展的紧密关联性、欧洲国家在亚洲的利益受到威胁，这些同时出现的因素都使更多的美国人民相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只不过是它想独霸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前奏而已，而中国很可能是美国在亚洲能够找到的唯一盟友。[35]

但是进一步去推敲，则胡适对于赢取美国同情的努力，也自有其可议之处。问题之一是胡适投注了太多精力于演讲活动，以致妨碍了他大使职位其他方面的任务。宋子文刚到美国没几天就告诉胡适，国内许多人批评胡适花费太多时间到处演讲，而忽略了大使的其他重要职责，并直截了当地要求胡适多多关注重要事务。[36]

胡适在演讲中所接触到的对象并不是美国一般人民大众，而是受教育程度较高而且关心国际事务的人群，俗称为公共意见领袖。在胡适赴美的早期而且尚未担任大使之前，他花费大部分精力时间从事演讲活动自有其道理，因为那时中国政府赋予胡适的任务是促进美国人了解中国。更何况，既然王正廷打定主意要排挤胡适，不许其插手正规外交活动，则胡适剩下来可以做的事并不多，公共演讲既可以让他有所作为，又可以对国家做出贡献。尽管演讲并不能够立即改变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但是至少可以在美国人民群众中建立对中国的好感，也增进其对中国人民及其文化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他至少达成了一个文化外交的任务。但是一旦担任大使之后，他的工作重点就必须重新调整。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抵达美国一段时间之后，连他自己对演讲的效果也有了另一种新的衡量，远不如早先那般乐观。比如说，他在1938年7月1日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论宣传》（*Propaganda*），胡适此时说道：

你的宣传到底会有何种效果？宣传的信息能够传达给多少人？其中又有多少人会受到影响？依我个人过去九个月来的演讲经验看来，演讲所能达成的功效非常有限，因为原本和你意见相同的人总是会支持你，而原本和你意见相左的人则会继续反对你。举个例子说，你可能指望去说服反对你的参议员吗？如果演讲的目的是去赢得同情和促成行动的话，则我们现在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同情，但却无法促成任何行动。

再说募款。能募多少款？为救济基金多募到几块钱，则于事又有何补？

再说敦促美国施行禁运。各位应该可以想象去要求美国妇女们不穿尼龙袜而改穿棉布袜该是多么困难的事。所以禁运到底能够产生什么效果？答案是：不能产生效果。

但是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国际上拿出

行动去恢复远东地区的和平，是采取积极行动去停止战争。而这却正是各位和我都无能为力的事。[37]

胡适一方面马不停蹄地从事演讲活动，另一方面又发出如此悲观的论调，这个结果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假如以上论调果真代表胡适内心对演讲功效的评价，那么他在接任大使职务之后，似乎就应该重新考虑是否还应该继续花费那么多精力去从事演讲活动。事实上，到了1939年初，连他自己在给重庆政府的报告中都已经指出，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非随民意而转移，而是由国家领袖们的态度决定。依据胡适的分析，孤立主义者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已经开始逐渐减退，因为他们无法迫使总统和国务院严格遵守中立法。正好相反，美国政治领袖们却有能力把美国的孤立主义气氛扭转为干涉主义。[38]

显然，胡适和重庆政府都已经逐渐放弃了早先认为美国公众舆论决定其外交政策的看法。此时胡适对蒋介石明白指出，美国领袖们才是外交政策的决策人。既然有了这些观念上的改变，就让人更难理解何以胡适不能及时修正自己的行为，以求言行一致。具有高度讽刺性的是，胡适的新评估对蒋介石所产生的影响，似乎远远大于对胡适本人的影响。蒋介石很快就改变了他的对美策略，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决定派遣宋子文去华盛顿，不再走群众路线，而是集中精力向联邦政府的高阶层做工作。胡适本人则仍旧处于徘徊之中，举棋不定。

对于胡适的言行不一致和仍然耗用大量精力从事演讲活动，除了旧习难改之外，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他认为中国并不具有改变美国政府高阶层政策的能力，而中国也必须小心尊重美国政府的自主立场。因此，尽管美国民意并不能产生决定性影响，但他还是认为自己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使不上力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可以被批评的是，他作为一个危难中国派出的外交官，委实缺乏斗志。他过于体谅东道主美国政府自身的困境，而没有铆足全力为自己风雨飘摇的国家去争取外援。

作为一个学者和君子，胡适的个性可能根本不适宜从事外交工作。即便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国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把美国的同情心转变成具体的物质援助，使中国的长期抗战得以维持，避免向日本屈膝求和。但是胡适的个性和他的人生哲学，都无法把他变成一个剑及履及的实践家，反而把他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在后文中我们将会用实例来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

（二）借款谈判

虽然中国政府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就已经有意向美国借款，准备对日本作战，但是到1938年6月为止，中国政府所有的试探均以失败告终。[39]

这些失败的原因可以从中美两方面去分析。对美国政府而言，它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既不想激怒日本，也不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而中国政府，除了王正廷所表现的无能之外，也没有积极地把美国当成一个重要的争取对象。只要中国能够指望继续从德国和苏联获得大量武器和其他物资，则美国贷款与否其实无关紧要。[40]

事实上，在整个1939年，中国政府为了寻求从欧洲国家获得援助做出了更大的努力，也派遣了更多的高阶层代表团前往欧洲。[41]只有在受到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拒绝后，中国政府才开始认为，如果能够先从美国得到借款的话，则或许可以改变欧洲各国的态度。[42]换言之，中国政府最初向美国贷款，并不是看重它本身的价值，而是认为英美两国的国际借贷政策基本相同，希望借此软化欧洲国家的态度。

在中国政府逐渐了解美国和欧洲国家关联的同时，也从美国政府得到一些令人鼓舞的信号，表示美国也在考虑增加对中国的援助。[43]基于以上这些因素，中国政府才开始了一个新尝试。由于中国领袖们当时认为在罗斯福领导的联邦政府中，财政部长摩根索对于以财政援助中国最为热心，因此当胡适接任大使时，重庆政府立即训令他向美国政府接洽贷款之事。[44]没过多久，中美两国之间有关桐油借款的谈判就给胡适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和陈光甫之间建立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共事关系。

（三）征召陈光甫到美国服务

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1938年7月一次和顾维钧的会谈中就曾经明白建议，中国在与美国财政部及进出口银行进行谈判时，不宜经过王正廷而应改派他人负责。摩根索同时特别称赞的人是陈光甫，因为陈氏早先曾经在有关白银问题谈判中和摩根索发生过接触，而且深获后者敬佩。摩根索做出承诺，如果中国政府派遣陈光甫直接和他谈判，他将会尽快协助中国获得美国贷款。[45]美国驻法国大使蒲立德适在此时也向顾维钧进言，中国政府应该尽快地寻求美国协助，因为英法两国一定要等到美国表态之后，才肯做出实际援华行动。顾维钧在得到这些信息后，立即报告给了孔祥熙。[46]这个发展在中美关系上可说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终于有一位美国联邦政府部长级的官员，毫不含糊地向中国承诺了提供援助。

孔祥熙的热烈反应不仅是因为陈光甫在中国财经界享有崇高地位，同时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有超过30年的友谊。不久，陈光甫接受任命，并且提出建议书，以中国的桐油作为抵押，向美国申请商业贷款。[47]

陈光甫于1938年9月抵达华盛顿，立即透过联邦财政部关系展开借款交涉。[48]而此时的蒋介石，除了想要展开对美宣传攻势之外，也想

要有计划地向美国政府借款。蒋介石的这个想法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逐渐形成，因为在抗战经历一年之后，虽然中国政府指望战争能够把日本的经济拖垮，但是也担心中国自己的经济会被拖垮。如果金融发生问题，势必严重影响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因此政府在精密的计算之后得到了一个结论，认为在“此后一年内如能借足一千五百万镑之外汇基金，决可应付裕如”。当时中国政府主要的借款对象是英国，而依据政府情报，英国可能愿意借款，但是需要美国和法国也共同参与其事。因此蒋介石敦促胡适一定要向美国下功夫，只要美国肯借钱，“无论款项多寡，影响必极重大”。而他能够设想到的最便捷途径，便是由美国政府避免经过国会而径直采取借款行动，或指示金融界从旁支持。[49]换言之，只要是美国肯借款，就达到了伸张道义的目的，借款数量的多寡此时尚不是重要考虑，因为中国政府真正的大目标是英国。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蒋介石要亲自写信敦促陈光甫赶紧启程赴美，而陈光甫一旦抵达美国后，蒋介石又请其“借款务望于本月内（10月）完成”。[50]由此可见蒋介石心情之急迫。

因此，几乎在同一时间内，摩根索传达了美国政府愿意协助中国的新意愿，又适值陈光甫和胡适二人新官上任，急于改变现状，双方共同为中美关系创造了一个新气象。美国政府不再仅以表达同情中国和重申道德原则为满足，而是愿意具体地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而中国政府此时的打算是让陈光甫和胡适两人在借款谈判中，担负同等责任。但是在实际上，两人此后的责任并不等同，因为陈光甫的担子远比胡适所承担的要沉重得多。

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摩根索曾经对财政部的下属做出明确指示，他们只许和陈光甫一人讨论借款事宜。[51]其次，陈光甫的财经阅历和他对中国当时财政、工业、矿产等领域的了解，使他成为当时有资格处理这几个领域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不二人选，而且他可以在和美国政府交涉时无须假手他人。第三，陈光甫不但和孔祥熙关系非比寻常，和蒋介石也有密切来往，因此他得到政府充分授权，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去和美国进行谈判。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陈光甫的例行做法是绕开重庆政府的外交部，而以电报方式直接和孔祥熙联系，让后者完全熟悉有关借款各方面的发展。[52]陈光甫在1938～1939年的工作，包括直接主导和美国财政部官员所进行的每一项重要谈判，成立世界贸易公司（Universal Trading Corporation，UTC）作为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商务代理机构，解决所有在中国西南省份的运输困难，使桐油得以如约交付给美国，然后以美国的贷款在美国购置中国抗战所需要的器材。

虽然陈光甫和摩根索之间存在深厚友谊，但是借款还是遭遇到多重困难。美国国会中的孤立主义派议员把任何与中国政府商谈的借款，都指称是美国政府好战的证据，即使美国外交界的领袖们也意见不一。亨贝克是在国务院内部主张借款最力的官员，而且也积极地去探索借款谋

略。他不但相信借款可以作为对日本的一种警告，而且还相信，除非中国能够阻止日本的侵略，否则一场美日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大冲突将在所难免。亨贝克除了主张借款之外，更进一步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单方面宣布中止1911年的美日商务条约，减少美日之间的商务，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而摩根索则对亨贝克的观点非常支持，他认为这种给予中国财政援助的手段，可以同时达到阻止日本和德国侵略扩张行为的目的。[53]

然而亨贝克的观点也遭到国务院内部分同事的反对，后者认为如果想要达到阻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与其向中国提供小额贷款，不如向日本直接施加压力。即便是国务卿赫尔本人也认为桐油贷款的政治意味太过浓重，很可能会引起美日直接的军事冲突。基于这项考虑，赫尔给罗斯福的建议是在今后几个月内暂缓桐油贷款事项。

广州和武汉的相继沦陷，使得中国政府更急于想要获得美国的贷款。经济部长翁文灏给胡适写信时指出，中国政府既不能向日本求和，又缺乏继续抗战的能力，此时唯有获得美国借款才能防止中国全面性崩溃。[54]中国的状况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忧虑，唯恐中国政府内部会产生剧烈人事变动，转而投向日本求和。[55]其实，在广州、武汉沦陷之前，美国政府就已经看出，它必须采取某些更强势的措施，才能阻止中国和亚洲情况继续恶化。为此，美国政府于10月6日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文件，指责日本违背门户开放政策，并提出警告称，将施行经济制裁以防堵日本的侵略行为。美国海军部长甚至建议世界各国采取集体行动，阻止日本海军的扩建。日本的侵略行为似乎终于使美国人相信，援助中国并不仅是帮助中国，而且是防止日本对美国乃至全世界安全的威胁。

日本对借款所采取的手段，也同时影响了美国人的观感。1938年11月3日，日本内阁暗示它可能会采取更和缓的态度，放弃以前拒绝以蒋介石政府为谈判对象的政策。日本姿态的和缓自然增加了美国的疑惧，担心蒋介石会与日本达成和平协议。当日本政府宣布准备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以及鼓吹东亚和非洲应该从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时，美国舆论界立即指控日本意图在东亚建立霸权，施行“关门主义”和挑起种族冲突。[56]11月18日，日本又向美国政府提出照会，声称日本不再受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约束，暗示日本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西方国家赶出中国和整个亚洲地区。

这些接踵而至的发展只能加重美国人的担忧，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加强中国政府的信心，否则后者或将被迫向日本寻求妥协。[57]虽然罗斯福和摩根索之间的关系比他和赫尔的关系更为亲密，而且也相信美国应该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但是他也不想冒犯国务卿。罗斯福在11月25日接受了赫尔的建议，把借款一事暂予搁置。[58]

然而，国际局势的演变不久又给美国增加了更多压力。摩根索很快提出警告称，如果美国不向中国提供借款的话，则中国很可能被迫向日

本求和，或是投入苏联阵营。[59]因此，趁着赫尔因公前往秘鲁时，罗斯福改变了立场，火速批准了对中国的借款（11月30日）。美国政府中的激进分子，终于在摩根索领导下说服了罗斯福，把中国抗战当成美国国防的第一线，防止日本继续向亚洲其他地区扩张。美国对华借款所象征的意义是，罗斯福终于同意中国已经成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60]

从实质而言，美国的新借款对于中国抗战并无重大帮助，因为借款只被允许用以购买美国制造的卡车、汽油和设备，而不准许用以购买武器弹药去增加中国的作战能力。它们最多只是能够略微增加中缅公路上的运输效率。但是在心理上，由于中国政府正面临内部分裂危机，主战派坚持继续抗日，但主和派却主张去争取在最优惠条件下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因此美国借款的确暂时产生了鼓舞中国士气的作用。美国政府借款的决定对于蒋介石的主战政策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而又及时的大好消息。[61]这就难怪蒋介石把借款宣称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和日本的一大挫败。[62]

此次借款在国际上造成的另一影响是它给英国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后者感到今后在抵抗日本压力时不致孤单无援。果然，英国在1938年12月16日也给予中国45万英镑的贷款，随后又向中国贷款500万英镑（1939年3月）帮助中国偿还外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似乎是完成了原先的计策，那就是以向美国借款为手段，去争取得到更多的英国援助。[63]更让中国政府感到满足的是，日本对于美国贷款的反应非常激烈，指责美国的行为是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将会严重伤害美日关系。让日本领袖们感到特别气愤的是，美国借款宣布的时机正值汪精卫叛逃重庆之时，因此大大地冲淡了后者对中国民心士气的打击度。[64]

然则胡适在此次借款过程中到底做出过何种贡献？

有些胡适的拥护者[65]历来把借款的功劳归诸胡适。最近的例子则更是推崇胡适外交全面性的成就。比如说，“胡适任内，对内不负国家重托，对外深受驻在国人民、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之礼遇及推崇，为中国解决了向美国借款、购买军机、洽购军资、重开滇缅、滇越路等重大交涉问题，更坚定了中国抗战决心，对抗战贡献，厥功至伟”。[66]但是事实上此说难以成立，因为胡适在整个借款过程中，并没有做出重要贡献。原因之一是他在接任大使不久就因病住院70天，基本上没有参与借款谈判。二是胡适完全缺乏财经背景和专业知识，无法对谈判过程产生作用。[67]诚然，蒋介石向罗斯福请求借款的电报一律经由胡适传递，但是真正重要的谈判工作都是在联邦财政部办公大楼内进行，而胡适却很少进入该大楼，或是完全不参与其事。[68]

然而第一次借款成功的确让胡适大受鼓舞，所以到了1939年5月份，他开始主动宣布要在今后对美借款事宜做出更积极表现，而他所建议的途径则是通过美国国务院。胡适的这种热情表现也令陈光甫受到感染，因为陈光甫历来也认为向美国政府借款的正道应该是通过国务院。

陈光甫一直感到不安的，就是通过摩根索和罗斯福这些“僻径”去获得借款，他也担心这种做法会使国务院大感不快。此外，他也一直认为胡适既然是大使，就应顺理成章地由他主导借款事宜。[69]

尽管胡适表达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但是并没有改变他好整以暇的生活步调，因为等到他开始采取具体行动时，已经是三个月后的事情了。而就在这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已经另行发展出一套新方案。由于顾维钧大使对于第一次借款曾经做出重要的穿针引线工作，因此重庆政府决定改由顾维钧向摩根索提出二次借款的请求。1939年8月27日，蒋介石通知胡适和陈光甫，请他们对于顾维钧的努力从旁予以协助。[70]

重庆政府这个不寻常的决定——要依赖驻法国大使去争取美国的借款——终于刺激了两位驻美代表不得不有更主动的表现。胡适很快向罗斯福提出以桐油作为第二次借款的抵押，而陈光甫也加紧步伐和摩根索安排借款谈判事宜。[71]在目睹胡适这种前所未有的积极表现之后，顾维钧乃决定退居幕后，不再参与借款的谈判工作。

在美国方面，摩根索和亨贝克的主张也得到进一步认可。在1939年内，亨贝克再三强调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对于美国在经济安全上的重要性，而中国又是东南亚安全的关键所在。亨贝克所持的论点是，美国在东南亚有两大利益，一是保证西方国家能够享有在该地区的天然资源，二是阻止日本获得该项资源。而中国正是在战略上控制该地区的基地。[72]财政部也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看法，承认中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同时也需要美国的援助。基于这个观点，摩根索的助理哈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大张旗鼓”地给予中国贷款（“a well publicized loan”），去遏止日本的侵略意图（1939年5月）。[73]1939年9月26日，摩根索通知胡适称，财政部希望采用桐油借款先例，再次向中国提供贷款。

在1939年里，苏联对华借款数目已达2.5亿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于苏联借款的可靠性逐渐产生怀疑，因此它急需找到另外一个国际财政援助的来源。另外苏联向日本传达的友好姿态和德国政府明白表示要居间改善苏日关系的姿态，都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的疑惧，认为苏联的援华工作将变得日益不可靠。但是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得不依靠外来的经济援助去购买西方武器，同时允许中国的天然资源得以运出口去偿还西方的债务，因此抗日战争进行得越久，中国想把天然资源运送出国去偿还债务的工作就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困难。[74]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的贷款就变得更为重要，而重庆政府也不断地给胡适训令，嘱其向罗斯福请求给予更多和更大的借款。[75]

1940年初，当罗斯福和赫尔在得到信息称汪精卫政权即将成立时，他们不再担心激怒日本，而决定给予中国（通过UTC公司名义）2000万美元的贷款。美国政府在批准贷款之前，也要求胡适做出承诺（1940年1月24日），即中国政府必将抗战到底，绝不中途求和。[76]

当蒋介石1940年2月14日得知美国国会通过对中国提供第二次贷款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尽管贷款数目并不大，但是依然有力地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同情，并且有决心保卫它在远东的利益。[77]这个第二次借款，在1940年4月20日经签署正式生效。它大致遵循第一次借款的模式，只是接受了美国人的要求，改以云南省出产的锡作为偿还品。[78]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陈光甫原本希望借款的数目是7500万美元（1939年9月），而最后的借款远远小于这个期望。[79]

（四）中国政府的谈判方针

1940年以前，中国政府寻求美国经济援助的经历，可以作为一个案例，来帮助我们去了解当时中国在美外交工作的实质及作风，从中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从实质上来说，中国政府终于放弃了此前的被动心态，转而积极争取美国财政协助，其目的大概有三个。首先，它意图鼓励更多的欧洲国家，在看到美国的例子之后，能够因此壮胆也向中国提供贷款。其次，无论贷款数量多少，中国政府还是希望能够从更多国家获得贷款，借以分散它对外资的依赖性。第三，中国在承受了一连串军事和政治挫败之后，希望用美国贷款去激励低沉的士气，也借此打击此时仍然甚嚣尘上的对日主和派的气焰。总的来说，美国前后两次的对华贷款，对于以上三个目的都有相当成果。

从外交作风上来说，中国政府在进行贷款谈判过程中最值得注目的，是胡适和陈光甫之间所表现的合作无间的精神。他们二人无论是从个性还是政治目标而言，都可谓相辅相成。二人的行事作风各有特色，但是能够密切配合，做出实质成效。对他们这种合作关系进一步的分析，也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中国政府当时对美外交的基本设想和执行策略的优势或是弱点之所在。

实际上，中国政府此时处理对美外交的团队成员有四人：蒋介石、孔祥熙、陈光甫和胡适。蒋孔二人在重庆主持决策，而陈胡二人在华盛顿负责执行。虽然蒋介石掌控一切对美的政策决策，但是不久就可以看出这四个人之间其实有两条信息渠道。一条是蒋介石—胡适的渠道，另一条是孔祥熙—陈光甫的渠道。它们之间的交叉情况并不多见。在1939～1940年的贷款谈判中，陈光甫极少和蒋介石联络，而胡适也很少和孔祥熙联络，只是在少数情况下，胡适会在陈光甫致孔祥熙的电文中联署签名以增加电文的分量而已。一般来说，胡适—蒋介石的电文内容着重于贷款的政治军事含义（比如，美援对中国抗战的意义），而陈光甫—孔祥熙的电文则强调技术性问题（比如，还款日期及利率）。一旦重庆方面决定了基本政策，胡适和陈光甫的任务就是将之付诸执行。这就使得胡陈二人在美国的工作特别重要。在数量上，孔陈之间的信件来往远

远超过蒋胡之间的信件来往，它显示借款谈判其实是由孔陈二人主持。导致此一现象的原因，将在稍后加以讨论。

在贷款谈判开始时，胡陈二人立即遭遇到的尴尬处境是如何应付美国的联邦体系，因为不同的联邦部门对于借款的态度并不一致。大致而言，摩根索相信，如果日本在中国的侵略目的得逞的话，必将鼓励法西斯国家在其他地区进行扩张，进而威胁世界和平。为此，摩根索愿意以美国的财政援助来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但是这一立场却遭到国务卿赫尔的反对。赫尔认为美国要给中国贷款，就必须也向日本贷款，以求在形式上维持对中日两国平等待遇。[80]在整个有关桐油贷款谈判过程中，摩根索被迫不断地提醒罗斯福，对中国贷款的后果是阻遏日本和德国的侵略，以及减低世界陷于混乱的危机。[81]

通过蒋介石不断地要求美国经济援助，罗斯福当然了解中国处境的危急，也有心想要帮助中国。但是他也必须面对美国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种种约束。换言之，罗斯福只能使用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作为搪塞，“对于提出之事项，当予以最慎重及同情之考虑”。[82]因此，尽管他鼓励摩根索继续和中国政府进行贷款的谈判工作，但是也不能忽视赫尔的立场。对财政部来说，贷款的谈判一直进行得颇为顺利，因为他们谈的尽是技术性细节，而国务院则担心借款的长远国际影响和对美日关系的重大影响。因此每当财政部和国务院意见分歧时，罗斯福的典型对策就是拖延不决。

反观中国方面的对策则是采取分工。由于陈光甫本来就是摩根索私人邀请赴美的，缺乏官方身份，因此他着意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于财政部长及其高级幕僚这个小圈子里，以避免让美国政府感到任何尴尬。

陈光甫自我设限的另一个原因，是猜测摩根索也可能把他视为财政部“私房”拥有的人际关系，因此不乐意看到他在美国政坛上交游广阔（而这个假设后来果然在摩根索对宋子文的不满上得到了旁证）。结果陈光甫只是在礼节上拜访过国务院和白宫官员，但是基本上只和财政部打交道。[83]相对而言，胡适以其外交官身份，能享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和自由度，可以经常和国务院及白宫官员交往，也偶尔拜访财政部替陈光甫加一把劲。

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在借款谈判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大阻力来自国务院，而陈光甫几乎在刚刚抵达华盛顿时（1938年9月）就已经察觉到问题之所在。[84]照理说，胡适既然是大使，本应该主持和国务院的交往工作，也应该更关心它的不合作态度，但是他似乎从来没有对国务院的作为表示任何不满，既没有在私人日记中提过，在和朋友同事间的大批信件中也未曾表示抱怨。其中道理，本书将在后文中加以说明。

相比之下，陈光甫和国务院甚少来往，却对其作为高度反感。陈氏认为国务院对他态度冷淡，对他的借款谈判也漠不关心。[85]到了1939年3月，陈光甫已经认定美国国务院是一个保守而又胆小的官僚机构，

从来不敢主动采取任何行动，而只知道以不变应万变。[86]这个看法只能让陈光甫加倍努力去赢得财政部的合作，给予中国贷款。

胡适和陈光甫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亲密合作，而且是互相敬重。虽然两人之间以往并无渊源，但是二人都对国家事务关心，而且精诚合作去追求国家利益。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圈里派系纷争不断的社会中，胡陈二人的关系可谓政治圈中极为难能可贵的表率。和胡适一样，陈光甫接受任命的动机也只是最单纯的爱国心，而胡适对这一点也十分敬佩。[87]

在1938～1940年，胡陈二人保持密切联系，经常聚会，传递简讯，把自己所得到的情报及时通知对方，也协调彼此的行事策略。多半时间他们对事情的看法相当一致，经常联名向重庆发电报，以增加电报的分量。他们在和美国联邦部门和国会领袖们交往时，也积极协调彼此的策略，务求达到最好的结果。[88]

到第二次借款谈判正式开始时，二人的合作关系又更进一步。一旦得知罗斯福已经和摩根索讨论过借款问题时，胡陈二人就分别和摩根索及财政部官员举行会商，然后又彼此聚会交换心得，并协商下一步行动。在他们之间取得共识之后，陈光甫才向摩根索正式提出借款要求。[89]虽然这些做法看起来既正常又合理，却是大大地违反了中国官场行事的常态。这是中国政府战时在美国处理外交事务时，其重要官员首次如此地精诚合作。之前在王正廷做大使时，这种情形从来没有发生过，而一年之后当宋子文赴美工作时，这种做法也随之消失无踪。

胡陈二人的关系中不含丝毫嫉妒或是竞争，也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这也违反中国官场常态。正好相反，胡陈二人几乎不断地称赞对方，甚至几乎形成一个互相恭维捧场的团队。他们无论是为了公事还是私人交谊，经常聚会。他们在谈论问题时都直言无忌，但是又能够获得共同结论，采取一致行动。尽管陈光甫在美国的身份有其暧昧之处，但是他和胡适之间从没有地盘之争。事实上，只要是对国家有利时，他们反而是急着把主要角色让给对方去扮演。胡适从来没有因为陈光甫和摩根索的亲密关系而感受到威胁，也没有因为陈光甫和底特律的汽车大亨达成大笔生意出尽风头而心含醋意，而陈光甫也不时地表露出对胡适外交地位的尊重。他们两人关系最好的说明就是，陈光甫一直希望胡适能够挑起借款谈判的大梁，而他自己则甘愿退居幕后予以协助。[90]

胡适不仅对于陈光甫借款的功劳赞誉有加，[91]而且在向重庆政府打报告和与朋友的私信中，也不断称赞陈光甫。[92]总的来说，胡适在和蒋介石通信中只要涉及陈光甫时，一律对陈光甫赞不绝口，要求蒋介石给予陈氏最大的支持。[93]

或许胡适能够给予陈光甫最大支持的表现，就是出面去维护孔祥熙，而孔祥熙却正是胡适内心中最不齿的人物。事情开端于1938年，当时孔祥熙主持下的中央政府工作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交相责难，要求将

其革职。胡适最敬重的朋友之一——傅斯年也正是批评孔祥熙最尖锐之人。尽管胡适内心同意傅斯年批评的内容，但是他也认为陈光甫在美国的工作因为得到了孔祥熙的支持才得以展开，因此他只好要求他的朋友们停止对孔祥熙的攻击。[94]胡适这份复杂心情在他请陈布雷转达给蒋介石的一封长电中最能表达无遗。胡适开宗明义地向蒋介石坦陈：“弟向不满于孔庸之一家，此兄所深知。”但是“一年来光甫在美所办各事业，所以能放手做去，无内顾之忧者，多因庸之绝对合作……”[95]

而一旦胡适得知陈光甫在1940年中期拟不再留在美国工作时，他就停止为孔祥熙缓颊。

（五）谈判中的困难

纵使是中国方面的两位主要谈判者合作无间，但是谈判仍然遭遇诸多困难。这也让陈光甫感受到极大压力，因为他总是想要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陈光甫非常清楚，借款成功的概率在于中国是否有能力依照约定的价格和数量，把货品（抵押品）交到美国人手中。它的先决条件就是中国政府必须有能力从桐油生产省份收购桐油。然而，一旦桐油成为中美贸易中的大项，政府中有权有势的人士就会想方设法先把桐油抢到手，然后以高价将之转卖给官方的采购员。而最让陈光甫气愤难平的投机者却正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依据陈光甫得到的情报称，孔令侃企图垄断浙江省桐油，使之不落入国民政府手中。陈光甫为此指责孔令侃是一个胆大妄为和人格低贱的年轻人，同时也指责孔祥熙惧内成癖，没有胆量阻止其妻子（宋霭龄）惯纵自己的儿子。陈光甫对孔令侃行为感到特别愤怒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自己远赴美国工作，不但是为国服务，同时也是帮了孔祥熙个人一个大忙，[96]而孔家的儿子此时却在暗中破坏他的工作。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因素也招致陈光甫极度不满，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他向美国政府请求借款的工作，那就是孔宋两家在美国的财富。1940年2月时，美国政府私下向陈光甫提供了一份资料，显示中国的富人在美国银行开立了大户头，存款总数接近1亿美元。这就让陈光甫觉得，一小部分中国富人在美国就有如此巨额存款，还要开口向美国政府借款，令他委实难以启齿。[97]

但是陈光甫和孔祥熙之间最尖锐的冲突，则是有关借款本身。

在整个借款谈判过程中，陈光甫一直谨遵孔祥熙的指示，并且不断地向孔祥熙报告进展。但是孔祥熙的缺乏关心让陈光甫感到失望，孔祥熙对借款的态度也让陈光甫感到不快。陈光甫怀疑，孔祥熙只是热心向

美国借款，但是从不曾认真计划如何偿还债务以维护中国的信誉。陈光甫也相信，在第一次借款成立之后，假如不是他个人努力去保护中国的信誉的话，则中国政府或许就会无法偿还借款而导致信誉破产，从此借不到外款。[98]

在中国政治圈子里，陈光甫和孔祥熙两人的私人关系向来是大众关注的话题，而陈光甫也普遍被视为孔祥熙派系的核心成员之一。但是陈光甫个人档案清晰显示，这些传闻并不准确。陈氏档案文件中的确无数次提到孔祥熙，但是都显示陈氏的立场公正、态度超然、立论持平，而且公私分明。他评判孔祥熙所用的尺度，和他评判别人的尺度非常一致，并无偏颇。

到了1940年初期，陈光甫由于操劳过度，以致健康出了问题。而他对孔祥熙的无能和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日益不满。有趣的是，陈光甫是出于和摩根索的私人关系而赴美工作这件事，也被国内的批评者拿来作为攻击他的口实，指责陈氏有拥洋自重之嫌。这类污蔑不但使陈氏行事更加谨慎细心，最后也促成陈氏做出决定，在第二次借款成功之后，立即打道返回中国。[99]当然，如果陈氏此时能够得到重庆政府明确支持的话，他就有可能不必去理会那些政治上的恶意攻击。但是当重庆政府没有做出支持行动时，陈氏的最佳选择就是及早抽身而退。

当陈光甫1939年6月察觉到孔祥熙的儿子正在暗中破坏他的工作时，就在日记中预言，他有朝一日必将会与孔祥熙走上决裂之路。[100]事实证明，在陈光甫成功地完成了第二次借款案的尾声时，决裂终于发生。这也让陈光甫成功的外交活动在画上句号时，增加了一分缺憾。事情的原委是，在陈氏已经和美方把所有借款细节商妥之后，孔祥熙突然通知陈氏（1940年3月9日）称，中国政府改变主意，不愿提供云南省的锡作为借款抵押。由于孔陈二人早已同意以云南省的锡作为抵押，所以难怪陈氏对于孔祥熙的临时变卦大感意外，而且也为之愤怒不已。

更令陈光甫愤怒不已的是，孔祥熙的反悔动作是在借款消息公布之后的次日才做出。无可置疑地，陈光甫当然把孔祥熙的变卦看成对他个人的侮辱，因为前此孔祥熙已经向陈光甫保证授予其全权处理借款事宜，却在最后阶段接受某些人的建议，破坏了陈氏辛苦谈成的借款协议。更糟糕的是，陈氏竟是从美方人士那里才得知，原来孔祥熙向美国政府要求不以云南省的锡作为抵押的请求，是先透过美国驻华大使在重庆提出，而陈氏却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这就更让他耐不住火冒三丈了。[101]

由于陈光甫担忧孔祥熙的新主意可能会导致整个借款谈判的流产，因此他立即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指责孔祥熙未能尊重他的判断力，同时坚持中国必须履行和美国政府已经达成的协议。事情的结果是孔祥熙做出让步，撤回他的新指示，允诺（1940年4月16日）依然按照陈氏和美国达成的全部原议，仍以滇锡作为抵押。即便孔祥熙做出这般让步，仍无法平息陈氏满腔怒气。陈光甫随即直接质问孔祥熙为何瞒着

他而私下和美国驻华大使另外建立与美国政府的信息渠道，孔祥熙却装聋作哑，不予回答。然而孔祥熙的回函却节外生枝地提供了另外一个原因，引起了陈氏加倍的愤怒，那就是孔祥熙暗示想要委派陈氏出任外贸部部长。在陈光甫看来，这就等于是想用一个部长的职位去收买他的人格。[102]孔陈二人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和处事方式，不但生动地表露出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态度和责任心，也表露出他们的个性和人格操守。陈光甫的尽忠职守和直言无忌，与孔祥熙的优柔寡断和无能善变，形成尖锐对照。

事情发展的结果是，孔陈二人的公谊私情双双遭到彻底破坏。但是美国的第二次借款却得以顺利达成。在陈光甫接到孔祥熙回信的当日，他到白宫去向罗斯福辞行，随即取道返回中国。

（六）陈光甫离美返华

陈光甫在1940年5月离开美国，结束了两年争取美国借款的努力。在当时局势中，美国两次借款是中美关系史上的突破，它们不但为此后美国数额更大的借款开启了先例，而且也让其他欧洲国家看出来，美国为了支持中国不惜开罪日本。

陈光甫本人对于借款成就也颇为自得，指出这两次借款较之此前的国际贷款对中国都更为有利，因为它们都没有附带政治条件，也没有干预中国经济自主权。虽然中国仍然不可以用借款来直接购买武器，但是可以购买国防工业所需的其他器材原料。[103]日本对于借款的强烈抗议也让中国感到满足，这些借款使美日之间关系更趋紧张，而这正是中国求之不得的政治效果。

但是如果仅从经济角度着眼，则桐油借款和滇锡借款的作用都并不重要，它们既不足以稳定中国货币制度，也不能购买美国军火。两次借款总数只有4500万美元，对于中国抗战的需求而言，远远不能满足，更无法扭转战局。但是它们多少能帮助中国维持抗战，也符合陈光甫本人原本对于美国借款的期望。

陈光甫在参加借款谈判后不久，曾经对中国战局做过一个全面性检讨。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借款应该遵循商业借款的原则。至于谈到中国更严重的财政和货币危机，则是应该运用本国资源和政策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美国援助。[104]而重庆政府的领袖们多数无法接受此种看法。

还有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到底陈光甫与摩根索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对中国是利或是弊？从美国政府观点看，二人的关系毫无疑问是一个优点。比如说，在财政部一次内部会议上（1940年4月25日），摩

根索告诉僚属说：

陈光甫是唯一一位对我说实话的中国人，是唯一一位不跟我玩把戏的中国人。他说的话绝对可信。我建议借款4500万给他，理由就是因为他向我提出了个人的保证。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真是了不起。[105]

陈光甫和摩根索之间的确存在真诚的友情和信赖，而这种关系在外交圈中也的确颇不寻常，真乃难能可贵。[106]但是在他们交往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现象，那就是他们两人之间并非平等的互动，而是一个由强国做出决定而由弱国照单全收的局面。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是乖顺而又充满感激的借债人，而美国则是把自己看成慷慨大方的债权人，因此难免露出财大气粗和施舍的心态，因为美国尚没有深切体会到，支持中国其实就是保护美国本身的国家利益。

事实上，重庆政府领袖们很快就对这种关系产生不满。1939年初，已经有人对谈判进展的速度感到不耐，进而批评陈光甫过于迁就美国人。[107]如果陈光甫和胡适果真在1940年春季以后继续作为一个团队的成员的话，则胡适的任务应该是拟定行动的大纲，而由陈光甫去操心技术问题，使之能够付诸执行。我们将在下文中解释为什么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因为无论是胡适的个性还是他的理念，都无法实现这样的分工。

诚然，如果胡适和陈光甫继续合作的话，中国或许可能从美国得到更多的贷款，但是基本上由美国单方面决定借款的速度和条件，而两者皆无法满足中国的需求。既然中国政府无法改变胡适和陈光甫的作风及策略，它如果想要得到更好的结果，就不得不采取其他的办法。

事实上，蒋介石对于胡适在借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被动性感到极为不耐。难怪他在改派宋子文赴美总管借款事务时，第一个训示（1940年7月12日）就是叫宋子文自行裁决，而完全不必和胡适商议借款事项。[108]此后，借款事务就从胡适的大使权责范围中完全排除。

三 中立法和禁运事务

胡适责任的第三部分是尽量降低美国中立外交政策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同时增加它对日本不利的影响。具体而言，中国政府敦促美国放松中立法案对中国武器禁运的限度，同时增加对日本禁运的限度。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希望美国能够停止向日本提供大量的战略物资，因为这些物资使得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得以无限延长。胡适的任务正是去达成这些目的。

（一）中立法案

回溯中立法的来源，我们可以发现最早的中立法由美国国会在1935年8月通过，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上弥漫的反战和自保的情绪。法案内容是全面禁止美国与任何交战国进行战争物资武器的销售运输。美国公民如果乘坐交战国的交通工具也责任自负，美国政府不予理会。1936年2月修正后的中立法进一步禁止美国向交战国提供贷款或信用支付。

1937年5月国会再度修正中立法，但是与前两年（1935年、1936年）的内容有几个重要不同：（1）中立法同等适用于外国的内战和国际战争；（2）美国船只不可开赴交战国，美国公民不可乘坐交战国船只；（3）该法案没有固定有效终止期限。但是在罗斯福的坚持下，这个中立法做出了一个所谓“cash and carry”的规定，即交战国如果使用现金和自己的船只，可以向美国购买货品并自行负责运输。这个特别条款规定有效期为两年。

但是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罗斯福为帮助英法两国获得美国战略物资，说服国会在1939年11月4日制定的中立法中，继续维持cash and carry条款，等于取消了过去武器禁运的国策。

等到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时，中立法自然寿终正寝。美国政府在租借法案下可以租赁、出售、出借任何战争物资给任何国家。[109]

美国的中立法案是在中日开战前三个月成为法律的。依照法案规定，如果总统宣布两个国家间处于交战状态时，总统必须禁止美国武器及借款进入该国家。中国最初采取的立场是提出抗议，认为法案没有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做出区别对待。因此，如果美国选择不采用中立法案的话，则中国和日本将有同等机会获得从美国进口的武器，这就可能使日本以其丰富的财源成为主要受惠者。中立法案经过修正后，又规定允

许交战国以现款付账和自行运送（cash and carry）形式购买武器。这种做法依然对日本有利而对中国有害，因为日本以其雄厚的财力可以购买大批战略物资，又能以其大量的船只把物资从美国运走。而中国则两者均无能力受惠。

要想了解中国对中立法案的担忧，我们必须记得，中国在进行战争之前一度乐观地估计，中国的顽强抵抗必将使日本国内资源很快就消耗殆尽，进而迫使日本政府必须倚仗外国进口战略物资去持续作战，而美国又正是世界上战略物资最丰沛的供应国。因此，中国如果可以说服美国停止向日本输出战略物资，就有希望迫使日本早日终止对中国的侵略行为。胡适作为中国特使出使美国的初衷，本就是敦促美国不要引用中立法案，因为那时中国的港口依然对外国航运开放。但是一旦这些港口被日本海军占领或封锁，胡适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说服美国政府对于侵略国和被侵略国做出区别对待，而让中立法案只去惩罚侵略国。[110]

虽然胡适循规蹈矩地为中国政府转达了向美国政府提出援助的请求，[111]但是他内心其实非常不认同重庆政府的做法，并且认为这些努力将毫无成功的机会。依照胡适推理，美国政府对于中立法的盘算其实更多是受欧洲而非亚洲局势的影响。所以按胡适的分析，罗斯福和赫尔想要修正中立法，废除其中关于武器禁运的条款，其意图主要是对希特勒刚刚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提出警告，不得继续其侵略行为。如若不然，美国就会向英国和法国提供武器，不再受任何限制。换言之，中国抗战在美国政府眼中无足轻重。

实际上，由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者的阻挠，其政府一直等到欧战爆发后才开始修改中立法案，国会立即通过了新的中立法，废除了武器禁运条款。[112]然而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罗斯福都从未引用中立法。在此期间内，胡适对于改变美国政府政策的努力也只是虚应故事，难怪他对于局势后来的发展也没有产生任何作用。

除此之外，胡适对于中国应该如何处理美国的中立法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他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政府绝不可以贸然对日宣战，因为其害处有二：一是一旦宣战，则美国政府不得不施行中立法，中国的借款和武器购买计划均将落空，而日本却仍然可以用它自己的船只运送原料到日本；二是日本可以享受交战国的权利，搜抢中立商船，使其针对中国的封锁政策执行得更为彻底。[113]

（二）禁运政策

从中日战争开始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希望西方国家不要向日本输出战略物资及商品去帮助日本的侵华行为。它首先努力的对象是要求国际联盟实行全球禁运。此项努力失败之后，中国政府改变方针，转而要

求个别西方国家制定自己的禁运政策。但是这一努力也必将失败，其原因是既然西方国家缺乏采取集体行动去惩罚日本的勇气，也就更缺乏采取个别行动的勇气了。

果不其然，当中国要求英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时，英国立即予以拒绝，它提出的理由是英国在远东地区的海军必须有美国海军的密切支持，否则根本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114]这对于中国而言，不啻是一盆冷水泼顶。别的西方国家随之而来的不作为，迫使中国政府只好决定改而向美国下功夫，因为美国才是真正向日本提供这些物资的最大输出国。美国和日本密切的商务关系，最足以说明美国是中国被侵略灾难的最大受惠者。在1937年上半年，美国输往日本的货品增加了38%，其中包括钢铁、汽车、石油、废铁和机械，它们全部和日本的侵华政策密切相关。1937～1939年，美国对日本的出口货物总值为7.69亿美元，其中主要部分是军用物资。与此同时，美国银行界还向日本提供贷款购买军用物资。[115]

胡适就任大使不久，就不断收到重庆官员的信函，要求他务必设法促成美国实施对日禁运。[116]中国政府越是感到被西方国家抛弃，它对美国政府的期望就越趋强烈。[117]

在1939年，中国政府同时也注意到，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日趋强硬。[118]在年初时，蒋介石就似乎为日本所可能面临的窘境感到鼓舞。比如，他注意到，日本报纸发布的数字显示，七七事变以来，日本军费已经达到119亿日元，超过日俄战争时期的7倍以上。[119]这就让他认为是美国中立法修正案之作用，如“能再加强其总统权限，于我为最有利”。[120]反之，如果修正案采纳基·皮特曼（Key Denson Pittman）参议员的提案，就会对中国有害。为此，他还特意给罗斯福写信，提请后者务必注意。[121]事实上，蒋介石此时对于国际事务绝大部分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瞬息万变的欧洲政治军事局势之上，而且希望中日战争终究可以从欧洲战局中得到良性影响，因此每日花费大量时间思考欧洲局势。但是在中美关系的领域里，中立法和禁运无疑也逐渐成为一个焦点。应该一提的是，蒋介石对于日本对欧洲的态度也做出了分析。根据他的推想，日本固然意图避免涉足欧洲局势，但是它必然乐意随从德国去挟持苏联。因此蒋介石认为，欧战一旦发动，即使日本设法避免参加亦不可得。更何况日本军方有一个传统政策，就是想要把白人势力赶出亚洲，而由日本予以取代。所以欧战果真发生时，日本军方“非乘势贯彻不可”。基于以上分析，蒋介石所得到的结论是“故不必患倭寇对英美之妥协，而吾处劣势耳”。[122]如此说来，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国政府此时面对欧洲局势的发展，并不需要担心日本会向英美寻求妥协，而是要设法劝说英美政府主动加紧对日本的制裁。

当美国政府在1939年7月26日宣布将任由美日商务条约在1940年1月26日如期终止而不再续约时，蒋介石感到备受鼓舞，认为此项发展将使美国得以实施对日禁运。[123]

美国政府的其他举动，比如在太平洋地区加强军备、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C.Grew）和其他国会领袖的强硬演说等，都引起了中国密切关注，认为美日关系必将急速恶化。依照中国领袖们的推测，日本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可能会向美国承诺由两国均分在华利益。假如日本能够和美国达成妥协，它就无须顾虑英国和法国的态度，径自建设其东亚新秩序。反之，如果日本无法与美国达成合作协议，则它依然可以利用汪精卫政权去指控美国在中国施行帝国主义政策。更因为美国商人的活动范围多半是在汪政权掌控的地区，因此后者也可以对美国商人施行各种要挟。

从另外一方面说，蒋介石也感到日本很可能比以往更依赖美国，因为欧洲局势的恶化可能导致德国不再有余力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如果美国也终止对日本的军用物资和商品输出的话，则日本很可能被迫在中国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124]

正因为如此，中国此时对美国的期待，是后者能够坚持禁止输出军用器材，禁止日本重要物资输入美国，以及禁止日本船只使用某些特定商港。而中国对于美国援助的要求，则仍然限于美国“政府与金融界能继续在物质上予以及时之接济与积极之协助”。换言之，即使到了此时，中国尚未向美国提出军事和武器援助之事。

然则美国施行禁运到底能够达成何种目的？蒋介石的设想，是希望它们可以“迫使日本采取对于其本身唯一安全之途径，而同意以集体会议之方式，以解决一切有关中国及其他关系国家之问题”。换言之，美国最终扮演的角色是以九国公约签订者身份，召集会议，依理智公义法则，终止中日战争。[125]

以上的这些盘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中国领袖在1939年中期之后开始把美国因素放进他们的战略考虑之中，并且越来越希望胡适能够说服美国加强对日本的压力。

至于说到日本，它对美国禁运所可能产生的威胁，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反制行为，其中包括对滇越铁路和重庆施行大规模空军轰炸，以图瓦解中国的斗志，早日结束“支那事件”。按照日本的推理，一旦它能够解决中日冲突，就无须担心美国的威胁，而美国也就无必要去威胁日本。但是当中国政府抵死不肯屈服，反而加紧了对美国的外交攻势时，日本的对策就只能是加紧对英国和法国的压力，希望借此使美国陷于孤立，同时完全切断中国通往西方国家的通路。而这种发展又随之彻底地改变了美国对日本在亚洲侵略行为的战略估计。

毋庸置疑，造成日本处境困难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政府的“冥顽不灵”和拒绝投降，并不断地向美国求助。在表达中国政府请求时，胡适的基本态度是尽到“本分”，但是并不竭尽全力以求达到目的。比如说，依照本书所参考的中外资料，胡适既未曾在私人场合向美国领袖们做过恳切动情的说服工作，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批评过商业界与日本的贸易活

动，以阻止美国战略物资流向日本。反过来说，胡适在对美国公众的演说中经常谈到日本侵略的本质和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而这种论调却也呼应了其他美国人要终止美日贸易的大声疾呼。持平而论，胡适在美国的外交活动和公共关系活动，对于促使美国政府施行对日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的工作，只是起了些微作用，并没有产生决定性效果，中国政府也没有因为胡适的工作而获得更多的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在这方面，胡适的成就的确非常有限。

四 对于促进国际合作的努力

重庆政府希望胡适能够做出重要贡献的第四个方面是促进国际合作，说服西方列强共同支持中国的抗战。抗战刚开始时中国政府领袖们就察觉到，原来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和其他列强对美国的看法存在极大差异。在中国人看来，既然美国不愿意涉入中国战局，那么它就应该被安置在中国外交舞台的边缘。但是他们从欧洲列强所得到的信息却正好相反，因为后者把美国看成太平洋地区的主轴。欧洲列强认为美国必须在抵抗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高的侵略行为上扮演主导角色，这样才能让其他国家敢于采取同样态度对付日本。然而即便在中国政府已经察觉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之后，它仍然未感受到必须立即采取应变措施的压力。考其原因是，只要中国政府依然有信心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打击日本的侵略气焰，或是中国可以不断地从德国或苏联获得必需的武器，它就大可以继续把中美关系摆在次要位置上。

（一）中国政府国际视野的改变

然而，1938年欧洲紧张局势的升级，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认识美国对中国事务的重要性。

如前文所言，自七七事变开始，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焦点就一直放在欧洲各国。在德国占领奥地利（1938年3月11日）和签订慕尼黑协定（9月29日）的这一段时间里，中国领袖们逐渐认识到欧洲局势也可以对中国抗战产生严重影响。在欧战爆发之前的至少12个月里，中国领袖们对于欧洲局势发展给予高度关注，他们特别担心英国和法国会在日本强烈压力下出卖中国。正是这种新局面，使得中国领袖们也开始思考应该跳出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的格局，改为努力去促进国家间的集体行动。[126]

毫不奇怪，在中国领袖阶层里，最初对于欧洲局势的看法颇为分歧。孙科和蒋方震认为欧战一旦爆发，必会对中国有利，他们认为欧洲将会速战速决，继之将召开全面性和平会议，而中日争端也可期望随着欧洲争端一并解决。中国前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则主张中国应该对德国和意大利表示亲善，因为这些国家很可能在大战中占上风。但是也有人认为欧洲发生战事一定会对中国不利，因为中日两国的冲突问题很可能根本就排不进欧洲和平会议的议程。他们还认为，即使欧洲和会解决了欧战问题，它处理中国问题的结果也未必对中国有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正是前车之鉴。[127]

中国领袖们的这种意见分歧，最终导致蒋介石决定要去提醒欧洲列强必须主动关心日本崛起对它们的威胁。一个例子就是，在武汉和广州相继沦陷后，蒋介石当即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 Kerr），日本的军事胜利不但打击了中国，也同时威胁了英国，因为如果英国不做出强烈反应，则日本最终的目的必将是要把英国赶出中国。[128]事后蒋介石认为，他和英国大使的谈话是他个人介入外交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努力，前后花费了5个小时，企图说服英国。[129]相形之下，英国人则是充耳不闻，无动于衷。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层内部也针对美国在维持世界均势中究竟是否重要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辩论的结果让蒋介石认为，欧洲如果发生战争将会对中国极为不利。因此他要求胡适设法从美国政府获取承诺，万一欧战发生，不至于牺牲中国而对日本做出让步。[130]

更有进者，蒋介石不仅关心美国是否可以直接给予中国援助，更希望美国可以在国际事务上声援中国。就是这样，蒋介石开始把美国看成在中国抗日的大战略中，可以扮演牵制日本的角色。因此他利用日军在广东省海岸登陆一事向美国提出警告（1938年10月13日），把此一事件形容成将对英美两国造成重大威胁，促请两国必须认真考虑共同出面干预远东事务。[131]在他看来，如果英美两国能够采取坚定立场，共同对付日本，则法国和苏联也将会有更大勇气去抵制日本的扩张。[132]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从驻欧洲使节的报告中，在西方国家合作的可能性问题上得到了一些启示。比如说，驻英大使郭泰祺和驻法大使顾维钧的报告称，英法两国政府均表示愿意考虑国际合作途径，并指出问题症结是美国不愿参与行动，英国更抱怨过去曾经向美国试探均遭碰壁。因此国际合作方案的关键端视美国是否采取行动。[133]姑且不去深究英法两国的说辞是否只是以美国作为托词来敷衍中国，它们一致突出美国的重要性，则是让中国政府领袖们不能忽视的现象。1938年底，蒋介石再度亲自出面与美国驻华大使进行会谈，他强调的重点，一是除非美国调停，中日战争将不会停止，因为中国政府绝不会主动求和；二是抗战是否继续完全有赖于罗斯福是否愿意负担调停责任，中国政府相信罗斯福在其总统任内必定可以帮助中日两国达成和平。[134]鉴于武汉、广州两地相继沦陷，美国政府在考虑是否应该援助中国抗战时，最担心的就是中国政府会与日本达成和平协议，因此蒋介石向美国大使的表态等于是向后者提出保证，如果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中国政府绝不会和日本私下议和。蒋介石的举动显示，在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考虑上，美国的重要性又增加了许多。

但是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此时期望西方国家共同行动的想法，其时机仍然没有成熟。就英、美、法三国而言，它们唯一愿意采取的共同行动，只是要求日本（1938年11月7日）恢复它们在中国的内河航行权而已，而即便是如此温和的要求也当即遭到日本拒绝。[135]同样地，中国政府提出警告称，日本占领海南岛（1939年2月10日）已经对英法两国在东南亚的利益造成严重威胁，但这并没有引起西方国家些微反响。

[136]而中国政府试图说服英法同意让中国加入其在远东地区的反侵略战线，并且缔结中、英、法三国联防协议之事，更是得不到任何回应。[137]

欧洲列强这种不理不睬的态度，让蒋介石大为失望。他在对于英、法、苏对华态度感到高度不满之后，自然而然地希望美国能够有所作为。他写道：“而美国之和平与正义之传统精神，则自不同耳。故美国实为今日惟我中国之至友。”[138]在整个1939年5月里，蒋介石似乎做出了结论，认为与英、法、苏建立合作关系已属毫无可能，而美国则可能成为中国的挚友。但是偏偏美国的态度并不积极。尽管如此，蒋介石对于罗斯福个人的动向还是存有乐观期望。比如说，罗斯福拒绝日本要求重新调整上海租界和美国决定派兵到鼓浪屿抵制日本势力等措施，都使蒋介石视为对中国有利的举动。当然他也希望美国能够尽快修改中立法使之更有利于中国，也希望中立法能够赋予罗斯福更大的裁决权。[139]

换言之，蒋介石对于美国在远东的重要性是逐渐认识的，对于影响美国政策的企图也逐渐增强。到了6月，蒋介石又认为美国的远东政策在9～10月将会有重大动作，中国应该及早做出准备。而美国对于天津租界所持的强硬态度和对于日本轰炸中国城市的谴责，更让他感受到鼓舞。[140]特别是他感到世界大战在9月可能爆发，更让他增加了影响美国政策的企图。他认为中国应该为世界大战及早做出准备，特别是为保护滇缅公路的安全，必须和美国进行协商。[141]这一切都能充分说明美国在蒋介石心目中与日俱增的重要性。

与蒋介石形成鲜明而有趣的对比的是，胡适此时对中国政府的献言却是敦促重庆领袖们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而是应该相信美国领袖们的判断力，尊重他们得以从容地为美国本身的利益做出最好决策。胡适所持的理由则是，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所提的国际合作方案根本缺乏兴趣，也不认为英法两国应该等待美国的决策然后采取自己的行动。胡适认为中国能够采取的最上策就是静观时局变化，不要无事找事和庸人自扰。因为中国政府如果打算去影响美国，只能适得其反，徒增美国人民的猜疑而已。[142]胡适最后成功地说服了重庆外交部，先去要求英国采取行动，然后希望美国能够同意参加。[143]然而由于这种想法和英国的立场完全相反，所以中国政府早先设想的四国（英、美、法、苏）合作方案，最后胎死腹中。胡适处理中国外交策略的设想与蒋介石存在极大的差距。

更让中国不安的是，蒋介石对于欧战可能对中国造成负面影响的看法，即欧战可能占据欧洲列强的全部精力，使日本得以趁机威迫它们放弃对中国的友善政策似乎不久就得到了证实。1939年7月24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宣布英国和日本在天津签订了一项协定，英国承认日军在中国的“特殊需要”。[144]在这种新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就可以对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而蒋介石也就更迫切地希望能够获得罗斯福的保证，美国将会尽一切努力阻止欧洲列强向日本的压力屈服。[145]

到了1939年8月初，蒋介石对世界大局的分析似乎更趋具体。在他看来，英国和苏联之间在亚洲无法采取合作，其关键是美国。如果美国能够出来主导远东时局，为英苏做中介，使英、美、法、苏四国在远东事务上能够采取一致立场对付日本，则远东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否则就可能导致往昔英日同盟的复活，苏联甚至可能在英国之先与日本妥协，进而导致日、苏、意和法国建立统一阵线。而美国总统最有能力阻止这种结局的出现。更具体地说，中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积极劝说英国切不可对日妥协。[146]

而胡适的判断恰恰相反。在他看来，英日同盟的恢复完全没有可能性，纯属杞人忧天。英国既然高度依赖美国，则一定不敢冒险丧失美国的同情与支持，因此英日妥协或是同盟，可说毫无可能。至于美国政府内部政策，胡适认为美国政治体制限制甚严，不能担任联络英苏的责任，因此中国大可不必去麻烦美国。但是从大局着眼，胡适说："鄙见以为，此时国际形势急转直下，显见问题已自然成为整个问题之一部分，此事与我国最为有利。"那么中国在此时应该怎么办？胡适指出的出路是："只要我国能站稳脚跟，继续苦撑，则两年助我之友邦，必不中途负我卖我，必能继续助我，不须疑虑也。"[147]

换言之，蒋介石希望中国驻外使节能够经由外交途径，去敦促美国在远东事务上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政策。而胡适的看法，则是中国政府应该自求致力于苦撑，不要去打扰美国，因为美国绝不致出卖中国。这两个政策主张的冲突在未来的几年中屡次呈现。从事后世界局势的演变来看，蒋介石的这些分析似乎更符合现实。如果一定要挑毛病的话，或许就是蒋介石对于日苏之间必有大战的预测属于乐观过甚。

在国际问题上，蒋胡二人之间显然产生了根本性的歧见。此后数日中，蒋介石警告胡适，关于英法与日本妥协之可能，绝非出于臆断，而是有事实依据，因此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则可能导致大祸。蒋介石告诉胡适："对英日妥协事，请勿过作乐观与大意。若美国不作警告，则英法不止与日本妥协，而且安南、缅甸对我后方之惟一交通，亦将即生阻碍……情势危急，无论如何，请速设法面告罗总统是荷。"[148]短短一封电报，除了完全暴露蒋胡二人对世局看法的极端差异之外，同时显示胡适敢于对蒋介石直言不讳，而蒋介石还选择不以国家领袖的姿态要大使遵照命令办事，反而以委婉口吻请求胡适配合，这些都是值得读者注意的几个不同层面。

有了蒋介石的明确表态，胡适只好如实向罗斯福当面转达（1939年9月8日）。而根据胡适的回报，罗斯福也持高度乐观态度，认为英法在远东之地位不致受欧战影响，以英、法、美等国在亚洲的实力，日本不敢用武力逼迫。[149]有了罗斯福的呼应，胡适更增加了对自己判断正确的信心。因此过不了几天，他再度致电蒋介石称："关于英法，鄙意以为英法对日或不免作一局部的妥协，但凡有关根本原则者，似不致退让，因英法今日皆须依赖美国，决不敢牺牲我国，而大失美国感情也。"说来说去，胡适又重弹老调，告诉蒋介石中国政府的基本外交政策应该

是，“在现势之下，我国只有咬牙苦撑一途，两年之抗战已过，世界形势骤变至此，此正国运转变之纽，倘能立定脚跟，安然应付，终有苦尽甘来之日”。[150]换言之，蒋介石和中国政府不应该总是想在外交领域里找出路，去妄想催促美国采取行动改变国际局势，而应该咬牙苦撑，被动性地等待国际形势变成对中国有利。

在这几个电文来往之间，我们可以察觉到几个现象。其一是，胡适是中国派驻外国的使节，他的职务本就是运用外交手段去维护国家的利益，但是“苦撑待变”听起来似乎应该是国内领袖在抗战找不到出路时为了鼓励士气而发出号召的语气，令人不禁有职务错位之愕然。其二是，蒋介石作为在抗战困境中的领袖，对于国际情势，理应要做最坏的打算，防患于未然。而罗斯福所反映的是典型西方白人对亚洲黄种人（包括日本人）的“想当然尔”心态。胡适最赖以分析世局的权威就是白宫和国务院，缺乏独立见解和批判精神，这就难怪他身为中国大使，在许多事务上却不知不觉地在唱美国的调子。其三是，才不到一年时间（1940年夏），远东局势的演变就证明胡适和罗斯福的乐观毫无根据，而蒋介石的忧虑却不幸而被言中，因为英法两国果然相继在越南和缅甸向日本屈服。

（二）欧洲局势发展对蒋介石战略盘算的冲击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1939年8月23日）使国际局势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改变，也严重影响到蒋介石对中国局势的盘算。一方面，蒋介石担忧德苏条约可能导致英苏关系急剧恶化，进而导致远东局势恶化，同时迫使英国和法国向日本的压力低头。为了防止这种危险，蒋介石赶忙训令驻西方国家使节敦促美国主动去协调英苏间的冲突，同时也敦促英国、美国、苏联和法国政府采取共同行动去阻止日本扩张。[151]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认为，比起苏联加入英国和法国阵营而言，或许德苏条约对中国更为有利。依照蒋介石的思路，德苏条约其实可以帮助苏联从欧洲争端中抽身而退，而去全神贯注于亚洲事务。[152]尽管苏联当前的行动是拒绝与英国和法国就欧洲事务（纳粹崛起）进行合作，但是它意想不到的效果却是可能鼓励苏联更大胆地与这些国家在亚洲事务上进行合作。

这些发展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含义是，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政策既有密切关联，却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蒋介石知道，英国和法国在德苏条约签订之后对于苏联只能深怀疑惧，因此自然地做出推理，认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把这三个国家在亚洲拉进同一条战线。蒋介石认为苏联在远东事务上应该可以接受美国的领导，因为苏联在亚洲最担心的是英国和日本恢复以前的合作关系，共同对付苏联。[153]蒋介石的这些分析显示出中国领袖们已经开始对国际关系做出相当细腻复杂的思考了。

欧战爆发迫使中国领袖们考虑中国被英国和法国出卖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在开战后的头三周里举行了一连串紧急会议，评估欧战的影响和中国的对策。

在这些会商中，有几位领袖（包括王宠惠、张群、朱家骅、孔祥熙等人）强烈主张中国应该对欧战宣布保持中立，但是也有领袖主张中国切不可放弃其道德原则和对西方国家的传统友谊。蒋介石却主张中国应该有更积极的作为。在连接几天的会议里，蒋介石再三强烈主张中国应该立即对德国宣战。他的用意不但是要把中国的命运和西方国家紧紧绑在一起，而且也想防止日本趁此兵荒马乱之际，胁迫西方国家出卖中国利益。

但是也有领袖指出蒋介石的主张不切实际，因为在德苏条约中有一项特别规定，那就是苏联不可以帮助任何与德国敌对的国家。因此，如果中国对德国宣战，则苏联马上就无法向中国输入大批武器，这就会直接危害中国的抗战。当时温和派领袖们建议，中国依然可以表达对西方国家的支持，但是所使用的手段则是要求国际联盟对德国施以惩罚，或是召回中国驻德国大使。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召回驻德大使，而蒋介石也不再坚持对德宣战。[154]

有关这些会商的中方资料显示，有一小部分领袖怀疑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真实态度，因此不愿意公然采取亲西方的政策；而另外一部分领袖又对苏联对欧洲的暧昧态度感到不安，因此建议蒋介石不要过早表态而绑住了自己的手脚。[155]蒋介石则对于中国应该采取的立场似乎自有主张，而且从欧洲危机酝酿之始就持一贯坚定态度。当人们回想起当时日本、德国、苏联、英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它们之间离合变化无穷，则蒋介石的这种自始明确的态度着实颇不寻常，乃至难能可贵。蒋介石似乎在欧战爆发之前早已对其影响予以深思，而且也形成了中国政府的对策。

比如说，欧战爆发当天（1939年9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务必做出两项努力，一是阻止日本参加欧战；二是阻止日本与苏联建立和缓关系。蒋介石判断西方国家必会获得最后胜利，因此中国务必参加英法联盟，并且阻止日本参加这个联盟。更为理想的发展是，中国应该设法使日本成为英法联盟的对手。但是蒋介石也决定，万一在中国参加英法联盟后，日本也随即参加了同一联盟，则中国也依然对日本进行抗战，绝不停止。[156]不幸的是，即便在欧战爆发后，英法两国仍然对中国提出的合作方案不予理睬，而法国的态度尤其恶劣，使得蒋介石不禁怒火中烧地写道："欺善怕凶，且无信义，真无国格可言。此种民族与国家岂能久存于世乎？"[157]但是尽管感情发泄，依然没有动摇国民政府的外交大政策。

没有中方资料显示蒋介石曾经设想过和意大利或是德国结盟，也没有奢望过欧战可以使中国抗战提早结束。正好相反，他更关心的是欧战将会如何影响中国的作战能力。他一方面对于西方国家必会赢得最后胜

利的结局高度乐观，比如说，他写道：“此后我国自处之道反形简单，即对内建设四川，对倭更作持久抗战到底，以待世界战争之结果而已。”[158]但是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又高度担忧欧战可能会对中国抗战在近期内造成不良影响，使英法两国把资源全部投注于欧洲战场，而使日本有可乘之机，在亚洲遂行其愿毫无顾忌，因此中国可能会面临更艰苦的局面。[159]

众所周知，战争的真相远比其表象要复杂得多。在国际冲突中，各国不但会竭尽所能地掩饰其真正意图，还会故布疑阵，混淆敌人和旁观者的视听。中日战争也不例外。正当中国政府致力于探讨和西方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时，日本政府也在散布谣言，使西方国家误以为中日间即将达成和解。[160]日本新闻界甚至传出谣言，指称中国打算参加德苏阵营，冀此引起西方国家疑惧。日本的谣言攻势立即引起蒋介石的警惕，并且尽速召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后者保证中国绝不会背弃英国和法国。[161]

欧战爆发使得蒋介石相信，即便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气氛依然浓厚，它最终必会承担起全球性责任，而中国的利益也必将受到美国全球政策的严重影响。1939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所获得的情报也使蒋介石提出预测，日本和苏联签订的边境停火协议不久将会变成互不侵犯条约，而日苏间的这些协议又将鼓励日本实行“南进政策”，同时促使苏联向中国施压尽快与日本议和。

尽管此种情势已经足够让蒋介石头疼不已，但是更让他忧心忡忡的是英国和法国对于日本的计谋似乎缺乏警惕，而且还心存侥幸地以为只要牺牲中国就可以保护它们在远东殖民地的利益。在蒋介石看来，除非美国能够承担起领导责任，否则英国和法国必将在亚洲节节败退，中国必将变得愈加孤立无援，而日本将更能实现其东亚新秩序的野心。反之，如果美国政府此时做出坚决反对日本的姿态，则或许可以为英法两国壮胆，阻止它们对日妥协。[162]

显而易见，蒋介石到了此时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的命运和世界某些其他国家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即使遥远的欧洲也必会密切影响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中国外交的处理，明显地采取了一个世界视野。他同时也越来越相信只有美国才有足够力量去影响全世界的政治和军事演变。正是这些思维方式，使得美国在中国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变得益发明显。

（三）蒋介石与胡适对于国际合作问题在认知上的差异

在这种国际局势瞬息剧变的环境下，蒋介石和胡适之间在对美政策上逐渐产生了重大分歧。简言之，蒋介石渴望从美国取得援助，而胡适

则并不积极地将之付诸实行。基本上，蒋介石想要做到的是，建立一个全球性而又常规化的国际合作机制，例如由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也可容许苏联参加）组成国际会议，而胡适则不认同这种想法。

蒋介石心中最大的恐惧，就是英国和法国被迫对日本妥协，因此强烈希望胡适能够从罗斯福那里获得承诺，去协助这些国家敢于与日本抗衡。但是胡适除了本性乐观之外，还对西方民主国家的荣誉感充满信赖，因此对于蒋介石的疑惧，忍不住拿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教诲语调，开导蒋介石无须对英日之间的协调太过操心。更让蒋介石气愤并无法释怀的是，胡适居然坦然承认他已经自作主张决定不把蒋介石致罗斯福的重要电函亲手交给对方，而是托由第三者转交。而胡适所持的理由居然是美国领袖们都正在全神贯注于欧战战局，根本无法顾及中国这类次要问题。所以胡适的建议是，中国政府应该“识相地”避免去强人之所难。

胡适继续以开导式语气劝告蒋介石，应该体谅美国政府手中的时间和资源都有限，而需要处理的事务又很多，因此也无暇顾及修复英苏之间关系，或是促进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共同对付日本这类事务。[163]事实上，胡适毫不婉转地告诫蒋介石毋庸操心，也不要用中国问题去烦扰美国领袖们，因为美国人需要关注的是更重要的世界大事。但胡适的信立即受到蒋介石的驳斥。蒋介石同时提醒胡适称，假如美国不能及时向日本提出警告的话，则英国和法国不仅会向日本屈服，而且会对经由越南和缅甸通往中国的国际运输线采取不利措施。[164]

1940年夏世界大局的发展，很快就证明蒋介石的忧虑是有根据的，而胡适对西方国家荣誉感和善意的信心却是悲剧性错误（见本书第六章）。但是胡适对于蒋介石屡次要求他去促请美国政府担负起领导国际合作的责任的要求一再推卸，而他回复蒋介石要求的一贯说辞则是，美国的法律不容许其政府去做任何政治或是军事的承诺，[165]因此中国的饶舌并无意义。

胡适不假辞色地告诉蒋介石，后者希望美国能够出面领导西方国家对抗日本的想法，根本脱离现实，因为很少有美国领袖会对此有兴趣。他指出，更糟糕的是有些美国人甚至怀疑英国和法国的阴谋，正是想激怒美国去和日本发生冲突，借此避开锋芒而坐收渔翁之利，以保护它们自己在亚洲的殖民利益。[166]蒋介石和胡适之间存在如此重大的意见鸿沟，中国促进国际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侵略的努力毫无进展就不足为怪了。

有关中国政府努力促进国际合作想法的演变，还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虽然蒋介石对国际合作这一观念深感兴趣，但是他最终目的还是想让中国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对日抗战。中方史料显示，每当蒋介石畅言国际合作时，他的唯一的或是主要的目的，都不曾是想借国际力量去替中国和日本作战。易言之，蒋介石希望国际合作可以增加中国的作战能力，而不是去取代中国军队本身的战斗。在西方史学界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政府从来不想对日作战，或是它急于想要挑起国际干预以便让

中国本身可以停止战斗。到目前为止，本书作者还没有看到史料可以支持这个论点。

第二，中国政府对于国际合作的思路，从早期就是想要团结西方民主国家的力量，去对付日本及其法西斯盟友。在这个思路里，苏联占据了一个特殊地位，因为中国政府一直无法猜透苏联的意向。一方面，在蒋介石心目中，苏联一直是中国军事结盟的首选，但是苏联与英国和法国的摩擦以及它与纳粹德国和日本的友好关系，又让中国政府难以安心。中国政府的最大愿望是由中、美、英、苏、法五国达成合作。但是在实际上，中国政府也一直持有心理准备，苏联很可能参与敌对阵营。

第三，从1938年开始，蒋介石和其他领袖就已经相信，唯有美国同意出任领导，才能使国际合作成为事实，因为只有美国才具备足够力量对抗日本，以及保护英国和法国免于在亚洲遭受日本威迫。还需要指出的是，其实中国政府对于“国际合作”这个概念的内容，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给予明晰界定，只是停留在泛泛而论的层次。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提出具体的政治军事联盟方案，因为它显然以为，仅是用西方列强的外交力量和声势（比如说，召开国际会议）就可以遏止日本的侵略野心。

最后，中方史料显示，蒋介石一直是国际合作概念的热心推动者，并且也经常以全球战略眼光去分析国际局势。即使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下，蒋介石也总是高度关切欧洲和亚洲局势的互动关系，随之把中国的战局放在一个全球性的框架里去分析。一个颇为明显的例子是，早在1939年3月，蒋介石就曾经说过：“非将中倭战争，加入于欧战局势之内，形成整个问题不可。”[167]

蒋介石推动对美外交的困境，是不得不高度依赖胡适去帮他争取美国的帮助，而胡适又偏偏有他自己独到的想法。透过胡适大量的文章和演讲词，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对很多问题显示出思想缜密，而对时事发展也有合情合理分析的人。但是在1937～1940年，胡适对于国际合作这个课题，却似乎并没有为后人留下资料，因此我们并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相比之下，蒋介石、外交部长、驻法大使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甚至驻苏联的杨杰都积极参与工作，彼此互相呼应地，致力于说服欧洲列强团结力量共同对付日本，而胡适对于扮演这个角色则似乎完全缺乏兴趣。事实上，当中国驻欧洲各国使节都为了不能达成此目的而感到沮丧时，胡适在美国却不断地给重庆政府泼冷水，敦促后者打消此念。

结果是，胡适在促进国际合作工作上的成绩，可能是他在履行大使职务时最乏善可陈的一部分。本书后文将要说明，这种现象并不难解，因为胡适基本上认为国际事务的发展自有其逻辑和规律，绝非中国政府一厢情愿所能改变。因此，如果中国政府妄图扭转局势发展，或是改变世界列强的外交政策，则无非庸人自扰而已。总的来说，当时中国想要促进某种程度的国际合作，它的原动力主要来自重庆，特别是蒋介石个

人，而中国驻美的外交官并没有提供任何协助，反而是一盆一盆的冷水。

五 胡适对于中国坚持抗战的贡献

在胡适的大使生涯里，一个令他特别关怀的问题就是对日和战的大是大非。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并无太多讨论。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和战问题通常并不是由其驻外使节去讨论，而是由国家最高层领袖们去裁决，然后交由驻外使节去执行。但是胡适认为他必须以坚强姿态加入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由于胡适有一群位居要冲的好友（包括王世杰、翁文灏和陈布雷），因此他对于国内和平运动的暗潮了如指掌，熟悉其领袖人物以及他们的论点和活动细节等。

身为中国驻美首席代表，胡适的地位让他能够告诉蒋介石有关美国政府对中国和平运动所持的负面态度。而胡适也能够告诉美国政府有关中国对于和平的态度。虽然胡适一生中对许多事务都采取温和中庸态度，但是他对抗战必须坚持到底却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而他对和平活动的反应则极为强烈，绝不妥协，甚至主动予以抨击。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时逾越一个驻外使节应有的权限，紧紧盯住国内政治领袖们的一举一动。这种作为可谓极不寻常。

为了评估胡适对于坚持中国抗战国策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本节将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胡适介入前，中国领袖们对于和战的态度

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决定和战问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敌人意向的估量，对其野心限度的猜测，对本国资源和民心的衡量，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团结的程度，两国武力的比较，各个国家承受痛苦和破坏的耐力程度，国际上可能产生的谋略，以及中国本身在当前世界中是否得以维持生存，等等，都会严重地影响到每个人对和战利弊得失的衡量和选择。从1937年开始，把战争看成爱国，把和平看成卖国，只能说是头脑简单的思维方式。同理推之，把所有的主和派一律视为“亲日派”或是投降派，也是不合情理。

诚然，有些中国领袖为了私利不惜放弃道德立场而去和日本妥协，但是也有许多领袖出于对国家及同胞的深切关怀而对和战问题感到左右为难。这些人的道德和爱国心不容置疑，但是他们对于国家利益之所在的盘算却可能大相径庭。更何况，他们的政治立场并不是自开战之初就一成不变，而是深受开战后不断的挫败而逐渐改变的。

蒋介石可能是中国领袖中自始就下定决心要对抗日本侵略的。也有其他领袖最初追随蒋介石立场，但是后来逐渐认为和平才是真正救国之道（如孔祥熙），更有一些领袖自始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纷争（如蒋廷黻和王宠惠）。战场上的重大失利当然也改变了某些人的态度。比如说，在1937年8月，国民党元老居正一度愤怒地谴责胡适的和平论调，但是到了11月底，他因对战场溃败感到极度忧伤，改而主张和平，乃至主动提出愿意牺牲个人政治生命去签订和平条约，以求拯救国家免于灾难。[168]

即使是主和派领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不愿意和蒋介石正面决裂，而希望能够抓住机会去向蒋介石做出和平建议。我们还应该记得的是，在1937～1939年，和平论调并非政治禁区，讨论和平并不会引起他人在道德上的谴责。

尽管蒋介石个人在和战问题上早已采取了明确而强硬的立场，其他负责任和有爱国心并且头脑清醒的领袖，依然可以心平气和地去论证和战的利弊。“和平”并没有和“卖国”画上等号，它只是让中国去和日本讨价还价，争取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停止军事冲突。而鼓吹和平的人也不认为他们自己比主战派更不爱国。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像蒋廷黻这样受人尊敬的学者，可以毫无顾忌地承认他主张和平。这种高度自由的气氛，一直等到汪精卫从重庆逃走投靠日本之后，才发生了决定性改变。

以上这个简略的历史回顾能够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在私下，当胡适已经完全得知主和派领袖们的主张时，也从来没有谴责过他们。他只是批评这些人不切实际而已。这个回顾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蒋介石在这些岁月里的处境颇为微妙。一方面他受到主和派压力催促他去试探和谈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敢轻易地去钳制他们的言论，唯恐因此引起领袖层内部的冲突。[169]

在最高领袖层中，既主张和平又对蒋介石忠贞不渝的是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和王宠惠（外交部长）两位重要阁员。两人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无疑具有重大影响力，而又正好都是胡适行政上的顶头上司。

孔祥熙倾向和平主张绝非因为他是亲日派。事实上，孔氏对日本从无太大兴趣，而在知识和感情上则非常接近美国。他的主和立场也和他的政治盘算扯不上关联，因为他不像汪精卫，从来没有野心脱离蒋介石的圈子去另起炉灶。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有很大野心的人，而且在私人关系和政治上，始终对蒋介石忠心耿耿。[170]

作为一位财经界人士，孔祥熙对军事缺乏了解，但是他的专业背景让他相信一个经济和科技落伍的中国，根本无法和一个高度现代化的日本对抗。在开战初期，孔祥熙也曾经努力遵从蒋介石指示，争取西方国家的精神和物质支持。但是一旦西方国家援助无望而中国军队又节节溃

退时，孔祥熙就相信中国已经竭尽其力，而应该尽快停止武装冲突，以避免全盘瓦解的悲剧。孔祥熙在个性上并不是一个刚强的人，他缺乏信念，更缺乏好斗精神。因此当军事挫败接踵而至时，孔祥熙就想要找寻一条出路退出战局。从1937年底开始，孔祥熙经常向中国领袖们发表议论，认为中国缺乏能力和日本继续打下去。[171]

同样，外交部长王宠惠也非亲日派，他生长在广东，曾远赴西方留学。因此，无论是在感情或是知识上，王氏都只跟西方接近。王宠惠在个性上和孔祥熙颇为相近，他为人随和，对于敌人或许宁可停止冲突也不愿意抗战至死。几乎从中日开战以来，王宠惠一直担心冲突的升级，不断谋求和平之道。当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派军队驰援华北战场时，王宠惠立即大为紧张，曾经试图说服蒋介石对日本做出让步，赶快结束武装冲突。[172]

当德国大使陶德曼（Oscar Trautman）在1937年底转达日本的和平试探时，孔祥熙和王宠惠二人立即力促蒋介石接受和平。[173]而当蒋介石拒绝正面响应时，孔祥熙在感到极端沮丧之余，还试图说服蒋介石，称德国的试探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174]然而蒋介石拒不回应日本和平条件终于关上了和平之门，因为蒋介石始终坚持一个立场，那就是即使当和平条件的内容可以接受时，和平的形式也必须经由第三国调停和保证，因为他无法相信日本人。[175]

以实质而论，孔祥熙和王宠惠对于和平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和汪精卫非常相似，然而他们对蒋介石的政治忠诚度比汪精卫要深厚得多，因此只要蒋介石坚持抗日，他们二人绝对不会和蒋介石分道扬镳。但是孔祥熙和王宠惠也无可避免地使蒋介石陷于一个尴尬处境。因为他们二人是中国政府的最高官员，虽然他们的忠诚度毋庸置疑，但是他们对于和战问题的政治判断则与蒋介石截然不同。蒋介石无法撤除他们的公职，因为他不容易找到如此可以信赖的下属，也不能对他们严词训斥。

就是这种微妙的环境，使得在美国任职的胡适，对于中国政府的国际事务战略考虑，反而能够扮演一个特殊角色。胡适没有参与德国的调停工作，因为他没有及时得知事件的发生。但是胡适不断地劝说重庆政府必须坚持抗战，却对蒋介石在中国国内的政治地位产生了正面影响。这倒不是因为胡适对于和战问题的个人意见受到国内各界的特别关注，而是因为胡适最熟知美国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由此增加了他发言的权威性。因此，胡适向国内政府所发出的电报，不但佐证了蒋介石坚持抗战立场的正确性，也让蒋介石可以据以警告孔祥熙和王宠惠等人，赶紧停止他们的和平论调，否则中国可能会遭受极大风险，失去美国的支持。

一般而言，中国领袖们对于和平问题的分歧看法，最多只是在政府高层内部交换而已，他们毫无可能控制日方言论或是实际行动。而在1938～1939年，日本方面对于和平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而且通过不同渠道把它对和平的信息向外界广为传递。日本似乎急于通过各种不同

渠道向中国人传达和谈信息，也提出各种不同说辞冀图说服中国政府，战争其实对双方的国家利益都会有所损伤。不同背景的日本人士透过非官方和半官方渠道所提出的各式各样的和平论点，在中国领袖们中不免产生了一个印象，那就是日本希望能够展开谈判，最终导致日本从中国撤离。但是与此同时，日本也指望中国做出让步，让日本政府可以向本国人民解释为什么他们所承担的战争消耗是物有所值，也让日本军队能够体面地从中国撤回本国。但是蒋介石历来所能接受的和平是日本必须“无条件”从中国撤退，同时还必须重申保证尊重中国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就蒋介石立场而言，这些是让中日能够开始谈判两国争端的最低限度，而且不可附带其他条件。[176]

蒋介石的立场显然让日本不敢贸然接受，因为风险过大，假如日本从中国无条件撤退，而蒋介石事后拒绝和日本签订任何协议，则日本将何以自处？对此，蒋介石的回应是，这正是他所坚持的“恢复七七抗战之前现状”的本意，那就是，伸张中国的完全自主权以决定是否与日本达成协议。无须赘言，蒋介石若要坚持如此不妥协的立场，则中国必须有继续抗战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寄望于能否得到国外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当中国政府的指望逐渐由苏联和欧洲列强转移到美国时，胡适的想法就将会在中国政府内部受到日益增加的重视。

（二）1938～1939年中国外交的挫折

但是孔祥熙却有强烈愿望去拉近日本人和蒋介石之间立场的差距，因此促使他在1938～1939年利用他已经建立的两个渠道，去试探是否可以达成和平。由于当时有许多和谈的传闻都声称与孔祥熙有关，但又无法验证，所以本节下文的讨论只限于目前公布的中方史料所能证实者。

孔祥熙的第一个渠道是运用个人亲信，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和日本人进行接触，这些日本人既有政府官员也有非政府官员。但是一旦蒋介石获知这些接触后，在1938年9月就命令孔祥熙立即终止。[177]然而孔祥熙阳奉阴违，并没有遵从蒋介石的命令。因此当蒋介石的情报人员发现了这些接触时，他当即对孔祥熙下达严厉警告（1939年9月22日）。而孔祥熙也被迫写了一份17页的自白书，承认他的亲信的确在香港和日本人保持联系，而且他本人也和某些日本人曾经互相问候致意。但是他坚决否认曾经和日本人私下举行过和平谈判。并且他表示，如果蒋介石的调查能够提出确切证据证明他曾经参与过这类活动，他愿意接受严厉惩罚。孔祥熙还声称这些指责都是有人对他存心陷害。[178]

孔祥熙的第二个渠道是利用公开场合在政府领袖内部制造有利于和谈的气氛。在政府领袖们非正式的聚会中，或是国防最高委员会例行会议里，主和派分子在1938年都可以公开而又自由地阐述意见。委员会开

会的气氛自由而委员们又可以畅所欲言，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本人忙于战场事务而几乎从来不参加会议，而会议经常是由汪精卫或是孔祥熙主持。

当时领袖们如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人从不隐瞒他们的观点，认为中国必须尽快停止战争。[179]孔祥熙也明确表示他同意汪精卫等人的立场，主张中国应该以向日本做出让步来谋求停止冲突。1938年下半年，当广州和武汉的局势相继恶化时，主和派的论调变得更为明目张胆。[180]但是汪精卫和孔祥熙都感到不知如何去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和平要求，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日本人所坚持的一个和平的先决条件，那就是蒋介石必须下台。

日本人也致力于制造和平气氛，他们所采用的策略是保持模糊态度，又让中国人认为和平在望。依汪精卫和孔祥熙看来，日本人在10月底对于和平条件似乎又有了松动，但是依然坚持蒋介石必须下台。11月2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称，只要国民政府放弃仇日亲共政策和改变其领导人（蒋介石），则日本愿意让中国加入它的东亚新秩序。这个声明显示，蒋介石已经成为和平最大的障碍，而只要蒋介石被排除在政府之外，则日本愿意和国民政府进行谈判。这和以前日本根本拒绝与国民政府谈判的立场相比，又似乎松动了许多。[181]

更有进者，有些西方列强此时也加大力度，催迫中国寻求和平解决之途。不但意大利和德国继续致力于调停中日冲突，即便是英国在1938年也一再表示有高度意愿调停中日冲突。[182]唯一没有介入此项努力的西方国家是美国。事实上，日本也特别声明它不欢迎美国介入调停中日冲突。[183]

面对政府内部和列强交叉催促中国寻求和平的巨大压力，蒋介石想要坚持己见实非易事。即便是他保持沉默，也很容易被外界解释为是对于和平活动的默认，因而严重打击中国的民心士气。只有蒋介石做出一个明白的反对和平的表态，才能使各式各样的和平活动中止或胎死腹中。因此在1938年7月初，为了有效地粉碎各种对和平的谣传，蒋介石特别向外国记者宣布，他反对任何不能完全恢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和平方案。蒋介石更指出，调停工作只能打击中国士气，有害而无益，同时希望他的公开声明可以有效地关闭所有的调停之门。[184]

1938～1939年是抗战中情势极为严峻的年份，但是蒋介石的坚持抗战心理似乎未见软化迹象。这可以从他日记中选取几则作为说明。

1939年3月30日，他写道：“高逆宗武、周逆佛海仍以余之名义在敌国政府卖空求和，使敌妄念不断，而不知其全为高逆所欺弄贻误也。郑异不察其奸诈，而乃竟以高逆函件呈余，党员之愚鲁与国人程度之低劣，为之心痛不置。惟有断然决绝，除恶务尽，使敌能有所大悟也。”

1939年4月1日，他又恨声不绝地写道：“汪（精卫）怂恿敌攻南昌

长沙，打通浙湘路之企图，汪肉不足食矣。”又写道：“汪高勾敌，不料其仍以中央代表名义卖空。此种卖国卖友，欺敌自欺劣性，诚狗彘之不若矣。而敌国不察其欺伪，乃竟照其言而行，更为可笑。”而蒋介石此时还希望国民政府在安南行刺汪精卫的举动应该让日本醒悟，汪的出走绝不是在和重庆政府唱双簧的一出戏。[185]

此时日本又散布风声，表示愿意和中国政府达成和平协议，而其所持之理由是这可以使日本与德国共同对付苏联。在蒋介石看来，日本早在1938年就曾经使用过同样伎俩，最后终归失败。而蒋介石所持的立场则是中国必定继续坚持抗战，直至日本在中国战场筋疲力尽，才有真正的和平希望。[186]到了4月5日，他就把话说得更为绝情：“如有以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之声明为和平根据者，即为卖国之汉奸。”显然此时在国内还是有人希冀借着近卫的和平攻势做文章，而蒋介石则提出最严厉的警告。不久，他又亲自花了几天时间手拟谴责汪精卫卖国的文章，并且对自己的文章深感满意。[187]

（三）胡适对和平的态度

面对来自国际的压力，中国没有理睬意大利和德国的和平建议，对于英国想要插手调停的试探也不予回应。蒋介石此时唯一能够给予信任，并且可以坦诚地就和战问题交换意见的对象，似乎只剩下美国而已。[188]蒋介石向罗斯福通报（1938年10月8日）有关意大利和德国企图调停中国和平的动作，同时他也向罗斯福表示中国只把美国看成可以促成和平的领袖。也正是因为蒋介石对罗斯福的信任，使胡适得以有机会比中国其他驻外使节扮演更活跃的角色。

早在1938年中期，当胡适首次听到谣传称孔祥熙可能将会推动对日和谈时，立即向蒋介石提出警告说，中国寻求和平的念头荒唐透顶，因为和平比战争要困难得多。他认为坚持抗战可以给中国带来许多好处，而和平活动只能削弱美国的支持。[189]1938年末的情势为胡适提供了一个机会发挥更大力量去影响中美关系。罗斯福在1938年10月19日致电蒋介石称，只要时机成熟，他一定会尽一切努力去为中国争取和平。[190]胡适为了呼应罗斯福的电文，也致电蒋介石（10月20日）称，因为美国协助中国赢得正义和平的机会尚未来临，中国目前最好的策略是“苦撑待变”。[191]

当第一次中美桐油借款谈判在1938年底将近成功之际，罗斯福获悉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而中国国内主和派又在积极倡议和谈，难免大为紧张。他所担忧的是，万一在美国政府刚刚批准借款不久，中国政府就放弃了对日抗战，这会给他在政治上造成重大难堪。因此当胡适得知（1938年10月25日）罗斯福希望中国千万不要放弃抗日政策时，他就赶忙要求重庆政府立即发布声明，做出绝不和谈的保证。[192]而当胡适

得到蒋介石回电对罗斯福做出保证时，他还认为蒋介石的语气不够坚定，因此决定大幅删改蒋介石的电文，务求能够稳住罗斯福的信心。[193]胡适在处理这次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果断，和他以往行事的慢悠悠而又不积极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极不寻常。也由此可见，胡适在处理和战问题时几乎换了一个人似的。

与此同时，胡适为了帮助蒋介石压抑主和派气焰，又分别致函汪精卫、孔祥熙和翁文灏等人，反复申述他历来的主张，认为中国除了抗战之外，别无他途可走，因为国际发展已经越来越对中国有利。胡适一方面向蒋介石报告美国借款即将批准的好消息，另一方面又从蒋介石处得到了一个绝不和日本和谈的承诺，因此他既对阻止和平运动做出了贡献，又帮助蒋介石巩固了他在中国政局中的地位，加强了蒋介石反对和谈的决心。蒋介石采取焦土政策去对付日本侵略，使日军无法获取中国资源，同时显示中国决心，宁可大规模地自我毁灭，也不向日本人屈服。在此期间，蒋介石花了大部分时间在前线监督陆军作战，而且在政府机构从武汉撤往重庆时，他是最后一批抵达重庆的政府官员。就在这个时候，汪精卫决定做出最后一次努力，说服蒋介石去和日本进行和平谈判。这次汪蒋二人面对面的谈判，在蒋介石刚刚抵达重庆时就举行了，而汪精卫遭到彻底的拒绝。[194]

这次会谈对于汪精卫和他同伙人的沉重打击，可以从陶希圣写给胡适的一封信里看出。陶希圣是汪精卫阵营中一员大将，他在信中对于此次会谈向胡适做了一个生动的叙述。在汪精卫和主和派的人士看来，蒋介石在12月初从前线回到重庆后态度截然改变。陶希圣抱怨蒋介石完全无视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危险，只是一味坚持称日本已经没有足够兵力可以继续战斗，并且对日本的和平试探完全不屑一顾。[195]12月9日，蒋介石在一个高层会议上，再度重申继续抗战的决心，完全不理睬孔祥熙关于日军可能会从广西向贵州进攻的警告。当汪精卫询问国民政府的和平条件究竟为何时，蒋介石的回答简单干脆，那就是必须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别无其他途径。[196]

蒋介石这种强硬态度最终让汪精卫相信，只要他继续主持重庆政府，和平就没有希望。在汪精卫和主和派看来，蒋介石11～12月这种对日态度显著的强硬化，只能表示他对国家民族所面临的重大灾难完全视若无睹，他一心一意想战胜日本只是沉迷于自己的幻想世界，而主和派的努力注定必将全盘失败。更让主和派气愤难平的是，他们的主和论点在此前一向受到尊重或容忍，可以在政府内部自由表达，而现在居然被蒋介石指责为是一种罪恶行为。[197]12月18日，汪精卫终于自重庆出走，取道河内，去追寻一个和日本人合作的途径。

（四）胡适在汪精卫叛逃后影响力的增加

在整个中日冲突过程中，蒋介石个人的信念一直是和战决策最重要的因素。虽然他在1938年底对日继续抗战的决心和七七事变时相比并没有改变，但是他的政治处境因为1938年底的势态而受到重大打击。因此胡适来电转达美国政府不但希望中国能够坚持抗战，而且答应未来会向中国提供有效支持，对于蒋介石而言，不啻是来得非常及时。到了年底，中日关系的发展正如胡适所希望的，即双方毫无妥协迹象，这与蒋介石和胡适在这个问题上的配合无间不无关系。

然而中国抗战国策不久又面临一个性质不同的挑战。1939年夏季欧洲局势持续恶化，导致部分中国领袖开始担心英法两国可能会向日本屈服而放弃它们在日本占领区内的租界，而这些租界多年来正是中国抗日人士所依赖的藏身之地。他们也担心英法两国将会向日本屈服，而关闭经由越南和缅甸通往中国的通道，而这两个通道则是中国抗战得以持续的生命线，因为所有重要的外国物资和武器弹药都必须经由它们运进国内。1939年8月23日苏德协定的签订，使得中国更为担心苏日和解即将达成，这就可能导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立即停止。而苏联和日本在边境冲突的停火，只能加重中国政府的担心。

面对这一连串发展，当胡适从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好友处不断听到和谈谣言时，必然提高了警觉。胡适所听到的是，孔祥熙和王宠惠仍然在努力探索试探和平之路。在1939年9～10月，孔祥熙和王宠惠二人趁着蒋介石离开重庆到前线视察时，居然擅自向某些外国记者宣称，中国政府希望罗斯福能够调停中日冲突。[198]王宠惠同时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1939年10月19日）上，企图说服其他领袖去敦请美国介入调停中日冲突，并透露他本人已经就此事和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做过讨论。[199]

这些事件表示，孔祥熙和王宠惠之间已经达成协议采取共同行动，也显示出当时重庆政府最高层领袖们对中国的对美关系和对日抗战大计，都严重缺乏共识。多数领袖在蒋介石缺席的情况下，不知如何处理孔王二人的建议，但是孔王二人则坚信他们的立场合情合理。在他们眼里，任何和平方案都必须得到美国人支持，原因是蒋介石一直坚持中日之间的和平协议必须经由第三国来调停和出面保证，而美国则比任何其他列强更能得到中国的信赖。

为了使这些和平试探尽快胎死腹中，胡适赶忙警告王世杰（1939年10月17日）称，王宠惠的言论已经在美国激起了不良反响。胡适还警告说，和平比战争要困难一百倍，因为和平只能牺牲受害者，但是并不能满足侵略者。[200]但是不久胡适收到经济部长翁文灏的一封信，使他更为担心。因为翁文灏暗示有一位文人领袖（指孔祥熙）实际上已经派遣一位代表赴上海去和日本人进行谈判。翁文灏不仅担心和平活动可能严重妨碍中国的军事处境，而且还可能会使中苏关系变得益显重要，进而引起美国人疑惧，并且导致其他西方国家改变对中国的态度。[201]

在这一大堆有关和平活动的谣言甚嚣尘上之际，胡适收到了四条从

重庆政府寄来的指令，嘱他去探询罗斯福是否有意调停中日冲突。胡适决定依据自己的判断，拒绝执行重庆的命令。胡适向重庆解释称，当此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中国第二次贷款之际，如果中国表示希图和平的话，必将会妨碍贷款进行。胡适同时指出，罗斯福前此已经拒绝了希特勒同样的建议，因为希特勒也曾经认为他是调停欧洲冲突的最佳人选，但是罗斯福不为所动。胡适相信罗斯福拒绝希特勒之举让他的态度非常明显，而中国不应该冒险提出类似的建议而去遭到拒绝。[202]

但是，仅是告诉重庆政府不可寻求和平并不能让胡适感到安心，他进一步还想要肯定美国政府将不会与中国政府合作去寻求和平。胡适的这项努力在10月中旬基本取得了成果，因为他写了一封五页的长信（未签名）给亨贝克，敦促美国政府一定要拒绝扮演和平角色。他甚至劝告美国政府不要把王宠惠的要求当真去处理。但是胡适的目的并不仅是劝告美国政府拒绝接受调停角色而已，他要做的是告诉美国，调停工作有其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

胡适警告称，任何日本可以接受的和平，都不可能是一个公平的和平，而只能是一个远东慕尼黑协定的翻版，只能严重伤害美国的声望。[203]显而易见，胡适的目的是尽一切努力打消美国人介入和平活动的念头，即便是违背顶头上司的指令也在所不惜。最终结果是胡适得以如愿以偿，亨贝克向国务卿赫尔提出建议时称，任何美国政府寻求早日终止中日冲突的努力，都可能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重大伤害。[204]

几天之后，胡适更是兴高采烈地跑去通知美国政府称，原来王宠惠在1939年9月27日对外国记者的谈话是在蒋介石离开重庆的情况下做出的，并没有获得蒋介石授权。事实上，蒋介石对于王宠惠的谈话内容深感愤怒，并且命令王宠惠立即宣布收回该项言论。[205]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蒋介石也同时向孔祥熙、王宠惠和其他官员下达了更严峻的指令（10月28日），此后不许再向罗斯福请求调停中日冲突。[206]

不久之后，蒋介石本人又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宣布，中国将继续抗战，既不寻求和平，也不欢迎外国介入调停。他更进一步宣布，中国既不依赖外国施以援助，也不会在欧战持续的过程中去考虑中国本身的和平。[207]但是这一连串事件也显示出，蒋介石此时对中国政府内部并没有充分的控制权，而政府高层领袖们不但可以发表个人的看法，甚至还可以从事未经授权的和平活动。

而胡适本人不但想要使中国的和平活动胎死腹中，而且也想要阻止美国政府插手其事，即使是冒着越权行事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而稍后在1941年，同样情况又再次发生。在当年晚春期间，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胡适非正式探询，中日冲突是否可能和平解决。依据赫尔的说法，日本官员曾经告诉美国人称，如果美国可以降低对日本的压力，则日本可以承诺去寻求途径结束中日战争，并且从轴心国条约中逐渐退出。

胡适闻言后，毫不迟疑地立即回复称，此种可能性完全不存在，并

且随之又送给赫尔一份备忘录，重复他的立场。正如当时甫上任的郭泰祺外交部长所指出的，胡适的行为大大地逾越了一名外交官的权限。因为他在事前既没有要求政府授权，事后也没有向政府提出报告，[208]纯粹是独行独断，自作主张。但是他对和战问题之坚定，也由此可见。

总的来说，胡适在和战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他在许多别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截然不同。如同前文所述，胡适在许多别的事务上所持的立场多半是谦让的甚至是被动的。但是在和战问题上，他的立场却是从不迟疑，甚至逾越职权地反对任何有关和平的论调或行动。他有技巧地运用了在华盛顿的地理优势，密切注视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态度，随时向重庆政府通报。更重要的是，他利用了在华盛顿的优势向重庆政府传递信息，阻挡任何想和日本人寻求和平的努力。

在这方面，胡适的作为对于蒋介石可说是非常有价值。这并不是因为蒋介石需要胡适的开导和鼓励去进行对日抗战，而是他需要胡适帮忙去说服中国政府内部其他领袖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因为在政府中两位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参与人都一直倾向对日求和。胡适不断地来电警告称，和平将会损害美国对中国的支持。他的这一说法无疑加强了蒋介石在政府内部对付主和派的力量。我们或许可以设想，假如当时中国驻美大使反对和平的态度不如胡适那般坚决，则蒋介石面对来自主和派的压力或许就要大得多，甚至难以抗拒而不得不有所妥协。事实上，胡适不仅尽力阻挡中国不要去寻求和平途径，也同样尽力阻挡美国不要去充当调停人。在这个意义下，而且也是颇具讽刺性地，胡适对中国外交的贡献并非运用他的能力去影响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而是利用他的特殊地位促使中国坚持继续抗战。

[1]《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9日。

[2]《蒋介石对王宠惠的指示》（1938年9月20日）、《蒋介石对孔祥熙的指示》（1938年9月21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16，#13306、13310。

[3]《蒋介石致汪精卫电并转孔祥熙、王宠惠》（1938年9月2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300016065。

[4]《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38年9月2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300016069。

[5]《孔祥熙致胡适电》（1938年9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第1页。

[6]《蒋介石致萧仙阁指示》（1938年9月28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第28辑：001。

[7]《面训要点》（1938年10月8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第28辑：001。

[8]《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25日；《外交部致胡适电》（1938年10月1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1页。

[9]《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8年9月2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

002090103016114。

[10]《孔祥熙致蒋介石电》（原件字迹不清，应为1938年12月3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08001。

[11]《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40年5月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1088201007。

[12]《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0年2月22日。

[13]《胡适致蒋介石函，托陈布雷转交》（1939年12月4日），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G-2。

[14]《外交部徐谟次长致顾维钧大使电》（1940年10月3日），《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461页。

[15]胡适此种行为的一个例子发生在1939年1月，《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342～343页。

[16]Hu Shih letter to Hornbeck，March 6，1943，Hornbeck Papers，Box 80.

[17]微尘：《如此外交》，《独立评论》第138号，1935年2月17日，第2～5页。

[18]《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8年3月16日；Hu Shih letter to Stanley Hornbeck，February 28，1938，Hornbeck Papers，Box. 80。

[19]Min-chih Chou，*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4），p. 126.

[20]Min-chih Chou，*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p. 126.

[21]《孔祥熙致蒋介石函》（原件无月份，当为1938年10月31日），《特交档案·外交》第8册《国际情报及宣传》：48587。

[22]刘锴：《备受美国朝野敬重的外交家》，《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年5月，第153～155页。

[23]Hu Shih，“I Became a Trained Public Speaker，”*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14，1980-81，pp. 31-34.根据胡适本人透露，他有时会花费2～3周去准备一次演讲。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第70页；《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0年6月1日。

[24]Chih-p'ing Chou，*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vol. 2. 有关胡适在1937～1942年演讲更详细的资料，请参阅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出版社，1989，第163～177页。

[25]张忠栋：《胡适五论》，第143～145页。

[26]Min-chih Chou，*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p. 126。

[27]《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76～277页。

[2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Department of State，written by Hornbeck，December 13，1937，Hornbeck Papers，Box 59.

[29]有关胡适公开演讲效果的不同评价，参见朱文华《胡适评传》，重庆出版

社，1988，第272～273页；耿云志《胡适与抗战》，张宪文等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第805页。

[30]*The Gallup Poll*，Public Opinion 1935-1971，vol. I，pp. 69，159.

[31]*The Gallup Poll*，Public Opinion 1935-1971，vol. I，p. 70.

[32]*The Gallup Poll*，Public Opinion 1935-1971，vol. I，pp. 90，159-160.

[33]*The Gallup Poll*，Public Opinion 1935-1971，vol. I，pp. 168-169.

[34]The *Gallup Poll*，Public Opinion 1935-1971，vol. I，pp. 196，268，306.

[35]有关中国人对这些因素所持的观点，参见《王世杰日记》，1937年9月29日、12月22日；唐培吉、王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张宪文等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676～678页。

[36]《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0年7月12日。

[37]"Speech Delivered by Hu Shih to Chinese Students in Chicago，" Chih-p'ing Chou，*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p. 764.

[38]《胡适致陈布雷电》（1939年1月27日），耿云志《胡适年谱》，第274页。

[39]任东来：《中美桐油贷款外交史末》，《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第107页。*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FRUS*），Diplomatic Papers，1937，vol. 3，pp. 610，832-833；1938，vol. III，The Far East，pp. 59-61，74-75，519-522，526-529；《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6日。

[40]参见《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37年12月24日）、《罗斯福致蒋介石电》（1938年1月11日），FDR Official File，150，Box 1；《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38年1月3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78～79页。

[41]《郭泰祺从伦敦致外交部电》（1938年1月19日）、《立法院长孙科与郭泰祺自伦敦致外交部电》（1938年3月29日），《战时外交》第2册，第24～25、27～28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3页。

[42]郭泰祺报告，参见《王世杰日记》，1938年6月27日、7月15日。

[43]顾维钧和蒲立德1938年2月21日的会谈，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66页；《王世杰日记》，1938年5月24日。

[44]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48～1649页；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p. 24-25。

[45]《顾维钧致孔祥熙电》（1938年7月27日），《特交档案·外交》第41册《美国经济援助》：48813。

[46]孔祥熙1938年12月26日致电顾维钧，感谢他对于争取美国贷款的努力。《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322～323页。

[47]"Detail Report of 1st and 2nd Loan Negotiations，"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E；牟润孙《中美桐油借款商谈纪要稿》（1968），第132～134页，Mr.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7。关于陈光甫使美的背景，请参阅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4册。

[48]《光公使美日记》，Mr.K.P.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

[49]《蒋介石致胡适电》（1939年7月3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30017。

[50]《蒋介石致胡适电》（1938年10月1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30007。

[51]《任嗣达日记》，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1。

[52]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G-2.

[53]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 26.

[54]《翁文灏致胡适函》（1938年10月2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第2册，第387页。

[55]《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38年10月28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0册《对美外交（1）财经援助》，第34～36页。

[56]《胡适致陈布雷和蒋介石电》（1938年11月4日），《特交文电·领袖事功之部（8）领导革命外交——对美关系》第1册：27050506。

[57]*FRUS*，*Japan*，1931-1941，vol.1，pp.477-81，797-806；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p. 27-28.

[58]*FRUS*，1938，vol. 3，pp. 540，562-563，566，569-575，581-582；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p. 24-26.

[59]*FRUS*，1938，vol. 3，p. 377.

[60]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 29.

[61]Memo.by Hornbeck to Himself，May 16，1939，Hornbeck Papers，Box 52.

[62]《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15日；《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322页。

[63]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1938年12月16日、1939年3月8日。

[64]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 28.

[65]这些人士包括王世杰、耿云志、胡颂平。参见朱文华《胡适评传》，第274～276页；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55页；张忠栋《胡适五论》，第121～123页。

[66]周谷编著《胡适、叶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联经出版公司，2001，第3页。

[67]1938年12月4日后，胡适突患心脏病住院，至1939年2月20日出院，前后住院77天。参见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66～167页；《光公使美日记》。

[68]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48～1649页。

[69]《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5月26日。

[70]《蒋介石致胡适电》（August 27，1939），“A Chronology of Loan Negotiations，1938-1940” by Dr. Hu Shih，From File of Chinese Embassy，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F-3。

[71]《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9月8日；September 7 and 8，1939，“A Chronology of Loan Negotiations，1938-1940” by Dr. Hu Shih，From File of Chinese Embassy，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F-3；Hu Shih cable to Kung，September 8，1939，“A Chronology of Loan Negotiations，1938-1940” by Dr. Hu Shih，From File of Chinese Embassy，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F-3。有关胡适在第二次借款谈判中的活动，参见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68～194页。

[72]国务院内部有些其他的官员也主张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和对中国增加援助。参见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 31。

[73]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 31.

[74]《翁文灏致胡适电》（1939年11月11日），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第1册，第175～176页。

[75]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451～452页；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96、1703～1704页；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68～170、194页。

[76]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69页。

[77]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493页；《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0年3月9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32页。

[78]有关第二次借款从1939年4月到1940年4月的谈判经过，以及陈光甫的工作，请参阅“Detail Report of 1st and 2nd loan negotiations，” pp. 33-60，Mr.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E。

[79]《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39年9月29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0册《对美外交（1）财经援助》，第47页。

[80]J.Blum，*From Morgenthau Diaries*，*Years of Crisis*，1928-1938（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59），pp. 508，510；*FRUS*，1938，vol. 3，pp. 547-550，557，559，563-564.

[81]任东来：《中美桐油贷款外交始末》，《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第109页。

[82]《罗斯福致蒋介石电》（1938年11月2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81页。又见《光公使美日记》，1938年11月18日；《陈光甫会见罗斯福总统纪录》（1938年10月13日），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p. 3。

[83]《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3月7日，Mr.K.P.Chen's Private Papers. Group A，Box 2，F-2，p.37。

[84]《光公使美日记》，Mr.K.P.Chen's Private Papers. Group A，Box 2，F-2，pp.1-2。

[85]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p. 7.

[86]Note on March 3，1939，and Entry of March 25，1939，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pp. 35-36，46.

[87]Entry of Hu's diary on June 22，1939，in “A Chronology of Loan Negotiations，1938-1940” By Dr. Hu Shih，From File of Chinese Embassy，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F-3.

[88]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Folder G-2，and Box 3，Folder H.

[89]《胡适致蒋介石电》（1939年10月16日），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G-2。

[90]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p. 94.

[91]《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5月26日。

[92]《胡适致外交部电》（1939年7月15日），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67～168页；《胡适致蒋介石电》（1939年8月3日），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p.94。

[93]《胡适致蒋介石电》（1939年11月27日），See entry of November 26，1939，in “A Chronology of Loan Negotiations，1938-1940” by Dr. Hu Shih，From File of Chinese Embassy，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F-3；《胡适致陈布雷电》（1940年4月27日），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F-3。胡适也写信给翁文灏、傅斯年、孔祥熙等强调陈光甫在借款谈判中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94]Hu Shih letter to Weng Wen-hao，December 4，1938，in entry of December 4，1938，“A Chronology of Loan negotiations，1938-1940” by Dr. Hu Shih，from File of Chinese Embassy，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F-3；《胡适致陈布雷电》（1939年11月27日），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69页。

[95]《胡适致陈布雷转蒋介石电》（1939年11月2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41001。

[96]《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6月24日。

[97]《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2月14日。

[98]《光公使美日记》，1940年4月6日。

[99]《光公使美日记》，1940年2月26日。

[100]《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6月24日。

[101]Mr.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G-2；《光公使美日记》，1940年4月9日。

[102]《光公使美日记》，1940年4月6、9、16日。

[103]“Detail Report of 1st and 2nd loan negotiations，”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E.

[104]《陈光甫致邹秉文函》（1939年2月3日），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pp. 23-26。此函的重要性是它全面地阐述了陈光甫

的看法，包括借款的目的、方法、优先级，也响应了他的反对者的批评和提出他自己的辩说。

[105]Minutes of the meeting，Henry Morgenthau，Jr.，*Morgenthau Diary*（*China*）（New York：Da Capo Press，1974），p. 124.

[106]Minutes of meeting on April 19，1940 between Ch'en and Morgenthau，*Morgenthau Diary*（*China*），pp. 112-118.

[107]K. P. Ch'en's letter to Tsou Ping-wen dated on February 3，1939，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pp. 23-26.

[108]《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12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36，14454。

[109]有关租借法案对中国的影响将在本书第八章详细讨论。

[110]有关美国中立法的论述，请参阅Robert Dallek，*Franklin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 102-108，117-121，139-140；张忠栋《胡适五论》，第118—119页。有关胡适在中立法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请参阅《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中华民国外交研究会”编印，1967，第182～218页；Robert A. Divine，*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65.），p. 38。

[111]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67页；张忠栋：《胡适五论》，第119～121页。

[112]有关胡适在修改中立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请参考《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182～218页；Robert A. Divine，*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p.38。

[113]《胡适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3174。

[114]《王世杰日记》，1937年10月14日；《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48页。

[115]唐培吉、王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张宪文等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676页。有关数字细节，参见孔庆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英助日侵华和苏联援华抗日》，张宪文等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662页。

[116]《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23页；《翁文灏致胡适函》（1938年10月2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第2册，第383～384页；《蒋介石致罗斯福函》，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2～3页。

[117]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9年7月24、25日。

[118]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9年1月4日；《王世杰日记》，1939年1月3、5日。

[119]《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4日。

[120]《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22日。

[121]《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25日。

[122]《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31日。

[123]《蒋介石致罗斯福函》（1939年7月2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82～83页。

[124]《翁文灏致胡适电》（1939年11月11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2册，第336～340页。

[125]《蒋介石致罗斯福函》（1939年7月2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82～86页。

[126]余伟雄：《王宠惠与近代中国》，文史哲出版社，1987，第95～96页。

[127]《王世杰日记》，1938年9月3、26、30日。

[128]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8年11月4日。又见《王宠惠致蒋介石备忘录》（1938年11月1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29～31页。

[129]《蒋介石日记》，1938年11月4、5日。

[130]《王世杰日记》，1938年9月26日。

[131]《蒋介石致胡适电》（1938年10月13日），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8年10月13日、11月11日；《蒋介石致胡适电》（1938年10月1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133013。

[132]《孔祥熙致胡适电》（1938年11月17日），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F-3。

[133]《王宠惠致蒋介石电》（1938年11月2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3194。

[134]《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11日。

[135]蒋永敬：《抗战期间中法在越南的关系》，“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1辑，编者印行，1985。

[136]《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77页。

[137]《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8、14日。

[138]《蒋介石日记》，1939年5月31日。

[139]《蒋介石日记》，1939年5月。

[140]《蒋介石日记》，1939年6月20～21日。

[141]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九月间世界大战其将爆发乎？”《蒋介石日记》，1939年6月21、22日。

[142]《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458～459页。

[143]《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460页。

[144]《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476页；《王世杰日记》，1939年6月17日；《徐永昌日记》，1939年7月26日。

[145]《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39年7月2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84～85页。

[146]《蒋介石致胡适电》（1939年8月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23003；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86～87页。

[147]《胡适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28012。

[148]《蒋介石致胡适电》（1939年9月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28013。

[149]《胡适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28014。

[150]《胡适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2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02004。

[151]《蒋介石致胡适电》（1939年8月2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86～87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9年8月29日。

[152]《蒋介石致白崇禧电》（1939年8月26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26，13895。

[153]《蒋介石致顾维钧电》（1939年8月29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26，13896。

[154]《王世杰日记》，1939年9月2、4、5、8、19日。

[155]《王世杰日记》，1939年9月15日。

[156]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9年9月2、5、6日。

[157]《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23日。

[158]《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30日。

[159]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9年9月20日。

[160]《徐永昌日记》，1939年10月17日。

[161]《王世杰日记》，1939年10月21、26日。

[162]《蒋介石致胡适电》（1939年9月1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28018。

[163]《胡适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87～88页。

[164]《蒋介石致胡适电》（1939年9月3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88页。

[165]《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2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97页。

[166]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Macmillian Co.，1948），vol. 1，pp. 445，544-545，554.

[167]《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22日。

[168]《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21日。

[169]《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8年8月13日、11月12日。

[170]邵铭煌：《孔祥熙与抗战初期的谋和试探》，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国近代史学会，1996，第22页。

[171]《翁文灏日记》，1937年12月28日；《王世杰日记》，1938年1月28日。

[172]《王世杰日记》，1937年7月15、19日。

[173]《孔祥熙自汉口致蒋介石电》（1937年11月27日），《特交文件·亲批文件》第45册：3256。

[174]《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8年（月份不详，应为11月）30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第32辑《和平酝酿》：45646。

[175]《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8年10月23日），《特交文件·亲批文件》第45册：3292。有关外交部长王宠惠1938年11月2日在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发言，参见《王世杰日记》，1938年11月2日。

[176]《特交档案·中日战争》第30辑《和平酝酿》：45528-45537；藤井志津枝《诱和：日本对华谍报工作》，文英堂出版社，1997；吕芳上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和战抉择》。

[177]邵铭煌：《孔祥熙与抗战初期的谋和试探》，《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第12～26页。

[178]《孔祥熙致蒋介石函》（1939年9月30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第31辑《和平酝酿》：45619。

[179]《周佛海日记》，1938年6月27日。

[180]《王世杰日记》，1938年7月2日，10月24、26日。

[181]《王世杰日记》，1938年10月26日、11月3日。

[182]《郭泰祺大使自伦敦致外交部电》（1938年1月19日）、《郭泰祺自伦敦致外交部电》（1938年3月1日）、《孙科与郭泰祺自伦敦联名致外交部电》（1938年3月2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24～28页；《王世杰日记》，1938年4月20日。

[183]《王世杰日记》，1938年4月20日。

[184]《王世杰日记》，1938年7月3日。

[185]《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2日。

[186]《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4日。

[187]《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9～12日。吴稚晖参加润笔工作。

[188]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46～1647页。

[189]《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8年8月13日。

[190]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46～1647页。

[191]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48～1649页。

[192]《胡适致陈布雷电报》（1938年10月25日），“A Chronology of Loan Negotiations，1938-1940”by Hu Shih，from File of Chinese Embassy，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F-3。

[193]《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8年10月2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241～242页；“A Chronology of Loan Negotiations，1938-1940” by Hu Shih，from File of Chinese Embassy，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F-3。

[194]《蒋廷黻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第213页。

[195]《陶希圣致胡适函》（1938年12月31日），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第1册，第171～172页。

[196]《王世杰日记》，1938年12月9日。

[197]《陶希圣致胡适函》（1938年12月31日），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第1册，第171～172页。

[198]《王世杰日记》，1939年9月29、30日，10月19日；《翁文灏日记》，1939年10月2日。

[199]《王世杰日记》，1939年10月19日。

[200]Mr.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G-2.

[201]《翁文灏致胡适电》（1939年10月21日），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第1册，第161～162页；《翁文灏日记》，1939年10月6、30日。

[202]《胡适致蒋介石函》（1939年10月16日），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G-2。

[203]参见《胡适致Hornbeck备忘录》，Hornbeck Papers，Box 80；“Statement on the Prospects of Peace Prepared but not Signed by Chinese Ambassador，”October 16，1939，*Morgenthau Diary*（*China*），pp. 56-58。

[204]Hornbeck's memo.to Secretary Hull，October 17，1939，Hornbeck Papers，Box 80.

[205]《王世杰日记》，1939年9月29、30日，10月19日；《翁文灏日记》，1939年10月6日。

[206]《王世杰日记》，1939年10月28日。

[207]《翁文灏日记》，1939年11月18日。

[208]《王世杰日记》，1941年6月28日。

第三章 1937～1939年胡适和陈光甫对中国对美政策的影响

在讨论珍珠港事件前中美关系的学术著作中，特别是英文著作很少有人深入地去分析影响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因素。但是如果读者想对中美关系获得深入了解，就必须去找出这些因素并加以分析。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胡适和陈光甫不但是中国政府对美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同时也是政策的重要制定者和策划人。到了最后，这两个人在美国的工作表现也促使中国政府在1940年之后改变了它的对美政策。

本章的目的是分析胡适和陈光甫的角色，并且试图说明他们何以会促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根本地改变其政策。本章重点将放在胡适身上，因为胡适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非常深远，同时也会关注陈光甫的角色，因为他是中美借款谈判中的主角。

一 胡适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如同前两章所述，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从七七事变开始就是争取西方列强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得以继续。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对于胡适的指望和对派驻欧洲各国的外交使节的期望并无二致。所有这些外交官都在努力地向驻在国争取借款，以便可以购买武器，说服这些国家对日本侵略行为进行谴责，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俾使国际联盟能够采取集体行动去惩罚日本（比如禁运）。中国当时驻各国的大使们（驻苏联的杨杰、驻德国的程天放、驻法国的顾维钧、驻英国的郭泰祺）或是特使们（孔祥熙、宋子文、孙科）都致力于达成这些目的，但是成就各有不同。中国政府当然也期盼胡适扮演同样的角色。

再如前文所述，胡适最初被派赴美的使命，是基于中国领袖们的假设，以为胡适的资历特别适合这个任务。但是胡适的工作表现却是成败参半，甚至很可能落后于中国驻欧洲的使节们。我们应该如何去解释这个现象？

如果要找到答案，或许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层次上去评估胡适对中国对美外交政策的影响。一是胡适的个性如何影响了他的政治行为；二是他的学识和思想如何影响了他对美国政府政策的了解和剖析；三是他的政治判断如何影响了他对重庆政府的建言。

（一）胡适的性格

就个人层次而言，胡适是一位扎实的学者，一位人文主义者，举止优雅，风度翩翩，谈吐机智，博学多闻，为人诚恳，善解人意，诚实可敬。他待人接物谦虚有礼，从不盛气凌人，总是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几乎任何人邀请他去讲演，他从不拒绝，在做客人时，永远是一个讨主人欢心的宾客。他勤于写信，无论是和亲朋好友或是事业上交往的人士，他都写了一大堆信，文字清晰，语气亲切，既遵守礼数，闲话家常，又言之有物。他的一切官方报告及文电，均出自亲笔，从不假手他人。他的心脏病与工作习惯和压力有直接关系。[1]

他的这些品质和习惯对于他的外交生涯产生了许多正面效果。由于他举止端庄和蔼，因此几乎所有跟胡适有过交往的美国人，从没有对他的形象吐露过一丝批评。张忠绂是和胡适私交极好的教授之一。他曾经说过，一个好外交官应该平易近人，有能力赢得驻在国人民的支持与信任。依照这些标准，则胡适无疑是历史上中国政府派遣到国外最好的使节之一。[2]

作为一位政府官员，胡适表现了高度的公德心和良心。比如说，他对于使用公款的谨慎细心，有时简直到了过分的程度。在他和另外两位教授离华赴美之前已经私下决定，既然他们已经从各自任职的大学获得正规薪水，因此将拒绝接受政府为他们外交任务而支付额外的薪水。他们只愿意把与外交工作有关的费用，向政府实报实销。这种高尚的行为，可以说是他们为国服务最好的见证，在中国政府官员之中，这种行为简直是凤毛麟角（顾维钧大使是另外一个特例。顾夫人家族经济实力雄厚，经常使用其个人财产对大使馆进行体面修缮、买豪华汽车，或支付使馆经常性的社交活动费用）。一旦抵达美国，胡适代表团立即又采取了其他一系列的节约措施，其出发点都是为苦难奋斗中的国家节省外汇。这种行为实在是他们的爱国心和个人品德的最高表现。但是他们的节俭措施有时候又做得太过分，以致可能招惹批评，认为和他们的外交官身份并不相符。

比如说他们最初抵美时，只到小旅馆去租便宜的单人房，因此没有客厅去接待来访的美国官员。而这个安排又迫使他们不得不移步到美国官员的办公室去进行公事商谈。更有甚者，他们为了节省经费，不给旅馆门房服务员小费，还特意每天从旅馆步行到几条街之外去搭乘出租车。最离谱的是，他们为了省钱而决定不聘用办公室职员，而把办公室的公务分摊负责。其结果是，为了和重庆政府保持联系，通常由胡适执笔拟稿，经过钱端升和张忠绂润色，继之由张忠绂将原文转译为电报密码发给蒋介石。有时，胡适本人也参加转译密码的工作。[3]

就处理行政事务层次而言，首先必须肯定的是胡适的语言才能。他用英文演说的才能好，所以美国知识界对他均有好感，视为中国罕有之人才。但是胡适改不了一个教授的习惯，就是在和客人谈话时，不但常持在野学者批评政府的姿态，而且把自己说成是学者降低身份而成为外交官，颇有不屑之意。如果对方是美国政府官员，这些则当然非他们所乐意听到的。[4]

胡适绝对称不上是一位干练的管理人才，对于统御部属并没有表现出独到的能耐，而且对于许多实际运作的细节也缺乏耐心。[5]在他的领导之下，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效率颇为低下。他不善管理大使馆，不习惯批阅国内公文。部下各自为政。馆中人员编制不足，一等秘书系由译电员提升。[6]

胡适的个人健康有多重问题，因此他的精力颇为有限，而这些问题又影响到他执行公务的能力。[7]即使是胡适最亲近的朋友也承认，他缺乏一个从政者必须具有的品质。他在外交工作上是个外行，而他私人领域所具备的若干美德，常常变成他工作上的包袱。他太容易信任别人，在处理问题时不能明快果断，不能展示一种权威的气度，不会玩弄政治场中的伎俩，也没有足够的警觉心能够看出其他国家之间的钩心斗角，而转换使之成为中国的外交筹码。他的心肠过于慈善正直，不善玩弄权谋把戏，而他的自尊心又过于脆弱，让他无法和别人去进行政治买卖。因此，在朋友们的眼中，胡适显然不够格成为一名政治人物。[8]

尽管胡适无论在公开演讲或是私人交谈场合里，都以能言善道著名，但是他缺乏和别人讨价还价的能耐，也没有那份心情去做这类事。说白了，他是一个脸皮薄的学者，对于应付外交界的社交活动似乎特别无奈。通观胡适本人留下的生活记载，很少提到他出席华府的大小宴会、酒会、舞会等，中国大使馆对于举办政治外交交际也非常忽视，甚至有时孤僻到失礼程度。比如说，当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返抵美国时，胡适也并未邀请后者聚餐，忽略了基本礼节。[9]

胡适的个性还充满了文化的矛盾。虽然他在中国是以一位西化运动的先驱者而享有盛名，但是在性格上却到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和教养的痕迹。最明显的冲突是他的西装革履和金丝眼镜，而且义无反顾地向中国传统文化挑战，但是另一方面却俯首屈从母亲为他安排的一场缺乏爱情的旧式婚姻。[10]同样地，这个矛盾性也在他的工作中屡屡出现。比如说，在公众场合里，他可以义正词严地谴责日本的暴行，誓言中国抗战必须坚持到底。但是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他却竭力避免冲突和对立，而且当别人无情无义地利用他的善良与敦厚个性时，不知如何保护自己。在面对他人的尖酸刻薄时，他只能以宽容大度去处之，或是干脆逃避。

举个例子来说，他和亨贝克的密切友谊是人尽皆知的事，[11]而他对亨贝克无论是在公开场合或是私下，从未透露过丝毫不满之情。但是陈光甫是一位有充分机会观察胡适和亨贝克互动的目击者，根据陈氏记载，每当他看到亨贝克以教训小学生的口吻跟胡适说话时，他就会感到痛苦不已，而胡适却完全不知道如何去应付这种场景。胡适所遭遇的羞辱只能让陈光甫加倍同情他的境遇，而且随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做大使的确是一件痛苦的差事。[12]

事实上，陈光甫深信，胡适不愿意和美国国务院打交道的最主要原因，正是他想逃避亨贝克和其他官员那种居高临下的架势。[13]这可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因为尽管国务院胆小如鼠，不敢主张援助中国，但是在国务院之内，亨贝克可是最积极地主张美国政府应该主动援助中国的代表性人物，而且坚信美日之间的冲突最终难以避免。然而，不管是在公务还是私人的接触上，胡适几乎从来没有运用他和亨贝克的友谊，去为中国争取到任何有利的待遇。当然胡适会和亨贝克不断地交换意见，有时极为坦白，但是很少借此去争取亨贝克的支持。

由于胡适很早就决定不参加贷款的谈判，因此他和美国政府最密切的接触点照理说应该是国务院才对。然而，胡适却着意避免和国务院进行密切接触，而其所持的理由则是国务院在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已经无足轻重。正如他在1939年1月对中国领袖们所说的，和国务院打交道纯属浪费时间，因为国务院的官员连他们本国外交政策的大方向都根本不了解。[14]

当然，假如胡适果真相信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加倍努力寻找其他途径去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比如说去开拓通往白

宫的路线。但是胡适却没有这么做。胡适并没有争取经常和罗斯福会面，而他所持的理由是罗斯福的日程已经繁忙不堪，因此不应该再去打扰他。而史料也显示，即便是在胡适和罗斯福会面时，气氛永远是客客气气，宾主尽欢，因为所谈的题目总是毫无争议性。胡适很少为中国提出要求，而是努力地站在罗斯福的立场看事情，有时甚至不惜违背中国政府的具体指示。胡适这种作为当然也给了罗斯福各种机会，去躲避许多和中日战争有关而又棘手的问题。

在胡适的性格里，或许最妨碍他执行公务的部分就是害怕求人伸手援助，或是以讨价还价的方式为中国争取国家利益。胡适个人向来重视一个外交官应该具有优雅的风度，能够赢得驻在国国人一致的赞美，他要证明他有能力充分体谅驻在国主人的处境困难，因此绝对不会粗鲁或是不识大体地去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让主人感到为难。即使是胡适最好的朋友也是最衷心的支持者——王世杰也曾经承认，胡适绝非外交长才，因为他过于不愿向任何人要求施惠。[15]而胡适本人在私下也承认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16]在现实生活里很难想象，如果一个外交官无法施惠或是要求他人施惠，如何还能有效地执行他的任务；也很难想象，如果一个外交官的基本态度是任由世局顺其自然地发展，而不做出任何努力去试图主导及改变世局时，何以还能够做一个称职的外交官。

胡适对他人处境的体谅，有时不免过于极端。比如说，他认为向美国官员们提出公务约谈的要求，就等于是去打扰他们的公务，因此应该尽量避免。特别是在他需要和不熟悉的人打交道时，他的这种性格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说摩根索），尽管这些人的职位能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利益。所以在和摩根索的交往过程中，胡适总是不断地表达歉意，宣称他实在不应该对后者太过打扰。而胡适的这种姿态，又偏偏并非一种虚假的客套，而是他发自内心的真诚感受。[17]正如胡适有一次致信摩根索时所言：

在过去繁忙的数月里，我知道您的工作有多么繁重，而且也知道您一直在努力地设法给予中国协助，因此我也一直避免去打扰您。您对我的赞誉，嘉许我的合作，其实只不过是我不敢去占据您宝贵而忙碌的时间而已。[18]

胡适打心底认为美国官员都有更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因此没有空闲去为中国的困难而烦恼。而胡适不断地使用这种语气讲话，最后达成的效果就是让美国人也相信，中国问题的确不值得美国人去过度关切。胡适这种讲话的语气，也会让美国人果真相信了他们自己的重要性。虽然这些语言可以使发言者（胡适）更讨美国人的欢心，但是它们也因此让美国人更不重视胡适语言的重要性。胡适所精心培养出来的“好人”或是“完美的中国绅士”形象，可能为他个人赢得了许多善意的回应，但是未必因此而增加了他的政治影响力。

正因为胡适对于求人一事难以启齿，因此他的解决之道就是把请求

讲得模棱两可，最后变得面目全非，在对方听起来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请求，这样就让他自己不会为被对方拒绝而感到难过。事实上，胡适经常使用这个方法去减少他个人的不安。比如说，在1938年初，胡适接到了他的好友，当时任经济部长翁文灏的严重警告，指出中国正面临严重财政危机，希望胡适尽快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要求任何形式的协助，以免局势变得不可收拾。然而胡适却不愿通过正式渠道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反而是采用了给亨贝克写一封私函的迂回方式，吞吞吐吐地表达了这份意愿，但是马上又给亨贝克吃了一颗定心丸，写道："此信只是供您参考，因此您无需作复。"[19]换言之，翁文灏十万火急的求援，经过胡适的改装，最终变成一段轻描淡写的闲话。在1938年10月中旬，蒋介石亲自写信向罗斯福求助。而当罗斯福回复称他在时机成熟时一定会努力协助时，胡适反而赶紧向国务院提出保证，声称中国政府完全体谅美国政府为何此时不能做出承诺。[20]

在1939年9月底，中国迫切需要美国向中国提供第二次贷款。但是在罗斯福建议胡适应该主动去和摩根索商量细节时，胡适却一直等到18天之后才向摩根索请求（1939年9月26日）商议下一个会面的时间。而当摩根索表示他早就在等候胡适主动来找他时，胡适的答复竟然是"我一直因为当前动荡不安的局势（disturbed situation）而不敢贸然来打扰您。因为我知道您是一个大忙人，因此我不敢来占据您的时间"。胡适笔下所谓"动荡不安的局势"指的就是欧洲战争的问题。而胡适认为欧洲危机必定早已霸占了美国政府官员全部注意力，相比之下，中国对于贷款的需求在美国人眼里，根本就是无足轻重。[21]事实上，胡适对于驻在国政府的体谅，可说是大可不必，因为摩根索比起胡适来，显然更把中国的危机当成大事一桩来对待。

诸如此类的案例显示，胡适在和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惯用的几个技巧，其目的都是万一中国的要求遭到美国拒绝，可以避免难堪场面。简言之，胡适首先会尽可能地建议中国政府不要向美国政府提出某些议题，其所持的理由是美国有更重要更迫切的事务需要处理，不能费神去处理中国事务。他也可能表示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不适宜处理中国的某些要求。但是在重庆政府坚持一定要他提出要求时，胡适则宁可用"非官方"的方式，把中国的要求向他熟识的朋友提出（比如亨贝克），而不是以官方形式向国务院或是白宫提出。[22]

但是即便是胡适终于采用了"非官方"方式提出要求时，他还是宁可把中国的"要求"装扮成"不是要求"和"指望"，而只是一个"愿望"。[23]他的这种做法等于是将主动权双手让给美国政府，使后者完全可以选择去正视或是忽略胡适的所谓"愿望"。亨贝克当然不是傻瓜，他一眼就看穿了胡适的弱点，正如亨贝克有一次向他国务院上司做的报告中所说的，"胡博士没有就这件事情向我正面提出任何问题，而我当然也就避免表达任何意见"。[24]

重庆政府向胡适发布的许多正式指令，嘱他去向美国政府提出具体的要求，最后都不了了之。其原因就是胡适把它们改头换面，装扮成了

不是“要求”，而是非正式的“探讨”，这就让美国政府大可以装聋作哑，甚至置之不理。在这方面，王正廷和胡适正好形成一个明显对照。王正廷可以毫不怕难为情地要求美国政府把它的政策秘密向中国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而且还要以答问卷的方式白纸黑字写清楚，而胡适则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因此中国政府想从美国政府处合情合理地得到任何的信息，都会让胡适感到万分为难无法启齿。显然，即使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要求做出一个温和客气的拒绝，都会使胡适感到万分恐惧。[25]

胡适不是一个高效率的外交官，根本原因是他缺乏进行外交事务所必备的权衡折冲的个性。在和平时期，胡适温文儒雅的气度、渊博的学识、进退有度的行为，或许会让他赢得许多西方人的喜爱和尊敬。但是在世界各国正在进行高度竞争的情况下，胡适的个性就显得过于被动和温顺，他被推上外交前线，实在无法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有效斗士。更何况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险境之中，他的局限性就益发突出。多年后，胡适本人也曾经向一位友人承认他的外交官生涯对他而言是一项充满困苦的任务，而他打心底也不喜欢外交生涯。他的这种感受其实很容易理解。

胡适是一位爱国者，全心全意地为国家服务，这一点绝无疑问。作为一位从学术界转向外交界的门外汉，我们也不应该用太苛严的尺度去评判胡适。但是如果我们使用外交界惯用的尺度去衡量胡适的大使生涯时，那么他的成绩显然不符合标准。作为一个处于战争状态中的弱国的外交官，胡适必须具有请求外国协助的技能，而这正是胡适最严重缺乏的，也是他最不愿意去执行的工作。在他的心目中，请求他国协助无异于乞讨，它既使人尊严丧尽，又难以达到目的，只能自取其辱而已。

胡适之所以不愿请求他国协助，主要来自他对尊严和面子等观念的看法。虽然胡适早年在文化领域里塑造了一个反传统先锋的形象，但是他的个性其实带着浓厚的传统教养的痕迹。尽管他也曾旗帜鲜明地主张扬弃传统儒家礼教中的君子形象，但是在个人行为上他却不自觉地以那个形象为楷模。不管是作为一个学者还是外交官，胡适都认为，讨价还价的行为委实有损个人的尊严而不值得为之。

同样地，胡适也认为中国必须维持其“国家尊严”，而不应该喋喋不休地去请求美国给予援助。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朋友们，也经常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他的外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为中国争取到一些尊严，或是“为国家做点面子”，借此让外国人减少一些历来对中国的轻视，增强一些对中国的尊重。在他看来，一个外交官所能做的也无非只是如此而已。换言之，中国的抗战是中国人自己的家务事。当中国要求美国施以道德和法律援助时，这是完全说得过去的；但是当中国要求美国提供武器和财政援助时，就是一种丢脸，如果这种要求还遭到了拒绝，那简直就是国家的灾难。

与胡适这种行为模式最不相称的，可能就是他在和战问题上所采取的强硬立场。但是在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又并无相互矛盾之处。即便是

在1920和1930年代，胡适在国内许多问题上，已经采取了清楚而坚定的立场去挑战传统，这包括文学改革、哲学辩论和政府政策等方面。而胡适对于和平运动的反对，以及他向蒋介石不断提出的进言，其实都符合传统儒家对于君子的要求，那就是一定要毫无保留地卫护道德原则，不可妥协，尽责地做一个诤臣。胡适的个性使得他在处理个人关系上显得温和谦让，但是在卫护抽象观念和原则时，却显示出高度的道德勇气和择善固执的气概。在这方面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他虽然对于和平运动口诛笔伐，但是对于倡导和平运动的领袖却从不疾言厉色地进行攻击。事实上，在一度参与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健将高宗武秘密抵达美国后，胡适一直和他保持亲密私人关系。总而言之，胡适在倡导和卫护抽象观念时的形象可以说是勇往直前，但是在处理个人交往关系时又瞻前顾后，过分体贴。

（二）胡适的知识理念

作为大使，胡适的基本责任是成为重庆政府在美国的耳目，去分析解说美国的政策，预测它未来的趋向，把影响美国政策的政治和观念上的各种复杂因素向中国提出解释，最后帮助中国政府做出更务实而有效的政策去和美国打交道。再进一步说，他也应该试图成为中国政府在美国有诚信和有说服力的代言人，去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尽心尽意地执行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

胡适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应该比其他同时代的中国人更具有知识能力，去应付千变万化的国际局势。他把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介绍进入中国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虽然他极力避免参与实际政治，但是他对中国内政和外交问题的见解，透过大量文章的发表，已经在国内广为人知。他在学术界的成就也早已被国人普遍认可，即使是和他持反对立场的人也能够衷心赞赏他的学术诚实，以及看待事物时客观、务实等优点。派送像胡适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人到美国去代表中国，很容易就能够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更不会有中国人怀疑胡适在这方面还可能有能力不足的缺点。

同时，胡适在那些熟悉中国事务的美国人中间也享有崇高声望。或许亨贝克对胡适的嘉誉，在一般美国人中颇具代表性。

胡适可能是中国当代知识界最杰出的领袖。他的言论既没有官僚气息，也不是一位（向美国）求助的说客，而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和政论家。他的分析的敏锐性和阐述问题的清晰性可以说是和李普曼不相上下。[26]

然而，尽管胡适具备了这些超乎常人的优点，但是他对美国文化和社会长期的熟悉和深入的了解，却可能并没有让他对美国的政治和政府

运作做出更敏锐的分析，从而帮助中国政府制定更有效的对美政策。

胡适的好友张忠绂曾经称赞胡适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人士。[27]这的确是一个很贴切的形容词，因为胡适一生从未偏离和违背民主的原则。即使是当他的某些亲密朋友，在某个特定的时段里向往独裁专制政治的优势，认为其更能有效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时，胡适也会坚持立场，和他们进行激烈争辩，畅言民主的优势，绝不动摇。

在人生成长过程中，胡适打从在美国做学生的年代里就深受民主意识熏陶，因此从心底对美国在知识层面上对他的启发充满感激，从而也坚信美国的政治传统和政府体制的优越性。他同时对美国人民有高度亲切感，认为他们善良、公正、崇尚理性。事实上，在他的生命的前半段中，我们在他公开的文章或私下的谈话里，都找不到任何迹象证明他曾经对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和制度提出过丝毫批评或保留意见。在国民政府时代，如果存在所谓“亲美派”的话，那么胡适无论在感情还是知识领域里，都对这个称号当之无愧。

胡适在中国国内的公开活动中，也一再表现出他的自由主义倾向，比如说他在早年就主张多谈实际问题，少谈空洞理论或主义。而他对于无论是政治界、语言文学界、哲学界、文艺界或美术界的一切新鲜观念都能够以开阔胸襟去看待。他能够倾听不同的意见，也愿意经过实证过程去评判这些意见的正确性。他对于各式各样的学说和主张都能持以高度的包容心，但是他也极力维护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认为其不容破坏。就像一位学者曾经说过的，胡适有一种趋势，就是高估了理性能够影响舆论的能力，而低估了人的感情和低劣的品质，可以让他们的行为违反他们自身的利益。[28]

以上这些对胡适评语的正确性，可以从他对美国政治的态度上得到大量印证。胡适看美国政治的出发点，是以自由民主的学说作为依据，然后用这个学说去解释美国的实际政治行为。他在讨论美国的文章中，几乎很少提到个别人物的特性、自私、认知上的短视、种族偏见、不理性、粗暴个性、对于权力的自大或是任性，或是帮派利益考虑等因素。他宁愿相信理性必定会得到尊重，而心胸公正的美国民众最后一定会接受最符合理性的政策。依据这个信念，少数美国人可能会被错误的观念所误导，比如说无条件地信奉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但是这只不过是思路不清而造成的一个短暂现象而已，一旦他们得知世界局势的真相，就一定会迷途知返。

胡适认为世界上正直的人士，一定都会对侵略和野蛮行为同样感到痛恨。一般人只要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理性的对话和一些温和的说服，就能够得到正确的观念。胡适深信美国人一定会寻求开明的自利观念，并且会和中国的利益互信吻合，而他也相信美国人的国家利益观念绝不可能和中国的利益相违背。既然如此，那么中国根本就无须试图把一些自己的观念强加于美国人。只要给予美国人充分的时间，他们一定会发展出一套政策，把日本视为侵略者，而且把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结

合在一起。[29]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胡适身为中国驻美大使，但是他向中国政府提交的业务报告却和中国其他驻外使节的报告显著不同。胡适的报告读起来像是教授写的学术论文，而不像是外交官的业务报告。胡适的报告内容很少提供有关驻在国的实质性政治情报，去帮助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或是对策。更常见的是，胡适的报告经常使用大量篇幅去详述美国政府的官方文告或是择录报纸社论，然后提出他自己的深度分析。

胡适的这种作风和中国派驻欧洲的使节形成尖锐对比，而最好的例子大概就是顾维钧。顾维钧在巴黎的日程表排满了和各式各样人士的会面，这其中包括地主国各部会首长，其他国家驻法国的外交官，社会各阶层行业的知名人士（以及任何可能向中国提供有用情报的人员），然后在夜里还要举行宴会、舞会、酒会等社交活动，而顾维钧最得力的助手就是他那位擅长社交的夫人。

相形之下，胡适在华盛顿的日程表包括偶尔去拜访国务院、白宫，或是少数几位国会议员的办公室，但是很少和其他国家驻华盛顿的外交官进行联系，并且完全不和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交朋友。他这种特殊做法的背后也许出自一个特殊的心态，那就是他恐惧会引起这些联邦行政单位之间的争风吃醋，他如果尽量缩小接触面，就不致招惹国务院和财政部的不快和责难。作为一位外交官而有这样的心态，本身就是一件怪事。

再和顾维钧相反的是，胡适白天在办公室会花上数小时，勤奋地去阅读美国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各种报纸杂志，甚至亲自动手用剪刀剪贴报纸，然后在晚上又花上更多时间去阅读、准备讲演稿和处理信件。胡适一生的习惯是小心仔细地找材料做研究，而他在做学术和从事外交活动时都一再显示出这个习惯。形象地说，他宁可去仔细阅读美国领袖们的演说词和政府文告，也不愿意去和这群官员进行直接对话。在工作之外，胡适最大的享受是闭门读书、和二三亲近朋友谈心。在公私活动记录中，似乎很难看到他出于培养感情或是商谈公务的动机而举办过大规模宴会，邀请华盛顿政要或是金主们。即便碰上这类活动，不但胡夫人帮不上忙，胡适本人恐怕也兴致索然。一个学者的优点，反而变成了外交官的缺陷。

至于说到他向重庆政府提出的报告，虽然书卷气息浓厚，但对美国政府的表面文章和实际动机之间的差异显得缺乏警惕，又对官方政策在实施时可能发生的偏差缺乏敏感。他更不相信美国政府居然会言行不一致，或是蓄意不兑现它的承诺。同样地，他对美国政府制定政策时的一些微妙因素缺乏敏感，也不体察美国行政体系内居然还会有帮派门户之争的可能性，而这些又确实是影响其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无疑因其领袖们个性差异而受到影响，可是在胡适向国内呈送的报告中，对此则是一字不提。正好相反，胡适送回国的报告总是把美国的政策形容成前后一致，合情合理，而这是连美国领袖

们自己都不敢吹嘘的现象。

有趣的是，胡适在讨论中国国内政治问题和人物之时，往往能显示出很敏锐的判断力，绝不天真幼稚。但是在他从美国送回中国的大量外交报告中，或是他的来往信函和日记之中，却找不到迹象显示他对美国政府和领袖们也采用了同样仔细严谨的尺度去分析批评。比如说，胡适对于罗斯福的观感是毫无保留的赞许。在第一次贷款成功之后，他也开始称赞摩根索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而贷款本身就足以证明摩根索的理想主义。[30]

胡适似乎没有想过，尽管摩根索可能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也是一位经历丰富的老政客和一个爱国的美国人，他决定向中国贷款的动机很可能远远要比他想实现理想主义的目标复杂得多。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胡适对于中国人的透视力，远远超过他对于美国人动机和意图的透视力。还有一点是，从大量的资料对比中可以看出，胡适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好友私下聊天，似乎从来没有对美国遍地皆是的种族歧视做过任何评述。这一点与陈光甫、宋美龄和宋子文大不相同。

胡适的随和个性和他对于美国政治的高度信赖，似乎是不谋而合。这当然就会影响到他认为中国到底能够如何实事求是地向美国提出援助的请求，以及中国政府究竟有何方法可以达到它的目的。即使在胡适还没有担任大使职务时，他对美国政治的分析已经做出了几个引人注意的结论。首先，他认为美国领袖们在1937年7月已经有意识地制定出一套条理井然的远东外交政策，而且从此坚定不移地遵循该项政策，既不犹疑也不矛盾。其次，他认为美国该项政策的基本精神是谴责国际无政府状态，捍卫国际秩序，其目的远远不仅是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国民、投资或是贸易，而且要捍卫国际关系更基本的价值和秩序。其三，尽管罗斯福在1937年因为发表过有名的“隔离演说”而引起了孤立主义势力的抨击，但是胡适认为罗斯福政策终将会“隔离”国际侵略分子，而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将会有效地抑制侵略行为并维持国际法和国际秩序。[31]

一个月之后，1938年7月3日，胡适在芝加哥对一群中国留美学生做了一场演讲，又把他的信念讲得更为透彻。他声称自己对美国政府文件和报纸言论做过细心研究之后的心得是，美国在未来必将会采取积极行动去恢复世界和平。而他所持的理由是，美国由于过去国内孤立主义及和平运动情绪高涨，因此政府难以采取断然行动。目前英法两国已经在帮助中国，而美国则尚未采取实质行动。不过，一旦美国采取行动，它就会显示高度实力。由于美国奉行积极进取的国际政策，所以它必将会采取实际行动，而国务卿和总统都已经先后阐述了这个政策。1937年7月16日赫尔发表了一份美国外交政策的声明，邀请其他国家予以置评。8月23日他又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重新阐述他的外交政策。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讲演。胡适在仔细研读这些文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一直都尊奉着一个既定的政策。中国人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信赖这些美国领袖高尚和诚信的人格。虽然胡适承认他并不能预测美国此项政策在何时才能付诸执行，但是他认为诸如日本飞机

攻击美国驻华海军船舰之类的事件，更可能激发美国政府将政策付诸实施。

胡适在讲演终结之前指出，美国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拯救中国，而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且这个政策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付诸实行。[32]胡适担任大使不久，就坚信中国根本无法也无必要去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其原因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乃是由有远见的领袖们所制定，因此当然是目标鲜明，充满理性和一贯性，[33]毋庸他人置喙。

由于胡适对于美国外交政策本质的理想化和一贯持有如此高度乐观的信心，就难怪他会颇为自满地向朋友和同事们宣称，他在美国外交工作的基调就是“无为”。[34]这两个字的真正意思，并不是说他果真不做任何事。他真正的意思是，如果中国政府总是要去追求一些不务实的目标或是做出一些兴之所至的行为，或是极力要去改变国际上无可扭转的发展的话，则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有害。因此，他拒绝浪费时间和精力去瞎忙一场。在他看来，中国许多外交活动的目的都只是应付宣传需要，而去营造外交积极的假象而已。

胡适始终坚信，美国领袖们早已制定好政策，只是在耐心等候时机去付诸实行，而美国对于中国的援助也正是这个政策的一个环节而已。让胡适感到特别欣慰的是，他认为美日两国关系走上了一条你来我往、冤冤相报的轨道。日本的每一个挑衅行为都会激怒美国做出双倍的反击。[35]在胡适看来，如果中国政府妄以为它可以通过向美国施加压力，就能改变美国行为的话，那真是荒唐绝顶，因为国际政治自有其逻辑性，不会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环境下，胡适认为，他真正力所能及的工作就是做更多的讲演，以扭转中国的形象，让中国少被他人厌恶，多被他人了解。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要采取“无为”的政策。

胡适相信，美国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一定会以其本身的利益为依归，而不会被中国的游说所牵制，不管中国如何努力亦是徒然。因此他建议中国政府最好的策略就是让国际情势顺其自然地发展，最后必定会有利于中国。他之所以提出这个看起来似乎颇为极端的说法，其原因是在他接任大使之初，重庆政府就向他颁发了一连串他认为不合情理的指示，让他感到为难。[36]

胡适这种心态可以说明，何以他会一再地嘲笑重庆政府不应该浪费精力去指望能够经由中国单方面努力就可以得到效果。正好相反，他认为中国政府最有效的策略，莫过于和美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为了支持这个论点，胡适指出，美国政府其实已经主动地采取了许多措施，最后都使中国得以受惠。[37]胡适甚至宣称美国贷款给中国一事，根本和中国政府的努力毫无关系，因为它完全是由于国际局势所造成，而且是美国政府的主动行为。[38]换言之，中国政府和外交人员的努力徒属庸人自扰，毫无功劳可居。

胡适认为他对于“无为”的想法完全正确，因此还尽量地去阻挠中国

政府，不要企图把美国拉进一些在国际关系里不切实际的大计划之中。所以当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英、美、法、苏在亚洲地区进行外交合作时，胡适却在1939年4月底批评政府，指出美国政府此时根本没有可能去关注中国所提的这个方案。胡适提醒重庆政府称，罗斯福和赫尔都具有正确的政治判断力，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听任美国领袖们采取他们自己的步骤，去拟定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中国政府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最后反而刺激美国人民提高了警觉性。换言之，中国要想得到好结果，上上之策就是等待，并且要无所作为。[39]依照胡适的主张，中国政府不但不应该向美国政府官员施加压力，也不应该向国会领袖们进行游说工作。胡适为了支持他的论点，特别举出美国单方面停止美日贸易条约的事件作为证明，表明即使没有来自中国的游说，美国国会也会做出正确的决策。

然而胡适这种极端的主张，即便是陈光甫也无法认同，因为陈氏不禁怀疑，胡适之所以建议中国政府不要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工作，其真正动机乃是出于他不愿意冒犯美国的国务院。但是陈光甫也看得很明白，假如胡适能够鼓起勇气撇开国务院，而改向国会进行更积极的游说工作，或许国务院根本不会感到丝毫不快。反之，如果胡适自以为“谨守本分”地避免游说活动，国务院也未必就会领胡适的好意，更不会因此而加倍努力地去维护中国的利益。说不定，国务院反而会食髓知味，习惯了胡适的自我退让，从此更指望胡适会谨守本分，免开尊口。当然，陈光甫也看到另外一个曲线形发展的可能性，那就是万一胡适对国会的游说工作失败，他依然可以振振有词地宣称，他的“无为”哲学果然从来就是正确的。[40]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假如一个弱小国家不愿意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努力，那么它的命运必将永远操之于他人手中，而它的目标则可能永无实现之日。胡适“无为”外交作风的后果就是他不知不觉地把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引导上了这条路。

（三）中国对美外交究竟应该遵循何种途径？

无论吾人对胡适个人的脾胃或是知识的倾向究竟持何种看法，他作为一个外交官，其工作成绩最后必须接受鉴定。就胡适而言，有两个因素影响了他的外交行为。一个是他对外交工作本质的认知影响了他如何去界定一个外交官的工作范围和权限；另外一个是他向中国政府建言的质量和他认为哪些是可以经由中美互动去达成的结果。这两个因素都对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产生过重大后果。

1.外交工作的定义是什么？

胡适对于外交的看法委实令人费解。虽然他针对许多当代事物经常做出大量评论，但是他在任职大使之前、之间和之后，都对“外交”一词

的含义甚少论及。我们只能猜测，或许胡适认为外交是政府功能的一方面，其性质是处理国家的大政方针，对象是战争与和平、结盟、制裁、禁运、中立法、公众舆论、国家间的互相了解与合作等大问题。虽然这类问题和中日战争有密切关系，但是也恰恰是中国政府无能为力去影响美国政策的大问题。换一个角度看，中国抗日战争急需金钱和武器，而它们又正是胡适最不愿意去处理的问题。这些主观意愿和客观事实格格不入的情况，必然严重地限制了胡适的外交运作空间。

胡适一就任大使职务，就立即给孔祥熙写信（1938年10月3日）。信中强调外交事务的确重要，而且誓言会尽全力地把外交事务做好。但是他话锋一转，紧接着声明，诸如借款、购买军火、宣传、募款等事务，虽然其重要性无可否认，但是非外交核心事务，因此应该付托给他人去处理。胡适这番对于大使职责的阐述让重庆政府大吃一惊，也让中国派驻欧洲各国的外交官大惑不解。[41]

1939年1月，胡适向外交部长王宠惠提出下一年度工作计划书时，再度阐述了他对外交工作的展望。他声称，计划帮助美国政府和人民去了解中国抗战的决心和对外援的需要，这样就可以争取美国更多的援助和对日本进行制裁。[42]其实胡适所指的只是对美国民众进行教育，使他们了解中国的需要，至于有关借款的具体事项，还是要交付给专家去处理。事实上，胡适在1939～1940年处理事务的做法，是让陈光甫去负责借款，而让李国钦去负责购买军火。陈李二人都和美国财政部关系良好，而又深得孔祥熙信任。但是事后这项安排的发展并不顺利，因为胡适本人既不愿意去协调，也不愿意去监督他们的工作。基本上他对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务的具体内容不愿意去学习了解，只是顺其自由发展。所以当陈光甫和李国钦两人关系恶化时，他们的工作效率就大受影响，而胡适始终是一位旁观者。[43]胡适对于外交工作和对大使职责的偏狭观念，可说是直接限制了他无法制定出一套有系统的策略，去向美国政府争取到更多借款和军火援助。

胡适本人的文章和日记，对于中国购买军火的需求几乎一字不提，而中国政府的官方记录也印证了胡适几乎对军火购买事务完全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由于缺少了胡适的积极推动，中国政府在1940年以前几乎完全无法有效地向美国政府提出购买军火的需要，当然也就不受美国政府重视。事实上，中国政府资料显示，胡适与美国的战争部和军火制造商从来没有发生过接触，也没有参与过任何一项武器的采购工作。正因为胡适的全程缺席，直到1940年中期，中国在美国采购武器的过程依然是零零碎碎和断断续续，而且多半是以失败告终。

相比之下，胡适对于借款的态度则显得略微积极和具有弹性。因此，他在涉及借款工作时的表现，更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胡适本人对于外交工作的看法如何影响到他的成绩。

如上所述，胡适在第一次借款时所持的态度，基本上是让陈光甫全盘操控谈判过程的一切细节。即使在第二次借款时他已经自告奋勇地想

参与更多的过程，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彰显。他只是在摩根索办公室举行的会议中露面一次，此后就不见踪影，把重担仍旧全部推给陈光甫。[44]

胡适不仅在借款谈判过程中避免担当责任，而且对于显然属于大使分内该处理的政治事务也同样未能尽职。虽然摩根索的确有心主动帮助中国，但也希望中国政府方面提供一些声援，作为他去争取国务院、白宫和国会支持的筹码。但是当陈光甫向胡适转达摩根索口信敦促他采取积极行动时，胡适不但拒绝接受，甚至还辩称中国本来就应该听任世界局势顺理成章的发展，而不要勉为其难地妄图扭转局势。只是在陈光甫再三恳求之下，胡适才勉强地把借款要求向亨贝克提出，但是不肯向赫尔提出。[45]至于说到向国会进行游说的功夫，摩根索对胡适不作为的表现更是深表不满，以致他坦白告知陈光甫，称他没有兴致和胡适打交道。因此在第二次借款的谈判上，摩根索露骨地宣布他只愿意和陈光甫一个人谈判。[46]

总的来说，胡适不愿意和国务院维持密切联系，对于中国政府想从美国获得贷款的努力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财政部又表明态度不愿意和胡适打交道，则更加重了工作的困难度。由于胡适难得和罗斯福见面，而他又怕冒犯国务院以致不敢向国会进行游说，使重庆政府不得不做出结论，这种一事无成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善。

胡适对于借款事务的冷漠态度，有时甚至达到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1940年2月初的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借款的谈判在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面临一个关键性的投票阶段，为此陈光甫极力敦促胡适亲自出面去游说几位态度游离的参议员，争取他们支持通过此项议案。岂知胡适不但直截了当地拒绝了陈光甫的要求，而且还向陈光甫承认称，其实格林参议员早先已经向胡适表示过他愿意在投票前和胡适进行沟通，但是被胡适一口予以拒绝。而胡适所持的理由仍然是他不想干涉美国内政。用不着说，这个回答简直让陈光甫目瞪口呆。

在和陈光甫谈话中，胡适进一步表示，美国终止和日本的通商条约已经给了中国一个最大的恩惠，因此中国应该识相，不要再去强人所难，逼迫美国给予更大的恩惠。更令陈光甫意想不到的是，胡适宣称他在参议院投票的关键时刻无法留守华盛顿，因为他已经安排好与周鲠生到佐治亚州的海边风景胜地去度假，而他果然就按照原定行程表丢下华盛顿的“俗务”，安心地去度假了。陈光甫无法理解何以胡适不能体察眼下中国抗战的重大牺牲，居然还有闲情逸致去游山玩水。幸好在胡适出游之后，重庆政府赶紧找到其他得力人士进行游说，使参议院有关委员会最终做出了对中国有利的投票。[47]

但是陈光甫也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他在离开美国之前，做出最后努力，恳请胡适今后能给予借款工作更多的关怀和参与。但是无论陈光甫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让胡适增加对于借款工作细节的了解，帮助胡适在未来可以顺利接管借款事务，胡适一概不予理睬。事实上，

胡适直截了当地告诉陈光甫，他对财政事务缺乏兴趣，就如同陈光甫对哲学问题缺乏兴趣是一样的，要想强迫他们彼此去学习对方的专长，根本就是浪费时间，毫无意义。胡适这番怒形于色的表达，让陈光甫最后只好放弃任何努力。对于之后应该如何去处理与借款有关的事务，陈光甫在离开美国之前始终无法向胡适做出任何交代。[48]胡适对于借款工作的排斥，可谓断然决然毫无商量余地。

读者们不禁要问，借款和军火对于战时中国如此重要，何以胡适会如此无动于衷，如此地事不关己？对于这个疑问，或许至少可以从三方面去寻求答案。首先，胡适对于这两个领域从来没有掌握过任何专业知识可供他做出正确判断，而他也毫无兴趣去学习这方面的新知识。其次，他对于外交事务所下的定义从不包括这两方面的工作。其三，他的个性和心理状态历来是运用温和言辞进行说服工作，尊重他人选择自己的道路而行。胡适害怕强迫他人采取行动，更害怕乞求他人施以援手。这一类的想法都会使他手足失措。但是当中国处于国难当头生死攸关之际，借款和军火正是中国赖以生存的唯二途径，是中国外交官必须全力以赴，从美国手里取得的最宝贵资源。更何况中国外交官在这两方面获得成功的概率，要远远大过于去游说或挑拨美国向日本开战。

不幸的是，在胡适心目中，这些事务在本质上却最令他嫌恶，不应该由外交官去担任，而应该交给专业人员，比如说银行家和负责军火采购的军官去办理。这就难怪在1940年以后，当中国政府对于借款和军火的需求日益迫切时，蒋介石不得不改派另外一个团队去接管胡适坚决不肯承担的责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蒋介石最后不得不派遣宋子文赴美，而胡适也毫无理由可以抱怨他被冷落的遭遇。

在中国到底应该指望如何经由外交途径在美国达成何种效果这个问题上，胡适和重庆政府领袖们之间也存在一条鸿沟。就最低程度而言，重庆政府指望驻外使节能够服从命令去达成政府所指定的目的。重庆政府更高的希望是使节可以发挥主动积极精神，表现出一些办事的能耐，甚至创造出奇迹。随着中国军事和财政情况的不断恶化，重庆政府当然希望从国外听到令人振奋的消息。随着中国遭到西方列强接二连三地背弃，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也逐日增加。到了1940年中期，美国可说是变成了中国唯一也是最后的国际支持。

对于重庆政府领袖们的这种窘迫心情和处境，胡适理当完全了解才对。岂知胡适的想法却自成一个格局。他不断地劝告重庆政府应该务实，不要心存幻想。令他特别感到自傲的是他有勇气直接打破蒋介石心中的幻想，并且“开导”蒋介石应该多去学习了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不幸的是，胡适这种做法不但没有改变蒋介石的思想，反而是激怒了后者。在这种背景下，读者就不难了解，何以胡蒋两人之间的隔阂会日益加深。事实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何以蒋介石长时间以来能够如此委屈地容忍胡适？即使中国政府在1940年中期已经明确决定放弃由胡适、陈光甫争取美国借款和军购的做法之后，蒋介石仍然把胡适留在大使位置上达两年之久。而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不断地希望胡适能够改弦易

辙，做出一些积极贡献。只有在对胡适彻底失望之后，蒋介石才终于在1942年9月免去了他的大使职务。

在胡适整个使美的外交年岁里，他对于美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政治环境里的各种限制和困境，总是表现得能够充分体谅，而又让自己举止有度。每当罗斯福或是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在口头上表达对中国的善意，而又同时为他们无法做出具体援助行动而表示遗憾时，胡适的响应永远是赶忙劝告重庆政府领袖们必须体会美国领袖们的困境与善意，而不要给后者添麻烦。[49]

但是身处国内的领袖们却无法接受胡适这种自我设限的做法，而抗日战局的日益恶化又使他们无法认同胡适这种气定神闲的长程构思，因此他们不得不催促胡适务必加倍积极地争取美国支持。即使是胡适在政府中服务的好友们，也乞求胡适做出更大的努力去争取美国支持。[50]但是胡适对于这些来自重庆的呼吁基本上置之不理，而它们也只能让胡适越来越憎厌他的大使职务。[51]

然而尽管胡适明确的排拒，也无法挡得住重庆的敦促。他最终的对策就是采用迂回手法去逃避这些敦促。比如说，在1939年1月，当胡适不愿意去执行一项来自外交部的指令时，他采取的办法是把他的反对意见向中国驻欧洲各国使节广为散播，希望借此可以赢得后者支持去抵制外交部。[52]如果重庆压力委实过大而使胡适无法规避时，他有时竟然会使用一种离奇而出格的手段，去向美国政府透露他本人其实并不同意重庆政府的做法，但是为了忠于职守，又不得不在形式上向美方传达，这样就可以把重庆政府指令的效力大为降低。胡适所采取的策略，是运用他最擅长的分析能力，在美国人面前以貌似“客观”的立场，替美国人把重庆政府的政策内涵“分析”得一清二楚，而他个人所采取的姿态则是以超然态度置身事外，根本看不出他本应该是重庆政府政策忠诚执行者的踪影。胡适的这种做法在他1938年写给亨贝克的一封信里做了充分表达。胡适写此信的目的是把蒋介石的政策做一番分析。他写道：

他（蒋介石）非常担忧当前的军事情况，而他也拼命地想找到及时而又有效的援助。他的这种心理状况非常像一个即将溺水身亡的人，只想抓住身旁的任何物件（祈求活命）。坦白地说，他希望能够获得民主国家有效的干预（中国抗战）。他不想经由法西斯国家的调停而接受一个耻辱的和平。因此他数度拒绝了德国主动想做调停者的愿望。蒋介石之所以请求罗斯福总统主导推动和平调停，其原因是因为他看不到民主国家有意介入中日争端。在华南发生的情况（广州沦陷——引者注）显然重新激起蒋介石的希望，英美两国可以干涉中日争端。[53]

胡适还写道：“中国抗日战争崩溃的危险的确非常大。如果民主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崩溃而投降的话，就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胡适这封信的语气委实令人纳闷。因为作为中国大使，他的基本职责应该是竭尽全力地去申述蒋介石的立场，再用自己的语言去强调蒋介

石的要求。但是恰好相反，他把蒋介石的立场用一种事不关己的语调加以传达，然后紧接着帮助美国人对蒋介石做了一番心理分析。胡适并没有遵照蒋介石指令去极力争取援助，而只是把蒋介石的请求转告亨贝克，然后任由美国人自行决定如何处理。这样也就让胡适自以为他已经完成了任务。

2.胡适对重庆的忠告——“苦撑待变”

为了历史的公道，在此也必须指出，胡适虽然和重庆政府领袖们不断地争论政府政策的正确性，但是对于抗战却从来不曾是悲观主义者或是失败主义者。相反地，他坚决相信美国最终将为了保护它自身的利益，选择适当时机和日本一战。

然则在美日开战成为事实之前，中国的自处之道究竟应该是什么？胡适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苦撑待变”。

这个观念早在1937年就已经在胡适心中逐渐形成。他在1937年12月26日致陈布雷的电报中首次写道：“适等深知国力之艰，待援之迫，然此时舍苦撑待变一途，实无快捷方式。”[54]胡适之所以提出这个观念或许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不久前日本攻击了在长江航行的美国兵舰（1937年12月12日），在美国激起了人民的义愤，这使得胡适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美国原先的“厌战贪和”心理并非言语笔墨所能改变，然而一旦日本对美国施加暴行，则人民情绪将急速改变。这从美国人民的排日心理和抵制日货运动的激烈程度就可以看出。因此设若类似事件再发生几次的话，则战争必将难以避免。而胡适能够接触到的美国“政府要人”（亨贝克？）也向胡适传话：“只要中国能支持，必有意想不到的转变。”[55]换言之，胡适的“苦撑待变”并非凭空设想，而是得到美方官员的信息而衍生的理念。

自此之后，胡适在与朋友的来往书信中经常提及这个观念。[56]到了1938年10月20日，胡适在致蒋介石的信件中更进一步地正式使用了这个观念。胡适对当前局势做了一番分析，他向蒋介石说明，美国运用它的国力去为中国争取和平的时机尚未来到。但是胡适也指出，苏联和美国都不愿意中国去和日本进行和谈，因此苏联才会向中国提供武器，而美国也向中国提供借款。有鉴于此，中国的最上策就是“苦撑待变”。[57]不久，胡适在一次演讲（纽约，1938年12月4日）中首度公开推出这个观念。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支持对于中国抗战至为重要，因此中国必须坚持作战，等待改变的到来。[58]

随着时间转移，胡适对于这个观念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对于它的内涵也逐渐说得更清晰。“苦撑”的意思是中国必须竭尽一切自身的力量去作战，并尽量延长作战时间。而“待变”的意思是中国必须耐心等待世界大局转变成为对中国有利。[59]这个观念作为一个口号，颇能精确地表达胡适心中对于抗战中的中国所能做的选择，也表达了他的对美政策

目标和他心中的外交到底可以为中国取得何种成果。

诚然，胡适从来未曾宣称他可以对世界局势的变化未卜先知，但是他的思想发展确实是前后一致的。早在1935年，胡适就已经形成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一旦做出抗日的决定就必须准备去承受“绝大牺牲”，独立苦战三四年，领土大量沦陷，国家受到严重破坏，然后太平洋战争才可能爆发。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必须做好孤军抗日的心理准备。[60]

胡适1937年10月1日在旧金山的一场演讲中表达了他的信念，那就是美国迟早会被卷入战争。他说：

在我们的世界里，战争与和平都是不可分割的。假如一场战争进行得够久的话，它就会把其他的国家也拉进战争。不管人们是倡导中立法或是和平主义论调，都无法使他们置身战争之外。同样的那些侵略国家中愚蠢的好战者，他们既然能够强迫人们参与上一次战争，他们也同样能够把人们拉进当前的这场战争。[61]

按照这个逻辑，胡适所致力的目标就是鼓励中国咬紧牙根单独作战，一直等到其他国家被迫参战为止。1938年夏末，胡适告诉陈布雷：“欧战必演成大战，甚难挽回。”这样就会使国际局势为之活跃，而“我必须咬牙苦撑，立定脚跟，始能利用此世界动态”。[62]

在上述1938年12月4日于纽约市的演讲中胡适把这个想法说得更为明晰：

中国的最后胜利必须依赖两个因素：一，它必须坚持继续作战，而它也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作战。二，在中国的长期抗战中，国际情势很可能转变成为对中国有利，对日本则不利。[63]

1939年1月，胡适自认为已经从美国的远东外交政策中看出了几个令人振奋的端倪，其中包括：美国给了中国经济援助，而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它也在太平洋地区加强军备去对抗日本的威胁；等等。[64]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向胡适提供了更多理由去相信中国的耐心等待（苦撑）最后必将得到结果。在1939年4月19日的会谈中，罗斯福告诉胡适，中国应该坚持抗战，因为世界局势可能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假如世界大战爆发，则日本和苏联的关系必将恶化，甚至引发战争，而这对中国一定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假如世界大战不爆发，则日本可能希望寻求和平而相应去改变它对中国的政策。[65]而在胡适眼中，苏联和日本关系的发展及欧洲局势的发展，都与他原先所预期的颇为相符。这就使他倍感自信。

1939年8月3日，胡适又向蒋介石发送一份详细报告，阐述对国际事务的观点。他反复强调，虽然世界大局的发展并非中国所能掌控，但是中国的坚持抗战仍然是强迫日本在国际上冒大风险的最有效方法，而这也是中国唯一能够做到的。胡适列举了美国政府最近的一些措施去证明它们全部都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66]在把美国1917年和1939年的态

度做了一番比较之后，胡适认为世界大局对中国越来越有利，因为美国政府单方面废止美日商务条约只能迫使日本面对左右为难的选择，那就是要么向美国让步，要么导致美日关系全面破裂。胡适接着以他本人对于日本国民性的了解作为依据，预测美日关系破裂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67]

毫不奇怪，蒋介石最初的反应是认为胡适言之有理。因为胡适终究是中国人中最有资格解释和分析美国政治社会现象的权威，他的言论当然具有分量。再说，蒋介石本人也希望事情的发展果能如他所愿。因此，一直到1939年初，蒋介石依然习惯性地透过胡适去看中美关系。当蒋介石在1939年4月18日初次听说罗斯福刚刚把大西洋舰队部分兵舰转调到太平洋地区时，立刻感到非常振奋，认为罗斯福终于拿出勇气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了。[68]但是当美国和日本关系不断恶化而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实质好处时，蒋介石对于胡适观点的准确性又逐渐丧失了信心。

正如本书第四章将会更详细地说明，蒋介石对于胡适处理中美关系的信心在1939年到1940年春天急速降低。在此之前，胡适之所以能抓住蒋介石的注意力，就是因为他为蒋介石指出在地道的尽头可以看到一缕光明。然而他却不能告诉蒋介石那个地道究竟有多长。从重庆立场来看，中国能够从美国获得援助的希望，甚至美日之间爆发大冲突，都不过只是影响中国抗战前途的众多因素中的一部分而已。在中国境内，抗战进行得极为艰苦，财政情况则更为拮据。在国际上，凡是有能力帮助中国的国家（英国、法国、苏联）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出于不同动机而对中国进行伤害。到了1939年底时，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在当前状况下，它实在无法再“苦撑”下去，而“待变”逐渐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中国逐渐警觉到一个更可怕的可能，那就是在“变”给中国带来好处之前，中国就可能会全盘崩溃。这些情绪最终让蒋介石摒弃了胡适所建议的“待变”外交方针，而采取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途径——把宋子文派遣到美国去。

事实上，蒋介石和胡适两人在七七事变前，对于中国如果进行对日抗战可能导致的后果，彼此所持的看法其实并无太大差异。简言之，蒋介石的信念是“攘外”必须首先“安内”，而胡适基本上也同意这个看法，认为中国对于日本不断地侵略必须暂时忍气吞声，以换取更多时间去达成国家统一，并且训练一支强大军队。如前文所言，胡适1935年就已经认为中国在能够争取到西方国家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侵略之前，必须准备好具有单独作战三四年的能力。同样地，蒋介石在1937年也曾明言，中国千万不可奢望战争很快就能结束，但是可以希望最终必定会战胜日本，因为他估计日本军队仅仅是在地面上进攻到四川省，就至少需要花费三年时间，而日本由于受到本身资源限制，根本无法把战争支持如此之久，更何况国际上反对日本的势力也必定会在这段时间内形成。[69]这就是蒋介石对于抗战胜算的基本看法。

当胡适和蒋介石二人同时从中国角度去审视国际局势发展时，他们

最终会得到相同的结论，这个现象并不奇怪。而他们也确实相信国际大局发展将越来越对中国有利。在抗战最初的年份里，蒋介石对于美国事务的陌生感，使他自然地高度依赖胡适的信息和判断力。即便是到了稍后的岁月里，当蒋介石对胡适的依赖程度逐渐减低时，他对国际变化对于中国所能产生的影响，依然大致和胡适的看法相同，这也仍然能够让人理解。但是面对这些国际变化时，中国到底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和中国到底有多大能力可以独力支持抗战？这几个重要问题终于导致他们分道扬镳。

胡适所主张的“苦撑待变”有其能够自圆其说的逻辑，更何况如果仅仅是把这个主张和美国政府长期的外交政策相对照的话，它的正确性也似乎言之成理。但是胡适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听在蒋介石耳中却毫无吸引力，因为从他的立场看来，胡适政策的致命伤正是因为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苦撑”到国际局势“变”到可以让中国受惠之日。换言之，即便是胡适所指望的美日关系恶化果然正如他所预期，在此之前中国早已不堪战争负荷而败亡了。这就不免引发了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胡适到底是否充分了解中国此时所承受的痛苦？抑或是他去国过久，以致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产生了严重隔阂，对国内的军事溃败和财政危机根本无法感同身受？

我们必须记得，胡适是在淞沪会战进入高潮之际（1937年9月）离开中国的。当时全国上下的民心士气正处于亢奋状态，而此后在他担任大使期间没有回国述职。尽管胡适在国内的朋友不断地向他传递悲观信息，并且大声疾呼要求美援，但是胡适可能依然无法切身体会中国在他离开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变得多么虚弱。但是对于蒋介石而言，情况则大不相同，因为这是他每一天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1939年底，日本政府发布了一份战事调查，称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11月底，仅仅是中国官兵的死亡人数已达1218462人，而日军自称死亡官兵为3万～4万人而已。抗日战争到此已经进行了约17个月，相比之下，中日甲午战争只持续了8个月（1894年7月至1895年3月，而且战斗稀疏），日俄战争也只持续了16个月（1904年2月至1905年5月，而且双方都不在本土作战）。[70]鉴于蒋介石并没有指斥日方数字造假，而抗战结束又遥遥无期，则国民政府如何能“撑”便成为每日每时最大的挑战。

照理说，外交工作的重点是运用说服力去为国家达到其目的。如果依照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胡适在美国的任务基本上并未达成。

他对任何美国政府原本没有打算去面对处理的问题，都尽量避免去向美国提出讨论。这些因素也让我们更容易了解，为什么胡适在美国官员心目中有那么好的人缘，特别是在白宫和国务院，尤其获得喜爱。但是胡适的这种作为，也放弃了他成为中国一位有效率的外交官的机会。一个称职的外交官绝对不可以到一个外国驻地，只是表现得客气和谦让并因此而取悦于当地政府。不幸的是，胡适的个性却让他不知道如何用

其他方式去执行任务。在他着意向地主国表示温文儒雅和维持中国“国格”的同时，事实上已经放弃了他的基本职责，而沦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外交官了。

胡适的行事作风不禁让人怀疑，一个弱国的外交官，是否拥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去奢谈“尊严”“风度”等问题？对于一个正处于生死交关的国家而言，它在任何时候或许都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扯起喉咙大叫大嚷地祈求外力援助。而这也正是中国政府当初把胡适派送赴美的主要动机。如果外交官开不了口去争取援助，这个外交使命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胡适在私人行为上，能够表现出咬紧牙关默默承受苦难而不失身份的美德，但是把它转移到处理国家事务时，就变成不合时宜的低调了。而胡适再三引以为自豪的“无为”政策，却正是出于这些低调，使他在外交战场上打不开局面，从而严重地妨碍了执行大使任务的效率。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公众形象和内心感情之间有着重大差异。他内心明明对中国军事挫败感到极端沮丧，但是在公共场合还是表现得高度乐观。举例说，广州沦陷的消息对于陈光甫和席德懋在心理上都造成了严重打击。但是胡适还能够安慰他们两人不要泄气，其所持的说辞是，虽然他们三个人离战场距离最远，但是他们是中国剩下的最后（外交）军队，因此绝对不可放松自己的职责。这些话听起来颇有慷慨激昂气概。岂知几天后武汉又告失陷，胡适禁不住在日记中写道，在过去15个月内，多年来所有的噩梦都已经成为事实，而在过去12个月来所有的指望却没有丝毫实现的可能。[71]即便胡适看不到美国有援助中国的迹象，他依然鼓励中国政府一定要勇往直前，继续抗战。

最让重庆政府日益感到灰心的是，胡适的“苦撑待变”口号不过是唱高调，内容空洞。胡适从来没有说明，在国际局势“变”了之后，中国究竟能够指望得到何种好处？在国际局势必然改变的前景下，胡适下一步的建议或许还是激励中国做出更多的苦撑，乃至了无止境。当胡适在1938年10月第一次向重庆政府提出他的主张时，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在当年11月国会选举后将会给中国的处境带来显著的改善。但是在国会选举以及一年后各种其他的改变都相继发生之后，胡适依然只是提到黑暗地道的尽头有一丝光明，但是提不出更具体的希望。

有关这一点，胡适在重庆最忠诚的支持者的反应最能一针见血地点出问题之所在。翁文灏是胡适在重庆的好友中，最初全心全意支持“苦撑待变”说法的，而且在其他领袖推动和平浪潮时（1938年），翁氏曾在蒋介石面前极力支持胡适的论点。但是到了后来，就连翁文灏也写了许多信要求胡适积极争取美国援助。因为作为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翁文灏非常清楚中国到底还有能力“苦撑”多久。

到底要“苦撑”多长时间？胡适自己倒是提供了一些信息。虽然他从未明白说出中国在得到有利的改变之前还需要苦撑多久，但在1938年10月间却提供了一个历史先例作为参考。胡适在日记中提到了菲力浦斯·拉塞尔（Phillips Russell）出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第一位文明的美国

人》（*Benjamin Franklin：the First Civilized American*），书的内容是富兰克林作为美国使节，如何在法国奋斗了八年时间，最后成功地为美国借到2600万法郎借款。胡适在日记里对于这段史实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这让陈光甫和他自己都受到莫大鼓舞，因为富兰克林和今日两位中国使节的处境大致相同，因此他们必须拿出耐心，去“苦撑”得更长久些。[72]

假如当时重庆政府领袖们得知胡适把富兰克林当作“耐心”的楷模，一定会大感恐慌，因为没有政府领袖能够相信自己能够苦撑那么长久。但是胡适却也实在提不出更好的方案来分担重庆政府的忧虑。

胡适的“苦撑待变”模式最大的缺点，是它既缺乏想象力，又完全使中国陷于被动。假如中国政府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依赖自己的国力去进行抗战，而任由其他国家去推行各自的外交政策的话，那么它大可以停止外交活动。胡适主张的被动性，最终含义就是放弃外交。即便是期盼的那个“变”终于到来之后，中国依然可能得不到所需要的外援去抵抗敌人，反而是可能被其他国家利用去作为一颗棋子，帮助它们去减少人力物力的损耗，而不是有利于中国本身。事实上，正是这个可能性，不但在此后变成中美两国间的严重摩擦点，也在珍珠港事件后变成中国和西方盟邦之间的冲突所在。而这些发展都完全超出胡适的预料。

回顾胡适的“苦撑待变”四字真言，始用于1937年12月，而前文所引蒋介石在10月底的日记[73]关于“苦撑待变”思路其实比胡适早一两个月即已形成，也比胡适所言更为缜密和具有逻辑。这恐怕是胡适的支持者始料未及的史实。而且胡适的“苦撑待变”是他不厌其烦向别人开导和推广的观念，即便是向蒋介石也是多番唠叨，语气近于教授对学生的开导。而胡适所不知道的是蒋介石早已在同样的思路上走了一大段路程，当他听到胡适拿出这般循循善诱的教诲姿态时，或许真是觉得啼笑皆非。难怪他有时会忍不住提醒胡适，他并不是像胡适所想象的那般无知。

二 陈光甫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如果想要给中美关系做一个较全面的检讨，那么就不能忽视陈光甫在借款谈判过程中扮演的极重要的角色，他的贡献必须加以认真分析。我们想要了解的是，尽管蒋介石对于胡适的外交作风非常不满，他是否曾经指望陈光甫取代胡适继续处理中美关系，或至少可以补正胡适的不足之处，为中国争取到更多援助？

不幸的是，重庆政府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它将无法指望胡适或陈光甫两者之中任何一人能够为中国争取到外援。这个结论令人感到特别沮丧，因为陈光甫一直是争取美国借款谈判中的重要人物。仔细看来，陈胡二人之间其实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对于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看法相同，他们向重庆政府提供的建议也大致相同。1938～1939年，重庆政府和它在华盛顿的使节之间，就如何与美国人打交道一事一直存在摩擦。在重庆和华盛顿两地的中国政府官员的来往文电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而在私人信函中更可以看出他们的冲突程度。这些根本无法协调的歧见，使得蒋介石和其他政府领袖很难制定一个明确而又连贯的外交政策，更使得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严重不稳定。最终的结局是，陈光甫的观念和他与胡适的亲密关系使得重庆政府不得不另起炉灶，在1940年中期开始寻求新的外交途径。

从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从1937年开始就一直希望从美国获得财政借款和政治借款；它希望能够借到大笔款项，由美国一次付款，不附带条件，也不限制中国政府如何去运用这些款项。[74]中国政府最希望的是美国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向中国借款，因为如此则可以由中国政府选择其用途，或者用来稳定法币信誉，或是充实政府外汇储存，或是到国际市场里以最好的价格去购买武器军备。相对而言，政治性借款则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比如说，在中国遭受重大外交或是军事挫折时，可以运用借款来激励民心士气。毫不奇怪，孔祥熙对于桐油谈判，原先最高的指望是能够借到1亿美元现金，用来支持中国的外汇需求和稳定中国币制，并及时地与汪伪政权的货币进行对抗。[75]

但是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极力抵制中国的这些要求。[76]陈光甫抵达美国后，逐渐对美国社会上的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强烈情绪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同时也更能体会为何美国领袖们难以克服来自国务院和国会对向中国提供政治性借款的阻碍。[77]比如说，财政部官员就一再告诫陈光甫，称美国借款不可用于购买直接作战所使用的武器，而只能购买与战争间接有关的器材，比如汽油。[78]因此陈光甫完全了解，美国政府必须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并顾及本国的公众舆论，而不能一味顺应中国的要求。陈光甫和胡适一样相信，中国必须依赖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抗战以及解决财政危机，切不可奢望外国人施舍协助。[79]

因此，每当重庆政府官员似乎不能了解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限制，而不断地要他去麻烦美国要求给予借款时，陈光甫总是感到万般无奈。和胡适一般，陈光甫也一再抵制重庆政府的指令，因为他认为执行这些指令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只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80]陈光甫进一步觉得，重庆政府过分强调借款的宣传价值和心理效应，而不看重它们在财政上的实效，这种做法根本不切实际。[81]结果是，陈光甫不断地抱怨重庆政府对他的进言没有给予重视。[82]事实上，陈光甫和胡适两人不时被迫采取联名上书的方式，企图让重庆政府能够认识清楚，向美国提出的多项借款要求根本都没有实现的可能。[83]

陈光甫对于中国政府应该如何使用美国借款，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事实上，他认同美国的观点，认为在当前抗战环境下，中国政府想利用借款方式来稳固币制的成功概率非常小。[84]依陈光甫之见，中国币制是否健全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国际局势，二是国内战争进行是否顺利。假如两者皆对中国有利，则法币自然健全。反之，即便有百分之百的外汇存底，法币仍将难逃贬值命运。[85]他又认为，任何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其币制贬值本是正常现象，欧洲国家在欧战爆发时也历经同样命运。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应该让法币在自由市场里听任它的价值浮动。归根结底，陈光甫认为中国的出路是自救，而不是不断地去骚扰美国人。[86]

由于陈光甫持有这些看法，使他对于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和着重点，与重庆政府的期待大相径庭。在1939年9月，陈光甫就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政府最多只愿意借给中国小额款项。[87]但是陈光甫和胡适有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即胡适的立场是把一切决定权交由美国，不去做任何强求，陈光甫则至少还愿意尽一份努力，帮助中国争取到更多的借款。

陈光甫曾拟订了一套计划，设法去赢取美国借款。根据胡适的认知，美国政府最终必将会帮助中国，其原动力将出自美国遵循的道德原则、民主价值和对国际法的尊重。但是陈光甫则以一个生意人的观点，认为美国帮助中国的最根本动机，是取决于借款是否符合美国自身的商业利益。[88]正因为美国不会采取任何可以伤害它自身商业利益的行为，所以中国政府想要得到美国借款，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利诱。那就是承诺用美国借款去购买美国产品，并且向美国提供它所想要的中国产品作为担保。陈光甫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官员不愿意提供政治借款的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他们也需要迎合公众舆论，不想被指责把美国拖进战争之中。依照陈光甫的分析，中国唯一的选择是接受商业借款，这样既可以让美国政府在实质上帮助中国，又可以振振有词地向美国人民宣称借款是为了促进美国的商业利益。[89]

一旦陈光甫认定美国法律的限制使得借款必须具备商业性质时，那么在他看来，中国应该要去争取合作的美国政府对口单位就不是国务院，而是财政部和进出口银行；借款谈判的重点，将会是如何帮助美国拓展商务、增加出口，并且保证债务得以顺利按期由中国政府偿还等问

题。假如中国能够证明它有能力满足以上要求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帮助美国政府去降低来自国会的反对力量，并且增加贷款的额度。[90]在1940年2月，正当第二次借款谈判接近成功之际，陈光甫再度向重庆建议，中国必须小心使用有限的资源（2000万美元）去购买最迫切需要的物品，而且这些物品必须是能够在短期内运回到中国的，同时还需要拟出一套周全计划去赢取美国的信心。[91]扼要言之，陈光甫的策略是首先打开美国财政援助的大门，不管数量多少，务求先拿到美国借款再说。一旦美国商业借款大门开启之后，中国接着就必须尽量把这个门开得更大，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步骤是尽量遵守借款协议，同时巩固中国在美国的信贷地位。只有在稳固好基础之后，中国才可能希望获得更多的美国商业贷款，两国间才能发展出一个平稳的财经关系。[92]

为了保证这个策略得以成功，陈光甫再三强调，中国必须尽一切努力去维护它的信贷声誉。[93]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就必须证明它有能力克服交通运输上的困难，把桐油准时运送到美国。他也要求中国政府尽一切努力去替美国政府设想，不要使它在国际关系上遭受不良后果。[94]如果这个策略能够付诸实行，则一旦借款有了开始，就可以源源不绝，而且它们的条件也将越来越优惠才对。[95]

拿到美国借款之后，陈光甫坚决主张中国政府应该首先将之用来改善经济大局，比如说开发西南各省丰沛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扩展国际贸易。为了达到此目的，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有效的运输系统，使西南各省的资源可以出口到国际市场，而外国产品也可以顺利进入中国本土。陈光甫不厌其烦地提醒重庆政府必须牢记在心的是，美国给予中国借款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借此开拓美国产品的市场。如果中国政府不能运用美国借款去采购美国产品的话，则美国就根本没有理由继续向中国借款。[96]

在陈光甫策略中完全不曾提及的是军事器材装备，而后者正是中国政府越来越无法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到的要件。陈光甫当然理解中国的需要，但是他的立场非常明确，那就是中国必须谋求其他方案去满足军备需求，而不可依赖美国借款达成此项目的。换言之，武器和借款必须分别处理。

陈光甫从美国回到中国后不久，在1940年7月2日曾经和蒋介石举行了一次会谈。他告诉蒋介石，中国解决国内经济危机和争取更多国外经济支持的最重要手段，是增加西南各省矿产的产量，并且将其运往国际市场去销售。陈光甫认为矿产的生产和销售，不但可以大幅增加中国抗战胜利的机会，也可以为战后国家重建奠定稳固基础。[97]但是，陈光甫也同时给了蒋介石一个悲观的估计：尽管美国人对中国充满好感，但是他们只愿意对英国出力协助，因为“血比水浓”。[98]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则是蒋介石避而不谈的，那就是陈光甫计划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国民政府可以控制和开发西南各省的资源。如果国民政府根本缺乏这个能力，则陈光甫的计划只能成为画饼。这就使局面变得非常清楚：如果蒋介石仍然指望从美国获得更多援助的话，他就不能依赖陈光甫，而必

须去找一位更积极的人去进行新的努力。

尽管陈光甫和胡适的行事作风或有不同之处，但他们对于向美国借款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则看法大致相同，他们都认为美国借款必将附带种种限制。如果这些限制无法符合中国期望的话，则中国必须另谋他法或他国去满足需要。陈光甫和胡适二人对于美国历来尽量表示尊重，而且在和美国官员接触时也一贯小心翼翼。他们不断地抱怨在工作上承受了太大压力，而事实上是因为他们二人自尊心过于脆弱，总是把美国的借款看成美国对中国所施舍的恩惠。陈胡二人又痛恨向他人求助，除非能够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绝对明确的许可信号，否则他们绝对不愿采取任何请求借款的活动。如此彻底的被动心理，对于中国外交而言，不啻是自我画地为牢。

平心而论，陈光甫并非不了解中国军事失败的惨状，对于美国政府加诸借款的种种限制也反感强烈，[99]但是他和胡适却认定他们毫无能力去说服美国人取消这些限制。反之，胡适的应付之策是告诉中国用尽一切方法去苦撑，而陈光甫则只能心怀不满却拿不出对策。1939年底，陈光甫在日记中不得不承认，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援助，其实多半只是口惠而缺乏实际行动。他也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去争取政治性借款，但是由于英美两国表明不愿提供此类贷款，因此中国唯一的指望只能是向苏联求助。[100]

然而从重庆政府立场来看，陈光甫的应对方法未必比胡适的方法更可取。因为即便是在和平时期最有利的条件下，经济发展也必将是一个漫长过程，而且成败未可预测。但是此时中国正在为了国家存亡而做挣扎，委实难以同时去发展经济。再说，陈光甫方式是否能够成功，有几个关键性的条件在当时中国都不存在。这些条件包括：国内能够维持稳定生产，地方政府必须高效率，必须维持通畅的公路系统，必须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把物品运送进入和输出中国的国境。陈光甫争取到的美国借款，倒是可以用来购买美国造的汽车去改善交通系统，但是重庆政府没有能力去提供其他的因素，而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重庆政府在退居西南地区之后，在政治和军事上并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些地区。即使是陈光甫的方案得以实现，它也将要经过一个极度漫长的过程，而中国的战事却无法支撑那么长久。

归根结底，一个影响陈光甫方案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能否保持通往国际市场的安全，而这根本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本身的合理性毫不相干。它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负，也取决于其他欧美列强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在陈光甫的经济计划还没有机会赢得重庆政府的首肯之前，它就已经被1939年中国国内情况的恶化，以及1939～1940年的国际变化所颠覆。当中国经由越南和缅甸通往欧美国家的生命线面临不断的威胁时，蒋介石也就不得不做出结论，认为陈光甫的方案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换言之，若要想救中国，必须另谋出路。

[1]刘锴：《备受美国朝野敬重的外交家》，《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年

5月，第153～155页。

[2]张忠绂：《迷惘集》，第118页。

[3]张忠绂：《迷惘集》，第115～116、120～122页。

[4]《在美见闻》（1941年，月日不详，大约是年底），《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14019013。发电人可能是1940年11月15日被蒋介石派到美国，有自己的电报密码，直接向重庆发电报，不经过宋子文控制，可见身份特殊。

[5]张忠绂：《迷惘集》，第120～122页。

[6]《在美见闻》（1941年，月日不详，大约是年底），《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14019013。

[7]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初稿》第5册，第1654～1655页。

[8]参阅唐德刚教授《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0），对胡适个性精辟的描述。

[9]《在美见闻》（1941年，月日不详，大约是年底），《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14019013。

[10]根据新近的材料，之后他又偷偷摸摸地和好几位红颜知己维持暧昧关系，见余英时、周质平等人的著作。

[11]刘锴：《备受美国朝野敬重的外交家》，《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年5月，第153～155页。

[12]《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10月13日。

[13]《光公使美日记》，1940年1月16日。

[14]胡适提出的证据是，当罗斯福在1937年10月5日提出隔离演说（Quarantine Speech）之时，国务院在事先竟然不知道他准备谈话的内容。《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342～343页。

[15]王世杰等：《胡适与中国》，中国文艺社，1962，第19页。

[16]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联经出版公司，1999。请特别参阅第127～128页《胡适致韦莲司函》（1938年8月25日）。

[17]胡适对美国官员经常使用的歉语是“It is very kind of you to give us any time at all.We know you must be very，very busy.”Transcript of meeting with Morgenthau on April 25，1941，Henry Morgenthau，*Morgenthau Diary*（*China*），p. 396。

[18]Hu letter to Morgenthau，March 26，1941，*Morgenthau Diary*（*China*），pp. 361-362.

[19]Hu Shih letter to Hornbeck，February 28，1938，Hornbeck Papers，Box 80.

[20]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46～1647页。

[21]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p. 94；*Morgenthau*

Diary（*China*），p.15。

[22]Hu Shih letter to Hornbeck，October 12，1938，Hornbeck Papers，Box 80.

[23]Personal note by Hornbeck，May 1，1939，Hornbeck Papers，Box 80.

[24]Personal note by Hornbeck，March 20，1939，Hornbeck Papers，Box 80.

[25]《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342~343页；《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1日。

[26]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是美国当时最具声望的政治分析家。Hornbeck notes of conversation with Hu Shih，October 15，1937，Hornbeck Papers，box 80.

[27]张忠绂：《迷惘集》，第118页。

[28]Min-chih Chou，*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pp.107-109.

[29]《胡适致蒋中正电》（1939年9月1日、1940年7月1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0028-012、002-090103-00012-345。

[30]Diary entry of May 7，1939，“A Chronology of Loan Negotiations，1938-1940” by Dr. Hu Shih，From File of Chinese Embassy，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F-3.

[31]Hu Shih letter to Hornbeck，dated June 9，1938，Hornbeck Papers，Box 80.

[32]Chih-p'ing Chou，*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pp. 768-769.

[33]Hornbeck notes of conversation with Hu Shih，October 15，1937，Hornbeck Papers，Box 80.

[34]《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8年7月11日。

[35]《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0年12月17日。

[36]《王世杰致胡适电》（1940年8月8日），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第2册，第781~782页。

[37]《胡适致顾维钧电》（1938年10月16日），《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24页。

[38]《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第5a册，手稿油印本，第18~19页。

[39]胡适与顾维钧之间电文来往，1939年4月23、29日，5月3日，《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458~459页。

[40]《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12月23日。

[41]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65、268页；《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70页；朱文华：《胡适评传》，第272页。

[42]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67页。

[43]《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0年4月29日。有关陈光甫在1940年5月4日致孔祥熙的电文，参见张忠栋《胡适五论》，第132～133页。

[44]*Morgenthau Diary*（*China*），vol. I，pp.177-181.

[45]《光公使美日记》，1940年1月16日。

[46]《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9月29日；Entry of March 25，1939，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p. 46。

[47]《光公使美日记》，1940年2月6日。

[48]《光公使美日记》，1940年4月15日。

[49]参见《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19、24日），《胡适任驻美大使往来电稿》，第56页。

[50]《翁文灏致胡适电》（1938年10月21、24日），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第1册，第161～164页。

[51]《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9年8月31日。

[52]《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342～343页。

[53]Hu Shih memo.to Hornbeck，October 16，1938，Hornbeck Papers，Box 80.

[54]《胡适致陈布雷电》（1937年12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3153。

[55]《胡适致陈布雷电》（1937年12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3153。

[56]《胡适致翁文灏电》（1937年12月26日），《特交文电·领袖事功之部（8）领导革命外交——对美关系》第2册：27011134；《胡适致傅斯年函》（1938年7月30日），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38～1640页。

[57]《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48～1649页。

[58]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66页。

[59]《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1年7月19日。

[60]《胡适致王世杰函》（1935年6月27日），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第1386～1388页。

[61]Chih-p'ing Chou，*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p. 959.

[62]《胡适致陈布雷电》（1938年9月2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3176。

[63]Chih-p'ing Chou，*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p. 959.

[64]《胡适致蒋介石电》（1939年1月12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8页。

[65]胡适电报向蒋介石报告其与罗斯福会谈经过，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

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66页。

[66]Hu Shih's cable to CKS，August 3，1939，“A Chronology of Loan Negotiations，1938-1940” by Dr. Hu Shih，From File of Chinese Embassy，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F-3.

[67]Hu Shih cable to CKS，August 3，1939，“A Chronology of Loan Negotiation，1938-1940，” by Dr. Hu Shih，From File of Chinese Embassy，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F-3.

[68]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9年4月18日。

[69]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册，第654～656页。

[70]如果依照日方的算法，中方在1937年的官兵死亡人数约为80万人，1939年约为40万人。《蒋介石日记》，第40箱，卷宗16。

[71]Entries of October 21，23，25，1938，“A Chronology of Loan Negotiations，1938-1940” by Dr. Hu Shih，From File of Chinese Embassy，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F-3.

[72]Entry of October 20，1938，“A Chronology of Loan Negotiations，1938-1940” by Dr. Hu Shih，From File of Chinese Embassy，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F-3.

[73]《蒋介石日记》，1937年10月31日。

[74]CKS letter to FDR on December 9，1939，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G-2；December 19，1939，CKS letter to FDR，FDR Official File，150，Box 1.

[75]牟润孙：《中美桐油借款商谈纪要稿》，第132～134页

[76]《胡适致蒋介石电》（December 20，1939），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G-2。

[77]“Detail Report of 1st and 2nd loan negotiations，”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E.

[78]Note on March 3，1939，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pp. 35-36.

[79]K. P. Ch'en's letter to Tsou Ping-wen，February 3，1939，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pp. 23-26.

[80]“Detail Report of 1st and 2nd loan negotiations，”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E；《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9月26日。

[81]《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7月1日。

[82]《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6月21日。

[83]Letter to Kung signed jointly by Hu Shih and K. P. Ch'en on March 14，1940，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G-2.

[84]“Detail Report of 1st and 2nd loan negotiations，” 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E.

[85]《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12月23日。

[86]Note on September 12，1939，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p. 92.

[87]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pp. 1-2；《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38年10月28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0册《对美外交（1）财经援助》，第34～36页。

[88]《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2月23日。

[89]《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12月10日。

[90]“Detail Report of 1st and 2nd loan negotiations，”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E.

[91]《翁文灏日记》，1940年2月10日。

[92]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E；“Detail Report of 1st and 2nd loan negotiations，” p. 9；“Detail Report of 1st and 2nd loan negotiations，”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E。

[93]“Detail Report of 1st and 2nd loan negotiations，”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E；Note on March 3，1939，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pp. 35-36。

[94]《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38年10月28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0册《对美外交（1）财经援助》，第34～36页。

[95]《光公使美日记》，1940年4月6日；Letter by Hu and Ch'en to Kung，March 14，1940，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G-2.

[96]《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6月21日、7月1日；note dated September 12，1939，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F-2，p. 92。

[97]Letter from K. P. Ch'en to Hu Shih，July 15，1940，Hornbeck Papers，Box 80.

[98]《王世杰日记》，1940年7月2日。

[99]《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6月21日、9月26日。

[100]《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12月1日。

第四章 寻求一个新的对美政策：1939～1940年来自各方的压力

以上的历史回顾说明了中国政府对美政策，何以在抗战的头三年里，无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或是财政上，都未能争取到实质性的援助。诚然，美国民间弥漫的孤立主义情绪，他们对中国事务的冷漠，以及对日本的恐惧，都严重影响到其政府的行为。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驻美外交官的不作为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便如此，只要美国在中国政府外交策略中占据边缘地位，胡适和陈光甫在美国的工作成绩就仍然无足轻重。因为中国政府主要希望从欧洲国家得到大力援助，那它大可以让胡适和陈光甫继续留在美国工作，并且持续他们的工作方式。

但是1939～1940年所发生的一连串变化，使得这个局面不再可以维持。中国政府所面对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接二连三地遭受剧烈冲击，它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政策取向。那么这些冲击究竟是什么，它们又如何改变了中国对于美国的观感？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章将集中讨论四个因素。第一，中国国际环境遭遇重大改变。这些改变包括日本对中国所采取的新战略，中国从国外输入武器的急剧减少，中国和苏联关系的日益疏离。第二，中国内部政治和财政处境的恶化。第三，许多中国领袖开始对中美关系现状日益不满。第四，有些中国领袖对美国产生日渐升高的期望。

一 国际环境剧烈变化

（一）日本战略改变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尽管日本侵华军队在战争初期的成绩，显示了它对中国守军的绝对优势，但是中国政府原先乐观的估算是日本财政将无法承受长期战争的负担，必将被迫放弃侵略野心。[1]不幸的是，在抗战进行了两年之后，中国这个指望似乎仍然无法实现。正好相反，在1939年中期中国政府开始察觉，日本人可能已经做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调整，由追求“速战速胜”转变为“以战养战”。换言之，日军只在有利的情况下进行攻击行为，而在大部分时间里则集中精力在日军占领区（沦陷区）的后方，进行较小规模的“扫荡”行动，消灭中国政府遗留下来的残余部队和地方部队，而避免动用精锐正规军到前线去和国军进行拼杀。

中国政府的这个情报，对于其领袖们而言的确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它的含义是，从今以后日本军队将会从广大沦陷区压榨出更多的资源去支持长期战争，而无须消耗日本本国的经济实力。[2]

正由于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全部地区，因此比起中国政府来，它更能够承受一个长期胶着的战争局面。而在紧锣密鼓筹备中的汪精卫伪政权一旦正式成立，它也将会和日本签订一些重庆政府拒绝签订的条约，全盘承认日本侵略的果实，甚至要求西方列强退出中国。这个发展也可能使重庆政府的抗战变得无关紧要，因为一旦日本和汪精卫政权关系“正常化”之后，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可能给予外交承认，这样就会使重庆政府愈加边缘化。

更有进者，日本为了节省资源，除了减少在地面上对中国军队进行大规模正面攻击之外，还试图运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摧毁重庆政府的战斗意志，那就是利用日本空军的绝对优势，对中国内地城市进行大规模轰炸。

第一波轰炸始于1939年5月，一直延续到该年10月重庆的雾季来临而使得地面目标难以辨识时才暂停。1940年4月雾季终止后，日本空军又恢复有系统的轰炸，其猛烈程度大大地超过了1939年。这种轰炸不但每日造成成百上千的平民伤亡，也对城市建设造成巨大破坏。大片商业区和居民区被夷为平地，仅在重庆一地，国民政府就不得不把20多万市民移往郊区和其他城乡地带，希图减少伤亡。这个局面大大增加了政府救亡疗伤、社会救济和消防灭火的负担，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在此之前任何中国政府所承受过的负担。

而这个局面最令人感到无奈的是，尽管中国空军飞行员斗志高昂，但是中国缺少一支强大空军，无法阻止日本飞机在中国天空里横行霸道。早在1939年1月，中国政府内部的一份机密报告指出，从1937年7月开战到1939年1月为止，中国已经损失了1200架飞机，这个数字是中国政府在开战时飞机总数的6倍。换言之，这些飞机都是政府在这18个月中历尽千辛万苦从各种国外渠道所补充的，但现在却几乎丧失殆尽。同样令人心痛的是，1937年7月中国空军驾驶驱逐机的现役飞行员，到了1939年1月时已经全部牺牲。[3]

这个情况当然是中国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密，绝对不能让日本知道（也绝对不能让其他西方国家知道），不然的话日本军方将大受鼓舞而更扩大它的轰炸政策，以彻底瓦解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但是对于蒋介石个人而言，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从他此时的几则日记中可以看出。

他在1939年3月29日写道：“昨夜防空夜间演习，目睹男女老幼恐怖与忧愁之色，心更不忍，惟愿上帝护佑中华，使倭寇早日悔过撤兵，使我军能从速转败为胜，使我同胞得解除此无穷之苦痛。”他紧接着写道：“此后如吾党政人员，若不再努力奋勉为民造福，其必禽兽之不如矣。”[4]

到了日机开始对重庆实施轰炸，蒋介石在5月4日写道：“敌机今日傍晚来渝轰炸，延烧，实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所见之惨事，目不忍睹。”次日又写道：“民众遭此苦痛，仍无一句怨恨抗战之言，思之更难自安。对此无知纯洁之同胞，其行动虽多难约束，然而其精神之可爱，使余铭感无涯，遭此惨残不能忍受之艰难，惟见此更增余乐观与勇气矣。”[5]

5月26日，蒋再度写道：“民众鹄立防空洞前，浃汗喘息，毫无怨色，而沿街毁焚之凄惨，思之心伤，未知如何得救吾民也。”[6]

此种惨状不但每日呈现在蒋介石眼前，而且他个人面对日本飞机肆意轰炸扫射的屈辱感和无助感，和一般老百姓并无二致，难怪他要叹息“未知如何得救吾民也。”

这种敌我悬殊的空中作战能力，对重庆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使它必须尽快找到化解的出路，而唯一可以满足中国需求的方式是仰仗外国协助。显而易见，解决的办法是首先要获得外国足够的借款，然后用之去购买性能优良的飞机，而美国正是两者兼备的供应者。到了1940年6~7月，当重庆再度每两三天就必定遭受日本飞机轰炸时，重庆政府的耐心已经消磨殆尽，决定采取有效方案彻底改变中美关系。让中国政府特别忧虑的是西方世界舆论似乎已经趋向麻木，对于日本滥轰中国平民不再引起震动或谴责。这些国家似乎已经认为这就是中日战争的现实常态。欧美国家这种不关痛痒的态度，正是蒋介石决定要把宋子文赶紧送往美国，改善中美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此或许也可以为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关系的发展做一个历史学的注脚。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中美两国就飞机而言，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关系，中国政府是一个急切的买主，美国厂商和政府是卖主，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卖方市场，所以美国政府大可以对中国的采购要求随意处理。但是珍珠港事件后中美两国变成盟友，美国政府（特别是军方）或是出于误解，或是蓄意制造一个不愿向中国提供足够飞机的借口，于是提出一个论点，认为中国政府打心底不想抗日，而只是妄图坐享其成，借重美国飞机去打败日本，如此就可以让中国陆军养精蓄锐地在战后消灭国内政敌。美国战时最高军事统帅马歇尔、史迪威等，由于不肯花费精力去深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领导人的心态，自作聪明地闭门造车，又据之制定战略和政策，对中美军事同盟的效果产生了重大影响。战后的历史学者犯了同样的错误。

（二）中国日趋严重的军火危机

无论中日战争的规模如何随时间而异，中国军队都必须有足够的武器和装备才能从事战斗。正是由于国内缺乏现代化军火工业基础，中国军队只有在从国外不断获得武器的前提下，才能继续作战。

到了1937年8月，国民政府已经面临重大困难，无法如同战前一般从多种渠道取得外国武器弹药。一方面，意大利和德国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不许中国从苏联获取军事援助，否则它们就要加入日本阵营与中国为敌。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又向中国提出警告，不可与意大利和德国友善而必须亲近西方国家。法国同时通知中国政府，中国只有在承诺抗战到底绝不中途谈和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西方的武器支持。[7]但是从中国立场而言，它当然不愿意在这些互相对立的国家之间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除非它能够从其中一方获得绝对支持的保证。中国真正想要的，是掌握最大限度的外交主动权，可以从不同国家购买到足够的武器弹药，俾能和日本进行作战。

众所周知，德国在抗战爆发前十年，一直是向中国输入武器和现代化军事装备的最大国家，也是向中国提供军事顾问的最大国家。但是德国在中日战争之初所采取的中立立场，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其原因是它有更强烈的愿望去和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这就间接地让德国感到有必要去帮助日本，尽快从中国这个泥淖中抽身而出。但是当德国在1938年初企图拿着日本设定的条件去调停中日战争时，却遭到蒋介石断然拒绝。就在这段时间内，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而意大利和德国同时也承认了“满洲国”。

然而由于德国武器对于中国抗战有如此的重要性，使得中国政府即使在1938年初仍然不得不把中德关系看成最重要的关系。[8]不幸的是，

中方的努力并不能挽救中德关系。1938年3月，德国政府单方面终止了中国军事学员在德国的训练项目，5月又拒绝中国政府继续购买德国军火。[9]为了迫使中国向日本屈服，德国更进一步召回在国民政府军队中服务的全部德国军事顾问。

在中德军事关系中，从一开始，德国向中国提供军备武器的先决条件，就是中国政府必须采取亲德反苏的外交政策，中国政府领袖们当然尽其所能地去抵制德国的这些要求。但是到了1938年6月，中国政府已经无法逃避这个问题。6月3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宣布，由于意大利和德国已经明显偏袒日本，中国政府必须在外交政策上做出一个根本性的调整，从今以后，必须更关注与英国、美国、法国和苏联的关系。[10]到了此时，中德关系沉到谷底。一旦欧战爆发（1939年9月），所有德国对华输出的军火器材基本上全面停止。

自抗战开始，中国所依赖的另一个军火供应来源是苏联。中国对于苏联军火最大的期望是在1937年底提出的。当时蒋介石要求苏联向中国提供足以装备20个陆军师的军火。此外，他还要求苏联每个月向中国提供150架飞机。[11]由于此时正值中国军队刚刚遭遇了淞沪会战失败，蒋介石上述要求表明他最大的雄心是运用苏联援助重建中国的陆军和空军。[12]

但是从一开始，苏联的军事援助就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其中最显著的是它运送的数量和速度经常不能符合中国的需求。1939年夏天，当中国政府从苏联获得第三次购买武器的大借款时，蒋介石还视之为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13]但是到了1939年底情况已经相当明朗，苏联军援困难的症结，并不是拨款不足，而是它根本不愿意向中国运送军火。到了1940年初，苏联当初军事贷款2.5亿美元总额中，其实还有1.3亿美元的余款并未使用，考其原因，却是苏联军火的实物运送严重落后于原来承诺的日程表。[14]更有甚者，苏联配备给中国陆军各师的武器装备又远远少于中国各师制式装备之需要。[15]中苏双方的军火交易非常不平等，通常都是由苏联单方定出货品价位和其他各种条件，中方照单全收。[16]这种交易关系当然会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到了1939年，苏联军火运送日程表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而且经常长时期中止运送。这就难免使中国领袖们开始深切怀疑，苏联的意向到底有多么可靠。[17]

依据孔祥熙1939年10月的报告，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的军事贷款前后共有三笔，总数是2.5亿美元。[18]但是，一旦苏联开始向日本与德国妥协，它对中国军火的运送速度就从1939年7月开始明显减少，到了1941年3月几乎陷入停顿。[19]苏联援华军火的逐渐减少，对于中国军队造成重大危机，因为中国当时兵工厂的全部生产量，远远不足以维持国军的战斗需要。[20]

德国和苏联相继对中国施行军火限运和禁运，逐渐把中国领袖们逼向一个绝境，他们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找到另外一个可靠的军火供应来源。如果不能达成此项目的，则中国就将无法继续抗战。这个紧迫的时

间因素，说明了为什么中国领袖们感到必须重新评估他们的对美外交政策。

（三）渐行渐远的中苏关系

在抗战前期，中国政府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日本和苏联之间关系的修好。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则中国在亚洲将面临彻底孤立无援的局面，日本将会从与苏联的紧张对峙中解脱，可以把屯驻在亚洲的全部兵力用来对付中国。

在1937～1939年，即使日本已经不断抗议苏联军火的援华行为，中国政府尚且无须担心，因为当时苏联和日本处于敌对状态。然而在欧战爆发之后，苏联修改对中日战争的盘算。当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远东边境停火协定时，苏联同时向中国政府发出通知，声称今后在中日战争中将保持中立。这个声明着实让中国政府大吃一惊。[21]

对于中国而言，更糟糕的是苏联政府通过媒体公开向中国喊话，劝中国早日停止对日抗战。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苏联领袖甚至通过媒体表示，如果苏联、日本这样的世仇国家都可以重新成为朋友的话，中国和日本当然也可以达成同样协议。该苏联领袖甚至语含威胁地表示，如果中国不识时务地错过了参加这个“远东地区的新纪元”的机会，而一意指望仰仗西方国家的协助，则前途必将不堪设想。苏联真正的意图是中国能够幡然悔悟，排拒英国影响，放弃对抗日本。[22]1939年10月31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发表演说，强烈抨击西方民主国家，同时表示愿意和日本彻底改善关系。他的演说对于中国问题则只字不提，这让中国政府更加忧心忡忡。[23]

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检讨中苏关系。蒋介石在其住所召开了一个高层会议（1939年11月7日），结果是中国领袖们决定由蒋介石促请苏联政府不可对日本妥协，同时敦促英国政府维持英苏关系不要发生变化，并向英国政府做出保证，万一英苏关系恶化，中国绝不放弃和英国的友谊。[24]如此说来，在1939年末，蒋介石及其幕僚已经开始接受苏联可能背弃中国去和日本修好的风险，而那些历来坚持中国必须继续相信苏联的人士（如孙科），则显然已经成为少数派。[25]

不管从何种角度来看，这都是处于极度逆境中的国民政府所做出的一个无比重要的决定。苏联的军火供应事关中国抗战成败，而中国政府此时一方面明知开罪苏联有着高度风险，同时也完全没有把握能够争取到任何西方国家取代苏联的地位来帮助中国，但依然做出此项决定，表现出极大的毅力和决心。为了不放弃最后一丝希望，蒋介石还是在1939年12月19日致函斯大林，表达中国可以在战后向苏联提供领土作为苏联

的军事基地，以换取苏联的对日参战。[26]这种建议对于苏联而言毫无吸引力，因此很快就被苏联拒绝。

由于欧战爆发而引起的复杂局势，只是造成中苏关系恶化的诸多原因之一，但是它是在中国政府所能够掌控的范围“之外”的一个原因。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却完全在中国政府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那就是中国对于苏联入侵芬兰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国民政府的选择是维护它自身的原则，并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事件起源是苏军于1939年11月30日大举入侵北欧小国芬兰，芬兰政府当即向国际联盟发出呼吁。这立即使中国政府陷入左右为难局面，一方面是国际道德和公义，另一方面是国家实际利益。从道德角度来看，尽管中国与遥远的芬兰甚少来往，但是大多数中国领袖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因为它和日本侵略中国的手法如出一辙。但中国又难以开罪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尤其是这样一来会影响中国本身的对日抗战。换言之，中国不愿在国际联盟中投出赞同制裁苏联的一票而开罪于它。然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正是引用同样的道德和法律原则，要求国联制裁日本在东三省的暴行，因此中国需要言行一致。[27]面对如此困境，蒋介石备受煎熬。最终他不顾幕僚的警告，决定向苏联表达其立场。除了召见苏联驻华大使深谈三个小时和派遣贺耀祖赴苏联解释之外，还决定“写史大林信，约千余言，审慎再四，决以直言告之”。一周后，又写了两封信给斯大林。[28]

因此，当国际联盟为是否开除苏联会员资格而进行投票时，中国政府拒绝了苏联政府的要求，没有投票支持苏联，而是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一起投了弃权票。虽然中国政府再度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加以解释，但是招致苏联政府的极度不满。[29]因为在后者看来，中国的行为无疑是与英法两国勾结和苏联作对。[30]中国此时国内舆论对苏联的批评也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在国际联盟开除苏联会员资格之后不久，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元帅立即中断了中苏之间的军火供应谈判，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对投票行为做出解释。[31]苏联政府明确表示，中苏必须先解决两国间争端，苏联满意后才可以恢复有关军事援助的对话。[32]中苏关系显然已经走入自抗战以来的最低谷。

面对如此糟糕的情况和漫天盖地而来的苏联方面压力，蒋介石变得愤怒，决定予以反击。1940年1月21日，蒋介石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称中国绝不会向苏联乞求援助，而苏联政府也必须估算一下，以军事援助中国是否符合苏联的利益。[33]紧接着，蒋介石又向中国驻苏特使贺耀祖严词训令，提醒后者在执行任务时必须时时刻刻记住国家尊严，切不可向苏联乞求军事援助。他训令贺耀祖做最坏的打算，并表明除了和斯大林当面会商之外，拒绝和任何其他苏联官员会谈。[34]就这样，在中苏关系经历了将近40个月的合作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新的立场，把自己和这个最重要军事伙伴的关系推到决裂的边缘。因此，到了1940年初，中国迫在眉睫地需要在国际上找到一个比苏联更可靠的支持者。

大约从1939年上半年开始，扑朔迷离的国际局势让中国政府一时看不出明确的发展轨迹。一方面，美国国会中立法修正案的胶着和对联邦政府的处处掣肘显然对中国相当不利，而英国和苏联未能签订协定也让中国感到失望。更何况，中英平准基金用尽后，英国的不合作态度让蒋介石火冒三丈。他在日记中忍不住写道："英国老狯之刻薄，世无其匹，难怪倭德俄义皆与之为敌也。"[35]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对中国抗战有利的发展。首先，在美国方面，蒋介石认为罗斯福内心想法和他本人相近，急于对日本进行制裁，而其民间舆论也愈加对中国友好。其次，日本和苏联在外蒙古的冲突，日本和英国在天津的摩擦，以及英国与法国在新加坡就军事合作所进行的会谈，都让蒋介石感到鼓舞。[36]而中国若想要对这些有利的国际局势善加利用，最重要的手段是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二 国内情势加速恶化

（一）财政困境

当中国政府首次向美国要求借款时，它的需求量并不大，部分原因是当时并没有预料到战时财政负担会变得如此沉重，而另外的原因则是美国尚未成为借外债的主要对象。1937年9、10月，宋子文估计中国经济大概可以支撑两年或是更久的战争。[37]蒋介石及其幕僚原本也估计战争可以在三年内结束。诸如此类的估算，使得中国政府相信国家有足够资源去抗日。当时既有苏联贷款，又有苏联和德国军工设备和武器支持，而中国又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获得这些装备，因此看起来可以长期维持无虞。至于美国借款则只具象征性的外交意义和政治含义，其功能超过实质上的财政意义。假如国际情形果真循此轨迹发展的话，则对美国借款工作大可以好整以暇地进行。不幸的是，1939～1940年局势的发展证明中国政府的设想太过乐观。

首先，开战初期军费的急剧增加，大大超出领袖们所想象。以蒋介石的军人背景，他从来对于财经问题就是外行。以前和各省军阀混战，他只需要发号施令，要求部下搜求财源，而后者也每每施展出各种手段完成了指标，姑不论这些手段的合法性如何。依蒋介石最初的看法，既然以前每次内战的财政需要都可以如愿以偿，则中国抗战也必然可以遵行同样模式，因此并没有迹象显示，他当时对于抗日战争的财政需求曾经给予特别关注。他在1937年7月的心情，不过是以其坚强意志，下定决心要倾尽中国的国力和日本人做殊死搏斗。果不其然，他最早的决定就是命令财政部长必须每个月提供1亿元法币用于作战，此外每个月还要筹备6000万元应付正常国防支出。[38]

但是情况恶化的速度远远超出政府预料。在开战后的头12个月，中国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只有1.8亿元法币，而支出则达15亿元。[39]政府此后不得不急速而且不断地上调战争预算。[40]面对这种状况，通货膨胀变得无可避免。

中国对于外国军火的高度依赖只能使财政情况更为拮据。根据何应钦报告，仅仅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2月，中国就向国外购买了7亿元法币的军火。[41]由于战争规模急剧扩大，军费也跟着急剧上涨。根据何应钦1940年9月的报告，在1937～1939年将近三年的战事中，全部军费达到35亿元法币。而仅仅在1940年一年之中，军费就跃升到35亿元。根据何应钦估计，1941年的军费恐将超过60亿元。[42]显然，中国政府用来购买西方国家军火的外汇储备很快就将枯竭，因为战前原本持有的外汇储备根本无法应付这般无底洞式的需求。相对外币而言，法币

急速贬值，法币的官价和黑市价格差距在国内市场也逐日加大。法币的贬值固然与军事失利有关，但是也有官员认为，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外币储备的枯竭。事实上，到了1938年中期，许多领袖已经认为，经济的衰败才是中国存亡面临的最大威胁。[43]等到武汉和广州相继沦陷后，政府对于民心士气的低落感到更为忧虑，同时也为中外货币的兑换率感到忧心，为此还特别卖出了几百万美元的储存款以安定市场。[44]

在开战最初的22个月（1937年7月至1939年4月），孔祥熙主掌财政，他曾经想尽办法去满足政府对军费的需求。由于他不得不采用种种短期有效的方法去应付不断高涨的军费，所以无可避免地会伤害到国家的长期经济利益。有趣的是，在这段颇为漫长的岁月里，孔祥熙从来不曾向蒋介石说明中国财政的大局和困境。孔祥熙的动机也可能是不想拿这些事情去增加蒋介石的烦恼，也可能是他以为战争会在中国财政崩溃之前终止，那么就不需无端地引起恐慌。然而到了1939年初，当抗战的结束看起来遥遥无期时，孔祥熙终于不得不向蒋介石说出实话。孔祥熙在1939年6月提出一份极机密而详尽的财政报告，其内容对于蒋介石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因为自七七抗战以来，蒋介石终于得知，中国的情况竟然已经变得如此糟糕。

依孔祥熙所言，中国的情况不但糟糕透顶，而且实质上大有别于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通常都在战时增加税收，中国却在战时丧失了税收来源。随着战火的急速蔓延，再加上南京时代基层政府体制的破坏和训练有素干部的流失，以及大批老百姓因战乱而流离失所，政府已经没有能力用强制手段去增加税收。因此只好陷入赤字支出的陷阱，并且越陷越深。由于开战头22个月内的收入已经短缺逾30亿元法币，政府同期的支出所需，就不得不依靠发行各种公债和借款约33亿元法币去应付。[45]这种局面的危险可以从政府正常税收和借贷的比例看出。这个比例在1937年是27.97%比72.03%，1938年是15.31%比84.69%，到了1939年则变成10.48%比89.52%。换言之，政府只能指望用税收来支付约1/10的军费，9/10都必须依靠非常规来源，而且完全不可靠。如果不尽快想出解决办法，则中国还没有在战场上被敌人打败，就会因为财源枯竭而全盘瓦解。

换言之，到了1939年，整个政府的税收体系对于维持抗战而言已经无关紧要。中国的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已经把寻找新财源的责任揽在自己的身上。孔祥熙向蒋介石提出，如果战争延长，即便是这些体制外的权宜之计也将会失效，不能满足作战的需求。[46]

一旦这些银行不愿意听从财政部命令行事，政府的财政处境就变得更为困难。[47]政府无限制地印发法币，也只能让情况更为恶化。1937年7月，政府只发行了14亿元法币在市面流通，等到1939年9月份已经发行了36亿元法币。[48]1939年比1937年多印发的25亿元法币，并没有储备金作为后盾。到了1940年底，政府厘定的1941年度预算高达175亿元法币，而预估的财政收入却不过区区10亿元法币。[49]这就让情况变得极为糟糕。

在1939年底，经济部长翁文灏已经提出警告，称由于抗战必须依赖外国援助，而中国又缺乏足够现金去偿付外债，因此中国必须大量出口天然资源，如桐油、茶叶、矿产等去应付开销。然而中国又只有能力输出少量的上列物品，而且可能很快就没有足够的产品可以偿付国外借款。因此，使用矿产和农产品去换取外国武器的做法，也可能即将难以为继。[50]

另外，中国政府担心这种还债方法将无法持久。[51]翁文灏心怀愤懑地指出，假如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都依然坚持使用这种交易方式的话，则它们口口声声想要帮助中国的说法，就无非只是假冒伪善的宣传伎俩而已，因为中国压根就没有能力可以去满足它们的条件。[52]中国西南各省固然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但是要想开发却绝非易事，何况即使在开发工作完成之后也未必能够支持长期抗战（运输困难），而这正是陈光甫对重庆政府所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到了1939年中期，有些政府领袖已经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那就是如果想要把抗战进行下去，政府就必须找出另外一条途径去获得国外援助，而他们对美国的期望也随之逐渐提高，认为只有美国才能够以更慷慨的方式向中国提供更大的帮助。[53]事实上，孔祥熙选择在此时向蒋介石提出详尽财政报告，其动机很可能是他承认以前开发财源的方法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因此从今以后中国必须改弦易辙寻觅新财源，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几乎从抗战一开始，就有中国领袖指出，中国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容许从事长期作战。但是蒋介石一旦下定决心要进行抗战，对于这类言论一概嗤之以鼻，根本不予理睬。在汪精卫出走之后，重庆的政治人物更是无人敢重提这种论调。但是1939年的中国财政和经济现实越来越险峻，使得那些原本不支持与日本和谈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可能正走向总崩溃。[54]到了1940年初，即使是政府内部的一些重要人士也不得不承认，经济因素可能将成为该年抗战中最严重的危机。[55]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开始向美国提出一连串紧急警告，指出中国的经济在1940年将开始陷入严重危机。

到1940年初，蒋介石已经有充分时间去消化孔祥熙秘密报告的含义，而且也相信中国的确是面临重大危机。[56]一旦蒋介石感到大事不妙，他就开始更积极地向美国政府提出给予中国更多援助的要求。因此，蒋介石在给美国政府的文电中，终于把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早已普遍熟悉的情况，心不甘情不愿地向美国人袒露。但是在一些历史学著作中，却经常把蒋介石的做法说成故意对美国人夸大其词和危言耸听，类似手段拙劣的欺骗和敲诈伎俩。

如前文曾经提到，陈光甫在美国时，他基本上认同美国政府处理中国事务的方式，那就是慢悠悠地给予中国一系列小额商业借款。但是等到1940年初返回中国后，他对中国经济危机的严重性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一封给胡适的私信里，他花了很多篇幅详细叙述回国后的所见所闻，同时指出，政府控制区内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是物价飞涨，生活越来越困难。[57]面对飞涨的物价，政府在香港设立的钞票印刷工厂根本

来不及供应国内市场的需求。到了1940年底，法币在香港印刷后秘密空运到内地，每个月约120批次，每批400万元。[58]但是掌管财经事务的部门彼此缺乏协调，也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以致印出来的钞票永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59]

在这种情况下，1939年底和1940年初，国内开始出现社会秩序不稳的现象。四川本是稻米生产丰富的省份，然而在1940年初却因为粮价过高而发生动乱，政府却没有能力将之平息。云南、贵州等省的粮价也急速上涨。[60]从1939年夏季开始，危机接二连三地发生，孔祥熙领导下的财政部完全无力应付。蒋介石最后不得不求助于宋子文，要求后者尽快从香港飞往重庆，寻求解决之道。孔与宋多年来的摩擦，使得两人之间根本没有合作的空间，而逐日加深的财政危机只是向他们提供了机会去互相指责和推诿责任。[61]宋子文表明态度，如果要他来承担挽救中国财政危机的责任，先决条件就是孔祥熙必须免职，而孔祥熙则表明他将会尽一切努力去保护自己的职位。

到了1940年初，中国领袖们的估计是日本在中国的军事攻势已经丧失其锐利之气，从此以后，日本在中国的作战将会变成一场长期的经济斗争。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此时也开始承受双重打击。一方面，日本宣布在上海成立汪伪政权银行，并发行自己的货币；另一方面，欧洲局势的恶化在继续加深。两者共同的影响是造成新一轮的物价上涨。这些发展都让重庆政府忧虑，除非外汇状况得以改善，否则财经情况将加速恶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借款的重要性变得更为突出，而这种新认识使得重庆政府更积极地想要争取到更多的现金借款，这正是胡适和陈光甫历来所最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为了开始新一轮谈判和树立新的作风，蒋介石向罗斯福透露他拟委派一位新的特使前赴美国主持其事。这就是宋子文日后赴美的兆因。[62]

（二）政治和军事上的挫折

1.军事危机

中国在1939～1940年所遭遇的政治和军事挫折，进一步加深了危机。1938年底，武汉和广州相继沦陷，整个中国的陆军再也没有一个师能够保持它在战前的完整性。换言之，它们都在战斗中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而实力大为削弱。国民政府在后方各省扩大征兵的结果，是在民间引起了极大反弹。而政府的焦土政策，虽然充分表露了其抗日决心，却也同时造成民众流离失所，以及种种难以形容的伤痛，尤其是在长沙的失误，使全城付之一炬，更是遭到民间一片责难之声。[63]虽然蒋介石似乎并未因此而动摇抗战决心，反而加紧督促部下进行各种反攻计

划，然而无可怀疑，汪精卫的投敌不但给政府内部造成了极大冲击，同时也为战时中国的外交关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因为抗战开始不久，日本政府就不断声称，拒绝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现在这个威胁终于看起来是真的，日本终于扶植起另外一个政权可以作为和平谈判的对象，而置重庆政府于不顾。

重庆政府领袖们清楚地了解到，伪政权的建立可以帮助日本立即向西方国家施加外交压力。如果软硬兼施地灵活运用，则日本就可以离间重庆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进而导致美国和中国撇清关系。[64]出于这种考虑，重庆政府千方百计要阻止汪伪政权成立。既然汪精卫的出逃已经严重打击了中国的民心士气，则最有效的扭转办法莫过于让国军打一场大胜仗，以消弭民众的悲观情绪，证明重庆政府依然是一个实体政权，同时也警告日本，和汪精卫合作绝无前途可言。

尽管国军在1938～1939年已经屡屡遭受军事挫败，但是许多高级将领依然坚信中国军队有能力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基于这个信念，他们着手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攻势，1939年12月12日正式开始，一般称为“冬季攻势”。[65]虽然这次攻势原本的目的是进行长期攻击，但是事与愿违，在大多数战区里攻势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星期就偃旗息鼓了。只有第四战区和第五战区的某些部队，能够把战斗坚持到1940年1月底，然后也不了了之。“冬季攻势”号称几乎动员了所有国军，战线蔓延数百公里，但是成果令人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并没有掌握对日军造成伤亡的确切数据，即便是战区指挥官呈报的战果也非常有限，在6个星期的战斗中，国军全部的战果是逮捕295名战俘，缴获马匹1141匹、步枪2506支、机关枪193挺、火炮42门、机动车辆390部。即便是这些数字仍然大有可疑。[66]说得残忍些，它只不过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军事闹剧。

在1940年初进行的战后检讨中，重庆政府把失败的小部分责任归于共产党军队在山西、河北和山东的干扰牵制了政府军，但是把大部分责任归于国军低劣的作战表现。[67]依据政府内部估计，国军在战斗中损失的枪支达到7%，而日军的损失只不过1%。尽管国军在个别小战场获得胜利，但就总体而言，冬季攻势是一个战略失败，充分暴露国军缺乏训练、纪律、领导才能和战斗精神，[68]日军在中国的地位丝毫不曾受到动摇，汪伪政权的诞生也没有因此而延误。

“冬季攻势”的彻底失败终于使蒋介石惊觉到，原来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能力把日军赶出广大的沦陷区。更令人不安的是陈诚在1940年夏季提交的报告宣称，日军已经向武汉集结部队，很可能是想在9月攻打四川。当政府提出希望派遣精锐部队驰援鄂西以阻截日军的进攻时，陈诚又被迫承认，这些所谓“精锐部队”其实早就疲惫不堪，根本没有能力去阻止日军的推进。[69]如果中国想继续抗战，则中国军队需要比过去从外国得到更多更好的装备，以及接受更严格的训练。换言之，到了1940年初，许多中国领导人持有一种看法，那就是国军未来战斗力的提升，必须高度依赖于新的军事援助，而在当时情况下，也只有美国最有能力

提供这种援助。[70]

2.地方势力集团的阻碍

蒋介石还面临着一个同样让他忧心如焚，但是无法说出口也看不出摆脱曙光的重大危机，那就是中国内部的不团结。这种状况其实经过了一段演变过程。

早在武汉沦陷之时，国民政府内部不团结的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微妙复杂关系，就已经让蒋介石苦恼。蒋介石最初对于长期抗战充满信心，认为中央可以有充裕时间从容布置和安排内部的统一与团结。四川省军事领袖刘湘死后，蒋介石一度以为川事将会渐趋稳定。在他看来，“若中央掌握四川，果能建设进步，则统一御侮更有把握矣”。[71]岂知才不过一个月时间，蒋介石就痛切体会到这个愿望完全难以实现。4月他就抱怨“川中军政之不合作，县长与管区之不合作，保甲长与士绅之不合作”。仅仅是蒋介石自己列举的问题就有兵役宣传抽签不切实，新兵伙食费遭长官克扣中饱，医官延搁不肯检验壮丁、轻易验收体能不及格之壮丁，人民在旅行途中被保安队强行拉去补空缺，新兵冻饿或被打死，军政与管区不合作，军事单位集体包烟（鸦片）等，不一而足。[72]当然蒋介石也提出一些处理方案，比如说“积极整顿四川，统一西南，巩固后方，为今日惟一之要务，犹未着手也。应于四川实行地方自治”。[73]

蒋介石在日记中沉痛地记述了重庆政府的艰苦处境。其实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时，就已经预知四川军人不好对付，所以特别任命四川籍军人王缵绪为主席，但是仍然无法消弭省内各个军政派系之间的斗争。到了夏季，成都军人就发起驱逐王缵绪风潮，对国民政府造成极大震动。

蒋介石在1939年8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四川军阀又要争夺私利，目无中央，目无外患，痛愤无已。此为内乱内讧，虽为川事，实最严重。”又写道：“为川阀内讧事深忧切痛，外患至此，尚有军阀如此作恶，愚鲁无识之徒，不可以包容为也。”面对此种困境，蒋介石只看到两条路。一是祈祷上帝垂怜，“上帝佑华，必不使此事表面化，而使能化险为夷也。上帝难人不其甚乎？”二是决定由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冀望以个人声望压制地方军人。[74]

岂知四川军阀并不买账，以致蒋介石只好忍气吞声地在8月18日日记中写道：“对川军将领之复电，用逆来顺受之法以处之，自较妥当。”蒋介石除了要安抚军事将领之外，还要对他们的家属和代表进行慰劳羁縻，才能暂时渡过危机。正如他在8月19日日记中所写：“惟终能动心忍性，再以逆来顺受之道处之，以求不致溃决，则幸矣。”而“溃决”二字也的确表达了蒋介石当时对于内政危机的忧虑。[75]

但是四川军人的桀骜不羁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这一点蒋介石完全

清楚。正如他在8月所写，“四川纠纷虽熄，然其事未了也”。[76]他在8月31日的日记再写道：“川政纠纷，邓（锡候）潘（文华）各部反对王缵绪主席，几见兵戎，幸得沉静处决。”他用“兵戎”相见来形容，可见事态极为严重。到了9月中旬，他又写道：“川事复杂不定，殊为可虑，此乃为一切问题中之根本。故外交无论如何吃紧，仍以此为念也。”[77]换言之，即便是在欧战爆发对中国外交造成重大冲击之时，蒋介石急需解决的还是内政问题。

事实上，不只是四川，全国各省地方军政势力早已根深蒂固，使得重庆政府几乎难以着手。随着国民政府军事力量的衰退，地方势力也相应抬头。正在四川问题胶着之际，云南又传出龙云的不稳迹象。10月初，龙云毫无顾忌地散布传言，称四川发生兵变，而且拘留中央政府官员作为人质。蒋介石写道：“幸灾乐祸与嫉忌恐惧之念昭然若揭。外患至此，而内忧如彼，可痛也乎。抗战期间军阀如此，可谓毫无心肝，其与汪奸相差无几矣。”[78]过不多久龙云又向国民政府提出一个难题，要求获得“行营主任”的名义。如果此例一开，则其他地方军人必然竞相效法，益发提高地方自主的身价。

国民政府退居重庆之后，它对各省地方实力派的弱势更为明显，即便社会上认为是抗日阵营的中坚分子也不例外。比如，虽然广东军人历来被认为是与国民政府关系最密切而且抗日立场最坚定的一群人，但是连要让广东籍将领具名谴责汪精卫叛国一事，蒋介石也需要亲自参与，花费大幅精力和口舌才能达到目的，而且他还把它视为一项重大成就，可见当时地方势力之庞大。[79]而在欧战爆发后，当国民政府需要和重要军事领袖商议如何对付新局面时，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居然会为了能够请到李宗仁、白崇禧、邓锡侯、潘文华等几位军人到重庆出席会议而大感安慰。[80]可见其控制权之薄弱。

1939年12月初，蒋介石又为内政事感慨不已地写道：“心神时觉忧患，以军阀心理不易改变，国家前途时多荆棘，藉外敌以为要求升官之机，殊堪痛苦，而又不能不予也。”[81]

才过了几天，蒋介石再度把与地方势力不和的痛楚讲得更透彻：“昨日以川滇政客与军阀有纵横闭阖之酝酿，而桂白（崇禧）对反攻南宁之部署，自用私心，不肯遵令处置。新疆盛世才有扣留贺耀祖之消息。国内军阀之恶劣，毫无国家观念，对于国家危急，人民痛苦，军队死伤，中央艰难至此，若彼辈只图私利，惟恐国家之不乱。思之痛楚，无以复加。终夜不得安寝，茫茫前途，究何所极？政客军阀无心肝，与其忍心害国至此，可否极矣。惟有上帝与实力，二者合而为一，方能解决困难。至此乃知鄙僻之臣，不可以德感，不可以理喻也。”[82]

此时正是重庆政府“冬季攻势”进入高潮之际，证诸重庆政府和地方势力的关系，该战役以失败告终毫不奇怪。此后，不但川滇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也不能团结。1940年5月，蒋介石对四川省的结论是“四川人心虚浮，社会黑暗，习俗刁顽，以余之诚正，尚

不能感格致治，是其难可想而知。川事愈久愈艰，惟以一片至诚出之，险易成败非所计也”。又写道：“四川习俗环境太劣，政治复杂，顾忌太多，如何使之改革上进，思之痛苦，其艰难甚于抗战也。”[83]而对于广西，他则写道：“德邻健生对敌军估计往往过高，故不愿积极抵抗，而以退缩避战为能，此其生性如此，不可厚非也。”[84]字里行间充满无奈和无能为力。

本节的目的并非要对战时重庆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进行全面检讨，而只是想把内政问题的严重性和对美外交政策理出一些因果关系。就整体而言，战时重庆政府和地方势力的关系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无法在地方执行，直接导致统治力的下降。它牵涉战时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党政军关系，并非本书的焦点。二是地方军人对日本的态度暧昧，游走于抗日、降日和不战不降之间，也非本书的焦点。三是在国民政府名义上主导的抗日阵营内，地方军人和重庆政府之间的团结程度。这则是重庆政府可以经由外交途径予以改善之点，也是1940年重庆政府致力于加强对美外交的目标之一。

三 中国对美国观感的改变

随着1939～1940年国民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上遭受种种挫折，它对美国的观感也开始被两个思路所影响。一方面，从1939年初开始，美国对于日本在亚洲的侵略行为做出的一连串激烈反应，使得中国人大受鼓舞。比如说，在1939年1、2月，蒋介石看到美国在远东的态度转向强硬，加强关岛防务，并且大幅提升海军力量，这都让他备受鼓舞。[85]美国的这些行为表明，美国正在逐渐放弃孤立主义立场，转而在国际事务上采取更积极姿态。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领袖们也了解，美国纵然抵制日本在亚洲的扩张，也并不表示它一定会增加对中国的援助。[86]很多中国领袖先后得到一个共识，主张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新的方针，去把中美关系的潜能发挥到更大程度。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逐渐提高对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影响力的估计。比如说，在1939年秋季，蒋介石从顾维钧提供的情报（8月29日）中得知，英法两国可能顺从日本的意愿向中国施压接受中日和谈。蒋介石听后大为愤怒，立即召见美国大使，请其转告罗斯福，务必设法阻止英法政府向日本妥协。并且他向罗斯福声称，中国未来对远东地区西方国家殖民地所产生的影响力将会远远大过日本。[87]依照蒋介石此时的看法，中国政府如果直接请求英法政府抗拒日本压力，收效将会非常微弱，但是如果能经由美国向英法施压则更可能达到效果。蒋介石认为，如果中国政府通过美国渠道向西方国家提出要求，不但可以防阻英日之间达成妥协，甚或可以促成英、美、法、苏四国针对中国问题采取共同立场。[88]

蒋介石转向寻求美国援助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对于国际关系一番深刻思考后所得出的结论。蒋介石分析，日本的外交策略大致不外三条途径。首先，它可以和所有西方国家（英、美、法、苏）妥协，俾得以全力击败中国。其次，只和英、美、法三个国家妥协，专心对付中国和苏联。最后，与英、美、法和中国取得妥协，而一意对付苏联。在蒋介石的判断中，日本最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寻求和英、美、法三国妥协，集中精力对付中国和苏联。[89]因此，要防止这个假设成为事实，中国必须拉拢英、美、法三国。不幸的是，中国对于英法两国的外交动向很难产生影响力。所以剩下来只能循由美国途径，才能产生影响英法的效果。

岂知过不了两天欧战很快爆发，这使得中国的外交选择受到更严峻考验。此时中国政府所面对的不再是理论层次的推想，而是关乎中日战争前途的生死存亡的抉择。蒋介石当然不能置身事外，而是反复思考中

国何去何从。依照他的想法，中国面对欧洲最关心的问题是日本将会采取何种态度，进而影响中国应该采取何种对策。

在蒋介石看来，中国应该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其一，设法阻止日本参加欧战。其二，阻止苏联不要向日本妥协。至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入欧战，则又有不同的考虑。在开战之初，蒋介石对于英法两国的战力仍存在乐观估计，认为“欧战胜利必属英法”。既然如此，则“我必须提前加入英法阵线，使倭不能加入”。这个选择有两个好处。第一，如果中国加入英法阵线，则即使日本和苏联达成妥协，也无法对中国加重危难，因为中国西南的防务（接近英法殖民地的缅甸和中南半岛）将为之加强。第二，由于中国抢先加入英法阵线，可能导致日本反对英法，则对中国更为有利。“我国对欧战之政策，主旨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媾和时，中倭战争必使与欧战问题联带解决也。故绝对阻绝倭寇参加英法战线也。”[90]

即便是在中国加入英法阵线之后日本也随即加入，中国也不会因之而改变抗日决心。正如他写道：“则我应宣明，抗倭之立场自主不变，必以九国公约与国联盟约为基础，必须我领土与主权行政之完整而后已也。”[91]最后一点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蒋介石的这些国际盘算，都是围绕着中国如何可以借力使力，善用列强的合纵连横，帮助中国抗战。换言之，即便是中日两国各自的盘算把它们推进同样一个阵线，中国抗日的基本国策也不会为之稍改。这和蒋介石在国内严厉打击和谈派是步调一致的。

当然，欧战所提供的可能不止如此，蒋介石也考虑到其他的可能。第一个可能有关苏联和日本的关系。比如说，如果苏联拒绝和日本妥协，或苏联日本开启战端，则“我应以俄为重心”。如果苏联和日本达成妥协，则中国应该继续独立对日抗战。

第二个可能有关日本和英法的关系。如果日本对于欧洲采取中立态度，而英法为了安抚日本而不与中国接近，只是保护其各自在中国的殖民利益时，这本身就对中国有利，因此“故我对英法亦可谅解”。但是如果英国支持日本进攻苏联，则中国必须与苏联站在一条阵线共同抗日。

第三个可能有关中国和德国的关系。蒋介石非常明确地表示“联德实为下策，当无此事”。这个立场似乎不仅仅是一种权谋，而且反映出他颇为一贯的道德评价。早在1939年春天，蒋介石就对希特勒持严厉批评态度。他在4月28日日记中写道：“希脱勒演说骄矜得意，目无世界，其败焉必矣。”[92]证诸当时西方列强政府首领面对希特勒的兴起，不是沉默旁观，就是同流自保，而蒋介石先前就曾为德国召回军事顾问和插足中日停战事，不惜冒与希特勒决裂的危险，此时又断言其必败，不知当时列强衮衮诸公，是否也有采取同样鲜明的立场者？

欧战爆发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又写了另外一段话：“（九月）一日德国进攻波兰，不知从此杀伤无故（辜）之人类，伊与何底？由中国人民

之牺牲，而推想于波兰以及以后全欧人类之劫运，诚不堪设想矣。希脱勒之肉其足食乎？”[93]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中国政府的国际视野里历来占据极重要地位，但是如果苏联参加德国阵线（甚至包括日本）和英法对抗，中国将要如何应对？蒋介石的答案依然明确直爽，那就是中国仍将保持继续对德日作战的立场不变。[94]

第四个可能是中日关系。蒋介石简单明了地以一句话解决：“与倭谋临时妥协乃为无策，决不出此。”[95]

经过这一番对世界大局全盘性的分析和推演之后，蒋介石终于把焦点放在第五个可能，那就是中美关系。要言之，中国必须通过美国牵制英法，阻止英法向日本的压力低头。[96]蒋介石在和幕僚商议之后，得到的结论是，不管欧战如何发展，远东问题之解决必须以九国公约为依归，而“其重心在美国”。更进一步说，中国政府“对欧战参加与否应视美国态度为标准”。[97]说到最后，美国的态度不但在国际事务上举足轻重，而且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政府外交动向的最重要因素。

以上这一切迹象都显示，欧战爆发使得在未来抗日战争的岁月里，美国的动向将会对中国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不但是由于欧战让老牌的西方帝国主义者在欧洲战场上自顾不暇，使它们在远东事务上不得不容忍日本的壮大，而且在蒋介石的判断里，日本也必然会趁机大展身手。他在此时就预言，日本必然会有大胆行为，特别是它的少壮军人，如果不主动北上攻击苏联，就会南下攻击英国殖民地。除了战略的原因之外，蒋介石坚信日本民族的仇视和排斥白人是其采取这样行动的根本原因。[98]

这些迹象都标志着，美国在中国政府领袖们的外交视野中，逐渐由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到了9月下旬，蒋介石的这个信念就更为明朗。他写道：“英法帝国主义实较其他独裁国为可恶，现时惟望美国能表明态度，防止英法与倭之妥协而已。”[99]

一旦美国在中国政府外交政策上的重要性大幅提高，中国又如何将对美外交予以实质化？

总而言之，中国逐渐形成的对美国观感和期望，大约包含以下几个因素：中国对于美日关系的观察；它对于美国援华数量不足的失望感；它自认为对于西方国家在安全措施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没有受到承认；中国政府内部对于胡适和陈光甫在1937～1940年所推动的对美政策的失望和求变。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其所产生的效果是向政府施加压力，去探求一个新的对美政策。

（一）中国对美日关系的新思维和对美国援华数量不满情绪的升高

从重庆政府的角度看，1939年的美日关系正在走上冲突之路。重庆领袖们最初的反应，是把1939年每一件美日冲突的个案都看成对中国有利。他们密切关注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向日本政府递送的一连串言辞激烈的照会和日本政府的反驳。[100]他们也密切注意美日两国公共舆论所表露出的对立情绪。[101]到了1939年底，他们又看到一波新的事件导致美日关系愈加恶化，并为之雀跃鼓舞。[102]因此，重庆领袖们目睹了美日关系恶化，不免信心大增，认为美日之间更大的冲突只是迟早问题。

1940年开春美日关系加速恶化，这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是一件好事。1月底，高宗武和陶希圣揭露了汪精卫和日本密约的内容，而美国在汪伪政权成立之时随即宣布不予承认，这让中国政府大受鼓舞。而蒋介石个人把美国主持正义的支持看得比借款更为珍贵，称之为“为寇伪当头一棒”。[103]

此后几个月，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但引起了重庆政府注意，也激起了它新的希望。

比如说，当日本政府在4月发表对荷属东印度语带威胁的言论时，当然这对于英国和法国也有杀鸡儆猴的用意，但是美国不但是以语言对抗，而且加强了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104]

5月，蒋介石又注意到美国国会通过了议案，决定增加国防预算30亿美元，而且很可能继续增加，这是对日本扩张政策的迎头棒击。期间，美国也扩张了在关岛的防务。5月底，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决定取消返美述职而继续留在日本和日本政府进行高姿态辩论，罗斯福和战争部长之间广受重视的会谈，国会通过授权罗斯福可以向外国施行禁运的议案等，都让蒋介石感到美日关系将会趋向恶化。

这一连串事件的发展让蒋介石对美国的期望变得更高，认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可以抑制日本和苏联的骚动。

蒋介石特别指出他并不希望美国被卷入战争，只是希望美国的姿态可以成为“世界一线之光明”，但是他并不认为美国的这些动作会对中国产生实质帮助。如他所言，抗战之事“仍赖自我努力奋勉，其实美国并不能与我有所援助之诚意也”。与此同时，欧战的发展反而令他倾向悲观。美国对荷兰和比利时的投降及英法军队在法国境内被包围无能为力。[105]而欧战发展究竟会如何牵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和日本的抗争，也确实难以预测。

这些外在环境的改变也影响到中国领袖们的自我认知。1939年以前，尽管美国对日本在亚洲侵略行为的态度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硬，但是它对中国的援助却没有相应的增加，而中国也从来没有指望过从美国获取大批援助物资，因此也从不抱怨美国人吝啬。但是到了1940年初，中国政府某些领袖已经开始对美国产生不满。在不知不觉的过程

中，中国政府在处理对美关系时，逐渐出现了一些具体的抱怨，而且这种新态度渐渐被大多数领袖所接受。

首先，中国人抱怨美国提供的贷款太少，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胡适和陈光甫团队在辛苦了19个月之后，所能获得的成绩不过是总数为区区4500万美元的两次贷款而已。

与此同时，中国所面临的灾难使得它对美国贷款的欲望大幅增加。虽然中国在争取到第二次贷款时也曾经为之欣慰，但是这种情绪为时短暂。因为贷款信息透露之后，政府众多部门立即展开激烈竞争，希图可以分到一部分，最后甚至不得不通过蒋介石的亲自干预才能摆平这些部门之间的争端。[106]很显然，这些小数目借款不但不能满足中国各方面压抑已久的需求，反而只会在不满的情绪上火上浇油，因为大部分政府机构的需求根本没有得到照顾。

事实上，孔祥熙最初目标是获得1亿美元贷款，所以他对桐油贷款的数目之小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难怪当他首次接到陈光甫电报时，赶忙去电查询，这个数目是否笔误，抑或是尚有其他更多的附加款项将会相继到来。[107]当中国领袖们事后获知，即使是这个微乎其微的贷款数不是经过双方协商而来，而是由美国单方面裁决后径行通知中方的，他们的不满情绪就变得愈加强烈。

令人感叹不已的是，中国驻美的两位外交代表，以他们典型的温顺有礼的作风去和美国政府打交道，以至于他们在整个商谈过程中，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和美国人商量借款的技术细节，而从来不曾向美国人去申述中国抗战的需要。哪知道，在两位代表费尽周章地把技术性细节全部谈妥之后，美国政府却单方宣布（而且是以一种若无其事的姿态宣布），借款的总数是2060万美元，最后改为2500万元整。胡适和陈光甫两人都是在最后一次谈判时才被美方代表告知这个数字，而这两位谦谦君子却“不好意思”去要求美方重开谈判。[108]

尽管连两位代表也对这个区区之数感到震惊，但是陈光甫依然努力地把它装扮成一个喜讯。他所持的理由是，这个借款至少提出一项有力证明，那就是他所主张的长期性借款策略已经产生了实际效果。当然这个成果在华盛顿颇让一般美国政府官员感觉良好，特别是财政部长摩根索一而再地自夸，他是如何努力地帮助了危难中的中国，但是在重庆的反响却截然不同。当中国官员想起了不久前曾经不费太多工夫就从苏联得到几亿美元贷款时，他们更无法感激美国人的吝啬。

另外，美国借款条件的内容也在中国引起了相当程度的不安。由于这两次借款是通过美国国家进出口银行办理的，因此准确地说，它们并不是美国的对华援助，而只是为了购买美国工业产品所预支的借款，且这些借款指明是由中国出口的桐油和锡作为偿还。[109]中国政府本来期望用桐油借款去购买美国大炮，但是遭到拒绝，因为美国政府坚持这项借款只可以用来购买非军用物资。[110]最后的妥协是中国用该项借款购

买美国大卡车，然后用它们运送中国的矿产品出口到美国去还债。如此说来，美国借款帮助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做了一笔大生意，但是对于中国抗战所能做出的贡献，却还真是说不清楚。难怪中国政府对于这种安排无法释怀。

更有甚者，美国借款也不准许用来支持中国政府企图稳定法币的努力。换言之，虽然美国政府此时政策是允许外国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到美国市场购买军需品，但是不允许中国把从美国所借到的款项用作此途，这就迫使中国政府必须再去开辟其他财源。可以说，美国政府其实是使用国家公款去补贴本国的出口产品，获取从中国的进口物资，同时又变成中国的债权人，诚可谓一举而三得。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美国都真做了一笔聪明的生意。相对而言，中国得到一大批大卡车，而它们最大的功能是满足美国的进口和出口需要。与此相对，投身抗战的中国军队在这整个交易中几乎完全是局外人。

中国政府也心里有数，不论是桐油或是锡，在现有的生产技术之下，其产量都有枯竭之日，无法支持一场漫无止境的战争。中国政府自然不希望把这些珍贵物资变成美国小额贷款的抵押品，而是希望把它们储备起来，等待将来世局改变时，可以用来做大宗借款的抵押品，或是购买大宗军火。中国政府还有一个忧虑，那就是这些资源的出产地（省份）可能遭受敌人进攻的威胁。交通运输的困难也会限制它们的供应量。更何况，当时抗战激烈，投入巨额人力和金钱去开采矿产和改善交通系统，不但难以实现，而且和抗战活动所需的人力、物力会互相竞争，政府实难面面顾到。

尽管孔祥熙对桐油借款的金额和条件都极为不满，他的第一反应还是想说服自己把它当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商业贷款，同时希望中国能够经由某种弹性方式把款项用在和战争有关的事情上。[111]但是到了1940年初，中国政府终于明白此路完全不通，因为中国军队的武器弹药需求剧增，而政府又没有能力把更多的天然物资运送出国作为付款之用。难怪政府的初步解决方案，就是敦促胡适和陈光甫去要求美国放宽借贷条件，而这却正是胡陈二人屡次宣称他们无法达成的任务。

第三，中国政府对于为了取得如此微薄借款而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也感到愤愤不平。1938年底，当罗斯福首度要求中国必须保证将继续对日抗战作为桐油借款交换条件时，中国政府毫不迟疑地做出了承诺。岂知不久，罗斯福却表示还需要把借款草约交给国务院审核，而后者却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借款将开罪日本，而且判断中国的运输系统可能无法将产品送出国外。

中国政府原先做了一个自认为合理的推论，那就是，既然罗斯福开口向外国提出要求，而外国政府又接受了该项要求，则罗斯福当然也会履行自己的承诺。让中国政府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在中方为了如此小额借款而做出了如此严肃的承诺之后，罗斯福居然还是不愿意在联邦政府内部的国务院和财政部的争执之间做出决断。虽然这个借款协议最后还

是在1939年2月8日被通过了，但是它并没有平息中国领袖们的愤怒。[112]正是诸如此类的事件刺激中国领袖们下定决心，今后中美之间谈判务必要更平等和更有效。

（二）中国逐渐改变了自我评价：中国抗日战争对西方国家利益究竟有何重要性？

中国领袖们对于美国的观感，一方面固然取决于美国借款政策的慷慨或是吝啬程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他们对于中日抗战是否攸关美国国家利益的评价。大致说来，在1937～1940年，重庆政府和它的驻美使节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开始产生歧见，而且随着时间进展，双方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基本上，重庆政府遭到国内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胡适和陈光甫在美国寻求借款的策略原本就属错误，更何况他们还有工作不力的问题。面对这些指责，重庆政府终于认为必须改弦易辙才能争取到更多的美国援助。在相当程度上，这些指责也反映了国内许多人对于抗战意义的评价正在发生变化。

早在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时，在西方国家中普遍流行一种观点，即把中日战争看成一场亚洲人之间的区域性争端，与西方人毫不相干。而中国领袖除了接受这种观点之外别无选择。当时大部分中国人在要求西方国家给予借款时，都认为这是向西方人请求高抬贵手施予恩惠。一直等到1938年春天，中国人才开始形成一种世界战略观，把中日战争放在一个全球性的格局里去分析。这种新分析方法的一个自然产物，就是认为中国战局和欧洲战局之间具有密切关联。民主国家和轴心国在欧洲的斗争很快就向中国领袖们提供一个启示：德国和意大利肯定会希望日本在亚洲的北部向苏联施压，并在南部向英国和法国施压，从而帮助自己更容易占领整个欧洲。但是偏偏中国地处亚洲中间，而它的对日抗战又使得日本无法实现上述目的。既然中国对于维系欧洲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西方国家的帮助作为回馈。[113]

到了1938年底，中国这种新思维变得更加细腻：中国对日抗战其实并不仅仅是维护中国本身独立，也是替西方国家保护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利益。日本在1938年10月先后占领了武汉和广州，又拒绝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些事件都增加了中国领袖们的信心。他们认为抗战直接帮助了西方列强（包括美国），保护了它们在中国的权益。蒋介石在1938年10月中旬发给胡适的一份电报中写道：

日军在广东沿海登陆事实上威胁了英国，而间接地也是对英国的一项挑衅。此时应该是最适宜由美国政府出面，去鼓励英国通过合作以达成共同干预远东局势的目的。远东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此类英美两国的行动，但是美国政府必须扮演主导角色。[114]

时间没有过多久，中国政府也开始向欧洲国家提出类似的说辞。[115]

中国开始相信，中日战争攸关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利益。尤其是当罗斯福正式要求中国政府保证将会继续对日作战时，[116]这个看法的正确性在中国领袖的心目中就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不久，当日军在1939年2月进占海南岛时，蒋介石立即很有信心地把日本的行动视之为中日开战以来，日本对英、美、法等国在远东利益最严重的威胁，而且必将会导致西方国家强烈的反弹。[117]

既然美国人要求把他们的借款和中国承诺作战绑在一起，那么中国的抗战肯定与美国的国家利益高度统一，中国当然也就有权利要求得到适当回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新思维是不把抗战看成亚洲地区的局部冲突，而是把它看成是民主国家和侵略国家间势不可免的全球性抗争的第一道防线，因此中国理当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118]

欧战爆发和罗斯福对于世界和平遭受威胁所提出的种种警告，益发加强了中国人的这种信念，即认为中日战争和美国的全球利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蒋介石在1939年9月所持的观点是，假如欧洲战事长期拖延下去，则日本肯定会抓住机会去挑战英法两国在亚洲殖民地的地位，因为欧战将为日本提供一个机会，在亚洲北部采取守势（对付苏联），而在南部采取攻势（对付西方列强）的大战略。[119]尽管中国费了许多努力去要求英法等国商谈合作项目，它们却依然不予理睬，因为它们既不愿意得罪日本，又只愿意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

既然欧洲列强对中国不理不睬，中国剩下来唯一的务实出路就是去加强和美国的联系。英法遭受重大失败之后，中国人也因此而对自身在这场全球斗争中所能扮演的角色有了更多的相对感受。在中国的新观念里，连跻身世界强国前列的法国和英国陆军，都如风吹草偃般地被德军击败，那么中国军队在过去两年多来坚持和日军战斗还真是足以自豪的。光是中国人所做出的这些努力，他们就值得接受美国援助。中国人在心态上这种微妙的变化，促使他们在1937年开战以来首度检讨中国的对美外交政策。

（三）中国政府传统对美外交政策逐渐失去民心

紧接而来的是，1939～1940年有几个新因素进一步改变了中国人的观点。

首先，孔祥熙在国内受到严厉指责，因此政府需要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孔祥熙在1938年1月被任命为行政院长，同时兼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受到指责不仅因为个人缺乏领导能力和行政经验，且思路不清，更重要的是他把财政大权放手交给了一些贪污、腐败、无能的下属。孔祥熙

不但在国内政坛无法赢得同侪的尊重，也无法获得在华西方人士的信赖。比如说，英国在中国的首席经济专家罗杰斯（Cyril Rogers）就曾经向翁文灏透露过，他对孔祥熙的无能充满轻视和愤怒。他同时发誓，只要孔祥熙一日留任行政院长，英国就不会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120]

早在1938年2月，知名学者傅斯年就向蒋介石提出警告，孔祥熙的政策已经降低了英国和美国对蒋介石的信任，也让政府在国内失去民心。[121]到了1938年下半年，国内对孔祥熙的批评变得更尖锐也更有组织。1938年10月，国民参政会里的二十几位委员向蒋介石表明他们反对孔祥熙继续留在政府里担任职务。[122]到了1939年，随着中国财政情况不断恶化，对孔祥熙的攻击也变本加厉。[123]1939年底，谣传军事将领陈诚、白崇禧等人也反对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并且请求蒋介石兼任。[124]最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39年11月20日决议，任命蒋介石为行政院长，孔祥熙改任副院长。[125]就这样，反孔的势力在经过两年漫长的酝酿后终于赢得了一场局部胜利。

中国的对美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和孔祥熙的政治处境纠结在一起，原因是在当时，陈光甫被普遍认为是孔祥熙的亲信。因此，在美国进行的借款谈判也自然地变成被攻击的对象。孔祥熙的批评者在参政会上指出，在欧战爆发之后，美国向其他国家贷款的还款期限一律得到延长而且取消担保，同时这些贷款也都从商业性贷款转换成政治性贷款。他们特别举出美国对芬兰的贷款作为实例，来证明胡适和陈光甫历来所持主张的谬误。这些人一致要求中国应该争取美国给予同等待遇，这就使得重庆政府感受到极大压力。[126]

面对如此压力，孔祥熙通知陈光甫，中国必须改变未来和美国谈判新贷款的策略，否则国内指责将更加尖锐。[127]然而陈光甫却愤怒地拒绝了孔祥熙的要求，坚持相信商业贷款是中国唯一的选择，因为美国政府根本不允许中国另谋他途。与此同时，第二次贷款的谈判正在进行，孔祥熙曾承诺以云南的锡做为担保。但是就在谈判宣告结束之日，孔祥熙却向国内的批评者屈服，并立即指示陈光甫撤回以锡为担保的承诺。陈光甫在日记中感叹有人居然会愚蠢到这种地步，他同时发誓一定坚持谈判到底，然后打道回府，不再在美国停留。

作为此前代表中国向美国借款的主角，陈光甫不但累积了丰富经验可以做出权威性的阐述，而且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借款策略，他对孔祥熙为人做事的观感和评价也远比外人更为深刻。因此他在日记中宣泄的一番话值得在此大篇幅地加以引用。

余积四十余年之经验，对于中国之政治及社会状态，可称阅历丰富。盖括言之，可用九字形容一切，即“敷衍，不认真”，及“以势欺人”是也。政府大员动辄以谋国家福利为口号，实际上但求得保持禄位，对于国家福利，何尝有深谋远虑？只求眼前舒服，不吃力，不致有严重问题，并日后有何不良之影响，均在不计之列。就借款而言，尚未借到之前，哀求苦告，无所不用其极。待其款项到手，则债信之保持，有如

耳边微风，漠不关心。如债权人有所议论，则曰我为民主而战，或曰赖债不乏先例。种种敷衍不理会之手段，层出不穷。如第一次美借款成立之后，余不努力维持债信，恐政府早已置之不闻。而第二次借款亦毫无希望矣。尤足痛心者，以堂堂行政院长之地位，今日说话，明日即可取消。此次以滇锡作押，电报盈寸，乃借款发表之翌日，即来电欲取消滇锡之议，反曰美友云云，不信仰全权委托之人，而信局外之美友信口雌黄，谓非不认其以势欺人，其谁信之。余今日系为国家做事，如听凭彼等滥发号令，向美方要求收回滇锡抵押之成议，更坚持取消中国银行之担保，其势美方如毛君（Morgenthau）、琼斯（Jones）等，始则表示诧异，终则非重新考虑借款不可。是已得者重又失之，尚谓系谋国家福利，亦等于痴人说梦而已。余之图谋借款，乃欲不闭源源接济之门，有一次借款即有二次，更继续至于三，四，五，六次。第一次条件较苛，第二次已松懈不少。苟吾人守信不渝，势必愈借愈宽。今国内乃欲杀鸡取蛋，遂其作威作福之私欲，岂不可痛？[128]

到了这个时刻，重庆政府和它驻美代表间的鸿沟已经到了无可弥补的地步。

陈光甫为自己的这种心情曾经做过一个非常生动而又令人扼腕叹息的见证。他虽然是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指定的中国借款谈判对手，且摩根索又在口头上对其推崇不已，但是他们之间远非外人所羡慕的平等关系，而是使陈氏充满屈辱感。1939年6月，陈光甫正好在外地，而摩根索却想要约见他，陈氏只好放下手边事务赶紧返回华盛顿。他事后写道：“决定乘飞机前往，随唤随到，有如人家仆役，如此伺候他人，平生未干过，亦无非冀为国家多得援助而已。”[129]陈氏之所以如此处理中美关系，依他的想法是“向人借钱，必须看人颜色，如要求而遭拒绝，此后再谈，多一痕迹，足以减少日后谈判成功之机会。此余之所以审慎再四，不敢冒昧进言也”。[130]

以上所述的这些状况，说明了为什么孔祥熙最后接受由宋子文出任新任驻美特使。孔祥熙个人对宋子文当然没有好感，但是当他驻华盛顿的亲信陈光甫也成为被攻击对象，而他和陈光甫的私人关系又到了濒临决裂地步时，他已经无路可走，只好同意让宋子文到华盛顿去另起炉灶，而宋子文本人当然也不遗余力地争取得到这个新职位。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孔祥熙也颇为自信地预计宋子文必将遭遇同样的失败命运，这样就可以间接地帮助他对政敌施以反击。

另外，重庆政坛还有另外一群人，对于中美外交关系进行了严格检查。他们发现美国的进出口银行早已没有剩余资源可以从事贷款任务，因此他们建议中国政府无须对美国过于委曲求全，应该更大胆地提出要求，争取更优惠的条件。也有人指出，陈光甫和摩根索的私人关系过于接近，可能对未来贷款工作不会发生太大作用，因为连摩根索本人也可能在下次内阁改组时被更换。[131]更有人对中国政府争取美国贷款的整个策略提出怀疑。在他们看来，中国选择只跟财政部打交道而得罪了国务院，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错误，因为这只能激起国务院的破坏动作。

换言之，他们从根本上就认为胡适和陈光甫的外交手段是错误的，而这些批评当然也让他们二人感到难堪。同时可以想象的是，蒋介石面对众说纷纭的局面烦恼不已，也急于找到一条合理有效的出路。

四 中国逐渐摸索出一个新的对美政策

到了1940年初，上述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发展已经把重庆政府逼到一个地步，对于未来的对美外交政策必须做出新选择。确切地说，胡适作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当然应该熟知中国要求美国援助的迫切性。作为所有蒋介石致罗斯福电文的传达人，胡适也完全清楚蒋介石的观点。因此，中国驻美外交官无法做出更大的成绩，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所处环境的险恶，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做得更多。换言之，他们不是由于信息隔阂而无所作为，而是由于不敢向美国人提出更多要求。当然，当胡适声称有些事是他作为一个外交官所不屑做的时，这种言论对于他的工作绝无帮助。因此，重庆和驻美使节间的矛盾就变得不可调和了。

其实，早在1939年欧战爆发后，蒋介石对于胡适的“不作为”就已经耐不住一肚子怒火而在日记中予以宣泄了。他在9月2日的日记中抱怨道：“内外军政皆不得其人，不得不令人悲愤。”就国“内”而言，军人指的是何应钦，政界指的是孔祥熙。至于国“外”，他点名写道：“尤其胡适，余令其向美办外交，而彼乃向余辩难办内交。作中国首领之痛苦，无论何国，恐无此种情形也。”紧接下来再写道：“研究外交方针与处理，自以为无遗，而执行者不力，余虽焦心苦虑，绞尽脑汁，而一般文人书生不知何。”[132]短短数语道尽了蒋介石对于胡适的无奈。难怪几天之后，蒋介石终于写下了“应速更调”胡适的想法，理由是“胡适……太不成事”。[133]这个时机无疑和刚刚发生的欧战有极大关系。欧战爆发之前，中国政府对美国的需求可以缓慢处之，所以胡适的慢吞吞步调和不积极态度，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负面作用。但是在9月1日欧战爆发之后，中国政府的外交盘算立即发生了变化。即便美国不是参战国，中国政府领导人也已得出结论，无论是哪一个列强国家（英、法、苏、德和日本）的动向，都必然会严重地受到美国影响。因此中国对美外交必须及时注入活力，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而纵观胡适的态度，似乎缺少这份危机意识。重庆的急中风，碰到了驻美的慢郎中。这个情形肯定不能持久。这则日记的时机还为另外一段历史公案提供了解码。多年来学术界对于胡适1940～1942年所受的冷遇和去职，都倾向于认为是他遭到宋子文粗暴的倾轧。但是蒋介石日记前后多次谈及胡适，都可以帮助我们推论，问题的症结是蒋胡二人在1938～1939年的冲突。宋子文的赴美正是蒋介石对于胡适不满的最好证明。

至于孔祥熙的问题，偏偏在此时刻又发生了一个雪上加霜的事件，那就是外交部长王宠惠在呈报蒋介石批准之前就擅作主张，请求罗斯福调停中日战争，大大地违背了重庆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难怪蒋介石气急败坏地在日记里大骂道：“亮畴突发外交可由美国调和奇诞，此种书生，不知其用意究竟何在？误事不浅。”隔了一日意犹未尽地继续骂

道："亮畴发言误事，诚所不料。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至）此，乃不应痛苦之痛苦。是国人愚弱怯懦成性所致也。心神忧患，实以本星期为最也。"[134]这种严重的外交失控，终于导致蒋介石对孔祥熙和王宠惠颁发一道指令，从今以后不许自由发表意见。事后蒋介石写道："事后觉太过，然不得不如此耳。"[135]这一切都显示，虽然蒋介石已经开始重估对美外交政策，但是几位主管外交政策的决策人和执行者都完全无法符合他的要求。

然而就胡适和陈光甫二人而言，他们坚决相信自己对美国政局分析的正确，因此相信美国的援助不得不受到某些限制，无法克服。当蒋介石和孔祥熙请胡适向罗斯福致送一份电报（1940年5月份），要求美国给予一个大额度的贷款去帮助中国稳定法币制度时，胡适的判断是这个要求必将遭到美方拒绝，因为美国政府受到许多法律上的约束。事实上，胡适在私下也确实从财政部和国务院方面得到过此类信息。因此，胡适建议重庆政府修改电文内容，并在5月31日把新电文送交美方。[136]事后回顾，这是重庆政府最后一次依赖胡适作为中间人去传达中国日益提高的对美财政要求。胡适的这一举动可能除去了蒋介石心中最后的一丝犹豫，促使他做出决定，假如中国对美的财政要求果真想要在美国积极推动的话，那么必须派遣一位新使节赴美主持谈判。

重庆政府如果曾经设想改变胡陈二位的观点的话，它的成功机会大概会非常渺茫。在他们二人之间，陈光甫原本希望胡适能够更主动地承担起更多的重任。比如说，胡适到国会和联邦各部门进行游说工作，争取政治支持，而陈光甫本人则可以就技术层面的问题和美方谈判。但是胡适并不如此想，因为他对陈光甫的工作表现非常满意，并且希望他们二人在华盛顿的合作关系可以按照过去的形式维持下去。即使是到了1940年4月，当胡适得知重庆政府可能会筹备成立一个外贸部并任命陈光甫为首任部长时，他马上提出反对，并建议政府赶紧将陈光甫再度派来美国，重新主持他原先遗留下来的工作。在胡适心目中，陈光甫在美国的工作要远比做一个部长重要得多。[137]由此可见胡适对陈光甫的器重。

胡适列举了许多理由说明陈光甫在美国的重要性，其中特别强调了罗斯福和摩根索指名希望陈光甫回任，陈光甫的清廉形象大大地改善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印象。作为一个私人企业团体的领导人，陈光甫在和美国政府谈判贷款时，将比以外贸部部长身份进行谈判更有优势。当然，在胡适列举陈光甫优点的背后，还隐含着一个假设，那就是胡适本人仍打算主持今后的贷款事宜。对于陈光甫来说，他固然很希望能够回中国一趟，但是也并没有断然表示绝对不再回到美国。事实上，即便是罗斯福也希望陈光甫将返回美国继续工作。[138]

对于重庆政府而言，假如选择让胡陈二人继续留在华盛顿工作，那么必须准备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今后的贷款工作和中美关系，大致上将仍按照过去的轨迹运行。换言之，相同的策略、相同的速度、小额贷款，而且一切遵从美国人的旨意行事。但是到了1940年初，中国政府已

经无法继续接受这种形式的中美关系。正如同胡适和陈光甫对于重庆政府态度深感不耐一般，重庆政府也对胡陈二人未能争取到更多贷款而深感不耐。这个僵局迟早必须打破。

国民政府在回顾过去四年的历史成绩时发现，尽管罗斯福和摩根索两人在口头上不断地表达对中国的善意和照顾，但是美国政府在处理贷款的谈判上却表现得既吝啬又漫不经心。摩根索在桐油借款公布之前，居然违反基本礼貌而没有和中国领袖们进行磋商，而罗斯福更是不愿意为了中国借款而去协调其部属（财政部和国务院）之间的歧见。这些举动让中国领袖们感到他们自己像是一只政治皮球，被美国人随意踢来踢去。更令他们失望的是，中国人在耐住性子多番哀求之后，从美国人手中取得的两次借款总数，还不及苏联借款的1/5。甚至美国借款对于中国抗战军事需要所能提供的帮助，更是远远不及苏联的借款。更有一种传说，就是摩根索和陈光甫之间的私人友谊对于头两次的借款起了极大作用。但正是这种说法让重庆政府意识到，如果不在人事上和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则中美关系将不可能有根本性突破。[139]

中国政府这种态度上和期望上的改变，导致它决定采取一个新的谈判姿态。中国政府的态度改变的另一原因，也可能来自它新得到的情报。在这方面，顾维钧发挥了相当作用。虽然他的外交任所在欧洲大陆，但是他对美国政府的动态相当了解，也因此成为重庆政府依赖的重要消息来源。如果追根究底，中国对于美国两次借款之所以成功，还是得力于顾维钧和摩根索及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的接触。1940年5月17日，蒲立德在返回美国前和顾维钧会面。一如既往地，蒲立德对于中国战事表露出高度关切。当顾维钧说明中国当前急需大炮、装甲车、高射炮等武器时，蒲立德当即表示可以提供协助，并且透露美国政府其实有大量库存火炮。他又宣称罗斯福、摩根索和赫尔三人其实都非常同情中国的遭遇，而他允诺在回到美国之后必定会把中国的需求转达给美国政府。[140]蒲立德这种自然表露的友好精神，提高了蒋介石的希望，使他相信，只要能够派一位精力充沛而且手段灵活的人去美国，则中国大有可能从美国获得更多急需的武器和财政援助。

一旦做出了这项决定，中国政府似乎就有两种方法可以使之付诸实行。最极端的方法，当然是同时撤换胡适和陈光甫两人，而比较缓和的做法则是撤换两者中的一人。蒋介石当然清楚胡适已经在美国民间建立起崇高声誉，在重庆政府高层官员里又有诸如王世杰、陈布雷、翁文灏、蒋廷黻等亲密朋友。因此，撤换胡适所付出的政治代价可能会相当高。

事实上，蒋介石在1940年春天陈光甫离开美国之后，的确动过撤换胡适的念头。他在4月30日向外交部长王宠惠透露，打算请胡适回国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并征询王宠惠和孔祥熙由何人接掌驻美大使为最适宜。[141]到了5月，陈布雷和王世杰也开始参与挑选继任人选的工作。[142]不久，孔祥熙和王宠惠提出两个人选，分别是顾维钧和颜惠庆，其中尤以顾维钧最适合。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到了

此时，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性已经超过对法外交。[143]这标志着在中国政府的外交视野中，美国的地位正式提升到法国之上，和英国、苏联并驾齐驱了。

胡适的去留问题很快就在重庆传开，立即引起了他的政界朋友关注。大致言之，从学术界转入政界的知识分子都希望胡适继续留在美国为国家出力，最具代表者莫过于王世杰。他在5月3日直接写信劝蒋介石打消撤换胡适念头，其所持理由有三。一是战争时期，如无重大事故，不宜更换使节。二是胡适早已告知众多友人，他计划在大使职位上尽力服务至战争结束。如果遽加撤换，他可能会以为失去政府信任而在解职后逗留海外，或是拒绝政府为他安排的新职务（中央研究院院长）。三是无论如何，胡适已经与白宫和国务院建立了良好关系，也建立了自己的声誉，这远非颜惠庆或是施肇基可比。[144]王世杰所提的第一、第三点是就事论事，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点。虽然胡适的确表示过要坚守工作岗位直至战争结束，但是王世杰也大概探知蒋介石不愿为此付出太大的政治代价，而胡适果真拒绝回国，就超过了蒋介石所愿意付出代价的限度。正是这层考虑终使蒋介石暂时放弃了更换胡适的念头。

反之，陈光甫的主要任务是获得美国贷款，他在美国政府中只和摩根索一人有密切关系，而摩根索正是向中国设立许多借款限制的人。陈光甫在中国的政治靠山是孔祥熙，而孔祥熙本人已经是焦头烂额、自顾不暇了。撤换胡适而保留陈光甫的做法并无太多意义，因为胡适原本就不曾热心参与购买武器或是贷款谈判工作，但是他在其他方面却还能做出相当贡献。撤换陈光甫而保留胡适，则很有可能为中美关系开辟一条新路。对于重庆政府而言，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不久就变得非常简单了。[145]

当然，与此同时，重庆政府内部也需要做出相应的人事调整。孔祥熙对于对美政策本无卓见，而王宠惠也不是一位得力的外交部长。两者都需要靠边站，俾使一个新政策可以得心应手地展开。

[1]有关中国方面的一些估算，参见《徐永昌日记》，1939年3月9日。

[2]《徐永昌日记》，1939年6月16日。

[3]《王世杰日记》，1939年1月6日。

[4]《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29日。

[5]《蒋介石日记》，1939年5月4、5日。

[6]《蒋介石日记》，1939年5月26日。

[7]《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20～422、442页。

[8]《蒋介石致谭伯羽电》（1938年3月1、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708～709页。

[9]《谭伯羽致孔祥熙电》（1938年5月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

第709页。

[10]《王世杰日记》，1938年6月3日。

[11]《蒋介石致杨杰（莫斯科）电》（1937年12月3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471页。

[12]《杨杰（莫斯科）致蒋介石电》（1938年3月2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483～491页；《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17日、1938年2月23日。

[13]《蒋介石日记》，1939年6月17日。

[14]《王世杰日记》，1940年3月1日；《徐永昌日记》，1940年4月11日。

[15]《蒋介石致杨杰（莫斯科）电》（1938年1月5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475页。蒋介石在电报中嘱杨杰向苏联政府表达中国的不满。

[16]《徐永昌日记》，1939年9月14日。

[17]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1939年5月19日。

[18]Kung cable to K. P. Ch'en，October 14，1939，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G-2.

[19]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页；《最高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报告》（1941年3月2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530～533页。

[20]《徐永昌日记》，1940年4月2日、6月18日、7月19日。

[21]《徐永昌日记》，1938年5月4日、1939年9月18日。

[22]《徐永昌日记》，1939年9月19、20日。

[23]《王世杰日记》，1939年11月1、4日。

[24]《王世杰日记》，1939年11月7日。

[25]《翁文灏日记》，1939年12月18日。

[26]John 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Oxford Nniversity Press，1988），pp. 96-98.

[27]《王世杰致胡适函》（1940年1月6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2册，第449页。

[28]《蒋介石日记》，1939年12月2、9日。

[29]《王世杰日记》，1939年12月9、15日；《蒋介石日记》，1939年12月16日。

[30]杨杰向蒋介石报告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对中国政府所表达的不满。《杨杰（莫斯科）致蒋介石电》（1940年1月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362～363页。

[31]《贺耀祖（莫斯科）致蒋介石电》（1940年1月9日）、《贺耀祖（莫斯科）致蒋介石电》（1940年1月1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363、364～365页。

[32]《贺耀祖（莫斯科）致蒋介石电》（1940年1月1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367页。

[33]《蒋介石与苏联大使在重庆会谈记录》（1940年1月2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369～370页。

[34]《蒋介石致贺耀祖（莫斯科）电》（1940年1月3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521页。

[35]《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18日。

[36]《蒋介石日记》，1939年6月30日，7月15、18日。

[37]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第296页。

[38]财政部次长徐堪报告及何应钦报告，参见《王世杰日记》，1937年7月27日。

[39]财政部长孔祥熙报告，参见《王世杰日记》，1938年7月7日。

[40]财政部次长徐堪报告，参见《王世杰日记》，1938年9月11日。

[41]《王世杰日记》，1939年1月23日。

[42]《徐永昌日记》，1940年6月14日、9月16；《王世杰日记》，1940年11月18日。

[43]《王世杰日记》，1938年5月19日。

[44]牟润孙：《中美桐油借款商谈纪要稿》，第132～134页。

[45]《王世杰日记》，1939年3月31日。

[46]《孔祥熙关于1937—1939年财政实况的密报（上）》，《民国档案》1992年第4期，第22～28页；王松等《孔祥熙和宋霭龄》，第204～205页。

[47]翁文灏关于行政院第424次院会的笔记，参见《翁文灏日记》，1939年7月25日。

[48]数据系由宋子文提供，参见《王世杰日记》，1939年11月28日。

[49]《徐永昌日记》，1940年11月27日。

[50]《王世杰日记》，1939年1月23日。

[51]《翁文灏致胡适函》（1939年11月11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2册，第336～340页。

[52]《翁文灏致胡适函》（1940年1月7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2册，第342～344页。

[53]《张忠绂致胡适函》（1939年6月4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2册，第420～421页。

[54]《张慰慈致胡适函》（1939年5月25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2册，第418～419页。

[55]《王世杰日记》，1940年1月1日。

[56]《王世杰日记》，1940年3月16日。

[57]Letter from K. P. Ch'en to Hu Shih，July 15，1940，Hornbeck Papers，Box 80.

[58]《徐永昌日记》，1940年11月27日。

[59]《王世杰日记》，1940年10月2日。

[60]《王世杰日记》，1940年3月16日。

[61]《王世杰日记》，1939年7月18、20、24、26日，8月8日。

[62]CKS cable to FDR，May 17，1940，*Morgenthau Diary*（*China*），pp. 173-74.

[63]《陶希圣致胡适函》（1938年12月31日），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第1册，第171～172页。

[64]《翁文灏致胡适函》（1939年11月11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2册，第336～340页。

[65]有关冬季攻势的战略构想、部署和执行，参见Hsi-sheng 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pp. 56-63。

[66]《徐永昌日记》，1939年12月29日、1940年1月22日。

[67]《徐永昌日记》，1940年1月13日、3月6日、4月11日。

[68]《徐永昌日记》，1940年4月8日、5月17日。

[69]《王世杰日记》，1940年8月24日。

[70]《王世杰日记》，1939年12月31日。王世杰与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德丁（Frank Tillman Durdin）谈话记录。

[71]《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4日。

[72]《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21、23日。

[73]《蒋介石日记》，1939年5月31日。

[74]《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11、13日。

[75]《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18、19日。

[76]《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26日。

[77]《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16日。

[78]《蒋介石日记》，1939年10月7日。

[79]《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31日。

[80]《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9日。

[81]《蒋介石日记》，1939年12月2日。

[82]《蒋介石日记》，1939年12月12日。

[83]《蒋介石日记》，1940年5月4日。

[84]《蒋介石日记》，1940年5月5日。

[85]《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28日、2月19日。

[86]《张忠绂致胡适函》（1939年1月25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2册，第402页。

[87]《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29日。

[88]《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30日。

[89]《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30日。

[90]《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2日。

[91]《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2日。

[92]《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28日。

[93]《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3日。

[94]《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6日。

[95]《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2日。

[96]《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1～4日。

[97]《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7日。

[98]《蒋介石日记》，1939年6月5日、9月2日。

[99]《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18日。

[100]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2～3页；《翁文灏日记》，1939年10月22日。

[101]《徐永昌日记》，1939年11月5、6日。

[102]有关这些引起中国领袖们高度关注的事件，参见《徐永昌日记》，1939年11月24、27、29日，12月4日；1940年1月27日。

[103]《蒋介石日记》，1940年1月27～30日，3月12、31日。

[104]《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30日。

[105]《蒋介石日记》，1940年5月18、25、31日。

[106]《翁文灏日记》，1940年3月10、14日。

[107]牟润孙：《中美桐油借款商谈纪要稿》，第135～136页。

[108]牟润孙：《中美桐油借款商谈纪要稿》，第132～134页；Hu Shih cable to

Chen Pu-lei，October 25，1938，“A Chronology of Loan Negotiations，1938-1940” by Dr. Hu Shih，From File of Chinese Embassy，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F-3。

[109]“Detail Report of 1st and 2nd loan negotiations，”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2，E.

[110]《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5月27日。

[111]Kung cable to Hu Shih and K. P. Chen，March 27，1940，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F-3.

[112]牟润孙：《中美桐油借款商谈纪要稿》，第135～136页。

[113]有关顾维钧在1938年1月10日和法国外交部长的会谈经过，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32页。

[114]Hu Shih letter to Hornbeck，October 16，1938，Hornbeck Papers，Box 80.

[115]《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63页。

[116]《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8年10月2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241～242页。

[117]《蒋介石日记》，1939年2月9日。

[118]有趣的是，虽然胡适本人从1939年4月起就开始提出这个论点，但是从未尽心去向美国人鼓吹。《胡适致外交部长王宠惠电》（1939年4月4日），《外交部档案》：172-1/1751，“国史馆”。

[119]《蒋介石致郭泰祺大使（伦敦）电》（1939年9月1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32页。

[120]当罗杰斯在1938年向蒋介石建议将孔祥熙解职时，蒋介石拒绝，宋美龄也向罗杰斯透露，蒋孔之间“不可分离”。《翁文灏日记》，1939年8月2日、1941年3月15日。

[121]傅斯年致蒋介石函，参见《翁文灏日记》，1938年2月15日。

[122]《王世杰日记》，1938年10月28日。

[123]《翁文灏日记》，1939年9月17、18日。

[124]《王世杰日记》，1939年11月11日。

[125]《王世杰日记》，1939年11月20日。

[126]Kung cable to K. P. Ch'en，March 9，1940，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G-2.

[127]Kung cable to Hu Shih and K. P. Ch'en，March 27，1940，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F-3.

[128]《光公使美日记》，1940年4月6日。

[129]《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6月14日。

[130]《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7月31日。

[131]《光公使美日记》1940年4月7日。

[132]《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2日。

[133]《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11日。

[134]《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29、30日。

[135]《蒋介石日记》，1939年10月28日。

[136]Letter by Mr. T. L. T. to Vice Foreign Minister Hsu Mu，June 3，1940，《外交部档案》：172-1796。

[137]Hu Shih cable to Ch'en Pu-lei，April 27，1940，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Group A，Box 1，F-3.

[138]《胡适致外交部报告》（1940年4月20日），《外交部档案》：172-1/1796。

[139]摩根索对于陈光甫和借款之间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参见“K. P. Chen is the head of the Universal Trading Company and he's the Chinese gentleman，‘gentleman’ underscored，in whom I have great confidence and it's entirely on his personal word that I recommend the first and second loan and he is now returning to China.He's a grand fellow. He is everything that a story-book Chinese businessman should be and most of them ain't.”摩根索是在1940年4月18日的一次财政部会议上说的这番话，参见 *Morgenthau Diary*（*China*），p. 106。

[140]《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255页。

[141]《蒋介石致王宠惠电》（1940年4月3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1061120001。

[142]《陈布雷致王世杰电》（1940年5月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1061120001。

[143]《王宠惠致蒋介石电》（1940年5月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1061120001。

[144]《王世杰致蒋介石函》（1940年5月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1061120001。

[145]有关陈光甫生平事迹，参见郑炎、蒋慧《陈光甫传稿》，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第五章 1940年以后外交作风的改变

1940年发生的事给中国对美外交政策带来了重大冲击，也破坏了胡适在美国辛苦建立起来的文雅平静而又井然有序的工作环境。造成这些变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宋子文在6月26日抵达纽约。

本章将要探讨三个问题。第一，通过检讨蒋介石与宋子文在1940年之前的关系，说明宋子文被任命的来龙去脉和其他相关信息。第二，深入了解宋子文任务的性质和他希望达到的目标。第三，讨论宋子文在美国执行任务时所遭遇的两个方面的阻力，一是他和胡适之间的摩擦，二是来自美国官方的抗拒。

一 宋子文被任命的背景

虽然宋子文早在1937年之前，就被认为是南京政府中的强硬反日派，但是政府在做战争准备时并没有委派他担任重要职务。战争爆发后，宋子文全力支持全面抗战，并且反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论调。[1]但是在抗战初期，宋子文唯一引人注意的活动，只是和他的姐妹们共同向美国人民进行广播，争取后者的同情和支持。[2]除此之外，宋子文在政府高层里可谓相当落寞。

在整个1930年代中期，宋子文在政坛失意的最重要原因，是他和妹夫蒋介石关系恶劣。尽管一般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宋子文必定深受蒋介石器重和信赖，但事实则不然。他们两人的分歧，不是亲戚关系所能弥补者。蒋介石对宋子文不满最大的原因是，虽然后者常年负责政府财政，但是他竟然屡次拒绝拨款帮助蒋介石进行军事行动。

因此，当中日战争爆发后，宋子文是在当时号称全国团结的政府中极少数未能获得一席职位的政府高官。宋子文唯一可以和抗战搭上关系的职位，是在武汉时担任航空委员会主任。[3]除此之外，宋子文在1937年只是替政府作为淞沪会战的非官方发言人。上海沦陷后，宋子文旋即前往香港，一直住到1940年中期。1938年1月，蒋介石委派宋子文为驻港代表。这个任命听起来颇为古怪，因为香港当时并非中国政府军事和财政所争取的主要对象，派宋子文这么一位大人物出任驻港代表，实在看不出有任何意义。最可能的解释是蒋宋关系恶化，宋子文自作主张去了香港，蒋介石在无奈之下只好授予一个空洞头衔以图粉饰太平。[4]

宋子文的政治麻烦，也由于他与孔祥熙的恶劣关系。[5]宋子文从来不佩服孔祥熙的才华或是人品，而他们在银行界又经常发生摩擦，因为宋子文不但反对孔祥熙的许多做法，还极端轻视孔祥熙的心腹。[6]更有甚者，他们两人各自和蒋介石的关系也难免形成另外一个冲突点。蒋介石在大多数事务上所持的观点和孔祥熙相同，而且他绝对信任孔祥熙对他的忠诚度，[7]对于宋子文则不然。

事实上，一方面是蒋介石蓄意冷落宋子文，而另一方面也是宋子文刻意要和中央政府疏远。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只要孔祥熙一日主持中央政府（汉口及重庆），他就对之不屑一顾。孔宋二人关系恶劣到连蒋介石也无法调解。1938年至1940年初，蒋介石间或还想邀请宋子文到重庆以备咨询，[8]但是均遭宋子文拒绝，而且他也不愿提供任何建议。换言之，只要是孔祥熙依然主政，宋子文就不愿意和中央政府发生任何关系。但是宋子文基本上依然愿意和蒋介石保持联系，特别是由于宋美龄努力从旁缓和两人关系。[9]

虽然蒋介石偶尔还曾经设想为宋子文安排一个工作，比如说作为“不驻国大使”，但是他在私下对宋子文依然不时加以严厉批评，“子文幼稚可悲，应规戒之”。[10]而随着时间推进，蒋介石的怒气似乎有增无减。到了1938年底，蒋介石曾经向宋子文咨询赴欧美借款和政府财政计划事务。[11]但是到了1939年年中，中英两国平准基金即将告罄，这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而蒋介石则把一团怒火出在宋子文身上，“此乃权操外人，而宋子文应负重责”。[12]到了7月下旬，该基金已经用完，中国政府只好停售外汇，[13]导致法币大幅贬值。而敌伪银行则趁机操纵汇率使得法币贬值更为严重，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危机。尤其是法币贬值在一些知识分子中造成恐慌心理，导致后者重弹向日本求和的老调。这就更激起蒋介石对这些知识分子缺乏骨气的怒火。[14]

造成如此乱象，蒋介石归罪于孔宋二人之不和以及英国人罗杰斯之操纵外汇。他对宋子文的指责是“子文愚妄可痛”。[15]尽管如此，蒋孔宋三人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依存关系。由于孔宋二人均是财经界人士，蒋介石能够依赖其中一人解决他的财政需求，就可以减低对另一人的依赖程度。孔宋二人之间则存在一种竞争和此消彼长的关系。换言之，蒋与孔宋二人之中一位可以维持合作关系，而孔宋二人之间则只有竞争关系。

从蒋介石的立场出发，他比较愿意和孔祥熙合作，因为后者甚少拂逆他的旨意，而宋子文则桀骜不羁，自视较高。这就是为什么自抗战开始，蒋介石就一直依赖孔祥熙主持财政。但是到了1939年夏季，孔祥熙主持财政的低能已经导致蒋介石高度不满。1939年7月1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庸之徒有财政而不注重整个政治，一与商讨财政，彼即愤气，怒色相加。凡重要事机皆秘而惟恐我知道。我亦乐得不知，一任彼之所为。而彼今日以你是领袖之言相加，是全将余助他之好意误会，可痛。”到了9月，他对孔祥熙的不满更形之于色，“时现鄙嫌之色与严厉之声”，以致达到连他自己都要警惕自己“应切戒之”的程度。[16]

在蒋孔关系进入低潮之际，蒋介石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启用宋子文来满足他的需要。但是最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他紧急召唤宋子文从香港到重庆共商大计，而宋子文却“抗命不来”，使得蒋介石接连几天在日记里大骂“子文愚妄可痛”“子文愚伪，竟不应召”。但是迫于抗战大局，蒋氏只好忍气吞声地寻找弥补措施。他先是在8月初派朱家骅赴港去劝说宋子文，随即又指示孔祥熙派员专程赴港恳邀宋子文到重庆，接着又授意徐堪（财政部副部长）向宋子文陈词。[17]当这些行动均未能奏效时，蒋介石只好委曲求全地亲自致电宋子文，请教后者对于“津交行事”（天津交通银行）有何处理办法。[18]依此时情况来看，政府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已经大大超过孔祥熙所能应付的。这就难怪蒋介石也按捺不住对于孔祥熙的不满，“孔之言行轻重失当，几使人人怨恨，殊为可虑”。[19]

相形之下，蒋氏对宋子文的态度却产生了转变，原因是宋子文和钱新之的合作，使得政府的经济和财政困境得到显著舒缓。[20]到了此

时，蒋介石更是认定必须依赖宋子文才能使中国金融问题获得进一步解决。因此他对宋子文迟迟不肯来重庆感到更为焦急，“应催其速来”。几天之后，情势显然大为好转，蒋宋恢复合作关系。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欣慰程度，“对子文抗命骄矜亦以宽严处之，卒乃有成”。[21]大致说来，到了欧战爆发后，宋子文已经出席蒋介石召集的高级智囊团会议，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共商军国大计。[22]但是从过去一年多的较量来看，蒋氏对宋的“宽”远过于“严”，这也或许是一种自我解嘲的说法。

通过以上蒋宋关系在1937～1939年间一些曲折发展的说明，我们大概可以推论，其中最重要的转变就是蒋介石把重庆政府的财经大计交给孔祥熙处理而对于宋子文不理不睬。但是岂知孔祥熙违命私下涉足对日和谈，对财政问题又无能为力，这使他在国内遭受言论攻击，最后无法招架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尽管蒋介石内心对于宋子文依然屡有严厉批评，但是遇到财经困难时又不得不求助于宋子文，所以在1939年8月底两者终于恢复合作关系。

但是这个合作并不表示蒋宋关系已经恢复到水乳交融的地步，因为两人的个性依然难以融合。1939年10月，蒋介石对宋子文依然不是十分放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子文成见与私心自用，不顾大局之难也。”[23]隔不了多久，他又写道：“子文各种主张，只有主观，不察环境，所以无事可成，而且其在政治必有害无益也。”[24]蒋宋两人虽然在工作上开始合作，但是他们个性上的不融洽在1940年初表现得最为明显。1月底，蒋介石显然对于与宋子文合作的问题做了深刻思考，而且拟出了一个方案要与宋子文进行一次严肃谈话，把心中对其的不满和盘托出。为了慎重起见，蒋介石在事先还把重点做了笔记，目的就是希望宋子文能够“改正性行”。

宋子文究竟需要如何改正才能满足蒋介石期望，蒋介石想得非常仔细。他在日记中所预定的论点包括：“丙、不可固执己见，应听从我意。丁、助人即所以助己，不可以私害公……己、少年得志，应自知戒慎，切无（勿）骄傲。庚、未任事不能听命，既任事必致冲突。”蒋介石大概也打算和宋子文商谈后者的“政治出路”问题，同时打算表明一个立场，那就是“余欲奠定政治基础，必上法规，勿使有人把持”。[25]一天之后，蒋介石和宋子文进行了长谈。按照蒋介石的记述，他对宋子文的态度是“谆谆以政治人格相告诫”。这个长谈在其他文献中（包括宋子文档案）都无法找到相关资料，但是可以推测的是，宋子文的反应显然让蒋介石大失所望。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本周心神郁结忧患丛生，每思子文，不禁共（其）痛之至。”[26]宋子文遗留的档案对此次事件却未有片纸只字，这也或许正是表示他完全把这次谈话当成了耳边风。

综观蒋介石在抗战中，虽然曾经对宋子文的行为大感愤怒而写过长篇大论的指责之言，但似乎还没有在另外场合对宋子文的个性做过如此全面而详细的分析。按照蒋介石此时心愿，显然他指望能够经由一番开诚布公的交谈，说服宋子文改变个性，以便蒋介石可以放心地将之委以

大任（政治出路）。但是宋子文完全不予理会，依然我行我素。情况的发展是，在此后岁月中，客观形势使得蒋介石不得不重用宋子文，但是两个人个性上的无法磨合，也导致宋子文在执行蒋介石所赋予的使命时屡屡和蒋产生分歧。这个因素也是我们考察中美关系所必须考虑的。

换言之，蒋宋二人各有自己的主见和看法。蒋介石在抗战开始后的前一段时间里，觉得并不需要依赖宋子文，因此对于后者去香港也采取了不闻不问的冷处理；而宋子文个性强烈，宁可在香港坐冷板凳，也不愿返回重庆政坛，不失为一种骨气和个性的展示。如果不是外来因素介入，这种冷漠关系很有可能会长期维持下去。

在此期间，蒋介石最耗费精力的事务是军事，他把财经事务全部交由孔祥熙处理，对外关系（苏联和德国除外）则交由王宠惠主持，基本上维持一个分工合作局面。但是到了1939年时，重庆政府在财经和外交两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

1939年7月底，蒋介石再度放下身段向宋子文和另外几位滞留香港的银行家（钱新之、叶琢堂）发出邀请，请他们到重庆共商如何解决当前财政危机。蒋介石不仅直接恳请宋子文捐弃前嫌共商国家大计，而且还动员了几位宋子文的好友出面，劝他务必去重庆一趟。在一封电报中，蒋介石请宋子文必须亲赴重庆一趟，因为国家存亡和抗战成败都系于宋子文一身。[27]到了8月中旬，蒋介石再度向宋子文发出恳求，希望后者能够到重庆商讨未来解决根本问题的方针大计，而且还把他们之间从前的隔阂归罪于彼此联系不够。[28]

蒋介石前后多次电报的语气既迫切又婉转，甚至委曲求全，流露出此时在蒋介石心目中，宋子文是唯一有办法解救中国经济免于崩溃的人选。这一连串电报和人情攻势，使得宋子文除了接受邀请，别无他路可走。

当然，宋子文本人在1940年之前绝非对中国的对美政策漠不关心。正好相反，他在1938年初就曾经建议政府，每月拨10万美元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游说活动，以赢取美国民意的支持。[29]如前文所述，这个意见没有付诸实行，是因为当时的大使王正廷对宋子文的想法毫无兴趣，再加上孔祥熙控制了政府财政，根本就不愿意花费这笔钱。到了1938年中期，当蒋介石询问宋子文应该如何加强对美外交时，他又建议派遣施肇基赴美担任大使以取代王正廷。但是这个建议依然没有被蒋介石采纳。[30]

宋子文虽然对于返回重庆政府任职一事反应冷漠，但是对美国事务依然保持高度关切。他早先就自许为主持对美借款谈判的最佳人选，其动机或许是认为这项重要外交使命可以为他最后重返国内政坛铺路。[31]即便是在陈光甫已经接受任命成为中国首席谈判官员之后，宋子文依然不放弃机会想要指导陈光甫如何去完成任务。[32]1939年，宋子文又整理出一套处理中美财政关系的思路，和胡适与陈光甫所执行者截然

相反。

到了1939年9月初蒋宋关系恢复时，宋子文对于中美关系就变得更为关心。蒋宋早期话题之一，很可能就是重庆政府如何能够为中美关系打开一个新局面。事实上，蒋介石在该月底已经首度在心中考虑“派子文赴美”。[33]虽然我们无法知道他们二人间是否正面讨论过这个话题，但是宋子文显然已经感觉到未来情况可能会朝这方面发展。他在10月底派遣心腹印度裔波兰人拉西曼（Ludwig Rajchman）赴美，一方面是去打探美国对中国的一般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去探测设若自己以某种官方身份赴美的话，美国政府将会如何反应。[34]

拉西曼虽然只是一介平民，没有中国政府授予的任何官方身份，但是他在抵达华盛顿后立即拉高姿态，声称不但有办法赴财政部拜访摩根索和哈里·怀特等高级官员并打探借款新途径，同时也在美国舆论界散布消息，声称中国政府短期内将会大幅改组外交部和财政部。他私下更露骨地向美国政府官员透露，宋子文的政治行情正在看涨，而孔祥熙则即将失势。拉西曼同时透露，宋子文非常不满意胡适在美国的工作成绩，批评后者过于被动。与此同时，陈光甫也从其他信息渠道获知，宋子文最初同样地不满意陈氏的工作成绩，并且想将其更换。但是当拉西曼听到摩根索对陈氏的信赖与尊重之词时，马上改变主意，希望能够争取陈光甫成为事业伙伴。[35]

宋子文所发动的这种自我宣传攻势可谓适得其时。陈光甫从来强烈厌恶政治，只是受了爱国心驱使而接受赴美任命。两次借款的漫长谈判也让他感到身心俱疲。尽管摩根索再三对陈氏表示尊重和友谊，陈光甫却越来越不愿意和摩根索共事。他和李国钦关系的恶化，也让他觉得非常苦恼，而对于胡适的缺乏主动和积极性也不时发出怨言。虽然拉西曼极力鼓励陈光甫与宋子文合作，但是陈氏素来不齿宋氏的作为，认为他一无是处。[36]陈光甫除了报效国家之外，毫无个人意愿留在美国工作，也缺乏兴趣参与重庆政治活动去破坏宋子文想要到美国工作的企图。至于孔祥熙也为自己的政治麻烦而焦头烂额，无法阻挡宋子文。换言之，在宋子文进军美国的道路上，大部分障碍已经被排除。

当蒋介石在1940年4月初开始积极争取宋子文从香港回重庆服务时，他最主要的动机是想运用宋子文的才能去解决中国内部的困境，从而弥补孔祥熙之不足，收拾孔祥熙遗留的财经烂摊子。因此蒋介石首先询问宋氏是否愿意接受贸易部部长职位，甚或成立一个新单位，任命宋子文作为“经济作战总长”。[37]

在此期间，蒋介石对于胡适和陈光甫驻美工作也产生了更具体的不满，开始考虑驻美大使人选的更换。[38]

但是不久，他对于启用宋子文的目的就改为解决其他关键问题。最迫切的考虑是，向美国要求贷款缺乏成效。前文对于那段历史已经做了交代，但是重庆政府则大感不足。2月初当蒋介石首度听到美国会通过

对华借款2000万美元的议案时，他的反应是“聊胜于无也”。[39]到了4月份，当第二次美国借款手续完成时，他依然写道：“美国借款完成，其数虽小，未始无补耳。”[40]

除此之外，此时重庆政府还面临两个危机，迫使它必须重新全面检讨中美关系，并且改弦易辙。

简单地说，买飞机需要借款，买其他军火也需要借款，而美国是最可能借款给中国的国家。

大致从1940年4月中旬开始，宋子文赴美和蒋介石对胡适大使职位的更动之间便产生了因果关系。

一方面，蒋介石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撤换胡适，预定新的驻美大使人选。同时为了替胡适找出路，考虑任命他为中央研究院院长。[41]

另一方面，宋子文赴美计划也逐渐变得更为具体。

大致在4月9日前后，蒋介石终于初步决定派宋子文赴美，而且把其主要使命定为借款。[42]到了5月初，中国政府开始筹划从美国获得另外一笔贷款，为此蒋介石还特别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霍尔，请他促成此事。[43]既然蒋介石不满足于陈光甫和胡适经手的借款数目，他当然希望下一次能借到更多。这或许是蒋介石在6月1日召宋子文至重庆商谈的目的。[44]

一旦中国政府有此想法，接下来的决定就是舍弃陈光甫和胡适而另起炉灶。蒋介石很可能已经因为请胡适向美国转达新借款的要求而碰了一鼻子灰，他把一团怒气发泄在胡适身上：“美总统对我要求其救济金融财政之电，澹然漠然，不加注意。抑我胡大使不知努力乎？其实此种半人，毫无灵魂与常识之人任为大使，是余之过耳，何怪于人？”[45]这样一来，宋子文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了。

但是以蒋宋二人数十年交往经验，自然知己知彼。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把宋子文送去美国，是否真正能够达到目的？以他对宋子文性格和作风的了解，宋子文此行可能产生的风险又是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在对“子文赴美利害与任务”研究后，蒋介石决定派遣宋子文赴美，而且蒋宋二人所谈的工作范围已经扩大到对美国和苏联两国进行交涉。[46]

即便如此，蒋介石并没有抱持乐观态度，认为宋子文的赴美就可以大幅改善中美关系。在宋子文赴美前后，蒋介石做了一连串的观察，认为美国不会热心帮助中国。

二 宋子文使命的实质与权限

无论在国内或是国际事务上，中国在1940年春天所面临的新危机，都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宋子文的雄心得以实现。在中国境内，日本加强了对中国城市的轰炸（1940年5月20日到6月16日），试图彻底破坏重庆城市建筑并且瓦解中国人的战斗意志。[47]此时更传出谣言，称41名西南各省的军政领袖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蒋介石设法和日本达成和平。一如既往，蒋介石拒绝妥协，坚持继续抗战，更重申中国只和西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48]

在国际上，欧战的发展大出中国政府意料。正如蒋介石所写："默察国际形势与倭寇近况，诚不知滔滔者何以终结矣。去年此时，以为欧战一起，民主阵线联合以后必可早日了结欧亚战局。而今则德俄联合阵线已成，英美俄国对倭寇皆多顾忌，倭则反可从中取利与坐大。因此中倭战局必无期延长，三年之内，国际上对倭必不能加以压迫。倭国内政即不能发生变化。如其再以不介入欧战为政略，则我国危矣。然吾人惟有一心抗战，除此别无他道，成败存亡，惟有听之于天父。深信是非善恶，终不致久湮而不始也。"[49]回想抗战初起，中国政府主战派的假设是中日战争最多持续三年必定会有了结。如今三年已过，蒋介石又估计还需要三年。国民政府将如何"苦撑"？更何况在远东，法国在6月20日宣布全面禁止外国借境越南把货物运往中国，英国也暂时中断外国武器经由缅甸运往中国。此种内外交迫的困境大大超过了抗战以来的任何时期。

面对这一连串新危机，蒋介石依然声称有充分信心能掌控抗战军事局面，但是迫切需要有一个帮手去替他更积极有效地处理中美关系。情况很快就变得明朗，因为宋子文对于美国事务既了解又有兴趣，并且能够提出改善中美关系明确而具体的方案。尤其重要的是，宋子文对于以往中国和美国谈判借款事项，不但能够指出其错误，而且能够提供改善对策争取获得更好成绩的方案。[50]6月8日，宋子文终于接受蒋介石敦请飞往重庆。经过一周时间的紧密商谈后，宋子文在6月15日取道香港飞往美国，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外交使命。[51]

蒋介石在致罗斯福的电文中充分显示出他对宋子文使命的重视。电文同时说明蒋介石不再依赖胡适去实现中国的政策目标。蒋介石告诉罗斯福："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完全之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52]

被任命为中国特使一事，充分显示出宋子文的政治分量无可置疑。但是他的使命究竟如何，应该完成何种任务，宋子文需要在美国停留多

长时间去完成任务，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变化。

中方资料显示，宋子文的任命是在仓促中安排而成的，原本只是希望在短期内达成几个有限的目标而已。宋子文随后在美国长期逗留，与中国政府原本的设想大有出入，是被情势所迫。

一系列由蒋介石发出的书信，或许最能说明为什么宋子文原本在美国只打算做短期停留，而且其所担负的任务也有限。几乎从宋子文抵达美国开始，蒋介石就告诉宋子文应该致力完成的具体任务有三。第一，要求美国给予价值3000万美元的武器（这个数字原本由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提出）。第二，要求美国提供150架驱逐机。第三，向美国提出贷款请求，具体数目可由宋子文自己斟酌决定。由于宋子文在赴美之前已经安排在此时访问欧洲去争取更多支持，因此蒋介石希望宋子文在启程赴欧之前，可以先在美国完成这几项任务。[53]

除此之外，蒋介石还托付宋子文把重庆政府对于国际事务的一些看法向罗斯福阐述。这些看法包括：第一，法国的战败投降严重影响远东局势，它会鼓励日本更敢于在中南半岛进行侵略，借以切断中国的外援和打击中国的抗战士气。第二，希望罗斯福可以对中日战争做出明确声明，警告日本切不可觊觎中南半岛。第三，如果日本在中南半岛得逞，则其下一步计划将会是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直接威胁美国利益。第四，日本对重庆的轰炸是得助于美国的石油，因此希望美国可以对日本施行石油禁运，并且不要把其太平洋舰队移防大西洋。[54]由以上蒋介石内容广泛的指示可以看出，他终于有一个自己能够信赖的人在美国从事加强中美关系的工作，并且相信此人必定会全力以赴。

但是根据蒋介石的最初设想，宋子文的外交任务只是阶段性的。不久，他又通知宋子文，重庆政府此时正在筹划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一个新的“经济作战部”，主持重要工作，预定任命宋子文为首任部长，而且在宋氏回国之前可由蒋介石本人短期代兼该职。事实上，蒋介石告诉宋子文一旦后者返国，可以选择去领导任何一个部。[55]8月中旬，蒋介石又电告宋子文：“行政院拟改组整顿，兄能早日回国为盼。”[56]一周之后，他又再度告知宋子文，称他已经接受宋子文对于中国政府改组的建议，但是要等到宋子文回国后才付诸实行。[57]即便是在宋子文归国日期一再推迟的情况下，蒋介石在1941年1月初依然表示，希望宋子文能够在3月底之前回国。但是到了这时，蒋介石也开始留了一些余地，那就是万一宋子文仍然无法结束在美国的工作，可以酌情再做短期延长。[58]

由此可见，在1940年7月到1941年1月这段时间，蒋介石还是依照原计划，隔不了多久就会重提宋子文早日回国之事。显然，他赋予宋子文的任务是去谈判一些借款，购买一批武器，然后希望美国政府在越南和缅甸问题上可以采取坚定态度。一旦达成了这些具体任务（预计最快在一两个月内便可完成），宋子文就应该打道回府。

但是宋子文却有他自己的想法，也可能受到几种因素的影响。

首先，出于他的进取个性，他主动地想在美国多逗留一些时日以便做出更大成就。比如说，他早在1940年10月就在给宋子安的信中提到，他想多停留两个月去开始筹划第二批借款，以及去利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环境有所作为。[59]而中美之间关系的扩展（购买武器、国际合作等）也使得蒋介石必须继续依赖宋氏留在美国处理这些问题。等到1941年租借法案通过后，此种依赖更是变得无可取代。

但是第二个原因则是宋氏自己对政治出路的盘算。其主要因素是孔祥熙仍旧在重庆政府中举足轻重，宋氏贸然回国将何以自处？这一层考虑在他给亲信钱昌照的私信中说得最为赤裸。宋子文写道："此后是否留美继续工作，或赴英办理借款，抑回国，正续考虑。以弟观察，介公仍被孔等愚弄，回国亦无意义。即平衡委员会弟亦不拟参加。一切听委座及孔等决定。弟或仍在美努力。惟胡大使非但不能为助，且恐暗中冷淡，诸事唱独角戏。"宋子文向钱昌照进一步透露，即使外交任务完成，他也打算留在美国休养，并且征求钱昌照的意见。[60]简言之，宋子文还真是面对一个两难局面：如果回国就必须与蒋介石和孔祥熙纠缠，如果留在美国又受胡适的掣肘而无法发挥自己的能量。

因此宋子文宁可让回程日期无限推延，先让他有机会把中国和英美两国之间尚未完成的交涉项目做一番梳理。[61]大约在1941年春季时分，当中国内政外交上的危机持续加深时，也当宋子文在和英美两国交涉中开始产生具体成果时，他也逐渐提出更具雄心的目标，而蒋介石也发现他实在无法让宋子文离开华盛顿。这样一来，让宋子文尽快归国就不再是蒋介石考虑的议题了。

三 宋子文的新作风和新阻力

宋子文赴任初期，能否在短期内完成任务似乎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他和胡适的关系，二是他和美国官方的互动。宋子文用不了多久就发现，他在两方面都遭遇了重大阻力。

几乎从抵达美国开始，宋子文就对借款工作进度缓慢向蒋介石表达了不满。他指出，虽然美国政府表面上做出同情中国遭遇的姿态，但其实并不打算开罪日本。美国全副精力都放在欧战和本国总统大选事务上，对中国局势漠不关心，而联邦政府各部门彼此间又缺乏协调，各行其是。更糟糕的是华盛顿在唱空城计，许多政府官员都离开首都去过暑假了。读者可以看到，宋子文对美国政局的分析和胡适并无二致，但是他们应对的方式却大相径庭。

面对此种情况，宋子文主张中国必须先改变自己的外交作风，才能在美国做出一番成绩。宋子文明白告诉蒋介石，中国仅是依靠公开演讲和宣传活动，绝对无法得到美国援助。中国真正的出路是必须表现出耐力、勤奋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在美国官员身上去做大量的工作才行。[62]用不着说，宋子文评判的靶子正是胡适。在宋子文的鼓励下，蒋介石也开始对美国援助的规模产生了更高期望。这样就渐渐地改变了宋子文使命的本质，同时也使他不得不长期留在美国。

（一）宋子文和胡适的关系

毫无疑问，宋子文对于中美关系所产生的第一个改变，就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胡适从1937年9月起精心培养出来的模式，也同时搅乱了胡适和一大群美国官员的互动关系。胡适和宋子文两人原来在中国时彼此并不陌生。事实上，胡适对于宋子文的负面观感，在宋子文赴美之前早已根深蒂固。

1939年底，胡适在一封致蒋介石的电文里就抱怨宋子文的私人亲信拉西曼在10月飞来美国后，立即四处散布风声，声称宋子文将要担任政府要职。这个传言之所以会引起胡适的不安，重点是因为他担心宋子文“个性太强恐难与光甫合作”。胡适也认为美国财政部官员对于宋子文印象不佳，因此强烈请求蒋介石维持孔祥熙内阁，不要让宋子文入阁，以免妨碍陈光甫工作。[63]

当胡适初次听到宋子文可能赴美的消息时，他当即预言宋子文个性上的缺点，必将对中美关系产生不良后果。在胡适眼中，宋子文是一个

受野心驱使的人，急功近利，总是想建立奇功，而最终不免于失败，因为他缺乏耐心和细腻。胡适相信，一旦宋子文所奢望的旗开得胜的光彩开局未能实现，他一定会怨天尤人而不反求诸己。基于这些理由，胡适曾经向政府建议不要派遣宋子文赴美。[64]有趣的是，胡适只是客观地批评宋子文可能无法顺利执行他的公务，并没有担心自己和宋子文之间会产生严重摩擦。而在宋子文赴美就任之前，在他的私人文件中似乎也找不出对胡适的评语。但是有鉴于当时重庆政治传言满天飞的情况，宋子文很可能完全知道胡适对他的反对，而这也让他们后来的工作关系自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两人关系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依据宋子文的说法，他初到美国被胡适介绍给美国官员认识时，胡适只称宋是陈光甫的接班人，这使美方误以为是宋氏设计把陈光甫挤走。这个说法也使得宋子文最初只能以中国银行董事长身份在美国活动。因此宋子文立即要求蒋介石授予他一个更正式的职衔，并且建议发表他为行政院副院长。但是蒋介石通知美国政府任命宋子文为中国的全权代表，其职权包括洽商、决定及执行军械采购及贷款。[65]这使得宋子文至少赢得部分胜利，其权限凌驾于胡适之上。

尽管如此，胡适也可能对于和宋子文合作一事并不完全悲观。如果胡适果真悲观的话，则他很可能当时就会辞去大使一职，而在1940年6月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但是他却婉谢了这个职位，理由就是他认为还有可能在大使的职位上为国家多做几年事，即使是和宋子文成为搭档也还是可以接受。[66]

但是胡适的乐观很快就被打破。宋子文很快就向蒋介石告密：“适之兄待人接物，和蔼可亲，惟终日忙于文学研究，公务上则惟东方司（指国务院东方司）之命是从。不敢逾越该司而与其上峰及其他各部接洽，以冀打破障碍，实无胜任大使能力。到任迄今，尚未与陆长、海长晤面，由此已可想而知矣。”[67]其中除了胡适是否“终日忙于文学研究”一项尚需进一步求证之外，其余批评基本属实。不久，宋子文又向重庆告状称，胡适的说话方式依然是平实学者姿态，不谙使用外交辞令，有时过于诚实，特别是对新闻界说实话，屡屡造成尴尬。[68]宋氏有这种轻视态度，当然很容易就把处理中美关系的大权揽到自己一人身上。

中方资料显示，在宋子文抵美的短短数月中，蒋介石两度意欲召回胡适而又中止。1940年10月，宋子文又向蒋介石提出更换胡适之事。宋氏指出，当前美日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应有一位活动能力强的大使去扩大效果，更何况美国大选在即，此后能够影响新政府尤为重要。宋氏并且提出由颜惠庆或施肇基二者选一最为恰当。宋子文个人特别推崇施肇基，因为他与总统、财政部长、进出口银行总裁均有良好关系，又熟悉美国政情，因此他建议蒋介石立即发表施肇基为驻美大使的任命。[69]

宋子文不但直接发电请求蒋介石，并且委托李石曾趁自美回国之便，向蒋介石说明自己在美国的工作得不到使馆协助，极为不便。宋子

文指出中国要求美国援助，其他国家亦然，由于彼此竞争激烈，因此他的工作需要使馆支持。[70]在此期间，蒋介石似乎同意任命施肇基为驻美大使，但是认为遽然更换胡适会让后者难堪，因此决定延后再论。[71]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之时，蒋介石依然没有解除胡适职务。蒋介石在处理人事问题上的这种犹疑不决的作风，在抗战时期屡屡发生，其根本原因似乎都是出于不忍，对于明显不适任者无法予以断然处置。

胡宋二人对于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发展中美关系，以及究竟可以从美国得到何种帮助也有截然不同的判断，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出自他们极为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不少中国领袖或许都觉得，胡适多年来累积的知识，使他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和民意有比寻常人更深刻的了解和分析。胡适在这方面的权威性，使人们不得不信服。但是宋子文也在美国有过长时间的求学经历，对事务有他自己的分析，对于胡适的权威性并不信服。

胡适永远体谅美国人的苦衷和尴尬处境，因此对于美国人任何自动自发向中国做出的帮助，总是心存感激，万分领情。宋子文则是不断地要去试探美国慷慨和耐心的最大限度究竟在哪里，从而从美国取得最多的帮助。一个明显例子是宋子文甫到华盛顿，就获得机会和海军部长进行密谈，海军部长表示美国为了支援英国必会参加欧战。届时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区域同时作战，为了自身利益也必须尽力协助中国，“俾能牵制日本大部分军力。此项政策，渠与总统已完全同意”。[72]不久，他又争取到机会登上海军部长的私人游艇做客，借此与不少海军将领接触和密谈，获得内幕信息和探知美国军方未来意图。比如说，宋子文得知美国政府不拟撤退驻沪海军陆战队，但又恐怕一旦美日关系恶化会遭到日本人缴械，并向蒋介石密告此事，希望将来万一有需要，美国海军陆战队可以和中国游击队会合以取得保护。宋子文又称，海军部长对东方事务最为关切，他已经托其协助中国获得飞机。[73]

以上几个例子，可见宋子文培养与美国官员人际关系的本领和探听美方信息的能耐，远远超过胡适。胡适长期在美却不会晤海军部长，而宋子文则刚到任就可以和海军高级将领密谈，而且得到的信息对于中国极具战略意义。所谓“苦撑待变”最后会得到什么结局？胡适从来没有提供过具体答案。而依据海军部长的一种解释是，那只不过是利用中国拖住大部分日本军力而已，并不是“变”了就能解决中国的困境。如果循着这个假设追问下去，则中国政府应对之道，当然应该未雨绸缪才对。而宋子文与海军将领的交际，又让中国政府看到某种程度上中美军事合作的可能性。

诚然，胡宋二人在个性上的差异，也使他们之间的摩擦愈加频繁。胡适在美国结交的对象包括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法官、新闻界人士、民间组织领袖和著名学者。这些人原本都可以成为一个外交官在美国可利用的最珍贵的政治资本，但是胡适似乎早就打定主意，要把他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区分得清清楚楚，互不相涉。最好的例子或许就是胡适和亨贝克之间的关系。[74]虽然亨贝克可能是胡适在美国政府官员中私

人关系最亲密的友人，但是在胡适日记中丝毫看不出他曾经盘算过如何去运用他们之间的友谊来为中国谋求政治利益。[75]同样的，罗斯福对胡适总是敞开大门，欢迎胡适和他联络，他也经常直接和胡适通话。1941年12月7日，就是罗斯福亲自拨电话告知胡适发生了珍珠港事件。[76]尽管如此，胡适还是保持他的个人作风，不把这些亲密的私人关系转换成政治筹码。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现象可以被赞美为公私分明，是一种为人处世的美德。但是在当时中美关系的大环境下，一个国家的大使可以说已经没有私人领域了，一切为了促进国家利益而能够动员的资源都是公的领域。这大概是胡适和顾维钧两位大使最明显的区别。

相比之下，宋子文的作风另成一格，与胡适形成鲜明对照。宋子文会毫不迟疑地从只有一面之缘的人那里榨取出最大的政治利益。无论何时在和联邦官员打交道受阻时，他都会毫不迟疑地跑到罗斯福那里告御状。宋子文毫无疑问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而又有高度控制欲的人，他的个性是不甘扮演配角，一定要霸占舞台中央。因此除非他能够成为主宰中美关系独一无二的人，否则他不会罢休。出于这些原因，他经常毫无必要的行为粗暴，因此开罪了许多原本可以成为亲密伙伴的人，这些人不但包括美国政府中的官员，也包括在华盛顿的其他中国人。但是即便是强烈厌憎宋子文个性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精力充沛，思想敏锐，办事效率高。[77]

事实上，厌恶宋子文的个性者大有人在。在华盛顿，中国驻美的两位最高官员（胡适、熊式辉）都先后对宋子文个性有诸多批评。在重庆，宋子文的批评者更多，除了孔祥熙之外，还包括何应钦、张群等人。[78]王世杰承认宋子文办事能力强，但是也认为他缺乏持平处事的能力，同时又“不识大体”。王世杰屡次敦劝胡适要心胸广大，忍气吞声，务必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感情之上。[79]蒋梦麟向来被世人认为是一位公正的学者和教育家，他也承认宋子文才干出众，但是具有严重个性缺点，包括缺乏耐心、感情冲动和缺乏判断力。[80]

既然宋子文个性予人如此负面评价，难怪胡适和宋子文两人对于中国对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截然相反，无论是他们的努力目标和使用手段，都可谓南辕北辙。

几乎毫不例外的，宋子文为了要尽快达成实质结果，即使冒着失格和失身份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他秉着高昂斗志，不惜做出种种姿态，散发风声，甚至采用戏剧化手段，务求达到目的。胡适对于美国内政事务一向保持礼貌性距离，但是宋子文只要是能够达成目的就不惜涉入美国内政，甚至拉拢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去和另外一个部门发生纠葛。

美国官员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是一切由他们操盘，拟定时间表、谈判规矩和进展速度，然后通知中国人去顺从接受。在他们看来，和胡适交往要比和宋子文更“顺心”（“agreeable”是摩根索对胡适的赞词）。但是如果以中国立场为出发点，虽然胡适和宋子文都是工作勤奋的爱国人士，但是胡适做法的结果则显然会让中国变成完全

依赖美国人的慷慨施舍。这就会让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对美外交政策可言。相反的，宋子文做法至少给中国一个机会（不管多么微弱），能够让美国政府认识到，中国对于本身的国家利益有它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事事顺从美国指使。在宋子文心目中，乖顺的中国人或许能赢得美国人欢心，但是无法赢得他们的尊敬。宋子文一直不遗余力地开导重庆政府官员，一定要懂得西方人脾气，如果想要赢得他们的尊敬，一定先要学会站稳自己立场和坚持自己原则。

和胡适相比较，宋子文的确比较有效率，并且更勤奋，把中国在美国的外交工作成绩提高了许多。在处理相关专业技术时，宋子文对于中国财政事务的了解，远远超过当时任何一位中国和美国官员。每次参加美国财政部会谈时，面对一大群美国专家，宋子文总是单枪匹马赴会，不带随从，有时甚至不带公文夹。而在面对美方提出的高度复杂的专业性问题时，他总能对答如流，显示出对于中国财政事务掌握得很娴熟，而且经常提出颇为深刻的看法。[81]

宋子文和陈光甫的对比同样具有重要性。陈光甫在美国时，采取自我设限立场，只和美方商谈贷款事务，而宋子文则将他负责事务的范围大幅扩大，不但和美方讨论中国的经济局势，也涵盖币制稳定、银行运作程序、军火购买需求等。宋子文一人的工作范围和效率，往往超过胡适和陈光甫两人的总和，但是他肯定没有后者所表现出来的恭谦和小心翼翼的姿态。宋子文此前的专业是财经事务，因此他处理中美之间的财经关系可谓驾轻就熟。但是军火武器事务，他在此前则是完全外行，而他也能在最短时间内主动学习，掌握重点，则是胡适、陈光甫两人望尘莫及的。

最后，胡适和宋子文之间的差别，也表现在他们各自向重庆政府发回的情报和建议事项上。胡适的作风一如学术界的研究者和君子，他向重庆发回的电报，无论是涉及事实还是提出分析，总是就事论事，很少涉及个别人物的个性或是行为，更是绝口不提美国政治圈的风言风语，或是政府官员之间的权力斗争、利益冲突、派系倾轧和争风吃醋之类的小道消息。另一个有趣现象是，虽然胡适对于中国政府内部官员不时会表达强烈的意见甚至谴责，但是在外交文电中却从来不曾出现过对于美国官员的负面报告。从他写给中国政府的大量报告中，很难看到有关美国内政行情的报告，也很难看到那些主掌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到底有什么特性。他最大限度的分析只不过是指称某些人是孤立主义分子，而某些人是干涉主义分子而已。除此之外，胡适谨守君子作风，对于美国政府官员不去评头论足，更不会对于他们的私人行为津津乐道。从胡适的报告中，重庆政府官员很难了解他们的美国对手到底是何种人物，这对他们试图了解、评价和应付美国政府产生了很大局限。在胡适笔下，美国变成一个只有政策而没有个人参与的团体。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宋子文的报告充满了对事实的叙述，举凡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有价值的情报，一律呈报国内。他向蒋介石提供的，是一个更全面而详尽的报告，除了形容美国政府政策之

外，还包括美国政治领袖人物的个性和癖好，各个政府机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那些能够影响美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人物的利益和私人关系，等等。其内容丰富的程度，可说是让蒋介石大开眼界，首度领略到美国政治原来是如此的五光十色。宋子文报告内容明显表示，他对美国政界里“人的因素”远比胡适要敏感和重视得多，因此也更努力地去运用这些因素帮助实现中国的利益。

胡适所关心的是“大”问题，因此他的报告着重去分析这些大问题，他也对自己分析的严谨度和创见感到心满意足。宋子文却不然，他更关心当前的实质收成。胡适习惯于从历史、文化、学术等宽广角度去审视战时中美关系，但是这并不表示他是一位具有宏观战略眼光的分析家，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其实对于蒋介石多年来致力于建造的和西方国家的大同盟，完全缺乏兴趣。当然，胡适在处理中美关系过程中仍然有其建树，那就是他以一位谦谦君子的气度和一个学者的风范，赢得了美国官员和人民普遍的尊重和善意。换言之，他的成绩是他不改本色的结果。

宋子文却大不相同。他既是一位智谋多端的实践家，又是一位擅长大叫大嚷的表演者。他对于富含哲学意味的探讨，或是令人击节赞赏的理论分析架构丝毫没有兴趣。他最大目标，是帮助中国在当前逆势下获得更多的武器和贷款。他坦然承认自己不是一位个性优雅细腻的人，彬彬有礼的风范非其所长，而他也无意去赢取这方面的美誉。然而他绝顶聪明、计谋多端、目标明显，而且全力以赴去达成任务。相比之下，胡适极为珍惜自己的形象和羽毛，而宋子文最大的满足就是能够做出成绩。当然，宋子文这种志在必得的脾气，也有时会把他带入危险境地。比如说在1941年10月底，为了急于知道美国政府究竟打算给予中国何种军事援助，他不惜使用“特殊渠道”取得了一份马格鲁德将军（John Magruder，时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呈交给战争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的机密报告，其中包括他对中国军事的调查和做出的建议。[82]宋子文的行径让中国政府大为震惊，因为它等于是利用间谍手段去对付一个友邦。因此政府立即警告宋子文千万不可泄露或继续从事此类活动，以免伤害中美关系。历史的讽刺是战后美国政府却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发展出一套高明的谍报手段，无论是对敌对友，一律适用。

总的来说，尽管宋子文的某些手段可能带来较高风险，但是对于蒋介石而言，宋子文作为驻美代表所能发挥的功能远远超过胡适和陈光甫两人。

无可避免地，胡适和宋子文个人关系很快就发展到短兵相接地步。当胡适向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抱怨宋子文在美进行外交活动都对他秘而不宣时，宋子文则提醒蒋介石，他是遵照蒋的指示不和胡适商议借款事，更何况胡适经常出外举办学术演讲，找不到他的人，因此许多事务都无法进行商量。[83]中国驻美的外交团队终成破局。

（二）宋子文与美国官方的互动关系

除了个性因素之外，宋子文在美国的处境也和胡适有两个大不相同之处。首先，他和中国的最高领袖有亲密私人关系，在中国政坛上有自己的权力基础，而且可以参与蒋介石“制定”对美外交政策的全部过程，而不只是“执行”而已。因此他享有的影响力远非胡适可以比拟。其次，在宋子文抵达美国后，美国的政治环境也和1937～1940年大不相同，这让宋子文在和美国官方的沟通中得以创造一个新局面。

宋子文手段灵活在几个案例中很快就展示出来。比如说，在借款事务上，当他认为美国不可能借巨款给中国时，就改为试探请美国派遣财政专家到中国考察实际情况，会同国内专家共同讨论，这样将来借巨款的希望就可以增加。在军事事务上，宋子文努力和海军部长发展密切关系，商议派遣美国军事专家到中国。[84]到了1941年4月，他已经做出成绩，可以向政府报告：“文与军械贷借委员会接洽后，顷已组织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请总统母舅Frederic A. Delano为董事长，总统当即允准。此后，对于援华一切，我在总统左右树立各方助手，俾援华政策能成为实际物质之援助。”[85]而对于军事援助一项，宋子文要求美援的新姿态是反客为主。他于1940年底估计美国原本打算只在两三个月内提供100架飞机给中国。因此他告诉英国驻美大使，在华日军正在准备南进战略，明年可能攻击新加坡。中国军队虽然可以阻止日军南进，但需要飞机才能攻击日军。他声称中国政府要求飞机并非为长期建设中国空军，而是中英美三国当前共同阻止日本南进的必需武器，因为一旦中国获得飞机，它就可能收复广东和牵制2000架日本飞机。因此他要求英国和美国赶紧向中国提供飞机500架，并邀请英国帮助去说服美国。[86]

这一番动作不但显示出宋子文的积极性，更显示出他政治盘算的复杂性。他在向美国直接争取军援时，还设法把英国拉进来替中国帮腔，而且也为了让英国安心，避免未来中英空军在亚洲成为竞争者，又特别强调中国需要飞机只是救燃眉之急，而不是想建立强大空军去挑战英国空军长期的优势。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美国政治环境中，宋子文的逞勇好斗作风的确不时让他陷入麻烦，有时还会造成反效果。在摩根索和亨贝克两人都已经分别通知宋子文美国无法提供新贷款的情况下，[87]他依然坚持提出要求，而且在数量上远超过胡适、陈光甫二人此前所敢想象者。怪不得在美国人眼中，宋子文所提的各种新理由都是夸大其词无法采信。比如说在1940年11月30日，宋子文向摩根索宣称，由于日本新近承认了汪精卫伪政权，使得中国面临的危机益趋恶化，因此中国最少需要1亿美元贷款才能渡过财政难关。在摩根索看来，这不啻是狮子大张口。[88]宋子文诸如此类行为，除了惹得美国人不快之外，也使得他个人政治声誉在刚到达美国不久，就受到沉重打击。

美国官方喜欢胡适而讨厌宋子文，原因其实很简单。但是基于同样理由，我们也容易了解胡适在和美国官方打交道时，为何远不如宋子文有效率。

和胡适的温文儒雅相比，宋子文每当他提出的美援要求没有被及时接受时，就会大做文章，绝不掩饰他的失望或是沮丧情绪，甚至刻意做出一些姿态去增加美方的不安，然后还会把自己的不满向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官员广事宣扬，弄得人尽皆知。此外，宋氏亲信拉西曼也成为一个障碍。宋子文1940年到美国后，拉西曼即成为宋氏幕客，代表宋氏在美国进行活动。但是美国政府深表不满，因为美方认为中美关系不宜由第三国人参加，甚至打算下逐客令，后经宋氏强求才能留下。拉西曼在中国使馆独自享有一间办公室（陈纳德和其他美国雇员都只共用大办公室），地位特殊，也引起使馆同事反感。有时宋氏宴请美国政要也让拉西曼出席，导致美方人士三缄其口，后来宋氏才停止邀请拉西曼。[89]

宋子文对待亨贝克的手法也和胡适大不相同。宋氏刚刚抵达华盛顿就急不可耐地向亨贝克抱怨美国忽视中国，他斩钉截铁地宣称，中国要抵抗日本就必须有武器和财力作为后盾，否则就无法进行，他高调表达他的失望和伤心，甚至语带威胁地宣称，既然他在美国不能发生作用，则不如趁早返回中国去。亨贝克在他为这次会面所做的笔记里，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宋子文的表演才能。

他（宋子文）（装模作样地）说，他深感遗憾，他实在不愿意说出口，他考虑再三不知是否应该说出来的是，中国在物质上已经接近崩溃边缘，急需外来援助。他问我是否我可以提供任何指望，或是任何建议，他在此时还可以做出何种努力？如果他留在美国还能发挥任何作用？是否还值得他继续努力，或是他应该径行打道回府？[90]

胡适绝不至于放下身段以返回中国向美国要挟，也不会如此赤裸裸地提出问题。但这次会谈的结果，却是帮助宋子文在上任的头几个月内，从亨贝克之处所得到的关注和信息，超过胡适在几年中所得到的总和。证诸胡适还衷心把亨贝克看成多年好友，这个讽刺委实不小。

宋胡两人除了应付人际关系的手法大有差别之外，宋子文内心根本不赞成胡适对于亨贝克政治能量的估计。在一封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宋子文称胡适向他坦承凡是遇到疑难问题即向亨贝克求教，而亨贝克也不吝开导。宋子文写道：“我国对美外交，一向摇尾乞怜，以博美方之好感，已于中国国体之尊重，及中美平等同一阵线之认识，实嫌欠缺。”又写道：“故项白克毛根韬一般心目中，已习于光甫适之之柔和。”“项白克借中国自重，包揽一切，惟仅居国务部次要地位，政治力量殊嫌薄弱，适之事无巨细惟项言是从，毫无办法时，即以美国政府限于国内政治理论为辞，电陈钧座。至文则不得不另辟途径，往往逾越彼方事务官，而直达主持政务之人，是以有时与适之不能为谋。”[91]短短数语倒是把两人和美方的互动关系说得颇为贴切。

宋子文抵达美国后，对于如何处理对美外交，逐渐领悟和发展出一套与此前截然不同的策略。根据宋子文所言，他在到达美国后首先的努力是，“始得与政府内幕决定政策之权要，密切往还”。继之根据他的观察，“美国参战之期已迫，故国务财政等部势力随之递减，军械贷借方案即为总统直接执行权职范围扩大之明证……故此时我方拉拢总统左右之亲信，并培植其势力，实为目前最重要之政治企图”。[92]

宋子文不但心中有了新策略去接近美方权贵，还不遗余力地向他们宣扬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新观点，那就是，中国抗战不只是为中国而战，乃是为全世界而战。这个观点早先已经被陈光甫嗤之以鼻，认为纯属低劣宣传伎俩，睁着眼说瞎话的自欺欺人。胡适虽然心中可能会接受这个观点，但是对宋子文的戏剧化表演，只能感到夸张到有失体面。而宋子文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引起反响，也正是因为他用了充满感性的方式去散布他的观点。对于那些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胡适那种君子风度的美国官员而言，宋子文这般不讲礼数又迹近暴发户似的新人新作风，让他们委实无法适应。即使在美国人已经说了“不”之后，宋子文居然还可以不识相地假装听不懂，继续唠叨不休，不达目的誓不罢手。

与此同时，也的确有另外一批美国领袖看出了宋子文个性的价值，认为他的动力和聪明狡黠着实可取。比如说，大卫·科克伦（David M. Corcoran）就曾经告诉摩根索，尽管宋子文是个难缠的人物，但是“我相信短期内，（你别指望）他会回到中国去，而他是唯一可以推动工作（指贷款工作）的动力，而你也必须使用你能够找到的能量（指宋子文）（去推动你的工作）”。[93]还有其他美国人，或许他们本身早就打算帮助中国，或许他们被宋子文的热情所感染，也都先后参与他的行动，在华盛顿共同推动美国给予中国更多援助。也正是在宋子文主导之下，成立了中国国防供应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Inc.）为中美两国政府就租借法案物资的运用而担任主要联络工作（见本书第8章）。

尽管宋子文精力充沛，他当然也不可能争取到所有人的支持，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财政部的官员。比如说，财政部副部长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就曾经抱怨他承受过“太多来自中国的压力”。财政部官员非常了解宋子文和胡适之间的摩擦，因此特意向胡适示好，希望借此鼓动胡适把宋子文挤到圈外。[94]

而财政部长摩根索本人，则把他对于宋子文的不满表现得最为露骨。他语带恐吓地说道：“假如中国人在华盛顿没有雇用这么一大批人帮他们打点事务的话，则他们从我这里得到的帮助可能会更多。目前这种情况，只会让我的工作进度缓慢下来。”当副部长丹尼尔·贝尔转告摩根索说，中国人曾经放出口风，假如他们无法获得5000万美元的一次性贷款，他们可能会在感情上受到伤害时，摩根索当即脱口而出说道：“就我而言，他们可以跳进长江里去（寻死）。这家伙（指宋子文）过去三个月来不断在耍把戏，而我是绝对不会让步的。当然现在讨论的贷款，本来就是一个差劲的贷款，要不要接受，由他们自己去决定。”[95]从这些

话语中可以看出，摩根索显然是被宋子文惹恼了。

摩根索何以会如此对待宋子文？考其原因，大概不外以下几点。

首先，宋子文使美的重要使命就是贷款。在这个问题上，宋子文和摩根索之间很快就产生了正面冲突，主要表现在他们对于美国经济援华的时机和方式问题上存在歧见。基本上，宋子文不但想要为中国争取到非常大额的贷款，而且还要一次性付清。摩根索则认为应该给予中国小额贷款，而且分多期支付，数量必须严格控制，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政府能够有效地运用款项去稳定货币，也可以防范中国国内黑市投机行为不致失控。借款户和债权人之间的基本利益差异，注定摩根索和宋子文会发生摩擦，无足为怪。

其次，摩根索早已习惯了陈光甫那种恭谦态度，这就大大地增加了他的信心，自认为是中国的大施主，而事实上美国的付出又非常有限。当摩根索面对宋子文时，后者不但有主见，居然还敢坚持自己的立场，这就使摩根索感到震惊不已。在他们两人间这种微妙心理互动的场面里，宋子文居然还敢向他提出一些（在摩根索看来是）“贪得无厌”和“离谱”的要求，则更是令摩根索无法抑制一腔怒火。读者如果参阅当年美国财政部档案，就可以发现摩根索之前在部属面前惯用轻蔑（居高临下）口吻形容中国外交官。这就难怪他会缺乏心理准备，居然会碰上像宋子文这般的中国人，敢于和他顶嘴。在摩根索心目中，类似这种中国人的“胡说八道”（nonsense）一定要尽快遏止，使之不得蔓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摩根索决定在双方接触一开始就需要端出架势，及早扑灭宋子文的气焰。

但是在宋子文赴美国履新之前，针对中国应该如何跟美国人打交道一事，心中也已产生了一套想法。在他初度和摩根索口舌交锋之后不久，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摩根索在那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态度显然变得和缓许多。因此宋子文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这就是西方人的性格。[96]换言之，假如中国用自己传统的恭谦礼让方式去对待美国人，则他们的工作将一无所成，因为美国人会误以为是中国人的个性软弱、无能的表现。反之，假如中国人能够站稳立场据理力争，则他们就会赢得美国人的尊敬和合作。当然，在摩根索和宋子文之间，双方都还需要经过多几个回合交锋才能找出一个平衡点，到底应该向对方施加多大的压力而不至于导致破裂。这也为我们研究中美关系找到了一个新的心理学层次，可以加意着笔。

第三，摩根索原本在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圈子里最为活跃，稳居主导地位。宋子文抵美之前，摩根索一直是美国政府中倡导对华贷款最热心的官员，但是宋子文来到之后，却没有恭谦地接受摩根索的呵护和照顾，反而是把主动权抓到自己手里，大有“抢风头”的趋势。而宋子文居然还胆大包天，向美国要求贷款的额度远远超过了摩根索历来所愿意提供的。就这样，宾主之势立刻产生颠覆。尽管摩根索的确关怀中国和担心日本，但是他只想运用少量美国资源去达成阻遏日本扩张的效果，而

他愿意付出的贷款数目又远远无法帮助中国赢得抗战。摩根索的精算，当然是力求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宋子文的要求则是为美国政府“添乱”而已。

更令摩根索感受威胁的是，一旦宋子文遭到摩根索抵制，他立刻开始在美国政府内外各方面拉拢关系争取政治支持，最后甚至直奔白宫求助。如果容忍宋子文如此“胡作非为”，其结果就可能让财政部降格为无关紧要的联邦行政单位了。怪不得摩根索会把自己看成一个（宋子文）阴谋诡计的受害人。当摩根索提到那些被宋子文延揽的美籍政商要人时，忍不住一肚子怒火地说：“我搞不清楚到底谁是拿他们（中国）的薪水，而谁又是拿联邦政府的薪水。因此我一定要小心从事。”[97]

尽管宋子文能够动员和拉拢的支持者和公关人士，在规模和数量上完全无法和当时英国政府在华盛顿所维持的公关团队相比，但是最让摩根索无法接受的是，中国人居然也胆敢用欺压财政部的方式来跟他较劲。摩根索情绪反应背后的种族色彩几乎是呼之欲出。在当时美国人民中有两种对待华人的态度，一种是保守分子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认为华人是劣质人种，厌恶华人，对于排斥华人一事，认为是理直气壮，无须隐晦，支持排华方案（Exclusion Act）；另一种是自许为开明人士，他们认为华人在人格上与白人应该平等，但是在现阶段属于落后民族，因此需要白人开导（the white man's burden），其中包括热心传播基督教的传教士。而且他们之中不乏愿意献身中华、开启民智者，无论是以教育、宗教、医疗、文化等各种途径，向中国人伸出援手，提携中国人一把。

不幸的是，在后者这一大群善意的美国人之中，也有一部分受到自己生长环境的影响，认为美国和中国交流当然是美国人主导定调，中国人服从执行。这就有时不免产生一种奇特而矛盾的现象：有些越是自认为爱护中国的美国人，越是指望中国人俯顺听话。他们可以信誓旦旦地宣称一切为了中国好，但是先决条件是中国人一定要遵从他们的指导。任何拂逆他们旨意的中国人都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引起强烈反弹。在美国政府中，珍珠港事件前的摩根索部长和同盟国时代的史迪威将军（Joseph W. Stilwell）甚至马歇尔将军（George C. Marshall），都跳不出这个诡异感情圈套。比如，摩根索给宋子文的下马威，罗斯福和摩根索要求由美国政府直接向中国士兵发薪水，史迪威和马歇尔要求由美国将领统御中国军队，等等。换言之，在两国关系中，除了国家利益、战略、贸易等因素，人际关系和文化背景这种难以量化的因素也经常产生严重后果。种族歧视是最难界定的一种因素，又让自由派的学者难以启齿，免得自己落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奚落。但是在研究抗日战争中的中美关系时，这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大阴影。在宋子文、胡适、陈光甫与摩根索等人的交往中，不断可以看到它的弦外之音。

从摩根索立场看来，更糟糕的是宋子文的运作方式还似乎颇见成效。首先能够看到的，就是罗斯福和白宫官员居然开始直接插手中国贷款事务。尽管罗斯福的决策有他自己的盘算，但是摩根索还是把罪状算

在宋子文身上，认定是宋子文颠覆了财政部在联邦政府中的主导权威。

在以往西方历史著作中，宋子文经常被描绘成一位用不光彩手段去结交美国权贵，然后又倚仗他们的声势去欺压美国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是一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但是从中国观点出发，则宋子文或许有另外一种形象。读者必须记得的是，宋子文带去美国的物资采购单，比以往三年的总和都要大。但是他最初的整个工作幕僚，只有一位电报收发员和一位英文秘书。他无法依赖胡适及大使馆职员，因为他们对于贷款和军购事务一无所知，也不熟悉如何进行和国会的联络工作。换言之，宋子文在华盛顿的工作诚可谓人单力薄，独力撑大厦。

由于宋子文和胡适的关系很快就疏离了，因此宋子文失去了运用大使馆职员去支持他工作的机会。即便是在重庆政府之中，也很难物色到适当人才可以流畅地和美国官员进行交谈。因此，宋子文急需有人熟悉美国政府内部运作，和联邦官员保持经常联系，即使在白宫、财政部或是战争部已经做出有利于中国的决策时，也还能够盯住它们认真地执行。

宋子文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培养中国政府和美国有权势人士的人际关系，很快就开始收到实效。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美国知名人士访华的频率显著增加。从1937年7月到1940年6月，没有一位美国领袖访问过中国。美国在中国的事务完全由詹森大使统筹办理，而中国在美国的事务则先后由王正廷和胡适打理。但是从1940年7月开始，这个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详细情形将会在本书第七章中做具体说明。

本章以上所列举的史实表明，自宋子文在1940年6月抵达美国之后，中美关系便产生了实质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其一，他把胡适逐渐排除在中美外交关系之外，使自己成为中国政府大权独揽的外交代表。他在中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过程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他远比胡适更透彻地了解中国国内在政治、军事和财经领域所遭遇的困难，而对于如何争取美国援助也有更多和更积极的设想。其二，他与美国对口单位和领袖们交往的方式、手段和作风同胡适、陈光甫两人大相径庭。宋氏以其锲而不舍的精神，务求达到目的，也因此而提高了开罪美国官员的风险。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宋子文似乎成功地打造了一个新基础去开拓中美关系。在这个过程里，或许很少有美国人会从内心对宋子文个人产生亲切感，但是有更多的人士会接受他作为工作伙伴。我们下一步需要检验的是，宋子文的出现是否会为中美关系带来实质上的改进。

[1]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297～298页。

[2]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294～296页；《国闻周报》第14卷第42期，转引自王松《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第167～168页。

[3]《王世杰日记》，1938年3月4日。

[4]参见吴景平《抗战初期蒋介石与宋子文关系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第20～32页。

[5]参见吴景平《孔祥熙与宋子文》，《档案春秋》1994年第2期，第36～41页。

[6]《王世杰日记》，1939年3月4日、7月5日。

[7]牟润孙：《中美桐油借款商谈纪要稿》，第132～134页；王松：《宋子文传》，第169页；《翁文灏日记》，1938年6月16日。

[8]《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8年5月29日、7月19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月7日、5月8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9年1月15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12-12991、014-13120、031-14138、034-14361、19-13464。

[9]《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7年11月12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全面抗战》第45册：2；《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38年9月20日），《特交文件·亲批文件》第45册：3288。

[10]《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15、24日。

[11]《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8日。

[12]《蒋介石日记》，1939年6月20、30日。

[13]《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18日。

[14]《蒋介石日记》，1939年6月29日。

[15]《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27日。

[16]《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2日。

[17]《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27、31日，8月1～3、5日。

[18]《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11日。

[19]《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26日。

[20]《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19日。

[21]《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26、31日。

[22]《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9日。

[23]《蒋介石日记》，1939年10月24日。

[24]《蒋介石日记》，1939年11月17日。

[25]《蒋介石日记》，1940年1月26日。

[26]《蒋介石日记》，1940年1月27日。

[27]《蒋介石致宋子文两电》（1939年7月22日）、《蒋介石致叶琢堂电》（1939年7月23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25-13827、13828、13829。

[28]《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9年8月14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26-13875。

[29]《蒋介石致宋子文宋美龄电》（1938年1月16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2010.30/4450.01-008-12646。

[30]《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8年7月15日），《特交文件·亲批文件》第45册：3281。

[31]《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6月9日；Harry White's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July 1，1940，*Morgenthau Diary*（*China*），pp. 174-176。

[32]《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7月12日。

[33]《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30日。

[34]拉西曼是宋子文亲信，与宋氏交往超过10年，此次是以波兰救济会（Polish Relief Mission）成员身份赴美，但是实际工作是为宋子文打前哨。Soong letter to Bullitt，October 23，1940，Soong Papers，Box 1，Folder 13，Hoover Institution。

[35]《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10月26日，11月11、13日。

[36]《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6月24日。他写宋氏时称："此等人能办好一事，余不信也。"

[37]《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19日。

[38]《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15日。

[39]《蒋介石日记》，1940年2月14日。

[40]《蒋介石日记》，1940年3月9日。

[41]《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29、30日。

[42]《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9日。

[43]《蒋介石日记》，1940年5月1、15日。

[44]《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1日。

[45]《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4日。

[46]《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8、14日。

[47]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沈宗瀚当时就深切担忧中国政府或恐无法维持。参见《翁文灏日记》，1940年6月30日。有趣的是，当时美国的某些军方人士和后世只研读美国档案的学者，总是把蒋介石类似的警告一律视为是蓄意夸大危机，以达到其敲诈美国政府不得不施以援手的目的。

[48]《翁文灏日记》，1940年6月29日、7月5日。

[49]《蒋介石日记》，1940年2月17日。

[50]《翁文灏日记》，1940年3月28日。

[51]《翁文灏日记》，1940年6月8、15、20日。

[52]《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0年6月1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274页；《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0年6月14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28册《对美外交（1）一般交涉》，第98页。

[53]《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6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2册《对美外交（3）军事援助》，第20页。又见《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8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蒋介石电告宋子文，在赴欧之前完成在美基本任务。

[54]《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6月26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55]《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16日），《革命文献拓影本》第15册，第106页。

[56]《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8月15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57]《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8月23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37-14536。

[58]《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1月6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42-14792；《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1月23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3册《对美外交（4）居里两度访华》，第26页。

[59]《宋子文致宋子安电》（1940年10月2日），Soong Papers，Box 45，Folder 3。

[60]《宋子文致钱昌照电》（1941年1月2日），Soong Papers，Box 41，Folder 1。

[61]《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3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3册《对美外交（4）居里两度访华》，第29页。

[6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15日、10月14日），转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314页。

[63]《胡适致陈布雷转蒋介石电》（1939年11月2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41001。

[64]《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15日。

[65]《孔祥熙致宋子文电》（1941年5月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32039。

[66]《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0年6月2日；《翁文灏日记》，1940年9月18日。

[67]《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1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25002。

[68]《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5月2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619032。

[69]《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04005。

[70]《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5月20日）、《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41年7月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619032、002080200618055。

[71]《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7月1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300045015。

[7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原件月份不清，当为1940年7月1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25002。

[73]《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44006。

[74]众多例证散见Hornbeck Papers，Box 80。

[75]此点在亨贝克的个人档案中亦可得到证实，参见Hornbeck Papers，Box 1。

[76]刘锴：《备受美国朝野敬重的外交家》，《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年5月，第153～155页。

[77]《翁文灏日记》，1941年3月5日。

[78]《翁文灏日记》，1939年7月28、29日。

[79]《王世杰致胡适函》（1941年7月16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2册，第529页；《王世杰致胡适函》（1941年7月22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第586～587页。

[80]《翁文灏日记》，1942年9月18日。

[81]有关宋子文对于财经事务的掌握程度和表现，参见Minutes of Treasury Department meeting on December 1，1940，*Morgenthau Diary*（*China*），pp. 300-322。在这个漫长的会谈中，宋子文一人面对6位财政部高官，解答对方的质询，提出自己的见解，表现突出。

[8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0月27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2册《对美外交（3）军事援助》，第152～154页。

[83]《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4月2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40006。

[84]《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11月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41001。

[85]《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4月1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44006。

[86]《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11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146026。

[87]《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15日。

[88]Transcript of meeting between Soong and Morgenthau in Treasury Department，on November 30，1940，*Morgenthau Diary*（*China*），pp. 273-277.

[89]《在美见闻》（1941年，月日不详，大约是年底），《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14019013。

[90]Stanly K. Hornbeck，“Memorendum of Conversation，”Department of State，August 15，1940，Hornbeck Papers，Box 52.

[91]《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5月2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619032。

[9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5月2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619032。

[93]Transcript of 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Corcoran and Morgenthau，April 14，1941，*Morgenthau Diary*（*China*），pp. 362-363.

[94]Transcript of Group Meeting at the Treasury Department，April 21，1941，*Morgenthau Diary*（*China*），pp. 373-385.

[95]Transcript of Group Meeting at the Treasury Department，April 21，1941，*Morgenthau Diary*（*China*），pp. 373-385.

[96]《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12月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23页。

[97]Transcript of Group Meeting at the Treasury Department，April 21，1941，*Morgenthau Diary*（*China*），pp. 373-385.

第六章 1940年下半年中美关系大幅扩展

在宋子文主导下，1940～1941年中美关系在四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分别是经济援助、军火购买、越南和缅甸通道的重开，以及促成中国与西方国家结成国际大联盟的努力。在这几个领域内，中国政府加大力度，投注大量精力，采取积极态度，也尝试运用不同方法。本章将要讨论的是，宋子文如何比胡适更努力地去体会重庆领袖们急迫的心愿和指望，以及他采用何种新手段去争取美国援助。本章也会讨论中国政府如何设法阻止美国改善与日本的关系。

一 促成重庆政府外交政策改变的背景和因素

在讨论这些实质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宋子文初到美国的半年里中国政府面临的三个新危机加以叙述，这样才能让我们更了解宋子文工作的压力和他需要争取美国支持的迫切性，远远超过胡适和陈光甫在此前两年所承受者。第一个危机是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大幅滑落。第二个危机是日本重启对中国城市的大规模轰炸。第三个危机是英法宣布关闭从越南和缅甸往中国西南省份的通道。

（一）国军战力低落带来的震惊

冬季攻势指的是国军在1939年冬季发动的一个大规模地面攻势，事先经过了长期精细的参谋作业，动员了40万~50万士兵，由4个战区协同向日军进行全面性反攻。其规模之大超过淞沪会战以来任何一次国军出动的兵力，其目的就是要扭转自从七七事变以来国军屡战屡败的劣势，希望一举而重创日军，挫折其侵略的锐气，重新夺回战场上的主动权，所以中国最高统帅部寄之以厚望。

但是会战结果可说是全盘失败，详情在1980年代的史学论著中已讨论过，在此不予重述。[1]

冬季攻势失败后，重庆政府在1940年2~3月对于失败原因进行了一系列的检讨和讲评。其中最具规模的是柳州军事会议。在会上，蒋介石不但公开指斥许多将领，而且明令处罚失职人员，所以在形式上似乎取得了教训和拟定出改善方向。但是实际上国军在冬季攻势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在此后抗战中依然长期存在。而蒋介石在私下的感受，远比公开场合中所言要坦诚和悲观许多。他的讲评重点是：“高级将领不顾威信，平时骄矜，败时颓丧，几乎手足无措，可痛可悲。因之心神惶惑，失眠加重，殊为从来所未有。”[2]

但就大多数将领而言，上级的责备、鼓励甚至奖惩都未能产生明显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冬季攻势是中国军队在抗战头四年作战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国军曾经表现出旺盛的战斗精神，在淞沪会战时期，国军（特别是中央部队）不但经常表现出炽热的求战精神，而且有旺盛的求胜欲望。1938~1939年，国军虽然多次战败，可是信心依然维持。最高统帅误以为这支战败之军，只要经过短期整训和补充武器装备，就可以重整旗鼓向敌军发起攻击。岂知这完全是最高统帅的错误估计，因而导致了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悲剧。

无论官方宣传事后如何淡化冬季攻势，它实际上让蒋介石清楚地看到国军根本性的弱点，逼使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在此后战略上做出了重大修正。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后作战方针应养精蓄粹，非整训完成，不轻决战，但各战区不时以一师以下之兵力乘机出击，不断打击敌人为主。"[3]到了8月，蒋介石又写道："以后反攻非待各战区整训完妥而有充分把握时，决不宜轻举尝试，否则如反攻无效，不惟后继补充为难，而敌且攻川无忌矣。"[4]半个月后他再度写道："待敌来攻，纵深抵御而反击之，则胜利在我者多。若我先攻其据点而求其幸胜，则必失败也。"[5]

说白了，他终于认识到国军必须经过长期整训，否则已经不具备从事大规模作战的能力，而只能以小部队的兵力对日军进行骚扰。蒋的这些话可能为此后重庆政府的抗战策略做了一个很中肯的描述，也是从冬季攻势失败所吸取的深刻教训。

要想改变此种窘境就必须获得大量外援，而所谓外援则不外两种：一是进口足够的武器重新装备国军精锐部队，二是借重外国军事专家协助中国训练军队，如同以前德国军事顾问一般。两者都是蒋介石在南京时期，既已高度熟悉而又取得高效成果的建军工作。在德国和苏联的军事援助都相继变得不可靠的趋势之下，美国自然而然地开始成为取代它们的对象。这项工作当然越快开始越好。

恰恰在此时，美国政府也正在酝酿大幅加强对反抗轴心国国家的援助。如读者熟知，美国自欧战爆发以来，一直受到1936～1937年中立法的限制，不可对欧战交战国施加军事援助。但是罗斯福在1939年9月21日向国会提出"cash and carry"（现金购买、自行运输）变通方法，使英法可以支付现金购买美国军用品，接着用它们自己的船只将货物从美国港口运往欧洲。然而到了1940年夏季，英法的处境又发生困难。首先是法国在1940年6月22日战败向德国投降，继之英国又现金短缺，逐渐无法以现金支付和自运方式从美国取得武器。因此，美国如欲避免英国步法国后尘向德国屈服，就必须找到另外方式，更积极有效地抵抗轴心国侵略。

此种国际趋势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当然是必须及时借重的一股外力。然而由于胡适已经做了原则性的表态，声称他的大使职责范围不包括借款和武器，则国民政府就必须尽快找到合适人选，向美国政府争取这些即将来临的外援。由于在这个关头，国民政府已经形成了整编30个精锐陆军师的计划，因此派遣干员赴美，似乎势在必行。[6]

（二）日本实施新一波残暴轰炸

就在宋子文赴美任务酝酿期间，大致从1940年5月中旬开始，日本

以每批150～200架飞机开始对重庆和成都进行不分昼夜的轰炸，其规模之大超过抗战以来任何时期。

回顾中国陆军的挫败和空军的挫败，虽然同为挫败，却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中日两国陆军对垒有作战前线，前线崩溃才会产生难民和震动后方，因此对于大后方居民而言，其影响是渐进的。但是日本空军的轰炸，则是把战争立即带进千家万户的生活核心圈。

自1938年开始，中国政府逐渐发展出一套有效的防空预警系统，不但在后方如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重要城市附近设立预警系统，而且在沦陷区日本空军基地附近，也建立了大批观测站及情报通讯网站。一般而言，只要日军飞机起飞15分钟之内，即可由国民政府派遣的地方观测员，将信息经过沿线转接站向内地传递。但是这个系统的功能也不可夸大，它可能只报告敌机起飞的地点及数量，并不能得知它们意图攻击的目标。

中国最大的致命伤是当敌机已经凌空时，严重缺乏防御能力。防御敌机来袭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地面防空，另一种是空中阻截。中国当时最缺乏的武器就是高射炮和高射机关枪，全国数量之少，无法构成火网保护任何重要的地面目标（包括军事委员会和委员长办公室在内）。升空拦截迎战的方法也无法生效。无论是苏联空军的驱逐机（И-15、И-16），还是轻轰炸机（SB双发动机），皆机型落后，速度缓慢，爬升能力极差，续航作战路程短，夜间不具作战能力，缺乏无线电设备。尤其糟糕的是武力薄弱，机关枪口径过小，每分钟只能发射1800发子弹，而且经常过热发生故障，突然丧失发射能力，在天空中无法发挥驱逐机的正常功能。而侦察机又因缺乏照相设备，只能在晴空以目视方式出勤。至于轰炸机则由于投弹瞄准器粗糙落伍，又缺乏驱逐机护航，难以发生作用。即便如此落伍，以上机种全国总数不过150～160架（另外更陈旧的杂牌机种80～90架）。地面设备同样陈旧，全国只有极少数量落后的加油车辆，大部分情况需要使用5加仑油桶以人工方式为飞机灌注油料。[7]

与以上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日本空军。据美国估计，它当时在中国战场可以使用的飞机大约有800架驱逐机和轰炸机，最主要的三个集中地为广州和汉口（约650架）及中南半岛的河内（约70架），其他散布各地。前两者可以攻击成都、兰州等地，后者可以攻击西南各省及滇缅路。[8]

由于双方数量和性能悬殊，以致日本飞机经常在白昼出动，肆无忌惮，偶尔也会利用月满时在下半夜起航，在清晨时飞抵目的地，完成轰炸任务后返航。由于日本掌握绝对空中优势，所以它的飞机习惯于采用最有效方式，先派遣1、2架毫无武装的侦察机勘察有利地面目标，通知轰炸机群随后抵达，集中在几个小时之内轮番投弹，放空炸弹舱后返航。直到1939年，日本轰炸机都无须驱逐机护航，可以单独大胆执行任务。其侦察机一般在18000～22000英尺高空以时速275里执行任务，而

轰炸机则在目标上空15000～20000英尺投弹，两者都超过中国地面高射枪炮的射程，而所投炸弹则为100～500磅。

1940年开始，日本空军间或派出驱逐机组，其目的为引诱中国空军仅剩的少数驱逐机升空迎战而予以击落，或是以驱逐机火炮对地面目标（特别是飞机场设施）进行低空扫射摧毁。1940年日本的新式零式飞机（Mitsubishi A6M）开始服役，更是大大地增加了日本空军的胆量和杀伤力。1940年9月13日，13架零式飞机与27架中国空军的苏联飞机进行空战，后者全数被击落，而前者丝毫无损。零式飞机的优势在于它的操纵灵活，转弯半径小，火力强大（装有两门20毫米火炮、两挺7.7毫米机枪），时速340英里，续航里程800英里（可在空中持续飞行6～8小时），爬升速度快（3.5分钟可以爬到9800英尺），还可以装载各式炸弹。在中国空军的苏联制造飞机爬到高度极限而濒临失速的情况下，早已获得升高先机的日本飞机，捕捉良机以快速俯冲方式向中国飞机扫射并将其击落。这成为抗战开始以来中国空军损失最大的一天。[9]

在当时中国人眼中，这次空战提供了最有力证据，说明苏联援华飞机的性能低劣。经济部长翁文灏甚至气愤到忍不住要问，即使苏联送来更多同类型飞机，又能指望达到什么好效果？[10]到了1940年10月初，日本空军又派遣驱逐机进驻宜昌机场，这就使得它们可以掩护轰炸机对重庆、成都等城市进行大规模轰炸。有一个简单的数据可以说明日本飞机的绝对优越性：苏联援华飞机需要用15分钟以上时间才能爬升到6000米，而日本飞机则仅需6分钟，然后以快速俯冲摧毁仍在爬升的中国飞机。这一切都使中国空军完全无法招架，急需谋求解决办法。

而在地面上承受灾难的大后方军民，在光天化日之下每次遭受延续数小时的轰炸，殆日机油弹耗尽扬长返航之际，以为可以喘一口气，不料下一波攻击飞机又随即赶到。日机攻击目标不仅是中国空军飞机和基地，也对平民目标进行轰炸，包括居住区。正如蒋介石所言："其情状之惨酷，为向来所未有。"[11]

遭受日机恣意炸射的平民百姓，其幸运的少数人或可以就近躲入简陋防空洞，多数人却只能漫无目的地四散奔逃。难怪每隔数日就会有超过千人丧生。城市居民白天无法上班或是进行商务交易，入夜无法生火作炊或是睡眠。如果房屋被毁，更是无家可归。到了6月底，连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官邸及国民政府办公厅都先后遭到轰炸。[12]

在地面上，鉴于当时重庆等地房屋多为木质建筑，日本又蓄意使用燃烧弹扩大其摧毁威力，以致一旦被炸，经常大片地区变成火海，政府的简陋消防设施根本无法应付，有时在重庆引起的火灾达三四十处之多。每日造成大量难民，对于政府的治理和应急能力形成严峻考验。政府由于缺乏消防设备，虽然苦经思索，但是能够想出来的办法，无非夷平现有建筑物去开辟防火巷，多备沙包，然后以人力排队传递水桶的原始方法泼洒而已，多半时间只能眼睁睁看着火海吞噬和扩散，无能为力。[13]

至于升空迎战，则中国空军根本缺乏能力和器材。面对日本的攻击，整个中国空军此时所能动用的防卫力量只有20架飞机，而且每日只能出动10架升空作战，其他必须留在地面修补。不久日本又发展出一种新战术，即以侦察机在高空巡回监视，一旦发现中国战机油料弹药用罄而必须降落补充，立即通知轰炸机将之在地面予以击毁。[14]这使中国空军蒙受了重大损失。

到了10月初，中国已无驱逐机可供作战，而轰炸机以及在机场附近修理之旧机也被日机击毁无余。[15]到了10月底情况更为糟糕，依照蒋介石的形容，“正午敌机来袭渝，专炸各工厂炉机。以吾无机应战，彼乃放肆无忌，为所欲为”。[16]换言之，居民区、政府办公场所和已经够简陋但是硕果仅存的工业生产厂房，无一幸免。

当重庆被大雾掩盖时，日机便转向其他城市寻求目标，同样经常造成数以千计的伤亡和无法估计的财产损失。[17]

蒋介石对于中国空军无法遏制日机狂炸，每日为之忧虑和愤怒不已。由于中国空军数量少得可怜，而空军指挥官又屡屡被指责无能（其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蒋介石有时甚至亲自插手指挥防空事宜。[18]

蒋介石此时心中感受，曾经留下了几段见证性文字。

1940年6月重庆气候已经超过摄氏40度，而日机依然每日轮番轰炸。虽然伤亡重大，但是重庆市民依然默默承受，社会秩序并无动摇现象。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忍不住写道：“如此热暑而又蒙如此惨炸，我民众忍痛耐暑，冒死不惧，岂非世界最坚忍之民族乎？”[19]

他在7月3日日记中写道：“被敌轰炸之中，每一人民，无论男女老幼，上下贫富，不惟生活无定，即生命亦不知其所止，已刻不知午刻之生命何在，今日更不知明日生活如何。每一防空洞塌倒，死者少则数十，多则数百，以如此之苦痛险恶之环境，而同胞并无怨言惧心，使余不知如何报答而无亏于心矣。但有感激心铭而已。”[20]

7月26日又写道：“妇女躲避空袭，得背负包裹，怀抱孩童，见之心酸，我下一代之国民，更应知孝重悌，以报其父母空前劬劳之恩也。”[21]

8月20日更写道：“寝食坐立皆不得安，甚恐人心因之动摇，抗战乃受不良影响。然寸心反甚平定，毫无纷扰之象。以敌寇爆炸，最多只能焚毁我全渝之房屋，而不能杀害我民命。且其飞机油弹有限，绝不能继续久炸。即使能毁我重庆，而不能毁我全国也。然而其所用烧延小弹之爆烈，实足以惊人而生恐怖耳。”又写道：“下午……登山巅眺望火光之大，与其火头之多，实为自有生以来所未见也。未知天父锻炼我民族究至何时为止耶？”[22]

几乎从轰炸一开始，蒋介石就相信，日军之所以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轰炸，其最终目的是加紧造成社会混乱、经济萧条、民心涣散和士气荡然，使中国人民最后放弃抵抗意志；同时也在对重庆政府一再拒绝响应日本诱和活动的“冥顽不灵”施加惩罚，因此日军不但使用千磅巨弹摧毁国民政府办公地，而且对蒋介石的故乡奉化武岭进行攻击。[23]

面对此种情况，而中国又无飞机可以迎战敌机，重庆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争取外援。鉴于以往经验，苏联本是理所当然的对象。

不幸的是，早在1937～1938年汉口时期，中国政府就对苏联志愿空军飞行员产生怀疑。虽然当时的确有大批苏联飞行员来华作战，但是已经有谣传称苏联空军只是在表面上迎战来袭的日本空军，而实际上并不积极，无非虚晃一招而已。[24]到了1940年1月，重庆政府又注意到苏联飞行员在平时操作飞机时的损毁率非常高，其原因似乎并不是机件故障引起意外而是蓄意破坏所致。中国政府甚至怀疑是苏联政府别有用心的授意所致。可能是为了改善这个情况，蒋介石曾经召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做了三小时谈话。[25]这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因为蒋介石和西方其他国家的代表都没有进行过如此长时间的对话，但是似乎没有成果。

虽然中国政府无法确定缘由，但是合理的解决方法是停止依赖苏联空军，改向其他国家购买数量足够而性能良好的飞机，以增强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这两方面，美国似乎都可以向中国提供最好的出路。

但是由于美国反应极为冷淡，因此一旦日军狂炸开始，中国政府依然迫不得已首先向苏联求援。5月下旬蒋介石特别召见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说明中国空军已经没有驱逐机可以抵抗来犯日机，希望苏联可以把早先承诺提供的飞机赶紧运到中国参战。但是蒋介石也特别声明，中国政府绝不哀求苏联提供飞机。6月初，由于日本轰炸实在过于严重，一周之内又炸死逾千人，蒋介石再度亲自约谈苏联总顾问，要求赶紧将飞机送来中国解救危机。[26]

不知蒋介石的语调是否过于表现出“骨气”而冒犯了苏联，其结果是“俄国史达林对我呼声要求其交我应交之飞机置之不理”。[27]

7月，重庆政府又向苏联提出购机要求，而到8月初，苏联政府正式拒绝，并建议中国政府在三个月后再谈。不仅如此，苏联也拒绝允许美国援华物资假道海参崴和中国西北运往内地。[28]与此同时，重庆政府也向美国提出申请提供飞机，并希望美国能够施行对日汽油禁运，让日本轰炸机因为缺乏油料而减少活动。[29]

不幸的是，美苏两国的反应均甚冷淡，使得蒋介石为之愤怒不已。他在8月23日日记中写道：“敌机轰炸各地与重庆，残酷至此，而美俄各友邦毫不动心，应交之飞机仍无消息，俄则反借此要挟我撤换航委会周至柔，世上最不忍与最难堪之事，莫过于此也。”10月25日又忍不住写道：“俄与美皆对华袖手不援，熟视无睹，可谓忍心之至矣。”

换言之，1940年5月开始的轰炸危机逼使重庆政府不得不加紧努力从美国争取到飞机供应。由于这个危机一直要延续到冬季大雾降临才能转缓，所以宋子文甫抵美国就铆足劲向各方面活动，希望能够纾解危机，俾能有效地解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检阅此时宋子文和蒋介石的来往电文，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蒋介石雪片而来的指令，嘱宋子文去争取美国出售飞机。蒋介石所强调的重点大约有如下几个。①苏联政府的计谋是迫使中国脱离英美而倒向苏联。若非如此，则苏联不愿帮助中国抗战。②因此，苏联飞机只有承诺而无兑现。但是蒋介石认为，即使苏联兑现，也无价值，因为苏联飞机作战力太差，徒使中国飞行员做无谓牺牲。③最近中国面临的危机是敌空军在华横行无阻，变本加厉，“军民抗战心理渐起动摇”。而且危机比宋子文三个月前离开中国时更为加重，因此急需外力援助。④如果中国能够获得美国飞机，则有适当机场供其立即使用（如衢州、丽水、玉山等地，可以威胁日本本土）。⑤中国要求获得美国飞机的数量是200架左右的轰炸机和驱逐机。[30]

除了蒋介石之外，宋子文也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恳求和压力。比如说，1940年8月，戴笠电告宋子文：“昨今两日敌机均百余架袭渝，在亚市（四川雅安）大投燃烧弹，房屋几全被毁，难民正在疏散中。”[31]10月，龙云电告宋子文，昆明遭受日机无情炸射，机关、学校、工商建筑损毁严重。[32]12月他再度电告宋子文，云南多地在12月11日一日之间被炸5次，而中国毫无空军可以迎击。因此他请求宋子文务必使用美国借款购买飞机。[33]与此同时，宋子文又接到军令部情报，称前—月敌机先后轰炸浙省金华、衢县等地，“散布白烟，并有鱼子状颗粒落下。经我卫生及军医机关鉴及，确系鼠疫杆菌”。[34]这个细菌战的讯息，使中国面临的轰炸危机更为严重。

（三）对外生命线切断的危机

1940年中南半岛发生了两件大事，严重地打击了中国对西方国家的信心。一件事是法国在1940年6月切断了经由越南通往中国的运输线；另一件事是，一个月后，英国关闭了缅甸通道。虽然长期以来中国领袖们就高度担忧，一旦欧战发展对于英法两国不利，日本很可能会对它们施加压力。但是等到事件果真发生时，中国政府还是感到措手不及，因为中国领袖们没有料到英法两国会如此温顺地向日本屈服。因此，我们需要了解这两条通道对于中国抗战的重要性，以及中国为何以不同的方式去分别处理对英国和法国的关系。

自1937年开始，中国就高度依赖香港和越南从欧洲国家进口军事装备，又经过同样通道将中国的矿产、茶叶、羊毛等物品运往国外作为偿付。日本也从来就想切断这些运输通道，而早在1937年10月，日本就已经达成了部分目的，迫使英法两国政府对于这两条通道做出了若干限

制。[35]

日本在1938年10月占领大亚湾并切断广州到九龙铁路，大大地减少了香港作为转运站的功能。相形之下，中国对于经由陆上路线，分别由广西和云南通往中南半岛的依赖性就相形增加。但是过不多久，这种情况使得法国和日本关系更趋紧张。在日本压力下，这些通道经常被迫中断。到后来，云南和缅甸之间的公路通车后，西方国家的军火就可以先由海运抵达仰光港，再以铁路运到腊戍，最终改用汽车经过大约1000公里运抵中国。[36]

日本对于英法两国的态度当然也受到它新近所遭受的两个挫败的影响。在军事上，日军在诺门罕被苏军彻底击败，证明苏联在远东地区实力不可动摇。在外交上，日本则完全没有预料到德国和苏联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外交盘算完全失着。这个双重打击迫使日本不得不在亚洲北部采取守势，但对东南亚则采取攻势，开始所谓“南进政策”。当欧洲局势和日本南进政策结合在一起时，其立见的后果就是威胁到中国通往西方国家的通道。[37]

如果苏联原本就诚心想帮助中国的话，则它在诺门罕的胜利应该给了它最新的信心去帮助中国。岂知事实正好相反，在苏联和日本签订停战协议后不到一个月，中国政府就察觉苏联态度大变，不仅对运送武器拒绝做出新承诺，即便是履行旧承诺也推延再三。因此蒋介石在7月向宋子文提出警告，苏联武器来源已经不可靠，他必须改向美国加紧努力，争取援助。不但如此，蒋介石还告诫宋子文，后者甫到美国就热心进行的计划，在美国买武器然后借道苏联海参崴运到中国，将无法实现，因为苏联对此态度冷淡。说到底，苏联珍惜它和日本的边境安宁，不愿为中国抗战而冒险。如此说来，尽管中苏之间原本有一条所谓“西北交通线”并没有完全切断，但是名存实亡。中国对外运输只能依靠越南和缅甸的转运。[38]

然而也是从1940年开春，越南情形就让重庆政府日益担心。1月初，日本多次出动空军轰炸滇越铁路桥梁，企图将之摧毁。而面对此一外来危机后，中国内部也面临一个困难，那就是云南省主席龙云拒绝以手中兵力去保卫铁路线。龙云拒不合作的态度甚至引起外国人怀疑，认为龙云内心其实希望日本能够将铁路摧毁，因为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日本打消向云南发动攻击的念头。无论如何，日本在越南的蠢蠢欲动，使得中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尽快找到另外一条对外通道，以保证军火供应不致断绝。[39]

但是1940年初真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4月份，中国位于云南缅甸边境的一所军火库突然发生爆炸，一夕之间损失了5000吨武器弹药。这对中国战力造成严重打击。蒋介石既痛心损失又忧虑如何补偿。[40]

到了5月下旬，蒋介石相信法国首都巴黎必将无法避免沦陷的命运，将导致日本趁机进犯越南，因此中国必须加强昆明的防务。当意大

利参加欧战后，法国的地位更是岌岌可危。蒋介石预期日本可能会以武力占领越南，并且没收中国在该地储存的物资。为了应付这个局面，中国政府开始准备一些应急措施，包括在西南邻近地区集结兵力加强云南、广西两省的防务，并指定专人负责筹划对滇越铁路进行爆破工程，以便在必要时使铁路不致落入敌手。[41]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蒋介石依然没有放弃苦撑的决心。正如他此时所写："美英法苏之对我态度皆冷峻旁观，毫不援手，而俄国应交之驱逐机，见我如此被炸，而亦澹然置之。我之咽喉被紧握，我之口舌被困塞，然而我之抗战本不靠人，亦不希望人，惟在自强而已。"[42]

到了6月中旬当法国终于向德国投降时，中国政府清楚认识到越南铁路迟早必将不保，而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日本将趁机向法国施加压力全面占领越南，切断中国的军火外援来源，进而在中国战区发动新一波攻势，以求强力击败国军而结束中日战争。[43]

果不其然，英法两国在欧战中挫败后，日本在几天之内就要求法国终止一切经由越南运往中国的军事物资，6月19日，法国政府完全屈服，停止了所有越南和云南省之间的铁路交通。[44]6月下旬，日本果然没收了全部中国囤储的军火器材。[45]蒋介石也担心英法军事失利，将会鼓励日本向昆明和重庆进行大规模进攻，以求一举结束中国战局，然后挟胜利姿态从容谋求和美国达成协议。[46]

而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面临的情况越来越恶化。1940年9月22日，法国政府被迫和日本签订协议，允许日本军队在中南半岛登陆，可以自由使用港口、机场、铁路和其他设备，并可以向中国发动进攻。[47]

日本在向法国施加压力的同时，它也向英国就缅甸提出类似要求。日本表示，除非英国立即切断和中国的通道并撤退其驻扎在上海的军队，否则日本将对香港施行封锁，甚至可能向英国发动攻击。[48]正值此时，英国政府也在进行改组，丘吉尔于1940年5月取代张伯伦成为首相。虽然这个发展在欧洲看来是英国决心作战的表示，但是它在亚洲的姿态却明显比较软弱。丘吉尔在7月18日对日本做出让步，宣布将在此后三个月中，暂时不会准许外国军用物资借道缅甸进入中国。丘吉尔甚至向日本承诺，会设法劝说中国政府去向日本祈求和平。[49]由于丘吉尔的这些让步是在他成为首相后向英国议院做的第一次演说中宣布，只能使中国领袖们倍感寒心。

蒋介石马上认为自7月起以后三个月，实为中国抗战最大之难关，"须准备一切以全部精神冲破此最大最后之艰难"。事实上，英国断绝缅甸运输之后，汽油与军用原料来路完全断绝。蒋介石可以预见到，在越南与缅甸交通皆断时，"此后外交经济交通皆必困难益甚。我之政略与战略皆应重新研讨，以求得至当事之"。[50]

这个新发展导致蒋介石产生几种不同的盘算。首先，除了断绝物资

之外，重庆政府还担心日本会趁机从越南入侵中国的大后方广西和云南两省。早在9月初，法国曾经和日本签订协议，允许日军进入越南南部。为了不引起纠纷，重庆政府决定不派兵进驻北越，而只是破坏滇越铁路在中国境内的重要桥梁。[51]果不其然，日军在9月23日进驻越南北部，几日后占领北越海防市。法国的抵抗至此全面停止。

但是内忧与外患总是一起到来。早在1940年春季，重庆和云南龙云的关系就显得紧张。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滇龙之不明事理何以至此，彼必以抗战失败为快而胜利为忧矣。可痛之至。"[52]到了6月，龙云更是明目张胆地向重庆政府要求调其云南籍的第一集团军回滇，"词意跋扈异常"。[53]到了9月，龙云进一步借用香港报纸散布信息，宣称云南本省籍的军队足以保卫家园，无须外省军队进入该省，其所指的显明是中央军。但是为了息事宁人，蒋介石只好忍气吞声，不做任何表态。[54]但是在暗地里，重庆政府开始计划对日军作战所需要使用的兵力与番号。[55]

其次，蒋介石原先认为德国必定不会同意日军进入越南，理由是德国并不希望日本和西方殖民地发生冲突，而希望日本对苏联增加压力。所以当日军入侵越南成为事实之后，蒋介石认为这必定在事先获得了德国的同意。如此则表示日本今后的焦点，将从中国大陆转向东南亚，并且直接挑战英美殖民地。因此，他认为日本的举动对中国抗战而言实在是一个重大转机，而中国政府必须善加运用。[56]

第三，日军入侵越南使得它也容易入侵缅甸，而缅甸则是中国政府抗战剩下来的最后国际通道，必须尽全力加以保护。

由于这些原因，中国政府必须加紧说服美国赶快向中国提供贷款，对日本施行制裁，同时及早和英美协调阻止日本入侵越南，并保障外援物资可以安全经由缅甸运往中国内地。[57]这一切责任自然又落到宋子文身上。

简言之，越南和缅甸通道几乎同时关闭，是中国自1937年抗战以来遭受到最沉重的国际打击，使得中国继续抗战的能力受到严峻考验。而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机，又正是中国政府刚刚开始满怀信心地想争取更多美国军事援助之时。因此，它们对中国的士气不啻是迎头一盆冷水。如果两条通道遭到封锁，即使是美国已经同意的贷款也将变成无用，因为这些外币将无法用来购买外国器材和民生物资以稳定国内法币或是抑制通货膨胀。美国的军事器材也将无法进入中国本土。同理推之，中国矿产也将无法运到国外去偿还购买军火的债务，而中国的民众只会更加感到孤立无助。[58]

二 中国对美外交实质上的扩展

（一）贷款谈判

1.中国目标的提高

从宋子文使美开始，他所设定的贷款数目就大大超过了胡适、陈光甫二人所敢想象者。他很快就表明态度，在未来和美国政府的谈判，他将会采取更积极进取态度。对于陈光甫过去的贷款成就，他也毫不隐藏他的失望，甚至露骨地批评陈氏在和美国政府谈判过程中，做出了太多不必要的让步。

宋子文从和罗斯福最初接触中所得到的印象是，罗斯福个人愿意想尽办法向中国提供抗战所需要的金钱和物资。[59]毫不意外地，当宋子文兴冲冲地把这个印象告诉胡适时，后者却劈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直截了当地告诫宋子文，宋氏的毛病就是缺乏耐心，好大喜功。[60]

但是胡适的批评只是加强了宋子文的决心，一定要打破过去中美关系的旧模式，而且把过去中美关系缺乏进展的责任全部归罪于胡适。[61]几天之内，蒋介石就给宋子文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告诉宋子文："借款事不必与胡使相商，请兄径自进行为便。"并且进一步征求宋子文意见："此时拟召胡使回国，未知有否不便之处？"[62]

宋子文也明确表示："总之，欲得美国之援助，必须万分努力，万分忍耐，绝非高谈空论所能获效。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俾得协助并进。否则弟个人虽竭其绵力，恐不能尽如钧座之期望。弟所以提议植之（施肇基），即为此耳，并非对人问题。敬乞钧察。"[63]换言之，宋子文除了指出胡适的缺失之外，还提出了具体的取代者，希望立即付诸执行。此时离宋子文抵美只不过4个月。他的行动果真迅速。

然而宋氏面对的最大挑战，还是如何去改变美国对于中国求援所采取的冷漠态度。事实上，美国政府在宋子文尚未提出要求之前，已经拟定了对策。依照财政部官员的预测，宋子文将会请求美国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其形式将会是采取以往模式，运用美国的平准基金帮助中国维持币制稳定。财政部官员想出拒绝的理由是，美国法律不允许使用平准基金借款去帮助中国维持币制稳定。他们进一步决定采取两种说辞去反驳宋子文的请求，一是宋子文过分夸大借款所能给予中国的帮助，二是宋子文过分夸大法币制度即将崩溃的危机。最后他们还指出，中国最迫切的困难并非国外贷款不足，而是中国政府未能有效运用手中的外汇储

存，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必需品，再把这些物品运回中国本土。[64]

显然，美国政府对中国当前危机的分析，和中国政府本身的分析大相径庭。如前文所言，到了1940年中期，许多中国领袖都认为经济对中国存亡所可能造成的威胁远远超过军事威胁。因此在宋子文动身赴美之前，蒋介石已经表示希望美国能够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以尽快稳定法币。依他的见解，抗战成败三分系于军事因素，七分系于财经因素。[65]

8月，蒋介石对于中国经济情况的恶化显得极为忧虑，甚至认为比日本的轰炸更能动摇国本。用他自己的话说："粮价飞涨，百物腾贵，钞票缺乏，运输不济，演成有物难用，束手无策之状。"[66]一个简单的指标是米价，1940年8月的米价已经比一年前涨了800%。因此他电告宋子文，中国必须告诉美国，如果中国得不到美国经济援助而无法改善经济问题，"则民生饿冻加之，共党必从此捣乱，则抗战必难持久"。[67]

轴心国联盟成立之后，蒋介石希望美国能够给予中国一系列的贷款。9月，蒋介石再度更明确地告诉宋子文，中国唯一希望从美国获得的武器只是飞机一项而已，别无他求。而中国真正需要美国援助的，是在财经领域。唯有后者才能保证中国的民心士气，坚持抗战到底。他说："如果美国有意与我合作，则我所望其接济之武器惟飞机而已。而主要之接济仍在经济与金融，以安我抗战之民心与军心，使能持久抗战，为惟一要求，此外无任何要求也。"[68]再者，鉴于轴心国针对的显然是苏联，蒋介石更希望苏联和英美能够成立共同阵线，"联成阵线，共同制裁侵略则幸矣。然此关键在美国，故我只可相机运用，而非我所能强求。如操之过急，反被其怀疑。请兄从中运用，使不失时机为要"。[69]面对如此严峻的财经局面，宋子文当然要尽其所能地满足政府的厚望。

2.宋子文精力旺盛的表现

宋子文甫抵美国，就和摩根索举行数度餐会，提出了几个不同的贷款要求，包括5000万美元支持货币稳定，7000万美元购买军事装备，3000万美元改善交通系统，而且详细地说明了每笔贷款运用的方法。宋子文主动向美国建议，中国政府在偿还当前的欠债之外，愿意承诺在此后五年向美国提供价值5000万美元的矿产品（钨、锡、锑）来偿还。[70]

宋子文这一连串的起身炮，显示出他外交攻势的猛锐。和以往大不相同的是，他不浪费时间去故作谦虚状，他此时对美国提出的经济和军事要求不但超过了胡陈二人前此的要求，也超越了中国政府在宋子文启程赴美之前所拟就的要求。宋子文也充分显示出他没有耐心去浪费时间。在抵达美国的最初几周，他在华盛顿所结交过的美方重要人士，就远远超过了胡适在两年内所结交过的总人数。他在和罗斯福第一次会面时，就完全抛弃了胡陈二人此前的姿态，不再把美援当成对中国的施舍，而是理直气壮地声称，中国比那些不战而降的欧洲国家更值得美国

援助。[71]

宋子文一方面出于真情流露的怨愤难平，大声抱怨美国对中国苦难漠不关心。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或许出于充满心机地大叫大嚷，让美方人士感到被动和忧虑。举个例子来说，在他和罗斯福最初会谈中谈到，一般美国民众多以为民主国家一定可以赢得战争最后胜利，但是宋子文率直地表示他怀疑此说的正确性。宋氏这种论调当即让罗斯福开始担心，中国是否会对民主国家失去信心，因此促使他更加努力地鼓励中国必须坚持抗战。[72]在处理这类事务时，胡适一定会遵守外交礼仪附和罗斯福的论调，而宋子文则经常大胆地逾越外交礼仪尺度，去达到攻心效果。

大凡在华盛顿政治圈子里，能够和白宫、国务院、财政部、战争部等搭上关系的美国有力人士，都是宋子文极力结交的对象，而这类美国人却正是胡适和陈光甫避之唯恐不及的，他们唯恐交游广阔过于招摇而开罪国务院和财政部。[73]但是宋子文却打定主意，要营造出一个包罗多方人才的人际网络，目的就是在华盛顿产生影响力。

宋子文为了笼络这类美国有力人士所采取的手法，也显示出他的作风和以前中国外交官大不相同。之前在陈光甫主持之下，美国政府对中国提供的信用贷款为了方便在美国采购所需物资，一般通过一个中国控制的公司，名为世界贸易公司（Universal Trading Corporation，UTC），而这个公司很少有美国人参与其中。

宋子文到任之后大幅改革，在1941年初创立了一个新公司，名为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取代了原来的世界贸易公司，并在1941年4月指定它代表中国处理租借法案物资。这个新公司让宋子文有机会安插许多有势力的美国人，进入该公司领导层去影响它的运作。[74]

宋子文除了设法改变他在华盛顿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致力于改变中国政府的对美工作。这包括改变重庆政府历来使用的方法，去了解和分析美国的政治动态和国民性。宋子文坦白告诉蒋介石，他在刚抵美国的头几个月内，依然尽量顺从美国人为中国人所定的“潜规则”办事，但结果是工作进展缓慢。不久他决定抛弃那些美国官员设定的规矩，而改用他自己的方法去测试美国政府能够容忍的限度，居然发觉他能够达到的成果反而更大，比如说得到更多贷款。

宋子文从最开始就显示出高度警惕和足智多谋。比如说，在1940年7月9日，他为了避免美国法律限制，就去和摩根索商量，是否中国可以用钨矿作为抵押向美国贷款，然后用美国贷款转而向苏联购买武器。摩根索听了之后大为兴奋，转而向罗斯福建议，美国可以在此后五年内向苏联购买1亿~2亿美元的矿产品和其他战略物资，而由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等值的贷款，供中国去购买苏联的军火。[75]当罗斯福对于这个为了让中国能够购买军火而设计的三边交易也感到相当兴趣时，宋子文立即去拜会国务院、财政部和苏联驻美大使馆（1940年8~9月），激起了

美国和苏联两国官员的兴致并开始进行商谈。虽然最后由于苏联不愿意参与此项安排（见本章前文），而美国政府又无法接受各种提案而作罢，但是这些活动明显显示出，宋子文一到达美国，就开始搅活一池春水。[76]

3.美国方面的反应

中国新政策在1940年10月初得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转机，宋子文接到美国政府通知，同意向中国贷款3000万美元，无须等待双方商定细节就可以宣布，其理由是中国正面临严重危机。[77]而蒋介石也做出了一个让胡适难堪不已的决定，那就是明白通知胡适，此次借款由宋子文一人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即可。[78]自此之后，胡适在借款事务上正式被排除在外。不久，两国政府签订了贷款协定（1940年10月22日），由美国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中国以钨矿作为还款担保。[79]就在这个当头，蒋介石的态度明显转向强硬。他训令宋子文去告知美国政府，除非美国能够接受蒋介石此前请求的大额贷款，否则中方宁可美国不公布这笔贷款，因为如此小数目贷款只能打击中国的士气。蒋介石所持的理由是，如果日本承认汪政权而美国不给予中国一个大借款，会动摇中国政府的法律地位和抗战意志。既然美方此前不愿意与中国进行正式合作，则美方接受蒋介石的请求至少可以视为一个补偿。蒋介石同时希望美国能够开始对中国西南省份的开发拟出整体计划，并且派遣经济专家代表团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和谈判。[80]显然可见，中方这些想法和胡适、陈光甫时期大不相同。

再过了不久，宋子文得到信息，中国新政策似乎在美国人心中已经产生影响。1940年11月29日，罗斯福突然指示摩根索必须在24小时内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贷款。这个仓促行动的原因是美国获得情报，汪精卫将在次日与日本签订一项新约，调整“中日关系”，并致力于重建“新中国”。而罗斯福则希望经由美国的干预，能够阻止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达成任何合作协议。[81]

就在此时，罗斯福又收到蒋介石另一个要求。蒋介石的说法是，日本既然已经承认汪精卫政权，假如美国和英国还不能够向中国政府提供大量援助，则肯定会使中国经济和士气受到严重打击。[82]虽然罗斯福稍早曾经误认为蒋介石可能会与汪精卫合作，但是他接受蒋介石的说法，认为日本承认汪精卫政权可能严重打击中国士气，同时也接受蒋介石的说法，认为中国必须及时得到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其结果是，在罗斯福向摩根索发出指示后的第二天（11月30日），美国政府宣布向中国贷款1亿美元，同时重申美国只承认重庆政府。[83]值得注意的是，连在处理美日关系中一贯小心翼翼的美国国务院，这次也完全没有提出反对意见。[84]

事实上，美国1亿美元贷款包括几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项目，但是美国采纳了宋子文的主张，把它们放在一个箩筐里营造浩大声势，扩大宣

传效果。正由于罗斯福的决定是紧接着日本承认汪精卫政权之后的次日宣布的，因此对于中国的士气造成了极大鼓舞，也是对日本一记当头棒喝。从蒋介石立场来看，这些贷款的宣传价值和心理的重要性，可能超过它们的经济效益。这些贷款的快速达成也间接显示，美国终于摆脱了此前坚持的商业贷款原则，而愿意向中国提供政治贷款了。罗斯福在1940年12月29日“炉边谈话”时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命运和英美两国休戚相关。因此，美国除了向中国继续提供经济援助之外，还将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而同时也将扩大对日本禁运的范围。[85]美国这一连串动作都明显表示，国际局势的改变和宋子文处理中美关系的新作风结合在一起，开始产生了实质性效果。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贷款成功增加了中国对英国外交讨价还价的力量。

12月初英国决定追随美国，向中国贷款1000万英镑，但是此时蒋介石却认为不值得为1000万英镑而让英国人得到援助中国的宣传效果，因此坚持英国必须贷款2000万英镑，否则请英国务必不要单方宣布。岂知一天之内英国议会已经对外发布消息。蒋介石只好训令宋子文坚持两国必须进行另一轮贷款谈判，而且宋子文是否访问英国也将视英国能否提供新贷款而定，并且训令郭泰祺大使和邹炳文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几经磋商，两国才在12月14日达成共识继续努力。[86]由此可见，虽然英国借款的数目并未立即增加，但是英国同意此后将更加努力，而中国政府的态度也因为得到美国贷款而趋强硬。

不难想象，宋子文这种专断独行的手法也引起胡适的大为不快，而胡适抱怨宋子文是“太上大使”（“super ambassador”）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双方合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87]在初期，胡适还只是把他对宋子文的怨气发泄在日记上。比如说，他在1940年10月21日的日记里就有下面这段话：

今天为了一件小事生气。我是为了一个主张来的。但是这个主张的实现不容易，不知道何年何月始能做到。这个时候大家都要看“灵迹”，也有人相信“灵迹”是可以用流氓手段得来的。我决不能如此自信，不如让别人来试试看。[88]

这段话显示，胡适感到自己正在被逼着去做那些违反他的意愿，同时又降低他身份和风度的事。他认为，宋子文的作风令人厌恶，形同流氓无赖。

在罗斯福于1940年11月30日做出决定后，胡适再也没有出席过中美贷款谈判，宋子文成为唯一的中方代表和美国财政部进行谈判。胡适认为他被宋子文诡计多端地挤压到靠边站，因为宋氏希望把贷款的功劳全部揽在自己头上。[89]到了1940年底，胡适也察觉到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电文来往都不再经过他。他只好求助于陈布雷，询问原因究竟何在。[90]至于胡适居然需要向陈布雷探听“内情”，也真是印证了“当局者迷”这句老话。无论如何，1940年底的这个贷款谈判的确为宋子文制造了一个绝好机会去证明，他不但是比胡适和陈光甫更果断的谈判能手，

他对中国经济和财政事务的了解也远比他人更为透彻精准。[91]

在这些因素相交集的情况下，难怪宋子文在重庆的政治身价日益看涨，而胡适的影响力则急速减退。中国政府越是希冀从美国得到更多援助，宋子文的价值就越高。等到中美两国开始谈判第三次贷款时，中国政府的谈判分别在两地进行：在重庆的谈判由孔祥熙和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主持，在华盛顿的谈判则由宋子文与赫尔国务卿和摩根索财政部长进行。作为现任大使的胡适完全被排除在外。

4.蒋介石态度的改变

或许宋子文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改变了蒋介石对美国的态度。在胡适和陈光甫主持中美贷款谈判过程中，尽管中方代表内心里非常不满美国政府的吝啬，但是中美双方从未有恶语相向的场面。宋子文却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在他看来，胡适和陈光甫两人完全不懂得美国人的心理。在一次和摩根索的重要谈话中，宋子文开宗明义地宣布，他自己的个性和一般恭谦退让的中国人不同，他把自己形容成一名“粗汉”，喜欢直言直语。他在做完这番自我表白后，紧接着告诉摩根索，除非美国同意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币制平准贷款，否则他个人不惜违抗中国政府命令，将会拒绝签订任何贷款协定。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是，摩根索对宋氏强硬的态度极感不快，会谈随即不欢而散。然而几天之后宋子文从财政部官员处得知，他所坚持的5000万美元的全额已经被美国接受，因此双方应该进入细节性的磋商。[92]对于宋氏而言，这个谈判经验非常珍贵，因此他立刻向蒋介石做出汇报。

如前所言，蒋介石的愿望是美国政府能够把贷款的总数一次性地对外宣布，而摩根索的希望却是中国政府在提用每一小笔款项时，都必须向美国政府提交详尽报告，说明款项用途并申述理由。

显然，蒋介石对美国态度由于这次贷款过程而产生了戏剧性改变。在此之前，他总是依照胡适和陈光甫的意见办事，尽管他内心并不满意他们工作的迟缓无效，但是他对美国领袖们维持客客气气的态度。现在经过宋子文鼓励，蒋介石终于决定直接对抗财政部长，而也不再顾忌得罪国务卿了。蒋介石的这种心态在他日记里面表现得最为赤裸。他在9月28日日记中写道：“美国以倭侵越南表示反对，而许我借款美金两千五百万元，且欲以钨砂作抵，实于我无济也。美国之自私与吝啬，而以其偏轻黄种为可憾耳。”[93]他的感受真是表现得越来越直接了。

一旦蒋介石采取强硬立场，他自然而然地把罗斯福看成改变中美关系并提高对华援助最好的希望。

（二）军火购置

1.国际局势对中国军火需求的冲击

宋子文赴美外交使命中，一个极重要的新增部分是购买美国军火。[94]宋子文在第二次和罗斯福见面时，两人就对中国的军火需求做了深入讨论。宋子文还趁机得到罗斯福许可，与苏联接洽。[95]在宋子文抵达美国几天之内，他就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军火采购列表，总价值为7000万美元。其中不仅包括火炮、弹药、兵工厂所需的器材和原料等，还包括价值约4000万美元的军用飞机，内含300架驱逐机和100架轻型轰炸机，以及所需的零件。[96]才过了不久，蒋介石又致电罗斯福称，假如美国能够把它向法国提供的武器和飞机数量的1/10交付中国的话，则中国的战力将大为提高。[97]蒋介石在此时对于美国武器兴趣大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9月底首度有机会看到欧洲战场的实况纪录片，英法两国所使用的美制海陆空武器的威力和数量都使他大开眼界，并且使他坚信日本武器绝非美国对手。[98]

1940年9月27日，德国、日本、意大利签订轴心国条约。这对于蒋介石如何看待中国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相信条约为中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稳固基础，“抗战必胜之形势已定矣”。[99]蒋介石所持的理由是，轴心国的形成，终将使得英国、美国或是苏联不致为了讨好日本而出卖中国，反而将迫使这些国家向中国寻求合作。蒋介石认为，中国要求美国增加援华计划的时机已经到来。[100]

然而正当中国人认为美日之间开战有真正可能性时，他们也警惕到美日关系恶化可能导致另外一个后果，那就是使中国的国际军火运送通道遭到切断。这种危险不免使得中国的战略盘算大大受到干扰，因为中国抗战不能离开外国武器支持，而中国又必须坚持作战才能维持民心士气。更进一步说，世界战争一旦爆发，则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进展也会和中国军队休戚相关。如果中国军队能够在大陆地区纠缠住大量日军，则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胜利也将会更快实现。但是中国军队又偏偏需要大批进口武器才能完成这项任务。这些复杂盘算，使得中国政府希望能够趁美日开战之前，尽量购买和储存大批美国武器，以免在危机到来时发生青黄不接的困境。[101]

2.飞机是最高优先考虑

中国军购清单中，包括陆军使用的一般性武器，如轻重机关枪等。[102]但是最重要的是美制飞机，因为到了1939年底，中国空军的战斗总力量已经低于100架飞机。[103]宋子文抵达华盛顿还不及两周就接到蒋介石指示，嘱他去向罗斯福说明，中国军队之所以在地面战争中无法赢得胜利，主要原因乃是中国空军实力不及日本空军的百分之一。[104]蒋介石紧接着（1940年7月21日）又指示宋子文去向美国争取，把它在法国尚未战败前准备拨给该国的飞机中的一部分，改拨给中国空军使用。[105]中国政府此时对于美国武器需求量急剧提升一事，只能益形增加宋子文的重要性，而使得胡适相形之下在华盛顿变成一位可有可无的人。

自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向民众灌输一种看法，那就是抗战无论如何在三年内必定会有一个了结。到了1940年，三年显然已过，抗战终点依然遥遥无期，民心也开始浮现不安。

与中国陆军作战屡屡失败的情况一样，中国空军的失利也极为严重。回顾七七事变之初，中国空军还曾经有过令全国民众振奋的战绩。当时中国虽然只有少数战斗机和轰炸机，但是飞行员训练颇佳，斗志尤其高昂，几乎每天主动出击，有效地延缓了上海的日军攻势，甚至将日本有名的木更津飞行队予以重创。但是由于伤损飞机无法补充及修护零件缺乏，没多久就无力继续作战。[106]

1940年10月18日，蒋介石在和美国大使詹森的会谈中，特别强调中国对于美国飞机需要之殷切。虽然中国也了解美国对华援助会随着时间而增加，但是时间正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由于中国预期在大战来临之际，缅甸路必会遭到封锁或日本会威胁新加坡，因此希望在海运尚未切断之前能够获得大批战斗机。由于中国政府声称必须在今后两三个月内获得飞机以振奋国内人心，而此时才向美国飞机制造商下订单显然已经太迟。因此蒋介石希望在今后12个月内，中国政府能够获得美国援助英国飞机数量的1/10，或至少有1/20，中国就可以运用这些力量去打击日本海军，从而或许可以减低日本扩张野心，并帮助美国避免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蒋介石进一步说明，即便是美日之间的大战无可避免，但是如果中国能够获得足够飞机装备，则美国海军也很可能无须开到远东作战。[107]

两日之后，蒋介石仍恐没完全表达清楚，再度致电宋子文，特别强调："当七、八月间敌机来袭，我尚有少数飞机应战，故民心未若今日之动摇。唯今日我空（军）消耗已尽，再无法起飞迎敌，所以敌机敢在全国各地狂施轰炸，横行无忌。此实使最近民众转侧不安。尤以商民为甚，常转相问曰：如美国再不援助我国，则我继续牺牲果有何益乎？"[108]

这些话充分表露蒋介石之所以要求美国飞机孔急，并不是雄心勃勃地去建立强大空军，而是希图让人民早日脱离每日遭受炸射而无力还击的苦海。

此时几个其他事情也影响到中国对于美国飞机要求的态度。首先，罗斯福10月30日在波士顿城的一场讲演使蒋介石大为震惊。在讲演中，罗斯福提到英国在1939年向美国要求拨给1.4万架飞机，1940年又要求1.2万架。中国的要求和这些数字根本无法相比。其次，蒋介石也为美国国务院的一封来电而大感不安。该电文声称美国政府无法同意中国政府从已经生产出厂的飞机中购买的要求（大概是因为这些飞机都已经被其他国家预定），因此中国只可以尽快下订单，在尚未生产的飞机中购买200～300架。即便如此，国务院还是警告称，由于其他国家（如英国）早已签下订单，美国制造商未必能够满足中国的需求。[109]

但是在蒋介石看来，如果美国果真把中国抗战当成一场重要战争处理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作为说辞称美国居然无法提供200～300架如此小数量的飞机。出于这种思维，因此中国政府坚持必须立即获得200～300架飞机，尔后每年获得500～1000架战斗机的补充。[110]鉴于下订单费时费事，因此中国重申它的愿望，是从美国已经生产出厂的飞机中，或是在战争部服役的飞机中抽取这个微小数量。[111]

蒋介石在1940年11月1日电文中告诉宋子文，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美国政府共发出飞机运华出境许可证279架。而美国政府核准1940年度运华飞机的115架全数为教练机，而非战斗机，以致当中国受到日机进攻时，已无飞机可以升空迎战。中国的要求是在12月底以前务必接济飞机300架，而在1941年3月前运足500架。[112]

到了1940年11月，蒋介石要求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美国转达一份四项重大要求的清单，包括：2亿～3亿美元贷款；购买200～300架战斗机；邀请美国派遣军事和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提供境内空军基地供美军使用。这些都显示中国对美国援助要求的显著提升，同时也首度明确地说出究竟中国期望得到何种美国援助。这些要求的本质和范围清楚地表示，中国政府希望美国取代苏联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国，也和中国进一步发展为密切合作的军事伙伴，去对付共同的敌人。

正如在贷款谈判事务上一样，蒋介石对有关中国要求购买美国军火武器一事，最初并没有通知胡适，而是授权宋子文为政府唯一谈判者。[113]更有进者，蒋介石也授权宋子文全权裁量，是否想邀请胡适参与军火谈判。[114]毫不奇怪，宋子文决定此后再也不允许胡适参与任何有关军火的谈判工作。至此，胡适在借款和军购两个最重要的外交事务领域里，完全被排斥在外。讽刺的是，最初是胡适自主地宣布他作为大使不屑牵涉这两个领域，最后却演变成他被动地受到排挤，不得过问这两个领域。这绝非是胡适当初所能预见的发展。

中国提出购买飞机要求之后，就不断地遭到美方刁难。首先，美方认为蒋介石担心海运中断的危险是杞人忧天。美国大使詹森声言："日本或将进攻新加坡，此固为极可能之危机，惟恐未必立即发生。倘美国海军留驻夏威夷，英国在欧仍为强国，日本不经严重考虑，决不敢轻易发动此项战局。"[115]

其次，关于购买飞机的程序问题，美方所持立场是，其国内生产设备已经无法接受中国这么多的订单。根据胡适转述，国务院把中国买不到飞机一事的责任完全推给中方，而其所持的理由是：中国政府不遵照美国规矩去向制造厂订购飞机，而只是想买现成的飞机，纯属中国自身的失误并且浪费了宝贵时间。所以中国当前急务是向厂商开出订单购买飞机100～200架。虽然为时已迟，但是厂商至少可以允许中国政府插入少量订单（比如说25架）。[116]而胡适对于美方这番说辞照单全收，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改变或抗议。国务院的话等于圣旨，而他没有看出美国政府或是军方这种官僚呆板作风的可笑。其实于美国而言非不能也，

是不为也。如果美国政府看重中国的空军需要（数字小得可笑），就不致采用如此拙劣的遁词，而居然还能赢得胡适全心信服。怪不得美国国务院如此钟爱他。

面对美方的这些阻挠，宋子文的对策却是另辟蹊径。恰巧就在这个时节，宋子文得知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William Franklin “Frank” Knox）其实是美国内阁阁员中，最早关注中国军事需要的人士。11月诺克斯发表了一番谈话，其中主张美国应该向英国和中国提供援助，并且不应该和任何国家妥协。诺克斯并主张，美国应该给予英国和中国同等数量的援助。[117]

蒋介石很可能是受到这些事情的鼓舞，因此在1940年11月决定派遣毛邦初赴美支持宋子文的工作。毛邦初是中国空军高级将领，又是蒋家亲戚，了解飞机事宜，可以弥补宋子文专业知识的不足。他行事积极果断，而且是中国将官级军人中少数懂英文的人才。毛邦初到任不久就和宋子文合作无间，主动和美国军方领袖们联络，凡事直接向蒋介石通报，成为宋子文得力助手，共同争取美国军备援助。

当宋子文得知诺克斯部长计划派遣下属麦修（James M. McHugh，或译为麦区、麦克猷）少校，前赴重庆实地考察中国军火需求，以协助诺克斯向美国政府做出更务实的建议时，宋子文当即提醒蒋介石，麦修此行的重要性和早先蒋介石要求美国派送赴华军事代表团几乎相等，因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宋子文进一步指出，虽然麦修原本职务只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武官而已，但是他目前身份却是海军部长的亲信，因此非常重要。宋子文建议蒋介石亲自接待麦修，并且向后者坦陈中国最紧迫的军事需求。[118]

宋子文如此锲而不舍地设法去影响美国决策，不久也使他想到去运用英国关系，以迂回手法去达成目的。为此，宋子文警告英国驻美大使，日本已经着手把华南日军抽调到东南亚，准备在次年春天进犯新加坡。宋子文的动机显然是想要说服英国大使，提升新加坡防务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帮助中国获得大量飞机，以使中国地面部队在中国战区内进行有效反攻，这样就会使日本无法从华南抽调部队到南洋战场去进行新一轮冒险。但是宋子文也猜测英国或许会担心中国一旦成为空军强国，就可能威胁英国殖民帝国的地位，因此他再三强调，中国对于飞机的要求并非致力于长期性建立空军大国，而只是在短期内帮助英美两国绑住日本的地面部队。宋子文向英国大使表示，中国如果能够获得500架飞机，不但可以收复广州、武汉等地，还可以把一大批日本空军绑在大陆，使日本本土的防务显得空虚。依照宋子文的盘算，他希望能够说服英国大使支持中国向美国政府要求获得更多的战斗飞机，而不仅仅美国当时同意的此后两三个月内向中国提供约100架飞机。[119]

宋子文这种灵活手段，一方面固然是个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受到美国友好人士的敦促和建言。比方说，任职财政部的菲利普·杨（Philip Young）就曾经向宋子文建议，中国要想尽快获得美国飞机，最有效方

法莫过于直接求助于罗斯福。而宋子文随即告诉蒋介石称，美国联邦各部门历来运用各种行政法规作为借口，来拖延中国的要求，而罗斯福则是美国政府中唯一可以打破这些陈规而立竿见影之人。因为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只有罗斯福才能决定随时向中国提供飞机。[120]事实上，宋子文和蒋介石在此后的抗战期间，都对杨氏的忠告信奉不渝，任何时候当他们在和联邦部门打交道遇到挫折时，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直奔白宫求助于罗斯福。

3.摩根索倡议派遣重轰炸机进驻中国

1940年12月初，宋子文又想出一个新方法去争取美国飞机。由于英国对于购买美国飞机的要求是由财政部经手办理，宋子文也依样去找摩根索部长谋求解决之道。摩根索重弹老调，宣称美国飞机制造厂生产能力有限，无法为了中国而去增加500架飞机的生产量。但是他紧接着表示，假如中国愿意向东京、大阪等地实施轰炸的话，他可以敦促罗斯福从拨给英国的“空中堡垒”（Flying Fortress，B-17）机群中，抽调一部分派赴中国战场。B-17是当时美国最大型的长程重轰炸机。摩根索乐观地预测，罗斯福有七成可能批准这个方案。[121]

蒋介石不但对摩根索倡议充满热情，还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支持摩根索的论点。根据蒋介石的说法，中国抗战和欧洲战争原本就无法分割，因此最合理的战略就是尽一切努力趁早结束中日战争，稳定远东局势，然后再在欧洲寻求彻底解决方案。根据蒋介石的推理，遏止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行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使它无法分身实施南进政策。而中国此时的军事情报显示，日本南进政策将会在1941年4月付诸实行。因此，对中国来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趁日本不备，对其本土实施空中奇袭。依据蒋介石估算，中国如能获得500架美国最新型飞机，就有把握捆绑住日本空军的半数（1500架），使它们无法参与南进行动，甚至迫使日本完全放弃南进政策。因此，早在中国违背自己愿意接受美国“先欧后亚”（1942）全球性战略之前，蒋介石已经试图向美国兜售一个“亚洲优先”的战略观点。

至于中国究竟应该如何运用空军力量，蒋介石向罗斯福保证，他除了使用美国飞机保卫缅甸通道和中国各大城市之外，还要用空军去支持陆军地面作战、攻击日军飞机场、轰炸日本本土飞机场和工业设施等。而为了达成这些目的，中国必须尽快得到至少500架最新型美国飞机，其中包括有长程飞航能力的飞机，其性能必须超过日本飞机。

基于以上考虑，蒋介石提出了两个最低要求：第一，罗斯福本人需要介入，把美国飞机总生产量的5%～10%拨交给中国使用，并且尽一切努力使得中国能够在3～4个月内达到500架飞机；第二，美国向中国提供一定数量的“空中堡垒”，俾能轰炸日本本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双方的讨论越来越具体化，摩根索很快就成为美国政府内部最热心派遣“空中堡垒”飞机赴华的人士。过了不久，蒋介石开始领会到，重轰炸

机必须有足够的驱逐机护航，才不至受到日本战斗机拦截。蒋介石同时也主动承诺，中国将会在1941年3月前把内地飞机场跑道延长，以供重轰炸机起落。[122]

不久，摩根索透露美国计划派送12架“空中堡垒”到中国，预计在次年（1941）2～3月对东京进行轰炸。他也认为“空中堡垒”需要驱逐机护航，但是又指出当前美国驱逐机的生产量非常有限。[123]这些具体而细致的讨论，更增加了中国领袖们的信念，认为美国空军的支持必将付诸实行。罗斯福在1940年12月29日“炉边谈话”中，首度明确提出中国、英国和美国的命运休戚相关。这种表态当然更让中国领袖们感到无限鼓舞。

罗斯福称赞中国抗战不仅是一场伟大的卫国之战，也是为了自由而战。他进而宣布，美国已经准备要做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声称美国将会对中国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124]罗斯福这些话让中国领袖们兴奋不已，并且使他们乐观地相信1941年极可能是胜利来临的一年。[125]

不幸的是，在1941年元旦，中国政府从摩根索处得知，美国战争部和海军部双双向政府建议取消“空中堡垒”派赴中国的计划，理由是美国没有足够的驱逐机可以执行护航任务。[126]尽管此时宋子文已经和英国人达成协议，后者同意把他们在美国的飞机中先抽调100架驱逐机给中国，而且其中的36架在三周内即可移交，但是这依然无法改变美国的决定。[127]摩根索原始计划的撤销，使中国政府原本想急剧增加空军实力的美梦戛然终止。而摩根索的计划此时居然被美国新闻界探悉而成为众所周知之事，也让蒋介石心中对于美国军方不能保守秘密而蒙上了一层阴影。[128]

三 越南和缅甸通道的关闭

（一）中国领袖们不同的反应

中国领袖对于6、7月两个交通要道关闭事件的反应可谓截然不同。当蒋介石首次听到法德两国停战协议（6月底）规定，法国陆军和海军必须全面解除武装时，他对法国的懦弱只是表示震惊和不齿，但也同情法国根本没有和德国讨价还价的力量。[129]中国政府也十分清楚，法国对来自日本的任何压力同样无法抗拒。因此中国政府除了形式上做出抗议之外，并没有采取更积极的行动。[130]

但是中国对于英国关闭缅甸路的反应，则是极力试图挽回局面。其实在1940年6月底中国政府已经预测这两条通道可能出现问题，因此训令胡适敦促美国对日本施行全面禁运，以表达美国对英法两国的支持。[131]

事后看来，蒋介石当时对于远东局势发展的估计还真是和历史发展的轨迹高度吻合。蒋介石告诉胡适："倭如进占安南，则其粮仓与重要原料，已可解决大半。且安南如被其占领，则美若不事先积极表示，则其第二步必进占荷属印度。此时美虽将制止为时无效，请以此意昭告美政府。"[132]

但是胡适并不同意蒋介石的分析，反而劝告蒋介石必须体谅美国的困境，而中国应该自求解决之道。胡适指出，依据他国务院友人（可能是指亨贝克）的劝告，目前法国在安南不得不迁就日本，因此只能由中国驻安南当地官员私下疏通，而不可去麻烦美国。更何况，任何英美政府当前所执行的所有政策，都是在间接援助中国。言下之意，中国应该自我克制，不宜提出分外要求。[133]显然，胡适还是拿着国务院"友人"的鸡毛当成美国政府的令箭，堵住蒋介石之口，怎能不叫蒋介石为之气结？偏巧这时正值宋子文抵美关头，胡适还没有摸清状况，因此还天真地问道："宋子文兄来美，本馆应作何布置，乞电示。"而在蒋介石心中可能早就打定了主意，就是宋取胡而代之。不旋踵，胡适也接到信息称日本已经威胁英国政府不得允许中国军用物资通过缅甸，又闻美国政府已经劝告英国政府不要向日本屈服。[134]但是胡适始终不曾主动提出对策，中国究竟应该采取何种行动去影响英美政府。

胡适显然不能体谅6月上旬是重庆政府一个极为艰苦的时段。几乎在十天之内，各种压力铺天盖地而来，其中包括宜昌的沦陷、日本轰炸造成的重大伤亡、都市破坏和交通通信的摧毁，以及意大利参战，都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向斯大林要求尽快把苏联早已答应提供的飞机运来

中国。[135]

蒋介石不久就从宋子文处得知，罗斯福和赫尔似乎都认为英国关闭缅甸路乃是无可改变的趋势，居然还有些“美国朋友”要求中国不要对英国过于苛责。[136]但是蒋介石却决定不听胡适和“美国朋友”劝告，指示胡适和宋子文务必尽其所能地去争取美国支持，设法改变英国立场。[137]胡适当即回电转达美国国务院信息，劝告中国政府千万“不可因英国小让步而灰心”，无论如何必须公开声明不顾任何困难也会继续抗战。至于美国国务院本身，则仍旧重弹老调，声称正在考虑有效声援中国的办法，但是依然拒不做出实质承诺。[138]

过不了几天，胡适从英国驻美大使处得知的信息，就更让重庆政府焦虑：英国政府在最近一段时期内，一直热心于探寻促进中日议和之道。“据英大使所谈，彼所谓和等于全盘屈服，包括承认汪伪组织。”依据胡适推测，英国政府或将以三个月为期，封闭缅甸路，考其动机不外有二。一是英国再过三四个月又将进入浓雾季节，将迫使德军降低其进攻力度，届时就无须过分担心日本在远东所能施加的压力。换言之，封锁缅甸路是英国缓兵之计，中国政府应该予以理解，不必惊慌失措。二是美国政策将随国内大选揭晓而日趋明朗。因此英国的策略是“以三月为期，又声言于此三月中，将拉拢中日谈和，其用意或在暂时和缓远东形势”。这个局面导致胡适向重庆政府提出两项建议。其一是对于英国政府这一连串充满威胁的行动，胡适认为，“我方此时似可不必过分猜疑，谓为有意卖我”。其二是对于美国政府的意向，胡适鉴于美国政府一直声称它支持中国继续抗战而不愿中日进行和谈，因此他又主张“我国对美应有信心，不必因其迟缓即生失望”。[139]简言之，两者都是劝告重庆政府不要做出激烈反应。胡适也似乎同意美国的说法，缅甸路一事只是“小让步”而已，完全没有从中国抗战情势去考虑越南和缅甸的危机。或许他认为中国的对策早已经由他多次说明，那就是“反求诸己，苦撑待变”，因此才能如此气定神闲，对于英美政府行动不做任何加以影响的企图。胡适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所表现的“宽厚”，真是令人感慨不已。

而蒋介石对于这些局势的反应则是完全相反。根据他的看法，只有英美结合海军力量切实合作，才能抑制日本侵略气焰，而美国又是远东安危的最大关键。因此蒋介石询问胡适：“美国为何不能与英国积极合作以支持英国在远东之地位，而使之不畏日本之威胁。此中原因究竟何在？”[140]

一天之后，蒋介石再度致电胡适，把他对于远东局势的看法做了更详细全面的阐述。蒋介石的要点是：日本近卫内阁不是和平内阁，而必定会奉行军人的扩张政策，最近目标就是夺取东南亚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亦不能幸免。如果没有美国支持，则英国必定屈服，但是英国愈是屈从，日本的气焰将愈是高涨，最后仍将实现其侵略野心。届时即使美国再加以抵抗，也为时已晚。而日本看准了英美不能合作，更会无所忌惮。而另外一方面，苏联也担心美日妥协会使自己陷于孤立，因此它也只好与日本虚与委蛇。反之，如果美国采取强硬态

度，则苏联对日态度也会相应强硬。这两种变化都会深刻影响中国抗战。[141]因此，如果美国在近卫内阁甫上台之际，就与英苏两国创造合作局面，就更能阻挡日本扩张的野心。说来说去，美国已经成为中国抗战前途最重要的国际因素了。

和往常一样，胡适并不能体察蒋介石的沮丧和愤怒心情，也不认为再去努力争取美国支持还能产生什么效果。[142]他虽然把蒋介石的要求如实地转达给美国政府，却拿出耐心向蒋介石解释美国何以此时无法采取更积极的作为。依照胡适说法其理由有二。一是美国在历史文化上历来不与外国结盟，而且对欧洲国家向来心存疑惧。二是美国的和平孤立分子在国内依然势力强大。在大选即将来临之前，罗斯福不愿意背负好战之恶名，故目前只能增加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并和英国以默契方式进行合作。[143]换言之，美国不能在亚洲有所作为，主要是受了国内政治传统和气氛的束缚。[144]

与此同时，胡适也对英国行为做出最敦厚体贴的解释，劝阻中国不要过度反应，而应该让英国有充分时间去解决它自己的问题。中国也不应该企望美国加以干预，因为美国即使干预也未必能够改变英国的立场。因此，即使是事关中国抗战大局，胡适的基本态度依然是不要去打扰友好的西方国家，应该让它们自己去决定如何对待中国。换言之，中国应该采取被动姿态。蒋介石既然得不到胡适的认可，只好转向宋子文寻求支持。他要求宋子文务必敦促美国做出具体行动阻止日本进犯越南，美国犹豫不决只会鼓励日本以越南为基地攻击中国西南各省。一旦西南落入敌手，则即使西方国家仍然拥有新加坡，也将无法接济中国抗战。[145]

但是英国关闭缅甸路的行为，在重庆立即引起群情汹涌的声讨。蒋介石气愤难平，一度想要用粗暴字眼去攻击英国，指斥它根本是与日本侵略者同流合污，最后在幕僚极力劝阻下才改用了比较温和的语气。[146]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特别训令驻英大使郭泰祺，必须不假辞色地向英国政府做出最严厉的口头抗议。[147]重庆其他许多领袖的反应比蒋介石则更为激烈和露骨。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人对于英国行为的反感并非一朝一夕的突发情绪，而是经年累月的隐忍最终爆发出来。1940年4月，蒋介石已经嘱咐杭立武向英国大使转达中国的愤怒，其导因是不久前英国向日本建议，就天津储存的白银问题和日本签订协议。这个事件在中国政府看来，无异是英国为了讨好日本而不惜损害中国利益。杭立武提出警告称，如果英国与日本完成此项交易，则中国只能把它视为“敌对行为”。[148]其实，这个立场来自蒋介石。蒋认为如果英日之间为白银达成协议，则中国将视为英国参加日本对中国的共同作战，而中国也必将以牙还牙。[149]事后，英国驻华大使先是警告重庆政府外交部长以撤离重庆作为要挟，之后又亲自拜访蒋介石寻求转机，但是蒋介石坚守中国政府立场绝不妥协。[150]

自七七事变以来，英国政府曾先后多次向中国施加压力去和日本进行和谈，这些行为都使中国感到愤怒不已。1940年4月英国又着手新一轮努力，由英国外交大臣在伦敦向中国大使探询，中国政府是否有意愿和日本进行“直接”和谈。郭泰祺大使不得不重申中国政府一贯立场，即中国只愿意在英美等国介入的情况下在华盛顿或是布鲁塞尔与日本举行和平谈判。[151]换言之，中日和谈必须有国际参与和保证才能进行，中日之间无直接谈判可能。

英国在试图拉拢美国合力向中国施压接受和平的努力失败之后，决定采取更直接的方式进行。7月中旬，英国外交大臣直截了当地告诉郭泰祺，中国必须向日本求和。英国在新加坡代理总督斯坦利·琼斯（Stanley Jones）发表广播演说，声称英日两国正在进行合作，共同探讨促进东亚和平的方案。因此，英国政府将避免一切延长亚洲战事（指中国）的援助项目。即使英日两国政府不能达成合作协定，英国唯一的敌人依然只有德国，不会伤害和日本的感情。[152]他除了撇清一切有关缅甸路关闭的责任之外，竟然还威胁称，如果中国拒绝向日本求和，则英国将无法保证云南到缅甸通道畅通无阻。中国政府当即训令郭泰祺断然拒绝英国要求，并提出严正抗议。[153]

读者对重庆政府此时所面临的微妙处境，必须要有一个充分认识。因为在中国政府内部，有一小部分领袖（如孔祥熙、王宠惠等）一直对战局抱持高度悲观态度。现在英国的和平建议，正好呼应了他们想说而又不敢说出的内心话。然而对于那些历来坚决主张抗战的领袖而言，则英国建议完全缺乏说服力，甚至被视为一种出卖。对于后者而言，中国之所以致力于维护缅甸路通畅，正是因为想要获得大量军事器材去持续抗战。假如中国被迫求和，英国人即使承诺维持缅甸路通畅，则对中国又有何意义？

而对于某一些领袖而言，在遭到英国人的背弃之后，他们仍然决心继续抗战，甚至愿意去寻求极端的方案去达成目的，其中最极端的方案莫过于倡议和德国合作。7月初，当两条通道的关闭看来势不可免时，孙科就提议向德国派遣特使以缔结亲密的中德关系，而且获得相当多政治领袖的共鸣。[154]就在丘吉尔宣布关闭缅甸路当天，孙科再度主张中国应该立即召回驻英大使，宣布退出国际联盟，然后和德国及苏联结成盟友。在次日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孙科的言论又受到相当一部分出席者的声援（包括张群和王宠惠），但也遭到吴稚晖等的反对。[155]

事实上，由于国际局势在1940年4月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那些主张和德国结成战略伙伴的人的言论就颇能引起共鸣。有一群学者甚至在昆明创办了一份杂志，名为《战国策》，公然赞许德国的成就，而这种论调在当时知识分子圈中颇为流行。[156]即使是声誉卓越的《大公报》，也在此时刊载了若干明显亲德和亲苏联的文章。[157]

即便到了1940年末，政府领袖之中依然有人倡导联德制日，[158]其中以朱家骅和齐崚的立场最为极端。依照朱家骅预测，苏联缺乏能力从

事长期战争，因此必会战败。尔后德国或许会再度向中国建议寻求和平解决中日之争，而中国应该珍惜与德国的感情。齐峻则认为许多德国领袖对中国存在好感。朱齐两人明确主张中国应该倒向德国，放弃任何和西方国家亲善的妄想。[159]

应该在此说明的是，这种亲德言论的突然出现，并不代表这些人突然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心仪者。他们所表达的，只是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漠然无视感到极度失望和伤痛。在他们眼中，西方国家对中国落井下石和背信弃义的行为，只能逼得中国走投无路。在这四面楚歌的环境下，一部分中国人为了找寻出路使抗战得以继续进行，只好把德国当成最后的救命草。换言之，此时重庆政府部分领袖的言论和民间的亲德表现，是被它们的仇英情绪所激发的，两者关系密切。但是他们一个共同的原动力，就是急于想找出一条路，让中国能够获得足够武器继续抗战。这股力量的背景是对于西方国家背弃的反击和对国际权谋的盘算，而不是对纳粹主义或是希特勒的认同。这个认识至关重要。因此某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把此时的公共舆论看成接受法西斯主义，他们其实还需要做出更深刻细致的研究和论证。

相对而言，当时重庆政府也还有一群头脑冷静的人士，为这种反西方言论深感忧虑，认为他们所提倡的无异于自杀行为。比如说，王世杰就曾经担心，如果政府高层人士的这种亲德反英言论流传到西方国家，中国会立即丧失西方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为此，王世杰恳求蒋介石务必不可放弃中国的原则，而且应该提出警告，如果中国采取亲德策略，必将自食恶果。他本人也恳求《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停止该报的亲德言论，以防止中国失去美国的支持。[160]

在如此众说纷纭的局面下，蒋介石所采取的立场，则正好和他那些怒火填膺的幕僚相反。他始终坚守的立场，就是美国才是中国最忠实的盟友，也是唯一可以给予中国最大限度帮助的国家。面对孙科等人的联德主张，蒋介石明白表示中国的亲英亲法外交立场不会改变。他对孙科的具体反驳是，德国海军势力根本无法进入太平洋地区协助中国，而美国和苏联的基本国策又是反日。只要中国坚持继续抗战，美国的重整军备政策终究会导致日本陷入劣势。[161]

当蒋介石接到胡适的报告，称美国政府某些官员希望中国可以拒绝英国有关和平的建议，而且指出美国政府正在寻求援助中国的方法时，蒋介石立即发表声明批评英国的态度。[162]无可置疑，美国政府的信号可谓来得及时，加强了蒋介石拒绝和平和坚持抗战的决心。他随即向其他领袖宣布，反对从英国召回大使，也反对自国际联盟退席。他也向他们透露，美国政府正在设法给予中国一项贷款，帮助中国向苏联或是美国购买武器，但是试图取道海参崴运回中国，这样就可以大幅减低英国关闭缅甸路所能造成的伤害。[163]

因此，尽管幕僚被英国人的背弃勾起万丈怒火，蒋介石依然决定把中国的命运和西方民主国家连接在一起。事实上，随着缅甸路危机日益

加深，蒋介石也下了更大决心，务必要完成中、英、美、苏四国合作，作为对付日本侵略最有效的方法。当然，他这么做也给自己增加了极大的压力，要去争取到更多的美国财政和军事援助，帮助他向其他政治领袖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

至于宋子文在处理这次危机中的作风，则再度显示他和胡适的不同之处。1940年7月，当中国国际通道危机初露端倪之时，宋子文就立即采取行动，试图把它的伤害减至最低。宋子文首先想到的就是和罗斯福商讨是否可以避免缅甸的遥远路线，而由中国“向美借款，向俄订货，由西北运华，成一三角方式”。[164]继之他又去和苏联交涉，允许美国武器假道海参崴运往中国内陆。[165]虽然苏联的反应并不支持，[166]但是宋子文已经充分表现出足智多谋的特色，因为此时离他抵达美国才仅仅几天而已。

事情很快就变得明朗，蒋介石不但需要依赖宋子文和美国人打交道，也需要他去安抚国内其他领袖。如前所述，此时国内许多领袖正为国际通道关闭之事而对西方国家产生强烈仇恨，而宋子文此时提出的中、美、苏三国通过海参崴运送武器的高招，使得蒋介石能够提出一种方案去平息这些领袖的怒火。缅甸路虽然最后不免关闭，但是宋子文维持和英国驻美大使之间的联系不断，使他间接得知英国最关切的乃是欧战局势，因此只要美国能够给予英国更多援助，则英国将不需顾忌日本而敢于重新开启缅甸通道。一旦宋子文得知这个重要信息，他立即与美国政府官员和新闻界人士密集接触，敦促美国政府增加对英国的援助。不久，宋子文又从澳大利亚驻美公使处得知，英国实际希望美国能够给予明确而具体的军援和经援数字，才愿意重新开启缅甸路，他又直接要求罗斯福给予英国足够的支持。[167]虽然我们无法确知宋子文的努力是否对美国同意租借50艘逾龄舰艇的决定产生过影响（它的时机和缅甸路重开不谋而合），但是宋子文这种夙夜匪懈的办事精神，对于蒋介石而言肯定是一个崭新体验，特别是胡适在这些高阶层活动中几乎从未露面。

（二）危机的化解

令人感到颇为荒唐的是，缅甸路危机其实和英德两国关系有着密切关联。这个道理并不复杂。虽然两国在欧洲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搏斗，但是它们在亚洲却不约而同地追求同样的目标，那就是在不同时段里试图说服中国政府向日本求和，以保障它们各自的利益。英国在1940年初夏试图压迫中国接受和平，而德国则在几个月后也试图重新扮演仲裁人的角色。虽然德国从1938年初调停中日战争遭到中方回绝之后就一直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现在看到中国对英国的怨愤，又重新燃起了它的奢望。

在欧洲方面，战争局势已经到了1940年9月已经明朗，德国迫使英国屈服的希望已经落空，因此它不得不面对要和英国进行长期作战的局面。既然如此，希特勒自然就更希望获得日本的合作，在远东地区压迫英国殖民地。其结果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终于在1940年9月27日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168]

这些国际大变故的影响很快就显示出来。丘吉尔在10月3日告诉郭泰祺，轴心国成立使得国际局势大为明朗，也使得美国孤立主义分子气焰大受打击。但是丘吉尔还是死不认错地想要为英国关闭缅甸路一事进行粉饰。依照他的说法，假如当初英国没有在缅甸路对日本让步，则日本很可能早已对英国宣战。而在英国做出让步后的局势，则大有利于英国的处境。因为它得到了美国50艘驱逐舰的支持，而美国政府也决定加紧对日本禁运，以阻遏日本对于越南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野心。[169]缅甸路关闭是英国的屈服，而受害者当然是中国，但是丘吉尔言外之意似乎是中国也无须抱怨。10月8日，丘吉尔在和日本协议的关闭期届满之时，宣布重新开启缅甸路。[170]

（三）新一波的和谈动向

缅甸路重启对于中国而言当然是大喜讯，但是同时也增加了德国的压力，促使后者加紧外交攻势，务必促成中国早日与日本缔结和约。在10月底，中国突然谣传纷起，指称德国正在极力促使中日两国进行和谈，而日本也乐意做出正面反应。还有谣言声称，日本新任驻苏联大使也将要求斯大林调停中日战争。中国政府当然心知肚明，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向日本传递任何和谈试探。所以这些谣言只能来自日本和德国方面的蓄意散布。但当王世杰为了让英美两国安心，而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发表一项严正声明去否认这些谣传时，蒋介石却主张中国应该暂时保持缄默。[171]蒋介石此时的动机，很可能是想借此让西方国家陷于某种程度的焦虑不安，而增加其对中国的重视。

其实重庆政府只是将此时和平活动的一小部分告知美国，这些活动既然牵涉其他国家（德、苏），最终仍将被美国得知，则重庆政府还不如坦然告知美国。相对而言，日本本身也经由更多渠道设法和重庆政府重启和平谈判的可能性，而重庆政府在拒绝接腔之时，却没有把这些信息逐一向美国传达。然而，即便是中国政府如此控制信息，后来仍然被一部分美国人认为是中国政府故意捏造和谈谣言来要挟美国，误导美国担心中国果真会和日本讲和，而迫使它增加援华的数量。史料显示，中国政府所言不但都是事实，而且其实际内容远远超过它向美国所透露的。无奈美国某些官员和学者，都利用自己的想象力对史料做出违反史实的解读。

具体而言，中日之间的和谈风云可以分为两部分去理解，一部分是

中日之间直接的接触，另一部分是假手外国斡旋。

1.日本的主动

中日之间的接触在1940年似乎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期，多半是由日本官方或民间热心人士发动。大约从7月开始，日本就利用各种渠道向重庆政府表达和意。当时大轰炸已经开始，也是缅甸路关闭之初，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际，蒋介石认为日本人是在玩弄两面手法，一则以威迫，二则以利诱，因此决定置之不理。[172]当时日方和重庆政府的接触，似乎是以张季鸾为中转站，因此蒋介石还特别选在七七事变纪念日给张季鸾写了一封信，嘱其对日方响应时必须表达的原则。其重点是：

甲 谈政策不谈条件。乙 谈感情与利害而不谈权利得失。丙 对于中国人心之得失，应令特别注意苏俄对华之宣言（放弃在华特权）丁 放弃北平至山海关驻兵权。戊 汉口租界提前取消。己 内河航权取消。庚 青岛与海南岛完全交还。辛 热河先行交还。壬 东三省问题，借用港口问题，东亚联盟问题，待和平完全恢复撤兵完全实行后再谈。癸 天津与上海租界定期交还。子 保障问题。丑 撤兵手续，平绥路张家口与归绥一带必须在第一期撤完。[173]

即便是英国人此时雪上加霜地关闭了缅甸路，蒋介石仍然斗志高昂地写道：“余以四川为中心，尚有百万基本军队，倭其奈我何？”[174]

7、8月，蒋介石对于日本的政策获得了进一步了解。首先是近卫内阁做了一个政策声明，宣称日本外交的最终目的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求取中国事件之完全解决则是建设“新秩序”之第一步。希望能以“日满华三国”团结作为基础，施行弹性方针。[175]依据蒋介石分析，日本海陆军之间矛盾深刻，而近卫内阁左右为难，国内不满情绪高涨，随时有倒阁可能，所以才会如此急于引诱重庆政府谈和。[176]而重庆政府的对策，当然是不落入日本圈套，反而应该坚决拒绝，才能促使近卫内阁加速倒台。

8月初，又有日本间谍名为“和知鹰二”者，透过希腊商人向重庆政府表达和意。蒋介石的反应是日本政府已经有高度迫切感，而究其缘由则是英美两国最近采取了高姿态，使日本更急于结束中日战争。[177]与此同时，日本又运用另外渠道与重庆政府接触。[178]

日本这种看似饥不择食的手法，也不禁增加了蒋介石的担忧。在他看来，如果日本的求和是出于诚意，则其手法之拙劣简直是蠢不可及。反之，如果日本只是玩弄诡计，则其对蒋介石坚定维护主权的立场缺乏了解又令人担忧。为了让日本政府放弃这些妄念，蒋介石特别选在“八一三”纪念日对日本做了一番不留余地的谴责。[179]到了8月底，日本又改变宣传策略，以即将承认汪精卫政权作为要挟，希望重庆政府能够尽快与日本签订合约，并且以12月1日为最后期限。蒋介石的反应除了是指

斥“此种欺骗手段可谓拙劣无比”之外，也认为日本这种伎俩正能帮助重庆政府促使英美两国接受蒋的合作方案。[180]到了此时，蒋介石拒绝和谈的立场在重庆政府内部已经没有反对声音，但是在外省仍然有杂音。比如说，9月“滇龙于九日有和平运动之拟议，可痛”。[181]

2.外国的斡旋

至于假手外国斡旋和平的动作，则早在1940年7月，重庆政府就得到消息称日本在运动德国出面调解，但当时对此还只能半信半疑。[182]到了1940年底，日本政府自己放出消息，宣称将在短期内承认汪精卫政府，又宣称日方和重庆政府也将达成停战协议，警告英美政府不要干涉中日和谈过程。而就在此时，德国政府开始紧锣密鼓地配合日本，推动中日和平。戈林（Hermann Goring）首先在10月要求中国接受对日和平。而与此同时，日本松冈洋右外相又表示希望重庆政府能够参加轴心国并与汪精卫合作。[183]

11月11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终于忍不住，正式把德国想要调停中日战争的意愿告知中国驻德国大使陈介。里宾特洛甫宣称，欧洲战争最多拖到1941年春天必定会有一了断，警告中国如果不赶紧向日本求和，则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就必然会承认汪精卫政府。里宾特洛甫进一步预测，中国局势将无可避免地持续恶化，使得英美两国纵使承诺援助也将无法付诸实行。反之，如果中国与日本签订和约或甚至加入轴心国阵营，则德国愿意做出保证，日本必定会履行和约。[184]蒋介石日记也证实：“德愿保证中倭将来和平条件之履行。”[185]

由于德国传递此项信息的时机，正值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访问柏林之时，它也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以为德国此项建议必定已得到苏联支持。这给中国政府造成了极大压力，也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极大的诱惑，那就是在即将来临的全球性对抗之中，中国或许应该加入轴心国行列。

陈介把里宾特洛甫的信息送呈国内后，王世杰立即看出德国的诡计，是图谋离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进而为日本的南进政策铺路。因此他马上通知胡适，必须敦促美国尽快采取行动给予中国支持。[186]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徐谟也在1940年11月19日向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做了通报，把里宾特洛甫和陈介接触的内容做了详细说明。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需要在此说明。在英国决定重新开启缅甸路之后，蒋介石得到的印象是，英美两国似乎又打算回到原点，继续对中国的援助要求不予理睬。而蒋介石已经打定主意，不再接受英美两国此种忽视态度。为了向它们施加压力，蒋介石向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Kerr）提出警告，假如英美两国在今后两个月内依然不向中国提供实质援助（指军事、政治和经济援助），中国将被迫“另谋出

路”。当然这本是气愤之词，但是也能让听者不敢掉以轻心。不过王世杰也曾经告诫蒋介石，这番话并不能产生预期效果，因为英国大使当然知道中国既不可能与日本谈和，也不可能参加德国阵营。王世杰建议蒋介石在下次与美国大使会谈时，千万不可再说这种赌气话，而应该把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情况如实说出。[187]

然而蒋介石对于被忽视和被牺牲的怒气，并不能如此容易平息，而里宾特洛甫向陈介提出的和平建议又给了他难得的机会去一泄心中之愤。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德国到了这个时候还锲而不舍地想促成中日和平谈判，对中国不惜使尽威迫利诱功夫；而另一方面，蒋介石却亲自指示外交部副部长徐谟把里宾特洛甫和陈介之间的谈话向美国政府全盘托出。蒋介石之所以这么做自有他的动机。虽然缅甸路危机已经渡过，但是蒋介石心中依然感到极度愤懑，因为西方国家并没有增加对中国的实质帮助。他很可能以为应该采用另外一种方法，去让西方国家感到紧张才对。他想要让美国人知道，他们绝不可以继续对中国的援助要求无动于衷，因为德国正在加紧拉拢中国。

3.缅甸路和对美关系

从整体观之，越南和缅甸通道所产生的危机，是1940年下半年中国抗战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由于它们肇因于欧洲战场上的剧烈变化，因此中国完全没有能力阻止其发生。一旦危机爆发，中国只能尽其所能地使缅甸路运输得以早日恢复。中方资料显示，蒋介石训令胡适和宋子文在美国达成双重任务：一是运用美国影响力压迫日本放弃占领越南的念头，二是敦促美国给予英国足够勇气抵抗日本压力。

就第一个任务而言，它最终归于失败，因为尽管美国决定扩大其对日本的禁运，但是日本依然执意占领越南。在此或许可以做出一个历史的注脚。1940年8月，日本占领越南的事实已经无可扭转。此时连胡适也终于承认，“安南事，贝当政府之决心卖我，似已无疑”。但是胡适却在这个局势无可救药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对策，那就是建议重庆政府尽快派送几位在法国学术界享受盛誉的中国学者（如王宠惠、翁文灏）前往河内，“恳切商讨中越间共同御侮之问题，或可尚有百一之挽救”。[188]胡适在再三给重庆政府泼了冷水，劝其不要去麻烦美国政府或是责怪法国政府之后，竟然以“神来之笔”提出由重庆派出几位手无寸铁的文化人去扭转乾坤，真是叫人啼笑皆非。这怎能不让蒋介石气破肚皮？事实上，当日本海陆军在9月进入越南并与当地法国军队发生冲突时，重庆政府也只能默默地进行了炸毁中越边境桥梁的准备工作。[189]

就第二个任务而言，当美国的支持最终导致英国在三个月后重开缅甸路时，它可谓是成功的。导致这个结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胡适和宋子文各自也做出了他们的贡献。总的来说，胡适基本上只是把蒋介石要求美国介入的信息忠实地向美方传递，但是在私下却认为这纯属多此一

举。他内心是同情英美两国的困难处境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宋子文超越了蒋介石的指令，争取主动，多方面而又不厌其烦地和美国、苏联、英国，甚至澳大利亚的官员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可以说，无论就精力的投入或思路及手段的灵活性而言，宋子文的表现均大大超过胡适。

但是严格地说，缅甸路重开仍然只是危机暂时消失而已，有两个可能依然存在。一是英国可能在新情况下在外交上再度向日本屈服；二是日本可能直接进攻缅甸，进行军事占领。事实上，虽然英国在10月上旬重开缅甸路，11月蒋介石已经担忧日本会悍然占领缅甸，切断中国的生命线。[190]要防止前者，中国政府会效法往例，要求美国斡旋；要防止后者，则中国必须让英国在防务上感到安全，才有国际合作方案的提出。

四 中国争取国际合作的努力：时机、动机和展望

（一）最初的尝试

中国想经由国际合作途径去抵抗日本侵略的念头并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长时间酝酿形成的。特别是当中国政府眼见自己国家利益被那些自诩为“中国友人”而实际上向日本压力低头的国家漠视时，更是感到痛切不已。尽管中国领袖们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力未必幼稚拙劣，但是由于国力不振，因此他们的行事弹性处处受到限制。在这整个过程中，中国领袖们一直试图寻求一套计划，既可维护本国利益，又可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

在这个前提下，中国在1939年最初的想法其实非常低调，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在亚洲进行外交干预。这个想法随后逐渐演变为要求成立一个较正式性的合作关系。1940年初期，蒋介石再度训令胡适敦促罗斯福向英国和法国提供更多支持，鼓励这两个国家敢于对抗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此时重庆领袖们普遍认为，虽然英国在亚洲拥有许多军事基地但缺乏军事实力，而美国则有广大兵员却缺乏军事基地，因此这两个国家在亚洲结成盟邦乃是最合理有效的安排。[191]大概在1940年7月初，蒋介石开始思考设法促进英美两国就远东事务进行合作。根据蒋介石的判断，日本近卫内阁上任后必定会秉承军人旨意，积极向南洋发展，矛头指向荷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此只有美国主动与英国合作，才能为英国壮胆去遏制日本的野心。[192]到了7月底，蒋介石看到英日之间的摩擦似乎变得严重，但是“美国对倭避战之势益明”，而美苏携手抵制日本或是英美在远东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又都逐渐降低。他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已经占了上风，并且将使中国的处境更为困难。[193]中国政府对于苏联意向的估计，则是来自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7月中旬，邵力子在给重庆的报告中称苏联政府此时缺乏与美国就远东事务进行合作的意愿，唯一的改善办法是由美国主动向苏联提出具体友善措施（比如说，由美国取消对苏联的禁运）。为此，蒋介石希望宋子文能够就近敦促美国政府与苏联进行实质性会商。[194]但是他也知道成功的希望极为渺茫。

然而不久，等到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在越南和缅甸通道危机声中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之后，许多重庆领袖越发相信国际局势将加速对中国有利，因为轴心国之成立将使得中国和德国关系不再会模糊得招惹西方国家猜疑。当蒋介石向政府领袖们说明三国条约对于中国前途的含义时，与会领袖们一致对于前景充满乐观心情。张群、王世杰和刘斐建议政府应该立即发表声明谴责三个国家，召回大使，并尽全力和西方国家

结成亲密关系，去对抗日本在亚洲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企图。孔祥熙和徐谟建议中国应该立即要求英国重开缅甸路，何应钦则推测日本甚至可能趁美国备战尚未完成之前向美国宣战。

与这些政府领袖不同，蒋介石首先注意到的是同盟成立的仓促。根据他的信息，三国前后仅用了20天时间商讨即宣告签订同盟条约。在他看来，这必然是日本少壮军人急不可待的结果。他甚至嘲笑日本军人的愚蠢，竟然妄图运用德国力量说服中国政府终止抗战。[195]

其次，他认为三国条约签订将促使中国的命运更紧密地和西方民主国家连接在一起，牢不可分。正如他所言，这种发展本来就是中国长期期望而没有得到者，现在终于成为事实，因此抗战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196]但是蒋介石同时体会到，三国条约也可能使欧战延长。为此，他认为中国必须有心理准备，再和日本进行三年战斗。因为中国也必须做最坏打算，那就是它和西方国家的通道可能完全被切断，而日本和苏联之间也可能达成合作协议，甚至间接使国共之间关系转向恶化。[197]

第三，针对三国同盟，蒋介石还慎重地列出了今后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坚持抗战，拒绝与日本谈和；向英、美、苏争取增加它们对中国的援助；维持抗战的独立立场，无须投靠任何国际集团；只要苏联愿意，中国应该特别强调中苏关系；世界大战决定于科学和技术，因此一旦苏德之间发生战争，则苏联必然与美国合作。[198]

尽管他的想法如此，蒋介石还是主张中国应该等到英国谴责日本之后，再谴责德国和意大利，以免上当受骗。与此同时，他心目中更重要的工作是敦促美国、英国和苏联接受与中国更密切合作的计划。[199]总的来说，蒋介石认为，三国条约签订将会使美国更认真对待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且愿意给予中国更多援助。[200]

面对这个复杂的国际局势，此时有一小群高层人士有颇具慧眼的分析，其中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将军最具代表。徐永昌认为即使英国谴责了日本，中国对于谴责德国和意大利一事仍应小心从事。他对于苏联、英国和美国加诸中国的轻视无法释怀。依他的分析，中国之所以招致这些国家轻视，其缘由就是它们认定中国绝不会和日本讲和，因此胸有成竹而无须认真帮助中国。在他看来，中国争取西方国家重视的方法，正应该是去增加它们的忧虑和不安，误认中国可能跟日本言和而导致日本加强与西方国家抗衡的实力和决心。他更进一步指出，设若中国要鼓励日本执行南进政策去挑衅西方国家，则最好的方法就是停止激怒日本，并同时向德国虚予示好。[201]虽然徐永昌的建议并未被采纳，但至少显示当时的确有一部分中国领袖对于西方国家的轻视深感不满，乃至不惜利用德国和意大利作为工具，去提醒西方国家应该更重视中国对于抵抗侵略战争所做出的贡献。

一般而言，大部分重庆领袖对于美国在处理德国和日本问题时所采取的日趋严苛的态度感到欣慰。他们同时也希望美国能够主动改善和苏

联的关系，并且联合力量去遏止日本的扩张。至于缅甸，由于它可能遭受日本军队来自泰国的攻击，因此中国政府认为最好的防御方式乃是由中、英、美三国合作，并建议这三个国家尽快指派参谋人员着手计划工作。[202]

最后，中国领袖们还体察到，万一美日之间发生冲突，中国在很长的时间内可能都将无法获得国外的军事援助，因此敦促美国务必尽快运送一大批军火前往中国，俾使中国在美日开战之前有足够军火支持继续对日作战。[203]

（二）对国际局势的新评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开始认真考虑美日之间开战的可能性。根据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的情报，美国海军部曾经预测1941年初美日之间可能开战，而美国政府最近又把85名军官晋升为将官级，其目的就是为扩展陆军做先期准备工作。[204]重庆领袖们同时也注意到，美国和日本两国的高层领袖在言辞上似乎逐渐失去控制，肆意攻击对方。[205]但是更重要的是，宋子文在1940年10月中旬呈交给蒋介石的报告，其中提到美国政府可能已经默认美日之间的战争将无可避免。根据宋氏的说法，美国之所以有这种态度，并非出于同情中国，而是世界其他地区情势的转变，逼使美国走向战争之路。[206]

在如此瞬息万变的世界局势之下，苏联的动向再度成为中国领袖们最大的关心点。最忧虑的是他们西方国家对苏联毫不掩饰的敌意，很可能会把它推进轴心国阵营。特别是法国战败（1940年6月）让德国取得优势地位，更对苏联造成重大压力。到了9月底，中国收到的情报显示，日本已经直接向苏联提出建议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性质和1939年苏德间的条约基本相同。这一消息使中国政府大感不安。与此同时，日本新闻评论员也开始公然倡导日本和苏联应该签订一项协议，在亚洲划分出各自的势力范围，并且由苏联承诺帮助日本结束中日战争。[207]几乎在同一时段，中国从柏林方面传来的情报也显示，日本和苏联之间在短期内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由苏联承诺不再向中国提供援助。[208]

蒋介石对上述事态有自己的分析。依据他此时的想法，苏联的对华政策有几种发展的可能性。第一，既然日方已经向苏联做出让步，而且日军锐气已消，则苏联就无须继续利用中国去钳制日本。换言之，中国的战略价值相对降低。第二，苏联可能会防止中国加入轴心国阵营而完成对苏联的包围，因此在中国会加紧扶植共产党势力。第三，英美全神贯注地对付轴心国，也可能让苏联有机可乘阻止中国加入英美阵营。[209]以上无论何种可能，显然都对中国不利。

10月底，更令人担忧的消息直接从苏联传来。根据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报告，德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向中国大使馆传递信息，称德国和苏联共同希望看到中日和谈及早实现。这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因为它正值日本新任大使抵达莫斯科就任，而这位新大使所强调的政策，就是要增进苏联和日本间的亲善关系。[210]

总而言之，1940年世界局势的两大发展让中国感到忧心忡忡。一是美日之间关系的恶化，二是苏联和轴心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对于中国而言，它所面临的外交挑战，是如何从美日关系恶化的过程中获得最大好处，同时也要防止苏联不致和轴心国关系过分亲密，或者至少把这种可能性对中国产生的伤害降到最低限度。

（三）国际合作计划的酝酿

中国对于这些国际挑战的因应，是尽一切努力去促成一个国际性的对垒阵营，包括英国、美国甚至苏联，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中国政府完全了解，要想让这个胆大构想成为事实，首先必须说服美国接受领导地位。[211]

至少从1940年9月起，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一个立场，认为要建立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对立团体完全有其可能性。9月底，中国政府又接到其驻美武官报告称，日本入侵越南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孤立中国，而是为进攻新加坡和东南亚做准备，而美国也很可能因为抗议日本对越南的入侵，而断绝美日外交关系。报告还指出，美国可能在1941年向欧洲战场派遣空军和海军部队，参战目的是首先打败德国。[212]几天之后，这个情报的准确性似乎又被日本证实。日本在上海方面传出消息，称如果美国执意帮助中国的话，则日本将视美国行为是蓄意挑战。[213]

1940年10～11月，美日关系的发展使得部分中国领袖相信，美日之间爆发大战完全有可能。10月初中国情报显示，德国很可能劝说日本及时把握其占领越南的优势，趁势向新加坡发动攻击，而德国也可能想说服日本，趁美国大选尚未举行，向西方国家进行总攻击，这样才能把日本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蒋介石当时对这几则情报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认为如果日本打算向英美等国发动攻击的话，则它应该抓住机会尽早执行。因为日本能够掌握优势的机会非常短暂，时间一拖长，西方国家必会重新赢得上风。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训令宋子文把中国政府的情报提供给英美两国，并且敦促他们及早做出相应准备。[214]就在此时，中国政府接到英国的要求，希望中国派遣部队前往云南缅甸边境以防止日本出兵侵犯缅甸。但是英国的要求也让蒋介石得到一个印象，那就是中国方面有关军事合作的提议，已经获得英国政府默许。因此蒋介石当即接受了英国要求，派

遣军队进入该地区。[215]

蒋介石在10月初就接到详细情报，称日本进犯越南的目的乃是在和其他两个轴心国盟邦施行全球战略：德国协助西班牙进攻直布罗陀及北非，意大利进攻苏伊士运河，日本则以越南为跳板和泰国军方取得联系后进攻新加坡与香港。蒋介石高度重视此项情报，嘱咐宋子文警告英美两国必须及早准备，设法建立共同防御协定。依照蒋介石的判断，日本必将因感受到压力而在一年内采取行动，否则其军力就会落后于美国。[216]

他进一步嘱咐宋子文直接和美国政府接触，讨论有关中美两国就东南亚问题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军事合作，而且认为中国的努力必将对日本产生极大压力。[217]在蒋介石看来，即便日本不执行南进政策，它也必将加强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因此中国也需要充分准备，以为防范。[218]换言之，无论日本与英美关系是恶化或是缓和，中国都可以从和英美合作中得到好处。

大约在10月下旬，蒋介石开始认为应该向英美两国提出更具体的合作方案。他原本设想是首先向英国提出，然后再决定是否应该也向美国提出。他认为，一旦中、英、美三国同意这个方案，也可能迫使苏联及早决定究竟是参加轴心国还是西方国家阵营。[219]

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之下，蒋介石在1940年11月1日正式提出了一份文件，名称是“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目的是共同协力对抗日本。中国要求英美两国承诺遵守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政策，作为远东与太平洋地区维持和平稳定的准则，明确反对日本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野心。蒋介石建议三国签订一项承诺，如果其中任何一国遭受日本攻击，则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他还建议英美两国向中国提供2亿～3亿美元贷款，维持中国币制稳定，向中国提供500～1000架战斗机（并立即运送200～300架到中国）。另外还要向中国提供军事、经济和运输专家帮助中国抗战。而中国的贡献则是向英美两国提供它境内全部的飞机场和全部陆军与英美军队在未来联合作战。[22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抗战对于外交政策的运用，似乎向积极和明确的方向迈了一大步。首先是原则问题。中方提出三个原则：中国之独立自由是远东和平之基础；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是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的法律依据；反对日本建立“大东亚新秩序”。[221]

对中国新发动的这一轮外交攻势和倡导国际合作一事，蒋介石决定由宋子文负责推动和作为主要代言人，而把胡适冷落在一旁。这表明蒋介石此时对于胡适推动国际合作的工作已经完全失望。[222]事实上，至少从8月开始，蒋介石每隔一个月就会把注意力放在撤换胡适的适当时机问题上。他不但和宋子文先后商量过单独撤换胡适而以颜惠庆或施肇基取代胡适的利弊，[223]到了11月底还更把撤换驻美大使和更换驻其他国家大使（法、德、英）放在一起考虑。由此就可以看出蒋介石此时是

如何对胡适的工作表现耿耿于怀了。[224]12月上旬，蒋介石的立场更为明朗。他致电宋子文讨论国际合作问题时指出，既然英美两国已有实质性军事合作，则此时不宜提出中、英、美三国合作计划，并进一步指出："胡大使在美不得力，故中在正式提出方案以前，召其回国。然现在电召或调换，据中所得消息，彼或仍留美，不愿奉召。故对此事处理当须研究至当，方能决定也。"[225]过不几天，蒋介石又告知宋子文，他心中的理想大使继任人是顾维钧，征求宋氏意见以何时发表为宜。[226]只是更换大使之事，到最后都没有付诸实行。

蒋介石也关心他的大胆建议可能在美国政坛产生的后果，因此训令宋子文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才能向美国政府提出。[227]蒋介石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机，是因为他相信（11月）美日之间的大战很可能在短期内爆发，而日苏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也即将签订。[228]而11月德国对促进中日停战所进行的积极活动，也促使蒋介石决定把他对中、英、美合作的消息传递给德国，借此打消德国的妄想。蒋介石这一连串举动的主要动机，正是希望美国对于中国所提出的中、英、美合作方案，能够予以更积极的回应。[229]

蒋介石在11月8日召集英美驻华大使举行正式会谈，提出"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它代表中国政府一个重大的外交努力。依照蒋介石的乐观估计，美国政府大概有六成机会会接受他的合作方案。[230]岂知才过了5天，宋子文就回电称美国拒绝参加合作方案。美国对于中国建议的回复是，重申其一贯立场，即美国政府受到不结盟传统的制约，不可能与其他国家签订同盟条约，但是仍然乐于见到中英两国能够签订同盟条约。这使蒋介石大为失望，他万分感慨地写道："美国政府决不与人有一点事先诺言周转之余地，为可叹耳。"[231]但是蒋介石并未因此气馁，反而在此后的几星期中，分别在重庆和华盛顿两地更加努力地向英美两国政府兜售他的合作方案。

首先在重庆，外交部副部长徐谟和蒋介石分别约谈了美国大使詹森（11月19～21日），向他通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强烈催促中国和日本缔结和平条约之事。[232]蒋介石想传送给美方的信号至少有两层用意：一方面他要让美国知道某些国家（德国、日本）正在以优厚条件试图勾引中国接受和平，而另一方面又要让美国知道，他已经拒绝了这些和平试探，因此希望美国能够给予实质性的援助作为回报，比如说彼此能够达成一系列军事和经济合作协议。

其次在华盛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进言称，美国能够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参加三国同盟，同时由英美两国共同发表声明，支持中国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性。[233]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拟就了一份备用方案寻求美方支持，即万一美国仍然不愿参加三国同盟，则由中英两国结成同盟国。但是这两个方案均未能产生任何结果，因为美国坚持遵守其不结盟的外交传统，而英国则不愿在美国缺席情况下单独和中国结盟。[234]

（四）西方国家的相应不理

回顾1937年以来的历史可以清楚看见，蒋介石一直在极力推动一个国际性的反日大同盟。他最初的愿望只不过是想从其他国家获取对中国的援助，形式不拘，数量也不计，更不在意美国是否参加其事。当中国政府这种冀求获得国际正义的努力屡遭碰壁之后，它才开始认识到原来列强的行动多以美国态度为依归。这个认识让中国政府决定减少在国际联盟或是九国公约组织中的努力，转而集中精力去赢取美国对于国际合作体制的支持。当然，只要德国或是苏联持续向中国供应武器，中国也仍然可以从容不迫地推行它的国际计划。

然而当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的变化威胁到中国的武器进口，同时又增加了列强之间的冲突时（比如说，英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再加上1938～1939年欧战爆发似乎迫在眉睫，使得欧洲列强在亚洲和远东地区的利益受到日本压迫，中国政府也开始认识到美国的重要性正在急速提高。因为只有美国才能够化解某些国家之间的猜忌，又能够加强另外一些国家对抗日本的胆量，因此美国就成为任何国际合作体系不可缺少的成员。中国原先的愿望，是经由建立一个对抗性的国际组织，强迫日本放弃侵略中国和称霸亚洲的野心。只是到了1940年底，中国才把这个设想逐渐变成具体建议，由中国、英国和美国结成一个国际合作关系反抗日本侵略。

总的来说，尽管蒋介石极力想要促成国际反日大联盟，[235]但是到了1940年底仍然没有做出成果。原因之一是，英国人满怀自信地认为，中国对英国的依赖远远超过英国对中国的需要。原因之二是，苏联遭受来自欧洲和亚洲两方面压力而不敢轻举妄动。原因之三是，美国人对于远东局势尚未做出适当准备。因此，尽管中国不厌其烦地提醒西方国家应该及早阻遏日本把战火引入东南亚的企图，但是西方国家却是充耳不闻。讽刺的是，中国政府的设想却需要等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才由日本替中国完全实现。而西方最后付出的代价，则是英、法、荷三国丧失了它们的海外帝国，而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则遭到极大破坏。

在整个中国政府酝酿国际制日大联盟计划过程中，蒋介石一直是它的倡导者和最热心的推动者。蒋介石看到的是，唯有美国才有能力把其他列强团结在一起，结成一个大联盟。而在这整个过程中，胡适认为他自己只是一位配角。在认知层面上，胡适从来不赞同大联盟的想法。比如说，胡适在蒋介石提出英美合作构想后的几天之内就唱反调：“据适所观察，美国在远东，虽极愿与他国合作，终因政策之束缚，不能与他国有政治上或军事上之事先承诺，故屡次声明美国在远东保持其独立之政策。”因为美国政府的立场早经各种渠道向中方表明，因此中方不宜喋喋不休。[236]

整体而言，胡适认为，中国应该采取的正道是等待国际局势按照它

自己的逻辑去演变，最终成为对中国有利，而不应该由中国去强求引导。他基本上接受美国人的观点，认为蒋介石的建议不切实际，过于妄想，甚至可能荒诞不经，幼稚可笑。胡适对于英国人和法国人品质的估计，一如他对美国人所具有的信心，认为他们都一定会讲求国际诚信和道义，因此他完全不能相信英国人和法国人会牺牲中国利益去保护它们自身的利益。即便是在缅甸和越南通道关闭之后，胡适依然拒绝谴责英法两国。他反而劝告蒋介石应该体谅英法两国的处境，相信它们迟早解决问题。虽然胡适从来没有正面反对蒋介石推动国际结盟的构想，但是他明显地缺乏兴致和热情。这就难怪蒋介石不久也看出胡适的冷漠态度，而决定依赖宋子文作为中国在华盛顿唯一的全权代表。

与胡适恰好相反，宋子文不遗余力地推动蒋介石的计划。他对蒋介石的全球战略思想从没有表示任何保留意见，也一贯忠实而又勤奋地向美方传达蒋介石的观点。毫无疑问，蒋介石也充分依赖宋子文在美国推动他的国际合作计划。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宋子文所扮演的角色和此前颇有不同之处。本章之前所讨论的问题，多半是牵涉中美双边问题（如贷款、军售），而现在蒋介石所努力的范围，则在不同阶段还要扩大到英国、法国、苏联等国，因此情况更为复杂。

宋子文是一位能力高强的实务执行人，善于绞尽脑汁计谋多端地达成眼前的目标，但他并不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家，对于财经本行以外的事务，很少有成熟的见解遗留后世。由于蒋介石的构想牵涉不同对象，因此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的使节也扮演了相当活跃的角色。还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本人在重庆也直接主导了许多外交活动，包括和西方国家驻华大使以及访华的贵宾之间的互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宋子文在这个领域里的成就，虽然显得扎实，但是比起他在其他领域中的表现，则成绩并不耀眼。

五 蒋介石在1940年的感情世界

综观1940年一年，虽然蒋介石和宋子文所组成的新团队已经积极努力求变，但是挫折感远远超过成就感。这就难怪蒋介石在私人感情上屡次发泄他对美国乃至英国的怒气和怨气。他曾做过一个比较："美总统与其人民，一闻英法失败，不惜接济一切，其热忱非言可喻。而对我国抗战三年，人民苦痛，经济困难，求其现金数千万元借款救急，彼乃置若罔闻。可知白人种族界限之严。惜乎倭寇同种相残，至死不悟。如其果能以平等互助之精神与我华诚意合作，则东亚民族何至受白人如此之贱视哉？"[237]又说："美国罗斯福对我呼声要求其协助金融亦置之不理。若不自立自强，任何外交皆为空虚。"[238]他甚至说出了更悲观的话："尤人怨望非君子之道，对美俄只望其不加害于我而不助于敌，则足矣。"[239]

此时蒋介石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我激励，不放弃继续抗战，"应以自求自救为第一义也"。[240]而对于西方国家不应存任何幻想，因为它们根本不顾中国抗战。"美俄对我之要求接济皆澹然置之。英法对我提议在远东合作，亦以'感谢'二字答之。若非自立自强，谁能助人？后人须记今日我国之被列强轻侮之情状，可不奋发图强以求己乎？"[241]又写道："艰难危急之际，唯有求其在己，力图自立，乃能有得。若希望他人有助于我，则是妄人自轻耳。"[242]

即使西方列强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恶化，也未必会给中国带来利益。比如说他在6月注意到罗斯福任命史汀生为战争部长一事，就表明美国对远东可能采取更强硬态度。但是他同时警惕自己不要自作多情，因为罗斯福只是关心他本人总统大选的行情而不是关切中国。他抱怨罗斯福"惟劝我继续抗战，诚不知他人之生死者也"。[243]他甚至怀疑罗斯福之所以鼓励中国继续抗战，目的也并不是给中国打气，而只是帮助他自己能够赢得下次总统大选而已。[244]

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也注意到西方国家和日本关系走向恶化的迹象，例如美国海军舰队大幅提高夏威夷军力，英国夺得法国海军的控制权，美国实行对日本汽油和废铁禁运，以及英美两国就大西洋海军基地和舰艇交换的协议，这些都是对日本的当头棒喝。但是这些发展对于中国抗战所能带来的好处，他并不感到兴奋，总是采取一种淡然置之的态度，"亦于我有益"，或是"然于我之关系太晚矣"。[245]

过不了多久，他的怨气又会上升而写道："美国上下皆自私图利，毫无公义，对受难者专谈豫佚之言，诚所谓对失意人谈得意事，此种国家将来必为法国之续也。"[246]才隔一日竟然预言美国必将失败："民主国家之所必败者，以其专作损人利己，毫无公道之心。余所以敢断英国速

败，而美亦必不能久安也。”[247]

更糟糕的是蒋介石有时怒气高涨到不可控制的地步，甚至把英美和其他列强当成一丘之貉。比如说，他在7月的日记中写道：“倭之狂暴，俄之阴狠，英之奸猾，美之贪吝自私，国际之不可靠如此。今后世界惟以强权狡诈是尚，而信义公理扫地殆尽。吾惟以正义与公理为本，以上帝与人格是依，成败存亡惟有听之。”[248]

9月日记又写道：“各国对华轻视，毫不动心援手，其狠毒有甚于倭寇者。”[249]这里所指各国当然包括美国在内。10月，他又采用了一些新字眼作为宣泄：“轴心国狂暴，苏联阴狠，英美吝啬自私，皆不足为友，且亦不欲余为友，并皆谋为害于我，独占中国。惟轴心三国之用意，则有轻重之不同。如明晰之，则倭当于我为敌意，意大利为无恶意，而德则出于无意，惟其本身计，不得不然。然余断德至今对余尚无一定之恶意，故较为可谅耳。”蒋介石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之计在“自立自强，不倚不求”。[250]

回顾1940年春夏之前，蒋介石的外交注意力尚未放在美国，因此在日记里极少见到感情强烈之词，他对美国的行为有失望但是没有谴责。但是中国政府在1940年初开始改变它对美国外交的战略思路，集中力量全方位培植对美关系，却在半年中处处碰壁。难怪蒋介石从高度期望跌入高度失望，才会在日记里把怨愤尽情喷吐。也可能正是这种心情让蒋介石在8月中旬一度打算电召宋子文回国。[251]这表示他对美国的失望，而觉得宋子文在美国没有继续努力的价值。

1940年是抗战艰辛的一年，其间经过了许多惊涛骇浪。这个经历或许可以从三个层次予以了解。

第一个层次是中日战争和与战的选择。尽管有日本长期残酷的空中轰炸，地面上继续攻城略地，派代表诱降，威胁承认汪精卫政权，以及运用德国压迫中国就范，但是重庆政府一贯不予理睬。事实上，蒋介石在这个众说纷纭的环境里一直保持清醒头脑，甚至还将心比心地从日本人角度审视中日战争。正如他所写：“对倭问题之研究。以其所牺牲，获得占领与惨淡苦痛所经营（土地、物资、事业、势力）之锦绣美丽之中华，如何能随便轻易而放弃，而归还于我耶？”[252]因此他认为日本能够接受的和谈结局必然是中国丧权辱国，而这又正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换言之，和谈是死路一条。幸而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又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在1940年底依然断然预测：“倭寇死症，绝无挽救之道。”[253]诚可谓信心十足！

第二个层次是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大局中，中国的应对之策究竟应该如何拿捏。世界大局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结成轴心国同盟。蒋介石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这个发展。到了1940年底，他理出了一个明晰的思路，作为中国的应对之道。他写道：“三国同盟以后，我对国际之政略与战略之处置如下：甲、中倭媾和为下策。以倭对华之野

心与其最近对占领地区之交通工业等建设及其积极移民状况，决非一纸和约所能令其履行与撤退。而且世界战争未了之前，何能使其琼州岛等沿海岛屿交还？即使我出任何代价，亦不可能也。若为保持西北与西南之根据地，则倭寇本已无力西侵，复何必与之媾和也。……乙、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如新嘉坡或昆明失陷，则我国战线不能与英美联系，完全孤立，而一面又受俄国忌恨，更使之对我断绝关系，甚至促令倭寇与中共协以谋我，此于我最不利之场合也。如果西南昆明与新嘉坡马来印度无恙，仍与我国打成一片，则待美倭战局开展以后，英美需要我陆军对倭参战，届时如俄不阻碍，甚或俄亦在英美战线上联合参战，则我自可相机参战。否则，非至俄与倭对我逼迫过甚，则我仍不参战也。……丙、对于倭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义（任何阵线）皆取中立政策，必待俄国态度表明，或其参加战争以后，我乃决定取舍。如此则对美、对德、对俄，均有进退自如之余地，而且皆可由我自动决择，以此中立自主，乃为目前惟一之上策也。”[254]

蒋介石特别提到1939年欧战爆发时，他曾经表示意图参加英法阵线而遭到拒绝，使他感到“无上之羞辱”。曾几何时，英法相继溃败，日本加入轴心国，而美国和苏联却仍然保持局外人身份。这使他警觉到中国必须小心谨慎地善用自己优势，不致成为列强尔虞我诈的牺牲品。

第三个层次则是中国如何达成自己的目标。既然中国决心拒绝日本的诱和，又不热衷于随着列强的翻云覆雨而浮沉，则只能一心一意地坚持抗战。如前所言，中国政府1940年在外交政策上做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认定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唯一能够在实质上帮助中国进行抗战的国家，所以无论遭受如何的忽视和白眼，仍然全力以赴。

到了1940年底，蒋介石对美国的感情似乎变得宽容多了。显然，美国援助量的增加，承诺派遣空中堡垒轰炸机到中国，都是令中国人感到欣慰的举动。而中国政府也感到，美国的增加援助也影响到苏联对华态度，使其更趋友善。[255]

蒋介石也开始关注美国大选。当罗斯福再度当选时，他在内心产生了极大转变。他在致罗斯福贺电中称许其当选是“世界和平之曙光，且为人类正义之福音”。而他在私下又写道：“美国民主制度之高超，令人羡慕不置。特致电罗斯福祝其成功。此乃出余至诚，而非可以普通应酬之电文视之也。”[256]到了11月底，当中国政府和英美两国进行了超过一个月的谈判而仍然没有结果时，蒋介石却宽怀大度地感叹英美到底是民主国家，因此无法做出果断决定，也应该予以理解。[257]这似乎是蒋介石在1940年首度以如此友善语调形容罗斯福个人，以及表达对美国式民主的称羡。这是否预示1941年将是中美关系的收成年？

[1]详情见Hsi-sheng 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7-45，pp. 56-63。

[2]《蒋介石日记》，1940年2月19～26、29日。

[3]《蒋介石日记》，1940年3月9日。

[4]《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27日。

[5]《蒋介石日记》，1940年9月8日。

[6]至于美国如何能对这30个师的装备和整训工作提供协助，本书将在第八章中详细讨论。

[7]“Air Mission to China，” prepared by Brigadier General H. B. Claggett，US Army，and reported to General Marshall，Chief of Staff，US Army，June 12，1941，China Defense Supplies（hereafter CDS）Papers，Box 49，Folder 2.

[8]“Air Mission to China，” prepared by Brigadier General H. B. Claggett，US Army，and reported to General Marshall，Chief of Staff，US Army，June 12，1941，CDS Papers，Box 49，Folder 2.

[9]“Air Mission to China，” prepared by Brigadier General H. B. Claggett，US Army，and reported to General Marshall，Chief of Staff，US Army，June 12，1941，CDS Papers，Box 49，Folder 2；《蒋介石日记》，1940年 9月13日。

[10]《翁文灏日记》，1940年9月19日。

[11]《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14日。

[12]《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24日、8月19～20日。1940年5月蒋介石发现他的下属为他在黄山的住所造了一个坚固的防空洞，大发雷霆，严厉训斥属下不该为了讨好他而浪费大量建筑材料。《蒋介石日记》，1940年5月25日。他的住所在6月被炸毁，或许就是因为属下不敢使用坚固材料。

[13]《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21日。

[14]《蒋介石日记》，1940年5月25、31日。

[15]《蒋介石日记》，1940年10月5日。

[16]《蒋介石日记》，1940年10月25日。

[17]《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27日。

[18]《蒋介石日记》，1940年5月28日。

[19]《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30日。

[20]《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3日。

[21]《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26日。

[22]《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20日。

[23]《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14日，7月8、9、27日，8月2、23日。

[24]《无字第9943号译文》（1938年1月9日），H.H.Kung Papers，Box 10，Folder 5。

[25]《蒋介石日记》，1940年1月11、21日。

[26]《蒋介石日记》，1940年5月25日、6月2日。

[27]《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30日。

[28]《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7、10日。

[29]《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27日、10月25日、11月30日、12月7日。

[30]《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0月7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31]《戴笠致宋子文电》（1940年8月23日），Soong Papers，Box 39，Folder 29。

[32]《龙云致宋子文电》（1940年10月19日），Soong Papers，Box 39，Folder 29。

[33]《龙云致宋子文电》（1940年12月15日），Soong Papers，Box 39，Folder 28。

[34]《军令部致宋子文电》（1940年12月18日），Soong Papers，Box 39，Folder 28.

[35]参见蒋永敬《抗战期间中法在越南的关系》，《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1辑，第162～163页。

[36]《宋子良报告》（1938年12月26日），《领袖特交档案 整编资料》第287册：270365。

[37]《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165～166页。

[38]《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18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39]《蒋介石日记》，1940年1月4、7、27～30日。

[40]《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20日。

[41]《蒋介石日记》，1940年5月19日，6月5、8日。

[42]《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8日。

[43]《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17、18日。

[44]《徐永昌日记》，1940年6月20日。

[45]《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21、30日。

[46]《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24日。

[47]《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377～456页；《重庆来电》（1940年9月23日），Soong Papers，Box 39，Folder 29。

[48]《徐永昌日记》，1940年6月20、21、30日。

[49]《王世杰日记》，1940年7月19日。

[50]《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30日、7月31日。

[51]《蒋介石日记》，1940年9月10、14日。

[52]《蒋介石日记》，1940年3月15日。

[53]《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21日。

[54]龙云的言论也可能是防止日机对云南省进行轰炸。《蒋介石日记》，1940年9月24日。

[55]《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22日。

[56]《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31日、9月23日。

[57]《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10日、9月27日、11月16日。

[58]《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16日），《革命文献拓影本》第15册，第106页；《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17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59]《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94页。

[60]《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0年7月2日；《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2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97页。

[61]《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3、6日。

[62]《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12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63]《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1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99页。

[64]Harry White's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July 1，1940，*Morgenthau Diary*（*China*），pp.174-176.

[65]Memorandum on meeting between CKS and the American Ambassador，May 15，1940，《革命外交·抗战时期·对美外交（1）一般交涉》，第93～94页。

[66]《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31日。

[67]《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8月11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28册《对美外交（1）一般交涉》，第118～119页。又见《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8月11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68]《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9月18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69]《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9月18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又见《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9月28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38-14622。

[70]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the Secretary of Treasury，July 15，1940，*Morgenthau Diary*（*China*），pp. 177-181；《宋子文与胡适谈话记录》，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0年9月4日。

[71]《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1、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93～94页。

[7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1、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93～94页。

[73]《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1册，第50页；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311～312页；*Morgenthau Diary*（*China*），pp.174-176。

[74]详情见本书第八章；Michael Schaller，*The U. 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 76。

[75]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the Secretary of Treasury，July 9，and 15，1940，*Morgenthau Diary*（*China*），pp. 176-178，211-216；Minutes of meeting on September 25，1940，*Morgenthau Diary*（*China*），pp. 225-231.

[76]《蒋介石与美国大使约翰逊谈话记录》（1940年10月1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00～103页。有关蒋介石个人对此事的看法，参见《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18日、8月8日、9月29日。

[77]《翁文灏日记》，1940年10月6日。

[78]《蒋介石致胡适电》（1940年10月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1088201007。

[79]CKS telegram to FDR，December 12，1940，FDR Official File，150，Box 1.

[80]《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1月30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3。

[81]Minutes of Treasury Department meeting on November 29，1940，*Morgenthau Diary*（*China*），pp. 243-250.

[82]《蒋介石致罗斯福电》（由胡适转交，1940年11月3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21页。

[83]《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12月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21～125页。

[84]《宋子文致蒋介石函》（1940年12月3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26页。

[85]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下），1940年12月29日。

[86]《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9、12、14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2月11、14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3。

[87]《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0年12月17日。

[88]《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0年10月21日。

[89]《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第5a册，第18～19页。

[90]《胡适致陈布雷电》（1940年12月1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44006。

[91]Minutes of Treasury Department meeting on December 1，1940，*Morgenthau Diary*（*China*），pp. 300-322.

[9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12月3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0册《对美外交（1）财经援助》，第100～101页。

[93]《蒋介石日记》，1940年9月28日。

[94]《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12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36-14454。

[95]《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94～95页。

[96]“Exhibit A” of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the Secretary of Treasury，July 15，1940，*Morgenthau Diary*（*China*），p. 179.

[97]《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8月15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37-14517。

[98]《蒋介石日记》，1940年9月30日。

[99]《蒋介石日记》，1940年9月28日。

[100]《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9月28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38-14622。

[101]《翁文灏致胡适电》（1940年10月15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2册，第489～491页；《翁文灏致胡适电》（1940年10月19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2册，第353～356页。

[102]《蒋介石日记》，1940年10月23日。

[103]《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10月6日。

[104]《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1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10～413页；Michael Schaller，*The U. 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 71。

[105]《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21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2册《对美外交（3）军事援助》，第21页。

[106]“Memorandun Re Chinese Level-Lease Program” prepar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n.d.，约1941年末，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107]《蒋介石与美国约翰逊大使谈话记录》（1940年10月1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00～103页；《蒋介石致胡适宋子文电》（1940年10月21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79～80页。

[108]《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0月2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03页。

[109]《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11月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

册，第414～415页；《胡适致外交部电》（1940年11月6日），《总统府档案》：055/0645；《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11月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44006。

[110]《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0月27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1月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13～414、107～108页。

[111]《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0月20日）、《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11月4日）、《蒋介石致送子文电》（1940年10月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03、414～415、411页。

[112]《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1月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146001。

[113]Telegrams by Ambassador Nelson Johnson，November 9，11，1940，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U.S.-China Relations*，1940-1949，Reel 1；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下），1940年11月9日。

[114]《蒋介石致胡适电》（1940年11月10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40- 14703；《蒋介石日记》，1940年 11月11日，日记写道："电子文，对交涉事，不必令适之参加。"

[115]《美国大使约翰逊与蒋介石谈话记录》（1940年10月3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05页。

[116]《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11月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44006。

[117]《翁文灏日记》，1940年11月16日。

[118]《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11月15日），《特交档案·外交》第44册《美国军事援助》：48921。

[119]《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11月26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19页。

[120]《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11月2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21页。

[121]《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12月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23页。

[122]《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2月23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32页。

[123]《毛邦初致蒋介石电》（1940年12月25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32～433页。

[124]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713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0年12月29日。

[125]《王世杰日记》，1941年1月1日。

[126]《毛邦初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34页。

[127]《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35页；《英国大使卡尔致蒋介石函》（1941年1月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136～137页。

[128]“空中堡垒事美新闻泄露，可怪。”《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30日。

[129]《徐永昌日记》，1940年6月24日。

[130]《蒋介石与法国大使谈话记录》（1940年10月26日），《特交档案·外交》第74册《一般外交》：49678。

[131]《王世杰日记》，1940年6月26日。

[132]《蒋介石致胡适电》（1940年6月2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300028028。

[133]《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6月2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40004。

[134]《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6月2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3235。

[135]《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10日。

[136]《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13日），《革命文献拓影本》第15册，第104页。

[137]《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22日。

[138]《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1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41001；《胡适致陈布雷电》（1940年7月13日），Soong Papers，Box 45，Folder 3。

[139]《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1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12345。

[140]《蒋介石致胡适电》（1940年7月1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1062000009；《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17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141]《蒋介石致胡适电》（1940年7月1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70200008037；《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18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142]《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19、24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56页。

[143]《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1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1062000009。

[144]《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2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300028036。

[145]《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8月11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146]《徐永昌日记》，1940年7月15日。

[147]《郭泰祺大使自伦敦致外交部电》（1940年7月15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115页。

[148]《杭立武呈蒋介石报告》（1940年4月1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109页。

[149]《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14日。

[150]《蒋介石日记》，1940年5月18日。

[151]《郭泰祺大使自伦敦致蒋介石电》（1940年4月3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37页。

[152]《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14日。

[153]《王世杰日记》，1940年7月15日。

[154]《钱昌照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6日），Soong Papers，Box 39，Folder 28；《王世杰日记》，1940年7月2日。

[155]《王世杰日记》，1940年7月10、17、18日。

[156]《陈源致胡适函》（1940年8月29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2册，第481～482页。

[157]《王世杰日记》，1940年7月30日。

[158]《王世杰日记》，1940年9月21日。

[159]《翁文灏日记》，1941年10月13日。

[160]《王世杰日记》，1940年7月9、10、30日。

[161]《钱昌照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6日），Soong Papers，Box 39，Folder 28。

[162]《王世杰日记》，1940年7月16日。

[163]《王世杰日记》，1940年7月20日。

[164]《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94～95页。

[165]《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13日），《革命文献拓影本》第15册，第104页。

[166]《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8月14日），《革命文献拓影本》第15册，第112页。

[167]《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9月14日），《革命文献拓影本》第15册，第116页。

[168]《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第459～460页。

[169]《王世杰日记》，1940年9月10日。

[170]《郭泰祺大使自伦敦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118页。

[171]《王世杰日记》，1940年10月27日。

[172]“对敌来探和，应暂置不理，以示不受轰炸之威胁。”《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3日。又：“敌方间接求和之心虽切，然其方法与政策仍毫无变更，可笑。”《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6日。

[173]《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7日。

[174]《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18日。

[175]《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2日。

[176]《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25日。

[177]英国刚刚拘捕了10名日本人，而美国则要求日本说明是否打算在越南驻兵。《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10日。

[178]“敌阀又托胡鄂公，何世桢，张治平各人各别来求见通问，皆一概严拒，此时惟有持之以一也。”《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13日。

[179]《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14日。

[180]《蒋介石日记》，1940年9月1日、11月22日。宋子文本人安插在国内的情报人员也向宋氏密报，日本宣传过去与国民政府进行和谈接触之说纯属子虚。《“七号”致宋子文电》（1940年12月3日），Soong Papers，Box 39，Folder 28。

[181]《蒋介石日记》，1940年9月25日。

[182]《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26日。

[183]《蒋介石日记》，1940年10月9日。

[184]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14～115页。

[185]《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11、14、19、30日。

[186]《王世杰日记》，1940年11月15日。

[187]《王世杰日记》1940年10月16日。

[188]《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8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14312。

[189]《重庆来电》（1940年9月23日），Soong Papers，Box 39，Folder 29。

[190]《蒋介石日记》，1940年10月9日、11月23日。

[191]《翁文灏致胡适信函》（1940年8月12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2册，第349～350页。

[192]《蒋介石致胡适、宋子文电》（1940年7月1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95～96页。

[193]《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6、31日。

[194]《蒋介石致宋子文电》，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195]《蒋介石日记》，1940年9月30日。

[196]John 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p. 112.

[197]《蒋介石日记》，1940年9月30日。

[198]《蒋介石日记》，1940年9月30日。

[199]《徐永昌日记》，1940年9月26日。

[200]《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9月28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39-14629。

[201]《徐永昌日记》，1940年9月28日。

[202]《翁文灏致胡适函》（1940年10月19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2册，第351～352页。

[203]《翁文灏致胡适函》（1940年10月15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2册，第489～491页。

[204]《徐永昌日记》，1940年10月9日。

[205]《徐永昌日记》，1940年10月6日。

[206]《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1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99页。

[207]《徐永昌日记》，1940年9月29日。

[208]《王世杰日记》，1940年10月3日。

[209]《蒋介石日记》，1940年10月6日。

[210]《王世杰日记》，1940年10月25日。

[211]《翁文灏致胡适函》（1940年10月15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2册，第487～488页。

[212]《徐永昌日记》，1940年9月25日。

[213]《徐永昌日记》，1940年9月29日。

[214]《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0月2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39-14632。

[215]《徐永昌日记》，1940年10月15日。

[216]《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0月3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217]《蒋介石日记》，1940年10月3、6、10、12日。

[218]《蒋介石日记》，1940年10月4日。

[219]《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1日。

[220]《蒋介石致宋子文及胡适电》（1940年11月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07～108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下），1940年11月9日。蒋介石对于这个方案寄以高度期望，因此亲自手拟了一个文件，称之为“中英美合作之原则与方案”。《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1日。

[221]《蒋介石致宋子文，胡适电》（1940年11月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07～108页。

[222]《蒋介石电宋子文》（1940年11月1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300040010。

[223]《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7日，10月10、25日，11月13日。

[224]《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30日、12月12日。

[225]《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2月14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3。

[226]《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2月19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3。

[227]《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1月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11～112页。

[228]《徐永昌日记》，1940年11月16日。

[229]《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19日。

[230]《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8、23日。

[231]《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28、29日。

[232]《外交部副部长徐谟与美国大使约翰逊谈话记录》（1940年11月1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14～115页。

[233]《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1月2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19～120页。

[234]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5～6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下），1940年11月21日。

[235]《蒋介石和拉铁摩尔谈话记录》（1941年7月3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730～732页。

[236]《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2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97页。

[237]《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6日。

[238]《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30日。

[239]《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6日。

[240]《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30日。

[241]《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4日。

[242]《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5日。

[243]《蒋介石日记》，1940年6月30日。

[244]《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5日。

[245]《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6、27日，9月7日。

[246]《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18日。

[247]《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19日。

[248]《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31日。

[249]《蒋介石日记》，1940年9月7日。

[250]《蒋介石日记》，1940年10月5日。

[251]《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14日。

[252]《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26日。

[253]《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15日。

[254]《蒋介石日记》，1940年10月31日。

[255]《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21日。

[256]《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3、6日。

[257]《蒋介石日记》，1940年11月30日。

第七章 1941年：美国迈向中国外交舞台中央

一 内外情势

（一）1941年日本继续大轰炸

正如1940年一样，日本在1941年春夏之交接又恢复对中国城市的大规模轰炸。

其实过去一年来中国政府已经尽力发展出一套预警系统。中国的城市或军事设施（如飞机场、兵工厂）在距离敌驱逐机320公里时即发布预行警报，在250公里左右时发布空袭警报，在170公里时发布紧急警报。针对敌轰炸机，则在距离300公里左右发布预行警报，在230公里时发布空袭警报，在130公里左右发布紧急警报。对于敌人侦察机的警报，则分别为200公里、140公里和80公里。[1]尽管这套系统非常有效，但是最多也只能帮助部分人员及早疏散，而对于来袭日机，依然无计可施。因此人员伤亡和设施破坏情况之惨超过上一年，这又使得空军建设更加迫在眉睫。

6月初，重庆市校场口防空洞被炸受堵发生窒息事件，当场死亡达1000人，[2]整个社会为之震动。如同上年一样，日本轰炸的目的是摧毁重庆政府斗志，迫使其向日本求和，所以在看到重庆政府不予理睬的情况下，便加强攻击力度。从7月下旬开始，日机每日从早到晚轮番轰炸，每次出动飞机为100～150架，有时甚至超过200架，人民不但无法正常作息，其财产损失也极为严重。[3]

日本此时在上海放出和谈空气，胁迫重庆政府响应。但是重庆政府不但拒绝响应日方和平攻势，蒋介石反而借着“八一三”纪念日的机会，重申中国政府继续抗战的决心。这当然更激起日本怒火，在此后几个月中扩大了轰炸的破坏面。8月底出动225架飞机轰炸，并且试图寻找中国飞机予以击毁，幸好并未发现中国飞机隐藏地点。但是由于日本空军使用新型飞机加入攻击，老旧的中国空军飞机完全无法招架。蒋介石担忧大轰炸将会引起民心士气的崩溃。他一方面认为以中国领土辽阔，日本无论如何轰炸也难以把重要城市彻底摧毁。但是另一方面，他看到民众

都明了政府缺少飞机的苦衷，因此虽然每日遭受重大伤亡，却没有怪罪政府不能提供有效保护。这使得蒋介石异常感动，在日记里再三发誓一定要解救他们的痛苦，设法渡过难关。[4]

在此顺便可以一提的是，蒋介石和家人也是大轰炸的直接受害者，甚至可能是日本选择的特定目标。在8月29日的空袭中，蒋介石的防空设施被炸弹直接命中，他本人幸免于难，而离他仅三步之遥的两位卫士则不幸身亡，宋美龄也遭到爆破波及。[5]宋美龄在轰炸中参与救济和救火工作已经有官方记载，无须在此赘述，但是蒋介石私下的一段记述倒是颇有引述价值。他写道："妻工作太猛，以致心神不安，脑痛目眩，继之以背痛牙病，数症并发。渝无良医，亦不愿远离重庆，以被敌狂炸之中，如离渝他往，不能对人民，尤不愿余独居云。此三年来战争被炸之情形，其心身能持久不懈，实非其他金枝玉叶之身所能忍受，不能不使余铭感更切也。"[6]更远一些在蒋介石浙江家乡的武岭村，5月遭到日军入侵，蒋母王氏的坟墓被肆意破坏，尸体被挖出暴露郊野。依照蒋氏推测，这是日本提出警告以迫使其接受和谈的信号。但是蒋介石除了不予理会之外，且谕令部下不必因其个人家务事而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以示其不为所动。事后日军见威迫无效，只好授意当地学校将蒋母遗体重新安葬。[7]

一如上年，重庆政府极力争取外国飞机。但是苏联零零星星提供的战斗机过于老旧，根本不是日本空军的对手，于是中国政府只好向美国请求准许购买飞机。6月初，蒋介石本人又亲自接待美国驻菲律宾的空军访华将领，要求援助飞机。[8]

但是到了6月中旬中国依然没有收到美国飞机，这使得宋子文懊恼不已。宋子文从侧面了解到，交货延误主要原因是英美两国本身需求量已经超过美国的生产能力，但是他仍旧觉得中国应该提出有力的新说辞去刺激美国采取更积极行动。

为了达到此目的，宋子文向蒋介石建议采用新说法去打动美国政府。在此之前，中国称如能获得更多美国飞机，就可以遏制日本侵略。但是这个说法未能达到效果，因此宋子文建议改而去向美方强调，中国士兵之所以屡遭失败其原因并非他们缺乏战斗意志，而是缺乏空中支持。宋子文建议重庆政府拟就一份文件，详列事实说明目前情况之紧急，并且设法运用政治途径，劝说罗斯福尽快采取积极行动。宋子文认为只要实行这个方案，就可能从英美两国飞机配额中先拨取一部分交给中国使用。宋子文深信这个策略能够奏效，因此他要求蒋介石事先给他充分授权。[9]

一旦宋子文取得授权，他立即向罗斯福和居里提出说帖，申述他的上述论点。并指出，中国要求的总数量不过是区区500架飞机而已，然而在空等了一年之后，它只得到100架驱逐机的承诺。由于宋子文探知英国早已获得全部要求的驱逐机数目，因此他也希望罗斯福能够加速对中国提供飞机。宋子文还提醒罗斯福，有关轰炸机的问题尚未解决，美

国完全有能力向中国提供150架轰炸机，这对中国战局将产生重大帮助，却对欧洲战局完全不致发生负面影响。[10]

事实上，中国对于飞机的焦虑与日俱增。到了1941年6月，稍早些时候从苏联运来的140架飞机中，已有40架遭到击毁。苏联飞机不是日本飞机敌手，已是不争事实。此时中国空军负责人周至柔唯一的期望，就是美国政府能够提供100架飞机交由美国志愿空军飞行员飞来中国参加中国空军。[11]不幸的是，中国的要求直到珍珠港事件之日也未能得到满足。

不知是出于偶然或是慎重思考，这个500架飞机的数字在1940～1941年屡次被蒋介石提及，成为他发展中国空军的指标。到了1941年尾，蒋介石形成了更具体的看法，认为日本陆军部队之所以能够在地面战争中节节胜利，其中70%～80%的原因归于日本空军可以对地面部队予以有效支持，无须担心会受到中方反击。[12]因此，此处讨论的重点是，蒋介石之所以对空军产生强烈兴趣，其来由是多方面的，但是都是在国共关系恶化之前，也在美日开战之前，根本没有牵涉到指望用美国空军去替中国赢得战争的荒唐想法。

同样重要的是，蒋介石在1941年3月之前就想要获得500架飞机。他当时的目的不仅是打击日本在华空军，而且想攻击日本国内的空军基地和工业基地。如前所述，这个构想的原始设计者本是美国政府，而摩根索则是最热心的推动者。蒋介石之所以接受此项计划，是因为它比蒋介石自己原先的构想更加大胆和富有进取精神。然而，蒋介石很快就发现美国（摩根索）的计划有一个致命疏失，那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些巨大无比但是又速度缓慢的轰炸机，必须有驱逐机护航才能执行任务。假如中国每次只获得50架飞机甚至100～200架飞机，它就无法发动大规模持续攻击行动。正好相反，如此小数量的美国飞机只能激起日本空军大规模反击而将之摧毁。因此，中国政府的指望并不是依靠50架飞机去保卫滇缅公路，而是获得一个强大空军可以迎战日本空军。蒋介石同时表示，如果美国能够承诺把大批飞机送到中国，则中国承诺在西南偏远省份建筑更多飞机场供其使用，使之超越日本飞机的攻击范围。[13]

（二）日本的南进和北上政策

尽管蒋介石的国际合作方案在1940年屡遭挫折，但是他对于战争与国际合作等问题的构思一直持续酝酿。从1941年初开始，中国政府几乎每日都会接到情报，称日本正在积极准备实施南进政策。重庆政府也从日本消息来源得知，日本在南进政策付诸实行之前，将会在中国境内发动攻击，以求缩短其在大陆的战线，并且使日军能够投入东南亚新战场。[14]随着时间推进，蒋介石对日本南进政策逐渐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依他推测，一旦日苏之间签订中立条约，日本就会将南进政策付诸

实行。

为了扼制这个趋势，中英两国建立军事合作的机制势不可免。因此当英国的兰斯洛特·丹尼斯（Lancelot E. Dennys）将军在1941年2月初访问重庆时，蒋介石再度催促他尽快开始两国军事合作实质问题的商谈。[15]但是英国的反应却是，这类军事合作方案必须等到日本攻击新加坡之后才能付诸实施。换言之，在此种事件发生之前，中英双方无议可商。蒋介石对英国的态度非常反感，因为它的含义是，中国因此承担了保卫新加坡的义务，英国却不愿承担保卫中国云南的义务。而蒋介石的方案则是把云南和新加坡两地的防务结合成一体，不论日本首先攻打云南还是新加坡，中英两国都应该立即启动合作关系。蒋介石进一步指出，如果英国在日军攻打昆明时拒绝派遣其空军支持中国，那么一旦日军在攻陷昆明后转而攻打新加坡，由于中英两国之间的交通线已被切断，合作就根本无法实行。

基于这些考虑，蒋介石试图让英国相信，日军攻打昆明和攻打新加坡的意义其实相同，就是阻止中国军队驰援新加坡。[16]但是设若中国可以在事先得到英国空军的支持，则中国不但可以保卫云南，而且还可以对在中国境内其他地区的日军施加打击，使他们无法抽身去攻击新加坡，并因此而加强英国在远东地区的整体防务。[17]显然，蒋介石在极力说服英国进行军事合作，同时坚持双方的责任应该对等，而不是由中国单方面承担协助英国去保卫新加坡而已。

再说到美国。尽管当时美国国内报纸已经开始讨论，假如日本推行南进政策的话，则美日之间可能发生冲突。[18]但是蒋介石却并不作如是观。他在1941年5月10日召见美国大使詹森时表示，他并不认为美国有必要和日本进行战争，但是他希望美国能够给予中国足够的军事援助，帮助中国单独去对抗日本。[19]不久，当高思（Clarence E. Gauss）被任命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之后，蒋介石再度表达他的愿望（6月24日），希望美国可以避免和日本作战。他并警告称，即使美国决定参战也必须等到苏联参战之后才付诸实行，千万不可在苏联态度尚未明朗之前贸然行动。蒋介石甚至向高思建议，让美国置身战事之外的最佳策略，就是向苏联提供大量援助，使日本不得不把兵力留在北太平洋地区，而强迫它放弃南进企图，也可以借此避免美日之间的正面冲突。[20]

随着时间推进，蒋介石越来越相信中国情报的准确性，认为日本南进政策已是蓄势待发。蒋介石也认为，最令日本担心的，是美国有能力在太平洋地区大幅加强海军实力。因此假如日本再等待两年才发动战事的话，则它必将被美国击败。这一层考虑将迫使日本尽快在美国尚未完成其军事准备前采取行动。当蒋介石获得此项认识，而美国又对他的军事合作建议充耳不闻时，他便向王世杰发出训令：中国应该尽一切努力发动宣传攻势，希望能够经由刺激日本向南方采取行动而提高美国的警觉。[21]当然，一旦日本政府下定决心，它根本无须中国的暗中推动就必定会采取行动。

在蒋介石的军事合作构思中，苏联的地位至关重要。尽管他相信日本早已做出南进决定，然而即便是在1941年7月，他依然企望日本可能会废止与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1941年4月13日签订），并向苏联发动攻击。蒋介石最大愿望就是日苏两国能够发生大战，但是他的现实感也同时让他知道，只要苏联在欧洲战场上和德国的战争进行得不顺利，它就绝不敢去招惹日本。[22]尽管如此，日本南进的高度可能性，还是使得蒋介石忍不住去努力，试探苏联是否有意愿与中国签订军事协定。

基于这个动机，蒋介石训示宋子文就近向罗斯福试探，美国对于中苏签订协议可能采取何种态度，或是美国是否愿意加入一个中、苏、英、美四国的大型联盟，以对抗轴心国阵营。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则美国是否愿意支持中、苏、英三国的军事合作，而由美国作为签字担保国？[23]换言之，这是蒋介石首度把他原先的中、英、美三国合作的蓝图，扩大到包括苏联，甚至愿意考虑改变合作成员（中、英、苏），只要罗斯福愿意保证支持该项合作。不出所料，美国的回应是，无论是中英合作还是中苏合作都应该对中国有利，但是美国既不拟参加合作组织，也不拟成为担保国。[24]

到了11月初，中国政府情报显示，日本已经完成所有南进的准备，而它的第一波行动将可能是从越南进攻云南。蒋介石立即（11月2日）向罗斯福说明日本南进政策和昆明防守之间的战略关系。他警告称，西方民主国家千万不可把昆明的沦陷当成与它们毫不相干的事件，因为它可能导致中国抗战的全盘失败，而日本很可能把100万~200万迄今被中国拖住的军队，迅速转移到东南亚作战。蒋介石进一步指出，日本军队最精锐的军种不是陆军而是空军，而日本必将动员它最优秀的空军去支持南进政策。因此蒋介石希望中国能够在日本进攻云南之前，获得大量西方的飞机，在中国境内对日本空军造成重大创伤，使后者无法顺利执行南进政策。鉴于美国此时给予中国的空军支持微不足道（只有约40名美国飞行员抵达中国），中国希望英美两国能够大力支持云南的空中保卫战。[25]

到了1941年11月中旬，当美日之间谈判逐渐走向摊牌之际，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的建议依然没有做出任何响应。甚至到日本执行南进政策的前夕，蒋介石关于达成国际军事合作的建议，仍然被英美两国搁置不谈。

二 中美关系开始质变

1941年中国政府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显露了几个“质变”，表明美国在中国外交视野中已经占据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其一是蒋介石本人外交策略的改变；其二是中国驻美官员在工作态度上的改变。本章在后面的篇幅拟从这两方面着重讨论。

中国对美新政策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期望美国政府能够做出一个戏剧性的宣布，给予中国以极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以激励中国的民心士气和提高它的国际地位。至于在其实施阶段，则可以分期小额支付无妨。当罗斯福1941年初表示美国因为正全力处理南斯拉夫局势，因此对于给中国的援助只能分为多次小规模资助时，[26]蒋介石向罗斯福表示完全理解美国的困难处境，愿意耐心等待美国在将来提供实际援助，但是仍然希望罗斯福可以在当下就宣布援助计划的总数，以达到振奋人心的效果。基于同样理由，蒋介石也希望美国能够一次性地宣布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用以稳定中国币制，中国政府则承诺不使用这笔贷款，而是把它直接存入美国银行账户。依照蒋介石的想法，这种做法既可以让美国政府继续控制这笔钱，又可以大幅增加中国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誉，可谓一举两得。反过来说，假如美国政府只是每次宣布小额贷款，则可能给中国人民一个错误印象，认为美国对于中国抗战缺乏信心。[27]事实上，当美国政府拒绝接受中国的这个建议时，蒋介石则拒绝签署协议，因为他担心虽然借到钱，却可能伤害了中国声誉，[28]得不偿失。

总体而言，中国政府驻美官员的新作风，不但表现在宋子文提出美国军援和经援的数量大幅超过此前的要求，而且也变为多元化，包括大胆地向罗斯福及白宫官员进言，不怕开罪联邦政府部会首长，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军方首长直接建立沟通渠道，乃至结交政经界权高位重人士和发动民间舆论支持，大幅扩展了在美的外交活动范围和能量。除了争取大量的经援、军援之外，中国官员还开始强调这些援助计划在政治上和群众心理上的效果。早先胡适所主张的中国必须咬紧牙关独自“苦撑”的哲学，现在被宋子文全盘抛弃。

而美方人士则仍然保持他们的心态和作风，那就是要遵循“务实”而合乎美国单方定下的规范行事。换言之，就程序而言，其含义则是规定中国政府必须提交它想要获得物资的清单，说明每一项需要的理由，同时说明中国打算如何运用这些物资，以及一个合理的交钱交货时间表。显然，美国政府的旧心态和中国官员的新作风之间，逐渐产生了严重歧见，它使中国政府开始怀疑美国的诚意，又使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无法提出更务实的援助请求而感到沮丧。[29]

一个明显的案例是到了1941年4月底，当贷款大局已经敲定时，摩根索提出建议，美国将会先向中国支付2500万美元（它本身已经是对中国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但是要求宋子文和胡适两人做出“个人担保”，承诺此后中国每个月的提款额度不超过500万美元。胡适当即认为这个要求合理，愿意接受，但宋子文却建议蒋介石加以拒绝。最后蒋介石接受了宋子文意见，通知美国政府称，中国可以同意每个月提款不超过500万美元，但是拒绝接受把它当成正式的限制条款。[30]在这个案例里，中美双方态度的差异，胡适和宋子文的分歧，可谓表露无遗。

三 蒋介石个人在对美外交关系上角色的转变

本书此前各章对于中国政府在外交界的几位重要人物都做了一番描述，也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处事方式做了解释，但是并没有讨论蒋介石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所参与的程度。事实上，蒋介石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和产生何种影响，应该是公众所关注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史学界所提供的多属推理和揣测，缺乏小心求证实例，的确是一个需要填补的学术空间。所幸目前中美双方保存的史料，应该足以让学者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帮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他个人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和作风。

本节的目的是试图追踪蒋介石参与中美外交关系的轨迹，从一位对中美关系兴趣低落而只是偶尔参与制定政策的领袖，逐渐转变为全心关注的积极参与者，甚至亲自掌控中美关系的各种细节。这个转变过程对于中国战时外交的转型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对此后战局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本节对于蒋介石1940年以前在中国外交事务上所扮演的角色，将会做一个简单回顾，然后对于两个具体外交事件做出深度的检视，一是居里首度访华之行，二是任命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为政治顾问。从蒋介石处理这两起重大事件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外交事务上的改变。

（一）蒋介石与抗战前的中国外交

中方档案显示，蒋介石在抗战开始之前，对于外交事务并没有偏好。他的军事背景让他在军事领域做决策时充满信心。在处理国内政治问题上，他主要也是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但是自从蒋介石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以后，在两个领域里一直表现出愿意接受专家的意见：一是财经事务，二是外交事务。在这两个领域，他不但尊重专家的建议，而且经常充分授权给专业官员，代替他处理事务。

在抗战军兴之前，中国政府在外交决策过程中一般是按照行政体制程序办事，由外交部总管和主导与驻外使节的正常联系工作。大部分外交事务在行政院会议中做出决定，而行政院院长享有极大的裁决权。然后这些决定经由外交部长和体制内的作业程序向驻外使节传达并付诸执行。相对而言，驻外使节的报告也是直接呈交给外交部长，由部长裁决问题的重要性提报行政院会议请求加以讨论。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在战前处理大部分外交事务时，都是遵照这个程序办事。

但是在这个正常运作程序中也有两个例外，那就是中国和苏联及德

国的关系受到特别处理。1930年代中期，中国曾经满怀希望可以和苏联缔结秘密同盟关系共同对抗日本。当时谈判属于高度机密，因此少数几位参与者都只能向蒋介石直接报告，而不让外交部长知情。[31]再者，在193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由于中国大量倚仗德国军火和军事工业产品，因此蒋介石特别委派亲信程天放为驻德国大使，又委派学生桂永清担任驻柏林武官。这个安排让蒋介石能够避开外交部，直接掌控他们在德国的活动。

然而即便是这两个案例，也不完全是蒋介石个人外交的典型例子，因为他依然需要倚仗许多其他中国官员经手处理这些事务，而他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和斯大林或是希特勒建立直接的单线接触。蒋介石虽然能够把中国外交部官员隔离在信息圈子之外，但是他的代表还是需要与德国和苏联的外交部打交道，因为这些中国代表并无法直接见到希特勒或是斯大林本人。

1936～1937年，随着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日益增加，蒋介石也加紧派遣特别使节或是使节团到欧洲各国争取军事、财政和外交支持，而这些使节一律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士，比如蒋方震到德国，杨杰到苏联，孔祥熙到英国及他欧洲国家，等等。但是即便是这些使节团，也依然需要通过欧洲国家当地的政府渠道进行沟通，而无法直接达到它们的最高元首。

在不牵涉中德或是中苏关系时，蒋介石一般的做法是听任外交部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空间。如果遇有重大事件需要他亲自关注时，他一般的做法是预先咨询高层领袖们，然后做出决策。这些咨询通常在蒋介石寓所举行，会议气氛非常自由，参与者可以畅所欲言，提出不同看法。[32]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几周，蒋介石还把咨询范围大幅扩大，邀请了大批学者、教育界人士、军事领袖，甚至其他党派的负责人进行磋商。这种会谈方式使得其他政治领袖（如汪精卫）的言论，在决策过程中发生了相当大的作用，而蒋介石本人则并不试图把他对外交问题的观点，强加于其他与会者之上。也说不定此时他心中还没有许多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

（二）1937～1940年蒋介石处理外交问题的行为模式

这个战前运作的模式在抗战初期依然被遵守。在武汉沦陷之前，蒋介石绝大部分精力花费在军事问题上，并且用了许多时间到前线督战，无暇顾及其他事务。由于中国政府此时的外交攻势主要集中在国际联盟和布鲁塞尔会议，蒋介石个人的参与非常有限。主要原因是他对于国际组织事务并无深入了解，同时对于和列强交往的复杂性也掌握不足，难以做出正确判断。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基本上听任外交部去决定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里需要采取的策略。举例说，中国在国际联盟会议中究

竟应该引用国联公约的哪一个条款来作为中国的诉求根据这一类事务，通常都是由行政院会议决定，并且由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行政院长孔祥熙去定夺。

中国驻外使节也有机会为政府的外交政策做出重要贡献。这些驻欧洲各国的使节包括郭泰祺（英国）、顾维钧（法国）、程天放和陈介（德国）、钱泰（比利时）、金问泗（荷兰）、胡世泽（瑞士和国际联盟）、蒋廷黻和杨杰（苏联）以及刘文岛（意大利）。他们虽然来自不同专业和社会背景，但是共同目标是为中国争取外交和物资支持，帮助中国持续抗战。[3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颇值得称道的一个时代，因为政府聚集了一批有才干的人才，共同为国家利益而努力。其结果是，蒋介石本人只是参与了制定外交政策的一小部分，而给了外交部和驻外使节广大空间去制定许多重要决策。不论是和北洋时期或是清朝末年相比，这批人的成就都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在这些外交领域中，蒋介石战前最少予以关注的，可能就是中美关系这一块。不论是蒋介石的公开讲演或是个人文字记载，他对于中美关系似乎很少发表议论。即便到了1937、1938年，蒋介石和驻美大使王正廷之间也甚少有书电来往，只是偶尔接到外交部的简报，对于王正廷在美的行为略知梗概而已。

这种现象等到胡适被派赴美之后才略见改善。由于胡适的任命来自好友王世杰的极力推崇，因此他们两人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沟通渠道。王胡两人之间的私人信件来往，很快就在数量和频率上超过了胡适和外交部长王宠惠之间的联系。再由于王世杰本人是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因此他占据了有利的地位，能够把中美关系问题直接向蒋介石汇报。

王世杰也会主动就某些问题去征求蒋介石的意见，然后向胡适传达。更有时候，王氏会在私信中向胡适透露蒋介石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这样就等于向胡适传达蒋介石半官方性质的训令。胡适的另外一位好友陈布雷也是蒋介石亲信幕僚之一。胡陈两人之间的书信来往又造成了胡适和蒋介石办公室的另外一条通信渠道。他们彼此的书信来往间或会把副本抄送外交部，但是也有些时候外交部完全不知情。

这种沟通方式并非出自蓄意设计，而是随着环境因素自然形成的。它的特质是当事人的私人友谊最后导致此种现象，其结果则是中国驻美大使不久就获得到特殊待遇，有别于驻欧洲的使节。尽管胡适和蒋介石幕僚之间存在此种特殊关系，但是孔祥熙和王宠惠在制定中国对美外交政策上依然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至少到1938年春天，蒋介石私人幕僚对于外交部的缺乏效率和积极性，已经再三表达不满和不耐。[34]到了1939年初，一个新的决策模式逐渐成形，蒋介石办公室幕僚（包括张忠绂、王世杰）会向蒋介石呈交建议，在得到批准后签送外交部长王宠惠予以执行。[35]因此，在开战后的头两年，由于蒋介石办公室幕僚对于外交部工作效率的不满程度增

加，因此他们逐渐自告奋勇地在外交事务决策过程中抓住主动权，使得外交部逐渐变成执行单位。

（三）蒋介石初次尝试“个人外交”：颜惠庆访美

蒋介石最初尝试采用“个人外交”途径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在1939年5月。当时王世杰建议他派遣一位“个人代表”前往美国和罗斯福会面，要求美国政府在九国公约会议上把中日战争列入议程。依据王世杰设想，假如蒋介石可以指派一位私人使者携带他的信函亲手递交给罗斯福，则象征性效果将会更大。但是在此早期，王世杰只考虑到信函内容和递交方式，还没有把这位特使本人的身份和能耐看成重要因素。因此，当王世杰得知当时居住在香港的资深外交官颜惠庆正准备去美国参加会议时，他当即赶赴香港征得颜氏同意作为向罗斯福传递信件的使者。[36]

经过数度延误之后，颜惠庆终于在11月和罗斯福会面并且呈交了信函。[37]虽然蒋介石最初是打算把颜惠庆当成他的个人使者，但是孔祥熙和外交部长王宠惠依然把颜氏访美当作官方访问而非个人特使身份来处理，并且在征得蒋介石同意之前，就径自向颜惠庆发出了许多额外的训令。最后当蒋介石得知孔王二人还在向颜惠庆发号施令时，感到大为不快，并随即撤销了这些政府性质的指示，严令颜惠庆只需按照他个人的训示行事即可。[38]这个案例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至少到了1939年中期，蒋介石已经相信获得美国援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争取罗斯福个人的支持。他也相信，领袖之间的私人信件来往，比两国政府之间官方外交文书来往更能达成效果。但是颜惠庆本人在与罗斯福会面时客客气气，行礼如仪，并没有发挥其个人的才华去强化蒋介石的信函内容。蒋介石在7月20日致罗斯福的信函中洋洋洒洒地提出了一大堆重要问题，包括九国公约、对华援助和欧洲大势对远东的影响等，全文约3000字。[39]但是颜惠庆在11月3日递交该信时，只和罗斯福见面20分钟，除了礼貌寒暄之外，并无深入对话。[40]事后，罗斯福嘱约詹森在重庆就近向蒋介石做口头回应，草草了事。[41]既然罗斯福本人没有做出任何私人响应，这次的尝试完全没有发挥个人外交的作用。

当然，蒋介石之所以逐渐趋向使用个人外交手段去拉近中美关系，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受到罗斯福言辞的鼓舞。罗斯福在许多场合里，总是情不自禁地表达他对中国特殊深厚的感情。[42]固然，罗斯福在做出这类表示时，很可能只是兴之所至地表达他个人美好的记忆而已，并不夹杂任何政治色彩，但是听在中国人耳朵里，它们的分量却大不一样，因为中国人在文化上向来讲究人情或是“关系”，因此就难免从罗斯福的话中听到了（也可能是自作聪明的）许多弦外之音。更何况，中国领袖们到了1939年已经内心充满疑惧，认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苏联都是一丘之貉，可以毫不迟疑地牺牲中国利益去满足它们的野心。而

唯独美国总统居然经常表露这些出自肺腑的善意和同情，这就让他们感到分外温馨。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国从美国接收到这些友好信息时，正是它遵循传统外交方式和美国政府打交道而处处碰壁之际。中国政府在和美国政府交往的过程中，屡屡因为美国政府中的权责不清，或是各部门之间推诿责任和争风吃醋而弄得一事无成，并心灰意冷。联邦政府中那些能够严重影响中国利益的部门，比如国务院、财政部、战争部、海军部，各有自己的立场，利害关系互相冲突，貌合神离，而又缺乏协调合作的运作。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最有效能够避免或超越这一切的做法，就是直接往最高层求援，那就是白宫。

因此毫不奇怪，中国最初构想或许是以为两国元首之间的直接沟通，可以省却联邦政府各级行政单位的纠缠。但是中国领袖们此时其实并没有演绎出一套周密计划，去培养中美两国领袖之间长期稳定的私人关系。他们当时显然还以为，只要蒋介石偶尔给罗斯福写一封私信，就可以引起对方特别重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传信使者的身份，在最初并没有被中国给予重视。但是中国政府也很快就从颜惠庆之行的经验中学习到，这种没有经过精心挑选的特使其实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再说到颜氏本人，他久已和美国政治环境脱节，不熟悉美国政治领袖们，也没有能力去影响美国对中国抗战的观点，这些都是颜惠庆没有做出成就的内在因素。[43]

事实显示，颜惠庆和罗斯福短暂的会面仅限于礼节性拜访。他除了面交蒋介石私人信函之外，没有做出一件胡适无法完成的工作，也没有进行机密性对谈。换言之，他只不过是一位顺路访客，顺便登门亲手递交了一封蒋介石的私信。颜氏也没有和美国政府其他官员开辟新的沟通渠道，没有对中美关系产生任何长远影响。这个经验逐渐让中国领袖们认识到，在蒋介石和罗斯福之间最好能够指定一个更足以信赖的联络人。

四 宋子文推行“个人外交”的努力

宋子文赴美使蒋介石和罗斯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蒋介石在1940年6月14日致罗斯福信件中说明，国际局势瞬息万变，迫使他设法和罗斯福之间建立一个直接沟通渠道。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决定派遣宋子文赴美作为个人代表，并且赋予后者全权和美国进行多方面谈判。蒋介石推崇宋子文熟知中国内政情况和外交政策，又享有他本人的绝对信任，因此敦请罗斯福和宋子文进行坦诚交谈。[44]蒋介石的话说得再明白不过，那就是从今以后拟不再依赖胡适作为他的代表去处理中美关系。显然，蒋介石并不只是想要做出人事安排而已，他还想要改变中美互动关系的模式。虽然胡适仍将留任大使职位，但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从今以后将会由他的个人代表去处理。

宋子文不但是带着更大授权和美国政府商谈实质性事务，而且他还带着新使命去推动个人外交（personal diplomacy）。宋子文在抵达华盛顿不久，就兴奋地向蒋介石报告，称他第一次会见罗斯福虽然还是由胡适陪同，但是立即感到和罗斯福的投缘。罗斯福表示“极愿与文两人详谈，故约文明午两人午餐”，显然没有顾忌胡适还在现场。次日午餐不但立即进入实质性话题，而且罗斯福表示“希望文在美时可常晤面”。而对于两人谈话内容和两人的互动关系，宋子文则更做了令人遐想的叙述：“再，昨今两电，与总统秘密谈话，敬乞严守秘密。如有泄漏，于总统在国内政治立场，及将来讨论结果，均有影响。”[45]乍听起来，罗斯福与宋特使已经推心置腹了。

不久，宋子文又向蒋介石报告称，罗斯福对待他的态度犹如家人，彼此直呼其名，省却虚伪客套。但是宋子文也记得赶紧向蒋介石保证，凡事关中国国家利益时，他还是会向罗斯福力争到底，绝不退让，更不会为了顾全私人感情而妨害公务。[46]虽然宋子文的这番叙述或许有自我吹嘘嫌疑，但是它基本属实，同时也非常符合蒋介石原本对私人外交功效的期待。那就是，既能随时接近一个强国的最高元首，又能把中国利益向他做出最有效倾诉。

而罗斯福的表现，又继续加强了中国人的信念，认为他是中国需要交往的唯一重要人物。在中国人眼中，最有力的证明莫过于美国在1940年底处理对华贷款的方式。在此之前，财政部长摩根索一直是美国官方最热心推动对华贷款的高官，国务卿赫尔则始终持刁难态度，而罗斯福的角色则是在这两位内阁官员之间来回协调。虽然罗斯福最后选择支持摩根索，但是却只肯给予中国少量贷款，杯水不足以救车薪。这种谈判架构，已经不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特别是宋子文表明立场，他绝对不肯和陈光甫一般被动地事事顺从美国的指挥。但是真正让中国感到无限鼓舞的是，到了1940年11月底，美国决定给予中国大数额贷款的原动力

是来自罗斯福本人，而摩根索却又突然神奇地找到方法，去克服以往美方振振有词的行政限制或借口，改而执行罗斯福的命令，以致不让赫尔有任何反对的机会。

随着美日关系持续恶化，罗斯福也决定更积极地运用个人影响力，去排除中美外交关系上的阻碍。为此，罗斯福在白宫幕僚的协助下，首度亲自过问对华政策。他虽然依赖财政部官员处理技术性细节，但是把国务院排除在外。在罗斯福直接干预下，美国政府不仅制订了一个更严谨的计划，援助中国和增加援助经费，而且也开始对中国提出军事和政治支持，帮助中国更有效地从事抗战。罗斯福的这种积极参与，中国人看在眼里，大受鼓舞，同时也益发坚定了必须继续发挥个人外交功能的决心。

（一）宋子文新作风的一个实例：与摩根索的较劲

两个发生在1941年4月的案例，或许最能显露出中美两国官员互动中的戏剧性变化。当月中旬，摩根索陪同胡适和宋子文共同拜访罗斯福，因为后者要宣布“协助中国”的新计划，目的是显示美国的坚定立场以鼓舞中国士气。[47]在整个会面过程中，胡适除了表达感谢之外，基本上沉默无语，宋子文则抓住机会大做文章，敦请罗斯福从租借法案里提拨相当于总数1/10的款项供中国运用。[48]这个场景很可能让摩根索感到意外和不快，因为在以往类似的场合，总是摩根索唱主角，而中国官员则在一旁随声附和。但是宋子文显然不遵场规，居然喧宾夺主了。

才隔不了几天，宋子文在华盛顿公务生涯上所遭遇的最大危机随即爆发。到了此时，摩根索显然已经无法继续忍耐宋子文的无礼和不识抬举，决定施以一记重击。4月21日，胡适突然接到邀请赴摩根索办公室会面。他事先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摩根索会在部长办公室里，召集了财政部一批高官，[49]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宋子文大张挞伐。而财政部还特意安排了一位速记员，在现场记录下这整个戏剧化的历史场面。

这次会议原本约定的议题是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借款，但是摩根索临时改变话题，向宋子文做出一连串声色俱厉的指控。他开宗明义地自夸为中国的挚友，对自己为中国所做的贡献感到自豪。他进而宣称一直竭尽全力去帮助中国，有时甚至把向中国出售的美国产品价格，压低到比美国政府自己所付的采购价更低。他声称这些都是他的功劳，不容任何人抹杀，而令他感到最为不快的是，宋子文以不当手段雇用了一批美国法律界人士去帮助中国获得所需物资，甚至试图对他（摩根索）施加压力。[50]

这次会议的气氛明白显示，美国政府中已经有某些掌权人士对宋子文过去半年多的活动能力和手腕，感到高度不满，乃至到了不顾外交礼

仪的程度。仅从摩根索在会议前精心安排出席者的名单就可以看出，他早已打定主意，要一举撕破宋子文的颜面，逼使后者做出选择，要么灰头土脸地溜回重庆，要么学会如何对美国官方温顺服从。或许还有另外一个未经挑明的心理因素，那就是此时正值租借法案刚刚通过，标志着中美关系将要进入新时代，如果摩根索不及时打压宋子文的气焰和“越轨”行为，重新夺回主动权，则将会后患无穷。

这种场景正是胡适历来最恐惧的，因为他最怕在外国人面前失去了国格和自尊。胡适乍然受到这个粗暴场面的冲击，其内心却毫不怀疑，肯定是宋子文在工作上犯了重大错误，才会惹起摩根索如此震怒和不顾颜面。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胡适在事后多次回顾这个事件时，一直对宋子文持批评态度。[51]在现场，胡适对美国人的愤怒指控感到震惊，以致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都哑口无言。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胡适很可能看到宋子文遭受挞伐，而在内心产生一丝秘密快感。总而言之，他既没有出言为宋子文申辩，也没有设法打圆场，而只是一位不发一言的旁观者，任由宋子文被对方宰割。

但是在这场宋子文和摩根索的针锋相对中，胡适的观察和反应未必正确。因为基于几个理由，事件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

首先，这次事件是在一个大背景之下发生的。4月初，虽然美国示意要贷给中国平准基金，但是蒋介石抱怨说：“美国对我援助口惠而实不至。至今不仅无援华整个具体办法，而且前贷五千万美元之平衡基金……不肯……交我也。”[52]几日之后，他召见美国大使，严厉批评摩根索“不肯以平衡基金整数交付之小器行为”。并且说：“此时无论对俄对美，皆以不求不忮自主自强之态度表示之，盖无须迁就也。”[53]既然摩根索很可能已经得知蒋介石的强硬态度，而又无法直接反击，因此宋子文就变成在华盛顿最好的靶子。更何况，摩根索对于宋子文本人也有足够的怨气。

其次，摩根索原本目的是要在这次会谈上，无情地揭露宋子文行事手法不但卑劣而且根本无效率，可是他并未达到目的。事实上，胡适一开始就被美财政部来势汹汹的阵仗吓呆了，以致缺乏冷静心情仔细体察这次冲突中双方的心理攻防战。会议一开始，摩根索怒火填胸地指控宋子文多项罪状，包括用金钱收买美国法律界人士为他效命，向白宫进行游说，然后对财政部施加压力向中国贷款等。但是在整个对阵过程中，宋子文多次重复声明，他并没有雇用美籍人士就当前的借款事项（指平准基金）和财政部进行过交涉。而摩根索或许由于精神过度亢进，根本没有把宋子文的话听进去，直到后来财政部官员哈里·怀特主动证实，宋子文的确曾经在事先向他和该部另外一位法律官员（Edward Foley）咨询，是否可以雇用美籍人士，因此完全没有欺骗摩根索的行为。一旦有了这个澄清，会谈旋即结束，摩根索则改向宋子文道歉，承认他做出了错误的指控。[54]事实上，摩根索本人也犯了记忆错误的毛病，因为当事人之一的大卫·科克伦曾经在电话中亲口告知摩根索，他是在替宋子文工作。而摩根索在听到后回复称他可以接受此项安排，但是建议他知会

胡适。[55]

第三，宋子文的做法其实和摩根索稍早给胡适及陈光甫的建议，完全吻合。摩根索曾经极力劝告过这两人务必更积极地游说联邦政府有关部门，推动借款事宜。即便是在1940年1月初，财政部官员哈里·怀特还曾代表摩根索向陈光甫进言，称虽然摩根索本人不方便过度明显地帮助中国，但是他希望中国人自己能够多做游说工作去帮助自己。当时摩根索的话对于陈光甫来说是一个惊喜，因为陈光甫一直避免接近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唯恐得罪财政部，而此时他才得知原来财政部鼓励他这么做。[56]事实上，在1940年8月份，当财政部找不出方法满足中国贷款要求时，摩根索也给了宋子文同样的建议。而宋子文在短期内立即言听计从，先后拜见了罗斯福、海军部长、战争部长、进出口银行负责人杰西·琼斯（Jesse Jones）等，请求他们支持借款。[57]无论摩根索是在会前一时火上心头，还是果真患了失忆症，背后隐伏的原因都是出于一种疑惧，那就是害怕失去对华贷款事务主导人的地位。他或许更害怕自己无法掌控宋子文，反而变成宋子文“阴谋活动”的靶子。这种从主导变成是对手或是受害人的疑神疑鬼滋味，肯定让他无法承受。

最后，宋子文在针锋相对过程中坚守他的立场之后，摩根索对宋子文的态度反而有了改善。讽刺的是，摩根索此前在和陈光甫打交道时，口头上总是再三声称他是如何的器重和尊敬陈氏，而陈光甫却痛恨摩根索的狂妄自大和居高临下的施舍气焰。但是陈光甫为了国家利益只好忍气吞声，让自己的尊严一再遭受对方践踏。以“后见之明”观之，陈氏这种爱国苦心的假设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从宋子文和摩根索的互动记录来看，虽然摩根索打心底不喜欢宋氏，但是他们此后还是维持着实事求是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让两个国家后来达成了多项实质协议。宋子文和摩根索共事的时间，超过陈光甫和摩根索共事的时间。换言之，设若陈光甫当年没有小心翼翼地迁就摩根索，不知他是否也可以做出更精彩的成绩？

中国对美外交作风的改变，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中国不再唯唯谨谨地依照美国人颁定的行为准则办事。上述的事件（宋子文对仗摩根索）大概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中国外交官面向美国领袖，双目逼视而没有做出丝毫退缩动作。事实上，一旦摩根索发现他准备好的枪弹打不响，他的语气也立即软化。回顾在对阵开始时，摩根索盛气凌人地用罗斯福名义，坚持宋子文必须做出解释。但是到会议结束前，他的语气明显变得轻柔和缓，他宣称：“我希望中国在战争中获得胜利。我个人在整个大局中所处的地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局本身。我很抱歉刚刚发生了这场争端。我真希望自己在事先多去了解一点实情，因为它对我而言是一件不愉快的事，而我也希望它没有被提出来讨论过，但是我很抱歉它还是被提出来讨论了。所以让我们双方都将之忘记掉，并且重新开始。”宋子文简短而又强硬的回答：“好吧。”[58]

这些历史事件之所以值得拿出来温习，是因为它们非常传神地显示出，中国官员在和美国政府互动时已经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不再是客

随主便地小心翼翼和委曲求全，而是敢于据理力争地伸张国家利益。特别是由于摩根索自许是美国政府中国事务的龙头人物，人人见之都要谦让三分，今宋子文却直面争辩，毫不退缩，可说是为中美官员互动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总体而言，中国领袖们对于个人外交的兴致，不仅让他们锁定罗斯福为最高目标，也促使他们对于环绕在罗斯福周边的人们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他的顾问和幕僚群。初期有一位在这种私人关系网中特别突出的人士，就是海军武官麦修。此人原本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少校，曾在驻华大使馆任职助理海军武官，官阶属于中等。任职期满回到美国后，麦修又被海军部长诺克斯在1940年11月再度派赴中国，考察中国的战况和作战需要。

应该在此附带说明的是，诺克斯是宋子文抵美后新培养出来的一个渠道。两人关系密切到诺克斯都会把内阁会议中的讨论内容密告宋子文，而宋子文也警告蒋介石，称“美国阁议绝对不外泄，敬请钧座守密”。[59]除非宋子文欺君犯上，否则这种亲密关系无疑是中国外交上的重大成就。

在一封致蒋介石的私函中，诺克斯要求蒋介石信任麦修，并向后者坦诚说明中国战争所需，因为麦修在回国后将会直接向诺克斯本人提出报告。[60]事实上，在诺克斯致蒋介石私信抵达前三日，宋子文就已经以其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从他私人情报网获知，麦修刚接到非正式任命，新职是诺克斯和罗斯福的军事代表。宋子文立即提醒蒋介石，虽然麦修军阶不高，但是在华盛顿具有一定影响力，而且可以直达海军部长，建议蒋介石务必给予麦修隆重款待，并向后者坦白表达中国立场。[61]

蒋介石立刻领会到麦修的特殊价值，他在宋子文来电的空白处亲笔注明麦修将会受到特别关照。这就让麦修在这一条新沟通渠道中的重要性立即大幅增加。在1941年1月11日所举行的会谈中，麦修向蒋介石询问是否允许今后可以随时求见，蒋介石当即答称，只要事关重要可以随时求见。[62]以蒋介石中国军队最高统帅的身份，去授予美国一位中下级军官如此无限制的晋见权利，看起来委实不甚对称，特别是较之蒋介石经常拒绝和美苏两国大使会面，更显得不寻常。这表明，蒋介石此时对于处理中美两国外交问题的新作风已经给予最高的关注。他此时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运用麦修作为桥梁，通过诺克斯这条线，最后去向罗斯福请求给予中国更多支持。

因此即便是在他们初次会谈时，蒋介石已经和麦修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包括中国要求美国给予更多飞机，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以及改善缅甸路交通。蒋介石也要求美国应该先集中精力解决远东问题，因为这样可以增加苏联的信心，甚至增加美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依蒋介石的观点，一旦远东问题获得解决，则欧洲问题就更容易得到解决。[63]显然，这些本都是中美关系的重要话题，却由中国最高统帅去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位小少校讨论。蒋介石之所以愿意花时间去耐心解说，唯一

理由就是这位美国少校可以直达美国政府的最高阶层。

五 1941年中国对美外交的几个里程碑

自宋子文1940年6月抵达美国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的17个月里，中美关系发生了几件大事，其中都有宋子文密切的参与。它们是：居里访问中国；美国协助组成空军志愿队；拉铁摩尔出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美国派遣军事代表团赴华；极力争取租借法案援助。中国政府如何改变对美政策，可以从这几件事情上看出基本趋向。本节将讨论第1～3项，而下一节讨论第4、5项。

（一）居里访华

在多方设法和白宫搭上线，并借此直接和罗斯福取得联系的过程中，宋子文从华府人际网获知，居里是白宫幕僚中的青年才俊，专业训练是经济学，在参加白宫幕僚工作不久就获得罗斯福赏识。作为总统的行政助理，居里很快成为罗斯福依仗帮他解决各种内政和外交事务的得力助手。在罗斯福前面八年总统任期里，居里也参与制定了财经政策。当宋子文最初向罗斯福提出希望能够派遣一位个人代表访问中国时，罗斯福当即提议居里，因为他相信居里将会是一位很称职的私人联络人，对罗斯福今后和蒋介石增进彼此的了解能够做出贡献。[64]

宋子文本人也欣赏居里的能力和他在政治圈的能量。[65]1941年1月初，当宋子文向居里发出邀请访问中国时，罗斯福当即指示居里接受邀请，并且说道："我认为你去拜访蒋介石，将会是一件非常有趣而又有价值的事。尽管他们此举的目的，无非是想得到你的帮助而已。"[66]居里对于能够访华也感到非常兴奋，更何况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费用。在此后几周中，这个访问计划只是在蒋介石、宋子文、罗斯福和居里四人之间反复磋商，既没有向美国国务院通报，也没有告知中国外交部。胡适则是到了晚期才被告知，用不着说，这些部门都为之深感羞恼。

在居里访华之前，宋子文把居里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已经向蒋介石做了报告。宋子文在1941年1月底向蒋介石提供的政治情报称，居里不但熟悉财经事务，而且熟悉美国政府援助英国的计划和美国飞机生产情形。近期罗斯福又指派他就远东事务和联邦政府重要阁员（如海军部长、战争部长、财政部长以及国务卿）进行会商。宋氏推崇居里的政治见解和能力均远在麦修少校之上，建议蒋介石加以礼遇。[67]

由于蒋介石把居里视为罗斯福的个人特使，因此提醒自己必须做出充分准备，绝对不能让罗斯福感到失望。出于这个原因，中国政府把居

里访问当成一件重大外交事件来处理，特别组织了一个接待小组，由孔祥熙和顾孟馀分任正副主任，并动员了多位内阁阁员陪同居里和他的伙伴——工业问题专家埃米尔·德普雷斯（Emile Despres），可见中国政府接待之隆重。[68]蒋介石还一度希望宋子文也可以陪同居里在3月返回中国。[69]

依照中方筹划，蒋介石和居里之间讨论的重点是经济、军事、政治等大问题，[70]而孔祥熙和其他大批中央政府部长和副部长则和居里商讨财政、税务、工业、商业、交通等各方面问题。如此大阵仗的安排在一般情形下，本应该是接待来访的国家级元首的规格，而现在中国如此接待居里，显然最看重的是居里和罗斯福的关系非比寻常。结果居里访华期间所接触的中央政府领导人，超过了前此来华的任何一位外国领袖，而且有机会和他们进行深度谈话。

在这些会谈中，中方官员强烈表示希望美国能够参与中国的战后经济重建工作，希望美国专家能够帮助拟订一套详尽计划协助中国未来的发展，强调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是阻止日本掠夺中国资源。而要达成这些目的，最好的途径就是邀请美国参加中国未来的经济建设工作。虽然胡适完全置身事外，但是经济部长翁文灏依然请求胡适从旁说项，[71]而更能表现中国官方意愿的是其他官员和宋子文之间的书电来往。比如说，宋子文致翁文灏电，称赞居里于行政机构甚明晰，请翁文灏务必向他详细介绍中国财经状况，并且听取其宝贵意见。[72]宋子文又致电财政部徐堪部长："熟悉国内金融财政情形，莫如我兄。今能供给居里充分材料，加以切实研究，或能达到数年来未定之大计方针，减少我兄痛苦。"[73]

居里通过这些接触所了解到的，不仅是中国当前抗战的情况，而且还有中国领袖们对于战后中国的需要，以及美国在中国和亚洲可能扮演的角色。通过这些长时间而又充满深度的会谈，中国领袖们向美国访客提供了丰富而又具体的信息，可供美国政府制定一套新的对华政策。当然，美国政府必须先有这样的意愿才行；若不然，就变成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居里访华的重头戏无疑是他和蒋介石及其一小群亲信幕僚的长时间会谈。在居里访华前后共18天（1941年2月8～26日）中，他和蒋介石共举行了10次会谈，总共时间长达25小时。尽管他们的话题涵盖极广，但是有三个突出点。一是有关内政问题，他们谈到了国共冲突、政治改革和土地政策。二是经济问题，他们谈到了粮食、货币、银行、战后重建和中国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三是战争问题，他们谈到了前线战局、缅甸路、建立空军、组织美国飞行志愿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派遣高阶空军将领访华和美国武器（包括运输机）运送来华问题。[74]

在他们最初几场会谈中，蒋介石想把中美关系从传统的模式转换到个人外交模式的意图立即凸显出来。蒋介石在1941年2月22日会谈中首

次向居里透露，他希望罗斯福能够派一位优秀的政治顾问和一位经济顾问，参加蒋介石个人幕僚班底。[75]他在此后几次会谈中又进一步表示，他心目中理想的政治顾问是一位熟稔罗斯福个人意向的人，这样就能够成为两人之间理想的桥梁，而他对经济顾问的要求则是兼顾中国当前的需要和制订战后重建计划。[76]

从各种迹象都可以看出，居里和蒋介石讨论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充分显示出个人外交的功能。

首先，从会谈频率可以看出，蒋介石非常重视和罗斯福建立一条特殊的直接沟通渠道，而居里在罗斯福亲信中所居的地位又正好给了中方这种盘算最大成功的概率。

其次，两人所讨论的问题几乎涵盖了中国全部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包括最具敏感性的国共冲突问题。在此之前，没有一位美国人或是外国人能够有居里这样的机会，去探讨蒋介石内心深处对于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从双方会谈的记录可以看出，蒋介石在和其他外国人交往时从来没有如此坦诚地说出过心里的话。这些会谈记录同时显示，蒋介石在会谈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诚意，而且也热切希望能够通过居里赢得罗斯福的友谊。众所周知，蒋介石向来缺乏亲自处理外交事务的圆润技巧，但是到了1941年，美国已经成为蒋介石唯一可以信赖而且又急于拉近关系的西方国家，所以他也只好忘却他在外国人面前的尴尬不安，而尽力为之了。现在留存下来的会谈记录清楚地显示，蒋介石的确以充满诚意的态度把他的期望和忧虑向居里和盘托出。而蒋介石对于居里的态度也充满信赖，认为“居里热力与诚实可嘉，其对我贡献经济财政人员之意见，亦全出于至诚”。蒋介石在私下对于会谈经过表示高度满意，认为这是抗战中的一件“大事”。[77]

居里访华的历史意义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本书前几章回顾了从七七事变到1940年夏季，美国在中国外交视野中的重要性只是呈现缓慢进展，不时还会由于波折而进退失调，但是到了1940年6月宋子文赴美，它标志美国在中国外交视野中已经迈向中央位置。这个政策意向上的选择，在蒋介石11月30日致宋子文的长篇电文中首度做了详细的阐述。

蒋介石指出，由于中国西南各省天然资源蕴藏丰富，即使300年也开发不完。这也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动机之一。而中国本身也必须把未来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业植根于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东、湖南、江西等省。等将来中日恢复和平之后，日本必定会不遗余力地搜夺西南资源，而中国也必须未雨绸缪考虑如何自保。“所以我国战后之经济建设全赖美国。否则日本必先争取。如此时中美对华西有一合作基础，订立条约，或即以我所提三万万美金为美国预付之资金亦可。如此则敌对华西之经济，不敢再有所觊觎。但此时要有整个计划与设计，故须先催其派经济交通军事顾问来华，切实进行也。希以此意转告美当局，从速推动为要。”[78]换言之，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的关系不仅是贷款和军

火以应抗战之急，而且包括在未来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等领域希望美国派遣专家代表团，或由中国政府聘请美国人为顾问，共同开发中国，充分依靠美国，并抵制日本。[79]在此时的日记中，蒋介石说得更具体："如美果能协助我抗战胜利，则中国以后建立海空军以及其海港皆可与美国订立二十年共同使用之协定。以我国如欲建立海空军，论人才，物力，与技术皆非此不可。而且只有美国对华无侵略之野心，此为我后外交与军事惟一之政策也。"[80]

如此说来，中国政府在认知层次上终于把美国看成占据舞台中央的唯一角色，而两个月后又付诸行动，向美国总统特使居里正式提出上述意向，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实在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既然有上述这些重要因素，加上蒋介石和居里的深度谈话，长期以来居然没有受到中美关系史学者的重视，着实是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事实上，即便是当时美国政府其他领袖也没有对蒋介石和居里谈话的内容予以重视。居里在回到美国后曾经向罗斯福提出过一份详尽报告，他本人又从中方获得他与蒋介石会谈全部详细记录的英文翻译本。这些资料对于当时中国的内政、蒋介石对国际局势的看法、蒋介石对中美关系的展望，以及其他诸多事务都有大量而丰富的信息和分析。在居里离华之前，许多部会因为接到蒋介石指示要以至诚对待，所以认真地搜集了大量政府资料向居里开诚布公，甚至做了一份复本，请居里带交宋子文，让后者也能跟上国内形势。[81]

蒋介石甚至允许居里与周恩来以及其他在重庆的共产党人进行官方接触，而这是他从来不曾允许其他外国人去做的事，包括英国和苏联大使在内。毫无疑问，居里是第一位亲自从蒋介石口中听到他对于中国政治和军事状况的观点，以及他对于一大堆国际问题想法和感受的美国人。

鉴于当时美国政府官员普遍对于中国事务的忽视，如果居里的中国之行所见所闻未能引起足够重视，而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未能产生明显影响，这也不算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

第三，居里和蒋介石深度会谈所产生的一个副产品，则是向宋美龄提供了一个机会，开始在中美外交事务上显露身手。居里和宋美龄显然很投缘，很快就同意在两国政府正常渠道之外建立一个特殊沟通渠道，只限于他们两人之间使用。在此后的岁月里，这个特殊沟通渠道很快就变成蒋介石和白宫之间最重要的渠道。这也成为个人外交一个极致的实例。难怪蒋介石写道："内人协助之力收效甚大。"[82]

居里在离开重庆前夕最后一次漫长会谈中，向蒋介石报告他此次访华的印象，随后又向蒋介石提交一份文件，名为"观感与刍议"，其中详细列举了对中国经济、外汇制度、银行系统、政治、军事、战后重建等各方面事务的具体建议。蒋介石也趁机请居里向罗斯福要求促进中美经

济合作，以及尽快派送战斗机来华。[83]

居里在回到华盛顿后向罗斯福提交的报告中，建议美国向中国派遣一个专家代表团，成员应该包括经济、政治和交通专家，帮助美国把大量援华物资运抵中国境内。这些专家应该作为中国政府行政体系的后备队，提供专业服务。代表团团长可由总统选派一位“开明人士”，去帮助蒋介石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在报告结尾时，他也不忘记去挑逗罗斯福个人的虚荣心。居里指出，蒋介石已经把罗斯福看成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因此罗斯福也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去影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袖。[84]

从中方观点来看，居里的访华肯定加强了他们的信念，认为个人外交的确远比通过政府部门正常运作的方式来得既快捷又奏效。居里本人当然也竭尽所能地去炫耀他在美国政界的重要性。居里之所以这么做，很可能是借此提高他在罗斯福幕僚中的重要性，进而成为罗斯福处理中国事务的首席助手，同时又可以运用他和中国人（宋美龄）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去开拓自己的政治生涯，包括此后想要争取美国驻华大使一职的雄心在内。而居里这些自利性质的盘算也间接增加了中方的动机，去精心培养和罗斯福身旁这位重要亲信的关系，居里本人则当然不会阻止中方人士去做这种设想。简言之，中美双方出于不同考虑，都在同一时间内对这种复杂而又微妙的个人外交模式，不约而同地变得兴致盎然。

不难想象，蒋介石和白宫之间的这种特殊渠道和使用频繁的现象，不久就招致了国务院强烈反感，乃至无法忍受。如前文所述，国务院历来习惯于胡适雍容有度而又唯恭唯谨的运作方式，因为这个方式可以让国务院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所有细节都有全面性掌握。但是宋子文偏偏过于认真地把自己当成蒋介石的个人代表，而把胡适排挤在中美关系事务之外。胡适一旦被隔离在中国决策圈外，国务院也就失去了一个最可靠的信息来源。等到宋子文在1941年初成功地安排居里访华，然后又安排拉铁摩尔被任命为蒋介石个人政治顾问时，情况就变得越来越糟糕。因为这两件事完全是由蒋介石、宋子文和白宫直接安排，而国务院却要等到事后才知情。

居里访华后几个月内所发生的变化只能使国务院更为忧心忡忡，因为更多的新沟通渠道似乎应运而生。不仅是蒋介石和罗斯福之间建立了直接渠道，居里和宋美龄之间也建立了另外一个渠道，而宋美龄随之大量地运用这个渠道向居里提供有关中国的消息，也向居里提出各种要求和建议，其目的就是要影响罗斯福的对华政策。

蒋介石和宋子文之所以如此热衷推行个人外交，其目的并不是故意去颠覆美国的正常行政运作程序，事实上他们的行为并无不可告人的企图。而在重庆和华盛顿两地，有不少政府高层人士认为这种做法效率卓越，是增进中美两国关系的一种极为可取的方法。当然，这种做法难免削弱了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的管辖权，但那是须由两国领袖们自己

去摆平的内政问题。

居里在访华期间也证实了麦修的政治身价，并且为他做出了特别安排，让麦修成为中国第一家庭和白宫之间的特别渠道。居里鼓励麦修把他的报告直接呈送给罗斯福，也要他把蒋介石不愿意通过正常渠道送往美方的信函转手交给罗斯福。[85]事实上，当蒋介石对于居里在回到美国之后似乎无法为中国争取到实质援助而感到失望时，也开始向麦修求助，并要求后者向诺克斯转达他的不满。[86]

居里和宋美龄的直接渠道也为这种新外交作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居里在访华时和宋美龄达成协议，瞒着国务院建立了直接沟通渠道，彼此还交换了专用的电报密码本。此后，宋美龄向居里发送了大量电报，署名为“SEGAC”，就各种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而宋美龄除了向居里传达蒋介石许多内心私密的想法之外，也对许多问题申述她本人的意见。

这些来自中方的电报，不但得到居里亲自响应，也经常被送呈罗斯福过目，而罗斯福又把它们所涉及的问题送交战争部长、国务卿、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等人去办理。事实证明，这种沟通程序远较正常渠道更为有效。[87]这个渠道的绝对机密性，使得两国最高领导人可以充分交换意见。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宋美龄在1941年5月12日发送了一封电报给居里，要求后者向罗斯福报告。内容是中国情报显示，德国将会在6个星期内向苏联开战。在苏德战争果然如期爆发后，居里立即致电蒋介石（1941年6月25日），称罗斯福相信中国情报的可靠性，并且希望今后继续向罗斯福提供有关日本动向和其他重要国际动态的情报。[88]

这些沟通渠道能够维持，其原因就是中美双方领袖都一致希望依赖个人外交途径去处理事务。在美国政府高官之中，摩根索最常指责宋子文偏爱个人外交是不当行为，希望予以禁止。但是讽刺的是，摩根索本人正是个人外交的始作俑者。他早先就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务必指派陈光甫为中国的贷款谈判人，随着又以私交而不是以公务处理方式和陈光甫进行谈判。摩根索之所以大声叫嚷，只是因为在这新一轮的沟通模式里，他被挤到局外而不再是核心人物。这种冷遇，让他感到不是滋味。

就罗斯福本人而言，他似乎也非常喜欢派个人代表去和世界他国领袖进行接触，他其实早在1938年就已经派送了几位特别代表造访不同国家。虽然这群总统特使可能具有不同的专业训练和政治倾向，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和罗斯福本人有密切关系。[89]后来在世界大战的年月里，他更是设法和美国最亲密的盟邦保持特殊关系，最好的例子就是他本人和丘吉尔经常保持不拘形迹的联系，又派遣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斯大林密谈。罗斯福显然能够体会，最好的方法就是首先运用私人渠道和盟邦领袖们探讨敏感问题，等到时机成熟时再把这些课题交给正常渠道，由后者去达成政府间的官方协议。

罗斯福对于传统外交部门工作人员缺乏信任，也不尊敬他们的专业能力，这是当时人尽皆知的事情。他对于国务院似乎特别反感，屡屡对之出言不恭。特别是他指责国务院官员办事不力、走漏消息和随意施加压力，这些都是让他感到不满之处。因此他非常愿意依赖自己的亲信去和外国元首接触。更何况，个人特使能够探讨的敏感话题远比政府官员更具弹性，而且不致引起政治性攻击。随着美日紧张局势在1940年底持续恶化，罗斯福也开始增加对白宫幕僚的使用，对于美国外交政策进行更直接的个人操控。[90]毫无疑问，宋子文原本就主动去试探在华盛顿推动个人外交的可能性究竟如何，因此，当美国领袖也显示出对个人外交有着同样兴致时，中国人当然更是乐意配合以求获得更多援助。

毫无疑问，这一切发展只能让国务院官员火冒三丈。为了及时阻遏这种情况继续发展，国务院采用了几种对策希望让中方能够知难而退。它的做法有时不着痕迹，有时也颇为赤裸裸。1941年4月，赫尔不得不亲自出马要求中国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在今后处理中美关系事务时，务必要经过正常渠道，而赫尔本人也声明国务院将遵守同样规矩。在中国看来，赫尔显然对于蒋介石和罗斯福之间的直接沟通方式极为不满。[91]赫尔向郭泰祺表达不满之后，国务院又紧接着经由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希望中国政府此后务必把所有向美国政府递交的外交文件经由国务院转达。[92]

当赫尔试图向白宫施加压力放弃和中方的直接渠道时，后者则完全无动于衷。居里在回复赫尔要求时的用词遣字显得非常冷漠。他写道："关于总统和蒋介石之间直接的私人文电来往一事，我们的决定是，虽然所有的文件往返照理应该经过正常外交渠道比较理想，但是实际上我们用蒋介石的密码经过商业电报渠道回复他的来电，这种做法似乎更为恰当。不然的话，蒋介石可能会感到遭受拒绝而陷于难堪。"居里意犹未尽地写道："至于我本人和驻重庆武官麦修少校之间有关租借法案事务的文电来往，我们两人决定仍会继续使用海军电台，但是我们相互传递的信息，在华盛顿方面会由我呈交给您，而在重庆方面则由麦修交给高思大使。"[93]显然，居里觉得他有罗斯福在背后撑腰，因此明白表示白宫在沟通渠道一事上自有它的看法，和国务院官员想法不尽相同，也不认为国务院值得为此事去小题大做。事实上，居里和白宫方面根本无意要取消私人渠道，反而认为它的功效显著。

但是国务院也不甘心如此轻易就被白宫打发而不做出任何抗议。最后它还是从白宫获得一个认可，就是用罗斯福名义向中国发出了一个文件，建议后者应该顾及外交礼仪。不久，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更指示高思向蒋介石传递一份以罗斯福名义送递的文件，其中写道：

有关沟通渠道一事，我希望您不至于误解我信中的建议。您最近送给我的信函通过不同的渠道。由于您委托的转信人可能有时会离开华盛顿，或是我本人也会偶尔离开华盛顿，或是您来信的收件人因为有重大任务而有所耽搁，因此，如果我们使用几种不同渠道的话，则很有可能

会耽搁我收到您信件的时间。在我国制度下，国务院及其下属驻外使馆是和外国政府沟通的正常渠道。这个渠道能最有效地处理、协调、转达、接收和发送您我两人之间的信件。因此，请容我在此建议，如果您有信件需要送交给我，请将之交给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或是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然后送交国务卿，转交给我即可。[94]

此信虽然是由罗斯福署名，但是最可能的是出自国务院授意，用一种客气婉转的方式告诉蒋介石，今后应该运用正常渠道维持两国沟通。国务院先后三度试图劝告中国政府停止个人外交的僻径，回归传统外交的正道，而且一次比一次说得更露骨，这本身就是一个大不寻常的现象。但是国务院此计完全没有达成预期效果，不仅宋子文毫无意愿放弃个人外交所带来的好处，就连罗斯福和白宫也根本没有意愿去放弃个人外交。

宋子文无意遵从美国国务院建议并不难理解，其原因至少有三个。第一，他已经花费了大量精力在华盛顿建构了一个私人关系网，作为呼应他在美国所发动的新外交攻势之用，因此绝对无意为了讨好国务院而将之拆散。第二，中国从个人外交途径已经获得相当利益，要想让中国自动放弃此种方式，也未免过于天真。第三，宋子文作为特使，他的活动范围和内容本来就有别于胡适。胡适是典型地遵照传统外交礼仪办事，而宋子文则必须证明他的办事效率超过胡适许多，这样才能显出他在华盛顿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

事实上，宋子文反而利用美方对他个人的批评向胡适射了一支暗箭。1941年7月，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抱怨，他一年前到美国后，勉力从公，在进行事务过程中屡遭困难和波折，不得不避免手续问题，“向美方军政最高当局直接洽商，以致引起各方对文越轨之责难”。宋子文提醒蒋介石，他在4月为了堵塞美国的批评，就曾经请求政府给他以行政院副院长的名义，使他可以官方身份在美国名正言顺地运作，但是被蒋介石以不符体制而婉拒。[95]

此时宋子文改用退而求其次的姿态，要求撤换胡适。宋子文声称，“如文仅负责办理借贷事宜，外交上之关系尚浅。如兼顾国际特别工作，则非有外交使节，同心协力，不足以求事功”。因此他需要得力帮手，“惟冀有精明干练之驻美使节，彻底合作，以便各事之顺利进行”，并且提名施肇基为继任人。[96]宋子文还提出另外一个理由更换胡适，那就是蒋介石刚刚电告宋氏称，此后所有与罗斯福之间的重要事务均由宋子文一人直接负责。这就使得宋子文更觉得有以施肇基取代胡适而成为他得力帮手的必要。宋子文私下致电李石曾说：“办理特别外交，必须予我便利。万一不蒙谅允，只可株守本职，循分尽心而已。”[97]

宋子文除了亲自写信给蒋介石外，还委托他的几位亲信去敲边鼓和刺探情况。比如说，宋子文曾致电李石曾，强调国际局势变化太快，“外（我）国在美外交亟待调整，务乞催促委座早日裁定，俾利进行，毋任企盼”。并叮嘱李氏千万不可让外交部长郭泰祺知情。[98]宋子文又致电

钱昌照，把过去几个月和蒋介石就副院长、施肇基等事的交涉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钱昌照。根据钱氏回报，李石曾随即两次和蒋介石谈起宋子文和胡适事，但是蒋介石均不接腔。钱昌照也观察到，蒋介石似乎尚在与孔祥熙商讨此事，但是没有做出结论。[99]事实上，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他的确考虑“驻美大使人选”事，但是没有做出决定。[100]

当然，就美国方面而言，宋子文无视联邦政府几个重要部门的感受，其明目张胆程度也肯定惹起了对方的嫌恶，最后使居里也不得不介入。1941年11月底，居里终于决定坦白告诉蒋介石，美国有些领袖已经对中国政府只依赖宋子文这个渠道向美国政府各部会传递外交文件的做法感到无法接受，认为这种做法有违国际惯例。[101]但是这一抱怨并没有产生结果，因为中国政府根本就不相信居里的抱怨是出自内心的真实话。更何况，中国政府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无法走回头路，重新恢复依赖正常渠道去处理中美关系。因此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之日为止，蒋介石和罗斯福之间的直接沟通渠道其实从来没有间断过。

还有一件事证明中国政府对于发展个人外交变得食髓知味，甚至还想更上层楼。在居里访华5个月之后，蒋介石和宋子文开始筹划邀请哈里·霍普金斯访华。[102]众所周知，哈里·霍普金斯是罗斯福最亲密最信赖的智囊和文胆，在美国政界的能量绝非居里所能望其项背。如果能够让他取代居里，则等于是在罗斯福身边安置了一位更重量级的信使，个人外交的格局将会达到完满境界。

（二）争取美国协助中国建立空军

1.美国派遣空军调查团访华

在中国政府不断敦促下，美国政府终于对中国空军的紧迫需要予以回应。首先，在居里首度访华时曾当面向蒋介石建议，由美国派遣高级空军军官来华考察。蒋介石甚感兴趣，旋即嘱宋子文在居里返抵美国后尽速与其接洽。[103]不久美国战争部在3月29日决定派遣一个调查团实地考察中国空军的状况，并提出务实的建议。该团由克拉格特（H.B. Clagget）准将领队，从5月17日到6月6日在中国进行考察。其间除数度与蒋介石会谈外（宋美龄全程参与），还和其他有关官员会商，包括何应钦、周志柔、毛邦初及一大批各阶层的文武官员。更重要的是该团还进行了实地考察，包括重庆、成都、昆明，对于地面设施和运作情形进行了仔细检查，后又飞往湖南芷江、广西桂林及柳州、江西吉安及赣州、浙江衢县及丽水等地的机场进行检视。

考察团呈交给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报告，[104]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克拉格特对所接触的中国政府各级官员的总体印象甚为正面。团员在将近20天访问考察过程中，中国主动提供有关空军

的各项数据，把军事机密文件给美国人阅读并且允许后者做笔录。所有空军机关及设施均开放给美国人，包括指挥部、各种航空学校、机场设备、武器弹药等。换言之，此种以往对外国人严守秘密的空军内情，对美国空军团全面开放，而且对该团提出的问题也一律诚恳回答，毫无隐瞒，使克拉格特认为该团充分掌握了中国空军的实际情况。

第二部分是对中国空军的评估。首先，该团和中国空军各阶层将校面谈所得的印象是，他们对空军战术的理解基本正确。中国也建造了一群适用于重型轰炸机使用的机场（重庆1个，成都3个，广西桂林、浙江衢县和丽水各1个），适用于驱逐机的更多。并且蒋介石做出保证，只要美国提出要求，中国政府可以保证在任何地点完成机场建设，而其中浙江的衢县和丽水还可以攻击日本本土，昆明可以攻击日本在中南半岛的空军基地。

克拉格特赞许中国空军的优点是组织有效，飞行员战斗意志高昂，地勤技工训练扎实。依照该团评估，中国空军当时有200多名飞行员可称为优秀战斗员（excellent pilots），他们具有实战经验。另有200名飞行员，虽然训练及作战经验不如前者，但仍可视为合格战斗员（satisfactory pilots）。最后尚有250名飞行员，既无作战经验，训练又不足（少于200小时空中作业），则需要加强训练以成为合格飞行员（fitted for combat）。换言之，依据克拉格特的估算，中国应已拥有650名飞行员和一群地勤技工骨干可以投入战斗。该团的报告再三称赞技术工人及基层工程师对各自专业领域的熟练，包括金属、水电、发动机维修等都具有相当水平，仅成都的一个技工学校每年就可以毕业200名合格技工。但是其他空勤人员则需加强训练，特别是轰炸机的领航员需要接受长途飞行、恶劣气候、海面作业等训练；炸弹手需学会使用新式轰炸机瞄准器；机枪手需要熟悉使用电动射击枪塔，然而因为中国空军严重缺乏弹药，使得机枪手无法进行实弹训练。

克拉格特的总结是：“整体观之，中国空军称得上有效率，特别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具有实战经验。”

第三部分是该团向美国政府所做的建议。克拉格特报告的两个重点是：中国要求500飞机合情合理；这500架飞机能够产生的效果是和日本空军进行“游击战”。它并不足以打败日本，但是可以大大减少日军在华陆军和空军的优势，打一场更公平的战争。

然则美国政府究竟可以做什么和怎样做，才能让中国达成此目的？简言之，该团建议美国首先在必要的器材上可以提供支持的是飞机、枪械弹药、零件、汽油及润滑油和先进的无线电，以帮助中国的驱逐机拦截来袭敌机。

其次，美国可以帮助训练人员，包括挑选100名飞行员到美国接受重型轰炸机的使用技术训练，20名飞行员到菲律宾熟悉中型轰炸机操作，大量派送中国空军学校毕业生赴美接受基本训练，选拔驱逐机战斗

员赴菲律宾受训。

报告强调，在空中作战的技术人员也需要加强训练，特别是他们没有接触过先进的仪器设备，特别薄弱的环节是导航、仪表飞行、无线电操作、空中及地面枪炮使用、空中侦察照相等几个领域。在战争条件下，他们原本已经遭受重重困难，日本空军的不断轰炸更使训练工作无法正常推动，而缺乏现代化器材更让中国空军官兵无法掌握现代空战的要领。

第三，该团建议美国政府派一定数量的人员赴华担任教官、顾问和督察（instructors，advisors and supervisors），则任务的成功率将可大幅提高。

从这个空军访问团的报告中，我们可以得到几个总体性的印象。

①美国军官团以诚恳和认真的态度去了解中国空军，既有切实坦白的批评，又提出建设性意见，对于中国的缺失毫不讳言。他们办事认真，进行实地调查，广泛接触中国军人，甚至亲身体会日本轰炸的惨状，所以言之有据，不是先带着成见，到中国去挑选事例去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②中国政府首次接待美国军事团，自蒋介石以下，开诚布公，对中国的设施及作战计划毫无保留地向美方提供。

③该团在20天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具体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飞机、军火器材、训练及派遣教官和顾问赴华。

④该团对中国政府空军要求美援的总评价是什么？简言之，中国政府向美国代表团提出的要求是由美国提供500架飞机。在详细审查中方计划及多次交换意见之后，克拉格特向美国政府报告：“我们相信，假如中国获得适当援助，将大有可能实现它向本团提交的作战计划。”而如上所述，此时中美空军领袖所共同认知的目标，是以500架飞机主动出击，对日军发动空中游击战，而不是战略性空战。这听起来非常务实。

附带值得一提的是，正如陈纳德一般，克拉格特和团员并不熟悉中国事务，只是谨守专业知识，做出实事求是的持平判断。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美国空军考察团是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军方对中国抗战的需要做出的最仔细而全面的调查。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并没有邀请德国或苏联专家做过类似的调查；在此之后，美国也再没有如此大规模地对中国空军做过同样的检查工作。它对美国想要了解的中国空军需求已经有充分的数据和品质的掌握，可以作为美国政府此后空军援华的依据。不幸的是，该团的建议在此后岁月里因种种原因完全被搁置。而美国政府，特别是陆军首长完全无视自己已经掌握的情况，对于中国空军的要求反而做出了种种异想天开的推论和推诿。为了掩饰美国不愿意向中国提供军援，却运用其想象力责怪中方对空军的要求不务实际，甚至荒诞不经，这不能不令人感叹。[105]

2.招募美国志愿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AVG）

大概中国政府在争取美国军援方面最积极的作为，就是试图说服美国政府允许其公民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国的对日抗战。有关这段历史多年来已经累积了大量的学术性和传奇性著作，在此无须赘述。[106]在本节范围内，只拟对宋子文的参与略做交代。

美国志愿航空队构思的起源是在1939年5月，当时美国航空工业巨子威廉·帕利（William D. Pawley）接受中国政府邀请访问重庆。在一次与孔祥熙的会谈中，后者提出希望美国能够组织一个外籍飞行员兵团（a Foreign Legion of American Volunteer Airman）到中国服务。他援引的先例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派遣过一个名为Lafayette Escadrille 的飞行员团队赴法国作战。威廉·帕利听后不但想帮助中国抗战，也看出如果能够运用中国战场替美国训练一批战斗飞行员，则有朝一日美日之间万一发生战事，美国将能够立即把他们派上用场，因此非常热心。但是初期只限于威廉·帕利和几位美籍热心人士彼此间的联系。

迨1940年6月宋子文到达美国，他立即和威廉·帕利的公司取得联络，该项计划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备阶段。初步设想是由该公司出面雇用350人。[107]陈纳德本人也于1940年下半年赴华盛顿配合宋子文活动，中国政府也派毛邦初赴美协助。[108]至于美国方面，前后积极支持的人士包括居里、大卫·科克伦及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多位领导人物。

1941年4月罗斯福终于下达秘密命令，允许成立一个特别航空单位（“Special Air Unit”），包括三个飞行大队（Group），所需的飞行员及地勤人员从现役的美国陆军、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军人中招聘。最后在1941年下半年招到100名飞行员，其中约60人来自海军和海军陆战队，40人来自陆军航空队。为了维护美国官方中立的假象，他们先从军队办理退役手续，再以平民身份与Central Aircraft Manufacturing Company（CAMCO）签订雇用合同。名义上是担任教官职务，帮助中国训练空军飞行员，实际上却是参加作战。举凡薪水、旅费、伤亡保险、购买飞机和零件的费用，中国方面均由宋子文主持，其工作的细节甚至包括轮胎、无线电器材、机枪子弹等。

关于成立美国空军志愿队的原则、条件等问题，双方人员在1941年初已经达成共识，均被蒋介石接受。但是即便是在中国需要美国援助如此殷迫之际，蒋依然坚持指挥权绝不允许落入外人之手。他训示宋子文道：“但需注意其权利与义务之详细规定，并需绝对服从统帅之命令为要。”[109]1941年8月1日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成立美籍志愿队第一大队，由陈纳德上校担任指挥官。[110]

在战时和战后流行于中美两国民间的印象是，美国志愿队援华的空军人员皆是一群对中国友好的热血青年，看不惯日军的侵略残暴，仗义来华拔刀相助。其实并非如此。它的起源与外籍佣兵并无太大差异。他们是一群拥有作战技能的空军人员，在“重赏之下”，到中国来兜售其飞

行技术而已。更糟糕的是，主持招募工作的CAMCO一开始就犯了许多错误。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最初应征的美国空军人员是为了优厚待遇而来。比如说，当时雇佣的价码是飞行员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是600～750美元，如有作战成绩（击落日本飞机）则另外加发巨额奖金，以及优厚的伤残抚恤金。这个数字不但远远超过中国中央政府一切部会首长的薪水，即使较之当时美军本国服役的同阶官兵的薪金也高出2～3倍。但是这和蒋介石自1920年代以来一贯以高薪访求外国优秀军事专家的作风完全符合。

志愿队成立之后，在不同时期对飞机类型的计划，随着客观因素而被迫不断修正。譬如说，驱逐机空勤只需要每机一名飞行员，其他均属地面维修技工，但是轰炸机则完全不同。在1941年8月，原本希望第一大队有100架驱逐机，因此除了100名飞行员之外，还需要每月有10名补充飞行员。至于第二大队，原来预估是33架长程轰炸机，而这个大队所需的美籍军人则大约为250名。[111]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不断改变主意，使得志愿队的组建工作受到极大困扰。

其次，志愿队决定先成立驱逐机大队后，选拔飞行员的工作全部交由CAMCO办理。而后者在招聘过程中又采取了许多不规范的手法，甚至涉嫌招摇撞骗。譬如说，它向应征者宣称，志愿队唯一任务是攻击日本没有护航的轰炸机，而不需与日本驱逐机进行搏斗，无须承担任何攻击性任务，无须夜间飞行，而其飞行范围只限于缅甸路地区，不会延伸到中国战场。[112]显然，招募者的做法就是来者不拒，不经过任何正常选择程序，以连哄带骗手段把上钩者赶紧送往中国，使他们无回头路可走。

事实上，迄1941年9月为止，陈纳德称约有15%的美国志愿队员在抵达中国后立即声明遭受欺骗，并且提出辞职要求回国。[113]而其他人也只是逆来顺受，内心则极为不满。宋子文不但深度参与筹划志愿队的大计方针，而且全力支持陈纳德的强硬态度。

但是在CAMCO方面，它的主事人在9～11月依然故我，把陈纳德和宋子文的警告当成耳边风，逼得陈纳德在11月不得不把话说得更露骨。

岂知事态发展并非如中方所愿。首批10位飞行员抵达中国时，其中3位在报到当天即声称遭受欺骗，要求立即返回美国，而剩下的7位又完全不合格。其中有海军出身的飞行员完全不掌握陆地起降技术，有一位飞行员甚至在一周之内接连摔坏了3架飞机。所以尽管他们决定留下，但是由于技术欠缺，其训练的过程及费用远远超过预期。[114]

这一切让陈纳德大为愤怒。他直言警告美国的招募者务必诚实待人，对于工作性质和责任绝不可有任何隐瞒，以便双方一旦签订雇用合同可以权责分明。他明白指出，CAMCO所有征招信息的每一项均属蓄

意误导，因为中国需要的美国飞行员不但要攻击日本轰炸机，也要与驱逐机进行空战、夜间作战及攻击敌人陆空目标。虽然陈纳德愿意在志愿队报到后施以适度训练以提高其作战能力，但是对于能力低下及缺乏勇气者，必须一律淘汰。最后陈纳德毫不含糊地告诉CAMCO高层人士，他宁可承受招募不足的痛苦，也不愿意对飞行员采取来者不拒的做法（“come one，come all”）。[115]在另外一封信中他再度强调，宁可只有数目不足但是称职的飞行员，而不是手头这群良莠不齐的大杂烩。[116]

陈纳德的这些行为真是令人不胜感慨。CAMCO是当时美国的大商团，在飞机制造业界具有极大影响力。它旗下雇用的工作人员各有雄厚背景，而且不少还具有比陈纳德更高的军阶。既然彼此都是美国人，基于血浓于水的感情，对于替中国人打仗之事，大可以不必较真，更不需要因此而得罪自己的同胞。再加上陈纳德与中国人非亲非故，只需领薪水办事即可。但是偏偏陈纳德为人正派，做事认真，不但空军专业知识娴熟，而且有高尚的职业道德，鞠躬尽瘁，对CAMCO高层人员的劣行尽量揭发，丝毫不假辞色，甚至到了指名道姓的地步。[117]同样，对于中方空军官员没有克尽厥职的，陈纳德也是直言无忌。[118]难怪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如此赏识和信赖陈氏，而中国军民也对他普遍敬仰，他对抗战的尽忠职守，完全可以和中国军人相比。

志愿队员即使决定留下来，他们所需经过的训练也花费了陈纳德极多精力，因为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海军及海军陆战队的飞行队，缺乏在陆地机场和对陆上目标进行作战的基本技术。更何况陈纳德的战术思想即使在美国当时陆军里也被视为“异端”，更让海军出身的飞行员（特别是轰炸机飞行员）需要加倍操练才能掌握。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志愿队员初期在中国生活中遭遇到一些军民关系的问题。

问题之一是志愿队个别成员的行为和风纪缺失。譬如说，有人经常在营房内酗酒，甚至在城市闹区喝得酩酊大醉，乱开车，引起交通事故。也有人私带中国女性回营房夜宿。更有人和中国人勾结利用志愿队货车，企图从缅甸走私商品进入中国内地发国难财。也有人私自允许美籍记者闯入军事禁区进行采访和摄影，然后在美国报纸张扬志愿队机密。[119]

中方对于这些行为都采取一副义正词严的姿态，向陈纳德提出抱怨，要求美国人尊守纪律。但是陈纳德除了承诺要惩治美国人的违规行为之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无论是带女性进营区，利用军车走私物品，都有中国人怂恿同谋，反过来请问中国政府打算如何执行中国法律去防止这类事件发生？至于美籍记者闯入机场禁区，陈纳德直接指出是中国哨兵的失职所致，因此也希望中国政府认真执法，给予中美人员一律待遇。[120]

还有一种情况令中国政府感到特别难堪，就是美国军事器材被附近居民（或许是农民）偷窃。譬如说，昆明机场志愿队飞行员的营房设在机场附近，营房和机场指挥中心之间依靠电话联络，每当敌机来袭，指挥中心即会通知飞行员驰往机场备战。但是电话线在当时大后方物资极度缺乏的环境下成为抢手物资，黑市价格昂贵，几乎每晚都被偷窃，多至一夜丧失500英尺，严重影响飞行员应变能力。[121]

回顾有关美国志愿航空队成立的经过可以看出，美方的居里和中方的宋子文是推动最力的两位文官。特别是宋子文，更是事无巨细，全力投入，大至向美方争取更多的飞机更快地运到中国，细至飞行员的伤亡投保、维修工具及零件的购买和运送时间，乃至飞虎队标识的设计工艺都一一参与。他主持下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更是派专人负责志愿队事务，并且和陈纳德保持密切联系。[122]到了1941年9月，当中国空军把第一批飞行员和学员送到美国接受训练时，整个安排和接待任务落到宋子文身上。[123]

至于美方，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的确也热心相助，CAMCO则可以说功过参半。中国方面宋美龄在重庆亲自参与大小事务。至于陈纳德个人，除了最初提出志愿队的构想和亲自到美国参与推动之外，还把最初的一群为钱卖命的美国雇佣兵，在心理上和技术上训练成为中国抗日的空中勇士，作为“美国友人”实在是一个好榜样，也是中国抗战的幸事。

当然陈纳德和宋子文的共同努力和合作无间也是功不可没。仅仅以1941年11月为例，由于美日谈判搁浅而使远东情形益趋紧张，美国志愿航空队为了取得少量的飞机及零件，需要宋子文和陈纳德动用的人脉即有一大批。他们包括在中国的马格鲁德和麦修，在新加坡的英军司令，在马尼拉的麦克阿瑟，在华盛顿的战争部官员如Lovett，Forrestal，Frankfurter，Robert Kintner，Steve Early 等。[124]

事态如此发展不由得令人感喟：美国战争部如果将早先承诺的飞机如期交货，则这一切纷扰均可以避免，而战争部历来（和此后）对宋子文的诟病就是他屡屡动员私人关系，干扰美国的正常行事规矩。但是11月为了这一批飞机之事，如果不是宋子文和陈纳德费尽千辛万苦地争取到手，则缅甸将毫无空防可言。而偏偏是这一个数目微小而设备欠缺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在远东给日本空军一记重创，使盟军的士气为之大振。

附带值得一提的是，在中美两国政府有关志愿航空队成立的漫长过程中，却有一个人名几乎未曾出现过，那就是胡适。由于胡适再三声明他的大使职责不包括争取美国武器，以致宋子文也明白告诉陈纳德，凡属飞机事务的电文均直接寄送宋氏本人，无须由大使馆传达。[125]根据笔者所参考的资料，陈纳德似乎自始就不解其中奥妙。

11月中旬，陈纳德和英国驻新加坡军队司令官达成初步协议，由英

国空军拨一个中队的飞机给美国志愿航空队。他也同时向马尼拉的美军方面商量紧急拨运Curtiss P-40战斗机的器材给美国志愿航空队，因此需要宋子文赶紧取得美国政府同意此项转让，并且以空运方式将飞机及器材尽快装箱送到缅甸，还需要考虑未来以何种方式补偿英方的转让。[126]

考虑到日本空军可能在紧要关头对缅甸路进行破坏，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向罗斯福请求（10月底）加速将预订的飞机及军火运往缅甸，而罗斯福也承诺会加速执行。

但是说归说，做归做，接下来几周，美国战争部依然纹风不动。因此宋子文又只好在11月下旬向哈里·霍普金斯求援，希望尽快获得这些武器。[127]

至于装备方面，原本设想成立3个飞行中队，但是到了1941年11月才从英国政府手中得到100架Curtiss P-40飞机。英国之所以如此爽快并非出于大方，而是该型号飞机性能过于老旧，无法在欧洲战场对抗德国空军，美国已允诺提供性能更好的Curtiss P-40s型号作为替换。说到这批飞机的由来，真可谓历经沧桑。早在欧战爆发之初，欧洲的英、法、芬兰、瑞典，都争相向美国订购飞机，超过美国的产量。中国只好和英国达成协议，由英国将其配额下的100架 Curtiss P-40飞机转让给中国，代表中国政府的纽约世界贸易公司与美国飞机制造厂商（Curtiss Aircraft Company）在1941年2月10日签订合同，以美金436万元成交。这笔交易由财政部官员到场见证，因为购机费用来自美国对华贷款。这批飞机的麻烦是其原始设计采用英国规格，机关枪、无线电等装备都在美国工厂无法生产。而中国又希望统一口径，让全部装备均是美国制造。为了修改这个美制机身和英制枪炮的怪物，中方需要花费极大努力辗转请求CAMCO公司予以协助，提供无线电、机关枪和其他零件。即使到了1941年11月下旬，宋子文还在和陈纳德策划如何从菲律宾获得器材，同时又在和英国空军代表讨论是否可以把新加坡的Curtiss P-40让给中国。[128]虽然在此之前陈纳德已经明白向居里表示，他只希望使用美国制造的军用品，而不想用英国制造的军用品，[129]但在情况紧迫时也没有选择余地。到了11月下旬，当陈纳德和新加坡英军司令达成初步协议，由英国转让Curtiss P-40给美国志愿航空队时，英方的交换条件则是从马尼拉得到美方武器。为此，宋子文又再度请求哈里·霍普金斯向麦克阿瑟将军去说项，以求完成此项交易。[130]因此一直要延至1941年11月下旬，这批飞机才在缅甸组装完成并交给中方，中方立即将之交给陈纳德使用。[131]

Curtiss P-40飞机在缅甸卸除装配后，立即开始训练。第一大队（Group）成立，下属3个中队（Squadron），每个中队实际能够作战的飞机大约20架。这个大队后来由宋子文建议称为“飞虎队”（Flying Tigers），取“如虎添翼”之意。[132]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美国志愿航空队究竟处于何种境遇？

11月初，居里仍在努力送34名飞行员到缅甸仰光参加志愿队，[133]但是事实上由于飞机不足、零件缺乏和训练不充分等问题，陈纳德担心美国志愿航空队无法在缅甸进入作战状态，建议把飞机迁往云南基地。[134]

但是珍珠港事件的次日，蒋介石立即指示陈纳德，美国志愿航空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滇缅路。[135]根据这项指示，美国志愿航空队留在了在缅甸，从此开始其作战活动，并且创造了光辉战绩。

1941年11月底，陈纳德向蒋介石提出美国志愿航空队报告时称，约有40架Curtiss P-40驱逐机及55名飞行员可以从事作战，但是在昆明的机场控管中心、电话和其他设备尚需赶工。[136]而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日，陈纳德还气急败坏地告诉宋美龄，CAMCO原本承诺在其设在中国内地的厂房能够对美国志愿航空队的Curtiss P-40提供维修的器材、工具、原料及熟练技术人员，但是此时却宣称均告缺如，逼得他只好向宋美龄求助。[137]

整个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组成还有两个小插曲。其一是它的美方人事费用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一些批评。这些人事费用包括薪水、战绩奖金、阵亡抚恤费、差旅费等，全部由CAMCO支付，总共为2995732美元。[138]客观言之，建立一支美国空军战斗部队只花了不到300万美元，似乎相当便宜。但是在当时外援短缺的情况下，宋子文仍然感到压力而不得不加以解释。[139]

其二是这批飞机原本应该交由中国空军使用，但是宋子文担心中国飞行员不熟悉飞机性能而造成失误，会妨碍此后争取美国飞机的机会，因此建议蒋介石将这批飞机交给陈纳德。[140]而正是这个东拼西凑而训练仓促的小股空军力量，在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就被蒋介石派赴缅甸前线作战，而且在同盟国亚洲的海陆空军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之际，赢得一场空中大胜仗。从此建立了飞虎队和陈纳德个人的声誉。

至于宋美龄的参与则与宋子文颇不相同。她对空军、飞机类型等实际操作问题不可能细致掌握，但她身在重庆，和航空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可以就近作为陈纳德、蒋介石、周至柔、王叔铭等人的桥梁。更何况她还和居里建立了特定的通信渠道。[141]

人手短缺一直是美国志愿航空队经历的严重困难。比如说，1941年11月初宋子文致陈纳德的电报显示，后者从9月底就申请招募的10名驱逐机驾驶员、10名机务长及10名无线电操作员迄未到任。而陈纳德希望招募到20名驱逐机驾驶员，并计划成立一个轰炸机大队，需要82名军官及若干技术士兵，均被美方耽误。因此宋子文只好请陈纳德让步，考虑让轰炸机飞行员兼任领航员和轰炸手，而无线电操作员也兼任机枪手。这样或许可以让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第二大队（轰炸）早日组建。[142]

陈纳德只好让步，但是也希望美方选送的无线电员要有能力兼任机枪手，而且他一再强调，选拔的人员一定要符合标准，以便在短期内能

够成立轰炸大队。[143]哪知才过几天，美方回复表示招募轰炸机飞行员有困难，CAMCO建议提高他们的薪酬，或许在每次完成任务后都发放奖金，作为物资刺激。[144]

在遭遇到这一连串挫折之后，陈纳德只好向中国空军要求紧急调遣所有能够充数的技工，取代他原本指望的美籍熟练人员，支持他驱逐机大队下的三个中队，以便飞机到达后可以立即派上用场。[145]当然，尽管这些中国空军的技工到此为止还从不曾接触过美制飞机，但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三）拉铁摩尔的任命

任命一位美籍人士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可说是在推进个人外交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努力。它也提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实例，说明中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是如何努力地为中美关系注入新活力。有关这个想法的起源、中国人的指望、美国人的应对，都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两个文化的差异，终至造成了政治上的误解。

1940～1941年，中国对美政策中一个重要考虑就是想要获得一位美籍人士成为中国的高级顾问。中国方面的动机并不难理解，因为类似居里这种高规格的访问只能偶尔为之，缺乏常规性。中美之间瞬息万变的状况以及人事的变迁，都很容易使短暂性的个人外交接触（例如居里访华之行）无法产生最大效应，也无法保证其稳定性和持续性。蒋介石最希望实现的，是能够和一位固定的美方人士保持长期关系，而这位人士能够对中国事务和需求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并将实情有效地向美国最高当局直接报告。更重要的是，这位人士必须享有总统高度的信任，让他能够促进中美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

读者或许记得，从20世纪开初，中国部分领导人就已经创了雇用外国顾问的先例。袁世凯如此，蒋介石本人亦复如此。因此，假如蒋介石的本意只是要一位“政治顾问”，而此人又必须是美国籍的话，则他大可以从美国社会径自招募一位合格人士。但是他却坚持此人必须由罗斯福亲自推荐，其含义是，这个人不但才华出众，而且是罗斯福钦定的人物。只有这样一位人士才能称职地作为两位领导人的桥梁。

蒋介石想要获得美国顾问的计划，其实早在宋子文刚刚抵达美国时，就已经私下嘱其邀请美国前任驻法大使蒲立德担任中国政府的“高等顾问”。[146]他首度向美国官方透露此意向的对象是1941年2月份访华的居里，人选依然是蒲立德。因为在中国人眼中，蒲立德在华盛顿拥有政治势力，与摩根索和罗斯福均有良好私交，具有成熟的政治判断力，娴熟外交事务，而且对中国充满好感，经常主动替中国贡献主意。换言之，他是一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是中国的忠实友人，而且在美国政坛

具有影响力。[147]假如这样一位美国人能够手持罗斯福的尚方宝剑来到重庆，而宋子文留守华盛顿，则罗斯福（蒲立德）和蒋介石（宋子文）之间就能够结成一个坚固的小团体，可以凌驾于美国政府其他部会之上。事实上，宋子文在1940年初就曾经把蒋介石的意图非正式地向蒲立德进行试探，但是由于蒲立德当时尚有其他事务缠身，所以只得放弃。[148]

居里在接到蒋介石要求之后，除了立即向罗斯福呈报之外，还建议后者赶快接受。但是居里在传达蒋介石请求时，却稍微偏离了蒋介石的原意，他自作主张地提醒罗斯福，美国应该抓住这个绝佳机会，安插一位美国人到蒋介石总司令部去担任重要职位，这样就可以就近催促中国政府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改革。他甚至试图去吊罗斯福的胃口，表示如果这位顾问能够具有正确的政治本能的话，他甚至可能把美国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引导蒋介石推行类似罗斯福的“新政”。但是居里并没有详细说明的是，这位政治顾问到底能够做什么，又到底能够指望从白宫得到何种支持。居里的感觉是，只要能够把一位美国人安插在蒋介石身旁，就可以帮助国民党脱胎换骨。[149]

用不着说，居里的说法对于罗斯福而言极为中听，而且立即被接受了，但是接下来的选拔过程则草率得惊人。当时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是罗斯福的朋友，拉铁摩尔是任职于该大学的教授。后者的名字就是由鲍曼校长向罗斯福提供的。在这个选拔过程中，美方没有人认真地考虑过蒋介石提出的要求，那就是他希望入选者能够具有如同蒲立德大使一般的个人品质和政治条件。美方也没有尽心去物色其他人选。1941年5月29日，居里向蒋介石发出通知称，罗斯福已经接受蒋介石要求并推荐拉铁摩尔出任该职。

自拉铁摩尔名字出现的那刻开始，中美之间就出现了不寻常的对比。一方面，中国政府天真地对这位顾问的到来充满期望；而另一方面，白宫幕僚在替蒋介石挑选这位顾问的过程中却漫不经心，随意应付。不管从任何一个尺度来衡量，拉铁摩尔和蒲立德完全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和罗斯福不相识，更谈不上享有总统信任，从来不曾在美国政府中任职，对美国的亚洲政策也不熟悉。他的学术专长是蒙古和中亚的古代少数民族史，也坦承自己对于近代和当代中国事务缺乏了解。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居里确实向蒋介石明白表示过，白宫希望拉铁摩尔只是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而不是美国政府派遣的公职人员。[150]

但是居里这番说辞实在很难引起中方的认真对待，因为在后者看来这只不过是外交辞令而已，其目的无非是避免美日之间不必要的摩擦，同时也不要去挑动美国国内孤立分子的反感而已。因为若非如此，罗斯福又何必多此一举地亲自为蒋介石去物色一位私人顾问呢？因此纯从事实而言，拉铁摩尔在蒋介石眼中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由罗斯福精挑细选的心腹人，而其用意就是要建立一条特殊渠道以方便处理中美关系。如果美国人连这个简单道理都不懂，那真是令人无言以对，或者是美国人故意装痴作呆在事后推脱责任的杰作。这个事件最后演成一场外交闹剧，

原因就是中方把它当作头等大事来处理，按情推理地将心比心，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已有共识，美方则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根本不理睬对方的苦心。

事情的发展是，蒋介石在听到罗斯福提名后大感兴奋立即致电宋子文，请宋亲自转告居里，他欢迎拉铁摩尔的提名，但是其正式任命，蒋则打算要等到宋子文和居里就拉铁摩尔的职务和待遇达成协议之后才予以公布。蒋介石还要求宋子文去探询，拉铁摩尔究竟希望被称为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还是蒋介石个人的政治顾问。[151]显然，蒋介石满心认定，拉铁摩尔既然是罗斯福钦定人选，则他在处理这个任命时当然需要分外小心，而且还要向罗斯福表达适当的敬意。

意想不到的是，宋子文的回复让蒋介石大吃一惊。宋子文6月3日报告称，拉铁摩尔通晓中文，了解华北和远东情况，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和知识水平，但是经由其他渠道发现他原来和罗斯福并不相识。这个消息对于蒋介石不啻是一盆冷水，难怪他忍不住在宋子文来电的空白处做了眉批。他写道：

惟其与总统不相识之语，决不至此，请居里君实告拉与总统关系如何。以中与总统发生个人直接关系故，特欲总统介绍政治顾问也。[152]

没有其他文字可以更坦白地表达蒋介石的想法。蒋介石之所以想要得到美国顾问的唯一动机，就是指望此人可以帮助他和罗斯福长期维持密切接触，而不是真正需要此人的政治智慧去发挥顾问的功能。为了要彻底找出答案，蒋介石不但要求宋子文继续运用他的私人渠道去挖掘真相，也嘱咐宋美龄用她的渠道向居里发送一封紧急电报（1941年6月6日），要求对方澄清，究竟拉铁摩尔是否和罗斯福认识，以及他和居里之间的关系。[153]与此同时，宋子文也警觉兹事体大，因此尽力去探访事实真相，包括特地亲自写信给拉铁摩尔本人，要求后者坦诚说明他和罗斯福之间关系究竟如何。在此之后几天，宋子文再度询问居里，而居里也透露他从麦修处也收到同样询问。居里的回答是："拉特摩尔与总统确无深交，惟因其学识声望，颇加器重，故以推荐。"[154]

就居里而言，他在接到中方询问后的立即反应是，必须向中方实话实说。因此他在6月7日为罗斯福拟好的回信草稿中，替罗斯福承认确实并不认识拉铁摩尔，但是熟悉后者的观点和著作，而且也曾经指派亲信专门对拉铁摩尔进行过仔细审查，罗斯福本人在做过独立审查之后也认为拉铁摩尔是所有候选人中最适任的一位，因此打算在下个星期三召见拉铁摩尔面谈。[155]

但是白宫其他幕僚担心，既然拉铁摩尔任命之事只差临门一脚，他们不愿冒被蒋介石回绝的危险而损伤罗斯福的颜面。因此他们反对采用居里诚实的回信，而想出了一记妙招去掩盖事实真相。提供这个计策的白宫幕僚克劳奇（C. K. Claunch），他的妙招是让居里安排拉铁摩尔在下星期一到白宫和罗斯福打个照面，然后向中国发出电报，一口咬定罗

斯福的确“认识”拉铁摩尔。[156]

这个计谋当即被接受而且依照剧本上演。这样就使得居里可以在6月9日向宋美龄发出正式回信，心安理得地向中方保证：“总统个人认识拉铁摩尔，而且授权我向您报告，他认为是最佳的人选。”[157]换言之，这个安排使得罗斯福可以宣称他的确“认识”拉铁摩尔。在美国文化和日常生活中，一直维持着一个重要而微妙的差别。美国人对于“说谎”认为是一种罪过，但是对于噤声不说出事件的全部真相，则可以认为无损于个人道德。然而说白了，美方这番折腾的唯一目的，就是在糊弄蒋介石。

不论蒋介石此时心中对于拉铁摩尔和罗斯福的关系是否还存在怀疑，他在6月14日接到宋子文来信后，也只好把怀疑深埋心底。因为宋子文来信提供了两个互相矛盾的证据。他在6月3日和拉铁摩尔会谈时，拉氏曾经坦承他“并不认识”罗斯福；但是到了6月6日当宋子文接到蒋介石指示再度去求证此事时，居里却向他保证，虽然拉铁摩尔和罗斯福谈不上是深交，但是他们两个人的确相识。

紧接着在6月12日拉铁摩尔本人也向宋子文致送了一封信，其中包含下列文字：“在您的来信中，有一点或许表示我们彼此之间有误解之处。假如这个误解是由于我的说辞所引起的话，我当然急于将之改正。（准确地说）我本人是认识总统的。”[158]

拉铁摩尔显然已经从白宫设置骗局的计谋家那里得到警告，而且也狠了心成为他们的同谋，把欺骗工作做到底。然而宋子文还是不得不向蒋介石承认，他依然无法肯定拉铁摩尔和罗斯福之间的关系性质到底如何，但是他对拉铁摩尔的学识和经验倒是肯定的。[159]有趣的是，约莫两个月后，宋子文在无可奈何之中发现了一种方法去安慰蒋介石：“拉特摩尔顾问对蒙古新疆，素有研究，请垂询。”宋氏电文花了大量篇幅分析在苏联和欧洲的油田受到战争破坏后，必会使中国新疆油田变得益形重要，而苏联又历来觊觎新疆。因此中国政府或许可以用上拉铁摩尔的专才为政府献策。[160]这就离中美关系越来越远了。

对于蒋介石而言，他大概也觉得无法再进一步要求美方提供更多证据，去担保拉铁摩尔和罗斯福关系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否则就等于是侮辱罗斯福了），只好接受来自白宫和拉铁摩尔本人一再的保证。不久，他就聘任拉铁摩尔作为他的个人政治顾问。[161]

中方目前已公开的资料并没有证据可以显示，蒋介石对于拉铁摩尔的政治价值是否持续怀疑。但是当蒋介石初次得知罗斯福已经推荐拉铁摩尔作为他的政治顾问时，正值美国战争部宣布将派遣空军将领访问中国，了解中国对飞机的需求。这两个事件同时发生，让蒋介石乐观地认为是美国对中国重视之增加，因此中方也积极着手筹备拉铁摩尔的工作范围和内容。[162]

不论如何，局势的急速转变使蒋介石不得不尽快发布拉铁摩尔的任命，否则就大有伤害他和罗斯福之间关系的危险。这份担忧不久就得到了证实。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罗斯福为了达到适当的宣传效果，还亲自修改了白宫宣布拉铁摩尔任命公告的文字。[163]罗斯福的这般投入，就更让中方没有退路了。

有趣的是，蒋介石决定采用以合同方式雇用拉铁摩尔，并且以六个月为试用期。这个颇为奇特的雇用方式，也或许正是蒋介石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万一发现拉铁摩尔和罗斯福并没有交情，他可以用一个不露声色的方式将其辞退，而不致损害罗斯福的颜面。事实上，如果蒋介石对拉铁摩尔满怀信心的话，他就不至于采取这种颇不寻常的“试用期”的规定，更何况试用期只有六个月，使拉铁摩尔根本无法做出任何成绩。[164]可以说，蒋介石提出的合同只不过是维持面子，让他无须拒绝罗斯福的推荐，而到时又有办法可以摆脱一个政治上轻量级的美国人。不论如何，中美双方遵照此前约定，拉铁摩尔的年薪定为一万美元，另外规定合同期满后可以续约或是中止雇用关系。[165]

从白宫幕僚的立场来看，他们一旦决定设立一个骗局，就只好硬着头皮坚持到底，即使把罗斯福陷于窘境也无法回头。两个星期后，罗斯福果然依据幕僚所定的剧本，写信向蒋介石表达他对于拉铁摩尔的任命感到欣慰。他赞赏拉铁摩尔的才能，又声称后者的政治立场和罗斯福本人十分吻合。罗斯福同时期望蒋介石重视拉铁摩尔的建议。[166]两天之内，居里又向蒋介石送出一封信，提醒蒋介石，称拉铁摩尔是罗斯福亲自推荐的，而拉氏不仅在学术上的成就广为人知，又热心支持中国，而且罗斯福本人也十分器重拉铁摩尔对于东方事务的了解，经常直接或是通过他的好友鲍曼向拉铁摩尔咨询意见。[167]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拉铁摩尔抵达重庆之后，蒋介石也觉得不得不写信给罗斯福，赞许拉铁摩尔超凡的才能，而且承诺必将重视拉氏的意见，因为“他（拉铁摩尔）的政治立场和您（罗斯福）的基本相同”。[168]

以上叙述清楚地显示，蒋介石掉进了白宫幕僚所设计的骗局而不得不假装糊涂地吞下一项人事安排，和他的初衷大相异趣。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的作为也说明，白宫的幕僚不把蒋介石竭诚的愿望当作一回事，以致为了掩盖起初的一个小谎到后来不得不扯下更大的谎言，甚至罗斯福本人也被拖下水。

这个事件，对于我们了解珍珠港事件前个人外交在中美关系上的重要性可以提供更多启示。毫无疑问，当蒋介石首次向居里提出要求时，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把它当成一件大事来处理。他并不是想要雇用任何一位美国籍人士来向他提供政治建议。事实上，他很可能从来就不曾认为他需要一位外籍人士，来指导他如何去处理中国内政事务。但是他肯定想要一位和罗斯福关系密切的美国人在他身旁说知心话。至于这位人士的职务名称，究竟是他个人的政治顾问还是中国政府的顾问，则更需推敲了。再从时机而言，中国既然在1940年10月之后就把美国推到外交舞台的中心位置，要全方位地推展中美关系，则这位顾问就更显得重要

了。

在另一方面，美国人则显然不能领会蒋介石如此认真处理此事的动机和程度，也说不定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们可能真的认为，重庆政府当然需要由美国人来进行正确的政治指导。有鉴于当时大部分美国人对于中国事务的认识，他们很可能认为任何一位心智正常的美国人，都有资格给予中国人正确的政治建议，更何况像拉铁摩尔这么一位大教授。拉铁摩尔的名字是美方未经遴选过程提出来的，它本身就说明蒋介石的要求在罗斯福心中从未占据足够分量。难怪罗斯福仅凭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一个随兴的推荐，拉铁摩尔就变成独一无二的候选人而且很快就被选中。仅凭名校教授的资格，拉铁摩尔就被白宫幕僚视为当然具备足够资格去指导中国人，更何况他还是一位政治学学者，加上又是“中国通”，当然绰绰有余了。然而美国人避而不谈的事实却是，拉铁摩尔的学术专长是古代中国和中亚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他对现代中国极端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问题却非常陌生。

一旦白宫在取得拉铁摩尔同意而开始做出先期工作安排之后，而中国方面又突然要求澄清拉铁摩尔和罗斯福之间的“个人关系”究竟如何，白宫幕僚就只好一不做二不休，装模作样地在匆忙中安排了一场短暂的拉铁摩尔和罗斯福的“会面”，然后一口咬定罗斯福和拉铁摩尔原本就曾经有过“个人关系”。读者如果要问，为什么一群位高权重又受人尊敬的美国官员，居然可以作践自己去玩弄如此低劣的骗局？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们打从开始就没有把中国的要求当作严肃事务去处理。因此，虽然中方要求的是一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而白宫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弱国，送去一个赝品也毋庸内疚。

从事后来看，白宫幕僚对于蒋介石着实玩了一出残忍的把戏，而没有考虑其长远后果。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拉铁摩尔抵华的最初几周中，蒋介石只能把他看成罗斯福的亲信人士，因此也就以同样心情去运用拉铁摩尔的才能。但蒋介石这种高涨的乐观完全缺乏事实基础，他希望在这种新安排下能够达成的目标，却一件也无法实现。

事实上，蒋介石和拉铁摩尔在后者抵达中国（1941年7月初）之初，可说是合作无间。在他们两人最初两次会面中（7月21、31日），蒋介石坦言他非常不满意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忽视。他抱怨说，尽管中国已经抗战四年之久，但是仍然没有取得西方国家的重视，而且相信即使在战后，恐怕仍然得不到它们的重视。蒋介石指出，这种情况已经被日本宣传工具大肆利用，嘲笑中国只不过是被白种人看成劣质人种，而白种人只要是为了维系他们对亚洲的统治，则随时可以牺牲中国利益。相对照之下，日本声称轴心国对待日本人如同平等民族，而且也必将会以同等方式对待在中国的亲日政权。蒋介石警告拉铁摩尔称，日本的这种宣传已经成功地在中国人民中激起了对白种人的不满情绪，最终必将打击中国的抗战决心。

蒋介石接着说，如果美国想要扭转这种状况，则罗斯福必须说服英

国和苏联与中国达成合作，邀请中国出席太平洋联防会议。该会议事实上已经成立，会员只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四国。蒋介石指出，只有罗斯福才有力量去建议将之扩大为包括中苏两国。在蒋介石漫长的申述中，或许有一点最能说明他此时心境。当拉铁摩尔询问蒋介石是否已经把类似意见向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传递时，蒋介石的答复是他只希望拉铁摩尔把他的看法直接传送给罗斯福本人。最后，蒋介石要求拉铁摩尔把他的意见写成信稿经他过目之后再以拉铁摩尔名义向罗斯福发出。[169]

蒋介石和拉铁摩尔初次交往，显示了几个特点。第一，蒋介石和拉铁摩尔交往的初衷，是拉铁摩尔有渠道可以通达罗斯福，因此决定马上加以运用。第二，蒋介石以宽松心情和拉铁摩尔交谈，一如他和居里交谈时那般。这和他通常跟美国大使或是苏联大使谈话时的僵硬姿态大不相同，显出相当的亲切感。第三，蒋介石内心打算利用拉铁摩尔的方式，是让后者忠实地记录下他的谈话重点，然后以拉铁摩尔的名义传达给罗斯福，使罗斯福以为这些都是发自拉铁摩尔的内心之言。

拉铁摩尔也似乎愿意充分配合蒋介石去扮演这个角色，这就让蒋介石更感到满意。隔日拉铁摩尔向宋美龄回报称，他已经遵从蒋介石旨意给居里写信。让宋美龄也感到高兴的是，拉铁摩尔不但把信稿交给她，并且征求她的意见是否尚有需要充实改进之处。[170]这个过程的最后产品是拉铁摩尔以自己名义向居里发信，但其内容却是忠实地传达了蒋介石的谈话重点、忧虑和具体的要求。信中有些段落，几乎一字不漏地重复了蒋介石的说法。[171]

从蒋氏夫妇立场来看，这种结果实在是好得难以想象。因为拉铁摩尔似乎完全愿意按照蒋介石所定方法提供合作，并且在和罗斯福的通信中，直截了当地把蒋介石的话当成他自己的话，讲给罗斯福听。由于蒋介石要求拉铁摩尔在发出信件之前让他有机会审核信稿，这就等于是让蒋介石有全权去掌控信件内容。更理想的是，这封信不是蒋介石对罗斯福提出的直接请求，而是经由拉铁摩尔的笔，附加了拉铁摩尔的个人信誉和判断，因此更具分量。从蒋介石立场看来，这封信出自罗斯福本人派到中国的亲信之手，就远比它出自蒋介石之手要来得更具说服力。再者，即便罗斯福决定不采纳信中要求，也不会伤害到蒋介石颜面，因为这些要求在技术上只是拉铁摩尔这个中间人的想法而已。不管如何，从中国人方面看来，这是和美国处理外交问题最理想的方式。果不其然，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这种方式很快就变成中美关系中的标准作业方式，拉铁摩尔完全配合蒋介石，把后者想要传递给美国的信息装扮成他自己的意见，用他自己的口气向美国政府表达。[172]

在这种安排之下，我们很容易就理解，为什么蒋介石在拉铁摩尔到任之初会对他的工作感到如此满意。就像宋美龄满怀欣喜地告诉居里的那样：“说到拉铁摩尔，请转告总统，他完全令我们满意。他对东方事务的了解，他的个性，和他急于想用尽一切方法提供服务，都让他成为蒋委员长身边一位价值非常宝贵的新人。他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让委员长

和我认为和您十分相似。”[173]到了11月底，宋美龄为了拉铁摩尔的事再度致函居里：“他（拉铁摩尔）和我们密切合作，而我也非常高兴总统挑选了他。他让别人和他共处时感到放松，在这个每天充满紧张不安的环境里，只有他这种个性的人才真正让我们感到自在。他对工作的热忱和乐观的神情，对我们也不啻是一剂补品”。[174]

只要中国人一日相信拉铁摩尔能够对罗斯福产生影响力，则他们的这些赞誉之词都是发自肺腑。但是无论迟早，蒋介石夫妇终究会发现原来拉铁摩尔根本就不是美国人吹捧的重量级政治人物。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未能找到任何原始史料可以精确地指出，这个令中国人伤心的发现究竟在何时发生。但是既然蒋介石在很早就曾经为拉铁摩尔和罗斯福没有交情而感到震惊，中国人大概必定也用了许多旁敲侧击的手法，去诱导拉铁摩尔亲口说出真相。在此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旁证。在7月，蒋介石就在日记里写了一段饶有趣味的观察：“拉铁摩尔顾问为一诚实之学者专家，其于政治或非所长乎。”[175]一种解读就是“诚实”的拉铁摩尔把他的底细和与罗斯福的关系可能和盘托出，而他又把自己的学识和见解说明之后，让蒋介石得知政治非其所长，而无法加以运用。这就难怪在此后的四个月中，蒋介石和拉铁摩尔见面的次数非常有限，而且交谈内容也没有任何记载，这和蒋氏与其他重要人士谈话的记载大有不同之处。[176]

无论如何，中国人的发现应该是在1941年底之前，因为那时拉铁摩尔的第一个雇用合同即将期满，而蒋介石夫妇最终决定不予续约，也不拆穿这个骗局，而是采取了典型的传统处理方法，那就是不直接通知拉铁摩尔不再需要他的服务，只是告诉他先回美国，等候进一步信息。事实上，中方给了他一个充满温情的道别式，再三推崇他的贡献。在一封由拉铁摩尔面呈给罗斯福的信函中，蒋介石宣称拉铁摩尔完全符合中方的期望，不辜负罗斯福的推荐，因此特别向罗斯福致谢。蒋介石在信的结尾时不忘把重点说出：“个人之间的接触，的确能够促进更亲切的关系和相互间的了解。”[177]

但是这一次却轮到美方去解读蒋介石的真实感情了。居里不久致电宋美龄，称他很高兴听到蒋介石对拉铁摩尔的赞誉。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刻，居里还是不放弃机会想要向蒋介石灌输一个观念，那就是拉铁摩尔的确和罗斯福有良好的个人关系。他还含糊其词地表示，拉铁摩尔很可能未来在白宫的影响力会增加。[178]

但是蒋介石打定了主意绝不让自己上当两次。尽管拉铁摩尔表现出高度合作意愿，然而蒋介石终于肯定他在白宫缺乏分量，因此他对蒋介石的价值一直就是假象。无论美国人如何认为拉铁摩尔具有资格给中国人出主意，蒋介石从一开始对于这个关系只有一个关心点，那就是和罗斯福建立直接可靠而又稳定的接触。一旦蒋介石发觉拉铁摩尔不能满足此项指望时，后者的实用价值就立即消失。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拉铁摩尔在中国服务为时短暂，但是西方

学术界却有人把他作为蒋介石和中国政府无法容纳他及其他美国派送到中国的顾问专家的一个证据，益发证明蒋介石和重庆政府领导者的心智闭塞和冥顽不灵。这个说法所持的理由是，诸如拉铁摩尔之类的美国专家，到了中国之后尽惹中国政府的讨厌，因为他们要么主张清除缅甸路上的贪污枉法，要么建议税收制度和经济改革，尽是些中国政府不愿听的意见。[179]或许是种族优越感的作祟，他们认为美国的大学教授理所当然地有资格胜任中国政府的导师。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军方这种心态更为显著。不幸的是，这一类分析经常忽略一个简单事实，那就是国民政府在战时不但熬过了大量的贪腐事件，也和许多地方实力派达成了和平共存的交易。至于当这一类分析引用拉铁摩尔作为实例时，就更显得文不对题。

在中方史料里，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拉铁摩尔曾经做出过重大的政治改革建议而触怒了蒋介石。正好相反，他们两人之间合作愉快的理由极其简单。拉铁摩尔永远只遵照蒋介石的嘱咐去做他的工作，而很少对中国内政改革发表意见。然而从蒋介石角度去看，这并不能令他满意，因为到了1941年底情况已经非常显明，那就是蒋介石原本指望通过拉铁摩尔而直达罗斯福的外交策略已经无路可走。但是蒋介石和宋子文两个人，却又都苦于无法扯下脸来明白地告诉拉铁摩尔，他对中国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

假如中国人指望拉铁摩尔本人会识相地为自己找下台阶的话，他们也注定会失望，因为拉铁摩尔是美国人，从不会以这般中华文化方式处理事情。他在美国无所事事地空等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在1942年5月3日给蒋介石写信，要求中国政府说明对他的未来究竟有何规划。

拉铁摩尔为了突出他本人对促进中国利益的重要性，特意透露他将于近期和罗斯福会面，而且又着意强调他比其他美国人更有能力直接通达总统和联邦各重要部会。更有甚者，他提醒蒋介石称，身为美国公民，他通晓美国国情，也容易和美国民众沟通。他还声称：“我表达意见的能力，无人可比（包括其他美国人在内）。”在充分强调他自己对中国政府的价值，并且声称他在华盛顿能够替中国做的工作，远超过他在重庆所能做的工作之后，拉铁摩尔依然征求蒋介石的意见，他是否应该回到中国去。[180]

拉铁摩尔急于想为中国服务的心情，也让他再度希望得到宋子文的帮助。他在1942年10月初告诉宋子文称，美国政府正打算委派他去主持远东的宣传工作，但是如果蒋介石依然愿意请他担任顾问的话，则他就会谢绝美国的任命。[181]用不着说，中国政府此时已经毫无意愿请他返回重庆。虽然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拉铁摩尔的工作依然和中国有关联，但是他作为中美两国之间发展个人外交所扮演的角色时间短暂，而且成果也乏善可陈。[182]

总结地说，拉铁摩尔事件代表中国政府的一种重要努力，企图运用亲密的个人关系去加强中美的官方关系。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孤立事件来

看，则拉铁摩尔事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场闹剧，中国的精心策划显然落空。尽管拉铁摩尔努力配合蒋介石，而且毫不迟疑地把蒋介石想要对美国表达的意见，一股脑用他自己的笔和名义忠实地写下，但是这些话并没有在华盛顿产生影响，而中国政府也不需要一位支高薪的美籍人士做英文刀笔吏的工作，这对于促进中国利益而言并无贡献。

至于美国人指望他成为蒋介石政治领路人的功能，他的成绩同样乏善可陈。后世某些学者有时也不免采取一种立场，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官员没有接纳美籍专家、官员或是军人的意见，其缺失无须经过进一步探究，必定在中方。但是在拉铁摩尔前后六个月任职期间，他对中国内政和外交事务最有创意的贡献，只不过是针对满洲、蒙古和新疆问题，向蒋介石呈送了几份备忘录。这些备忘录终于让他的学术本行知识派上了用场，也附带做了一些政策性建议。但是它们并不反映美国官方立场，也没有在中国政府的政策上造成长远影响。[183]事实上，如果中国政府只是想要聆听拉铁摩尔对这些专业课题的看法，则它大可以邀请拉铁摩尔以学者身份到中国做短期学术访问，付给他一份体面的讲演费，而无须大张旗鼓地任命他去担任那么崇高的职务和支付那么高昂的薪金。

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去审视拉铁摩尔事件的话，则它所代表的是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做了长期的试探，以找出一个更好的途径发展中美外交关系。它代表一个重要的努力，去培养与美国总统之间的特殊关系，从而把中美关系植根于更稳固的个人关系基础之上。蒋介石的这些设想虽然颇具雄心，却被白宫幕僚求功心切的小动作颠覆。但是这次失败并没有使蒋介石感到气馁，反而坚定了他的决心，在此后的岁月中加倍努力。拉铁摩尔任务的失败绝非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白宫拆了他的台，拒绝用实际行动向中国人证实一位美国顾问应该具有的政治能耐。

后世某些学者引用拉铁摩尔事件，指责重庆政府和蒋介石不懂得珍惜重用拉氏的政治智慧以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更是自作聪明而不知所云。这类学者不愿意潜心静意地检阅史料，只看表象，当看到美国专家到战时中国服务而不能施展抱负时，立即认定其由来必是中国政府的愚昧短视，而很少探究美国专家是否称职。美国政治领袖在面对中国时的那种自以为是和将对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懒惰狂妄心态，屡屡造成闹剧甚至悲剧。珍珠港事件之前有拉铁摩尔事件，之后又有史迪威事件，[184]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国际政治是残酷的，每当这类事件发生时，打落牙齿和血吞的一方永远是弱国。这就难怪在国际政治里，人人都想成为强国。

六 对个人外交的评估

本章以上的讨论显示，在抗战的最初四年，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先后经过了几个重要阶段，表现在它们的政策目标、认知和作风上，而导致这些改变的因素大致有几个。

首先而且也是最简单的原因是，中国政府花费了相当一段时间，才逐渐体会出美国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性。这个醒悟要等到1939～1940年才出现。

其次，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在早期是由行政院和外交部主持。由于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前线军务上，因此他只有余力关注和德国及苏联的关系。一直等到中国与苏联、德国的军援和军售关系发生危机，而中日之间的战线渐趋稳定时，蒋介石才将注意力转移到中美关系上。

第三，蒋介石在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对当时中美关系的处理方式，随着更深入的了解而产生不满。中国外交政策在孔祥熙和王宠惠主持下，到了1938年初已经成为国内攻击的目标，但是要等到11月才被50名国民参政会委员集体签署，公开予以谴责。[185]

在这个背景下，蒋介石才逐渐掌控中美关系。最明显的迹象，就是他此后向胡适直接发出指示电函的频率越来越高。一旦蒋介石显示这个新作风，外交部长王宠惠在处理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就变得越来越退缩。1941年4月，国民党八中全会决定由郭泰祺取代王宠惠为新任外交部长。[186]但是郭泰祺还没有来得及进入状态就因为个人操守问题被新闻界大肆攻击，最后黯然去职。所有这些事故使得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决策核心，在1939～1940年产生了剧烈变化。外交工作重心从外交部转移到蒋介石及其他委员长办公室的幕僚手中。

第四，随着时间推进，蒋介石对于中国驻美外交人员的办事能力也开始感到不满，包括王正廷、胡适和陈光甫在内。因此，蒋介石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指令胡适和陈光甫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向美国政府争取更多的援助，要么改派一位新人去设法和白宫及罗斯福本人建立直接关系。蒋介石选择了第二条路，决定派宋子文去担当这个任务，因为宋氏并没有胡适和陈光甫的包袱，而又有他们二人所不及的才干。在这个意义上，宋子文赴美大有助于改变中国的外交作风，放弃传统之路，改走个人外交之路。

第五，在中国改变对美外交作风的同时，政府内部的决策过程和机制也在发生变化。重庆和华盛顿之间的沟通，主要是在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而驻美大使和外交部长则每每发现他们对于中美关系上发生的重

大事务茫然无知。重大的决策经常由蒋介石和宋子文决定，也经常有委员长办公室的幕僚（比如王世杰、陈布雷）的参与。

因此，当我们把1937～1941年的中美关系做一个总检讨时，宋子文的赴美应该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外交作风的分水岭。从1937年7月到1940年6月，几乎没有一位重要的美国领袖访问过中国。美国在华事务由美国大使詹森在重庆处理，而中国在美事务则由王正廷和胡适先后两位大使在华盛顿处理。蒋介石极少和美国驻华大使会谈，即使会谈也是短暂而刻板，缺乏实质内容。中国大使和罗斯福的会谈也几乎同样地稀少，内容同样缺乏实质意义。

宋子文在1940年6月抵达美国之后，情形随即大为改观。中国政府改为采取更具个人色彩的方式去处理中美关系，而美方也出于自身的考虑而做出相等的响应。宋子文最初只是以其无懈的精神去培养在美国的社会关系和私人关系，借此让联邦政府更多的部会为他开方便之门。其结果是一批重要的美国领袖访问中国，而每次都是由宋子文担任幕后推手。这些重要访问包括：1940年11月麦修访问重庆，1941年2月居里作为罗斯福个人代表第一次访华，1941年6月拉铁摩尔出任蒋介石政治顾问，1941年7月美国空军军官团访问中国，1941年8月陈纳德在组成美国志愿航空队，然后是马格鲁德将军率领的美国陆军代表团于1941年10月赴华工作。以上这些活动在胡适任大使期间，从来没有一件被列入计划。

在策划这些访问的过程中，宋子文免不了得罪部分华盛顿的重要人物。比如说，当宋子文在1941年初安排居里的访华活动时，中国政府原本还表示请居里做客，由中方承担他的全部费用，[187]却意想不到此举引起国务院高度不快。考其缘由是国务院到了很晚才得知访问计划，而且还是居里在不经意之中透露的，这就让国务院觉得大失颜面。胡适更是被蒙在鼓里，他是从亨贝克处才得知的，比国务院还更晚一步。

类似情形在宋子文设法拉近中美两国军事关系时再度发生。1941年7月，宋子文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接触并且做出一个计划，由美国派送一个高阶军事代表团去中国工作。正当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商量该代表团的性质和地位等问题而遭受内部阻力时，宋子文却在努力设法提高代表团的层次，希望美国派出军官代表的规模、人数和专业素养，都可以和1930年代德国军事顾问团相匹配，甚至超过之。正如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的报告所言，他担心此举又会激怒国务院，但是依然决定勇往直前，因为他相信这样做一定符合中国利益。[188]宋氏的努力最终造成美国在1941年10月由马格鲁德将军率领军事代表团派往中国服务。[189]顺便在此一提的是，宋氏这方面的努力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也没有停止，为拉近中美关系做出了更多贡献。

在此也需要指出的是，一旦宋子文成功地安排了美国有力人士相继访问中国，他就成功地促使蒋介石走上中美外交关系的第一线，直接和美国访客短兵相接。这个改变促使蒋介石运用他个人的渠道接近罗斯

福，因而在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越来越活跃的角色。很多迹象显示，蒋介石对于这个新的亲身参与的角色感到既新鲜又有趣，而且也越来越增加了他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好的信心。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美关系所涵盖的话题和关系的本质。而这些改变的重要性，在珍珠港事件导致两国终于成为盟国之后变得格外显著。事实上，蒋介石变得非常勇于直接掌控中国对美关系，最后甚至成了中国的外交部长。

但是这个过程也让蒋介石付出了相当代价。抗战开始之后，由于各种的重任从四方八面落到他的肩上，因此一人集权的趋势日益鲜明。更由于他主战立场强硬，就如同其他官员所言，一切都唯他是从。1937～1940年，蒋介石同时要处理党政军三方面事务，因此在私底下已经承认力不从心。他写道："对于全盘战局，自信确有把握，故此心泰然，毫无疑虑。惟对于行政与军政之改革及人事之安置，尤其是经济建设，茫无头绪，反加忧惧惶惑，时现不克胜任之象。"[190]他不时会在日记中希望孙中山和陈英士仍在世间，可以在党政事务上为他分忧，让他能够专注军事问题。

岂知到了1940年以后，他的责任反而加重，外交事务逐渐占据极多精力。除了要和胡适就外交事务不断地进行学术和哲理性质的笔战之外，他还要接见外宾，不仅是美国总统特使如居里者，还包括英美苏联大使、麦修少校、马格鲁德将军等。到了此一阶段，许多给罗斯福的信件也是由他亲笔拟稿。这种工作上的压力使他经常在日记中怒气冲天、破口大骂。有次外交部长王宠惠就因为做了件让蒋介石不顺心的事，被认为是无能，而被狠狠地臭骂一顿。事后蒋介石又后悔自己缺乏修养。[191]这种境况在蒋介石的战事生活中屡屡发生。

再如前章所述，在美日密谈的紧锣密鼓阶段，蒋介石接连几日未曾入眠，密切注视时局发展，以致弄得肝火大旺。在珍珠港事件之日，他对于外交部效率的不满达到了极点。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外交部之不得力，郭泰祺之无常识，与其官僚成性，毫无活气，区区说帖拟稿至五小时，尚杂乱不清，令人为之脑痛气闷，此为从来所未有者也。"[192]这短短几句话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景象：蒋介石显然亲自处理外交事务，交代外交部草拟一个说帖，但是等了五个小时，得到的仍然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文件，无法采用，这当然只好逼着他亲自动手改写，或是交付给委员长办公室的幕僚去另拟。难怪他会气得"脑痛"。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到了太平洋战争期间只会变本加厉。蒋介石几乎取代了重庆政府的外交部。

某些西方学者经常诟病中国的个人外交不尊重美国政府的体系，打乱了他们的行政行事准则。中国人不知轻重，不懂规矩等都能言之成理，但是他们却忘记了，最会运用个人外交的领袖莫过丘吉尔，他经常和罗斯福会面、写信。许多经由丘吉尔和罗斯福个人接触而做出的决定，联邦高级官员甚至要到事后才知道，然后赶紧照办。他们不但不敢批评，还要心存愧疚，责备自己没有及时"体察上意"。而学者也少有敢于责备丘吉尔者。如此看来，美国人检验个人外交的标准，并不是它是

否在原则上有问题，而是谁从事个人外交，英国是有价值的友邦，所以可以。中国是弱小国家，当然由美国定调如何交往。这是中国必须吞下的现实苦水。强国定调，弱国顺从。历来如此。

七 个人外交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案例

中国在转变为着重个人外交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它为宋美龄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舞台，使其成为外交工作领域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个过程无论在中国近代史或是世界其他国家里均属绝无仅有。虽然宋美龄的外交才华要等到珍珠港事件之后才广为世人所重视，但是她早已参与中国的外交事务。

事实上即使在1940年初，蒋介石已经不得不依赖宋美龄参与外交事务，以致当她还逗留在香港治病期间，蒋介石就数度紧急致电，促其赶紧返回重庆。[193]麦修少校在1940年底访问重庆，让宋美龄得以扮演一个更活跃的角色，去培养与在中国而又具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的交情。在随后的岁月里，宋美龄继续和麦修保持直线联系并就国际事务交换意见。[194]

真正让宋美龄外交才华大放光彩的机会，是1941年2月居里的访华。居里之行建立了一个新模式：宋美龄不但列席蒋介石和居里的会谈并充任口译，而且越来越频繁地参加实质性商讨，最后成为货真价实的全程参与人。除了她的语言能力和社交风度之外，对于美国文化和心理的熟悉以及细腻的观察力，都让她在这些以男性为主谈论政治和战争的场合中显得分外突出。她也毫不迟疑地抓住主动权，对于谈论的方向和进度都敢于控制。事实上，她的外交技巧的娴熟程度，很快就让她和蒋介石组成了一个有效的团队。他们的目标一致，但是各人表现出不同的姿态。等到她和居里建立了私下沟通渠道时，她对中美外交的涉入程度就变得更深入，因为双方都大量使用这个渠道互通信息和传达向对方的要求。

用不了多久，宋美龄就在所有蒋介石与来访的美国要人或是美国大使之间的秘密会谈中成为一位全程参与者，也经常兼任口译工作。除此之外，会谈通常只会有一两位速记员在场，而外交部则根本无人可以出席。[195]

在拉铁摩尔成为政治顾问后，几乎所有他和蒋介石之间的沟通都要通过宋美龄传达，而宋美龄也可以向拉铁摩尔提出她本人的指示。事实上，拉铁摩尔和宋美龄之间的沟通，可能并不少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来往。因为双方都有默契，那就是宋美龄的发言代表蒋介石。随后，当美军代表团访问重庆时，宋美龄是蒋介石和马格鲁德全程会谈中的重要人物。[196]

宋美龄对于陈纳德和美国志愿航空队援华工作的推展，也做出了幕前和幕后的贡献。众所周知，蒋介石夫妇最初赏识陈纳德的空中作战才

华是来自双方的直接接触，与美国政府毫不相干。而他们合作初期也是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国自己的空军。还是在1937～1939年，宋美龄对于中国政府内部发展空军的事宜，就已经成为陈纳德依仗的帮手。到了1940、1941年，重庆政府开始积极争取美国支持发展中国空军时，宋美龄的角色则明显转变为国际化。在这两年时间里，大致上有五个人涉足运用美国资源发展中国空军。他们是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陈纳德和居里。一般的运作程序是，由陈纳德向蒋介石提出具体要求（飞机类型、性能、数量及飞行员、机械师），由宋子文向居里传达，后者再向罗斯福进言和与战争部协商。人员部分只要得到美国政府默许，通常由宋子文协调CAMCO公司向海陆军或民间招聘，以商业合同方式建立雇用关系。而宋子文掌控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因为全程从旁协助，也承担了许多工作。

宋美龄的工作不是直接和美国政府进行官方外交，而是发挥两种非官方的外交功能。一是她为陈纳德排解中国政府内部障碍。陈纳德是一位不谙中国官场莫测高深的门外汉。中国空军将领甚至陆军将领想染指或是霸占空军事务者大有人在。他们针对陈纳德的业务或是中国空军复杂的盘算，以及在蒋介石面前直接进言的内容，其城府之深和钩心斗角、诡计多端，绝非陈纳德这个美国汉子所能了解。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宋美龄所扮演的角色。1941年底，陈纳德突然接到命令，今后一切有关空军的事务必须由他直接向蒋介石汇报。陈纳德当即请求宋美龄继续担任他和蒋介石之间的联络人。他把理由说得非常直白，那就是蒋介石本人日理万机，经常会听信他人错误信息而做出对空军发展不利的决定。因此宋美龄的关注和斡旋，对于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行员队伍的成立非常重要。[197]

二是宋美龄和居里之间的直线沟通（SEGAC），绕过了联邦政府的官方机构。陈纳德的请求，经过蒋介石同意后由宋美龄发给居里，甚至可能直达罗斯福，诚可谓一条简便快速的通道。

如此说来，即使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宋美龄已经在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确立了一个可以产生重大影响力的地位，虽然这个地位仍然属于幕后而不是官方正式身份。珍珠港事件之后，她的身份就变得更为公开，从幕后走向前台，而且影响力与日俱增。到了她旋风式地访问美国以及她调停蒋介石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冲突时，她的重要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1]《中国空军第五路司令部公函》（1941年12月6日），Currie Papers，Box 2，Folder 2。

[2]《蒋介石日记》，1941年6月6日。最初估计为1500人，但是在6月30日清算实际为990人。

[3]《蒋介石日记》，1941年7月31日、8月8～11日。

[4]《蒋介石日记》，1941年8月16、31日，9月1、3、4日。

[5]《蒋介石日记》，1941年8月29日。

[6]《蒋介石日记》，1940年9月21日。

[7]《蒋介石日记》，1941年5月5~8日、9月20日。

[8]《蒋介石日记》，1941年3月22日、6月6日。

[9]《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6月13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53页。

[10]《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7月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58页。

[11]《徐永昌日记》，1941年6月27日。

[12]《徐永昌日记》，1941年10月30日。

[13]《蒋介石与McHugh谈话记录》（1940年12月1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24~427页。

[14]《徐永昌日记》，1941年1月20日、2月8日。

[15]《王世杰日记》，1941年2月18日。

[16]《蒋介石致郭泰祺大使电》（1941年4月1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157~158页。

[17]《蒋介石致郭泰祺大使电》（1941年3月25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2册，第151页。

[18]《徐永昌日记》，1941年2月20日。

[19]《王世杰日记》，1941年5月11日。

[20]《蒋介石与美国大使高思谈话记录》（1941年6月2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41~144页。

[21]《徐永昌日记》，1941年7月5日。

[22]《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7月4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45-14958。

[23]《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7月5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45-14959。

[24]《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7月1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44~145页。

[25]《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1年11月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80~481页。

[26]《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4月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46页。

[27]《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4月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47页。

[28]《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4月1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35～136页。

[29]《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1月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327页。

[30]《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4月21、22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4月24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0册《对美外交（1）财经援助》，第128～133页。

[31]这些人包括陈立夫、邓文仪、杨杰、贺耀祖和张冲。杨奎松：《抗战前夕陈立夫赴苏秘密使命失败及原因》，《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32]多项实例载于《翁文灏日记》，1936年3月6、13日。

[33]《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35页。

[34]《王世杰日记》，1938年2月26日。

[35]《王世杰日记》，1939年4月8日。

[36]《王世杰日记》，1939年5月20日，6月18日，7月2、8、12、27日。

[37]关于颜惠庆致蒋介石电报告与罗斯福会面经过，见《王世杰日记》，1939年11月7日。

[38]《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39年7月20日），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1939年7月20日；《王世杰日记》，1939年7月27日。

[39]《蒋介石致罗斯福函》（1939年7月2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82～86页。

[40]《颜惠庆致蒋介石电》（1939年11月3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89～90页。

[41]《罗斯福致蒋介石函》（1939年11月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90页。

[42]《外交部长王宠惠致蒋介石电》（1938年11月2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81页；《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522页；《颜惠庆致蒋介石电》（1939年11月3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89～90页；《胡适致蒋介石电》（1939年11月6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28册《对美外交（1）一般交涉》，第85页。

[43]《王世杰日记》，1939年12月22日；周鲠生及钱端升信件，《王世杰日记》，1940年2月13。

[44]《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0年6月1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274页。

[45]《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7月1、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93～95页。

[46]《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6月26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3册，第166页。

[47]Transcript of 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Corcoran and Morgenthau，April 14，1941，*Morgenthau Diary*（*China*），pp. 362-363.

[48]Summary notes of conference at the White House，April 15，1941，*Morgenthau Diary*（*China*），pp.364-365.

[49]包括财政部副部长丹尼尔·贝尔、国务院远东局局长汉弥尔顿（M.Hamilton），以及哈里·怀特、大卫·科克伦。

[50]For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meeting on April 21，1941，*Morgenthau Diary*（*China*），pp. 385-394.

[51]《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1年4月21日；何凤山：《外交生涯四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第119~122页；《海桑集》第5a册，第18~19页。

[52]《蒋介石日记》，1941年4月12日。

[53]《蒋介石日记》，1941年4月16日。

[54]当摩根索声称他从来不曾听过宋子文雇用美国人参加的那家公司时，哈里·怀特说："部长先生，假如对这件事有人犯有错误的话，那个犯错者是您的幕僚，而不是宋先生。因为Foley先生和我自己都是知情者。"摩根索立即回答道："如此说来，Foley先生和你都对不起宋先生和我本人。我的意思是，如果宋先生曾经告知你和Foley先生，那么我必须认为宋先生是没有犯错的。"参见transcript of the meeting on April 21，1941，*Morgenthau Diary*（*China*），pp. 385-394。

[55]Phone log，February 21，1941，*Morgenthau Diary*（*China*），pp. 352-353.

[56]《光公使美日记》，1940年1月16日。

[5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Department of State，written by Stanley Hornbeck on August 15，1940 meeting with Soong，Morgenthau and Hornbeck，Hornbeck Papers，Box 52.

[58]Transcript of the meeting on April 21，1941，*Morgenthau Diary*（*China*），pp. 385-394.

[59]《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11月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13页。

[60]《诺克斯海军部长致蒋介石电》（1940年11月15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16页。

[61]《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11月1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15~416页。

[62]《蒋介石与麦修会谈记录》（1941年1月1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35~438页。

[63]《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2月12日），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57~58页。

[64]《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533页。

[65]宋子文向蒋介石提供有关居里的履历表，参见《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3册《对美外交（4）居里两度来华》，第23～25页。

[66]FDR memo.to Currie，January 11，1941，Currie Papers，Box 5.

[67]《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4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3册《对美外交（4）居里两度来华》，第29页。

[68]《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2月7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5；《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1月 6日），《革命文献拓影本》：4450.01-042-14792；《蒋介石日记》，1941年1月25日。

[69]《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2月7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5。

[70]《蒋介石日记》，1941年2月7、24日。

[71]《翁文灏致胡适电》（1941年3月10日），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第1册，第187～190页。

[72]《宋子文致翁文灏电》（1941年1月25日），Soong Papers，Box 41，Folder 1。

[73]《宋子文致徐堪电》（1941年2月14日），Soong Papers，Box 41，Folder 1。

[74]各次会谈记录，参见《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3册《对美外交（4）居里两度来华》，第44～121页。

[75]《蒋介石与居里谈话记录》（1941年2月2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579页。

[76]《蒋介石与居里谈话记录》（1941年2月26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591～595页。

[77]《蒋介石日记》，1941年2月26、28日。

[78]《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1月30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3。

[79]《蒋介石致宋子文和胡适电》（1940年11月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07～108页。

[80]《蒋介石日记》，1941年10月31日。

[81]《顾孟馀致宋子文电》（1941年2月20日）、《钱昌照致宋子文电》（1941年3月16日），Soong Papers，Box 39，Folder 28。

[82]《蒋介石日记》，1941年3月7日。

[83]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33～34页。

[84]Report by Currie to Roosevelt，March 15，1941，PSF，Box 427，Roosevelt Papers.

[85]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 51；Visit to

China of Lauchlin Currie File，March 3，1941，Department of State，Decimal File，003.1193，RG 59.

[86]《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4月13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43-14849。

[87]案例见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 1册；Currie letter to Mme. CKS，May 26，1942，Currie Papers，Box 1。

[88]两份电报本文，参见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622～624页。

[89]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 19.

[90]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p. 38，47.

[91]《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69页。

[92]蒋介石在接到美国警告后，立即指示宋子文把他最近的电文首先发送给国务卿。参见 CKS cable to Soong，June 1，1941，Currie Papers，Box 3。

[93]Currie memo.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3，1941，Currie Papers，Box 5.

[94]Welles cable to American Embassy in Chungking，July 17，1941，Currie Papers，Box 3.

[95]蒋介石告诉宋子文，他无法任命宋氏为行政院副院长，因为于法不合，而且有政治困难，但是征求宋氏意见是否可以接受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的任命。参见《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5月7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8；《蒋介石日记》，1941年5月1日。

[96]《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7月6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0。

[97]《宋子文致李石曾电》（1941年7月7日），Soong Papers ，Box 41，Folder 1。

[98]《宋子文致李石曾电》（1941年7月5日），Soong Papers，Box 41，Folder 1。

[99]《钱昌照致宋子文电》（1941年7月4日），Soong Papers，Box 45，Folder 4；《宋子文致钱昌照电》（1941年8月21日），Soong Papers，Box 41，Folder 3。

[100]《蒋介石日记》，1941年7月8日。

[101]《居里致拉铁摩尔电》（1941年11月26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736页。

[102]《蒋介石日记》，1941年7月 26日。

[103]《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3月5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6。

[104]Report by Brigadier General H. B. Claggett，“Air Mission to China，” submitted to General George C. Marshall，Chief of Staff，June 12，1941，China Defense Supplies（hereafter CDS）Papers，Box 49，Folder 2.

[105]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一书中，史迪威对中国空军要求的驳斥理由。

[106]参见Alan Armstrong，*Preemptive Strike*：*The Secret Plan That Would Have Prevented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Guiford，Delaware：Lyons Press，2006）；Daniel Ford，*Flying Tigers*：*Claire Chennault and His American Volunteers*，1941-1942（Washington D.C.：Harper Collins Smithsonian Books 2007）；Claire Lee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New York；G.P.Putnam's Sons，1949）；Duane Schultz，*The Maverick War*：*Chennault and the Flying Tiger*（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7）；Jack Samson，*Chennault*（Hew York：Doubleday，1987）。

[107]William D. Pawley，*Americans Valiant and Glorious*. No publisher，1945，pp. 5-7；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1，Folider 14，Hoover Institution.

[108]《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0月12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109]《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1月27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4。这是蒋介石一生使用外籍顾问及军人的一贯作风，但是在中美两国成为盟国之后，他对史迪威的职务做出同样规定时，美国政府却不予理会，造成双方严重裂痕。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

[110]《蒋介石命令》（1941年8月1日），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2，Folder 8。

[111]计45名飞行员（pilots），37名发动机技工（engine mechanics），37名飞机技工（airplane mechanics），37名无线电技工（radio mechanics），20名枪炮弹药技工（armorers），外加75名文职人员。参见Chennault letter to Soong，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1，Folder 14。

[112]Chennault letter to Captain Richard Aldworth，Central Aircraft Manufacturing Company，November 5，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1，Folder 12.

[113]Letter from T. H. Shen，China Defense Supplies，Inc. to Captain Richard Aldworth，CAMCO，September 26，1941，CDS Papers，Box 50，Folder 6.

[114]Chennault letter to Central Aircraft Manufacturing Co.，November 7，1941，CDS Papers，Box 50，Folder 6.

[115]Chennault letter to Central Aircraft Manufacturing Co.，November 7，1941，CDS Papers，Box 50，Folder 6.

[116]Chennault letter to Captain Richard Aldworth，November 5，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1，Folder 12.

[117]他特别提出Captain Irvine和 Captain Claiborne两位海军上校行为最为恶劣，必须给以惩戒。参见Chennault letter to Captain Richard Aldworth，CAMCO，November 5，1941，CDS Papers，Box 50，Folder 6。

[118]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他以严峻语调要求空军一位钱上校把他的工作做好。参见Chennault letter to Colonel C. T. Chien，November 1，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1，Folder 12。

[119]Letter from Major Lin Wen Kuei to Chennault，December 6，1941，

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1，Folder 15.

[120]Chennault letter to Major W. K. Lin，December 12，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1，Folder 15.另见Transportation Officer R. Whitehead letter to Chennault，November 8，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1，Folder 16。

[121]J. M. Williams to Major Lin Wen-kuei，First AVG，March 22，1942，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1，Folder 15.

[122]Cables from Dr. T. V. Soong to Chennault，August 15-October 15，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1，Folder 14；Soong letter to Chennault，November 13，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2，Folder 6。在两个月内宋子文共向陈纳德发送了18份电文。

[123]《宋子文致周至柔电》（1941年9月12日），Soong Papers，Box 41，Folder 3。

[124]Alsop cable to Soong，November 20，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2，Folder 6.

[125]Soong cable to Chennault，August 19，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2，Folder 6.

[126]Chennault cable to Soong，November 16，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2，Folder 6.

[127]Soong letter to Hopkins，November 13，1941，CDS Papers，Box 8，Folder 12.

[128]Soong letter to J. Alsop，November 17，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2，Folder 9.

[129]Chennault letter to Currie，October 6，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2，Folder 26.

[130]Soong letter to Hopkins，November 21，1941，CDS Papers，Box 8，Folder 12.

[131]《美赴华志愿军成立经过》（n.d.），Soong Papers，Box 43，Folder 8。又该机的型号是Curtiss Wright Model 21 驱逐机，每机单价43347美元，Chennault letter to E. P. Pawley of CAMCO，October 17，1941，Chennault Papers，Box 1，Folder 12。关于零件的困难，见Soong cable to Chennault，October 15，November 7，1941；Chennault cable to Soong，December 4，1941.all in 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132]飞虎标志图案的设计系由迪士尼工作室（Disney Studio）提供，经宋子文首肯、陈纳德同意后采纳。参见Letter from R. C. Chen to Chennault，October 17，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2，Folder 11。

[133]Mme. CKS cable to Chennault，November 5，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1，Folder 13.

[134]Chennault cable to C. J. Chow，December 8，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2，Folder 4.

[135]C. J. Chow cable to Chennault，December 9，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2，Folder 4.

[136]Chennault report to CKS，November 24，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2，Folder 4。根据另外一项官方统计，从1941年4月到11月20日，CAMCO经手为美国志愿航空队招募了109名飞行员、215名技工。他们全部派往缅甸，到11月20日才完成训练。《美赴华志愿军成立经过》（n.d.），Soong Papers，Box 43，Folder 8。

[137]Chennault letter to Mme. CKS，December 8，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1，Folder 13.

[138]计算截止日为1942年7月4日，美国志愿航空队并入美国空军建制。《美赴华志愿军成立经过》（ n.d. ），Soong Papers，Box 43，Folder 8。

[139]宋氏的说辞是美国志愿航空队未来的战略重要性和美国政府的重视。《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2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

[140]《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2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

[141]Chennault letter to General C. J. Chow，October 1，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1，Folder 13；Mme. CKS to Chennault，November 4，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1，Folder 13.

[142]Soong letter to Chennault，November 6，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2，Folder 6.

[143]Chennault letter to Soong，November 8，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2，Folder 6。轰炸大队预计下分三个中队，每队32名飞行员，共96名飞行员外加其他配备人员。

[144]Soong letter to Chennault，November 15，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2，Folder 6.

[145]Chennault letter to Colonel S. M. Wang，November 25，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1，Folder 14.

[146]《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12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147]《蒋介石与居里谈话记录》（1940年2月2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579页。

[148]《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0年（月份不详）31日]，《特交档案·外交》第24册《对美国外交》：49184。

[149]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 53.

[150]《居里致蒋介石电》（1941年5月2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725页。

[151]CKS cable to Soong，June 1，1941，Currie Papers，Box 3.

[15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6月3日）及蒋介石的批示，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725～726页。

[153]Madame Chiang Kai-shek cable to Currie，June 6，1941，Currie Papers，Box 1.

[154]《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6月11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9。

[155]Proposed Draft of Reply From Currie to Chiang Kai-shek，June 7，1942，Currie Papers，Box 5.

[156]Memorandum from C. K. Claunch to Lauchlin Currie，June 7，1941，Currie Papers，Box 1.

[157]Currie cable to SEGAC，June 9，1941，Currie Papers，Box 1.

[158]Lattimore letter to Soong，June 12，1941，《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5册《对美外交（5）拉铁摩尔顾问聘用经过》，第25页。

[159]TV Soong cable from DC to CKS，June 14，1941，Attachment #1；TV Soong letter to Lattimore，June 11，1941，Attachment #2；Lattimore letter to T.V. Soong，June 12，1941，均见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827～828页。

[160]《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8月26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1。

[161]《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6月1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726页。

[162]《蒋介石日记》，1941年5月31日、6月20日。

[163]《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6月23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9。

[164]《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5册《对美外交（5）拉铁摩尔顾问聘用经过》，第2～3页。

[165]《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6月4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5册《对美外交（5）拉铁摩尔顾问聘用经过》，第15页。

[166]《罗斯福致蒋介石电》（1941年6月23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728～729页。

[167]Currie letter to CKS，June 25，1941，Currie Papers，Box 1.

[168]《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1年7月2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729页。

[169]《蒋介石与拉铁摩尔谈话记录》（1941年7月3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730～732页。

[170]《拉铁摩尔致宋美龄函》（1941年8月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732～734页。

[171]Lattimore cable to Currie from Chungking，August 2，1941，Currie Papers，Box 5.

[172]参见《拉铁摩尔致居里函》（1941年11月24、26日；1942年1月1日），秦

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734～735、737～738页。

[173]Letter of Mme. CKS to Currie，November 5，1941，Currie Papers，Box 1.

[174]Letter of Mme. CKS to Currie，November 29，1941，Currie Papers，Box 1.

[175]《蒋介石日记》，1941年7月20日。

[176]《蒋介石日记》，1941年7月29、31日，8月28日，11月1日。

[177]《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2年1月1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738～739页。该电亦存于Currie Papers，Box 3。

[178]Letter of Currie to Mme. CKS，February 14，1942，Currie Papers，Box 1.

[179]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 54.

[180]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744～745页；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 54；Currie letter to Welles，August 3，1941，*FRUS*，1941，vol. IV，p. 361。

[181]《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10月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746页。

[182]《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5册《对美外交（5）拉铁摩尔顾问聘用经过》，第2～5页。

[183]关于这些备忘录的文本，参见《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5册《对美外交（5）拉铁摩尔顾问聘用经过》，第48～52、55～61、62～67、79～81页。

[184]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第3、4章。

[185]《王世杰日记》，1938年11月5日。

[186]《王世杰日记》，1941年4月2日。

[187]《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1年1月28日。

[188]《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7月17、24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2册《对美外交（3）军事援助》，第109、115页。

[189]《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2册《对美外交（3）军事援助》，第140～141页。

[190]《蒋介石日记》，1940年3月2日。

[191]《蒋介石日记》，1941年2月25日。

[192]《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8日。

[193]《蒋介石致宋美龄电》（1940年3月24日），《蒋总统家书·致夫人》第3册：389。其他有关资料参见《领袖特交档案整编资料》第290册：290027、290029、290036、290037。

[194]参见McHugh's letter to Mme. CKS of May 9，1941，CDS Papers，Box 50，Folder 5。

[195]《蒋介石、宋美龄与美国大使约翰逊会谈记录》（1941年4月16日）、《蒋介石与美国大使高思会谈记录》（1941年6月24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28册《对美外交（1）一般交涉》，第185～192、212～215页。

[196]《蒋介石与马格鲁德会谈记录》（1941年10月27日），《革命文献拓影本·抗战时期》第32册《对美外交（3）军事援助》，第142～151页。

[197]Chennault letter to Madame Chiang Kai-shek，November 27，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1，Folder 13.

第八章 租借法案带来的希望和失望

一 租借法案：一个崭新的局面

（一）美国援华意念的落实及组织体系

前文曾经提到，抗日战争及欧战开始后，美国受中立法约束，对于运往交战国的货物不得不采取“现金购买及自行运输”的变通办法，以维持其中立姿态。但是此法只有利于英法两国，因为它们既有充足的外汇可供购买美国产品，又有强大商船队和海军可以把美国的物资和武器运回欧洲战场。而中国却两者皆缺乏，无法利用这个办法。不久法国溃败，英国不但在敦刻尔克一役损失惨重，其资金也渐告匮乏，使得现金采购办法无法应付当前之急，而迫使美国不得不另谋出路，最后想出来的应急方法就是租借法案。所谓租借法案，就是由美国国会经过立法程序，充分授权总统决定哪些国家是从事反对侵略斗争者，使它们一体都可以接受美国援助。

当罗斯福尚在与国会领袖商议制定法案时，宋子文已经听到风声，并且机警地开始一连串先期部署。

首先，他要求美国政府把中国列入被援助国家名单并争取到罗斯福亲自承诺，一旦法案成立便定会让中国成为受惠国。鉴于法案尚在国会讨论时期时，曾经有议员打算使之只适用于英国，但是遭到罗斯福反对，因此罗斯福对中国的承诺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其次，宋子文在法案酝酿期间还成功地安排居里访问中国。居里原本与中国毫无渊源，但经过宋子文精心安排他访华之后，便被罗斯福倚为处理中国事务的得力助手。而居里在1941年2月访华期间已经开始关注军火援华事务。他曾以中国的需要为基础拟就一份清单，尽量利用中国政府可以动用的2000万美元贷款去购买美国产品。依据居里估计，中国陆军使用的轻武器最多只能支撑到1941年9月，而重武器则更是历来缺乏。如果中国能够获得制造武器的原料，则它的兵工设备大致可以满足步兵70%轻武器的需求，其中包括每年生产10万支步枪。除此之外，中国军队还需要从国外进口1万挺机关枪、2000门迫击炮和其他各式火炮，才能勉强对日军进行防卫战。如果要进一步发动攻击战，则必须进口更多的火炮。

居里返美后，正值租借法案立法程序接近尾声，立即被罗斯福指定为白宫处理中国租借法案事务的专门负责人，定期向他汇报。虽然居里的上述构想后来并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它们首度让中美两国领袖对于中国军火需求的数量和类型形成了一些初步概念，也成为此后两国军方领导人谈判的最初基础。不久，中国政府便开始派遣军事专业人员赴美推动美国武器援华事务。[1]

以上的背景说明了为何一旦美国租借法案成立，中国政府便可以立即提出要求援助的项目列表。

第三，宋子文在租借法案通过后七周内快速地组成了一个新的机构，称为中国国防供应公司，[2]而且延揽到罗斯福的舅舅弗里德里克·德拉诺（Frederic Adrian Delano），出任公司董事会董事和特别顾问。宋子文的这些动作无疑把对美国联邦政府上层领导的联络工作，做了相当程度的安排，但是对于中下层主持实务的官员则缺乏门路进行培养，而后者主要集中在战争部，特别是陆军部门。这个情况将会在此后造成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1941年3月11日，租借法案正式成为法律，罗斯福随即宣布共有34个国家符合反侵略的定义，中国也顺利成为其中一员。此项法案之所以成为中美军事关系的分水岭，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努力的目标只是说服美国同意出售飞机一项武器而已，而租借法案实施之后，中国便可以依法要求美国提供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蒋介石立刻指派宋子文代表中国，和美国谈判一切有关军备的事务，[3]而胡适则没有被安排担负任何责任。

（二）租借法案的内容

扼要言之，租借法案的目的是授权总统将国会通过的拨款支付国防器材和劳务的费用，以租、借、销售等方式，把它们的所有权转让给反抗侵略的国家。租借法案的具体内容和功能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物资。它包括军用物资（枪炮及弹药、飞机、战车）、粮食、医疗药品、生产工具、金属矿产等，占租借法案总预算的80%以上。

第二部分为劳务。它包括陆海空的运输工具（飞机、船只、汽车）和运输设备（机场、码头、公路、铁路），占总拨款的20%以下。

毫无疑问，租借法案的原始目的是帮助远隔重洋的英国能够经由大规模海空运输而直接得到美国支持。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一直到珍珠港事件为止，其需求相当有限，又只有缅甸路一条通道可供运输，更何况后者还控制在英国人手中。严格地说，缅甸只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通道

而已，其通往中国的物资部分只是间接借境，在规模上微不足道。

（三）租借法案的总格局

1.拨款数量

大致而言，国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共进行两次拨款，总金额约500亿美元。[4]

法案规定至1943年6月底为止。租借法案支出案内容为：

第一次 70亿美元

第二次 59.85亿美元

第三次 54.25亿美元（与本书主题无关）

再加上其他支出案内适用于租借之部分，总计629.4465亿美元。

此外，国会还把等值于13亿美元的陆海军物资拨交给受惠国。[5]

在以上美国国会通过指定作为租借的款项总数约630亿美元之中，中国所提各租借预算案总计约25亿美元，仅占数的4%。[6]

美国国会在1941年3月11日通过租借法案时，授权可以运用的经费为70亿美元。这些经费在1941年7月中旬完成分配，而中国得到的“分配额”是：

①武器弹药：47876181美元

②飞机：5000万美元

③国防工业：0美元

④农工商品：5000万美元（包括1500万美元的铁路建筑器材）

⑤其他

总计：2.3亿美元。

除此之外，在上述美国援助给25个国家相当于13亿美元的武器弹药中，中国的“分配额”是25103100美元（占总数的1.9%）。

不久，中国政府又接到美国政府通知，罗斯福正准备向国会提出第

二次租借法案拨款，要求中国提供其在1941年12月31日以前所需要物资的申请数量。由于时间短促，使中国政府不及准备，宋子文只能提出一个15亿美元概数的申请书，包括以下几个大项：

①武器弹药：2.96865亿美元

②飞机：6.7645亿美元

③军用汽车：1.672亿美元

④国防工业设备：2510万美元

⑤农工商品：1.917万美元

⑥其他

经审核，美国政府决定中国在1941年底的第二次租借法案经费为6亿美元，并且向国会做出以下的分配：

①武器弹药：17912.85万美元

②飞机：20100万美元

③军用汽车：7602万美元

④国防工业设备：60万美元

⑤农工商品：7500万美元

⑥其他

换言之，美国政府在1941年8月决定由租借法案第一次和第二次向中国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其他各项援助的分配总数为855103100美元，[7]而在第二次分配中，美方批准的数字是中方申请的40%。

但是以上所列举的这些数字最多只有参考价值，并不能代表美国援华的内涵。因为有太多因素可以使其失去意义。首先，随着时间推移，美元的价值不断改变。由于武器弹药的价格完全由美国单方决定，其间可以有极大差距。美国甚至在把同样武器（比如飞机）转让给不同国家时定出不同的价格，其间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其次，即使是在国会宣布“分配额”和特定武器立项批价之后，它们仍然可能遭遇各种波折甚至被取消。因此，本章在评估租借法案对中国援助的贡献时，尽量以移交到中国政府手中的实物为准。换言之，不论纸面上的拨款数字有多少，凡是美方没有移交给中国的武器弹药都只是一场空欢喜，对中国抗战没有产生实质帮助。

2.美方的组织

为了推动租借法案，美国政府设置了一系列的责任单位，首先成立了统筹全局的租借法案行政总署（Lend-Lease Administration）。

在白宫内部，原本就有一个行政单位名为预算局（Burea of the Budget），专司预算工作。继之又设立一个直接负责租借法案的新单位，名为“Division of Defense Aid Reports”，负责人是詹姆斯·彭斯（James H. Burns）少将，负责和中国保持经常联系的首席联络官是菲利浦·杨（Philip Young）。该单位的主要职责是统揽租借法案受惠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各个经手部门之间的联系工作，帮助租借法案的推展。世界各国为了获得租借法案援助，首先必须向这个单位提出初步申请，然后由该单位把案件分发到联邦政府其他相关部门进行细部作业。

至于罗斯福个人，则指派哈里·霍普金斯统筹管理租借法案，而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则交由居里负责。由于必须随时向罗斯福汇报中国租借法案申请事项的进展，因此居里在早期扮演了穿针引线的角色，是罗斯福和“Division of Defense Aid Reports”之间一切有关中国事务的总联络官。[8]而居里为了履行职责，又向联邦政府各单位（战争部、财政部等）发出通知，要求它们把处理有关中国援助的全部重要来往公文都做成复件，送交他的办公室归档和转呈罗斯福。中方也主动配合这个规定，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每天在下班前把当天全部有关租借法案与美方来往的公文，一律做成复制本送交居里办公室。[9]换言之，所有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有关租借法案的交涉和执行进度，理论上完全在居里和白宫的掌握之中。

美国政府在处理租借法案时，与中国发生重要关系的单位包括：

战时生产局（War Production Board）；

国务院下属单位 Division of Controls；

财政部下属单位the Procurement Division；

战争部（War Department）；

联合航空委员会（The Joint Aeronautical Committee）；

海洋委员会（The Maritime Commission）。[10]

由于许多租借法案受惠国的要求都与军火有关，所以战争部成为最重要的对口单位，它内部特别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名为“Defense Aid Division”，配备联络官与各受惠国政府联络。战争部下属还有其他部门（如作战部Operations、空军部Air Corps、军火部Ordnance），也都指派了专门人员负责与受惠国保持联系。

就处理中国事务而言，尽管战争部内部负责中国租借法案事务的官员随时间有所变更，但是在法案通过之初，它的基层组织和成员大致如下：

①军火组（Ordnance），准将1人（G.M. Barnes）；

②后勤事务组（Quartermaster Corps），中校3人，文职1人；

③通讯兵种组（Signal Corps），中校1人，少校2人；

④工兵组（Engineers），中校1人，少校2人；

⑤化学作战组（Chemical Warfare），中校1人；

⑥军医组（Surgeon General's Office）：中校1人。[11]

从以上名单可以看出，美国战争部配置处理中国租借法案事务的人员数量既少（总共13人），官阶也在中层以下（最高官阶是准将），而且可能是兼职，而非专职。尽管他们的专业知识应该符合美军水平，但是对中国事务和中日战争想必非常陌生，因此判断可能并不准确。而偏偏中国对于租借法案的申请，有80%是和军火有关。

在这些处理实际事务的人员之上还有一个委员会，名为 “China Defense Aid Requirements Committee”，它是在战争部的“Defense Aid Division”之下的一个委员会。其功能是处理中国政府军火申请的具体问题，比如说审核各项申请案件所需要物资的类型、数量和使用者。该委员会共有6人，代表中方出席的是宋子文和大卫·科克伦，代表战争部的有4人，主席由战争部指定一位中校级军官沃尔德隆（A. W. Waldron）担任。[12]读者几乎立即可以看出，这个委员会虽然是中美双方的高层协调单位，但是其组成缺乏对等性，也就是说，中方的两位重量级代表（少数），在开会时必须向美方4位（绝对多数）中低层军官，去说明中国政府需要某些特定军火的理由，请求后者惠予接受，然后呈报战争部领导定夺。战争部给中国的这种待遇，和它给英、法、苏的待遇存在天差地别。

二 中国政府如何应对租借法案

（一）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成立、组织及运作

1.成立及内部组织

如前所言，中国政府得知租借法案动态之后，立即着手筹划因应之道。其成果就是成立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并在特拉华州注册，成为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官方代表，负责处理法案中一切器材物资的取得、生产、运输和移交工作。[13]1941年5月24日，中国驻美大使馆以公文正式照会美国国务院，证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是中国政府处理美国租借法案事务的官方代表。由于当时中立法依然有效，所以美国国务院还需要特别做出一个行政裁决，认定美国物资借境缅甸运往中国并不违反中立法条款。从此美国中立法几年来带给中国的困扰烟消云散。这也可以视为意外的惊喜。[14]

公司成立时的董事会有5位董事：

宋子文，董事会主席

费雷德里克·德拉诺，董事、名誉顾问

大卫·科克伦，董事长

哈里·普莱斯（Harry B. Price），董事、财务主管

劳伦斯·莫里斯（Lawrence Morris），副董事长

公司主要干部（officers）为：

拉西曼，董事会主席助理

詹姆斯·库克（James J. Cook），财务助理

理查德·博纳维尔（Richard W. Bonnevalle），秘书。[15]

由此可以看出，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宋子文、弗雷德里克·德拉诺、大卫·科克伦、哈里· 普莱斯和劳伦斯·莫里斯，他们有权代表公司向美国政府提出武器的申请书，而其中只有大卫·科克伦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支领薪水，年薪为1.25万美元，宋子文和弗雷德里克·德拉诺则不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支薪。[16]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下设6个技术专业小组，目的是和战争部的各委员会对接，和它们保持顺畅联系，就中国政府所提的申请项目向美方提供说明和理由，以及回应战争部对于技术性项目的质疑，譬如说武器的种类、口径、功效等。

中美双方这种在技术层次上的沟通基本上没有重大阻碍，但是间或也会产生一些问题。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职员在法案实行后的最初几个月磨合期，就累积了一肚子怨气。比如说，有的美军基层人员会质疑中国申请项目的认真程度，或是中方人员是否有能力操作这些先进的美式装备。而事实上，部分美方质疑是基于对中国缺乏了解，或是道听途说，表明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

尽管如此，中方人员的处境是求人者嘴软，需要对每一项器材详尽说明其用途。比如说，中方在申请兵工厂器材时，多半同时包括发电机。当美方质疑中方随意加码时，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一线人员便必须向美方解释，中国许多地区没有商业电力供应，因此兵工厂必须自备发电设备。又比如说，当美方拒绝提供某些武器和兵工厂设备时，其所持理由经常是猜测中方不懂得如何操作这些先进器材。中方人员在面对这些质疑时，又不敢直言中国军队在战前早已见识过德国的先进设备，深恐会伤到美方人员的自尊心。这种本可以基于互相了解、尊重和信任基础而三言两语就解决的问题，却需要大费周章才能澄清。

幸运的是，总体而言双方都是行家论兵，容易达成共识。依照惯例，凡是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提出的要求，都会事先经由这些基层技术性接触取得美国战争部的首肯后，才由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正式向战争部立项申请。换言之，等到一个项目或是武器出现在美国战争部批准提供的名单上时，它（们）事实上已经通过美方在技术层次上的检验。[17]同样，如果牵涉的项目是非军事性的（比如汽油、润滑油、原料、汽车等），则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还需要通过财政部 “Procurement Division”的初步协商和同意后，才会正式申请立项。[18]

更具体地说，租借法案大致经过下列几个步骤。

①中国国防供应公司首先从中国国内相关单位搜集所需器材的情况，然后经过内部专家筛选，综合拟成初步申请清单。

②由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专业人员及联络官就各个项目，与美国政府相对应的技术人员及采购员逐一进行缜密协商，对于中方所要求的项目是否切合实际，其需求的迫切程度和美国是否制造或有库存等实际问题予以审查，并就相关问题寻求共识。

③中方只有在与美方基层人员就项目的数量、规格及美方库存情况等协商后，才会将该项目或器材由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上级向美方提出正式申请。接下来就是等待预算审批等相关手续之完成。美方的预算对于中方能够申请何种武器有决定性影响，如果美方批准的预算额度低，或

是武器定价高，则中方就必须减少其申请的数量。这些数据的弹性完全由美方掌控。

④提出申请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委员会或联络官与美方相关单位继续保持联系，追踪列表项目的完成情况。若有急需项目，中方就会向美方提出特别要求或催促，其对象从租借法案行政总署，战争部的Defense Aid Division，白宫的居里、哈里·霍普金斯，战争部长史汀生，乃至罗斯福本人，层层去求援、抱怨，或是施加压力。

⑤经由美方批准取得正式配额和详列武器的类型、数量、交货日期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继续密切关注和敦促美方准时如数交货。

⑥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在取得美方物资后，完成所有权转让手续，再去与美国相关单位（海关署等）安排验收、报关、装箱、争取舱位或吨位，由轮船载运离开美国港口。实际的运输工作由美国海运委员会负责处理。

⑦货物抵达中国（或缅甸仰光）港口，移交给中国政府，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才算是完成其任务。剩下来的任务是取得缅甸英国殖民政府的批准和协助，将物资沿滇缅两地之间的河流、公路和铁路运进中国，由中国政府相关单位验收后，交给中国政府进行细部分配。到了这个阶段，美国的租借法案物资才真正开始对中国抗战做出贡献。

以上这些步骤从租借法案开始实行时就被中美双方政府所采用，是处理租借法案物资援华的标准作业程序。[19]在此过程中如果遇到重大波折，由董事（包括宋子文）出面疏通。

2.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申请项目如何产生

以上是从美方角度了解租借法案申请的过程。然则从中方角度出发，则过程又是如何？

首先，所有有关武器、弹药、装备和其他器材物资的要求，主要是由中国政府从所属各部门搜集资料。既然武器是占中国申请经费的80%以上，在此不妨以武器为例。

无论中国陆军任何单位及作战部队需要武器器材，首先都呈交重庆军政部综合办理，一律经过兵工署俞大维署长审核后，挑选其中一部分送往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处理。俞大维在中国学术界历来广受尊重（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术本行又与兵工武器有关，为人正直，行事严谨，无论在私人操守还是公德方面都是战时中国的一流人才，在兵工武器事务上极受蒋介石倚重。因此凡是经过他审核然后送往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武器清单，应该是务实而且诚实可信。事实上，中国政府在1940年向美国提出的武器采购清单和后来转变为1941年向美国申请的租借法案清单，都是出自俞大维之手。[20]

至于中国空军方面，由于几乎根本缺乏实力，因此完全指望由美国提供援助，其机种、型号、数量、配备等大抵由陈纳德协助航空委员会的主要干部（周至柔、王叔铭、毛邦初）草拟，提交给蒋介石夫妇定案后，再转交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因此，中国陆军和空军虽然同样申请租借法案援助，但是中国政府内部作业过程是遵循两条不同的路线。这些需求到了美国之后交给宋子文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汇合一并办理。

一般而言，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专业委员会的技术人员包括中国政府派遣人员、在美国民间雇用的华裔人士和美籍专家。在所有委员会之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武器委员会（从中国派来8人，雇用2位美国人作为联络官），二是空军委员会（共11人，多数由中国航空委员会委派，雇用技术顾问美籍1人，联络官美籍2人）。这两个委员会的负责人都是少将军衔，而且都是中国政府精挑细选的干员（陆军江杓和空军沈德燮），其他委员会主持人则军阶为校官或是文职人员。[21]

至于中方选拔人员的素质，宋子文对于空军组的成员甚感满意，因为除了沈德燮的专业素养被宋氏高度赏识之外，先后还有陈纳德和毛邦初参与，所以足供与美方交涉。陆军方面，江杓专业优秀，但是宋子文仍特别要求重庆政府多选派熟悉美国和欧洲国家军火兵工专业的军官到美服务。[22]除此之外，宋子文对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的无能、贪污和有辱国格极为不满，敦促优秀军官朱世民出任使馆武官，以便加强大使馆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之间的合作，[23]增进与美方交涉的效率。

概言之，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华籍军官虽然对美军的体制和装备的专业知识很可能不及美方人员，却是中国军方能够派遣的专业最佳和熟知英语的人员。即以三位主要人物为例，朱世明曾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沈德燮是早期国民政府建立空军时的重要参与者，抗战初期负责在兰州军区接收苏联飞机；江杓留学德国并且获得德国工程师资格，回国后担任兵工厂厂长、大学教授，由兵工署俞大维选派赴美。他们的学历比起对口的美军人员大约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对于本国国情和军队的知识则远远超过美军人员。这种落差在国际交流中本是正常现象。如果双方能够以诚意和互相尊重进行沟通，则合作的空间应该很大。如果缺乏诚意和尊重，则合作远景必然黯淡。

（二）中国提案的作业程序、与美方基层的协调及双方人员的互动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某些组织细节，在过去学术讨论中很少受到注意，但是对读者了解中美双方的合作关系可能会有帮助，因此本处将会使用一些篇幅加以说明。

或许从一个小案例可以帮助读者从侧面探窥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在向美国政府提交器材申请之前，是如何对重庆政府送来的申请进行审核工作的。1941年5月7日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举行内部会议，讨论中国政府送来的飞机无线电设备和公路器材的需求列表，共有10人参加，包括宋子文、江杓、沈德燮、陈纳德等。宋子文主持会议，并指示与会人员在向美方提出申请单之前，“务必准备完善的申请书，对于美方可能提出有关无线电器材的问题，必需有系统地准备解答”。会议记录显示，会议的过程严谨，具有高度专业性，而且极为认真。[24]如果这个案例能够代表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处事作风的话，则颇为可圈可点。

美国战争部参与对华租借法案工作的博特纳上校，曾经向宋子文建议应该邀请战争部选派军官，直接参加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各个技术组的实际工作。每个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技术组都应该有一位美国军方的事务官员和几位技术专家协助工作。宋子文随即向中国国际供应公司传达了一份内部文件，认为中美双方联络员只是每隔若干时间进行短暂会商，的确不能达到充分沟通的效果，因此主张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应该认真考虑博特纳的建议，邀请战争部官员直接到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办公室和技术人员当面沟通。[25]虽然目前未能找到资料显示博特纳的建议是否被采纳，但是宋子文的管理作风和对于增加中美双方技术人员沟通的重视由此可见。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也定出与美方联络的分工原则：

①凡属普通性质者，由该公司美籍人员负责。

②凡属专业性质者，由技术处华人负责。

③凡关于大计方针者，或特别重要事件，则由宋子文主持。而宋子文接触美方对象则包括罗斯福总统，华莱士（H.A.Wallace）副总统，战争部史汀生部长，海军部诺克斯部长、财政部摩根索部长及居里、哈里·霍普金斯等。[26]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的中方资料甚少提到宋子文和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有互动关系，而马歇尔对于军火的分配却握有决定性的权力。

经过战争部基层专业人员认可的中方申请项目和数量，还要经过其上级审核、删减才能定案。换句话说，几乎所有中方申请的项目都是美国军方业务性官员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要求。等到战争部最后批准这些项目时，则更是表明战争部上下各级专业人员都已经认可它们的合理性，代表美国政府承诺提供。这个背景了解对于本章后文的讨论至为重要。

本书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些细节，是因为在过去有关中美关系史的著作里，有许多广被学者和民间引用的说辞，指责租借法案执行过程中遭遇的困难过错全在中国。笔者完全没有想为任何一方护短或是平反的兴趣，但是忠于事实是所有学者的基本责任，因此本章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中美双方的基层工作人员沟通的过程。事实上，大量中方资料显

示，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对于美国基层的对口人员，不但没有怨言，而且赞誉有加。特别是战争部Defense Aid Division的泰勒上校，热心合作，即使无法接受中方的申请项目，也坦然直言，而其他工作人员的同情心、宽厚与谅解，也都让中方感动不已。[27]简言之，中美双方在武器问题上出现的冲突和互责，多半来自高层政务官员。它们不是技术性的问题，而是政治性的问题，或是把技术层次的歧见加以政治化的问题。

三 中国对陆军武器的要求

然则中国对于租借法案的要求究竟是什么？

本节的讨论范围只限于陆军武器，空军武器将在另外一节加以讨论。

（一）要求的目的

中方提出要求的目的大致有两个：继续抗战、改革和建立新军。

首先，中国陆军的武器装备原本就与侵华日军相差极大，日本是世界级强国，而中国只是亚洲的落后国家。难怪纯从科技观点出发，日本军事领袖在战前预言可以在几个月内击败中国，并非自我陶醉的梦呓，而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理性判断。更何况中国政府花费十年工夫辛苦建立的新式陆军，被政府毅然投注在淞沪一次战役，伤亡殆尽之后更使日军相信胜利指日可待。而中国政府从1938年到1940年之所以能够继续“苦撑”，除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可以承受超乎常理的苦痛之外，还有两个理性思考：一是指望日本经济的储备力耗尽而使民众反战厌战心理蔓延；二是经由不断努力寻找新的武器供应来源。1941年租借法案通过，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不啻是绝处逢生，当然希望借此补足过去的损耗，改进装备，冀能和日军平等交战，用自己的力量去阻挡日本肆无忌惮的凌辱。而这个愿望的实现还寄托在一个较少受到学术界注意的理由上，那就是重建陆军。

1.30个陆军师整军计划

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的武器要求并不是零零碎碎的东拉西扯，能拿就拿，也不是为了囤积居奇，而是有一个更全盘性的指导原则。回顾国民政府的建军史，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蒋介石自从1920年代末期就热衷于建立一支小而精的现代化军队。他在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时期追求这个目标，抗战初期改向苏联求援时追求同样目标。租借法案给了他一个新的契机，转向美国追求同样目标。

讽刺的是，在过去数十年来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事关系的英文论著中，30个陆军师的整训计划的确是一个论述重点，但是其起源却从珍珠港事件前改换到美国参战之后，而这个观念也被美国战争部将领和后世学者张冠李戴地提出，作为美国极力协助国民政府进行军事现代

化的远见，以及中国落伍守旧军人阻挡改革的有力证据。

依照某些英文著作的论述，美国的史迪威将军才是30个师观念的首创者，因为他一直苦口婆心地试图向蒋介石灌输“新的”观念。那就是：中国在抗战时期300～400个师的陆军编制完全是虚有其表，对于抗战毫无贡献。中国政府更理智有效的做法，应该是挑选30个精锐陆军师进行严格训练，配以现代化装备，就能对国军战斗力产生革命性的提升。如果成果丰硕，更可扩编为60个师，乃至90个师，成为中国现代化军队的核心。但是不幸蒋介石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军人，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因此无法理解史迪威计划的精髓。更何况蒋介石又沉迷于国内政治斗争，不愿从事此项基础建设，徒使史迪威竭尽心智帮助中国的一番善意与宏图完全浪费。[28]

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完全无视史实。因为中国政府1940年在外交策略上做出重大方向性改变的动机，正是希望从美国得到军事援助。中国在此前三年多孤军对日抗战的岁月里，首先是把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出来的30个精锐师消耗殆尽，继之把外交重心转向苏联，希望能够从苏联得到20个陆军师的装备和训练，在达不到目的之后，改为自己进行大规模整训。但是一场冬季攻势却以全盘失败收场，使得国民政府不得不再度寻求外援。所以中国政府在1940年对美国军事的期望，既不是要求结盟，也不是希望美国参战替中国抗日，而是希望取得训练和装备的援助，加强国军的战斗力。

事实上，中国政府此时的军事计划并无新意，依然是1930年代德国顾问发展成功的模式。它也早已拥有德国顾问在1930年代初期拟定的训练30个陆军师所需的装备表（甚至60个师的蓝图），略做修改即可向美方提出。另外一个要素则是聘用外国顾问主持训练工作，以恢复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所以一旦美国实施租借法案，中国政府几乎立即把30个师的理念重新提出。既然过去德国顾问已经投入多年时间，完成了基本调查研究工作，留下大量计划书，则中国政府对于陆军的装备细节也无须从头学习，只需照抄原计划，把德式装备转换成美式装备即可提出。

这个重要背景因素说明，何以中国政府在美国租借法案刚生效时，就能立即提出要求援助的清单。依据中国政府的计划，第一次和第二次租借法案的申请内容是为了训练30个师新军所需的最低武器配备。紧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求美国派遣军事顾问团去执行原本是由德国顾问承担的训练任务。简言之，借重外国军火及训练人才，帮助中国重整作战力，以便继续对日抗战，这便是中国政府对美外交重心转移最大的企图。

依照中国政府的构想，如果有30个师新军，就可以予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如果能够有60个师美式装备新军，就可以逼使日军在中国战场向后撤退，而这正是中国政府预计将在第三次租借法案申请书中所要提出的。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对于使用租借法案的设想是经由陆军整训途径抵抗日本侵略。[29]

但是，美国军方（史迪威、马歇尔）对于这个背景居然一无所知，也不肯虚心学习，史迪威甚至声称不知道30个师观念从何而来。[30]而过去几十年一些学术著作也夸耀美国军方的“真知灼见”，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2.中国政府对租借法案的具体要求

早在1940年中期，当美国借款渐露曙光之时，中国政府就指示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着手整理国军对军火的需求量。俞大维的第一份购货单是假设有1000万美元贷款，则首要军火应该是1万挺轻机关枪和3亿发子弹。第二份购货单是假设有2000万美元贷款，其主要项目包括步枪、战车防御炮和山炮，至于数量多寡则须视美国厂商的货品价格而定。[31]

到了1940年底，重庆政府指示宋子文设法向美国购买的急需武器，依然是步兵最基本的武器，其中特别强调的是“各种高射枪炮”、轻机关枪和步枪，必须尽快获得。[32]

第一次提案

进入1941年之后，租借法案实施仅仅3周，中方便于3月31日向美方提出第一次申请，其执行时间到1941年10月27日为止。换言之，是预估在今后7个月之内所需的武器。此时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公司尚需一个月才能正式立案，由此可见中国政府行动之迅速，而其内容则涵盖了前一年多来中国政府一直期盼从美国得到军事物资援助的最大数量。它的大项包括陆军、空军、兵工厂、通信器材及运输、滇缅路建设、后勤等六大范围。

其中陆军方面，中国政府紧急需要的是：

①7.9mm口径轻机枪1.5万挺，及5亿发子弹；

②75mm口径山炮及炮弹；

③山炮480门，每门2000发炮弹；

④0.50英寸口径高射机关枪1000挺，每挺5000发子弹；

⑤37mm口径战车防御炮360门，每门炮弹1500发；

⑥中型和轻型战车、载重汽车。[33]

至于兵工厂需要，则包括各种钢铁金属、化学药品、炸药及厂房生产工具。[34]

1941年5月24日，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第二次军售贷款刚刚得到

美方批准，其中重要武器包括：

①600门山炮及120万发炮弹

②144门75mm口径火炮及144000发炮弹；

③360辆战车及武器配备；

④1000辆轻型卡车；

总价值为4900万美元。[35]

以上这个清单从中方看来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尽管中方从1940年就开始向美国提出购买军用品，但是美方只愿出售原料和非作战用品（大卡车）。宋子文电报所称的突破，使得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至此始得安心。”[36]讽刺的是，他完全无法预见未来的艰辛。

第二次提案

中方在1941年10月28日向美方提出租借法案的第二次申请，预计到1942年1月14日完成，执行时间是两个半月。它基本上是重述第一次提案的要项，提出了具体的预算金额，共为327529365美元。大项是军火（约37%）、飞机（约41%）、运输器材（约15%）、通信器材和医药品及医疗器械（约7%）（第三次提案于1942年1月15日提出，总金额为美金1379579067元，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就具体武器而言，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在1941年10月28日提出第二次提案，它基本上是修正第一次提案的内容，有增有减。其重要内容包括：

①105mm榴弹炮和75mm山炮；

②37mm反坦克炮；

③0.303英寸机关枪；

④0.38英士左轮手枪；

⑤3英寸高射炮及弹药。[37]

综而言之，中国在租借法案生效后申请援助的陆军武器约有16项，其中被中国政府列为最急需的5项武器分别是：轻机关枪、7.92mm口径步机枪子弹、榴弹炮、0.50英寸口径高射（防空）机关枪及37mm口径反坦克炮。[38]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不但16项全是步兵武器，而且最紧迫需要的

5项之中，前三者是步兵作战的最基本武器和弹药。中国军队如果继续抗战，就绝对不可缺乏这些武器和弹药。高射机关枪是对付日本飞机的最后防卫手段，而反坦克炮也只是中国士兵在肉身阻挡不了日军坦克攻势的情况下，在中近距离予以打击的最后一线希望。[39]

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政府无论在第一次或是第二次租借法案提出的申请中，除了为应付战况的急需消耗品之外，最基本的出发点都是以装备30个陆军师（45万士兵）为前提。根据中国政府估算，这30个步兵师最低限度的装备需要：

①7.92mm口径枪弹：5亿发；

②75mm口径山炮：10个团共350门；

③75mm口径野炮：20个营共240门；

④0.50英寸口径防空机关枪：1360挺防卫重要据点；

⑤37mm口径反坦克炮：20个营共720门；

⑥155mm榴弹炮：10个团共360门；

⑦105mm榴弹炮：10个团共360门；

⑧3.7英寸口径高射炮：180门配置给5个团；

以及必须附带的装备和弹药。[40]

再依照中方估算，上述列表所列武器弹药在美国只够装备10个步兵师，但是在中国却足以装备30个步兵师。这显示中国政府在提出要求之前，已经对美军编制做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工作。更重要的是，美军10个步兵师的基本装备，就可以帮助中国政府建立一支新军，为继续抗战创造一个新局面，而不是零零碎碎、拆东补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在俞大维署长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技术委员会认可后，才以试探性方式向美国提出的申请援助项目，都是步兵作战最基本的武器弹药。

即便如此，中国依然愿意采取退让态度，主动降低对某些武器质量的期望。最好的例子是，中国政府原本申请的是性能较好的105mm榴弹炮，但是由于美方声称缺货，因此主动提出接受性能较差的旧式155mm榴弹炮作为代替品。同样，中国愿意接受3英寸口径高射炮，取代性能较好的90mm高射炮。中国政府并且主动表明，如果美方缺货，冲锋枪、反坦克炮及炮弹、侦察车等武器可以稍缓拨交。[41]

事实上，抗战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军队手中的武器早已是七拼八凑，包括早先堪称先进但是屡经战火而残破不堪的德国装备，硕果仅存的几辆坦克，以及本国兵工厂出产的次档产品。有些步机枪枪管在发射

若干发子弹之后，就可能因过热而炸膛。有的部队甚至仍在使用大刀、长矛、土枪、土铳等，和日军坚持了四年战斗。因此中国军队早已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只要能够获得美制武器，无论就世界标准而言如何落后，对中国军队而言已经是最先进武器，马上可以送到战场去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和士气。这乃是中国政府最急迫需要的一部分。

（二）美方提供援助的承诺和实际状况

然则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国政府究竟向美国提出了何种数量的武器要求，又获得了多少援助？

就美援武器的项目细节而言，笔者目前能够找到的是两件颇具权威性的文件。一件是美国战争部承诺向中国提供的武器项目的内部资料。根据1941年8月15日战争部会议的记录，它承诺在1941年12月31日之前向中国提供下列武器：

①105mm榴弹炮：360门；

②155mm榴弹炮：20门；

③155mm大炮：96门；

④40mm博福斯高射炮：180门；

⑤37mm高射炮：360门；

⑥布伦轻机关枪：15000挺；

⑦博伊斯反坦克枪3000挺；

⑧·45冲锋枪：12000挺；

⑨·38左轮手枪：30000支；

⑩·32左轮手枪：25000支；

⑪·30机关枪：2000挺；

⑫布伦枪子弹：50000000发；

⑬冲锋枪子弹：6056400发；

⑭炮弹、炸弹：10000000美元；

⑮杂项：40000000美元；

⑯3.7英寸高射炮及子弹：4500000美元；

以上16项军火器材总值：175152000美元。[42]

另一件是宋子文1941年10月24日向罗斯福提交的备忘录，列举中方实际收到武器弹药的项目和数量，包括下列要点：

①50英寸口径高射机关枪，中方要求1360挺，美方实际交货只有100挺。美方决定拨交185挺并且承诺在1941年底交货，但是中方希望立即获得750挺。

②37mm反坦克炮，中方要求720门，美方实际交货为0门。美国决定拨交240门，但是只承诺在1941年底之前交货60门，中方则希望立即获得300门。

③75mm山炮，中方要求600门，美方实际交货仅44门。美方决定拨交598门，并承诺在1941年底前交货178门，中方希望立即获得300门。

④M3轻型坦克（3吨），中方要求120辆，美方实际交货为0辆，承诺0辆，中方却希望立即获得120辆。

⑤90mm口径高射机关炮，中方要求96门，美方实际交货为0门，承诺0门，而中方希望至少立即获得24门。

⑥中方还要求800吨火药，俾使兵工厂可以自行生产轻型武器的弹药。

宋子文提出备忘录的目的，正是挑明战争部的不作为，因此只好把美国军援的实际情况向罗斯福直接汇报，希望罗斯福能够亲自出面指示战争部尽快满足中国政府这些微小数量的需求。[43]值得一提的是，宋子文在向罗斯福抱怨美方拨交武器失信时，逐项做出说明，罗斯福还当场做了笔记，并叮嘱哈里·霍普金斯赶紧将这些武器送交中国。[44]但是军方不为所动。

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次租借法案的申请项目绝大部分是美国产品，小部分由加拿大提供，但是两国的表现截然不同。来自加拿大的武器有两项，一是1750挺布伦式机关枪，二是50门两磅重火炮，两者都全数而准时地移交给中国。但是当加拿大又承诺提供20门高射炮给中国时，却在半途被美国军方拦截挪作他用。[45]

如果换一个方法计算，则美国第一次和第二次租借法案的总预算大约是1.64亿美元，中国分配到的部分大约是745万美元或占4.5%，其中器材武器部分从美国接收和运出的占租借法案的2.9%而已，而实际运到

缅甸仰光港口的部分则只占2.1%。[46]

难怪中方对这两次申请的成果做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批评："中国申请的大部分重要项目，（美国政府）要么从来没有予以拨交，要么只拨交极少一部分，乃致丝毫不能发生作用。"[47]

依据中国政府估算，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美国租借法案军火实际送到中国手中的最多只能装备三个中国陆军师。如果依照美军标准，则只够装备1个师而已。这就是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前对中国陆军全部的支持。[48]而这些武器在零零碎碎到达中国后，立即在战场上消耗殆尽，中国政府想倚仗租借法案装备训练30个陆军师的计划全盘落空。

四 中美差距的外在原因

读者当然会想要进一步了解，中国对美国租借法案的期待和实质收获之间的这种悬殊差距，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

其实，即便是在法案施行之初，中国方面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知道美方对于中国政府所提出的申请清单绝不会全额照收。中方的了解，包括美国本身的压力和国际竞争两方面。

（一）美方本身的压力

中国政府深知，美国本身的确有许多客观因素，使它无法迅速满足中国对租借法案物资的全部需求。

首先，美国由一个和平时期的生产环境转变成为备战状态，由消费工业转变为国防工业，无论是在厂房设备上，或是劳工人员的技能和心态上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在租借法案生效前夕，美国国内生产设备只有15%从事国防生产，然后不得不急剧提升，但是依然赶不上需求，特别是飞机、大炮、无线电、药品、弹药的生产尤其紧张。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政府早期最易获得美国慷慨拨交的物资，基本来自美国原本和平时期的生产线，比如军用大卡车、铁路钢轨等，都可以立即从库存中提取，等于是在刺激美国的消费，使得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工业成为最早的受惠者。

其次，即便是军火武器已经生产出厂，分配依然赶不上需求速度，因为美国本身此时也正在全力扩充和装备海陆空三军。美国陆军自20余万常备军急速扩充，而海军也需要大量物资去建立两洋海军，加紧太平洋各地的防务。它们的需求当然得到最优先的分配。

第三，美国的货运轮船数量有限，途中损失率高，因此即便有物资，也难以分配到轮船货舱和吨位去运输，再加上中国所依赖的缅甸港口和滇缅路的交通瓶颈，更增加了困难。

以上这些因素，都是宋子文曾经设身处地地为美国设想，也要求中国政府予以理解的。[49]

（二）国际竞争

租借法案一生效，三十几个符合规定的国家立即争相要求美国施以援手。特别是英国和苏联，不但情况紧急，国际地位重要，而且战斗力强，又正遭受德国摧残，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是美国优先援助的对象。

宋子文从一开始就告诉蒋介石，租借法案既创造了新机会，也制造了新冲突。许多国家都将成为中国争取租借法案物资分配时的劲敌，而这些国家为了促进与租借法案总署的合作，也会成立专责机构代表政府行事。

宋子文特别对于英国在美国政府内外的活动能力，既是警惕又是羡慕，并且给予高度关注。为了了解英国人如何在华盛顿发挥他们的能量，他还特别去搜集有关英国供应委员会（The British Supply Council in North America）的资料，得知该机构代表英国全权处理一切和美国政府有关的租借法案事务，其最上层是一个9人的委员会，下属6个“missions”，每个 mission 都有独立自主的运作权，它们又分别代表英国内阁的重要部会，如外交部、海战争部、空军部、粮食部等。[50]

更引人注意的是，仅英国一国当时已经派有700多名工作人员常驻华盛顿，专门为争取美国物资而努力。这些英国人不但包括专家，对各种武器具有高度专业知识，可以把英国对于武器的要求说得头头是道，而且还有专职公关人员，与对口的美国政府单位进行联系，使得美方的批准手续得以快速通过。它的成员中包括一大批才干出众的人士，语言文化又和地主国一致，因此占尽优势。可以想象，仅仅是为了应对英国这么多能说善道、手腕灵活的人员，瞒天过海式地争取租借法案物资，美国战争部和其他各部会都必须出动大批人员，保持经常性接触，难怪英国能够获得法案支配范围内最大数量的物资援助。[51]

英国供应委员会的案例，显然为宋子文组织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提供了重要启示。面对如此劲敌，宋子文也须雇用少数有能力的美国人去帮助中国争取利益。宋子文这么做似乎完全合情合理，也是职责所在，但是却使摩根索气愤难平。因为在过去三年里，他已经为中国人立下了一些行为规矩和限制，基本上是由美国人随心施舍，由中国人感恩接受，而现在居然有中国人胆敢不遵守这个规矩。当然他无法控制的是，宋子文远比胡适和陈光甫要难缠得多。

其实，中国在华盛顿的工作人员远远无法望英国人的项背。依据中国国防供应公司1941年6月初的编制表，全部职员共58人，其中还包括秘书、打字员、信差、电话接线生、门房等。有趣的是，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美籍职员中有14人为女性，恐怕是最早实行男女工作机会平等的单位。但是它在当时白人男性主宰的华盛顿政治圈中，又显然是一个弱势单位。在这全部职员中，有28人为中国公民（多半来自重庆）。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董事会和其他具有领导地位者约有33人，其中17位为中国公民。换言之，最多只有16位美国籍人士可以帮助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在美国政府和社会中开展工作。[52]再依中国国防供应公司1941年8月向美国国务院的申报，为外国单位工作的全部人员为37人，包括董事、军官

和文职雇员，其中有4名华裔、32名美国公民、1名波兰人（拉西曼）。[53]虽然宋子文曾经要求蒋介石从国内增派多名军事专家赴美支持，但是中国军方缺少熟稔英文的军官，这成为最大阻碍。[54]

宋子文既得不到大批国内军事专家协助去和美国政府保持广泛联络，只好延揽几位在华盛顿政商界具有活动能力的美籍人士，成为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成员。一旦完成这个安排，宋子文就很安心地向蒋介石报告，称从今以后凡是牵涉美国对华援助事务，他都将能在罗斯福身边找到有力人士协助，务使美国援华政策得以产生实质性效果。[55]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和其他国家驻美单位不同之处，就是没有设立专责的公共关系部门，也不向外界定期发布新闻稿。它的公共关系事务只是依赖个别董事在美国政商界的人际关系。依据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内部文件，他们能够接触的对象包括：联邦政府各部门，几家著名报纸杂志（*The New York Times*，*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The Washington Post*，*Time Magazine*，*Life Magazine*，*Fortune Magazine*，*Asia Magazine*，*the United States News*），其他新闻媒体和知名人士，以及部分民间团体。总共列名的个人或单位在30～40个。[56]这大概就是宋子文经手的公共关系工作的总和，也是后来被美国学者大事渲染的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的雏形（当然宋美龄还有其他南方和教会的关系）。但是比起当时的英国游说团诚可谓小巫见大巫了。正由于人手如此短缺，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董事和非专业人员必须经常客串联络员，与美方财政部或战争部的专业人员直接打交道。[57]

也正是这种活动能量悬殊的对比，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有些国家的确占据了租借法案分配的优先权，虽然心有未甘，但也只能接受美方决定授予较少额的援助数量。

然而，中美之间的问题远远超过上述范围，因为美方不仅是向中国提供极少量的援助，而且还振振有词地评判中方的缺失。

（三）中美双方互责的内在原因

即便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军方对于中国政府所申请的军事援助项目就已经逐渐形成一些看法和说法。等到两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为盟友之后，这些看法和说法益形露骨，而在战后则被军方历史学家将之定调，成为后世英文著作广为采用的标准叙述。其要点是：中国政府在申请租借法案物资时，表现出无知无能，狮子大张口，不切实际，一味沉迷于先进和复杂的武器系统。由于美方无法接受中国的无理要求，而使来往商议审核的程序旷日费时，导致物资分配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美国军方抱怨称，中国政府想要获得的武器经常缺乏具体资料，或是美国兵工厂根本不生产的类型，或是根据美国军方判断根本不适合在中国战

场使用。美国军方特别嘲弄的，是中方盲目要求美方提供美国并不生产的7.92mm口径步机枪和子弹；完全罔顾中国缺乏能够载重的路基和桥梁，好高骛远地要求坦克和大炮。[58]除了这些技术层面的指责，军方还做出政治分析，判断中国政府缺乏抗日斗志，只是指望取得美制武器后加以囤积，尔后在美日冲突中坐享其成。

检视上述论点多年来之所以广为流传，其主要原因就是学者在论述军火问题时完全依赖美国军方资料，而没有对军方处理事务的过程和所涉武器的类型进行独立审核思考，更不屑参考（或不能阅读）中方资料。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批评中国政府只是意图囤积武器而缺乏作战意愿，此说首先是由美军代表团一位校级军官提出，旋即由团长马格鲁德将军转述报告战争部。但是按照这位军官本人叙述的搜证过程，他只是和几位中国军官交谈之后，加上自己的观察，就对中国政府的抗战意图做出如此全面性的判断。而此时该团抵达中国还不足一个月（11月），尚未展开工作。该军官本人初次身临异国，不懂中文，对中国派系复杂的军队情况既未进行实地考察，也没有和政军领导人进行接触，更无缘对蒋介石察言观行，却对中国领导人内心深处最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已经了如指掌，真是充分表现出美国某些军人的政治智能和对中国事务的“洞若观火”。[59]

我们今日重新审视当年的中美关系，就会发现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此前的历史论述，因此本书拟从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1.程序层面

首先就程序而言，基于本章前文已经详细介绍中国政府经过重庆俞大维署长和华盛顿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专业委员会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以及他们与美方战争部专业人员的互动情况，可以认为凡是美国军方宣布接受的中国申请清单而且列为拨交的项目，就是已经经过美方严格检验认可的项目。而美方在中国原先申请的数量上，经过七折八扣后所批准并承诺的数量，更是美国认为合情合理的（最低限度）数据。所以即使是完全依照美国军方的说法，也可以看出问题的出现不在于中国的要求不合理和不务实，而在于美方改变（反悔）了自己的承诺。换言之，即使中方曾经提出过不合理不务实的项目，也早已被战争部主办人员在审核过程中予以排除，不能进入立项拨款的阶段。等到战争部上级既做了承诺又不能兑现时，其原因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决策问题，或是政治问题了。

考其原因，不外下列数端。

第一，美方在批准项目后长期拖延不予落实，中方如若询问也不予理睬。如果中方在下次申请时再度提出，则美方又可指责中方犯了重复申请的过错。比如说，105mm榴弹炮、90mm口径高射炮、7.92mm口径枪弹，中国都曾经多次申请，但是因为其他国家或美国本身的需求有

更高的优先权而遭到搁置。而7.92mm子弹则美国战争部一直等到1941年底才通知中国，它可能会去订购能够生产7.92mm子弹的工作母机，但是否会实行与何时实行则尚待进一步考虑。[60]

第二，美国军方在宣布履行承诺的过程中，经常单方改变数量或类型，或中途延期，或改送到其他国家，或全盘取消承诺，而且不向中方做出任何解释。另一种情况则是，中国政府也可能被通知，虽然美国的确拥有某些武器，但是有更紧迫用途，因此不能拨交给中国使用，甚至在拨交后又收回或停运。比如13吨坦克、噪声探测器、探照灯、望远镜、枪炮测距器等，都在已经公布启运时间表之后又被取消。有些中国紧迫需求的武器，美国战争部也承诺提供，但是毫无例外，每一项都被大幅度减少数量，或是延迟拨交时间，比如榴弹炮、高射机关枪、反坦克炮、装甲侦察车、坦克等。[61]

第三，同样普遍的情况，是美国军方内部各单位缺乏协调，以致多次在大炮移交后却发现没有运送炮弹，或是送了炮弹而没有大炮，使大炮形同废物。[62]

难怪在面对这些困难时，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提出了非常清楚而简单的解决方法。其要点是：①请美方批准中国申请的最低要求的武器和弹药数量，帮助中国军队继续抗战；②给中国的最低要求与其他国家的要求授予同等优先权；③在美国全部生产量上，对中国的申请划出一定的分配比例；④把这个比例的数量在承诺的时限内拨交给中国军队使用。万一遇有特殊情况使得美方必须把向中国承诺的武器改送到其他国家时，应该事先与中国协商。[63]尽管中方这些要求看似合情合理，美方却不予理睬。

2.实质层面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对美方的批评进行思考，那就是中国申请的武器弹药项目是否果真不切实际和好高骛远？我们不妨在此对中方申请的武器弹药的性质和数量进行更细部而理性的考察。

前文曾经提到过中国政府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租借法案申请中突出的16种武器弹药，其中特别强调的是步机枪弹药、防空高射机关枪炮和榴弹炮，它们是中国最急需和最大宗申请的军火，值得我们深入了解。

7.92mm口径步机枪子弹的案例

中国对租借法案武器最大的要求项目是7.92mm步机枪子弹，它立即被美国军方予以拒绝，而后世学者更是屡屡引用此案例，嘲笑中国政府完全无视美国根本不生产该口径枪弹的事实，胡乱要求，足见中国政府的无能和无知。

然则，中国政府究竟为何提出此项要求？美国又究竟是否有能力提

供帮助？

如前所言，7.92mm步机枪是自20世纪初期以来，所有中国的中央军队和地方军队普遍使用的制式武器，中国数百万士兵依靠它去对日作战。除非美国能够提供数百万支新式步枪（0.30英寸）和机枪（0.50英寸）全面重新装备中国军队，否则中国抗日战争必须每天消耗7.92mm枪弹为200万～250万发（依照中国政府1939～1940年的实际作战经验）。既然美国要以租借法案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而又是中国武器唯一的支持国家，因此向美国要求该项弹药毫不奇怪，与“无能无知”完全不相干。

更为实际的问题应该是，美国军方究竟是否有能力向中国提供7.92mm子弹？可以想象的解决方法似乎有两种，一是由美国兵工厂制造后运往中国，二是帮助中国兵工厂就地制造。

就美国制造而言，它没有现成的产品的确是事实。它不能制造，只是借口，掩饰其缺乏援助中国的诚意。因为任何小口径子弹，只不过是工作母机不同而已。如众人所知，枪弹的生产并不复杂，它的四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弹头、火药、金属弹壳和点火引信，把这四种材料放进不同尺寸的工作母机，就可以出产不同口径的子弹。以美国兵工业的发达，几乎不需克服任何技术难关，即可建立大规模的生产线。[64]

回顾租借法案刚刚实施时，蒋介石就急不可待地致电宋子文（1941年4月），说明7.9mm步机枪和子弹是中国战场上最迫切需要的军火。正因为中国政府知道美国当时并不生产该口径的子弹，所以特意指示俞大维领导的兵工署，把制造该项军火所必需的全部图纸和规格准备妥当，以备随时向美国军方提供，务必请求美国政府尽快采取行动。[65]宋子文经过几个月努力仍旧未能取得军方回应，只好退而求其次，希望美方提供生产原料，由中国在自己国内生产。[66]但是直到1941年底，尽管中国三番五次急迫请求提供5亿～6亿发枪弹，仍未能获得任何回应。而美国之所以不予理睬，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而且还要借此奚落中国军方不谙美国国情。[67]

第二种方式是由美方协助中国政府，在中国内地生产7.92mm步机枪子弹。正因为该口径的步机枪早已是中国陆军的制式武器，国内兵工厂对于其子弹生产都能驾轻就熟。只是由于历经四年的破坏，中国兵工厂的设备只能满足军队一半的需求，这也是中国需要美国5亿～6亿发枪弹应急的原因。[68]

中国政府兵工部门曾经做出估算，如果要达到每月生产6600万发枪弹目标，则需要约3725吨原料（炸药、弹体、工具钢、锌、特制润滑剂、钢板等）。如果能够从美国多获得4200吨原料，则中国兵工厂还可以生产轻型迫击炮和炮弹。[69]

1941年中国后方大约尚有20家兵工厂，有一个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

群，可以生产各种小型武器和弹药，但是由于缺乏原料和生产母机老旧破损，因此无法发挥潜能。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在其物资申请项目中，曾经特别要求美国提供9万吨原料供中国兵工厂使用，并且向美方提出估计，在得到这些原料之后的一年内，中国兵工厂能够生产的武器大致如下：

①105mm口径榴弹炮：60门；

②75mm口径山炮：120门；

③37mm口径高射炮：240门；

④20mm口径炮：480门；

⑤7.9mm口径轻重机关枪：14400挺；

⑥120mm口径迫击炮：1200门；

⑦82mm口径迫击炮：6000门；

⑧60mm口径迫击炮：7200门；

⑨轰炸机炸弹：6000吨；

⑩各式榴弹炮炮弹：600000发；

⑪迫击炮炮弹：4200000发；

⑫7.92mm口径步机枪枪弹：600000000发；

⑬手榴弹：1200000枚；

⑭防毒面具：200000套。

以上这些武器器材都是中国抗战的急需品。美国军方既可以选择在美国生产后运往中国，又可以向中国提供兵工原料，由中国自行生产。但是美国军方最后的选择是两者均不予理睬。一直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四个月后的1942年4月，美国战争部才终于关心中国战场的情况，开始在美国生产7.92mm口径步机枪弹药。

其他武器的案例

中国政府要求的其他武器的命运也同样令人深思。

①75mm口径山炮。中国申请360门，美方拨交20门，并且没有进一步安排后续的拨交计划。此项武器非常适用于中国山区地形战场，但是到1941年11月为止，中国总共只收到20门，其他全无音信。

②0.50英寸口径高射机关枪。这是整个中国战场抵抗日本空军轰炸最重要的防御武器。中国申请1360挺，但是实际拨交285挺。依照美方1941年7月22日所定的日程表，批准了中国全部申请的数量，并且承诺7月拨交100挺，然后逐月增加，并且承诺在1942年4月完成全部拨交目标。但是在1941年9月6日，战争部单方宣布新的日程表，9月拨交285挺，其他仍然依照原计划完成。9月11日又突然取消全部承诺。为此蒋介石赶紧亲自向罗斯福求援，其结果是美国在10、11、12三个月内一共拨交了285挺，但是拒绝对未来做任何承诺。不幸的是，这批武器运抵仰光港口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立即被当地英军没收据为己有，蒋介石又不得不致电丘吉尔求援，而英国在三个星期后才允许中国政府取回。

③37mm口径反坦克炮。美方拨交60门，并且没有进一步决定。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这种反坦克炮是反制日军坦克最有效的武器。中方申请360门，但是战争部1941年单方将之减少为240门，而到了年底却只移交60门。战争部口头上通知中国政府未来送货的希望渺茫。

④75mm口径野炮。中方申请240门，美方拨交77门。美方原先承诺在1942年1月以前将240门炮全部拨交，但是实际只拨交77门，战争部同时单方取消了剩余的167门计划。[70]

⑤冲锋枪。中方要求22000挺，运到12000 挺，承诺后续运送10000挺。这是在第一次租借法案中中方申请的全部武器项目中，唯一被美方全部接受的要求，但是它也是中方武器要求中质量最差的一项，即使在中国战场，也只适用于游击队作战，而且是由加拿大制造（难怪美方不予刁难）。[71]

以上这些资料显示，中方依照租借法案提出的大批物资，其中再三强调的16项武器，并不是标新立异的先进武器，而是最基本的步兵枪炮和防空枪炮。但是即使这些基本武器要求，美国军方或不批准，或在批准过程中大打折扣，更常见的是承诺之后不兑现，或是中途改变决定，或是交货日期严重滞后，或是不了了之，以致对中国战场几乎不能产生有意义的帮助。这些资料也让美国战争部历来对于中国武器要求的批评显得软弱无力，美国不肯给的不是先进武器，而是制式武器。如果连步枪、机枪和子弹都不愿意给，实在很难令人信服美国军方为了洗刷自己责任而诿过于中国的说辞。

这个现象也帮助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蒋介石和宋子文屡次感到必须绕开战争部，而直接向罗斯福求助。从战争部立场看，他们当然最喜欢和胡适这类的中国官员打交道，因为他尊重美国联邦体制，不做越级的接触或求援。如此则一切主动权都操在战争部手中，他们愿意给什么、给多少、什么时候给、什么时候改变主意等，完全自主定夺，不受中国的干扰和压力，甚至不许中国政府质疑。也正是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胡适所谓“苦撑待变”的负面含义才暴露无遗。换言之，美国人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中国只能照单全收地苦撑到底。但是人们不禁会产生

一种疑惧，万一国际和美国的“变”，导致了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和会上列强出卖中国的结局，那么中国怎么办？如此说来，蒋介石授意不让胡适过问军援事务，也许确有先见之明。此举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军方的冷漠，但是至少为中国的“苦撑”增加了些微心理能量和物质支持，为国际局势的“变”从消极的“等待”转换成积极的争取。

（四）其他几个常被美方诟病的问题

1.中国申请的武器不适用于中国战场

战时美国军方对中国申请武器的另外一个批评是，中国领导人要求坦克，足见其对于战场实际缺乏认识，原因是该项武器过重，中国的桥梁和道路无法承载，等于废物。其实仔细查阅中国的申请清单即可发现，中国所要求的不是欧洲和北非战场交战双方所使用的巨型坦克，动辄数十吨，而只是3吨或7吨的轻型坦克，比军用大卡车重量略重而已。

更何况美方说法，已被中国战场以往三四年的实例屡屡否定，因为日军在华作战大量部署坦克及大炮，中方传统由泥土堆积而成的防御工事完全无法承受其攻击。这使得中国政府也希望取得相等的武器，与日军公平搏斗。

再从外国战场经验观之，德军在南斯拉夫山地作战使用同类武器，以及1944、1945年美国军方在第二次缅甸战役中大量配置同类武器等实例，足见美国战争部此种说法只是遁词，或是暴露自身的无知而已。

事实上，如前所言，如果这些武器最初在中美双方技术人员的会商中没有通过美国审核，则中方自然没有机会将之列入正式申请项目。而其通过战争部审核并且得到配额后，却又转变为指责中方的理由，则它说明的是战争部高层人员在政治上的不愿给，而不是基层人员在专业检验时认为无法过关技术上的不应给。只是高层人员不愿意坦承自己的变卦，只好转移焦点，将责任归于中方。而后世学者不察实况，也对美军官方说辞照单全收。中国是弱国，在此充分承受了“拿人手短”的苦果。而美国作为强国，是施舍方，诿过于人当然也是它“特权”的一部分。[72]

2.中国囤积武器之嫌

美国军方对中国更负面的指责是，中国有预谋地囤积武器。换言之，国民政府的如意算盘是尽量取得美国武器，但并非用于抵抗日军。

1941年初，当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对中国今后18个月的武器需求做出一次性批准时，罗斯福却表示他虽然愿意破例对中国的飞机要求尽力满

足，但是对于其他武器则必须逐步审核办理，无法做出一次性承诺。[73]中国要求大批输入武器的意愿在此后逐渐在战争部引起质疑，认为中国政府处心积虑就是想要从美国大捞一笔，也在心理上形成严重的抗拒感。

其实，中美两国各自采取的立场都不难理解。

从中国方面来说，重庆政府之所以一次性地提出了此后18个月的武器需求，主要理由有二。其一，这是测试美国诚意的最好方法。因为在过去两年来苏联供应中国抗战武器最大的困难就是其不可靠性。不管是空军或是陆军武器，其数量之多寡，性能之优劣，交货之急缓完全视苏联政府的意向而定。而苏联政府的意向又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苏德在欧洲战场上的较量，苏日关系的紧张或松弛，苏联对于中国内政的盘算和干预等，以致演变成蒋介石虽然屡次请求苏联履行承诺，到最后仍不免失去耐心，向苏联政府表示绝不哀求。这也正是中国政府改向美国购买武器的主要原因之一，18个月可说是从痛苦经验中得出的教训。有了18个月的库存武器，就比较能够应付国际上的不测风云。

但是想不到，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观点下就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解释。美国部分军人无视中国从七七事变以来就持续独力抗战的艰苦记录，大胆推测国民政府其实并不想抗战，而蒋介石要求美方尽快提供武器，就正好印证了他们推测的正确性。那就是，中国人只想欺骗美国，赶紧骗取大量武器到手，予以秘密囤积，作为他日进行内战的资本。

其二，中国的抗战历程一直被两个因素所困扰。一个是国际大势瞬息万变，另一个是武器出产国随时改变它们的国策（先有德国，后有苏联）。因此中国的对策就是在惊涛骇浪的国际局势下，可以储存足够的武器弹药应付本身抗战需要，而且越快越好，越早越好，越多越好，以防国际局势发生突变（比如英国关闭缅甸路）而使中国措手不及。更令中国担心的是供应国（比如德国）不时把提供武器当成胁迫中国向日本妥协求和的条件，全然无视二者之间根本性的矛盾：中国政府之所以求购武器孔急乃是为了继续抗战；如果必须被迫谈和，则又何必买武器？

换言之，中国政府最理性的盘算是，无论国际局势如何逆转，中国抗战都可以持续进行。因此，储存18个月武器已经成为国家军事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项保证，则中国领袖们将永远处于焦虑之中，今日不知明日能否有米举炊，而且可能导致军队在作战过程中为了节省弹药而益趋保守，过分保存实力而丧失攻击性。

史料显示，重庆政府对于西方国家武器是否能够顺利运送到中国的担忧，并非故意做给美国人看的一种姿态，而是发自内心的恐惧。1940年夏季英国突然宣布关闭缅甸路已经是一个强烈警讯，即便是缅甸路在1940年底恢复运输之后这种恐惧也未稍减。10月，蒋介石担忧日本可能进攻云南，因此派遣何应钦和林蔚到云南筹划防务。[74]与此同时，他又开始关注从西康建造一条新公路到印度的萨地亚以远离日军轰炸破

坏，并且指示驻英大使郭泰祺协同宋子文向英国交涉，在印度招募劳工，由美国提供机械，尽快施工。[75]1941年1月日本势力进入越南，更让蒋介石相信它必定会进攻云南，[76]因此中国必须未雨绸缪，为缅甸通道可能切断预做准备。所谓预做准备包括两个对策，一是另辟新通道，二是及早得到充足武器。不久，他甚至更为悲观地说："若照倭对泰越与琼明之动作而论，势非美倭决战不可。则余不愿美国加入战争之期望恐成泡影耳。"[77]如果蒋介石这则日记是诚实记述，则他此时的期望并不是把美国拉进战争，而是正好与某些美方人士的推测相反，他希望美国可以避免战争。

根据蒋介石私下所表达的，1941年有几种因素增加了重庆政府对于缅甸路安全的担忧。一是英美和日本之间关系可能恶化，二是日本可能执行南进政策。两者无论何者发生，都足以直接威胁到缅甸路的安全，因此中国数度要求英美两国共同保证路线通畅。[78]重庆政府也试图和英国直接交涉，并在1941年初多次企图说服英国协商中英防务合作事宜，但都遭到英国人冷淡对待。

到了1941年春末夏初，蒋介石更趋向认定日本会执行南进政策。他对国际局势做了一个宏观性的预测，写道："而倭之南进，与德之攻俄，以及美之参战者，是皆已成定局。如无特殊变化，则此三者必于最近期内实现，可无疑也。"[79]适值此时，日本又抢夺了中国在越南海防市库存的物资。这些都迫使重庆政府在7月定出时间表，首先是紧急疏散在缅甸的库存物资，其次是由蒋介石在8月初指示部下尽快着手从西康开辟一条通往印度的新公路的测量工作。[80]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唯一能够倾诉其内心恐惧的对象是美国，岂知美国一些军人自作聪明地以为中国人在玩弄障眼法，只是一味想骗取武器。因为纯从美国立场着想，军方宁愿中国只提出短程申请，让美国可以在优先满足欧洲战场西方国家的需求之后，从容地将剩余物资酌量拨交中国，并且在此期间还可以对中国使用美式武器的效率加以检查，同时维持美国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讨价还价的空间。双方此种心态差距，在此后的军事合作过程中不免产生长期性恶果。中国开始怀疑美国承诺的诚意，而美国却认为中国的意图根本不是抗日，而只是囤积大量武器留作他日消灭国内政敌。

后来的发展显示，即使美国政府已经承诺提供的武器，也不能如期运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当即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比如说，蒋介石向美国大使詹森（1941年5月10日）表示，如果美国能够提供给中国足够武器的话，则中国可以独力对付日本侵略而帮助美国避免美日之间的战争。[81]显然，蒋介石试图以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作为诉求点，去打动美国准时向中国提供军火，美国军方却不为所动。不幸的是，上述蒋介石5月所做的三个宏观性预测在此后半年内相继应验。

3.琐碎的批评

当美国军方在批评中国要求的军事器材不合理时，还会举一些琐碎的实例。比如说，最近一本英文著作所列举的证据就包括大量的“重复和不切实际的器材和原料”：军毯、防毒面具、棉花、铜制和铁制通信电话线。[82]

如本章前文所述，虽然中国不断大声疾呼的重要项目是飞机、大炮、步机枪、弹药等，但是以中国军队处境之艰苦，它完全可以用得上美国愿意慷慨解囊的一切物资。就以上例子而言，中国不是产棉大国，数以百万计的士兵中有很多人衣不蔽体或冬着夏衣，完全可以受惠于美国军毯和棉花。中国军队因日军使用毒气作战造成伤亡惨重，肯定欢迎配备美式防毒面具。而金属通信线则更是所有军事单位不可或缺的基本通信器材。以上物资均非中国本身有能力充分供应的，那么向美方要求此类物资不解有何“不切实际”之处？

重读此类批评不免让人产生两种感触。第一是它的津津乐道。学者在战后70年重新检讨这个问题时，居然仍然只能重弹老调，提不出新史料和分析，诚为憾事。更何况，该著作所引的权威史料来自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一位低级军官，其目光所见只是仰光港口，对战争全局缺乏宏观思考，而且尚未到过中国战场，就满怀自信地将某些物品定性为“不切实际的器材和原料”，令人觉得学术似乎停顿在原地不动。简言之，如果这些器材原料可以运到中国境内，则对抗战肯定会有相当贡献。第二是它的避重就轻。美援的瓶颈在缅甸，世所共知，而美国虽然在缅甸有极大的外交和军事谈判实力，却明令马格鲁德不可涉入。回观美国此时对英国的支持，在史学界屡屡得到称赞，因为它在运输过程中虽遭受德国潜艇重大打击仍坚定不移完成任务。但是在讨论缅甸运输时，却撇清干系，诿过他人。这种做法完全是对历史真相的歪曲。

（五）中国对飞机的要求

本章前文对于军火的讨论，重点是中国陆军的需求和美方的回应。鉴于中国对于空军的需求性质极不相同，因此必须在以下篇幅加以单独处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飞机是中国对美国武器最早感到有兴趣而且在相当时期是唯一的项目。早在1939年，重庆政府就想以美国飞机取代苏联飞机，而宋子文派赴美国的主要使命之一也是争取美国制造的飞机。他在抵达美国不久，就不断接到蒋介石相关指示。先是在7月，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将原本计划拨交给法国的飞机的10%转拨给中国。[83]两个月后，他又致电宋子文：“如美国果有意与我合作，则我所望其接济之武器惟飞机而已。而主要之接济仍在经济与金融，以安我抗战之民心与军心，使能持久抗战，为惟一要求，此外无任何要求也。”[84]相对而言，陆军军火是后来提出的新要求。

在此还应该指出的是，蒋介石虽然此时已经希望发展中国的空军力量，但其动机并非如同某些批评者所指责的那么单纯幼稚。多年来一些西方人士对于蒋介石热心发展空军力量的批评，大致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推测蒋介石处心积虑地只想借美国空军之力替他打仗，此说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尤其流行。但是事实上，蒋介石要求美国提供飞机，远在珍珠港事件前就已经屡次而急迫地提出。因此美方这些人的推测犯了时空倒置的基本错误，完全无法解释蒋在1939～1941年的行为。另外一个说法是指责蒋介石头脑简单，受到陈纳德夸张宣传的迷惑，沉醉于空军威力的幻想，误以为仅靠空军就可以击败日本。如此则他既可以避免因整编陆军可能带来的痛苦，又可以保存嫡系部队实力在战后去对付国内政敌，一举两得。这两个说法都值得我们认真检视。

现有中方史料显示，早在陈纳德来中国之前，蒋介石就已对空军产生浓厚兴趣。从1930年代初期开始，蒋介石就曾以重金礼聘西欧国家的飞行师来帮助中国建立空军。宋美龄也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热心投入航空事业。在当时中国殷切追求军事现代化的环境里，蒋介石的心情和见解和他同时代许多有识之士并无不同，一致认为飞机是国家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工具。不论是来自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或是在1937年以前飞机在多次内战中的表现，都让蒋介石认识到，空军将会是现代化战争中必须具备的实力。

蒋介石对空军重要性早就持有自己的见解，因此在抗战一开始和苏联恢复军事关系时，他要求的重要武器之一就是苏联制造的飞机，而且不论是苏联提供的飞机数量，或是苏联飞机和飞行员直接参加中国抗战的数量都非常大。但是在史料里，似乎苏联从来不曾指责过中国政府居心叵测，希冀苏联替中国人打败日本。

同样，飞机也是中国向美国要求购买的最重要武器之一。[85]中国早在美日关系恶化之前就已经做出相关决策。这些史实显示，把陈纳德看成蒋介石对空军憧憬的启蒙者，委实夸大了陈纳德的作用。更正确地说，陈纳德是蒋介石在世界市场物色杰出空军人才过程中的后起之秀。如果把蒋介石对空军的重视看成他蓄意避免地面作战的证据，则既误解了中国军事发展史的先后顺序，又误解了蒋介石个人的心理。如果进一步审视蒋介石与陈纳德的关系，则我们必须记得，陈纳德在美国军中不被赏识，遭受排挤，视为异类，黯然退役，到了中国反而得到蒋氏夫妇的器重。因此，与其说陈纳德是蒋氏夫妇的启蒙师，不如说他是蒋氏夫妇“伯乐”所发掘的千里马，原本是被美国军方放逐荒郊野外的一匹老破马。这样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他对中国人忠心耿耿。理由很简单，是中国人给了他事业的第二春和青史留名的机会。

毫无疑问，中国对美国飞机的兴趣随着宋子文赴美而急速提高，但是此时仍然是在国共关系全面恶化之前。如上一章所述，1939、1940年重庆政府无法阻止日本飞机对内地城市和人民的轰炸，而中国军民普遍而又强烈地要求对日本进行报复，在这种多重因素作用下，中国要求得到美国飞机本来就是顺理成章之事。更何况它要求的飞机数量是如此

之少，完全没有必要扯上其他文不对题的分析。战时美国军方某些头脑简单的将领自作聪明的分析和后世一些学者的人云亦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只知参阅少数美军将领提供的英文资料，而不去检视中文资料，加之染上了怠惰的坏习惯和带有浓厚种族优越感的自以为是，就让这些了无新意的分析变得流传甚广。

再者，即使蒋介石对陈纳德能够以少胜多打击日本空军的宣称感到兴奋，也没有中方史料可以证明中国领袖们采纳了新的战略观点，指望以空军取代陆军成为赢得抗战胜利的法宝。正好相反，中国将领普遍抱怨，是日本空军严重打击了中国士兵地面作战的能力，因此蒋介石不得不争取更多的飞机，以维持国军的士气和战力，指望陆军在空军支持下进行联合作战并进行反攻。

诚然，蒋介石对于空军价值的乐观看法，有一部分是受到陈纳德热情的感染，但是也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因素。首先，英国皇家空军在伦敦保卫战时期的英勇表现就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会怀疑，设若当年英国没有强大空军作为后盾，它还能支撑得过德国的攻击而不屈服。英国动员了数以千计的飞机去保卫伦敦，又大声疾呼要求美国提供数以千计的飞机去保卫英国这么一个领土狭小的国家。其正当性从未引起任何美国军事领袖质疑，更不曾有美方将领指责过英国妄图以美国飞机打败德国。但是尽管中国领土数十倍于英国，而中国又只要求数百架飞机保家卫国，却被美方批评者指责为贪得无厌，这个逻辑实在值得细究。

此时还有另外一个更贴近中国的实例，对蒋介石产生了重大影响，那就是苏联和日本在西伯利亚边境的冲突，而苏联红军在1939年成功地击退了日军的挑衅。根据蒋介石获得的情报，这项战果得力于苏联在远东地区动员了500架飞机，在半个月内摧毁了600架日本飞机，阻遏日本空中攻势，然后协同陆军在地面战斗中获得胜利。在一封致罗斯福电文中，蒋介石表示他也希望同样情形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发生。[86]

在租借法案的范畴下，中国对于飞机的申请则是另外一本复杂的账。就美方而言，一般军火完全由陆军决定，但是飞机则需要经过陆军、海军和陆军航空队的协调才能做出决定。[87]

读者或许希望了解几个基本的问题：中国要求美国提供多少飞机？中国需要飞机的理由是什么？中国就飞机申请事项和美国互动的经验如何？

①中国要求美国提供多少飞机？

这个问题的答案比较清楚。中国政府在文件中提过的最高的理想数字是1000架飞机，但是又立即声明最初阶段只要求500架，其中包括350架驱逐机和150架轰炸机。[88]如同本章前文所述，这个数量早在1939～1940年就已经纳入中国政府的长期计划，继之在第一次租借法

案时又成为正式申请，并且在珍珠港事件前甚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都维持不变。[89]

第二次租借法案申请只是希望能够保证500架飞机的作战状态，能够有足够的补给，维持这个500架的数量。中方甚至指出，这个数字低于美国航空工业一个星期的生产量。[90]

②中国需要飞机的理由是什么？

中国政府除了希望有空军可以升空保卫城市人民和工商业设备之外，再三强调的是它可以更有效地持续抗战，其论点大约可以综合为下列几点。

首先，中国陆军需要空中支持地面作战。由于中国地面部队完全没有空军支持，而日本空军可以对他们肆意炸射，这是国军屡屡败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说，1940年夏季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每次（战役）我军之所以不能得到最后胜利，完全在我空军数量对日不及百一之故也。"[91]1941年，蒋介石又电告宋子文："入夏以来，敌机肆虐更甚，任意轰炸，我军民无法抬头反击，中条山失利，原因即在飞机缺乏。"[92]如果有了美国飞机，就可以扭转此种战场上的绝对劣势，甚至帮助国军反守为攻。这种说法在中国政府内部文件中不断出现，[93]而且这些说法的时机和中国政府希望重建30～60个陆军师的计划正好重叠。

其次，中方指出，由于日军在华的补给系统不是依赖公路或铁路，而是依赖长江及其无数支流的水运，将后方（沿海）补给品运送到前线（内地）。这些内河航行的船只既没有防卫装备又速度缓慢，如果中国拥有飞机，极易使其后勤瘫痪，迫使日军从大面积土地上撤退。[94]

第三，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的空军基地距离越南北部日本空军的集中地只有350英里；而东南地区（浙江）几个大型而装备较完备的机场，可以对台湾和日本本土的工业重镇如神户、大阪等地进行攻击，或是对日本海军加以攻击。值得注意的，如前文所述，蒋介石宣称，如果美国向中国空军提供足够飞机的话，就可以避免美国和日本进行直接冲突。[95]回想美国军方部分军官一直坚持一个信念，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迷醉"于空军，就是希望借美国空军的力量打败日本，而中国政府可以退缩一旁坐享其成。而蒋介石这份电报所持的理由，却是美国只要愿意向中国提供飞机，它就可以"避免"和日本冲突，由中国军队来抵抗日军。这两个逻辑之间的差别之大，也提醒学者在对历史提出分析和推论之前，一定先要尽量厘清史实。

③中美两国就飞机申请一事的互动经验

回顾史料可以看出，宋子文初抵美国时，对于取得美国飞机一事似乎甚为乐观。因此刚刚抵达华盛顿就和苏联驻美大使接触，甚至向苏联外交部试探，希望在预期获得大批美国飞机后，可以借道苏联海参崴港

口运回中国。[96]

中国政府的态度也同样乐观。在1940年10月给宋子文的指示中，详细地列举了中国的指望需求，包括：

300架驱逐机：其中150架用以对付日本的轰炸机，150架用以迎击日本驱逐机。

200架轰炸机：其中100架为单发动机，用以俯冲轰炸，另外100架为双发动机，用以轰炸固定大型目标。

每个月补充损耗以30%计算，即90架驱逐机和60架轰炸机，外加零件。

2500万～3000万加仑汽油，外加润滑油。

每年30000吨炸弹。

中国飞行员及技术人员委托美国在菲律宾或美国本土提供训练。

在海外招募1000名华侨为飞行员，由陈纳德负责训练。[97]

这份指示电很可能是由陈纳德参与起草，包括许多细节，如发动机类型、生产厂家等都有精确说明，显示对美国飞机品种和制造商非常熟悉。这可能是目前中国政府在1940年有关飞机要求最详尽和权威的清单。

但是事后发展显示，中国向美国申请飞机的成果远远少于它在陆军武器弹药方面所获得的成果。虽然中国以为其申请的总数只不过是美国飞机工业生产量的极小部分，但是一直得不到美方承诺。宋子文在走投无路之际，试探了各种间接途径。比如说，当法国战败之际，中国要求美国将原本决定拨交给法国的200架飞机改售给中国，但是没有成功。不久，当中方得知瑞典向美国订购的飞机无法取得出口许可时，又辗转要求瑞典政府将飞机转让给中国，同时请求美国允许转让。虽然瑞典政府表示同意，中国政府也准备把飞机从美国装箱运往新加坡组装后飞回中国，但是得不到美方合作，亦无成果。[98]

如果说美方对于驱逐机只是持暧昧态度，对于轰炸机则是绝口不提。[99]到了1941年6月，宋子文不得不向居里求助，但是“居里亦谓智穷力竭，无计可施”。[100]尽管宋子文不断向美方提出轰炸机要求，但是美方拒绝考虑的理由就是英美两国本身的需要必须优先满足。因此到了1941年6月中旬，宋子文只好向蒋介石提议，超越战争部而向罗斯福直接求援，“历举事实，率直密告，进以危言，晓以利害，以政治方法促动总统之决心，或可于英美需要之中，抽让若干”。并请求蒋介石明白指示是否可以采取这个途径。[101]到了9月，宋子文更进一步认为，如果要想让租借法案达成更好效果，则中美双方必须在心态上做出根本性调

整。他向蒋介石建议："美国现在供给我方物资，似出乎情义居多。以后应使其更加明了，中国之抗战在国际上有莫大之关系。尤其中美两国之间，利害与共，不可分离。供给我军械，系为我达到一种任务，非关于情面交谊，否则我永久处于请求之地位，焉得谓之平等合作？"[102]换言之，出于情义，则施舍与否，全权操在美方手中，出于互利，则中方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公平待遇。

尽管蒋介石相信中国所要求的150架轰炸机绝不可能影响欧洲战局，但是美国不愿帮助，使得中国也只好求助于丘吉尔，希望他能够转让部分轰炸机给中国。即使宋子文也承认"此亦无可奈何之中，作万一之想"。[103]鉴于蒋介石历来与英国有隔阂，却要低声下气去求助于丘吉尔，可见中国的需求何等迫切。当然，问题的核心并不是英国，而是美国军方不愿提供飞机。

在整个轰炸机申请过程中的一个异数，是空中堡垒型轰炸机。它原本不在中国政府的申请项目之列，而是由美方主动提出，并且急不得待地要求中国政府务必在一个月内完成机场建设供该机进驻。中方当然喜出望外，当即保证在1941年3月前建成可供该型轰炸机起降的机场。但是中方也善意提醒美国，空中堡垒机型必须要有足够的驱逐机护航，否则易被敌机击落。[104]这就使美方重新思考，最后不了了之。这个案例也显示美方决策摇摆不定，起初十万火急，不久销声匿迹。而美国军方在处理这个粗糙和轻率的战略决策时的轻描淡写，相对于它处理中国陆军武器申请单项武器时的热讽冷嘲，只能责怪中国是弱国，如果想他国施以援手，就必须忍气吞声。

轰炸机在1941年9月又有新进展，陈纳德突然向宋美龄报告好消息，称美国将拨交33架洛克希德轰炸机和33架 DB-7 Douglas轰炸机，而且他建议将前者拨交给美国志愿航空队，而将后者拨交给中国空军。[105]不久证明，这又只是一场空欢喜，因为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中国始终没有收到过一架轰炸机。

就飞机申请的大局而言，在1941年8月中旬似乎出现转机。经过宋子文亲自到战争部交涉，战争部做出承诺，在1941年12月31日之前向中国交货的数量将会是：

①中型轰炸机：100架

②驱逐机：1000架*

③运输机：100架

④高级教练机：200架

⑤初级教练机：300架

⑥杂项

根据美国战争部这个比较完整的文件可以看出，它承诺在1941年底之前交货，这就可视为第一次和第二次租借法案拨款中美双方在“纸面上”的总成绩。[106]

不幸的是，纵观中国政府要求美援飞机一事，仅在1941年夏秋之际的短短几个月中就发生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波折。不妨举几个实例作为说明。

第一批36架美国制造的Curtiss P-40驱逐机在1941年5月中旬运抵仰光港，但是没有机关枪装备，需待以后补充，因此无法投入战斗。这批飞机比此前中国空军拥有的飞机速度快、性能好，因此中国担心自己的飞行员因为缺乏经验而造成失误，被美方作为借口刁难今后的飞机供应，所以决定将它们优先拨给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使用，并且让中国飞行员也随机训练。[107]

1941年6月，宋子文又从罗斯福口中得到另外一个喜讯，美方承诺向中方提供269架驱逐机。如此则中方原本申请的350架驱逐机就可以大致到位，所以宋氏赶紧催促蒋介石，选拔500名中国空军飞行员到美国受训。[108]

1941年8月初，中国收到美国战争部通知，将会分两批提供86架和58架Curtiss P-48型驱逐机，全部飞机将会在1941年底和1942年1月交货。但是交货行动随即拖延。到了珍珠港事件爆发，本来已经有几架飞机准备装船，却临时被美国陆军单位拦取。换言之，中国没有获得一架此类型的飞机。

8月中国政府再度接到美方通知，有125架P-43型驱逐机将从11月开始逐步运往中国。12月初战争部将数目减少到108架，而其中只有首批30架号称已经装船。但是直到珍珠港事件为止，中国未收到一架。

洛克希德·哈得逊（Lockheed Hudson）轰炸机，美方原本拨配33架，预定1941年底交给中国。但是中方发现这个型号的飞机只是空壳子，机舱内缺乏装备和武器，必须先运到英国进行组装，因此在珍珠港事件时尚未见踪影。

DB-7轰炸机，原本批准33架，预计1941年底交货，但是一架都没有抵达中国。[109]

讽刺的是，到了1941年底，中国战场也没有获得美方飞机，连罗斯福亲口承诺的269架驱逐机也不见踪影。唯一例外是前文所述的100架驱逐机，型号落伍，武器不足，为英国军方所不屑，却被中国视为至宝。千辛万苦拿到手后，经过各方努力拼凑勉强达到作战状态，然后仓促交付陈纳德立即使用。

由上所述，美国数度通知中国要提供飞机，随后又单方缩减或取消。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当中国政府直接向罗斯福求助而他又亲自做出承诺时，战争部不得不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些拨交的数字去向罗斯福交差，但是在罗斯福的注意力转移之后，战争部便可以在操作过程中阳奉阴违，自行其是。

在历史上，中美两国为空军一事曾经不断争辩，大部分情形是由美国军方提出指责，而中国政府只是分辩，甚至为了维系双方感情，还吞吞吐吐，不做透彻说明，以致多年来英文的历史论述只反映美方观点。本书以上的叙述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就发展空军的目的和规模而言，中国早在单独对日作战时期（1939）就已经把基本数量定为500架飞机（350架驱逐机、150架轰炸机），珍珠港事件之后也没有因为美国成为盟国而显著增加。作者遍查中方内部文件（包括政府文电、私人信函、日记或回忆录），也未能发现中国曾经企图依靠美国空军打败日本的迹象。可是战时美国陆空军将领由物资分配而引发了激烈斗争，陆军的攻击说辞之一就是把中国政府扯进来，指责中国政府之所以再三要求飞机，就是迷信空军而希望由美国空军代替中国打败日本。这种言论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1939～1941）后（1941～1945）两个时段混为一谈，完全无视中国政府早在美国参战前两年就要求500架飞机的事实，而更早还有更大量的苏联飞机。如果今后还有学者钟情此论，能够向读者做出的最好贡献就是提出有力的新证据，而不是引用几位美军将领自作聪明的论调，否则这种说法只能凸显美方官员的严重误判和无知。

其二，中方资料对于这500架飞机究竟要达到何种目的，曾经向美方提供过明确的答案：一是有效地阻止日本对中国大后方城市的轰炸；二是打击日本陆军在华高度依赖的水运补给系统；三是以空中炸射支持中国地面部队作战，希冀扭转战场劣势，帮助中国陆军进行反攻；四是攻击日本本土工商业基地，打击日本海军，使日本人知难而退，脱离中国战场。

其三，美国军方从租借法案生效之始就缺乏帮助中国发展空军的意愿，对于中国提出的申请，尽量降低批准的数字。一旦批准后又随意缩减，改拨他国，延误运输，甚至干脆全盘取消。英文史书对美方这些缺失和背信尽量淡化，而把焦点放在批评中国空军建设构思的不切实际。美方明确的结论是，错误都在中方。

其四，中国从1939年对美国飞机产生希望以来，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所得微薄。直到1941年11～12月，才取得不足100架驱逐机交给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使用，全部投入缅甸保卫战。而整个中国广大的地面战场，在珍珠港事件前没有美国飞机的踪影。比起苏联空军1938～1939年的贡献，两者相差极大。

五 派遣军事代表团赴华

太平洋战争前中美军事关系还有一个发展需要予以关注，那就是美国军事代表团（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简称AMMISCA）的派遣。它不但和租借法案有关，也和宋子文的外交作风有关，因此需要进一步说明。

（一）美国决定派遣军事代表团

由于中美双方对于租借法案的重点和运作程序这么早就产生了根本性歧见，因此两国同时意识到必须尽早达成协议。宋子文与美国陆军和海军幕僚几经谈判之后，后者很快就向罗斯福建议，应该尽快派遣军事代表团去中国，对中国陆军的需要进行实地考察，并向罗斯福提出报告。1941年7月底，美国陆军和海军决定代表团访问中国，由马格鲁德将军担任团长，而马格鲁德本人之前也曾经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任职武官。

从美国军方观点来看，它很愿意派送一个代表团赴华。部分原因是它对把武器从美国本土送往中国费时过长而感到不满，更何况一旦武器抵达中国，它无法知道它们究竟被分配到哪些作战单位和使用的效果究竟如何。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和战争部对于现行租借法案作业程序也深感不满。在原有情况下，这些物资的申请等问题是由居里和宋子文共同协商，这当然让军方感到有被喧宾夺主之嫌，而且在执行上不断产生摩擦。军方惯用的手法就是不作为，让白宫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共识不了了之。但是军方还是希望通过成立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就可以让马歇尔名正言顺地建立军方权威，完全掌控援华物资的申请和批准手续。[110]

中方史料显示，宋子文很可能在得到政府授权之前，就独自开始与美国军方商谈派遣代表团赴华事宜，因为当蒋介石首次听到有关这个代表团的消息时，他的反应并不积极。[111]反而是宋子文认为派遣代表团象征着中美军事合作上的重大突破，因此极力推动。宋子文告诉蒋介石称，这些美国军官可以作为蒋在军事各方面的顾问，其功能就和从前德国军事顾问团一模一样。[112]换言之，它可以和30个师的训练计划相配合。8月7日，宋子文写信给罗斯福，转达蒋介石邀请美国军事代表团赴华之意，罗斯福在8月20日回复同意派遣，并且透露史汀生部长已经指示马格鲁德将军着手组团。[113]各种迹象显示，宋子文此时的专注点，是希望代表团在军事合作上能够产生实质效果，而不是愿意放弃他本人

对租借法案的影响力。

不幸的是，代表团一事不久就遭到国务院反对，因为后者没有在事先受到战争部和海军部的咨询。国务院担心代表团可能会激怒日本，因此建议取消代表团，而仅仅增加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处职员的编制，以求达到同样效果。若是换成胡适，他肯定不愿意牵入这种美国政府内部的纷争，但是宋子文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尽管他对事态的演变感到失望，但是仍旗帜鲜明地支持军方立场，甚至建议蒋介石直接求助于罗斯福，坚持必须派遣代表团赴华，即便是得罪国务院也在所不惜。[114]换言之，宋子文刚在4月冒犯了财政部，又在7月冒犯了国务院，这标志着中国政府驻美官员的行为已经和胡适、陈光甫时代大不相同，更敢于伸张中国自己的观点。

更有进者，宋子文在代表团酝酿过程中参与美国政府内部行政和人事纠葛的程度变得更深，因为代表团的概念来源很可能是美国政军两个部门争风吃醋的产品。根据陈纳德所得的情报，它最初的构想来自一位名为梅耶（Mayer）的陆军上校，其动机是不满海军少校麦修在中国事务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与居里所发展出来的亲密关系。梅耶上校因此向战争部建议应该建立自己的渠道去控制租借法案物资，以免落入局外人之手。事实上，居里自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活跃分子，又替罗斯福处理军购和军援事务后，很快就招致职业军人的不满。这就难怪居里从中国访问回国后所提出的建议被战争部讽嘲为“文人之见”，无足重视。所以一旦有人提出代表团建议（或者甚至是战争部授意），战争部立即积极响应，以期把军购军援主动权从居里手中夺回。而最终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的马格鲁德准将，则既是梅耶上校的朋友又是麦修少校的连襟，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115]

在这整个充满权力斗争的复杂诡异局面里，宋子文的处境当然也随之复杂化。一方面他展望美国对华武器输送会因为代表团之成立而大幅增加；另外一方面居里在白宫的能量和善意必须维持，但是又因为战争部和居里之间的关系僵硬，宋子文必须小心从事，不可开罪任何一方。正如宋子文向陈纳德所说的一样，他完全了解战争部和居里之间的相互仇视，又深知代表团在战争部的高度影响力，因此建议陈纳德尽量与双方合作，“我们不关心也不参与他们之间的内部政治”，同时要求陈纳德转告宋美龄也必须小心从事为要。[116]这些都是胡适、陈光甫小心翼翼避开的地雷阵，而宋子文则必须在地雷阵内一步一步地避开触发地雷的引信，但是又谈何容易？中国政府驻美官员的角色的确产生了巨大变化。

1941年8月26日，美国政府终于宣布将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赴华，由马格鲁德任团长。10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首度接见马格鲁德。虽然蒋介石此时心中仍有疑问，不知代表团将能提供何种援助，但是美国政府的决定总算是给了中国多一重保证，那就是美国为了促进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已经不顾日本的反应如何了。[117]

事实上，自代表团开始筹备之际，它的性质和职权就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混淆。考其缘由就是两国缺乏充足沟通，各有各的想法和解读。在现有中美双方档案中，找不到足够的资料证实双方在事先有过磋商和说明。而美国军方虽然是派遣单位，也没有向中方充分说明该代表团的性质和职权。大概军方领袖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内部的事务，派遣本身又是对中方的施舍，因此无须向中方多费口舌。这就让中方只能陷于猜测臆度。

宋子文在9月4日致电蒋介石，报告美国军事代表团将分三批在9月16、26、30日抵达中国，其中25名军官和14名士官将常驻重庆，其他成员则会派往各地。[118]但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仍然以为中方可以用合同方式雇用代表团成员。显然他以为中国和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关系，可以采用此前中国和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模式，用契约聘请方式处理，然后代表团协助中方推行它的军事计划。为此宋子文不得不赶紧澄清，美国顾问团乃是由罗斯福派遣，由战争部付费的，其功能是执行有关租借法案和其他贷款的职责，所以建议蒋介石暂时观察代表团执行任务的成效，稍后再决定是否由中国政府聘用其为顾问团。[119]

几天之后，宋子文再度致电澄清称，罗斯福在派遣军事代表团时，曾经向国会报告，该团的任务是“视察贷借案运用情形”和“备中国咨询”，性质大致和美国派遣到英国的代表团一致。但是宋子文的电文中又加了一句意思含混的话：该团在华工作“当然应受钧座之指挥”，并且说江杓会随团到重庆向蒋介石做详尽的报告。[120]至于江杓向蒋介石当面报告的内容如何，则笔者尚无法找到有关史料。

然而就在这个关头，宋子文似乎也有把美国代表团看成德国顾问团的趋势。9月18日，他向蒋介石提出一个长篇建议，主旨是：①中方需要整编和训练30个陆军师（30万～40万名士兵）；②详列这个整编计划所需的武器配备；③说明整编完成后，中国军队将发动何种攻势，俾使中国军队可以单独抗战驱除侵略的日军。宋子文强调，此项计划务必“规划周详，切实可行”。在中方写好此项计划书之后，应该立即邀请马格鲁德参与实现，并由宋子文在华盛顿向美国政府提出配套的武器装备申请。并且宋子文要求蒋介石指派两位高阶军官到美国协助推行此项计划。[121]由于宋氏本非军事专家，历来对于军队、武器都甚少发表个人的“创见”，尤其在蒋介石面前更不敢夸夸而言。因此他电文中所提的这些建议，最可能的是他们之间此前已经讨论过多次的对美工作腹案。而此时宋子文只是提醒蒋介石，付诸实行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用不了多久，蒋介石将会发现，代表团根本无权也无意触碰如此庞大的问题。

（二）代表团的成就

然则，代表团究竟为中国抗战做了何种贡献？答案或许可以分为三

部分：顾问参谋业务，“备中国咨询”；缅甸路运输改进；增加租借法案施行效率。

（1）顾问参谋业务

从马格鲁德到达重庆开始，就上演了一场悲喜剧。就中方而言，由于宋子文认为美国军事顾问团是一个重要的外交里程碑，必须加以高度重视，因此决定指定中国陆军驻美国的最高将领江杓少将亲自陪同到重庆。[122]宋子文同时又请求蒋介石委派黄仁霖负责接待代表团的大小事宜，[123]以示隆重。

代表团自10月9日抵达重庆始，蒋介石就对它给予高度关注。他和马格鲁德进行多次长时间深度谈话，把他对于中国军务、抗战、日军动向和国际局势的看法向马格鲁德详细提出。[124]这和蒋介石此前对德国军事顾问的推心置腹如出一辙，只是更为真切，因为美国武器更为重要。

但是中方所不知的是，马格鲁德根本没有资格和中方进行此类讨论。

马格鲁德最初得到战争部的授权，可以与中国政府商谈的范围只限于训练和后勤，绝不可涉及实质性政策问题。但是他心中盘算，假如他不向中方透露这个底细，则中国政府还会误以为他的地位重要而对他益发尊重。蒋介石天真地不断和马格鲁德商谈政策性事务，除了想聆听他的高见之外，还想获得他的大力鼎助。[125]面对蒋介石“天真的”重视，马格鲁德只能装模作样，将计就计。

更糟糕的是，马格鲁德上任才不过一个月，他在美国战争部内的地位和影响力就迅速下降。马歇尔在公开场合不假辞色地指出他的缺点。战争部随之把马格鲁德踢出有关中美两国间军事事务的信息网，不让他知情。而到了11月15日，战争部参谋总长助理格罗（L.T.Gerow）准将更命令马格鲁德不可再与中国官方讨论政策性事务。此后，马格鲁德向战争部送呈的报告也逐渐不受重视。[126]但是对于这一切，中方完全被蒙在鼓里，难怪中方30个师整编计划完全无法得到美方响应。

（2）改善缅甸路运输效率

前文多处提及，远在马格鲁德代表团抵华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试图改善缅甸路效率及运输量。虽然它在缅甸境内获得英国政府批准设立若干行政机构，但是由于主权和地方行政权均在英国殖民官员手中，因此必须看英国人脸色行事。其中最让中国人气愤的是，中国物资，包括美国租借法案援助物资在内，凡是借道缅甸者都要向当地殖民地政府缴付进口税（仰光）或过境税，税率为1%。殖民地政府把中国看成商业货品进口商，因此视课税为当然。而在中国人看来，这等于是“变相封锁”，完全是一种乘人之危的压榨。[127]几经交涉，英国才宣布1941年9月3日之后取消该税，但是仍旧装模作样地通知

中国政府，称英国政府此后将会自己以相等金额补偿缅甸地方政府。因为此项改革系由英国驻新加坡官员库珀（Cooper）所倡议，所以宋子文还特别建议蒋介石应该亲自致函库珀道谢。[128]

除课税外，英国和缅甸官员还进行各种敲诈和欺压，比如限制中国对缅甸铁路（仰光到腊戌）的使用量。当美军事代表团最初开始在缅甸执行任务时，在缅甸北部公路上的运输车辆拥挤不堪。由于仰光是所有美国租借法案援华物资的必经之地，因此造成仓库严重短缺，起重机及其他卸货器械经常发生故障，加上后勤管理混乱，使大量物资堆积露天，遭受风吹雨打并大量失窃。而英缅政府也故意限制或刁难中国租用仓库，其目的就是尽量拖延中国物资滞留在缅甸的时间，为当地政府制造机会，把中国物资据为己用。至于其他形式的压榨、贪污、扣留、中饱、盗窃、走私和行政无能，都增加了缅甸政府把中国物资当成肥肉的机会。[129]

中国政府驻缅甸的官员也存在诸多问题。国民政府在抗战前从未曾处理过如此大量的运输工作，无论是道路路面及交通工具（卡车）的维修、调配、保养，或是厂房仓库的安全措施，其规模之大和分工之复杂远非一个以农立国的政府所曾经见识过的，许多官员可能从未到过中国沿海的大城市见过现代化的场面，更不必说他们必须摸索和承受在英国人鼻息下运作的艰苦。除了不熟悉业务之外，部分中国官员的贪污、中饱、偷窃、走私等行为与英缅官员也不相上下。这些缺失重庆政府十分忧虑。

早在1941年春，蒋介石就指示宋子文尽快敦促美国政府派遣交通专家来华协助。[130]不久，宋子文从哈里·霍普金斯处得知，有一位交通运输专家，名为丹尼尔·安斯坦（Daniel G. Arnstein）。宋子文立即与之联络，不到两周便成功地聘请到丹尼尔·安斯坦等3位美籍运输专家赴重庆，并且叮嘱贝淞荪予以高规格接待，安排其与蒋介石见面，[131]行动极为迅速。

经过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丹尼尔·安斯坦等人在8月初完成对滇缅路的视察回到重庆。他们提出了一个16页的报告，并直接向蒋介石做了5个小时的口头报告，详细诉说他们对中方人员在缅甸主持运输工作的各种缺失的严厉批评和改进方案。蒋介石除了对他们的批评极力赞赏之外，甚至即席邀请丹尼尔·安斯坦组织一个民间公司去接管缅甸路运输，推行他的改革方案，并且建议该公司可以向每辆通过的卡车收取管理费作为管理报酬，[132]但丹尼尔·安斯坦婉拒了蒋的邀请。此时中国仍然高度乐观地指望美国将给予9亿美元的租借法案物资，因此急于改善缅甸的运输通畅率，以免美国政府以缅甸运输为借口而减少对华援助。为此，宋子文催促蒋介石务必亲自关心缅甸运输问题，并且指派专人去提高运输效能。[133]9月初，宋子文又得知美国财政专家杨格（Arthur Young）熟知缅甸路情况，当时正在重庆，因此敦请蒋介石与之详谈，甚至建议蒋介石向杨格索取他关于缅甸路的调查报告，将之翻译成中文后仔细阅读。[134]

就在这个关节点上，美国军事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已经抵达缅甸并且开始积极工作，而其中最认真的成员是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上尉，他在丹尼尔·安斯坦调查的基础上，采取了许多立竿见影的措施，在公路管理和运输器材维修等众多事务上做出相当成绩。[135]宋子文在得知詹姆斯·威尔逊的工作成绩后，立即予以高度重视，并建议蒋介石去咨询马格鲁德，是否有可能帮助詹姆斯·威尔逊尽快从美国陆军办理退休手续，然后由中国政府委派其专责治理缅甸路。[136]由此可见，中国本身由于其落后的农村社会背景，许多官员缺乏管理和调配成百上千辆运输工具（汽车、轮船、火车）的能力，因此非常愿意邀请美国专家协助，甚至授权主持，可惜均未能实现。

当马格鲁德本人也逐渐深入了解租借法案物资在缅甸路上所遭遇到的困难并向战争部呈报时，战争部却在10月发出指令，不许其介入当地事务。[137]从大局来看，中国政府在缅甸最缺乏影响力，凡事只能仰仗英国殖民政府鼻息；美国最有影响力，因为英国在欧洲战场的补给高度依靠美国租借法案。但是美国战争部在缅甸却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禁止马格鲁德主动排解困难，反而津津乐道地数说中国在缅甸的无效和无能。这不禁让人想起宋子文此前对蒋介石的警告，那就是美国很可能利用租借法案物资无法顺利通过缅甸境内作为借口，振振有词地减少美国的援助，同时还可以把责任全盘归于中方。果然如此的话，则宋子文还真是对美国军方领导人的心态有了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总的来说，代表团对于履行其第二个任务即改进缅甸路运输还是认真的，投入了几位有能力的干部，制定出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方案。可惜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他们的方案并没有产生显著效果，一方面固然是时间不足，另一方面也是战争部明确指令马格鲁德不可在缅甸介入太深。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虽然史迪威有全权指挥美军，但是他对于詹姆斯·威尔逊等人的建议完全没有兴趣。[138]

（3）增加租借法案施行效率

中国政府对代表团最大的期望就是协助争取更多的租借法案物资，以及增加它的兑现率。这也是蒋介石多次和马格鲁德谈话的用意。而马格鲁德也认为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获得更多的美国军事援助，并且提高其使用效率。[139]

从一开始陈纳德就探知，战争部成立军事代表团的目的是排挤居里，希望把租借法案的控制权拿过来，而不是为了增加援华物资的数量。因此陈纳德还向宋子文请教，遇到这种微妙人际关系，应该如何处理。[140]有意思的是，陈纳德是一位美国人，居然需要就教于宋子文如何去应付其他的美国同袍和同侪，也可见他个性的单纯耿直。

尽管有这些顾虑，陈纳德还是决定向马格鲁德直话直说。他不假辞色地向马格鲁德抱怨，美国在援华时的缺点是经常在小钱小事上斤斤计较，乃至忘了大局，反而造成更大浪费，诚可谓得不偿失。换言之，他希望马格鲁德能够帮助中国得到更多美援飞机、零件和人员。[141]但是

当马格鲁德向战争部转达陈纳德的请求并且建议战争部给予最高优先考虑时，战争部却不顾罗斯福曾经亲自下达的命令，对马格鲁德不予理睬。在有关飞机援华方面，最大的阻力来自亨利·阿诺德（Henry H.Arnold）将军，他认为自己的责任只是加强美国空军，而且认为陈纳德是个神经病（“a crackpot”），[142]不值一顾。

至于陆军武器方面，马格鲁德初到中国时也曾经想扮演一个积极角色。宋子文在10月底就通过“不正规手段”取得马格鲁德一份呈报给战争部部长的“秘密报告”，它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马格鲁德和战争部的关系，以及他想要达到的目的。这份报告和本节讨论问题相关之处，有几个重点值得读者注意。

首先，马格鲁德是想要替中国争取一些武器。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军队必须有大炮才能实行反攻。即使为了维持作战，也非常需要兵工厂原料、枪支弹药、机关枪、火炮、反坦克炮和榴弹炮。马格鲁德的武器清单和中国政府的清单基本相同，都是步兵作战所需的基本武器。但是这个清单很可能会引起战争部上司的不快，因为这正是他们所不愿向中国提供的。

其次，马格鲁德也急于想把租借法案援助的大权抓到自己手中，因此他向战争部部长建议：“以后供给中国军械之质量程序等等，均请凭其（指马格鲁德本人）径电战争部核办。居里及中国驻美京机关（指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和宋子文）要求过奢，可置之不闻。”其夺权之心切，跃然纸上。反过来说，如果马格鲁德能够为中国争取到他自己所认可的武器，则中国政府很可能会欢迎他取代居里和宋子文。

其三，他建议美国政府今后在与英国及苏联发表共同声明时，可以附带提到中国，如此则既可提高中国士气，又属惠而不费。[143]

宋子文除了再三提醒蒋介石千万不可泄露这份文件已经落入中方之手外，还指出美国涉及援华的事务其实是许多派系在互相竞争，包括马格鲁德、居里和战争部内部其他意见团体，彼此不能合作。因此他建议蒋介石，凡是有关中国申请美援事项，仍旧依照过去程序行事，“盖代表团仅备咨询及从旁协助”。宋子文特别向蒋介石解释英美关系，指出虽然美国也有驻英军事代表团，但是无权过问英国对租借法案物资的申请。这个任务是由英国驻美代表直接向美方提出。换言之，按照英国模式，则美国援华物资部分也应该由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和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直接沟通，[144]无须假手马格鲁德。在此，宋子文显然是想维护他个人的影响力。

事实证明，宋子文过虑了。因为最基本的一点是战争部马歇尔将军和其他领导，一致看轻中国抗战对于美国利益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如果美方有多余资源，应该优先投入菲律宾和东南亚的英属及荷属殖民地，而不是浪掷在中国战场。[145]因此，虽然战争部为了应付罗斯福和打击居里而派遣代表团赴华，却明白告诉马格鲁德，他不但无权与中方商谈

政策，也无权掌控租借法案物资。一旦我们了解美国军方内部的这些隐情，就比较能够了解，为什么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马格鲁德就急不可待地想要游说蒋介石任命他为中美联合空军的领导。[146]因为如此一来，他才能够突破在战争部遭受轻视的困境，挟中方的任命，反过来逼迫美方承认既成事实。

综上所述，美国军事代表团的访华，固然是宋子文个人外交的另外一个里程碑，但是它除了在缅甸做出一些成绩之外，基本上对于租借法案和中美军事合作并没有做出重大贡献。

六 太平洋战争前租借法案军火援助的总检讨

回顾中国在抗战爆发后四年间的对外军事关系，经历了一些极为重要的转变和强烈对比。在德国援华时期，军事顾问团成员一律以私人身份个别受雇于中国政府，签署雇用合同。他们竭尽其能地为中国服务，谨守职业道德，受到中国将士一致赞扬。另外，德国政府则以商业方式向中国出售军火，依照国际市场价格收取费用。接下来苏联援华期间，苏联政府提供巨额贷款，其空军飞机及飞行员又大量投入中国战场。然而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提供的20个陆军师的装备和训练则从未实现，导致军火和训练的脱节。但是苏联政府从来不曾企图干涉或控制中国军队，其在华作战的军人一如德国顾问的作风，从不涉足中国内政或军政，也不居高临下地嘲弄中国人。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他们的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时好时坏，最后甚至决裂，但是德苏军人在华协助作战，表现了高度的职业风范和效率，深得中国军人的赞佩。

到了美国成为军事援助主要来源时期，截至珍珠港事件爆发，其政府在名义上慷慨相助，但在实质上并未兑现。中国政府提出的30个师装备和训练的要求，不但完全被忽视，反而被美国军方大模大样地将此据为自己的创见，进而指责中国政府不知建设军队的重要性，尚需要美国人的耐心开导，向其说明建立一支短小精干的国防军队对抗战是何等重要。

更关键的是，美国军方从开头便没有意愿提供装备，他们认为中国国内所存的军火已经足够抗日，只需重新集中进行“再分配”即可提高战斗力。中国真正缺乏的是领导人才和行政效率，而这正是美国可以充分提供的资源。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军方会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雄心勃勃地想要取得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既然它认定组建30个陆军师的创见来自美国，当然只有在美军将领的指导下才能予以实现。这对于国民政府而言，甚至对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而言，都是一个从未遇见过的挑战。[147]

其实中国政府对租借法案的设想非常简单，那就是希望美方不要把军援计划切割成为个别的武器，然后一项一项支离破碎地分割处理。中国政府希望美国能够为军援定出一个大方向和长远目标，要求美国军方在几个层次上进行宏观思考：中国政府建立30个师新军（包括训练）需要何种基本武器装备？建立60个师又需要什么？武器之间如何配套？武器类型决定之后，数量各需多少？何时应该运到？只有拟出一套通盘计划，中美两国才能依照计划进行并检查进度。[148]

不幸的是，在美国陷入太平洋战争之前，战争部根本没有兴趣对中国问题进行如此宏观而又缜密的长远思考，也可能没有足够的专业人才

和智慧去从事这项工作。尽管罗斯福认为中国作为世界抵抗侵略阵营的一分子，有权获得租借法案支持，但是军方领袖对中国的战略价值缺乏认识和兴趣，因此他们只想从单一武器着手，逐项琐碎地讨价还价，等到军方把重要物资依照它自己的优先级分配完毕后，才把最后一丁点剩余品拨交给中国以虚应故事。美方这个心态和中国政府的期望完全南辕北辙。事实上，即使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战争部同样不愿为中国战场的需求做出整体考察和筹划。而当少数美国将领不能揣摩上级的心意，居然主张以同情态度去应对中国的要求时，就只能惹得战争部领袖勃然大怒。[149]中国抗战的悲哀是，如果不是宋子文去力争，就连这一丁点援助可能也得不到。

中美两国就军援事务所产生的矛盾，虽然在1940～1941年就已经存在，但是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充分表面化。大致而言，美国军方在战时流行的说法而战后又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历史论述，是植根于1940～1941年。其要点是：美国从一开始就正确而热心地要帮助中国重整军队，提高其战斗力，以求能够更有效地抵抗日本。尤其是史迪威更是一心一意地想帮助中国，却受到中方在军事上无知的，在政治上结党营私的，以及在知识上顽固守旧的蒋介石政权的百般阻挠，因此美国纵然是竭诚帮助中国，而战时的国民政府却并不想积极抗日，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事实上，史迪威的确热衷于训练军队，也发展出一套相当有效的做法。他同时也认同以30个师为精简中国陆军的目标，并以此广为宣传。但是史迪威居然不知道或不承认30个师这个观念实际上来自1940～1941年的中国政府，把它据为自己的创见。当美国军方以讹传讹地把他誉为创始人时，史迪威依然拿出当之无愧的态度，难怪若干后世学者也津津乐道地赞许史迪威对中国整改军事的宏观气度。照常理说，史迪威曾担任美国驻华武官多年，在职责上对于德国顾问的计划和执行都应该相当熟悉。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军方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对于中国的军火需求反应冷漠，而一旦中国成为盟友时，其首先想到的具体措施就是掌握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或许最能衡量租借法案对华武器援助成果的案例，发生在1942年3～5月。当时日军开始威胁缅甸，企图彻底切断租借法案物资通往中国的必经之路，所以中国政府必须尽全力保卫缅甸。而史迪威到中国就任的第一天，就要求全权指挥中国部队。在为时两个月的战斗中，中国政府投入的兵力共约10万人，是当时国民政府统御下仅存的作战能力最强和装备最完善的部队。战斗开始后，中国政府也竭尽一切国内资源支持缅甸前线军队。当时外界普遍认为，这必然是一支接受大量美军装备的劲旅，而美方也不予否认。

但在缅甸战败之后，当时在华盛顿任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主管军火部门的江杓，在极度气愤心情下以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名义草拟了一封给美国国会全体议员的公开信，说明美国援助的苛刻和吝啬。其中一段写道：

在缅甸战役进行中，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使用的大量武器弹药，必然是来自美国租借法案。只有少数实际处理过租借法案事务的人士才会知道，此说完全违背事实。因为除了12门75mm山炮和20门75mm野炮以及6400发炮弹之外，租借法案对于中国士兵的装备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事实上，中国士兵的装备或是来自国内生产，或是从外国购买而来。假如史迪威将军本人愿意做出诚实报告，则我们相信美国的广大民众和政府高级官员都会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一直都受到了蒙蔽而不了解真相，而从事蒙蔽者正是那些受到政府信托（执行租借法案）而又滥用职权的人士。

江将军还意犹未尽地直白道：“我们（指中国政府派到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工作的军官）来到美国已经有一年时间。我们无法再保持缄默，因为事实的真相是，自从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在过去一年来从我们的朋友——美国方面得到的帮助，还不如我们在同样时段内从我们敌人——德国方面得到的帮助。”[150]出自中国政府主持租借法案事务的最高级军火武器主管的笔下，这委实是个令人震惊的抱怨。

当然，由于江杓是陆军军火部门的负责人，他没有指出，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空军。前文所述美国战争部的冷漠处理，逼使中国政府最终不得不向英国求助转让驱逐机，而英国此时则同意将手中旧式的Curtiss P-40转让给中国，再从美国战争部获得新型的Curtiss P-40S作为补偿。就这样，英国空军乐意脱手的旧式驱逐机，终于帮助陈纳德的飞虎队得以仓促成军。

即便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10天，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仍旧在向美国空军参谋长卡尔·斯帕茨（Carl Spaatz）将军求助。它委婉指出，虽然100架Curtiss驱逐机是来自英国空军的转让而且已经运到，但是另外33架洛克希德·哈得逊和 33架道格拉斯轰炸机依然需要英国移交给中国，却全无音讯，因此恳请斯卡尔·帕茨予以协助。[151]

但是到珍珠港事件之日为止，中国依然没有直接获得美国的驱逐机，更不必说轰炸机了。中方资料显示，在第一次租借法案中国政府申请的飞机和器材中，只有7%实际抵达中国，而其中一半还是汽油。[152]而根据另外一份中方统计，美方实际运送出口到中国的租借货品总计不过1.3亿元，仅占美国全部租借预算的2‰。[153]

1.中美两国在租借法案产生歧见的隐形原因

本章前文除了叙述中美两国执行租借法案的过程之外，对于双方所遭遇的困难也试图从运作层面上提供一些解释。但是美国战争部在运作层面上还有一个不便明言，但又无所不在的隐形因素，那就是差别待遇。

美国战争部工作人员和英国数以百计的驻美工作人员之间，每日保持密切沟通。英国官员不但可以充分知悉美方决议的细节和所持理由，而且还有机会和美方进行讨论及争辩以维护其本国利益。美国战争部工作人员，自基层的尉官到中层的校官，对于他们本国的军火生产状况和本部的分配决定及日程表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以在各层次的会商中向英方透露实情，帮助后者做出及时的应对。但是战争部对中方人员却是不透露一丝风声，不进行磋商，只是把决定通知中方，然后又随时随意改变计划，取消承诺，不向中方提供任何解释，却希望中方驯服听从。这种切断沟通的作风，使得中方不但无法执行任何整训军队的长程计划，就连筹划一个特定战役或是年度作战计划，也无法肯定届时是否有足够武器弹药进行战斗。而美国军方又抓住中方这些无作为，作为它无法信任中国的口实。[154]双方关系演变成为恶性循环。

美国对中国的差别待遇，似乎有不同方式的表现。即使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罗斯福对中国的态度也表现得最为友善和平等，而军方，特别是战争部对中国的轻侮表现得最露骨。这或许正是引起罗斯福警觉的原因，所以才会三番五次地告诫下属，千万不可以用对付非洲酋长的傲慢态度去对待中国领袖。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并不能改变战争部某些领导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一个典型的案例发生在1941年11月6日，可以帮助读者体会当时的互动关系。当时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个月，宋子文致函战争部史汀生部长称，中国急迫需要几种武器。首先是3英寸高射炮，用以保护缅甸境内桥梁不致遭受日本空军炸毁而切断中国的生命线。他主动表示中国愿意接受美军已经落伍退役的高射枪炮以应急。其次是750挺0.50英寸口径的高射机关枪以保卫中国境内的飞机场。再次是13吨的坦克和75mm榴弹炮。他都恳请美方尽速拨交。6天之后，史汀生部长回复了一封冷冰冰的短信，写道：“（b）13吨轻型坦克。很遗憾没有轻型坦克可以运到中国。（c）75mm榴弹炮。我们会考虑目前在菲律宾的2.95英寸榴弹炮，稍后将会通知你。（d）3英寸高射炮。高射炮的补给（不足），让我们无法把（老旧型号的）高射炮退役。我们自己最大的需要已经超过现有的补给量。（e）50英寸口径高射机关枪。除了已经向中国承诺的285挺之外，无法增加。”蒋介石为了这些武器曾经亲自致电罗斯福求援，但是史汀生依然置之不理。尽管史汀生态度冷漠和惜言如金，但是至少还有回信，在更多情况下，中国的要求是石沉大海。

美国军方态度的形成至少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是国际大势。英国和苏联是抵抗纳粹侵略的主要战斗力，当然要予以优先重视。日本只是未来可能的次要敌国，可以迟缓对待。

第二是国力。中国无论在作战能力或是行政效率上，都无法和西欧国家相提并论，因此无法赢得美方同样的尊重。

这两个都属于客观因素，美国战争对中国的忽视和轻视应该激起中

国人自己的反思，为何国力薄弱，需要向他国求援？在国际上，施舍援助的国家趾高气扬恃“财”傲物，而受施舍的国家打躬作揖低声下气，本来就是多见不怪的现象。但是也不免激发另外一个问题：英国也是求援国，何以美国战争部不会摆出颐指气使的姿态？这就牵涉到种族认同和优越感的问题。

2.优越感的作祟

在以往处理中美关系的英文学术著作中，“种族歧视”这个尴尬因素一直被学者着意掩盖或淡化。但是无可否认，即便是在珍珠港事件前的中美关系中，美国战争部领导人的种族优越感也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因素。如前文所述，美国战争部在处理英国对租借法案的要求时会尽量满足其需求，对于英国所遭受到的战争痛苦会感同身受，使英国成为租借法案拨款和军事物资援助最大的受惠国。即使在美国无法满足英国需求时，也会以诚恳态度向英国解释原委，并请求谅解。

但是对中国而言，则不但其申请很少得到的满足，而且美国军方的态度是不接触、不解释、不容置疑和没有商量余地，中国只能吞下去。胡适对于这种待遇可以安之若素，但是宋子文却大叫大喊，甚至去多方运用关系，最后还养成“坏习惯”，直接找罗斯福喊冤叫屈。这一切当然让战争部官员大动肝火，认为他如此不守本分，有失大体，做了一些美国人心目中认为谦卑成性的东方人所不该做的举动，甚至层层上纲，指责他藐视美国的宪政体制。

如果我们把这些美国军方行为，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去检视，也许并不奇怪。因为此时的美国主流社会，仍然把黑人视为次等人种，在法律上加以歧视，即使允许他们参军报国，也不许他们和白种人在同一单位并肩作战，因为担心黑人的“愚蠢无能”作为战友会威胁白人士兵的生命安全。而华人也只不过是比黑人略胜半筹的人种，依然是全世界唯一不许移民美国的民族，排外法依然是国家法律，“Chinaman”依然是社会大众对中国人习惯性的轻蔑称呼。而美国主流的学者对种族问题感到难以启齿，所以只好避而不谈，或者在中美关系发生冲突时，无条件地接受美国军方的说辞而把全部责任推给中方。这种做法都让广大读者不能透视历史真相，对于真正了解中美关系是一层障碍，必须予以移除。

种族歧视在抗战时期的中美军事关系史上，无论是珍珠港事件之前还是之后，都起着重要而又难以量化的作用，是一个无法躲避的因素，也是在历史叙述和分析层次上必须正视和直言的一个角度。对这个因素避而不谈，只能扭曲很多历史事件的叙述。从中美关系或是国际关系长远发展而言，美国战争部领袖们有浓厚的种族歧视是他们的缺失，他们可能在无意中直接损伤到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国历史学者需要深切自我反省的课题。中国作为抗战时期遭受歧视的对象，受害程度更

深。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似乎也不可以一味以苦主身份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指责美国人患有种族歧视的缺失，更需要反躬自问，为何近代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地位竟会这般低下？

然而“种族歧视”毕竟一直是近代中美关系中的一股暗流，两国关系的顺畅和摩擦都和它有千丝万缕的牵连。特别是美国军方领导人的成长背景、心理状态和文化素养更是值得后世学者用抽丝剥茧的方式去探讨。真实的历史只有在不逃避、不躲闪、有凭有据、有话直说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持平的展示。

[1]“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n.d.（about end of 1941），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2]China Defense Supplies，Inc.，1941年5月1日。

[3]《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5月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51页。

[4]“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Defense Supplies，”CDS Papers，Box 7，Folder 8.

[5]“Coordination of liaison activities，” a report by CDS，in a memorandum written by R. W. Bonnevalle，to the CDS Board Members，May 26，1941，CDS Papers，box 1，folder 5.

[6]《借款事务总报告》（宋子文呈，日期不详），pp. 38-39，Soong Papers，Box 54，Folder 8。

[7]《江杓报告》（1941年8月25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1。有关其他的估计，参见Arthur N. 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 350。

[8]“Coordination of liaison activities，” a report by CDS，in a memorandum written by R. W. Bonnevalle，to the CDS Board Members，May 26，1941，CDS Papers，Box 1，Folder 5.

[9]Bulletin #4，“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n.d.，1941？，CDS Papers，Box 1，Folder 5；“Coordination of liaison activities，” a report by CDS，in a memorandum written by R. W. Bonnevalle，to the CDS Board Members，May 26，1941，CDS Papers，Box 1，Folder 5.

[10]“Information concerning China Defense Supplies，Inc.—not for publication，” June 1，1941，CDS Papers，Box 1，Folder 5.

[11]“Officers Representing the Several Arms and Services of the Defense Aid Requirements Committee of the War Department，”n.d.，CDS Papers，Box 1，Folder 5.

[12]“Coordination of liaison activities，” a report by CDS，in a memorandum written by R. W. Bonnevalle，to the CDS Board Members，May 26，1941，CDS Papers，Box 1，Folder 5.

[13]“Coordination of liaison activities，” a report by CDS，in a memorandum written by R. W. Bonnevalle，to the CDS Board Members，May 26，1941，CDS

Papers，Box 1，Folder 5.

[14]“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Defense Supplies，” CDS Papers，Box 7，Folder 8.

[15]Letter from D.M. Corcoran，president of CD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27，1941，CDS Papers，Box 43，Folder 14.拉西曼是一位有争议性的人物，他原本是以短期商务事由获得美国入境签证，但是由于行为嚣张，招致国务院不满并且一度打算驱逐出境。即使参加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工作后，国务院也不承认他是中国政府官员，拒绝授予外交人员身份。为了拉氏居留权，宋子文还曾经请求蒲立德帮忙。Soong letter to Bullitt，October 23，1940，Soong Papers，Box 1，Folder 13；William S. Youngman，Jr. memo to Rajchman，July 16，1942，CDS Papers，Box 8，Folder 26。

[16]Undated minutes of a CDS meeting，probably in May 1941，CDS Papers，Box 6，Folder 7.

[17]“Coordination of liaison activities，” a report by CDS，in a memorandum written by R. W. Bonnevalle，to the CDS Board Members，May 26，1941，CDS Papers，Box 1，Folder 5.

[18]“Coordination of liaison activities，” a report by CDS，in a memorandum written by R. W. Bonnevalle，to the CDS Board Members，May 26，1941，CDS Papers，Box 1，Folder 5.

[19]“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Defense Supplies，”CDS Papers，Box 7，Folder 8；“Coordination of liaison activities，” a report by CDS，in a memorandum written by R. W. Bonnevalle，to the CDS Board Members，May 26，1941，CDS Papers，Box 1，Folder 5；《借款事务总报告》（宋子文呈，日期不详），pp. 7-13，Soong Papers，Box 54，Folder 7；“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Defense Supplies，” n.d.，but probably prepared around May 1942，pp.11-16，CDS Papers，Box 7，Folder 8。

[20]《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8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10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21]“Coordination of liaison activities，” a report by CDS，in a memorandum written by R. W. Bonnevalle，to the CDS Board Members，may 26，1941，CDS Papers，Box 1，Folder 5.

[22]《蒋介石致宋子文电及宋子文回电》（1941年1月10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4。

[23]《宋子文致朱世明电》（1941年3月18日），Soong Papers，Box 41，Folder 1。

[24]Minutes of meeting in Dr. T. V. Soong's office at 6 P.M.，May 6，1941，CDS Papers，Box 6，Folder 7.

[25]Soong memo.to CDS internal staff，n.d.，CDS Papers，Box 1，Folder 5。

[26]《借款事务总报告》（宋子文呈，日期不详），pp.13-14，Soong Papers，Box 54，Folder 7。

[27]“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n.d.，about end of 1941，p. 5，

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28]Barbara W. Tuck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New York：Macmillian Co.，1971）.

[29]参见"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n.d. ，about end of 1941，p. 2，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30]"30 Division Plan，" WD Radio No. 75，August 29，1942，Stilwell Papers，Box 9，File 99；Radiogram from AMMDEL NEW DELHI to AMMISCA CHUNGKING，September 9，1942，Stilwell Papers，Box 15，Folder 176.

[31]《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10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32]这些武器的细节包括：1万挺7.9mm轻机枪及3亿发子弹；120门75mm山炮，每门炮配置3000发炮弹；120门高射机关炮，每门炮配置3000发炮弹。《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2月27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3；《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1月14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3。

[33]《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3月30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6。

[34]"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Defense Supplies，"CDS Papers，Box 7，Folder 8.

[35]《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5月24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9；"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Defense Supplies，" n.d.，May 1942？，p. 27，CDS Papers，Box 7，Folder 8。

[36]《蒋介石日记》，1941年5月26日。

[37]"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Defense Supplies，"n.d.，May 1942？，p. 27，CDS Papers，Box 7，Folder 8.

[38]"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n.d.，约1941年末，CDS Papers，Box 40，Folder 5.由中国政府内部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之间的电文来往，以及中国向美国战争部提供的武器清单中可以看出，中国最需要美国提供的共有16种武器，它们是：105mm howitzer；155mm howitzer；75mm howitzers；40mm Bofors a.a. guns；37mm a.a. guns；Bren light machine guns；anti-tank rifles；.45 sub-machine guns；.38 revolvers；.32 revolvers；.30 machine guns；Cartridges for bren guns；Cartridges for sub-machine guns；Artillery ammunition，bombs；Spot items；3.7in a.a.guns and ammo。"List of Commitments before December 31，1941 taken from the War Department original Photostat copy at the meeting on August 15，1941，attended by Dr. Soong，Colonel Taylor，Colonel MacMorland，etc.，"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1。

[39]"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n.d.，约1941年末，p. 2，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40]Memorandum on Ordnance，n.d. but probably written in late 1941，CDS Papers，Box 14，Folder 15；"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Program，"n.d.，约1941年末，p. 1，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41]"Chinese Ordnance Requirements Summary，" n.d.，约1941年末或1942年

初，CDS papers，Box 8，Folder 12。

[42]“List of Commitments before December 31，1941 taken from the War Department original Photostat copy at the meeting on August 15，1941，attended by Dr. Soong，Colonel Taylor，Colonel MacMorland，etc.，”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1.

[43]Soong Memorandum to FDR，October 24，1941，CDS Papers，Box 15，Folder 2.在此项备忘录中宋子文还提到飞机部分。他告诉罗斯福：①中方要求驱逐机350架，实际交货仅100架（Curtiss P-40s），美方决定拨交269架，承诺在1941年底前交货83架，中方希望立即得到186架；②中方要求轰炸机150架，实际交货为0架，美方决定拨交66架，承诺在1941年底前交货24架，而中方希望立即得到125架。

[44]《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0月31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3。

[45]“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n.d.（about end of 1941），p. 5，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46]“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Program，” n.d.，约1941年末，p. 4，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47]“Most of the important items required by the Chinese have either not been delivered or have been delivered in such small qnaitities as to be virtually useless.”参见“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n.d. ，约1941年末，p. 2，CDS Papers，Box 40，Folder 5。依照另外一个换算法，中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从美国获得的全部武器弹药大约是700万美元；或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租借法案拨款的总数为164000000美元，而中国所得只是745万美元，约为总数的4.5%而已。参见“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n.d.，约1941年末，p. 5，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48]“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Program，” n.d.，约1941年末，p. 2，CDS Papers，Box 40，Folder 5；“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n.d.，约1941年末，p. 2，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49]《借款事务总报告》（宋子文呈，日期不详），pp. 1-7，Soong Papers，Box 54，Folder 7。

[50]Letter from Arthus B. Purvis to Soong，May 15，1941，CDS Papers，Box 35，Folder 1.

[51]《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3月3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45～446页。

[52]“Office Personnel as of June 10，1941，” Soong Papers，Box 11，Folder 4.所谓中国籍领导人包括宋子文、施肇基和朱世明、沈德燮、江杓三位将军，6、7位校级军官，以及几位文职人员。

[53]Letter from Lawrence Morris，CDS to Liu Chieh，counsellor of the Chinese Embassy，August 6，1941，CDS Papers，Box 13，Folder 4.

[54]《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3月3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45～446页。

[55]《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4月15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

册，第447~448页。

[56]“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Defense Supplies，” n.d.，约1942年5月，pp.17-18，CDS Papers，Box 7，Folder 8。

[57]“Coordination of liaison activities，” a report by CDS，in a memorandum written by R. W. Bonnevalle，to the CDS Board Members，May 26，1941，CDS Papers，Box 1，Folder 5.

[58]Charles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D. 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3），pp. 14-17.

[59]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p. 43-44；William G. Grieve，*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1941-1942（Jefferson，N.C.，McFarland ＆ Company，2014），p. 25.

[60]“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n.d.，约1941年末，p. 2，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61]“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n.d.，约1941年末，p. 3，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62]“A Report To Members of United States Congress On Lend-Lease To China，” prepared by Major General P. Kiang，CDS，dated May 13，1942，pp. 1-4，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63]“A Report to Members of the United State Congress on Lend-Lease to China，” prepared by major general P. Kiang，chairman ，Ordnance Department，CDS，May 13，1942.p. 7，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64]“Chinese Ordnance Requirements Summary，” n.d.，约1941年末或1942年初，CDS Papers，Box 8，Folder 12。

[65]《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4月19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7。

[66]《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9月8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2。

[67]“Chinese Ordnance Requirements Summary，” n.d.，约1941年末或1942年初，CDS Papers，Box 8，Folder 12。

[68]Memorandum from H. Wang to Soong “Re：7.92 mm Rifle cartridges，”October，13，1941，CDS Papers，Box 21，Folder 1；“Status of Chinese Ordnance Requirements and Deliveries，” dated March 23，1942，CDS Papers，Box 50，Folder 3。

[69]Memorandum from CDS to Currie，“Status of Arsenal Material Problem for China，” April 1，1942，CDS Papers，Box 50，Folder 2；Memorandum on Materials for Chinese Arsenals，from General P. Kiang to Corcoran，August 5，1941，CDS Papers，Box 21，Folder 8.

[70]Memorandum on Ordnance，n.d.，约1941年末，pp. 2-3，CDS Papers，Box 14，Folder 15。

[71]“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n.d.，约1941年末，p. 5，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72]证诸美国军方1942年初处理熊式辉和中国军事代表团一事，就可知这种对待中国的事例并不少见。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第2章。

[73]《罗斯福致蒋介石电》（1941年5月3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621页。

[74]《蒋介石日记》，1941年10月27日。

[75]《宋子文致郭泰祺电》[1940年10月，日期不详（15日？）]，Soong Papers，Box 41，Folder 1。

[76]《蒋介石日记》，1941年1月9日、2月20日。

[77]《蒋介石日记》，1941年2月24日。

[78]《蒋介石日记》，1941年2月20日、8月7日。

[79]《蒋介石日记》，1941年5月13日。

[80]《蒋介石日记》，1941年5月27日，7月5、22、27、31日，8月2日。

[81]《王世杰日记》，1941年5月11日。

[82]William G.Grieve，*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1941-1942，p.107.

[83]《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12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84]《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9月18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85]《光公使美日记》，1939年4月.

[86]《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0年12月13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27~429页。

[87]“Coordination of liaison activities，” a report by CDS，in a memorandum written by R. W. Bonnevalle，to the CDS Board Members，May 26，1941，CDS Papers，Box 1，Folder 5.

[88]《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6月13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9。

[89]“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Defense Supplies，”CDS Papers，Box 7，Folder 8. 具体言之，第一次租借法案申请包括：250架战斗机，其中100 架Curtiss P-40战斗机；150架轰炸机；训练机及运输机若干；每个月补充额为战斗机25%、轰炸机15%。另外还有相关的武器弹药（机枪、炸弹），照相仪器，探照灯，无线电通信设备，防空高射机关枪炮。

[90]“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Defense Supplies，” n.d.，约1942年5月，pp. 27，28 pages，CDS Papers，Box 7，Folder 8。

[91]《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7月12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92]《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7月1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0。

[93]“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n.d.，约1941年末，p. 7，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94]“Minimum Chinese Aviation Requirements，” a document listing a desired operating force for the CAF，in “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n.d.，约1941年末，p.10，CDS Papers，Box 40，Folder 5。在此附带一提的是，类似“minimum requirements”的字眼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已经在中美来往文件中被双方普遍使用。但是1942年6月史迪威却大张旗鼓地把它升级为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的最后通牒，而后世学者也随之大做文章，诚为可叹。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第3章。

[95]Untitled and undated memorandum，possibly written in late 1940 after Russia's defeat in Europe but before Pearl Harbor，CDS Papers，Box 43，Folder 5；《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0月20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96]《宋子文致钱昌照电》（1940年9月3日），Soong Papers，Box 45，Folder 3。苏联政府的答复是“不方便”。

[97]《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0月6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98]《外交部来电》（1940年8月7日），Soong Papers，Box 39，Folder 29；《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8月15日、10月27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99]《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7月1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0。

[100]《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6月13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9。

[101]《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6月13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9。

[10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9月18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2。

[103]《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7月2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0。

[104]《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2月23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3。

[105]Chennault memorandum to Mme. Chiang Kai-shek，September 1，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1，Folder 13.

[106]驱逐机“1000架”似是笔误，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已经惯用350架为申请基础。所有数字来源见“List of Commitments before December 31，1941 taken from the War Department original Photostat copy at the meeting on August 15，1941，attended by Dr. Soong，Colonel Taylor，Colonel MacMorland，etc，” in 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1。

[107]《宋子文致周至柔电》（1941年5月27日），Soong Papers，Box 41，Folder 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6月6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9。

[108]《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6月5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9。

[109]"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n.d.，约1941年末，pp. 8-9，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110]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 57.

[111]《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7月2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61～462页。

[11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7月2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59～460页。

[113]Soong letter to FDR，August 7，1941，FDR letter to Soong，August 20，1941，CDS Papers，Box 43，Folder 5.

[114]《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7月2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460～461页。

[115]Chennault letter to Madame Chiang Kai-shek，October 28，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1，Folder 13；《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7月23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0。

[116]原文是："We are not concerned with and should not be involved in their domestic politics. Feel you should pass this advice to Mme. Chiang Kai-shek."R. C. Chen，Representative of China Defense Supplies，Inc. cable to Chennault，on behalf of Chairman，Dr. T. V. Soong from Washington，October 25，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2，Folder 9。

[117]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下），1941年10月27日。

[118]《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9月4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2。

[119]《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9月9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2。

[120]《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9月12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2。

[121]《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9月18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2。

[12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9月4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1。

[123]《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9月4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2。

[124]《蒋介石日记》，1941年8月19日，10月9、27、31日，11月18日；《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0月31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3。

[125]William G.Grieve，*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1941-1942，p.179.

[126]William G.Grieve，*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1941-1942，pp. 166，184，186，187.

[127]《蒋介石日记》，1941年3月17日、7月27日、8月17日。

[128]《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9月8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2。

[129]美国军事代表团初抵缅甸工作时，从腊戍到昆明的运输量每月约为15000吨。William G.Grieve，*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1941-1942，pp. 104-106，127-128.

[130]《蒋介石日记》，1941年1月11日。

[131]《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6月3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9；《宋子文致俞飞鹏电》（1941年6月16日）、《宋子文致贝淞孙电》（1941年6月16日），Soong Papers，Box41，Folder 2。

[132]William G.Grieve，*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1941-1942，pp. 89-95.

[133]《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8月8、21日），Soong Papers，Box，58，Folder 11。

[134]《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9月4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2。

[135]工作细节请参见William G.Grieve，*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1941-1942，pp. 96-99。

[136]《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9月30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2。马格鲁德个人对中国政府驻仰光办事处的批评是缺乏领导，单位之间各自为政，不敢做决定，贪污，腐败。但是对于美国在缅甸工作人员的缺失和美国战争部的不作为却不置一词。William G.Grieve，*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1941-1942，p. 108。

[137]William G.Grieve，*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1941-1942，p. 126.

[138]William G.Grieve，*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1941-1942，pp.96-99.

[139]William G.Grieve，*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1941-1942，p. 179.

[140]Chennault cable to Soong，October 22，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2，Folder 6.

[141]Chennault cable to Soong，October 22，1941，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Box 2，Folder 6.

[142]William G.Grieve，*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1941-1942，p. 162.

[143]宋子文对马格鲁德报告的反应是，报告没有包括几项主要武器，如坦克、高射机关枪、75mm和150mm榴弹炮。当然，宋子文对马格鲁德急于抓权也大为不满。《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0月27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3。

[144]《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0月27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3。

[145]William G.Grieve，*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1941-1942，p. 185.

[146]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第3章。

[147]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

[148]“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n.d.，约1941年末，p. 6，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149]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第2章。

[150]“A Report to Members of the United State Congress on Lend-Lease to China，” prepared by Major General P. Kiang，chairman，Ordnance Department，CDS，May 13，1942，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151]Letter from R. W. Bonnevalle，Secretary of CDS to General Carl Spaatz，Chief of the Air Staff，War Dept.，Novembeer 25，1941，CDS Papers，Box 13，Folder 11.

[152]“Memorandum re Chinese Lend-Lease，” n.d.，约1941年末，pp. 8-9，CDS Papers，Box 40，Folder 5。

[153]《借款事务总报告》（宋子文呈，日期不详），pp. 38-39，Soong Papers，Box 54，Folder 8。

[154]“Memorandum Re Chinese First and Second Lend-Lease Program，” February 12，1942，CDS Papers，Box 21，Folder 1.

第九章 最后的冲刺：中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中的努力

中国抗日战争在独立“苦撑”了53个月之后，国际局势突然在一夕之间山摇地动。这个“变”究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的“待变”结果，还是中国人努力不懈“求变”的成果？而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中国领袖们究竟是手足无措地听天由命，还是铆尽全力地试图去扭转乾坤？本章的目的就是运用现有的史料，对这些历来颇具争议的课题提出一些新看法。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

随着美国在1940年后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美日关系也随之成为中国政府最关切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此时的中国外交政策动向，就必须去了解中国领袖们如何去分析美日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努力去阻止这两个国家达成妥协。

（一）1941年春夏季的局势

1941年新春开始时，胡适对于未来充满乐观。他在1月10日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长篇大论的分析，检讨美国近期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他特别称赞罗斯福在耐心等待了三年半之后透露了他对侵略者的反感，而且新近赢得了总统大选才让他敢于透露充实军备的新政策。对于胡适而言，最明显的结论就是中国的“苦撑”终于得到了正面回报。[1]

但是胡适对世界大局的这种大而化之的分析，并不被其他重庆领袖认同。他们认为许多具体的偶发事件对世局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大趋势。事实证明，尽管美国的对日心态有所改变，但是它在1941年仍然不能向其他国家提供大量援助，因为它自身的军事实力仍然不足。因此，罗斯福不得不试图和日本进行谈判，希冀找到可以消弭双方冲突的方法，或是至少延迟冲突爆发的时间，以便加强自身的军备。毫无疑问，此时的日本人也在探索他们自己的方法去修补和美国的关系。

到了1941年中期，中国领袖们开始警惕有关美日和解的谣传。在夏季，当日本空军对重庆及其他重要城市恢复大规模轰炸时，中国领袖们愤怒地发现原来美国仍然在向日本输出大量汽油，供日本侵华飞机使用。[2]换言之，罗斯福政策的“变”并没有改善中国抗战的环境。

更糟糕的是到了5月底，美国国务卿赫尔居然要求胡适向重庆传递一个试探，请问中国是否愿意和平解决中日争端。赫尔亲自向胡适透露，日本政府官员曾经表示愿意终止和中国作战，并逐渐从轴心国阵营退出，条件是美国必须减少对日本施加的压力。[3]用不着说，这一切足以让中国担心，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可能将会减少。

美国于1941年7月26日冻结了日本在美资产，并禁止日本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从而打击了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正常贸易。不过这些动作也只是部分地减少了中国的担忧。到了8月初，罗斯福又宣布全面禁止石油运往日本。[4]由于美国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是以支持中国抗战为主要目的，而是表达对日本在远东地区所施行政策的不满，因此中国领袖们也

察觉到，这些摩擦将迫使美日双方都会去寻求根本解决方法，而不管结果如何都将会对中国的利益产生严重影响。证诸蒋介石这时候的心境，则他对英美的作为必定会保持高度警惕。在此可以摘录他日记中的几段话作为佐证。

他在5月写道：“美国始终想与倭寇妥协。白人皆视黄人为玩具，可痛。以美国对英之热忱，与其对华之比较，岂啻血浓于水而已。”[5]

两个月后又单挑美国作为批评对象，他写道：“美国对我之不注重，较对法国犹不如也。此血浓于水之理，白人任何政治家皆必认同乎。”[6]到了8月，更进一步写道：“近对英美行动态度，自私自利，不知我国抗战之困苦与牺牲之大，漫不在意，无论其对荷印与苏俄，则明白保证，不许倭寇侵犯，而独对我国则始终不提一语，而且所谓贷借案或合作，皆无一毫诚意，总之利用我之牺牲以谋其安全而已。思之愤慨。”[7]

至9月初，蒋介石已经想到被出卖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无须过虑，因为“无论国家与个人，如不能自信自强，而未有不为人贱视卖弄者。我本非依赖他人之武力或感情，望其为我报复牺牲，而我惟自信道义与精神为武器，以主义自强为基础，而对各国之外交，不过乃为之势，以佐其外之声援而已。彼之卖与不卖于我无与也。”[8]

而自救自立之道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提高警觉，所以说，“我之抗战自始即不存依赖外国之心，惟对各国与日本间之矛盾则充分利用而已”。[9]此后几个月美日之间关系的发展正好让蒋介石把他自己的话派上了用场。

（二）1941年秋季的警讯

到了1941年9月初，中国政府对于美日两国可能达成妥协的恐惧益形增强。此时胡适提供的情报是，他在9月5日从国务卿的谈话中得知，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最近屡次向美国政府暗中表示称，松冈洋右外长其实不能代表多数人的意愿，如果英美两国能对日本采取和缓态度，则日本也有脱离轴心国的可能性。而国务卿虽然声明这只是日本单方面的表示，但是同时又说到民主国也的确需要时间充实其军备。[10]听在中国人耳朵里，美方的潜台词是：美国政府基于自身理由将需要和日本进行妥协，或至少虚与委蛇。仅仅这个信息就足够让重庆领袖们大感恐慌了。

在几天之内，拉铁摩尔也警告中国，称助理国务卿韦尔斯和国务院某些官员历来主张对日本妥协，因此中国务必密切关注即将举行的美日双边谈判。拉铁摩尔的警告使得蒋介石赶紧向美国进言，千万不可放松

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因为中国的坚持抗战加上美国的禁运，双管齐下已经造成日军战斗力量显著衰退。[11]经济部长翁文灏也给胡适写信，请他尽一切努力阻止美日修好。[12]

在中国政府高度关切的气氛下，宋子文当然不会缺席。他在接连多日密集地向罗斯福亲信和陆海军部高层人士打听美日协商情况之后，向蒋介石提出他的结论称：一方面美国总统和人民不致牺牲中国利益，另一方面日本又不可能轻易中止对华战争。因此美日之间冲突没有签约解决之可能，美日战争最终或许无法避免。然而即使美国在根本国策上不致出卖中国，但是在短期内借口权宜之计，做出危害中国利益举动的可能性则不容忽视。美国政府内颇有一部分人士认为，既然日本天皇亲自掌握军权，则美日之间暂时尚有缓冲机会，这将使未来美日之间增加谈判空间。依照宋子文的情报，今后局势大致发展的方向是，日本承诺不对东南亚（越南、新加坡）和西伯利亚进犯，而交换条件则是美国政府解除经济制裁和恢复美日经济关系。但是对于中国问题，则双方都打算避而不谈。虽然这将对中国不利，宋氏也认为“在此间反对两国协商，恐无效果”。但是宋氏也看到美日协商前途可能充满变数，比如说，苏联在欧洲的战事挫败，或是日本军人一旦得知协商内容，可能会不顾天皇威信而坚决予以反对。[13]

这些变量都无法令中国感到安心。在整个1941年下半年，蒋介石和中国领袖们所最担心的，就是美日两国谈判最终可能导致美国牺牲中国利益。偏偏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得到的信息时常让它难以捉摸。比如说，罗斯福1941年10月31日在和宋子文的谈话中，一方面对于日本妄想恢复美日经济关系嗤之以鼻，声称中日问题未能得到圆满解决之前，就谈不到其他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透露信息称，日本政府非常急切要安排罗斯福与近卫文麿在海上会面。而罗斯福也承认，美国的拖延策略也让菲律宾的炮台和空军防务得以大幅加强。[14]

换言之，美国政府此时的策略还是要和日本维持谈判，而不是断绝谈判。但是从中国立场而言，只要美日两国持续谈判，中国的利益就可能变成交换筹码而遭到牺牲。中国驻美使馆公使刘锴就曾经指出，尽管美国努力制造的形象是它想借谈判来换取时间，让美国的军备工作做得更完善，但是实际上美国很可能打心底就想和日本达成真正妥协。[15]

在如此混乱的局面里，蒋介石只能运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向美国人表达他的忧虑，并且尽量设法阻止美国和日本达成秘密交易。他向罗斯福抱怨说，美国人从来没有认真对待中国对于日本南进政策的警告，因为美国人误以为中国的警告只不过是想要挑拨美日冲突的诡计而已。蒋介石也抱怨，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体系中的地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他个人也强烈怀疑美国国务院有些官员内心是主张向日本做出让步的。[16]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努力地试图警告美国政府美日和解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他在1941年11月25日分别致电美国战争部和国务院，强

调局势的严重性。他指出，假如美国政府放松禁运政策或是解冻日本资产，或是这类传闻在民间流传开来，则中国人民将会一致认为中国已经成了美国的牺牲品，中国的民心士气将会崩溃，全亚洲人民也将会对民主感到绝望，中国军队将会瓦解，而日本将会随心所欲地完成它征服中国的计划。中国抗战的总崩溃在全世界将会是一个大灾难。[17]

除了担心美日关系的大局之外，中国政府更具体的忧虑是西南各省的防务。在中国政府所得到的情报中，美国对日本最具体的要求，似乎着重在日本承诺不采取南进或是北进战略，但是对于中国战场则没有明确立场。而从中国立场而言，它历来指望的就是苏联和日本之间能够发生战争。美国要日本停止北进政策，对于中国而言已经是令人失望。如果美国进一步要求日本停止南进政策，则对于英国、美国和荷兰的属地固然可以换得暂时安全，但是此时中国最担心的乃是越南局势。法国在欧战中的挫败使得它完全无力抗拒日军入侵越南，而越南正是日军进攻中国西南各省最好的通道。依照重庆判断，日军攻滇既可以由越北直接指向昆明，又可以由越入桂而攻滇，而后一条路所经地形比较开阔，便利日军使用大批机械化部队作为前锋。无论如何，云南的防守都会直接影响到抗战大局，而赖以保卫滇缅路的空军是陈纳德所指挥的美国志愿飞行队。因此万一云南失守，就会立即切断中国和英美国家军火进口的唯一通道，也会使西南门户大开，改变整个抗战的军事情势并动摇民心士气。[18]正是出于这层急迫考虑，重庆政府此时特别努力希望美国能够出面，促成英国和中国达成协议，同意英国空军协助中国共同防守云南。[19]

在对付日本进攻西南省份的可能性上，中美之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在中国方面，蒋介石从1941年7月就计划派遣中央军第五军、第六军进入云南加强西南防务，但是为了缓和与龙云关系，耐心等待到11月底才终于完成中央军入滇的部署。[20]马格鲁德刚刚抵达重庆，蒋介石就立即表达了对于日本进攻云南的担忧，希望马格鲁德可以转达，他希望英美提高警觉，预做部署，并且希望美国可以让驻防菲律宾的空军协助中国和加紧对中国的飞机运送。[21]但是当几天之后宋子文与罗斯福长谈时，后者却不为所动。罗斯福表示，依美国军方判断，云南的多山地形和落后的交通设备将使进攻极为困难。即使日军动员4个师团兵力也未必可以达到目的，更不必说长久控制滇缅。当宋子文指出日军有装备和空中优势，可以仿效德军在南斯拉夫的做法时，罗斯福则称中国已经单独抗战4年，即使失去缅甸路也可以继续坚持作战一两年。很明显，云南的防守无法说动美国军方予以协助。谈话到了此时，宋子文只好改变策略，指出如果滇缅失守，则不但中国民心士气会受到极大打击，而且军队也会因为缺乏武器而无法作战，结果就是让日本可以从中国战场抽出100万士兵去实现其北上或南下的攻击计划。[22]这番深度谈话是在10月底举行，而且历时45分钟，它是否在罗斯福心目中留下任何涟漪（特别是日军北上南下的风险），以致间接地影响到美国在11月和日本谈判的心态与盘算，至今尚无史料可以帮助我们理出头绪。但是宋氏的努力却是非常明显。

回顾美国政府在9月中旬曾经正式向中国政府承诺，如果美日谈判中牵涉中国利益时，一定会事先与中国商议，而且只要日本的侵略行为一日不停止，则美国绝不会取消其对日经济制裁措施，[23]但是在11月上旬和中旬，美国政府一直绝口不向中国政府透露它和日本谈判的内容，最多只是闪烁其词、言不及要。

宋子文是在11月中旬才初次向蒋介石报告美日密谈之事，“据某要人密告此次敌使来栖三郎来美，携有根本让步条件，惟与中日事无直接关系。其内容不愿见告。并谓似非如外间臆测无成功希望，等语”。[24]依照宋子文的解读，日本似乎要以承诺不进攻西伯利亚来换取美国对于禁运的让步。而如果美国拒绝让步，则日本就可能攻击缅甸。既然如此，而美国又曾经再三强调日军没有能力进攻缅甸，则宋子文的对策就是趁机加紧向美国要求运送武器和飞机，防患于未然。综言之，宋子文首度听到美日谈判的消息时并没有特别警惕，也没有十万火急地建议蒋介石高调抗议，只是把它看成一个机会，催促美方加速向中国提供武器。

此时还有两件事帮助我们增加对美日谈判的了解。一件事是胡适选择在此时离开华盛顿去外地演讲，以致宋子文与之无法联系。[25]当然宋子文打小报告的目的是指责胡适，但是后者外出演讲也表示在他心目中这并非美日关系特别紧张的关头。

另外一件事是霍普金斯因病住院，宋子文趁机拜访并进行详谈，双方对谈的首要话题当然是美日谈判。霍氏向宋子文透露，美国海军跃跃欲试希望早日和日本开战，而陆军则认为美德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因此不愿在太平洋引起军事冲突。而日本政府也充分了解美国内部不同的观点，因此来栖使节的任务是来达成一个交易。“（霍氏）又云，日代表仅希望商谈恢复美日经济关系，以不侵犯海参崴西伯利亚为交换条件，而对中日战事不愿讨论。但美方以为，舍解决中日问题，日本无其他代价可以供献。故谈判最后预料日方必请美方调停。”换言之，依霍氏观之，日方代表如果在美日谈判中只谈西伯利亚而不愿触及中日战争问题，则日方根本没有筹码可以要求美方让步。因此霍氏推测日方必将接受谈判失败，而改为要求美国调停中日战争。既然霍氏亲口说出美方如此保护中国利益，则中国就无须过分担忧美日谈判了。

然而想不到的是，霍氏却扯出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满洲国”。霍氏推测，日本既然不能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支持，就可能改而要求美国承认“满洲国”作为一个小让步。宋子文当即响应，“文答，美如承认伪满是违背基本之既定国策。且中国如此重大牺牲，惟绝不能置三千五百万于日本奴役之下”。

换言之，当初美日谈判进入紧锣密鼓之时，霍普金斯给宋子文的信息是美国一定会保护中国的利益，因此无须担心，但是“满洲国”却是一个充满危险的问题。因为除了霍普金斯之外，宋子文也从其他美国政要处听到了许多令人不安的言辞。比如说，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就被传言曾经表示，美国可以坚持日军必须撤离中国，但是对于“满洲国”却无法采取同样立场去拒绝和日本妥协。

然而最令人不安的信息来自亨利·鲁斯（Henry Luce）。他是美国新闻界巨子，态度对中国友好，毋庸置疑。在谈到美日谈判时，他向宋子文保证，美国政府或是民意无法接受日本飞机用美国汽油去杀害中国人民。因此日本代表如果坚持美日会谈不包括中日问题，而仍然希望恢复美日经济关系正常化，则会谈注定失败。但是“满洲国”问题却是性质大不相同。换言之，美国人民可以接受日本从中国的侵占土地上全盘撤出，以交换美国承认“满洲国”，因为他们多数人认为中日两国对于满洲地区的主权伸张都各有理由。

以上这些来自美方权威人士的信息让宋子文大为紧张，立即请求蒋介石把在九一八纪念会的宣告赶紧翻译成英文，强调满洲（东三省）和中国不可分割的关系，“此时惟有不惜耗资，在此（指美国）扩大宣传，对于将来最后之和平条件，必有莫大之裨益”。[26]

综合以上宋子文在11月中旬所获得的信息，让他得到的印象是，美国政府和人民一定不会在与日本的谈判中出卖中国利益，这一点中方无须担忧。而在另外一方面，宋子文稍早也做了一个预测，那就是美日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张，因此在1941年双方不致开战。[27]如此说来，当前的谈判大概也不至于改变现状。

倒是可能从美日谈判中衍生出来的“满洲国”问题，值得中国密切关注，及早行动。这或许就让中国政府产生一些错觉又分了心，耽误了几天宝贵时光。

而在这个时段里，美方依然躲躲闪闪，一些支离片段的传言只能让中国领袖们不知如何反应。胡适自外地演讲返回华盛顿之后，虽然数度与国务卿赫尔见面，也没有获得任何确切信息。[28]

蒋介石对美日谈判的认知也颇为有趣。大致而言，他在得知来栖三郎赶往美国一事时显得并不特别操心。他相信日本使节虽然会另提妥协条件，但是只要日本不放弃统治中国之野心，则美国必定不能容忍。美国政府也一定能够清楚认识到，如果任由日本统治中国，即等于其独霸太平洋，无异驱逐美国于太平洋之外。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对时局有几个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他过分信任美国政府提供的情报，以为后者在菲律宾的防务已秘密完成十分之九。既然菲律宾作为美国在远东反制日本最大之根据地已经巩固，则美国绝无退让之必要。何况此时中国政府又接到美国海陆两部部长向中国密告（通过宋子文），宣称12月10日美方的远东备战即可全部完成，届时就可以对日本做最坚强之表示。战争部长史汀生更表示，一定会支持滇缅路的安全。根据美方的密告，日本对于这些情况尚蒙在鼓里，因此难怪蒋介石会认为日本实在不知天高地厚、愚

不可及。

第二个误解是此时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中立法，而政府又宣布从天津撤退海军陆战队和自上海撤侨。蒋介石认为美国的决心既定，则这些强硬姿态必定会压住日本的气焰迫使后者软化。这就可以解释何以当他得知罗斯福曾经和来栖见面时，并没有产生特别警惕。而在得知来栖与赫尔举行秘密谈判时，也认为“此无足为奇”。

第三个误解是蒋介石认为日本可能在短期内（估计大约在12月初）转而进攻苏联。[29]日苏开战是蒋介石梦魂所系的大事，仅仅是在此前5个月中就两度以为爆发在即。一次是在7月初，蒋介石认定日本在短期内将会攻打苏联。[30]才不过一个月，他又认为日本已经完成向苏联进攻的兵力集结，只是德军在欧洲战场与红军胶着已逾40日尚无突破，使得日军暂时按兵不动。[31]类似如此的误判，此前已经多次发生，此后还会发生多次。日苏战争的想法并不荒唐，但是屡屡事与愿违。

二 危机终于来临

在这个局势暧昧而且谣言纷起的美日谈判过程中，中国等到11月22日才得到一些确切信息。该日早晨，美国国务卿赫尔终于先召见了英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大使到国务院听取简报至下午1时，又请胡适参加散会前最后约30分钟的商谈。根据当时的记录，应该是美国先向西方三国做了充分而详尽的解说，并商讨了太平洋海上防务形势之后才邀请胡适进场，至1时35分散会。但是在此之前，他们之间交了什么“底”，胡适并不知道。胡适的到会是为了进行与中国有关的实质讨论，抑或是虚晃一招，糊弄外界误以为中方也充分参与会议，增加美方未来妥协的合法性，这只有几位美国最高领袖心里有数。

胡适入场后，在这后小半段的会谈中，五人就几个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赫尔开宗明义地指出，西方国家在远东的防务仍然单薄，因此需要争取一段时间才能得到有效的提升。而要达成此目的，就必须和日本达成妥协。问题是：做出何种让步和期望达成何种效果？

依照美国政府分析，中国当前最担心的是日本从越南进犯云南，而西方国家则恐惧日军进犯缅甸和泰国。因此美国提出一个设想：要求日本撤退在越南全境的军队，或是最多只准许留守3000人，并承诺不向其他新方向进攻，以换取美国政府同意暂时性地放松经济封锁。他征求各位大使的意见，如果这样做是否可以暂时解除中国西南地区的危急，并允许西方国家趁机增强在远东的海空军实力？

英国大使的响应比较片面，他支持美国与日本妥协，但是提醒美国经济封锁放松的程度，千万不可使日军作战能力得到增加。

胡适的响应则更为全面。

首先，他从赫尔处得到了一个澄清，那就是美国只打算要求日本不攻打云南，并不打算要求日本不攻打中国其他地区。胡适当即指出，日本既然承诺不“南进”也不“北进”，则必乘此机会全力“西进”中国，这样就会使中国成为美日妥协最大的牺牲品。

其次，关于美国放松经济封锁的限度问题。经济封锁是美国当下最有效的外交武器，施行四个月以来给日本造成了重大打击，但是仍未发挥最大效应，因此不可轻易放弃，否则只能助长日军侵略气焰。虽然赫尔立即解释说美日之间并未达成协议，因为日本的要求是美方解除冻结的资金，使其可以购买粮油等产品，而美方则希望继续维持出口管理特许之办法，但是胡适仍不安心。

最后，还有一点让胡适感到不安的是，虽然赫尔声称拟议日本从越

南全境撤军，但是胡适从其他渠道得到的信息则是，日本的原提案只是从越南南部撤退而已，换言之并不影响日军在越南北部的活动。[32]无论如何，中国政府终于从美国方面得知美日谈判的梗概，而胡适也在现场把中国政府的立场做了正确说明。

可以说，这次会议对于中国的冲击巨大无比。这个冲击可以从几方面去了解。

第一，这是美国首度正式向中国传达美日谈判内容。假如中国相信美国政府没有玩弄两面手法，对西方三国和中国各说一套的话，则虽然赫尔依然语带隐晦，但是谈判的轮廓已然凸显。

第二，胡适由于置身现场，对美国说辞的重要性可能还来不及充分掌握，但是重庆领袖们可以从容咀嚼电文中每一个字背后的含义，因此所产生的危机感更为强烈。

第三，胡适作为知识分子对于美日谈判的军事意义未必能够深切了解。但是蒋介石作为军事领袖，对于中国西南地区防务之单薄和国内其他地区的脆弱性，内心非常清楚，而其中细节既不宜让胡适知道，更不能让美国和日本知道。

第四，会议的过程是西方外交官从早晨开始已经密商数小时之后才邀请胡适入席，国务院对待东方和西方国家“亲疏有别”的态度，已经表现得极为明显。鉴于中国此时掌握美国政治情报最权威的人士是宋子文，而此项最珍贵情报的来源却是胡适，这难免让蒋介石担心，胡适是否还有其他的信息既没有看明白，又没有说透彻？

蒋介石在看到胡适报告后的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胡适终于被邀请参加中、英、澳、荷四国使节在国务院会商对日本谈话问题。胡适虽然在最后才受邀进入会场，“然此为太平洋联合对倭阵线第一次公开之形式。我国至此脱离孤立之危。然而回忆十年来之苦斗，与军民之牺牲惨烈情况，不禁栗惧系之”。

另一方面，胡适来电的内容让蒋介石11月初以来听到美日谈判时，那份气定神闲和信心满满的态度一扫而空，继之而起的不但是感到大事不妙，而且是大为光火。因为美国只商议日本撤退驻越南军队之大部，保证不南进不攻滇，而由美国放松经济封锁事，“其对中国撤兵问题毫不提及。乃可知美国仍对倭妥协而牺牲中国甚矣。国际无道义，痛愤盍极。余复电严斥美国之虚妄，尚冀其不变政策，不丝毫放松经济封锁也”。[33]读者可以看出在此关键时刻，中国政府的最高领袖和驻外使节之间对于紧急事态的认知和反应已经发生严重脱节。胡适在现场雍容有度的应对，和蒋介石的“痛愤盍极”之间真是天差地别。这将影响他们两人此后一周时间的互动和互信。

无可置疑，中国政府最感忧虑的是美国解除对日本经济制裁的可能性，及其对中国抗战可能引起后果的严重性，因此希望在美日密谈尚未

终结之前尽量多获取情报，俾向美国提出警告，同时本身尽快采取相应措施。11月24日，蒋介石致电胡适，嘱咐他务必转告赫尔："此次美日谈判，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有任何援助均属虚妄。中国亦决不能再望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亦不可复问矣。"[34]

蒋介石的反应究竟有多么强烈？外交部长郭泰祺向胡适透露："介公阅兄来电后，反感颇烈。认为美方对中国问题不图解决，仍拟对敌姑息牺牲我国。"这段话把蒋介石的心情描述得颇为准确。郭泰祺告诉胡适："吾人对任何凡足以增加我国抗战之困难，或加强敌人对我侵略之力量之办法，必坚决反对。务请转告国务卿。"[35]郭泰祺所说的"反感颇烈"的另外一部分是蒋介石对于胡适的反感，正是由于胡适没有在现场处理周全，蒋介石才需要亲自出马。

岂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24日下午4时，赫尔再度约见中、英、澳、荷四国使节报告最新进展。美方此时方才承认，日本是在11月18日提议双方着手讨论一个临时过渡办法，并且在20日提出说帖。美国政府对该说帖内容的最初反应是它违反美国基本原则，因此无法接受。但过不了几天，美国政府感到国际局势恶化速度太快，因此自己提出一个临时过渡性（a transitional period）方案交付日方代表。美国方案包含几个重点：①美日两国承诺没有疆土野心。②美日两国承诺不得从其军备区域向亚洲之东南、东北或北太平洋、南太平洋作进攻或进攻之威胁。③日本承诺撤退越南南部之军队，并不再补充，而将越南全境之军队限制在2.5万名士兵之内。④美国承诺稍微变通其冻结资产及出口贸易限制之条例。日本货物可以输美，而美国食物、棉花、医药、油类也可以输日。美国政府承诺向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政府要求采取类似办法。⑤此项临时过渡办法有效时间为三个月。

即便是身处现场的胡适也立即看出，美国方案内容对于中国产生了更不利的后果：第一，美国只是要求日本不可向东南亚、东北亚、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地区发动攻击，唯独对于中国战场刻意保持沉默，等于是给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开了绿灯。第二，美国曾经要求日本在越南驻军不可超过3000人，而现在居然允许增加到2.5万人，等于是纵容日本进犯云南。尽管美国军方宣称日军缺乏足够兵力攻打云南，但是中国无法相信美方判断的准确性和其让步的动机。至于提出三个月过渡期，则是美国军方（海陆军参谋部）认为它们需要这些时间才能加强军备。而美方也提出准备在这三个月中加速向中国运送武器，只是这个承诺完全无法得到中国政府的信任，因为只要回顾过去记录，就知道美国从来没有履行过向中国运送武器的承诺。

更令重庆领袖们担忧的一段话是胡适电文的第七条："对于中日战争，美政府之根本政策只期望中日两国将来所有任何讨论或解决方案，均需基于和平、法律、秩序、公道之基本原则。"[36]外交部长郭泰祺指出："介公对'只期望'三字尤感不满。"因为该条那么多的空洞外交辞令无

法掩饰一个赤裸裸的事实，那就是美国政府面对日本侵华现状只有“期望”，而没有行动，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方案。它只是玩了一道文字障眼法欺骗中国政府，使中国接受美国向日本提出的方案。难怪郭泰祺也致电胡适，指示后者再度向赫尔要求澄清。[37]

而胡适对整个美日密谈的大趋势也感到无能为力。他在报告结尾处写道：“以上办法，大似去年英国滇缅路停运一事。其用意为换得三个月之准备时间，其主张闻出于海陆军参谋首长、外长。此举似亦有其苦心，恐不易阻止。”[38]换言之，胡适的立场是，既然美国人如此决定，则中国也无力加以阻止。

但是蒋介石的反应则大为不同，他进入精神高度紧张状态，“为美国有放松对倭经济之意，乃汇集全神，致胡宋各电，要求美国立即宣布其不妥协态度”。[39]

如果读者回忆1940年英国滇缅路停运给中国带来的危机感，不难想象中国政府绝不致就此罢休。25日夜，赫尔又约见胡适，嘱后者转达美国对中国的诚意，三个月方案只是缓兵之计，绝不会出卖中国利益，并请求蒋介石信赖罗斯福和他本人，消除疑虑。[40]但是蒋介石此时已经无法相信这类空话。更何况，日本在华宣传工具此时已经全面开动，宣称美日达成秘密协定，重点是美国承诺不插手中日战争，换取日本承诺不南进；双方解除资金冻结，恢复商务关系。这个宣传攻势在中国立即造成了强烈震撼，全国人心惶惑，军事经济为之动摇，使得抗战有崩溃之虞。[41]

到了此时，中国政府的应对立场也逐渐明朗化，那就是，“请美政府实时宣明与日本决不妥协之态度。并声明如日在华侵略军队之撤退问题未得根本解决以前，则美对日之经济封锁与冻结资金之一贯政策决不有丝毫之放松，如此日本必能转变其威胁态度”。还需指出的是，根据中国政府判断，即便是日本不愿意改变其威胁姿态，但也绝不敢与美国开衅，其行为的极限也不过是停止交涉而已。换言之，中国政府也做出了一个严重误判，那就是日本绝不敢主动攻击美国，而珍珠港模式的攻击行为则更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国人脑海中。[42]

三 中国开始全方位处理危机

虽然以上几封来往电文都是发生在蒋介石和胡适之间，但是蒋氏绝对不会把宋子文这颗重要的外交棋子搁置不用，更何况胡适的灰色态度更增加了宋子文的重要性。因此，蒋介石在11月25日电促宋子文投入工作，“总使美政府能迅速明白表示其对日本决不妥协之态度关系重大。务请协力以赴之”。[43]而宋子文也不负蒋介石信托，在收到蒋介石电报的当天，就委托罗斯福的亲信幕僚转达蒋的立场。次日（26日）宋子文就得到罗斯福接见，前后会谈约一小时，胡适也被邀共赴白宫。宋子文从白宫辞出后立即发电报向蒋介石报告，而这封电报的内容，不但扭转了中国政府对于当时局势的判读，也彻底改变了它在此后几个关键性日子里的外交策略，因此值得仔细研读。

首先，宋子文向胡适射了一支冷箭，直指胡适向政府所提供的情报或是来源不够权威或是曲解美方意图，因此误导了政府。他写道：“适之两电，颇有美国原则已定，事在必行之意，故不能再事商量。但总统云，向来主张美方之提议，事先向各关系友邦征求同意，再向日本提出。”[44]

宋子文这段话有何含义？第一，他指出胡适的灰色结论根本缺乏事实根据，没有尽到一个外交官的职责。尤其是在关系中国国家命运这么重大的问题上，轻率做出事情无法挽救的分析，实在离谱。第二，即使胡适所报属实，也证明他没有尽到最大责任去保护国家利益，因为罗斯福所言和赫尔所言，无论是语调上、内容上，或是程序上都有重大差别。胡适没有盘根究底，就遽然向政府提出报告和判断，显然有怠职之嫌。而在宋氏电文之外，还可以看出一个新的端倪，那就是罗斯福才是政策最终决定人。即便是赫尔当初给四国使节的简报内容完全正确，也不表示那是美国政府的最后立场。因为罗斯福可以随时加以改变，中国使节在和美国交往过程中理应早就察觉到总统有否决权，他事实上也经常否决部下的决定，而这也就给中国以可乘之机。果真如此的话，则在关系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胡适不在罗斯福身上下功夫，反而俯首接受赫尔的说法而劝说重庆政府接受，实在难以理解。

说来说去，在过去几度数目有限的借款过程中，中国使节都知道去向罗斯福下功夫，何以这一次却会如此自我设限俯首接受失败？从中国立场而言，一旦打开白宫和罗斯福这扇大门，中方的外交攻势就得以展开，而且其弹性也会大幅提升。当然更可怕的解释是，如果罗斯福在说实话，则赫尔邀约使节们会商的目的，应该是先听取后者的意见然后再向日本提出。但是赫尔却罔顾罗斯福制定政策程序的事实误导使节们认为美国立场已经不可变更。

英、澳、荷三国使节可以欣然接受美国的简报，因为他们对本国的利益已经受到美国的充分保护充满信心。唯独中国利益被摒弃于局外。国务院只是用了外交辞令去鱼目混珠，实际上是把中国交给日本任由其宰割。如此看来，重庆领袖们对美日谈判的大局倒还是看得清楚的。

宋子文电文接下来展示的外交能量也使重庆政府大开眼界。在上述的白宫会面时，罗斯福显然还想辩说美日妥协旨在保护滇缅路，宋子文立即反驳道此说不通，并且表示，中国宁可因为抵抗而牺牲，也绝不能接受因为美日妥协之侮辱而崩溃。“总统无词可答，态度似露窘促。”[45]用不着说，胡适作为一个旁观者，也一定为宋子文“鲁莽”的行为羞愧得无地自容。[46]

接下来是宋子文把对胡适的批评尽情铺陈开来。重点是：其一，“适之过信国务部，以为霍尔之方案为循守美国已定之政策，不可变更。故不愿在原则上力争，仅斤斤于驻越北日军多寡之问题，舍本逐末，何济于事？”其二，“适之对于美政府权要，素少接洽。仅与英澳各使约略商谈，真相不明，几致贻误事机”。宋子文的结论是：“当此千钧一发之际，适之不能胜任，似可危虑耳。”[47]

宋子文这位外交斗士一旦行动，就铆足全力向前冲刺。就在同一天，他“极力联络各方反对妥协”，当晚他又安排了和财政部长摩根索共进晚餐，席间也引出摩根索对赫尔的不满和对妥协方案的反对。这一切当然使国务院大为光火。[48]

简言之，蒋介石在11月25日授权宋子文插手美日妥协谈判事务，让中国政府的外交出现了契机。宋子文26日电文帮助中国外交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此后数日中国政府发动的外交攻势是挽救中国命运的转折点。宋子文一夕之间把外交主动权掌握在手，还把自己的汗马功劳让重庆政府牢牢地在他的功劳簿上记上一大笔，而这也符合宋子文做人做事的风格。

读者或许不禁好奇，胡适对于这个与罗斯福会谈的报告如何处理？这不但可以看出胡宋二人对于事实叙述部分是否有出入，而且可以去探究重庆政府关于外交事务的情报到底是否足够正确到做出有效的对应之策。这一点对于了解当时中美关系极为重要。

幸运的是，胡适对于此次白宫会谈也向重庆政府提呈了一份报告。比较之下，胡宋二人报告在内容上的差异真是发人深思。

首先，胡适也叙述了罗斯福对于滇缅路安全的辩解，但是对于宋子文的反诘则只字不提。这或许出于胡适个性淳厚，不屑在同事背后说宋的坏话。但是在如此重要的外交对话场合里，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表情与语气都可能对重庆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更何况胡引的话是出自罗斯福之口？因此胡适的惜言很可能妨碍重庆政府思考下一步如何向罗斯福回应的策略，这将会是政府外交考虑上一个重大损失。胡适电文中还有另

外一句重要的话，那就是罗斯福称他的本意是欲先求得中、英、荷、澳“四国大致同意，然后与彼方开谈，此案至今未提出”。换言之，胡适既然在场而没有提出反对就可以视为默认，若不是事后蒋介石和宋子文提出反对意见的话，则美国政府就可能把妥协方案提交给日方了。罗斯福也曾向宋胡二人表达“闻蒋先生对此事颇有误会，甚感焦急，请代为解释云云”。蒋宋的反对，果然引起了美方因应。“此案至今未提出”表明胡适的“不作为”和蒋宋二人的“作为”，对事态发展完全不同的影响。

其次，胡适电报称：“总统云，外长办法只陷（限）于局部的临时救济，其中确信不能顾到全部中日战争。”罗斯福的这番招认，只是因为蒋宋的进逼才从他口中道出，若是依照胡适的处理方式行事，则中方根本拿不到这个话柄，也不能在感情和道义上让美方感到内疚（依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既然中国自己都没有为保护本国利益而发言，那美国还有什么责任？）。[49]

但是蒋介石私下的态度，在日记中做了更尽情的宣泄。他写道：“接阅美国所拟对倭放松妥协之条件，痛愤之至。何美国愚懦至此。从此可知帝国资本主义者，惟有损人利己，毫无信义可言。昔以为美国当不至此，故对美始终信仰其非英可比，今而后知世界道德之堕废，求己以外，再无可信之所谓与国友邦也。然而本来如此，乃余自痴，信人太过，何怪他人？”[50]

总的来说，中国外交领袖们处理美日妥协谈判的态度明显有了重大分歧。蒋宋二人立场大致相同，但是驻美大使胡适和外交部长郭泰祺则各有不同。概略言之，胡适认为美国的权宜之计合情合理，出于务实，中国只能配合，最多在枝节上略做修正（日本在越南驻军数量）。郭泰祺却忠实地传达蒋介石的意旨，要求胡适做出更多的努力。而他自己对美国方案的态度更靠近胡适，认为赫尔的过渡办法在实际上“并无大害”，但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因此胡适应该加倍努力去改变美国态度。[51]郭泰祺的这种分析让宋子文感到担心，立即致电蒋介石指出郭泰祺“对美日谈判态度似不如钧座坚决”，希望蒋就近监督郭泰祺以后和美方人员谈话时，切“不可与钧意稍有出入”。[52]

大致说来，到了11月27日，宋子文（及胡适）再度与罗斯福会谈之后，中国政府的理解是：美方尚未提出临时过渡办法；美方在没有得到四国同意之前，将不会和日本开始正式谈判；如果日本遽行向南方增兵则谈判即可决裂，而战争或将不可避免。[53]

精力充沛而又消息灵通的宋子文，在28日又向蒋介石提供了一大堆重要情报。其最重要者有以下几项。

第一，从美方运作的日程表而言，美政府的过渡办法原本是依照罗斯福的构想在11月24日拟定。但是日本政府代表表示需在26日前达成协议，后来又延期到29日。因此前后最关键时刻不过四五天而已。

第二，赫尔本来是想拖延时间，但是国务院内部以远东司司长麦克斯韦尔·汉密尔顿（Maxwell M. Hamilton）为首的缓和派急于与日本妥协，牺牲中国利益也在所不惜，向赫尔施加压力，使其不得不顺从缓和派主张。

第三，若非中国政府从25日起开始表达反对，又向各方人士表达坚决立场，则过渡办法可能在25、26日会交给日方。

第四，美国政界有力人士在得知中国的反对意见之后，也分别向罗斯福进言。但是罗斯福仍欲再次试探，并在26日下午再度召见胡适与宋子文。试探失败之后，罗斯福就指示赫尔放弃过渡办法。

日本使节原本对于过渡办法之商定持高度乐观态度，最后终于失望离美。[54]

这一切改变，中国方面自认是蒋介石坚决反对的功劳，因为只有在中方提出激烈反对之后，才能得到罗斯福的干预，并且改变了美国政府的策略。当然蒋介石是冒了一个大险，因为他事先并无能力预测美方是否会接受他的建议，也无法知道是否会引起美方的不快而狠心彻底出卖中国利益。事实上，宋美龄和拉铁摩尔都非常担心重庆政府的回函会冒犯美国。但是蒋介石要他们放心，而最后美国在回复日本的文件中包含了中方的立场，令蒋介石感到非常满意。[55]这个经验对于中国此后处理对美关系将会产生长期性的影响。

当美日谈判尘埃落定时，美国驻华大使高思终于在11月29日把赫尔在26日向日本提出的说帖内容转交给郭泰祺。众所周知，美方在这份说帖中所提出的条件和承诺的让步，都远非日本政府所能接受。美国的新立场是要求日本在整个亚洲停止一切侵略活动，和亚洲所有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承认重庆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撤销被占领区内各种不合法的政治组织。而日本所获得的将是美日订立新商约，取消封存资金平准兑汇。毫不夸张地说，它等于是要日本放弃多年来在亚洲辛苦经营所累积的侵略成果，[56]日本拒绝接受。战争的契机由此开启。

四 中国政府处理危机的评价

有了以上中文资料作为历史重建的素材，我们就可以对史学界流行多年的看法进行再评估。

在英文著作中，美国著名史学家毕尔德（Charles A. Beard）在讨论这段历史时，把大部分功劳都归给胡适，认为胡适具有熟知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优势，又是知名的自由主义者，而罗斯福主政时期美国又崇尚自由主义，因此中国政府的官员们在胡适领导下得以完成任务。[57]近来也有其他研究胡适的专家指出，当时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的外交官对于美国的立场都没有持异议，唯独胡适极力反对，最终导致美国放弃原来打算妥协的决定。总的来说，这些历史叙述都认为胡适在美日谈判破裂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后引发了太平洋战争。[58]

回顾1941年11月底，当美日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中国的外交活动也随之变得显著频繁。从11月22日到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数度提出不同建议，试图打破僵局和日本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但是就像赫尔事后所抱怨的那样，他提出的和解方案立即引起“中国外交官和某些特定人士”（Chinese diplomats and special agents）的坚决反对，而中国的立场又获得若干美国有力人士的呼应。但是赫尔所说的这些“中国外交官和某些特定人士”，究竟指的是何人？

首先，胡适在和战问题上一直信守鲜明的反对和平的立场，这一点绝无疑问。但是要把1941年底导致美日谈判破裂的功劳归诸胡适，则有张冠李戴之嫌。因为历史资料并不能支持这个结论。中方史料显示，蒋介石在此时至少动用了三位人士去努力阻止美国和日本达成妥协，他们分别是胡适、拉铁摩尔和宋子文，而他们三个人的贡献又大不相同。

（一）胡适的角色

依据赫尔的记载，他曾经把将要向日本提出的妥协方案（Modus Vivendi）向胡适、英国大使、荷兰公使和澳大利亚公使做了详尽的简报。[59]赫尔向胡适解释美国军方需要两三个月时间备战，而美国政府也想要在历史上留下证据，证明它的确尽了一切努力去挽救和平。[60]妥协方案内容在本节上文已经叙述，在此不拟重复。我们此处关切的是胡适的反应。根据赫尔记载，胡适在听取了美方解释之后，“显得有些不安”，但是并没有表示严重关切。胡适不安的理由是美国提案中指明日本在中南半岛的驻军不得超过2.5万人，这样就使得日本无法占领滇缅路。虽然胡适没有能够从赫尔那里取得承诺，保证这个妥协方案可以防止日

本在今后三个月内不致对中国本土发动攻击，但是胡适并没有刨根究底。他只是提出一个技术细节上的修正，希望能够把日本在中南半岛上准许维持的兵力从2.5万人减少到5000人。[61]

赫尔关于胡适在听到美方提出妥协方案简报后的温和反应的记载，也被胡适本人给重庆政府的报告所佐证，[62]在报告中胡适并没有建议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和以往英国关闭缅甸路事件一样，英美两国都惯于把它们向日本让步形容成只不过是为期三个月的“暂时安排”，而胡适也认为应该信任英美两国的说辞。

但是胡适对于美国说辞的信赖，立即遭到重庆领袖们的质疑。外交部长郭泰祺向蒋介石进言，中国绝不可以接受美国的这种“过渡时期办法”，因为它们会大大地减弱中国的战斗力量。[63]蒋介石采纳郭泰祺进言，训令胡适再度转告赫尔，假如美国在没有和日本就侵略中国的一切根本问题达成协议之前，就贸然放松对日本的禁运和经济制裁，则中国抗战就可能崩溃，并使得今后美国对华援助变得毫无意义。事实上，蒋介石指示胡适直接告诉赫尔，中国将无法继续信任美国援华的承诺。[64]

11月25日，蒋介石再度致函叮嘱胡适和宋子文务必警告赫尔，日本已经发动宣传攻势，谣传美日之间已经达成秘密交易，美国承诺不干涉中国战争，而日本承诺不采取南进政策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宣传同时指称，美国已经同意解冻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蒋介石提出警告，日本宣传已经在中国民间引起震动，直接危害到军心、民气和经济状况。因此蒋介石急迫需要美国做出保证，在日本从中国撤兵之前，绝不会和日本达成如谣传所指的协议。蒋介石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做出的只是模棱两可的澄清，则中国抗战可能受到致命打击，但是如果美国能够表示坚定的立场，则最坏结局不过是美日之间的谈判暂时中止而已。[65]蒋介石显然认识到，当此美日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中国政府必须向美国施加最大压力才能免于灾难。

多年来，我们对于胡适在珍珠港事件前后扮演的角色，多半来自美国人和胡适的中国友人们的评价，但是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则一无所知。所幸的是，随着蒋介石日记公开，学者们可以有机会一窥他内心的感受。在珍珠港事件前一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了这么一段话：“胡适、郭泰祺、陈光甫等毫无志气，不知责任，更无国家观念，唯以私利权位为谋。对于此等政客奸商官僚不道非人之所为，时起忿愤。不可抑止，岂不自我小乎哉。”正在他人以为胡适对卫护国家利益有功之际，蒋介石这番疾言厉色的指责，还把郭泰祺和陈光甫拉进来，可见他的评价是绝对的负面。[66]作为胡适的顶头上司，蒋的评价当然有重大参考价值。

蒋介石的恶感和胡适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从外交战线全面退缩之事，当然是互为因果，最后也导致胡适在1942年8、9月去职。即便如此，蒋介石对于胡适的外交生涯依然不能释怀，并在当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忍不住写了下面这么一段话：“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

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不顾。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获罪于美国，而外间总谓美国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67]

以上这一段评判和感叹，大概非常准确地表明了蒋介石对于胡适使美全部外交生涯的总结。他对于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没有给胡适丝毫功劳，对于胡适和美国人的关系，以及他在美国的活动做了露骨的批判。当中国的元首如此评价驻美大使时，胡适最终只能走人。

（二）拉铁摩尔的角色

蒋介石如果想向美国施加压力的话，他的最佳帮手不可能是胡适，而必须是别人。从蒋介石的立场而言，拉铁摩尔及时地成为中美双方政府沟通的桥梁，因为拉铁摩尔非常愿意扮演这个角色，把蒋介石想要向美方表达的意见当成他自己的意见，以美国人的身份向美方表达。拉铁摩尔在11月24日致函居里，要求后者尽快把胡适和赫尔此前会谈向罗斯福提出详尽报告。拉铁摩尔向居里透露，他从未见到过蒋介石的精神状态处于如此紧绷地步。他同时警告称，假如美国此时放松对日经济制裁或是解冻日本资产，只能增加日本在中国的军事优势。即便是美国向日本做出让步的传言，也会动摇中国对美国的信赖，造成远比英国关闭滇缅路更大的恶果。拉铁摩尔最后指出，虽然蒋介石到目前为止依然对罗斯福充满信心，但是一旦中国对美国的信赖发生动摇，则即使是蒋介石也将无法控制未来的局面。[68]

不久，蒋介石得知美日谈判内容后非常恼火。蒋介石向拉铁摩尔率直指出，美方只不过在外交文件里使用了一些温和而不留把柄的辞藻，但是它们无法隐藏美国的无情无义和背信弃义。蒋介石坦白承认，当中国抗战进入第五个年度时，它所遭遇的困难必然会增加，而美国打算对日本做出的让步也必然会使日本成为更强大的敌人。根据蒋介石推测，假如美国果然放松了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则中国国内的失败主义分子必将趁机极力鼓吹对日求和。拉铁摩尔随即在11月26日再度致函居里，向他报告蒋介石的这些反应。

更令美国人不安的是拉铁摩尔挑明了中国可能在内部发生动乱而导致崩溃的可能性。他告诉居里，民间有谣传称阎西山和一些军事将领对战争态度发生动摇，考其原因就是受了日本人宣传，认为美国最终必将走上和日本妥协一途。拉铁摩尔警告居里，假如美国还希望中国继续抗战的话，就必须以有力的手段去制止谣言，使民众不至于误以为民主国家最后会牺牲中国而和日本进行交易。[69]

拉铁摩尔前后几封长篇大论的信函，其收件人虽然是居里，但是实际的读信人是罗斯福。拉铁摩尔在信中所列论点，和中国政府经由胡适和宋子文向美国传达的论点大致相符，有些地方的遣词用字甚至几近雷同。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假设，那就是拉铁摩尔并非运用他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去向美国政府提出报告，而是如实地传达蒋介石的论点，再顺便加上一些个人的观察而写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拉铁摩尔其实已经被吸纳成为中国对美外交攻势的一颗棋子，但并不是核心人物。很可能在美日谈判危机爆发之前，蒋介石就已经打算把拉铁摩尔派回美国，因此初步拟定了一些项目希望其回到美国后可以和美方进行讨论。它们包括：东北问题，财经问题，中美之间长期军事和经济合作问题，对苏联和日本政策问题，对付中共和国内民主问题，等等。[70]美日秘密谈判只是一个偶发事件，拉氏正好派上了用场，却非他的重头戏。而蒋介石交付给拉氏的任务之广度和深度，也远远超过后者的政治能量。因此把拉氏派回美国，很可能是蒋介石打发他离开重庆最不露痕迹的做法。

（三）宋子文的角色

当然，最后必须说到宋子文。胡适和拉铁摩尔的功用是以温和而又有分寸的方式，向美国官员传达中国的反对意见，但是这绝非宋子文的作风。当他首次得知美国正在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时，他立即威胁说要在公开场合予以揭露与谴责。宋子文打心底就不相信赫尔所谓“过渡性安排”的说法，而是把赫尔视为一个和平分子，一心一意就想和日本达成协议。他也相信所有政治人物都害怕公共舆论的力量，而公共舆论正是他可以善加运用的武器，是阻止美日达成协议的最佳手段。宋子文也认识到他只能孤军奋战，不可能从胡适处获得任何支持，[71]因为双方没有合作基础。

事实上在此关键时段，中国的外交阵营内部已经存在严重分歧。一方是宋子文和蒋介石，另外一方是胡适。虽然蒋介石依然运用胡适和赫尔保持直接联系，但是他更依赖宋子文去向美国政治界有力人士进行活动，争取他们的支持。而宋子文也有他自己的行事作风。

首先，他毫不掩饰地打击胡适在这场外交战斗中的地位。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他三番五次地评判胡适的失误。宋子文对胡适做事作风和效率的不满，如前文所述，早在宋子文甫到美国即已开始。此后他不时向蒋介石和其他亲信宣泄，也不断要求政府撤换大使，甚至数度推荐过继任人，但是都未能成为事实。宋氏的不满到了1941年似乎更为明显，一方面是继续在蒋介石周边营造了不利于胡适的气氛，另一方面则是针对胡适在美日谈判关键时刻的“失误”直言挞伐。

就前者而言，有些有趣的例子。比如说，在9月，当宋子文“闻此间有人”主张美国应该优先将武器支持苏联时，立即向史汀生部长请求，千万不可将拨给中国的武器改送苏联。[72]虽然宋子文已经得知“此间有人”乃是胡适，但还是决定用隐晦方式点到为止。

到了11月上旬，宋子文的耐心大概消磨殆尽，开始改为指名道姓。美日密谈即将开始，他致电蒋介石称：“适之最近在毕次堡对记者宣称，美国应先以飞机军火供给苏联。中国已抗战四年余，虽无新式武器亦可支持云云。昨史汀生谈话中，曾暗示此语。居里亦引以为异，并谓中国步骤未能一致，愿助中国之友人，实感困难，等语。”[73]

三天之后，宋子文又向蒋介石报告称，胡适和罗斯福有约，将会谈到贷款和军售事宜，但是宋氏担心胡适不熟悉这些业务，所以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份书面材料，让他和罗斯福交谈时不致出错。[74]这个看似平铺直叙的电报，其用意可能就是让蒋介石知道，胡适是如何的不称职。11月25日，中国对美外交进入最紧张关头，宋子文又向蒋介石报告称，后者给胡适的电报过了一整天尚未完成译码工作。[75]换言之，胡适工作效率低，完全缺乏危机意识。宋子文所举的这些事例应该都是事实，但是在电文中再三提出，肯定也是连番冷箭。

11月26日，当蒋介石嘱咐宋子文就近去和胡适共同设法提出最有效的方法，以阻止美国向日本妥协时，[76]宋子文的批评就更为露骨了。宋子文回电写道：“适之对于美政府权要，素少接洽，仅与英澳各使，约略商谈，真相不明，几致贻误事机。”又写道：“惟当此千钧一发之际，适之不能胜任，殊可危虑耳。”[77]

宋子文又抬出美国政府重量级领袖来“借刀杀人”。他首先向蒋介石报告他和海军部长诺克斯的长谈（11月25日）。诺克斯宣称胡适没有从赫尔处得知美日谈判的真相，而赫尔声称军队要求三个月的备战期，也并没有正确地反映军队的主张。[78]

宋氏最后的撒手锏是罗斯福对胡适的微词。11月26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报告他和罗斯福会面的经过。鉴于蒋介石在之前曾经致电罗斯福警告美国不可以牺牲中国利益去达成美日妥协，罗斯福明言那是蒋介石受到胡适11月22、24日两日电报的误导，做出的错误结论。

罗斯福的澄清包含几个重点。第一，胡适的电报错误地向国内报告，赫尔在与四国大使会谈时宣布美国已经做出决定不可更改，会谈的目的只是事先在礼貌上通知友邦，并可修正部分细节而已。而罗斯福宣称，美国政府历来的习惯，都要先行向友邦提出它的初步方案，在听取友邦意见之后才做出决定。换言之，胡适认为大局已定是他的误读，把赫尔的试探性发言当成美国已定政策的宣示。难怪宋子文紧追不舍地写道：“适之过信国务部，以为霍尔之方案，为循守美国已定之政策，不可变更，故不愿在原则上力争。仅斤斤于驻越北日军之问题，舍本逐末。何济于事？此次若能挽回牺牲中国之厄运，实由钧座义正词严之一

电。”就这样在字里行间，宋子文成功地给蒋介石戴了一顶高帽子，指出是由于后者当机立断地亲自出马，才纠正了胡适的严重失误。第二，罗斯福还指出，日本就在与美国谈判的同时，竟然从山东把30000万名士兵向南方调动。仅仅是这个动作就暴露日方缺乏谈判诚意，使得美方无法继续谈判。也就是说，美国并不是因为受到中国抗议才改变策略，而是因为日方已经调动兵力，使美方无法相信日方继续谈判的诚意。第三，虽然赫尔再三强调美国必须妥协的理由是军方需要三个月备战，但是宋子文注意到，罗斯福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对于这个因素一字未提（显然又是胡适领会错了赫尔本意，误把鸡毛当令箭）。宋子文在罗列了这许多不利于胡适的论点之后，也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声称他无法确知罗斯福是在讲真心话，或是在寻找遁词。无论如何，宋子文在谈话结束前向罗斯福表示，“中国毋宁因抵抗攻击而牺牲，不愿因日美妥协之故而崩溃”，而罗斯福的因应则是“总统无词可答，态度似露窘促”。[79]

在这神经紧绷的10天左右时间里，宋子文动员了他在华盛顿培养的一切关系，除了拜访罗斯福、霍普金斯和居里之外，还请大卫·科克伦传话，向亨利·鲁斯和《纽约时报》发行人探询美国民众的反应，与海军部长诺克斯、战争部长史汀生及财政部长摩根索进行长谈，既去争取他们的支持，也从他们口中得到许多宝贵情报，帮助中国做出及时而又切实果断的危机处理。其中特别是和诺克斯及摩根索的谈话，极为重要。

11月25日，宋子文拜访海军部长诺克斯，致送蒋介石的电文。宋氏向诺克斯转述了胡适被召到国务院听取赫尔简报的经过，并且警告称，如果赫尔的妥协方案实现，则中国士气必定遭受致命打击而使抗战全盘瓦解。诺克斯的答复有几个重点。首先，他透露赫尔并没有推心置腹地对待胡适。因为美方所提条件之一，就是要日本退出轴心国。既然日本刚刚签订轴心国条约，当然无法满足美方要求，因此密谈将会失败。其次，诺克斯不同意赫尔利用美国军方要求三个月备战期的说法来支持美日妥协的必要性。诺克斯反驳称，任何军队都会希望有更多时间进行备战，永无止境。但是事实上，美国军方自认为备战已经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足够应付日本挑衅，而无须被迫做出让步。第三，诺克斯认为赫尔年事已高，身心羸弱，缺乏斗志，因此中方对他的言行无须过虑。诺克斯指出，美方的谈判态度其实非常强硬，不但不会接受日方条件，而且即便日方接受美方条件，其内阁也会在24小时内垮台，因此美日冲突指日可待。总的说来，诺克斯对他不能透露更多机密而道歉，但是敦请中国大可不必担忧，而他本人也必将尽一切努力帮助中国渡过难关。“日本已到绝地，中国应感觉欣幸，无需顾虑。”[80]而其努力的大方向，就是和国务院唱反调。

宋子文在11月25日又设法安排了一场与摩根索的晚宴，理由也是送交蒋介石的电文。席间摩根索直爽地表达对国务院的不满。他声称自己经过了两年努力才达成冻结日本在美资产的成果，而此次国务院安排美日如此重要的密谈，竟然没有事先通知他。他继之批评国务院历来对日态度软弱。即便是两年前美国政府决定贷款给中国时也遭到国务院阻碍，最后只好趁国务卿出访南美洲时迅速予以宣布，使得国务院措手不

及。至于当前的美日密谈，摩根索个人认为难有结果，最后只能诉诸武力。[81]这个论调与诺克斯不谋而合，让中方看出国务院的孤立处境。

次日，摩根索又与宋子文进行第二次谈话，更是赤裸裸地怂恿中国鼓起勇气和赫尔对着干。在这场所谓“秘密会谈”中，摩根索向宋子文证实，内阁官员，除了赫尔之外一致同情中国，因此中国必须大胆伸张自己的立场。他进一步告诉宋子文，他已经拟好一封支持中国的信件给罗斯福，并警告后者如果美日达成妥协，将会严重打击世界民主阵营。摩根索甚至声称，如果他的信件惹起罗斯福的不悦而要求他辞职的话，他也在所不惜。[82]

宋子文在经过与美方大批政府民间领袖的接触后得到许多启示，并就如何去打动美方心弦向重庆政府提出建议。因此在蒋介石指示宋子文向居里、诺克斯和其他重要人士送发的电文中，他着重表达下列几个信息。

①如果美国此时放松禁运或是解冻日本资产，则必定会让中国人民感觉被美国出卖，而导致军队斗志全面崩溃。

②日本宣传机器在过去两个月已经全部开动，谣传美日两国会在11月完成妥协，并且与中国内部某些“不稳分子”达成联系。“故我南北各方动摇分子确有默契，只要美日一旦妥协，或美国经济封锁略有一点放松，则中日两国人民观感即视为美日妥协已成，中国全被美国牺牲。如此全国人心不仅离散，而亚洲各国失望之余，因其心理之激变，必造成世界上不可想象之惨史，从此中国抗战崩溃，故不待言。”

③因此，美国政府不但不可以试图对禁运和日资冻结做出任何让步，而且必须立即有效地驳斥此种谣言，采取鲜明立场发表严正声明，保证如果日本军队之侵华问题得不到解决，则美国将不会考虑日本提出任何对于解除禁运和解冻资产的要求。[83]这大概是中国政府把立场说得最清楚的一个文件。

与此同时，外交部长郭泰祺（11月25日）训令胡适向赫尔致送一份文件，表明蒋介石强烈反对美国所倡议的妥协方案的态度。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据美方资料，正是胡适在扯自己政府的后腿。根据赫尔的记载：“胡适博士在递交该项文件时，几乎是几近道歉地说，蒋介石对于（美国）和日本谈判涉及的其他国家的国际事务大局缺乏掌握，因此才会对妥协方案提出反对。”胡适甚至向赫尔保证，他打算向中国政府提出更全面的解释，并希望因此而使中美双方的紧张局势得以纾解。[84]

1941年11月的美日谈判向胡适提供了一个最好机会，去影响国际局势的发展和维护中国的利益，也可能给了他一个最后机会去表现他在处理外交事务上的主动性。尽管从1940年中开始，蒋介石就依靠宋子文向美国政府传递信函，但是国务院官员一直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只愿意和胡适打交道。因此当赫尔抱怨中国政府动员了“特别人士”时，其所指

就是宋子文所拉拢或是雇用的美国人。1941年11月的美日谈判，也是蒋介石多时来第一次真正希望胡适和宋子文两人可以同心协力地去影响美国的政策。[85]不幸的是，胡适的作为并没有达到蒋介石的要求。

胡适的被动性使蒋介石不得不在中国的外交攻势中亲自扮演更直接的角色。正像赫尔事后向罗斯福所抱怨的那样，蒋介石和宋美龄向美方“发出了潮水般的电报”，警告美国政府有关日本进攻缅甸路的危险性，同时大声呼求美国给予援助。用不着说，蒋介石的这种手法引起了赫尔高度的反感。[86]

而与此同时，宋子文在华盛顿则能够更有效地传达重庆政府的观点，并动员美国有力人士同声抗议美日达成任何交易。宋子文的外交攻势甚至延伸到大西洋彼岸，他成功地说服了丘吉尔向罗斯福发出一封电报，支持中国的立场。最终的结局是，赫尔放弃了妥协方案，在11月26日和日方代表的会谈中选择了对抗的姿态。[87]在这个过程中，宋子文的活动引起了国务院极大的愤怒。特别是宋子文把蒋介石的抗议信函在美国政府高层广为散发，让赫尔感到有失颜面，因此要求居里和拉铁摩尔转达国务院的抱怨，但是居里在私下却建议中方不予理睬。[88]在整个危机中，国务院无一句恶言批评胡适，却对宋子文大张挞伐，也可以当成宋氏打乱国务院谈判策划的一项佐证。

等到整个危机结束之后，蒋介石对宋子文的表现赞不绝口，认为是宋子文的努力使得失败最后转变成胜利，而且安慰宋子文无须担心他冒犯了美国国务院。[89]

我们必须记得，国务院是联邦政府处理危机时和胡适维持经常关系的一个部门，而且也最嘉许胡适的表现。但是在中国政府11月底的外交攻势中，反而是蒋介石和宋子文两人敢于发动美国公众舆论，争取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支持，最后说服国务院放弃了以中国作为交易筹码，与日本达成暂时和解的方案。

（四）蒋介石的看法

既然蒋介石是整个危机处理的舵手，我们不妨参考他的回顾和评价。

他在11月28日日记中写道：“此次美国对倭态度之强化，全在于自我态度之坚定与决心之强毅，尤在于不稍延迁时间，得心应手，穷理致知，乃得于千钧一发时，旋转于顷刻也。而内子力助于内，子文辅佐于外，最为有力。否则如胡适者，则未有不失败也。”29日日记写道：“自二十四美国务卿对日妥协方案得悉后，三昼夜未得安心。此诚存亡成败之惟一关键，故不计美国当局是否疑忌怨恨，亦不再顾成败利钝，乃尽

其心性，一面对其正式反对警告，一面向其陆、海、财各部长，嘱子文奔走呼号，并嘱拉铁摩尔电其罗总统警告，卒能挽救危局，获得胜利。此种旋乾转坤之大力，非有上帝眷佑指导，决不能致此也。”

最后在30日日记中做了一个全盘性总结。他写道：“倭派专使来栖赴美交涉，彼仍抄袭其甲午战争迁就列强独对中国压迫之故智，以售狡计。果尔美国务院主持妥协，几乎为其所算，且其势力已成百分之九十九，只差其妥协条件尚未提交来栖而已。幸赖上帝眷佑，运用全神，卒能在最后五分钟，当千钧一发之际，转败为胜。内助之力实非渺也。妻云无论商家与住室，若无家主与老板娘时刻灌注全神，管理业务，则必不成。其言以鉴于历次外交部与驻美大使胡适，对其使命与任务之成败，几乎毫不在意而发也。次（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因之无论家与国，皆必须有主，而且必须全赖其主者自身之努力奋斗，其他皆不可靠也。”

这几段话把他处理11月24～30日中美外交的心路历程和采取的措施做了一个重点交代。第一，中国政府的及时反应，达到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功效，阻止美国以牺牲中国利益去和日本交换和平共处。第二，他本人的认知和断然决定是中国政府外交攻势的原动力。第三，辅佐他执行的得力助手是宋子文、宋美龄，外加拉铁摩尔。第四，影响美国政坛的对象是总统、海军部长、战争部长、财政部长、国务卿和一切在政治上能够产生影响力的人士，“奔走呼号”才能“旋乾转坤”告成大功。第五，最无功可居的是胡适、重庆外交部，外加陈光甫。[90]

到了最后关头，中国的努力终于得到报偿。在美日谈判破裂后几小时，中国政府就获知，美方已经在11月26日通知日本，双方在远东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中国政府也被告知，这个结局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向美方提出的请求和抗议所造成的。[91]11月28日，中国政府又直接从罗斯福口中证实了这个说法。罗斯福还同时向胡适和宋子文强调，中国应该对他给予完全信任，因为他一定不会忽视中国的利益。[92]11月30日，蒋介石满怀欢欣地向中国最高层军事将领宣布，他刚从美国驻华大使手中接到美国政府11月26日给日本的说帖，其要点包括：日本必须从中国和越南撤退它的海陆空军和警察单位；日本必须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日本必须以重庆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93]

五 危机回顾

美国政府决策者在采取上述立场时无疑深受中国影响，使他们相信美国做出任何对日本的让步，都会导致中国抗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全面瓦解。这无疑是中国外交上的一项重大胜利。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这是它的领袖们第一次表现出有能力拟出重大外交政策，运用多方面渠道和资源提出说辞，以高度技巧和果敢明快的决心将之付诸执行，最后导致世界两个强国（美日）之间的关系发生巨大改变。这个做法不再是消极地“待变”，而是竭尽一切能力地“求变”，并且把“变”的方向掌握在自己手中。论者也许可以指称，无论有无中国的努力，美日两国关系原本就注定走向冲突的不归之路。但是我们无法验证这种说法是否切合实际。在这次危机中，中国领袖们不遗余力地去维护中国利益，最后终告成功。本章所列举的史料显示，蒋介石和宋子文对于达成这个结局的贡献大过于胡适许多。也有其他历史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美国对于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功劳应该完全属于美国政府的决策者。[94]当然，由于日本无法接受美国的立场，战争成为双方唯一的选择。

蒋介石如此努力要求美国政府在美日密谈中采取强硬态度，他指望得到的成果究竟是什么？他是否指望美日开战？在此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其他几个人的看法。

胡适在11月26日认为：“太平洋事端之大爆发，恐已不远。”[95]但是他并未言明战争。

外交部长郭泰祺认为：“日本原无开战之决心，即无过渡办法，日本当亦不敢启衅。”[96]依照宋子文的转述，罗斯福认为：“现局势变化多端，非所逆料。一二星期后，太平洋上即有大战祸，亦未可知。”[97]

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遗留的文档并没有提供明确答案，我们只能看到少许线索。比如说，他在11月30日日记中写道：“倭对美复文到美时，即可决定远东和战之前途，故三日内之时间，实为重要。”[98]然而远东到底是和是战？日本如果坚持南进政策则当然战争难以避免，但是蒋介石认为可能性不超过30%。证诸日本宣传攻势的色厉内荏，蒋介石似乎倾向于日本最后必将对美国低头。设若事态如此发展，则蒋介石又担心日本可能乘机向美国提出承认伪满洲国的要求作为交换条件，因此认为中国政府必须及早提出对策。[99]即使美日终究不能避免开战，战争爆发点应该是南进政策的路途上，而菲律宾最可能首当其冲，珍珠港从未被蒋介石提及。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直接后果，是国务院在美国决策程序中急剧退居边缘地位，而宋子文的进取型行事作风成为保护中国利益不可缺少的要

件。我们还应该记得，在整个1941年，宋子文一直向罗斯福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申诉中国需要贷款的迫切性，然而总是得不到明确的回应。但是珍珠港事件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了中美关系。只要美国一天不和日本处于作战状态，它都可以对中国的要求置之不理。而一旦美国变成了作战国和盟邦，中美关系的本质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珍珠港事件之后不到两个月，白宫就宣布将向国会要求给予中国5亿美元贷款。美国多年来反对给予中国政治性贷款的立场突然间消失无踪，英国紧接着也宣布给予中国2000万英镑的贷款。[100]

虽然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之间的谈判绝非一帆风顺，但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华盛顿受到了更多重视。宋子文在维护中国利益时依然有话直说，有时甚至出口粗暴毫不留情。他这种作风依然不时引起美国领袖们的不快，但是两个国家既已结成伙伴对付共同敌人，则双方为了推动共同利益，也必须学习互相适应和忍让。

美日密谈的过程和失败引起了世界大变，中外学者都曾经运用史料加以诠释。宋子文作为一位参与者和消息高度灵通人士，也留下了一个依他个人判断所重建的“日程表”。虽然有其片面性和主观性，但是至少代表一位历史人物的见证，饶有趣味，值得读者注意，也可以和其他史料进行对比勘误。兹摘录如下：

1.赫尔原本设想是在美日谈判上可以采取拖延策略。

2.日使来栖要求以11月26日为谈判终结日（所提理由是日本政府需要取得解决以打压国内极端分子气焰），后来延长至29日。性质类似最后通牒。

3.赫尔国务卿感受来自国务院和平分子压力：以远东司主管汉密尔顿为首主张和日本妥协，即使牺牲中国权益也在所不惜。而亨贝克虽然同情中国，最后仍然接受汉密尔顿的主张。

4.美国海陆军领袖主观认为美国已经完成战备，但是当国务院询问军方是否可以需要更多时间准备时，军方只能答复当然是可以利用更多时间加强备战。

5.11月22日早晨：赫尔国务卿召集英、荷、澳使节讨论“过渡办法”，英荷使节反对该项办法，但是澳大利亚使节赞成。

6.11月22日下午：由于此项办法影响中国最大，因此临时决定邀请胡适出席会议。[101]

7.11月24日：总统批准赫尔“办法”（根据居里透露），并且认为过渡办法不致对中国产生太大伤害，同时预定在25日或26日向日本代表提出。

8.11月25日：蒋介石“有电”送达总统及分送美方其他领袖手中。

9.11月25～26日：多位其他领袖开始批评过渡办法无异于东方“慕尼赫”，并向总统表达反对意见。

10.11月26日：总统依然同意赫尔的办法，因此召见宋子文与胡适深谈，希望化解中方的反对。但是会谈完毕后总统召见赫尔，宣称该项办法有违美国基本原则。

11.11月26日：虽然美方从未向日本代表提交“过渡办法”，但是新闻界已经探知其轮廓，并且透露出部分内容。日本代表肯定事先也有相当了解，并且预测美方将在26日向日方提交。这就说明为何日方代表在进入国务院大楼时神情乐观，而离开时垂头丧气。[102]

[1]《胡适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1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27～128页。

[2]《王世杰日记》，1941年6月14日。

[3]《王世杰日记》，1941年6月28日。

[4]《王世杰日记》，1941年8月2日。

[5]《蒋介石日记》，1941年5月20日。

[6]《蒋介石日记》，1941年6月16日。

[7]《蒋介石日记》，1941年8月11日。

[8]《蒋介石日记》，1941年9月1日。

[9]《蒋介石日记》，1941年4月25日。

[10]《胡适致蒋介石电》（1941年9月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16。

[11]拉铁摩尔与王世杰谈话，见《王世杰日记》，1941年9月9日。

[12]《翁文灏致胡适函》（1941年9月22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2册，第530～532页。

[13]《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9月1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17。

[14]《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17。

[15]刘锴与顾维钧谈话记录，1943年5月下旬，《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333页。

[16]Owen Lattimore，*China Memoirs*（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0），pp. 158-159.

[17]Soong to Stimson，November 25，1941，*FRUS*，1941，vol.Ⅳ，pp. 660-661.

[18]《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1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32079。

[19]《蒋介石致胡适电》（1941年11月1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300046028。

[20]《蒋介石日记》，1941年7月26日、11月30日。

[21]《蒋介石日记》，1941年10月27日。

[2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0月31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3。

[23]《蒋介石日记》，1941年9月15日。

[24]《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14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1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07017。

[25]《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15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

[26]《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1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

[27]《宋子文致宋子安电》（1941年10月17日），Soong Papers，Box 45，Folder 2。

[28]《胡适致外交部》（1941年11月2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18。

[29]《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8、9、10、15、18、19日。

[30]《蒋介石日记》，1941年7月1日。

[31]《蒋介石日记》，1941年8月1日。

[32]《胡适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158022。

[33]《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24日。

[34]《蒋介石致胡适电》（1941年11月2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158024。

[35]《郭泰祺致胡适电》（1941年11月2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18。

[36]《胡适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21。

[37]《郭泰祺致胡适电》（1941年11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21。

[38]《胡适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21。

[39]《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25日。

[40]《胡适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21。

[41]事实上，外交部长郭泰祺在另外一封电报中向胡适透露，华北某领袖恐将会立即呼应日本，并采取和平行动。《郭泰祺致胡适电》（1941年11月2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21。

[42]《蒋介石致胡适电》（1941年11月2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17。

[43]《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11月2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300046034。

[44]《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27。

[45]《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27。

[46]《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27。

[47]《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27。

[48]《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27。

[49]《胡适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29。

[50]《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26日。

[51]《郭泰祺致胡适电》（1941年11月2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21。

[5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28。

[53]《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30。

[54]《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28。

[55]《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27日。

[56]“廿六日美国务卿对日代表所提的说帖”中文翻译本，《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30。

[57]Charles A. Beard，*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41（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8），pp. 514-515.

[58]耿云志：《胡适与抗战》，张宪文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

集》，第799页。

[59]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pp. 1072-1073.

[60]《胡适致外交部电》（1941年11月2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49～151页。

[61]《胡适致外交部电》（1941年11月2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49～151页；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pp. 1073-1074。

[62]《胡适致外交部电》（1941年11月2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49～151页。

[63]《外交部长郭泰祺致蒋介石备忘录》（1941年11月2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47页。

[64]《蒋介石致胡适电》（1941年11月2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49页。

[65]《蒋介石致胡适及宋子文电》（1941年11月25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4450.01-046-15039。

[66]《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7日。

[67]《蒋介石日记》，1942年10月17日。

[68]《拉铁摩尔致居里电》（1941年11月2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734页。

[69]《拉铁摩尔致居里电》（1941年11月26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735页。

[70]《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29日。

[71]宋子文和顾维钧谈话记录，1942年11月，《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113页。

[7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9月25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2。

[73]《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7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

[74]《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10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

[75]《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5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

[76]《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11月26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

[77]《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6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

[78]《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5日），Soong Papers，Box 58，

Folder 14。

[79]《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6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

[80]《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5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

[81]《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6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

[8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7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

[83]《蒋介石致宋子文电》（代号"有电"，1941年11月25日），原件在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副本见Currie Papers，Box 3；*Morgenthau Diary*（*China*），p. 530。

[84]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pp. 1077-1079.赫尔的原文是："Dr. Hu virtually apologized as he handed me the note，saying that the Generalissimo was not so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broad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the Japanese conversations as they related to other countries，hence his opposition to the modus vivendi." 胡适随即向赫尔保证："he would give his Government a fuller explanation that he hoped might relieve the situation."

[85]《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11月26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15040。

[86]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p. 1078.

[87]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pp. 1081-1083.

[88]《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7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

[89]《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11月29日），《蒋总统筹笔拓影本》：15045。"此次幸赖兄在各方努力呼吁，乃得转败为胜。国务院不满一节，何足悬怀？尚望以后不断注意，能收更大功效也。"《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11月29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

[90]蒋介石在11月29日日记中突然把陈光甫痛责一顿，虽然陈氏早已脱离中美关系工作圈。30日又专门写信到摩根索谢谢他的帮助。《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29、30日。

[91]《徐永昌日记》，1941年11月27日。

[92]《王世杰日记》，1941年11月28日。

[93]《蒋介石对高级将领训话》（1941年11月3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151～153页；《徐永昌日记》，1941年11月29日。

[94]参见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pp. 58-59，65。

[95]《胡适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29。

[96]《郭泰祺致胡适电》（1941年11月2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702100。

[97]《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7030。

[98]《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30日。

[99]《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29、30日。

[100]《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2日。

[101]依照宋子文的说法，“适之柔糯（懦），不思探本追源，仅集中力量于过渡办法之修改。霍尔遂以过渡办法可以推进，告知总统”。

[102]《宋子文致蒋介石两电》（1941年11月28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4。

第十章 结论

本书前此各章试图填补史学界在讨论1937～1941年中国对美外交政策时所遗留下的一些问题，通过更多的中英文史料，去增加我们对于这段时期中美关系的了解。特别是鉴于史学界有相当一部分重要作品，是从美国观点去分析问题并且以英文发表，因此本书目的之一就是让中英文史料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新史料基础上重新检讨过去史学界流传多年的若干解释和分析，帮助我们对这段历史获得比较持平的论述。

而本章的目的则是用更广阔的视野去评价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因此，在剩下的篇幅里将把焦点放在四个重大问题之上：中国抗战的决心和列强的反应；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角色；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官；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处的地位。

一 中国决心抗战和西方列强的反应

多年来学界不断地在争辩国民政府是否真心抗日，抑或是被动地被拖进战争。另外一个争论是，中国一旦处于战争状态，其政府是否有决心把抗战进行到底，还是心存侥幸地指望引起列强干预而早日结束战局。

要想解答这个问题，一项重要的努力是必须对1937年中国国内政治和军事极端复杂的因素加以细心分析，[1]而本书前面各章也通过对国际关系的叙述做了部分解答。简单地说，当中国政府在1937年遭遇日本挑衅时，它的选择空间其实非常狭小。一种选择就是依循自1928年以来的往例，和日本签署区域性和平协议，缩小冲突面，避免和日本全面决裂。另一种选择就是要求列强干预，比如说通过国际联盟，运用外交手段诉求国际正义，或是运用经济制裁等手段迫使日本知难而退。剩下来的第三个选择就是积极抵抗日本侵略，不管是独力抗战或是请求他国协助。

事实上，国民政府处理1937年危机的方式和以往大不相同，因为它纵然在形式上也确曾谋求局部停火，但是并未赋予很高期望，而且不久就放弃努力，使得第一个选择很快就无疾而终。蒋介石在这个决定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这不免让日本感到大出意表，因为它原本指望中国政府将会因循往例，吞下苦水，继而屈膝求和。结果是中国政府做了第二个选择，向国际联盟正式提出诉愿，请求伸张国际正义。但是由于中国对国际联盟的效率，早在1932年“满洲国”事件的不了了之中得到了教训，因此它只是觉得为了争取国际同情不可省略此路，并没有抱太大指望。基于这些考虑，国民政府的外交部成为外交统筹中心，动员中国驻欧洲各国使节共同努力展开外交攻势。在整个过程中，蒋介石最多只是偶尔过问其事。中方资料显示，1937～1938年，国际联盟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并没有占据优先地位，而在蒋介石的活动日程中更显得缺乏重要性。

导致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政府早已决定采取第三个选择，以对日抗战作为战时外交主轴，而这正是史学界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一个要点。事实上，蒋介石和他的下属从1930年代初期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希图最后和日本人算总账。但是在时机尚未成熟之际，每当日本制造纠纷时，中国只好忍气吞声做出局部性让步，以求化解眼前危机。这个互动关系的另一个后果，是在日本人心目中形成了一种认知：只要日本采取挑衅行为，中方必定会做出相应让步。根据国民政府计划，国军的现代化在1939～1940年可以完成战斗准备。但是当卢沟桥事变在1937年7月爆发时，国民政府仍然决定采取坚定立场断然予以反击。

这使得中国领袖们做出了一个关系重大的战略选择，那就是积极地在淞沪地区部署一场大决战。他们以为，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兵力大大超过日军，而且还握有战术上的优势。中国领袖们的错误并不是不该进行决战，也不是不该选择淞沪地区，而是在地区性优势消失之前，没有及早脱离战场。

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还可以从它在开战最初几个月所追求的最高优先外交政策目标看出。因为它最大的努力，是去争取最大的国际物质支持，俾使抗战得以有效地进行。而最能满足此项需求的西方国家，既非美国也非其他民主国家，而是德国和苏联。

德国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其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德国军官帮助国民政府建立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德国军火商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武器，德国工业家又向中国提供了一系列的现代化工业和兵工设备，使抗战得以继续进行。但是当德国表示意图促进中国与日本讲和时，中国领袖们立即察觉到不可能与德国发展出更亲密关系。尽管中国高度倚仗德国军火供应，但是中国政府依然拒绝了德国调停中日战争的意愿。这本身就明白显示，在蒋介石心目中对日抗战是最高目标，不管是拥有或是缺乏资源都义无反顾。中国对于和谈的拒绝，加上德国想要拉拢日本的意愿，很快就导致德国决定从中国撤离军事顾问，继之在1938年中期又大幅减少对中国的军火供应。这同时也反证了西方观察家的谬论，认为中国发动淞沪战役的动机是为了引起国际干预。事实上，德国极为热衷干预，而中国则不惜切断与德国的密切关系，因为后者的干预阻碍了中国的抗战。

至于苏联对中国的重要性，则可以从两方面去了解。一方面，它是另一个可能向中国提供大量军火的国家；另一方面，它又可能在未来变成一个盟邦。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中国领袖们一直认为日苏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要大过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心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当苏联在1936～1937年向中国试探缔结共同防卫条约时，中国政府不愿接腔，而只愿意商谈有关互不侵犯条约事宜，为的就是不想被苏联拖下水。但是一旦卢沟桥事变演变成中日战争时，中国就改变初衷而更急于和苏联结成盟邦。只是苏联也改变了立场，因为中国既然已经在对抗日本——苏联的头号敌人，则苏联当然就可以避免直接参战而坐收渔翁之利了。中国则依旧保持此前看法。事实上，直到1939年为止，蒋介石始终坚信日苏大战无可避免，而且每隔几个月就会做出类似的预言，只是每次都被现实证明其为错误。尽管如此，在德国和意大利为了向日本示好而相继停止对华供应武器之后，苏联很快就取代它们成为中国武器最重要的国际来源。

正因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心，是在全世界找寻资源和武器以继续抗战，而不是谋求和平，它对各个国家重要性的评估，通常都取决于这些国家能否对中国抗战做出贡献。这就让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除了德国和苏联之外，还曾经向意大利、法国、英国，甚至欧洲一些小国家寻求购买武器，或是邀请它们派遣军事顾问来华协助。极具讽刺的

现象是，1941年之前西方民主国家从不忘记在口头上高唱国际正义和建立国际法制，但是在中国遭受侵略时却又视若无睹，反而是世界上两个最极权的国家向中国提供了最有力的协助。事实上，每当西方国家针对中国问题采取行动时，它们对中国的伤害远远大于对中国的帮助。

设若中国政府此时果真想要停止抗战的话，它大有机会实现愿望，因为几乎所有西方列强在不同时段都曾经试图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去与日本谈和。德国调停的努力只不过是一个稍早期的事件，并引起了更多历史学者的关注而已。英国和法国政府，除了对于中国要求购买武器和派送军事顾问的试探不予理睬之外，也曾经先后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而企图胁迫中国向日本求和。

1940年中期缅甸和越南通道的关闭，只不过是英法两国最明目张胆的行为，还有许多列强的行为同样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利益。在它们自己遭受日本攻击之前，西方列强都曾经想要扮演中日战争的调解人，以各种威迫利诱方式企图说服中国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只要能够帮助自身免于和日本发生冲突，牺牲中国利益对于西方列强而言实在无足挂齿。但是在自己遭受日本攻击之后，它们又变得高度神经质地疑神疑鬼，恐惧中国会背着它们去与日本秘密讲和。这个恐惧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和之后，从来没有在西方国家领袖们脑海中消除过，有时候还会煞有介事地被嵌入政府高层的分析报告之中。虽然抗战的史实证明，所有这些怀疑均属庸人自扰或是过度反应，但这或许正是它们本身心理状态的最好写照。

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的作为，也只是略微可取而已。具体地说，美国民意对于日本在华暴行普遍反感，而美国政府也不时表示谴责。但是这些表现并不代表美国政府改变了孤立主义政策，它基本上认为这场战争事不关己。它也没有阻止美国商人继续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帮助日军继续施行对中国人民的暴行。罗斯福本人也认为中国之命运对美国并不重要，帮助中国抗战也不是美国的责任。而他在1937年之前的政策重点是减少任何和日本冲突的可能性。他还极力向中国泼冷水，让中国不要指望在战争中从美国获得援助。更有甚者，在不同时段里美国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还采取了互相矛盾的做法。1938年底，罗斯福要求中国政府做出保证绝对会继续抗日，而到了1941年底时却又向中国试探与日本缔和的可能性。假如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不够坚强，则很可能在它的军队还没有被日本击败之前，就屈服于西方国家的软硬兼施手段之下。

但是中国政府锲而不舍地争取外援的努力，终于使它认识到美国的重要性，进而把中美关系提升到最重要位置。这个转变过程前文已经做过交代，重点是中国对美政策的首要目的，并不是要求美国帮助中国去终止日军的侵略，也不是要求美国介入调停工作。事实上，中国反而希望美国和日本可以免于一战。但是中国确实要求过美国不要向日本运送战略物资，也希望能够获得美国贷款去稳定国内经济。最后（1940年中期以后）也是最重要的，它还想购买大批美国军火，来补足德国和苏联停止武器输华之后所造成的严重匮乏。因此，正如前几章所言，中国政

府致力于加强中美关系，把美国从外交视野的边缘移到中央位置，其最大动力来自中国的态度改变，认为美国具有最大潜能，能够给予中国最多的帮助去进行对日抗战。

中国政府这个主观认知上的改变大约在1940年10月完成。虽然没有向美国政府言明，但是从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电文和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个基本国策的形成。10月20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中写道：“在中美英合作中，我国当随美国之领导，自无待言。”又写道：“总之，国际形势不论如何发展，中国必与美英（合作）到底。”[2]鉴于蒋介石历来对英国充满敌意，但是英美又是亲密伙伴，因此蒋介石之所指就是在国际上追随美国。

这种态度在蒋介石的内心更是明确。他在10月31日日记中写道：“如美果能协助我抗战胜利，则中国以后建立海空军以及其海港皆可与美国订立二十年共同使用之协约。以我国如欲建立海空军，论人才，物力，与技术皆非此不可。而且只有美国对华无侵略之野心，此为战后外交与军事惟一之政策也。”

正是出于这个基本国策的转向，中国才会在1941年春季开始就努力促成居里访华，聘请拉铁摩尔任顾问，以及邀请美国空军和陆军代表团先后访华，而且每一次蒋介石都亲自接待长谈。而美国此时对华的经援和军援尚且雷声大雨点小，完全无法和德国、苏联援华的规模相比，但是中方对于美国人员的礼遇和推心置腹早已超过对苏联的态度，接近1938年以前的中德关系。

可以说，美方的心态和重视程度与中方完全不成比例。虽然1941年美方也采取了上述几个外交措施作为对中方的回应，但是中方仍然停留在美国外交视野的边缘，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为止，基本上没有改变。即便是日本的攻击让中美两国结成盟友，但是这种心态上的不对称将会持续干扰它们的同盟关系。

二 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角色

蒋介石对于抗战的态度和他处理中美关系的手法，历来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本书前几章曾经讨论过他对于战争结局的预测和对国际局势发展将会如何影响中国国家利益所做出的判断。资料显示，蒋介石在抗战头四年里不管局势是好是坏，他都是一贯而且坚定的主战派。蒋介石不但拒绝了经常来自外国的调停建议，也抗拒着国内政治伙伴和幕僚建议他不妨去试探和平之路的劝说。设若蒋介石在这些关键时刻态度略有松动，则中国抗战大局或许早已走上另外一条道路。

有了这个了解，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地去处理当时各种有关和平运动的谣传。比如说，中国是否有意愿与日本达成和平？它是否企图利用和平的可能性去向西方国家施障眼法，甚至进行敲诈？

如前文所示，至少有三个因素使情况变得扑朔迷离。第一，在当时政府内部的确有部分领袖相信，如果中国的抗战超过了某种限度，则无异是全民族的自杀行为。汪精卫与他的伙伴对于这一点深信不疑，以致在蒋介石完全拒绝听取他们的意见时，不惜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去“挽救国家命运”。而蒋介石则自了解汪氏真正意向后，便对之不存任何幻想。即便是汪氏尚在河内而势态似乎仍有转机时，重庆政府已经公开严厉指责并企图予以暗杀。蒋介石在私下态度则更是坚定。他在1939年5月初日记中写道：“汪对倭寇至今尚以政府与彼唱双簧为言也。卑劣至此！”当他在5月底听到汪精卫已经抵达上海而且迁入原日本领事馆时，忍不住用了粗话写道：“已投入敌怀抱，此贱种本是如此也。”[3]

在汪精卫出走之后，留在政府中的孔祥熙和王宠惠，每当机会来临时总是对和平抱持高度兴趣。显然，孔祥熙虽然在政治上忠于国民政府，但是在时局判断上仍然认为政府应该寻找机会与日本寻求和平之道，但是这个态度屡屡遭到蒋介石的指斥。1939年10月，蒋介石在日记中又接连两次对其予以严厉批评。讲到孔祥熙的求和立场，蒋介石写道：“孔见解之庸，几何不为敌方所轻？国人心理之卑鄙，殊堪悲痛。”又写道：“孔求和之心理应痛斥。”不久，蒋介石只好采取断然措施，命令孔祥熙和王宠惠闭嘴，非经许可不许发表意见。[4]

第二，有一部分隐性人物在“和平运动”中施展了身手。这些人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其中有的是日方派遣的使者探听重庆政府的意向，也有的是招摇撞骗的闲杂人等、失意政客，想借着跻身和谈来自抬身价，向中日双方吹嘘自己的能耐，希冀捞到政治油水，而中日双方也有时果然坠入圈套。

另外有些中方人士则是与日本人私通款曲，他们未必想左右中日之

间和战的大局，却想区域性地保境安民或是维护个人权位。这种人被蒋介石在日记中指名道姓，视为抗战阵营团结的忧患，其中地方军人能够造成的杀伤力特别严重（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抗战几十年之后，他们之中居然还有人被不知情者誉为抗战英雄）。但日本军方宣传部门看出了此中奥妙。比如说，在1939年初，当日军的攻城略地策略进展开始缓慢，而对中国政府军队又无法捕捉歼灭时，日本制造传闻指称，国军部署方式的诡计是牺牲杂牌军，而政府从保卫城市的战略转移到运动战，则背后的目的只是保全实力。[5]诸如此类的传言，加上了多方的渲染，令人无法辨识，使人们对于和谈一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第三，我们应该记得中国最初四年抗战是孤军奋战，而几乎所有西方列强都曾经建议过或是压迫过中国去向日本求和。如果说求取和平代表一种道德上的缺失的话，则奉行机会主义的西方国家和中国内部的某些政治团体都无法推卸责任。

有关和平不断的谣传也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蒋介石个人动机究竟如何？正由于蒋介石有时会向美国人通报这些谣传，因此不免引起人们猜疑，认为蒋介石很可能故意制造和谈空气，借此敲诈美国人。同理推之，如果蒋介石向美国人提出警告称中国面临重大危机时，也会被认为是蓄意小题大做，危言耸听。当这两种看法糅合在一起时，就很容易让人们对蒋介石产生一种印象，把他看成一位善于操纵和混淆他人视听的高手，其独到的本领就是把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弱势，转换成外交上的优势。而他的惯技是隔不了多时就提出恐吓，声称中国抗战即将全面崩盘，借此骗取美国人不得不赶紧对中国施以援手。

但是本书所提证据并不支持这类推测。事实上在很多关键时刻，中国的确遭遇了极大危机，而它的领袖们也的确恐惧局势将全盘瓦解。前文曾经引用过的经济部长翁文灏发给胡适的私人信函，就对中国局势表现出极度悲观。类似的资料可以佐证前面分析的准确性。因此当中国政府向美国人透露对于局势瓦解的忧虑时，一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是它借此捏造崩溃假象，希冀达到勒索美国人的效果；二是它代表一种在绝望中求救之声。笔者认为后者的可信程度远远大于前者，因为在政府其他领袖间的私信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呼吁（例如胡适与翁文灏）。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请求援助的信息向来是以最机密方式传达给美国官方，因为中国政府不但想向欧洲国家隐瞒这类信息，而且也想向中国人民隐藏真相。其理由非常简单：一旦此类信息让国民得知，则会导致民心士气过早崩溃；如果让日本人得知，则会激励后者加倍努力去加速中国的溃败。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处理？为什么中国不能接受停战求和？

其实蒋介石对于中国政府不能停战的原因心中早已反复思考过。他所列举的理由大致有以下两个。第一，一旦中国接受停战安排，则现状立即成为“既成事实”，“而中国即就此灭亡”。他担心一经停战，则中国

的民心士气将全盘瓦解，而日本军阀更会以战胜者自居，增加少壮派军人之骄气，更增加其以战争作为冒险投机的心理。第二，此次中日战争不仅是争取中国的民族生存，也是争取民族之平等，要达成的理想是“与日本共存东亚，造成为真正兄弟之邦”。归根结底地说，“若一经停战，不仅中国在沦陷区内所丧失之人民生命与公私产业为无价之牺牲，而中国且成为奴隶之国，以东亚惟一大国成为奴国，则东亚之公理与真理全失，东亚文明亦因之灭绝”。[6]

尽管这些说辞含有不少理想主义色彩，但是最重要的是，中国不能接受为日本“奴国”的安排，所以必须抗战。“我国欲得胜利，必在坚持抗战，必待国际问题之总解决，必不可中途屈服与妥协。”[7]

事实上，重庆政府花费了不少精力公开抨击和谈谣传，而这些谣传又经常是日本方面蓄意散布的。在几次中国政府确实接获认真的和平试探时（比如来自德国、苏联或是英国政府渠道），也立即把信息只向美国一个国家透露。这种做法的理由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让美国放心中国必将坚持抗战，所以才不会对美国封锁信息，而另一方面也要求美国给予援助。这种做法和中国政府争取外援抗日的外交大方针完全吻合。在此我们或许也可以看到，胡适和蒋介石两个人在当时中国政府内都是坚决反对和谈的人，“和比战难”。但是胡适基本上是劝告别人（重庆政府的官员）不要放弃战斗，而蒋介石则需要竭尽一切努力去进行战斗。

对于与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角色有关的一些问题，上面的讨论也可以让我们得到某些启示。其中一个让许多美国官方人士关心的问题是，蒋介石争取美国军火的动机究竟为何。根据某些美国军方人士的说法，蒋介石其实不想使用美国军火去和日军作战，而是想囤积武器留待他日攻击国内政敌。在本书所涵盖的时段里（1937～1941），热衷于揣测的人士在大胆假设之余，从未负责任地提出史料证明。而在1941年之后，持这类论调的人士也未能从更丰富的中英文史料中去进一步查证。凡是思维正常的人士应该都可以接受一个基本的说法，那就是任何国家在进入战争之前或是战争之中，都希望能够做好军火的战略储备，中国政府也不例外。根据当时中国领袖们的估计，中国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战略储备使军队可以作战18个月，而不必担心来源断绝导致弹药耗尽。美国军方在1941年底和日本尚未开战之前，也需要再三检查它的备战工作是否已经完成，更何况中国已经在战斗之中？

当然，不同的军事专家可能有不同的判断，究竟“18”这个数字是过于保守或是过于贪心？但是他们还是应该把中国特有的遭遇列入考虑。本书前文中曾经多次提到，中国政府从开战以来就不断地依赖外国政府和军火供货商的恩赐和施舍。不但这些供应国的外交政策可以一夕间大变，而且它们军火输入中国的通道也可以突然彻底中断。为了预防因措手不及而造成的灾难，中国领袖们合情合理的对策，莫过于利用一切机会储备武器。事实上，设若中国在1941年缅甸通道仍然通畅之际就建立了18个月战略储备的话（而这也正是中国当时向美国提出的请求），则它在1942～1943年的战斗情势就会有极大改变。不幸的是，1942～

1943年是中美军事合作史上最艰苦的两年，除了从驼峰运进中国少得可怜的军火之外，美国庞大的租借法案下的物资对中国而言可说是毫无意义，因为它们根本运不进中国国土。

在这一方面，美国军事援华物资和苏联援华物资也形成鲜明对比。苏联在1937～1939年向中国提供的武器援助量远远超过美国在1939～1941年的援助量，但是苏联军方从来没有怀疑中国政府从事囤积的阴谋，更没有在言辞上奚落中国。而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后，却有一些军方人士在还没有开始运送武器之前，就自作聪明地认为中国政府要求武器有不可告人的盘算，是想囤积武器作为将来打内战之用，而且在此后的岁月中一直跳脱不出这个自设的思想樊笼。这两国职业军人在心态上的差异，或许在未来还可以成为一个有趣的研究题目。

历史学要求不断改善和推陈出新，一个最重要的方法是尊重史料，讲求方法。两者缺一不可。不幸的是，这个“囤积论”出自几位美国军官的玄想，当时并未提出任何证据。这也难怪，因为当时局势混乱，而这些涉足中国事务的美国军官的学识素养本来就并不高明。其中不少人自诩为“中国通”，自认为对中国事务了如指掌，其含义除了白人种族优越感之外，还认为中国事务并不复杂，只是中国人自己不争气而已，他们若能听从美国的指导，则自然可以走上正道。更何况美国的确是军事和经济强国而中国是弱国，强国的想法即便是浅薄错误，也能产生重大影响。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之处。但是后世学者持续老调重弹就令人不解，也难以赢得赞同。如果后者能够把“囤积论”重新拿出来运用新史料去证实它的正确性，则他们对于抗战史也就可以做出重要贡献。鉴于当今史料日趋丰富，这个工作应该可以得到解答，甚至可以进一步去了解“囤积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由来究竟是什么。

另外一个与此紧密相关的对蒋介石的批评，是他对于空军力量的估计完全不切实际，因为他打心底只想利用美国空军力量去取代中国陆军，借此避免在地面战争中和日军进行拼斗，保全实力作为将来的政治资本，同时还为中国去赢得一场不应该属于中国的胜利。虽然这个论调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在美国军方蔓延开来，但是植根于1940～1941年中国开始要求美援之际，因为1941～1945年中国政府对空军的设想和要求美援的规模在1940～1941年已经大致定调。

如果蒋介石确曾有过这种念头，则作为一个中国领导人而言，他的立场还真是值得中国人民给予高度赞许。因为他因此而一举两得：一方面他达到了“以夷制夷”的目的，由美国人流血去战胜日本人；另一方面他又可缩短中国的抗战，节省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撇开中国的政治内斗不说，如果一个国家领袖能够有此高深的战略谋略，真可称得上是民族英雄。当然从美国人立场去考察同样的行为，则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评价，因为它只能突出蒋介石的狡诈，牺牲盟邦，而求坐享其成，足以令人寒心和不齿（在尔虞我诈的国际关系中，美国政府本身多次做了同样的计谋，而且享受了实质的成果，这又是一些史学家蓄意规避的尴尬题目）。换言之，如果蒋介石这个想法能够得到史料证实的话，则中国

和美国的历史学家或许会做出不同的评估，其间在道德上的对错分际大可以进一步去辩证。

不幸的是，这个说法在目前已有的史料面前完全无法自圆其说。首先，蒋介石对于空军力量的“着”迷，不是在听到陈纳德带来的空军福音之后才开始的。在时间顺序上正好相反。先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对于空军产生了浓厚兴趣，促使他们在世界雇佣兵市场上去物色优质的飞行员（先后包括欧洲各国），最终找到了陈纳德。另外一个历史讽刺则是，当他们找到了陈纳德并为其才华所倾倒时，陈纳德在自己国家却处于落魄状态。他因为没有受到陆军将领们的重视而长期被投闲置散，甚至被迫提早退伍，称他为美国“军中废料”并不为过。蒋介石虽然也出身陆军，但是并不需要陈纳德来开导他有关空军的重要性。不过他在听取陈纳德有关空军的独到而高超的言论之后，确实从陈纳德处获得了许多有关空军潜力的启发，为之大开眼界。与此同时，陈纳德做事的务实和尽责又让蒋氏夫妇对他产生完全的信赖，以致在陈纳德抵华不久，蒋介石即授权陈纳德可以试飞当时中国空军拥有的任何飞机和参观任何军事设备及器材，并且赋予陈纳德极大的自主权，去谋划中国空军的发展和训练。蒋介石这些措施与指望依靠美国军队为中国抗战的论点完全站不住脚。还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在陈纳德整个服务中国的生涯中，笔者迄今没有在任何中文资料里看到他对中国人摆出白人种族优越感的丁点指责。这一点和大多数当时美国军人在华服务的形象大不相同。易言之，他完全不是一位“中国通”。

就空军事务而言，蒋介石或许应该和罗斯福、摩根索以及一些其他美国领袖被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去评估。这些美方领袖没有某些陆军将领的狭隘专业视野，愿意用新角度去看待空军潜能。相对而言，某些正统派的陆军将领（比如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来华的史迪威）对于空军功能在理论上既排斥，在实际上又被军种间利益分配冲突所局限，乃至不问青红皂白漫天盖地地加以抨击，把一个虚假的历史学课题编织得似乎头头是道，占据了历史学园地数十年而不衰。总的说来，虽然蒋介石对于空军力量发展了他自己的看法，但是以整个南京时代（1928～1937）而论，中国国防现代化的最重要部分依然是建立陆军。而对美国政府领袖而言，他们不肯向中国提供飞机（1937～1941），并不是故意“刁难找茬”，而是在心理上以及政略和战略上“轻视”中国抗战的价值。只要日本的领土扩张野心不直接威胁西方国家利益，则美国的基本策略只是以最小限度的物质投资，勉强维持中国对日作战，借此拖住日本后腿无法在其他地区威胁西方国家的利益即可。

也正因为美国政府“轻视”中国战场，所以对中国军民在抗战中所受的苦难无法做出客观判断。就以大轰炸而言，西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书上大篇幅记载和讴歌的，都是伦敦如何承受了德国空军的残暴破坏，英国飞行员如何英勇保土卫国和视死如归，以及伦敦市民面对轰炸所表现的坚韧不屈的意志力。但是对于重庆和其他中国城市在1939年、1940年、1941年不断遭受日本空军轰炸却甚少提及，甚至不知其存在。这真是一个典型的西方中心的历史观。

或许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读者了解重庆轰炸的惨状，那就是把它和德国在欧战初期轰炸伦敦做一些比较。虽然日本空军轰炸重庆的规模比不上德国对伦敦的轰炸，但是重庆遭受轰炸的时间长度远远超过伦敦。重庆的轰炸绝不是战争中的一个插曲而已，仅仅在1940年5月28日到8月16日的两个半月时间里，日本就派遣了3300架次飞机攻击重庆，投弹超过2000吨。所以日本对于重庆的攻击绝不会小于德国空军对伦敦的攻击。但是两者之间的确有一个重大差别，那就是，尽管德国空军派遣了大批飞机轰炸伦敦，但是英国皇家空军还是拥有相当数量的飞机可以升空迎战，并且美国以大量飞机填补英军的损耗，造成德国空军损失惨重。[8]但是当日本空军对重庆和其他中国内地城市进行轰炸时，它的飞机却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地面目标尽情炸射，因为中国缺乏空军，无法迎战，而地面上的军民也只能奔走逃命，毫无反击能力。

在此或许也可以引用一位西方高阶将领的观感作为我们的参考。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在1942～1944年任职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非常熟悉中国在抗战中所受的灾难。1943年5月他路过英国进行访问，被英国政府引导参观了各大城市的市容和军政设备，对伦敦在德国空军攻击下所受的破坏做了一些评估。他写道：“（伦敦）所受到的轰炸破坏远比我所想象的要小得多。（破坏程度）被大幅夸张。如果以重庆（轰炸）的规模轰炸伦敦，伦敦可能已经被彻底夷为平地了。”[9]重庆政府向美国要求几百架飞机，以帮助中国平民老百姓能够保护生命财产以及陆军士兵能够和敌军公平拼刺，却被美国几位“慧眼独具”的军人看穿是想依靠空军打败日本，其逻辑思考的功力委实令人叹为观止。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顾，那就是蒋介石在本书所涵盖的抗战最初四年中间，究竟是否意图对政府和军队进行改革？

关于这个问题，与前文描述的居里和马格鲁德的来华访问都应该颇有关系。蒋介石对于改革军队的意愿可以由他对于马格鲁德代表团的重视看出端倪。读者或许记得，宋子文曾经提醒蒋介石，美国军事顾问团可以向中国提供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相似的协助，而德国顾问团在1930年代的作为，正是蒋介石注重军事改革最有力的表现。

蒋介石想从美国取得政治性协助的意愿，也可以从他接待居里的态度和谈话内容看出端倪，因为他邀请后者对于中国应该如何去改革政府、社会等方面提出建议。为此，他几乎动员了全部政府高层官员向居里做简报和提供内部资料。中国官员的诚意显然打动了居里，他回国后向罗斯福建议美国应该派遣一个专家团去协助中国。我们当然无法猜测，假如居里当时的建议被采纳的话，可能会产生何种后果。但是居里的这些建议的确表明，当时存在着可能会为中国带来重大改革的机会，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都可能与战前德国的军事、经济和工业顾问在中国做出的成果相提并论。事实上，假如美国政府能够注入高度热情的话，它完全有能力派遣一个在人员数量和专业能力上，超过德国各类顾问总和的顾问团。

以蒋介石在南京时代对于德国顾问的言听计从，与他对居里（第一次访华时）的推心置腹及坦白承认中国各种缺失等行为做一比较，可以大胆推测，假如居里的建议能够在1941年开始实施，则美国顾问很可能有机会对于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一些扎实的贡献。中美关系中的若干摩擦点，比如说蒋介石对于政治贷款的偏好，提出的武器要求不够务实，以及政府行政效率低等，都可能有机会在一个新的中美关系架构下获得改善。如果居里提出的军事和经济改革方案，哪怕只有一部分被采纳，它们也可能让中美关系在1942年成为盟邦之后更能够稳固，而提升应付战争带来的压力的能力。

当然，战前和七七事变之后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段。在所谓“南京十年”时期，德国政府把妥善处理德中关系视为国家重大政策，充满耐心地和中国官员打交道，务求达到成果。相对而言，到了1941年初，美国政府对于居里在中国的调查和建议的漠视，也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美国官方把中国视为无关紧要的边缘地区。当时很少有美国领袖预测到美国居然会在短期内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结为盟邦，这就难怪他们根本缺乏兴致对中国进行人力和物力投资了。

三 中国的外交和外交官

学术界有关1937～1941年中美关系的著作，甚少试图从中国的立场去探讨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和政策取向。本书希望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因此选择去关注中国的外交工作人员和他们外交工作的质量。本书先后讨论过几位中国外交官和他们扮演的角色。本书主角包括胡适、陈光甫、宋子文和蒋介石，次要角色包括王宠惠、孔祥熙、王世杰和宋美龄等人。本书除了让这些人物能够对历史叙述加以充实外，还努力避免一个普遍趋势，那就是把他们分成两类——正面人物和负面人物。按照长期以来的惯例，胡适肯定是正面人物，而宋子文大概属于负面人物之列。本书试图说明这种二分法过于简陋，因为要评鉴人物实际上非常复杂。胡适肯定受大多数美国人喜爱也被他的亲朋好友极力推崇，但是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极为有限。宋子文在美国遭到不少人嫌恶也被国内某些舆论所诟病，但是对于中国抗战却做出了更大的贡献。本书所提供的资料希望可以帮助我们在评鉴历史人物时，能够力求持平而且多元化。

更重要的是，本书试图对于那些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因素能够做出更深入的分析，包括这些人的学识素养、品行个性，他们的世界观和对世局的分析能力，他们对于国际上行为准则的认识，他们到底认为应该如何“自处”和“相处”才算是合宜得体，以及他们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等因素在内。这些因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他们之间的行为能够如此不同，而他们宣称的目标又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本书也试图解释中国外交政策在决策过程和实质运作上重大的改变，从1937年抗战初起时的谨守传统型外交规范，转换成1940年以后强调个人外交的泼辣风格。本书所列举的事例清楚显示，“个人外交”绝不是中方“不识大体”或是蓄意颠覆美国行政体系的计谋，而是中美元首的共同意愿，双方都想要找出一条更有效率的途径去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国务院的指责并不代表美方对中方整体的评价，只是宣泄它自己被罗斯福冷落的不平，不敢向罗斯福抗议，只能拿中国出气而已，不值学者小题大做。

作为一个群体而言，中国这些外交界人士可能是从19世纪以来，历届政府所凝聚的最具专才实学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努力，政府尽量洞察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做出合理的判断和制定相应对策。这个群体对于国际大势的掌握远比此前几代的中国外交界人士要务实而准确。事实上，大部分中国领袖对于国际事务表现出高度敏感，常能采用世界眼光去分析全球重要变化，而且有能力看出欧洲和亚洲各自面临危机的关联性。

因此，他们远在西方国家领袖尚未认识到局势严重性时，就预测到日本将入侵东南亚，并且试图推动国际性的合作计划。他们甚至在1939～1940年就已经开始思考抗战结束后的国土重建问题。其结果是，中国

政府在面临全球一连串天崩地裂的突发事件时，一直抗拒德国和意大利的引诱和日本的劝和（诱降），也压制住自己内心对于西方国家多年来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在国际事务上罔顾道义出卖中国利益的劣迹所累积下来的极度怨愤，依然小心谨慎地固守中国本身的立场。尽管西方国家大多数时间对中国视若无睹，但是中国依然下定决心要加入它们的阵营。只有等到美日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政策才获得收成。

从个人质量上着眼，中国在美国的外交官和其他国家驻美代表相比，可谓毫无逊色。很少其他国家此时的驻美代表称得上是他们国内的第一流学者，或是对地主国的历史、政治、哲学和民情风俗的掌握，可以和胡适与宋子文相提并论。其他国家的使节也没有很多人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美国度过，而且在美国社会的融入感可以与宋子文及其姐妹不相伯仲的。

在本书涵盖范围内，中美两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质量，也可以在它们对于彼此的了解程度方面加以评估。诚然，中美两国此时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美国是世界级强国，其一举一动足以影响全球事务，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却下定决心不去发挥这个能量。中国则是亚洲弱国，其能力不足以自保，更遑论左右他人。而在此时，它正在遭受邻国的侵略。中国为了生存不得不学习以世界眼光去分析国际事务。简单地说，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强国，却埋首躲在自己狭小的地区里，而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弱国，却不得不经常去关注全球性发展动态。这些压力使得中国处理外交事务的决策者，对于西方国家事务的关注程度，要远远大于西方国家对于亚洲事务的关注。

说到最后，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成败必然深受其国力所限制。当然，仅是握有军事和经济实力并不足以保证这个国家一定会做出明智的决策，但是它们可以部分地弥补劣质外交政策的不足。反过来说，一个弱国即使具有正确的外交政策，但是它的成功率很可能操在他人之手。高质量的外交政策或许能够弥补国力之不足，但是很少能够完全取代国力。这个残酷的事实，有时会使强国领袖们看起来比弱国领袖们似乎要更明智，但是其实不然。因此，当弱小的中国扮演求援角色而强大的西方国家扮演施舍角色之时，中国领袖们实在不容易让旁观者为他们的行动击节赞赏。

不幸的是，在史学作品中时常出现一种现象，在有意无意的情况下把中美两国领袖们去做比较，然后推演出一些结论，认为中国领袖们眼光短浅、心智闭塞、缺乏理性、能力低落，看不清自己国家最重要利益之所在。在不少情况下，这些批评其实是根据美国官员的愤懑之词做出的，原因就是中国领袖们拒绝按照美国人给他们立下的规矩办事。而后世学者因为疏于治学和惰于思考，也跳不出这个窠臼。

一个更恰当的评鉴中国外交的方式，或许是去考察它的外交目标和成果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1937年以后，中国政府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运用一切外交手段去保证它可以进行抗战。虽然几乎没有一位中国领袖

曾经负责任地说要在战场上击溃日本，但是他们认为只要中国能够持久抵抗，或许最终可以强迫日本知难而退放弃侵略。在此时刻，中国把全部外交精力都灌注在实现这个愿望之上，凌驾一切其他考虑。

中国政府也知道，仅靠中国本身国力无法达成此一愿望，而它又缺乏其他手段可以从别的国家取得支持。因此，它务实的指望是靠自己“苦撑”，等到国际事务有一天出现重大变化，创造对中国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用这种尺度去衡量中国当时外交政策的话，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中肯的结论。特别是当我们发现中国在推行它的外交政策时，并没有在关键时刻违背国际正义原则。比如说，它在处理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芬兰的被入侵事件时，宁可开罪强国也不背信弃义。

对于一个处于极端劣势的弱国而言，中国在四年抗战期间的成就诚属可圈可点。虽然中国求助于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组织的努力归于失败，而它也无法从西方列强（如英国、法国）争取到有意义的援助，但是成功地从德国和苏联手中得到大量武器，直到1939年。中国在1939～1940年所遭遇的重大挫折迫使它不得不转移外交重心，而重庆政府对于胡适和陈光甫两人争取外援成绩的不满，又使它不得不改弦易辙，派遣宋子文前往华盛顿。也正是由于中美两国领袖更密切的接触，导致了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增加，使得中国抗战得以“撑”到珍珠港事件。

固然1941年底美日冲突并非由中国直接挑起，但是中国无疑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中国的坚韧不拔和拒绝停战，才迫使日本不得不向其他地区搜求大量战略物资，去维持在中国的战事。不然的话，它就会被迫从广大中国占领区灰头土脸地撤退，使它宣称要以武力彻底摧毁中国的豪言壮语完全破产。美国禁止战略物资输出日本的决定，又使日本不得不执行其南进政策，期使东南亚的丰富资源尽括囊中，而为了达到此目的，日本又需要进一步铲除南亚和东南亚的殖民体制。

设若中国在1937～1940年任何时间放弃抵抗而屈膝求和的话，则卢沟桥事件在历史上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不致对日本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设若中国在持续抗战一段时间之后，因筋疲力尽而臣服于日本的话，则日本在亚洲和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对立中将逐渐取得上风。设若日本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终究无法避免的话，则国力大增的日本将会是西方的劲敌。幸运的是，在这些至关紧要的年份里，中国能够运用其外交政策找到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的新来源。特别是它的对美外交政策，最初动机只是使中国本身能够维持抗战，最后却迫使日本和西方国家走上正面冲突的路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中所推行的对美政策，甚至可以被视为成就卓越。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七七事变到珍珠港事件，中国除了坚守立场绝不向日本屈服之外，还抗拒了极大的诱惑，拒绝与德国及意大利结成盟邦。至少从1938年开始，国际局势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蒋介石及其幕僚基本上坚守自己的信念，认为全球性冲突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而另一边则是英国、美国和法国。至于苏

联将会如何选边则一直是中国密切关注而又最无法捉摸的因素。他们也坚信中国必须尽一切努力，在最早时间内促进反日合作的成立。本书所引用的资料显示，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要比西方国家至少早两年，而最后世界列强的对垒完全符合中国的估计。

四 历史评价

在本书结束之前还有一件需要交代的事，就是把抗日战争最初四年放在一个视野更广阔的历史架构中，跟中国在近代史上其他抵御外侮的经验做一个比较。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不停地在摸索各种方法抵抗外国侵略，维护国家尊严。不幸的是这些尝试屡试屡败，有时它表现出来的无能甚至达到可笑地步。中国政治领袖不谙国际情势，而军人则在战斗中表现出可耻的懦怯颟顸。年复一年，那些自我标榜的改革派，誓言要找到新快捷方式去达成富国强兵宏愿，而一般人民大众也每每群情激昂地声称与侵略者不共戴天、洗雪国耻。但是残酷历史证明，所有豪言壮语、政府公告和党派文宣最终都流于空谈，国耻却不断地在累积增加。

1937～1941年的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展示出有能力去抵抗世界一流强国的侵略，而且长时间孤立作战。仔细算来，这四年战争的时间长度（52个月）超过了过去一百年来各式各样中国政府和地方势力抵御外侮实际作战时间的总和。诚然，中国的军队效率和经济资源都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如果纯粹从军事科学立场而论，日本在战前估计以3个月时间即可迫使中国军队屈服，并非过甚其词。无论从武器的性能、士兵训练、军官的专业素养和军事工业，乃至国防设施和部署而言，中国都远远无法和日本相较量。形象地说，日本可以制造世界水平的飞机和航空母舰，而中国无法制造一支精准的步枪和一辆内燃机驱动的摩托车，一切必须依赖进口西方产品。

几乎可以断言的是，一个意志略微软弱的国家，在面对侵略者如此无情摧毁时，或许早就会选择俯首认输（比如说法国），而其动机可能是多方面的。求和动机可以是为了个人荣辱、地方安宁、国家元气，甚至是保存党派实力，不一而足。而日本军政领袖在发动战争时，也正是持着这个乐观但又看起来非常务实的设想。

但是中国却咬紧牙关，百败不馁。其表现之所以如此出人意表，不外几个原因。

在这场斗争中，一个令日本人无法估量的因素是，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高昂，无论千辛万苦毁家杀身，也不向敌人屈服。他们并非中国人民的全部，显然有些中国人（伪政权）宁愿向敌人屈服以求苟安；又有另外一部分中国人（地方势力）宁愿作壁上观，怂恿他人上战场与敌搏斗，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还有一些城市居民和年轻知识分子，在游行示威时慷慨激昂，誓死杀敌，但在投笔从戎机会来临之际却又销声匿迹，不见踪影。这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史上的一个怪象。但是确有无以计数的中国人民，包括一小部分都市青年和一大群农村青年愿意舍身

救国，才使得中国政府得以动员他们达到继续抗战的目的。

同样重要的是，日本人完全没有预料到蒋介石的个人因素。他的抗日既可以称之为“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又可以看成“坚韧不拔”“贯彻始终”。这个信念几乎从抗战一开始就成为支撑蒋介石的精神力量。许多看过蒋介石日记的读者都会注意到，他在抗战时期每日日记的开端总是书写“雪耻”二字。而在抗战最初四年里，他还用过许多其他文字来表露他的决心（散见本书各章）。蒋介石个人对于继续抗战的影响无可否认。

在对日作战问题上，蒋介石屡屡证明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每当他的作战计划或指望落空，或是部队遭受严重挫败时，他总是相信下一步将会峰回路转，引向成功之路。自七七事变以来，国军除了在极少数战役（台儿庄战役）中得以获胜之外，几乎是节节败退。但是蒋介石也似乎具有一种本领，就是在令常人悲观绝望的情况下，鼓励自己去乐观。而最后实在缺乏任何理由去乐观时，则乞助于“上帝”的恩赐和怜悯。这个心态在1939年9月显得特别突出。

1939年9月欧战爆发使得中国的对日作战受到极大冲击，人们也深切体会世事之难以逆料。在抗战开始后，许多中国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的战斗，绝对无法祈求能够苦撑到欧战爆发，而欧战居然在9月爆发。照理说，这本应该是使中国人感到雀跃鼓舞之大事，然而岂知苏联和德国签订秘密协定，反而使日本成为获利者，而中国抗战前途受到更大损害。面对此种挫折，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外交形势显然不利，此乃意中之事。倭寇枭张，汉奸跳梁，人心似渐动摇，全赖此一片耿耿之赤忱，撑持坚定，自信必能渡过难关耳。”他又写道：“然而今日之不利，安知非明日之利？……凡事尽其在我，至于成败与存亡，惟有听之于天。上帝有灵，必不负人也。”[10]真是到了呼天抢地的地步。

欧战这种扑朔迷离的列强权谋游戏虽然引起蒋介石极度关心，但是无能为力。隔一日，他又写道：“吾之方针仍以独立自主为主。”[11]换言之，不管国际局势如何变化，蒋介石以不变应万变的基本国策就是“抗战到底”。

中国政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其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它终于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制定了一个有系统有谋略的外交政策，又能以颇为细腻的手法将之付诸实施。正是拜这个外交政策之赐，中国在国内武器供应枯竭之后，还能依赖外国武器去装备将士们在前线与日军继续搏斗。

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当中国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际，这个外交政策也能争取到外国的政治和经济援助，使得中国民众在精神上受到莫大鼓舞，数度从濒临绝望的边缘重新找回拼斗勇气。最后结果是，中国的坚韧不拔迫使日本扩大战争面，终致引发和西方国家的战争。

在回顾本书所涵盖的这一段历史时，我们或许可以强调以一字之差，来解释对国家命运的影响。在胡适整个外交生涯中，他极力提倡而

又响亮的口号是“苦撑待变”，而后世对胡适这段日子的记忆也突出这个口号，作为形容他真知灼见的标志。而蒋介石在这段时间的作为或许可以用“苦撑求变”来形容。“待”和“求”一字之差，其可能衍生出的后果却是天差地别。他们两个人的爱国热忱同等高昂，他们也都认为中国人民最低限度应该做的是“苦撑”，由千万军民去和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承受血的洗练。但是当中国军民筋疲力尽之余还在坚持战斗之时，下一步要怎么办？胡适说得非常明确，就是“待变”。这个“变”来自何方，什么性质，要变到什么程度才能对中国抗战产生积极影响？胡适全没有给出答案。他只能说，变比不变要好。如何好法也无法预测。说到底，这是一个彻底被动的做法：尽管中国人民每一分钟都在承受侵略者的加害，但是中国政府却只能等待，毫无引导变局的雄心和计划。这个“变”则是完全操纵在他人（列强）手中。

一旦接受这个前提，则中国政府的外交工作就失去意义，而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也就失去特殊意义，大家都在“待”变。虽然胡适并没有用他自己的语言去分析他所处的环境，但是以上描述应该是他在美国外交生涯的忠实写照。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此时对美外交实在乏善可陈，没有突出的历史价值。

在此，我们或许有必要重新回顾胡适在处理抗战初期中美外交关系时最重要的论述。1940年夏宋子文赴美处理中美关系之后，胡适对于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急剧滑落，但是他自己或许要到该年年底才慢慢察觉情况不妙。有趣的是，1940年10月，他还有机会更充分地发表了一次他对苦撑待变的看法，值得我们仔细去了解。

胡适在一份致蒋介石的长电中，明白指出他对“变”的解释。他告诉蒋介石称：“所谓变者，包括国际形势一切动态，而私心所期望，尤在于太平洋海战与日本海军之毁灭。”而过去一个多月的世界局势发展，完全印证了他“待变”的“正确性”，不仅是小变，而且是大变。他举出最明显的事例是：①美国政府施行两大洋海军扩建计划，使海军力量增加一倍；②日本侵入越南导致美国反击，废铁全部禁运，又决定向中国进行第三次贷款；③轴心国结盟激起美国民意强烈反弹；④美国促使英国在10月17日以后重新开放滇缅路；⑤国会通过和平时期兵役法，可以征召约1500万平民参加军队。以上这些大变“皆在一月内急转直下，使人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感”。[12]

正是这些英美国家自动自发的行为，才使得“变”成为事实。难怪他得出的结论是“太平洋和平会议未必比太平洋海战更易实现”，而前者是中国政府孜孜寻求的国际发展，后者则完全是西方国家自己行动所产生的后果。换言之，中国政府实不必枉费心机去企图左右国际情势，而应该听任其自然发展。反过来说，中国政府倒是应该小心自处，以配合国际情势的发展。因此胡适对重庆政府的具体建议是：第一，日本或许不敢向美国海军挑衅，也不致贸然南进，反而可能西进对中国进行猛攻，无论是进犯云南或是炸毁滇缅路，都会造成极大伤害。因此中国在苦撑三年多之后，还需继续苦撑，不为日本所趁。第二，世界大局已经明

朗，轴心国和英美民主国壁垒分明，罗斯福必定连任总统，“当此时机，我国对于国际分野，似应有个比较明显的表示”。具体地说，胡适认为重庆政府应该“召回驻德意之使节，使国人与世人知我重气节有决心，似是精神动员最有效方法”。[13]

在胡适讲了三年多“苦撑待变”观念的时段里，这份长电把他的理念说得最透彻，而且举出的事例最具体，希望达成的目的也最明确。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胡适抛开了他向来自谦的行事作风，一反往例，特别注明请重庆政府把这份电报抄送给孔祥熙、孙科、王宠惠、翁文灏、王世杰、张群、陈立夫、朱家骅、陈布雷等人阅读。众所周知，这些人都是当时对制定外交政策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力的人物。胡适显然是认为自己对于“苦撑待变”终于做出了精辟的阐释，而且又有无可否认的铁一般的事实作为证据，深感自得，因此想一劳永逸，把这个外交基调定下来。

但是细读胡适电文仍然不免令人产生重大疑问。最明显的是，他只是侃侃而谈“变”，而绝口不提“撑”。似乎在他看来，他是在美国观察世界大局的代表，只要把世界大局正确地向重庆政府做出开导性的分析，后者就可以在外交问题上善于自处，不会在国际事务上逆水行舟或是异想天开。至于怎么“撑”，那是国内政府需要操心的事，与他这位驻美大使无关。因此，对于“苦撑待变”这四个字的前半部，他几乎是不置一词。这就不免引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既然“变”的因素和过程全部操在他人手中，则中国只能被动地“待变”而已，那么中国的驻外使节就似乎是可有可无才对。偏偏是“苦撑”的部分，却是中国政府每一日都需勉力挣扎，以求延续抗战，而也正是驻外使节最能为国家出力之处。简言之，胡适抗战外交政策最大的盲点，就是过度着眼于被动的“待变”，而严重地忽略了他在帮助国家“苦撑”的过程中所能做出的积极贡献。其自我设限，到了令人百思不解的地步。

有了以上这层透视，我们就更容易了解胡适和蒋介石之间最根本的分歧之所在。这也就难怪蒋介石在几日后给胡适的回信中，唱的是完全另外一个调子。[14]蒋介石完全没有兴趣接胡适的腔去讨论世界大局，他简洁地指出：“如欲……安定我国之人心使能继续作战，非有美国在事实上之积极援助不可，我国所期望于美国者为飞机与经济援助。”蒋介石接下来说明，中国需要500～1000架飞机，而最急迫的问题是时间问题，因为蒋介石估计日本未来很可能会炸毁滇缅路，甚至进攻新加坡而切断西方国家的海运。因此，“今后美国之援助，其最重要者，厥为时间问题”。美国必须在三个月内把武器送抵中国，始能帮助中国“苦撑”。如果延误时机，滇缅路被炸，或是海运被切断，则美国纵有援华意愿，也无法帮助中国抗战。在蒋介石看来，这才是“苦撑”的本钱，而又正是胡适不愿去麻烦美国政府的事务。

事实证明，蒋胡之间尽管经过了这类电文来往，然而基本上依然是各说各话，没有交集点。蒋介石最终的出路是放弃胡适，转而依赖宋子文。宋子文分析国际大局时，虽然远远不如胡适说得头头是道，但是他帮助中国获得苦“撑”所需要的物资，却远远比胡适来得要有办法。在此

值得一提的是，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重庆政府和其驻美使节的电文来往方式也有了微妙的改变。从宋子文抵美开始（1940年6月），蒋介石的电文多半是发给胡适，然后转抄给宋子文。因此除了少数例外，胡适和宋子文对于蒋介石的政策和态度应该是具有同等了解。但是大约从1940年10月下旬开始，蒋介石发电给宋子文，然后请他转抄给胡适。到了11月份，蒋介石开始只发电给宋子文，而不另发电给胡适，只是请宋子文口头转告而已。到了1941年，情形就更糟糕，胡适时常接不到重庆电报。

回顾这一段历史，“苦撑待变”是胡适自认为得意之作，是他对于稳定抗战外交大方向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后世学者和胡适支持者也再三对这一点赞誉有加。但是我们或许在此可以指出，胡适其实是掉进一个自设的迷魂阵，而没有看出自己角色的矛盾处。客观地说，中国从淞沪会战失败之后就已经陷入苦撑的局面，只要蒋介石周边的政治人物和军队继续坚持抗战立场，他们就已经天天都在苦撑，无须胡适把它当成一个真知灼见去指教；而且只要蒋介石和周边的主战派当政，也无须胡适的开导或鼓励。反过来说，胡适整天叫嚷“苦撑”，却没有看到他原来可以在外交领域里做出许多贡献，帮助他的政府和同胞“撑下去”。以胡适这么一位思想成熟的学者，居然没有看清“变”和“撑”之间的紧密关系，而认为它们是两个独立的现象，实在令人费解。更进一步说，“变”也正是重庆政府想要看到的国际现象，但是“变”一定要变得对中国有利才行。不然的话，天下大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正是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惨痛经验。而偏偏在这一点上，胡适选择了相信“西方民主国家”的道义、诚信和深思熟虑，却忘记了同样的这些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凶猛的帝国和殖民国家，在中国领土上依然坚持它们的治外法权、内河航行权、势力范围等。如果中国外交全部的锦囊妙计只是“待”变，而不是“求”变的话，则胡适实在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让中国人相信国际局势变的结果，会是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中国。难怪胡适这套理论连他在重庆最忠实的朋友都无法接受，王世杰、陈布雷、翁文灏都写过信把国内艰苦抗战的状况告诉他，请他一定要向美国争取到更大的实质性援助。不幸的是，胡适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根本不知道如何进行。归根结底，胡适在抗战初期之为中国驻美大使，既帮不上中国的“苦撑”，也不去设法影响国际局势的“变”。一个“待”字实在最能传神地说明胡适在美国的角色。

本书之所以花了许多篇幅去讨论胡适的大使工作，主要是他激起了一个反应。如果不是他的缘故，说不定这个反应不会产生。正是因为他，所以反应特别激烈。这就是以蒋介石和宋子文为代表的对美外交新政策。我们依然可以套用胡适的话而略做修改，称之为“苦撑求变”，最为恰当。蒋介石以及一切主战派都主张“苦撑”，这是全国的共识，不成问题。如果连自己都不肯苦撑，那还有什么资格和国格去要求他人高抬贵手解救中国？

主战派也心知肚明，以中国之国力无法迫使日本停止侵略，因此也希望“变”出一番新局面来，但是他们并不消极地等待变，而是积极去谋

求变。一旦有了这种主动意愿和进取心态，中国政府就对抗战策略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外交当成“求变”的重要手段，二是把美国当成“求变”的重要对象。换言之，中国政府开始有了更具体的想法，而且开始努力把世界大局“变”的方向和速度，引导到符合中国的愿望。这种新心态和新行为显然和胡适的个性、素养及对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的看法格格不入。他既放不下身段，也没有那份能耐执行这个新政策。因此宋子文的任命就应运而生，最终他个人的光彩完全掩盖了胡适的存在。

但是以中国这么一个弱国，自己的生存尚且朝不保夕，居然想要使出一些招数去“求”变，谈何容易？也就难怪中国的一些努力看在某些西方国家眼中是不知天高地厚，有时甚至是幼稚荒唐可笑。但是中国政府一旦认定美国是世界大局“变”的重要操盘手，就用尽各种方法去运用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从增加贷款数目、扩大购买武器范围，到请求美国政治贷款、武器援助，建立国际军事合作，鼓动美国向日本施行禁运、冻结资产，到最后不惜激怒联邦政府要员而直达天听，集中精力争取罗斯福支持。其中不少时候只能激起美国官员的极度反感，认为中国（宋子文）不识时务、不识大体，甚至死皮赖脸，违反外交礼仪，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从中国立场出发，这些动作和请求容或有可议之处，但是它们整体的行为几乎都是一个弱国死里求生的最后招数，在美国全面施展发挥。如果当年中国政府采纳了胡适主张，则以上这些问题当然都不会发生。至于中国抗战最后结局是否会因世局之“变”而好或是坏，则无人得知。但是事实上，中国政府一旦采取了“苦撑求变”途径，其间虽然颇引起部分美方人士的讪笑、嘲讽，甚至厉声谴责，但是同时也引起了另外一部分美方人士的同情和热心赞助，包括罗斯福在内。这两种美国人士的反应在英文著作中已经有充分描述，无须在此赘述。

但是如果我们跳出具体历史事件的细节，而把中美关系的发展和收获放在一个宏观历史格局中去考察，就不难看出1937～1941年的中国外交政策其实是一个成绩斐然的时代。而最重要的成果，是抗战最初四年为后四年打下了坚实的外交基础。1937年中国政府断然抗战时，最大的雄心是以战逼和，指望日本知难而退，并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情势。由于四年多民族所付出的惨痛“苦撑”的代价，以及1940～1941年千方百计地“求变”的努力，到了1941年11月底和12月初终于看到曙光。

在这段漫长过程中，重庆政府并不是在国际局势里随波浮沉，而是一直在惊涛骇浪的大变局中掌握住基本方向不变。这些惊涛骇浪包括日本运用地面和空中攻击以及南京大屠杀和在其他城市的残暴行径，企图摧毁中国的斗志，夹以官方和民间此起彼伏的和平攻势企图引诱中国政府主动放弃抵抗。中国国内和平分子言行的散布，汪精卫的叛变，以及国际上几乎所有列强先后对中国施加压力去向日本妥协。它们的性质都是“变”，而且都对重庆政府提供过极大的诱惑或造成压力。但是重庆政府始终维持一个不变的基准点，那就是抗战必定坚持到底，而且把美国锁定为中国求变过程中不变的最佳伙伴。即便是在美国反应冷漠时，重庆政府依然坚守立场，没有因为失望而改弦易辙，只是锲而不舍地加倍努力而已。

1941年11月中国政府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在美日谈判濒临决裂之时，中国抗战四年的记录和它的战略价值，开始在美国全球战略部署里展露出重要的地位。这就难怪在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的几小时之内，罗斯福就亲自通知中国政府；而在此后几周内，美国政府则不遗余力地争取中国成为太平洋战争中的新盟友，并开始积极建立合作关系。

在西方学术著作中历来流行一种说法，认为这一切都是美国宽宏大量的恩赐，[15]特别是罗斯福个人因为家庭背景或是个人浪漫主义色彩过于浓厚，经常和军方将领意见相左，屡屡被军方指责为违反实事求是原则，把中国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虚幻的地位，放纵中国领袖们不知天高地厚地自抬身价，造成此后同盟关系的诸多摩擦。学者在讨论罗斯福家庭和个人感情因素之外，也提到两个理智选择的因素。一是罗斯福在政治思想上是一位信服威尔逊哲学的人，主张种族平等和殖民地解放，因此他的国际公义感觉敏锐，把中国视为平等伙伴。二是他对于战后维护世界和平有一套完整的组织蓝图，期望把战后的长期和平建立在由几个地区性警察分工合作的体制上。在亚洲，罗斯福认为中国是当然的伙伴，尽管以实力而论，中国并不合格。

但是罗斯福和军方将领的差异，其实或许并不难了解，因为美国军方对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分析方式，和日本军人在七七事变之前的估算方式大致相近。作为职业军人，他们都是从器材设备训练等传统专业角度着眼，而忽略非物质和非量化的因素。军方领袖在面对罗斯福重视中国的态度时，又过于批评后者的主观意识和感情用事，未能体会罗斯福“政治判断”的超人之处。我们必须记得的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罗斯福已经和中国领袖们有过两年（1940～1941）的亲近互动经验。而蒋宋二人推行的新中美关系策略，更是让罗斯福对于中国抗战的决心和能耐得到的了解，超过了国务院和军方将领。这是影响罗斯福重视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美国军方将领，他们不但拥有和日本军人几乎一样的专业思维方式，更掺杂了军方内部颇为盛行的种族优越感，以致在1940～1941年对于军援中国一事，或是兴致索然，或是热讽冷嘲，乃至疾言厉色，多方阻挠，与罗斯福的政策屡屡背道而驰。

但是从1941年12月8日开始，当美国总统和政府环顾亚洲和西太平洋局势时，看到西方列强花费多年在殖民地辛苦建造起来的堡垒要塞，一个个如同银样镴枪头般相继倾倒，美国军方将领历来自信日本绝不敢挑衅美国的预言又相继破产，而唯有中国以其在过去四年抗战中所表现的英勇牺牲，使得美国不得不做出争取中国作为重要盟友的选择。因为如果没有中国作为亚洲最重要盟友，则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百万大军，既可以南进而加速西方列强在东南亚的崩溃，也可以东进取道阿拉斯加威胁美国大陆的安危。为了美国在危急之际能够抓住中国作为盟邦，罗斯福不但愿意格外示好，即使是略施欺骗小计亦在所不惜。[16]如此说来，罗斯福掌控国际大势的务实性，可能远远超过他手下的职业军人。尽管在此后四年的同盟关系中，罗斯福的政略和美国军方的战略之间的摩擦仍然经常发生，但是并没有根本影响1945年中国取得远远超出一个世纪以来最具雄心壮志的民族主义者所敢奢望的、全面而彻底的军事胜

利。

在近代国际体制下，国家这个观念最简单明确的定义是行政和领土的完整性，也就是主权观念。抗战到底是为了什么？彻底打败日本，并将之完全赶出中国大地？在此或许可以看看蒋介石是如何表述的。

前期抗战中国政府的目的是什么？蒋介石在1939年6月曾经私下里做过一次明确的阐明，那就是“撤退其侵略军至七七战前状态”。至于长远的解决方案则是，“在战后召集太平洋和平会议，而先由自认强者（日本）自动撤兵，表示其武士道尚武好义，礼让之精神。至于弱者（中国），绝无停战约降，任受宰割，重蹈塘沽停战协议之覆辙，而植东亚百年之祸根。解铃必须系铃之人。否则，兵连祸结，战争永无休止之时”。[17]

此时他又对中日两国长期关系表达了一番见解。他写道：“中国对日本惟求平等与共存，而日本则必欲消灭中国，使之降为奴隶，而以日本独存为快事。此其相差为何如今日也。如日本先主动退让，则日本不仅无损，而其地位与声誉必为之大增。若中国退让，乃是降服，然亦退无可退，惟有灭亡而已。与其不战而必亡，何如抗战到底，尚能死中求生也。”[18]

蒋介石在1940年夏天又谈到这个问题。他在5月11日日记中写道，必须以九国公约为基准，必须列强共同调解，特别是必须有英美两国保证恢复和平，而且“必须恢复七七战前之原状后，再谈和平条件”。换言之，在日本军队从占领区全面撤出至七七事变之前的界限之前，中国政府拒绝任何和平讨论。[19]而在日本做出以上的大撤退行动后，中国还坚持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必须参与以九国公约为依据的中日长期和平条约。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这可说一直是中国政府所坚持的停战先决条件。

他在7月底写道：“此次抗战目的惟在打破倭寇亡华之传统政策，及其侮华之自大心理。至于根本取消不平等条约，求得完全独立，则在战后之自强自立，而于十年以内倭美，倭俄，或德俄战争之时期，我国乃能获得真正独立自由之机，然而建国独立之基础，则奠定于此次之抗战耳。”[20]

在8月初又写道：“抗战目的首在打破其侵略政策与侮华心理，至于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须待战后能自强耳。”[21]

这两段话的前半部都是表达一种民族主义的气概，一定要不惜牺牲地打破日本军阀的狂妄心理，使其痛切认识中国之不可侮；后半部则是务实的估计，只有中华民族能够自立自强，才能彻底恢复国家主权。

从这个目标来看，正因为中国有抗战最初四年的苦撑，才能创造后四年惊天动地的巨变。正因为中国政府果然苦撑到了珍珠港事件，果然把抗日战争“变”成与欧战连成一个世界大战，才使得胜利的意义发生了

根本性的改变。和美国结成盟邦，才使得国家行政和领土的完整性能够重新界定。在开罗宣言（1943年12月）里，中国为之奋斗的胜利变成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到了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中国将一切东方和西方列强百年来加诸中国的屈辱，例如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海关征收权、租界、驻兵等一扫而空。

外交政策选择的对错，真是既可以兴邦，又可以丧邦，能不慎重戒惧乎？

[1]Hsi-sheng 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Chapter 1.

[2]《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10月20日），Soong Papers，Box 58，Folder 1。

[3]《蒋介石日记》，1939年5月3、25日。

[4]《蒋介石日记》，1939年10月9、10、28日。

[5]《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15日。

[6]《蒋介石日记》，1939年6月11～13日。

[7]《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15日。

[8]《徐永昌日记》，1940年8月16、17日。

[9]*Stilwell Diary*（*type-written version*），May 30，1943，Stilwell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

[10]《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30日。

[11]《蒋介石日记》，1939年10月1日。

[12]《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1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04005。

[13]《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1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04005。

[14]《蒋介石致胡适电》（1940年10月2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014502O。

[15]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16]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第1章。

[17]《蒋介石日记》，1939年6月16～19日。

[18]《蒋介石日记》，1939年6月8日。

[19]《蒋介石日记》，1940年5月11日。

[20]《蒋介石日记》，1940年7月25日，“杂录”。

[21]《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2日。

参考文献

一 中文文献

《蒋介石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蒋介石档案”，“国史馆”藏。

“外交部档案”，“国史馆”藏。

《翁文灏日记》，“国史馆”藏。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出版社，1989。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

《顾维钧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5。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第5a册，手稿油印本。

何凤山：《外交生涯四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远流出版公司，1989。

《胡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部分日记》，《近代史资料》1995年第2期。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公司，1984。

《蒋廷黻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孔祥熙关于1937—1939年财政实况的密报（上）》，《民国档案》1992年第4期。

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远景出版社，1982。

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3。

《王世杰日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徐永昌日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3。

周谷编著《胡适、叶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联经出版公司，2001。

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联经出版公司，1998。

陈兴唐：《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郭岱君编《重探抗战史（一）：从抗日大战略的形成到武汉会战（1931—1938）》，联经出版公司，2015。

李传玺：《做了过河卒子：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刘绍唐编《民国大事日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吕芳上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军事作战》，“国史馆”，2015。

唐德刚：《胡适杂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华文出版社，1990。

任骏、蒋耘：《胡适与蒋廷黻》，未刊稿。

藤井志津枝：《诱和：日本队华谍报工作》，文英堂出版社，1997。

王世杰等：《胡适与中国》，中国文艺社，1962。

王松：《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2。

王松等：《孔祥熙和宋霭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1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余伟雄：《王宠惠与近代中国》，文史哲出版社，1987。

张忠栋：《胡适五论》，允晨文化公司，1987。

张忠绂：《迷惘集》，文海出版社，1978。

郑炎、蒋慧：《陈光甫传稿》，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

中华民国外交研究会”编《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编者印行，1967。

朱文华：《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

耿云志：《胡适与抗战》，张宪文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第799页。

耿云志：《七七事变后胡适对日态度的改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

蒋永敬：《抗战期间中法在越南的关系》，“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1辑，编者印行，1985。

孔庆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英助日侵华和苏联援华抗日》，张宪文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

刘锴：《备受美国朝野敬重的外交家》，《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年5月。

任东来：《中美桐油贷款外交史末》，《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邵铭煌：《孔祥熙与抗战初期的谋和试探》，中国近代史学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联经出版公司，1996。

唐培吉、王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张宪文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

王世杰：《傅先生在政治上的两三事》，《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1976年1月。

吴景平：《抗战初期蒋介石与宋子文关系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

吴景平：《孔祥熙与宋子文》，《档案春秋》1994年第2期。

杨奎松：《抗战前夕陈立夫赴苏秘密使命失败及原因》，《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联经出版公司，1996。

二 英文文献

Claire Lee Chennault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Foreign Relation of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vol. 1（Washington，D. C.：Department of State，2008）.

H. H. Kung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Mr. K. P. Chen's Private Papers，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

Stanley K. Hornbeck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Armstrong，Alan. *Preemptive Strike*：*The Secret Plan That Would Have Prevented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Guiford，Delaware：Lyons Press，2006）.

Blum，J.. *From Morgenthau Diaries*，*Years of Crisis*，1928-1938（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59）.

Ch'i，Hsi-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

Chennault，Claire Lee. *Way of a Fighter*（New York：G.P.Putnam's Sons，1949）.

Chou，Chih-ping，ed.. *A Collec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Taipei：Yuanliu Publishing Co.，1995）.

Chou，Min-chih.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4）.

Dallek，Robert. *Franklin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

Divine，Robert A..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65) .

Ford，Daniel. *Flying Tigers*：*Claire Chennault and His American Volunteers*，1941-1942 (Washington D. C.：Harper Collins Smithsonian Books，2007) .

Garver，John. *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

Grieve，William G.. *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1941-1942 (Jefferson，N.C.，McFarland ＆ Company，2014) .

Hull，Corde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Macmillian Co.，1948) .

Morgenthau，Henry，Jr.. *Morgenthau Diary* (*China*) (New York：Da Capo Press，1974) .

Schaller，Michael. *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 .

Schultz，Duane. *The Maverick War*：*Chennault and the Flying Tiger*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7) .

Young，Arthur N..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

人名索引

白崇禧 34，99，183，184，196，213

鲍曼（Isaiah Bowman）358，363

贝淞荪 437

陈布雷 14，27，31，57，66，72，80，81，105，113，145，146，204，223，265，277，321，372，511，513

陈光甫 45，46，48，52，55，61，68～71，74，76～85，121，125，134，137～142，151～159，163，176～178，188，190～193，197～199，201～205，215～218，223，224，229，231，232，234，236，238，239，243，258，261，263，265，266，325，328，329，339，372，406，432，433，473，482，503，506

陈介 288，289，320

陈立夫 318，511

陈纳德（Claire L.Chennault）233，346～356，372，376，377，392，393，421，422，426～430，432，433，439，444，456，499，500

陈仪 22

程潜 15

程天放 121，319，320

丹尼尔·安斯坦（Daniel G. Arnstein）437

邓锡侯 183

董道宁 22

杜威（John Dewey）8

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171

傅斯年 46，47，80，145，196

高思（Clarence E. Gauss）314，340，341，365，376，470

高宗武 13，19，22，130，189

戈林（Hermann Goring）288

顾孟馀 333，336

顾维钧 6，44～47，58，59，62，67，68，73，74，88，89，94～96，99，104，121，123，125，129，133，137，139，143，167，185，194，203，204，227，254，255，285，298，320，322，340，455，475

桂永清 319

郭泰祺 67，68，94，104，111，118，121，195，231，264，279～281，285，313，320，340，343，371，374，418，463～465，469，470，472，473，480，484

哈里·怀特（Harry D.White）75，216，326，328

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340，344，352～354，386，390，394，403，437

杭立武 280

何应钦 34，40，169，173，174，200，227，292，344，418

贺耀祖 171，172，183，318

赫尔（Cordell Hull）31，71，72，75，77，78，88，117，118，135，137，140，203，266，277，325，340，341，452，459～461，463～467，469～472，474，475，477～481，485，486

亨贝克（Stanley K. Hornbeck）6，31，56，57，70，71，74，75，116，117，124，125，127，128，131，140，144，145，226，227，232～234，276，373，485

亨利·阿诺德（Henry H.Arnold）439

亨利·鲁斯（Henry Luce）458，478

胡世泽 320

胡适 7～16，18，19，24，26～28，31，44～48，51，52，54～

81，85～94，96～99，101～109，112～118，121～155，158，163，171，176～179，185，188，190～195，197，199～202，204，205，209，215～218，220，222～235，238，239，243，245，258～266，268～272，275～279，281，283，284，289～292，294，296，298，301，302，317，320～328，332，333，336，338，342，343，353，371～374，383，406，415，432，433，447，451～454，456，457，459～478，480～486，496，497，503，504，506，509～514

黄仁霖 435

加伦 37

江杓 385，392，393，407，434，435，443，444

蒋百里 19

蒋方震 93，319

蒋介石 4，6～8，14～48，51～59，61，63，66，67，69～77，79～81，85，88～91，93～118，123，127，130，142～145，147～154，157～159，165～168，170～190，194～196，199～201，203，204，209～215，217～226，230～232，234，236，244，245，248～252，254～280，282～306，309～325，327，330～346，348，349，351，353，355～377，383，392，396，398，399，403，405～407，409，412，414～428，431～441，443，446，451～484，486，489～491，493～497，499～503，506，508～513，516，517

蒋梦麟 228

蒋廷黻 9，10，12，13，19，47，59，93，106，114，204，320

金问泗 320

近卫文麿 454

居里（Lauchlin Currie）221，222，311，318，331～339，341，343，344，348，352，354，356～361，363，365～368，372～377，381，382，386，390，394，426，431～433，439，440，474，476，478，479，481，486，493，501，502

居正 15，106

卡尔（Archibald C.Kerr）93，101，275，289，444

孔祥熙 25，31，32，40，42，44～46，48，51，52，54，55，58，61，68～71，76，77，80～83，94，99，106～111，113～117，121，138，139，154～156，167，169，174～178，190，192，194，196，197，199～201，204，205，210～217，222～224，227，248，266，281，292，319～322，333，343，347，371，495，503，511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300，318，331，338，343，356，358～372，376，453，454，470，471，473～475，481，482，493

拉西曼（Ludwing Rajchman）216，223，233，388，389，407

来栖三郎 457，459

兰斯洛特·丹尼斯（Lancelot E. Dennys）313

李国钦 27，52，55，61，139，216

李石曾 225，343

李宗仁 183，184，213

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288，289，299

梁士纯 55

林蔚 418

刘斐 292

刘航琛 34

刘锴 61，122，124，227，455

刘文岛 320

刘湘 34，181

龙云 35，182，183，252，254，256，257，456

罗杰斯（Cyril Rogers）196，211

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6，27，41，42，46，51，56，67，68，71～79，83，86，88～91，94～96，98，102，112，113，115～117，125～127，134，135，137，140，143，144，147，148，172，178，185，189，193～195，200～203，220，227，238，245，258，260～265，267，268，270，273～275，277，

279，283，284，291，302，303，306，311，315，316，321～326，328～344，348，352，353，357～369，372～377，381，382，384，386，390，394，402，403，407，414～416，420，423，426，428，429，431，432，434，439，440，442，445～447，451，452，454～456，460，465～470，474～481，483，484，492，493，500，502，503，510，514～516

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230，352，372～374，376，409，420，431～436，438～441，456，501

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166，238，339，344，394，397，431，435，440

麦修（James M.McHugh）272，330～332，338，339，341，352，360，372，374，375，432

麦克阿瑟（Dauglas A. MacArthur）352，354

毛邦初 272，275，344，348，392

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46，68，70～72，74，75，77～80，82，84，85，126，128，134，140，191，198，199，202～205，216，228，232，235～238，260，262，263，266，273～275，312，317，325～330，339，357，394，406，467，478，479，482，500

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170，171，288

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25

诺克斯（William Franklin“Frank”Knox）272，330，331，339，394，477～479

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6，68，203，357～359，389

齐峻 282

钱昌照 222，281，283，336，343，425

钱端升 26，27，123，323

钱泰 320

钱新之 212，214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256，281，285，340，375，414，427，481

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341

邵力子 292，295

沈德燮 392，393，407

盛世才 183

施肇基 7，204，215，225，258，298，342，343，407

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166，238，347，348，371，377，396，397，424，443，444，500，501

史汀生（Henry L. Stimson）11，230，303，390，394，432，445，446，459，476，478

斯大林（Joseph Stalin）38，40，170～172，277，285，319，340

松冈洋右 288，453

宋霭龄 25，81，175

宋美龄 27，42，52，59，63，134，196，211，215，310，337～339，344，351，352，355，356，360，361，366～368，375～377，408，421，427，433，470，480，482，499，503

宋哲元 16

宋子安 221，222，459

宋子文 27，34，42，44，46，47，65，66，78，79，85，121，123，134，142，148，166，173，176，178，199，200，209～239，243，245，252～254，257～275，277～279，281，283，284，288，290，292～294，296～300，302，304，311，314～317，324～333，335，336，338～340，342～344，347～363，369，372，373，376，377，381～384，387～389，391～394，398，399，402，403，405～408，412，415，418，420，422～428，431～442，445，447，454，456～459，462，465～469，471～473，475～486，493，502～504，506，510，512～514

孙科 67，93，111，121，170，281，283，511

陶德曼（Oscar Trautman）108

陶希圣 19，110，114，179，189

汪精卫 7，8，13~15，19，31，48，52，73，75，90，106~108，110~115，130，164，177，179，183，189，209，232，263，264，287，288，305，319，494，495，514

王宠惠 19，27，48，51，52，93，94，99，106~108，115~117，139，195，201，204，205，214，281，290，320~322，371，374，495，503，511

王世杰 14~16，19，26~28，40，41，44，46，47，64，67，68，73，88，89，93，96，100，101，105~108，110，111，114~118，126，136，146，157，165，168，170，171，173~178，180，181，196，204，210，227，256，275，276，281~283，285，289，292，295，313，314，320~323，371，372，419，452，454，483，503，511，513

王叔铭 356，392

王正廷 6，7，28，43~48，54，56~58，65，67，68，79，129，215，239，320，372

王缵绪 181，182

翁文灏 12，44，45，71，75，80，89，90，105，107，113，115~117，127，143，145，151，156，170，175，176，179，189，190，196，204，210，218，219，224，227，228，248，262，268，272，282，290，291，294，296，319，333，454，496，511，513

吴稚晖 112，281

希特勒（希脱勒，Adolf Hitler）3，25，36，88，116，187，282，285，319

席德懋 151

萧仙阁 52，53

熊式辉 137，227，265，416

徐堪 40，173，174，212，333

徐谟 58，289，292，299

徐永昌 40，96，101，164，168~170，174，176，177，180，189，255，256，276，279，293~297，299，312~314，483，501

颜惠庆 7，204，225，298，321~323

杨格（Arthur Young）437

杨杰 104，121，168，171，318～320

野村吉三郎 453

叶琢堂 214

于右任 24

俞大维 220，391～393，398，401，409，412

约瑟夫·格鲁（Joseph C.Crew）90，189

詹森（Nelson T.Johnson）27，115，124，239，266，269，271，289，299，314，322，372，419

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96，256

张季鸾 47，282，286

张嘉璈 47

张君劢 47

张群 47，99，227，281，292，511

张忠绂 26，122，123，131，176，185，321

周鲠生 46，47，141，323

周至柔 252，312，352，356，392，428

周作民 22

朱家骅 47，99，212，282，511

朱世民 392

邹炳文 264

左舜生 47

后记

许多关注这段时期（1937～1941）中美外交关系的读者或许都会好奇，蒋、宋、胡三人之间这段外交共事，会如何影响他们此后的政治关系。这里并不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做充分阐述，只是提出一些此后发展的线索供读者思考。

蒋介石对胡适处理外交事务的不放心，几乎从他本人关注中美关系之始就表现出来。1939年1月他就感到胡适在美国公开场合发表的演说颇不得体，要“对胡大使讲演”进行“辨证”。[1]在后来的日记中更是多次严厉地指责胡适。虽然蒋介石也指责胡适好名，但是大部分的不满，出于他认为胡适没有把外交工作做好，而宋子文则几乎集中评判胡适的工作风格和成效，鲜少涉及为人问题。两人都能保持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即便是后来蒋介石三番两次被部属要求撤换胡适，还是一拖再拖，不忍伤害胡适的感情。简言之，他们之间有公怨而没有私怨。正因为胡适不是一位政治色彩浓厚的人物，因此他们三人在胡适离开大使职位之后（1942～1948），甚少有政治性交集。

岂知世事难料，到了1949年这个情况有了改变，而这些改变对本书就他们三个人的关系的讨论，提供了一些注脚。

1949年夏季，国民政府政局急转直下。蒋介石主动致电胡适说明阎锡山正在组阁，希望胡适出面担任外交部长。蒋介石虽然明知胡适不会应允，但是请求胡适至少考虑暂时不要公开表示坚辞。[2]宋子文也对此议表示支持，致电蒋介石称赞胡适，说他无论是外交部长或直接组阁都是适当人选。[3]不久蒋介石再度要求胡适接受外交部长一职并兼任行政院副院长，理由是胡适最能得到美国朝野信任。[4]蒋介石又另电阎锡山，劝其坚邀胡适入阁，不容辞让。[5]在此期间，宋子文也极力敦请胡适出来任职。

胡适在给蒋介石的坚辞信函中写道：“个人生死病苦，在此危难时期，本不足计数。但此种事例正可以证明我是无能的人，绝不能当大任也。子文兄从欧洲来纽约，他与廷黻兄谈过几次，他们忽发幻想，以为我可以出来担负救国大任……故我很害怕，诚恐先生过信子文与黻廷之臆说，真以为一个无能的学者依赖一点虚名，一点诚心，即可以担任国家大事，救亡而图存。吾乡（徽州）有句俗话说，‘做戏无法，出个菩萨。’子文、廷黻诸友今日之臆说，正是妄想‘出个菩萨’，绝无可以考虑之价值。”[6]

隔不了几天，胡适再度向蒋介石剖白：“做官治事，则绝无能力……无能书生不应担任国事职权。”[7]胡适在骨子里是一个书生，或许正如他所说的，“我在1943到1948，五年之中，用全力研究《水经注》疑案，真是在象牙塔里过最快活的学术生活”。[8]

这几封函电来往，委实令人感慨不已。蒋介石和宋子文在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际，能够在谔谔众士中属意胡适实在难得。而胡适的自我评价，也是出自肺腑之言，充分表现出他的自知之明。书生“论政”自有其慧眼独具之处，但是书生“从政”，胡适却提供了一个令人忐忑不安的例子。

[1]《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29日。

[2]《蒋介石致胡适电》（1949年6月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400028133。

[3]《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9年6月1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6152。

[4]《蒋介石致胡适电》（1949年6月2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400031059。

[5]《蒋介石致阎锡山电》（1949年6月2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400031062。

[6]《胡适致蒋介石电》（1949年6月2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400029006。

[7]《胡适致蒋介石电》（1949年7月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400029006。

[8]《胡适致蒋介石电》（1951年5月3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622001。


装帧设计
Telephone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启微

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件，
期间中美关系到底经历了何种变化？
特别是中国政府对美外交的决策过程是什么？
由何人执行？
中国外交的目的是什么？
谈判的技巧如何？
美方的反应是什么？
中国政府在此期间总体的得失又当如何评价？
何以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时美国政府认为事不关己，
而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时，
却十万火急地促请中国成为并肩战斗的盟友？


出版社官方微信


启微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定价：118.00 元